GUDAI SANWEN BAIKE DACIDIAN

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







GUDAI SANWEN BAIKE DACIDIAN

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

（京）新登字151号

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

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

王　洪　主编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成方街3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纺织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48　字数：6000千字
印数：0001～6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5077-0380-0/Z·63　　定价：23.40元

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

总　主　编：王　洪

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

名誉顾问：郭预衡　周定一　朱靖华
主　　编：王　洪
副 主 编：周季平　乔　力　李维国

分部主编、副主编：
尺牍用语：厉　兵（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描写用语：白维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副研究员）
古文虚词：王海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副研究员）
古文典故：陆尊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副研究员）
国内研究：管士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陈洪宜（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副教授）
海外研究：周发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新学科室副研究员）
　　　　　王丽娜（北京图书馆副研究员）
古文典籍：张学忠（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古文美学：樊德三（江苏盐城师专副教授）
　　　　　王文龙（江苏盐城师专副教授）
古文写作：林　岫（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
古文知识：杨恩成（《唐代文学年鉴》副主编、副研究员）
　　　　　张亚萍（副主编）

古文作家：宫晓卫（齐鲁书社古编室编辑）
名篇精要：刘传新（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古文名句：孙安邦（山西人民出版社古编室主任、副编审）
孙国平（中国新闻学院讲师）

领衔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积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朱靖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孙昌武（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杜维沫（人民出版社编审）
李明滨（北京大学教授）
吴小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蒲清（湖南教育学院教授）
龚克昌（山东大学教授）
曾枣庄（四川大学教授）

撰　稿　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绍卿　于春香　于辅仁　马　达　马现诚
马积高　马清江　卞　岐　王　洪　王　勇
王　端　王一娟　王广平　王文龙　王中玉
王少华　王立柱　王兴康　王丽娜　王枝忠
王金地　王海棻　王晓平　王彬彬　王培元
王景琳　王锡凡　王增斌　夫　容　牛贵琥
宁志荣　石　玲　艾思同　白　迪　白维国
刘传新　刘宜生　齐石宜　祁志祥　许建中
安　笈　吕伯涛　吕晓庄　朱野坪　朱靖华

乔　力	孙　歌	孙乃修	孙安邦	孙国平
孙连琦	孙昌武	杜维沫	李　丽	李永祥
李玉洋	李正民	李亚娜	李酉宏	李建民
李明滨	李雪枫	杨　文	杨恩成	张　璐
张文颖	张亚萍	张学忠	张建铭	张爱东
张培坤	张增兰	吴小平	吴小林	吴伟斌
吴言生	吴嘉才	何连明	余久春	余逊涛
邹宗良	陆尊梧	陈鸿彝	陈蒲清	郑训佐
郑永晓	郑宝贵	郑杰文	苗文利	范　陌
林　岫	周　晶	周小薇	周五纯	周少雄
周发祥	周建东	周季平	朋　星	孟　光
宫晓卫	姜剑云	祝振玉	赵其辉	赵佩瑜
赵洁敏	赵敬利	赵燕滨	胡　健	钟家新
侯光复	姚　远	高克勤	袁　闻	耿百鸣
钱　宁	倪志云	殷大云	徐　明	徐国宝
徐家昌	陶文鹏	章亚昕	康建华	康金铭
龚克昌	笛　音	曾　胡	曾枣庄	谢琛香
落　叶	落馥香	韩宝光	傅　眉	傅绍良
廖　群	蔡锡明	管士光	戴　娟	樊德三

条目笔画索引：张九菊　周　波

终　　审：周定一　吴小林

责任编辑：张光勤　孟　光　曾　胡　徐建军

封面设计：王　筌

版式设计：姚　建

责任排版：宋学军　李　萍

凡　　例

1. 本书是《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中的一部。

2. 本书以中国古代散文为研究对象，上起先秦，下迄“五四”前夕，“古代散文”，包括诸子、史传、骈文、辞赋等多种文体。分为14个分部，按语言类、研究类、文学本体类依次顺序排列。

3. 由于各分部、各类别之间性质不同，本书体例在分部内统一。虚词、典故按音序排列，其余均按内容分类排列（包括以时间为序）。

4. 各分部之间如有交叉出现的词条，一般均出现，例如“苏轼”既在“古文作家”分部中出现，又在“古文美学”分部中出现，但释文内容各有侧重。

5. 本书条目的释文力求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

6. 条目释文开始一般不重复条目标题。

7. 需要署撰稿人的词条，凡有连写者，只在最后一条署名。

8. 本书除必须用的繁体字外，一律使用规范简化字。

9. 本书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的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

总　　序

王　洪

中国文学，是一条浩瀚无涯的长河、一座恢弘瑰奇的艺术宝殿、一个令人神往错愕的宇宙。

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世界吸引着无数骚人墨客沿波讨源、显幽烛微，却又无人能穷尽其源——一部部提要钩玄的辞书问世，却还有着更多、更好的作品在酝酿、萌生；正如中国文学自身所具有的魅力一样，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探讨也具有永恒的价值。

尽管每一部辞书的诞生，都向着更高的境界迈进了一步，但仍不可避免地带着历史的局限。就今天我们所在的历史点上而言，对于这种局限可否这样认识：

传统的文学工具书，大多囿于作家、作品及一般文学知识的介绍，然而，文学是在人类语言、历史、文化的具体氛围中产生的，是人类语言、历史、文化等与文学内在规律结合的晶体，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诸多学科。如果研究文学的工具书只含有文学自身的内容，就势必不能立体地、全面地反映出文学的原貌，自然也就不能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

我想，今天已经到了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全面整理总结的时代，到了各学科学者之间可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时代。这样，搞一套多角度、跨学科、全方位地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型工具书，反映出古今中外研究中国文学各方面的成果，就成为我们编纂这套《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的宗旨与理想。

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迄今为止，已有：《古诗百科大辞典》（先秦至隋诗）、《唐诗百科大辞典》（以上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唐宋词百科大辞典》、《元曲百科大辞典》、《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以上学苑出版社出版）、《宋诗百科大辞典》、《元明清诗百科大辞典》（以上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八部辞典在编纂或排版之中。中国文学的其他部分，也拟在近期补齐。

此套系列辞典囊括中国文学中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诸体裁，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民俗、艺术、文学等诸多学科。试图“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角度出发”，将中国文学“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傅璇琮《唐诗百科大辞典·序》）加以考察、研究。

系列中的每部辞典之间，具有大致相似的框架而又根据各自的特点加以调整。譬如，同为诗歌体裁，唐诗卷中的“文化”分部，在唐宋词卷中分为“音乐”、“民俗”、“宗教”三个分部；古代散文卷将“语词”分为“尺牍用语”、“描写用语”、“古文虚词”三个分部，此外增设“古文写作”分部，意在对今人之写作有所裨益；古代小说卷则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设“市井俗语、饮食服饰、民情风俗、占卜星相、酒令游戏”等栏目，又增设“人物形象”、“情节欣赏”等分部，这是由小说的特质所决定的。其余元曲诸卷亦然。

由于此套辞书具有跨学科、跨时代、跨体裁的特点，我们分别邀请了海内外在该学科、该体裁研究上享有盛誉的学者为顾问和领衔撰稿人，各分部均设置分部主编（主要由学有专长的中年学者担任）。迄今为止，已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文学所、历史所、宗教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河北、宁夏、江西、天津等省市的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大、北京师院、中国新闻学院、山东大学、山东师大、陕西师大、上海师大、南京师大、浙江师大、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图书馆等几十个科研、教学、出版部门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编撰工作。海外如日本、美国、加拿大、苏联以及台港的一些学者也为这套辞书撰写了一些宝贵的词条、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在此，谨向参与这项工程的海内外诸位先生和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唐圭璋、王利器、吴晓玲、傅璇琮、郭预衡等先

生分别为各部辞典撰写了精采的序言，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正如人们站在宏伟的殿堂之前常感到自身的渺小一样，当我们以近乎宗教的虔诚将这套凝结着数百名学者心血的辞书奉献给学界与读者之时，我们顿感自己学识的浅薄。尤其是我本人，忝为总编，深感惶愧。如果说，这套辞书还有可取之处的话，其功在老前辈的鼓励、支持和指导，功在几十位分部主编的无私奉献，功在几百位学者的积极配合与共同努力。全套书约十部而逾一千五百万字，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诸位方家不吝赐教。全套书由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在装帧形式上，实难统一；而每部辞书内部，由于各分部特点有异，有时也只能保持分部内的统一。这些都是遗憾之处。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时惟岁暮。爆竹声里，献上我最美好的祝愿：愿这套系列辞书能对人类的文化事业有所裨益，但愿她能得到您的喜爱。

初稿于一九八九年岁暮
修定于一九九〇年早春

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

序

郭预衡

当《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出书之际，受命作序，谨就汉语文章的传统特点，谈谈我的一些浅见。

首先要谈的是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范围。

在中国古代，什么样的文章算是散文？人们的看法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只有抒情写景的文章才是散文。我则以为不然。把“散文”限定在抒情写景的范围之内，这是从某种“文学概论”的定义出发，不是从中国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而得出的看法。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则先秦诸子之文，《国语》、《国策》之文，贾谊、晁错、司马迁、班固之文，下至韩、柳、欧、苏的许多文章，都不能算是散文。如此一来，则中国文学史上能够算得上散文家的，恐怕没有几个。即使是古文大家如韩愈者，其抒情写景之作，也没有几篇，也就不能算是散文作家。

从汉语文章的实际考察，中国古代的散文，曾是包括了各体文章的。不但包括诸子、史传，而且包括碑文、墓志。在一篇文章里面，抒情、写景、叙事和议论，又往往兼而有之。单纯写景抒情的文章是很少的。

中国古代的散文，一般说来，即是前人之所谓“古文”，但也包括与古文相对的“骈文”。中国的骈文，乃是汉语文章一种特殊的结构形式。骈辞俪句，却不同于诗词。曰“骈”曰“古”，都是散文。骈四俪六，只是汉语文章向偶俪句式发展的一个极端。但物极必反，古文运动之废“骈”复“古”，就是文章句式又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中国古代的散文，不但包括骈体，而且包括赋体。古来的辞赋，本来介乎诗文之间，虽然有人说赋是“古诗之流”，但有些辞赋不近于诗而近于文。有些古文选本，不仅包括骈文，而且包括辞赋。反之，一些诗歌选本，却没有包括辞赋的。事实上，古人作赋与作文，命意谋篇，无大区别。“答难”、“解嘲”，都是亦文亦赋。有的标题为赋，而实属杂文、论文。赵壹的《刺世嫉邪》、陆机的《文赋》，都属此类。唐宋以后的“以文为赋”，更不待言。反之，有的标题为文，却是赋体。司马相如的《封禅文》、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构词造句，与赋无异。

也许有人认为，辞赋用韵，而散文无韵。其实，先秦以来，有些文章，往往韵散相兼。诸子之文，和儒家经典，都不免用韵。《老子》五千言，韵语多不胜数，但仍是散文，而非诗赋。顾亭林说：“《诗》有无韵之句”，而“五经中多有用韵”者。这也是说，古有无韵之诗，亦有有韵之文。由此看来，有韵之文，也不能一概排斥在散文之外。

总之，中国古代的散文，和今天之所谓散文的概念，有所不同，古代散文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其次要谈的，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特征。

古代散文的范围确定之后，便可以谈到传统特征的问题。这也要从先秦说起。

中国古代散文的飞跃发展，是在春秋战国。这时王纲解纽，礼坏乐崩，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于是各类文章，尤其是论说之文，大为发展。

这时文章的思想特征是“放言无惮”，“无所拘忌”；艺术特征是“深于取象”，“深于比兴”。这时的儒、墨、名、法各家各派的作者，都有纵意而谈、不拘格套的文章。其中庄周之言，尤为汪洋恣肆，仪态万方，其文章成就，冠于晚周诸子。还有，这时的诸子著书立说，尽管都“以立意为宗，

不以能文为本"，但因其"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故发而为文，亦"时有愤辞"，颇富真情实感。这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传统特征。

秦并六国，天下一统，焚诗书，坑术士，实行文化专制，百家之文曾经一度禁锢；但到楚汉之际，诸子之学又曾一度复兴。故汉初之文，仍有战国余风。不仅贾谊之文，"疏直激切"，司马迁之文，更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直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得到实行之后，汉代之文才逐渐失去先秦之文的传统特色。

但到汉末，又值王纲解纽。曹操当权，解除了儒学的束缚，文人思想通脱，文章也就写得随便。这时便产生了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再到魏晋之际，又产生了嵇康、阮籍那样的"师心以遣论"的作品，在这以后，又产生了陶潜的貌似和平而实愤激的文章，这是乱世之文的一种的特色。

晋宋之后，改朝换代更为频繁，文人思想变化很大。"置君为奕"，人"无特操"。在这时期，作者之中，既有"文雅的庸主"，也有"柔媚的词臣"，还有"才秀人微"的人物。这时的文章也多种多样。诗歌方面，固有所谓"山水方滋"，散文方面，也产生了山水小品。而"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风尚，在散文中也有体现。但这时文章的特点，不仅表现为形式的骈四俪六，而亦在于行文的不甚拘谨。所谓"文章且须放荡"，也即是行文勿甚拘忌的意思。因此，这时确也产生了一些写得自然随便的文章。

唐宋两代，由于科举取士，涌现了大批的布衣文人。又由于政治比较开明，文人多半直言敢谏。在这几百年间，议论文章有大发展。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是这些文人干预朝政在文学上的反映。唐代的韩、柳，宋代的欧、苏，以及他们前后左右的许多作者，都是从事朝政改革、或渴望朝政改革的。所谓"文以明道"，大多是用文章发表政治主张

的。唐末的杂文小品，宋末的纪实论事之文，也都是和当时的朝政得失息息相关，都是很有时代特点的。

金元明清几代，政治不及唐宋开明，文化专制却比前朝厉害。尤其是明清两代，曾有几个很有权术的帝王，八股取士和文字狱，对于文章颇有影响。鲁迅说："宋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这时的文化政策和文章的状况。这几代的文章，发展变化是不大的。当然，明代后期，以公安派为首的文人写了一些小品文字，还有个别文社的作者也写了颇有生气的文章，都是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清代乾、嘉前后，桐城派的文章笼罩一世，也不是毫无成就。不过，他们既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相标榜，也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创造了。而且，在这时的历史条件下，韩、欧之文，除了字句、气息之外，其他如刚正之风、雄直之气，也是不可能学到的。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年月里，一介文人，大概也只能如此而已。

到了晚清时期，文章才有新的变革。从龚自珍到梁启超，文章变化不小。再到"五四"，社会发生了更大的变动，文章也发生了更大的变革。白话文运动兴起，古代散文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但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是存在的。作为珍贵的文学遗产，古代散文是取之不尽的。现代的散文作者，不能不受古代散文的影响，广大的读者也不能不从这份文学遗产中有所借鉴。现在这部《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出书，对于读者将有重要的帮助。这是不须我来多讲的。

一九九〇年夏日，序于北京。

总　　目

目　录

（一）概　目

（页码为详目的页码）

（二）详　　目

尺　牍　用　语

尺牍名称

称谓用语

寒喧用语

具署用语

描 写 用 语

山

水

天

地

人

草木

建筑

古 文 虚 词

A

B

K

L

M

N

P

Q

R

S

T

W

X

Y

Z

古 文 典 故

国 内 研 究

研究家

研究著作

总体研究

专题研究

海 外 研 究

总体研究

概述

作家作品研究

古代文论

研究方法

研究专家

日 本

苏 联

法 国

英 国

美 国

德 国

瑞 典

台 港

古 文 典 籍

总 集

通 代

断 代

专　集

寓言著作

古 文 美 学

美 学 家

美学论著

美学术语

古 文 写 作

写作总论

笔法技巧

修辞手法

写作著作

古 文 知 识

文体总类

文体分类

辞 赋

论 说

史传

序 记

诏令檄移

章表书启

流派并称

古 文 作 家

周秦汉

三国两晋

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　代

辽　金

元　代

明　代

清　代

轶事掌故

名 篇 精 要

先 秦

三国两晋

北 朝

隋唐五代

金　　元

明　　清

古 文 名 句

壮 志

人 生

人 才

学 习

友 谊

修 养

哲 理

治 国

世　事

附 录

尺牍用语

尺牍名称

简牍 书信。古时无纸，书于木片曰牍，书于竹版为简。简牍的内容包括书籍、公私往来的信函、文书、案卷、契约、文稿、历谱、遣策等等。用来编指信函，是后来的事。《柳宗元集·与许京兆孟容书》："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

青简 书信。削青竹所作简书。《文选·刘孝标重答刘秣陵沼书》："青简尚新，而宿草将列，泫然不知涕之无从也。"

竿牍 书信。竿，竹的主干，引申为竹简。《颜氏家藏尺牍·董讷书》："迩来长安寓邸，景况萧屑，竿牍久疏。"

尺牍 书信。汉代诏书写于一尺一寸长的书版上，后省称尺牍，用为书信的通称。《柳宗元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虽在京都，日数十人到门者，谁出秀才右耶？前已毕秀才可为成人，仆之心固虚矣，又何鲲鹏互乡于尺牍哉！"

尺书 书信。同"尺牍"。《尺牍新钞·徐世溥与友人书》："今天下文章声气，可谓胜矣。虽然，日午月望，有道不居，将来必有以文章得罪、数百里不敢通尺书者。"

咫尺之书 书信。八寸曰咫。参见"尺牍"。《文选·孔文举论盛孝章书》："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尺一之书 书信。参见"尺牍"。《艺文类聚》卷卅《徐陵答尹义尚书》："所以降尺一之书，驰輶轩之使，心期与国，必遂还徐。"

折简 书信。古人用于书写的竹简长二尺四寸，短的折半。折简，折半之简。又作"折柬""折札"。《尺牍新钞·周圻与高康生书》："盖闻属此时已成康庄，无复豺虎纵横，若如去岁今期，则不敢折简相邀矣。"

手毕 书信。毕，通"简"。《艺风堂友朋书札·傅增湘书》："奉诵手毕，敬领一一。二僧诗荷代为装订补钞，至荷至荷。"

手柬 书信。柬，通“简”。《苏东坡全集·与范梦得书》：“某启：辱手柬，且审起居佳胜为慰。”

手札 手书，亲笔信。《健馀先生尺牍·答沈子大驿道书》：“岁前接到手札，足见听德之聪，受益之谦。”

手尺 书信。参见“尺牍”。《尺牍新钞·叶秉敬寄郑闾卿峥阳书》：“日与故旧乘小车携觞游钓，幸分半晷之暇。损手尺以度我。”

简书 书信。《艺文类聚》卷卅《张奂与延笃书》：“唯别三年，无一日之忘。京师禁急，不敢相闻，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素书 书信。古人书信写在白绢上，因称“素书”。《尺牍新钞·陆陛为外母与外父书》：“虽窗外合欢，未能蠲念；即庭中萱草，谁肯忘忧。爰作素书，用凭青鸟。是知紫台远去，犹还青冢之魂；黄鹄思归，尚有乌孙之咏。岂女子有情，独丈夫无志哉！”

尺素 书信。《健馀先生尺牍·答杨卫京书》：“溽暑毒热中忽接尺素，如得一剂清凉散，顿觉沁我心脾也。”

牒 书信。《曾巩集·回傅权书》：“能沿牒至此一相见否？荒隅之中，孤拙寡俦，钦企钦企。春暄，馀保爱保爱。不宣。”

楮颖 纸和笔，也代称文字书画。楮木皮可制纸，因以代称纸；颖，带芒的谷穗，因以喻称毛笔头。《尺牍新钞·陈宏绪与周栎园书》：“某又安敢以潦倒附入冒渎典记，自伤大君子之门，遂不复有鄙人之姓名矣。乃者手谕自天而下，亹亹千百言，高情雅意，淋漓楮颖。老社台垂念于蓬蒿贱子者，何其敦以切、崇以至也。”

手启 书信。《苏东坡全集·答李琮书》：“惟冀以时自重，谨奉手启。起居热甚，幸恕不谨。”

手笔 手书，手迹。《后汉书》赵壹报皇甫规书：“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损，而远辱手笔，追路相寻。诚足愧也。”

手书 亲笔书信。《昌黎先生集·与孟尚书书》：“愈白：行官自南回，过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书数番，忻悚兼至。未审入秋来眠食何以。伏惟万福。”

手讯 书信。《苏东坡全集·与鲁直书》：“久不上问，愧负深矣。忽枉手讯，劳来勤甚。夙昔之好，不替有加。”

手谕 敬辞，亲笔书信。《尺牍新钞·徐芳答萧明彝书》：“两接手谕，具悉老社翁为寿昌殷切之至意。弟于此亦几大声疾呼之。顾呼愈急，而应愈缓。即固不可如何，而弟于此犹有歉者，以其所以呼之道未尽也。”

手命 敬辞，亲笔书信。《吴质答魏太子笺》：“奉读手命，追亡虑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

手翰 敬辞，亲笔书信。《昌黎先生集·与鄂州柳中丞书》：“是以前状，辄述鄙诚，眷惠手翰还答，益增欣悚。”

手教 敬辞，对方亲笔书信。《苏东坡全集·答毕仲举书》：“奉别忽十余年，愚瞽顿仆，不复自比于朋友。不谓故人尚尔记录，远枉手教，存问甚厚，且审比来起居佳胜，感慰不可言。”

手诲 敬辞，对方亲笔书信。《欧阳修全集·与韩忠献王书》："某启。忽承手诲，以屡辞新命未得请。"

缄书 书信。《尺牍新钞·杨于庭与李鹏岳少参书》："曩从玉绳具纫门下簪履之念，兹又缄书分俸，而俨然使临之，至奖藉不肖。"

书问 书信。《苏东坡全集·答李端叔书》："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问书问，怠慢之罪，犹可阔略。"

通问 互通音讯，互致问候。《尺牍新钞·俞瑰纶与缪当时书》："浙江涛，春明柳，与年丈醒里平分、梦中交换，然而通问之书窅然。盖自有心期，而竹素桃文，非所言赠也。"

音问 书信。《尺牍新钞·王铎答孙无高书》："抱疾穷山，虽想念，无便通一音问。顷闻世缘已偶，甚慰。得书又知在世缘中，不忘信力，尤惬远怀耳。"

音耗 书信、音讯。《周书·晋荡公护传》："今大齐圣德远被，特降鸿慈，既许归吾于汝，又听先致音耗，积稔长悲，豁然获展。"

音息 书信、音讯。《梁书·何胤传》萧衍与何胤书："今遣候承音息，矫首还翰，慰其引领。"

音旨 言谈意旨，也指书信。《尺牍新钞·王士祯将出都与苕文书》："眷然惜别，愁焉增忧。惟冀音旨虽遥，而神明不隔；山川虽阻，而鳞羽时通。则千里不邻，而地无殊揽袂。"

音邮 书信。《徐孝穆集·又为贞阳侯答王太尉书》："临江总辔，企望音邮。"

音翰 书信、诗文。《宋书·徐湛之传》："又昔蒙眷顾，不容自绝，音翰信命，时相往来。"

音书 书信。《健馀先生尺牍·与王云卿书》："或因事务之纷缠，或因精力之就衰，或因性情之疏懒，以致总角知交，全无音书。兴言及此，不觉怆然。"

音尘 音讯、踪迹。《尺牍新钞·卓发之与丁叔潜水部书》："音尘销灭，又更两载。"

音徽 敬词，指方的容范遗教。系琴弦之绳曰"徽"，后又谓琴面音位标志为"徽"，亦称"音徽"。借指人的容范遗教。《颜氏家藏尺牍·张锡怿书》："二十余年，道义骨肉之情，遥望音徽，如在天上。"

鱼雁 鱼与雁，指代书信。鱼，参见"双鲤"。雁，苏武牧羊北海，汉帝托言射猎得雁，雁足系苏武所写之书，使苏武得以归汉。见《汉书·苏武传》。《艺风堂友朋书札·吴重熹书》："彼此一笺，鱼雁互左。及到宁晋谒，则台驾犹在江阴，至未能面答衷曲，怅惘奚似。"

鳞鸿 书信。同"鱼雁"。《颜氏家藏尺牍·冯溥书》："喜得藉为鳞鸿以通芳讯，故遽然而治一函。"

鳞翼 书信。同"鱼雁"。《尺牍新钞·张鹿徵与程端伯先生书》："而弟匿影空山，云泥既殊，鳞翼久绝，其为瞻恋，罄竹莫申，尔来落魄无似。"

鳞羽 书信。也以喻形迹。《尺牍

新钞·臧懋循与吴左兆书》："不佞人郢后，仅再得允兆书，岂真以鳞羽之艰，仰为华歆终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计也。"

苍雁赪鲤 书信。参见"鱼雁"。《艺文类聚》卷卅《周弘让答王裒书》："愿爱玉体，珍金相，保期颐，享考黄发，犹冀苍雁赪鲤，时传尺素，清风朗月，但寄相思。"

双鲤 书信。《文选·古乐府》："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因以"双鲤"指代书信。明人杨慎谓汉世书札相遗，或以绢素叠成双鱼之形，烹鱼得书，亦譬况之言。《尺牍新钞·陆陛为外母与外父书》："白马山前，征轺远引，归鸿亭上，双鲤难通。异秦嘉之给使，目玩帝城，岂许迈之求仙，心留金阙。"

双鱼 书信。参见"双鲤"。《尺牍新钞·尤侗谢人馈药书》："仆风月膏肓，烟花痼疾。同马卿之消渴，比卢子之幽忧。忽启双鱼，如逢扁鹊，赠之芍药，投我木瓜。"

鱼书 书信。参见"双鲤"。《尺牍新钞·叶甲与方八公书》："正疑此数日何鱼书寥寥也，云横木户，月压柴床，昔日佳朋，渐为风雨，昨接尊笺，使人喜快不可言。世情之深浅，交道之厚薄，如立水中，高卑自见。今日不与文士墨客游，彼亦不我游，无益适自取辱耳。"

鱼函 书信。同"鱼书"。《颜氏家藏尺牍·谢兆昌书》："弟碌碌寡缘，素餐自愧，不干擅附鱼函，有溷清思，惟抱悚阔之衢而已。"

朵云 敬词，对方的书信。唐人韦陟五采笺写信，由别人代笔，自己只签名。自称所签的"陟"有如五朵云。"朵云"本此。《尺牍新钞·某书》："某某老友知己：别来思念，两地同之。刻奉朵云，捧诵之余，慰我饥渴。"

五云 敬词，对方的书信。参见"朵云"。《尺牍新钞·陈宏绪再与栎园书》："庶几少有进益，不能不翘首于五云耳。"

尊教 敬词，对方的书信。《尺牍新钞·王思任简徐元伩》："尊教挚诚感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令，罪主家无赦，则有必不可谢、必不可绝之客，将奈之何。又云，不得已，姑行之，客去即翻案。"

尊札 敬词，对方的书信。《颜氏家藏尺牍·刘良书》："尊札乞草付来手，断不敢劳远顾，居于往返俗套，切订上祷，依依不既。刘良顿首，不另具单。"

尊裁 敬词，对方的书信。《颜氏家藏尺牍·惠周惕书》："刻工令其诣府自言，可用与否，亦唯尊裁示之。"

尊谕 敬词，对方的书信、指示。《颜氏家藏尺牍·鲁超书》："顷接尊谕，捧读之下，仰见高云，周详笃挚，感佩何极。当备勒心版也。"

台诲 敬词，对方的书信。台，指"三台"，星名。古代用来比"三公"。书信中通用作对人尊称之词。《欧阳修全集·与韩忠献王书》："某顿首：伏承台诲，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岂胜愧然。"

台函 敬词，对方的书信。《颜氏

家藏尺牍·施天裔书》:“接发初六、八日两次台函，具见真切婉转之至，感激感激。”

台命 敬词，对方的书信。《尺牍新钞·陈宏绪与周栎园书》:“得读诗话楼佳刻,神魂已缭绕于樵川莒溪,况台命肫笃如是，敢复如曩昔惮数百里之远，而不一泥首于棨戟，以抒其仰止耶。”

台翰 敬词，对方的书信。《颜氏家藏尺牍·郝惟讷书》:“相去千有余里，岁华屡更，虽彼此神依，非山川所能间隔，而握晤维艰，无日不拳拳于怀也。接台翰，恍如面承，稍慰积愫。”

台谕 敬词，对方的书信。《尺牍新钞·陈宏绪再上司理李公恳辞荐辟书》:“捧读台谕，仰识老公祖俯念沉沦，嘘植不遗余力。夫士为知已者死，况重之以章服之荣,畀之以井邑之寄。宏绪非有胸无心者，何能不捐躯图报。”

台札 敬词，对方的书信。《尺牍新钞·龚鼎孳与纪伯紫书》:“尘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酷闻，业将台札手致，殊极恋恋故人。”

惠教 敬词，对方的书信。《尺牍新钞·许友与周减斋先生书》:“吾师秋月澹面，春风扇人，不觉潦倒屏椾间，抱醉而归。人生乐，屈一指矣。承惠教，适从村外晚归，吹灯快读，眼光欲晌，敬服敬服。”

惠翰 敬词，对方的书信。《欧阳修全集·与韩忠献王书》:“方欲旦夕驰布悬诚于左右，忽辱惠翰，感慰兼深。”

惠书 敬词，对方的书信。《昌黎先生集·答陈商书》:“愈白：辱惠书。语高而旨深，三四读，尚不能通晓，茫然增愧赧。”

惠贶 敬词，对方的书信或赠物。《文选·吴质答东阿王书》:“质白：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乎。”

惠问 敬词，对方的书信。《尺牍新钞·叶秉敬答张参戎明初书》:“近开东海，盐官咫尺，保障声闻，踯躅山林，未能走贺，乃承惠问，骈锡佳仪，多情若斯，令人感慨，但惭无以报，如何如何。”

惠笺 敬词，对方的书信。《艺风堂友朋书札·章钰书》:“昨奉惠笺,并各件，均祗悉。伯宛函已转去，并未移居也。”

诲帖 敬词，对方的书信。帖，古代写字在布帛上称为“帖”，后称言词简短的文书为“帖”。《艺风堂友朋书札·章钰书》:“岁杪奉读诲帖，开益良多。”

赐书 敬词，赐予书信。《艺文类聚》卷卅一《马融与窦伯向书》:“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曾巩集·寄欧阳舍人书》:“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损书 敬词，对方的书信。损，谦抑，贬抑身分。《文选·刘越石答卢谌诗一首并书》:“损书及时，备辛酸之苦言，畅经通之远旨。”

辱教 敬词，屈尊指教，也指对方的书信。《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以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辱示 同"辱教"。《昌黎先生集·与冯宿论文书》："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之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

辱笺 同"损书"。《昌黎先生集·答刘正夫书》："愈白。进士刘君足下：辱笺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赐，且愧其诚然。幸甚幸甚。"

辱命 同"辱教"。《文选·陈孔璋答东阿王笺》："昨加恩辱命，并示龟赋，报览粲然。"

辱问 同"损书"。《昌黎先生集·答刘秀才论史书》："愈白。秀才刘君足下：辱问见爱，教勉以所宜务，敢不拜赐。"

下询 同"辱问"。以上问下。《尺牍新钞·王相说覆盐台邓书》："在老公祖料自了了，谬蒙下询，敢讳迂悚，遥率数言，唯祖台笑而置之。"

枉问 同"辱问"。《古文辞类纂·韩退之与崔群书》："自足下离都，凡两度枉问，寻承已达。"

大翰 敬词，对方的书信。《颜氏家藏尺牍·冯溥书》："前承大翰，已有小札奉复，想久尘记室矣。"

大教 敬词，对方的书信。《颜氏家藏尺牍·叶方蔼书》："终年碌碌，未获时候孝履。忽辱大教，注念殷殷，愧荷交并，曷可言喻。"

鼎札 敬词，对方的书信。《尺牍新钞·茅维寄叶相公书》："鼎札至今春始达，稍悉相公里居之概，不以西河余痛，损其行乐高怀。"

鼎函 敬词，对方的书信。《尺牍新钞·伍瑞隆寄王喜广书》："细撵鼎函，字字肝腑，区区苜蓿下吏，既恐其志业之无成，复恐其食之不足。腆赐至再，稚注隆极。伏而思之，则天之雨露风雷，地之汶淮济洛所不及也。"

鼎吕 敬词，对方的书信或赠物。鼎吕，"九鼎大吕"之略。九鼎为夏禹所铸，大吕为周宗庙之大钟，都是贵重的宝器。后人用以喻指珍品。《颜氏家藏尺牍·魏麟徵书》："昨承鼎吕，允赐解推，翘切无似。"

教言 敬词，教诲之言，也指对方的书信。《尺牍新钞·徐世溥答杨维节博士论著述书》："辛未辱枉车骑，昨夏复拜教言，则仁兄之先施者厚矣。"

教尺 敬词，对方的书信。尺，尺牍。《尺牍新钞·张芳与黄俞邰书》："客夏在衡阳得捧教尺，如清风习习，涤我歊蒸，何移情至是也。"

教命 敬词，对方的书信。命，指示。《柳宗元集·与许京兆孟容书》："忽奉教命，乃知幸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没复起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华翰 敬词，对方的书信。《健馀先生尺牍·答徐别驾书》："顷接华翰，得悉参案开复为慰。"

芳函 敬词，对方的书信。《尺牍

新钞·丁雄飞复徐仪明书》："昨接芳函，知己之感，已勒兰谱，读卧雪刻，壮怀幽韵，如龙吟鹤唳。"

芳札　敬词，对方的书信。《萧绎与孝绰书》："数路计行，迟还芳札。"

芳讯　敬词，对方的书信。《颜氏家藏尺牍·冯溥书》："远承芳讯，足纫不忘，兼领大杯之惠，谢谢。"

荣示　敬词，对方的书信。《柳宗元集·上西川武元衡阳公谢抚问启》："相公以含弘大之德，广博渊泉之量，不遗垢污，先赐荣示。捧读流涕，以惧以悲，屏营舞跃，不敢宁处。"

瑶华　敬词，对方的书信。瑶，美玉。《艺文类聚》卷卅《周弘让答王裒书》："甚矣悲哉，此之为别也，云飞泥沉，金铄兰灭，玉音不嗣，瑶华莫因。家兄至自镐京，致来书于穹谷，故人之迹，有如对面。"

瑶函　敬词，珍贵的书籍，也指对方的书信。《健馀先生尺牍·答王从先书》："别来数月，正切怀想，接奉瑶函，恍同面晤。"

琅缄　敬词，对方的书信。琅，玉石。《艺风堂友朋书札·王存善书》："正深轖念，忽拜琅缄，雒颂回怀，既感且愧。"

玉音　敬词，对方的言辞或书信。《尺牍新钞·某书》："伫候玉音，手此。顺颂近安。"

好音　敬词，对方的言辞或书信。《王若虚答张仲杰书》："某启。仲杰县令：方深渴想，厚惠好音，曷胜欢喜。壇棍之赐，甚惬老饕，正恐踏破菜园，为鳜神所怪耳。"

德音　敬词，对方的言辞或书信。《艺文类聚》卷卅七《皇甫谧答辛旷书》："泛爱不遗，猥降德音，清喻烂焕，情义款笃，执诲欣然。"

音旨　敬词，对方的言辞或书信。《颜氏家藏尺牍·许承宣书》："幸托渊源，方以获承音旨，慰十余年渴饥。"

雅教　敬词，美好的教诲。也指对方的书信。《艺风堂友朋书札·吴重憙书》："行前得暇，再面聆雅教，以当话别。先此上复，敬请著安。"

雅贶　敬词，美好的赠与。也指对方的书信。《臧洪答陈琳书》："前日不遗，比辱雅贶述叙祸福，公私切至。"

嘉命　敬词，对方的指示或书信。《尺牍新钞·董黄答吴锦雯书》："自别西陵，时怀季重，尺素三年，已置石头城下，相思两地，仅存明月诗中。何期云间之鹤，忽坠瑶函，原上之鸰，载衔嘉命。"

嘉贶　敬词，美赐。《曹丕与钟大理书》："嘉贶益腆，敢不钦承。谨奉赋一篇，以赞扬丽质。丕白。"

重贶　敬词，厚赐。《曾巩集·回傅权书》："以巩有乡人之好，又于闻道有一日之先，使获承重贶，幸甚。"

直示　坦率指教。《尺牍新钞·蔡复一与长沙府书》："门下有真闻见，幸直示，庶得自省，而免失言失人之悔。"

疏示　疏导、指示。《曾巩集·答王深父论扬雄书》："或以为未尽，愿更疏示。"

裁示　来信指示。裁，裁笺作书。《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可否寄上代付之处，先求裁示，不敢多劳

笔墨，可当作自家人，交三弟随笔见复数行足矣。”

垂教 指教，上对下。《尺牍新钞·苏桓与梅朗三书》：“客秋辱垂教，甚切。缘邸次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纠绳拙诗，益以矩墨，引领宛水，每想一见，尽所欲言。”

抚教 充满爱心的教导。《柳宗元集·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奉二月九日书，所以抚教甚具，无以加焉。”

拜教 拜受教诲。《尺牍新钞·徐世溥答钱牧斋先生论古文书》：“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来章，高言如绮。”

见示 敬词，对方把某物给自己看。《尺牍新钞·顾梦游与龚野遗书》：“老病增馋，以口腹累高士，罪岂可忏耶。承选拙诗，幸侍者先录一帙见示，有未安处及生前改窜也。一气不属，与仁兄异路矣。奈何奈何。”

见赠 敬词，对方的赠与。《尺牍新钞·许友与周減斋先生书》：“佳笔见赠，拜抱于怀。村妇无文采，插满髻山花，虽不见好，亦不见丑。敬谢敬谢。”

荣施 敬词，荣耀的施与。《颜氏家藏尺牍·张锡怿书》：“足下膺特达之知，处郎官之重，盈门桃李，声望日隆。不肖叨在故交，与有荣施矣。”

来书 来信。《尺牍新钞·曾异撰答曾长修书》：“来书所云，以廉耻护送诗道者，无理亦无色者也。”

来讯 来信。《文选·曹子建与吴季重书》：“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覆，旷若复面。”

来翰 来信。《宋书·吴喜传》：“前驱之人、忽获来翰，披寻狂惑，良深怅骇。”《尺牍新钞·万代尚答王伯驭书》：“捧读来翰，哀思逾幅，才闻鹤唳，辄吊士龙，未绝广陵，翻思叔夜，挂剑秋高，碎琴音切，以古准今，未为多逊。”

来谕 敬词，来信。《尺牍新钞·王铎答钱养淳书》：“来谕道念家缘，两战未降，今但于婚嫁等事，随力随分，一无强知。即与道念无碍，不两战也。若于观心契合，便即下手，必待俗缘了，则无时可了。”

来命 敬词，对方的书信。《文选·应休琏与满公琰书》：“适欲遣书，会承来命，知诸君子复有漳渠之会。”

来贶 敬词，对方的赠与或书信。《后汉书·赵壹传》赵壹报皇甫规书：“辄诵来贶，永以自慰。”

来教 敬词，来信。《尺牍新钞·李陈玉复友人书》：“阅来教，所处甚当。凡事三平两满，便是世法饶人放手极高处。若两家过为执言，所伤多矣，非弟所乐闻也。”

贻书 敬词，来信。贻，赠送。《尺牍新钞·陈际泰答闽中罗美中书》：“贵乡陈仲谋贻书弟云，海内得大士片纸只字，皆已掇巍科，跻膴仕，儿孙满天下，而祖父母尚自留滞人间，是天下极不平之事。”

遣书 去信。《文选·阮元瑜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故按兵守次，遣书致意。”

裁书 裁笺作书。《文选·魏文帝

与吴质书》："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丕白。"

寸札 谦辞，书信。寸，形容极短或极小。《尺牍新钞·某书》："肃泐寸札，祇颂侍安，并祝庭闱万福。"

寸笺 同"寸札"。《艺风堂友朋书札·丁立诚书》："去岁曾布寸笺，计登签阁。时维著祺清福，定协颂忱。"

小笺 同"寸札"。《颜氏家藏尺牍·孙少祀书》："数日前有小笺，上候新祉，想达典签。"

芜牍 文辞杂乱的书信，谦辞。芜，杂乱。又作"芜函""芜简"。《尺牍新钞·某书》："附呈芹敬，聊伴芜牍，专此敬颂台安。"

污素 谦辞，书信。《颜氏家藏尺牍·吕考书》："两次污素系方悚仄未已，复承重委，敢不赧面报命，但恐有损诸葛公盛名耳。"

狂简 谦辞，字迹不工的书信。《尺牍新钞·徐世溥答杨维节博士论著述书》："浃岁苦无便使，不成报章，希恕。狂简附去归壶一执，尚友编一册。吾兄或沦茗而论古人，庶几时时念弟也。"

弱翰 毛笔。《古文苑·扬雄答刘歆书》："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异语。"

搦札 写信。搦（nuò），握持，执笔。《艺文类聚》卷卅七《王僧孺与陈居士书》："云波遥夐，燕越数千，行云郁术，征禽难使，用隔巾车，未能搦札，引领南望，怅矣心飞。"

秉毫 写信。秉，把持，拿住。《尺牍新钞·周婴与黄若木书》："所根壮图行乖，远犹摧陨，白马谁赴，朱生奚托。洛城之魂，空思旧里，郇亭之鬼，终恚他乡。相去千里，生死长辞，秉笔为书，涕泪横集。"

削 书札。古时用刀削竹木作简册，在上面写字。如"削哺""削牍""削简"。

奉书 谦辞，写信给对方。《昌黎先生集·与于襄阳书》："七月三日。将士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奉启 同"奉书"。《曾巩集·与王向书》："道中匆匆奉启。不宣。"

致书 同"奉书"。《柳宗元集·与顾十郎书》："四月五日。门生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致书十郎执事：凡号门生面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致简 同"奉书"。《文选·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

修禀 同"奉书"。《艺风堂友朋书札·曹元忠书》："南北奔驰，久未修禀为罪。恭惟禔躬万福，道履安和，翘企师门，无任神往。"

寓书 寄信。《曾巩集·与王介甫第三书》："巩启：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于邮中寓书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书，不审皆到否？"

应教 敬词，回信。《尺牍新钞·王思任与冒辟疆书》："向辱翰贶，因冗极热极，不能应教，兹偶如命，勉

为之以星。第珠玉满前，自觉形秽，奈何。”

复书 回信。《柳宗元集·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辱复书，教以报张生书及答衢州书言春秋，此诚世所希闻，兄之学为不负孔氏矣。”

复讯 回音，回信。《艺风堂友朋书札·徐乃昌书》：“艺风先生大人惠鉴：昨奉手教，敬悉种切。翁某样本，寄至通州，尚无复讯。日前函催，俟复到再奉闻也。”

归简 回信。《艺文类聚》卷廿五《梁简文帝与魏东荆州刺史李志书》：“密驿轻邮，侧望归简。”

还云 敬词，对方的回信。参见“朵云”。《艺风堂友朋书札·夏勤邦书》：“接奉还云，藉谂蓬馆风清，兰陔日永，欢喜无量。”

惠复 敬词，对方的回信。《艺风堂友朋书札·姚永朴书》：“知博学能文如先生，必不以烦渎见责也。肃布，即请道安，并希惠复，至盼。姚永朴谨启。”

还答 回信。《文选·李少卿答苏武书》：“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

还翰 敬词，对方的回信。《梁书·何胤传》萧衍与何胤书：“今遣候承音息，矫首还翰，慰其引领。”

答贶 答谢馈赠的信。《文选·吴季重答东阿王书》：“质小人也，无以承命，又所答贶，辞丑义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

申贶 敬词，对方的赠与或书信。

《尺牍新钞·徐世溥答黄商侯论保举书》：“兄乃俨然先教，又申贶之，开缄一行，即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读未竟，已心铭矣。”

裁复 写信答复。《尺牍新钞·万代尚答王伯驭书》：“敬此裁复，以慰远怀，幸解拳拳，兼恕草草。”

裁谢 写信答谢。《苏东坡全集·答毛滂书》：“顷承示长笺及诗文一轴，日欲裁谢，因循至今，悚息。”

嗣音 连续传寄音信。嗣：接续。《艺风堂友朋书札·惠周锡书》：“此刻即行，不及奉别。耑望后日嗣音。”

报章 酬答别人诗文和书信。《尺牍新钞·曾异撰复曾叔祈书》：“前日手教之及，某适薄游梅溪。归而读之，作数日喜。时方小春，梅使未发，是以报章迟之。顷者又接来翰，不知何日得与叔祈西窗剪烛，尽其所怀。”

琼玖 敬词，喻指对方的诗文或物品。琼、玖，玉名。《颜氏家藏尺牍·王日藻书》：“秋初辱赐瑶函，并贻琼玖，属以顺邮裁报，未罄缕忱。兹草芜律四十韵，藉用椒觞。”

惠让 敬词，转让。《艺风堂友朋书札·傅增湘书》：“手教并副笺均读悉，正统班、范史承惠让，至感。遵即代购《儒学警语》以报。赐书亦敬领，拜谢拜谢。”

便羽 乘便替人传递书信的人。《颜氏家藏尺牍·李鸿霔书》：“乃老年兄及子纶兄相继言归，望望停云，不啻失左右手，每欲寄候，苦无便羽。”

鸿便 别人乘便捎带的书信。《尺牍新钞·韦人月与吴来之书》：“盈盈

一水，相隔不通，而所居僻陋，鸿便甚希，久不获布一语于左右。”

羽便　同“便羽”。《尺牍新钞·苏桓报陈龙媒书》：“足下讲道读书，于席门茅屋之下，此已荣遇，他更何云。羽便敬笺奉报，无由会合，千万珍重。”

音驿　书信传递。《后汉书》马援与杨广书：“春卿无恙？前别冀南，寂无音驿。”

驰寄　迅速传递、邮寄。《尺牍新钞·陈宏绪与周栎园书》：“气运渐转，道路渐以通达，当把弱翰，贲侧理问诸藏书之家，冀有所得，即抄录驰寄，但不能限之以日月耳。”

递中　驿递之中。《苏东坡全集·答李端叔书》：“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矣。”

称谓用语

陛下　陛，宫殿的台阶；陛下，本指群臣列于阶下，后借作帝王的尊称。《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阁下　古者三公开阁，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阁。“阁下”的构词方式与“陛下”同。开始称地位显赫者为“阁下”，后来一般朋友之间亦称“阁下”。《昌黎先生集·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

足下　战国时称君主为[illegible]，后来作为下称上或同辈相称的敬词。《李陵答苏武书》：“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诸葛亮集·与刘巴论张飞书》：“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门下　门庭之下，借指弟子。也是对长官的敬称。《曾巩集·答范资政书》：“仰望门下，不任区区之至。”

座下　座床之下，座席之下。称尊长的敬词。《艺风堂友朋书札·陈庆年书》：“夫子大人座下：前奉钧复，知南洋学堂之议已经搁起。钟山一席想照旧，送关已定局，幸知为盼。”

公　敬辞，对男人的尊称。《尺牍新钞·杜濬答某公书》：“辱示云云，殊为可异，愿公胜之以静，而辨之以默。且仆尝有言，自古小人之祸，君子撤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于成君子之名並受小人之祸，天下事因之破坏者，不少矣。”

大人　对亲属中长辈或朋友中年龄辈份稍高者的尊称。《李太白全集·与韩荆州书》：“至于制作，积成卷轴，

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请给纸笔，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

吾师 对老师的尊称。《尺牍新钞·许友与周减斋先生书》：“病窗无耳，寺茗作供，日开半卷，或能酿出一二句好诗，报答吾师未可知也。”

吾子 同辈男子间相亲之称。子，古以为男子之美称。《昌黎先生集·答陈商书》：“略不辞让，遂尽言之。惟吾子谅察。愈白。”

函丈 原意“讲席”，后来专用弟子对师长的敬称。《黄宗羲与陈乾初论学书》：“自丙午奉教函丈以来，不相闻问，盖十有一年矣。”

左右 敬辞。书信中称对方，不直称其人，而称他的左右执事人。《艺风堂友朋书札·张元济书》：“小山老前辈大人左右：廿七日赐教敬悉。”《昌黎先生集·与陈给士书》：“去年春，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厲乎其言，若闵其穷也。

座右 敬辞，同“左右”。《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艺风师座右：迭闻南中警报，尊居想不敢受惊。惟南京书版与酒，殊代悬悬。”

尊前 敬辞，书信中称父辈。《艺风堂友朋书札·邓嘉缉书》：“筱山先生大人尊前：昨者上书，请教江楚编译之书如何领购，未蒙示复，企盼曷胜。”

尊右 敬辞，同“尊前”。《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艺风吾师尊右：元夕手示谨悉。事冗心烦，延未奉答，歉歉。”

侍右 敬辞，同“尊右”。侍，陪从尊长身边。《艺风堂友朋书札·李详书》：“艺风先生侍右：前奉复书，敬悉尊状，炳烛之明，无谢公丝竹之好，惟藉书卷，陶写性灵。”

尊鉴 敬辞。用在书信开头对方的称呼之后，表示敬请对方看信。鉴，细看，审察。《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艺风先生尊鉴，新岁敬承道履增胜，蒙示并赐读近词，欣荷欣荷，容再和呈。绶年内小有不适，开正杜门，少事休息，极拟趋前，未果为罪。”

台鉴 同“尊鉴”。《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艺风先生台鉴：连奉两示，敬承一一。草堂诗余经师校定，至感至感。”

钧鉴 同“尊鉴”。《艺风堂友朋书札·叶德辉书》：“艺风太夫子大人钧鉴：秋间旋鄂，时聆训言，惜冰相匆匆北行，未得长侍文宴，怅恨奚如。”

赐鉴 同“尊鉴”。《艺风堂友朋书札·钱恂书》：“筱珊年伯大人赐鉴：月前发还示朴《骈剩》，时适目患红肿，未克敬复。近日肿退，亟趋大吉巷，而驾已南矣。罪罪。”

惠鉴 同“赐鉴”。《艺风堂友朋书札·张元济书》：“小山老前辈大人惠鉴：前日刘、张两书估承命送旧本来，感谢之至。”

大鉴 同“台鉴”。《艺风堂友朋书札·宗舜年书》：“艺风先生大鉴：不亲颜色，忽忽数月。舜年于三月杪回常熟，三径就荒，楹书亹损，粗为整庇，颇觉无事而忙。秋仲再至海上，当畅聆清诲。”

尊览　同“尊鉴”。《艺风堂友朋书札·李详书》：“艺风先生尊览：承赐三垣笔记跋，谨读一过，考据翔实。”

台览　同“台鉴”。《尺牍新钞·张可度与周栎园书》：“倘蒙许可，幸令靖公二先生与纪伯紫兄同严校录编次，然后上尘台览。”

钧览　同“钧鉴”。《艺风堂友朋书札·叶德辉书》：“艺风太夫子大人钧览：昨奉谕书，并平水书铺考一纸，均读悉。”

赐察　同“赐鉴”。《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艺风师赐察：昨上一缄，度可先达。所见古书录，亟求抄示。”

垂察　同“赐览”。《艺风堂友朋书札·邓嘉缉书》：“筱珊先生大人垂察：前上汪府十元。嗣复贡书，未荷赐答。”

钧侍　侍，陪从尊长身旁。《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艺风夫子大人钧侍：叠奉赐书，敬领种切。适以事琐，并料理移居，未即修复，至深歉仄。”

钧座　座，座床。意思是卑末之使，不当授受，把自己的书信置于座床之前，不敢直接送上。《艺风堂友朋书札·陈庆年书》：“夫子大人钧座：顷展来谕，诵悉一切，并承赐秘籍多种，感谢无已。”

台端　敬辞，同“座右”。《尺牍新钞·夏华与蒋养庵父母书》：“两雏初谒台端归，即驰书不佞。不佞读已，举手加额。吾梓里何幸，有此父母。”

台侍　同“钧侍”。《颜氏家藏尺牍·茅麟书》：“初二日，竭诚奉候，此复。上颜老先生大人台侍。晚生茅麟顿首。”

尊大人　对亲友中长辈的敬称。《陆云答东茂安书》：“尊大人、贤姊上下，当为喜庆，歌舞相送，勿为虑也。”

尊公　对别人父亲的尊称。《尺牍新钞·王思任与冒辟疆书》：“恭喜尊公，衮衣东借，节钺匪遥，奉太翁太母于铃阁，朝夕视膳，仅一衣带黄河也。”

尊堂　对别人母亲的尊称。《陆云答东茂安书》：“云曰：前书未报，重得来贶。知贤甥石季甫当屈鄮令。尊堂忧灼，贤姊涕泣，上下愁劳，举家惨戚，何可而耶。”

尊丈　对长辈的尊称。《许衡答耶律惟重书》：“书奉寄耶律生，久别不得会见，岂胜怀想。王之奇来，审闻尊丈以下皆安，良慰。”

尊先人　对别人亡父的尊称。《颜氏家藏尺牍·刘芳躅书》：“仆抱病连年，展转山舍，不返里门者，两阅岁矣。曩闻尊先人乘箕而去，凡仰芳型者，罔不霣涕。”

尊先祖　对别人亡祖父的尊称。《颜氏家藏尺牍·刘良书》：“念昔在尊先祖教下，患难相依，岂比泛常哉。”

贤姊　对别人姐姐的尊称。《陆云答东茂安书》：“尊大夫贤姊上下，当为喜庆，歌舞相送，勿为虑也。”

贤倩　对女婿的美称。《尺牍新钞·某书》：“某某贤倩左右：前承枉顾，招待不周。”

贤从　对别人从兄弟的尊称。《世语新说·桓玄与羊欣书》：“贤从情所

信寄，暴疾而殒，视予之叹，如何可言。”

贤兄 对平辈男性的尊称。《艺文类聚》卷卅《王衮与周弘让书》：“南北殊方，炎凉异节，木皮春厚，桂树冬荣。摄卫惟宜，动静多豫。贤兄入关，敬承阔曲。”

贤郎 对别人儿子的尊称。同“令郎”。《欧阳修全集·与王懿恪公书》：“于时贤郎幼年辞翰，公以本司恐谤，不议祁奚；仆闻善必惊，见敬王粲。骤请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飞，已迁京县。”

贤弟 对位卑年幼者之敬称。《艺文类聚》卷卅七《刘孝标与宋玉山元思书》：“今贤弟宾从，抗鳞奋翼，或衣绣方塘，或鸣驺洛渚，连骑方驱，击钟乃食，荨蔚若是，吾子得何忧哉。”

翁兄 对老年兄长的尊称。《尺牍新钞·金声与谭友夏书》：“惟学问一事，耿耿于怀，恨不得胜师良友日亲时接，以此亦欲见翁兄，一罄区区之意。”

兄翁 同“翁兄”。《颜氏家藏尺牍·金煜书》：“丑之冬，舍妹丈自京门旋归，荷兄翁所致一函件，具稔至谊，不意所事不果，可胜惆怅。”

台兄 对平辈男友的敬称。《尺牍新钞·何楷答冒壁疆书》：“南国即多才，求其养如木鸡，体追台阁，断未有逾台兄者也。弟笔研久荒，然宝气所呈，犹望而识之。非欲慢然贡佞，唯倾耳以聆好音而已。”

兄丈 敬辞，兄长。丈，通“长”。《尺牍新钞·陈衎与王彦升书》：“兄丈德业日新，无由款奉，徒有伊郁。万祈顺时保重为慰。”

师台 对老师的敬称。《尺牍新钞·徐世溥上虔抚潘昭度先生辞荐辟书》：“备此数者，不得立于天地之间。尚何面目复图执笔墨，侍恩师左右乎？部咨且至，祥禫有期。伏惟师台矜其愚，鉴其诚，力为辞免，则不肖幸甚。”

兄台 同“兄丈”。《尺牍新钞·徐世溥答杨维节博士论著述书》：“夫人之质，各有所宜之地；其所治，亦各有所宜之时。如兄台与弟，皆非宜处金陵者也。”

世妹 称有世交的女性同辈或晚辈。明清科举，称座师、房师的女儿为“世妹”。《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元夕手示谨悉，事冗心烦，延未奉答，歉歉。世妹出阁，有失贺礼。”

世兄 称有世交的男性同辈。《艺风堂友朋书札·钱振常书》：“未知幼亭世兄完姻，如何办法。”

仁兄 对同辈友人的尊称。《尺牍新钞·徐世溥答黄商侯论保举书》：“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简清要，亦未可知。”

仁翁 对老年男子的尊称。《尺牍新钞·张二严与房大生书》：“淳于髡，莱人也。仁翁过其地，得无有罗襦芗泽之思乎。”

仁君 敬辞，对有名位者的尊称。《后汉书·赵壹传》报皇甫规书：“今壹自谴而已，岂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损？而远辱手笔，追路相寻，诚足愧哉。”

年伯 对世交的父辈友人的尊

称。《颜氏家藏尺牍·任枫书》："敬托八行，藉手起居，薄仪伴函，仰祈莞awaited纳。倘天念苦人，不即沦没，尚容图报于异日也。年伯寿辰，聊抒犹子华祝之诚，然自愧布鼓矣。"

年丈 同"年伯"。《尺牍新钞·高攀龙与黄凤衢书》："年丈横被风波，然转高声价矣。夫天意岂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实。"

年兄 唐宋以来，科举考试同榜登科者称"同年"，互相尊称为"年兄"。后来同学间也互相尊称"年兄"。《颜氏家藏尺牍·柳焘书》："雅集定期，候年兄酌示，以便遵行。"

年嫂 对年兄之妻的尊称。《艺风堂友朋书札·钱振常书》："前从柚岑令弟处送来讣告，知年嫂宜人遽登莲界，至为骇愕。"

令兄 尊称对方的兄长。《尺牍新钞·叶甲再寄方八公书》："令兄章牧及林子将近况何似。灯影酒席之下，恋恋有故人之思，何日共乘车过我乎。"

令先君 敬辞，称对方的亡父。《尺牍新钞·徐芳答邓日生书》："如年兄者，知断断焉衷于礼，而不为俗所惑者矣。与令先君有骨肉生死之谊，于事之重且急者，固不可以无言。伏惟炤谅。"

令弟 敬辞，指对方的弟弟。《尺牍新钞·陈弘绪再与栎园书》："武子令弟不识存亡，此兄竟无一线之传，真可悯也。"

令叔 敬辞，指对方的叔叔。《颜氏家藏尺牍·孙士焞书》："兹者令叔老先生贲临，捧读瑶函，恍如提命。"

令亲 敬辞，指对方的亲戚。《颜氏家藏尺牍·钟朗书》："及至巡试商洛，时晤令亲孔涵老，备道颠末，竟因机缘相左，乖袂而返。"

令嗣 对对方的儿子的敬称。《吕东莱文集·与朱侍讲书》："令嗣气质甚淳，已令就潘叔度舍旁书室，……同窗者，乃叔度之弟景愈。"

慈帏 称对方的母亲。《尺牍新钞·丁雄飞与刘生三书》："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复天谴，夺以慈帏，我两人青衫欲破，白雪满身，情绪悲丝，何日向虎邱龙潭相持一痛苦也。"

大方 大道理，引申为见识广博。后称博学或精于一技一艺的人为"大方"。《尺牍新钞·张可度与周栎园书》："但其稿皆草创，别无副本，今欲缮写成帙，请正大方。"

通人 学识渊博的人。《艺风堂友朋书札·萧穆书》："下走比年于它学率多荒落，惟考证汉、魏、六朝石文，粗有所得，都为六卷，冀附通人之末。"

大君子 大德之君子。书信中对对方的尊称。《曾巩集·与杜相公书》："非自以谓能也，怀区区之心于数千里，因尺书之好，而惟所以报大君子之谊，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趋，故辄及之也。"

家君 对别人称自己的父亲。《颜氏家藏尺牍·李鸿霔书》："便道里门，待家君膝下者月余，又健壮善饭，尚能步行二十里，差慰于怀。"

家严 对别人称自己的父亲。《尺牍新钞·丁雄飞与刘生三书》："老年伯与家严同以慈悲愿力而出，乃世尊

人心不可问矣。岂乐行时哉。林下之味，数百亿堂上也，承欢色养，弟与仁兄勉之。”

家慈　对别人称自己的母亲。《尺牍新钞·曾异撰与黄东崖先生书》：“附上缣素一方，倘为家慈载笔，悬之纺授堂中，不但为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谓异撰寡妇之子，虽垂老，碌碌无所见，其于先生犹不在礼，弗与交之列耳。”

家母　对别人称自己的母亲。《尺牍新钞·曾异撰与黄东崖先生书》：“今者始以拙稿自赞，而以家母之行略请。”

家侄　对别人称自己的侄儿。《尺牍新钞·茅维答朱大复书》：“家侄韶稚英伟，称其家儿。弟虞锋铩太露，易致缺折，是在一二父执严束之，非痴叔所能口舌争也。”

家大人　对别人称自己的父亲。《尺牍新钞·俞瑰纶答友人书》：“家大人尝语小子曰：吾为文，宁唇颊烂，不袭垂涎；为官，宁面皮烂，不受眉眼；为乡宦，宁姓名烂，不人官衙。”

家兄　对别人称自己的哥哥。《诸葛亮与陆逊书》：“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

家表兄　对别人称自己的表兄。《颜氏家藏尺牍·谢兆昌书》：“祈老年翁推国士之爱，弗靳春风而和煦之。铭佩不特家表兄已耳。临楮拳切，不尽依依。”

舍亲　对别人称自己的亲戚。舍，同“家”，一般用于对别人称自己的辈份低或年纪小的亲属。《颜氏家藏尺牍·沈荃书》：“舍亲咨文已送到。闻且晚尚须题请，不识何时可以咨人成均也。”

舍甥　对别人称自己的外甥。《颜氏家藏尺牍·张锡怿书》：“昨晤鲁公，知文旌适临敝郡，把臂在迩，喜不能寐，缘敝居浅陋，蓬蒿之径，不足容高贵之驾，有艾舍甥居，稍觉轩爽，已令悬榻以俟。”

舍妹夫　对别人称自己的妹夫。《颜氏家藏尺牍·沈泌书》：“而舍妹夫梅生之激感高谊，宁待言耶？率禀不庄，皇恐皇恐。”

舍侄　对别人称自己的侄子《颜氏家藏尺牍·张锡怿书》：“另有里言，托宾门舍侄转达。幸垂照不尽。”

舍弟　对别人称自己的弟弟。《苏东坡全集·答秦太虚书》：“轼启：五月末，舍弟来，得手书，劳慰甚厚。日欲裁谢，因循至今，递中复辱教，感愧益甚。”

贱子　谦辞，自称。《颜氏家藏尺牍·惠周惕书》：“以贱子鄙见，时文终非传世之业，以此种心思手笔为六经作笺解，不更快乎。”

贱累　谦辞，对别人称自己的家属。《苏东坡全集·与林天和长官书》：“承问贱累，正月末已到赣上矣。”

贱眷　同“贱累”。《尺牍新钞·周圻与高康生书》：“贱眷之在三山者，艰偕行。星子督豚儿甫有绪，元润将适甫，咸弗随。共随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祥耳。”

亲习 亲近熟悉之人。《尺牍新钞·周婴谢谭海澄书》："明公视仆，既无亲习之故，非又平生之好，若凫乙翻翔于天末，夔蛇踸踔于泥中，本不关情，何缘介意。"

冢孙 长孙。冢，长，大。如冢子（长子）、冢息（长子）、冢嗣（嫡长子）、冢妇（嫡长子的妻子）。《颜氏家藏尺牍·张锡怿书》："兹因舍侄泽复应试之便，复此附候。舍侄为先叔学宪子美公冢孙，敝同门绎翁先生玉润，才品颇佳，想高轩在敝郡时，曾已识韩，兹来晋谒，祈门下渚盼对之。"

豚儿 谦辞，对别人称自己的儿子。《张文公集·与潘伯曾文伯书》："豚儿寡学，滥旁科名，远辱遣贺，兼拜珍贶，感戢莫喻。"

尼儿 好孩子。尼，通"昵"，亲昵。《尺牍新钞·陈际泰甲戌登第后家报》："威逸二儿，可勉励攻苦，兄弟俱有隽才，不宜自满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与负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儿要曲体我怀，好行其德，学做好人，勤俭雅慎，助成老父一个贤乡绅。"

弱息 谦辞，对别人称自己的子女。《尺牍新钞·陆陛为外母与外父书》："况夫弱息犹在冲龄，初习方名，未娴翰墨，虽情同赵至，时闻释卷之悲。"

先君 亡父。《尺牍新钞·周庚与仲嫂书》："居诸忽忽，不觉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游则病。游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装束，有先君方书存耳。"

先严慈 亡母。《尺牍新钞·周圻与王先生书》："今仆为先严慈襄大事，事毕策蹇行矣。则此后去先生日远，通问盖艰，东南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强仆矣。"

亡兄 死去的兄长。《昌黎先生集·与孟东野书》："李习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

亡友 死去的朋友。《尺牍新钞·张鹿徵与刘公勇书》："亡友弱女，独立周旋，此在流俗，诧为希有，而大豪杰视同毫末耳。"

亡儿 死去的儿子。《尺牍新钞·卓发之与金台法师书》："计向年聚首时，亡儿才十五龄，嗣后亡儿方堕落名场中，今又十五年矣。"

膝下 指人在幼年时，常依于父母膝旁，言父母对幼孩之亲爱。后用作对父母的尊称。如书信开头说"父母亲大人膝下，谨禀者"。

小妹 小妹妹。《尺牍新钞·高兆与纪伯紫书》："弟残冬嫁小妹，发春卜葬两亲后，将去故乡矣。"

牛马走 谓在皇帝之前如牛马供奔走的人。常用作自谦之词。《文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

下走 趋走之役。犹如"仆"。自称的谦辞。《柳宗元集·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今而预知斯举，下走之大过矣。书虽多，言不足导意，故止于此。不宣。宗元再拜。"

下劣 资质平庸的人。自谦之词。《尺牍新钞·林之蕃与周减斋书》："先生高明超子瞻，之蕃下劣，宁敢效佛

印饶舌。然窃比于春梦婆，发居士一笑也。"

袜才　浅薄之才。自谦之词。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韩昭仕蜀，……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时有朝士李台嘏曰：'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后来就把艺多而无一精者称"袜线"，也作自谦之词。"袜才"本此。《尺牍新钞·黄虞龙与廖傅生书》："忆陆机有云，文适多体，欲便不清。此语竟似为仆袜才下一便宜法也。"

寒生　贫苦的读书人。自谦之词。《尺牍新钞·朱泰祯与某同年书》："提挈寒生，亦年台意中事，愿少垂盼焉。即弟身沐鸿波葛亩矣。临楮神驰。"

后学　后进的学者或读书人。常用作自谦之词。《尺牍新钞·徐世溥与钱牧斋先生书》："后学世溥再拜，牧翁先生阁下：三月九日得接丙申仲春十八日所赐手书，何其奖予之深、指示之切，反复循环，实非小子所克当也。"

棘人　急于哀戚之人。后人居父母丧时，自称"棘人"。棘，通"急"。《艺风堂友朋书札·傅增湘书》："近得数书，录如别纸，鉴定为幸。此请校安。棘人傅增湘稽首。五月廿五日。"

樗栎　原指樗、栎两种不材之木。后用以比喻才能低下。多作自谦之词。《尺牍新钞·卓发之与丁叔潜水部书》："弟寝处此中，逃名铲迹，置身才与不才之间，尚不能以樗栎自免，何有乎楩楠栝柏耶。"

不才　没有才能的人，也作"不材"。常用作自谦之词。《宗臣报刘一丈书》："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

不肖　子不似父。后来称不孝之子为"不肖"。常作自谦之词。《尺牍新钞·徐世溥寄侍御李匡山先生书》："奉教，忽焉经岁，蒹葭伊人，自是朋辈相怀，终以一水为恨。若不肖于先生，直高山仰止耳。"

不孝　不孝顺的人。常作自谦之词。《尺牍新钞·周圻与济叔书》："此中见大作者，俱有南阳刘之骥之思。不孝惧唐突，不敢作包揽里长，若不拒，便褰裳濡足，桃源洞恐成河西务矣。"

不佞　没有才能。常用作自谦之词。《颜氏家藏尺牍·金煜书》："倘便中邮寄衡斋王父母函内，希加意道及不佞萧萧近况。"

仆　男子谦称自己。《柳宗元集·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

窃　私下，谦称自己。《李斯谏逐客书》："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猥　谦辞。辱。《艺文类聚》卷廿六《王僧孺答江琰书》："猥惠嘉音，用蠲疾首，发函伸纸，朗若披云。"

小子　自称的谦辞。《昌黎先生集·上宰相书》："小子不敢自幸，其尝所著文，辄采其可者若干首，录在异卷，冀辱赐观焉。干渎尊严，伏地待罪。愈再拜。"

同庚　同年。《尺牍新钞·宋之桢

寄真存古书》："足下观物如朗鉴，而守口如覆瓶，防身如履冰，而爱人如冬日。同堂勿昵腹心，共胞勿轻与肝膈，寻常宴会，上之勿议及国家，次之勿语及臧否。不佞常与诸同庚一谐一谑，皆为后日诽谤之资，殊可鉴也。"

同甲 同年。《欧阳修全集·与知县寺丞书》："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与之同甲，内顾身世，可为凛凛。"

同好 爱好相同的人。《曹子建集·与杨德祖书》："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

友侪 同事朋友。侪，同辈。《尺牍新钞·唐时答张梦泽先生书》："今向僧家借一鱼缸，尽夜坐卧其中，友侪怜而止我，时戒以勿言。"

吾侪 我们。指同辈中人。《尺牍新钞·宋祖谦与张子京书》："弟于愚贪矣，而足下辄乐施焉。伤廉伤惠，吾侪于笔墨间不暇避矣。"

吾曹 同"吾侪"。《尺牍新钞·陈孝逸答刘孝若书》："千古英雄人物，正诡不同，而刚决则等。吾曹丈夫，于天下何所足系累，乃复刺刺昵昵，向儿女耳边语耶。来教获我心矣。"

若辈 你们。《尺牍新钞·陈孝逸柬竺庵》："昨柬二三兄弟，声声和尚高姿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推尊长老，凡为若辈狠敲热骂，引向里学熏修耳。"

汝曹 同"若辈"。《艺文类聚》卷廿三《张奂诫兄子书》："汝曹薄佑，早失贤父，财单艺尽，今适喘息。"

愚 蠢笨、无知。常用作自称的谦辞。

愚见 愚昧的见解。书信中常用作谦辞。《尺牍新钞·杜浚答某公书》："区区愚见，得之十年读史，辄敢以为左右献。"

愚意 谦辞，自己的想法。《尺牍新钞·韩廷锡与李明六书》："弟愚意以为注有二法，一训经，二发经。训经者，训其字义，而寘其经义，非遗意也，留其意不发，以俟读者自得之也。"

敝 自谦之词。用于与自己有关的事物。如敝姓、敝处、敝校等。

敝友 我的朋友。参见"敝"。《尺牍新钞·陈宏绪与周栎园书》："天启中，敝友曾尧臣一日忽从鹭洲驾舴艋诣会城，茂先问其来故，曰，吾思枫亭荔子，急往图一饱啖。"

敝地 谦辞，我（们）这地方。《尺牍新钞·高兆与纪伯紫书》："惟八月十一日接栎园先生及旅堂孟夏书为最吉祥事。敝地人民益无聊。"

敝乡 谦辞。我（们）的家乡。《尺牍新钞·李陈玉复诸缙绅为谢凤老举名宦书》："谢凤老生平本末，敝乡人士耆蔡奉之，桐乡之士，则尤表表。捧诵尊揭，具仰厚道，墓木拱矣，而挚怀不衰。"

敝居 谦辞，称自己的家。《颜氏家藏尺牍·张锡怿书》："昨晤鲁公，知文旌适临敝郡，把臂在尔，喜不能寐，缘敝居浅隘，蓬蒿之径，不容高贤之驾。"

敝同年 谦辞，对别人称自己的同学。《颜氏家藏尺牍·张为焕书》：

"近者接得敝同年一札，知改授已有成就。"

鄙 谦辞，用于称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事物。如鄙人、鄙意、鄙见、鄙著等。

鄙人 谦辞，我。《艺风堂友朋书札·端方书》："尊体康复，甚慰。鄙人寒疝亦脱然矣。"

鄙悃 谦辞，我的诚意。《颜氏家藏尺牍·张锡怿书》："鼎彝董书二种，出自鄙悃，不敢具套，并祈鉴入。临楮不尽瞻溯。"

鄙诚 谦辞，我的诚意。《昌黎先生集·与鄂州柳中丞书》："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适机宜，而丰采可畏爱故也。是以前状概述鄙诚，眷惠手翰还答，益增忻悚。"

鄙意 谦辞，我的意思。《颜氏家藏尺牍·于琏书》："昨见暂以恙谱之疏，殊失鄙意。仍祈速出东山，侍当作湖海散人，以庆荣迁耳。"

鄙怀 谦辞，我的心怀。《颜氏家藏尺牍·张惟赤书》："昨从张幼青舍亲处得接手教，深慰鄙怀。"

寒家 卑微的门第。常用于谦称己家，犹言"寒舍"。《尺牍新钞·卓发之于黄海岸公祖书》："而寒家奕世沐浴膏泽，如以鼹鼠而饮恒河，尤觉腹中充满。"

寒暄用语

赐 给予。上给下谓赐。书信中常用的敬辞。如赐鉴、赐览、赐纳。《昌黎先生集·与于襄阳书》："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曾巩集·谢杜相公书》："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陈，徘徊迄今，一书之未进。顾其惭生于心，无须臾废也。伏惟明公赐亮察。"

辱 谦辞，有辱对方。如"辱教""辱赐""辱临"。《文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曾巩集·回傅叔书》："巩启：辱惠书及古律诗、杂文，指意所出，义甚高，文辞甚美。"

枉 屈就。用于别人，含有敬意。《苏东坡全集·答毕仲举书》："远枉手教，存问甚厚，且审比来起居佳胜，感慰不可言。"

伏 谦辞，拜伏。如"伏望""伏祈""伏乞""伏冀""伏蒙""伏念""伏想"。《欧阳修全集·与韩忠献王书》："新岁甫迩，伏乞为国自重，下情祷咏之至。"《曾巩集·答孙都官书》："提刑都官阁下：伏承赐书及示盛制六编，凡三千首，盛矣哉。"

禀 敬辞。下对上言事曰禀。用于

书信中。《颜氏家藏尺牍·郭昂书》："郭昂谨禀：昂自卧病以来，贱体亏损，元气尚未平服，只因家计单寒，不意舟车又复劳顿。"

蒙 受到。《陆放翁答陆伯政上舍书》："春中蒙见顾，衰疾无聊，不得款承绝尘迈往之论，至今悒悒。"

俯 屈身，低头，与"仰"相对。书牍中常用的敬辞。如"俯允""俯念"。《艺风堂友朋书札·曹元忠书》："受业日暮途远，方且借此以为枝栖，故求吾师速赐一函与乔，嘱其吹嘘。知素蒙挚爱，培植逾恒，定承俯允。"

伏惟 俯伏思惟。下对上的敬辞。如"伏惟幸察""伏惟哀怜""伏惟动止万福"。《陆放翁全集·上虞丞相书》："某而不为穷，则是天下无穷人。伏惟少赐动心，捐一官以禄之。"《欧阳修全集·与韩忠献王书》："某自夏入秋，苦于亲疾，以故久不修问，谨因人还，附此为谢，伏惟幸察。"

契阔 离合、聚散。常偏指离散。《尺牍新钞·胡介复龚中丞定山书》："正拟涉江泥首太夫人座前，并与阁下握手写心，一申契阔。"

暌别 离别。暌(kuí)，同"睽"，隔开、分离。《尺牍新钞·陈台孙与陶庵书》："山野之人，懒慢自废，暌别四载，未得图晤江干，辱我公垂念殷笃，时切远问。"

流寓 寄居他乡。《尺牍新钞·卓发之上叶曾城师书》："某流寓南中，为背城借一之计，乃三折肱两折足，兼而有之。"

忝叨 自谦之辞，有愧于受到某种待遇。《尺牍新钞·朱泰祯与某同年书》："某忝叨同籍，念久处隐约，无穷时素，屈指吾党声气中，夙称幽燕老将，两臂能开八百弓，据鞍顾盼，而意气不衰。"

捧诵 两手承托书信诵读，表示恭敬。《艺风堂友朋书札·范当世书》："两承手示，欢欣捧诵。拙文承奖借过分，何此敢当。"

盥读 洗净手拜读，表示恭敬。盥(guàn)，洗手。《尺牍新钞·严首升答华藩书》："盥读手书，摹写旅次萧条，如谴如叹，笔端有诗画矣。"

谙 知悉。同"审"。书信中常用如"～知""～悉""不～近况如何"。《苏东坡全集·与章子厚书》："春初辱书，寻遂中裁谢。不谙得达否？"

壹是 一切，一概。《艺风堂友朋书札·王仁俊书》："夫子大人阁下：奉到手谕，敬悉壹是。伏惟师门多福，学界大昌，定如私祝。"

幸甚 很荣幸。《文选·岳希范谕陈伯之书》："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神交 精神之交。指以道义相交，推心置腹。后又以尚未见面而仰慕其人引之为友为神交。《尺牍新钞·严首升与王明最书》："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见，荒城夕阳，顶趾并有沧桑之感。"

抠衣 提裳而行，以示敬意。《礼·曲礼》："抠衣趋隅，必慎唯诺。"又："两手抠衣，去齐尺，衣毋拨，足毋蹶。"《尺牍新钞·林嵋与张公亮书》："与先

生相隔千里，抠衣无从。正如成连弟子，操舟入海，还顾林筱时也。”

腹心 忠诚。《尺牍新钞·徐世溥答黄商侯论保举书》：“如弟不才，忾学宫已将十年，少加自爱，再十年旅进应考，侥幸不被宗师降黜，安往而不得广文哉？使旋，聊布腹心，仁兄以为何如？”

兰襟 衣襟。喻良友。兰，指朋友，语出《易·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尺牍新钞·张鹿徵与刘公勇书》：“契阔兰襟，有怀如岳，闻丁酉秋冬之际，车骑久驻白门，而弟以萍踪流浪，失此良觌，抱歉何言。”

杖履 拄杖和鞋。敬老之辞。不指其人，以示敬意。《礼·内则》：“父母姑舅之衣衾、簟、席、枕、几，不传；杖、履，祇敬之，勿敢近。”古礼五十岁老人得扶杖，又古人入室，鞋必脱于室外。为尊敬长辈，长者可入室而后脱鞋。后遂用“杖履”为敬老之词。《尺牍新钞·陈宏绪与刘伯宗书》：“顷在明圣湖，颇穷冷泉韬光诸胜，留烟霞石屋一带，候仁兄杖履东来，不期山灵妒人，夙痾陡发，前驱至而弟已挂帆行矣。”

把臂 握人手臂，表示亲密。《尺牍新钞·王士祯与顾修远书》：“日日无暇，不得一把臂奈何。”

如面 如同见面。《尺牍新钞·徐世溥与陈伯玑书》：“欧天叙旧，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诗云：羁旅客中客，乱离身后身。念此为我兄，又复怆然。人至为客，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即次，岂不可怜哉。”

垂怜 怜悯(上对下)。《昌黎先生集·后十九日上宰相书》：“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愈再拜。”

见恤 受人体恤怜悯。《文选·吴质答东阿王书》：“不胜见恤，谨附遣白答，不敢繁辞。”

台虑 敬辞，思虑。《颜氏家藏尺牍·吴元莱书》：“别谕自不敢劳台虑。此弟所借以安靖地方之贤技也，况叨梓里乎。”

台爱 敬辞，厚爱。《颜氏家藏尺牍·顾云臣书》：“谬承老先生台爱，委写待漏调琴图二幅，涂鸦之伎，殊不堪入大方之目。”

诱掖 引导和扶助。《尺牍新钞·陈允衡复朱遂初先生书》：“使乎远临，伏蒙谆示，不啻亲炙提诲。但愧衡蒙瞽，无足以当诱掖之勤。”

策引 督促引导。《尺牍新钞·卓发之与李太虚太史书》：“台台以一片至心热肠，宏奖风流，策引后学。凡荷青眼一顾，不啻广厦万间。”

疏越 疏远离散。《尺牍新钞·宋之桢柬吴中阳年兄》：“初年丈有龙门之命，适不佞弟得赐休沐，既弟谒选春明，而年丈以艰归矣。吴水无鱼，燕山乏雁，弟与丈共胞乳者，何能堪此疏越耶。”

青眼 重视。眼睛正视则见青处，斜视则见白处。晋代阮籍对人重视用青眼，对人轻视用白眼。《尺牍新钞·叶棄敬答张参戎明初书》：“弟当其时，方且滚涌墨池，香销囊字，而翁丈抠垂一时之青眼，称百代之鸿儒，见片

毛即云吉光，听半晌即云韶濩。投壶饮酒，弹琴赋诗。即今回思，犹如昨日。”

青及 过目。参见“青眼”。《艺风堂友朋书札·莫绳孙书》：“七月初付政大源局寄上函，谅已早邀青及。小儿在尊府，荷蒙教诲周至，心感无极。”

见及 见过。《柳宗元集·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萧、张前书，亦请见及。至之日，勒为一卷，以垂将来。”

台庇 敬辞，荫庇。《颜氏家藏尺牍·魏学渠书》：“聊布芹私，并复前教，统祈慈鉴。临楮神驰，归舟并祈台庇。制弟名揣肃。”

云谊 深情厚谊。《颜氏家藏尺牍·臧眉锡书》：“获附骥尾，已快平生，乃复蒙云谊殷殷，真如就日饮醇，不知其暖。”

契谊 投合无间的情谊。《尺牍新钞·熊文举与康小范书》：“难弟夙尘契谊，而豚儿又附兰谱，青云在望，激昂如何。”

息壤 信誓之言。典出《战国策》。战国秦武王三年使甘茂约魏以伐韩，茂恐王中悔，乃与王盟于息壤以为信。后以“息壤”为信誓盟约之言。《尺牍新钞·宗灏与黄与权老伯书》：“望老伯夺爱以此理以数，勉为解息。侄辈后起，何辞于责，息壤之言在耳。所以报圮播吾兄者，从今日始。”

书意 用文字表述情感。《苏东坡全集·答李端叔书》：“此事非相见不能尽。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台意 敬辞，崇高的敬意。《颜氏家藏尺牍·李鸿霪书》：“澹兄处，行致台意。中情缕缕，不能尽及。且有不便形之纸笔者，统惟照鉴。神往不宣。”

尊意 敬辞，您的意见。《颜氏家藏尺牍·惠周惕书》：“翰来正直出门，故信归不及取奁。尊意即语广平公，渠再四辞让，即托致谢。”

尊见 敬辞，您的见解。《尺牍新钞·陈孝逸符号管子敬书》：“奸雄人由此一念，故事事不肯罢手，所以能杀天下。尊见如何？”

金诺 守信不渝的诺言，珍贵如金。《史记·季布传》：“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尺牍新钞·某书》：“如蒙金诺，即当书立证据，奉呈台核，约期归还，决不食言也。专此奉恳。顺颂筹安。”

台命 敬辞，您的旨意。《颜氏家藏尺牍·吴元龙书》：“名炉甚精，何当割爱。台命谆切，谊不敢辞。第家藏一二，尽堪抚玩，仍留长兄案头，知弟日侍左右耳。”

素心 心地纯洁。陶渊明《移居》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尺牍新钞·王铎与纪伯紫书》：“素心晨夕，良晤在怀。忽复远征，咏采葛之章，为之三叹。老杜翁高怀不羁，真气迎人，每向长安物色，不敢再屈一一指也。”

雅尚 平素的好尚。《萧子良与荆州隐士刘虬书》：“勤味道腴，幸遵雅尚，岂不乐哉。”

雅抱 高尚的胸怀。《尺牍新钞·

莫廷韩与殷无美书》："经春离家，想彼此同怀。比来雅抱保似，斋头著述，足销穷愁。"

雅意 素旧之意。《文选·吴质答东阿王书》："伐竹云梦，斩梓泗滨，然后极雅意，尽欢情，信公子之壮观，非鄙人之所庶几也。"

懿事 美善之事。《尺牍新钞·许友与周减斋先生书》："顷拜捧瑶函，嘉言懿事，光浮纸背。友同乡同社人，当以五福练作珠环，百灵和为兰蕙，纪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天际真人 天上神仙。《尺牍新钞·孙枝蔚与王贻上书》："承惠示山水闲诸作，初读之，目眩心骇，既则形神萧散，便欲作天际真人想，先生真移我情矣。"

敦笃 诚恳宽厚。《陆放翁答王樵秀才书》："如龙图公虽差远，顾尚可纪，则于足下亦肋瓜葛。蒙敦笃，尤感。旦暮诣见，先此为谢。"

拳拳 恳切、忠谨。《文选·司马迁报任安书》："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尺牍新钞·陆彦龙报吴旦生书》："屡辱手教，拳拳。连篇累牍，不及答问。"

钦钦 忧念难忘。《柳宗元集·报崔黯秀才书》："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

区区 ①思念、爱慕。②自称的谦辞。《苏东坡全集·答李昭玘书》："即欲作书以道区区，又念方以罪垢废放，平生不相识。"《朱熹答曹元可书》："区区于此，所以望于当世之友朋者，盖已切矣。"

悬悬 惦念。《昌黎先生集·与孟东野书》："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

恳恳 诚恳、急切。《尺牍新钞·王思任简徐元仗》："台翁以弟视弟，再求酌教。恳恳。"

忽忽 恍惚、失意。《昌黎先生集·与崔群书》："仆家不幸，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以此忽忽思与足下相见，一道其怀。"

惘惘 失意、迷惘。《尺牍新钞·龚鼎孳与纪伯紫书》："江流无声，故人欲别。恋恋燕矶百尺，遂为千古销魂之地，而知己情深，觉桃花潭真浅矣。别后惘惘，如有所失。此间寥寂，都不堪破愁。"

悬想 挂念。《淳化阁帖释文·张芝与府君书》："前比得书，不遂西行，望远悬想，何日不勤。"

恳恋 诚挚、爱慕。《柳宗元集·与许京兆孟容书》："书辞繁委，无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无任恳恋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悬迟 犹言"久仰"。《后汉书·赵壹传》赵壹报皇甫规书："沐浴晨兴，昧旦守门，实望仁兄照其悬迟，以贵下贱，握发垂接。"

恳款 诚挚、恳切。《颜氏家藏尺牍·颜伯珣书》："昨子书来，劝以留心学业，极为恳款。"

寄情 寄托感情。《尺牍新钞·杨思圣与刘生书》："足下神游竹素，寄情歌吹。览是编也，沿媚泽，涉山辉，

栗栗落落，触目皆宝，其诗家之嚆矢乎。”

蕴结 情思郁结。《尺牍新钞·王士祯将出都与茗文书》：“天涯兄弟，晨夕过从，谊同手足，一旦晨风零雨，天各一方，人孰无情，能不蕴结。”

岑寂 冷清、寂寞。《尺牍新钞·苏桓报陈龙媒书》：“桓白，龙媒足下：西涧伤离，遽焉易岁。彼此岑寂，浩叹何如。承惠远书，自怜怜弟，悲不堪读。”

触绪 受触动而生之情。《尺牍新钞·王士祯与汪茗文书》：“昨者芜城暮雨，官阁孤灯，相见悲喜，真如梦寐。尔时旧愁新感，触绪纷来。对此茫茫，百端交集，窃思百年之中，良会有几。”

感刻 深深感激。《苏东坡全集·与张元明书》：“远辱专人惠书，辅以药物，极济所乏，衰疾有赖矣。感刻感刻。”

感铭 感激不忘，铭刻于心。陈思道《后山集·答陈先辈书》：“书问见遗，感铭心切。”

雪涕 拭泪。《尺牍新钞·顾梦游与周雪客书》：“是时方为催科所窘，虎吏狞兵，性命呼吸，爱我者颤心雪涕。仆方作此闲暇生活，皆笑为辇下弹琴。”

龙钟 沾濡湿润。指眼泪。《艺文类聚》卷卅五《王裒与周弘让书》：“会见之期，长无日矣。援笔揽纸，龙钟横集。”

长想 久思。《宗臣报刘一丈书》：“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

驰思 向往思念。《尺牍新钞·茅维与陈眉公书》：“入夏暂学闭关，並懒酬对，驰思足下，如暑月凉风，招摇不能去怀抱。”

驰系 驰，向往；系，牵挂。《艺风堂友朋书札·曹元忠书》：“顷在礼馆，得奉赐谕。藉谂道履稍有违和，就医沪上，计此时当早占勿药，无任驰系。”

往怀 对往昔的怀念。《艺文类聚》卷卅一《庾冰与王羲之书》：“得示。连纸一丈，致辞一千，只增其叹耳，了无解于往怀。”

苦怀 悲苦的心情。《文选·应休琏与侍郎曹长思书》：“自然之数，岂有恨哉。聊为大弟陈其苦怀耳。想还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怀仰 怀念仰慕之情。《尺牍新钞·胡介与栎园司农书》：“记垂死榻前，握手慰问，仓遽为别，至今耿耿。时从铁老处询知眠食无损，怀抱有加，稍慰怀仰。”

翘企 翘首举踵，形容盼望。《艺风堂友朋书札·张锡恭书》：“去冬知春融后当安车入都，翘企甚殷，又成虚望。”

延企 伸颈举踵，喻远望。《艺文类聚》卷卅七《辛旷与皇甫规谧书》：“旷以不敏，感佩厚惠，愿附骥尾，抚尘而游，咨睹未因，而西望延企。”

廑系 也作“廑念”“廑注”。十分想念。廑（qín），古“勤”字，殷勤。系，惦念。《艺风堂友朋书札·章钰书》：“旬前奉手教，开益宏多。闻从

者须半月后来京，至为翘切。馆中一切如常，足纾廑系。”

仰止 仰望，向往。出自《诗·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尺牍新钞·万时华与李龙侯书》：“弟不肖。章水荒寒，悬车束马；坐困明时，虽与龙侯数年仰止，尚无由宾阶一见。”

跂仰 踮起脚尖。跂，通“企”。《尺牍新钞·熊文举与康小范书》：“握别长安，倏忽八年，跂仰黼黻于丹霄之上，惄如饥渴。”

缓颊 使绷紧的面颊松驰，指婉言劝解，或代人说情。《尺牍新钞·周婴谢谭海澄书》：“明公犹纳之洪流，收以大度者，岂不以贵有把臂之雅，故答其缓颊之殷哉。”

望风 想望丰采。自远处瞻望其人。《文选·李少卿答苏武书》：“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台光 敬辞，对方的丰采、容颜。《颜氏家藏尺牍·刘良书》：“得觐台光，如挹紫芝坐春台之上，温醇和厚，祖风宛在。”

台范 敬辞，对方的仪容、仪范。《颜氏家藏尺牍·郭昌书》：“自违台范，已届深秋，回溯之私，与日俱积。”

台严 敬辞，尊严。《元好问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冒渎台严，不胜惶恐之至。”

光霁 “光风霁月”的省略语。“光风霁月”，天朗气清时的和风、雨过天晴后的明月，用意比喻人物胸襟开朗、心地坦率或政治清明。《艺风堂友朋书札·钱振常书》：“曩岁展率复笺，如觌光霁，阙将候简，积日绵时，愿言之私，如何可喻。”

光仪 光采和仪表。《艺风堂友朋书札·王秉恩书》：“久不接光仪，时深梦毂。”

清颜 清秀的容貌。常作敬辞。《艺文类聚》卷卅《梁元帝与萧挹书》：“阔别清颜，忽焉已久，未复音息，劳望情深。”

容辉 仪容风采。《尺牍新钞·胡介复唐中翰祖命书》：“芜城别路，犹在梦中，回首容辉，忽忽三岁，故交零落，河山黯然，触绪伤怀，万念灰冷。”

鸿仪 敬辞，出自《易·渐》：“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后以“鸿仪”喻官位。书信中常用以称人的风采。《尺牍新钞·某书》：“远隔鸿仪，正殷葭溯。”

紫芝眉宇 初次相识。《新唐书·卓行元德秀传》：“元德秀，字紫，……善文辞，作<蹇士赋>以自况。房琯每见德秀，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后因用这一典故表示初次识面，一睹风采。《尺牍新钞·陈孝逸与邓止仲书》：“紫芝眉宇，阔复数年，尝思此人，如在天际。”

芝宇 参见“紫芝眉宇”。《尺牍新钞·某书》：“某某仁兄台右：久违芝宇，弥切葭思。”

芝眉 “紫芝眉宇”的简说。《颜氏家藏尺牍·吴元莱书》：“远承手谕，如对芝眉，复荷蘧仪，安敢墨拜。”

紫芝 "紫芝眉宇"的简说。《尺牍新钞·蔡复一与长沙府书》："曩拜瑶华，藏袖经年，字不灭也。岭衡相望，远莫致之。惟遥想紫芝，引领轸中一星，心随飙往耳。"

眉宇 参见"紫芝眉宇"。《尺牍新钞·钱谦益与冒辟疆书》："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为天下士，不虚所闻，非独淮海维扬一俊人也。"

况味 境况和情味。《尺牍新钞·龚廷韩与徐巃庵书》："读来札，知况味亦复未佳。佛氏称缺陷世界，正须以清凉心地为对治之药可耳。"

迂阔 不切实情。《尺牍新钞·韩廷锡山中寄衡之伯兄书》："刻苦读书，尽我本分，至于世事，听之于天。处世正如登山，且拣目前稳处置脚，前面纵有险阻，俟到时商量耳。次段迂阔，愿与兄共之。"

悢悢 惆怅。悢，liàng。《文选·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

劳结 忧郁。《文选·曹丕与吴质书》："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三青鸟 使者。《山海经·大荒西经》："沃之野有三青鸟，赤首黑目。"注曰："皆西王母所使也。"《尺牍新钞·蔡复一与毕东郊勋抚书》："有何微音，可当三青鸟乎，谨拜而藏之。容兵事稍定，勉效一言，庶赖赞佛之虔，以忏挠栋之罪。"

损挹 谦虚退让。《尺牍新钞·顾梦游与梅杓司书》："仁兄天才旷逸，弟所仰首而望，愧莫能追，顾蒙损挹垂交，若惟恐失之者。"

大受 才德足以任重的人。《昌黎先生集·答卫中行书》："大受足下，辱书为赐甚大。然所称道过盛，岂所谓诱之而欲其至于是与。不敢当，不敢当。"

涓埃 滴水与轻尘。借以喻微小的贡献。书信中常用作谦辞。《尺牍新钞·熊文举与减斋书》："且严闱有命，誓墓难坚，一出逡巡，四疏迂直，愧无涓埃之效，遂抱终天之痛。"

云泥 云在天，泥在地，比喻人地位悬隔，道路有异。书信中常用作谦辞。《颜氏家藏尺牍·谢兆昌书》："老年台典礼南宫，恩集多士，以视弟之伴食河滨者，真云泥隔矣。"

固陋 见识鄙陋。书信中常用作谦辞。《文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宗工 犹"宗匠"，指学问或技艺为众所推崇的人。《尺牍新钞·顾梦游与就园先生书》："积数十首，待正先生，率易荒陋，何当宗工，或谓樵蕉可削，不敢自外斧斤也。"

袜线 参"袜才"。书信中常用作谦辞。《尺牍新钞·张壬姻复王谷子书》："仆古袜线也、儡之索，蓬转于场，马之汗，雨洒于路。"

疏愚 粗疏愚昧，自谦之词。《昌黎先生集·应科目时与人书》："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

而有是说焉。阁下其亦怜察之。”

顽钝 愚呆。常用作自谦之词。《苏东坡全集·答李端叔书》：“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

愚蒙 愚昧不学。常用作自谦之词。《文选·杨恽报孙会宗书》：“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推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

朴遬 小木。用以比喻才能之浅陋、平庸。也作“朴樕”“仆遬”。书信中常用作谦辞。《尺牍新钞·张九徵与王阮亭书》：“第为柳与黄之人者，无辞于朴遬耳。所有绪言，副之别楮。”

燕贺 庆贺居室落成。出自《淮南子·说林》：“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尺牍新钞·某书》：“谨具不腆之礼，藉申燕贺之私。专此肃请福安。”

完赵 “完璧归赵”的简说。也称“完璧”“璧还”“奉赵”“归赵”。《尺牍新钞·纪映钟与周减斋书》：“经年苦别，一见便披拂此鸿宝，快幸何如。稍俟一二日卒业完赵，亦愿附传不朽耳。”

掷还 敬辞。归还。《颜氏家藏尺牍·惠周惕书》：“连日拟录客中文字，先呈一二义，幸即改抹付下，诗说上卷，亦求掷还。”

轩渠 开怀畅悦。《尺牍新钞·沈灏与罗琨公书》：“陈先生见委作无声诗，须速速付生绢，今发恩兴云，现东南山水，一博轩渠。何如何如。”

桑梓 家乡，故乡。《诗·小雅·小弁》：“惟桑与梓，必恭敬止。”桑与梓为古代住宅旁常栽的树木。东汉以来遂用以喻故乡。《尺牍新钞·金声告邑人送何二尹书》：“其不羞惮廉节如登峻山，而趋货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习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吾为梓惧，谨告长者，维桑与梓，共深念之。”

匝楮 充满整个书信之中。《尺牍新钞·陈孝逸答朱子强书》：“誉言匝楮，何宠之深也。弟年纪浸大，尚持数行文字，从少妙辈问妍媸于不必知己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国舅，言不辱者强颜耳。”

共志 共识。《尺牍新钞·唐堂与吴冠五书》：“曾闻苏文忠见诸子谋业，凡虚字少实字多者，必涂抹掷还，此为文之法也。愿与足下共志之。”

承命 谦辞，接受指令。《尺牍新钞·林简寄周无声书》：“佳诗及诸要，既不肯刻矣，索仆弁言胡为乎。承命，仆敢不勉，但仆尝忆客岁序刘后村诗时，三易稿，几不能存，岂非江瀷见海而退乎。笑笑。”

报命 谦辞，执行命令后回报。《尺牍新钞·许友与周减斋先生书》：“纸佳极，当集诸子闭门为师，作山水花卉，十日内可报命也。”

自处 自行处事。《尺牍新钞·王士云与某书》：“直以行己，不过失官，曲以从人，乃至失性。此两失者宜何居焉。仆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颇知所自处，足下勿过为我虑也。”

祗承 敬辞。敬承，恭奉。《尺牍新钞·徐世溥答钱牧斋先生论古文书》：“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

以嘉教，敢不祗承。来教曰，寄庐小笺，偶兴之书也。偶兴如此，足以传矣。”

稽　滞误、拖延、耽误。《艺风堂友朋书札·丁立诚书》：“春间奉到惠书，以行旌北上，未得确音，有稽笺答，歉甚歉甚。”

捃拾　搜集（文字）。捃，jùn。《尺牍新钞·钱谦益与减斋书》：“三家村中，都无片楮，捃拾非报，未尽驰念。”

尊作　敬辞，称对方的文章作品。《尺牍新钞·陈宏绪与巨源书》：“尊作原帙收藏弟处，兹以录本附上。芋谈师友类竟散失强半，致匡山先生士云诸兄轶事不传，甚为悒悒，亦祈闲中续成之。”

大著　同“尊作”。《尺牍新钞·林之蕃与周减斋书》：“得大著，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无此作矣。”

拙作　称自己作品的谦辞。《张文忠集·答石麓李相公书》：“承以老伯隧碑见委，弟虽不文，素辱同气之爱，敢不敬承。……拙作俟秋冬间呈上也。”

芟薙　删削。芟（shān）、薙（tì），均是除草。《尺牍新钞·卓发之与汤海若先生书》：“蓟邱一集，乞芟薙掷还。”

台削　敬辞，修正、删削。《颜氏家藏尺牍·冯遵祖书》：“外附拙稿两册，先呈台削。因未竣事，鱼豕多讹，集成再奉师席。”

绳削　纠正删削。《尺牍新钞·胡介与龚半千论诗书》：“仆重违故人之意，只得录旧稿十之六七奉正，幸柴丈痛加绳削，以收朋友相成之益。”

批绳　删削纠正。《尺牍新钞·黄景昉与周减斋书》：“先生案牍之暇，时赐批绳，倘稍有一言几乎道，勿吝教音，一题及之，感且不朽矣。”

斧正　谦辞，请人修改文字。又作“斧政”“削政”。用《庄子·徐无鬼》郢人善斧斤斲削的故事。《尺牍新钞·陈衎与邓彰甫书》：“小赋不知堪入目否？万祈斧正，方可就梓。”

郢削　谦辞，以诗文求人教正。参见“斧正”。《尺牍新钞·卓发之与李太虚太史书》：“昨过姑孰，以未得追随杖履为恨。数诗附呈郢削。”

郢政　谦辞，同“郢削”。《颜氏家藏尺牍·李之粹书》：“巴里之音，涂鸦之笔，皆足为大方绝倒，但以愿教之殷，不暇自匿其丑，惟老年台不吝郢政，足纫云谊。”

呈正　敬辞，请人修正文字。《颜氏家藏尺牍·顾宸书》：“今遇知音，敢以绝句一种呈正，尊作亦在内。看过即付还可也。”

呈政　同“呈正”。《尺牍新钞·陈宏绪再与栎园书》：“此外尚有杂著数种，沧桑以来，馇粥不继，苦不能觅人缮写呈政，怅怅如何。”

附郢　谦辞，附上作品请求教正。《尺牍新钞·杨思圣与刘生书》：“不然，拾巩瑕而舍火齐，琢楚璞而虽弁会，此技止此矣。唯足下图之。小诗附郢。”

评骘　评定。骘（zhì），注定。《尺牍新钞·卓发之与宋公》：“近方汇集散佚诸稿，先以一卷求正。乞为一一评骘，指摘瑕颣，以当负剑辟咡之诏，

不负亲炙宗匠一番耳。"

台体 体，身体。《颜氏家藏尺牍·吴元龙书》："顷承教，因对客失复为罪，贱痾疼楚如故，不发不消，医生束手，今惟静以听之，更无他法。台体服药后，可得平复否？"

尊体 同"台体"。《尺牍新钞·许友与周减斋书》："尊体千宜自重，定力如先生，自不待嘱。"

尊恙 恙，病。《颜氏家藏尺牍·吴元龙书》："尊恙似外感居多，万祈静摄，以节劳清心为第一胜剂。"

台恙 同尊恙。《颜氏家藏尺牍·吴元龙书》："台恙闻已平复，尚祈益加珍摄，慎用饮食为上，勿过啖也。"

贵恙 同"尊恙"。《尺牍新钞·叶甲与方八公书》："吾八公当此时不我遐弃，知八公根器厚矣，刻草若成，叙文宜以今日盛名者为冠，苏公以为凶衰不祥之书，奈何可弁冕也。贵恙近如何？幸加餐饭。"

尊用 敬辞。问对方饮食起居情况。《曾巩集·与杜相公书》："春暄不审尊用如何。伏惟以时善保尊重，不胜鄙劣之望。不宣。巩再拜。"

贱体 谦辞。称自己的身体。《颜氏家藏尺牍·赵开雍书》："贱体缠绵，又在逆旅，触事增人怀抱。"

贱恙 谦辞，称自己的病。《艺风堂友朋书札·吕景端书》："兼旬以来，气候不佳，贱恙因之迭作。"

僵卧 卧床不起。《尺牍新钞·徐芳答傅平叔书》："归来僻匿空山，僵卧再月，念西溪一步地，薄分尚难领受，何况天边五老。台札至，读之温生于背，翟然坐起，若亲言对锡，则自为大集中添一首绝妙文字。"

作古 去世。《尺牍新钞·卓发之与颜开美司理书》："闻了宓弟作古，则尤深憾于造物也。追思少年同学，此时已有为名臣卿者，有自摈辐而林下者。子宓才具，犹当横驾其上，而云泥判绝如此。"

见背 父母或长辈去世。《尺牍新钞·顾若璞示诸儿书》："亦缘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见背，至我归时，贫与病合，处世艰阻，事非一端。"

奉倩 婉指丧妻之痛苦。晋荀粲，字奉倩，与妇伉俪之情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庭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死，粲哭之至恸。后以"奉倩"喻丧妻之痛。《尺牍新钞·万时华与李龙侯书》："千古书生尽感恩之句，则弟之感兄，乃当过武子耳。时闻近况，知奉倩之悲，继以寝疾，倚庐深缀，愿龙侯自爱武子。"

西河之痛 因丧子而遭受的痛苦。《史记·仲尼弟子传》："孔子既殁，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后因谓丧子之痛曰"西河之痛"。《尺牍新钞·茅维寄叶相公书》："鼎札至今春始达，稍悉相公里居之概，不以西河余痛，损其行乐高怀。"

慰唁 对遭丧者之慰问。《尺牍新钞·某书》："某某仁弟足下：某以不德，奄遭内子之丧，承赐慰唁，良深感谢。"

枉顾 屈尊看望。称人来访的敬辞。《欧阳修全集·与赵康靖公书》：

"向尝辱许枉顾，虽日企伫，乃出于乘兴，不敢坐邀。"

惠临 称人来访的敬辞。《艺风堂友朋书札・万中山书》："拟十日后函达高斋，转请诸公惠临，共赏石经双璧。"

降睇 敬辞，屈尊看望。《尺牍新钞・周婴谢谭海澄书》："犹望元燕降睇，重过故垒，青骊结乘，或驸旧轩，率而睽携，自知悠忽，瞻言孱恻，不觉嗫嚅。"

照临 同"光临"。敬辞，称宾客来到。《文选・应休琏与满公琰书》："昨者不遗，猥见照临，虽昔侯生纳顾于夷门，毛公受眷于逆旅，无以过也"

台驾 敬辞，对方的车乘，也指人。《尺牍新钞・龚鼎孳与纪伯紫书》："久候台驾不至，知为雨阻也。长歌之妙，裂石崩天，时而玉勒轻裘，时而冰车铁马。"

台旌 同"台驾"。《颜氏家藏尺牍・张锡怿书》："前劳尊使至舍，慢去为歉。日来时望台旌贲临，悬榻以俟者久矣。"

踵谢 谦辞，亲至其门而谢。《颜氏家藏尺牍・梁联馨书》："前承年兄体念，知我之感，耿耿铭心矣，尚容踵谢也。"

造谒 谦辞，往访。《尺牍新钞・陈宏绪再与栎园书》："昭武偶有兵噪之变，道路复梗，稍俟宁息，既图造谒，率谢不既。"

造诣 ①往访。②学问技艺所达到的程度。《晋书・傅咸传》傅咸与汝南王司马亮书："比四造诣，及经过尊门，冠盖车马，填塞街衢。"《朱文公集・答何叔京书》："易说序文，敬拜大赐。三复研味，想见前贤造诣之深，践履之熟。"

觌面 见面。觌（dí），相见。《尺牍新钞・莫廷韩与刘与可书》："二绝婉丽近人，亲于觌面。才士类多有情，语不虚也。"

奉候 敬辞，等候。《尺牍新钞・钟文明与邹满字书》："昨奉候不及见，见佳画喜而欲狂，乃登阁开窗，盘桓徙倚，指天南霄色，如君州窑，红紫闪烁炙人，比之兴尽返者，所得不既多乎。"

鹄候 如鹄引领翘望。鹄颈长，能远望，因喻引领之状。又作"鹄望""鹄企"。《艺风堂友朋书札・华世芳书》："专肃。虔请道安，鹄候赐复。晚学华世芳顿首。"

宇下 敬辞，在某人庇护之下。宇，屋檐。《尺牍新钞・徐世溥上虞抚潘昭度先生辞荐辟书》："宇下深识高蹈之士，年长于溥、材力倍之者，尚有数人，其间诡昧歆羡，钻营冀得者，盍可数计。"

潭第 犹"贵府"。潭，大。《艺风堂友朋书札・邓嘉缉书》："连日大雪，几至四寸，严寒过于去腊，街衢冻毙之人，日以十数，闻见所及，凄恻欲涕。省门春冷如何？维兴止珍摄。万万。潭第咸绥。"

尘浼 打扰。对人有所请求的客气话。《华镇上温倅朱朝奉书》："敢录所为文若干篇，随此专人尘献于门下，

斐然狂简，固不足尘浼清视，姑以致区区之意。”

首肯 点头表示同意。《尺牍新钞·唐时与徐穆公书》：“由今思之，隐然有引之以入于妇人之数，而不许其独为丈夫者，公穆其能首肯焉否也。”

津梁 本意是“桥梁”，引申为“接引”“引荐”。《尺牍新钞·李雯答陈大樽书》：“被放以来，两接手书，故人拳拳，弥增感叹。雯身世相迫，已到穷崖，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以倍笃于往年也。”

齿少 年纪小。齿，牛马幼小者，岁生一齿，因以齿计其岁数。后也指人的年龄。《柳宗元集·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穷踬殒坠，废为孤囚。”

幽明 昼夜。幽，阴，月照夜；明，阳，日照昼。《尺牍新钞·熊文举与减斋书》：“而良书远颁，美于黼绣，煌煌哀些，荣及泉扃。盥一日捧诵既陈，幽明悉为感涕。何老年台重念鲜民，而锡类惠施之过渥也。”

朱明 夏季。出自《尔雅·释天》：“夏为朱明。”《文选·应休琏与从弟君苗君胄书》：“朱明之期，已复至矣。相见在近，故不复为书。慎夏自爱。”

岁杪 岁暮，年末。杪，同“梢”。《尺牍新钞·张九徵与王阮亭书》：“岁杪旅次冗悉，接台札如沃我于梅花树下酌中冷泉也。附谢不一。”

菲仪 谦辞，微薄的礼物。又作“菲物”。杨万里《罗氏定亲启》：“十世可知，继好复从于今始。两端而竭，菲仪仍守于旧规。”

菲敬 同“菲仪”。《艺风堂友朋书札·方功惠书》：“附呈菲敬一函，拙刻二种，祈哂存为幸。手肃，覆请礼安，容再趋送。”

片芹 谦辞，微薄的礼物。参见“献芹”。《尺牍新钞·刘荣嗣回王受人书》：“大贶蓮领，片芹为报。琼来桃往，殊失诗人匪报之旨。弟尝自称曰贫道，此之谓也。”

生刍 新割的青草。《诗·小雅·白驹》：“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后汉书·徐穉传》：“林宗有母忧，穉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后世因称吊丧礼物为“生刍”。《艺风堂友朋书札·王秉恩书》：“附上楮敬六金，聊申生刍之意，希鉴收。未克执绋，良用慊慊，诸希为道自玉，不尽欲白。”

报琼 报答。《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尺牍新钞·宋祖谦与陈伯玑书》：“求墨于足下者众矣，而独以赠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玑之嗜予，犹予之嗜墨也。此语可为吾两人写照。敢持以献，聊当报琼。”

献芹 谦辞，言论之不足取或礼物之微薄。典出《列子·杨朱》：“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茎、芹萍之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尺牍新钞·某书》：“兹寄奉寿幛全幅，寿对双联，藉表献芹之意。尚祈哂存。不胜荣幸。专此录渤，敬颂台安。”

不腆 谦辞，不丰厚。《颜氏家藏尺牍·朱宏祚书》：“岀此附谢，外具

不腆，伏惟垂纳。”

哂存 谦辞，笑纳，请人收下礼物。哂（shěn）微笑，讥笑。又作“哂收”“哂纳”“莞纳”“笑纳”。《艺风堂友朋书札·方功惠书》：“附呈菲敬一函，拙刻二种，祈哂存为幸。”

匆匆 急遽。《苏东坡全集·与广西宪曹司勋书》：“承惠牙蕉数品，有未尝识者，幸得遍尝，感愧不已，匆匆奉谢。”

卒卒 匆促急剧。《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至意。”

薄遽 急迫。《曾巩集·谢吴秀才书》：“顾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于鄙闇，推足下此志，其进岂可量哉？仆之所可告于足下者，无易于自勉也。薄遽不宣。”

草草 谦辞，草率。《苏东坡全集·与张朝请书》：“惟万万若时自得，慰此区区，途次裁谢，草草不宣。”

草削 谦辞，草草写就。《颜氏家藏尺牍·张贞书》：“不揆鄙陋，妄意仰干，所恃宏慈，统加亮宥耳。匆匆草削，不尽所怀。”

草率 谦辞，草草。《欧阳修全集·与冯章靖公书》：“某为目疾为梗，临纸草率。”

草报 谦辞，匆匆禀报。《尺牍新钞·胡介复唐中翰祖命书》：“然胸无至情，而眼孔如豆，那能作得度外事来，还宜自惜头面。率报草草。”

敷陈 铺叙。《尺牍新钞·熊文举与康小范书》：“别久怀深，所欲敷陈于知已者，期期其未悉一也。临书惝恍。”

涂鸦 多作谦辞，比喻书法幼稚。语出唐代卢仝《示添丁》：“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尺牍新钞·陈宏绪再与栎园书》：“知己恩深，竟不获以涂鸦恶札，布悃诚于掌记，悲酸何极，然清夜终不能以自安，聊复扶痛作此。惟老社台鉴之。”

丘言 空话。《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恐犹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凡百 概括之词，泛指一切。《苏东坡全集·答李琮书》：“轼凡百如昨，愚暗少虑，辄复随缘自娱。”

不次 没按寻常次序。用于书信末尾，谦称文字凌乱。《苏东坡全集·答李端叔书》：“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不庄 不端正。旧时写信不用正楷而用行书或草书时，结尾常用此语，以示歉意。《尺牍新钞·熊文举与纪伯紫书》：“俗冗猬集，面目可憎，何时得与诸老友放杖浩歌于荒寒寂寞之滨。弟虽钝笨，尚可索林梅陶菊也。谢教不庄。仰惟原宥。”

不克 不能。克，能。《苏东坡全集·与范梦得书》：“今日谒告，不克往见。辱教，伏承文体佳胜。”

不尽 言犹未尽，不一一细说。用于书信末尾。《尺牍新钞·韩廷锡山中答孟韩妹书》：“奶老矣，膝下爱子越在山中，我辈少年人，犹自不堪，况老人乎。每一念此，叹息而已。妹可体二哥此意，余不尽。”

不悉 同“不尽”。《柳宗元集·与

李翰林建书》："足下默以此书见之，勉尽志虑，辅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不宣　同"不尽"。《柳宗元集·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书虽多，言不足道意，故止于此。不宣。"

不罄　同"不尽"。《艺风堂友朋书札·叶德辉书》："匆具不罄，恭叩道安。"

不儩　同"不尽"。《艺风堂友朋书札·王秉恩书》："专复。敬请撰安，统惟潜察不儩。同门小弟王秉恩顿首。六月廿六日。"

不一　同"不尽"。《归有光与宣仲济书》："人去草草，明当奉晤。不一。"

不既　同"不尽"。《艺风堂友朋书札·陆心源书》："专此布复，敬请台安，惟希惠照不既，愚弟导陆心源顿首。"

不尽缕缕　同"不尽"。缕缕，详尽细致。《艺风堂友朋书札·吕景端书》："专此，敬请著安，不尽缕缕。"

未罄　同"不尽"。《尺牍新钞·蔡复一答刘学宪书》："承教大刻，为黔画者，真是老农谭稼，粒粒皆苦，国医处方，剂剂皆中。所恨牛种无，畜药物不全耳。实心做事之难，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风赋谢，未罄欲言。"

无宣　同"不尽"。《艺文类聚》卷廿一《陆景答从兄安成王书》："心伤泪洒，投笔无宣。"

书不尽怀　同"不尽"。《文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缕既　详尽。《尺牍新钞·陈宏绪与周栎园书》："拙刻附正，胸次万端，嗣图缕既。"

覼缕　委曲、原委。《苏东坡全集·与王敏仲书》："所欲言者，岂有过此者乎。故覼缕此纸，以代面别。"

委折　委曲、原委。《颜氏家藏尺牍·沈荃书》："茹凡所托，承老年翁台谕，即欲为之作札，所有委折，竟尔忘却。"

冒犯　谦辞，多用于书信末尾。《陆放翁答邢司户书》："天下岂有器识卑陋而文词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余罪。"

干冒　触犯。干冒威重，冒犯威严。《苏东坡全集·上蔡省主论放欠书》："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干渎　同"干冒"。《苏东坡全集·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干渎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干黩　同"干冒"。《昌黎先生集·上兵部李侍郎书》："如赐览观，亦有可采。干黩严尊，伏增惶恐。"

惶恐　恐惧。用于书信末尾表示在尊长者面前十分不安。《昌黎先生集·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陆放翁集·答刘主簿书》："属两目苦眩，未得面陈，而先以书布谢。惶恐惶恐。"

惶汗　恐惧流汗。参见"惶恐"。《尺牍新钞·周圻与高康生书》："每展画册，见蔺老以性命应我，使人惶汗。"

战汗　同"惶汗"。《柳宗元集·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生之通塞，决在此举，无任战汗陨越之至。不宣。

宗元惶恐再拜。”

悚惕 忧惧。《艺风堂友朋书札·傅增湘书》：“前奉手教，知前书有开罪之处，悚惕万分。迟回再四，未敢遽答，非故迟滞，实恐措辞再有失当，益以重晚之咎也。”

悚息 惶恐喘息。《三国志·吴·周鲂传》：“谨拜表以闻，并呈笺草，惧于浅局，追用悚息。”

惭赧 惭愧而脸红。《后汉书》延笃与李文德书：“上交不谄，下交不黩，从此而殁，下见先君远祖，可不惭赧。”

无任 不胜，非常。书信中常用套语：“无任荣幸”“无任私幸”“无任欣幸”“无任神驰”“无任依驰”“无任感荷”“无任欣荷”“无任哀祈”等。《苏东坡全集·与曾子固书》：“轼无任哀祈恳切之至。”

起予 原意指能发现了解我意者。后指得自他人的教益。《文选·应休琏与广川长岑文瑜书》：“想雅思所未及，谨书起予。”

垂听 注意听取（用于上对下）。《尺牍新钞·唐时答方孟旋书》：“若碌碌应酬，纵然不竭不困，必不能转而他之也。愿高深垂听焉。”

垂览 阅览（用于上对下）。《尺牍新钞·苏桓上马劬先生书》：“因录所为古文词十篇，附以蓟西杂咏二十七章，伏冀阁下政事之暇，赐垂览焉。”

台览 敬辞，阅览。《颜氏家藏尺牍·朱綵书》：“昨于句曲，聊寄数行奉复，想入台览矣。”

尊览 敬辞，阅览。《艺风堂友朋书札·李详书》：“艺风先生尊览：二十八日奉上一书，计可达览。”

清听 静听、明察善听。常作请人听纳意见的敬辞。《艺风堂友朋书札·罗振玉书》：“诸烦清听，惶悚惶悚。肃叩道安。姻愚侄罗振玉叩上。”

清览 敬辞，阅览。清，公允、明晰。《尺牍新钞·徐芳与汤惕庵书》：“不揣谨备行实一帙，家乘一册，冒陈清览。”

垂察 敬辞，阅览。《曾巩集·谢章学士书》：“竭固陋之分，庶几不愧于偏才一曲之人者，此巩之所可至也。敢献其情而以为进谢之资，惟明公之垂察焉。”

矜察 敬辞，阅览。矜，怜悯。《徐一夔与王待制书》：“贱疾大作，行步不全，谨令侍生奉状上达左右，乞赐矜察。言之当路，别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备。”

省览 考虑、监察。《古文辞类纂·毛生与盖宽饶书》：“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裁省览。”

采览 敬辞，请人有所选择地看。《艺文类聚》卷卅七《辛旷与皇甫谧书》：“献斯一篇，惟蒙采览。”

俯鉴 敬辞，请阅览、鉴察。《尺牍新钞·陈衎与钟仪部书》：“伏惟俯鉴鄙言，惶仄惶仄。”

惠照 敬辞，请鉴察。《艺风堂友朋书札·陆心源书》：“弟八九月间不作远游，台从秋深回南，伏望枉驾苕溪，作平原十日之留。已扫榻小园，盼承大教矣。专肃布复，并谢。敬请礼安，惟希惠照不宣。愚小弟陆心源顿首。”

亮察 敬辞，明鉴。也指希望对方谅解。又作“亮照”。《尺牍新钞·某书》：“自出都后，更不作不为。……今不可复写，千万亮察。”

昭鉴 同“亮察”。《诸葛亮集·与孙权书》：“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书不尽言，万希照鉴。”

宽宥 宽容饶恕。《尺牍新钞·伍瑞隆上葛介龛直指书》：“伏惟台臺定其体材，授以旨意，使捉笔之际，一一遵行。隆自当矢公矢慎，以成盛典。至于梁园授简，滕阁留宾，类略世法之烦，以发文心之净，并乞台臺曲赐宽宥。”

临函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一般在书信末尾用“临函如何如何”套语，表示写信时的心情。《锦带书·卢象升与吴葵庵书》：“某于行吟操管，皆如梦中事，供大方一噱而已。短奏不虔，临函依切。”

临书 同“临函”。《文选·赵景真与嵇茂齐书》：“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身虽胡越，意存断金。各敬尔仪，敦履璞沈。繁华流荡，君子弗钦。临书悢然，知复何云。”

临楮 同“临函”。楮，木名，皮可制纸，因以作纸的代称。《尺牍新钞·陈衍与邓彰甫书》：“作者苦心脉络关纽，实暗藏字句之中，稍经裁断，便索然。临楮干冒，惶仄不既。”

临纸 同“临函”。《苏东坡全集·谢吕龙图书》：“临纸涩讷，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临缄 同“临函”。缄，通“缄”，信封、信件。《锦带书·卢象升与吴葵庵书》：“冗极不遑多布，临缄神驰。”

临启 同“临函”。《尺牍新钞·许友与周减斋书》：“并愿先生且焚研痤笔，暂为枯木，以保雪霜，自有春来，旋荣雨露。友临启可胜瞻注。”

临笔 同“临函”。《吴激答董中丞书》：“激感恩报知，非言可殚，末由庭参，敢冀为家国天下保重。临笔不胜拳拳。不宣。”

临颖 同“临函”。颖，毛笔。《昌黎集·毛颖传》：“以物拟人，称笔为毛颖，纸为楮先生。”《颜氏家藏尺牍·成性书》：“草草奉复。临颖曷胜驰慕之至。”

临池 临池学习书法。池，指砚池。典出自东汉张芝学书的故事。书信中“临池”，同“临函”。《颜氏家藏尺牍·孔允钰书》：“又，昨袁氏札至，言前物已全完矣。未知果否？并问。临池翘注。不悉。”

临禀 同“临函”。《颜氏家藏尺牍·余去祚书》：“顷因张子赴任入楚，顺道归里，特肃荒函，上候万福。临禀曷任瞻驰。云祚再顿首禀。”

临风 同“临函”。《颜氏家藏尺牍·张为焕书》：“特遣小价泥首，伏祈迅惠德音，翘祷翘祷。临风遥企，曷胜依依。”

摄卫 养生，保护身体。同“摄生”“摄养”。《简文帝与慧琰法师书》：“且来雨气，殊有初寒，摄卫已久，转得其力。”

良食 努力加餐。《昌黎先生集·与鄂州柳中丞书》：“临敌重慎，戒轻

出入，良食自爱，以副见慕之徒之心，而果为国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自玉　自珍自爱。《尺牍新钞·宋之桢复李劬云书》：“南中曹事稀简，清议沓杂，即一燕饮，一登涉，亦有操月旦而弄讥评者。千乞为国家自玉。”

谨空　唐人书简末的用语，表示尊敬及请求批复之意。《梦溪笔谈》：“前世风俗，卑者致书于所尊，尊者但批纸尾答之曰反，故人谓之批反，如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故纸尾多作“敬空”字，自谓不敢抗敌，但空纸尾以待批反耳。”《池北偶谈》：“唐人书末曰谨空。”

具署用语

大安　书信末尾问候语。《艺风堂友朋书札·刘世珩书》：“南中闻大水，秋成尚难有获耶。手答，敬请大安，小侄世珩顿首。”

钧安　同“大安”。《艺风堂友朋书札·陈庆年书》：“消息不知如何，千万赐知，至所幸盼。炎威甚厉，怀不能尽。敬请钧安百福。”

潭祺　同“大安”。潭，深也，大也。祺，吉祥。《艺风堂友朋书札·邓嘉缉书》：“缉郁郁谁语，时萦归梦。攫杖何日，念之怃然。春寒，敬惟褆躬宣卫多益，并颂潭祺。”

潭福　同“潭祺”。《艺风堂友朋书札·邓嘉缉书》：“敝乡得先生为寓公，足使湖山生色。它日抠衣攫杖，常侍坐隅，讲习之乐，已为神往。此维顺时笃祜，并颂潭福。后学功邓嘉缉谨启。”

台安　同“大安”。《艺风堂友朋书札·恽祖翼书》：“时局艰危，得人方能撑拄，求操守洁而才识明者尚难多得，况出类拔萃之人耶！肃此复谢，并道歉怀，敬请台安不尽。小弟祖翼顿首。”

台祺　同“台安”。《艺堂友朋书札·盛宣怀书》：“尤虑有关系文字不在史馆及各家文集之中，网罗散佚，端赖贤者。余言已属子渊转达一切。手复，再颂台祺。小弟宣怀又顿首。”

台祉　同“台安”。祉，幸福。《颜氏家藏尺牍·吴元龙书》：“适逢使至，审悉台祉平安，踊跃无量。拜读瑶翰，勤勤恳恳，爱我怜我之谊，溢于纸背。”

尊安　同“台安”。《艺风堂友朋书札·吕景端书》：“率复，敬请尊安。渐安，幸慎餐卫。侄景端肃上。”

崇安　同“尊安”。《艺风堂友朋书札·缪朝荃书》：“曾有拓本见寄，谨奉一纸，乞察入，馀容续陈。专复，祇请崇安，伏祈垂鉴。宗年小弟朝荃拜状。”

崇绥　同“崇安”。绥，安。《艺风堂友朋书札·章钰书》：“即日移居天

津河北字纬路字泰里，附闻以便通信。冗次，祗叩艺风先生崇绥。”

寿祺 长寿吉祥。《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石屏》《梅屋》二词，务属饶兄速写，俾仆人早归，至盼。肃此，敬叩寿祺。”

福安 幸福、安康。《艺风堂友朋书札·叶德辉书》：“大著《金文最补》亟思快读，如蒙赐睹，当即属工校刊。湘中刻资较金陵、江、浙价廉，惟板式行格，拟用公《艺风堂集》旧样，以昭划一。公谓何如？专此鸣谢，并叩福安。”

颐安 颐，身体保养。《艺风堂友朋书札·张鸣珂书》：“天气融和，百花齐放，惜未能追陪杖履，一听花外书声也。专肃，祗叩颐安不尽。弟鸣珂顿首。”

颐绥 同“颐安”。《艺风堂友朋书札·章钰书》：“如何办法，敬请函示。祗叩艺风先生颐绥。”

颐祺 同“颐安”。《艺风堂友朋书札·钱振常书》：“昨柚岑言，有便役可带书，追而作此笺。阁下观其字迹，绎其词气，而知其惫矣。率报，上叩年伯大人颐祺，并请开安。即惟朗鉴不宣。”

礼安 礼，祝福。《艺风堂友朋书札·方功惠书》：“附呈菲敬一函，拙刻二种，祈哂存为幸。手肃，复请礼安，容再趋送。”

万福 多福。《昌黎先生集·与孟尚书书》：“未审入秋来眠食何以，伏惟万福。”

侍安 侍，侍奉于帝王左右，做官。《艺风堂朋友札·莫绳孙书》：“局琴《韵会》虽已蒇工，尚待修补。知念附及，敬请侍安。诸希谅察不具。姻小弟制莫绳孙顿首。”

双安 这里的“双”，指对方夫妻俩。《艺风堂友朋书札·恽祖翼书》：“默观时局，不愿日久滥竽，拟稍作迟回，即陈情归去。明知故里亦非桃源，较胜身肩重担也。匆匆肃布，敬请双安。”

俪绥 同“双安”。俪，配偶。《艺风堂友朋书札·吴德潇书》：“拨冗匆匆，敬颂俪绥新祺。”

坤安 坤，女性，这里指向对方女性亲属问安。《艺风堂友朋书札·莫绳孙书》：“二伯、伯母大人尊前敬祈叱名请安，嫂夫人坤安，虚甫令弟统此请安不另。”

近安 《艺风堂友朋书札·王崇烈书》：“昨读佩师外丙中壬之说，又值读罗叔言君《殷墟书契》之编，而外丙字竟见于古龟板中，真快事也。于《孟子》多一注脚矣。谨此再肃，伏乞箴训时锡。再叩近安。崇烈百拜上言。”

年安 祝贺新年。《艺风堂友朋书札·万中立书》：“写书、刻板、印纸费若干？亦乞示及。敬请年安。中立顿首。除夕前一夕。”

岁釐 同“年安”。釐，通“禧”。《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又吕晚村手书家训五卷，似不多见。冗次，率叩岁釐。昌绶谨上。”

新安 岁始的祝福。《艺风堂友朋书札·张謇书》：“要之堤未全成，必须日驻工次乃妥耳。敬请艺风老前辈

大人新安。晚苇顿首。正月八日。”

新祺 同“新安”。《艺风堂友朋书札·吴德潚书》：“每忆吾兄大著，记本朝事实，不审何时编定？时深梦想，何时从公掀髯一快读之耶！拨冗匆匆，敬颂俪绥新祺。”

春祺 用于新春的祝福语。《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明日旧历除夕，仍不得闲。灯下率勘，恭叩春祺。昌绶谨上。二月朔。”

春祉 同“春祺”。《艺风堂友朋书札·谭廷献书》：“连日锁印迎春，公谅亦未与耕老通辞。此承筱珊先生同年春祉。年筱弟廷献顿首。”

暑安 用于夏季的问候语。《艺风堂友朋书札·谭廷献书》：“刘光珊函，先睹之愿甚愁如。手上，即承筱珊道兄同年暑安。年小弟献顿首。”

秋安 用于秋季的问候语。《艺风堂友朋书札·秦臻书》：“肃引奉布，顺颂秋安。伏维赐察不具。弟秦臻顿首。”

秋祺 同“秋安”。《艺风堂友朋书札·王存善书》：“如《石经校勘记》及李莼老笔记考经史各条，中有可疑，非查检原书不能臆改也。敬颂秋祺。”

冬安 用于冬季的问候语。《艺风堂友朋书札·缪朝荃书》：“桑志知已写竟，务求法眼校定，方可付刊。如刊资已罄，即当续奉。费神之至，感不尽言。弟前月杪又赴沪一行，于初八晚返里。顽体称尚敉平，并以附报。专复，祇请冬安。宗年小弟朝荃拜上。”

炉安 同“冬安”。《艺风堂友朋书札·吴俊卿书》：“客中无书可翻，吾先生肯为指示一是否？封面篆竟，即走叩请教。复请炉安。后学俊顿首。”

升安 升，升迁。《艺风堂友朋书札·张鸣珂书》：“建霞先生处写件，便望一催，此恳。即请升安。制弟鸣珂再顿首。”

勋安 勋，功绩。《艺风堂友朋书札·盛宣怀书》：“应由何处电局取书，请随时填发，随时寄知。因卷页累重，俟有主顾，再行运寄也。手布，敬请勋安，不尽一一。世小弟宣怀顿首。”

馔安 馔，饮食。《艺风堂友朋书札·杨葆光书》：“鄙人亦有拙句，检呈两分，聊博一粲。肃笺专恳，敬请馔安，统祈涵照不尽。教小弟杨荷光顿首。”

旅安 旅，出差旅行。《艺风堂友朋书札·吴得惠书》：“京友虽有多人，大率不相来往。因念勸此，敬请旅安。”

轺安 同“旅安”。轺（yáo），使者所乘之车。《艺风堂友朋书札·丁绍基书》：“鳞鸿有便，尚望惠锡箴言。都门近事，并望示悉为荷。专此布谢，敬请轺安，统希爱鉴，不备。”

文祺 文，学问，文章。《艺风堂友朋书札·郑海仑书》：“留俟数天，致身于书香燕几之间，大嚼咸牛，长许附骥，执事以为如何？谨将短帖，布此憧憧，统希亮照，恭候文祺。”

著安 著，写作。《艺风堂友朋书札·郑孝胥书》：“艺风先生左右：承赐《濠堂铭》，绵丽工雅，如出诚斋、后村手笔。雒诵欢悦，不能自已。布谢，敬请著安不一。孝胥再拜上。望日。”

箸祺 同“著安”。箸，同“著”。

《艺风堂友朋书札·钱溯耆书》："衡甫兄抱丧明之痛，其儿妇绝粒以殉。家运攸乖，老怀大损。度以走告台端，必为之阐幽纪实，以待輶轩。亦立言君子所谊不容辞也。手肃，敬颂箸祺，伏维爱鉴不具。"

纂安 同"著安"。《艺风堂友朋书札·吴俊卿书》："比来贱躯病暑良苦，俟秋凉再趋教，并谢一切。倘荷惠复，尤感。专肃渎恳。敬请纂安。后学俊卿顿首。"

撰安 同"著安"。《艺风堂友朋书札·陶濬宣书》："并附呈长歌，藉博一粲。馀迟走谢。敬承小山仁兄同年大人撰安。"

吟安 吟，吟诗、作诗。用于对文人墨客的祝福。《艺风堂友朋书札·王鹏运书》："《洪幼臣文集》，独公所需一卷不在全集中，记曾取出读之，不知在何处矣。刻即登车入山，匆匆未遑寻觅，归来再觅呈。此复，请筱珊仁兄大人吟安。弟期运再拜。"

讲安 讲，讲学。《艺风堂友朋书札·缪朝荃书》："病体甫瘳，草草不恭。敬询讲安，伏希垂鉴。"

刻安 刻，刻书，出版书。《艺风堂友朋书札·杨守敬书》："而守敬犹有诸者，敝处于古之不存者，凡有见皆双钩刻之，可否假我一二日，摹以传世。则嘉惠学者尤广，如何如何，唯裁察。即颂刻安不庄。守敬顿首。"

校安 校，校勘。《艺风堂友朋书札·傅增湘书》："近得数书，录如别纸，鉴定为幸。此请校安。棘人傅增湘稽顿。"

简安 同"大安"。《艺风堂友朋书札·蔡右年书》："徜徉山水，话旧瀚书，得践君言，固所大愿。专此奉复，敬请简安。诸维爱照，不尽欲言。年如小兄期右年顿首。"

开安 开，岁始。《艺风堂友朋书札·陶濬宣书》："有复信一函、书两册，烦便中转致。馀非面不既。敬承小山仁兄同年大人开安。"

开祺 同"开安"。《艺风堂友朋书札·顾印愚书》："岁暮天末，岑寥寡欢，率书申谢，敬候开祺不备。顾印愚顿首。"

痊安 痊，痊愈。《艺风堂友朋书札·吕景端书》："长者谓病最磨人，亦最误人。侄一生为病所磨所误，读此二语，真惊心动魄也。敬颂艺老表叔大人痊安。"

崧辰 好运。崧，高大；辰，时运。《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书》："回溯前年谈宴之乐，曷任驰仰。率启，敬叩崧辰，不庄不备。问业弟子吴昌绶谨肃。"

专此 书信末尾用语，表示恭敬。后边可接续"禀渎""奉答""布复""布渎""布达""奉达""奉讯""肃泐""肃复""琐渎""奉谢""致谢""鸣谢""附谢""布恳""奉留"等等，也可独用。又作"耑此"。"耑"，是"专"的异体字。另有"谨此""肃此""手此""草此"等套语。《颜氏家藏尺牍·徐乾学书》："原欲走叩面恳，恐不相宜，耑此布渎。临启虔悚。"

布达 陈述、表达。《尺牍新钞·某书》："一俟摒挡琐务，即当首途来

前，面谢一切。手此。”

副启 正式信件之外附加的信。明王世贞《觚不觚录》：“尺牍之有副启也，或有所指讥，或有所请托，不可杂他语，不敢具姓名，如宋疏之贴黄类耳。近年以来，必以此为加厚，……甚至有称副启一、副启二。至三至四者。又作“副笺”。《艺风堂友朋书札·傅增湘书》：“手教并副笺均读悉。”

别楮 另外的附信。《张居正答应天巡抚胡雅斋书》：“辱华翰及别楮，捧读数过，不胜浣慰。”

拜言 禀告。《昌黎先生集·后十九日复宰相书》：“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顿首 叩头。表示写信者的恭敬。可用于信的开头或末尾。《陆放翁全集·答邢司户书》：“五月二十六日笠泽陆某顿首再拜复书司户迪功足下：某辱赐书及圣人之道与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称师弟子，而徒事科举、求利禄者为羞，卓乎伟哉。”《李陵答苏武书》：“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

再拜 一拜而又拜，表示对收信人虔诚恭敬。一般用于信尾。《昌黎先生集·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愈再拜。”

泐 泐（lè），雕刻。通“勒”。引申为书写。手书又作手泐。书信末尾落款常作“某某泐”。《艺风堂友朋书札·丁绍基书》：“夏间夏薇卿进京，挥汗匆泐一函，附呈唐刻《道德经》并元氏汉唐碑数种，正以未奉赐复为怅。”《艺风堂友朋书札·钱振常书》：“颠眩心痛，叵耐作字，诸交好处，久未寄笺，兹因房医蓬窗，心中略谧，率泐布臆。

丙丁 古代以天干配五行，丙、丁属火，后来称火为“丙丁”，或叫“丙”，并把付诸火焚叫作“付丙丁”、“付丙”。《李光与胡邦衡书》：“近又缘虚惊，取平生朋友书问，悉付丙丁。”《艺风堂友朋书札·叶德辉书》：“此纸阅后付丙。”

描写用语

山

碧峤 bì qiáo　青山。因满山松柏，青翠蔚然故称。峤，山锐而高。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

螺髻 luó jì　形容山峦浑圆，状如美人发髻。明·袁宏道《灵岩》："登琴台，见太湖诸山如百千螺髻，出没银涛中。"

霞壁 xiá bì　形容石壁光洁明亮。明·袁宏道《由小溪至水心崖记》："岩削立数十仞，正侧面皆霞壁，有窦八九，下临绝壑。"

童山 tóng shān　光秃无草木的山。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两山密树深箐，与贵阳四面童山迥异。"

椒麓 jiāo lù　山巅与山脚。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唐宋间楼阁参差，弥布椒麓。"

崖巘 yá yǎn　陡壁与高峰。唐·李渤《南溪诗序》："溪左屏列崖巘，斗丽争高。"

岩崭 yán zhǎn　指险峻的峰峦。宋·欧阳修《送陈经秀才序》："山两麓浸流中，无岩崭颓怪盘绝之险，而可以登高顾望。"

危岫 wēi xiù　高耸的峰峦。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岩南山峰隔江排立起，横陈南天，上分危岫。"

危峤 wēi qiáo　陡峭之山。唐·吴武陵《新开隐山记》："万林危峤，夹耸左右。"

绝巘 jué yǎn　山之极顶。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遂登绝巘，则越王坛也，是为桂山。"

峻坂 jùn bǎn　险峻的山坡。清·陈元龙《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从荆湖逆溯湘流，如登峻坂。"

狠石 hěn shí　指形状凶恶的石头。清·乔莱《湘漓二水记》："其江多狠石蹲踞，穿急滩，下旋濑，顷刻百里。"

巉石 chán shí　高峻的山石。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山根中时出清泉，激喷巉石中，悄然如语。"

巉岩 chán yán　高而险的石山。明·袁宏道《从舍身岩至文殊狮子

岩》："每登山，则皆问巉岩几处，骨几倍，肤色何状？"

崇岩 chóng yán　高峰。晋·慧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

嵁岩 kān yán　深山峭壁。唐·李涉《南溪元岩铭并序》："酒一卮兮琴一曲，嵁岩之下，可以穷年。"

万仞 wàn rèn　形容极高。仞，八尺。宋·范成大《吴船录》："雷洞者，路在深崖，万仞磴道，缺处则下瞰沉黑若洞然。"

摩霄 mó xiāo　高入云霄。宋·范成大《吴船录》："惟大峨一山，其高摩霄，为佛书所记普贤大士示现之所。"

凌虚 líng xū　高入太空。清·陈钟麟《阳朔永邮记》："凌虚有一十八盘，什数则三百余里。"

攒峙 cuán zhì　群聚耸立。明·瞿昌文《粤行纪事》："盖苍梧之西北，万山攒峙，僮瑶错处。"

错峙 cuò zhì　交错耸立。宋·王履《南峰记》："去洞，沿故路东行，降八九折，缘磴复升，巨石错峙。"

鼎峙 dǐng zhì　如鼎之三足而立。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峰顶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

突峙 tū zhì　耸立。明·乔宇《恒山记》："相传飞于曲阳县，今尚有石突峙。"

骈立 pián lì　并列而立。明·李裕《华山记》："天顺间，余尝巡按是邦，道经山下，仰望芙蓉、明星、玉女诸峰，骈立天确。"

竦出 sǒng chū　突出。元·麻革《过龙山记》："山竦出，崭然露芒角。"

玉立 yù lì　形容姿态秀美。宋·张栻《南岳游山唱酬序》："宿雾尽卷，诸峰玉立，心目顿快。"

岿介 kuī jiè　岿然独立。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孤山岿介湖中，碧波环绕，胜绝诸山。"

孤拔 gū bá　形容山势挺立突出。唐·吕温《送薛大信归临晋序》："皆天光朗映，秀气孤拔，岂藻饰而削成者。"

奡兀 ào wù　傲然耸立。清·谢振定《登太华山记》："峰背有赛华山，气象亦奡兀，少北为'三公山'，如列鼎。"

片插 piàn chā　单独耸立。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又里许，至草庵，则状元峰南一峰片插。"

孤标 gū biāo　高标特出。明·董传策《游桂林诸岩洞记》："已，又登崖，望独秀峰，孤标直耸。"

单椒 dān jiāo　形容山形独立而尖削。清·朱弦《八景说》："山形单椒，秀泽不连，岭以自高。"

蛮锷 mán è　形容山势陡险状。明·刘侗《红螺崄》："东去三十里，有红螺崄焉，山通体一蛮锷，而峦诸相具。"

卓笔 zhuō bǐ　直立的毛笔，形容山势峭削。明·程嘉燧《自昌化至歷溪》："又前，有大冥山十余峰，尤峭削如卓笔。"

岧亭 tiáo tíng　高耸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澧水》："吴永安六

年，武陵郡嵩梁山，高峰孤竦，素壁千寻，望之苕亭，有似香炉。”

戌削 xū xiāo　清瘦貌。清·袁枚《游武夷山记》：“如用倚天剑截石为城，壁立戌削，势逸不可止。”

峭裂 qiào liè　陡峭坼裂。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垂石上穹无际，下陷成潭，颓洞峭裂。”

崆峒 kōng dòng　山体中空如大洞。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海阳山俱崆峒贮水。”

礧磈 léi kuǐ　石头大而多。明·周叙《游嵩阳记》：“路循深溪，滩石礧磈，按辔徐行，毛发森竖。”

磊砢 lěi kē　堆积众多貌。明·张岱《西湖梦寻》：“两地皆石薮，积牒磊砢，无非奇俏。”

窊隆 wā lóng　高下貌。明·屈大均《登华山记》：“西峰之石，窊隆不一，皆如莲叶倒垂，有筋交络。”

隐磷 yǐn lín　形容石头大小不等，高低不平。唐·杨炯《辞官寻杨隐居诗序》：“石隐磷而环阶，水潺湲而匝砌。”

支离 zhī lí　残破不全的样子。清·汪中《经旧苑吊马守真文》：“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

荦确 luò què　山上石头大而多的样子。明·周叙《游嵩阳记》：“沿洛阳南至河，水清，驶水滨，山石荦确。”

剥泐 bō lè　剥蚀崩裂。明·宋濂《游荆涂二山记》：“石未剥泐，文尚可读。”

皴竖 cūn shù　形容石头的外形粗绉竖裂。明·王思任《游九奇峰五老峰记》：“壁垒俱石皮皴竖，远望之披柴堆炭也，以朴鲁妙。”

怪特 guài tè　指形态特别怪异。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以为凡是州之山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颓怪 tuí guài　指山势险恶。宋·欧阳修《送陈经秀才序》：“山两麓浸流中，无岩崭颓怪盘绝之险，而可以登高顾望。”

嶙峋 lín xún　山崖突兀的样子。清·陆以湉《冷庐杂识》：“龙洞窈窕，鹫峰嶙峋。”

皱瘦 zhòu shòu　形容山石细瘦而纹理聚结如皱。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其岸根水洗石出，亦复皱瘦巉嵘。”

窅窱 yǎo tiǎo　深远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汶水》：“石壁窅窱，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如在云中。”

窈窱 yǎo tiǎo　幽深貌。明·张岱《西湖梦寻》：“其山秀石玲珑，岩窦窈窱。”

文莹 wén yíng　色彩斑斓，质地晶莹。明·张岱《西湖梦寻》：“玛瑙坡，在保俶塔西，碎石文莹，质若玛瑙，采之以镌图篆。”

秀异 xiù yì　美好奇特。宋·王得臣《登莲花峰记》：“惟有华山莲花峰之秀异未睹，今则力役一登尔。”

秀润 xiù rùn　美好滋润。宋·佚名《游韩平原故园》：“虽草木残毁殆尽，而山石秀润可爱。”

奇秀 qí xiù　少见而美丽。明·张岱《西湖梦寻》："南山自南高峰逦迤而至城中之吴山，石皆奇秀一色。"

耸秀 sǒng xiù　高而秀丽。《宋书·刘穆之传》："既而至一山，峰崿耸秀，林树繁密，意甚悦之。"

淡怡 dàn yí　形容春山颜色浅淡明丽。《宣和画谱·山水》："熙后著山水画论，言近远浅深，风雨如晦，四时朝暮之所不同，则有春山淡怡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透而如睡之说。"

遒逸 qiú yì　遒劲飘逸。明·张岱《西湖梦寻》："一片云、神运石，风气遒逸，神明刻露，选石得此，亦娶妻得姜矣。"

浑朴 hún pǔ　浑厚朴实。明·张岱《西湖梦寻》："此石但浑朴，不复起奇峰。"

轩豁 xuān huò　高大明豁。清·袁枚《游武夷山记》："又如禹铸九鼎，罔象夔魈，轩豁成形。"

敞豁 chǎng huò　宽敞开阔。宋·罗大经《游桂林岩洞与容州勾漏洞天》："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

横骞 héng qiān　横飞，这里指石崖悬起，向外往高伸展。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石崖横骞其上，仅可置足。"

崭横 zhǎn héng　高峻横隔。清·姚鼐《游媚笔泉记》："其将平也，两崖忽后，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径。"

偃宕 yǎn dàng　仰卧的石头。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兼茅中自时有偃宕，疑为虎穴。"

盘屈 pán qū　怪石随着溪岸弯曲屈折的样子。唐·元结《右溪记》："悉皆怪石，攲嵌盘屈，不可名状。"

盘绝 pán jué　指山路曲折难行。宋·欧阳修《送陈经秀才序》："山两麓浸流中，无岩暂颓怪盘绝之险，而可以登高顾望。"

诡俶 guǐ chù　奇异。清·乔光烈《登华山记》："洞毖石态，诡俶之观，蹬危梯涩，缒曳之险。"

哆张 chǐ zhāng　开口貌。明·胡直《游七星岩记》："左右石柱凡三，北则哆张而天入焉。"

谽谺 hān xiā　谷中空廓貌。元·李孝光《雁山十记·大龙湫记》："而其颠谽谺，犹蟹两螯，明一动摇，行者兀兀不可入。"

空嵌 kōng qiàn　玲珑貌。清·罗辰《游隐山六洞记》："洞口较狭，郁崩空嵌。"

騞擘 huō bò　山崖开裂的样子。清·张裕钊《游虞山记》："有二石中分，曰剑门，騞擘屹立，诡异殆不可状。"

奇邃 qí suì　奇异而深。明·袁宗道《上方山四记》："峰后有云水洞，甚奇邃。"

坎嵎 kǎn yú　凹陷弯曲之处。唐·李渤《南溪诗序》："西北曰玄岩洞，曲通坎嵎，晴眺滴水。"

岩幽 yán yōu　山谷深处。唐·杨敬之《华山赋》："噫气厥然，怒乎岩幽。"

隩区 yù qū　幽深而秀丽之地。元·汪泽民《游黄山记》："夫山水缭绕，

自为隩区于高峰之下。"

郁茀 yù fú　山势层叠貌。清·罗辰《游隐山六洞记》："洞口较狭，郁茀空嵌。"

郁律 yù lǜ　山深峻的样子。宋·范成大《过三峡记》："最西一峰似之而差小，余峰皆郁律非常，但不如两峰之诡特。"

盘郁 pán yù　曲折幽深。明·张岱《西湖梦寻》："独孤山盘郁重湖之间，水石草木皆有幽色。"

绵络 mián luò　延续联络。唐·元晦《四望山记》："亭之前后，绵络山腹，皆溪梁危磴。"

轮囷 lún qūn　盘曲。清·戴名世《赠赵骖期序》："齐鲁山泽间多瘿瘤之疾，臃肿轮囷。"

回攒 huí cuán　曲折簇聚。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倚松而坐，瞰坞中峰石回攒，藻缋满眼。"

纡谲 yū jué　曲折多变。明·张岱《陶庵梦忆》："放舟焦山，山更纡谲可喜。"

瑰玮 guī wéi　宏伟。宋·曾巩《游信州玉山小岩记》："森然巍然，瑰玮奇怪，与珉珹甚远。"

昂藏 áng zàng　高峻轩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淇水》："又东北，沾水注之。水出壶关东治台下，石壁崇高，昂藏隐天。"

磅礴 páng bó　大的样子。清·乔莱《游七星岩记》："入洞门，巨石磅礴，拾级而下，然炬入其崖。"

雄拓 xióng tuò　雄伟宽广。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洞雄拓，门亦西北向，仰眺崇赫。"

雄特 xióng tè　雄伟奇异。元·虞集《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明日登小孤山，观其雄特险壮，浩然兴怀。"

雄尊 xióng zūn　雄伟庄严。元·麻革《游龙山记》："若太华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儿之婉严，马权、白马之端重，兹山固尤之。"

竦桀 sǒng jié　突出耸立的样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其颓岩所余，比之诸岭，尚为竦桀。"

峣兀 yáo wù　山高险貌。宋·王履《南峰记》："由是自岩底北旋，峣兀中度小榷，又度架枝代榷者三，若波舟之所摇荡。"

突兀 tū wù　高耸特出的样子。宋·陆游《过小孤山大孤山记》："自舟中望之，突兀而已。"

突怒 tū nù　突起挺立的样子。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

斗发 dǒu fā　高崖峻绝陡立状。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洞外即飞崖斗发，裂隙迸峡。"

斗叠 dǒu dié　重叠高耸貌。明·袁宏道《从天池逾合郡岭至三峡涧》："而石斗叠，忽落为潭。"

斗峻 dǒu jùn　陡峭，险峻。明·李裕《华山记》："登跻之径，险绝斗峻。"

员峭 yuán qiào　山顶高而耸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巨洋水》："巨洋水又东北合康浪水，水发县西南峨山，无事树木，而员峭孤峙，巑岏

分立。”

巉峭 chán qiào　高峭险峻。唐·符载《梵阁寺常准上人精院记》：“峰峦不巉峭，无以为英华。”

偃卒 yán zú　倾斜而险峻状。明·胡直《游七星岩记》：“愈南，窈窕偃卒，伛偻行数十步，又复宏衍。”

峭岸 qiào àn　悬崖峭壁。宋·朱熹《百丈山记》：“出山门而东，十许步，得石台，下临峭岸，深昧险绝。”

峭卒 qiào zú　陡峭高峻。宋·柳开《游天平山记》：“回轮连接，崭岩峭卒，虽善工亦不可图画。”

嵯嵲 cuó niè　山高貌。明·张岱《西湖梦寻》：“悠然向溪坐，况对山嵯嵲。”

嶕峣 jiāo yáo　高峻貌。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嶕峣。”

岧峣 tiáo yáo　山高的样子。宋·范成大《过三峡记》：“言其山岧峣，终日犹望见之。”

棱层 léng céng　高峻突兀貌。明·吴同春《太华双游记》：“挽余而下，饱尝棱层，岂复故吾。”

崚嶒 léng céng　高峻突兀貌。清·林倜《由藏归程记》：“巨石临崖，崚嶒逼仄。”

硉矹 lù wù　岩石突兀貌。清·吴阐思《匡庐纪游四则》：“踏涧中石，策仗而行，高低硉矹，两足不并立。”

崷崒 qiú zú　峥嵘高峻的样子。宋·欧阳修《画舫斋记》：“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于两檐之外。”

崇赫 chóng hè　山高大显赫。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洞雄拓，门亦西北向，仰眺崇赫。”

崔嵬 cuī wéi　高峻。宋·范成大《吴船录》：“此诸山之后，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数十百峰。”

巃嵸 lóng zōng　山高耸貌。明·董传策《游桂林诸岩洞记》：“复为指点桂林三峰，巃嵸宛转，悉入瞩界。”

陡崱 dǒu zè　高耸峻峭。清·乔光烈《登华山记》：“以山最陡崱，必旋盘十有八折，乃得升，故以名之盘。”

峗峨 wēi é　同“巍峨”，形容山高大。明·张岱《西湖梦寻》：“泰岳既峗峨，补陀复杳渺。”

崎危 qí wēi　陡险高峻。宋·张缙《游玉华山记》：“然荒崖穷谷之崎危，废宫颓地之萧条，虽累岁月，未尝有一二人游焉。”

嵚削 qīn xiāo　高峻陡峭。明·袁宏道《从云峰寺至天池寺》：“路嵚削，杖而跻，遇泉则卷叶以酌。”

嵚崟 qīn yín　山石高大的样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嵚崟。”

嵚崎 qīn qí　山高峻不平貌。清·黄肇敏《黄山纪游》：“登阶而左，则迎面莲花，莲蕊两峰，嵚崎直峙。”

崎嵚 qí qīn　山高峻不平貌。清·乔光烈《登华山记》：“然自第一关来，虽崎嵚塞侧，尚可觊士人之健且习于险者，以篮舆舁至坪所。”

攲嵌 qī qiàn　石块错斜嵌插溪岸的样子。唐·元结《右溪记》：“悉皆怪石，攲嵌盘屈，不可名状。”

穹嵌 qióng qiàn　山高险处。唐

·陶翰《仲春群公游四司直城东别业序》："出迥塘而入苍翠，更指深亭，因曲岸而扪穹嵌，忽升绝顶。"

岖崟qū yín　形容山势高险。明·魏敏政《夜渡两关记》："石栈岖崟，悉下马累肩而上。"

嶜崟jīn yín　又高又尖的样子。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张子平云：'幽谷崟嶜，夏含霜雪。'信夫！"

岌嶪jí yè　高耸的样子。宋·苏轼《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

嶪嵲yè niè　山高危貌。明·江瓘《游黄山记》："苍崖嶪嵲，有洞穹然。"

巀嶪jié yè　形容山高耸陡峻。明·程启充《游千山记》："东引瓯脱，南抱辽阳，巀嶪蓊郁，时有佳气，如海蜃然。"

崒嵂zú lǜ　山势高峻而危险的样子。清·张道浚《游劳山记》："环海百余里，名劳盛，群峰复岭，崒嵂而起。"

巑岏cuán wán　峻峭的山峰。元·麻革《游龙山记》："下瞰无底之壑，危峰怪石，巑岏巧斗，试一临之，毛骨森竖。"

崄巇xiǎn yǐ　险峭。宋·曾巩《游信州玉山小岩记》："其道盘屈崄巇，而无光明，蹊超俯降，登陟艰难甚。"

巇嶔xī qīn　山势险要。明·袁宏道《华山记》："登崖下望，攀者如猱，侧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鹞，山之巇嶔乃至此！"

岝崿zuò è　山高险貌。清·曹文埴《游黄山记》："群峰之岝崿崟，皆隐而不见。"

厜㕒zuī wéi　山峰高峻。清·钱谦益《游黄山记》："庵背莲花，面天都，负心厜㕒，蔽亏云汉，俯视洞壑，日车在下，阴茀檐。"

磳碚qūn zēng　山石高危的样子。唐·元结《峿台铭序》："下当洄潭，其势磳碚，半出水底，苍然泛泛，若在波上。"

嶪巀yè jié　高耸陡峻貌。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飞梁嶪巀，千丈层崖之中。"

窈然yǎo rán　幽暗深邃的样子。宋·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有穴窈然，入之甚寒。"

窅然yǎo rán　深远的样子。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由隙历磴数十级，直至窝顶，则窅然平台圆敞，中有罗汉诸像。"

岈然xiá rán　山谷深空貌。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从天都峰坳中北下二里，石壁岈然。"

洼然wā rán　溪谷低下的样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

屹然yì rán　高耸直立的样子。宋·张缗《游玉华山记》："双壁屹然，如削石而成，既至其处，若视瓮。"

峨然é rán　高耸的样子。宋·曾巩《游信州玉山小岩记》："有势依瑰合，峨然覆于空而存者。"

隐然yǐn rán　庄重的样子。宋·欧阳修《岘山亭记》："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

崛然jué rán　突出的样子。宋·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

岌然 jí rán　高耸的样子。宋·苏洵《木假山记》："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决无阿附意。"

巉然 chán rán　高峻的样子。宋·陆游《过小孤山大孤山记》："自数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已非他山可拟。"

皋如 gāo rú　高貌。清·袁枚《游五夷山记》："三峰比肩，皋如也。"

磔磔 zhé zhé　破裂的样子。明·张明弼《避风岩记》："石崖磔磔，不治土壤。"

岩岩 yán yán　岩石积垒的样子。晋·张载《剑阁铭》："岩岩梁山，积石峨峨。"

磊磊 lěi lěi　石多貌。明·张岱《西湖梦寻》："飞石磊磊如牛羊，其声空砻然。"

龂龂 yín yín　争雄貌。明·潘之恒《消摇溪记》："怪石累累龂龂，或立或卧，或锐或秃，或仄或陡。"

亭亭 tíng tíng　耸立的样子。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更前，重岩之上，一峰亭亭插天，为观音岩。"

帖帖 tiē tiē　驯服的样子。清·潘耒《游罗浮记》："往来所见大小石楼、玉鹅、蓬莱诸峰，渺有霄汉者，皆如培𡍩，帖帖肘腋下，其顶可抚而摩也。"

楚楚 chǔ chǔ　鲜明貌。明·吴庭简《黄山前游记》："云门诸峰，尽在足底，虽天都亦称仲氏，匡庐、九华，楚楚眉睫间，一切丘垤且蚁封视之，呼吸直通帝座，非虚语也。"

宛宛 wǎn wǎn　曲折蜿蜒的样子。明·薛瑄《游龙门记》："西则连山宛宛而去。"

碌碌 lù lù　琐细的样子。汉·马第伯《封禅仪记》："俯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

峨峨 é é　山岩高峻的样子。晋·张载《剑阁铭》："岩岩梁山，积石峨峨。"

皴皴然 cūn cūn rán　毛糙的样子。宋·范成大《过三峡记》："峡中两岸，高岩峻壁，斧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滩最号险恶。"

千寻濯濯 qiān xún zhuó zhuó　形容山高无草木的样子。明·魏光绪《华游记》："觚棱特起，屹无扳附，千寻濯濯，若引绳而受斤焉，不作寻常陂陀也。"

争气负高 zhēng qì fù gāo　群山都好象自恃高尚而要争气出头。南朝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南则积山万状，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

秀出天半 xiù chū tiān bàn　山势秀丽，高入云空。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花二顶，俱秀出天半。"

挺拔天表 tǐng bá tiān biǎo　特立出众，高耸入云。明·董传策《游桂林诸岩洞记》："或半空开窍，冥搜叵测，或挺拔天表，登蹑无阶。"

厥高镵云 jué gāo chán yún　意为山峰之高，刺入云端。清·张裕钊《游虞山记》："连山青翠相属，厥高镵云。"

驾轶云霞 jià yì yún xiá　山峰高耸入云。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五峰森列，驾轶云霞。"

云梯矗空 yún tī chù kōng　山路高险，直插天空。明·潘之恒《莲花峰记》："又见云梯矗空，为旋踵者数数然矣。"

幽岫穷崖 yōu xiù qióng yá　山深崖陡。晋·慧远《庐山略记》："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穷崖，人兽两绝。"

高岩仄宇 gāo yán zè yǔ　高峻的山岩下形成的倾斜的空间。例见上。

崇山巨壑 chóng shān jù hè　高山深谷。唐·莫休符《栖霞洞》："其东南皆崇山巨壑，绿树青松，崆峒幽奇，登临险易，不可名状。"

奇崿危峰 qí è wēi fēng　奇特而险峻的山峰。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奇崿危峰，澄湖靓壑，江介海门，回环拱固。"

重岩叠嶂 chóng yán dié zhàng 山势高峻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

横巘差叠 héng yǎn cī dié　大小山峰，参差横出。宋·徐兢《高丽录》："早发，南望一山丛之，谓之紫云苫，横巘差叠。"

萦抱屏立 yíng bào píng lì 形容山峰周围环绕状。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山腰有阁，翼以千峰，萦抱屏立，积岚沉雾。"

峰涛沸乱 fēng tāo fèi luàn　形容山峰重叠状。明·王思任《游敬亭山记》："日暮景收，峰涛沸乱，饥猿出啼，予栗然不能止。"

重山如阙 chōng shān rú quē　层层重叠的山峦象宫阙一样。宋·陆游《入蜀记》："西望重山如阙，江出其间，则所谓下牢溪也。"

重峰罨映 chóng fēng yǎn yìng 山峰重叠，彼此掩覆而衬托。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峡中西望，重峰罨映。"

层叠攒矗 céng dié cuán chù　山峰重重汇聚的样子。明·程嘉燧《自昌化至魇溪》："隔岸有平畴，春华烂然，远山益层叠攒矗，若回巧呈异于险仄之境者。"

峰峦攒簇 fēng luán cuán cù　形容山峰聚集状。明·袁宏道《上方》："至于峰峦攒簇，层波叠翠，则虎丘亦自佳。"

峰峦叠秀 fēng luán dié xiù　形容山峰秀丽，重重叠叠之状。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其郊垌之林烟水色，山径柳堤，及近之峰峦叠秀，楼阁流丹，则固皆几席间物。"

青峦紫逻 qīng luán zǐ luó　青山紫障，指群山草木深密呈青紫色。明·袁宏道《天池》："逾岭而西，平畴广野，与青峦紫逻相映发。"

苍镵翠削 cāng chán cuì xiāo　形容山峦苍翠挺拔，仿佛精工刻削而成。明·祖傅《姑敦八景赋》："苍镵翠削，奇凝秀结。"

千嶂彩飞 qiān zhàng cǎi fēi　形容群山色彩多样。明·王思任《游焦山记》："扪攀而至吸江亭，望海门

瓜步，都作龙腥，点帆归鸟，千嶂彩飞。”

天山共色 tiān shān gòng sè　青空和青山颜色相同。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风烟俱静，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山似青螺 shān sì qīng luó　形容山势浑圆林木茂盛如同女子的发髻。明·袁宗道《岳阳记行》：“从石首至岳阳，水如明镜，山似青螺，蓬窗下饱看不足。”

螺髻黛眉 luó jí dài méi　形容青苍的山峰好象女子的发髻和眉毛。清·檗庵禅师《黄山记恨》：“其积也厚，则深雪棉暾日中，千百峰或没半身，或及肩，亦有只存螺髻黛眉，沐浴银者。”

远翠稠叠 yuǎn cuì chóu dié　形容远处山峰重叠的样子。明·袁宏道《上方》：“平者远翠稠叠，为屏为障，千山万壑，与平原旷野相发挥，所以入目尤易。”

苍龙叠翠 cāng lóng dié cuì　山象苍龙游于层层叠叠的青绿之中。明·杨慎《游点苍山记》：“比入龙尾关，且行且玩，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蓝。”

屏山献青 píng shān xiàn qīng　形容群山草木青碧一片，尽来眼底。明·袁宏道《天池》：“才至山腰，屏山献青，画峦滴翠，两年尘土面目，为之洗尽。”

画峦滴翠 huà luán dī cuì　春山鲜绿欲滴的样子。例见上。

层峦耸翠 céng luán sǒng cuì　形容青山重叠的样子。唐·王勃《滕王阁序》：“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

苍颜秀壁 cāng yán xiù bì　山色绿而山势秀丽。宋·曾巩《拟岘台记》：“山之苍颜秀壁，颠崖拔出，挟光景而薄星辰。”

丹碧如霞 dān bì rú xiá　形容苔藓色泽红绿相错状。明·程嘉燧《发淳安记密山诸岩》：“其右一山，皆精石嶙峋，苔绣丹碧如霞。”

斐绿叠丹 fěi lǜ dié dān　形容山色多彩状。明·王思任《剡溪》：“山高岸束，斐绿叠丹，摇舟听鸟，杳小清绝。”

萦青缭白 yíng qīng liáo bái　形容山上碧树蔓延山间云雾缭绕状。唐·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出。”

联岚含晖 lián lán hán huī　连绵的山峰象含着阳光。明·江瓘《游黄山记》：“日且晡，联岚含晖，仰瞻诸峰，紫翠如沐。”

紫翠如沐 zǐ cuì rú mù　山上的草木象洗过一样。例见上

含霞饮景 hán xiá yǐn jǐng　形容群山在云霞阳光中，有的好象咀含彩霞，有的好象渴饮阳光。南朝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南则积山万状，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

蹇仰恣傲 jiǎn yǎng zī ào　形容山石横斜的样子。明·王思任《钓

台》："附东台一平屿，陡削畏眺；一石笋横起幽涧，蹇仰恣傲，颇似先生手足。"

崎岖佶屈 qí qū jié qū　曲折不平。清·乔光烈《登华山记》："因问道士，登山若何为是？言崎岖佶屈，上下奇险，及见闻诸景状。"

堆阜突怒 duī fù tū nù　形容山石堆磊、形状怪异。唐·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

突兀奋怒 tū wù fèn nǔ　形容山石险怪状。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又有大士洞，石理诘曲，突兀奋怒，皱云驳雾，较华严洞更觉华严险怪。"

魁岸踞肆 kuí àn jù sì　强壮高大的样子。宋·苏洵《木假山记》："余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

层突弥耸 céng tū mí sǒng　山崖层叠突起，高高耸立。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南面一崖，层突弥耸。"

层叠错立 céng dié cuò lì　石块堆积状。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乱石层叠错立，浪文花萼。"

欹耸相乱 yī sǒng xiāng luàn　倾斜的、直立的相互交错。明·许楚《黄山游记》："两岸争高，欹耸相乱，山皁之不接者仅二丈。"

纷拿杰张 fēn ná jié zhāng　纷纭错乱貌。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迤西一洞，高穹层裂。纷拿杰张。"

犬牙交峙 quǎn yá jiāo zhì　犬牙般交错屹立。宋·曾巩《游信州玉山小岩记》："探其穴，犬牙交峙；视其形，若圭璧联植。"

剑戟齿牙 jiàn jǐ chǐ yá　形容石头形状尖利。宋·陆游《入蜀记》："剑戟齿牙，碨硊江侧，蹙激波涛，险不可测。"

峭崿斗突 qiào è dǒu tū　高崖或高峰突起。明·王思任《游敬亭山记》："峭崿斗突，逼嵌其中。"

错崿窈窕 cuò è yǎo tiǎo　山峰错落耸立，深远曲折。清·方夜《黄山小游记》："归而落梦，如千朵芙蓉刺天表，错崿窈窕，出没云雾间，兀兀枕席者，经旬月不散。"

崔嵬刻削 cuī wéi kè xiāo　山高大陡险。宋·范成大《吴船录》："此诸山之后，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数十百峰。"

庄栗刻峭 zhuāng lì kè qiào　庄严肃穆。宋·苏洵《木假山记》："二峰者，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

峭拔若削 qiào bá ruò xiāo　陡峭高拔，如同刀砍斧削一般。宋·王得臣《登莲花峰记》："兹山峭拔若削，自非驭风凭云，亦无有去理。"

崭然特起 zhǎn rán tè qǐ　高高突起。宋·苏舜钦《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始维舟，即登灵岩之颠，以望太湖，俯视洞庭山，崭然特起，霞云采翠，浮动于沧波之中。"

尖翠特立 jiān cuì tè lì　形容山峰锐利，挺拔独立。宋·周志菲《岭

外代答》："夫其尖翠特立，无不拔地而起。"

巀嶭独出 jié yǎn dú chū　山高独立貌。宋·王履《始入华山至西峰记》："东则东峰、玉女峰昆季相倚，唯南峰巀嶭独出，径视三峰，薄暮不及往，遂宿焉。"

峭拔凝立 qiào bá níng lì　挺拔肃立。明·张岱《西湖梦寻》："山下有石人岭，峭拔凝立，形如人状，双髻耸然。"

离立献奇 lí lì xiàn qí　诸峰分立，争献异彩。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又五里，西穿石山峡，则诸峰分峙叠出，离立献奇。"

秀特卓诡 xiù tè zhuó guǐ　美好直立，与众不同。宋·曾巩《游信州玉山小岩记》："去县治所东南二十五里，有山秀特卓诡，介然出于群峰之表。"

巉巀如劈 chán jié rú pī　形容山壁直立，如象刀斧劈成。清·王闿运《游华山记》："石作莲花，飞岗五色，巉巀如劈，故曰削成。"

石峰峭嵲 shí fēng qiào niè　礁石被海浪侵蚀而孤立挺拔的样子。明·屠隆《海览》："又西有善财洞，石峰峭嵲，足似断而悬。"

紫锷凌厉 zǐ è líng lì　青山奋迅向前貌。明·袁宏道《从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铁船峰当其而，紫锷凌厉。"

参错骨立 cēn cuò gǔ lì　形容乱石瘦削不整齐状。明·程嘉燧《发淳安记密山诸岩》："其石大都瓦裂冰坼，参错骨立，或琐碎攒累，如鸟兽器物之形者，不可胜记。"

倾危相捍 qīng wēi xiāng hàn　倾斜的崖石相互支撑着。明·许楚《黄山游记》："仰见三峰霞举，竦桀干天，倾危相捍，望之恒有落势，为紫石、朱砂、老人三峰。"

崩峦倾返 bēng luán qīng fǎn　形容山峦象要崩裂而左右倾倒。明·张明弼《避风岩记》："仰而睨之，若层衡之列烟上，崩峦倾返，颓石矗突。"

山魁水怒 shān kuí shuǐ nù　山高流急。明·王思任《游敬亭山记》："姑孰据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

壁立群嶂 bì lì qún zhàng　群山直立如墙壁。宋·王得臣《登莲花峰记》："既及华三分之一，则壁立群嶂，莓苔泠滑，石罅纵横，仅容半足。"

峻崖突壁 jùn yá tū bì　山高崖陡。明·许宁《黄山纪游》："里许至小心坡，峻崖突壁。"

巉崿窾石 chán è kuǎn shí　凿出山崖石级。清·赵嘉肇《太华纪游略》："巉崿窾石而入，有凌空木槛，路逼侧，险且阴。"

跃虚巉积 yuè xū chán jī　指插入天空的悬崖峭壁。清·王炜《黄山记游》："当其跃虚巉积，受趾不浮，似招游客，以尽其奇。"

峰回岫复 fēng huí xiù fù　峰峦重叠。清·乔莱《游七星岩记》："峰回岫复，若岛若洲，若溪若堑，若烟云变幻者，曰须弥山。"

峰攒岫复 fēng cuán xiù fù　峰峦聚集繁复。清·施闰章《游九华山

记》："由青阳西南行，则峰攒岫复，环奇百出。"

屏矗墉回 píng chù yōng huí 山崖象屏风一样矗立，象城墙一样曲折环绕。清·姚鼐《游媚笔泉记》："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经。"

连山倒垂 lián shān dào chuí 形容山影倒映水中之状。唐·柳宗元《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登舟于兹水之津；连山倒垂，万象在下，浮空泛景，荡若天外。"

一径千绕 yī jìng qiān rào 形容山路盘曲状。明·王思任《游敬亭山记》："一径千绕，绿霞翳染，不知几千万竹树，党结塞阴。"

涣若奔云 huàn ruò bēn yún 形容山石散乱之状。唐·柳宗元《永州万石亭记》："绵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

窈窱森沉 yǎo tiǎo sēn chén 深远的样子。明·屈大均《登华记》："二里许，得一拆，窈窱森沉，索袅袅如丝。"

蜿蟺扶舆 wān tán fú yǔ 曲折盘旋。明·许孚远《游华山记》："余观夫终南万里而来，蜿蟺扶舆，磅礴郁积，不可胜纪。"

陂陀曼衍 pō tuó màn yǎn 形容丘陵倾斜而连绵不绝。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北瞩陵阜，陂陀曼衍，箭栝丛出，麰麦连云。"

坡陀偃伏 pō tuó yǎn fú 石横斜倒地貌。清·乔莱《游七星岩记》："其石，或坡陀偃伏，或斩削倾欹，石笋林立，乳凝迈如雪。"

深昧险绝 shēn mèi xiǎn jué 幽暗险阻。明·朱熹《百丈山记》："下临峭岸，深昧险绝。"

童山濯濯 tóng shān zhuó zhuó 秃山无草木状。清·林佶《由藏归程记》："童山濯濯，风景荒凉。"

石壁童秃 shí bì tóng tū 谓山壁寸草不生，光秃秃。明·魏光绪《华游记》："石壁童秃，罕生树木，惟奔泉飞瀑，争奇斗胜而已。"

神凿嵌窦 shén záo qiàn dòu 象神仙凿开的洞。唐·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神凿嵌窦，呀而为室。"

山高月小 shān gāo yuè xiǎo 山势高大使月亮都显得小了。宋·苏轼《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巉石兽蹲 chán shí shòu dūn 形容山石形状如同蹲伏的野兽。明·王思任《东山》："舟子突叫看东山，山麓巉石兽蹲，守江如拒。"

神明刻露 shén míng kè lòu 神采外现。明·张岱《西湖梦寻》："一片云、神运石风气道逸，神明刻露，选石得此，亦娶妻得姜矣。"

焕若披面 huàn ruò pī miàn 光彩外现象面色坦然状。晋·慧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文石发采，焕若披面。"

石光如练 shí guāng rú liàn 形容山石反射月光如同白绸铺衬。明·袁宏道《虎丘》："已而明月浮空，石

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

滑腻砻光 huá nì lóng guāng 谓山石光滑。清·王闿运《游华山记》：“亦或天然圆秀，正排纤云，滑腻砻光。”

嵌空垤块 qiàn kōng dié kuài 形容土石相杂的样子。唐·白居易《庐山草堂记》：“堂北五步，据层崖积石，嵌空垤块，杂木异草盖覆其上。”

皱瘦崚嶒 zhòu shòu léng céng 山石粗糙峻削而高大状。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其岸根水洗石出，亦复皱瘦崚嶒，崎嵚陷坎，罅中松鼠出没，净滑可人。”

棱层剔透 léng céng tī tòu 形容山峰险峻，结构奇巧。明·张岱《西湖梦寻》：“飞来峰，棱层剔透，嵌空玲珑，是半颠袖中一块奇石。”

绉縠叠波 zhòu hú dié bō 形容山身曲折，象绉纱重叠的波纹。明·高濂《四时幽赏录》：“更喜四顾山峦若层花叶萼，绉縠叠波。”

层花吐萼 céng huā tǔ è 山峰象一层层花瓣张开之状。例见上。

浪文花萼 làng wén huā è 形容岩石纹理如波浪，如花瓣。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乱石层叠错立，浪文花萼。”

溜乳作花 liū rǔ zuò huā 石乳下滴凝成各种花样。明·张岱《西湖梦寻》：“前后大小洞四五，窕窈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镂。”

堂堂廪廪 táng táng lǐn lǐn 形容山峦突兀高峻有气魄。宋·范成大《吴船录》：“前后山既高且迈，堂堂廪廪，追而临之，如欲覆压。”

纷纷靡靡 fēn fēn mí mí 众多而美丽状。明·高启《游灵岩记》：“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

林林总总 lín lín zǒng zǒng 众多的样子。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其中悬柱亦多，不及百感之林林总总。”

水

悬练 xuán liàn 悬挂的白绢，喻飞泉。唐·白居易《三游洞序》：“次见泉，如泻如洒，其奇者如悬练，如不绝线。”

匹练 pǐ liàn 喻雪白如练的瀑布。清·田雯《游太室纪》：“两山忽张，匹练下垂，微飙吹之则左右动，奔涧荡壑，众山皆响，为嵩山佳处。”

浩白 hào bái 形容水面辽阔平静明亮的样子。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有老僧持杖散步塍间，水田浩白，群蛙偕鸣。”

绀凛 gàn lǐn 色碧而清。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水鼻绀凛，旱

不缩而潦不盈，有龙居焉。"

绀静 gàn jìng　水色深青而水面平静。明·宋濂《游钟山记》："舒王所植松已无，唯泉绀静沈沈如故。"

黛碧 dài bì　水色青绿。明·袁宏道《从天池逾含鄱岭至三峡间》："忽焉石逊，涓然黛碧，观者亦舒舒与与，不知其气之平也。"

湛碧 zhàn bì　水清澈碧绿的样子。清·潘耒《游罗浮记》："池在乱石间，径三尺许。渟泓湛碧。"

绀碧 gàn bì　深绿色。明·张岱《西湖梦寻》："泉水绀碧，味淡远，与他泉迥矣。"

浤碧 hóng bì　水涌出而清彻碧绿貌。清·刘大櫆《黄山纪》："旁一池浤碧，是莲花之洞。"

渟泓 tíng hóng　水深静的样子。清·潘耒《游罗浮记》："又里许至阿耨池。池在乱石间，径三尺许。渟泓湛碧。"

澄泓 chéng hóng　清澈深邃。清·李卫《西湖志》："寒泉涓沥，汇为澄泓者，往往而有。"

泓澄 hóng chéng　水深而清澈。元·麻革《游龙山记》："又行数里，得泉之泓澄渟滀者焉。"

泓映 hóng yìng　清水映照。清·姚莹《粤东学使后园记》："地不数亩，一池泓映。"

清冽 qīng liè　清澈。唐·柳宗元《小石潭记》："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

清泠 qīng líng　清净凉爽。唐·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潸潸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清泚 qīng cǐ　清澈澄净的样子。清·汪中《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寒流清　，秋菘满田，室庐皆尽，唯古柏半生，风烟掩柳，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

莹彻 yíng chè　光洁透亮。宋·王向《游石笼记》："而水间之石，或嶂然如岩，或剜然如臼，或偃然如欂，或落然如盂，端正莹彻，类非锼凿之能及。"

莹然 yíng rán　清澈透明貌。清·王昶《游珍珠泉记》："泉莹然至清，盖地皆沙也，以故不为泥所汩。"

莹晶 yíng jīng　光明澄澈的样子。明·袁宏道《灵岩记》："有泉常清，莹晶可爱。"

光艳 guāng yàn　明丽可爱。明·张岱《西湖梦寻》："孙堤直达西泠，车马游人，往来如织，兼以西湖光艳，十里荷香，如入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

璀璨 cuǐ càn　光采夺目。明·杨慎《游点苍山记》："西南有一溪，叠嵒承流，水色莹澈，其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宛如宝玉之丽，其名曰清碧溪。"

滟潋 yàn liàn　常作"潋滟"。波光闪动貌。明·张岱《西湖梦寻》："雨色空蒙，何逊晴光滟潋！深情领略，是在解人。"

滟耀 yàn yào　水波动荡耀眼。明·方孝孺《清泉山记》："海涛际天，

日光倒射其上，滟耀难正视。”

演漾 yǎn yàng　水波动荡的样子。清·谢振定《登太华山记》：“其左，崔石如层波演漾，或作云，若芝形，苔藓荧之，古秀可爱。”

洸漾 guāng yàng　水波动荡闪光的样子。清·张道浚《游劳山记》：“初犹洸漾水光中也，一轮初上，山耶水耶，人耶物耶，由晦复明，光华四散，真目得未曾有。”

滉漾 huàng yàng　波光动荡的样子。清·李卫《西湖志》：“亭下南望平湖，水天滉漾。”

溶漾 róng yàng　波光浮动的样子。清·邵长蘅《夜游孤山记》：“望明月上东南最高峰，与波溶漾，湖碧天青，万象澄澈。”

容裔 róng yì　高低起伏状。明·王世贞《海游记》：“文沦若縠，容裔荡漾，与天下上。”

沦涟 lún lián　风吹水而形成的波纹。唐·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夜登华子冈，辋水中沦涟，与月上下。”

呀呷 yā xiā　波相吞吐貌。清·钱谦益《游黄山记》：“雨止，泉益怒，呀呷撞胸，如杵在臼。”

涓然 juān rán　水细流貌。明·袁宏道《从天池逾含鄱岭至三峡洞》：“忽為石逊，涓然黛碧，观者亦舒舒与与，不知其气之平也。”

涓沥 juān lì　泉流滴沥。清·李卫《西湖志》：“寒泉涓沥，汇为澄泓者，往往而有。”

幽浏 yōu liú　幽深澄澈。清·姚莹《粤东学使后园记》：“俯临深地，幽浏不测。”

幽阒 yōu qù　幽静。清·吴桭辰《宁古塔纪略》：“帐房临涧，涧水淙淙然，音韵极幽阒。”

潺湲 chán yuán　水徐流貌。清·吴桭臣《宁古塔纪略》：“冰泮时，下有流澌潺湲，亦一奇也。”

伏息 fú xī　形容水波平静，缓缓流动的样子。宋·苏辙《武昌九曲亭记》：“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

漫衍 màn yǎn　洋溢的样子。宋·秦观《游龙井记》：“西湖深靓空阔，纳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丽，龟鱼鸟虫之所依凭，漫衍而不迫，纡余以成文。”

蹇产 jiǎn chǎn　曲折。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

委蛇 wěi yí　形容河流弯弯曲曲，延续不绝。明·宋濂《阅江楼记》：“长江发源岷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入海。”

纡余 yū yú　屈曲的样子。宋·秦观《游龙井记》：“西湖深靓空阔，纳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丽，龟鱼鸟虫之所依凭，漫衍而不迫，纡余以成文。”

潆回 yíng huí　潆绕回环貌。明·钟惺《浣花溪记》：“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

洄洑 huí fú　水流回转貌。明·张岱《西湖梦寻》：“南頫大江，波涛洄洑，舟楫隐见杳霭间。”

漩旋 biàn xuán　峡中回流和旋涡。明·汤宾尹《游栖贤桥记》："而渡水一石特大，注水渾转细，众水聚行石上，当其坦博，漩旋欲舞于微凹处。"

旋濑 xuán lài　从沙石上流过的回旋的急水。清·乔莱《湘漓二水记》："其江多狠石蹲踞，穿急滩，下旋濑，倾刻百里。"

濆淖 fén nào　大漩涡。宋·范成大《吴船录》："七十里至涪州排亭之前，波涛大汹；濆淖如屋，不可梢船，过州入黔江泊。"

淦潆 gàn yíng　水回流貌。唐·柳宗元《晋问》："凌巑岏之杪颠，濑泉源之淦潆。"

飞溜 fēi liū　山泉飞快下注。清·李卫《西湖志》："微飙暂拂，飞溜寒生。"

汩流 gǔ liú　水急流。《列子·汤问》："引盈东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

奔放 bēn fàng　水势迅疾貌。宋·苏辙《黄州快哉亭记》："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

峻激 jùn jī　水急。宋·朱熹《百丈山记》："阁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最为可玩，乃壁其后无所目者；独夜卧其上，则枕席之下，终夕潺潺，久而益悲，为可爱耳。"

湍激 tuān jī　水流急。清·袁枚《游武夷山记》："惟武夷两山夹溪，一小舟横曳而上，溪河湍激，助作声响。"

荡潏 dàng yù　浩荡汹涌。宋·苏舜钦《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出横金口，观其洪川荡潏，万倾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

喷豗 pēn huī　波浪冲激的声音和形状。宋·徐兢《使高丽录》："惟见连波起伏，喷豗汹涌，舟楫振撼。"

喷薄 pēn bó　猛烈喷击貌。宋·徐兢《使高丽录》："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渊沦，正黑如墨，猝然视之，心胆俱丧。怒涛喷薄，屹如万山。"

潢然 huáng rán　水喷涌而出的样子，这里形容泉水声。宋·赵汝驭《罗浮山行记》："事已，明日与客步自冲虚，东行数里，泉声潢然出丛薄中，其上则洞口也。"

汪然 wāng rán　水深而聚的样子。明·张岱《西湖梦寻》："泉出讲堂之后，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

森然 sēn rán　瀑布垂貌。明·王世懋《游五老三叠开先瀑布记》："飘者如雪，断者如雾，缀者如旒，挂者如帘，散入山足，森然四垂。"

滃然 wěng rán　水盛之貌。宋·欧阳修《丰乐亭记》："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

茫然 máng rán　无边无际状，形容江面，宋·苏轼《前赤壁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渺然 miǎo rán　水远貌。唐·吴武陵《新开隐山记》："可以走方舟，可以泛画鹢，渺然有江海趣。"

渺弥 miǎo mí　水波辽阔的样子。宋·陆游《过小孤山大孤山记》：

“大孤则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

杳渺 yǎo miáo　形容水广远。明·张岱《西湖梦寻》：“泰岳既峨峨，补陀复杳渺。”

溟涬 míng xìng　大水混茫，无边无际。唐·刘禹锡《救沉志》：“跻高望之，溟涬葩华。”

浩汗 hào hàn　形容积水很大，茫茫一片。南朝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吾自发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无边。”

浩溔 hà yǎo　水势大的样子。唐·刘禹锡《机汲》：“浩溔东流，赴海为期。斡而迁焉，逐我颐指。向之所谓阻且艰者，莫能高其高深其深也。”

淼淼 xiǎo miǎo　水势浩大的样子。清·宋荦《游姑苏台记》：“犹见震泽掀天陷日，七十二峰出没于晴云淼淼中。”

汗漫 hàn màn　水势浩大貌。元·夏文彦《图绘宝鉴》：“董羽……善画鱼龙海水，其汹涌澜翻，咫尺汗漫，莫知其涯涘也。”

泛潋 fàn liàn　水波起伏动荡。明·袁宏道《从天池逾含鄱岭至三峡涧》：“长江泛潋，浊波一线；鄱湖清潋如片照，细见帆影，湖中诸峦，或如蚀翠，或如砂斑之凸起。”

澒洞 hòng dòng　潭水深广无边。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由台上入一门，直北幽暗处，垂石上穹无际，下陷成潭，澒洞峭裂，忽变夷为险。”

浸淫 jìn yīn　洪水扩张漫延貌。唐·刘禹锡《救沉志》：“崩巉前迈，浸淫旁掩。”

浸灌 jìn guàn　形容江水浩荡的样子。宋·苏辙《黄州快哉亭记》：“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

巨浸 jù jìn　指浩渺的大水。明·张岱《西湖梦寻》：“盖山水映发，他处即有澄波巨浸，不及也。”

洞然 dòng rán　形容水声。唐·柳宗元《小石城山记》：“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

淙然 cóng rán　流水的声音。清·姚鼐《游媚笔泉记》：“积雨如霁，溪上大声淙然，十余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雉。”

铿然 kēng rán　流水声铿锵清脆。唐·柳宗元《游黄溪记》：“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铿然。”

琮琤 cōng chēng　形容泉水的声音。清·李卫《西湖志》：“琮琤作琴筑声，倾耳可听。”

激越 jī yuè　形容响声的清脆。唐·柳宗元《小石城山记》：“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

湃湃 pēng pēng　水相激声。唐·柳宗元《晋问》：“崩石之所转跃，大木之所摧拔，湃湃洞踏者，弥数千里。”

訇磕 hōng kē　水石相击的巨响。清·刘世馃《三元洞石阑干引》：“澎湃訇磕之声若轰雷逸马，悍不可驭。”

镗鞳 tāng tà　钟鼓声，这里形容水石相激声。宋·苏轼《石钟山记》：

"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

怒喧 nù xuān　形容山泉激流声。明·刘侗《红螺崄》："山头苦乱，目不给瞬也，正复爱其历乱；山涧苦喧，耳不给聒也，正复爱其怒喧。"

震霆 zhèn tíng　形容水声宏大，如劈雷震响。元·李孝光《大龙湫记》："又折而入东崦，则仰见大水以天上堕地，不挂著四壁，或盘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震霆。"

淙淙 cóng cóng　流水声。明·张岱《西湖梦寻》："淙淙之声，四分五络，达于山厨。"

泠泠 líng líng　形容声音清越。明·董传策《游桂林诸岩洞记》："桥下水声泠泠，寒气侵肌。"

潺潺 chán chán　形容流水声。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溅溅 jiān jiān　形容流水声。明·朱熹《百丈山记》："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声溅溅然。"

嘶嘶 sī sī　形容泉水流动的声音。明·刘侗《水尽头记》："石罅乱流，众声嘶嘶，水踏石过，水珠渐衣。"

琅琅 láng láng　形容浪涛触石的声音。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有采乳石者入之，闻江涛琅琅然，槽声聒耳。"

聒聒 guō guo　形容水流声。明·邢址《游山谷记》："水聒聒从桥入溪。"

潆潆 yíng yíng　流水声。唐·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潆潆之声与耳谋。"

濊濊 guó guó　水流声。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则溪流自西北石山下折而东来，始濊濊成声。"

渟渟 tíng tíng　形容泉水流得轻而且缓。唐·白居易《冷泉亭记》："夏之夜，我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心情。"

款款 kuǎn kuǎn　徐缓移动的样子。明·王思任《游九奇峰五老峰记》："石怒起如惊雷，择最锐一株，踞其顶，望鄱湖，白气中有履数点，又如凫流款款，不见动而见移，半时乃隐者，舟行也。"

涔涔 cén cén　水滴不止貌。明·张岱《西湖梦寻》："烟霞洞，亦古亦幽，凉沁入骨，乳汁涔涔下。"

潏潏 yù yù　水涌出的样子。宋·曾巩《齐州北水门记》："其酾而为渠，布道路，民庐官寺无所不至，潏潏分流，如深山长谷之间。"

镞镞 zú zú　挺进的样子。明·张岱《白洋潮》："渐近喷沫，冰花蹴起，如百万雪狮，蔽江而下，怒雷鞭之，万首镞镞，无敢后先。"

激激 jī jī　形容水流迅疾。宋·秦观《龙井题名记》："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有也。"

滮滮 biāo biāo　水流的样子。明·宋濂《游钟山记》："鸡笼山下接落星涧，涧水滮滮流。"

渤渤 bó bó　喷溢四散的样子。元·李孝先《大龙湫记》："乃缘石下，出乱石间，始见瀑布垂，渤渤如苍烟。"

沄沄 yún yún　水波起伏的样子。明·杨慎《游点苍山记》："勉从入舟，则天光澄净，波纹沄沄，遵崖壁而南，壁下石窟，有深有浅，皆渔家妇子居之。"

汤汤 shāng shāng　大水急流的样子。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鸟道盘折，逾坳右转，溪流汤汤，涧底石平如砥。"

泱泱 yāng yāng　水广深的样子。宋·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沈沈 chén chén　同"沉沉"，深邃的样子。明·宋濂《游钟山记》："舒王所植松已无，唯泉绀净沈沈如故。"

磷磷 lín lín　水中石块明显可见的样子。明·张岱《西湖梦寻》："闸下皆石骨磷磷，出水甚急。"

鳞鳞 lín lín　同"磷磷"，形容石子在清水中历历可见的样子。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见石子鳞鳞，朱碧磊珂，如金沙布地，七宝妆施，荡漾不停，闪烁晃耀。"

粼粼 lín lín　清澈可见的样子。明·杨慎《游点苍山记》："西南有一溪，叠屿承流，水色莹澈，其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宛如宝玉之丽，其名曰清碧溪。"

凿凿 zuò zuò　鲜明的样子。唐·白居易《三游洞序》："仰睇俯察，绝无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凿凿，跳珠溅玉，惊动耳目。"

锦鳞 jǐn lín　鳞片如锦的游鱼。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红酣 hóng hān　形容红色浓重。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朱鱼万尾，匝池红酣，烁人目睛；日射清流，写影潭底，清慧可怜。"

怡然 yí rán　静止之状。唐·柳宗元《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翕然 xī rán　聚合的样子。明·杨士奇《游东山记》："余糁饼饵投之，翕然聚，已而往来相忘也。"

翕忽 xī hū　轻快的样子。唐·柳宗元《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奄忽 yǎn hū　形容流转很快。宋·王质《游东林山水记》："风起水面，细生鳞甲，流萤班班，若骇若惊，奄忽去来。"

折折 tí tí　安闲舒适的样子。明·刘侗《水尽头记》："小鱼折折石罅间，闻跫音则伏于苴于沙。"

洋洋 yáng yáng　舒缓的样子。元·李孝先《大龙湫记》："潭上有斑鱼二十余头，闻转石声，洋洋远去，闲暇回缓，如避世士然。"

跳达 diào dá　轻捷跳跃的样子。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小鱼尾游，翕忽跳达。"

幽幽然 yōu yōu rán　水流微弱的样子。唐·柳宗元《石渠记》："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

湛湛然 zhàn zhàn rán　潮水清

澈的样子。清·恽敬《游庐山记》："东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泽，皆隔湖，湖光湛湛然。"

累累然 lěi lěi rán　重迭貌。清·王昶《游珍珠泉记》："大者为珠，小者为玑，皆自底以达于水面，瑟瑟然，累累然。"

长波天合 cháng bō tiān hé　远望水波与天际相接。南朝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西则迴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

水地霞天 shuǐ dì xiá tiān　形容水面与霞光相映的景象。明·谭元春《三游乌龙潭记》："是时残阳接月，晚霞四起，朱光下射，水地霞天。始犹红洲边，已而潭左方红，已而红在莲叶下起，已而尽潭皆赪，明霞作底，五色忽复杂之。"

映水如绣 yìng shuǐ rú xiù　形容晚霞映入水中之状。明·王思任《小洋》："溪西一带山，俱以鹦鹉绿，鸦背青，上有腥红云五千尺，开一大洞，逗出缥天，映水如绣铺赤玛瑙。"

一碧万顷 yī bì wàn qǐng　一片碧蓝，广阔无边。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烟波缥缈 yān bō piāo miǎo　水波隐隐约约的样子。清·郁永河《采琉日记》："澎湖凡六十四岛澳，……悉断续不相联属，彼此相望，在烟波缥缈间。"

横无际涯 héng wú jì yá　形容水面辽阔，没有边际。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浩浩汤汤 hào hào shāng shāng 水势浩大之状。例见上。

吞吐百川 tūn tǔ bǎi chuān　形容水势极大。南朝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其中腾波触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写泄万壑。"

滃然浩漾 wěng rán hào yàng　水势开阔动荡的样子。明·屠隆《海览》："乘流送目，陡觉东南天地大荒，寥廓开朗，滃然浩漾。"

演迤滉漾 yǎn yí huàng yàng　形容波涛翻滚动荡。清·王灼《黄山纪游》："奇态诡状，呼吸百变，则演迤滉漾，数峰浮出海面，与风潮相上下。"

闪烁晃耀 shǎn shuò huàng yào 光芒闪耀的样子。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见石子鳞鳞，朱碧磊珂，如金沙布地，七宝妆施，荡漾不停，闪烁晃耀。"

皦焉冲照 jiǎo yān chōng zhào 亮晶晶地好象透明似的。明·张岱《西湖梦寻》："是地水望澄明，皦焉冲照，亭观绣峙两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

漭漾广溢 mǎng yàng guǎng yì 水势广大溢出貌。《后汉书·明帝记》："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漾广溢，莫测圻岸。"

悬河注壑 xuán hé zhù hè　指瀑布注入沟壑。北朝·郦道元《水经注·清水》："瀑布乘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

潆洄旋覆 yíng huí xuán fù　水流回旋。清·邵长蘅《青玉峡记》："夹峙削壁百仞余，嵌壁杂树经新霜，作丹碧色相间，树叶坠潭中，潆洄旋覆，久之乃急溜而去。"

洄悬激注 huí xuán jī zhù　回旋腾涌，激荡倾注。唐·元结《右溪记》："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攲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

濆淖洄洑 fén nào huí fú　形容泥水的喷涌回漩。宋·范成大《过三峡记》："戊午，乘水退下巫峡。滩泷稠险，濆淖洄洑。"

支离胶葛 zhī lí jiāo gě　分散而深广。宋·王质《游东林山水记》："水数百脉，支离胶葛，经纬参错，迤者为溪，漫者为江，断者为沼，洄者为坳。"

夭矫曲折 yāo jiǎo qū zhé　溪水曲折奔跳的样子。明·袁宏道《游盘山记》："其下皆奔泉，夭矫曲折，触巨细石皆斗，故鸣声彻昼夜不休。"

白浪拥象 bái làng yōng xiàng　白色的浪涛如同象阵。清·冒襄《影梅庵忆语》："长江白浪拥象，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

巨涛摧硖 jù tāo cuī chuǎng　大浪冲击拍打。明·屠隆《海览》："金鸡虎蹲两山对峙奔腾峡口，蛟门峡东谽谺鼓怒，巨涛摧硖，六合顿撼。"

猛浪若奔　形容水流急速。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崩浪万寻 bēng làng wàn xún　激起的浪头有一万寻那么高。寻，八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

腾波触天 téng bō chù tiān　涌起的波浪高可触天。南朝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其中腾波触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写泄万壑。"

掀天陷日 xiān tiān xiàn rì　波涛翻腾，象是搅动天空，吞没太阳。清·宋荦《游姑苏台记》："犹见震泽掀天陷日，七十二峰出没于晴云漏淼中。"

排天沃日 pái tiān wò rì　排斥上天，浇灌太阳，极言气势之盛。元·虞集《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使排天沃日之势，虽极天下之骄悍，皆将靡然委顺，听令其下而去，非兹峰，其孰足以当之也耶？"

沸沸汤汤 fèi fèi shāng shāng　腾涌貌。《山海经·西山经》："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

湁潗鼎沸 shí jí dǐng fèi　水涌沸貌。明·王之杰《游黄山前纪》："池中水清沙白，湁潗鼎沸，垢自浮去。"

涵澹澎湃 hán dàn pēng pài　形容水波动荡，波浪冲击。宋·苏轼《石钟山记》："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

澒洞砰湃 hòng dòng pēng pài　水面辽阔波浪汹涌的样子。明·屠隆

《海览》："舟在大波中，蓬蓬天上，无处可著，澒洞砰湃，邈隔神州。"

喷薄漓澌 pēn bó lí sī　形容水波涌起的样子。明·程嘉燧《自昌化至履溪》："远者如连山之涛，喷薄漓澌，千派万落。"

惊波汩㶟 jīng bō gǔ jí　形容波涛突起，剧烈翻滚。唐·玄奘《跋禄迦国》："洪涛浩汗，惊波汩㶟，龙鱼杂处，灵怪兼起。"

浑洪赑怒 hún hóng bì nù　大水汹涌如狂怒状。赑，勇猛。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

砰雷转毂 pēng léi zhuǎn gǔ　形容瀑布的声音如雷声，泉水旋转如车毂的转动。清·邵长蘅《青玉峡记》："两潭递受之，激者沸白，渟者沉黛，砰雷转毂，澎湃千伏。"

雷奔海立 léi bēn hǎi lì　形容水势猛而声音响。明·袁宏道《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搴万仞，峡风逆云，帘卷而上，忽焉横曳，东披西带。"

冰轰雪吼 bīng hōng xuě hǒu　形容瀑布激流飞沫，好象冰雪轰鸣怒吼。清·李调元《西樵》："凡作三级，逶迤而下，冰轰雪吼，倒射青冥，势益瀑。"

撼波若雪 hàn bō ruò xuě　波浪卷起水沫象雪一样。明·袁宗道《岳阳记行》："薄暮风极大，撼波若雪，近岸水皆揉为白沫。"

飞流喷雪 fēi liú pēn xuě　飞泻的急流溅起的水花象喷吐雪沫。清·刘大櫆《浮山记》："仰见飞流如喷雪，其声轰然，人语不能相闻也。"

沸冰结雪 fèi bīng jié xuě　形容水花飞溅的样子。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至裂帛泉，水仰射，沸冰结雪，汇于池中。"

霜雪同根 shuāng xuě tóng gēn　形容水沫飞贱状。明·谭元春《游南岳记》："举头见山岩间，忽忽摇白光者，水帘也。水倾如帘，霜雪同根。"

舞雪拖绅 wǔ xuě tuō shēn　形容飞瀑溅起白沫象一条长带。清·王炜《黄山游记》："时当秋涸，虽未睹舞雪拖绅，想其蟺遏弗达之势，必雷惊海簸无疑，万壑奔涛，作如何支遣也！"

一水浸天 yī shuǐ jìn tiān　形容水面宽广，水天相接状。清·沈复《浮生六记》："遥见一水浸天，风帆隐隐，即太湖也。"

一泓泠然 yī hóng líng rán　一道泉水泠泠作声。明·张岱《西湖梦寻》："亭对峭壁，一泓泠然，凄清入耳。"

一泓清碧 yī hóng qīng bì　形容潭水清彻碧绿。清·沈复《浮生六记》："下凿一潭广丈许，一泓清碧，有金鳞游泳其中。"

一溪涨绿 yī xī zhàng lǜ　形容溪水涨满。明·袁宏道《云峰寺至天池寺记》："佛庐甚华整，覆以铁。一溪涨绿，泠然阶下。"

夹江滴翠 jiā jiāng dī cuì　形容江两岸林木碧绿状。明·王思任《钓

台》："肃入先生祠，古柏阴风，夹江滴翠，气象整峻。"

层波叠翠 céng bō dié cuì　绿水涌起层层波浪的样子。明·袁宏道《上方》："至于峰峦攒簇，层波叠翠，则虎丘亦自佳。"

波澄黛蓄 bō chéng dài xù　形容水面平静水深色绿。明·袁宏道《由水溪至水心崖记》："水至此亦敛怒，波澄黛蓄，递相亲媚，以与游人娱。"

青萍碧浪 qīng píng bì làng　形容长着水草的水面。明·陈继儒《许秘书园记》："使十五小儿，锦衣画舸，唱采莲词，出没于青萍碧浪之间，可以终老。"

清流急湍 qīng liú jí tuān　河水清而水流急。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

素湍绿潭 sù tuān lǜ tán　白色的激流和绿色的深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

窈然深碧 yǎo rán shēn bì　幽深碧绿的样子。明·钟惺《浣花溪记》："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

澄碧渊渟 chéng bì yuān tíng　清澈碧绿深邃平静。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又水潴其中，亦澄碧渊渟。"

清莹秀澈 qīng yíng xiù chè　形容溪水清洁透明，秀美澄净。唐·柳宗元《愚溪诗序》："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

水望澄明 shuǐ wàng chéng míng　水色清澈。明·张岱《西湖梦寻》："是地水望澄明，皦焉冲照，亭观绣峙两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

虚明凝湛 xū míng níng zhàng　空旷透明，好象液体凝结。宋·范成大《吴船录》："光之正中，虚明凝湛，观者各自见其形，现于虚明之处，毫厘无隐。"

空明窅映 kōng míng yǎo yìng　湖光倒映，水天一色。清·李卫《西湖志》："空明窅映，俨然湖中之湖。"

晶光荧荧 jīng guāng yíng yíng　光亮微弱。清·郁永河《采疏日记》："海上夜黑不见一物，则击水以视，一击而水光飞溅，如明珠十斛倾撒水面。晶光荧荧，良久始灭。"

沁洁奇幻 qìn jié qí huàn　谓山泉、井水澄澈清爽，峰峦、山崖的形态奇特。清·赵坦《烟霞岭游记》："岩曰佛手，井号上方，莫不沁洁奇幻，克有其名。"

乱石流影 luàn shí liú yǐng　形容水中石影摇动状。明·谭元春《游南岳记》："再往水帘洞，越陌踏涧。洞中乱石流影，闲花开之。"

回清倒影 huí qīng dào yǐng　回旋的清波和倒映的景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

倒影沉碧 dào yǐng chén bì　形容两岸山景倒映水中状。明·程嘉燧《发淳安记密山诸岩》："时方昼晡，坐舲间观潭水如展镜，浸濯峰趾，倒影

沉碧。”

月影银碎 yuè yǐng yín suì 形容波涛动荡中的月影。清·管同《宝山记游》："是月既望，遂相携观月于海塘。海涛山崩，月影银碎，寥阔清寒，相对疑非人世境。”

半月拖蓝 bàn yuè tuō lán 海水象半轮月亮披洒一派蓝色光波。明·杨慎《游点苍山记》："比入龙尾关，且行且玩，山则苍龙儗翠，海则半月拖蓝。”

柔蓝懈白 róu lán xiè bái 形容日落时河岸渐趋模糊的景色。明·王思任《小洋》："日益旸，河滩色如柔蓝懈白，对岸河则芦花月影，忽忽不可辩识。”

缭青萦白 liáo qīng yíng bái 形容青天白云倒映水中之状。明·袁宏道《由水溪至水心崖记》："山水如在镜面，缭青萦白，千里一规，真花源中一尤物也。”

水清石白 shuǐ qīng shí bái 形容水中石色。明·王思任《游焦山记》："澡罢，谒焦先生祠，庶几所谓水清石白者。”

石梁如雪 shí liáng rú xuě 形容石桥洁白。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两岸垂柳，带指清波，石梁如雪，雁齿相次，间以独木为桥，跨之濯足，沁凉入骨。”

淘金漾碧 táo jīn yàng bì 形容水中石色鲜明状。明·程嘉燧《自昌化至歷溪》："时日色射水底，晶莹的砾，沙石五色如霞绮，淘金漾碧，亦异观也。”

朱碧磊砢 zhū bì lěi kē 形容水中石子堆叠颜色鲜明状。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至裂帛泉，水仰射，沸冰结雪，汇于池中，见石子鳞鳞，朱碧磊砢，如金沙布地，七宝妆施。”

朱鱼垂空 zhū yú chuí kōng 形容水中红叶飘浮状。明·谭元春《游玄岳记》："有落叶数十片，背正红，点桥前小池，若朱鱼垂空。”

浮光跃金 fú guāng yuè jīn 形容月光映照在动荡的水面上的景象。宋·范仲淹《岳阳楼记》："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渊无潜甲 yuān wú qián jiǎ 水深处没有不可见的潜游之鱼，极言水清。明·张岱《西湖梦寻》："祠前有池亩许，泉白如玉，水望澄明，渊无潜甲”

平如油盎 píng rú yóu àng 喻江水平静而光亮。宋·陆游《入蜀记》："仰视天，如匹练然。水已落，峡中平如油盎。”

渌渊镜净 lù yuān jìng jìng 清澈的水如明镜一般。晋·慧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

波澜不惊 bō lán bù jīng 形容水面平静无浪状。宋·范仲淹《岳阳楼记》："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波容零碎 bō róng líng suì 波光跳跃象是碎金。明·陈仁锡《剡溪记》："桥壁五里，壁有夜光，见壁下持灯者。月照帆影，波容零碎。”

文沦若縠 wén lún ruò hú　水纹象绉纱似的。明·王世贞《海游记》："文沦若縠，容裔荡漾，与天下上。"

縠纹轮漪 hú wén lún yī　形容水波。明·陈继儒《许秘书园记》："梁有亭，亭可候月，空明潋滟，縠纹轮漪，若数百斛碎珠，流走冰壶水晶盘，飞跃不定。"

水波容与 shuǐ bō róng yǔ　水波缓缓流动状。明·陈仁锡《剡溪记》："稍前则冯家浦，若雉堞环拱，而晚照沙平，水波容与，远山皆碧。"

溶漾纡余 róng yàng yū yú　形容泉水溶聚缓缓流动的样子。唐·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余。"

秋深潦缩 qiū shēn lǎo suō　时至深秋，水位下降。宋·陆游《小孤山大孤山记》："是日风静，舟行颇迟，又秋深潦缩，故得尽见杜老所谓'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也。"

幽韵涵淡 yōu yùn hán dàn　形容泉清而幽静。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刹后有泉，从山根石罅中出，喷吐冰雪，幽韵涵淡。"

苔石啮波 tái shí niè bō　形容水畔石上长满青苔状。明·钟惺《梅花墅记》："又穿小酉洞，憩招爽亭，苔石啮波，曰锦淙滩。"

长桥卧波 cháng qiáo wò bō　长桥横架在碧波之上。唐·杜牧《阿房宫赋》："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

铁面横波 tiě miàn héng bō　形容两岸风景缺少意致。明·王思任《剡溪》："浮曹娥江上，铁面横波，终不快意。将至三界址，江色狎人，渔火村灯，与白月相下上，沙明山静，犬吠声若豹。"

黯湛渊沦 àn zhàn yuan lún　深黑无底。宋·徐兢《使高丽录》："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渊沦，正黑如墨，猝然视之，心胆俱丧。"

电流雷语 diàn liú léi yǔ　形容溪水急而声喧。明·王思任《剡溪》："城南百丈桥翼然虹饮，溪逗其下，电流雷语。"

俏然如语 qiào rán rú yǔ　形容水声跳宕细碎。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山根中时出清泉，激喷巉石中，俏然如语。"

珠迸玉碎 zhū bèng yù suì　形容水色晶光闪闪，象珠玉一样。明·王世懋《游五老三叠开先瀑布记》："水石冲激，乃始潆洄作态，珠迸玉碎。"

跳珠喷玉 tiào zhū pēn yù　形容急流激起的浪花如珠如玉。清·刘大櫆《游碾玉峡记》："其中旁陷迫束，水激而鸣，声琮然，为跳珠喷玉之状。"

跳珠溅玉 tiào zhū jiàn yú　形容泉水溅石，象珍珠洒在玉石上那样跳跃四溅。唐·白居易《三游洞序》："仰睇俯察，绝无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凿凿，跳珠溅玉，惊动耳目。"

碎玉哀弦 suì yù āi xián　形容山泉飞溅，雪白如玉的水珠，发出哀伤如弦乐的声音。清·施闰章《游九华记》："由山麓蹇裳，则寒泉数十百道，喷激沙石，碎玉哀弦。"

哀玉淙淙 āi yù cōng cōng　形容泉水流声。明·王思任《东山》："又壑中时有哀玉淙淙，草多远志，看洗履池一泓不竭，可当万里流也。"

甘粹柔滑 gān cuì róu huá　形容泉水甜美、澄清、柔和。明·袁宏道《灵隐》："潺湲洁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嗜，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

粹冷柔滑 cuì lěng róu huá　形容涧水的清洁和缓。唐·白居易《冷泉亭记》："矧又潺湲洁澈，粹冷柔滑。"

空水弄影 kōng shuǐ nòng yǐng 日光下波影动荡的样子。元·吴莱《游甬东山水古迹记》："及日光照海，薄云掩蔽，空水弄影，恍类铺僧伽黎衣，或现或灭。"

天

鸿蒙 hóng méng　广大无边的样子。明·周叙《游嵩阳记》："目与景接，心契神会，超然若御浩气，游鸿蒙，而不知其所止也。"

空蒙 kōng méng　形容云雾迷茫的样子。宋·张栻《南岳游山唱酬序》："云气出岩，夏腾涌如喷镏，过南岭，为风所飘，空蒙杳霭，顷刻不复见。"

晦蒙 huì méng　黯淡无光貌。明·张岱《西湖梦寻》："仰天暂江，月星晦蒙。"

晦冥 huì míng　昏暗没有星光。宋·徐兢《使高丽录》："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

冥蒙 míng méng　景色不明。元·李泂《观开先瀑布记》："回风一散，万象冥蒙。"

苍苍 cāng cāng　迷茫；看不分明的样子。明·张岱《西湖梦寻》："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苍苍。"

苍茫 cāng máng　形容广阔无边，看不分明。明·张岱《西湖梦寻》："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胜，一望苍茫，可数百里。"

茫昧 máng mèi　幽暗不明，不可测度。元·萨都剌《龙门记》："前不可见，后不可知，迷人于恍惚茫昧之途。"

混茫 hùn máng　广阔无涯的境界。清·屈大均《登华记》："东南二峰隐混茫，虽晴霁弗见，跛立久之。"

莽閬 mǎng láng　广大空旷的样子。清·李宗昉《游庐山天池记》："席蒋坐松下，四周莽閬苍翠。"

沕穆 wù mù　深微貌。清·李宗昉《游庐山天池记》："坐侧老龙鳞咫尺无睹，置身苍茫沕穆中。"

纷郁 fēn yù　盛多的样子。宋·

范成大《游峨嵋山记》："兜罗绵㲯布岩下，纷郁而上。"

弥沦 mí lún　完全被淹没。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时浓雾成雨，深茅交通，四顾皆弥沦如银海。"

氤氲 yīn yūn　云烟弥漫的样子。清·张道浚《游劳山记》："僧言海气氤氲，晨曦恒晦，若此纤悉毕现，人不数见者也。"

杳霭 yǎo ǎi　也作"杳蔼"。深远的样子。宋·张栻《南岳游山唱酬序》："云气出岩，夏腾涌如喷馏，过南岭，为风所飘，空蒙杳霭，顷刻不复见。"

叆叇 ài dài　形容云很浓密的样子。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达旦雨止，而云气叆叇。"

叆霼 ài fèi　昏暗的样子。清·张维屏《天池看云记》："叆霼荟煜，参潭丰融，如五采之错综，如五金之销熔。"

轮囷 lún qūn　云气盘绕之状。《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

熇蒸 xiāo zhēng　热气升腾。唐·柳宗元《光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人多疾殃炎暑熇蒸。"

滃然 wěng rán　云气升腾之状。宋·王履《始入华山至西峰记》："倚树息，四侧相语角健，若贾勇于余者，时云方滃然，进退开合，若相与相背，往来四峰端，悠飏不已。余神凝其间，忘所以事事者。"

滃起 wěng qǐ　涌起。元·汪泽民《游黄山记》："俄顷，白云滃起，遍山近岭，如出没海涛，仅余绝顶，槎溯天汉中，倏又敛藏如扫，如是者三，可谓奇观矣。"

滃渤 wěng bó　形容云气涌起的样子。宋·张栻《南岳游山唱酬序》："下视白云滃浡弥漫，吞吐林谷，真有荡胸之势。"

浡滃 bó wěng　云气四起貌。汉·扬雄《解难》："泰山之高不嶕峣，则不能浡滃云而散歊烝。"

坌涌 bèn yǒng　喷涌，聚而上涌。清·袁枚《游庐山黄岩遇雨记》："正徘徊间，大雨暴至，云气坌涌，人对面不相识。"

拂拂 fú fú　飘动的样子。明·杨士奇《游东山记》："时风日和畅，草木之葩烂然，香气拂拂袭衣，禽鸟之声不一类。"

泬寥 xuè liáo　空旷清朗貌。清·钱谦益《游黄山记》："百里之内，天容泬寥，云物鲜华，游尘飞埃，望崖却返。"

澄凝 chéng níng　清明。唐·苏颋《秋夜小洞庭离宴序》："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

澄济 chéng jì　清明晴朗。明·乔宇《五台山》："厥明山空澄济，但觉风飕飕起林间。"

缥碧 piāo bì　青绿色。明·谭元春《游南岳记》："又望于县之郊廛，云顶一二片绽者，的的见缥碧。"

溶云 yóng yún　白云浮动若水波荡漾。清·姚鼐《游媚笔泉记》："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

喧霁 xuān jì　形容秋天晴明热

烈之景象。明·谭元春《游玄岳记》："两重山接魂弄色于喧霁之中，万壑树交盖此围于趾步之间，目不得移，气不得吐。"

晴霁 qíng jì　天气晴朗。宋·周必大《亲征录》："又军兴以来，阴雨连绵，天气愁沮，间值晴霁，必传捷音。"

皓然 hào rán　洁白光明貌，此指炎热的阳光。清·汪济淳《黄山气候云物记》："黄山气如高秋，野服箨冠，曳杖岩趾，见奇峰撑天，叠巘蔽日，古木千章，寒潭百尺，凉飔拂拂，皓然向有！"

晶沁 jīng qìn　晶莹渗透。明·张岱《西湖梦寻》："月光晶沁，水气滃之，人稀地僻，不可久留。"

霅煜 shà yù　光明显赫的样子。清·张维屏《天池看云记》："叆叇霅煜，参谭丰融，如五彩错综，如五金之销熔。"

熀烂 huǎng làn　明亮、辉煌。晋·葛洪《抱朴子》："所谓抱萤烛于环堵之内者，不见矢光之熀烂，侣鲉虾于迹水之中者，不识四海之浩汗。"

曈昽 tóng lóng　太阳初升逐渐明亮的样子。宋·刘弇《游狼山记》："是时朝日初上，曈昽如耀金发莽苍中，洞视上下，不隋祥祸。"

熹微 xī wēi　微明貌。明·张岱《西湖梦寻》："还谓所知，湖之潋滟熹微，大约如晨光之着树，明月之入庐。"

杲杲 gǎo gǎo　太阳明亮的样子。清·徐瀛《西征日记四则》："一路晴日杲杲，舆中闷甚，挥扇不辍。"

绎绎 yì yì　光盛貌。《汉书·五行志》："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

煜煜 yù yù　明亮的样子。明·程敏政《夜渡两关记》："适有大星光煜煜自东而西流。"

烺烺 lǎng lǎng　如火样明亮。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中夜闻隔户夜起者，言明星烺烺。"

叠阵 dié zhèn　形容风声猛烈。宋·王履《玉女峰记》："夜过半，大声叠阵如涛雷然，孔隙皆喁喁，明处澄黑，如云风欲酿雨也。"

寥戾 liáo lì　形容声音清远。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故虎啸而风寥唳，龙起而致云气。"

飂飘 liáo piāo　寒而多风。宋·陆游《入蜀记》："是日重阳，微雪，天气飂飘，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

飂飂 liáo liáo　风吹的样子。明·高启《游天平山记》："则见山之云浮浮，天之风飂飂，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

飗飗 liú liú　通"溜溜"，风凉快的样子。唐·冯宿《兰豁县灵隐寺东峰新亭记》："但山风飗飗，岭云峨峨。"

泠泠 líng líng　清凉的样子。唐·白居易《冷泉亭记》："夏之夜，我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心情。"

湑湑 xǔ xǔ　形容风清。唐·柳宗元《湘源二妃庙碑》："南风湑湑，湘水如舞。"

飒尔 sà ěr　风声响动。宋·王履

《始入华山至西峰记》："风飒尔有声，众籁齐鸣。"

飒然 sà rán 形容风声。宋·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门牖相值，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在何境也。"

凄其 qī qí 寒凉貌。明·江瓘《游黄山记》："亭午抵祥符寺，逢罗子尚纲，乡子叔玉，路子子美，藏修山房，结伴偕往，风雨凄其，登临兴阻。"

觱发 bì fā 寒风陡生。明·乔宇《五台山》："又十里，至欢喜岭，风果觱发。"

殷殷 yǐn yǐn 雷声很大。清·戴名世《乙亥北行日记》："顷之，雷声殷殷起，风雨骤至。"

霏微 fēi wēi 水点细微的样子。唐·白居易《庐山草堂记》："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

廉纤 lián xiān 微雨的样子。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下饭庵中，雨廉纤不止，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

淋漉 lín lù 流滴貌。晋·葛洪《抱朴子》："甘露淋漉以霄坠，嘉穗婀娜而盈箱。"

瀼瀼 ráng ráng 露盛的样子。清·钱谦益《游黄山记》："三十六年徽茫侵日魄中，零露瀼瀼，沾湿巾屦，凄神寒骨，峭怆而返。"

沣沛 fēng pèi 雨水充沛的样子。汉·应劭《风俗通》："暴雨亟至，大雨沣沛。"

滂霈 páng pèi 雨水盛大。三国魏·应璩《与广川长岑瑜书》："昔夏禹之解阳旱，殷汤之祷桑林，言未发而水旋流，辞未卒而泽滂霈。"

滂薄 páng bó 雨下得很大的样子。明·张岱《西湖梦寻》："自是祷辄应，而雨每滂薄不休，世传烂稻龙王焉。"

蓬蓬然 péng péng rán 风起云涌的样子。清·恽敬《游庐山记》："于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成阵，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

滃滃然 wěng wěng rán 云气涌起貌。清·吴敏树《君山月夜泛舟记》："云起船侧，水上滃滃然。"

渰浥浡郁 yǎn yì bó yù 水气蒸腾的样子。宋·谢翱《登西台恸哭记》："有云从南来，渰浥浡郁，气薄森中，若相助以悲者。"

杳冥鸿蒙 yǎo míng hóng méng 深远混沌的样子。清·王灼《黄山纪游》："东极日之所出，灏气布弥，杳冥鸿蒙，与天无际。"

苍莽寥泬 cāng mǎng liào xuè 旷荡空虚的样子。清·龚自珍《乙亥六月重过扬州记》："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为萧疏淡荡，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

澒洞蟠际 hòng dòng pán jì 形容云气弥漫无际。清·韩诗《初登黄海记》："飞流怒霄，澒洞蟠际。"

窅窅莽莽 yǎo yǎo mǎng mǎng 深远空阔不分明的样子。明·屠隆《海览》："五鼓起观朝旭，初黑气罩幕，窅窅莽莽，有若混沌未辟。"

睢睢盱盱 suī suī xū xū 天地未开前元气浑朴貌。汉·杨雄《剧秦

美新》："权与天地未袪，睢睢盱盱。"

洞洞瞩瞩 dòng dòng zhǔ zhǔ　云不相连貌。清·韩诗《初登黄海记》："须臾云敛，洞洞瞩瞩，风上云下，山出壑生，巍峨狮子座欠申而起。"

蓊蓊蓬蓬 wěng wěng péng péng　茂盛的样子。清·张维屏《天池看云记》："返照倒映，倏而紫翠，倏而青红，滔滔滚滚，蓊蓊蓬蓬。"

沧沧凉凉 cāng cāng liáng liáng　凉貌。《列子·汤问》："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

飕飕飒飒 sōu sōu sà sà　形容风声。清·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微风震撼，则如波涛汹涌。飕飕飒飒，不可名状。"

雾淞沆砀 wù sōng hàng dàng　雾气水气白茫茫一片。明·张岱《西湖梦寻》："雾松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绛雰浮幰 jiàng fēn fú yǐn　形容岚气在山间浮动状。明·王思任《游敬亭山记》："曾过响潭，鸟语入流，两壁互答，望敬亭绛雰浮幰，令我杳然生翼。"

岚润如滴 lán rùn rú dī　形容山气湿润之状。明·李流芳《游西山小记》："由青龙桥纵辔堤上，晚风正清，湖烟乍起，岚润如滴，柳娇欲狂。"

岚气袭人 lán qì xí rén　山林中的雾气侵人肌肤。明·王世懋《游玉老三叠开先瀑布记》："既而岚气袭人，背袷骤单，觉阒然幽境，凛不可留。"

勃如队仗 bó rú duì zhàng　形容云气团团象队列仪仗似的。宋·范成大《吴船录》："云气勃如队仗，既当岩，则少驻，云头现大圆光，杂色之晕数重。"

奔涧荡壑 bēn jiàn dàng hè　在山涧里奔腾，在山壑中激荡。清·田雯《游太室记》："微飙吹之则左右动，奔涧荡壑，众山皆响，为嵩山佳处。"

薄暮冥冥 bó mù míng míng　临近黄昏幽暗不明的样子。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苍霭沉沉 cāng ǎi chén chén　谓云气深沉。清·屈大均《登华记》："久之，但见西峰之影，苍霭沉沉，曦日中，尝如瀑雨。"

云霞漠漠 yán xiá mò mò　谓云霞密布。明·魏光绪《华游记》："云霞漠漠，下视无际，北斗正挂檐际，大可碗许。"

混然一白 hùn rán yī bái　白茫茫一片的样子。宋·范成大《游峨嵋山记》："复诣岩殿致祷，俄氛雾四起，混然一白。"

雷辊电霍 léi kūn diàn huò　雷鸣电闪，形容声势之盛。明·袁宏道《虎丘》："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皱云驳雾 zhòu yún bó wù　形容山洞里雾气凝涩状。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又有大士洞，石理诘曲，突兀奋怒，皱云驳雾，较华严洞更觉华严险怪。"

霪雨霏霏 yín yǔ fēi fēi　形容降雨连续不停。宋·范仲淹《岳阳楼记》："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

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

天高日晶 tiān gāo rì jīng　形容秋季天气晴朗景物清明状。宋·欧阳修《秋声赋》：“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

天宇晴霁 tiān yǔ qíng jì　天空晴明。宋·陆游《入蜀记》：“是日，天宇晴霁，四顾无许翳。”

灏气澄肃 hào qì chéng sù　空气澄澈肃杀。灏，广大无边的样子。明·高启《游天平山记》：“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积霖既霁，灏气澄肃。”

秋空澄霁 qiū kōng chéng jì　秋季的天空晴朗明亮。清·刘大櫆《游黄山记》：“秋空澄霁，登顶而望，日月之所出没，霞虹之所照耀。”

澄泓萧瑟 chéng hóng xiāo sè　形容秋天景色。明·陈继儒《许秘书园记》：“此去桃霞莲靥，绘绣绮错，而一片澄泓萧瑟之景，独此写出江南秋。”

烟霏云敛 yān fēi yún liǎn　形容秋季空气澄明状。宋·欧阳修《秋声赋》：“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

白露横江 bái lù héng jiāng　形容秋季夜晚江面上水气凝重寒凉之状。宋·苏轼《前赤壁赋》：“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月白风清 yuè bái fēng qīng　秋季夜晚的景象。宋·苏轼《后赤壁赋》：“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林寒涧肃 lín hán jiàn sù　形容秋节林木清冷山涧萧瑟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

烟霜助洁 yān shuāng zhù jié　形容秋天的霜气使景物洁白状。明·钟惺《梅花墅记》：“阁以外，林竹则烟霜助洁，花实则云霞乱彩，池沼则星月含清，严晨肃月，不辍暄妍。”

烟高霜满 yān gāo shuāng mǎn　形容秋天的景象。明·谭元春《自题湖霜草》：“僧上凫下，觞止茗生，篱辉因风，渔茭聚火，奇唱发，流光开，霞敛星移，烟高霜满。”

虹销雨霁 hóng xiāo yǔ jì　形容雨后天晴，彩虹亘天的景象。唐·王勃《滕王阁序》：“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霞映桥红 xiá yìng qiáo hóng　晚霞把桥映成红色。清·沈复《浮生六记》：“少焉，霞映桥红，烟笼柳暗，银蟾欲上，渔火满江矣。”

出炉银红 chū lú yín hóng　形容晚霞色彩。明·王思任《小洋》：“又有夜岚数层斗起，如鱼肚白，穿入出炉银红中，金光煜煜不定。”

碎剪鹅毛霞 suì jiǎn é máo xiá　形容晚霞中细茸状白云。明·王思任《小洋》：“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金黄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

云霞紫翠 yún xiá zǐ cuì　形容朝日映照云霞的颜色。明·屠隆《海

览》："须臾大火轮吐海底，海峰如赭，云霞紫翠，倏忽变幻。"

彩翠云涛 cǎi cuì yún tāo　谓群峰叠翠铺彩，云涛舒卷之状。明·李裕《华山记》："彩翠云涛，竞秀献状，令人心目俱驰！"

传明散彩 chuán míng sàn cǎi　放散出光亮和霞彩。南朝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

彩错斓斑 cǎi cuò lán bān　形容色彩错杂的样子。清·赵坦《烟霞岭游记》："烟霞岭，南山之长也。秀气磅礴，苍松蔚然，晨光夕曦，烟浮霞映，彩错斓斑，天成图画。"

吐云蒸媚 tǔ yún zhēng mèi　形容水面云气浮动状。明·王思任《游敬亭山记》："姑孰据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从青山讨宛，则曲曲镜湾，吐云蒸媚，山水秀而清矣。"

霞气蒸人 xiá qì zhēng rén　形容晚霞照人。明·曹学佺《春风楼记》："余一夕与云将泛小艇问其处，西山霞气蒸人，中流闻箫鼓声渺渺自空堕，回视春风楼如在蓬岛，而我辈已神仙中人矣。"

烟浮霞映 yān fú xiá yìng　烟霞起伏交错的样子。清·赵坦《烟霞岭游记》："烟霞岭，南山之长也。秀气磅礴，苍松蔚然，晨光夕曦，烟浮霞映，彩错斓斑，天成图画。"

烟霭异色 yān ǎi yì sè　烟云色采异常美妙的样子。唐·元结《寒亭记》："若旦暮景气，烟霭异色，苍苍石墉，含映水木。"

风烟掩抑 fēng yān yǎn yì　风烟笼罩的样子。清·汪中《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寒流清泚，秋菘满田，室庐皆尽，唯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

落日含半规 luò rì hán bàn guī　形容日落成半圆之状。明·王思任《小洋》："落日含半规，如胭脂初从火出，溪西一带山，俱以鹦鹉绿，鸦背青，上有腥红云五千尺。"

素月流天 sù yuè liú tiān　形容白色的月亮在天空移动。明·叶绍袁《窃闻》："今春上元之后，素月流天，瑞花集树，帘风送冷，曙漏催愁。"

月影横斜 yuè yǐng héng xié　形容夜深月影偏斜状。明·袁宏道《虎丘》："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

月痕如眉 yuè hén rú méi　初弦之月，象眉毛那样弯曲。清·李圭《东行日记》："是晚海天一色，月痕如眉。"

斜照薄金 xié zhào bó jīn　夕阳下的景物仿佛涂上一层薄金。明·王衡《游香山记》："轩前两山为腭，而虚其襟以摔帝城，斜照薄金，银台蒸气。"

云收天碧 yún shōu tiān bì　雨后天晴的景象。唐·荆浩《画山水赋》："雨霁则云收天碧，薄霭依稀，山光浅翠，网晒斜晖。"

地

胜概 shèng gài　美好的景色。明·张岱《西湖梦寻》："露台亩许，周以石栏，湖山胜概，一览无遗。"

清胜 qīng shèng　清淡美好。明·张岱《西湖梦寻》："想二三月，柳叶桃花，游人阗塞，不若此时之为清胜。"

灵胜 líng shèng　神妙的山水胜景。唐·白居易《草堂记》："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待我。"

绝景 jué jǐng　美好无比的风景。宋·周密《三高亭记》："三高亭，天下绝景也；石湖老仙一记，亦天下奇笔也。"

童土 tóng tǔ　无草木之地。《庄子·徐无鬼》："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来之泽。"

林坰 ín jiōng　山林郊野。宋·侯彭老《程公岩记》："自湘南楼渡重江而东，林垌旷然。"

樊邱 fán qiū　田园山野。清·王复礼《御览孤山志》："远荣名于朝市，安寂寞于樊邱，殆将心古人之心，行古人之行矣。"

徼道 jiào dào　边境曲折迂回的道路。唐·张说《宋公遗爱碑颂》："天子念穷乡之僻陋，徼道之修阻。"

间道 jiàn dào　偏僻但是捷直的小路。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寨东去武关九十里，西向商州，即陕省间道。"

坎窞 kǎn dàn　地坑。清·黄之隽《游隐山记》："光尽处，为坎窞，谛望有隙光。"

膏腴 gāo yú　肥沃。唐·玄奘《跋禄迦国》："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树林蓊郁。"

膴膴 wǔ wǔ　肥美貌。明·江瓘《游黄山记》："自黑溪四十五里达汤口，平原膴膴，阡陌交通。"

亢爽 kàng shuǎng　高旷开朗。宋·曾巩《拟岘堂记》："去榛与草，发其亢爽。"

圹埌 kuàng làng　原野平圹、一望无际的样子。《庄子·应帝王》："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

旷莽 kuàng mǎng　空阔苍莽。明·魏光绪《华游记》："北顾秦川，旷莽千里；黄河一发，崤函一垤；首阳、中条一培塿。"

延袤 yán mào　绵亘，绵延连续。明·欧阳亘《游风洞记》："其间良田沃壤，果园花圃，延袤千余亩。"

辽邈 liáo miǎo　宽广稀少。元·汪泽民《游黄山记》："由兴岭抵此四十五里，人迹辽邈，可屏尘事，遂宿焉，听泉而去。"

绵邈 mián miǎo　延绵广远貌。明·袁宏道《灵岩记》:"山河绵邈，粉黛若新。"

平衍 píng yǎn　地平广的样子。明·杨士奇《游东山记》:"东行数十步，过小冈，田畴平衍弥望，有茅屋十数家，遂造焉。"

羡衍 xiàn yǎn　广阔平坦貌。宋·邓牧《雪窦游记》:"寺前秧田羡衍，山林所环，不异平地。"

坱郁 yǎng yù　茫无边际貌。南朝梁·刘峻《东阳金华山栖志》:"山川秀丽，皋泽坱郁。"

幽奇 yōu qí　幽境奇景。唐·元结《峿台铭序》:"掩映轩户，毕皆幽奇。"

幽绝 yōu jué　幽美之极。明·张岱《西湖梦寻》:"园中有楼，倚窗南望，沙际水明，常见浴凫数百出没波心，此景幽绝。"

幽阒 yōu qù　偏僻寂静。明·张岱《西湖梦寻》:"其径经路崎岖，草木蔚秀，人烟旷绝，幽阒静悄，别有天地，自非人间。"

幽邃 yōu suì　幽深。明·宋濂《游钟山记》:"池上有圆通阁，阁后即屏风岭，碧石青林，幽邃如画。"

渊邃 yuān suì　深远。元·麻革《游龙山记》:"至于奥密渊邃，树林荟蔚繁阜，不一览而得，则兹山亦其可少哉!"

奥如 ào rú　幽深曲折的样子。清·僧沐湛等辑《圣水杂志》:"盖奥如而具旷如之致，不独为兹山之冠。"

险奥 xiǎn ào　形容形势险要偏僻。明·钟惺《浣花溪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

萦纡 yíng yū　曲折迂回。宋·吴自牧《梦粱录》:"唯堂滨湖，入其门，一径萦纡，花木蔽翳，亭馆相望。"

襟束 jīn shù　如衣襟之束，意谓狭窄。唐·莫休符《栖霞洞》:"有石门，势甚襟束。"

龃龉 jǔ yǔ　形容地面参差不平。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于是皆车道平拓，无龃龉之虑矣。"

瑰奇 guī qí　奇异。宋·范成大《吴船录》:"山绵延入天竺诸藩，相去不知几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间，瑰奇胜绝之观，真冠平尘矣。"

潇洒 xiāo sǎ　形容景色清秀洒脱。宋·柳开《游天平山记》:"四顾气象潇洒，恍然疑在物外。"

冶艳 yě yàn　妖冶美丽。明·张岱《西湖梦寻》:"后至北宋，西湖起而夺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鉴湖之澹远，自不及西湖之冶艳矣。"

澹远 dàn yuǎn　清雅高远。例见上。

清远 qīng yuǎn　清新淡远貌。明·钟惺《《浣花溪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

廓然 kuò rán　广阔的样子。宋·邓牧《雪窦游志》:"忽出林际，则廓然开朗，一瞬百里。"

阒然 qù rán　静寂貌。明·王世懋《游五老三叠开先瀑布记》:"既而岚气袭人，背袷聚单，觅阒然仙境，凛不可留。"

隐然 yǐn rán　安稳的样子。宋·

曾巩《墨池记》："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

清荣峻茂 qīng róng jùn mào 水清、木荣、山峻、草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绝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水木清华 shuǐ mù qīng huá 指园林池沼景色清丽。《宋书·隐逸传》："且严壑闲远，水木清华，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

团栾映带 tuán luán yìng dài 谓山水聚集，相互交映。宋·周去非《岭外代答》："青山绿水，团栾映带。"

回溪绝壑 huí xī jué hè 回转的溪流和僻远的深谷。明·张岱《西湖梦寻》："造山房数楹，尽驾回溪绝壑之上，溪水淙淙出阁下。"

幽泉怪石 yōu quán guài shí 幽深的泉水和怪异的山石。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瑰美幽丽 guī měi yōu lì 幽静奇异美丽。宋·曾巩《游信州玉山小岩记》："自古述山水者多矣！见其瑰美幽丽，而多诿之神明之为者，其言怪诞迂谲，非戴缨垂绅而游者所宜尚，予不敢知也。"

閟邃幽阒 bì suì yōu qù 深远幽静。唐·刘宽夫《剔竹记》："閟邃幽阒，似非官曹。"

幽深奥曲 yōu shēn ào qū 幽静深远曲折。清·姚鼐《左仲郛浮渡诗序》："而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览不穷。"

幽遐瑰诡 yōu xiá guī guǐ 谓幽僻荒远山水里种种奇丽景物。唐·韩愈《燕喜亭记》："猿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宜其于山水厌闻而猒见也。"

幽邃靖深 yōu suì jìng shēn 幽静深远。宋·王质《游东林山水记》："溪上下色皆重碧，幽邃靖深，意若不欲流。"

结曲幽邃 jié qū yōu suì 曲折深远。唐·吴武陵《新开隐山记》："东过小石门，门东頫行三十步，结曲幽邃。"

坦夷爽垲 tǎn yí shuǎng kǎi 地势高平而土质干燥。明·董传策《游桂林诸岩洞记》："余二人从石门而入，顿觉坦夷爽垲，约可列坐数十人。"

白云绿坳 bái yún lǜ ào 形容晴和的山野风光。明·王思任《天姥》："从南明入台山，如剥笋根，又如旋螺顶，渐深遂渐上，过桃墅，溪鸣树舞，白云绿坳，略有人间。"

烟樯雨楫 yān qiáng yǔ jí 形容雨中船状。明·李流芳《游石湖小记》："放舟湖中，见烟樯雨楫，杂沓而来，举酒对之，亦足乐也。"

枕上沸波 zhěn shàng fèi bō 夜卧山寺，听到风声、雨声、泉声、松涛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如翻腾的波浪。明·张岱《西湖梦寻》："枕上沸波，竟夜不息，视听幽独，喧极反寂，益信声无哀乐也。"

淡冶相得 dàn yě xiāng dé 素雅、艳丽相配和谐。明·袁宏道《由水溪至水心崖记》："而淡冶相得，略

如西子湖。”

人

轩渠 xuān qú 悦乐的样子。清·黄淳耀《李龙眠画罗汉记》：“而仰视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轩渠自得。”

容与 róng yǔ 悠闲自在的样子。清·宋荦《游姑苏台记》：“时已薄暮，饭罢，乘风容与而归。”

闲都 xián dū 娴雅美丽。明·张岱《西湖梦寻》：“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

呕煦 ōu xù 和悦貌。清·邵长蘅《阎典史传》：“陈明选宽厚呕煦，每巡越，拊循其士卒，相劳苦，或至流涕。”

嗫嚅 niè rú 想说话而又停止貌。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

委顿 wěi dùn 极度疲困。清·郁永河《采疏日记》：“人人竹中，往往牵发毁肌，莫不委顿，世有嵇阮，难共入林。”

腭眙 è yí 惊骇貌。清·乔光烈《登华山记》：“有所为回心者，不自知向之勇于往而忘其腭眙也。”

噤瘁 jìn shēn 寒栗发抖的样子。宋·王履《南峰记》：“阑外临绝谷，试微瞰，怵然神悚，噤瘁不可当。”

鬅鬙 péng cēng 头发松散的样子。清·黄淳耀《李龙眠画罗汉记》：“两童子首发鬅鬙，共舁一人以渡。”

轩轩 xuān xuān 兴奋状。清·乔光烈《登华山记》：“读之，喜其奥于境而奇于观也，意恒轩轩动，特未暇一至焉。”

舒舒 shū shū 从容舒缓貌。宋·苏舜钦《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其视舒舒，其行于于，岂上世之遗民者邪！”

阳阳 yáng yáng 安舒自得貌。唐·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

楚楚 chǔ chǔ 鲜明整洁的样子。明·袁宗道《上方山四记》：“诸公两手扶杖，短衣楚楚，相顾失笑。”

施施 yí yí 慢慢行走的样子。明·李流芳《游玉山小记》：“遥见伯美自山麓施施而来，遣童呼之。”

于于 yú yú 行动舒缓自得貌。清·袁枚《游桂林诸山记》：“余寓太守署中，哺食后，即于于焉而游。”

絮絮 xù xù 形容话语连续不断。明·张岱《西湖梦寻》：“小青无事，辄临池自照，好与影语，絮絮如问答，人见辄止。”

蹙蹙 cù cù 局促的样子。清·钱谦益《徐霞客传》：“霞客生里社，奇情郁然，玄对山水，力耕奉母，践更

徭役，蹙蹙如笼鸟之触隅，每思飏去。"

洒然 sǎ rán　不受拘束的样子。宋·苏舜钦《沧浪亭记》："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

翩然 piān rán　轻快貌。清·罗辰《游隐山六洞记》："于是翩然独行，越漂帛堵，度蒙溪桥，所过长林匝道，微暑不侵。"

煜然 yù rán　明亮的样子。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佩容臭，煜然若神人。"

怡然 yí rán　快乐的样子。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兀然 wù rán　平庸无知的样子。明·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书》："此后便得烧却毛颖，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

愀然 qiǎo rán　容色变动的样子。宋·苏轼《前赤壁赋》："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喟然 kuì rán　叹气的样子。晋·慧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因此而推，形有巨细，智亦宜然。乃喟然叹宇宙虽遐，古今一契。"

翩翩然 piān piān rán　风致优美的样子。宋·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记》："玉田张叔夏与余初相逢钱塘西湖上，翩翩然飘阿锡之衣，乘纤离之马。"

营营然 yíng yíng rán　弛逐貌。清·袁枚《游武夷山记》："一夜魂营营然，犹与烟云往来。"

落落焉 luò luò yān　明显的样子。清·施闰章《就亭记》："俗俭讼简，宾客罕至，吏散则闭门，解衣槃礴移日，山水之意未尝不落落焉存乎胸中也。"

舒舒与与 shū shū yǔ yǔ　从容的样子。明·袁宏道《从天池逾含鄱岭至三峡涧》："忽焉石逊，涓然黛碧，观者亦舒舒与与，不知其气之平也。"

洒脱委蛇 sǎ tuō wěi yí　自然而随和。明·张岱《西湖梦寻》："平居笑谈谐谑，洒脱委蛇，有永公清散之风。"

韵士高人 yùn shì gāo rén　风雅之士，清高之人。明·张岱《西湖梦寻》："至于湘湖则僻处萧然，舟车罕至，故韵士高人无有齿及之者。"

风姿特秀 fēng zī tè xiù　形容人身姿优美，气质优雅。《世说新语·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华容婀娜 huá róng ē nuó　容颜美丽，身姿柔美。三国魏·曹植《洛神赋》："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芳兰竟体 fāng lán jìng tǐ　遍体芳香，比喻高雅绝俗的仪态。《南史·谢弘微传》："意气闲雅，视瞻聪明，武帝目送良久，谓徐勉曰：觉此生，'芳兰竟体，想谢庄政当如此。"

神姿艳发 shén zī yàn fā 形容女子艳丽。清·张明弼《冒姬董小婉传》："年十一二，神姿艳发，窈窕婵娟，无出其右。"

逸韵风生 yì yùn fēng shēng 形容人举措文雅有韵致。明·沈宜修《季女琼章传》："比梅花觉梅花太瘦，比海棠觉海棠少清，故名为丰丽，实是逸韵风生。"

瑰资艳逸 guī zī yàn yì 形容女子神姿美好，艳丽不俗。三国魏·曹植《洛神赋》："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翩若惊鸿 piān ruò jīng hóng 形容女子轻盈的身态象翩翩飞翔的鸿雁。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朝霞丽彩 zhāo xiá lì cǎi 形容女子明艳美丽貌。清·陈裴之《香婉楼忆语》："璧月流辉，朝霞丽彩，珠襦玉立，艳若天人。"

蘼芜媚香 mí wú mèi xiāng 喻妓女。清·陈裴之《香婉楼忆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足为蘼芜媚香一辈人扬眉生色矣。"

璧月凝辉 bì yuè níng huī 形容女子白晰明丽如同月光凝成。清·汪端《紫姬哀词序》："璧月凝辉，前身定呼明月；琼花照影，几生修到梅花。"

琼花照影 qióng huā zhào yǐng 形容女子身姿秀丽如琼花之影。例见上。

出水芙蓉 chū shuǐ fū róng 形容女子娇嫩秀丽状。清·陈裴之《香婉楼忆语》："姬如出水芙蓉，不假雕饰；当春杨柳，自得风流。"

一泓秋水 yī hóng qiū shuǐ 形容人神清韵秀如同一汪秋水。清·沈复《浮生六记》："有女名憨园，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

吹气如兰 chuī qì rú lán 形容女子气息芳香貌。清·闺香居士《紫姬小传序》："个侬吹气如兰，挛身如玉，除是侍香金童，甫能消受耳。"

秀色可餐 xiù sè kě cān 形容女子美丽动人。明·沈宜修《季女琼章传》："儿鬓发素额，修眉玉颊，丹唇皓齿，端鼻媚靥，明眸善睐，秀色可餐。"

云鬟雾鬓 yún huán wù bìn 形容女子头发浓重蓬松状。清·沈复《浮生六记》："其中人物皆云鬟雾鬓，脂粉薄施，阔袖长裙，语音了了。"

面晕浅春 miàn yùn qiǎn chūn 形容女子面带微红。清·冒襄《影梅庵忆语》："与余晤，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

面如凝脂 miàn rú níng zhī 形容人肌肤白润。《世说新语·容止》："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齿如含贝 chǐ rú hán bèi 形容牙齿象贝壳那样晶莹洁白。宋玉《登子徒好色赋》："臣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

眼如点漆 yǎn rú diǎn qī 形容人瞳仁黑，眼神亮。《世说新语·容止》："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转眄流精 zhuǎn miàn liú jīng 眼珠转动灵活有神采。三国魏·曹植《洛神赋》："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

明眸善睐 míng móu shàn lài 形容人眼睛明亮，眼神灵活。三国魏·曹植《洛神赋》："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欢。"

顾盼神飞 gù pàn shén fēi 形容人目光灵活有神。清·沈复《浮生六记》："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

头童齿豁 tóu tóng chǐ huō 秃头缺齿，形容老态。唐·韩愈《进学解》："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

土木形骸 tǔ mù xíng hái 形容人形质不佳而又不加修饰。《世说新语·容止》："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烟霞痼疾 yān xiá gù jí 对山水酷爱成癖。《新唐书·隐逸传》："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烟云供养 yān yún gòng yǎng 指以山水怡情。明·陈继儒《妮古录》："米友仁八十余神明不衰，无疾而逝，盖画中烟云供养也。"

穷源溯委 qióng yuán sù wěi 探究水的源头和下流。清·陈元龙《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乃复令参议张君，偕黄郡丞穷源溯委，丈量而估计之。"

凿险追幽 záo xiǎn zhuī yōu 开凿探寻险要幽深的地方。清·陈钟麟《阳朔永出记》："若夫日南所至，柳州所传，凿险追幽，探微索赜，吾不及而见也，吾不得而知也。"

探微索赜 tàn wēi suǒ zé 细细地探究幽深难见之地。例见上。

撮奇搜胜 cuō qí sōu shèng 集中了奇特的景色，包罗了美好的风光。明·张岱《西湖梦寻》："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可累丈，撮奇搜胜，物无遁形。"

迩延远挹 ěr yán yuǎn yì 招揽远近的湖山胜景。宋·吴自牧《梦粱录》："盖迩延远挹，尽纳千山万景，卓然为西湖堂宇之冠，游者争趣焉。"

草　木

林樾 lín yuè 杂树交阴。宋·吴自牧《梦粱录》："背负长冈，林樾深

窈。”

丛莽 cóng mǎng　丛生杂乱的草木。唐·柳宗元《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丛莽下颓，万宾皆出。”

浓黛 nóng dài　形容树色深绿。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田畴纡畦间，见峰峦回曲萦抱，万树浓黛，点缀山腰。”

幽翠 yōu cuì　形容僻静而多草木状。明·谭元春《游南岳记》：“乃复过上封，见歧路幽翠，仿佛若有奇，欲搜之。”

冷翠 lěng cuì　形容颜色碧绿而又给人以凉意。明·袁宏道《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游人坐石上，潭色浸肤，扑面皆冷翠。”明·袁中道《筼筜谷记》：“予耳常聆其声，目常览其色，鼻常嗅其香，日常食其笋，身常亲其冷翠，意常令其潇远。”

碧沉 bì chén　形容树影竹阴等。明·谭元春《鲸川庄记》：“蜀中竹善为阴，碧沉如桐，高飘如有叶。叶郁郁隆至半，万竹齐阴，倒影在川，川尝碧碧浸人影而后已。”

绿影 lù yǐng　形容树阴。明·谭元春《游南岳记》：“离桥南折，频上绿影，小憩半山亭，游者颇自足。”

翠葆 cuì bǎo　指绿树丛。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行者惟见翠葆浮空。”

青苍 qīng cāng　青绿色。宋·陆游《入蜀记》：“初冬草木皆青苍不雕。”

菁葱 jīng cōng　草木青翠茂盛。清·施闰章《就亭记》：“烟雨之出没，橘柚之菁葱，莫不变气象，穷奸巧，翼胸拂睫，辐辏于栏槛之内。”

苍蔚 cāng wèi　形容竹木碧色浓郁。明·谭元春《鲸川庄记》：“朱无易先生从苍蔚间置含清亭，清所含也。”

映染 yìng rǎn　形容景色互相辉映浸染。明·王思任《游焦山记》：“入碧桃湾，则疏杨播曳里许，青莎与朱华映染，半规山隐。”

秾华 nóng huá　花木茂盛艳丽。明·陈继儒《游桃花记》：“南城独当阳，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阳气及水色，太是秾华。”

绣错 xiù cuò　形容树木色彩错杂如绣。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憩左侧来青轩，尽得峰势，右如舒臂，左乃曲抱，林木绣错，伽蓝棋布。”

斑驳 bān bó　杂乱错落。明·归有光《项脊轩志》：“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影移动，珊珊可爱。”

莹泽 yíng zé　晶莹而有光泽。宋·周师厚《洛阳牡丹记》：“紫绣球，千叶紫花也，色深而莹泽，叶密而圆整。”

烂然 làn rán　光彩灿烂的样子。宋·邓牧《雪窦游记》：“亭之下，为园池，径余十丈，植海棠环之，花时影注水涘，烂然疑乎锦，故名。”

斓斑 lán bān　色彩错杂鲜明的样子。宋·范成大《峨嵋山行记》：“数日前雪大降，木叶犹有雪浸斓斑之迹。”

夭矫 yāo jiǎo　屈伸自如的样子。清·钱谦益《游黄山记》：“有长松夭矫，雷劈之仆地，横亘数十丈。”

粹容 cuì róng　精美的样子。元

·麻革《游龙山记》："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无粹容。"

偃蹇 yǎn jiǎn　屈曲高耸的样子。宋·范成大《吴船录》："又有塔松，状似杉而叶圆细，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图，至山顶尤多。"

竦擢 sǒng zhuó　耸立。宋·王得臣《登莲花峰记》："菡萏方盛，浓碧鲜红，四旁则巨桧乔松，竦擢于霄汉。"

槎枒 chá yá　枝干歧出的样子。清·徐瀛《西征日记四则》："四围壁立万仞，古木槎枒，奇崛万状。"

轮囷 lún qūn　盘曲的样子。清·钱谦益《游黄山记》："逆而折之，使之更百千年，不知如何槎枒轮囷，蔚为奇观也。"

蟠舞 pán wǔ　盘曲舞动的样子。明·陈仁锡《剡溪记》："去年雪压一枝，枝在上，作蟠舞势，更可惋痛。"

婆娑 pó suō　形容枝叶纷披舞动状。明·张岱《西湖梦寻》："出灵隐后二、三里，路径甚可爱，古木婆娑，草香泉渍，淙淙之声，四分五络，达于山厨。"

纷披 fēn pī　形容枝叶披散交错状。清·李卫《西湖志》："飞英蘸波，纷披掩映。"

离披 lí pī　分散的样子。明·魏光绪《华山游记》："山花烂漫，异草离披，高下回折，种种幽胜。"

扶苏 fú sū　同"扶疏"，形容树木茂盛，而又参差有致。明·张岱《西湖梦寻》："行其下者，枝叶扶苏，漏下月光，碎如残雪。"

绰约 chuò yuē　柔美的样子。明·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

袅娜 niǎo nuó　形容柔软细长的样子。清·李渔《芙蕖》："有风既作飘飖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是我于花之未开，先享无穷逸致矣。"

娟然 juān rán　秀美的样子。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山顶之石，四旁有苔，如发下垂，嫩绿浮烟，娟然可爱。"

萧森 xiāo sēn　树木错落竦立的样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

历落 lì luò　疏疏落落，参差不齐。清·谢振定《登太华山记》："日晷已正，贾勇面前，见数树历落出云端，至则青柯坪也。"

葱蒨 cōng qiàn　树木繁茂的样子。明·张岱《西湖梦寻》："西湖之上，葱蒨亲人，亦爽朗易尽。"

轇轕 jiāo gé　纵横交错的样子。明·刘基《松风阁记》："有风拂其枝，如龙凤飞舞，离徙蜿蜒，轇轕徘徊。"

葳蕤 wēi ruí　枝叶繁盛下垂的样子。宋·王质《游东林山水记》："一色荷花，风自两岸来，红披绿偃，摇荡葳蕤，香气勃郁。"

芊绵 qiān mián　草木蔓衍丛生的样子。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桥堤烟柳葱青，露草芊绵，望如裙带。"

蒙翳 méng yì　花草树木蒙罩遮蔽的样子。明·王世懋《游五老三叠

开先瀑布记》："春夏草木蒙翳，决不可入。"

蒙茸 méng róng 亦作"蒙戎"，蓬松貌。明·王世懋《游五老三叠开先瀑布记》："径皆蒙茸细草，或滑磴，但容一趾，径穷辄度涧。"

郁然 yù rán 草木繁盛的样子。宋·苏舜钦《沧浪亭记》："一日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

蔚然 wèi rán 草木茂盛之状。宋·欧阳修《醉翁亭记》："望之蔚然深秀者，琅邪也。"

蔚秀 wèi xiù 繁茂秀丽。明·张岱《西湖梦寻》："其地径路崎区，草木蔚秀，人烟旷绝。"

森蔚 sēn wèi 繁茂貌。清·宋荦《游姑苏台记》："稍见村落，竹树森蔚，稻畦相错如绣。"

蒨蔚 qiàn wèi 鲜明茂盛。宋·叶适《题张声之友于从居记》："山回水明，葱秀蒨蔚，如譬画者。"

荟蔚 huì wèi 形容林木繁盛的样子。元·麻革《游龙山记》："至于奥密渊邃，树林荟蔚繁阜，不一览而得，则兹山亦其可少哉。"

蓊然 wěng rán 丛密的样子。明·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

蓊苁 wěng cōng 草木茂盛。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青松紫蕊，蓊苁于上。"

蓊蔚 wěng wèi 草木茂盛的样子。明·张岱《西湖梦寻》："高崖插天，古木蓊蔚，大有幽致。"

蓊蔼 wěng ǎi 茂密多荫貌。晋·葛洪《抱朴子·博喻》："故一条之枯，不损繁林之蓊蔼；蒿麦冬生，无解旱发之肃杀。"

蓊翳 wěng yì 树木茂盛的样子。明·张岱《西湖梦寻》："朱栏屈曲，桥跨如虹，草树蓊翳，尤更岑寂。"

云蓊 yún wěng 茂盛貌。明·张岱《西湖梦寻》："屋宇鳞次，竹木云蓊。"

翳荟 yì huì 草木茂盛貌。宋·王履《始入华山至西峰记》："地多棫棘且翳荟不见路。"

藂茂 cóng mào 丛生茂密貌。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鲜少。"

雄深 xióng shēn 草木浓厚幽深。宋·范成大《吴船录》："十二里龙神堂，自是涧谷春淙，林越雄深。"

衍纵 yǎn zòng 形容树木枝叶伸展状。明·乔宇《五台山》："然后枝叶衍纵，披覆四下。"

芃彧 péng yù 茂盛。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其中田禾芃彧，村落高下。"

垂云 chuí yún 形容枝条下垂状。明·陈仁锡《剡溪记》："面前一山吐萼，树皆垂云，左一小山郁起，竹木森茂，而一小冈尾之。"

竹笑 zhú xiào 形容竹遇风摆动的姿态。元·李衎《竹谱详录·竹态》："竹得风，其体夭屈，谓之竹笑。"

鬖鬖 sān sān 若毛发下垂的样子。宋·范成大《游峨嵋山记》："古

苔如乱发，鬖鬖挂木上，垂至地，长数丈。”

珊珊 shān shān 美好的样子。明·归有光《项脊轩志》：“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猗猗 yī yī 美好茂盛。清·郁永河《采硫日记》：“惟绿竹最多，一望猗猗，不减渭滨淇澳之盛。”

童童 tóng tóng 树荫下垂貌。晋·陈寿《三国志·蜀·先主传》：“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

濯濯 zhuó zhuó 清翠的样子。明·宋濂《游钟山记》：“揉柏为麋鹿形，柏毛云怒长，翠濯濯可玩。”

葱葱 cōng cōng 青翠貌。清·李宗明《游庐山后记》：“比至方丈，低屋蔽亏，无所睹，惟天然石阶，石缝，兰叶葱葱可爱。”

罗罗然 luó luó rán 清疏的样子。清·恽敬《游庐山后记》：“云过通傍，草木罗罗然。”

风姿雨韵 fēng zī yǔ yùn 形容风雨中荷花别有韵致。明·刘侗《西堤》：“荷，风姿而雨韵。姿在风，羽红摇摇，扇白翻翻；韵在雨，粉沥沥，碧琤琤，珠溅合，合而倾。”

鬣走带牵 liè zǒu dài qiān 形容水草细长，随流拂动的样子。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流水澄澈，洞见沙石；蕴藻萦蔓，鬣走带牵；小鱼尾游，翕忽跳达。”

荒烟迷草 huāng yān mí cǎo 形容荒凉衰败的郊野景象。明·王思任《天姥》：“至则野佛无家，化为废递，荒烟迷草，断碣难扪。”

修篁密筱 xiū huáng mì xiǎo 修长茂密的竹林。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山径曲折，沿路皆修篁密筱，浓绿杳深，醉人心骨。”

长松绣天 cháng sōng xiù tiān 形容松林梢头在天际拂动状。明·王思任《东山》：“从谢公樟楔上磴路，每数十武，长松绣天，涛声百沸。”

松梢乱云 xōng shāo luàn yún 形容松林树梢摇动如拂云团状。明·张鼐《程原迩稿序》：“南高峰下，松梢乱云，竹影蔽日，刳竹引泉，其声潺潺，出于涧底。”

林藿绵蒙 lín huò mián méng 林木幽暗不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汶水》：“自入莱，芜谷夹路连山数百里，水隍多行石涧中，出草药，饶松柏，林藿绵蒙，崖壁相望。”

山筱蓊郁 shān xiǎo wěng yù 山间竹林茂密状。明·陆树声《嘉树林小序》：“予自甲辰六月，由天马峰步人此山，见山筱蓊郁，群木森拱。”

云木森悦 yún mù sēn yuè 树木耸立云中，茂密而悦目。元·揭傒斯《陟亭记》：“仰见层峦茸拥，云木森悦，遂舍舟循溪而入。”

菶茸荟郁 běng róng huì yù 四字义近，均是形容草木繁盛茂密的样子。唐·白居易《养竹记》：“又有凡草木杂生其中，菶茸荟郁，有无竹之心焉。”

蓊薆茏茸 wěng ài lóng róng 草木茂盛。元·汪泽民《游黄山记》：“山皆直松名杉，藤络莎被，蓊薆茏

茸。”

骈织承翳 pián zhī chéng yì 形容叶蔓交结成荫的样子。唐·白居易《庐山草堂记》：“松下多灌丛，萝茑叶蔓，骈织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

干云蔽日 gān yún bì rì 形容树木参天，高及云际，荫可蔽日。汉·班固《后汉书·丁鸿传》：“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

翠盖斜偃 cuì gài xié yǎn 象斜翘的绿色伞盖。明·宋濂《游钟山记》：“沿道多苍松，或为翠盖斜偃，或蟠身矫首；如雄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涧泉饮。”

亭亭如盖 tíng tíng rú gài 形容树若伞盖高高挺立。明·归有光《项脊轩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袅袅濯濯 niǎo niǎo zhuó zhuó 柔弱清翠的样子。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其上为望湖亭，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积雪未消，柳堤一带，不知里数，袅袅濯濯，封天蔽日。”

林林亩亩 lín lín mǔ mǔ 众多茂盛的样子。明·刘侗《水尽头记》：“燕故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

离离蔚蔚 lí lí wèi wèi 树木排列疏密相间的样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

铁干虬蟠 tiě gàn qiú quán 形容老树枝干盘曲苍劲状。明·谭元春《游玄岳记》：“虫切切作促织吟，红叶委地，如秋；老槐古木，铁干虬蟠，叶不能即发，如冬。”

铁干镠枝 tiě gàn liú zhī 树干如铁，树枝如金，形容老树苍劲。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至殿前，有老树二株，大可百围，铁干镠枝，碧叶虬结，纡羲回月，屯风宿雾。”

虬枝峭拔 qiú zhī qiào bá 树枝折曲向上的样子。明·陆树声《嘉树林小序》：“山麓有垂丝桧二，虬枝峭拔，霜皮剥落。”

飞带如虬 fēi dài rú qiú 形容枝条飞舞萦回象虬龙游动。明·张岱《西湖梦寻》：“一松苍翠，飞带如虬，大有古色，真数百年物，当日白公想定盘礴其下。”

崎嵚虬曲 qí qīn qiú qū 曲折不直的样子。明·袁宏道《游盘山记》：“而松之抉石罅出者，崎嵚虬曲，与石争怒。”

缕理纠结 lǚ lǐ jiū jié 树木枝条盘结状。明·陆树声《嘉树林小序》：“而二木挺特，不著枝叶，而缕理纠结，势复棱棱如神仙蜕骨。”

蟠身矫首 pán shēn jiǎo shǒu 形容松树仰头曲身的姿态。明·宋濂《游钟山记》：“沿道多苍松，或为翠盖斜偃，或蟠身矫首，如雄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涧泉饮。”

肤皱枝拗 fū zhòu zhī ào 形容松树枝干弯曲树皮粗糙状。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有松盘曲夭乔，肤皱枝拗，有远韵。”

钩爪锯牙 gōu zhǎo jù yá 林木交错歧出的样子。清·黄金台《游狮

子林记》："而兹林也，卷毛颏舌，钩爪锯牙。"

奇崛万状 qí jué wàn zhuàng 形容树木形状奇特多样。清·徐瀛《西征日记四则》："四围壁立万仞，古木槎枒，奇崛万状。"

离褷蜿蜒 lí xǐ wān yán 形容风吹枝条的样子。明·刘基《松风阁记》："有风指其枝，如龙凤翔舞，离褷蜿蜒，轇轕徘徊。"

剥脱拳秃 bò tuō quán tū 树皮脱尽，树干光秃而曲结回绕。清·张裕钊《游虞山记》："有罗汉松一株，剥脱拳秃，类数百年物。"

千瘿万螺 qiān yǐng wàn luó 形容老树干长满树瘤的样子。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至殿前，有老树二株，……霜皮突兀，千瘿万螺，怒根出土，磊块诘曲，叩之丁丁作石声。"

桃霞莲露 táo xiá lián lù 桃花如霞，荷露如珠，指春夏之景物。明·陈继儒《许秘书园记》："此去桃霞莲露，绘绣绮错，而一片澄泓萧瑟之景，独此写出江南秋。"

桃芳李葩 táo fāng lǐ pā 桃花、李花芳香华美。明·乔宇《恒山游记》："东遵岭北而上，最多珍花灵草，格态不类，桃芳李葩，映带左右。"

纤苞浓朵 xiān bāo nóng duǒ 纤细的花苞浓艳的花朵。明·袁宏道《由水溪至水心崖记》："四面峰峦如花蕊，纤苞浓朵，横见侧出，二十里内，秀蒨阁眉，殆不可状。"

晓树满星 xiǎo shù mǎn xīng 形容果树秋实累累状。明·刘侗《水尽头》："然春之花尚不敌其秋之柿叶，叶紫紫，实丹丹，风日流美，晓树满星，夕野皆火。"

朱实离离 zhū shí lí lí 红色果实丰硕鲜明的样子。唐·白居易《草堂记》："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其名，四时一色。"

乳柑若火 rǔ gān ruò huǒ 形容柑实红艳状。明·王思任《华盖》："乳柑若火齐时，稻蟹膏流琥珀，吾当来往梦草堂，拄九节短筇，日日踏华盖顶门。"

焰焰欲然 yàn yàn yù rán 象要着火的样子。明·宋濂《桃花涧修禊诗序》："忽见鲜葩点润其间，焰焰欲然，可玩。"

落英缤纷 luò yīng bīn fēn 落花纷纷飘舞之状。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繁英积雪 fán yīng jī xuě 形容花多且白。清·王灼《黄山纪游》："叶深翠，大如枇杷，花时繁英如雪，甚香。"

弥望如雪 mí wàng rú xuě 形容白色梅花绵延充满视野。明·张岱《西湖梦寻》："梅花绵亘村落，弥望如雪，一似余家西碛山中。"

绿雪轻风 lǜ xuě qīng fēng 形容暮春时绿树飘英的景象。明·王思任《游焦山记》："暑气既深，幽碧如浸，选绿雪轻风之下，小饮之。"

绿烟红雾 lǜ yān hóng wù 形容成片的绿柳和红桃。明·张岱《西湖梦寻》："湖上繇断桥至苏堤一带，绿

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

浓碧鲜红 nóng bì xiān hóng 叶绿花红状。宋·王得臣《登莲花峰记》：“菡萏方盛，浓碧鲜红，四旁则巨桧乔松，竦擢于霄汉。”

赤纷绿骇 chì fēn lǜ hài 红绿颜色错杂的样子。明·宋濂《桃花涧修禊诗序》：“西垂苍壁，俯瞰台矶间，女萝与陵苕轇轕之，赤纷绿骇，日翠霞屏。”

纷红骇绿 fēn hóng hài lǜ 形容花叶繁盛错杂状。唐·柳宗元《袁家渴记》：“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

红披绿偃 hóng pī lǜ yǎn 形容花叶茂盛随风摆动。宋·王质《游东林山水记》：“一色荷花，风自两岸来，红披绿偃，摇荡葳蕤，香气勃郁。”

缬红萦碧 xié hóng yíng bì 形容红花碧草牵人衣裾的样子。明·袁宏道《云峰寺至天池寺记》：“独石而梁，一丝百石，下临千仞者，曰锦涧桥。缬红萦碧，蜿蜒而导者，曰九叠屏。”

五色纷披 wǔ sè fēn pī 色彩纷乱之状。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

鲜妍绚蒨 xiān yán xuàn qiàn 鲜美茂盛。宋·范成大《吴船录》：“峰峦草木，皆鲜妍绚蒨，不可正视。”

灿若图绣 càn ruò tú xiù 林景美丽多彩，如织如画。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

绘绣绮错 huì xiù qǐ cuò 形容花木色彩绚烂之状。明·陈继儒《许秘书园记》：“此去桃霞莲露，绘绣绮错，而一片澄泓萧瑟之景，独此写出江南秋。”

霞封绮错 xiá fēn qǐ cuò 形容花色绚丽状。明·陈仁锡《纪游》：“及烂熳，离花数百武。择危楼杰构，置酒凭栏，与客指点霞封绮错之奇。”

云霞乱彩 yún xiá luàn cǎi 形容花朵色彩绚烂如云霞状。明·钟惺《梅花墅记》：“阁以外，林竹则烟霜助洁，花实则云霞乱彩，池沼则星月含清，严晨肃月，不辍喧妍。”

日翠霞屏 rì cuì xiá píng 红绿交错，灿若云霞状。明·宋濂《桃花涧修禊诗序》：“西垂苍壁，俯瞰台矶间，女萝与陵苕轇轕之，赤纷绿骇，日翠霞屏。”

岚翠欲滴 lán cuì yù dī 形容山树翠绿鲜嫩的形状。元·李泂《观开先瀑布记》：“两崖岚翠欲滴，其地如火瓮，泓渟为潭。”

画壁流青 huà bì liú qīng 形容山峰间石壁布满青苔之状。明·袁宏道《西湖记述》：“涧水溜玉，画壁流青。”

娇姿欲滴 jiāo zī yù dī 娇媚的姿态极为美丽。清·李渔《芙蕖》：“迨至菡萏成花，娇姿欲滴，后先相继，自夏徂秋。”

柳娇欲狂 liǔ jiāo yù kuáng 形容柳丝柔嫩翻飞之状。明·李流芳《游西山小记》：“由青龙桥纵辔堤上，晚风正清，湖烟乍起，岚润如滴，柳

娇欲狂。”

新叶洗人 xīn yè xǐ rén　形容新叶嫩绿给人以洁净感。明·谭元春《游南岳记》：“行三十里，入岳坊，杂木乱植；新叶洗人。”

竟川含绿 jìng chuān hán lù　满川都是绿色。明·钟惺《梅花墅记》：“林木荇藻，竟川含绿，染人衣裾，如可承揽。”

新青欲堕 xīn qīng yù duò　形容树木碧色浓重象要掉下来似的。明·谭元春《游玄岳记》：“入隐仙岩，若无居人，惟异柏一株，类垂杨，袅袅然新青欲堕矣。”

幽碧如浸 yōu bì rú jìn　形容绿阴覆人之状。明·王思任《游焦山记》：“暑气既深，幽碧如浸，选绿雪轻风之下，小饮之。”

空翠古碧 kōng cuì gǔ bì　形容秋天的碧色。明·谭元春《自题湖霜草》：“细而察之，意绵绵于空翠古碧之中，逢客来而若断；目恍恍于衰黄落红之下，触松色而始明。”

深翠殷绿 shēn cuì yīn lù　形容树木浓重的绿色。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于时宿雾既收，初日照林，松柏膏沐之余，杨柳浣濯之后，深翠殷绿，媚红娟美，至于原隰隐畛，草色青秀，莫不淹润柔滑，细腻莹洁。”

绿霞翳染 lù xiá yì rǎn　形容林木浓绿之色。明·王思任《游敬亭山记》：“一径千绕，绿霞翳染，不知几千万竹树，党结寒阴。”

翠色扑人 cuì sè pū rén　形容树木繁茂。明·陈仁锡《剡溪记》：“溪江平渡，二十里，望上虞龙珠山，翠色扑人。”

青青漠漠 qīng qīng mò mò　形容远眺林木状。明·刘侗《极乐寺》：“岸北数十里，大抵皆别业僧寺，低昂疏簇，绿树渐远，青青漠漠，间以水田界界，如云脚下空。”

繁阴匝地 fán yīn zā dì　树阴深密满地。明·陆树声《嘉树林小序》：“时繁阴匝地，云气蒸衣，爽籁四发，不知此外尚有烦暑也。”

绿阴沈沈 lù yīn chén chén　树荫浓重貌。清·曹文《游黄山记》：“拾危磴，入丛木中，绿阴沈沈，肌骨皆冷。”

绿阴蒙蒙 lù yīn méng méng　枝叶茂盛的样子。唐·白居易《草堂记》：“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其名，四时一色。”

梧竹翠流 wú zhú cuì liú　形容梧桐竹子的浓绿之色。明·王思任《游焦山记》：“左行而得水晶庵，梧竹翠流，潭空若永昌之镜。”

碧骨雨寒 bì gǔ yǔ hán　形容竹干润绿而凉滑。明·王思任《天姥》：“入太平庵看竹，俱汲桶大，碧骨雨寒，而毛叶离屣，不啻云凤之尾。”

香雾霏霏 xiāng wù fēi fēi　形容花粉花片四处飘散的样子。明·袁宏道《天池》：“时方春仲，晚梅未尽谢，花片沾衣，香雾霏霏，弥漫十余里，一望皓白，若残雪在枝。”

香气勃郁 xiāng qì bó yù　形容气味芳香浓郁。宋·王质《游东林山水记》：“一色荷花，风自两岸来，红

披绿偃，摇荡葳蕤，香气勃郁。”

草薰木欣 cǎo xūn mù xīn　野草散发香气，树木生长茂盛。明·张岱《西湖梦寻》："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导和纳粹。”

葱茜秾郁 cōng qiàn nóng yù　形容花草茂盛，气味芳香。元·麻革《游龙山记》："嘉木奇卉被之，葱茜秾郁。”

琮铮铿訇 cóng zhēng kēng hōng　形容风吹松林发出的声音，即松涛。明·史鉴《西村十记》："每风自山顶下，则龙飞凤舞，翱翔霄汉，涛鼓籁鸣，琮铮铿訇，响应山谷。”

涛鼓籁鸣 tāo gǔ lài míng　风吹松林声如涛涌。例见上。

松风如沸 sōng fēng rú fèi　风吹松树林声如涛滚水沸。明·陆釴《春游西山记》："顷至碧云，下窥岩洞，松风如沸，飒有奇趣。”

红叶如锦 hóng yè rú jǐn　形容秋天红叶满山似锦绣成状。明·都穆《再游西山记》："道上之草已黄，惟霜林红叶如锦。”

翘髻羞妆 qiào jì xiū zhuāng　形容荷花高低摇曳之状。明·王衡《游香山记》："时荷花已开，甚纤缛纷敷，浅深在水，植者如翘髻，偃者如羞妆。”

云树泱漭 yún shù yāng mǎng　雨雾中树林显得旷远模糊的样子。明·陆树声《游韦庄记》："立马少伫，右视圆丘，云树泱漭；回瞻城阙，出云雾中。”

建　筑

璇室 xuán shì　雕饰华丽的宫室。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由殿左透级上，得璇室如层楼。”

绣桷 xiù jué　画栋雕梁。桷，方形的椽子。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景林寺，在开阳门内御道东。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楹炫日，绣桷迎风。”

甍阁 méng gé　高脊之阁。甍，屋脊。明·乔宇《五台山》："缘冈行十里，至玉亭寺岭，丹碧映辉，甍阁于山腰。”

彪焕 biāo huàn　光彩灿烂。南朝梁·萧统《七契》："璇题昭晰，珠帘彪焕。”

巍焕 wēi huàn　巍峨壮丽。清·靳治荆《游黄山记》："西行迤北约七八里，至某村三元殿，甚巍焕，登楼小憩。”明·张岱《西湖梦寻》："四十二年，御使杨鹤为公增廓祠宇，庙貌巍焕，属云间陈继儒作碑记之。”

严焕 yán huàn　庄严灿烂。宋·苏舜钦《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有佛庙号水月者，阁殿甚古，象设严

焕。"

巍奕 wēi yì　高大。清·朱彝尊《游晋祠记》："圣母庙不知所自始，土人遇岁旱，有祷辄应，故庙特巍奕。"

轩爽 xuān shuǎng　高敞。明·张岱《西湖梦寻》："其临湖一带，则酒楼茶馆，轩爽面湖，非惟心胸开涤，亦觉明清朗。"

凝邃 níng suì　形容居室幽静而深邃。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

翼然 yì rán　展起欲飞之状。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

睽罛 kuí gū　高峻深邃貌。唐·颜真卿《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豁达其外，睽罛其中，云轩水阁，当亭无暑。"

危楼杰构 wēi lóu jié gòu　形容建筑高大。明·陈仁锡《纪游》："及烂熳，离花数百武，择危楼杰构，置酒凭栏，与客指点霞封绮错之奇。"

崇刹高栋 chóng chà gāo dòng 形容寺庙高大。明·屠隆《海览》："崇刹高楼，兀立波中，撞钟者鼓，与海涛响答。"

飞阁危楼 fēi gé wēi lóu　形容楼阁高耸。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飞阁危楼，腾红酣绿者，香山也。"

飞檐反宇 fēi yán fǎn yǔ　形容屋檐向上反卷状。反，同"翻"。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殿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

复阁重楼 fù gé chóng lóu　重重叠叠的楼阁。明·张岱《西湖梦寻》："其中佛舍甚精，复阁重楼，迷禽暗日，威仪肃洁，器钵无声。"

闷阁精蓝 bì gé jīng lán　清幽的楼阁，精致的僧房。明·张岱《西湖梦寻》："然东边一带闷阁精蓝凡九进，客房僧舍百什余间，棐几藤床，铺陈器皿，皆不移而具。"

雕梁粉壁 diāo liáng fěn bì　雕画的梁栋，粉饰的白壁。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难得而言。"

青琐绮疏 qīng suǒ qǐ shū　用青色和彩色镂画的窗子。疏，窗。例见上。

桂殿兰宫 guì diàn lán gōng　形容建筑高雅富丽。唐·王勃《滕王阁序》："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

闳巨华赡 hóng jù huá shàn　宏大华丽。清·李圭《东行日记》："南北长三十余里，适中处新建费城梅尔署，闳巨华赡，云费一百五十万金。"

博敞弘丽 bó chǎng hóng lì　建筑高大敞亮，装饰华丽。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也。"

高杰整丽 gāo jié zhěng lì　形容建筑物高大而又精致。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此山门径幽邃，青松夹道里许，流泉淙淙下注。朱栏千级，依岩为刹，高杰整丽。"

甃结坚缜 zhòu jié jiān zhěn　形容砖石结构坚实而细密。元·虞集《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石级盘旋以上，甃结坚缜，阑护完固，登者忘其险焉。"

勾心斗角 gōu xīn dòu jiǎo　形容建筑物结构严整的样子。唐·杜牧《阿房宫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

低昂疏簇 dī áng shū cù　形容建筑群错落高低状。明·刘侗《极乐寺》:"岸北数十里，大抵皆别业僧寺，低昂疏簇，绿树渐远。"

栉比如鳞 zhì bǐ rú lín　象梳齿和鱼鳞那样排列，形容密集。明·袁宏道《虎丘》:"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

屋宇鳞次 wū yǔ lín cì　形容屋舍密密层层。清·赵嘉肇《太华纪游略》:"上房如市镇，然南北廛列，屋宇鳞次，街头一房砌壁，窗檐毕具。"

隆隆卬卬 lóng lóng áng áng　盛大的样子。宋·晁补之《钱塘七述》:"累累硠硠，隆隆卬卬，若金城天府之疆。"

闾阎扑地 lǘ yán pū dì　高大的门庭排满地面，形容建筑之盛。闾阎，里坊大门。唐·王勃《滕王阁序》:"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

廊腰缦回 láng yāo màn huí　形容长廊曲折状。唐·杜牧《阿房宫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

飞廊舞磴 fēi láng wǔ dèng　形容建筑依山而起状。明·陈仁锡《纪游》:"若远若近，而琳宫紫刹，飞廊舞蹬，为之色矜。"

飞馆生风 fēi guǎn shēng fēng 形容建筑高敞。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

飞轩凭虚 fēi xuān píng xū　形容亭四檐若展翅欲飞，高踞峰顶，仿佛临空。唐·冯宿《兰豁县灵隐寺东峰新亭记》:"飞轩凭虚，洞壑在下。"

四甍翚飞 sì méng huī fēi　形容屋檐上翘，其状如飞。唐·李白《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苏亭序》:"通驿公馆南有小亭焉，四甍翚飞，巉绝浦屿。"

卷云切铁 juǎn yún qiē tiě　形容建筑物背山入云状。明·谭元春《游玄岳记》:"其宫背展旗峰，卷云切铁，如起止之势，使人眩栗。"

楼观出云 lóu guān chū yún　形容亭台楼阁高入云际。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宝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

杰构云连 jié gòu yún lián　宏伟的建筑，象云层一样连成一片。清·张荫桓《三州日记》:"金山荒芜之区，蔚为都会，杰构云连，商旅阗溢，微华人之力，曷克臻此。"

焕烂霞表 huàn làn xiá biǎo　光彩照射于云霞之上，形容建筑之华丽。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装饰华丽，侔于永宁，金盘宝铎，焕烂霞表。"

光照云表 guāng zhào yún biǎo 形容建筑之华丽。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

铎垂云表 duó chuí yún biǎo 屋檐下的铃铛挂在云外，形容建筑之高。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有五层浮图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

宝铎含风 bǎo duó hán fēng 楼檐下的铃铛在风中作响。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

丹碧错落 dān bì cuò luò 红墙绿瓦交错分布的样子。明·袁宗道《上方山四记》："顶上为寺一百二十，丹碧错落，嵌入岩际。"

楼阁流丹 lóu gé liú dān 形容楼阁用朱红彩画状。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其郊坰之林烟水色，山径柳堤；及近之峰峦叠秀，楼阁流丹，则固皆几席间物。"

飞阁流丹 fēi gé liú dān 形容楼阁彩画艳丽状。唐·王勃《滕王阁序》："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

丹素炫彩 dān sù xuàn cǎi 红白等辉映斗彩。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

腾红酣绿 téng hóng hān lǜ 形容红墙绿瓦的建筑色彩浓重醒目状。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万树浓黛，点缀山腰，飞阁危楼，腾红酣绿者，香山也。"

点黛设色 diǎn dài shè sè 形容建筑犹如黛色点缀。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下见麦畴稻畦，滦堑柳路，村庄疏数，点黛设色。"

华榱金铺 huá cuī jīn pū 形容建筑华丽，饰金涂朱。榱，椽子。明·袁中道《游西山十记》："夫雄踞上势，撮其胜会，华榱金铺，切云耀日。"

丹楹刻桷 dān yíng kè jué 红色的柱子和雕镂的椽子，形容建筑之精美。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

绛宫缥瓦 jiàng gōng piǎo wǎ 红屋青瓦。明·王衡《游香山记》："望西山层峦远岑，绛宫缥瓦，随云光日影以幻奇。"

箬篱菁径 ruò lí jīng jìng 竹篱草径。明·叶绍袁《甲行日注》："至华桐坞，凿山为址，三面皆峰，箬篱菁径。高下委折。"

飞甍浮栋 fēi méng fú dòng 形容建于山坡高处的建筑。明·陶允嘉《游西山记》："远望香山，倚壁嵌空，飞甍浮栋，万树拥绕，青黄丹紫，相错如绣。"

古文虚词

阿 ā 词头。加于人名、代词"谁""堵"，和表示排行的数词前，不必译出。如：①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三国志·蜀书·刘封传》"阿"句：自从立阿斗为皇太子以来，有见识的人无不为此失望和痛心。) ②敦作色曰："小人阿谁？"(《晋书·王敦传》"阿"句：敦变了脸色说："〔你所说的〕小人是谁？") ③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阿"句：表现人的神韵、描写人的相貌，只在这〔眼睛〕当中。) ④阿六！汝生活大可。(《南史·临川靖惠王宏传》："阿"句：阿六！你生活很可以的。)

安 ān 代词。(一)用于动词或助动词前表示反诘，相当于"怎么""哪里"等。如：①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安"句：燕雀怎么能了解天鹅的宏图大志呢？) ②纾(shū)国家之难，安敢爱身？(《资治通鉴·唐纪·昭宗天复二年》"安"句：为了解除国家的危难，〔我〕怎么敢吝惜个人的身躯？) ③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乡里，安可不救？"(《旧唐书·张万福传》"安"句：魏州闹灾荒，父卖子，子卖父，饿死的人满街都是。万福说："魏州是我故里，怎么能不救助？")(二)用于动词或介词前作宾语，可代人、事物、处所、原因等，相当于"谁""什么""哪里"等。如：④〔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史记·循吏列传》"安"句：〔子产〕在郑国当政二十六年而去世，青壮年号陶大哭，老人象孩子一样啼哭，他们说："子产离开我们而死了，老百姓将投靠谁呢？) ⑤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管子·小匡》"安"句：公说："从什么开始才好？"管子回答说："从爱民开始"。) ⑥根本既倾，枝叶安附？(《南史·袁湛传》"安"句，根子已经倾折，枝叶依附〔在〕哪里？) ⑦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史记·魏公子列传》"安"句：如今邯郸很快就被秦国降服然而魏国的救兵迟迟不来，公子能在别人困难时分担忧愁表现〔在〕哪里呢？) ⑧若夫死者，吾安用而爱之？(《管子·大匡》"安"句：至于〔为争夺禄位而〕死去的人，我为什么怜惜他们呢？)(三)"安用〔以〕……为"这一固定格式，相当于"为什么还要…呢""哪里用得着…呢"。如：⑨世方乱，安以富为？(《三国志·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安"句：世道正乱，为什么还要富贵呢？) ⑩吾父已死，吾安用生为？

（《宋史·王济传》“安”句：我父亲已经死去，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呢？）⑪我旦夕死人，安用宝为？（《资治通鉴·晋纪·安帝隆安五年》“安”句：我是很快就会死去的人，哪里用得着珍宝呢？）（四）“安”作修饰语，被修饰的只是名词“所”，“安所”相当于“哪里”“什么地方”。如：⑫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对曰：“愿居洛阳。”（《史记·滑稽列传》“安”句：王夫人病得很重，国君竟亲自去问她说：“儿子将立为王，〔你〕想在哪里安置他？”）。⑬寡人国小以狭，民弱臣少，寡人独治之，安所用贤人辩士乎？（《说苑·奉使》“安”句：我的国家地方狭小，臣民很少，我独自治理它即可，什么地方用得着贤人和辩士呢？）。

案〔按〕àn　连词。（一）表示顺接，相当于“就”“于是”。如：①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荀子·臣道》“案”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②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则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矣。（《荀子·王制》“案”句：刑罚政令稳妥，百姓和乐，国家风俗俭朴，就能〔使得〕军队强大城防巩固，敌国也就自己屈服了。）（二）表示逆接，相当于“却”。如：③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失丧之，我按起而制之。（《荀子·富国》“按”我句：别人都慌乱，唯我们太平；别人都危殆，唯我们安定；别的国家都衰败沦亡下去，我们却能奋起而治理国家。）

半bàn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只关涉主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的一半或一部分，相当于“有一半”等。如：①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国策·齐策一》“半”句：韩魏两国出兵打仗若战胜了秦国，兵力就会有一半损失，边境不能守卫。）（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涉及宾语所代表事物的一半。相当于“……的一半”。如：②民间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半纳者，止出息一分。（《宋史纪事本末·元佑更化》“半”句：民间蚕丝和麦子成熟丰收了，随着夏季税收先交纳所应交税的一半。愿意交纳〔赋税的〕一半的，只出利息一分。）（三）分别用在两个反义动词前，相当于“一会……一会”。如：③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徐霞客游记·游黄山日记》“半”句：那时浓雾一会密布一会消散，每当一阵浓雾到来，对面就看不见东西。）

旁〔傍〕bàng　介词，和介词宾语一起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和依据的对象，相当于“沿着”“依照”。如：①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论衡·纪妖》“旁”句：于是沿着海岸向西到达平原津却得了病，到沙丘就死去了。）②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汉书·扬雄传上》“旁”句：又依照《离骚》作了另外一篇，篇名叫《广骚》。）

暴bào　副词，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动作发生的急速和突然，或表示程度之甚，相当于“陡然”“特别”等。如：①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水经注·沔水》

"暴"句：顷刻大水陡然涌出，赤崖以南的桥梁阁道都被冲坏。）②第中鼠暴多，与人相触，以尾画地。（《汉书·霍光传》"暴"句：宅第中老鼠特别多，敢于跟人相碰，用尾巴在地上画来画去。）

备 bèi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在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内完成，相当于"全部""尽"等。如：①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备"句：晋侯在外已经十九年了，而最终得到晋国。艰难险阻，全部尝到了。）②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è）。（《后汉书·班超传》"备"句：臣以前曾与下级官属三十六人奉使出使边远小国，受尽艰难困苦。）（二）用于动词前，表示自谦：现任某职，只是聊备使用而已，相当于"不称职地""勉强地"。如：③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左传·哀公二年》"备"句：蒯聩我不敢自图安逸，不称职地拿起长矛担任车右。）④吾尝备位将相。（《汉书·萧望之传》"备"句：我曾经勉强地位列将相。）

被 bèi　介词，用于被动句中，或介绍施动者，或直接用于动词前表示被动。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被"。如：①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虨（bān）。（《世说新语·方正》"被"句：诸葛恢的大女儿嫁给了太尉庾亮的儿子…庾亮儿子被苏峻杀害后，改嫁江虨。）②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被"句：诚信却被怀疑，忠诚反被诽谤）。

辈 bèi　助词，用于名词、代词或数词后，表示人或物为多数、同一类或一批，相当于"们""类""批"等。如：①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著高屐（jī），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世说新语·简傲》"辈"句：王子敬兄弟们看望郗公，放轻脚步问候寒暖，十分注意外甥的礼节。等到嘉宾死了，他们兄弟都穿上高高的木底鞋，态度轻蔑傲慢。让他们坐下，都说："有事情没空儿坐。"他们走后，郗公感慨地说："倘使嘉宾不死，小子们胆敢这样！"）②尔辈群奴，正可牧牛羊，何为送死？（《晋书·苻坚传》"辈"句：你们这些奴隶，应该去放牧牛羊，为什么来送死呢？）③若此辈者，数千百处。（《史记·司马相如传上》"辈"句：象这一类的地方，有上千成百处。）④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史记·王翦传》"辈"句：王翦到达关塞以后，派遣使臣回去请求良田的有五批。）

本 běn　副词，用于名词性谓语或动词前，表示原本如此，相当于"本来""起初"等。如：①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本"句：我本来是个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求飞黄腾达名闻天下。）②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

益于事，请从此别。（《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本”句：起初想跟您一起建立王霸之业，是凭着这颗心；现在已失去老母亲，我的这颗心已经乱了，已于事无补了，请允许我就此告辞。）

比 bǐ （一）副词。（A）用于动词或小句前，表示动作的连续施行或情况的连续发生，相当于“接连”等。“比比”相当于“屡次”等。如：①始至之日，岁比不登。（《古文观止·苏东坡：超然台记》“比”句：我开始到的时候，年景接连歉收。）②比比上书，言得失。（《元氏长庆集·序》“比”句：屡次向皇帝上书，陈说政令的利害得失。）（B）用于谓语或小句前，表示动作或事情在不久前发生，相当于“最近”“近来”等。“比来”义同。如：③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世说新语·谗险》“比”句：最近你跟殷仲堪背着别人尽说些什么？）④愈眼疾比剧。（《韩昌黎集·与孟东野书》“比”句：愈的眼病近来恶化了。）⑤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三国志·魏书·徐邈传》“比”句：近来天下奢侈浪费，相互攀仿攀比。）（二）介词，引进比较的对象、涉及的对象或时间，相当于“比起”“等到”“为”。如：⑥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柳宗元集·捕蛇者说》“比”句：如今我即使因捕蛇而死，比起我的乡邻的死，已经算晚了。）⑦比其返也，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比”句：等到晏子回来时，齐景公正役使百姓修筑大台。）⑧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xiào）乎？（《孟子·公孙丑下》“比”句：且为死者着想，不使泥土挨着尸体，对于亲人来说难道不高兴吗？）

彼 bǐ 代词，可代人、事物、处所等，在句中可充当主语、动词宾语和名词修饰语，相当于“他”“对方”“那个”等。如：①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彼”句：他是个男子汉，我是个男子汉，我为什么怕他呢？）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彼”句：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身经百战而没有危险。）③彼来者为谁？（《史记·范雎列传》“彼”句：那个来的人是谁？）

必 bì 副词，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动作行为或某种性状发生和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相当于“必定”“总”“一定”“确实”等。如：①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必”句：我听说聪明的人考虑一千次，也必定会有一次失误；愚笨的人考虑一千次，总会有一次正确。）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史记·游侠列传》“必”句：他说话一定算数，他办事一定有结果。）③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必”句：大王确实没有〔合适〕的人，我愿意带着宝玉出使。）

毕 bì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主语代表的人或物的全体施行，或表示动作涉及宾语所表事物的全部。相当于“全部”“全都”。如：

①儒墨毕起。(《庄子·在宥》"毕"句：儒家、墨家全都兴起。)　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古文观止·兰亭集序》"毕"句：众多贤达全都到了，老的少的都聚会一起。)　③不过旬月，军食毕尽，击之可破也。(《后汉书·吕布传》"毕"句：过不了十天个把月，军粮全部吃光了，那时去攻击他们一定可以攻破的。)

便 biàn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即将进行，相当于"马上就"等。如：　①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便"句：南部中部各郡，都发动了叛乱，诸葛亮因为刚刚遭到大丧，所以不能马上就兴兵讨伐。)　②今有人十年长患瘵(zhài)，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旧唐书·魏征传》"便"句：现在有人十年之中长期患病，刚刚治愈，这人必是瘦得皮包骨头；马上就叫他背一石米，一天走一百里，绝对不可能。)(二)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前，后一分句的情况是随着前一分句的情况出现的，相当于"就"。如：　③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后汉书·窦融传》"便"句：现在正是蜀汉相攻的时候，关键就在将军您了。您抬脚迈向左或向右，就会使两方的力量对比有轻重的不同。)　④正人在朝廷，则朝廷安。邪人一进，便有不安之象。(《宋史纪事本末·元祐更化》"便"句：正派的人在朝廷任事，朝廷就平安无事。邪恶之徒一进朝廷，就会出现不安定的征兆。)(三)用于相同的两个短语间，构成假设复句的紧缩式。相当于"就"。如：　⑤砍头便砍头，何为怒邪？(《三国志·蜀书·张飞传》"便"句：要砍头就砍头好了，为什么发怒呢？)

遍〔徧〕bià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涉及宾语代表的事物的全部，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遍"或"全部"等。如：　①足可以遍行天下。(《荀子·性恶》"遍"句：脚可以走遍天下。)　②大率如此，不可徧举。(《白居易集·与元九书》"徧"句：大体如此，不能全部列举。)

别 bié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在一种动作外再施行一种动作，相当于"另外""单独""分别"等。如：①炀帝以澹书犹未能善，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史通·古今正史〈后魏书〉》"别"句：隋炀帝认为魏澹写的书还不够完善，又命令左仆射杨素另外撰写。)　②其二月，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别"句：那年二月，魏文帝把陈地四个县封给曹植〔并封他〕为陈王，食邑三千五百户。曹植屡次请求单独相见面谈，讨论当时政事，希望得到任用，始终没能如愿。)　③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世说新语·贤媛》"别"句：李氏单独住在外边，不肯回到贾充家里。)　④成树之后，树别下子一石。(《齐民要术·槐柳楸梓梧柞》"别"句：树长成后，每棵树分别打下一石子。)

并〔竝、倂〕bìng　　副词。(一)

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主语代表的人或物共同施行，或动作涉及宾语代表的事物的全部，有时，表示几种物体并排呈现，相当于“一起”“都”“并排”等。如：①诸侯并起。（《汉书·高帝纪》“并”句：诸侯一起兴盛。）②俾我兄弟竝有乱心。（《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竝”句：使我兄弟都产生叛乱的心。）③中夜，酒欲竭，顾船中有醋斗馀，乃倾入酒中，併饮之。（《梦溪笔谈·人事》“併”句：半夜，酒快喝完了，回头看见船里还有一斗多醋，就倒进酒中，一起喝了下去。）（二）表示递进，相当于“并且”“连”等。如：④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备，并请灵等与共飨饮。（《后汉书·吕布传》“并”句：吕布屯兵在沛城郊外，派人延请刘备，并且请纪灵等一起饮宴。）⑤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魏书·杨播传》“并”句：于是派骑兵追捕缉拿，连被盗的绢一起缴获。）⑥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聊斋志异·促织》“并”句：官吏严格限期追查拷打，十几天打了上百棍。〔成生〕两条大腿间脓血淋漓，连蟋蟀也不能去捉了。）

不 bù　副词。（一）用于动词、助动词或形容词前，对动作或情况加以否定，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如：①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吕氏春秋·察今》“不”句：国君为什么不效法先王的法制？）②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不”句：多做不合道义的事，必定会自己倒台。）（二）用于句末或句中，表示反复询问，“不”前或有抉择连词，“不”后或有动词重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等。如：③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不”句：秦王用十五座城邑来换我的璧，可以给不〔可以给〕？）④子以秦为将救韩乎，其不乎？（《战国策·韩策二》“不”句：你认为秦国打算救韩国呢，还是不〔打算救韩国〕呢？）⑤臧者论不论？论。（《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不”句：窝藏赃物的人论罪不论罪？论罪。）

曹 cáo　助词，用于名词或人称代词后，表示多数，相当于“们”“辈”等。如：①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世说新语·德行》“曹”句：清贫，是士人的本色，怎么能登上高枝就抛开本色呢？你们应当记住。）②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干试有司乎！（《后汉书·李固传》“曹”句：你们这些多么迂腐的儒生，竟敢公开触犯皇帝诏令，干扰主管刑律的官吏！）③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后汉书·郭伋传》“曹”句：郭伋问：“孩子们为什么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回答说：“听说您来了，很高兴，所以前来迎接。”）

曾 céng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发生在过去，相当于“曾经”等。如：①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史记·袁盎列传》“曾”句：梁王因此怨恨袁盎，曾经派人刺杀他。）②孟尝君曾待客夜食。（《史记·孟尝君列传》“曾”句：孟尝君曾经招待客人夜晚吃饭。）③彭

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世说新语·假谲》“曾”句：袁绍年少的时候，曾经让人夜里用剑掷向魏武帝，掷得稍低了点儿，未刺中。）（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或情况出人意料之外，相当于“竟”“竟然”等。如：④纣贵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史记·淮南王列传》“曾”句：商纣尊贵地居于君位，死时竟不如普通百姓。）⑤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列子·汤问》“竟”句：你心性固执，固执得不可理谕，竟然连寡居女子和小孩子都不如。）⑥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世说新语·伤逝》“曾”句：象〔我〕这样的人，竟未能活到四十。）

差 chā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具有一定程度，相当于“比较”“还算”“大致”等。如：①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差”句：现在军队战士在住地种田，粮食的储备就比较多了。）②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后汉书·吴汉传》“差”句：光武帝时常派人去观察大司马在干什么，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正在整修打仗攻伐的器具，于是赞叹地说：“吴公还算令人满意。”）③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世说新语·言语》“差”句：谢安太傅在大雪天把家里的人聚集到一起，给子女讲论作文章的要领，一会雪下大了，谢公兴奋地说：“白雪纷纷象什么？”侄子谢朗答道：“撒盐在空中大致可以拿来作比。”）

侪 chái　（一）助词，常用于第一人称代词“吾”后，表示多数，相当于“们”。如：①吾侪小人，食而听事犹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焉与知政？（《左传·襄公三十年》“侪”句：我们下等人，吃了饭听候使唤还怕不能完成使命，因而不免有罪，哪里还能参与政事呢？）②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左传·成公二年》“侪”句：文王尚且运用群众的力量，何况我们呢？）（二）副词，用于动词前，相当于“一起”“共同”。如：③长幼侪居。……男女杂游。（《列子·汤问》“侪”句：老人小孩一起居处。……男的女的杂相交游。）

长 cháng　副词。（一）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动作或状态的长久存在和经常发生，相当于“长期地”“永远地”“经常”。如：①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长”句：不仁的人不可以永久地生活在穷困的环境中，也不可以长期地生活在安乐的环境中。）②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战国策·齐策一》“长”句：现在齐国，也就好象是您的水。您永远地有齐国的庇荫，何必在薛地筑城？）③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长”句：君子心地平坦宽广，小人经常忧心忡忡。）（B）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持续或顺利进行。相当于“长长（地）”“顺利迅速地”等。如：④臣窃惟事势，可

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贾谊集·数宁》“长”句：我私下里考虑政治形势，值得为之沉痛惋惜的事有一件，值得为之流下眼泪的事有两件，值得为之长长叹息的事有六件。） ⑤吾用兵三十馀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三国志·魏书·徐晃传》“长”句：我指挥打仗三十多年，加上所听到的古代善于指挥打仗的人，还没有能顺利迅速地驰驱径直冲入敌人营垒中的。）

尝 chá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发生在过去，相当于“曾经”。如：①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荀子·劝学》“尝”句：我曾经整天地冥思苦想，但不如学习一会儿的收获大；我曾经踮起脚来往远处看，但不如爬上高处看得远。） ②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世说新语·言语》“尝”句：长沙王曾经问过乐令，乐令神色自然若无其事。） ③欧阳文忠公尝言曰：“观人题壁而可知其文章矣。”（《梦溪笔谈·艺文》“尝”句：欧阳修曾经说过：“看人在墙壁上的题辞就可以知道他的文章怎么样了。”）

常 cháng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经常发生，相当于“经常”“常常”。如：①陆贾者，楚人也……居左右，常使诸侯。（《史记·陆贾传》“常”句：陆贾是楚国人……侍奉在〔高祖〕左右，经常出使到诸侯国去。） ②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慎子·外篇》“常”句：奢侈的人心里经常是贫乏的，俭约的人心里经常是富有的。） ③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世说新语·言语》“常”句：张玄之、顾敷分别是顾和的外孙和孙子，都少年聪颖，顾和都很看重，可常常认为顾敷更胜一筹。）（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或情况发生在过去，相当于“曾经”，通“尝”。如：①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史记·高祖本纪》“常”句：您最初曾经特别看重这个女儿，想把她嫁给高贵的人。） ⑤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洛阳伽蓝记·城西》“常”句：元琛曾经会合皇族，陈设种种宝贵器物。）

诚〔成〕 chéng　副词。（一）用于谓语前，表示事情的真实性、确切性，相当于“的确”“确实”等。如：①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成”句：如果坐着一动不动，站着恭恭敬敬，不问不说话，说话必定表情严肃而恭敬，这的确是众人之中的善者。） ②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诚”句：现在天下分为三国，我们益州实力消耗到了极点，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二）“诚”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如果真能”“如果确实”等。如：③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诚”句：如果真能做到这样，老百姓归附他好比水向下奔流一样，哗啦哗

啦有谁能阻挡住它?) ④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史记·苏秦列传》“诚”句:大王如果确实能听我的计策，就把燕国的十个城邑归还给它；燕国白白得到十个城邑，一定非常高兴。)

啻〔翅〕chì 副词，用于动词、名词性短语、数词等前表示对范围的限制，相当于“止”“只”等。经常与“不”“何”“奚”等连用作“不啻”“不翅”“何啻”“奚啻”等，相当于“不止”“不只”“哪里才”“哪里只”“岂止”“哪只”等。如：①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世说新语·排调》“啻”句:王浑的妻子笑着说:“如果让我嫁给你的弟弟王沦，生的儿子可能不止如此。”) ②江思悛思怀所通，不翅儒域。(《世说新语·赏誉》“翅”句:江思悛博览坟典，通晓百家，不只是儒学一域。) ③计其费耗何啻亿万?(《宋史·王禹偁传》“啻”句:总计建造寺院耗费的钱财何止亿万?) ④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吕氏春秋·当务》“啻”句:盗跖的弟子问跖说:“盗有道义吗?”跖说:“哪里只是他们有道义呢?”) ⑤然比之开禧时，物价腾涌奚啻倍蓰(xǐ)矣?(《宋史·李宗勉传》“啻”句:然而比起开禧年间，物价猛涨了岂止两倍或五倍呢?)

重 chó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重复，相当于“再次”“重新”等。如：①近以河决韩村，发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当以诸军代之。(《宋史纪事本末·治河》“重”句:近时因为黄河在韩村决口，发动百姓修治河堤没有成功，怎么可以再次劳累我的百姓呢?应当派出一些军队去代替他们。) 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重”句: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一切废弛的事情全部兴办起来，于是就重新修建了岳阳楼。)

畴 chóu 代词，用来询问，只可代人，相当于“谁”。如：①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尚书·舜典》“畴”句:帝舜说:“谁来管理我的山川草木鸟兽?”都说:“伯益吧!”) ②运转亡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列子·天瑞》“畴”句:运转不停，天地在无声地变化着，谁感觉到了这一点呢?)

初 chū 副词。(一)用于句前，表示追溯往事，相当于“当初”；用于动词前，表示事情首次发生，相当于“第一次”“开始”等。如：①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左传·隐公元年》“初”句: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叫武姜。) ②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左传·隐公五年》“初”句:于是第一次用六人执羽，开始用六排人跳舞。) ③初置张掖、酒泉郡。(《史记·平准书》“初”句:开始设立张掖郡和酒泉郡。)(二)用于否定词前，与否定词一起相当于“从来没有”“一点也不”等。如：④帝曰:“善。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后汉书·盖勋传》“初”句:灵帝说:“好。遗憾的是我见到您太晚了。我那些臣子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

话。”）　⑤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世说新语·德行》“初”句：怎么一点也不见你教育儿子？）

垂 chuí　副词。（一）用于动词、形容词、数词、数量短语前，表示即将完成某种动作，或接近某种状态、某种数量，相当于“〔即〕将”“近”等。如：①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三国志·蜀书·姜维传》“垂”句：天水太守听到蜀军即将来到，而且各县都将响应，怀疑姜维等人都有二心。）　②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晋书·宣帝纪》“垂”句：现在贼军粮食将尽，而军营尚未建好。）　③臣年垂八十。（《晋书·山涛传》“垂”句：我已年近八十。）（二）表示恭敬：对方高于自己，是自上而下施行某种动作。现代汉语中没有相应的词对译。如：①垂听逆耳，甘纳苦言者，济世之君也。（《晋书·刘颂传》“垂”句：能向下听取逆耳之言，采纳忠诚之谏的国君，是能拯救国家的国君。）　②臣虽才不经国，言浅多违，犹愿陛下垂省。（《晋书·刘颂传》“垂”句：尽管我的才能不足以管理国家，言论浅陋而多背于事理，也还是希望陛下省察。）

此 cǐ　（一）代词，可指人和事物，可作主语、宾语、定语，相当于“这”“这些”“这个”等。如：①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史记·淮阴侯列传》“此”句：〔韩信〕告诉楚国各位文武官员说：“这是位壮士。”）　②贤者亦乐此乎？（《孟子·梁惠王上》“此”句：贤良的人也喜欢这些〔鸟兽〕吗？）　③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世说新语·识鉴》“此”句：这个孩子不同寻常，只是我老了，看不见他长大罢了。）（二）连词，连接前后两项，表示有前面的情况，就会出现后面的情况，相当于“这就”。如：④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礼记·大学》“此”句：有德政这就有人民，有人民这就有土地，有土地这就有财富，有财富这就有用项。）

从 cóng　介词，介绍动作开始的时间或动作进行的起点，或介绍动作的对象，相当于“从”“向”等。如：①元帝过江犹好酒，王茂弘与帝有旧，常流涕谏，帝许之，命酌酒一酣，从是遂断。（《世说新语·规箴》“从”句：元帝过江以后还嗜酒如命，王茂弘与元帝有旧交，经常流着眼泪劝谏，元帝答应了他，让斟酒大喝一次，从此就断酒。）　②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世说新语·言语》“从”句：顾长康从会稽回来，人们〔向他〕询问那里山川的美丽。）　③从田荣藉助兵，以击常山王张耳。（《汉书·高帝纪》“从”句：〔陈余〕向田荣借来援兵，用以进击常山王张耳。）　④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世说新语·任诞》“从”句：刘伶发了酒瘾，很想喝酒，向妻子要酒。）

粗 cū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粗略地进行某种动作，或大体上存在某种情况，相当于“粗略地”“简略地”“大体上”等。如：①谢粗道其意。（《世说新语·言语》“粗”句：谢万粗略地谈了自己的打

算。）②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世说新语·文学》“粗”句：孙安国简略地重复了自己〔刚才说〕的话，也觉得大不如刚才。）③上幸大司马门，城上闻跸声，皆鼓噪流涕，众心粗安。（《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太清二年》“粗”句：皇帝来至大司马门，从城上听到开道声，众人擂鼓呼喊流出眼泪，民众的心大体上安定下来。）

卒 cù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情况出乎意外地出现，相当于“突然”。“卒然”义同。如：①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荀子·王霸》“卒”句：突然发生了外患内乱，又希望百姓去为自己效死，是不可能实现的。）②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贾谊集·论积贮疏》“卒”句：突然边境上有了危急情况，数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国家拿什么给他们吃？）

趣 cù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迅疾，相当于“赶快”“快”等。如：①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史记·项羽本纪》“趣”句：你不赶快投降汉王，汉王就要俘虏你，你不是汉王的对手。）②韩厥告赵朔趣亡，赵朔不肯。（《新序·节士上》“趣”句：韩厥告诉赵朔赶快逃走，赵朔不肯。）③腓（féi）大于股，难以趣走。（《韩非子·杨权》“趣”句：腿肚子比大腿粗，就很难快跑。）

大 dà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程度之甚，相当于“大大〔地〕”“非常〔地〕”“特别”“大声”等。“大抵”“大较”“大率”相当于“大体上”“大略”“大致上”等。如：①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大”句：古代贤人大大超过一般人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善行罢了。）②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yuè）。（《史记·齐太公世家》“大”句：于是周西伯去打猎，果然在渭水之北遇到了姜太公，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③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世说新语·言语》“大”句：对答说：“圣人生而知之，故难以企望仰慕。”庾公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的对答。）④故其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大”句：所以庄子撰书十几万言，大体上都是些寓言。）⑤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颜氏家训·涉务》“大”句：国家任用人才，大略不过六条标准。）⑥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大”句：大致上十里为一亭，每亭有亭长。）

殆 dài　副词。（一）用于谓语前，表示一种推测，相当于“大概”等。如：①吾尝见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史记·赵世家》“殆”句：我曾在路上看见一个孩子，大概是您的儿子吧。）②此殆空言，非至计也。（《汉书·赵充国传》“殆”句：这大概是空话，不是最好的主意。）（二）用于动词前，表示距动词表示的动作或情况相差不多，相当于“几乎”等。如：③几败北山，殆死潼关。（《诸葛亮

集·后出师表》"殆"句：差点儿败在北山，几乎死在潼关。） ④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世说新语·德行》"殆"句：船很狭小，且又大漏，几乎再没有坐人的地方。） ⑤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文选·孔文举：论盛孝章书》"殆"句：海内亲朋好友，几乎全都死去。）

逮 dài　介词，介绍动作或情况施行或发生的时间，相当于"趁…的时候""到"等。如：①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左传·定公四年》"逮"句：趁吴国还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君王应该去平分楚国。）② 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已。（《世说新语·尤悔》"逮"句：到周侯被杀害，丞相事后才知道周侯救过自己。）③逮晋以降，流宕逾远。（《史通·叙事》"逮"句：到晋朝以后，〔史书的文章〕漫无检束，距古代的作品越来越远。）

单 dā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施事者单独进行，相当于"独自"等。如：①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单"句：诸葛诞的处境窘迫危急，独自骑着马，率领他的部下从小城门突围出去。） ②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初平三年》"单"句：你们如果离开军队独自行动，那么一个亭长就能把你捆缚起来了。）

但 dàn　（一）副词。（A）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有限，相当于"只"等。如：①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世说新语·规箴》"但"句：东方朔说："这不是言语所能争辩的。你一定想得到挽救的话，在你将要离开时，只是频频回头看皇帝，千万不要说话。"） ②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世说新语·文学》"但"句：何晏注《老子》没注完，听到王弼谈自己注《老子》的意图，何晏感到很多地方不如他，不再作声，只应声"诺，诺"，就不再去注了。） （B）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无所顾忌地进行，相当于"尽管"等。如：③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世说新语·容止》"但"句：温忠武说："溪狗是我所熟悉的人，你尽管去见他，不要有顾虑！" ④黄王为生灵……但各安家！（《旧唐书·黄巢传》"但"句：黄王替百姓办事…尽管各自安心回家去吧！）（二）连词，表示转折，相当于"只是""但是"。如：⑤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世说新语·贤媛》"但"句：唤来王明君后，汉元帝一见就舍不得让她走，只是名字已经报知匈奴，不便中途更改，于是王明君就前往匈奴去了。）

当 dāng　（一）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示理应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应当"。如：①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宜以'消阳'为名。"（《世说新语·言语》"当"句：〔魏明帝〕对左右的人说："馆舍应当用什么作馆名？"侍中缪袭

说："…应该用'渭阳'作馆名。"）②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文选·曹丕：与吴质书》"当"句：少壮时真是应当努力，时光一过，怎可攀留？）（二）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或情况势必发生，相当于"会"等。如：③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列子·天瑞》"当"句：天空果然是凝聚的气体，太阳、月亮、星星不会坠落下来吗？）④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文选·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当"句：以内心偏狭的本性，又普遍存在着这九种隐患，〔即使〕没有外部的灾难，也会有内部的病害。）（三）介词，介绍动作施行的地点、时间、情况，相当于"正对着""在""在…的时候""在…的情况下"等。如：⑤既歌而入，当户而坐。（《礼记·檀弓上》"当"句：唱完了歌就进屋去，正对着门坐下。）⑥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世说新语·德行》"当"句：在这个时候，桂树哪里知道泰山的高，渊泉的深呢？）⑦卿海内之儁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世说新语·规箴》"当"句：您是海内杰出人物，大家效法的榜样，为什么在居丧的情况下却蒙着锦被呢？）（四）语缀，在"何""奚"后构成"何当""奚当"，相当于"什么时候"。如：⑧曰："曹州刺使何当人朝？"或曰："即今冬也。"（《北史·柳裘传》"当"句：〔皇帝〕问："曹州刺史什么时候入朝？"有人回答说："就在今年冬天。"）⑨哀公问子羔曰："子之食奚当？"（《礼记·杂记下》"当"句：哀公问子羔说："你的先人食禄做官是什么时候？"）

道 dào　介词，介绍动作开始的处所，相当于"从"等。"奚道"相当于"怎么"。如：①诸使者道长安来。（《汉书·淮南王安传》"道"句：众使臣从长安来到。）②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早！奚道至于此乎？（《晏子春秋·杂篇》"道"句：你为什么这样年轻而被逐出国家又如此之早！〔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得 dé　助动词。（一）用于动词前或动词后，表示动作行为的客观可能性，相当于"能够""得以""能""到"等。如：①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世说新语·识鉴》"得"句：石勒不识字，让别人读《汉书》〔给他听〕，听到郦食其劝谏应立六国贵族的后代，刻印将授予他们时，大惊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怎么能够就领有天下呢"？）②平子饶力，争得脱，逾窗而走。（《世说新语·规箴》"得"句：平子有力气，使劲儿拼争才得以脱身，跳窗逃跑了。）③田为王田，卖买不得。（《后汉书·隗嚣传》"得"句：田地是国君的田地，不能卖和买。）（二）用于动词前，表示许可进行某种动作，相当于"准许"等。如：④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世说新语·尤悔》"得"句：太后说："你已经杀害了我的任城，不准许再杀我的东阿！"）

⑤故布衣皆得风议，何况公卿之史

乎？（《盐铁论·刺议》“得”句：所以平民都允许议论政事，何况作为公卿属官的长史呢？）（二）“得”与“无”“微”“毋”构成“得无”“得微”“得毋”，相当于“莫非”“该不会”等。如：⑥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得”句：而今人们生长在齐国不偷盗，进入楚国就偷盗，莫非楚国的水土使人们善于偷盗吧？）⑦诸侯得微有故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得”句：诸侯莫非有事故吧？）⑧魏得毋用周叔为大将乎？（《汉书·韩信传》“得”句：魏国该不会任用周叔做大将吧。）

等 dĕng　（一）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情况相同，相当于“同样”等。如：①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等”句：如今逃亡也得死，起义也会死，同样是死，为国而死可以吗？）（二）助词，用于表示人或事物的诸平列成分后，相当于“这些人”“这些东西”等；用于人称代词后，表示多数，相当于“们”等。如：②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飞等不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等”句：于是〔刘备〕与诸葛亮感情和关系日益加深和密切，关羽、张飞这些人不太高兴。）③灵宝视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图？（《〈世说新语·仇隙〉注引〈晋安帝纪〉》“等”句：灵宝把我看作母亲，你们怎么忍心骨肉相残？）

抵〔底〕 dĭ　介词，介绍动作发生的时间，相当于“到”。如：①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汉书·礼乐志》“抵”句：草木凋零，到冬天就下霜。）②林类年且百岁，底春被裘。（《列子·天瑞》“底”句：林类年纪将近百岁了，到春天披上皮衣。）

第 dì　（一）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对范围的限制，相当于“只”“只是”；或表示无须顾忌地施行某种动作，带有祈使语气，相当于“只管”“尽管”。如：①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新唐书·裴行俭传》“第”句：今后只按我的要求安排就是，不要问我知道的原因。）②第举兵，吾从此助公。（《史记·淮阴侯列传》“第”句：只管发兵好了，我从这里帮助你。）③第随我来，或希冀耳！（《博异记·张遵言》“第”句：尽管跟我来，或许有点希望吧！）（二）连词。(A)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如果”；用于条件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只要”，如：④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句：如果到临邛，向兄弟们借点钱，还可以维持生活。）⑤楚国第我死，令尹、司马非胜而谁？（《左传·哀公十六年》“第”句：楚国只要我一死，令尹、司马不是胜又是谁呢？）(B)表示转折，相当于“只是”。如：⑥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理耳。（《唐摭言·宣慈寺门子》“第”句：我是宣慈寺守门人，也跟诸郎君素无交情，只是对那些下等人的无理感到不平罢了。）⑦生心实爱好，第虑父嗔，因直以情告。（《聊斋志异·白秋练》“第”句：年轻人心里确实爱她，只是怕父亲生气，因此

照直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三）助词，加于数词前表示序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第"。如：⑧平原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史记·萧相国世家》"第"句：平阳侯曹参，身负七次伤，攻打城池占领地盘，功劳最多，应该位居第一。）

递 dì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依次进行，或交替进行，相当于"依次""交替"等。"递……递……"义略同。如：①死罪以下，递减一等。（《宋史·真宗纪》"递"句：自死罪以下，依次减轻一等。）②巧谋并行，诈术递用。（《吕氏春秋·先己》"递"句：虚夸与计谋同时进行，欺诈与权术交替使用。）③递兴递废，胜者用事。（《史记·律书》"递"句：兴起与衰废交替出现，胜利的一方主宰万事。）

定 dì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事实确实如此，相当于"确实"等；用于疑问句的动词前，有追究事实真相之义，相当于"到底""究竟"等。如：①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藉，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座，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世说新语·方正》"定"句：王含任庐江郡守，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王敦却袒护他的哥哥，故意在人前声称："我哥哥在庐江郡确实很好，庐江人士都称颂他。"当时何充作王敦的主簿，正好在座，严肃地说："我就是庐江人，听到的情况跟你说的完全不同。"）②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世说新语·言语》"定"句：邓艾说话结巴，说到自己时总是连着说"艾……艾"。晋文王戏弄他说："你总是说'艾……艾'，到底是几个艾？"邓艾回答说：'凤呵凤呵'，原本只有一个凤。"）③抚军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世说新语·品藻》"定"句：抚军司马昱问殷浩："你究竟比裴逸民怎么样？"〔殷浩〕停了好久回答说："本来应当强些。"）

动 dò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的经常出现或轻易发生，相当于"动不动就"等。"动辄"略同。如：①军旅岁起，将士无钱帛之赏；而后宫之家，赐及僮仆，动至数千万。（《资治通鉴·晋纪·愍帝建兴四年》"动"句：军队年年打仗，官兵没有一点儿钱币布帛的赏赐，而皇后妃子的家里，赏赐连仆人都有份，动不动就达几千万之多。）②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文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动"句：只是自己以为身体伤残受过污刑，动不动就受到责备，想要做些事情，反而有害于事；因此独自沉默忧郁而能跟谁说呢？）③跋前踬后，动辄得咎。（《韩昌黎集·进学解》"动"句：进退两难，动不动就犯了错误。）

都 dū　（一）感叹词，相当于"呵"。如：①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尚书·皋陶谟》"都"句：皋陶说："呵！〔重要的〕在于了解贤

人，在于安抚人民。"）②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尚书·益稷》"都"句：夏禹说："啊！帝王！谨慎就能永居君位。"）（二）副词。(A)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的周遍性，相当于"都"。如：③然则凤皇、骐麟都与鸟兽同一类，体色诡耳，安得异种？（《论衡·讲瑞》"都"句：既然这样，那么凤凰、骐麟都和普通鸟兽属于同类，只是身体颜色奇异罢了，哪里能是不同种类呢？）④备明旦自来至云营，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为胆也！"（《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二十四年》"都"句：刘备第二天天亮亲自来到赵云的兵营中，视察昨天交战的地方，说："子龙浑身都是胆啊！"）(B)"都"与"不""无"连用作"都不""都无"，相当于"一〔点儿〕…也不""一…也没有"等。如：⑤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世说新语·伤逝》"都"句：王子猷、王子敬一起病重，而子敬先死。子猷问左右的人说："怎么一点消息也听不到？这个人已经死了。"说这话时毫不悲恸，就要车去奔丧，一声也没哭。）⑥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世说新语·言语》"都"句：当时天空清朗月色皎洁，连一丝云翳也没有，司马太傅赞叹以为风景佳丽。）

独 dú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是主语所代表的人单独施行的，相当于"单独""独自"等。如：①苏峻既至石头，百僚奔散，唯侍中锺雅独在帝侧。（《世说新语·方正》"独"句：苏峻到石头以后，百官逃奔四散，只有侍中锺雅单独呆在皇帝身边。）②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世说新语·方正》"独"句：阮宣子论说鬼神有或者没有，有人认为人死后有鬼，宣子独自认为没有〔鬼〕。）(二)用于谓语前，表示动作的施行仅限于主语，或接受动作的只限于宾语，相当于"只有"等。如：③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臧之。（《汉书·萧何传》"独"句：诸将领争相奔赴金银丝绸府库去瓜分财物，只有萧何先到咸阳把秦丞相御史掌管的法律条令图书珍藏起来。）④所患独吕产。（《史记·吕太后本纪》"独"句：〔我〕所担心的只有吕产。）(三)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专断、不合情理，相当于"独断地"等。如：⑤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文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独"句：所以偏听偏信就会产生奸佞之人，独断地用人就会形成混乱现象。）(四)用于反问句中，加强反问语气，可不译出。如：⑥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吕氏春秋·顺说》"独"句：我这里有个办法，使人纵有勇气，不敢刺杀；纵有力量，不敢攻打。您就无心于此吗？）⑦嗟乎！陵独何心？能不悲哉？（《文选·李少卿：答苏武书》"独"句：啊！我是什么心？能不悲哀吗？）

断 duà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的确定不疑，相当于"绝

对”。“断断”义同。如：①安危之理，断可识矣。（《文选·豪士赋序》“断”句：安全和危亡的缘由，是绝对可以察知的了。） ②若私约，则断断不可！（《聊斋志异·胭脂》“断”句：如果私自约会，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顿 dù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突然或程度之甚，相当于“顿然”“一下子”“完全”等。如：①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世说新语·容止》“顿”句：庾亮的风姿神韵，陶侃一见就改变了看法，谈笑饮宴了一整天，爱慕敬重之情顿然到来。） ②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南史·刘穆之列传》“顿”句：刘穆之考虑适宜的机会，随顺形势矫正时弊，不满十来天，风俗一下子改观。） ③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聊斋志异·促织》“顿”句：〔成生〕走来走去，四处张望，看见蟋蟀趴在墙上。仔细看它，短小，黑红色，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

俄 é　副词，用于动词或小句前，表示时间的短暂，相当于“不久”“不一会儿”“一会儿”“很快”等。“俄而”“俄顷”义同。“俄顷”还可用作宾语。如：①陛下昔在晋阳，粮不支五日，俄成大业。（《资治通鉴·后晋纪·高祖天福二年》“俄”句：陛下以前在晋阳，粮食不够五天吃的，不久也成就了大业。） ②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世说新语·雅量》“俄”句：谢公跟别人下围棋，不一会儿谢玄淮上的使者到来。谢公看完了信，默不作声，慢慢又转向棋局。） ③俄顷，月明辉室。（《聊斋志异·劳山道士》“俄”句：很快，月光照亮室内。） ④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世说新语·雅量》“俄”句：王文度立即想走，谢太傅说：“不能为保全性命忍受一会儿吗？）

而 ér　（一）连词。（A）连接偏正关系的两项，前项可为后项的条件、原因、时间、状态等，相当于“才”“就”等；或用于主、谓语之间，相当于“如果”等。如：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而”句：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就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呵！） ②臣犹吴牛，见月而喘。（《世说新语·言语》“而”句：我象吴地的水牛，看见月亮〔以为是太阳〕就喘气。） ③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言语》“而”句：秦朝任用商鞅，〔经过〕两代就灭亡了，难道是清谈导致了祸患吗？） ④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而”句：子产如果死了，谁接替他？） （B）连接并列关系的两项，后项与前项相一致，“而”相当于“然后”“就”“而又”等；后项与前项相背逆，“而”相当于“却”“可是”等。如：⑤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策四》“而”句：看见了兔子然后回过头来叫犬，还不算晚，丢失了羊然后修补羊圈，还不算迟。） ⑥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世说新语·方正》“而”句：

看见可以就进一步去做，看见困难就退下来不做，是自古以来的原则。）⑦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新书·过秦论》"而"句：〔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这四君子，都明智而又忠信，宽厚而又爱护他人，尊重贤者而又重视士人。）⑧张凭何以作母诔而不作父诔？（《世说新语·文学》"而"句：张凭为什么给母亲作诔却不给父亲作诔？）⑨伯仁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闇。（《世说新语·识鉴》"而"句：伯仁这个人志向远大可是才能低下，名声很大可是见识短浅。）（二）代词，用以指称对方，可作主语和名词修饰语，相当于"你""你的""你们的"等。如：⑩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左传·成公二年》"而"句：我是你嫁出去的妇人的父亲。）⑪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左传·定公十四年》"而"句：夫差！你忘记了越王杀死了你的父亲吗？）⑫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句：你们知道你们的心和左右手以及后背吗？）（三）语气助词，用于句末，相当于"吧""呵"等。如：⑬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而"句：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事政治的人危险呵！）

尔 ěr　代词。（一）用来指称对方，可作主语、宾语、名词修饰语，相当于"你""你们"等。如：①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尔"句：你舍不得那只羊，我爱惜那种礼。）②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世说新语·雅量》"尔"句：劝你饮一杯酒，自古以来什么时候有活到一万岁的天子？）③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论语·先进》"尔"句：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该怎么办呢？）④恐阿大非尔之友。（《世说新语·识鉴》"尔"句：恐怕阿大不是你的朋友。）（二）用来指代事物和情况等，可作宾语、修饰语、状语，相当于"这个""这样""这""如此"等。如：⑤夫子何善尔也？（《礼记·檀弓上》"尔"句：夫子为什么称赞这个呢？）⑥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尔时已被遇。（《世说新语·雅量》"尔"句：许侍中、顾司空都当了丞相的从事，这时已经受到赏识和重用。）

⑦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文选·诸葛孔明：出师表》"尔"句：在军队连遭失败时接受任用，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奉行命令，这样以来已经二十一年了。）⑧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尔"句：不是上天赋予人的心性如此不同，而是使心性变化的环境所致。）

（三）语缀。（A）用于某些副词、形容词后，相当于"…地"等。如：⑨夫子莞尔而笑。（《论语·阳货》"尔"句：夫子微微地笑着。）⑩铿尔，舍瑟而作。（《论语·先进》"尔"句：〔曾皙〕铿地一声，放下瑟站了起来。）（B）用于疑问句末，相当于"呢"；用于叙述句末，相当于"而已""罢了"等。如：⑪何讥尔？（《公羊传·隐公三年》"尔"句：〔《春秋》经〕为什么讥刺呢？）⑫

昭帝立时，年五岁尔。（《〈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尔”句：昭帝即位时，年龄才五岁而已。） ⑬军有七日之粮尔。（《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尔”句：军队只有够七天吃的粮食罢了。）

耳 ěr　助词，用于句末，或表示仅限于此的语气，相当于“而已”“罢了”等；或表示肯定语气，相当于“呀”“了”等。如：①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史记·项羽本纪》“耳”句：从这条道儿到我军营，不过二十里而已。） ②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世说新语·贤媛》“耳”句：我当年可以当作朋友的，只有嵇康、阮籍二人罢了。） ③诸将，易得耳。（《史记·淮阴侯列传》“耳”句：诸将领，容易得到呀。） ④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世说新语·规箴》“耳”句：乳娘来到后，东方朔也侍奉在帝侧，就对〔乳娘〕说：“你太傻了！皇帝哪里还能记得你哺乳〔他〕时的恩情呢?）

凡 fán　副词，用于动词短语、数量短语等前，表示对动作次数或人与事物的数量以及时间等的总体估计，相当于“总共”“共计”等；用于名词或名词短语前，表示事物的全部，相当于“所有”；用于句首（主语前），表示后面所述为经验、规律等，相当于“凡是”。“大凡”略同。相当于“凡是”“大致上”等。如：①凡杀三人，伤五人。（《汉书·文三王传》“凡”句：总共杀死三人，伤残五人。） ②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凡”句：因此先主就去拜谒诸葛亮，总共去了三次，才被接见。） ③凡九十二篇，分为十卷。（《齐民要术·序》“凡”句：共计九十二篇，分为十卷。） ④凡尔器用财贿，无置于许。（《左传·隐公十一年》“凡”句：所有你的东西钱财，都不要放在许国。） ⑤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世说新语·言语》“凡”句：长沙王亲近小人，疏远君子。所有在朝的人，都感到不安和害怕。） ⑥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左传·隐公九年》“凡”句：凡是下雨，从三天以后就称为霖。） ⑦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昌黎集·送孟东野序》“凡”句：凡是事物不公平就会发出鸣叫。） ⑧大凡乱国多，理国寡。（《柳宗元集·封建论》“大凡”句：大致上是混乱的国家多，得到治理的国家少。）

反 fǎ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与常理相反，相当于“反而”等。如：①卫蘧伯玉贤而灵公不用，弥子瑕不肖而反任之。（《孔子家语·困誓》“反”句：卫国蘧伯玉贤良可是卫灵公不任用，弥子瑕不贤却反而任用他。） ②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谢朕。”（《魏书·高崇传》“反”句：君王说：“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你反而向我道歉。”） ③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韩昌黎集·师说》“反”句：巫医、乐师、各类工匠这些人，是君子很看不起的，而今天君子的智慧反而赶不上他们，不是很奇怪

吗?)

方 fāng　（一）副词。（A）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正具有某种情势，相当于“正”等。如：①天下之势方病大瘇(zhǒng)。(《贾谊集·治安策》“方”句：天下的形势〔好比〕正患着严重的肿病。）②天下方乱，群雄虎争。(《世说新语·识鉴》“方”句：天下正处于混乱中，众多英雄象老虎一样地争斗着。）（B）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施行在不久之前，相当于“刚”“刚刚”等。如：③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世说新语·言语》“方”句：〔我〕刚问起国士，〔你〕却说到各位兄弟，因此责备你呀。）④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世说新语·文学》“方”句：〔使女〕刚刚要自己陈述理由，郑玄就发怒了，让人把她拖到泥泞中。）（C）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施行在某种情况或某件事情之后，相当于“才”等。如：⑤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世说新语·雅量》“方”句：〔谢益寿〕回过头来跟羊孚谈赏义理，王齐、王睹才知道羊孚有奇才。）⑥二人素善，遂十余日方还。(《世说新语·识鉴》“方”句：两人一向友善，所以十多天以后才回来。）（二）介词，介绍动作的时间，相当于“正当”“当”等。如：⑦方此时也，尧安在?(《韩非子·难一》“方”句：正当这个时候，尧在哪里?）⑧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文选·曹子建：求自试表》“方”句：当今天下统一，九州和平。）

非 fēi　副词。（一）用于主语和名词性谓语之间，表示主语代表的人或事物，不是谓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相当于“不是”。如：①伯仁曰：“今主非尧舜，何能无过?”(《世说新语·方正》“非”句：伯仁说：“现在的君主不是尧舜，怎么能没有过错?”）②故封建非圣人意也。(《柳宗元集·封建论》“非”句：所以实行分封制不是圣人的意志。）（二）用于形容词或动词前，表示对动作或性状的否定，相当于“不”。如：③豹呼妇视之，以为非妙。(《水经注·浊漳水》“非”句：西门豹叫出新娘子看了看，认为不好看。）④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非”句：不敢说一定会成功，愿意打一次胜仗来堵住进谗言者的嘴。）（三）用于句末，表示对句子所述内容的否定，共同构成反复问句，相当于“…不是”。如：⑤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庄子·盗跖》“非”句：这是那个鲁国的巧伪人孔丘不是呢?）⑥此天子非也?(《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兴平二年》“非”句：这是天子不是呢?）（四）“非”与“但”“独”“惟〔唯〕”连用，作“非但”“非独”“非惟〔唯〕”，相当于“不但”“不只”“不仅”等。如：⑦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三国志·魏书·刘廙传》“非”句：不但君主应当了解臣下，臣下也应当了解君主。）⑧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兴平二年》“非”句：这也是为我吕范打算，不只是为将军。）⑨臣之辛苦，非独蜀之

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文选·李令伯：陈情表》"非"句：我的辛苦，不只是蜀郡人士和两州长官亲眼所见并清楚知道，皇天后土实在也都看得清楚。）⑩非独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刘禹锡集·上杜司徒书》"非"句：不仅我知道，天下的人都知道。）⑪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非"句：服用五石散，不但能治病，也觉得精神爽朗。）⑫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不益，乃增吾忧也。（《世说新语·贤媛》"不"句：你做官，用公家的东西给我吃，不仅对我无益，反会增加我的忧虑。）

否 fǒu　副词。（一）表示对上文（叙述文字或对话）的否定或不同意，相当于"不这样""不是"等。如：①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左传·成公十八年》"否"句：诸大臣立我为君在今天，不这样也在今天。）②"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孟子·公孙丑上》"否"句："伯夷、伊尹与孔子相比，是一样的吗？"回答说："不是。"）

（二）用于句末、或用于第二分句，表示反复询问，相当于"没有""不"等。如：③文宗好文，尤重纶诗，尝问侍臣曰："卢纶集几卷？有弟子否？"（《旧唐书·卢简辞列传》"否"句：文宗喜好文学，尤其看重卢纶的诗，曾问左右大臣说："卢纶的诗集共几卷？〔卢纶〕有弟子没有？"）④公曰："然则夷吾将受鲁之政乎，其否也？"（《管子·大匡》"否"句：既然如此，那么管仲将接受鲁国的政事呢，还是不〔接受〕呢？）

夫 fú　（一）代词，用作主语或兼语等，相当于"他"；用于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前，相当于"那个""这个"等。如：①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夫"句：让他去学一学，他也就更知道怎样治理国家了。）②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左传·僖公三十年》"夫"句：如果没有那个人的力量，我到不了今天。）③夫执舆者为谁？（《论语·微子》"夫"句：那个驾车的人是谁？）

（二）助词，用于句首，后面词语带有议论性质，没有相当的词对译；用于句末，相当于"呵""吗"等。如：④夫假于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所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柳宗元集·封建论》"夫"句：利用外物的人一定会相争，争执不休，必定去找那些能判断是非曲直的人而听从他的意见。）⑤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贾谊集·无蓄》"夫"句：贮积粮食，是国家的命根子。）⑥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荀子·礼论》"夫"句：悲哀呵！恭敬呵！对待死去的人象对待活着的人一样，对待亡去的人象对待幸存的人一样。）⑦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左传·僖公十五年》"夫"句：先君如果听从史苏的卜卦，我不会到这个地步呵！）⑧吾歌，可夫？（《史记·孔子世家》"夫"句：我唱歌，可以〔表达我的用意〕吗？）

弗 fú　副词，一般用于及物动词（或助动词）前，且动词后一般不带宾

语，“弗”相当于“不…之 ”；有时，也用于动宾短语前，相当于“不”。如：

①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弗居也。（《论衡·刺孟》“弗”句：因为哥哥的房子是用不义之财换来的就不住它。） ②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史记·冯唐列传》“弗”句：上即使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也不能任用他们。） ③长安中诸公莫弗称之。（《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弗”句：长安的王公大臣没有谁不称赞他的。） ④帝幼而聪睿，六岁便能属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试，帝揽笔立成文。（《南史·梁本纪》“弗”句：皇帝小时候很聪明机智，六岁就能写文章，武帝不相信他，当面测试，皇帝拿起笔立刻写出了文章。）

伏 fú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下对上的恭敬语气，多见于奏章书信中。现代汉语中没有与之相应的词。如：①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诸葛亮集·与孙权书》“伏”句：希望您凭着同盟的情义，命令将帅向北进军，共同平定中原，一起匡辅汉室。） ②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文选·李令伯：陈情表》“伏”句：〔我〕想晋朝是用孝道治理天下的，凡是遗老，还都蒙受矜怜养育，何况我孤苦零丁，〔情况〕尤其严重呢？） ③臣伏自忖度，有方刚之力，不得备戍行（háng），致死命，况今已无事，思报国恩，独惟文章。（《柳河东集·献平淮夷雅表》“伏”句：我独自考虑，在有旺盛精力的时候，未能从军打仗，豁出性命，而现在已无战事，想要报答国家的恩德，只有〔写〕文章一法。）

甫 fǔ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起始，相当于“开始”。如：

①伤痍者甫起。（《汉书·匈奴传》“甫”句：受伤的人开始起来。）

（二）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动作的施行、情况的发生是在不久之前，相当于“刚”“刚刚”等。如： ②甫过山陵，义恭与柳元景、颜师伯等声乐酣饮，不舍昼夜。（《资治通鉴·宋纪·明帝泰始元年》“甫”句：国丧刚过，刘义恭就跟柳元景、颜师伯等欢歌狂饮，日夜不停。） ③然天下甫平，不欲劳人耳。（《新唐书·东夷传》“甫”句：然而天下刚刚安定，不愿烦劳别人。）

复 fù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再现或持续，相当于“再”“又”“还”等。如： ①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复”句：很久了我不再梦见周公！） ②终而复始，日月是也。（《孙子兵法·势篇》“复”句：结束了而又开始，太阳和月亮就是这样。） ③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世说新语·言语》“复”句：父亲您难道见过倾覆的鸟巢之下还有完整的鸟卵吗？） ④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临川先生文集·答司马谏议书》“复”句，所以只简略地给您回一封信，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

盖 gài　（一）助词，用于句首，其后词语带有议论性、概括性，没有相应的词语对译。如： ①盖五帝不相

乐，三王不相袭礼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新序·善谋》"盖"句：五帝的音乐各不相同，三王的礼仪互不相袭，不是故意使之相反，而是各自根据当时的需要。) ②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汉书·高帝纪》"盖"句：听说国君中没有人超过周文王，伯主中没有人超过齐桓公，〔他们两个人〕都是依靠贤德之人而成就了功名。)
(二)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对情况的推测性判断，相当于"大概"；或表示对原因的推测，相当于"大概因为"。如： ③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盖"句：由诸侯决定，大概经过十代很少有不失败的。) ④晋宋以还，得者盖寡。(《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盖"句：晋宋以来，得〔风人之旨〕的大概很少。) ⑤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左传·庄公十四年》"盖"句：现今诸侯侍奉我君远不及过去，大概因为言谈话语之间泄漏了机密。)

敢 gǎn　(一) 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有勇气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敢于""敢"等。如： ①主明臣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争正谏，如此者，国日安。(《新序·杂事》"敢"句：国君明智臣子贤良，左右侍臣大多忠诚，国君有失误，群臣敢于据理力争直言劝谏，象这样的话，国家一天比一天安定。) ②我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世说新语·德行》"敢"句：我有车，而让人不敢借用，还要车干什么？) (二)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下对上的谦敬语气，相当于"冒昧地""请"等。如： ③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敢"句：我见过的人很多，没有人能赶得上〔蔡泽〕，我不如他，我冒昧地把他推荐给您。) ④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敢"句：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

各 gè　副词，用于动词、数词前，表示动作成数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各自施行或各自具有的，相当于"各自"或"每…"。如： ①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世说新语·言语》"各"句：王武子、孙子荆各自论说自己家乡的土地美和人物美。) ②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世说新语·规箴》"各"句：京房说："明知〔一个人〕不忠却还要任用他，为什么呢？"回答说："亡国的君主各自都认为他的大臣贤良。哪里是明知不忠而任用呢？") ③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搜神记·韩凭妻》"各"句：又有雌鸳鸯和雄鸳鸯每种一只，经常栖息在树上。)

更 gēng　副词。(一) 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前后相继，相当于"相继"等。如： ①四国迭兴，更为伯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更"句：四国先后兴起，相继成为霸主。) (二) 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交替进行，相当于"轮流"等。如：②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史记·孔子世家》"更"句：

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恰逢晋国与楚国争强斗胜，〔两国〕轮流攻打陈国。）

（三）用于动词前，表示在原有动作以外，另施行一种动作，或动作涉及另一个对象，相当于“另”“另外”等。如： ③愿太傅更虑之。（《史记·刺客列传》“更”句：希望太傅另作考虑。） ④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史记·伍子胥列传》“更”句：秦国女子非常美丽，大王可以自己娶了她，另外给太子娶一个。） （四）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转折，相当于“反而”。如： ⑤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战国策·秦策》“更”句：这就使商君反过来成为国君，而大王反而成了臣子。）

更 gèng　　副词。（一）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程度比原来更甚，相当于“更加”“越发”等。如： ①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史记·孝武本纪》“更”句：寻找蓬莱安期生没找到，东海一带燕国、齐国的怪诞荒唐的术士们就多仿效于此，更加托神弄鬼了。） ②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世说新语·言语》“更”句：王长史对刘真长说：“你更加长进了。”回答说：“这好比天自觉很高罢了。”） ③李既服天衣，貌更殊异。（《神仙拾遗·许老翁》“更”句：李氏穿上天衣之后，形貌越发奇异。） （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同一动作的重复施行，或不同动作的积累，相当于“再”“加之”等。如： ④还家可速烧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烧其次；若又不活，更烧第三符。（《广异记·赵州参军妻》“更”句：回家可以赶快烧第一符，等象人走十里路那么长的时间，没有活，再烧第二符；如果还没有活，再烧第三符。） ⑤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更”句：在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侮辱我时，你不劝止，这是罪状之二；加之〔你〕喝醉了酒朝我身上小便，你多么狠心呀！这是罪状之三了。） ⑥袁彦道有二妹，一适殷渊源，一适谢仁祖，语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世说新语·任诞》“更”句：袁彦道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了殷渊源，一个嫁给了谢仁祖，〔袁〕对桓宣武说：“恨不能再有一个妹妹许配给你。”）

共 gòng　　（一）副词。（A）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两个或数个主体共同施行，相当于“共同”“互相”“一起”等。如： ①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国语·越语上》“共”句：凡是我的父兄亲友及国内百姓，有能帮助我谋划使吴国撤军的，我跟他共同主持越国的政事。） ②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共”句：如今两虎相互搏斗，势必不能都存活。） ③越王为人长颈鸟喙（huì），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共”句：越王这个人长脖子鸟嘴，可以跟他一起经受患难，不能跟他一起分享快乐，您为什

么不离开〔他〕?） (B) 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主语代表的人的全部加以施行，相当于“都”。如： ④少事长，贱事贵，共帅时。（《礼记·内则》“共”句：年少的事奉年长的，卑贱的事奉尊贵的，〔大家〕都遵循这个原则。） ⑤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史记·苏秦列传》“共”句：苏秦受反间计而死，天下的人都讥笑他。） ⑥诸名士共至洛水戏。（《世说新语·言语》“共”句：诸位名人学士都到洛水游赏。） (C) 用于数量短语前，表示对事物数量的总计，相当于“总共”。如： ⑦北龙头岭，共五里。（《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共”句：到北龙头岭，总共五里。）（二）介词，介绍动作涉及的方面，相当于“跟”“同”。如： ⑧既知不能逾己，稍共诸生叙其短长。（《世说新语·文学》“共”句：〔服虔〕知道〔崔烈〕超不过自己以后，稍稍跟学生谈论些他的长处和短处。） ⑨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文心雕龙·史传》“共”句：要使一代的体制，同日月一样长期保存下去。）

苟 gǒu （一）副词。 (A) 用于动词前，表示施行某种动作时态度不够严肃，马虎从事，或要求不高，得过且过，相当于“马马虎虎”“苟且”等。如： ①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苟”句：所以范蠡三次迁移位子，还在天下成就了功名，〔是因为他〕不是马马虎虎地离开原位了事。） ②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苟”句：我本是一个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田，只求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不想在诸侯之间闻名显达。） ③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陈亮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苟”句：一日的苟且偷安，会成为几百年的祸难。） (B) 用于动词前，表示希望，相当于“希望”等。如： ④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左传·襄公十八年》“苟”句：希望得胜有功，不给神灵丢丑。） ⑤是犹弇其目而祝于丛社也：“苟使我皆视！”岂不谬哉？（《墨子·耕柱》“苟”句：这好比蒙着自己的眼睛向社神祈祷：“希望让我都看见！”岂不是很荒唐的吗？）

（二）连词，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假定，相当于“如果”等；用于条件复句的前一分句，引出条件，相当于“只要”等。如： ⑥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左传·成公二年》“苟”句：如果有危险的情况，我总是下去推战车。） ⑦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世说新语·文学》“苟”句：如果符合天下人意，也可以不说一个字而被封官，又何必凭靠一个字？） ⑧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苟”句：所以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富强，不必沿袭原有的制度；只要可以有利于百姓，不必遵循旧有的礼仪。）

姑 gū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施行带有短期性或尝试性，相当于“姑且”“暂且”等。如： ①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隐公元年》“姑”句：多干不义之事就一

定会自己倒台，你姑且等待着吧。） ②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战国策·齐策》“姑”句：希望您顾念先王的宗庙，姑且回国管理百姓吧！） ③银亦细事，汝姑出。（《聊斋志异·王者》“姑”句：银钱也不过是小事，你们暂且出去吧。）

故 gù （一）副词。（A）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是有意识地、特地施行的，相当于“特地”“故意”等。如：①成愍而与之，乃故往谯，更从佗求。（《后汉书·华佗传》“故”句：李成同情他并把药给了他，然后特地去谯县，又从华佗那儿要了些。） ②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世说新语·政事》“故”句：王濛对何骠骑说：“我今天特地跟林公来看你，希望你放开日常事务，〔跟我们一起〕应对玄言。） ③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世说新语·政事》“故”句：吴郡里的强族轻视贺太傅，就在府门上写道：“会稽鸡，不能啼。”贺太傅听到后，故意外出行走。） （B）用于谓语前，表示本来如此，相当于“本来”等；表示情况已属过去，相当于“原先”等。如：④天命修短，故非所计。（《世说新语·言语》“故”句：天命的长短，本来不是人所能预料的。）⑤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史记·刺客列传》“故”句：豫让是晋国人，原先曾经事奉范氏和中行氏。） （C）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动作依然进行或情况依然存在，相当于“依然”“依旧”。如：⑥江淮间居人为儿时，以龟枝床，至后老死，家人移床，而龟故生。（《史记·龟策列传》“故”句：在江淮间居住的人还在少儿时期，就用龟支在床腿下，到后来年老死去，家里的人挪动床时发现，龟依然活着。）

⑦庆之既通贵，乡里老旧素轻庆之者，后见皆膝行而前。庆之叹曰：“故是昔时沈公。”（《南史·沈庆之传》“故”句：沈庆之富贵通达以后，家乡的旧相识中平素轻侮过庆之的人，后来见庆之都跪着上前。庆之感叹地说：“〔我〕依旧是过去的沈公。”） （D）用于谓语前，表示对事物、情况的确切推断，或对真实性的肯定，相当于“必定”“确实”等。如：⑧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之。（《世说新语·德行》“故”句：你从东部来，必定有竹席子，可以拿一张给我。） ⑨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韩非子·解老》“故”句：人们的迷惑，其时间确实已经很久了。） ⑩谢公熟视殷，曰：“阿巢故似镇西。”（《世说新语·轻诋》“故”句：谢公仔细看了殷颉，说：“阿巢确实很象谢镇西。”） （二）连词，用于因果复句的后一分句解释原因，相当于“所以”等。如：⑪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故”句：他们七个人常聚会在竹林中，任意纵酒为乐，所以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⑫岂有胜公人而行有非者？故一无所问。（《世说新语·规箴》“故”句：难道有比你强的人却去做坏事吗？所以我一点也不加过问。）

固 gù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坚定；或表示情况的确凿无误和本已如此，相当于"坚决""确实""本来"等。如：①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曹操集·让县自明本志令》"固"句：在此之前朝廷施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辞让不接受。）②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嘉佑集·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固"句：您名扬天下，虽然没见到您的文章，可确实已经知道您欧阳先生的名字了。）③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孟子·梁惠王上》"固"为：我本来就知道君王是不忍心。）

顾 gù　副词。（一）多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引出与前相反的情况，相当于"反而"。如：①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汉书·霍光传》"顾"句：皇后是上官安的亲生女儿，霍光只是她的外祖父，却反而独揽朝政。）②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史记·燕世家》"顾"句：子之朝南居王位，燕王哙年老，不主持国政，反而做臣子。）（二）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之首，表示限制范围，并表示轻度的转折，相当于"只是"等。如：③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史记·淮阴侯列传》"顾"句：这也记在兵法上，只是你们没有发现罢了。）④于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史记·刺客列传》"顾"句：我每想到这事，常感到痛入骨髓，只是不知计策从哪里产生罢了。）

果 guǒ　（一）副词。（A）用于谓语前，表示事情的结果与预期的相一致，相当于"果然"；表示事情已有结果，相当于"终于"。如：①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果"句：襄子说："这一定是豫让。"让人去了解，果然是豫让。）②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世说新语·识鉴》"果"句：王含不听，就一起投靠了王舒，王舒果然把王含父子投入江中。）③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果"句：晋侯在外十九年了，终于得到了晋国。）（B）用于动词前，表示询问事情的结果，相当于"果真""究竟"。如：④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果"句：我听说古时候夔有一只脚，其果真有一只脚吗？）⑤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苏轼集·教战守策》"果"句：当今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二）连词，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假设，相当于"如果"等。如：⑥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庸》"果"句：如果真能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即使愚笨一定会变得聪明，即使软弱也一定会变得坚强。）⑦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史记·赵世家》"果"句：因此圣人如果可以有利于国家，就改变方法；如果可以有利于政事，就不用旧礼。）

过 guò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动作或情状超过适当的程度或正确的范围，相当于"过于""过分

地”“错误地”等。如： ①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世说新语·夙惠》“过”句：陛下白天过于冷，夜里过于热，恐怕不是养生的良法。） ②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世说新语·德行》“过”句：有一个老翁犯了法，谢奕用醇酒惩罚他，以至于过分地醉了还不停止。） ③芮也，使寡人过杀我社稷之镇。（《国语·晋语三》“过”句：冀芮使得我错误地杀掉了我们国家的重臣。）

好 hào　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施事者主观上爱好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喜欢”“爱好”等。如： ①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史记·周本纪》“好”句：褒姒不喜欢笑，周幽王想让她笑想尽了千万种方法。） ②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反。（《世说新语·规箴》“好”句：孙休喜欢射野鸡，到时候，就早去晚归。）

合 hé　（一）副词。（A）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两个或更多施事者共同进行，相当于“共同”“一起”等。“合共”义同。如： ①会康艺全与右军兵马使尚国忠引兵至，合击之，杀韶、玄明及其党，死者狼籍。（《资治通鉴·唐纪·穆宗长庆四年》“合”句：恰好大将军康艺全和右军兵马使（官名）尚国忠带兵赶到，共同进攻张韶等，杀了张韶、苏玄明和他们的党羽，死亡的人横七竖八躺倒在地。） ②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世说新语·雅量》“合”句：谢益寿跟王齐、王睹寒暄了几句后，回过头来与羊孚谈话游赏，王齐、王睹才感到羊孚与众不同，就一起谈起话来。） （B）用于数量短词前，相当于“共计”“总共”等。如： ③和平元年，重增封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后汉书·梁冀传》“合”句：后汉桓帝和平元年，又加封梁冀一万户，加上先前所承继下来的封地共计三万户。） ④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合”句：三郡乌丸贵族趁天下混乱之机，攻取了幽州，侵夺汉民总共十多万户。） （二）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示理应如此，相当于“应当”等。如： ⑤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朱子文集·答孙敬甫》“合”句：南康印本的《论语》《孟子》，是后来校定的本子，然而近来读它，〔觉得〕还有应当订正的地方。）

何 hé　疑问代词，可以代人、事、物、时间、处所等，也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谓语、动词宾语、介词宾语、名词修饰语、状语，相当于“什么”“谁”“什么时候”“哪里”“为什么”“怎么”“什么样的”“哪一个”等。如： ①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汉书·韩信传》“何”句：现在大王确实能改变原来的做法，任用天下武勇之士，谁不被诛？用天下城邑封赏功臣，谁不归服？用正义之师追击总想回东边故土的士兵，谁不逃散？） ②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yù）踊者。故对曰：“踊贵屦贱。”

(《左传·昭公三年》"何"句：公问："什么贵什么贱？"这时景公频繁用刑法，有卖假脚的人。所以回答说："假脚贵鞋贱。") ③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谷梁传·隐公元年》"何"句：仲子是谁？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 ④僧孺初读《孝经》，问授者曰："此书何所述？"曰："论忠、孝二事。"(《南史·王僧孺传》"何"句：王僧孺刚读《孝经》，向讲授的人说："这部书所说的是什么？"回答说："论述忠、孝两件事。") ⑤若不立王，百姓何归？(《辽史·耶律淳传》"何"句：如不立王，百姓归服谁？) ⑥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公羊传·庄公十三年》"何"句：管仲说："那么你打算要什么？"曹刿说："想要回汶阳的土地。") ⑦湖州刺史高澧性凶恶，尝召州吏议曰："吾欲尽杀百姓，可乎？"吏曰："如此，租赋何从出？"(《资治通鉴·后梁纪·太祖开平三年》"何"句：湖州刺史高澧性情凶恶，曾召集州内官吏议论说："我想杀尽老百姓，可以吗？"官吏们说："象这样，租子赋税由谁来交纳？") ⑧二野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人云粟，一人云豆。(《南齐书·傅琰传》"何"句：两个村野老头儿争夺鸡，琰分别问他们："用什么喂的鸡？"一人说用米，一人说用豆。) ⑨〔齐桓公〕曰："是为何墟？"(《新序·杂事》"何"句：〔齐桓公〕问："这是谁的墟落？"村民回答说："这是郭氏的墟落。") ⑩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圣人。"(《论衡·知实》"何"句：陈贾问孟子说："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回答说："是圣人。") ⑪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论语·先进》"何"句：问："先生为什么耻笑子路呢？"回答说："用礼治理国家。子路言词不谦让，因此耻笑他。")

⑫寡人将去斯而之何？(《列子·力命》"何"句：我将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 ⑬父老何自为郎？(《史记·冯唐列传》"何"句：老人家从什么时候起做了郎官的？) ⑭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宋史·文天祥传》"何"句：您纠集万余名乌合之众前往打仗，这同驱赶一群羊去同猛虎搏斗怎么区别呢？) ⑮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yuè)。"周曰："何乐？谓乐毅邪？"庾曰："不尔，乐令耳。"(《世说新语·轻诋》"何"句：庾元规对周伯仁说："大家都把你比做乐。"周伯仁说："哪一个乐？是乐毅吗？"庾元规说："不是这样，是乐令而已。")

曷 hé　代词，用来询问或反诘，可问人、事物、时间、处所、原因等，可作宾语、状语、名词修饰语等，相当于"谁""什么""哪里""什么时候"等。如：①藐(miǎo)藐孤女，曷依曷恃？(《陶渊明集·祭程氏妹文》"曷"句：幼小的孤女，依仗谁指靠谁呢？) ②然则曷祭？(《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曷"句：那么祭什么？)

③恐陈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结舌，祥瑞亦曷由来哉？(《晋书·段灼传》"曷"句：害怕面陈国事的大臣知道刚正之言不被采纳，都闭口不再

说话，祥瑞从哪里来呢？） ④公曷为出若言？（《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曷”句：您为什么说出这种话呢？） ⑤吾子其曷归？（《左传·昭公元年》“曷”句：您将什么时候回去？）

盍〔阖、盖〕hé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询问或反诘，相当于“为什么不”或“为什么”。如：①盍各言尔志？（《论语·公冶长》“盍”句：为什么不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 ②夫子阖行邪？（《庄子·天地》“阖”句：您为什么不走开呢？） ③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礼记·檀弓上》“盖”句：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志向说给公呢？） ④盍不出从乎？（《管子·戒》“盍”句：为什么不跟随着去呢？） ⑤阖不起为寡人寿乎？（《管子·小称》“阖”句：为什么不起来为我祝寿呢？）

恒 héng　副词。（一）用于谓语前，表示动作或情状的长期性和一贯性，相当于“永远”“总是”等。如：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恒”句：爱人的人，人永远爱他；尊敬人的人，人永远尊敬他。） ②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核。（《世说新语·俭啬》“恒”句：王戎有好李树，卖李子时，怕别人得到他的好树种，总是把李子的核剔去。） （二）用于谓语前，表示动作的经常性和频繁性，相当于“常常”“经常”等。如：③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柳河东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恒”句：我过去听说庸地南边，常常下雨很少出太阳。） ④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世说新语·文学》“恒”句：康僧渊刚过江时，没有知道他的人，〔他〕经常到街市上闲逛。）

横 héng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与“纵”“竖”等相对，表示动作是横着施行的，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横”。如：①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隋书·崔仲方传》“横”句：如果敌人一定认为上游有军队，因而派他的精兵去增援的话，下游的诸将领就要选择适当的地点横渡过江。） （二）用于动词前，表示行为方式是漫无边际、施及四处的，相当于“四处”“漫”等。如：②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上》“横”句：尧的时候，天下还不安定，洪水四处奔流，各处泛滥成灾。） ③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横”句：〔洞庭湖〕波涛起伏，波澜壮阔，漫无边际。） （三）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是肆意地、意外地进行的，相当于“肆意”“意外地”“暴”等。如：④业缘私横求，恩已过厚。（《汉书·王嘉传》“横”句：郑业凭着私情肆意贪求，所受恩惠已过于丰厚。） ⑤正恐更有大罪横至耳。（《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天监三年》“横”句：只怕又有大罪名意外地降到头上。） ⑥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世说新语·雅量》“横”句：你的才能比不上弟弟，却暴得大名。）

后 hòu　（一）副词，用于短语或小句前，表示事情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相当于“以后”“后来”等。如：①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史记·

伍子胥列传》"后"句：现在大王不灭掉越国，以后必定后悔。） ②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世说新语·识鉴》"后"句：这些人当时都没有什么名气，后来都得到了重用。）
（二）介词，用于名词或表示时间的数量短语后，介绍动作施行的时间，相当于"在…之后""在…以后"等。如：
③齐王闻之，恐后天下得魏，以事属犀首。（《战国策·魏策一》"后"句：齐王听说这一情况，恐怕在各国之后结交魏国，就把结交魏国之事嘱托给犀首。） ④后三岁，闽越复兴兵击南越。（《汉书·严助传》"后"句：在三年以后，闽越又举兵攻打南越。）

乎 hū （一）语气词，用于句末，表示疑问、反诘、测度、感叹等，相当于"吗""吧""呀"等。如： ①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战国策·赵策四》"乎"句：男子汉也那么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 ②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乎"句：学习知识又时时复习它，不也很快乐吗？） ③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韩昌黎集·师说》"乎"句：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愚人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在于此吧！） ④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乎"句：曾参呀！我的学说用一个基本观点贯穿它。）
（二）语缀，用于形容词、副词后，表示情态，相当于"…的样子"，可不译出。如： ⑤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乎"句：他那礼仪文彩光辉灿烂！） ⑥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乎"句：洁白得无以复加了！） （三）介词，介绍动作的处所、对象、施动者，或介绍形容词的比较对象，相当于"到" "向""被""比"等。如： ⑦归父使乎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乎"句：归父出使到晋国。） ⑧或问乎曾西。（《孟子·公孙丑上》"乎"句：有人向曾西询问。） ⑨万尝与庄公战，获乎庄公。（《公羊传·庄公十二年》"乎"句：万曾经跟庄公交战，被庄公俘获。） ⑩异大乎灾也。（《公羊传·定公元年》"乎"句：记作"异"比记作"灾"要严重。）

忽 hū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情况的出现时间短暂或出乎意料，相当于"一下""忽然""突然"等。如： ①伯仁曰："君何所欣悦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世说新语·言语》"忽"句：伯仁说："你有什么高兴的事而一下子那么肥？"庾公说："你又有什么忧伤的事而一下子那么瘦？"） ②忽逢桃花林。（《靖节先生集·桃花源记》"忽"句：忽然遇见一片桃花林。）
③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jī）。（《世说新语·雅量》"忽"句：王子猷、子敬曾共同坐在一个房子里，房顶突然失火。子猷赶忙逃跑，来不及拿走木鞋。）

胡 hú 代词，用来询问，可以问人、事物、原因、情状等，可作宾语、状语、名词修饰语，偶而也有作主语的，相当于"谁""什么""为什么"等。如： ①孔子往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孔子家语·辨物》"胡"

句：孔子去看麟，说："麟呵，为谁来呢？"）　②曰："君胡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kòu），鷇弱，故反之。"（《说苑·贵德》"胡"句：〔晏子问〕说："你干什么呢？"景公说："我掏幼鸟玩儿，幼鸟太弱，所以放了回去。"）　③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汉书·食货志》"胡"句：如果不幸发生了方圆两三千里的干旱，国家用什么去救济灾民？边境突然发生紧急情况，国家用什么提供军队的粮饷？）　④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胡"句：谁是君夫人？我为什么不知道呢？）　⑤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新序·杂事》"胡"句：魏文侯出游时，看见一个路人反穿着皮衣背柴草。文侯问："为什么反穿皮衣背柴草？"回答说："我舍不得损坏皮衣上的毛。"）　⑥相国胡大罪，陛下系之暴也？（《汉书·萧何曹参传》"胡"句：相国犯了什么大罪，陛下这么重地惩办他？）　⑦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曹操集·祀故太尉桥玄文》"胡"句：不是非常亲近的友好，谁肯说出这些话呢？）

还 huán　　副词。　（一）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转折，相当于"反而"。如：　①而容纳其策，以为谋主。今臣骨肉兄弟还为雠敌，交锋接刃，构难滋甚。（《后汉书·袁绍传》"还"句：如果采纳了日磾的计策，把他作为谋主，就会使我们骨肉兄弟反而变为仇敌，锋刃相接，造成的祸患就越发严重。）　（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回头或反身进行某一动作，相当于"回过头来"等。如：　②是时，杨喜为郎骑，追羽，羽还叱之，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汉书·项籍传》"还"句：这时，杨喜作郎骑追赶项羽，项羽回过头来大声呵叱他，杨喜连人带马都惊恐万分，倒退了好几里路。）

会 huì　　副词，用于小句或动词前，相当于"正遇上""适逢"等。"会当"连用，相当于"总应"等。如：　①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史记·陈涉世家》"会"句：正遇上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期。）　②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文山先生全集·指南录后序》"会"句：大小官员集会在左丞相府内，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适逢双方使者车马往来频繁，元军方面邀约执政的人前往相见。）　③人生在世，会当有业。（《颜氏家训·勉学》"会"句：人生在世，总应有自己的专长。）

或 huò　　（一）代词。　（A）作句或小句的主语，泛指某人某物，或指它前面词语所表示的人或物，相当于"有人""有的"。如：　①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左传·昭公八年》"或"句：有人报告给子旗，子旗不相信。）　②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世说新语·言语》"或"句：高坐道人不说汉语，有人问这是什么原因。）　③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汉书·宣帝纪》"或"句：国中四十九个郡发生地震，有的郡山崩

水涌。）（B）分别作两个小句的主语，相当于“有人…有人”“有的…有的…”“有时…有时…”。如：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汉书·司马迁传》“或”句：人总有一死，有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人死得比鸿毛还轻。）⑤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惜抱轩文集·登泰山记》“或”句：回视日观峰以西诸山峰，有的得阳光照射，有的没有阳光照射。）⑥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世说新语·自新》“或”句：周处当即把老虎刺死，又进到水里去杀蛟龙，蛟龙有时浮上来，有时沉下去，往前游了几十里，周处一直跟它在一起。）（二）副词。（A）用于谓语前，表示情况的不确定或不经常，相当于“大概”“或许”“有时”等。如：⑦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子张》“或”句：能找到门径的人大概已很少了。）⑧刃之与利，或如来说。（《梁书·范缜传》“或”句：刀刃与锋利的关系，或许象你所说。）⑨或取良人，悉为奴婢。（《后汉书·梁冀传》“或”句：有时抓去一些好人，全部做为奴婢。）（B）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重复，相当于“又”。如：⑩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史记·魏公子列传》“或”句：事情有不可忘记的，又有不可不忘记的。）（C）用于否定句的动词前，相当于“稍微”等。如：⑪残贼公行，莫之或止。（《贾谊集·论积贮疏》“或”句：残害民众之事公然进行，没有人稍微制止一下。）

几 jī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接近某种情况、某种数量、某种年岁等，相当于“几乎”“差一点”“差不多”“将近”等。如：①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贾谊集·治安策》“几”句：一条小腿大得几乎象腰，一根指头大得几乎象大腿。）②于是贾充语妃曰：“卫瓘老奴，几败汝家！”（《〈世说新语校笺·规箴〉引〈晋阳秋〉》“几”句：在这时贾充对贾妃说：“卫瓘这个老奴才，差一点毁了你的家！”）③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世说新语·赏誉》“几”句：殷渊源在墓地守墓差不多十年。）④简性温雅有父风，年二十余，涛不知也，简叹曰：“吾年几三十，而不为家公所知。”（《〈世说新语校笺·言语〉引〈晋书·山简传〉》“几”句：山简性情温文尔雅，年纪二十多了，山涛还不知道，简叹息说：“我的年龄将近三十岁了，却不被家父所知。”）

疾 jí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快速，相当于“快”“迅速”。如：①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战国策·赵策四》“疾”句：老臣的脚有病，不能快跑，不得谒见很久了。）②战胜勿追，不胜疾归。（《吴子·应变》“疾”句：战胜了不要追赶〔敌人〕，不能获胜就迅速撤退。）

即 jí　（一）副词。（A）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快速及时，相当于“立即”“当即”“即刻”等；有时表示在前一件事发生后，紧接着施行某种动作行为，相当于“就”。如：

①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世说新语·排调》"即"句：桓公拿过药草来问谢公："这药又叫小草，为什么一个东西而有两个名称？"谢公没有立即回答。） ②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世说新语·方正》"即"句：王恭坐在那里，不敢当即说出〔请江卢奴当长史的事〕，很久以后才提到这件事。） ③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世说新语·黜免》"即"句：小猿的妈妈沿着河岸悲哀地鸣叫，走了一百多里仍不离去，于是跳上了船，一跳上去就断了气。） （B）副词，用于主、谓语之间，表示判断，带有系词性质，相当于"就是"。如： ④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汉书·杜延年传》"即"句：担任少府官职的徐仁，就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 ⑤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也。（《洛阳伽蓝记·法云寺》"即"句：崔延伯出师到达的洛阳城以西的张方桥，就是汉朝时的夕阳亭。） （二）介词，介绍动作的时间、地点、条件等，相当于"当""就着""顺着"等。如： ⑥项羽即日因留沛公与饮。（《史记·项羽本纪》"即"句：项羽当天挽留沛公一起饮宴。） ⑦吴王即山铸钱。（《史记·吴王濞列传》"即"句：吴王就着山铸造钱币。） ⑧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文心雕龙·物色》"即"句：没有人不沿用前人的方法并借用其技巧，顺着前人的笔势使自己的作品奇丽。） （三）连词，用于假设复句和让步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如果""即使"等。如： ⑨即有急，奈何？（《史记·李将军列传》"即"句：如果有紧急情况，怎么办？） ⑩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汉书·萧何传》"即"句：您如果去世以后，谁能代替您呢？） ⑪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受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史记·信陵君列传》"即"句：公子即使对上了兵符，晋鄙不把军队交给公子又去请示魏王，事情就一定危险了。）

极 jí　副词，用于动词或数词前，表示程度之甚，相当于"深""非常"等。如： ①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史记·燕召公世家》"极"句：我深知燕国国小力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报仇。） ②入其中者，必极燥之谷，稍润则碎断也。（《天工开物·粹精·攻稻》"极"句：放进石磨中去的，必须是非常干燥的稻谷，稍有点潮湿就容易碾成碎末。）

几 jǐ　表疑数词，可作谓语、宾语、定语等，用来询问年龄、数量、时间，相当于"多大""几种""几""多少""几个"等。如： ①〔弁〕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南史·王弘传》"几"句：弁问："你年龄多大了？"融说："五十岁，早就超过了它的一半。"） ②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世说新语·贤媛》"几"句：妻子说："我所缺的只是容貌而已。然而士应有百种德行，你有几种？"） ③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几"句：君问："车上有几匹

马？"庆用鞭数完后，举起手来回答说："六匹马。"）

既 jì　副词。（一）用于谓语前，表示动作已经完成或状态已经存在，相当于"已经""…以后"。如：①既克，公问其故。（《左传·庄公十年》"既"句：已经打了胜仗，鲁庄公问他打胜仗的原因。）②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世说新语·言语》"既"句：到了石头以后，王长史、刘尹一同拜访褚公。）（二）表示在一件事情后不久又施行某一种行为，相当于"不久"等。"既而"义同。如：③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左传·成公二年》"既"句：新筑邑大夫仲叔于奚，救了卫大夫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免除了祸殃。不久，卫国赏给仲叔于奚城邑。）④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国语·周语》"既"句：不久，荣公作了周朝的卿士，诸侯不再进贡祭祀用品。）⑤遂置姜氏于城颍…既而悔之。（《左传·隐公元年》"既"句：于是把姜氏安置在城颍…不久就后悔了。）⑥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世说新语·德行》"既"句：刘道真曾经是个徒隶，扶风王骏用五百匹布把他赎了出来，不久任用他为从事中郎。）（三）与另一"既"或"且""又""亦"等前后照应，所连两项为并列关系，相当于"又…又""既…又"。如：⑦既雕既琢，还归其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既"句：又雕又琢，还归他本来面目。）⑧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孙子·谋攻》"既"句：军队既迷惑又迟疑，各国诸侯交相进攻的祸患就到来了。）

⑨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世说新语·识鉴》"既"句：当时在坐的人既叹赏褚太傅的善于识人，又高兴孟嘉的被赏识。）⑩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世说新语·雅量》"既"句：王看完，既不笑，又不说好坏。）

加 jiā　副词。（一）用于形容词前，表示程度的增升，相当于"更加"等。如：①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荀子·劝学》"加"句：登到高处招手，胳膊并没有更加长些，但远处的人也能看得见；顺着风呼喊，声音并没有更加强些，但远处的人也能听得清。）②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临川先生文集·游褒禅山记》"加"句：我和同游的四人举着火把进洞去，进得越深，前进就越难，而看见的景致就越奇丽。……大凡洞的更深处，能到达的人就更加少些。）（二）用于动词前，相当于"加以"。如：③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霑（zhān）接，人人有说色。（《世说新语·政事》"加"句：王导做了杨州的地方长官，宾客几百名，全都加以接济款待，人人面带喜悦。）④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世说新语·政事》"加"句：桓公非常忧虑他〔办事〕的迟缓，常常加以劝诫勉励。）

（三）用于复句后一分句之首，表示更进一层，相当于"加之""加上"。

如：⑤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众，立功于外，岂宜复屈小职，知军中细事乎？（《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兴平二年》“加”句：你已经是军中将佐，加之手下已经有很多人，在外立有战功，难道应该再屈就卑职，去过问军中的琐事吗？）⑥以魏武之暴戾强伉（kàng），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加”句：凭着曹操那样的凶暴跋扈，加上对国家有大功劳，他包藏着目无国君的祸心已经很久了。）

兼 jiān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加倍地施行，相当于“加倍”等。如：①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兼”句：不要让豪强隐匿钱物，而让无权无势的百姓加倍交纳赋税。）②昼夜兼行，逾旬于成都。（《宣室志·淮南军卒》“兼”句：昼夜不停加倍赶路，过了一旬到达成都。）（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涉及受事者的全部，相当于“全部”“全都”等。如：③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兼”句：秦王全部领有天下，立名称为皇帝。）④游学徐土，兼通数经。（《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兼”句：〔华佗〕游学徐州一带，几种经书全都通晓。）⑤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世说新语·德行》“兼”句：乡民说：“〔大家〕各自都饥饿困乏，因你贤良，大家想共同接济你罢了，恐怕不能对所有的人全都加以救济。”）

见 jiàn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被动，相当于“被”；有时在动词后用“于”引进施事，或不用“于”；有时在动词前用“为”引进施事。如：①武等正直，而见陷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见”句：窦武等正直，却被陷害。）②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韩昌黎集·进学解》“见”句：然而办公事不被人信任，办私事不被朋友帮助。）③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世说新语·赏誉》“见”句：这几位士子，只有瞻居于首位，嵇绍、山简也被当世器重。）④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文选·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见”句：懒散与傲慢相互助长，而被同辈宽容。）（二）用于动词前，指代动作的受事，受事多为第一人称，也有第三人称，相当于“我”或“他”等。如：⑤我相遇甚厚，何以见负？（《晋书·罗企生传》“见”句：我待你很宽厚，〔你〕为什么背叛我？）⑥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世说新语·排调》“见”句：何次道说：“你今天为什么忽然推崇起我来了？”）⑦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世说新语·言语》“见”句：先公以礼待我，所以我能以礼决定进退；您以法限制我，我畏惧法令而到任罢了。）⑧群小叩头曰：“若府君复不见治，便无所诉。”（《世说新语·规箴》“见”句：百姓们〔向贺司空〕叩头说：“如果您再不管教他〔张闿〕，〔我们〕就没处申诉了。”）

渐 jiàn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动作的逐渐施行和情况的逐渐变化，相当于"渐渐""逐渐""日渐"等。如：①顾长康噉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世说新语·排调》"渐"句：顾长康吃甘蔗，先吃甘蔗稍儿，别人问这样吃的原因，他说："渐渐到达最佳境界。"）②先是峰顶雾滴如雨，至此渐开，景亦渐奇。（《徐霞客游记·游嵩山日记》"渐"句：原先是峰顶的雾凝成水滴象雨一样掉落下来，到此时云雾逐渐散开，景致逐渐奇丽。）③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世说新语·识鉴》"渐"句：这时盗贼到处结伙行凶，郡国大多因为没有准备而不能制服，〔盗贼〕就日渐嚣张。）

将 jiāng　（一）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或情况将要施行或出现，相当于"即将"；表示主观愿望，相当于"打算"；表示对事情的推断，相当于"必将"；用于数量短语（或数词）前，表示接近某种数量，相当于"将近"。如：①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将"句：他这个人，奋斗起来忘记了吃饭，欢乐起来忘记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即将来临罢了。）②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将"句：孔子说："好吧，我打算去做官了。"）③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史记·吴子胥列传》"将"句：如果不这样，以后必将后悔莫及。）④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孟子·滕文公上》"将"句：如今滕国用国土的长边补到短边上，每边长度将近五十里呢。）（二）连词，用于抉择问句的后一分句前，相当于"还是"。如：⑤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汉书·龚遂传》"将"句：现在您想让我去战胜他们呢，还是去安抚他们？）⑥李绛或久不谏，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也？"（《资治通鉴·唐纪·宪宗元和七年》"将"句：李绛有时很久没有进谏，国君就责问他说："难道是我不能纳谏吗？还是〔你〕没有事情可进谏了呢？"）⑦魏帝欲为久都平城，将移也？（《北史·张济传》"将"句：魏帝是打算长期建都于平城，还是要迁移他处呢？）

交 jiāo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两个或更多施事者交互施行或同时施行，相当于"相互""都"等。如：①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六朝文絜·与宋元思书》"交"句：横着的树枝遮蔽了上空，白天也象黄昏一样；只是那稀疏的枝条相互映衬的地方，有时可以见到阳光。）②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俱据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战国策·赵策三》"交"句：如今秦是万乘大国，梁也是万乘大国；同时拥有万乘的大国，又同时都有称王的名分。如果看到秦国一战而取得胜利，因此想顺从它并以它为王，那么，这就使得三晋的大臣连邹、鲁的奴仆婢妾都不如了。）（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两方或多方交错进

行，相当于"交错"等。如：③元街县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盘龙。（《酉阳杂俎·物异》"交"句：元街县有一口泉，泉眼里的水交错旋转象盘龙一样。）

皆 jiē　副词。（一）用于主语、谓语之间，表示主语代表的人或事物的全体施行某种动作或具有某些情状，相当于"都"等。如：①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庄子·盗跖》"皆"句：丘所说的都是我所鄙弃的。）②郑玄家奴婢皆读书。（《世说新语·文学》"皆"句：郑玄家的使女都读书。）（二）用于谓语前，表示动作涉及受事者全体，相当于"都"。如：③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左传·隐公元年》"皆"句：我有母亲，我的食品〔她〕都吃过了。）④石崇后闻，皆杀告者。（《世说新语·汰侈》"皆"句：石崇后来听说了，把泄漏技术的人都杀了。）

今 jīn　副词。（一）用于短语或小句前，表示时间，相当于"如今""现在"等。如：①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世说新语·方正》"今"句：我如今登上王位继承大业，是谁的主意？）②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曰："试自求之。"（《世说新语·识鉴》"今"句：〔褚太傅〕问庾太尉说："听说孟从事很好，现在在这儿不在？"庾太尉说："你试着找他吧。"）（二）用于谓语前，表示动作即将施行或情况即将发生，相当于"将"等。如：③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涉魏境。（《战国策·韩策一》"今"句：十天之内，几万兵士将越过魏国边境。）

仅 jǐn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数量之少或程度、范围有限，相当于"仅仅""只"等。如：①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于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正义〉》"仅"句：曹操用他诡诈取胜的力量，兴几十万军队，在阳平关解救张郃。结果是陷于困境，想起来也后悔，仅仅得以自己逃脱。）②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仅"句：假使秦子婴有平庸君主的才能，只得到中等人才来辅佐，山东即使动乱，秦国的土地也可以保全，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的。）（二）用于数量短语前，表示数量之多，相当于"将近""竟达"等。唐代始见。如：③初守睢（suī）阳时，士卒仅万人。（《韩昌黎集·张中丞传后叙》"仅"句：开始守卫睢阳的时候，士卒将近一万人。）④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晋书·赵王伦传》"仅"句：从开战六十多天以来，战争所杀害的竟达十万人〔之多〕。）

尽 jìn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范围之广和程度之甚，相当于"全部""完全""都""极"等。如：①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尽"句：把鲁国公室分成四份，季孙氏择有二份，叔孙氏、孟孙氏各一份，全部征收地租而贡献给鲁公。）②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

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汉书·食货志》"尽"句：生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山河之利没有全部开发，游荡无业的人没有完全反归农业生产。） ③大军至，一郡尽空。（《世说新语·德行》"尽"句：大军到来，全郡都空了。） ④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尽"句：孔子说《韶乐》美极了，也好极了。）

敬 jìng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主语代表的人以恭谨勤勉的态度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认真地"等。如：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敬"句：领导一个有千乘兵车的大国，要认真地工作而又讲究信用，节约费用而又爱护人民，要合于时宜地调度群众。） （二）用于动词或另一个副词前，表示谦敬，相当于"恭敬地""忠诚地"等，或可不译。如：②越石父曰："夫子礼之，敢不敬从？"（《吕氏春秋·观世》"敬"句：越石父说："您以礼对待我，我敢不恭敬地听从吗？"） ③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孟子·万章上》"敬"句：夏启贤明，能够忠诚地继承禹的传统。） ④间与语曰："…公毋泄！"扁鹊曰："敬诺。"（《史记·扁鹊传》"敬"句：〔长桑君〕秘密地跟扁鹊说："…不要泄露这个秘方！"扁鹊说："好吧。"）

径[逕] jì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施动者不顾及别的情况，直接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径直"等。如：①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阁，拔刀径上合殿。（《资治通鉴·宋纪·文帝元嘉三十年》"径"句：张超之等几十人奔驰进入云龙门和斋阁，拔刀径直冲上文帝居住的合殿。） ②罗既至，初不问郡事，径就谢数日饮酒乃还。（《世说新语·规箴》"径"句：罗君章赴任后，一点也不过问郡内政务，径直到谢镇西处接连几天喝酒取乐后才回家。） ③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世说新语·伤逝》"径"句：子敬平素喜欢弹琴，〔子猷〕就径直进去坐到灵床上，拿起子敬的琴弹起来。）④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逕便出。（《世说新语·方正》"逕"句：仲智走上前，一点也不问病情，直率地说："你在渡江前，跟和长舆齐名，怎么会跟奸佞之人刁协有交情！"说完，径直走了出去。）

久 jiǔ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长，相当于"长久地""长时间"等。如：①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淮南子·道应》"久"句：我跟不可知的广漠约好在九天之外相见，我不能长久地停留。） ②久与贤人处则无过。（《庄子·德充符》"久"句：长时间跟有道德的人在一起，就可以少有过失。） ③臣闻：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废。（《文选·刘越石：劝进表》"久"句：我听说：至尊的位置不能长久地空着，万般国事不能长久地废弛。）

居 jū　助词。用于疑问代词"谁""何"后，相当于"呢"。如：①臧孙闻之曰："国有人焉！谁居？其孟椒

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居”句:臧孙纥听到这件事后说:“鲁国有人材啊!是谁呢?大概是孟椒吧!”) ②吾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何居?(《礼记·檀弓上》“居”句:我同意他大的方面,却不同意他细小的方面,为什么呢?)

举 jǔ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范围的周遍性,或表示动作涉及受事者的全部,相当于“都”“全都”等。如: ①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举”句:齐王假如任用我,岂只是齐国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全天下的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 ②君举不信群臣乎?(《左传·哀公六年》“举”句:君王全都不信任大臣们吗?)

具 jù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主语代表的人全部施行某一动作或全部具有某种情状,或动作涉及受事者全体,相当于“全部”“全都”等。如: ①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靖节先生集·桃花源记》“具”句:看见打渔人,就很惊讶,问〔渔人〕从什么地方来,全部回答了他们。) ②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颜氏家训·涉务》“具”句:人的质素有长有短,难道能要求在六个方面全都尽善尽美吗?) ③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具”句:政治通明百姓和乐,诸多被废弃的事情全都重新振兴起来。)

讵 jù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反诘,相当于“怎么”“难道”等。如: ①阿翁!讵宜以子戏父?(《世说新语·排调》“讵”句:爷爷!怎么能拿儿子跟父亲开玩笑呢?) ②殿下处朱门,游紫闼(tà),讵得与山人交邪?(《南史·齐宗室》“讵”句:殿下生活在朱门、紫门之中,怎么能跟山野之人交往呢?) ③我国家如金瓯(ōu),无一伤缺,今忽受景地,讵是事宜?(《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太清元年》“讵”句:我国象金碗,没有一点缺损,如今忽然接受侯景所管辖的地方,难道是合适的做法吗?)

俱 jù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动作或性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施事者共同进行或共同具有,相当于“一起”“都”等。如: ①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世说新语·言语》“俱”句:简文作抚军时,曾跟桓宣武一起入朝。) ②三王臣主俱贤。(《汉书·晁错传》“俱”句:夏商周三王时臣子与君主都贤良。)

遽 jù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迅即,相当于“立即”“赶快”等。如: ①范氏之败,有窃其钟负而走者,鎗然有声,惧人闻之,遽掩其耳。(《淮南子·说山》“遽”句:范吉射失败后,有窃得范氏的钟背起来就跑的,钟鎗然发出声响,他怕人家听见,赶快捂住自己的耳朵。) ②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世说新语·俭啬》“遽”句:女儿回来后,王戎脸上不高兴,女儿立即把钱还给他,他才消了气。) ③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zé)。(《世说新语·赏誉》“遽”句:桓公去拜访谢太傅,正碰上谢梳头。谢赶快去取

衣服和头巾。）（二）表示两事相继，相当于“就”。如：④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吕氏春秋·察今》“遽”句：他父亲善于游泳，他的儿子难道就一定擅长游泳吗？）⑤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文心雕龙·辨骚》“遽”句：从《九怀》篇以下，就是跟着屈原的脚印走了。）

绝 jué　副词。（一）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程度之甚，相当于“极”“最”等。如：①罴之状，被（p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柳宗元集·罴说》“绝”句：罴的情况是，披散头发象人一样站立，极有力气又很能伤害人。）②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徐霞客游记·游黄山日记》“绝”句：四处观望奇峰错综排列，诸多山谷纵横交叉，真是黄山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二）用于形容词后，作程度补语，相当于“极”。如：③四面险绝，无由升陟矣。（《水经注·清水》“绝”句：四面险极了，没有路径可以攀登。）

堪 kān　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对后面动作的接受能力与可能性，相当于“经得起”“可以”等。如：①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世说新语·容止》“堪”句：卫玠原先就体弱多病，身体经不起劳累，随即就得病死了。）②惟东峰昂然独上，最东之常云，犹堪比肩。（《徐霞客游记·游雁岩山日记》“堪”句：只有东峰高高耸立，最东边的常云峰，还可以跟东峰相比高。）

可 kě　（一）助动词。（A）用于动词前，表示客观情况容许或主观能力容许施行某种动作，也表示理应如此，相当于“可以”“能”“应该”。如：①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韩非子·五蠹》“可”句：官爵可以买到，那么商人和工匠就不卑贱了。）②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汉书·食货志》“可”句：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③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文选·曹子建：求自试表》“可”句：如今我没有功德可以称述，没有业绩可以记载。）④及平长，可娶妻。（《史记·陈丞相世家》“可”句：等到陈平长大后，应该娶妻了。）（B）用于动词前，表示希冀、命令，相当于“请”，或可不译。如：⑤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锺繇曰：“可令二子来！”（《世说新语·言语》“可”句：魏文帝听说这两个孩子后，对他们的父亲锺繇说：“请让两个孩子来！”）⑥〔伶曰：〕“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世说新语·任诞》“可”句：〔刘伶说：〕“就去准备酒肉吧！”妻子说：“是。”）（二）副词。（A）用于数词或数量短语前，表约数，相当于“大约”“大概”。如：⑦项羽之卒可十万。（《史记·高祖本纪》“可”句：项羽的兵卒大约十万人。）⑧潭中鱼可百许头。（《柳宗元集·永州八记》“可”句：石潭中的鱼大概一百条左右。）（B）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转折，相当于“却”“可是”。如：⑨方今天下饥谨，可亡大自损减以救之。（《汉书·贡禹传》“可”句：现在天下百姓受灾挨饿，却

不能大力节俭以赈济百姓。）⑩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诸葛亮集·答李严书》"可"句：我和您交往很久了，可是彼此还不了解。）

肯 kěn　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施事者愿意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肯"或"愿意"等。如：①御使大夫张汤，智足以距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汉书·汲黯传》"肯"句：御使大夫张汤智慧足够用来拒绝劝谏的，奸诈足够用来掩饰过错的，从不肯正派地为天下百姓说话，专门迎合君主的心意。）②诸葛宏年少不肯学问。（《世说新语·文学》"肯"句：诸葛宏年轻时不愿意潜心学问。）③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世说新语·方正》"肯"句：〔陶胡奴〕运去一船米送给王修龄，〔王〕却不肯接受。）

恐 kǒng　助动词，用于谓语前，表示对施行某种动作的担心和测度，相当于"恐怕"。如：①偿城恐不可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恐"句：偿还城邑恐怕不可能。）②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王乃止。（《世说新语·尤悔》"恐"句：围观的人都说："王侯是州将，新媳妇是州民，恐怕没有缘由答拜。"王浑这才停止答拜。）③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世说新语·方正》"恐"句：只是能谦让自然是美德，恐怕不能缺少。）

酷 kù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程度之甚，相当于"非常""很"。如：①何无忌，刘牢之之甥，酷似其舅。（《晋书·何无忌传》"酷"句：何无忌是刘牢之的外甥，非常象他的舅舅。）②韩康伯数岁，家酷贫。（《世说新语·夙惠》"酷"句：韩康伯几岁时，家里很穷。）③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世说新语·惑溺》"酷"句：贾公闾后娶的妻子非常妒忌。）

况 kuàng　连词，用于递进复句的后一分句前，表示逼进，相当于"何况"。"而况""而况于""况乎"等义略同。如：①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左传·隐公元年》"况"句：滋生蔓延的野草尚且除不尽，何况是你宠爱的弟弟呢？）②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况"句：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人呢？）③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下》"况"句：管仲尚且不能随便召唤，何况不愿做管仲的人呢？）④亲昆弟有过，不违，而况疏远乎？（《商君书·赏刑》"况"句：亲兄弟有过错都不能免刑，何况关系很远的人呢？）⑤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二十三章》"况"句：天地尚且不能长久，何况是人呢？）⑥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孟子·万章下》"况"句：用召唤大夫的标帜去召唤狩场管理人，狩场管理人死也不敢去；用召唤士的标帜召唤平民，平民难道敢去吗？何况用召唤不贤人的态度来召唤贤人呢？）

来 lái　助词。（一）用于句末，相

当于“吧”“呵”。如：①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庄子·人间世》“来”句：虽然如此，你一定有原因，试告诉我吧！） ②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庄子·外物》“来”句：鲫鱼呵！你是干什么的呢？） （二）用于句末，表过去时态，相当于“来着”等。如：③恪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许事。（《陈书·沈恪传》“来”句：我曾侍奉萧家来着，今天不忍心看到这样的事。） ④老贼！吃虎胆来，敢偷我物？（《太平广记·尧君卿》“来”句：老贼，你吃虎胆来着，敢偷我的东西？） （三）用于短语、小句、数量词语前，表示从过去某时到现在，相当于“以来”；“来”在“以”后，还可表示未来时间，相当于“以后”。如：⑤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柳宗元集·与杨京兆凭书》“来”句：从贬官以来，没有什么事情，读了诸子百家的书。） ⑥足下又十年来困顿若此。（《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来”句：您十年以来又如此困顿坎坷。） ⑦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孝文本记》“来”句：从今以后，有犯言论罪的，不要判刑。） ⑧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汉书·西南两粤朝鲜传》“来”句：从今以后，还象原来一样互通使节。）

类 lèi　副词，用于动词或名词短语前，表示对动作或情况的大体估计或猜测，相当于“好象”“似乎”等。如：①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国语·吴语》“类”句：我看吴王的脸色，好象有深沉的忧愁。） ②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汉书·贾谊传》“类”句：改变陈规陋习，使人们追求善心向往道义，似乎不是普通官吏所能做到的。）

立 lì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及时，相当于“立即”“即刻”等。如：①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管子·小称》“立”句：所以我有好的地方就立即称赞我；我有过错时就立即指责我。） ②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史记·李将军列传》“立”句：我们离开大部队几十里远，现在象这样率领百十名骑兵逃跑，匈奴兵追逐射击，我们会即刻毁灭。）

良 liáng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事实确切，或程度较深，相当于“确实”“很”。“良久”，相当于“很久”，有时出现于动词（或动宾短语）后。如：①麋（mí）麑（ní）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柳河东集·临江之麋》“良”句：小鹿渐渐长大，忘记自己是鹿了，以为狗确实是自己的朋友。） ②绝巘（yǎn）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水经注·江水》“良”句：山顶上长着很多奇形怪状的柏树，悬挂着流泉瀑布，飞腾涤荡在它们之间，浇灌得柏树更加青翠茂盛，很富于情趣。） ③帝怒，不应。穆伏不肯起，左右传“出!”良久，乃趋而去。（《资治通鉴·汉纪·桓帝延熹六年》“良”句：“桓帝发怒，不答应。朱穆伏在地上不肯起来，皇帝身边的人传呼“出去!”很久，朱穆才快步离开宫廷。） ④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

久。(《世说新语·文学》"良"句：在坐的同时拍着手笑，〔对真长的雄辩〕称颂赞美了很久。) ⑤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世说新语·文学》"良"句：郑玄听了很久，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

了 liǎo　副词，与"无""不"等构成"了不""了无"，相当于"毫无""一点儿也不"等。如：①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闲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世说新语·雅量》"了"句：魏明帝在宣武场上，把老虎爪子和牙齿敲断，让老百姓去看，王戎当时刚七岁，也去看了。老虎趁机攀上栏杆大声吼叫，它的吼声震动大地，围观的人没有不向后倒退乃至跌倒的，而王戎却静立不动，毫无恐惧的表情。) ②赴蔡守饭于丹阳楼，热特甚，堆冰满坐；了无凉意。(《渭南文集·人蜀记第一》"了"句：〔我〕赴蔡守之约到丹阳楼吃饭，热得特别厉害，把冰堆满座位四周，也毫无凉意。) ③水中之月，了不可取。(《李太白文集·志公画赞》"了"句：水中的月亮，一点儿也不能捞取。)

临 lín　(一)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亲临现场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亲自去"等。如：①建章宫后阁重栎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以闻，武帝往临视之。(《史记·滑稽列传》"临"句：建章宫后面楼阁的双重栏干处有个东西跑出来，它的样子象麋鹿。禀告汉武帝，武帝亲自去观看。) ②霍光秉政前后二十年，地节二年春病笃，车驾自临问光病，上为之涕泣。(《汉书·霍光传》"临"句：霍光主持政务前后二十年，汉宣帝地节二年春天病重，汉宣帝亲自去询问霍光病情，并为此而哭泣。)　(二)介词，介绍动作发生的时间或处所，相当于"临…之前""在…面前""面对着"。如：③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诸葛亮集·前出师表》"临"句：先帝知道我为人谨慎，所以临去世之前把安定国家的大事嘱托给我。) ④胡建临敌敢断，武昭于外。(《汉书·杨胡朱梅云传》"临"句：胡建在敌人面前勇敢果断，威武昭示于军旅之外。) ⑤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文选·诸葛孔明·出师表》"临"句：如今就要远离，面对着这奏章我流泪哭泣，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令 lìng　连词，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假如""如果"等。"假令""设令"义同。如：①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合；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史记·张释之传》"令"句：这个人亲自惊吓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性情柔顺；假如是别的马，不是肯定要摔伤我吗？) ②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汉书·贾谊传》"令"句：如果这六七个人都健在，就在这时，陛下就天子位，能安然自处吗？) ③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史记·淮阴侯列传》"令"句：如果韩信能够学习道义谦虚退让，不夸耀自己的才能，那么，功劳差不多可以同周公等人相比了！)

④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三国志·魏书·傅嘏传》"令"句：如果敌人在重要渡口摆列渡船，坚固城池，仗险据守，那横行的计划大概就难以实现了。）

略 lüè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的粗略和简要，相当于"简要地""概略地"。如：①请略陈固陋。（《文选·报任安书》"略"句：请让我简要地谈谈浅薄孤陋的看法。）②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文选·子虚赋》"略"句：虽然这样，请概略地把你所看到和听到的说一说。）

每 měi　（一）副词，用于谓语或小句前，表示动作或情况反复施行或出现，有的表示持续施行或出现，相当于"每次""往往""总"等。如：①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世说新语·赏誉》"每"句：王蓝田每次发表议论，众人都竞相赞美。）②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史记·项羽本纪》"每"句：每次吴郡有劳役和丧事，项梁总是当主办。）③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临川先生文集·答司马谏议书》"每"句：我私自认为跟您友好交往的时间很久，但议论政事意见往往不一致，是我们所持政治观点不同的缘故。）④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三国志·蜀书·蒋琬传》"每"句：诸葛亮总说："蒋公琰心志忠诚高尚，应当是和我共同辅佐王业的人。"）（二）代词，用于名词前，表示逐指，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每"。如：⑤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每"句：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问。）⑥每鼓三、十击之。（《墨子·旗帜》"每"句：每个鼓打三下或十下。）

弥 mí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程度逐渐加甚，相当于"更加""越发"等。如：①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弥"句：我因言语不慎而遭此祸，被乡党所耻笑，从而侮辱了先辈，又有什么脸面去上父母的坟墓呢？即使过了一百代，污点只会更加严重而已。）②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世说新语·言语》"弥"句：水杨的柔姿，一到秋天就凋残；松柏的朴质，经历霜雪而更加茂盛。）③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世说新语·容止》"弥"句：戴渊就哭泣起来，扔下剑归服了陆机，〔戴渊〕谈吐不同寻常，陆机越发器重他。）

靡 mǐ　（一）代词，用于否定副词"不"前，指人或事物，相当于"没有谁""没有什么"等。如：①德厚侔(móu)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史记·孝文本纪》"靡"句：功德深厚可与天地相比，恩泽遍施于四海，没有谁不得到好处。）②物靡不得其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靡"句：万物中没有什么得不到他适当的位置的。）（二）副词，表示否定，相当于"没""不"等。如：③子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新序·杂事》"靡"句：于是相互伴随去朝见，

没有不来的。） ④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史记·游侠列传》“靡”句：古代民间的侠客，已不能听到了。）

谬〔缪〕miù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不合规范或不诚信，相当于“盲目”“乱”“假”等。如：①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文选·曹子建：求自试表》“谬”句：无功授官称之为盲目提拔，凭空受任称之为白吃俸禄。） ②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废数行。（《史通·叙事》“谬”句：一行之中一定乱加几个字，一尺长的纸上总是白白浪费几行字。） ③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汉书·司马相如传》“缪”句：临邛县令假装恭敬，天天拜会司马相如。） （二）用于动词前，表示谦敬：自己在某职位上不称职，相当于“不自量地”“错误地”等。如：④子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资治通鉴·唐纪·高祖武德九年》“谬”句：〔我〕对于殿下没有功劳，不敢不自量地接受重赏。） ⑤谬承知遇，欣荷实深。（《韩昌黎集·答魏博田仆射书》“谬”句：我错误地承蒙您的赏识和重用，欣慰与感激之情确实很深。）

莫 mò （一）代词，可代人、事物、处所等，相当于“没有谁”“没有什么”“没有哪里”等。如：①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左传·宣公二年》“莫”句：进谏如果不被采纳，就没有谁接着你了。） ②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世说新语·规箴》“莫”句：〔小庾〕问各位官员说：“我想做汉高祖、魏武帝那样的人，怎么样？”在坐的人没有谁回答的。） ③臣闻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左传·哀公元年》“莫”句：我听说树立德行没有什么比得上让德行滋长，去除邪恶没有什么比得上让邪恶除根。） 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汉书·食货志》“莫”句：当今的要务，没有什么比得上让百姓务农了。） ⑤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盐铁论·非鞅》“莫”句：所以孝公死的时候，全国攻诘商鞅，东西南北没有哪里可以逃跑的。）

（二）副词。（A）用于动词前，表示对动作的否定，相当于“不”。如：⑥小子何莫学夫《诗》？（《论语·阳货》“莫”句：年轻人为什么不学习《诗经》？） ⑦旌与诛莫得而并焉。（《柳宗元集·驳复仇议》“莫”句：表彰与杀戮不得并用于一个人。） （B）用于动词前，表示劝阻、禁止，相当于“不要”。如：⑧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莫”句：希望早作出决策，不要听信那帮人的意见！） ⑨君有急病见于面，莫多饮酒！（《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莫”句：你有紧病显现在面部，不要多喝酒！） （C）用于反复问句中，表测度，相当于“可”等。如：⑩行五十许里，天王问绍：“尔莫困否？”绍对曰：“亦不甚困。”（《太平广记·崔绍》“莫”句：走了十来里，天王问崔绍：“你可累不累呢？”崔绍回答说：“也不算太累。”） ⑪项羽遂乃高喝：“帐前莫有当直使者无？”（《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莫”句：项羽就高喊：“帐前可有值班人员没

有?”)

那 nǎ　代词，用于助动词前，表示反诘，相当于“怎么”“哪”等。如：①明帝在西堂会诸公饮酒，未大醉，帝问：“今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周伯仁为仆射，因厉声曰：“今虽同人主，复那得等于圣治?”（《世说新语·方正》“那”句：明帝在西堂与王公大臣聚会饮酒，没大醉时，明帝问：“今天名臣一起聚会，比尧舜时怎么样?”周伯仁是仆射，就大声说：“如今虽然同为国君，又怎么能与圣明之君治理国家相提并论?”）②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世说新语·假谲》“那”句：替我跟愍度说：没有道义怎么能立身?）③闻公有惠政，此州那可无尹?（《元史·王伯颜传》“那”句：听说你有良好政绩，这个州哪能没有州的长官呢?）

乃〔迺〕 nǎi　（一）代词，用于第二人称，相当于“你”“你的”“你们的”等。如：①今欲发之，乃能从我乎?（《汉书·翟义传》“乃”句：如今将要出发，你能跟从我吗?）②尔其毋忘乃父之志！（《欧阳文忠公集·五代史伶官传序》“乃”句：你不要忘掉你的父亲的遗志！）③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左传·昭公三年》“乃”句：赐给你州县的土田，来报答你们的过去的功劳。）（二）副词。(A) 用于名词性谓语前，肯定主语代表的人或事物就是谓语代表的人或事物，相当于“是”等。如：④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史记·陈涉世家》“乃”句：应当立为皇帝的，是公子扶苏。）⑤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论衡·命义》“乃”句：我遭到失败是命运，不是用兵的错误。）(B) 表示事情紧接着出现，相当于“就”；表示过了很久才出现，相当于“才”。如：⑥无几何，疾乃止。（《吕氏春秋·制乐》“乃”句：没多久，病就好了。）⑦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战国策·齐策四》“乃”句：先生为我买义的道理，到今天〔我〕才看清了。）(C) 表示两事顺承相接，相当于“就”等。如：⑧父不在，乃呼儿出。（《世说新语·言语》“乃”句：父亲不在家，就叫儿子出来。）⑨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迺神伏。（《世说新语·文学》）“迺”句：何平叔刚注完《老子》，去拜访王辅嗣，看见王的注本见解精辟新颖，心里就很佩服。）(D) 表示后一件事的出现与上述情况不一致，或出乎意外，相当于“却”“竟然”等。如：⑩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乃”句：而今你身高八尺，却做别人的仆役给人赶车。）⑪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迺作儿女子相问！（《世说新语·方正》“迺”句：男子汉大丈夫快要死了，不去问他安国定邦的道理和方法，却象妇人小孩那样问他〔些琐事〕！）⑫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世说新语·尤悔》“乃”句：〔周子南〕半夜里慨叹说：“大丈夫竟然被庾元规所出卖！”）（三）连词，表示另提一事，相当于“至于”；表示让步，相当于“就是”等。如：⑬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乃”句：〔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在这方面还不能有什么行动；至于我所希望的事，就是学习孔子。） ⑭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也。（《史记·刺客列传》“乃”句：不但是聂政能干，就是他的姐姐也是烈性女子。）

难 nán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施行某种动作、实现某种愿望具有相当的难度，相当于“不敢轻易”“难以”“很难”等。如：①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难”句：郑子产说：“众人的愤怒不敢轻易激惹；独断专行者的欲望难以得逞。） ②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难”句：然而这些情况可以跟聪明睿智的人说，很难对世俗的人讲。） ③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世说新语·言语》“难”句：庾公说：“〔你〕为什么不仰慕孔子却仰慕庄周呢？”回答说：“孔圣人生而知之，所以难以企望和仰慕。”）

宁 níng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对施行某种动作的坚决态度，相当于“宁愿”“宁可”等。如：①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史记·屈原列传》“宁”句：〔我〕宁愿投人江河，而葬身于江鱼腹中呵。） ②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世说新语·德行》“宁”句：巨伯说：“朋友有病，我不忍心丢开他，宁可用我的身体换取朋友的性命。”） （二）用于复句中：用于假设复句的后一分句中，前有“若”等与之呼应；用于取舍句的前一分句，后有“不”“无”“岂”等与之呼应；或用于后一分句，前有“与”“与其”与之呼应。这几种句中的“宁”都相当于“宁愿”“宁可”“宁肯”等。如：③若绝君好，宁归死焉。（《左传·宣公十七年》“宁”句：如果断绝了国君间的友好关系，宁愿回国而死。） ④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汉书·霍光传》“宁”句：我宁可有负于您，不敢有负于国家。） ⑤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宁”句：宁可相信尺码，不相信自身。） ⑥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臣？（《晋书·刘曜载记》“宁”句：我宁可做国家的鬼，哪能做你的臣？） ⑦与人刃我，宁自刃。（《史记·鲁仲连传》“宁”句：与其别人杀我，宁可我自杀。） ⑧与其害其民，宁我独死。（《左传·定公十三年》“宁”句：与其危害人民，宁可我一人死去。）（三）用于反诘句中，相当于“难道”等。如：⑨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宁”句：天下正处于紧急情况之中，王孙难道可以拒绝出任吗？） ⑩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世说新语·排调》“宁”句：王丞相说：“为什么不说葛、王，而说王、葛呢？”诸葛令说：“比如说驴马，不说马驴，驴难道比马强吗？”）

（四）用于抉择问句中，或与另一个“宁”前后照应，或与“将”等前后照应，“宁”相当于“还是”。如：⑪人之情，宁朝人乎，宁朝于人也？

（《战国策·赵策四》"宁"句：人之常情，还是愿意受人朝拜呢，还是愿意朝拜他人呢？）　⑫王宁亡十城耶，将亡齐国也？（《新序·善谋》"宁"句：大王还是愿失去十个城邑呢，还是愿失去齐国呢？）

诺 nuò　副词，用来表示同意对方的谈话，相当于"好吧"等。如：①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战国策·赵策四》"诺"句：赵太后说："好吧，任凭你怎样支使他。"）　②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诺"句：孔子说："好吧，我打算出任官职了。"）　③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史记·滑稽列传补》"诺"句：西门豹说："好吧，姑且留下等他们一会儿。"）

丕 pī　（一）连词，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相当于"就"。如：①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尚书·禹贡》"丕"句：三危山已可建宅居住，三苗族的人就可安定下来。）　（二）副词，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程度之甚，相当于"很""大大地""非常"等。如：②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尚书·盘庚》"丕"句：先王向官员布告政令，〔官员〕能不隐瞒先王旨意，王因此很满意，〔官员传达命令〕没有错误言论，民众因此大大地改过向善。）　③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丕"句：重耳我再拜叩头，敬奉并宣扬天子非常显赫的美善政令。）

披 pī　介词，介绍动作的处所或凭借，相当于"在…旁""沿着""按着"等。如：①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五帝本纪》"披"句：天下有不归顺的，黄帝就去征伐它，归顺的就离开它，在山旁开辟道路，不曾安居过。）　②临池观鱼，披林听鸟。（《南史·徐勉传》"披"句：临近池塘看鱼跃，沿着树林听鸟鸣。）　③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世说新语·贤媛》"披"句：汉元帝的宫妃既然很多，就让画工为每人画相，想有所召呼，就按着画相召来。）

频 pí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频繁，相当于"频繁""多次"等。如：①是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后汉书·李云传》"频"句：当时，大地多次震裂，种种灾难频繁降临。）　②咨频载使北，魏人敬异。（《<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频"句：赵咨多次乘车出使北方，魏国人异常尊敬他。）

颇 pō　副词。（一）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程度之轻，相当于"稍微"等。如：①山界颇开。（《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颇"句：山界稍微开阔了些。）　②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论衡·别通》"颇"句：渡过浅水的人能看见鱼虾，渡过稍微深一点的水的人能看见鱼鳖，渡过最深的水的人能看见蛟龙。）　（二）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相当于"都""大多""很"等。如：③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汉书

·陈汤传》“颇”句：城外的人射中了单于的鼻子，几位夫人都死了。） ④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史记·大宛列传》“颇”句：其后一年多，张骞派到大夏诸国的使者，大多和他们国家的人一起来至汉朝。） ⑤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世说新语·规箴》“颇”句：桓道恭是桓玄同族的人，当时任贼曹参军，很敢说话。）(三) 用于反复问句中，与句尾否定词“不”“否”等前后照应，表示测度语气，相当于“可”。如：⑥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世说新语·赏誉》）“颇”句：〔桓公〕走了以后，谢太傅对左右的人说：“可曾见过象这样的人没有？”） ⑦沙门达多发冢取砖，得一人以进。时太后与明帝在华林都堂，以为妖异。谓黄门侍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否？”（《洛阳伽兰记·城南》“颇”句：沙门达多掘墓取砖，发现一人进献皇帝。当时太后和明帝在华林都堂，认为这是妖怪。对黄门侍郎徐纥说：“上古至今，可有这样的事没有？”）

其 qí (一) 代词。(A) 用于名词前，有指示作用，相当于“那”“那种”“这”等。如：①其巫，老女子也。（《史记·滑稽列传》“其”句：那巫婆是老年女人。） ②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史记·自序》“其”句：把我的书藏到名山中，传给那种〔合适的〕人。） ③其岁，新垣平事觉。（《史记·文帝本纪》“其”句：这年，新垣平的事被察觉。） (B) 用于名词前，为第三身人称代词，相当于“他〔它〕的”，也可用作第一、第二人称，相当于“我的”“你的”。如：④人有亡铁者，意其邻之子。（《列子·说符》“其”句：有人丢了斧子，怀疑他的邻居的儿子。） ⑤支意惜之，乃铩其翮(hé)，鹤轩翥(zhù)不复能飞。（《世说新语·言语》“其”句：支公很舍不得鹤飞走，就折断了它的翅膀，鹤可以高飞的翅膀不再能飞了。） ⑥孤也与其二三子不能禁止。（《左传·襄公八年》“其”句：我跟我的臣子们不能禁止。） ⑦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战国策·赵策四》“其”句：我认为您替长安君谋划得太短浅了，所以认为您的爱〔长安君〕不如爱燕后。） (C) 作兼语、小句主语、动词的间接宾语，相当于“他”“他们”等。如：⑧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世说新语·文学》“其”句：王苟子来，跟僧意一起说话，就让他宣讲义理。） ⑨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列子·汤问》“其”句：操蛇神听到这件事，担心他们不停止，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天帝。） ⑩戎遗其一单衣。（《晋书·王戎传》“其”句：王戎送给他一件单衣。） (二) 副词。(A) 用于谓语前，表示推测，相当于“恐怕”“大概”等。如：⑪为政者其韩子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其”句：掌握政权的恐怕是韩起吧！）

⑫若小人者其不幸欤！（《刘禹锡集·上杜司徒书》“其”句：象我这样的人大概是不幸的呵！） (B) 用于谓语前，表示希望，相当于“要”。如：⑬君其勿复言！（《史记·李斯列传》

“其”句：你不要再说了！） ⑭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世说新语·赏誉》“其”句：王参军是人伦道德方面的表率，你要学习他！）（三）连词，用于抉择复句的两个分句之首，或后一分句之首，相当于“还是”。如：⑮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庄子·大宗师》“其”句：不知道现在谈话的我们还是醒着的呢，还是做着梦的呢？） ⑯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庄子·养生主》“其”句：这是什么人？为什么只有一只脚？是〔因为〕天呢，还是〔因为〕人呢？）

奇 qí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动作或情状超出正常情况，程度很高，相当于“特别”“极”等。如：①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世说新语·夙惠》“奇”句：何晏七岁，聪明如神，魏武帝特别喜欢他。） ②今岁奇寒。（《酉阳杂俎·语资》“奇”句：今年气候极冷。） ③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和妹，奇丑。（《世说新语·贤媛》“奇”句：许允的妻子是阮卫尉的女儿，是德和的妹妹，长得特别难看。）

岂 qǐ　副词。（一）用于谓语前，表示反诘，相当于“怎么”“难道”等。如：①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史记·项羽本纪》“岂”句：沛公不先攻破关中，您难道敢进去吗？） ②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孟子·滕文公下》“岂”句：陈仲子难道不真正是一个廉洁之士吗？） ③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岂能量敌国之胜负哉？（《资治通鉴·后梁纪·均王贞明四年》“岂”句：陛下起居在深宫之中，跟您一起计议大事的都是左右亲近熟悉的人，怎么能正确测知敌国的胜负呢？） （二）用于谓语前，表示测度性征询，相当于“可”“是不是”等。如：④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庄子·外物》“岂”句：您可有一斗半升的水来救活我吗？） ⑤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岂”句：这或许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您是不是也有意于此呢？）

亟 qì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频仍，相当于“屡次”“频繁地”“多次”等。如：①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左传·隐公元年》“亟”句：〔姜氏〕喜爱共叔段，想要立他为太子。屡次向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她。） ②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左传·成公十六年》“亟”句：我国前代君主频繁地打仗是有原因的。） ③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柳河东集·封建论》“亟”句：多次驱使成千上万的人服劳役，施行严刑酷法，耗尽了国家资财。）

前 qián　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施行的时间在前或位置在前，也可表示动作朝着前方进行，相当于“先”“前边”“向前”。如：①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世说新语·雅量》“前”句：蔡子叔先到，坐得靠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得稍远一点儿。蔡子叔临时起来一下，谢万石就移坐到他的座位上了。） ②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世说新语·

假谲》“前”句：前边有一片大梅林，〔结了〕很多籽实，味道甜酸可以解渴。） ③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世说新语·言语》“前”句：文举到门口，对小吏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通报以后，向前坐下。） ④延范独拔戟前逐，刺杀之。（《宋史·王延范传》“前”句：王延范独自拔出矛戟向前追赶，杀死了豹。）

潜 qiá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是秘密进行的，或表示程度之深，相当于“偷偷”“秘密地”“潜心”等。如：①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世说新语·假谲》“潜”句：魏武帝少年时，常常喜欢跟袁绍冒充侠客，看到有人结婚，就偷偷进入新婚主人的园内。） ②何无忌潜诣裕，劝裕于山阴起兵讨恒玄。（《资治通鉴·晋纪·安帝元兴二年》“潜”句：何无忌秘密地去见刘裕，劝刘裕在山阴起兵讨伐桓玄。） ③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yǒu）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后汉书·王充传》“潜”句：王充认为庸俗儒生做起文章，大多失其真义。于是关起门来潜心研究构思，谢绝参加贺喜吊丧之类的礼仪，门窗墙壁处都备有刀笔，写成《论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万字。）

且 qiě　（一）连词。（A）连接句中并列的两项，或用于两项之间，或分别用于两项之前，或前项之首用“既”，后项之首用“且”。相当于“一面〔边〕……一面〔边〕……”或“又……又……”。如：①斗且出，提弥明死之。（《左传·宣公二年》“且”句：一面搏斗一面往外走，提弥明因之而死去。） ②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世说新语·言语》“且”句：它的土地宽广而又平坦，它的河水浅淡而又清彻，它的人民又廉洁又坚贞。） ③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史记·田儋列传》“且”句：彭越这时在梁地，又帮助汉又帮助楚。） ④王且笑且言：“那得独饮？”（《世说新语·方正》“且”句：王恭一边笑一边说：“哪能一个人饮酒？”） ⑤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孙子兵法·谋攻》“且”句：军队又迷惑又犹豫不决，诸侯入侵的灾难就会到来。） （B）用于复句中：用于递进复句的后一分句，相当于“而且”“况且”等；用于递进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让步，相当于“尚且”；用于抉择问句的后一分句之首，相当于“还是”。如：⑥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左传·隐公元年》“且”句：庄公告知颍考叔事情的缘由，而且告诉他自己的懊悔。） ⑦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且”句：诸位大夫有什么罪？况且我不会用一次过失掩盖他的巨大功德。） ⑧忠且见弃，吾不之楚何适？（《战国策·秦策一》“且”句：忠诚尚且被贬斥，我不去楚国又到哪里？） ⑨臣死且不避，卮（zhī）酒安足辞？（《史记·项羽本纪》“且”句：我死尚且不回避，一杯酒哪里用得着推辞？） ⑩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为盗主，且不为？（《睡虎

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且”句：私人奴婢盗窃主人父母的东西是算盗主呢，还是不算盗主呢？） ⑪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且”句：您是想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还是想率领诸侯打败秦国呢？） （二）副词。(A)用于动词、数词或数量短语前，表示将要施行某种动作，将要出现某种情况和即将达到某个数量，相当于“将要”“即将”“将近”等。如：⑫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柳宗元集·三戒》“且”句：驴大叫一声，虎很害怕，远远逃开了，以为驴将要吃掉自己呢。） ⑬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资治通鉴·晋纪·孝武帝太元八年》“且”句：那些逃跑的士兵，听到风声鹤鸣，都以为晋军即将到来。） ⑭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 （《列子·汤问》“且”句：北山愚公，年纪将近九十了。）

⑮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柳宗元集·永州八记》“且”句：那清澈而又平静的水面将近十亩。） (B)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进行的时间短暂，或带有临时性，相当于“暂且”“姑且”等。如：⑯先生且休矣，我将念之。（《史记·淮阴侯列传》“且”句：先生暂且休息去吧，我将考虑此事。）

⑰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世说新语·规箴》“且”句：贺司空没说什么，只下令说：“〔你们〕姑且回去，我见到张廷尉时为你们反映这件事。”）

窃 qiè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施行是不公开的、不被人知的，相当于“暗地里”“偷偷地”“悄悄地”等。如：①弟子皆窃骂。（《史记·叔孙通传》“窃”句：〔叔孙通的〕弟子都暗地里骂他。） ②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史记·孙膑传》“窃”句：齐国使者认为孙膑才能出众，偷偷地用车把他请到齐国。）

③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世说新语·规箴》“窃”句：陈之方的母亲心疼之方，悄悄地用锦被盖在他身上。） （二）用于表示心理活动和五官活动的动词前，表示谦敬，多出现在下对上的话语中。不必译出，或相当于“私下里”。如：④窃闵公之将死，故吊之。（《汉书·蒯通传》“窃”句：我私下里怜悯您快要死去，所以来吊丧。） ⑤窃闻众口铄金，浮石沉木。（《三国志·魏书·孙礼传》“窃”句：我私下里听说众人的嘴能把金子熔化，能让石头浮上水面也能让木头沉到水底。）

亲 qī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施事者亲自施行，相当于“亲自”“亲身”等。如：①武王亲释其缚。（《左传·僖公六年》“亲”句：周武王亲自解开捆绑微子启的绳子。） ②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 （《苏东坡集·上梅直讲书》“亲”句：今春一国的读书人成群来到礼部〔应试〕，您和欧阳修先生亲自一一考核，我没料到自己竟荣获第二名。）

轻 qī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以轻率的态度进行某种动作，相当于“轻易”“轻率”“随便”等。如：①匈

奴不敢轻侵也。（《新序·善谋》"轻"句：匈奴不敢轻易入侵。） ②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晋书·张华传》"轻"句：当时大臣们都认为不可轻率进军，唯独张华坚持〔要进击〕，认为那样必能获胜。） ③临安约降已有成言，吾轻杀一人，则害大计，况屠一县邪？（《元史·董文炳传》"轻"句：临安投降的条件已经谈妥，我随便杀掉一个人，就会破坏整个计划，何况杀掉全县的人呢？）

情 qíng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情况的确切与真实，相当于"确实"等。如：①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墨子·非攻中》"情"句：古时候的王公大人确实希望得到而厌恶损失，希望安全而厌恶危难。） ②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庄子·应帝王》"情"句：他的知识确实可信，他的德性非常纯真。）

顷 qǐng　副词，用于谓语或小句前，表示动作或事情发生在近期，相当于"近来"等。由"顷"和其它词语组成的"顷者""少顷""有顷""顷之"等，都表示时间短暂，相当于"最近""片刻""一会儿""不久"等。如：①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而顷多以无辜死。其减鞭杖之制，著于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顷"句：鞭刑作为国家刑法〔的一种〕，是用来纠正怠惰行为的，可是近来却多有因遭鞭刑而无罪死去的。〔今后〕应当减轻鞭刑的规定，明文公布在法令中。） ②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文选·与吴质书》"顷"句：近来用什么自慰呢？可有什么著述没有？） ③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文选·报孙会宗书》"顷"句：最近您离开原来的地方，到达安定〔任职〕。） ④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荀子·致士》"顷"句：君子是实行政治主张和法律条令的关键，不能片刻缺少。） ⑤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史记·留侯世家》"顷"句：第五天，张良不到半夜就去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象这样〔敬勤有礼〕。"） ⑥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世说新语·贤媛》"顷"句：当初许允被收审，全家哭泣号叫。媳妇阮氏镇静自若，说："不必忧虑，很快会回来的。"并做好米粥等他。不久，许允就回到家中。）

趋 qū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急促，相当于"赶快""很快""快步"等。如：①定公越席而起曰："趋驾！召颜渊！"（《荀子·哀公》"趋"句：鲁定公跨越座席站了起来说："赶快驾车！叫颜渊来！"） ②魏王趋见卫客。（《战国策·宋卫策》"趋"句：魏王很快接见了卫国的说客。） ③王莽篡后，文公推数，知当大乱，乃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趋走，日数十，时人莫知其故。（《后汉书·方术列传》"趋"句：王莽篡夺政权以后，任文公推算历数，得知会有大乱，于是规定家人背负百十来斤重的东西，绕着住宅快步小跑，每天几十次，当时的人没有谁知道是什么缘故。）

渠 qú　（一）代词，指代第三人称，相当于“他”。如：①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渠”句：女婿昨天曾来，一定是他所偷。）　②翁恳白郡守曰：“某老钝无能，全藉此子赡给，若渠不胜杖，则翌日乏食矣，愿以身代之。”（《宋史·隐逸·南安翁》“渠”句：老汉恳求郡守说：“我年老迟钝无以为生，全靠这个儿子赡养，如果他受不了杖打〔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明天就没有饭吃了，我愿用老身代替他挨打。”）（二）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反诘，相当于“难道”。如：③掾部渠有其人乎？（《汉书·孙宝传》“渠”句：下属诸吏中难道有那种人吗？）

全 quá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或情况是在全部范围内进行或发生的，相当于“全”“全都”等。如：①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孙子兵法·形篇》“全”句：善于防守的人好似隐藏在地层之下，善于进攻的人好似出动于云霄之上，所以能够保全自己并获全胜。）　②足所不蹈，全活不伤。（《论衡·幸偶》“全”句：脚践踏不到的地方，〔蚂蚁〕全都活下来没有受到伤害。）

群 qú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施事者群体施行，相当于“成群地”等。如：①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韩昌黎全集·师说》“群”句：巫医、乐师、各种手工艺人，都不以互相学习为耻。而在士大夫这些人中，如有彼此称呼“老师”“弟子”的，就成群地围聚起来而加以耻笑。）　②先生窃念：天色向晚，狼复群至，吾死矣夫！（《东田文集·中山狼传》“群”句：东郭先生暗想：时光已接近傍晚，狼又会成群地窜来，我必定得死了！）

然 rán　（一）代词，指代上文所说的情况，相当于“如此”等。如：①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文选：曹丕：典论论文》“然”句：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②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世说新语·雅量》“然”句：人问他，回答说：“树在路边还有很多果实，这一定是苦李。”取下来一看的确如此。）　（二）连词，用于两个分句的后一分句前，或两个段落的后一段落前，表示转折，相当于“然而”“但是”等。“然而”“然且”“然则”义略同。如：③谢太傅道安北“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世说新语·赏誉》“然”句：谢太傅说安北是“见了他也不让人讨厌，然而出门去不再让人思念”。）　④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世说新语·排调》“然”句：王丞相枕着周伯仁的膝盖，指着他的肚子说：“你这里头有些什么？”回答说：“这里头空洞无物，但是能容得下你们几百个人。”）　⑤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史记·商君列传》“然”句：商鞅又谒见孝公，阐述得更透彻，可是仍未中孝公之意。）　⑥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

于泽也。(《孟子·公孙丑下》"然"句：知道他不行，然而还要来，那就是孟子贪求富贵。) ⑦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庄子·秋水》"然"句：那事不能实行是很明白的了，可是还说个不停，这不是愚蠢就是说谎。) ⑧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荀子·荣辱》"然"句：显贵地成为天子，富足地拥有天下，这是人情共同希望得到的，可是顺从人的欲望，时势不能容许，物质也不够使用。) (三) 语缀，用于其它字后构成状语，可根据上下文义译出；或与前面的"如""若"一起构成"如…然""若…然"，相当于"象…似的"。如：⑨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靖节先生集·桃花源记》"然"句：又往前走了几十步，通畅明亮。) ⑩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然"句：桓公北征时，经过金城，看见从前在琅邪作郡守时种的柳树，都已十围那么粗了。感慨地说："树尚且如此，人怎能不老？"攀着树枝手拿枝条，老泪纵横。) ⑪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礼记·大学》"然"句：别人看自己，象看见了自己的肺肝似的。) ⑫山见(xiàn)水中若柱然。(《水经注·河水》"然"句：山出现在水中象柱子似的。) (四) 副词，表示同意对方的意见，相当于"是的""对"。如：⑬鲁仲连曰："然。梁之比于秦，若仆耶？"辛垣衍曰："然。"(《战国策·赵策三》"然"句：鲁仲连说："是的。那么，魏国对秦国来说，就象是仆人吗？"辛垣衍说："是的。") ⑭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世说新语·识鉴》"然"句：〔褚太傅〕指着孟嘉说："此君稍稍与人不同些，恐怕就是孟从事吧？"庾太尉大笑着说："对。")

容 róng　副词。(一) 用于动词前，表示对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的测度，相当于"或许""也许"等。如：①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后汉书·杨厚传》"容"句：各位王子大多在京城，或许有反常的天象变化，应该赶快打发他们回到各自的封国去。) ②凡稻最佳者九穰一秕。倘风雨不时，耘耔失节，则六穰四秕者容有之。(《天工开物·攻稻》"容"句：最好的稻谷九成是饱满的，一成是不饱满的。倘若风雨不调，耕耘不及时，那么六成饱满四成不饱满的情况或许会发生。) ③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世说新语·方正》"容"句：何至于这样？他们也许不知道呢。) (二) 用于动词前，表示反诘，相当于"难道"。如：④盖郑詹来而国乱，四佞放而众服。以此观之，容可近乎？(《后汉书·杨秉传》"容"句：郑詹从齐国到鲁国，鲁国就混乱衰败，舜流放了獾兜、共工、鲧、三苗等四个凶族，百姓就归服了他。由此看来，奸佞凶暴的人难道可以亲近吗？)

如 rú　(一)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测度和不肯定口气，相当于"似乎"；表示理应如此，相当于"应当"。如：①丞相如有骄主色。(《史记·袁

盎传》"如"句：丞相似乎对君主有骄矜之色。） ②天欲杀之，则如勿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如"句：天要杀他们，就应当不生他们。）（二）连词。(A)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假设，相当于"如果""假如"。如：③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孟子·梁惠王上》"如"句：王如果知道这一点，就不要希望老百姓比邻国多了。） ④如孔子知津，不当更问。（《论衡·知实》"如"句：假如孔子知道渡口，就不该再问。） (B)连接并列的两项，相当于"或者""和"。如：⑤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论语·先进》"如"句：怎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就不是国家呢？） ⑥予秦地如毋予，孰吉？（《史记·虞卿列传》"如"句：给秦国土地和不给，哪种做法好？） （三）语缀，用于另一字后构成谓语，相当于"…的样子"等。如：⑦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昌黎集·答李翊书》"如"句：仁义的人，他说话〔总表现出〕和蔼的样子。） ⑧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如"句：孔子在乡里中，〔总显出〕温和恭顺的样子。） （四）"如…比"这种固定格式，带有比喻或举例性质，相当于"象…那么大〔小〕""象…这种情况"等。如：⑨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如"句：流出血来，血滴象豆子那么大的有五六颗。） ⑩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韩昌黎集·柳子厚墓志铭》"如"句：一旦面临利害，仅象汗毛头发那么小〔的利害〕，就翻脸不认人。） ⑪详共通议如峤比，我将亲裁其中。（《晋书·礼志中》"如"句：详细地统一讨论一下象峤这种情况〔的人〕，我将亲自裁决。）

若 ruò （一）代词。(A)人称代词，多用作第二人称，相当于"你""你的"，偶而也用作第三人称，相当于"他的""她的"。如：①若能掩之，则吾子也。（《左传·襄公二十年》"若"句：你能掩盖我杀君之名，〔你〕就是我的儿子。） ②吾翁即若翁。（《史记·项羽本纪》"若"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 ③欲使仲子处于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禄，耳闻目见，昭晰不疑，仲子不处不食明矣。（《论衡·刺孟》"若"句：要让仲子住在于陵，避开他的哥哥的房子，吐出他的哥哥的食物，〔这如果是孟子〕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明明白白，无可怀疑，那么仲子不居住不吃喝是明摆着的了。） (B)代词，用于名词或形容词前，相当于"这""如此"。如：④君子哉若人！（《论语·宪问》"若"句：这人是君子呵！） ⑤尔知宁王若勤哉！（《尚书·大诰》"若"句：你知道文王如此勤勉呀！） （二）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测度或不肯定语气，相当于"似乎"等。如：⑥若闻蔡将先卫，信乎？（《左传·定公四年》"若"句：似乎听说盟会时蔡国将列在卫国之前，是真的吗？） ⑦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陶渊明集·桃花源记》"若"句：山上有一个小口，隐隐约约好象有点光亮。） （三）连词。(A)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

分句，表示假设，相当于“如果”等。如：⑧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世说新语·方正》“若”句：王修龄如果饿了，自然应当去向谢仁祖索取食物，不需要陶胡奴的米。） ⑨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世说新语·贤媛》“若”句：如果鬼神有灵，不会接受奸人的吐诉；如果鬼神没有知觉，向他吐诉有什么用？）
(B) 表示另提一事，相当于“至于”。“若夫”义同。如：⑩臣之罪大，尽灭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后，君之惠也。若臣，则不可以入矣。（《左传·哀公十四年》“若”句：我的罪恶大，〔君王〕灭尽桓氏家族是可以的；如果因为先臣的缘故而使桓氏有继承人，这是君王的恩惠。至于我，那是不能回国了。） ⑪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焉？（《国语·楚语下》“若”句：至于白色美玉，是先王的玩物，算什么宝呢？） (C) 用于并列短语中表示抉择，相当于“或者”。如：⑫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左传·昭公十三年》“若”句：或者听从践土盟约，或者听从宋国，也尊重晋国的意见。） (四) 语缀，用于另一字后，构成状语。如：⑬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庄子·德充符》“若”句：一会儿〔小猪〕都弃掉死母而跑了。）

善 shàn 副词。(一) 用于动词前，表示擅长于进行某种活动，相当于“善于”等。如：①宋人有善为不龟(jūn)手之药者。（《庄子·逍遥游》“善”句：宋国有一个善于配制防止手裂之药的人。） ②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史记·留侯世家》“善”句：黥布是天下勇猛的大将，善于指挥打仗。） ③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善”句：刘备有雄才大略，诸葛亮善于治理国家。） (二) 用于动词前，表示态度的良善与友好，相当于“很好地”“好好地”等。如：④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左传·昭公十二年》“善”句：史官倚相快步走了过去，楚王说：“这是很好的史官，你要很好地对待他。”） ⑤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论语·雍也》“善”句：季氏叫闵子骞做费地的长官。闵子骞〔对来人〕说道：“好好地替我推辞掉！若是再来找我的话，那我一定要住到汶水河边去了。”） (三) 表示同意对方意见时的应对，相当于“好吧”等。如：⑥亮答曰：“……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善”句：诸葛亮回答说：“……若真能象这样，霸业就可成功，汉朝天下也可复兴了。”刘备说：“好吧！”）

擅 shà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独断专行地从事某种活动，相当于“擅自”等。如：①及臻吕后季年，产、禄专政，内兼二军，外统梁、赵，擅断万机。（《文选·为袁绍檄豫州》“擅”句：到了吕后末年，吕产、吕禄独霸朝政，在内兼管南北二军，在外统御梁地、赵地，擅自决断一切国家大事。） ②汉先为韩馥所不礼，且欲

徽迎绍意，擅发兵围守馥第。(《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初平二年》"擅"句：朱汉以前曾被韩馥无礼相待，并且也想迎合袁绍的意思，就擅自派兵包围了韩馥的住宅。)

尚 shàng　副词。(一)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原有动作或状态的继续，相当于"还"等。如：①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左传·宣公二年》"尚"句：〔赵盾〕整整齐齐地穿着礼服准备上朝，时间还早，就坐着闭目养神。)　②及夫至门，丞相尚卧。(《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尚"句：等灌夫到了门口，丞相还在躺着睡觉。)　(二)用于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让步，相当于"尚且"等。如：③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汉书·李广传》"尚"句：霸陵尉官喝醉了酒，呵责拦阻李广。李广的从骑说："这是前任的李将军。"尉官说："现任的将军尚且不能夜间通行，还管什么原任的！")　④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尚"句：我认为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尚且不互相欺骗，何况大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呢？)　(三)用于动词前，表示希冀，相当于"希望"。如：⑤呜呼哀哉！伏惟尚飨！(《柳河东集·为韦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尚"句：唉，伤心啊！诚恳地希望你来享受祭品！)

稍 shāo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是逐渐施行的，或表示程度之轻，相当于"渐渐""稍微"等。"稍稍"义略同，相当于"陆续"。如：①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史记·项羽本纪》"稍"句：于是项王怀疑范增与汉王有私交，渐渐剥夺了范增的权力。)　②仆自去年八月来，痞(pǐ)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柳河东集·与李翰林建书》"稍"句：我自从去年八月以来，痞疾稍微轻了些。过去隔一两天发作一次，现在一个月才发作两三次。)　③其群臣稍稍背叛之。(《史记·项羽本纪》"稍"句：他的臣僚们陆续背叛了他。)

深 shēn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施行深入或具有隐蔽性，相当于"深深地"。如：①夫兽深居而简出。(《韩昌黎集·送浮屠文畅师序》"深"句：野兽深深地隐居而很少出来。)　②良贾深藏若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深"句：高明的商人深深地隐藏宝货象什么都没有一样。)　(二)用于动词前，表示程度之甚，相当于"深入地""特别""认真"等。如：③愿王请大夫种与深议，则霸王之术在矣。(《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深"句：希望您请大夫种跟他一起深入地商讨，称霸的方法就有了。)　④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深"句：魏武帝常说："我睡着以后不能随便走近，近了我就要砍人，〔自己〕也不知道，左右人等对此要特别慎重。")

⑤时温夙有此谋，深纳超言。(《世说新语·言语》"深"句：当时桓温早就有此打算，〔就〕认真采纳了郗超的意见。)

审 shěn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确切性，相当于"确实"等。如：①谁当久与龟鹤同居？君审知其年岁乎？(《新论·辨惑》"审"句：谁长时间跟龟和鹤住在一起？你能确实知道它们的寿命吗？)　②咸阳王禧等知后审死，相视曰："设无遗诏，我兄弟亦当决策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资治通鉴·齐纪·东昏侯永元元年》"审"句：咸阳王元禧等知道冯后确实死了，〔他们〕互相看看说："如果没有皇帝遗诏〔赐冯后死〕，我们兄弟也该决计干掉她了；怎么能让丧失贞操的妇人来统治国家，屠杀我们兄弟呢？)　(二)用于动词前，表示深入审慎地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深入地""慎重"等。如：③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审"句：广泛地学习，深入地提问，仔细地思考，清楚地辨别，专心地实行。)　④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资治通鉴·唐纪·太宗贞观十七年》"审"句：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的话大大地错了。希望谨重考虑，不要误了大事！")

甚 shèn　副词，用于形容词、动词前，表示程度之深，相当于"很""特别""非常"等。如：①宋人有酤(gū)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甚"句：宋国人有个卖酒的，量酒很公平，待客很恭谨，酿出的酒味道很纯美，悬挂的酒旗很高。)　②王中郎甚爱张天锡。(《世说新语·言语》"甚"句：王中郎特别喜欢张天锡。)　③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世说新语·言语》"甚"句：梁国杨氏的儿子九岁，非常聪明。)

慎 shè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审慎，相当于"谨慎地""小心地"等。"慎勿〔毋〕"相当于"务必不要""千万不要"。如：①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论语·为政》"慎"句：多听听，保留疑难，谨慎地说出其馀足以自信的部分，就能减少错误；多看看，排除有怀疑的，小心地做其馀稳妥的部分，就会减少后悔。)　②凡人操行，不能慎择友，友同心恩笃，异心疏薄，疏薄怨恨，毁伤其行，一累也。(《论衡·累害》"慎"句：凡人立身处世，如果不能小心地选择朋友，朋友思想一致就恩情深厚，不一致就疏远冷淡，由疏远冷淡而产生怨恨，就诋毁中伤对方的行为，这是一种牵累。)　③四年，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gao)。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史记·高祖本纪》"慎"句：汉高祖四年，项羽就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说："小心守住成皋。如果汉兵来挑战，务必不要和他交战，不要让他向东进兵就成了。")　④今遣若等诛其猷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宋史·岳飞传》"慎"句：现在派遣你们讨伐他们的首领而安抚他们的部众，千万不要乱杀，以免损害主上爱护百姓的仁德。)

生 shē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施事者或动作对象是活着实施或接

受某一动作的，可译为“活〔着〕”等。如：①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史记·淮阴侯列传》“生”句：韩信就命令军中，不要杀广武君李左车，有能活捉他的人，赏千金。）　②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后汉书·班超传》“生”句：我不敢盼望能到达酒泉郡，只期望活着进入玉门关。）　③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三国志·蜀志·张飞传》“生”句：张飞到了江州，击破了刘璋的将领巴郡太守严颜的部队，活捉了严颜。）

胜 shē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施事者有能力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完”“尽”，经常与“不”连用作“不胜”，相当于“不完”“不尽”等。如：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胜”句：不耽误农业耕作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　②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诸葛亮集·草庐对》“胜”句：自从董卓以来，英雄豪杰全都兴起，占有几个州郡的人是数不尽的。）　③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古文观止·吊古战场文》“胜”句：尸体填满了大河的两岸，鲜血流满了长城的窟穴，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都一起变成了枯骨。〔这种情况〕可以说得完吗？）

盛 shè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程度之甚与范围之广，相当于“一味地”“大”“很多”。如：①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世说新语·雅量》“盛”句：羊孚不多答对，一味地吃饭，吃完了便告退。）　②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世说新语·任诞》“盛”句：七月七日，北阮大晒衣物，都是绫罗绸缎。）　③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世说新语·文学》“盛”句：〔康僧渊〕忽然到殷渊源处，正值有很多宾客。）

实 shí　（一）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情况的真实性，相当于“实在”“确实”等。如：①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世说新语·识鉴》“实”句：天下正乱，各种势力象老虎一样地你争我夺，消除混乱理顺局势，不该是您吗？然而，您实在是混乱国家中的英雄，安定局面下的奸贼。）　②景林寺，在开阳门内御道东。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洛阳伽蓝记·景林寺》“实”句：景林寺，在开阳门内驰道东边，经堂叠相呈现，房庑连成一片，朱漆栏杆在日光中闪耀，画栋雕梁迎接着微风的吹拂，确实是风景优美的地方。）　③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旧唐书·魏征传》“实”句：能有良好开端的人确实很多，能坚持到底的大概很少。）
（二）助词，用于前置宾语和后面的动词之间，不必译出。如：④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实”句：鬼神不亲近某一个人，只凭靠德行。）

时 shí　副词，用于动词或小句前，表示动作施行或情况发生的时间，相当于“按时”“当时”“那时”“及时”

“有时”等。如：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时”句：学习知识又按时复习，不是很愉快吗？）②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气无变。（《世说新语·雅量》“时”句：夏侯太初曾经靠着柱子写字，当时正碰上下大雨，霹雳击毁了他所靠的柱子，衣服烧焦了，〔他的〕脸色没有改变。）③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世说新语·文学》“时”句：等到王家会见女婿时，羊孚送弟弟一起去了，那时永言的父亲东阳还在场。）④锺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世说新语·言语》“时”句：锺毓兄弟两人小的时候，碰上父亲白天睡觉，就一起偷喝药酒。父亲及时发觉了，姑且假装睡着来观察他们。）⑤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汉书·霍光传》“时”句：霍光有时休息沐浴外出，上官桀就进宫代替他决断国事。）

始 shǐ　副词。（一）用于小句或谓语前，表示追溯往事，相当于“当初”等。如：①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史记·伍子胥列传》“始”句：当初，伍员和申包胥是朋友。）②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始”句：元帝当初过江时，对顾骠骑说：“寄居他人的地方，心里常常怀着羞惭之情。”）（二）用于谓语前，表示动作或情况发生在不久以前，相当于“刚”“刚刚”等。如：③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世说新语·文学》“始”句：锺会写《四本论》刚写完，很想让嵇公看一看。）④后正会，值积雪始晴。（《世说新语·政事》“始”句：后来正旦大会僚属，正遇上下了很久的雪刚刚放晴。）⑤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世说新语·言语》“始”句：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又出任内史，年龄刚刚二十九岁。）（三）用于动词、数量词前，表示频率低、数量少，相当于“才”等。如：⑥寒暑易节，始一反焉。（《列子·汤问》“始”句：由寒冷到暑热变换季节，才回一趟家。）⑦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次曰周七，子厚卒乃生。（《韩昌黎集·柳子厚墓志铭》“始”句：子厚有两个男孩，大的叫周六，才四岁，次子叫周七，子厚死后才出生。）（四）用于后面的分句，表示后面的事情是紧接着前面的情况发生的，相当于“才”。如：⑧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史通·叙事》“始”句：深刻理解这个意思，才可以谈论史书的编撰。）

使 shǐ　连词，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假定一个事实，相当于“假使”“结果”。如：①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韩非子·喻老》“使”句：假使天地间三年才长成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东西就太少了。）②及嘉宾死，皆著高屐（jī），仪容傲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世说新语·简傲》“使”句：等嘉宾一死，〔王

子敬兄弟〕都穿着高底木鞋，态度傲慢。让他们坐，他们都说："有事没功夫坐。"他们走后，郗公感慨地说："如果嘉宾不死，这帮老鼠敢这样！"）

试 shì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带有尝试性，相当于"试着""试探性地"等。如：①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试"句：军队阵列已经整齐，君王可以试着下来检阅她们。）②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试"句：希望您试着替我留意细看一遍。）③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世说新语·赏誉》"试"句：后来王济姑且试探性地问王汝南近来的时势，汝南的答对甚有见地也很有辞彩。）

是 shì　（一）代词，可代人或事物，可以作主语、谓语、宾语、名词修饰语等。相当于"这""这样""这件事""此""这个"等。如：①是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是"句：这是实现仁的方法。）②终而复始，日月是也。（《孙子兵法·势》"是"句：结束了而又开始，太阳和月亮就是这样。）③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左传·僖公九年》"是"句：周昭王南征而没有再回来，我就责问这件事。）（二）系词，用于主语、谓语之间，表示判断，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如：④问今是何世。（《陶渊明集·桃花源记》"是"句：问现在是什么朝代。）⑤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世说新语·文学》"是"句：殷仲堪是王东阳的女婿，也在坐。）（三）助词，用于前置宾语和后面的动词之间，不必译出。如：⑥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世说新语·规箴》"是"句：如今政治衰败人民疲弊，只担心灭亡，我哪里还敢说强盛？）⑦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是"句：你们要帮助我发现地位低下的人，推举贤才，使我能任用他们。）

适 shì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施行的时间不久，相当于"刚刚""刚才"等。如：①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汉书·贾谊传》"适"句：陛下的臣僚中虽然有象冯敬这样勇敢的人，但是他刚刚开口，匕首就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②狼咆哮谓先生曰："适为虞人逐，其来甚速，幸先生生我。"（《东田文集·中山狼传》"适"句：狼吼叫着对东郭先生说："我刚才被掌管山林的官吏追逐，他来得很急速，希望先生救我。"）（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恰逢其时，相当于"正""正好"等。如：③适欲遣书，会承来命，知诸君子复有漳渠之会。（《文选·应休琏：与满公琰书》"适"句：正要写信，碰巧接到来信，得知几位又将有漳渠的聚会。）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适"句：我心里的话很想说出来，但没有门径上达，正好遇上皇帝召问，就以此意推断李陵的功劳。）（三）用于动词前，表示对动作范围的限制，相当于"只是""只"等。如：⑤俱死无益于国，适

所以快敌耳。(《〈三国志·吴书·孙峻传〉注》"适"句：一块儿死去对国家没有好处，只是让敌人高兴的做法而已)。 ⑥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适"句：今天我虽然想雕琢自己，用美好的言辞修饰自己，没有好处，世俗之人不相信，只是足以讨取侮辱而已。) ⑦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适"句：虽说怀有隋侯珠、和氏璧一样的才华，行为象许由、伯夷一样高尚坚贞，然而终究不能以此为荣幸，只够被人嘲笑以自污而已。)

殊 shū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程度之甚，相当于"特别""根本""确"等。如： ①老臣今者殊不欲食。(《战国策·赵策四》"殊"句：我近来特别不想吃饭。) ②礼书所载黄彝，乃画人目为饰，谓之黄目。予游关中，得古铜黄彝，殊不然。(《梦溪笔谈·器用》"殊"句：礼书上所记载的黄彝，是在上面画人眼来做装饰，叫作"黄目"。我游历关中，得到的古代铜制黄彝，根本不是这样。) ③俯瞰其下，亦有危壁，泉从壁半突出，疏竹掩映，殊有佳致。(《徐霞客游记·游武夷山日记》"殊"句：低头看山下，也有险峻的山壁，泉水从山壁半腰喷出，稀疏的翠竹掩映着泉水，确有一派美妙的景致。)

孰 shú　　代词，用来询问，可问人，也可问事物，可作主语、兼语、宾语，偶或可作名词修饰语，常用于抉择询问，相当于"谁""什么""哪一个""什么样的"。如： ①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孰"句：〔梁襄王〕突然问："天下从哪里获得太平？"我回答说："从统一。""谁能统一天下？"回答说："不嗜杀成性的人能统一天下。") ②白玉不毁，孰为珪璋？(《庄子·马蹄》"孰"句：一块完整的玉石一点不损毁，什么用来做成珪(guī)璋这些玉器呢？) ③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汉书·司马迁传》"谁"句：俗谚说："为谁干这些？让谁听这些？") ④孰继？继子般也。(《公羊传·闵公元年》"孰"句：继承谁？继承子般。) ⑤圣王有百，吾孰法焉？(《荀子·非相》"孰"句：圣明的古代君王上百个，在他们之中我效法哪一个呢？) ⑥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此而归尔。(《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孰"句：你离开我而回去，我跟谁呆在这里？我也跟随你回去吧。) ⑦孰臣而敢杀其君乎？(《说苑·君道》"孰"句：什么样的臣子敢于杀害他的国君呢？)

属 shǔ　　助词，用于人称代词后，表示多数，相当于"们"。用于名词后，或用于"名词十之"后，相当于"……之类"等。如： ①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史记·项羽本纪》"属"句：夺项羽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刘邦〕，我们很快就要被他俘虏了。) ②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汉书·元后传》"属"句：你们父子宗族，承蒙汉代朝

廷的力量，富贵接连好几世。）　③君欲小与众异，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属耳。（《汉书·两龚传》“属”句：你想多少〔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以求在外面获得声誉，你不过是申徒狄之类的人罢了。）　④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史记·封禅书》“属”句：〔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的神山龟鱼之类。它的南边有玉堂、璧门、大鸟之类。）

率 shuài　（一）助词，用于动词前，无义。如：　①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尚书·汤誓》“率”句：夏桀重役百姓之力，残害各地人民。）（二）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大致如此，或表示情况的划一，相当于“大体上”“大致”“大都”“一律”“全都”等。如：　②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馀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淮南子·主术训》“率”句：天地间的根本大计是，三年耕种要馀下一年的粮食，大体上九年间应有够三年食用的粮食积蓄。）　③觊历汉魏，时献忠言，率如此。（《三国志·魏书·卫觊传》“率”句：卫觊经历了汉、魏两朝，经常进献忠言，大致都象这样。）　④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率”句：到了梁陈时期，〔诗〕大都是吟诵风花雪月罢了。）　⑤吴主饮群臣酒，不问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资治通鉴·晋纪·武帝泰始九年》“率”句：吴王请群臣饮酒，不管能饮与否，一律以饮七升为限。）　⑥有诸少年出与为礼，率十三四岁。（《聊斋志异·晚霞》“率”句：有几个少年出来行礼相见，全都是十三四岁。）

谁 shuí　代词，用来询问，主要用于问人，也可问事物，可作主语、兼语、宾语、谓语、名词修饰语等。“谁”作动词宾语或兼语，多在动词前，作介词宾语，多在介词前，也有在其后的，汉代以后，在后者渐多，相当于“谁”“什么”“哪一个”。如：　①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史记·萧相国世家》“谁”句：您如果百年以后，谁可以代替您呢？）　②若子死，将谁使代子？（《韩非子·说林上》“谁”句：如果您死后，打算让谁代替您？）　③子产若死，其使谁嗣之？（《吕氏春秋·乐成》“谁”句：子产如果死了，将让谁继承他？）　④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史记·梁孝王世家》“谁”句：太后说想立梁王，梁王如果死了，想立谁？）　⑤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吕氏春秋·制乐》“谁”句：民众死了，我当谁〔的〕国君呢？）　⑥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史记·留侯世家》“谁”句：陛下跟谁一起夺取天下呢？）　⑦追我者谁也？（《孟子·离娄下》“谁”句：追我的是谁呢？）　⑧上堂见玉，曰：“谁之玉也？”（《说苑·指武》“谁”句：上堂看见了玉，问：“是谁的玉呢？”）　⑨敢问人道谁为大？（《礼记·哀公问》“谁”句：请问人间事务中什么最重要？）

数 shuò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频仍，相当于“多次”“频繁”

等。如： ①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史记·陈涉世家》“数”句：扶苏因为多次直言劝诫〔皇上〕的缘故，皇上就让他到塞外领兵。） ②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资治通鉴·唐纪·太宗贞观十年》“数”句：法律条令不能频繁变更，频繁变更就会烦琐，官长不能全都记住，而且前后又容易有差异相背的地方，官吏就会利用它去作坏事。）

私 sī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在不公开的状态下或以非官方的形式进行，相当于“私自”“私下里”等。如： ①有仕於此，而子悦之，不告於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则可乎？（《孟子·公孙丑下》“私”句：有个士人在这里，您很喜欢他，不禀报国王就私自把您的俸禄官位给了他；这个士人呢，也没有国王的任命就私自从您那里接受了这些，那么可以吗？） ②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柳河东集·晋文公问守原议》“私”句：不公开地在朝廷上讨论，却私下里在宫闱中商议。）（二）用于动词前，表示行为的不公正、不全面，相当于“偏私”“片面”等。如： ③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庄子·大宗师》“私”句：天不偏私地覆盖着，大地不偏私地负载着，天地难道就会偏私地使我贫困吗？） ④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吕氏春秋·序意》“私”句：片面地考察〔情况〕会使眼睛变瞎，片面地听取〔意见〕会使耳朵变聋，片面地谋划〔事情〕会使心志迷乱。）

斯 sī （一）代词，可代人、事、物，可作主语、宾语、名词修饰语，相当于“这”“这样”“此”“这个”等。如： ①江水又东，经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水经注·江水》“斯”句：江水又向东流，经过广溪峡，这是三峡的开头。） ②为主计若斯，亦未可谓尽忠也！（《盐铁论·西域》“斯”句：为君主出谋划策象这样，也不能算竭尽忠诚呵！） ③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世说新语·言语》“斯”句：孙皓问：“你的字是仲思，所思的是什么？”回答说：“在家里思孝，事奉国君思忠，对朋友思信，如此而已。”） ④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世说新语·方正》“斯”句：叔治因为即将离别，眼泪鼻涕止不住地流，仲智对此很生气，说：“这个人是女人，跟人辞别，只会啼哭。”）（二）副词，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承接，相当于“就”。如： ⑤知惧如是，斯不亡矣。（《左传·成公七年》“斯”句：知道惊惧象这样，就不会亡国。） ⑥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斯”句：如果知道这种行为不合于义，就赶快终止得了，干么还等到第二年〔才终止〕？）

似 sì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情况的仿佛，或这一情况类似另一情况，相当于“似乎”等。“似……者”这一固定格式，相当于“好象……似的”。如： ①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

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尽心上》“似”句：公孙丑说：“道倒是很高了很好了，好象登天一样，似乎不可攀登；为什么不使它变成可以攀登得上因而使人每天不停地去努力呢？”）②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史记·陆贾传》“似”句：于是南越王尉他问陆贾说：“我和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贤明？”陆贾说：“您似乎贤明些。”）③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似”句：孔子在本乡显出非常恭顺的样子，好象不能说话似的。）

夙 sù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或情况发生在早晨或早些时候，相当于“早”“早年”“素来”等。如：①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dá）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史记·孝文本纪》“夙”句：如今我早起晚睡，为国家大事操劳，为千万民众忧虑，为他们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不曾有一天忘怀。）②少好学，夙成。（《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纪》“夙”句：〔曹髦〕从小喜好读书，早年就有了成就。）③许靖夙有名誉。（《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夙”句：许靖素来有名望声誉。）

速 sù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施行的迅速，相当于“很快”“尽快”等。如：①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是不材之木也。（《庄子·人间世》“速”句：用它来做船便沉没，用它来做棺椁便很快腐朽，用它来做器具便很快损坏……这是不成材的树木。）②狼请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图！”（《东田文集·中山狼传》“速”句：狼请示〔东郭先生〕说：“情况很紧急了，希望先生尽快想法搭救！”）

素 sù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情况的存在具有一贯性，相当于“一向”“向来”“素来”。如：①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史记·陈涉世家》“素”句：广一向爱护部下，士兵大都愿意为他效力。）②王右军素轻蓝田。（《世说新语·仇隙》“素”句：王右军向来轻视蓝田。）④修素肥壮，堪忍楚毒。（《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天监二年》“素”句：赵修素来肥壮，能容受痛楚。）

虽 suī　连词。(一)用于让步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确认某一事实，以引起后一分句的转折，相当于“虽然”。如：①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世说新语·方正》“虽”句：蓝田喜爱文度，虽说已经很高了，还抱起放在膝盖上。）②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世说新语·文学》“虽”句：〔僧意〕又问：“圣人象柱子吗？”王苟子说：“象计算时用的筹码。本身虽然无情，运转它的人有情。”）(二)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一种夸张的假设，相当于“即使”。如：③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公输》“虽”句：即使杀掉我，也不能灭绝〔抵御你们的力量〕。）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虽”句：把这种志向加以发扬，即使与日月争光，也

是可以的。)

遂 suì　副词。(一) 用于动词前，表示事情的彻底完成和最终结果，相当于"最终"等。如：①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遂"句：诸侯因此知道他不能最终完成霸业。) ②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说苑·建本》"遂"句：民众如果怨恨他们的上层，国家不最终灭亡的，从没有过。) ③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遂"句：曹操比起袁绍，名声小兵民少，然而曹操最终能够战胜袁绍，转弱为强的原因，不只是客观上的时机好，也是人的谋略高明。) (二) 用于动词前，表示情况的持续，相当于"一直"。如：④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史记·高祖本纪》"遂"句：等到高祖发迹，就一直不知道老人在什么地方。) ⑤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遂"句："遂"句：〔王丞相、殷中军、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就在一起清谈，一直谈到三更。) (三) 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后一件事是承接着前面的事情而出现的，相当于"因而""就"等。如：⑥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左传·隐公元年》"遂"句：庄公是难产而生下来的，把他母亲姜氏惊吓了一下，所以取名寤生，〔姜氏〕因而讨厌他。) ⑧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世说新语·文学》"遂"句：〔郭象〕看见向秀对《庄子》的注没有在世间广为流传，就偷来做为自己的注了。) (四) 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动作仍然延续原来的状况和意图，相当于"还是"。如：⑨彭城王有快牛，至爱惜之。王太尉与射，赌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则不论；若欲啖(dàn)者，当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废啖，又存所爱。"王遂杀啖。(《世说新语·汰侈》"遂"句：彭城王有一头快牛，非常珍惜它。王太尉跟彭城王射猎，赌赢后得到了这头快牛。彭城王说："你想自己乘用它，就不说了；如果想吃它的肉，我愿意用二十头肥牛代替它。这样，既不影响你吃肉，又保存了我的爱牛。"王太尉还是把它宰杀吃掉了。) ⑨任让在帝前戮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帝泣曰："还我侍中！"让不奉诏，遂斩超、雅。(《世说新语·政事》"遂"句：任让在成帝面前要斩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成帝哭着说："还给我侍中！"任让不听诏令，还是斩了刘超、钟雅。)

所 suǒ　(一) 代词。(A) 用于动词前，与动词一起构成名词性短语，指代动作的对象，有时也可指代处所等；"所"在动词"生"等前，还可指代动作的施事者，这种情况，先秦偶见，六朝后频见。"所"字短语可作主语、谓语、宾语、名词修饰语等。相当于"……的东西""……的事""……的人""……的地方"等。如：①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孟子·梁惠王上》"所"句：那么王最想得到的东西可以知道了。) ②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史记·平原君列传》"所"句：这是百代的怨仇，又是赵国

引为羞耻的事。） ③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句：昏庸的君主奖赏自己喜欢的人而惩罚自己厌恶的人。） ④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所”句：殽山的北陵，是文王避风雨的地方。） ⑤初，明帝少失所生，为太后所摄养。（《南史·孝武昭路太后传》“所”句：当初，明帝少年时就失去了生他的人（生母）。）（B）用于介词前，与介词构成所字短语，指代介词的宾语，相当于“……的目的”“……的人”“……的原因”“……的地方”等。如： ⑥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战国策·赵策》“所”句：〔我〕见将军的目的，是想救赵国。） ⑦问其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孟子·离娄下》“所”句：〔他的妻子〕问跟他一起吃喝的人，〔说〕都是富贵的人。） ⑧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士，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文选·诸葛孔明：出师表》“所”句：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先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士，这是后汉衰败的原因。） ⑨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靖节先生集·桃花源记》“所”句：见渔人，都很吃惊，问〔他〕从来的地方。） （二）助词，用于被动句动词前，构成“…为…所”的句式，相当于“被…所…”。如： ⑩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史记·淮阴侯列传》“所”句：我后悔没采用蒯通的计策，竟被小儿妇女所欺骗。） ⑪太祖为流矢所中。（《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句：太祖被飞箭所射中。） （三）不定数词，用于数词、量词、数量短语后表示约数，相当于“来”。如：⑫自后，宾客绝百所日。（《世说新语·规箴》“所”句：从此以后，拒绝宾客一百来天。） ⑬父去里所，复还。（《史记·留侯世家》“所”句：老人走了一里来地，又回来了。） ⑭皆生毛，长一寸所。（《汉书·郊祀志下》“所”句：都长了毛，毛一寸来长。）

他〔它〕 ta 代词，可作主语、谓语、宾语、名词修饰语，相当于“其他的”“别的”等。“他日”表示另外一个时候，可根据上下文意灵活译出。如： ①拜见在近，千万自爱！他留面陈。（《王文公文集·与孟逸秘校手书之一》“他”句：很快就要拜见您了，务必保重！其他的话留在见面时详谈。） ②夫秦非他，周时之建国也。（《吕氏春秋·悔过》“他”句：秦国不是别的，是周朝时封立的国家。） ③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庄子·让王》“他”句：〔我只知道伊尹〕富于力量能忍受屈辱，我不知道他别的〔方面〕。） ④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辄引以它端。（《世说新语·雅量》“它”句：太傅想安慰他失去了官职，安南就用别的话题引开。） ⑤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吕氏春秋·审己》“他”句：齐国攻打鲁国，索要岑鼎，鲁君载去了别的鼎。） ⑥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世说新语·贤媛》“他”句：有一天，嵇康、阮籍两个人来了，山公的妻子让山公留他们两人住下，准备了酒肉。）

太〔泰〕tài　副词，多用于形容词前，表示性状超出一定限度，相当于“过于”“太”等。如：①嘉固言董贤泰盛。（《汉书·息夫躬传》“泰”句：王嘉坚持说董贤过于显贵。）②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蚤。（《世说新语·言语》“太”句：你年纪不到三十，已享有万石俸禄，也太早了点。）③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世说新语·文学》“太”句：本来都是从同一个根子生长出来的，煎熬我何必过于着急呢？）

傥〔党、倘〕tǎng　（一）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施行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相当于“偶然”“或许”等。如：①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傥现，是无世而不尝有之。（《荀子·天论》“傥”句：有日蚀和月蚀，有不测之风雨，怪星的偶然出现，这些都是没有哪个时代不曾出现的。）②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史记·淮阴侯列传》“党”句：吕后想召见韩信，恐怕他或许不就范，就跟萧相国商量。）（二）连词，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假设，相当于“倘若”“如果”等。如：③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十三年》“倘”句：倘若〔刘将军〕能屈尊来此，真是太符合我的愿望了。）④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李太白全集·与韩荆州书》“傥”句：如果国家出现了危难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愿意贡献我微贱的身躯。）

忝 tiǎ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谦敬，现代汉语中没有适当的词对译。如：①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当选士报国。尔何人，而伪诈无状！”（《后汉书·史弼传》“忝”句：史弼非常愤怒地说：“我作为太守肩负重任，现应选拔贤才来报效国家；你算什么人，却弄虚作假胡作非为！”）②臣忝当大任，义在安国。（《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忝”句：我身负重任，理当安国定邦。）③公戎车犯正，下官忝率六军，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世说新语·方正》“忝”句：你武装反叛朝廷，我率领六军〔平叛〕，而朝廷军队出师不利，因此只好对不起你了。）

通 tōng　副词。（一）表示动作由几个施事者共同施行，相当于“共同”“一起”等。如：①于是诏诸尚书通议。（《后汉书·朱晖传》“通”句：于是〔汉章帝〕下令召集各位尚书共同商讨这件事。）②历怫（fú）然廷诘皓曰：“属通谏何言？而今复背之！”（《后汉书·来历传》“通”句：来历怒冲冲地在宫廷上责问薛皓说：“刚才一起进谏时你说些什么，而现在却又来推翻它？”）（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涉及宾语的全部，相当于“全都”“全而”等。如：③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韩昌黎全集·师说》“通”句：李家的孩子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儒家的六种经典全都学习过了。）④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通”句：我年轻，未能全面掌握官吏的业务。）

同 tó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

动作由几个施事者共同施行，相当于“一同”“共同”“一起”等。如：①重进，周太祖之甥，与帝同事周室。(《宋史纪事本末·太祖代周》“同”句：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跟宋帝曾一同服事后周朝廷。)②陈实、韩韶同看其事。(《后汉书·方术传上·成公传》“同”句：陈实、韩韶共同看到了这件事。)③经宿别去，偕妻同返。(《聊斋志异·娇娜》“同”句：过了一夜告别离去，偕同妻子一起回家。)

投 tóu　介词，介绍动作的时间或处所，相当于“到……时”“到”“向”。如：①涉单车敺(qū)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汉书·原涉传》“投”句：原涉独自赶着车去茂陵，到天黑时进入其里弄住宅。)②秣马饮食，以夜进兵，投晓攻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投”句：〔兵士〕喂马、吃饭，准备夜里进军，到天亮攻城。)④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世说新语·容止》“投”句：温忠武与庾文康向陶公求救。)

徒 tú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没有成效，相当于“白白地”“徒然”等。如：①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徒”句：想要把和氏璧交给秦国，又恐怕得不到秦国的城邑，白白地被欺骗。)②今空守孤城，徒费财役。(《资治通鉴·宋纪·文帝元嘉三十年》“徒”句：如今守着一座孤城，徒然浪费财力人力。)(二)用于谓语前，表示动作仅限于某种范围，相当于“只是”等。如：③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徒”句：强悍的秦国不敢出兵攻打赵国，只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④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吕氏春秋·用民》“徒”句：不能按规律办事，而只是增加自己的威风，威风越大，人民越不听从。)

往 wǎng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前往的方向，相当于“前往”“前去”等。如：①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庄子·秋水》“往”句：惠子做了魏国的宰相，庄子前往拜见他。)②女其将卫士而往卫冢乎?(《谷梁传·僖公十年》“往”句：你带着卫兵前去保卫陵墓吧!)③灵公心怍(zuò)焉，欲杀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公羊传·宣公六年》“往”句：晋灵公心里惭愧，想杀死他，因此就派勇士某某前去刺杀他。)(二)“往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频繁与范围之广，相当于“处处”“到处”等。如：④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史记·陈涉世家》“往”句：第二天，士卒中处处窃窃私语，同时都指着看陈胜。)⑤秋七月，地震，往往涌泉出。(《汉书·武帝纪》“往往”句：秋天七月，发生了地震，到处有泉水涌出。)

妄 wàng　(一)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行为的不合道义与规范，相当于“乱”“随便”等。如：①汝勿妄语，灭吾门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妄”句：你不要乱说，要诛灭咱们全家的!)②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

(《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妄"句：高兴时不能宽容有罪的人，愤怒时不能杀戮无辜的人，喜怒时的事情，不能随便处理。)（二）连词，用于抉择问句，相当于"还是"。"妄其""忘其"同此。如：③先生老悖(hun)欤，妄为楚国妖欤？（《新序·杂事》"妄"句：您是老糊涂呢，还是楚国的妖孽呢？）④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国语·越语下》"妄"句：是道理本来如此呢，还是〔你〕欺骗我呢？）⑤不识三国之憎秦而爱怀邪，忘其憎怀而爱秦邪？（《战国策·赵策四》"妄"句：不知道〔赵、齐、楚〕三国是憎恨秦国而爱护怀人呢，还是憎恨怀人而爱护秦国呢？）

微 wēi　（一）副词。(A) 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是不公开的，相当于"秘密""暗中"等。如：①上始为微行。（《汉书·成帝纪》"微"句：皇帝开始秘密外出。）②解使人微知贼处。（《汉书·游侠传》"微"句：郭解派人暗中探知犯人隐藏的地点。）(B) 用于谓语前，表示程度较低，相当于"稍微""轻声"等。如：③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世语〉》"微"句：〔魏明帝〕是秦始皇、汉武帝一类的人，才能稍微差些罢了。）④琥珀最贵者名曰瑿(yī)，红而微带黑。（《天工开物·珠玉》"微"句：琥珀中最贵重的一种叫瑿，红色稍微带点黑色。）⑤王见谢，甚说(yuè)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世说新语·文学》"微"句：王珣见谢幼舆以后，非常喜欢他，完全不再管王大将军，〔两人〕就轻声谈叙直到天亮。）（二）连词，表示假定某个事实不存在，相当于"如果没有""如果不是"。"微独"相当于"不仅"。如：⑥微二子者，楚不国矣。（《左传·哀公十六年》"微"句：如果没有他们两位，楚国将不成其为国了。）⑦微虞卿，赵以亡矣。（《新序·善谋》"微"句：如果不是虞卿，赵国已经灭亡了。）⑧然而以义理斫削，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禹。（《吕氏春秋·离俗》"微"句：然而用义理来严格剖析〔人的一生〕，连神农、黄帝尚且有可非议的地方，不仅是舜和禹如此。）⑨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战国策·赵策四》"微"句：不仅赵国，其他诸侯国的子孙被封传几代的还有存在的吗？）

为 wéi　（一）连词，用于抉择问句的后一分句之首，或分别用于两个分句之首，相当于"还是"。如：①助教顾良戏之曰："汝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河水之河？"（《北史·何妥传》"为"句：助教顾良跟他开玩笑说："你姓何，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②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世说新语·纰漏》"为"句：便问人说："这还是茶还是茗？"觉得人们脸色异样，就自己申明说："刚才是问饮料还是热的还是冷的罢了。"）（二）助词，用于带有疑问词语的问句之末，相当于"呢"。如：③世方乱，安以富为？（《三国志·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为"句：世道正乱，哪里用得着财富呢？）④王室

如毁，雄安用生为？（《晋书·易雄传》"为"句：王室如遭焚毁，我还为什么要活着呢？）　⑤何恐侏儒为？（《汉书·东方朔传》"为"句：为什么要吓唬那些个子矮小的宫人呢？）

唯〔惟〕 wéi　（一）连词。（A）用于让步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让步，相当于"即使""虽然"。如：①唯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汉书·韩信传》"唯"句：即使是我韩信，也认为您不如他。）　②唯睢，亦得谒。（《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唯"句：即使是范睢，也能谒见〔张相国〕。）（B）用于因果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原因，相当于"由于""因为"。如：③卫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败于荧。（《左传·成公十六年》"唯"句：卫懿公由于不取下他的旗子，所以在荧地战败。）　④唯无亲，故能兼翼。（《国语·晋语》"唯"句：因为没有私情，所以能兼并翼城。）（二）副词。（A）用于主语或谓语前，表示限定范围，相当于"只有"等。如：⑤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qiǎo）然变色："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唯"句：大家都面对面地流眼泪，只有王丞相变了脸色严肃地说："应当共同努力效忠王室，光复国土，哪里至于象楚囚那样相对而坐呢！"）　⑥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论语·子张》"唯"句：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⑦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世说新语·贤媛》"唯"句：我当年可以做为朋友的，只有嵇康、阮籍二人罢了。）　（B）用于前置宾语之前，表示限制与强调，构成"唯……是……"的固定格式，相当于"只"。如：⑧小国将君是望，敢不唯命是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唯"句：小国将仰望君，敢不只听从他的命令！）　⑨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年》"唯"句：只看我所骑马的马头！）　（C）用于应对，表示同意对方的意见，或表示对彼方询问的肯定，相当于"是"等。如：⑩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荣趎曰："唯。"（《庄子·庚桑楚》"唯"句：老子问："您从楚国那里来吗？"南荣趎说："是。"）（三）助词。（A）用于句首，表示希冀，相当于"希望""请"等。如：⑪愚臣亡识，唯陛下财察。（《汉书·晁错传》"唯"句：臣下没有见识，希望陛下裁定。）　⑫余必废之，何齐之有？唯君图之！（《左传·昭公十三年》"唯"句：我一定要废掉它，有什么同盟？请您加以考虑。）（B）用于谓语前，表示强调，相当于"是"，或可不译。如：⑬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学而》"唯"句：公西华说："这正是弟子学不到的。"）　⑭人心惟危。（《尚书·大禹谟》"惟"句：人心是坏的。）

委 wěi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假定情况的确实，相当于"如果确实"。如：问世儒不知圣，何以知今无圣人也？世人见凤凰，何以知之？既无以知之，何以知今无凤凰也？委不能知有圣与无，又不能别凤凰是凤与非，则必不能定今太平与未平也。（《论衡·宣汉》"委"句：问俗儒既然不能识别圣人，又怎么能知道今天

没有圣人呢？一般人看见了凤凰，又怎么能识别呢?既然没有办法识别，又怎么知道现今没有凤凰呢？如果确实不能知道有没有圣人，又不能辨别是不是凤凰，那么也一定不能肯定如今是太平还是不太平。）

伪 wěi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虚伪和不真实，相当于“假装”等。如：①然则舜伪喜者与？（《孟子·万章上》“伪”句：那么舜是伪装高兴的吗？）②公用贾诩计，伪许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伪”句：曹操采用了贾诩的计谋，假装答应他。）③今山泽之兽，无黠（xiá）于麋。麋知猎者张网前而驱己也，因还走而冒人，至数。猎者知其诈，伪举罔而进之，麋因得矣。（《战国策·楚策三》“伪”句：山林湖泊地带的野兽，没有比麋鹿更狡猾的。麋鹿知道猎人张网向前驱赶自己，因而转头奔跑冲撞猎人，〔这样〕达数次之多。猎人知道麋鹿的狡诈，假装举起网而诱使它进来，麋鹿终于被捕获了。）

猥 wěi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施行超出正常范围或出乎意料之外，相当于“错误地”“盲目地”“突然之间”“冒然”等。如：①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猥”句：而且功臣有的尚未录用，饥寒的尚未赈济，而却错误地分割土地使子弟丰厚，加高爵位使妃妾荣宠，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②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文选·扬子幼：报孙会宗书》“猥”句：然而我遗憾的是您并不深思事情的来龙去脉，却盲目地跟随世俗之见来加以褒贬。）③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叛。（《汉书·王莽传》“猥”句：貉人违犯法令，不是从侯驺时开始的。即使〔侯驺〕有二心，应该让州郡暂且安抚他。现在突然之间把大罪加在他身上，恐怕他很快就会叛变。）④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王右丞集·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猥”句：你正在研读经书，〔我〕不敢冒然相扰。）（二）用于谓语前，表示谦敬，可不必译出，或相当于“不称职地”等。如：⑤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文选·诸葛孔明：出师表》“猥”句：先帝不因为我卑贱鄙陋，竟屈驾来此，三次到茅屋中拜访我。）⑥臣弟永宝，猥任定州。（《资治通鉴·梁纪·武帝中大通六年》“猥”句：我弟弟永宝，不称职地担任定州长官。）

为 wèi　介词。（一）介绍动作的对象、目的、原因，相当于“替”“给”“对”“因为”等。如：①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为”句：现在大王事奉高祖非常谨敬，可是高祖无礼，请允许我们替大王杀掉他。）②为天下兴利除害。（《史记·陆贾列传》“替”句：替天下百姓兴办好事消除祸端。）③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世说新语·言语》“为”句：魏明帝给外祖母在甄氏建造了一座华

丽的房屋。） ④不足为外人道也。（《陶渊明集·桃花源记》"为"句：不必对外边的人说起。） ⑤具为天子言之。（《史记·大宛列传》"为"句：全都对天子说了。） ⑥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为"句：才知道文章应该为了反映时代而著述，诗歌应该为了表现时事而创作。） ⑦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谷梁传·僖公三十三年》"为"句：因为什么对着我的军队哭哭啼啼的呢？） ⑧公曷为出若言？（《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为"句：您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二）用于被动句中，介绍施动者，相当于"被"；有的"为"后没有出现施动者，也相当于"被"；有的"为"介绍施动者，其后的动词前面有"所"，构成"为……所……"的被动句式。如：

⑨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子·五蠹》"为"句：兔子不能再得到，而自身被宋国人讥笑。） ⑩战而不克，为诸侯笑。（《左传·襄公十年》"为"句：打仗而不能取胜，被诸侯耻笑。） ⑪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左传·文公十三年》"为"句：〔晋人〕如果背弃自己的誓言，我死了，妻儿被杀，对君王没有好处，这是无可后悔的。） ⑫和娇为武帝所亲重。（《世说新语·方正》"为"句：和峤被武帝所宠爱和器重。） ⑬既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世说新语·言语》"为"句：〔张天锡〕被苻坚俘获以后，被任用为侍中。）

未 wèi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或单独出现，表示动作或情况尚未发生或存在，相当于"没""没有"等。如： ①王珣问殷曰："陕西何故未有处分？"殷曰："已有人。"（《世说新语·识鉴》"未"句：王珣问殷仲堪说："陕西为什么没安排〔适当的人选〕？"殷说："已经有人了。"） ②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世说新语·言语》"未"句：梁国杨姓家的儿子才九岁，非常聪明。孔君平拜访他父亲，父亲不在家，就呼唤他出来。他为客人摆上水果，水果中有杨梅，孔君平指着杨梅对这个孩子说："这是你们家的水果。"孩子随声回答说："没有听说孔雀是你们家的鸟。"） ③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孟子·公孙丑下》"未"句：有人问〔孟子〕说："〔您〕鼓励齐国讨伐燕国，有这回事吗？"回答说："没有。"）（二）用于数词、表示数量或年龄的词语前，表示尚未达到某种数量或年龄，相当于"不到""没有到"等。如： ④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世说新语·文学》"未"句：〔习凿齿〕不到三十岁，就被任用作荆州治中的官了。） ⑤王弼未弱冠，往见之。（《世说新语·文学》"未"句：王弼不到二十岁时，去拜见何晏。） 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徂。（《文选·诸葛孔明：出师表》"未"句：先帝创建帝业没有到一半，而中途辞世了。）（三）用于句末，与前面的句子一起构成反复问句，相

当于“没有”等。如： ⑦武帝每见济，辄以湛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世说新语·赏誉》“未”句：武帝每次见王济，就用王湛跟他开玩笑，说：“你的傻叔叔死了没有？”） ⑧永泰元年，城陷，缚思忌，问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宁为南鬼，不为北臣。”（《南齐书·魏虏传》“未”句：永泰元年，城市陷落，捉住了思忌，问他说：“现在打算投降了没有？”思忌说：“宁可做南边的鬼，决不做北边的臣。”）（四）用于动词、助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对动作、动作的可能性或性状等的否定，相当于“不”。如：⑨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世说新语·政事》“未”句：皋陶制定了刑罚的条令，不算不贤；孔丘任司寇的职务，不算不仁。） 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左传·庄公十年》“未”句：鲁庄公正要追击，曹刿说：“不行。”） ⑪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未”句：人固然不容易被了解，要了解一个人也不容易呀。）

恶 wū 代词，可问处所，也可表反诘；可作动词宾语、介词宾语、名词修饰语和状语，相当于“哪里”“什么”“怎”等。如： ①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恶”句：〔做官的应〕是百姓的父母表现在哪里呢？） ②所谓道恶乎在？（《庄子·知北游》“恶”句：所说的道存在在哪里？） ③吾将恶许用之？（《墨子·非乐上》“恶”句：我将在什么地方用这些舟船呢？） ④且王攻楚将恶出兵？王将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史记·春申君列传》“恶”句：再说君王攻打楚国打算〔从〕哪里出兵？君主打算向仇敌韩、魏借路吗？） ⑤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墨子·公孟》“恶”句：你不能管好自身，怎能治理国家的政事？）

无 wú （一）代词，表示否定的无指代词，相当于“没有谁”“没有什么”等。如： ①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史记·高祖本纪》“无”句：〔我〕给很多人相过面，没有谁比得上季的相貌。） ②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韩非子·难一》“无”句：我的矛很锋利，在各种东西中没有什么〔它〕不能穿透的。）（二）副词。(A)用于谓语前，表示对存在或动作的否定，相当于“没”“没有”。如： ③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下》“无”句：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往下流的。） ④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左传·成公三年》“无”句：将尽力拼死，没有三心二意。） ⑤吾无与犀首言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无”句：我没有跟犀首说过。）(B)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对动作、性状的否定，相当于“不”等。如： ⑥因令韩庆入秦，而使三国无攻秦。（《战国策·西周策》“无”句：因此派韩庆去秦国，使三国不进攻秦国。） ⑦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学而》“无”句：贫困却不谄媚，富贵却不骄矜。） (C)用于谓语前，表示禁戒，相当于“不要”。如： ⑧谓其二子曰：“无顾！”（《左传·宣公十二年》“无”句：〔逢大

夫〕跟他的两个儿子说："不要回头看!"） ⑨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左传·隐公元年》"无"句：不如早点给他安排个地方，不要让他的势力蔓延滋长。） （D）用于意义相反的两个词或短语前，表示"无论如何"之义，相当于"无论"。如： ⑩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论语·尧曰》"无"句：君子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势小势大，都不敢怠慢。） ⑪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文选·诸葛孔明：出师表》"无"句：我以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都应拿来请教他们，然后再实行。） ⑫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史记·游侠列传》"无"句：然而天下的人无论贤良的还是不好的，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仰慕他的名声。）（E）用于句尾，与前面的句子一起构成反复问句，相当于"没有"等。如： ⑬夫人下处如法无？（《酉阳杂俎·僧侠》"无"句：夫人住处如法安排了没有？）

毋〔勿〕wù （一）副词。（A）用于谓语前，表示禁戒，相当于"不要"。如： ①先生毋言矣。（《韩非子·内储说上》"毋"句：先生不要说了。） ②毋妄言，族矣！（《史记·项羽列传》"毋"句：不要胡说，要诛灭全族的！） ③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毋"句：将军不要失去良机！时机不容许迟疑。）（B）用于动词前，表示对动作的否定，相当于"不"。如： ④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毋"句：燕赵的城池可以不攻打就归降了。） ⑤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文选·枚叔：上书谏吴王》"勿"句：想让别人不听到，不如不说；想让别人不知道，不如不做。） （C）用作反复问句的后一分句，两分句间用抉择连词"将"，相当于"不"。如： ⑥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内即言内，入乎将毋？"（《韩诗外传·卷四》"毋"句：客说："在外就说外边的事，在内就说内部的事，是进去呢还是不〔进去〕?"） （二）代词，否定性的无指代词，相当于"没有谁"。如： ⑦郡中毋声，毋敢夜行。（《汉书·酷吏列传》"毋"句：郡中没有声响，没有谁敢晚上走路。） ⑧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史记·魏其武安后列传》"毋"句：遍观宗室中人，窦氏族人没有谁比得上窦婴贤良的。）

务 wù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动作的必要与必须，相当于"必须""务必""一定要"等。如： ①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尚书·泰誓下》"务"句：培养美德必须使它滋长，铲除邪恶必须使它除根。） ②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孟子·告子下》"务"句：君子的服事国君，务必引导他的国君掌握正确的治国之道。） ③务使以时益种五谷。（《汉书·西域传下》"务"句：一定要使他们按照时令播种五谷。）

昔 xī 副词，用于句首，表示事情发生在过去，相当于"从前"等。"昔者"义同。如： ①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世说新语·言语》"昔"句：从前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把

殷商那些顽固不化的遗民迁往洛邑。）

②郭大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妇嘱小郎。"（《世说新语·规箴》"昔"句：郭氏很愤怒，对平子嚷道："从前婆母死时，把你这个小叔子托付给我了，而不是把我托付给你。"） ③昔者吾舅死于虎。（《礼记·檀弓下》"昔"句：从前我公爹死于老虎。）

悉 xī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全部施事者都实施某种动作或具有某种特性，或表示动作涉及受事者全体，相当于"全都""都""都是""全部"等。如：①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悉"句：我认为宫里的事情，无论大小，全都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去执行，必定能补救欠缺和遗漏，有很大好处。） ②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晋书·宣帝纪》"悉"句：关中地区多长蒺藜，晋宣帝派二千名士兵穿着软木做的平底木屐在前头开路，蒺藜都扎在木屐上，然后骑兵步兵一道前进。） ③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赪(cheng)壁，霞举。若红云秀天二岫，更为殊观矣。（《水经注·丹水》"悉"句：丹水南边有座丹崖山，山崖都是红色石壁，象红霞似地高耸着。至于红云岫、秀天岫两个山峰，就更是绝妙奇观了。） ④数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汉书·项籍传》"悉"句：几天之后，〔外黄城〕投降了，项羽命令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城东集中，想把他们活埋掉。）

奚 xī　代词，用来询问，可以问事物、处所、原因、方法等，可作谓语、宾语、状语、名词修饰语，也可用于抉择询问。"奚"作宾语，在动词或介词前。相当于"为什么""什么""哪里""怎么""哪一个"等。如：①武子胜事赵简子久矣，其宠不解(xiè)，奚也？（《说苑·臣术》"奚"句：武子胜服事赵简子很久了，却总不失宠，为什么呢？） ②国胜君出，非祸而奚？（《说苑·善说》"奚"句：国家被战胜国君出奔在外，不是祸患是什么？） ③公曰："太师奚笑也？"师旷对曰："臣笑叔向之对君也。"（《韩非子·难二》"奚"句：国君说："太师笑什么？"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的答对国君。"） ④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庄子·人间世》"奚"句：颜回将拜见仲尼，请求辞行，仲尼问："到哪里〔去〕？"回答说："打算到卫国〔去〕。"） ⑤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吕氏春秋·贵直》"奚"句：这是堵塞水源却又想得到水，水从哪里来？） ⑥仲父病不幸卒于大命，将奚以告寡人？（《韩非子·难一》"奚"句：仲父您的病重万一不幸而辞世的话，打算用什么来告诫我？） ⑦其自藏之与在于上奚择？（《吕氏春秋·审应》"奚"句：百姓自己贮藏粮食和把粮食存入国库怎么区别开呢？） ⑧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列子·仲尼》"奚"句：这是什么病呢？什么药方能治好它呢？） ⑨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庄子·山

木》"奚"句：一个雁能叫，一个不能叫，请问杀掉哪一个？）

先 xiā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事情发生在前，相当于"首先""原先""原来"等。如：①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先"句：跟诸位将领约定，首先入定关中的人可以称王。）②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世说新语·言语》"先"句：〔袁阆〕问到颍川人士，荀慈明首先谈到他的几位哥哥。）③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后遇于范豫章许。（《世说新语·方正》"先"句：张玄与王建武原先不认识，后来在范豫章处相遇了。）④简文作相王时，与谢公共诣桓宣武，王珣先在内。（《世说新语·容止》"先"句：简文作相王时，与谢公一起到桓宣武那里去，王珣原先已在里面。）

咸 xián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谓语的内容涉及主语的全部，相当于"都"。如：①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靖节先生集·桃花源记》"咸"句：村民听说有这个人来了，都来探问。）②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贤。（《世说新语·识鉴》"咸"句：当时的人都赞叹郗超有先见之明，又钦敬他不凭个人爱憎压制贤才。）③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世说新语·文学》"咸"句：桓宣武责成袁彦伯写《北征赋》，写完以后，桓公跟当时的贤明士人一起赏读，都啧啧称赞。）

相 xiāng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两个或多个主体交互施行，相当于"互相"。如：①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史记·项羽本纪》"相"句：沛公屯军霸上，没能跟项羽互相见面。）②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相"句：相邻的两国能互相望见，鸡犬的鸣叫可以互相听见，民众到老死不互相交往。）（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两个或更多的主体递相进行：一个传递给下一个。相当于"一个接一个地"。如：③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相"句：天下是汉高祖的天下，父子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这是汉朝的法规。）（三）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两个或多个主体一起进行，相当于"一起"。如：①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孟子·离娄下》"相"句：〔他的妻子〕跟他的妾讥笑她们的丈夫，并在庭中一起哭泣。）

向〔乡〕 xiàng　（一）副词，用于谓语前或用于小句前，表示动作或情况发生在不久前的过去，相当于"刚才""刚刚"等。"向"也用于名词前作修饰语，相当于"刚才〔的〕。"如：

①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世说新语·汰侈》"向"句：刘寔立即返身往回走，就对石崇说："刚才误入你的卧室内。"石崇说："只是厕所而已。"）②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世说新语·任诞》"向"句：桓宣武〔对罗友〕说："你刚才想商议什么事，为什么这就走了呢？"）③向吾

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庄子·养生主》"向"句：刚刚我进去凭吊，有老人哭老聃象哭自己的儿子，年轻人哭他象哭自己的母亲。） ④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世说新语·文学》"向"句：许掾问支法师说："弟子刚才的演讲怎么样？"）（二）介词，介绍动作的处所、时间等。相当于"对着""向""到了"等。如： ⑤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庄子·秋水》"向"句：于是河神才转过脸，怅惘地对着北海神若叹气。） ⑥馀房走向落川。（《后汉书·段颎传》"向"句：残余的先零诸种向落川逃跑。） ⑦夫水，乡冬则凝而为冰。（《淮南子·俶真训》"乡"句：水到了冬天就凝结成冰。） ⑧乡晨，傅裤袜。（《汉书·外戚传》"乡"句：到了早晨，〔成帝〕穿上裤子和袜子。）（三）连词，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假设，相当于"假使"等。如：⑨向不遭度，则郡早为丘墟。（《〈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注引〈魏书〉》"向"句：假使不遇到公孙度，那么郡早就成为废墟了。） ⑪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柳宗元集·黔之驴》"向"句：假使不暴露它的技能低下，老虎即使凶猛，也因疑虑害怕而终不敢杀死它。） ⑫乡亡桓公，星遂至地。（《汉书·五行志》"乡"句：假使没有齐桓公，星星就会掉落到地下。）

小 xiǎo　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数量少、时间短、程度低，相当于"小量地""一会儿""稍微"等。如： ①匈奴小入，详北不胜。（《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小"句：匈奴小量地入侵，假装失败不能取胜。） ②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世说新语·文学》"小"句：支道林对王逸少说："你不要走，我要跟你谈一会儿话。"于是讨论起《庄子·逍遥游》来。） ③乔当及卿，髦小减也。（《世说新语·品藻》"小"句：杨乔将比得上您，杨髦稍微差些。） ④明旦有客，公头鬓未理，亦小倦。（《世说新语·赏誉》"小"句：第二天有客人来，王丞相鬓发没有梳理，也稍微显得疲倦。）

屑 xiè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频繁与错综交叉，相当于"多次""纵横"等。"屑屑"相当于"琐琐碎碎"；"不屑"相当于"不介意""不屑于"等。如： ①尔乃屑播天命。（《尚书·多方》"屑"句：你竟然多次地抛开天命。） ②岂不酸鼻痛心，忆雒阳之宫陛；屑泣横悲，想长安之城阙？（《太平御览·梁元帝郑众论》"屑"句：怎能不酸鼻痛心，回忆那洛阳宫殿的台阶；涕泪纵横极度悲哀，想到那长安的城楼？） ③子笑我之沉滞，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后汉书·崔骃列传》"屑"句：你讥笑我呆滞不灵活，我也不满意你琐琐碎碎地没完没了。） ④廖性质诚畏慎，不爱权势声名，尽心纳忠，不屑毁誉。（《后汉书·马廖传》"屑"句：马廖性情质朴真诚小心谨慎，不追求权势和名声，尽心竭力贡献赤诚，不介意〔别人的〕毁谤和赞誉。） ⑤如其不然，则是玩物丧志而已，固知贤者不

屑为此。（《朱子文集·答吴斗南》"屑"句：如果不是这样，那简直就是玩赏所喜好的东西而消磨斗志罢了，本来就知道贤者是不屑于做这种事情的。）

新 xī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刚刚发生，相当于"刚刚""新近""不久前"等。如：①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xíng）。（《庄子·养生主》"新"句：如今我的刀已用了十九年了，所解剖的牛有几千头了；但是刀刃还象刚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②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左传·昭公三十年》"新"句：吴光新近掌握国家政权，并且亲近他的臣民。）③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三国志·魏书·贾诩传》"新"句：曹军虽然不久前退兵，曹操必定亲自断后。）

信 xìn　副词，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情况的信实，相当于"确实""果真""的确"等。如：①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左传·昭公元年》"信"句：子皙确实漂亮，然而子南，是〔可以做〕丈夫〔的〕。）②臣北方之鄙人也，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吕氏春秋·爱类》"信"句：我是北方的贱民，听说大王将要进攻宋国，果真有这事吗？）③山坂有两石虎……作制甚工，信为妙矣。（《水经注·比水》"信"句：山坡上有两只石雕的老虎……雕刻得很精致，的确是美妙啊。）

徐 xú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或事情发生的缓慢，相当于"慢慢地"等。"徐徐"义同。如：①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孟子·告子下》"徐"句：慢慢地走在年长者后面，叫做悌；很快地走在年长者前面，叫做不悌。慢慢地走，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只是不〔愿〕做罢了。）②超载温诣城下，使告城中云："东方无救。"温向城大呼曰："大军不过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称万岁。超虽怒，犹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诱温，冀其改意。温曰："事君有死无二，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乎！"超遂杀之。（《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十八年》"徐"句：马超用车载着阎温到城下，叫阎温告诉城里的人说："东方没有救兵。"阎温却向城内大喊道："大军不过三天就赶到，努力〔坚持下去〕啊！"城里的人都感动得哭泣，高呼万岁。马超虽然恼怒，但仍因攻城很久都没能攻下，就慢慢地再劝诱阎温，希望他改变主意。阎温说："事奉君主宁死没有二心，而你却想命令年长的人说出不合道义的话吗！"于是马超杀死了他。）（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是在前一事发生后施行的，相当于"后来慢慢地"等。如：③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chēng hóng）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xià），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hán dàn）澎湃而为此也。（《苏东坡全集·石钟山记》"徐"句：我正觉得心惊想要返回，却有巨大响声从水上发出，轰轰隆隆象不停顿的钟鼓声，船夫十分害怕。后

来慢慢地仔细察看，原来山下都是石洞和裂缝，不知它们有多深，水波涌了进去，动荡起伏，互相撞击因而发出这样的巨响。）

许 xǔ　不定数词。（一）或用于数词后，或用于两个数词之间，或用于数量短语后，或用于数词与量词之间，表示约数，相当于“约”“来”“左右”等。如：①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世说新语·俭啬》“许”句：郗公开始以为只减少数百万左右。）②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世说新语·容止》“许”句：庾公一会儿领了左右十来个人走过来。）③述果使其将谢丰、袁吉将众十许万，分为二十余营，并出攻汉。（《后汉书·吴汉传》“许”句：公孙述果然让他的大将谢丰、袁吉率领兵众十来万人，分成二十多个营，一起出发进攻吴汉的军队。）④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世说新语·术解》“许”句：服药后就大泻，泻下几段纸，象拳头那么大。）（二）用于动宾短语后，相当于“些”。如：⑤君章云：“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胜我许人。”（《世说新语·规箴》“许”句：君章说：“不清楚你认为谢尚是什么样的人？”桓温说：“谢尚是比我强些的人。”）（三）用于“多”“多多”“诸”“少”“几”后，构成“多许”、“多多许”“诸许”“少许”“几许”，分别相当于“许多”“许多许多”“一点儿”“多少”等。如：⑥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世说新语·假谲》“许”句：〔王敦〕命令骑士追赶〔晋明帝〕，已觉得追了许多里路。）⑦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世说新语·赏誉》“许”句：〔王怀祖〕只用真诚坦率一点儿，就足以抵上别人许多许多。）⑧保而用之，可作诸许物也。（《世说新语·容止》“许”句：〔如果对王长史父亲加以〕保护和重用，可以作许多事情。）

⑨上问尚书库部郎顾琛：“库中仗犹有几许？”（《资治通鉴·宋纪·文帝元嘉七年》“几许”句：文帝问尚书库部郎顾琛说：“兵库中武器还有多少？”）

还 xuá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迅疾，相当于“立即”“迅速”等。如：①於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还赐之如初。（《韩非子·内储说上》“还”句：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个车辕，下令说：“有谁能把这个搬到南门外的，赐给他良田美宅。”大家都没去移动它。等到果真有人去把它移到了南门外，立即按照当初的命令赏赐他。）②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於彭城。（《汉书·魏豹传》“还”句：汉王迅速平定了三秦，过了临晋关，魏豹把本国政事委托给汉王，自己就跟从汉王到彭城反击楚军。）③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汉书·董仲舒传》“还”句：努力学习询问，就能见闻广博而越来越聪明，努力实行道义，就能使道德一天比一天高尚而功业越来越显赫：这都是可使迅速到来而立即

生效的。）

寻 xún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事情的发生距前事不远，相当于"很快""不久"等。如：①明帝收朗，欲杀之，帝寻崩，得免。（《世说新语·识鉴》"寻"句：明帝收审杨朗，想杀掉他，明帝不久死了，〔杨朗〕才得以幸免。）②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世说新语·政事》"寻"句：只有任用陆亮，是据皇帝诏旨而为，与山司徒的本意不同，〔山司徒〕与皇帝争辩，帝不采纳。而陆亮很快因贿赂而败官。）③未果，寻病终。（《靖节先生集·桃花源记》"寻"句：〔南阳刘子骥〕没有找到桃花源，不久就病死了。）

洵 xún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情况的确切，相当于"确实"等。如：白松在祠后中庭，相传三女蜕骨其下。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干，鼎耸霄汉，肤如凝脂，洁逾傅粉，蟠枝虬曲，绿鬣舞风，昂然玉立半空，洵奇观也。（《徐霞客游记·游嵩山日记》"洵"句：白松树在祠堂后边庭院中，传说从前有三个女子在树下脱胎换骨成了仙女。松树粗大，四人才能抱住，树由一根主干分成三个支干；这三个支干象鼎的三足耸入云霄，树皮如同油脂般光滑，洁白胜过扑粉，枝条弯弯曲曲，绿叶随风起舞，高高地象块玉石耸立在半空中，确实是奇妙的景色啊！）

雅 yǎ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动作或性状一贯如此、向来如此，也表示程度之甚，相当于"素来""很""颇"等。如：①虽雅知悍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文选·扬子幼：报孙会宗书》"雅"句：即使是素来了解悍的人，尚且都随风而倒了过去，还有什么称誉可言？）②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琴。（《文选·扬子幼：报孙会宗书》"雅"句：我老家在秦地，能唱秦声；妻子是赵地女子，很善于弹琴。）③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世说新语·赏誉》"雅"句：太傅东海王镇守许昌，任用王安期作记室参军，颇了解和看重安期。）

焉 yān　（一）代词。（A）用于动词后，为"于之""于是"的兼词，其中的"之""是"代处所、人或事物，"焉"相当于"在这里""向他们""比这个"等。如：①制，严邑也，虢叔死焉。（《左传·隐公元年》"焉"句：制是险要的地方，虢叔死在这里。）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论语·微子》"焉"句：长沮、桀溺并排耕田，孔子从他们身边经过，让子路向他们问路。）③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国语·晋语五》"焉"句：现在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B）用于动词后作宾语，相当于"这些东西""他"等。如：④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焉"句：鸟羽、兽毛、象牙、犀革，您的国土上出产这些东西。）⑤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柳宗元集·捕蛇者说》"焉"句：所

以为此写这篇文章，以等待考察民情的人参考它。）（C）用于疑问和反诘，可代人、事物、处所、原因等，可作宾语、状语。“焉用……为”这个固定格式，以及“焉”用在助动词“能”“足”等之前，大凡表示反诘。这种用法的“焉”相当于“谁”“什么”“何必”“怎么”“哪里”等。如：⑤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将焉致乎鲁国？（《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焉”句：我如果因这次重病而死去，我将把鲁国〔的政权〕交给谁呢？）⑥夫子焉不学？（《论语·子张》“焉”句：孔子什么不学？）⑦见晏子曰：“夫子将焉适？”晏子曰：“见疑于齐君，将出奔。”（《吕氏春秋·士节》“焉”句：〔北郭骚〕看见晏子说：“您打算到哪里去？”晏子说：“被齐君怀疑，将出奔国外。”）⑧鼎焉为出哉？（《汉书·郊祀志》“焉”句：鼎为什么出现呢？）⑨今服之既死，焉用此为？（《汉魏丛书·神仙传·魏伯阳》“焉”句：现在吃了这灵丹既然还是死，何必还要这灵丹呢？）⑩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管子·戒》“焉”句：现在竖刁这个人，连自身都不爱惜，怎么能爱护国君呢？）⑪夏后启曰：“鄙人也，焉足以问？”（《吕氏春秋·知分》“焉”句：夏后启说：“我是个鄙陋的人，哪里值得您向我询问？”）（二）助词。（A）用于叙述句末，表示强调语气，相当于“了”；用于疑问句末，相当于“呢”。如：⑫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焉”句：我已二十五岁了，再等二十五年后改嫁，那就进棺木了。）⑬子何术以为焉？（《庄子·达生》“焉”句：你用什么方法做成的呢？）（B）用于句中表示停顿，不必译出。如：⑭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柳宗元集·贞符》“焉”句：于是有位圣人叫黄帝。）⑮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韩昌黎集·原性》“焉”句：上等的，使他完善下去就是了；中等的，可以引导他或上或下。）（C）作宾语前置的标志，不必译出。如：⑱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焉”句：我们周朝国都向东边迁移，要依靠晋国、郑国。）（三）语缀，用于副词、形容词后，表示情态，相当于“……的样子”，可不译出。如：⑯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史记·伯夷列传》“焉”句：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很快地过去了。）⑰是其诞漫惝（chǎng）恍（huǎng），冥冥焉不可执取者。（《柳宗元集·蜡说》“焉”句：这就是那种广漠迷糊幽暗不清难以捕捉的东西。）（四）连词，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相当于“才”“就”。如：⑲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墨子·兼爱上》“焉”句：一定要知道祸乱从哪里来，才能治理它。）⑳凡人之动也，为庆赏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荀子·议兵》“焉”句：凡人都是为了庆赏而去干事，那么遇见伤害自己的事情时，就不干了。）

奄 yǎn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发生的突然，相当于“忽然”“突然”等。如：①奄闻旗鼓来至白帝。（《三国志·吴书·诸葛瑾

传》"奄"句：忽然听说军旗战鼓来到白帝城。）　②庾每诣（yì）周，庾从南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对终日。（《世说新语·尤悔》"奄"句：庾亮每次到周邵家看望，庾从南门进去，周就从后门出去。一次，庾突然直奔周家，周来不及离开，就同庾对坐了一整天。）　③备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十九年》"奄"句：刘备曾趁游览之机，突然到达广都。）（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涉及受事者的全部，相当于"全部"等。如：④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庄子·大宗师》"奄"句：傅说得到了道，用来辅佐武丁，全部占有了天下）

阳 yá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是伪装的，相当于"装""假装"。如：　①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文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阳"句：从前玉工献上宝玉，楚王把玉工杀掉了；李斯对皇室尽忠竭力，胡亥对他处以极刑。因此箕子装疯，接舆隐居，怕遭这类祸殃。）　②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世说新语·假谲》"阳"句：〔魏武帝〕后来假装睡着了，他所宠幸的一个人，悄悄给他盖上被子，顺手就杀死了这个人。）③飞阳北，贼来追之。（《宋史·岳飞传》"阳"句：岳飞假装败逃，贼兵跟着追击他。）

也 yě　　助词。（一）句末助词。（A）用于判断句、叙述句之末，表示肯定语气，可不译出。如：　①陈涉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也"句：陈涉是阳城人。）　②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文忠公集·醉翁亭记》"也"句：醉翁之意不在于酒，在于山水自然风景之间。）（B）用于感叹句、祈使句末，表示感叹和命令、请求语气，相当于"啊""吧"。如：　③是何楚人之多也！（《史记·项羽本纪》"也"句：这里楚人怎么这么多啊！）　④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史记·魏公子列传》"也"句：公子对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掉这些吧！）（C）用于疑问句或抉择问句末，相当于"呢"。如：⑤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也"句：朱家说："您看季布是什么样的人呢？"回答说："贤德之人。"）⑥晏子，贤人也，今方来，欲辱之，何以也。？（《说苑·奉使》"也"句：晏子是位贤明的宰相，现在就要来我国，想侮辱他一下，怎么办呢？）　⑦鲁侯曰："敢问：天道也，抑人故也？"（《汉书·天文志》"也"句：鲁侯问："〔你说晋国将有祸乱，〕是占卜得知的天意呢，还是根据人事推出的结论呢？）（二）句中助词。（A）用于主语后（主语或为名词，或为短语与小句，或为几个并列名词），相当于"么""呀"，或不译出。如：　⑧回也非助我者也。（《论语·先进》"也"句：颜回么不是能助我的人。）　⑨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孟子·梁惠王上》"也"句：我对于国家，尽心竭力而已。）　⑩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

火木也，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列子·天瑞》"也"句，山岳呀，河海呀，金石呀，火木呀，这些都是积累起来而形成大地的东西。）(B) 用于表示时间的词语后表示顿宕，相当于"么""呀"。如：⑪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庄子·养生主》"也"句：开始么我以为他是一般的人，现在才知道不是这样的。）⑫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晋书·王羲之传》"也"句：这一天呀，天空晴朗空气清新，微风和煦顺畅。）

业 yè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已经进行，相当于"已经"。"业已""已业"义略同。如：①天子业出兵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汉书·李广利传》"业"句：天子已经出兵讨伐宛国，宛这样一个小国如果打不下来，那么大夏等国就会逐渐轻视汉朝。）②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汉书·西域传下》"业"句：使者已经接受了符节，可以到达皮山就回来。）③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史记·刘敬传》"业"句：那时汉军已跨过句注山，二十多万大军已经行动。）

一 yī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只进行一次，相当于"一次"。如：①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世说新语·伤逝》"一"句：文帝亲临王仲宣的葬礼，回头对平日一起游聚的人说："王仲宣喜欢驴叫，可以每人学叫一声为他送葬。"参加葬礼的都学了一次驴叫。）(二) 用于谓语前，表示谓语所述的情况出人意料，相当于"竟"。如：②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李太白全集·与韩荆州书》"一"句：怎么令人仰慕竟达到这种地步呵！）(三)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直捷了当，相当于"径直地""突然"。如：③庾尝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对终日。（《世说新语·尤悔》"一"句：庾公曾径直地突然到来，周子南来不及躲避他，两人便对坐终日。）(四) 用于谓语前，表示主语代表的人或事物，毫无例外地属于谓语叙述的情况，相当于"一律""一概"。如：④参代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资治通鉴·汉纪·惠帝二年》"一"句：曹参代替萧何作宰相，一切政事都没有什么变更，一律遵循萧何时的法律条令。）(五) 用于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轻度的假设，相当于"一旦"等。如：⑤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niè）其短。（《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一"句：而今做事一旦有失误，那些保全自身也保有妻子儿女的人紧接着就去指责他的过失，把小错夸大成大罪。）⑥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一"句：援兵不来，兵士死伤的堆积如山。然而李陵一旦招呼如此疲劳的军队，兵将没有不奋起响应的。）

伊 yī　(一) 代词。(A) 指示代词，用于名词前，相当于"这"等。如：①"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左传·宣公二年》"伊"句：

"我的怀念，给自己带来这忧患"，大概是说的我吧！）②伊年暮春，将瘗（yì）后土，礼神祇。（《汉书·扬雄传》"伊"句：这年暮春，将要祭祀地神，礼拜天神。）（B）第三人称代词，可作主语、宾语、名词修饰语，相当于"他""他们"。如：③伊必能克蜀。（《世说新语·识鉴》"伊"句：他一定能攻克蜀地。）④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世说新语·品藻》"伊"句：不要学你哥哥，你哥哥本不如他。）⑤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世说新语·贤媛》"伊"句：山涛的妻子说："你的才情完全不及他们，只应以见识器度与他们交友而已。"山涛说："他们那些人也常以我的器度为优长。"）（二）助词。（A）用于句首，不必译出。如：⑥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汉书·董仲舒传》"伊"句：希望风化流布而政令推行，刑罚渐轻而奸邪归正。）（B）用于疑问代词前，不必译出。如：⑦王氏故问："此伊谁？"家人进曰："张屠之妻。"（《聊斋志异·马介甫》"伊"句：王氏故意问："这是谁？"家人答说："是张屠的妻子。"）⑧又顾问："丽人伊谁？"（《聊斋志异·凤阳士人》"伊"句：又回头问："美人儿是谁？"）⑨伊何导物？贵在清身。（《南齐书·孔琇之传》"伊"句：什么可以主导种种事理？重要的在于使自身纯洁。）（C）与前边"匪"一起构成"匪……伊……"的格式，相当于"不是……而是……""不是……就是……"。如：⑩今得臣举者，匪荣伊辱。（《资治通鉴·汉纪·顺帝永和三年》"伊"句：如今得到我推荐的人，不是得到荣誉，而是留下耻辱。）⑪灰尽粉灭，匪朝伊夕。（《资治通鉴·齐纪·明帝建武元年》"伊"句：粉身碎骨，灰飞烟灭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早晨就是晚上了。）

猗 yī 语气助词，用于句尾，表示感叹，相当于"呵"。如：①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返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庄子·大宗师》"猗"句：呵，桑户呀！呵，桑户呀！你已经归本返真了，而我还在做人呵！）②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为南音。（《吕氏春秋·音初》"猗"句：夏禹治水遇见了涂山氏族的女子，禹没有礼遇她，又巡视南方去了，涂山氏族的女子就让她的侍女在涂山的南面等待禹，涂山女子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等待着一个人呵！"〔这〕实际上是开始形成的南国音乐。）

宜 yí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或小句前，表示理应如此；相当于"应当""应该""理应"等。如：①此人宜在帝左右。（《世说新语·言语》"宜"句：这个人应该在皇帝身边任职。）②王珣当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自可别诏召之。（《世说新语·谗险》"宜"句：王珣是当今的知名人士，陛下不应当面带酒色接见他，可以另外下令召见。）③问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汉书·佞幸传》"宜"句：问

道："天下谁是最爱我的人呢？"邓通说："理应没人比得上太子。"（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委婉的劝导口气，相当于"还是"。如： ④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世说新语·贤媛》"宜"句：第二天早晨范逵走了，陶侃长送不归，送了一百来里，范逵说："走得太远了，您还是请回去吧。"）

已 yǐ （一）副词。(A) 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动作的完成和情况的已经出现，相当于"已经""已"。如：①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太傅已醉。(《世说新语·言语》"已"句：桓玄、义兴回去后，见了司马太傅，太傅已经喝醉了。) ②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史记·老子列传》"已"句：那人的身体与骨头都已腐朽了。) (B) 用于谓语前或小句前，表示事情的出现距离前一事不久，相当于"很快""不久"。"已而"义同。如： ③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史记·项羽本纪》"已"句：韩王成没有军功，项王不让他反国，同他一起到彭城，废王号贬为侯，很快又杀了他。) ④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欧阳文忠公集·醉翁亭记》"已"句：不久夕阳落山，人影疏落散乱，这是太守返回而宾客相随的情景。) (C) 用于形容词前，表示程度之甚，相当于"很""太"等。如：⑤吾得仲父已难矣。(《韩非子·难二》"已"句：我得到仲父很难呀。) ⑥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汉书·霍光传》"已"句：霍光每次去朝见，汉宣帝总是谦虚恭敬，礼遇霍光太过分了。) （二）助词，用于句末，相当于"了"。如： ⑦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韩昌黎集·原毁》"已"句：士在这个社会里，希望名誉能够显赫，道德得以推行，太难了！) ⑧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史记·孔子世家》"已"句：如今老了，不能干事了。) (三) 叹词，单独成句，表示感叹，相当于"唉"。如： ⑨已！我安逃此而可？(《庄子·庚桑楚》"已"句：唉！我向哪里逃避这些才行呢？) (四) 连词，用于连接前面词语和方位词（或"来"等），表示时间或方位，相当于"以"。如： ⑩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世说新语·赏誉》"已"句：自从过去那些学人去世以来，我常担心深刻精微的言辞将再也听不到了，今天从你这里才又听到了这种言辞。) ⑪丞相目子躬云："人理泓然，我已上人。"(《世说新语·赏誉》"已"句：丞相评价王子躬说："入理深广，是在我以上的人。)

以 yǐ （一）介词。(A) 介绍动作的工具、凭借、身分、原因、时间等。"以"和它的宾语或在动词（动宾短语）前，或在其后。相当于"用""凭借""根据""因为""在"等。如：①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墨子·法仪》"以"句：百工画方形用曲尺，画圆形用圆规，打直线用绳墨，检验垂直用悬锤。) ②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世说新语·方正》"以"句：古代

的君子，凭借礼任用人，凭借礼黜退人。） ③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世说新语·言语》“以”句：庾稚恭进献扇子根据好坏不根据新旧。） ④刘公干以失敬罹罪。（《世说新语·言语》“以”句：刘公干因为对上有失恭敬而犯了罪。） ⑤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世说新语·伤逝》“以”句：卫洗马在永嘉六年逝世，谢鲲哭他，感动了过路的人。）(B)“以”的宾语经常可以出现在“以”前；疑问代词“何”“曷”“胡”等作“以”的宾语一般在“以”前；“是”作“以”的宾语，多在“以”前，也有在“以”后的。如：⑥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以”句：君子以义为根本，用礼实行它，用谦逊的语言表现它，用诚信的态度完成它。） ⑦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史记·项羽本纪》“以”句：楚军兵士没有不是用一个顶十个的。） ⑧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以”句：等到赵括快要出发时，他母亲上书对皇帝说：“赵括不能担任将领之职。”皇帝说：“为什么？”） ⑨曷以知舞之意？（《荀子·乐论》“以”句：用什么办法了解舞蹈的意思呢？） ⑩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汉书·食货志》“以”句：如果不幸有方圆两三千里的大面积干旱，国家用什么救济百姓？） ⑪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荀子·天论》“以”句：所以君子重视自身的努力，而不仰慕上天的恩赐，因此天天进步。） ⑫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以”句：从这里看，别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C)“以”的宾语经常省去。如：⑬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文选·李斯：上书秦始皇》“以”句：秦孝公实行了商鞅变法，风俗习惯大改，老百姓因此而富足，国家因此而强大。） ⑭国宝谓绪于已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以息。（《世说新语·谗险》“以”句：王国宝以为王绪对自己有隐瞒，果然〔跟王绪的〕感情一天天疏远，王绪向王国宝给殷荆州进谗言因此而停止。）（二）连词。(A)连接并列的两项，相当于“而又”“和”等。如：⑮狐偃惠以有谋，赵衰文以忠贞，贾佗多识以恭敬。（《国语·晋语》“以”句：狐偃仁惠而又有谋略，赵衰有文采而又忠实坚贞，贾佗见识广而又恭谨谦敬。） ⑯季康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论语·为政》“以”句：季康问使百姓恭敬、忠诚和努力，〔该〕怎么办？”(B)用于状语和后面的动词之间，相当于“地”。如：⑰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汉书·食货志》“以”句：骄奢淫逸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地滋长起来，是国家的最大祸端。） ⑱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韩昌黎集·原毁》“以”句：〔我〕从早到晚地考虑，去掉不象舜的，采取象舜的。）(C)连接一先一后的两项，其中有的后项为前项的结果，有的后项为前项的目的。相

当于"就""使得""去"等。如：⑲因流涕抱儿以归。(《世说新语·文学》"以"句：于是流着泪抱着孩子就回去了。) ⑳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文选·诸葛孔明：出师表》"以"句：不应该随便地自轻自贱，说话不合道义，使得尽忠劝谏的道路堵塞。) ㉑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世说新语·伤逝》"以"句：王仲宣喜欢听驴叫，可以每人学一声驴叫去给他送殡。)(D)用于方位词和"来""往"等词之前，表示时间、方位等，不必译出。如：㉒余暨以南属越，钱塘以北属吴。(《论衡·书虚》"以"句：余暨以南的地方属于越国，钱塘以北的地方属于吴国。) ㉓浑曰："何如我？"济曰："济以上人。"(《世说新语·赏誉》"以"句：王浑问："〔你叔叔〕比我怎么样？"王济说："〔我叔叔〕是在我以上的人。") ㉔汉元以来，未有此人。(《世说新语·赏誉》"以"句：汉初以来，没有阮文业这样的人。)

矣 yǐ　助词。(A)用于句末，表示动作已经施行、情况已经出现，相当于"了"；表示对未来情况的预断，也相当于"了"。如：①前人之述备矣。(《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矣"句：前人的记述已经很全备了。) ②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矣"句：确实能够这样做，就可以成就霸业，振兴汉室了。)(B)用于感叹句、祈使句，表示感叹或请求命令的语气，相当于"啊""吧"等。如：③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文山先生全集·指南录后叙》"矣"句：唉，我几乎死去的情况不知有多少次了啊) ④公子勉之矣！(《史记·魏公子列传》"矣"句：公子努力吧！)(C)用于疑问句、反诘句中，相当于"了""呢"等。如：⑤曰："子来几日矣？"(《孟子·离娄上》"矣"句：问："你来多久了？") ⑥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战国策·赵策四》"矣"句：太后说："好吧。〔你的儿子〕年龄多大了？"回答说："十五岁了。") ⑦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论语·季氏》"矣"句：他遇危险却不去帮助，他要跌倒却不去搀扶，那么何必要那个辅佐的人呢？)

义 yì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合于义理，相当于"按照义理"，或可译为"执意"。如：①吾义不食子之食也。(《列子·说符》"义"句：我按照义理不该吃你的食物。) ②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资治通鉴·宋纪·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义"句：我跟崔浩实际上干着同样的事，生死荣辱两人应该共同担负，按照义理我不应该个人特殊。) ③遂苦相留，羊义不住。(《世说新语·雅量》"义"句：于是极力挽留，羊孚执意不肯留下。)

亦 yì　副词。(一)用于后面的短语或分句中，表示动作或情况与前面的相同，相当于"也"。也有前后各用"亦"照应的，义同。如：①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孟子·告子上》"亦"句：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 ②项庄拔剑起

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史记·项羽本纪》"亦"句：项庄拔出剑站起来挥舞，项伯也拔出剑站起来挥舞。) ③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世说新语·政事》"亦"句：周公不效法孔子，孔子也不效法周公。) ④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亦"句：秦国也不把十五座城邑给赵国，赵国也最终不给秦国璧玉。)(二) 用于谓语前，表示限定范围，相当于"只是""不过"等。如： ⑤圣人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孟子·滕文公上》"亦"句：圣人治理天下，难道是无所用心吗？只是不用在耕作方面罢了。) ⑥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左传·僖公十五年》"亦"句：我跟从晋君向西走，不过是实践晋国的妖梦罢了。)(三) 两"亦"前后照应，表示"无论如何"都一样，相当于"也"。如： ⑦臣言亦死，不言亦死。(《新序·杂事》"亦"句：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 ⑧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荀子·不苟》"亦"句：君子有才能也好，没有才能也好。)(四) 用于递进复句的后一分句，相当于"也"。如： ⑨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亦"句：我使您留在这里，不仅为了许国，也为了暂时稳定我国边疆。) ⑩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韩非子·孤愤》"亦"句：法术的难于实施，不只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如此〕，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也是如此。)(五) 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转折，相当于"又"。如： ⑪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孙子兵法·虚实》"亦"句：越国军队即使很多，对战争的胜负又有什么用呢？) ⑫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世说新语·言语》"亦句：枫树柳树虽然有合抱那么粗，又能派什么用场？)(六) 用于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限定在这一范围内，后一分句表示轻度的转折。相当于"只""只是"。如： ⑬亦有君之不能耳，士无弊者。(《韩非子·难二》"亦句：只有君主的不知人善任而已，士没有坏的。) ⑭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战国策·齐策四》"亦"句：只是王不喜欢士罢了，〔要喜欢〕哪用担心没有士？)

益 yì 用于形容词或动词前，表示程度逐步加深或情况逐渐变化，相当于"越来越""一天比一天""渐渐"等。如： ①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韩非子·孤愤》"益"句：因此君王愈加卑下，权臣的势力就越来越大。) ②燕军由此益懈。(《史记·田单列传》"益"句：燕军从此一天比一天懈怠。) ③始皇帝益壮。(《史记·吕不韦列传》"益"句：秦始皇渐渐长大成人。)

意 yì (一) 连词，用于抉择问句的后一分句之首，表示抉择，相当于"还是"。"意亦"同此。如： ①子之义将匿耶，意将以告人乎？(《墨子·耕柱》"意"句：你的主张打算隐藏起来呢，还是打算把它告诉别人呢？) ②诚病乎，意亦思乎？(《战国策·秦策二》"意"句：确实是病了呢，还是

想念〔吴国〕呢?）（二）叹词，同“噫”，相当于“唉”。如： ③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庄子·在宥》“意”句：唉！太严重了！他们不知惭愧又不知羞耻也太过分了！）（三）副词，用于小句或谓语前，表示对事情的主观猜测或想法，相当于“想来也许是”等。“意者”相当于“想来大概是”“意思是”“想来”。如：④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与？（《说苑·君道》“意”句：想来大概是我的政令教化有不当之处吧?） ⑤意者臣愚而不阖于王心耶！（《战国策·秦策三》“意”句：想来大概是我很愚昧而不合乎国君的心意吧?） ⑥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人而深诫也。（《白居易集·与杨虞卿书》“意”句：有该使国君等上层人物听到的东西，我用诗歌渐渐劝导他们，意思是想让这些东西易于接受从而深深劝诫他们。） ⑦意者斯文殆可取乎。（《柳宗元集·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意”句：想来此书大概有可取之处吧。）

噫 yì 感叹词，表示痛惜、懊丧，相当于“唉”。如： ①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噫”句：颜渊死了，孔子说：“唉！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 ②噫！官有守、私有系，会合不可以常也。（《临川集·同学一首别子固》“噫”句：唉！在官位上有职务在身，回到家里有私事缠绕，聚会不能经常。）

因 yīn （一）介词，介绍动作的途径、凭借、条件、原因等。“因”的宾语是疑问代词“何”，则作“何因”。相当于“由”“凭借”“根据”“趁”“因为”等。如： ①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因”句：廉颇听到这话后，袒露着身体背负着荆条，由门客导引去到蔺相如门前谢罪。） ②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因”句：益州关塞险要，有方圆千里的肥沃土地，是天赐的好地方，汉高祖凭借它而成就了帝业。） ③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因”句：善于作战的人根据情势正确地引导部队。） ④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因”句：吴王想趁楚国有丧事而讨伐它。） ⑤后绥为太学博士，因事见谢公，公即取以为主簿。（《世说新语·方正》“因”句：后来羊绥当上太学博士，因为有事谒见谢公，谢公就任命他作主簿。） ⑥既称恩化，何因复威？（《北史·崔鉴传》“因”句：既然以恩德教化著称，因为什么又施展威风呢?）（二）副词，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后面的情况是继续或承接前面情况的，相当于“仍然”“仍旧”“于是”等。如： ⑦公见人被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柳宗元集·段太尉逸事状》“因”句：你见人被残害，仍然泰然自若，即将大乱，怎么办?） ⑧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世说新语·规箴》“因”句：晋武帝虽然明白了王濬的意思，仍旧笑着说：“你醉了吗?”） ⑨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

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世说新语·文学》"因"句：东阳的母亲王夫人在壁后听他们还在谈话，就又派人去叫东阳回来，可是太傅挽留他，于是王夫人亲自出面了。)

憖yìn 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施事者的愿望，相当于"愿〔意〕"等。如：①旻(mín)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王位。(《左传·哀公十六年》"憖"句：上天不怜悯我，不愿意留下一位长老，使他保卫我一人永在君位。) ②不榖虽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国语·楚语上》"憖"句：我虽然不能采纳〔你的意见〕，但我愿意把它听到耳朵里。) ③天不憖遗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时靡宪。(《文选·陈太丘碑文》"憖"句：天不愿留下老者，使〔他〕保护我们的国君，栋梁崩折圣哲萎顿，这时已没有楷模了。)

应 yìng (一)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示理应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应该"等。如：①应割近情，以存远计。(《世说新语·黜免》"应"句：应该割舍私情，以长久保全国家为念。) ②左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左曰："逆则应杀，狂何所徙?"(《世说新语·黜免》"应"句：诸葛左问："朝廷为什么把我发配远方?"王夷甫说："说你颠狂叛逆。"诸葛左说："叛逆就应该杀掉，颠狂为什么发配远方?")(二)介词，和它的宾语一起，表示情况发生的迅疾，可随文译出。如：③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疗之，应手便愈。(《北齐书·徐之才传》"应"句：武明皇太后不舒服，徐之才给她治病，手一到病立即就好了。) ④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史记·李将军列传》"应"句：估计射不中就不射，一射敌人就紧接着弦的弹射而倒下。) ⑤时郗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世说新语·排调》"应"句：当时郗隆在坐，紧随着话音回答说："这很容易解释。")

庸 yōng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反诘，相当于"难道""怎么""哪里"等。"庸"与"安""讵""可""何"连用，义略同。如：①虽王之国，庸独利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庸"句：即使是对你的国家难道就有好处吗?) ②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庄子·大宗师》"庸"句：怎么知道我所说的天然的不也是人为的，所说的人为的不也是天然的呢?) ③彗星之出，庸可惧乎?(《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庸"句：彗星的出现，哪里值得害怕呢?) ④明言之，庸何伤?(《聊斋志异·耿十八》"庸"句：明白地说出，难道〔有什么〕妨碍吗?

永 yǒ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持久性，相当于"永久""永远"等。"永永"义略同。如：①兹可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文选·封燕然山铭》"永"句：这可说是劳累一下就可长久闲逸，短期耗费就能永久安宁。) ②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祖宗焚灭，污辱至今，永为世鉴。(《文选·为袁绍檄豫州》"永"句：从

前强大的秦国〔有个〕懦弱的国君，赵高把持政权，独断专行，作威作福。当时人迫于压力，没有人敢说真话。〔秦君〕终于有在望夷宫〔被迫自杀〕的惨败。宗庙被烧毁，名声至今仍遭玷污，永远成为世人的鉴戒。） ③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汉书·景帝纪》"永"句：这样做了以后，祖宗的功德就可以流传千秋万代，永远永远没有穷尽。）

犹 yóu　副词。（一）用于谓语前，表示两个（或多个）主体同样具有谓语表示的情况，相当于"同样"。如：①从之将退，不从亦退。退，楚必围我。犹将退也，不如从楚。（《左传·襄公十年》"犹"句：顺从他们要退兵，不顺从也退兵。退兵，楚国必然围困我国。同样是将要退兵，不如顺从楚国。） ②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论衡·祸虚》"犹"句：天地的惩罚，无论大小同样实行；鬼神的报应，不论远近同样施及。）（二）用于动词、形容词前，表示原有动作或情状的持续，相当于"还"。如：③夫人、太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左传·文公七年》"犹"句：夫人和太子还在，却到外边去找国君，这一定行不通。） ④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世说新语·政事》"犹"句：听事厅前台阶上下雪以后还湿，就用木屑覆盖上，一点儿也不妨碍〔走路〕。）（三）用于让步复句的后一分句，相当于"仍""还是"。如：⑤今君虽终，言犹在耳。（《左传·文公七年》"犹"句：现在国君虽已去世，他的话仍响在耳边呢。） ⑥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墨子·公孟》"犹"句：这四位国君，他们的服饰不同，他们的做法还是一样的。）（四）用于递进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尚且"等。后一分句用"况""而况"等与之呼应。如：⑦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左传·隐公元年》"犹"句：滋生的野草尚且不易除尽，何况您的被宠爱的弟弟呢？） ⑧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左传·宣公四年》"犹"句：牲畜老了尚且害怕杀它，何况国君呢？）

于〔於〕 yú　（一）介词。（A）介绍动作的处所、时间、范围、对象、原因、工具、依据等，相当于"在""到""在……中""对于""向""用""按照"等。"于〔於〕"及其宾语可在动词前，也可在其后。如：①和乃抱璞而哭于楚山之下。（《韩非子·喻老》"于"句：卞和于是抱着璞玉在楚山脚下痛哭。） ②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于"句：我率领正义之师，诛罚叛逆，到现在十九年了。） ③于姬姓，我为伯。（《左传·哀公十七年》"于"句：在姬姓诸侯中，我们晋国是霸主。） ④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汉书·高帝纪》"于"句：我对于天下的贤良士子和有功之臣，可以说没有什么对不起的了。） ⑤许於郑，仇敌也。（《左传·昭公十八年》"於"句：许国对于郑国，是仇敌。） ⑥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世说新语·谗险》"于"句：殷荆州对此非常忧虑，向王东亭讨求办法。） ⑦

乱主使民饰于智。(《韩非子·饰邪》"于"句：乱国之君使民众用智巧粉饰自己。)　⑧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史记·淮阴侯列传》"於"句：按照诸侯的盟约，大王应当在关中称王。)(B)介绍比较的对象，"于"及其宾语在形容词或动词后。相当于"比"。如：　⑨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新书·过秦论》"于"句：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诸国之君尊贵。)　⑩青取之於蓝而青於蓝。(《荀子·劝学》"於"句：靛(diàn)青从蓼(liǎo)蓝中提取，而比蓼蓝更青。)　⑪人问刘尹："玄度定称所闻不?"刘曰："才情过于所闻。"(《世说新语·赏誉》)"于"句：别人问刘尹："玄度到底跟听到的情况相称不相称?"刘尹说："才华情致比听到的有所超出。")(C)用于被动句中，介绍动作的施事者，相当于"被"。如：　⑫郤克伤于矢。(《左传·成公二年》"于"句：郤克被箭射伤。)　⑬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雠。(《世说新语·方正》"于"句：你性情坦率正直，一定不会被贼寇容纳。)(D)"于〔於〕"宾语可以在"于〔於〕"之前。如：　⑭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左传·僖公九年》"于"句：别人占有了国家，我们有什么爱惜的?回国而能得到人民，对于土地有什么呢?)　⑮谚所谓"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谓矣。(《左传·昭公十九年》"於"句：俗话所说的"在家里生气，到市上给人脸色，"说的就是楚国了。)(二)助词，用于名词前，凑足音节；用于动词后，补足音节；用于句末，表示疑问语气，相当于"吗"等。如：　⑯于越入吴。(《左传·定公五年》"于"句：越国进入吴国。)　⑰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柳宗元集·封建论》"于"句：过错不在于建立州县制而在于兵制。)　⑱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于?(《吕氏春秋·审应》"于"句：魏昭王说："那么您很圣明吗?"(三)连词，连接两个并列成分，相当于"与"。如：　⑲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尚书·多方》"于"句：〔你们〕不能谦敬与和洽，那就不要埋怨我。)

馀 yú　(一)副词，用于动词后，表示动作已经完成，相当于"以后""过"等。如：　①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馀之人不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馀"句：齐威王想任命孙膑为将，孙膑辞谢说："受刑以后的人不能〔胜任〕。")(二)代词，可指人或事物，相当于"其他"等。如：　②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论语·为政》"馀"句：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他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说出，就能减少错误；多看，有困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他〔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懊悔。)　③超临没上疏曰："臣门宗二百馀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馀无复言。"(《三国志·蜀书·马超传》"馀"句：马超临死〔向皇帝〕上疏说："我的家族共二百多口人，被曹

操诛杀殆尽，只有堂弟马岱应当成为我们衰微家族举行祭祀的继承人，深深地拜托陛下〔对他加以保护〕，其他就不再说什么了。”）（三）不定数词，用于数词、数量短语或表示时间的名词“月”等之后，表示馀数，相当于“多”。有时“馀”前加“有”，义同。如：④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孟子·离娄下》“馀”句：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隔一千多年。）⑤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馀，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馀”句：房舍东南角篱墙上长有一棵桑树，高五丈多，远远看去宛如小车盖一样，来往的人都奇怪这树不同寻常，有人认为〔这家〕要出贵人了。）⑥茂问曰：“子亡马几何时？”对曰：“月馀日矣。”（《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馀”句：卓茂问道：“你的马丢了多久了？”回答说：“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欤〔与〕yú 助词，用来表达语气，用于疑问句或反诘句，相当于“吗”“呢”；用于抉择问句，相当于“呢”；用于感叹句，相当于“啊”；表示测度语气，相当于“吧”。如：①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史记·商君列传》“与”句：商鞅说：“您不喜欢我治理秦国吗？”）②四海之大，有几人欤？（《七录斋集·五人墓碑记》“欤”句：天下如此之大，有几个人呢？）③今其智乃反不及，其可怪也欤？（《韩昌黎集·师说》“欤”句：现在君子们的智力竟然反而比不上那些巫医乐师，难道不是很奇怪吗？）④子巧与，有道与？（《庄子·知北游》）“与”句：是你手巧呢，还是有诀窍呢？）⑤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曹操集·论吏士行能令》“欤”句：议论者的话，简直象从竹管中看老虎啊！）⑥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柳宗元集·封建论》“欤”句：该不是诸侯力量过盛，象尾巴太大动转不灵的错误〔所致〕吧？）

与 yǔ （一）介词，介绍动作涉及的对象、服务的目的等，相当于“跟”、“替”等，“与”的宾语经常可省略。“与”的宾语有时在“与”前。如：①公与之乘。（《左传·庄公十年》“与”句：鲁庄公跟他一起乘车。）②今子与我取之，而不与我治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与”句：现在您替我取得天下，却不替我治理它。）③竖子不足与谋。（《史记·项羽本纪》“与”句：这个小子不值得跟他商议大事。）④民为邦本，一有逃移，谁与守邦？（《宋史·曾孝序传》“与”：人民是国家的根基，一旦逃移而去，跟谁一起守卫国家呢？）⑤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僖公十五年》“与”句：晋国位居深山之中，同戎狄为邻。）（二）连词。（A）连接并列的两项，相当于“跟”“和”。如：⑥吾与汝毕力平险。（《列子·汤问》“与”句：我跟你们一起竭尽全力铲平大山。）⑦丞相与殷共相往反。（《世说新语·文学》“与”句：丞相和殷中军一起往复辩难。）（B）用于选择复句的前一分句，

与后一分句的其它连词前后照应，相当于“与其”。如：⑧与人刃我，宁自刃。（《史记·鲁仲连列传》“与”句：与其让别人杀我，宁可自杀。）⑨与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新序·节士》“与”句：与其靠你而活着，不如被拘捕而死去。）

欲 yù　（一）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示施行某一动作是施事者的主观愿望，相当于“想”“打算”。如：①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东方朔。（《世说新语·规箴》“欲”句：汉武帝的乳母曾在宫外犯了错误，武帝想诉诸法律，她求救于东方朔。）②雅荐王珣于帝，帝欲见之。（《世说新语·谗险》“欲”句：王雅把王珣推荐给皇帝，皇帝打算召见他。）（二）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即将施行，相当于“将要”。如：③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欲”句：您的胃里有虫子几升，将要变成体内的毒疮。）④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世说新语·言语》“欲”：支公喜欢鹤，住在剡东岇山时，有人送给他一对鹤，过了不久鹤的翅膀长长了，将要飞去。）

豫〔预〕yù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在某个时间之前进行，相当于“预先”“事先”“早”等。如：①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史记·孝文本纪》“豫”句：预先确立太子是重视宗庙社稷、不忘国家大事的措施。）②岱将见贡，语友人张允、沈滑(mín)，令豫具船，以贡必悔，当追；逐之。（《〈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豫”句：高岱将要去见许贡，嘱咐他的朋友张允、沈滑，让他们事先准备好船只。认为许贡一定会反悔，来追赶他的。）③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预”句：我早知道会是这样，这不是我圣明，只是经历的事情多些罢了。）

缘 yuán　介词，介绍动作依沿的对象，相当于“沿着”等。如：①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靖节先生集·桃花源记》“缘”句：晋太元年间，有个武陵人以捕鱼为职业，沿着小溪前行，不知走了多远。）②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世说新语·黜免》“缘”句：桓公到蜀地去，行至三峡中，随行人员里有人弄到一只小猴，小猴的母亲沿着江岸哀声号叫。）

愿 yuàn　助动词，用于动词前，表示主观上愿意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愿意”等。如：①子路曰：“愿闻子之志。”（《论语·公冶长》“愿”句：子路说：“愿意听听您的志向。”）②吾欲攻郭则虞救之，攻虞则郭救之，如之何？愿与之虑之。（《公羊传·僖公二年》“愿”句：我想进攻郭国，虞国就会来救郭；进攻虞国，郭国就会来救虞，怎么办？愿意跟您商量这件事。）

允 yǔn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事实的确凿，相当于“必将”“确实”等。见于较早的上古文献或后代的仿古文章中。如：①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尚书·胤征》

"允"句：威严战胜其恻隐之心，必将成功；恻隐之心战胜其威严，必将不成功。） ②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尚书·大禹谟》"允"句：确实能如此，有益的言论不会被埋没，贤德的人才不会被遗漏在朝外，万国都得安宁。） ③尔以通经发闻于世。允蹈所学，尚何训哉？（《王文公文集·直讲刘仲章可大理寺丞》"允"句：你因为通晓经籍而被世人所知。确实能实践你所学到的知识，还有什么可以用来训导你呢？）

杂 zá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在参差不齐、杂乱无章的状态下施行，相当于"参差地""夹杂着"等。如：①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柳宗元集·游黄溪记》"杂"：溪水下面大石参差地排列着，可以坐在上面吃喝。） ②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xiàn）雪。（《洛阳伽蓝记·永宁寺》"杂"句：当时雷雨交加天色昏暗，冰粒和雪花夹杂着飘落下来。（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若干个施事者共同施行，相当于"都""共同"等。如：③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国语·越语下》"杂"句：那件事情因此不能成功，〔我们〕都将受到惩罚。） ④其后群臣言封禅者多，乃命秘书少监颜师古、谏议大夫朱子奢等集当时名儒杂议，不能决。（《新唐书·礼乐志》"杂"句：后来群臣中谈论到泰山祭祀天地的人很多，就命令秘书少监颜师古、谏议大夫朱子奢等人召集当时著名学者共同商议，但未能做出决定。）

哉 zāi　助词，用于感叹句末，表示慨叹语气。相当于"啊"等；用于疑问和反诘，相当于"呢"。如：①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震川文集·先妣事略》"哉"句：世间竟然有没有母亲的人！天呀，多么悲苦啊！） ②年来著书一种，名曰《天工开物卷》，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乏陈思之馆。（《天工开物·序》"哉"句：近年来写就一部书，名叫《天工开物卷》，贫穷该多么令人忧伤啊！想买些珍贵资料加以考证，却没有石崇等人那样的资财；想召集同行，讨论鉴别真伪，却没有陈思王曹植那种招延文人墨客的馆舍。） ③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汉书·司马迁传》"哉"：从前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呢？） ④吾何敢望古人哉？（《翰林罗圭峰先生文集·西溪鱼乐说》"哉"句：我怎敢自比古人呢？）

暂［蹔］zàn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突然施行，相当于"突然"等。如：①行十馀里，广详死。睨（nì）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馀军，因引而入塞。（《史记·李将军列传》"暂"句：走了十多里，李广假装死了。斜眼看见旁边有个匈奴小孩骑了一匹好马，李广突然跳到匈奴小孩的马上，顺势把小孩推了下去，夺取了他的弓箭，鞭打着马向南奔跑几十里，又找到他剩下的部队，带领他们进入边塞。）（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程度之低和数量之少，相当于"一""稍"等。如：②昔齐桓一矜其功而

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十三年》“暂”句：从前齐桓公一夸耀自己的功绩，背叛〔他〕的就有九国；曹操一骄横自夸，天下就分成了三部分。）③真君谓贾玉曰：“汝家骨肉，几为鱼鳖也，今须速移，不得暂停。”贾玉仓促徙居。（《太平广记·许真君》“暂”句：真君对贾玉说：“你家的亲骨肉，几乎成为鱼鳖。现在必须迅速迁移，不得稍停。”贾玉匆忙搬了家。）（三）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动作施行或性状呈现的时间短暂，相当于“暂时”“片刻”等。如：④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xiào）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任诞》“暂”句：王徽之曾经暂时寄住在别人的空宅中，还让人种上竹子。有人问他：“暂时住一住何必如此麻烦？”王吟咏了很久，直指着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君子呢？”）⑤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柳宗元集·与李翰林建书》“暂”句：有时走到幽雅的树林、奇美的石头那里，暂时能有一笑，随后又不觉得快乐了。）⑥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若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文选·晋纪总论》“暂”句：由于爱恶不同而互相攻击，由于利害冲突而互相争夺，这种情况是经常的。象是把水在堤岸旁积聚起来，把火在原野上点燃起来一样，〔水势火势〕不曾〔有〕片刻宁静。）

早〔蚤〕 zǎo　副词，用于动词和形容词前，表示动作或情状的出现在早晨或早些时候，或动作提早进行，相当于“一大早”“早晨”“过早地”“尽早”等。如：①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早”句：魏其和他的夫人多买了些牛肉和酒，连夜洒扫，一大早陈设餐具直到天亮。）②羊绥第二子孚，少有儁才，与谢益寿相好，尝蚤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世说新语·雅量》“蚤”句：羊绥第二个儿子羊孚，少年时就有出众的才华，跟谢益寿要好，曾早晨到谢家，没有吃饭，不一会儿王齐、王睹也来了。）③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世说新语·言语》“蚤”句：顾悦跟简文同岁，可是头发过早地变白了。）④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左传·隐公元年》“早”句：不如尽早给他个地方，不要让他的势力蔓延。）

则 zé　（一）连词。（A）连接时间上有相承关系的两项，相当于“就”。如：①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jiàn）。（《柳宗元集·永州八记》“则”句：我高兴地按他的意见办理，就加高了它的台子，加长了它的栏杆。）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聊斋志异·促织》“则”句：成回头看见蟋蟀笼里空了，就声咽气断。）（B）连接事理上有相承关系的两项；后项是前项的结果，有时，这样的两个句子并列出现，意义或相反，或相对。如：③民贫则奸邪生。（《汉书·食货志》“则”句：百姓贫困，奸诈邪恶现象就容易产生。）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唐纪·

太宗贞观二年》"则"句：兼听就聪明，偏信就愚暗。）　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则"句：学了却不思考就迷惘，只思考却不学就疑惑。）（C）两个"则"连接的两个并列句，"则"前的一项往往是说明"则"后一项的时间、方位、状态等的，两句意义或相反，或相对，"则"相当于"就""是"等。如：　⑥臣闻士之出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文选·曹子建：求自试表》"则"句：我听说士生活在社会上，回家就事奉父亲，外出就事奉国君。）　⑦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后汉书·耿恭传》"则"句：对外是纵容蛮夷施暴，对内是伤害殉难之臣。）　⑧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荀子·解蔽》"则"句：活着天下的人就歌颂，死了四海的人就痛哭。）（D）连接两个同样的词，表示让步，构成让步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倒是""固然"等。如：　⑨多则多矣，抑君似鼠。（《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则"句：多倒是多，可是您象老鼠。）　⑩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世说新语·文学》"则"句：你的讲演好倒是好，哪至于互相斗气呢？）　⑪善则善矣，然昔人为书者，岂若是摭前人耶？（《柳宗元集·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则"句：好固然好，然而过去写书的人，难道象这样挑剔古人吗？）（E）连接两项，后项在前项之先已经出人意外地实现了，相当于"原来已经"等。如：　⑫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左传·成公二年》"则"句：韩献子即将斩人，郤献子赶着车急往搭救，到那儿后原来已经斩杀了他。）　⑬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论语·微子》"则"句：让子路回去见他，子路去后〔他〕原来已经走了。）（F）用于假设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如果出现前面的情况，就可以出现后面的结果，相当于"那么""就"。如：　⑭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左传·隐公十一年》"则"句：您如赐恩于我，那么希望您答应滕君的请求。）（G）连接两项，后一项与前一项相反，"则"相当于"可是"等。如：　⑮臣欲奉诏奔驰，则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文选·李令伯：陈情表》"则"句：我想奉命效劳，可是祖母刘氏的病日渐沉重；我想苟且依顺个人感情不去做官，可是告诉我说不行。）　⑯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世说新语·忿狷》"则"句：魏武帝有一个歌妓，声音清脆高扬，但性情很坏。想杀了她可是舍不得她的才华，欲留下她可是又受不了。）（二）副词。（A）用于谓语前，表示判断，相当于"是""就是"等。如：　⑰视之则六，察之则鹢（yì）。（《公羊传·僖公十六年》"则"句：看上去是六个，仔细察看是一种叫做鹢的水鸟。）　⑱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则"句：这就是岳阳楼的壮丽景观。）（B）用于谓语前，表示限制范围，相当于"仅"。如：　⑲口耳之间，则四寸耳。（《荀子·劝学》"则"句：嘴与耳朵之间的距离，仅四寸而已。）（三）助词，用于"何"后，

表示自设询问，相当于“呢”。如：⑳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战国策·秦策三》“则”句：投给这些狗一块骨头，就立即互咬起来，为什么呢？有互相争抢的意思。）

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众无不按剑相眄（miàn）者，何则？无因至前也。（《新序·杂事》“则”句：月光一样晶莹的珍珠，夜里放光的璧玉，暗夜里在道上把它们投掷给行人，没有谁不按着剑斜眼相看的。为什么呢？没有理由地降临面前。）

旃（zhān）　（一）代词，用于动词后，指代上文出现的人或事物，相当于“他〔它〕”等。如：①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左传·桓公十年》“旃”句：从前，虞叔有块宝玉，虞公想要它。）（二）合音词，相当于“之”和“焉”。如：②高竖致卢而奔晋，晋人城绵而置旃。（《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旃”句：高竖交出了卢地而出奔晋国，晋国人建筑绵城而安置高竖在这里。）

朝 zhāo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发生在早晨，相当于“早晨”等。有时与“夕”前后呼应。“朝夕”相当于“时时刻刻”。如：①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朝”句：早晨听到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了。）②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墨子·非攻中》“朝”句：赵氏早晨死亡，我晚上我跟着他〔死去〕；赵氏晚上死亡，我〔第二天〕早晨就跟着他〔死去〕。）③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左传·成公二年》“朝”句：晋国跟鲁国卫国是兄弟之国，他们来告诉〔我们晋国〕说：“齐国时时刻刻都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发泄仇恨。”我们国君对此不能忍受，派我们来向贵国请求。）

肇 zhào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开始施行，相当于“开始”等。如：①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尚书·洛诰》“肇”句：王开始举行殷的祭礼，在新城举行祭祀，都进行得有条不紊。）②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后汉书·文苑列传》“肇”句：开始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个郡，据守在敦煌。）

辄 zhé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经常不断地施行，相当于“总是”等。如：①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史记·游侠列传》“辄”句：而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总是为他报仇。）②衡不慕当时，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后汉书·张衡传》“辄”句：张衡不慕权贵，所任官职，总是多年不升迁。）（二）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迅即，相当于“马上”“立即”。如③有敢收视者，辄捕之。（《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辄”句：有敢于收验或看视〔彭越头颅〕的人，马上逮捕他。）④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洛阳伽兰记·白马寺》“辄”句：得到奈林、蒲萄这些水果的人不敢立即吃掉，总要历传好多家。）（三）用于两个分句或两个短语间，表示后者承接前者出现，相当于“就”。如：⑤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世说新语·德行》

"辄"句：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就感到很为难。） ⑥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世说新语·德行》"辄"句：丞相看见长豫就高兴，看见敬豫就生气。）

者 zhě　（一）代词，用于动词、动词短语、形容词、数词等后，指代人、事物，相当于"的〔人〕""……种东西"等。为强调由数词充当的状语，把它升到全句谓语的位置上，而在主语后用"者"，相当于"的情况"。如：①缚者，曷为者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者"句：被捆绑的〔人〕是干什么的〔人〕？） ②此必射雕者也。（《史记·李将军列传》"者"句：这一定是匈奴中射雕的人。） ③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不可不与饮。（《世说新语·任诞》"者"句：比我强的人不能不跟他们饮酒，不如我的人也不可不跟他们饮酒，是我同辈的人不能不跟他们饮酒。） ④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世说新语·言语》"者"句：孔文举有两个孩子，大的六岁，小的五岁。） ⑤ 嵇欲言而复止者三。（《世说新语·规箴》"者"句：王嵇想说而又停下不说的情况〔有〕多次。）（二）助词。（A）用于主语后表示提顿，也有用于句尾煞句的，可不译出。如： ⑥秦始皇者，秦庄襄王子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者"句：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 ⑦左右曰："固然。"王因诛二人者。（《韩非子·内储说下》"者"句：左右的人说："本来就是这样。"于是魏王杀掉了这两个人。）（B）用于时间词语后凑足音节，可不译出。如：⑧今者项庄拔剑起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史记·项羽本纪》"者"句：现在项庄拔出剑来站起挥舞，他的主意打在沛公身上。） ⑨莫春者，春服既成。（《论语·先进》"者"句：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备好。）（C）与前面的"如""若"等构成"如……者""若……者"等，相当于"象……似的"。如： ⑩至廷见，如不能言者。（《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者"句：到朝廷上谒见，象不会说话似的。） ⑪言之，貌若甚戚者。（《柳宗元集·捕蛇者说》"者"句：说这些事，脸上象非常忧伤似的。）

真 zhēn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情况属实，相当于"确实""真""真正"。如： ①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世说新语·赏誉》"真"句：陈仲举曾赞叹说："象周子居这样的人，确实是治理国家的人才。"） ②人言会稽王痴，真痴。（《世说新语·方正》"真"句：别人说会稽王痴，〔他〕是真痴。） ③锐峰叠嶂，左右环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观。（《徐霞客游记·游雁宕山日记》"真"句：陡峭的山峰重叠的峻岭，从左右环绕相向，奇巧之状层出不穷，真正是天下的奇观！）

朕 zhèn　第一个称代词，秦以前，可指代普通人，自秦始皇起专用于皇帝自称。相当于"我""我的"等。如：

①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dǐ），朕；二嫂，使治朕栖。"（《孟子·万章上》"朕"句：象说：

"谋害都君都是我的功劳。牛羊，〔归〕父母；仓禀，〔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弤弓，〔归〕我；两位嫂嫂，让他们照料我歇息。"）②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朕"句：我是第一代皇帝，后代接数计算，二世三世一直到万世，无穷无尽地传下去。） ③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后汉书·章帝纪》"朕"句：特此公布告知天下，使明确了解我的意图。）

正（政） zhèng （一）副词。(A)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姿势端正、位置正中，或与另一情况正相吻合，相当于"端正地""不偏不倚地""正好"等。如： ①坐者百数，皆离席伏，护独东乡正坐。（《汉书·楼护传》"正"句：在座的宾客一百多人，都离开席位俯伏在地，唯独楼护面向东方端正地坐着。） ②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屈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梦溪笔谈·书画》"正"句：江南徐铉擅长写篆字。透过日光看他的字，笔画的中心有一缕浓墨不偏不倚地正在当中，就是到屈折拐弯的地方，也在当中，没有偏向一侧的地方。这是由于笔锋直下不向旁侧偏倒；所以笔锋能够常在笔画的正中。这是写字运笔的要法。） ③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十三年》"正"句：孙权叹息道："众人所持意见，都很使我失望。而今〔只有〕你阐明宏图大略，正好与我意相同。"）(B)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以公正的态度施行，相当于"正直地"等。如： ④御史大夫张汤……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史记·汲黯传》"正"句：御使大夫张汤……不肯正直地为天下人讲话，专门迎合君主的旨意：君主心里不喜欢的，就跟着诽谤他；君主心里所喜欢的，就跟着赞扬他。）(C)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相当于"正在"等。如： ⑤再循溪下，溪边香气袭人，则一梅亭亭正发。（《徐霞客游记·游黄山日记》"正"句：再沿着溪水往下走，溪边香气袭人，原来是一枝梅花高挺着正在开放。）(D)用于表示颜色的形容词前，表示颜色的纯正，相当于"纯"。如： 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水经注》"正"句：水的颜色纯黑，俗名叫黑水池。）（二）连词，用于让步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即使"等。如： ⑦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世说新语·文学》"正"句：不但能谈《白马论》的人不易得到，即使是能听懂的人，也不易得到。）

之 zhī （一）代词。(A)用于名词前，具有指示作用，相当于"这""这个"。如： ①之二虫又何知?（《庄子·逍遥游》"之"句：这两个虫又知道什么?） ②之歌者非常人也。（《吕氏春秋·举难》"之"句：这个唱歌的人不是寻常之人。）(B)用于第三人称，也活用于第一、第二人称，

可指代人和事物，没有单数、复数之分，相当于“他们”“他”“我”“你”等。如：③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chèn），跳往助之。（《列子·汤问》“之”句：邻居京城氏的遗孀有个遗腹子，刚到换牙的年龄，蹦跳着去帮助他们。）④闻之死，请往。（《礼记·檀弓下》“之”句：听说他死了，请允许我去看看。）⑤君将哀而生之乎？（《柳宗元集·捕蛇者说》“之”句：您哀怜我并打算使我活下去吗？）⑥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左传·宣公二年》“之”句：进谏如果不被采纳，就没有谁接替你了。）（二）助词。（A）用于修饰语和后面的中心词之间，相当于“的”。如：⑦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世说新语·德行》“之”句：家父好象桂树生长在泰山的顶端，上有万仞的高空，下有无法测知的深渊。）⑧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世说新语·言语》“之”句：夜里放光的珍珠，不一定必须出自孟津的河中。）（B）用于小句（子句和分句）的主、谓语之间，取消其独立性，可不必译出。如：⑨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世说新语·容止》“之”句：嵇延祖出类拔萃象野鹤立于鸡群中。）⑩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之”句：我有孔明，象鱼得到了水。）⑪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列子·汤问》“之”句：即使我死了，还有儿子活着呢。）（C）用于前置宾语与后面的动词或介词之间。如：⑫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左传·僖公十五年》“之”句：君王不忧虑〔自己〕流亡，却担心群臣。）⑬心无杂虑，唯鱼之求。（《列子·汤问》“之”句：〔我〕心中没有其他念头，只求鱼。）⑭吾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先进》“之”句：我不为那个人悲痛而为谁〔悲痛〕？）（D）用于某些动词或表示时间的词语后，补足音节。如：⑮公将鼓之。（《左传·庄公十年》“之”句：庄公将要敲响战鼓。）⑯久之，见其不动，试摸之，乃石也。（《梦溪笔谈·异事》“之”句：过了很久，见它不动，就试着摸它，原来是一块石头。）（三）连词，连接并列的两项，相当于“和”。如：⑰皇父之二子死焉。（《左传·文公十一年》“之”句：皇父和〔他的〕两个儿子死于是。）⑱昔鬼侯之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战国策·赵策三》“之”句：以前鬼侯和鄂侯、文王，是纣王的三公。）

直 zhí　副词。（一）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施行是直接的，相当于“直接”“径直”等。如：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史记·蒙恬列传》“直”句：始皇将漫游天下，经由九原，直接抵达甘泉。）②袁宏作《名士传》，直云王参军。（《世说新话·赏誉》“直”句：袁宏作《名士传》，径直称王安期为王参军。）（二）用于谓语前，表示限制范围，相当于“只是”等。如：③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孟子·梁惠王上》“直”句：只是没跑到百步之外罢了，这也是逃跑。）④吾直戏耳。（《汉书·叔孙通列传》“直”句：我

只是开个玩笑罢了。) ⑤中丞初不视，直云："鹰化为鸠，众鸟犹恶其眼。"(《世说新语·方正》"直"句：中丞一眼也不看匡术，只是说："鹰伪装成鸠，众鸟还是讨厌它的眼睛。")(三)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是施事者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特意施行的，相当于"故意""特地"等。如： ⑥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史记·留侯世家》"直"句：有一位老人，穿着粗布衣服，走到张良跟前，故意让他的鞋掉到桥下。) ⑦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直"句：我最不贤良，所以特地出使楚国。)

祇〔**秖**〕zhǐ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仅限于某种范围或情况，相当于"只不过""只是""只能"等。如：

①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左传·定公四年》"祇"句：我们晋国自从方城战役以来，楚国一直未能很好对付，〔出兵〕只不过是徒劳罢了。) ②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史记·项羽本纪》"祇"句：天下的局势还不知道会怎样，况且打天下的人是不顾惜家庭的，即使杀了他，也没有好处，只是增添祸害罢了。) ③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结怨而不见德。(《新序·杂事》"祇"句：所以无缘无故地来到〔别人〕面前，纵然〔向别人〕抛出随侯珠、夜光璧，也只能招来怨怒而不会受到感激。) ④异方之乐，祇令人悲、增忉(dāo)怛(dá)耳。(《文选·李少卿：答苏武书》"祇"句：异域的音乐只能令人悲伤、徒增忧痛而已。)

止 zhǐ 副词，用于谓语前，表示限制范围，相当于"只是""只"。如：

①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世说新语·赏誉》"止"句：王济有时经过，只是道句寒暖而已。) ②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rú)。(《世说新语·夙惠》"止"句：韩康伯几岁时，家里特别贫穷，到了很冷的严冬，只有一件短袄。) ③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南史·徐勉传》"止"句：今晚只能谈论风月，不应涉及公事。)

至 zhì (一)副词，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程度达于最高点，相当于"非常""极"等。如： ①彭城王有快牛，至爱惜之。(《世说新语·汰侈》"至"句：彭城王有一头跑得很快的牛，〔彭城王〕非常珍爱怜惜它。)

②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文选·李令伯：陈情表》"至"句：现在我是由被灭王朝俘来的贱虏，极卑微又极鄙陋。) ③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世说新语·德行》"至"句：当时是夏季，暴雨突然降临，而船又非常狭小。)(二)连词，表示在叙述一事之后，另提起一事，相当于"至于"；或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表示结果，相当于"以至"。如： ⑤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墨子·非攻》"至"句：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要损害别人而有利于自己；至于偷窃别人的狗、猪、鸡、猪仔，他不道德的程度更甚于进入别

人园子偷窃桃李。） ⑥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衔亭违命之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至”句：不能训示典章严明法纪，遇有大事就惊慌失措，以至有违背命令失守街亭的过失。）（三）介词，介绍动作的时间、处所、方位等，“至”和它的宾语可在动词前，也有在其后者，相当于“到”。如： ⑦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口。（《史记·滑稽列传》“至”句：到那时，西门豹往河边去同众人见面。） ⑧追至濮阳，下鄄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至”句：追击到濮阳，攻下鄄城。） ⑨先府君累增至吏部尚书。（《刘禹锡集·子刘子自传》“至”句：先父连续被提升直到吏部尚书。）

终 zhōng （一）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持续性和一贯性，或表示动作的最终结果，相当于“始终”“最终”等。如： ①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战国策·赵策》“终”句：鲁仲连辞让再三，始终不肯接受官爵。） ②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世说新语·尤悔》“终”句：颜氏感到耻辱。因王浑家门第高贵，始终不敢离异。） ③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世说新语·识鉴》“终”句：郗超观察他们好久，对傅瑗说：“你的小儿子才华和名声都会胜人一筹，但保全你的家族的，最终还会是〔他〕哥哥。”）（二）介词，介绍动作的时间，相当于“到……终结时”等。如： ④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申韩列传》“终”句：到申子生命终结时，韩国社会安定兵力强盛，没有侵犯韩国的诸侯。） ⑤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八年，家无馀财。（《史记·李将军列传》“终”句：到李广一生终结时，任二千石俸禄的高官四十多年，家中没有多馀的财物。） ⑥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贼为忠义。（《陈亮集·中兴论》“终”句：河北一些藩镇，到唐代终结时，一直以崇奉叛贼为忠义。）

诸 zhū （一）代词，用于动词后，作宾语，相当于“这个”“他”“他们”等。如： ①吾敢违诸乎？（《左传·昭公三年》“诸”句：我敢违背这个吗？） ②潘崇曰：“能事诸乎？”（《左传·文公元年》“诸”句：潘崇说：“能臣事他吗？”） ③驹伯曰：“待诸乎？”（《左传·宣公十二年》“诸”句：驹伯说：“抵挡他们吗？”） 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诸”句：告诉他已往的他就知道未来的。）（二）介词，介绍动作的处所，相当于“到”“给”“从”等。如： ⑤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庄子·逍遥游》“诸”句：有个宋国人买了礼帽而去到越国〔卖〕。） ⑥郑人囚而献诸楚。（《左传·宣公十五年》“诸”句：郑人把解扬囚拘起来献给楚国。） ⑦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左传·成公十年》“诸”句：到中午，〔他〕背着晋侯从厕所出来。）（三）“之于”的合音词，用于动词与后面的名词之间，指代动作的受事，并介绍动作的处所。如： ⑧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诸”句：子张把它写在大带上。）

⑨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列子·汤问》“诸”句：把它放到渤海边上，隐土北面。）（四）“之乎”的合音词，用于句尾。如：⑩吾恶乎哭诸？（《礼记·檀弓上》“诸”句：我在哪里哭他呢？）⑪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梁惠王下》“诸”句：周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吗？）（五）助词，用于句尾，表示祈使语气或感叹语气，相当于“吧”“啊”等。如：⑫子速诸！（《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诸”句：您快点吧！）⑬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左传·文公五年》“诸”句：皋陶、庭坚不祭祀，太不重视啊！）

自 zì　（一）介词、介绍动作的处所、时间、范围、原因等；“自”和它的宾语常在动词前，有时在其后；“自”以疑问代词作宾语，在疑问代词后。相当于“从”“由于”等。如：①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吕氏春秋·察今》“自”句：楚国有个渡江的人，他的剑从船上坠落到江水中。）②楚师还自徐。（《左传·昭公十三年》“自”句：楚军从徐国回来。）③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吕氏春秋·淫辞》“自”句：秦、赵一起订立盟约，盟约指明：“从今以后，秦国想做的事，赵国相助；赵国想做的事，秦国相助。”）④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自”句：从楚王以下的人都象教师那样尊重庄生。）⑤祸自怨起，福由德兴。（《史记·文帝本纪》“自”句：祸患由于怨怒而产生，福分由于恩德而到来。）⑥水奚自至？（《吕氏春秋·贵直》“自”句：水从哪里来？）⑦父老何自为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自”句：老人家从什么时候作了郎？）（二）副词。（A）用于谓语前，表示事情本来如此或理所当然，相当于“自然”。如：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自”句：桃树李树无须自己说话，树下自然被人们走出一条路径。）⑨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共欲出战，怒自十倍。（《史记·田单列传》“自”句：即墨人从城上看到，都哭了，都想出城作战，怒气自然十倍〔地增加〕。）（B）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主语代表的主体亲自施行，相当于“亲自”。如：⑩上自劳军。（《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自”句：文帝亲自慰问部队。）⑪既成，自行视。（《世说新语·言语》“自”句：〔馆舍〕建成之后，〔魏明帝〕亲自巡视。）（三）代词，用于动词前，实际上是动作的受事者，相当于“自己”。如：⑫王未出户，江叹曰：“人自量，固为难。”（《世说新语·方正》“自”句：王恭还没有出门，江卢奴就感叹道：“人正确估量自已，本来就是很难的。”）⑬王长史云：“刘尹知我，胜我自知。”（《世说新语·赏誉》“自”句：王长史说：“刘尹了解我，胜过我了解自已。”）（四）连词，用于让步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即使”；用于假设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如果”。“自非”义略同，相当于“如果不是”“除非”。如：⑭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

卑下之。(《汉书·周昌传》"自"句：周昌为人倔强，敢于直言，即使萧何、曹参这些人，也都谦敬待他。) ⑮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贾谊集·治安策》"自"句：如果高皇帝还不能因此得到一年的安定，我就知道您也不能。) ⑯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水经注·江水》"自"句：如果不是正午和半夜，就看不见太阳和月亮。) ⑰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文选·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自"句：除非有深怨，不会到这个地步。)

总 zǒng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由全部施事者发出，或表示动作涉及受事者的全部，相当于"全都""全面地"等。如： ①总持干楯，山立不动。(《〈史记·乐书〉注》"总"句：都拿着盾牌，象山一样直立不动。) ②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总"句：终于能够全面地掌握住大的时机，成功地创立伟大事业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英明策略是最突出的。)

纵 zòng 连词，用于让步复句的前一分句，相当于"即使""纵然"。"纵令""纵使"义同。如： ①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史记·项羽本纪》"纵"句：即使江东父老怜惜我而拥我为王，我有什么脸面见他们？即使他们不说什么，我难道能无愧于心吗？) ②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柳宗元集·封建论》"纵"句：如果汉王室把城邑全部封赏给他们使他们成为侯王，纵然他们扰害百姓，〔王室〕也只能忧戚而已。) ③纵使得仙，终当有死。(《颜氏家训·归心》"纵"句：即使得了仙道，终归得死。)

足 zú 助动词。(A)用于动词前，表示主语代表的事物，足够施行某种动作，相当于"足够""足以"等。如： ①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韩非子·五蠹》"足"句：古时候男人不用种地，野生的果实就足够吃了；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了；) ②王浑与妇锺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世说新语·排调》"足"句：王浑和夫人锺氏一起坐着，看见武子从庭院走过，王浑欣然对夫人说："生儿子象这样，足以安慰人心。")(B)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的施行是有价值的或有可能的，相当于"值得""必""能"等。这种用法的"足"经常与"不""何""胡"等连用作"不足""何足""胡足"等。如： ③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世说新语·汰侈》"足"句：石崇说："不值得遗憾，现在还给你。") ④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陶渊明集·桃花源记》"足"句：桃花源里的人说："不必跟外面的人说呀。") ⑤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十三年》"足"句：刚才观察众人的议论，纯粹是想贻误将军〔的大事〕，不能跟这些人计议大事。) ⑥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世说新语

·政事》"足"句：文王的园囿，还与民众共同享有，池中鱼哪里值得惋惜？） ⑦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漱玉集·金石录后叙》"足"句：然而有有就一定有无，有聚就一定有散，这是常理。有人丢了弓，就有人得到了弓，又哪里值得论说？）

卒 zú 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示动作是最终的结果，相当于"最终""终于""最后"等。如：①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史记·淮阴侯列传》"卒"句：把成安君陈馀杀死在泜水的南边，脑袋和脚不在一个地方，最终被天下人耻笑。） ②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盐铁论·非鞅》"卒"句：大夫文种辅助越王勾践，为他深谋远虑，终于灭掉了强大的吴国，占据了原属吴国的东夷。） ③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柳宗元集·黔之驴》"卒"句：假使毛驴不显出自己的本领小，老虎虽然凶猛，但是多疑胆怯，最后还是不敢去攫取它。）

最 zuì 副词，用于动词性短语、名词性短语前，表示动作、性状、方位等达到顶点和极度，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最"。如：①自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最"句：自己跟兵士平分口粮，而且是比照兵士中最体弱多病者〔的标准〕。） ②是时贾生年二十八，最为少。（《史记·屈原贾谊列传》"最"句：这时贾谊二十多岁，最年轻。） ③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最"句：田骈等都已辞世。齐襄王的时候，荀卿是最老的师长。） ④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汉书·杨胡朱梅云传》"最"句：天下的人都戒惧良言，是国家最大的祸患。） ⑤楼兰国最在东垂。（《汉书·西域传》"最"句：楼兰国在〔西域的〕最东边。）

古文典故

A

安堵识家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址，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竟识其家。"后以此典表现久客思乡之情，也用以咏汉高祖刘邦事。唐·骆宾王《兵部奏姚州破贼露布》："首丘怀恋，疑临旧国之墟；安堵识家，似入新丰之邑。"

昂昂千里 《楚辞》屈原《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正义引《鲁仲连子》："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后以此典称有才华、有作为的青少年。晋·潘岳《阳城刘氏妹哀辞》："诞育圣王，发奇稚齿。如彼名驹，昂昂千里。"

B

拔才岩穴 参见〔傅岩之梦〕。魏·曹植《文帝诔》："拔才岩穴，取士蓬户。惟德是索，弗拘祢祖。"南朝梁·江淹《萧骠骑让封第二表》："方求士于板岩，宜思贤于屠肆。"

霸陵醉尉 《史记·李将军列传》："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

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后以此典形容人失势后受到欺凌冷遇；也用以表现失势后的郁闷心情。北周·庾信《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霸陵醉尉，侵辱可知；东陵故侯，生平已矣。"

白虹贯日 《文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注引《列士传》："荆轲发后，太子相气，见白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矣。'"《汉书·邹阳传》应劭注："燕太子质于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后以此典表示人的诚心气概感动天地。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晋·潘岳《马汧督诔》："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棱威可厉，懦夫克壮。"唐·李白《拟恨赋》："至如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长虹贯日，寒风飒起。"

白龙鱼服 汉·刘向《说苑·正谏》："吴王欲从民饮酒，伍子胥谏曰：'不可，昔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龙上诉天帝。天帝曰："当是之时，若安置而形？"白龙对曰："我下清冷之渊化为鱼。"天帝曰："鱼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龙，天帝贵畜也；豫且，宋国贱臣也，白龙不化，豫且不射。今弃万乘之位，而从布衣之士饮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后以此典指大人物或能者才士遭逢困厄。汉·张衡《东京赋》："白龙鱼服，见困豫且。虽万乘之无惧，犹怵惕于一夫。"晋·潘岳《西征赋》："彼白龙之鱼服，挂豫且之密网。"

白鹿随车 《后汉书·郑弘传》注引吴·谢承《后汉书》："弘消息繇赋，政不烦苛。行春天旱，随车致雨。白鹿方道，侠毂而行。弘怪问主簿黄国曰：'鹿为吉为凶？'国拜贺曰：'闻三公车幡画作鹿，明府必为宰相。'"后以此典称颂地方官为政清明。南朝梁·萧绎《侍中新渝侯墓志铭》："三分竹使，再徙建旟。朱雉自举，白鹿随车。"南朝梁·萧纲《司徒始兴忠武王诔》："将旋上国，恋结四民；三鳣表服，二鹿随轮。"

百金难比重诺 《史记·季布列传》："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悦，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后以此典形容人严守诺言，言必有信。宋·李廷忠《谢王枢使荐举启》："虽十夫不得以挠椎，信百金难比于重诺。"唐·骆宾王《灵泉颂》："片善可嘉，朝闻甘于夕死；一诺犹重，黄金贱于白圭。"

百里自鬻 参见〔羊皮詎赎〕。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宁子饭牛。"魏·阮籍《大人先生传》："百里困而相嬴，牙既老而弼周。"

班超投翰 《太平御览》卷八二

九引《东观汉记》曰："班超，字仲升，家贫，恒为官佣写书，尝辍书投笔叹曰：'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后以此典表示弃文从戎，立功疆场，建树勋业。唐·杨炯《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班超投翰，扬雄执戟。弓合三才，刀长四尺。"唐·元稹《赠裴行立左散骑常侍》："班超奋笔，志在功名；郦寄秉心，义先忠孝。"

班超望返　《太平御览》卷三八三引《东观汉记》曰："班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后汉书·班梁列传》："（班）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后以此典表现将帅官员出使或任职边地久而思归。北周·庾信《哀江南赋》："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唐·柳宗元《为桂州崔中丞上中书门下乞朝觐状》："岂使班超之望长悬，子牟之恋空积。"

班姬辞辇　《汉书·外戚传》："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选人后宫。……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倢伃同辇载，倢伃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后以此典称颂后妃贤德有识见。魏·何晏《景福殿赋》："嘉班姬之辞辇，伟孟母之择邻。"晋·潘岳《西征赋》："壮当熊之忠勇，深辞辇之明智。"晋·张华《女史箴》："班女有辞，割欢同辇。夫岂无怀，防微虑远。"

班荆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王子牟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举实送之。'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后以此典表现交谊深厚、畅叙旧情。南朝梁·江淹《别赋》："可班荆兮增恨，唯尊酒兮叙悲。"

版筑　参见〔傅岩之梦〕。后汉·班固《公孙弘传赞》："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明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晋·羊祜《让开府表》："假令有遗德于板筑之下，有隐才于屠钓之间。"唐·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果投竿诣鏖，舍筑作相，佐周文，赞武丁。"

杯里蛇疑　《晋书·乐广传》："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乐）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是河南听事壁上有角，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顿愈。"后以此典比喻疑神疑鬼，自相困扰。唐·罗隐《吴公约神道碑》："床间牛斗，杯里蛇疑。天胡可测，神亦难知。"

北部丹帷　参见〔褰帷广听〕。北

周·庾信《谢赵王赉马并繖启》："北部丹帷，更须高卷；西河竹马，即已郊迎。"南朝梁·萧绎《侍中新渝侯墓志铭》："三分竹使，再徙建旂。朱帷自举，白鹿随车。"

北斗以南 《新唐书·狄仁杰传》："同府参军郑崇质母老且疾，当使绝域。仁杰谓曰：'君可贻亲万里忧乎？'诣长史蔺仁基请代行。仁基咨美其谊，时方与司马李孝廉不平，相语曰：'吾等可少愧矣。'则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后以此典称誉人品行高卓，为人景慕。宋·陆游《贺叶枢密启》："北斗以南一人，谁其伦拟；长安之西万里，行矣清夷。"

奔月 《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汉·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姮娥，也作常娥、嫦娥、常仪等。后以此典借指女仙、美人；或借指月。唐·杨炯《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银台窃药，想奔月而何年；金殿煎香，思反魂而无日。"南朝梁·江淹《遂古篇》："常娥奔月，谁所传兮；丰隆骑云，为灵仙兮。"

比干剖心 《史记·殷本纪》："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后以此典指忠臣直谏被害。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宋·陆九渊《送宜黄何尉序》："比干剖心，恶来知政；子胥鸱夷，宰嚭谋国。"

跛鳖千里 《荀子·修身》："故蹞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厌其源，开其渎，江河可竭；一进一退，一左一右，六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尔！"后以此典形容勤可补拙；或指人才能低下。唐·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则铅刀起一割之用，跛鳖致千里之行。"

碧鸡金马 《汉书·王褒传》："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汉书·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注：如淳曰："金形似马，碧形似鸡。"后以此典咏四川、云南一带风物。南朝梁·简文帝《神山碑铭》："关号天井，山称地雌。碧鸡金马，越渎梁池。"晋·左思《蜀都赋》："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倏忽而曜仪。"

鞭石成桥 《初学记》卷七引《齐地记》曰："秦始皇作石桥，欲渡海观日出处。旧说始皇以术召石，石自行，至今皆东首，隐轸似鞭挞瘢，势似驰逐。"《艺文类聚》卷七十九引《三齐略记》曰："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于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城阳一山石，尽起立，嶷嶷东倾，状似相随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尽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

尔。”后以此典形容秦始皇事；或用以咏桥、海边景色等。北周·庾信《哀江南赋》：“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唐·杨炯《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驾鼋梁于圣海，秦皇息鞭石之威；泛鳌钓于仙洲，愚叟罢移山之力。”

辩析天口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词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注引汉·刘向《别录》：“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后以此典形容人议论宏富，善于雄辩；或指谈论漫无边际，难以信实。南朝梁·任昉《宣德皇后令》：“辩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龙，而成辄削藁。”唐·李白《送黄钟之鄱阳谒张使君序》：“亦有抗节玉立，光辉炯然；气高时英，辩析天口。”南朝梁·萧纲《庶子王规墓志铭》：“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诵其心，谈天其口。”

别鹤之哀　《太平御览》卷五七八引汉·蔡邕《琴操》：“高陵牧子娶妻无子，父母将改娶，牧子援琴鼓之，痛恩爱乖离，故曰别鹤操。”后以此典指夫妻分离。唐·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琴前镜里，孤鸾别鹤之哀；竹死城崩，杞妇湘妃之怨。”

冰清之姿　《世说新语·言语》“卫洗马初欲渡江”条注引《卫玠别传》：“（卫玠）娶乐广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润之望，所谓秦晋之匹也。’”《晋书·卫玠传》：“玠妻父乐广，有海内重名，议者以为‘妇公冰清，女婿玉润。’”后以此典称美他人翁婿。唐·李白《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序》：“前许州司马宋公，蕴冰清之姿，重傅侯玉润之德，妻以其子。”

伯乐　《楚辞》屈原《九章·怀沙》：“伯乐既没，骥焉程兮？”后汉·王逸注：“孙阳，伯乐姓名。”《庄子·马蹄》：“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释文：“伯乐，姓孙，名阳，善驭马。”后以此典指善相马者，泛指技艺高超的人或善于鉴识人才的人。晋·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夫未遇伯乐，则千载无一骥；时值龙颜，则当年控三杰。”晋·孙楚《荐傅长虞笺》：“楚闻骐骥不遗能于伯乐，良宝不藏耀于卞和。”

伯牙绝弦　《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后以此典指心意相通的知音；或形容琴曲高妙。魏·曹丕《与吴质书》：“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南朝陈·刘师知《侍中沈府君序集》：“伯牙之弦，寂寥长绝；山阳之管，惆怅徒闻。”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

惭。"

伯夷叔齐 《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后以"夷齐"等指节操高尚的隐士；或以"采薇"等指隐士生活；也形容人恪守清高节操。汉·董仲舒《士不遇赋》："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周武有伯夷与叔齐。"南朝梁·萧绎《庾先生承先墓志》："风翻岭背，月下松西。扬名不朽，高蹈夷齐。"宋·苏洵《辨奸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

伯有之魂 《左传·昭公七年》："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晋·杜预注："襄三十年，郑人杀伯有，言其鬼至。"后以此典形容人心惶惧，自相惊扰。北周·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请门袭封表》："幸使伯有之魂，不能为厉；若敖之鬼，其无馁而。"

不礼于其嫂 《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后以此典指人失意潦倒，被人耻笑冷待。宋·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

步雪履穿 《史记·滑稽列传》："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仍似人足者乎？'"后以此典形容读书人生活穷困饥寒；也用以咏雪。唐·王维《送郑五赴任新都序》："牵衣肘见，步雪履穿。获戾由忠，是贫非病。"南朝梁·任孝恭《谢裙襦启》："而绳带屡尽，苦风霜之切；弊履恒穿，践泥沙之冻。"

C

采薇 参见〔伯夷叔齐〕。汉·杜笃《首阳山赋》："忽吾睹兮二老，时采薇以从容。魏·阮籍《首阳山赋》："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

苍鹰 《史记·酷吏列传》："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郅）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后以此典指执法严酷的官吏；或泛指司法官吏。北齐·樊逊《刑罚宽猛对》："则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兽含牙，苍鹰垂翅。"

沧浪之歌 《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复与言。"后以此典表示避世脱俗，保持高风节行；或反用表示随波逐流，混同世人。南朝梁·丘迟《还林赋》："依稀子陵之钓，仿佛沧浪之歌。"唐·王维《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燕集序》："犹有濯缨清歌，据梧高咏。与松乔为伍，是羲皇上人。"

长裾日曳 《文选·邹阳〈上书吴王〉》："今臣尽知毕议，易精极虑，则无国而不可奸；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后以此典指投靠并效劳于权贵之门。南朝齐·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长裾日曳，后乘载脂，荣立府庭，恩加颜色。"

尝胆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耶？'"《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越王念复吴雠，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后以此典形容人发愤立志，报仇雪耻。唐·元稹《授田布魏博节度使制》：

"家雠国耻，并在一门。当怀尝胆之心，岂俟绝浆之礼!"

草庐三顾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以此典表示诚心诚意聘请人才。晋·庾阐《吊贾生文》："夷吾相桓，汉登萧张。草庐三顾，臭若兰芳。"南朝梁·沈约《齐太尉王俭碑铭》："霸君亦虑属一匡，情隆三顾，卜匪熊罴，唯人是与。"

测海窥天　《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文选·东方朔〈答客难〉》："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后以此典指见识狭隘浅陋；或指浅薄无法理解高深。唐·王维《能禅师碑》："香饭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测海窥天。"北周·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以管窥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岂陈梗概?"宋·王安石《辞仆射表》："奉扬成命，虻力困于负山；敷释微言，蠡知穷于测海。"

豺狼当路　《汉书·孙宝传》："入见，敕曰：'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掾部渠有其人乎?'(侯)文印曰：'无其人不敢空受职。'宝曰：'谁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宝曰：'其次。'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复问狐狸。'宝默然。"另参见〔埋轮〕。南朝梁·萧绎《忠臣传执法篇》："豺狼当路，安问狐狸。昏明有世，直道无时。"晋·桓温《荐谯元彦表》："方今六合未康，豺豕当路，遗黎偷薄，义声弗闻。"唐·元稹《加裴度镇州四面招讨使制》："朝于尽脱网罗，岂欲驱之陷阱?而豺狼当道，荆棘牵衣。"

巢父　晋·皇甫谧《高士传》："巢父者，尧时隐人，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尧之让许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击其膺而下之，由怅然不自得。"后以此典指埋名隐居的隐士。北周·庾信《小园赋》："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魏·曹植《七名》："河滨无洗耳之士，乔岳无巢居之民。"

巢许　参见〔巢父〕、〔洗耳〕。后汉·蔡邕《郭有道碑文》："将蹈鸿崖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魏·徐干《中论》："轻位不仕者，则有巢许之高；废职待客者，则有仲尼之称。"唐·李白《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序》："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

巢由　参见〔巢父〕、〔洗耳〕。南朝梁·江淹《齐王让禅表》："伏愿陛下遗舜禹之心，臣守巢由之节。"宋·

陆游《丞相率文武百僚贺寿皇正旦表》："以海宇之富，而蹈巢由高世之风。"

陈宝鸣鸡 《史记·秦本纪》："（文公）十九年，得陈宝。"正义引《晋太康地志》："秦文公时，陈仓人猎得一兽，若彘，不知名，牵以献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娟，常在地中，食死人脑。'即欲杀之，拍捶其首'。娟亦语曰：'二童子名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乃逐二童子，化为雉，雌上陈仓北坂，为石，秦祠之。"后以此典形容称霸、霸业。后汉·张衡《西京赋》："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层梁岍雍，陈宝鸣鸡在焉。"晋·潘岳《西征赋》："邪界褒斜，右滨汧陇。宝鸡前鸣，甘泉后涌。"北周·庾信《齐王进赤雀表》："臣闻南阳雉飞，尚论秦霸；建章鹄下，犹明汉德。"

陈蕃之志 《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吴·谢承《后汉书》："陈蕃家贫，不好扫室，客怪之者，或曰：'可一扫乎？'蕃曰：" '大丈夫当为国扫除天下，岂徒室中乎？'"《后汉书·陈玉列传》："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后以此典形容人有大志，但尚未得机会施展。唐·杨炯《从弟去溢墓志铭》："黄宪之名，闻于海内；陈蕃之志，扫于天下。"

陈后失宠 《文选·司马相如〈长门赋〉序》："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后以此典形容妇女失宠，心境愁闷。唐·李白《拟恨赋》："若夫陈后失宠，长门掩扉。日冷金殿，霜凄锦衣。"

陈雷 《后汉书·独行列传》："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与同郡雷义为友，俱学鲁诗、颜氏春秋。太守张云举重孝廉，重以让义，前后十余通记，云不听。义明年举孝廉，重与俱在郎署。""义归，举茂才，让于陈重，刺史不听，义遂阳狂被发走，不应命。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三府同时俱辟二人。"《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引《谯子》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后以此典形容朋友间友情真挚牢固。唐·杨炯《宴族人杨八宅序》："若使陈雷可作，摄齐于廊庑之间；管鲍再生，拥篲于高门之外。"

称象于船 《三国志·魏书·曹冲传》："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曹操）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后以此典称颂人年少聪颖。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崔说神道碑》："观虎于槛，韶发不惊；称象于船，胜衣能对。"

丞相问牛 《汉书·丙吉传》：

“（丙）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合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后以此典形容官员关心民间疾苦，也借指丞相等高官。唐·罗隐《投永宁李相公启》：“晋代则司空试剑，汉朝则丞相问牛。”北周·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少阳用事；路不喘牛；仲秋以殿，民无惊水。”

成都之壁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乃使人重赐卓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后以此典形容家境贫寒，一无所有。唐·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直以容膝一丘，曲阜之瓢遽切；枕肱五亩，成都之壁已穷。”宋·张孝祥《重修三塔偈》：“七泽所潴，十年九潦。三塔虽在，四壁常空。”

澄波千顷　《后汉书·郭太列传》注引吴·谢承《后汉书》：“初，（郭）泰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黄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后以此典形容人学识广博，才器宏富。北周·庾信《周陇右总管长史豆卢公神道碑》：“公资忠履孝，蕴义怀仁，直干百寻，澄波千顷，留心职事，爱玩图籍。”唐·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心波湛汉，泳曜魄于黄陂；情岳干天，韬风云于稽岭。”

乘赤鲤　汉·刘向《列仙传》：“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之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旁，设祠。’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后以此典形容仙家之事；也借指乘船、渡水等。晋·左思《魏都赋》：“琴高沉水而不濡，时乘赤鲤而周旋。”

乘桴　《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后以此典指避世远遁；或泛指航海。后汉·班彪《览海赋》：“悟仲尼之乘桴，聊从容而遂行。”晋·戴逵《闲游赞》：“放舞雩以发咏，闻乘桴而慨厉。”

乘轩之鹤　《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后以此典指人无功受禄；或用以咏鹤。唐·元稹《授刘悟检校司空幽州节度使制》：“不均飨士之羊，徒养乘轩之鹤。”南朝宋·鲍照《舞鹤赋》：“入卫国而乘轩，出吴都而倾市。”

虫臂鼠肝　《庄子·大宗师》：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后以此典借指事物微细不足道。唐·王维《为薛使君射婺州刺史表》："岂臣虫臂鼠肝，所能谈天述圣。"

处士星　《太平御览》卷七引晋·孙盛《晋阳秋》："会稽谢敷字庆绪，隐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处士星。时戴逵名著于敷，时人忧之，俄而敷死，故会稽人士嘲曰：'吴中高士，求死不得死。'"后以此典借指高人隐士；或指隐士去世。唐·杨炯《唐上骑都尉高君神道碑》："议郎清秩，县符处士之星；开府崇班，上接台阶之位。"南朝梁·萧绎《中书令庾肩吾墓志》："关吏早逢，恒表真人之气；少微晚映，还彰隐士之星。"

楚歌四合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后以此典形容孤立危急、四面受敌的处境。唐·李白《拟恨赋》："闻楚歌之四合，知汉卒之重围。"

床间牛斗　《世说新语·纰漏》："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有蚁动，谓是牛斗。"后以此典指心神惊悸；也指无谓争斗。唐·罗隐《吴公约神道碑》："床间牛斗，杯里蛇疑。天胡可测，神亦难知。"宋·范成大《问天医赋》："且欲兴而三休，夜将诵而九息。听蚁为牛，视朱作碧。"

吹箫弄玉　汉·刘向《列仙传》："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后以"弄玉"指仙子、公主、女子等；以"凤台"等指仙子或女子居住的楼阁；或形容吹奏乐曲。北周·庾信《春赋》："吹箫弄玉之台，鸣佩凌波之水。"唐·崔融《嵩山启母庙碑》："孔雀飞而仪凤舞，弄玉遨欢。"

垂衣以君　《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后以此典称美君主无为而治。唐·崔融《嵩山启母庙碑》："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负扆而化，垂衣以君。"

醇酎中山　晋·张华《博物志》卷十："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向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后以此典指美酒。晋·左思《魏都赋》："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

窜身清漳　《文选·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诗之二》："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所

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便复为别辞，游车归西邻。"后以此典指人生病或生涯寂寞潦倒。北周·庾信《周大将军义兴公萧公墓志铭》："临淄负海，翻然改途；窜身清漳，垂翅渤海。"宋·欧阳修《上随州钱相公启》："告休漳浦，许淹卧以弥旬；偶造习家，或忘归而终日。"宋·陆游《谢施参政启》："零丁稷下之游，寂寞漳滨之卧。"

D

大床独卧　参见〔元龙湖海〕。宋·陆游《上郑宣抚启》："湖海襟怀，正在大床之独卧；庙堂风采，未妨一壑之初心。"

大电绕枢　《初学记》卷一引《帝王世纪》："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娶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感附宝，孕二十月，生黄帝于寿丘。"后以此典表现上古帝王事，或祝颂君王寿辰。北周·庾信《周使持节大将军丘乃敦崇传》："况复大电绕枢，流星入昴，派分源别，干其嗣兴者乎？"北魏·温子升《司徒元树墓志铭》："昔枢电降祥，姬水成业。握八符以驭世，膺五命之会昌。"宋·陆游《丞相率文武百僚请建重明节表》："当渚虹枢电之辰，受岳贡川珍之集。"

带砺山河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亦载，注引应劭曰：'封爵之誓，国家欲使功臣传祚无穷也。带，衣带也。厉，砥厉石也。河当何时如衣带，山当何时如厉石，言如带厉，国犹永存，以及后世之子孙也。"后以此典指传国长久；也指经历时间久远。唐·张说《唐故凉州长史元君石柱铭序》："坛场鄗洛，据天地之图；带砺山河，建王侯之国。"唐·元稹《许刘总出家制》："功留鼎彝，誓著山河。长存鱼水之欢，勿忘香火之愿。"唐·罗隐《代武肃王钱镠谢赐铁券表》："录臣以丝发之劳，赐臣以山河之誓。"

箪食瓢饮　《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字子渊，是孔子最赏识的学生。后以此典形容读书人的清苦生活；或形容虽生活清苦，但读书治学，自有其乐。魏·桓范《荐管宁表》："以箪食瓢饮，过于颜子；漏屋蔽衣，逾于原宪。"唐·韩愈《与李翱书》："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魏·曹植《大司马曹休诔》："好彼蓬枢，甘彼瓢箪，味道忘忧，逾宪超颜。"

当熊　《汉书·外戚传》："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婕伃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婕伃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元帝嗟叹，以此倍敬重焉。傅昭仪等皆惭。"后以此典形容女子忠勇有义，临危不惧。晋·潘岳《西征赋》："壮当熊之忠勇，深辞辇之明智。"晋·张华《女史箴》："玄熊攀槛，冯媛趋进，夫岂无畏，知死不吝。"

蹈海之志　参见〔鲁连赴海〕。晋·陆机《演连珠》之四十八："是以吞纵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卤之威，不能降西山之节。"南朝宋·范晔《逸民传论》："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唐·李白《奉饯十七翁寻桃花源序》："则绮皓不得不遁于南山，鲁连不得不蹈于东海。"

倒屣迎宾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后以此典形容主人热情待客，宾主情意相投。唐·杨炯《唐恒州刺史王公神道碑》："金友玉昆，良田广宅，而能吐食下士，倒屣迎宾。"

登车之志　参见〔揽澄清之辔〕。宋·张孝祥《淮东漕魏郎中启》："某栖迟晚节，漫浪此官，方怀投劾之归，空切登车之志。"

登龙　参见〔元礼龙门〕。唐·骆宾王《上李少常伯启》："将恐在藻纤鳞，终寡登龙之望；抢榆弱羽，徒仰抟鹏之高。"

登御之车　《太平御览》卷四六七引晋·司马彪《续汉书》："荀爽尝谒李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见慕如此。"后以此典表示与名人贤士往来，感到荣耀。唐·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龙津共济，竞欣登御之车；羌室钦贤，必揽澄清之辔。"宋·陆游《与沈知府启》："公将假道于虞，仆其得御于李。"

帝为杜鹃　《文选·左思〈蜀都赋〉》注引《蜀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号曰望帝。宇死，俗说云，宇化为子规。子规，鸟名也。蜀人闻子规鸟，皆曰望帝也。"后以此典咏杜鹃鸟；或咏蜀地风物。唐·杨炯《浑天赋》："女何冤兮化精卫，帝何耻兮为杜鹃。"晋·左思《蜀都赋》："碧出苌弘之血，鸟生杜宇之魄。"

颠倒山公　《世说新语·任诞》："山季伦（简）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注引《襄阳记》曰："汉侍中习郁在岘山南，依范蠡养鱼法作鱼池，池边有高堤，种竹及长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燕名处也。山简每临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曰：'此是我高阳池也。'襄阳小儿歌之。"后以

此典表现豪饮醉酒，不拘礼数；也形容士人饮宴之事。宋·孙觌《西徐上梁文》："颠倒山公白接篱，光芒太一青藜杖。"唐·李商隐《道士胡君新井碣铭》："覆景升之伯雅，倒季伦之接䍦。"唐·骆宾王《秋日于益州李长史宅宴序》："曲浦澄漪，似对任棠之水；芳亭兴洽，如归山简之池。"

殿中无双 《后汉书·丁鸿列传》："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后以此典称美人学识渊博，经义明晰。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枢机近侍，出纳丝言，所谓多识旧章，殿中无双者矣。"

鼎湖弓剑 参见〔黄帝登仙〕。宋·王安石《英德殿上梁文》："已葬鼎湖之弓剑，将游高庙之衣冠。"

东阁官梅 南朝梁·何逊《杨州法曹梅花盛开》诗："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注："逊为建安王水曹，王刺扬州，逊廨舍有梅花一株，日吟咏其下，赋诗云云。后居洛思之，再请其任，抵扬州，花方盛开，逊对花彷徨，终日不能去。"唐·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后以此典咏梅花，寄托兴致。宋·陆游《与本路郡守启》："曲江禁柳，早旅食于京华；东阁官梅，晚狂吟于蜀道。"

东海成田 晋·葛洪《神仙传》："（王远）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久不到民间，今来在此，想姑能暂来语否？'……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后以此典形容世事翻覆迁改，人事变迁；也用以形容年代久远。隋·江总《度支尚书陆君诔》："悬车以泊，就木何几。但东海成田，南冠承絷。"南朝梁·萧纲《招真馆碑》："夫东瀛渌水，三变成田；西岳灵桃，千载未子。"

东海孝妇 《汉书·于定国传》："东海有孝妇，少寡无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以此典形容人遭受冤屈；也形容天旱。唐·杜牧《祭城隍神祈雨文》："东海孝妇，吏冤杀之，天实冤之，杀吏可也。"

东家丘 《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邴原别传》："（邴原）欲

远游学，诣安丘孙崧。崧辞曰：'君乡里郑君（玄），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躧履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文选·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张诜注："鲁人不识孔子圣人，乃云：'我东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轻孔丘也。"后以此典指人浅陋无知，轻视贤人才士。南朝梁·沈约《辩圣论》："干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为东家丘，或以为丧家犬。"魏·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故颇奋文辞，异于他日，怪乃轻其家丘，谓为倩人。"

东山之志　参见〔高卧东山〕。唐·王维《与工部李侍郎书》："吟咏先王遗风，翛然有东山之志。"宋·陆游《贺吕知府启》："虽北阙之书，至于屡上；然东山之志，宁许遽从。"

董狐　《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后以此典称颂敢于秉笔直书、不加隐讳的史臣。唐·白居易《鸡距笔赋》："夫然，则董狐操，可以勃为良史；宣尼握，可以删定《春秋》。"

董生下帷　《史记·董仲舒传》："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后以此典形容人专心致志，精研学问。后汉·班固《答宾戏》："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南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下帷闭户，投斧想梁，虽玄晏书淫，文胜经溢。"唐·张说《洛州张司马集序》："下帷覃思，穿墉嗜古。蓬山芸观之书，群玉惎金之记。"

董衣百结　《太平御览》卷六八九引王隐《晋书》："董威辇，不知何许人，忽见洛阳，止宿白社，于市得残缯，辄结以为衣，号曰'百结衣'。"后以此典形容人贫困，衣衫破烂。南朝陈·江总《山水纳袍赋》："若董衣之百结，同卫服之十年。"北周·庾信《拟连珠》之二十九："盖闻悬鹑百结，知命不忧；十日一炊，无时何耻。"

洞庭之乐　《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庄子·至乐》："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不人，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后以此典指演奏盛大音乐；或咏黄帝事。北齐·邢子才《百官贺平石头表》："行举洞庭之乐，放畜长洲之苑。"

独鹤群鸡　《世说新语·容止》："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后以此典形容人风度不凡，超出常人。唐·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昂昂不杂，如独鹤之映群鸡；矫矫无

双，状真龙之对刍狗。"

渡河之兽　《北堂书钞》卷七五引吴·谢承《后汉书》："刘昆迁弘农太守，先是崤险，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而去。"又引晋·华峤《后汉书》："宋均迁九江太守，先是九江多虎，数伤民。均曰：'咎在贪残，均今退贪残。'虎远渡江，不为民害。"后以此典称誉地方官吏政绩卓著。北周·庾信《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虽复兼能共治，未遣渡河之兽；烽拆是警，实扰移关之民。"

短狐伺景　《太平御览》卷九五○引陆机《毛诗疏义》："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龟二足，江淮水皆有。人在岸，影在水中，投入影则杀人，故曰射影也。"《抱朴子·登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似鸣蜩，大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即发疮。不晓治之者，杀人。其病似大伤寒，不十日皆死。"后以此典形容暗中攻击，诽谤中伤他人。唐·柳宗元《闵生赋》："雄虺蓄形于木杪兮，短狐伺景于深渊。"

E

二顷之田　《史记·苏秦列传》："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后以此典指家中产业；或指归隐田园。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渭南千亩之竹，更惧盈满；池阳二顷之田，常思止足。"

F

樊姬感庄　汉·刘向《列女传》："樊姬，楚庄王之夫人也。庄王即位，

好狩猎，樊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王改过，勤于政事。"后以此典形容女子贤德。晋·张华《女史箴》："樊姬感庄，不食鲜禽；卫女矫桓，耳忘和音。"唐·王维《沂阳郡太守王公夫人成氏墓志铭》："诚良人之从畋，不尝原兽；训爱子之为政，遂返池鱼。"

范蠡登舟 《国语·越语下》："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史记·货殖列传》："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后以此典形容及时隐退，不贪恋官位；或形容心境恬退，泛舟江湖。唐·元稹《许刘总出家制》："张良却粒，尚想高踪；范蠡登舟，空瞻遗象。"唐·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可谓庚桑畏垒，致大壤以匡时；范相鸱夷，行计然而济俗。"

饭牛 参见〔宁戚饭牛〕。后汉·班固《公孙弘传赞》："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明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唐·元稹《回风变节判》："和饭牛之唱，白露乍结于东郊；授舞鹤之声，青阳忽生于南吕。"

饭玉炊桂 《战国策·楚策三》："苏秦之楚，三月乃得见乎王。谈卒，辞而行。楚王曰：'寡人闻先生，若闻古人。今先生乃不远千里而临寡人，曾不肯留，愿闻其说。'对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闻命矣。'"后以此典形容物价高昂，生活艰难。魏·应璩《与尚书诸郎书》："中馈告乏，役者莫兴，饭玉炊桂，犹尚优泰。"北周·庾信《谢赵王赉米启》："非丹灶而流珠，异荆台而炊玉。"

方朔之饥 《汉书·东方朔传》："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后以此典指小官俸微禄薄，生活窘困；也借指求官职。宋·陆游《谢周枢使启》："朝迹久疏，忽喜长安之近；戍期未及，先宽方朔之饥。"唐·卢照邻《双槿树赋》："侏儒何功兮短饱，曼倩何负兮长贫。"

防风后至 《国语·鲁语下》："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后以此典指讨伐叛臣逆党；或咏异闻奇物。唐·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诗序》："舜觐群后，有苗不服。禹会诸侯，防风后至。"唐·骆宾王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唐·杨炯《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七旬下羽，不籍有苗之师；万国侯王，坐见防风之戮。"

鲂鱼赪尾 《诗·周南·汝坟》："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郑玄注："赪，赤也，鱼劳则尾赤。"后以此典形容人困苦劳累，负担很重。北周·庾信《哀江南赋》："既而鲂鱼赪尾，四郊多垒。"唐·李商隐《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击水三千，暂随鹏运；澄流十二，免使鱼劳。"

飞燕体轻 《太平御览》卷五七四引《汉书》："赵飞燕体轻，能掌上舞。"唐·李冗《独异志》："汉成帝赵飞燕身轻，能为掌上舞。"后以此典形容女子体态轻盈。后汉·张衡《西京赋》："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晋·潘岳《西征赋》："卫鬒发以光鉴，赵轻体之纤丽。"

飞鸢堕水 《东观汉记·马援》："马援击交址，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尝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为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乌鸢跕跕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后以此典表示边地环境艰险或处境险恶，内心感慨。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而飞鸢堕水，马援去而无归；金马骋光，王褒行而不反。"

非惧真龙 汉·刘向《新序·杂事第五》："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后以此典指看起来爱好，而并非真的爱好。南朝梁·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朕倾心骏骨，非惧真龙；辎𫄨青紫，如拾地芥。"

吠尧之犬 《汉书·邹阳传》："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后以此典比喻一心为主子效命；或各为其主。唐·王维《大唐故临汝郡太守韦公神道碑铭》："吠尧之犬，驱彼六骡；凭武之狐，犹威百兽。"

分光邻女 汉·刘向《列女传》："齐女徐吾者，齐东海上贫妇人也，与邻妇李吾之属会烛相从夜绩。徐吾最贫而烛数不属。李吾谓其属曰：'徐吾烛数不属，请无与夜也。'徐吾曰：'是何言与？妾以贫烛不属之故，起常

早，息常后，洒扫陈席以待来者，自与蔽薄，坐常处下，凡为贫烛不数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烛不为暗，损一人烛不为明，何爱东壁之余光，不使贫妾得蒙见哀之恩，长为妾役之事，使诸君常有惠施于妾，不亦可乎？'"后以此典指希求得到别人的援助提携。唐·李商隐《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在稽、吕之交朋，宿常连接。而独分光邻女，贷润监河。"宋·陆游《谢葛给事启》："某偶阶末契，遂借余光。"宋·张孝祥《王提举启》："食求饮冰，且钦昔德；匿瑕藏垢，今借余辉。"

分桃断袖　《韩非子·说难》："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后汉书·董贤传》："哀帝立，贤随太子官为郎。二岁余，贤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识而问之，曰：'是舍人董贤邪？'因引上与语，拜为黄门郎，繇是始幸。……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日间赏赐钜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后以此典指受君主权贵宠爱的男宠。南朝梁·沈约《忏悔文》："淇水上宫，诚云无已；分桃断袖，亦足称多。"

分香卖履　魏·曹操《遗令》："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后以此典形容风流云散，霸业已空；也形容嘱托后事。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焚书坑儒　《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又"（侯生、卢生）于是皆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后以此典指毁灭文化，残害读书人的行径。汉·孔安国《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风声鹤唳　《晋书·苻坚载记》："（苻）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融于是麾军却阵，欲因其济水，覆而取之。军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军遂大败。王师乘胜追击，至于青冈，死者相枕。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还于淮北，……闻风声鹤唳，皆谓晋师之至。"后以此典形容人慌乱疑惧，自相惊扰。宋·李刘《贺丞相明堂庆寿并册皇后启》："风声鹤唳，不但平淮；雪夜鹅鸭，更

观擒获。"

风树之叹 《韩诗外传》卷九："孔子辟车与之言，曰：'子非有丧，何哭之悲也？'皋鱼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好学，周游诸侯，以殁吾亲，失之一也；高尚吾志，简吾事，不事庸君，而晚事无成，失之二也。与友厚而中绝之，失之三矣。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吾请从此辞矣！'"后以此典表现人怀念父母，感慨未能尽孝。唐·白居易《八人亡父同制》："斯可以栽扬兰陔之光，辍风树之叹耳。"北魏·温子升《常山公主碑》："而钟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风无静树。"

冯驩弹铗 《史记·孟尝君列传》："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蹻而见之。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孟尝君置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作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长。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孟尝君不悦。"后以此典形容有才能不得赏识任用，心中郁闷，也指对人有所希求。唐·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薛邑闻歌，揖冯驩于弹铗；夷门命驾，顾侯嬴于抱关。"南朝梁·陶弘景《答赵英才书》："予架学区中，飞才甸外，不肯扫门觅仕，复懒弹铗求通。"

冯唐已老 《史记·冯唐列传》："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后以此典感慨岁月蹉跎，人已老去，不被任用。唐·王维《为杨郎中祭李员外文》："恨冯唐之已老，喜相如之同时。"南朝梁·刘孝标《辨命论》："贾大夫沮志于长沙，冯都尉皓发于郎署。"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冯谖三窟 《战国策·齐策四》："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后以此典指避祸求安，多设藏身之所。魏·

吴质《答东阿王书》:"深蒙薛公折节之礼,而无冯谖三窟之效。"

凤凰池 《晋书·荀勖传》:"久之,以勖守尚书令。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恨。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贺我耶?'"后以此典指中书省,泛指中央政府机构。北周·庾信《为杞公让宗师骠骑表》:"伏愿览青蒲之奏,曲允微诚;诏凤凰之池,特收严召。"南朝梁·任昉《王文宪集序》:"长舆追专车之恨,公曾甘凤池之失。"唐·杨炯《同詹事府祭郝少保文》:"昭昭北斗,宫号文昌;隐隐西掖,池名凤凰。"

伏波铜柱 《后汉书·马援列传》注引《广州记》:"(马)援到交址,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水经注·温水注》引《林邑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后以此典表示将领征战边地,奠定疆域。唐·李白《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如星辰而增辉,挂文字而不灭,虽汉家金茎,伏波铜柱,拟兹陋矣。"唐·卢照邻《秋霖赋》:"子卿北海,伏波南川,金河别雁,铜柱辞鸢。"

伏青蒲 《汉书·史丹传》:"(史)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后以此典形容直臣强谏。南朝梁·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比虽辐凑阙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

鹏入 参见〔贾生问鹏〕北周·庾信《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既而三湘辽远,时逢鹏入;五溪卑湿,或见鸢飞。"唐·白居易《答户部崔侍郎书》:"虽鹏鸟集于前,枯柳生于肘,不能动其心也。"

抚铜人 《后汉书·蓟子训传》:"蓟子训者,不知所由来也。建安中,客在济阴宛句。有神异之道。""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后以此典感慨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宋·陆游《答交代陈太丞启》:"抚铜人而叹息,方感旧游;拾竹马之弃遗,俱叨新命。"

阜乡留舄 汉·刘向《列仙传》:"安期先生者,琅琊阜乡人也。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翁。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度数千万。出于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后以此典形容仙家之事。晋·木华《海赋》:"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襂缅。"魏·阮籍《清思赋》:"释安期之朱履兮,践席假而集帷。"

俯拾青紫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后以此典指读书以求官。南朝梁·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忘舍讲之尤,存诸公之贵,俯

拾青紫，岂待明经。”唐·元稹《授卫中行陕州观察使制》：“始以词赋深美，轩然有名。甲乙符升，遂拾青紫。”南朝梁·刘峻《辩命论》：“见张恒之朱绂，谓明经拾青紫。”

负鼎谒汤　《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后以此典指寻求机遇，以得帝王赏识任用。唐·杨炯《唐恒州刺史王公神道碑》：“河宗两日，负鼎而谒成汤；渭水七年，垂钓而逢西伯。”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晋·陆机《遂志赋》：“傅栖岩而神交，伊荷鼎以自进。”

负米　汉·刘向《说苑·建本》：“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为亲负米之时，不可复得也。’”后以此典指孝敬奉养父母。唐·杨炯《唐恒州刺史王公神道碑》：“积粟万钟，思负米而何得；榱题三尺，泣吾亲而不见。”

负弩前驱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武帝）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后以此典指迎接官长，礼仪隆重；也形容宿愿实现，得任显官。宋·陆游《贺叶提刑启》：“抠衣函丈，每怀问道之诚；负弩前驱，即下望尘之拜。”北周·庾信《周大将军闻嘉公柳遐墓志》：“犀节去关，衮衣驰传，迎郊则文学前驱，宾卫则邦君负弩。”

附骥尾　《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索隐：“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以譬颜回因孔子而名彰也。”《太平御览》卷九四四引《东观汉记》：“光武与隗嚣书曰：‘苍蝇之飞，不过三数步，托骥之尾，得以绝群。’”后以此典形容追随前辈、名人而得以受益。汉·王褒《四子讲德论》：“夫蚊虻终日经营，不能越阶序，附骥尾则涉千里，攀鸿鹄则翔四海。”晋·辛旷《与皇甫谧书》：“旷以不敏，感佩厚德。愿附骥尾，抚尘而游。”

富贵若浮云　《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以此典指藐视功名富贵，不予动心。后汉·蔡邕《翟先生碑》：“其树富贵，忽若浮云。既不降志，亦不辱身。”后汉·班固《答宾戏》：“是以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

傅岩之梦　《尚书·商书·说命》：“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

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麴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史记·殷本纪》："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后以此典指大臣主持治理国政；或表示君王寻求而得贤臣。晋·陆机《演连珠》之七："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园之币；洗渭之民，不发傅岩之梦。"

傅说托星 《庄子·大宗师》："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唐·成玄英疏：傅说，星精也。而傅说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则是二十八宿之数，维持东方，故言乘东维，骑箕尾。后以此典指大臣去世。南朝梁·江淹《遂古篇》："夏后乘龙，何因缘兮。傅说托星，安得宜兮。"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

赋有凌云称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后以此典称誉人文笔飘逸，才气非凡。南朝梁·江淹《别赋》："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唐·元稹《授杨巨源郭同玄河中兴元少尹制》："诗律铿金，词锋切玉；相如有凌云之势，陶潜多把菊之情。"

G

甘棠之风 参见〔召伯甘棠〕。汉·王褒《四子讲德论》："受命如丝，明之如缗，甘棠之风，可倚而俟也。"南朝梁·刘孝仪《为临川王解司空表》："衣衮坐槐，既惭论道；驰传憩棠，尤惭为政。"唐·李白《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高门纳驷 参见〔于公高门〕。唐·杨炯《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既而幽垄埋魂，终降槐庭之赠；高门

纳驷，式居茅社之封。”唐·骆宾王《上瑕丘韦明府启》：“孕兰畹而生姿，澧濡踵高门之庆。”

高卧北窗 晋·陶潜《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晋书·隐逸传》：“（陶潜）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后以此典形容人生活闲散自适，心境安逸。南朝梁·萧纲《答定襄侯饷卧簟书》：“三伏余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馆，高卧北窗。”唐·杨炯《益州温江县令任君神道碑》：“陶潜则安枕北窗，言偃则鸣弦东武。”

高卧东山 《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安）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后以此典指隐居山林，不图出仕。唐·李白《与贾少公书》：“谢公高卧东山，苍生属望。”宋·李廷忠《谢王枢使荐举启》：“谢傅之卧东山，将复为苍生而起。”

歌大风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后以此典表现帝王创业之事；或表现慷慨豪迈的壮士情怀。唐·柳宗元《沛国汉原庙铭》：“乃乐沛宫，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风，以昭武成之德。”

庚桑畏垒 《庄子·庚桑楚》：“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拥肿之与居，鞅掌之为使。居三年，畏垒大壤。”后以此典指隐士绝圣弃智，安心隐居；或用以指隐居之处。唐·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可谓庚桑畏垒，致大壤以匡时；范相鸱夷，行计然而济俗。”

耕禽田兽 参见〔象耕鸟耘〕。魏·曹植《文帝诔》：“百神警侍，来宾幽堂。耕禽田兽，望魂之翔。”

耕于岩石 汉·扬雄《法言》：“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后以此典形容隐居山野，耕作为生。南朝梁·刘峻《辩命论》：“是使浑敦梼杌，踵武于云台之上；仲容庭坚，耕耘于岩石之下。”南朝梁·王僧孺《与陈居士书》：“依然谷口，觉子真之咫尺；静睇岩滩，信子陵之非远。”

羹墙 参见〔见尧于羹〕。宋·陆游《转太中大夫谢表》：“永怀弓箭之藏，每切羹墙之慕。爰求遗老，俾诵旧闻。”

弓开伏石 《韩诗外传》卷六：“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跃无迹。”《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

矣。"后以此典形容勇将武艺精湛；或用以形容用心专精，气概豪迈。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崔说神道碑》："剑起沉犀，弓开伏石；楚后让盟，秦君还璧。"后汉·班固《幽通赋》："养流睇而猿号兮，李虎发而石开。"魏·曹植《黄初六年令》："昔熊渠李广，武发石开；邹子囚燕，中夏霜下。"

公孙之阁 《汉书·公孙弘传》："时上方兴功业，娄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晋·葛洪《西京杂记》卷四："平津侯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钦贤馆，以待大贤；次曰翘材馆，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馆，以待国士。……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后以此典指广开门路，延揽人才。宋·陆游《贺莆阳陈右相启》："登李膺之舟，恍如昨梦；游公孙之阁，尚觊兹时。"宋·秦观《贺吕相公启》："昔陪北海之樽，有同梦寐；今望平津之馆，如隔云天。"宋·李廷忠《谢王枢使荐举启》："三鳣地冷，幸依通德之门；一鹗天高，误入翘材之阁。"

龚胜亡身 《汉书·龚胜传》："（王）莽遣使者即拜胜为讲学祭酒，胜称疾不应征。后二年，莽复遣使者奉玺书，太子师友祭酒印绶，安车驷马迎胜，……胜自知不见听，即谓晖等：'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胜因敕以棺敛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死时七十九矣。"后以此典感慨贤者节士身世不幸。晋·桓温《荐谯元彦表》："进免龚胜亡身之祸，退无薛方诡对之讥。"

共被之欢 《后汉书·姜肱列传》注引吴·谢承《后汉书》："（姜）肱性笃孝，事继母恪勤。母既年少，又严厉。肱感《凯风》之孝，兄弟同被而寝，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后以此典形容兄弟友爱和睦。唐·杨炯《从弟去溢墓志铭》："姜肱设齿，无因共被之欢；钟毓生年，非复同车之乐。"唐·王维《京兆尹张公德政碑》："悌有过于共被，慈有逾于含食。"

姑苏麋鹿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刘安）坐东宫，召伍被与谋，曰：'将军上。'被怅然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吴王）使人赐属镂之剑，子胥受剑，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今汝不用吾言，反赐我剑，吾今日死，吴宫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后以此典形容亡国后的破败荒凉景象；或感慨朝代兴废。魏·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故子胥知姑苏之有麋鹿，辅果识智伯之为赵禽。"晋·左思《魏都赋》："殷殷寰内，绳绳八区，锋镝纵横，化为战场，故麋鹿寓城也。"北魏·魏收《檄梁文》："荆棘生于建业之宫，麋鹿游于姑苏之馆。"

姑射神人 《庄子·逍遥游》：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后以此典指仙子、美女等。宋·张孝祥《大行皇后斋疏》："蕊宫绛阙，陪姑射之神人；天雨宝花，超华严之法界。"

故剑 《汉书·外戚传》："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倢伃为皇后。"后以此典指不忘旧妻、旧人等。南朝齐·谢朓《齐敬皇后哀策文》："乾景外临，阴仪内缺。空悲故剑，徒嗟金穴。"南朝梁·陆倕《除詹事免让表》："送珥抱薪，未闻成绩；陈席不弃，故剑无遗。

顾日弹琴 《晋书·嵇康传》："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后以此典感叹仁人贤士被害；或悼念亡友。晋·向秀《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叹黄犬之长吟；悼嵇生之永辞，顾日影而弹琴。"

寡和之歌 《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后以此典指高雅超俗的作品或人物；或指言行高深，不易为人理解；也指知音难得。晋·陆机《演连珠》之二十三："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东野有不释之辩。"魏·阮瑀《筝赋》："曲高和寡，妙妓难工。伯牙能琴，于兹为朦。"魏·嵇康《琴赋》："尔乃理正声，奏妙曲，扬白雪，发清角。"

挂冠 《太平御览》卷六八四引《东观汉记》："（王）莽居摄，子宇谏莽，而莽杀之。逢萌谓其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门而去。"《南史·阿弘景传》："（陶弘景）家贫，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后以此典指辞官隐退。唐·王维《故右豹韬卫长史任君神道碑》："可传首于魏阙，然后挂冠东郡，拂衣五湖。"宋·陆游《谢周枢使启》："乘下泽之车，忽过半生；挂神武之冠，今无多日。"

挂瓢 汉·蔡邕《琴操·箕山操》："许由者，古之贞固之士也。尧时为布衣，夏则巢居，冬则穴处，饥则仍山而食，渴则仍河而饮，无杯器，常以手捧水饮之。人见其无器，以一瓢遗之，由操饮毕，以瓢挂树，风吹树动，历历有声，由以为烦扰，遂取损之。"后以此典形容山林隐士生活。唐·骆宾王《秋日与群公宴序》："昔挂瓢隐舜，蹈箕山而不归；结组逃齐，泛沧波而长往。"

关西孔子 《后汉书·杨震列传》："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

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后以此典借称学问渊博的人。南朝梁·刘峻《辩命论》："然则关西孔子，通涉六经，循循善诱，服膺儒行。"北周·庾信《谢滕王集序启》："殿下雄才盖代，逸气横云，济北颜渊，关西孔子。"

冠沐猴 《史记·项羽本纪》："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后以此典指人徒具仪表，而无内才。晋·潘岳《西征赋》："羽天与而弗取，冠沐猴而纵火。"

管鲍之情 《列子·力命》："管仲尝叹曰：'吾少穷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后以此典指彼此知心，友谊深厚；也指这样的挚友。宋·陆游《福建谢史丞相启》："上非知己，宁无管鲍之情；人之多言，诬为牛李之党。"唐·杨炯《从弟去盈墓志铭》："晏平仲之善交，鲍叔牙之知我。"

管宁藜床 晋·皇甫谧《高士传》："（管宁）常坐一木榻上，积五十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皆穿。"后以此典形容人心情恬静，淡然隐居。北周·庾信《小园赋》："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坐；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唐·王维《与魏居士书》："柴门闭于积雪，藜床穿而未起。"

管宁辽海 《三国志·魏书·管宁传》："天下大乱，（管宁）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度虚馆以候之。既往见度，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后渐来从之。……中国少安，客人皆还，唯宁晏然若将终焉。黄初四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司徒华歆荐宁。文帝即位，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注引《傅子》曰："宁在辽东，积三十七年乃归。"后以此典指人离家漂泊，或指淡泊守节隐居。晋·桓温《荐谯元彦表》："虽园绮之栖商洛，管宁之默辽海。方之于秀，殆无以过。"

管中窥豹 《世说新语·方正》："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后以此典指人见闻不广或片面；或指只见局部，未见整体。唐·韦庄《又玄集序》："故知颔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

冠军辞宅 参见〔匈奴未灭〕。梁·萧绎《谢敕赐第启》："昔狼望未平，冠军辞宅；马池犹隔，雍丘让邸。"

龟回印转 《晋书·孔愉传》："（孔愉）以讨华轶功，封余不亭侯。愉尝行经余不亭，见笼龟于路者，愉

买而放之溪中，龟中流左顾者数四。及是，铸侯印，而印龟左顾，三铸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后以此典形容知恩报恩；也借指官员之印。北周·庾信《周大将军闻嘉公柳遐墓志》：“位参上将，荣兼本选，蛇盘绶结，龟回印转。”唐·骆宾王《上郭赞府启》：“则回眸之报，不独著于前龟；清亮之音，讵专闻于往笛。”

归去来兮　晋·陶潜《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后以此典表示抛弃名利，回归故乡，隐居田园。唐·杨炯《庭菊赋》：“凭南轩以长啸，坐东篱而盈把，归去来兮何为者。”唐·杜牧《望故园赋》：“赋言归兮，余之忘世，徒为兮纷扰。”唐·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歌去来之作，不觉情亲；咏招隐之诗，惟忧句尽。”

桂枝片玉　《晋书·郤诜传》：“（郤诜）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以此典指科举考试及第。唐·柳宗元《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遐登王粲之楼，高视刘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唐·罗隐《投湖南王大夫启》：“三箧亡书，幸无漏略；一枝仙桂，尝欲觊觎。”

郭伋还州　《太平御览》卷二五六引《东观汉记》：“郭伋，字细侯，河南人也。在并州素结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伋问曰：‘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迎。’诸儿复送到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语别驾从事计日告之。行部还入美稷界，先期一日。伋念负诸童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后以此典称誉地方官施政仁厚，受人爱戴。唐·李商隐《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郭伋还州，尚不欺于童子；文侯校猎，宁爽约于虞人？”梁·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尽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

H

韩冯　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

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后以此典表现男女间坚贞不渝的爱情；也借指鸳鸯等。北周·庾信《鸳鸯赋》："共飞詹瓦，全开魏宫；俱栖梓树，堪是韩冯。"唐·杨炯《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偃松千古，长无寡鹤之悲；文梓百寻，还见双鸳之集。"

寒鸱吓雏 《庄子·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鹐，子知之乎？夫鹓鹐，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鹐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后以此典指妒贤忌能。南朝宋·鲍照《芜城赋》："风嗥雨啸，昏见晨趋，饥鹰厉吻，寒鸱吓雏。"

汉飞将 《史记·李将军列传》："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后以此典借指勇猛善战，威名远震的将领。唐·杨炯《唐恒州刺史王公神道碑》："李北平兮汉飞，郭并州兮竹马。"

汉君识履 《汉书·郑崇传》："（傅）喜为大司马，荐崇，哀帝擢为尚书仆射。数求见谏诤，上初纳用之。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后以此典指臣子向君王直谏。北周·庾信《周太傅郑国公夫人郑氏墓志铭》："骖乘则晋后停舆，来朝则汉君识履。"唐·李商隐《上河东公启》："汲县勒铭，方依崔瑗；汉廷曳履，犹忆郑崇。"

濠梁之鱼 《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后以此典形容人寄情物外，心境安乐。宋·王安石《乞宫观第三表》："使坛陆之鸟，无眩视之悲；濠梁之鱼，有从容之乐。"

涸辙 《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后以此典形容人身处困境，急需救援。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唐·元稹《莺莺传》："若因

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何氏万钱　《晋书·何曾传》：“（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后以此典指达官显贵生活奢侈无度。唐·杨炯《隰川县令李公墓志铭》：“居常饱德，不言何氏之万钱；直置当仁，岂特于公之驷马。”

河内之借　参见〔借寇恂〕。北周·庾信《周柱国长孙俭神道碑》：“河内之借，寇恂更断谒帝，交州之请，士燮还著上表。”唐·白居易《乔弁可巴州刺史制》：“州人借留，廉使贯奏。既因会课，宜及陟明。”

河阳一县花　《白孔六帖》卷七十七：“潘岳为河阳令，树桃李花，人号曰：‘河阳一县花’。”后以此典称誉地方官吏治理有方，当地风物美好；或借指某地花木。北周·庾信《枯树赋》：“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南朝梁·庾肩吾《谢东宫赐宅启》：“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夹石双槐，似安仁之县。”唐·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郁文条而耀采，藻逸潘花；晔词锋而炫奇，光浮卫玉。”

和氏之璧　《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下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后以此典称美玉，也借指美好的人或才干；或形容怀才不遇等。后汉·班固《答宾戏》：“宾又不闻，和氏之璧，韫于荆石；隋侯之珠，藏于蚌蛤乎？”晋·刘琨《答卢谌书》：“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无缘得玩于随掌。”唐·罗隐《两同书》：“卞和献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滥食齐禄。”

貉共一丘　《汉书·杨恽传》：“恽闻匈奴降者道单于见杀，恽曰：‘得不肖君，大臣为画善计不用，自令身无处所。若秦时但任小臣，诛杀忠良，竟以灭亡；令亲任大臣，即至今耳。古与今如一丘之貉。’后以此典指彼此相同，没什么区别。宋·孙觌《西徐上梁文》：“蜗蛊两角，已同堕甑之观；貉共一丘，岂恨虚舟之触？”

鹤归辽天　旧题晋·陶潜《搜神后记》卷一：“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后以此典形容久别家乡重归，感慨人世变迁；或表现客居异地，眷念故土。宋·陆游《除直华文阁谢丞相启》：“晚仅升于省闼，旋即返于乡关。鹤归

辽天，狐死丘首。”唐·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群公叶县凫飞，入朝廷而不出；下走辽川鹤去，谢城阙而依然。”唐·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华表千年之鹤，未见成都；津亭八月之龙，时归乡里。”

横槊赋诗 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后以此典表现人有文才武略，以诗文抒发感情，气慨雄浑。宋·苏轼《前赤壁赋》：“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侯嬴抱关 《史记·魏公子列传》：“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信陵君）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后以此典指人能礼贤下士；也指隐士处境困顿。唐·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薛邑闻歌，捐冯驩于弹铗；夷门命驾，顾侯嬴于抱关。”

狐藉虎威 《战国策·楚策一》：“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后以此典指倚仗他人的势力来欺压人。南朝梁·沈约《恩幸传论》：“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唐·王维《大唐故临汝郡太守韦公神道碑铭》：“吠尧之犬，驱彼六骒；凭虎之狐，犹威百兽。”

狐死首丘 《礼记·檀弓上》：“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以此典形容人不忘本；或形容思念故乡。宋·陆游《贺叶丞相启》：“骥老伏枥，知难效命于驰驱；狐死首丘，但拟祈哀于造化。”唐·骆宾王《兵部奏姚州破贼露布》：“首丘怀恋，疑临故国之墟；安堵识家，似入新丰之邑。”

瑚琏之器 《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后以此典比喻有才能、堪当重任的人。南朝梁·任昉《王文宪集序》：“岂非希世之隽民，瑚琏之宏器。”唐·李峤《神龙历序》：“望重簪缨，才高瑚琏。家风推其直道，帝范籍其谟明。”唐·

韦庄《又玄集序》："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宝；载雕载琢，方成瑚琏之珍。"

觳觫之牛 《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见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后以此典表现王者仁心；或指人无辜受难。南朝陈·徐陵《答尹义尚书》："夫以拥肿之木，得免困于不才；觳觫之牛，自保由于无用。"宋·陆游《谢施参政启》："牛欲衅钟，谁其弗忍；妇非束缊，何以自还。"

虎头燕颔 《太平御览》卷七二九引《东观汉记》曰："班超行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以此典称赞人相貌不凡，将来会发达显贵，建立功业。元·揭傒斯《妻齐国夫人宋氏进封济南王夫人制》："翟茀鱼轩，尚服异恩于永世；虎头燕颔，从怀旧将当于年。"

华亭鹤唳 《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机）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注引《八王故事》："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语林》："机为河北都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闻此不如华亭鹤唳。'故临刑而有此叹。"后以此典形容居官而蒙杀身之祸，令人伤感、追悔；或表现思念故土、旧游；也以此咏鹤。北周·庾信《哀江南赋》："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化龙渡江 《艺文类聚》卷十三引《晋阳秋》："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永嘉大乱，王室沦覆，唯琅琊、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至是中宗登祚。"后以此典指帝王南渡，建立帝业。宋·陆游《德勋庙碑》："宋传九圣，高宗是承，化龙渡江，天开中兴。"唐·李善《上文选注表》："长离北度，腾雅咏于圭阴。化龙东骛，煽风流于江左。"

画虎不成反为狗 《后汉书·马援列传》："初，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还书诫之曰：'……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后以此典形容仿效不成，反而不伦不类。魏·曹植《与杨德祖书》："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

怀刺 《世说新语·言语》"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条注引《文士传》："（祢衡）以建安初北游，或劝其诣京师贵游者，衡怀一刺，遂至漫灭，竟无所诣。"后以此典指拜访他人；或指无人可访，不得接纳。唐·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瞻言前古，徒欲

思齐；俯惟当今，空劳怀刺。”

桓荣稽古　《太平御览》卷二四四引《东观汉记》：“建武二十八年，以桓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后以此典指研读经书而求取仕官。宋·曾巩《贺蹇周辅授官职启》：“一人嗟异，欲相如之同时；多士推先，服桓荣之稽古。”宋·陆游《贺周参政启》：“国有隆儒之盛，士知稽古之荣。”

黄帝登仙　《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汉·刘向《列仙传》：黄帝“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至于卒，还葬桥山。山崩，柩空无尸，唯剑舄在焉。”后以此典指追念去世帝王，也借指帝王诸侯的葬地。魏·阮籍《清思赋》：“昔黄帝登仙于荆山之下，振咸池于南岳之冈。”

黄金贱籝　《汉书·韦贤传》：“（韦）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贤四子：长子方山为高寝令，早终；次子弘，至东海太守；次子舜，留鲁守坟墓；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后以此典称扬人诗书传家，教子有方。南朝陈·徐陵《皇太子临辟雍颂》：“丹书贵道，黄金贱籝。洙泗兴业，阙里增荣。”唐·王维《送郑五赴任新都序》：“籝金盛业，克传丞相文儒；万石高风，弥重故人宾客。”

黄绮　参见〔四皓〕。魏·繁钦《禄里先生训》：“故吕尚重翼北海，以待鹰扬之任；黄绮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赞。”晋·戴逵《闲游赞》：“降及黄绮，逮于台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

黄雀伺蝉　汉·刘向《说苑·正谏》：“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兵。”后以此典形容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其后的祸患。南朝梁·萧绎《荆州放生亭碑》：“譬如黄雀伺蝉，不知随弹应至。”宋·范成大《馆娃宫赋》：“是犹螳螂之褰蝉，不知黄雀之议其后也。”

黄石授书　《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字子房）曾步游下邳圯上，一老父将其履堕于圯下，使张良为取履并穿上。“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

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后以此典表示向人传授奇书秘策，用以创建功业，经世济民。唐·骆宾王《上司列太常伯启》：“道叶神交，黄石授帝师之略；德攸天纵，白星降王辅之精。”唐·王维《送李补阙充河西支度营判官序》：“勇能尽敌，礼可用兵。读黄石书，杀白马将。”

蝗虫避境　《太平御览》卷二六七引《东观汉记》：“卓茂，字子康，南阳人。迁密令，视民如子，口无恶言。……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艺文类聚》卷一〇〇引《东观汉记》：“鲁恭为中牟令，时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后以此典称颂地方官吏的政绩。唐·王维《裴仆射济州遗爱碑》：“蝗虫避境，虽马棱之化能然；洪水滔天，固帝尧之时且尔。”南朝齐·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顷深汰珪符，妙简铜墨，而春雉未驯，秋螟不散。”

讳名号父　参见〔邵父杜母〕。唐·王维《魏郡太守上党苗公德政碑》：“亲爱之深，讳名而号为父；歌咏不足，取姓以命其儿。”

昏行不变　汉·刘向《列女传》卷三：“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谓谁？’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堕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视之，果伯玉也。”后以此典指人仁义守礼。唐·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入暗室而无欺，属昏行而不变。”

婚嫁之累　《艺文类聚》卷三十六引魏·嵇康《高士传》：“尚长，字子平，禽庆，字子夏，二人相善。庆隐避不仕王莽。长通《易》、《老子》，安贫乐道，好事者更馈遗，辄受之，自足还余，如有不取也。举措必于中和。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遂求退，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知富贵不如贫贱，未知存何如亡尔。’为子嫁娶毕，敕家事断之，勿复相关，当如我死矣。是后肆意，与同好游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后以此典指家中事务拖累。宋·曾巩《应举启》：“仆仆东南，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蚤夜，惟米盐薪水之忧。”

J

鸡肋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时王（曹操）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后以此典借指没有多大价值的事物。宋·陆游《知严州谢王丞相启》："弃鸡肋而犹惜，虽仰戴于深仁；续凫胫则自悲，恐难逃于薄命。"

鸡林鉴裁 唐·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诗"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后以此典指诗文著名，流传广远。宋·陆游《与李运使启》："飞腾捷路，耻烦狗监之吹嘘；散落遐荒，宁付鸡林之鉴裁。"

鸡鸣狗盗 《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入秦，秦昭王"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后以此典表示运用智谋，度过难关；或泛指微末的技能、有微末技能的人。宋·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后汉·李尤《函谷关铭》："孟尝离秦，奔骛东征，夜造稽疑，谲以鸡鸣。"南朝梁·江淹《诣建平王上书》："备鸣盗浅术之余，豫三五贱伎之末。"

鸡谈 《艺文类聚》卷九一引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尝买得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恒笼著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言智，终日不辍。处宗因此言巧大进。"后以此典形容谈论诗文；也借指书斋。唐·骆宾王《冒雨寻菊序》："泛兰英于户牖，座接鸡谈；下木叶于中池，厨烹野雁。"

击水三千 参见〔鲲击鹏抟〕。南朝梁·刘孝绰《司空安成康王碑铭》："故能击水三千，抟风九万；排天关而俯眡，掩浮云而上征。"唐·骆宾王《答员半千书》："故张子房之达人也，

击水抟风之适焉。"唐·李商隐《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击水三千,暂随鹏运;澄流十二,免使鱼劳。"

汲黯简靖 《史记·汲郑列传》:"(汲黯)迁为东海太守。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后以此典称扬地方官吏治政清简,地方太平。唐·柳宗元《封建论》:"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

及瓜而代 《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后以此典指任职期满由他人接替。宋·陆游《严州到任谢表》:"憩棠阴而听讼,期无坠于家声;及瓜戍而代归,尚少酬于君赐。"宋·陆游《答交代杨通判启》:"瓜戍及期,幸仁贤之为代;萍踪无定,怅候问之未遑。"

嵇懒 《文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后以以典指人性情懒散。宋·欧阳修《上随州钱相公启》:"至于怜嵇懒之无能,容祢狂而不辱。"

箕山之叟 参见〔洗耳〕。晋·皇甫谧《答辛旷书》:"且箕山之叟,超迹于尧帝之世;首阳之老,抗操于有周之隆。"晋·周颡文《祭梁鸿文》:"夫子迈志箕颍,尘垢雕俗。"

棘霸儿戏 参见〔细柳之壁〕。晋·潘岳《西征赋》:"轻棘霸之儿戏,重条侯之倨贵。"宋·陆游《贺叶枢密启》:"莫宣方叔之壮猷,更类棘门之儿戏。"

季札观风 参见〔吴札听歌〕。唐·元稹《怒心鼓琴判》:"详季札之观风,尚分理乱;知伯牙之在水,岂曰诪张。"唐·柳宗元《代裴中丞贺分淄青为三道节度表》:"足使季札观鲁,更陈南籥之仪;山甫徂齐,复正东方之赋。"

骥服盐车 《战国策·楚策四》:"汗明曰:'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已也。'"后以此典形容人才遭到埋没、压制、处境困厄。汉·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晋·潘尼《怀退赋》:"困吴坂之峻,畏盐车之严策。"唐·温庭筠《上学士舍人启》:"贱彼在途之厄,仍遗生刍;脱于鸣坂之劳,兼贻半菽。"

佳城郁郁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四:"滕公驾至东都门,马鸣,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

卒掘马所跑之地，入三尺，得石椁。滕公以烛照之，有铭焉。乃以水洗写其文，文字皆古异。左右莫能知，以问叔孙通。通曰：'科斗书也，以今文写之，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后以此典悼念人去世；或指墓地。唐·柳宗元《亡妻弘农杨氏志》："佳城郁郁，闭白日兮。之死同穴，归此室兮。"唐·骆宾王《对策文三道》："至夫滕公长往，佳城开白日之征；洪崖不归，曾丘控紫云之盖。"

贾生问鹏　《史记·贾生列传》："贾生（谊）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五："贾谊在长沙，鹏鸟集其承尘。长沙俗以鹏鸟入人家，主人死。谊作《鹏鸟赋》，齐死生，等荣辱，以遣忧累焉。"贾谊《鹏鸟赋》："服集于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后以此典形容对命运、遭遇忧伤感慨；也用以婉指人死。宋·孙觌《西徐上梁文》："已免贾生问鹏之尤，遂谐韩公见蝎之喜。"

贾谊痛哭　《汉书·贾谊传》："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后以此典形容忧国忧民，向君王上书陈事。晋·干宝《晋纪总论》："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

见尧于羹　《后汉书·李杜列传》："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后以此典形容对已故帝王的追思。宋·王安石《英德殿上梁文》："纂禹之服，期成万世之功；见尧于羹，未改三年之政。"

荐祢衡　《后汉书·祢衡传》："衡始弱冠，而（孔）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上疏荐之曰：'……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鸷鸟累伯，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后以此典表示推荐人才。唐·李商隐《上尚书范阳公启》："荐祢衡之表，空出人间；嘲杨子之书，仅盈天下。"

江使反璧　《史记·秦始皇本纪》："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后以此典中"祖龙"借指秦始皇；或形容秦灭亡事。晋·潘岳《西征赋》："忆江使之反璧，

告亡期于祖龙。"

江夏之童 《太平御览》卷三八四引《东观汉记》："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年十二，博览传记。京师号曰'日下无双，江夏黄童。'"《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东观汉记》："黄香知古今，记群书，无不涉猎，兼好图谶天官星气钟律历算，穷极道术。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后以此典称誉聪颖博学、才华洋溢的年轻人。唐·王维《为人祭李舍人文》："名高江夏之童，貌夺河阳之美。"唐·杨炯《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汝阴徐令，人号无双；河内王君，时称未有。"

将相岂无种 《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后以此典表示人有雄心抱负，想做大事业。也以之反用。宋·陆游《与沈知府启》："将相岂无种哉，方且抟风而直上。"

绛帐 《太平御览》卷四九三引《东观汉记》："马融才高博洽，为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瑟，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以此典指设教授徒，传授学业；也指教学之所。北齐·邢子才《广平王碑文》："志犹学海，业比登山。踟蹰缇衮，绛帐韦编。"唐·元稹《五品女乐判》："广张女列，徒效尤于马融；内顾何功。欲思齐于魏绛。"

胶漆 参见〔陈雷〕。唐·骆宾王《灵泉颂》："耿介之士也，道合则金兰若胶漆，情异则轩冕犹尘泥。"唐·白居易《与微之书》："况以胶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进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

鹪螟巢蚊睫 《晏子春秋》外篇第八："公曰：'天下有极细乎？'晏子对曰：'有。东海有虫，巢于蚊睫，再乳再飞，而蚊不为惊。臣婴不知其名，而东海渔者命曰焦冥。'"后以此典形容极细小的事物。晋·张华《鹪鹩赋》："鹪螟巢于蚊睫，大鹏弥乎天隅。"

嗟来之食 《礼记·檀弓下》："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后以此典指带侮辱性的施舍等。唐·杨炯《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军井未建，如临盗水之源；军灶未炊，似对嗟来之食。"

接舆行歌 《论语·微子》："楚

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后以此典形容人洁身避世或傲世嫉俗。晋·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接舆以之行歌，鲁连以之赴海。"汉·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接舆避世，箕子被发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晋·曹摅《述志赋》："嘉沮溺之隐约，羡接舆之狂歌。"

结草 《左传·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魏）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后以此典形容感恩图报。晋·李密《陈情表》："庶刘侥幸，卒保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唐·柳宗元《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何以报恩？唯当结草。无任喜惧感恋之至。"

介山之志 汉·刘向《新序·节士》："晋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将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介子推无爵而就位，觞三行，介子推觞而起曰：'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此何谓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过也。吾为子爵，与待旦之朝也。吾为子田，与河东阳之间。'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号呼期年。……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后以此典表示贤者爱惜名节，志行高尚。南朝梁·任昉《宣德皇后令》："一马之田，介山之志愈厉；六百之秩，大树之号斯存。"

借寇恂 《北堂书钞》卷七十六引晋·司马彪《续汉书》："（寇恂）入为执金吾。颍川盗贼群起，上谓恂曰：'独卿能平之耳。'恂至颍川，盗贼悉降，百姓遮曰：'吾愿借寇君一年。'"《后汉书·寇恂列传》："明年，从车驾击隗嚣，而颍川盗贼群起，帝乃引军还，谓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从九卿复出，以忧国可也。'……即日车驾南征，恂从至颍川，盗贼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长社，镇抚吏人，受纳余降。"后以此典称誉地方官吏有政绩，受民爱戴挽留。南朝梁·刘孝标《为雍州柳津请留刺史晋安王表》："敢缘借寇之愿，切望申耿之恩。"唐·元稹《授马总检校刑部尚书天平军节度使制》："由是罢征黄霸，复借寇恂，诚阻急贤之心，姑务从人之欲。"

借箸 《史记·留侯世家》："（郦）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后以此典指分析谋划，提出办法、计谋

等。唐·李商隐《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管氏初来，屡发新桑之井；留侯每入，便闻借箸之筹。"宋·张孝祥《代憁得居士上宰相》："况仄席搜罗于豪杰，欲前筹开济于艰难。"

金谷酒数 《世说新语·品藻》"谢公云金谷中"条注引晋·石崇《金谷诗叙》："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后以此典指宴游雅集之事。唐·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金穴 《后汉书·郭皇后纪》："（郭）况迁大鸿胪。帝数幸其第，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后以此典称人豪富。南朝梁·刘峻《广绝交论》："富埒陶白，赀巨程罗，山擅铜陵，家藏金穴。"南朝陈·江总《故侍中沈钦墓志》："哂窦氏之青山，耻郭家之金穴。"

金张许史 《汉书·盖宽饶传》："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应劭注："许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张，张安世也。此四家属无不听。"《汉书·金日磾传》："（金日磾）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汉书·张汤传》："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文选·左思<咏史诗>》："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后以此典泛指皇亲国戚贵官权臣等朝廷显贵。汉·扬雄《解嘲》："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南朝梁·刘孝标《与宋玉山元愿书》："驱马金张之馆，飞盖许史之庐。"

惊弓之鸟 《战国策·楚策四》："更羸与魏王处京台之下，仰见飞鸟。更羸谓魏王曰：'臣为王引弓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间，雁从东方来，更羸以虚发而下之。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对曰：'其飞徐而鸣悲。飞徐者，故疮痛也；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疮未息，而惊心未至也。闻弦音，引而高飞，故疮陨也。'"后以此典指遭受祸患、打击后，内心存有余悸。《晋书·王鉴传》："黩武之众易动，惊弓之鸟难安。"南朝梁·沈炯《魂归赋》："雁虚弓而自殒，猿叫子而肠裂。"南朝齐·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夫危叶畏风，惊禽易落，无

待干戈，聊用辞辩。”

荆飞擒蛟 《吕氏春秋·知分》：“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还反涉江，至于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非谓舟人曰：‘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见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宝剑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弃剑以全己，余奚爱焉。’于是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次非”他书也作“佽飞”、“兹非”。后此此典指无畏的勇士；或形容勇敢无畏的气概。晋·郭璞《江赋》：“壮荆飞之擒蛟，终成气乎太阿。”

荆卿燕市 《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后以此典形容侠义之士的慷慨豪放行为。南朝梁·江淹《泣赋》：“若夫景公齐山，荆卿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夷甫伤子。皆泣绪如丝，讵能仰视。”北周·庾信《拟连珠》：“是以吴起之去西河，潸然出涕；荆轲之别燕市，悲不自胜。”

荆山之玉 参见〔和氏之璧〕。魏·曹植《与杨德祖书》：“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晋·潘岳《杨仲武诔》：“春兰擢茎，方茂其华；荆宝挺璞，将剖于和。”南朝齐·王俭《畅连珠》：“是故魏人指玉于外野，和氏泣血于荆山。”

荆州一纸 《晋书·刘弘传》：“（刘）弘每有兴废，手书守相，丁宁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后以此典敬称他人书信。唐·李商隐《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方候明诛，忽蒙复命。荆州一纸，河东百金。”

精卫填海 《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后以此典形容心怀冤愤，立志奋斗复仇。宋·谢枋得《与李养吾书》：“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取讪笑于腐儒、俗吏。”晋·左思《吴都赋》：“精卫衔石而遇缴，文鳐夜飞而触纶。”唐·崔嘈《嵩山启母庙碑》：“精卫衔木而偿冤，女尸化草而成媚。”

井蛙 《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太平御览》卷七七八引《东观汉记》：“（公孙）述鸾旗旄骑，警跸就车，礼甚盛，欲以援封侯，食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马）援晓之，因而辞归，谓（隗）嚣曰：‘子阳井底蛙耳，不如专意东方。’”公孙述，字子阳。后以此典形容人见识狭隘，没见过世面。南朝梁·陆倕《未至浔阳郡教》：“公孙陛戟，既似井蛙；延寿执戈，实同儿戏。”

竟富樽前 《世说新语·汰侈》：“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晋书·石崇传》：“（石崇）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粭澳釜，崇以蜡代薪。”后以此典形

容达官贵人奢侈靡费，挥霍无度。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序》："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

沮溺 《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后以此典指避隐田间的贤人高士。晋·曹摅《述志赋》："嘉沮溺之隐约，羡接舆之狂歌。"

举案 《艺文类聚》卷六九引《东观汉记》："梁鸿适吴，依大家皋伯通庑下，为人凭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异之，曰：'彼佣赁能使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后以此典形容妻贤知礼，夫妻互敬。北周·庾信《周赵国夫人纥豆陵氏墓志铭》："举案外恭，停机下训，馨馥于兰，年华于舜。"

聚米 《太平御览》卷二七五引《东观汉记》："上自征隗嚣，至漆，诸侯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计未决。会召马援，因说隗嚣侧足无所立，将帅土崩之势，兵进必破之状，于上前聚米为山川，指画地势，上曰：'虏在吾目中矣。'嚣众大溃。"后以此典表示摆列地形阵势，策划作战。唐·元稹《授刘总守司徒兼侍中天平军节度使制》："学弄之始，画地而壁垒势成；言兵之时，聚米而山川形具。"唐·杜牧《贺平党项表》："按项而边事无遗，聚米而兵形尽见。"

聚萤 《世说新语·识鉴》："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条注引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车）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识裁，见，谓其父曰：'此儿当成卿门户，宜资令学问。'胤就学恭勤，博览不倦。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继日焉。"后以此典形容人刻苦攻读学问。南朝梁·萧绎《与学生书》："汉人流麦，晋人聚萤。"宋·陆游《谢晁运使启》："学才比子聚萤，智莫阶于束缊。"南朝梁·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至乃集萤映雪，编蒲缉柳。"

君羹遗母 《左传·隐公元年》："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后以此典称人孝敬父母。唐·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诗序》："游宦三年，愿以君羹遗母；不居一国，欲其锦还乡。"唐·元稹《追封孔戣母韦氏等》："颍考叔食美而思遗其亲，此孝子不违于一饭也。"

君子猿鹤 《艺文类聚》卷九十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后以此典指战死的将士或死于战乱的百姓；或泛指人世众生。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

钧天广乐 《史记·赵世家》："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后以此典指歌舞演奏，多指宫廷乐舞。后汉·张衡《西京赋》："昔者大帝说秦缪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后汉·孔融《荐祢衡表》："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宝。"晋·陆机《演连珠》之三十二："臣闻听极于音，不慕钧天之乐；身足于阴，无假垂天之云。"

K

柯亭之竹 《艺文类聚》卷四四引晋·伏滔《蔡邕长笛赋》序："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长笛，传之耆艾，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难江南，宿于柯亭，柯亭之馆，以竹为椽，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奇声独绝，历代传之。"后以此典咏笛；也指善于识才辨物。唐·骆宾王《上司列太常伯启》："故雕其朴，峄山有半死之桐；赏其音，柯亭无永枯之竹。"唐·罗隐《谢大理薛卿启》："苟非令君侧耳于车上，郎中注目于亭间，则随赵辄以长鸣，与吴椽而共朽者也。"

孔父困陈 《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庄子·让王》："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后以此典指遭受磨难困厄；或指绝粮忍饥。晋·嵇茂齐《答赵景真书》："故颜生居陋，不改其乐；孔父困陈，弦歌不废。"魏·王粲《登楼赋》："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魏·李康《运命论》："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

孔席墨突 《淮南子·修务训》："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后以此典形容为苍生百姓四处奔波。后汉·班固《答宾戏》："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唐·韩愈《争臣论》："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

叩角 参见〔宁戚饭牛〕。唐·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方结羡鱼之网，将谣叩角之词。"宋·陆游《谢葛

给事启》："但欲负耒慕许行之学，岂复叩角歌宁戚之诗。"

哭亡簪　《韩诗外传》卷九："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问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妇人曰：'乡者刈蓍薪而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后以此典表现怀念故人旧物。晋·陆机《演连珠》之四十："是以江汉之君，悲其坠屦；少原之妇，哭其亡簪。"

夸父邓林　《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后以此典形容志向虽大，但事业难成。南朝梁·江淹《遂古篇》："夸父邓林，义亦艰兮。建木千里，乌易论兮。"

胯下　《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后以此典形容人穷困受辱或为实现大志而暂时忍耐。宋·李廷忠《谢王枢使荐举启》："或小识坐间之异，或大推胯下之奇。"

葵藿倾叶　《淮南子·说林训》："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于日也，虽不能与终始哉，其乡（向）之诚也。"后以此典形容对人向往倾慕，忠诚追随。魏·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南朝梁·任孝恭《辞县启》："不使恋主之心，施于犬马；倾日之志，偏在葵藿。"

鲲击鹏抟　《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后以此典形容人胸怀大志，奋发有为，前程远大。宋·陆游《贺谢殿院启》："灰寒木槁而誉益高，鲲击鹏抟而才乃见。"晋·左思《吴都赋》："大鹏缤翻，翼若垂天，振荡汪流，雷抃重渊。"唐·李白《送戴十五归衡岳序》："而此君独潜光后世，以期大用。鲲海未跃，鹏霄悠然。"

L

来暮之歌　参见〔襦袴兴讴〕。唐·杨炯《唐恒州刺史王公神道碑》：

"才临蜀郡，即闻来暮之歌；初践益州，已听中和之乐。"唐·白居易《前吉州刺史李繁可制》："勉率分忧之任，庶成来暮之谣。"隋·江总《吴兴郡庐陵王德政碑》："剖符彭国，述职琅台。去谣曙鼓，留歌暮来。"

揽澄清之辔　《太平御览》卷七七八引晋·司马彪《续汉书》："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厉清节，为州所服，举孝廉。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使滂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乃至州境，守令自知赃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伏众议"后以此典指人欲济世报国，抱负不凡。唐·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龙津共济，竞欣登御之车；芜室钦贤，必揽澄清之辔。"宋·陆游《贺王提刑启》："方揽澄清之辔，已腾谣诵之声。"

郎潜　《文选·张衡<思玄赋>》注引《汉武故事》："颜驷，不知何许人。汉文帝时为郎。至武帝，尝辇过郎署，见驷龙眉皓发，上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后以此典形容不得机遇，命运淹蹇。后汉·张衡《思玄赋》："尉龙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唐·柳宗元《睢阳庙碑》："不遇兴词，郁龙眉之都尉。"

老骥伏枥　曹操《步出夏门行》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后以此典形容人虽年暮或闲散，而壮志犹在。宋·陆游《与何蜀州启》："老骥伏枥，虽未歇于壮心；逆风撑船，终不离于旧处。"唐·李白《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所冀枯松晚岁，无改节于风霜；老骥余年，期尽力于踌足。"

老罴当道　《北史·王罴传》："神武遣韩轨、司马子如从河东宵济袭罴，罴不觉。比晓，轨众已乘梯入城。罴尚卧未起，闻阁外汹汹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谓曰：'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敌见，惊退。逐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后以此典形容猛将把守城池；也表现壮士豪气。唐·王维《工部杨尚书夫人王氏墓志铭》："河南则分虎临人，华阴则老罴当道。"

勒门箴客　《史记·汲郑列传》："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后以此典形容人情势利，世态炎凉。南朝梁·刘峻《广绝交论》："而翟公方规规然勒门以箴客，何所见之晚乎！"

离娄明目　《孟子·离娄上》汉·赵岐注："离娄，古之明目者，黄帝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后以此典形容人目力锐敏；或形容能洞察事物。唐·杨炯

《玉兰盘赋》："离娄明目，不足见其精微；匠石洗心，不足征其奥秘。"魏·曹植《车渠碗赋》："虽离朱之聪目，内炫曜而失精。"

骊龙之珠　《庄子·列御寇》："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后以此典形容珍贵难得的人才、宝物；或形容探求事物精蕴等。魏·曹植《七启》："缀以骊龙之珠，错以荆山之玉。"唐·罗隐《谢江都郑长官启》："长官鏤笔才清，探骊价重，因循世态，放荡宦游。"

李广难封　《史记·李将军列传》："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封为乐安侯。……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大将军（卫）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后以此典感慨命运不佳，不得机遇，难以立业成名。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宋·陆游《答廖主簿发解启》："虽数奇如李广之封，犹强饭有廉颇之志。"

李膺之舟　《后汉书·郭太列传》："郭太（应作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后以此典形容与知己好友同游；或用以尊称所敬仰、所推崇的人。宋·陆游《贺莆阳陈右相启》："登李膺之舟，恍如昨梦；游公孙之阁，尚觊兹时。"唐·骆宾王《上郭赞府启》："仙飞有道，荣河泛高尚之舟；德验通神，灵策洞幽冥之境。"

里丑捧心　《庄子·天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后以此典形容不恰当地模仿，效果反而更坏。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

栎散之质　《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庄子·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

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满，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后以此典指人平庸无才干，多用于自谦。晋·戴逵《闲游赞》："栎散之质，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树之于广汉。"南朝陈·徐陵《答尹义尚书》："夫以拥肿之木，得免困于不才。"唐·罗隐《谢湖南于常侍启》："庄栎粗疏，庾膏昏钝，不能量力，尝欲干名。"

莲幕　《南史·庾杲之传》："(王俭)乃用杲之为卫将军长史。安陆侯萧缅与俭书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渌水，依芙蓉，何其丽也。'时人以人俭府为莲花池，故缅书美之。"后以此典借指幕府等；也称美幕僚之人富有才具。宋·陆游《与成都张阁学启》："陪莲幕之英游，虽知迟暮；居草堂之朴处，尚窃光华。"唐·李商隐《道士胡君新井碣铭》："窦将军之府内，玄甲朱旗；王太尉之幕中，红莲渌水。"唐·罗隐《投前夏口韦尚书启》："王俭望高，芙蓉比幕；陈琳笔健，玳瑁为簪。"

廉公屈体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驩，为刎颈之交。"后以此典表示人顾全大局，忍让小忿；也表示向人认错赔罪。北周·庾信《周陇右总管长史豆卢公神道碑》："上马谕书，临戎习礼，贾复开营，廉公屈体。"晋·潘岳《西征赋》："入屈节于廉公，若四体之无骨。"唐·元稹《授刘悟检校司空幽州节度使制》："蕴孟贲之勇，不以力闻；避廉颇之强，使之心伏。"

廉颇强饭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后以此典形容人老当益壮，雄心犹在。北周·庾信《为阎大将军乞致仕表》："虽复廉颇强饭，马援据鞍，求欲报恩，何能为役？"宋·陆游《答廖主簿发解启》："虽数奇如李广之封，犹强饭有廉颇之志。"

梁上尘飞　《艺文类聚》卷四三引汉·刘向《别录》："有丽人歌赋，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后以此典称美歌声高亢清妙。唐·张鷟《游仙窟》："清音呖呖，片时则梁上尘飞；雅韵铿锵，卒尔则天边雪落。"

梁生适越　《后汉书·梁鸿传》：

"（梁鸿）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后以此典表示隐退离去。晋·赵景真《与嵇茂齐书》："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唐·杨炯《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鸿以抗节遐征，览帝京而有作。"

辽豕 《初学记》卷二九引《东观汉记》："朱浮与彭宠书，责之曰：'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后以此典指人矜功自傲，妄自尊大；也指少见多怪。唐·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抱山鸡而自恧，顾辽豕以多惭。"

列子御风 《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列子，名御寇。后以此典形容仙人乘风飞游；或用以形容乘车马等飞驰。唐·杨炯《浑天赋》："列于何方兮御风而有待，师门何术兮验火而登仙。"晋·湛方生《风赋》："王乔以之控鹄，列子以之乘虚。"

裂帛系书 《汉书·苏武传》："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苏）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后以此典指书信或信使，多用以表现离情别绪、思亲怀土等。南朝梁·江淹《恨赋》："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唐·杨炯《送东海孙尉诗序》："但当晨看旅雁，君逢系帛之书；夕望牵牛，余候乘槎之客。"

邻人笛悲 晋·向秀《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后以此典表现追念故交好友。北周·庾信《思旧铭》："匣中弦绝，邻人笛悲。昔为幕府，今成繐帷。"南朝陈·刘师知《侍中沈府君序集》："伯牙之弦，寂寥长绝；山阳之管，惆怅徒闻。"

临川感流 《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后以此典慨叹光阴流逝，事物变迁。晋·潘岳《秋兴赋》："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晋·傅咸《遂登芒赋》："孔临川以永叹，赵有感于九原。"

临川羡鱼 《淮南子·说林训》："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汉书·董仲舒传》："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后以此典指空有愿望而无行动。汉·扬雄《幸河东赋》："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晋·夏侯湛《观飞鸟赋》："苟临

川而羡鱼，亦观翔而乐飞。”唐·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方结羡鱼之网，将谣叩角之词。”

麟角 晋·葛洪《抱朴子·极言》：“若夫睹财色而心不战，闻俗言而志不沮者，万夫之中有一人为多矣。故为者如牛毛，获者如麟角也。”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养生》：“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后以此典形容事物稀少而可贵。唐·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学惭麟角，德类鸿毛。愧汗如浆，忧心如疠。”

伶伦嶰谷 《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后以此典形容精美音乐或乐器；也指善识音律的人。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召鸣鸟于弇州，追伶伦于嶰谷；发参差于王子，传妙靡于帝江。”魏·嵇康《琴赋》：“伶伦比律，田连操张；进御君子，新声憀亮。”

灵蛇之珠 参见〔隋侯之珠〕。魏·曹植《与杨德祖书》：“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南朝梁·萧绎《中书令庾肩吾墓志》：“荆山万重，地产卞和之玉；随流千仞，水出灵蛇之珠。”南朝梁·陆倕《新刻漏铭》：“陆机之赋，虚握灵珠；孙绰之铭，空擅昆玉。”

凌烟阁 《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十七年，……诏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旧唐书·代宗纪》：“（宝应二年），功臣皆赐铁券，藏名太庙，画象凌烟阁。”后以此典形容臣子建立勋业，名垂史册。唐·李商隐《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烟阁传形，革车国。尽人臣之极分，焕今古之高名。”

流虹绕渚 《初学记》卷一引《河图》：“太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意感，生白帝朱宣。”《艺文类聚》卷十引《帝王世纪》：“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之，意感，生少昊。”“陶唐之世，握登见大虹，意感，生舜于姚墟。”后以此典祝颂君王寿辰；或称颂君王。宋·陆游《丞相率文武百僚请建重明节表》：“飞龙在天，方仰君临之德；流虹绕渚，实开圣作之祥。”北魏·温子升《舜庙碑》：“虹气降灵，姚墟诞圣。树阴未徙，帝图已定。”南朝陈·江总《陈宣帝哀策文》：“妫水妪宿，姚墟大虹。讴歌承历，揖让受终。”

流麦 《艺文类聚》卷八五引《东观汉记》：“高凤，南阳人，诵读昼夜不绝声。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以竿授凤，令护鸡。凤受竿诵经如故，天大雷，暴雨流潦。凤留意在经史，忽不视麦，麦随水漂去。”后以此典形容人读书勤奋专心；或形容下雨。南朝梁·萧绎《与学生书》：“汉人流麦，晋人聚萤，安有挟册读书，不觉风雨以至。”南朝梁·萧纲《求宁国临城二公入学表》：“下帷投斧，昔人以为精力；弃竿委麦，先哲以为美谈。”唐·骆宾王《冒雨寻菊序》：“仰折巾于书阁，行见飘麦；挹雅步于琴台，坐闻流水。”

流星入昴　《艺文类聚》卷十引《帝王世纪》："脩巳山行，流星贯昴，意感慄然，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后以此典称颂显贵或祝人寿辰。北周·庾信《周使持节大将军丘乃敦崇传》："况复大电绕枢，流星入昴，派分源别，干其嗣兴者乎！"唐·杨炯《左武卫将军崔献行状》："诞灵辰昴，降德山河。"

柳絮之诗　《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兄女即谢道韫。后以此典形容女子才华出众，文思敏捷；也用以咏雪、柳絮等。唐·王维《汧阳郡太守王公夫人成氏墓志铭》："同云降雪，常闻柳絮之诗；献岁发春，即赋椒花之颂。"宋·张孝祥《回沈子直礼书》："盐絮咏风前之雪，敢拟昔人？箕帚扫堂上之尘，庶无失职。"

六龙　《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薄于虞渊，是谓黄昏。"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渊，羲和至此而回六螭。"后以此典形容太阳运行，光阴流转。魏·曹植《与吴季重书》："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南朝梁·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四牡方驰，六龙顿辔；斯民曷仰，邦国殄瘁。"

龙伯钓鳌　《列子·汤问》："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后以此典形容气概非凡，抱负宏大；也用以形容海上景观。唐·李白《大猎赋》："龙伯钓其灵鳌，任公获其巨鱼。"唐·杨炯《少室山少姨庙碑》："共工氏触皇天之八柱，未足拟议；龙伯人钓溟海之三山，无阶响像。"

龙见白水　《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白水真人'。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后以此典形容帝王发迹之兆，或称光武帝刘秀事。后汉·蔡邕《光武济阳宫碑》："帝乃龙见白水，渊跃昆滍，破前队之众，殄二公之师。"

龙门点额　《艺文类聚》卷九六引《辛氏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者为龙，不上者，故云曝腮龙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尔雅》曰：鳣，鲔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矣。否则点额而还。"后以此典形容人功名成就，科举得中等。南朝梁·萧绎《启东宫荐石门侯启》："切以凤鸣朝阳，必资蓝田之宝；龙门点额，亦俟棠溪之珍。"

鲁连飞一矢　《史记·鲁仲连列

传》："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聊城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聊城乱，田单遂屠聊城。归而言鲁连，欲爵之。"后以此典形容善于谋略，以智克敌。后汉·班固《答宾戏》："是故鲁连飞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顾眄而捐相印。"南朝梁·庾肩吾《为武陵王拜仪同章》："岂能屯兵大夏，封万里之侯；飞箭辽城，受千金之寿。"南朝陈·徐陵《让五兵尚书表》："参闻秘计，弗解单于之兵；飞箭驰书，未动聊城之计。"

鲁连赴海 《史记·鲁仲连列传》："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奈何？'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万之众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言事！'……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皆非也。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后以此典称颂人敢于维护正义，不为强暴所屈。晋·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接舆以之行歌，鲁连以之赴海。"唐·骆宾王《上李少常伯启》："欲乘幽控寂，进绮季于青山；乐道栖真，从鲁连于沧海。"

鲁阳挥戈 《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三舍。"后以此典形容人气概豪壮，震撼天地；也表示感慨光阴流逝，希望时光回转。晋·左思《吴都赋》："鲁阳挥戈而高麾，回曜灵于太清。"晋·陆机《吊魏武帝文》："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南朝梁·萧绎《伐侯景檄文》："按剑而叱，江水为之倒流；抽戈而挥，皎日为之还舍。"

陆海潘江 南朝梁·钟嵘《诗品》上："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潘，潘岳。陆，陆机。两人都是晋代著名的文学家。后以此典形容人文才宏富渊深。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唐·骆宾王《秋日与群公宴序》："不有雅什，何以摅情。共引文江，同开笔海云尔！"

履冰 《诗·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后以此典形容处境艰危，心怀戒惧。晋·潘岳《寡妇赋》："惧身轻而施重兮，若履冰而临谷。"唐·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轻渎威严，惧深履尾；载尘听览，迫甚蹈冰。"

履虎尾 《易·履》:"履虎尾,咥人,凶。"后以此典指身临险境。晋·潘岳《西征赋》:"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于子房。"晋·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虽遇履虎,神气恬然。"唐·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轻渎威严,惧深履尾;载尘听览,迫甚蹈冰。"

绿珠 《世说新语·仇隙》:"孙秀既恨石崇"条注引晋·干宝《晋纪》:"石崇有妓人绿珠,而工笛,孙秀使人求之。崇别馆北邙下,方登凉观,临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择。'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绿珠也,未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许。"《晋书·石崇传》后有"(孙秀)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后以此典感伤红颜薄命。北周·庾信《拟连珠》:"是以楼中对酒,而绿珠前去;帐里悲歌,而虞姬永别。"

轮扁不语斤 《庄子·天道》:"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后以此典形容人经验丰富,技艺精湛;或指心得奥妙难传。晋·陆机《文赋》:"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

洛川回雪 魏·曹植《洛神赋并序》:"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后以此典形容女仙或美女等。唐·骆宾王《扬州看竞渡序》:"能使洛川回雪,独美陈思;巫岭行云,专称宋玉。"

M

马革裹尸 《太平御览》卷四三八引《东观汉记》:"马援曰:'方今匈

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耶！'"后以此典形容决心报国，不惜战死疆场。宋·陆游《谢周枢使启》："志士弗忘在沟壑，固当坚马革裹尸之心。"唐·李商隐《祭全义县伏波庙文》："铜留铸柱，革誓裹尸。男儿自立边功，壮士犹羞病死。"

马角徒生　《燕丹子》卷上："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缪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后以此典指愿望难以实现；也形容人困于他乡，无法回归。南朝陈·江总《度支尚书陆君诔》："龟山更徙，空想吹箫之哀；马角徒生，绝望通波之水。"

马陵书树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膑）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后以此典形容智谋高明，克敌制胜。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开府广饶公郑常墓志铭》："置阵黎阳，鏖兵官渡，平阴听乌，马陵书树。"

马援据鞍　《太平御览》卷二七四引《东观汉记》："马援，字文渊，建武二十四年，威武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遣援。"后以此典表示人老当益壮，思建勋业。北周·庾信《为阎大将军乞致仕表》："虽复廉颇强饭，马援据鞍，求欲报恩，何能为役？"南朝梁·陆倕《张侍中启》："实欲强饭据鞍，自劳心力，濡足磨顶，少报洪私。"宋·陆游《谢周枢使启》："而某少颇激昂，老犹矍铄。志士弗忘在沟壑，固当坚马革裹尸之心。"

埋轮　《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东观汉记》："梁冀作平上軿车，侍御史张纲独埋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冀。"《后汉书·张纲列传》："汉安元年，选遣八使徇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唯纲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曰：'大将军冀……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后以此典形容不畏权势，弹劾权奸。南朝梁·沈约《奏弹王源》："虽埋轮之志，无屈权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广饶公郑常墓志铭》："公露节东驱，风奔群盗，埋轮当路，威振中原。"唐·张说《洛州张司马集序》："若乃抗埋轮之章，执惊马之议，旌贤有通德之教，疾恶存署背之文。"

买臣负薪 《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后以此典形容士人未发达前，生涯贫困。晋·束皙《读书赋》："倪宽口诵而芸耨，买臣行吟而负薪。"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宋·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

毛遂耀颖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后以此典形容才干得以显露施展；或反用之，指未得机遇，无法施展才干。魏·吴质《答陈思王曹植书》："虽恃平原养士之懿，愧无毛遂耀颖之才。"唐·骆宾王《上瑕丘韦明府启》："是以临淄遣妇，寄束缊于齐邻；邯郸下客，效处囊于赵相。"

毛子捧檄 《北堂书钞》卷一〇三引《东观汉记》："庐江毛义，性恭俭谦约，少时家贫，以孝行称。南阳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有顷，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而入白母，喜动颜色。"《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亦载，后有"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后以此典指为奉养尊长而出仕为官。晋·颜延之《陶征士诔》："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南朝梁·裴子野《刘虬碑》："及其长也，捧檄动容，薄游下邑。"唐·元稹《祭翰林白学士太夫人文》："坚同金石，爱等弟兄，每均捧檄之禄，迭庆循陔之荣。"

扪虱 《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咸阳王猛被缊袍而诣桓温，一面谈当时之事，猛摸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奇之。"后以此典形容人胸怀才略，谈吐不凡，态度从容。宋·孙觌《西徐上梁文》："拥百结之褐，扪虱自如；拄九节之筇，送鸿而去。"

门垂五柳 晋·陶潜《五柳先生

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后以此典指隐士；或隐士的住所；也用以咏柳。南朝梁·萧绎《全德志论》："虽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径；接五侯，不妨门垂五柳。"

门多长者　《史记·陈丞相世家》："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陈）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后以此典指人有才学，受人器重。南朝梁·任昉《王文宪集序》："室无姬妾，门多长者，立言必雅，未尝显其所长。"魏·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

孟尝问琴　汉·刘向《说苑·善说》："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门子周曰：'然。臣之所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声敌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之约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从则横。从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王秦帝，必报仇于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报仇于弱薛，譬之犹摩萧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识之士，无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万岁之后，庙堂必不血食矣。高台既已坏，曲池既已堑，……'于是孟尝君泫然……孟尝君涕浪汗增欷，下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后以此典指使人警惧的规谏；或表现昔盛今衰的破败景象。南朝梁·萧绎《全德志论》："宁与孟尝问琴，承睫泪下；中山听息，悲不自禁。"晋·陆机《豪士赋》："孟尝遭雍门而泣，而琴之感以末。"唐·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波澜不息，箭刻无停；梁木其坏，高台已倾。"

孟母择邻　汉·刘向《列女传》："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旁。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后以此典指母亲贤德，教子有方；也借指好邻居。晋·孙绰《景福殿赋》："嘉班姬之辞辇，伟孟母之择邻。"晋·左九嫔《孟轲母赞》："邹母善导，三徙成教。邻止庠序，俎豆是效。"唐·元稹《祭翰林白学士太夫人文》："励诸子以学，故大被择邻；示诸子以正，故寸葱方判。"

鸣琴　《吕氏春秋·察贤》："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后以此典称誉地方官政清事简，治理有方；也借指担任县令等地方官。南朝齐·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至有旦抚鸣琴，日置醇酒，文而无害，严而不残。"宋·王安石《贺

知县启》："操刀之能制锦，素显殊勋；弹琴之不下堂，行闻异政。"

明妃玉塞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后以此典形容因奸人欺蒙，不得赏识恩宠；也形容远离故土，心境哀怨。唐·李白《愁阳春赋》："若乃陇水秦声，江猿巴吟。明妃玉塞，楚客枫林。"晋·潘岳《笙赋》："子乔轻举，明君怀归。荆王喟其长吟，楚妃叹而增悲。"

明星玉女 《太平广记》卷五十九引《集仙录》："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远皆见。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减耗。"后以此典形容女仙之事。唐·杨炯《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巫山南眺，逢暮雨于瑶姬；华岳西临，降明星于玉女。"后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

明月暗投 《文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后以此典指人怀才不遇；忠贤受谤；或指才士误投昏主。宋·陆游《答发解进士启》："都骑来临，方快景星之先睹；雄文授贽，更惭明月之暗投。"晋·赵景真《与稽茂齐书》："又北土之性，难以托根；投人夜光，鲜不案剑。"

明珠弹雀 《庄子·让王》："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后以此典形容轻重失当，得不偿失。唐·罗隐《两同书》："夫美玉投蛙，明珠弹雀，舍所贵而求所贱，人即以为惑矣。"

蓂荚 《竹书纪年》卷上："（尧时）又有草夹阶而生，月朔始生一荚，月半而生十五荚，十六日以后日落一荚，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荚焦而不落。名曰蓂荚，一曰历荚。"后以此典借指时光、日期。晋·张协《七命》："悲蓂荚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

殁降巨鸟 《艺文类聚》卷九十引吴·谢承《后汉书》："杨震卒，未葬，有大鸟五色，高丈余，从天飞下，到震棺前，举头悲鸣，泪出沾地，至葬日，冲升天上。"《太平御览》卷九一四引晋·司马彪《续汉书》："杨震将葬，大鸟来止亭树，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头泪出。众人更共摩抚抱持，终不惊骇。其鸟五色，高丈余，两翼长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后以此典称颂亡者德高望重，操守高洁。隋·李德林《天命论》："东京太尉，关西孔子，生感遗鳣之集，殁降巨鸟之奇。"

墨子悲丝 《墨子·所染》："子

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后以此典指人易为环境、习俗等所左右，而改变自己。唐·罗隐《谗书》："阮何情而泣路？墨何事而悲丝？"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岂期终始参差，苍黄翻覆，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南朝梁·丘迟《还林赋》："验难停于杨辙，昭易改于墨丝。"

墨子回车 《文选·吴质〈答东阿王书〉》注引《淮南子》："曾子至孝，不过胜母里；墨子非乐，不入朝歌。"后以此典指人珍惜名誉、操守，行为谨慎。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

木羊随葛由 汉·刘向《列仙传》："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足以豪。'"后以此典形容仙道之事。唐·皇甫松《大隐赋》："遇茅狗之迎酒妪，逢木羊之随葛由。"

墓木已拱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后以此典指人死去已久。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穆生谢病 《汉书·楚元王传》："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后以此典形容人明察见机，全身远祸。魏·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穆生谢病，以免楚难，邹阳北游，不同吴祸。"魏·曹植《酒赋》："穆生以醴而辞楚，侯嬴感爵而轻身。"

穆王八骏 《穆天子传》卷一："丙寅，天子属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宪，用伸八骏之乘，以饮于枝洔之中，积石之南河。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后以此典形容君王嬉游，也用以指骏马等。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至如夏后两龙，载驱璿台之上；穆王八骏，如舞瑶水之阴。"

N

南金 《晋书·薛兼传》："（薛）兼清素有器宇，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曰'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后以此典称扬出众超卓的人才，多指南方之士。晋·孙绰《庾司空冰碑》："贞质谋于白圭，明操励乎南金。"唐·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片善必甄，搉虞翻于东箭；一言可纪，许顾荣以南金。"

南山之南 《后汉书·法真传》："（法真）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见之，真乃幅巾诣谒。太守曰：'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惧然，不敢复言。"后以此典表示隐遁世外，不求仕禄。南朝梁·江淹《报袁叔明书》："虽五侯交书，群公走币，仆亦在南山之南矣。"

倪宽芸耨 《汉书·兒宽传》："兒（ní）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则读诵，其精如此。"后以此典称颂人贫而好学。晋·束皙《读书赋》："倪宽口诵而芸耨，买臣行吟而负薪。"

逆鳞 《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后以此典形容触犯君王而致其怒。晋·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屡摧逆鳞，直道受黜。"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鸟伏翟泉 《世说新语·赏誉》："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条注引晋·王隐《晋书》："董养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禄求荣。永嘉中，洛城东北角步广里中地陷，中有二鹅，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问之博识者，不能知。养闻，叹曰：'昔周时所盟会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鹅，苍者胡象，白者不能飞，此国讳也。'"后以此典指外族入侵，国家有难。北周·庾信《思旧铭》："况复鱼飞武库，预有弃甲之征；鸟伏翟泉，先见横流之兆。"

宁戚饭牛 《吕氏春秋·举难》："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

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艺文类聚》卷九四引汉·蔡邕《琴操》："宁戚饭牛车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裁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冥冥何时旦。'齐桓公闻之，举以为相。"后以此典指人穷困未显，怀才不遇而忧闷感慨。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穆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宁戚饭牛。"魏·曹植《七启》："此宁子商歌之秋，而吕望所以投纶而逝也。"

牛渚怪物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七："晋温峤至牛渚矶，闻水底有音乐之声，水深不可测。传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怪状，或乘马车著赤衣帻，其夜梦人谓曰：'与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峤甚恶之，未几卒。"后以此典形容山川怪异鬼神之事。唐·李白《天门山铭》："惟海有若，唯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围车轮。"

女娲补天　《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后以此典形容为百姓建立大功业，挽救国家等；也指治理自然灾害。南朝梁·江淹《遂古篇》："女娲炼石，补苍天兮。共工所触，不周山兮。"南朝梁·陆倕《新刻漏铭》："乐迁夔谚，礼变商俗；业类补天，功均柱地。"宋·秦观《贺吕相公启》："窃以娲皇补天之际，高宗梦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资陶铸。"

P

磻溪翼周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盖尚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干)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正义：《说苑》云"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韩诗外传》卷七："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乃为天子师，则遇文王也。"《楚辞·天问》汉·王逸注："吕望鼓刀在列肆，文王亲往问之，吕望对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文

王喜，载与俱归也。”《水经注·渭水注》：“东南隅有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也。其投竿跽饵，两膝遗迹犹存，是有磻溪之称也。”后以此典表示贤士隐居，待时而起；或表示隐士出山，干一番事业；也用以形容君臣遇合，共取天下等。南朝梁·江淹《齐王让禅表》：“昔傅岩佐商，秩终上公；磻溪翼周，名极列伯。”后汉·班固《答宾戏》：“殷说梦发于傅岩，周望兆动于渭滨。”唐·骆宾王《上司列太常伯启》：“实欲投竿垂饵，晦名迹于渭滨。”

佩韦弦　参见〔韦弦之戒〕。唐·杨炯《后周青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吴王旧国，采山铸钱。公为中正，佩以韦弦。”唐·白居易《何士乂可河南县令制》：“然能佩弦以自导，带星以自勤。”宋·张孝祥《抚州到任谢表》：“求民之瘼，稍更珥笔之风；胜己之私，切谨佩韦之戒。”

烹鲜　《老子》下：“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鲜，鱼。烹小鲜，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靡也。治国烦则下乱。”后以此典指治理政事。唐·骆宾王《上梁明府启》：“三主七公，罩彭扬而岳立。于是功超振鹭，位典烹鲜。”唐·白居易《崔咸可洛阳县令制》：“然宰大邑，如烹小鲜。”

彭祖为夭　《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彭祖，传说中长寿的人。殇子，未成年而死的小孩子。后以此典指人的寿夭，表示达观生死。魏·阮籍《达庄论》：“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漂母进饭　《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后韩信辅佐刘邦，功成后被封为楚王，“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后以此典表示知恩必报；或形容士人未遇时生涯饥寒。唐·李白《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鲁姑弃子，以却三军之众；漂母进饭，没受千金之恩。”宋·陆游《谢施参政启》：“尚无漂母哀王孙而进食，况有故人怜范叔而赠袍。”

平舆二龙　《世说新语·赏誉》：“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注引《汝南先贤传》曰：“谢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识人伦，虽郭林宗不及甄之鉴也。见许子将兄弟弱冠时，则曰：‘平舆之渊有二龙。’”后以此典称誉兄弟皆才华出众。唐·杨炯《唐恒州刺史王公神道碑》：“荆枝擢秀，棣萼生光，何止平舆之二龙，是为贾家之三虎。”南朝梁·萧纲《安成蕃王墓铭》：“许氏犹龙，荀家鸣鹤，岂如宗子，分联华萼。”

破卵倾巢　《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后以此典指为主的人遭祸，其他人也一起遭难。宋·张孝祥《谢汤右相启》："斯文衡鉴，收雕虫篆刻之微；群枉织罗，救破卵倾巢之酷。"

蒲柳残年 《世说新语·言语》："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后以此典指人年长体衰。宋·王安石《乞宫观第一表》："松揪旧国，实使镇临，蒲柳残年，足为荣耀。"宋·曾巩《谢中书舍人表》："于风波流落之余，以蒲柳衰残之质，自循崖公，曷副恩荣。"

Q

七步立成 《世说新语·文学》："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后以此典称誉人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唐·杨炯《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七步立成，五行不缀。家惟万卷，韦实三绝。"

七叶珥貂 参见〔金张许史〕。唐·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千年驭鹤，振仙气于帝乡；七叶珥貂，袭荣光于戚里。"唐·张鷟《游仙窟》："在汉则七叶貂蝉，居韩则五重卿相。"

泣麟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后以此典指时世昏乱，生非其时。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隋·李德林《天命论》："墨不代苍，泣麟叹凤，恓恓汲汲，虽圣达而莫许也。"唐·卢照邻《秋霖赋》："论有能鸣之雁，书成已泣之麟。"

泣珠 《太平御览》卷八〇三引晋·张华《博物志》："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后以此典形容精美织物、珍宝等；也用以咏海中奇事。晋·左思《吴都赋》："泉室潜织而卷绡，渊客慷慨而泣珠。"

萋斐成市 《诗·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汉·郑玄笺："喻谗人集作己过，以成于罪，犹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锦文。"后以此典指故意编造谗言，陷人以罪。唐·柳宗元《为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庙略初定，异议纷然，诋讪盈朝，萋斐成市。"唐·王维《裴仆射济州遗爱碑》："厚为之礼，则生我羽毛；小不如意，则成是贝锦。"

齐竽 《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后以此典指没有真才实学，不称其职；或指假冒充数。南朝梁·任孝恭《谢示围棋启》："文业未彰，武功已坠。内愧齐竽，外羞鲁服。"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窃吹草堂，滥巾北岳。"唐·罗隐《两同书》："卞和献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滥食齐禄。"

麒麟阁 《汉书·苏武传》："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传。"后以此典形容臣子建立功业，名标青史。唐·李峤《神龙历序》："箫吹凤管，朝升乌鹊之楼；渐阅龙章，暮下麒麟之阁。"南朝齐·谢朓《为明帝拜录尚书表》："无以辅位明堂，遗象麟阁。"唐·王维《为曹将军谢写真表》："何以厕迹虎臣，仪形麟阁。"

杞妻哭梁 汉·刘向《列女传》："齐杞梁殖之妻也。……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后以此典形容人悲愤哀痛，而产生惊人举动。魏·曹植《黄初六年令》："邹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为之崩。"晋·皇甫谧《让征聘表》："臣闻邹子一叹，霜为之降；杞妻一感，城为之崩。"宋·李清照《祭赵湖州文》："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

启金縢 《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后以此典形容忠心辅佐君王；或指虽有忠心，但受猜忌而蒙冤。后汉·张衡《思玄赋》："旦获谠于群弟兮，启金縢而后信。"

弃笔从戎 参见〔班超投翰〕。唐·张鷟《游仙窟》："兄及夫主，弃笔从戎，身死寇场，茕魂莫返。"

弃杖成龙 晋·葛洪《神仙传·壶公》："（费长）房忧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与之曰：'但骑此，得到家耳。'房骑竹杖辞去，忽如睡觉，已到家。……房所骑竹杖，弃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后以此典形容仙家变化；或用以咏竹、竹杖等。唐·骆宾王《对策文三道》："弃杖成龙，有异

虞翻之旨；衔恩结草，宁符宗岱之言。”

迁莺 《诗·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后以此典贺人升官或中举；也贺人迁居。唐·王维《白鹦鹉赋》：“深笼久闭，乔木长违，傥见借其羽翼，与迁莺而共飞。”唐·骆宾王《上梁明府启》：“使幽禽迁木，侣丹山于帝梧；鸣石浮川，应黄钟于仙管。”

褰帷广听 《艺文类聚》卷五十引吴·谢承《后汉书》：“乃以（贾）琮为冀州刺史。旧典，驂驾乘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车言：‘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闻风，自然悚震。”后以此典称颂地方官吏贤明，体察民情。唐·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披裳问疾，垂爱景以字人；褰帷广听，穆薰风而扇物。”宋·王子俊《知成都谢到任表》：“亟怀绶以遐征，已褰帷而莅止。具以朝廷宽大之意，告诸田里愁苦之民。”

黔驴之技 唐·柳宗元《三戒》：“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尨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后以此典形容徒有其表，无其本领。宋·张孝祥《抚州到任谢执政启》：“殚黔驴之技，未答洪私；致鹈梁之讥，莫逃余责。”

前席 参见〔宣室之谈〕。唐·王维《故右豹韬卫长史任君神道碑》：“一见天子，必为之前席；三说大臣，必为之解印。”

遣狱之化 《晋书·曹摅传》：“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愍之，曰：‘卿等不幸至此非所，如何？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见家邪？’众因皆涕泣曰：‘若得暂归，死无恨也。’摅悉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咸谓不可。摅曰：‘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号曰圣君。”后以此典形容官吏体察民情，治政宽仁。南朝梁·江淹《始安王拜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章》：“臣职右南阳，谢蒲鞭之政；任重临淄，无遣狱之化。”

强项不屈 《艺文类聚》卷五十引晋·司马彪《续汉书》：“董宣为洛阳令，宁平公主乳母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于大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数主失者三，叱奴下车，格杀之，主即驰车入宫，上大怒，召宣：‘令欲死乎？’宣叩头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纵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愿一言，死无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民，以奴杀臣。臣死之后，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杀臣，不如臣自杀。’即以头撞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黄门持之，曰：‘痴令！叩头谢主。’宣不从。上曰：‘顿痴令头！’宣两手据地，不肯低头。上敕强项令出，谓太

官赐食。”后以此典形容官吏不畏权贵，执法不阿。唐·李白《赵公西侯新亭颂》：“殷南山之雷，剖赤县之剧。强项不屈，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颂。”

桥山弓箭 参见〔黄帝登仙〕。唐·杜牧《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朕以桥山弓箭，渭北衣冠，霜露之心，悽感常切。”

樵人取箭 《后汉书·郑弘传》注引孔灵符《会稽记》：“射的山南有白鹤山，此鹤为仙人取箭。汉太尉郑弘尝采薪，得一遗箭，顷有人觅，弘还之。问何所欲。弘识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载薪为难，愿旦南风，暮北风。’后果然。故若耶溪风至今犹然，呼为‘郑公风’也。”后以此典形容乘船顺风；或用以咏鹤及仙事等。唐·李商隐《祭全义县伏波庙文》：“何烦玉女之投壶，方闻天笑？不待樵人之取箭，已见风回。”

秦皇灭学 参见〔焚书坑儒〕。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秦皇灭学，星琯千年；汉武崇文，市朝八变。”

青白其眼 《世说新语·简傲》“嵇康与吕安善”条注引《晋百官名》：“阮籍遭丧，（嵇喜）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后以“青眼”表示对人喜爱、赏识；以“白眼”表示对人轻蔑、厌恶。唐·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青白其眼，瞢而前行，亦何异抗庄公之轮，怒螳螂之臂。”

青蝇染白 《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郑玄笺：“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变乱善恶也。”后以此典形容奸人进谗，诽谤正人君子。魏·丁仪《厉志赋》：“疾青蝇之染白，悲小弁之靡托。”汉·王褒《四子讲德论》：“夫青蝇不能秽垂棘，邪论不能惑孔孟。”

轻裘缓带 《晋书·羊祜传》：“（羊祜）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后以此典形容将帅风度闲雅，雍容倜傥。元·揭傒斯《送彭仲宝赴水北巡检序》：“轻裘缓带，足以坐镇之，何旷官之足惧哉。”宋·陆游《答钤辖启》：“绿沉金锁，虽勇略之无前；缓带轻裘，亦风流而自命。”

穷途之哭 《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注引晋·孙盛《魏氏春秋》：“（阮）籍旷达不羁，……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后以此典形容人感到前途无望，心中压抑悲伤。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北周·王褒《与周弘让书》：“嗣宗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唐·温庭筠《上裴舍人启》：“今则阮路兴悲，商歌结恨。”

屈原沉湘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汉·王逸《楚辞·离骚叙》：“（楚）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

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后以此典抒发遭受谗毁而不得申雪的悲愤，或伤时吊古的感慨。魏·李康《运命论》："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南朝梁·刘峻《辨命论》："至乃伍员浮尸于江流，三闾沉骸于湘渚。"

趋庭 《论语·季氏》："陈亢问于伯鱼（孔鲤）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后以此典指学生、晚辈受到师长教诲。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捧袂，喜托龙门。"唐·骆宾王《上瑕丘韦明府启》："幸以奉训趋庭，束情田于理窟。"南朝陈·徐陵《谢儿报坐事付治中启》："老臣过庭之训，多谢古贤；折笄之杖，有愧前达。"

取戒牺牛 《庄子·列御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先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后以此典形容当官有危险，不如隐居自在。晋·夏侯湛《庄周赞》："遁时放言，齐物绝尤。垂钓一壑，取戒牺牛。"

犬舐丹 汉·王充《论衡·道虚》："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此言仙药有余，犬鸡食之，并随王而升天也。"后以此典指得道飞升；也指攀附权贵。宋·陆游《谢费枢密启》："骥伏枥以悲鸣，曩谁念者；犬舐丹而仙去，今乃似之。"

鹊印 晋·干宝《搜神记》卷九："常山张颢，为梁州牧。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飞翔入市。忽然坠地，人争取之，化为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府。"后以此典指官印；也借指得官。唐·王勃《上绛州高长史书》："鳞轩羽殿，瑶台降卿相之荣；鹊印蝉簪，金社发公侯之始。"

R

人琴两亡 《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后以此典哀悼亲属、友人去世。唐·杨炯《从弟去盈墓志铭》："痛门户之无主，悼人琴之两亡。"北周·庾信《周车骑大将军宇文显和墓志铭》："草衔秋火，树抱春霜，书剑俱没，人琴并亡。"

任安独存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霍去病）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卫）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后以此典指人守信义，不趋炎附势。北周·庾信《拟连珠》之二五："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门下宾客，任安独存。"

任棠置水 《文选·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引《东观汉记》："庞参，字仲达，拜汉阳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节。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本，水一杯，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于是叹息而还。参在职，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后以此典称扬地方官吏惠政爱民，扶弱抑强。南朝梁·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尽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唐·杨炯《益州温江县令任君神道碑》："庭前置水，甑内生尘。园蚕生茧，野雉来驯。"

任子垂钓 《庄子·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后以此典形容气魄宏大，举动惊人；也用以形容渔钓。魏·曹植《七启》："乃使任子垂钓，魏氏发机，芳饵沉水，轻缴弋飞。"唐·卢照邻《穷鱼赋》："竞下任公之钓，争陈豫且之网。"

日置醇酒 《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

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后以此典指恪守以前法度，不作变更，稳定局势；也指会见高级官员，受到款待。南朝齐·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至有且抚鸣琴，日置醇酒，文而无害，严而不残。”唐·李商隐《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蜀郡登文翁之堂，上国醉曹参之酒。”

荣期三乐　《列子·天瑞》：“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后以此典形容人达观处世，不以贫富、贵贱、生死为念。北周·庾信《荣启期三乐赞》：“荣期三乐，惟人与年。夫子相遇，即以为贤。”魏·阮籍《辞蒋太尉辟命奏记》：“昔荣期带索，仲尼不易其三乐；仲子守志，楚王不夺其灌园。”晋·孙楚《荣启期赞》：“援琴自娱，咏此三乐。眉寿无疆，惟德之宅。”

如羊如粟　《后汉书·张奂传》：“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千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后以此典形容官吏为政清廉。南朝陈·江总《广州刺史欧阳頠墓志》：“如羊如粟，不改夷齐之心；遗庆遗风，方留豹产之德。”南朝梁·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金如粟而弗睹，马如羊而靡入。”北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陆逞神道碑》：“军国纷总，部领填阶，马不入厩，金不入怀。”

儒坑　参见〔焚书坑儒〕。魏·曹植《文帝诔》：“崩乐灭学，儒坑礼焚。二世而歼，汉氏乃因。”

襦袴兴讴　《艺文类聚》卷五十引《东观汉记》：“廉范，字叔度，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隐蔽，烧者日日相属。范乃毁削前令，但严使储水，百姓为便。乃歌之云：‘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无襦，今五袴。’”《后汉书·廉范列传》作“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后以此典称扬地方官吏关心民间疾苦，施政有方。唐·元稹《夜绩判》：“若廉叔之劝蜀，襦袴兴讴；类古公之居豳，茅绹斯诵。”唐·白居易《史备可濠州刺史制》：“得不思勤俭教导，劳来安缉，膏雨吾土，襦袴吾人者乎？”唐·柳宗元《代韦永州谢上表》：“禄秩徒增，讵施乳哺之惠；服命虚受，宁兴襦袴之谣？”

乳虎　《史记·酷吏列传》：“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公孙）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

使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岁余，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后以此典指执法严酷的官吏；或泛指司法官员。唐·杨炯《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白水时清，乳虎之谣行息；禄符垂异，扣马之谏必申。"北齐·樊逊《刑罚宽猛对》："则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兽含牙，苍鹰垂翅。"

S

塞翁失马 《淮南子·人间训》："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后以此典形容祸福相倚，彼此转化。宋·陆游《贺蒋尚书出知婺州启》："鲁人获麟以为不祥，虽爱憎之叵测；塞翁失马未必非福，抑倚伏之何常。"宋·李廷忠《谢王枢使荐举启》："塞上之马，屡得而屡亡；梦中之蝶，孰非而孰是？"

三黜 参见［展禽三黜］。唐·杨炯《常州刺史杨公墓志铭》："来居白室，直绳明笔，潘子一除，士师三黜。"唐·柳宗元《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献艺春卿，当三黜之辱，可谓屈抑矣。"

三冬遽足 《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后以此典形容读书勤奋，学业有成。唐·杨炯《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被玉轴之文章，三冬遽足；穷金坛之秘诀，百战不孤。"

三荆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赀皆平均，唯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更合财宝，遂为孝门。"后以此典形容兄弟之间和睦友爱。南朝陈·周弘让《答王褒书》："三荆离拆，二仲不归。

麋鹿为曹，更多悲绪。”

三径　《三辅决录》："蒋诩，字元卿，隐于杜陵。舍中三径，惟羊仲、求仲从之游。二仲皆挫廉逃名。"后以此典指隐士居处。南朝梁・萧绎《全德志论》："虽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径；接五侯，不妨门垂五柳。"南朝梁・裴子野《寒夜赋》："疏三径以负汲，结二耦而为宾。"南朝陈・周弘让《答王裒书》："与弟分袂西陕，言反东区。虽保周陂，还依蒋径。"

三绝　《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初，恺之在桓温府，常云：'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后以此典指人书画神妙奇绝；或指人有痴气。唐・王维《书画人谢赐表》："徒以职官，不敢贰事；顾惟时论，有惭三绝。"

三良殉秦　《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后以此典感慨良臣死去。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哀吊》："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横，黄鸟赋哀。"

三箧亡书　《汉书・张安世传》："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后以此典称人读书广博，记忆超群。唐・罗隐《投湖南王大夫启》："三箧亡书，幸无漏略；一枝仙桂，尝欲觊觎。"后汉・孔融《荐祢衡表》："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南朝陈・江总《陶贞白先生集序》："门人补辑，若逢辽东之本；好事研搜，如诵河西之箧。"

三日绕梁　《列子・汤问》："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后以此典形容歌声隽永，余味绵绵。唐・张鷟《游仙窟》："一时忘味，孔丘留滞不虚；三日绕梁，韩娥余音是实。"

三吐　参见［吐哺握发］。南朝梁・沈约《齐丞相豫章文宪王碑》："谦以备物，贵以在身；再握励己，三吐忘倦。"南朝梁・刘孝绰《司空安成王碑》："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宋・陆游《谢施参政启》："三吐哺，三握发，野无片善之遗。"

三鳣表服　《太平御览》卷九三七引吴・谢承《后汉书》："杨震常客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众人谓之晚贵，而震志愈笃。后有鹳雀衔三鳣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曰：'蛇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后以此典指官至高位。南朝梁・萧纲《司徒始兴忠武王诔》："将旋三国，恋结四民。三鳣表服，二鹿随轮。"唐・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于是翔鳣应符，观光上国；飞龙成卦，利见大人。"宋・李廷忠《谢王枢使荐举启》："三鳣地冷，幸依通德之门；一鹗天高，误入樾材之阁。"

桑田 参见［东海成田］。南朝梁·庾肩吾《东宫玉帐山铭》："煮石初烂，烧丹欲成。桑田屡尽，海水频倾。"唐·杨炯《群官寻杨隐居诗序》："忆桑海之无时，问桃源之易失。"

桑榆末光 《文选·潘岳〈西征赋〉注引《东观汉记》："冯异，字公孙，拜为征西将军，与赤眉相距。上命诸将士屯渑池，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坂。异复合兵追击，大破之殽底。玺书劳异曰：'垂翅回谿，奋翼渑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太平御览》卷三引《淮南子》："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后以此典借指人的暮年。晋·左思《魏都赋》："彼桑榆之末光，逾长庚之初辉。"宋·陆游《谢钱参政启》："侵寻迟暮，虽嗟已失于东隅；激励衰疲，尚及未先于朝露。"

丧家之狗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人，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类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后以此典指处境困窘，无处投奔的人。唐·王维《大唐故临汝郡太守韦公神道碑铭》："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南朝梁·沈约《辩圣论》："干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为东家丘，或以为丧家犬。"

杀白帝 参见［蛇分沛泽］。唐·柳宗元《沛国汉原庙铭》："杀白帝于大泽，以承其灵；建赤旗于沛邑，以昭其神。"

山人卖药 晋·皇甫谧《高士传》："韩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游名山采药，卖于长安市中，口不二价者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买药于康，康守价，乃曰：'公是韩伯休邪？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欲避名，今区区皆知有我，何用药为？'遂遁于霸陵山中。"后以此典形容隐士逃名避世。唐·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野老披荷，暂辞幽涧；山人卖药，忽至神州。"

山涛之启 《晋书·山涛传》："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入怀慕尚，风俗颇革。""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后以此典指选贤举能，知人善任。北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陆逞神碑》："东京鼎实，先加邓陟之勋；西晋官人，多用山涛之启。"唐·白居易《王承林可安州刺史制》："汉择名儒，任先疏广；晋求耆德，选在山涛。"

伤麟 参见［泣麟］。北周·庾信《思旧铭》："朝阳落凤，大野伤麟。佳城郁郁，流寓于秦。"唐·杨炯《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南游楚国，遂闻衰凤之歌；西狩鲁郊，独有伤麟之泣。"

商羊之舞 《孔子家语·辨证》："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宫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两

肩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至矣。急告民趋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雨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民人，唯齐有备不败。"后以此典形容下雨或雨灾。唐·柳宗元《贺亲自祈雨有应表》："故得瑞鸟迎舟，掩商羊之舞；仙云覆水，协从龙之征。"

上蔡逐猎 参见[叹黄犬]。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南阳校书，去之已远；上蔡逐猎，知之何晚！"

尚书之期 《汉书·陈遵传》："遵耆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尝有部刺史奏事，过遵，值其方饮，刺史大穷，候遵沾醉时，突入见遵母，叩头自白当对尚书有期会状，母乃令从后阁出去。"后以此典指人热情好客，尽意挽留。魏·应璩《与满公琰书》："仲孺不辞同产之服，孟公不顾尚书之期。

烧牛之兵 《史记·田单列传》："（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乘胜，燕日败亡，卒至河上，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后以此典称人善用奇谋，退敌建功。北周·庾信《哀江南赋》："下江余城，长林故营。徒思拑马之秣，未见烧牛之兵。"

召伯甘棠 《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后以此典称颂官吏仁政爱民，受民仰戴怀思。南朝梁·萧纲《长沙宣武王北凉州庙碑文》："扶风高碣，召伯甘棠；余芳无泯，望古可方。"晋·潘岳《马汧督诔》："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爱树，甘棠不剪。"南朝宋·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夫爱人怀树，甘棠且犹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

邵父杜母 《汉书·召信臣传》："（召信臣）其治视民如子，所居见称述。……迁南阳太守，其治如上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后汉书·杜诗列传》："杜诗字君公，河内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称。……七年，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以此典称颂爱护百姓，受民爱戴的地方官吏。唐·杜牧《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爱碑文表》："渤海颍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校之于丹，未足为比。"

蛇分沛泽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以此典形容帝王开创帝业。唐·骆宾王《上廉察使启》："洎乎鹿走周原，霸燕图于即墨；蛇分沛泽，封汉爵以华城。"

蛇虚画足　《战国策·齐策二》："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后以此典形容做多余而无益的事。唐·罗隐《谢江都郑长官启》："某海曲迷声，寿陵忘步，蛇虚画足，鹄不中心。"

申胥泣血　《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使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后以此典形容人救国济难的忠心；也形容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南朝梁·吴筠《连珠》："是以墨子萦带，不禀肉食之谋；申胥泣血，非有执圭之位。"唐·李白《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吴师鞭尸于楚国，申胥泣血于秦庭。"北周·庾信《哀江南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

生刍一束　晋·袁宏《后汉纪》卷二三："（郭泰）后遭母丧，过于哀，徐孺子荷担来吊，以生刍一束顿庐前，即暗而退。或问：'此谁也？'林宗曰：'南州高士徐孺子者，其人诸生，吾不堪其喻也。'"《后汉书·徐稚列传》："（郭）林宗有母忧，（徐）稚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众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后以此典形容悼祭先辈、友人等，赞誉死者有德行。唐·杨炯《泸州都督王湛神道碑》："生刍一束，泣血三年，不逾圣人之礼，能行大夫之孝。"南朝梁·萧纲《征君何先生墓志》："桥曰只鸡，徐称醉素。余钦夫子，风期素著。"

生子当如孙仲谋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曹公（操）出濡须，夜渡洲上。（孙）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

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后以此典称生儿有才能；或以"豚犬"称生儿不才。宋·张孝祥《㐀庵赞》："气骨清羸，抱负雄伟，江西湖南，掀天扑地。生子当如孙仲谋，景升诸郎豚犬耳！"

师子雷音 《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演法无畏，犹师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后以此典指讲经说法。北周·庾信《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若夫法云深藏，师子雷音，梵志往生，声闻说戒。"

识履 参见［汉君识履］。北周·庾信《周安昌公夫人郑氏墓志铭》："畴昔之邑，今兹成姓，识履传风，参舆留庆。"南朝梁·萧绎《中书令庾肩吾墓志》："任同北斗，锡韩棱之剑；朝此南宫，识郑崇之履。"

使越之装 《史记·陆贾列传》："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值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后以此典指积蓄、资财等；或表示安置家业。南朝梁·张缵《谢东宫赉园启》："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装；别馆河阳，亦资牧荆之富。"北周·庾信《周大将军闻嘉公柳遐墓志》："鸣琴在膝，或对故人；宝剑自随，时过稚子。"

是贫非病 《庄子·让王》："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后以此典形容安贫守道的寒士生涯。唐·王维《送郑五赴任新都序》："牵衣肘见，步雪履穿；获戾由忠，是贫非病。"

舐痔结驷 《庄子·列御寇》："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后以此典讥刺人无廉耻，不择手段谄媚以求取名利。汉·赵壹《刺世疾邪赋》："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

轼庐 《吕氏春秋·期贤》："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后以此典表示敬重仁人贤士。唐·骆宾王《上郭赞府启》："加以延宾置驿，接士轼庐。采拔刍微，迈钦贤于司隶。"

守株待兔 《韩非子·五蠹》："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

之类也。”后以此典形容墨守陈规，不知变通；也形容坐以待成，希图不劳而获。南朝梁·萧衍《围棋赋》：“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魏·卞兰《赞述太子赋》：“嘉通人之达节，笑俗士之守株。”唐·罗隐《投永宁李相公启》：“独某行迷要路，坐守穷株；九品班资，略非亲旧。”

受书黄石 参见［黄石授书］。北周·庾信《周柱国大将军纥于弘神道碑》：“而受书黄石，意在王者之图；挥剑白猿，心存霸国之用。”魏·李康《运命论》：“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宋·苏轼《留侯论》：“夫子房受书于圯上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疏傅辞荣 《汉书·疏广传》：疏广居官太子太傅，其兄之子疏受被任为太子少傅，“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后以此典称人急流勇退，及时归隐。唐·杨炯《唐上骑都尉高君神道碑》：“比疏傅之辞荣，追留侯之高蹈。”元·揭傒斯《与萧维斗书》：“苟其说行，则从容可为二疏之事；不行，则挂冠神武，拂袖而西矣。”

黍离愍周 《诗·王风·黍离》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其诗为：“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后以此典指人触景生感，伤时吊古。晋·陆机《辩亡论》：“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晋·向秀《思旧赋》：“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数奇 参见［李广难封］。唐·柳宗元《睢阳庙碑》：“数奇见惜，挫猿臂之将军。”唐·杨炯《大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公深惭位薄，命舛数奇。”

双鹤之征 《世说新语·贤媛》“陶公少时作鱼梁吏”条注引《陶侃别传》：“侃丁母忧，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仪服鲜异，知非常人。遣随视之，但见双鹤冲天而去。”后以此典指人去世或吊丧之事。唐·杨炯《李怀州墓志铭》：“观其吊客，不无双鹤之征；察其成坟，自有百鸟之感。”

水镜之姿 《世说新语·赏誉》：“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弟子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

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 后以此典形容人议论精妙，使人受益非浅。唐·白居易《君子不器赋》："彦辅信美，空标水镜之姿。"唐·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对光阴之易晚，惜云雾之难披。"唐·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入其门者，披烟雾于九天；闻其音者，听咸韶于三月。"

朔去偷桃　晋·张华《博物志》卷八："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唯帝与母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后以此典形容仙家之事；也用以咏桃。南朝陈·江总《玄圃石室铭》："岫浓翠合，林虚桂静。朔去偷桃，董来货杏。"

丝条拂武昌　《世说新语·政事》"陶公性检厉"条注引《晋阳秋》："（陶侃）性纤密好问，……尝课营种柳，都尉夏施盗拔武昌郡西门所种。侃后自出，驻车施门，问：'此是武昌西门柳，何以盗之?' 施惶怖首伏。"后以此典咏柳或咏武昌风物。唐·张鷟《游仙窟》："青青岸柳，丝条拂于武昌；赫赫山杨，箭干稠于董泽。"

四皓　晋·皇甫谧《高士传》："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闻而征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已。"盛弘之《荆州记》："上洛有商山。高士传谓地肺，即此也。"后以此典称年高德劭的隐士；或泛指隐居山林的人。汉·扬雄《解嘲》："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后汉·班彪《王命论》："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魏·曹植《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养志弗营。"

宋玉之悲　《楚辞》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后以此典形容秋色悲凉，感伤年华易逝，境遇凄苦。唐·骆宾王《灵泉颂》："三秋客恨，长怀宋玉之悲；一面交欢，暂雪桓谭之涕。"

苏秦六印　《史记·苏秦列传》："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后以此典形容人得任官职，荣耀显赫。唐·杜牧《上周相公启》："买臣怀绶郡邸，萧育召拜扶风，杨仆三组垂腰，苏秦六印在手。"唐·王维

《魏郡太守上党苗公德政碑》："苏公佩印，始归乡里尽欢；疏傅散金，不与子孙为计。"

苏武守节 《汉书·李广苏建传》："（卫）律知（苏）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后以此典称颂人不畏强暴困苦，坚守节操。魏·嵇康《家诫》："若夫申胥之长吟，夷叔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唐·卢照邻《秋霖赋》："子卿北海，伏波南川，金河别雁，铜柱辞鸢。"

夙谈孔雀 南朝梁·萧绎《金楼子·捷对》："杨子州年十岁，甚聪慧。孔永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有杨梅，永指示儿曰：'此真君家果。'儿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后以此典形容少年人聪慧善辩。唐·骆宾王《上瑕丘韦明府启》："幼辩羝羊，演飞龙之秘策；夙谈孔雀，对家禽之丽词。"

隋侯之珠 《淮南子·览冥训》："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汉·高诱注："隋侯，汉东之国姬姓诸侯也。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盖明月珠也。"后以此典指珍宝或人才等珍贵美好的事物；也形容感恩报德。魏·卞兰《赞述太子表》："令夜光之璧，显于金匱；隋侯之珠，彰于韫椟。"汉·扬雄《羽猎赋》："东瞰目尽，西畅无崖。随珠和氏，焯烁其陂。"后汉·班固《西都赋》："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

岁寒之操 《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后以此典形容人德行高尚，节操坚贞。宋·陆游《贺施知院启》："大节全名，松柏挺岁寒之操；同心一德，风云协圣作之期。"南朝宋·周祗《执友箴》："久而致敬，见之晏平。霜雪既至，劲柏冬青。"宋·曾巩《移亳州回人贺状》："言为黼藻，饰陋质以为荣；操若松筠，处大寒而不变。"

孙弘牧 《史记·平津侯列传》："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后以此典指士人出身贫贱。北周·庾信《谢滕王赉猪启》："孙弘牧于淄水，惟以求钱；卜式养于上林，岂知其味。"唐·骆宾王《对策文三道》："岁渐悬车，尚牧淄源之豕；年甫志学，且珥汉庭之貂。"

孙武先诫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齐人孙武以兵法求见吴王阖庐，吴王想度试他行兵布阵的能力，派出一百八十名宫女，孙武分为二队，以吴王宠姬分别任队长，并规定好口令。"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

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见状大惊，急忙下令勿斩。"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后以此典指操演阵法；也戏指姬妾众人。北周·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六韬九法，不用吴起旧书；三令五申，无劳孙武先诫。"

T

弹冠出仕　《汉书·王吉传》："（王）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后以此典指准备出仕；也指得引荐而将为官。南朝梁·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若夫弹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南朝梁·刘峻《广绝交论》："是以王阳登则贡公喜，罕生逝而国子悲。"宋·陆游《贺蒋中丞启》："某尝辱王翰卜邻之荣，妄怀贡禹弹冠之喜。"

澹台见谋　晋·张华《博物志》卷七："澹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阳侯波起，两蛟挟船。子羽左掺璧，右操剑，击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跃而归之，子羽毁而去。"后以此典形容人不惧强暴，勇敢无畏。晋·左思《吴都赋》："哂澹台之见谋，聊袭海而徇珍。"

叹凤　《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安国注："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端。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后以此典感慨遭逢乱世，生不逢时。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南朝梁·沈约《辨圣论》："若不高叹凤鸟，称梦周公，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当世安知其圣人乎！"隋·李德林《天命论》："墨不代苍，泣麟叹凤，恓恓汲汲，虽圣达而莫许也。"

叹黄犬　《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二年七月，具（李）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太平御览》卷九二六引《史记》作"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不可得矣。"后以此典感慨仕途险恶，蒙受杀身之祸，追悔莫及。晋·向秀《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叹黄犬之长吟；悼嵇生之永辞，顾日影

而弹琴。"唐·李白《拟恨赋》："执爱子以长别，叹黄犬之无缘。"晋·潘岳《西征赋》："商法焉得以宿，黄犬何可得牵？"

螳臂拒辙 《庄子·人间世》："蘧伯玉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韩诗外传》卷八："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为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庄公曰：'此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车避之，而勇士归之。"后以此典形容不自量力，做不胜任的事情。唐·元稹《授牛元翼深冀州节度使制》："螳臂拒辙，鸡肋承拳，万万相殊，破之必矣。"唐·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青白其眼，瞢而前行，亦何异抗庄公之轮，怒螳螂之臂。"

桃李不言 《史记·李将军列传》："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后以此典指人德行高尚，受人钦仰、爱戴。晋·潘岳《太宰鲁武公诔》："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没能弥彰。"

陶潜把菊 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陶潜《饮酒》诗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后以此典表现隐士的田园生活；或用以咏菊。唐·元稹《授杨巨源等河中兴元少尹制》："相如有凌云之势，陶潜多把菊之情。"唐·杨炯《庭菊赋》："凭南轩以长啸，坐东篱而盈把，归去来兮何为者。"

陶铸尧舜 《庄子·逍遥游》："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后以此典指培养造就人才。唐·骆宾王《与程将军书》："则当效驽骀之用，饰固陋之心。陶铸尧舜之典谟，宪章文武之道德。"

滕城 参见［佳城郁郁］。北周·庾信《周越国夫人纥豆陵氏墓志铭》："山回地市，路没滕城；松悲鹤去，草乱萤生。"唐·杨炯《大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坟开白日，终留恨于滕城；礼被皇家，忽沾荣于蓬隧。"

天麟 《陈书·徐陵传》："（徐陵）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时宝志上人者，世称其有道，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之，宝志手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后以此典祝颂生儿或称誉他人之子。唐·李商隐《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野鹤天麟，绝比伦于朝右；骥参短簿，困拟议于军前。"

田光伏剑 《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曰：'愿因先生得愿交于荆轲，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之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诺。'……田光

曰：'光闻长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约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使人疑之，非节侠士也。'欲自杀以激荆轲，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后以此典指义士信守诺言，不计生死。魏·曹植《七启》："故田光伏剑于北燕，公叔毕命于西秦。"

停餐训子　《汉书·隽不疑传》："（隽不疑）擢为京兆尹，赐钱百万。京师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后以此典形容妇女贤德，仁慈恤人。唐·王维《工部杨尚书夫人京兆王氏墓志铭》："妇道允谐，母仪俱美；每出诫夫，停餐训子。"唐·柳宗元《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志文》："惟昔孟氏，号为母师。在汉称贤，有戒不疑。"

庭训　参见［趋庭］。唐·骆宾王《上郭赞府启》："又以家传素业，弋书林而骋志；少奉庭训，践文圃以游魂。"唐·杨炯《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仰庭礼而不违，睹楹书而增慕。"

桐圭戏　《吕氏春秋·重言》："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为珪，而受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后以此典指分封领地爵位。南朝梁·任昉《抚军桂阳王墓志铭》："沛易且传，楚诗将说。桐圭谁戏，甘棠何憩。"南朝梁·刘孝绰《司空安成康王碑铭》："允同卫叔，赐宝器于商郊；殊异应侯，戏桐圭于汾水。"

桐乡置祠　《汉书·朱邑传》："朱邑字仲卿，庐江舒人也。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初邑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后以此典称誉官吏廉洁爱民，受百姓爱戴。唐·王维《魏郡太守上党苗公德政碑》："棠树勿翦，何如审像图形；桐乡置祠，岂比耳闻身及。"唐·杨炯《益州温江县令任君神道碑》："居人致祭，桐乡有朱邑之祠；怪力成坟，叶县有王乔之墓。"宋·王安石《谢特授仪同封舒国公表》："久陶圣化，非复鲁儒之所愆；积习仁风，乃尝朱邑之见爱。"

铜山　《史记·佞幸列传》："文帝曰：'能富（邓）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后以此典称人富豪。北周·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酒以兽行，肴由鼎进。采则锦布俱移，钱则铜山合徙。"

投笔　参见［班超投笔］。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无

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

投鼠忌器 《汉书·贾谊传》："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后以此典指欲除奸恶又有所顾忌。《北齐书·樊逊传》："至如投鼠忌器之说，盖是常谈；文德怀远之言，岂识权道。”宋·陆游《江西到任谢史丞相启》："方仇怨造言，投鼠不思于忌器；乃保全极力，舍牛宁废于衅钟。”

投杼 《战国策·秦策二》："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后以此典形容流言可畏。唐·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震于严威。”唐·韩愈《释言》："市有虎，而曾参杀人，谗者之效也。”

屠钓 参见［磻溪翼周］。魏·曹植《求通亲亲表》："昔伊尹之为媵臣，至贱也；吕尚之处屠钓，至陋也。”晋·羊祜《让开府表》："假令有遗德于板筑之下，有隐才于屠钓之间。”南朝梁·江淹《萧骠骑让封第二表》："方求士于板岩，宜思贤于屠肆。”

屠龙 《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后以此典指高超稀少的技艺。南朝陈·江总《云堂赋》："是负风之多幸，愧屠龙之不真。”

吐哺握发 《韩诗外传》卷三："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后以此典表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招纳人才。唐·韩愈《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魏·曹植《汉二祖优劣论》："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唐·李白《与韩荆州书》："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

抟风九万 参见［鲲击鹏抟］。唐·骆宾王《答员半千书》："及其化羽垂天，抟风九万；振鳞横海，击水三千。”南朝梁·萧纲《谢为皇太子表》："势举千钧，方兹未重；高抟九万，比此非遥。”宋·陆游《答发解进士启》："万里抟风，莫测云程之远；一第翻子，行闻桂籍之传。”

吞炭坏形 《战国策·赵策一》：晋豫让为知（智）伯门客，很受其宠信。后赵襄子杀死知伯，豫让逃走，决心为知伯报仇。他先伪装刑人，入宫涂厕，欲刺襄子不成。“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识，曰：‘状貌不似吾夫，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为哑，变其音。”后又伏于桥下，准备

刺杀襄子，被襄子发觉捉住，豫让要求让他用剑刺击襄子的衣服，表示为知伯报仇，以偿心愿，然后自刎而死。后以此典表现义士舍身复仇，报答知遇之恩。汉·谷永《谢王凤书》："昔豫子吞炭坏形，以奉见异，齐客陨首公门，以报恩于智氏。"南朝梁·江淹《诣建平王上书》："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

W

王粲之楼　《文选·王粲〈登楼赋〉》刘良注："仲宣（王粲字）避难荆州，遂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有此作，述其进退危惧之状。"王粲《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后以此典形容人羁旅异乡，思念故土。唐·柳宗元《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遐登王粲之楼，高视刘表之榻。"

王澄绝倒　《世说新语·赏誉》："王平子迈世有俊才，少所推服。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注引《卫玠别传》曰："玠少有名望，善通庄、老。琅邪王平子高气不群，迈世独傲，每闻玠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后以此典指人言论精采高妙，令人叹服。唐·李白《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序》："吾因抚掌大笑，扬眉当之。使王澄再闻，亦复绝倒。"

王良造父　《荀子·王霸》："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淮南子·览冥训》："昔日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安劳乐进，驰骛若灭，左右若鞭，周旋若环。世皆以为巧。"后以此典指善于御马、识马的人；也泛指能工巧匠。后汉·张衡《思玄赋》："命王良掌策驷兮，逾高阁之将将。"唐·韩愈《送石处士序》："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先后也。"

王乔控鹤　汉·刘向《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以此典形容修道成仙；或形容吹奏音乐等。晋·孙绰《游天台山赋》："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蹑虚。"南朝齐·孔稚珪《褚先生百玉碑》："是以子晋笙歌，驭凤于天海；王乔云举，控鹤于玄都。"唐·顾云

《题致仕武宾客嵩山旧隐诗序》："钿走伊波，控隐士饮牛之渚；螺排缑峤，对仙人驾鹤之峰。"

网漏吞舟 《史记·酷吏列传》："汉兴，破觚而为圜，斲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后以此典指刑法疏宽，使大罪犯逃脱。唐·元稹《处分幽州德音》："由是网漏吞舟，视盗不谨，寇羯乘衅，勃为妖氛。"宋·陆游《贺谢枢密启》："网漏吞舟，示太平之宽大；云举肤寸，泽庶物之焦枯。"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危于累卵 《文选·枚乘〈上书谏吴王〉》注引《说苑》："晋灵公造九层台，荀息闻之，求见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鸡卵其上。'公曰：'危哉！'"后以此典形容形势极其危险。汉·枚乘《上书谏吴王》："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晋·潘岳《马汧督诔》："爨麦而炊，负户以汲；累卵之危，倒悬之急。"唐·王维《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仅在而危同累卵，将坠而间不容发。"

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后以此典形容人读书刻苦勤奋，精研细读。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北齐·邢子才《广平王碑文》："志犹学海，业比登山。蹁蹮绨衮，绛帐韦编。"唐·杨炯《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七步立成，五行不缀。家惟万卷，韦实三绝。"

韦弦之戒 《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论衡·率性》："西门豹急，佩韦以自缓；董安于缓，带弦以自促。急之于缓，俱失中和，然而是韦弦附身，成为完具之人。能纳韦弦之教，补接不足，则豹、安于之名可得而参也。"后以此典表示自我规戒，弥补不足。唐·元稹《授裴向左散骑常侍制》："予欲用为垂珰夹乘之官，以代吾盘盂韦弦之戒。"南朝梁·任昉《王文宪集序》："孝友之性，岂伊桥梓；夷雅之体，无待韦弦。"唐·柳宗元《虞鸣鹤诔》："愉乎其和，确尔其坚。更为砥砺，咸去韦弦。"

伪烽沮众 《史记·周本纪》："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后以此典指女色惑乱而亡国。晋·潘岳《西征赋》："举伪烽以沮众，淫嬖褒以纵慝。"

尾生以信 《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后以此典指人守约不变。魏·嵇康《琴赋》："是以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

为人灌园　晋・皇甫谧《高士传》："陈仲子，齐人。其兄载为齐卿，食禄万钟。仲子以为不义，将妻子适楚，居于於陵，自谓於陵仲子，穷，不苟求不义之食。……楚王闻其贤，欲以为相，遣使持金百镒，至於陵辟仲子，仲子人谓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书，乐在其中矣，结驷连骑，所安不过一肉，而怀楚国之忧，意可乎？'于是谢使者，遂相与逃，为人灌园。"后以此典形容隐士坚守节操，避世辞官。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南朝梁・江淹《建平王聘隐逸教》："挹於陵之操，想汉阴之高。"

温树靡答　《汉书・孔光传》："（孔光）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后以此典指居官言行谨密。南朝梁・王僧孺《詹事徐府君集序》："自绸缪轩陛，十有余载，温树靡答，露事不酬。"

温席扇枕　《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东观汉记》："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父况为郡五官掾。……况举孝廉，贫无奴仆，香躬亲勤苦，尽心供养，冬无袴被，而亲极滋味。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后以此典形容孝敬侍奉父母。北周・庾信《周柱国长孙俭神道碑》："温席扇枕，承颜悦膝，冻浦鱼惊，寒林笋出。"唐・杨炯《从弟去盈墓志铭》："子之承亲，温席扇枕。子之友悌，同舆共寝。"

文侯校猎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明日，会天疾风，左右止，文侯不听，曰：'不可。以风疾之故而失信，吾不为也。'遂自驱车往，犯风而罢虞人。"后以此典形容人讲信用，不失信于人。唐・李商隐《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郭汲还州，尚不欺于童子；文侯校猎，宁爽约于虞人？"

文翁正俗　《汉书・循吏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后以此典称誉地方官吏推行教化，治政有方。南朝梁・丘迟《永嘉郡教》："虽谢文翁之正俗，庶几龚遂之移风。"唐・李商隐《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蜀郡登文翁之堂，上国醉曹参之酒。"

闻韶　参见［仲尼忘味］。魏・阮

籍《乐论》："故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好，言至乐使人无欲。"唐·杨炯《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数年学易，伏羲龙马之图；三月闻韶，妫帝凤凰之典。"

蜗角自大　《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后以此典指妄自尊大；或指争斗、战事等。唐·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而犬戎不识，蜗角自大。偷安九服之外，谓天诛罕及。"

蜗舍　《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蜗牛庐。"后以此典指隐士的简陋居处。唐·李商隐《上尚书范阳公启》"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隘佣蜗舍，危托燕巢。"

偓佺　汉·刘向《列仙传》："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后以此典指仙人、得道之人。汉·司马相如《上林赋》："偓佺之伦，暴于南荣。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汉·扬雄《甘泉赋》："虽方征乔与偓佺兮，犹仿佛其若梦。"

卧理　参见［汲黯简靖］。唐·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至如卧理称难，坐啸匪易。披裘问疾，垂爱景以字人。"

巫峡仙妃　《文选·宋玉〈高唐赋〉序》："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后以此典形容男女爱恋情事；或咏美女、女神等。唐·张鷟《公主出降礼钱判》："巫峡仙妃，映高唐而散雨。"南朝宋·谢庄《宋孝武宣贵妃诔》："玄丘烟煴，瑶台降芬。高唐泄雨，巫山郁云。"

吴都倾市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蒸鱼，王前尝半而与女，女怒曰：'王食鱼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阊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后以此典指女子死；或用以咏鹤。南朝宋·鲍照《舞鹤赋》："入卫国而乘轩，出吴都而倾市。"唐·李白《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

吴门曳练　《论衡·书虚》："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

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昌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正之，因与俱下。"后以此典咏吴地风光；或指极目远望。南朝宋·谢庄《乘舆舞马赋》："写秦坰之弭尘，状吴门之曳练。"北周·庾信《谢赵王示新诗启》："曳练且观，无劳白马之望；流泉欲委，伫见青凫之飞。"唐·骆宾王《下廉察使启》："登小鲁之山，辨练光于乱马；临大吴之国，识宝气于连牛。"

吴札听歌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后以此典形容赏鉴音乐；也指以下的不值一提。晋·左思《魏都赋》："卜偃前识，而赏其隆；吴札听歌，而美其风。"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是以叔誉闻诗，验同盟之成败；延陵听乐，知列国之典彝。"

五丁　汉·扬雄《蜀王本纪》："秦惠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于是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于蜀王，蜀王爱之，遣五丁迎女。还至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压五丁，五丁踏地大呼，秦王五女及迎送者皆上山，化为石。"后以此典形容蜀地、蜀道事；也用以称力士。唐·杨炯《大唐益州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武侯龙伏，犹观八阵之图；壮士蛇崩，仍辨五丁之石。"唐·骆宾王《兵部奏姚州破贼露布》："楚人三户，蜀郡五丁。气拥玄云，精贯白日。"

五鼎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主父）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后以"五鼎"指贵族大臣的饮食，借指贵族大臣；以"五鼎烹"指大臣被处死。南朝梁·刘峻《辨命论》："及至开东阁，列五鼎，电照风行，声驰海外。"唐·王维《大唐故临汝郡太守京兆韦公神道碑铭》："坑七族而不顾，赴五鼎而如归。"

五月披裘　《论衡·书虚》："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当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来！'薪者投镰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视之下，仪貌之壮，语言之野也？吾当夏五月披裘而薪，岂取金者哉？'季子谢之，请问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名！'遂不顾。"后以此典指山林隐逸之人。北周·庾信《小园赋》："虽

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

武城弦唱　《论语·武城》：“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后以此典称颂地方官吏治政有方；或借指出任地方官吏。唐·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然后武城弦唱，优游礼乐之中；彭泽琴樽，散诞羲皇之表。”唐·元稹《刘颇河中府河西县令制》：“河西近边，择吏惟精。勿吝牛刀，为我烹割。”

武库　《太平御览》卷四四五引王隐《晋书》：“杜预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后此典形容人博学多识，干练多能。南朝陈·江总《特进光禄大夫徐陵墓志铭》：“辞奔太史，笔利干将；心缄武库，口定雌黄。”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

武骑迁升　《太平御览》卷七十三引常璩《华阳国志》：“升迁桥在成都县北十里，即司马相如题桥柱曰‘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此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华阳国志》：“蜀大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也。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云‘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后以此典表现人有大志，进取功名。唐·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武骑迁升之路，冠盖云飞；文翁讲肆之堂，英灵雾集。”

舞雩之咏　《论语·先进》：“（子曰：）‘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后以此典指人志向高洁不俗；也形容春天景色。唐·柳宗元《柳州贺破东平表》：“介丘雾息，已望翠华之来；沂水风生，更起舞雩之咏。”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惟暮之春，禊饮之日在兹，风舞之情咸荡。”宋·陆游《贺曾秘监启》：“识度关之云，距今十载；从浴沂之乐，终后诸生。”

雾豹　汉·刘向《列女传》：“（陶答子）妇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衣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国贫，君不敬民不戴，败亡之征见矣。愿与少子俱脱。’”后以此典形容隐居修身，避灾远害。唐·白居易《与元九书》：“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唐·司空图《擢英集述》：“虽豹文必备，方成隐雾之姿；而翠羽已零，犹称凌波之玩。”

X

西河竹马 参见〔郭伋还州〕。北周·庾信《谢赵王赉马并繖启》："北部丹帷，更须高卷；西河竹马，即已郊迎。"

西山食薇 参见〔伯夷叔齐〕。魏·阮瑀《吊伯夷》："东海让国，西山食薇。重德轻身，隐景潜晖。"晋·陆机《演连珠》之四十八："是以吞纵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卤之威，不能降西山之节。"

洗耳 汉·蔡邕《琴操·箕山操》："许由者，古之贞固之士也。尧时为布衣，夏则巢居，冬则穴处，……以清节闻于尧。尧大其志，乃遣使以符玺，禅为天子。于是许由喟然叹曰：'匹夫结志，固如盘石，采山饮河，所以养性，非以求禄位也；放发优游，所以安己不惧，非以贪天下也。'使者还，以状报尧，尧知由不可动，亦已矣。于是许由以使者言为不善，乃临河洗耳。……后许由死，遂葬于箕山。"后以此典形容隐士志行高洁，耻于仕宦，甘心隐居山林。魏·曹植《七启》："河滨无洗耳之士，乔岳无巢居之民。"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故免群生于汤火，纳百姓于休和。引镜皆明目，临池无洗耳。"晋·陆机《演连珠》之七："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园之币；洗渭之民，不发傅岩之梦。"

细柳之壁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后以此典称誉将帅统军严明，军队整肃；也泛指军营、军队；或以"棘门、霸上"指纪律松弛的军队。宋·杨亿《驾幸河北起居表》："劳军细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阳。"晋·潘岳《西征赋》："掩细柳而抚剑，快孝文之命帅。"

隙驷不留 《礼记·三年问》：

“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后以此典形容人生短暂或时光流逝迅速。南朝梁·刘峻《追答刘沼书》：“虽隙驷不留，尺波电谢；而秋菊春兰，英华靡绝。”南朝梁·萧衍《孝思赋》：“念过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唐·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况过隙不留，藏舟难固。追惟逝者，浮生几何。”

夏虫疑冰　《庄子·秋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后以此典形容人见闻短浅，不可理喻。晋·孙绰《游天台山赋》：“哂夏虫之疑冰，整轻翮而思矫。”南朝梁·张绾《龙楼寺碑》：“盖闻井鱼之不识巨海，夏虫之不见冬冰。”

夏侯玉树　《世说新语·容止》：“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后以此典形容人才貌俱美；也指二人相比，美恶悬殊。南朝梁·裴子野《司空安城康王行状》：“夏侯玉树之谈，卫玠璧人之目。”

下泽之车　《东观汉记·马援》：“马援击交址，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尝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骑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为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乌鸢跕跕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后以此典形容满足于悠闲平稳的生活，不求名利。宋·陆游《贺吏部陈侍郎启》：“驾下泽之车，虽已安于微分；磨浯溪之石，尚拟颂于中兴。”

先鞭　《世说新语·赏誉》“刘琨称祖车骑”条注引晋·孙盛《晋阳秋》：“刘琨与亲旧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箸鞭耳！’”《晋书·刘琨传》：“（刘琨）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气相期如此。”后以此典表现人奋发争先，建功立业；也泛指占先。北魏·温子升《为司徒高敖曹谢表》：“见义援戈，临危奋剑。顾惭后劕，终谢先鞭。”唐·李商隐《道士胡君新井碣铭》：“郄元帅之诗书，那宜夺席？曹相国之黄老，未足争鞭。”

咸触屏　《汉书·陈万年传》：“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万年任为郎。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书数十上，迁为左曹。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后以此典指人谄媚；或指人不听谬言。唐·柳宗元《佩韦赋》：“咸触屏以拒训兮，肆陨越而就陵。”

衔环　晋·干宝《搜神记》卷二十：“汉时弘农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

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后以此典表示知恩报恩。宋·曾巩《代翰林侍读学士钱藻遗表》："生而无益，曾莫及于衔环；死或有知，犹庶几于结草。"北周·庾信《齐王进赤雀表》："岂直云中太守，见赤心之奉主；蓬莱童子，知白环之报恩。"

献凤楚门 《尹文子·大道上》："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凰也，'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曰：'然。'则十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将欲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献楚王。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凰，贵欲以献之，遂闻楚王。王感其欲献于己，召而厚赐之，过于买鸟之金十倍。"后以此典形容不辨真伪，以假为真。南朝梁·江淹《奏记诣南徐州新安王》："岂宜炫璞郑氏，献凤楚门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

湘妃之泪 汉·刘向《列女传》："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晋·张华《博物志》卷八："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后以此典表现思念、悼伤的情感；或用以咏湘地风物。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哭。"唐·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琴前镜里，孤鸾别鹤之哀；竹死城崩，杞妇湘妃之怨。"

响遏青云 《列子》·汤问》："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后以此典形容歌声嘹亮动听。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序》："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凤律。"唐·杨炯《幽兰赋》："兰缸熠耀，兰麝氛氲，舞袖回雪，歌声遏云。"

项羽拔山 《史记·项羽本纪》："（项）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后以此典形容人力大无比。唐·杨炯《唐上骑都尉高君神道碑》："蚩尤食石，灾害于生人；项羽拔山，凭陵于上国。"

相如涤器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后以此典表现文人贫困落魄；也用以形容女子卖酒或酒舍韵事。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

相如睨柱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及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后以此典表现大义凛然、不惧强权的气概。北周·庾信《拟连珠》："是以曹刿登坛，汶阳之田遂反；相如睨柱，连城之璧更还。"晋·潘岳《西征赋》："想赵使之抱璧，浏睨楹以抗愤。"

象耕鸟耘 汉·王充《论衡·书虚》："传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文选·左思〈吴都赋〉》注引《越绝书》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后以此典形容帝王有道而能感化鸟兽万物；或用以悼念帝王去世。晋·左思《吴都赋》："原隰殊品，窳隆异等，象耕鸟耘，此之自与。"

小草出山 《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安）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后以此典指人地位低微，官职卑小。宋·陆游《修史谢丞相启》："老骥伏枥，修途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效尚期于自见。"

笑客美人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盘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后以此典指轻士重色；也戏指腿跛。唐·杨炯《唐恒州刺史王公神道碑》："无笑客之美人，有拜宾之童隶。"

谢家宝树 《艺文类聚》卷八一引晋·裴启《语林》："谢太傅（安）问诸子侄曰：'子弟何预人事，而政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生于阶庭。'"后以此典形容子弟优异超群。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唐·杨炯《唐恒州刺史王公神道碑》："芝兰有秀，羔雁成行。"

心存恋豆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晋·干宝《晋纪》："桓范出赴（曹）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驽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后以此典形容人贪恋安乐、禄位。宋·李清照《打马赋》："且夫丘陵云远，白云在天，心存恋豆，志在著鞭。"

心游魏阙 《庄子·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后以此典形容虽隐居江湖或遭受放逐，心中仍思恋朝廷。唐·杨炯《群官寻杨隐居诗序》："与夫形在江海，心游魏阙，迹混朝市，名为大隐，可得同年而语哉？"南朝梁·张缵《谢东宫赉园启》："情爱山泉，颇乐闲旷。虽复伏膺尧门，情存魏阙。"唐·白居易《与崇文诏》："而望阙之恋深，固难夺志。"

行计然 《史记·货殖列传》："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后以此典指致富之道或谋生手段。唐·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可谓庚桑畏垒，致大壤以匡时；范相鸱夷，行计然而济俗。"

行雨 参见〔巫峡仙妃〕。南朝齐·谢朓《八咏》："迎行雨于高唐，送归鸿于碣石。"南朝梁·江淹《灵丘竹赋》："况有朝云之馆，行雨之宫，窗峥嵘而绿色，户踟蹰而临空。"唐·杨炯《少室山少姨庙碑》："华山之上，明星远烛；阳台之下，暮雨潜通。"

匈奴未灭 《史记·骠骑列传》："骠骑将军（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后以此典形容人决心建功立业，不以家庭为重。唐·杨炯《左武卫将军崔献行状》："匈奴未灭，霍去病所以辞家；天子动容，周亚夫于焉不拜。"宋·杨亿《驾幸河北起居表》："师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挟纩；匈奴未灭，受命而孰不忘家。"

休牛放马 《尚书·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后以此典指天下太平，战争止息。南朝梁·裴子野《喻虏檄文》："朕拨乱反正，君临亿兆，休牛放马，载戢干戈。"

羞以牛后 《战国策·韩策一》："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夫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而买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

牛后乎？"后以此典指宁在小范围当家做主，也不随在大人物后面受支配。魏·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昔苏秦说韩，羞以牛后；韩王按剑，作色而怒。"

徐偃柔 《韩非子·五蠹》："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后以此典指行为背离时势，往往结果与愿望相反，下场可悲。唐·柳宗元《贞符》："徐偃柔以屏义兮，犊邦离而身虏。"宋·徐铉《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陇西公墓志铭》："孔明罕应变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义之行，终于亡国。"

许由岩栖 参见〔洗耳〕。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唐·白居易《进士策问五道》："尧让天下而许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饿。"

宣室之谈 《史记·贾生列传》："后岁余，贾生（谊）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后以此典表示受帝王召见，感到荣耀；或指君王不关心国政，有才而不受赏擢，难以施展。南朝梁·刘孝标《追答刘沼书》："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唐·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洛阳才子，一承宣室之谈；鲁国儒生，行践中都之邑。"

雪夜鹅鸣 《旧唐书·李愬传》："愬乘其无备，十月，将袭蔡州。……是日，阴晦而雪，大风裂旗旆，马慄而不能跃，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诸将请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也。'……自张柴行七十里，比至悬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鹅鸭池，愬令惊击之，以杂其声。贼恃吴房、朗山之固，晏然无一人知者。李佑、李忠义坎墉而先登，敢锐者从之，尽杀守门卒而登其门，留击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济外宅，蔡吏告元济曰：'城已陷矣。'"后以此典称扬将领足智多谋，破敌立功；或表现有破敌立功，报效朝廷的愿望。宋·李刘《贺丞相明堂庆寿并册皇后启》："风声鹤唳，不但平淮；雪夜鹅鸣，更观擒蔡。"

荀铎 《晋书·荀勖传》："初，（荀）勖于路逢赵贾人牛铎，识其声。及掌乐，音韵未调，乃曰：'得赵之牛铎则谐矣。'遂下郡国，悉送牛铎，果得谐者。"后以此典指未被发现的人才；也借指人或物虽低微但亦有用。唐·温庭筠《上学士舍人启》："某荀铎播车，邕琴入爨。委悴倌人之末，摧残膳宰之前。"唐·罗隐《谢大理薛卿启》："苟非令君侧耳于车上，郎中注目于亭间，则随赵犊以长鸣，与吴桐而共朽者也。"

Y

雅歌投壶 《北堂书钞》卷一〇六引吴·谢承《后汉书》："祭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投壶，古代宴会上一种文雅的娱乐活动，宾主依次将箭筹投入壶中，以投中多少决定胜负。后以此典形容武将风流儒雅的气度；也用以咏饮宴之事。元·揭傒斯《纯德先生梅西集序》："而素尚高洁，登山临水，雅歌投壶，宾馔无虚日。"

燕图穷 《战国策·燕策三》："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于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后以此典指义士不惜生命，不畏强暴的壮烈行为。晋·潘岳《西征赋》："燕图穷而荆发，纷绝袖而自引。"

燕昭市骏 《战国策·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后以此典形容诚心访求贤才；或形容人才杰出。唐·骆宾王《与程将军书》："燕昭为市骏之资，郭隗居礼贤之台。"后汉·孔融《论盛孝章书》："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

盐梅 参见〔傅岩之梦〕。北周·庾信《商调曲》："若涉大川，言凭于舟楫；如和鼎实，有寄于盐梅。"南朝齐·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懋陈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盐梅之和，属有望焉。"唐·杨炯《同詹事府祭郭少保文》："实冯舟楫之功，必籍盐梅之味。"

颜生居陋 参见〔箪食瓢饮〕。晋·嵇茂齐《答赵景真书》："故颜生居陋，不改其乐；孔父困陈，弦歌不废。"南朝梁·萧绎《释奠祭孔子文》："致虚守静，曲巷安贫；钦风味道，其德有邻。"

晏婴近市 《左传·昭公三年》："初，（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后以此典指狭小喧嚣的住处。北周·庾信《小园赋》：“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南朝梁·刘孝仪《为武陵王谢赐第启》：“毕晏婴之湫隘，同潘岳之闲居。”

燕巢飞幕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后以此典形容处境十分危险。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晋·潘岳《西征赋》：“危素卵之累壳，甚玄燕之巢幕。”

燕砾为宝 《后汉书·应劭传》注引《阙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观之，主人父斋七日，端冕之衣，衅之以特牲，革匮十重，缇巾十袭。客见之，俛而掩口卢胡而笑曰：‘此燕石也，与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贾之言，竖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弥谨。”后以此典指以假当真；或指孤陋寡闻愚昧无知。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魏氏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

燕雀贺厦 《淮南子·说林训》：“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忧乐别也。”后以此典形容人有喜庆之事。宋·李刘《贺丞相明堂庆寿并册皇后启》：“燕雀贺厦，岂惟免风雨之忧？鸿雁宾秋，更乞遂江湖之乐。”唐·李商隐《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金楹假荫，望同相贺之禽；珠岸回光，庶及不枯之草。”

燕雀小志 《史记·陈涉世家》：“陈涉（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后以此典形容人志向远大，或以“燕雀”指安于现状、庸碌无为的人。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汉·班彪《王命论》：“是故驽蹇之乘，不骋千里之涂；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

殃及池鱼 《艺文类聚》卷九六引《风俗通》：“城门失火，祸及池中鱼。旧说池中鱼人姓李，居近城。城门失火，延及其家，仲灾烧死。谨案《百家书》曰：宋城门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后以此典比喻无端遭祸害或受牵连。北魏·魏收《檄梁文》：“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宋·张孝祥《代揔得居士上宰相》：“雨流木偶，所念无归；火及池鱼，又将奚咎？”

羊皮讵赎 《孟子·万章上》：“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

之皮，食牛，以要秦缪公。”《史记·秦本纪》：“（秦缪公）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余。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后以此典形容帝王礼贤下士，重视人才；或指未得际遇的贤士。北周·庾信《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移营减灶，空幕禽飞。羊皮讵赎？画马何追？”

羊续悬枯　《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吴·谢承《后汉书》：“羊续好食生鱼，为南阳太守，丞侯俭贡鲤，续受而悬之一岁，俭复致一枚，续乃以所悬枯鱼以示俭，终身不复食鱼。”后以此典称颂官吏廉洁拒贿。《陈书·宗元饶传》：“求粟不厌，愧王沉之出赈；征鱼无限，异羊续之悬枯。”

阳城考下下　《旧唐书·阳城传》：阳城任道州刺史“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诮让。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后以此典指官吏体恤民情，不计自身荣辱。宋·陆游《贺谢提举启》：“班超之策平平，阳城之考下下，至于俗吏，乃求奇功。”

阳侯　《淮南子·览冥训》：“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汉·高诱注：“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休水而死。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后以此典指水神；也借指风浪。后汉·蔡邕《汉津赋》：“阳侯沛以奔骛，洪涛涌以沸腾。”魏·应玚《灵河赋》：“鲧乘高而迅逝，阳侯沛而振惊。”

阳乌　《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艺文类聚》卷九二引《古今注》：“所谓赤乌者，朱鸟也。其所居高远，日中三足乌之精，降而生三足乌，何以三足？阳数奇也。”后以此典借指太阳。晋·张协《七命》：“阳乌为之顿羽，夸父为之投策。”唐·李白《明堂赋》：“阳乌转影而翻飞，大鹏横霄而侧度。”

扬子一区宅　《汉书·扬雄传》：“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杨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后以此典泛指平民、学者安身生活的住所。宋·张孝祥《洪帅魏参政启》：“开商邦三面之罗，已涵大惠；筑扬子一区之宅，终藉余休。”

杨意不逢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

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后以此典表现受人（多指帝王近臣）荐引而得赏识任用。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宋·陆游《与李运使启》："飞腾捷路，耻烦狗监之吹嘘；散落遐荒，宁付鸡林之鉴裁。"

杨朱歧路 《列子·说符》："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焉。'杨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杨子，名朱。后以此典感慨人生之路多曲折、歧途；也用以形容离别分手。北周·王褒《与周弘让书》："嗣宗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岂期终始参差，苍黄反覆，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

尧民击壤 《论衡·艺增》："《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后以此典颂扬太平之世。宋·陆游《江西到任谢表》："所愿预草汉家检玉之文，未敢遽同尧民击壤之作。"南朝梁·王僧孺《为韦雍州致仕表》："傥帷盖未亲，东岳稍驻。击壤鼓腹，其赐犹多。"

尧羊触邪 《太平御览》卷八九〇引《说文》："獬豸，似牛一角。古者决讼，命触不直。黄帝时，有遗帝獬豸者，帝问何食何处，曰：'食荐，春夏处水泽，秋冬处竹箭松筠。'"又引《论衡》："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皋繇治狱，有罪者令羊触之，皋繇敬羊，跪坐事之。"后以此典借指官吏执法断狱。唐·元稹《戒励风俗德音》："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安可不惑？"

鹞死握中 《太平御览》卷九二六引《唐书》曰："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郑公魏征，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语古帝王逸豫，微以讽谏。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征，欲尽其言。征语不时尽，鹞死怀中。"后以此典表现君王纳谏。唐·白居易《续虞人箴》："温颜听纳，献替从容；及瑑趋出，鹞死握中。"

叶县乘凫 《后汉书·王乔传》："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乃诏尚方诊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后以此典形容地方官吏之事，多指县令；也借称鞋履。南朝陈·徐陵《天台山馆徐则法师

碑》："所以伊川控鹤，叶县乘凫；灵化无方，去还斯在。"唐·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群公叶县凫飞，入朝廷而不出。"唐·王维《故右豹韬卫长史任君神道碑》："不坠象贤，一门而二凫舄；皆为政以德，遗爱在人。"

曳尾涂中 《庄子·秋水》："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后以此典形容甘于贫贱而不愿仕宦。魏·曹植《七启》："假灵龟以托喻，宁掉尾于涂中。"宋·欧阳修《谢致仕表》："虽伏枥之马，悲鸣难恋于君轩；而曳尾之龟，涵养未离于灵沼。"

一饭之恩 《左传·宣公二年》："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后以此典指知恩必报。唐·杜牧《裴诒除监察御史等制》："古人于一饭之恩，尚有杀身以报。"

一顾倾城 《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后以此典形容女子美貌动人，令人倾倒。后汉·张衡《西京赋》："眳藐流眄，一顾倾城，展季桑门，谁能不营。"晋·陶潜《闲情赋》："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

一钱之郡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裴松之注引晋·司马彪《续汉书》："（刘宠）后辟大将军府，稍迁会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征入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民去治数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间，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闻宠迁，相率共送宠，人赍百钱。宠见，劳来曰：'父老何乃自苦远来？'皆对曰：'山谷鄙老，生未尝至郡县。他时吏发求不去，民间或夜不绝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间，年老遭值圣化，今闻当见弃去，故戮力来送。'宠谢之，为选受一大钱。故会稽号宠为'取一钱太守'。其清如是。"后以此典称誉地方官为政清廉，地方平靖。北周·庾信《周大将军义兴公萧公墓志铭》："岂直邓攸清白，见称五鼓之歌；刘宠廉能，名为一钱之郡。"

一月九迁 《东观汉记》："马援与杨广书曰：'车丞相高祖园寝郎，一月九迁为丞相者。'"《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晋·张璠《汉纪》："董卓秉政，复征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诏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

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后以此典形容官员升迁迅速。南朝梁·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虽千秋之一月九迁，荀爽之十旬远至，方之微臣，未为速达。”宋·陆游《除制司参议官谢赵都大启》：“方当日有九迁之荣，何难身兼数器之地。”

衣锦之荣 《史记·项羽本纪》：“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沃，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汉书·朱买臣传》：“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后以此典形容富贵回乡，显耀乡里；也指回本籍任官。宋·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唐·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诗序》：“游宦三年，愿以君羹遗母；不居一国，欲其昼锦还乡。”

移丰 参见〔安堵识家〕。北周·庾信《汉高祖置酒沛宫赞》：“虽欣入沛，方念移丰。酒酣自舞，先歌大风。”

圯桥取履 《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后以此典表示尊老受教；或形容贤人志士尚未得志。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吴明彻墓志铭》：“圯桥取履，早见兵书；竹林逢猿，遍知剑术。”

遗弓 参见〔黄帝登仙〕。南朝梁·沈约《齐武帝谥议》：“慕切遗弓，哀同遏密。晦朔不语，殡宫将启。”

倚马可待 《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后以此典形容人才思敏捷，著文迅速。唐·李白《与韩荆州书》：“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唐·白居易《日试诗百首田夷君等制》：“而倚马爰来，衣锦归去；以文得禄，亦足为荣。”

羿乃毙日 《艺文类聚》卷一引《淮南子》：“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乌皆死，堕羽翼。”后以此典形容神人、勇士的壮举；或形容日烈天旱。南朝梁·江淹《遂古篇》：“十日并出，尧之间兮。羿乃毙日，事岂然兮。”

薏苡兴谤 《太平御览》卷四五二引晋·司马彪《续汉书》：“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邀名，嫌疑之戒，愿留意焉。”《后汉书·马援列传》：“初（马）援在交址，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为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后以此典指遭受诬陷毁谤，无法自明，蒙受冤屈。南

朝梁·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既而分虎出守，以襄被见嗤；持斧作牧，以薏苡兴谤。"南朝梁·张缵《让尚书仆射表》："情态参差，世途盈虚；薏苡兴谤，舍尘见猜。"唐·柳宗元《为南承嗣上中书门下乞西河效用状》："首级之差，今复谁辨？薏苡之谤，不能自明。"

阴德蛇埋 汉·刘向《列女传》卷三："（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见其母而泣焉。母问其故，对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今者出游见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对曰：'吾恐他人复见之，杀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有阴德者阳报之，德胜不祥，仁除百祸，天之处高而听卑，书不云乎？'"后以此典形容人德操高尚，除害利人。北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陆逞神道碑》："谦恭周密，言行无乖，忠公兕殪，阴德蛇埋。"

颖脱 参见〔毛遂耀颖〕。唐·李白《与韩荆州书》："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映雪 《初学记》卷二引《宋齐语》："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淡，交游不杂。"后以此典指贫士勤学苦读。南朝梁·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至乃集萤映雪，编蒲缉柳。"唐·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每蟋蟀凄吟，映素雪于书帐。"

游刃余地 《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后以此典形容观察事物透彻，处理问题得心应手。宋·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晋·孙绰《游天台山赋》："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

于公高门 《汉书·于定国传》："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今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后以此典形容人有德行，子孙发达显贵。南朝梁·刘峻《辩命论》："且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墓以望丧。"南朝梁·任孝恭《谢赉钱治宅启》："门学于公，逆容驷马；巷均王璿，豫拟幡旗。"唐杨炯《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门容驷马，旌旗玉塞之雄；坐列三貂，人物金行之秀。"

鱼肠尺素 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后以此典指书信，多用以表现相思之情等。北周·庾信《谢滕王集序启》："鱼肠尺素，凤足数行，书此谢辞，终知不尽。"唐·柳宗元《为韦京兆祭杜河中文》："谁谓河广，愿言莫由。烹鱼之问，往复相酬。"宋·陆游《答漳州石通判启》："烹鱼而得尺素，藏妙语以为荣。"

虞姬永别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后以此典感叹英雄末路，无可奈何，心境悲凉。北周·庾信《拟连珠》："是以楼中对酒，而绿珠前去；帐里行歌，而虞姬永别。"后汉·马融《琴赋》："饮马长城，楚曲明光。楚姬遗叹，鸡鸣高桑。"

愚公移山 《列子·汤问》："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后以此典形容人有决心毅力，不怕困难。宋·谢枋得《与李养吾书》："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取讪笑于腐儒、俗吏。"唐·杨炯《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驾鼋梁于圣海，秦皇息鞭石之威；泛鳌钓于仙洲，愚叟罢移山之力。"

与哙伍 《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同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迎送，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后以此典指不屑与比自己差的人为伍。宋·李廷忠《谢王枢使荐举启》："客有荐雄文，始置在十科之列；生乃与哙伍，犹未离七选之阶。"

玉关生人 参见〔班超望返〕。宋·南游《知严州谢王丞相启》："且定远未归，惟望玉关之生入；轻车已老，犹护北平之清秋。"

狱吏之尊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后以此典指人

不幸入狱，无法剖白，受制于人。南朝梁·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赭衣为虏，见狱吏之尊；除名为民，知井臼之逸。"宋·周必大《岳飞叙复元官制》："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

鸳鹭充朝 《禽经》："寀寮雝雝，鸿仪鹭序。"晋·张华注："鸿雁属大曰鸿，小曰雁，飞行有行列也。鹭，白鹭也，小不逾大，飞有次序，百官缙绅之象。"后以此典指朝官的班行序列；也借指在朝廷任职。唐·柳宗元《上权德舆补阙启》："今鸳鹭充朝，而独干执事者，特以顾下念旧，收接儒素，异乎他人耳。"唐·罗隐《上太常房博士启》："某则困踬于龙津，博士则回翔于鸳侣。"宋·陆游《谢葛给事启》："冥心鹓鹭之行，投迹鸡豚之社。"

元礼龙门 《太平御览》卷四六五引晋·袁山松《后汉书》："桓帝时朝廷日乱，李膺（字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尚，后进之士升其堂者，以为登龙门。"《后汉书·李膺传》注：以鱼为喻也。龙门，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绛州龙门县。辛氏《三秦记》曰："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也。后以此典形容得前辈、贤者接纳，与之交往；也用以褒称接纳、奖掖自己的人。唐·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高扃向术，似元礼之龙门；甲第临衢，有当时之驿骑。"唐·王维《裴仆射济州遗爱碑》："熊轼之贵，子弟夷于平人，龙门则高，宾客不遗下士。"

元龙湖海 《三国志·魏书·陈登传》："陈登者，字元龙，在广陵有威名。……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后以此典形容人志向远大，豪放不羁，不屑与世俗之人往来。宋·陆游《贺泉州陈尚书启》："下视诸公，负元龙湖海之豪气；独尊九牧，擅诸葛宇宙之大名。"

园绮 参见〔四皓〕。晋·桓温《荐谯元彦表》："虽园绮之栖商洛，管宁之默辽海。方之于秀，殆无以过。"唐·李白《奉饯十七翁寻桃花源序》："则绮皓不得不遁于南山，鲁连不得不蹈于东海。"

袁安之门 《后汉书·袁安传》注引晋·周斐《汝南先贤传》："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后以此典形容士人清操自守，生活贫寒；也用以咏雪。北周·庾信《谢赵王赉丝布启》："张超之壁，未足障风；袁安之门，无人开雪。"唐·杨炯《卧读书架赋》："尔其临窗有风，闭户多雪，自得陶潜之兴，仍秉袁安之

节。"

援琴之挑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临邛）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后以此典表现男女相思爱恋等。唐·元稹《莺莺传》："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

鶢鶋悲愁　《庄子·至乐》："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疏："昔有海鸟，名曰爰居，形容极大，头高八尺，避风而至，止鲁东郊。"后以此典形容违背本性，使无法适应；也形容隐士不耐世俗烦嚣。唐·李白《大鹏赋》："精卫殷勤于衔木，鶢鶋悲愁乎荐觞。"唐·罗隐《谗书》："所谓饰猱狖以冠带，飨爰居以酒食者也。"

鼋鼍为梁　《竹书纪年》卷下："（周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架鼋鼍以为梁；遂伐越至于纡。"后以此典指渡江海架设桥梁。南朝梁·江淹《恨赋》："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鼋鼍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唐·炯《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架鼋梁于圣海，秦皇息鞭石之威；泛鳌钓于仙洲，愚叟罢移山之力。"

苑鹿化马　《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后以此典指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晋·潘岳《西征赋》："野蒲变而成脯，苑鹿化以为马。"

月旦　《后汉书·许劭列传》："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以此典指评论人物、作品等，定其高下。南朝梁·刘峻《广绝交论》："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

越王轼蛙　《韩非子·内储说上》："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勾践）自谓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见蛙张腹而怒，将有战争之气，即为之轼。其士卒有问于王曰：'君何为敬蛙虫而为之轼？'勾践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称吾意者。今蛙虫无知之物，见敌而有怒气，故为之轼。'于是军士闻之，莫不怀心乐死，人致其命。"后以此典指

激励将士，使士气高昂。魏·曹植《矫志》："螳螂见叹，齐士轻战；越王轼蛙，国以死献。"唐·柳宗元《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正当天讨之辰，更积鬼诛之罪。众轻斗蚁，勇劣怒蛙。"

越吟 参见〔庄舄越吟〕。唐·柳宗元《凌助教蓬屋题诗序》："与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获者，异日道也。"宋·陆游《上二府乞宫祠启》："优游食足，敢陈楚些之穷；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苦。"

鸑 鸣岐 《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 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时神之志者也。"且以此典形容太平之世来临。北周·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虹蜺满野，是废当涂之高；鸑鷟鸣岐，实始维新之命。"晋·孙绰《景福殿赋》："故能翔岐阳之鸣凤，纳虞氏之白环。"

云台 《太平御览》卷九一引《东观汉记》："（永平）三年春二月，图二十八将于云台，册曰：剖符封侯，或以德显。"后以此典形容臣子功勋卓著，名标史册。南朝梁·萧绎《上忠臣传表》："宣帝褒德，麟阁画充国之形；显宗念功，云台图仲华之象。"唐·司空图《擢英集述》："人人骥路，云台之此日豪华；处处鸾丛，仙馆则当时寥落。"

Z

宰予昼寝 《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后以此典形容不可救药；也用以指白天睡觉。魏·曹植《学官颂》："由也务学，名在前志。宰予昼寝，粪土作诫。"唐·杨炯《卧读书架赋》："高眠孰可，讵贻边子之嘲；甘寝则那，宁耻宰予之责。"

泽畔之吟 《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汉·王逸叙："《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后以此典表现遭贬失意，忧愁吟叹；或指臣子被放逐边地。唐·白居易《与元九书》："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

斩楼兰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傅介子，家在北地，以从军为郎，为平乐监。昭帝时，刺杀外国王。天子下诏书曰：'平乐监傅介子使外国，杀楼兰王。'"《汉书·傅介子传》："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

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后以此典表示臣子建功异域。唐·杨炯《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系单于之颈，有类长沙；斩楼兰之王，更如平乐。"

斩蛇 参见〔蛇分沛泽〕。后汉·班固《高祖泗水亭碑》："建号宜基，维以沛公。扬威斩蛇，金精摧伤。"魏·曹植《汉高祖赞》："屯云斩蛇，灵母告祥。"

展其骥足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后以此典指人有才能，正待施展。唐·杨炯《常州刺史杨公墓志铭》："东南之美，吴会之乡。展其骥足，有赖王祥。"唐·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佩吕刀而邵美，已赞褰帷之游；屈庞骥而未伸，将骋仁风之驾。"宋·陆游《答漳州石通判启》："谓宜凌厉以横翔，乃复逡巡而小却。使为治中，乃展骥耳。"

展禽三黜 《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即展禽，为鲁国大夫，字季，因封邑在柳下，谥惠，又称柳下惠。士师是掌管司法的官。后以此典指被罢官免职或官场失意。唐·杨炯《李怀州墓志铭》："展禽三黜，安仁再免，奚辞棘署，俯集桐华。"晋·袁宏《三国名臣赞》："屡摧逆鳞，直道受黜。叹过孙阳，放同贾屈。"晋·潘岳《西征赋》："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无柳季之直道，佐士师而一黜。"

张陈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陈余为秦末汉初人，两人原先为生死之交。后起兵反秦，因为产生嫌隙，争权夺地，互相攻伐，"汉二年，东击楚，使使告赵，欲与俱。陈余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持其头遗陈余。陈余乃遣兵助汉。汉之败于彭城西，陈余亦复觉张耳不死，即背汉。汉三年，韩信已定魏地，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陈余泜水上。"后以此典指势利之交，交情不终。南朝梁·刘峻《广绝交论》："由是观之，张陈所以凶终，萧朱所以隙末，断焉可知矣。"

张良却粒 《史记·留侯世家》："留侯（张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后以此典指不恋官位，及时隐退。唐·元稹《许刘总出家制》："张良却粒，尚想高纵；范蠡登舟，空瞻遗象。"晋·陆机《汉高

祖功臣颂》："恰颜高览，弭翼凤戢。托迹黄老，辞世却粒。"唐·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寻赤松而见及，泛黄菊以相从。"

张巡效忠 《旧唐书·张巡传》："及城陷，尹子奇谓（张）巡曰：'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视其齿，存者不过三数。巡大骂曰：'我为君父义死，尔附逆贼，犬彘也，安能久哉！'"后以此典指将领不顾生死，奋勇抗敌的义烈行为。唐·元稹《授李愿检校司空宣武节度使制》："睢阳在尔之东，张巡效忠之诚尚在；夷门在尔之境，侯嬴报恩之迹犹存。"

昭王筑台 《战国策·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雠者奈何？'郭隗先生对曰：'……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后以此典指君王招纳贤士，礼敬人才；也指人才得到礼遇、任用。后汉·孔融《论盛孝章书》："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唐·柳宗元《为韦侍郎贺窦群除右拾遗表》："言而不废，微臣敢窃于荐雄；德必有邻，圣代式光于尊隗。"

赵衰之日 《左传·文公七年》："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晋·杜预注："冬日可爱，夏日可畏。"后以此典形容人待人亲切，令人温暖。唐·罗隐《投永宁李相公启》："出则祝赵衰之日，永冀流暄；入则祷傅说之星，惟希借耀。"南朝宋·谢庄《宋孝武宣贵妃诔》："游艺弹数，抚律穷机。踌躇冬爱，怊怅秋晖。"南朝齐·王俭《太宰褚彦回碑文》："君垂冬日之温，臣尽秋霜之戒。"

折腰 南朝梁·萧统《陶渊明传》："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后以此典表示有气节，不肯屈身事宦；或反用之，表示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为官。宋·李廷忠《谢王枢使荐举启》："既不能饰固陋之心以取容，复未免折凄凉之腰而衣食。"唐·王维《与魏居士书》："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

折柱倾维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后以此典形容时局混乱，朝政无主；或用以形容奇景异观。唐·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蚩尤则命风召雨，桀黠于中州；共工则折柱倾维，崩腾于海县。"南朝梁·刘峻《辩命论》："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

谪仙捉月 《旧唐书·李白传》："（李白）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居金陵，与白诗酒唱

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或云太白平生爱谢家青山，葬其处，采石特空坟耳。世传太白过采石，酒狂捉月。”谪仙，指李白。后以此典形容诗人文士纵饮豪放。宋·文天祥《贺赵侍郎月山启》：“啸吟水石，酹谪仙捉月之魂；上下风樯，访舍人麾军之迹。”

磔鼠　《史记·张汤传》：“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后以此典形容官吏执法严厉老练。唐·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推公平而折狱，磔鼠谢其严明；拥端悫而行仁，化蛇惭其智勇。”

真汉相　《汉书·王商传》：“（王）商代匡衡为丞相，益封千户，天子甚尊任之。为人多质有威重，长八尺余，身体鸿大，容貌甚过绝人。河平四年，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单于前，拜谒商。商起，离席与言，单于仰视商貌，大畏之，迁延欲退。天子闻而叹曰：‘此真汉相矣！’”后以此典形容官员威严，使人敬畏。宋·秦观《贺吕相公启》：“宗族谓之小许公，夷狄以为真汉相。”宋·李刘《贺丞相明堂庆寿并册皇后启》：“楚氛甚恶，动兵邦域之中；汉相有真，折冲尊俎之上。”

真气临关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索隐引《列仙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后以此典指有道之人隐遁；或指有道之人降临。唐·王维《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臣闻仙祖行化，真气临关；圣人降生，祥光满室。”南朝梁·萧绎《中书令庾肩吾墓志》：“关吏早逢，恒表真人之气；少微晚映，还彰隐士之星。”宋·陆游《贺曾秘监启》：“识度关之云，距今十载；从浴沂之乐，终后诸生。”

枕戈　参见〔先鞭〕。北周·庾信《拟连珠》：“盖闻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空思说剑，徒闻枕戈。”

整冠李下　古诗《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比肩。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后以此典指人应谨言慎行，避免嫌疑。南朝陈·徐陵《谢儿报坐事付治中启》：“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惧。”

郑璞　《后汉书·应劭传》注引《尹文子》：“郑人谓玉未琢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遇郑贾，人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后以此典表现有名无实或名实不副。南朝梁·任昉《王文宪集序》：“一言之誉，东陵侔于西山；一眄之荣，郑璞逾于周

宝。”南朝梁·江淹《奏记诣南徐州新安王》:“岂宜炫璞郑氏,献凤楚门哉。”

郑乡 《后汉书·郑玄列传》:“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昔齐置士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后以此典形容人有学问德行,为人敬重。南朝梁·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芜没郑乡,寂寞杨冢;参差孔树,毫末成拱。”宋·李廷忠《谢王枢使荐举启》:“三鳣地冷,幸依通德之门;一鹗天高,误入翘材之阁。”

郑庄好贤 《史记·汲郑列传》:“郑庄(当时)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后以此典称颂人爱贤好士,礼敬宾客。南朝梁·刘峻《广绝交论》:“英跱俊迈,联横许郭,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北周·庾信《周兖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况复郊门致骑,先迎内史之宾;南宫旦朝,独识尚书之履。”唐·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高扃向术,似元礼之龙门;甲第临衢,有当时之驿骑。”

置驿 参见〔郑庄好贤〕。唐·杨炯《李舍人山亭诗序》:“从来八子,辟高阳之邑居;今日四郊,逢舍人之置驿。”唐·骆宾王《上郭赞府启》:“加以延宾置驿,接士轼庐。采拔刍微,迈钦贤于司隶。”北周·庾信《周太傅郑国公夫人郑氏墓志铭》:“居德圃田,当官教府,置骑宾来,开黉学聚。”

彘肩卮酒 《史记·项羽本纪》:“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后以此典表现人言行豪壮,勇敢无畏。后汉·孔融《难魏武帝禁酒书》:“樊哙解厄鸿门,非彘肩卮酒,无以奋其怒。”晋·潘岳《西征赋》:“樊抗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扬。”

中牟驯雉 《艺文类聚》卷一〇〇引《东观汉记》:“鲁恭为中牟令,时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察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旁,旁有童儿。亲曰:‘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雏’。亲瞿然有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三

异也。府掾久留，扭忧贤者。'具以状白安。"后以此典称颂地方官吏施行仁政，很有政绩。唐·骆宾王《上瑕丘韦明府启》："狎中牟之驯雉，岂惧骁媒；惊重泉之瑞鸾，非关照舞。"南朝梁·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雏雉必怀，豚鱼不爽，由是倾巢举落，望德如归。"北周·庾信《周兖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胄衿智勇，即埋云梦之蛇；童子仁心，已爱中牟之雉。"

中原逐鹿 《史记·淮阴侯列传》："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后以此典形容国乱无主，群雄争夺天下。唐·杨炯《唐上骑都尉高君神道碑》："中原逐鹿，西岳亡羊。汉起高帝，周兴太王。"后汉·班彪《王命论》："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宋·虞允文《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中原豪杰无逐鹿之心，而率众内附，今皆居吾境上，聚为市落。"

终军长缨 《汉书·终军传》："南越与汉和亲，乃遣(终)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天子大说(悦)。"后以此典表示立志报国，请命出征或出使。后汉·孔融《荐祢衡表》："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唐·王维《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爱宗悫之长风。"宋·杨亿《驾幸河北起居表》："空励请缨之志，惭无廛畔之劳。"

钟仪南音 《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后以此典表现人困处异乡，怀念故土。晋·枣据《登楼赋》："钟仪惨而南音，庄舄感而越声。"唐·柳宗元《凌助教蓬屋题诗序》："与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获者，异日道也。"

仲尼忘味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后以此典形容音乐美妙，令人忘情；也指恭听帝王之乐。魏·应璩《与从弟君苗君胄书》："虽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遁于荆台，无以过也。"后汉·班固《幽通赋》："虞韶美而仪凤兮，孔忘味于千载。"晋·成公绥《啸赋》："钟期弃琴而改听，孔父忘味而不食。"

仲蔚杜门 《艺文类聚》卷八二引汉·赵岐《三辅决录》："张仲蔚，平陵人也。与同郡魏景卿，俱隐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后以此典指贫士或其住处。南朝梁·江淹《诣建平王上书》："子陵闭关于东越，仲蔚杜门于西秦，亦良可知也。"唐·李商隐《上

尚书范阳公启》："岂期咫尺之书，终访蓬蒿之宅？"

众口铄金 《国语·周语下》："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注："众口所毁，虽金石犹可销也。"后以此典形容谗毁、偏见的影响之大，不可忽视。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北魏·温子升《上党王穆让太宰表》："才轻任重，惧有绝膑之悔。既虑铄金，固除匪石。"宋·陆游《上赵参政启》："岂图下石之交，更起铄金之谤。"

重寸阴 《淮南子·原道训》："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后以此典指时光宝贵，应倍加珍惜。魏·曹丕《典论论文》："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南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耻一物之不知，惜寸阴之徒靡。"

朱亥袖椎 《史记·魏公子列传》："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公子，即信陵君。后以此典形容义士危急时为人解难济困。唐·王维《魏郡太守上党苗公德政碑》："朱亥袖椎，豪雄扼腕；曹王拂局，轻薄为心。"

朱虚来归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后以此典形容入胆识雄豪，不惧强势。唐·李白《朱虚侯赞》："朱虚来归，会酌高堂。雄剑奋击，太后震惶。爰锄产禄，大运乃昌，功冠帝室，于今不忘。"

朱游折槛 《汉书·朱云传》："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

将云去。……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后以此典形容臣子犯颜直谏。南朝梁·萧绎《忠臣传谏争篇》："子政铿铿，诚存社稷。朱游折槛，遂其婞直。"北周·庾信《朱云折槛赞》："身摧栏槛，义烈风云。应从御史，翻赖将军。"

竹马之期 参见〔郭伋还州〕。唐·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约法遵宽，设蒲鞭之耻；立言惟信，控竹马之期。"北周·庾信《周车骑大将军贺娄公神道碑》："竹马来迎，已知名于郭伋；羊车在道，即见赏于王澄。"

烛龙衔光 《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神而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淮南子·地形训》："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汉·高诱注："委羽，北方山名也。龙衔烛以照太阴，盖长千里，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后以此典指照耀黑暗的光明；也形容灯火。唐·李白《大鹏赋》："烛龙衔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启途。"南朝宋·谢惠连《雪赋》："白日朝鲜，烂兮若烛龙衔耀照昆山。"晋·陆机《演连珠》之三十八："是以王鲔登俎，不假吞波之鱼；兰膏停室，不思衔烛之龙。"

传癖 《世说新语·术解》："王武子善解马性"条注引晋·裴启《语林》："武子性爱马，亦甚别之。故杜预道：'王武子有马癖，和长舆有钱癖。'武帝问杜预：'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后以此典指人酷好读书，有研读古书的癖好。唐·王维《魏郡太守上党苗公德政碑》："淮王九师之易，汉代三家之诗。传癖书淫，鹰扬学府。"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

庄舄越吟 《史记·张仪列传》："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后以此典表示人怀念家乡，眷恋故国。魏·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晋·束皙《登楼赋》："钟仪惨而南音，庄舄感而越声。"北魏·温子升《司徒元树墓志铭》："孔既叹鲁，庄亦吟越。况以度思，有怀明发。"

壮士不还 《战国策·燕策三》：荆轲受燕太子丹重托，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后以此典表现慷慨悲壮，视死如归的气概；或描写士人别离的悲凉场面。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南朝梁

·江淹《报袁叔明书》："唯横议汉庭，怒发燕路，且犹不数，而况于邻里乎？"唐·李白《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良牧出祖，烈将登筵。歌酣易水之风，气振武安之瓦。"

壮士闻鸡 《晋书·祖逖传》："（祖逖）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后以此典表示人怀有壮志，思图奋发，警励自己。唐·王勃《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惠寺碑》："奸臣跃马，据折坂而吟云；壮士闻鸡，拥阳关而啸雨。"

酌贪 《世说新语·德行》"吴道助、附子兄弟"条注引《晋安帝纪》："（吴）隐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洁，奉禄颁九族，冬月无被。桓玄欲革岭南之敝，以为广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贪泉，世传饮之者其心无厌。隐之乃至水上，酌而饮之，因赋诗曰：'石门有贪泉，一歃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后以此典称颂廉洁从政。唐·李白《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宰剧惭强项之名，酌贪励清心之节。"唐·王维《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谨当闭阁以思政。酌泉以励心。"

斲冰 《初学记》卷三引南朝宋·师觉授《孝子传》："王祥少有德行，失母，后母憎而谮之，祥孝弥谨。盛寒河冰，网罟不施，母欲得生鱼，祥解褐叩冰求之，忽冰少开，有双鲤出游，祥垂纶而获之。于时人谓至孝所致也。"后以此典称人孝敬父母。南朝宋·谢灵运《孝感赋》："孟积雪而抽笋，王斲冰以鲙鲜。"

子陵之钓 晋·皇甫谧《高士传》："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游学。及帝即位，光乃变易姓名，隐逝不见。帝思其贤，乃物色求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车玄纁聘之，三反而后至。"后以此典形容人避世而隐居山泽。南朝梁·丘迟《还林赋》："依稀子陵之钓，仿佛沧浪之歌。"

子牟之恋 参见〔心游魏阙〕。唐·柳宗元《为桂州崔中丞上中书门下状》："岂使班超之望长悬，子牟之恋空积。"宋·王安石《辞明堂陪位表》："心若子牟，虽每存于魏阙；身如杨仆，乃自外于汉关。"

子胥鸱夷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吴王赐（伍）子胥剑，遂伏剑而死。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越绝书·德序外传记》："胥死之后，……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后以此典形容臣子含冤受害，内心悲愤；也用于形容江海浪涛。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宋·陆九渊《送宜黄何尉序》："比干剖心，恶来知政；子胥鸱夷，宰嚭谋国。"南朝梁·刘峻《辩命论》："至乃伍员浮尸于江流，三闾沉骸于湘渚。"

宗悫长风 《宋书·宗悫传》：

“宗悫字元干，南阳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悫年少时，炳问其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后以此典形容人抱负远大，志气不凡。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

邹衍吹律 《北堂书钞》卷一二二引汉·刘向《别录》：“《方士传》言，邹子在燕，燕有黍谷，地美天寒，不出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今名黍谷也。”《论衡·寒温篇》：“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后以此典形容天气回暖；或形容他人的关怀、温暖。唐·白居易《礼部试策五道》：“至乃邹衍吹律而寒谷暖，鲁阳挥戈而暮景回。”晋·左思《魏都赋》：“且夫寒谷丰黍，吹律暖之也；昏晴爽曙，箴规显之也。”南朝梁·刘峻《广绝交论》：“叙温郁则寒谷成暄，论严苦则春丛零叶。”

邹子囚燕 《后汉书·刘瑜列传》注引《淮南子》：“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仰天而哭，五月天为之下霜。”后以此典感慨忠臣义士遭受冤屈。魏·曹植《黄初六年令》：“邹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为之崩。”南朝梁·江淹《诣建平王上书》：“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中岩罢燠，飞霜为之夏凝；太谷生寒，层崖以之秋沍。”

走马章台 《汉书·张敞传》：“敞为京兆，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后以此典指京城繁华场所。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崔说神道碑》：“移民下邑，未学边韶；走马章台，不同张敞。”

祖逖慷慨 《晋书·祖逖传》：“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后以此典表现立志报国，收复失地的壮烈胸怀。北周·庾信《拟连珠》：“是以刘琨之英略，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樽酒不空 《艺文类聚》卷二十六引晋·张璠《汉纪》：“孔融拜太中大夫，虽居家失势，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士，常若不足。每叹曰：‘坐上宾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以此典称誉人爱才礼士，殷勤待客；或形容士人宴饮雅集。南朝梁·萧绎《全德志论》：“人生行乐，止足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满。”

左衽 《论语·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后以此典指受外来异族的统治。宋·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南朝宋·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夫盛德不泯，义存祀典；微管之叹，

抚事弥深。”

左袒 《史记 • 吕太后本纪》：“太尉（周勃）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太尉行至，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太尉遂将北军。”《汉书 • 高后纪》亦载。后以此典指拥护正统；或拥护某一方。唐 • 柳宗元《睢阳庙碑》：“裂裳而千里来应，左袒而一呼皆至。”宋 • 汪藻《隆佑太后告天下手书》：“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

国内研究

研究家

李　详（1859—1931）　字审言，中年又字愧生，晚号䶑叟。江苏扬州兴化县人，是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1911年以前，曾被聘为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和安庆存古学堂教习。1923年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1928年，蔡元培为大学院长（后改为中央研究院），聘李详及陈垣、鲁迅、胡适等12人为特约著述员。1929年以后便在家乡从事著作整理。近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审言文集》，辑存了李氏传世的23种主要文稿。李审言一生精研子部杂家之学与集部诗文之学，其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如《选学拾沈》、《文心雕龙补注》、《颜氏家训补注》、《汪容甫文笺》、《韩氏证选》以及《愧生丛录》、《文选萃精》等均是。他的《论桐城派》一文，在清末民初，有较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桐城派文章之空疏不学，专讲起承转合，用邪矣也焉诸虚字，播曳作态，谓之桐城家法"。（李稚甫《李详传略》）文章认为不能说"桐城派"才是文章的主流，同时对桐城派文章末流的弊害，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徒具形式，没有内容，仅讲起承转合，用虚字摇曳作态，实质上是八股文的变种。这篇文章一经发表，文坛上便引起很大震动。李审言先生对古代散文研究的论点，散见于文集中与友人论学书札（如《致钱基博书》，以及一些书的序跋（如《江都汪氏丛书序》）。

唐文治（1865—1950）　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省太仓县人，晚年定居无锡。幼年因家境清贫，在父母的教育下发愤读书，14岁读完《论语》、《孟子》和"五经"，16岁入州学，17岁从太仓理学名家王紫翔学习。18岁考中举人，21岁到江南菁书院，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元同和王先谦门下，从事训诂之学。28岁考中进士，分派在户部江西司任主事，后改任总理衙门章京兼云南司正主稿行走。后历任清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商部右丞、左丞、左侍郎、农工商部尚

书。1907年任上海实业学校校长。1920年以后一直在无锡国学专修馆任馆长，他主办“国专”前后达30年之久，对保存国粹，培养国学人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唐文治先生擅长经学，被称为经学大师。他八岁就开始学习《孟子》，后来又潜心攻治《孟子大全》等书，因而对孟子学说造诣极深，著有《孟子大义》、《孟子分类学》等著作。50岁以后，又努力攻读《易经》，晚年著有《周易消息大义》，这是一部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的专著。唐文治先生“师承姚鼎文章阴阳刚柔之说，把古文风格分成阳刚美，阴柔美两大类的原理，更作进一步的发挥”（陈其昌、胡子远：《唐文治传略》），因此写作了《国文阴阳刚柔大义》8卷，选《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国策》、《庄子》以及贾谊、董仲舒、司马迁、韩愈等文章，分注阴阳各名于其下。陈衍在《太仓唐茹经先生全书总叙》中说此书为“盖论文之至精、师而无弊者矣。”

高步瀛（1872—1940） 字阆仙。河北省霸县人。1894年举于乡，教学于永清、完诸县，主讲定兴书院。1901年任畿辅大学堂教席，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教席，旋赴日本，卒业宏文师范学院，回国后任省视学。入民国，任教育部佥事，继任教育部编审处主任、迁社会教育司司长。辞去官职以后，先后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兼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私立中国大学教授，并常赴保定莲池讲学院讲学。主要著作有《古文辞类纂笺证》、《史记举要笺证》、《周秦文举要笺证》、《两汉文举要笺证》、《魏晋文举要笺证》、《唐宋文举要笺证》、《明清文举要笺证》、《古文范注》、《孟子注》等，程金造在《高步瀛传略》中说：“先生的考据，既精且搏，所谓搏，是于书无所不读，精通声韵训诂、典章制度之学，对于两千年来之政治得失、学术源流、风俗淳薄、人才优劣、职官、地理沿革，如指出掌。所谓精，是有宏通之识见，凡所著书，对前人学说，善能鉴别其真伪然否，博辨纵横，归于至当。非饾积罗列无持择者比，卓然为一代大师”。如《古文辞类纂笺证》，在姚氏选的周秦至清代各体文辞七百篇中，凡涉及名物制度、学术、政治、地理、职官、文字音训的都加以考证。“但先生笺注姚书，与他人注前代诗文集者不同。一般注前代诗文集者，大抵释事释义，其阐述范围，止限于本文本句，无所发挥。先生笺证姚书，则贯串今古，穷源竟委。其注解在形式上虽附于某篇某句之下，实则是独立的一篇考证文字。若是把这部书中的千万条注解，摘出来辑为一书，便是今时一部顾亭林《日知录》。而文字之细密，条理井然，则又过之。”

张宗祥（1881—1965） 原名思曾，字阆声，晚号冷僧，又自署铁如意馆主。浙江海宁人。29岁时赴京考职，殿试一等，辛亥革命后任本省教育司课长，后去北京，任清华学校（其时尚未称大学）教师和教育部视学、佥事，曾一度任大理院推事。38岁，任京师图书馆主任。1922年回省任教育厅长。北伐后，供职京绥铁路

局，任汉口办事处主任。解放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兼省文史馆副馆长，浙江历史学会名誉会长，西泠印社社长。其著作有《高注三书异同考》、《吕氏春秋高诱注订正》、《清代文学史》、《校注论衡》、《读书札记》、《校注晏子春秋》、《全宋文及“四库”中所采诸书目录》。另外，张宗祥先生还曾校勘、补编《明文海》，他博览群籍，尤精晚明史，以为私家别集中，可以取以证史者极多，尤其是明代遗民著作，有许多是后来才公之于世的，因此决定收集史料，补编《明文海》。这件工作对研究明代散文极有价值。

（侯文朴）

陈中凡（1888—1982）　原名钟凡，字觉元。江苏建湖人。1917年由北京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女高师国文部、东南大学国文系、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解放后曾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入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陈中凡先生治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植基深厚，涉猎广博；二、弃旧谋新，绝不冬烘。其主要著作有《老子学说略》、《庄子学说略》、《古书校读法》、《诸子书目》、《经学通论》、《诸子通谊》、《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韵文通论》、《周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两宋思想述评》。还有近百篇论文，散见于各报刊杂志。1956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散文选》是解放以后这一时期散文的第一个选本，因为这个选本选目合适，注释精当，所以它一直影响很大，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所珍视。在此书的《前言》里，作者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他首先指出“汉、魏、六朝虽无‘散文’之名，已备列‘散文’的各种体制。大抵‘韵文’多用于纯文学，‘散文’则用于杂文或应用文者居多”。作者认为汉魏六朝时期的散文，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了变化，所以分为三个时期概述了这一阶段的散文发展：“西汉的散文”，突出论述了贾谊的政论文和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的散文”，主要论述了班固、蔡邕等人的作品，指出蔡邕的散文趋于形式主义，而内容陈陈相因，毫无创见；“魏晋南北朝的散文”，作者指出这一时期的的散文向多方面发展，大体说来有如下几派：“名法家的散文”，以徐干的《中论》为代表；“名理派的散文”，以王弼、阮籍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小说家的散文”，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代表；“写景的散文”，以陶宏景、宋元思的作品以及《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为代表；“拟古派的散文”，以《颜氏家训》为代表；对于“杂帖派的散文”，作者指出：因为汉末清谈风气的影响，魏晋人颇尚清谈，“推而至于书牍，也力求其清俊简要，耐人寻思，遂有杂帖一类的小品”。陈中凡先生在这篇《前言》里所阐述的观点在他其他有关著作中也时有阐发，即使是今天看来，这些观点还仍然是很有学术价值的。（齐石宜）

王伯祥（1890—1975）　名锺麒，字伯祥，50岁以后以字行，别号很多，常用的有碧庄、容叟、容安、苏亭等。江苏省苏州市人。1906年考入

苏州中西学堂。1907年考入苏州公立中学校。毕业后任苏州甪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教师。几年后应北京大学中文系之聘，任北大中文系预科讲师。不久，又就职上海商务印书馆任史地部编辑。1932年离开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任编辑。直至解放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年到北京大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来文学研究所改属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其主要著作是《春秋左传读本》、《史记选》等。《史记选》在精细的校勘工作的基础上，选了描写生动而故事性强的本纪、世家、列传共二十篇，作了详尽的白话注释，其中地名的注释一般均一直注到现在即何地。其他如官职、谥法、地望等，也尽量地注得详尽明白，因此为一般读者所欢迎，自初版以来，一再重印，影响很大。　（侯文朴）

郭绍虞（1893—1984）　原名希汾，字绍虞，后以字行世。江苏苏州人。1913年始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先后在商务印书馆所属尚公小学、启秀女中教书，后在进步书局任编辑。"四五运动"前后，受《新青年》影响，入新潮社。1921年与矛盾、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先后在福州协和大学、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大夏大学、同济大学等大学任教授、系主任，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还曾担任《辞海》副主编、《上海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战国策评注》、《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续诗品注》、《宋诗话考》、《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等，并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等。

郭绍虞很久以来一直致力于古代文论的搜集、整理、研究与注解、考证等工作，他很重视资料的详尽、完备、可靠。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源流，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分为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斯，其中既有对文论家文论主张的评述、分析，又有对古文流派、散文思潮的阐发，考索，通过大量翔实材料的分析，勾勒出了中国古文理论发展的基本轮廓，在对古文家古文理论、散文作品的具体分析、评价上，他看重思想内容及现实性，反对空洞无物、脱离现实、雕琢华靡的文风，注重从散文艺术、古文理论的前后革新中评论作家、作品。他很推重唐宋古文运动，对其发生发展有较为详尽的论说，他认为唐宋古文运动起于南朝刘勰、北朝苏绰、经过长期酝酿，抵唐宋才形成了高潮。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古文运动的作家们都很重视"道"的作用，但各自主张的"道"的内容却不甚一致。"道"是随着社会的变革、文学的发展而有不同的含义的。古文运动的成功，"一是内容上的革新，变南朝言之无物专事涂泽的作风改为有内容有思想的作品；又一是形式上的革新，变南朝讲究骈骊讲究声律的技巧，改为直言散

行接近口语的作品，总之重在'变浮靡为雅正'。"他从理论上科学地论证了古文运动发生发展的过程，充分肯定古文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颇有说服力。　　（王景琳）

刘麟生（1891—1980）　字宣阁，笔名春痕、宣阁。安徽无为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曾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编辑。1927年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四川等地，后赴台湾，1958年赴台湾"驻美大使馆"工作。后定居美国。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骈文研究法》等。（参看《中国骈文史》条）。

陈　柱（生平事迹不详）　现代学者，主要著作有《周易论略》、《诸子概论》、《研究国学之门经》、《尚书论略》、《墨学十论》、《老子与庄子》、《老子集训》等。他的《中国散文史》是古代散文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自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至今仍是古代散文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参看《中国散文史》条）

（侯文朴）

段熙仲（1897—）　安徽芜湖人。1914年考入中华大学文预科，1923年，考取金陵大学文科，以哲学和心理学为主要专业。从1927年起，在皖南教中学10年，1937年至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1944年任中央大学教授。解放后一直在南京师范学院（现改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段熙仲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家、经学家，他的学问渊博，研究的范围很广泛，在他所发表的六七十篇论文中，上则《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散文，下至明清文人，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段熙仲先生用力最勤的则是今文经中的《仪礼》、《公羊》及考据校勘之学。对《水经注》等古代著作研究也相当深入。段熙仲先生的治学经验，主要有一、"乐学亲师"，他认为"知"、"好"、"乐"是治学的三个阶段。二、读书应当"观其会通"，从全书探求其内在规律。三、强调文、史之不可分。

方孝岳（1897—1973）　原籍安徽桐城，出生于安庆市。1911年进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后又转入圣约翰大学法律系就读。1919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担任国文课教师，1920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不久，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修法律。1924年回国后到华北大学任教授。其后分别在东北大学师范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圣约翰大学任教。1948年重返中山大学，直到去世。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散文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左传通论》、《尚书今语》等。《中国散文概论》全面地论述了散文的各种问题，是一部相当有分量的著作；《尚书今语》将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方面的学识结合起来，"自成一家之言"。五、六十年代，方孝岳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表现在音韵学上。方孝岳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一生好学不倦，同时，对后学的指导也十分尽力。（参看《中国散文概论》《左传通论》两条）　（齐石宜）

郑振铎（1898—1958）　笔名西谛、C. 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

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前后，结识瞿秋白、许地山、耿济之等，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与矛盾、叶圣陶、王统照、郭绍虞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1921年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1922年主办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周刊《儿童世界》，1923年接替矛盾主编《小说月报》。1925年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1927年"4. 12"政变后，旅居巴黎。1928年10月回国，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此后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6年当选为"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抗日战争期间，创办《救亡日报》，参加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抗战胜利后，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主编《民主》周刊，并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49年2月，郑振铎从上海绕道香港至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局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以及文联常委、作协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曲协理事等职，多次参加促进和平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国际活动。1958年10月，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主要著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研究》、《佝偻集》、《短剑集》、《俄国文学史略》、《太戈尔传》、《文学大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古代版画史略》、《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文学》以及文学丛刊《世界文库》、《中国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参加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等。

郑振铎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著述宏富，在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创作、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以及古代绘画艺术、文物考古、中外文化交流等各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他高度重视俗文学，以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反对将一部文学史只写成是一部正统诗文史，在对古代散文的具体评析上，他推崇先秦诸子、司马迁的文章、陶渊明的散文、柳宗元的山水记，认为这些作品没有丝毫虚饰模拟之弊，都是以抒写性情为第一要义的。他认为，先秦诸子虽然不以文学为业，"但他们的文章，却也是光彩焕发，风致遒美，其结构的严整，文句的精粹，都为汉以后散文作家所少见。他们每能在盛水不漏的严密的哲学思想，装载于美丽多趣的文字里，驱遣着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活泼而有情致的文辞，为他自己的应运。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不惟成了哲学上的名著，也成了文学上的名著。"他称颂司马迁的《史记》是以舒卷自如、丰泽精刻的文笔写出的"空前的大著"，虽然汉代两司马并称，但司马迁的重要实远过于司马相如。他还认为陶渊明的散文与其诗一样，能独立于时代风尚之外，貌似淡

泊，实为丰腴，与当时一般以彩艳来掩饰其浅陋者恰恰相反，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丝毫虚骄的心情，总是“以随随便便的称心称意说出他整个情思”，这便是他“真实的伟大的所在”。从这种崇尚自然、真实、反对虚饰的文学观出发，他也很看重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说柳“在永、柳诸州所作者，尤为精绝，往往有诗意画趣，是古文中的真正的珠玉，”给予很高的评价。

（王景琳）

罗根泽（1900—1960） 字雨亭。河北深县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及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解放前先后在河南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河北大学、中国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任教，解放后一直任教于南京大学。罗根泽先生以治诸子学及中国文学批评史著称于世，其主要成果是《诸子考索》、《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曾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除早在三十年代初出版的《乐府文学史》外，曾留下几部中国文学史草稿，另有论文多篇，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罗根泽对先秦散文的研究造诣最高，《论文集》中许多文章对先秦散文作了深入地研究，如《散文源流》一文，作者便论述了“殷代之贞卜文与散文之起源”等问题，指出没有文字，便不会有散文，所以散文的产生与完成，必在有了文字之后，“殷墟的卜贞的文字，才只是极简单而且幼稚的文字，虽然后世的散文源于它，但不能说它就是散文”。罗先生1958年出版了《先秦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选本的选目还不够全面，但因为它不仅出版较早，而且注释确切详明，所以仍为读者所推重。在此书的《序言》里，罗先生指出：先秦时代，“不只史传文飞跃地发展到相当完美的高度，成为后来的楷模；更重要的还产生了一种政治性、哲学性的杂文——即理论文，也发展到相当完美的高度，也成为后来的楷模”。作者对先秦诸子分别作了论述，指出在古典史传文学范围内，只有《史记》才可以与《左传》比美；《国语》“对理论文——特别是对我国的理论文，有直接的影响”；《战国策》的特点是“敷张扬厉”；《论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说理的理论文的书”；《孟子》“从方法到技巧，从议论到声势，大大地提高了理论文”；《庄子》“使散文在逻辑性、科学性和说服力以外，又增加了故事性、形象性和感染力”。在概述了先秦诸子散文的成就及特色以后，作者总结道：“战国时代，不只相反相生的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思想，也相生相长的产生了丰富的文章文艺。就文章形式说，则简单的提纲，发展成为有骨有肉的优美传记；由简单的考语，发展成为洋洋洒洒的理论文；又由单篇的理论文，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整部著作。就方法技巧说，由考语式的孤立论点，发展成为言之有物，言之有序的逻辑性很强的长篇大论；同时又不满足于只是逻辑的说理，又藉助人物言行，藉助故事寓言，一方面证明抽象理论，一方面塑造具体典型，这就使他们的理论文，在逻

辑性外，又增加了形象性。”罗先生的这些论点都是相当精辟的，他的这些观点，在其他一些论文里也得到充分的阐发。（齐石宜）

高　亨（1900—1982）　又名晋生。吉林省双阳县人。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24年秋又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其著述颇丰，主要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古经通说》、《周易杂论》、《周易大传今注》、《老子正诂》、《诸子新笺》、《上古神话》等，其研究的重点是先秦诸子，以后则研究《周易》、《诗经》、《尚书》三部古经，以对《周易》所下功夫最多。

谭正璧（1901—）　字仲圭。生于上海。1919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1923年在上海神州女校文学专修课任国文教师，后又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省立黄渡师范学校、民立中学、民立女子中学等学校任国文教师。抗日战争后，继任市立务本女子中学教师及图书馆主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华光剧艺专科学校讲师，震旦大学、新中国医学院国文教授，中国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兼文学史教授。解放后，曾任省立黄渡师范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图书馆主任。1951年应聘为山东齐鲁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语法修辞教授。1953年任上海棠棣出版社总编辑。1979年应聘入上海市文史馆。1980年应聘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兼任教授。谭正璧先生著述甚丰，他不仅对中国小说戏曲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古代散文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既有《国学概论讲话》、《文学概论讲话》、《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文学进化史》、《中国女性文学史》、《新编中国文学史》等概论性质的著作，其中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及其代表作家、作品有详细的论述；又有《文人传记选》等选本；还有《礼记读本》、《老子读本》、《荀子读本》、《墨子读本》等普及类读物。这些著作对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侯文朴）

刘大杰（1904—1977）　湖南岳阳人。1922年考取武昌高等师范，受业于黄侃、胡小石、郁达夫。1926年赴日攻读欧洲文学，1930年回国，就职于上海大东书局，编辑《现代学生》杂志，后任教于私立复旦大学、安徽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夏大学、四川大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刘大杰滞留上海，拒绝了有的学校要他讲授日语的聘请，潜心于学术著述，一度在圣约翰大学兼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1949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并任《收获》、《文学评论》、《上海文学》等杂志编委，参加全国高校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订、《辞海》、《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主要著述有《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思想论》、《刘大杰古典论文选集》、《易卜生研究》、《托尔斯泰研究》、《德国文学概论》、《法国文学简史》、《东西文学评论》等。

刘大杰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

尤其重视社会历史条件、时代风气、地理环境对散文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力图透过各种相互关联的文学现象，揭示散文发展的规律。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散文发达的原因，他在力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有它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这种原因和规律性，是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思想特征的反映，是文学给予人类社会的实用功能的表现，是新内容决定新形式的表现。在那个大变革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们丰富的思想意识，要开展剧烈的斗争和详细历史的记载，”散文只有“向着新的形式发展，才能更好地为新内容服务，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历史给予文学的新使命”。在对韩、柳散文的论述中，他注重当时古文运动理论的发展，将二人放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比较二人的异同，他说：“韩立论过于重道，柳则较重为文，然在文体的反骈文与重散文这一点上，两人却是一致的。”韩愈排拂，“柳本好佛，虽论文也主宗经，而其思想范围则较韩愈为广阔而深厚。”这就决定了韩柳虽然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其文却各有自已的独特风貌与思想内涵。在研究古代散文时，刘大杰还注意到散文的发展与语言、宗教、音乐、风俗的联系，注重揭示文学演进、发展、蜕变的渊源关系及继承与创新，所以时有精到见解，往往能新人耳目。　（王景琳）

姜书阁（1907—）　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诗学广论》、《中国文学史大纲》、《先秦辞赋原稿》、《骈文史论》、《中国文学史四十讲》等。

《先秦辞赋原稿》主要探讨了汉赋的渊源；《骈文史论》从史的角度叙述和研究了骈文这一文体的发展和演变。《中国文学史四十讲》，“打破历来文学史章节连绵、欲断还续的编写体例，改用四十讲，分四十个大题目，概括地叙述了三千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史。”（《序言》）。在这四十讲里，陆续介绍了古典散文，如第三讲介绍了先秦三部杰出的史传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第四讲介绍了先秦诸子散文——《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第六讲介绍了秦代文学和汉代的辞赋；第八讲论述了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第九讲介绍了汉代散文发展概况及这一时期的政论文、说理文和记叙文；第十一讲介绍了南北朝的散文和一些著名赋家；第十七讲论述了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和唐代的散文；第二十一讲分别论述和介绍了“宋初文坛面貌及其斗争形势”、“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者苏轼”等专题；第二十七讲论述了元代的诗、词和散文创作；第二十八讲分别论述了明代前期和后期散文以及“清代散文作家与各派文论”。第三十六至三十八章，论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文学、太平天国的文学主张和这一时期的文坛形势、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文学改革及其诗文。总之，将这些章节抽取出来，

正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散文发展史。在体例上，作者希望此书"从全书看，要求历史线索明白、清晰，有一定的系统性；而就每一讲来说，则又必须相对地独立成章，完整地论述每一个大题目所规定的主要内容，使本书既可以连续讲、连续读，也可以任抽一讲来查阅某一特定问题，从而得其梗概。"（《序言》）。从全书来看，这种设想显然是实现了。（参看《先秦辞赋原论》、《骈文史论》两条）（齐石宜）

杨伯峻（1909—） 湖北长沙人。幼年就读私塾，随祖父诵习经书，奠定了坚实的古文基础。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大学，从学于钱玄同、吴承仕、余嘉锡、黄节、陈垣诸师，获益良多。1931年又正式拜在黄侃先生门下，成为"黄门弟子"。叔父杨树达的经常指点与教诲，尤具重要影响。大学毕业，至著名将领冯玉祥处供职多年，以后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中学和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执教。1960年调入中华书局，从事古籍的整理研究和编辑业务。曾任中华书局编审、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国家文物局咨询委员、孔子研究会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中国先秦时代的文献，是他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长期以来，杨伯峻先生对《论语》、《孟子》、《左传》这三部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名著，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编著出版《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这三部著作，凝聚着作者大量心血和主要学术成果，是对古代散文整理研究的杰出贡献，业已成为备受中外学人欢迎的读本，享有盛誉。此外，他早年还撰有《列子集释》。1958年龙门联合书局出版，1979年经修订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又被列入中华书局编辑的《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出版。

在研治先秦散文名著的实践中，杨先生形成并建立了一套富有个人特色的注释、译文、词典三位一体的整理方法，即选定一部价值高、影响大的古书，在充分搜集、提炼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首先撰作注释，接着将原文翻译为现代语体文，最后编出该书的词典。三个部分，各有所主，互为补充，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注释力求通古今、集大成，译文注重准确、流畅、通俗、词典服从实际需要。这套方法，贯彻了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兼顾的原则，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赢得了广泛的不同层次的读者的欢迎。

在对先秦散文作专书整理研究的同时，他又从总体上对先秦文学进行了考察。这方面的探索，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我看先秦文学和〈礼记·檀弓〉》一文（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文章认为：先秦文学的范畴，应该突破某些狭隘的观念，拓展到传统的经、史、子、集各个有关部类。在勾勒先秦文学概貌时，强调《左传》"既是最早的编年史，又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为历代散文家的示范品"；《战国策》"文采绚烂，巧喻连环，足以打动人心"；《论语》里有较长的叙事小文，多为简洁生动的精品；《孟子》文胜于理，气势磅礴，以气压人；

《荀子》理胜于文；《庄子》"以汪洋恣纵、千奇百态、滑稽突梯、嬉笑怒骂的文章从多方面表达他非一般言语所能说出的思想境界"；《吕氏春秋》和《韩非子》都有不少好文章。并且特别剖析《礼记·檀弓》里的几节文字，指出其中包含了被一般人所忽略的先秦叙事短文的上乘之作，值得引起先秦散文研究者的重视。

他还非常注意从语言学、训诂学角度对古典文献作纵向研究，撰有《中国文法语文通解》、《文言语法》、《文言文法》、《文言虚词》、《古汉语虚词》、《古汉语语法》等多种专著。1984年3月岳麓书社出版的《杨伯峻学术论文集》，收录1948年到1982年撰写的30篇论文。他在八十高龄之际谈及治学心得时说：虽然天赋不高，可是我认为勤能补拙。一生的优点不多，比较自信的是不浪费时间。还说：一般都是有目的地读书，先拟好一个题目或书名，再尽可能地搜集并研究资料，胸中有了腹稿，一气呵成；再仔细地看一遍，稍事修改和润饰。最好是不忙于发表，放一段时间，再多读书，细细推敲，或许可以多避免些缺点。肺腑之言，动人心弦；经验之谈，足启后学。（参看《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三条）（李建民）

任访秋（1909—） 本名维焜，字仿樵。河南南召县人。1929年毕业于河南第一师范，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深造，1933年在河南洛阳师范学校任教，1935年到北大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回洛阳师范任教，1946年到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其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鲁迅散文论》、《中国文学史散论》、《袁中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袁中郎研究》论述了明代袁中郎的思想与文学成就，指出袁中郎的散文比诗写得好，这些作品，真是独树一帜，在当时文坛上可谓异军突起。除抒情文外，他的写景散文写得也很好，其原因，一则由于他酷爱山水。所以他有独特的写作方法，因而能达到超凡入圣的境地。作者进而论述了袁中郎以后明代散文的发展，他将这一时期的散文归纳成四个流派作了系统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收入了作者的一些古典散文的研究论文，有的论述了司马迁和《史记》，指出《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散文的典范，由于司马迁的继承和创造，使中国古代散文在叙事、抒情、说理上，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成就；有的论述了《水经注》，指出因为这部著作有许多逼真的写景，又有许多富于趣味的风土民俗以及具有传奇的神话传说，从而使这部地志成为具有浓厚的文艺色彩的作品。其他一些论文，分别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韩愈、柳宗元、龚自珍的散文作了论述。（参看《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袁中郎研究》三条） （齐石宜）

钱钟书（1910—） 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父钱基博，执教于清华大学，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对钱钟书影响至深。钱钟书先生早年就

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获庚子赔款中拨出之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获该校英文系副博士学位，并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文学。学成之后，于1937年归国，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他执教于国立师范学院、西南联大、暨南大学等，并任北京图书馆英文馆刊顾问、中央图书馆英文部总编纂等职。近30多年来，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钱钟书先生知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与拉丁文学，对中国文学造诣尤深。其主要著述，有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长篇小说《围城》，诗话式文学评论《谈艺录》；另有《宋诗选注》等书。其力作《管锥篇》（四册）一书，纵论千古诗文著述，笔力雄深。对于古代散文名著如《易经》、《左传》、《史记》与《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等，更有精辟论析。文章选疑问难，辨似订伪、爬梳抉剔，不仅沟通往古，而且融汇中西，使古代散文研究，呈现出一种旷古未见的斑烂奇彩。钱钟书通过自己的文学研究，描绘出一个沟通融汇全人类精神世界的新天地，得到中外学术界的共同赞誉。（文　白）

李长之（1910—1978）　原名长治，后改为长植，常用名为长之。出生在山东利津县，1929年，人北大预科甲部（理学院）读书。1936年清华大学毕业后担任了一个时期的辅导老师，给华侨生、蒙藏生补习中文，不久前往云南，在云南大学任教，后又来到四川重庆中央大学，开始任助教，后任讲师、副教授。1946年任国立编译馆编审。解放以后，他一直在高等学校任教。李长之先生一生著述甚丰，其内容涉及文学作品、鲁迅研究、文艺理论、外国文学、儿童读物，其中与古代散文研究有关的著作主要有《韩愈》、《文史通义删存》、《司马迁》、《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等。参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条）（侯文朴）

周振甫（1911—）　浙江平湖人。1932年进入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所工作。1953年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1971年调至中华书局，参加点校《明史》。1975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现为中华书局编审。主要著作有《文章例话》、《文学风格例话》、《诗词例话》、《文心雕龙新注》、《鲁迅诗歌注》等。

周振甫的论文主张，主要见于《文章例话》、《文学风格例话》以及他在1986、1987年《文史知识》杂志上"怎样学习古文"栏目连载的文章。《文章例话》着重从古代文话以及文论所涉及的名篇佳作谈论文章的阅读、修辞、写作、风格，深入分析了阅读古文的要领与方法，在"阅读"部分的"去成见"中，他认为"读书时不要先有一个成见。有了成见去读古人的书，用自己的成见来解释，就看不见或者会曲解古人的原意，这就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违反了读书的要求。"他从《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个实例出发，说："对句子不能作孤立的解释，对于有疑问的话，要取得旁

证或其他证明。总之，要了解原文的意义，不要歪曲原文，要实事求是，不要自以为是，才能真正了解原文的意思。”《文学风格例话》则分别从文体、文学作品、作家、流派、时代、地域、民族等不同侧面分析风格的差异。在《地域的风格》一节中，认为不同地域的散文由于各地风俗的不同，学风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在先秦散文中，南北不同文风突出地表现在《论语》和《庄子》上，《论语》的特点“是反映现实的，思想深刻，影响很远”，“自然生动精炼而富有含意”。而《庄子》散文“是善于用比喻，通过寓言故事来表达情思”，“故事是想象虚构而风格奇诡的。”在《文史知识》的一系列文章中，他对学习古文提出了六条主张：一、主体的懂；二、因声求气；三、六观；四、比较；五、一家风貌；六、融汇贯通。所谓“主体的懂”指经过长期熟读、背诵，一旦豁然贯通，不懂的也就全懂了。“因声求气”指通过熟读、背书，体会文辞的音节美，感受到原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气势。“六观”指一观词句，二观宫商，三观辞格，四观篇章，五观体性，六观通变，也就是由词句到章节，到命意谋篇，到风格，最后到观察历代文章的变化，这样由浅入深地学习古文。“比较”是从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比较中辨别作品的高下得失，作出评价。“一家风貌”指一家的文章，有一家的不同题材、不同作品的不同风格，加上作家在文辞上的特点，综合成作家的独特风貌。“融汇贯通”则指贯通各家古文的写法。

（王景琳）

王利器（1917—）　字藏用，号晓传。四川省江津县人。曾在四川大学受业于张颐、龚向农等先生，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三年，完成毕业论文《吕氏春秋比义》以后回到四川大学任教，并兼任成华大学教授，两年后，又应邀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解放后，由北京大学调入文学古籍刊行社任编辑，后为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现已退休，被北京大学等高校聘为教授。曾两次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设讲座，又应日本文部省邀请去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等大学讲学。王利器先生著述甚丰，有“千万富翁”和“大杂家”之称，其主要著作有《盐铁论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历代笑话集》、《颜氏家训集解》等多种。王利器整理古代作品，力求准确、实用、因此很有学术价值，如在《颜氏家训集解·叙录》中，他指出“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颜之推其人，除了把他的这部著作从事集解之外，我还把《颜之推传》和他流传下来的作品，统统收辑在一起，加以校注，以供研究者参考。”

（志　云）

袁　珂（1916—）　四川省新凡县人。1937年入四川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读书，后转入华西大学中文系，1941年毕业后在中专学校任教，解放后曾任《川西日报》副刊编辑，1950年在西南人民艺术学院任教，后调到作协重庆分会搞专业创作，后来这个机构与四川省文联合并。1979年从四川省

文联调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现为该院研究员。袁珂先生主要研究古代神话，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古神话选释》、《山海经校注》、《神话论文集》等。（参看《神话论文集》条） （侯文朴）

郭预衡（1920—） 河北玉田人。1920年11月出生于一个农家。祖父务农，父亲到津京谋生，后来成了一名工程技术人员。郭预衡先生随父到津京读书。抗战期间，就读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对中国文学颇有造诣。1945年毕业，被选拔留校当助教，同时在该校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在余嘉锡先生和陈垣先生指导下，他攻史治文，撰写了《纵横家研究》。并作有多篇论文，《益世报·文史周刊》等处，曾发表过他的《释纵横》《战国纵横家的社会背景》《汉代崇儒之真相》等文章。他敬佩鲁迅先生的治学与为人，按照鲁迅的方向进行学术研究。1952年院校调整，郭预衡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五十年代中期曾赴匈牙利布达佩斯讲学两年。在教学的同时，一度兼任中文系和学校的教育行政领导工作，现任中文系暨该校古籍研究所教授。为著名散文研究家，在古文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例如：五十年代他发表过《陶渊明评价的几个问题》，六十年代他发表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等文，同时也发表了《鲁迅论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这类文章，都足以反映当时文学研究的风貌与水准。七、八十年代以来，郭预衡先生的散文研究，更向综合性、总体性方向发展。他先后发表的《精神解放与文章的变迁》《秦汉文学之变迁》《八代文风和曹操》等，便标示出这种进展。近年来，他又出版专著《古代文学探讨集》《历代散文丛谈》《中国散文史》（上中下三册，上册已出版）等，均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中国散文史》的出版，将古代散文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水平，填补了当代散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郭预衡先生不囿于成见，不拘于世论，明辨深思，多所创获，其学术贡献，将超出于散文研究之外。

（文　白）

吴小如（1922—） 本名同宝。1922年出生于哈尔滨，祖籍是安徽泾县。父亲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吴家琭（玉如）教授。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但仍留在天津读书并在中学任教。1945年以后，先后就读于燕京、清华、北大，受业于朱自清、俞平伯、游国恩、沈从文等著名学者。1949年毕业后，先后在津沽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小说讲话及其他》、《读常人所见书日札》、《读书丛札》、《古典小说漫稿》、《古典诗文述略》、《古文精读举隅》他对待研究工作十分认真，在《漫谈我的所谓"做学问"和写文章》里，他说："说到写学术论文或读书札记，我目前只抱定两条宗旨：一是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哪怕这一看法只与前人相去一间，却毕竟是自己的点滴心得，而非人云亦云的炒冷饭。否则宁缺毋滥，决不凑数或凑趣。二是

一定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古典诗文述略》由三篇文章组成，其中《古典散文述略》提纲挈领地叙述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和演变，因为作者注意了在介绍作品的同时阐述散文发展的脉络，这样便使读者既了解了中国古典散文的几个发展阶段，又能了解这几个阶段的联系和继承关系，从而对古代散文有一个全面和准确的认识。除了一般所说的学术研究之外，吴小如先生特别擅长于讲析和鉴赏作品，读他的赏析文章总能得到美的享受，《古文精读举隅》便是他讲析古代散文作品的文章合集。(参看本卷《古典诗文述略》、《古文精读举隅》两条)

胡念贻（1924—1982）　字孟闻。广州人。194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在游国恩教授的指导下，专攻先秦文学。1953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后为该所研究员。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先秦文学论集》、《中国古代文学论稿》、《楚辞选注及考证》。胡念贻先生对先秦散文的研究卓有成就，在其《先秦文学论集》和《中国古代文学论稿》中，均收入了他对先秦散文著作如《尚书》、《左传》、《战国策》、《论语》、《孟子》的研究论文。另外，他对汉赋、汉代贾谊的散文、《史记》以及欧阳修的散文也有较为专门的研究。《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里有两篇文章从“古典文学研究的综合性”上阐述了作者对古代散文的一些思考，《古代散文研究的两个问题》首先论述了散文的范畴，作者指出历来对“散文”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个界说，他认为文学史上的散文，“应指那些具有文学价值或者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而言，并非泛指一般文字，也不能局限于狭义散文。对于汉以前的文字，尺度可以较宽，魏晋以后，标准应该比较严格一些。”其次，作者探讨了“如何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古代散文”的问题，指出“讨论一部著作的文学成就，应该注意它在思想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也应该注意它在语言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抛开文学本身方面的问题，而过分注意别的方面”。如何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广义的散文呢？作者认为“首先是分析作品里面的形象，其次是看作品里面怎样表达了作者的感情。”《文学史编写中的散文问题》继续探讨了散文的界限，指出“我国古代文学散文和非文学散文混淆不清，有它的历史原因”，而我们今天“要从经史子集中分辨出哪些是应该在文学史里叙述的文学散文，哪些不是，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其标准除形象和感情外，“还应该看到古人某些理论文字在艺术结构和语言修辞等方面的工力，在文学史上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引用了许多例证来阐释自己的看法。(参看《先秦文学论集》、《中国古代文学论稿》两条)

冯其庸（1924—）　江苏无锡人。1946年在无锡国专读书，1954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后为

该系教授，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并任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著述甚丰，对古典文学的各个领域，他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如对中国戏剧，冯先生作了多年专门研究，写出一大批研究论文，后来收入其《春草集》中，而冯先生最为学术界所赞赏的，是他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研究，这方而他的主要著作有《梦边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等。除了古典文学以外，冯其庸先生兴趣广泛，在书法、绘画以及摄影等方面，他均有极高的造诣，他的书画作品曾被送到海外展览，为国内外收藏家所珍视。

冯其庸先生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较偏重从宏观的角度探索其发展规律和演变过程，其《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对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散文作了系统研究，叙述了这一时期散文的发展及其不同特征。在为他主编的《历代文选》所写的“序言”里，冯其庸先生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指出从我国三千年来散文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我国散文的发展过程，与社会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尽管有的作品着重于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揭露，有的作品着重于对社会理想的憧憬和描绘，然而，积极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一直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主要内容；在我国散文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散文大师，他们在语言艺术上，都善于继承前人的书面语言和善于提炼、吸取当代的口语以丰富自己的散文语言；我国古代散文，题材是多种多样的，大至历史事件、政治事件，小至日常生活、山水草木，均能在作品里加以表现。从形式上看，有传记、政论、赋、骈体文等，也是多种多样的。另外，冯其庸先生对司马迁和《史记》也有专门的研究，写有《司马迁的人物特写》、《结构·描写·风格——读〈项羽本纪〉》等文章。冯其庸先生还善于从古代作品中总结写作经验和技巧。如《从古典文学中学习简炼的技巧》、《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等便是这方面的成果

研究古代文学和文学史，冯其庸先生主张不仅要留意文学这一面，还必须同时去了解其他相关的各个“面”，其中“尤其是经济、政治、哲学、艺术、宗教这几个‘“面”’。他还强调治文学史，要注意“通”和“变”，并指出“通”和“变”是辨证的关系，只有结合文学史的发展过程细加考察，才能真正理解“通”和“变”的关系。冯其庸先生还特别强调应该重视考证工作，他认为“考证是一种手段，是学术工作上的调查研究，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研究文学史，就需要脚踏实地地认真做好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工作。

吴文治（1925—）　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史专业研究生，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柳宗元简论》、《柳宗元评传》、《柳宗元资料汇编》、《韩愈资料汇编》以及《论柳宗元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柳宗元集〉版本源流考略》等大量论文。

吴文治先生对唐代古文运动领袖

韩愈和柳宗元研究最为深入。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中，特别注意将这两位文学家的作品作全面的探讨，既分析它们的思想内容，又研究它们的艺术特色。他的研究以资料丰富著称，两部资料汇编正反映了他在资料工作中的成绩，他的一些论点，往往产生于对丰富的资料的反复研讨之后，所以便显得立论新颖同时又有扎实的基础。在《韩愈资料汇编·前言》中，吴文治先生指出"韩愈散文之所以能取得那么高的成就，决不是由于他能专学某一位或某几位古人，跟着他们亦步亦趋；而是由于他既能善于广泛向前人学习，又能善于独创"。吴文治先生还论述了韩愈的思想、文艺观点和他在古文运动中的贡献，最后指出："在中国散文史上，韩愈确实是一座巍峨矗立的丰碑。"这些观点都是十分精辟的。（参看《柳宗元简论》条）

（齐石宜）

马积高（1925—）　湖南衡阳县人。1948年夏毕业于前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1948年秋到1956年夏在衡阳市几所中学任教，1956年秋来湖南师范大学工作，现任该校中文系及文史系教授。著有《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赋史》《宋明理学与文学》及《论柳宗元对唐代古代运动的贡献》、《李翱生平仕履考略》等论文20余篇，过去研究中国辞赋的，大都只注意汉以前或隋以前的赋，间有注意及唐以后之作的，也只略及唐宋的律赋和新文赋（亦称"文赋"），未见有探源溯流，并联系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对中国辞赋史全面加以探讨的。《赋史》则力图对它作较全面的阐述，对各个时期的赋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特别重视魏晋南北朝和唐代讽刺赋，认为唐赋是汉以来赋的发展的高峰等都与前人之论不同。（参看《赋史》条）

（志云）

曹道衡（1928—）　江苏省苏州市人。幼年时期，就在潘景郑先生的指导下，从《说文》、《尔雅》入手，学习经部群籍。后入无锡国专，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受教于游国恩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

曹道衡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著述颇丰，共发表论文50多万字，后精选30余万字，编成了《中古文学论文集》。这部论文集收入的文章，有的以考证精审著称，如《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何逊三题》、《庾信〈哀江南赋〉四解》；有的以研究深入、颇有创见而受到学者的赞扬，如《江淹及其作品》、《关于裴子野诗文的几个问题》；还有的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某种文体作了专门的研究，如《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试论北朝文学》。这些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骈文和辞赋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曹道衡先生还著有《汉魏六朝辞赋》一书。曹道衡先生的治学特点是材料扎实，态度严谨，他在《关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里，特别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考据和收集材料的重要性，这正是他一贯的治实主张。（参看《中古文学论集》、《汉

魏六朝辞赋》两条） （马辉文）

朱靖华（1928—） 山东省安邱县景芝镇人。1950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年8月至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1959年任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英文版）编辑。1961年春调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现任该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主要指导硕士研究生及外国高级进修生。在学术界，担任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文艺学会理事等职。

五十年代初起，陆续发表一些散文、小说、诗歌、寓言、小品、评论及古代文学研究文章，同时开始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寓言。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解放后第一部古代寓言评注集《先秦寓言选释》，1983年起，又与公木合作，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历代寓言选》上、下册。随后，于1989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苏东坡寓言评注》，均获得好评。同时为陈蒲清主编的《中外寓言鉴赏辞典》中有关苏轼的寓言撰写鉴赏文章。作者在《先秦寓言选释》和《历代寓言选》中除艺术地评价了历代寓言的精华及其创作特证外，还在总体上勾勒出中国寓言发展的基本轮廓；在《苏东坡寓言评注》中，作者对苏轼的散文寓言做了深人的审美赏析，并特别详尽地考证了《艾子杂说》确为东坡所作，进而指出该书为我国第一部寓言专集，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自六十年代起，朱靖华先生着重从事唐宋文学、特别是苏轼研究的工作，其中属于古代散文研究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出版社1980出版的《古代散文选注》，他参加了该书唐宋部分中有关柳宗元、王安石、苏轼等作品的注释；而后又为中国妇女出版社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中有关苏轼的散文撰写鉴赏文章；198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历代书信选》（与麻守中合作），1990年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史记名篇鉴赏》（与顾建华合编）等书。作者于1988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简明中国文学史教程》（与李永祜合编）中，简洁扼要地论析了我国自先秦到清末的散文作家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线索；在其专著《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中，还专门探讨和论述了苏轼的寓言艺术成就及其前、后《赤壁赋》的题旨和创作特征，由于颇具新见，而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参看《苏轼新论》条）

马　达（1928—） 湖南省华容县人。北京大学毕业，现为北京出版社副编审、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已出版著作有：《寓林折枝》（与人合作）、《庄子寓言选》、《列子寓言选》、《宋濂寓言注译》、《古代寓言名篇选》（与人合作）、《中国古代寓言诗选注》（与人合作）、《新序译注》、《古代劝学寓言》、《中国古代动物寓言故事》，为《寓言辞典》特约撰稿人，主编了《中外寓言知识手册》，并参与主编了《当代中国寓言大系》一、二、三卷。即将出版的有《说苑译注》等。

《寓林折枝》、《新序译注》被大学用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中国古代动物寓言故事》获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纪念奖，外文出版社将其译成英、西班牙、阿拉伯、乌尔都、孟加拉5种文字向国外介绍。已发表诗歌、散文、文艺短论、寓言等各种体裁的作品约800篇，其寓言被选入《世界寓言精品500篇》等选本。已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较重要的有《寓言是屈原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宋濂寓言初探》、《刘向说苑管窥》等。 （志 云）

褚斌杰（1933—） 笔名楚子。北京市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助教，师从游国恩、林庚先生。1958年调入中华书局任哲学编辑室编辑，1978年调回北京大学中文系执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中国广播电视大学主讲教师。主要著述有《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部分)，《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白居易评传》、《中国古代神话》、《古典新论》，主编有《中国文体百科辞典》、《白居易诗歌鉴赏集》，应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主编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先秦卷，参加《世界诗学大辞典》的撰写，并任该书编委、文体部分主编，校定多卷本《中国古代文学辞典》，与人合编了《李清照研究资料汇编》等。

褚斌杰对古代文学研究范围甚广，神话、诗词、曲、赋、文、小说、文体等，无不涉猎，提出不少精到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对于散文的研究，他很推重先秦。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他认为虽然先秦时期的散文还文史哲不分，没有独立的文学散文，“但要为后世的各体散文作品（包括小说、戏曲）的发生发展都准备了条件。它的精湛的语言技巧和修辞技巧，井然有条的说理和叙事，以及生动的故事性等等，都为后世许多文学作品所吸取，我国历代的散文家和小说家，几乎无不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在这部著作里，他不仅细致精要地分析和评价先秦、秦汉时期的各个散文作家、作品，从文学现象的阐释中揭示散文的基本线索，而且还非常注重散文体式自身的演变发展，认为“我国文学发达，文体繁富，样式众多，而后世的许多文体一般在先秦时代即已滥觞和有所孕育。”他还提出汉赋这一文学体式，受到荀子赋的影响，但“这时赋体还属于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并从赋的体式特征论述了这一观点。褚斌杰的力作《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系统论述了古代各种散文体式如论说文、杂记文、序跋文、赠序文、书牍文、传状文、箴铭文、哀祭文、碑志文、公牍文等自身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如他认为山水游记这一文学体式，“肇始于魏晋，成熟于唐、宋，至明清则成为文学散文中重要一体。”晋慧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开了后世游记文学的先河”，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家为唐柳宗元、宋苏轼、王安石等，而明清则是“山水游记文大量产生的时期”，“比较有特色的是随着晚明小品文的勃兴，而涌现出来的记游小品”。 （王景琳）

韩兆琦（1933—）　天津静海县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跟随中文系著名教授蒋天枢先生读"前四史"。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回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曾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职。现为该校教授。已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史记选注集说》、《史记评议赏析》、《汉魏南北朝诗选注》、《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史记选注汇译》、《史记通论》、《史记赏析集》、《中国传记文学史》、《中国古代名篇人物形象辞典》等，还有与他的研究生吕伯涛合作撰写的《汉代散文史稿》。他主持编写了1981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此外还发表过上起先秦下至宋代的各种古典文学研究学术论文近百篇。他对古代散文特别是对《史记》的研究功力甚深，出版的各种著作深得学术界的好评。这些研究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对历史材料尤其是汉代史事特别熟悉，十分注意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状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博采古今众家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独到见解。所以取材翔实，论断有据（参看《史记选注集说》、《汉代散文史稿》、《史记评议赏析》三条）。　（冠　山）

龚克昌（1933—）　福建平和人，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文史哲》副主编，辞赋研究所所长、全国赋学会副会长。

龚克昌教授自1981年以来接连出版了《楚辞选译》（与陆侃如合作）、《屈原赋译注》、《汉赋研究》、《白居易诗文选注》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等全国性大型学术刊物和各种丛书中发表论文50多篇。

龚克昌先生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研究辞赋以来已近30年，其中《汉赋研究》一书是其力作。此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山东出版通讯》以《开创汉赋研究新局面的一部好书》为题加以推荐。《东岳论丛》也以《汉赋研究的新收获》为题发表评论，提出此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汉赋的专著"。国内外专家也给予很高评价。该书被评为1983—1985年度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龚克昌先生于1988年被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选为访问学者（37人选7人），到美国哈佛、伯克利、斯坦夫、威斯康星、华盛顿等5所著名大学讲学，专讲中国辞赋，受到热烈欢迎。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教授已将此讲稿中的10篇译成英文，并加以详注在美出版。山东出版总社也拨专款3万元出版他在美的全部讲稿，该书仍取名《汉赋研究》，36万字。《山东图书信息报》以《汉赋研究又绽新葩》为题发表评论说："修订版《汉赋研究》运用马列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详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历史地考察了汉赋的产生、发展和其主要作家的成败得失，推翻了千百年来人们对汉赋的一些鄙薄之词，充分肯定其在中国文

学史上应有的光辉地位，从而恢复了汉赋的名誉。”

现在龚克昌教授担负的新的研究课题有：山东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全汉赋校注》和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中国历代赋研究》两项，与美国康达维教授合作《中国赋史》等三项。（参看《汉赋研究》条）

（彭　行）

王水照（1934—）　浙江余姚人。195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60年毕业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后调至复旦大学任教。现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王水照先生从事宋代散文研究有年，对这一领域涉足较早，用力勤勉，取得不少成果。其宋代散文系列论文有：《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曾巩及其散文评价问题》、《苏轼散文的艺术美》、《苏辙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色》、《苏洵散文与〈战国策〉》、《散文家王安石评传》、《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等10多篇，并有《宋代散文选注》。王先生还搜集整理日本古今三位学者的文章学论著，编集《中国文章学——日本学者论著三种》一书。

对于古代散文概念如何界定这一歧义纷呈的问题，王水照先生指出要顾及我国古代散文历史形成的具体特点即独特的概念系统，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却在事实上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种认识，王水照先生注重挖掘包括说理文在内的古典散文的美学特征和艺术技巧，研析其文章法、气势神理、风格渊源等。同时，王水照把对宋代散文的总体把握和对各大散文家的个案探讨两者结合研究，从散文史的角度逐一考察宋代六大散文家的创作状况、文论思想，试图勾画北宋散文的演进轨迹，在研究中，王水照先生努力开拓视野，更新视角，把宋代散文研究纳入宋代文学的综合探索之中，使散文研究本身得以进一步深化。此外，王水照先生注重实证，主张要详细地占有资料，从中引出其固有的结论。

其他论著有《苏轼》、《苏轼选集》、《唐宋文学论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参看《唐宋文学论集》条）　（袁　闻）

董治安（1934—）　江苏徐州人。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该校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孔子研究会常务理事。董治安先生侧重研究先秦两汉古籍，尤以先秦两汉文史研究见长，“其研究特点，既注重基本资料的研究整理，又注重宏观的综合考察”。所作《说晏子春秋》、《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等论文，对于《晏子春秋》一书的文学价值和产生时代等问题，“较早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和辨证，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注意。”曾与高亨先生合著《上古神话》一书，后随高亨先生研究《周易》，参与编撰《周易书目提要》，发表了《孔子与周易》、《关

于周易哲学的辨证法因素的两点意见》等。近年主编的《先秦要籍词典》已出版了《诗经词典》,《庄子词典》等亦将陆续出版。　（闻士则）

谭家健（1936—）　湖南衡阳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并兼研究生院导师、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先秦散文纲要》（与郑君华合作)、《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墨子选译》（与郑君华合作)、《水经注选注》、(与李知文合作)、《古代神话寓言选读》,主编有《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中国文化史概要》等。

谭家健对中国古代散文颇有研究，尤专力于先秦散文。在《先秦散文纲要》中，他说："先秦散文是中国古典散文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丰富多彩的散文著作和风格各异的散文名家，为中国文学史掀开了光辉的一页。"他认为先秦散文"有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深刻的社会基础。其代表作品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这个时期发生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促进散文繁荣昌盛的重要原因所在。"对于先秦散文的研究，他并不注重于训诂与注释，而是更多的把目光放在作家、作品的主要思想观点以及作品的艺术风貌与价值上。不仅对那些文学色彩很浓或比较浓的诸如《庄子》、《左传》、《战国策》、《论语》、《孟子》、《晏子春秋》、《国语》等著作予以充分重视，而且对那些有一定文学色彩，却极少为文学史家或古代散文研究者所注意的著作，如《逸周书》、《孙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尹文子》、《公孙龙子》、《礼记》、《考工记》、《易传》、《慎子》、《申子》、《文子》、《尸子》等，也进行了文学方面的探讨。如关于《逸周书》，他既指出其中"有少数记叙文颇具一定形象性，"并具体分析了《克殷解》写周武王克殷杀纣的一段，认为它写得"相当精彩",有较强的艺术性。同时，对此书中一些"语言平易"、"表现思想精确而含蓄"、"层次清晰面又曲折有趣"的篇章也都给以中肯的分析、评价。谭家健对这一类散文的研究，大大拓展了先秦散文的研究内容，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发掘出它们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及对后代文学在思想、艺术上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谭家健也有自已的特点，他对一些作者不明，成书时间不清的著作，常常先简明扼要地考订其作者、真伪、成书时间，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去考察。他的研究重点则放在作品的文学价值方面，包括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他还很重视文史哲的融汇贯通，注意从作家的哲学观、美学观入手，去分析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参见《先秦散文纲要》条）

（王景琳）

陈蒲清（1936—）　湖南省桃源县人。1960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任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兼任湖南古汉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寓言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在寓言研究方面有四部书：《中国古代寓言

选》(合编),《中国古代寓言史》,《中国寓言鉴赏辞典》(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世界寓言通论》,全书贯通中外,上编介绍寓言的本质属性,文体特征与创作途径,中编介绍世界三大寓言体系及其发展规律,下编介绍寓言与哲学、宗教、教育的关系及寓言的研究鉴赏与教学。《中国古代寓言史》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寓言史。全书按寓言发展特色分为五个时期:先秦哲理寓言,两汉劝戒寓言,魏晋南北朝过渡性寓言,唐宋讽刺寓言,元明清诙谐寓言。书中还阐述了中国古代寓言的定义、范畴、历史地位和影响,并初步论述了寓言的文体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不仅研究了一批素为人知的寓言家(如:庄子、韩非子、柳宗元等),而且发掘了一批鲜为人知的寓言家(如:刘元卿、江盈科等)。此书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但是,仍有遗漏,对寓言小说和戏剧,对少数民族寓言,都未论述。《世界寓言通论》对此作了弥补,作者认为寓言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文体,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了先锋作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特别是散文)的人都必须重视它。

在古籍整理和古汉语方面的著作有:《文言文基础知识问答》,《文言今译教程》,(全书系统介绍文言今译的知识,并设计了大量练习,在国内为最早的文言今译专著),《欧阳修文选读》,《言文对照古文观止》,负责总校订、作序和部分撰稿,《周勃·周亚夫》,《史记注译》;(译注五帝、夏、殷、秦、周本纪及绛侯、五宗世家),《足本白话聊斋》(与羊春秋、萧艾、刘建国合译)等,此外,还有《教学语法答题》等书及论文数十篇(涉及古今汉语、古典文学、中外寓言、方言等方面)。 (志 云)

刘文忠(1936—) 江苏省丰县人。196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1965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专业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导师为陆侃如先生,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副编审。其主要著作有《鲍照与庾信》、《友谊诗选》、《文言小说名篇选注》,另有《高适岑参名篇赏析》、《〈吕氏春秋〉选译》、《元明散曲选讲》、《中国古代歌谣选》等即将出版。已发表的论文约50篇。

刘文忠先生对鲍照、庾信颇有研究,在其《鲍照与庾信》一书里,他对这两位文学家的生平和辞赋、散文都作了深入的探讨。他对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有很深入的研究,如《〈世说新语〉文论资料概述》、《颜之推评传》等都是很有分量的论文,特别是后者,对颜之推的生卒年作了细致地考证,提出了新的说法,对《颜氏家训》中的文论的研究也有突破。除了一些专著外,他偏重于鉴赏,他这一方面的赏析文章有20篇左右,主要特点为:一、范围广。不仅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而且还有《尉缭子》、《鹖冠子》等寓言和苏轼的作品;二、能结合作者的思想特点,深入探讨古代散文的艺术特色,如《俯仰苍茫之气,惊天动地之文——〈芜城赋〉赏析》,不仅指出鲍照具有历史辨证法的因素,他的赋也反映了、"人生无常"

的思想，而且从对比虚实等多方面，深入论述了《芜城赋》的艺术特点。三、在写法上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有的偏重于作品思想内容的阐述，如有的偏重于艺术结构的研究，如对《哀江南赋》的赏析文章，便特别指出这篇赋虽是自传体作品，却具有史诗的规模。（参看《鲍照与庾信》条）

（志　云）

孙昌武（1937—）　辽宁省营口市人，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1956年毕业于北京第一中学；1961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历任营口师范学校、营口教育学院教员、南开大学讲师、副教授，现为南开大学教授。1984年—1986年应聘为日本神户大学客座教授；1989年应聘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比较社会”部门）。1979年开始致力于唐代散文的教学与研究，陆续发表《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韩愈散文艺术论》等专著与论文多篇；同时探讨佛教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诸问题，发表了《唐代文学与佛教》、《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论著。在这些著作中，努力将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等诸领域相沟通，从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上揭示文学现象的本质与规律，颇多创意，并有古籍校勘、外国学术著作汉译及用日文出版的著作多种。

孙昌武先生散文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三部互相补充的论著之中，《唐代古文运动》概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演变过程，《柳宗元传论》论述了柳宗元的生平和作品，《韩愈散文艺术论》主要探讨了韩愈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点，这与《柳宗元传论》有所不同，作者在此书的《后记》中指出，他过去对于古典散文的艺术方面探讨不足，主要是受到主观水平的限制，一是在认识上对古典文学遗产的艺术方面重视不够；二是“个人能力还不能深刻地认识、体会古代散文大师创作艺术的妙处，并把它细致地分析和清晰地表达出来”。这里当然有谦虚的成分，但长期以来忽视古典文学艺术性的研究，确是学术界存在的一种偏向。“论及古典作家和作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它们的思想价值与社会意义方面，而轻视、忽略它们的艺术性，实际上不可能认识它们的真正价值，也不利于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引为今日的借鉴”（《后记》）。正基于这样的认识，此书对韩愈散文的文体、文风、写作技巧、文学语言等作了系统的研究。

（志　云）

吴小林（1937—）　苏州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该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唐宋八大家》、《柳宗元散文艺术》以及《论韩愈散文的结构美》等论文20余篇。

吴小林先生研究的重点是唐宋散文，他认为目前对古代散文的研究十分沉寂，对古代散文艺术方面的评价显得非常冷清。这种文学史上创作相对繁荣与如今研究相对薄弱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急须加以改变，“企图为振兴古代散文的研究略尽绵力，”他写作了《唐宋八大家》。这部

著作对“古文八大家”的散文作了系统、全面地分析和论述，但作者认为此书“对其中每位散文作家的评析比较简略”，所以便想对“八大家”中几位特别有代表性的几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作进一步的专题研究，于是便写作了《柳宗元散文艺术》一书。作者认为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尤其他的散文，成就卓著，与韩愈的散文一起，体现了唐代散文的最高水平，堪称唐代散文史上的双星。和韩愈相比，柳宗元的散文具有更为鲜明的文学特色和审美情趣，对推动纯文学散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对他作系统的艺术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此书分别从柳宗元的散文主张、杂文、传记散文、寓言散文、山水游记、辞赋的艺术特点、柳文艺术风格、结构艺术、语言艺术、柳宗元韩愈散文比较等十个方面作了深入地论述。《柳宗元散文艺术》分析细致，论证妥贴，富有文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参看《唐宋八大家》、《柳宗元散文艺术》两条）（志　云）

曾枣庄（1937—）　四川简阳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分配到四川大学从事哲学、政治学教学工作。1965年因受到批判，调离四川大学，先后在中专、中学任语文教师。1979年调成都教师进修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1980年调四川大学中文系讲授唐宋文学、苏轼研究、三苏研究。1984年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现为该校教授。1985年开始主编《全宋文》。

长期以来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尤其是三苏研究。1975年开始系统研究苏轼，于1982年出版《苏轼评传》，认为苏轼也是主张改革的，苏、王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反对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并进一步扩大到对苏洵、苏辙的研究，先后完成了《苏洵评传》、苏洵《嘉佑集》校注（与人合注）、《苏辙评传》、《苏辙年谱》、苏辙《栾城集》校点（与人合点）、《三苏文艺思想》、《三苏选集》（与人合著）。现《全宋文》已出版6册，全书出齐将大大超过原来估计的100册，字数为《全唐文》的七、八倍。这是汇集宋代所有单篇散文、骈文及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总集，它的出版将为宋代文史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资料。（志　云）

吴汝煜（1940—1990）　江苏吴县人。1963年毕业于徐州师院中文系，去世前为该校教授；他主要致力于《史记》和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研究，对苏轼等其他散文大家亦有研究论文多篇，主要著作有《刘禹锡传论》、《刘禹锡选集》、《史记论稿》等。（参看《刘禹锡传论》、《史记论稿》两条）（齐石宜）

研究著作

总体研究

《中国散文概论》 方孝岳著。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中国书店1985年重版。此书共分两个部分，在“本体论”里，作者论述了散文的定义，指出散文这个称号，是相对于骈文而来的，“论其本体，即是不受一切句调声律之羁束而散行以达意的文章”。作者还分析了散文与骈文在形式上的不同之处，叙述了散文学的演进过程，指出“散文之学，自唐韩愈柳宗元以后才有途径可循”。“方法论”分别论述了“字句的格律”、“篇章的体裁”、“议论文之体裁”以及“叙事文的体裁”等专题。（齐石宜）

《中国散文史》 陈柱著。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上海书店重印。本书共分5编，详细地叙述了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代表作。第一编《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夏商周秦》，作者将这一时期的散文分为四个阶段来叙述，即一、“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自夏商至春秋”，介绍了夏代散文、殷代散文和周初散文。二、“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之散文——春秋时代”，介绍了孔子、老子的散文、史传家左丘明的散文。三、“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战国”，介绍了阴阳家的散文、墨家墨子的散文、儒家孟子、荀子的散文、道家庄周的散文、法家韩非的散文、名家公孙龙子的散文、杂家的散文、纵横家苏张的散文。四、“反文化时代之散文——秦”，介绍了“反文学者”李斯的散文。第二编《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两汉三国》，分为两个阶段，即一、“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两汉”，介绍了辞赋家的散文、经学家的散文、史学家的散文、训诂派的散文、碑文家的散文。二、“为文学而文学时代之散文——汉魏之际”，介绍了三曹的散文、建安七子的散文、吴蜀作家的散文。第三编为《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晋及南北朝》，作者将这一时期的散文作家分为“藻丽派”、“帖学家”、“自然派”、“论难派”、“写景派”等五派作了细致地介绍和论述。第四编《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唐宋》，论述了“古文家先锋”元结的散文、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的散文、韩门弟子的散文以及“矫枉派之散文、艰涩派之散文、浅易派之散文、宋古文六家之散文、道学家之散文”。第五编《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明清》，论述了明代复古派前后七子的

散文、反七子派的散文、“明独立派的散文”，以及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和“清维新以后的散文”。此书材料丰富，是我国较早的一部散文史，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管士光）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 冯其庸著。北京出版社1964年出版。此书分三个部分，叙述了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发展。在介绍了先秦时期最早的初具散文形式的作品《尚书》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孟子》、《庄子》以后，作者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已有很大的发展，表现为：一、它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提高；二、各个不同的作家或作品的独特个性和风格已经形成，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文学的性质；三、开始确立了散文的最基本的形式，即史传文（叙事文）和议论文；四、具有实用性，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作品，还有待于以后历史的发展。在对秦汉时期散文的论述中，作者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时期的政论文、史传文和辞赋，特别突出了贾谊、司马迁、班固和汉赋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指出：两汉的散文，总的来说，是有很高的成就的，一方面出现了象司马迁这样卓越的语言艺术大师，他在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基础上，创造了富有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的文体，给后世以无比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产生了汉赋这样新的文学形式，这种文体在当时和以后都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除此以外，汉代的政论文，也是在先秦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散文。在第三部分，作者介绍了曹操、曹丕、嵇康、阮籍、王羲之、陶渊明的散文以及《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还介绍了骈文作家鲍照、吴均的作品和王粲、曹植、庾信的辞赋，指出：南北朝时期是散文发展变化的时期，魏以前的文章，一般是质胜于文，风格朴实庄重，着重辨析事理；魏以后的文章，一般重视文采超过了内容，或文采内容一样看待。这一时期的文章风格渐趋清峻通脱，而较重于抒情；学术文章和文艺性的文章的区别，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齐石宜）

《古典诗文述略》 吴小如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部著作由《古诗述略》、《唐诗述略》、《古典散文述略》等三篇文章组成。在《古典散文述略》一文里，作者首先指出：在我国古典文学的领域中，所谓“散文”，应具有广、狭两义。就其广义说，散文是对韵文而言的一种文体。就其狭义说，则指包括在散文这一文体中的、与骈体文（又称骈文、四六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论述中国古典散文（不仅指散体文）的发展演变，不宜排斥骈体文的情况不谈。用散文写的东西（包括用散文体和用骈体文写的）不一定都是文学作品，但在我国古代（特别是唐以前），很多用散文写的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实际上都不宜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作者认为中国古典散文具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传统，内容相当丰富，它的发展演变大体上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奠定了古典

散文发展的基础；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给史传文学开创了新局面；从东汉到盛唐，骈体文垄断文坛数百年；经中唐和北宋两次"古文运动"之后，散体文又得到很大发展，明清两代，由于复古主义和八股文的影响，散文始终没有跳出形式主义的窠臼；直到近代，在那些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资本主义文化思潮洗礼以后，散文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者在对散文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叙述中，都注意结合作品说明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线索，指出它在发展过程中的继承性和传统性，如在分析介绍了先秦史籍和诸子论著后，作者指出：先秦的史籍和诸子论著成为我国后世几千年来叙事散文和说理散文的光辉典范。后世叙事散文的简明洗炼，说理散文的流畅条达，都是从先秦散文作品中继承下来的优点和特色。而后世散文所要求的极致乃是寓简练于流畅之中，在条达流畅的基础上力求概括凝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叙事散文中同时有着"记言"的传统，充满了丰富多彩的辞令，使叙事中的对话部分不至陷于枯燥板滞，而在先秦的说理散文中又同时具有浓厚的艺术趣味，充满了活泼多姿的寓言，使读者对于比较深奥抽象的理论部分不至于吃力费解——这种兼容并包的风格上的多样化，就成为后世散文作家所学习的榜样。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褚斌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这是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体（文学体制、体裁）演变、发展及种类的专著。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名家辈出，而文学种类和文学体裁也十分繁富多样，因此，赓续不断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各种文学种类、各种文学体裁争奇斗艳，以及相接递变的历史。本书介绍了诗歌、赋体、骈文、词、曲以及文章的各种体类。作者在对每一文体的介绍中，一方面着眼于此一文体的特点，同时结合古代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阐述此一文体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如在介绍山水游记时，作者指出山水记，是一种模山范水，专门记游的文章。它以描写山川胜景、自然风物为题材，但它的写法也可以多种多样。在魏晋以前，自然景物描写只是抒情诗文和某些铺叙苑林的辞赋作品之附庸，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山水诗和某些写山川胜景的书信，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等，严格地说，这些作品还不能算真正的游记，而晋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山序》，才是一篇事实上的游记文，其记述游踪、山水胜景和感受，十分生动、形象。游记体文学真正的出现并趋于成熟是在唐代，其代表作家是柳宗元，他的《永州八记》，是我国游记体文学的奠基之作，后来的王安石、苏轼也创作了一些山水游记，他们的《游褒禅山记》、《石钟山记》等不以写景、抒情为重点，而以议论说理取胜，实属游记文中别开生面之作，南宋以后，由名家创新，还发展起一种日记体游记，这种体裁的游记

以南宋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和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为最著名。明清是山水游记文大量产生的时期，多数明、清人文集中都有游记文，而比较有特色的是随着晚明小文的勃兴，而涌现出来的记游小品，其代表作家是袁宏道和张岱。我国游记体散文，是在吸收山水诗、山水赋，以至山水画的艺术技巧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文学性都比较强，在我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作者的论述既是提纲挈领的，又是系统详细的。其他内容，如对“论说文”的论述，对“杂记文”中的“台阁名胜记”、“书画杂物记”、“人事杂记”以及对“序跋文”、“赠序文”、“哀祭文”的论述都是既注意了不同文体的特点，又简述了各种文体的演变过程。另外，作者对赋体和骈文的介绍也是本着这一原则进行的。因此，这部专著便兼有文体知识介绍和文体发展演变史的叙述这样两方面的内容。（贺然青）

《中国散文史》　郭预衡著。全书约计180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论述先秦、秦汉及魏晋南北朝的汉语文章，中册论述隋唐五代宋辽金元的汉语文章，下册论述明清两代的汉语文章。上册已于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下册即将问世。本书总揽上下数千年我国古代汉语文章的全部发展进程及其实际成果，揭示各历史时期的文章特色和蕴含于其中的文学规律，包容了历代的经世之文如政论、史论、人物传记及某些哲理或学术文章；应用之文如碑铭记序书启檄移之类；文艺之文即各种记人记事写景抒情的文章，如山水小品、笔记、杂说之类，囊括了传统概念中的古文、骈文、时文、辞赋等所有汉语文章。全书钩深稽远，纵论千古，而又字字落实到特定社会政治条件下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上，其用力之勤、创获之多，其实事求是、由史治文的学术方法的运用之妙，均为近数十年来散文研究界所罕见。就已面世的上册来说，其论世评人，析文说理，相当多的观点是学术界研究成果的承袭、综合与提炼，与前人或当代人的看法相吻合，那是因为汉语文章的历史实际本来如此，不得不然；而更多的论述则不步趋熟道，不拘守常谈，那是因为作者站在今日的学术高度、去审视历史陈迹，自然要作出新的分析和新的概括。比如本书将“散文”界定为“汉语文章”而不是流行概念中的“文艺散文”便是突出的一例。又比如在论列先秦散文时，本书未采用通常的二分法，即把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两大类，而是参照学术界关于先秦文章巫史二脉的研究成果，从三个方向上进行论列：一是论述从巫卜记事到《周易》、《老子》、《庄子》到《山海经》以至屈宋杂赋的发展脉络；二是论述从鼎彝记事到《尚书》、《春秋》、再到《国语》、《左传》以至《战国策》等史家之文的发展情况；三是论述从《论语》、《墨子》到《孟子》、《荀子》、《韩非子》，联同《商君书》、《吕氏春秋》之类私家著述的演进轨迹。这样做，清晰地凸现了汉语文章民族风

格、民族气派与民族特色其所由形成的历史动因和初期面貌，对于建立我国散文研究的理论体系，厥功甚巨。在具体论列作家作品时，本书总是本着实是求事是，知人论世，全面看人不执一端的精神，将问题提到具体的历史政治环境和学术思潮中去论述，对扬雄、班固之类著名作家是这样，对王弼、萧纲这些一般文学史中很少正面论列的作家也是这样。本书在介绍了王弼的作品实例后说道：王弼文章不同于汉儒的章句之学和注经之文，而是畅述己见，文辞也老练精到。这就与那些指王弼为玄学家而施以挞伐者不同；至于萧纲，因他有过"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一语而被人诟骂至今，本书在引述了原文全文后，又联系其全部文章述作的实际，指出："放荡"与"谨重"对文，其意只是要求为文不要拘束而已，他自己的文章，有的写得相当随便，有如白描；有的也雍容典雅，相当谨重，并不像其宫体诗赋那样"轻艳"，所以"未可一概而论。"可见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的一种示范，本书的价值也是很高的。（陈鸿彝）

《古代作家写作技巧漫谈》

周振甫、冯其庸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广闻博识、擅长文章的著名作家。他们在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上的巨大成就，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本书共收集了论述我国古代著名作家写作技巧的文章16篇。《春秋笔法》（振甫）一文，论述了孔子修订的鲁国《春秋》笔法，以及先秦时代其它编年史书的笔法。作者认为，所谓春秋笔法，主要是指不由作者出面来对人物或事件表示意见，而是通过对人物或事件的叙述来表示褒贬，含有让事实说话的意味。作者以标目、映衬、陪衬、详略、引用、细节描写、比喻等几方面，对春秋笔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在中国古典散文中，辩论文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孟子的辩论文学习写作技巧》（振甫）一文，探讨了孟子杰出的辩论文写作技巧，认为孟子辩论的技巧，是在他比较高的人生观和广阔的生活面上获得的，他善于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这是他所能够驳倒和说服对方的关键所在。《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传记（包括"本纪"和"世家"在内），可说是古代杰出的人物特写，《司马迁的人物特写》（冯其庸）一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一、人物性格的刻划和细节描写；二、对人物或事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评论；三、材料的取舍和结构的安排，四、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作品中人物的语言。《韩愈的散文》（振甫）和《柳宗元的散文》（振甫）两篇，深人而仔细地研究和分析了韩愈和柳宗元这两位唐代最杰出的散文家的散文作品，从思想性、艺术性两个方面，对他们的散文作品予以确切精当的评论。《论证的方法》（郑国铨）和《论说文的谋篇布局》（郑国铨）两篇，是作者阅读古代论文的札记，分析了古代论文谋篇布局的技巧和论证的方法，对今人撰写论文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夹叙夹议和夹喻夹议》（振甫）一文，以古代议论

文中的实例为依据，分析了在议论文中如何以形象的叙述和抽象的议论相结合，以及如何在议论文中用比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论据充足，分析透彻。（于绍卿）

《古典文学三百题》 多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此书共有六大类内容，第一部分为散文，共38题，分别介绍了古典散文、骈文、辞赋的源流和主要流派及主要作家作品，既有总论性质的题目，如《先秦诸子的寓言有什么特色》（邓韶玉）、《汉赋的主要作家和作品有哪些》（曹明纲）；也有专论性质的文章，如《司马相如的赋有哪些特色》（殷海国）、《〈水经注〉是怎样一部书？它的文学价值如何》（张明华）。每个题目的内容以介绍为主，综合前人的论述，融入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一部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参考书。（侯文朴）

《中国古代散文九讲》 李景华、马啸风、王振堂、李泱、董兴文合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此书分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秦汉散文、魏晋南北朝散文（上、下）、隋唐五代散文（上、下）、宋代散文、元明清散文等几个专题，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散文从萌芽、产生到演变、发展的历史，论述了先秦散文各家至明清散文各派的源流及其继承关系，作者指出：我国有着丰富的散文遗产和悠久的散文传统，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出现过内容精深、风格多样的诸子散文、史传散文；魏晋时期，产生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但齐、梁以后，骈文逐渐统治了文坛，阻碍了散文的发展；到了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的影响，文学散文出现了，散文从哲学和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文学体裁；唐宋两代，我国散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繁荣，唐宋八大家，以他们的理论和作品打垮了骈文的统治，开创了自由抒写的新文风，扩大了散文的实际应用范围；元明清三代散文，是唐宋散文的继续和延伸，虽然具有自己适应时代变化的某些特点，出现了不少作家和流派，但总的来说成就不高。本书还重点分析了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方苞、姚鼐等优秀散文家代表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这些分析和评价较为客观和准确，对读者了解中国散文的发展历史很有帮助。

《中国散文美学》 万陆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该书是一部自成体系、兼及理论与欣赏的专著，旨在以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成果，尤其是近30年来中西方美学领域取得的突破，返观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散文。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中国古代散文概观》，作者首先分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散文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古代散文是作者出于现实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如记事记言、泻泄情怀、发抒议论等，而采用的既不同于诗歌而近于小说的散行文体，又不同于小说而近于诗歌的主体言意缘情性文体，流灌于其间的是：通过作者精神个性表现出来的特定历史时代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与

作家个性的统一。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总体特征是创作与理论的明显乖离，并从实用性、真实性、抒情性、意象性、灵活性等方面论述了这一特征表现的不同层面。进而，作者按记叙性、论说性、实用性三类的划分，介绍了各类散文的界限、发展沿革以及包括的品种。其中记叙性散文，又分为重要事件记、人物传状记、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论说性散文又分为政论、理论、史论、文论。实用性散文分为书信、序跋、赠序、公牍、碑志、哀祭、箴铭。作者认为要对中国古代散文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就要从其发展流变中对它作动态考察，因而将古代散文的发展分成成体时期、成熟时期、分化时期分别作了研究，探讨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流变规律。第二章《中国古代散文的美学特征》，分别由"散文美质论"、"文画异迹同趣论"、"诗文会通论"、"散文小说血缘辨踪论"等方面探讨了古代散文的美学特征。最后一章，分别论述了如下专题：记叙性散文的美质及其美学嬗变、论说性散文的美质及其学说嬗变、实用性散文的美质及其美学嬗变。此书是仅见的一部散文美学专著，具有拓荒性质以及填补空白的意义，在重视理论构架，尽量做到精深严谨的同时，此书还注意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结合，理论探求与艺术赏析的统一，从而使这部著作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是一般读者提高艺术素养、借鉴艺术技巧的精良读物。

《骈文概论》 金秬香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这是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里的一种。作者在《叙言》里说明了骈文的定义，又在其他几章，即《上古至周骈体之起源》、《两汉曹魏之骈文》、《晋至陈之骈文》、《隋唐五季之骈文》、《宋辽金元之骈文》、《明清之骈文》里，运用较为丰富的文学史料，论述了骈体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虽然其中有一些观点今天看来已经陈旧了，但作者的论述对后来的学者还是很有帮助的。其中尤以论述南北朝时期骈文发展的一些章节最富启发性。作者不仅论述了有定论的骈文家的作品，还论述了历来以散文获得盛赞的散文家的骈文作品，如"韩昌黎之骈文"、"柳子厚之骈文"、"欧苏之骈文"等，都有很独到的见解，对今天的研究者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骈文概论》 瞿兑之编著。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作者认为"骈文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就是指由汉到唐这一段文学最昌明的时代的文学"（刘序），这一时期，"确曾出过不少的文学天才，确曾遗留不少的佳构。他们没有什么义法的拘束，就是骈偶也并不是每句非对不可，就是用典，也不是每篇非用典不可，所用的典，也不是非叫人不懂不可。他们能细腻的亲切的写景，能密栗的说理，能宛转的抒情。能说自己所要说的话，能说了叫人同情而不叫人作呕，这些都是骈文里面的好处"（《概说》）。除总论外，本书前三节即《从三百篇到楚词》、《赋》、《魏晋文与陆机》介绍了骈文产生的

文学条件及其原因，继而论述了骈文在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当时人们对骈文这种文体的认识与评价。《唐代之骈文与古文》、《陆贽》、《李商隐》，分别从点和面上介绍了唐代骈文的特征与发展情况。最后四节，分别介绍了宋代的四六文、清代的骈文以及律赋与八股、八股与骈文等内容。

中国骈文史　刘麟生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这是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本书共分十二章，即"别裁文学史与骈文"、"古代文学中所表现之骈行语气"、"赋家奏疏家论说家暨碑板文字"、"所谓六朝文"、"庾信与徐陵"、"唐代骈文概观"、"陆贽"、"宋四六及其影响"、"骈文之中衰——律赋与八股文"、"清代骈文之复兴"、"骈文之支流余裔——联语"、"今后骈文之展望"。从每章的标题可以看出，作者是按照史的线索来叙述骈文这种文体的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的；同时，在叙述一个时代骈文发展的状况时，又适当注意了这个时代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如论六朝骈文，特别分析了庾信与徐陵；论唐代骈文，特别分析了陆贽。作者不仅注意总结骈文的历史，还注意展望它的未来，所论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部著作的一个特点是材料丰富，作者要阐述一个问题往往引用许多材料来加以说明，如在论述宋代骈文的特点时，作者从六个方面加以叙述，每一个方面都引用了贴切的材料，从而使论点特别清楚和可信。同时，作者在史的叙述中，还能注意不同时期互相比较，如论到宋代骈文时，作者指出："唐文醇，而少创造之风格；宋文肆，而有犷悍迂腐之病；此其大较耳"。（《宋四六及其影响》），这对深入研究很有益处。当然，这部著作毕竟是九十年前的作品，其中有些观点今天看来已经不够准确了，作者所使用的方法，今天看来也可能显得过时和陈旧了，但它对今天的研究者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管士光）

《骈文史论》　姜书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此书"述二千年骈体文学之起源、发展与夫演变、衰亡之迹，并于历代各家各派之观点、主张及其创作实绩，略以己意有所论评。"（《序》）。在"叙说第一"里，作者论述了骈文名称的由来、骈文的特征即一、同样结构的词句两两并列，如骈之驾二马，二、词句讲求对偶。三、音调协调。四、用典使事，雕饰藻采。在论述了经史丽辞、诸子丽辞、屈宋骚赋之后，作者用四章的篇幅，论述了汉代的散文、辞赋及骈文的发展，特别论述了骈赋的产生及主要代表作家和作品，进而对汉末大骈文家蔡邕作了较为详细地论述。在"建安骈体第九"里，作者论述了建安文学与骈赋、骈文的关系、仲长统的《昌言》、曹操与骈文、曹丕、曹植与骈文以及建安七子和诸葛亮的骈文。以下三章，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发展状况及其主要作家和作品，大体有以下这些内容：魏蒋济、桓范、王肃、夏侯玄、李康、杜恕等人的骈文、傅嘏、何晏、王弼等人的骈文、嵇

康、阮籍与其他“竹林名士”的骈文、以张华、左思、潘岳、陆机为代表的西晋骈文学、东晋刘琨、郭璞、葛洪、孙绰、陶渊明的骈文；从傅亮、何承天到谢灵运和颜延之的骈文、范晔、刘义庆、鲍照与骈文、南齐永明声律说与王融、陆厥、沈约等人的骈文；梁、陈骈文与北朝骈文、从刘勰的《文心雕龙》论及六朝的文笔之辨、江淹、陶弘景、刘峻、丘迟、吴均、裴子野的骈文、徐陵及陈代周弘正、沈炯、江总、张正见、顾野王等骈文家的作品、北朝温子升、邢邵、魏收等人的骈文、庾信及其骈文、隋代骈文家和他们的作品。“唐骈衰落第十三”一章，在论述了唐代骈文衰变的必然原因之后，介绍了初唐四杰的骈文、张说、苏颋及其前后的骈文、韩愈、柳宗元及其前后的骈文、陆贽奏议之骈体、李商隐的四六骈文、四六骈文向社会下层发展。“宋骈四六第十四”首先概述了宋代四六骈体衰变的情况，继而介绍了北宋初期从王禹偁到西昆体的四六文、欧阳修、苏轼与北宋四六骈文、曾巩和王安石的四六骈文、汪藻和南宋人的四六文、王安石创为经义之文及其流弊、宋人歌舞剧曲的四六致语。最后一章概述了金、元、明、清的骈文发展，特别介绍了明、清的制义八股和骈文的余裔——联语。 (齐石宣)

《赋史》 马积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此书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的一部赋史，全书分为十二章。在“导言”里，作者论述了赋的基本特征和赋的起源，概括指出：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它的形成有“由楚歌演变而来”、“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演变而来”、“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等三种不同的途径。作者还论述了赋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在“先秦辞赋”一章里，作者首先论述了战国文化的历史特点，进而研究和分析了屈原的《离骚》、宋玉的《九辩》以及他们的《卜居》、《渔父》、《风赋》、《高唐》等文赋，对荀况的《赋篇》也作了分析和介绍。在有关汉赋的两章里，作者论述了汉赋的特点及成因；汉初赋家贾谊、藩国君臣赋、武、宣之世赋的兴盛；元、成至新莽赋的演变以及东汉前期的赋；张衡和东汉中期作家；赵壹、蔡邕等汉末作家；汉赋的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专题。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及赋作，作者也用了两章的篇幅加以论述，论述的主要内容是：汉末魏初文学的兴盛与赋的新发展、魏及西晋文风的变化与赋的繁荣、东晋赋以及晋宋之际文风的转变和宋代作家、齐、梁、陈三代赋的发展、庾信与北朝赋。在“唐五代赋”的两章里，作者对唐赋的繁荣与概况、唐前期赋、作家辈出的开元、大历赋坛以及贞元、元和前后赋的空前繁荣、晚唐五代赋的继续发展、唐代的律赋、唐代的俗赋等内容都作了细致和深入的探讨与论述。第九、十两章专论宋元时期的赋，作者首先介绍了宋代的文风与宋元赋的特色，进而论述和介绍了北宋初期、中期和晚期作家以及南北宋之际和南宋初期、中期和晚期作家，并用一节的篇幅，专

门论述了金、元时期的赵秉文、元好问及刘因、朱德润等作家。最后两章研究的对象是明清时期的赋，作者论述和探讨了如下一些内容：明代的文学思想与前期作品、明代后期赋的发展与变化、明末清初赋的复兴、清康熙、嘉庆间的学风和赋的特点、古文家的作品、骈文家的作品、朱彝尊等其他作家的作品、道咸以后赋的衰落。本书既注意从史的角度阐述赋这种文体的发展与演变，同时又注意研究和介绍在它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作者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内容（题材、主题、思想等）和形式（体制和表现艺术等）两个方面，来阐明赋的发展以及赋与其他文学样式的交互影响。另外，经过深入地研究，本书对于与赋有关的一些文学现象，如汉代宫廷文学、魏晋以来的骈文、齐梁宫体、宋西昆体、明复古运动等，都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观点。

《中国古代寓言史》 陈蒲清著。198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按中国古代寓言发展的五个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分为五章，章下分节，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寓言的发展与演变以及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寓言作家和作品。作者在《绪论》里论述了古代寓言的范畴和称谓、中国古代寓言的产生和分期以及中国古代寓言的历史地位。《先秦寓言》一章从社会条件、文学土壤、发展概况等方面论述了先秦寓言的产生和发展，进而论述了《墨子》和《孟子》的寓言、庄子散文的艺术精华——《庄子》寓言、富于科学幻想的《列子》寓言以及《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和其他诸子著作中的寓言。在《两汉寓言》一章里，作者首先介绍了两汉寓言的概况，进而论述了两汉劝戒寓言的代表作《说苑》和《新序》、两汉理论著作《新语》、《新书》、《淮南子》中的寓言以及两汉史书中的寓言及其影响。《魏晋南北朝寓言》一章，首先总论了这一时期寓言创作的概况，进而论述了我国第一部笑话专集《笑林》中的寓言及其影响、魏晋南北朝理论著作《苻子》、《金楼子》中的寓言、笔记小说中的寓言以及印度寓言的传入及其影响。在《唐宋寓言》一章里，作者先概述了唐宋时期寓言的复兴，进而论述了寓言诗的产生和影响、古文运动与韩愈的寓言创作、晚唐小品中的寓言以及《无能子》和《伸蒙子》，并设立专节，论述了柳宗元寓言的现实意义和艺术成就。在宋代作家中，作者介绍了欧阳修、王安石、邓牧等人的寓言作品，细致地论述了苏轼的寓言，指出苏轼寓言有承先启后的特色，同时，对《艾子杂说》作了深入地分析和论述。最后还论述了唐宋传奇、笔记、类书中的寓言。《元明清寓言》一章，首先介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创作概况，接着论述了杰出的寓言作家刘基的生平和创作，《郁离子》寓言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宋濂及元末明初的寓言、《中山狼传》及明中叶《叔苴子》、《权子》等寓言、刘元卿及其《贤奕编》、江盈科的寓言创作、赵南星的

《笑赞》、明代《艾子后语》、《笑林》、《雅谑》、《笑府》等诙谐寓言。对清代的寓言，作者主要论述了石成金和他的《笑得好》、清代其他诙谐寓言、《聊斋志异》及其他文言小说中的寓言以及《潜书》等清人文集中的寓言和龚自珍的寓言，最后论述了吴趼人的《俏皮话》。在《结束语》里，作者分别论述了寓言的文体特色、寓言的民族特色、寓言的时代特色、中国古代寓言的整理研究等问题。

（管士光）

《历代名记艺术论》 方伯荣等编。语文出版社 1988 年出版。这是一本集合各种古代“记”体而分类选讲的鉴赏集，编著者选了 60 多篇历代名“记”，对每篇文章的个性特征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艺术探索，还分别归纳了各类“记”的共同特点，分析和总结得都较为准确。从总的类别上，此书分为“山水游记”、“亭台楼阁记”、“图画记”、“人物记”、“器物杂事记”五种。在每一个种类里，选编者都选了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苏轼的《石钟山记》；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白居易的《冷泉亭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还选入了一些历来不为人重视，但又确实很有艺术特色的篇目，如刘因的《辋川图记》、归有光的《吴山图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便是此类作品。在鉴赏和讲解中，作者十分注意从艺术的角度下功夫，或论这些作品的结构，或论它们的语言，有的还论述了这些作品的风格特征，从而使读者能因小见大、由浅入深，提高自己的审美和鉴赏能力。

《山水游记探美》 韩玉奎著。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此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 6 篇论文，这些文章分别阐述了山水游记的源流、山水游记的文体种类、山水游记的审美特征和山水游记的意境美、语言美、结构美，作者论述的对象是作为一种文体的山水游记，因此古今山水游记均是本书叙述的内容，但总的说来，此书所依据的材料主要的还是古代山水游记。第二部分是山水游记名篇赏析，共有 12 篇文章，除有关鲁迅和郭沫若的两篇外，其他均是对古代山水游记的赏析，其中有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陆游的《入蜀记》、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全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贺然青）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 任访秋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6 年出版。本书收入 8 篇论文，在《伟大的现实主义散文作家司马迁》一文里，作者指出：《史记》近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其具体表现，首先是它真实地刻画出了封建统治阶级那种丑恶的面目，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其次表现在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不是纯客观的叙述，而是对那些人物都先有了一定的理解，认识和评价后，才着手写他们。《史记》之所以能够成为优美的文学作品，还由于它的高度的艺术表现手法。它具有一般文学作品所同具的特质，就是形象、典型，以及簡

练生动的语言。关于司马迁之所以能写作出《史记》这样伟大的作品，作者认为有三个原因：一、司马迁继承了先秦的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优良传统，而又加以发展；二、对现实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体验；三、司马迁的出身和遭遇，决定了他对现实的态度。在《桃花源记的思想体裁和写作方法》一文里，作者首先对《桃花源记》所表现的政治思想，和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以及它的现实意义作了分析和说明，指出这篇作品的写成是作者借现实中某些事实，加以发展，借以达到寄托个人理想的目的的，所以就创作方法而论，乃是以现实为基础而产生的浪漫主义的作品。这篇作品在表现上的特点，是自然、简炼、生动，仅用400余字，便写出了作者的理想社会。

《中国古典文学论稿》 邓潭洲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本书共收入13篇论文，分别涉及宋玉、《史记》、《归去来辞》以及韩愈等作家和作品。在《简单地谈谈宋玉》里，作者首先论述了自己对宋玉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分析了他的《九辨》、《风赋》等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指出：宋玉的作品不仅感情热烈，而且爱憎也是分明的。宋玉在性格上虽有某些弱点，但他毕竟是伟大的。他的成功的艺术创作，浇灌了秦汉以后两千多年间的文学苗圃。在《试论司马迁〈史记〉的思想性》一文里，作者指出：《史记》是我国古代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创撰的传记文学作品，司马迁在叙述历史事实时，运用生动的、形象的、饱含着感情的笔调，通过适当的剪裁和重点取材的艺术手法，来反映社会现实，因此他就赋与《史记》以不朽的艺术上的生命。《史记》真正伟大的价值是在于它忠实地反映了社会矛盾，它冲破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描写了极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记叙，严格的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因而就鲜明地表现了司马迁的倾向性。《读〈项羽本记〉》一文指出：《项羽本记》不仅包含了深刻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其一、它在文章的剪裁、结构等方面都处理得非常恰当；其二、它处处前后呼应，连贯性很强；其三，它善于采用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和叙述事件，更使文章达到异常的完美，具有高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作者进一步指出：《项羽本纪》在艺术上的特点主要还是在于它对人物性格的巧妙刻画和所使用语言的无比优美，并结合作品对此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在《关于韩愈思想的评价问题》一文里，作者根据韩愈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及他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具体情况，指出韩愈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对我国唐、宋以后的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是复杂的，瑕瑜互见，只有详细地“占有材料”，并根据正确的观点，全面地加以探究，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方兴元）

《中国古典散文研究论文集》 多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这是一本论文集，共收入12位作者的14篇文章，“其中有确有研究和独创见解的，也有论点成为问题，可以大大展开讨论的”（《出版说明》）。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这部论文集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有总论古代散文作家或著作的，如《“战国策”简论》（潘辰）、《论韩愈》（陈寅恪）、《论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任访秋）；有对古代散文作家及作品进行考证的，如《试论“战国策”的作者问题》（潘辰）、《“试论‘战国策’的作者问题”的商榷》（罗根泽）、《“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郭沫若）、《读郭沫若先生“‘太史公生年考’有问题”后》（王达津）；还有重点研究古代散文的艺术特征的，如《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陈咏）、《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谭家健）；另外，如《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的》（季镇淮）等论文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散文作家及其作品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当然，收在这里的论文发表的较早，现在看来，其中有一些观点已显得陈旧了，但它们所包含的材料，所用的分析方法，以及许多基本的结论，仍为后来的研究者重视和借鉴。（贺然青）

《古典文学论丛》 多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此书共收入论文13篇。在《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王运熙）一文里，作者指出：韩愈诗文的基本特征是力避庸弱，务求奇崛。韩文的语言，有小部分由尚奇而流于怪僻晦涩，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喜欢使用生僻怪异的字。当然，韩文在用词造句方面的怪僻艰险，毕竟还是韩文的次要现象，韩文基本上是明白流畅的，它的基本特征是奇而不是涩。当然，指出韩愈散文的语言风格特征是奇崛古奥，并不因此否定韩文在文学史上的进步意义。韩愈以自己的努力和突出的成就，有力地打击了骈文，动摇了骈文长时间来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使古文运动能够深入开展，到了宋代终于使比较自然的古文取代了骈文的统治地位，这无疑是中国散文史上的重大成就。作者还指出：韩愈在文学爱好上的尚奇倾向，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诗文创作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对别人作品的评价上，他在散文创作和理论上的尚奇倾向，对后来的古文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谈桐城派的方刘姚》（刘季高）一文里，作者首先介绍了“江东第一能文之士”方苞的生平和家庭教育，指出他“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主张是把理学和古文合而为一的“金字招牌”，进而介绍了方苞的所谓“义法”的文学主张并对其作品做出了总的评价：方苞的古文总的倾向，是为清朝封建统治服务的，因为他常常宣扬程、朱的教义。当然，方苞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作者还介绍了“诗胜于文”的刘大櫆和依傍方苞门户的姚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情况，指出：刘大櫆古文成就不如方苞，在他的文集中，看不到他个人的真面目，或则要弄些抑扬开阖的技巧，雷同陈腐；在古文风格方面，姚鼐接近

归有光，属于“阴柔”那一种类型。另外，本集中还有一些文章，如《〈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兼论〈王荆公年谱考略〉中的有关问题》（章培垣）等都有一定的考参价值。

（方兴元）

《逝川集》　冯其庸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这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收了专论古代散文或与古代散文研究、鉴赏有关的论文十余篇，其中《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按散文发展的历史线索，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各个时期主要的散文作品及其艺术特色和主要的散文作家，并概括地指出，从古代散文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一、我国散文的发展过程，与社会现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二、在我国的散文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散文大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善于继承前代的书面语言和善于提炼、吸取当代的口语以丰富自己的散文语言；三、我国古代散文，在题材、形式和风格上都是多种多样的。《司马迁的人物特写》指出《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传记（包括“本纪”“世家”在内），是古代杰出的人物特写，作者从“人物性格的刻划和细节描写”、“对人物或事件进行直接或间接地评论”、“材料的取舍和结构的安排”、“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作品中人物的语言”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人物传记作了细致地分析和研究。从借鉴和介绍前代作家散文写作的成功经验出发，作者还写作了《从古典文学中学习“简炼”的技巧》、《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谈文章的说服力》、《文章修改难》等文章，这些文章深入浅出，对读者学习前人写作经验很有帮助。本书还收入了作者对几篇古代著名散文的赏析文章，即《结构·描写·风格——读〈项羽本纪〉》、《叙事·议论·抒情——读〈岳阳楼记〉》、《意在言外——读〈醉翁亭记〉》，这些文章虽然都较短小，却反映了作者对这几篇古代作品的深刻理解。（贺然青）

《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　任访秋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此书共收入论文 16 篇，内容比较丰富，涉及的作家作品也较多。在《郦道元和他的杰作〈水经注〉》一文里，作者首先介绍了郦道元的生平和其它著述，继而指出：《水经注》在地理学上有不朽的价值，同时在文学上也一样有巨大的成就，它不只是一部地志，而且是一部山水游记，民俗风土录，神话故事集。它描绘祖国各个地方的壮丽幽美的景色，同时也叙述各地的名胜古迹，历史传说，以及风俗习惯，使读者百读不厌。在文体上，《水经注》是骈散杂糅的，从文学的发展看其渊源，应该是楚辞和汉赋。《水经注》的文章对后世作者的影响是很大的，唐宋以来，描绘山水的散文，可以说有许多是导源于道元。在《论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一文里，作者指出：韩、柳提倡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原因是：一、他们提出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二、在创作上，韩柳也有他们系统的理论，他们一面创作出了新的内容与高

度艺术性的散文，同时又有一套系统的创作理论，从而使文坛风气为之一变；三、唐代贞元、元和间是中国文学复古运动的一个高潮，元稹、白居易等人在诗歌上对复古的提倡，以及在散文上对他们的支援，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作者指出：韩愈在散文上的改革，首先是一扫齐、梁以来的浮滥之习；第二、韩文中很少用典；第三、用形象的笔墨，来写一般应用文；第四、句子的多样化；第五、气势雄放。柳宗元的说理文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写景文有精彩入神的描绘，讽刺文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在《关于袁中郎和他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一文里，作者指出袁宏道的散文清新俊逸，其游记作品尤为著名。在《龚定庵文学略论》一文里，作者首先介绍了龚自珍的生平事迹、著述及政治思想和文学主张，继而分析和论述了他的诗歌、散文作品，指出：龚自珍的散文，汪洋恣肆，纵横驰骤。从内容看，其积极意义是：一、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二、对统治阶级中的蠹贼，提出了斗争的方法；三、对未来革命的憧憬与展望。在表现方法上，他最喜欢用寓言的形式，同象征的手法。其次，在句子的组织上，短句短到两个字，长句长到三十六个字，又喜欢在一个长句中，用许多两字一顿的短语，从而使文章的句子富有变化，使读者感到它既雄浑豪放而又骀荡多姿。他的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有丰富的辞汇，特别是他喜欢把辞赋中的辞汇用入散文之中。这一切，便形成了他的散文豪放雄奇、诙诡瑰丽的特殊风格。本集中的其它一些文章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参看。

（方兴元）

《古代文学探讨集》 郭预衡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本书是郭预衡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论著的第一部综合性选本，共收入 40 篇文章。其中，有谈中国文学史编写问题的文章 5 篇，谈古代作家作品评价的文章 19 篇，谈我国散文艺术传统的文章 10 篇，谈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的文章 6 篇。本书的特点是：突出地讨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无论是文学史的编写、作家作品的评价、还是艺术传统的阐述，批判继承的运用，作者都力主学习鲁迅，全面地、历史地、真实地、有批判地对待文学史上的一切。关于写文学史，作者提倡“多用史笔，少作文章”即多向读者作启发性的解说，少替读者做琐碎的分析（《谈谈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文学史教材应写出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面貌，从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不能用文学欣赏的笔墨去介绍作品，不应以研究者的颀赏爱好去代替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叙述，不应以研究者的思想倾向去“改造”历史资料。在介绍一种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时，自然应该讲清其历史背景，但这种背景介绍，不应一般地列叙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而应扣紧文学发展这个主题，介绍相应的社会动态，社会风气，学术思想和已有的文学成就，这才能揭示出作者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从事创作的，才能说明他比他的前人在思想内容

上，文章写法上提供了那些他所特有的东西，才能准确地揭示出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进而阐明其对于当代文学及后世文学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一句话，才能给人以准确的历史感。这就必需有很高的史识，慎重地甄别和使用文史资料；同时，要避免无批判地颂扬古人古作，将古人的某些思想、理论，观点或精神、作风、品行"现代化"，模糊了认识的历史规定性，出于同样的理由，本书在阐述文学传统时，向读者推荐的是白描手法而不是藻饰，推荐的是关于国计民生的论战文章而不是某些写景言情的书札小品。　　（陈鸿彝）

《神话论文集》　袁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出版。此书收入中国古代神话方面的研究论文 10 余篇，对神话领域内的诸多问题，作了学术性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略论〈山海经〉的神话》两篇文章，对《山海经》的一些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说《山海经》是楚人所作，大体上或者没有什么疑问"。"除了《海内经》四篇是成于汉代初年的以外，其余都成于战国时代"。作者对《山海经》中神话的产生、流传与演变的过程作了论述。其他一些论文，如《神话的起源及其与宗教的关系》、《古代神话的发展及其流传演变》、《中国神话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宋玉〈神女赋〉的订讹和高唐神女故事的寓意》，也都很有深度。

（齐石宜）

《柿叶楼存稿》　刘开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出版。这是一本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共收入文章 14 篇。其中《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论司马相如赋的本原和特点》，二文对汉代赋家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作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作者认为司马相如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随着生活的变化，他的辞赋也日趋成熟；作者还就相如一生的重要政治活动和作品的思想问题以及司马相如《子虚》等赋的有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作者指出：司马相如的赋继承了屈原赋，但对屈赋又有所发展，其赋的特点是"宏丽温雅"，如《上林赋》、《子虚赋》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司马相如的文也具有宏丽的特点，其语言生动有力。《论庾信及其诗赋》一文，对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作了论述，作者首先结合历史资料，对庾信的生平事迹作了一番探讨，特别阐明了所谓"徐庾体"的具体内容和特点；继而分析了庾信的诗和赋，指出庾信以能赋著称，人们常常把他和屈宋、曹植相提并论，他的《哀江南赋》、《小园赋》等作品表明他是上接骚赋，也继承和发展了两汉辞赋的铺张扬厉的作风的。庾信的赋之所以成功，其原因主要在于它能有力地反映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动态，抒发作者的爱国的思想感情，从而感动了读者。这和那大半堆砌辞藻、注重模仿的汉赋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对汉赋的一个变革，它继承和发展了屈宋、曹植、鲍照以来的优秀传统。其他如作品中词汇丰富以及用事贴切等，也是成功的重要原因。《杜文窥管》及续篇，针对

杜诗为人所重而杜文为人忽略的情况，指出：杜甫之文与李白、独孤及诸人之文是四杰之后、韩柳之前文章发展的里程碑，想了解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就不能不读杜甫之文。何况，要研究和探讨杜甫的思想及作品，就更不能不读杜甫之文了。作者对杜甫的文章作了探讨，将其文章列出，下面用批语的形式表明自己的评论，或论其文之思想内容，或论其文之艺术特点，或推测其文之写作时间，往往言简意赅，如《进三大礼表》下批道："少陵此作，朴实无华，视陈思为逊色，盖由孔明《出师表》来，求其志尽文畅面已"。

《古典文学论文选》 多人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书共收人论文24篇，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在《韩愈生平及其思想的评价——兼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沿袭》（王昌猷）一文里，作者指出：韩愈提倡"道统"说，是封建制上层建筑演变的一个历史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唐社会现实的要求，他的一生活动是维护唐王朝的统一的；韩愈毕竟不是道学家，而是一个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是与他生动活泼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在《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兼论唐代古文运动》（马积高）一文里，作者首先比较了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同前辈及韩愈的异同，指出他的独特贡献，即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提出"文有二道"说，提出广泛继承和注重创新的见解，强调"气"在古文中的作用。其次，作者从历史的比较中说明文章一代有一代之胜，指出唐代古文家的主要建树是把前人尚未注意的赠序、杂记、杂文等文体的创作推进到一个高峰，柳宗元最擅长的是杂文和山水游记，其价值不仅在于内容深广，艺术上的成就也很高。最后，作者论述了柳宗元和唐代古文家对赋体的革新及柳宗元的贡献：一、柳的《愚溪对》使文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二、柳宗元还继承并发展了骚赋和荀赋的传统，创作了大量的骚赋和四言诗体赋。作者还对唐代古文运动与传奇小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笼天地于形内 挫万物于笔端——我国古代游记初探》（贝远辰、叶幼明）一文里，作者指出：南北朝时期，山水诗文发展起来，以描绘旅游中所见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作为主要对象的游记便应运而生了，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发展，游记成为我国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品种，它的成就是十分喜人的，其一，它好似一束牢笼百态色彩缤纷的画卷，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祖国的锦绣山河，广阔而又深邃地揭示了大自然的美；其二，它好似一面历史的折光镜，在这面镜子里，或隐或显地反映出时代的影子，或强或弱地袒露着作者的灵魂；其三、有些篇章借助山水来生发议论，阐述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某种人生哲理；其四、其中的一部分与我国古代科学研究的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不仅是优秀的文学著作，而且也是杰出的科学著作；其五、从选取题材直到具体描绘，都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表现出高度

的艺术技巧。

《古代文学研究集》　多人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本书共收入论文24篇，其内容以论述古代诗歌、戏剧、小说为主，但有一些总论性的文章仍然涉及到古代散文的研究，如《关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曹道衡)一文，作者就几个问题——关于批判和继承，关于观点和材料，评价作家、作品的几个具体问题等，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涉及对古代散文作品的评价，如作者认为《孟子》逻辑性强，语言生动，善于使用比喻，具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在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孟子》一书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本集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谭家健的《关于古典散文的若干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针对古典散文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古典散文的范围有多大，它应该包括那些体裁，怎样分类，史传文、议论文算不算散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首先对中国古代的散文发展作了一些历史考察；其次，作者提出了自己对散文概念和散文范围的意见，作者认为，首先应该把散文和韵文分开，骈文和赋大体上也应归人散文一类；其次，要把西方的散文概念和中国的散文概念区别开来，即不应把小说也归入散文一类。第三，在非韵文即广义散文之中，又可分为纯文学散文，具有文学性的散文和一般文章三类。第四，在具体评价作品时，要把文集和单篇，全书和章节分开来看，不宜笼统地说某人的集子或某书算不算散文。第五，从纵的方面看，随着时代的先后，散文范围应有所不同。作者还论述了散文的分类问题，他认为，应以内容为主，形式为辅的原则来给散文分类，因此他将古代散文分为四类——记事类、写景类、抒情类、说理类。　(方兴元)

《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部论文集所收文章涉及面很广，其中有几篇专论古代散文作家及其作品，如《散文源流》、《先秦散文发展概说》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论文。在《散文源流》一文里，作者论述了如下问题：中国散文之义界及其分期、应用的散文之萌芽期。在《先秦散文发展概说》一文里，作者论述了《论语》、《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先秦散文作品，并勾勒出先秦散文发展的线索，指出先秦散文的人民性，不只表现在内容方面，也表现在形式方面，主要的就是运用了人民的语言和语法。“正因为先秦散文家划时代地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意识，运用了人民语言，所以才能划时代地发展并奠定了相当完美的散文的艺术形式。”在《〈洛阳伽蓝记〉试论》一文里，作者首先介绍了杨衒之以及《洛阳伽蓝记》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进而分析了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指出它“确是一部有组织、有去取标准的专著”。本集中还有其他几篇文章如《〈李邕墓志铭〉跋尾》、《韩欧辟佛的反响》、《读〈东坡七集〉》、《苏轼的文学思想》等都是很有深度的力作。　(齐石宜)

《历代散文丛谈》　郭预衡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收存了郭预衡先生近30年来在散文研究过程中撰写的34篇重要论文（少量为成书时的新作，多数是历年发表过的），由作者亲自编定。全书上自《东鲁春风，商华秋水》，下至《五四散文与文风》，形成了一个纵论千古汉语文章的理论构架。书中所研究的课题，有些是古代散文教学与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如班马优劣论，八代文风与曹操，宋代散文的特色等题皆是；有的则是古代散文教学与研究中被轻视甚而被遗忘的、然而又确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如辽金元的散文、王阳明与袁中郎的文学活动，归有光文章别解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汇聚，完成了对全部古代散文的历史考察。概略地说来，不同时期的文章各有其时代特色：商代靠天发令，言辞简截；周代恭谨说教，注重伦理；春秋战国尤重辞令，两汉文章有歌颂也有牢骚，六朝文章无拘检，唐宋文章好议论，明人重性灵，清人讲义法，近代作者纵笔求新，各有所成，也各有所偏，不能一概而论。文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质而后文，文而后质，文质相推，斯文乃进。在论述作家作品时，作者善于从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倾向上，去剖析一种文风、一种写法或一个流派其所以形成的历史因由，给人以强烈的具体的历史感，没有空泛的议论。比如班固为什么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写汉家历史？韩愈是怎样写作他的“谀墓之文”的？桐城义法到底还有没有某种积极意义等等。作者绝不随意重复世人的一般议论，也不仓促下判断，而是精详地勾稽历史资料、考查具体作品，从中引出必要的结论。而且，作者又总是把从中引出相关结论的作品例证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自行判断的相应条件。这种尊重读者的态度，也贯串于全书，形成他的论著的一大特色。本书行文朴实畅达，用语雅洁，时见情采，读来平易可亲，显示了作者对学术文章净美纯正境界的不懈追求。

（陈鸿彝）

《中国古代文学论稿》 胡念贻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此论文集共收入有关散文和赋的论文9篇。《〈尚书〉的散文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指出：《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总集，是我国古代散文的源头。《尚书》中的一些篇章成为古代散文的典范，其艺术特点表现为：一、有些篇章写得富有感情，从感情的流露中表现了作者的自我形象；二、《尚书》中的文字在叙事方面也有特色，在当时说来，它在这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三、《尚书》各篇在语言方面都是精心不苟具有特色的；四、《尚书》中许多篇很注重结构，在命意谋篇上下过功夫。因此，《尚书》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在：一、《尚书》是我国古代散文的源头；二、秦汉以后，各个朝代一些制诰章奏之类的应用文字都和《尚书》有着传统的继承关系；三、《尚书》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于推动散文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特定的作用。《〈左传〉真伪和写作时

代问题考辨》一文，就三个重要问题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左传》不是一部为《春秋》作传的书，《左传》不是刘歆的伪作，《左传》作于春秋末年，后人虽有窜入，但它还是基本上保存了原来的面目。《贾谊和他的散文》一文，作者指出：西汉散文的变化和发展，是从贾谊开始的，他在我国散文史上，是一个重要作家。他散文的代表作是《治安策》和《过秦论》三篇，前者在我国散文史上是空前的巨制，也是第一篇很有价值的政论文章。它篇幅虽长，但使人读来觉得痛快淋漓，没有繁复的感觉；后者共有三篇，文学价值较高的是第一篇，这一篇在叙述当中，有很明显的辞赋化的倾向，极力铺张。全文只一千余字，内容十分丰富，结构十分严密。在文学史上是一篇散文杰作。《论〈史记〉的文学价值》一文，首先分析了司马迁之所以能写作出《史记》这样不朽之作的主客观原因；继而指出：司马迁在文学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和他巧妙地运用他所创造的修史体例（即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纪传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史记》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它成功地写出了许多人物传记，它的一些作品能够写出人物一生的主要经历，刻画出他们的性格，并且在组织和结构上都有很巧妙的安排。《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一文，在介绍了他的生平以后，作者指出：欧阳修一生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而以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散文的显著特点是它的低回感叹和委宛曲折，前者指浓郁的感情，后者指表达感情的方式和笔调。他的散文所表现的思想看起来是一些平常的道理，然而写得富有感情；他所描写的风景也多是一些寻常景物，然而它写得是那样幽美，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等都是这样。其它几篇论文，如《宋玉和他的作品》、《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汉代的辞赋》、《论汉代“京殿苑猎”赋》等或论作家，或论作品，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方兴元)

《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这部论文集所收论文涉及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有关古代散文作家及其作品的有 9 篇。在《先秦散文述论》里，作者论述了与《尚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先秦散文著作有关的问题；《辞·赋·颂》，论述了赋这种文体的产生，指出它同辞一样皆源于春秋时的政治辞令；《关于汉赋》，指出以司马相如作品作为代表的典型的汉赋，是在汉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统治阶级实行思想统治的情况下产生的。经过分析，作者指出汉赋尽管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但它毕竟有一定的创造性；《由汉赋之地理区分说到文学与地理之关系》，作者以汉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 7 人为依据，叙述了汉赋在地理上的区分，从而论述了文学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有关扬雄》，作者客观地分析了扬雄的作品，一方面指出他的《羽猎赋》等，过分铺陈夸张，只是为了阿谀帝王，同时又指出扬雄也有一些思想性较好的作品，如《长杨

赋》便有很强的风谏之意，《逐贫赋》能以对比的方法，尖锐地揭露当时的阶级矛盾。总的看，扬雄的实践证明他已超过了司马相如，这一点刘勰已经指出，后世及今天有些人认为扬雄只会模拟，是不加分析的说法；《〈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分别论述了有关这两部散文名著的问题，如作者的事迹、作品的特点、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作品的思想倾向等，同时也论述了这两部作品的历史局限；《韩愈诗文系年辨证》，考定了韩愈一些文章，如《上贾滑州书》、《祭郑夫人文》等的写作年代；《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评龚书炽〈韩愈及其古文运动〉》，分别阐述了作者对韩愈及其领导的古文运动的评价和研究成果。（管士光）

《姚奠中论文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共收论文 43 篇，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其中专论散文家及其作品的文章均极有价值，如《试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作者特别强调了庄子的批判精神，指出《庄子》这部作品内容的主要特点，就是对现实所采取的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尽管《庄子》书中有些消极的东西，但庄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这些光辉伟大的名字并列。《司马迁的传记文学》，作者首先论述了司马迁的思想，继而论述了《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作者往往仅用数语，便能收到既全面又深刻的效果，如作者用“智慧、冷静、忠厚、单纯”八个字，概括出韩信的性格；用“裙带关系的力量”，概括了《卫将军骠骑列传》的主旨，都是非常精辟的。另外，《柳宗元的辞赋——柳宗元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之一》，细致地研究了古文大家柳宗元的辞赋作品，指出柳宗元的辞赋之所以有价值，是和他的进步的思想分不开的。在进步倾向的基础上再加之以精湛的艺术造诣，就使他的辞赋在许多地方超过了前人，在思想和艺术上，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古文运动”与“唐宋八大家”》，介绍和分析了中国文学史上两次著名的“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对他们的贡献给以高度评价，指出由于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由于“八大家”的写作实践，使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散文，长期占据了散文发展史上的主流地位。此书还有几篇总论性质的文章，如《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分析问题》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散文名作欣赏》 多人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年出版。此书共收入古代散文的鉴赏文章 15 篇，这些文章对我国古代部分散文名家的优秀作品进行了较为精辟的分析，见解深刻，文字畅达，有些文章还对古代作家的散文作了总的评价，如《所谓“谀墓之文”和“以文为戏”——读唐代散文随笔》（预衡），作者便指出韩愈散文的主要成就，不在论说和赠序，因为他本来不是思想家，而只是所谓“工于文者”，由于理论水平不高，有些论说文章，他就徒具声势；韩愈的“赠序”一类文字，比较喜欢架空议论，有些文章铺陈过当，理不胜

词。作者认为韩愈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叙事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们所谓"谀墓之文"和"游戏之文"。有些文章则较留意于古代散文的艺术特色，如《精美的赋体散文——〈阿房宫赋〉的艺术特色》（吴功正）、《生动传神　刚柔相济——介绍元代散文〈大龙湫记〉》等便是这样的文章。总之，这本鉴赏集对广大读者了解古代散文家不同的艺术风格，从中学习古代散文艺术严谨精严的构思、深远隽永的意境和洗炼优美的文字，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名文欣赏》　多人著。岳麓书社1984年出版。此书选取近年来国内杂志所发表的我国古代散文名篇的赏析文章48篇，除其中一篇的原作在文中完整抄录无需再附外，其它各篇后都附有原作，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所选原作，如《庄子·逍遥游》、《长门赋》、《出师表》等均为历代公认的名篇，作品思想格调都较高，艺术感染力也很强，它们出自各个朝代具有代表性的名家之手，很能体现我国古代散文的风貌特色。所选取的赏析文章，如《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读韩愈〈祭十二郎文〉》、《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讲析》、《读〈五代史伶官传序〉》等一般都能对原作进行透彻的讲析和评论，有的还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学术上的新见解。

《古典散文名作赏析》　多人著。《名作欣赏》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书共收入赏析文章30余篇，这些文章分别对《左传》、《庄子》、《史记》以及唐、宋、明等许多散文家的作品作了细致地分析和介绍，其中有许多篇写得相当出色，如《精比巧喻　奇幻莫测——读〈庄子·逍遥游〉》（诸斌杰、王景琳）、《文情并茂　理趣盎然——读〈兰亭集序〉》（周维德）、《闪耀着哲理光辉的论说文——谈苏轼的〈日喻〉》（徐中玉）等，都是值得一读的。

（齐石宣）

《古代散文鉴赏辞典》　多人著。王彬主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这部辞典选入了500多篇散文佳作，上起先秦，下至晚清，从时间上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每一篇散文作品都配有一篇赏析文章，这为读者阅读和研究中国古代散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部辞典的选目很有特点，它不仅大量收入了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作品，还适当收入了一些介于散文和韵文之间的"赋"，如宋玉的《风赋》、《高唐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等都收入了。另外，历来研究者都较重视先秦和唐宋散文，而对明清散文却有所忽略，其实明清两代的散文，也有许多名篇佳作，很值得介绍给读者，这部辞典弥补了这个缺陷，在明清散文中各选了100余篇，约占全书比例的五分之二左右，"这不仅大大开拓了读者的眼界，而且对我国丰富的散文遗产也起到了发掘传播的作用，这就比坊间习见的局限性很大的《古文观止》之类的读物具有更大的特色"（引自吴小如为本辞典写的《序》）。从鉴赏文

章的作者来看，有不少是研究专家，如周振甫、韩兆琦、吴小如等先生都为这部辞典写了文章，他们的文章分析深入，言之有据，对读者很有帮助，但大量的文章都是中青年研究者写的，他们的文章有的虽然难免显得肤浅，但大都很有生气，常能从前人未曾注意的角度对古代散文进行分析和介绍。 （贺然青）

《古文精读举隅》 吴小如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此书共收古典散文赏析文章 40 篇，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和教学的成果。这些文章或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或论述其艺术特点，大都观点鲜明，深入浅出，对读者阅读原文很有帮助。

《历代名篇赏析集成》 多人著。袁行霈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年出版。这部鉴赏辞典精选了先秦至“五四”历代名作 900 篇。其显著特点有三个，其一，此辞典收入的作品，包括各种体裁，其中散文及辞赋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二，赏析文章中有三分之一散见于“五四”以来的各种报刊书籍，三分之二是新撰的；其三，此书作者共 400 余人，几乎包括了国内所有长于写作赏析文章的研究者。因此，这部辞典不仅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而且所收赏析文章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平。袁行霈在《序言》中说：“我们希望这部书既有总结性，又有开拓性。既能反映当前古典文学鉴赏的水平，又能为鉴赏学的建立开辟道路”。

《历代骈文名篇注析》 多人著。谭家健主编，黄山书社 1988 年出版。本书选录自汉至清历代骈文名作 58 篇，力求比较系统地介绍骈文发展和演变的大致面貌，比较具体地反映骈文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其选录标准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有些二者未能得兼但在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作品也酌量选入了。因为骈文大多用典繁密，修辞华美，本书的注释便以简明扼要、通畅易懂为原则；所选文章，每篇均有简要评析，介绍作家生平和写作背景，评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书前有谭家健写的“代前言”《历代骈文发展概述》，向读者介绍了历代骈文发展的大致轮廓；书后有谭家健写的《略谈骈文的基本特征》一文，从“行文普遍要求对仗”、“句式以四六为主”、“选词大量用典”、“要求大致的声律”、“讲究藻饰”等五个方面介绍了骈文的基本特征。 （齐石宜）

《中国名胜诗文鉴赏辞典》 多人著。佘树森、乔默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本书是中国名胜诗文之荟萃，共收录古代和现代诗文 353 篇，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古代散文名作，每篇原文之后附一篇鉴赏文章，选文标准“一是所写内容，依然能成为今天旅游之对象；二是艺术精美，有较高的鉴赏价值”（《凡例》）。

《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 多人著，傅德岷、张耀辉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此书共收入中国古典散文名篇 70 余篇，每篇散文原作之后配有一篇鉴赏文章。

（侯文朴）

《古今名作鉴赏集粹》 吴功正著。北京出版社1989年出版。此书对中国古代、近代、现当代的近70篇作品从美学等角度作了详尽的鉴赏和分析，涉及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体裁，其中古典散文作品近20篇。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文字流畅洒脱，深入浅出，对读者很有帮助。书后还附有“名作鉴赏美学论要”方面的论文五篇，为广大文学爱好者进行作品鉴赏，指出了门径。

《古文鉴赏大辞典》 多人著，徐中玉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全书收目上溯《尚书·无逸》，下迄民国烈士林觉民《与妻书》，共468篇。不仅历代脍炙人口的大家名篇尽收书内，而且还包括了一般读者不太熟悉的《无逸》和一般散文选本不收的《浮生六记》，其他如钟嗣成《录鬼簿序》、宋史《张顺张贵传》等都是较冷僻的作品。除了每篇原著后附有历代评家深有心得的精评外，附录有“作家小传专集要介”、“古文总集简介”、“文体知识概说”、“文章流派述略”、“名家论文类辑”、“古文工具书举要”、“古文名句索引”、“篇目笔划索引”等8种材料。

《艺苑撷英》 常振国、降云著。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此书是一部鉴赏文章的合集，共收古代散文鉴赏文章16篇，涉及的范围较广，即有先秦散文作品，如《左传》、《战国策》等名著中的名篇，又有宋、明、清各代如苏轼、刘基、宋濂、郑燮等人的散文佳作。作者在探讨古代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同时，较偏重于从艺术特点和写作技巧的角度，对古代散文作品作具体分析和欣赏，如《丝扣环连严谨有致——读〈东莱博议·郑伯侵郲〉》、《文章之妙 贵在传神——读宋濂〈秦士录〉》、《烘云托月绘英雄——〈冯婉贞传〉写作特色浅析》等便是这类文章。作者在《前面的话》中指出：“欣赏文章虽然有别于学术论文，但好的欣赏文章又往往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它离不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纵的方面要研究历朝历代对这一作品的评论；横的方面要研究同时代人对这作品的研究水准。欣赏贵在创新，最忌人云亦云。同样一篇作品，可以从不同的审美角度写出很多篇欣赏文章，而具有独到体会和研究的才是好文章”。收入此书的鉴赏文章正体现了作者的这种追求。

（洪星柯）

专题研究

《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 杜国庠著。三联书店1955年出版。此书共收入6篇论文，或论先秦诸子的思想，或论先秦诸子的作品，有的还就某一问题作了综合的研究，这6篇论文的题目分别是：“论公孙龙子”、“论荀子《成相篇》”、“荀子从宋尹黄老学派接受了什么？”、“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

《先秦寓言研究》 王焕镳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本书

共分5章，对先秦寓言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作者首先从寓言与神话传说的关系、寓言与谚语民歌的关系以及由比喻发展为寓言的过程等方面论述了寓言的起源；又从士阶层以辩说进身、辩说中采用寓言的缘故、寓言用夸张手法的根源等方面探讨了先秦文学中含有大量寓言的社会根源，进而论述了寓言的作用，作者指出寓言至少有四个作用，即一、阐明事理、加强说服力的作用；二、对于统治阶级和一般人情世态的讽刺作用；三、说教作用，包括劳动生活的经验、关于人事的教训、关于阶级的认识等三个方面。四、隐晦的作用，因为有时不能直露其辞，只好隐约地用寓言表达自己的意思，让读者仔细去体会。作者还从比喻的性质、主旨的说明、夸张性的表现手法、人格化的手法、语言和风格等方面论述了先秦寓言的艺术特征。最后作者考察了先秦寓言的影响，主要内容有：隐语与寓言的合流、对语言的影响、对文学的影响。在《结论》里，作者指出先秦寓言大部分原为民间的口头创作，为先秦学者们利用为自己作品的题材，经过一番加工之后，又有了新的提高。它们即反映了人民的智慧和生活，在内容和艺术上又有优秀的品质，值得认真地研究和整理。（齐石宜）

《先秦文学论集》 胡念贻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书收入论文17篇，除论《诗经》、《楚辞》和神话的论文以外，有7篇是专论先秦散文著作的。在《论〈左传〉》一文里，作者论述了《左传》的作者问题、《左传》的艺术成就、《左传》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在《〈左传〉叙事的倾向性》一文里，作者指出：《左传》虽然是一部编年体的著作，它有许多地方却是以事件为中心。这给它的作者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带来很大的方便，使作者在叙述事件时有无限广阔的天地来施展他的才情。《左传》在叙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时，作者总是对于这一事件作出了他的评断；他在叙述中表现出了鲜明的观点，使每一事件在叙述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倾向性，其表现方式也是很独特的。在《论〈战国策〉在文学上的成就》一文里，作者认为《战国策》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司马迁和唐宋时代的一些古文家，都曾受到它的影响，它的风格特点是“辩丽恣肆”。《战国策》广泛地记载了当时各国的政治斗争，许多地方比较精细地刻画了人物的精神状态，描绘了一些人情世态，它还记下了当时一些辩士的词锋，记下了一些人对于政治的长篇大论——它的辩丽恣肆，正表现在这些方面。这种风格的形成，和那个时代的风尚、时代的精神有密切的联系。在《从人物形象论〈论语〉的文学价值》一文里，作者指出：《论语》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它写出了孔子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形象。这部书所写的人物，都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以表现一个人物为中心的著作，这是第一次出现。《论语》所写的孔子的形象，相当鲜明。同时，也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子路和颜渊。《论语》中一

些格言式的表述哲理的语句，有的也富有文学意味。在《〈孟子〉的文学价值》一文里，作者指出《孟子》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刻画了孟轲这个人物形象，同时还描写了其他人物，如齐宣王、梁襄王、陈仲子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其次，《孟子》里面的论说文字，有一部分也具有文学意义，如《孟子》较多地运用了比喻，它的许多比喻常常是拈出生活里面一件习见习闻的事来，一针见血地说明一个比较复杂的和有意义的问题，都用得很巧妙。《孟子》所用的比喻构想有时很奇特，能使人震惊；有时又别具风味，很耐人寻味。《孟子》文章的总的特色是感情很充沛，有时也很激越，从而形成了文章"有气势"的特色。在《论〈庄子〉的散文》一文里，作者指出《庄子》为散文的写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在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庄子》的文笔向来被称作是"汪洋恣肆"和"谲怪"的，这主要表现在意境的开阔和想象的丰富上。作者在分析和研究了庄子及其散文的思想倾向以后，又通过分析《庄子》中的寓言故事，从文学的角度对《庄子》作了深入地研究。作者进一步指出：《庄子》对客观事物的描绘刻画有很巧妙的艺术手法，它不仅能够描绘那些难于描绘的事物，而且善于描写人们的心理和抒发感情。同时，《庄子》还善于讽刺，它善于把被讽刺对象的心理状态细致地刻画和描绘出来。总之，《庄子》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有它的重要地位。

（管士光）

《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

祝端开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此书对先秦社会的社会性质和先秦百家的思想及著作作了系统的探讨，对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孙子兵法》、《帛书四篇》、《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诸子的著作所表现的作者思想作了细致地分析和论述。

《先秦七子思想研究》　童书业著。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此书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七子所处的阶级地位出发，探讨了孔、孟、荀、墨、老、庄、韩非七家的思想，全书材料丰富，论述深入，如《孔子思想研究》便结合《论语》探讨了孔子的宇宙观、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庄子思想研究》根据《庄子》一书，论述了庄子的天道观、认识论、人生哲学。在《概论》一节，还探讨了《庄子》三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总之，此书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了先秦七子，对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论语》、《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先秦著作很有帮助。

《先秦诸子杂考》　金德建著。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本书共29章，分别对孔子、墨翟、田常、老莱子、老聃、慎到、惠施、邓析、申不害、尹文、田骈、陈仲、乐正子春、孟轲学派、尸佼、荀卿、韩非等的某些方面，包括学说渊源、学术思想、所属流派、内外策略、历史功绩、存佚著作、出身为人，都分别作了考证；对于《论语》的复杂内容，《墨子·尚

贤》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老子》的成书情况，《大学》、《中庸》的思想体系，《管子》中《任法》、《枢言》、《心术》、《白心》、《内业》等篇的作者，《荀子》某些篇章的思想内容，《尸子·广泽篇》的综合倾向，《礼运》的思想渊源及作者，都作了具体分析。此书内容丰富，论述深入，是研究先秦思想史和先秦散文的有价值的参考著作。

（齐石宜）

《先秦辞赋原稿》 姜书阁著。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在《宋玉及其辞赋考辨》一节里，作者首先分析了历史上屈宋并称的原因，介绍了宋玉的生平传略，继而对宋玉的遗文作了考辨，指出确属宋玉作品之留存至今者，赋体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3篇，骚体则有《九辩》一篇，共4篇而已。最后，作者论述了宋玉的影响，指出宋玉的辞赋艺术成就是很高的，其作品均极尽写人、写物、写景、写事之妙，所有这些，都成为后世文人，尤其辞赋家仿效、摹拟，乃至抄袭的蓝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确可与屈原的作品相比。宋玉文章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好的一面，如他用词的准确而多变，讲究声调音律之美，善于细致地描绘景物、刻画感情，在艺术上有新成就；但有些作品并无个人的真情实感，仅出于单纯的摹仿，便成了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了，对文坛也产生了恶劣影响。在《宋玉〈高唐〉〈神女〉为汉赋之祖说》一节里，作者指出屈原的作品与宋玉以后的汉赋在文体上是不一样的，“骚”、“赋”既别，名号乃立，其结论为：骚体赋作于屈原，赋或曰文体赋始于宋玉。宋玉是词人之赋体的创始人，而《高唐》、《神女》则为汉人赋体之祖。在《〈荀子·赋篇〉平议》一节里，作者指出荀子首创以赋名篇，是楚辞发展成赋的主要过渡作家，所以其作品《成相》、《赋》等，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中自有其重要地位，荀卿赋对后人影响之大，主要当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孙卿赋类二十五家及杂赋类十二家（其中包括“成相杂辞”在内）这些记载得到证明，虽然这些家的作品今已多不得见。另外，《〈荀子·成相〉通说》一节，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贺然青）

《先秦诸子初探》 刘毓璜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书论述了孔子的仁学、《左传》、《国语》中所见到的孔子、思孟学派对儒学的发展、杰出的儒家异端荀况、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墨家学说的人民性以及吕不韦其人和《吕氏春秋》其书等专题，虽然主要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但对研究先秦百家的散文著作仍有很大的帮助。

《先秦名家研究》 许抗生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此书对先秦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的学说，作了比较细密的剖析；对儒、墨、道、法、阴阳诸家与名家的争论，也作了比较详备的叙述，“取材丰富，论断允当，有独到之处，是一部有价值的哲学史著作”（张岱年《序》）。同时，此书对《公孙龙子》作了深入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因此，此书对先秦散

文的研究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齐石宜）

《先秦散文纲要》 谭家健、郑群华合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台北明文书局1990年增订重版。全书共有18章，全面叙述、评析了中国古代先秦散文的产生背景、发展阶段、历史特点以及先秦主要散文著作的文学价值、艺术成就，同时扼要介绍了散文作者的生平、作品成书年代和主要思想观点，尤其是文学观、美学观，系统反映了先秦散文的总体面貌，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先秦散文断代史。《先秦散文纲要》的研究范围，较之传统的先秦散文研究有较大的拓展，不仅讨论了那几部重要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而且论述了许多文学史未提及的先秦兵家、名家、法家、道家、杂家及其他儒家著作，包括《孙子兵法》、《公孙龙子》、《管子》、《礼记》、《尸子》等。在资料上，则广泛搜罗，严加考辨，特别注意运用七十年代后出土的各种文物资料及科研成果，如《尉缭子》、《文子》等书，过去皆被视为伪书，作者则根据新出土的山东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竹书、河北八角廊村西汉墓竹简本、湖北马王堆帛书等，确认其为先秦古籍。《先秦散文纲要》对先秦散文总貌的描述，注重从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各种文学现象，注重运用比较的方法，阐发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同时充分顾及作家美学观、思想观对作品的影响，如对《庄子》、《战国策》寓言的横向比较，对《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荀子》艺术风貌的纵向比较等，就都是从“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的。又如从孟子主张言语要平易、意旨要深刻的美学观论述孟子散文，从庄子的思想特征评析其散文特色，也都分析透辟，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先秦散文纲要》在编写体例上不采取传统史书分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论作家、作品的固定格式，而是抓住作家、作品的主要特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深入分析，提出一家之言。同时对一些尚存争议的诸如成书时代等问题，也以一定篇幅予以考辨。书中的论述次序，则尽可能注意先秦散文发展的阶段性，大致以作品成书先后为准，而不完全以作家活动时代为据，这些都体现了作者的治学特点。此书问世后，受到了学术界的注意，有若干篇书评发表，都充分肯定了此书在先秦散文研究内容的开拓上和提供新资料方面的贡献。 （王景琳）

《左传通论》 方孝岳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此书共分4篇，《文旨篇》探讨了“《左传》文研究法”、“求文于《左传》与求文于他经之异”、“求文于《左传》与求文于《春秋》本经之异”等问题；《源流篇》论述了《史记》论《左传》之缘起、刘歆班固论《左传》之缘起以及后人对《左传》的研究；《史意篇》从史学的角度对《左传》进一步作了研究；《释疑篇》针对后人的一些疑问，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释唐啖助《左传》为口授之疑”、“释汉太常博士左氏不传《春秋》之疑及近人引申汉太常博士之说谓刘歆伪造凡例之

疑。"此书对研究《左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齐石宜）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初版后，作者在编辑的支持、协助下，进行全面修订。修订本将于1990年问世。

《左传》以编年体形式，从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风俗等多侧面展示春秋时代255年间（前722——前486）的历史，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叙事翔实生动，写人性格鲜明，文字凝炼典雅，辞令恢弘洒脱，取得巨大的文学和语言成就，成为后代历史著作和叙事散文的典范。作者自幼诵习《左传》，早年萌生整治《左传》之志，留意搜集、阅读有关书籍和资料。60年代初，正式开始《春秋左传注》的编著工作。经过近20年辛勤劳动，完成这部百万余字的巨著。是为作者一生代表之作。

本书以通行的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复取阮氏《校勘记》所未见之六朝人手书残本、日本金泽文库本、多种敦煌残卷等作校勘，并参考各种类书和其它唐宋以前古书的引文，厘为新的定本。于《春秋》经文，详列《公羊》、《谷梁》之异。每年之首，具列干支、公元纪年、周室及重要诸侯纪年。重新核正《经》、《传》的章节。对全部原文，从字音词义、语法修辞、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地理沿革、风尚习俗诸方面进行诠释。注文采用浅近文言，广泛汲取2000多年来古今中外《左传》学的成果，引用书籍近500种，还充分利用近现代考古学成就和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使之与作者创见融为一体，对《左传》注释作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向广大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提供了一部简明而博洽、方便而精当的《左传》新读本。在国内外获得普遍好评，《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等有专文评介。

与该书配套而行的，还有经作者指导、由沈玉成作的《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1版）和作者及其夫人徐堤编的《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5年11月第1版）。这三部书，以《春秋左传注》为主体，分别从注释、翻译、词汇不同角度出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研读《左传》的系列套书。（李建民）

《左传疏证》 徐仁甫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此书共分10个问题，即"论左丘明撰《国语》"、"《左传》采《国语》例证"、"《左传》采《国语》之规律"、"《左传》与《公羊》、《谷梁》、《檀弓》之比较"、"《左传》采诸子例证"、"《左传》采《史记》例证（上、下）"、"论西汉人不见《左氏传》"、"《左传》采《新序》、《说苑》、《列女传》例证"、"论《左传》出于刘歆之手"。作者将《左传》与有关古籍细加剖析之后，认为《左传》并非成书于先秦的解经之作，而是西汉末年刘歆博采群书之后精心加工而成，因此能集众家之长，从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作者全面而细致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前人各种异说均加以讨论辨驳，故而能成一家之言，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战国策考辨》 缪文远著。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此书资料丰富，从诸经注疏、史书、诸子、文集、笔记到后来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云梦秦简《大事记》等，凡属有关资料，无不广搜博采，而此书用力最多的是两个方面，其一为系年，其二为辨伪。作者萃集众家之说，分析判断，"或择善而从，或自树新义，旁通曲证，求其本真，义据通深，持之有故"（缪钺《序》），从而对《战国策》所记诸事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订。这无疑对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战国策》很有帮助。

《论语研究》 温裕民著。商务印书馆30年代出版。此书共分6章，第一章为《论语考原》，叙述了论语的作者、论语之三家、三家之混合等问题；第二章《孔子之哲学观》，论述了孔子的道、德、性、命等观念；第三章《孔子之道德观》，论述了孔子之"仁"、"孝弟"、"忠信"、"刚与勇"、"知"、"义"、"修养"等观念；第四章《孔子之政治观》，论述了孔子"正名"、"德治"等思想。第五章《孔子之教育观》，从论教、论学、论礼、论乐、论诗等方面介绍了孔子的教育和文学思想。第六章为《结论》，论述了孔子受客观环境之影响、孔子学说内部之组织以及《论语》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 （齐石宜）

《论语新考》 刘光宇著。世界书局1948年出版。作者鉴于前人对《论语》理解多有偏差之处，故而写了这部著作。此书对《论语》"摘其要目，考绎诂训，推原事类，力求精当"（《自序》），在"古文、词法、故事、乐章、赋税、卜筮、衣制、人物"等方面作了考证，对研究《论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管士光）

《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本书按照《论语》的篇次，逐章进行注释，并翻译为现代语体文。章节的分合，比较斟酌以往各家的异同后择善而从。文字的校定，广泛利用古今学者成果，取舍缜审。注释的重点是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诠释。于疑难之处，有简明的考证，或注明出处，或略举参考书籍，以便读者查究。译文在尽可能不走失原意并保持原来风格下力求流畅明白。古人言辞简略，有时为补足文意而于原文涵义之外增添的词句，加方括弧作为标志。译文参照严复在翻译西文时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采取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注意通俗化、大众化，充分照顾到专业工作者以外广大读者的阅读方便。书末附有《论语词典》。《词典》论"词"不论"字"，兼收近于"词"的"词组"；凡见于《论语》本文之词，不论基本词或派生词，习见义或罕见义，一律收录；词条按词头笔划为序排列；词目下，先释词义，再举例句；一词多义，分列义项；每词各义一般均标注出现次数；与"注释"交相为用，详于"注释"者，"词典"仅略言之，而"注释"未备者，"词典"则补充之。

由于作者深厚的功力和卓有成

效的工作，这一富有创造性的整理古籍新方法，达到了预期目标：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原著，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又为自学者提供了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阶梯。该书不但获得大陆众多读者的喜爱，而且受到港台及世界研习汉学者的欢迎，日本东京和京都的大学曾采用此书作为教本。

（李建民）

《论语新探》 赵纪彬著。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作者力图通过《论语》一书，对春秋时期社会性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进而阐明古代前期儒家的阶级基础、哲学体系及历史地位等问题。全书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从《论语》所记“孔子应答时人、弟子及弟子相与言”中，探求其无意透露的关于当时社会性质的资料，借以确定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下部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出发，将《论语》一书作为古代儒家的原始经典，探讨前期儒家的哲学体系。此书虽属于思想史著作，但对从文学角度研究《论语》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齐石宜）

《论语——散文艺术的萌芽》 黄绳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是作者的一本中国古代散文札记，着重探寻《论语》中的散文艺术，极少涉及它的思想内容。作者指出欲知中国散文的早期艺术成就，则不能不读《论语》，《论语》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文学价值、语录体的散文集，它善于运用精粹的语言表达抽象的意念以及具有一定深度的哲理，不仅开辟了说理文字的发展道路，而且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遣词、造句、叙述、描写的范例。其中也有一些片段，具有较多的文学色彩，或在描写手法上树立先声，或在文学体裁上粗具雏型，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难得的是：《论语》作为产生在春秋和战国之间的一部书，那里面的语言竟绝大部分为历代文人学士所利用，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可见孔子及其门人十分重视提炼口语，下过不少功夫，取其精华，舍其芜杂，这才创作了这样一部书，给后世留下一份极其可贵的语言资料。这部札记不按《论语》所列篇章次序进行，而是从《论语》中几个具有小品文意味的片段开始，然后又分点论述，不强求布局的完整。全书共有札记30余篇，从不同的角度对《论语》作了分析研究，其结论是：一、《论语》的篇章绝大部分都是三言两语的语录，没有成篇的完整的文字，但也屡见小品的雏形，甚至闪出散文诗和诗篇的影子；二、《论语》写下了孔子和其个别弟子的言行，以及他们和一些时人的交往情况，而以记录孔子言行为主，也就塑造了孔子的形象，或说为塑造孔子形象提供了不少珍贵的素材。三、《论语》在艺术语言上的成就是很突出的，它的编纂者显然十分重视语言的通俗与优美。《论语》中的一些章节，使用了比喻、比拟、夸张、重叠、对偶、排比等修辞方法，而且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四、《论语》在语言上的成就，还表现

在对后世语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可以将《论语》看作是中国散文艺术的萌芽。这部札记的特点是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对一般读者很有帮助。（管士光）

《论语新解》 钱穆著。巴蜀书社1985年出版。此书体例是先按顺序举出《论语》原文，然后加以解释，在解释时，往往能结合原文，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学而篇第一》、《子罕篇第九》、《子路篇第十三》等均是如此。在解释之后，有“白话试译”一项，把《论语》译成白话，对读者理解原著很有帮助。（齐石宜）

《孟子译注》 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本书对《孟子》全书进行注释并翻译为现代语体文，编纂《孟子词典》附于书末。这是作者继《论语译注》之后于1955年至1957年间完成的又一部先秦散文名著整理本。其编撰宗旨和体例完全遵循《论语译注》的规制。该书堪称《论语译注》的姐妹篇，同样获得极大成功，是研究古代散文特别是先秦散文的重要参考书。（李建民）

《老庄研究》 陆永品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部著作共分两部分，分别对老子和庄子做了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在“老子研究”里，作者对老子的哲学思想、兵法思想作了论述，对老子其人其书作了考辨，对老子的地位及其影响和《老子》的主要版本及有关论著作了说明和介绍，特别论述了老子散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指出：老子散文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他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他还用激烈的言词，痛斥那些掠夺人民财富的达官贵人是盗魁；对战争，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因此，他便绘制出一种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安居乐业的小国寡民、百姓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的蓝图，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现实不满的进步的一面，同时，也表现了他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主义思想。作者认为，《老子》是我国最早的哲理散文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别具一格，有其独到的艺术特色，即一、“对字协韵”，富有节奏，有些章节具有诗一般的语言，能引起人们的兴味；二、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鲜明的形象，来阐发抽象的哲理，赋予虚无缥缈的自然道论以形象化、具体化；三、言辞简要，旨意深远。另外，老子的散文还带有楚国地方文化的色彩，说明他受楚文化的影响较深。在“庄子研究”这一部分里，作者首先介绍了庄子其人其事，继而对庄子的散文及美学思想、人生观、历史观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在“庄子散文的思想性”一文里，作者指出：《庄子》的散文，反映社会生活面是非常广泛的，从大的方面来说，庄子散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批判现实的精神，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揭露各诸侯国的最高统治者兼并邻国土地、剥削奴役人民的罪行；二、对社会黑暗和封建制度的极端不合理，进行了抨击；三、批判“仁义”，贬责“圣人”；四、对新兴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给予无情的鞭挞；五、表现出

庄子悲观厌世、顺应自然、逃避现实和信奉天命论的消极思想；六、庄子继承了老子复古倒退的思想，向往“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在“庄子散文的艺术性”一文里，作者指出：庄子散文的艺术性，表现为：一、它擅长讲述故事，叙事井井有条，说理娓娓动听；二、文笔辛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三、气势雄伟，意境开阔；四、笔法多种多样，行文千变万化，往往使人应接不暇；五、善于比喻，富于变化，含蓄蕴藉，生动活泼；六、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表达力强，富有创造性。此外，庄子的散文在抒情写性，直抒胸怀方面，也显示出与其他诸子散文的不同特色。在“关于庄子美学思想问题”一文里，作者认为庄子散文在老、庄、孔、孟、荀、韩等先秦诸子散文中，最优美、最有美学价值，庄子散文能给人以新奇诡怪，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审美价值表现为：一壮阔险峻，气象万千；二、千奇百怪，如绘如画；三、语言诙谐，饶有情趣。其它几篇文章，如《〈庄子〉与浪漫主义问题》、《〈庄子〉与现实主义问题》、《庄子散文的笔法——明清庄子散文研究论略之一》、《庄子散文的文境——明清庄子散文研究论略之二》、《庄子散文的地位及其影响》等对研究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方兴元）

《老庄论集》 张松如、陈鼓应、赵明、张军合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本书共收人20篇论文，分别论述了老子的生平、哲学系统的形成、庄子的哲学思想、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学等方面的内容。《哲学家的庄子与艺术家的庄周》（张松如、赵明）一文指出庄子将概念与形象、理智与感情联结起来，抽象的逻辑线索与形象的理想境界相纠相结，错杂综合，从而形成了汪洋恣肆、宏逸玄妙的庄周文章，使《庄子》其书成为哲理与艺术的合金。正因如此，庄子不仅作为哲学家而与老子并称，老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而且，他还作为广义的艺术家、文学家与屈原并驱，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屈原、庄周浪漫主义比较论》（张军）一文指出：庄子和屈原的浪漫主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有：他们都是在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理想人物的热烈向往的基础上孕育自己的浪漫主义精神并使其磅礴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他们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们都是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大师。庄子和屈原的浪漫主义不同的地方有：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中总有一股贵族的气息，而庄子的作品却始终带有强烈的愤世精神。在艺术手法上，屈原是一位艺术家兼思想家，庄子则是一位思想家兼艺术家，他是写了大量富有哲理、饱含形象的艺术性散文的杰出作家。《论庄子的浪漫主义理论和艺术实践》（张军）一文首先分析了庄子浪漫主义形成的原因；指出：正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否定、道家学派的文艺观、殷楚文化和上古神话的影响以及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四方面因素的合力，促使庄子踏上了浪漫主义的道路，并使其在浪漫主义理论的建树和

艺术实践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进而，作者论述了庄子在浪漫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指出：庄子的作品是带有艺术色彩的理论著作，或者说是表达了深刻哲理的文艺作品。在《庄子》中，出现了一系列"为理性观念塑造并发明了的形象"，从而使它们成了"真正的诗"，也成了"真正的哲学"。然而，这些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彩虹般的形象"一经诞生，就不再仅仅是说明真理的"辅助手段"，而是毫无愧色地跻身于艺术形象之林，有的甚至成了此后的文艺家难以企及的"典范"，如《逍遥游》、《秋水》、《齐物论》等作品里都有这样的艺术形象。本书中的其他一些文章，如《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谈庄子的浪漫主义兼及庄、孟比较》（赵明、张军）、《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学》、《道家思想与两汉文学》、《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均为赵明作）等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管士光）

《庄子新探》　施章著。1930年出版，出版者不详。本书对庄子思想及其文学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庄子评传》介绍了庄子的生地、时代及其著作。《庄子人生之分析》论述了如下内容：庄子的理智生活、经济生活、艺术生活、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庄子文学》首先论述了庄子在文学上的贡献，进而从喜剧文学之特质、象征艺术之特征、范畴文学之特质等方面论述了庄子散文的特质。最后介绍了庄子的文学观。《庄子哲学》一章，论述了庄子哲学的渊源、庄子之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齐石宜）

《庄子研究》　叶国庆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此书共分14节，分别为"庄子事略"、"版本"、"篇章"、"体裁"、"各篇著作时代"、"读法"、"渊源"、"时代背景"、"学说"、"庄子学说对于后代的影响"、"庄注的派别"、"庄子中的古史"、"庄子之文学"、"结论"。作者指出：自唐宋以来，古文家韩柳欧苏诸人对《庄子》散文无不赞叹，因此"舍哲理而论文学，《庄》书亦一杰作也"。《庄子》散文气势宏放，文风浑然，"如山出云，如地出泉，卷施自然，肆应无方"。《庄子》的比喻奇特，"大至鲲鹏，小至木石，以及洪荒古人，莫不纳入篇中，跃然纸上，各尽奇致"。《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寓言，"事有迹可循，记叙易工；理蕴藏于密，笔墨难状，庄生乃善为剖析，出以寓言"。作者还认为《庄子》"外杂"诸篇，文意不通畅，文辞不连贯，与"内篇"相差甚远。此书对《庄子》的地位与影响也作了论述。总的看，此书材料简单，论述简略，但对研究者来说，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管士光）

《庄子哲学讨论集》　多人著。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这是一部研究庄子哲学思想的论文集，共收文章16篇，作者均为对庄子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此书虽然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研究庄子，但对文学研究者研究《庄子》一书的思想倾向及艺术特点也很有帮助。

《庄子新探》 张恒寿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此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研究了庄周的生平和《庄子》书的时代真伪、《庄子·内七篇》的真伪等问题，并对《庄子外篇》、《庄子杂篇》作了细致地分析和考察。下编主要论述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和庄子哲学的阶级基础和发展演变。本书材料丰富，论述深入，对从哲学和文学的角度研究《庄子》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齐石宜）

《韩非子研究》 王世琯著。商务印书馆30年代出版。此书分别论述了韩非的生平、韩非子思想的渊源、韩非子书考证、韩非子学说等内容。在《韩非子思想的渊源》里，作者较详细地论述了韩非子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伊尹太公的关系。《韩非子书考证》一章，论述了韩非子书的篇数、真伪、著书的前后以及对后人的影响等问题。

《〈韩非子〉札纪》 周勋初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此书是作者阅读《韩非子》时写下的一些笔记。共40余篇。作者在"后记"中说此书"提出的问题，虽很稚拙，但也不愿人云亦云，总想在每一篇札记内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至少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于学术研究有所裨益。"此书论述的范围很广泛，有关于《韩非子》版本和作者的，也有专论《韩非子》思想内容的，还有由《韩非子》而论述其他内容的。其中有些篇章，很有学术价值，如《形名之术的由来》、《研究韩非哲学的一条新途径》、《韩非对纵横家的批判》、《韩非的偏见》等均是此类文章。有几篇札记，探讨了《韩非子》的写作方法等属于文学方面的问题，如《韩非写作手法上的一些特点》一文，由分析韩非《观行》入手，总结出他论说文写作上的一些特点，指出《韩非子》中的排比句整齐而又富于变化，这与先秦其他子书很不相同；韩非善用比喻，他的比喻，往往出人意表而又在情理之中，特别生动有力；韩非写作论说文，十分讲究篇章结构，如《说难》在结构上就很有功夫。《历历如贯珠的一种新文体——储说》一文指出：韩非创作的"经"、"说"已是成熟的富于文学意味的作品。"经"的文句很凝炼，便于阅读和记诵；"说"的故事性完整，可以单独表达某种观点。二者既可单独成文，更宜前后合观。由"经"、"说"组成的"储说"文体，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创造。《我国文学中第一个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指出韩非《说疑》里描写的奸臣，形象生动，概括性很强。韩非采取文学上虚构的手法，综合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权臣的本质特征，采择了若干有代表性的细节，塑造出这样一个鲜明生动的典型。其他如《寓言漫谈》、《〈战国策〉与〈韩非子〉》等也值得一读。

（马辉文）

《汉代散文史稿》 韩兆琦、吕伯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本书系统地研究了汉代散文的发展过程，考察了汉代散文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自身的一些发展变化规律，同时结合着介绍了一些主要

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可以帮助读者比较系统全面地了解汉代散文。这本书的突出特点，首先是线索明确，能帮助读者看清汉代散文发展的脉络，给读者以史的印象。书中把汉代散文划分为西汉前期、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东汉后期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首先扼要地介绍影响散文发展的政治状况、学术文化、社会风气，帮助读者理解该时期散文发展的原因，把握评价该时期的作家和作品的特定历史环境。然后分别介绍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作品，最后归纳出这一阶段散文的基本特征，以及它对以前散文的继承和以后散文的影响等等。其次是论述的范围比较广，资料相当丰富，又很注意突出重点。全书论及45位散文作家，重点分析到的作品有90多篇，大大超过了现有的一般文学史著作和作品选本的分量，既可以帮助读者广泛了解汉代的散文作家和作品，又可以使史的论述更加扎实可信。书中引用古今各家有见地的评论资料相当丰富，有利于读者鉴赏作品，提高研究的兴趣。书中给汉代最杰出的散文作家列了"司马迁与《史记》"专章，给贾谊、司马相如、刘向、杨雄、班固、王充等重点作家，也列了专节或用了较多的篇幅，能使读者重点掌握汉代那些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书中还对引用的作品中比较艰深的字句加了一些注释。有的评论认为这本书"既是一本比较通俗的读物，又是一部学术著作，是汉代散文研究方面的一项新收获"。"把史的知识、代表性作品、作品赏析三个方面熔于一炉"，"这样的体例很新颖，它将给读者的学习和阅读提供很大的方便。"　　（葛　民）

《汉赋之史的研究》　陶秋英著。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这部著作是作者计划写作的"赋史"的缩本，本来作者要写成赋史，但因为篇幅的关系，自魏晋以后编成短章，列入汉赋之末，作为结束。本书分为"总论"、"骚赋"、"汉赋"三篇。在"总论"里，作者论述了赋这种文体的来源和流变，首先，作者阐述了赋的定义，然后细述了赋的源流：赋的名称的产生、赋的实体的产生，以及赋与各种文体（如谣谚诗歌、铭箴颂诔）、与诸子（如纵横家、庄子、孟子的寓言）的关系；最后论述了赋的衍变和沿革，其中谈到了赋与诗歌、骈文的关系及赋给与其他文体的影响；在赋的沿革一节里，作者简述了骚赋——汉赋——魏晋六朝赋——唐律赋——宋文赋的发展演变过程。在"骚赋"一篇里，作者先由名称和实体论述了骚赋的由来，指出骚赋和诗经是两个系统，九歌是民歌，后经屈原修改过，它是骚赋之祖；继而作者论述了"骚赋时期的作者"，主要是屈原和宋玉，还有唐勒和景差；作者还论述了荀卿及其作品，指出他是"骚赋时期的一个非骚赋作者"；最后，作者又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论述了骚赋在赋史上的地位。在本书第三篇"汉赋"里，作者首先从政治影响、贵族的提倡、道家思想的影响以及与其他学问（如经学、文字学、诗歌）的关系的角度，论

述了汉赋的产生和特点；然后又将汉赋分为四大派，介绍了汉赋时期的作者，如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蔡邕以及刘安、邹阳等作者，在对汉赋作者的介绍中，还介绍和分析了他们的作品；最后，作者论述了汉赋在赋史上的地位，指出汉赋有统一南北文学的功绩，它又是“自骚赋滋生各文体的关键”：七言诗酝酿于此时、骈文胚胎于此时、乐府受楚声影响盛行于此时。在这一篇的“结论”里，作者论述了赋这种文体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和演变。此书1986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说明》说：“这次重印，抽掉了作为屈原作品示例、但较常见的《离骚》，以及作为宋玉作品示例、但并无定论的《招魂》，把最后一章《结论》改为《汉赋的后身》，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改动。书的重点是研究汉赋，故更名为《汉赋研究》”。　（贺然青）

《汉赋研究》　龚克昌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部著作除有“总论”和“汉赋探源”2篇概述性质的论文外，其他7篇文章专论骚赋作家贾谊、散赋作家枚乘、汉赋奠基者司马相如以及扬雄、班固、张衡、赵壹等赋文作者及其作品，最后附录了“刘勰论汉赋”一文。作者在“说明”里概括地表述了他对汉赋的主要看法，即“应把汉赋放到两汉这个文学艺术发展的早期阶段，放到文学艺术尚处在经典附庸的地位之下，经学统治着两汉文化思想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评价，”由此出发，作者对汉赋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如汉赋的不重视讽刺、以及它的夸张虚构和追求辞采的华丽等，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作者指出，汉赋并不是毫无可取的，它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千百年来强加在它身上的一些鄙薄之词应该推翻。作者分析了过去广为人们所征引的汉赋作家对汉赋的批评，指出这些赋家，如西汉的枚皋、扬雄和东汉的蔡邕等，他们批判汉赋，是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思想动机的。作者指出，汉赋受到人们鄙弃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放弃或弱化讽谏，经过分析，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汉赋确实已开始不注重讽谏，忽视讽谏了，汉赋作家把自己的注意力着重放在发展艺术形式上，以期更符合艺术作品的特点，更符合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汉赋作家的这些努力，对当时尚处在发展早期阶段的文学艺术，对仍深深陷在经典附庸地位之中的文学艺术，无疑是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的，它为文学艺术最后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门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针对人们对汉赋是“虚辞滥说”的指责，作者认为所谓“虚辞滥说”实际上就是虚构、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法，汉赋按照文学艺术的特点，运用一些虚构夸张的表现手法，是非常正常，也是十分可贵的。汉赋作家所表现的浪漫主义手法，比之屈赋在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接着作者论述了汉代大赋的主要内容，即首先，一方面表现大汉帝国强盛的国势，辽阔的疆土和国内各民族的大联合；另一方面对象征中央集权的天子大加肯定和赞扬；其次，歌颂祖国壮

丽的山河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温泉赋》，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等都是这一类作品。对汉赋形式体裁上的特点，作者指出，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它的虚构、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法和长于描绘，以及具有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文势等特色。至于汉赋的局限，作者指出首先是汉赋反映的生活面不够宽；其次，取材有些繁芜庞杂，行文过于铺张扬厉，因此篇幅较长；形式有些程式化；第三是语言有雕琢、堆砌的毛病。作者对其他具体汉赋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都体现了这里所阐述的思路和观点。

《汉赋：唯美文学之潮》 刘斯翰著。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出版。本书以专题分章的方法写作而成，共有十一章，第一章论述赋体的渊源和特性，第二章写汉赋的创作主体及其环境，特别指出了以司马相如、枚乘和扬雄、班固、张衡为代表的两次高潮的特点与贡献；第三、四、五章写汉赋的主要部分大赋，分别由“唯美文学之潮”、“山水描写与楚人遗风”、“山水描写中的写实派与浪漫派”（第三章）、“两汉宫殿描写的顶峰《甘泉赋》”、“描写倡优的乐舞百戏之赋”（第四章）、“分析大赋的艺术特点”、“宋枚马篇章布局之传承发展”、“从句式判定赋为诗而非文”（第五章）等小专题组成。第六章论述汉人对赋的理论批评。第七、八章写小赋（包括中等篇幅的赋），这两章以“咏物与叙事”为总的标题，分别论述了小赋的繁盛和散佚、西汉宫廷小赋的代表咏物赋、武帝以后咏物赋的两次高潮以及皇权与宫庭赋的俱荣俱损、非宫廷的幕僚文学与文士文学、异军突起的文士自造赋等问题。第九、十章论述抒情赋（包括汉之“楚辞”）。这两章以“人格与情的复活”为总标题，一些小专题颇有新意，如“《九叹》与《七谏》研究的若干发现”、“庄忌《哀时命》反映了人格独立的危机”、“王褒《九怀》中虚幻的独立人格”以及“冯衍《显志赋》的虚幻人格与真实情感”、“张衡《思玄赋》对于人格独立的终极思考”、“抒情小赋的崛起”等都说明作者对汉赋确有独到的见解。第十一章论述汉赋的总评价与汉以后赋体的流变。此书各章次序的安排，大体依照汉赋发展的历史顺序，以保持一种历史的流动感。并且，各专题之间也很注意互相贯通，避免了割裂和不连贯的缺陷。但作者认为这样一来，汉赋的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线索看起来就不那么明白清晰，因此，又在“前言”里特别论述了汉赋发展的几个阶段，即：汉赋的酝酿阶段、汉赋的成熟阶段、汉赋的鼎盛阶段、汉赋的蜕变阶段、汉赋的衰亡阶段。总的看，此书对于汉赋这一文学现象，较多注意揭示和描绘其内因，即汉赋自身作为一个系统的生存和发展；而比较地忽略其外因，即汉赋这个小小系统与整个庞大的汉代社会中的众多系统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主要是介绍有关汉赋的比较专门的知识的一部著作，这种情况

是难免的，它并不是本书的缺点。

（管士光）

《汉赋通论》 万光治著。巴蜀书社1989年出版。本书从文体论、流变论、艺术论三个方面对汉赋作了全面的历史回顾与艺术评价。在文体论部分、作者考索了赋这一文体名称的来历和“汉赋三体”（四言赋、骚体赋与散体赋）的区别与联系；在流变论部分，从两汉文化心理、时代精神及国家文化政策、社会文化需求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论述了汉赋兴盛演变的社会历史原因；在艺术论部分，着重论述了汉赋的美学特征：描绘性、图案化、类型化及其用词遣句方面的特征。最后并附以《汉赋今存篇目考索》，将现存西汉之作、东汉之作与建安之作作了汇集，一一叙明其作者事历、作品今存何处等，虽只言片语、残篇断简，亦加钩稽存录、颇有助于学者对汉赋的研讨。郭预衡先生称此书“对于汉赋作了比较认真的研究，是一部具有独立见解的著作。”

（文 白）

《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 高光复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书选取在汉魏六朝时期辞赋创作中占有一定地位、具有一定影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某个时期、某种风格的40余家辞赋，结合时代环境，对它们的思想、艺术以及在辞赋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志岳先生在《序》中认为，此书旁征博引，论证详明，对各家赋作的考核评价，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明，可取之处甚多，更难得的是在众多作品的具体分析中突出了对汉大赋及六朝骈赋的研讨。本书从汉赋渊源与大一统的新形势，说明汉大赋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作品，并就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细加推究，从时代的特点与文学发展的规律上，对这两篇赋作出了精当的评价，从而对其它大赋作家及作品，也都作了有益的阐发。对骈文的发生、发展及其评价，本书通过对江淹、庾信诸赋的分析，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齐石宜）

《汉魏六朝辞赋》 曹道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此书共分七章，第一章论述了赋的定义、起源以及发展与演变。以下六章，从文学史的角度，以作家作品为纲，作了细致的分析和介绍。《西汉辞赋》和《东汉辞赋》两章，分别论述了贾谊、枚乘、司马相如、西汉中后期赋家扬雄、刘歆以及班固、傅毅、张衡、王延寿等作家及其作品。作者还特别列出《三国辞赋》一章，重点论述了王粲、曹丕、曹植和三国后期辞赋家。第五章为《两晋辞赋》，作者介绍了晋初赋家皇甫谧、傅玄以及潘岳、陆机、左思、孙绰、陶渊明等作家及其作品。最后两章分别论述了南朝辞赋和北朝辞赋，其主要对象是颜延之、谢灵运、鲍照、江淹以及颜之推、庾信。在“结束语”里，作者指出汉魏六朝辞赋本身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而两汉与魏晋南北朝的辞赋从许多方面看都存在着区别。在文学史上，赋与诗相互影响，同时又对散文的发展产生影响，如散文中骈句的增多，其原因

之一就是来自辞赋的影响。

（马辉文）

《建安文学论稿》 张可礼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此书共收入论文16篇，附录有两个内容：刘勰对三曹评价的得失、建安文学研究论著索引。其中《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及其形成的原因》、《建安作家的艺术个性特点》、《曹植文学思想述评》、《建安文学和它以前的文学传统》、《建安文学的影响》等或多或少涉及到对建安时期散文的研究，而专门研究建安时期辞赋和散文的论文有2篇。《建安时期的辞赋》一文指出：建安时期，不论是地位显赫的三曹，还是其他的著名作家和一般的封建士大夫，对辞赋都是比较重视的。建安时期虽然不长，但却留下了不少辞赋作品，其中尤以曹植的辞赋作品数量最多，其他如王粲、徐干、刘桢等都有不少辞赋作品。从内容上考虑，建安辞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抒情为主，一类以体物为主。从表现形式来看，建安辞赋有四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篇幅比较短小；二、语言比较通俗；三、句式比较自由，骚体赋较多；四、骈俪的现象有所发展。《建安时期的散文》指出，要全面地评价建安文学，就应当顾及建安时期的散文，因为它同建安诗歌和辞赋一样，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新成就。就现存资料来看，建安文人对散文是十分重视的，他们留下来的散文，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相当可观的，三曹、孔融、王粲、陈琳等人都写了不少散文作品。建安时期的散文，就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叙事为主的叙事性散文；一类是以议论为主的议论性散文。建安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二、直抒胸臆，饱含真情实感；三、在语言方面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重视骋词铺采、骈俪偶句，骈化有所发展；一是清峻通脱、质朴无华，散体比较明显。作者进而分析了建安散文之所以取得了新的成就，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的主要原因和特殊原因。

《南北朝的诗和散文》 金汉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此书共分上下两编，分别论述了南北朝的诗歌和散文。下编分为三章，《南北朝的骈文》指出骈文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汉语独特的文字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赋的影响，它起始于汉代，形成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刘宋初期，颜延之的文章，虽有用典繁密的毛病，但也有一些优秀之作，而南朝初期在骈文方面获得突出成就的，应推鲍照，其他如谢惠连、谢庄也有一些优秀之作。南朝中期齐、梁之际的作家，熟练地运用骈文这一体式，有的抒写情怀，有的描摹山水，有的剖析事理，题材较广泛，风格也多样，其代表者有孔稚圭、江淹、丘迟等。最后，本书设专节介绍了北朝的庾信及其作品。《范晔的后汉书》指出，《后汉书》中的一部分记传有序和论，表明作者对后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它们具有深广的内容，常爱用夹叙夹议的写法，叙述史事简

炼生动，倾向性鲜明，同时辞采可观，是我国古代史论中杰出的篇章，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北朝散文的异彩》指出，在骈文盛行，竟为浮华的南北朝时代，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却大放异彩，这三部散文作品，根植于北方质朴的社会风尚的土壤，风格朴素，表现了北朝文学"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艺术特色。这三部作品都用散体，不过其中匀整的句法、清丽的辞藻，仍随处可见，反映了当时文章骈化的时代风气及前进的趋势。 （齐石宜）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集》 王运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这部论文集所收入的文章，大多是论述汉魏六朝唐代的诗人及其诗作的，论述散文家及散文的只有 6 篇，其中还有一些是与文学理论有关系的，如《范晔〈后汉书〉的序和论》、《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等。另外，有几篇专论散文作品的论文，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作者指出，过去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和作者创作意图的解释，有可以怀疑的地方，因此，他作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肯定这篇文章属对精工，文辞华美，声调和谐，它的语言形式的完整，达到了南朝骈文的高峰；又如《略谈韩愈的〈师说〉》，作者在介绍和归纳了《师说》的思想内容以后，指出韩愈散文的特点是以气势雄壮著称，他的散文风格的形成，从语言因素讲，善于运用排偶是一个重要原因。排偶把同范围同性质的事物，以结构相同或相类的语句接连在一起讲，就使文章有如长江大河，前浪接后浪，形成滔滔不绝的气势。在《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文学好尚》里，作者指出，韩愈的散文同其诗作的风格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就是力避庸弱，务求奇崛。在用词造句方面的怪僻艰险，是韩愈散文的次要方面，他散文的特点基本上是明白流畅的，它的基本特征是奇而不是涩，这一切都是因为韩愈文学爱好上尚奇的特点造成的。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里，作者指出：中唐时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并不成为促进传奇发展的一种动力，传奇不是古文运动的主流。古文运动也不可能依靠试作传奇成功而兴起。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曹道衡著。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这部论文集共收论文 30 余篇，是作者多年苦心研究的成果。在《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里，作者分析了汉赋及其缺点形成的原因，概述了汉代以后赋的发展情况，指出抒情小赋和汉代大赋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前者着重抒情，后者主要是"体物"，并指出抒情小赋的形成与发展是与诗的影响分不开的；在《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里，作者首先辨析了骈文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原因，论述了骈文、散文两种文体的分化过程，然后概括地叙述和评价了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和散文，最后论述了骈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在《江淹及其作品》里，作者分析了江淹的一些抒情赋，如《恨赋》、《别赋》等，指出

它们在内容上有高度的概括性、典型性，而且在艺术上也很有特点，如在描写人物心理时，常常能通过环境、气氛的描绘，渲染、烘托出人物的心理，又如它们富有强烈的抒情气氛，加上词采的华美，犹似两首抒情短诗。其他如《关于裴子野诗文的几个问题》，论述了《宋略》和《雕虫论》的有关问题；《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考证了鲍照《游思赋》、《登大雷岸与妹书》、《野鹅赋》、《谢随恩被原疏》、《谢永安令解禁止启》、《芜城赋》等十余篇文及赋的写作时间并论述了这些文章的思想内容；《庾信〈哀江南赋〉四解》，对庾信《哀江南赋》里的“头会箕敛”、“胡书”、“赤岸”和“赤壁”等文句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部论文集，因为研究的深入和言之有据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马辉文）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李长之著。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三联书店1984年重版。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作者指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只有这样的时代才能产生司马迁这样伟大的人物；楚文化和齐文化对汉代文化有很大影响，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对汉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现了司马迁，因此司马迁的出现自有其特殊的意义。第二章《司马迁的父亲》，从家世和家学渊源的角度对司马谈作了介绍。第三章《司马迁和孔子》，分析了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拜、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之契合点及其距离、司马迁对六艺的了解、司马迁与春秋、司马迁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的地方、司马迁在心灵深处和孔子的真正共鸣等问题。在第四、五、六三章里，作者以“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为总的题目，介绍了司马迁从耕牧到京师求学、大旅行、扈驾和奉使蜀滇。作太史令等生平事迹，分析了司马迁性格特征的本质，介绍了司马迁的交游，重点对李陵案的前因后果作了叙述和分析；另外，对《史记》各篇著作的先后次序作了一些推测，指出有些篇章可能是出自司马谈之手，有些篇章不好分明是司马迁作的[illegible]司马谈作的；又论述了《史记》[illegible]材料和创作情况，并将司马迁[illegible]113篇作品分成六个集团，对它们的创作年代，分别作了推测。第七章《司马迁的精神宝藏之内容——[illegible]自然主义》，分别介绍了司马[illegible]思想和哲学思想以及语言[illegible]，出他与儒家、道家在思[illegible]上的[illegible]还介绍了司马迁的政治观、“[illegible]神”并用“浪漫的自然主义”来概括司马迁的性格特征。第八章《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首先指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的来[illegible]是现实生活和秦代的文章，接着从《史记》中的形式律则、建筑结构与韵律、句调、语汇及其运用等方面对《史记》的艺术特点和美学特点作了详[illegible]的分析，最后论述了司马迁散文的风格特征与后来的古文运动的关系。第九章《文学史上之司马迁》，主要论述司马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首先，

作者指出:《史记》实在是发挥了史诗性文艺的本质,即从全体性、客观性、发展性、造型性等史诗性的文艺作品的实质看,《史记》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史诗。其次,作者指出《史记》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史记》中的许多好的传记正象是好的小说。第三,作者对司马迁的文学批评也作了介绍。第四、作者对《史记》所具有的讽刺艺术给以极高的评价,指出《史记》是不折不扣的谤书,它尽了讽刺的能事,也达到了讽刺艺术的顶峰。最后,作者以"抒情诗人的司马迁及其归宿"为题,对司马迁及其《史记》作了总结,指出:司马迁的事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留下了最伟大的抒情篇作,虽然形式上是历史著作,从本质上说,司马迁是一个抒情诗人。

《司马迁与史记》 多人著。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这是一本论文集,收入文章9篇,分别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论述了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在《史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高亨)一文里,作者指出《史记》的思想性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史记》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二是《史记》中的人民性。作者指出《史记》的艺术性也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史记》的形象性,司马迁在人物描写上,很注重塑造生动的形象。在形象中表现出他的爱和憎;其二是《史记》中的典型性,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形象中,又往往能够根据历史事实,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品质,塑造出各式各样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人物。在《试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殷孟伦)一文里,作者指出:司马迁的语言,有着一种耐人寻味、百读不厌的鼓动力量,激荡着每个读者的心灵。他往往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同时,司马迁也很注意叙述语言的使用,借此达到刻画人物性格和描写事件的目的。在《司马迁赋作的评价》(赵省之)一文里,作者首先介绍了司马迁的辞赋理论,继而论述了"司马迁赋作的评价问题",论证了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不是伪作,最后对这篇作品作了分析,指出了它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和它所具有的艺术特点。在《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殷孟伦)一文里,作者指出:司马迁写作态度的谨严详审,首先表现为对历史材料的慎择审取上;同时表现在他的笔下描绘出社会不同层次的许多人物形象,而对他们的评价又能采取较为客观和适当的态度。《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和成就》(卢南乔)一文,较为全面地评价了司马迁及其《史记》,作者指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史记》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以平浅代艰深,为'古文辞'开导了先路";其次在于它广泛利用"俗词、谚语与歌谣,是'口头文学'的宝库";第三在于"类传与合传,是高度的综合,是一贯的联系,为'传记文学'奠定基础"。总之,这些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司马迁及其《史记》,有些观点当年是很新鲜的,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太肤浅,甚至是

不正确的了。尽管如此，这本论文集，对研究者来说，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方兴元）

《司马迁和史记》 胡佩苇著。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先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即“少年时代”、“漫游大江南北”、“入仕和扈从封禅”、“太初历的制订和继春秋而述作”、“李陵案”、“发愤著书”；又介绍了有关《史记》的一些问题，如“史记的体例”、“考信和实录”、“不与圣人同是非”等。作者用了不少篇幅从文学的角度叙述了《史记》的成就和特色，在“歌颂和讽刺”一节里，作者指出：《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它的出现，不仅建立了我国纪传体的历史学，也从此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因此，《史记》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从文学的意义出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史记》的思想性。这是司马迁的进步世界观在文学上的一种体现，这主要反映在司马迁所歌颂和讽刺的两个不同方面。即对好人好事的歌颂和对坏人坏事的讽刺。司马迁歌颂农民起义、歌颂历史上反抗暴政的英雄人物，他讽刺汉朝的统治阶级、讽刺酷吏及其他一切丑恶现象，都是从同情人民、反抗当时暴力统治的立场出发的，这是司马迁思想中最可贵的地方。在“小故事的描写和大场面的表现”一节里，作者指出：司马迁在记载历史和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时，不但表现了自己的爱憎，而且表现了自己卓绝的艺术才华。在描写人物的各个不同的面目时，司马迁比较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就是描写人物生活中的小故事。通过这些极为生动的小故事，揭示了人物的思想面貌，笔墨既极经济，又能表现出人物特有的个性。同时，司马迁还善于表现大场面，如《项羽本纪》里许多紧张激烈场面的表现，就十分出色。在“语言艺术”一节里，作者指出：司马迁在创作上，特别精于语言艺术，在他所运用的艺术手法里，语言的优美、精炼及其表达的多样性，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最后，作者还论述了《史记》的流传情况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贺然青）

《司马迁所见书考》 金德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此书所探讨的旨趣，“是把西汉时候司马迁的《史记》所依据的典籍和他对于这些典籍所作的评论，加以申述阐发；也就是对司马迁著作《史记》时所凭借的各种典籍，加以探讨。……能够使我们因此认识到司马迁的写著历史，的确是整理百家杂说，贯穿经传遗文，对于文字部分史料的取材是怎样的广博”（《自序》）本书共分六十四个题目，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对从历史和文学两个角度研究《史记》都极有帮助。（马辉文）

《司马迁研究新论》 施丁、陈可青编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严格地说，这是一部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司马迁及《史记》的论文集，但它内容丰富，涉及的范围较广，对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和《史记》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本论文集共收入文章13篇，分别对司马迁的史学

思想、历史编撰、历史文学，以及司马迁与班固两大历史家的史学异同，作了较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论，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如《论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赖长扬）、《论司马迁的社会经济思想和历史观》（陈可青）、《司马迁写“今上（汉武帝）”》（施丁）等，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都很有深度。最后还附有《三十种〈史记〉研究书目提要》（陈可青、杨燕起、赖长扬），在“提要”里，介绍了我国学者研究《史记》的主要著作，如对《史记三家注》、《班马异同》、《史记题评》、《史记论文》、《史记札记》等均作了介绍和评论，这为历史和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管士光）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 多人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部论集，多数文章从史学的角度论述司马迁和《史记》，如《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等，其中有些文章论述了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的创作，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如《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从“十岁诵古文”商榷司马迁生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等。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都比较深人。论集里还有一些文章专门论述了司马迁《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侯外庐的《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和白寿彝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因此，这部论集虽然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收集的文章，但因为作者都是对司马迁和《史记》颇有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论文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史不分家，所以，这部论集的大部分文章，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也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深人研究，对古典文学者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马辉文）

《史记选注集说》 韩兆琦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是一部适用于大学文科学生，大中学校文科青年教师，和具有高中以上程度的古典文学、古代历史爱好者阅读的《史记》选本。全书选注了《史记》中的名篇28篇，都是文学性强，反映的历史事件重要，或者与作者的生平思想关系密切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司马迁的生平思想，除选了《太史公自序》外，还在“附录”中收入了司马迁的名作《报任安书》，收集了一部分历代学者对司马迁和《史记》全书的评论文字。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资料丰富而又简明扼要。既适用于初学《史记》者阅读，有利于普及；又可以给深入研究者以启示，有利于提高。注释不做繁琐考证，对一般句子不串讲，但对少数难句也作了串讲，以便读者理解。对于一些不易理解或者有异见的地方，引用了一部分旧注，选择了一些历代学者的见解，有的地方又提出了编著者自己的意见，既可以给人以启发，又有利于引起读者细读作品、深入思考问题的兴趣。在每篇“注释”之后，列有“集说”一项，收录了不少历代学者对该篇作品

的理解、评论文字。其中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学者如刘知几、王应麟、顾炎武、赵翼、章学诚、钱钟书等人的评论，也有过去很少被人提及的学者如李景星等人的有价值的评论，还有陇川资言等日本学者的评论。这些评论文字都按照讲全篇、讲思想的居前，讲局部、讲艺术的居后的顺序排列，条理十分清楚。书中引用的各种资料，一般都引用原文，并注明出处，对于资料中个别生僻的词语，还随文在括弧中加了小注，便于读者理解、引用和查对。每篇的“集说”之后，还有一段编选者的话，概括了编选者对本篇主旨及有关重要问题的理解和评述，是对该篇的一段精采的“总评”，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抓住要害，深人理解全篇。本书出版以来，深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1983年北京市自学考试委员会确定考试“史记研究”专题时，曾指定本书为自学者的基本教材。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江西人民出版社已多次重印。 （冠 山）

《司马迁研究》 陆永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由10篇文章组成，其中有的考证司马迁的生平事迹，有的论述司马迁的文艺观、历史观、社会观和哲学思想。在《司马迁传记文学的艺术成就》一文里，作者以《司马穰苴列传》、《李将军列传》等传记为例，指出《史记》中的许多作品艺术性比较强，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司马迁的传记是形象的历史，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常常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直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从而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征。诗文并用，是《史记》传记文学的又一个突出特色，在司马迁手里，诗文并用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并且运用得十分自然、纯熟，诗与文浑为一体，成为整篇传记文学作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史记》传记文学的语言也很有特点，表现为：一、语言通俗易懂，犹如白话。二、语言生动、形象，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三、善于变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句法。作者还论述了《史记》传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指出它对古典诗、词、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形式均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司马迁笔下项羽和刘邦的形象》一文里，作者通过对司马迁笔下项羽和刘邦形象的分析研究，论述了司马迁塑造人物的多种艺术手法和他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进步的历史观。在《司马迁是怎样取得伟大成就的?》一文里，作者指出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除了他本人刻苦学习以外，还因为他对社会生活作了实际考察，同时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继承了前人的文化遗产。在《司马迁与（史记）有关问题简介》一文里，作者谈了三个问题：一、司马迁“子长”之称的由来；二、《史记》书名的问题；三、关于《史记》中若干篇的真伪问题。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 郭双成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书是一部从文学角度评价《史记》人物传记的著作。在“绪论”里，作者提出了从文学上研读《史记》人物

传记应注意的问题，即一、要重视前人关于《史记》记事本身的疏忽、抵牾和错误等等方面的考证成果，如果对《史记》人物传记所写的内容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甚至还看不大懂，就从文学上大谈对它的评价，肯定是不会准确的；二、《史记》所写的人物，都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要想正确地评价司马迁为他们所写的传记，便有赖于对于他们活动的时代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的说明，因此要充分利用历史工作者对《史记》所记载的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全书正文共分四章，在"《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时代、生平和思想"一章里，作者在简要介绍了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和生平以后，重点论述了司马迁的思想，指出不能用在司马迁之前产生的道家或儒家的思想去范围司马迁的思想，并分析了司马迁比他以前的思想家提供的一些"新的东西"。在"《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评价"一章里，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了《史记》对某些封建帝王和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揭露和批判；论述了《史记》对所谓的"明君"、"贤臣"、"循吏"及其他封建统治阶级"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论述了《史记》对陈涉、项羽等反暴秦"豪杰"的肯定和歌颂，论述了《史记》中为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所写的传记；论述了《史记》中的爱国英雄人物的历史形象；论述了《史记》中的中下层社会的历史人物形象；论述了《史记》中其他一些历史人物传记的思想评价；论述了《史记》人物传记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局限和不足；最后，就思想内容，论述了今天学习《史记》人物传记的意义。在"《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一章里，作者从不同方面作了分析和论述，即一、《史记》人物传记是记述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作品；二、《史记》人物传记的材料的取舍和结构的安排；三、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生动地描绘和表现历史人物；四、《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运用；五、为什么《史记》中会出现一些可供当作文学作品读的历史人物传记；六、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写作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在"关于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学习和借鉴《史记》人物传记的问题"一章里，作者首先指出，正确地评价《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仍具有现实意义；接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论述了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学习和借鉴《史记》人物传记的问题；最后对《史记》人物传记作出了总结性的评价，认为它的光辉成就将永放光辉。在正文之外，还附录了两篇论文，即《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报任少卿书〉论》和《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价》，这两篇文章对读者理解正文很有帮助；另外，"本书引用书目"和"本书索引"为读者的研究与学习也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管士光）

《史记管窥》　程金造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严格地说，这是一部历史学著作，所收论文大部分是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但是，这些内容，如"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论史记三家

注解”等，对从文学角度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也很有帮助。另外，有两篇论文值得注意，即一、《〈史记〉的论断语言》，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指出：《史记》的语言文字，写人是俨然象其人的意态；叙事宛然如其事的曲折。真可说是雄辞刚韵，指物呈形，使读者觉识到有声有色一种活的形象，现于心目之中。但是，它的褒贬论断语，却少有人注意。《史记》中的论断语言，有容易看出的，有很难理会到的。容易看出的多是从他自己立场发出的“太史公曰”。其不易理会的往往是曲折其史事，隐晦回护其看法，形式是多样的，作者将其分为“直言”、“微言”、“反语”、“赞言”、“言外之言”、“自言”、“借他人言”、“疑语”等八类分别作了叙述和介绍。二、《〈史记〉中把抽象情理作具象化之妙用》，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指出：司马迁即使写的是抽象的事理和悲欢离合怨恨之情，也仍然能使其具象声色，引使读者如入百战之场，如观万剧之象。这“皆由于太史公的绝世才学，与卓越之识见，能以穷理尽性，洞悉情之所当宜。蓄于心中，且饶且富，所以发而为文，能纵笔之所如”。作者还以《项羽本纪》、《孟子荀卿列传》、《刺客列传》、《春申君列传》等纪和传的片断为例作了分析和说明，指出其中虽是抽象事理，皆有声有色，成具象化。且其著出之事，多不从正面叙述，或从旁面，或从后面，或从反面，或从侧面，或从虚处，或用补笔。又都是用极疏略的语言，表现出极繁复的情节，却觉其神远而意深，含蓄而不吐。

（马辉文）

《史记研究》 张大可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是一部《史记》研究文集，共收文章23篇，分别对《史记》及司马迁的思想作了有价值的研究，虽然，严格地说，它是一部历史研究著作，但对文学研究者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仍有很大帮助，因为它所涉及的《史记》的成书与断限、残缺与补窜、体制与取材、论赞与互见法、结构与例书、太史公释名与生卒年等问题，也是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所应该探讨和弄清楚的。其中《司马迁评传》一文，论述了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家学渊源和师承、二十壮游、从入仕郎中到太史令、遭李陵祸而发愤著书以及他的体大思精的著作《史记》，最后论述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指出：作为一个文学家，司马迁是无以伦比的人物传记作家。《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它系统地叙述了我国古代首尾三千年间各色各样人物活动的历史，展示一长卷光彩夺目的历史形象，篇篇传记都有生动的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的活动场面及细节描写，生动活泼的口语化语言，直接影响了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史记》的辞采文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影响了历史文学大家的成长。在散文发展史上，《史记》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司马迁怎样塑造历史人物》一文，作者指出：在司马迁笔下，历史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形象鲜明，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此，《史记》的人物传记被公认为古

典文学的优秀作品。作者从以下几方面指出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的具体方法：一、运用选择和互见表现历史人物的个性；二、两两对照，烘托人物；三、熔铸鲜明的爱憎感情以感染读者；四、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塑造人物。锤炼语言，故事化的情节结构，细节描写，大场面的夸张渲染等等文学描写手法，司马迁均运用精熟。五、塑造历史人物的理想。总之，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的成功，不只是他有深厚的文学素养，而更重要的是他有进步的历史观，有崇高的理想，敢于创新。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的创造精神和取得的成就，达到了传记文学的高峰。其他一些文章，如《简论史记论赞》、《论史记取材》、《论史记互见法》等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方兴元）

《史记艺术美研究》 宋嗣廉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本书作者从美学角度人手，对《史记》一书的写作艺术做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全书共分五章并附有五篇短文，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历代对《史记》的审美评价。《史记》作为史学对象、文学对象，历代多有评论。一些著名学者还把《史记》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进行了研究，作出了某些审美评价。重温这些历史评价，无疑会启发和促进今人对《史记》艺术美的再认识。第二部分论述了司马迁的美学思想及《史记》的艺术美，作者分析了司马迁的非“中和”美思想，并指出《史记》的美学风格是雄浑的，具体表现在所传写的人物多雄奇而悲壮；所叙述的事件往往具有某种气势和速度；其结构既庞大而又匀称。接着，作者论述了《史记》讽刺艺术美，介绍了《史记》讽刺艺术遵循的原则、《史记》讽刺艺术的形式及艺术手法。在第四章里，作者从实录与想象、褒美与贬恶、人物性格的多样与统一、共性与个性等方面论述了《史记》的艺术辩证法，并指出了这种艺术辩证法对后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及其写作的深刻影响。最后，作者结合西汉到东汉文学艺术风格的变化，论述了《史记》与《汉书》在艺术风格上的异同。作为附录的五篇短文，既有论述司马迁美学思想的，如《非“中和”美的宣言书——读司马迁的〈论六家要旨〉》，又有评论和赏析《史记》作品的，如《平行交错 珠联璧合——试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结构艺术》、《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万石张叔列传〉的讽刺艺术》；还有将《史记》和《汉书》进行比较分析的，如《奸雄”，还是“贤豪”——兼议〈史记〉〈汉书〉两篇游侠传的异同》，这些文章分析和论述得较为细致、深入，对了解正文很有帮助。 （马辉文）

《史记评议赏析》 韩兆琦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这部著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的分析论述司马迁其人与《史记》。第二部分对《史记》单篇作品进行分析论述。第一部分共有 12 篇文章，分别论述了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司马迁的求实精神、司马迁的民族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文学观、审美

观以及有关《史记》的一些问题。在《史记的小说因素》一文里，作者认为《史记》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体大思精，包罗万象，为我国古代历史的写作树立了楷模，同时，由于作者又努力描写故事情节，努力刻画人物形象，努力提高作品的美学价值，因而它也为后世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作者还论述了《史记》的小说因素与“实录”的关系以及《史记》对后世小说发展的影响。在《史记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一文里，作者指出《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写人物，这与先秦那种以叙事记言为主的作品如《左传》、《国语》、《国策》等不同，它开拓了一个新的以写人物为主体的新天地。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与他同时代的以及后代其他人笔下的人物不同，他们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英雄色彩，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还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悲剧色彩。在《史记的抒情性》一文里，作者指出：《史记》闪耀着司马迁理想的光辉，他对那种美好的政治、崇高的形象无比热爱，无比赞赏；同时，《史记》也流露着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他对那些邪恶形象、腐朽东西无限愤怒、无比痛恨。正因为他爱得深，所以他也恨得切。在他的笔端纸上，字里行间不期而然地就流动激荡着感情的波涛，给读者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这是《史记》抒情性的根本来源。具体表现为：一、作品夹叙夹议，以叙代议，以议代叙，叙议结合，整个作品象一首抒情诗。二、许多作品虽不能说整篇象一首诗，但其中有许多抒情段落，语言的节奏感很强。三、大量诗赋和民间谚语歌谣的引入，尤其是作品中人物的即景作歌，更加增强了文章的抒情色彩。另外，《史记的特殊修辞与畸形句例》也值得一读。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里，作者分别对《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13篇作品作了赏析，其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史记论稿》 吴汝煜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此书共收入文章30余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门。第一部分2篇文章论述了司马迁与公羊学的关系以及司马迁的儒道思想。第二部分11篇文章着重探讨了《史记》的文学成就。其中有的是从美学的角度论述其散文艺术，有的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它对前代文学的继承与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有的则是对单篇作品的分析研究。第三部分9篇文章，属于史学的范畴。在《论〈史记〉散文的艺术美——兼谈司马迁的审美观》一文里，作者结合司马迁审美观的某些方面，就《史记》在场面描写、人物描写、论赞咏叹和艺术风格诸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丰富的美学特征作了一定的探讨，指出：这些美学特征与司马迁的“爱奇”的审美观密切相关，在汉代，司马迁的美学观是最进步的，因此，《史记》在当时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在《略谈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一文里，作者指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成就是杰出的，这首先是因为他写了重

大历史题材，写了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上的真人真事（也有一部分是传说中的人物），展示了司马迁去世前中华民族约三千年的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历史画卷。其次，还因为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作了必要的艺术加工，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最后，司马迁创立了多种与内容相统一的传记形式，量体裁衣，因人设传，构成了我国传记文学人物形象的洋洋大观。在《卓越的史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的结合》一文里，作者指出：在《史记》中的传记文学部分，司马迁的史识实际上是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艺术概括的前提，而其中不少艺术概括很高的优秀作品又充分表现了他卓越的史识。史识与艺术概括。在《史记》中结合得比较成功。在《司马迁对历史素材的艺术处理》一文里，作者对司马迁对历史素材的艺术处理作了研究，指出：一、司马迁善于从丰富的素材中提炼主题，然后再根据主题的需要选择和组织材料，并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二、司马迁在历史材料的选择上，往往通过偶然性来揭示必然性，通过个别来表现一般，从而引起读者的联想，给人以思考的余地。三、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还善于用扬抑法和对比法来造成文章的波澜，增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在《〈李将军列传〉艺术谈》一文里，作者就《李将军列传》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提供的艺术经验，作了一定的探讨。其它几篇文章，如《论〈淮阴侯列传〉的思想和艺术》、《试论〈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读〈高祖本纪〉》、《读〈屈原列传〉》、以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试释》等都从文学角度对《史记》作了论述，颇有参考价值。

《司马迁论稿》　聂石樵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这是一部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专著，作者在《自序》中指出：我国古代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发展到汉朝，达到了顶峰，这个顶峰的代表就是司马迁。《史记》的体裁，主要是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也就是传记文学。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个开创，从司马迁开始才系统地集中地给人物写传记。司马迁的文章是严格的散文体，他有意识地避免偶句，而专心熔炼散句，他的文章的语言比较接近当时普通的口语。《史记》以善于叙事著称，司马迁强烈的倾向性和鲜明的褒贬态度，有时不是通过发议论表现出来，而是包含在对人物、事件的具体叙述之中。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司马迁的生平"，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即"家世渊源"、"诞生龙门"、"少年生活"、"二十岁漫游"、"侍从和奉使"、"从巡封禅、负薪塞河"、"为太史令，开始著述"、"为李陵受辱"，最后对司马迁之死作出了自己的推断；第二章"司马迁的思想"，介绍了司马迁经学思想的渊源、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历史观点和文学观点，以及学术思想上对其父司马谈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章"伟大著述的内容"，介绍了《史记》的主要内容，即讽刺汉朝最高统治者、揭露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矛盾、批判汉儒、谴责诸

侯王叛乱、惋惜对匈奴用兵"建功不深"、歌颂陈胜、吴广起义、赞扬"游侠"、崇尚"货殖"、推许"刺客"；第四章"司马迁笔下的主要人物"，作者列举了《史记》中所描写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孔子、商鞅、屈原、李斯、项羽、刘邦等共十余人。第五章"司马迁的文笔"，作者指出：司马迁不仅具有卓越的史学才能，而且具有卓越的文学才能。作者从七个方面具体研究和论述了司马迁文章的特点，一、善于把握历史的重要问题，描述它的变化的脉络和原委；同时，叙事论理，注意翔实而不空疏，质朴而有文采。二、直书其事，不作曲笔，述事准确，并无伪造。三、有严谨的写作态度，描绘历史力求准确，善恶必书，而且力求恰如其分，对美不虚夸，对恶不隐讳。四、考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对其整个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得出足资借鉴的经验；同时，在考察历史的进程中，能从盛世看出衰败的征兆，从表面的煊赫看到内里蕴含着的危机，也就是用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五、对历史的评价，只是通过对具体史实的叙述体现出来，此外不另作评论。这是一种优良的史笔，同时也是一种卓越的文笔。六、司马迁是以写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写历史的，整部《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了我国约三千年的社会生活史的，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看，这确是一项创造。七、司马迁在语言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他对语言下过很深的琢磨和锤炼工夫，他善于选择、摄取那些比较雅驯、确切的语言，他所熔铸和创造的语言，在我国语言艺术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结束语一节里，作者指出：在史学方面，司马迁主要吸取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的内容和创作精神；在文学方面，司马迁吸取了《诗经》和《楚辞》的创作方法和精神，并有很大的创造和发展。

（方兴元）

《王充卷》　蒋祖怡著。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本书是作者30年来对王充研究的成果，共分五个部分。在《自序》里，作者论述了有关王充的著述、有关《论衡》的篇数、有关王充思想的评价等问题。《前言》总述了王充的时代、思想、进步文学观和他对当时写作上的复古、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第二部分介绍了王充的生平和著述，对其《养性书》、《政务书》作了分析介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第三部分探讨了《论衡》的篇数问题，作者认为《论衡》原本是85篇，除现缺《招致》一篇以外，并无其他的佚篇。作者进而对《论衡》85篇作了解题并列举出《论衡》佚文若干条。第四、五两部分是"王充年谱"、"《论衡》的版本和序跋"。"附录"为后人的评述若干篇。总之，此书是近年来比较完整研究王充的资料性很强的一部论著。

《鲍照与庾信》　刘文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了鲍照与庾信所处的时代和文学概况。第二章专论鲍照，作者在介绍了鲍照的生平和诗歌作品以后，论述了鲍照的赋和文，特

别分析了鲍照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从而概括了鲍照赋与文的创作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三章专论庾信，同样是在介绍了庾信的家世、生平以后，论述了他的创作，作者将他的作品分为前后两期，分别阐明了两个不同时期里庾信的创作情况，特别列出专节，论述庾信后期的赋作。作者对庾信作品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也作了概括地评论。在最后的"小结"里，作者对鲍照与庾信作了概括的比较和论述。

《望乡诗人庾信》 仲优民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此书是一部庾信评传，前几章主要介绍庾信的生平，后几章重点论述其作品。《赋比屈宋 遒劲哀怨》一章指出：庾信早年在南朝创作的赋，流传至今的只有七篇，几乎全部描写女性，多表现贵族阶级荡冶情思的低级趣味，客观上暴露了上层社会的颓废腐朽；庾信后期赋作，传诵千古，最有价值的是那些把咏怀与写景、抒情与叙事巧妙结合，把倾吐个人离愁哀怨和描绘时代风云变幻融为一体的名篇。《文齐潘陆 富博苍凉》一章指出庾信骈文现存有110篇，几占庾集三分之二，继而又按书信表启、连珠、铭赞、教文序传、碑志等五类分别作了论述与介绍。经过分析，作者指出：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庾信骈文风格，前后变化显著，早期文风绮丽，晚期文风雄健。在艺术上，庾信骈文常常采用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笔墨，娓娓动听，亲切感人，其语言，既通俗易懂，又清新隽秀。在《高瞻六代 永放异彩》一章里，作者论述了庾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指出庾信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他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再现了他的时代，而且集六朝文学之大成，开唐代文学之先河，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全书最后附有《庾信年表》，对庾信及其作品的研究很有帮助。

《〈水经注〉研究》 陈桥驿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此书共收论文43篇，是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此书出版后，一些评论认为它是"郦学研究进展的重要标志"，"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水经注》的专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续集《〈水经注〉研究二集》，收入论文20篇，其中如《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近代郦学研究概况》、《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郦道元与徐霞客》、《〈水经·江水注〉研究》等文章所论，虽然仍属于历史地理学范围的内容，但对从文学角度研究《水经注》，无疑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齐石宜）

《唐宋古文运动》 钱冬父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出版。此书首先说明了骈文与古文的区别，介绍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人物韩愈、柳宗元的文学主张，进而论述了韩、柳的古文创作，分别介绍了韩愈的杂著、书信、序文与碑志和柳宗元的论说、传记、寓言及游记。指出：韩愈和柳宗元散文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丰富的社会内容，成熟的艺术技巧和精炼的语言。他们二人的风格是不同

的；韩愈的文章气势雄健，热情横溢；柳宗元的文章则是精密深刻，含蓄凝敛。韩愈对文学技巧的掌握与运用达到了使人难以捉摸的地步，柳宗元的文章则是思想性更为强烈，进步性更为显著。在“宋代新古文运动”一节里，作者首先介绍了新古文运动兴起前的历史背景和文学思潮，提出新古文运动的三个重大问题：即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如何继承和发展唐代古文运动传统的问题、新古文运动创作实践的标准问题。接着分别介绍了宋代散文作家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及其作品，指出：历来公认的古文“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属于宋代新古文运动时期，可见这是古文创作的一个极其繁荣辉煌的时期。自西魏以来的古文运动，就是由于他们大量丰富多采的作品而最后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唐代古文运动通论》　孙昌武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作者在“后记”中指出，唐代“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史的光彩夺目的篇章。唐代“古文”家们以其思想和艺术上的重大建树，辉耀当世，沾丐后人，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在这本书里，概略地介绍了它的发展历史和重要作家、作品的成就”。全书除“序章”和“结语”以外共分八章。在“序章”里，作者指出了“古文”的含义和渊源，叙述了“古文”的历史发展脉胳，同时指出“古文”是文学历史上的新产物，“古文运动”是对文体和文学散文全面革新的运动，它是作为骈文的对立物出现的，但在它的发展中，却汲取了骈文取得的艺术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骈文的繁荣，就没有“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在“‘古文运动’的社会与文学背景”一章里，作者从“古文运动”的社会背景、阶级基础、思想条件等方面，阐述了促使它发生、发展的外部原因；同时指出决定它的独特面貌和成就的更基本的原因，还是文学内部的因素，“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发展的必然成果；在“文体革新的兴起”一章里，作者指出革正文体的努力，在唐王朝建国时便已进行，李世民等人已认识到华靡的骈文的浮艳文风不适应维护统治和整饬思想的需要，在贞观论政中，曾多次谈到改革文风的问题；后来的“初唐四杰”、史学家刘知几等都对当时的文风表示不满，一直到陈子昂，在唐代散文史上，第一个创造了文体革新的实绩，成为“古文运动”的开端；在“‘古文运动’的发展”一章里，作者指出从开元起，特别是到“安史之乱”前后，这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积累、激化到爆发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的重要发展时期，这时期的重要作家有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还有苏源明、李白、王维等人，而元结是韩、柳以前在散文创作上成就最高，在文体改革上创获最大的一个人；在介绍了“古文运动”的前期理论主张后，作者用两章的篇幅重点介绍了韩愈和柳宗元，指出从陈子昂算起，经过约一百年的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的努力，到了贞元年间，“古文运动”形成了高

潮，这个高潮的代表人物，就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对前人的创作是集大成者，在当时是领袖文坛的一代宗师。"古文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在他们手中都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因而他们的出现，也就标志着"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因此作者深入细致地论述了韩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散文创作以及他们的文学理论。在"古文创作的全面繁荣"一章里，作者指出在韩愈柳宗元的前前后后，还有许多人为"古文运动"做出过贡献。这些人不仅以各自的努力丰富了"古文运动"的成果，推动了整个运动的发展，有些人还直接支持、帮助过韩、柳二人，给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以有益的影响，如旧称"韩门弟子"的一批人，其中包括欧阳詹、李观、张籍、李翱、李汉、沈亚之、樊宗师等，以及柳宗元身边的一些人，如凌准、陆质、陈谏、韩泰、韩晔、吕温、刘禹锡等都是不应忽视的人物；另外，作者还介绍了元稹和白居易，指出他们也是对"古文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创作相当宏富，只是诗名掩盖了文名。最后作者还介绍了其他一些人物，如权德舆、裴度、牛僧孺、李德裕、舒元舆，作者对他们的创作及文学主张做了较为准确和全面的评价。在"'古文运动'在晚唐的延续"一章里，作者由分析社会、历史条件入手，论述了晚唐散文创作的特点，重点介绍了杜牧、李商隐、孙樵、刘蜕、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以及李甘、陈黯、来鹄等人的散文成就，指出他们的创作，给唐代"古文运动"作了一个颇有光彩的结尾。在最后一章"结论"里，作者总结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贡献和基本经验，同时，也指出了这个运动及"古文"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局限。

《唐代古文运动论稿》 刘国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本书由 22 篇文章组成，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唐代古文运动发展的全貌和主要散文作家及其作品。其中有的论文从总的方面把握唐代古文运动，如《论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唐代古文运动和佛教》、《唐代古文运动衰落的原因》；有的论文论述了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如《论陈子昂》、《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元结》、《柳宗元和古文运动》、《杜牧和古文运动》、《李翱和古文运动》、《皮日休和古文运动》、《孙樵和古文运动》；对于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作者用了很大篇幅，分别从韩愈的生平、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关系、韩愈的政治倾向、韩愈的散文艺术、韩愈和古文的理论建设、韩愈和柳宗元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地论述，有的论点还是比较新鲜的，如作者指出：韩愈散文的主要特点是"能自树立"，雄壮奔放和生动形象，并借助韩愈的大量作品，对韩愈散文的这些特点作了具体细致地论述。作者还对韩愈的具体作品作了发人深思的分析，如《〈师说〉解》和《再谈〈师说〉》在对作品深入分析之后，指出韩愈作《师说》的目的是提倡圣人之教，反对佛教传法世系的法统，这种观点在过

去几乎是没有人提过的。另外，《〈原道〉和“诛民”说》也是具体而又有深度的论文。（马辉文）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此书分九章论述了唐代进士行卷这种社会风尚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其中有《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一章，作者指出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及行卷风尚关系的密切，主要还不是表现在韩愈等人在文坛上初露头角、以古文行卷从而获得进士登第的时候，而是表现在后来他们在社会上文坛上已经成为当世显人、其力量已经足以左右文风、并能够接受后进行卷、将其向主司或其通榜者加以揄扬和推荐的时候。正因为韩愈等人入仕以后，已经在文坛上树立起了古文的旗帜，而又能荐举后进，并且乐于荐举后进，许多后进才踊跃地接受其文学主张，并且积极地写出符合于这种主张的作品，献给他们，以求知已；而韩愈等人则又利用这种与后进接近的机会来大力宣传和推动古文。这就形成了一种更有利于促进这一当时新兴的文学运动的连锁反应。在《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一章里，作者指出唐代有些行卷作品对文学的发展有明显的推进作用，如皮日休的《文薮》便是这样的作品。皮日休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写作，企图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进步的政治、社会观点，体现较高的艺术水平。罗隐的《谗书》也是同类作品。他们都利用行卷这一方式来宣传自己所持有的进步观点，抨击其所不满和反对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齐石宜）

《唐宋八大家》 吴小林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本书共分十章，一、二、五、十等章带有总论性质，其他几章分别是对唐宋八大散文作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专论。在“唐宋八大家名称的由来”一章里，作者指出“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文学斗争的产物，是为了表达一种散文主张而提出来的。作者还分析了“唐宋八大家”这个称号本身不够科学的地方，同时说明了这个名称一经提出，就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称号从主要方面看，有它合理的内核。“因为它以极其简炼的五个字概括了唐宋时期八位互有联系而又独树一帜的著名散文作家，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面貌。”在“‘唐宋八大家’的地位和影响”一章里，作者指出：“唐宋八大家”扫除了我国散文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六朝以来被败坏了的文章之道，在他们的手里得到振兴，从而使散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整个散文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具有崇高的地位。“唐宋八大家”的创作体现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水平，形成了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个散文创作高峰，也是我国散文史最后一个光辉时期。除了总论以外，作者用主要篇幅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唐宋八大散文家，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一章里，作者介绍了韩愈坎坷

的经历和矛盾的思想以及他“文以载道”和“不平则鸣”的文学观点，又从“缜密雄健的论说文”、“鲜明生动的记叙文”、“婉曲深挚的抒情文”以及“雄奇的散文风格和卓绝的语言艺术”等方面介绍和研究了韩愈的散文作品。在“柳宗元卓越的散文成就”一章里，作者介绍了柳宗元抑郁而坚贞的一生和“褒贬讽谕”的观点，也从“深刻雄辩的议论文”、“精严生动的传记文”、“警策隽永的寓言”、“情景交融的游记”以及“沉郁峻洁的散文风格”等方面介绍和研究了柳宗元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在“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一章里，作者首先概括地介绍了作为刚正不阿的政治家和勇于革新的文章家的欧阳修，继而介绍了欧阳修提出的“穷而后工”和“易知易明”等主张，最后也从“委婉爽健的议论文”、“情文并茂的记叙文”、“寄慨遥深的抒情文”以及“婉曲平易的散文风格”等角度论述了欧阳修的散文创作。在“宋代最杰出的散文家苏轼”一章里，作者首先以“政治家的悲剧和文学家的幸运”为题，介绍和论述了苏轼的生活道路和一生事迹，接着论述了苏轼提出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散文主张，最后从“汪洋恣肆的论说文”、“异彩纷呈的杂文”、“似诗如画的散文赋”以及“挥洒自如的散文风格”诸方面对苏轼的散文作品做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在其他几章里，作者分别用“改革家的斗争生涯，政治家的散文主张”和“刚劲的笔力，奇峭的风格”为标题介绍了王安石的生平、文学主张和散文创作；用“一个颇有改声、深于儒学的古文家”和“雍容平和之文”为题介绍了曾巩其人其文；用“科举考试中的败者，古文创作上的名家”和“雄辩恣肆的散文”为题介绍了苏洵的生平和古文创作的成就与特色；用“提倡‘养气’说的著名散文家”和“汪洋澹泊的散文创作”为题，介绍了苏辙的生平、文学主张和散文创作。总之，作者对“唐宋八大家”的介绍较为详细、准确，他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另外，还有两章分别论述了“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新古文运动”，这对读者了解“唐宋八大家”的生平、文学主张和散文创作很有帮助。（管士光）

《唐宋文学论集》 王水照著。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这部论文集收有总论宋代散文的论文2篇，论述曾巩散文的论文1篇，论述苏轼及其散文作品的论文4篇。在《宋代散文的风格》和《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两篇文章里，作者认为，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即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这既是传统散文发展的结果，也是北宋古文运动斗争的产物；构成这一风格的因素，除了作家的气质、素养和美学理想等外，主要还由于结构和语言上的特点，作者以欧阳修《与高司谏书》、范仲淹《岳阳楼记》等为范例作了分析，作者还分析了宋代散文家在平易、婉转的基本风格的基础上，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特色。作者运用大量材料，论述了宋

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如指出比喻、夸张、渲染和引证等是宋代议论文常用的艺术手段；文字凝炼简短、风格峭拔遒劲是宋代游记散文的艺术特点。作者还指出宋代散文在样式上的发展和革新，这体现在赋、笔记文等方面。作者的结论是：宋代散文"加强了议论性、形象性和抒情性，丰富了表现技巧和手段，在样式上也作了新的开拓和改革。"在《曾巩散文的评价问题》一文里，作者指出，曾巩的文章内容丰富，有的反映了作者重视民生疾苦的民本思想，有的研讨了治国之道，有的反对墨守经学成规；这说明曾巩不是拘执不化的泥古迂儒，而是双目注视现实、知权达变的通儒。曾巩的文章多为议论文，其特色有："敛气蓄势，藏锋不露；善于立意，精选"文眼"；议论与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在其他几篇文章里，作者论述了苏轼政治书简《与滕达道书》的系年和主旨问题；论述了《与鲜于子骏》一文和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关系以及苏轼的思想和创作发展过程。 （马辉文）

《唐宋诗文鉴赏举隅》 霍松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书收入唐宋诗文的赏析文章66篇，其中唐宋散文的赏析文章有8篇，作者是根据自己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写出这些鉴赏文章的，它们一般都由句到段到篇，逐层讲解，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当然诗与文的赏析自然会有所不同，但作者鉴赏的路子大体上是一样的，唐代散文的赏析文章有四篇，即《词唯心苦 明送实留——说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大笔独传牧荛儿——说柳宗元〈童区寄传〉》；《山水记与山水诗的完美结合——说柳宗元〈永州八记〉》；《欲申炯戒赋阿房——说杜牧〈阿房宫赋〉》；宋代散文的赏析文章也有四篇，它们是：《先忧后乐谕骚人——说范仲淹〈岳阳楼记〉》；《"六一风神"垂典范——说欧阳修〈伶官传序〉》；《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说苏轼〈记承天寺夜游〉》；《绝妙的讽刺小品——说朱熹〈记孙觌事〉》。从这八篇文章的选择可以看出，作者的视野是比较宽的，有送人远行的赠序，有山水游记，也有为普通人作的传记，还有讽刺小品；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鉴赏的角度也是有变化的，有的探索古文的主旨，有的欣赏古文的艺术特色，有的将古代散文与古诗比较研究，作者遵循的原则是深入浅出，逐层讲解，这很利于读者对原作思想和艺术的理解和把握。总之，本书的赏析文章具有针线细密、文意周详的特点，读之，有如亲聆著者娓娓而谈，十分亲切自然。 （贺然青）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 韩兆琦等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书收录韩愈文8篇，柳宗元文8篇，欧阳修文5篇，苏轼文6篇、王安石文3篇，苏洵、曾巩、苏辙文各2篇，每篇均有简要注释，附以赏析文章一篇。在作者名下，有关于作者生平事历、著述成就、散文风格特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等方面的简要介绍。入选篇目，以能反映作者的基本思想、能代表其散文成

就为准则。赏析文章则结合时代特点、联系作家生平，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作比较深入的分析，颇有助于读者研习八大家作品。

（葛 民）

《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 多人著，关永礼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本书撷取唐宋八大家的文章378篇，其中韩愈文70篇、柳宗元文52篇、欧阳修文55篇、苏洵文27篇、苏轼文88篇、苏辙文26篇、王安石文27篇、曾巩文33篇。每位作家配有一篇小传，介绍其生平事迹和创作情况。原则上，一篇原文缀以一篇鉴赏文章，有的分章赏析，有的总体玩味，有的对比鉴赏，不强求一律。书前有谭家健写的“序言”：《中国文学史上的峨峨丰碑——唐宋八大家概述》，对唐宋八大家及唐宋的古文创作作了概括的评论和介绍。主要内容有：一、骈散之争和唐代古文运动；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艺术成就；三、唐末五代古文的衰落和北宋古文运动的胜利；四、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散文艺术成就；五、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唐宋文鉴赏集》 纪作亮著。黄山书社1989年出版。此书共选唐宋散文50篇，分别作了赏析。作者很注意选文的代表性，选了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好的名篇，既考虑到流行的传统篇目，也照顾到较高层次的要求，选录了一些不大常见的“新”名篇。其次，作者的赏析文字注意了学术性，努力将作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尽量阐明自己的新观点。第三，解说注意通俗性，作者对古代的词语和典故，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说。

（侯文朴）

《李白新论》 刘忆萱、管士光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此书共分15个专题，对李白的生平事迹、思想倾向及其作品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李白以诗知名，他的散文历来不受重视。鉴于此，此书不仅在总论李白及其作品的一些专题，如《李白的生活道路与创作实践》、《李白的政治思想及具体主张》等较多地涉及了李白的散文，而且还有两篇文章专论李白的古赋和散文。在《李白的古赋八篇》里，作者指出，李白胸怀旷达，性格豪放，文如其人，他的赋大多是意境辽阔，气势奔放之作，能给读者强烈的艺术感染，如《大鹏赋》、《大猎赋》都表现出一种宏伟壮丽的艺术意境。李白的赋既总结了前人创作经验，又有所创新，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前人的影响，但却具有鲜明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全面认识李白不应忽略的作品。在《李白的散文》中，作者指出《李太白全集》共收散文58篇，分为9类，内容相当广泛，表现艺术也颇有特色，是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李白散文能用挥洒自如的笔触揭示自己的思想，挥斥内心的幽愤，豪放爽朗中带有凄怆悲愤之气。李白的散文还常常表达对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以揭露社会的黑暗，这些文章往往言简意深，发人深省。李白散文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些文章，或谈骨肉欢聚，或为临别赠言，篇幅短小，语言生动，感情真挚；另一类散

文论事说理，大都旁证博引，连类取譬，侃侃而谈，大有战国策士之风。总之，李白的散文，内容充实，风格多样，反映了李白政治思想的部分内容，表现了李白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艺术上也很有特点。

（王志飞）

《韩愈及其古文运动》　龚书炽著。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全书共分六章；作者首先论述了"唐代文章的变革"，指出：唐代文章至大历贞元间，其变革之主潮有二，即骈文和古文。继而论述和介绍了韩愈，作者阐述了韩愈的文学主张、政治思想以及文学创作。在《韩愈古文运动之先驱者》一章里，作者分别介绍了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的文学思想和散文作品。在《韩愈同辈之古文家》一章里，作者介绍和论述了柳宗元、李观、樊宗师等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情况。在《韩派古文家》一章里，介绍了李翱（附论张籍李汉皮日休）、皇甫湜（附论孙樵）、沈亚之（附论陆龟蒙）等古文运动参加者。在最后一章《论唐代古文运动》里，作者分别论述了如下问题：史官之文学观、取士文章发生文弊、南北文派之争、一系统之文学运动、古文家之思想、释古文、韩柳之碑文传记受传奇所影响。总之，此书论述的内容较为广泛，虽然按今天的眼光看来，作者的论述还不够深刻，有些观点也不够准确，但此书对一般研究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贺然青）

《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　黄云眉著。齐鲁书社1979年出版。这部著作由正文2篇、附文1篇、新唐书韩柳传及韩柳碑志5篇和韩柳散文48篇组成。两篇正文为《韩愈文学的评价》和《柳宗元文学的评价》。在《韩愈文学的评价》一文里，作者认为对韩愈的肯定，主要是韩愈的文学，不是韩愈的儒学。"韩愈的文学，是有卓越的成就的，而他的儒学，则仅仅跨在文学的背上腾踔虚誉而已，它的本身谈不到有什么独立的成就。"作者从韩愈所处时代的经济、韩愈的阶级成分及其生平等方面论述了韩愈文学取得成就和存在局限的主要因素，继而指出韩愈文学成就的取得，有家学渊源，及其和前辈的师承等原因，更重要的是韩愈自己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的结果。接着，作者论述了韩愈文学的进步形式，即"以自己创造的辞汇，结合着正确的流畅的语法，来表达它的内容"。最后，作者分析了韩愈"文学内容所以赶不上文学形式"的原因。附在这篇正文之后的，是一篇题为《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虽有新见，但缺乏足够的坚实的论据，过高估计了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贡献，并就韩愈儒学、文学等方面内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柳宗元文学评价》一文里，作者首先论述了柳宗元所参加的政治集团的进步意义，指出由于中小地主思想意识里积极的一面起了作用，柳宗元"清楚地看到了当时政治上旧势力的落后性和新势力的进步性，然后才参加这个在他以为符合他的政治改革愿望的集团的"。其次，作者通过分

析柳宗元的作品，肯定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战斗精神，指出他是一个品德和作品统一的杰出作家，离开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要了解柳宗元文学的精神实质是困难的。最后，作者分析了柳宗元文学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指出他发挥的领导作用，不如韩愈那么大，其原因是："一、在指示文学改革的方向上，韩愈较柳宗元为明确"；"二、在达成文学改革的愿望上，韩愈较柳宗元为坚决"。正文之后所附的传记材料及韩柳二人的散文作品，对理解作者的论点很有帮助，因此它们也是这部著作不可缺少的部分。　　（管士光）

《韩柳欧苏古文论》　陈幼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前四章分别论述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位古文家的文学主张和散文成就，最后一章是结论，论述了唐宋古文遗产的意义和价值。在《韩愈："道""文"的复古与正统的建立》里，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韩愈的历史作用，即一、他首先是一个划时代的文学理论家，他关于"道"、"文"统一的学说，为极端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敲响了丧钟；二、他创造了一种散文体，以后这种文体就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传统中正统的文体；三、作为一个散文作家，他的主要贡献是把"古文"提高到真正的文学境界。四、他是孔学复兴运动的奠基者和倡导者。在《柳宗元对"文"统与"道"统的新探索》里，作者分别从"柳宗元的文学观"、"'文以明道'中柳宗元的'道'观"、"'文有二道'和柳宗元的文学观"、"柳宗元著作中的'自然'"、"山水游记中的自然：'寄'的抒情手法"、"动物寓言和反嘲手法"、"本性（的自然）说和人道趋善的必然性：载道的传记手法"等方面论述了柳宗的文学理论和散文作品。在《欧阳修的文学理论与实践》里，作者首先介绍了欧阳修文学观的理论基础，并以其代表作《醉翁亭记》为例，分析了欧阳修是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他的文学理论付诸实施的。在《苏轼文学理论中的"变"和"常"——兼论〈赤壁赋〉》里，作者对苏轼的文学主张及作品作了详尽的评述。在结论里，作者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古文传统、"重评韩、柳交谊"、"古文的文化遗产"等论题。

《韩愈及其作品》　刘耕路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部著作由"韩愈评传"和"韩愈诗文选注"两部分组成。作者在介绍了韩愈的生平以后，分别从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角度对韩愈作了高度评价，在"文学家的韩愈"一节里，作者论述了韩愈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指出：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刘邦"，他不是发难者，却是成功者。韩愈的贡献首先在于使"古文"的理论更充实、更条理，更完整了，其次，还在于他的散文创作实践，即在于他的示范作用；第三，在于他广招后学，奖掖后进，培养了一代文人。作者还分析了韩愈取得巨大成功的主、客观原因，如他一生的主张和作为适应了中唐社会历史的需要、前辈在古文创作上为他开拓了一段道路，他继承了前辈

的成果；又如从主观原因看，韩愈博学多才，又具备一种韧性的奋斗精神，敢于冲破强大的习惯势力。这些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在这一节里，作者还对韩愈的散文作了分析和评价，作者按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三类，对韩愈的散文作品作了概要的介绍。作者把韩愈散文的艺术特色总结为：一、气势充沛，豪逸奔放；二、曲折多姿，变幻莫测；三、逻辑严整，锐利雄辩；四、想象丰富，巧于取譬；五、语言融会古今，富于独创性。在"韩愈诗文选注"里，作者选了韩愈的赋和散文共30篇，"说明"简练准确，注释通俗易懂，可以参看。

（关　山）

《韩愈述评》　陈克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书对韩愈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研究和论述，全书共分五章，从不同方面评论和叙述了韩愈的家世和经历、韩愈的政治和经济主张、韩愈的哲学思想、韩愈的文学成就、韩愈的师承关系。在《韩愈的文学成就》一章里，作者介绍了韩愈从事古文运动的过程和影响，并指出韩愈的文学主张主要有：坚持宗经、明道等原则、反对陈词滥调和剽窃抄袭、重视文气盛衰和个人修养、宣扬"文穷而后工"和"物不得其平则鸣"、强调打好文字基础。通过对韩愈散文的分析，作者总结出韩愈散文在风格和艺术上的特点是：一、议论纵横，汪洋恣肆。韩愈的一些杂著，不论谈哲理、谈政治、谈教育，文章层次分明，逻辑推理严密，气势磅礴，动人心弦。二、比喻生动、发人深思。韩愈的一些文章，因为借用了比喻和寓言等手段，使平铺直叙的议论文和记事文，增加了形象思维，产生了气象雄浑、生姿摇曳的艺术感染力。三、感情真挚，热情奔放。韩愈的不少散文，笔锋下常带感情，这些作品往往言辞悲凉，凄凄感人。本书书后有三个附录，即《韩愈籍贯考》、《韩愈年表》、《本书引用书目》。

（弥式宏）

《韩愈散文艺术论》　孙昌武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共分七章，主要论述了韩愈的散文艺术。前两章论述了韩愈的文学主张、韩愈"古文"思想内容的特征及其与艺术形式的关系。第三、四两章论述韩愈在改革文体与文风中的成就，指出：提倡"古文"，改革文体不自唐代始，但提出"古文"文体这个具体概念是在唐代，而"古文运动"之得到质的提高，取得远远超出骈文的艺术成就并取而代之，功绩首推韩愈。韩愈针对骈文统治文坛长期形成的流弊，又鉴于以前提倡"古文"的人的教训，以雄健矫弱靡，以新奇矫陈腐，大大提高了"古文"的艺术格调，增加了耸动观听的感染力量。第五、六两章所论内容为写作技巧，第五章专论韩愈基本行文的技巧，作者将其概括为：精辟而形象的议论、洗炼而生动的记叙、真切而细致的描写、质朴而热烈的抒情。在此基础上，第六章探讨了韩愈散文的某些艺术手法，即"立意"、"结构"、"讽刺"、"比喻"，前两个方面是文章组织问题；后两个方面是文章表现问题，从

而大体归纳出了韩文在艺术形式上的特征。第七章从散文创作艺术的角度，对韩愈散文语言的文学特征，分别从"形象性"、"主观性"、"形式美"、"提炼词语"等几个方面作了论述和探讨。最后作者还论述了韩愈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影响与功过，指出韩愈凭着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散文艺术的成就，足堪列人中国文化史的伟人的行列。

《韩愈研究论文集》 多人著，韩愈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书共收论文35篇，内容以韩愈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心，涉及韩愈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文学成就以及诗文创作。其中《韩愈的历史地位》(任继愈)、《韩愈道统论的得失及其对中国民族心理的影响》(罗宗强)、《韩愈的文学思想述略》(季镇淮)、《关于韩愈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张少康)、《从骈文的演变看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意义》(王景霓)等论文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杨勇《论韩愈文之文气》，论述了韩文的特色，即不论任何一篇，都会觉得气势磅礴，痛快淋漓，进而研究了"韩文文气的成因"、"文气的形象"、"体味文气的要领"、"韩公之增强文气法"等问题。康达维的《论韩愈的古赋》，对向为人忽略的韩愈的《感二鸟赋》等古赋作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刘知渐《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与过》，指出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功大于过的，但他的认识水平不够高，而又受到过分的推崇，他的功与过，有历史的因素，也与个人教养有关。本集中还有些文章介绍了韩愈在潮州的事迹，或者对韩愈的籍贯作了细致的考证，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韩愈新论》 何法周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书共收8篇论文，集中讨论了抑韩思潮中关于韩愈思想方面的八个问题，即"评所谓韩愈诛杀劳动人民说"、"论韩愈的人性观"、"兼评所谓韩愈谀墓之说"、"论韩愈的民本仁政思想"、"兼评儒家思想保守说"、"再论韩愈的政治态度"、"论韩愈的人才思想"、"论韩愈历史上的一桩遗案"。为了同韩愈原作等第一手材料相互印证，每个专题之后都附有一定数量的原文。在"前言"里，作者对近百年来抑韩思潮作了概括的评论。书后有《韩愈语言创造的一项丰硕成果——韩愈诗文成语集锦》和附录《韩愈及其著作研究索引》。

《韩愈叙论》 胡守仁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此书对韩愈及其作品作了系统的研究，分别论述了韩愈的籍贯、家庭和生平；韩愈的人世思想、儒学思想以及他反对藩镇割据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政治思想倾向；韩愈的文学观点及其诗文创作。作者对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这场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永远放射着光芒。对韩愈的散文创作，作者用专章作了介绍和评论，指出在韩柳以前，出现了一些古文作家，他们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但要成为一个突出的高峰，却

只有韩柳，而韩比柳更胜一筹。韩愈的散文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赞扬，这原因之一就是他从小就非常致力于读书写文章，并善于从前人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渐渐熔铸成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些文章，看似好象表现了韩愈所独有而别人所无的艺术风格，但这些文章也是长期学习古人的结果。其散文作品在艺术上很有特点，或者用笔曲折顿挫，令人回肠荡气；或者以奇崛之笔，刻划山川之险，字句烹炼，气势雄伟；或者语谐意庄，含有深刻的寓意；或者信笔所至，脱去一切拘束，做到了情文并茂；或者一气舒卷，痛快淋漓，能使读者兴感于无穷。韩愈的散文善于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善于运用比喻，在字句安排上，有时以参差错落为尚，他还创造了许多新短语，很有生命力。最后，作者论述了韩愈散文的影响。

《柳宗元评传》 吴文治著。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此书共有十五章，分别论述和介绍了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家世与出身、早年学习和科举活动、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被贬为永州司马，以及改贬为柳州刺史、悲剧的结局。作者对柳宗元的生平介绍比较客观，这对了解柳宗元其人其文很有帮助。作者还在“致力于文学创作”、“山水游记和‘追求闲适’”、“古文运动中的旗手”等节里，比较集中的论述了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对柳宗元传记散文的论述，比较深入。作者指出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不同于那些歌功颂德的应酬性质的传记文章，也不同于那些取材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传记；他的传记，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并以《捕蛇者说》、《河间传》、《梓人传》为例加以说明。作者还结合柳宗元的生平和思想，分析了他的山水游记，指出柳宗元这一类作品，除了其中有一部分表现了他在无聊时追求闲适的情绪外，更多的作品则是写进了他自己的遭际和对当时现实的不满，抒发了他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的抑郁和不平。作者指出，从主导方面看，柳宗元选择山水景色作为自己创作劳动的对象，也只是基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以此来暂时强制转移他的悲愤抑郁的心情而已。作者以这些论断为依据，具体分析和介绍了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等山水游记。在作者另一部著作《柳宗元简论》(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里，作者发挥了这些论点，在“人物传记”、“《永州八记》”等章节里，对柳宗元的散文作品作了更为详尽、准确的分析。

《柳文指要》 章士钊著。中华书局1971年出版。这是一部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依原集次第，逐篇加以说明”，称为“体要之部”，即照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体要者，谓柳集本体所有事，必须交代清楚也”。下部是“通要之部”，即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等，作者《总序》中说：“下部赅括千年来之评论，分别项目，如政治、文学、儒

佛、韩柳交谊种种，各归部居，严加分析，号曰通要之部，通要者，谓各即品目而观其通，得所会归也"。在下部里作者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如"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子厚之春秋学"(卷一·柳志)；"唐代封建社会下之奴隶制"、"子厚哀永贞三诗"(卷二·永贞一瞥)；"戈小莲书柳宗元平淮夷雅表后"、"梅圣俞之乞巧赋"(卷三·辑余)"；子厚之视班孟坚奚若"、"元次山与子厚"(卷四·评林上)；"焦里堂之于柳文"、"方望溪之视柳集"(卷五·评林下)；"韩柳李"、"学韩先学柳之谬说"(卷六·第韩)；"吕温""程异"(卷七·同时人物)；"唐代文章流别之争"、"张文虎所谓唐文"、"宋初古文"(卷八·各代文风)；"文与笔"、"文与道"(卷九·论文一)；"郝伯常文说"、"黄忍庵论文"(卷十·论文二)；"儒与佛"、"韩退之与大颠"(卷十一·佛)；"柳诗"、"刘梦得与柳有关之诗"(卷十二·柳诗)；"柳州书法"、"柳子厚笔精赋"(卷十三·柳书)；"牛僧孺颂忠"、"吐谷浑词"(卷十四·杂录一)；"记里鼓赋"、"晋文公问守原"(卷十五·杂录二)。仅从每一卷里举的二、三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部著作研究的范围很广泛，"作者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已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全书对柳文的思想和艺术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并对有关的论著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柳宗元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线索"(《出版说明》)。总的看，这里的说明和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柳宗元传论》 孙昌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部著作是近年来出版的系统研究柳宗元及其作品的新成果，共分十二章。在"生长在积衰动乱的年代"、"树立'辅时及物'之志"、"参加'永贞革新'"、"拘囚十年，待罪南荒"、"终生沦落、遗惠一方"等几章里，作者重点介绍了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和他政治上的坎坷经历；在其他一些篇章里，结合柳宗元的生平和思想，介绍了他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如"创作'褒贬讽谕'之文"一章，作者指出柳宗元走入社会的贞元中年，正是唐代文坛上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即新兴的"古文"与流行的骈文激烈搏斗并不断扩大自己阵地的时期。柳宗元学文章，开始是写骈体文字的，后来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转而学习"古文"。同时，他在参与政治斗争、接触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认识到那种"务辞采，夸声音"的"无用之文"，是不能有效地表达"辅时及物"的现实内容的，因此与韩愈比较，他更能把文体改革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从现实斗争的实际出发来解决文体问题。他的《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辩侵伐论》等都表现了这种倾向。在"倡导'古文运动'"一章里，作者指出柳宗元在做朝官期间，已经自觉地写作"辅时及物"、"褒贬讽谕"之文，在"古文"的写作实践上做出了许多成绩，并提出

了关于写作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看法，贬官以后，他被迫离开了政治斗争舞台，远离政争，就有可能旁精力于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写作上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还奖掖后学，广泛宣传，总结"古文"的写作经验，写成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论文八书。由于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普及。在"光辉的文学业绩"一章里，作者概述了柳宗元的创作成就，指出在传统文学批评中，柳宗元被看成是"古文"家，明代以后，他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被看成是写"古文"的典范。在柳宗元的文章中，占有较大比例的是杂文、寓言和山水记。他的杂文与那些哲学、政治、历史论文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也较大；柳宗元的山水记，是他散文创作中具有高度艺术技巧和最富于艺术独创性的一个部分。他的著名的"永州八记"等作品，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描绘自然山水的艺术手法，开拓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的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做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柳宗元汲取了诸子寓言的传统，借鉴了六朝以来的小说和杂文的写作技巧，发展成为一种思想深刻、概括性强而又形象鲜明、情节生动的富有独创性的寓言文，这是柳宗元在散文发展上的一个贡献。最后，作者在"柳宗元评价问题"一章里，就柳宗元的思想倾向及其与创作的关系、柳宗元的政治态度、柳宗元诗文本身的评价与继承等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指出了目前柳宗元研究中还存着的问题，如柳宗元文集一直没有一个理想的版本，与此相联系的是，柳宗元作品的注释存在许多错漏；另外，对柳宗元生平事迹，还缺乏细致研究。

（关　山）

《柳宗元散论》　高海夫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本书共有八篇文章，其中前三篇，即《论"大中"——兼谈韩柳的思想分歧》、《"大中之道"和柳宗元的斗争精神》、《柳宗元"以生人为主"的政治思想》专论柳宗元的思想，后五篇，分别论述了柳宗元的文学主张、"文以明道"说和柳宗元的创作实践以及柳宗元的散文、诗歌和辞赋。在《柳宗元论'文'》一文里，作者从"文以明道"和"卓然自得"、"慎文采"和"文有二道"、从"不必罪俳"到"尽天下之味以足于口"、要求学习遗产但反对"荣古虐今"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柳宗元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系列文学主张，指出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的古文运动起了指导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不少地方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在《"文以明道"说和柳宗元的创作实践》一文里，作者在介绍了"文以明道"说的含义以及这一主张提出的意义以后，指出：总观柳宗元的全部散文创作，应该说他是实践了他"文以明道"这一主张的。这类作品，都是或直接或间接、或这样或那样地体现了他的所谓"道"的。这类作品，大约可分为如下几类：一、

有一部分作品，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他的社会政治的理想和愿望。二、在柳宗元的散文中，更为常见也更为突出的一部分内容，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现实中的种种病态、弊端，以及统治阶级中腐朽、丑恶的种种表现的揭露、批判与嘲讽。三、柳文中还有一类作品，重在抒情，或自抒胸臆怀抱，或倾诉政治遭遇之不幸，有的正言书愤，有的反语致慨，这同样是他所谓“道”的体现，只是其方式与前两类作品又有所不同而已。四、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形象生动，情景交融，这些山水游记描写了大自然的景色，渗透着作者抑郁的情怀，表现了作者不满现实而纵情山水的思想。它们同样是柳宗元所谓“道”的某种体现。在《柳宗元的散文艺术》一文里，作者指出：柳宗元的散文，不仅思想新颖，卓有识见，较少迷信先贤、盲从旧说的奴性色彩，敢于对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生活中种种败坏腐朽的现象给予揭露和批判，因而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和强烈的战斗精神，而且，在艺术上也富有创造精神。柳宗元的论说文既精警杰出，深刻透辟，又典正简洁，缜密精严，劲健有力。讽刺小品是柳宗元散文中最有创造性、成就最为突出的部分之一。这些讽刺小品，或亦可称之为杂文，有的抒情，有的议论，有的叙事，有的刻画人物形象，有的描绘自然景物；有的直言写意，有的反语幽默，有的托物寓愤。它们大多笔锋犀利，短小精悍，意味深厚，又多具强烈的战斗性或讽刺性。对“记”这一文体在唐代的兴盛和发展，应该说柳宗元是有突出贡献的。他的这类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艺术技巧精湛独到，如柳宗元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特别受到后人的赞赏。在“别具特色的其它散文”一节里，作者介绍了柳宗元的赠序、书信、碑志等散文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本书最后一篇文章《柳宗元的辞赋》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方兴元）

《柳宗元散文艺术》 吴小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本书共十章，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论述了柳宗元“文以明道，褒贬讽谕”的散文主张；第二至第六章按柳文的各个文体作了艺术分析，这几章的标题分别为《议论和抒情的结合——杂文的艺术特点》、《精严生动，传神毕肖——传记散文的艺术特点》、《短小警策，蕴藉隽永——寓言散文的艺术特点》、《文中有画，情景交融——山水游记的艺术特点》、《抒情浓郁，讽刺强烈——辞赋的艺术特点》。第三部分从总体上论述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特色，作者指出：柳文的艺术风格，既有主导的方面，又是丰富多样的。总的看，其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柳宗元散文好比凄清悠深的“幽篁曲涧”，具有一种幽美；这种风格的形成，不仅和柳宗元长期被谪受贬的遭遇经历、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富有批判锋芒的作品内容有关，而且与他具有凄幽、愤激、冷峻的色彩，浓郁的诗意，明显的讽谕性、象征性，廻曲峻峭的笔法诸艺术

特色也是分不开的。柳文结构的主要特点是既严谨有序，一气贯通，又灵动多变，曲折起伏，往往能给人以严正精巧的感觉，成为我国古代散文结构艺术的典范之一。柳宗元散文写得优美生动，这与他卓越的语言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柳文的语言，具有峻洁、劲峭、精丽、形象的特点。最后一章以《双峰并峙，各有千秋》为题，对柳宗元和韩愈的散文作了深入的比较，作者认为柳韩二人的散文，除表现出共同的特色外，在某些方面也有高低之分和差异，尤其在散文艺术方面，都独具特点，各有千秋，这是他们在散文史上产生独特影响的原因所在。总之，本书通过纵横结合，文体评价和散文鉴赏兼顾的方式，全面地揭示了柳宗元散文创作的艺术规律。因此，它是近年研究柳宗元散文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管士光）

《刘禹锡传论》 吴汝煜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此书为“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中的一种，由十四章组成，前八章主要叙述了刘禹锡的生平，第九章论述了刘禹锡的思想，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四章详细地论述和分析了刘禹锡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最后一章专论刘禹锡的散文，作者先论述了刘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他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都对韩、柳提倡的古文运动作出了贡献；继而，作者论述了刘禹锡的散文成就，指出在刘禹锡的散文创作中，以论说文的成就为最高，他的论说文，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刘禹锡的论说文有“富于卓识”、“因小见大”、“巧丽渊博”等特点。刘禹锡的记叙文也有不少佳作，如《救沉志》等均是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好文章。另外，刘禹锡的抒情散文和一些短小的诗序也都值得一读。作者还对刘禹锡的《陋室铭》作了专门的论述，指出它短小精警，是一篇千古名文，是刘禹锡散文作品中的代表作。最后，作者论述了刘禹锡散文的渊源与影响。

《欧阳修》 张华盛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此书共四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欧阳修的评论；后一部分是欧阳修文学作品的评注。作者在论述了欧阳修的生平和政治主张以后，重点论述了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作者指出：从北宋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斗争可以了解诗文革新运动的历史原因；从时文、昆体诗的控制文坛可以了解运动向前发展的艰巨性，这就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如果没有梅尧臣、苏舜钦、尹洙等人阐发文论，创作诗文，便不可能把宋初诗文革新的启蒙运动引向深入；如果没有欧阳修对他们的极力褒扬，他们在文坛上的威望和影响也将大为减色。他们之间彼此促进，互相揄扬，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中期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作用。而推倒时文、西昆体诗，奠定北宋一代文体诗风的不是别人，正是欧阳修，进而，作者从“学韩辟佛、复古非今”、“阐明理论、指引革新”、“发表诗话、抨击西昆”、“罢黜时文、提举后进”、“大兴创作、绮丽铸声”等

几个方面论述了欧阳修之所以能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成功的措施和原因。在《欧阳修部分散文评注》里，作者指出欧阳修的散文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简明自然，条达疏畅；二、雄辩宏辞，以理服人；三、纡余委备，容与闲易；四、富于挚情，清音幽韵。并选了欧阳修《朋党论》、《醉翁亭记》、《秋声赋》等9篇文章分别作了注释和解说。

《欧阳修》 郭正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此书较系统地介绍了欧阳修的生平和文学成就，其中《欧阳修散文的特色和影响》一节专论欧阳修的散文，作者认为欧阳修的散文，种类颇多，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称为"经旨"、"辨"、"论辨"、"时论"，包括对儒家经典旨意的质疑，对传统见解和史载的辨驳，对时事政策的评论，属于政论、史论和时事述评的性质。另一类称为"序"、"书"、"杂题跋"、"杂文"、"试笔"、"笔说"，大抵属于文学批评和各种随笔、杂文和小品。这两类散文均以议论为主，间或杂有小叙。它们大都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笔锋犀利，具有一定的斗争性。第三类是"记"、"传"和"祭文"，属于叙事、绘景或抒情性质，间或略有小议。这类散文，艺术性最高。关于欧阳修散文的艺术特色，作者引用了周振甫先生概括的五点，即一、婉转曲折，态度从容；二、气势旺盛，措辞平易；三、结构严密，富有逻辑力量；四、一唱三叹，富有情韵；五、用词造句，精炼而有变化。作者还论述了欧阳修散文对同辈、晚辈及后人的影响。 （关 山）

《王安石评传》 柯昌颐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本书共分二十四章，分别论述了王安石的生平、时代背景、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他经学、文字学、文学的成就，作者特立专节，论述了王安石的散文，指出王安石的散文，"盖最能学韩愈之奇倔者"，他的散文，受孟子、韩愈的影响最为明显。其《读孟尝君传》、《孔子世家议》、《闵习》等短篇固然为人们所赞赏，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等长篇文章，"亦未见其逊处"。总之，作者认为王安石的散文以意胜不以辞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张式宏）

《苏洵评传》 曾枣庄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共有十七章，分别论述了苏洵的生平事迹，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以及他的散文、诗歌的艺术成就。在《"有得乎吾心而言"》一节里，作者指出：苏洵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他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他的文论散见于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其主要观点是：一、反对时文，不肯"区区符合有司尺度"；二、学习古文；三、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反对因袭前人；四、反对为文而文，强调文贵自然；五、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六、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在《"君之文博辩宏伟"》一节里，作者指出苏洵的文章在当时文坛上之所以能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与他散文的艺术成就是分不开的。概括起来，苏洵散文有以

下特色：一、纵横恣肆，气势磅礴。苏洵散文深受战国诸家，特别是纵横家的影响。我国散文，包括纵横家的说词，往往感情充沛，气热磅礴，纵横恣肆，酣畅淋漓，滔滔不绝，笔带锋芒，妙喻连篇，形象生动，富有鼓动性，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苏洵的文章也具有这种特点，如他的《项籍论》等便是其代表作。二、结构谨严，说理周详。如苏洵的《谏论》上篇，颇能代表苏洵的文风：结构谨严。有总论，有分论，有小结，层次分明，前呼后应；全用事实说话；大量使用排比段，排比句，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有力。三、曲折多变，纡余宛转。如《与欧阳内翰第一书》开头部分便极尽行文曲折变化之能事。四、妙喻连篇，形象生动。苏洵的文章还以善作贴切的比喻见长，这些生动的比喻比说一大堆空道理有说服力得多，如《谏论》、《乐论》、《仲兄字文甫说》等文章里都有十分生动的比喻。五、语言直朴，意味隽永。苏洵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而内涵丰富，能给人以回味的余地，如《名二子说》虽仅有八十余字，但却言简意赅，在极其精炼的文字中，含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在《"一时之杰，百世所宗"》一节里，作者指出苏洵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上，他的散文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历代对苏洵散文的评价都很高，到了明清两代，苏洵散文更成为学习的典范，选家们编辑的一些范文选本都入选苏洵的文章。总之，在文学史上，苏洵上继韩、欧，下开苏轼兄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本书的"附录"有两个内容，一、"苏洵年谱"；二、"苏洵著述简介"。这两个附录对了解和研究苏洵其人其文很有参考价值。（关 山）

《苏洵》 金国永著。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此书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通过孕育隽秀之才的环境、少不喜学和游荡不学、年二十七后的发愤苦读、在家创作和名动京师、拒绝诏试和上书求官等内容的叙述，介绍了苏洵的生平。后一部分介绍和论述了苏洵的文学成就，指出苏洵强调必须要有自己的心得才能发为文章，因此他的文章往往反映出他的独立见解。苏洵的议辩文，格调高古，波澜起伏，抑扬顿挫，"如大江流水，汩汩滔滔；如空中咳唾，随风飘扬，使人读之琅琅上口，爱不忍释。"他的杂文，具有不同的风格，反映了苏洵文章风格的多样性，它们或者铺叙事物，随物赋形；或者借物寓慨，畅抒情怀，都比较注意描摹刻画，宛转曲尽，但却感情真挚，格调高昂。最后，作者还论述了苏洵的文学主张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齐石宜）

《苏轼评传》 曾枣庄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本书共分九章，前六章主要介绍了苏轼的生平事迹，即"苏轼的家世和他的少年时代"、"仁宗、英宗朝的苏轼"、"神宗朝的苏轼"、"元佑更化时期的苏轼"、"绍述新政时期的苏轼"、"北归和病逝"。后面三章分别论述了苏轼的世界观、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关

于苏轼的评价等问题。作者指出：苏轼一生都在大力推进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为肃清“五代文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说自己不学“求深”、“务奇”的“时文”，坚持“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文风。他主张文章要言之有物，要“意尽言止”。主张要讲自己信以为真的话，反对人云亦云，主张文以致用，要“有为而作”文章。苏轼认为文章应“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针对文坛时弊提出了许多精辟和深刻的见解；而且更在于他以自己大量的堪称典范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使古文革新运动立于不败之地。苏轼一生写了很多政论和奏议。他的这类文章说理透辟，气势雄浑，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纵横姿肆，雄辩服人。苏轼的史论，善于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发掘一些他人不易见到的新颖见解。在论证中，能广泛征引史实，忽放忽收，舒卷自如，议论风生，写出许多雄辩有力的文章。苏轼很善于用一些浅显、生动、贴切的比喻，阐明一些深刻的道理。苏轼一生很少作墓誌碑传等应酬文字，但就在他所作的寥寥数篇碑传中，也有一些脍炙人口的篇章，其中以《方山子传》和《韩文公庙碑》最为有名。苏轼一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写了大量的游记，他的游记往往以描写、记叙、议论、抒情的错综并用为特点。苏轼还写了大量书信，其中也不乏佳作，如《答李端叔书》等，就“信笔抒意”，非常动人。苏轼的赋，现存20多篇，大多是以散代骈，句式参差，用典较少，押韵不严的文赋，其前后《赤壁赋》，就是这种文赋的代表作。另外，苏轼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不仅在于高文大册，还在于“小文小说”。苏轼《志林》和《仇池笔记》中的许多随笔，就是这种“小文小说”的代表作。总之，苏轼无论政论、史论、杂说，还是游记、碑传、书信、随笔，都写得如“行云流水”，平易自然，明晰轻快，挥洒自如。在《关于苏轼的评价问题》一章里，作者指出：苏轼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富有革新精神，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二、苏轼同欧阳修一样很注意奖拔后进，他继欧阳修之后，成了北宋文坛的实际领袖；三、苏轼的诗词散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在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苏轼年谱”、“苏轼著述简介”和“苏轼行踪示意图”。

（方兴元）

《苏轼文学论集》 刘乃昌著。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这本论文集共收论文17篇，除专论苏轼诗词创作的几篇文章外，其他有总论苏轼及其作品的《苏轼简述》、《试谈有关苏轼评价的几个问题》，有专论苏轼文艺思想的《苏轼的文艺观》；有论苏轼与其他文学家交往的《苏轼与欧阳修》、《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还有《论佛老思想对苏轼文学的影响》等论述苏轼与佛老思想关系的论文。这些论文有的也涉及到苏轼的散文，如在《苏轼简述》里，作者叙述和评介

了苏轼散文的成就，指出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札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作者又分别介绍了苏轼的谈史议政的论文和叙事记游的散文以及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较为系统研究苏轼散文的论文，在这本论文集中只有一篇专论，即《苏东坡的散文》。作者指出苏轼以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晓畅的风格，为北宋散文开辟了崭新的天地。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散文的独特风格，即他的散文以奔腾倾注、波澜层出见长。作者具体分析了苏轼的"谈史论政的论文"、"写人叙事和记游的散文"、"书札、序跋与杂著"，指出苏轼的政论文中，有不少有的放矢，反映现实，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表现出作者一定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决壅蔽》等便是这类论文；苏轼写人叙事和记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最富有独创性，如《方山子传》、《喜雨亭记》、《超然台记》、《记承天寺夜游》等都是广为传诵、脍炙人口的名篇；书札、序跋、杂著等杂文，在苏轼散文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类作品或叙友情，或写襟抱，或谈文艺，或论学术，最为直接地体现出作者的心胸、性格和识见，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答参寥书》、《书吴道子画后》等都是很有价值和值得一读的文章。，总之，作者认为苏轼散文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诸体皆备，不拘一格，艺术上有鲜明的个性，写作技巧变化多样，不少篇什被古人奉为文章楷模，在历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对苏轼的散文遗产，是很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关　山）

《苏轼新论》　朱靖华著，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此书收苏轼研究论文10篇，除几篇专门研究苏轼的诗词及文学观点的文章以外，有的研究了苏轼的生平和思想，如《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有的研究了苏轼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作用和他具体的散文作品。在《苏轼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真正完成者》一文里，作者针对"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最后完成者、是诗文革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的观点作了深入分析，指出欧阳修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继往开来者；而苏轼却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大任，其标志是：一、从"文"的角度，对"道"提出了划时代的理论解释；二、提出了"道"、"艺"并重的理论，并在"艺"上深入探索；三、彻底廓清西昆体的影响；四、反对所谓"务奇"新弊和"重道轻文"的倾向；五、把诗文革新精神贯注到各种文体形式中去，如他的散文，雄浑奇崛，打开了广阔的题材疆域，在艺术上，结构多变、语言明快，表现出独创性。在《前、后〈赤壁赋〉题旨新探》一文里，作者根据作品的实际和苏轼的自书题跋，并结合两赋创作的时代背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赋是为慨叹北宋皇朝对西夏作战失利，骄纵轻敌、导致国危势弱而写作的。作者还进一步详尽地论述了两赋深刻的思想内

容和精湛的艺术特色，陈迩冬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这个观点，“其说自圆，为以前论者所未曾到。作者发微显幽，言之成理，足可立一家之言。”

（弥式宏）

《苏轼及其作品》 丛鉴、柯大课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书由苏轼评传和作品选注两部分组成。在“苏轼评传”这一部分里，作者结合他的生平事迹，介绍了他的散文创作，如在介绍苏轼凤翔时期的生活时，作者指出：这一时期苏轼还写了一些著名的散文，他为凤翔郡写的《凤鸣驿记》，记述凤鸣驿的变化及修整过程，内容详实，文字质朴。《喜雨亭记》表现了作者关心农事，关心民生，积极入世的精神，文笔活泼，行文富于变化，联想丰富，代表了苏文的风格特点。《凌虚台记》表现了苏轼对北宋封建王朝的深刻认识，文章调子低沉，奏出了一个时代衰落前的哀音，但作者的态度仍然是执着于现实的。这时期苏轼的文学散文已具备“不择地而出”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的特色。在介绍苏轼密州时期的生活时，作者指出：这一时期，苏轼也写了许多散文，重要的如《超然台记》、《盖公堂记》。《超然台记》写他对逆境，对困难，对艰难生活，对政治上的冷遇，对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能采取超然物外，不计荣辱的态度，因此能够始终保持开朗豁达，自得其乐的心情。《盖公堂记》赞扬了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让人民休养生息。在“结束语”一节里，作者对苏轼散文创作给以高度评价：苏轼散文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挥洒自如。他的一些文章常常是信手拈来，自然成文，他不拘题材，不拘形式，有感而发。他的散文富于变化，内容章法奇特，波澜起伏，反复跌宕，意趣不凡，引人入胜。另外，他的散文也富于哲理，描写事物生动传神，行文如流水，气势磅礴。他的论文，论辩滔滔，说理透辟，语言平易。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诗文不仅影响到宋元明清的诗文，甚至对《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苏轼诗词文选注”部分，作者选注了《南行前集叙》、《范曾论》、《喜雨亭记》、《文与可飞白赞》、《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答谢民师书》等共20篇散文作品。

（关　山）

《东坡文论丛》 多人著，苏轼研究学会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是苏轼研究学会编选的“苏轼研究论文集”的第四辑，共收入论文14篇，分别就苏轼的各类散文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论述。在《从韩愈与苏轼散文的比较看北宋古文运动的成就》（谢桃坊）一文里，作者就文体的一般情况，以苏文为例说明了宋代散文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和丰富了。作者还就韩、苏散文在气格、文理、文辞、结构等传统散文艺术方面作了具体比较，指出：苏轼散文学习了韩文的气格，而文理更加精密深透，语言进一步通俗化而更加平易晓畅，结构也更曲折而富于变化。这不仅体现了苏轼个人们的成

就，也体现出了北宋古文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在艺术上取得的新的成就。在《诗情与哲理的交响曲——苏轼文学散文艺术美浅探之一》（陈华昌）一文里，作者指出：苏轼的文学散文不仅以浓郁的诗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以丰富深刻的哲理启迪人的思想。几乎所有的苏轼散文名篇，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地蕴含着某种哲理。在这些文章中，情和理互相融合，互相渗透，说理议论中兼带着抒情，抒情中兼带着说理，二者水乳交融，构成一曲美妙的乐章。在《东坡散文艺术探微》（王文龙）一文里，作者指出：苏轼散文的一个特点是"妙造自然"，它们相当平易流畅，读起来毫无艰涩、局促之感，尤其是他的随笔小品，丝毫不做作，不逞才使气，潇洒从容，悠然自得，更给人们以艺术的快感。苏轼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溢为奇怪"，它们有的具有新颖、独特以至奇妙的构思，因而显得不同凡响。东坡散文的奇处难以企及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用巧骋奇，刻意追求，而是自然达到的一种艺术高境。苏轼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创造意境，尤其是他的游记和小品文，其中不少作品都有鲜明、深远的意境。作者还就苏轼散文常用的技法——传神和衬托以及苏文中议论的妙用作了细致地分析和论述。在《苏轼杂记文中的艺术特色》（洪柏昭）一文里，作者指出：苏轼的记，有60多篇，这是苏轼最富于文学性的散文之一，其中很多篇章，颇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一斑。他以其积极用世的政治态度，丰富的生活经验，复杂的世界观，宽阔旷达的胸怀、渊博的学问，高度的文艺修养，在记里谈政治，谈人生，谈佛道，谈哲理，谈艺术，谈学问，读者在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到丰富生动的记述，妙趣横生的议论，获得优美的艺术享受。作者还就构思、谋篇、表现手法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苏轼记文"随物赋形"，"姿态横生"的艺术特色。在《浅谈苏轼小品文的风格》（李苓）一文里，作者指出：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小品文大师，他的小品文题材广泛，几乎无所不及，它们非常随便，自然，有感即发，有话便讲，言之有物，无所讳忌。苏轼的小品文具有许多文豪所不及的丰富感、变化感、幽默感。作者从立意，谋篇、行文三个方面对苏轼小品文作了一些较为深入地探索。其它几篇文章，如《苏轼散文的比喻手法》（何江南）、《苏轼题跋浅探》（郭隽杰）、《论苏轼的赋》（张志烈）以及《达观幽默，遇慨于谐——苏轼〈游沙湖〉评析》（陈祖美）、《独辟蹊径，不主故常——苏轼〈方山子传〉的结构艺术》（丁永淮）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方兴元）

《曾巩研究论文集》 多人著，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共收论文20篇，从不同方面对曾巩的思想及其作品作了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分别论述了曾巩的学术思想、哲学思想、史学观、文论思想；其二，有些文章论述了曾巩的生平及其与王安石、欧阳修等人的交游；其

三，许多文章重点论述了曾巩的诗文创作，专门论述曾巩散文创作的文章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以上。《义理精深，独标灵彩——试论曾巩散文的朴素美》（万云骏）一文指出：从思想内容上看，曾巩散文最显著的特点是朴实无华，从艺术手法上看，曾巩散文往往曲折隐蔽而不是直捷了当的，含蓄蕴藉而不是明显发露的；从风格上看，曾巩散文具有纡徐委备、幽情雅韵的风格特点。《浅谈曾巩杂记文的议论特色》（傅开沛）一文分别从"叙事以明理"、"托物以寓理"、"命辞以达理"三个方面论述了曾巩杂记文的议论特色。《略谈曾巩题记文的思想内容》（袁瑾洋）一文指出曾巩的题记文没有一篇是纯客观地记叙某事某物的，作者总是将具体的事物提到一定的高度来认识，同时发表自己的见解。本文从社会政治、道德、宗教、教育等几个方面，对曾巩题记文的思想内容作了归纳和分析评论。《论曾巩散文的艺术风格》（钱贵成）一文把宋以来关于曾巩散文风格的说法概括为四组，分别作了阐释，指出曾巩散文的风格是典雅而平易、含蓄而简洁，继而探讨了曾巩散文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其他几篇论文，如《曾巩散文的评价问题》（王水照）、《从曾巩诗文的借鉴意义谈起》（陈仰民）等也都极有学术价值。（管士光）

《明代散文赏析》 胡冠莹选析。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6 年出版。此书为《古典文学选析丛书》中的一种，共收入明代宋濂、刘基、归有光、袁中道等人的散文作品 30 篇，所选篇目均为明代散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了适应读者对象的要求，本书的注释较为准确、详细，一些难点力求给以适当的解释，没有避重就轻的毛病；赏析写得深入浅出，对于每篇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写作技巧、均能抓住要点，给予适当的评论。在具体写法上，注意避免面面俱到，而是能够根据不同的作家和作品，着重分析其特色，因而显得生动活泼。

（齐石宜）

《清代散文赏析》 黄珍珠著。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此书共收入清代散文 20 余篇，作者对原作分别作了注释和赏析。赏析部分力求抓住每篇作品艺术或思想的主要特点，给以适当的分析和评论，并从欣赏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者注意的问题。（侯文朴）

《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 钱仲联著。齐鲁书社 1983 年出版。这部论文集共收入 13 篇文章，又有"后录"4 篇，共 17 篇。此集文章，多论清代诗歌，也有几篇专论清人文论和文学思想的，如《清人诗文论十评》、《顾亭林的文学思想》；也有论述清人律赋的，如《化臭腐为神奇——论黄遵宪的一篇律赋》；还有几篇总论清代的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如《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家黄人》、《论黄遵宪——〈入境庐诗草笺注〉前言》。专门论述散文的，只有一篇，即《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指出：就古文与时文（八股）的关系来说，唐宋古文对明清时文产生过影响，著名的时文家如唐

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方苞，正是因为于古文有湛深的造诣，所以时文的成就也超出于辈流。而时文又转而影响了明清的古文，但二者的循环影响，主要却在于古文影响时文的一面。古文影响时文，所以提高时文的水准；而时文影响古文，则是降低古文的品格。影响不能改变不同文体的特性，古文自是古文，时文自是时文，而清代桐城文派盛极一时以后才对时文产生了影响。本集"后录"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一文也值得注意，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指出：不能一笔勾销佛教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他从文学的角度对佛教的影响作了考察，由佛教的哲学思想进入了文学领域入手，研究和分析了佛教对我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学形式的影响，进而具体介绍了佛教为我国古代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带来的变化。

（方兴元）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概论·诗文卷）》 多人著，牛仰山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书收录1919——1949年间近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资料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共39篇。所论内容为近代文学思潮、文学派别、重要作家和作品，其中如《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节录）》（胡适）、《论桐城派》（陈灨一）、《章太炎的文章论》等均是极有价值的论文。附录为"中国近代文学（概论、诗文）研究论文、资料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 （侯文朴）

《桐城文派评述》 姜书阁著。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此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叙述了桐城派以前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归有光的古文、清初的古文；第二章论述了桐城派的起源及其主张、方苞的时代思想及其文章之批评、方苞之古文义法、刘大櫆之古文及其在桐城派之地位、姚鼐之师承及其文章之批评、姚鼐之古文义法；第三章专论桐城派之别支——阳湖诸子，介绍了阳湖派的起源、阳湖诸子之学术文章、阳湖诸子之师承交游，进而论述了阳湖诸子之文应否别称一派的问题；第四章论述了桐城派的传播和影响，介绍了姚鼐之弟子及其文章、私淑桐城派之文人及其文章、姚鼐之再传弟子、曾国藩之再振桐城派、曾国藩之幕僚及其弟子之古文、严复林纾及其前后之桐城派古文。如果说前四章主要是叙述桐城派发展变化的历史，那么第五章则是对这一流派的评论，在这一章里，作者介绍了桐城派自己之批评、非桐城派古文家之批评、白话文家之批评，最后阐述了自己的评论："就桐城派之文章言，通顺平正则有之，应用则未也"；"就桐城派之义法论之，则不足取者固多，但间亦有稍可取者"；"以历史之眼光言之，桐城派已为过去之遗迹，陈旧尸骸，不可复生。"最后附有四个表格，即"桐城派自认所承之古文家系统表"、"桐城派及阳湖诸子之关系表"、"桐城派文人系统表"、"桐城派文人传表"。 （张式宏）

《桐城文派论》 梁堃著。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这是较早的一篇专门研究桐城派散文及其理论主

张的专文，作者论述了如下问题：桐城文派之源流、桐城派与阳湖派之异、桐城派兴起的原因、义法、品藻、所以为文者八（即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禁忌、桐城派与宋学、桐城派与汉学、桐城派古文与八股、题材、桐城派古文家所好之书、桐城派古文家之工夫、风格、文弊、桐城派衰歇的原因。因为篇幅较少，而作者论述的问题又较多，所以显得论述不够深入，也没有展开，但作者所论的16个问题对研究者还是很有启发的。（齐石宜）

《桐城派研究论文集》 多人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这本论文集共收论文12篇，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桐城派作家的文学主张和散文创作，《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王气中）一文，从桐城派的文论体系、桐城派反时文反骈文反考据文的性质以及桐城派对于中国散文的贡献等方面论述了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桐城派“义法”说及其实质》（段熙仲）、《桐城派的“义法”》（王泽浦）、《关于桐城派的“义法”说》（王竹楼）等论文集中讨论了这个流派论文的中心理论“义法”说。在《谈有关桐城文派的几个问题》里，作者在论述了“现在怎样看待桐城文派才算恰当”、“桐城文派的产生及其历史背景”、“姚鼐对文学上的贡献”等专题以后，特别指出桐城派的散文有可供借鉴的地方，如桐城散文文字简洁，结构谨严，他们的主张是求精而不求多，重视古人惜墨如金的精神。他们的散文，虽然缺乏宏博的议论，但绝无浮辞浪墨。其他几篇文章，如《论桐城派古文和清朝的文化统治》（乔国章）、《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钱仲联）、《桐城派发生发展及其衰亡的社会原因》（王泽浦）、《再论桐城派》《（段熙仲）、《论桐城派》（方铭、吕美生）等都从不同的方面，或论桐城派产生衰亡的原因；或论桐城古文与八股文的关系；或论桐城派作家的文学主张和散文成就。这些论文发表的较早，有些观点难免已经陈旧了，但对今天的研究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关 山）

《桐城古文学派小史》 魏际昌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作者认为，桐城派的“文”，是“韩欧古文”，又“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因为无论在“义法”的归纳上，创作的表现上，他们都是既继承又发展，成体系，有特色，因时变易，与前不同的。如“辞类”的“大编纂”，“文笔”的较清新，思想较为解放，都是值得称道的。本书即是追本溯源地研究这个文派的历史和演变的专著，作者力图使给这个文派一个比较正确的评价。从写法上，这部著作以人为纲，排比先后，分清地区，力图读者一目了然。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为“桐城古文学派的树立、桐城四祖”，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先行者戴名世、创始者方苞、中继者刘大櫆和集成者姚鼐；第二编为“桐城古文学派的分播、姚门诸子”，分别介绍了安徽桐城作家方东树、刘开、姚莹；江苏上元作家管同、梅曾亮、姚椿、吴德旋；江

西新城的“桐城派”作家鲁九皋、陈用光及陈学受、陈溥、吴嘉宾。第三编为“桐城古文学派的分播、梅氏之群与‘阳湖派’”，分别评述了湖南的“桐城派”作家吴敏树、杨彝珍、孙鼎臣、郭崇焘、王先谦；广西的“桐城派”作家吕璜、朱琦、王拯、尤启瑞；阳湖古文家恽敬、张惠言、李兆洛、陆继辂。第四编为“桐城古文学派的陵替——‘准桐城派’”，分别介绍和论述了私淑桐城的曾国藩以及曾国藩的幕客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和严复、林纾。这部著作材料丰富，论述清晰，线索分明，是研究桐城派的重要参考书。（张式宏）

《桐城文派》 何天杰著。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出版。此书共分九章，前有“导言”，后有“余论”，最后附有“桐城文派年表”。在“导言”里，作者介绍了桐城文派得名的原因，概述了这一文派的几个重要人物，并论述了现在研究桐城文派的意义。第一章主要是历史的回顾，论述了中国文学史上散文理论的发展，主要内容有：散文理论的艰难起步、尚用观念下汉人的创作与理论、六朝唯美的创作与形式主义文论、复古的唐宋文论、形式主义再次高扬的明代文论。第二、三两章专论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作者首先论述了方苞提出的“义法”论，概括了这种理论的本质特征，并指出方苞将“义法”视为文章写法的同义词，并由此阐述了他对作文的经验体会和对散文的要求，继而分析和研究了方苞的散文作品。作者以《“叛逆者”的开拓之功》为第四章的标题，论述了刘大櫆的文学理论主张及其创作，作者的论述是从以下线索展开的：不合标准的接班人对桐城家法的形式主义改造、神气与“活法”、在古代诗论与文论交叉点上产生的“因声求气”说，以诗论说文的先行者之误。第五章专论姚鼐，其标题为《道与艺合 天与人一》，作者论述了姚鼐的理论建树，指出他的文学观点与时代的关系，进而论述了姚鼐折衷文道的“道与艺合”论以及出儒入庄的“天与人一”论，指出姚鼐的一个贡献是发现了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本质区别并在前辈文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神韵”观。第六章，论述了桐城派“全盛时代及其危机”，这一章主要论述了姚门弟子，如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刘开等人，分别介绍了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情况，特别指出了切磋竞争之风带来的创作的兴盛。第七、八两章，主要介绍曾国藩及其弟子，作者论述了曾国藩的纪实散文，指出他此类散文具有深识高见和爽直明快的特点，并常常表现出一种诙诡之趣。对曾国藩的弟子如薛福成、吴汝伦、黎庶昌等人的文学观点和创作情况也作了介绍和论述。第九章为《桐城派的末路人——林纾》，作者先概述了桐城派的萎缩及其原因，继而介绍了林纾的生平，并从“儿女真情的大胆描写、含蓄缠绵的抒情方式”等方面，论述了林纾的散文创作，指出林纾散文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笔端饱含感情，这种感情往往喷薄而出，令人不能不为之动容。“余论”主要论述了这样几个内容：晚

辈学人对桐城文派的缅怀、桐城文人的努力规定了现代文学散文的发展方面、历史与借鉴。作者特别指出：桐城文人对文学散文的自觉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他们的创作大大丰富了文学散文的种种表现手法，因此，他们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对以后的散文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齐石宜）

《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 · 刘声木撰，徐无祥点校。黄山书社1990年出版。此书是具有工具书性质的关于桐城派文学资料的集大成著作。作者刘声木，是清末民初安徽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历时30余年写成此书。《渊源考》收录桐城派及有关文学家1200余人，从记述师承关系入手，探索桐城文学的起源，研究桐城派的形成、发展和社会影响，同时对与桐城派有关的阳湖、湘乡文学流派也有较为客观的评述。《撰述考》著录桐城派及有关作家、作品，共收书目4100余种，对其中一些书的别名、卷数、刊本、收藏及散佚等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介绍，是一部关于桐城派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目索引。本书兼“学案”、“目录”、“索引”的作用，对研究桐城派文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弥式宏）

《袁中郎》 多人著。今知社出版部1935年出版。这是一本论文集，书前有周作人的代序，题为《明末的新文学运动》，正文分三个部分，其一为《袁中郎评传》，由四位作者合写，即《袁中郎的生平》（任维焜）、《袁中郎的思想》（任维焜）、《袁中郎的诗文观》（刘大杰）、《袁中郎与佛学》（张裕钊）、《袁中郎与政治》（阿英）、《袁中郎遗事》（刘大杰）。第二部分有6篇文章，即《袁中郎全集序一》（周作人）。《袁中郎全集序二》（郁达夫）、《袁中郎尺牍序》（阿英）、《读袁中郎集》（周木斋）、《公安小品之一夕谈》（刘燮）、《公安竟陵与小品文》（陈子展）。最后一部分由《发现袁中郎手迹的经过》（樊锁）和《袁中郎与王石谷》（沈思）两篇文章组成。

（管士光）

《袁中郎研究》 任访秋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此书共分两编，上编为论述，下编为年谱，是研究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专著。上编共有三章，第一章《中郎以前明代文学思潮的趋向》，介绍了明初作者的复古论、复古运动的勃兴与李何的复古论、唐宋派的复古论、复古运动的再起与李王的复古论、复古派中的作者对复古运动末流的修正论、先于中郎而反复古派的作者；第二章《中郎的思想与文学》，作者就袁宏道与李贽、袁宏道与王学中泰州派的关系等问题，对袁宏道的思想作了剖析和论述；同时对袁宏道的作品作了介绍；第三章《明末以来对中郎文学上功罪的评判》，分别论述了公安的衰歇与竟陵的代兴、唐宋派对于复古公安两派的评论、王夫之论明代诗歌、复古派之死灰复燃与清初复古派的偏袒者、中郎性灵说的光大者、中郎诗文集的被禁、五四后对中郎在文学上功罪的新评价，中郎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在第二章里，作

者用专节论述了袁宏道的散文创作和袁宏道以后的散文发展状况，指出：袁宏道的散文，可以分为议论文、抒情文、写景文三类。他的议论文，在当时主要表现在对复古派文艺论的批判上，有序文，有尺牍。他的立论，能在破对方错误理论的同时，建立自己的正确论点，因此它们逻辑性强，如《与丘长孺书》、《叙小修诗序》等便是这样的作品。其抒情文，主要是那些与师友的尺牍，这类散文真是做到了写文象说话一样，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无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如《与顾升伯修撰》等即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袁宏道的写景文，主要是那些山水游记，在这方面他的确有着极其卓越的成就。在论述了袁宏道的散文成就之后，作者又介绍了袁宏道以后明代散文的发展，指出：中郎以后明代的散文，因受了中郎的影响，也有着很大的变化，大体说来，可分为四派：一、竟陵派，这一派以锺惺、谭元春、刘侗等为代表，他们在创作上同中郎一样主张表现自我，反对因袭，不同的是，他们以谨重来矫公安末流的率意，以新奇来矫公安末流的俚俗，因此形成一种幽深冷僻的风格。二、复古公安的折中派，这派的作者有王思任、陈继儒等，他们的作品，有复古派之雄浑，而无其虚矫；有公安之清隽，而无其浮浅。他们取公安之信腕直寄，无法为法的主张，而又济之以复古派的博雅，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三、唐宋派中的左倾者，此派作者只有李流芳一人，他不象一般古文家那样拘泥，他的文章，不求明道，只为抒情，所以也就清新可喜。四、公安竟陵的融合派，此派的代表是张岱和祁彪佳，他们的作品清澈爽冽，沁人心脾，如寒潭，又似皎月，很有自己的特点。总之，明代的散文比起诗歌来，更有特色，也更有成绩，这与袁宏道倡导的文学革新论和他的创作实绩有着密切的联系。

（方兴元）

《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 多人著，张国光、黄清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这是一本论文集，共收论文20余篇，其中有论述公安派文学主张及这种主张对明中后期文化的影响的论文，也有专论三袁的人品及公安派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关系的论文。其中《论公安三袁的散文》（尚学锋）及《山水出“性灵”——论袁中道的山水游记》（石育良）等对三袁的散文作了专门的论述。前者指出三袁是明代重要的散文家，他们的散文在当时独树一帜，影响很大，在后代也受到不少人的喜爱。从整体看，这些作品固然不能和历史上一流作家的作品相比，但它们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某些方面有新的开拓，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微妙变化；人物形象的新特点；寄托着作者理想的山水境界。而作者还分析了三袁散文的艺术特点，即打破格套，独抒情灵；具有通俗浅近的审美特征，又有自由灵活，不拘一格的表现形式。最后作者论述了三袁散文的影响和他们最终没有取得韩柳欧苏那样辉煌成就的主客观原因。后者结合

袁中道的个性追求和他所生活的时代，对他游记的审美价值作了研究，指出袁中郎游记对社会政治采取的是一种否定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脱离时代，他的游记主要表现了世俗生活的情趣。袁中郎不仅观赏、再现、创造了自然美，而且是自然美的鉴赏家、批评家。如果没有个性自由的追求，他的心灵不可能超越社会现实，也就不可能产生他的自然美观，从而也就写不出那些优美的山水游记作品了。本书其他一些论文，虽然并没把三袁散文作为研究重点，但它们或论述三袁文学观点，或探讨三袁的生平事迹，这对三袁的散文研究无疑是有帮助的。 （弥式宏）

《龚自珍研究》 管林、钟贤培、陈新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龚自珍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除致力于诗文的创作外，还从事哲学、历史、地理、文字、音韵、儒学和佛学等方面的研究，本书着重研究龚自珍文学方面的成就。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论述了龚自珍所处的时代、他的生平和他的文艺思想；第六、七两章分别从佛学思想和经史研究两个方面论述了龚自珍的诗文创作，指出："参与佛教活动和佛教唯心主义思想，对龚自珍的创作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有害的。但作为佛经的文学色彩和逻辑推理（因明），却给龚自珍诗文写作带来了某些有益的影响。""龚自珍曾着力研究经史，他的大量的文学作品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研究经史的某些气息。显然，急剧变化的时代现实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而研究经史对他的文学创作有深刻的影响。"第八章集中论述了龚自珍散文的特点，作者认为除了运用公羊家的"三世说"和借古讽今这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之外，以文学的角度看，龚自珍散文还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形象描写与政论的结合。在龚自珍的许多散文中，常常可以见到不同程度的形象描写。这些散文往往带着较浓厚的文学色彩，这些形象描写与散文中的政论有机地配合，增强了文章的战斗性与艺术感染力。二、善于运用曲笔。他运用曲笔常常是不得已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一种战斗的方法。这些迂回曲折、闪烁其词的笔法显然投射着清初文字狱的阴影。三、立意新颖奇巧。龚自珍的散文，没有当时的八股格局，力避陈腔俗调，往往善于想人心中所有，道人口中所无，匠心独运，别开生面，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给人一种艺术享受。四、语言尖刻、含蓄。作者指出：龚自珍的散文显得生气勃勃的原因，除了他对现实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之外，也与他具有某种程度的求新思想有关。除此之外，龚自珍的丰富生活实践，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也是他写出许多为人称道的散文作品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最后一章论述了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文坛上的地位和他对改良派诗文革新运动和南社诗人的影响。 （贺然青）

海外研究

总体研究

概　述

苏联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翻译与研究　苏联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翻译相当重视，先秦散文已译成俄文出版单行本的有：《管子》，施泰因翻译并注释，东方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380页。《周易》，休茨基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孙子兵法》，康拉德译并注释，苏联科学院1950年出版，401页。《战国策》，克·瓦西里耶夫翻译并注释，科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253页。《商君书》，佩列洛莫夫翻译并注释，科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350页。《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列子、杨朱、庄子）》，波滋涅耶娃编译，1967年，231页。

此外，由司徒卢威和列德尔编选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年出版）一书几乎收入了所有先秦散文文集的选段，其中有《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列子》，译者是波兹涅耶娃。

在《古代世界史文选》（司徒卢威编，1950年）、《中国文学文选》（康拉德编，1959年）、《古代东方诗歌与散文》（1972年）、《远东诗歌与散文》（1973年）等书中都选译了若干先秦散文。《远东诗歌与散文》里还增译了《韩非子》节选。

对《史记》的翻译尤为重视，先后出过两种版本：《司马迁文选》，帕纳秀克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0年出版，136页。司马迁《史记》（两卷本、439＋357页），维亚特金·塔斯金译，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72和1975年出版。

除了《史记》，秦汉散文中的《淮南子》、《盐铁论》、《汉书》也有节译，被收入《古代世界史文选》（司徒卢威编，1950）一书中。

阿列克谢耶夫编选并翻译的《中国古典散文》（科学出版社，1958年，387页）一书精选了司马迁的名篇：

《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酷吏列传序》、《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序》、《孔子世家赞》、《五帝本纪赞》、《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管宴列传》和《游侠列传序》等。

此外，《中国古典散文》俄译本还收入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汉武帝、李陵、王羲之、陶渊明、谢庄、王勃、李白、李华、韩愈、柳宗元、刘基、苏询、王安石等22人的散文，整本文集共有散文63篇，这是迄今最全的俄文选本。阿列克谢耶夫的译笔也精湛，一向为苏联汉学家所称道。

在中国历代的散文作家中，作品被译成俄文者最多的是司马迁、韩愈和柳宗元三人。此外，陶渊明和陆游也是比较受重视的两位。这些作家散文作品的俄译分别见于《中国古典散文》（1958）、《韩愈柳宗元文选》（1979）、《入蜀记》（1968）等书中。

苏联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81—1951）、康拉德院士（1891—1970）、施泰因（1890—1964）、休茨基（1897—1941）、杨兴顺（1908—1974）、克・瓦西里耶夫（1932— ）、佩列洛莫夫（1928— ）、克罗尔（1931— ）、李谢维奇（1932— ）、波梅兰采娃（1938— ）等。但角度各不相同，从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角度研究的都有。其中写出的专著有杨兴顺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1950年出版，158页；克罗尔的《司马迁——历史学家》，科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446页。

先秦散文在俄国颇有影响，诗人普希金就对儒家的教育思想感兴趣，称赞“中国的贤人孔夫子”。作家托尔斯泰则承认老子对他的影响“巨大”，而孔孟之道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迷恋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甚至有时运用道家和儒家学说的部分原理来论证自己的理论。（李明滨）

日本的中国散文研究 日本的中国散文研究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当时的许多汉学者在文章中对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已有较完整、较系统的认识，评论各家，阐述已见。荻生徂徕首倡古文辞派，追慕李王复古思想，在散文方面模拟盛唐，唐宋八大家流播较广。古贺侗庵（1788—1847）在《论文赠原田好直》、《书文江丽藁后》，《苏老泉集后序》、《跋东坡论文语》、《读黄石牧瘖堂集》、《与家兄穀堂先生》、《读韩文公书集》、《苏老泉文妙》、《唐荆川集后序》、《读汪钝翁类稿》等文章中评论范围涉及周秦至明清各种流派及主要人物，对明代复古派有批判吸取（参阅《古贺侗庵的诗文论与中国诗文论》，松下忠著，《东方学报》第24集；《古贺侗庵的中国散文论》，松下忠著，《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9集）。系统回顾中日散文发展历史的专论则是斋藤拙堂的《拙堂文话》，斋藤拙堂（1797—1865）首创文话一体，书中评论中日古文发展的流派与作品，记载古文家议论行事，认为“文当以唐宋为门阶，秦汉为阃奥”，推服韩愈，对中国文言散文发展趋势持“文章极衰论”，而对于日本汉语散文的发展则持“文章日盛论”，然

其品评文章时有笃论。进入二十世纪，研究益加深入。各种中国文学史对于古代散文的发展都有论述，包括内田泉的《中国文学史》（明治书院，1956）、仓石武四郎的《中国文学史》（中央公论社，1956）、吉川幸次郎述、黑川洋一编《中国文学史》（岩波书店）、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波多野太郎《中国文学史研究》（樱枫社，1974）。在历史散文中，《史记》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十五世纪已有桃源的《史记抄》十九卷与月舟的《史记抄》八卷，有《史记抄》研究会对此二书集中作专门研究。江户时代冈白驹著有《史记觿》，皆川淇园著有《史记助字法》。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引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加以考证，并据古抄本考勘本文，补订古注，初版1932－1934年由东方文化学院刊，再版于1956－1960年由《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刊，有台北艺文印书馆发行的影印本。小川环树、今鹰真、福岛吉彦对《史记》的世家、列传加以译注，分别由汲古书院及筑摩书房出版。安续由纪子《史记的人物评语》（榷歌书房）、桥木尧《史记入门》（中日出版）、陈舜臣《史记之旅》等是近年有关《史记》研究的新著。增田欣《以史记为源泉的说话的考察》（《太平记比较文学研究》，角川书店，1976）、仁田香鹤子《源氏物语里史记的投影》（樟明文学七，1955．10）等着重探讨了《史记》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根据《史记》创作的文学作品以长与善郎《项羽与刘邦》（新潮社，1916）、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新潮社，1980）为代表。唐宋八大家也是现代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从池田四郎次郎《唐宋八家的名称》（东洋文化，二二）、林田慎之助《唐代古文运动的形成过程》（日本中国学会报，1977，第29集）、高桥明郎《欧阳修的散文文体的特色——与韩愈散文差异的成因》（日本中国学会报，1987，第38集）、《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围绕梅圣俞诗集序》、东英寿《太学体考——其在北宋古文运动里的一个考察》（日本中国学会报，1988，第40集）、《欧阳修〈居士集〉编纂的意图》（中国文学论集，17，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谷口匡《韩愈散文作品的立场与道的主张》（中国文化，146，大塚汉文学会）、《张中丞传后叙与韩愈的立场》等著述中大体可以看出对唐宋八家研究的倾向。对于明代复古派散文的研究，有前野直彬《明代古文辞派的文学论》（日本中国学会报，16集）、松下忠《古文辞里李王的不同》（和歌山大学纪要人文科学，7）、岩城秀夫《抨击古文辞》（中国戏曲演剧研究，36）、吉川幸次郎《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庶民性》（立命馆文学，180，1960）等。内山知也《明代语文人论》（木耳社，1987）倾注了对于明代文人文化的注意。中国散文的选编有何建章、濑户口律子《中国散文选》（明治书院，1985）、本田济《近世散文选》（鉴赏中国古典24，角川书店，1988）等。（王晓平）

我国古典散文在西方 我国古

典散文的西渐究竟始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但至迟是在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时。他们在中国学习汉语，研究儒经。据张尔岐《蒿庵闲话》载：意人利玛窦初到广州时，“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义”。利玛窦等人随后便选译四书，将其介绍到了欧洲。十八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和俄国先后建立汉语学校；十九世纪，巴黎、牛津、剑桥、伦敦等地也相继开设汉语讲座。古典散文是教材之一。

这个以经书翻译为主的西播潮流，于十九世纪中晚叶形成了高潮。这时译著汹涌，译者济济，与十七、八世纪西方盛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遥相呼应。例如，英国的理雅各，译有《中国经书》五卷（包括《论语》、《孟子》、《书经》、《诗经》、《左传》以及《易经》、《礼记》；此外还译有道家经典。法国的高夫越(Seraphin Convreur) 也是中国经学的翻译家，他将《书经》、《礼记》、四书、《左传》译成了法文，并且编纂了《中国文言文字典》。进入二十世纪，经书西译仍然绵续不绝。德国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英国阿瑟·韦理(Arthur Waley)、美国卫德明 (Helimut Wilhelm) 等均翻译过部分经书。

值得注意的是，在译者的心目中，这些经书不纯为中国文学的遗产，而是中国文化的遗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的中国文化综合研究开始分流时，经书和史书才得到了文学研究者的青睐。二十世纪的散文西播情况，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译介　尽管赋的文字艰涩难懂，它在西方却拥有众多的读者。早在二十年代，就出现了较有分量的译著，如韦理的《庙及其他》(纽约，1923；其主要内容是赋)、马古礼 (Georges Margouliès) 的《〈文选〉中的赋》(巴黎，1926)。后来又有埃尔温·冯·察赫 (Erwin von Zach) 的德译，华生、康达维的英译。赋在西方流传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赋被当作一种诗体，读起来音韵铿锵，琅琅上口；二是译者做了大量的注释，为读者扫除了文字障碍。唐宋明清的散文，译介则远远不足，迟至七十年代，才出现较重要的译著，如刘师舜的《中国古典散文》(香港，1979)。近十几年散文研究稍呈活跃之势，那些论文和专著中含有不少散文译文。

二、评传　相对而言，赋家和散文家的传记也较少。已见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袁宏道等作家的评传；有些构成研究著作的首章，有些纯为传记著作。其中刘子健的《欧阳修——十一世纪的理学家》(斯坦福，1967)一书，尽管偏重传主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评介，但在文学界也有较大的影响。

三、研究　在普及的层次上，诸如有关中国文学的文学史、文学纲要、文学艺术入门之类的著作，均介绍散文作家、作品、时代背景、文体特点、文学成就与影响等内容。七、八十年代，散文研究的学术性逐渐增强，几部专著的问世是其明显标志。这些专

著是：康达维的《汉赋——扬雄赋作研究》（剑桥，1976）、蔡涵墨的《寻求统一性的韩愈和唐代》（普林斯顿，1986）、陈幼石的《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斯坦福，1988）和周质平的《袁宏道和公安派》（剑桥，1988）。与此同时，论述深入的期刊文章也日渐增多。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将重点向唐宋明清的散文家转移，另一方面，即使以史传、先秦诸子为论题，也多从文学角度加以讨论，如论《左传》、《史记》的叙事艺术，孔子与上古的文学批评等。就研究方法而言，这时的散文作品研究偶见西论中用的例子，而古代文论研究则多有比较诗学的性质。

综而观之，西方的中国古典散文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显得有些薄弱，这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周发祥）

台湾古文研究情况述略 散文研究在台湾虽不甚繁荣，但据笔者所见，也颇有一些涵盖面广、立意独到、功力深厚的论著。只是由于资料匮乏，笔者见闻不广，很难对台湾古文研究情况作出系统全面的考察。故仅就笔者现有材料所及，分两个部分对此略述一二，以供参考。

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研究

这个时期中较为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篇著述：一是史墨卿《战国诸子散文的特色》（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9卷第7期）一文，该文鉴于以往诸子之学多从哲学角度予以探讨，而较少从文学层次作出论述的局面，试图对诸子散文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期能够得出有关诸子散文创作的根源及欣赏诸子散文的方法。文章从透辟精微的论辩、自然适切的修辞，艺道合一的特质、深邃高妙的境界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诸子散文的艺术特色。许俊雅《古本（大学）散文研究》（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9卷第2、3期）对"四书"之一《大学》在炼字修辞、锻句运调、谋篇布局方面的特点作了阐释，也颇富启发意义。该时期中，辞赋作品较受学者们的重视。张书文《由文学观点谈楚辞到汉赋的发展与流变》（正中书局1981年版）一书试图通过探讨社会环境对文学作品的激荡和影响，以及文学本身由于时间推进的自然演变，以期求得汉代文学在发展形态上的完整，作者详细考察了辞赋的渊源，并着重分析了汉赋的发展与流变，对汉赋兴盛的原因、汉赋的特质、汉赋的分期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简宗梧《汉赋和诗文的关系》（载《东方杂志》复刊17卷第9期）一文旨在考辨赋体之属性，他认为，追溯源流，汉赋是诗的别枝；就作家的主观意识而言，汉赋是诗的延续，就作品的客观风貌而言，汉赋是诗的扩大，而从形式方面观察，汉赋是散文化的诗。王国璎《汉赋中的山水景物》（载《中外文学》第9卷第5期）一文则试图通过对汉赋中山水景物描写的分析，来探讨汉赋对山水诗起源的影响。此外，澳籍华裔学者柳存仁《上古秦汉文学》（商务版）、简宗梧《汉赋文学思想源流》（《政大学报》第37、38期）、苏雪林《赋的渊源与流变》（《自由太平洋》第10卷

第7、8期)、廖国栋《魏晋咏物赋研究》(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简宗梧《司马相如及其赋之研究》(同上)、张清钟《汉赋研究》(商务版)、张正体、张婷婷《赋学》(学生书局版)等专著和论文对这一时期的文章从不同角度作了探讨,惜笔者未见,不便妄言。

二、唐宋元明清文研究

唐宋古文运动在中国散文史上影响深远,也是颇受学者们着意探讨的领域。何寄澎《唐宋古文运动中的文统观》(《中外文学》第14卷第1期)一文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文学观念,即指导方针作了细致分析。何文指出,唐人自始对文章的要求乃虽言"道"却多不废"文",且迅速倾向于重"文",一开始便展现出文学性质,独孤及以下日益浓厚,至韩愈遂成为强烈的修辞主义,可见唐代古文运动始终为一文学性运动。而宋代古文运动在欧阳修以前毋宁为一纯粹儒学性的运动,至欧阳修始添入文学性质,发展至苏轼以下,才摆脱儒道,成为文学性运动,显示了唐宋古文运动在性质上的差异。罗联添《韩愈研究》(学生书局1977年版)一书对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愈的生平、家世、交游、古文理论和古文特色等作了详细阐述,着重考察了韩愈早期交游人物李观、韩愈长兄韩会、柳宗元父柳镇等对韩、柳领导古文运动的影响。叶庆炳《从〈平淮西碑〉看韩愈古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散文与评论之部,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一文通过对韩愈名作《平淮西碑》的艺术分析论证了韩愈在打倒骈文、建立古文方面的卓越成就。古文以外,唐宋辞赋也受到应有的重视,陈韵竹《欧阳修苏轼辞赋之比较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对欧、苏辞赋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在对欧、苏辞赋分别予以详细阐述的基础上,又从组织结构、修辞技巧、情志内涵方面对于二人的作品作了比较。此外,张健《欧阳修之诗文及其文学批评》(商务版)、游信利《苏东坡的立身与论文之道》(学生书局版)、罗敬之《论欧阳修的古文运动》(《华学月刊》第95期)、江正诚《欧阳修的生平及其文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等专著和论文也对该时期的有关作家和作品有所论述。唐宋以外,明清文似稍受冷淡,尤信雄《桐城文派学术》(文津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为笔者所仅见。该书本述而不作原则,对桐城派的源流、师承、评点学、桐城古文与时文之关系、桐城派的文论等作了详细阐述。全书材料丰富,条理清晰,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桐城派的本来面目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另外,尚有几部综论中国古代骈、散文史的著作,如李曰刚《辞赋流变史》(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中华书局1970年版)、薛凤昌《文体论》(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等均有专文予以介绍,兹不赘言。其他如张仁青《中国骈文析论》(东升版)、傅隶朴《中国韵文通论》(正中书局版)、《中国韵文概念》(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印行)等为笔者

所未见，仅示书名以便查找。

（郑永晓）

散文的确立和发展 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中国散文》中说："散文确获有纯文学中之崇高地位，应自唐代韩愈开始"。韩愈提倡散文，是采取文选中赋前之序变化出来的，如《送李愿归盘谷序》，为唐代一篇名文。同时的还有柳宗元，下及宋代欧阳修等人，多善记叙文章，柳的山水游记，欧的园林杂记等。他们的文章，总把自己投入作品中，在文学里表现人生，即所谓"文中载道"。由宋经金、元，骈文走下坡，至明代终于没落，散文则大大昌盛起来，前后七子，王世贞、李梦龙等，力仿秦汉。而较有成就者，应首推宗法唐宋的归有光。他反对盲目模拟古人，斥责七子文是在格调词藻上下功夫的空架子。而他自己则以日常生活描述为主，以文学表现人生，又回复到韩愈及宋学家们的精神上。他所擅长的家庭生活描写，及文字的史记风格，对清代桐城派影响很大，可以说在唐宋八大家中尚未畅行。这是一条散文写法的新路。只是这类文章不能反映出当时的整个时代。

清代散文，多是桐城、阳湖两大势力。桐城始祖方苞，弟子刘大櫆，刘的弟子姚鼐，远宗唐宋八大家。姚鼐选辑《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文体分类比《昭明文选》进步。他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个字作为衡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将文章与义理兼通互用融化合一。阳湖派恽敬、张惠言诸人，虽为桐城别支，尤喜以骈文写作，力创新骈体。

综观古文及古文家，韩愈虽为散文确立了地位，其中实是从经、史、子中蜕变而来。以后，尤其明清两代，渐渐不走这条路，是一大错误。从归有光、方苞以下，古文的气味转弱，渐不够有力。古文派文以载道，表现人生，正是散文被重视的原因，往后的古文，远比不上唐宋。 （王立柱）

古文的发展 在名为《古文》的辞书条目里，倪豪士对中国古文的发展做了概述。他说：

"古文"是个多义词，汉代开始用它指"壁中书"；六朝初指儒经，后又统指周秦两汉的典籍；但研究者一般是指唐代（尤其是贞元、元和年间）有意模仿秦汉文体的散文，以及其后各种质朴的非骈体散文。

六朝时，文风浮华，是骈文时代，虽然刘勰、孙绰、李谔等人反对这种文风，但效果不大。从初唐开始，六朝文学遭到清算，这为古文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陈子昂、元结、独孤及、梁肃、萧颖士、李华、柳冕，均为模古思潮推波助澜。安史乱后旧式贵族政治衰落加剧，地方上的一代新人已见崛起。在贞元、元和年间，与文苑新生事物（如新乐府运动、传奇和词的创作）相伴随，古文运动也拥有两个杰出人物——韩愈和柳宗元。韩愈强调儒家经典，使创造态度和文风规范化，主张治国之道与文学之道不可分割。他还认为，作者之"穷"有助于文章之"工"。他写有大量文章（其中不少是名文），希望它们成为后代的典范。柳宗元是韩愈的同道，但有自己独特的古文风格，尤以游记和

寓言作品最为著名。他主张“文以明道”。一般认为，韩的影响比柳大；也有人认为，韩代表保守派（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为其后继者），柳代表激进派（沈亚之、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为其后继者）。

宋代欧阳修是古文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他主持进士考试期间，提倡古文，促进它的普及。他本人文风平易，多有佳作。他的后继者苏轼成就更大，是一代巨擘。他跟欧阳修一样，不偏执“文”、“道”一端，而认为“文必与道俱”，并把“道”等同于万物所含的“理”。他还认为，识物、辨理并把握它们是为文之本，这一过程一旦与“法”相结合，作品即可诞生。他的文风自然，说自己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他的作品数量多，种类也多，影响深远。

由宋至元，古文盛行不衰，如朱熹、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刘因、姚燧、虞集、苏天爵均是比较有名的实践家。明代李东阳及前后七子，提倡复古，但强调“文必秦汉”。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则反对盲目尊古，提倡唐宋古文。他们对竟陵、公安两派影响较大。清代古文主流是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为其主要成员。他们认为“义”（即理学家所谓的“道”和“法”必须统一，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是对这种理论的具体说明。恽敬、张惠言开创的阳湖派，独树一帜，与之抗衡，但竞争力不强。桐城派以其文集和门生曾国藩，对近现代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参见《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江原）

叙事性散文　在《中国文学艺术基础》（北希求埃特，1979）一书中，刘若愚把中国古典散文分作“叙事性散文”、“描述性散文”和“寓言”三种。他说，叙事性散文是以叙事为主，以事实为基础的非虚构作品。这类作品有的叙述历史事件，有的叙述家庭场面和私人生活。从叙事角度来看，前者用第三人称，做纯客观描述，后者多用第一人称。

论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前一种散文的典范。司马迁不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公认的散文大家。他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一段，语言简洁生动，情节戏剧性很强，人物刻划鲜明、逼真。例如，写侯嬴佯装傲慢，故意激起围观者的不满、客人们的惊讶，以考验公子，就不仅描绘出人物的外在表现，而且揭示了人物的内在感情，及其行为的动机。而“荆轲刺秦王”一段，更富于戏剧性。作者交待事情速度极快，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短小的语句好象急促的“断音节奏”（staccató rhythm），主语的省略又加强了这一效果。此外，作者在这闪电般的行动中，还能忙中偷闲，找到时机解释秦王何以不能立即抽剑、廷臣何以不带武器、卫兵何以未来援助。总之，司马迁的许多描写，都堪与现代小说媲美。

论者认为，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和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是另一种散文的范例。他说，李文是一篇优秀的自传体叙事散文，其中记载了她与丈夫分享研讨学问和收藏古物的喜悦，以及后来的流落江南、夫妻离居

和丈夫病逝等等。文中没有夸张的感情，没有言过其实的描绘，但通过这些毫不渲染的文字，她初婚时的美满和后来的不幸形成了鲜明对照。归文以朴素而真挚的笔触写家庭琐事，也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该文颇具言外之意，如写家庭衰败的厄运、对亡母的孝爱、对童年的怀恋，皆在不言之中。补叙的一段写妻子。作者天真地回忆亡妻的言行，透露了自己的悲痛之情；又通过树木的繁茂，反衬自己在妻子死后的哀伤与孤独。

描述性散文　在《中国文学艺术基础》一书中，刘若愚说，中国许多散文作家擅于描景写物。有些只须灵巧的几笔，即可描出一片景象；有些则细腻描绘所写事物。前者可与"写意"画相比，笔触轻灵，富有印象主义特点；后者可与"工笔"画相比，笔触细致，多现实主义细节。

论者选取的范文是《滕王阁序》(片断)、《小石潭记》、《满井游记》和《核舟记》四篇。他说，王勃这篇文章情调庄重，音韵铿锵，用词造语多姿多彩，富于装饰性，与叙事散文的简朴文风形成了鲜明对照。有人读到文中"落霞"与"秋水"两句时，惊呼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他的预言已成为现实。柳宗元是古文大师，他写《小石潭记》较少拘泥于形式特点。在他笔下，比喻意象给人以深刻印象：流水声"如鸣佩环"，怪石"为坻、为屿、为堪、为岩"，溪水是"斗折蛇行"，两岩似"犬牙差互"。该文还有情景交融的特点。它不是一幅静态画面，适得其反，读者被邀来与作者一起探察险境，随其脚步，共其心情。起初有一种见所未见的喜悦，继之与他分享静寂的欢快，最后气氛变得可怖起来，我们几乎要劝作者离开这里。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更多印象主义性质。它不象柳文那样以敬畏的目光看自然，而是从美学上、以亲切的目光欣赏自然。大自然给了作者很多乐趣。这篇文章的句子较长，结构复杂而节奏自由。用词也有独创性，例如，说"泉而茗者"，而不说"取泉水沏茶者"，用法很新颖。魏学洢的《核舟记》与王勃的文章一样，是精雕细刻的作品。《核舟记》描写之细腻，犹如描述对象——核舟。所写者，无一笔不精细；应写者，无一件被遗漏。核舟的主题——东坡游赤壁，尽人皆知，舟侧小窗上所刻的语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和"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也指明了这一点。由此看来，核舟不仅是一件技艺精巧的手工制品，而且是以另一种艺术媒介对著名文学作品所作的评论，其微型世界反映了苏轼所创造的世界。反过来，魏氏的文章又是以语言媒介对核舟所作的评论。我们在此看到了文学艺术和视觉艺术之间的有趣的相互影响。

寓言作品　在《中国文学艺术基础》一书中，刘若愚说，寓言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事，它是为了阐明某一想法、某一观点或某一伦理。中国古代哲学家喜欢用寓言来证明自己的看法，因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写出了许多有文学价值的寓言作品。

接着，他列举了寓言大师庄子的两则寓言——"轮扁斲轮"和"神龟

曳尾”。关于前者，他说，这则寓言说明，庄子不相信书本知识，而相信直觉。庄子认为不论是道，还是斲轮技术，写作技巧，都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奥秘。对于中国一代代艺术家、作家和批评家而言，轮扁这个人物就是直觉理解的象征。关于后者，他说这一则显示出了庄子的幽默感。庄子不是郑重地宣称“人世间的权力和荣耀均为空虚之物”，而是通过它们与死龟的比较，让我们看到了它们的荒谬性。另外，一无官职之累的生活也并不理想，因为它被喻为“曳尾于涂中”的神龟。论者还指出，这则寓言将名词转化为动词的用法（如“巾”“笥”），使文章增添了生动性和具体性。最后，他又举出苏轼的《日喻说》作为范例。他认为，《日喻说》实际上包含着两则寓言。一则的主旨是靠道听途说学不到任何知识；另一则的主旨是，只有使技艺内化为个人的东西才能学到本领。他还认为，苏轼的写作动机（政治与思想上的原因）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没有多少趣味；但寓言的两个要旨，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依然是正确的。

寓言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说，“寓言”一语出自《庄子》第二十七篇首句（“寓言十九”）。由于“寓”有“寄托”的意思，“言”和“意”的分歧是中国传统寓言概念的基础。“言”和“意”大致与西方的“vehicle”（媒介）和“tenor”（旨意）同义。

隐蔽性是中西寓言的基本性质。作者不想、不能或不敢直接表达自己。其理由有三条：（1）为了达到说教目的，他希望读者“挣扎一番”再得到他的意思。这类作品有先秦诸子和佛教的寓言，以及可采取寓言式解读的某些小说。（2）由于社会习俗阻碍，作者不能直接描述政治上或文化上的敏感的题材。这类作品有讽谏统治者的宫廷文章，如汉代的某些赋作。（3）作者害怕在法律上或政治上遭到报复，为安全起见，不得不采取象征性的表达手段。这类作品数量众多，它们大都是中国诗文的杰作。

本文作者还讲到了中国最早的寓言诗，以及诗歌、小说的寓言读法。（参见《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

“小品文”界说　台湾学者王令樾在其名为《小品骈文例释》（载于《古典文学》第五集）的文章里，讨论了“小品文”的来历和定义。

论者说，“小品”一名，不见于晋以前的载籍，到了苻秦时代，佛事大盛，才通过佛典翻译传入中土。例如，鸠摩罗什译有《大品般若经》（二十七卷本）和《小品般若经》（十卷本）。“小品”于此开始见于中文。这是以详略区别大小的例子。后人根据“小品”简略、短小的本义，将其移用于文章，于是有了“小品文”之说，也因而有了种种界说。

论者首先总结了前人界定小品文的意见：

（1）狭义的界说　有些词书或著述认为，凡是随笔、杂感、小说（小家珍说或短篇小说）等短篇文字，均可称作小品文。这种文章，其文辞不

在于雕丽、组织，其意义不限于冠冕、雄伟，多半出自一时兴会，即兴漫记而得，寥寥数行，意尽辄止。

（2）广义的界说 从著述或选本（如明人小品、清人小品）上看，有人认为，举凡游记、书札、杂记、记传、寓言、论事、抒情、言志等散文，均可算作小品文。其定义则是以篇幅简短、文字超逸、趣味隽永、余意不尽、悦人耳目、怡人性情诸特点，来和典重堂皇的大文章以及载道明理的严肃文章相区别。

接着论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上述定义虽宽却仍未说尽中国小品文学的全貌，于是他提出了另一种界说——

（3）最广义的界说 他说，建立这一界说的标准是：第一、以篇短意精为范畴。篇短是小品的本体，但篇章短促内容贫乏者不在此列，须象学者所说“尺幅具千里之势”，即篇简而境阔，文少而意丰。如王羲之的小简：“寒食近，得且住为佳耳”。短短两句，不足十字，而风神摇曳，情韵澹宕，令人咀之不尽。第二、以轻逸隽永为准矩。文章既是短篇，自应重在轻灵飘逸的风致，理趣深长的韵味。文虽短而意境深，辞虽简而意义远，这是小品的精神，也是小品所以异于严肃艰奥文章的畛域。第三、以各具特色为准绳。小品以轻逸隽永为特点，这是就其神韵而言。而文章的风格，变化万端，因时、因人而异，因体势而变，凡所谓逸品之文，均有其卓异笔法。所以挺拔的文采，无碍轻倩的风神，而崭截的风格也不害隽永的韵味。神、格两者看似分离，其实是相扶相济。

最后论者总结说，简而言之，小品文乃是篇幅短而意深韵永，且各具特色的文章。（江 原）

“小品文”的来历 参见“‘小品文’界说”条。

六朝后的纯散文流派 台湾学者游唤认为，从《昭明文选》开始，中国散文界便明显存在着两大主流：其一是纯散文，其二是古文系统的散文，即博散文。六朝以后，纯散文流派可归属者，有以下诸家：一、矫枉派散文，如杜甫的《秋述》、李商隐的《刘叉》；二、艰涩派散文，如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三、幽默浅易派散文，如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四、自然山水派散文，如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散文；五、生活派散文，如苏轼、黄庭坚的笔记尺牍文；六、性灵派散文，以公安、竟陵两派为代表；七、综合派散文，如晚明诸家小品，是为纯散文之集大成。（参见游唤《古典散文与现代散文》一文，载于《古典文学》第五集。）（潘 达）

唐代古文运动中的群体 台湾学者何寄澎撰文（名为《简论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文学集团》载于《古典文学》第六集）说，唐代古文运动始自萧、李，成于韩、柳，前后近一百年，可分为“始动期”（自玄宗天宝年间至代宗末年）、“续动期”（自德宗初年至贞元中叶）和“成功期”（自贞元中叶至文宗大和年间）三个阶段。与此相应的有三代人：第一代以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为代表，第二代

以萧存、韩会、梁肃为代表；第三代以韩愈、李翱、皇甫湜、柳宗元为代表。他们的关系，既有同代的交往，又有异代的师承。就横向而言，第一代萧李关系最密切，可能通过元德秀，又与元结结为同志。独孤及则是李华的弟子。第二代萧、韩、梁是朋友。第三代韩柳是文友，又是世交。李翱就教于韩愈，又是他的侄女婿。皇甫湜入韩门较晚，却得其衣钵。就纵向而言，萧颖士传子萧存，李华传韩会，独孤及传梁肃。而后韩会传弟韩愈，梁肃传韩愈和李观（李华之侄）。韩愈又结合李翱、皇甫湜、柳宗元等人。

（江　原）

唐宋古文运动　美籍学者陈幼石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一书中，对唐宋古文运动及其四位卓越代表——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做了细致的研究。这部专著以唐代古文运动的两位代表韩柳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宋代古文运动的两位代表欧苏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得到下列结论。首先，唐宋古文理论与实践并不象文学史家郭绍虞和罗根泽所认为的那样是同质性的；其次，唐宋古文大家们在视点上有着一种基本的转变，即从单一性转到普遍性；第三，宋代古文倡导者汲取了唐代关于单一性和独创性的理想（韩愈的“高”与“奇”），融人他们自己提出的普遍性和简易性概念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创作的散文作品，在性情、风格、哲学倾向诸方面都与唐代的先驱者们有着明显的区别。作者在书中努力揭示出这些古文大家们在观念上、文体上的种种差异，特别是他们对“道”的个人理解究竟有何不同，它是如何流传下来的，作为这种流传方式的文字媒介——文——所具有的显著特点又是什么。这部专著的重点在于对古文大家们各自的差异进行研究，而不是在于对这场古文运动的同质性进行研究。当我们纵观由唐到宋这场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时，就会看到这些古文运动的理论家和作家不仅把视点由单一性转向普遍性，而且还为古文中的一种抒情韵味奠定了地位，因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理论方向的转变：由政治性转向诗意性。到了苏轼时代，对古文的基础问题的思考就已经从历史、自然以及政治性质（“道”）转到对作者个人有洞察力的心灵（“意”）和对表达艺术（“法”）的分析、研究上来。中国散文第一次摆脱了实用性或说教性，转到对艺术性表现本身的关注上。

古代散文从观念到审美的发展

美籍学者陈幼石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一书“结论”中指出，唐宋散文创作领域中的运动（即古文运动）使作家朝着更大的自由度发展，他们可以表达自己对公共事物和历史题材的看法，并且将一种诗意的声音引入通信、寓言和传记随笔之类散文体裁中，直到宋代初期依然如此。由人复归到作为自足的自我身上，这一转变对于宋初以后的思想史和文学史有着深刻的意蕴。学者们最终势必要研究宋代这种由人到自足的世界的转变与元、明时代中国小说和戏剧创作原则的逼真要求之兴起这两者间

的关系。从韩愈开始，古文的这种理论倾向就已经从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性转向具有主导地位的审美性：从“古文”转自一般的“文”，从对“古”和“道”的强调转向对个体艺术家（“意”）及其艺术技巧（“法”）的感知。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政治和自然不再支配人性和道德，政治秩序与自然秩序之间达成了和谐。

（孙乃修）

虎关师炼论唐宋文 虎关师炼是日本室町时代（1392—1573）五山禅僧中一位提倡复兴古文的汉学者，他认为“经史者诗文之盐酱也。诗文之中不可少盐酱矣。夫馔餐之中伤盐酱者不可食矣。诗文亦然。若人好多用经史语，犹食之伤盐酱矣。”并力图将载道说与贯道说统一起来：“唐李汉序韩文云文者贯道之器也，后来朱晦庵云文者载道之器也，非贯道也。予谓贯亦载也。唯因物而异也耳矣。索之于钱也，贯犹载也。李氏之言奥乎哉！朱子之思不至于此乎？”（《济北集》卷二十·《通衡》五）。他曾经希望通过关白藤原内经影响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在日本扫除骈骊余风大兴古文，这集中反映在《答藤丞相》一文中，文中说：“夫文者有散语焉，有韵语焉，有俪语焉。散语者经史等文也，韵语者诗赋等文也，二语共见虞夏商周以来诸书焉。俪语者表启等文也，出于汉魏之衰也矣。刘子曰：文章与时高下。因此而言，俪语卑矣。汉末以降，三国两晋用偶语，至南北朝尤盛焉。唐兴而改南北之弊，故斥杨、王、卢、骆之俪语，复韩柳之古文。古文者，雅言也；雅言者，散语也。唐亡而为五代，又用偶语焉。宋兴而救五代之弊，故又斥西昆之俪语，复欧苏之古文，故有韵有偶，韵语有散有偶，俪语阙焉，崇古文卑四六者是也。本朝之文用四六者，盖我遣唐使入太学同诸生受业，此时唐文未复古文，杨、王之后，韩、柳之先也。国家淳质不察所由，以始习之俗或后传之风耳，伏惟阁下辅政化，贵典坟，振颓纲，极冗迹，况兹文弊在其所好乎？”因从容谕明王，使天下学古文、斥四六，跨汉唐，阶商周，宁非文明之化兴于当代乎！”并编撰《禅仪外文集》，以倡导古文的格法体裁。虎关师炼推崇天然浑成的风格，曾向其弟子说：“夫文章妙处，天然浑成万世一律耳。人或诚心覃思而自合也。若未至天浑之处，虽工有可改之字，虽奇有可换之言。若已至于天浑，自然文从字顺，格调韵雅，权衡齐等，不可移动，所谓醇乎醇者也。”在唐宋八大家中，虎关师炼最尊尚的是韩愈，曾极口赞扬韩愈的志气、操行、文章：“纵有志气，岂有操行邪？纵有操行，岂有成文之语邪？纵有成文，又岂有门人之系其文而不靳言邪？”“呜呼！韩公为公用字格体严正如此，盖作文者先须知正助……旨哉！韩子之言乎！虽一字不苟下，庶或后君子弁为文之正助焉！”（《济北集》、《通衡》五）以韩愈为诗文双绝的俊才，曾仿韩愈《原道》、《原性》、《原人》、《原思》、《原毁》，而作《原嗔》、《原冤》、《原慢》。对宋代散文家苏轼，承认其“道德文章为越宋师

表”，又对其鼓吹庄周齐死生、一毁誉、安贫贱的看法有尖锐的批评；对司马光，虎关师炼曾讥刺他佛教蒙昧无知。参阅久须本文雄《虎关师炼的中国文学观》（《禅文化研究所纪要》一二）、《虎关师炼的儒道观》（《禅文化研究所纪要》一一）

古贺侗庵论唐宋文 古贺侗庵认为“嬴刘而后，文章之盛，莫过于唐之中晚，韩柳尚矣”（《侗庵文集》二集卷十四上·《读黄石牧痦堂集》），最推崇韩文，他论及韩愈的复古与欧苏复古的差异时说：“盖古文至魏晋而中圮，韩子崛起，回澜直上继汉氏。五季衰颓，而欧苏振之，竟不如韩之卓卓。韩子之复古，犹之程朱之唱明圣学，克承孔孟正脉；欧苏之复古，犹之许衡、薛瑄之上继程朱，才足羽翼圣道耳，乃又一洗旧习，刻意于修辞，欲以追古之作者。”在他三十四岁时写的《书王梅溪集后》中又对韩与欧苏作了比较，自述“予亦夙爱韩文，当时惑于唐应德、茅顺甫之楷说，以韩与欧苏为鼎峙之作手；既而矻矻多年，学有寸进，然后觉韩之才子，不啻弟畜欧苏二子；二子逊韩，不啻夷惠之于孔子。”过了一年，又作《读韩文公书集》，谓“先儒有云，左之包公穀也如天。予谓韩之于欧苏也亦然。盖韩子纂汉而降一人，与太史公颉颃”。（二集卷十四）同年在《读黄石牧痦堂集》中又说：“欧苏二子，宗韩柳祖秦汉，一洗唐末五季之陋，导一世于正轨，厥功卓矣……要未可与韩子复古同日而语也”，明言欧苏不可与韩同日而语。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欧苏文章的短长在于“富有章法而字句法未备，理致有余而殊少英华。特以命意巧妙，犁然中心，能来人欣慕。”在宋代散文中，侗庵独酷爱老泉，评论老泉“其学未敢谓出于正，其才未为卓靡伦比，其见未全协于圣贤之旨。要之识虑坚定，气力有余饶”，“或仅仅数十字中，自含无穷之变，或千万言滔滔漭漭，无一句之缓慢，辉光映射，风骨峥嵘，如华岳耸而海波震荡然。在宋文中，亦可谓迈群拔萃也已”，并在与欧苏（轼）的对比中阐述老泉的特点：“欧主妥帖而乏气焰，专务密塞周尽，无复余味，颇陷于俗；坡胸无定见，心浮而气粗，间杂以谐谑，殊无庄重之态，较流于轻。斯其愆不止于小疵。而老泉未尝然。即是一事，固已度越二子。矧其深诣独得，更自有卓焉者乎”（以上见六集卷三《苏老泉集后序》），又以为宋代惟王荆公、曾南丰可与老泉并驱：“予谓王荆公之峻洁奇峭，曾南丰之遒丽雅健，胥溯古文之奥，与欧坡二子之浸淫于今文者绝殊。求宋一代足与老泉并驱者，其惟王曾二子乎？”（同上）而对老泉最叹服的一点，则在于他的“洞见物情时弊”（《刘子》卷二十九，《苏老泉文妙》）。

师法八大家的月象溪泽 在朝鲜李朝时代的文坛上，有被奉为文章正宗的月（月沙李廷龙）、象（象树申钦）、溪（溪谷张维）、泽（泽堂李植）四大家，他们直接规摹唐宋八大家，文章以醇正为宗。李廷龙（1564—1635），字圣徵，号月沙、秋崖、习静、痴庵、保晚亭主人。申钦（1566

—1628)，字敬叔，号象村、玄轩。张维（1587—1638），字持国，号溪谷、支离子、占爪子。李植（1584—1647），号泽堂。泽堂李植在其《作文规范》中指示学作文章的要领，是将韩文作为"终身模范"，要象茅鹿门抄录八大家文，品味其妙、暇时披览，并要以"仁义"作为标尺。金昌协《农岩杂识》曾论四家优劣，谓："月沙天才华赡而窩简不足，且不规规于古人绳墨，出之甚易，故其文纡徐通畅，绝无艰难拘窘之态，但体裁欠典严，格调不雅。象村天才敏妙而深厚不足，又学诸子及国策，且喜皇明诸大家，故其文宏丽，光彩绚烂，但少质实之意、隽永之味。两家长短概不出此……溪谷碑志，虽乏逸调，然其叙事繁简得当，称美处亦有斟酌分寸，斯其所以为善也。泽堂文体浑成不如溪谷而结构精密过之。溪谷之词赋、泽堂之骈俪，又足相当。比之于古，殆近子韩柳。蔡湖州每称张李云：泽堂诗胜溪谷，此又与子厚、退之相似。泽堂文太密塞，文字处不见有余地，此不及溪谷处，然如疏札论事之文，皆精核切深，不似溪谷平泛无激发处。"金允植《云养续集》概括说："象村之文，熔炼淘洗，有明末清初文气；月沙之文，不以雕彩为工，行文驯熟，尽其所欲言而止。论者又言溪谷天才优，泽堂人工胜，盖各有所长也。"

古贺侗庵论明文 古贺侗庵在《唐荆川集后序》中直谓"予不甚喜明文"（《侗庵文集》六集卷一），又责明才饶而不善自用："予尝（疑当为尝）论唐以降才子之盛多，未有如明者。惜其饶于才而不善自用，文之所以大不振也。"并具体分析说："成弘而前士风敦庞、所见不流乎颇僻，随其才之崇卑，感者可观。金华正学东里辈卓矣，犹恨其平平不能追尘赵宋大家。盖以卤莽之心为之，熔炼之功殊之，不能自竭其才也"。谓祖秦汉者"大都浮心粗气、徒得其形似，只来识者诮，"宗唐宋者"往往逊志而专力，颇窥测作者堂奥，"，而大张清新空灵之说的公安派"概以艰棘不易读为妙，殆流于文妖。"相比之下，明三百年文章，侗庵以王伯安（守仁）为第一，方正学（孝孺）又次之，张太岳（居正）次之，而后方及唐王辈（二集卷七《读张太岳集》）。对唐顺之则认为"荆川亦宗宋文者，非有中立倚之见，顾其文俊迈条畅，转折无穷……固天才不凡，又稍善用己之才，以克进于兹。较诸震川鹿门文，张主唐宋而读之恐卧者，画有上下床之辨矣"，但又认为唐学曾（巩）而未能溯其富丽遒美之妙境，其足冠绝时代，正见明文之卑。

古贺侗庵论清文 古贺侗庵在《读黄石牧痞堂集》（《侗庵文集》二集卷十四）中论清文风："清文人其才更下于明，又潜心经史，以文为余事，不能如明人之呕吐肝肺，又鉴二李饰体之失，……一意贵平平，以致一代文风。"其间较有好评者，只侯朝宗、魏叔子、恽子居三人，以为"其精妙动人，实有超明数大家之表者，无他故，其用力苦，而不甚事模仿也"。"侯魏二子之文，遒逸俊伟，气雄而思远，在清代卓尔文宗"。又曾给予黄石

牧较高评价："在清代真喧啾群中孤凤凰也。予故尝论清文人当尊石牧为第一，以别无作手而然，非以石牧之文为至也。"侗庵评方望溪，也多微辞，言"其推为一大文宗者，独望溪方氏。方氏固八家之遗，而衰竭为甚。使之生于明，决不能与茅归对垒；生于宋，则才斗量车载中一人耳。乃清人尸祝尊奉，迄今如一日，可以见其文之不古若矣"（《读黄石牧猜堂集》），对于汪琬（号钝翁）更讥刺其文如"老婆絮语"，"使读者欠伸思睡，古文之妙止乎此，未始觉其难企，而又奚足尚！"'钝翁之于侯魏，犹宋卫之比晋楚。其规局之巨小，画然复别"（《读汪钝翁类稿》，《侗庵文集》五集卷九）。

日本的汉语散文 日本的汉语散文是指日本人用汉文按照汉语文法撰写的散文。日本流传至今最古的文章，便是用汉文写的，那就是《宋书·蛮夷传》所载倭王武（即雄略天皇）致刘宋顺帝的表，表文多引《诗经》、《尚书》、《左传》等中国作品，文风骈俪，富六朝风格。远在奈良朝时代，文学为贵族独占，用汉字书写，这个时代诞生的《风土记》、《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汉文叙事作品，在行文中常借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艺文类聚》等书中的华辞丽句来润饰史实或传说，文风中也多受六朝影响，又摆脱不了日语句法，多少属于日本化了的汉语体。《万叶集》中有些和歌的序文也可看到王羲之、王勃等文字的影响。平安初期，这种文体继续盛行。平安后期藤原明衡所编《本朝文粹》，载录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初二百余年间的汉诗文，仿《文选》体裁，书名仿宋姚铉编《唐文粹》，载录六十九位作者的诗文四百二十七篇，以赋、杂诗、诏、敕书、敕答、位记、敕符、官符、意见封事、策问、对策、论奏、表、奏状、书状、序、词、行、文、赞、论、铭、记、传、牒、祝、起请、奉行、禁制、怠状、落书、祭文、咒愿、表白、发愿、知识、愿文、讽诵文等三十九部录诗文，所录诗文以大江匡衡、大江朝纲、菅原文时等为最多。后又有藤原季纲编《本朝续文粹》，录十一世纪初至十二世纪中叶约百二十年的诗文二百四十四篇。两书所录散文反映了汉语散文兴盛的轨迹。汉语叙事散文为后来假名物语、说话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丰富了作者的知识，积累了写作的经验。川口久雄在《菅家文草、菅家后集解说》中，曾说："在汉文古典的语言、文学形式日本化而形成日本汉文的过程中，同时不能不给日语及日本文学的形式以影响，也就是说，使日语更加洗炼，更加丰富，并为日本文学吹入艺术的生命，使其以后的发展成为可能。从《古今》的真名序产生出假名序散文，从宽平期的散文形式，产生出延喜、天历期的散文，这一切，恰如从拉丁系的诸形式中，产生出欧洲的变形文学的情形一样。连《源氏物语》、《枕草子》的文体，也可以看到是受过这种汉文系统的形式和内容的影响的。"当时许多汉文作品承袭六朝遗风，讲求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中唐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成功，文

风、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变化，在日本也出现了一些散行单句、自由活泼的汉文叙事散文，再加上《白氏文集》传入，诗坛上流行平易流畅、情意深长的风格，这对日本贵族文人产生了一种精神的影响，即造句谋篇都要服从于自如地表情达意。都良香《富士山记》、庆滋保胤《池亭记》、菅原道真《书斋记》等，都可以看出唐人杂记体文章的影响。平安朝后宫中的贵族女作家大都汉文学造诣很深，而又富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出色的独创精神。以清少纳言《枕草子》而言，全书由类聚、日记、随想三类组成，其类聚部分，采用了相传为李义山撰写的《杂纂》中的以类相从的形式，而文笔之清丽，描绘之细腻，又是“聊资笑噱”的《杂纂》所没有的。公元847年，净土教由从唐朝归来的圆仁带回日本，不到百年时间便风靡全国。随着佛教的兴盛，说话文学兴盛起来，作者往往用杂有片假名的变体汉文，或是杂有汉字的片假名的文体，将口头传说记录下来。其语言风格，不同于汉文学系统。平安后期的所谓“和汉混淆文”，便是一种混用日文、汉文系统的文言文并且掺杂着当时口语的文言体文章。它将日文的优美和汉文的劲健有机地结合起来，吸收各自的长处，加以融汇锤炼，以更加纵横自如地表情达意。中古时代许多深受武士喜爱的以战争生活为中心的军记物语，便是这种文体写成的。室町时代五山文学中也出现过一些善文的僧侣，虎关师炼曾建议当时的执政者要黜骈文，提倡汉文，并亲自仿韩愈《原道》而作《原慢》等。江户时代幕府以儒教为官方哲学，汉诗文进入兴盛时代，宋黄坚所编《古文真宝》继续作为习作汉诗文的范本流行，榊原篁州著《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林罗山谚解、鹈饲石斋增述《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大成》(以上二书收入汉籍国字解)，这两种释解之书虽遭荻生徂徕一派的抨击，但仍流行甚广。荻生徂徕自己编有《古文矩》一书，收入李攀龙《比王集序》等文，分段详注，以提倡唐宋古文。江户时代的儒生依靠师徒相授、父子相传、训点诵吟的办法，学作中国式的古文。斋藤拙堂《拙堂文话》评介这一时期古文发展的趋势是“元禄(1688—1703)胜元和(1615—1623)、享保(1716—1735)胜元禄，天明(1781—1788)、宽政(1788—1800)胜享保”。著名的汉学者如太宰春台、服部南郭、古贺侗庵、皆川淇园、赖山阳等，都潜心学习散文写法，许多汉学者有文集传世。江户幕府末年的维新志士，主要是采用汉文汉诗的形式来表达“盛极萌衰”的忧虑。习作汉文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治初年，并影响到当时的翻译文学，使其带有浓厚的汉文调。清政府驻日使馆随员姚文栋曾有心对日本汉文作系统介绍，拟从《经国集》、《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及菅原道真、都良香等人的作品中选其精粹，编纂成《日本文源》；从江户时代朱子学派、古学派、古文辞派、折衷派中出现的出色文章家中选录佳作，辑为《日本文录》，并将明治维新后中日文人直接交流的佳作编成《海外文传》，为此曾作

《东海征文启》，希望日本各界人士协助收集资料，后因种种原因此计划未果。（王晓平）

专　著

翟理思译著《古文选珍》 此书1884年由伦敦伯纳德夸里奇出版公司与上海别发洋行分别出版，1898年重印，共254页。1922—23年伯纳德夸里奇出版公司与上海别发洋行又同时分别出版修订增补本，分作上下两卷。上卷与初版一卷本内容基本相同，下卷增补诗词部分。此二卷本1965年由纽约帕拉冈书局重印。此书上卷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古典散文的选译评介，包括《尚书·召诰》、老子《道德经》、晁错《论贵粟疏》、王肃《孔子家语》中关于孔子遭难的四则故事、汉武帝刘彻《贤良诏》、李陵《与苏武书》、李斯《谏逐客书》、刘伶《酒德颂》、欧阳修《纵囚论》、《醉翁亭记》、《秋声赋》、苏轼《喜雨亭记》、《赤壁赋》、《放鹤亭记》以及战国诸子和朱熹、文天祥、林则徐、梁启超等人的散文。译著者对入选的散文作家及其创作特点，也都按时代顺序作了评介。此书译笔流畅，能保持原著的风格，可以称得上是读者学习中国古典散文的一种范本。

翟理思著《中国文学史》 此书1897年列为戈斯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之第十种在英国出书，1900年由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社出版单行本（446页），1923年纽约再版。此书后来由美籍华人汉学家柳无忌教授补写二十世纪现代文学部分，书名仍为《中国文学史》，1967年由纽约弗雷德里克昂加尔出版公司出版，1973年再版。此书是翟理思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西方汉学家撰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专著。由于它对中国文学发展作了系统而稳妥的介绍，故它虽然初版于十九世纪末叶，却具有长久的参考和使用价值。

翟氏按照中国历史与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将书的内容分作八章，即先秦、西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先秦及两汉二章侧重于论述儒家的经书和散文；魏晋南北朝及唐、宋三章侧重于论述诗歌；元、明、清三章侧重于论述小说和戏曲。在论述各个时代的作家时，除对作家生平和创作情况等综合性介绍外，还选译重要作品加以全译、节译或边叙边译，并进行讲解，尽力使读者理解作家作品的创作特色。例如在散文方面，先秦时代评述了古铭文《汤誓》、老子《道德经》、儒学五经四书、诸子散文等；秦汉时代评述了李斯《谏逐客书》、晁错《论贵粟疏》、刘彻《贤良诏》、刘伶《酒德颂》、李陵《与苏武书》等；唐代评述了韩愈《祭柳子厚文》、《祭十二郎文》、柳宗元《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等；宋代评述了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喜雨亭记》、《赤壁赋》等。这些散文作品的评述文字均准确生动，流畅可读，因而也就成为此书的一大优点。（王丽娜）

《中国古典散文》俄译本 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编选并翻译的《中国古典散文》一书，由科学出版社于1958和

1959年各出一版（387页）是迄今最全的俄文选本，收入的中国古代散文作家和篇目最多，计有：

屈原的《卜居》、《渔父》。宋玉的《宋玉对楚王问》、《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汉武帝的《汉武帝求茂材异等诏》。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酷吏列传序》、《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序》、《孔子世家赞》、《五帝本纪赞》、《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年表》、《管晏列传》和《游侠列传序》等。李陵的《答苏武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闲情赋》。谢庄的《月赋》。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阁序》。刘禹锡的《陋室铭》。李华的《吊古战场文》。韩愈的《杂说》、《祭鳄鱼文》、《柳子厚墓志铭》。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周敦颐的《爱莲说》。苏轼的《稼说》、《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喜雨亭记》、《石钟山记》。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桐叶封弟辨》、《捕蛇者说》、《梓人传》、《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小石城山记》、《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等14篇。刘基的《卖柑者言》。此外还有苏洵、王安石等的作品，共收入作家22人，散文63篇。

（李明滨）

《凤凰笛调——中国古代散文》

民主德国恩斯特·施瓦茨（Ernst Schwarz）编译。此书1973年由民主德国吕滕和勒宁出版社出版，1976年再版，全书分一、二两册，共960页，书中有77幅彩色和黑白插图，书末还有多种附录：所选文章的作者简介、注释、地图、中国历史年表、选文来源、插图目录、汉语的书写和发音等。

本书卷首撰有100余页的序言，这篇长序确切的说应为《中国文学简史——散文篇》。它从中国的甲骨、钟鼎文讲起，直到近代孙中山的“民国日报”序言。按照时间的顺序，以各个朝代为阶段，分别介绍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文学发展、著名作家作品、散文代表作等。内容详细，材料丰富，向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背景材料，和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这篇序言也可以单独成篇向德国朋友介绍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书选译了90多位名家的上百篇散文佳作。所收篇目，上起先秦，下至晚清，从时间上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

本书选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和韩非子等人的代表作。如孔子与弟子谈政治抱负、孔子与两个隐士的对话、老子的《道德经》片断、庄子论“鱼之乐”、韩非子的《说难》、荀子论治国策略等。书中对两汉的散文作品也收录不少，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三曹的选文包括曹操的《抑兼并令》、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髑髅说》。所选唐宋文有不少名家名篇，例如，李白的抒情小品《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韩愈义正辞严讨伐恶势力的战斗檄文《祭鳄鱼文》、柳宗元声言“苛政猛于虎”的《捕蛇者说》、以及欧阳修纵情

于山水的《醉翁亭记》、王安石假借记游而申说治学道理的《游褒禅山记》等等。清代文人顾炎武、龚自珍（乃至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也有选译介绍。

《中国古代散文》的译文基本符合原文的意思。这本书对我国散文遗产在德语国家的传播、对于促进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对我国德语工作者而言，这本书也是很有用的参考资料。　（蔡锡明）

《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　巨型辞书。主编是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倪豪士（Jr. William H. Nienhauser），并有纽约州立大学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夏威夷大学马幼垣、亚利桑那大学奚如谷（Stephen H. West）襄助编纂。参加编写的人员遍及全球，有美、加、中、日、台、港、英、荷、德、法、瑞（典）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近二百人。全部工作费时七年多，1986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于布卢明顿出版。

辞书正文近一千页，分作“论文”和“词条”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有《散文》一文，专门介绍有关古典散文的知识；其他如《佛教文学》、《道教文学》、《妇女文学》、《文学批评》、《修辞学》诸文，也涉及古典散文。在第二部分，有关散文家、散文集和散文名篇的条目，占较大比重。辞书附录很多：正文前有《编辑说明》、《撰稿人名录》、《一般书目》、《中国主要朝代年表》等；正文后附人名、篇名、主题三种索引。

作家条目一般讲述其生平、代表作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每条均提供三种书目“作品版本，英、法、德、日译本，关于该作品的研究。名著、名篇除了在有关作家的条目里讨论外，有时也立专目评介。主要文类和亚文类也设有专目介绍。全书共收条目近五百条。

论文和词条多半出自专门家的手笔，因此辞书质量很高。它的出版是对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江　原）

《中国文章论》　日本吉川幸次郎著。本文写于1942年末到翌年春，原载日本《文学界》杂志，因杂志停刊而未能全部登载完毕，后收入其论文集《中国散文论》（弘文堂1949年初版）。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日本当代著名汉学家，著述宏富，辑为《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八卷行世。本文着重论述中国古代文章的两大特质，即中国文章的暗示性和装饰性。

作者认为，“所谓暗示性，是指不把要表现的内容全部地在文章的表层展示出来，而是尽量地克制；或者说，在想要表现的内容中，只展现其高潮，其余则依赖于读者的想像的一种性质。这样的性质在中国历代的文章中都多少带有的，尤为显著地显示了这一倾向的是唐代的韩愈”，以及韩愈所开创的宋代以后成为中国文章正统的“古文”。这种性质来自“先天地富于暗示性”的汉语。“汉语是一种只须指出中心词语的语言，起码也是易于流向这一方向的语言”。中国古代文人早就认识到了汉语的这种性质，所以有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传》）之类的论述。

作者认为，“装饰性，也就是说中国的文章总是强烈地追求着形式的美，特别是音乐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四六文”。四六文要求字数和音节的限定、对仗和音律的规定，全篇充满了有出典的古语，语言不是口语而是文言。由四六文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即使在以排除四六文的装饰性为使命的文体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以音律上的装饰意识为中心、为契机而招引了对仗、出典等其他的装饰”的文章的音乐性，“其产生根源先天地存在于汉语的本质中。”汉语是富有抑扬的语言，句子短，有四声。由于语音和意义的要求，汉语里有着无数的双字词，即双音词。把两个双音词重叠，就形成了两两相加的四字句，这就是四字句为什么成为中国古今文章基调的原因。“古文虽自由地遣使长短句，但以其精心调节而使长短错杂的句子和谐流畅。”总之，“汉语的容易倾向于要求音律的调和，并不难使这一要求得以实现的先天性质，在书而语言的文章里被有意识地加以强化，因而对音律的考虑格外仔细，这是使中国的文章迈向装饰之道的第一个契机。以这种由音律而来的装饰意识为契机，招引了更富有装饰意味的对句和有出典的词语”。

吉川氏在这篇长文中，不仅用生动的例证加以精辟的论述，而且从汉语的特点、口语和文言的差别、中国人的语言观、文章观等多种角度，对形成这两大特点的本质及其相互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颇具启发性。（高克勤）

《文体论》 古文文体研究专著。作者薛凤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3月初版，为王云五主编《人人文库》之一种。全书共由四章组成：一、文体的概观，二、文体的纵观，三、文体的分别，四、现代文体之变革。在第一章中，作者考察了文体的定义、文体的缘起等问题。并介绍评述了《文章流别论》、《文章缘起》、《文心雕龙》、《文选》、《文苑英华》、《文章正宗》、《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历代辨别文体的著作。作者认为，文体的分别，始于梁代，繁于宋明而论定于近代。梁以萧统《文选》为极则，明以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为大备，近代以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为正宗。明代以前，诗歌乐府皆入选录，明代以后，诗文分途。而刘勰《文心雕龙》的上篇，辨析源流、别裁同异，堪称文体论的祖宗，后世自不得不奉为金科玉律，论文诸家，都从此胚胎而出。

第二、三两章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前者纵论先秦以至唐宋以来的文体发展和创作情况，后者对几千年来的各种文体逐一阐释。作者指出，历代文才虽先后辈出，但明清文学不及唐宋；唐宋文学不及汉魏六朝；汉魏六朝又不及周秦。故六朝以后之文章多沿袭、少创作。而别裁文体，则清胜于明，明胜于宋，宋胜于魏晋六朝。在第三章中，作者依据姚鼐《古文辞类纂》和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二书有关文体的分类，依次阐述了论辨、序跋、奏议、书牍、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典志、叙记等各类文体的渊源、特点、写作程式及其嬗变情况。并将历来文家作品的标题应归入某一类者分列于各类文体之下，如论辨体下，作者又简介了论、设论、广论、续论、驳、难、辨、议、说、解、释、考、原等，序跋体下分别阐述了序、后序、序录、序略、引、表序、跋、读、书后、题辞、题后、评、述等。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简要分析了白话文的勃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以及今后白话文的发展问题。

《中国骈文发展史》 张仁青著。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5月初版。全书分上下二册，包括绪论共由九章组成。在"绪论"部分中，作者分析了中国语文的特质，阐述了骈文的义界，并就骈文的起源及变迁的总趋势和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作了探讨。作者认为，骈文有广义、狭义之分，晋宋以后的骈文，是狭义的骈文；广义的骈文，则凡文章之意义平行、属对精切、声调谐协、轻重悉称者，皆能列于骈文之列。为论述全面起见，该书所述，从其广义。作者从受自然界事物奇偶相对之启发、观念联合之作用、社会及时代之需要、文章本身之需要、人类爱美之心理、中国语文之恩赐等六个方面分析了骈文产生的因素。作者指出，骈文之成，先之以调字数，是为裁对；再之以铺张典故，是为隶事；继之以渲染色泽，是为敷藻；进之以协谐音律，是为和声，终之以灵动句法，是为调句。持此五者可以考斯体演进之迹。这一部分还从骈文与中国文学相终始、易于流传不朽、最能表现中国文学之艺术美等十个方面肯定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以下几章对历代的骈文作家、作品、艺术成就及地位等依次予以考察。作者认为，自泰古以来、骈散并驰、迭相雄长、与时高下，虽变态百出，不可究极，然论其大概，可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嬴秦，为骈散未分时代；第二期自西汉以讫于东汉，为骈文之胚胎时代，亦骈散并出之时代；第三期自魏晋以迄于盛唐，为骈文全盛时代；第四期自中唐以迄于赵宋，为骈文蜕变时代，亦骈散并驰时代；第五期自蒙元以迄于朱明，为骈散文之衰落时代；第六期有清二百余年，为骈散文之复兴时代。作者以考察各个时期骈文的发展情况时，为求材料丰富，分析全面，通过对代表作家和作品的详细阐述，来展示该时期骈文发展的全貌。如在第一章"邃古骈散文之未分时期"中，作者又分"经典中所表现之骈行语气与形态"和"诸子中所表现之骈行语气与形态"两部分予以论述。对于前者，作者依次阐述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左传》等，后者则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而每一家中又依次罗列各代表人物，如道家的老子和庄子、法家的管子和韩非子。作者对他们的代表著作或代表文章又依次分析其句法与用

韵。该书分析论述之细致详尽于此可见一斑。为使读者能深刻体味某些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该书还于每章之中转录了一些名篇佳作以供读者欣赏。为读者了解骈文的发展流变和阅读优秀骈文作品提供了便利。

《辞赋流变史》　台湾文津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著者李曰刚，前中央大学教育系中国文学辅系毕业，曾任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中国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等职。该书原为作者所撰《中国文学流变史》第二编"辞赋史"。除总论外，共有七章组成，依次为骚赋（楚辞）、短赋（荀赋）、古赋（汉赋）、俳赋（魏晋南北朝赋）、律赋（唐宋赋）、散赋（宋赋）、股赋（明清赋）。著者对各种赋体的命名、渊源、特质、作家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作者认为，辞赋远承古《诗》之"赋"义，近得楚人之"骚"体，并与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游说辞令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屈原被放逐后，将平日学《诗》所得之铺采摛文、设辞托讽的工夫，发为骚辞，以抒其忠君忧国、伤时疾俗之愤，由外交名流一变而为辞赋开山祖师。至汉代一统，社会得三百余年之长治久安，捭阖纵横已无所施，于是一般文人学士乃移其简练言辞之心力，转而用于雕琢辞藻，歌颂太平盛德，以博帝王欢宠，而为干禄进身之阶。所以辞赋特盛于两汉，而陆贾，主父偃辈，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于纵横家之林。

该书对辞赋的流变、各类辞赋的特质作了尤为详细的考察。作者认为，辞赋创始于楚辞，肇名于荀子、宋玉。大抵屈偏写志，荀多体物，宋玉则以铺采为宗，各有其特色。后代作家崇其所向，消长不一。综其流变，约可分为骚赋、短赋、古赋、俳赋、律赋、散赋、股赋等七种类型，与时推移，由盛而衰、变本加厉，逐渐消失讽谕之义。其中骚赋，短赋虽同产生于战国，而前者具江汉浪漫之作风，缘情托兴，怨悱凄切，辞致近于淫丽；后者禀河朔贞刚之气，敷理隐比，事义回环，态度近于严肃。古赋盛于两汉，虽然侈丽闳衍，尚不失古意。俳赋盛于魏、晋、南北朝，但重声华工整，已远离风雅。律赋盛于唐，专以平仄谐和、对偶巧妙为能事，置情志于不顾。散赋盛于宋，虽不尽废对偶，然或用长句、或用短句，纯以散文气势行之，专尚说理，不拘字句、格律。股赋盛于明、清，兼律赋、散赋二者而糅之，于对偶中杂入八股句法，寓骈于散，以俳为偶，虽形式完美，而桎梏性灵，亦赋体之末流也。作者认为，赋当以楚辞为正则，自汉魏而后，愈趋愈下，而走向没落之路。全书材料丰富，条理分明，对辞赋的嬗变勾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轮廓。在辞赋类别的分析方面也颇富启发意义。　　（郑永晓）

《中国风景散文》　马蒂纳·瓦莱特—埃默里〔法〕译，勒尼克塔洛普出版社，1987年，161页。

译者为法国中国文学翻译家，曾翻译鲁迅、袁宏道作品及其他中国文学作品多种。译者在本书中，翻译了我国唐代至清代二十六位著名作家的

风景散文共四十九篇。如唐代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柳宗元的《游西山》、《西山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宋代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松风亭记》、《白水山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明代张岱的《西湖梦寻》、《湖心亭看雪》、《游湖》，袁中道的《颐和亭记》、《碧泉记》、《游西山》；清代袁枚的《飞泉亭记》、《黄龙山记》、《黄山记》，李流芳的《游虎丘山小记》等。

译者在前言中说明，中国风景散文通常称为游记，也称为风景。在中国文化的初期，自然力，特别是它在山中的呈现，引起一种神奇和宗教般的崇敬，依据惯例，按照道教，自然力的神秘观起着持久的影响，要得到公众秩序，就必须同大自然相和协。正是这控制大自然的愿望，从而才产生了风景：把大自然在缩影中再现的想法，产生了园艺，它可直到缩小成"盆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做为游历者而与大自然经常来往，与此同时，关于风景的美学观念发展起来。至五世纪，基本上已变为风景的大自然，已成为文学方面优先的主题。

这种纯风景文学出现在动乱时代，也是佛教传播和道教复兴的时代，文人们向往于个人自好和退隐山野。大自然施展的魔力，首先出现在诗中，最初描写风景的散文是书信体。这一体裁迅即既有了自己的格律、并且流行至今未见中断。

这些散文是在成名作家们的大量文集中搜集而来，也来自游历者们和无名官员们的题词。但是，许多这种散文，除其形式美之外，还出色地表现出历险及人与风景接触和沉思的快乐，很多散文是在隐居和流放中写成，在那里，风景是避难所。几乎全都任过官职的经典作家们，实际上，常是遇到不幸，或是渴望暂时忘却官职的束缚。

译者认为，"写景文"是一种称为艺术的散文，在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由严格的简明协调的段落发展到比较广阔自由的结构，并反映出文学传统的两种对立倾向：效法儒家的精神或充满道教与佛教培育的个人自好。虽然风景的写作象是自发的，却仍然是失真的。一些景象起初新颖，由这一作品到另一作品，则有所改变或甚至相同；唯独"山"不是这样，并使人注意到巧妙的讽喻这一中国文学的持久特点。正如一幅画是汇集各种因素的综合，在创新中按个人看法写作的文学范畴的风景，同样是根据景象的共同基础，而重新结构出的风景。风景的词汇常常是美学作品的词汇，而风景，也可以作为文学评论的参考。

在中国，象风景这样受到如此热情论述的主题不多。游历是对激烈生活的追求，也是对"另一世界"中远离"尘世"和超凡的平静的揭示。

（韩宝光）

《战国诸子散文的特色》 先秦散文研究论文。作者史墨卿。载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9卷第7期（1986年7月出版）。文章指出，历史上的诸子之学，学术界多从其哲学的角度去探讨，殊少有从"文学"的

层次来研究的。近年来这种情况虽有所改观，但研究者均是针对某子而言，多从其“殊相”析论，未能对诸子散文作全面系统的考察。有鉴于此，该文偏重于“共相”的考索，以期能够得出有关诸子散文创作的根源及欣赏诸子散文的方法，从而为创作欣赏现代散文提供依据。全文分一、前言，二、诸子范围之界定，三、诸子散文兴起的原因，四、诸子散文的特色共四部分。鉴于诸子学派虽纷歧繁多，卓然自立者却只有儒、道、墨三家。因此，文章所论，以儒、道、墨三家为范畴，时空座标定在公元前四八〇年至公元前二百九十年约二百年左右，墨子最先，孟子次之，庄子殿后。作者认为，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时期，墨、庄、荀及韩非诸子目睹战争形态的转化，封建的解体、社会的剧变、经济的崩溃以至官师不合、政教大分、世族衰替、平民崛起，于是一方面他们抱救世的热忱，针时弊以立言，提出他们个人的学说主张；二则时君世主，多提供学术、拔识人才，两种力量，相互激荡，以致思想上，成就了中国哲学之母的典型，在文学上，也展现了光明灿烂的成果。

文章指出，诸子学说所以并行于世，其高超的哲理、纯真的情思，为当代不同的群众所接纳是其主因，但运用驾驭文字的能力，使他们的思想更易引起他人的共鸣，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文章从透辟精微的论辨、自然适切的修辞、艺道合一的特质、深造高妙的境界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诸子散文的艺术特色。作者认为，墨子文中展现的论辩能力与方法，在诸子当中独具只眼，运用十分成功。他不仅对辩的定义、功用、方法等有明确而详尽的阐述，而且更利用论辩之道为文表情达意：或用以修饰文句，使作品生动，文采优美；或用来推理说明，以加强立论根据。孟子的文章富有奇气而明快隽永，文采华赡，畅达流利，其文气，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而下，一泻千里，极具感人的力量。至于庄子之文，则如天马行空，空灵自然，似长江大河，汪洋恣肆，见事既明，说理尤妙，极富机趣。其论辩手法高明，论辩过程精微，论辩内容深远。除非必要，他是以一种隐晦而不显豁的方式来达到其论辩目的的，似有若无，似无若有，初看似无论辩之迹，但其结语始见其论辩所以然处。在修辞方面，文章限于篇幅仅就其修辞方法之一的譬喻，对诸子散文在修辞方面的成就作了抽样式的论述。作者认为，身为哲理散文大师的诸子，都深悉譬喻之妙，而且多能独出新裁，创造新譬。其中墨子是讨论“譬喻”一词最早的人之一，他主张用譬喻的方法，使抽象变为具象；使难知为易知。他对喻词的变化，运用非常灵活，精妙自然，适切有味。《孟子》一书中，纯比附性的譬喻，多达六十一次，如缘木求鱼，揠苗助长等，颇能使人想入非非，于警策中具幽默之趣。庄子也深悉譬喻之道，其设喻取譬，往往悠谬秘奥，藉使其玄虚之谈精微之论，获至首肯。作者最后指出，诸子生当扰攘之秋，人人具有悲天悯人的意识，旷视宇宙的襟怀，瞰见人类生活时空

的失序，自然关心生命的妥切安顿。所以对生命的体认，较之春秋时代的人要深刻透澈得多，因而呈出在字里行间的人生境界，也就尽为高远。尽管墨、孟、庄三子的境界性类容或有所不同，然其为“境界”之深远高妙，则毫无二致。（郑永晓）

《先秦哲理散文》　（新加坡）林徐典著。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82年出版。本书为作者所著《先秦文学史稿》的第四分册，共十五万字。绪言部分先介绍先秦哲理散文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将这个时期的本类散文分别归属于三个阶段：《论语》、《墨子》产生于春秋末年战国初期，《老子》、《孟子》和《庄子》属于战国中叶，而《荀子》、《韩非子》则是战国末年的产物。接着又概括介绍了每部散文著作的总体情况。最后对先秦哲理散文的发展趋势加以归纳总结。下面分为七章分别论析了上述七部著作，每章一般都是先介绍作者概况、作品版本、章节及其思想内容，然后分析其艺术结构和表现形式，语言特色等。结语再归纳先秦哲理散文的几个共同特点，并论述它们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本书从语言风格发展的规律着眼，考定了先秦七部哲理散文成书的年代先后，从而为这个长期聚讼纷纭难题的最终解决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作者覃思精研，精辟论述了这些著作体制方面从语录体到语录、著述体兼蓄，再到纯粹著述体，从片断、点滴到注意结构、逻辑说明、论辨技巧的演化之迹，这也是本书的一大新见。全书条理清晰，文字深入浅出，被评者许为“文字清雅，分析、概括精到、明彻”之作。（王枝忠）

《中国的赋》　译著。译者，美国学者伯顿·华生。197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所选，是汉魏六朝的代表作，包括宋玉的《风赋》、贾谊的《鹏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潘岳的《闲居赋》、木华的《海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谢惠连的《雪赋》、鲍照的《荒城赋》、江淹《别赋》、庾信的《小园赋》，总计十三篇。每篇前附有题解，介绍作者、题旨、文化背景等等。例如，在《海赋》前，译者写道：“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海，是个隐秘、神奇的地方。他们时时冒险出海，去寻找神秘之岛和仙人之居——蓬莱、方丈和瀛洲，据说它们浮于北海之上，或在其外。不过，北海多半被认为是百川所归的地方。据我所知，木华这篇赋，是中国文学里以海为题旨的第一篇重要作品……。”本书还有介绍赋的一般知识的引言和两个附录，即《早期关于赋的批评》、《荀卿的两篇赋》。著名学者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为本书撰写了前言。

（江　原）

《由文学观点谈楚辞到汉赋的发展与流变》　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10月初版。为该书局编辑出版的《国民文库》的一种。作者张书文，东北大学文学学士，南朝鲜圆光大学名誉哲学博士、历任台湾成功大学训导长、中兴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等职，著

有《由楚辞谈到屈原作品》、《汉代歌谣与音乐》等。鉴于楚辞研究自汉代迄今多偏重于篇章真伪及时代先后等问题的考证，该书则着重于探讨当时社会环境对文学作品的激荡和影响及文学本身由于时间推进的自然演变，以期“求得汉代文学在发展形态上的完整”和“从其递演兴衰的过程看出在整个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意识中各项文学本身的流变与异同”(自序)。全书包括一、引言，二、周代南北文学的兴起，三、秦代文学，四、汉赋的发展与流变，五、结语等五个部分。作者先后考察了我国周代南北文学的代表作品《诗经》和楚辞，阐述了楚辞的定名与骚、赋的异同、楚辞篇目与屈原作品等问题，并比较了《诗经》与楚辞的异同。作者认为，《诗经》作法之一“赋”的意义在整个中国文学流变里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它虽是源于北方文学的产物，但其作风却遍及南方，而且深深影响到以后秦汉文体的发展。楚辞的形成实在是造端于南音而又蜕变于《诗经》，楚辞的合乐可歌、隐具六义，而且所用多语助词等，都与《诗经》体制相同。但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与作者心态等方面的差异，楚辞与《诗经》也有诸多相异之处。作者指出，在时代相续中所产生的新旧文体，无论就形式或内容上说，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由《诗经》发展到楚辞，有其必变的道理，而从楚辞流变到秦代文学，其中也自然有其转化的因素与特质。作者在考察了荀赋与李斯刻石文后指出，楚辞转化到荀赋，在形式内容上已有很大不同，而由荀赋过渡到汉赋，则秦代散文的赋化更是一道重要桥梁。秦代时间短促，作品贫乏，但在文学发展史上却是一个汉赋酝酿的重要时期。

汉赋的发展与流变是该书的重点之一。作者从经济物质宽裕的影响、汉代帝王的喜好和科名利禄的引诱三方面分析了时代背景对汉赋兴盛的影响。关于汉赋的特质，作者主要阐述了两点：一、汉赋形体近于散文，内容较少浪漫情感；二、汉赋辞采比较华丽，表达空洞多不切实际。至于汉赋发展的趋势及其主要作品，作者分汉赋的形成期、全盛期、模拟期、转变期等四个阶段作了论述。作者认为，汉代初期六七十年的文学作品，无论形式内容都是直接受到楚辞、荀赋的影响，代表作家有陆贾、贾谊、枚乘等，是为形成期。从武帝、宣帝、元帝、成帝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武、宣二帝由于好大喜功，附庸风雅，当时文风颇盛，元、成二世继承前者余绪，在文学上也有不少作品产生，是为汉赋发展上的全盛期，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淮南群僚、严助、枚皋、东方朔、朱买臣、刘向、王褒等，作品大都以歌颂帝王的田猎、游乐为题材。从西汉成帝到东汉章帝的一百多年间，作家们由于难以越逾前人的范畴，而只得在摹拟方面大做工夫，代表作家有扬雄、冯衍、杜笃、班固、崔骃、李尤、傅毅等，是为模拟期。从东汉和帝至献帝亡国一百三十年间，因民生凋敝、国势日衰，文学思潮也受冲击和影响，以往那些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汉赋在此期间内逐渐发生变化，

代表作家有张衡、赵壹、蔡邕等，此为转变期。作者最后指出，任何一种新文学的产生，都不可能完全抛弃旧有文学的遗传而突出，其变化定然是由萌芽阶段逐渐吸收成长，到成熟期的巅峰后，又慢慢落入衰退。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也多半由不固定到固定，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疏到精密，由宽松到严格，当发展到一定高峰后，便又逐渐走下坡，开始酝酿另一番文学蜕变。深入把握这些文学演化的必然过程和趋势，才能真正了解汉代赋体文学的发展与流变。全书深入浅出，学术性与通俗性并重，为楚辞至汉赋的发展与流变，勾勒出一条颇为清晰的脉络，值得一读。

《汉赋和诗文的关系——赋体属性之考辨》 汉赋研究论文。作者简宗梧。载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17卷第9期，1984年3月出版。文章旨在通过对汉赋源流和内容形式的分析，考察汉赋和诗文的关系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章认为，要说明汉赋究竟是诗还是文，首先要确定所谓诗和文的义界，关于文，在先秦包含六经文籍，在六朝与笔对举，涵盖本文所谓赋、诗和散文。至唐代，韩愈之所谓文，则专就非韵非骈的散体言之。本文以诗文对举，则"文"之义界即取乎此。至于诗的定义，则根据传统的习惯，拘于三百篇及其嫡传作品。作者认为，追溯源流，汉赋是诗的别枝。赋原来是诗的一种体裁，或说是一种作法，发展到汉，学者都已认定为诗的别类。刘歆《七略》将诗赋共为一略，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取法，可见赋和诗有深厚的血缘关系。到了齐梁，刘勰仍然认定赋自诗出。所以汉赋宜置于诗的系统而具别枝的地位。作者指出，就作家的主观意识而言，汉赋是诗的延续。在汉人心目中，诗可以正得失、美教化、厚人伦，而这些也正是汉赋作家创作所遵循的圭臬。汉赋篇章几乎篇篇都以讽谕为主旨，是完全模仿他们心目中的古诗人，写下了"主文而谲谏"的赋。因而在主观意识上，汉赋是古诗的延续，是新时代的诗体。而就作品的客观风貌而言，汉赋也是诗的扩大。盖自《离骚》以来，辞赋作家都是饱学经典，有特殊修养及语文训练的士大夫，观察精微，娴于辞令，造成情事杂沓、铺张扬厉的局面。因此诗流变为赋，则堂庑为之扩大，除了造成淫丽以外，在情感和音节方面也就没有诗那么纡回往复，而显示了若干散文的特性。

文章指出，从形式方面观察，若以有韵无韵为诗文划分的标准，那么汉赋是散文化的诗。这表现在：一、前后散文体的穿插，除主文外尚有序、乱等；二、句式的参差和提头、接头语词的运用。从内容方面来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因其写志，所以还是诗的传统，又因其体物，所以是以描写事物为内容。因此，赋是叙事描写的诗。作者认为，推究衍变，汉赋是文士散文产生的关键。合乎萧统"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选文标准的文士散文，大量出现在汉朝，作者大都是汉赋的名家，其散文作品则多用婉丽或恢诡的赋笔，恢廓声势，甚

至假设问对。可见汉赋正是史传文蜕变为碑传文的关键。文章最后指出，赋是诗的别枝，是偏向叙事描写的诗。因主观的需求和客观的因素而有了散文化的倾向，更是产生文士散文的关键。赋还扣住不少文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如骈文、排律等，它和诗文之关系由此可知。

《汉赋中的山水景物——中国山水诗探源之三》 汉赋研究论文、王国璎著。载台湾《中外文学》月刊第9卷第5期，1980年10月出版。文章旨在通过对汉赋中山水景物描写的分析来考察汉赋对山水诗起源的影响。全文由两部分组成：一、汉赋中的山水观，二、汉赋中山水景物的描写。文章认为，汉赋表现出两种绝然不同的山水观，即在歌颂帝王的作品中认为山水是天子权势与帝国繁荣的象征，而在抒写个人情志的作品中赞美山水是避世隐居之所，是个人幸福的源泉。前者是以儒家的入世精神为后盾，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后者是以道家的出世精神为依归，出自理想生活的索求。作者指出，退隐山林原来只是一种对政治社会不满的间接抗议，可是在动乱的时代，还兼具避难全身、忘忧娱心的功能。自东汉以后，为避难全身而辞官不仕的文人学士越来越多，或借山水来避乱、或寄山水以忘忧。个人与自然这种直接接触经验的增多，是促使山水萌芽的重要关键。

文章对汉赋的山水景物描写作了较为细微的分析。作者认为，赋讲求的是铺陈。作者可以铺陈华丽的文辞来"体物写志"，而且赋又没有长度的限制，可以在广面上、细节上尽力发挥，是一种很适宜表现描写艺术的文学体裁。汉赋作者即使并不是以山水景物的描写为创作的目的，也会以很大的篇幅来铺陈大自然层见迭出的千态万状，极尽模山范水、状景形物之能事。很多汉赋作家，或铸造奇字以状山水，或自创新辞以喻景物，他们竭心尽力的以美辞丽句来构筑富艳瑰丽的世界，使得山水景物的描写不仅有炫目的形象，而且有悦耳的韵调。显然他们过分注重文字的雕琢堆砌，只图形象的巧构，而无感兴的渗入，往往使得呈现的山水景物虽然纷披繁密，却是生意索然。但是不可否认，汉赋作者在用字练句上的创新，以及他们的尚文求美，尚辞好藻的传统，的确为刘宋时代"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山水诗开辟了先路。

文章指出，固然大部分汉赋所描写的景物缺乏作者个人的情绪和关怀，但也并非绝对没有。它们多半出现在以抒写情志为动机的赋篇里。当山水景物描写的写实成分增加时，夸张与解说的意味减少，个人的情绪与关怀增加，有时甚至可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而且由于作品的感情化、个人化，诗意也更浓郁，班固《终南山赋》遗留下来的关于终南山水的描写足以证明。文章最后指出，以上分析可以说明，远在东汉时期的文人，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模山范水的艺术技巧，同时具有赏爱与了解自然山水的能力。唯一还缺欠的，就是南朝山水

诗人为表现山水本身的美，以及个人对山水赏心悦目的美感经验而创作的动机和目的，这还需要一段漫长的、动乱的时代才能逐渐培养而成。

（郑永晓）

《汉魏六朝唐宋散文选》 伊藤正文、一海知义编译，1970年10月平凡社发行，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3。载译文和注释，不载原文。收有汉：《谏逐客书》以下20篇；魏：《檄州郡文》以下17篇；六朝：《酒德颂》以下十九篇（晋），《陶徵士诔》以下5篇（宋）、《北山移文》（齐）、《宋书谢灵运传论》以下8篇（梁）、《哀江南赋》（北周）；唐：《五斗先生传》以下21篇；宋：《唐河店妪传》以下48篇，计收140篇，卷末附有解说。日本自古以来学习古文，以《古文真宝》、《文章轨范》、《唐宋八大家文》为范本，此三书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文章大抵不出此三书。《汉魏六朝唐宋散文选》选篇有此三书未见者。（王晓平）

《中国古典散文》 译著，又名《唐宋八大家文选》。译著为香港学者刘师舜。197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发行。本书选文以韩愈（16篇）、欧阳修（14篇）、苏轼（13篇）为最多，曾巩（8篇）、柳宗元（7篇）次之，王安石（4篇）、苏辙（3篇）、苏洵（2篇）较少。译者旨在系统地向西方读者介绍八大家的散文成就，因此名家选文均有代表性。本书有导言（亨利·W·韦尔斯撰）、前言和序言。序言介绍赋、骈文和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先驱者”、“韩愈和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第二阶段”）。本书系中英对照，左页为中文原文，右页为英文。注释较详，以脚注形式给出。各大家均有生平介绍，并附肖像一帧。本书在西方拥有大量读者。（江　原）

《唐宋古文运动中的文统观》

唐宋散文研究论文。作者何寄澎。载台湾《中外文学》月刊第14卷第1期（1985年6月出版）。文章指出，唐宋古文运动的基本主张在于文章应为阐扬儒道的教化工具，故文道合一，“文统”实际为“道统”。因而就严格的文统观而言，文章必须谨合儒家圣人之“道”，才可列诸“统”绪，是为正统。但若就稍宽缓的文统观而言，则除掉以“道”衡量，列入正统之外，另有若干作者的文章，与“道”不违，虽间有出入，仍可取法，是为正统之附。作者认为，我们一方面应先据前者严格的角度，找出古文运动从事者心目中合乎“道统”的文章正统；一方面须再以后者稍宽缓的角度，审视他们附列于正统的人物。一个古文运动从事者，严格、宽缓两种角度的立论都有，便可见其重“道”之外，兼且重“文”，文章应有儒道教化之用，但并不只是儒道附庸。作者指出，对文统观的考察至少具有三项意义：一、有助于了解运动从事者的基本文学观念；二、有助于了解运动的发展与变化；三、有助于了解唐宋两代运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差异。文章在考察了唐代李华、柳冕、权德舆、韩愈、皮日休和宋代柳开、孙复、石介、祖无择、欧阳修、苏洵、曾巩、苏轼、苏澈、黄庭坚、张耒等人的有关言论后指出，唐

人自始对文章的要求乃虽言“道”，却多不废“文”，且迅速倾向于重“文”，一开始便展现出其文学性质，独孤及以下日益浓厚，至韩愈遂成为强烈的修辞主义。可见唐代古文运动虽倡载“道”，却始终为一文学性运动。宋代古文运动则不然，宋人先重“道”，而后“文”“道”兼重，而后倾向重“文”。因而唐宋两代古文运动从事者的基本文学观念不尽相同。作者认为，文学观念为运动的理论基础，也即运动的指导方针，观念不同，演变自异。宋代古文运动在欧阳修以前，毋宁为一纯粹儒学性的运动，文章改革的目的在求儒道振兴与教化推行；至欧阳修始添入文学性质，从艺术观点要求文章，故欧阳修改革之主要对象竟为石介；再发展至苏轼以下，益往而不返，遂摆脱儒道，成为文学性运动。南宋朱熹所以痛诋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盖非事出无因。

文章还分析了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关系。认为，宋人入文统之人物不出唐人范围，且又尊韩，由此可见二者相承之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唐人始终一贯具有重“文”倾向，宋人则强烈重“道”，至欧阳修后始渐重“文”，则又显示了二者性质上的差异。

（郑永晓）

《唐宋八大家》 张健编著。1987年1月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出版，340页。列为“开卷丛书古典系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24”。

此书为唐宋八大家文选析，分八章。第一章选析韩愈文《原道》、《送董邵南序》等4篇；第二章选析柳宗元文《箕子碑》、《种树郭橐驼传》等5篇；第三章选析欧阳修文《纵囚论》、《醉翁亭记》等4篇；第四章选析苏洵文《管仲论》、《心术》等3篇；第五章选析曾巩文《寄欧阳舍人书》、《墨池记》等3篇；第六章选析王安石文《读孟尝君传》、《伤仲永》等4篇；第七章选析苏轼文《留侯记》、《喜雨亭记》、《方山子传》等6篇；第八章选析苏辙文《六国论》、《黄州快哉亭记》诸篇。编著者张健为台湾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家，已出版有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等著作四十余种。在书前的代序《探访古代的芳邻：致读者书》中，编著者对唐宋八大家文都作了颇为精到评析。如评韩文云：“他的文章特色是气势磅礴，条理清晰，变化多端，平中有奇，雄峻高明，能大能小。”评柳文云：“柳宗元一方面崇尚儒家，一方面也接受佛学思想的精萃，他的思想是博大的，而且也似乎比韩愈的深刻。他的文章‘雄深利健’。他最擅长的是游记和寓言，游记细腻幽冷，精彩美妙，寓言也妙趣横生。”评欧文云：“欧阳修的古文典雅温婉，但在柔婉中不时透出阳刚之气，且善于创新，能够巧妙地运用平常虚字，而造成新鲜的效果。他也注意结构的技巧，写文章十分谨慎，使其十全十美。”评苏洵文云：“苏文章非常刚强有力，受《战国策》、《史记》的影响很大，讲究方法和结构，有精神，有主见，十分严谨，偶尔也能洒脱。议论文尤其杰出，其代表作都是论历史和讨论政治、军事的。”评曾巩文云：“曾巩文章善于说理，文字精

实，结构谨严，气势壮盛，简洁含蓄。他的古文对清朝桐城派很有影响，被称为桐城派古文宗师。”评王安石文云：“王文简洁而厚实，有些也表现了孤峭的特色，有的像司马迁，也有的像韩愈或柳宗元。”评苏轼文云：“苏轼古文豪放，但自有法度，往往波澜起伏，变化莫测，读来爽神。他受庄子影响很大。议论也很精彩独特。”评苏辙文云：“苏辙文章气势高妙，阴柔中含有阳刚成份，议论温和而中肯，受论语、孟子、韩愈古文影响很大。他主张多游历山川，多交朋友，以充沛自己的体气，开扩自己的心胸，这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来。”编著者在向读者介绍本书的编造意图时说：八大家绵延三个半世纪，是在时间上包含最广的一组文学史人物，他们人人均能诗能文，才艺纵横，故欲学文者，不可不熟读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关于本书的注释和赏析，编著者作了这样的说明：“在注释方面，注音是挑难字、破音字，以及一般容易读错的字注。解释力求简洁清楚，完全用白话，尽量少注琐屑的出典，有故事性的地方稍为加强。语释一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很忠实、很流利的白话翻译，只有百分之四、五因用白话直接翻译几乎不可能，才稍稍改写，但以不损害原作精神为准。赏析方面也努力做到深入浅出，除了说明题旨，还进一步发挥分析文意，有时一篇很短的文字，因为内涵丰富，还牵涉作者的生平背景和学识的休养性，故加重笔墨给以详细地阐述”。 （杜维沫）

《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

美籍学者陈幼石论述唐宋古文运动的专著，1988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六章：导论：唐代古文运动；1，韩愈：作为正统思想的古典主义；2，柳宗元：历史中的个性；3，欧阳修：返回普遍性；4，苏轼：艺术中的感知论；结论：严酷的历史逻辑与温柔的诗歌之音。这本专著对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和宋代古文运动领袖和主将欧阳修、苏轼的文学观点和创作实践分别作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对他们在文学理论观点上的异同作了细致的辨析，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这是近年来海外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不多的专著中很值得重视的一种。 （孙乃修）

《桐城文派学述》 清代散文研究专著。作者尤信雄。台湾文津出版社1975年4月出版。作者指出，桐城文学流传既久且广，支流余裔蔓衍天下，左右清世两百年之文运，然而一二百年来“世之子桐城，毁誉交加，褒贬互见”，因而作者“本先圣述而不作之训”，“述其宗派之源流、师承，论其评点之学，论其与时文之关系，并归纳其文论而述之”（《序言》）。全书共由七章组成：一、绪论，二、桐城派之源流，三、桐城派之旁支，四、桐城派之选本及评点之学，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之关系，六、桐城派之文论，七、结论。作者认为，桐城派之崛起并非偶然，自有其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和文学的继承性，而且深受学术风气、时代背景、地理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作者阐述了桐城派的渊源，考察了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

琬和戴名世等桐城先驱的作品和主张，对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桐城名家的生平与创作及师承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同时作者还对桐城派的旁支阳湖派和湘乡派也作了探讨，阐述了其派别名称的由来、文论及其与桐城派的渊源关系。

该书还论述了桐城派的选本和评点文学。尤对桐城派的选本《古文约选》、《古文辞类纂》、《古文词略》、《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等依次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该书对桐城派的文论、桐城文与时文的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探讨。作者指出，桐城派集历代古文家与道学家文论之大成而发皇之，建立了严密而系统的文论，于是讲其义法，作为雅洁之文，自写其面目，成一家之特色。而为文之士，争趋附从，则“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语，自非谀辞戏言。桐城虽以古文名派，然诸家不拘拘以文士浅焉自限，观其所主“文道合一”之论、义法之说，莫不欲合文士之言与学者之言二而一之，以臻其有物有序之境。而诸家又皆积学之士，方苞、姚鼐、方植之等莫不精研经术，或深明于义理，则讥其“空疏浮浅”未免执偏。桐城虽倡为古文、然非模拟剽窃，他们是求“道”之古，而非辞之古，且其融合前人之文论，皆能化腐生新，是“精神”上“复古”，而非“形式”的复古，所以以复古讥评之，难免矫枉而过正。同时作者也分析了桐城派末流之弊，在于徒讲义法，以空议相演。末流之士，拘守戒律成法，不能脱化，不知求变求大，以致空疏浅陋，仅得其间架波澜，而将精神弃之殆尽。但我们也不能因末流之弊而全盘否定桐城派。全书材料丰富，条理清晰，作者虽然自称保持述而不作的原则，但所作各种评论仍颇富启发意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桐城派的本来面目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郑永晓）

作家作品研究

《尚书》与文学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许锬辉认为，《尚书》具有三重身份：是经书、史书，也是文学巨著。它的文学特征表现在几个方面。就体裁而言，它是“中国最古的散文”（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其中所含的训、诰、誓、命，开后代帝王诏书、臣子奏议、进策之类文字的先河；就文辞而言，它所运用的用事、对偶、协音、设问等辞格，长久以来给后代文学以启迪；就思想内容而言，它所弘扬的天道、五伦思想，则直接

影响着后代载道尚用的文学。因此，《尚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文学家本人也多有宣称从中获益良多者，例如，韩愈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进学解》）；柳宗元说他做文章时有多种“取道之原”，其中之一即是“本之《书》以求其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参见“《尚书》中的辞格”、“《尚书》与载道文学”条（许铁辉文载于《古典文学》第四集。）

《尚书》与载道文学 许铁辉说，综观《尚书》各篇的内容，主要在于阐明天道和五伦之道，尽管并未明白提出“道”字。从尧舜开始，就宣传尊天、法天的思想，提倡遵从天道行事。后来禹汤出师、盘庚迁都、周公进谏等等，也都标榜天道。五伦之道也是由尧舜传授下来、代代相承的。它表现在政治上，便是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表现在教育上，便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五典之教。这些内容本来并非为文学而提出，但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道”成了文学的依归。范晔所谓“以文传意”（《后汉书序》）、刘勰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是载道说的先声。在创作领域，唐初开启了载道文学的风气，及至韩愈提倡古文运动，载道文学便臻于极盛的高潮。柳冕说：“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与徐给事论文书》）又说：“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尚，故俗有雅郑。”（《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他把文学与教化、儒与道结合起来，欲图建立道统的儒家文学理论。这是韩、柳之所本，后代载道文学之准绳。唐代这种文学思潮，主旨在复古明道，而所明的道，即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圣圣相传而来的。（参见许铁辉文，出处同上。） （鲁 仁）

阿瑟·韦理著《道德经探研》

阿瑟·韦理的专著《道德经探研：它的意向和力量，以及它在中国思潮中的地位》，1934年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印1970部），262页。1937年至1956年重印四次。又，1958年美国格罗夫出版社出版，列入“联合国代表著作集：中国卷”。

此书是韦理的著名译著之一，内容包括：前言、导论、附录短文六篇、《道德经》译文等。韦理在前言中申明，这一译著是为喜爱人类通史的一般读者服务的，全书中的译文、解说和论述的共同目的，是在于准确地反映老子的生平，同时就“无为主义”、“道”、“圣”、“唯实论者”、“唯实论的神秘基础”、“名与实”、“道德经”的表现方法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书中附录的六篇短文，分别就老聃与《道德经》写作的传说、《道德经》的各种中文注释本、阴阳与五行的含意、《道德经》在世界上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详细评介。韦理是中国古典文学权威翻译家，韦理《道德经》的译文是精确生动的，能体现原著的风格，他的这本译著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典散文也有很好的帮助。 （王丽娜）

老庄在日本 圣德太子（574——622）所撰佛教注释书《维摩经义疏》卷中弟子品第三已引用《老

子》第十二章的语句："老子亦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六〇四年四月圣德太子撰定十七条宪法的第十条有"彼是则我非"一句，饭田武乡著《日本书纪通释》卷五十三认为出自《庄子·齐物论》："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万叶集》卷十六"读人不知"（意为咏者佚名）歌里有"心居无何有之乡，则近睹藐姑射之山"，以和歌吟咏庄子追求"逍遥游"境界的思想。这些都说明在奈良时代老庄思想已传入日本。《经国集》所收葛井广文的对策文中说："窃以玄以独善为宗，无爱敬之心，弃父背君；儒以兼济为本，别尊卑之序，致身尽命"，故其时排斥老庄独善而取儒教兼济。老庄尚未进入大学的科目，但是平安朝初期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了《老子》河上公注二卷、王弼注一卷、周文帝注二卷、玄宗御注二卷、《庄子》司马彪注二十卷、郭象注三十二卷等，可知这些书正被人阅读。春澄善绳（797－870）精通老庄，充任进讲。以后被广泛阅读的主要是《老子》河上公注和《庄子》郭象注。从平安朝末到镰仓室町时代战乱频仍，易生人生无常之想，贵族们渐渐爱读起《庄子》来。《徒然草》第十三段"文则《文选哀感之卷》，《白氏文集》、《老子》之辞，南华（指《庄子》）之编"，表明了对《庄子》的关心。该书三十八段有"智慧出则有伪"，即据《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第百二十段"贵难得之货"据《老子》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三十八段"真人无智无德"则据《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些都可看出老庄的影响。由于老庄思想与禅宗的闲寂之趣有相通之处，五山禅僧也喜爱《庄子》，从他们的诗文中可以看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中岩圆月《东海一沤集》、虎关师炼《济北集》都有诗赞美老庄思想。江户时代林罗山为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加上训点，译成口语，取代河上公注流行起来。徂徕学派、折衷学派对老庄都有研究，徂徕学派中，有太宰春台的《老子特解》、片山兼山的《老庄类考》、龟井昭阳的《老子考》、《庄子琐说》、海保青陵的《老子国字解》、《庄子解》，折衷学派中，有龟田鹏斋的《老庄摺解》、东条一堂的《老子标注》、太田晴轩的《老子铨解》等，老庄的注释书即有数种。老庄思想对某些日本文学家的思想、文风和人生态度都发生过一定影响。西山宗因赞庄子象有"研读庄周文章，仰承宗武俳风"之句，松尾芭蕉号栩栩斋，源于《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所写俳句多化用《庄子》之意。明治时代的汉学家栗本锄云，是个赞成维新，讲求西法的人，其名鲲，字化鹏，号匏庵，名、字、号均出《庄子·逍遥游》。近代文学家夏目漱石为后世留下二百多首汉诗，在他晚年写的七律中佛道思想的投影和"则天去私"的思想融汇在一起，如"自笑壶中大梦人，云寰缥缈忽忘神。三竿旭日红桃峡，一丈珊瑚碧海春。鹤

上晴空仙翻静，风吹灵草药根新。长生未向蓬莱去，不老只当养一真”。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嫌恶古道德与观念之束缚，”喜好老庄思想，曾赞扬“老庄是在中国最高尚深远的哲理”。（王晓平）

《古本〈大学〉散文研究》 先秦散文研究论文。作者许俊雅。载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9卷第2、3期（1986年2月、3月出版）。全文除前言、结语外，共由四个部分组成：一、《大学》一书之解题，二、《大学》成书年代考，三、《大学》散文之内容思想，四、《大学》散文之作法，五、《大学》散文之影响。作者认为，古人命篇每取首句中之二字或三数字为之，非比后世之因题命名。所谓“大学”实为学宫之名，并无他义。以此释本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文义甚为清晰。文章依据较为丰富的资料，否定了孔子、曾子、子思的著作权，并依据对文体语气、思想内容的考察，断定该书成于秦统一天下之后至项羽焚烧之前。进而从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方面分析了《大学》的思想内容。作者指出，关于《大学》义理的研究，前人著述颇多，而对于《大学》散文的研析，极为少见。有鉴于此，该文重点对《大学》散文的作法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大学》散文的炼字修辞有类字以广文义、转品以求新颖、顶真以求畅气三个特点。在锻句运调方面则有层递、反复、排比、引证、借宾形主、倒装六类，往往随义运用、组绣成章，文采朴茂，托旨遥深。作者还引用其师高仲华等人的有关言论阐述了《大学》在谋篇布局方面的特点。关于《大学》对后世的影响，作者从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两方面作了分析。（郑永晓）

《论语》与日本文学 据《古书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和迩吉师（《日本书纪》作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四月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引用了出自《论语》的“以和为贵”“使民以时”，说明《论语》与日本文化结缘甚早，奈良时代编纂的《养老律令》规定《论语》与《孝经》同为大学寮各科兼习的必读书籍，据称课文用的是郑玄注《论语》和何晏注《论语集解》。现存汉籍目录、平安朝初期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除录郑注（一〇卷）、集解（一〇卷）外，还载录了陆善经注《论语》（六卷）、皇侃撰《论语集疏》（一〇卷）、褚仲都撰《论语疏》（一〇卷）、佚名氏《论语》（六卷）、《论语义》（一卷）、《论语音》（一卷）、《论语弟子录名》（一卷）、《论语私记》（三卷），可知《论语》在当时已颇为流行。《枕草子》（前田本）说：“文则《文集》（《白氏文集》、《文选》、《论语》、《史记·五帝本记》）”，将《论语》列为文章典范。在平安朝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出现的金言集中，从宽弘四年（1007）源文宪《世俗谚文》以下，镰仓初期藤原良经的《玉函秘抄》、藤原孝范的《明文抄》、芝原为长的《管蠡抄》等，都载有出自《论语》的金言佳句。室町时代还出现了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讲

述《论语》的《论语抄》。在《源氏物语》、《徒然草》、《太平记》等古典名著中，都可读到引用《论语》的语句，江户时代甚至川柳中也有《论语》语句的变形。在日本流传的《论语》，起初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主，它作为博士家的传统学问世代相传。以后五山禅林盛行宋学，《论语》也由古注转为新主，朱子的《论语集注》取得主导地位，研究《论语》的著述渐多，江户时代幕府提倡儒学，有关《论语》的书种类极多。参阅新美保秀《影响日本文学的〈论语〉》（《东京学艺大学研究报告》六，1955，10）、新美保秀《日本读到的〈论语〉经本的注解系统考察数例》（《汉文学会会报》一七，1957，6）、新美保秀《写在我国古传〈论语〉释文的性质与价值》（《日本中国学会会报》九，1957．10）、远藤光正《见于金言集的〈论语〉的精神》（《斯文》六六，1971，8）、服部宇之吉《祭祀孔子的神社》（《斯文》一〇——一二，1928，12）、增田欣《〈太平记〉与〈论语〉》（《富山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二〇，1972，2）、宇田尚《儒教给予日本文化的影响——表现在文学里的儒教思想》（东洋思想研究所，1935）等。

日本十八、十九世纪有关《论语》的著述 日本江户时代儒教是官方学问，《论语》是汉学者最重视的书籍之一，研究《论语》的著述颇多，此举其部分。首先要提到的是古文辞派荻生徂徕（1666－1728）所著《论语徵》十卷的影响。此书以秦汉以前的古书探求《论语》的宗旨，直接摘出各章字句论说。此书对中国也有影响，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已有引用。《论语徵》收入《四书注释全书》、《荻生徂徕全集》，与此有关的可供参考的有宇佐见灊水的《论语徵考》六卷、中根凤河的《论语徵渫》二卷、松平黄龙的《论语徵集览》二十卷、西冈天津的《论语徵训约览》十卷等；对此书加以辨驳的有五井兰洲的《非物篇》六卷、中井竹山的《非徵》八卷、井上金峨的《辨徵录》、片山兼山的《论语徵废疾》（收入《崇文丛书》第二辑C。冈龙洲著《论语徵批》一卷（抄本），指斥《论语徵》的误谬，有享保十九（1734）年的自序，编入《儒林杂纂》、《续续日本儒林丛书》第十四卷。古学派的伊藤仁斋（1627－1705）由追溯孔孟古义来研究儒学，尊《论语》为“最高至极宇宙之书，他不满足于朱熹的注，著《论语古义》十卷，激烈地批判朱注的思辩性的、严格主义的态度，力图阐明《论语》古老的本义，将《论语》二十篇的前十篇作为上论正编，后十篇作为下论续编，提出新的见解。仁斋去世后《论语古义》于正德二年（1712）由其子东涯刊行。今收入《四书注释全书》，东涯有《论语古义标准》四卷，伊藤善沼有《论语古义抄翼》二卷，都是《论语古义》的补疏，以抄本流传。可参考大江文城《古义堂四书》（《支那学》一四——一、一二）、吉川幸次郎《仁斋与徂徕：〈论语古义〉与〈论语徵〉》（ビブリア四，1955、6）、贝塚茂树《论语古义及其它》（《日本的名著》一三，中央

公论社)。伊藤仁斋之孙伊藤东所著《论语古义抄翼》四卷，于天明六年(1786)成书，摘译《论语古义》，用杂以假名的文字写成。前面提到过的《论语徵集览》,松平黄龙(名赖宽)著，集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解》、伊藤仁斋《论语古义》、荻生徂徕《论语徵》诸说，于宝历十年(1760)刊行。太宰春台《论语古训》十卷，择汉(九家)、魏、晋(各五家)、后魏、梁(各一家)、唐(三家)、宋(二二家)，明(四家)、日本(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共五十二家之说，取与古训相合者以己意解说，有元文二年(1737)自序，又有《论语古训外传》二十卷，说明在《论语古训》中取舍各家之说的理由及自己见解的立足点。皆川淇园著《论语绎解》十卷，以仁说解《论语》，并分析《论语》各章顺序的意义，安永六年(1777)刊，收入《四书注释全书》第五卷。

十八世纪日本汉学界的古学派和古文辞派研究《论语》的著述，到十九世纪仍有很大影响。丰岛丰洲著《论语新注》四卷，就《论语集解》、《论语集注》等裁断取舍，有享和二年(1802)增订本，收入《四书注释全书》第七卷。猪饲敬所著有两种：一种是《论语考文》一卷，据《史记》、《汉书》、《经典释文》、皇侃《义疏》注解经文字句，引荻生徂徕《论语徵》、中井履轩《论语逢言》、大田锦城《论语大疏》等书中的论述，天保三年(1832)刊，收入《四书注释全书》第四卷；另一种是《论语说抄》一卷，为抄本，就《论语》中的问题批判诸家解说，发表看法，收入《儒林杂纂》、《续续日本儒林丛书》第十四卷。迟塚连叟《论语说》五卷，讲说《论语》，据认为其书为天保年间(1830—1844)的著述。仁井田好古是南纪的硕儒，在日本文化(1804—1818)，文政(1818—1830)年间对《论语》的注释，对其古义的解说，编成《论语古传》一书，本人撰写本四册十卷，照相版合为一册，1935年由南纪德川史刊行会公开发行。松下葵冈(名寿)著《论语一贯》五卷，是一部发挥其师片山兼山观点的注释书，每篇解说主旨，每章阐述章意，设“一贯”一目明其要点，以“仁”贯穿全书。文化(1804—1818)年间刊行。冢田大峰著《论语群疑考》十卷，就诸家《论语》注举疑论辩，文政年间刊行。井田淡泊(名均)著《论语经论》二卷，以《易》解《论语》，终于《学而》、《为政》两篇，安政六年(1859)刊行。《渔村文话》的著者海保渔村也著有《论语驳异》一卷，为抄本，辨驳佐藤一斋《论语栏外书》及安积艮斋《论语埤注》，仅有《乡党》篇，有天保十五(1844)自序，收入《儒林杂纂》、《续续日本儒林丛书》第一四卷。志贺节庵(名孝思)著《论语补解辨证》十卷，对《论语》逐次解说，有嘉永四年(1851)序。龟井南冥有《论语语由》二十卷，所谓语由，即发语由来之意，该书解释孔子及其弟子发语由来。收入《四书注释全书》第四卷，龟井昱(号昭阳)著《论语由述志》十卷，为该书作补疏，为抄本。尚有有

关《论语》的著述多种。（王晓平）

《阿瑟·韦理的〈论语〉英文译注本》 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的《论语》译注本，1938年由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68页，印行2000册。1945年第二次印行1220册，1964年第五次印行。又，美国纽约兰多姆书局1960年初版，印行15000册。此书还有荷兰文转译本，1964年荷兰出版。由此可见此书在西方流行之广泛。

此书正文是《论语》的全译文（83—233页）。书前有韦理所撰“序言”、“导论Ⅰ”、“导论Ⅱ”。在两篇导论中，韦理论述了孔子以及与孔子同时的学者的学说，介绍了《论语》中的一些术语，如仁、道、诗、君子、小人、天、信、思、王、霸等，还介绍了《论语》中提到的古代礼仪、丧仪、音乐、舞蹈，同时更着重介绍了由《论语》所开创的语录文体的写作传统。韦理认为，《论语》本身就是一部较早时期的中国古典散文的典范著作，读者不仅应了解《论语》的思想性和哲学性、民俗性、礼仪性，更要了解《论语》的文学性。韦理在此书的《序言》中也说明，《论语》的文字看来似乎显得机械而枯燥，但认真诵读，即可体认到它的文学性，故译文尽力将它的文学特点表达出来。此书书后还附有孔子年表、译文注释、索引等，特别是译文注释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对于一些难度较大的注释，力求准确可信，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所以此书既是一部学术性的译著，又是一部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读本。（王丽娜）

《孟子》在日本的流传 据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已有后汉赵岐注《孟子》（十四卷）、唐陆善经注《孟子》七卷，藤原赖长《台记》（康治二年〔1143〕九月三十日一条）记载1142年讲读《孟子》十四卷九《孟子音义》二卷。但是《孟子》在日本一直是受到轻视的，未被列入大学教材。镰仓时代以来，宋学传入日本，有虎关师炼等开始推崇《孟子》。虽然《孟子》对某些古典作品也有过影响，如《徒然草》第一四二段有“人无恒产则无恒心”之说，《太平记》等书也有引用，然而由于《孟子》肯定易姓革命、宣扬民本主义的思想，据认为与日本国体不符，受到明显的抵制。《五杂俎》所载日本“独无《孟子》”，携其书往者，舟辄覆溺之说正反映了这一情况。由此可见江户时代产生的大义名分论与尊王论对吸取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宋学逐渐发展的形势下，日本也出现过一些以《孟子》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如室町时代清原宣贤著《孟子抄》，因内容是讲述《孟子》，也叫《孟子听尘》，宣贤接受了家学参看各种注本，采用赵注本原文编写成书。江户时代有伊藤仁斋著《孟子古义》七卷，为探求孟子古义而为《孟子》全书作注，有1720年伊藤东涯序，收人《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其子善韶有《孟子古义抄翼》七卷（写本）。又有中村明远著《孟子考证》一卷，考证孟子事绩及孟子师授等，有1747年自序，同年刊行；猪饲敬所著《孟子考文》，主解经文字

句，收入《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孟子断》二卷，为冢田大峰所著，是非孟派的代表作之一。总论言“如轲则唯战国之一辩士，亦非有有德义之可崇者”，其下篇末章又说：“《孟子》七篇之书，其于世教切要者，未居三分之一，其三分之二则是屑屑锥刀之论也”。有《孟子定本》十四卷，为安井息轩所著，以赵注本为底本，取朱熹《集注》、焦循《孟子正义》、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等，以自己见解加以解说，收入《汉文大系》。参阅井上顺理《孟子传考》（鸟取大学学艺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一五，1964）、增田欣《〈孟子〉的章句与思想》（《〈太平记〉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角川书店，1976）、野口武彦《王道与革命之间——江户朱子学中孟子接受的问题》（《文学》四四——七，岩波书店，1976，7）、野口武彦《江户阳明学与〈孟子〉》（《文学》四九——二·三，岩波书店，1981，2）、井上顺理《我国中世孟子接受史的研究》（风间书店，1972）等。

《孟子论》 太宰春台（1680－1748）撰，收入《春台先生紫芝园后稿》卷八，分上下两篇。此论发展了荀卿、王充的非孟论，上篇认为孟子出言多过，其故有二：“其与国君言，则冀见听；其与学士诸子辩，则欲服人。冀见听，则务为可悦之言，欲服人，则牵强持论”，而孟子有斯二者之患，则不免其言多过。太宰春台首先攻讦的是《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违背孔子“君君臣臣”之教，而太宰春台则认为“君子不仕则已，仕则必敬其君”，以幕府倡导的武士道的绝对忠君精神来反对孟子的易姓革命主张及理论依据；其次，太宰春台对孟子在哲学上提出的性善论也颇有异议，认为这违背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论点；又斥责孟子“绌伯而专言王”，使得“王伯之分，遂成泾谓”。由此得出结论，孟子“所著书三万言，而违孔子者，不止十五”。而程朱尊孟，使《孟子》与《论语》并行，则为“惑”。《孟子论》下篇以“自古贤人君子，能为于天下者，必为众人所不为者也。彼其为之也，常道可行则行之，其或不可，则视时而行”，驳斥孟子的一味提倡礼乐。论者以孟子“天下溺，援之以道”的观点为鹄的，认为孟子所谓道者、是唐虞三代治平之道，“当此之时，天下之乱极矣，轲乃欲以唐虞三代之德治之，譬如不脱桎梏，教之揖让，可谓不知急务也。”“夫以先王之世，刑入尚有三典，而况衰乱之世，何可概用礼乐治之乎。故于周季之乱也，贤者诚欲治之，则虽合从连衡、攻伐战争可矣，虽为商鞅申韩亦可矣”。从《孟子》以来，“先王之道，降为儒家者流，遂令后世谓儒者难与进取。千百年来，儒生之谈，无补于国家，由轲误之也”。孟子之危害，不独使自己没有成就“可观之事业”、“终子一儒生”，而且“使后之学者皆自小”，其祸后生极大。太宰春台此论出后，有薮孤山等倡崇孟论，反驳《孟子论》的观点。

《讲孟余话》 吉田松阴（1830—1859）在狱中曾以囚徒为对象讲授《孟子》，出狱后继续向人讲授，遂将讲义编为《讲孟札记》，后又改名为《讲孟余话》，借以宣传他的“一君万民”的政治主张。《讲孟余话》是吉田松阴的主要著作。在书中作者明确说明，他讲孟子，不是精其训诂，也不是喜其文字，而是要将自己一忧一乐，尽寓之于《孟子》。孟子是主张民本主义的，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而吉田松阴却完全相反，借否定“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儒家的君臣关系，而以“天下者，一人之天下也”的命题为基础，提出“一君万民”的理论。孟子曾提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而吉田松阴认为，孟子这些主张，不适于日本。在日本，“普天率土之民，皆以天下为己任”，不分贵贱尊卑，都要尽死以仕奉天子。“一君万民”的主张，是要在理论上掀倒幕府统治的合法性，松阴死后，他的弟子久坂玄端、高杉晋作等继续鼓吹，从事倒幕活动。这种理论又是针对“草莽志士”的，是为建立天皇的专制统治服务的。（王晓平）

《战国策》的版本 美国犹他大学学者杜润德（Stephen Durrant）撰文介绍了《战国策》版本的演变情况。他说，今存本有32篇，写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12国之事，纪事一般以年代先后为序。《战国策》原为西汉刘向所编；一说为楚汉争战时人蒯通所编，但证据不足。汉代末年高诱作注并重编，订为21篇。《新唐书》书目所录高本，有32篇。有人认为《战国策》内容卑下，它曾遭到蔑视，宋代《崇文总目》说有12篇已告缺失。不久，曾巩借校勘书籍之便，予以补编。到了南宋，又有姚宏注本和鲍彪注本，后者于1147年刊刻。元代吴师道对鲍本加以补正，后收入《四部丛刊》。据研究证明，《战国策》有120多个片断已经亡佚，某些部分已经不能反映刘本的原貌。（参见《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

《战国策》游说词的特点 康达维说，一般认为《战国策》是一部游说言论的结集，其言论虽然基于历史事实，诉诸历史人物，但具有虚构性质。他以“苏秦以连横说秦”为例分析说，这段游说词显然不是实际生活中的话语，而是一篇高度精炼、讲究修辞的书面文章。其特点是：①夹用有韵律的四言句，构成了一种韵散并用体的原型。②采用纵横家的长技——列举史实。希腊、罗马雄辩家也很重视这一辩说模式。中国纵横家具体采用重复手段进行列举。一种重复手段是连用某一词语，如“昔者神农伐补遂”及以下诸句，“伐”字连用八次；另一种重复手段是连用同义词，如“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昏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③这些重复手段的运用，不仅起到了劝说的作用，而且产生了装饰、美饰语言的效果（详见“修辞研究”条）。他又另举例证说，由于听者是君王，纵横家不可能一味地公开警告、训

诫或批评，有时采用迂回曲折的手法。这是《战国策》游说词的另一特点。有一种迂曲手法，柯润璞（J. I. Crump）名之为“双重劝说”（doubled persuasion），即给出正、反两种命题或意见，供君王选择，如桓臧对楚王说伐秦一段。（参见康达维的《汉赋——杨雄赋作研究》。）

荀子的《赋篇》 一般认为以“赋”名篇，始于荀子。但康达维说，现在难以确定篇名原有，还是编者（刘向）所加。据《汉书·艺文志》所录，这一组作品包括《礼》、《知》、《云》、《蚕》、《箴》五赋和《佹诗》二章，它们的题目中不见“赋”字。

他还说，五赋和二诗的关联、其篇名的确切含义，现在也不清楚。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认为，这些作品实为一首诗，由五个部分和一个尾声（《佹诗》和《小歌》）组成。荀子“在五赋中暧昧地显示了自己从政的资格：了解社会原则，聪明，灵活，勤奋，并有批评能力……。然后在尾声里，他哀叹有资格者生不逢时，援引类似史实，以为映衬。”（《文人的挫折：释一种赋》）卫氏的解释证据不足。因为《小歌》曾单独录子别本，与“赋篇”不相连属，这表明五赋本身也不一定彼此连属。此外，人们很难断言五赋是作者从政资格的表现：《云》、《蚕》、《箴》与个人品质毫无联系，即使其隐喻意义亦如此。有理由认为，五赋、《佹诗》与《小歌》是独立而存的。

他又说，“赋篇”确有赋的某些特点，例如采用对话体，文笔铺张，曲写意旨等。而其最新颖的特点是它那独特的韵律，那种韵律标志着摆脱汉前旧型的趋向。它们的语句是四言和多言并用；四言句多见于《诗经》，多言句近似骚体。后者的一般形式为：

甲部	句腰	乙部	疑问词
×××	O	×××	者邪/者与

句腰字不重读，稍作停顿，句尾作较长停顿。这种句型便于诵读。根据“赋篇”的特点判断，它们很可能属宫廷口诵之作。（参见康达维的《汉赋——扬雄赋作研究》。） （江 原）

《长门赋》真伪辨 美国学者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撰写《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41卷第1期）一文，对《长门赋》的真伪性做了分辨。论者说，司马相如的名声主要建筑在《子虚》、《上林》两篇名赋上，而他的《美人》、《长门》二赋，因见于较晚的典籍，常被学者疑为伪作。关于后者，疑点多半来自序言，它有意解释《长门赋》的创作背景。但正如顾炎武所说，序称“孝武皇帝”显系时代错误，相如比武帝早逝，不可能知道他的谥号；而且结句“陈皇后复得亲幸”之说与《汉书》所载史实不符。其实，怀疑此赋的真实性由来已久。最早的见疑者是陆厥，他在给沈约的信中指出《长门》、《上林》并非由一人所作（参见《南齐书》）。清代何焯因发现《长门赋》笔致“细丽”，认为不似相如，而似张衡。现代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所研究。吴德明（Yves Hervouet）从韵律特点出发，断定此赋是伪作。许世瑛则认为序是伪作，赋为真笔；但许氏

没有提供判为真笔的证据。

论者又说，从韵律特点考察，有利于做出肯定的判断。1958年，罗常培和周祖谟合写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发表，引起学者对这一研究角度的注意。简宗梧在《长门赋辨证》(载于《大陆杂志》第46卷第2期)一文中，分辨西汉时蜀地作家以方言用韵的情况，得出《长门赋》极有可能为真作的结论。此赋若为伪作，多半写于六朝时期，因为那时赋家有用西汉作家充当代言人(personae)的风尚(如谢惠连的《雪赋》)，但伪作者不可能写出如此维妙维肖的拟作。

最后，论者从主题、措词和讽谕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在西汉"宫怨"主题尚未成形。在现存的汉赋中，极少有象《长门赋》那样深刻反映宫怨的。班倢伃的《自悼赋》差可相比，但这类作品的常见母题如月、琴、高楼、啸猿、鸾凤分飞、怨女怀人等，没有充分展开。鉴于这种情况，"宫怨"主题(它有部分内容会引起色情联想)没有引起儒家的兴趣，因此，一直被人忽视，也未能著录于《史记》或《汉书》。而在六朝晚期，这一主题已经成型，于是萧统将《长门赋》收入了《文选》。其次，《长门赋》中有一段文字写长门宫，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写其雕梁、画栋、玲珑的窗格、结构复杂的木柱、以及炫人眼目的色彩和光泽。作者似乎有意制造一种讽刺性的反衬效果：女主角孤寂而忧伤，却住在如此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里，她不能享受住所的壮丽风姿。这种描写很象司马相如的风格。其中一些生僻词语(如"丰茸"、"离楼"等)的运用，也能代表司马相如的措词手法。另外，这篇赋没有提及女主角陷入苦境的原因。篇中虽有"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等语，也没有暗示她遭到了惩罚。写"长门"、"兰台"、"曲台"，也不与陈皇后事联系。作者显然在责备女主角的爱人(他喜新厌旧)，却没有说这人就是汉武帝。这种曲笔讽谕的手法，在相如的其他赋里也很常见，如《大人赋》和《上林赋》。

根据上述分析，康达维认为《长门赋》的序是拟托之作，赋本身实出自相如之手。 (周发祥)

《史记》在俄苏 司马迁的《史记》一向受到俄国的重视，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1777—1853)就在《古代中亚各族人民资料汇编》(分两卷，后来于1950年公开出版)选译了《史记》的《匈奴列传》、《朝鲜列传》等篇。苏联时期选译史记的有关篇章收入历史、哲学、文学等各种文集出版的有11种47篇次。其选译篇数最多的是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81—1951)选编的本子。

阿列克谢耶夫编选并翻译的《中国古典散文》(科学出版社，1958年，387页)一书精选了司马迁的名篇：《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酷吏列传序》、《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序》、《孔子世家赞》、《五帝本纪赞》、《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管晏列传》和《游侠列传

序》等14篇。

《史记》俄译文作为单行本出版则是在五十年代，先后出过两种版本：《司马迁文选》，帕纳秀克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136页。司马迁《史记》(两卷本，439+357页)，维亚特金、塔斯金译，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72和1975年出版。

评论司马迁的文章至1980年为止共发表21篇。论者有比丘林、阿列克谢耶夫、杜曼、康拉德、克留科夫、李谢维奇、波梅朗采娃等。以克罗尔(18篇)，为最多。

克罗尔(1931—)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研究员，曾以论文《司马迁——秦亡后的历史学家》于1963年获副博士学位。后来于1970年出版专著《司马迁——历史学家》(科学出版社，446页)，对《史论》及其作者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李明滨)

《史记》与日本文学 《史记》传入日本极早，圣德太子(574—622)《十七条宪法》第十条有"如环无端"，即源出《史记·田单列传》"如环之无端"日本天平胜宝九年(757)施行的《养老律令》规定，《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为大学课程。平安朝大学的纪传道要学习《史记》，从弘仁七年(816)以来，史记"竟宴"(讲解《史记》之后举行宴会)十分盛行，《凌云集》所收贺阳丰年《史记竟宴赋得太史自序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清少纳言《枕草子》第二一一段谈到"文则《文集》(即《白氏文集》)、《文选》、《新赋》、《史记·五帝本纪》"，说明了《史记》在贵族中流行的盛况。不仅《源氏物语》在故事的结构与叙述方法上受到《史记》的影响，《史记》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也成为历史物语《大镜》为首的"镜物"模仿的对象。在《平家物语》、《太平记》等军记物语中可以读到许多源出《史记》的故事，如吴越之争、汉楚之战、鸿门晏、纪信救主等故事，一再被长篇引用、改编，插入日本历史故事中，成为其中重要的部分。室町时代桃源瑞仙著《史记桃源抄》，讲说《史记》，多用口语，文明九年(1477)成书，抄本有京都大学图书馆清原文库本二十册、东洋文库本二十册，版本有宽永古活字版《史记抄》十九卷二十册。月舟寿桂的《史记抄》(幻云史记抄)流传也很广。江户时代更出现了如皆川淇园、中井履轩、赖山阳、冈白驹等优秀的《史记》研究者。皆川淇园及门人著《史记助字法》辑录《史记》助字加以说明，其载录助字二百二十字，类似的字分类排列，举例说明用法，其书刊行于1760年。冈白驹著《史记觿》(1756)摘解《史记》难句。明人凌稚隆(1199—1287)《史记评林》的日本刻本出版受到普遍欢迎。读本作者上田秋成《雨月物语》中的《贫福论》受到《史记·货殖列传》的影响《菊花之约》受到《史记·商君列传》的影响也已成为定论。俳句名家与谢芜村在俳句中也使用过"约法三章"、"漂母之恩"等出自《史记》的典故。项羽和刘邦的故事在日本是脍炙人口的，近代文学中取材于这一故事的著名作品，如长

与善郎的话剧《项羽与刘邦》(新潮社，1916)使作者一举成名(参阅《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司马辽太郎的《项羽与刘邦》(新潮社，1980)对这一题材又有新的发展。有关《史记》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可参阅：增田欣《以〈史记〉为源泉的故事的考察》(《〈太平记〉的比较文学研究》，角川书店，1976)、增田欣《〈太平记〉作者对〈史记〉的接受》(同上)、仁田香鹤子《〈源氏物语〉里的〈史记〉投影》(《樟阴文学》七，1955，10)、松村博司《投影于〈大镜〉的海外文学——关于〈史记〉的影响》(《国文学》六——三，1961，2)、小守郁子《〈源氏物语〉里的〈史记〉影响》(《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二)、凡山清子《〈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三，1957，2，《〈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松本治久《〈大镜〉向〈史记〉学了什么》(早稻田大学《汉文学研究》一一，1963，12)、增田欣《〈太平记〉与〈史记〉的列传》(《中世文艺》二九，广岛大学中世文艺研究会，1964，5)、新美保秀《〈史记〉与日本文学》(《汉文教室》一九，大修馆书店，1955，6)、吉川幸次郎《〈史记〉与日本》(《文艺春秋》三四——六，1956，6)、冈田正之《〈史记〉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东亚研究》二——五)、菅谷军次郎《〈史记·货殖列传〉与浮世草子〈永代藏〉》(《生活文化》一——一，清教社，1956，11)、后藤丹治《中国典籍与〈雨月物语〉》(《国语国文》二一——一一)、松本治久《关于中国史书给予历史物语的影响》(汉文学研究》九，1965，9)等。

《史记抄》 指日本室町时代桃源瑞仙的《史记抄》(史记桃源抄)十九卷与月舟寿桂的《史记抄》(幻云史记抄)八卷，都是讲述史记的书，有双璧之称。前者完成于日本文明九年(1477)十二月，抄本有京都大学图书馆清家文库本(二十册)、东洋文库本(永禄七年抄，缺《史记源流》、《周本纪》、《项羽本纪》，二十册)及京都府立图书馆本(江户初期抄，十四册)、内阁文库本(室町时代抄，十四册)，版本有日本宽永古活字版《史记抄》十九卷(二十册，1626)，后者也称《史记抄》，为汉文写成。参阅龟井孝、水泽利忠《〈史记桃源抄〉的研究》本文编一——五(日本学术振兴会，1964—1973)《史记抄》(抄物资料集成一，清文堂，1971)、三尻浩《史记抄》(1937—1938)、岛利一《读桃源瑞仙〈史记〉抄》(《东方学报》一〇——一，1939，5)、大冢光信《关于〈史记抄〉》(抄物资料集成七，清文堂，1976)、寿岳章子《〈史记抄〉的文章》(《国语国文》，1966，5)、《史记抄》研究会《〈史记桃源抄·高祖本纪〉注解》(《立命馆文学》三，1966，3)、荫木英雄《桃源瑞仙的史学——以〈史记抄〉为中心》(《东洋文化》二二、二三合刊号，1970)、大冢光信《〈史记抄〉的诸本与本文》(《京都大学国语国文》三三——五，1964，5)等。 (王晓平)

《史记》的越译和评论 越南如成翻译的中国司马迁的名著《史记》1963年由河内文学出版社出版印刷成越南文。1988年该出版社又第三次印刷，深受越南读者欢迎。如成的越译《史记》前言长达24页，分“司马迁其人”、“作品”、“思想”、“艺术”四个方面详细地分析评价了《史记》，这是一篇很好的介绍评论文章。其主要论点是：

“司马迁的《史记》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国史学巨著而且在世界上也享有盛名。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它还是一部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之一”。

“《史记》使所有的人都得到满足。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综合的真实的宝贵史料；哲学家可以从中了解‘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文学家可以看到一部抒情诗般的不朽的散文作品，一般读者可以从中看到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典型形象，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栩栩如生。”

“《史记》规模宏大让我们愕然，作家的笔力让我们惊奇。作品紧紧抓住历史事实，半步都不离开生活，使读者感到自己的双脚是踏在大地之上的。”

“可以说司马迁是世界上第一个写国家通史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写当代史的人，是继孔子之后第二个总结中国文化的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给我们留下了成千上万个活生生的社会各阶层代表的典型形象，单就这方面而言，他就可以跻身于人类最伟大的文学家之林。他笔下有陈涉、吴广农民的形象，有游说家苏秦、张仪的形象，有荆轲、聂政侠客的形象，有孔丘、庄周哲学家的形象，有韩信、李广名将的形象，有信陵君、孟尝君诸公子的形象，还有暴君秦始皇和秦二世的形象，有刘邦、项羽等许许多多不朽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被改成诗、戏剧、传记等成了文学宝库中的典型形象，他们的语言成了民族的宝贵遗产。这是很奇特的。但更奇特的是后来的人怎样增补删改也不能塑造出与司马迁不同的韩信、荆轲、项羽等人物形象来。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已全部被人民所接受、所承认，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一般的史学家在描写历史人物时只注意他们在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关键时刻的历史姿态”，而司马迁则不然，他不放过表现人物性格的典型事例，哪怕是艰难困苦受欺受辱的细节也不放过，他不仅写在刘邦手下当上将军时的韩信，还写寄食时的韩信，还写张仪被打掉牙齿几乎脱光的情节，还写刘邦喝酒赖帐的情节。司马迁认为，任何伟大的人物首先也是常人。他抓住人物的典型语言、典型动作，使人物性格突出。例如只用‘皇帝斜躺在床上接见卫青大将军’就表现出了汉武帝的傲慢，用‘昌尝燕时入奏，高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表现出汉高祖的放浪。”

“在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后，作者并没有就此止笔大发议论，而是根据典型事件本身的发展变化规律继续发挥叙述，这更有说服力，这也是后人无

论如何也模仿不来的。"

"司马迁的文章简洁明快,生动多样,代表了西汉时期的文学风格,他笔下的人物代表了西汉时期人物的特点,但人物本身又各具特色。为了突出时代特点和人物性格,作者并不孤立的看待某一个人,而是把他与其他的人物对立起来加以处理,如在读到李斯时就会看到赵高,读到平原君时就会想到信陵君,读到刘邦时就会看到项羽。正是由于作者使用了严谨的自叙方法使得这些人物客观的实实在在完完整整的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使后来的人无法更改替换。另外作者在每章的结尾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寄托自己的思想和纠正世俗的看法。"

"《史记》是一部难读但是很好的作品,读后会受到深刻的教育,因内容丰富,表现方法独特,需要反复读,反复看才能深刻体会出它的妙处。作者是杰出的人物,作品是伟大的作品。我们相信《史记》是会受到越南读者欢迎的,并且会象对待屈原、杜甫那样以深厚的感情对待司马迁。"

(王金地)

《汉赋——扬雄赋作研究》 专著。康达维撰。197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六十年代,作者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书期间,开始研究扬雄。这本书的前身是他的博士论文(1968)。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序言",介绍扬雄的生平和著述,以及中西方扬雄研究的情况。第二章"杨雄之前的赋",介绍赋的译名和发展史。后者涉及《楚辞》、"赋篇"(荀子)、游说传统、司马相如等内容,强调游说艺术是赋的重要源头。第三章"《甘泉》和《河东》赋"及第四章"《校猎》和《长杨》赋",分别介绍这四篇作品,包括译文、背景知识、词句解释、内容与艺术性分析。第五章"经过批评和改革的赋",介绍《太玄经》、《法言》中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对赋的特点的认识;并介绍《解嘲》和《逐贫赋》两篇作品。认为《逐贫赋》体现了扬雄的新诗观。第六章"结语"概述杨雄风格的转变,强调他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本书弁有著名学者傅汉思(Hans H. Frankel)所撰的前言。他盛赞作者在西方赋的研究中做出的贡献。

扬雄的《逐贫赋》 在《汉赋——扬雄赋作研究》一书中,康达维说,《逐贫赋》完全以四言句写成,大量运用《诗经》中的套语(formulae),似乎诗人有意以古诗的形式写赋。它的措词,就赋体来说,也相当简朴,决不会遮掩赋的意旨。不过,《逐贫赋》仍然具有赋的特质。它的结构贯穿着一个对话体("扬子"与"贫")的论辩,这与赋的基本修辞特点相符。但它没有隐蔽的批评和掩饰起来的劝说,辩论开门见山而且具有个人性,结尾也毫不暧昧。这与大多赋作的论辩完全不同。这篇赋是否为扬雄所写、写于何时,没有证据可供稽考,可能是他晚期创作的产品,在他明显放弃写赋之后。很可能扬雄对之谴责、决心不写的赋,仅仅是指卖弄词藻的那一种。于是他写了这篇赋,使之与自己的诗歌理想一致。

扬雄在理论上、甚至在实践中寻求赋的改革。他早期的作品如《甘泉赋》和《校猎赋》，是想在错采摛文的形式下进行批评，显然他以为那是失败的尝试。接着，他在《长杨赋》中运用了令人想起战国游说词的结构和技巧，但论点仍然依稀难辨。当兴趣转向哲学时，他开始摈斥藻饰的赋，而提倡比较直接、较少美饰的文风，以便明白显露道德意旨。《解嘲》尽管充斥着说教性历史故事，还运用了另外一些旧式的修辞技巧，但不仅比较直率，而且是表达个人感情的第一篇赋作。而《逐贫赋》，即使不是扬雄所作(康氏以为出自他手)，也是一种将扬雄新的诗歌原则付诸实践的杰出的尝试，那种新的诗歌原则就是：开门见山、措词平易、陈述己见、进行说教。

（江　原）

《汉书》与文学　台湾学者王明通说，班固所撰《汉书》，总成一代之史，范晔以下，论者不绝，习其书者，历代迭出，其影响可谓深远。对文学的影响，大约有下列数项：

(1) 就思想而言　《汉书》建立了载道致用的文学理论。司马迁未尝明言其文学观，从《太史公自序》中可约略看出，他视文学为遂志抒情之作。而在《汉书》、《司马迁传》、《艺文志》、《司马相如传》等处，班固主张人之立言宜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论道则宜以载道之六经为本，而且认为，可根据乐府歌谣，观风俗之厚薄，以为施政之资。

(2) 就文体而言　一方面班氏文章上承典谟训诰之遗，复受辞赋铺采摛文，竟尚侈丽闳衍之风，爱好整文，每出偶句，实为六朝骈俪之滥觞。而文章不外奇偶二流，骈散二体，因此《汉书》是文章的一大宗。另一方面，班固别立诗赋于六艺，使得文经分离，文学观念愈来愈明。《隋书》、《四库全书》均受其艺文入志的影响。

(3) 就内容而言　《汉书》保存了西汉文章的精华，如东方朔的《答客难》，贾谊的《治安策》、《鹏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扬赋》等，均是精要博雅之文。班固所录文章中诰令奏议占相当大的比重。

(4) 就剪裁而言　《汉书》烦省适当，取舍得宜，并善于熔裁经传之文，笔削冗繁，存其神髓。这些做法是后代撰文者的典范。

(5) 就叙事而言　《汉书》在叙事技巧上有几个特点：①详而有体，赡而不秽，自成一家之言；②描摹人物，细腻生动，声容如见，为后世写实文学之圭臬；③叙事委曲详尽，明晰有法，能尽其情状，穷其幽隐，为后代所称。

(6) 就措辞而言　《汉书》删芜去冗，语言精练，音节流通，自然和雅，为后代所宗；其整偶之句，也分划后代的奇偶流派。

(7) 就风格而言　《汉书》辞采华赡弘丽，其体气详实整密（详实指文体，整密指文气），其意态温雅蕴借。这些风格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建东）

《祢衡的〈鹦鹉赋〉》　期刊文章，作者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

格雷厄姆(Jr. William T. Graham)。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39卷第1期(1979，6)。

作者认为，以草木、禽鸟等为题的小赋即可称作咏物赋，由于早期作品的亡佚，现存作品有些又不详其作者，其起源很难明确断定。《桔颂》熔描写和寓意于一炉，是典型的咏物赋，大约成于西汉或更早；《风赋》和《笛赋》一般归于宋玉名下，从理论上说应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但其作者究竟是谁，至今尚有疑问；贾谊的《鹏鸟赋》有确定的创作年代，但不是咏物赋，而是一篇说理之作。无论如何，咏物赋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

接着作者又介绍了祢衡的生平遭际和这篇赋的写作背景。他说，祢衡祖籍山东，因避战乱，逃到南方。他在许县结识孔融，并被推荐给曹操。但他傲视权贵，敢于直言，托病拒不见曹，曹欲加羞辱，他却裸体而鼓，痛骂奸佞，演成千古奇闻。后来，他被遣送他处，辗转至江夏太守黄祖门下。又因侮慢主人，终被杀害。他在此期间，与黄祖长子黄射友善，应邀写了这篇赋。

在译出《鹦鹉赋》全文后，作者评论说：按照惯例，咏物赋有两种内容，一是社会性的，一是个人性的。黄射为爱鸟求赋，自然想听到褒奖的话，诸如"聪鸟爱主何其幸运"之类，祢衡却哀叹囚鸟之不幸，并寄以深刻的同情。因此在赋中，强烈的个人情感的抒发与因袭成规的社会内容的传达，显得很不协调。例如"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两句，可用于任何咏鹦鹉的宫廷之作，也一定能博得主子的欢心，但与上文"闭以雕笼"、"剪其翅羽"、"载罹寒暑"等句放在一起，就不融洽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鹦鹉赋》文笔生动，读之感人，但也是中国文学中最奇特的作品之一。 (周发祥)

曹丕的才具 台湾学者庄耀郎说，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的滥觞之作。但后代人对于曹丕的知性思考能力，大多未能正确理解，扬植抑丕，认为其才"去植千里"。这种看法的立足点是创作。刘勰很早就为他辩解，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子桓虑详"，"典论辩要"，认为文帝不应"以位尊减才"，思王不应"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王夫之也曾为他鸣不平："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邪！"(《姜斋诗话》)刘勰明显推重其知性，指出《论文》的特质是批判性，王夫之也指出他具有"精思"的质性。现代学者也多有称赞曹丕者。叶嘉莹说，他感性和知性均衡正常，堪与张衡、杜甫并列，属于兼长并美的天才(《秋兴八首集说》)。林文月更从各种角度透视曹氏兄弟，认为曹丕理智、谨慎，有文人气质兼治学能力(《中国文学评论》)。就《论文》本身而言，它之所以被收入《昭明文选》，也是因为洋溢着十足的藻采，有很高的可读性。(参见庄耀郎《曹丕典论论文"气"义探微》一文，

载于《古典文学》第六集。）

（潘　达）

《桃花源记》产生的时代背景

苏霍鲁科夫认为：中国叙事散文的产生和形成的最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乱时期。一到六世纪，汉王朝逐渐衰弱终至灭亡，继而军阀割据，异族入侵，南北分裂，皇室频繁更迭。在此条件下，人类生命的价值比任何时候都低廉，任何人无法相信自己的未来，占有文化的官僚社会也不例外：许多著名人物在这些灾难深重的年代相继死去，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文学家，如孔融、祢衡、嵇康、张华、陆机、陆云、刘琨、潘岳、郭璞和谢灵运等。在当时上流的文学圈子中，不少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和避世疾俗的思想，向往穷乡僻壤的生活，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逃避社会骚乱、躲进和平绿州的忧思，真正成了时代的旗帜。这时，产生了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样著名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也就并非偶然了。（参见《紫红色的碧玉》一书绪言。）

（赵佩瑜　王中玉）

《三国志注》对《三国演义》的影响　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楚生认为，《三国志注》对《三国演义》有很大的影响。他说，陈寿所撰《三国志》内容不够充实；裴松之博采魏晋时代的典籍一百八十多种，对它在材料上进行"补阙"和"备异"，在考证上进行"惩妄"和"论辩"，写成《三国志注》，遂使三国时代的历史真相更加彰显。将《三国演义》与之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关系。于是，本文作者根据故事情节的重要与否，大致分作三类，探讨演义小说的故事情节取材于裴氏之书的情况。比较之后，作者总结说：一、《三国演义》的情节取材于《三国志注》者，较重要的有十二件，较次要的有二十七件，再次的有五十八件。三类合计共有九十七件，两者关系可谓极其密切。二、《三国演义》的史实，自然以取材于正史（《三国志》）记载者为主，其故事情节的推演，大体也不违正史所载的史实，但其精采片断，文学成份，则以取材于裴氏《三国志注》的博采异闻者为多，其小说描写也多半演化裴氏著作的精采记述。三、《三国演义》一书根据史实，参酌史注，经历多年，踵事增华，方始勒成今本。假如无裴氏之注，其动人情节，精采描写，必将大为逊色。（参见胡楚生《略论〈三国演义〉与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关系》一文，载于《古典文学》第三集。）

（令　仁）

《昭明文选》的选文标准　台湾学者游唤（本名游志诚）认为，先秦两汉之文，偏重"文章"性质，《昭明文选》使文章的意义更加扩充。它述其选文标准曰："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段话大体包括如下诸要素：一、议论文字，笔路有条理，段落清楚，措词求理顺，兼达词美。二、记叙描述文章，善用比喻。三、想像之为真。四、优美的词句之中，含蕴丰富的思想。考察这一尺度和散文的流变，可知除第一项议论文章要有条

理，允称诸派共通法则之外，其余讲想像、比喻、词类等项，皆非"古文派"的要旨。昭明所未选的文章有下列四种：经书（"姬公之籍，孔父之书"）、子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应用之文（"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和史书（"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四种则是"古文派"所崇尚的文章。（参见游唤《古典散文与现代散文》一文，载于《古典文学》第五集。）

（潘 达）

康达维译《文选》 美国学者康达维计划用八卷全部译出《文选》，现在已出两卷。卷一于1982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卷名为《京都赋》，收班固、张衡、左思写京都的大赋六篇。译者在序言中声称，这个译本"既是译文，又是参考书"。因此，他提供了详细的注释、书目、古人评语等参考资料。注释包括地名、人名、典故、传说、古董、古俗、礼仪、职衔等。卷二于1987年仍由普大出版。体例与卷一相同。它包括十七篇抒情、写景赋作，即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潘岳的《耕籍赋》、《射雉赋》、《西征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王粲的《登楼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鲍照的《芜城赋》，王延寿的《灵光殿赋》，何晏的《景福殿赋》，木华的《海赋》和郭璞的《江赋》。这两卷均为"普林斯顿亚洲研究丛书"之一。

《洛阳之忆：杨衒之和毁弃的京城（493—534）》 作者：詹纳尔（W. J. F. Jenner）。198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牛津出版。这本书原为作者的博士论文，经加工而成。全书长达三百余页，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北魏历史，第二部分是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英译。叙史部分有六章，重在政治史，如宫廷危机、军事活动等。译文部分多做脚注，根据史书和其他典籍释疑解难，训通文义。书中还附有地图数幅，"附录"三则，介绍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大规模地评价杨氏的著名散文集，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本书也存在一些缺点，譬如关于写作意图，作者说是想把"洛阳城兴起、历史、作用和性质的观点，与杨氏《洛阳伽蓝记》的英译密切结合起来"（"序言"）。但这一意图没有达到。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ctor H. Mair）所说，两部分结合得很勉强，读者的印象不是结合，而是离异。因为本书第一部分强调政治，而第二部分对佛教感兴趣。（参见梅维恒的书评，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43卷第2期。）

《哀江南赋》 研究专著。作者：格雷厄姆（William T. Graham, JR）。198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四章：第一章《历史背景》，叙述庾信的生平和时代，从社会、历史方面提供阅读此赋的基本知识。第二章《六朝的赋》，介绍赋的发展、特点和类别，从文类方面提供阅读此赋的基本知识。第三章是《哀江南赋》并序的译文和意释。第四章《评论》，逐句讲解此赋措词、用典的含义及其牵涉的历史事件。此外，本书还包括一篇

"序言"和七篇"附录"：①"历史和传记资料"，②"庾信的事业"，③"庾信的文集和评注"，④"《哀江南赋》的创作年代"，⑤"庾信和司马迁"，⑥"两件《隋书》佚闻"，⑦"庾氏家谱"。本书讲解细致，材料翔实，并从多方面指出了庾信在赋这一体裁上的创新。（江　原）

《李白求取仕进的书信》 期刊文章。作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44卷第1期（1984，6）。作者说，李白自命不凡，仕进心切，但又不耐烦在科场上一试身手。他相信"登龙有直道"，于是走上投书显贵的道路。仅在南北漫游的十六年间（726—724），就写了不少这样的信。作者依次讨论了《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和《上安州李长史书》三篇文章，并与韩愈的《上李尚书书》、刘禹锡的《献权舍人》、王维的《与工部李侍郎书》和柳宗元的《寄许京兆孟容书》等文做了详细对比。她认为，《与韩荆州书》是李白（以及唐代其他文人）这类书信的代表作。该书可分为四部分：(1)说天下人均仰慕韩荆州；(2)自述出身与抱负；(3)称赞韩荆州善识文学，要求阅览自己的文章；(4)请求帮助。这些内容与别人所写的求仕信并无区别，但它也自有特色。最突出的是他过于自信，甚至声称他的作品具有重要价值。他对韩荆州也寄以厚望，简直就是说韩若不举荐就对他不利。仿佛他期望韩荆州会因为自己选他做靠山而感到荣幸。此外，他在自我赞扬中也设法说了一些奉承话。但那些话都是些套话，一旦他想认真说几句，就显然说过了头。（江　原）

韩愈的散文成就 美籍学者陈幼石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一书中，对唐代韩愈在古文运动理论与创作上的特点，作了新的探讨。他认为，韩愈对"古"这个字作了概念上的界定，把它等同于正统的儒家学说，把它同道家观念和佛教思想加以区别，并且把儒家的正统思想树立为唯一值得复兴的古代教义传统。在韩愈的影响下，"古文"文学不仅成为骈文的对立面，而且成为当时盛行的佛教和道教文学的对立面。学者们和文学史家们总是一再强调说，古文运动既不始于韩愈，也不止于韩愈。然而，只有到了韩愈这里，这一运动才得到最强烈的表现。他也许并不象他的那些宋代崇拜者们所推崇的那样有独创性，然而却找不到第二位古文大师象他那样英勇地为独创性而奋斗，象他那样广泛地进行探索和实验，并且象他那样为这一事业而遭受强烈的心灵和情感上的苦楚。总的说来，他在古文上的成就，有四个显著的特点值得强调。第一，韩愈毕其一生的文学生涯，都在宣扬这一观点：文学应当具有宣教性；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必须服从三种要求：他必须广泛阅读经书典籍，学会区别真伪，不断地与古典杰作沟通、融汇。第二，韩愈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卓越作家，并不在于他是一位能够以自己的那种并不时兴的儒家观念影响世界的伟大雄辩家，而是在于他创造出灵气风发、强悍有

力的散文风格，这使他与他的那些对手们的散文形成截然不同的格调，并且产生一种文体，使得那些不肯苟同者也不能不赞扬其文体的出类拔萃。第三，这种文体极为灵活，包容了极为不同的各种文体的诸种因素和成份。韩愈散文的基本原则是本着文体变化这一根本原则而树立的。那些似乎与他的儒家标准相矛盾的作品则可以按照这种原则改造得很顺当。第四，韩愈的文学理论是沿着一贯的线索和道路发展起来的。韩愈的文体学说的发展（诸如“奇”、“师法古人”等）并没有反映出他的文学理想的真实变化。这些文体学说的发展年序，对于了解文学理论家韩愈的发展、了解这位古文文体家的成长，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可是这一点却被批评家们忽视了。韩愈自认为他的古文理论是有创造性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衡量他的古文理论的创造性内容，不应当从它失败的地方考查，而应当从它的努力方向来考查。　　（孙乃修）

斋藤拙堂论韩愈　斋藤拙堂在《拙堂文话》中把韩愈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最高典范加以推崇，对其德、业、文章三方面都给予了极高评价，而把文章看成是为人和成就的一部分。他说：“韩子之文，前无古人，后无继者，从唐至汉千有余年，惟有太史公为之耦而已矣。柳子厚曰：‘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之遣意措词，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真韩子知己也。”又说：“韩公道德，孟子之亚也。程明道曰：‘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也！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真西山曰：‘自汉至唐而有韩子，其斯道之中兴乎！’薛敬轩曰：‘当韩子之时，异端显作，百家并倡，孰知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为相传之正统？又孰知孟轲氏没而不得其传？又孰知仁义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释氏，濒于死而不顾。若此之类，大纲大节，皆韩子得之遗经，发之身心，见诸事业，而伊洛真儒之所称许而推重者也。’大儒评骘韩子如此。韩公道德学识既高，而事业亦不卑，为守令则务除民害；为执法则极论政弊；为公卿则侃侃直言，不恤贬谪；论兵事则揣敌情如蓍卜；奉使命则折服叛将以壮朝威；独未为宰相耳。若使为宰相，则其功烈未必不在裴晋公、李卫公伯仲间也”。虽然拙堂以为韩愈的文章“盖非荀扬比”，“上继往圣，下开来学，其功大矣”，但是对于世人将韩愈“以文士目之”愤然不平。韩愈之书以集行，不如荀扬之在诸子之列，拙堂有感于此，自选其“醇粹有关系者”，编次为六卷，以《原道》、《原姓》诸篇，系世道民彝者为《内篇》，以《佛骨》、《复仇》诸疏，《淮西》、《黄家事宜》系政事经济者为《外篇》，以《龙马》、《获麟》、《讳辨》等篇及系学问文章出处进退者为《杂篇》，名曰《韩子新篇》，“盖推置诸子之上，欲以附孔孟之籍”，想把韩

愈推上如同孔圣、亚圣一样的显赫的地位。 （王晓平）

韩愈的游戏文 美国学者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撰文说，韩愈终其一生，排佛斥道，维护儒家信仰，做了不少道德说教文章。但他也写了一些游戏文，人们读后，或"大笑以为怪"，或视之为"驳杂无实之说"。其实这正显示了大散文家韩愈文笔诙谐的一面。

论者列举实例说，现代人读《毛颖传》，会对它肆其戏谑（毛姓名士几乎尽拘于此）和谐摹《史记》（却无意揶揄史迁及其传主）的特点留下深刻印象。这是韩愈以文为戏的显例。裴度曾说："（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寄李翱书》）也许裴氏为有所指，但《毛颖传》确实招来了同样的指责，以致柳宗元不得不写《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为他辩护。（参见"柳宗元的《毛颖传》辩"条。）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常被目为传奇。在唐代，罕见有为联句写序者，而序由韩愈所写也很独特。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本人并未参与所写之事，而是邀来友人兼门徒刘师服和侯喜。但评家对道士身份聚讼纷纭，或曰其为作者的虚设，或曰作者假托轩辕弥明，教训门徒。后说不可信，序与联句实为韩愈的游戏文字。另一例是《送穷文》。文中多用对话体，这是适合与鬼怪交流思想的形式。文中也有不少戏谑文字和妙词隽语，其背后则隐含着令人难忘的自知之明。像韩愈这样耿介不俗的人，有了那种长处，就会产生幽默感。

论者还举了两篇所谓"不能当真的作品"（tongue—in—cheek pieces）。他说，一篇是转引自柳宗元书信中的《天说》，谐摹《庄子》的文章。"谐摹"（parody）不一定是笑谈，有时可以充当严肃的批评。不过，柳宗元转述《天说》时故作严肃的做法，使它听起来很象游戏之文。如果按其表面意义理解，韩愈就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道家人物。我们肯定不会采取他的"天说"，即使在陷人困顿的时候。最后一例是《柳州罗池庙碑》。《旧唐书》指责说："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这句话的意思是：韩愈知道这是一篇迷信文章，他自己也不迷信，却偏偏这么写。碑文有一种凌驾常人之上的态度，不大适合在庙堂铭刻。韩氏另外两篇悼柳的文章——《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无疑是严肃的，与这一篇的口吻明显不同。弄清作者的信念和态度，有利于确定如何读这类文章。韩愈写《祭鳄鱼文》是个很好的说明。他决不可能相信，这样公开祭告会对鳄群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士兵在侧，并且手持劲弓与毒箭。但他知道，作为受天子委派、保护百姓的刺史，这是应尽的职责。他象其他许多正统的道德家（人们会想起塞缪尔·约翰逊或孔丘）一样，也不无作为补偿的幽默感，他不会不开朋友的玩笑。

鉴于韩愈的文章亦庄亦谐，海陶玮说，与"专职"的幽默家马克·吐温相比，韩愈堪称"兼职"的幽默家。（参见海陶玮的《作为幽默家的韩愈》

一文，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44卷第1期。） （周发祥）

韩愈碑文与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在摒弃骈体文的态度上，韩愈比柳宗元坚决，所付出的努力也多。柳文中并不排斥骈句。因而韩愈以做碑文来表示古文可以替代骈文，《平淮西碑》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台湾作家叶庆炳先生在文章《从〈平淮西碑〉看韩愈古文》中认为：碑文之为体，以典雅庄重为尚，而典雅庄重正是骈体文的特色。所以柳宗元撰南府君睢阳庙碑之类文字，也就未能免俗，通篇偶句，堆砌典故。而韩愈则不然，他大胆地把古文引向典重的碑文，《平淮西碑》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篇碑文是韩愈奉旨而撰写的，用来纪平淮西大功。当时有许多文人拭目以待，无疑，文章成功与否，对古文运动的倡导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据韩愈自述："经涉旬月，不敢措手"。其实全文长不足一千五百字。可见，韩愈为此文而煞费苦心的努力。结果，他的苦心没有白费，《平淮西碑》文不但没有因不用骈体而缺少典重的气氛，反而在典重之外，还赋予了活泼的生命，比起一般用骈体完成的典重有余而精采不足的作品，实在胜过许多。

其主要技巧之一是，故意把文句造得长短悬殊，或多加语助字，使语气变化多端，不成为有规律的节奏。其间也有四字句法，只是使他们三三两两自成段落，读来依然是散文。而叶庆炳先生认为，文中最成功的莫过于作者一再使唐宪宗现身说法，直接戒饬臣下，语气严肃而生动，比起以骈句典故作间接的叙述，其感人的程度不知胜过多少倍。

另外，韩愈撰写《平淮西碑》之后，有人进言宪宗，欲加诋毁，于是宪宗下诏，另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一篇。段文通体骈偶，繁用典故，正是当时流行的文体，然而读来颇为逊色。苏东坡题跋载有一首不知作者的七绝写道："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韩愈《平淮西碑》的成功，象征着古文运动向碑铭进军的胜利。

（王立柱）

《韩愈文》 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的《韩愈文》一书，由王云五主编，庄适、臧励和选著，系三十二开竖排平装本，人人文库丛书之一一五二、一一五三号。本书于1969年8月初版，1985年7月五版。正文前刊有1928年3月3日臧励和所作绪言，内容包括"韩愈略传"、"韩愈文评"、"韩愈文作法说明"及"编例"。全书共选文77篇，其中"杂著"含《对禹问》、《师说》、《张中丞传后叙》等14篇；"颂赞"含《子产不毁乡校颂》等3篇；"传记"含《圬者王承福传》、《画记》、《蓝田县丞厅壁记》等4篇；"书"含《与孟东野书》、《与陈给事书》、《与鄂州柳中丞书》等15篇；"序"含《送孟东野序》、《送廖道士序》、《送郑尚书序》等14篇；"哀辞祭文"含《欧阳生哀辞》、《祭郴州李使君文》、《潮州祭神文》等10篇；"碑"含《平淮西碑》、《柳州罗池庙碑》等3篇；"墓志"含《李元宾墓铭》、《柳子厚墓志铭》等8篇；"杂文"含《毛颖传》等

3篇；“表状”含《论佛骨表》等3篇。书末附创作年表3页。在“韩愈文评”中，有历代学者评价愈文之不同观点，选注者则认为，“就文论文，愈在八大家中，洵当首屈一指，此则尽人所认，而不能稍异议者。其杂著诸篇，多类诸子，与人书，因人而施，赠送序，随事变化，尤其绝技。各类文皆有特长。用字造句构句，篇各不同”。在具体评价所选各篇之特点时，多属褒奖之意。如：“综论昌黎全集大率以雄取胜；而《画记》又极生峭，《平淮西碑》又极庄严典重……《李元宾墓铭》每一篇各有意境，各有结构，绝不信手挥洒，可谓无调不变，无格不奇，无美不备！”均属此类言辞。在文中最后还指出：“学愈者能息心静气，熟读深思，则一切篱藩之障碍，流滑之口吻，皆可扫除净矣。”本书编例阐明：本书所选，出入诸家，皆为精粹之文，书中注释参考各家，惟正确是取，文章之正意喻意，亦多注出；成语典故，务载篇名，以备查检；韩集版颇多，本编所用为江苏重刊本，各本与苏本不同之处，除重要而可据者一一注入或径为改易外，其余皆以苏本为准。编末列有创作年表，可见韩愈渐进之学力。

该书发行所：台湾商务印书馆股分有限公司，负责人为朱建民。

（赵洁敏）

《韩愈》 台湾学者罗联添著。1977年3月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出版，列入“古风丛书”之六，140页。

全书包括前言一篇，韩愈年表及十七个章节。作者在“前言”中讲明撰写本书的目的，在于澄清近代学术界一些批评者对韩愈这位文章的宗师、儒臣的典范、刚正不苟的伟大人物的不当批评。作者认为这些不当的批评是出于误解和认识造成的。为此有必要写一本韩愈传，将韩愈一生的文章、事功、为人、思想各方面作一系统的说明。本书的十七个章节是：时代、前世与出身、早年生活与应举、长安求仕与幕府从事、从洛阳到长安、贬谪阳山、和柳宗元的交往与论辩、出征淮西、谏佛骨贬潮州、自袁州回朝、“衔命山东抚乱师”、晚年、学术思想、古文运动、文学理论、诗文特色。在第十四节“学术思想”中，作者总结了韩愈的思想是尊儒学、排佛老。韩愈认为，以儒教圣人“为之君”，“为之师”，有圣人的伟大作为，人类才能绵延，不至灭绝。韩愈还认为，道教的为害不下于佛教。韩愈建立道统，推崇孟子，提出大学篇奠定新儒学的基础。在第十五节“古文运动”中，作者指出韩愈兴古文运动，目的是要“文起八代之衰”，古文运动成功的因素，首先在于韩愈既有文学理论又有杰出的作品，其次是他具有坚定的信念。韩愈的功绩和成就，是革除六朝华靡不实的骈文，使文风归之于朴实纯正。作者认为，韩愈古文运动的成就可归结为：促进传奇小说的发展，以文为诗，扩大诗的领域，用散文写碑传，使碑传文面目一新。用散文写书函，使书函一体成为精妙作品。在第十六节“文学理论”中，作者把韩愈的文学理论总括为以下四点，即：载道的文学观、从”去陈言”到“怪

奇”、文气与诗胆、“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在“诗文特色”的第十七节中，作者指出，韩愈的诗与文都卓然成家，但就两者造诣与影响而论，散文远在诗歌之上。韩文的特色是气势雄伟、字句怪奇、具有阳刚之美，弟子皇甫湜称韩文“豪快足以凵跃天下”，李汉称韩文“奇特如蛟龙翔舞、虎凤腾跃”，曾国藩也称韩文“有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气，古人雄奇之美，以昌黎为第一”。这些看法已都为世人所公认。 （王彬彬）

《韩愈研究》 唐代散文作家研究专著。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11月初版，1981年11月出版增订本。著者罗联添，台湾大学国文系教授。全书正文共由八个部分组成：一、韩愈家世：旨在说明韩愈与家族人物的关系，及其如何在贫困家庭中卓然有以自立，考察了有关韩愈的郡望与里居、先世、家族、家庭经济情况等问题。二、韩愈事迹：作者在参考吕大防《韩文公集年谱》、程俱《韩文公历官记》、洪兴祖《韩子年谱》、钱基博《韩愈志》等各家谱志的基础上，搜集各种有关资料，整理爬梳，分幼年至成人、长安应举、进士擢第、三举吏部与三上宰相书、汴州推官、从事徐州幕、四门博士、阳山之贬、移江陵召受国子博士、仕宦洛阳、人仕长安、中书舍人改右庶子、出征淮西、贬潮州移袁州、自袁州召受国子祭酒、奉使镇州、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退之服硫磺”等十八条目介绍了韩愈的生平概况，旨在彰明韩愈一生大节、为人、风骨等。三、韩愈交游：对韩愈交游人物中较为重要者如陈羽、李观、欧阳詹、侯喜、陆傪、张署、孟郊、柳宗元、杨凭、杨凝、杨敬之、刘禹锡、皇甫湜、元稹、白居易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作者认为，韩愈早年朋友李观为文不沿袭前人，韩愈日后倡导古文，主张“陈言务去”，可能受李观的影响；韩愈诗文写作，在诗方面有孟郊跟他角力，散文方面有柳宗元跟他争胜，韩愈的文学成就与孟柳的角力争胜密切相关；韩愈长兄韩会与柳宗元父柳镇友善，并主张文以贯道，韩柳相交是因为世交关系，二人倡导古文运动，乃是承父兄的主张加以发扬光大。四、学术思想：分析了韩愈尊儒道、排佛老、建立道统、推崇孟子、奠定新儒学基础以及情性三品说等。五、古文运动：探讨了古文的名称、古文运动的含义、古文运动的渊源与产生背景以及古文运动的成功因素、功绩与成就等问题。六、文学理论：对韩愈载道的文学观、“去陈言”与“怪奇”、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等有关文学理论作了细致分析，并阐述了韩柳文学理论的异同。七、韩文评论：旨在探讨韩文的渊源、传承、特征、以及修辞等问题。八、韩文特色：从奇诡、散文化、刚劲壮伟三方面对此作了说明。

全书材料丰富，分析全面，并附录有韩文论述选辑、韩愈论著目录、韩愈年表等，对探讨韩愈生平与文学成就颇富参考价值。 （郑永晓）

《韩柳散文选》 金民天编著，三十二开竖排平装本。1979年5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刘修桥发行。系“零玉碎金集刊”之四十四。该书

分上下编，上编选韩愈文，收《原道》、《王箴并序》《伯夷颂》《毛颖传》《答李翊书》《祭鳄鱼文》《柳子厚墓志铭》等二十篇文章；下编选柳宗元文，收《辩列子》《宋清传》《愚溪诗序》《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潭西小丘记》等二十一篇文章。因编著者有感于中学以上国文课外读物缺乏，故编辑此书供一般学生作课外阅读或作补充教材之用。由于韩愈、柳宗元二人之全集卷帙浩繁，本编所选各篇仅求足以代表作者思想精神与文学成就者为限。所纳文章，皆分段落，并加新式标点。注释则取诸家之长，经编著者修饰后应用。遇用罕见之字，除加解释外，并附音切，以便诵读。

（赵洁敏）

《韩愈柳宗元文选》的俄译及评论　《韩愈柳宗元文选》由索科洛娃编选并翻译成俄文，由文艺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230页。计收入：

韩愈的散文《与于襄阳书》、《后十九日上宰相书》、《后廿九日上宰相书》、《圬者王承福传》、《祭十二郎文》、《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读荀子》、《原毁》、《与孟东野书》、《送孟东野序》、《张中丞传后叙》、《应科目与人书》、《送杨少尹序》、《答刘正夫书》、《与陈给事书》、《送石处士序》、《送李愿归盘谷序》、《杂说之二》、《杂说之三》等38篇。

柳宗元的散文《罴说》、《三戒》、《宋清传》等9篇。

除该文选外，韩愈诗文的俄译已发表的有10种20篇次。柳宗元诗文的俄译已发表的有14种53篇次。

评论韩愈的文章有10余篇，论者为康拉德、李谢维奇等，以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古萨罗夫为最多，他写了6篇，所论涉及韩愈的政治哲学观，文章的体裁特点等问题。

评论柳宗元的有康拉德、马怒欣、热洛霍夫采夫、费多鲁克等人写的文章。

（李明滨）

《〈祭十二郎文〉及其翻译》

美国学者唐·Y·李（Don Y. Lee）著，1983年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出版。全书有两个部分：引论和《祭十二郎文》的英译。在第一部分，作者根据中国的文化背景，分别对祭文的定义、鬼神观、该文的写作背景以及韩愈与十二郎（老成）的血缘关系作了介绍。第二部分主要是该文的英译，附有详细的词语和风俗习惯解说。此外，作者还对赖德奥特（J. K. Rideout）、翟理思（Herbert A. Giles）和赖明（Lai Ming，译音）的三种英译和数种语体译文及日文译文作了比较，指出它们的异同，讨论译法的优劣。作者在前言里说，西方学者很少研究中国的追悼文体，建议从"乐观世界"进入"悲观世界"，因为在这里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深层里的信息。

《寻求统一性的韩愈和唐代》

研究专著。作者，纽约州立大学学者蔡涵墨。198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韩愈的生平》，写韩愈的出身、教养、仕途遭际和创作活动，并选介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一部分倚重罗联添的《韩愈研究》（台北，1977），也

有相当多另外的资料。第二章《帝国的政治》,根据当时的政治气氛讨论韩著，特别强调论政治改革的文章。第三章《道统的一致性》,讨论韩愈在哲学和学术上所做的贡献。重点是韩愈对儒家经典的评论，韩愈与同代人（柳宗元、梁肃、李翱）思想观点的异同。本章不因袭旧的看法——韩愈仅是“理学的先驱”，而认为韩愈是独立门户、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家。第四章《风格的统一性》，讨论韩愈的文学理论（特别是“文”“道”合一的理论）及其实践，韩文对后代的影响。这本书在西方是第一本以专著形式所做的韩愈研究。(录自司马德琳的书评，这篇书评载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107卷第1期。)　　（江　原）

柳宗元的文学观与创作实践

美籍学者陈幼石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一书中，对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代表作家柳宗元，辟专章加以探讨。她分以下几节进行论述。1. 政治流放的影响；2. 柳宗元论“道”与“文”，此节包括两个内容：“文以明道”与柳宗元的“道”论，“文有二道”与柳宗元的“文”论；3. 柳宗元作品中的自然，此节包括三个内容；作为风景的自然与抒情方式，作为动物行为的自然与理性方式，作为生存和发展和自然与道德方式；4. 韩愈与柳宗元的成就。他对柳宗元的“自然”这一概念作了分析，认为这对于了解柳氏思想和文学实践是基本的途径。他把柳氏诗歌和散文中的自然分为三个方面，即抒情的（特别是在那些写景抒情散文中），理性的（在动物寓言中）和道德的（在道德性传记中）。柳氏作品从抒情性发展到理性，最后缘于自然的道德观。柳宗元总是坚持个性在历史和时间中的地位。作者认为，在研究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和实践时，不能够不注意到柳氏思想的发展，它与韩愈的思想有着重大的不同，无论对“道”的意义还是对“文”的功用，都明显存在着分歧。和韩愈不同，柳宗元不写《原道》或《原性》之类哲学论文。他有意避开教师爷之类的名称或使命，在他看来，人生比哲学和道德更为复杂。各种情感和现象与哲学概念和道德现象是相互矛盾的，各种情感和现象一般来说是共存于人生中，被历史所接受，并且表现于文学之中。唐代那些哲学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政治所不能包括的问题，愈来愈被文学的王国所收留。“古文”文学的发展，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结果。唐代文人不满于仅仅为国家而撰写文章。在唐代以前，个人对自然、对人类所持的见解，通常只是局限于诗歌领域，而现在，则在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作品中扩大了领域。韩愈要求人们纯粹、真实、独创，柳宗元则鼓励人们进行客观、多样、有批评精神的个性思考。　　（孙乃修）

柳宗元与《国语》　马来西亚华裔学者郑良树撰文说，柳宗元读书涉猎既广，用力亦深，非韩愈所能相比。在其博览的群书中，有《国语》一种，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他一方面从中吸取文学情趣，一方面借此磨练思想。他细读《国语》之后，写成《非国语》两卷，目的是抨击其“背理去道”、“诬

淫不概于圣”的说法，指责其“繁芜曼衍”以及详略不当的文辞（参见《非国语》的前言和后记）。其实，他写作的真正目的还是想表达他的政治主张和理想。

论者接着从“政治理想”和“从政态度”两个方面，总结了《非国语》的思想内容。柳宗元的政治理想是：第一，主张排除对天地山川的迷信，踏上埋头力干的积极途径。例如，《国语》有“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的记载，柳氏予以痛诋，认为“天事”与国家兴亡没有关系，人们应该尽“人事”，不可坐而待亡。第二，主张摆脱怪力乱神的困惑，走上人定胜天的务实之路。柳氏痛恨占卜、神祭、巫祝及各种怪异事件，宣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尧、舜是矣。”第三，认为礼乐只是政治的缘饰，治国惟有依赖干才和贤士。在《非国语》“不借”、“无射”条里，柳氏表达了这种意见。第四，推行敬、孝、忠及贞等伦理道德，借以提高政治素质。《晋语》载猛足劝申生出计自固，他不同意，要成全孝敬忠贞四事，柳氏赞赏说：“申生于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辞也略”。柳氏的从政态度是：第一、笃信理想，力排众议；第二、严明刑法，忠诚不二；第三、重视实际，灵活应变，论者还认为，柳氏在《非国语》里也发泄了遭贬后的牢骚和愤懑。

论者最后说，《非国语》撰成后，反响强烈，大多数持不同意见，如刘章的《非非国语》、江端礼的《非非国语》、叶真的《是国语》等。其中也有赞同柳氏意见的，如林概的《辨国语》。近人章士创对柳氏的这一著作也有所议论，胜义颇多。 （江 原）

柳宗元及其《非国语》 刘三富著，台湾弥勒出版社1985年9月初版，共449页。论著透过柳宗元一生的事迹探索发明《非国语》的内涵所及，并兼及《国语》、《左传》有关的文字或史实部分。正文分十二章，前六章着重在柳宗元的生平、政治生涯、文学创作、政治哲学思想、《非国语》的产生，认为柳宗元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特然卓异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天才高旷，于儒释道典籍无所不读，能辨古书真伪，知历史演进，在唐代可以说是罕见的学者。古文与韩愈齐名，峻洁精奇，在文学复古运动及文学创作中都同样坚决地贯彻了“文以明道”的纲领。他的“文以明道”的文道统一观，突出地反映了当时文学革新和振兴儒家的双重性质。第八、九章对《非国语》内容逐篇探索，简扼地辨明了两者之间的立场，对柳宗元撰著《非国语》的旨趣，综合各种因素（出身、经历、际遇等影响他心态的角度），对子厚爱《国语》而又非《国语》的心态和事实作出分析。论者认为，子厚之所以要撰作《非国语》，若从个人简捷地说，那就是不甘于声名受到扭曲或无闻于后世，如用现代人格心理学的术语解释，亦即“自我价值的肯定”，这当然与他“俊杰廉悍”的人格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若从政治立场和角度来观察，却是含有相当强烈的反抗意识，事实上《国

语》本身就是一部具有高度政治作用的史籍，而且在当代又高踞“春秋外传”的地位。子厚著论《非国语》的主旨之一，就是反映他内心世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他的另一个动机，也可以说是他最崇高、最伟大的意旨，就是本着“大中”的立场，匡正《国语》记载中不合于圣人思想的谬误，从而具体展现他所揭橥的“文以明道”的理想。论著就子厚认知世界尤其对他的文学主张作了进一步阐发。第十一章《柳宗元非国语内容斟理》对《非国语》作了系统化归纳，一个方面是《非国语》对《国语》作者编撰心态的抨击：抨击作者以史实结果用以征验预言的谬误，非难作者以迷信眼光神化荒诞言论的愚昧；驳斥以主观意识著录诬妄史事的偏私，讥刺以轻忽态度滥取不当素材的浅陋，另一方面论者又探讨了《非国语》所欲建立的大中思想：树立以人为本的理性世界，推行合情合理的伦理关系；倡导信实理想的政治方针。　　（王晓平）

柳宗元的《毛颖传》辩　海陶玮说，韩愈的《毛颖传》一文使时人“大笑以为怪”，柳宗元认为有必要为之一辩，于是他写了名为《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的文章。柳氏所采取的策略是很有趣的：他没有直接断言，而是徐徐地解说。柳氏辩解道，《毛颖传》也许是个玩笑，但古人不轻视幽默，而给它以很体面的位置。严肃的文人学士毕竟也需要放松自己。文苑里也应有各式各样的作品。此外，“毛颖”是保存文化的一种重要媒介，应该寄以同情，叙其功绩。这样做对青年人也是一种鼓励。因此，这篇文章具有实际的价值。行文至最后，柳氏又暗暗捎上一笔：《毛颖传》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感情，不是无可救药的琐屑之作。这一断言更为重要，因为它肯定了韩文具有中国文学批评里的最高价值——真诚。人们也许怀疑，柳氏的吁求是否能够说动那些借口韩文缺乏严肃性而对之非议的人；人们宁可希望柳氏之慷慨陈词是出于策略，而非出于说服。不过，柳宗元并非自始至终都在进行辩护，他发现自己读韩文时犹如“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就是对韩文变幻无常、难以捉摸这一特点的比喻。（参见海陶玮的《作为幽默家的韩愈》一文，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44卷第1期。）　　（周发祥）

《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　日本清水茂著。载日本中国《文学报》第2期（1955年）。清水茂为日本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及研究家，京都大学文学科主任教授，主要从事唐宋古文研究。本文共分六节，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作者在本文中着重论析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他被流放到永州以后的文学创作，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状况密不可分的。作者指出：表面上看，永州诸作好像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写的，实际往往是作者的自我叙述，自我表现，不过常以曲折隐蔽的形态表现罢了。例如《祭兄衡州温文》即是如此，而《永州八记》、《愚溪对》等描写山水的散文作品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把描写山水的作品当作

柳宗元的生活和思想表现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发现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对自然的赞美，而且也是充满着他对自己的不当境遇的无限愤慨。作者指出，政治生活的经验，特别是贞元二十一年的王叔文事件，对柳宗元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具体分析有关描写永州山水的九篇文章时，作者认为，柳宗元笔下的愚溪既清又美，然而不被人们所承认，说明在与都城远隔万里的永州却有被人见弃的山川之美，其含意是很清楚的。柳宗元正是把"山川的遭遇当作自己的遭遇"，从而才创作出《愚溪对》这类暗含自我怨闷的文章来。为了证明此一观点，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把柳宗元在柳州的作品和他在永州写的山水记中所包含着的对社会的尖刻批评相比，那么在柳州的作品就全然失去了这种尖刻性了。其原因可能是这样：虽然柳州比永州更远，但柳宗元在柳州是做着与员外司马大不相同的刺史，是实际可以行使职权的实职官，这时他重返政治中枢也有了希望。《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一文，一点没有足以反映柳宗元生活和思想的语句，而完全是关于山水的论述，这正如茅坤所批评："全是叙事，不著一句议论感慨，却淡宕风雅。"这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作者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认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都不过是山川美景的客观的论述，都不过是心平气和地放情于山川之乐的描写，那是不正确的，柳宗元在永州所写的山水游记，的确寄托着他流放生活的感慨，也暗示着他的政治主张的正义性。

在本文最后，作者认为在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特别困难的是《乞巧文》以下骚体文学的寓言意义以及在游记中柳宗元如何认识山水美表现山水美。 （王丽娜）

《柳宗元》 美国"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之一种。它是集体编写的一本书。1970年春，美国著名学者柳无忌在印第安纳大学举办中国文学研讨班。来自西德波恩大学的倪豪士，向研讨班提交了一篇论述柳宗元写景散文的文章。它引起班内其他成员的兴趣，于是组成了一个"柳宗元传记"写作组。参加者有"倪豪士、蔡涵墨、威廉·布鲁斯·克劳福德（William Bruce Crawford）、简·W·沃尔斯（Jan W. Walls）和劳埃德·奈伯兹（Lloyd Neighbors）。他们分工合作，最后由柳无忌抚平，统一行文风格。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丛书"负责人之一威廉·舒尔茨（William Schultz）的支持。他担当本书的责任编辑。本书于1973年在纽约出版。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历史和文学背景》，介绍当时政治形势、社会状况和文学风尚。第二章《生平和著作》，分为"长安"、"永州"、"柳州"三个时期，介绍柳宗元的抱负、交游、官场上的进取与挫折，以及感时而写的作品。第三章《哲学思考和思想观点》，阐述柳宗元对宇宙与人性、治理与社会、历史和圣人的看法。第四章《写景散文》，介绍中国文学的写景传统，写景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并重点讲解"永州八记"的风格和结构。第

五章《寓言和传记》，结合柳宗元的生平阐释这两类作品中的主题和寓意，理想和苦闷。第六章《诗歌》介绍他的欢宴、记游、羁旅、抒情之作，强调柳诗的人民性。最后一章是《结语》，指出柳宗元是一位学者、文学风格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诗人。本书写得简明扼要，富有新意，深受读者喜爱。（江　原）

《柳宗元传记资料》　朱传誉主编。1982—1985年台北天一出版社出版，共八册，精装影印本。

全书由“柳宗元生平与年谱”（第一册）、“柳宗元评传”（第二、三册）、“柳文及其思想渊源”（第四册）、“柳宗元山水游记研究”（第五册）、“柳宗元研究”（第六、七、八册）五大部分组成。“柳宗元生平与年谱”包括《柳子厚家世考述》（段醒民著）、《柳宗元的生平及其仕宦生涯》（罗滿能著）等文7篇；“柳宗元评传”包括《柳宗元传》（冯作民著）、《柳宗元评传》（梁容若著）、《谈韩柳的古文复兴运动》（彭逸群著）等文37篇；“柳文及其思想渊源”包括《谈柳宗元集》（钱穆著）、《从答〈建中立论书〉看柳宗元的为文理论》（何沛进著）、《韩柳比较研究》（储祇中著）等文29篇。“柳宗元山水游记研究”包括《柳宗元的游记》（刘文献著）等文14篇；“柳宗元研究”包括《思想深湛的柳宗元》（张朴民著）、《柳宗元的思想背景》（方介著）等文22篇。

本书主编朱传誉，为台北天一出版社社长，新闻学家、儿童文学创作家、文学研究家，他主编的中国系列古典作家传记资料集及中国文学研究论文资料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台湾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进程和状况，这部《柳宗元传记资料》为其中的一种。

《柳文选析》　胡楚生著。1983年12月台湾华正书局有限公司出版，279页。

全书分为前编、正编、附篇三部分，书前有编著者“自叙”及胡怀琛撰《柳文的长处》一文。前编包括《唐书·柳宗元传》、柳文综评等六篇；正编包括《桐叶封弟辩》、《论语辩》、《箕子碑》、《捕蛇者说》、《罴说》、《送僧浩初序》、《永州新堂记》、《与友人说为文书》等40篇；附篇包括《柳子厚墓志铭》（韩愈著）等5篇，以及引用诸家姓名、资料来源对照表。编著者在《自叙》中说：自来论柳文之特征者，或钻研过深，或所涉肤浅，本书对柳文之佳处，努力做到评析中肯，繁简适中，而对僻字和涩典，则特别加以注释和详解，以便读者领习。本书所附录胡怀琛撰《柳文的长处》一文认为，柳宗元思想自由，其考订文、寓言、游记都极好，“在唐代韩柳并称，若就思想而论，实是柳胜于韩”。特别是柳宗元的寓言，可独立成为一篇篇精彩的短文，其文学意味就更为丰富。

本书作者胡楚生，任教于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康建华）

《岳阳楼记》的文体特色　日本学者福田殖在其论文《关于范仲淹的二、三个问题》中谈到了《岳阳楼记》的文体特色（见《文学论辑》第三十五号，文学研究会〔福岗〕编，1989

年12月)。

该文认为,《岳阳楼记》的文体特色前人与世人都有所评论,其中有两个问题应予注意:一、该文体与当时的古文不同,其不同点在何处?范仲淹年轻时受西昆体影响,并对杨亿的为人持尊敬态度,这是他与石介不同之处;他在理论上也赞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张,因此,《岳阳楼记》所体现的与当时古文文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文章在修辞上很下功夫,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西昆体的内容空疏和思想的贫乏。二、如何理解范仲淹的友人尹洙评《岳阳楼记》为"传奇体"?根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说法,"传奇"具有"作意好奇"(有意识地追求奇特)与"幻设语"(由空想而创造出的东西)两层内涵,所谓作意与创设,就是有意识的创造。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的庆历六年正是被左迁知邓州之时,他并未亲临岳州,只是从滕宗谅那里得到一张岳州地图,恐怕他是参考着这张地图,凭借儿时对于洞庭湖的记忆,才得以创造出对湖景变幻的生动描写。尹洙所谓"传奇体",可以理解为就是指此种创造性而言。

"先忧后乐"在范仲淹后期思想转变中的意义 《岳阳楼记》中有一名句为"先忧后乐",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何理解这一名句呢?日本学者福田殖在《关于范仲淹的二、三个问题》(载《文学论辑》第三十五号,文学研究会[福冈]编,1989年12月)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福田认为,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在早年为实现道德及政治理想而不断进行富有献身精神的努力,以致多次因直言相谏而遭贬谪。景祐三年,因批判时政致使范仲淹降职,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也因为他辩护而遭株连,于是由此产生了朋党之论。范仲淹的政治思想以此为契机开始产生了变化。景祐三年他48岁以前的前期思想特征是刚直果敢地直陈自己的政治意见,但在他49岁时所写的《润州谢上表》中已经对朋党之争引起的政治纠纷及社会方面的副作用进行了反省。在他的后期思想中,政治理念虽未发生变化,但对于政治实践的方法却进行了反省和新的探索。

《岳阳楼记》体现的正是范仲淹后期的思想变化。"先忧后乐"中的"先忧",是以对"同忧"思想的克服为前提的,范仲淹61岁时所写的致叶清臣的书简中提出与国同忧、与国家共存亡的人不应该介入政治,因为同忧思想动辄会招致政治危机而关涉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先忧"的思想是由对于易经见微知著道理的体会和《中庸》明哲保身思想的演绎而构成的。它主张的是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守乐天乐道之分,否定了进亦忧、退亦忧的政治实践方法,并且对于君子保存自身的行为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过去人们在理解"先忧后乐"之时,一般都把重点放在"先忧"之上,但实际上《岳阳楼记》的主调并不是"先忧",而是"后乐"。在写作此文之时,范仲淹已在政治上失意,失掉了

"进忧"的基点，而不得不处于"退乐"的地位。实际上左迁邓州的时期，他的确与李宗易、孙甫等文人士大夫多作应酬唱和的作品。在庆历七年他为修复百花州所作诸多诗作中，找不到因政治失意而生的怅恨之情，却给人以明郎乐观陶醉于自然的印象。在这一时期，范仲淹的确是沉醉于天下之乐，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他个人的心理素质不可分割，而这一切是从他对于《易》和《中庸》的深厚素养而来的。（孙　歌）

醉翁与自然的和谐　美籍学者陈幼石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一书中，对宋代古文运动主将欧阳修，辟专章加以探讨。他分以下三节分别加以论述。1. 从唐到宋古文运动之发展；2. 从单一到普遍；3.《醉翁亭记》中的自然和人。欧阳修是唐宋散文大家中的核心人物。和韩愈、柳宗元一样，欧阳修在被放逐期间，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古文理论中的许多文学见解，诸如"信"、"简"、"常"，可以看作是对唐代古文遗产的批评或反拨。这使他的著作具有一种和韩愈截然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文体倾向。自然在欧阳修的文学理论中并不起直接的作用。它是欧阳修的批评性思考中的一个概念，但并不是直接来自六经，而是来自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氛围。在宋代初期和欧阳修那里，自然既不是自然风景，也不是动物界那种纯粹、简单的自然。这一概念首先含有形而上的"理"的原则，含有宇宙秩序的那种理性原则。《醉翁亭记》是欧阳修将自己的文学理论诉诸创作实践的出色作品。此文写于他被贬到滁州时期（1046），它不仅代表欧阳修个人的古文风格，而且还表现出宋代古文创作具有的那种人文精神特质。文中出现二十一个"也"字，几个世纪以来使读者与批评家倍感兴趣。而对此文的解释，则建立在文中的一句话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通常被看作是一位学者兼官员对酒和自然的怡然自乐之情。但这种情感中可能是一种艺术手腕，在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一种清醒的、压抑的现实感，应当对其结构因素重新加以探讨，更深地揭示出它们内在的主题关联。酒与诗的灵感之间那种紧密的关系是中国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在西方文学中也如此。在晋代竹林七贤的作品中，在唐代李白的作品中，在宋代苏轼的作品中，酒都起着一种解放诗歌精神的作用，它具有摧毁传统束缚的力量，使诗人获得自由，漫游于想象的王国里。然而在欧阳修那种对人生、艺术、人和现实所持的见解看来，这样一种浪漫的想象力的飞腾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他总是控制着自己的感官，宁愿保持一种知觉状态和理性态度。贬到滁州以后，酒就开始进入他的作品中，成为一个形影不离的伴侣，并且迫使他创造出一副人格面具——醉翁——来理解它的人生层面及其道德意义。酒与自由，因其价值而得到接受，使这位老人的精神超乎其外，进入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审美和谐所具有的道德潜力所做的揭示。如果自然是美好的，人对其美质有着敏锐的感受，如

果"一切创造"都能够通过酒这一途径从意识中获得，如果人事的复杂性能够被自然的这种更纯粹的活动所取代，那么人——那位老翁——就可能通过与自然的一种和谐关系而恢复其内心的快乐。（孙乃修）

《欧阳修之诗文及文学评论》 专著。张健著。1973年10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初版，1982年4月再版，列为王云五主编的"人人文库2020号"。著者为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家、中国时报专栏作家。1939年生，浙江嘉善人。有《中国文学散论》等著作四十种。

本书较全面地论述了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及其文学批评，为作者一系列文学批评专著之一，也是作者在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使用的教材之一。全书分作以下十章：1. 绪论；2. 平淡与自然；3. 创作的步骤及技巧；4. 文穷而后工；5. 老成与新奇；6. 造意与状物；7. 道、志与诗文；8. 对《诗经》的研究；9. 对历代作家的批评；10. 对苏梅（苏舜钦、梅尧臣）的赏誉。在《绪论》中，作者归纳欧文的风格是婉约中时见刚劲之气，认为欧阳修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他非常注重推敲的工夫，最反对诘屈聱牙的文字，故为文能够做到畅达雅健。在《道、志与诗文》一章中，作者认为：欧阳修主张"言以载事，文以饰言"，所谓"载事"实即"载道"，"守道"纯是欧阳修对文章写作者的一项积极要求，所谓"文以饰言"又表明欧阳修对文章技巧的充分重视。作者还认为，欧阳修谈文时常标举"道"字，谈诗时常标举"志"字，这是他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载道"、"言志"理论的一种发展。（杜维沫）

《欧阳修散文选》 台湾学者金民天编著。1979年5月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列为"零玉碎金集刊45"，共183页。

全书分三辑，第一辑选论、书五篇，第二辑选传二篇、记七篇、序八篇，第三辑选祭文四篇、墓志铭八篇、杂文一篇、赋一篇，共选文三十六篇。编著者对所选各文均作有较详细的注释，并在书前撰有序言一篇。在这篇序言中，编著者全面评介了欧阳修的生平和著作，同时着重论析了欧阳修散文的成就。在分析欧阳修对古文运动的杰出贡献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时，编著者指出：自唐末五季以至宋初，四六骈文仍十分流行，宋初且变本加厉，僻涩怪诞，无奇不有，支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词，文体之坏，无可言喻。欧阳修为扭转这一局面而领导宋代古文运动，乃顺应时代要求，故响应者众，作出了辉煌的成绩。欧阳修之为人，天怀乐易，性情真挚，生平又博览群书，好学不倦，他为文多苦心孤诣所得，决不草草从事，曾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属思尔"。故其文章能纡余委曲，神韵翼然，一洗猥屑，出以自然。欧阳修的古文，虽得力于韩文，"然昌黎文格雄浑，得之于阳刚者，而修则一变为阴柔，其风神颇有独到之处，又非韩文之所有。"编著者对欧阳修各体文章特点的论

析，都很中肯得要，例如："修之作论，平直详切，明白畅晓，易于启悟，其所作书翰，语极切至，纡徐易直，确似有德之言。""欧阳修所作之诗，笔墨生动，颇能描绘个性。所有记事之文，意境平实，颇有宋人风格，与韩柳之作不同。然风韵翛然，自有独到之处。其所作序文，更有特长。""盖修之生平，笃于交友，故其所作哀祭之文，多悱恻动人，而交愈厚则文愈佳，缠绵尽致，笔含情感故也。""其余如杂文词赋等，亦欧具抒情写感不易多得之作。"编著者对欧阳修的总的看法是：自韩愈以来，三百余年间，仅修一人能够转移文风，此乃众所共仰者。欧阳修在古文运动上实为有数之功臣，而其著述确实与世永垂。

（王彬彬）

《欧阳修的文学作品》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罗纳德·C·伊根（Ronald C. Egan）著。198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六个部分，除"序言"和"结论"外，其余四部分分别讨论欧阳修的散文、诗、赋、词四种作品。第二部分专论散文，所占篇幅最多。全书（包括附录一"散文附译"）共评介欧文四十篇，其中有《非非堂记》、《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送杨寘序》、《纵囚论》等名篇。评介集中在北宋的古文运动、欧阳修于中所起的作用、欧氏的散文创作、欧文的艺术风格等几个问题。关于风格，本书又分别以非正式作品（"书"、"序"、"送序"、"记"）、墓志铭、政论文为例，详析欧文的主体性、寓言性、严肃性、直言性和论辩性。第四部分专论欧赋，篇幅最少，介绍了《鸣蝉赋》和《秋声赋》的内容和特色。

（江　原）

《欧阳修苏轼辞赋之比较研究》

宋文研究专著。作者陈韵竹。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9月初版。作者鉴于历代研究欧苏诗文者颇多，对于同样开启风气，成就卓著的辞赋却绝少问津的不公正局面，试图通过对欧苏辞赋作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探讨欧苏二人文学主张与创作的关系、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问题。全书共有七章组成：一、绪论，二、欧阳修辞赋之评介，三、欧阳修辞赋之分析，四、苏轼辞赋之评价，五、苏轼辞赋之分析，六、欧苏辞赋之综合比较，七、结论。作者以欧、苏文集中所收录的辞赋作品为研究素材，包括欧阳修辞两首、赋二十篇，苏轼辞十一首、赋廿四篇。其中第二章、第四章从基本材料的了解入手，考察其著代年代，探究其动机，钩稽其事实，分析其形式，以便披沙拣金，确切掌握欧苏辞赋的形貌与神髓，作为论述的基础。第三、第五两章再分别将欧阳修辞赋分为古赋、骈赋、律赋、文赋四种体类，苏赋则分为辞、古赋、骈赋、律赋、文赋五类，由当时的文学背景、文学风尚，以见其形式特色与时代意义，并由欧、苏间开启与承续之脉络，比较二人辞赋的作风与个性。作者认为，欧阳修领导宋代的古文运动，务去时文之雕镂浮薄，一心向往古道古文，表现在辞赋方面，便是摆脱了俳赋、律赋之对偶与声律的藩障，而代之以散文自由流畅的笔调。他的

《病暑赋》、《述梦赋》、《红鹦鹉赋》、《螟蛉赋》、《啄木辞》、《哭女师》等古赋不论抒情或说理，都是平易浅近，纡馀委备，往复百折，无丝毫退能堆砌，艰难劳苦的情态。同样欧阳修以古文的气势与精神来运动骈体精密的格律，驾驭规矩而不为规矩所箝梏，不仅一扫往昔之卑靡，且开启骈赋之新局。在律赋方面，欧阳修越出唐人轨范，是宋代律赋转变的枢纽。在他的文赋中，欧阳修的古文理想更发挥得淋漓尽致，《秋声赋》、《鸣蝉赋》等布局紧凑、文气灵动，辞采精练，声律绵渺，诚为文学艺术之极品，而欧阳修古文运动成功的关键，正在乎此。

该书从五个方面对苏轼辞赋作了颇为详细的阐述：一、苏辞仪态万千，开拓了别有风雅的辞赋堂庑。他的《太白山迎送神词》、《上清词》等，神话与传说出入交织，充满了浪漫灵幻、诡异谲怪之气息，是苏轼热情活跃的生命展现，应有得于楚辞《九歌》的启发。《归来引》、《黄泥坂词》、《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表现的那种涤去尘虑的明净、忘情荣辱的洒脱，随遇而安、进退自如的恬适和那皎然轩昂的志慨、独立不屈的风骨，虽是楚辞一系的述志抒情之作，却无郁抑忧愁的黯淡色彩和悲愤怨恨的激烈情绪。二、苏轼任情率性，摆落古赋的传统与矩矱。他以骚体古赋为咏物、叙事、抒情、议论，既不规于仁义讽喻，也不铺张扬厉，浑然是一派任情率性，带有浓郁的散文化倾向。三、苏轼气势豪迈，打破骈赋之严整与繁缛。他不斤斤区别骈散之高下，而是时而取骈丽之华艳，时而用散行之质直，古文运动藉着这种修饰华丽而又气势轩昂的美文奠立了深厚稳固的基础。四、苏轼纵横议论，驭律赋规则而不为所箝。与欧阳修的在规则中求疏通，散行规则与骈偶规则等量并重不同，苏轼损规则以就文气，纵横捭阖，澎湃雄健，以议论胜人。五、苏轼挥洒变古，为文赋奠定规模与地位。

该书第六章旨在对欧苏辞赋作综合观照以鸟瞰其全面。作者从谋篇、章法、句式、字词诸端比较了欧苏辞赋的组织结构，从对仗、用典、声律、夸饰、比兴、隐秀等方面比较了欧苏辞赋的修辞技巧，并由思想与感情两者透视欧苏辞赋之情志内涵，并兼摄其内质与外象。作者认为，欧苏在辞赋创作上有深厚的师承渊源，稍前略后，其光芒固不分轩轾，然二人风格迥异，成就不同，论其贡献，却也难分高下。全书材料丰富，引证详明，论述细密，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欧苏二人在辞赋创作方面的成就及其在辞赋史上承先启后的地位。 （郑永晓）

《析论王安石的散文》 蔡信发撰。收入1985年台北天一出版社出版、朱传誉主编的《王安石传记资料》第七册。此文从“学人之文”、“文尚实用”、“文有卓见”、“真实见称”、“文有个性”五个方面较详细地论析了王安石的散文，指出王文的主要表现特点是精峭、气锐、劲直、锋利、遒劲、紧严、直而不阿、义形于辞、深沉之思、简而有法、周而能解等，同时指出王文并有其深情的一面。作者认为，在唐宋八大家中，王文实

有其他七家所不及处，这正如梁启超在《王荆公》一文中所说的："彼七家者，皆文人之文，而荆公则学人之文也；彼七家者，非不学，若乃荆公之深湛于经术，而浃饫于九流百家，则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故夫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而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然而，后世为何长期未能对王文作出更高的正确的评价呢？对此，作者指出如下三点：(1) 王安石自己本来视文章为从政的余事，他的散文成就为其政绩所掩。(2) 王氏个性耿介，眼力甚高，从不假人辞色，稍加应酬，因此得罪不少人，而这些对头不仅在政治上有很高的地位，同时在文坛上也有相当的势力，所以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股不小的力量，给予王氏很大的打击。再加上这些人的后裔沆瀣一气，彼此声援，对王氏猛攻重创不已，使王氏在文章上的评价受到相当大的影响。(3) 王氏生前有许多实录，后来都被政敌烧毁，使其真相消失而无闻，再加上《宋史》的诬妄不实，政敌的胡乱造假，致使王氏死后一直处于挨打的地位，同时后世为他辩诬的人有限，不能形成气候，故他的文章自然也就随之而不能得到更高的正确的评价了。蔡信发此文的结论是：真金不怕炉火烧，尽管王安石遭遇这么多冤曲，仍使他跻身在唐宋八大家的行列里，足证他是经得起考验的，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了。 （杜维沫）

文章三层次说 北宋理学家程颐云："语丽辞赡，此应世之文也。识高志远，议论卓绝，此名世之文也。编之乎诗书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传世之文也。"台湾学者程兆熊撰文（载《中国文话文论与诗学》，台北，1979）发挥说，程文中明确指出写文章有"应世"、"名世"、"传世"三个层次。所谓"应世"之文，是指文章仅仅反映时代，不能指导时代，扭转时代，文章只以"语丽辞赡"为满足，这是第一层次。所谓"名世"之文，是指文章能把握时代的核心，承担时代的重任，须在"语丽辞赡"之外，有"识高志远"之事，发"议论卓绝"之言。这样，即由第一层次进至第二层次。所谓"传世"之文，是指文章贯通古今，立意高远，能够超越时代，斩断一切时代的葛藤。此种文章使人安于真常，以处万变。真常者，可为诗书之真常，所以"编之乎诗书而不愧"；亦可为天地之真常，所以"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种文章全归于生命、性情、心灵和智慧。这样，即由第二层次进至第三层次。 （周建东）

苏轼散文的创新 美籍学者陈幼石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意象和观念》一书中，对宋代重要散文家苏轼，辟专章加以探讨。他分以下几节分别加以论述。1. 政治流放的影响；2. 自然与艺术世界：义，法和工；3.《赤壁赋》中的变异性与连续性之"二位一体"。苏轼对道和文的看法标志着与韩愈和欧阳修那种"文以载道"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分离，苏轼的"文学之道"很接近于《庄子》中那种古人的艺术概念或完美的技巧。从哲学上说，苏轼与周敦颐、邵雍、张载等新

儒学思想家们站在一边，而不是与他的老师欧阳修站在一起。在1071—1085年他被放逐期间，特别是他在黄州期间，他的思想开始成熟，这在几篇最重要的作品中得到表现。他起初偏重佛教，这使他的心智和情绪获得平衡。他没有沉浸于柳宗元的那种苦味的愤慨和自叹自怜中，也没有沉湎于欧阳修的那种不够中庸的饮酒之中。他在这期间写作的作品中，达到一种超越的人生观，以此看待事物，堪称积极的乐观主义态度。1080年苏轼来到黄州之后，形成了他那种变化中有连续性的观点。此后，他在通信和杂文中对这一观点的各方面作了详细论述，并且把这些方面运用到他的创作中。《赤壁赋》则是他将这种观点运用到创作中的一个例子。1080年以后，我们看到苏轼有这样一种始终坚持的倾向，即强调自然（“天”）甚于强调人，并且将注意的焦点从技巧或技艺（“工”）转到内心或概念（“义”）上。苏轼不再单单把义和圣贤的著作等同起来，他开始把义与自然（“天”）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义就成了他的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批评概念。苏轼对义的很多探讨都集中在谈论绘画艺术上。绘画直接沟通并且表现自然，在苏轼这位有造诣的画家看来，绘画首先是自然的艺术。正如与苏轼同时代的很多批评家指责苏轼时所说的，他是一位折衷主义者，一种非正统的思想家。他的折衷主义的一个最核心的特点就是，他似乎从不追随任何一种思想路线，不想限定自己的立场。他的结论是直觉的，而不是拘泥形式的。这种折衷主义可能就是他从未在中国知识史上占据显著地位的原因，也是为何极少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把他的著作置于他们时代的知识背景中的原因。总的来说，当我们看到“气”、“理”这样的概念和《易经》的“生生”原则（这些东西传达出他的文学创作和艺术批评方法，即“法”）时，很明显，苏轼是一位他那个时代新儒学思想家的信徒，而不是唐代古文大师们的信徒。因此，他的古文理论与实践不能根据其与先师欧阳修、先驱韩愈、柳宗元之间的共同之处来理解，而应当根据当时苏轼所处的思想倾向的革命性质来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古文运动从唐代古典主义转向宋代新儒学主义这一复杂进程。 （孙乃修）

《后赤壁赋》的“动作”象征

在《〈后赤壁赋〉析评》文中，台湾学者柯庆明先生认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以来，几乎成为窠臼的冗长夸张的对话之运用，在《前赤壁赋》中尚有，而《后赤壁赋》已没有了。取代这种写作方式的，是将简短扼要的对话，切合情境地融和在一个完整的“动作”里。如“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首先透出作者经济上的窘困，一面说“无酒”，一面又说“有酒无肴”，显示出作者窘困得即使尽力设法弄到酒，又对下酒的菜肴无能为力。作者慨叹“良夜”，不只因“月白风清”，最重要的是“有客”，但“有客”却“无酒”，“有酒”又“无肴”，客、酒、肴都不常有，越发暗示了作者生活不只窘困，而且寂

寞。

与《前赤壁赋》相比，两篇都提出了一种对生命现象的思索，而“前赋”藉着赋体特有的铺叙对话形式表现出来，“后赋”则未作直白的申述，却在力求简净素朴之美的文字所展示的整个动作中象征地表现出来。“后赋”标出“是岁十月既望”，并“复游于赤壁之下”，可知作者是以《前赤壁赋》的经历为心理基础，也正因此，《后赤壁赋》中景色产生了意义。《前赤壁赋》于“自其变者而观之”后提出“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的想法。但三个月后的赤壁景象已不是“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而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那种想法是不可能的，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时势变迁压迫下的时间意识。“江流有声”是一种“逝者如斯”的紧迫感；“断岸千尺”是时光过去留下的历史长长的遗迹；“山高月小”是人陷溺于现实环境的深沉，而不可攀那遥远的明月；“水落石山”则是一种表象的剥落和真实的显露，赤壁在岁月的变迁中，赤裸地展现出来。正是这种时间意识使得登岸上山的文字显示了某种象征意义。

自“予乃摄衣而上”，“乃”字领起下面的动作都是对于前面景象的反应。“摄衣”的细微动作，使上山具有一种严肃性和庄严感，象虔诚的进谒，把自己整理停当后，全力以赴去从事某项事业。“上”字简化了整个“上山”的动作，成为一种向上追求、努力的趋势。整个《后赤壁赋》完全在这样一种“写实之外深具象征”的机制中进行。无论“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的高远境地，还是“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等，都具深刻的象征意味。整个动作过程，在时间意识中进行。

重游赤壁，赤壁的水落石出，时间那样不止的过去，人很快老去死去。于是，作者焦急，急于有所作为。不再安于《前赤壁赋》中对生活的安排。他要提升自己，达到一个高远的境界。然而，为其高远，也更寂寞，寂寞得“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于是，又进入了另一层境界：对自然的敬畏，“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王立柱）

《东坡文抄序》　皆川淇园撰。皆川淇园（1734－1807），名愿，字伯恭，淇园为号，此外还有裴斋、筇斋、吞海子等号，对《周易》有独到的解释，提供“开物学”，诗书画皆通，著有《诗经绎解》、《论语绎解》等。《东坡文抄序》对比了苏欧两家散文：“大抵欧辞多婉曲，旨尚隽永，而苏乃辞气宕逸，旨喜痛到，此二家之异也。然要之苏天资俊迈十倍于欧，想其平生英气射人，才锋颖锐，常令人不得不厌伏，是以每一言出人皆传诵、海内宗之也”。序文提到朱晦庵讥笑苏文用字多疏漏，表示赞同，进而以“行文之法”衡量，认为苏东坡奏议书疏之类条达明畅无可议者，“如其余辞体效古文者，其措辞先后相承之间以其神理之不属者强作缀缉者甚多。盖虽读惯古文而其解旨疏略之过也。此不唯苏而欧亦不免有之。盖以古今言语繁简异势，虽其所含理自然不同而读者

不知其辨，则读之所可得粗略为其旨已尽故也耳。"以此来强调"精古文者，理经之一要也。"序文最后再次重申"苏乃绝代之奇材"，"世之一切学作文者以苏为准亦可以足矣。"

《惟有苏斋记》 日本江户末年朱子学者藤田东湖所作的汉语散文，苏指苏轼兄弟。藤田东湖（1806—1855），名彪，字斌卿，幼名武次郎，后改为虎之介，东湖是他的号。藤田东湖以苏轼《与李公择》："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间"为座右铭。1844年，东湖以言论忤当局，获罪入狱，在狱中作《回天诗史》（原题作《述怀》），自言"自惊尘垢盈皮肤，犹余忠义填骨髓"。他认为："苏轼斯语，必有孟子浩然之气，方可贯注。夫浩然正气，胸中别具一至大至刚之明，非后世黄吻耳学之徒，或以豪放磊落、跌荡不羁者之所藉口，以大背孟子之本旨。苟欠慎独内省之工夫，则行慊于心者，斯在气愈歉然而中馁，安有所谓浩然者！故必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然后正气磅礴充塞于其中，及其至则可塞于天地之间。"

《惟有苏斋记》说苏轼兄弟穷且益坚的精神支柱，便是"道理"与"忠义"，学习他们最根本的，也就是要学这一点。而那些只学他们书画翰墨的人，则是取皮肤而舍骨髓："苏氏兄弟奉其家学，确乎不变，群小侧目，谮毁百端，屡贬窜于瘴疠魑魅之乡，而节操愈坚，穷愁潦倒，无所往而不乐者，超然徜徉于万物之表，其所谓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间者，岂夸论哉！"他将苏轼的无往不乐的超然的生活态度，归结于苏轼的"道理"和"忠义"为内容的指导，并以之作为自己在幕府末年的政治大变动中自己怀抱的人生哲学。

（王晓平）

《入蜀记》俄译 陆游的《入蜀记》，由谢列布里亚科夫译成俄文，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158页。

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1928年生于列宁格勒。1950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1954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伟大诗人杜甫的爱国主义与人民性"。1973年以"陆游生平与创作"论文获博士学位。有专著《杜甫评传》（1958）、《陆游生平与创作》（1973）、《中国十——十一世纪的诗词》（1979）等。

谢列布里亚科夫本来重点研究唐诗，后来转到宋代文学，就是从翻译陆游《入蜀记》（1968）开始的。他把陆游这本用文言文写的游记译成俄文，并加了详尽的历史和语言文学方面知识的注解。他写了述评和跋，着重介绍中国中世纪文学中游记这种体裁的特点。他认为，《入蜀记》是游记的早期作品，它兼有记述科学知识和反映作者内心世界的功能。从记实角度来看，它记述了宋代的政治现实，包括官吏和农民的日常生活风貌。这在史学和民族学上都有重要价值。从反映诗人的主观世界来看，谢列布里亚科夫从诗人的诗和有关日记，找出有关的材料，探寻诗人据以加工的素材，

研究陆游创作的规律。他发现，中国古典散文作品也是反映作者的心境，把作者丰富的内心感受充分体现于文学形象之中的，因而不能说中国古典散文仅具有强烈的纯理性主义。

（李明滨）

《入蜀记》英译本 译者是张春树和琼·斯迈思（Joan Smythe）。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这个译本原是琼·斯迈思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博士论文初稿，未及整理，译者便于1963年溘然去世。三年后，哈大燕京社将遗稿交给美籍华人学者张春树，嘱其完成这项工作。张氏专攻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曾在1964年获哈大历史学博士学位。他对陆游这部日记体游记做了研究，在译著未发表之前，曾将书中有关内容撰成《〈入蜀记〉的写作、流传和版本》一文，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3分册上发表。这个译本的书名叫作《十二世纪的南部中国——陆游旅行日记译文》，是经过张氏彻底修改过的产物。书中的注文很多，并附有术语表、陆游入蜀路线图等资料，便于西方读者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尽管这个译本存在着某些缺点，但在出版后，它仍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夏威夷大学马伯良（Brian E. Mcknight）说，“译者在书中明显倾注了大量的劳动”，“张译很具学术性”，“是宋代重要资料的出色译文”。（参见马伯良的书评，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2期。） （江 原）

《古文真宝》与日本文学 《古文真宝》在元明时颇流行，版本很多，在日本室町初期传入，成为五山僧徒爱读的书。继桂林德昌《古文真宝抄》、笑云清三《古文真宝抄》以后，又出现万里、一元、湖月等禅僧的笺释。江户时代《古文真宝》与《三体诗》并行成为学作汉文汉诗的范本，正如名儒林罗山所说：“本朝耽于文字者，学诗则专以《三体唐诗》，学文则以《古文真宝》”（《罗山文集》二六）。林罗山自己也编出《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其后，宽文三年（1663）鹈饲石斋加以增补，是为《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大成》二十卷。天和三年（1683）榊原篁洲又编出《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十七卷（此前后集谚解大成收入《汉籍国字解全书》）。虽然荻生徂徕视其为俗本而加以排斥，但由于《古文真宝》搜罗诗文名篇较多阅读方便而流行颇广。文化年间（1804—1814）《唐宋八家文》、《文章轨范》盛行起来，1814年《唐宋八家文》出了读本的官版，1796年出了《文章轨范》的日刻本，1818年也出了官版，但《古文真宝》仍是学习汉诗文者手边常备之书，直到明治年间依然被用作课本，并出现了注释的书籍。在《古文真宝》盛行期间，日本文学家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等多在作品中引用，狂诗文也有题作《古文铁炮前后集》（桂井巷八作）的。森川许六编《风俗文选》（本朝文选）分类方法模仿《古文真宝》，并照搬《师说》（韩愈）、《吊古战场文》（李华）、《陈情表》（李密）、《酒德颂》（刘伶）等《古文真宝》选篇的篇名，或模仿其中选篇的篇名，如《爱梅说》，即是模仿周茂叔

的《爱莲说》;《宴柳后园亭》,即是模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嘲佛骨表》即是模仿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古文真宝》中收入的《长恨歌》、《琵琶行》是特别受到日本学人喜爱的篇目,清原贤《长恨歌·琵琶记抄》对这两篇的解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参阅芳贺幸四郎《有关中世禅林的学问及文学的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有关《古文真宝》的研究,有《古文真宝新释》(久保天随著,前集1909年4月博文馆发行,后集1909年6月博文馆发行),该书对选篇标记读法,解释题意、字意、诗文意,并有"余论";另有《古文真宝新译》(昭和汉文丛书,弘道馆),《古文真宝》(星川清孝著,新译汉文大系,明治书院)。 (王晓平)

评《袁宏道和公安派》 这本书系华裔学者周质平的专著,198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乔纳森·查维斯(Jonathan Chaves)写了一篇书评(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48卷第1期)予以评介。他说,本书作者在两年前还发表过一本中文著作,名为《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台北,1986)。这两本书最好结合起来看,因为虽然两书部分内容有重迭,但中文书含有较多的资料,而英文书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有所发展,有所开拓。作者是从历史背景上考察公安派的。他详细讨论了三袁的文学理论,分析了袁宏道的诗文,也探讨了公安、竟陵两派的关系,指出它们颇为不同。另外,他对公安派现代研究的评说,详尽的中、日、西文有关书目,均对读者尤有裨益。本书简明扼要,内容丰富,因为其论述开门见山,绝少泛泛空论;几乎每页上均有发人深思的洞见。本书也存在若干缺点。例如,作者说到了袁宏道与宋代文人的关系,但溯本追源不够深入;他洞悉现代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如何操纵公安的"形象",以使之符合自己理论的需要,但他本人也没有完全摆脱现代主义的影响。

(江 原)

《袁宏道:文学理论与实践》

瓦莱特-埃默里,马蒂纳〔法〕译,法兰西学院高等汉学研究所出版,1982年,276页。

译者瓦莱特-埃默里,马蒂纳首先在前言和著作介绍中,评介了我国明代散文家袁宏道的生平及其著作。接着在作家与社会(佛教的影响,个人自在,政治与社会评论)、文学与传统(关于复古论的争论,文学的发展,研究与评论)、文学与自我(性灵论,趣,文学创作)和"自然"(语言的适应,散文接替诗歌,"风景")各章中,深入、系统地论述了袁宏道的文学思想、理论及实践。

译者说,明朝万历年代被称为"公安学派"的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以其不受束缚而著名。公安学派属于反对正统派和复古派的思潮。袁宏道最有才华,最为出名,著述颇多。他是以合理的论据,也是以他对那种因循守旧表明基本态度的论战,来评论他那个时代的文学的。对他来说,不受束缚是文学主要的要求。真正的文学作品,不是按照试验过的

方法写成，即使它是完美的，也应该受到作家个性和情感的培育。和正统文学传统相反，文学在这里成为个性直接表达的工具。他强调指出文学与自我的关系，这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至少在确认他的理论中，看来非常新颖。

袁宏道对文学作品，强调情感至上和人的现实性，他的名字永久和以人的情感为基础的性灵论连结在一起。特别是他的散文，可以说是不朽之作，这不仅是有关文学思想的著作，也是有关"自由评论"的著作。袁宏道实际上被视为他那个时代革新了古典散文的，开拓了小品文领域的主要代表。这种文体，因其不沉陷于娇揉造作，而成为中国文学引人注目的发展道路。

袁宏道的著作，代表一种反对教条束缚和沿用旧体的文学创作。它们表达出，作者为在文学中确认自我的精神和情感，而表现出的拒绝继承传统戒律的个人气质。袁宏道在传播和阐明这些文学思想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坚持的文学思想，如文学的"真实"，作者的"个人特色"，表明了万历年代部分文学的特点。

综上所述，构成了和袁宏道的名字连结在一起的性灵理论的主要之点，不过，这种适合于创立一种真正新颖的表达方式的文学形式的革新，不是在诗中实现的，而是在最宜于表达这种情感的体裁——散文中实现的。通过他的抒情方式，他的许多评论，特别是他的"风景"，拥有了传统上属于诗的作用。这些散文，由于消泯了各类古典体裁之间的界限，融合了文学譬喻和朴素语言，因而有利于一种自由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的出现。这一文学思潮，在明代末期，通过张岱而达到其顶点，通过金圣叹和李渔而持续到清代初期。（韩宝光）

《古文观止》的缺点及流传

杜润德说，《古文观止》为吴楚材和吴调侯所编，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编辑目的是《正蒙养而裨后学》。"观止"二字取自《左传》"季札观乐"一段。这个选本有几个缺点：(1) 一般认为，古文与骈文适成对照，但选本中也有少量骈文。(2) 选文比例失调：选自《左传》、《战国策》和《史记》的文章特别多，而未选先秦诸子和班固的文章；六朝选文八篇，数量不足；唐代散文除韩柳之外，也多有忽略。(3) 某些选文代表性较差，如元代的文章。尽量这个选本有种种缺点，但在中国极为流行，很多读者熟知它的内容。除此而外，选本还流传到了西方，上个世纪，晁德莅（P. A. Zottoli）选出一百篇，译成拉丁文，辑入他的《中国文学教程》（四卷本；上海，1880）。其他选译还有翟理思（H. A. Giles）的英译，辑入他的《古文选珍》（上海，1922）；马古礼（G. Margouliès）的法译，辑入他的《中国古文》（巴黎，1926）；以及刘师舜的英译，辑入他的《中国古典散文》（香港，1979）。（参见《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 （江 原）

古 代 文 论

我国古典文论在西方 我国的古典文论，除了少数以诗歌形式陈说（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外，绝大多数为散文著作。这些著作蕴含丰富、见解独到、论述方式奇特，倍受西方学者的重视，因而构成了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下面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译介 迄今所知，1929年在美国匹兹堡出版的英译本《沧浪诗话》，是我国古典文论专著最早的西译。五十年代初，陆机的《文赋》有了三种英译本：一种为休斯（Ernest Richard Hughes）所译，1951年在纽约出版；另一种为方志彤所译，同年在坎布里奇出版；第三种为陈世骧所译，1948年初印于北平，1953年在波特兰再版（修订本，后又收入白之的《中国文学选集》）。在休氏译本中，还有美国著名文论家理查兹（I. A. Richards）撰写的前言，并有《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原道》的英译作为附录，缀于篇末。数年后，《文心雕龙》全书英译（纽约，1959）开始面世，它是美籍华裔学者施友忠的译本。到了六十年代，法国著名学者戴密微编辑的《中国古典诗歌选》（巴黎，1962）出版，其中有《文赋》的法译。同年，又出现了《沧浪诗话》的德译本（威斯巴登），它出自德邦（Gunther Debon）的手笔。除此而外，在期刊、文集中，还有一些中国古典文论（或其片断）的西译。

二、评传 在许多译本中，常有介绍文论家生平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字，如休斯和陈世骧的两种《文赋》英译。当然，讨论比较充分的还是评传著作，这在西方也有一些。例如，吉布斯（Donald Arthur Gibbs）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载于《亚洲文献》第29卷），邵永兴（译音，Paul Yong—shing shao）的《作为文论家、批评家和赋家的刘勰》（1981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尼维森（David S. Nivison）的《章学诚的生平和思想》（斯坦福，1966）。我国古代文人多半一面创作，一面发表文学观点，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等，他们也都有评传在西方流传。上述评传不仅介绍传主的生平，而且重点介绍其文学观的形成和内容，以及他们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三、研究 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芝加哥，1975）。论者将我国古典文论划分为六类（参见“玄学理论”、“决定理论”等条），分述各类观点的渊源、发展及流变，综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并比较中西文论的异同（参见“玄学

论与象征论”、“玄学论与现象学”等条)。断代研究著作有匈牙利学者托凯(Ferenc Tökei)的《中国三世纪至六世纪的文体理论》(布达佩斯,1971),法国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的《中国三世纪初的文学批评》(载于《亚洲研究》第28卷第2期)。李又安(Adele Rickett)根据维尔京国际学术会议论文辑成的《中国的文学观》(普林斯顿,1977)一书,旨在讨论西方读者较陌生的文论家,涉及孔子、欧阳修、黄庭坚、王夫之、“脂砚斋”、梁启超等人。就内容而言,这些论著大体上集中讨论四个论题:中国古典文论的整体特点和分类,某个(或某些)文论家的文学主张,以及中西文论的异同。 (周发祥)

孔子的文学观念 台湾学者王金凌说,孔子的文学观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的范围——“文学”一词见于《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门的文学工夫相当广泛,包含诗、书、礼、乐,也就是指一切典籍的研究。孔氏弟子的文学素养来自长期的学术研究。德行、言语和政事强调外在的行为表现,与专指探讨典籍的文学有所区别。所谓典籍,具体说有《易》、《诗》、《书》、《礼》、《春秋》。孔子对这些典籍的看法,就是他的文学观念之所在(就《论语》所载,他对《春秋》未著一语)。

(2)文学的内容——孔子就《诗》来论文学内容,他不特别限定文学应该表达什么内容,只提出以“无邪”的为原则。正如《为政》篇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无邪”就是无恶念。诗本感兴而作,是情志的流露。《宪问》篇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不知文采斐然的重要,而是认为文采背后的纯挚感情更重要。因为有德者,其感情纯挚。

(3)文与质——《雍也》篇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段话指行为,礼仪简慢谓之“质”,繁缛则谓之“文”。简慢显得粗鄙,即“野”;繁缛显得多辞,即“史”(《仪礼·聘记》“辞多则史”)。后人视“质”为天性,未经“文”(文化)熏陶者,它们便不构成对举关系:

质→文 ⇄ 多→史 / 寡→野

这与孔子的理解不同。后人还把孔子的论述用于文学,这种观念遂成为文质论:一方面以“质”为内容,“文”为辞采;另一方面又以“质”为辞采素朴,“文”为辞采华美。此外,孔子虽然提倡“文质彬彬”,但往往不可兼得,若不得已,即取“质”而舍“文”。

(4)文学的功能——孔子指出《诗》有政教功能:《子路》篇说,《诗》的功能在于观风知俗,以诗喻志;《季氏》篇则强调《诗》在应对中的作用。《八佾》篇还指出观乐舞可以知政风。除了政教功能外,孔子还认为

《诗》可以增广见闻，陶冶性情，进而达到修身的目的。《阳货》篇就提出了"兴、观、群、怨"说。"兴"是自由的心理活动，兴发无端，不能无止，因此，"观、群、怨"即是心理活动的方向与内容。它们依次是"观风俗之盛衰"（郑康成）、"群居相切磋"和"怨刺上政"（孔安国）。

作者认为，孔子的文学观念是我国文学理论的雏型，影响到后世对文学意义、内容与辞采以及文学应该表现什么等问题的讨论（摘自《孔孟荀的文学观念》一文，载于《古典文学》第六集。） （江　原）

"气"的原始概念　台湾学者庄耀郎指出，"气"字最早见于《左传》、《国语》二书。它的意义大致可分为自然之气和人气两部分，二者有某些关联。人气是人的生命之气的总称，如血气、气息、声气、辞气、志气、勇气、意气、愤气等等。自然之气则包括自然界诸多流动现象，如阴、阳、风、雨、晦、明，即"六气"。总之，气是一种流动，也是流动的一种。它是人的生命力、自然界一切现象的活力的象征，它具有生生不息，永远在流动变化的特质。战国时思想家又把它放在价值层次上加以衡定。孟子提出"以志帅气"、"配义与道"的见解，认为透过专一、持志的修养，可以使气升华至浩然充于天地之间的境界。这显示出自然生命和道德理性的和谐统一。庄子将气所原有的虚、自然、流动的特质，阐释为心斋坐忘后所达到的逍遥境界，也是在说明精神现象的抽象意义。他还试图以气解释万物的生命本体，有"通天下一气"的思想。在此，气已有很浓的哲学意味和神秘倾向。《管子》、《吕氏春秋》对这种思想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气作为生命活力的表征，可由长期观察而知，即自然或人类变化的消息，均得自气的外显。因此，《左传》等书中有"望气"、"望氛"、"观气色"、"相人气"的记载。

在汉代，气的概念普遍流传。《淮南子》赋予气以道的地位，使其由形上意义跃为将宇宙万物生命化的总原理——元气。董仲舒由此演化出了"气性"说；王充也将气区别出刚柔、强弱、厚薄、清浊诸种性质，并用来解释夭寿、富贵、贫贱、才、庸、智、愚、善、恶、美、丑等人生现象。及至魏代刘劭的《人物志》，便以人的性情所本乃"元一之气"的品鉴思想，直接刺激当时的文学觉识。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陆机的"缘情"说，以及其他有关文学中"情志"、"情性"、"性灵"等的论述，均受刘氏著作的影响。文学既然是心志的外发，情性的表征，从人物品鉴到作品品评便是自然而然的过渡。（参见庄耀郎《曹丕典论论文"气"义探微》一文，载于《古典文学》第六集）。

"文以气为主"辨　台湾学者庄耀郎说，文学是宇宙原理通过人的笔来表现的。文学所本的情性即源自人的生命，生命的本质即自然赋予的气。因此，曹丕云："文以气为主"。

历来讨论这句话，多将它追溯到《论语·泰伯》中曾子所说的"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或者《孟子·公孙丑》

所说的"养气知言"。其实曾子所说的"辞气"是指说话时的态度，与说话者的品德修养密切相关，而与文章的"气势"、"音律"殊异其趣。孟子的"养气"与"知言"本来是两回事，一论养气的生命境界，一论判知言辞的限制。即使刘勰所说的"养气"也不能与孟子的"养气"混为一谈，两者名同实异，不可不有所辨别。历来说《论文》本于曾子或孟子的人，都未能明察道德与文学的界限。

另一种意义是以"气势"解释"文以气为主"中的"气"。"气势"是行文时通过音节、字数、声调的变化而达到的效果。《文心雕龙·章句》中有对气势的讨论。韩愈继承刘说，进一步强调气势的重要性。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刘、韩远在曹丕之后，他们的见解是文学高度自觉、创作经验丰富之后的产物。曹丕刚开始提出文学自觉的宣言，似乎不能反省至此。尤为重要的是，用"气势"一义难以解释下文"清浊有体"和"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诸句。

最后，庄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文以气为主"说的提出，实际上是曹丕意识到了文学的本源和核心。"为主"的"主"，不能经解为"主要"、"重要"。"气势"、"音律"重要，内容、情感、想像又何尝不重要？这种解释显然不够周延。"主"字的意义应该解作"根源"、"本源"。文学正如宇宙间万事万物，是宇宙原理透过个人的生命来表现的，个人"生命之气"和"宇宙之气"是根柢相连的。曹丕此说使批评界注意到了作者的个性，使文章风格与个人生命的风格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了文学表现论的发展。（参见庄耀郎《曹丕典论论文"气"义探微》一文，载于《古典文学》第六集。） （潘 达）

《文心雕龙》与《文选》选评标准的比较 台大中文系教授齐益寿撰文说，刘勰在任东宫通事舍人时，与"引纳才学之士"的萧统太子结下主臣之谊。然而，前者的文学观对后者是否产生过影响，后代学者对这个问题多予关注。有人认为，《文心雕龙》和《文选》"宗旨如一"、"同其藻镜"（骆鸿凯《文选学》）。本文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从"选文定篇"和"评文标准"两个方面对这两本书做了比较。

作者逐项统计了两书所列赋体、诗体、论体、书笺体、章表奏启体作品及其作者。他根据统计数字断言，两书在选文定篇上相异之处大大超过相同之处。他又补充说，《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末年，但只列"九代之文"，充其量也只是"蔚映十代"（即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对于"皇齐"一代的作者作品敬谢不敏，而对刘宋一代文学也仅仅略举大概。《文选》却不仅选了齐文，而且选了普通七年（526）以前的梁代作品。即使不计齐梁作品，两书的差异仍然是很大的。

作者认为，选文定篇上的差异反映出刘勰与萧统二人的文学观当有明显不同。《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深

的文学批评巨著，其写作动机却是因不满晋宋以后的文学风尚而发的。在刘勰看来，这种文学风尚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为文而造情"。其始作俑者是两汉辞赋家。他们"心非郁陶"，却以"苟驰夸饰"的伎俩，以收"鬻声钓世"的目的。这种作品的主要特色是"淫丽而烦滥"。晋宋以后的作家师承此风，远弃风雅之真，而且变本加厉，从"为文"进而"逐文"，到了"逐奇失正"、"失体成怪"的地步。观文风的流变，刘勰感到自商周以后，文学发展一代不如一代。萧统却有不同的看法。在《文选序》里，他对于古今文学的发展变迁，视同大辂之于椎轮、增冰之于积水，无非是后来居上，今胜于昔。两人的文学发展史观大相迳庭。他们所持的作品评价标准则有异有同，但异大于同。萧统以"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作为选文标准，重辞采，尚复笔。刘勰对于重辞采、尚复笔不但不反对，而且对宋齐以来盛行的复笔技巧，如用典、对偶、声律等，多持肯定态度。但在他的评价标准里，辞采并非首要，首要的是作者的情性，作品的内容。《情采》篇分别出了情为经、辞为纬的主从关系，阐明了"辩丽本于情性"的本质之美，从而确立了"为情而造文"的主张。这与萧统不顾情性之有无，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是务，是很不相同的。此外，刘勰评价作品还注意通变、奇正、事义、宫商等内容。这又见出刘氏标准的多元性与萧氏标准的一元性很不相同。

因此，作者不同意两书"宗旨如一"、"同其藻镜"的说法。（参见齐益寿《〈文心雕龙〉与〈文选〉在选文定篇及评文标准上的比较》一文，载于《古典文学》第三集。）（江 原）

玄学理论 一译"形上理论"。刘若愚说，玄学理论认为文学是宇宙原理的表现。在中国，宇宙原理一般称作"道"，它是万物唯一的本源，又是一切存在所组成的整体。（译作"形上理论"便是取"形而上者谓之道"之意）。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人生之道"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不同。

玄学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易传》，其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论述以及其他有关的解说，不仅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作类比，而且赋予"文"这个词以种种意义："斑纹"、"图型"、"文饰"、"文化"、"学问""写作"和"文学"。这给评论文化、文饰或写作转为评论文学提供了可能。《乐记》也许是玄学理论的另一个源头。由于在古代中国音乐与诗歌的关系密切，它的"乐者，天地之和也"即音乐反映宇宙之和谐的观点，很容易影响诗歌的概念。两汉魏晋时阮瑀、挚虞、陆机等人，仍在宇宙哲理的框架之内讨论"文"的功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后，玄学理论臻于全盛。刘勰关于"文之为德也，大矣"、"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之气，肇自太极"以及"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论述，将"文"的几种概念合并成"文学为宇宙原理的表现和文饰之言的组合"这一概念。而他所说的"道、"

“圣”、“文”三者的关系，也构成了一个循环体系。尽管他的论述里有审美理论的成分，但基本上属于玄学理论。萧统、萧纲兄弟也持类似的观点。此外，老庄以直觉关注自然并与道合一的思想，也被文学批评家用来指导写作。陆机、司空图、苏东坡等人就承袭了这一思想。后来，玄学传统衍生出许多支脉，如主张以古代文学作为直觉关注对象的拟古主义（黄庭坚首开其端，严羽倾向性较为明晰），注重情景——内在体验与外在世界——合一的谢榛、王夫之，提倡“神韵”的王士祯以及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从玄学理论引出了文学有阳刚、阴柔之美的审美理论）。（参见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

决定理论　刘若愚说，阐明文学为同时代政治与社会现实之不自觉的即必然的反映与表现这一概念的理论，就是决定理论。它不同于玄学理论，因为它认为宇宙就是人类社会，并非所谓的“道”；它也不同于西方的模仿理论，因为它认为作家与宇宙的关系是一种不自觉展示的关系，而非自觉的模仿。

《左传》所载季札观乐（襄公二十九年）一段，叙述季氏根据《诗经》演唱的道德特点和政治情调，准确判断它们出自何时何地。这段文字从音乐和文学两个方面，明确地阐释了决定论诗歌观。《乐记》论“治世”、“乱世”和“亡国”之音，也包含着决定理论的成分。《诗·大序》移用《乐记》的观点，并且进而提出诗歌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论点：“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汪琬的“正”“变”之论继承了这一传统。决定观常常与实用观相结合，认为文学可以用来作历史的“镜鉴”，叫人从中汲取实际的教训。（参见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

表现理论　刘若愚说，表现理论认为，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类的普通情感，或者是个人的性情、才华、感触和德操。

最早的表现理论认为，文学尤其是诗歌乃是人类普通情感的自然表露。从字源上分析，“诗”和“志”为同源字，《大序》更有“诗言志”、“诗者，志之所之也”的论断。曹丕的《论文》开始强调文学表现个人的性情，他所说的“气”即是基于性情的个人才赋。陆机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他一方面认为作品中的情感是作家对大自然敏锐反应的结果（“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另一方面认为，文学的实质不仅含有“情”，而且含有“理”——“理智”、“物理”、“条理”。于是，他的“诗缘情”说成了堪与“诗言志”说相提并论的重要概念。刘勰的表现观见于《体性》篇：“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显然，他受陆机的影响，但其论述更加深入。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睹物兴情”、“感物吟志”等等，就与一个复杂的知觉过程有关。这即是说，“神”受“气”和“志”的控制，“物”通过耳目而感知，耳目的活动则受语言的控制。《体性》篇还有关于表

现过程的论述："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以及"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在唐宋诸代，表现理论常常附属于实用观点，处于低潮时期；直至晚明，它又开始兴盛起来。李贽和袁宏道相继提出了"童心"说和"性灵"观，促使表现理论形成了一股潮流。不过，他们的影响未久即衰。在清代，金圣叹主张真挚感情足以使任何人都能变成诗人，叶燮兼有玄学观和表现观，而以后者为多，袁枚也强调个性与情感的重要，但其论点不够系统，也缺乏独创性。

技巧理论 刘若愚认为，把文学看作是一种技艺的观念，即为文学的技巧观。在中国文学里，这种观念常常隐含在创作实践之中，较少诉诸理性论述。

但公开陈说技巧观的，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子。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他认为，懂得如何调配韵律，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有几篇讨论技巧；而在《总术》篇，他特别强调"术"的重要："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高启所谓"诗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其中含有技巧理论的因素。李东阳既坚持区别诗文、诗体的形式，又坚持认为写作要有一定的规则和方法。例如，他说："夫文者言之成章……。章之为用，贵乎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之准。"（《怀麓堂集文后稿》三）在明代，技巧理论有时与复古主义相结合。李梦阳和唐顺之均强调遵循古人的成文之法。清代的技巧论者有李渔（如"编戏有如缝衣"）、翁方纲（撰有《诗法论》）、刘大櫆（如"文人者，大匠也"）、姚鼐（指出学习古人要循序渐进地驾驭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要素）。

审美理论 刘若愚说，认为文学是优美的语言形式这一概念，是审美理论赖以构成的基础。它与技巧理论有密切关系，但也有基本的不同：前者重在论述文学作品如何对读者产生直接影响，后者重在论述作家如何处理他的作品。

审美理论的源头在"文"字的本意——"图样"或"斑纹"。先秦典籍里有些言论可以划入审美主义文学观，如《左传》载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易传》称赞《易经》本身的评语"其旨远，其辞文"。在汉代，审美概念渐趋明朗。汉代人开始用"文章"代指文学，主要是考虑它的形式与美学特质。他们也在文学和织物间进行类比：司马相如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西京杂记》所引），刘熙说"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魏晋及南朝的陆机、刘勰、萧统、沈约等人，

也有这方面的论述，如陆机的名言“诗缘情而绮靡”，刘勰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篇）。后来又出现了以味感体验表达审美观的论述，如“味在酸咸之外”说（司空图）、“味如食橄榄”说（欧阳修）。清代提倡骈文的阮元，认为只有使用押韵和对仗手法的作品才能称作“文”，也是审美论者中的显例。

实用理论 刘若愚说，实用理论的基本概念是，认为文学为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这一理论由于得到儒家的认可，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影响最大的理论。

《诗经》里有些作者写讽谕诗、赞美诗，即透露出诗歌与政治有关的观点。这种观点得到孔子和早期其他儒家的支持。孔子从各个方面论述诗歌的功用，而关于事父、事君、识鸟兽草木之名等论断，显然都是实用主义的。他即使注意到文学的情感效果和美学特质，也要把它们放在文学的道德与社会功用之后。从公元前二世纪儒教被立为正统起，直到二十世纪初，实用主义文学观一直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因此，这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较明显的例子，除了确定诗歌政治功用的《诗·大序》外，还有王充、曹丕、周敦颐、沈德潜等人的论述。王充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论衡》），是强调文学的道德教育作用。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论文》），陆机说“济文武以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赋》），是强调文学的政治与教育作用；周敦颐从伦理观提出“文以载道”（《通书·文辞》），成了历代引用最多的口号；沈德潜综合指出诗歌“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的作用，并无独创，只是蹈袭《论语》和《大序》的观点。（周发祥）

《文论》 太宰春台（1680—1748）撰，收入《春台先生紫芝园后稿》卷七，是江户时代论述散文的重要著述，可谓《拙堂文话》、《渔村文话》的滥觞。《文论》首先结合中国散文的历史，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提倡“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反对“唯文艺是执，务丽其辞，不修其行，所希则左氏司马，所要则名誉，日弄文墨，孳孳汲汲，唯恐技之不售，名之不闻。”接着专论“文之文理”，认为“文之有理，犹人身之有血脉也”，讽刺当时的古文辞派“文理不属，意义不通”，根源在于“要誉与贪多”，又论修辞之道，反对不择其辞而用套语。在谈到文章写法时，提出四法（一曰篇法，二曰章法，三曰句法，四曰字法），三要（一曰体，二曰法，三曰辞），又专门批评了当时的古文辞者“必以左氏司马为口实”的谬误。最后论及诗文关系，提出“文辞之累，赋居其一。”他认为文章应当达到的效果应当是“叙事则令后之读者，如亲见之；持论则令后之读者，如亲闻之；状物则如画；语喜则令人展眉拊髀，语怒则令人切齿攘臂，语哀则令人歔欷于邑，语乐则令人欢欣抃舞，此文辞之妙也。自先秦古文以至韩柳二家，其孰不然？”《文论》论左氏司马之异，除言其用字、用句、简繁之异外，总言各有其法：“左氏之文自一

法，前无古人，司马之文亦自一法，其纪汉兴以来，乃其自撰，其纪五帝以降，至秦楚之际，则采摭经传及诸家遗文，以为《本纪》、《世家》、《列传》之言。虽采摭经传及诸家遗文，然于其中颇隐栝原文，而行之以其家法，此子长所以能成一家也。夫子长之所以能成一家而高于百世者，以其能变化也。后子长而能变化者，千载唯有一韩退之而已。"其论各家文章，可见其好恶："夫六经尚矣！自《檀工》、《考工记》、《礼运》、《乐记》诸篇，左氏公羊之释经叙事，孟轲、荀卿、庄周、列御寇之论道立言，屈平、相如之骚赋，《战国》诸策，《吕氏》、《淮南》之搜罗宇宙，司马迁、班固之纪传……凡此虽其体与法各殊，而均之皆古文之隽也。譬之如数十匹锦，文采各殊，而要皆出自机杼者也。"

（王晓平）

《拙堂文话》《拙堂续文话》

日本斋藤正谦著。《拙堂文话》八卷刊于文政十三年(1830)，即古香书屋本。《拙堂续文话》八卷刊于天保七年(1836)，即不自欺斋本。

斋藤正谦(1797——1865)，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儒者，字有终，号拙堂，又号铁研，有《拙堂文集》六卷。《文话》是作者"忧近世文弊所作"(土井有恪跋)，专论中日古今学者、文人之文。时日本文坛深受明代前后七子余风的影响，斋藤对此给予尖锐的抨击，与中国贬抑七子、褒扬唐宋派的传统看法基本相同。《拙堂文话》开卷即从论列日本古今文风开始而追源到日本明代诸家，卷二论明清文、三、四两卷论唐宋文，五、六两卷再上溯论及先秦两汉文，末二卷则附论文章写作之法和山水游记等各体文章。《拙堂续文话》八卷则以品评文章特点、讨论文章作法等为主。大抵卷一主要讨论山水文，卷二论文体，三、四两卷历论先秦至清诸家之文，接着三卷评述清文家的文论思想，卷八主要论述谏疏之文。全书以对中国历代散文作家、作品的评析构成全书的主要内容，可以作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散文史纲要。斋藤氏有深厚的汉学根基，全书用纯熟流畅的古代汉语写成，故与中国学者所著几无二致。如《拙堂文话》卷二评述徐渭、袁宏道矫正七子文之弊的功过；卷六论学习古文"不规规学先辈之语"，临贴既要"无我"又要"有我"；《拙堂续文话》卷一论唐宋文和秦汉文的特点和关系，学古文应"沿唐宋溯秦汉"；卷三论"文当以唐宋为门阶，秦汉为阃奥"，"宜效宋人由唐而溯秦汉，慎勿如明人弃唐宋直趋秦汉"等论，都颇有见地。至于书中论析文章作法和写作特点，更是胜义迭出，故钱钟书先生称"斋藤论文，每中肯綮"(《管锥编》第三册第881页)。

文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样式。可以说，斋藤正谦的《文话》，集中体现了文话这一样式内容广泛、形式自由的特色，诸如评论散文作家的作品，叙述散文历史演变和流派，记录有关散文的议论，以及考订、辨析、辑佚等，应有尽有。然而，比起诗话、词话来，我国的文话数量稍逊。清人李元度(1821——1885)

《〈古文话〉序》在感叹我国古代文话之作甚少后说："而日本国人所撰《拙堂文话》、《渔村文话》反流传于中国"（《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六）。可证清朝末年，此两种文话已流传于中国，但以后又沉晦少闻。近年，台湾影印了《拙堂文话》和《拙堂续文话》，大陆学者的整理本也可望出版。

《渔村文话》 日本海保元备著。全书分正、续两篇，初刊于嘉永五年（1852），即传经庐本；后收入明治二十四年（1891）的《日本文库》。

海保元备（1798——1866），字顺卿，号渔村、传经庐等，长于经义考据之学，有《传经庐文钞》等。全书正编文话凡二十四则，计声响，命意，体段（即整体结构的安排），段落，达意，词藻，三多、三上（即《后山诗话》等所载欧阳修为文看多、做多、商量多，其文多作于马上、枕上、厕上者），锻炼，改润法，病格，十弊、三失，简疏，《左传》纪事，史传纪事，轻重，正行、散行，错综、倒装、缓急、抑扬、顿挫，警策，明意叙事，周汉四家，唐宋八家。续编文话凡十五则，即汉以后文体源流，唐古文源流，宋古文源流，韩柳文区别，唐宋古文区别，韩文来历，古文有本，圆通（蹈袭、弃染），诤臣论，范增论，放胆、小心，官名，《左传》错举，古文标点、标抹圈点，《文章轨范》原本。全书主要辑录中国历代论文的言论而成，以述为作，寓作于述，涉及到文章的写作过程、构成要素、文体文风、流派和批评等多方面，对有关文论材料作了广泛的采摭和细心的排比，论述平实，时有胜义，如"改润法"归纳了翻、变、融等十种修改润色的方法，"病格"列举了三十六条文章弊病等。可以说，《渔村文话》对中国文论作了一个深入浅出的总结，是指点初学门径的入门书，也是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文化著作。日本现代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1887——1964）评论此书道"海保渔村是幕末的儒者，此书乃论唐宋八家古文之源流及概说古文之作法者，就其要领妥当之点来说，在中国也看不到这样的书"（《中国文学概论》），评价未必妥当，但反映出此书在日本学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高克勤）

《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 译著。黄兆杰译。联合出版公司在1983年于香港出版。译者在1976年动笔，1980年完稿，历时4年。全书包括：《毛诗序》、《离骚经序》、《典论·论文》、《与杨德祖书》、《文赋》并序、《文章流别论》（选译）、《翰林论》、《宋书·谢灵运传论》、《诗品序》、《文心雕龙》的《神思》和《序志》篇、《与湘东王书》、《文选序》，计13篇论文的英译。每篇译文均有"说明"和"注释"。书前撰有"概论"，讲述这些论文关于文学目的、功能和性质的看法，并总结早期文学批评的特色。书末附中文原文、有关书籍和人物介绍。此外，还有英国著名学者霍克斯（David Hawkes）为本书写的"前言"（补充说明早期文化的特色）。本书填补了西方中国文论研究的某些空白，价值重大。

（江原）

研究方法

艺术四要素作为文论分类的框架　美国著名学者阿伯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一书中指出，艺术的创作与欣赏过程有四个要素，即作品、艺术家、宇宙（包括"人和行为，思想和感情，实物和事件，以及超感觉的本质"）和观众。阿氏把它们排在一个三角形框架内，用来区分西方的模仿论、实用论、表现论和客观论四种艺术理论。

这一理论框架对于西方的中国文论分类研究影响很大。从七十年代初起，接连出现了一些移用的例子。例如：吉布斯的《〈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0）、林理彰（Richard J. Lynn）的《传统和综合：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王士禛》(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71)、王靖宇的《阿伯拉姆斯的艺术四要素和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载于《东西方文学》，1972）和《金圣叹》（纽约，1972）、卜立德（David E. Pollard）的《一个中国人看文学：周作人之与传统有关的文学价值观》(伯克利，1973）等。

以上诸文的分析基本上不出阿伯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芝加哥和伦敦，1975）一书中，却对阿氏的框架作了修正。他认为，中西文学理论有些是很相似的，但在中国文论里也有一些难以纳入阿氏提出的四种文论中的任何一种。于是他将四要素（其中"艺术家"以"作家"代替）重新排列。他说："而艺术过程，我认为，不仅包括作家的创作过程和读者的审美体验，而且包括先于作家创作的过程和后于读者审美的过程。"他又说，在第一阶段，宇宙影响作家，作家对宇宙作出反应；第二阶段，由于这种反应，作家创造出作品；第三阶段，作品接触读者，便立即影响读者；第四阶级，读者对宇宙的反应，因阅读作品的经验而有所改变。这样整个过程就完成了一次循环。与此同时，宇宙对读者的影响也涉及到他对作品的反应，而他通过作品又接触到作家的思想，并重新捕促作家对宇宙的反应。因此，这个循环也是可以逆向进行的。他根据这个框架，把中国古典文论区分为玄学、决定、表现、技巧、审美、实用六种理论（参见有关词条），并将其分别纳入上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玄学理论
　　　　　决定理论
第二阶段：表现理论
　　　　　技巧理论
第三阶段：审美理论
第四阶段：实用理论

刘若愚的创造性运用，赢得了许多学

者的肯定和赞扬。

寓意研究 这是从寓言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批评方法。在西方，寓言作品有几种常见的形式：一种是fable，它以动物或其他东西作主角而寓含教诲的旨意；一种是parable，它通过人类日常生活的描述，而进行道德说教。这两种都是篇幅短小的故事。还有一种叫作allegory，其词源是希腊文allègoria，意思是“以别样的方式说话”。这种作品具有双重意义：基本的或表面的意义，和附属的或字面之下的意义。因此，人们可以在两个（甚至三个、四个）层次上对之解读(allegoresis)。它的艺术形式有文学作品，有绘画。若为文学作品，其体载可为诗歌，可为散文；其篇幅体制没有限定，长篇而分章节者亦不乏见，如但丁的“神曲”、班杨的《天路历程》。由于长篇寓言作品在中世纪很受欢迎，原属解经学领域的寓言研究遂被移植到文学领域。如上所述，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寓言作品（allegory）指屈抉隐，发掘出各个层次的意蕴来。

倪豪士所写名为《韩愈〈毛颖传〉的寓言读法》（载于西德《远东》杂志第23卷第2期）的文章，即是对中国古典散文进行寓意研究的范例。论者的研究分几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毛颖传》是allegory。

他说，韩文里充满了典故，这为种种意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开篇时出现的隐喻——

毛颖＝兔/笔＝大臣／？

一直维持在这篇文章里。而贯穿作品始终的隐喻，就是allegory。文章的许多段落（曾被人斥为“驳杂无实”）其实均是有意而设，均为维持寓言的必要因素。毛颖故事必须组织得符合毛笔的事实，毛笔的事实又要组织得能够产生更深刻、更重要的时事信息。

第二步：讲解典故的含义、分析典故的性质。

论者译出了《毛颖传》全文，边译边讲解典故的出处与含义。这些做法与国内研究相类似，事实上他也大量采用了国内研究的成果。但他对典故的性质做了区分。他说，文中的典故有两大系列：一种是发散(divergent)系列，它们只与某一题旨有关，但涉及许多可引为佐证的典籍，如关于毛兔和毛笔的典故；另一种是会聚（convergent）系列，它们在文章中没有固定的指涉物，但总是与个别的常引篇章(Locus classicus)和题旨相关联，如开篇及下文涉及的《史记·齐太公世家》和“中山国”。

第三步：指出《毛颖传》的寓意。

他说，根据文章所述及用典，可以明显看出它含有三层意义：

一、毛颖的传记——虚构的故事；

二、毛颖的“历史”——发散性典故；

三、中山毛氏的故事（降服某君，佐其治国，老年见弃）——会聚性典故。

最后，他又根据柳宗元的《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断定，文中还有一层更为现实的意义，那就是：

四、毛颖与韩愈的关联。

叙事学方法的应用 叙事学是

随着小说艺术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专门学问。但它的用途不限于小说研究，它在叙事散文的研究中也派上了用场。美国学者王靖宇的《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载于浦安迪编辑的《中国叙事文学》)一文，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论者说，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在西方已经广为流传。"这一方面就是分解出叙事文学的主要成分和因素，然后再逐一加以考察，看看它们……是如何产生效用并相互作用的。"关于有多少主要因素，诸家看法不一致：E. M. 福斯特提出了六分法——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示、型式或节奏（《小说面面观》）；韦勒克和沃伦提出了另外的方法——情节、人物刻划、背景（"情调"、"气氛"）、世界观、视点等等（《文学理论》）；罗伯特·斯科尔斯和罗伯特·凯洛格提出的是四分法——情节、人物、视点和意旨（《叙事文学的性质》）。论者认为，罗氏提出的这四种是任何叙事文学都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根据这一理论框架，论者接着对《左传》进行了分析。

一、情节 情节是一连串"可续性"事件的安排。这个定义强调两点：第一，情节必然涉及一个变化过程，因此，时间的运动成了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一组事件本身不能构成情节，它们必须有可续性(followable)。就时间运动而言，《左传》的情节是直线性的，因为它是编年史。但在某一插曲、特别是充分展开的插曲中，常常有倒叙甚至预示打断时间的直线运动。倒叙的例子如写郑穆公之死，预示的例子如写晋楚城濮之战（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结局了）。就情节类型而言，《左传》当然是先甲后乙的编年体，但从中依然可以区分出三种亚类：传记情节、游记情节和戏剧性情节。传记情节重点在显示人物性格、事件的安排不必合乎逻辑，也不必遵守严格的时间顺序，甲事在前或乙事在前，关系不大，如郑国子产的故事。《左传》中唯一的游记情节是重耳周游列国，其所见所闻构成了这一情节的主要内容。戏剧性情节最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概念，其重点是行动，而这种行动通常关涉对峙双方之危机的产生与解决。因此，事件之间的连系比较紧凑，比较合乎逻辑。《左传》中关于战争的描写，是这种情节的范例。

二、人物 要有故事，先得有人物，它也是叙事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就人物类型而言，《左传》中有如下几种：仁慈而能干的统治者，邪恶而愚蠢的统治者，聪明而忠实的大臣、强悍、非分、有时甚至是奸佞的大臣，因拘泥礼教而遭难的筆伯，自私却有远见的女人，绝代佳人，恪尽愚忠的卑微仆从等等。就人物刻划而言，《左传》中有很多静态人物。所谓"静态人物"是指自始至终性格不变的人物。重耳出游，历时不下十九年，性格基本上没有变化；楚灵王受到子革申斥后，决心改弦更张，最后还是依然故我。只有夫差是个性格明显发生变化的人物。在刻划人物时，心理描写是西方常用的方法，而《左传》中

极为罕见。有一内心独白（interior monologue）的例子，那是写鉏麑不忍刺杀赵盾触槐而死前的喟叹。

三、视点　故事必须通过讲述者的眼睛和觉识讲出来，作者选择什么样的讲述者，对于传达他的意旨、取得艺术效果，有重大关系，这就是叙事艺术中的视点问题。叙事文学的视点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第一人称视点，二是第三人称视点。《左传》采用一个无所不在的第三人称目击者的视点，但不是无所不知的讲述者。他可以记下他人的一言一行，但不知道他人的所思所想。这种视点的优点在于：作者可以借此记叙得生动活泼，富于戏剧性，而不至失去读者的信任感。其缺点在于叙述者不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使读者难以了解人物言行的动机。例如郑庄公掘地见母的一段，多有据此指责郑庄公"阴险"、"虚伪"者，这与《左传》的描述不符。

四、意旨　作者构思情节、描绘人物、运用视点，无非是想有效地传达他的意旨。判断作者的意旨并不容易，这至少要涉及四种关系：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作者与读者。由于《左传》的作者和性质还不清楚，探讨此书的意旨就更加困难。此书初次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想生动而真实地记载历史人物的事件。深入阅读，又使人觉得书中有一种道德准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不能把它说成是图解道德观念的寓言。它是一部史书，一部高度道德化了的史书。

论者最后又以城濮之战的描写为例，以四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了"情节、人物、视点、意旨在同一篇故事中妙合无垠、互济互补，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的结论。　（周发祥）

视点　参见《叙事学方法的应用》条。

原型批评　原型（Archetype）说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创立的一种理论。他认为，人类祖先的经验不断以"原始意象"的形式在种族的心灵上反复出现，这种积淀下来并沿传下去的原始意象就是"原型"。换句话说，原型是"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所公式化了的结果"，是"无数同类经验在心灵上的积淀物"（《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艺术的关系》）。由于荣格的原型说有先验性质，无法用实验等科学方法加以证实，后来加拿大学者弗赖伊（Northrop Frye）对它作了修正。他的《批评的解剖》一书，对原型批评（西方当代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之一）的形成贡献很大。他认为"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就是原型。他还像荣格那样，特别重视神话对于原型的重要意义："它给宗教仪式以原型的意义，给神的传谕以原型的叙述。因而神话就成了原型……。"

台湾旅日学者王孝廉在《死与再生》（载于《古典文学》第七集上册）一文中，即以原型说对中国古代神话和时间观念做了透视。他说，在创世神话中，有一种"原型回归"神话，广泛地分布在世界各地。其结构通常是：

（1）神话乐园（原始的宇宙秩序）；

（2）乐园破坏（人类的叛神，诸神的斗争，宇宙洪水等历劫的过程，也就是失乐园）；

（3）乐园重建（恢复宇宙原初的秩序，原型回归）。

其中心母题不外是下列内容：

（1）天地开辟；

（2）神造人类、万物；

（3）宇宙洪水；

（4）全人类和万物灭绝，唯有两人得救，他们通常是兄妹或姐弟（超自然神灵的选民）；

（5）近亲交配（再生人类的神婚行为）；

（6）宇宙秩序复旧，圆形循环完成。

《淮南子》记载了这样的神话。《天文》篇说水神共工怒触不周之山，破坏了宇宙原有的秩序，使得"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览冥》篇是说女娲炼石补天，重建宇宙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原始母神女娲之补天、理水，并非创新，而是恢复还原工作，正如司马贞《补史记》所说，经过女娲努力，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此外，李冗《独异志》中也有女祸与其兄通过神婚创生人类的记载。

论者认为，这种"原型回归"神话与古代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时间观有密切关系。初民看到四季变化、日月运行、河水盈枯、农事活动等等很有规律性，自然产生了循环的时间观，也与不死与再生的信仰联系了起来。"原型回归"神话这种"原始"、"历劫"、"回归"的结构，也是一些古典小说借以展开情节的框架。　　（周发祥）

意象分析　香港学者钟玲在《先秦文学中杨柳的象征意义》（载于《古典文学》第七集上册，1985）一文中，采用了意象分析这一研究方法。

她首先界定"意象"和"象征"两个术语的涵义。她说，"意象"一词出自《文心雕龙・神思》："……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此处的意象，是指内心意想的事物的形态象貌。它与英文 image（或 imagery）的涵义暗暗相合。卡罗琳・斯珀津（Caroline Spurgeon，以意象分析法研究莎剧的英国女学者——笔者注）为 image 下了定义，它是"诗人、散文家以文字描绘成的小幅图画，用以解说阐明他自己的想法，润饰他的想法。作者的看法、设想、言有未尽之处，自有其整体的内涵，自有其深度与丰富的意义，意象就是一种描写或一种意想，用以把上述的涵义传达给读者。而传达的方式是利用某种事物，以说明的方式、含蓄的比喻方式，或类推的方式，传达给读者；并通过由意象而引起的种种情绪和联想，来传达给读者。"斯珀津的定义以视觉为主。韦勒克（René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指出，还应该包括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压力、动态、联觉等方面的意象。布雷特（R. L. Brett）又补充说，有些意象主要靠智性、而非纯靠感官去把握。"象征"是欧美文学传统的术语。它"是一个意象，它能触发读者心中客观具体的事实，而那事实会令读者联想另一层涵义。"（C. 休・霍尔曼《文学手册》）如

果意象不断出现，就会成为象征。

界定了术语内涵之后，钟玲转来讨论《诗经》和先秦散文中的杨柳意象，分析这些意象的运用方式、双重内容以及它们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所谓“杨柳”，是指杨柳科树木——柳、杨柳、杨、杞、杞柳、蒲柳（即水杨）等，以及非杨柳科的柽（即柽柳）。她说，先秦散文提及杨柳，有些只是记叙事实，如《管子·地员》介绍凿井之法时提到柳，就不是文学意象。杨柳意象经常出现在具有明暗双重意义的“寓言”（allegory）之中。例如，《战国策》载有惠子劝说田需的一段话，他以蒲柳之易生暗示田需扶摇直上，以蒲柳之易毁暗示政敌的手腕可使其丧命。又如《孟子·告子》中所载关于人性与仁义的讨论。告子把人性比作杞柳，把仁义比作桮棬，说明仁义非天然本性。孟子引申了这个比喻，指出戕贼杞柳才能成为桮棬，却不能戕贼人以为仁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显示孟子高超的辩才。寓言是比喻手法的一种；有时杨柳意象还可构成暗喻，如《易经》以“枯杨生稊”和“枯杨生华”比喻老年人与青年人的婚姻，构思巧妙而有谐趣。

最后，论者还谈到了先秦文学中杨柳意象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当然以《诗经》中此类意象的影响为最大。）

（江　原）

老庄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

本世纪以来老庄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受到一些日本学者的重视，有关的论文如武内义雄《在日本的老庄学》（东北大学《文化》四——七，1937．7）、广田二郎《芭蕉思想作风的发展与庄子》（《人文研究》一三）、野野村胜英《芭蕉、庄子与宋学》（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芭蕉》Ⅰ，有精堂）、广田二郎《江户蕉门与庄子》（《专修国文》一五，1974．1）、山本平一郎《俳谐与庄子寓言》（《国语与国文学》一、二，1938）神田秀夫《关于兼好法师与庄子的接触》（《东京女子大学论集》七——一）、松本俊枝《兼好与庄子》（《文艺研究》六九，1972．3）、藤野恒男《〈徒然草〉里的老庄思想》（《汉文学》一一，福井汉文学会，1964．8）、野口武彦《徂徕学派的老子受容》（《文学》，1974．11）、芳贺幸四郎《对老庄的关心与神仙思想》（《关于中世禅林的学问与文学》，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等，都从不同方面论述了老庄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下面再列举有关内容的部分文章：广田二郎《蕉门与庄子》（有精堂，1979）、铃木由次郎《在我国的老庄学》（大东文化学院《大东文化》八，1934、12）、芳贺幸四郎《中世禅林的庄子研究——与五山文学及近世学问的关系》（《日本历史》四四，1952、1）、日野龙夫《延宝前后的江户诗坛——围绕庄子接受》（《日本文学》二五一九，1976、9）、广田二郎《支考与庄子》（《小樽商科大学人文研究》三一）、福岛正义《日本上代文学与老庄思想》（高文堂出版社，1983．）、福岛正义《菅原道真的作品与老庄思想之一端》（日本大学《汉学研究》二〇）、福岛正义《〈怀风藻〉解释上的异议》（日本大学《汉学研究》一三、

-四合并号，1975. 11）、吉田惠《〈徒然草〉与老子及庄子的思想》（《同志社大学人文科学》一一一，1966、10）、山崎真也《老庄思想与〈徒然草〉》（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二三）、细野哲雄《〈方丈记〉与老庄的思想》（《鸭长明行的周围·方丈记》，简野书院），广田二郎《素堂与老庄——贞享期》（专修大学《专修国文》五·八，1965、1，1965、9）、福井康顺《关于道学之传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哲学年志》一三，1937）、野野村胜英《围绕谈林俳偕的寓言》（《国语与国文学》1956. 1）、大星光史《芭蕉书简文里的庄子》（《文艺研究》一0四，日本文艺研究会）、伊狩章《则天去私与老庄思想》（新泻大学《国文学会志》二六，1983）。

（王晓平）

修辞研究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修辞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它大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比较中西修辞学发展史；

二、比较中西辞格；

三、以西方修辞学概念为模式、衡量中国传统文论的有关论述；

四、以西方修辞学概念为模式，分析中国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后一种实例散见在具体的作品批评之中。现举一例说明之。在《汉赋——扬雄赋作研究》一书里，康达维认为《战国策》的某些游说词既有"劝说"效果，又有"装饰"、"美饰"效果。他从词源学上提供了依据："修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两件事：装饰性话语和劝说性话语。这两件事似乎在心理上是互相抵牾的，因为装饰的愿望不偏不倚，而劝说的愿望基本上与之相反……。装饰性修辞对听者产生静态影响，引导他们去欣赏它的美与智；劝说性修辞则是动态地引导他们采取某种行动路线。一种是明确表露情感，另一种是操纵情感。"（诺思罗普·弗赖伊《批评的剖析》）康氏接着说，虽然两者似有矛盾，但常常共存于一篇作品之内。因为"装饰性修辞对促生劝说效果的贡献并不小。当听众觉得听来有趣时，他们的注意力和相信所闻之事的意愿，就会同样地增加，有的甚至因羡慕而万分激动。"（昆提利安《辩论家的培训》）辩说者的难题，就是如何防止追求美言的趣味挡住劝说的言路。（关于修辞研究，请参阅下述诸条。）　（周发祥）

中国的修辞学　美国耶鲁大学学者高辛勇的《修辞学》（载于《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一文，介绍了中国修辞学的起源、发展、分类和应用，并做了一些中西比较研究。

作者说，中国和西方的修辞学都是起源于讲演术，后来逐渐被文学作品所吸收。两者基本上也都分作两大类：劝说性修辞（persuasive rhetoric）和装饰性修辞（ornamental rhetoric，即文学性修辞）。关于前者的理论最早见于《韩非子》的《难言》、《说难》、《说林》诸篇和《荀子》的《非相》篇。在《墨子》中也出现了像"辟"、"侔"这样辞格。关于后者的讨论，最早可以在《论衡》、《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著作里找到。从唐代到清代的诗论，经常涉及具体的辞格。在宋代开始出现

论散文写作的著述，最明显的例子是陈骙《文则》。明清两代活跃着一些散文流派，这刺激了散文修辞学的发展。在这方面的著作中，涉及辞格的有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唐彪的《读书作文谱》、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

作者指出，中西修辞学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与讲演术、风格学、文类学、创作方法等混淆在一起。根据现代的观点，修辞学仅仅关涉写作的语言技巧。由此来看，《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就与修辞学无关，而《丽辞》、《声律》、《章句》、《比兴》等篇，则含有修辞学的成份。再如姚鼐提出的作文八要素：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其中前四者不在修辞学范畴，后者有关修辞学。

作者还根陈望道等人的著作，对中国古典文学所用的辞格作了归纳，并提供了西方与之对等或相近的辞格（参照“中西修辞术语名称对照”条）。

中西修辞术语名称对照 （录自《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所载高辛勇的《修辞学》一文，有一部分辞格无西名与之对应。）

1. 设问 hyopophora
   a. 提问；b. 激问
2. 跳脱 aposiopesis，interruption；参照 anapodoton
3. 倒装 anastrophe
4. 飞白 参照 barbarismus
5. 藏词 参照 ellipsis
   a. 藏头语；b. 歇后语；c. 譬解语
6. 连及
7. 镶嵌（即拼字法）diacope
8. 复词 ploce；参照 anatanaclasis，polytoton
9. 对偶（即对仗）parallelism，antithesis，parison
10. 错综
    a. 互文；b. 交错；c. 蹉对
11. 顶真 anadiplosis，redouble
    a. 联珠；b. 连环
12. 层递 gradation，climax；参照 auxesis
13. 摹状（即模拟） 参照 onomatopoeia
14. 婉曲（即委婉） 参照 periphrasis，euphemism
    a. 烘托；b. 闪烁；c. 婉转
15. 警策 apothegm；参照 paradox
16. 映衬 参照 oxymoron，antithesis
    a. 反映；b. 对衬
17. 双关（即谐隐） paronomasia；参照 syllepsis，zeugma，antanoclasis
18. 比喻（即譬喻） metaphor，simile
    a. 明喻 simile；b. 隐喻 metaphor；c. 借喻（即暗比） cryptic metaphor
19. 借代 metonymy，synecdoche；参照 kenning，epithet
    a. 旁借 metonymy；b. 对代 synecdoche
20. 比拟 参照 personification
    a. 拟人；b. 拟物
21. 拈连
22. 感兴
23. 夸饰（即夸张） hyperbole，

overstatement

24. 倒反　参照 irony

a. 倒辞；b. 反语 sarcasm

25. 转品　anthimeria

26. 引用　adaptation

27. 引经　argumentum adverecundiam

28. 稽古（即用事）allusion，参照 exemplum

29. 析字　参照 anagram，paronomasia

a. 化形

(1) 离合；(2) 增损

b. 谐音

(1) 借音　参照 syllepsis；(2) 切脚；(3) 双反

c. 衍义

(1) 牵附；(2) 代换；(3) 廋辞（即隐语）

30. 回文　参照 palindrome

《尚书》中的辞格　许锬辉认为，《尚书》中虽未提到如何修辞的问题，但它的文词表现出了各种修辞技巧。它们是我国最古的、也是影响深远的修辞范例。他举出了如下几种：

(1) 骈俪　骈俪对偶是基于自然界的对称，心理上的联想，以及追求对比、平衡、匀称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直而温，宽而栗"（《尧典》）。

(2) 协音　协音用韵是为了便于记忆，如"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汤誓》）

(3) 引用　引用是一种诉之于权威或大众的辞格。如"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盘庚》）

(4) 譬喻　譬喻是一种"借彼喻此"——以易解难，以旧引新，以具体说明抽象，而产生类化作用——的辞格。如"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尔，其犹可扑灭。"（《盘庚》）

(5) 设问　设问是一种变平叙为询问以加强语势的辞格。如"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吕刑》）

(6) 排比　排比属于章句上的修饰，利用结构相似的句子，接连排出同范围、同性质的意象，使文句显得劲健、奔腾，扣人心弦。如"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洪范》）

(7)层递　层递是按事物大小、轻重次序，层层递进或递减的一种辞格。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典》）

(8) 繁简　繁简指文体的繁丰或简约；简约者，显得质朴可爱，繁丰者，显得灵活动人。如《甘誓》中禹伐有扈氏的誓师之辞，仅用"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寥寥八字揭发敌方罪行；而在《汤誓》中，汤伐桀的誓师之辞采用问答体，反复陈说。这是一简一繁的例子。（参见许锬辉的《尚书与文学》一文，载于《古典文学》第四集。）　（江　原）

文类研究　文学研究即文类学（genology），是指研究文类划分（如分类标准、分类法）和文类演变（如形成、变异或消亡的情况和原因）的学问。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文类学

均有悠久的发展。不过，传统的文类学大多注意文类表面的形式特点。近几十年，随着文类理论的深化和比较文学的开展，文类学开创了新的局面。当代学者已开始注意文类概念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评价的作用。在比较文学范畴内，文类学除了兼涉上述内容外，还专门研究某种文类跨越国界的流传、或者平行比较不同国家近似文类的异同。

中国的“散文”和西方的“prose”，中国的“赋”和古希腊的“rhapsody”，是近似的文类，对于它们的平行比较即属文类研究。（参见“散文和 prose”、“赋和 rhapsody”等条目。）（周发祥）

散文和 PROSE 美国学者倪豪士说，中西表达“散文”这个意思的术语，有不同的背景。英文“prose”源自拉丁文“prorsa oratio”（直接谈）或“prorsus”（直接），与诗歌（verse）相对，诗歌源自拉丁文 vertere（转弯）。因此，prose 的最大优点就是明晰，正如英国当代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所说，优秀的散文“像窗玻璃一样”。不幸的是，这个术语在英文里已经带上了消极的意义，如“a prosy old fellow”（一个罗嗦的老人），“a prosaic problem”（一个乏味的问题）。结果，在西方批评中，prose 多遭忽视。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以致很少有论述散文的著作。而在中国，近似 prose 的术语有好几个，它们共同的词素是“文”。——“文”被提到了作为社会支柱之一的地位。文最初是“线条”、“图案”，其意义由“修辞”、“装饰”（与“质”相对），演变到“韵文”、一般的“文学”。最接近 prose 的术语是“文章”（约在公元三世纪始有此意）。（参见《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

赋和 RHAPSODY “赋”这一文体既有诗歌的特点，又有散文的特点，因此，很难找到一个与之对应的西文译名。就英文而言，西方学者即有“rhyme —— prose”、“prose poetry”、“poetical description”、“verse essay”等几种译法。美国学者康达维认为，译作“rhapsody”比较贴近原意，其理由如下：“赋”原有“展示”、“描述”、“表达”的意思；汉代以前，宫廷里有赋诗之举，所谓“赋诗”，一般指背诵现成的诗歌，如《诗经》，有时也指即席创作诗歌。《左传》里有很多关于赋诗的记载，赋诗的能力成了优秀官员的标志，甚至成了从政的必要条件。孔子训子时说“不学《诗》，无以言”，即强调这一点。《汉书·艺文志》对赋也有较详细的介绍：

>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专，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这段话里的“登高”一语，亦非指“登山”或“登楼”，而应作“登殿堂、登庁台或登丹墀”解。在西汉某时，“赋”变成了一种可朗诵的文体，通常以韵散并用、骈言长句、多用对话、错采摛文、排比物类、而语言艰涩为特

点。西方的“rhapsody”也是一种文体——古希腊的一种史诗。吟游诗人或宫廷诗人（名为“rhapsode”）经常吟诵这类作品，或者以这种诗体进行即兴创作。赋的表现媒介与 rhapsody 的很相像（但这决不是说赋即是史诗，尽管有些赋具有史诗的特点）；赋作者在很多方面也就是 rhapsode；中西这两种作品都展示迷狂情绪、壮观景象和强烈感情。（参见康达维《汉赋——扬雄赋作研究》一书。） （江 原）

比较诗学 诗学，指文学理论；比较诗学即是对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认为，文学理论还应包括“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理论”，比较诗学自然也以这两者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因素——来看，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的必然产物。由作品到理论，只是进行比较诗学研究的一种途径；另一种途径是将不同的理论予以直接比较。东西方文化是异质的（inhomogeneous），它们所孕育的文学理论，有些呈现出明显的差别，但也有不少表达方式迥异而内容相同。中西文论的比较正广泛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有人甚至期望建立“共同诗学”。

在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芝加哥，1975）一书中，有许多中西文论比较的实例，例如，玄学理论与模仿理论、表现理论的比较，玄学理论与现象学的比较等。余宝琳的《中国诗论与象征主义诗论》（载于《比较文学》第30卷第4期），也是比较诗学的一例。通过比较，论者寻找出了中西文论的异同之处，以及更为细腻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周发祥）

研 究 专 家

日 本

太宰春台（1680—1748） 日本江户时代汉学者。名纯，字德夫。有《春台先生紫芝园稿》二十二卷收其诗文，另有《朱子诗传膏肓》二卷，《斥非》一卷，《产语》二卷、《新选唐诗六体集》六卷、《六经略说》一卷等著述。所著《文论》、《诗论》收入《春台先生紫芝园稿》，是春台阐述自己散文、诗歌理论的重要著述。又曾著《读李于鳞文》，言：“自古文辞之说作而好为之者，莫如李于鳞。余观于鳞文，务为难读难解，前言未既，突出后言，说甲未尽，旁及乙事，且多摭古人成语而连合成章，是以言无条理，语无贯串，譬之犹童子争斗，有人问其故，答之疾言妄语，此则余所尝言也”，对其师荻生徂徕“最悦于鳞氏”颇不以为意，并提倡读“先秦西汉之

文”。在《论文》中也曾讽刺汪伯玉李于麟其文“不免类俳”。

古贺侗庵（1788—1847） 日本江户末期的汉学者，中国散文的研究者。一生经历日本文化、文政、天保、弘化四个时期，自幼喜爱古文，而崇尚几变。据《侗庵初集自序》言：“予十五六岁，始学属文，耽嗜日笃，迄弱冠成若干卷。”在《论文赠原田好直》中又说：“年甫十五六，便学属文，而未有定见，始是之而终非之者，凡几变。卒归宿于唐顺之、茅坤之论，奉唐宋八家为太宗师。仍偏爱欧苏、直跻以媲古之左丘明、庄周、司马迁。其所结撰，固未始自足，然犹以为不诡乎正轨。”最初，他认为日本人的文章“文鲜华藻，令神韵，寒气之态随处发露，虽哲匠宗工，有所不免”，其原因是日本“以威武建国，俗质而悫”，出路则在于“学俪文”（《侗庵初集》卷七·《书文江丽藻后》）。于是便潜心研习骈丽文，“遂至抛掷经史而专力于此，役役于抽黄对白之间，矻矻于风云月露”。四年之后，一日读《易》，至天文人文之说，幡然有悟，自誓自是绝不言四六。他从其父古贺精里的遗训中了解到“欧苏诸家，命意有余，而摛辞未逮，全篇之斡旋照应甚备，而一字一句之矩度全阙，较之周秦，画然判一大鸿沟”。他自己对明代李王复古派也提出过批评，贬斥“明代李王主张古文，舌剥檀左班马，以为得古文之髓者，固不中一吷”，最后归结于以韩文为理想，主张以之为阶梯回溯周秦之文。对于中国散文的发展，古贺侗庵提出“文章日衰论”，在《与家兄穀堂先生》（初集，卷三）中直言：“盖以文论，则汉胜唐，唐胜宋，清不及明，明不及宋，愈季而愈下。其人才亦然，是亦不足畏也”。这与斋藤拙堂《拙堂文话》见解一致，因言“斯书有云，西土文章日衰，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一此亦予与有终，议论符同者之一也。”

斋藤拙堂（1797—1865） 名正谦，字有终，号拙堂，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早期曾肄业于江户最高学府“昌平书院”，从古贺精里研习朱子学。曾在津地（今津市）藩校“有造馆”任教职，后历任侍读郎、郡宰、督学等职。

拙堂特别有心在古文批评上有所建树。他看到中国和日本有诗话、词话、赋话、四六话，唯独没有文话，认为是一个缺欠，便将多年积累的材料编成《拙堂文话》，来评论古文家的作品、流派，记载他们的议论行事。其书论及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生发展，时有精采的议论。此书刊行后，又有《拙堂文话评》，乃是山本眉山（积善）在文话栏外用朱笔加上评语，而拙堂以墨挥写答言而成，原稿藏斋藤家，以其为底本刊行的有《日本艺林丛书》本，其中附有问学于拙堂的三岛中洲的疏记、宫川鹿川的短文和高於菟三编的小传。

拙堂同情柳宗元的遭遇，曾引范文正、严有翼之说为之辨冤。看到昌黎等人都有年谱，而独柳宗元无，便据其全集和新旧《唐书》，略次其年月，以备考察。拙堂汉诗清新自然，为文学庄马及唐宋八大家，其游记散文尤

为著名。

五十川士深 日本明治年间关西的古文爱好者，字渊，号訒堂，生卒年不详，其散文集《竹雨山房文钞》1897年刊行。五十川士深从小便学古文，曾经手抄明清诸家评注，加在沈德潜的唐宋八家文选本上。后来为了使初学者了解古文，又增损更定，间或加上自己见解，编出《增补唐宋八家文读本》。在序文中谈到唐宋八家法严而可窥的看法，又概括唐宋八大家风格之异："尝试论之，昌黎如长江大河，浑浑浩浩，其闳远不可测；柳州深雄雅健，其气势有抓雷掣电之概；庐陵得史迁之风神，纡余曲折，容与闲易，自具太平之气象；老泉笔力矫健，简而不冗，侈能尽之约，远而能见之近；东坡才大，一泻千里，若万斛之泉；颍滨汪洋淡泊，似其人；南丰湛于经术，义理精微；而临川议论俊伟，笔笔消峭，别建旗帜。此皆八家之面目也。而至其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与夫过渡收束之法，则未始不同，所谓唐以后之文，不失乎法，其法严而可窥者是尔。"五十川士深认为，要学作古文，关键于在"熟"，精心阅读，用才去领会，用情感去辅佑，用气来通达，日月钻研，那么"发而为文者，融化混合，彼之声响步趋，即我之声响步趋，八家之面目，无不随吾所欲而出，混混乎如源泉之初涌，滔滔乎如江河之不竭，是以谓天下之至熟，乃贾、董、马、班或可驾，而四子六经，或可窥也。夫然后醇乎醇矣。布之一世，则一世法之，传之后代，则后代则之。"士深所作杂记文《雨溪书屋记》、《重筑樱堤记》、《心远堂记》等，在构思谋篇用语诸方面，更接近于宋代散文。 （王晓平）

长泽规矩也（1902— ） 日本著名中国文学史家。1925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30年任法政大学讲师，后任教授。196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70年从法政大学退职，获名誉教授称号。日本中国学会、东方学会会员。曾两次因研究成绩突出而获奖。

研究范畴涉及先秦至清诸代文学。著有《支那文学概论》（1951）、《汉文学概论》（1952）、《周易注疏》（1973）等；并编有《和刻本文选》（三卷；1974）、《和刻本诸子大成》（五卷；1975）等。

吉川幸次郎（1904—1980） 日本著名中国学家。1926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31年任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9年任该所经学文学研究室主任。1947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同年以《元杂剧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1967年由该校退休，任名誉教授。并历任日本东方学会会长、中国学会评议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等职。曾多次来华访问，并积极参与国际中国学学术活动。

研究范围广涉中国文学史、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著述十分丰富，筑摩书房编有二十四卷本《吉川幸次郎全集》（1973）。涉及古典散文的有：《唐代的诗与散文》（1948）、《中国散文论》（1949）、《论语》日译（1965—1966）、《中国散文选》（1965）等。

中岛千秋（1908— ） 日本辞赋研究家。东京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50年任爱媛大学文理学部副教授。1961年以《赋的形成与发展》获文学博士学位。1974年转任松山商科大学教授。为东方学会会员，中国学会会员。

专长为辞赋研究，著述有：《关于辞赋的构成》（1958）、《子虚上林赋的源流》（1958）、《向秀的〈思旧赋〉》（1967）等多篇；并译有：《文选赋篇》（上；1976）、《文选文章篇》（上、下；1977）。关于赋的批评理论也有所涉及。

波多野太郎（1912— ） 日本著名中国学家。1937年大东文化学院中国文学研究科毕业，后于195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37年任东北帝国大学助教。1946年任大东文化院教授。1949年任日本大学讲师。1955年起任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后升为教授。1976年从该校退职，转任东洋大学教授。日本中国学会会员，东方学会会员，现代中国学会会员，亦为道教学会理事。

研究范围极广，包括中国古典诗词、散文、戏曲、小说与现代文学，以及中国语言、音乐民间传说等。在上述各研究领域均有著述。散文研究重点在先秦，包括《老子王注校正》（1952）、《老子序说》（1978）、《老子道德经研究》（1979）等。此外，对清代文学史、明代作家李贽，以及文言语法亦有所研究。（鲁 仁）

前野直彬（1920— ） 日本东京人。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论文题为：《聊斋志异研究》。后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任教。1948年辞去教职并考取京都大学大学院中国文学科特别研究生。1952年退学后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讲师，讲授中国文学课程。1955年起改任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汉文学科助教授（副教授）。1958年转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任助教授，1968年升任教授。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还分别在北海道大学、岩手大学、东北大学、新泻大学、茶水女子大学、东京都立大学、，冈山大学、广岛大学、九州大学、熊本大学担任兼职教师各一年，同时于197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小说史考》。1981年退休后，被东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在大学任教的三十多年里，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曾经开设过这方面的许多课程和讲座，其中如“韩退之研究”、“古文读法”、“唐宋古文”、“先秦的文学”、“桐城派古文”、“明清文”等。已出版九部著作：《修辞论》（1967）《唐诗鉴赏辞典》（1970）、《唐代的诗人们》（1971）、《风月无尽》（1972）、《中国文学史》（1975，目前日本各大学已把它作为中国文学史课程中最常用的一种教材，其中总说部分由前野教授撰写）、《中国小说史考》（1975）、《韩愈的生平》（1976，主要依据韩愈本人所写文章作为资料写成的韩愈传纪专著）、《蒲松龄传》（1976）、《宋诗鉴赏辞典》（1977）。前野教授在六、七十年代还翻译出版了以下九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文章轨

范》(1961、1962)、《唐诗选》(1961、1962和1963)、《唐代传奇集》(1963、1964)、《幽明录·游仙窟》(1965)、《李白》(1966)、《唐代诗集》(下;1970)、《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述异记及其他》(1971)、《宋元明清诗集》(1973)、《山海经·列仙传》(1975)。除了以上这些论著,译著外,还在《日本中国学会报》、《中国文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而口头发表的许多观点,还有一半左右并未形诸文字。　(王枝忠)

今鹰真(1934—)　日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哲学科毕业,并获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58年后在国立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任副教授、教授。从1977年起在该大学主讲中国文学。日本中国学会理事兼评议员。

曾参与多种辞书的编写或编译,1975年获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进行《中国散文史及其文章论》的研究。著有《墨子的文章》(1968)、《诸子百家》(1975)、《"空言"、"空文"考》(1974)等。译有《司马迁》(1965)、《史记列传》(1969)、《三国志》(1977)等。

刘三富(1943—)　台湾省台中县梨山人,1966年毕业于台北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1969年进入日本九州大学文学研究科,1971年3月九州大学文学研究科专攻硕士课程,1986年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西南学院大学、九州大学,现为福冈大学教授,著有《柳宗元及其非国语》,并发表《李华的思想与文学》(《中国文学论集》第4号)、《关于韩愈的创作态度》(《文学理论集》第十五号)、《关于独孤及的文学》(《中国文学论集》第五号)、《梁肃的思想与文学》(《文学研究》第七十六辑)等论文多篇。　(王晓平)

苏　联

阿列克谢耶夫　瓦西里·米哈依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阿翰林,1881——1951)苏联汉学奠基人,科学院院士。

他生于彼得堡。1902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留校从事教学。1916年以研究司空图《诗品》的论著获硕士学位。1923年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任院士。1929年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列宁格勒大学、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列宁格勒文史哲学院、莫斯科东方学学院。曾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1904——1905、1910、1926年在中国进修讲学。发表著作约260种。多年致力于翻译和研究蒲松龄的作品。他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著作,已辑入1978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阿列克谢耶夫著作选集《中国文学》一书。专著尚有《东方学》等。他翻译的《聊斋志异》曾多次再版。

他编选并翻译的《中国古典散文》曾由科学出版社于1958和1959年各出一版(887页),是收入中国古代散文最多最集中的选本。计有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汉武帝、司马迁、李陵、王羲之、陶渊明、谢庄、王勃、李

白、刘禹锡、李华、韩愈、欧阳修、周敦颐、苏洵、苏轼、王安石、柳宗元、刘基等22人的散文63篇。

杨兴顺 杨兴顺（1904－1989），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生于浙江宜兴，1933年毕业于社会科学教师共产主义大学，1948年以论文《道德经的哲学学说》获副博士学位，1968年以论文《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获博士学位。1933——1939年在海参崴的中国列宁学校任教，1939——1940年在国际革命援助中央委员会任教，1941——1946年在广播委员会工作，1948年起转入哲学所。

主要著作：《中国古代哲学老子及其学说》（1950）、《中国哲学史摘编》，（1959）、《老子》节译（载《古代东方史文选》，司徒卢威编，1963）、《道德经》译并序（收人《古代中国哲学》第1卷一书中，1972）。此外，他还与人合译《管子》（节译）并作序（均载《古代中国哲学》一书第2卷，1973）。

波兹涅耶娃 波兹涅耶娃（1908——1974）莫斯科大学教授。生于彼得堡，1932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46年以论文《元稹的〈莺莺传〉》获副博士学位，1956年以专著《鲁迅的创作道路》获博士学位。1958年升为教授。1932——1939年先后在列宁学校及海参崴远东大学任教，1944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

她发表过著译一百余种，主要有：翻译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1949）、著作《鲁迅的生平与创作》（1959）、翻译及注解《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辨证法家（列子·杨朱·庄子）》（1967）以及文章《论红楼梦》（1955）等。她还与人联合主编莫斯科大学《东方大学》（四卷本）教科书，负责中国文学部分。

她译过大量中国古代散文，包括《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列子》等的选段，收入《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中国文学文选》（1959）等书中。

克罗尔 克罗尔（1931－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两汉的古籍《史记》和《盐铁论》。

他生于列宁格勒，195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3年以论文《司马迁——秦亡后的历史学家》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57年起在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工作。

其主要著述有两个方面：

1.《史记》研究：有专著《司马迁——历史学家》（1970）及论文《论司马迁〈史记〉中利用文献资料方法的几个特点》（1961）、《对〈史记〉给予文学评价》（1966）、《〈史记〉是文学作品》（1970）、《司马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1974）、《论联想思维对〈史记〉一书的影响》（1974）、《论汉代文学中对待史料的两种传统态度》（1975）、《司马迁关于“六家”的考证》（1977）。

克罗尔研究《史记》，采用的方法是什克洛夫斯基和托马舍夫斯基等创立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方法，以及巴赫

金分析作品“复调”理论。克罗尔依据形式主义的术语把《史记》归为“无情节”类的作品。他认为，《史记》是“多种题材”串联而成的文学作品。而从“复调”来看，《史记》一书中至少可以分出“作者的声音”和“书中人物的声音”。

2.《盐铁论》研究:《桓宽〈盐铁论〉中争论的空间概念》(1978)等。

其他还有《北京歇后语分析和转写经验》(1969)等。（李明滨）

法　国

高夫越（1835—1919）　即Seraphin Couvreur。中国经学研究家。译著甚丰，主要有《中国文言文字典》、《诗经》、《书经》、《四书》、《礼记》、《左传》等书。

沙畹（1865—1918）　沙畹是法国中国学家E—douard Chavannes的汉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来华在法国公使馆任职。回国后，于1893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T´oung Pao)。1903年被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

沙氏是早期的中国学家，在法国起着先驱者的作用。对中国历史和艺术史有很深的造诣，著有《司马迁的〈史记〉》、《西突厥史料》等。

戴密微（1894—1979）　戴密微系法国著名中国学家Paul Henri Demieville的汉名。生于瑞士洛桑。1914年获巴黎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1915年于伦敦皇家学院学习中文，后至巴黎从微西也(Arnold Vissiére)续学中文，从沙畹、烈维(Sylain Levi)研究汉学及梵文。1919年卒业于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年末入远东学院任研究员。1920—1931年间，先后在越南、中国、日本等地进行研究、考察和教学活动。返欧后入法籍，并在巴黎高级研究学院、法兰西研究院等单位任教，讲授佛教文献学和中国语言文学。1945年起任《通报》(T´Toung Pao)编辑，195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著述极为丰富，专著、论文及书评约三百余种。（江　原）

英　国

理雅各（1815—1897）　理雅各系英国著名中国学家James Legge的汉名。英国传教士，1839年被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4年随该院迁往香港，开始翻译并注释中国古典作品。1873年回国，1876—1897在牛津大学教授汉语。

理氏是多产的译者，著译有五卷本《中国经书》(包括《论语》、《孟子》、《书经》、《诗经》、和《左传》)、《易经》、《礼记》、《道家经典》、《离骚及其作者》等书。早年对孔子有成见，晚年尊崇孔子，重新修改旧译。他的部分译著曾收入米勒(Max Muller)编纂的《东方经典》丛书。（江　原）

翟理思（1845—1935）　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赫伯特·艾伦·贾尔斯）教授，1867年来华任使馆翻译生，以后历任驻上海、宁波等领事。1897年应聘担任剑桥大学汉文教授。1924年获牛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

位，同年被选为法国科院院士。自返国直至逝世的四十余年中，他继续钻研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发表了论文、译著、专著五十余种。这些译著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遍及中国古代文化的文史哲三个方面，如：《中国文学史》（1897）、《古文选珍》（1898）、《聊斋志异选》（1880）、《中国古代之宗教》（1904）、《中国的文明》（1911）、《世界史上之中国》（1913）、《洗冤录》（1924）、《中国古诗选》（1934）等。《中国文学史》及《古文选珍》二书，皆侧重於对中国古典散文的译介。其关于中国古典散文的专题译著有：《耀山笔记：中国文学选集》（1884年上海别发洋行初版，1905年再版），此书包括对朱熹、陆游等散文作品的评介和对老子《道德经》、四书等的论述评介。《中国的寓言》（载香港版《中国评论》第6卷，1877－78），此文是对唐王绩《醉乡记》、宋苏轼《睡乡记》、清人Lan Lu chou《饿乡记》以及宋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比较研究。翟理思堪称是一位有系统著述的在中学西渐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汉学家，他的许多有关中国学的译著在西方学术界都被认为具有永久性的学术价值。

翟理思的次子翟林奈能继承父志，研究汉学成绩显著，他译有《孙子兵法》和《论语》等书，并编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等。

阿瑟·韦理（1889—1966）

阿瑟·韦理是英国近代著名汉学家、诗人、东方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绘画史、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而成绩斐然的学者，中国古典诗歌之权威翻译者，他精通汉、满、蒙、梵、日、西、葡等文种。其著作和译著共有250余种，绝大部分涉及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可谓洋洋大观。中国古典散文的翻译与研究，也是韦理毕生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译著有《论语》译注本；王羲之《兰亭集序》译解（收入韦理著《中国绘画入门》导论部分，此书1923年伦敦出版，1958年纽约重印）；论析唐代散文大家韩愈的广播稿《中国最杰出的作家》（载《收听者》1947．5．22）；《白居易一篇散文摘译》（载《东方研究学院学报》第一卷第二部分，1918年）；专著《道德经探研》（1934年伦敦出版）；论文《庄子与惠子》（收入休斯著《中国的人体与魂》一书，1958年伦敦出版）；论文《孟子注说》（载《大亚细亚》卷1，1949）等。韦理的一生是为钻研东方学而呕心沥血、孜孜不倦的一生，是为沟通东西文化而努力奋斗的一生，他也是较早向西方介绍中国古典散文作品的西方著名学者之一。

（王丽娜）

美　国

海陶玮（1915－　）　James Robert Hightower，美国著名中国学家。1936年科罗拉多大学文学士，1940年哈佛大学文学硕士，1946年哲学博士（远东语言）。1946—1948年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讲师，1948－1951年任助理教授，1951－1958年任副教授，

1958 年升为教授。亦为美国科学和艺术科学院成员，亚洲研究协会成员。

专长虽为诗歌研究，但所涉很广。专著《中国文学大纲》(1963)，曾被采用作高教中文教材。所撰期刊文章甚夥，有关散文的如《〈文选〉和文类理论》(1957)、《骈文的若干特征》(1959)、《张衡的〈鹦鹉赋〉》(1979)《作为幽默家的韩愈》(1984) 等。古典文学素养深厚，其著述有很大影响，在国际中国学研究界亦享有盛誉。

刘若愚 (1926—1986) 原籍北京，曾入英籍，后又入美籍。1948 年辅仁大学学士，1952 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硕士。1951—1956 年任伦敦大学中文讲师，1956—1959 年任香港大学中文助理教授，1959—1961 年任香港新亚学院英文副教授。1961 年赴美、先后执教于夏威夷大学、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1967 年起为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69 年升为亚洲语言系主任。

研究重点在中国古典诗歌、诗论以及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著作有多种，大多为中国学界的力作，其中《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基础》(1979)、《悖论·语言·诗学》(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等书涉及古典散文和文论。刘氏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理论素养，其著述博贯中西、淹通古今、立论精当、新见迭出。因研究成绩卓著而多次获奖，在国外学术界享有盛誉。近十年来，他的著作在国内已有多种译本。

倪豪士 (1943—) 倪豪士系美国学者 Jr. WilLiam H. Nienhauser 的汉名。年青时参军服役，开始学习中文。1965 年入印第安纳大学读中国文学，1966 年获学士学位。1968 年获硕士学位，1972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西京杂记〉的文学特点和历史特点》，其指导教授为柳无忌。1968—1969 年间曾留学德国。毕业后曾在母校短时任教。1973 年转任威斯康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1979 年升为副教授；1983 年升为教授。

研究兴趣为中国古典诗歌、散文和小说。与人合编半年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主编大型辞书《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1986)，并在书中撰写专文《散文》和有关散文、辞赋的条目多则。著有《柳宗元》(1973；与人合作)、《皮日休》(1979)。所写期刊文章也比较多。

(江　原)

德　国

卫礼贤 (1873—1930) 又叫尉礼贤，德国中国学家 Richard Wilhelm 的汉名。德国同善会传教士，1897 年来华传教。办礼贤书院。辛亥革命后在青岛办尊孔文社。1922 年任德国驻华使馆文学顾问。

译著有《易经》、《老子及其〈道德经〉》、《吕氏春秋》、《中国文明简史》、《中国精神》(有英译本) 等。

(江　原)

瑞　典

高本汉（1889－1978）　即Bernhard Karlgren，瑞典著名中国学家。1909年获乌普萨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游历中国三年。返国后即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授。1931--1936年任哥德堡大学教授、副校长。1939年任远东博物馆馆长。后升为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长。

研究兴趣广泛，举凡中国历史、文学、考古、哲学、宗教无不精详深入，尤善汉语古音韵学。曾译注《诗经》、《书经》、《左传》等书。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了中文，受得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江　原）

台　港

黄锦鋐（1922－　）　福建莆田人。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系毕业。历任中小学教员、大专院校教授、系主任、文学部主任等职。现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曾于1967、1978年两度自费赴日进修。获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创办"文心雕龙研究会"；主编《文史》季刊。

著有《庄子读本》、《庄子及其文学》、《庄子与郭象》、《文心雕龙译注》、《中国文学史初稿》等。

罗联添（1927－　）　福建永安人。1959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历任台湾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1969年升为教授。

讲授并研究唐代文学。所讲课程有"国学导读"、"韩柳文"、"唐代文学专题"、"中国文学史"等。著有《韩愈研究》、《韩愈传》。编有《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四册)、《唐代文学论著集目》、《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等。其著作在台湾、并在国外有一定影响。（江　原）

史墨卿（1930－　）　山东省益都县人。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学人，及陆官、文藻、高雄师院专、兼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国立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中国国学年刊总编辑。

著有《岑参研究》、《墨学探微》、《离骚引义》、《楚辞文艺观》等书，论文有《宗教与文学》、《道通为一》、《文学与哲学》、《孟子修辞观》等数十篇。史墨卿以微观研究见长，如《战国诸子散文的特色》等文，对诸子散文的思想流派之关系及修辞手法，都有较深入细致的探讨。

张　健（1939－　）　笔名汶津，浙江嘉善人。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士，台湾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台湾大学讲师、副教授，中国时报专栏作家。现任台大中文系教授。

著有《中国文学与思想散论》、《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欧阳修之诗文及文学评论》、《宋金四家文学批评研究》、《中国文学批评论集》等六十余种。研究涉及中国文学各个领域，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甚至佛教文学，都有论述。对先秦散文尤有见地，如其论文《由论语看孔子为学之态度》、《情致、情感、情操——由另一个角度看论语首章》、《先秦诸子的风格》、《老子首章句读商榷》等，分别

从作家思想和作品形式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王立柱）

简宗梧（1940— ） 台湾南投人。在台中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多年，后又继续在政治大学中文系、以及该校的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班、博士班深造。获博士学位。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之职。现为政大教授

所授课程范围极广，以春秋左传到现代文学；从文字、音韵学到文学理论。指导研究生则偏重在《左传》和辞赋。著述有《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博士论文）、《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文学的御花园——文选》等。（江 原）

何庆明（1946— ） 台湾省南投县人。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台大中文系副教授。

著有《一些文学观点及其考察》、《萌芽的触须》、《分析与同情——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与其理论》、《境界的再生》、《境界的探求》、《试论王维诗中的世界》、《文学美综论》等，另有散文集《出发》、诗集《清唱》等。

擅于将现代批评方法运用于古典散文的研究。如论文《〈后赤壁赋〉析评》，作者发掘出一个崭新的角度，认为作品表现了一个完整的"动作"，其它的对话等写作方式都融和在整个"动作"中。

陈启佑（1953— ） 笔名渡也，台湾省嘉义县人。台湾文化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曾于台湾国立嘉义农专任教五年。

著有论文集《辽代文学背景及其作品》、《分析文学》、《唐代山水小品文研究》、《渡也论新诗》等，散文集《历山手记》、《永远的蝴蝶》等，诗集《阳光的眼睛》、《愤怒的葡萄》等。对小品文颇有研究，其专著《唐代山水小品研究》及《元结山水小品探讨》，对小品文体的形成发展、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语言风格、修辞手法等，均作了较有深度的探讨。他的论著和创作曾先后获得"教育部青年研究著作奖"、"联合报小说奖"、"中国时报叙事诗奖"、"明道文艺全国学生文学奖"等。（王立柱）

古文典籍

总　集

通　代

《文选》　南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又称《昭明文选》。30卷。收录自先秦至梁诗文辞赋700余篇，作者135人，分为37类，不收经、子作品，史书仅选论赞。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过广泛影响。《文选》存世最早注本为唐显庆间李善注，将原书析为60卷。注文广征博引，有"淹贯古今"之评。今世传本有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清胡克家翻刻宋尤袤本60卷，附《考异》10卷。1959年重印。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全三册，附《考异》、篇目及著者索引。

《六臣注文选》　唐开元年间，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五人为《文选》作注，称"五臣注"；至南宋，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为一，称"六臣注"。60卷。《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

《古文苑》　宋章樵注。21卷。传为唐无名氏编辑，南宋韩元吉分为9卷，章樵又加增补注释，分为21卷。收录周代至南朝齐代诗文共260余篇，分为20类，均为史传及《文选》所不载者。明成化刻本。清守山阁刻本。岱南阁丛书本。《四部丛刊》本。

《续古文苑》　清孙星衍辑。20卷。系孙氏辑录自周至元代金石、传记、地志和类书中遗文，以补《文选》、《古文苑》之不足。《平津馆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文苑英华》　宋李昉等编。1千卷。辑录南朝梁初至唐末诗文，近2万篇，作者2200余人，以上续《文选》，体例亦略相同，而分目更细。明万历刻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宋刊配明刊本，附南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清劳格《文苑英华辨证拾遗》。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清严可均辑。746卷。收录自上古三代至隋之文，共3497家。内容按时代顺序编为15集，分为骚、赋、制、诏等70类。此书以"全"为要，收罗

广泛，对研究隋以前文体流变、文风异同等颇多便利。然亦有误收伪作、重出、漏收者。原稿现存上海市图书馆。有清光绪间王毓藻刻本。丁福保加校影印本。1958年中华书局断句影印光绪刻本，1965年重印，并增附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

《古文关键》　宋吕祖谦编。2卷。选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文共60余篇，并各标举其命意布置之处，以示初学门径。清康熙时徐氏刊本。《金华丛书》本。

《文章正宗》　宋真德秀编。20卷，续集20卷。所录皆唐以前文，分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每类又分子目。续集皆收北宋之文，只分议论、叙事二类。明嘉靖间孔天胤刊本。清乾隆间杨仲兴刊本。

《古文集成前集》　宋王霆震编。78卷，以十干标注卷次。收录自春秋至南宋文共522篇，宋文占十之八。广采吕祖谦、真德秀、楼昉诸选本标注。宋人无集传后者，其文亦多赖以存。《四库全书》本。

《文章轨范》　宋谢枋得编。7卷。收录自汉至宋文共69篇，以韩、柳、欧、苏之文为主，韩文占三分之一。分放胆、小心二格，各有圈点评语。《四库全书》本。咸丰间万氏本。同治间杨氏本。

《文章辨体汇选》　明贺复征编。780卷。其体例仿吴讷《文章辨体》而加增广，分132体，每体之前，皆有凡例，并选上自三代，下至明末之文附诸体之后，以便参考。《四库全书》本。

《文编》　明唐顺之编选。64卷。收录自周至宋之文，分为33类。顺之深于古文，妙解文理，所选皆习诵之文，又标举脉络，能使后人尽知文章变化之妙。明天启元年刊本。《四库全书》本。

《古文渊鉴》　清康熙御选，徐乾学等编注。64卷。收录上自春秋，下至宋代之文。每篇各有评点，并附前人评语。清内府刊本。古香斋刊本。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吴调侯编选。12卷。收录自先秦至明末60余家文共222篇。所选范围广泛，以散文为主，兼收骈文。题材、风格多样，是清代以来流传最广的散文选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中华书局1959年版。

《古文雅正》　清蔡世远编选。14卷。收录自汉至元之文，共236篇。皆取有关学术治道者，兼收骈体。乾隆间刊本。道光间许乃普刊本。

《古文辞类纂》　清姚鼐编选。75卷。收录自战国至清初文共700余篇。按文体分为论辨、序跋等13类，不收先秦诸子、史著及骈体文。书中有评点，皆为宣扬桐城派文学主张，流传颇广。《四部备要》本。通行本。其后又有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28卷；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34卷。皆存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经史百家杂钞》　清曾国藩编选。26卷。其体例与姚鼐《古文辞类纂》大致相同。共分论著、词赋等11类，每类以六经冠其首，并收入较多

的史传文。《四部备要》本。曾氏另有《经史百家简编》2卷。《求实斋丛书》本。

《七十家赋钞》　清张惠言编选。6卷。收录自屈原至南北朝庾信辞赋共70家，206篇。所收赋体作品较全面，概述赋体源流变化，亦较中肯。道光间合河康氏刻本。

《历代赋汇》　清陈元龙编。140卷，外集20卷，逸句2卷，补遗20卷。收录上自周末，下至明代之赋共4001篇。扬州诗局本。重刻通行本。

《骈体文钞》　清李兆洛编选。31卷。收录自战国至隋代骈文。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庙堂制作之文，分铭、颂等18类；中编为指事述意之作，分书、论等8类；下编为缘情托兴之文，分连珠、杂文等5类。所收颇富，并间评风格流派异同。《四部备要》本。通行本。

《骈文类纂》　清王先谦编选。46卷。收录自先秦至清末骈文。体例略同于姚鼐《古文辞类纂》。光绪间刻本。

《历代文选》　冯其庸等编注。选文150篇，全2册。上册自先秦至南北朝，下册自唐至清末。所选作品，每家有生平介绍，每篇有题解和注释。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历代散文选》　黄肃秋、李知文选注。所选皆历代精粹短篇。入选的每位作家皆有简介，每篇都有提示和注解。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历代散文选注》　江西师院中文系选注。收先秦至明清散文102篇。入选各家有生平简介，每篇有扼要注释，并对其思想和艺术予以分析。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中国历代散文选》　刘盼遂、郭预衡主编。选历代散文200余篇。入选各家皆有简介，每篇有题解和注释。本书系高等院校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教材。全2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古代散文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注。选先秦至清代散文246篇。注文包括题解、作者介绍、注释、有关段落结构的简要提示四部分。全3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3年出版上、中册，1981年出版下册。

《古文百则》　姜涛、王立和等编注。本书编选先秦至清代各体文章100篇（其中一部分是节选），入选各篇均有注释、译文和说明。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历代文选》　四川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选先秦至清末散文123篇。注文包括作者介绍、解题、注释三部分。全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古代散文选注》　北京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选文110篇。起自先秦，止于晚清。每篇有简要分析，并从详注解。全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古文选读》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选。选先秦至清代古文51篇。入选大多名篇。每篇有译文、简注和扼要讲析，每段末加注段落大意。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1982年重印。

《中国古典传记》　乔象钟等选

编。选取汉迄清81位作家157篇作品。每篇加有详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历代传记选》 裘汉康选注。选取自先秦至明清的传记作品30篇。注文包括作者介绍、篇义说明、注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历代游记选》 贝远辰、叶幼明选注。全书共选上自盛唐下至晚清的40位作家50多篇游记散文。每位作家有简明介绍，每篇有说明和注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代游记选注》 刘操南、平慧善选注。选录东晋到清代游记作品28篇。每篇后有作者介绍、篇义说明和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983年重印。

《中国古代游记选》 倪其心等著。选录100余家150余篇作品。上起汉代，下到清代。每家有略传，每篇有题解，指出本篇出处、背景及写作特点，并有详细注解。全2册。中国旅游出版社1983年版。

《古代风景散文注释》 于非选注。辑选南朝宋至清代风景散文38篇。每篇注文包括注释、译文、简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古代桂林山水文选》 张家璠等译注。选取唐至清代描写桂林山水的文章45篇。每篇加以注释和翻译。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西湖游记选》 曹文趣等选注。选取唐至现代104篇描写西湖的游记散文，对一些难懂之处加注，予以必要说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西湖笔记小品选译》 于在春选译，孙旭升注释。选唐至民国作品104篇。将文言文译成普通话，并加必要注释，篇末标明选文出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历代书信选注》 黄均等编选。选文70余篇。上自春秋战国，下迄清末。每篇有作者简介、说明及注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历代名人小简》 吴增祺编纂，子聿点校。选收自汉至明150多位名人的小札400余篇，篇前有简注。岳麓书社1984年版。

《古代家书选》 陈桂芬等编注。辑选自汉代至清末62家75篇家书。每篇前有作者简介、原文后有注释和译文。如是语体文，则无注释和译文。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历代讽谕散文选》 高启沃、臧维熙选注。选录先秦至晚清讽谕散文200多篇。入选诸家都有生平简介和作品内容提要，每篇有注释和今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历代赋译释》 李晖、于非选注。选录自汉至清26家26篇作品。分段意、注释、译文、说明四部分，其中说明近乎鉴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古代寓言选》 陈蒲清、汤可敬等选编。精选先秦至清代寓言531则。按时代先后编排，以书为经。编排体例分为原书简介（突出寓言）、故事原文、注释、译文、简评五部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历代寓言选译》 杨晓敏

等选译。选先秦至清代寓言200篇。编排体例分为原文、题解、注释、译文四部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古代寓言选》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编。选先秦至清末寓言150多篇。每篇有题解、注释、今译三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寓林折枝——中国历代寓言选注》 刘国正、马达等选注。选先秦至清末寓言670余篇。书中对寓言作家和从中选用寓言的著作都作了简要介绍，每篇注明出处，并予以注释。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历代寓言名篇大观》 王景琳、徐匋编著。本书共收入寓言500篇，寓言按成书的年代编序，由寓言原文、注释、今译、提示四个部分组成。

《古代日记选注》 陈左高选注。选宋至清24家24篇日记。每篇有作者介绍、说明、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983年重印。

断　代

《先秦散文选》 罗根泽编，戚法仁注。从《左传》、《战国策》、《论语》等13部典籍中选取42篇作品。注文有校勘、注释、篇义提要、作品作者简介。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先秦诸子散文选译》 杨宏选译。选12家46篇作品。每家有简介、每篇有内容说明、注释、译文。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981年版，1982年重印。

《先秦诸子文译释》 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选译。选儒、道、法、名、墨、兵、杂7家39篇作品。篇前有作者生平思想介绍，每篇分段注释，并有译文和简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明张溥编。118篇。以张燮《七十二家集》为底本，又补缀冯惟讷《诗纪》、梅鼎祚《文纪》而成。虽不免颠倒舛误之处，但全书以文系人，以人系代，使唐以前文学发展线索分明，颇利检寻。明张氏原刊本。《四库全书》本。

《六朝文絜》 清许梿编选。4卷。收录自晋至隋骈文共72篇，分为18类。偏重篇幅短小者，多有抒情写景名作。有道光间许氏写刻本。清黎经诰有《六朝文絜笺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中凡选注。选文30余篇。选注者在前言中注述了这一时期散文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每家有小传，每篇加注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1版。

《汉魏六朝散文选注》 曹融南编著。选文22篇，多为各时期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每篇有简介和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汉魏六朝文译释》 裴晋南、李濒卿编著。选文42篇。篇前有作者简介，每篇有注释和译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汉魏六朝赋选》　瞿蜕园选注。选汉魏六朝20家20篇赋。每篇有题解（含作者介绍），并分段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汉魏六朝赋选注》　裴晋南等选注。选汉魏六朝18家19篇作品。所选各家均有作者介绍、每篇有内容说明和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全唐文》　清董诰等编。1千卷。收录唐五代文18400余篇，作者3000余人，并附作者小传。是迄今收录最全的唐代文章总集。后陆心源有《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1983年中华书局据清内府刻本断句影印，附《唐文拾遗》及《续拾》。

《唐文粹》　宋姚铉编。100卷。按照作品体裁不同，分为10余类。选辑精审，崇尚古雅，故于唐代诗文皆取古体，不录律赋，近体诗和四六文。实开宋古文运动先河。清郭麐有《唐文粹补遗》26卷。清江书局刊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

《唐代散文选注》　张起文选注。选唐代散文49篇，全2册。上册以韩愈为中心，下册以柳宗元为中心。每篇有说明、作者介绍、注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唐代散文选注》　张忱之选注。选文56篇，尤以韩愈、柳宗元为中心。注文由作者介绍、说明、解释三部分组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983年重印。

《唐文选注》　张宇光选注。选文30篇。突出韩柳、兼顾全唐诸家。有作者简介、题解、注释。《文学小丛书》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唐文选》　高文、何法周主编，白本松、王宗堂、毕桂发、孙方注释。入选作品，共61家，124篇，其中骈文36篇，散文88篇。选目编排，按作家的年代顺序。选篇皆有作者介绍、作品说明、词句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唐宋八大家文钞》　明茅坤编。164卷。收录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家文。所选虽非精审，亦能得繁简之中，足为初学门径，后世流传甚广。明万历间刻本。清代书坊有通行翻刻本。

《唐宋十大家全集录》　清储欣编。51卷，仿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增唐李翱孙樵为十家。各为批评，亦间附考证。清康熙间刻本。光绪间苏州书局本。

《唐宋文醇》　清乾隆“御定”。58卷。以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为兰本、重加增删改订，并录宋诸家评语，间附考证。有清内府大字本。广州重刻大字本。苏州书局本。

《唐宋文举要》　高步瀛选注。本书分甲乙两编。甲编为散文，共8卷，计42家178篇。乙编是骈文，共4卷，计49家70篇。全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　冯中一主编。选辑唐韩愈、柳宗元及宋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八家79篇作品。每家有简介，每篇

有提要及注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本。

《唐宋八大家文选》 牛宝彤选注。选辑八家散文108篇。每家有评介，每篇加详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宋文选》 一作《圣宋文选》。北宋无名氏辑。32卷。为传世最早的宋人选宋文集，共录北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等14家文，而不及三苏。所收多有关经术政治之文，诗赋碑铭皆不载。《四库全书》本。

《宋文鉴》 原名《皇朝文鉴》。南宋吕祖谦编。150篇。体例仿萧统《文选》，分为诗、赋、奏疏、杂著等61类，皆为北宋时期作品。江苏书局刻本。《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宋魏齐贤、叶棻同编。110卷。收录宋代之文共520家，以骈体文居多。虽鉴裁不精，但宋人无别集传后者，遗文多赖此书保存。有八千卷楼钞本。朝鲜活字印本。

《南宋文范》 清庄仲方编。70卷，外编4卷，作者考2卷。所选皆南宋作品，时限上接《宋文鉴》，内容按体裁不同，分为55类，文以议论说理为主，诗只收古体。清道光时活字本。光绪时江苏书局刻本。

《宋代散文选注》 王水照选注。选宋代31家60篇作品。每家有简介，每篇有说明和注释。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版，1983年重印。

《宋文选》 四川大学中文系选注。选宋代70家119篇散文。注文由作者简介、题解、作品提示、注释四部分组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全辽文》 陈述辑校。曾以《辽文汇》之名行世，后经不断补充，重加整理而成。为有辽一代收罗最富的文章总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金文最》 清张金吾编选。120卷。收录金代骈散体文，分为42类，不收诗词。此书采集广泛，材料丰富，虽不免滥杂之弊，但不少金人著作赖此以存。清光绪间粤雅堂刊本。江苏书局刻本。

《元文类》 元苏天爵编选。70卷，目录三卷。收录自元初至元延佑间之文，分43类。此书去取精严，所选多为元文盛时佳作，论者以为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鼎足而三，并称佳选。江苏书局本。《四部丛刊》影印重刻本。

《明文衡》 明程敏政编选。98卷。收录自明初至弘治时文，分为文、赋、骚、乐府等共38类，不收古、近体诗，为明初文选佳本。有明刊本。《四部丛刊》影印明重刻本。

《明文海》 清黄宗羲编选。482卷。分为28类，每类又各分子目。所收皆明代之文，其旨在于保存史料，故选录繁富，明代散失文史篇章，多赖以保存。《四库全书》本。

《明文在》 清薛熙编选。100卷。收录明代诗文2000余篇，仿照昭明《文选》体例，分为72类。文章取舍以唐宋派古文为标准。康熙间刻本。光

绪间江苏书局本。

《明代散文选注》 刘世德选注。收明代22家40篇散文。注文包括：作者介绍、说明、解释三部分。其中说明部分着意阐述该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983年重印。

《明清散文选析》 方铭选析。选明清散文各27篇。每家有小传，每篇前有分析，后有注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清文汇》 原名《国朝文汇》。近人沈粹芬、黄人等辑。200卷。收录清代1300余家，作品10000余篇。此书体制完备，收罗丰富，颇有参考价值。有上海国学扶轮社本。

《清文颖》 原名《皇清文颖》。清陈廷敬等辑。124卷。所收自顺治元年至乾隆9年，凡清初百年间文，广为甄录。前24卷为清初诸帝文，后100卷为诸臣文，为研究清文史重要参考书籍。《四库全书》本。

《皇朝经世文编》 清贺长龄、魏源等编选。120卷。收录清初至道光以前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以助时政取鉴。收集丰富，颇资参考。道光间刊本。其后又有清康盛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光绪间思补楼刊本。清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光绪间上海文盛书局刊本。

《骈体正宗》 原名《国朝骈体正宗》。清曾燠编选。12卷。收录清代自清初至嘉庆年间43家骈文共170篇。去取精审，多为名作，曾盛行一时。《花雨楼丛钞》本。另有姚燮评本，12卷。有光绪间刻本。

《清代散文选注》 王荣初、蔡一平选注。选黄宗羲、顾炎武、龚自珍等29家34篇作品。每家有简介，每篇有说明和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983年重印。

《桐城派文选》 漆绪邦、王凯符选注。选戴名世、方苞、刘大魁、姚鼐等27家137篇作品，并选若干文论文章。入选诸文有说明和注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专　　集

《尚书》

《尚书》 原有100篇，今存58篇。亦称《书》、《书经》。传为孔子编选。内容多为商周誓辞文诰等，行文或简朴流畅，或古奥难懂，叙事亦具条理，标志着我国古代散文已经成熟。对后代散文发展有深远影响。《尚书》有今古之分，今文为汉初经师所传，用隶书写者；古文为孔子宅壁所藏，用古文写者。清马国翰曾分别辑佚，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嫏嬛馆本。楚南书局本。通行注本则为今古文合编。

《尚书正义》 20卷。汉孔安国传（伪），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有《十三经注疏》本。《四部备要》本，附清阮元校勘记20卷。

《尚书今古文注疏》 30卷。清孙星衍注疏。是清代《尚书》注本中较全备者。有《平津馆丛书》本。《丛

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另有39卷本，有《皇清经解》本。

《古文尚书疏证》 阎若璩疏证。辨证古文尚书凡128条。有乾隆间刊本。吴氏天津刻本。杭州局本。续经解本。

《尚书今语》 方孝岳著。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尚书正读》 曾运乾著。中华书局1964年版。

《尚书译注》 王世舜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礼记》

《礼记》 分曲礼、檀弓、礼运等49篇。传为西汉戴圣编纂，多出自孔门后学所记。是研究古代礼仪制度及儒家学说的重要资料。其文气势充沛，议论严谨，对后世散文亦有影响。朱熹将其中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称为《四书》。《礼记》最通行注本是郑玄注。有《十三经注疏》本。

《周礼注疏》 42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注疏特详于名物训诂，对后世影响颇大。有《十三经注疏》本。《四部备要》本，附唐陆德明音义，清阮元校勘记42卷。

《礼记正义》 63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孔疏务申郑注，虽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说，词富理博，影响亦大。《十三经注疏》本。《四部备要》本，附唐陆德明音义，清阮元校勘记63卷。

《礼记集说》 160卷。宋卫湜撰。采汉至宋说礼之书，凡144家，征引广博，去取精审，有"礼家渊海"之称。《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

《云庄礼记集说》 10卷。元陈澔撰。注释简便浅显，便于初学。自明永乐之后，列为科举教本，故影响广泛。《四库全书》本。十三经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新编诸子集成》本，79年再版。

《礼记训纂》 49卷。清朱彬撰。广采汉魏以来诸说，用以纠正陈澔《集说》之疏漏。《四部备要》本。《十三经注疏》本。

《礼记集解》 61卷。清孙希旦撰。以郑玄注及孔颖达正义为主，兼采宋元以来诸家之说，博观约取，颇为赅备，尤详于名物制度。苏州新刻本。

《左传》

《左传》 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传为春秋末左丘明著。内容记述春秋列国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及言论。行文严谨，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擅长战争描写。对后世记叙文、议论文发展有重大影响。《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晋杜预集解，是《左传》流传至今最早的注本。杜预将《春秋》和《左氏春秋》合编一起，汇集前人注解作注，对后代注本影响较大。《四部丛刊》影印宋本。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点校本，更名为《春秋左传集解》。

《春秋左传正义》 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正义。孔颖达对杜预《集解》作讲疏，并附陆德明音义，为唐以前研究《左传》带总结性著作。《四部备要》本，《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左传诂》 20卷。清洪亮吉撰。《四部备要》本。《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左传注》 全4册。杨伯峻注。注释详审，内容广泛，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左传》新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左传译文》 沈玉成译。译文采用直译，颇忠实于原著。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配套。中华书局1981年版。

《左传选》 朱东润选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左传选译》 瞿蜕园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国语》

《国语》 21卷。传为春秋末左丘明著。所记上自周穆王，下至晋智伯亡，共538年。按照国别分为8编，内容多记各国君臣间言论对话，文字朴实简易，形象生动，善描绘人情物态。其传世注本以三国胡昭为最早。《四部备要》据宋刻本排印的明道本。《四部丛刊》影印宋庠序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参校《四部丛刊》本、加标点重印，并附《国语解叙》、《国语人名索引》。

《国语韦昭注疏》 16卷。清洪亮吉撰。旌德吕氏刻本。

《国语正义》 21卷。清董增龄撰。光绪间会稽章氏式训堂刊本。

《国语选》 傅庚生选注。共选110章，每章前加有标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战国策》

《战国策》 共33篇。汉刘向编。作者不详。有《国策》、《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短长》等别名。内容记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谋略及言论，起自战国初，至六国亡，共240年。其文犀利明快，长于辩论，语言夸饰生动，善用比喻、寓言，对后世散文影响甚巨。其注本以汉高诱最早，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战国策校注》 10卷。元吴师道撰。《四部丛刊》本。

《战国策》 全三册。附有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与《战国策》有关的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校点本。

《战国策集注汇考》 诸祖耿撰。广采古今诸家之说，并附逸文、考研录、人名地名索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战国策故事选译》 刘旭林选译。共译注《战国策》中《荆轲刺秦王》等35则故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论语》

《论语》 共20篇。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主要记述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是早期语录体散文典范。语言精炼含蓄，高度概括，善于通过简

短对话展示人物神情语态，对后世散文发展有很大影响。其传世注本以三国何晏《论语集解》为最早，有《四部丛刊》影印观古堂藏日本刊本。

《论语注疏》 20卷。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本。《四部备要》本附有清阮元校勘记20卷。

《论语集注》 10卷。宋朱熹集注。汇集宋人注释，兼采古注，以宣扬义理为主，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教本，影响很大。《四部备要》本。《四书集注》本。

《论语正义》 24卷。清刘宝楠撰。《四部备要》本。《诸子集成》本。

《论语注》 清康有为注。中华书局1984年据《万木草堂丛书》刻本校点出版。

《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每条原文后，均先译后注，书末附有《论语词典》。中华书局1958年版，1981年重印。

《墨子》

《墨子》 原有71篇，今存53篇。墨子弟子编纂。主要记录墨子的言行及讲学内容。其文质朴无华，不重文采，但论证严谨，逻辑性强，长于说理，开论辩文之先河。《墨子》旧题周墨翟撰。有《经训堂丛书》本。明嘉靖间唐尧臣刊本。明万历间茅坤刊本。清光绪浙局刊本。《四部丛刊》本。

《墨子闲诂》 15卷。清孙诒让撰。广集诸家之说，正误补缺，并加训释，间附己见，影响颇大。另附《目录》、《附录》各一卷，《后语》二卷。有《诸子集成》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书局1954年曾重印。

《墨经校诠》 高亨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墨经分类译注》 谭戒甫译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1984年重印。

《孟子》

《孟子》 孟子及其弟子合著。全书分7篇，主要记述孟子的言行。行文流畅，辞锋犀利，气势充沛，具有纵横家善辩的特点，对古代散文发展有巨大影响，是唐宋以来古文家创作的典范。传世注本以汉赵岐最早，有《孟子注疏》14卷，附宋孙奭疏，《十三经注疏》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孟子集注》 宋朱熹撰。汇集宋儒注解，兼采赵岐注，以阐发义理为主，是南宋迄清影响最大的注本。《四书集注》本。

《孟子字义疏证》 清戴震著。戴震反对朱熹派歪曲《孟子》原义，因著此书。共分三部分，以《字义疏证》为主体，编列卷首，次为《原善》、《孟子私淑录》。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

《孟子正义》 30卷。清焦循撰。以汉赵岐注为主，兼采清学者考订训释成果。《诸子集成》本。

《孟子译注》 全二册。杨伯峻译注。附有《孟子辞典》。中华书局1960年版，1981年再版。

《孟子译注》 兰州大学中文系

孟子译注小组撰。中华书局1960年版。

《老子》

《老子》 亦称《道德经》、《老子五千文》。传为春秋末老聃著，实约编成于战国中期。分上下篇，共5000字。历来列为道家主要经典，主要阐述无为思想，亦具有一定文学性。体裁为语录体韵文，语言凝炼，音韵铿锵，排比对偶，对后世文学亦有较大影响。传世最早注本《老子注》2卷，旧题河上公撰。唐齐知几认为不类秦汉人书。有世德堂本。经训堂考异本。涵芬楼影印宋刊本。《四部丛刊》本题《老子道德经》。

《老子注》 2卷。魏王弼撰。此注词义简远，颇得老子玄奥之旨，于后世影响较大。聚珍版本。正统道藏本。浙江书局重刊华亭张氏本。《四部备要》本题《老子道德真经》2卷，附唐陆德明音义。

《老子衍》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收入《船山遗书》。是作者37岁时所著，对老子哲学上颇有批判和发展。中华书局1962年曾将《老子衍》、《庄子通》二书合编一册出版。

《老子注释》 高亨著。高亨曾著《老子正诂》，开明书店1943年版。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老子注释》为作者近年研究成果。《老子》原文用王弼本，再据汉帛书本、河上公本、傅奕本等参校，并附注释、译文及分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老子校释》 朱谦之撰。以唐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文为主，参校石本、敦煌本、旧抄本、诸刻本100多种，并引近人成果，详加考释。中华书局1984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老子注释及评价》 陈鼓应著。对《老子》原文进行今注今释及评价，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并附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释文、《老子》参考书目等。中华书局1984年版。

《老子》 马王堆汉墓帛书。1973年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老子》甲、乙两种，甲本书体介于篆隶之间，乙本为隶书，体例与今本不同，甲乙两本均不分章，均为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内容与今本亦有一定出入。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列子》

《列子》 8卷。旧题周列御寇撰。原本已佚，今本出于晋人收集。其内容庞杂，多宣扬道家虚无思想，兼言佛儒及神仙之说，但保存了较多的古代寓言，神话及民间故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散文发展颇有影响。《列子》注本以晋张湛注最早，有《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题作《冲虚至德真经》。

《列子集释》 杨伯峻撰。据晋张湛注、唐卢重玄注、殷敬顺释文，广征古籍引文，详加校勘训释，并附张湛事迹、重要序跋及辨伪文字等资料，

颇资参考。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华书局 1979 年增订版。

《庄子》

《庄子》 现存 33 篇。庄子及其门人著。分为内篇 7，为庄子自著；外篇 15、杂篇 11，为庄子后学著。其文富于想象，辞采瑰丽，善于运用寓言譬喻，对后世散文发展影响深远。其传世注本最早的是晋郭象《庄子注》，有《四部备要》本，附唐陆德明音义。《四部丛刊》本称《南华真经》。

《庄子解》 清王夫之撰。偏重庄子思想探讨，每篇首有解综括大意，每段后再加申说。中华书局 1964 年版，1985 年再版。

《庄子集解》 8 卷。清王先谦撰。集以往各家注之长，并有个人见解。《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 1954 年排印本。

《庄子集释》 10 卷。清郭庆藩撰。辑录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音义三书全文，兼采清人训诂、考证、校勘成果，附以己见。《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 1960 年重新校点排印，1978 年重印。

《庄子今注今释》 陈鼓应注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庄子浅注》 曹础基著。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庄子译注》 王世舜等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 共 8 卷，分内外篇，215 章。旧题春秋齐晏婴撰，实系后人依托。内容主要记载齐相晏婴生平言行。人物形象丰满，语言诙谐幽默，行文流畅，为先秦散文代表作之一。《四部丛刊》据明活字本影印。《四部备要》本，附清孙星衍音义，黄以周校勘。

《晏子春秋校注》 张纯一校注。以湖北局元刊本为主，参照他本，甄录旧注，间附己意。有《诸子集成》本。

《晏子春秋集释》 吴则虞集释。吴氏认为《晏子春秋》作者可能是淳于越等齐人，成书约于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华书局 1962 年出版，1982 年重印。

《孙子》

《孙子》 1 卷，共 13 篇。亦称《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春秋末孙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对后世文学发展亦有影响。其体例按专题分篇论述，主次分明，结构缜密；逻辑性强，文风质朴，语言凝炼，善用比喻、排比等手法，有"辞如珠玉"之誉。历代注家甚多，传世最早注本为曹操注，3 卷。有《丛书集成初编》本。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内有今本 13 篇外《吴问》、《四变》等佚文。

《孙子十家注》 宋吉天保辑。13 卷，附叙录 1 卷，遗说 1 卷。十家为三国魏曹操、南朝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有《诸子集成》本。《丛

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

《十一家注孙子》 除宋吉天保辑曹操等十家注外，又增杜佑注。附郭化若译文。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改为《孙子今译》，由郭化若重新修改译文，略去十一家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更名《孙子译注》。

《孙子兵法新注》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部注。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参校银雀山汉墓《孙子》残简。中华书局1977年版，1981年重印。另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孙子兵法新注》，亦参校银雀山汉墓《孙子》残简。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

《荀子》

《荀子》 现存32篇。荀况及其门人著。其文细密严谨，条理明晰，说理透辟，善于设喻，富于辞藻，对后世说理文有重大影响。传世注本最早为唐杨倞注，20卷。有明嘉靖顾氏世德堂本。杭州局《二十二子》本。《四部丛刊》本。

《荀子集解》 20卷，32篇。清王先谦撰。汇集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影响颇大。光绪间长沙王氏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诸子集成》本。

《荀子简释》 梁启雄撰。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兼采近人新说，加以简明注释，并附《荀子传征》、《荀子行历系年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重印。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荀子新注》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编注。每篇包括说明、原文、注释。后附荀况生平简表；名词及人名简释；词条及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

《荀子简注》 章诗同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 26卷，分为12纪、8览、6论。又名《吕览》。秦吕不韦主编，其门客合著。内容庞杂，实为先秦各家学说总汇。其文短小精悍，组织严密，语言简明，富于形象，善用寓言神话故事进行说理。传世最早注本为汉高诱注，元刊本。明刊本。光绪间浙江局本。《四部丛刊》据明刊影印本。

《吕氏春秋》 26卷，附考一卷。汉高诱注，清毕沅校辑。《经训堂丛书》本。《诸子集成》本。《四部备要》本。

《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集注。采集各家旧说，并参校旧版，间附己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吕氏春秋选注》 王范之选注。共选26篇，每篇前冠有说明，辩说其主要思想内容。中华书局1981年版。

《吕氏春秋校释》 陈奇猷校释。精装全二册，平装全四册。汇集前人校释加按语考释，论述甚详，考校精审，颇多创见。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韩非子》

《韩非子》 20卷，55篇。战国韩非撰，内容为阐述韩非刑名法术之学。其文锋芒锐利，议论透辟，结构严密，逻辑性强，善用寓言故事阐明事理，富于文艺性，对后世议论文发展有重大影响。《四部丛刊》影印宋钞本、《四部备要》本。

《韩非子集解》 清王先慎撰。以宋乾道本为主，旁采诸说，间附己见，并附考证、佚文1卷。光绪间长沙王氏刊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韩非子浅解》 梁启雄撰。以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为底本，并采近人及日本学者之说，兼附己见。中华书局1960年版，1982年重版。

《韩非子集释》 12卷。陈奇猷校注。收罗丰富，考订精审，为汇校汇注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重版。陈奇猷又有《韩非子集释补》，补充注文130多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出版。

《韩非子校注》 《韩非子校注》组校注。参校各种善本、吸收前人成果，全面整理，颇资参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韩非子选》 王焕镳选注。共选录30篇，篇目按内容性质，分5类排列。各篇先列解题，后注释。中华书局1965年版。

《山海经》

《山海经》 旧称夏禹或伯益撰，不可信，约出于周秦间人记述。今本18卷，分为山经6卷、海经13卷。内容多载古代山川、道里、部族、物产、医药、宗教等，其中保存有大量远古神话传说。其文荒诞奇伟，具有浓厚神怪色彩，对后世文学发展影响很大。其注以晋郭璞注最早，有《四部丛刊》本。

《山海经注》 18卷。晋郭璞，清毕沅校正。又称《山海经新校正》。广征地理方志，对《山海经》篇目、文字，山名水道等均考证精审。清乾隆时《经训堂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山海经广注》 清吴任臣注。18卷。以郭注为本，广采古代典籍，进行注释考订。清乾隆间金阊业堂刊本。

《山海经笺疏》 18卷。清郝懿行笺疏，兼采吴任臣、毕沅二家之长，笺以补注，疏以证经。并附《订讹》1卷。《四部备要》本。

《山海经校注》 袁珂注。对神话部分注释特详，并附插图150幅及索引，颇资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刘安

《淮南子》 21卷。(汉)高诱注。书中多谈论道家自然天道，收集和保存了部分神话故事。语言夸诞，富于想象。有《四库全书》本。

《淮南子》 21卷，(汉)高诱注，(清)庄逵吉校。《诸子集成》本。《四部备要》本。

《淮南子》 2卷。(明)归有光辑评。《诸子汇函》本。

《淮南子》 1卷。(明)焦竑注释，

(明)翁正春评林,《注释九子全书》本。

《淮南子》 1卷。张之纯评注,《评注诸子菁华录》本。

《淮南子》 沈雁冰选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淮南子旧注整理》 4卷。(清)吴承仕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贾　谊

《贾长沙集》 1卷。收政论文和辞赋。其文长于议论,气势雄伟。其辞赋善用排句,巧设比喻,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影响甚深。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贾谊集》 收录《新书》及散文、辞赋。附:佚文、贾谊传、贾谊生活时代大事年表、著录、序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晁　错

《晁错新书》 1卷。(清)冯国翰辑。其文不重文采,朴实深厚。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晁错集注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附《汉书·晁错传》及刘知己、李贽、王夫之等人对晁错的评语。

枚　乘

《枚叔集》 1卷。(清)丁晏辑。收散文和辞赋。其辞赋想象丰富,铺排淋漓,对汉赋有较大影响。有《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楚州丛书·第一集》本。

邹　阳

《邹阳书》 1卷。(清)马国翰辑。其文善于辩析事理,巧于辞令,有战国游士之风。《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司马相如

《司马文园集》 1卷。收辞赋和散文。其文比较质朴,辞赋结构宏大,气象非凡。但有铺张过甚、夸张过玄之弊。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司马长卿集》 2卷。《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司马文园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东方朔

《东方先生集》 1卷。收散文和辞赋。其文感情饱满,言辞激越,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有《汉魏诸名家集》本。

《东方大中集》 1卷。《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古云子》 不分卷。(明)归有光辑评。《诸子汇函》本。

司马迁

《司马子长集》 1卷。收散文和辞赋。其文笔法雄健,感情饱满,真挚感人。有《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史记》 130卷。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部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记传体通史,同时具有很高的文

学价值，对我国记传散文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古注有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宋元丰刊本合三家之注为一，至今仍之。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点校本。分段标点，附校点后记。

《史记选读》　王邻苏选注。春明出版社1956年版。

《史记选注》　王晓传等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史记选》　王伯祥选注。选记叙文21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史记选注》　王利器等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史记选讲》　郑权中著。有注释和讲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史记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史记选注集说》　韩兆琦编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褚少孙

《汉褚先生集》　1卷。收褚氏补充《史记》之文。其文善于刻划人物，对修葺和完善《史记》有一定贡献。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刘　向

《新序》　10卷。杂文集。其文辞浅意畅，用意深切。影响较大。有《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新序佚文》　1卷。(清) 王仁俊辑。见《经籍佚文》。

《新序选注》　赵仲邑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说苑》　20卷。《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说苑佚文》　1卷。(清) 王仁俊辑。见《经籍佚文》。

《说苑疏证》　刘善诒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扬　雄

《扬子云集》　6卷。收《大元》、《法言》、《方言》及辞赋、散文，并附逸篇目录。其大赋篇幅宏大，但多模拟因袭。散文纵横驰说，辩锋锐利。有《四库全书》本。

《扬侍郎集》　1卷。《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扬侍郎集选》　1卷。(清) 吴汝纶选评。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班　彪

《叔皮集》　1卷。张鹏一辑。收辞赋和散文。其赋叙事性较强，议论巧妙，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有《关陇丛书・扶风班氏佚书》本。

王　充

《论衡》　30卷，85篇。其中《招致篇》已佚。其文避虚妄而求证实，立论深辟，推理明晰。有宋乾道本。《四部丛刊》本。

《论衡》 校点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论衡集解》 刘盼遂集解。古籍出版社 1957 年版，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论衡注释》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注。有校勘、标点、分段、注释、说明。书末附人名索引及其他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班　固

《班兰台集》 1 卷。收辞赋、散文、诗歌。其赋肆力铺排，典奥繁富，有一定影响。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汉书》 120 卷。仿《史记》体例，分纪、志、表、列传四部分，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文采虽不及《史记》，但文字整饰，组织严密，自有特色。古注有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 1962 年出版校点本。附校勘记。

《汉书补注》 王先谦补注。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用《国学基本丛书》本纸型重印。中华书局 1983 年版，全 2 册。

《汉书补注补正》 杨树达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

《汉书故事选》 瞿蜕园选注。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年版。

《汉书注商》 吴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陈国庆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汉书刑法志注释》 赵增祥、徐世虹同注。法律出版社 1983 年版。

《汉书选》 顾廷龙、王熙华选注。选文十篇，篇前有简说，篇后有注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汉书选》 冉昭德等选注。中华书局 1962 年版。1980 年重印。

张　衡

《张河间集》 2 卷。收辞赋和诗歌。其大赋融叙事议论说理为一体，较有特色。小赋篇幅短小，感情真挚，长于抒情，对魏晋抒情小赋影响很大。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赵　壹

《赵计吏集》 1 卷。张鹏一辑。他的赋一洗汉赋典雅富赡作风，以真率尖利见长，在赋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有《关陇丛书》本。

孔　融

《孔少府集》 1 卷。收散文和诗歌。其文感情豪迈，文笔爽俊，但有理不胜词之嫌。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孔北海集评注》 孙至诚评注。录文不录诗。附《孔北海年谱》。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蔡　邕

《蔡中郎文集》 10 卷。收诗歌、散文和辞赋。其文感慨激愤，文气悲抑，现实色彩较浓。有《四部丛刊》本，附《外传》1 卷。

《蔡中郎集》　2卷。《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蔡中郎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曹　操

《魏武帝集》　1卷。收散文和诗歌。其文清峻通脱，颇具特色。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4卷。

《曹操集》　点校本。附曹操年表、曹操著作考。中华书局1959年版。

《曹操集译注》　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王　粲

《王侍中集》　1卷。收诗歌和辞赋。其文长于言情，抒情小赋感情深沉，情景兼融，在赋史上具有较大影响。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汇刻建安七子集》本。

《王粲集》　俞绍初校点，中华书局1980年版。

《王粲集注》　吴云、唐绍忠注。附《英雄记》、《王粲年谱》、《王粲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4年版。

诸葛亮

《诸葛亮集》　11卷。段熙仲、闻旭初编校。其文质朴自然，志尽意畅。明清编辑其文集者甚多，尤以清张澍所编《诸葛忠武侯文集》较为完备。此本系用张氏本为底本整理校点。共分文集四卷、附录二卷、故事五卷。卷首有《诸葛亮著作考》。中华书局1960年版。1974年重印本。

《曹操诸葛亮著作选注》　《曹操诸葛亮著作选注》小组选注。选文60篇。每篇有题解、注释和译文。书后附《曹操诸葛亮主要活动年表》。湖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曹　丕

《魏文帝集》　2卷。收散文和诗歌。其文叙事简洁，说理周密，富于文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6卷。

曹　植

《曹子建集》　10卷。收诗歌、散文、辞赋。其文感情洋溢，格调悲慨。是建安时期代表作家。有《汉魏诸名家集》本。《汇刻建安七子》本。

《曹植集校注》　赵幼文校注。大部分作品依年编次，未编年者置于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阮　籍

《阮嗣宗集》　4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使气骋辞。辞锋锐利，且奇偶相生，很有韵致。其集有《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阮籍集》　李志钧等校点。收《咏怀诗》82首、赋6篇，另有其他散作。有简单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嵇　康

《嵇中散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立意高妙，文笔精炼，以清峻见长。有《汉魏诸名家集》本。《四库全书》本。

《嵇康集》　鲁迅辑校。《鲁迅全集》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鲁迅校稿，线装全一册。

《嵇康集校注》　戴明扬校注。各篇附明清诸家评论。书末有附录和参校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陈　寿

《三国志》　65卷。史传中写人叙事，较为生动，有一定文学成就。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四史。古注有刘宋裴松之注。有元刊本，明刊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校点本，陈乃乾校点。

《三国志集解》　卢弼集解。此本是《三国志》注解集大成之作。古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线装本。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精装影印本。

《三国志选》　缪钺选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

陆　机

《陆士衡集》　10卷。收诗歌、散文、骈文、辞赋。其文运思精美，词藻宏丽，在当时享有盛誉。有《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四部丛刊》本。

《陆机集》　金涛声校点。附《补遗》三卷，陆机传记资料，序跋等。中华书局1982年版。

潘　岳

《潘安仁集》　5卷。收诗歌和辞赋等。潘岳善叙哀情，其文曲折深婉，十分感人。有《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左　思

《左太冲集》　1卷。收诗歌和辞赋等。左思以诗著称。其大赋运思精深，有一定成就。其集有《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张　载

《张孟阳集》　1卷。收诗歌、骈文散文和辞赋。其文文体省净、辞句秀美。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张孟阳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刘　琨

《晋刘越石集》　1卷。收诗歌、骈文散文和辞赋。其文文笔慷慨激昂、深挚动人，在当时独具特色。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刘越石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王羲之

《王右军集》　2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清新朴素，有异于当时的咏物谈玄之作。《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王右军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陶渊明

《笺注陶渊明集》 10卷。(宋)李公焕笺注。收诗歌散文和辞赋。其文闲淡放狂，朴质清新，叙事写情，语言晓畅，在晋宋之际独具风格，有《四部丛刊》本。

《靖节先生集》 10卷。(清)陶澍集注。附录诸家评陶汇集及年谱考异。有《四部备要》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排印本。

《陶渊明集》 逯钦立校注。附《关于陶渊明》及《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

《陶渊明集》 王瑶注。依年编次。各篇有简明校勘和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83年重印。

傅 亮

《宋傅光禄集》 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长于言情，景物渲染，情景兼融。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傅光禄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颜延之

《颜光禄集》 1卷。收诗歌和散文。延之以诗文著称，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其文富丽精美，但过于藻饰。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颜延年集》 4卷。《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颜光禄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范 晔

《后汉书》 120卷。史传文语言凝炼，富有文采。特别是论赞部分，艺术性很强。古注有唐李贤等注。历代多有刻本。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校点本。

《后汉书集解》 王先谦集解。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全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全2册。

《后汉书选》 束世徵选注。中华书局1966年版。

刘义庆

《世说新语》 3卷。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年间名士文人的言行风貌，文字简洁，文采纷呈，对后代小说及笔记散文有较大影响。梁刘孝标有注。《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

《世说新语》 6卷。《崇文局汇刻书》本。《诸子集成》本。

《世说新语》 3卷，附校语1卷。(清)沈岩校。《四部丛刊》本。

《世说旧注》 (明)杨慎撰。《丛书集成初编》本。

《世说新语注钞》 2卷。(明)钟惺辑。《三注钞》本。

《世说新语》 3卷。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据日本影宋本影印。精装2册。附：《世说叙录》、《世说新语考

异》、《世说人名谱》、《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世说新语校勘记》。

《世说新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世说新语校笺》 陈震晔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

刘 勰

《刘子集校》 林其锬、陈凤金集校。刘勰以《文心雕龙》名世。其文汇为《刘子》，多论治国立身之要，并杂以九流之说，内容比较广泛。咀英吐华，隽采警拔，很有特色。自唐至清对其集都有校勘、注释和整理。此集校本以清乾隆间程遵岳校本为底本整理而成。末附《历代主要序跋》、《刘子作者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鲍 照

《鲍参军集》 10卷。收诗歌、散文骈文和辞赋。其文笔法遒丽，风格俊逸，对后世文学很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鲍参军集注》 （清）钱振伦注，黄节补注诗集并集说，钱仲联增补集说校。卷首有年表，古人评论分辑各篇之后，属总论者辑载卷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增订本。

谢 庄

《谢光禄集》 1卷。收诗歌、骈文、散文和辞赋。其文语言精巧，作风典雅，但内容较贫乏。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谢光禄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孔稚圭

《南齐孔詹事集》 1卷。收诗歌、骈文散文和辞赋。其文气韵幽闲，句净字巧，在六朝骈文中较有特色，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孔詹事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江 淹

《江文通集》 4卷。收诗歌、骈文散文和辞赋。其文铺采摛文，辞清句丽，艺术精美，在当时颇负盛誉。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江醴陵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江文通集汇注》 （明）胡之骥注。李长路等校点。篇后有校勘记，书末附佚文及南史江淹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陶弘景

《华阳陶隐居集》 2卷。（清）严可均辑。收散文骈文和辞赋。其文以描写山水见长。语言骈散相间，节奏

铿锵，神气飞越。有《观古堂所刻书》本。《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陶隐居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任　昉

《任彦升集》　5卷。收诗歌、辞赋和散文。其文渊雅丰丽，富于文采。犹以《文章缘起》之书名世。有《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任中丞集选》　1卷。(清)吴汝纶评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本。

刘　峻

《刘户曹集》　1卷。收诗歌骈文和散文。其骈文结构严谨，文情兼备，在六朝骈文中较有特色。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刘户曹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丘　迟

《梁丘司空集》　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善剖事理，不事雕饰，在当时颇负盛名。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丘司空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吴　均

《吴朝请集》　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多描绘山川景物，风格清新挺拔，在当时影响较大，号为吴均体。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吴朝请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萧　统

《昭明太子集》　6卷。收诗歌、散文和辞赋等。萧统以编《文选》名世。其文构思严谨，章法缜密。有《四库全书》本。

《梁昭明太子文集》　5卷。《四部丛刊》本。

《梁昭明集选》　1卷。(清)吴汝纶选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本。

郦道元

《水经注》　40卷。其文善于谋篇布局，将详实记载与生动的形象结合起来，文笔优美，真实可信。有《四库全书》本。

《水经注》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据《永乐大典》影印。

《水经注》　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据《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

《水经注疏》　(清)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线装3函21册。

《水经注校》　王国维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据原校手稿排印。

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 5卷。记述洛阳城外48寺的建置兴废，语言简洁，叙述生动，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有《四库全书》本。

《洛阳伽蓝记校注》 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1978年修订版。

《洛阳伽蓝记校释》 周祖谟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华书局1978年版。

庾 信

《庾子山集》 16卷。收诗歌、骈文和辞赋等。其文前期浮华艳冶，后期沉郁清新。他将白描艺术移入骈文中，文章清丽疏爽，感慨深沉，在南北朝骈赋、骈文中成就最高，对后世具有很大影响。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屠隆合刻评点本。

《庾开府集笺注》 10卷。（清）吴兆宜笺注。此本系庾信最早的注本。有《四库全书》本。

《庾子山集注》 16卷。附总释1卷。（清）倪璠注。末附《庾子山年谱》。此本较吴注精审。有《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庾子山集注》 许逸民校点并辑佚。以倪璠注本为底本校点整理。中华书局1981年版。

《庾信诗赋选》 纪馥华选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庾信选集》 舒宝璋选注。选诗文赋共120篇。依年编次。卷首有庾信年谱，卷末有庾信传、《庾信集著录考略》、《庾信诗文评辑要》等参考资料。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颜之推

《颜氏家训》 7卷。本书所涉内容比较广泛，其文朴素通畅，质实平易，自然亲切，在当时独具风格。有《四库全书》本。

《颜氏家训》 7卷，附注补。（清）赵曦明注。（清）卢文昭校并补注，（清）钱大昕补正。有《抱经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

《颜氏家训注》 严士海辑。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颜氏家训集解》 王利器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 绩

《王无功集》 3卷，补遗二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疏散淡雅，在唐初别是一家，对后世很有影响。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东皋子集》 3卷，附校勘记一卷。《四部丛刊续编》本。

玄 奘

《大唐西域记》 12卷。历述玄奘西行途中所历各地的民俗风情、景观名胜及典章制度等，内容十分丰富。文字优美，质朴流畅。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大唐西域记》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本。附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贺昌群《大唐西域记之译与撰》。

《大唐西域记》　章巽校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　向达辑。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

《大唐西域记校注》　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大唐西域记今译》　季羡林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　1卷。《吉石盦丛书初集》本。

杨　炯

《盈川集》　10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感情深厚，语言优美，骈偶气较浓。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本。

《杨盈川集》　10卷，附录1卷。《四部丛刊》本。

《杨炯文集》　7卷。《初唐四杰文集》本。《四部备要》本。

《杨盈川集》　13卷，附录1卷。《初唐四子集》本。

魏　征

《魏郑公文集》　3卷。收散文。其文以议论见长，比喻生动，辞约意深。有《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骆宾王

《骆宾王文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富有气势，辞句精警。有《四部丛刊》本。

《骆宾王文集》　10卷，附考异一卷。（清）顾广圻撰考异。有《唐人三家集》本。中华书局1973年以此本影印，线装2册。

《骆宾王文集》　3卷。《初唐四杰文集》本。《四部备要》本。

《骆临海集笺注》　（清）陈熙晋笺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据咸丰间刊本排印。

卢照邻

《卢升之集》　7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语言华美，雕饰对仗。但华艳之中时见清刚之气。有《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幽忧子集》　7卷，附录1卷。《初唐四子集》本。《四部丛刊》本。

《卢照邻文集》　2卷。《初唐四杰文集》本。《四部备要》本。

张　说

《张燕公集》　25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张说以文章名显一时，与苏颋齐名，时称燕许。其文多颂扬升平之作，文辞华美，有骈文之风。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说之文集》　25卷，补遗5卷。《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本。《嘉业堂丛书》本。

《张说之集》　25卷，补1卷。《四部丛刊》初次印本。二次印本附校记1卷。

王　勃

《王子安集》　16卷。收诗歌、散

文、辞赋等。(明) 张燮辑。王勃行文骈丽，语言典雅，描摹刻划，细腻精妙，但不故作文饰，对骈文改革具有重要作用。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有附录1卷。

《王子安集佚文》 1卷，附录1卷，校记一卷。罗振玉辑并撰校记。见《永丰乡人杂著·续编》。

《王子安集注》 20卷。(清) 蒋清翊注。光绪间刊本。石印本。

陈子昂

《陈拾遗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陈子昂以诗著称，其文除表序有骈丽之习外，其他文体都疏淡朴实，与古文相近，对扭转当时文风有一定作用。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陈伯玉文集》 10卷。《四部丛刊》本。

《陈子昂集》 10卷。徐鹏校，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整理，并辑补诗文10余篇。末附罗庸所编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

张九龄

《曲江集》 2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注重实用，语言朴实，议论生动，较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曲江张先生文集》 20卷，附录1卷。《四部丛刊》本。

《曲江张文献公集》 12卷，附录1卷，曲江集考证2卷。(清) 温汝适校并撰考证。《广东丛书第一集》本。

《曲江张文献公集》 12卷，附录1卷。《四部备要》本。

李　邕

《李北海集》 6卷，附录1卷。散文集。李邕长于碑颂文。记述条达，层次鲜明，在当时很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乾坤正气集》本。

《李北海集》 5卷。《湖北先正遗书》本。

王　维

《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 6卷。收诗歌和散文。(宋) 刘辰翁校。其文清淡闲雅，情趣盎然，具有山水诗风格。有《四部丛刊》本。

《王右丞集》 14卷外编附录3卷。(明) 顾起经笺。《摛藻堂四库全书会要》本。

《王右丞集笺注》 28卷。(清) 赵殿成笺注。有《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排印本，附赵殿成编《右丞年谱》。

李　白

《李太白文集》 36卷。(清) 王琦注。《四部备要》本。

《李太白全集》 中华书局以王琦注本排印，末附篇目索引，1979年版。

《李白集校注》 瞿蜕园、朱金城校注。以乾隆间刊王琦注本为底本整理，分校、注释、评笺三部分。注和

评笺以杨齐贤、萧士赟、胡震亨、王琦四家评注为基础，并补充唐宋以来诗话、笔记、考据材料及近人研究成果，较旧注本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颜真卿

《颜鲁公文集》 30卷，补遗1卷。收诗歌和散文。颜真卿以书法著名，其文长于碑传，叙述翔实，层次明晰，文笔朴厚，较有特色。有《三长物斋丛书》本。《四部备要》本。

《颜鲁公文集》 15卷，补遗1卷，附录1卷。《四部丛刊》本。

《文忠集》 16卷，拾遗4卷。拾遗为（清）黄本骥辑，（清）孙星华增订。《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李 华

《李遐叔文集》 4卷。收诗歌和散文。李华倡导古文，其文感情质朴，气脉流畅，文情并茂，对唐古文运动有一定影响。有《四库全书》本。旧钞本。

刘长卿

《刘随州集》 11卷。收诗歌和散文。刘长卿长于诗歌。其文造语清丽，意境疏淡，在当时也有盛誉。有《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刘随州文集》 10卷，外1卷。《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元 结

《次山集》 12卷。收诗歌和散文。元结倡导复古，反对骈丽文风。其文清爽平易，淳朴浑成。山水记意境清远，笔墨流畅，更见特色。是唐古文运动先驱之一。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唐元次山集》 10卷，拾遗1卷。《四部备要》本。

《唐元次山文集》 10卷，拾遗1卷，补1卷。孙毓修辑补。《四部丛刊》本。

《次山子》 不分卷。（明）归有光辑评。《诸子汇函》本。

《元次山集》 孙望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

萧颖士

《萧茂挺文集》 1卷。萧颖士反对骈偶，提倡古文。其文古朴劲健、质实平易，对唐古文运动有较大影响。有《四库全书》本。

《萧茂挺集》 1卷。《常州先哲遗书第一集》本。

独孤及

《毘陵集》 20卷。收诗歌和散文。独孤及提倡古文，主张复古。其文情意真挚，古奇雄健，是唐古文运动先驱之一。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毘陵集》 20卷，补遗1卷，附录1卷。《四部丛刊》本。

陆 贽

《翰苑集》 22卷。散文集。其文以奏疏为主，思想深刻、论辨精辟，文笔质实，古朴刚劲，对唐古文运动具有一定促进作用。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唐陆宣公翰苑集》 24卷。《四部丛刊》初次印本。二次印本22卷。

《唐陆宣公集》 22卷，增辑2卷。（清）耆英增辑。《四部备要》本。

《唐陆宣公文集》 4卷，首1卷。《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唐陆宣公翰苑集》 24卷，首1卷，末1卷。（日）张佩芳注。《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

李　观

《李元宾文编》 3卷，外编2卷散文集。李观是唐古文运动主要作家。其文语言古拙，构思新奇，但有艰深晦涩之弊，与孙樵风格相近。有《四库全书》本。

《李元宾文集文编》 3卷，外编2卷、续编1卷。《唐人三家集》本。《粤雅堂丛书二编》本。

《李元宾文集》 6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欧阳詹

《欧阳行周文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欧阳詹与李观、韩愈同出陆贽门下，善长古文，是唐古文运动重要作家。其文条理明晰，形式灵活，格调散逸，有一定成就。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欧阳行周文集》 10卷，附缪荃孙校记1卷。《三唐人集》本。

韩　愈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40卷，外集10卷，遗文1卷。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是唐古文运动领袖。其文刚健雄浑、气势奔放，语言简洁明晰，生动晓畅，自然质实。其创作奠定了唐代古文基础，对后代散文具有重大影响。宋人对韩集整理用功甚深。此本系宋朱熹校，王伯大音释。有《四部丛刊》本。

《昌黎先生集考异》 10卷。（宋）朱熹撰。此本原不载韩文，王伯大取朱熹《考异》诸条散入韩文各篇之下，以便寻览，但已失《考异》本来面貌。近年发现宋本《昌黎先生考异》，是现存《考异》一书的最早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此本，线装2册。1985年重印，平装本。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40卷。（宋）魏仲举辑。《四库全书》本。又有《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题《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

《昌黎先生集》 40卷，外集10卷，遗文1卷。（宋）廖莹中辑注。此本以朱熹校本考异为主，参以魏注本，是韩集较完备的注本。有《韩柳二集》本（世采堂本，景世采堂本）。

《东雅堂韩昌黎集注》 40卷，外集10卷。此本系明徐时泰覆刻廖注本。是明以后最流行的本子。有《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附清陈

景云《韩集校勘》四卷。

《唐韩昌黎集》 40卷，外集10卷，遗文1卷，附录1卷。(明)蒋之翘辑注。《韩柳全集》本。

《韩集补注》 1卷。(清)沈钦韩注，(清)胡承珙订。《广雅书局丛书》本。

《韩昌黎文集校注》 马其昶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韩昌黎文选》 4卷。(清)孙琮选。《山晓阁文选》本。

《韩文选》 2卷。(清)陈兆仑选。《陈太仆批选八大家文钞》本。

《韩愈文选》 童第德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刘禹锡

《刘宾客文集》 30卷，外集1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政论文立论高远，逻辑严密。杂文短小精炼，清新别致。有《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

《刘宾客文集》 30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据明刻本影印。全2册。

《刘梦得文集》 30卷，外集10卷。《四部丛刊》本。

《刘禹锡集》 校点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以清刻《刘宾客文集》为底本进行校点整理。

白居易

《白氏文集》 7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不刻意求工，自然流畅，平易古朴。有《四部丛刊》本。

《白氏长庆集》 71卷。《四库全书》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宋刊本。精装本全4册。线装本全10册。

《白香山集》 71卷。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万有文库》本校订重印，全3册。

《白居易集》 顾学颉校点。有校记。辑所佚诗文为外集2卷。末附顾氏所编《白居易年谱简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全四册。

《白居易选集》 王汝弼选注。选诗词文共300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白居易诗文选注》 龚克昌、彭重光选注。选诗文84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柳宗元

《诂训柳先生文集》 45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宋)韩醇撰。收诗歌和散文。柳宗元是唐古文运动领袖，与韩愈并称韩柳。其文长于政记、寓言和山水游记。政论文思想深刻，章法严谨；寓言构思巧妙，锋芒锐利；山水游记笔法细腻，富有诗情画意。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增广注释音辩柳集》 43卷。(宋)张敦颐音辩，(宋)潘纬音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增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

《五百家注柳先生集》 21卷，新编外集3卷，附录4卷。(宋)魏仲

举辑。《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河东先生集》 45卷，外集2卷，补遗1卷，附录2卷，传1卷。（宋）廖莹中辑注。《韩柳二集》本（世采堂本，景世采堂本）。

《唐柳河东集》 45卷，外集5卷，遗文1卷，附录1卷。（明）蒋之翘辑注。《韩柳全集》本。《四部备要》本。

《柳集点勘》 4卷。（清）陈景云撰。《邈园丛书》本。

《柳河东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附文安礼《柳先生年谱》、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1958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重印。

《柳宗元集》 吴文治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宋刻蜀本《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为底本校点、整理。

《柳柳州文选》 4卷。（清）孙琮选。《山晓阁文选》本。

《柳文选》 1卷。（清）陈兆仑选。《陈太仆批选八大家文钞》本。

《柳文指要》 章士钊著。全书分体要和通要两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和专题论述诸方面。中华书局1971年版。

《柳宗元诗文选注》 《柳宗元诗文选注》编辑组选注。选文30多篇，每篇有注释和说明，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李　翱

《唐李文公集》 18卷。收散文。其文造语深隐、古拙奥涩，是唐古文运动重要作家之一。有《四部丛刊》本。

《李文公集》 18卷补遗1卷。冯焌光辑《三唐人集》本（光绪本、民国本）。

《协律子》 不分卷。（明）归有光辑评。见《诸子汇函》。

皇甫湜

《皇甫持正文集》 6卷。收散文。其文古奇艰涩，有刻意求奇之弊，是唐古文运动重要作家之一。《四部丛刊》本。《续古逸丛书》本。

《皇甫持正文集》 6卷，补遗1卷。冯焌光辑《三唐人集》本（光绪本、民国本）。

樊宗师

《樊宗师集》 1卷。收散文。樊氏是唐古文运动作家之一，其文肆力铺张，有艰奥难懂之弊。有《樊谏议集七家评附·樊集句读合刻三种》本。

《强恕斋本樊绍述遗文》 1卷。（清）张庚注。《心园丛刻一集》本。

《樊绍述集》 2卷。（清）孙之騄注。《晴川八识》本。《樊谏议七家注》本。

《樊子》 2卷。（清）胡世安注。《樊谏议七家注》本。

吕　温

《吕衡州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吕温师事梁肃，写作古文。其文笔姿洒脱，语言简洁，当时深得刘

禹锡称赞。有《四库全书》本。

《吕和叔文集》　10卷。《四部丛刊》初印本，二次印本附校勘记1卷。

《吕衡州集》　10卷，附（清）顾广圻撰考证1卷。《粤雅堂丛书二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又有《唐人三家集》本。

元　稹

《元氏长庆集》　60卷，补遗6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元稹是中唐著名诗人，与白居易齐名。其文章法严谨，语言爽洁，议论叙事，自然真率。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元氏长庆集》　60卷，集外文章1卷。《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初印本，二次印本附张元济校文1卷。

《元微之文集校补》　1卷。（清）卢文弨撰。《抱经堂丛书·群书拾补初编》本。《丛书集成初编·群书拾补》本。

《元氏长庆集》　60卷。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宋抄本。

《元稹集》　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

沈亚之

《沈下贤集》　1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沈亚之是唐著名传奇作家，诗文也很有特色。其文构思奇异，语言奇险，与孙樵文风相近，而叙事形象，变化自如，则又胜之。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刘　蜕

《文泉子集》　1卷。散文集。刘蜕是晚唐重要古文作家。其文远宗扬雄，近师元结，造语奇奥，古拙艰深，以别于当时风行的骈丽文风。有《四库全书》本。

《文泉子集》　6卷。《别下斋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唐刘蜕集》　6卷。《四部丛刊》本。

《唐刘蜕集》　6卷，补遗1卷。《湖南丛书》本。

《文泉子》　不分卷。（明）归有光辑评。《诸子汇函》本。

杜　牧

《樊川文集》　20卷，外集1卷，别集1卷。收诗歌、散文和辞赋等。其文文势飞扬恣肆，语言铿锵优美。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樊川文集》　陈允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杜牧诗文选注》　朱碧莲、王淑均选注。选诗文共65篇。每篇有注释和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李商隐

《李义山文集笺注》　10卷。（清）徐树谷笺，（清）徐炯注。李商隐是晚唐著名骈文家，其文亦很有特色，言辞优美，明白晓畅，自成一家。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

荟要》本。

《李义山文集》 5卷。《四部丛刊》本。

《樊南文集详注》 8卷，附补，(清)冯浩编订。《四部备要》本。

《樊南文集补编》 12卷。(清)钱振伦、钱振常注。《四部备要》本。

孙 樵

《孙可之集》 10卷。散文集。孙樵是唐古文运动重要人物，其文力图创新，超奇走怪。但往往流于艰涩，气象比较促迫，且有模仿韩柳文痕迹。有《三唐人文集》本。《四库全书》本。

《孙可之文集》 10卷。《续古逸丛书》本。

《唐孙樵集》 10卷。《四部丛刊》本。

《孙可之文集》 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宋本。线装1册。

《孙文志疑》 10卷。(清)汪师韩撰。《业陆汪氏遗书》本。

罗 隐

《罗昭谏集》 8卷，收诗歌和散文。(清)张瓒辑。罗隐以小品文见称，其文善于讥刺，锋芒尖锐，被誉为晚唐小品文高峰。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谗书》 5卷附校1卷。《丛书集成》据拜经楼本排印。

《罗隐集》 雍文华校辑。末附生平传记、序跋书目著录及诸家评述材料。中华书局1983年版。

皮日休

《皮子文薮》 10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以议论见长，立论新颖、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是晚唐小品文代表作家。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校点本，萧涤非校点整理。

陆龟蒙

《笠泽丛书》 4卷补遗1卷。收诗歌和散文。陆龟蒙自编，多载杂文。其文善于讽刺，常以寓言、譬喻等，借物寄讽，以小见大，很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

《唐甫里先生文集》 20卷附校勘记1卷。(宋)叶茵辑。收诗歌和散文，内含《笠译丛书》。有《四部丛刊》本。

司空图

《司空表圣文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司空图以诗论著名。其文清丽优美，造语醇雅，意境疏淡，情趣深永，在晚唐具有一定影响。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续古逸丛书》本。

《司空表圣文集》 10卷，诗集3卷，附录1卷，校记1卷。《嘉业堂丛书》本。

徐 铉

《骑省集》 30卷。收诗歌和散文。徐铉文思敏捷，文风淹雅，名冠当时，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徐公文集》 30卷。《四部丛刊》本。

《徐公文集》 30卷，附补遗1卷，校勘记1卷。徐乃昌撰校勘记。《四部备要》本。

张 咏

《乖崖集》 12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张咏是西体派诗人之一，其文疏通平易，不作怪涩之语。有《四库全书》本。

《张乖崖事文录》 4卷。《五名臣遗集》本。

《乖崖先生文集》 12卷，附集1卷。《续古逸丛书》本。

柳 开

《河东集》 15卷，附录一卷。柳开仰慕韩柳，提倡文道合一。其文理古意高，迥异于宋初西昆体，但有辞涩言苦之弊。其集有《四库全书》本。

《河东先生集》 16卷。《四部丛刊》本。

穆 修

《穆参军集》 3卷。收诗歌和散文。穆修提倡古文，其文上承韩柳，下启尹欧，在宋代散文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有《四库全书》本。

《河南穆公集》 3卷，校补1卷。孙毓修撰校注。《四部丛刊》本。

王禹偁

《小畜集》 3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朴实流畅，清新淡雅，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具有开拓作用。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王黄州小畜外集》 13卷（存卷7至卷13）。（宋）王汾编。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 徐规著。有诗文辑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杨 亿

《武夷新集》 20卷。收诗歌和散文。杨亿是宋初西昆派创始人，其文从容典雅，在当时很有影响。其集有《四库全书》本。《浦城遗书》本。

《杨文公集》 4卷。《两宋名贤小集》本。

赵 湘

《南阳集》 6卷。收诗歌和散文。赵湘反对骈偶。以古文为主，有唐李翱、皇甫湜之遗风。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抱经楼丛刊》本。

《南阳集》 6卷，拾遗1卷。拾遗（清）劳格辑目，（清）孙星华录文。《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范仲淹

《文正集》 20卷，别集4卷，补编5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结构谨严，文气流畅，富于文采。《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范文正公集》 20卷，别集4

卷，政府奏议22卷，尺牍3卷，附录13卷。《四部丛刊》本。

《范文正公文集》 9卷。《正谊堂全书续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胡 宿

《文恭集》 4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工于骈偶，典重富丽，直追六朝。《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文恭集》 50卷，补遗1卷。《四库全书》本。

《文恭集》 40卷，拾遗1卷。拾遗（清）劳格辑目。

尹 洙

《河南集》 27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古峭劲洁，一洗五代浮靡文风，是宋古文运动重要作家。有《四库全书》本。

《河南先生文集》 28卷。《四部丛刊》本。

石 介

《徂徕集》 20卷，收诗歌和散文。石介标举儒家道统，提倡古文。其文劲健质实，有唐人之风，是宋古文运动重要作家。有《四库全书》本。

《徂徕石先生文集》 陈植锷点校。增补佚文。附录有石介生平及《徂徕集》文献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宋 庠

《宋元宪集》 4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宋庠之文追慕唐代张说和苏颋，为文温厚典雅，词藻华美，骈散相间，代表了北宋初期的写作风气。《四库全书》本。

《元宪集》 36卷。《湖北先正遗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 祁

《宋景文公集》 62卷，补遗2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宋祁主修《旧唐书·列传》，文字比较雕琢艰涩。其他散文则博奥典雅，别具风格。有《四库全书》本。

《景文集》 62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欧阳修

《文忠集》 153卷，附录5卷。收诗词、散文和辞赋等。欧阳修大力倡导古文，其文简洁明畅，说理透辟，状物写情，委婉曲折，开北宋一代文风，在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四库全书》本。

《欧阳文忠公文集》 153卷，附录5卷。《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卷首有宋人胡柯编《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又有《四部备要》本。

《欧阳永叔集》 《万有文库》第一集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据此本重印。

《欧阳文粹》 20卷，（宋）陈亮辑。《四库全书》本。

《欧阳庐陵文选》 4卷。（清）孙琮编。《山晓阁文选》本。

《此木轩庐陵文选》 1卷。(清)焦袁熹撰。《此木轩全集》本。

《欧文选》 1卷。(清)陈兆仑选。《陈太仆批选八大家文钞》本。

《欧阳修文选》 杜维沫、陈新选注。选文81篇。依年编次，末附《宋史·欧阳修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欧阳修文选读》 陈蒲清选注。选文71篇。岳麓书社1984年版。

韩 琦

《安阳集》 5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词气典重，议论时事，深刻而贴切。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韩魏公集》 20卷。《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孙 复

《孙明复小集》 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多议论说理、文风谨严峭洁，对宋古文运动有一定促进作用。《四库全书》本。

苏舜钦

《苏学士文集》 16卷，补校语1卷。收诗歌和散文。苏舜钦以诗名世。其文古雅清秀，简而有法，是宋古文运动重要作家之一。有《四部丛刊》本，校语为清人何焯撰。

《苏学士文集》 16卷。《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

《苏舜钦集》 沈文倬校点。以清康熙间宋荦校定、徐惇复刊本为底本校点整理。另编拾遗1卷，附录2卷，选辑各家传记、诗话、序跋及校者撰年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修订版。

苏 洵

《嘉佑集》 16卷附录2卷。收诗歌、散文和辞赋。苏洵擅长策论，其文纵横捭阖，气势雄壮，有战国纵横家之风。有《四库全书》本。《三苏文集》本。

《老泉先生文集》 12卷附考异1卷。(宋)郎晔注，罗振常撰考异。《经进三苏文集事略》本。

《经进嘉佑文集事略》 1卷附考异1卷。(宋)郎晔注，罗振常辑佚并撰考异。《经进三苏文集事略》本。

《老泉先生文集补遗》 2卷。罗振常辑。《经进三苏文集事略》本。

《嘉佑集选》 1卷。(明)赵南星选。《味檗斋遗书》本。

《苏老泉文集》 2卷。(清)孙琮选。《山晓阁文选》本。

《老苏文选》 1卷。(清)陈兆仑选。《陈太仆选批八大家文选》本。

李 觏

《盱江集》 37卷，外集3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长于议论，立论高远，说理深刻，较有新意。《四库全书》本，卷首有年谱一卷。

《直讲李先生文集》 37卷，外集3卷。《四部丛刊》本。

文 同

《丹渊集》 40卷，拾遗2卷，附录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文同以书画名世。其文文笔精炼，条理清楚，较有神韵。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丹渊集》 40卷，拾遗2卷，附录1卷（明）陈继儒订正。《四部丛刊》本。

刘 敞

《公是集》 54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刘敞以政论文见长，其文内容翔实，语言生动，深刻有力。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周敦颐

《周元公集》 9卷。收散文。其文简洁优美，章法精妙，富有理趣。有《四库全书》本。

《周濂溪先生全集》 13卷。《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据此。

曾 巩

《元丰类稿》 50卷。收诗词和散文。其文不重文采，质实淳厚，自成一家，对后世散文有一定影响。有《四库全书》本。

《南丰先生元丰类稿》 50卷，附录一卷。《四丛刊》本。

《元丰类稿》 50卷，附行状墓志。《四部备要》本。

《元丰类稿补》 2卷。（清）陆心源辑。收入《潜园总集·群书校补》。

司马光

《傅家集》 8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司马光以史家名世，编有《资治通鉴》。其文不喜骈体，多用古文体，行文劲爽，简洁明快。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温国文正公文集》 80卷。《四部丛刊》本。

《司马温公文集》 14卷，首1卷。《四部备要》本。《赵氏藏书》本。

《资治通鉴》 （元）胡三省音注。国学整理社1935年版。

《资治通鉴》 （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校点出版，1976年重印。

《资治通鉴选讲》 王仲荦等编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1979年重印。

王安石

《临川集》 100卷。收诗词和散文。其文立意高远，语言简洁雄健，不假比浮辞，析理透彻明晰，是宋代古文代表作家。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题《临川先生文集》。又有《四部备要》本。

《临川先生文集》 中华书局1959年校点本，附陆心源、朱孝臧、唐圭璋及日本岛田翰所辑王氏诗文佚篇。

《王荆公诗文笺注》 （宋）李壁笺注。有清绮斋刊本。中华书局上

海编辑所据此本排印，并校点整理。1958年版。

《王荆公诗文集注》 8卷。(清)沈钦韩注。《嘉业堂丛书》本，全称《王荆公诗集李壁注勘误补正四卷王荆公文集注八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本排印，简题《王荆公诗文沈氏注》。1959年版。

《王临川文选》 1卷。(清)孙琮选。《山晓阁文选》本。

《王文选》 1卷。(清)陈兆仑选。《陈太仆选批八家文钞》本。

《王安石诗文选注》 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选注。选诗文24篇。各篇有说明和注释。江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张　载

《张横渠先生文集》 1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张载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其文析理透辟，取材翔实，有一定成就。有《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子文集钞》 1卷。《四库全书》本。《张子全书》，本。《四部备要》本。

沈　括

《梦溪笔谈》 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等17类。内容涉及科学技术、历史、考古及文学艺术诸方面。文章用笔简洁，行文精确严谨而不乏文采。有元刻本，明仿宋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元刻本。

《新校正梦溪笔谈》 胡道静校注。末附沈括事迹年表。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又有中华书局1957年版，此本校注较简。

《梦溪笔谈选注》 《梦溪笔谈》注释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长兴集》 41卷(缺卷1至卷12、卷31、卷33至卷40)。除收《梦溪笔谈》外，另有骈文及表、启等文。有《四部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苏　轼

《东坡全集》 115卷。收诗词、散文和辞赋。其文笔墨恣肆，疏密有致，舒卷自如，于诗情画意中蕴含人生哲理，情理交融，朴素自然，是宋代古文代表作家。有《四库全书》本，卷首有宋人王宗稷编年谱1卷。《四部备要》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据此本重印。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60卷。(宋)郎晔注。精于考订，是苏文最早的注本。有《四部丛刊》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重印本。民国罗振常撰事略《考异》4卷，收入《经进三苏文集事略》本。

《苏东坡文选》 6卷。(清)孙琮选。《山晓阁文选》本。

《大苏文选》 1卷。(清)陈兆仑选。《陈太仆批选八大家文选》本。

《苏轼选集》 王水照选注。选诗、词、文共320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苏 辙

《栾城集》 50卷，后集24卷三集10卷，应诏集12卷。收诗词、散文和辞赋。其早期文笔法雄隽，富有锋芒。晚期文沉静简洁，汪洋淡泊。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经进栾城文集事略》 1卷附考异1卷。（宋）郎晔注。罗振常辑佚并撰考异。《经进三苏文集事略》本。

《小苏文选》 1卷。（清）陈兆仑选。《陈太仆批选八大家文选》本。

《三苏文选》 牛宝彤选注。选苏洵文10篇，苏轼文54篇，苏辙文8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晁补之

《鸡肋集》 70卷。收诗词、散文和辞赋。其文文势跌宕，波澜起伏，颇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黄庭坚

《山谷内集》 30卷，外集14卷。别集2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黄庭坚是宋江西诗派创始人。论文主张以理为主，理得辞畅。其文则典雅富赡，略带艰涩。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豫章先生文集》 30卷。《四部丛刊》本。

《豫章先生文粹》 4卷。《苏门六君子文粹》本。

李 廌

《济南集》 8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条畅曲折，辨而中理，气势纵横，颇近苏轼。《四库全书》本。《宋人集丙编》本。

《济南先生文粹》 5卷。《苏门六君子文粹》本。

王 令

《广陵集》 30卷，拾遗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纵横骋辞，很有气势。有《四库全书》本。

《广陵先生文集》 20卷，拾遗1卷，补遗1卷，附录1卷。《嘉业堂丛书》本。

《王令集》 21卷。沈文倬校点。有诗文拾遗。附王令生平及作品评论，点校者所编《王令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张 耒

《宛邱集》 76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妙。其集有《四库全书》本。

《柯山集》 50卷，拾遗12卷，续拾遗1卷。（清）陆心源辑拾遗，续拾遗编者佚名。《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右史文集》 60卷。《四部丛刊》本。

《宛邱先生文粹》 22卷。《苏门六君子文粹》本。

秦 观

《淮海集》 40卷，后集6卷。收

诗词和散文等。秦观以词著称，其文清新婉丽、运思深沉，在当时有较大影响。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淮海集》　17卷，后集2卷，补遗1卷，续补遗1卷，考证1卷。(清)王敬之等辑补遗考证。《四部备要》本。

《淮海先生文粹》　14卷。《苏门六君子文粹》本。

陈师道

《后山集》　24卷。收诗歌、散文和丛谈等。陈师道当时以诗著称，但其文简洁严整，构思缜密，直承唐之李翱、孙樵。《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后山先生集》　24卷。《四部备要》本。

《后山先生集》　30卷。《适园丛书》第九集本。

《后山居士文粹》　4卷。《苏门六君子文粹》本。

李格非

《洛阳名园记》　1卷。李格非主张为文要诚，要字字从肺肝出。其文言辞精炼，感慨深沉，在当时较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古今逸史》本。

李清照

《漱玉集注》　王延弟注。收辑诗词和散文。李清照以词名世，其文笔墨疏秀，以情贯文，自然工稳。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李清照集》　本文根据王延弟、丁锡根和胡文楷的两种辑稿整理编成。收有李清照诗、词、文等。末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李清照事迹考辨》等资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李清照集校注》　王学初校注。各篇后有注释及历代评议资料。末附校注者所撰《李清照事迹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重辑李清照集》　黄墨谷编著。附李清照年谱及历代评论资料。齐鲁书社1981年版。

宗　泽

《宗忠简集》　8卷。收诗歌和散文。宗泽是宋抗金名将，其疏奏之文言辞慷慨激切、很有感召力。《四库全书》本。

《宗忠简公集》　4卷。《乾坤正气集》本。

《忠简公集》　7卷，附辨伪考辨1卷。(清)胡凤丹撰辨伪考异。《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杨　时

《龟山集》　4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以奏疏和答辩见长，论议时事激切而翔实。有《四库全书》本。

《杨龟山先生集》　6卷。《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元干

《芦川归来集》　10卷，附录1

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张元干以词著称，其文长于题跋，颇具苏黄遗风。有《四库全书》本。

张　守

《毘陵集》　15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长于议论，谈论国事，明晰深透，且切合时用。有《四库全书》本。

《毘陵集》　16卷。《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毘陵集》　16卷，拾遗1卷。佚名辑拾遗。《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唐　庚

《唐子西集》　24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善学东坡，长于议论，精确高远，较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

《眉山唐先生文集》　30卷。附张元济撰校勘记1卷。《四部丛刊三编》本。

叶梦得

《石林居士建康集》　8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运思高雅，词藻丰腴，有北宋遗风。有《四库全书》本。《石林遗书》本。

汪　藻

《浮溪集》　36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工于丽语，明白洞达，曲折感人。在当时很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

《浮溪集》　32卷。《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四部丛刊》本。

《浮溪集》　32卷，拾遗3卷。（清）孙星华辑拾遗。《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浮溪文粹》　15卷。《四库全书》本。

李　纲

《梁溪集》　180卷，附录6卷。收诗歌和散文等。李纲是南宋著名政治家，其文雄深雅健，辞义鲜明，很有感染力。有《四库全书》本。

郑刚中

《北山集》　30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简炼古朴，疏爽明晰，自成一家。有《四库全书》本。

《北山文集》　30卷，末1卷。《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李　侗

《李延平先生文集》　4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清疏简洁，较有特色。有《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朱　松

《韦斋集》　1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温婉典裁，尤长于议论，论述透辟而切中事理。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

刘子翚

《屏山集》　20卷。收诗歌和散文

等。其文长于说理，辨析明快，曲折尽意。议事之文；洞悉时势，明体达用。《四库全书》本。

岳 飞

《岳武穆遗文》 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其文感情激昂，用词恳切，铿锵有力。有《四库全书》本。

《岳忠武王集》 1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岳忠武王集》 4卷。《乾坤正气集》本。

胡 铨

《胡澹庵先生文集》 32卷附录2卷。收诗词和散文。其文善长辨论，用词精确，且纵横恣肆，富有感染力。有《宋庐陵四忠集》本。

《澹庵文集》 6卷。收诗词和散文。《四库全书》本。

王十朋

《梅溪集》 54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规矩闳阔，骨骼开张，变化自如。《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梅溪王先生文集》 54卷。《四部丛刊》本。

洪 适

《盘州文集》 80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精切质实，表启疏状诸篇，足以补史。《四库全书》本。

《盘州文集》 80卷，附录1卷，拾遗1卷。《四部丛刊》所印本。二次印本有张元济札记1卷。

韩元吉

《南涧甲乙稿》 2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渊源欧苏，言辞自然清爽，很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南涧集甲乙稿》 22卷，补遗1卷。补遗（清）劳格辑目，（清）孙星华录文。《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洪 迈

《容斋题跋》 2卷。洪迈学问渊博，善写读书札记，其《容斋随笔》内容浩繁，多有创见，对后世影响甚大。此本系洪迈札记之一，语言简练而严整，颇见功力。有《津逮秘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汪应辰

《文定集》 24卷。散文集。其文雅博渊深、奏疏之文论事精确，激切感人。有《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文定集》 24卷，拾遗1卷。拾遗（清）陆心源辑目，（清）傅以礼录文，《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陆游

《渭南文集》 50卷。收词和散文。其文言词简洁，章法灵活，在南

宋文坛有较大影响。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陆放翁集》 收《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遗稿》、《老学庵笔记》等七种。《万有文库》本。全24册。

《陆游集》 收《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遗稿》。末附《陆游佚著辑存》。中华书局1976年版。

《陆游选集》 朱东润选注。选诗、词、文314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初版，1979年修订再版。

范成大

《石湖纪行三录》 4卷。其文层次鲜明，取舍精当，文势跌宕，富有神韵。此三录无合刊本，其中《揽辔录》1卷，《骖鸾录》1卷，《吴船录》2卷。均收入《知不足斋丛书》。另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范成大佚著辑存》 孔凡礼辑。辑范氏佚文50多篇，诗词若干首，残篇若干。各类佚文大体以时代先后为序，佚文时间不明者，略加"案"考订。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杨万里

《诚斋集》 133卷。收诗歌和散文等。杨万里以诗著称，创诚斋体。其文文笔条达，运思灵活，感情真切，亦很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杨万里选集》 周汝昌选集。收诗词文赋等。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重版。

陈　亮

《龙川文集》 30卷，首1卷，补遗1卷，附录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陈亮擅长政论文，其语言平易，宏富典丽，意理相兼。有《四部备要》本。

《龙川文集》 30卷，附录1卷，辩伪考异二卷。有《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陈亮集》 校点本。中华书局1974年版。

《陈亮诗文选注》 上海市建工局工人理论组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叶　适

《水心先生文集》 29卷。收散文和诗歌等。叶适以政论文见长，其文以经史为基础，析理细密，语言简朴厚重。其集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水心文集》 29卷，补遗1卷。《永嘉丛书》本。

《叶适集》 刘公纯等校点。收《水心文集》和《水心别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张孝祥

《于湖集》 4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规模苏轼，天才超逸，纵横兀傲，别具一体。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于湖居士文集》 40卷。附录1卷。《四部丛刊》本。

朱　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朱熹是宋著名道学家。其文则笔法典丽，平实自然，有一定成就。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朱子文集》　18卷。《正谊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陆九渊

《象山先生全集》　36卷。收散文和诗歌，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其文平实稳健，质朴深厚，较有特色。有《四部丛刊》本。

《陆象山先生全集》　36卷。(清)李绂评点。《四部备要》本。

《陆九渊集》　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

真德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51卷。收诗歌和散文。真德秀是南宋理学家之一，其文以议论为主，说理透辟，层次明晰，在当时较有影响。有《四部丛刊》本。

《西山文集》　55卷。《四库全书》本。

《真西山先生集》　8卷。《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西山文钞》　8卷。《浦城遗书》本。

陈傅良

《止斋先生文集》　52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雄伟精深，流畅自然，错综起伏，自成一家。《四部丛刊》本。《永嘉丛书》本。

《止斋文集》　52卷，附录1卷。《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楼　钥

《攻媿集》　11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词气雄深，笔力雅健，在当时较有影响。《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攻媿集》　112卷，拾遗1卷。(清)傅以礼辑拾遗。《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辛弃疾

《辛稼轩诗文钞存》　邓广铭辑。辛弃疾以词著称。其文语言洁爽，情理契合，平坦之外见波澜。旧有词集行世，诗文为后人所辑。此本民国期间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由作者重加增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辛弃疾词文选注》　《辛弃疾词文选注》注释组编选，选文四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袁　燮

《絜斋集》　24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不事雕琢，剖析义理，铺陈利病，较为自然。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絜斋集》　24卷，拾遗1卷。拾

述（清）劳格辑目，（清）孙星华录文。《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袁正献公遗文钞》 2卷，附录3卷。《四明丛书》第四集本。

陈 淳

《北溪大全集》 50卷，外集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陈淳师事朱熹，其文质朴真挚，无所修饰，当时影响较大。有《四库全书》本。

《北溪先生各体文》 30卷。《北溪先生全集》本。

刘 过

《龙洲集》 14卷，附录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跌宕纵横，才气横溢，多粗豪抗厉之声，很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

《龙洲集》 10卷。《函海》（乾隆本、道光本）第九函本。《函海》（光绪本）第十二函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魏了翁

《鹤山全集》 109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追慕韩愈，根柢经术，纡徐宕折，自然醇正，在南宋中叶别是一家。有《四库全书》本。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110卷。《四部丛刊》本。

洪咨夔

《平斋文集》 3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以议论时事为主，忠言谠论，力陈时弊，自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

《平斋文集》 32卷，拾遗1卷，校记1卷。（清）汝奎撰校记。《洪氏晦木斋丛书》本。

王应麟

《四明文献集》 5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典雅温丽，词藻工美。记述之文翔实准确，足以证史。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四明文献集》 5卷，补遗1卷。《四明丛书第一集》本。

《深宁先生文钞摭余编》 3卷。《四明丛书第一集》本附。

金履祥

《仁山集》 6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渊源经籍，醇洁有法，言之有物，切合实用。有《四库全书》本。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 5卷。《金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周 密

《武林旧事》 10卷附录1卷。此书记录南宋朝章典制、杭州山川、风俗、市肆、物产及诸色伎艺。文辞优美，雅博富赡。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武林掌故丛编》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齐东野语》 20卷。书中考证极详，记述南宋旧事，尤多记朝廷大政，可补史阙。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癸辛杂识》 前集1卷后集1卷续集2卷别集2卷。书中多记述南宋琐事杂言、遗文佚事，可资考据。因作于杭州癸辛街，故名。有《四库全书》本。《津逮秘书》。《学津讨原》本。

文天祥

《文山集》 21卷。收诗词和散文等。其文雄赡富博，慷慨沉郁。有《四库全书》本，另收原跋9条，文天祥自撰《纪年录》1卷，可资考据。

《文山先生全集》 20卷。《四部丛刊》本。

《文山先生文集》 2卷。《正谊堂全书》本。

《文文山文集》 2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文天祥全集》 20卷。中国书店1984年排印本。

刘克庄

《后村集》 5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刘克庄是南宋江湖诗派代表作家。其文雅洁疏爽，尤善题跋。有《四库全书》本。

《后村先生大全集》 196卷。《四部丛刊》本。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 10卷。记述东京汴梁（开封）的地理名胜、民间风俗，并涉及当时宫廷生活。文笔简洁，语言灵活生动。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郑思肖

《郑所南先生文集》 1卷，附录1卷，补遗1卷。郑思肖以诗画名世，其文笔墨自然，雅致清新。有《知不足斋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郑所南先生文集》 1卷，附校勘记1卷。张元济校。《四部丛刊续编》本。

谢枋得

《叠山集》 5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内容宏博，法度谨严，是南宋末年散文大家。有《四库全书》本。

《谢叠山先生文集》 4卷。《乾坤正气集》本。

《宋谢文节公集》 6卷。《半亩园丛书》本。

《谢叠山先生文集》 2卷。《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叠山集》 16卷。《四部丛刊续编》本。

刘辰翁

《须溪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直追韩欧，初以奇怪磊落为宗，用词艰涩。宋亡之后。托意深远，而自然平易。有《四库全书》本。

《须溪集》 7卷。附魏元旷撰校勘记1卷，胡思敬撰校勘续记1卷。《豫章丛书》本。

邓　牧

《伯牙琴》 1卷。散文集。邓牧

与周密、谢枋得齐名。其文放旷，寄托亡国之感。高洁自然，很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

《伯牙琴》 1卷，补遗1卷。《知不足斋丛书》本。《武林往哲遗著》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林景熙

《林齐山集》 5卷。收诗集《白石樵唱》3卷文集《白石稿》2卷。其文工于刻画，婉曲含蓄，语言苍凉沉郁，多哀国忧时之感。有《四库全书》本。

《齐山先生集》 5卷首1卷拾遗1卷。（元）章祖程注。有《知不足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齐山集》 5卷。中华书局排印本。1960年版。

谢　翱

《晞发集》 10卷，遗集2卷，遗集补1卷，附《天地间集》1卷，《西台恸哭记注》1卷，《冬青引注》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曲折婉转，寄意深厚。有《四库全书》本。《国粹丛书第二集》本。

赵秉文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20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长于辨析，笔墨酣畅，意尽而止，不受形式拘束。《四部丛刑》本。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20卷，补遗1卷，附录1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20卷，附校札记2卷，附录1卷。（清）吴重憙撰札记附录。《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

《滏水集补遗》 1卷。孙德谦辑。《金源七家文集补遗》本。

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 45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形象生动，辞达理顺，意旨深远，尤长于小品文。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滹南遗老集》 45卷，诗集1卷，续编诗集1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滹南遗老集》 45卷，续1卷。《四部丛刊》本。

《滹南遗老集补遗》 1卷。孙德谦辑。《金源七家文集补遗》本。

元好问

《遗山集》 40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笔墨简洁，转折有致，自然酣畅，是金国散文大家。《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遗山先生文集》 40卷，附录1卷。《四部丛刊》本。

《元遗山先生集》 40卷，附录1卷，补载1卷。《元遗山先生全集》本。《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

《遗山集补遗》 1卷。孙德谦辑。《金源七家文集补遗》本。

《元遗山先生集考证》 3卷。

佚名撰，《元遗山全集》本。

《元遗山先生文选》　7卷。（清）李祖陶选。《金元明八大家文选》本。

戴表元

《剡源集》　30卷。收诗词和散文。其文清深雅洁，化腐朽为神奇，描摹刻划，隐而不晦，以文章名重一时。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题《剡源戴先生文集》。

《剡源集》　30卷附札记1卷。（清）郁松年撰札记。有《宜稼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剡源集逸文》　1卷。缪荃孙辑。《艺风堂读书志·剡源集校》附。

耶律楚材

《湛然居士集》　14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温雅平淡，自然清逸，在元代很有影响。《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湛然居士文集》　14卷。《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王恽

《秋涧集》　10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词藻富赡，造语雅重．在当时影响较大。《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　100卷，附录1卷。《四部丛刊》本。

姚燧

《牧庵文集》　36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纵横开阖，以气使辞，古劲挺拔。为当时一代文宗。《四库全书》本。

《牧庵集》　36卷。《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姚牧庵先生文选》　5卷。（清）李祖陶选。《金元明八大家文选》本。

许　谦

《白云集》　4卷。收诗歌和散文。许谦长于古文，其文醇古流畅，无宋人语录之气，较有特色。《四库全书》本。

《许白云先生文集》　4卷。《四部丛刊续编》本。

《白云集》　4卷，首1卷。《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赵孟頫

《松雪斋集》　10卷，外集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赵以书画名世，其文清雅流畅，自成一家。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松雪斋文集》　10卷，诗文外集1卷。《四部丛刊》本。

刘　因

《静修集》　3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笔势遒劲、醇正清雅，在当时影响较大。有《四库全书》本。

《静修集》　25卷，续集3卷，

《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静修先生文集》 22卷。《四部丛刊》本。

《静修先生文集》 12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虞 集

《道园学古录》 5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法度谨严，辞旨精实，在当时较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

《虞文靖公全集文》 44卷。《古棠书屋丛书》本。

《虞道园文选》 2卷。(清)刘肇虞选评。《元明八大家古文选》本。

袁 桷

《清容居士集》 5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博硕伟丽，造语工练，在当时颇有影响。《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清容居士集》 50卷，附札记1卷。(清)郁松年撰札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

柳 贯

《待制集》 20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汪洋博洽，辩论宏伟。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柳待制文集》 20卷，附录1卷。《四部丛刊》本。《续金华丛书》本。

揭傒斯

《文安集》 14卷。收诗歌和散文。揭傒斯以诗著称，其文叙事严整，语言简洁，尤善碑传之文。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揭文安公全集》 14卷，补遗1卷。《四部丛刊》本。

《揭文安公文集》 9卷，补遗1卷，附校勘记1卷。胡思敬撰补遗。《豫章丛书》本。

《揭文安公文粹》 2卷。《粤雅堂丛书初编第二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揭文安公文粹》 6卷。《半亩园丛书》本。

吴 澂

《吴文正集》 100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构思缜密，情理兼备，为当时一代学宗。有《四库全书》本。

李孝光

《五峰集》 6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笔法腾挪跌宕，语言清爽优美，在元代文坛独具风格。有《四库全书》本。

《五峰集》 10卷补遗1卷。冒广生辑补遗。《永嘉诗人祠堂丛书》本。

黄 溍

《黄文献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词采清雅，含蓄深远，较有特色。《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黄文献公集》 10卷，补遗1卷，附录1卷。《金华丛书》本。《丛

书集成初编》本。

《金华黄先生文集》 43卷。《四部丛刊》初印本。《续金华丛书》本。又：《四部丛刊》二次印本附张元济撰校记1卷。

欧阳玄

《圭斋集》 15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典实质朴，无夸诞之词。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圭斋文集》 16卷。《四部丛刊》本。

苏天爵

《滋溪文稿》 30卷。散文集。其文词华淹雅，波澜起伏，有欧苏之风。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具特色。《四库全书》本。《适园丛书第六集》本。

杨维桢

《东维子集》 31卷，附录1卷。收散文和诗歌等。其文通俗平易，自然质朴，是元代散文名家。《四库全书》本。

《东维子文集》 31卷。《四部丛刊》初印本。二次印本附傅增湘校勘记1卷。

《丽则遗音》 4卷，赋集。《四库全书》本。

吴莱

《渊颖集》 12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师承秦汉，雄深卓绝，下开明代文风。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渊颖吴先生集》 12卷，附录1卷。《四部丛刊》初印本。

《渊颖集》 12卷。《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渊颖吴先生集》 12卷，附录1卷，附考异1卷。胡宗楙撰考异。《续金华丛书》本。

《渊颖吴先生集》 10卷，附录1卷，札记1卷。林志恒撰札记。《四部丛刊》二次印本。

陈基

《夷白斋稿》 35卷，外集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笔姿洒脱，雍容闲雅，较有特色。《四库全书》本。

《夷白斋稿》 35卷，外集1卷，补遗1卷，附胡文楷撰校勘记1卷。《四部丛刊三编》本。

宋濂

《宋学士全集》 36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辞采富赡，雍容浑穆，气脉流畅，变化自如。是明初一代文宗。有《四库全书》本。

《宋学士全集》 32卷，补遗8卷，附录2卷。《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学士文集》 75卷。《四部丛刊》本。

《宋文宪公全集》 53卷，首1卷。《四部备要》本。

《宋景濂未刻集》 2卷。《四库

全书》本。

《宋文宪先生集选》 11卷。（明）张汝瑚选。《明八大家集》本。

《宋景濂先生文选》 7卷。（清）李祖陶选。《金元明八大家文选》

刘 基

《诚意伯文集》 2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逻辑严密，古朴深厚，尤以讽刺小品见长，是明初散文大家。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20卷。《四部丛刊》本。

《诚意伯先生集选》 5卷。（明）张汝瑚选。《明八大家集》。

《郁离子》 魏建猷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郁离子寓言选》 熊宪光编译。选寓言63篇。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郁离子寓言故事选译》 鲍敬毅编。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唐桂芳

《白云集》 7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学苏洵，以意使词，容与逶迤，无聱牙晦涩之习。有《四部丛刊》本。

《白云文稿》 3卷。《唐氏三先生集》本。

王 祎

《王忠文公集》 24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醇朴宏肆，气象沉雄，浑然天成，深受宋濂赞誉。有《四库全书》本。

《王忠文公集》 20卷。《乾坤正气集》。《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高 启

《凫藻集》 5卷。散文集，高启以诗著称，其文作风朴实，叙事生动，简洁明快，很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

《高太史凫藻集》 5卷。《四部丛刊》本，末附词集《扣舷集》。又有《四部备要》本。

张 羽

《张来仪先生文集》 1卷，补遗1卷。张羽有诗名，其文简洁典雅，尤长于叙事，条理清晰，详略得体。有《豫章丛书》本。

贝 琼

《清江贝先生文集》 30卷，诗集10卷。贝琼于文主张平衍丰腴，反对刻峭险怪，其文自然清新，温厚平婉，在当时较有影响。有《四部丛刊》本。

《贝清江诗文集》 41卷。诗集10卷，文集31卷。《四库全书》本。

《贝清江先生全集》 40卷。《文瑞楼丛刊》本。

苏伯衡

《苏平仲文集》 16卷。首1卷。

收诗歌和散文。其文词采蔚赡，章法清晰，较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苏平仲集》 16卷。《四部丛刊》本。

王叔英

《静学文集》 1卷。散文集。王叔英于文造诣颇深，但其文大都散佚，此本仅收序、记两种文体，难见其全貌。《四库全书》。

《静学先生文集》 3卷，首1卷，末1卷。《螺树山房丛书》本。

《王静学先生文集》 3卷，补遗1卷，附录1卷。《嘉业堂丛书》本。

方孝孺

《逊志斋集》 24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师从宋濂，纵横豪放，词锋锐利，自成一家，是明代散文大家。有《四库全书》本。

《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 24卷。《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逊志斋集》 24卷，附录1卷。《四部丛刊》本。

《方正学先生文集》 7卷。《正谊堂全书》本。

《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 11卷。(明)李贽辑。《三异人文集》本。

《方正学先生集选》 13卷。(明)张汝瑚选。《明八大家集》本。

薛 瑄

《薛文清集》 24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不事雕琢、清新典雅，有异于当时台阁体文风。有《四库全书》本。

《薛敬轩先生文集》 10卷。收散文。有《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薛文清公文集》 8卷。《续中州名贤文表》本。

王 直

《抑庵集》 30卷，后集37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典雅纯正，温厚和平，在当时很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

于 谦

《于忠肃集》 13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以政论文见长，奏议中立论高远，辨理精确，切合时务，足见其经济之才。有《四库全书》本。

《于忠肃公集》 4卷。《乾坤正气集》本。

《于肃愍公集》 8卷，拾遗1卷，附录1卷。《武林往哲遗著后编》本。

《李卓吾评于节庵集》 8卷，附1卷，补遗1卷。(明)李贽辑。《三异人文集》本。

李 贤

《古穰集》 3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质实娴雅，自然而温厚，无矫揉造作之习。有《四库全书》本。

倪 谦

《倪文僖集》 3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章法严谨，朴而不俚，简而不陋，有别于当时台阁体，自成一家。有《四库全书》本。

《倪文僖公集》 32卷，补遗1卷。《武林往哲遗箸后编》本。

韩 雍

《襄毅文集》 15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气雄意直，高视阔步，有韩愈遗风，迥异于当时台阁体。有《四库全书》本。

岳 正

《类博稿》 10卷，附录2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雅健脱俗，高简峻拔，质实古朴，力抗当时台阁体，对后代散文有一定影响。有《四库全书》本。

郑文康

《平桥稿》 18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不假修饰，简朴法度，颇似宋石介，伊洙之作。有《四库金书》本。

张 宁

《方渊集》 26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长于议论，奏疏之文伟言正论，切合国事，磊落有气。有《四库全书》本，附《读史录》4卷。

丘 濬

《重编琼台会稿》 24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好论天下事，富博雄辩，冠绝一时。有《四库全书》本。

《丘文庄公集》 10卷。《上海二公文集合编》本（康熙本、乾隆本）。

郑 纪

《东园文集》 13卷，续编1卷。散文集。其文气畅思深，辩博而不杂，切中时政，有苏洵遗风。有《四库全书》本。

胡居仁

《胡文敬公集》 3卷。文集。胡居仁是明著名理学家，提倡经世宰物之学，其文醇正清雅，有儒者之风。有《四库全书》本。

《胡敬斋先生文集》 3卷。《正谊堂全书》本。《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吴 宽

《家藏集》 77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以苏轼为宗，平和恬雅，雍容轻缓，在当时很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匏翁家藏集》 77卷，补遗1卷。《四部丛刊》本。

李东阳

《怀麓堂集》 100卷。收诗歌和散文。李东阳坚决反对台阁体，开创了茶陵诗派。其文平正典雅，质朴务实，为明朝一代文宗，对后代散文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李东阳集》 周寅宾校点。岳麓书社出版社1984年版。

王 鏊

《震泽集》 36卷。散文集。王鏊以写古文为主，渊源经术，典雅遒洁，有唐宋古文遗风，尤以制义名传一代。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王守溪集》 不分卷。《广理学备考第一函》本。

张 吉

《古城集》 6卷，补遗1卷。收诗歌和散文。张吉生于明代文风由台阁体向向复古派转变时期，其文辞气刚正，不事雕琢而通脱晓畅，独具风格。有《四库全书》本。

《张古城先生文略》 1卷，补遗1卷。《张古城先生文集》本。

蔡 清

《虚斋集》 5卷。收诗歌和散文。真文淳厚朴直，言皆有物，语言清爽，不假修饰。有《四库全书》本。

《蔡虚斋集》 不分卷。《广理学备考第一函》本。

邵 宝

《容春堂集》 61卷，前集20卷，后集14卷，续集18卷，别集9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学茶陵体，典重和雅，以李东阳为宗。有《四库全书》本。

马中锡

《东田集》 15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笔法灵活，饶有情趣，尤以寓言见长。《马东田孙沙溪两公遗集合编》本。

《东田文集》 3卷，诗集3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林 俊

《见素文集》 28卷，奏疏7卷，续集12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体裁多样，奇崛博奥，不沿袭台阁体，自成一家。有《四库全书》。

罗 玘

《罗圭峰文集》 3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规模韩愈，纡徐奥折，戛戛独造，在明代别树一帜。有《四库全书》本。

吴 俨

《吴文肃公摘稿》 4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布局从容，语言典实古朴，无台阁体陋习，足以与李东阳相并列。有《四库全书》本。

石 珤

《熊峰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石珤反对台阁体，是茶陵派作家。其文平正通达，无浮华之习。有《四库全书》本。

邹 智

《立斋遗文》 5卷。收诗歌和散

文。其文感情丰沛，言辞锋利，不假修饰，真挚感人。有《四库全书》本。

《立斋遗文》 4卷。《乾坤正气集》本。

顾 清

《东江家藏集》 4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顾清是茶陵派重要作家，其文简炼醇雅，法度灵活，较有成就。有《四库全书》本。

唐 寅

《六如居士诗文集》 7卷，补遗1卷。唐寅以书画名世。其文笔姿飘洒，言辞清爽，变幻自如。有《六如居士全集》本。

《才子文》 1卷。《巾箱小品》本。

文徵明

《甫田集》 35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文徵明以书画名世，其文博雅典则，在当时较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王守仁

《王文成全书》 38卷。收诗歌和散文。王守仁主张直抒胸臆，反对模仿，其文感情真挚，言辞谐婉，独具风格。有《四库全书》本。

《王文成公全书》 38卷。《四部丛刊》本。附明钱德洪著《年谱》。又有《四部备要》本。

《文章集》 4卷，(明)施邦曜评辑。《四部丛刊》本。

《王阳明文选》 2卷。(清)刘肇虞选评。见《元明八大家古文选》

李梦阳

《空同集》 66卷。收诗歌和散文。李梦阳倡导复古，主张文必秦汉，是明前七子代表人物。其主要成就在诗，其文运思谨严，古奥深厚，但有聱牙艰涩之弊。有《四库全书》本。

康 海

《对山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康海是前七子之一。其文成就高于诗，长于议论，切中时弊，有异于李梦阳文风，时人以司马迁之才比之。有《四库全书》本。

何景明

《大复集》 38卷。收诗歌和散文。何景明倡导复古，主张文必秦汉，是前七子代表人物，与李梦阳齐名。何景明亦以诗著称，其文工于析理，论述精深。但有堆砌晦涩之嫌。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徐祯卿

《迪功集》 6卷，附《谈艺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徐祯卿是明复古派之一。其《谈艺录》颇负盛誉。其文醇雅自然，有异于何、李之作。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何瑭

《柏斋集》 11卷。收诗歌和散文。何瑭是明理学家之一，其文古朴质实，不拘法度，变化自然。有《四库全书》本。

《何文定公柏斋集》 10卷。《续中州名贤文表》本。

《何粹夫集》 不分卷。《广理学备考第五函》本。

崔铣

《洹词》 12卷。收诗歌和散文。崔铣以佛学著称。其文语言简约，委曲传神。有《四库全书》本。

《崔文敏公洹词》 12卷。《续中州名贤文表》本。

陆深

《俨山集》 100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质实平和，叙述议论，皆能切中事理，迥别于七子派文风。有《四库全书》本。

韩邦奇

《苑洛集》 22卷。收诗歌和散文。韩邦奇主张为文不必求合于古人。其文典实而明了，议论深辟而切合时事，与复古派相异。有《四库全书》本。

杨慎

《升庵集》 8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杨慎以才博名冠一时。其文体裁多样，笔墨灵活，简洁自然，于明代独立门户。有《四库全书》本。

林文俊

《方斋诗文集》 10卷。林文俊以文名世，其文醇正清雅，不事雕琢，自然晓畅。有《四库全书》本。

王慎中

《遵岩集》 25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初学秦汉，后专师唐宋。文思流畅，洋赡饱满，是明唐宋派创始人之一，与唐顺之并称王唐。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王遵岩先生集选》 10卷。(明)张汝瑚选。《明八大家集》本。

《王遵岩文选》 2卷。(清)刘肇虞选评。《元明八大家古文选》本。

茅坤

《茅鹿门集》 6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茅坤着意模仿司马迁、欧阳修之文，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后世影响甚大，是明唐宋派重要人物。其集有明刊本。

《茅鹿门先生集选》 8卷(明)张汝瑚选。《明八大家集》本。

唐顺之

《荆川先生文集》 17卷，外集5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唐顺之倡导唐宋古文，反对拟古，其文直抒胸臆，汪洋纡折，在明中期别树一帜，是唐宋派代表人物，与王慎中并称王唐。有《四部丛刊》本。

《荆川集》 12卷。《四库全书》

本。

《荆川公佚文》 1卷。唐鼎元辑。见《武进唐氏所著书》。

《唐荆川文选》 2卷。(清)刘肇虞选评。《元明八大家古文选》本。

《唐荆川先生文选》 7卷。(清)李祖陶选。《金元明八大家文选》本。

陆 灿

《陆子余集》 8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师从王鏊，其文秀美平顺，辞句清爽，有欧阳修文遗风。有《四库全书》本。

罗洪先

《念庵集》 22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初学李梦阳，后与唐顺之等共学唐宋文，文意清晰，法度自然。有《四库全书》本。

《罗念庵集》 1卷。《广理学备考第三函》本。

归有光

《震川文集》 30卷，别集1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归有光反对拟古，提倡唐宋古文。其文感情诚挚，记述生动，笔法简洁朴素而有神韵，是唐宋派代表作家。有《四库全书》本。

《震川先生集》 30卷，别集10卷。《四部丛刊》本。又有《四部备要》本。

《震川先生集》 周本淳校点。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整理，每卷有校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归震川先生集选》 10卷。(明)张汝瑚选。《明八大家集》本。

《归震川文选》 2卷。(清)刘肇虞选评。《元明八大家古文选》本。

《归震川先生文选》 6卷。(清)李祖陶选。《金元明八大家文选》本。

《归震川文钞》 1卷。王文濡选。《明清八大家文钞》本。

尹 台

《洞麓堂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根柢经学，追慕汉、宋名家，阐释名理，屏除绮语，较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

张永明

《张庄僖公文集》 5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注重实用，不尚雕华，平实质朴。有《四库全书》本。

王立道

《贝茨集》 5卷，补遗1卷，文集8卷，补遗1卷。附录1卷，遗稿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反对七子派模仿苏轼，笔姿纵横，而自成一家。有《四库全书》本。

李攀龙

《沧溟集》 30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李攀龙主张复古，是明后七子创始人。其文辞藻富赡，高华伟丽，但有雕饰诘屈之弊。有《四库

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宗　臣

《宗子相集》　15卷。收诗歌和散文。宗臣主张复古，是明后七子之一。其文雄厉横放，笔势爽畅，在后七子中成就较高。有《四库全书》本。

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稿》　174卷，续稿207卷。收诗歌和散文等。王世贞主张复古，是后七子代表人物。生平著述繁富，文章博雅深厚，词藻华美，晚年渐趋于平淡自然。有明刊本。《四库全书》本。

张居正

《张太岳集》　47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庄雅真醇，平实朴厚，较有特色。有明万历刻本。

《张太岳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据万历本影印，并以其他本配补，比较完备。

杨继盛

《杨忠愍集》　3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词气贞刚，笔墨流畅，真挚感人。有《四库全书》本。

《容城忠愍杨先生文集》　4卷。《容城三贤文集》本。

《杨椒山先生文集》　2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　4卷。（明）李贽辑。《三异人集》本。

海　瑞

《备忘集》　10卷。散文集。海瑞品性刚正无隐，其文也劲气直达，侃侃而谈，气概凛然，在当时有振起颓靡之功。有《四库全书》本。

《海忠介公集》　6卷。《丘海二公文集合编》本。

《海刚峰先生集》　2卷。《正谊堂全书续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海刚峰集》　不分卷。《广理学备考第四函》本。

王　樵

《方麓集》　16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简洁质朴，议论切合时事，与后七子派文风迥异、有《四库全书》本。

徐　渭

《青藤书屋文集》　30卷，补遗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徐渭以戏曲书画著称，其文豪放俊逸。纵横无羁，在当时独具风格。有《海山仙馆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徐文长佚草》　10卷。《抱经楼丛刊》本。

《徐文长逸稿》　24卷。《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本。

胡　直

《衡庐精舍藏稿》　30卷，续稿11卷。收诗歌和散文。胡直是明代著名理学家。尤重佛学。其文健爽清雅，释理浅切，较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

《胡庐山集》 不分卷。《广理学备考第六函》本。

李 贽

《焚书》 4卷。收诗歌和散文。李贽反对道学，提倡“童心”说。为文笔锋锐利，论辩翔实，个性色彩浓郁，对明末公安派有很大影响。有《李氏全书》本。《国粹丛书·第一集》本(六卷)。中华书局以此本为底本校点整理，1961年版。

《续焚书》 5卷。收诗歌和散文。中华书局1959年以明刊本为底本校点出版。又，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焚书》、《续焚书》合印本。

《藏书》 68卷。传述战国至元末人物约八百人。有《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59年版，1962年重印，全4册。

《续藏书》 27卷。传述明代人物约四百人。有《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74年重印本。

《李贽著作选注》 《李贽著作选注》小组选注。分上下两册。上册主要选自《焚书》、《续焚书》。下册主要选自《藏书》和《道古录》，并选有少量诗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袁宏道

《袁中郎集》 4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袁宏道反对拟古，主张抒写性灵，是公安派领袖。其文清新淡雅，流畅自然，在当时影响很大。有明刊本。清刊本。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5年铅印本，刘大杰编校，题《袁中郎全集》。

《袁宏道集校笺》 钱伯诚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袁中道

《雪珂斋近集》 4卷。收诗歌和散文等。袁中道与其兄袁宏道同为公安派中坚。其文清新隽永，笔墨畅爽恣肆，很有特色。其集有《国学珍本丛书·第一集》本，上海书店1982年据此本重印。

《雪珂斋文集》 十四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铅印，《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

屠 隆

《娑罗馆逸稿》 4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屠隆是明后五子之一，主张复古。其文质实古朴，文理相称，自有特色。有《宝颜堂秘笈》正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钟 惺

《钟伯敬合集》 1卷。阿英校点。收诗歌和散文。又名《隐秀轩集》。钟惺反对拟古，提倡书写性灵，是明末竟陵派领袖，其文笔锋冷隽，孤深幽峭，对明末文坛有一定影响。有《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铅印版。

谭元春

《谭友夏合集》 23卷。收诗歌和散文。谭友夏反对复古，提倡直抒

性灵，是明末竟陵派代表作家。其文风格清幽，运思峭深，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有《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本。

汤显祖

《汤义仍先生集》 2卷。收诗歌和散文。汤显祖是明戏曲家。其文注重真情，造语自然，锋芒锐利。《临川文献》本。

顾宪成

《泾皋藏稿》 22卷。收诗歌和散文。顾宪成是明末东林党领袖，人品端直，其文如其人，醇雅爽利，为一时典范。有《四库全书》本。《顾端文公遗书》本。

《顾泾阳集》 1卷。《广理学备考第四函》本。

高攀龙

《高子遗书》 12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笃实周密，不事雕饰，古朴自然。有《四库全书》本。

《高子遗书》 6卷。《乾坤正气集》本。

《高子遗书节钞》 11卷。许珏辑。《锡山先哲丛刊第四辑》本。

《高子文集》 6卷。《高子全书》本。

赵南星

《赵忠毅公文集》 18卷。收诗歌和散文。赵南星学问富博，其文渊雅深厚，运思灵活，章法自如，为当时一代文宗。有《乾坤正气集》本。

《味檗斋文集》 15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邹元标

《愿学集》 8卷。收诗歌和散文。邹元标是明末东林党领袖，其文辞锋尖锐，正气凛然，很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按：此本未收邹元标入仕后奏议，多收其讲学之语。

《邹南皋集》 1卷。《广理学备考第四函》本。

焦　竑

《淡园集》 49卷，续集27卷。收诗歌和散文。焦竑是明著名理学家，其文质实朴厚，说理晓畅，在当时很有影响。有《金陵丛书乙集》本。

《焦淡园集》 1卷。《广理学备考第六函》本。

陈继儒

《白石樵真稿》 24卷。陈继儒明末散文大家。其文简洁清新，构思灵活，蕴含深厚。有《眉公十种藏》本。《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本。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 24卷。《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本。

王思任

《王季重先生文集》 4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构思灵巧，笔法灵活，尤以小品文见长。有《乾坤正气

集》本。

《王季重十种》 《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本。

顾允成

《小辨斋偶存》 8卷，附《定事录》3卷。其文直抒胸臆，不事雕饰，对策奏疏，都情真意切，富有感染力。尤长于书简。有《四库全书》本。《顾端文公遗书》本。

《小辨斋偶存》 8卷。附录1卷。《常州先哲遗书第一集》本。

徐宏祖

《徐霞客游记》 12卷。徐霞客是古代著名的游记散文家，其文结构精妙，记述生动，风格多样，在游记文学中具有重大影响。有《四库全书》本。

《徐霞客游记》 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以乾隆本与过去从未刻过的原始抄本为底本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周顺昌

《忠介烬余集》 3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周顺昌重气节，隐忧国事，其文多激愤之气，一如其人。有《四库全书》本。

《周忠介公烬余集》 3卷。《乾坤正气集》本。

《周忠介公烬余集》 4卷。《借月山房汇钞》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范景文

《范文忠集》 12卷。收散文等。其文善陈时事，议论激切，足显其济时雄才。有《四库全书》本。

《范文忠集》 9卷。《乾坤正气集》本。

《范文忠公文集》 10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倪元璐

《倪文贞集》 17卷，续编3卷，疏奏12卷，讲编4卷，诗集4卷。倪元路长于古文，注重实用，其文详明深切，多涉国家兴亡大事，为时所推重。有《四库全书》本。

卢象升

《忠肃集》 3卷。收诗歌和散文。卢象升感慨国事，故无意于文而文自工，尤长于书简，感情丰沛，悱恻动人。有《四库全书》本。

《卢忠肃公文集》 2卷。《乾坤正气集》本。

《卢忠肃公书牍》 1卷。《借月山房汇钞》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娄　坚

《学古绪言》 25卷。散文集。娄坚师从归有光，专工古文，与当时公安派和竟陵派相匹。其文平和安雅，真朴感人。有《四库全书》本。

李流芳

《檀园集》 12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师从归有光，与娄坚并名。有

《四库全书》本。

毕自严

《石隐园藏稿》 8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学韩、苏，关注国事，议论时政，以显其经济之才。有《四库全书》本。

曹于汴

《仰节堂集》 14卷。收诗歌和散文。曹于汴长于笔札，简炼流畅，较其理学论谈别具风格。有《四库全书》本。

葛昕

《集玉山房稿》 10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疏爽骏快，言急意挚，如其人品。有《四库全书》本。

宋登春

《宋布衣集》 3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简炼质实，古趣盎然。有《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刘宗周

《刘蕺山集》 17卷。散文集。刘宗周工古文，忧念国事，其奏疏论辨尖锐，切中时弊，很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

《刘蕺山文》 12卷。《刘蕺山先生集》本。

《刘子文编》 10卷。《乾坤正气集》本。

瞿式耜

《瞿忠宣公集》 8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注重实用，议论说理，激切感人。有《乾坤正气集》本。

《瞿式耜集》 4卷。苏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苏州地方史研究室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魏学洢

《茅簷集》 8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情挚意切，层次清晰，生动感人。有《四库全书》本。按：其名作《核舟记》未收入本集，收人清张潮选辑《虞初新志》，有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

张岱

《瑯嬛文集》 6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多叙往事，寄托亡国之慨。语言简洁峭拔，清新优美，是明末散文大家。有《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刘大杰校，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

《西湖梦寻》 5卷。忆写西湖掌故。有《武林掌故丛编》本。《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家遂校注本。

《陶庵梦忆》 8卷。叙昔日生平琐事。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西湖书社1982年出版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二书合印，由马兴荣校点，1982年版。

张溥

《七录斋集》 16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张溥提倡兴复古学，其政论

文风格质朴；记传文激情饱满，笔墨流畅，是晚明重要散文家。有明刊本。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注》 殷孟伦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祁彪佳

《祁忠惠公遗集》 8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笔势萧洒，情理兼胜。有《乾坤正气集》本。

《祁彪佳集》 排印本。中华书局据道光15年刊本圈点排印，1960年版。

黄淳耀

《陶庵全集》 2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语言质实，平和温厚，意旨深远，一扫明末剽摹诡怪之习，在当时很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知服斋丛书·第四集》本。

《陶庵文集》 10卷。《乾坤正气集》本。

张煌言

《张苍水全集》 12卷，补遗1卷，附录4卷，题咏2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善述事理，感情沉郁，慷慨激昂。有《国粹丛书·第二集》本，附《诗文题中人物考略》1卷，补1卷。

《张苍水集》 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末附全祖望、赵之谦所撰年谱二种。

史可法

《史忠正公集》 4卷，首1卷，附录1卷。史可法是明末著名抗清将领。其文如其人，慷慨激愤，忧念国事。有《赵氏藏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史可法集》 （清）张纯修编辑，罗振常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宋惕

《髻山文钞》 2卷。附录1卷，补遗1卷。其文清疏爽洁，缊意深远，独具风格。有《豫章丛书》本，附魏元旷校勘记1卷、胡思敬续记1卷。

陈子龙

《陈忠裕全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陈子龙是明末几社创始人。其文直抒孤愤，感慨深沉，现实性极强。有《四库全书》本。

申佳胤

《申端愍公文集》 2卷，首1卷，末1卷。其诗学李、何，其文则典质朴实，流畅生动，有异于七子文风。有《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夏完淳

《夏内史集》 9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夏完淳早人几社。其文伤悼国事，激昂悲壮，铿锵有力。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夏节愍全集》 10卷。补遗2卷，卷末1卷，（清）王昶编刻。有清

刊本。

《夏完淳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1959年版。末附《夏允彝完淳父子史传事迹辑存》等资料。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 110卷。收诗歌和散文，钱谦益是由明入清的重要作家。其文典重深稳，议论考证，富博丰赡，在明末较有声誉，入清后亦影响了清初文坛。此集系他手自编定在明时作品。有《四部丛刊》本。

《牧斋有学集》 50卷，补1卷，校勘1卷。此本系钱氏手自编定入清后作品。有《四部丛刊》二次印本，初印本无补遗和校勘。

《牧斋全集》 163卷。内含《初学集》、《有学集》及补遗、《投笔集》。有清宣统间铅印本。

《重校钱牧斋全集》 163卷，上海文明书局1925年版。

孙奇逢

《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 4卷。收诗歌和散文。孙奇逢是清初著名理学家，其文渊源经术，析理浅易。有《容城三贤文集》本。

《夏峰先生集》 14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孙钟元集》 1卷。《广理学备考第四函》本。

王猷定

《四照堂文集》 12卷，诗集4卷。王猷定是清初著名散文家。其文叙事条达，语言丰美，尤以记传文见长。有《豫章丛书》本。此本有胡思敬撰《校勘记》、魏元旷撰《校勘记补》。

《轸石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四照堂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陈　确

《乾初先生文集》 18卷。散文集。陈确是清初著名散文家。其文以政论文为主，议论深刻，语言质朴，较有特色。有《乾初先生遗集》本。

《乾初先生文钞》 2卷。遗诗钞1卷。《海昌六先生集》本。《海昌丛载》本。

《陈确集》 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

《陈确哲学选集》 侯外庐等编注。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朱鹤龄

《愚庵小集》 15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典奥深厚，旨趣深远。有《四库全书》本。

《愚庵小集》 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据康熙本影印，末附影印附记。

《愚庵杂著》 1卷。《昭代丛书》本。

吴传业

《梅村集》　4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吴伟业以诗著称，其文词藻绮丽，间有骈偶，也较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

《梅村文集》　20卷。散文集。《风雨楼丛书》本。

《梅村家藏稿》　58卷，诗补遗1卷，文补遗1卷。《涵芬室丛刊初编》本。《四部丛刊》本。

傅　山

《霜红龛集》　40卷，附录3卷。收诗歌和散文等。（清）丁宝铨辑。傅山以文章书画名世，其文言辞激切，慷慨激昂，文势雄放。有宣统间刊本，附丁氏所编年谱1卷。

彭士望

《彭躬庵文钞》　6卷。（清）彭玉雯辑。其文长于记述、事中寓情，情理兼备，在清初文坛影响甚大。其集有《易堂九子文钞》本。民国14年排印本。

《耻躬堂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黄宗羲

《南雷集》　收诗歌和散文等。内有：《南雷文案》10卷、外集1卷。《吾悔集》（即《南雷续文案》）4卷、《撰杖集》（即《南雷文案三刻》）1卷、《子刘子行状》2卷、《南雷诗历》3卷等。黄宗羲之文内容丰富，析理透辟，朴质自然，锋芒锐利。有《四部丛刊》本。

《南雷文定》　黄宗羲晚年手自删定。内有：《南雷文定前集》11卷，《后集》4卷、《三集》3卷，《南雷诗历》四卷，附《梨州先生世谱》等。有《四部备要》排印本。

《南雷文录》　3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黄梨州文集》　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杜　濬

《变雅堂文集》　8卷，诗集10卷，首1卷，补遗2卷。其文词采优美，纡徐曲折，在清初影响较大。有《黄冈二处士集》本。

《变雅堂文录》　1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归　庄

《归玄恭先生文续钞》　7卷，附录1卷。其文气势雄浑，笔力酣畅，思想性强，是清初散文大家。有《国粹丛书第二集》本。

《归庄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收诗1卷，曲1卷，文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84年新1版。末附《年谱》、《传略》、《题赠》、《序跋》、《辑补》。

李　渔

《笠翁一家言全集》　收《一家》文集4卷，诗集8卷，二集12卷，别集4卷，《闲情偶记》16卷等。李渔以戏曲名世，其文浅切晓畅，笔法细腻，善造意境。有康熙间刊本。

顾炎武

《亭林文集》 6卷，诗集5卷。顾炎武重气节，于文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其文关注时务，辨理深微，语言质实，文风晓畅，是清初著名散文家。有《亭林遗书》本。《四部备要》本。

《亭林文集》 6卷，诗集5卷，附校补1卷。《四部丛刊》本。

《亭林文集》 6卷。《学古斋金石丛书第一集》本。《端溪丛书四集》本。

《顾亭林诗文集》 华忱之校点。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1983年重印。

《亭林文录》 2卷。《国朝文录》本。

《亭林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宋琬

《安雅堂全集》 6卷。收诗歌和散文。宋琬以诗名世，其文清疏晓畅，言辞精美，在清初有一定影响。有康熙刊本。又有乾隆刊本，14卷。

冯班

《钝吟老人文稿》 1卷。冯班以诗著称，其文闲逸自然，不拘章法。有《钝吟老人遗稿》本。《常熟二冯先生集》本。

邱维屏

《邱邦士文钞》 2卷。邱维屏注重经学，其文典质平实，妙于说理。有《易堂九子文钞》本。

《河东文录》 1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魏裔介

《兼济堂文集》 20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长于议论，奏疏诸文皆能切合国事，论辨严密，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有《四库全书》本。

《兼济堂集》 9卷。《畿辅丛书》本。

魏象枢

《寒松堂集》 10卷。收散文。魏象枢人品端正，其文根柢经籍，典雅淳厚，有儒士之风。有《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申涵光

《聪山集》 3卷。散文集。其文深隽精美，家国感伤之情蕴含其中，清凄感人。有《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聪山文录》 1卷。《国朝文录》本。

尤侗

《艮斋倦稿文集》 15卷，诗集11卷。尤侗是清初著名戏曲家，其文构思巧妙，语言优美，亦有特色。有《西堂全集》（康熙本）本。

侯方域

《壮悔堂文集》 10卷，遗稿1卷。收散文和诗歌。其文构思奇妙，词微义婉，有含蓄蕴藉之美，是清初著名散文家，与魏禧、汪琬合称“清初三家”。其集有《赵氏藏书》本。《四部备要》本。

《侯朝宗文钞》 8卷。见《国朝三家文钞》。

《雪苑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壮悔堂文录》 2卷。《国朝文录》本。

施闰章

《学愚堂文集》 28卷，诗集50卷，别集2卷。施闰章以诗著称，其文亦质朴严谨，语约意丰，自成一家。有《施愚山先生全集》本。《四库全书》本。

《愚山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愚山先生文录》 2卷。《国朝文录》本。

魏际瑞

《魏伯子文集》 10卷。收诗歌和散文。魏际瑞有文名，与弟魏禧齐名。其文说理明晰、议论深刻。有《宁都三魏全集》本。

《魏伯子文钞》 1卷。《易堂九子文钞》本。

《魏伯子文录》 1卷。《国朝文录》本。

周　容

《春酒堂文存》 4卷，诗存6卷，诗话1卷，外纪1卷。周容诗名甚著，其文精于构思，妙于议论，叙述清晰，语言简洁有力。有《四明丛书第一集》本。

王夫之

《薑斋诗文集》 28卷。王夫之是清初著名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其文构思缜密，逻辑严谨，说理透辟而词采斐然，对后代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四部丛刊》本。

《薑斋文集》 10卷。《船山遗书》本。《四部备要》本。

《王船山诗文集》 收《薑斋文集》、《薑斋诗集》和《薑斋诗余》三种，有附录。有中华书局1962年版，1983年重印。

毛先舒

《潠书》 8卷。散文集。其文笔墨隽爽，章法精细，疏而能密，以文章名显一时。此书系毛氏手自编定，每篇间附王猷定、柴绍炳、沈谦评语。有《思古堂十四种书》本（康熙本）

《思古堂集》 4卷。《思古堂十四种书》本。

《东苑文钞》 2卷。《思古堂十四种书》本。

《小匡文钞》 4卷。《思古堂十四种书》本。

吕留良

《吕用晦文集》 8卷，续集4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吕留良以编《宋诗钞》著称，其文疏散自然，文法清晰，较有成就。有《国粹丛书第一集》本。

《东庄吟稿》 7卷。《风面楼丛书》本。

徐 枋

《居易堂集》 20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风格平实，质朴自然。有《明季三孝廉集》本。

《居易堂集》 20卷，集外诗文1卷，王大隆辑。《四部丛刊三编》本。

贺贻孙

《水田居文集》 5卷。散文集。其文注重务实，用词朴实，较有特色。有《水田居全集》本。

《水田居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毛奇龄

《西河文集》 179卷。收文集119卷，诗集53卷，词集7卷。毛奇龄生平著述繁富，尤重经学。其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有《四库全书》本。

《西河文集》 107卷。《西河全集》本。

魏 禧

《魏叔子文集外篇》 22卷，目录3卷，诗集8卷。其文凌厉雄奇，运思神异，落响非凡，是清初著名散文家，与侯方域齐名。又与兄际瑞，弟礼合称宁都三魏。有《宁都三魏全集》本。

《魏叔子文钞》 12卷。《国朝三家文钞》本。

《魏叔子文集外篇》 1卷。《二余堂丛书》本。

《魏叔子文钞》 5卷。《易堂九子文钞》本。

《勺庭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汪 琬

《钝翁类稿》 62卷。收文稿38卷，诗稿12卷，外稿12卷。汪琬是清初散文大家，其文内容浩繁，疏通畅达，叙事精妙，风格独特，与魏禧齐名，对清代文坛具有很大影响。有《钝翁全集》本。

《钝翁续稿》 56卷。收文稿22卷，诗稿8卷，别稿26卷。《钝翁全集》本。

《尧峰文钞》 50卷。此本系汪氏晚年手自汰定。《四库全书》本。

《尧峰文钞》 40卷。《四部丛刊》本。

《汪钝翁文钞》 12卷。《国朝三家文钞》本。

《汪文摘谬》 1卷，附校记1卷。(清)叶燮撰。叶德辉校记。《郋園先生全书》本。

陈维崧

《陈检讨四六》 20卷。(清)陈

师恭注。陈维崧是清初较早创作骈体文作家，其文词采华美，气脉浑厚，有庾信遗风。有《四库全书》本。

《陈迦陵文集》 6卷，《俪体文集》10卷。《四部丛刊》本。

郑日奎

《静庵集》 10卷。散文集。其文排宕闳肆，笔姿俊逸，尤长于记叙文。有清刊本。

《郑静庵先生文录》 1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唐 甄

《潜书》 4卷。分上下篇。上篇主要论学术，下篇主要论政治。观点比较进步。其文独抒己见，无所蹈袭，闳肆遒劲，条理通达，在当时别具风格。有《四库全书》本。

《潜书》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末附（清）王闿运《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

《潜书》 吴泽民校。附诗文录。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

《潜书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叶 燮

《己畦文集》 22卷，诗集10卷，残余诗稿1卷。叶燮是清著名文学理论家。其文善辨事理，立论高远，论述深刻。其叙事文简洁疏爽，清新自然。有《郋园先生全书》本。

汤 斌

《汤子遗书》 10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汤斌是著名理学家。其文典雅深稳，而奏疏诸篇则构思周密，条析详明，通达晓畅，在当时深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

《汤子遗书》 10卷，首1卷，续编2卷。《汤文正公全集》本。

《潜庵先生遗稿》 5卷，《汤文正公全集》本。

《汤潜庵先生集》 2卷。《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潜庵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潜庵先生遗稿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潘天成

《铁庐集》 3卷，外2卷。收诗歌和散文等。潘天成是清初著名理学家。其文直抒胸臆，言所欲言，自然高妙。有《四库全书》本。

魏 礼

《魏季子文集》 16卷。收诗歌和散文。魏礼与兄际瑞、禧并有文名，名振一时。其文说理通畅，论辨雄实，较有特色。有《宁都三魏全集》本。

《魏季子文钞》 1卷。《易堂九子文钞》本。

姜宸英

《姜先生全集》 33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姜宸英幼习古文，以古文名世。其文宏博雅健，骁畅恣肆，独

具风格，是清代散文大家。有光绪间刊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据此本重印。线装2函22册。

《湛园集》 8卷。散文集。（清）黄叔琳编。《四库全书》本。

《湛园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湛园未定稿文录》 3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陆陇其

《三鱼堂文集》 12卷，外集6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陆陇其以文著称，其学问深醇，文章以议论为长，论述心性，辨析时事，功力甚深。有《四库全书》本。《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本。《陆子全书》本。

《陆稼书先生文集》 2卷。《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三鱼堂文录》 1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朱彝尊

《曝书亭集》 80卷。收诗歌、散文和辞赋等。其文内容博雅，语言舒婉清爽，辞约义丰，当时与王士祯齐名，为一代散文大家。此本系他亲手编定，其中诗赋皆依年编次。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附其子昆田《鱼笛小稿》10卷。又有《四部备要》本。

《曝书亭文稿》 1卷。《风雨楼秘笈留真》本。

《曝书亭集外文》 2卷，诗5卷。《槜李遗书》本。

《竹垞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屈大均

《翁山文钞》 4卷，附佚文辑3卷，徐信符辑。屈大均以诗名世，其文激愤慷慨，直抒情怀，较有特色。有《广东丛书第一集》本。

《翁山文钞》 6卷，附佚文二辑1卷，佚文黄荫普辑。《广东丛书第二集》本。

《翁山文外》 16卷。《嘉业堂丛书》本。

彭孙遹

《松桂堂全集》 37卷。收诗歌和散文等。其文才学富赡，词采清华，总领一代文风。但大多台馆之作，内容比较空乏。有《四库全书》本。

王士祯

《渔洋山人文略》 14卷。散文集。王士祯以诗名世，倡神韵说，影响甚远。其文清疏爽洁，自然明快，也较有特色。有《王渔洋遗书》本。

《带经堂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宋荦

《西陂类稿》 39卷。收诗歌和散文。宋荦以诗著称，其文流畅通达，自然清爽，加之他政治地位较高，喜奖掖后进，故当时声望甚显。有《四库全书》本。又有康熙本，50卷。

《西陂类稿文录》　1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田　雯

《古欢堂集》　36卷。收诗歌和散文。田雯才博学富，其文纵横排奡，奇丽伟特，结构新异，遣语不俗，与当时文坛盟主王士祯相抗衡，自成一家。有《德州田氏丛书》本。《四库全书》本。

颜　元

《习斋记余》　10卷。其文典雅质朴，简炼有力。有《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习斋记余》　10卷，遗著1卷。《颜李丛书》本。

邵长蘅

《邵青门全集》　30卷。收诗歌和散文。邵长蘅是清初著名散文家。其文感情饱满，文笔朴实，叙事议论，灵活生动。有《常州先哲遗书》本，附《邵氏家录》2卷。

《邵青门文录》　3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青门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张　英

《文端集》　46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典雅平和，多宫廷台馆之作。但有些则抒写性灵，称心而出，不加雕饰，较有特色。有《四库全书》本。

《笃素堂文集》　4卷。《申报馆丛书余集》本。《玉鸡苗馆丛书》本。

《张文端公诗文选》　2卷。周学熙选。《周氏师古堂所编书》本。

万斯同

《石园文集》　8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质朴平实，条理明晰，有所成就。有《四明丛书第四集》本。

《万季野先生遗稿》　1卷，附录1卷。《百爵斋丛刊》本。

陈廷敬

《午亭文编》　50卷。收诗歌和散文。陈廷敬以古文著称，深得汪琬称赞。其文叙事明了，层次清晰，文笔朴厚，独具风格，在当时很有影响。有《四库全书》本。

《午亭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午亭文录》　3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汪懋麟

《百尺梧桐阁文集》　收文集8卷，诗集16卷，《锦瑟词》。汪懋麟长于古文，其文语言峭刻，豪宕雄放，高古顿挫，是清初著名散文家。有康熙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据此本影印。

《百尺梧桐阁文录》　1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李光地

《榕村集》 40卷。收诗歌和散文等。李光地是清著名理学家，学问渊深，其文宏深简括，说理条达，语言质朴。有《四库全书》本。

《榕村全集》 40卷。《李文贞公全集》本。《榕村全书》本。

《榕村全集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张玉书

《张文贞集》 12卷。收散文。其文从容典雅，朴质简古，尤长于碑传。有《四库全书》本。

《张文贞公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彭定求

《南畇文稿》 12卷，小题文稿1卷。散文集。其文根柢经术，以议论见长，说理透辟，较有特色。有《南畇全集》本

王　源

《居业堂文集》 20卷。散文集。王源师事魏禧，长于古文，又善研经术，其文古朴质实，章法严谨。有《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伯行

《正谊堂文集》 12卷，续集8卷。收散文等。张伯行注重经学，其文渊深宏博，说理透辟，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有《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蒲松龄

《蒲松龄集》 路大荒整理。除《聊斋志异》外，蒲氏其他诗文赋曲几乎全部收入。蒲松龄以志怪小说著名于世。其文叙事性强，简洁严重，很有特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附编者所著《蒲柳泉先生年谱》及其他参考资料。

赵执信

《饴山诗文集》 32卷，附录1卷。收诗集20卷，文集12卷。赵执信是清著名诗人，其文隽爽清疏，叙述纡徐，饶有韵味。有《四部备要》本。

《饴山文录》 1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方　苞

《望溪先生文集》 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2卷。方苞论文重义法，其文明晰晓畅，言辞简洁，自成一家，在当时文名甚著，是清桐城文派开创者。其集有《四部丛刊》本，附清人苏惇元编年谱2卷。又有《四部备要》本。

《望溪文集再续补遗》 4卷，三续补遗3卷。刘声木辑佚。《直介堂丛刻初编》本。

《方苞集》 刘季高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望溪集》 8卷。《四库全书》本。

《望溪文集补遗》 1卷。《孙氏山渊阁丛刊》本。

《方望溪文钞》 1卷。王文濡

辑。《明清八大家文钞》本。

《望溪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沈德潜

《归愚文钞》 20卷，余集8卷。沈德潜是清初著名诗文选家。其文平实简古，书卷气较浓。因地位较高，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有《沈归愚诗文全集》本。

《归愚文录》 1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蔡世远

《二希堂文集》 12卷。散文集。蔡世远是清著名理学家，其文以阐释理学为主，但文笔洒脱，章法自如，有韩苏遗风。

《二希堂文录》 1卷。《国朝文录》本。

沈彤

《果堂集》 12卷。散文集。其文以订正经学为主，以才学富博见长。有《果堂全集》本。《四库全书》本。

《果堂文录》 1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尹会一

《健余先生文集》 10卷。散文集。其文根源经学，文笔质朴，说理浅切。有《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厉鹗

《樊榭山房集》 10卷，续集10卷，文集8卷，集外诗3卷，又1卷。厉鹗以诗名世，编著《宋诗纪事》，影响甚远。其文富赡丰腴，章法严密，语言典雅。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汪由敦

《松泉文集》 20卷，诗集26卷。其文才学富博，经义深微，文笔典雅，名重当时。有《四库全书》本。

《松泉文录》 1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乔亿

《剑溪文略》 1卷。乔亿以诗名世。其文疏淡爽朗，直抒己意，文笔清新，在当时别具一格。有《乔剑溪遗集》本。

郑燮

《郑板桥集》 收诗歌和散文。郑燮以书画名世，是清扬州八怪之一。其文在当时也唱别调，反对拟古，反对繁芜的释经文，真挚自然，不事堆砌和雕饰，清新流畅，平易朴实。旧有《板桥集》，此本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校点本，1962年版，增《补遗》及年表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修订重版。

陈弘谋

《培远堂文集》 10卷。散文集。其文内容浩繁，长于记述和考订。清

《陈榕门先生遗书》本。

《培远堂文录》 1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刘大櫆

《海峰文集》 8卷，诗集11卷。刘大櫆是清桐城派创始人之一，提倡义理和法度。其文素雅清淡，繁约得体，平中有奇，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有同治刻本。

《海峰先生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刘海峰文钞》 1卷。(清)张患言选。《大亭山馆丛书》本。

《刘海峰文钞》 1卷。王文濡选。《明清八大家文钞》本。

黄永年

《南庄类稿》 8卷。散文集。其文古朴质实，雅淡自然，有一定成就。有《黄静山所著书》本。

《南庄类稿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冯　景

《解舂集文钞》 12卷，补遗2卷。散文集。其文构思精妙，造语古朴，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有《抱经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少渠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彭端淑

《白鹤堂文稿》 不分卷。(清)胡天游等评。其文平易质朴，说理形象精辟，叙述从容舒缓，很有特色，有乾隆间刊本。

《白鹤堂文录》 1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陈兆仑

《紫竹山房文录》 3卷。其文淡泊清雅，章法灵活，语言醇古，在当时很有影响，被推为一代文宗。有《紫竹山房集》行世。此本为《国朝文录初编》本。

全祖望

《鲒埼亭集》 38卷，《经史问答》10卷，《鲒埼亭外编》50卷。其文构思严谨，语言简炼生动，叙事翔实而有情趣，是清代散文名家。有《四部丛刊》本。

《鲒埼亭文录》 4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鲒埼亭大集选注》 黄云眉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

牛运震

《空山堂文集》 12卷，诗集6卷。牛运震长于经术，其文闳博深厚，释理条达。《空山堂全集》本。

袁　枚

《小仓山房诗文集》 82卷。收《文集》35卷，《外集》8卷，《诗集》37卷，补遗2卷。袁枚主张直抒性灵，反对拟古，其文形式灵活，记述生动、说理浅切，涉笔成趣，在当时别具特

色。有《四部备要》本。《随园三十种》本。

《袁太史时文》 1卷。《随园三十种》本。《随园三十八种》本。

《随园文钞》 1卷。《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本。

《小仓山房文录》 2卷。《国朝文录》本。

《袁文笺正》 16卷，补注1卷。(清)石韫玉笺。《扫叶山房丛钞》本。

《袁文笺正补正》 1卷。(清)邹树荣撰。《南昌邹氏一粟园丛书》本。

《袁文合笺》 16卷。(清)王广业集笺。光绪间刊本。

《音注小仓山房尺牍》 8卷。(清)胡光斗笺。《申报馆丛书余集》本。

卢文弨

《抱经堂文集》 34卷。卢文弨是清代中期著名儒学家，其文学问渊深，说理明晰，记述条达，较有特色。有《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王鸣盛

《西庄始存稿》 40卷，附录1卷。收诗歌和散文等。王鸣盛是著名史学家。其文质朴古劲，理直意畅。有乾隆本。

戴震

《东原文集》 10卷。戴震是清中期著名经学家，学问富博。其文质实朴厚，渊雅典重，在当时很有影响。有《微波榭丛书·戴氏遗书》本。

《戴东原集》 12卷。《戴段合刻》本。《四部丛刊》初印本。

《戴东原集》 12卷，附段玉裁撰覆校札记1卷。《四部丛刊》二次印本。《四部备要》本。

纪昀

《纪文达公遗集》 16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取事翔实，叙事婉转，平和温厚。其集有嘉庆间刊本。

《纪文达公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蒋士铨

《忠雅堂文集》 12卷，诗集27卷，补遗2卷。蒋士铨是清代著名戏曲家。其文长于抒情，言辞委曲，声情并茂，风格清新。有《蒋氏四种书》本。

《忠雅堂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王昶

《春融堂集》 68卷。收诗歌和散文。王昶学问富博，时称通儒。其文宗主韩苏，文笔恣肆，酣畅淋漓，较有特色。有《春融堂集》本。

赵翼

《瓯北集》 53卷。收诗歌和散文。赵翼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兼善诗文。其文条理清晰，议论精妙，记述生动，在当时很有影响。有《瓯北全

集》本。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 50卷，诗集10卷，诗续集10卷。钱大昕学问宫赡，但古文却无书卷气。其文长于说理，语言警策简炼，逻辑严密，考辨精细。有《潜研堂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潜研堂文录》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姚鼐

《惜抱轩文集》 16卷，文后集10卷，诗集10卷，诗后集1卷，诗外集1卷。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论学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于文不拘门户之见，自成一格。其文简洁严整，语言精美，章法严谨，对后代文学具有重大影响。有《惜抱轩全集》本。《四部备要》本。

《惜抱轩文集》 16卷、诗集10卷。《四部丛刊》本

《惜抱轩先生文选》 2卷。《国朝文录初编》本。

《姚姬传文钞》 1卷。王文濡选。《明清八大家文钞》本。

《惜抱先生尺牍》 8卷。《海源阁丛书》本。

吴骞

《愚谷文存》 14卷。吴骞是清著名藏书家。其文用笔朴实，语言简古。有《释经楼丛书》本。

翁方纲

《复初斋集外文》 4卷，集外诗24卷。翁方纲有诗名，提倡肌理说。其文注重章法，语言丰腴。有《嘉业堂丛书》本。

《复初斋文集补遗》 1卷。杨宝镛辑。《龙渊炉斋金石丛书》本。

段玉裁

《经韵楼集》 12卷。收诗歌和散文。段玉裁是清著名经学家，尤长于小学。其文典实质朴，条理畅达。有《经韵楼丛书》本。《戴段合刻》本。

《经韵楼集文录》 2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桂馥

《晚学集》 8卷。桂馥是清著名经学家，其文简古劲健，释义浅切，记述条达。有《校经山房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章学诚

《章氏文集》 8卷。散文集。章学诚以治史著称。其文结构缜密，叙述清晰，析理深微。有《章氏遗书》本。

《实斋文集》 8卷。《禹域丛书》本。

《章实斋文钞》 4卷。《古学汇刊第一集》本。

汪中

《述学内外篇》 4卷，补遗1卷，别录1卷。收骈文和散文。汪中是清代骈文代表作家。其文感情诚挚，

清新爽利，略有感伤。其集有《粤雅堂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汪容甫先生遗文》 1卷，附钞1卷。《志古堂丛书》本。

《汪容甫文笺》 3卷。选自《述学》。古直选笺，《层冰草堂丛书》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

王念孙

《王光禄遗文集》 6卷。王念孙是清著名经学家，学问渊博。其文深稳朴厚，论辨精细，叙述灵活。有《高邮王氏家集》本。

《王石臞文集补编》 1卷。《段王学五种》本。

洪亮吉

《卷施阁文甲乙集》 18卷。诗20卷。洪亮吉是清代骈文代表作家，其文工整清丽，文气酣畅，风格独特，与汪中等并称为骈文八大家。其议论文布局疏朗，浅显明快，亦较有成就。有《北江全集》本。《四部备要》本。

《更生斋文甲乙集》 8卷，诗8卷。《北江全集》本。《四部备要》本。

《洪北江诗文集》 66卷。《四部丛刊》本。

孔广森

《骈丽文》 3卷。孔广森长于骈文，其文笔法细腻，语言华美。有《四部备要》本。

《仪郑堂文》 2卷。《文选楼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仪郑堂遗稿》 1卷。《八家四六文钞》本。

孙星衍

《孙渊如诗文集》 21卷。孙星衍是清中期著名骈文家。其文构思精妙，文字质实，章法灵活，很有特色，与汪中、洪亮吉齐名。有《四部丛刊》本。

《孙渊如先生文补遗》 1卷。王大隆辑。《戊寅丛编》本。

恽敬

《大云山房文稿》 初集4卷，二集4卷，言事2卷，补编1卷。恽敬是清阳湖派创始人。其文追慕秦汉，自然奔放，语言优美、骈散相间，在当时较有影响。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大云山房尺牍》 1卷。《尺牍丛刻》本。

王昙

《烟霞万古楼文集》 6卷。王昙有诗名。其文清疏畅达，质朴自然。有《粤雅堂丛书三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惠言

《茗柯文》 5卷。张惠言是阳湖派创始人之一，亦有词名。其文宗主韩愈、欧阳修，笔墨浓厚，言辞爽朗，优美工稳，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茗柯文补编》 2卷，外编2卷。《四部丛刊》本。

焦 循

《雕菰集》 24卷。收诗歌和散文等。焦循是清著名文学理论家，其文简朴质实，叙事说理，法度灵活。有《文选楼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焦里堂先生轶文》 1卷。徐乃昌辑。《鄦斋丛书》本。

《雕菰集文录》 2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阮 元

《揅经室集》 63卷。收诗歌和散文。阮元以经学著称。其文考辨精细，议论深微。有《四部丛刊》本。

王引之

《王文简公遗文集》 8卷。王引之以经学名世。其文才学富赡，论辨翔实。有《高邮王氏家集》本。

《王文简公文集》 4卷，附录1卷。《高邮王氏遗书》本。

《王伯申文集补编》 2卷。《段王学五种》本。

李兆洛

《养一斋文集》 20卷，诗集4卷，赋1卷。李兆洛注重务实，反对桐城文派。其文质朴劲直，自然疏朗，别具一格。有《四部备要》本。

《养一斋文录》 1卷。《国朝文录续编》本。

方东树

《考槃文录》 12卷。方东树是姚门弟子之一。其文典实质朴，章法严谨。有《方植之全集》本。

管 同

《因寄轩文集》 16卷，补遗1卷。收诗歌和散文。管同是桐城派古文家之一，其文自然健爽，气骨劲峻，独具风格。有道光间刊本。光绪间刊本。

刘 开

《孟涂文集》 44卷。前集10卷。后集22卷，文集10卷，骈体文2卷。刘开是清桐城派作家之一。其文流畅清爽，古朴简洁，不拘章法，文笔灵活。尤长于骈体文。有道光间刊本。

周 济

《介存斋文稿》 2卷。周济是阳湖派代表作家，亦有词名。其文现实性强，注重务实，语言浑朴，别具风格。有《求志斋文稿汇编》本。

《止庵遗集》 文1卷，诗1卷。《常州先哲遗书后编》本。

严可均

《铁桥漫稿》 13卷。严可均以编集上古至南北朝文著称。其文富赡博雅，论辨精僻。有《四录堂类稿》本。

《铁桥漫稿》 8卷。《心矩斋丛书》本。

张维屏

《松心文钞》 10卷。其文不贵绝术，注重时务，自抒胸臆，笔法灵活。有《张南山全集》本。

《听松庐骈体文钞》 4卷。《张南山全集》本。

梅曾亮

《柏枧山房文集》 31卷。梅曾亮是姚门弟子之一，与管同齐名。其文简洁、鲜明生动、自然明快。有咸丰刻本。

《柏枧山骈体文钞》 1卷。《国朝十家四六文钞》本。

《梅伯言文钞》 1卷。王文濡选。《明清八大家文钞》本。

龚自珍

《定盦文集》 16卷。收诗歌和散文。其文感情丰沛，多涉时政，论述翔实，奥博纵横，顿挫跌宕。对近代文学影响很大。有《四部丛刊》本。又有《四部备要》本，17卷。

《龚自珍全集》 王佩诤校。按文体和诗体编为11辑。附《年谱》、《年谱补》、《龚自珍佚著待访目》，中华书局1961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重印。

《龚自珍诗文选》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选注。选诗文56篇。江苏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寓言著作

《庄子》 战国庄周著。《汉书·艺文志》著录52篇，今只存33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寓言故事。这些寓言别具一格，充满智慧；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批判现实的精神。《庄子》是先秦寓言著作的一个高峰，对后世的寓言创作、文学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吕氏春秋》 又称《吕览》。先秦杂家代表著作，秦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分八览、六论、十二纪，20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书中含寓言二百余则，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在先秦诸子中都是比较突出的。大部分寓言取材于先秦寓言故事，或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这对两汉寓言有着直接的影响。形式上，这些寓言已有独立成篇的端倪，这在寓言发展史上是关键性的一个环节。

《说苑》 汉代劝戒寓言代表作之一，西汉刘向编著。"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以为此书，奏之，欲以为法戒"(曾巩《〈说苑〉序》)。具有强烈的政治、道德色彩。内中寓言大都独立成篇，只是采摭先秦诸子书，加

工模仿有余而独创性不足。较好的篇目有：《枭将东徙》、《炳烛之明》、《乐羊食子》等。

《新序》 西汉刘向编著。为汉代劝戒寓言故事代表作之一。原书30卷，后缺佚，宋曾巩整理后析为10卷。共有故事170余篇。其中寓言多系历史题材的加工创造，但不囿原篇主旨，往往能推陈出新，是其特色。有些篇目说教性强，有些篇目则惩恶扬善，寓意深刻。著名的寓言"反裘负刍"、"叶公好龙"、"以粃食凫雁"等就出于此书。

《苻子》 凡六卷，南北朝时前秦文学家苻朗撰。原书已佚，清代马国翰有辑本，载《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书中杂录故事传说，寓言颇多。这些寓言有意模仿《老子》，却又能别出新裁。佛经中的事物在这些寓言中也得以展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刘子》 又名《刘子新论》、《流子》、《德言》等，著者或刘勰，或刘昼、或刘歆，迄今仍无定论。为南北朝时期较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主要论述治国修身之要，间杂九流之说，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论证。寓言大约30余则，或改造旧寓言，或另加新制，都能别具一格。

《金楼子》 梁元帝萧绎著。原为十卷十五篇，今本六卷十四篇。辑于《永乐大典》。其中寓言20余则，集中于《杂记篇》上、下。这些寓言在南北朝时期较有影响。《金楼子》有"知不足斋"本、"百子全书"本。

《无能子》 作者自号"无能子"，姓名生平不详。据书内序文可知，此书是公元八世纪时的作品。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书中寓言约20则，大都阐述老庄思想。其中"鸩与蛇相遇"、"樊氏有美男子""枭未必凶"较出色，有"百子全书"本。

《艾子杂说》 又名《东坡居士艾子杂说》、《艾子》。我国古代第一部寓言专集。托名苏东坡撰，但苏东坡全集中不见载。共有寓言39则，作者所假托的人物"艾子"贯串全书，他滑稽幽默、机智多谋，体现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的褒贬和讽喻。此书对后世影响较大，《郁离子》、《艾子后语》等均有模仿它的痕迹。

《龙门子凝道记》 寓言体散文集。明宋濂撰。凡三卷、二十四篇，与一岁的节气暗含。借龙门子（作者别号）的言行，讥刺、抨击黑暗现实，用寓言阐述哲理，微言大义，发人深省。《魏人博物》、《焚鼠毁庐》、《宝价十万》、《剜股藏珠》等著名篇目即出自此书。

《郁离子》 寓言专集，由元入明政治家、文学家刘基著。全书凡10卷，分18篇，195则，写于作者元末隐居之时。据明初徐一夔《郁离子序》分析："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郁离者何？离为火，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郁离子》不仅是我国古代自著寓言集中规模最大、质量较高的一部，而且也是世界寓言宝库中的瑰宝。作者以其超群的才华，变神话

传说、历史故事为己用，驱三教九流、士农工商、自然界事物为主角，表现了作者对元末黑暗社会的深恶痛绝，具有积极意义和人民性。此书上承唐末时的寓言高潮，下启明清寓言的复兴，在寓言史上有重要意义。

《燕书》 寓言集。明宋濂著。41则。系作者于元末隐居之时所作。抨击元代政治社会的黑暗、讥刺一般的人情世态。笔锋犀利，寄意深刻。形式上，"起有引，末有记"（傅旭元《小序》）特为讽刺流弊而设。

《权子》 又名《权子杂俎》，寓言小故事集，1卷30篇。明耿定向编撰。书名本于孔子"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一语，"权"即通权达变之意。书中作品有的是作者自著，有的则是改编而成。大都具有警戒性。较好的篇目有《吾失足容》、《假人》、《季子投师》等。

《解愠编》 笑话寓言集。明乐天大笑生纂集，凡14卷。寓言占五分之二。内容多为对贪官污吏、纨绔子弟、迂腐书生及社会丑恶现象的讥刺、嘲讽。从总体水平而言，此书格调不是十分高雅。

《笑林》 笑话寓言集，明浮白斋主人辑。全书1卷，145则。描写对象都是社会下层的人物，对假道学及人情世态的畸形怪状作了极为尖刻的讽刺。语言通俗浅显，形式短小精悍，是明代笑话寓言集中较好的一种。

《艾子后语》 寓言笑话集，明陆灼撰。凡1卷15则。作者在表现手法上，完全取《艾子杂说》的形式，也是让"艾子"这一主人翁贯串全书，借"艾子"的言谈举止，揭示作品的主旨，对社会现实中丑恶现象的揭露、抨击、讥刺、嘲笑，过《艾子杂说》而无不及。

《笑赞》 笑话寓言集。明赵南星编撰，凡1卷，72则，附录1则。载《赵南星全集》中。每一则笑话寓言之后都为之作"赞"，"赞"中往往又引述其他寓言。文字犀利，颇能醒目。这种新形式是一种创造。

《广谐史》 传体寓言集，明陈邦俊编，凡10卷，万历四十三年（1615）编就。编者在明徐常吉《谐史》之基础上，用20年时间广泛搜求增补而成。收录自韩愈《毛颖传》问世以来，以物品为传的寓言、游戏文242篇，大大超过《谐史》，故名。许多作品依赖此书才得以流传，它是中国传体寓言的可贵资料。

《雪涛小说》 诙谐寓言集，明江盈科撰，凡1卷14篇。每篇都有作者评议的文字，讽喻时政和市俗丑态。在诙谐中隐含讥刺的锋芒，显示出笑话和寓言合流的倾向，这是我国古代寓言形式上的一个发展。《驼医》、《狡生梦金》、《鼠技虎名》可视为代表作。

《古今谭概》 又名《古今笑》，《古今笑史》。笑话、寓言、讽刺小品集。明冯梦龙编纂。共36卷。每卷各为一"部"，每"部"都有其美刺的特定对象，如"迂腐部"谈腐儒，"贫俭部"谈俭吝，每"部"之首都有概论，指明讽喻的对象；每则寓言故事之后又附简短评语，点明主旨。

《广笑府》 笑话寓言集。明冯梦龙纂辑。共13卷，分《儒箴》、《官箴》、《九流》、《方外》等14部，总计101条。因体制、内容和明乐天大笑生所纂《解温编》大同小异，故推断此书可能是冯梦龙在《解温编》之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全书总旨是针砭人情世态。

《笑府》 笑话寓言集，明冯梦龙辑。分上下两卷，8类，100则。内容多为编辑者加工、改造过的民间笑话和寓言。编者在其《笑府序》中说："《笑府》集笑话也，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作者将笑话当成了醒世的寓言，著书的目的非常显明。

《谐史》 传体寓言集。明徐常吉编。凡4卷73篇，系唐宋以来以物品为传的寓言和游戏文的选编。为研究古代传体寓言和拟人化寓言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笑禅录》 笑话寓言集。明潘游龙编撰。1卷18则。作者利用佛经语录的形式，先"举"（举证）后"颂"（或称"偈"），中间插入"说"，目的在于讥笑禅宗。文中"举"和"颂"实际上就是寓言故事的主体。

《贤奕编》 笔记体，明刘元卿撰，凡4卷16编，附录杂钞两编。其中有寓言90余则，这些寓言大都从前人著述、同时代人作品、佛经中裒辑而成，内容非常丰富，每则之后扼要点明主旨以警诫读者。书名含"览卷贤于奕"之意。

《叔苴子》 明庄元臣著，收在《庄忠甫杂著》中。共38卷，1265条。其"外篇"14卷寓言颇多。讽刺时政，寓意深刻。较优秀的寓言有：《暴慎二子》、《以瓦为钱》、《为珠设者》等。

《古今寓言》 寓言专集。明陈世宝辑。选录先秦至明代各家文集中的寓言，依内容分成12编，上至天文，下及地理、人物、神鬼、鸟兽等无不在其中。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辑成书且以寓言命名的寓言故事集，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寓言的可贵资料。

《吴鳏放言》 寓言体散文集。清吴庄撰。因丧妻故，作者"窃念往年此日方作团𪤊之会，而今孑焉此身，风雨孤灯，形影相吊，有难以卒岁者"（作者书中记），遂自称鳏夫，著书自遣。文中常插入寓言故事，寄寓自己的孤独、苦闷。对话方式的采用略嫌千篇一律，但具体到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还是比较有新意的。

《物感》 寓言集，清李世熊撰，凡1卷20篇。内容为讥刺时政、人情世态。有些篇目本于他书而非作者自撰。其他作者创作的篇目受《伊索寓言》的影响较大，如将寓言主角拟人化、用警句格言结束等。这在中外寓言史上都是大可注意的。

《嘻谈录》 笑话寓言集。清小石道人纂辑。分"初录""续录"两集。作者创作此书的目的是"言之者无心，闻之者解颐，录之者又何憾焉。"（自序）内容多讽时刺世。故事性强。用对话揭示主题是其特色。

《笑得好》　笑话寓言集。清石成金撰。全书分初集、二集，分别收在《传家宝》初集卷七和二集卷七中。作者欲“以笑话醒人”，在每则故事之后“评列醒目”。大都劝善惩恶、讥刺时弊。语言系民间俚俗，极易流传，影响也较大。

《一笑》　笑话寓言集，清俞樾撰，1卷13则。收录在《春在堂全书》中的《俞楼杂纂》卷48（1899年刊）。这些作品是作者对少年时所听到的民间笑话、寓言的追述，艺术上有所加工改造。作者强调“夫古人著书，期于明道，若止以供一笑而已，又何足传”（《一笑引》）所以他书中的寓言故事讽喻颇深。

《孔子集语》　清代经学家孙星衍在宋代薛据《孔子集语》（三卷）之基础上，广收博引孔子言论行迹，编纂而成，共17卷。目的是“羽仪经业，导扬儒风”（严可均《孔子集语·序》）。书中除间有寓言外，特设“寓言”篇，分上、下两卷。这些寓言多取材于《庄子》、《列子》，独创性差。

古文美学

美学家

孔　丘（前551—前479）　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创始人。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人。他的思想言行，主要见于他的弟子记录、整理的《论语》一书。孔丘的思想体系以"礼""仁"为核心，一生以恢复周王朝的一整套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和各种礼节仪式为己任，提出以"仁"为规范，即把自己的主观目的、情感、欲念自觉地与一定的社会客观规定（"礼"）相融合。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十分重视文艺的作用，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论语·泰伯》）。孔丘把文学作为"事父、事君"恢复周礼的工具；"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和"礼"、"仁"思想相一致。他主张中和之美，提倡"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他既重视文学的内容，又不忽视形式，提出了最初的文质观："文，犹质也；质，犹文也。"（《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虽然孔丘的文学思想是从其"礼""仁"核心出发，并为之服务的，但因其在儒学中的崇高地位，对后世散文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辞达"说以及"志足言文"说，更成了后世散文创作中基本的美学原则（详见"辞达"、"左传"及"志足言文"诸条）。

墨　翟（约前468—前376）　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鲁国（一说宋国）人。出身平民，曾为造车工人，自称"贱人"。相传墨子早年曾学习儒术，但不满儒礼的烦琐，于是聚众讲学，另立新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为了实现政治主张，他奔走各处，先后到过宋、卫、楚、齐等国。为了扑灭战火，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不远千里去止楚攻宋。其学说代表了"农与工肆"的小生产者的根本利益，有一定

进步意义。墨子要求文学与一切言谈，都有实用功能："今天下之君子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利者也"（《非命》下）就是说，对国家、对人民都要有实际的好处。这开了后世古文家关于文贵致用的观点的先河。从尚用的原则出发，墨子又提出"非乐"的思想。这些思想观点虽也有表达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的一面，但主要地基于小生产狭隘的功利主义，否定了审美和艺术。墨子还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即"有本"、"有原"、"有用"（详见"三表法"条），把它作为立言、著文的原则和标准。"三表法"有一定科学性，在古代散文美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辉。墨子从"三表法"认识论出发，肯定作为"善"的美，而否定作为"饰"的美。尽管肯定了美的客观存在，却片面强调"用"而轻"文"，以至否定了美的形式，美的文饰，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孟　轲（约前372—前289）

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散文家。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孟子最先提出了"养气"说，强调人的内心道德修养，认为"浩然之气"是一种刚健之气，是充塞于人体内和天地间的精神本体。后来北宋苏辙将"养气"说发展为散文美学的一种理论，南宋王十朋以刚气论文，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倡充满"天地之阳气"的"风雷之文"，等等，都与孟子的"养气"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两说，虽属诗论范围，但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对后世散文的鉴赏与评论也不无指导意义。

庄　周（约前369—前286）

战国时著名的思想家、杰出的散文家，道家思想的创立者之一。宋国蒙城（今河南商丘县）人。他对各家学说无不涉览。司马迁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周继承了老子天道无为的自然观，主张顺应自然，反对人为。他提倡"朴素"之美，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反对雕琢，反对矫揉造作。这对后世苏轼等古文家推重自然天成之美，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他要求文艺必须有真情："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渔父》）他充分肯定了情感的审美价值，对中国古代散文美学理论和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还提出了"言不尽意"的看法："大辩不言……言辩而不及"，"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篇》）。尽管在庄子文章中，这一思想前后有众多矛盾的地方，但对文学本性的深刻把握，是有很高的理论价值的。

荀　况(约前313—前238)
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个主要代表者。赵国(今山西安泽县)人。当时人尊称他荀卿。汉人避汉宣帝刘询讳，又称孙卿。荀况从儒家立场出发，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的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重视文学的作用(先秦诸子所谓“文学”是广义的，主要指学术、学问或文物制度，也包括文学在内)，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文学思想，重质尚用，要求文学为封建政权服务。他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石)也，玉人琢之，为天下宝。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大略》)即是说，文学有塑造人的作用，即使是“鄙人”，也可以通过文学塑造成君子。他主张“文而致实，博而党正”，反对华辞丽藻，把“辞辩而无统”、“文章匿而采”看作是“乱世之征”。但又肯定“文为质饰者也”，把“文饰”看成事物美质的表现，不完全否定“文饰”。可见他的认识是矛盾的。他对孔子提出的“文”与“质”这一对美学范畴的涵义与相互关系作了发挥。他认为“文”包括名、辩、丽、采等，“质”包括情、理、用、功、实等。认识到二者是对立的，又成反比地互相消长，虽然归于“文”从属于“质”这一主张，对“文”的审美特征有所忽视，但毕竟丰富了古代散文美学理论。

韩　非(约前280—前233)
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出身于韩国贵族，曾师事荀况。韩非反对儒家的学说，对儒、墨所称道的典籍、诗书、文学，竭力加以反对和排斥，认为都是游辞虚文，妨害法治。“儒以文乱法”，“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五蠹》)。因此，为了强调法治，必须“息文学而明法度……此公利也”。(《八说》)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他继承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就文和质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重质而轻文，强调质的自然与本色美。“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解老》)但由于他一概排斥文饰，也走向了否定形式美的极端。这是由他强调“务本”的政治思想以及崇尚“功用”的狭隘功利主义观点所决定的。(余逊涛)

董仲舒(前179—前104)　西汉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著作有《春秋繁露》等。汉武帝元光元年他被举为贤良，对答汉武帝策问，成为有名的《天人三策》(即三篇《举贤良对策》)，系统说明大一统的政治主张与天人相与的哲学思想。本文的结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

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文字，引经立论，将荀子《非十二子》中提出“圣王之所禁”的主张，作了符合新的政治需要的阐释，进而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代基本国策，而其张扬儒术，雍容论道的文风，也一变先秦汉初以来诸子百家放意纵谈的传统，对两千年间封建正统文人的学风、文风、思想作风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董仲舒还竭力倡导一种“中和之美”。他说：“中者，天下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他用中和来观察一切，衡量一切，也用于对作家作品的评品。他要求“君子怒则返中而自悦以和，喜则返中而收之以正，忧则返中而舒之以意，惧则返中而实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返如此。”据此，就取消了文章中的一切喜怒忧惧的个人情志，诸子之辞，纵横之说，屈赋庄论，就都在排斥之列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董仲舒应是官方文学的早期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文　白）

司马迁（约前146—约前86）

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散文家。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县）人。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发愤著书的重要观点，认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都是由于作者遭遇到重大不幸，“意有所郁结”而“发愤之所为作”。根据这种观点，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种观点与孔、孟以来主张文学作品必须“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思想相比，显然是很大的突破。后来韩愈提出“不平则鸣”说，就是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司马迁还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成一家言”的观点，虽然主要就学说而论，却给后世散文美学家的创作风格论以极大的启示。

扬　雄（前53—18）　西汉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辞赋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作为古文美学家的扬雄，主要致力于赋的创作和研究。他早年曾沉溺辞赋写作，摹仿司马相如，构思遣辞，力求写得沉博绝丽，虽自有其特点，却使辞赋创作走上了模拟因袭的道路。随着思想的发展变化，他晚年一反以前对赋的偏爱，指出汉赋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妨害了文学讽谏作用的发挥：“雄以为赋者，将以风（讽）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就是说，赋家尽管意在讽谏，但由于作品极力铺陈，“侈丽闳衍”，只能起到欲讽反劝的效果。因而悔其少作，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自以为“壮夫不为”（《法言·吾子》）。这种对浮夸文风批判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但扬雄并未全盘否定赋体文学，他从思想与艺术两方面将赋体分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两大类，并揭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他所要否定的实际上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详见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条》)。在《法言》等文章里，扬雄还提出要宗经，征圣等观点。主张以经书作为言语的典范、行动的规则。"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无)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法言·吾子》)与此相应，他反对过分文饰，主张华实相符："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这些思想，对后世刘勰，韩愈等都产生了影响。

王 充(27—97) 东汉著名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王充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吸收先秦时代关于天地之气的朴素唯物思想，建立了他的以"气"为核心、以"无为"为原则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的散文美学思想，融合了儒道两家的许多基本观点，注重文学的实用价值，认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篇》)，要求文学能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作用，反对"徒弄笔墨，为美丽之观"。这与后代散文家关于文贵致用的观点的形成，有一定关系。而对文学自身审美属性有所忽视，是其理论上的缺陷。不过，他也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情与辞的统一，要求"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超奇篇》)，反对"雕文饰辞"、"言过其实"，提出了"疾虚妄，归实诚"的主张，以及"精诚出中"，其文感人的观点。他对真和善的强调，是针对当时虚妄、模拟和复古的文风而发的。他批判了"贵古贱今"的文学观，提出了衡量作家作品新的价值尺度："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案书篇》)王充的这些思想，深刻而富有创见。刘熙载云："王充《论衡》独抒已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艺概·文概》)是很中肯的。

班 固(32—92) 东汉著名史学家、辞赋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县)人。班固的散文美学见解，主要见于《两都赋序》、《汉书》一些传赞以及《艺文志·诗赋略》等。班固对汉代新兴的赋体文学作了比较精到的研究。他考察了诗与赋的源流关系："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叙述了赋体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揭示了赋体产生的时代原因，描述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盛况，分析了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多虚辞滥说"的创作特色(见《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指出了汉赋"润色鸿业"(《两都赋序》)的时代特点，等等。对赋体文学思想价值与美学价值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充分肯定了汉赋的文学成就，认为汉赋完全继承了《诗经》雅颂的传统："……或以杼(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同上》)这一见解，虽然有对帝王的曲意逢迎也加以大力褒扬的不足，但就总体言，却基本上符合汉赋的创作实际，相对于扬雄晚年作的过多的否定来说，要显得比较客观公正。班固对屈原有独特的看法，他虽然对屈原的为人和作品也有所肯定，但明哲保身的儒家观念，使

他对屈原一生的处世行节基本持否定态度。甚至对屈原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他也反对。他把屈原的诗歌作品全部看作赋体，是对文体概念的混淆。班固相当保守的文学观，同样表现在他对司马迁的评论上："司马迁著书成一家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义）士也"。（《典引序》）又说司马迁"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赞》）。这些错误的评判，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不良影响。 （余逊涛）

曹　丕（187—226）　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散文美学史上较早地运用宏观的方法，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的专篇。在此之前，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只言片语，淹没在哲学和政治的论述之中。到了汉代，已出现用序、赞形式来讨论文学的，但往往只讨论某一具体作家的作品，限于一篇一书，没有宏观意识，所以《典论·论文》有开创性。曹丕以帝王之尊，推崇文艺，提倡开展文艺批评，这在文艺美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与吴质书》中，他扼要而公允地肯定了陈琳、刘桢、王粲诸人的文学成就，特别是散文创作的成就，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它与《典论·论文》都是散文美学史上最先对一个创作群体进行全面总结的文字。文中"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的观点，包含着文学将不断发展的思想，也与《典论·论文》中"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批评精神相一致。 （周玉纯）

曹　植（192—232）　著名文学家。字子建。其文学观的集中表述，无过于《与杨德祖书》一文。在文学评论方面，曹植认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必文章高手才可以评论文章，这显然是偏颇之论，把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混同起来了。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地位问题上，他与其兄曹丕的观点也直接对立着，公开宣称不以翰墨为勋业、辞赋为君子，而一心想着投笔从戎，立功绝域，认为文章小道，不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这与曹丕"经国之大业"的提法形成了争论的对垒。话虽如此，曹植毕竟是位文学家，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则是十分认真、用尽心血的。他对于散文美的追求是开风气的。比如他复信吴质，称赞来信写得好，自己读信时心灵非常愉悦，他说："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复，旷若复面。"这种写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手法：将抽象的、难以捉摸的情感体验，用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传达出来。这一手法，前此罕见，而开六朝文坛词采华艳的新风。

嵇　康（223—262）　魏晋时期的著名作家，性刚直，有才学，喜老庄，情意傲散，不涉经学，不守礼法，"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文学上，他接过老庄崇尚自然的旗帜，在王弼等人的玄学思辨之外，另辟蹊径，从具体学术活动与艺术创作、艺术功能的分析入手，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他写《难自然好学论》，批驳儒家宣扬的人从天性上就能接受仁义道德的说教，反对把儒家经典看得高于一切。他

反对儒家倡导的诗教礼教乐教那一套。作《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本身有艺术水准高低之分，但不具备哀与乐的成份。因为哀或乐是人的情感，不是音乐自身的内在因素。嵇康以此抨击儒家，指出其利用文学进行说教的毫无根据。嵇康一面指出音乐本身的没有哀乐，同时又进一步研究了音乐是如何作用于人的情感，从而引起人的哀乐感受的，他说："然音声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涕泣涟涟矣。"这就是说，"音声和比"是调动欣赏者的情感活动的关键。于是研究如何使"音声和比"便是文艺家的任务了。这样，嵇康也就开始了对于文学作品艺术语言的音乐美的问题的研究，当然也就开始了对散文语言音乐美的研究。六朝人对声律热烈探讨，与嵇康是有密切关系的。汉语文章讲究声之高下抑扬与"气"之清浊长短，是有其传统的。

王　弼(226—249)　字辅嗣，曹魏时著名玄学理论家，有《老子注》《周易注》等传世。他在进行哲理阐释的同时，也涉及到文学问题。先秦《易经》中有"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情伪"的说法，《庄子》中有"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观点。王弼综合这些看法，为着玄理宣传的需要，也对"言"——"象"——"意"的关系进行了思辨性的考索与论证。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周易略例·明象》)这是说，言，可以勾画出象来；象，可以传达出意来；言可立象，象可尽意。这里的言，泛指一切书面的和口头的语言，当然不仅是文学语言；这里的意，则泛指人的一切概念、观点、思想、理论，或情志、印象、风采、气质等等；这里的象，就不仅指生活中实有的人的形象及事象物象，还包括人们经过想象、联想、幻想而构撰出来的各种幻象。运用这种"立象尽意"的原则于散文创作，就要求以优美的文学语言，鲜明的文学形象，来传达人们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与评价、理解与体验。在文学欣赏中，就要懂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不要拘泥于具体物象或只言片识，而应从精神上去契合它、领悟它。这样，王弼就不仅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立象"、去写作，也教会人们如何去阅读，去欣赏。他的玄学思辨，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资料。

葛　洪(250？—330？)　号抱朴子，西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位炼丹士。所作《抱朴子》分为内篇与外篇两部分，其文学观较集中地反映在外篇的《钧世》、《百家》、《刺骄》、《辞义》等文中。他反对流行一时的玄学清谈之风，对王充尚质尚用的文学理论，对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观点，他都赞同，却也吸收了陆机重视文学形式美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文章与德业同样重要，"谓之余事，未之前闻"。在他看来，天地万物各有

自身的文彩辉光，各有自身的德行功用，不应强分高下或偏废其一。他试图从文与德的关系上，解决文的社会地位问题。显然，这是对曹植“辞赋小道，不足以揄扬大业”论以一种拨正。他认为文学是发展的，今胜于古。“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其清富赡丽过于《尚书》”。他斥责崇古论者说：“盖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虽冶铄于畴曩，然其精神布在于方册，情见乎辞，指归可得”，有什么可神秘的呢？古人之书，由于时代不同，地域各异，加上简册难以保存，埋藏日久，残篇断简，难以认读，并不是古人行文有什么奥妙之处。这一分析，无疑使那些宗经崇古论者失去了灵光。同时，他也不一味“颂今”。他曾说：“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美，故有损而贱”。对当时文坛不顾及社会效果，不顾及文章内容的文风，也进行了有力的拨正。总之，葛洪在文学上的观点，总的看来是进步的，积极的。（文 白）

陆 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陆机的《文赋》，是探讨文艺美学的专门著作，也涵盖了散文美学的理论和观点。因其研究的深入与论述的具体，其价值在陆诗之上。他写《文赋》的目的是“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利害之所由”，以利于创作上的“曲尽其妙”，但全文重点不在前者，而在于后者。他从文章创作的原因讲起，广泛论及构思、谋篇、行文、风格、体裁以及他体会到的创作甘苦。他本是作家，加上潜心体味，精心表述，因此《文赋》在探讨文学创作内部规律上，十分深入和具体，这是《典论·论文》所不能相比的。其中许多精到的见解，对刘勰的文学理论颇有影响。

刘 勰（465—521） 字彦和，东莞（今山东莒县）人，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坎坷贫穷，青年时期到南京谋生无门，依定林寺和尚僧佑十多年。其间除帮助僧佑整理佛经外，更精研经史百家的著作和历代文学作品。31岁左右开始《文心雕龙》的写作，历5年完成。经过沈约的评定，该书渐为人知。503年，他离开定林寺入仕，做过几任小官。511年，改任萧绩记室，兼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519年，升迁步兵校尉，管理东宫警卫。同年，奉命回寺整理佛经，尔后弃官为僧，不久便谢世。刘勰的伟大著作《文心雕龙》是世界上早期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为成功的一部理论专著，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美学理论的最高成就，在散文美学理论的建设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全面总结了创作经验，深入开展了文体研究，其思维的缜密、深入、全面，直到今日还为人所叹服。它的许多精采论述仍然是今天指导文学创作、研究文学现象的有力武器。由于时代思潮和文艺发展的限制，当然也有些局限，但在一千五百年前，出现这样理论色彩强烈、抽象思辨发达的著作，实在无愧于古今中外读者的敬仰和推崇。（周五纯）

沈 约（441—513） 字休文，齐梁作家，声律学说奠基人之一。有《宋文章志》《晋书》《宋书》《齐记》等

著作，明人张溥说他“史书居长”。在文学理论方面，他的突出贡献是研究了汉语语音的声韵调的构成，提出了“四声说”，并将其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当时的诗歌与骈文的创作。他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见《宋书·谢灵运传》）同时，沈约又用他的声律说去评价前人作品，说汉代王褒刘向杨雄班固等人，“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词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但对建安作家的暗合音律之作，他倒颇为赞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这里，他讲的虽然是诗，但在当时条件下，无疑也是对骈文骈赋的一种要求，一个准的。《梁书·沈约传》称：“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他对自己的文学贡献是颇为自负的。

裴子野（469—530） 字几原、齐梁之际的作家，文艺理论家。作品今存《雕虫论》《宋略总论》等。他对南朝君主的雅好文艺很为不满，称为“雕虫之艺”；对当时文坛“摈落六艺，吟咏情性”的时风，非常反感，发出了“圣人不作，雅郑谁分”的慨叹。对于宋齐以来的文风，他概括为“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志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并归结为“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彩’。”这段话，对齐梁文风，实际上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他自己“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辞。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在齐梁文坛上，裴子野是独树一帜的，如果说北朝与隋唐时有文章复古之论，那么，裴子野应是生于齐梁而反对齐梁、主张复古的先行者。不过，他的作品存世不多，虽然当时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他的反对者萧纲就曾说“比见京师文体，懦钝异常……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可见他在当时是发生过影响的，只是时风如彼，未能奏效。

萧子显（489—537） 齐梁作家，有《南齐书》等传世，另有《后汉书》一百卷，已失传。他的文学观，集中表现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他将文章定义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文章是人的心灵的观照、情感的外射，所以，“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于生灵，迁乎爱嗜。”文章的蕴酿构思，结撰成篇，都取决于作者本人的个性，取决于作者本人的好尚。他将宋齐文章，分为“三体”，一以谢灵运文为代表，“典正可采，酷不入情；二以傅咸为代表，“缉事比类”、“顿失情采”；三以鲍照为代表，“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他认为真正的好文章在“三体”之外，他希望有这样的文章：“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平时注重个性修养，多读史传，临文不必苦思冥想去搜索典故，必能思发泉涌

而自然成文。他又说："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反对那种堆砌故实，非对不发的骈偶艰涩文风。他欣赏一种"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之文。应该说，萧子显的这段话，比同时代的许多论者更贴近于文学的本质。在同篇文章中，他还发出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号召，要求当世文人才士，着意于"新变"，不要守旧复古，也不要沉溺于时风，而要另辟蹊径，就如建安作者，各逞所长，陆机潘岳，互不相袭一样，要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建树。这些都是对的。当然，他本人的文学成就未能达到这一目标。

苏　绰（498－546）　北朝作家。魏周之际，他曾写《奏行六条诏书》，要求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得到采纳。他说："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异于木石，不同禽兽，故贵之耳。"他是讲中和仁恕之美的。他说当时"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因而风衰俗弊，必须下一番"洗心革意"的教化之功。这里，他没有直接谈到文章在教化中的作用，其实已包涵了这方面的意思。后来宇文泰当政，认为从晋以来，"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尚"，想革除此风，便命苏绰作《大诰》，行文全仿《尚书》，并下令全国："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大诰》是一篇政府文告，大意为叙述西魏政权的创业唯艰，表彰宇文泰的扶危拯溺之功，然后写道："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爰自三五，以迄于兹，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袭，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本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这样提出问题，就其用意讲，是合理的，必须的；就其救弊之方讲，却是陈腐的，而且用语完全脱离当时社会生活以至政治生活中的语言实际，因而并未如愿推广。不过，改革魏晋南北朝的浮华文风的历史要求，终究是被提出来了，并引起了政界的注意。苏绰的这份工作，还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文　白）

萧　统（501－531）　南朝梁文学家。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长子。天监元年立为太子，未及即帝位病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著有《昭明太子集》（明人辑本）。萧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十分推崇儒家经典，同时也受到佛家思想熏陶，笃信佛教。他力倡文学，曾聚集当朝文学精英，汇编《文选》30卷。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萧统顺应文学发展的要求，在我国文学史上最先对文学与学术著作作了区分。他认为学术著作以阐述作者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为主，即所谓"以立意为宗"（《文选序》）；文学则要求作者通过精心的艺术构思来组织题材，并运用辞藻、声律、对偶等形式技巧来表现精深含蕴的义理，即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以能文为本"（同上）。这说明萧统对艺术思维的部分特征有所领悟，特别是对文学形式方面的特征已有明确的认识。萧统的文学审美倾向偏重于形式，但也

注意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对文学的审美要求是“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强调了文学形式诸因素之完美统一，以及文与质的相称。他对六朝文学重文轻质的现象亦持肯定态度，认为“踵事增华”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认识到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和巨大的美感作用，指出优美的文学作品对审美主体的精神、品格、情操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之可蹈，抑乃爵禄之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陶渊明集序》)《文选》反映了时代审美倾向，反映了萧统的文学审美标准，成为研究中国美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萧统对文体的研究，对陶渊明作品(包括诗文)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也都对古代散文美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王锡凡)

萧　纲(503—551)　梁武帝第三子，后袭位为简文帝。他的诗歌“伤于轻艳”，但文章写得并不浮华，其文学观主要见于《答湘东王书》、《昭明太子集序》与《诫当阳公大心书》等文。他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立身是应该谨重的，所以，他作为太子时，是以“触邪进善”、“献可替否”为己任的，他曾“驱驰五岭，在戎十年”，不似那种“未尝识山川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的人(均见《答徐摛书》)但他为文，则主张“放荡”，即不受拘禁，不学经典。他说：“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一句话，抒写情志之文，自应让情志充分地表达出来，这叫“放荡”。他颇为遗憾地说：“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如何能够改变这个局面呢?他主张思想开放一些，文章随便一些，象他的弟弟萧绎所说的，要写得“流连哀思，情灵摇荡”才好。萧纲先以太子身份，后以国君身份，作为文辞，提倡放荡，对社会的影响自然是深远的，它给六朝文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刘　昼(516?—567?)　北齐作家。终身未能入仕，其文学主张，颇能反映北朝风气。其《刘子·言苑》篇说：“画以摹形，故先质后文；言以写情，故先实后辩。无质而文，则画非形也；不实而辩，则言非情也。红黛粉容欲以为艳，而动目者希；挥弦繁弄欲以为悲，而惊耳者寡：由于质不美也。”这样的重质轻文，正与南朝风气成反对。有人说“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理胜其辞”而“便于时用”，但不宜于咏歌。北方重质，南方重文，其来有自。(文白)

颜之推(约531—约595)　北齐文学家。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先后仕梁、齐、周、隋四朝。著有《颜氏家训》。颜之推的散文美学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他认为有的作品有“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的社会作用和教育功能；有的作品富有审美情趣意兴，人们在创作和欣赏过程中，可从中感到是一种“乐

事”。但他认为对这种作品“行有余力，则可习之”，多少表现出对这类富有审美情趣的作品的轻视。他认识到作家在创作中“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灵感思维的特点，却又要求作家在抒发主观感情，表达审美理想时，“深宜防虑”，不要“忽于持操”。因此，他对屈原、赵壹、阮籍、嵇康等具有反抗现实的积极精神和浪漫风格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给予了错误的评价。颜之推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看法颇为正确，主张义理和词采并重，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认为华实不可偏废：“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他很重视创作才能，承认创作要有天才，也不否认后天的磨炼：“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这接触到了创作的某些本质。从总体看，颜之推的散文美学观点，反映了南北文风逐渐融合、统一的历史趋向，具有重要意义。（王锡凡）

魏　征（580—643）　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馆陶）人。魏征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观点主要见于《隋书·文学传序》、《群书治要序》和《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之中。作为一个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魏征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认为，文学的作用乃在于“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因此，他崇尚质朴纯正，于世有补的文风，反对梁陈以来浮靡轻巧的宫体、骈俪之类的“亡国之音”。他批判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他认为，梁陈诸朝的灭亡，都与淫靡文风有关，批判这种淫靡浮艳的文风，对巩固唐王朝的政权有重要借鉴意义，从而把文学与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等同起来，混为一谈。但在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和美学问题上，魏征顺应了文学发展的历史，主张继承，反对模拟；主张创新，反对复古，特别对当时南北文风的不同与融合，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他说：“江左（南）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北）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以上均见《隋书·文学传序》）。这种融合南北文风，旨在使阳刚美与阴柔美结合的美学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后唐诗的发展，正应验和证实了这一美学主张的正确。

令狐德棻（583—666）　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历任大丞相府记室，后累迁至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弘文馆崇贤馆学士等。曾建议购求唐初散亡书籍，使数年间文籍略备。又主编《高宗实录》、《太宗实录》、《周书》等，对唐代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其文学理论和美学观点主要见于他主编的《周书·王褒庾信

传论》中。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很注重文学的教化作用，对齐梁以来的文风表示不满，评庾信说："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同时，他又批评苏绰摹仿《尚书》，不要文采的做法，以为"虽属词有师古之美"但"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他认为："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作诗文，应"以气为主，以文传意"。作为诗歌美学上的要求，他不仅主张创作要"掳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以做到调远，旨深，理当，辞巧，而且还强调"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只有这样，才能使诗文创作达到"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的境地。（曹 旭）

刘知几（661—721） 唐代史学家、史学理论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著有《史通》20卷。刘知几虽为史论家，但其所论，不少观点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特别是对史传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他主张文章内容应反映现实，忠于事实："书功过，记善恶"，"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史通·叙事》）。在形式上，应"文而不丽，质而不野"（同上），否定了齐梁浮靡文风，要求文质并茂。他重视史传文学中叙事这一表现方法，一再强调"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同上）。他提出了叙事"尚简"的主张，要求文章达到"文约而事丰"、"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同上），从而使史传文学具有一种精炼、含蓄、平易、深刻的审美意味。 （王锡凡）

萧颖士（717—759） 字茂挺，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祖籍兰陵（今山东枣庄南）。萧颖士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是与李华齐名的古文家。《赠韦司业书》自谓"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述之外，略不婴心"。因为他的兴趣只在历史、经术、制度方面，所以称自己"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又况区区咫尺之判，曷足希丈夫壮志哉！"对六经以来的著作，他以为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贾谊"文辞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之士，然而不近风雅"；"扬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此后复绝无闻焉。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提倡"原道"、"征圣"、"宗经"，不仅反对齐梁以来的骈体文和浮靡诗风，还几乎反对所有的文采，表现出他以古为美的思想。

贾 至（718—772） 字幼邻，一字幼几。洛阳（今属河南）人。贾至以文名天下，风格典重雅洁，皇甫湜《谕业》说："贾常侍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鸣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资以道义。"李舟《独孤常州集序》更称他下笔"历历如

西汉时文”。与其父贾曾前后掌执朝廷文笔，玄宗曾赞叹说：“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谓继美”（《新唐书·贾至传》）。《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一文，最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文章说：“唐虞赓歌，殷周雅颂，美文之盛也。厥后四夷交侵，诸侯征伐，文王之道将坠地，于是仲尼删《诗》、述《易》、作《春秋》，而叙帝王之书，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飚，大变风雅。宋、齐、梁、隋，盈而不返。”可见，其论文之旨，与萧颖士、李华大致相合；其中重人伦教化，贬斥屈宋扬马，以古为美，以为文章不断在倒退从而急需改革的观点，比萧、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独孤及（725—777）　字至之，河南洛阳人。独孤及以古文得到李华、贾至等人的赏识，自谓“后世虽有作者、只籍其不可及已。”“每申之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其文学主张和美学观点，主要表现在《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和《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两篇文章中。前者以为“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而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以后，“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后一篇文章阐发五言诗“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李、苏，盛于曹、刘”的发展过程，以为“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他强调，正确的诗歌发展道路，应是古代的比兴传统与当今声律的结合。独孤及重儒家经典，但不排斥文采和声律，复古，但又重视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倾向，对于曾师法他的门徒韩愈，无疑有重要影响。

梁　肃（753—793）　字敬之，一字宽中，安定（今甘肃泾川）人。作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独孤及视梁肃为友，梁肃仰独孤及为师。贞元八年（792），梁肃协助陆贽主试，又推举韩愈登第。故其文学思想和美学观点，既受独孤及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他的学生韩愈。比起萧颖士、李华、贾至等人的美学观点来，梁肃对文章、道德、政教之间的关系，看法更趋向全面。《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说：“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秘书监包府君集序》说：“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薄厚，与立言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最值得重视的是，梁肃提出了一个古文运动中的重要美学命题——“气”的问题。《补阙李君前集序》说：“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为常州独孤使君祭李员外文》说：“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气积中，畅于四肢，发为斯文，郁郁耀耀。”梁肃的“气”，指气势，气魄，与曹丕《典论·论文》中“文以气为主”主要指作家的气质、才气有所不同。曹丕以为“气之清浊有

体，不可力强而致。"梁肃则以为"道能兼气，气能兼辞。"即指由创作冲动和道德积累形成的充沛情绪状态，完全可以人为地培养，得道即可得气。文道与儒道、道与气与辞，这一系列美学观点，都为韩愈继承，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纲领。

裴　度（765—839）　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度是李翱的从表兄。论文尚平易通达之美，反对奇言怪语。李翱创作虽受韩愈奇诡险怪的影响，但仍有平实流畅的一面，且论文不偏向易难的任何一端。以为"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词之易与难也"。但在裴度看来，李翱，乃至韩愈，仍有追求语言新奇，故意把文章弄得奇奇怪怪的弊病。他在《寄李翱书》中指出：自古以来的名家之文，都是"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的。而"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他进一步阐发说："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这一看法，的确是击中了一些古文家的要害。美感的产生，并不在于那些违反语言规律的"陌生化"。裴度赞成古文运动，同时对古文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加以纠弹补救，对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曹　旭）

柳　冕（约766—约830）　唐代古文理论家。字敬叔，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人。《全唐文》辑存其文14篇，而以"论文"名者有6篇之多。柳冕提倡古文，反对六朝骈俪文风，强调文章必须弘扬"六经"之道："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他对"道"的理解是："盖言教化发乎性情，系乎国风者谓之道"（《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意即圣人之道应体现在化民成俗的教育作用上。因此，他主张文章应以"六经"之道教育百姓。柳冕强调文章要反映社会现实："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乱。"（《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他重"道"而不轻"文"，提倡文道相兼："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语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兼之者，斯为美矣。"（《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不过，他的文道相兼，实质上是文教合一，与韩愈的以文贯道，着重从理论上阐发儒家思想，旨趣不同。鉴于当时文坛崇"道"卑"情"的偏向，柳冕还提出了情、道一元论。他说："夫天生人，人生情，圣与贤在有情之内久矣。"（同上）以为"志于道"，"尽于道"，是"合于情，尽于礼"（同上）。这表明他对散文创作中作家情感性的重视。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者之一，柳冕的散文美学观点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一些理论上的准备。

韩　愈（768—824）　唐代散文大家、诗人。韩愈的散文美学思想突出表现在对文与道关系的认识上，亦即对作品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认识上。他认为古文创作中应文道合一，而以

道为主，“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送陈秀才彤序》）。认为作文传道是目的，文辞是传道的手段。韩愈之所谓“道”，指儒家道统，他极力主张写文章要宣扬儒家道统。韩愈对创作中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把“道”的内涵局限于儒家道统，就显得狭隘与保守。在古文创作方面，他还提出许多颇有美学价值的意见。他从文章气势着眼，提出了“气盛言宜”的著名观点：“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所谓“气”，是指源于作者感情和肌肉、心灵的一系列运动而形成的内在节奏，经过外化，成为体现于结构和语言的抗坠、疾徐、张弛、强弱一系列的波澜起伏。这与曹丕的“文气”说涵义不同。对后世古文家的创作与理论均有很大的影响。清代桐城派刘大櫆更把“文气”和“神气”（作家的特定个性风格）结合起来。韩愈还强调作家要有自己的个性，强调创作的独创性，认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要做到“陈言”“务去”，学古人应“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虽有强调过分之处，为后人所诟病，但重视独立创造，力戒模仿因袭的创作精神是极可贵的。韩愈本人乃至唐宋古文大家能在创作上各标风韵，取得高度成就，与韩愈对审美创造的张扬是分不开的。他提出了有名的“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真正的作家对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不会是旁观者，而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自鸣其不幸”。他的观点体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比司马迁“发奋著书”说更有理论高度。此外，韩愈的“文从字顺”的观点，对唐宋散文自然的风格的形成，也有着极大的关系。由韩愈所倡导的唐代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旗帜下所进行的革新运动，它大力矫正了六朝骈文末流那种浮靡的文风，开创了古代散文创作全新的局面。韩愈的散文美学理论与创作实绩对中唐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坛影响极大。

（王锡凡）

李　翱（772—836）　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人，一说赵郡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与参加者。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上，受韩愈影响而与韩愈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首先，对古文与古道的关系，他也是因好古道而好古文，所谓“道”，他也指儒家传统的“尧、舜、文、武、孔子之道”（《答侯高第二书》）。其次，由于“道”必须由“文”表明，因此，他也重视文。这些都是韩愈美学思想的正传。

正如李翱散文发展了韩愈尚奇的一面，形成新奇诡丽的风格一样，在某些文学观点和美学思想上，李翱也有发展韩愈的地方。如对文章内容和形式两者关系的看法，他提出：义、理、文三者应该并重。《答朱载言书》说：“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又说：“故义深则意远，意

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李翱还强调文章"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答朱载言书》阐发说：古代的经典著作，都贵在自创其意，各不相袭。读《春秋》，如未尝有《诗》，读屈赋庄文，如未尝有六经，而《诗》、《书》、《易》、《春秋》及屈赋、庄文所以不朽，正在于它们独辟蹊径，各有"津润怪丽"之词，各自开辟了不同的思想领域和审美领域。意要新，言要工，所谓言工，必为己之独创，这比韩愈的"唯陈言之务去"和"辞务己出"来，阐述更详尽，意义也揭示得更为清楚。

李翱对韩愈的道德、文章都十分推崇，《与陆傪书》说："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与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从美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两方面，李翱都成了韩愈古文运动重要的羽翼。

柳宗元（773—819）　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柳宗元的文学主张和美学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继承王充的朴素唯物观点，认为宇宙是无限的，物质性的"元气"是宇宙的本元。物质世界的变化，是阴阳二气运动的结果，人事祸福社会兴衰，与自然界没有对应关系。这使他的文学主张和美学思想更带有进步的倾向。柳宗元在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文以明道"的美学主张。《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结合他的《守道论》一文看，他所说的"道"，是可以"辅时及物"的道，指可以使国家强盛，对人民切实有用的某种社会自然规律，并不仅指停留在纸面上的儒道，这种看法，与其他古文家的观点有所不同。

在艺术形式上，他一方面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忽视内容，"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的做法，比喻"是犹用文锦复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重视文采的作用。同篇中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杨评事文集后序》又强调说："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因此，在学习和继承问题上，他主张学习经典，借鉴《庄子》、《老子》、《离骚》及两汉人的作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详细阐述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对青年作者，他提出"奥"、"明"、"通"、"节"、"清"、"重"六种美学要求。使文章写得既深刻又明朗，既流畅又有

节制，既清新又凝重。

在作家修养与文学的关系上，他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要求作家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写作时，应克服"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使文章避免"剽"、"驰"、"杂"、"骄"等弊病。《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在文学发展史观上，他既重视文学遗产，又反对"荣古虐今"的做法。《与杨京兆凭书》说："诚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犹为今之人笑，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是观之，古之人未始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的社会现象，他大加抨击，称之为"俗耳庸目"，并以挑战者的口吻说，今人未必不及古人，韩愈的文章，就完全可与司马迁相比而超过了扬雄。《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赋，退之特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对于诗歌美学，他高倡"比兴"传统和陈子昂的"兴寄"说，承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他表明诗是失意者抒发其积郁的歌唱，是"感激愤悱"而作，这与韩愈的"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之类的说法相近。

皇甫湜（约777—约830）　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作为韩门弟子和韩愈古文运动的羽翼，他在散文创作和美学理论上都发展了韩愈奇崛劲健的一面，在磔裂章句，把文章弄得奇奇怪怪的道路上比李翱走得更远。面对随之而来的批评，他作《答李生书》三篇，抓住"奇"与"常"这一对立的美学范畴展开了论述。《答李生第一书》首先说明，"奇"与"常"是相对的，又是必然出现的，"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他举例说，例如，"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答李生第二书》围绕"文奇"与"理正"两者关系进一下阐发说："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他又举例说："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他又以儒生崇拜的《易经》为例说："《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为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等何语也？"面对李生对此始终抱有的敌意，在《答李生第三书》中，对李生奇与易与作者无关，仅在所为的观点加以反驳，嘲笑了他推重相如、扬雄的，正是艰深的作品，而真去写艰深的作品，则"恐生乃不能，非不为也。"

皇甫湜以为，奇特的思想，独创

的风格，别具一格的语言，必然会在普通人的审美经验里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而只有“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既表现了至正之理，又写出了“我这一个”，那样的文章才会传之久远，至于不朽。这种嗜奇嗜怪，以奇为贵，以奇为美的美学观点，虽也产生流弊，但对作家创造个性的丰富和审美领域的拓展，都具有积极意义。（曹　旭）

李德裕（787——849）　字文饶，赵郡（今河北晋宁西北）人。李德裕论文，以《文章论》为代表。他发展了曹丕的“文气”说，强调“气”要贯通，要“势壮”，要富于变化与节奏感。他说：“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词丽藻，……不得为金璞之宝”，“鼓气以势壮为美”。又以“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川流迅激，必有洄（回旋而流）洑（伏流地下）逶迤”为喻，说明“气”的变化与节奏。所谓“气”是指文章气势，与韩愈的“气盛言宜”说一脉相承。李德裕还提倡“自然灵气”说，认为“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这接触了文学创作中灵感思维的特点，又是为了强调作品具有自然音律与本色美的可贵。李德裕的散文美学观点，对韩、柳有一定继承性，但他完全否定沈约声律说，又轻视“文”的修饰美，认为“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即可，若再“错以金翠”，就会“美质既雕，良宝斯弃”，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王锡凡）

王禹偁（954——1001）　北宋文学家。字元之。在宋初文坛上，他是上承韩愈，下启欧、苏的重要人物。他反对西昆派浮华的文风，又与以皇甫湜一派为宗、一脉相传的古文家僻涩的偏向大异其趣。他主张建立平易朴素的文风，强调文章思想内容的明白易懂——“义之易晓”，语言风格的平易流畅——“句之易道”，显然取法于韩愈“文惟其是”的创作标准，以及“文从字顺”、“章妥句适”的风格特点。这就与“辞涩言苦”及磔裂章句这两种不良的创作倾向都划清了界线，从而体现了王禹偁以文“传道明心”的文道观，也有助于增强散文作品的美感。不过，他对扬雄文章艰深的一面作了全盘否定——“仆谓雄之《太玄》，乃空文尔”（《再答张扶书》），就多少失于偏狭（后来苏轼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也有类似的局限）。对于古文创作，他提倡“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旨在“传道明心”，但客观上也表明了他对作家创作冲动的重视，对后代古文家不无启发意义。因此，可以说王禹偁的文论是“宋代古文家文论的渊源”（郭绍虞语）。

欧阳修（1007——1072）　北宋大文学家、史学家。北宋新古文运动领袖，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有重大建树。其古文美学理论是对唐代古文家的继承与发展，也纠正了西昆派的不良倾向以及新古文运动先驱者的某些偏颇。在文与道、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上，他提出文道并重、道先文后的观点，大致相当于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思想性先于艺术性的观点。将“道”与“文”统一在儒家

“圣人”的名下，以确定二者并重的地位。他指出“道”的源头在于“经”，《答祖择之书》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深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他把“道”作为作家修养的功夫与创作的先决条件（“中充实”），明显受到韩愈《答李翊书》的启示，与道学家视“道”为终身学问，以“文”为工具不同。韩重道统，欧事功利（见《与张秀才第二书》），二者也有区别。他认为“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虽属道先文后之说，却是针对西昆派只重艺术形式而轻视思想内容的创作倾向而发的。在重道的同时，并不轻视文的作用。他认为“道”不能代替“文”，以颜渊为例，说明有德者不必有言。他强调独创性，主张建立个性风格，对唐代李翱“自成一家”的见解作了发挥，并加以理论化。《与乐秀才第一书》说：“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可见“道”并不排斥“文”的个性化，个性化的形成是同作家先天的秉赋、气质以及后天的修养等分不开的。在新古文运动开始时反对“僻涩言苦”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取其自然”这一创作实践的标准。据曾巩转告王安石说：“欧公更欲足下少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然耳。”（《与王介甫第一书》）语言及作品风格的自然，是对矫揉造作与机械模仿而言的，它继承了韩文“文从字顺”、“章妥句适”的一面，体现了宋代古文家的审美标准。在创作实践中，他注重传记文学，提出了“事信”、“载大”、“言文”（《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的审美标准。“事信”，是说内容的“真”；“载大”，是说宗旨的“善”；“言文”，是说形式的“美”。这三者的结合，体现了历史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的统一。他对古文创作还提出“文简而意深”的要求，在可能简短的文字形式中表达尽可能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但在语言上刻意求简的偏向，也为后人所诟病。对创作中审美经验的积累尤为珍视，他说：“惟勤读书而多为文，自工……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苏轼《记欧阳公论文》）欧阳修的散文美学思想，直接指导了宋代新古文运动；他的“取其自然”的创作观点，奠定了宋代散文的基本审美风格；他的关于传记文学的理论，成为后来古文家“义法”论的先声；他提倡的简古文风和正统文学观点，一直影响到清代桐城派古文。

苏　洵（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轼、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宋代古文家中，苏洵敢于突破唐代古文家“文以贯道”的传统见解，第一个宣称为文而学文，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大谈己所涵咏的孟、韩“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上田枢密书》中所作的“大肆其力于文章”的一番表白，都表

明了他对散文独特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价值的极端重视。他绍述贾谊、陆贽的议论，提出了对文章事、词、道、法的具体要求："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并且指出："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史论上》）。虽是在分析经、史的长短及相互关系，也是在探讨文章作法。他又打破经为独尊的旧有观念，并在《史论下》中提出史兼经之长的看法，实际上表现出古文家向着文学倾斜的新观念（所谓"以事、词胜"的"史"，其实是"事既曲详，词亦夸耀"的文学的别名）。他所说的文章四用，除了"道"具有传统性，"事"曾为欧阳修所述，"词"与"法"都是他所新创（韩愈所谓"不惟其辞之好"的"辞"，是"文"的同义语）。重词，表现出他对作为语言艺术之一的散文审美特征的认识和把握。他提倡与称许"一家之文"（《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表明了他对建立一家独特风格与各家多样风格的创作主张。他对孟子、韩愈、欧阳修三家散文不同的风格美所作的精到的总体把握，显示了他高度的审美感受力和鉴赏力。这对散文的风格学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中提出的"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的观点，也是对古文美学理论建设的一个贡献。

王安石（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政治家，王安石的散文美学思想最大的特点是，从功利的目的出发，重在教化，有着明显的重道轻文的倾向；而所谓"道"，只是经世之学，所谓"文"，只限于治教政令的范围。他认为"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就突出地体现出上述特点。因而他的散文美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浓厚的政治色彩。不过，他对散文的审美特性只是有所削弱，而不是完全取消，他把内容和形式比喻为"器"与"刻镂绘画"，以前者为"本"，后者为"容"（装饰，美化），虽有主次之分，却无取舍之意。这同古文家的文、道并重的理论固然有一定距离，而同道学家只要"道"（也有特定内涵）不要"文"的极端的偏见差别更大。再加上他的才识超卓，所以在散文创作上仍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提倡与推行他的文学主张的结果，带来了创作上雷同化的倾向。后来，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

苏　轼（1037—1101）　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诗、词、散文等创作均取得杰出成就，在古代散文领域，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领袖，在继承师说和家学的基础上，广泛地总结了古代散文美学思想，并以其学力的深厚、识见的卓越、思想的活跃以及创作经验的丰富，对此作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开拓。他大体上承唐人"文

以贯道”之说，而所谓“道”的内涵相当宽泛，与韩、欧的专指儒道截然不同，包括佛老思想在内，《日喻》中“可致而不可求”的“道”，更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他主张“诗文皆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文集叙》），说明文章对“经国”的巨大作用，可见对作品思想性以及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在创作实践中，他强调“文以述志”（《送人序》）。“志”，即意。提倡“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策略第一》），反对言之无物。他在自述创作经验时也说：“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苏籀《栾城遗言》引）。把立意视为“作文之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引），突出了表现人的主观的“意”的独特价值，是对前人“以意为主”说的继承，又是对“贯道”的一种修正。他注重创作与现实的关系，提出“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南行前集叙》）的观点。正如“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花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同上），这种创作冲动是平素的修养、积累同因现实的触发所引起的淋漓的兴会相结合的产物。他对孔子的“辞达”说作了新的解释与阐发。孔子的本意是重质（内容）轻辞，苏的解说则成了从审美感知（“求物之妙”）到审美意象的形成（“了然于心”），再到审美创造（“了然于口、于手”）这一创作过程完整的表述。他坚持文贵自然的审美观，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提倡体式的自由——“初无定质”，行文与布局的自由——“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对扬雄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以及宋初以来“求深”与“务奇”两种不良的创作倾向都加以贬斥。但也不一般地废止“奇”这一审美创造，“溢为奇怪”说便是对文贵自然说必要的补充（详见该条）。在创作原则上，他提出“随物赋形”（《文说》）一说，意即通过观察、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不同形态和万千变态，去真实地反映这些事物，并还其自然美。在创作风格上，他提倡多样化。在《答张文潜书》中，对王安石加以指斥，虽然承认“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但又指出“好使人同己”的弊病，而且嘲弄了由此造成的“弥望皆黄茅白苇”式的雷同化倾向。他还根据自己一生的创作经验，论述了由绚烂而走向平淡的审美倾向变化过程，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视为现实美的极致和艺术美的上品，体现了两宋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苏轼的散文美学思想，对后世有着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苏　辙（1039—1112）　北宋散文家。苏辙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第一个将它用于散文创作。他指出养气的方法，除加强主观的道德修养外，更重要的是丰富人生的阅历，即对现实生活的审美体验。与他父亲苏洵少不喜学而好游历，后来着重强调“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对为文的作用不同，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百家之书“无所不读”，缺乏的是阅历，因此强调周览天下以领略社会美和自然美对养气为文的作用。他还受苏洵关于“一家之文”的观点的影响，明

确提出“文章自一家”（《栾城后集》卷四《开窗》），“凛然自一家”（《题东坡遗墨卷后》）的创作主张，强调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化。从他的散文创作来看，虽然才华不及轼，但“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答张文潜书》），仍不失为一家风格。

李之仪（生卒年不详） 北宋词人，散文家。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在今山东省）人。神宗元丰进士。作过苏轼定州知州任上的幕僚，又曾任枢密院编修官、提举河东常平等职。死于徽宗政和年间。有《姑溪居士文集》。李之仪从古文家重文的一面出发，完全着眼于创作主体的研究，但舍弃了创作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又超越古文家而独树一帜。其主要观点是：（一）才性说。他认为创作主体的才华和气质是第一位的，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可以勉强达到的。他举例说，“司马相如、扬雄之于词赋，司马迁、刘向之于叙事，李陵、苏武之于诗，是以其所长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发之于言耳”（《折渭州文集序》）。换言之，这些作家创作成就的取得，是发挥各自的才性，扬其所长的结果；由于各人才性的不同，在创作领域内又各有偏胜。这种说法来源于曹丕的文气说以及“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观点，但李之仪所论更为详明与深刻。（二）方法说。他主张“先凌厉而后收敛”（《跋吴思道诗》），与欧阳修所说的“作文之体，初欲奔驰，久当收节”（《与渑池徐宰》）颇为相近；他所阐明的由模仿、继承到创新的创作阶段性，更是自成一家之说：“作字为文，初必谨严，相时造语须有所出，行笔须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辙迹，则为可喜。久之，语以不蹈袭为工，字则纵横皆中程度，故能名家传世，自成标准。”（《跋荆公所书药方后》）正因为如此，李之仪成了“纯粹的辞章家”（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

朱　熹（1130—1200）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字元晦，一字仲晦，晚号晦庵，又号晦翁，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及第。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卒谥“文”。有《晦庵先生朱文公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朱熹是宋代道学家中文学修养最高的一个，所以他的古文理论虽未脱离道学家重道的立场，却能在古文家和其他道学家之外另树一帜。在文道关系上，他反对“以文贯道”的观点，斥之为本末倒置，而主张以道为中心，道文一贯。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论文》）又说：“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与汪尚书》）。因此，他不满意古文家“吾所谓文，必与道俱”的提法，认为这是把文、道截然分开。不过他至少看到了文与道的差异性，因而并未完全抹煞散文的审美特征，相反，对文的方面多有阐发，与程颐

“作文害道”之说大异其趣。他倡导“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跋余岩起集》）的明白、剀切的文风，主张“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论文》），反对“文字艰涩”，“酝藉袭藏，圆熟软美”的时尚，对欧阳修及三苏散文平易自然的风格特点表示赞赏。这与古文家的观点比较接近。他强调“明理”，而不尚“气”，又与某些古文家判然有别。他认识到散文是一种语言艺术，因而相当注重修辞，强调语言的准确性和自然性。他受前代古文家启发，多次说到“作文自有稳字”（同上）的意思，批评了生造词语的写作弊病，并以欧阳修《醉翁亭记》的修改稿为范例，指出修改的重要性。他认为文章不必太“做”，即过事雕饰，以致丧失自然之趣，与他论诗的见解相同，但也不废符合自然性的审美创造：“文字奇而稳方好”（同上）。 （王文龙）

李　涂　字耆卿，南宋人。生卒年及事迹均无考。著有《文章精义》。李涂论文多宗六经，不屑屑于声律章句。对工拙繁简，源流得失的分析，清晰明辨，颇多卓见。他以“气”论文，认为“《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庄子》气乐，屈子气怨，《史记》气涌，《汉书》气怯。”他提出：“文字顺易，道难。”因此主张作文须有广阔胸怀，所谓“做大文章，须放胸襟如太虚始得”，这样才能放笔纵横自如。他反对作文先立意，认为倘若立的是“私意偏见”，就更不足取。他辨别唐宋一些散文大家的风格说：“韩如海，柳如渊，欧如澜，苏如潮。”等等。都可谓持论不拘门户，较为公平稳当，颇有参考价值。

王若虚（1174—1243）　字从之，号慵夫，又号滹南遗老，藁城（今属河北）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经义进士，官至翰林应奉转直学士。金亡不仕。王若虚博学而有创风，为当时文坛领袖，著有《滹南遗老集》。王若虚论文继承其舅父周昂（德卿）的观点，强调“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反对本末倒置。他说：“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论诗》）要求作品要有独创性和真性情。他还提出“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文辨》）的主张。“定体”是指束缚人们手脚的一成不变的法则，“大体”指“辞达理顺”，即文字流畅，充分表达思想内容的基本要求。同他论诗的主旨在于“真”、“自得”一样，对那种“雕琢太甚，经营太深”的文风也深表反对。 （胡　健）

宋　濂（1310—1381）　字景濂，号潜溪，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宋濂以文章闻于世，其文论亦值得重视。他文论的基本点是复古，具体说来有二：一是宗经师古。宋濂推崇圣贤之道与圣贤之文为至高至上，故其论文以宗经为规，以师古为法。他在《文学篇序》中说：“文学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众矣，然当以圣人之文为宗。”他认为古之六经是经天纬地之作，无所不包，道在其中，文亦在其中。所谓“天地之间有全文焉，具之于五经”（《删梁建中序》），所谓“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

焉从"(《文原》)，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二是明道致用。宋濂论文，强调文以载道。他在《文说赠王生黼》中说："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又在《文原》中说："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宣之，本建则其末治，体著则其用彰，斯所谓乘阴阳之大化、正三纲而齐六纪者也。"他强调文章的内容和社会作用，把宣扬儒家道统看作是文学最根本的任务。因此，他在《赠梁建中序》中把文章分为三等：圣贤之文为上，明道之文为中，失道之文为下，表现出重道轻文的观点。宋濂还提出了"养气说"，认为明道要养气，作文也要养气，"为文必在养气……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文原》)他的所谓气，是指作者的气度、气概；所谓养，则是指道德品格修养，即孟子的"养吾浩然之气"。

自宋代以来，道学家与文章家分立门户。至宋濂论文，则企图探本穷源，合义理、事功、文章为一体，融道学、古文于一炉。这一思想倾向集中表现在他的《文原》中。

宋濂论文主张崇实务本，注重作家的个人修养，在当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同时，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已认识到要取法前代文章大家，"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文原》)，他还倡导"辞达"，反对诘屈聱牙、陈腐萎靡、追求险怪的文风，对扭转当时文坛风气起了一定作用。宋濂的文论，对后人有相当影响。如唐宋派诸公提倡唐宋散文，以"文从字顺"来纠正"文必秦汉"的偏差，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宋濂的影响和启发。

方孝孺(1357—1402)　字希直，又字希古，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明代初年著名散文家。方孝孺是宋濂的学生，其文论亦为儒家正统。他继承韩愈之说，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答王秀才书》)他认为要写好文章，必须"气昌"与"辞达"，所谓"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文者，辞达而已矣。"(《与舒君书》)他这里所说的气，就是指文章的气势。他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会于神者能之，然亦难矣"(《苏太史公文集序》)，反对摹拟剽窃，表现出对复古之风的不满。他还认识到作家的性格修养不同，会使各自文章产生独特的风格，决无雷同。他在《张彦辉文集序》中说："人之为文，岂故为尔不同哉？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强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表现出对文学个性化的初步认识。

在师古与创新关系上，他指出："不师古非文也，而师其辞又非文也。可以为文者，其惟学古之道乎？"(《张彦辉文集序》)这虽是绍述宋濂的观点，但又有所发展，表现了道不变而文则因时变体的正统文学发展观。

李东阳(1447—1516)　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今湖南茶陵)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李东阳的文论不多，其基本出发点是儒家的教

化说，强调文以载道。他在《邵孝子诗序》中说："古者，国有美政，乡有善俗，必播诸诗歌以风励天下，薰陶诱掖。盖有深于教令者，吾党则有不得而辞焉。"还说："文之见于世者，唯经与史。经立道，史立事。载道之文，《易》、《诗》、《书》、《春秋》《礼》、《乐》备矣。"（《篁士敦文集序》）据此，他在评论别家作品时，每每以教化为度。他还从体制上，把文与诗特别区分开来，探寻各自的特征，认为"诗与文各有体，而每病于不能相通"（《春雨堂稿序》），指出"诗与文不同体，近见各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为诗，则毫厘千里，终其身而不悟"（《诗话》），这些认识比之前人看法更前进了一步。此外，他对当时的诗文并不满意，认为"求其浑雅正大，可追古作者，殆未之见"（《诗话》），于是提倡复古，主张以古代国家强盛时那种雄健壮阔的格调来代替时下格卑调俗的文风。

明代永乐、成化年间，文坛流行"台阁体"。李东阳一方面因袭之，一方面又倡导复古，起了明代正统诗文从一种形式主义（台阁体）向另一种形式主义（七子的拟古）过渡的承前启后作用，实为明代中叶文学复古思潮的发起者。

李梦阳（1473—1530）　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文学理论的基本主张是以复古自命，从模拟入手。具体说来，一是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仿效汉魏，近体宗法盛唐。他在《与徐氏论文书》、《缶音集序》中，都表明了这种观点。因此，《明史·文苑传》说："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二是主张严守古法，模拟形式。他认为古人作品，无论篇章结构，语言修辞，音调格律，都有不变的法式。只要严格遵守这种法则，在形式上刻意摹仿，就可追步古人的格调，使作品取得同于古人的成就。就此，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述："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答周子书》）、"是以古之文者，一挥而众善具了。然其翕辟顿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无法也，所谓圆规而方矩者也。"（《驳何氏论文书》）

李梦阳与同为前七子领袖的何景明，复古的基本观点相同，但在拟古的具体方法上意见不一，有过激烈的争论。何景明有《与李空同论诗书》，李梦阳有《驳何氏论文书》、《再与何氏书》。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李梦阳的拟古，提倡句模字拟，强调"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的成法，要"刻意古范"，"独守尺寸"；而何景明则主张拟古要"领会神情"，"不仿痕迹"，做到"达岸舍筏，以有求似"，最终不露模拟痕迹。何景明的批评触及了李梦阳的要害，指出了他拟古主张的弊病。然而李梦阳并不接受意见，反责备何是"入室操戈"，并进行反复辨论，还指斥何的作品。二人之争，不免意气

用事，且有自立门户、争霸文坛之意，但也推动了李梦阳以后的自我反省。

李梦阳复古的文学主张为当时许多文人所接受，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文学复古运动，李、何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等七人是骨干。李梦阳首倡复古，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使人们注意汉魏盛唐诗歌。这对廓清台阁体的文风，抵制八股文的影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主张，对后人影响巨大。前七子成为后七子的先导，文学复古运动自此在明代延续达百年之久。

何景明（1483—1521） 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信阳（今属河南）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何景明与李梦阳的文学主张大略相同，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在《海叟集序》中表明了自己在文学上的基本立场。概言之有二：一是关心文学是为了关心政治，要求改革文风是为了使文学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以恢复理想的三代之治；二是倡导文学复古，包括词与意，即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目的是要使文学作品既合乎封建之理，又具有完美之词。

何景明与李梦阳在复古的取径和具体方法上意见不同，《明史·本传》说："梦阳主摹仿，景明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李梦阳曾写信给何景明，批评他论诗有乖古法，劝他改步。何景明则写了《与李空同论诗书》来回答，两人就此展开辨论。何景明虽赞成以复古为口号，从学古入手，但却提倡复中有变，有自己的创造与发展。他认为学古的方法应是："富于材积，领会精神，临景结构，不仿形迹。"学古只是入门途径，绝非终极目的。从古人入，必须从古人出，"以有求似"，"不相沿习而相发明"。所谓"达岸舍筏"，创作目的是为了"自创一堂室，一户牖，成一家之言。"他不赞成李梦阳那种"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即步趋于古人形迹法度之间的做法。

何景明的文学观，比李梦阳有更多的积极因素。他主张不要因学习古人而淹没自己本来面目的看法，无疑是有一定价值的。 （黄道京）

杨　慎（1488—1559） 明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他认为"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升庵诗话》），所以他论文、如其论诗，主张性情感悟之说。他认为对于美的欣赏和创造，不仅在于艺术技巧的钻研把握，而且更在于审美能力，尤其是审美意识和审美修养的提高，在于对社会生活和人生境界的某种领悟。他说"文非至工，则不可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琐语》）但综其所论，仍偏重于文辞、结构的分析评判。他既提出"辞尚体要"之说，排斥浮夸繁冗之习，又强调"辞达"，勿为浅陋（《辞达》），并从审美的角度品评高下："论文者当辨其美恶，而不当以繁简难易也"（《论文》）。提倡为文新鲜拔俗，极错综震荡之妙；陈言务去，免泥古寡陋之讥。对宋明理学，多有嘲讽，斥之为"陈陈相因"、"红腐不堪"（《陆韩论文》）。他的诗文理论及其创作实出李东阳指授，他努力在道学家与古文家的散文

美学之间另辟蹊经，在前七子倡言复古、海内风靡之时，能独立超然于纷杂宗派之外，卓然自成一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文虽不及其诗，然犹存古法，贤于何（景明）、李（梦阳）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唐顺之（1507—1560） 明散文家。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为文始尊秦汉，效法七子，后闻王慎中之论，幡然大悟，极推崇唐宋古文，议论见解明快、深刻，为"唐宋派"之巨擘。作为复古的健将，他十分重视艺术技巧的师承，认为应去"臃肿窘涩浮荡之文，"而效"自古以来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他更强调作家对于社会时代的情感体验，提倡"本色"说，主张作品应坦诚地表现作家真实的思想感情："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与洪方洲书》）；文章之"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不足以与此。"（《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舍外表而求内容，于复古之中，推重所谓真性情、真事理、真精神、真见识，这是他散文美学理论为时人所不及的地方。这对于以儒家"六艺"为指归的古文家来说，尤为可贵。其论源于宋濂，但更为明快。正德、嘉靖、隆庆之际，天下之言，接踵七子拟古之论，他与王慎中、归有光独创一宗，"庄严宏丽，咳唾金璧"（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本传），"古文一线得留天壤，使后生尚知读书者，三君子之力也。"（艾南英《答陈子龙论文书》）他提出的"文之工拙在心源"之说，"心地超然"、"直据心臆"之论，对此后李贽的"童心"说，公安的"性灵"说，都有一定的影响。 （许建中）

归有光（1506—1571） 字熙甫，号项脊生，人称震川先生，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归有光在文学理论上主要是推崇唐宋散文，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时王世贞为后七子领袖、文坛宗师，归有光却在《项思尧文集序》中贬斥他说："盖今世之所为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合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以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王世贞闻后不服，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反驳说："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由此可见，他对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批评之尖锐、激烈。王世贞到了晚年，对归有光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表示心服，给归有光的遗象题赞词说："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告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把归有光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

归有光对"文必秦汉"的主张深恶痛绝，批评道："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与沈敬甫书》）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

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答俞质甫书》）

归有光的文论不多，主要以创作实践名世。但他以一“穷乡老儒”身份，敢于与后七子抗衡，其精神尤为可贵。

王慎中（1509—1559） 字道思，号遵岩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明代著名散文家。他与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同为唐宋派主将，文章与唐顺之齐名，世人称为“王唐”。有《遵岩集》等著作行世。

明代前七子倡言复古，散文以摹仿古人为能事，思想空乏，文字诘屈，流弊甚烈。时王慎中与唐顺之等人，力矫其病，主张学习唐宋文章，从而形成唐宋派。此中，王慎中持论最先。但他早年也受李梦阳、何景明影响，后来才别开宗派：“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明史·本传》）由此，可以看出他由秦汉转变到唐宋的过程。

王慎中论文的宗旨，是他的“义法说”。他在《与江午坡书》中说：“文字法度规矩一不敢背于古，而卒归于自为其言。”在这里，他把学古之法的根本归于“自为其言”，即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语言。而要“自为其言”，则“义”必是前人所未发，又要法度规矩不背于古，因此，“法”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所以，他在《曾南丰文粹序》中说：“盖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于法之难入，困于义之难精。”

王慎中还提出作文要“得其理”。（见《义则序》）他的所谓理，就是文理；主张“得其理”，就是主张学习前人行文、叙事的手法，灵活运用于自己的文章，反对摹拟前人字句。他自己的散文创作，就实践了这一主张。

王慎中的文论不多，但他为唐宋派之首倡者，功不可没。同时，他还最早并列地提出“义”“法”两个概念，为后来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奠定了基础。

茅　坤（1512—1601） 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他是唐宋派的主将，与唐顺之关系最密切。有《茅鹿门集》行世。

茅坤论文，以唐宋为宗，尤其重视韩、柳、欧、三苏、王、曾八家。他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序》中，从文道合一的论文宗旨出发，阐明了建立文论的基本原则：“孔子之系《易》，曰‘其旨远，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者之至也。……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说也。”这里的“其旨远”、“其辞文”，可以看作是唐宋派的论文宗旨。他所并列的文章正统是：孔、孟、游、夏之后，接汉之晁错、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汉后接唐之韩、柳，宋之欧、曾、王、三苏。他还提出：“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唐宋八大家文钞序》）这里是说，文章的成

就高低，主要在于作者的才能与造诣，是不受时代限制的。这可看作是茅坤的古文发展观，是同七子的崇古卑今观点相对立。

在唐宋派诸公中，茅坤对文章的技巧与文章之美最为重视。他在《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说："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以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尽同哉？"强调对古人写作技法的灵活运用，提倡学古人而遗貌取神。他还写有《文诀》，论述作文之道。其中分为"认题"、"布势"、"调格"、"炼辞"、"凝神"五条，而以"凝神"为文章的最高要求："神者，文章中渊然之光，窅然之思，一唱三叹，余音袅袅，即之不可得，而味之又无穷者也。"可见，他已把文章写作纳入了审美活动的领域。茅坤评价文章的这一标准，贯穿于他对历代作家的评论中，具体表现在《唐宋八大家文钞》的评点中。

李攀龙（1514－1570） 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代著名散文家。他是后七子的领袖之一，与王世贞齐名。有《沧溟集》30卷行世。

李攀龙的文学主张，继承了李梦阳的衣钵而有所发挥。他主张"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见《明史·本传》)。他认为，文章章法尽备于古人之作，要学古人之法而作自己之文。他说："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拟议成变，日新富有。今夫《尚书》、《庄》、《左氏》、《檀弓》、考工、司马，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吾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引）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送王元美序》)，主张模拟古人，遵守古法，且越古越好。他自己的文章，即"无一语作汉以后，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表现出模拟的病态。他还指责唐宋派是，"以易晓妄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沾窃誉，不自知其非。及见能为左氏、司马文者，则又猥以不便于时制，徒敝精神"（《送王元美序》)。不摹古人之作却又不变古人之法，不是古人之作又酷似古人之作，这就是李攀龙追求的目标。

李攀龙虽为后七子的发起者，但其文学主张简单零碎，且持论比谢榛、王世贞更为偏狭。

王世贞（1526－1590） 字元美，号凤州，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他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王世贞在文学上也坚持"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与人所不同的是：他一方面主张"师匠宜高"，一方面又主张"捃拾宜博"。所谓"师匠宜高"，是说不读"唐以后文"，不学唐以后之作；所谓"捃拾宜博"，是要把先秦两汉文章以至韩柳诸家之文，选其佳篇，熟读涵咏。他认为只有这样，创作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迹"达到"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地步。他还提出创作以格调为中心，强调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有密切关系。他在《艺苑卮言》中说：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就是说由个人的才情产生一定的艺术构思，有了一定的艺术构思就显示出一定的音调，有了一定的音调就确定了一定的体格。这里强调的是离开了才思，就无所谓格调。他在艺术表现上比较重视辞采，认为“物相杂故曰文，文须五色错综，乃成华采；须经纬就绪，乃成条理”。他强调的是华采与法式，推崇的是一种华妙而精深的境界，并以此作为评论前人和当世作品的标准。

李　贽（1527—1602）　原名载贽，号卓吾，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氏文集》等著作行世。

李贽在文学上的著名观点是“童心说”。他在《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他所谓的“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赤子之心与真情实感。因此，他认为只有具有童心的文学才是真文学，否则就是假文学，所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李贽提倡“童心”，其实是反对以“闻见道理”，即孔孟之道为心，反对以封建思想为心。他这种观点不仅与封建传统观念对立，而且对于假道学的文学观点与作品也是一个深刻批判。同时，他认为评价文学也应以童心为标准，不能以时世先后为标准。因为文学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从而否定了贵古贱今的复古主义观点。

与“童心说”相联系，他又提倡“迩言”，所谓“好察迩音”、“则得本心”（《焚书·答邓名府》）。这里的“迩言”，就是“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者”（《道古录下》），即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语言。提倡“迩音”，就是提倡弃雅从俗，以下层人民的口语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这样，就完全颠倒了历来以正人君子的仁义道德之音为高雅，以市井子民利欲之言为鄙俗的传统观念。

李贽还强调“自然”与“发愤”。他在《杂说》中极力推崇自然之美，认为文学创作上的“化工”胜于“画工”。他所说的“化工”，就是自然天成，不饰雕琢。同时，他主张文章要有为而作，要有真情：“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杂说》）他这种观点，表现出强烈的反道统精神，比司马迁、韩愈等人的相关观点更为进步。

由此可见，李贽提倡“童心”与“迩言”，是要求革新文学的内容，表现新的思想和生活。他主张“自然”与“发愤”，旨在打破传统的清规戒律，追求文学的解放与愤世疾俗的风格。

李贽的文学理论虽有其局限性

(如“童心说”有唯心色彩)，但它集中代表了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发展对文学的要求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成为当时文学新思潮的纲领，对当时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尤其是对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清代王夫之、叶燮、刘熙载等文学家也深有影响。

焦　竑(1541—1620)　安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明代著名学者，有《澹园集》49卷、《续集》35卷行世。

他论文强调“实”，要求文章要有“道”、“德”、“事功”、“性命”(即“义理”)之实，认为前人如申、韩、管、晏文章的内容之所以充实，是由于他们“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无丝粟之疑，而其为言也，如倒囊出物，借书于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实胜也”(《与友人论文书》)，这样的文章，实非“后世之空言”。同时，他不废“词”与“法”，即语言和艺术法则。主张“惟文以文之，则意不能无首尾，语不能无呼应，格不能无结构”(《与友人论文书》)，但又反对“离实以为词与法”——离开一定的内容而追求辞藻和法度，要求作者“心能知之，口能传之，而手又能应之”(《刻苏长公外集序》)，真正达到文章“实胜”。

他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观点批评甚激，力反因袭剽窃，认为“夫词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词，又不以相袭为美。”他还提出“性灵”之说：“诗非他，人之性灵所寄也”(《雅娱阁集序》)，主张创作要“脱弃陈骸，自标灵采，实者虚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与友人论文书》)，要求推陈出新，脱弃前人之体貌风格，突出自己之精神风采，其论点多有反道统的倾向。他反对因袭、主张独创、提倡“性灵”的文学主张，对于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有直接的启示和影响。

屠　隆(1541—1605)　字长卿，号赤水，鄞县(今浙江鄞县)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有《栖真馆集》等著作行世。

屠隆列名于王世贞所定末五子列，是后七子的支流。但他却是拟古论的反对者，其文论时有独见。他重视才情，不废词采，在《文论》中评论历代文学发展情况，特别强调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指出，六经固是“文章之大观”，然《左》、《国》、《庄》、《列》文章和屈赋，“言人人殊”，各有特色。他把先秦、两汉不同风格的文章，概括为两种，一是“寥廓清旷，风日熙朗”的意境，一是“飘风震雷”、“光怪变幻”的奇作，风格不同，但“其为古文辞一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他更提出“取材于经史，而熔意于心神；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文论》)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免于“傍人藩篱，拾人咳唾”。这种古为今用，变通古今的观点，实是对七子复古理论的纠正。

屠隆以身在复古思潮中人，指责复古之人之作“抱长才而乏远识，骍厉之气盛，而陶熔之力浅，学《左》《国》者得其高峻而遗其和平，学《史》《汉》者得其豪宕而遗其浑博，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篇一律也。”

(《文论》)从理论上对拟古之说加以彻底否定，实乃前所未有之举。他的文论观点，代表了明代中叶文学复古思潮的终结。　　(黄道京)

汤显祖(1550—1616)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少师罗汝芳，长慕李卓吾而友紫柏禅师，受他们影响颇深。"情"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他崇尚真性情，主张个性解放，认为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应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他的美学观点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即与宋明理学之"理"相对，又与复古因袭之"法"相左。他是当时戏曲创作中与格律派相对的言情派的领袖，世多誉其传奇《临川四梦》而忽略其诗文。其实，他"少熟《文选》，中攻声律，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白居易)、眉山(苏轼)，文变而之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钱谦益语)，诗文创作也是较有成就的。论文主张性灵才情说，以"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王季重小题文字序》)为标准。他认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点。"(《答吕姜山》)"意、趣、神、色"是他的创作原则和审美标准。他十分重视作品的思想性，反对为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齐、典雅、和谐而妨害思想情感的表现。他注意到风趣、神韵是获得美感效果的重要因素，主张作家的主观寄托与世俗的审美趣味相结合，推崇想象的奇妙和富有个性特征的刻画，认为这样可以激发和强化人们的审美感受，他努力追求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欣赏的辩证统一。他沟通了戏曲与文章之间的联系，以戏曲填词的方法作文，亦以此标准评文，因而与主张摹拟的七子相反，而与公安三袁相近。他的美学思想和散文理论，反映了当时社会新的思想意识。"自王(世贞)、李(攀龙)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雺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驳。归太仆(有光)之后，一人而已。"(钱氏语)，其理论及创作在当时文坛颇具地位，对后代也较有影响。(许建中)

高　琦　明中叶人，生卒年及生平不详。曾著《文章一贯》(有日本宽永翻印本)。该书是探讨文律，以求"执一贯万"(高琦语，转引自程默《文章一贯序》)的论著，故称"文章一贯"。分上下卷。卷上所论为立意、气象、篇法、句法等，卷下所论为起端、叙事、议论、引用、譬喻、形容、过接、缴结(结尾)等。多引用前人及同时代人语论述问题，有资料价值。所论文章作法颇细密，如叙事有十一法，议论有七法，用事有十四法，起端有八法，体物有七法，过接有十法，这标志着散文创作的美学法则到这时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但不免流于琐碎，且诸法之间有重合交叉之处。

(祁志祥)

徐师曾(1510—1574)　明文体学家。字伯鲁，别号鲁庵。吴江(今属江苏)人。徐师曾编摩穷年，尤重文体之学。他认识到各种文学体裁之间是有区别的，即便是散文，也有事、理、情、意等种种文体上的分工，

作家的艺术创作首先应该了解和把握各种艺术形式的美学特征。他说："文章必先体裁，而后可论工拙；苟失其体，吾何以观？"（《文体明辨序》）他研究文体的目的是："明义理，抒性情，达意欲，应世用，上赞文治，中翼经传，下综艺林。"（同上）在法古摹拟之习笼盖文坛的时候，他受其影响是必然的，但也有不同之处。七子重在字句摹拟，倡言"文必秦汉"；他坚持取法于古，但又主张以"性情"之说力救摹拟之弊，试图既学习古人的文字笔法，又把握其风貌精神，达到神情意趣与法古的融合。这实际上是对秦汉派和唐宋派散文美学理论一定程度上的折衷，所以后学顾尔行誉其"回狂澜于既倒，指斗极于方中，先生惠来学，岂浅鲜乎"（《刻文体明辨序》），即指此而言。他虽仍囿于复古范围，已与稍后的屠隆"取材于经史而熔意于心神，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文论》），李维桢的"体格法古人而不必立异于今人，旬意超今人而不必袭迹于古人"（《许觉文集序》），实出一辙，表现出复古流派中的变革。

（许建中）

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又号石羊生。兰溪（今属浙江）人。他是末五子之一，著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诗薮》等。胡应麟的文学思想主要见之于《诗薮》，他大抵承袭了明代"后七子"的衣钵，特别是王世贞对他影响较深，在创作上主张复古，取法汉，魏以前之作，曾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造道之等也。立志欲高、取法欲远，精艺之衡也"。（《诗薮》外编卷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于各种文学体裁的特征也颇为重视、善于从艺术形象的构成方式、作品的外部形式及文体风格等角度来研究文体样式，强调样式与思想内容的一致性，如说："诗与文体迥不类，文尚典实，诗贵清空；诗主风神，文先理道。"（《诗薮·外编卷一》）将诗与文二者比较，阐明其各自特征，指出古代散文多有较强的应用性，大抵尚实，这点是符合实际的。他在文学理论上，主张研究作品需紧密联系作家的创作实践，从历史实际出发，进行考察，方能提到应有的高度，反对抓住只言片语作穿凿附会的考证。故其论述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他说："古大家有齐名合德者，必欲究竟，当熟读二家全集，洞悉根源，彻见底里，然后虚心易气，各举所长，乃可定其优劣。若偏重一隅便非笃论。"（《诗薮·外编卷四》）这既表现出他对待文艺科学所持的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又体现了古代文论家，诗论家对于文学特征的探讨已日趋深入，不断完善，其见解是很可取的。

（孙连琦）

袁宗道（1560—1600） 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人，明代文学家。有《白苏斋类集》22卷行世。

袁宗道与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人称公安派。三袁中，宏道成就最著，但发起者实为宗道。他在《论文》中，对复古主义进行了激烈批评，说："古文

贵达。学达即所以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内也。大抵古人之文专期于达，而今人之文，专期于不达。以不达学达，是可谓学古者乎？”他在这里提出应学习古人辞贵达意的精神，否定七子的单纯模拟剿古，可谓一针见血之谈。他还正确说明了文章同语言、思想的依从关系，明确了文字作品必须以口头语言为基础：“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论文》）他又进一步指出，古代著作都是运用当时口语写成的，故能真切表达作者心意。只是由于时代与语言变化，今天读来才艰深难懂，并非原来如此。由此看来，专求古文奇奥以学之，实不可取；而下笔平易，则应为追求的目标。

袁宗道还总结了《史记》等优秀作品的写作特点，批评王世贞等人在文学语言上是古非今的荒谬，并切中要害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根“不在模拟，而在无识”。由此，可见袁宗道对复古主义批判的尖锐、有力。　（黄道京）

袁宏道（1568—1610）　明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同创“公安派”，而成就名望最盛。以论诗著名，力主“任性而发”的性灵说，论美以“真”为中心，在散文的创作和欣赏中，则从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变”，而以“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同上）为指归。他认为文学的创作必然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也都受其制约，所以，应不断开拓新的形式和内容，“伸其独往”，创造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作品，以适应和满足时代新的审美需求。如此，“意则常新”，“调则无前”（《与友人论时文书》）；“举业之用，在乎得隽。不时则不隽；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时文叙》）他强调大胆直率地反映对社会生活的审美认识和情绪感受，认为唯有情意真挚之作，才具有强烈的美感力量，才具有不朽的审美价值。他竭力排斥复古剿袭摹拟的文风，自创清新轻俊之体，直率而自然。他深受李贽影响，“意在破人之缚执”（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务矫今代蹈袭之风”（《雪涛阁集序》），是反对秦汉、唐宋复古流派的中坚，是晚明新兴的文艺和美学思潮的代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本传评曰：“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可见，晚明、清初的散文发展受其影响极大。而其弊在于“矫枉过正”（钱氏语）而流于率易，且多写闲情逸致。晚年有所变化，“亦渐趋严谨”（袁中道《珂雪斋游成柿录》九）。

袁中道（1570—1623）　明文学家。字小修，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其论文“力矫敝习，大革颓风”，坚持文学发展的观点，主张申写性灵，以真情卓见为文：“文章之道本无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后”（《解脱集序》）。这也是公安三袁的共同主张，钱谦益以为“小修兄弟间，师承议论”（《列朝诗集小传》本传）。但

他晚于中郎，所以，对于竟陵派的理论，昌言攻击；对于公安派的流弊，亦多补救。这是他散文美学理论的独特之处。竟陵派"以俚俗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钱氏《小传·钟惺传》），试图以此反对七子复古之习。他则以为"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次则能言其意之所欲言"，"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门狭，手腕迟，而不能尽抒其胸中之奇，安能嗫嗫嚅嚅如三日新妇为也"（《溪成集序》）。中郎之作，意在破人执缚，不过间有率易游戏之作，且快爽之极，浮而不沉；情景太真，近而不远，其流弊所至，则为俚俗、纤巧、莽荡。他于此有所醒悟，亦"自患决河放溜，发挥有余，陶炼无功"（钱氏引）所以坚持性灵而兼重格调，"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阮集三诗序》），认为"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然后下笔，切莫率自矜臆，便谓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了"（《蔡不瑕诗序》），期以扬整刷之功，革末流之弊；颂矫枉之功，补过正之失。这是对中郎文论的弥补和修正，在当代及清初均较有影响。

（许建中）

王思任（1574—1646） 字季重，号遂东。山阳（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散文家。著有《王季重十种》等。他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反对七子的复古理论，在《百家论钞自序》中，他提出"宋不如唐，唐不如汉，汉不如三代，此文谈旧唾也"的观点。"吾以为文章至明而始妙"，这种倡导今必胜昔的文学思想给诗文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他的散文在遣词造语及法度风格上都与传统的散文不同，"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姿意描摩，尽情刻画."表现出一定的革新精神，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他还提出了艺术形象的创造问题："火可画，风不可描；冰可镂，空不可斡。盖神君气母，别有追似之手，庸工不与耳。"这就是说，在客观世界中，象"火"和"冰"这样可见的实体是较易描绘的；象"风"和"空"这样不可见的"虚体"却是难以刻画出来的。引申到文学创作中来，就是说要想描绘某个艺术形象可见的外表是容易的，但要把某个艺术形象内在的精神气质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则是十分困难的。没有夺天之功的大手笔是办不到的。所以他说："《易》及五经之外，能言其所象人亦不多。"这就是说，真正能把艺术形象完美地表现出来的人是很少的，文学之难，莫难于此。虽然他未能找到如何创造艺术形象的办法和途径，但他能接触到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徐　明）

艾南英（1583—1646） 字千子，东乡（今江西东乡）人，明代末年著名散文家。有《天慵子集》行世。

艾南英论文既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又反对竟陵派的幽深孤峭。他在《重刻罗文肃公集序》中指责前后七子"所持既狭，中无实学。……持之愈坚，流弊愈广。"言论甚激。崇祯元年（1628），他在娄江与著名诗人陈子龙相遇，两人论文看法不一，引起激烈争论，后又作书相互论辩达数月之久。他们争论的焦点，一是陈子龙

主张为文取法秦汉而舍弃唐宋，艾南英则主张学秦汉须取其“神气”，而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名家的文章正是典范。二是陈子龙认为时代越古，文章越艰深；文章越艰深，艺术性就越高。艾南英则认为文章写作的原则是“辞达”和“体要”，以条理通达、简练扼要为主。在这场争论中，陈子龙的观点是保守的，艾南英的观点是积极的。通过这场论争，艾南英把唐宋派的文论整理得更有系统，扩大了影响，进一步明确了取径唐宋以溯秦汉的道路，突出了从司马迁、韩愈、欧阳修到归有光的文章传统，肯定了平易畅达的文风。

艾南英还编撰了《文剿》、《文妖》、《文腐》、《文冤》、《文戏》五部书（今已失传），列出“浮华补缀”“生吞活剥”、“不顾义类”、“盖美饰非”、“以文为戏”等作文避忌，目的在于“取文之无当者告之，则人知避实”（《再与周介生论文书》）。

（黄道京）

黄宗羲（1610—1695） 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史家。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南雷文案》等。黄宗羲怀抱亡国之痛，论文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推崇那些有思想内容悲歌慷慨的作品。而与民族气节相联系，又特别推重诗文的阳刚之美。他对明代各个散文流派都有不满，认为他们摹拟古人、依傍门户，缺少真情实感。他认为有真实而浓烈的情感就会出好文章“凡情之至也，其文未有不至者也。”（《明文案序》）而这情又是“与物相游”，即建立在对客观事物体验的基础上的。可见黄宗羲是很重视文学的情感性这一美学特质的。另外，黄宗羲还指出好的作品往往是社会矛盾激烈的时代的产物：“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从时代角度概括文学的发展规律，说明黄宗羲的美学思想与其民主主义战斗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 （胡 健）

汪 琬（1624—1691） 字苕文，号钝庵，又号尧峰，江苏长洲人。清初散文家。他与魏禧、侯方域共称“三大家”，著有《尧峰文抄》50卷。他的散文创作本于六经，接迹于明代的唐宋派，继承了我国正统散文的传统而循轨前进，尝谓“琬亦尝好学深思，力期从事于此，因不敢自安于不贤，而气昏惰，虽欲勉进贤者之域，以求溯孔子之所谓‘文’，而终不能逮也。”在文学理论上，他曾对“文以载道”和“文者贯道之器”的说法有所怀疑：“尝闻儒者之言曰：文者载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仆窃谓此言亦少夸矣。”（《答陈霭公论文书》）看来，他认为“文”是难以“载道”的，所以他又说：“傥又能因之以窥见大道之端倪，则虽以仆之陋劣衰耗，且将欣然执鞭之不暇。”（同上）在《王敬哉先生集序》一文中，他还追述了这种“道”的发展过程，对各朝儒家代表人物给予了评价，在《答陈霭公论文第二书》列举的许多人物里，大都为唐宋派的代表，可见他是宗经重

道的。同时，他也很注重才气，“惟其才雄而气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读之者动心骇魄，改观易听，忧为之解颐，泣为之破涕，行坐为之忘寝与食，斯已奇矣。”（《答陈霭公论文书》）当然，这样的“才气”，是与作家自身的修养分不开的。他很推尊韩愈、欧阳修、归有光，认为后代作家取得的成就是接受了他们积极影响。他还特别讲究文章的构架、布局谋篇及表现手法：“以文言之，大家之有法，犹奕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并批评说：“后之作者，惟知其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于是有开而无合，有呼而无应，有前后而无操纵顿挫，不散则乱。”（《答陈霭公书》）这些看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叶　燮（1627—1703）　字星期，号己畦，浙江嘉兴人，晚年定居吴江横山讲学，世称横山先生。著有《己畦文集》，其中包括《诗集》十卷，《文集》二十二卷，《原诗》内外篇四卷，《已畦诗集残余》一卷，《汪文摘谬》一卷。叶燮总结了前代文学创作及发展的正、反经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文学的本质、渊源、特征、规律、创新及作家的修养等许多问题。他认为：文学作品是客观上的理、事、情与作者主观上的才、胆、识、力的统一，“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原诗·内篇》）对于文学作品所要反映的现实，他用“理、事、情”加以概括，并以草木为喻，说明“理”，即事物内在规律；“事”，则指事物发展的过程；“情”，是表现于外的纷繁的现象：“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把客观现实视之为创作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认为理、事、情又必须借助作者的才、胆、识、力四项条件，才能表现为文学作品，而四者之中，“识”又是主导，是本体，所谓“识为体而才为用”，由此他特别强调了作家的自身修养，认为作家只有致力于“格物”，才能提高对理、事、情的认识。由此可见他把文学问题，提到了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从物与我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解释，这是很有眼光的。同时，他还从本体论出发，对于当时盛行的复古主义者摹拟风气表示不满，积极主张创新，尝谓“正变系乎时”，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他还看到了文学的生命力贵在独创，提出“争新竞异，千姿万态”，并认为写出的作品当是“人未言之，而自我始言之。”这说明，他确乎是一位很有真知灼见的文论家。而对那些拟古、剽窃之风，则深恶痛绝。　（孙连琦）

方　苞（1668—1749）　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方苞以道学家和醇儒自命，且有很多经学著作，但他的真正成就在于散文理论与创作。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他论文以《左》、《史》为准则，推崇韩、柳。他集文论中正统之大成，在《古文约选序》中，明确提出“义求有物，法求有序，法从义生，法又随意变”的“义法”说。方苞的“义法”说，显然比过去单纯摹拟秦汉字句的复古派和专讲间架结构的唐宋派为高。后来，方苞又提出“雅洁”说

作为“义法”的标准，认为只有情真雅洁，谨严朴素，“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精光”的文章才算好文章。据此主张，桐城派作家把创造澄清雅洁的散文当作风格上的共同追求。但依照这样严格的清规戒律，实际上很难写出纵横驰骋、气魄宏伟的文章。在方苞的抒情、叙事散文里，没有什么瑰奇玮丽的鸿篇巨制，而是谨严质朴、清莹澄澈的短篇。袁枚讥为“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这正说明了方苞在实践自己的散文美学追求上表现的弱点。 （胡　健）

郑　燮（1693—1765）　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归扬州，卖画为生。擅诗文，工书画。有诗文合集《板桥全集》。《家书·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是他的论文名篇，集中表现了他的散文美学思想。文中严厉批判了当时以王士祯的“神韵说”为代表的“世间娓娓纤小之夫”“剌剌不休”宣扬的“文章不可说破，不宜道尽”的狭隘的论调，主张文章在内容上以“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为主，在风格上“以沉著痛快为最”，亦即《偶然作》中所说的“直摅血性为文章”，反对“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来束缚内容的充分表现。该文还重新评价了《左传》、《史记》、《庄子》、《离骚》、杜诗、韩文，认为“间有一二不尽之言，言外之意”，只“是他一枝一节好处”，就其总体“本色”来说仍然是“沉著痛快。”他的散文乃至诗词创作，贴近生活，富于真情实感，形式平易，风格奔放，就是他这种美学主张的实践。郑氏的散文美学思想，虽然在强调“敷陈帝王之事业”、“剖析圣贤之精义”方面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重视“歌咏百姓之勤苦”，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他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出发，反对一以温柔含蓄的风格为旨归，推举“沉著痛快”的风格，在理论上也颇为有力；尤其是“文章以沉著痛快为最”的观点，在一向以“温柔敦厚”为贵的古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实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刘大櫆（1698—1779）　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今属安徽省）人。有论文著作《论文偶记》。他是清代桐城派散文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散文比较喜欢铺张排比，辞藻气势较方苞、姚鼐为盛，而雅洁淡远则不如。《观代》、《息争》、《焚书辨》、《书荆轲传后》、《海舶三集序》、《马湘灵诗序》、《送姚姬传南归序》等可代表他文章的风格。其《论文偶记》上承方苞“义法论”，进一步探讨文章的艺术性，在创作方面提出“神气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为辅”；在欣赏方面提出“因声求气”说：“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直接开启了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

（祁志祥）

全祖望（1705—1755）　字绍衣，号谢山。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清代学者，文学家。在文学思想上，他注重文以致用，这一点可以说是对韩、柳、欧、王、苏等传统文学理论的继

承。他著书立说的目的是总结前代的学术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当时社会发展出路的探索。他曾搜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写出了许多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志士以及遗民的碑铭传记，目的是为了发扬民族正气。"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他致力于实学，重视文章内容的表现，不尚空谈，"应酬文字，十九束阁"。他认识到学术不能脱离政治，但不附和统治集团的主观意旨，他看不起当时专搞考证既可避祸又可博高名禄位的考据派，对那些"以闭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庙堂意旨随声附和"为不传之秘的义理派更所不屑。他主张不定一尊，对理学和其他各家各派，一律平等看待，没有门户之见。当然，他未能超出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他也只能从儒家思想里去寻求自己的理论依据。(徐明)

袁　枚（1716—1797）　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今杭州人）。散文创作主要见于《小仓山房文集》。袁枚以诗论出名，其实文论也颇具特色。袁枚论诗重性灵，论文则重有本。他在《答平瑶海书》中说："枚读书六十年，知人论世，常谓韩、柳、欧、苏其初心俱非托空文以自见者。惟其有所余于文之外，故能有所立于文之中。"所谓"余于文之外"的，就是文章之本，只是没有明确地将它与"明道""致用"等用起来。关于骈、散之间的关系，袁枚提出了同源而异流的见解。他认为"六经滥觞"，古代文章本无骈、散之分，然而散行中又孕育着骈偶的因素。后来，骈、散分流，各有功用，应该并行而不悖。他一面肯定"骈体者，修辞之尤工也"（《胡稚威骈体文序》），一面推崇韩愈等人在散文语言艺术上的创造。袁枚在《与程蕺园书》中还指出，散文创作"一误于南宋之理学，再误于前明之时文，三误于本朝之考据。"他认为"理学""时文""考据"或"下笔多滞"，或以"门面语为真谛"，或"繁冗芜杂"，都不是散文创作的正路。袁枚的散文创作论，能从文学的审美特性出发，不为某些成见所拘限，因而颇有新意。　(胡健)

姚　鼐（1732—1815）　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桐城（今属安徽省）人。著有《惜抱轩全集》，编有《古文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钞》。他的文章，简淡纡徐，偏于柔美。在散文理论方面，他继承方苞的义法论，又继承刘大櫆的声气论，并有所发展。其一、提倡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济"，反对"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述庵文抄序》）。其二，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其三，概括文章的阳刚、阴柔两大类风格，认为二者可以有所偏胜，不可有所偏废："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阍幽，则必无与于文者

矣。"(《海愚诗抄序》)姚鼐在创作和理论上的实绩，使他成为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

章学诚 (1738—1801) 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所著《文史通义》，是文史理论的名著。另有《校雠通义》、《方志略例》、《文集》、《外集》、《湖北通志检存稿》及《未成稿》、《外编》等，均收入吴兴嘉业堂刊本《章氏遗书》。其古文美学的著名观点主要有：一、重新界定"义理"、"博学"的内涵。章氏论文与桐城派一样主"义理"、"博学"、"文章"的合一，与桐城派不同的是，他所说的"义理"是人伦日用、万事万物中自然不易之"道"(《文史通义·原道》)，他所说的"博学"包括对现实的认识与把握，故又称为"征实"(《文史通义·说林》)。二、由于文章是"义理"，"征实"、"辞章"的合一，而"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同前)，所以他对文史作者提出"才"、"学"、"识"三项要求(《文史通义·文德》)，并指出："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答沈枫墀论学》)，从而深入到"才"、"学"、"识"的先天生理——心理机制之中。三、提出"临文必敬"的创作态度和"论古必恕"的批评态度，要求创作必须严肃认真，批评应当设身处地(《文史通义·文德》)。四、列举"古文十弊"(《文史通义·古文十弊》)，对当时桐城派散文创作中存在的种种流弊作了辛辣、中肯的比判。 (祁志祥)

汪 中 (1745—1794) 字容甫，江苏江都人，清代学者，文学家。著有《述学》等。他是汉学家中的皖派一系的重要人物，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他论定孔子思想的真正继承人是荀子。他以孔荀而不是以孔孟并提，以否定理学家的"道统"说。他的许多学术论著，合学术与文章为一，别具一格。朱熹的《四书注》当时被尊为孔子之道，捧上了天，他却不以为然，提出了"孔子之道，冀若《左氏春秋》"的观点。并指出，出自程朱之手的《四书》根本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那些理学家们把他们的私货硬塞进孔子学说里，拉孔子的大旗以营私，完全违背了孔子学说的原意。这些观点都反映了他的张烈的反叛精神。对尊奉理学的方苞，他极端鄙视，认为不屑一骂；对桐城派文人的"八股文与古文无区别"的论点，他也认为不值一驳。他自己作文，弃"欧苏曾王"于不顾，而师法汉魏六朝，"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突破了形式主义的束缚。他自称："为文恒患意不逮文，文不称物，不专一体。"他的《哀盐船文》的文风近于汉赋及鲍照，其《自序》则颇似齐梁人的文章。他所作骈文，在清代，被誉为格调是最高的。在我国骈文史上，他的一席地位不可忽视。 (徐 明)

洪亮吉 (1746—1809) 字稚存，号北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清代文学家。著有《北江诗文集》、《北江诗话》等40余种。他的文学观点主要见之于《北江诗话》。这部书以"诗话"为名，实际上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类于杂谈，"举凡金石

文字、历史人物、史学、地理、书法以至于科场掌故……莫不数见"。(陈迩冬《〈北江诗话〉后记》)书中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和见解，他认为"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卷二、一)这里虽然主要的是就诗而言，但也包括了文。就内容来说，他的理论乃属性灵派，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曾说："他的标准在于性情、学识、品格三者兼备，故很难得。然而在三项之中，仍以性情为第一。"(《清代文学批评史》149页)他反对格调派与拟古派，主张创新，对于王士祯、沈德潜之论颇不以为然，曾谓："至诗文讲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亦必有数人，如王莽之摹《大诰》、苏绰之仿《尚书》，其流弊必至于此。……方望溪之文，王文简(士祯)之诗，亦不免有此病，则拘拘于格律之失也。"(卷二)由于注重性情，当然就斥责格调，而提倡自成一格的独创精神。他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之外"自成一家"。他还提出"真气"说问题，这实际上是对以往的"文气"说的发展，他认为文学史上"诗文之有真气者，秦汉以降，孔北海、刘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高、岑诸人其尤著也。"可见他的所谓"真气"，就是指那种雄奇、豪放的文风。

(孙连琦)

恽　敬(1757—1817)　字子居，号简堂。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代散文家。阳湖派的创始人。他虽受桐城派的影响，但主张与他们不同，他对宗奉程朱理学公开提出非议，他的《喻性》篇是专驳程子"性之本即理"之说的。他认为桐城派古文家的学问渊源未免狭隘，他们所提倡的"义理、考据"之类取路狭窄，不足为法。为此，在《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中，他主张"百家之敝当折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就是说在文中要兼及考据与经世之学，仅限"六经"是不够的，应当纵横诸子，出入百家，取径要更宽泛一些。只有博采百家之长，充实古文的思想内容，才能补救桐城派古文行文单薄和思想上专主程朱的弊病，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散文风格。这个观点在古文理论中是个重要发展。他认为，南宋以后的古文家，大都局促于古文的成法之下，有严整而无其变化，究其原因是他们"有意为古文"。他们不是学有所本，发自肺腑，而是按照古文法式"为容"，当然使其"平生之才与学不能沛然于所为之文之外。"因此，在创作上，他强调一是要用"性灵"与"气魄"来提高古文的思想境界，二是要重视积累，"积之而为厚焉，敛之而为坚焉，充之而为大焉"，才能写出好的文章，他不局限于所谓"义法"之说，在某些方面是突破了桐城派的清规戒律的。

阮　元(1764—1849)　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清代学者，文学家。他是清代"文笔论"的首倡者。在《文言说》里，他提出"文必有韵说"。他认为文章之初先有韵语"寡其词，协其音"，使人"易于记诵"，便于行远。这一观点基本上是符合文学发生的规律的。但是，他把这

种文学发生时的语言基本规律当成文学永久性的特征，因而指责一切“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的作品是“非言之有文”者，这就有些偏颇了。在《文韵说》中，他说：“韵者，即声音也，声音，即文也，然则今人所使单行之文”，“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这是从六朝“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说推演而来的。他企图用那时的理论作尺度去裁割文学自身生动的、复杂的发展过程，去束缚已有很大发展的，包括小说戏曲在内的一切文学样式，这种以古绳今的观点是没有多少科学价值的。他还提出了“文必尚偶说。”“凡偶，皆文也。”就是说，只有偶俪为文，才算是文学作品；反之，就不是。这个看法是片面的，以偶俪排斥散体是违背文学发展实际的。他的这个观点一股脑儿地取消了唐宋以来的“古文”作“文”的资格，当然也包括桐城派所宣扬的那些“古文”。这对否定桐城派标榜的“文统”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这种彻底的否定也一笔抹杀了近千年散文发展的历史事实，因此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也无助于推动文体改革。

李兆洛（1769—1841） 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今常州）人。著有《养一斋文集》等。他以主张“骈散合一”的观点而著称于世。在《骈体文钞序》中，他说：“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这就是说，阴阳相生，奇偶相辅，方圆相用，刚柔相济，而成文章。他“颇不满于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两汉”。于是，他选辑《骈体文钞》与桐城派的《古文辞类纂》分庭抗礼。他认为“齐梁绮丽，都非正声”，秦汉时骈散不分才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因此主张学习秦汉，借鉴六朝，由骈入散，创造一种事有实诣，貌不袭古，风骨高严，文质相符的新型文体。他指出，文章的出路就是奇偶并用，骈散合一。他的这一主张，虽然是着眼于语言形式的改革，但与阮元的“文言说”相比，则有更深刻的理论意义。他还认为文学创作要“言必称情，藻必当物，凡辛苦愉乐之词，一视乎其境之所遭而不娇饰也。”所谓“言称情，藻当物，”就是要真实地而不是娇饰地反映人的境遇和在此境遇中产生的感情。这里的“境”不限于个人的际遇，主要指时代治乱，乡俗民风。这就是说，文学作品应真实而不娇饰地反映时代的重大问题。作家本人，不论其遭际顺逆，境遇穷通，都不应违背这个原则。这个观点无疑是进步的。

方东树（1772—1851） 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人。清代文学家。他曾师事姚鼐，是姚门四弟子之一。著有《昭昧詹言》等。他大力提倡桐城派所倡导的义理和法式，认为文学作品如果于“义理”不合，即使有用，也不足取。因此，他论道恪守程朱，论文力保“文统”，攻击“经世致用”之文是“随时取给之文”。他认为只有桐城派的文统和道统才是“真”的，“足以济天下之用”。他想把古文之法应用于诗歌领域中。他认为不懂古文之法就不懂得古诗，力图把

古文理论和诗歌理论熔为一炉，"故尝谓诗与古文一也。"他还企图把书、画理论也纳入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中，他说："大约古文及书、画、诗，四者之理一也。其用法取境亦一"。他这种努力探索艺术规律的意图是应予肯定的。但这个立论是片面的，他硬把散文的某些规律搬来强加于诗，甚至还拿八股文的章法以及，"随步换形"之类的腐儒之见去肢解历代名篇。这可以说是桐城派古文理论在诗歌理论中的生搬硬套。在诗文艺术形式上，他主张文章要有独创，"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要"善因善创，知正知奇。"但在内容上，他却"见后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这表现出他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深刻矛盾。在诗文理论方面，他强调创作要基于真情实感，要从"自家胸臆中真流出"，"文字成，不见作者面目，则其文可有可无。"他要求"文字要有气骨，"反对"只于枝叶上粉饰"，提倡"思积而满，乃有异观，溢出为奇"，反对"强索为之"。这些见解虽然都是只言片语，但也都包含着合理的因素。 （徐明）

包世臣（1775—1855） 字慎伯，号倦翁，又自署白门倦游阁外史、小倦游阁外史。安徽泾县人。泾县东汉时曾分置安吴，包氏旧居接近其地，所以人称安吴先生。嘉庆举人，多次考进士不中。曾任江西新喻县令。毕生留心经世之学，并勤于实际考察，对于漕运、水利、盐务、农业、民俗、刑法、军事等，都能提出有价值的见解。鸦片战争时期，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曾有记述与议论，颇具卓见。包世臣思想、学术皆不同于乾嘉以来一般学人。论文也贯穿经世之旨，与当时古文家、经学家异趣。他反对脱离民事，将"道"抽象化，批评韩愈、柳宗元以来古文家抽象的载道之文是"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与杨季子论文书》），讥刺"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提出"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提倡"言事之文"（同前）。文章大都也关切时务政事。 （祁志祥）

管　同（1780—1831） 字异之，江宁上元（今南京）人。近代散文家。著有《因寄轩文集》。他与梅曾亮同乡，又俱为姚鼐之高足，二人交往甚密，其文学主张亦相类，同循姚氏轨辙。他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学理论，将儒家之道、道学家之理视之为文学的根本。他说："取道之原，六经其至极也，"（《与友人论文书》）并认为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则是愚蠢的："士生于世，上之不能修孔、颜之德"，"其亦可谓愚也夫！"（《方植之文集序》）因此，加强这方面的修养、锻炼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特别强调了文与气的问题，发展了孟子、韩愈、苏轼等以来的养气说，以为气有阴阳，文分刚柔，而两者又是不可分割的。他更重视阳刚之气的重要，"圣贤论人，重刚，而不重柔，取宏毅而不取巽顺"，"舍刚大而言养气，不可以为养气也。"（均见《与友人论文书》）他认为这种

"气"可以塞乎天地之间，"要获得它非加强内养不可，有了它"如此则学成，而其文亦随之以至矣。"(同前)可见，他把养气看成创作的保证，所谓"舍养气而专言为文，不可以言为文也。"从而进一步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文论中养气说的内涵。

梅曾亮（1786—1856） 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近代散文家，著《柏枧山房集》31卷。他少喜骈文，后转攻古文，为桐城派的传人，是姚鼐的四弟子之一。他的文学主张，基本上与桐城派理论一致，内容上多宣传孔孟、程朱之道，是封建社会正统文学观的崇奉者和宣传者。但是，有些论述也还有可取之处：一是认为创作应"随时而变"。他说："惟窃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又谓："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矣：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均见《答朱丹木书》）这种因时而变的观点，尽管本质上是为维护日渐解体的封建制度，但较之方苞、姚鼐的认识是进步些的。其二、梅曾亮还主张创作要真实，要求文如其人。他说"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人有缓急刚柔之情，而其文有阴阳动静之殊。"(《太乙舟山房文集序》）他强调真实的重要，反对"失真"，并将文章的阳柔之美和阳刚之气，与作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性格、气质等相互联系起来，他还批评过骈体文的矫揉造作，说它"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复陈伯游书》）这种批评也是有道理的，与他的"求真"的创作主张是一致的。 （孙连琦）

龚自珍（1792—1841） 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在近代，是他首先冲破了桐城派的古文统治，为新体散文的发展开创了道路。他摒弃考据学，主张以"通经致用"之学来取代当时脱离实际的汉学和程朱理学，倡导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诗文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指出了儒学、政事、诗文具有共同的目的，就是有用。诗文都是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判。因此，他极力提倡"尊史"。他认为"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就是说，文学作品是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历史的真实，因此，都可以称之为"史"。他还倡言恢复所谓"圣人之文"。这种"文"与我们今天的文学概念不同，它的首要问题是"民生饮食"。他把文学的根本问题同人民的日用饮食联系起来，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先进的文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不过这样一来，"文"的范围实在过于宽泛了。他还认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学术文化应适应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而发展变化，反对那种把圣人的学说作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和那种因循守旧的拟古主义文学思潮，要求诗文打破清规戒律随时代而变化，这反映了他在文学领域里力求"更法"，"改图"的思想。对文学创作，

他提出"尊情"这一命题，主张诗文应具有真情。就是要求摆脱束缚，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做到文如其人。在《识某大令集尾》中，他说："文章虽小道，达可矣，立其诚可矣。"就是说，作者要表现自己创作个性就必须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要不肯捋撦他人之言为己言"，不能无病呻吟。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相当进步的理论。他还提倡"平易"、"自然"的艺术风格，反对诗歌重"格调"、文章"义法"的僵化形式，主张"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他的这些观点对后世作家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魏　源（1794—1857）　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清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古微堂内外集》等。他宗尚今文经学，利用它来反对传统的封建教义，倡导社会改革。他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师夷之长以制夷"等著名观点，要求因时而变，反对"闭关自守"，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进步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这种进步思想促进了今文经学和"西学"的结合，成为后来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在对"文"的看法上，他与龚自珍不同，龚自珍认为《六经》皆史，而他认为《六经》皆文。他强调《六经》对于文学的典范意义，"经"本来就是文，文的最高典范就是"经"。在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中，他提出一个与桐城派的《古文辞类纂》和文选派的《骈体文钞》迥然不同的选文标准——经世致用。他尖锐地批评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或蔽于声音训诂，或空谈心性，皆"无一事可效诸民物"。他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他说："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就是说，文学本身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产物。他所强调的文学特点不是重视文学的愉悦性，而是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他还提出："文章与世道为汚隆"的观点，即一个时代的文章与当时的世道也就是社会、政治有正比例的关系。文章与世道关系密切，这自然是对的，但他认为世道盛，文章也随之而盛；世道衰，文章亦因之而衰，这就有些偏颇了，它与文学史上的事实不相符合。在文学思想上，他提出"逆愈甚"，"复愈大"的反对传统的叛逆主张，这就是要求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要有其独创性和叛逆精神，一定要摆脱前人的各种束缚。这种叛逆精神愈强烈，那么，其学术和文章就愈有独创性。这种大胆地要求变革的文学思想是进步的。在文学艺术创造上，他反对"专取藻翰"、"专揣于音节风调"的浮丽的形式主义。他重视自然，强调要有独立的生命与风貌，有如造物之陶铸万品，"一花一天地"。这些观点也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蒋湘南（生卒年不详）　字子潇，河南固始人。清代文学家。著有《七经楼文钞》等。他力主"文笔之分"。在《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中，他说："叶声韵者谓之文，""不叶声韵者谓之笔"，但他重文轻笔，认为"古人用功先文而后笔也，……自古有工于文而不工于笔者，岂有不工文而能工于笔者哉？"可他并不苟同于阮元的

“文笔论”那样偏狭，以叶韵偶俪排斥一切，而是主张文章应骈散兼用。他说：“阳变阴化，奇只偶双；奇偶相间，律中宫商；物相杂，声成音，皆谓之文。”他从奇偶着眼，分析汉语言文字的基本特点，总结文学语言的结构规律，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问题是，在他的心目中有古无今。他要求文章要词古、义古、句式结构古。为达此目的，他提出了一个取径模拟，由文入笔的“用功之法”，并认为只要这样用心日久，就可以逐步掌握古代的书面语言和写作规律了。这实际上割断了文学创作与时代生活的联系，因此是不妥当的。不过他强调“古人模拟之法，在移神不在范貌，”就是说要注意创新。这对当时流行的复古摸拟之法也有所改进。他还以强烈的批判性对桐城派古文进行了清算，认为在形式上一味模拟唐宋八家的桐城派古文都是“伪八家”。指斥他们“道之不明，何有于书？文之未是，于法何有？”他以“奴”、“蛮”、“丐”、“吏”、“魔”、“醉”、“梦”、“喘”八个字来形容桐城古文的弊病，可谓穷形尽相，入木三分，这对动摇桐城派的统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徐　明）

曾国藩（1811—1872）　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著述甚富，统其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他的文论主要见之于《鸣原堂论文》二卷及薛福成的《论文集要》中。桐城派为文讲究义法、考据、词章三者，而三者之中以义法为基础。所谓“义法”，就是倡导“孔孟之道”、宣扬程朱理学所标榜的封建道统精神。但是曾国藩的时代已今非昔比，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满清王朝已是江河日下，摇摇欲坠，因此，他认为“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与刘霞仙书》，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肯定了“文章与世变因”，强调了文学为当时封建统治服务的作用，以力矫桐城派古文空疏好雅的弊病。他曾批评桐城派的“义法”：“盖惜抱名为辟汉学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又谓“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均见《复吴南屏书》）。显然，对桐城派的空谈“义理”，他是颇不以为然的。桐城派的古文到了曾国藩手里，变为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更为适应的工具了。（孙连琦）

刘熙载（1813—1881）　字伯简，一字融斋，江苏兴化人。其论艺著作有《游艺约言》、《艺概》。“六经，文之范围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作为广义的文学概念的内涵；“文，心学也，”在一定意义上概括了中国文学的表现主义特质；“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生焉”，指出了创作发生于心物交感；“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两种基本方法；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说明艺术真实是“真”“幻”统一；文“与时为消息”，注意到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关系等等，辩证的方法是贯穿在刘氏文艺理论中的一大特色。如论文法：“法以去弊，亦易生弊”，论用典：“善文者满纸用事，未尝不空诸所有；

满纸不用事，未尝不包诸所有"；论通变："善用古者能变古，以其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论艺术手法，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断续、淡丽等。他的理论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包括古代散文美学在内，是带有总结性的，

（祁志祥）

王闿运（1832—1916）　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门人辑其著述为《湘绮楼全书》。在文论方面，他基本上承袭了阮元、蒋湘南的理论，抑散重骈、重文轻笔，进一步地发展了所谓"文笔论"。不过他并不一味追求形式之美，也比较地注重于文章的是否尊经守道，曾说："夫词不追古，则意必循今；率意以言，违经益远。"（《八代文粹序》）为了使文词"追古"而不"循今"，他在《国粹学报》第二十二期上，发表文章，竟主张"学古当渐渍于古：先作论事理短篇，务使成章。取古人陈作，处处临摹，如仿书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帐记，皆可摹古；然后稍记事，先取今事与古事类者，比而作之……如是，非十余年之专功不能到也。"在这种仿帖式的摹拟主张下，他批评韩愈等"八大家"的文章也"号为复古"而"全无古色"，责备韩愈文章"岂有一句似子长、扬雄耶?"（《湘绮楼论文》）由此可见，他的文学思想是一种守古不变的思想、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作这样的理论宣传，无疑是违背历史要求的。

（孙连琦）

薛福成（1838—1894）　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近代散文家，外交家。著有《庸庵全集》等。他曾师事曾国藩，是"曾门四弟子"之一。他推崇桐城派，长期与桐城派文人为伍，但却比较注意"经世致用"之学，极力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他认为"变法"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规律，只有实现"迭变之法"才能"变古以就今"。他驳斥了封建顽固派的那种效法西人是用夷变夏的谬论，指出语言、风俗，中外是不同的；"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则是相同的。他认为中国的士大夫只在八股、试贴、小楷上耗费时日，"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实际上是一无所能。因此他呼吁"变旧法"，"除积弊"，主张"治术学术"要"专精"，甚至还提出要改变科举旧制的要求。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也不可能摆脱孔孟之道的羁绊，"舍儒教，吾谁与归"，则反映了他思想的落后和保守。在散文创作上，他虽也曾高谈"义法"，但却很少去写那些"阐道翼教"的敷衍应酬文章。他著作的文字别具一格，不仅没有酸臭的八股腔调，而且还突破了桐成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把散文的写作与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他的作品，对近代散文内容的改革，形式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吴汝纶（1840—1903）　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近代文学家、教育家。著有《桐城吴先生全书》等。他曾师事曾国藩，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在论"道"与"文"时，他本着

桐城派的传统观念，强调“道”不能离开“文”而独立存在。他所说的“道”与曾国藩所谓“经济”是一脉相通的，其内容包括桐城派所倡导的世教风化封建伦常在内，并要求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他也提倡向西方学习以改变中国的落后方面，并认为“法”不可不变，不可尽变；“学”须新旧并存，中西具列。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比较开明。他看到“桐城诸老……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的每况愈下的事实，指出：时文、公牍、说部之词“不足与于文学事”，说道论经，“不易成佳文”。因此，他主张用“西学”救“中学”之蔽。他认为西学“其义富，其辞危，使读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天演论序》）这个看法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不过，他又认为“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都可以废除，只有桐城“义法”，“则万不能废。”假如将来都必须改习“西学”的话，只留一部“姚选古文”与“西学”同时习诵就可以了。这又表现了他维护桐城“文统”保守性和数典忘祖的奴化思想。在对待文学语言的标准上，他严守桐城家法，要求语言“古雅”。本来文学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他这种认为只有一成不变地遵循古文家的规范才是古雅的看法，完全是泥古不化的见解。他还反对“俗语”、“俚语”入文，认为“俚俗鄙浅”，主张语言要“雅洁”，甚至认为“与其伤洁，勿宁失真。”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文学形式的通俗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限制、割断语言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的观点是违反文学发展规律的，是阻碍文学向接近人民的通俗方向前进的。（徐明）

林　纾（1852—1924）　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人，近代文学家、翻译家。著有《畏庐文集》、《续集》、《诗存》、《笔记》、《春觉斋论文》和《韩柳文研究法》等。林纾是晚清宗唐宋的代表之一，尊儒重道、远崇韩、柳，近推姚鼐、曾国藩。在文学理论上强调“意境”“义法”，曾谓“意境者，文之母也。一切奇正之格，皆出于是间，不讲意境，是自塞其途，终身于讲道之日矣。”（《春觉斋论文》）这就是在创作上要求写出有具体内容和真实情感的作品，把它看成最根本的，这是可取的。同时在形式上注重表达的技巧。他的“义法论”既继承了桐城派的理论，又借鉴外国文化之某些特长，用之于评述一些名著，也颇具启迪意义。林纾是旧道德旧文学的积极维护者，在“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文论运动中，他完全站在旧营垒一边，对当时提倡的白话文极尽攻击侮蔑之能手，谓之“都下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与蔡子民书》），这也反映出他思想的保守和落后。

严　复（1853—1921）　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著有《严侯官先生全集》。严复早年由于受西学之影响，思想上是比较进步的，是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在爱国情感的支使下，他于1895年在天津《直

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一系列文章，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倡导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主张变法维新，突破了当时风行于文坛的桐城派呆板之风。在文学理论上，他主张写作必须有明确的宗旨，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强调务实，反对浮泛和虚夸，曾谓："一举足则不能无方向，一论著则不能无宗旨。"他批评那些空洞无物的文章："其论事也，诡入诡出，或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知命意所在，其纪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均见《国粹报·说难》）在文学思想上，严复是个复古主义者，过于推重先秦文学，力求艰深典雅，与当时日趋简易的文风背道而驰，故梁启超说他，"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介绍新书原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反对文学革命，反对以白话代文言，有其消极影响。

康有为（1858—1927） 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南海先生诗集》等。他作为"戊戌变法"的改良派代表人物，继承魏源、龚自珍的传统，坚持文学要变迁的观点，注重文学的政治功用，强调文学要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体现出经世致用的主张。他称颂那些受时代感召而"郁积勃发"之作，认为这样的作品能"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人境庐诗草序》），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因此，可以说他的文学观是现实主义的。为了提高文学的创作水平，有助于推动国内政治的改良，他还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博以寰球之游历"、"考于中外之政变学艺"，"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人境庐诗草序》），使文学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他个人及其门人也正是这样做的。他的散文以政论成就最高，"上清帝"七书可视为代表，能熔新旧学与中西学于一炉，突破传统古文的程式定局，畅抒己见，思想奔放，洋洋洒洒，意无不达，实开了梁启超"新文体"的先河。 （孙连琦）

章炳麟（1869—1936） 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思想家，散文家。著有《章氏丛书》等。他积极提倡革命文学，主张文学应该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好舆论准备。在《革命军序》中，他要求文学要起到开启民智，鼓舞民心，反对封建王朝的作用。他对从汉代就已产生的"讽一而劝百"的文学逆流深恶痛绝，他批评"务为蕴藉"的文墨议论不能"辞多姿肆，无所回避。"因此，他主张革命文学应该反对"空言"，要"叫咷恣言"，"以跳踉搏跃言之"，为革命大贼大叫，奔走呼号。这样才能成为"义师先声"。在中国散文史上，这样热切地召唤"雷霆之声"显然还是第一次。在《文学总略》中，他提出了"义界论"，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也就是说，他把一切用文字写成的东西都

叫做“文”，而研究讨论“文”的规律和法则的学问叫做“文学”。可以看出，他给文学下的定义，其外延最为宽泛。在这样的理解下，他把“文”分为“有句读文”与“无句读文”，又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他提出“义界论”的目的是为了批判阮元的“文笔论”，这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他把一切文辞都当作文学看待，所以批判不能切中要害。其实，文字和文学，本来是有区别的，他这种以古文字来确定“文学”的标准未免过于保守。他还否定了西欧文论所谓“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观点，反对以感人与否作为文学义界的标准。他认为，论说文也有“感人顾深挚”的，而“文辞”也有“咏之不为奋”的。这个看法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他还提出了“修辞立诚”的标准，认为议论文章要以学问为基础，不能空泛无据。叙述文章要“确尽事状，比类知原”，不能以猜测为实事。在写历史公牍及杂文一类文章时，他主张用平实的叙事说理的方法，反对有意模糊不清和强行润饰的“诡雅异俗”。他还主张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统一，要“文质彬彬”，“文质相称”，“文质相扶”。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章炳麟是辛亥革命时期“文学复古”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不满汉文和唐宋文，而以魏晋古文相号召，但他的“复古”只是要求魏晋古文的简单重现，后来又发展到反对文体改革，这就不符合新文学的要求了。 （徐 明）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先后用过笔名有哀时客、饮冰、饮冰子、新民子等10余个。广东新会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其著述甚丰，均收入于《饮冰室全集》中。梁启超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积极地参与了“百日维新”活动。他的文论充分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要求，他认为文学应直接地反映社会现实，使其自觉地为改良运动和启蒙思想的宣传服务。他对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等问题都做出过比较精到的论述。对于清中叶以来盛行的桐城派那种空洞僵板的文风十分不满，“夙不喜桐城派古文”而提倡“新文体”，这种文体新鲜、活泼，或奇或偶，或文或白，非常自由，可以广泛地吸收口语和俗语。他曾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小说丛话》）这实际上已开了我国白话文之先河，他自己正是以此为方向从事写作的。“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这实在是对于传统古文一次猛烈的冲击。

王国维（1877—1927） 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观堂集林》等。他的“境界说”对我国后来的文学理论影响较大。在《宋元戏曲考》中，他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也。”在《人间词话》中，他还要求作者“写真景物，真感情。”这

就是说抒情作品应该写"沁人心脾"的真感情；叙事写景的作品应该"在人耳目"，毫无娇柔妆束之态；人物表现应该性格化；"述事则如其口出"，即形象鲜明生动、情景交融，富有强烈的感染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境界"，才能达到艺术上的"不隔"，"隔"就无所谓"境界"了。这样他就引出了"隔"与"不隔"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模糊，感情晦涩"如雾里看花"是为"隔"；反之，如果"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所以，他反对多用僻典，生涩字词或专事雕饰。在创作方法上，他认为"境界"又"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由分。"他以"造境"和"写境"来区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用理想与写实来区分文学史上两大流派，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经验总结，也是世界文学的普遍规律。他还认识到，写实和理想两派是紧密相连的。写实派虽以直接描摹"自然之物"为主，但当他在选取描写对象时就包括了理想的成份；理想派虽以创造"虚构之境"为主，但"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也就是说，任何创造，其根底仍然不能不是现实生活。这一见解是精辟的。由此，他认为，作者"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就是要求作者要深入"宇宙人生"对事物进行认真的观察和体验，以便"写之"；另一方面，又要求作者不要被它所局限，还要"出乎其外，"站在更高的层次来审视它。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此外，他还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前者不能纯然摆脱个人的得失之情，侧重情浓缩于景，情感色彩强烈、执着；后者则彻底地消除了个人功利之念，纯客观地观察事物，侧重景浓缩于情，情感色彩淡泊，超然。这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是，作为一切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一般地说是不可能不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存在所谓"无我之境"。这反映了他唯心主义艺术观的倾向。

刘师培（1884—1919） 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著有《刘申叔先生遗书》等。他力主阮元的"文笔论"的观点，继续提倡韵偶之文，强调以"藻饰"、"对偶"、"声律"做为"文"的主要标准。这实际上，他是把先秦诸子散文，两汉传记文学，唐宋古文等一律排斥在"文"之外，认为它们都是"笔"，而不是"文"。在《文章源始》中，他有"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的说法，推崇清代骈体，反对"天下文章，莫在乎桐城"的观点，公开与桐城派对立，为骈文争夺文坛的正统地位。他还区分了被盛行的宋学与汉学所混淆了的文学创作与学术著作及实用文字的界限，认为"义理考证之学，迥与词章殊科。"就是说"语录为文"与"注疏为文"是不同于文学创作的。他还认为，文学是进化的，而不是退化的，宋以后小说入文"已开俗语入文之渐"，终必达于"文言合一"之用。也就是说，有朝一日，白话一定会代替文言。他还从普及文化的角度来说明"文言合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那就是开通

民智，增长人民的文化知识“以助觉民之用”。这些看法都是有道理的。但他后期的文学历史观却要求作者遵循古义，文学创作要“惟衷《尔雅》以辨言，师许君之《解字》。”如果真要这样的话那就什么文章也写不成了。这种复古主义的观点是绝对行不通的。

姚永朴（生卒年不详） 字仲实，晚自号蜕私老人。安徽桐城人。近代散文家。著有《文学研究法》等。他是桐城派末期的后起之秀，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桐城“义法”说与先秦文学理论的关系。在《文学研究法·纲领篇》中，他说：“《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艮·六五》又曰：‘言有序’，物即义也，序即法也。《书·毕命》曰：‘辞体尚要，’要即义也，体即法也。《诗·正月篇》曰：‘有伦有脊，脊即义也；伦即法也。《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信即义也，巧即法也。《左氏·襄二十五年传》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即义也，文即法也。”在这里，他分析了桐城“义法”理论的源头与内涵，认为它是对中国上古时代人们论文学形式与内容问题的各种见解所作的集中和概括。这样，他也证明了方苞认为“义法”源于经，成于史的观点。他这样分析和论证不单是为了托经自尊，为“义法”罩上圣哲的灵光，更主要的是想推本溯源，力图从中国散文发展的全部历史中来说明“义法”的概念和“义法”在理论上的普遍意义。虽然这样，他也无可挽回桐城理论日趋没落的结局。不过，他这种寻觅“义法”理论源头的办法，比明代人评点群经，专着眼于文字音节，绳墨布置之法要高明得多了。 （徐　明）

美学论著

《尚书》 又称《书经》。《尚书》的内容极为庞杂，就它的文学、美学思想而言，主要是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重要观点。这段记载在《虞书·尧典》中舜帝的一段谈话，虽不一定是舜帝所言，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当时的诗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但却反映出了古代思想家对文艺性质及社会作用的朴素认识。“志”，郑玄注《尚书》解释为“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意”，即志向，怀抱。“诗言志”，即诗歌是用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意志、怀抱的。再与“神人以和”相联系，则初步体现出这

样的思想:文艺既是抒情言志的手段,又是交流思想,以"德"("志"的核心是"德")育人的一种方法。"诗言志"说不仅成为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而且对后世散文家提出"文以述志"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周易》 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经》大约起于殷周之际,记载六十四卦的卦名和卦辞以及爻题和爻辞。是古代用以占卜的书。《传》则是战国或秦汉之际所作,是用以解释《经》的。《周易》既是儒家的一部哲学著作,又比较广泛地涉及了有关审美和艺术创造特征等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周易》较早地提出了"文"的概念,在对革卦的解释中讲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所谓"文",即指形式。在对贲卦的解释中,又对"文"进行了区分。所谓"天文",即指自然美,所谓"人文",即指文饰美。这一区分,是对中国古代美学的贡献。《周易》还对"象"与"意"、"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形象、意义、语言是文学的三个要素。"立象以尽言",即用形象来阐明深刻的思想。形象是以言语作媒介的,故而要领会其意,则需"观其象而玩其辞",对"象"要"极深研几",而且对他的领会理解,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这句被后世的艺术理论著作经常引用的话,说出了艺术的欣赏创造所具有的非概念所能规范的特征。除此,《周易》还提出了"阳刚"和"阴柔"之美,既看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又指出其相互渗透,相反相成:"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柔丽乎中正,故亨","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这些思想,对司马迁、刘勰、苏轼、姚鼐等人的散文美学思想,对后世散文的创作和评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 儒家经典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人左丘明。《左传》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比较系统地详细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事件以及各国卿大夫和新兴阶级士的言论,也记载了相当丰富的关于审美、文艺方面的重要资料。特别是《襄公二十五年》中一段记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之是否有"文",直接关系到能否充分表达"志",这里强调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志足言文"说成了后世散文创作中基本的美学原则之一,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散文发展史上,《左传》是上承《尚书》、《春秋》,下开《战国策》、《史记》的历史散文著作,对唐宋以来的散文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语》 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也是历史散文的汇编。相传为春秋左丘明所撰。所记事实大都通过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论、对话或互相驳难来表现,所以称为《国语》。《国语》在

文学、美学方面有一些重要见解。《楚语上》中记载，针对灵王建造章华之台，伍举提出了善、美统一的观点："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并明确地把"德"看作美的核心，无"德"便无美。这一观点在美学、文学的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国语》中的文章也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为后世古文家所效法，柳宗元就说过"参之《国语》以博其趣(情味)"（《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样的话。

《论语》 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孔子弟子及孔门后学所记的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书。在西汉时有《齐论》、《古论》、《鲁论》三种本子，今本《论语》基本上是鲁国学者所传的《鲁论》(一说现存本子即《鲁论》)。全书共20篇，每篇分若干章。内容范围甚广，涉及到当时社会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等众多方面，孔子思想体系从中可见一斑。作为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特别强调文和道德的关系，提出了"有德者必有言"（《宪问》）的观点。把善（"德"）看成高于美，忽略了文学独立的审美性，以至于将《诗三百》也道德伦理化，一方面是出于宣扬"仁"的需要，一方面也由于当时还远未形成明确的文学观念。这一观点对后来古文家及道学家的散文美学理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论语》中，孔子还提出了著名的"辞达"说："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它表明孔子重视语言与内容的关系，与他的"志足言文"说相互补充，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一条美学原则。后来陆机与苏轼作了不同程度的发挥，可见"辞达"说在散文美学史上的贡献与影响之大（见"辞达"条）。

《墨子》 墨家经典的总汇，先秦理论散文著作之一。由墨子弟子据墨子讲学记录整理而成。原有71篇，现存55篇。墨子的主要思想是兼爱、节用，反对贪暴和战争，反对儒家的礼义仁政。从狭隘的感觉论和功利目的着眼，他提出了"尚用"和"非乐"的主张，要求"文学"和一切"言谈"，即与政治、法令、学术有关的一切文章和言论都要有实用价值，都要能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服务。他否认文艺的社会功用，只看到追求声色之乐的危害性，而看不到文艺的陶冶情操、鼓舞情志的积极效应。他很重视文学的内容，明确提出"先质而后文"，认为华丽的辞藻，会使人们"怀其文而忘其质"，"以文害用"。他过于强调实用，理论、观点有明显的偏颇。他提倡的"三表法"，讲究"言必立仪"，注重事实，处处考虑人民的利益，为论辩语文的写作和完善，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后世论辩散文产生了积极影响。

《孟子》 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也是先秦杰出的散文著作，孟轲及其弟子合著。全书分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7篇。内容广泛涉及孟轲的政治活动及主张、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以及个性修养等。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知人论世"的见解，对后世正确

地开展文学批评和准确地鉴赏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知言养足”观点，虽是就个人道德修养而言的，但后来古文家移用并发展为散文美学的一种理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所谓“知言”，即是指“诐辞（片面的言辞）知其所蔽，淫辞（过分的言辞）知其所陷，邪辞（不合正道的言辞）知其所离，遁辞（躲闪的言辞）知其所穷。”把它借用到文学批评上，就是指对于作品的鉴别力。所谓“养气”，是一种内省的修养功夫，即养“浩然之气”，“集义所生”之气，指自我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把“言”和“气”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文”和“气”结合起来，即把文学作品和创作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这对后代“文气”说的提出是有启发性的。《孟子》长于气势，感情充沛，曲折尽情，波澜壮阔，富于阳刚之美，成为唐宋古文家韩愈、苏洵、苏轼等摹写的范本。

《庄子》 又称《南华经》。道家经典之一，也是先秦诸子散文的重要著作。庄周和他的弟子、后学所著。原书52篇，现存郭象注本仅33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周自著，外篇、杂篇是庄周弟子或后学所作。《庄子》基本思想有三个主要方面：关于“道”的本体论和“形”的现象论；主观唯心的相对主义论；无条件的精神自由。在文学、美学思想上，书中从抽象的精神本体出发，提倡“朴素”美。虽然所谓的“朴素”，是指能充分体现虚空之道的精神的“朴素”，但作者所追求的仍是不加造作、毫无文饰的自然天成之美。他竭力反对人的创造性的审美实践，认为人的一切创造美的行为都是对事物的自然之性的破坏。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在文与质的关系上，他认为质是本然之性，文是人为附加的外在因素，“既（尽）其文，未既（尽）其实”，不能得“道”，一切文对质来说都是有害的。“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这种割裂内容和形式的联系，一味反对文饰的思想，显然也是片面的。《庄子》的文风是独特的。他描述自己文章的风格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宛转的样子）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奇异）可观。”作者采用“寓言”、“重言”、“卮言”等形式，阐述他深湛的思想，通过奔放新奇的想象和浓厚的浪漫情调，有意把一切自然事物、神话传说都具体化、人格化，使文章具有独特的魅力，为历代散文家所赏爱。柳宗元论文主张“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苏轼之文最得力于《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引）。可见《庄子》对唐宋古文家的创作影响之大。

《荀子》 战国末期儒家重要著作之一，也是先秦理论散文的重要著作。

现存32篇，多为荀况所作，惟《大略》等最后6篇，系门人弟子所记。《荀子》反映出荀况哲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他的文学、美学思想。荀子的文艺思想，主要反映在《劝学》、《正名》、《儒效》、《乐论》、《非相》等篇中。他很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明确指出："辨说也者，心之象道（对正道的认识）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主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正名》）。认为文学的目的在明道。这成了唐代柳宗元"文以明道"说的滥觞。他反对华辞巧说，认为君子的仁言应该"文而致实，博而党正"，使其"善乎黼黻文章"，"乐于钟鼓琴瑟"。否则"好其实而不恤其文"，就成为"卑污""庸俗"的"鄙夫"之言。他崇尚实用，主张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对后世散文家的文贯致用说与文道合一说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韩非子》 法家的重要著作，也是先秦理论散文集大成著作。全书55篇，大部分由韩非所著，《初见秦》、《存韩》等篇，恐出于后人增附或由他书窜入。作者从实用功利出发，笼统地反对一切文学艺术的存在，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取消与"法"无关的其他意识形态。他认为文艺极大地危害法治，因而要加以取消。这与墨子的思想很接近。就文和质的关系说，他提出重质轻文的思想，认为"实厚者貌薄"，文胜则质衰，"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二者不可兼得，所以人们应该"处于实不处其华"，"好质而恶饰"，去"文"而"取质"。这一观点虽有重质轻文的偏向，但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注重自然本色之美看，也有其合理性。作为先秦理论散语文著作，《韩非子》廉悍峻削，明切犀利，又善用寓言，巧设譬喻，生动形象，同样为后代散文家提供了范本。

《淮南子》 又称《淮南鸿烈》。由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主持，他的门客集体编写。该书的注释者高诱在《叙目》中说：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持以道德，辅以仁义"是全书的主旨。。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先秦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也承袭儒家的一些观点。它继承了道家和管子的"气"的学说，从元气自然论的哲学观出发，提出了"形"、"神"、"气"三位一体的思想。"夫行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原道训》）作者认为"形"是人的身体（"形骸"），"气"是充斥于人体中的"血气"，即生命力；而"神"则是为人所独有的感觉、意志、情感、思维的总和。在这三者中，作者又特别强调了"神"对"形"的制约作用，"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诠言训》）作者虽重在阐发养生理论，但也涉及了美与艺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形"是客观摹写对象，"神"是作者的主旨，

"气"则是作家的内在精神，文艺就是形、神、气三位一体的融合。强调"神"对"形"的制约，正是突出了"神"的主宰地位。无神之"形"和无形之"神"都是不足取的。"形"、"神"、"气"后来成了古代散文美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在《本经训》中，还提出了"文"与"质"的关系，认为"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肯定了"文"与"质"的对立统一关系，并突出了"质"的重要地位。《淮南子》反对过分的雕琢，但又不是一概反对文饰。它反对的只是那种没有"质"之美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虚伪的文饰。"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诠言训》）。《淮南子》中的这些主张，对文学内容和形式的深入研究，对后代散文发展中不假雕琢的自然质朴文风的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

《太史公自序》 西汉司马迁作。本文主要自述创作《史记》的动机，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以及《史记》一书的创作精神，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司马迁的文学思想。文章借和壶遂的一段谈话，揭示了著书大旨。作者出身于史官世家，有着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生活阅历，对社会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借古鉴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这就是他创作《史记》的动机。他把历代许多作家满怀悲愤潜心著书的史实与个人的不幸遭遇联系起来，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出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的情绪和批判精神，以及对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崇高性的充分肯定。这种张扬个性，强调主观情感的抒发，从个体与社会矛盾冲突这个基本点去观察文学创作和文章写作的角度，对后世散文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言·吾子篇》 《法言》中的一篇。《法言》是东汉扬雄摹拟《论语》写成的一部著作。共13卷。该书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中心，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文学思想。本文从汉赋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提出问题，指出其欲讽反谀的特点。汉赋以铺陈渲染、雕绘辞采为特色，因此，作者虽有讽谕之义，而读者往往买椟还珠，所欣赏的只是它侈丽闳衍的词藻。扬雄以创作实践中的切身体会总结出这一看法，抓住了汉赋发展中的根本弱点，批判了汉赋的形式主义文风。但扬雄也不一概排斥华美的形式。他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他看来，合乎儒家思想规范的（"则"），"丽"则美，而不合儒家思想规范的（"淫"），"丽"则不美。据此，他对景差，唐勒，宋玉，枚乘等人的赋予以否定。从对赋的批判，扬雄进一步提出"征圣"，"宗经"的观点，认为要想达到"丽以则"，分清"雅"与"郑"，"则"与"淫"，则"众言淆乱，必折诸圣"。即以经书为最高典范，以儒家学说为思想标准。本篇还对文与质的关系作了充分论述："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率直），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主张文质必须兼备，开了后世文以载道说，文

道合一说的先声。

《论衡》 东汉王充撰。共85篇。现缺《招致》一篇，实存84篇。这是作者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讨论了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为中国中世纪思想界开辟了一条新路。作者的文艺观点主要见于书中《艺增》、《超奇》、《自纪》等篇。王充很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认为文学应"劝善惩恶"，"有补于世"，"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哲理、历史散文，他提出要"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话要说得轻重得当，辨别真伪。针对汉代谶纬迷信盛行而形成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浮夸文风，他主张"疾虚妄"，"归实诚"，认为"虚伪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对作篇》）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上，作者主张文质并重，既反对有文无质："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超奇篇》）也反对有质无文："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蛇，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书解篇》）做到文质并茂，华实相符，"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文见而实露"（《超奇篇》）。作者反对模拟，力主创造："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自纪篇》）在作品语言上，他主张言文一致，通俗准确，并提倡明白晓畅的文风："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自纪篇》）"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同上）。王充对文艺的论述虽不全面，但深刻而有见地，对后代的曹丕，葛洪，刘勰，白居易等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事起于汉高祖，终于王莽末年，计一百篇，由12帝纪、8表、10志、70列传四个部分组成；又是后汉著名的历史散文。作者为东汉班固。《汉书》中的《艺文志》是依据刘歆《七略》创立的。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阁典籍，刘歆总群书而奏《七略》，分类编目，其中"诗赋略"可说是最早的文学书目。班固则以此为蓝本，"删烦取要"编成的。《艺文志》删去《七略》中的《辑略》（据颜师古注，《辑略》为"诸书之总要"）而取其六略，包括《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诗赋略》单独列出，可知当时的文学已从六经和诸子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从散文美学的角度说，《诗赋略》着重阐明了赋的来源和发展。作者认为，辞赋出于古诗，春秋之后，"贤人失志"，于是古诗一变而为赋。他十分强调赋的讽谕作用，肯定孙卿、屈原"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同时批评了汉赋发展中的不良倾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讽）谕之义。"其思想和扬雄是基本一致的。（余逊涛）

《典论·论文》 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专论文学的一篇。"典"，

法，常。“典论”，就是讨论事物的法则、规律。《典论·论文》开创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先例，大约作于汉献帝建安末期。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学批评方面，作者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善于自见”其长，又“闇于自见”其短，加上“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因而形成“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现象。他又批评了文学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不良风气。其次是文体方面，指出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风格要求，特别是“诗赋欲丽”的提法，把诗赋这类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区别开来，提出“丽”的独特要求，突破了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发掘出文学的美学意义。作者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揭示了作家风格与个性禀赋的关系，是具有开创性的。第三讲文学的价值，说文学事业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强调富贵年寿“不若文章之无穷”，这就把文章的美学价值标举突出，与“经国”的社会功利作用并列，显示了文学的多方面功能。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的句意，就是承此而来。因此，《典论·论文》在中国散文美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文赋》　西晋陆机作。与《典论·论文》相比，《文赋》的理论已趋于系统化。多方面论述文学现象的种种原理，文学创作的种种规律和方法，表现出体系化倾向。《文赋》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深入细致地描述了创作过程。构思时的精神状态，谋篇行文时的情形，以及创作灵感的通塞等，都作了真切的描述和精细的把握。由于体察真切、思考深入，所以精见迭出。“诗缘情而绮靡”，揭示了诗的审美本质：情感性。这与“诗言志”的传统说法各标一帜，对后世诗坛发生了深远影响。“立片言以居要”的观点，“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种贵独创的观点，写文章“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的观点，文章内容和形式都很重要的观点，都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深入展开的可能性，都是文学创作中的关键性问题。正因为《文赋》有如此多的发现和建树，所以得到历代的重视。

《文章流别论》　西晋挚虞著。《晋书·挚虞传》云：“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得。”《新唐书·艺文志四》载挚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全书今已佚失，只残存后人从各种类书中辑出的若干条论说，《文章流别论》先就文章的源起和类别作了总体解说，然后就赋、诗、七体、箴、铭、诔、哀辞、碑文、图谶等各种文体分别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尤详于赋、诗、七体等几种当时比较流行的文体。比如他谈赋，先讲赋的起源和作用，继言赋的发展变化，并评论有关作家作品，且举出足以为典范的文章，最后标举赋的创作原则，又剔出“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种写作失误，这是很有系统的论述方法。《文心雕龙·序志》篇曾讲到立论文体的四条纲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定义，选文以定篇，敷

理以举统"，这四条纲领挚虞早已运用。刘勰的立论很可能受到了挚虞的启发。（周五纯）

《翰林论》 东晋李充著。原书54卷，已散佚，后人辑存10则。据典籍零星记载，及所存残文，可推知《翰林论》主要内容是说明各种文体的产生，并按文体"褒贬古今，斟酌利病"（《文镜秘府论·四声论》），列出数篇代表作品，评论得失。作者通过评论古今作家作品，表达了自己的散文美学观点。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较近于历史的探讨不同，《翰林论》较近于美恶的品评。作者所谓"论贵允当"，是上承曹丕"书论宜理"（《典论·论文》）的见解。所谓表与驳"不以华藻为先"，是承袭周、秦、两汉"尚用"的观点，而提倡、美"，提倡"文"，就体现了魏、晋以来重文的审美倾向。作者对各种文体的产生所作的研究，是带有开创性的，在散文美学史上有一定意义。

（王锡凡）

《抱朴子》 东晋葛洪著。分为内外篇，内篇20卷，主要是宣扬道家理论；外篇50卷，属政论性著作。其中有些篇章及文字，反映了作者的散文美学观点。在创作论方面，作者融合了曹丕的天才说与陆机的方法说，提出天才与方法并重说。他批评了不讲方法的天然说："清音贵乎雅韵克谐，著作珍乎剖微析理。故八音形器异而钟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以开涩有主宾，妍蚩有步骤，是则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外篇·辞义篇》）但他认为运用方法仍须天才："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瀁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言功，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同上）所以作者既重视创作主体在审美过程中特有的才华，又重视在审美创造中运用的方法，从而纠了曹丕与陆机的偏失。在鉴赏论方面，作者虽多承前人旧说，但第一，比较系统，涉及鉴赏的能力、主观的爱憎、客观的宥蔽诸方面。第二，有所发展。他以为优秀作品各有其风格特色，应当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而不应当以主观的爱憎影响正确的审美评价。桓谭说"凡人贱近而贵远"，王充说"俗好珍古，不贵今"，曹丕说"常人贵远贱近"，都是指因时间的不同而产生的审美评价的偏差。作者所论更为详明，而且指出因空间的阻隔而发生的偏差。作者的审美观对齐梁之后的散文美学有一定影响。

（王文龙）

《文心雕龙》 南朝著名文学、美学理论家刘勰著。它体系完备，结构严密，在古代文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全书50篇，由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组成。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总序，说明该书的写作动机、持论态度、内容和结构。《原道》等前5篇，作者称之为"文之枢纽"，主要讲文学源起、文学原则。文体论从《明诗》到《书记》20篇，分别论述35种文体的作品。从《神思》到《总术》共19篇，为《创作论》，是全书文学理论的精华部分，理论上的重要建树大多在这一部分。从《物色》到《程器》共5篇为批评

论，总结和阐发文学批评的种种原则。各部分既有分工，又互相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有许多精到的见解。首先是文质并重的观点。作者生活的时代是文学追求形式美的时代，文学技巧进步了，但作品的社会内容淡薄了。刘勰既肯定这种趋势的合理成分，又同时强调了"质"，强调内容的真、善要与形式的美相统一。这是一种文质彼此相依、相得而益彰的比较全面而公允的立论。对待文学和社会环境，作者揭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发展规律，把文学的流变与社会、政治相联系。这一见解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是对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作者又指出批评家要有广博深厚的修养，公正平和的态度，客观全面的批评标准。这与他以前偏于主观印象的批评相比，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该书中还有若干散文美学的理论、观点，直至今日仍熠熠生辉。（周五纯）

《南齐书·文学传论》 梁萧子显著。作者在本文中综论诗文，也反映了他的散文美学思想。他指出文学应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认为文学的表现形式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作为一个进步的史学家，他看到了文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不断更新，因而提出了变化说："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他指出产生变化的原因，不外"才"与"学"两个方面，即所谓"委自天机，参之史传"。把对传统的继承与作家创造才能的发挥结合起来，立说比较深刻。但没有看到时代因素对作家创新的影响，是其理论上的不足。

《文选序》 南朝梁萧统作。作者所编选的诗文总集《文选》前的序文。作者在本文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对古代散文美学理论也有所建树。他提出了文学不断演进的观点"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认为这种发展变化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萧统规定了作品入选的标准是以"能文为本"，并第一个揭示了文学共同的审美特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划清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作者对文学体裁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将文体分为38种，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散文（广义），本文分析了各体的源流和艺术风格，对文体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锡凡）

《狱中与诸甥侄书》 南朝宋范晔作。在散文美学史上，作者第一个提出了"以意为主"的见解，重视对现实的审美感受，并阐明了"文"与"意"的关系，对后世散文美学及创作影响很大（评见"以意为主"条）。作为史学家与散文家，作者所创作的《后汉书》颇有美学价值，本文详述了在审美创造中的体会，并作了自我评价。他认为自己的部分作品立意精深："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笔力纵横如意："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构思不同凡响："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虽

然总体评价未免言过其实，但作者的创作成就和经验还是对后来的散文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文龙）

《颜氏家训·文章篇》 北齐颜之推著《颜氏家训》20篇，其中《文章篇》论及散文美学。作者主张文章经世致用，反对当时盛行的追逐华丽词藻、徒尚形式的文风。他说："今世相承，趋末逐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典故）与才争，事繁而才损"。他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文风的产生是由于文士没有实际生活，空谈学问所致。他主张义理与词华并重，不可偏废："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对于文坛上复古与崇今、重质与尚文之争，作者主张取长补短，兼采古今："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所谓"本"与"末"，即指内容和形式。作者重视创作才能，认为文学创作要有"天才"，但也不废后天的学力与对传统的继承，持论比较辩证。作者的散文美学观点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以儒家传统思想、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就显得比较保守。

《史通》 唐史学家刘知几著。我国最早史学理论名著。共20卷。其史论与文论多有相通之处，有一定美学意义。作者认为文章应该反映现实，做到文质并重，对齐梁靡丽文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提出了叙事之文"用晦"的主张，所谓"用晦"，就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也就是抓住表现对象的本质特征，剪裁一切浮词累句，显示出高度的概括性和表现力，使读者能够"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这是对《史记》以来史传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对于叙事文章，作者还提出了"尚简"的创作要求，并把语言的简炼与内容的充实统一起来，以"文约而事丰"为标准。这些见解，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散文创作的发展。（王锡凡）

《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 唐代柳冕作。作者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本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散文美学思想。在文道观方面，作者提倡文道合一，与韩愈因文以道，重道而不废文的主张相类似。但"道"的内涵与韩愈的理解不同。韩愈着眼于儒家道统，作者则着眼于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教育功能。所以作者的文道合一，实质上是文教合一。由此基本观点出发，作者颇为重"气"。他所谓"气"，涵义不一：或就社会生活言，指风气（"圣人感而仁义行焉之气"）；或就作者言，指志气与才气（"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或就作品言，指气势（"直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他认为文章必须关系教化，鼓舞人心，作者才能以气驭词。这对韩愈的"气盛言宜"说有一定影响。（王文龙）

《韩昌黎集》 唐代韩愈著。初由门人李汉编辑成集，定名为《昌黎先生集》。共40卷。书中的《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荆潭唱和诗序》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散文美学观点。在分析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

时，作者提出了“不平则鸣”说，认为这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共有的现象。这一观点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后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分析文与道的关系时，作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此外，他还提倡艺术的独创性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阐述了“气盛言宜”的见解等。作者的散文美学理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对古代散文创作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柳河东集》　唐代柳宗元著，刘禹锡编。凡45卷，《外集》2卷，集前有刘禹锡序。书中文论作品主要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等。作者主张“文以明道”，文道并得，文道统一。《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但又坚决反对“务富文采”之作，认为这样等于“用文锦覆陷阱”。作者重视文艺的美感作用，对“奇味”进行了论述，提倡文艺体裁、趣味和风格的多样化。在唐代古文家中，作者的散文美学思想对后代的影响仅次于韩愈。

《答朱载言书》　唐李翱作。作者是韩愈大弟子，本文对文与道、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继承了古文运动领袖们的观点，主张文以载道，主张文章“义”、“理”、“文”三者并重。“义”“理”是文章内容，“文”则指文章形式。作者以“《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的事实为依据，提倡“自成一家之文”，强调“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由此出发，本文详论了“创意之大归”，在义深意远，各不相袭。认为《春秋》、《诗》、《六经》以及屈赋、庄文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各有其意，又各有“津润怪丽”之词。同时还阐述了“造言”，批判了种种错误观点，指出“尚异”、“好理”、“溺于时”、“病于时”、“爱难”、“爱深”是受“情有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的偏见影响造成的。强调造言必求工，而真的辞工，又贵独创。作者的散文美学观点，继韩愈之后推动了古文运动的进展。北宋王禹偁在《答张扶书》等文中，又继续加以发挥，促使新古文运动的再度兴起。

（王锡凡）

《答李生第一书》　唐代皇甫湜作。作者的老师韩愈论文，有矜奇尚异的一面，他说：“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荆潭唱和诗序》），“不专一能，怪怪奇奇”（《送穷文》），“所珍爱者必非常物”（《答刘正夫书》）。本文发挥了韩愈“尚奇”的散文美学观点，提出意新词高之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作者把意新词高视为怪奇的先决，出以虎豹之文、鸾凤之音、金玉之光为类比，证明怪奇都是积于中而发于外，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出于自然。这体现了作者在散文创作中一种审美追求，有其可取之处。但意新词高与“怪怪奇奇”并无必然联系，作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又离开了意的新颖而沉溺于词的奇异，客观上导致了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后果。后来孙樵对作者的尚奇论有所阐述与补充，纠正了他的偏向。　（王文龙）

《文章论》 唐代李德裕作。本文明显地受到了曹丕"文气"说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发挥了韩愈"气盛言宜"的观点，认为"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词丽藻，……不得为全璞之宝"。文中强调"气"要"势壮"才"美"，而"势壮"又要有节奏有变化才行。写文章既应重"气"，又要有波澜起伏，疏密相间。作者又提出了"文之为物，自然灵气"这一精妙的见解，触及创作中的灵感思维，表现了作者对作品本色美的珍爱。但完全否定艺术构思（"抒轴得之"）、词语修饰（"琢刻藻绘"）等，也有其片面性。

（王锡凡）

《答张扶书》 北宋王禹偁作。作者与柳开同时，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先驱。他批评了五代以来的颓靡文风，抱有"革弊复古"的愿望，本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改革主张。在文、道关系上，本文阐述了古文"传道明心"的功能，这与韩愈的"文以贯道"、柳宗元的"文以明道"一脉相承，而所谓"明心"，即表达思想，与"传道"互补，涵盖面更为宽泛。作者以六经为旗帜，指出"文"是"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是出于"惧乎言之易泯"的本意。由此推导出为文贵在"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结论。这一结论也正是作者提出的新的创作标准，显示出他对古文的价值取向。"句之易道"，是就语言风格的平易而言的；"义之易晓"，是就思想内容的鲜明而言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大力提倡取法韩愈的"文惟其是"，同时反对那种"模其语而谓之古"的赝品。本来，韩愈的文论与创作都有"怪怪奇奇"与"文从字顺"两个侧面，前者由弟子皇甫湜所继承，曾给古文创作带来流弊；后者则是韩文成功之处，在散文发展史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作者继承并发展了这后一面的传统，给宋文初步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成了欧阳修、苏轼他们的先导。

《宋景文公笔记》 北宋宋祁著。作者从陆机的"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以及韩愈的"惟陈言之务去"之中悟出"为文之要"，鲜明地提出关于独创性的创作要求和审美标准："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并对创作上机械模仿、不敢突破加以贬抑与嘲讽。陆机的话原是指作品艺术的构思的新颖、独到，韩愈也只是讲语言的创新，作者则是要求作家总体风格的独创。这是对"孔子没后，百家奋兴，类不相沿"的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家主体性增强的表现，又是宋代作家在创作上独辟蹊径的创造精神的反映。作者的观点在宋代文坛颇有影响，王直方曾在诗话中引用他的说法，并与黄庭坚的"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这两句诗联系起来，誉之为"不易之论"。作者是历史学家，他还就自己撰写《新唐书》的经验，谈到史传文的写作宜用散行文字，而不宜用有"属对平侧（仄）用事"的骈体，同时申述了"史近古，对偶宜今（指朝廷、官府有一些应用文）"的理由。这种对骈、散二体各有所施的看法，是比较通达的。此外，作者还以韩、柳等唐代古文家作品语言

为例，提倡创造“新语”，也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欧阳文忠公文集》 北宋欧阳修著。共153卷，附录5卷。作者主张文、道并重，用“圣人之文”的提法将二者统一起来。一方面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把“道”放在首位，旨在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一方面又说有德者不一定有文，指出了“文”的不可替代性。作者重视独创，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说“各由其性而就于道”，指明了个性风格形成的原因和途径。作者着眼现实与审美的关系，提出了“穷而后工”的著名观点。《梅圣俞诗集序》一文在阐述这一观点时重在论诗歌创作，《薛简肃公文集序》则重在论散文创作：“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作者把作家“穷居隐约”的境遇，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激发愤”的情感，看成创作成功的决定因素。这是在宋代的历史条件下，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论以及韩愈“不平则鸣”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虽然斗争锋芒有所削弱。在创作实践中，作者注重传记文学，提倡“事信”、“载大”、“言文”，把真、善、美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他的“记事似司马迁”的作品，便是这种理论的实践。

《仲兄字文甫说》 北宋苏洵作。这篇文章本来是为了阐明苏涣由字公群改字文甫的理由，但同时表现了苏洵一个文艺思想，即风水相遭，自然成文，乃天下之至文的理论。本文提出这一理论，一方面来自《周易·涣》卦中“风行水上涣”一语的启迪，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同时代人的影响，略早于作者的蜀人田锡就说过“微风动水，了无定文”。(《贻宋小著书》)的话。本文进一步发挥了田氏的观点，以水比喻平时的积蓄，以风比喻一时的灵感，满而上浮的水有待于风的鼓荡才能形成千姿百态的波纹，深厚生活积蓄和文学素养也有待于创作冲动才能形成“天下之至文”，二者不可缺一。而这二者都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的，都不是有意于成文，而是二物相遇，自然成文，是“不能不为之文”。这比那些“刻镂组绣”之文更符合自然美。总之，本文用形象的比喻，阐述了作者一贯的主张：提倡不得已而言，反对为文而文。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倡言为文“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是受家学熏陶的结果。

《通书·文辞》 北宋周敦颐作。“载道”本是周秦儒家旧有的观念，齐梁时刘勰也有“宗经”、“征圣”、“明道”一类主张，在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提出“志乎古道”(《题欧阳生哀辞后》)，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周敦颐在《文辞》中则标出了“文以载道”的旗帜。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作者的“文以载道”说发表了理学家在文道关系上最初的倾向性意见。本文把“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说成“艺焉而已”，表现出重道轻文之意，也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与古文家的看法有着原则性的分歧：第一，古

文家虽重道，却也重文，韩愈说过“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答刘正夫书》）的话，欧阳修更提出了文道并重的观点，与作者轻率地贬低“文”不同。第二，所使用的“文”与“道”的概念内涵也不同。古文家的“文”指的是词章，是作品的艺术性，“道”实质上是指文章内容的思想性（与其口头标榜的“古道”并不相同）；作者所谓“道”，则是指身心性命义理之学，而“载道”之“文”，则成了语言文字之“文”，成了仅仅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不过，作者还看到文辞“美则爱，爱则传”，没有否认它的修饰语言的功能，所反对的只是“徒饰”而已。他的弟子程颐变本加厉地提出“作文害道”的观点，并发挥了“有德者必有言”的传统偏见，就更走向了否定文学的极端，道学家所说的“文”也就丧失了全部审美特征。

《南齐书目录序》 北宋曾巩作。所论为史传文，对唐代古文家以文贯道的观点有所阐发。作者认为写史要有良史之才，“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因为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明事达理，做到以文贯道，所以恃重人选。在作者看来，古之良史“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如此则“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这就等于提出了“史”的标准。这一标准体现了文道并重的精神，对创作主体逻辑思维（“周万事之理”、“通难知之意”）与形象思维、情感思维、直觉思维之类（“发难显之情”）兼备这一要求颇具卓识。这里还涉及作品的文学性与实用性共存的问题，在当时古文家与政治家之间带有折衷的意味。但作者对“圣人之徒”与“能文之士”这两类史才更偏重前者，对司马迁深致不满，显得比较保守；也忽略了《史记》高度的文学成就和审美价值，显得比较偏颇。包括作者在内的古文家关于传记文的理论缺陷，导致了这一文体创作中艺术性的削弱，并给后来的发展带来种种限制。作者所论成为后世古文家“义法论”的先导。

《上人书》 北宋王安石作。作者在这封书信中，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古文家们的热门话题——道、文关系。作者认为，“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篇章之美。作文的本意在于明道，而所谓“道”，则是施之于实用的经世之学：“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这就是作者“文贵致用”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固然与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特定地位有关，但过分强调“文”的实用性，而且把“文”的作用局限于礼教治政的范围，把散文降到了应用文的地位，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和“辞”的关系上，作者把二者比喻为“器”与“刻镂绘画”。制造器物的目的在于实用，器物上面的刻镂绘画，不过是为了装饰和美观。“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作者的重道轻文，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性是很清楚的。当然，作者对“容镂绘画”的作

用也有所保留与肯定："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尽管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征，但与道学家的轻文乃至取消"文"还是有差别的。文中批评韩愈、柳宗元"徒语人以其辞"，贬低他们作品的巨大成就和审美价值，无疑是一偏之见，是不公道的。

《东坡七集》 北宋苏轼著。凡110卷，包括《前集》、《后集》、《续集》、《奏议集》、《外制集》、《内制集》、《应诏集》7种，是一种诗文合集（词集不在其内）。该书中一些信、叙、记、赠序、杂文、题跋、碑文等，广泛地涉及散文美学思想。作者主要地继承了前代古文家以及老师欧阳修的理论、观点，又有所修正，有所拓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在文、道关系上，一方面宣扬正统的儒家文学观，批评了历代异端，特别是当时的新学（见《居士集叙》），一方面又把"道"变成容纳儒、释、道各家思想乃至事物客观规律的极其宽泛的概念。在创作中，用"文以述志"来取代"文以贯道"，强调主观的"意"在审美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作者与父亲苏洵一样，坚持文贵自然的审美观，不仅要矫正五代文弊，而且要革除宋古文创作中"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谢欧阳内翰启》）的新弊。而让自然与"奇怪"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即所谓"溢为奇怪"，又是作者在理论上独特的创造。在创作原则上，提出了"随物赋形"的新说，简言之，即取法自然，复归自然。这是一个包括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在内的美学命题，是对庄子"法天贵真"以及《易传》"观物取象"的审美观的继承与发展。作者还丰富发展孔子的"辞达"说，把它变成对审美创造过程完整的表述；提倡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批评了王安石所倡导的单一化与雷同化倾向；多处引用欧阳修的"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的说法，说明作品的美学价值取决于本身的客观性，取决于鉴赏者的"众口"，而不以个别人的褒贬为转移，等等，也都富有美学意义。

《上枢密韩太尉书》 北宋苏辙作。这是作者十九岁进士及第时写给枢密使韩琦的一封求见信，却以论文为主。在这封信中，作者着重对养气说作了新的阐述。养气说出自孟子，而孟子只是着眼于主观的道德修养的强化，把养气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与文学无关。"养气"主张的提出始于刘勰，但刘勰基本上限于论养生与写作的关系。把养气真正与为文联系起来，苏辙是第一人（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并未明确提出"养气"，所说的"气"仅指文章的气势）。本文中养气说的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作者论气与曹丕的观点截然不同。曹丕论气，侧重于先天的禀赋："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作者论气，侧重于后天的修养："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因此，他尽管认为文章的化境非学力可到，而养气的结果，仍然可以使文章致于极诣："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容，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二是作者提出怎样养气的

问题。他举孟子与司马迁为例，来说明养气的方法。孟子善养浩然之气，所以"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这是重在内心修养，旨在提高精神境界。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是重在外境阅历，旨在加深审美体验。外境阅历，又包括人物交游的影响与山川形胜奇闻壮观等的激发。这是对刘勰关于"江山之助"（《文心雕龙·物色》）一说的继承和发展。自我修养与外境阅历是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充实创作主体，二者不可分割，而作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更偏重于外境阅历，强调对现实生活（社会美和自然美）的审美体验。可见作者的养气说是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实践性的。后来陆游、宋濂等讲为文"养气"，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苏辙的影响。

《与王观复书》 北宋黄庭坚作。这封信兼论诗文，从散文美学的角度看，其重要性超过《答洪驹父书》。作者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以理为主"的创作观点，并提出了"理得辞顺"的要求和标准。这里的"理"有其特定涵义，既是指文理，又包括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及人生态度，不同于道学家的抽象的义理，也不同于秦观的事理之"理"。"理得"，既指文理自然，又指说理正确、充分；"辞顺"，指语言畅达。作者把"好作奇语"的创作倾向当作"以理为主"的反面加以评击："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苶，其病至今犹在。"又从正面论述了"以理为主"的好处："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由此也可见"理得"与"辞顺"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论诗文创作讲求布置法度，与苏轼注重天成自得各标一帜。本文提出"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观点，可以与作者"文章必谨布置"（范温《潜溪诗眼》引，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的一贯主张互相补充，而不是向苏轼靠拢。"绳削"，即指规矩、法度。"不烦绳削而自合"，意思是不拘守法度，却自然合乎法度。在作者看来，这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他列举杜甫到夔州后的诗作，韩愈自潮州还朝后的文章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韩愈论》 北宋秦观作。作者把文章分为五类，即"论理之文"，"论事之文"，"叙事之文"，"托词之文"，"成体之文"。这主要是就内容的性质与表达的方法来划分的，自然未尽妥当，甚至在概念上有互相交叉之处，但也有其开创性，而且比明人宋濂所采用的"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的两分法要细密得多。本文对上述文章类型一一作了解说，认为列子、庄子的著作是"论理之文"，苏秦、张仪的文章是"论事之文"，司马迁、班固的作品是"叙事之文"，屈原、宋玉的作品是"托词之文"，囊括诸家的韩愈的作品则是"成体之文"。文中对"论理之文"与"论事之文"的论列同作者"文以说理为上，序事为次"（《通事说》）的观点有关，而且可以看出"理"的内涵主要是指列、庄的道德、性命（指人的禀赋和命运）。作者注重

事理，并不轻视文辞。对其中最富于审美特征的“托词之文”作了这样的概括：“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这里涉及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观照，把审美对象化为审美形象的艺术手段，以及读者的审美情感等。他所推尊的韩愈的“成体之文”，也包括“托词”在内。说韩愈的文章集各体大成是宋人的共识，至于说包括列、庄、苏、张，则是作者的新说。事实上，韩愈所矜重的是孔孟之道，与列、庄不同，与苏、张更是了不相涉。作者只是夫子自道，这与他的事理说，与他重事功的人生观都有密切关系。作者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思想主要来自苏轼、苏辙兄弟的影响。

《海陵集序》 北宋晁补之作。本文提出了事、文无关说，主张文章与事业分家，指出“文学古人之余事”，又以战国的士无事业可言，而“文章可喜”为例，说明事业不可无，文章只是“缘饰而行”而已。作者认为文章本身的功用不大，对个人说不足以“发身”(成就功名)，对国家说更可有可无。这种文学价值观与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大相径庭。不过，两人的身份与立说的角度不同。曹丕身为魏太子，意在提高文学的地位，他的话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作者本是苏门文学家，也想建立一番功业，然而事与愿违，事、文无关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遭遇出发所发的牢骚。但从另一角度看，表明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文章独立的审美价值。因此，他将文学看作一种嗜好，一种艺术(“若钟鼎锦绣”)，甚至将创作成就视为不幸命运的一种补偿。作者在创作上注重修养，注重功力，也出于他的文学价值观。

《答李推官书》 北宋张耒作。本文对“文”与“理”的关系作了颇为辩证的阐述。既说“文”是“寓理之具”，又指出“理”离不开“文”的表述：“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这里的“理”是指道理，不同于道学家的“义理”之“理”，也有别于秦观的“事理”之“理”。从上述辩证的观点出发，作者强调作家“明理”的重要性：“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同时提出创作上的“理达”要求。所谓“理达”，或许应当包括说理的鲜明性、深刻性、条理性、正确性乃至生动性诸方面。他把“江淮河海之水”形象地比喻成“理达之文”，足供我们玩昧。这种“理达”要求是从苏轼所阐明的“辞达”说化来的。作者还从写作的角度提倡文间脉理，批评了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流弊：“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为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脉理”，指文章条理，指文章内在的逻辑性或脉络。这表明了作者对创作中逻辑思维的作用已有所认识。作者针对李推官的文章片面追求“瑰奇险怪”的弊病，论述了自然与奇险这一对风格范畴，也很符合艺术辩证法。文中推重作品自然的风格。“能文者，固不能以奇为主也。”但也不废奇险，以“水之奇变”，“因其所遇而变生”为喻，揭示了一种“不求

奇而奇至”的风格美境界，实际上是提倡自然与奇险的统一。这同他的老师苏轼关于“文理自然”和“溢为奇怪”的艺术观点也是一脉相承的。

《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 北宋李廌作。本文提出了文章四要的观点：“凡文章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其中的“体”和“志”是文章的内容，“气”和“韵”是文章的形式。按照文中的解释，“体”包括叙事、本道、考理、辨义，所以当指文章本体；“志”即“意”，苏轼及其门人陈师道就有“文以述志”之说，“气”已为苏辙所提倡，但苏辙所说的养气只是强调创作主体的主观条件的创造（思想修养的加强与审理经验的积累），作者则用来涵盖主观修养和文章气势两个方面，因为它既“充其体于立意之始，从其志于造语之际”，又“生之于心，应之于言”，这后一点与韩愈的“气盛言宜”之说相一致；“韵”源于晚唐司空图论诗的韵味说，作者移用来论文，主要指通过对象特征的表现，来反映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独特的审美感受、情趣、理想等，使作品的言外之意获得更高的审美价值和更大的美感力量。从作者鉴评文章只以“气”、“韵”为标准来看，他是视气韵重于体法，即视形式重于内容的。这样，作者对散文本体研究就深入到了对艺术形式及其审美属性的探讨。作者在文中批评了一些有缺陷的文章，同样着眼于艺术形式：“若乃或混沦而不辨，或散漫而无纪，或错杂而无序，或晦暗而不显，虽曰谓之文，亦不足矣。”至于把人品与文品完全等同起来，虽然旨在说明“养德”的重要，却不免有绝对化之嫌。

《姑溪居士文集》 北宋李之仪著。作者不是从习见的文、道关系上立说，而是完全割断文学与事业的联系，只就为文这一角度，对创作主体作了某些较为独特的探索，从而显示出“纯粹的辞章家”的特色。作者认为创作主体的才华和气质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虽然他们各有偏长，“要之非勉强而至者也”（《折渭州文集序》）。才华和气质对创作主体来说，都是必备条件，前者是作家在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特有才能，后者则是形成作家个性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的说法是唯物的。但强调过分，忽视了客观现实（社会、自然）的激发以及后天的磨炼，就未免带有片面性。作者还论述了创作主体的写作进程，特别是指明了由对前人的模仿、继承到自成一家，由严守法度到“自成标准”的阶段性，这对创作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陆机在《文赋》中已涉及继承与创造的问题，但不及李之仪所论详明。作者的文集仅存普通诗文，而无进策进论，并且从未述及文学与事业的关系，这可以看成他本人创作理论的一种实践。

《荆溪林下偶谈》 南宋吴可作。作者承北宋古文家余绪，相当重文，对散文创作作了某些较深入的研究。作者提出为文三要，很有点理论色彩：“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这里的“理”，与黄庭坚“以理为主”的“理”是同一

的；"气"似应兼指作家的主观修养与文章气势两个方面，与苏辙养气说之"气"不完全等同；"法"，即黄庭坚所说的法度，指艺术创作中的形式、技巧、表现手法等方面的规则。因此，这大体上是对黄庭坚偏重"理"、"法"，苏辙重"气"的创作理论的综括，并用"主"(统领或贯通)、"张"(张大，包括意旨与文辞两方面)、"束"(规范)三字分别说明"理"、"气"、"法"的作用。作者注重本色美，主张雕琢与自然的统一："文虽工，不可掩素质。"在散文的风格美方面把"雅淡不浮，混融不琢，优游不迫"作为一种极致，又列举唐宋诸家为例，并推欧阳修为第一，与一时文坛风气有关，也表现出作者的偏好。作者推崇南宋散文家叶适，赞扬叶氏文章"自家罗列""自家物色"的独创精神(也不否定"融会古今文字于胸中，而洒然自出一机轴"那种创造性的继承)，以及"化工之妙"与"画工之妙"。他把"化工"(指艺术表现上的真实自然)与"画工"(指艺术表现上的形象生动)对举，分为两个不同的审美层次，显示出很高的审美眼光。但用叶适写墓志能"随其资质，与之形貌"来说明其"文章之妙"，颇有溢美之嫌，而且不够恰当。

《梅溪文集》 南宋王十朋著。作者是永嘉派重要人物，其学说与北宋道学家、古文家、政治家都有渊源关系。他远承曹丕的文气说，近师苏辙的养气说，又受到道学家本体论的影响，创为刚气说："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蔡端明文集序》)认为"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同上)把孟子、韩愈作为"天下之至刚者"的代表，说他们一个有"浩然充塞天地之气"，一个有"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因而在事功与著述上取得非凡成就。所谓"刚气"之"气"，是兼指人的修养、气质乃至节操诸义的概念，与作者前人的说法都有所区别。北宋的古文家和政治家本来都重事功，到了南宋初期，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永嘉派的事功观念更加强烈。刚气说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因此，作者以刚气论文的观点，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爱国精神的一种体现。刚气说强调人的若干特定的主观因素在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能解释更多的创作现象，它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另一突出的观点，是首先将韩、柳、欧、苏(轼)相提并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四家散文特点和长短作了比较，从而奠定了他们在古代散文史上的崇高地位。

《容斋随笔》 南宋洪迈作，是关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笔记。作者多引用唐、宋古文家有关创作的论说，尤其重视对传统的借鉴与继承，重视"自成一家"的风格的建立。对寓言的夸张性、荒诞性特点有所认识，指出"列御寇，庄周大言、小言皆出于物理之外(意即超出自然规律)"(《续笔》卷十三《物之大小》)，并与佛经中故事作了比较，得出"其理一也"的结论。但以儒学为正宗，将列、庄之学斥为"一偏所及"，是一种偏见。作者注重对散文语

言艺术的研究，其繁简并重论立说辩证，识见通达："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随笔》卷一《文烦简有当》）对《新唐书》肯定"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欧阳修《进新唐书表》）的一面，又指出"省文之失"的一面。又举《史记》与《汉书》为例，说明繁简不同，各有千秋。以"达"（表达效果）为一种审美标准，很可能来自苏轼所阐释的"辞达"说。繁简并重说一反前人尚简的偏执，对后来的胡应麟、顾炎武、钱大昕等都有影响。作者强调史传文语言的自然高妙，即符合生活的逻辑以及人物思想、性格的逻辑。他说："风行水上而水波（涌起波澜），真天下之至文也。"（《五笔·史记渊妙处》）其底蕴即在于此。对《史记》中人物语言"高古简妙处"所作的赏析，是最好的证明。

《履斋示儿编》 南宋孙奕著。在散文创作与赏评方面，作者较多地从语言和作法这两个角度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重在示例，本意在于向儿子指示门径，却不乏较精到的见解。作者认为欧阳修与韩愈相比，在文章风格上有继承性："观其词语丰润，意绪婉曲，俯仰揖逊，步骤驰骋，皆得韩子之体。"又指出欧文发展、变化的一面："盖其横翔捷出，不减韩作，而平淡详赡过之。"对韩、欧文风格美的比较研究，继踵王十朋而又能自出新见。作者提出为文"三难"之说："命意，上也；破题，次也；遣辞，又其次也。"过分强调破题的难度，固然反映了重程式的偏向，但把立意放在第一位，是对"以意为主"的传统创作法则的运用，也是对唐宋古文家创作经验的总结。作者引用别人的话，说是将韩愈的"奇而法，正而葩"取为作文之法，并作了精辟的阐述："文贵乎奇，过于奇则艳，故济之以法。文贵乎正，过于正则朴，故济之以葩。奇则有法度，正而有葩华，两两相济，不至偏胜，则古作者不难到。"把构思奇妙与写作法度、内容纯正与词藻华美看成两两互补，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精见。此外，对修辞技巧、句法、文章弊病等的研讨，是古文家重文思想的必然发展，对提高散文创作的艺术水平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鹤林玉露》 南宋罗大经著。杂记读书所得，体例在诗话、语录之间。作者受王十朋影响，将韩、柳、欧、苏（轼）合在一起加以品评。对韩、柳文的异同作了较细致的鉴别，从题材类型上指出其相似之处，又从内容与体裁上指出各有胜处。又精辟地指出"欧似韩，苏似柳"，揭示了欧、苏与韩、柳之间的承传关系，并就其悟性思维与审美情趣分析了主观原因："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作者既肯定韩、柳的高度成就，又揄扬欧、苏后来居上之处："然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苏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韩柳所无也。"持论也较客观、公允。对艺术构思的迟速问题作者着眼于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以及艺术生命力，立说颇为通达："余谓文章要在理意深长，辞语明粹，足以传世觉后，岂但夸多斗速于一时哉！"作者从杜甫的"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两句诗中受到启发，注重学问根底，注重对传统的学习和继承：“凡作文章，须要胸中有万卷书为之根底，自然雄深有筋骨，精明有气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认为这可以纠正创作中的浅薄，但对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有所忽视，也多少流于偏颇。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媒介和传达工具，语言文字有其局限性，如同绘画有其局限性一样，作者已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绘雪者不能绘其清，绘月者不能绘其明，绘花者不能绘其馨，绘泉者不能绘其声，绘人者不能绘其情，然则言语文字固不足以尽道也。”这是一个十分卓越的美学见解。“固不足以尽道”，应当包括作品中语言文字的有限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诉诸人的想象）。这或许源于庄子的“言不尽意”说，而所论更明白透彻，可以为讲求文字精炼、风格含蓄提供理论依据，其意义已超出了散文美学的范围。

《朱子语类·论文》 《朱子语类》，又名《朱子语录》，南宋朱熹讲学语录汇集。朱熹死后，他的学生们所追记。全书共140卷，其中的《论文》2卷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古文的见解。朱熹坚持以“道”为中心，道文一贯的观点，反对将道、文截然分开。他把“道”喻为“根本”，把“文”喻为“枝叶”，“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他举例说：“三代圣贤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他不同意古文家的文以贯道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这也突破了周、程等前辈道学家将文、道对立的藩篱。他的道文统一观是对古文理论的一个贡献，而忽视散文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则是其一大缺陷。与此相联系的是，他重内容而轻形式，并提出了一个大致的比例：“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这种量的规定是不科学的。他还倡导明白、晓畅的文风，注重修辞，强调语言的准确性和自然性，体现出文学家的审美的眼光，也显示出与其他道学家的不同之处。

《文则》 南宋陈骙著。宋人现存最早的谈文专书。所论属于语法修辞，与创作、鉴赏也有某种联系。作者的繁简论上承前人主简说，论述颇为严密，辩证：“且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读之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将“文简”与“理周”（说理周密）并举，划清“简”与“疏”（粗疏）的界限，是作者的创见。对叙事散文的语言，作者提倡含蓄的风格：“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事之载也，以蓄意为工。”他赞扬古籍中“意自蓄其中”的叙事文字，批评“意随语竭，不容致思”的文字。作者对助辞、倒言、比喻、引证、接踵体、交错体、经传文法、韩文文法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其中有的还带有开创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散文语言的一种规范，对散文创作经验的一项总结。 （王文龙）

《文章精义》 南宋李涂撰。今本仅1卷，101条。该书主要论述北宋以前的散文，也偶及诗歌。其论文多宗

六经，不屑屑于声律章句，辨识源流得失，颇多卓见。作者对韩、柳、欧、苏四家不同风格的把握，对先秦、两汉一些散文家不同气质的体认，对散文创作中“请客对主”、“一节高似一节”（层层深入）等技法的研究，也都显示了该书在宋代文话中独特的价值。（胡　健）

《古文关键》 南宋吕祖谦编。选辑韩、柳、欧、苏、曾等人文章60余篇，在评点批注中表现出对古文体格源流、命意结构、句法字法等问题的见解。作者注意到对立统一、相反相成这一文学创作的审美规律，如说“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要“常中有变，正中有奇”，要“缓急、显晦相间”，结构上“须有几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这是很可取的。（祁志祥）

《滹南遗老集》 金代王若虚作。凡45卷，其中《五经辨惑》、《史记辨惑》、《文辨》等37卷，《诗话》3卷，杂文5卷，内附诗歌。另附《续集》1卷。作者论文一方面宗尚苏轼，一方面又渊源于舅父周昂，强调“以意为主”，重在一个“真”字，说“散文到宋人始是真文字”（《文辨》四）。本于这种观点，作者既不主奇诡，又不尚藻饰：“凡为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同上）作者不拘守前人现成的法则，提出了“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同上）这一著名的美学命题。书中不少零星札记讨论文法，讨论修辞，辨析文体，可以说是后代有系统的文法学、修辞学与文章学的滥觞。（王文龙）

《文说》 元代陈绎曾撰。原本久佚，后《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录出，有《文学津梁》本。陈绎曾论文重“养气”，即重作家的主观修养。他认为不同题材类型与不同功用的文章，须配之以不同之“气”，如“朝廷之文宜肃，圣贤道德宜肃”；“长江大河之文宜壮，军阵英雄之文宜壮”，等等。他对“抱题”、“明体”、“分间”、“立意”、“用事”等均有具体论述，表明他对写作方法与技巧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虽然不免有程式化的偏向，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散文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胡　健）

《答程大伯论文》 元朱夏撰。作者屡次举进士不第，于是杜门治经史，作文不及于古不止，所以评论散文，以复古为号召，认为“文犹乐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风俗以醇，人心以正”。他主张“本于经而根于道”，具体地说，应当“取韩、孟文日夜诵之，觉己之见与向者异焉，然后一吐其辞，庶有合乎。”他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作者创作的程序，他认为：立论应当自大处作眼，以“尽合乎圣人之道”。应努力寻求并适应创作规律，“为文而不法，是犹用师而为以律矣”；他认识到多种文体具有不同的审美特征，所以强调“必先体制而后工制（应为“拙”）”，“纪、志、表、传、记、序、铭、赞则各有其体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他进一步认为，作家进入创作状况之后，应当摆脱现实功利关系的干扰，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非有心于文也，若风之于水，适相遭

而文生也。故鼓之而为涛，含之而为漪，蹙之而为縠，澄之而为练，激之而为珠玑。非水也，风也，二者适相遭而文生也"，这样才能创造出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出于造化之自然"的艺术品。他的复古理论，自然不足取，但他在思考"何能与古人齐驱并驾"时所提出的由创作时的自觉意识进入自由状态、由艺术表达之"工"而入"化"等美学观点，却颇具卓见。

《文原》 明宋濂撰。作者的散文美学思想以"宗经明道"为核心，文主唐宋，学宗义理，形式兼及内容，以宗经为基础，融合义理、事功、文章三者而为一体，本文即阐述了这种思想，文章分为上、下两篇，前有引言，后有综论。上篇推究文章的来源，论述文学的本体。他对文学的理解十分宽泛，"凡有关民用的一切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于文"。他认为文之初，为具有规律的自然现象；后由圣人衍为有条理的社会人事；"事为既著，无为记载之，则不能以行远，始托诸辞翰，以昭其文。"既然文学之宗旨在于表现物理、发明事功，因此，作为作家的文学创作，"必有其实，而后文随之，初未尝以徒言为也。"此"实"是指文之本，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应当具有真切的思想内容，应该表现作家对于社会生活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解。下篇剖析文章的利病，论述文学的功用。"为文必在养气"，此"气"指作者的气度、气概，"养"指道德品格的修养。他认为不能养气，则种种弊病将有以累文；"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当与天地同功也"。他指出"六籍"是"本与根"，应当借鉴孟、韩、欧阳诸子之文，应当"以道为文"，求"辞达而道明"。作者身为"开国文臣之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本传）合古文道学而为一，是明代复古思想的先驱。他的观点并没有超出前人对文道关系的认识和理解，理论上缺乏新意。但经过元末纷繁的战乱之后，他崇实务本，努力避免道学家的偏执，反对文学家的"日以学文为事"（《赠梁建中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后来唐宋派以情理神气反对和补救秦汉派搜文摘句的摹拟之失，即受此启迪。

《与郭士渊论文书》 明方孝孺撰。作者为宋濂弟子，以讲明道学为己任，以振作纲常为己责，以继往者、开来学为己事，以辅君德"起民瘼为己业"（王大可《重刻正学方先生文集叙》），论文一遵守其师而多有发挥。本文是他阐述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他既志在明王道、致太平（《杂诫》），因评论文学便倡导"加意学问，以《六经》为务"。他以为"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于物，岁异而日新，多态而善变。使人观而不厌，用之而无穷，不失荣悴消长之常理，乃足为文"，故为文必如经，"上足以发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陈治乱之理，而可垂法于天下后世，垂之愈久而无弊，是故谓之《经》，立言者必如《经》而后可"如此方为文之美者。秦汉以下直至元明之文，只可谓轻俳巧薄而非美，世之人多"乐蹇涩者，以艰言短语为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长为美；或采摭异书怪说，以为多闻；或蹈袭庸

谈俚论，以为易晓；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总之，以“文而于道有明”为归。此虽偏重道德政教，即其所谓“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是也”（《答王秀才书》），但又未陷于道学家的偏执；所倡复古，重在神理而轻文法，为后来反对七子摹拟剽窃的唐宋派所推崇。他实际上是以学习先儒“六经”为号召，强调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的结合，反对仅仅在艺术技巧、语言风格等方面争奇斗胜。他为人刚正，文章纵横豪放，出入东坡、龙川之间，“志高气锐，而词锋浩然足以发之，故其文奇峻有光焰”（郑瑗《井观琐言》），在明初文坛较有影响。

《文章辨体序说》 明吴讷撰。文体论专著。作者以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为蓝本，编采历代至明初诗文，分体编录，各为序说，成《文章辨体》55卷。《内集》50卷，凡49体；《外集》5卷，凡5体。书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古代文体及其性质、流变的资料。今人于北山取其序说，为此书定名。作者详论散文，十分注重体制与内容。他认为“文辞以体制为先”，强调艺术体裁、形式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他不仅认识到文体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注意到每类之中，众体并出，因此他提出应精辨古今之文，“使数千载文体之正变高下，一览可以具见”，（彭时《文章辨体序》）。对于作品思想内容，强调“以关世教为主”。作者以为“命辞固以明经”，“凡性命道德之言，虽孔门弟子所未闻者，后生学子，皆得诵习”。他采录例文的标准是：“必择辞理兼备、切于世用者取之；其有可为法戒而辞未精，或辞甚工而理未莹，然无害于世教者，间亦收入；至若悖理伤教，及涉淫放怪僻者，虽工弗录”。综观其散文美学理论，并无多少新意，但此书不失为明初文体论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最大的贡献在于考核了各种文体（多属散文）的源流，阐发了各种文体的美学特征。后来徐师曾编《文体明辨》，贺复征辑《文章辨体汇选》，皆据此增修而成。

《丹铅杂录》 明杨慎撰。凡十卷，见《总纂升庵合集》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二十五。李调元在《序》中阐明书名的含义：“吴郡顾其志作《揽茝微言》，具载升庵以“丹铅”名录之义，谓中古犯罪者，以丹书其罪。《魏律》：“缘坐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以铅为卷轴。升庵名在赤籍，故寄意于此。然则是书之作，其在先生入滇后乎？观其名，可照其志矣。”他以“丹铅”命名的著作共有十种，此是其中的一种，“大率皆记注文字、笔之于篇，故曰杂也。”他论文主张复古，认为秦汉文章“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古人独胜处》），皆可以“为作文法式”（《许颍滨》）；晋朝以后不复有此工致，而“文弊于宋”，宋之欧、苏、曾、王“视韩、柳远不及矣，韩、柳视班、马又不及，班马比三传又不及，三传比《春秋》又不及”（《辞尚简要》）。他试图由文法奇古而至文章之妙，即由艺术技巧的拟古、创造出富有美感的作品，并以“道与艺俱化”的境界作为自己的审美

理想，所以他的复古理论也有异于七子的地方。他认为朱门道学家文论思想的的流弊在浅拙寡陋："不复旁通他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朱紫阳》）；"但恐陈陈相因，红腐而不可食"（《陆韩论文》）。他主张文辞自然蕴籍。上承苏洵关于风行水上之文乃天下之至文的观点（《风行水上》），并指出"若说尽，则无味"、"不说尽，而文益蕴籍"（《古文之奥》）。他又认为古今世变不同，文章的繁简也因此随之变化，"论文者当辨其美恶，而不当以繁简难易也。"（《论文》）这种将繁简统一于审美价值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救片面强调复古的偏失。（许建中）

《文章指南》 明归有光撰，共66则。书中收录自《左传》以下至明代的文章180篇，其中以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为多。书中按文章作法分类，将各篇文章分属之，计有：通用义理、用意奇巧、造文平淡、神思飘逸、化用经传、含意不露、题外生意、结束有力等66则。每则中均有文字说明此类写法的要义和范文的独到之处，每篇范文还有评语。在文之前，还有《归震川先生总论看文法》和《归震川先生总论作文法》，分论学习文章与写作文章的方法与规律，兼论各家文章的风格特色，可供读者参考之。

此书所选文章，多为名家名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诸葛亮的《出师表》均收其中，故能引人历览各代文章；所作评语，多言简意赅，如《通用义理则》称："文章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故能使读者从中学到写作方法与创作经验。

这部书不失为学习古代散文的善本，然在流传中，书版曾毁，经后人收集重编而刻印出，故现存书恐非当日旧貌，已由他人增删改易。今有清代刻本存世。（黄道京）

《罪知录》 也作《祝子罪知录》。明祝允明撰。凡10卷。其凡例有五：举、刺、说、演、系。"举"用来"是是"，"刺"用来"非非，""说"用来"原是非之故"，"演"用来"布反覆之情"，"系"用来"述古作以证斯文"。全书分论人，论诗文、论佛老、论神鬼妖怪四部分。作者的散文美学思想以"自然"为核心。他主张作家应该达到对于社会生活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认识的统一，并借助于高超娴熟的艺术创作予以表达，不作刻意的追求而暗合创作的规律性，以达到一种"自然"天成的审美理想境界："含灵结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气"，"心动情之，理著气达，宜齿颊而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也，言即文也。"以此为基础，他倡导以六经为典范，认为"凡古今之文，键枢治教者，毕集于兹；而为文之体要貌态，亦斯咸备。"他提出的这样的基本观点："文极乎六经而底乎唐，学文者应自唐而求至乎经"；"今称文，韩柳欧苏四大家，又益曾巩、王安石作六家者，其谬误人"。他十分注意文质关系，认为文体既立，其状各异，当不偏于质，也不黩于文："虽文质相须，语默为体，必摛文披质，所以谓之文而不称曰质"；对于前代的散文作品，他认为应当随时相宜："时雅而雅，时奇而奇，时繁

而繁，时简而简；”反对剧烈变革，刻意求新。他认为韩、柳之变，已矫枉过正；欧、苏涣漫，固合枯短，曾、王宜为丰实，却又转薄。宋代四家情状虽殊，他们的弊端却是一样的：“过矫坠偏，枯瘠刻削，而弗准于中庸矣。”他的观点颇为新奇，为常人所不敢言；虽然主张宗经复古，却不入七子秦汉派阵营，也异于以后唐宋派的主张，在当时复古大潮之中，自成一家，为后来的屠隆，李贽等人所推崇。他聪颖过人，放诞自负，所以“举”、“刺”予夺之间，持论亦时有偏激。

《荆川先生文集》 明唐顺之(世称荆川先生)撰。凡17卷，诗4卷，文13卷。又有外集3集。作者“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小则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枪拳棍，莫不精心扣击，究极原委，以资其经济有用之学”(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本传)。他的散文创作流畅生动，风格平易。他的散文美学思想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张学古，后期追求神悟。40岁以前，前七子坚持“文必秦汉”的主张而沦入剽窃摹拟，他与王慎中、归有光等人倡导唐宋古文，以“文从字顺”矫正其弊。他以为“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文编序》），可由唐宋古文语言之妙，悟求它们行文构思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他认为创作中艺术技巧和艺术形式的运用，最终要受到作者对于情感体验和本质理悟的表达的制约，随其变化而变化。“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其窥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驳有醇，而能有得也，而神明未尝不在焉。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文编序》)较之七子徒袭形貌而丧失精神，此论可谓出新意于绳墨之余。当然，这时的观点终未出复古范围。他在40岁以后，论文已不注重文字之法，认为文章之绳墨布置、奇正转折等艺术创作技巧方面的问题，自有专门师法，但“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不足以与此”(《答茅鹿门知县二》)。他已初步体悟到文学创作中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的极端重要性，已开始弃复古而求革新了。所谓“直写胸臆”(《与洪方洲书》)，所谓“道得几句千古说不出的说话”（《答皇甫百泉郎中》)，已与李贽、三袁的主张相类似。由复古领袖而为趋新先导，他的散文美学观念的转变，表明了当时散文美学思想的发展和进步。

《艺苑卮言》 明王世贞撰，共分八卷。其中论诗者十之七，论文者十之三。作者叙言称作此书乃“欲为一家言者”，故其文学主张与文论观点多表现其中。

书中卷一先引历代各家文论、诗论，然后自述见解，其中说：“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表现出重文章法度的观点。其卷二、卷三、卷四，论历代各家诗文，品评短长，议论得失，不乏新意。如：“韩柳氏振唐者也，其

文实。欧苏氏振宋者也，其文虚。临川氏法而狭。南丰氏饫而衍。”卷五、卷六，专论明代之诗文，往往能切中要害，其论曰：“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丰饶，而寡芍药之和。……刘伯温如丛台少年人说社，便辟流利，小见口才。”卷七记叙明代文人的逸事，饶有趣味。卷八先论历代君主文章与事迹，后以论文章九命作结。所谓文章九命是：贫困、嫌忌、玷缺、偃蹇，流窜，刑辱、夭折、无终、无后。以此议论文人生平遭际，语多感慨。

王世贞虽未出前七子轨范，仍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在此书中持论并不偏激，且时有卓见，故可成一家之言。（黄道京）

《童心说》 明李贽撰。作者是晚明社会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新兴美学和文艺思潮的代表，本文是其代表作。文章虽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民间蓬勃兴盛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批评了当时文坛复古主义摹拟剽窃的风习，但主旨则是提倡“童心说”，抨击封建理学道统及其文学观点。作者指出“童心者，真心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也就是赤子之心，即情感的纯真性。他主张作品应表达作家的真情实感，如同儿童那样纯洁坦诚；也只有儿童般的纯真童心，才有可能认识美、接近美、从而创造出艺术的美。“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是“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童心本是人人所原有，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往往道理闻见入主其内，而童心遂失。尤其是儒家经典原只是孔孟门徒弟子记忆师说、随见所书，“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岂可以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宋、明道学侈谈性理，是“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言虽工，与我何与”？对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的文论作如此激烈的批判，对“绝假纯真”、独抒己见的美学观点如此推崇，这是前所罕见的，无疑具有反封建的个性自由、解放的进步意义，对于后来公安派，竟陵派的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以及晚明小品文的繁荣，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与友人论文书》 明焦竑撰。本文是作者散文美学思想的代表作。他主张致道而辞达。他解释说，道者“性命、事功其实也”；文者“特所以文之而已”。既然“意不能无首尾，语不能无呼应，格不能无结构”，文又有词与法，所以应当“华实相副”，不能离开内容而单纯讲求词与法。他强调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情感体验在创作中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作家在作品中应倾注自己的真情实感，超脱现实功利关系的影响。“心之所契，身之所履，无丝粟之疑，而其为言也，如倒囊出物，借书于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实胜也”，这样才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由“道”出发，他主张抒发性灵，言所欲言；由“辞”出发，他认为应当借古之词与法“以贻之，而脱弃陈骸，自标灵采，实者虚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他重视创作中的独创

性，强调文“以不相袭为美”，即使是“以古之词，属今之事”，也毫无必要。他竭力反对模拟剽窃，以为近世文章“蔑其实而欲妄为之词，身居一室而指顾寰海之图，家盖屡空而侈谈崇高之飨，”以“谬流传，浸以成习”，实乃“空言”。他博极群书，师事耿定向、罗汝芳，笃信李贽之学，出入儒佛，“冀以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收摄二氏”（《管东溟墓志》），所以他的散文美学观念大多与公安派相合，袁宏道也曾经师事之。但公安派论文惟知师心，以本色独造为高，对继承传统有所忽略，他则由师于古到求悟于心，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立说比较全面。

《文论》　明屠隆撰。作者文名在王世贞所称“末五子”之列，实可入后七子一派。《由拳集》是他早年为青浦令时所刊，集中此文所论，仍然主张复古。但他摆脱了审美的道德评判和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从艺术技巧、语言风格等艺术的形式美的角度，阐明“六经”的文学成就，论述先秦、汉作品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唐后无文，韩愈之文气弱格卑、情缓格疏，“传先哲之神，而脱其躯壳；模古人之意，而遗其形画”，因而提出“文必秦汉”的主张。这当然出于格律派的成见，但他对于七子“千篇一律”的弊端也痛切批判：“抱长才而乏远识，踔厉之气盛，而陶熔之力浅，……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篇一律”；“独有周汉之句法耳，而其浑博之体未备也，变化之机未熟也，超妙之理未臻也”。他主张“必取材于经史，而熔意于心神；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认为作家应抒发自己的真实的情感体验，表现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努力达到古与今、理与情的结合，而“不必字字而琢之，句句而拟之”。不以宗经明道论复古，即异于七子。他的老师沈明臣是徐渭同僚，他自己则踵接王世贞而与三袁为友，经历了由七子的格调说转向公安派的性灵说的过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言王、李之涂饰而又兼三袁之纤佻”（卷一百七十九），这一贬斥之词，恰好表明对他散文美学理论的变化发展已有所认识。

《玉茗堂文》　明汤显祖撰。16卷。论文，有感而发，才情放逸，格调颇高。作者主张“灵性”说，反对摹拟。他以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神情、声色已尽，今人已不可能再造其境；如能独抒机轴，自写灵性，或许“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王季重小题文字序》）。他说：“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性灵者，自为龙耳。”（《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他主张“凡文以意为宗”，以达义为审美的第一要义，强调应表达作家的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反对任何形式方面的戒律。他认为“奇”可以“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校点虞初志序》），强化人们的审美感受。“奇”是他积极、浪漫的理想主义的表现特征。而拟古之作，无神无趣，如“三馆画手，一堂木偶”（同上），所以他认为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

怪奇奇，莫可名状，非夫寻常得以合之。”（《合奇序》）有了性灵感兴，才能纵横自如，机趣天成，即所谓“化之所至，气必至焉；气之所至，机必至焉。”（《朱懋忠制义序》）心灵飞动，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方为“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序丘毛伯稿》）。因此，他对七子师习定式之格，多有抨击；对宋明理学教条之论，亦多有批判；至于“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更突破了儒家所谓“发乎情，止于礼义”的传统的教条。他的散文成就不如戏曲，但仍是表现以“情”为核心的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包含着个性解放的内容。他的散文美学观点对于晚明散文创作及散文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小品文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文章一贯》 明高琦撰。文章学专著。大体上辑录前人《文筌》、《丽泽文说》、《文章精义》等论文和语录而成，间有作者自己的观点。上、下两卷，分类编排，卷上标目为“立意第一”，“气象第二”，“篇法第三”；卷下为“起端第一”，“叙事第二”，“议论第三”，“引用第四”，“譬喻第五”，“含蓄第六”，“形容第七”，“过接第八”，“缴结第九”。在阐述此书的基本思想时，作者以为：“意不立则罔，气不充则萎，篇章句字不整则淆。吾于是立起端以肇之，叙事以揄之，议论以广之，引用以实之，譬喻以起之，含蓄以深之，形容以彰之，过接以维之，缴结以完之。九法举而后文体具，体具而后用达，执一贯万，嗣有作者其弗渝哉！”（程默《文章一贯序》引）此书虽专论文法，却以推究文与道、学与悟等关系为旨趣。他强调作品应当反映表现作家自己真实的思想认识和审美感受，“是文律也，吾谓有道焉。道者，根诸心，著诸事为，而托文以相示也。是故缀乎事者存乎文，命乎文者存乎律，主乎律者存乎道，体乎道者存乎人。”（程默《文章一贯序》）。他多引唐宋古文大家的理论和文章，提倡认真学习揣摩；他又以为“引伸触类，随人之机”，即使对于创作规律，也应“随宜增减，有则用之，无则已之，若强摆布，即入时文境界矣”。此论虽强调作法规则，却较为通达，不排斥作者的自悟，可能多少受到了前人“文有活法”说的影响。此书列目清晰，搜集整理亦颇见功底，对散文的创作和审美鉴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体明辨序说》 明徐师曾撰。为当时文体论之集大成者。其乡先贤吴讷有《文章辨体》，共分54体，分体选文，依体序说。作者由此增益而成《文体明辨》84卷，沿其凡例而增其体类；《正集》广达101目，《附录》为26目，凡127体；又于诸体分辨正、变、古、俗。编录之文大多习见，值得重视的是他分类所加的序说，对于研究古代文体类别、性质及其流变，颇有参考价值，故今人罗根泽取其序说为此书定名。他十分重视各种文体不同的美学特征，认为“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为之，

其不见笑于识者鲜矣，况文章乎！”（《文体明辨序》）他从发展的观点出发，认为文学的体裁是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而逐步丰富完善的：“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由于受当时复古思想的影响，他也认为散文创作的价值在于阐明义理，“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尤不可无”（《文章纲领》引杨时语）。但他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七子复古外树理法之藩篱而内行描摹剽窃之实的弊端，转以“明义理，抒性情，达意欲，应世用”为要旨，主张“义理”与“性情”的互补。他的散文美学观点体现了明中叶散文复古理论内部的论争和转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此书“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欤”，未免诋之过甚。

《评文》 明董其昌撰。作者的《画禅室随笔》卷三分记游、记事、评诗、评文四项子目。本文是其中之一。共15条，大都是记注体悟文字，不同于一般文章。他“天资高秀，书画妙天下”，“精赏鉴，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一俗语，米元章、赵子昂一流人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本传）论文主张“妙悟”说，强调主体心灵在审美过程中对某种人生境界的体验。他认为艺术创作要得解悟，要处理好情与理、神与形等多种关系，“了解时，只用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自是文中有神，动人心窍”；艺术鉴赏则要得神气，要探刻认识和把握艺术的审美特征和规律，“识得真，勘得破，可与论文。如阅时文，阅时令吾毛辣色动，便是他神气逼人处。阅时似然似不然，欲丢欲不丢，欲读又不喜读，便是他神索处。”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摆脱现实的功利实用态度，就要“养精神”：“人若调养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无解悟、无神气，自是矢口动人”；要“擒得真种子”悟“真血脉”，去凿空之旧料，弃卑琐局曲之情态，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修养，逐步积累审美经验，以提高自己的审美感受力和审美判断力。具体地说，就应该取《周易》、《论语》、《诗》、《骚》、《左传》、《史记》、《文选》之类经典作品，“熟读妙悟，自然出言吐气，有典有则，而豪少佻举俘俗之习，淘洗殆尽矣”。他与李贽、三袁交往颇厚，论学宗旨亦相近，以禅论文，倡导“灵知之自性”，所谓“王廷尉妙于文章，陆宗伯深于禅理，合之双美，离之两伤”（卷四《禅悦》），可知其趣所归。这接触到了艺术思维的一些特点，却又有离开现实生活和创作实践单纯讨论主观修养问题的缺陷。

《论文》 明袁宗道撰。分上下两篇。上篇专论文之辞。作者坚持文学的历史发展观点，认为“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司马（迁）不能同于左氏（丘明），而今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所以他反对七子摹拟学舌的复古理论，认为是“以一传百，以讹益讹，愈趋愈下，不足观矣。”他强调“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

也。”下篇专论文之意。作者认为七子剽窃摹拟之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或如李攀龙，“强赖古人失理”，或如王世贞，“不许今人有理”，无理则所达之辞为何物？他们原不曾做一项学问，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鸿钜之裁，“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他认为要想创作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就应该十分重视创作中学识与才能、义理与情性、创新与拟古等相互关系。他强调学问积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种语言”，“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他的才能虽不及两位弟弟，但“厌薄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本传）的见解相同，以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模拟文字，正如字画臒本，决难行世”（《答陶石篑》）。公安一派理论的建设，离不开兄弟之间的相互切磋和补充，钱氏认为“公安一派实自伯修（袁宗道的字）发之”，不为无见。

《袁中郎全集》 明袁宏道（字中郎）撰。55卷。收录诗文杂著15种，另有附录，包括辑佚、传记、序跋等。“真”是他论美的中心，也是他散文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只有“真”，才能呈现出事物的个性，才能使艺术美表现出独创性，“真则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与丘长孺》）；只有以纯净自然的情感来感受客观世界，才能把握客观存在的“真”。在情“真”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趣”的美学范畴。所谓“趣”，客观上是超脱名理功利、归返自然淡泊的理想美，主观上是摒弃闻见知识和尘世欲望，与自然交融深化的高度的审美愉悦。表现在创作上，则是情与法融汇化合的艺术反映。情“真”则“趣”深，如赤子婴儿，“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叙陈正甫会心集》）“真”戒剿袭，“句比字似，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雪涛阁集序》），屈于法而牵于习，则情伪而“趣”失。因此，他又提出了“变”这一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美学观点。“春情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与江进之》）风格之变，贵在独创；体制之变，贵在不粘不缚；“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他主张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真诚坦率地表达对于现实生活的审美认识和感受，而不能把前人作品奉为创作之源，摹拟因袭。变而求通，则“穷新极变，物无遁情”（《雪涛阁集序》），“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与丘长孺》）通在于师心而不师法。师心则情真而语直，自然之韵出（见《叙竹林集》）；师法则摹拟而如赝，理入而韵无（见《寿存斋张公七十序》）。“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若只同寻常人一般知见，一般度日，众人所趋者，我亦趋之，如蝇之逐膻，即此便是小人行径矣。”

（《答李元善》）因此，“真”与“变”乃是他散文美学思想的核心，“情”与“理”是他散文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趣”与“韵”是他散文美学理论的归结，三者虽可分别言之，却浑然一体。这与他“不拘一格，独抒性灵”（《叙小修诗》）的诗论，各有侧重，殊途同归。

《珂雪斋集》 明袁中道撰。凡20卷。珂雪，洁白义，出自梁元帝《与萧谘议等书》，取为书斋名，志趣可知。其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诗文因此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论文反对蹈袭粉饰，主张师法自然：“山水之清美，且足以发灵慧之性，而助其深湛之思”（《程申之文序》）。他认为作家应当接近社会和自然，以获得真实深刻的情感体验，这样才能创造出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士生而处丰厚，安居饱食，毫不沾风霜冰雪之气，即有所成，去凡品不远。惟夫计穷虑迫，困衡之极，有志者往往淬励磨练，琢为美器。何也？心机震撼之后，灵机逼极而通，而知慧生焉。即经世出世之学问，皆由此出，而况举业文字乎？”（《陈无异寄生篇序》）这与其兄见解大致相同，钱谦益以为“小修兄弟间师承议论”（《列朝诗集小传》本传）。当竟陵以幽峭之风反对剿袭剽窃之七子，异军突起时，他却强调真情实感对于审美和艺术创作的极端重要性，反对仅仅限于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翻新争奇，认为应“以意役法”，提倡“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笔之间”（《中郎先生全集序》），排击竟陵之谬。对于中郎“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袁宏道《与张幼于》），他坚持以历史的、分析的态度进行考察，既肯定其矫枉整刷之功，又提出了性灵与格调的结合，以弥补过正偏激之失。他的散文创作，多写闲情逸致，流露出脱离现实的思想倾向。他的散文美学理论及创作实践的优劣利弊，对当代及清初文坛均较有影响。（许建中）

《文脉》 明王文禄撰。共三卷。作者认为自古文章一脉相传，故以文脉名书，专论古今之文章。

其卷一为总论，综论古今文章源流与成就得失。其中说：“为文若云花龙凤之饰，经纬纵横而起伏无定；又若河流入中国，或隐或现，若绝若续，而源深长”，指出“文脉”之所在。

卷二为杂论，分论历代文章大家之短长，最推重《昭明文选》，对韩、柳、欧、苏等唐宋元明各代作家都有评论。其论唐文，扬柳而贬韩，论宋文，扬苏而贬欧。其论曰：“欧阳（修）肉多而骨少，孙石肉少而骨多。曾子固木笃而欠玲珑，王介甫骨骼而无丰采，皆不及苏子瞻之俊逸也。”

卷三为新论，专论明代各家文章，于人于事多有论及，且探源溯流，评说当代文章。

本书为文章学著作，虽篇幅不长，但品评古今文章，尚有新意。然其立意评说未免过当。有《丛书集成》本行世。（黄道京）

《文字法三十五则》 明李腾芳撰。本文专论文章作法，分为意、格、句、字、抢、款、进住、贴、摔、突、

括、喝、穿、度、翻、脱、剥、垫、擒纵、缀、跌、开、逗、接、扭、挈、复、入、抽、转、倒、托、抱、锁、束。进住、擒纵各为两法，实有37法。例文皆取《孟子》、《左传》及唐宋大家，意在整理方法，分析优劣，提供范例，指导写作。他虽然讨论的是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技巧，但议论所及，却是主张表现作家的创作个性，具体表现为创作内容上的"独造"和创作技巧上的"变幻"。他认为"独造"乃是作家的真实感在作品中的体现，"独造"而后可以"行意"，可以"自然"而"有情"，如"堪舆家寻龙入手，最要紧真龙真脉，一毫假不得"。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灵活变幻地运用艺术技巧，可以使作品活而不死，获得"萦洄反复，曲尽其致"的审美感受。他要求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大至方法，小至文字，都要注意相对、陪衬、搭配，他认为作品应当"活动圆巧，伶俐宛折，上下有情。极忌顽硬死块"，他以"奇绝"的佳妙境界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审美理想。其列目清晰，分类颇详；范例选录，亦见功底；议论简明精到，时有独到见解。尽管偏重于艺术技巧，但对艺术创作多有启示，对提高散文的审美判断力，也有参考价值。

（许建中）

《文通》 明朱荃宰撰，三十卷又一闰卷，分八个部分。卷一为文章总论，分明道、本经、正纬、叙学等篇，综论文章根本与宗旨。卷二专论史书，分史法、史系、史家流别、评史等篇，将史籍分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体，论述各家史书成书情况和体例特点，评说其得失短长，语多详实。卷三论及经史渊源，介绍诸子百家，阐述文章所承渊源始末。卷四至卷十九为文体论，将文章分为158体，逐一论之。其分类颇细，故文体俱全，古代文章体裁多已囊括其中。其历述文章渊源，论及文体特点，条析缕分，全面而详尽。卷二十分序例、正名、题命、编次、断限等篇。论列文章之常用体例。卷二十一至二十三之专论作文之法，分体性、神思、养气、风骨、情采、熔裁、曲笔、夸饰等42篇，援说举例，分别论之。卷二十四论作家修养，分人物、品藻、鉴识、才略、知音等篇，会通古今，尊是黜非。卷二十六至三十杂记经史书籍，阐述为文"六过"、"四弊"、"四不可无"。

书前有焦竑所作的《引》，称此书"搜括既富，辨析复精"。还有罗万爵作的《序》及作者《自序》两篇。

此书为文章学专著，收入文体较为详尽，故对研究古代文体有一定参考价值。有明代天启年间刻本存世。

（黄道京）

《文情》 清初王晫作。文章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特定空间、特定时间尤其是特定情绪的产物。作家有了创作激情，往往不能自已，会进入痴迷状态，这时候文字中所流荡、贯穿的一股文情，是一种特定情绪。作者由此引出几个结论：一、作品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欣喜时不能作哀文，哀时不能作欣喜之文；二、文章不能摹仿剿袭，因古人之文是古人之"文情"的流露，别人文章是他人"文

情"之表现，摹仿剿袭，是借他人的情，来表达自己的情，这或是乖谬，或是板滞，不能称之为创造；三、即使作者自己，事过情迁，当年的作品一旦散佚，自己也写不出那种"文情"来，因为特定的"文情"一去不再返回了；四，文章作品一定要独出机杼，那怕"不免过中失正"，也不要紧，过一点头，分寸感把握不太好，但总算是自己的东西，比起与他人作品相似处太多的作品，还是更有生命力。显然，他这样强调"文情"，重视它的审美价值，是为了提倡创造，反对拟古、反对陈陈相因，对于推动散文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文情"的时间性有强调过分之处，这对史传文以及回忆性的文字中的优秀作品，解释便有困难。　　（周五纯）

《论文管见》　清代黄宗羲撰。由八段杂感组成，见《南雷文定》三集卷二，又见《黄梨州文集》。该文主张文章必须表现真实情感。"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又说："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移人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此说不同于理学家，显然与他胸怀亡国之痛有关。该文对语言与叙述等也有较好的论述。其论语言力主去陈言。"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犹如玉在璞中，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认璞为玉也。"其论叙事重"风韵"，即注重生动性和形象性，能给人以美感，"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不观《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使其人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所谓"颊上三毫"，是对绘画技法的借鉴，已涉及典型的细节描写，在散文创作理论上也不失为新见。　　（胡　健）

《日知录》　清代顾炎武撰。共32卷，按史地、吏治、财赋、地理、艺文等分类编入。书中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见解。作者抨击了明人散文创作中的拟古倾向："近代文章三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文人摹仿之病》）同时引用《曲礼》中"毋剿说，毋雷同"的古训，以印证其创新观点。作者还提出了著名的繁简并重说，明确指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文章繁简》），在南宋洪迈说的基础上有新的发挥，可以纠正散文语言片面主简的偏向。　　（王文龙）

《伯子论文》　清代魏际瑞撰。论文见解与魏禧相近。作者论文重识见，重论说："文章首贵识，次贵议论，有识则议论自生，有议论则词章不能自已"。在散文创作方面，作者提倡切近生活："眼前景，口头语，当时情，意中事，神妙莫过于此"。这同明代李梦阳、何景明等的拟古主义迥然不同，而与主张"直写胸臆"的唐宋派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在重"养气"、"炼格"的前提下，作者特别注重对作品的总体构思。他说："古大家文虽极奇崛，必有气静意平处。故忙处能闲，乱处能整，细碎处有片段，险兀处有安顿，顺处不流，逆处不费筋力，穿插处不小家，方正处不板硬。"这里论治鉴赏与

创作，是颇有见地的。（胡　健）

《尺牍新抄》　清初周亮工编。书中保留了明末清初有关诗、文、书、印、园林美学的思想资料，对认识当时文艺思潮及人们的审美意识的特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论及文者，如一集唐时《与袁州平》："男子出世，不与乾坤撑持一番，虽文章做到极处，终如妇人女子，低眉敛衽，巧针细线，何足夸贵。"重申了"立功"高于"立言"的价值观；二集陈孝逸《又与付平叔》："士不可无豪，犹文不可无英。文无英气，则五代、宋末老婢作声是也。"表现了对慷慨任气的雄奇风格的向往；一集黄虞龙《与客》："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无物，眼底无人。无物，故河山大地、以至虫鱼花鸟，都足供其笔端；无人，故先秦两汉百家诸子，只是我寻常交往。"论述了空诸万物的心理状态对创作构思、空诸古人的态度对变化生新的重要作用，都反映出这个时期散文美学的动态。

（祁志祥）

《宋子发文集序》　清代魏禧撰。是魏禧关于散文理论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该文指出，今人治古文而不能"卓然并立于古人"的原因有二：一是优孟衣冠，一是师心自用。前者是一味模仿而忽视创新，后者则只讲创新而不讲继承（实际上算不得真正的创新）。这是对散文创作中两种不良倾向的批判，都是针对明代文风的流弊而言的。由于"师心自用，其失易明"，所以该文论述的要点在前者。文中说："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无所有，其弊为优孟衣冠。"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法"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作者以为文章之法，有常有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必须于不变之中，求变的一面，又能于变之中知其不变的一面，才能符合古人之法而不至拘守古人之法。然而，"法"毕竟是文章的外在表现，就是神而明之，极变化之能事，也只能"熔铸古人以自成，其势必不可以更加，"更重要的还是中有所得。于是他进一步提出"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文章格调有尽，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穷"，舍本逐末，即使全似古人，也"不过古人之再见"，循本以求末则古今事变万殊，文章之用就可以日新而不匮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理"与"法"是密切关联的，而"理"是文章之本，亦即"法"之本，这实质上是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内容决定形式这一美学命题。作者论文颇多己见，尤其是他关于"法"的理解，既不同于明代的复古派，也不同于唐宋派。（胡健）

《与魏叔子（魏禧）论文书》　清邵长蘅（号青门）撰。本文从创作角度，提出了"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的观点，强调作家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条件的改善。他主张作家应丰富自己的学识见解，提高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努力探索艺术创作的规律，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作者认为"浚文之源，"在于读书、养气。读书应渐及，"先于治经，……不必屑屑拘牵注疏，务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后纵贯诸史，以验其废兴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参其邪正得失之

故。”养气应重品格修养而轻名利得失，“涵咏道德之途，菑畬六艺之圃”；“泊乎寡营，浩乎自得”。至于究文之法，他认为重在理解和把握“不变”与“至变”的辨证关系。文类有定体，辞章有定格，内容有定理，“此法之不变者”；但是，创作主体自身的素质和条件是各不相同的，作家应“各视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师，后先不相袭，此法之至变者”。“吾得其所为不变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韩、柳、欧、苏，而不可骇其创也；吾得其所为至变者，即《左》、《史》，即班、范，即韩、柳、欧、苏，而不可訾其袭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他认为如果不一浚其源，不究其法而侈言文学的创作，想要创造出好的作品是不可能的。作者是清初散文大家宋荦的门客，当时与侯方域、魏禧齐名，他从自身创作实践的体会和经验来评论文学创作，因此颇中肯綮。他所阐述的读书之循序渐进、养气之修养品性、文法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等，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了创作主体论与创作方法论的意义。他虽仍以复古明道为标榜，却不可以迂腐视之。（许建中）

《方望溪先生全集》 清代方苞作。凡30卷，其中文集18集，集外文10卷，补遗2卷，系戴钧衡编。另附苏望元《方望溪年谱》1卷，《年谱附录》1卷。作者是桐城派初祖，提出了著名的“义法”说。此说包举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又融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的文论为一体，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集古今文论之大成。作者又提出“雅洁”说作为“义法”的标准，使雅洁的散文风格成了桐城派作家共同的审美追求。后来刘大櫆和姚鼐分别就“法”与“义”作了发挥或推阐，使“义法说”具体化或抽象化。

（王文龙）

《秋山论文》 清李绂撰。这是札记之文，或叙写所得，有感而发，或记注言论评说先贤。“其论学大指，谓朱子道学问，陆九渊尊德性，不可偏废”（《清史稿》本传）。作者尊崇陆氏及王阳明之学，“以朱子悔悟为文，又举朱子所称切实近理功用者，一概归之心学”（《四库全书总提目要》卷九十八《朱子晚年全论》）。他的散文美学思想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主观的体验感悟为存中心，主张作家进行创作，应当如学问家钻研究学术那样，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为文须实有格物工夫，凡事见得明，然后说得出也。文莫奇于子长（司马迁），试读其书，人情物理，细入无间，故能穷奇尽变乃尔。若体验不精而欲求肖物，乌可得哉！”在方法上，他提出应当尽心学习先贤佳作，由此而入，穷其奥区；但是他更强调学古而化，得其精神。“文章字句须有成处，即《曲礼》所谓‘言必古昔，称先王’也。然不可勉强抄袭，降为剿贼，亦即《曲礼》所谓‘毋袭言’、‘毋剿说’也。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亦无一语蹈袭，此可以为法矣。”他进而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如能去杂念，“惟求切，则随题命意，因物赋形，可以千篇不竭”。这个“切”，就是作家对于人生境界的某个方面的深刻体验和领悟在作品中完

美地表达，也就是所谓"'思涉东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能如士衡（陆机）云云，自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这样，无论平奇浓淡，都能有一种动人处。他觉察到了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他认为"聚精会神，多有所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他颇通陆、王心学与文学，所以他的散文美学理论往往能发一般文学家所不能发。对于形于神，学与悟等关系的阐发，也较为透彻切实。他的理论注重创作主体内在情感的体验和感悟，是富有美学意义的。（许建中）

《郑板桥集》　清代郑燮著。分家书、诗钞、词钞、小唱、题画五个部分，系作者生前编定。作者的散文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家书部分。他推崇"沉着痛快"的美学风格，认为"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并举出"《左》、《史》、《庄》、《骚》、杜诗、韩文""六君子本色"为例，加以证明（见《家书·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这突破了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祯"神韵说"的藩篱，也越出了自唐以来部分文论家以含蓄蕴藉为无上妙境的局限。作者以禅论文，提出了"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补遗·与江宾谷、江禹九书》）的著名观点。他强调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强调作品艺术的"美"、内容的"真"和命意的"善"三者兼备："理明词畅，以达万物天地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同上）他把这类作品称之为"大乘法"，而把单纯追求形式美的"锦绣才子"那些"劳而无谓"的作品称之为"小乘法"。虽然以禅为喻不免有几分模糊，归入"大乘法"的作家作品也未必都很恰当，但作者的倾向性是明显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论文偶记》　清刘大櫆著。桐城派著名的一部散文理论著作。作者认为文章的素材是"义理、书卷、经济"，但仅有它还不能构成文章，"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行文"的"能事"即"神气音节"。"神气"属于作者的精神力量，"音节"是作者拥有的艺术技巧。在"神气"中，"神"是主要的，决定"气"的，"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所以说"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大抵"神"相当于作者的思想情感，"气"相当于作品语言的气势。在文章中，"神气"外化为"音节"，"音节"体现为"字句"，所以说："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据此，作者提出"精粗"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由创作言，他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由欣赏言，他提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的"因声求气"说。从"神气音节"出发，刘氏提出了文贵"奇"、"变"、"高"、"远"等观点。此外，他重视散文的美学特征，以"文至味永"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提出"即物以明理"、"即事以寓情"的审美创造的方法，也颇有见地。刘氏的"神气音节"、"文之精粗"、"因声求气"等理论，上承方苞的"义法"论而加以发展，下开姚鼐的"神理气味、

格律声色”说，在桐城派散文美学理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祁志祥）

《小仓山房文集》 清代袁枚作。收文集24卷，续文集11卷，外集文8卷。作者论文，颇能从审美角度着眼，所以能创为新说，不囿于成见。他重视文章的审美价值，而忽视它的功利作用，指出“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与无用也”。（《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他举例说：“盖以理论，则（程、朱）语录为精，以文论，则庄屈为妙”。（同上）对骈、散二体之间关系，提出了同源异流的见解，并进而主张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即二体并行而不悖。作者反对拟古，力求创新，从社会、自然不断变化的理论高度，阐明了创作求新的原因：“文章家所以少沿袭者，各序其事，各值其景，如烟云草木，随化工而运转，故日出而不穷。”（《答定宇第二书》）此外，对前人关于作史才、学、识三长的看法也有所发挥。（王文龙）

《惜抱轩全集》 清姚鼐著。共88卷，其中文集16卷、后集10卷，诗集10卷。姚鼐的散文，上承刘大櫆、方苞、归有光，远绍唐宋八大家，与欧阳修、曾巩的风格相近，纡徐清淡，简洁要约，偏于阴柔之美，恰与他在理论上对阳刚之美的偏尚相反。议论文如《伍子胥论》、《李斯论》、《贾生明申商论》，序跋如《老子章义序》、《海愚诗抄序》，书信如《答翁学士书》、《复汪进士辉祖书》，传记如《登泰山记》、《朱竹君先生传》等名篇，颇可看出他散文的这种风格。这使得他的散文在桐城派诸家中最富情韵。从另一方面看，他的散文笔力不够雄健，规模不够阔大，与社会现实不够贴近，是其不足之处。

《文史通义》 清代章学诚著。凡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继《文心雕龙》、《史通》之后综合探讨文史问题的理论名著。章氏生当考证盛行的清中叶，在文学领域，标举义法的桐城派和高扬性灵说的随园派正占上风。章氏独不以当时风气为转移，平章古今学术，在文论方面，也能独树一帜。象《文德》、《文理》、《史德》、《古文十弊》等都是论文的名篇。《文德》所论，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作者应持的态度，这就是“临文必敬”，“敬”即“气摄而不纵”；二是批评者应持的态度，这就是“论古必恕”，“恕”即“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史德》把文章的动人之美归于创作主体的“气”“情”，并以“气昌情挚”为“至文”的决定因素：“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文理》指出：“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由后者出发，他对归有光开启、桐城派步其后尘的古文评点派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评点虽然对“不知文章法度之人”“未尝不可资其领悟”，但毕竟只是“为文之末务”，“不足据为传授之秘”，若以此范人，流弊就不可胜言了。《古文十弊》则对当时古文领域中种种弊病作了辛辣而中肯的批评。

《文颂》 清雍正时人马荣祖步趋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作的一部论

文著作。该著以四言诗的形式，形象化的语言，表述了对文学创作各种现象的感受与认识。与司空图不同的是，《诗品》只是风格论，《文颂》则远远超出了风格论，如"养气"论及作家修养，"神思"、"意匠"论及构思，"运气"、"布势"、"遣辞"、"结音"、"使事"、"取譬"、"奇正"、"实虚"、"疏密"、"离合"、"起落"、"顿挫"、"开遮"、"往复"、"断续"、"炼字"、"守法"等论及技法。《诗品》只论及二十四种风格，《文颂》则论及四十多种风格，它们是沈雄、峻洁、典雅、淳古、怪艳、沉著、生动、严重、疏放、遒媚、超忽、苍润，清越、奇险、轻淡、郁折、洸漾、雄紧、颓畅、奥涩、朴野、蕴藉、恣睢、淡永、跌宕、瘦硬、浑灏、秀拔、排奡、修远、夭矫、冲寂、鼓舞、停均、雄挫、闲适、坚深、清新、古拙、妙丽、劲宛、英雅、遒逸、复隐、空灵、神解、飘渺等。原著分上、下卷，大体上卷为创作论，下卷为风格论。　　（祁志祥）

《文说》　　清代焦循作。焦循是清代的哲学家、戏剧理论家。本文是讨论文学作品的专论文章，有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作者把"辞达"作为统一文章繁简深博的标准，他认为"博"是因为被叙述事物本身内容丰富，为了"达"文章自然会"博"起来。繁、简、深刻也是这样统一在"达"当中，这是对南宋洪迈、清初顾炎武繁简并重论的发挥。但忽略了文章表达风格的因素。同一件事情，表达者风格不同，文字会呈现繁缛炳焕与峻洁峭拔的差别。作者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简炼而内容丰富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说是因为古代作家对某一事理有深入的思考和真切的把握；今人学古文，如果只是学古人的唇吻，只是在语气上、章句和行文上去学古人，并未学到古人那种深入的思考、真切的把握，那就像死水和枯骨，丑腻而无精神，不能算是学了古文。这可以说抓住了提倡复古运动的合理内核，作了科学的具体的解释。　　（周五纯）

《骈体文钞序》　　清代李兆洛撰。《骈体文钞》是李兆洛编选的一个著名的集子。清代桐城派散文势力最大，骈体文也曾复兴。赞同骈文的阮元就提出过"以韵偶为文，散文为笔，以沉思翰藻为文，而清言杂说振笔纵书者为笔"的主张，试图与古文家争正统。李兆洛发挥了阮元等人的见解，欲以《老子》、《管子》等为骈，强调骈文本出于古代。他在这篇序中进一步提出了散、骈合一说。先运用朴素的自然辩证法作了理论说明："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再从文体演进的角度指出骈、散同源："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这种骈散合一论与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持论相近，从艺术形式的角度来看，是比较允当的。但形式对内容有反作用，唐代中叶以来的创作实践证明，散文与骈文的兴衰是同人们用来抒情达意的利弊相联系的，李兆洛虽然提出了"相杂迭用"的主张，但毕竟没有看到

骈偶自身的局限。（胡健）

《艺舟双辑》　晚清包世臣所著的一部论艺著作。凡6卷。4卷论文，2卷论书，故名之曰"双辑"。他留心经世之学，论文也贯彻经世之旨。他反对抽象地言道，指出"道附于事"，故推重"言事之文"、"记事之文"；为了即事明道，他主张"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条理原委，抉明正义，然后述得失之所以然，而条画其补救之方"，"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后述其本末"，以求"是非明白"，据此他批评了韩愈、柳宗元以来"虚言道以张其军"的古文家的陋习（《与杨季子论文书》）。对于"法"的问题，他以为就文章而言，"典型具在"，就作者来说，"辙迹各殊"。由于人的才性不同，描写的对象也不一样。故"法"的运用千变万化，不可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因此，他认为在行文时"固不必求与古人同，亦不必求与古人异，应以事义为指归"（同前）。在《再与杨季子书》中，他还对有清以来侯方域、魏禧、方苞、姚鼐、张惠言等散文名家一一作了批评，从而表现出他的美学旨趣。

《艺概·文概》　清刘熙载著。《艺概》是刘氏著名的论艺著作，《文概》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它按照历史的顺序，品评历代散文名家的作品特点，所论尤为精当，如论庄子："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论司马迁："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论韩愈："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从而比较准确地勾勒出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它也表达了刘氏对散文创作的美学见解。他以心灵表现的文字为贵，要求"无论纪事纂言，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体现了宋明心性之学对他的影响。他重视明心见性，也兼顾到文章与现实的关系，提出"文之道，时为大"，文应"与时为消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又探讨了文章作法，语言技巧等问题。如"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亦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叙事要有法，然无识则法亦虚；论事要有识，然无法则识亦晦"，"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觚质非文，浮艳亦非文也"，等等。他提出"文之为物尤言语之精者"，这个命题也很值得注意。在欣赏方面，他提出的"好各因人，书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损焉"，是对审美主客体辩证关系的最好表述。（祁志祥）

美学术语

辞达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语言和内容关系的一种观点。语出《论语

·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这里的"辞"，原意主要指辞令，特指"言辞"之辞，而非"文辞"之辞。孔子的意思是，辞要达意。后代的文论家根据孔子的意思，把"辞达"运用到文论中。陆机在《文赋》中主张文章"辞达而理举"。特别是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引用了孔子的"辞达"说并作了解释和发挥，指出"辞达"的意义、要求和途径："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外，他还在《答王庠书》、《答俞括书》中分别引用孔子的"辞达"说，并作了发挥，从此，"辞达"成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条美学原则。

情信辞巧　孔子对情感和语言的要求。语出《礼记·表记》："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子曰：'情欲信，辞欲巧。'"孔子在这里指的是情感和言辞，也可以从文艺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角度去理解。"情"，文章的内容；"辞"，文章的形式；"信"，真诚，对文章内容的要求；"巧"，美妙，对形式的要求。所以"情信辞巧"，可以理解为内容的"真"与形式的"美"的统一。关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论语·雍也》载有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质彬彬"的原意是就人的修养而言，但也可以理解为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关系，与"情欲信，辞欲巧"的美学意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孔子的思想是一贯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也载有孔子的话："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里的"志"、"文"实质上也是对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孔子关于内容和形式的观点，并不是专门对古代散文而言，对后世散文创作和研究却也有着一定的美学的指导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篇中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刘勰的这一美学思想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樊德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这是孔子关于语言文采的著名观点。语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谓"言"是用来充分表达"志"的，而"言"又应该是具有文采的，"言"如果缺乏文采，便不能在社会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里，孔子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辩证关系问题。孔子论文强调"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因而既重内容，又重形式，要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对后世文、道统一观的建立有着积极的影响。

（殷大云、吴嘉才）

三表法　墨子提出的立言、著文的美学原则和标准。语出《墨子·非命上》："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

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有本”，指言要有据，以古代圣王言行为本；“有原”，指立言要从下情出发，以百姓的实际体验为据；“有用”，指立言、著文要考虑到有利于国家百姓的良好政治效果。墨子“三表法”注重立言、着文在内容方面的逻辑性、可信性以及社会功能，对后世论说性散文的写作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同他的“非乐”思想相联系，忽视形式方面的美感因素，就带有片面性了。

养气 本是孟子提出的关于道德修养的一种观点。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养”，培养；“气”，指道德修养，特指“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配义与道”，即指人长期坚持正义活动，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后人往往从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的关系角度去理解孟子的“养气”说，把它作为文论中的一种观点，认为要写好文章，一定要在思想修养上下功夫。因此，孟子的“养气”说在中国古代散文美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韩愈的“气盛言宜”说、魏了翁的“辞根于气”说、方孝孺的“气畅辞达”说，都明显地继承或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始于曹丕的“文气说”也是受其影响的。当然，孟子所养的“气”“配义与道”，有明显的政治道德内容，是儒家的道义。同时，他提倡的修养是脱离社会实践的主观唯心论的修养。他的“养气”说，是后来道学和禅学“明心见性”修养论的渊源。 （樊德三）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 汉代扬雄对词赋所作的分类。语出《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把赋体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屈原为代表的，称之为“诗人之赋”；另一类是以景差、唐勒、宋玉、枚乘等为代表的，称之为“辞人之赋”。屈原等人的赋所以被称为“诗人之赋”，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体同诗雅”（《文心雕龙·辨骚》引扬雄语），得《诗经》风雅之旨，有教化之功，符合《诗经》的儒家道德规范。扬雄推崇这种“诗人之赋”。另一类因为缺乏或偏离了《诗经》的创作精神，所以扬雄称之为“辞人之赋”。这种划分，从整体上把屈原的骚赋与汉赋加以区别，不仅指出了体制上的差异，而且指出了内容与艺术上的区别——“丽以则（合乎中正的法度）”与“丽以淫（指过多的藻绘）”，这是符合实际的。但这种划分也有偏颇不公之处，如说宋玉、贾谊也属于“辞人之赋”而加以批评，就不尽符合实际。而且这种划分也过于粗疏。一个作家的创作倾向往往是多元的，如枚乘的《七发》并不乏“教化之功”，只不过喧铺陈体物之宾而夺“要言妙道”之主，表现得

不够强烈罢了。再从文体大的分野说，赋体虽曾被视为“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其实只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并且多半是押韵的散文。所以扬雄把屈原的诗歌作品列为“诗人之赋”，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诗歌与散文的界限。（殷大云 吴嘉才）

发愤著书 司马迁提出的创作思想。他曾一再阐明这一思想：“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意，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略有异文）这是对前代一类创作现象的概括，更是对自身创作经验的总结。他的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史传散文巨著《史记》，正是在遭李陵之祸之后，“感身世之戮辱”，才完成创作的。这一创作思想，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的美学思想而言，是一个大胆的反叛。它肯定了现实生活中进步势力冲决旧世界桎梏的正当性，肯定了遭受迫害的志士仁人借文艺形式发抒胸中抑郁愤懑之情的合理性。它以作家的“愤”为创作动力，将非“中和”尺度引入审美领域，也从另一侧面显示了汉代散文美学特有的生气和活力。惟其如此，《史记》才能使后来读者产生“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茅坤语）一类审美感受。司马迁反“中和”的创作思想，对后世作家创作有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关于“不平则鸣”的创作主张的提出，显然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王文龙）

成一家言 语出司马迁《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把“家”作为学派概念引入史学领域，司马迁是第一人。“成一家之言”，有双重意义：一从司马迁的家世上说，他和父亲司马谈都重视世袭史官的家史，他也曾立志要把写史作为家学，“成一家之言”即指要把史学作为家族的文化传统，一代代接下去。另一层是从学派观念出发，即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不拾他人牙慧，不走别人老路。司马迁的确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的《史记》文体新创，见解独到，称得上“史家之绝唱”。后世散文家更多地以风格论“家”，唐代李翱所谓“自成一家之文”，北宋宋祁所谓“文章必自名一家”，苏辙所谓“文章自一家”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司马迁的启发。

心以文为表 语出王充《论衡·超奇》篇：“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心”，指内在的思想感情。“表”，外，这里指外在表现，或外化的形式。王充把“心”与“文”作为两个对立统一的概念，来说明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品是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真实而自然地流露；作家内在的思想感情则以作品为

表现形式。在这二者中，王充强调的是创作主体的"心"，认为思想感情是第一位的，本源的东西。照此推断，没有深刻、独特的思想与真切、强烈的感情，便不可能产生感人的作品。这和他"疾虚妄"，反对"华伪之文"，"虚妄之语"的创作观点，是联系在一起的。

精诚由中，其文感人　语出《论衡·超奇篇》："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精诚"，至诚，真心诚意。"中"，内心。重真实反虚妄，是王充散文美学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针对当时虚浮不实的文风而发的。他在《对作篇》中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从"疾虚妄"出发，他提出了文章必以"实诚"为核心，凡是"实诚"的，就予以肯定，凡是"虚妄"的，就加以排斥。他说："……有根株于下，有叶荣（花）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超奇篇》）王充认为文章中真实的内容来源于作者胸中的真情实感，并用"根株"，"实核"来比喻作家胸中的真实思想感情，用"荣叶"，"皮壳"比喻语言文字。作家写作，先有"实诚在胸臆"，然后文墨才能著于竹帛。换言之，"实诚"是关键，只有作家思想情感的真诚坦露，才有文章的真挚动人。王充的这一创作理论表明了作家的情感在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它的异乎寻常的审美效应，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勰的"为情而造文"，白居易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都可以说是对这一理论的继承和发挥。

劝百讽一　语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这是班固对扬雄批评汉赋失去讽谏作用的文学观点的概括。"劝"，勉励。"讽"，讽谕。扬雄根据亲身的创作体会，批评汉赋内容上铺陈事物，形式上浮华靡丽，只能对帝王歌功颂德，而无益教化。在他看来，尽管汉大赋都留个"讽谕"的结尾，还是改变不了"歌颂"的基调，客观上起着对帝王勉励的作用。汉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作《大人赋》以讽谏，结果武帝反而有飘飘欲仙之意，就是扬雄所举的一个典型例子。从一定意义上说，扬雄的看法正击中了汉赋的思想内容上的根本缺点。但在今天看来，汉赋是汉朝一代文学的代表，它反映了那个大一统帝国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也表现了当时汉民族的社会理想和审美风尚，所以就思想内容而言，也不应对汉赋作简单的否定。

（余逊涛）

曲终奏雅　原指汉代大赋在讽谕意义方面的特点。语出班固《汉书·司马相如列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代大赋多以京城、宫殿、游猎、山川等宏大事物为题材，借以夸耀汉帝国的强盛，并且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但

汉代大赋往往在其篇末寄托一些讽谕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曲终奏雅"。扬雄认为汉代大赋"劝百而风（讽）一"，如同郑卫的音乐往往在乐曲终了时才开始演奏雅乐一样。汉大赋结尾时加上的所谓"讽谏"的点缀，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扬雄看到了汉大赋的根本弱点，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殷大云、吴嘉才）

文气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作家气质、作品风格的一种观点。它对古代散文创作和研究有着重要的美学意义。这种观点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所说的"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指作品风格。如"徐干时有齐气"；二指作者的气质。如"孔融体气高妙"。"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中的"气"，则兼指二者。在作者方面，是指他的气质，形诸作品，便成为作品的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提出"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在《养气》篇中认为"学业在勤"、"素气之养"。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也论说了"言"与"气"的关系，但韩愈所说的"气"，指文章的气势，文章的内在力量。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既承认"文者，气之所行"；又强调了"气可以养而致"的观点。并且还进一步提出怎样养气的途径：一是内心加强修养；二是增强外界阅历。刘勰等的观点，多少是受了曹丕观点的影响，但也有所发展。在曹丕的"文气说"之前，有孟子的"养气说"、张衡的"元气说"，但都不是对文而言，前者是讲儒家修身养性，后者说的是哲学问题。

本同末异　曹丕关于文体共性与个性关系的观点。语出《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本同"，指各种体制文章创作的共同原则，即共性。"末异"，指不同体裁的文章的不同特点，即个性。曹丕对文体的研究，不仅注意到文章"本同"的方面，更重要的对文章的"末异"方面作了前无古人的阐述。他指出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八体文章，分别有"雅"、"理"、"实"、"丽"的特点。曹丕的论说虽显得粗疏，但对后代的文体论和风格论有着深远的影响。魏末桓宽的《世要论》、西晋陆机的《文赋》、东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有关文体和风格的论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典论·论文》中这种观点的影响。　（樊德三）

以意为主　语本刘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尝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他解释说："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杂乱无章）；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后来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文章纲领》中加以征引，把"以意为主"当成了文章的创作法则。古代散文创作中"意"的重要性，历来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梁代萧统虽也提过"以立意为宗"（《文选序》），但偏指论说性文章，"意"的内涵比较狭窄。晚唐杜牧上承范说，进一步提出"以意为主，以气

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答庄充书》）的主张，立说比较全面，并使与“意”相对的“文”的涵义具体化。北宋苏轼还打过比方来说明“作文之要”：“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转引自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清初王夫之更强调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以意为主”的创作法则的提出，反映了古代作家对散文创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尽管深浅、广狭程度各有不同。所谓“意”，是指作家的主观思想、观点、意图、旨趣及其在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它是人对现实的审美体验、认识、评价和趣味，并构成创作的中心思想和主导方面。作品创作的“意”，是作家对现实的审美感受的提炼和集中，蕴含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它以作家理性认识和判断“志”、“思”为基础，又为事物的规律和社会伦理的“义、理”所制约。“以意为主”的创作法则，从一定意义上强调和突出了“意”在构思和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但第一，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意”往往是同作品的感性内容紧密联系、融为一体的（有时也可以片言居要，脱颖而出）；第二，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作家的审美创造。“以意为主”的提出，与我国古典美学中尚意的倾向性也有密切关系。（王文龙）

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陆机对物、意、文三者不协调弊病的概括。语出《文赋》：“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唐大圆《文赋注》：“所构之意，不能与物相称，则患在心粗；或意虽善构，苦无词藻以达之，则又患在学俭（学问贫乏）。欲救此二患，则一在养心，使由粗以细；一在勤学，使由俭而博。”此注阐释的“二患”原因及补救途径，并不准确。“物”、“意”、“文”三者是创作的主客观三大要素，陆机探讨了三者之间应该具有的关系：意称物，文逮意。这观点揭示了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它对我国古代散文创作具有特别重要的美学意义。陆机关于“物”、“意”、“文”三者关系的思想，是孔子“辞达”说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探讨的“思”、“意”、“言”三者关系，实际上是对陆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樊德三）

片言居要 语出陆机《文赋》：“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剖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这是说，讲述比较复杂的情况和道理，文辞当然要繁富，但弄得不好会使文意不集中，文辞散乱，最好在适当的地方安排能统率全篇文辞的警句，这样，文章其它字句就好象有了主心骨，效果十分明显。这种句子，一是要简炼和醒目，否则不足以称为“警策”，不能充分调动读者的注意力。二是要成为一篇文字的中心，使其它语句围绕该句而生发，如众星之拱月。三是要“居要”，放在全篇最适当的地方。韩愈的名篇《杂说四》中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就是这样的句子。它首先是矫健挺拔，一反“先有好马，

然后才有识好马的伯乐”这样一个常识，反拨成“有伯乐才有好马”这种常人一下子不易理解的判断，这就很警策。该句文字也简炼而流畅。整篇文章都围绕此句而生发。“居要”之处不一定在篇首。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心句在篇末，而韩愈《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中心句则在文章中间。陆机“片言居要”的论述把这一类文章写法的特点讲得清晰透辟，很有指导意义。

因宜适变 语出陆机《文赋》：“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这就是说，文章的繁简，文句的各种安排，要根据文意的需要，怎样适宜就怎样变化，没有固定的法则。比如讲“丰约”，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只有四句，很简约，但强烈表达了作者人寿不永、怀才难遇的愤懑情绪；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反复叙说他惊听噩耗后的悲凉心绪和当年与十二郎朝夕相处的琐碎往事，很丰繁，二者行文风格迥然不同，但都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特定情绪。这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因为作者的气质、风格、文章的体裁、内容的不同，都会对文章有不同的影响力，不能拘于一体。总之，要看情况的需要，看选择哪一种表达形式更能向读者传达情绪和境界，这大致就是“因宜适变”这一创作法则的含义。后来的“文无定法”，“定体则无、大体则有”等说法，即从陆机“因宜适变”之说而来。

谢华启秀 语出陆机《文赋》：“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之已披，启夕秀之未振。”“朝华”，早上已经开过的花，这儿用来比喻古人已经用过的文辞和文意。“夕秀”，晚间开的花，这儿指古人未曾发现的文意和美句。“谢朝华”、“启夕秀”，意思为不可袭用陈旧的辞、意，而应当创造新鲜的辞、意，使之如鲜花盛开，总之，贵在独创，反对模拟，反对剿袭。剿袭前人的东西，尽管抄得很巧妙，还是没有价值。《文赋》中还说：“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那怕是自己精心结撰，有时也会与古人暗合，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造，那就得“虽爱而必捐”。陆机这种力主创新的观点，是《文赋》创作论中的精华之一。明人杨慎《丹铅杂录》卷十一《谢华启秀》条，将陆机这两句话同韩愈的“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以及李德裕的“文章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相提并论，称之为“古人论文之要”，可见对后世影响之大。

文心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夫文心，言为文之用心也。”“为文之用心”，就是指创作文学作品或写文章时的方法和技巧。“文心”涉及的问题，非常宽泛，大概可包括《文心雕龙》中所阐发的主要原理。比如构思、结构、熔裁、风格、章句、灵感、技法等等诸种问题，都包括在“文心”之中。本来，刘勰这部书的题目就叫做《文心雕龙》，因此也可以说，该书的内容就是讨论与“文心”有关的问题。

原道 古代散文美学观点。刘勰用为《文心雕龙》第一篇题目。“原道”，即源于道，本于道。刘勰说：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唯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这里说的“道”，具体解释为“太极”，指天地未分前的一团元气，这就多少包含了文学起源于客观世界这样较为合理的成分。在刘勰那儿，“道”又自然地与儒家经典相统一，这样，文学又与其它上层建筑、哲学、政治相关联。刘勰把文学与生活、社会、其它上层建筑这样虽然很粗疏甚至是含混地联系起来，在那个思辩科学并不发达的时代，亦不失为一种包含相当合理成分，也能说明一定问题的解释。“原道”是刘勰理论体系的核心，又是文以“明道”的理论基础，它是针对齐梁时代文坛轻内容、重形式的积弊而提出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对后代古文家的理论与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周五纯）

宗经　刘勰关于作文要以儒家经书为效法标准的一种观点。他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写了一篇《宗经》，十分强调并充分阐发这一观点，把“宗经”作为作文的最高美学原则。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意思是，文章能够效法经书，就各种文体说有六个优点：一是感情深厚而不偏邪，二是文风纯正而不混杂，三是叙事真实而不虚假，四是含义正确端直而不枉曲，五是语言精炼而不繁冗，六是文辞华丽而不浮靡。这实际上是刘勰对写作的基本要求。刘勰强调“宗经”对纠正晋宋以来的绮靡文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宗经”并不一定能达到这“六义”，因为经书本身就并非都达到这“六义”。因此，刘勰过分强调“宗经”，出于正统的儒家思想，又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志足言文　刘勰对作品内容和语言提出的要求。语出《文心雕龙·征圣》：“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志足言文”，是对孔子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概括。“志”，指思想感情。“文”，指文采。两句的意思是，用语言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用文采充分修饰语言。换言之，思想感情要表达充分，言辞要有文采。孔子这两句话记载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上，这是他赞美子产办外交时善于辞令的话。刘勰这里的概括，是作为文学作品思想感情和文辞完美统一的基本要求提出来的。这种观点顾及到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也是古代散文创作中基本的美学原则之一。　（樊德三）

文与质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也是古代散文美学范畴。源于孔子的“文质彬彬”说，本指个人修养而言。刘勰则改造并发展了传统的文质观。《文心雕龙·情采》篇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里讲的“文”与“质”，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概念。“文”指形式；“质”指内容。以文章论，“文”是指语言、色彩、音律、体制等表现在外面的东西，“质”是指思想、感情、义理等内部的

本质的东西。刘勰强调，有什么样的“质”，便有什么样的“文”。水性流动，便有波纹，花木是实体，花朵便悬空开放，有一定的内容，便有相应的形式附着于其上。另一方面，刘勰也强调“文”的积极意义，“文”不仅是“质”的附庸，同时也对“质”有表现作用、辅佐作用、推进作用。比如虎豹，如果其毛皮没有斑斓的文采，威势自然减少几分。因此，“质”也要求“文”能彰明、突出“质”的作用。刘勰把内容和形式的主从关系、辩证关系讲得如此全面、精辟，对后世散文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熔裁　语出刘勰《文心雕龙·熔裁》：“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这里的“熔”，是指内容的提炼。“规范本体”，就是提炼主题、选择材料、划分层次等工作，都与内容有关。“裁”，是指文辞的提炼和删改，凡是字繁意疏的、可有可无的、作用不大的、风格不协调的文句，统统要删改。至于如何熔裁，刘勰提出著名的“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而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他把确定文章格局、选择表达中心思想的情事、撮辞作为熔裁的重要步骤。《熔裁》篇又说：“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这是说要锤炼文句。熔裁的工作对于初学者固属重要，大作家对此项工作更是精心。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开头，几费踌躇，是大作家熔裁的著名例证。因此，“熔裁”，不仅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素养，也是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语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意为铺陈辞藻，创作文辞，体察物像，抒写情志。两句话概括了赋体的特点。汉赋是在楚辞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以铺叙、铺张扬厉为其主要特点。刘勰说赋是“极声貌以穷文”，就是多方描写，对事物状况的叙写充分展开，写得淋漓尽致，这可以看成“铺采摛文”的注脚。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等作品，分类体物，语言华赡，篇幅宏大，最后带个“讽谕”的尾巴，言归于雅正，典型地体现了刘勰所说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点。由于汉赋过分地逞才行文，多有不顾物理而夸奢过当的，在后人看起来显得板滞和重沓，“曲终奏雅”也显得软弱无力。但汉赋是从先秦的质朴走向铺张和华丽，具有由朴向美的倾向，这无疑给文学注进一种新的营养，为骈文的发展作了充分准备，又是不可抹煞的。

文采　语出《韩非子·难言》。刘勰作了较多的发挥，《文心雕龙·情采》篇说：“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又说：“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文采”，指文章的词藻，词义的色彩，发音的轻浊，对偶排比这些文章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南朝时期盛行骈体文，特别重视这一种形式美。刘勰并不否认这种美，他比时人高明的是，认为散行单句的文字也有文采。他在《征圣》中说“精理为文，秀气成采”，认为散文中的“文采”，是由文章中透

露出来的灵秀之气形成的，这就把"文采"的涵义扩大了。"辩丽本于情性"，"文采"主要由文章内在意蕴的丰厚隽永所决定，这比外在的形式美更重要。如果忽视了内在的"情性"，单纯在形式上下功夫，那就会导致淫丽烦滥，华而不实，"为文而造情"，就显得轻薄和飘浮了。刘勰总结说，语言要有"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是实际情况，但要有深刻的内容，"文采"才更显得华赡，"繁采寡情"的作品，只会使人倒胃口。

文思　语出《世说新语·政事》。《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神思》篇说："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这里的"文思"是指创作的构思，文章的思路。这是审美创造的中心环节。一篇文章写作契机的触发，审美意象的孕育，审美形象的形成，以及写作的顺序、联想的过程、转折的枢纽等，这些构思文章时的思考过程以及写作的思路，可以统称为"文思"。"文思"固然与现实生活有关，也与作者的审美情趣、文学素养、创作方法等有一定关系。

体性　语见《文心雕龙》第二十七篇题目。"体"、"性"是两个概念，"体"是体貌，这儿指文章的风格。刘勰把文章风格分为四组八体：典雅和新奇、远奥和显附、繁缛和精约、壮丽和轻靡。刘勰对新奇和轻靡两种风格取贬抑态度，显然是对齐梁时代华而不实和诡艳不经的文风有所不满。风格本是抽象概念，这儿能解说得如此切实，显示了刘勰理论上把握的能力。刘勰对于对立的风格，一般并无褒贬，这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很可取。"性"，指作家的个性、情性。刘勰把作家个性分成才资和学习两个部分。才资是先天而有的，而学习则出于后天。二者之中，他对才资、气质这些天赋看得比后天的学习更重要，虽然他并未否定后者。这种说法略见偏颇，但今天看来，还是有心理学上的依据的。作家的个性与作品风格关系很大，由于个性不同，作品风格也就千差万别。刘勰论述作品风格、作家个性及其相互关系，有许多见解值得今人借镜。　（屠五纯）

八体　刘勰关于文章风格的分类。语出《文心雕龙·体性》："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这里的"体"不同于《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各有体"的"体"，即不是指体裁，而是主要指风格。刘勰把文章的风格概括为这八类，还对每一类的特点作了具体论说，又把"八体"分为四组，每组都有一正一反的关系："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刘勰认识到风格的多样化。所谓正反，不一定有高下之分，但他又不是无所贬褒的，如对"新奇"、"轻靡"二体，颇露微词而对典雅最为推崇。这虽有纠正当时文风流弊的作用，但贬低二体是不恰当的。至于"八体"所以形成，刘勰认为是由于作者"才（才华）"、"气"（气质）、

"学"(学识)、"习"(习染)四者的综合。他还指出"八体屡迁",即作家的风格常有变化,因此,只有将"八体"融会贯通,才能运用自如,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说:"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可见,刘勰的"八体"风格论纲举目张,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较之曹丕、陆机之说,有了重大的发展,对古代散文美学风格的分类和辨析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 (樊德三)

风骨与文采 "风骨"二字是刘勰《文心雕龙》第二十八篇的篇名。"风骨"原指人的精神和体貌。"风"指风采,"骨"指骨相。刘勰转而用之于文学,赋予特定的含义:"风",是指文章的感染力。作品写得生动、有气韵,有生气,写人写得活,写景写得有味,写情绪表达真切,能引起共鸣,就是"风"。"风"不仅体现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更重要的是有成熟的思理、蕴含于其中的真切动人的思想感受,与内容关系更密切。"骨",是对文章形体方面的要求。言辞十分精炼准确,就有"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风"是一种寓于情感的美学感染力,"骨"是一种寓于文辞的美学感染力。"风骨"二字连称,就是对文章感染力和文辞的总要求。刘勰推崇"风清骨峻"的标准,是针对齐梁作品"瘠义肥辞"的流弊痛下针砭的。刘勰论文,首标"风骨",次及"文采",他认为有文采而缺乏风骨的作品,好象是羽毛五彩缤纷的野鸡,飞不高,飞不远,有风骨而乏文采的作品,好比是老鹰闯进了花园;只有凤凰,既有风骨,又有文采,华丽炳焕而又高高飞翔,达到这样的境界,才是理想的作品。 (周五纯)

情动言形,理发文见 刘勰关于文学创作过程的概括。语出《文心雕龙·体性》:"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意思是,感情激动了,要用语言来表达。道理得到表达,则体现为文章。从隐藏内心的情理到表达为明显的语言文字,内容和形式相符合。刘勰这观点在《文心雕龙·知音》篇里也有表述:"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他这观点本于《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究其源,都是"诗言志"说的进一步发展。不过,刘勰这一观点并不局限于诗,而是针对包括散文在内的整个文学创作而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揭示了以语言文字为传达工具的作品同作者心灵世界的对应关系。

因情立体,即体成势 刘勰关于情感、体裁、文势三者关系的一种美学观点。语出《文心雕龙·定势》:"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意思是,由于情趣各各不同,因而创作手法也各有变化,但没有不是依照情思来确定体制,并就着体势来形成一种文势的。这就是刘勰所说的"定势"。关于"势",刘勰作了解释:"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这里,刘勰明确提出"文势"就是"文

章体势”，并且以“机发矢直，涧曲湍回”、“圆者”“自转”、“方者”“自安”为喻，说明“文章体势”是一种自然之势。刘勰据此提出“定势”说，即“文势”一定要按文体的要求而定：“即体成势”、“循体成势”。刘勰这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说，意在要求作者根据思想感情去确定文体，再由文体特点自然形成文章风格气势。情、体、势三者，“情”是基础，“体”是本位。“势”是结果。刘勰这“定势”说是针对当时存在的追求奇诡的不正文风提出来的。他说：“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所谓“讹势”，即违反文体自然之势。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刘勰关于物、情、文三者关系的一种美学观点。语出《文心雕龙·物色》：“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以物迁”是说触景生情，情随物的变化而变化。刘勰列举了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景色，引起人的不同情感，来加以证明。刘勰把“物”与“情”看作因果关系，即把“物”看做第一位的。这就肯定了客观景物对激发创作情感的重要性，是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辞以情发”，刘勰把“情”与“辞”也看作因果关系，“情”决定“辞”。这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动而辞发”是一个意思。刘勰强调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刘勰关于物、情、辞三者关系的观点，是符合创作规律的。这种观点在刘勰以前，已有人论述过，如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从创作角度对物、情、辞三者关系作全面论述，是对陆机观点的发展。

为文造情　刘勰对古代辞赋家一种不良创作倾向的理论概括。语出《文心雕龙·情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所谓“为文造情”，指为了创作而做作感情。这主要针对汉赋作者而言。刘勰指出“为文造情”之所以令人厌弃是由于作者“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从而致使文章“淫丽而烦滥”，即没有真情实感，一味浮泛绮靡。扬雄曾说：“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刘勰把这种现象从理论上加以阐发，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这对当时文坛“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不良倾向，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刘勰这种反对“为文造情”的思想，与“为情造文”的创作要求互补，表明了他对创作主体的情感在审美创造中的作用高度重视，这对诗文创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樊德三）

文变染乎世情　语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世情”，指时代风貌、时代生活、时代思潮，也包括时代的学术风气在内。这就是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思潮都有关系。曹丕的《典论·论文》只论及文学与作者个性、才性、素养的关系，陆机《文赋》主要讨论创

作的内部规律。刘勰则把文学运动与时代、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散文美学史上意义十分重大。刘勰认为楚国辞赋是受纵横学派的影响，汉武帝时辞赋创作是由于君主的提倡以及"润色鸿业"的需要，这些论断都是有说服力的。刘勰这种理论上的发展，拓宽了散文美学研究的视野。虽然他所处的时代使他往往多注意封建帝王、政权、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显得不够全面，但"文变染乎世情"的结论却是科学的和有生命力的。（周五纯）

文约事丰　语见唐代刘知己《史通·叙事》"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史传散文的文学意义往往体现在叙事上，刘知己认为史传散文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而"叙事之工，以简要为主。"要使两者之间的矛盾得到统一，不在于"寡事"，而在于"省文"，于是"文约而事丰"就成了衡量叙事才能的标准。刘知己认为，要做到"文约而事丰"，应从两方面下手：一是就表现方法言，"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或"直纪才行"，或"唯书事迹"，或"因言语而可知，"或"假论赞而自见，"只须根据家际情况，灵活采用其中的一种方法，不可"兼而毕书。"二是就修辞技巧而言，则"叙事之省，其流有二"，即省句、省字。二者相比，"省句为易，省字为难"。陆机在《文赋》中就说过："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刘知己关于"文约事丰"的创作要求，不仅是对史传散文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传统的主简论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代散文家创作家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胡健）

气与言　气与言，是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的一对美学概念。说的是"气"与"文"，养气与写作的关系。

《答李翊书》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的"养气"说，源于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又受古文运动的先驱梁肃等人"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说的影响，这里的"气"，实际上指作家的气势、气魄和一种精神状态，以及由这种充盈饱满精神状态的喷涌出来的美的创造力。韩愈把这种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创造力比作"水"，把作品比作"浮物"。指出，只要精神充沛，创造力旺盛，无论写长或写短的文辞，也无论采用什么音节，都无不适宜。因此，要进行美的创造，就必须"养气"。养气固然有才力的锻炼，更是思想修养和道德的积累。《答李翊书》还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说自己的养气过程，开始是："戛戛乎其难哉，"尔后，"汩汩然来矣"；最后，"浩浩乎沛然矣。"对美的创造力的探讨，用"气"与"言"的关系加以阐释，韩愈的结论是：宏于中则肆于外，气盛则言宜。（曹旭）

陈言务去　唐代韩愈对散文写

作提出的美学要求。语出《答李翊书》："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意思是，当把自己心里所想的写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些陈旧的言辞全部去掉，这是很费力很困难的啊！这里的"惟陈言之务去"，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去掉人们用腻了的陈词滥调；二是指摒除人云亦云的庸俗之见。清代文论家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对此作了比较确当的解释："昌黎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就是说，韩愈所要求的，在于从形式到内容要有独创性。这观点在他的《答刘正夫书》里也有表露："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立不因循者是也。"这里的"能自立不因循"，就是"惟陈言之务去"的意思。他还在晚年所写的《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里再一次作了强调："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这种美学主张在他的散文写作实践中是加以贯彻的。但他要求"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把创造新词汇同继承文化遗产对立起来，不免流于偏颇，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所以"陈言务去"的美学要求，固然启示着后代作家不断创新，但也由于"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的激烈主张而产生流弊，致使古文运动中部分青年作家走上追求奇异怪僻的狭窄道路。

文从字顺　　唐代韩愈提出的散文写作要求。语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文从字顺各识职"。对这句话，近代古文家林纾曾作过较为确切的解释："此句大有功夫。'文从字顺'，似人人能之，所难者'识职'。'职'字是用字能得其出处，能使其安宅，用此字便称此字之职。"（《韩柳文研究法》）这说明韩愈主张语言自然流畅，明白准确。韩愈提出"文从字顺"，是为了纠正齐梁骈文的绮丽文风。因此，可以说"文从字顺"与"惟陈言之务去"是韩愈为古文运动所规定的两条美学原则，对后来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仍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韩愈本人的写作实践并没有完全贯彻"文从字顺"这条美学原则，他的作品就有某种程度的崇尚奇险的毛病。　　（樊德三）

文惟其是　　语出韩愈《答刘正夫书》："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后来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概括为"文惟其是"。这是韩愈提出的创造新体古文的具体标准之一。所谓"文惟其是"，即指在创作中"难"（艰深）与"易"（平易）两途都可行，只是要看文章的需要。《文概》解释说："余谓'是'字注脚有二：曰正，曰真。""正"指文体，"真"指内容。韩愈从对创作规律的尊重着眼，提出"文惟其是"的创作标准，是正确的。而他在创作实践中，主要是朝着"易"的方面发展。他的学生皇甫湜评论他的作品，特别提出"章妥句适"（《韩文公墓志铭》），也是一个证明。

“文惟其是”的创作标准，在唐代古文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不平则鸣　韩愈关于作家生平遭际与其创作关系的观点。语出《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韩愈认为“不平则鸣”是物与物、物与我（审美主体）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是宇宙间的一个普遍规律。作者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与他所处的不公平的环境、悲惨的身世遭遇有关，他创作的目的，就是“自鸣其不幸。”韩愈为散文创作中“不得已而后言”以及重视情感内容的真实性，找到了哲学上的依据。“不平则鸣”说，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中心之一，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发愤著书”说仅仅是从个人的不幸遭遇出发，而“不平则鸣”说则建立在对社会的不平和黑暗的尖锐批判，以及对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崇高性充分肯定的思想基础之上。它启发了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对当时以及后来散文创作乃至整个文学创作，都发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王文龙）

欢愉难工　穷言易好　这是韩愈在《荆潭唱和集序》中提出的美学观点。说的是，和平欢愉和穷愁悲哀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美感，由于对人们的刺激不同而带来创作上的易难不同。

《荆潭唱和集序》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和平之音何以会“淡薄”？欢愉之辞又何以“难工”，其中隐藏着的美学原理是，这种平和欢乐所激发的美感比较柔和，我们对它的接受处于“顺受”状态，因此，带来的美感刺激量也就柔弱无力；而“愁思之声”、“穷苦之言”则属于悲剧类型的美感，它能给人以巨大的惊恐、痛苦、不安和“霎时的精神抗拒”，使人处于“逆受”状态，带来的美感刺激就强烈持久，美感效应也就更大。因此，在同等美感刺激的要求下，抒发愁思怨情的作品，远比歌唱和平欢愉的作品更真实，更感人，也更容易写。以此为前提，也出于对历代优秀作家作品的总结，韩愈的结论是，凡是优秀的作品，其著作权，只属于“羁旅草野”的不遇之士而决不可能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欢愉难工”、“穷言易好”的美学命题，是与他的“不平则鸣”和唯其不平之鸣，才歌有思，哭有怀，才是感人作品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修辞明道　这是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积极倡导的一个文学口号。说的是文学与儒道的关系。

《争臣论》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答李秀才书》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题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

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这里的“修辞”，是学习文辞的意思；“道”，指的是儒家道统。《原道》说：“吾所谓道也，非而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所谓“明道”，就是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无需多加解释，韩愈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好“古道”，才去写“古文”，写古文的目的，是宣扬已经湮没不彰的古道，即失传于孟子的儒家道统。这就是韩愈的修辞明道说，或他学生所称的“文以载道说”。因此，以为韩愈是借“明道”的幌子“修辞”，或以为“明道”是强调“修辞”内容的说法，是勉强的。不过，创作实践证明，韩愈还是摆正了“修辞”与“明道”的关系，他对文辞非常重视，对文学的社会功用，对文学作品和文学家的评价，也比古文运动的先驱们更为公允。他赞扬建安七子，批判抑李扬杜的人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一生之中，他“明道”不成，“修辞”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曹旭）

道统 原指儒家传道的系统，后来则含有儒家传统之义。《论语·尧曰》中尧、舜传授之言，为此说之本。至唐代古文运动，韩愈进一步加以发挥。道统开宋代道学之先声。在文学观上，主张文以载道，提倡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发展到宋代，道统则演变为儒家一整套的道德伦理观念。朱熹《朱文公集·中庸章句序》：“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接夫道统之传”。道统说后来发展成为维系封建正统地位的思想工具。（张亚萍）

文以明道 唐代柳宗元论文道关系的重要观点。语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和《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两文。他说：“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这里从文学的社会功能上强调了“文以明道”。柳宗元的“道”的含义，和韩愈一样，指的是圣人之道。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说：“仆曾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在《与杨晦之第二书》中又说：“时时读书，不忘圣人之道”。但在学道的目的上又与韩愈不同，韩愈在于恢复“古道”：“愈之志在古道”（《答陈生书》），即恢复已经遭到破坏的儒家的思想传统，。而柳宗元标举的“圣人之道”，则注重现实，他要用圣人之道改革社会，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他在《送徐从事北游序》中说：“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世，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可见，柳宗元要求的“文以明道”，则是用文为现实政治服务。（樊德三）

意尽便止 语出柳宗元《柳河东集·复杜温夫书》。杜温夫是当时慕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文名，特从中原追踪到他们的贬所潮州、柳州、连州拜访求教的一位文士。复信中说：“吾

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这当是柳宗元向杜温夫所作的婉转的批评。“意尽便止”，是行文的原则之一，指文章要干净利索，一旦要说的说完，马上结束文字，不要拖泥带水，画蛇添足。这体现了行文畅達与文字利落的对立统一，又是对以表达内容为主，反对无病呻吟的创作精神的强调。

（周五纯）

文奇理正　语出唐代皇甫湜的《答李生第二书》："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又云："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文奇理正”说，是受了韩愈“尚奇”这一审美情趣和创作倾向的影响。韩愈在《送穷文》中说过："不专一能，怪怪奇奇”。皇甫湜要把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正确同艺术表现的不同凡响统一起来，使之达到“奇”“怪”的境地，体现了一种新的审美追求。但在创作实践中，他却走上了刻意追求奇异怪僻的斜路。所以清代章学诚批评他“震于韩氏之奇，而不复求其所以致奇之理”，结果只能是“袭于形貌以为瑰奇”而“外强中干”(《章氏遗书》卷八《皇甫持正文集读后》)确为中肯之论。　（胡健）

文以贯道　语出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李汉是韩愈的学生，这番话是对韩愈关于文、道关系观点的一种综括和阐释。意为用文来贯彻儒家道统。这是韩愈文论的核心，也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之一，被宋人说成“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王柏《题碧霞山人王文公集后》)。韩愈十分重视儒家的传统思想即所谓“古道”，也没有忽略“文”的重要作用。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文字暖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为了贯彻“古道”，他提倡古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打起了“复古”的旗帜。其实，文、道并提，“道”也就成了与形式相对的内容，与艺术性相对的思想性，与纯粹哲学意义的孔孟之道并不等同。因此，“文以贯道”的主张对反对形式主义文风，重视思想内容，给文学注入比较活跃的生命力，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它在我国古代散文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今天看来，韩愈在创作实践中有较多的“卫道”色彩，对散文的审美特征及其独立的价值仍缺乏足够的重视，这是“文以贯道”论的历史局限性。

（王文龙）

文之为物，自然灵气　语见唐李德裕《文章论》。它触及文学创作中的灵感问题："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常为后世灵感论者所称引。由于灵感的到来是自然而然，不可强求的，又由于在灵感状态下创作的文章总是成功的，所以他论文以“自然”为贵，而鄙薄人为的雕琢:“琢刻藻绘，弥不足贵……美质既雕，良宝斯弃。”表现了以自然为美的美学观。这可看出钟嵘等人崇尚“自然英旨”的美学趣味对他的影响。

（祁志祥）

文道合一　宋初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在“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前期提出的理论主张。柳开在《上王学士第三书》中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王禹偁《答张扶书》：“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他们都把儒家的文统和道统合而为一，确认“道”是目的，是内容；“文”是手段，是形式。文道合一，即内容和形式做到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在具体创作中，柳开重道，故文章有艰涩之感；王禹偁重道也重文，故作品平易近人。（张亚萍）

道胜文至　宋代欧阳修关于文与道关系的一种观点。语出《答吴充秀才书》：“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意在强调重视道德修养，不可为文而文，应重道而为文，即是说，思想内容正确充实，文章自然发为光辉。从这个角度看，欧阳修是以道为本，以文为末，然而学道是为了充实文的内涵，其终极目的还在于文，则重道亦即重文。这和后来的道学家轻文重道，甚至认为文能害道，把文与道对立起来，在提法上有根本区别。另外，“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与“有德者必有言”有区别，它不是说有了道（或“德”）就必有文（或“言”），即不是作为一种因果关系来说的。它只不过申明“文”之至“不难”而已，意在强调作者不应该沉溺于文而轻视道德修养。他在文中还论述了“学者有所溺”的现象：“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少）也。”这里，欧阳修指出了为文者“易悦而自足”、自囿于文的不良风气，并强调了为文者重道多学的必要性。（樊德三）

纡余委备　语见宋代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曲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语，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欧阳修的散文无论叙事、议论、抒情，写景，都能做到平易晓畅，摇曳生姿，曲折而有变化。苏洵用“纡余委备”概括了欧阳修散文曲折有致的风格特色。“纡余”，屈曲貌，见司马相如《上林赋》。“委备”与“纡余”同义，。（胡　健）

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风行水上”，语本《周易·涣》卦“风行水上涣”，孔颖达《周易正义》：“风行水上，激动波涛，故曰：‘风行水上涣’。”这是讲自然的物理。苏洵在阐明苏涣改字的理由时，借以为喻，表现了一个重要的文艺思想：“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仲兄字文甫说》）这就是风水相遇，自成文章，乃天下之至文的道理。后来刘熙载用“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来赞扬《庄子》的“缥缈奇变”（《艺概·文概》），更归结为散文创作的一种理论。总起来说，这一理论有三层涵义：第一，强调创作机遇和创作冲动。满而上浮的水有待于风的鼓荡才能形成千姿百态的波纹，二者都不是有意于成文，而又

"不能不为之文"的。第二，强调审美创造的客观条件。离开了"风行水上"，就无法形成"文"；离开了外在的美的事物，也就谈不上审美创造。第三，强调审美创造及艺术成品的自然性。从作为"第一自然"的审美对象——"风行水上"，到"第二自然"的艺术成品——"文"，其间的审美创造是出于自然，顺理成章的，艺术成品就容易达到"妙造自然"的境界。大致说来，苏洵偏重于第一点，刘熙载偏重于二、三两点。严格地说，他们对审美对象的客观性，只是着眼于物理，对艺术成品则着眼于文理，因而他们的理论与反映论或"再现"说是有区别的。（王文龙）

文以载道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关于文道关系的主张。语出《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意思是文如车，道如物，文的作用是"载道"。周敦颐在文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这里的"文以载道"与古文家所说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从表面看，似乎并无多大差别，但所指的实际内容是有区别的。以"文"来说，道学家周敦颐指的是语言文字，即发表思想的工具，而古文家则指文章；以"道"来说，道学家指身心性命的义理之学，而古文家除指儒道之外，还可看作与形式相对的内容，与艺术性相对的思想性。古文家重道而不轻文，周敦颐则表示出重道轻文的思想。他在文中把"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说成"艺焉而已"。当然，他没有完全否认文饰的作用，曾说："美则爱，爱则传"。到了程颐就变本加厉地提出了"作文害道"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与古文家相对立的观点。（樊德三）

以适用为本 宋人王安石散文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语出《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上人书》："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之容而已。"作者认为，"文"与"辞"犹如"用"与"容"。"文"指作文本意，当以实用为主，而以礼教治政的范围；"辞"指篇章之美，不过作为一种容饰。在文学的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上，他认为应首先强调内容；在此条件下，也承认艺术形式所具有的审美作用。北宋文坛，门户之见更盛，他与司马光，李觏等人，以"适用"为旗帜，既异于"学文而见道"（吴孝宗语，《优古堂诗话》引）的韩愈文论，又异于同时"以华藻宏辩为贤"（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答孔文仲司户书》）的古文家的文论，也异于"作文害道"（《二程遗书》卷十八）、"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学家文论。照此推论下去，可以较为接近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但是，他所说的"文"，既是想要"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与祖择之书》），只能是"治教令之文"，亦即书、序、说、论之类理论文，并不包括文学创作。在强调文章的现实政治教化功能的时候，排斥了作为艺术品的审美功能，这是对于散文的一种狭隘的认识，是北宋政治家文论的弊病。（许建中）

随物赋形 苏轼提出的创作原

则。语出《文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物"，指客观事物；"形"，指客观事物的形象。"随物赋形"，即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自然形态，将它真实地表现出来。这包括以下三层涵义：(一)充分肯定形似的作用，要求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二)由于事物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因而不仅要写出事物的常态，而且要写出事物的种种不同变态。苏轼在《滟滪堆赋》中说得很清楚："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他称赞唐代画家孙位画水之妙，说是"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书蒲永升画后》)，也与此意相通。(三)要求从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摆脱法度的束缚，以自然为原则自由地进行创作，真切地再现事物的特点，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的自然天成之美。"随物赋形"的创作原则，渊源于庄子"法天贵真"的审美观和《易传》"观物取象"的审美观照方法，而又有新的发展。陆机在《文赋》中提出"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又作了发挥，可能对苏轼也有一定的启示。"随物赋形"说对明清的李贽、袁宏道、袁中道、袁枚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语本苏轼《答谢民师书》："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是苏轼创作论中一个重要观点，意在强调创作风格的自然性与艺术表现的多变性的统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文理自然是同作者以客观事物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运用自如地驾驭艺术规律密切相关的。《庄子》对于"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的审美观照以及"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的造诣，韩愈对于"文从字顺"的语言要求，苏轼关于"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行文布局的经验，"随物赋形"以及合乎常理的创作原则，等等，从不同侧面昭示了通向"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一创作境界的途径。苏轼关于"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创作观点的形成，同对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的继承，对宋代新古文运动倡导者欧阳修"取其自然"(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引)的创作标准的认同，以及对他父亲苏洵文贵自然的主张的贯彻，都是分不开的。

溢为奇怪　语出苏轼《答黄鲁直》："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也。"这是苏轼散文创作的经验之谈，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法，带有普遍意义。作品的"奇"也是一种审美创造，体现了作家一种审美旨趣，"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便是一证。所谓“溢为奇怪”，还在于作品的奇处不是用巧骋奇，刻意追求，而是自然达到的一种艺术高境，也就是“奇纵高妙，变化于自然”(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张谦卿语)。它是平易与奇险的统一，自然与奇怪的统一。这既是对韩愈散文风格中“怪怪奇奇”的一面所作的适当的修正，——韩愈好用奇字，有些作品未免留下了刻削的痕迹，以至于多少流于奇险谲诡；又是对宋初“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苏轼《上欧内翰书》)的文风恰当的纠偏。在散文创作中，如能在妙造自然的前提下，兼具奇妙的构思，或不落常套的结构，或错综变化的笔法，或浪漫主义的奇情壮采等，都有可能达到“溢为奇怪”的审美境界。除了《史记》之外，从一些古文大家那里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

求物之妙　语本苏轼《答谢民师书》：“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这里概括地论述了创作的全过程，即“求物之妙”——感知阶段，“了然于心”——构思阶段，“了然于口与手”——表现阶段，从而表明了苏轼对创作规律的认识。“求物之妙”，是说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物”)的感知和把握，这是创作的第一步，是创作的契机和基础，是客观的“物”转化为作者头脑中审美意象的必备条件。“求”，即观察和研究；“妙”，是指客观事物带有特征性的属性，包括形(外形)、神(风神)、理(内在规律或本质)三个方面。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认识和把握某种客观事物的妙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苏轼用“系风捕影”来比喻和形容它的艰难、精微以及随机性。作者必须将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直觉思想三者并用，才能奏效。作为创作中第一阶段的要领，“求物之妙”不仅适用于散文创作，也适用于整个文学创作乃至艺术创作。

文如其人　初见于苏轼《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的本意是称扬他弟弟苏辙散文作品的风格与其本人志趣、性情的一致性，并不是提示作品与作者之间某种带有规律性的普遍联系的。后世多将“文品”与“人品”等量齐观，将“文如其人”引入了文学风格论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观文可以识人，即指以文观人、以言观人的可能性，或者说用来强调作家自身人格的塑造，“文如其人”说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将文学的风格与作家的品格完全等同，忽视了文学风格的特定性，抽掉了构成文学风格的“这一个”人的全部的完整的复合内涵，以致把文学领域内的风格论混同于伦理学、行为学范围里的品行说，就失去了科学性。事实上，文不一定如其人。“文如其人”说大概滥觞于扬雄的“故言，心声也”(《法言·问神》)的说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过分强调了禀赋对风格的作用，对这方面观念的影响尤大，明、清时持此说并加以发挥的

更不乏其人。但有识见的文学理论家们很早就有所注意并提出了疑问。金代元好问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三十首》）以西晋潘岳"人品"与"文品"的分离为例，对以文观人的可信性表示怀疑和否定。明末清初的魏禧在指出作品格调的可模拟性之后，断言"虽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观人"（《杂说》卷二）。"文如其人"说与真正属于文学风格学范畴的"风格即人"论也不等同。（王文龙）

绚烂与平淡 北宋苏轼提出的一对散文美学范畴。在《与二郎侄》中，苏轼说过这样一段颇富辩证精神的话："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这里指出了文章的两种美学境界，一种是"绚烂"，它是对质木无文的否定，是一种华丽精工的美，但这种美尚留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另一种是"平淡"，它是对"绚烂"的否定，但又不同于达到"绚烂"之前的那种质木无文、淡而无味，而是"绚烂"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人工化为天工的一种境界，是对"绚烂"的保留与超越，因而是一种层次更高的美，所谓"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正是这个意思。苏氏此论，受到唐司空图"浓尽必枯，淡者屡深"（《二十四诗品·绮丽》）的诗歌美学的影响，但他移之于论文，且把"浓丽"与包含"浓丽"的"平淡"视为文章创作的初级境界与高级境界，是他的贡献。后来刘熙载讲："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艺概·诗概》），虽然论的是诗，但"初关"、"重关"之说，与苏轼此论一脉相通，可见其影响之大。（祁志祥）

文章自一家 语出苏辙《开窗》。有两层涵义：一是强调作家风格的独创性，一是提倡各家风格的多样化。代表了三苏共同坚持的文艺主张。苏洵在《史论》中称赞"司马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愈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欧阳修之文"纡余委备"，"条达疏畅"等，并称赞他们"皆断然一家之文"。他从语言的气势、力度、节奏感、精炼性、含蓄性等方面把握了上述各家作品独具个性的风格美。苏轼论书画尤其重视各家不同的艺术风格，在散文创作上也强调"一家之言"。他认为"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答张嘉父书》），其原因就在于少作往往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三苏的文艺主张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成一家言"，但司马迁主要着眼于学说，三苏则着眼于风格。后来北魏祖莹说过："文章当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随园诗话》卷七引）韩愈的大弟子李翱则更明确地提出"自成一家之文"的说法，或许对三苏有更多的启发。

（王文龙）

理得辞顺 宋代黄庭坚评论文章的一种用语。它在古代散文创作和

评论中具有美学意义。语出《与王观复书》："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所谓"理得"，指文理充实而公稳，黄庭坚这里所指的"理"，有独特的含义，既不同于道学家抽象的义理，也不是一般作者直抒胸臆的情理。他既指"文理"，又包括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及人生态度。所谓"辞顺"，指文辞畅达。此语从陆机的"辞达而理举"演化而来。这里，黄庭坚把"奇语"作为文章的弊病，并且强调"以理为主"，这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又专挑出杜甫、韩愈两人后期作品，加以推崇，这不能不看出他的喜爱和倾向是在形式技巧方面。"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关心现实的倾向有所减弱，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形式技巧上，而且综观黄庭坚的诗论，并没有真正贯彻他的"以理为主"的理论，实际上，他强调的和实践的主要是"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理论。

（樊德三）

文有活法　南宋俞成《萤雪丛说》提出的观点。以"活法"论诗，始自江西派诗人吕本中。俞成把"活法"引入散文创作，指出"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所谓"活法"，即"所出，万变不穷"的创作方法。内容不同，命意不同，表达的具体方法也就不同，没有固定的方法可以死守，"活法"之"活"即是此意。就思想渊源来说，孔子尚"辞达"，即辞以达意，苏轼主张"随物赋形"、"惟意所之"，与"活法"之旨是相通的。明代唐宋即散文领袖唐顺之提出"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文编序》），与"活法"的精神一脉相承

以意役法　古人对诗文创作中"意"与"法"关系的一种见解。这是对"以意为主"的传统观点的一种发展（见"以意为主"条）。初见于金人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第二条："吾舅尝论诗云：'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后来明人袁中道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概括为"以意役法"四字。他认为，文学创作固应有"法"，但如果象明代前后七子那样"文准秦汉，诗则盛唐"，以"古法"役使己意，那就错了，只有"以意役法"，让既成的方法为表现自己的新意服务，方能产生"诗文之精光"（同前）。这种认识摆正了"意"与"法"的主从关系，是对创作规律的一种深刻的揭示，又包含着对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风有力的批判。

定体则无，大体则有　语见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体"，这里相当于"法"，指文章的写作法则。"定体"，指固定不变的法则。王若虚论文，十分推重苏轼"随物赋形"、"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些主张自然天成，不拘于法的观点，认为写文章虽有一定的法则，但只是"理达辞顺"这一十分宽泛、不拘执于一端的法则。至于一定要学习前人的句法、章法、神气、

风格，即使学到十分相似处，也只是蹈袭前人的窠臼。他提出“定体则无”，是为了反对形式主义者的死法；提出“大体则有”，是为了强调创作的基本规律。两句话互相补充。辩证统一，体现了王若虚既反对形式主义，又重视形式的散文美学思想，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

文成法立 古代散文创作的一个美学命题。元代郝经在《答友人论文法书》中阐述道：“……古之为文，法在文成之后，辞由理出，文自辞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与求法而作之也。后世之为文也则不然……法在文成之前，以理从辞，以辞从文，以文从法，一资于人而无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无法……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有法者也。”（《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三）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中也指出：“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可知“文成法立”，意即文章在根据表情达意、状物叙事的需要写成后，它所运用的方法因为符合内容表现的要求，所以是无可非议、得以成立的，是美的。它揭示了文章的方法所以为美的原因，反对把美的方法从其所表现的特定内容中孤立出来，对于打破“以法役意”的形式主义和死守古法的拟古主义，指导人们正确地使用审美的方法创作出美的文辞，具有积极意义。 （祁志祥）

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 明代宋濂关于散文分类的用语。语出《文原》。“载道之文”主要指“六经”：“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这里的“载道之文”和宋代理学家所宣扬的“文以载道”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一是具体指“六经”，一是把宣扬儒家道统看作是文学的根本任务。宋濂特别推崇“六经”，他反复强调说：“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天地之间，有全文焉，具之于六经。”“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他不仅把“六经”看作“至文”，而且还当作文的根本：“六籍者，本与根也。”既然如此，宋濂认为学文就必须宗经：“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语此也。”但是，宋濂也指出：“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除“六经”外，宋濂还对宋代理学家的文章极力推崇。认为既高于贾谊、司马迁，也高于韩愈、柳宗元，是“揭白日于中天，万象森列，无不毕见。”“纪事之文”主要指史传文：“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纪事之文”与“载道之文”对举，指从司马迁、班固开始的史传文。宋濂把“载道之文”的“六籍”当作“本与根”，而把史传文当作“枝与叶”或“波澜”。可见，他对史传文评价是不高的，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肯定：“波澜不足，则无以尽事之变”。宋濂对两类散文的褒贬，出于封建阶级正统的文学观念，是不可取的。他所作的分类也不足以涵盖古代散文的各种题材类型。 （樊德三）

文必秦汉 明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

海、王九思、王廷相等掀起的复古思潮，史称“前七子”。明嘉靖、万历年间，又出现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师承“前七子”主张，史称“后七子”。他们针对当时台阁体束缚创作，文风萎弱的时弊，以复古为号召，都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讲究格调与法度。意在从古代文风、诗风中挖掘遗产，重振明代文坛，实质上却陷入了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张亚萍）

文惟求美 明代文论家杨慎在《丹铅杂录》中提出的观点。他说：“论文或尚繁或尚简，予曰，繁非也，简非也，不繁不简亦非也。或尚难尚易，予曰，难非也，易非也，不难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恶，简有美恶，难有美恶，易有美恶，惟求其美而已。”这就是说，难、易、繁、简都不是文章的原则，只要写得美就好，不在乎是否繁、简，是否难易。他举左丘明与司马相如为繁而美的代表，举公羊、谷梁传为简而美的代表，二者风格迥然不同，但丰赡有丰赡之美，精约有精约之美。至于不美的作品，繁、简都不好。这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文章的语言风格所作的判断，实际是一种繁简并重论，可以与洪迈的繁简并重论互相补充（见《容斋随笔》条），而涵盖面更广。它比单纯着眼于语言文字的繁简论高出一个层次，是正确的，有价值的。

辞尚简要 这是明代文论家杨慎在其《丹铅杂录》中提出的观点。其大意是说，文辞只是要表达思想，到了表达清楚的地步，就是达到标准，不必要再铺采摛文，踵事增华，弄到文辞淹没了要点。他举了宋人奏章冗长，元人修《宋史》不加删节做例证，这是对症下药的论断。尚简的观点是带有传统性的，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藻饰、渲染、细描等，又自有其作用，不能把文章风格中的那种繁富，把表达感情的细微变化的文字，一律看成是退步。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思维的进步，随着人类对文学风格要求的多样化，文学作品不可能也不必要统一在“简古”这一个原则之中。杨慎则不免有偏颇之论，他认为宋文不及唐文，欧苏曾王不及韩柳，韩柳又不及班固、司马迁，班固、司马迁又不及孔子所作的《春秋》，这与他同一书中所提出的“文惟求美”的观点自相矛盾。（周五纯）

童心说 明代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集中体现在他的《焚书》卷三《童心说》，贯穿于整个文论之中。“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而非“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他强调作家的真实情感对于艺术创作的极端重要性，旨在艺术个性的培育和发展。他主张艺术创作应出于自然真实，反对复古摹拟。寻行数墨，追求字句之奇、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如此种种，只可语“文”，而不可语于天下之至文；“化工”与“画工”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情感体验是否纯真、深刻（《杂说》）。他强调艺术作品自然之美的观点，包涵了反对内容上的虚伪和形式上的雕琢两方面的意义。他认为创作是随着

时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因此，他反对恪守陈规而丧失自然真实的复古思潮，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主张“自然发于性情”（《读律肤说》），反对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只有真实的情感才能产生“自然”的作品，而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自然之作，无不表现出作家自身的创作个性，“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论政》）；世之真能文者，乃“蓄极积久，势不可遏”，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杂说》）。而宋明理学“以我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李贽的“童心”说远绍黄、老“无为”思想，近承陆、王“良知”心学，于唐宋派“自为其言”（王慎中《与江午坡书》）、“直写胸臆”（唐顺之《与洪方洲书》）之后，独树一帜，代表了既区别于复古主义的摹拟因袭，又区别于封建道统的代圣人立言的文艺新思潮，对晚明散文美学思想及整个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许建中）

文必程古，见必超妙　明代屠隆提出的在散文创作中既坚持法古又力图独创的主张。语出《文论》：“夫文不程古，则不登于上品；见非超妙，则傍古人之藩篱而已。”意思是，创作如果不以古文为程式、范本，作品就不会成为上品佳作，但是，创作中如果没有超妙的见识，作品就会限在古人的框子里。屠隆认为“六经”是“文章之大观”，“风骨格力，高视千古”，难以逾越，因此，创作必须以“六经”为程式、为模范。但是屠隆认为学古中又要有自己的卓见。他说：“高足远览，洞幽极玄，以特立于千载之下，与古人并驱而前，分道而抗旌”，并且要“标异而出之，立于太古之上”。屠性这种既要法古又要独创的观点难免矛盾，其论说不能自圆其说，但对李梦阳的一味模古的主张是一种突破。

（樊德三）

辞主乎达，不主乎简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他认为文章最首要的原则是“达”，要恰到好处地表达思想内容，不是文字越少越好。他举了正反两方面的例证来说明。一是刻意求简，简到同时代人、后代人不易理解乃至不理解的地步，非要旁人加注才能读通，这是求简而得繁；二是举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有馈生鱼于郑子产》二章为例，其中齐人妻的重述、子产校人的重述，形式上看起来都与上文重复，但这恰恰生动地表达了齐人妻的疑惑和校人不理解子产而自以为聪明的神态，这是不能简的。如果单追求文字之简而失文章神气，那就是因小失大。这种繁简并重论，始于南宋洪迈，顾炎武上承其说，对后来的钱大昕等又有一定影响。“繁丰简约要看实际的成就如何，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可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繁简

并重论是比较公允、通达的。

(周五纯)

义法 桐城派初祖方苞提出的写作散文的一种美学理论。"义法"一词原出于司马迁的《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则撷取《周易》中"言有物"、"言有序"两语作为《史记》中"义法"的诠释,并以此比附成他的文学主张:"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可见,"义"指有充实的内容,"法"指好的形式。方苞这种从内容与形式统一角度去论文,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他这"义"实指内容要符合儒家传统思想,"法"实指形式要符合《四书》、《五经》、《史记》及唐宋古文家的文章规范。因此,方苞的"义法"说,是典型的封建正统派文论。而且以"义法"论文,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姚鼐曾指出:"望溪(方苞号)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与陈石士》)。

(樊德三)

雅洁 桐城文派初祖方苞提出义法说,论文强调"有物""有序",法与义相结合,又提出"雅洁"作为义法的标准。他认为只有清真雅正,谨严朴素,"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精光"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他在《书萧相国世家后》中说:"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辞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此处所谓雅洁,正是法随义生,法与义相合的意思。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称引方苞的话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据此,"雅洁"也含有刊落浮辞,删繁就简,在语义上汰去一切杂质的意思。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中说:"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近俚","伤于繁",都不合雅洁的要求。可以说,创造澄清雅洁的散文,是桐城派散文的共同风格。但是,依照这样严格的清规戒律,很难写出驰骋议论、气魄宏伟的文章,写出的文章虽雅洁,内容却空疏薄弱。袁枚认为"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推之为"正宗",而贬之为"才力薄",正说明了方苞在实践他的主张方面所表现出的缺陷。 (胡健)

沉著痛快 清人郑燮(号板桥)关于文艺美学的术语,是他对于文学创作审美理想的基本概括。见《郑板桥集·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文章以沉著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这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在审美理解方面,坚持继承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认为应该"立功天地,字养生民",反对无"一句道着民间痛痒",如若"门馆才情,游客伎俩,只合剪树枝、造亭榭、辨古玩、斗茗茶,为扫除小吏作头目而已,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在艺术创作方面,主张自树旗

帜，富于独创，反对因袭，主张“以天地万物为心”，“标新领异，指画目前，绝不受古人羁绁”。如若“扯东补西、提张拽李，皆拾古人之唾余，不能贯串，以无真气故也。”在作品风格方面，强调直率地抒发作家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情感体验，主张“秉笔而快书”，说破道尽，反对刻意追求所谓“不尽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含蓄蕴籍的艺术风格。绝句诗、小令词，必以意外言外取胜，但诗文如专以意外言外为能，则“自文其陋，可笑也”。因此，郑燮认为只有完美地体现“抽心苗、发奥旨、绘物态、状人情，千回百转而卒造乎浅近”的创作原则，“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断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才能创作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散文作品。他的理论发展了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美学思想，坚持从古代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倡导个性创造力在散文中畅酣地表现，坚持真、善、美三者在散文创作过程中的融合，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许建中）

大乘法与小乘法 清人郑燮以禅论文使用的术语。本义是“大乘的方法”与“小乘的方法”，由于中国佛教界普遍崇大乘教抑小乘教，所以又有“高明的方法”与“低劣的方法”之意。郑燮在《与江宾谷、江禹九书》中说：“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五经》、《左》、《史》、《庄》、《骚》……韩、柳、欧、曾之文……所谓大乘法也。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六朝靡丽，徐、庾、江、鲍、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谱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拈断黄须，翻空二酉，究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佛教中的大乘与小乘，在认识论，修行的方法与果位等方面都有区别，如大乘主张“普渡众生”，小乘只主张“自我解脱”，大乘如禅宗的修行方法简单易行，小乘的修行方法则比较繁琐，且证得的果位还不及大乘高，郑燮把“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的“易而有功”的创作方法叫作“大乘法”，把不问“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而尺尺寸寸于声色格律、只管自娱的“劳而无谓”的创作方法称作“小乘法”，与佛教中“大乘法”与“小乘法”的涵义是相通的。郑氏以禅论文是受宋人以禅论诗的启发与明人以禅论文的影响，他把美与真、善相兼的作品同唯美的作品划为高下不同的两个层次，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

（祁志祥）

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清代桐城派散文家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提出的文章八大要素。其中，“神、理、气、味”属于文章的内容，“格、律、声、色”属于文章的形式。姚鼐对这八要素的内涵没有明确的解释，结合姚氏的整体文艺思想，联系方苞的“义法”论与刘大櫆的“神气”说，大致可以这样理解：“神”是精神，“理”是义理，“气”是气势，“味”是感染力，“格”是结构，“律”是法则，“声”是音韵，“色”是辞采。姚鼐指出它们的关系：“神、理、气、

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神、理、气、味”较“格、律、声、色”在文章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然而，“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格、律、声、色”作为“神、理、气、味”的表现形式，也不能轻视。他还指出：学习古文辞的方法，第一步是接触“格、律、声、色”，第二步是接触“神、理、气、味”，第三步亦即最后一步是“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自方苞提出“义法”说以后，刘大櫆提出“神气音节”说，这是对“义法”论的发展，姚鼐又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这是对刘大櫆“神气音节”说的深化。

（邵志祥）

阳刚阴柔 清代姚鼐关于散文风格美的一种理论概括。“阳刚阴柔”说是对桐城派古文家在散文风格美学理论方面的总结。文章风格的区分，开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以后的文论家也有论述，而姚鼐则把它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说：“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中还用一系列的形象比喻说明这两种风格美及其在语言艺术上的特色。属于阳刚一类的，如掣电流虹、喷薄出之，以雄伟劲直为尚；属于阴柔一类的，如烟云舒卷，蕴藉出之，以温深徐婉为贵。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则认为“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即不能算作成熟的风格。姚鼐不仅阐明了阳刚阴柔的区别，而且还指出了两者对立统一的关系。他在《海愚诗钞序》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阍幽，则必无与文者矣。”但是，姚鼐对阳刚阴柔两种风格美并不是等量其观的。他指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可见姚鼐是偏爱于阳刚的风格美的。姚鼐这种“阳刚阴柔”说，从美学上看，是一份宝贵的遗产，但是，不可否认也有某种程度的唯心的消极因素。（樊德三）

即物明理 清代刘大櫆《论文偶记》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刘氏以“义理”为文章材料之一，但他从“神远而含藏不尽”即文章的审美意味出发，提出表达义理的方法：“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这接触到文学的形象思维特征。作为一种审美的创作方法，“即物明理”是值得肯定的。

即事寓情 清代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提出的一种写作方法。刘氏以“神气”论文，他的“神气”是包含创作主体的情感的。散文也要传情，但从“含藏不尽”这个审美的角度出发，他要求对情的传达要象《史记》之文那样：“情不可以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寓情，这是诗歌创作的常用方法；文章以叙事为主，故“情”只能寓于“事”中。刘氏提出了在创作中处理客观的“事”与主观的“情”之间关系的正确方法，同样接触到形象思维特征。

文贵奇 清代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刘氏说：“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

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奇，正与平相对。气虽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谓奇。奇者，于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韩愈散文有“奇”的一面，其弟子皇甫湜则片面地发展了这一面，走到了追求奇异怪僻的极端。刘大櫆论文尚“奇”，与韩愈是有关系的。他的创作也如此，气势较方苞、姚鼐为盛，字句上喜用铺张排比，颇有一种雄奇的风格。

文贵变 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说：“文贵变。……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刘氏此论，把《易》经传中的发展变易观引入散文创作领域，对于防止散文创作中千篇一律、僵化单调的弊病，是有积极意义的。苏轼在主张文贵自然的同时，也提倡“姿态横生”，与文贵变的观点相通。不过，苏氏着眼于自然与变化的统一，章氏则着眼于审美创造中构思、结构、语言、神采、形象等多方面的变化，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神气 语见刘大櫆《论文偶记》。刘氏认为，“义理、书卷、经济”是行文的“材料”，光有它还构不成文章，它得靠“神气音节”的结构布置才能成就文章。因此，他以“神气音节”为行文之“能事”。在“神气音节”中“音节”只是“神气”之迹，故“神气”为行文能事中的核心。行文之道，就是要以“神气”为主。在“神气”中，“神”又占主导地位，“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所谓“神”，是指作者的思想情感；所谓“气”是指语言的气势，体现了作者的生命力量。刘氏以“神气”论文，表现了对创作主体思想情感和生命力量在审美创造中的首要地位的自觉。

才、学、识 人对文学创作主体提出的特殊要求。作为对散文作者主体素质的要求，约始于明袁宗道（《论文》），以清章学诚的论述最为详备，影响也最大。章氏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指出：“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按章氏对“文”的理解，“古文辞”皆“由史出”（同前），所以“史有三长”，不妨理解为一切散文作者都有“三长”。《文史通义·文德》说：“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在《答沈枫墀论学》中，章氏又说：“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可见“才”是一种创造力，“识”是领悟力的表现，是独到、非凡的思想，“学”是各种知识的积累。章氏还论述了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有才能的人还需要学习，学习尤贵有见识。天生有才而不勤勉学习，这种人只能成为“小聪明”，“小聪明”再加上没有见识，最终只能成为没有才

能的人。"才"、"学"、"识"，三者交相为用，缺一不可。

客笔主意，主笔客意 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提出的命题，它论及散文创作中主、客体描写的辩证统一。"客笔主意"，指文章在状物叙事、描写客体中要寓含主体精神，刘氏称司马迁《史记》对历史事件、人物的描写"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又说"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即是此意。"主笔客意"，指作者主体精神的表现不能离开对客观事物的描写单独进行，否则便直露。这个意思，大致与清代前期刘大櫆所说的"理不可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论文偶记》）精神相通。

情生文，文生情 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里提出的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揭示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作者情生文"；第二个命题揭示了文学欣赏的规律："读者文生情"。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作者情生文，故读者文生情。"刘氏此论，是对刘勰思想的继承。《文心雕龙·知音》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不过刘勰所说的与"情"相联系的"文"兼指诗文，刘熙载这里说的"文"完全是指散文。他把"情"与散文的创作与欣赏密切联系起来。值得重视。

结实与空灵 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提出的一对美学范畴。《文概》说："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著于一偏。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结实"与"空灵"，约与前人论诗时讲的"沉著"与"清空"两种风格相类。它们虽各有其美，但又各有不足。倘一味"结实"，便有质实之嫌；倘一味"空灵"，便有空廓之弊，故刘氏主张"结实"与"空灵"交相为用。他所赞美的韩愈散文，就是这种典范。

（祁志祥）

情与理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也是古代散文美学范畴。"情"，一般指情志、感情；"理"，一般指道理、事理以及作品所包容的思想内涵等。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曾出现"言志"和"缘情"，两种创作主张。"言志"派注重作品的思想性，"缘情"派则注重作品的情感性。两种倾向虽然不同，但也不是截然对立。主张"言志"的荀子在其《乐论》中也注意到情感对作品的重要性；主张"缘情"的陆机也说过"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话。大多数古代理论家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理"与"情"二者的辩证关系。有的甚至将"情"、"理"二字连用，以至于互相代替。《文心雕龙·体性》篇说："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这里互文见义，"情"即"理"，"理"即"情"，都指文章的内容。到了宋代，由于思辨科学的发展，重"理"的倾向大大加强。文章和诗歌中"理"的成份增加了，议论、讲道理多了起来。后人有"唐诗人主情，宋诗人主理"的说法。这里的"情"指情韵；"理"，则指哲理、道理。到了晚明清初，情理之争达到高

潮，主“情”反“理”的呼声很高。这时的“理”，专指道学家所主张的束缚人们情性的“理”，因此，主情派战胜主理派是自然的结果。后来，“情理”交至的观点又流行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说：“作诗之法，情胜于理；作文之法，理胜于情。乃诗未尝不本理以纬乎情，文未尝不因情以宣乎理。情理并致，此盖诗与文所不能外也。”（邹祗谟《与陆荩思》）这里指出了诗与文在表情达理方面的异同，是颇为中肯的。（周五纯）

古文写作

写作总论

义法 古文作法语。清代“桐城派”提出的古文写作准则。首倡者是方苞。义，指内容，要求“言有物”。包括褒贬美刺、见识论断、寄寓等。法，即指形式，要求“言有序”。包括文章布局、章法、叙事记人的要求、语须雅洁等。符合义法要求的文章内容须充实得体，言之有物，形式上必须按《四书》、《五经》、《史记》或者唐宋散文大家之作文模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著《春秋》曾“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故桐城派方苞认为“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司马迁）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见《方望溪先生文集·又书货殖传后》）。义法以“雅洁”取文。雅洁文，在章法上“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用语上要求“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等。义法因陈规戒律太多，步步作缚，故文势翕张且波澜曲折者不多。义法之内容与宋代程朱理学、明清八股文有一致性。

文眼 论写作语。文眼，指文章脉胳之眼线，即“画龙点睛”之“睛”。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揭全文之指（即主题思想、主旨），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必后之，在篇末则必前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揭全文之主旨，不限于篇末，位置应视情节发展、人物性格的变化、内容的开拓等安排在关涉全局的吃紧处，这便是文眼所在。篇首点题，如清人梁启超所言，“文章最要令人一望而知其宗旨之所在，才易于动人”，关键是要兼顾（照应）下文，否则旁生枝节，泛入闲事，前后脱节，也是败笔。同理，篇末设文眼，则必须前注（即预伏）之。篇中自然要瞻前顾后，起承接贯穿作用。

四法 章法用语。指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四法。语出元范梈《诗法》：“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

春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后也用以称文章结构之法。四法须要贯通，并非后法专注前一法而不顾他法。清刘熙载《艺概·经文概》：“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参见“起承转合”。

主脑 写作术语。主脑即为文主旨。清刘熙载《艺概·文概》：“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主脑既得，则制动以静，治烦以简，一线到底，万变不离其宗，如兵非将不御，射非鹄不志也。”主脑对文章材料的取舍加工、语言的熔炼运用、结构的组织安排等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所谓“一线到底”，指中心思想是全文之“灵魂”、“主脑”，如果枝蔓旁出，意多纷繁，文章无凝聚力，行文必松散，不能很好地表情达意，更不能深刻地表述作者对事物或问题的理性认识。

立意 写作术语。作者对某人某事有所触动后，开始构思、设计，提炼和确立意脉，并用感情编织语言和经营文脉，这就是立意。“意犹帅也”，立意高低或好坏关系着文章好坏。作者借助联想、想象、事实、人物、情节等进行创造性构思，在不断提炼、完善的过程中锤炼主旨，并力图使它更鲜明、更深刻。立意要精练集中，“意多乱文”，会模糊主旨。立意贵有独见，要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所谓“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出新意、去陈言”，不可傍人壁立，自缚前人枷锁。立意，即是炼意，需要苦思，也需要启迪和灵感。真知灼见也是从平素真积力久（知识酝酿、才能酝酿、生活酝酿）中来，既靠积累，也靠锤炼。立意与学识修养、品德胸襟有关，见地高，命意自高，才能在剖析社会、审视生活中独具慧眼，发现层次更深而未为人发现和道出的新意。（林 岫）

破题 论写作语。指作文首端就点明题意。唐宋时称一般诗赋的开头部分为破题。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评梅圣俞《赋河豚鱼诗》说“诗者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称八股文的开头两句为破题，后成为一种固定的写作程式。在写作中，破题也有“审题”、“点题”的意思，包括对题目的分析、解释等。

章法 写作术语。文章布局谋篇的方法，包括文章的体势、承转、熔裁等。一篇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就应考虑如何安排文章的结构，例如何处预伏，何处照应，如何擒纵，如何收束等等。这就是文章的章法。它是人们长期写作过程中经验的总结。常见的章法或称起承转合，或称首尾照应等，可具体到疏密、呼应、详略、悬念等问题。研究古代文章篇章结构的组成、性质及其作用最佳化规律的学科是古文章法学。体裁不同，文章的章法也有所不同。如记叙文中有顺叙、倒叙、插叙，说明文中有先合后分、先分后合等。章法无定格，关键在于作者匠心独运。体势合理、熔裁精妙、承转自然的章法加强了叙述和说理的条理性、逻辑性，就能使文章浑然一体，

并且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表现力。

（王一娟）

六字法 论写作语。语出自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乔梦符吉（即乔吉，字梦符，元代散曲作家）博学多能，以乐府称，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所谓"六字法"，即凤头、猪肚、豹尾。文论家也多用来论古文写作。

文贵远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刘大櫆《论文偶记》："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或出者少，不说出者多，乃可谓之远。"文贵远，意指作文立意贵深远、深邃，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一定能含蓄。所谓"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就是说要意在言外，启发读者去联想、去思考、去玩味，说出来的话语虽少，但表达的意思却很丰富，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就是"远"，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白 迪）

文贵完 论写作语。完，即完整，指文章要首尾圆合，浑然一体。清代林纾在《春觉斋论文·忌繁碎》中提出"完者，首尾有起讫，简接有法度，叙述有去取，言词有分寸，成为整篇文字，斯亦可以谓完矣"，"完"还包括内容与形式完美和谐统一的问题。"完"与"繁碎"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首尾叫应又圆融一体，张驰断续合乎法度，叙述讲究详略又举重明轻，语言精炼又表达准确，与"行文涣溢而漫无结束者"正好相反，这样的文章可称"完者"。

立主脑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李渔《闲情偶寄》（卷一）："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意思是作文要确立一个主题思想。主脑、即意脉、主旨、中心思想。古人对立意十分重视，清人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即"主题如同一军之题，无帅之兵，叫做乌合之众"）。两句意思一致，可互作参证。

减头绪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李渔《闲情偶寄》（卷一）："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事多则关目亦多，令观者如入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作传奇者，能以'头绪忌繁'四字刻刻关心，则思路不分，文情专一，……"后来文论家将此拈出多论作文，即要求叙事或议论要突出主线，意杂语乱，泛入闲事，旁生枝节，反而会影响主要人物或事件的叙述，或者冲淡主要论点的论证。

密针线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李渔《闲情偶寄》（卷一）："编戏有如裁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节。顾前者，欲其照应；顾后者，便于埋伏。照应、埋伏，不止照应一人、埋伏一事，凡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

说的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针线，是指起伏照应。密针线，指文学作品中事件的起伏和前后的照应要严密。这段话原说戏剧创作，后人也多用来评论文学创作。例如叙事，情节发展也须环环相扣，何处伏应，何处断续，离合悲欢，张弛有道，均顾及主脉，结构紧凑严密，方能圆融为一个整体。

（林 岫）

三十二法 论笔法语。胡怀琛编《古文笔法百篇》（言文对照）中选古文百篇，分为三十二法，即事理辩驳法、一字立骨法、感慨生情法、抑扬互用法、逐层推论法、严婉并用法、一气承接法、虚境实写法、跌宕取神法、夹叙夹议法、纯用叙述法、匣剑帷镫法、驭繁以简法、复笔取神法、虚字取神法、写景琢句法、先喻后证法、步步传神法、用笔矫变法、步步停顿法、起讫不平法、结处点睛法、小题大做法、三段分叙法、谐笑讽刺法、前后叫应法、正喻夹写法、措词得体法、狭题宽做法、两两比较法、托物寓意法、宽题狭做法。这是在研究古文作法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对阅读、研究古文的读者有参考价值。 （白 迪）

三番来者 写作经验语。语出自元人陈绎曾《文说》：“戴师初先生曰：‘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之不可用；第三番来者，精意也，方可用之。’”发意，指思绪勃勃之构思时。第一番来者，即首先想到的，多是前人所发之言，作文立意贵新，故唯陈言之务去，要写出有价值的新意作品必须将陈言“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是不新不旧的比较合适的文辞和想法，宁可放弃而不用。待精思之后，第三番来者则是精意（即炼意后之主意）。精意，在创意造语上均有自家面目，不步踵前人，能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立意既深远又新颖。能用“第三番来者”，文章必然与众不同。

文之要三 论写作语。清人刘熙载《艺概·经义概》：“文之要三：主意要纯一而贯摄，格局要整齐而变化，字句要刻画而自然。”刘熙载认为著文在主意、格局、字句三个方面最要注意。主意，即文章要叙述或说明什么，今称中心思想、文章旨意。著文不可单说一端，但最核心的内容必须清晰，不可头绪纷杂，而且主意犹如主线，须贯穿文章始终，素材的剪裁、着墨的轻重均视主意需要断定。格局，即样式、结构布局，文章结构的设计和安排必须要首尾圆合，整齐统一，而且整体布局的考虑、起笔收尾的安排、层次段落的设计等要富于变化，既眉目清楚，层次分明，又勾前呼后，浑然一体。字句，指字词造句方面的要求，字词造句要描述精细，但贵自然。信手拈来，刻画又神味俱厚，无意晦语涩之病，方见作家心手之妙。

文法有四 论写作语。清代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说“魏叔子（清代文学家魏禧）论文法，析而为四：曰伏，曰应，曰断，曰续……伏处不必即应，断处亦不必即续，此要诀也。”这是一种对作文之法的概括说法。伏与应，断与续，均能使叙述波澜纵横，别开生面，增强表现效果。伏得要巧，

应不必立即呼应，可制造悬念，引人入胜，应时自然带过，如风拂树林，有声无痕，与预伏暗暗相扣。断在巧处，续也不必即续，可使文意顿挫，耐人寻味，当续时即续，所谓“续在好处”，自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林纾认为，这些都是作文的要诀。

（林 岫）

文章三易 写作要求语。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沈隐侯（即梁代沈约）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意指作文要通俗易读，不可故作艰深，雕削取巧。易见事，就是叙述说理显而易见，平顺易晓。易识字，就是不用怪僻难辨之字。易读诵，就是著文喻深以浅、喻难以易后，文章容易读诵，自然有利于理解和运用。

（白 迪）

古文十弊 论写作语。语出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作者针对当时文人存在的作文弊病提出了自己在作文和辞章学方面的观点。古文十弊：其一是“剜肉为疮”。意指要了解古文的作法、体例，必先认识古文大义而文辞工拙可在其次，万不可妄加雕饰，如在冰雪肌肤上剜肉为疮，弄巧成拙。其二是“八面求圆”。意指作文要识大体，即使《春秋》记载亲近人的事，也不忌讳写不足之处，古人作文叙事不嫌于得失互见，如果叙一人之事，要兼顾上下、左右、前后之人皆无小疵，如八面求圆，触手皆荆棘，就太难了。其三是“削趾适屦”。意指作文要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不能为了仿古人作法，临文摹古，以至削足适履，使内容残缺或失实。其四是“私署头衔”。意指作文不可援附空名，高自标榜，自诩与某某齐名，借人炫己，如私署头衔。其五是“不达时势”。意指作文要了解背景，褒贬要符合实际情况，不可不问时势，妄作断语。其六是“同里铭旌”。铭旌为古时丧礼用的一种专书死者姓名职衔的旗幡。昔有好袭头衔的自夸之人，将死前召友人筹计铭旌题字，有讨好迎合者择其乡中显贵，书显贵衔后为“某公同里某人之柩”。这里指作文中搞无端影附以自我标榜者，如同“同里铭旌”。其七是“画蛇添足”。意指作文要真实，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或有关考证，必须原本具有，即使闲情逸出，也正为“阿堵传神”，不可凭虚乱演。其八是“优伶演戏”。意指作文要注意记传语言的真实，名将起于卒伍，义侠或奋闾阎，不必出口皆锦绣文章，与其文而失实，还不如质以传真，否则就成了优伶演戏，连耕夫役隶脱口而出的都合乎乐调，使文章失去了真实性。其九是“井底天文”。意指作文有活法，未尝有定格，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法之中有定法，塾师讲授四书文义，因法度难以空言，往往取譬喻以示蒙学，若动辄以启蒙议论进窥一切古书文义，则如象棋枰布围棋子、井底谈天文一般荒谬可笑。其十为“误学邯郸”。意指古人之书，文见于史传者极多，选家也多从史传中采录，因不知史传辑文往往有删，便妄评其文章开端结尾如何绝妙，后学者必欲作而致之，易于受惑，而不知文

章起结皆发于自然，就象误学邯郸步一样"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以上十弊，对学习古文写作和阅读古文赏析著作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林 岫）

龙门笔法 笔法语、修辞语。通常指绝妙笔法、科举考场常用的传统笔法。龙门，科举考场之正门。清代陆以湉《冷庐斋杂志》说史传常用夸张手法，"史传有形容失实之语。如《史记·蔺相如列传》记相如持璧却立，倚柱，则曰'怒发上冲冠'；《赵奢传》记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则曰：'屋瓦尽振'；《项羽本纪》记羽与秦军战，则曰：'楚兵呼声动天'；皆摹状传神之笔，事虽虚而不觉其虚，弥觉其妙。此龙门笔法，所以独有千古也。《晋书·王逊传》袭其语而增一句曰：'怒发冲冠，冠为之裂'，则近于拙矣"。形容失实，就是指夸张过分到不合情理，则是拙笔、败笔。这里的"龙门笔法"，指在夸张这种修辞手法中最为精妙的。（白 迪）

未尝敢四 写作经验语。唐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论写作时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柳宗元自述作文时，一不敢掉以轻心，随意纵笔，怕文章轻浮而欠深沉；二不敢有懈怠之心，草率动笔，怕文章松散而乏严谨；三不敢思绪杂乱，盲目下笔，怕文章隐晦而生歧义；四不敢骄矜哗众，意气使笔，怕文章疏狂而反情理。

（林 岫）

用笔八则 论写作语。语出自林纾《春觉斋论文》。说作文（偏重叙事之文）笔法有八则。一为起笔，强调精警在前，然后转归平淡。二为伏笔，又称伏脉，主张首尾圆合，预伏要在巧处，叫应要在好处，唯善伏方可得后文之显豁。三为顿笔，主张"神妙者于顿笔之下并不说明，而大意已包笼于一顿之中"，文有顿笔，方有文势。四为顶笔，类同今称"逆笔"，须谋篇时先作布置，宜后者反先，宜直者反曲，裁量某处吃紧则故意雍容其态。五为插笔，文中插入可作交待、补充之用。六为省笔，类同今称"略述"，认为"详处非难，省处难"，数语带过，作一点醒，便能清人耳目，省笔可从篇章、句法、字法处着手。七为绕笔，谓曲绕渡川之笔，可使文章曲折波澜，无直率之病。八为收笔，说文章结尾之法，举《史记》诸传为例。

用晦之道 论写作语。用晦之道，是讲作文含蓄之法。语出自唐代刘知几《史通·叙事》："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即说"晦与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赅，片言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显，即浅白，繁词缛说，和盘托出，不给读者留下一点任想象驰骋的天地。晦，即含蓄，语言精炼而意蕴深远，可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吟味，从而领略文章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二者之优劣，是显而易见的。含蓄之道，就是要略小存大，举重明轻（抓主要的，牵带一

般），语言精炼而描述事物大小俱备，全无遗漏（即穷形尽相）。（白 迪）

交友公鉴 写作经验语。指文章要反复琢磨修改，除自己斧 外，还可以请友人指出瑕疵。语出自唐白居易《与元九书》："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宋人吕东莱也说过初学作文"须广以示人。不可耻人指摘疵病，而不将出。盖文字自看，终有不觉处，须赖他人指出"（见叶元垲《滏吾楼文话》）。如宋代范仲淹写《严先生祠堂记》，初稿文尾原有一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写完后请教李觏（1009～1059，北宋思想家），李认为"德"字承云山江水未免失之板，建议换作"风"。一字之易，令歌生色。"风，犹孟子故闻伯夷之风者之风，正与上'贪夫廉，懦夫立'六字相关应"。交友公鉴，实际上是在小范围内接受第一批读者的批评和评价。要提高写作水平，"不可耻人指摘疵病"。这对今天写作也有借鉴意义。

先标三准 论写作语。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 裁》说："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这是论作文立意和剪裁的精辟语。"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皆借《左传·文公元年》语，分别表示首先、其次、然后的意思。此段意思是，当思绪勃勃而进入构思时作者常为文辞纷乱而来感到无从下笔，内心不能如秤一般准确，用辞轻重不合适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起草写鸿笔巨制之前要先立三项准则：首先，立一篇之主意，并根据主意确定文章体裁；其次，研究分析素材，并决定取舍和提炼题材；然后，选择和编织合适的文辞来表情达意。

作文八简 写作经验语。清代刘大櫆《论文偶记》认为，文章贵简，"简为文章尽境"，提出了作文"八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意思是说，凡文笔老练者、表意真切者、言语确切者、述理精当者、文风淡雅者、气宽蕴深者、品格古朴者、寄托远而韵味隽永者，才能真正达到言简要而事详博之佳境。（林 岫）

作史三长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3）："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意思是说，写史书须具备三个优势，即才能、学问和识见，缺一不可。写诗也是如此，其中要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的是识见。袁枚在《答兰垞第二书》中说"作史者，才、学、识缺一不可；而为识尤"，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见解是一样的。

作文三备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人李扶九选编、黄仁黼纂定《古代笔法百篇·曲折翻驳》中明代郭子章

《管、蔡论》一文的评解："文章有翻案一法最为新奇，然此不易作。先要有识，识者得题之间也；次要有笔，笔者议论出奇、层层批驳也；三要有书，书者引证得切合也。如此文三者备矣，故尔足传。然识、笔、书三者，即一切题作之要备，方足观也，不止翻案文而已。"说作文须先有识（真知灼见），其次要有笔（文笔），三要有书（引证据古，有充足的理论根据）。没有平素真积力久的功夫（包括学识和表达技巧），没有力排众议的识见和充足的论据，是写不好文章的。翻案文如此，作其它文也是如此。（白　迪）

作史之病　论写作语。语出自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19）："《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新唐书》文辞刻意求简，故述史实时常有交待不清楚之处，不如《旧唐书》保留很多原始资料更有价值。这本是刘器之评欧阳修、宋祁等人编纂《新唐书》的话。郁，即隐晦。此话意思是说，《新唐书》叙述历史事件，好用词过于简略，所以叙事大都隐晦而不清楚，这是写史书之毛病。（林　岫）

体有六义　论写作语。体，指作文的基本原则。义，指作文的具体要求。语出自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即师法前贤的经典著作。刘勰在这里提出学习古代前贤的经典著作，落实到文学创作中要注意的六项具体要求。一是感情深挚而不虚假，二是风气纯正而不杂乱，三是叙事可信而不荒诞，四是说理正确而不歪曲，五是风格简朴而不繁缛，六是文辞秀丽而不过分。这六项要求涉及写作的内容、技巧、风格和美育作用等各个方面，对阅读、研究古文和指导写作都有参考价值。

抑扬四法　笔法语。抑，即收束、按下。扬，是放开、扬起。有抑有扬，文章上下起伏，文势昂扬，能增强艺术感染力。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抑扬之法有四。曰欲抑先扬，欲扬先抑，欲扬先扬，欲抑先抑。"抑扬交互使用的只有前两种。欲抑先扬，重点是要抑，抬高是手段，跌下来是目的。欲扬先抑，重点是要扬，先写困惫失意、缺点不足等，后写通达得势、功业成就等，前后形成对照，最后达到肯定或赞扬的目的。可参考有关词条。

应知八则　论写作语。语出自林纾《春觉斋论文》。论写作必须注意的八个方面的问题。一为意境，说造境须先立意，下笔之前须心胸朗彻，有平素的酝酿和积累，一有触动便会文字自出笔底，反对每构思一文就虚构一境。二为识度，说作文要有识见，还须识法、辨别法度，在博涉诸家的基础上决定去舍和汲取，反对自有文病又加之古人陋习。三为气势，说文贵气势，气要旺，势要蓄，形散神涣之作则无气势。四为声调，行文的起伏、波澜、曲折等应与感情交汇，写真情实感（非仿古人），文意抑扬顿挫，必能感人。五为筋脉，说文章结构的策

划与安排。六为风趣，说作文要讲辞趣，举"一字成趣"，有精辟之见。七为情韵。八为神味。后二则有相似之处，主张文如作诗、作画，神韵必不可少。以上八则，对欣赏古文和指导写作有参考价值。

陈言务去 论写作语。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昌黎（即韩愈）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此语对唐以来所谓"陈言"作了比较全面的释解，并提出了新的见解。通常以"剿袭古人之说以己有"者为陈言。刘熙载却认为陈言未必仅限于此，如果识见、议论落于俗套和流于一般化，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没有独自的高见和新颖的意境，在结撰文章的大手笔（即"结撰至思者"）看来，都是陈言。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去陈言，非止字句，先在去熟意；凡前人已道过之意与词，力禁不得袭用；于用意戒之，于取境戒之"，认为熟意是陈言，也在"务去"之列。这些见解对阅读古文和指导写作都有启发性。 （白 迪）

初欲奔驰 写作经验语。宋欧阳修《与渑池徐宰》主张"作文之体，初欲奔驰"，意指初学写作时可以奔放一些，不必步步设防，束缚太多。宋谢枋得《文章轨范》也说"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小心——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一开始"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矣"，先写"放胆文"，待比较成熟后再渐入纯粹。这对初学写作者有指导意义。（林 䌷）

形散神聚 论写作语。这是对散文主要特点的概括。"形散"指散文的取材广泛，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写一人、一事、一个场面、一种情绪，也可以写人物的某个侧面或人物群象；可以写古今人事。在表达方法上也比较灵活，可以以记叙为主，也可以以抒情为主；可以描写人物形象，也可以发表议论，或二者兼而有之。"神聚"指散文的立意要求明确而集中，意脉贯通。无论散文的内容多么广泛、表现方式多么灵活，形散神不散，都要突出主旨，为表现文章的主题服务。 （王一娟）

法识相依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叙事要有法，然无识则法亦虚。论事要有识，然无法则识亦晦。"意思是说，叙事要讲笔法，但是若无真知灼见，笔法如同虚设。议论事理要有识见，但是若不讲笔法，真知灼见也不能清楚准确地表达出来。法识相依的观点，实质是说内容与形式要尽可能完美地求得统一。

明理有二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此语说，明理之文（即说理之文）在立意上要抓两个重点：一是阐明前人已经发表过的观点，一是发展前人尚未发表过的观点。对"前人所已发"，若作进一步阐明，也可以语陈而意新，有精辟之见；对"前人

所未发”，若能发展之，扩充之，便能有创辟之见。（白　迪）

取喻十法　论写作语。语出自宋陈骙的《文则》：“文之作也，可无喻乎？博采经传，约而论之，取喻之法，大概有十，略条于后：一曰直喻，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见。……二曰隐喻，其文虽晦，义则可寻。……三曰类喻，取其一类，以次喻之。……四曰诘喻，虽为喻文，似成诘难。……五曰对喻，先比后证，上下相符。……六曰博喻，取以为喻，不一而足。……七曰简喻，其文虽略，其意甚明。……八曰详喻，须假多辞，然后义显。……九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证其事。……十曰虚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比喻可以使被描绘和说明的人或事物更具体、更生动、更形象，引起读者的联想和阅读兴趣。上述十法分类过细，其实按点明主体的方式可分直喻（即“明喻”）和隐喻两类。直喻，取比以明，是显而易见的，通常借助“比喻词语”（如、象、好比、犹如等）。例如唐白居易《荔枝图序》“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等均为直喻。隐喻，即今称“暗喻”或“借喻”，例如晋李密《陈情表》“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汉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田）蚡以肺腑为京师相”等。文中以“日薄西山”比喻生命垂危，以“肺腑”比喻心腹，均直接牵出喻体不借助任何比喻词语。（林　岫）

贵出乎实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洪兴全《中东大战演义自序》：“从来创说者，事贵出乎实，不宜尽出于虚，然实之中虚亦不可无者也。”意思是说，历来搞文学创作，叙述事件要贵在真实，不应该尽是凭空捏造，然而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的虚构也是必不可少的。此语道出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对古文写作有指导意义。（白　迪）

叙事十法　笔法语。清人李绂在《秋山论文》中将叙事笔法归纳为十法，即顺叙、倒叙、分叙、类叙、追叙、暗叙、补叙、借叙、特叙、夹叙夹议等。对十种笔法，李绂分别结合古人作品作了简单的分析。其文认为“顺述最易拖沓，必言简而意尽乃佳。苏子瞻（轼）《方山子传》则倒叙之法也。分叙者，本合也，而故析其理。类叙者，本分也，而巧相联属。追叙者，事已过而覆数于后。暗叙者，事未至而逆揭于前。……叙中所阙，重缀于后，为补叙。不用正面，旁迳出之，为借叙。……特叙者，意有所重，特表而出之，如昌黎作子厚墓志，独抽出‘以柳易播’一段是也。而又有夹叙夹议者，如《史记》伯夷、屈原等传是也”。以上各法可参考各词条理解。

叙事四寓　论写作语。作叙事文不能单纯为叙事而叙事，总要有所寄托和想说明一些什么问题。清代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提出了“四寓”：“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寓理，是在叙事中寓以作者要表达的观点和道理，使读者从客观事件的叙述描写中去悟出这些观点和道理。寓情，就

是作者只描写物象和事件，不直接抒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寄寓在对物象和事件的具体描绘之中。寓气，就是要在作品中表现特有的艺术气质，“气盛则言宜”，才能使其作品富有个性的风采。寓识，就是有感于外物而抒发见解或述志抒怀。若无寄寓，只为叙事而叙事，作品就会成为毫无生气的偶人。

叙事体四　论写作语。这是从记叙人物事迹的内容来区分叙事手法的一种说法。唐代刘知几《史通・叙事》：“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意思是说，叙事可以有直接记载人物才行的，也有只写其事迹的，或者从记述人物言语而知其才行的，或者借赞颂语（一般附于人物传记之后，有散文和韵文两体）来表达的，但是这四体均可独立使用，若兼而用之，则辞多烦琐。

起承转合　章法语。又称“启承转合”。指文章的结构布局。古代诗文评论家和作家把此法视为作文写诗之第一法，清人王渔洋（王士祯）认为“勿（无）论古文今文、古今体诗，皆离此四字不可”，徐增《而庵诗话》也认为“若欲学此法则，累十年而不能尽。诗法虽多，而总归于解数及起承转合，正法眼藏，毕竟在此”。古今论此法者颇多，意思相近，即指作文写诗在结构上的一般顺序。“起”，文之开端，有扣题目起、开门见山起，写景起、发议论起等等方法，通常记叙文在文起处交待时间、地点、人物等，论说文则是亮出问题作为议论说理之“的”。“承”，承“起”而来，对开头的补充、接续、发挥，如记叙文开始展开情节或交待事件发展的经过等，论说文则是逐一摆出论据，对“的”（论点）予以剖析、驳斥、评议等。“转”，既承前文而来，又平中生奇，峰回路转，可增文章气势波澜，带出下文，如记叙文可用插叙、倒叙、特叙等手法，或改变叙述角度，或作某个侧面的补充，或对某细节、过程作详细介绍等，论说文则常陡转一笔，或引证，或对比，或退步说（以退为进）等。“合”，即总合、结束之笔，记叙文交待人物、事件发展之结局，或引申更深刻的含意等，论说文则给出结论，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等。“合”既要与“转”顺势而下，又能总束全篇。此法总结出文章结构上的一般性规律，古人有的视为“命脉”，可见其重要性，但须知株守此法者，言成四法，文必不成章了。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律诗起承转全，不为无法，但不可泥，泥于法而为之，则撑柱对待，四方八角，无生动圆活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从容娴习之余，或溢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用之古文创作，也是同理。此法，又称作“作文四法”、“四法”。

继踵体三　论写作语。叙事文贯气脉相贯，有如前后两人走路，要足迹相随。宋代陈骙《文则》谓有三体：“文有上下相接，若继踵然，其体有三：

其一曰叙积小至大，……其二曰叙由精及粗，……其三曰叙自流极原，……。"意思说，上下文一气相贯有三种写法。其一是由点及面，即写些局部的事物，推及到全面。其二是从一些细节描写入手，然后再广及事件或人物的概貌。其三是由今溯昔，或由近涉远，或由流极源的写法。这三种写法都可以使全文脉络清晰，文理通畅，有以小见大、写个别带一般的艺术效果。（林　岫）

胸襟为基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上》："兰亭之集，时贤名流毕会，使时手为序，必极力铺写，谀美万端，决无一语稍涉荒凉者。而羲之此序，寥寥数语，托意于仰观俯察，宇宙万汇，系之感慨，而极于死生之痛，则羲之胸襟，又何如也！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意思是说兰亭宴集时贵名流毕会，趋俗逐流的人肯定以谀美之笔，极尽铺陈之事，独王羲之寥寥数语，得清新自然之妙，这是因为王羲之的胸襟宽广所至。胸襟高、见地高，立意才能高。这种"有是（这种）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的观点，对今天指导写作也有借鉴意义。

深造之法　写作经验语。语出自清人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三）："作文有深造之法。如文章一次做不佳，迟数月将此题再为之，必有胜境出矣。盖作文如攻玉然，今日攻去石一层，而玉微见；明日又攻去石一层，而玉更见；再攻不已，石尽而玉全出矣。作文亦然，改窜旧文，重作旧题，始能深造。每月六课文，止宜四次换题，其二必令其改窜旧作之有弊者，重作其旧题之全未得窍者，文必日进也。此与浅尝粗入之功大异也。"这段话说作文如攻玉，笔耕务勤，经常重作旧题或改窜旧作，便能深造。浅尝辄止，或粗入即成的文章是难有胜境的。这些经验对指导写作有启发性。（白　迪）

常山蛇势　此谓文章首尾相应之法。陈善《扪虱新话》云："桓温见八阵图曰：'此常山蛇势也。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予谓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史记·荆轲传》先写荆轲"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又写"鲁勾践与荆轲搏，争道，勾践怒而叱之，荆轲默而逃去。"这两处已经伏下脉络，为后文张本。下写荆轲为燕国报仇，渡易水，赴秦廷，图穷匕首现，谋刺秦王而未中。处处照应前文。结尾又以鲁勾践的话"闲闲回顾篇首，此等收笔，出神入化。"（林纾《春觉斋论文》）这样文章就能在整体上血脉贯通。（徐远之）

谋篇布局　写作术语。指对文章篇章结构的考虑和安排。在构思过程中，要根据主题的要求考虑应选择何种体裁，怎样安排结构、段落之间如何衔接等。谋篇布局，应从全局着眼，统筹安排结构，合理组织材料，使之更好地为表现主题服务。如唐代韩愈的《杂说》之四，这篇文章的中心是要说明善于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他选择了杂文这种体裁，运用借影笔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结构上，第一段叙说了伯乐的重要，若无伯乐，千里马有也等于无。第二段

写有千里马，若与常马同等对待，“力不足，则才美不外见”，也不能求其千里。最后写若枉用其才，“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还叹“天下无马”，前扣首段“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换言之，则是“若无伯乐，千里马有也等于无”）。此文三段首尾衔接，用蟠蛇章法，又七用“千里”二字，令人感慨不已。文势纵有转折起伏，仍首尾贯通，不难知作者谋篇布局之良苦用心。　（上--娟）

善删之法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魏禧《日录论文》：“东房（魏禧之兄魏际端）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删。此可得学简之法。然句中删字，篇中删句，集中删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能于将作时删意，未作时删题，便省却多少笔墨。能删题乃真简也。”文贵简（精确），善删之法，即学简之法。魏禧认为“句中删字，篇中删句，集中删篇”都是大家知道的删文三法，但善作文者却善删在先，即在将要下笔时“删意”（炼意），以及没下笔之前先“删题”（选题），这种方法比“句中删字，篇中删句，集中删篇”要省事，而且主动得多；如果能在没下笔之前先“删题”，这才是“真简”（即根本上的精简）。

意主气辅　论写作语。语出自唐代杜牧的《答庄允书》：“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意思是说，凡是写文章，要以意（表情达意）为主，以文章气势为辅，文采章句只是实现表情达意的辅助手段或工具。　（白　迪）

精炼二法　写作经验语。唐代刘知己《史通·叙事》认为叙事须“务却浮词”，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精炼之法有二：“一曰省句，二曰省字。”省句或省字均以表情达意之需要为据，例如《唐宋八家丛话》说：“欧阳（修）公在翰林日，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道。公曰：‘试书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公曰：‘使子修史，卷末已也’。曰：‘内翰以为如何？’曰：‘逸马杀犬于道。’”将十一字文省为六字，这是省字。据说欧阳修初作《醉翁亭记》写滁州四面有山，用了五十余字，后来仅“环滁皆山也”五字则概而无余。省句也是省字。文章好坏自有评定标准，烦简或是得当，非因字句多寡、篇幅短长，“若庸絮懈蔓，一句亦谓之烦，切到精详，连篇亦谓之简”（见清人魏际瑞《伯子论文》）。　（林　岫）

三得不可易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上》：“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则诗文一道，岂有定法哉？发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絜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故法者，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叶燮认为诗文之法重三得，即理得（必合乎道理而无错误）、事得（能验证事实而不抵牾）、情得（感情表达能恰到好处），这是创作中最重要的，不可随意乱来，若能如此，“则自然之法

立”。

不可学者四 论写作语。语出自清代黄子云《野鸿诗的》:“六朝中有不可学者四:不细意贴题而模棱成章者,一也;行文涣溢而漫无结束者,二也;不本性灵,专以典故填砌,而辞旨不能融畅者,三也;对偶如夹道排衙,无本末轻重之别、可存可削者,四也。”此语论诗,后人亦多借论作文。说六朝的四种不良文风不可学,实际上对文学创作有普遍意义。这四种不良文风,其一是不仔细审题而模棱含混成章者;其二是行文涣散复繁而漫无结果者;其三是不独抒性灵(真情实感),专门推砌典故而语意欠畅达者;其四是对仗如夹道的官衙仪仗,没有本末轻得之别、可删可留者。

文有十六忌 论写作语。语出自林纾《春觉斋论文》。说作文十六忌,即论作文的十六种弊病。一忌直率,谓语意浅白、直露无遗之病。二忌剽袭。三忌庸絮,反对平庸、涣溢。四忌虚枵,反对言之无物、外肥中枵(空虚、空洞)。五忌险怪,反对文求怪异。六忌凡猥,谓平庸浅薄、凡琐流俗之病。七忌肤博,反对“舍内饰外”、华而不实的文风。八忌轻儇,反对轻佻浮滑之作。九忌偏执,反对只执一端而不容他说。十忌狂谬,谓言多不实、内容狂谬之病。十一忌陈腐,主张有新见、独见,反对陈词滥调。十二忌涂饰,反对堆砌丽辞,如金银涂饰而内容空泛之作。十三忌繁碎,主张简朴。十四忌糅杂,谓意出多门、混杂零乱之病。十五忌牵拘,反对拘泥前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十六忌熟烂,谓言词陈腐、趋时逐流之病。十六忌中有的意思虽有交叉,但对写作中正本清源、革弊去俗有借鉴意义。(白 迪)

古代文章学 写作学科名。这是一门研究古代文章写作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范围有两个方面,一是古代丰富多采的各类文章,二是古代文章学家已经总结出来的写作理论。古代文章学主要研究文章本身构成的法则,以及文章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它的任务是探讨古代文章学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此基础上建立文章学的科学体系。此体系应包括古文章法学和古汉语修辞学等。 (王一娟)

用典十四类 论写作语。用典,又称“用事”。宋严羽《沧浪诗话》说“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沈侯(即沈约)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用事”即“用典”,指写作中援引前人事迹或摘录典籍的词句来表情达意、阐明自己的观点等。“用典十四类”,语出明人高琦《文章一贯》,“一曰正用,二曰历用,三曰列用,四曰衍用,五曰援用,六曰评用,七曰反用,八曰活用,九曰设用,十曰借用,十一曰假用,十二曰藏用,十三曰暗用”,十四曰逐段引证(高氏未命名,这里引《古汉语修辞简论》名)。典故通常指古代故事、事典、有出处的词章片语、典制、掌故等。十四类,分类过细,一般常用的有“正用”(即“明用”)、“暗用”(即“隐典”)、“反用”、“借用”等。用典也可以分为“引文”、“引事”、“引言”三种。可参见各条。

作文四不可 论写作语。语出自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亦不可有龃龉处。"冗，即多余，累赘。意思是说，写文章在整篇中不可有多余的章节，在章节中不可有多余的语句，在语句中不可有多余的字，也不可有互相矛盾、前后抵触的地方。此语旨在论作文简洁之法，对今人写作也颇有借鉴意义。

作论二不可 写作经验语。清初散文家魏僖在《日录论文》中说："巧文刻深，以攻前贤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实。此二'不可'作也。"意指写说理文时，专务应时取巧之文，文辞苛刻严峻，抨击前贤之短而不中要害，此"一不可"。专务新奇，哗众取宠，去翻古人之案，又不合乎情理和实际，此"二不可"。

作论三不必 写作经验语。清初散文家魏僖在《日录论文》中说："作论有三不必作。前人所已言，众人所易知，摭拾小事无关系处，此三不必作也。"意思是写论述文须有真知灼见，见解要有独到之处。对别人已有议论的，若无更深刻、更新颖的观点，就不必再论。对一些浅显易见的现象等，不必故弄玄虚。对一些琐屑而无关要旨的小事，也不必硬去发挥。别人所未言的现象，可以开拓议论，抒发自己的精深见解，对一些"前人所已言"的，如能作进一步阐发，又能提出新见解的，也可以立论。如唐代杜牧《阿房宫赋》认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宋代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中提出与"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相反的观点，即"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

叙事十一法 笔法语。元代陈绎曾《文筌》对古代叙事文的笔法作过分析，提出了十一种笔法。此书已佚。现存陈氏关于叙事笔法的分析是由明人高琦编撰的《文章一贯》(有日本宽永翻印本）辑录的。陈氏对叙事的十一种笔法曾作过简要说明："正叙，叙事得文质详略之中。总叙，总事之繁，略言之。间叙，以叙事为经，而纬以他辞，相间成文。引叙，首篇或篇中用叙事以引起他辞。铺叙，详叙事语，极意铺陈。略叙，语见事略，备见首尾。别叙，排别事物，因而备陈之。直叙，依事直叙，不施曲折。婉叙，设辞深婉，事寓于情理之中。意叙，略睹事迹，度其必然，以意叙之。平叙，在直婉之间。"此提法与其他研究家的提法不尽相同，可参考其他词条理解。

叙事十八法 笔法语。叙事因内容剪裁化工之需要可以有多种手法。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提出了十八种手法："叙事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预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唯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唯吾所施。"此提法与其他研究家的提法不尽相同，可参考其他词条理解。

叙事十四笔 笔法语。清人邵作

舟在《论文八则》一书中将叙事笔法归纳为十四笔，有些分类与其他研究家的提法不尽相同，可参考其他词条理解。叙事十四笔为"正笔、旁笔、原笔、伏笔、结笔、补笔、带笔、铺叙立案之笔、提缀呼应之笔、关锁串递之笔，断制咏叹之笔、详略虚实之笔、宾主映射之笔、点缀传神之笔"。

左氏叙事六法　技法语。清代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评述《左传》叙事技法时说："左氏（左丘明）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意思是说，《左传》叙事剪裁运化之方法最为完备。如果素材纷乱杂碎，就设法使之完整，贯穿起来写。如果素材不多，就再补充一些。如果素材板滞不生动，就要文笔生花，把它写得活一些。如果事件发展比较平直乏味，就要委婉曲折地去写。如果是些比较通俗的趣味不高尚的题材，可以写得高雅一些。如果内容枯燥单调，就要写得尽可能丰满生动些。　（林　岫）

脱套去陈之法　论写作语。语出自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三）："脱套去陈，乃文学之要决，是以剖洗磨炼，至精光透露，岂率尔而为之哉，必非初学可到。自定一取舍，取人所未用之辞，舍人所已用之辞；取人所未谈之理，舍人所已谈之理；取人所未布之格，舍人所已布之格；取其新，舍其旧；不废辞，却不用陈辞；不越理，却不用皮肤理；不异格，却不用卑琐格。得此，思过半矣。"这段话提出"脱套去陈"之法有"四取舍"、"三不用"。"四取舍"，即取他人所未用之辞（新语），舍去他人已经用过之辞（陈言）；取他人所没有议论过的事理，舍去他人已经议论过的事理；取他人所没用过的新格局（写作方法），舍去他人已经用过的旧格局，（总之是）取新舍旧。"三不用"，即不反对遣词动语，但反对用陈辞；不悖越情理，但反对肤浅之理；不主张手法上的立异，但反对用俗格。此乃论写作之经验谈，对阅读、评价和研究古文有参考价值。　（白　迪）

凤头、猪肚、豹尾　论写作语。语出自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乔梦符吉（即乔吉，字梦符，元代散曲作家）博学多能，以乐府称，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致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也称作"六字法"。文论家也多用来评论古文写作。这是一种对诗文创作的开头、主体以及结尾的比喻说法。就是说，文章的起头要奇句夺目，引人入胜，如同凤头一样俊美精采；文章的主体要言之有物，紧凑而有气势，如同猪肚一样充实丰满；文章的结尾要转出别意，宕开警策，如同豹尾一样雄劲潇洒。

建首、陈末、举中　论写作语。语出自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建其首，则思下辞而可承；陈其末，则寻上义不相犯；举其中，则先后须相依附。"这是对文章起首、中段、结尾的顾注关系的一种说法。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说"揭全文之指

（要旨、主题），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必后顾（即照应）之，在篇末则必前注（即预伏）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可与此参照理解。《文镜秘府论》这段话是说文章开端要有气势，并且要兼顾下文的承接（即"凤头"与"猪肚"、"豹尾"之关系），文尾作结时必须看看与前文所叙所论有无抵牾之处（即"豹尾"与"凤头"、"猪肚"之关系），文章中段要丰满，而且主管首尾衔接贯穿等（即"猪肚"与"凤头"、"豹尾"之关系）。如此，文章首尾圆合，意脉连贯，才能浑然一体。（林　岫）

笔 法 技 巧

开合　指说理或叙事时常用的文笔曲折之法。先言他人他事，似与正题无关，这是开，然后转到正题、书归正卷，就是合。清人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文之作法十三》："笔尚变化，似无成法可拘。然阴阳开合，造化之机，为文之道，亦岂外是。故虽笔之变化无常而有一定之开合。其曰断曰续，曰纵曰擒者，皆得统名之开合。……笔之所以妙者，唯在熟于开合，使断续纵擒无不如志而已。盖有断与纵者，以离而远之；有续与擒者，以收而近之，此之谓善于用笔。"清代冯李骅在《春秋左绣·僖公二十八年》中也说"文章妙用，全在多作开合之至奇极变者"。古人作文有一开一合者，也有数开数合者。开合大者，如一篇之开合，一段开又一段合，即一段虚又一段实。开合小者，如一段之开合，时而断又时而续，即时而纵又时而擒。如《史记·留侯世家赞》先言"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学者大多认为没有鬼神，然而也有人说有怪物），这是开，然后说"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至于象留侯遇见老人送他兵书的事，也可以算是怪了），就是合。唐孙樵《与贾秀才书》言"物之精华，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锢玉以璞；珊瑚之丛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颔骊龙。扶而不知已，积而不知止，不穷则祸，天地雠也"，不说贾秀才之怀才不遇，也不说作者对贾秀才之同情，先拓开一笔。继之以"文章亦然。所取者廉，所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穷"作合，对全文旨意而言，只是稍归正题，也可以看作是开。最后一段，以"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古人抱玉而哭泣，今捧你的文章，能不为你怀才不遇而流泪吗？）作合笔。此法须开合有度，步步紧扣主旨。说与不说，反说与正说，虚说与实说，均为了使文章巧生波澜，富有变化，并能启发读者深思和联想。文有开合，还有开中之合、合中之开、合中之合。开合二者之间的

关系最终是开为着合。

反衬 衬笔的一种。利用人或物的对立条件来反面衬托主体叙述的笔法，通常是以美好反衬丑恶或以丑恶反衬美好，以动反衬静或以静反衬动。俗话说"要想甜，加点盐"，即指此笔法。宋代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劄子》意在向宋神宗力陈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以文章的叙述重点放在揭露神宗当时的政弊和危机四伏之现状。此文前一部分写宋初百年间政通人和、太平无事，是因为"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等一系列强国政策的贯彻执行，这就是反衬笔法。它反衬了后一部分，从而使揭露现状更加尖锐醒目。清人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第45回"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批语说"文章有正衬，有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为反衬也"，说出了反衬笔法以人物或事物的对立、相反情况来衬托主要人或事物叙述的艺术特征。反衬须注意主次分明，陪衬段落要写得适当，过分或不及，都会影响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林 岫）

巧避 行文时不直接陈述观点，而是巧妙地避开，去写对立或相矛盾的另一方面或侧面，曲折婉转地达到陈述观点的目的。如唐代韩愈《进学解》本是为自己久为博士不见升迁之事而发的不满之词，然而文章首段发端，中段作驳，用学生们的反问来否定自己所讲的"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的话，从而表达了对自己业精行成却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现状的不满。胸中抑郁，借他人之口说出，就是巧避。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曰："此公久为博士，不见超迁而作，注意全在宰相。盖大才小用，不能无憾，而以怨怼无聊之词托之人（指文中"弟子"），自咎自责之词托之己，言之者无罪，闻之者知愧。巧于避忌，最为得体。"

（王 娟）

对比 把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或者两种相反或矛盾的事物，并列一处，使之形成比较、对照，以便达到强调目的的一种表现手法。修辞上多用此法。如明代刘基《卖柑者言》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墨子·公输》中"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装饰华美的车辆）之与敝舆（破旧的车辆）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荆地五千里，言其多，宋地五百里，言其少；文轩与敝舆，言好与坏之比，皆是对比。多少、好坏、粗细、高低、大小等可以构成正反对立的关系，在对比之中事物的特征会更加突出，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笔法上也用此法。例如将某人前后言行不同来作对比，由事物或人物的发展变化说明题者，这是纵向对比；将两种不同的人物或事物来作对比，通过双方不同的特点说明题者，这是横向对比。前者如宋代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论》写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天下，从兴亡盛衰的纵向对比中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以及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的结论。横向对比在写作中最为常见。如唐柳宗元

《永某氏之鼠》写新旧主人对鼠的不同态度得到的不同结果，启发读者深思一些社会现象。又如明代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以自己过去家贫求学之勤艰与当时学生优越条件作对比等。

写生　原绘画术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摹写人物和景物，能真切再现自然风貌和人物形象及其内心活动，给读者以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受，这种描绘手法也称写生。清冯李骅《左绣·宣公十四年》称《左传》写楚庄王听到出使齐国的申舟在途中为宋人所杀时大怒极为传神，"此为第一首写生文字，写得怒容可掬。又不写他如何怒法，只就袂上、屦上、剑上、车上逐一渲染，便令怒气拂拂从十指中出，奇绝"。楚庄王大怒是从四个动作的写生中真切描绘出来的。"袂上"指庄王挥动袖子一跃而起。"屦上"指庄王来不及穿鞋，手下人拾鞋追至寝门前才匆忙穿上。"剑上"指庄王未及佩剑，手下人拿剑追至寝门外才追上。"车上"指庄王顾不得坐车，出门便跑，手下人驾车追至集市才追上他。这段写如写生一般，将庄王的性格、闻讯后怒不可遏和急躁的心情都形象地表现出来。（林　岫）

写照　即写真，谓给人物画像。原本绘画用语。《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即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又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谓"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意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虽言绘画，后人渐用于论作文之法。含义也由相貌、外表的描绘，扩大到写人物的身分、地位、性格、生活和内心世界等。如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文中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然而细读之，便知这是"性嗜酒"、"好读书"、"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的陶潜先生。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有评解曰："不矜张，不露圭角，淡淡写去，身分自见。……《辑注》评：不肯仕宋，自是先生大节，然读此文不必计此。但看他突然而起，悠然而结，叙出事迹，了无异人，味之却有大本领在。通篇结构总画出个'不知何许人'意，若曰：'知先生者，先生也。'"此法如同给人"造像"，或细描，或勾勒，或漫画笔法，可描绘出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肖像。《五柳先生传》是借史传之笔为自己作传，表现自己旷达自适、安贫乐道的情趣，写照极为传神。（林　岫、王一娟）

正衬　唐白居易《长恨歌》写杨贵妃之美，不用正面直接描绘，而写"六宫粉黛无颜色"，《陌上桑》不正面写罗敷之美，而从侧面（借助他人看见罗敷后"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表现。散文叙述运用这种手法也叫正衬。此法运用得好，可以获得正面叙述所达不到的艺术效果。方苞《左忠毅公逸事》主要记述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忠毅之事，文中以左光斗发现史可法，重用史可法，下厂狱后史冒死探监而晓之以忠义，直写到史可法不忘师恩，都为了表现左光斗"忠毅"，自"崇祯末"起，方苞转而专写史可法忠毅为国和身先士卒

的行为，则是正衬。它从侧面借助史可法之所作所为衬托出左光斗之忠毅。正衬，可启发读者省思，耐人寻味，使要刻画的人物或叙述的事件更加生动突出。清人毛宗岗在评点《三国志演义》第45回"群英会蒋干中计"时说"文章有正衬，有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譬如写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读此可悟文章相衬之法"，道出了运用正衬增强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性。

托法　又称"托空法"、"虚托法"。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评《孔子世家赞》，有评解曰："赞孔子，不实道一句。前半以己工写，后半以人工写，乃避实击虚，全用托法也。"司马迁写项羽，称《本纪》，写孔子用《世家》（用以纪公侯的），而孔子并无公侯显位，是尊孔。孔子难写，挂一或至遗万，故用虚写一法，可除绪弊。先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句虚笔笼起，然后写己，再写人，写己是"学者宗之"，写人是给出参照，"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而孔子以一布衣成至圣，道出太史公主意，也可窥《史记》列孔子于世家的本旨。若作实笔一一去写，定生多少碍手之处。参见"虚托"。

约叙　又称"略叙"。元代陈绎曾在《文筌》中论古文叙事笔法，说"略叙，语见事略，备见首尾"。人物成长过程或事态发生发展经过中有些内容不必详叙但又必不可少的，可作约叙处理。如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一开始用"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高度概括地写了秦统一天下的形势和大兴土木营建阿房宫事。这是略笔。又如《左传》写齐鲁的长勺之战，写曹刿的远见卓识，故战前筹谋等用详笔，战争过程用略笔，结局仅以"齐师败绩"、"遂逐齐师"等一掠而过，最为简洁。约叙要简炼直捷，绝不拖带，言简意赅。与详叙连用，更显疏密有致。何处详，何处略，均根据题理，从表情达意、深化主题的需要考虑。约叙也不可失之过略。

收笔　文章结尾的笔法。结尾应有总结全篇、深化主题、点明隐意，或者引人由此思彼的艺术感染力。结尾通常采用归纳总括、画龙点睛、推及其他、暗示前景等多种手法，力求收篇巧妙，令读者长吟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大家之文，于文之去路，不惟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其最擅长者无若《史记》。《史记》于收束之笔不名一格。……用一冷隽之笔闲闲点醒，如《封禅书》之收笔是也。有叙定霸巨子（指越大夫范蠡），幸免弓狗之祸，却把其退隐之逸事尽情一述，寓其微旨，如《越王勾践世家》之收笔是也。有同恶之阴谋，同时败露，是天然陪客。结穴处大书彼人之罪状，句中用一'亦'字，不加议论，其义见焉，如《春申君列传》之收笔是也。有事一而人三，而每传收笔，各用似了非了之笔，雅有余味，则《魏其灌夫武安列传》之收笔是也。《荆轲传》终写荆轲之勇，行

刺之难，而史公（即司马迁）冷眼看出荆柯剑术之疏，于传末用鲁勾践一言，闲闲回顾篇首，此等收笔，直入神化。”《封禅书》写汉武帝沉缅求仙，方士入海求仙山或等候神仙驾临都不灵验，武帝虽已厌烦，却仍与方士交往，寄希望于一旦。结尾以冷隽之笔，正话反说，点醒方士弄虚惑众和武帝之昏庸，不说方士的鬼话没有灵验，而说“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写勾践与范蠡，重点放在表现勾践的成功主要是依靠范蠡所以结尾写“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将其退隐之逸事尽情一述，再未提勾践，寓意不表自明，故称“寓其微旨”。另一种结尾是将与文中人物相同的人挟持带入，谓“天然陪客”，如《春申君列传》，写的是春申君，但吕不韦和春申君使用同样的阴谋，且同时败露，故结尾是“是岁也，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大书他人（吕不韦）之罪状，其谴责春申君之意则不言自喻。《魏其武安侯列传》实际上写了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和灌夫三人，此传先分写窦婴之耿直、田蚡之骄奢、灌夫之勇猛和犯法去官，然后合写三人在一件事中的结局，既有合传写人物互相映衬的特色，也表明了作者对三人的褒贬。另有一种结尾是借他人言语作结，既照应前文，又能点出文中关钮。如《荆轲传》结尾用鲁勾践语：“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比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与前文荆轲以匕首拂秦王未中和荆鲁二人博戏时鲁怒而叱之二事呼应，既赞美了荆轲不与人争的品德，又对他不精刺剑之术招致失败感叹惋惜。

伏笔 又称“伏脉”、“伏线”。指行文时预先在前文对将要出现的人物或者事件作出某些提示、暗示，使后来人物性格或事件的发展合情合理，全文也前后呼应，脉胳贯通。林纾《春觉斋论文·用伏笔》：“行文有伏笔，即伏脉，猝观之实不见有形迹，故吕东莱（祖谦）论文，谓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文章前有伏，后必有应，先埋伏，后有着落，来龙去脉便十分清楚，能给读者一个完整而情晰的印象。伏笔用得好，不时唤起读者的联想和回味，也可以增强作品的连贯性和整体感。林纾所引南宋吕祖谦语是，“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见《古文关键》）。伏笔有明伏、暗伏之分。《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是伏笔，后写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是应笔，这是明伏。写荆轲好读书击剑，“以（剑）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盖又认为他说得有不对头的地方，这些皆为后来荆轲刺秦王失败作了暗伏。伏笔有助于文章结构严谨，前文留下伏笔、悬念、藏头、疑惑等，能引人入胜，在文章中段或结尾时点明、释惑、醒悟、接应，就能收到无意为佳之效果。伏笔不能太隐晦，也不能处处求显，所谓“东云出鳞，西云露爪”，点

到为止即可，须给读者留一些联想、省思、回味的余地。林纾《春觉斋论文·用伏笔》还说用伏笔，“是阳断而阴联，不是伏下此一处，便抛却去经营彼处”。伏笔须显示结构、内容上的意义，伏而不应，首尾则缺乏连续。

补叙 叙事过程中所遗漏的内容，在文后作一说明、补充或交代。清人李绂《秋山论文》中论叙事有十法，说“叙中所阙、重缀于后，为补叙”。如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文尾补缀“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表达了作者对物在人亡的感伤心情。插叙在文中穿插，补叙只缀于后，补叙与前文叙述要有内在联系，不合乎情节发展的逻辑，不能顺势而出的补叙，则有“赘笔”之嫌。补叙运用得好，可以使文章结束前有一跌宕，令读者吟味不已。有的补叙只起简单补充说明的作用，如明代张溥《五人墓碑记》文尾“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只是对文中提到的“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的贤士大夫作一补充说明。

详叙 根据内容的需要，对某些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成长过程，作细腻详尽的叙述。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叙事有十八法，中有详叙。有详则有略（“约叙”），疏密有致，文章才能脉络清晰，主旨跳脱。清人唐彪《读书作文谱》中引柴虎臣语：“详略者，要审题之轻重为之。题理轻者宜略，重者宜详。”详叙要依据题旨需要而定。题理，文章之意脉主旨。详略按与题理的关系轻重而定。例如明代宋濂《秦士录》写秦士邓弼力大过人，放荡不羁，又文武双全，抓住酒楼考“四库”书对答如流，嘲笑萧、冯二位书生，以及闯御史台、东门外舞剑斫马首等情节，作了细致的描述，这些详叙皆为表现邓弼人物性格和非凡气概服务的。对其结局却以“遂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终”一句带过，详略有致，疏密得宜，更能激起读者对邓弼才艺无从施展、抱负无法实现的同情。《左传》最善详略之法。据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的统计，《左传》写兵战，详在前而略在后，即记战前双方如何最详，多则占全篇十分之七以上，至少也占二分之一。《左传》叙战况等少，不到十分之一，最多不到二分之一。王源《左传评》说“左氏叙战，每将权谋、方略铺叙于前，而实叙处不过一两言”。详叙，须抓住主要情节、特征等着墨，叙述要详尽而语言要精炼。

衬笔 从文章主要人物或事件之外的非主体人手，通过不同的人或事的对照比较来加强主体叙述，或者通过相近的人或事的陪衬烘托来突出主体叙述，叫衬笔。前者又称反衬，后者又称正衬，衬笔的对照比较是手段，目的是以非主体为陪衬来突出主体叙述，故主次分明，轻重不一。衬笔不同于对比，后者是不分主次的比照二体均在对照比较中取得更加突出或生动形象的效果。反衬和正衬，另有专条介绍。清人唐彪《读书作文谱》说作文“当衬者不衬，则匡廓狭小，意味单薄，无华瞻之致矣。……作文能知衬贴，则文章充满光彩，何待言

哉”，恰当地评价了文章巧用衬笔的作用。各种人物或事物都存在着联系，孤立地单向地去写常常显得意味单薄和缺乏表现力，运用相近或对立的人或事之联系去多侧面表现，会使主要人物或事件得到更丰富的表现。

点染 原指挥毫作画的方法。点是勾勒，染是渲染。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有“随宜点染，即成数人”。这里转指一种把抒情、议论跟叙事、写景相结合以突出题者的写作技巧。点，是正面抒发感情、阐述见解、亮明观点。染，是为了突出题者所作的形象刻画、景色描绘和叙事等。先抒发感情或亮明观点，并以此为意脉，再作一些必需的景色描绘、叙事等，是先点后染。如李斯《谏逐客书》、清彭端淑《为学一首示子侄》等。先描绘客观景物或叙事，情以景兴，然后再亮出观点、阐述见解等，是先染后点。如南宋林景熙《蜃说》，先记叙作者亲眼目睹在浙江海滨所见海市蜃楼奇观的情景，语言凝炼生动，景物如历历在目，然后借题发挥，亮出主旨，即将历代帝王奢侈享乐之宫殿比作稍纵即逝的海市蜃楼，从而抒发自己对南宋终遭灭亡的万般感慨之情。点、染交叉出现，类似“夹叙夹议”手法，叙议熔合，是交叉点染。这种交叉，可以使文章收到叙事见理趣、议论蕴深情的艺术效果。例如宋苏轼《放鹤亭记》，先写隐居在云龙山的张天骥草堂被淹之后修建放鹤亭事，山、亭之景色描绘对写隐者自得其乐来说是一种渲染，在写与张对饮之乐中引出历史上卫懿公因好鹤亡国和刘伶、阮籍以醉酒保全真性来作对比，用对话形式抒发感慨见解，强调隐居是真正的乐趣，这是点。再写张山人作放鹤招鹤之歌，又是染。点染的结合要注意自然贴切，叙事或写景要脉胳连续，不可因插入议论而显得支离破碎，议论要与叙事、环境等和谐相关，才能起到突出主旨的艺术效果。

点缀 这是一处结合抒情、写景来叙事或发议论的表现手法，类同“点染”。目的是“点”（叙事或发议论），对“点”有关的气氛环境、心理活动等作比较集中的描绘，就是“缀”。孙德谦《六朝丽指》：“丘希范（丘迟，南朝梁文学家）诗，锺仲伟（锺嵘）评为‘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余读其文，觉文亦如此。其《与陈伯之书》，通篇情文并茂，可谓风清骨峻。……‘暮春’四语，借景生情，用眼前花草作点缀。”丘迟《与陈伯之书》是骈文佳构，为了唤起陈伯之对美好景物的回忆用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四语，为劝陈伯之回归梁朝在气氛上作了渲染。苏轼《前赤壁赋》从写秋夜赤壁泛舟开笔，先染后点，写江上景色和主客游兴，为引出主客对话给出一个特殊气氛的环境。点缀须围绕题者和主要对象，不能盲目追求绚烂色彩、强烈气氛等而淹没了题者和主要对象。此法运用得当，可以使文章情趣盎然且富有艺术感染力。

顺叙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叙事笔法，它按人物活动或事态发生、发展

等前后顺序来进行叙述。它或者以空间转换顺序或时间推移顺序的方式进行，或者以事态中人物活动行踪或以作者对事物的认识变化发展过程的方式来安排材料、铺展情节和描写人物。采用此法之文章的层次往往同人物活动或事态发展过程是一致的，故文章旨在写人物成长或事件全过程的多用此法，可收叙述井然有序、脉络清晰之效。如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依事直叙"，从项羽起兵西进伐秦写到乌江自刎，展现了楚霸王由弱渐强，又由强转衰的一生，人物之来龙去脉、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过程均笔到不紊。又如明人宋濂《杜环小传》，虽用顺叙笔法，但叙有轻重，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单调枯燥之病，对杜环之生平几笔带过，对收留和奉养张氏，却按时间推移顺序叙述了事情的全过程，表现了杜环的高尚品德。要顺叙精采，材料的选择剪辑、叙述主线的确定、主要情节的铺展等皆是关键，故清人李绂《秋山论文》说"顺叙最易拖沓，必言简而意尽乃妙"。顺叙，又通"直叙"（依事直叙，不施曲折）。

追叙　为了使主要情节、事件或人物的叙述或说理更加充实完整，有时需要对已经过去的人或事作一追加性叙述，以达到补充解释的目的。清人李绂《秋山论文》说叙事有十法，其中"追叙者，事已过而复数于后"。西汉贾谊《过秦论》文说秦以七世亡六国，而民以期月亡秦，过秦在始皇、二世，故追叙秦孝公至庄襄六代事业，言秦强盛之由，"及至秦王（始皇）"仁义不施，二世又"重之以无道"，归至始皇、二世之过而引为万世人主之鉴则不言自明。断案在前，追叙在后，文章有跌宕变化，虽峰回路转，终是一个去处。

带笔　意指顺手携带所作的叙述。清人邵作舟《论文八则》说"非本人本事，而闲情逸韵或关其人行迹，或为后世之美谈，则随事带书之"，即指带笔。此法是在叙述主要人或事的过程中，或者结束之后，顺便叙述有关的人或事，貌似闲笔，但这些人或事与主要人或事实有内在的联系，虽在作者叙述聚光点之外，却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如汉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自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一直写到被赵高所陷、腰斩咸阳，记叙了对秦王朝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的一生。李斯死后至秦"遂以亡天下"则为全传不可缺少之余波，虽是顺带写出，却交代了传中出现的赵高、秦二世诸人在李斯死后的结局，文尾对李斯的评价才不致于突然。带笔须语言精简，承接自然，有助于表现人或事，否则头绪纷繁、拖泥带水，便有"赘笔"之病。

借叙　清人李绂《秋山论文》："不用正面，旁逆出之，为借叙。"这是一种在叙述人物活动或事件发展过程中，不从正面直接叙述人或事，而是借助他人他事来写的叙述笔法。如明人袁宏道《徐文长传》文首不正面写徐文长诗之奇，而是借作者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读来数首，不觉惊跃，急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

等惊跃情景，以及“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等侧面人物的叙述来写。虽一字未言徐文长之诗如何，但从这些人读诗时惊跃叫绝和睡者皆惊起的描写，是不难得知的。运用此法可以避免正面叙述常见的单调和说教的毛病，使文章叙述更耐人寻味和增强真实感。

（林 岫）

借影 借他人或他事来比喻自己。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曰：“古人言事言物不专是那事物，往往托以影道理，影人己，其文乃深而有味。若呆说是事物，则浅索矣。”如唐代韩愈《马说》，文章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来比喻自己怀瑾握瑜，却不被重用。《古文笔法百篇》评解曰：“此篇以千里马自喻，以伯乐喻知己，总言知己之难遇也。分作无数转折。”参见“借影相形。”

（王一娟）

预伏 作文时对有来龙去脉、因果相连的人或事，预先作出某种暗示，待事情发展之后这些人或事的出现不致于突然，而且能使全文结构周严缜密。清人唐彪《读书作文谱》说，“如一篇文中所载不止一事与一意，或此一事一意，不能于篇首即见，而见于中幅，或见于后幅，作者恐后突然而出，嫌于无根，则于篇首预伏一二句以为张本，则中、后文章皆有脉络”。宋代苏轼《后赤壁赋》写复游于赤壁之下，预伏“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也”。待客去，写“余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方知道士即昨夜戛然长鸣的那只孤鹤。预伏须巧妙，要点到为止，似不经意，待读至后文或合卷静思之后始悟前文张本之道理。林纾《春觉斋论文·用伏笔》称“善于文者，一题到手，须将全篇谋过，必先安顿埋伏，在要处下一关键，到发明时即可收为根据”，即指预伏。参见“伏笔”。

剥法 此法避免正面地平直叙述，象剥笋壳一般层层渐入，既可以增文章气势，而且层次分明，由浅入深，似水到渠成，还能增加说服力和吸引力。明李腾芳《山居杂著》说“此法由浅入深，由粗入细，由外入内，由客入主，渐渐剥出为妙。如孟子对梁惠王，先言杀人以梃与刃，以刃与政，然后说到惠王率兽食人。谓齐宣王，先言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冻馁之，及士师不能治士，然后说到齐宣王四境不治，此皆剥法也”。写论述文多用此法，它可沿着读者思考的顺序，层层展开，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因论证周全，步步立足，故意脉清晰，结构严谨，有较强的逻辑性。《孟子·梁惠王》上说孟子要批评梁惠王政策失误，有如“率兽而食人”，正面论证就很难说服对方，孟子先说“杀人以梃与刃（用棍棒和刀子），有以异乎”，王自然说“无以异也（没什么不同）”，再说“以刃与政（用刀子和用政治杀害人），有以异乎”，王也说“无以异也”，然后列举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就有了说服力。宋欧阳修《朋党论》由“尧之时”，一进至“舜佐尧”时，二进至

"舜自为天子"，三进至周武王，四进至汉献帝时，五进至唐之晚年，由远及近，援古说今，渐入主旨，愈进，理愈明，如剥壳见笋。运用此法，须注意各层次之有机联系，以利文脉贯通，说理清晰。

倒叙 这是在顺叙过程中笔起波澜的一种笔法。此法是将事件的终局，或者某些精采的片断、情节安排到发生时间之前来叙述，从而使文章结构富于变化，某些片断、情节也会因先声夺人而增强读者印象，使人物和事件的描叙更加生动形象。何处倒叙，作者要有精心安排，须有必要的文字作过渡，方衔接自然。倒叙之后，再回归顺叙时也须见化工衔接之妙。否则，文章流失于拼凑，就会伤气脉。如明人归有光《寒花葬志》，写婢女寒花不幸早逝，先用倒叙手法，再写婢女生前事，就能给人以更感人的吸引力。这是先写眼前，然后写回忆往事，以形成倒叙。宋苏轼《方山子传》是先写有方山子这个隐士，继写见面后方知方山子即故友陈慥（季常），然后用倒叙笔法写十九年前同游之往事，表现方山子当年豪侠之士的风姿。此法笔致奇崛，文势起伏，可避免顺叙平铺枯燥之病。清人王源《左传评》认为行文结构可"中者前之，后者前之，前者中之后之，使人观其首，乃身乃尾；观其身与尾，乃首乃身，如灵蛇腾雾，首尾都无定处，然后方能活泼泼也"，即指倒叙笔法。倒叙，须依据刻画人物、深化主题和情节的最佳铺展等需要安排，不可为倒叙而倒叙。倒叙，又称"逆笔"、"倒插笔"。 （林 岫）

特叙 对有典型性意义的特征或情节着意叙述，从而使要表现的人或事更为生动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清人李绂《秋山论文》说"特叙者，意有所重，特表而出之"。这种特意详尽叙述以示强调的笔法，可以让读者清楚掌握局部或个别特征之后，由点及面，去了解文章的主旨，如同电影艺术中的特写手法。唐代韩愈为柳宗元作墓志铭，要写的内容很多，必须选择最能表现柳宗元高尚品德的情节来写，才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柳子厚墓志铭》写刘禹锡被贬播州（今贵州遵义市），柳念刘母年迈，刘不便远去，愿以自己被贬之柳州换播州，代刘远行，"以柳易播"最能表现柳宗元节义，故文中着墨较多，作了特叙。此笔法可以使行文生动，叙述轻重分明，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有的古文选择几个情节作特叙，如明代宋濂《秦士录》中写了娼楼答四库书"历举传疏，不遗一言"、袖书谒德王时"连出踣数人"等，多侧面地表现了邓弼的识勇过人。特叙须写得简练精采，切不可滥用。叙述平平或选材没有代表性，均不利于表现人物性格和深化主题。特叙使用过多，结构涣散，会影响表现力和感染力。

虚托 又称"托法"。是一种用想象构思，不着实写，纯用虚笔的写作方法。虚托之文一般立意新奇，富有创见，但并非凭空臆造，此法能使文章增加情趣，富有浪漫色彩。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评唐韩愈《送杨少尹序》文，评解曰："古人行文，纯用虚托，不肯用一实写，乃自占地

步，不滥夸人处，不徒善作波澜已也。”运用虚托手法，可以写推测、对话、议论等，“纯是空中楼阁，宛如逼真情景”。如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通篇游虚，未实写一笔。李愿之言也非真有其言，均作者设想，文中写景也非实笔，但全部是从对现实的认识中出，给人以真实的说服力。与无中生有法不同，虽然均文格高奇，但后者虚笔奇幻，须有寓意，所谓“‘无’中生出‘有’来”，读者要得之章句之外。

略叙 见“约叙”。

铺垫 这是一种为了突出表现主要人物或情节而用另外的人物或情节作衬垫的手法。运用此法，可以使被衬垫的人物更为鲜明突出、情节发展更为自然，能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真实感，高潮和结局的出现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铺垫可以运用一些相类似或相反的人或事来衬垫，有“山外有山”或“以坏衬好”的艺术效果。铺垫用笔墨要适当，不能喧宾夺主，要兼顾与被铺垫的人物或情节之间的关系，如唐柳宗元《捕蛇者说》先写永州异蛇“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等，是为文后写蒋氏的血泪控诉作铺垫，异蛇愈毒，蒋氏“一岁犯死者二”之苦，苛政、悍吏赋敛之毒甚于异蛇也就可想而知了。

（林　岫）

渲染 渲染，原是中国绘画的一种技法名，指用水墨或淡色涂抹画面，使被烘染之物象生动突出。宋郭熙《林泉高致·画诀》称“以水墨再三而淋之，谓之渲”。明人杨慎《艺林代山·浮渲梳头》说“画家以墨饰美人鬓发，谓之渲染”。这种使色彩浓淡匀净以突出形象的技法，用以喻写作，则是通过对环境、景物、人物行为及心理等的描写，以加强气氛、突出人物、深化主题。明末金圣叹评《西厢记》时对这种技法的解释是“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不在云者，意固在月也”。渲染可分为直接正面的描绘和从侧面作间接的烘托映衬。后者，又同于“烘云托月法”，故《清诗别裁》有李天根《题听松山人雨蕉书屋题》诗句：“吾闻古人画月但画云，渲染巧妙妙人神。”运用此法须围绕一个中心，所谓“意不在云者，意固在月也”，不可恣意泼墨，淹没主要形象。渲染法运用得好，可以使文章情趣盎然，主要人物或事件更为突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主要写作者放情山水、与民同乐的喜悦之情，文中几处描写了周围景色，如“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又如“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等，均为了渲染主人的欢乐，读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感染。唐柳宗元《捕蛇者说》写乡邻“生日蹙”的情况和“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等，均是有意渲染，既加浓了紧张气氛，又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百姓在苛政下生不如死的痛苦情景。（林　岫、王一娟）

插叙 又称“插笔”。叙述中暂时

中断主要事件的叙述线索，而插入与主要事件或人物相关的另一事件或人物的叙述，这种叙事笔法叫插叙。此法根据插入的内容和方式不同，又分补叙（如对主要事件中某人物、某情节附加释解或补充）、追叙（如对往昔某个有关人物、片断作番回忆）等。主要事件的叙述是顺叙，插入的片断也是顺叙，但有些插叙常采用由此及远或由今溯古等逆笔，故又有称“逆叙”为插叙的。插叙运用得好，可以使文章包孕力强，横纵交贯，缓急相济，主要事件和情节更为充实生动。如明人宋濂《杜环小传》，在顺叙张氏投奔其家之事件前，插一段杜环父友常允恭死于九江而其母张氏年迈无所归的叙述。这段插叙既引出了下文，又以张氏投亲不被纳之经过与后文写杜环收留并侍奉张氏之义举作了对比。使用插叙要力求主线突出，插叙杂乱或过多，会喧宾夺主、枝蔓繁杂。插笔要注意前后文的过渡和照应，衔接自然，才无断裂和拼凑之病。林纾在《春觉斋论文》说：“叙到吃紧处，非插笔则眉目不清，故必补其所以致此之由；叙到纷烦处，非插笔则纲要不举，故必揭其所以必然之故。总之，须出自然，无嵌附填塞之弊，方为佳笔。”

插喻　指在叙述或说明过程中插入比喻句，以便更生动形象地叙述或说明的一种写作方法。例如明代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在论及魏王“亦不得为无罪”时忽插一喻：“木朽而蛀生之矣。”说魏王如果堂堂正正执政，“内外莫敢不肃”，那么信陵君、如姬等是不敢妄为的，此事恰如“木朽而蛀生之”一样，先有魏王之错而后有信陵君、如姬之错。插喻运用及时且恰到好处，可以突出说明对象，而且能使文章生动，并启发读者的联想。如明方孝孺《深虑论》说到各朝衰亡之教训，插入“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二喻，有叫醒题旨之妙。“良医的子女多死于疾病，良巫的子女多死于魔法”，并非“拙于谋子（不善于救活自己的子女）”，而是要说明“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等主意。插入比喻句，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方法。运用此法须注意插喻与主要叙述或说明之间要有相同或相似的特性，插入必须自然，语句过渡要畅达，否则会影响文势的连贯性。

喻起　文章开端的一种用喻突起之法。如宋代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起端：“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旨在言好兵之弊害，用“好兵犹好色”作喻起，有突兀而起、奇句夺目之妙。清人李扶九编《古文笔法百篇》中评此文眉批有“陡起用喻”句，陡起即突起。又唐代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又名《送温处士序》）的起端：“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也是以喻突起法。先以善识良马之伯乐，故冀北

"马群遂空"，比喻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乌公）擢用温处士、石处士等人才而东都才空，再以"空"字为骨，切入此时情节，以伯乐比喻乌公，又与韩愈《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相照应，喻意是十分清楚的。喻起，虽有突兀而起、陡生文势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要叙说的事情或人物更为形象化，从而激发读者的兴趣和联想，增强文章的吸引力。

照应 使前后文互作呼应、顾注，在文章结构经营方面的一种技法。前去以使后顾，是预伏，对前法的响应，是照应。前伏后应，往往同篇对应使用。照应可以使文章中人物或情节的来龙去脉清晰，在篇章结构上瞻前顾后，浑然一体，而且对某些人物、情节、冲突、道具等到强调或突出的作用，不时唤起欣赏者的回忆和联想，更能引人入胜。照应因下笔不同而异，有重要情节的照应、人物语言或心理活动方面的照应等多种形式。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太子丹在荆轲行刺秦王前曾要求生劫秦王，以便迫使秦王还掠夺各国的土地，如果生劫不成，再刺死秦王，这就是预伏。待荆轲行刺受伤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就是照应。荆轲失败，欲以生劫秦王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是最重要的原因。清人魏僖《日录论文》说"文字首尾照应之法，有明明缴应（即照应）起处者，有突然不顾者，有若无意牵动者，有反骂破（即道破）通篇大意，实是照应收拾（指结尾）者。"

操纵 又称"擒纵"。意指先放开笔写，然后再收束的表现手法。宋王迈《臞轩集》说"文亦有活法，先使意气张，如破劲敌垒，须擒贼中王"，即指此法。清代陆以湉《冷庐杂志》评曰："文家操纵之笔，太史公最为擅长。有以一句纵一句操而于一篇之中屡见之者，试以《鲁仲连列传》证之。'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操，抓住。纵，放开。文章有操纵，文势必有起落开合，能给人以强烈印象，也有利于深化主题。例如宋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文有擒纵，故起伏跌宕，蓄势甚奇。写范仲淹贬官后，与高司谏相见于余安道家，高诋毁范仲淹，"予始闻之，疑是戏言；乃见师鲁，亦说足下（指高司谏）深非（诽谤）（范）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先放开写反向或意外的一面，拉开距离，然后写结局，会显得新颖生动。宋苏辙《黄州快哉亭记》先写快哉亭的环境和由来，继写世俗之快，大王之快和坦然志士之快，气势开阔，至文尾作一收束，落笔至"此皆骚人志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擒得有力，一反前意，余味隽永。操纵有两句见之者，也有通篇几擒几纵者。

擒纵 又称"操纵"。见"操纵"。

三表法 表，即标准、法则。三表法，又称"三法"，本是墨子关于认识论的术语，语出于《墨子·非命上》："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三表，即发议论或写文章要遵循的三个标准。“本之者”，是说要言有史据或者史鉴。“原之者”，是要考察百姓在所见所闻之后发表什么意见。“用之者”，是在实行中检验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古代议论文中多用墨子“言必有三表”为抒发政见、阐明主张之本。这种用以上三法著文的，也称“三表法”。例文如唐代柳宗元《封建论》。周代之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开始由封建制（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即各地区为国家的地方行政单位，地方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而非世袭，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自秦至唐，仍有人主张恢复秦以前的贵族分封制。《封建论》立论是反对分封制，先从“本之者”看，根据各个时期的历史事实，指出封建制之弊害和郡县制之优越，其次从“原之者”考察，指出分封制之贵族统治者虐待人民而朝廷无奈，然后就“用之者”分析，分封制“末大不掉”（即尾大难动，意指下不从上），朝廷压不住诸侯，而郡县制可以“摄制四方，运于掌握之内”；前者“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而后者对地方官吏“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甚至“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所以“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是符合国家人民利益的。用三表法作政论文，优点是立论有据，论证从事实和利害关系上着眼，故笔锋犀利，易击要害，有强烈的说服力。

引古起　文章开篇笔法之一。引古代史实突兀而起。这些史实须是经过选择的有针对性的典型事例，用以说明文章要描述和议论的事物的特征、性质、规律等。在议论文中，史实也是论据，可以使抽象、复杂而深奥的事理，变得具体、简明而浅显易懂一些。开端引古，可以启发读者的兴趣和联想，紧跟着作一转折或引发到要说明的事物上，如果过渡自然畅达则更有效果。清人李扶九编《古文笔法百篇》称宋代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起端用此法。此文起端说“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表彰他有好的开端而且勉励他坚持下去）。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使他痛弃前非而重新开始）”，引古发起议论，更具有说服力，为最后点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作了牵引。

引证法　引用若干事理作为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论证方法。引用的事理通常指经典性著作言论、历史事实等早有公论的材料。这些材料用作论据，可以使论证和说明更加真实可信。引证往往是若干事理同时并列引用，能增加气势和给人以不容置疑的说服力。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有

"学者于文用引证，犹讼事之用引证也"。例如明代方孝孺《深虑论》自"当秦之世，灭诸侯，一天下"始，先引秦事一证，又引西汉事、东汉事、魏晋事、唐事、宋事，一一作证，成败利钝，剖析入微，历数各朝兴亡之教训，指陈历代君主均片面吸取前代教训而忽略一些掩盖着的重要问题，故"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运用此法，被引用的事理必须具有准确性和针对性，引证时要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实例的介绍也要具体生动，有的放矢。

反敲法　又称"反击法"。敲，即击，扣。指论述过程中对批驳的对象，以代为区处的方式予以层层驳入的手法。代为区处，即代替对方给出办法、方向、出路等，借此反驳对方原有的论点或作法不必非此不可，从而历数其错、其罪。《古文笔法百篇·曲折翻驳》说明代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中用了此法。侯生献窃符之计，如姬窃符，信陵君以此救赵，虽然在客观上有救赵存魏和"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策"的作用，但擅自盗符均是出自私情，故文章以此立案，力论信陵有罪，表明反对人臣结党营私和要求加强君主权力的政治主张。文章论及侯生、如姬等人罪时，说信陵"曷（何）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如果真"为信陵计，曷若谏魏王而说之救赵；不听，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如果真是"有意于报（报答）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这样的话，"则信陵不负魏，亦不负赵；二人不负（魏）王，亦不负信陵君"。此段各为信陵、侯生、如姬指明作法、出路，以其计谋偏偏未出于此而罪之，显得文势曲折变化，驳入有力，直令不同识见者无言以对。反敲法，实际上是一种假设驳论手法，并非主要的直接驳入而近乎"旁敲侧击"，是一种能在曲折翻驳中揭出对方论点致命之处的重要手法。　（林　岫）

对偶法　类同"对比"。文中段落以类排比，两两相对，称为对偶法。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评宋王禹偁《待漏院记》文曰："以法言（用笔法言之），起对（指用天道、圣人对起）、中对（指用贤相、奸相对），乃对偶法。"又如唐代韩愈《原毁》，文章开头第一句便是"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在一番论述之后接着说："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这样，通过对古今君子在"责己"、"待人"两个方面的比较，作者的观点，即赞美古人的"人乐为善"和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改正自己不足的做法，批评那些专门抵毁别人的小人，则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原毁》通篇皆用排偶，只是结尾处以单行作收，分析了"怠"、"忌"是"事修则谤兴，德高则毁来"的思想根源，并为自己的怀才不遇作了"不平则鸣"。如此，文章则浑然如一，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茅鹿门（明人茅坤）谓，秦汉来无此调，昌黎公（韩愈）创之。……其摹写人情，

形容刻酷，如铸鼎象物，燃犀烛怪。”(见《古文笔法百篇》) （王一娟）

关锁法 在文章分段处或篇末处作结语，用以醒段明篇。明代李腾芳《山居杂著》：“锁者有一步一步锁者，步步锁为妙，然须不觉重迭方得。……有连篇总锁者，有逐段分锁者。逐段分锁为难。”连篇总锁者，比较常见，如汉东方朔《上武帝书》，全篇述自己成长过程，最后以“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关锁。逐段分锁，即步步锁，例如唐杜牧《阿房宫赋》，写宫中景之大，以“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关锁，次写宫中美人之众，以“有不见者，三十六年”关锁，又写宫中物之多，以“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关锁，末写秦王“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等“六不该”后，以“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关锁。步步锁，可以使文章段落层次分明，而且文如流水，行至转折处，以简洁语对段意作一关锁，有助于读者整理思绪，合卷之后，文章有几处水流洄环曲折，总流向奔往何处，均十分清晰。

那辗法 那，同“挪”，给出矛盾(或疑惑，或悬念)后延缓节奏，左盘右旋，缓缓移向题旨。辗，旋转，指点破题旨之前又悠悠宕开，盘旋后再道明题旨。金圣叹评论《西厢》说，“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并称之为“那辗”。此种写法回避了平直的正面陈述，使文章顿生波澜曲拢，情节起伏曲折，更富有艺术魅力。由《战国策·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可悟此法之妙。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求救于齐而齐要太后幼子为人质，紧急之时大臣强谏，太后怒言“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之后，则写触龙见太后的一大段对话，由病足、饮食、强步，说到自己的儿子以论太后爱女甚于爱子(长安君)，眼看要点破题旨，笔又宕开，问赵之继承者，落笔到“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这是“辗”。由此破题而出，再说太后不令长安君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则后果不堪设想。运用此法，常与照应、对比、错综等手法合用。

步步锁 指在文章分段处作内容上的小结，有总括或点明段意的作用。因是逐段分锁，故叫步步锁。例析见“关锁法”。 （林 岫）

进步法 文章段落之间后一段的意思比前一段的意思更进一层，谓之进步法。(见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如明代宋濂《送天台陈庭学序》，在叙述了西南川蜀山水之奇险以及陈庭学之出游后，叙述了自己虽有此愿望但始终未能如愿。结尾更进一步，说“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也许是“有出于山水之外者”存在吧。这样以推测之笔写出，发人深思，意思更进一层，能使整篇文章的意境高于一般论山水游历的文章，颇具意在言外之妙。《古文观止》评曰：“先叙游蜀之难，引起庭学之能游，是正文，继叙己之不能游，与前作反衬，末更推进一步，起伏应合

如峰回路转，真神明变化之笔。”

突陈法 指文章开端突兀而起，开势矫变的一种笔法。有开篇奇离纵肆，突卷波澜，引人入胜之妙。此法往往采用比喻、象征等手法，即借用某种特定的具体形象暗示某人或某事的艺术手法，启发读者去联想，去思考。《古文笔法百篇》中绂麟引周武青语曰：“韩（愈）文惯用突陈法，如周公、水火、怪物、伯乐、疏广等篇。无异金人使用铁浮图、拐子马，以冲突为长技。”如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开篇便曰：“天池之滨，大江之濆，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品汇之匹俦也”，比喻奇绝，接下去的几个比喻皆是如此。只有最后一句才归结到自己：“愈今者实有类于是。”全篇皆是比喻，最后点出喻己，可唤醒全篇。朱良玉语曰：“公以龙自比，笔亦如神龙在天，夭矫不测，寸幅云烟擅沧海之大观，奇绝，老绝。”（《古文笔法百篇》）

借点法 作者不直接解题，而借文中他人之口点出。《古文笔法百篇》评解唐代李华《古战场文》曰：“借亭长口中点题，此借点法也。”《吊古战场文》开头先对这片战场作铺陈描述，然而并未说这是何地。然后作者写道：“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清人林西仲曾说：“古战场为朔北沙漠之地，人迹罕到，当年交战亦无有目击其事者。故文中初据亭长之说，再则曰吾闻，又曰吾想，又曰吾闻。”实际上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借古事来抒发自己的感慨。通过他人之口来叙说，可以增强文章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王一娟）

倒装法 在叙述人或事件中按常规文序应交待在前的，如人物名姓、事件发生时日及地点等，偏偏倒装于文中或文尾的一种写法。此法可以在文章前半部留下未知的空白点，又不影响情节的展开和议论的进行，最后填补这些空白点时，能收合卷释疑、和盘托出、交待周到的效果。例如唐代柳宗元《梓人传》，意在借梓人发端，大书宰相之道，故梓人名姓和梓人职业之古称或今称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放在文尾点出，有补充说明、交待周到的效果。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结尾写“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也是一种倒装，前文留下悬念，文尾点出，自有合卷释疑之妙。在文中点明的，如宋苏轼《方山子传》开篇不说方山子何许人，待苏轼谪居黄州，偶遇方山子时才言明方原来是“故人陈慥季常”，能给人以意外感。清人沈德潜曾说“写游侠须眉欲动，写隐沦姓字俱沉，自是精神能手”，即指此法。

尊题法 尊题，即照题，以题意贯穿全文，处处扣题。此法可突出所写的人物，通篇浑然一体。有通篇尊题、反类尊题之分。如宋代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写光武帝气度恢宏、礼贤下士，均是为了写严先生（严光），落笔重点（实写）是尊题，写严光鄙视权贵和气节清高。《古文笔法百篇》评解有谓此文“有起有结，有平有侧，有夹缝。予尤爱其起句，以‘先生’特安于光武之上，平中已寓侧矣。而每

比俱先生人（指严先生），极得尊题之法”。可参见“反类尊题法”。

（林　岫）

感慨法　又称“感慨生情法”。感慨生情，以赋体为文的如唐代李华之《吊古战场文》，通篇慨古伤今，舒悲壮之气，抒凄婉之情。开头描写古战场：“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开卷即生一股悲凉之气。接着追溯“秦汉而还，多事四夷”，言历代好战之故，又用叠字叙述交战情状：“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最后阐明宜守不宜战之意。《古文笔法百篇》有评解曰：“但用赋体为文，段段用韵，感慨悲凉之中自饶风致。故尔人人乐诵。”由于应用韵法，读起来铿锵有力，琅琅上口，极富感染力。参见“感慨生情法”。

蟠蛇法　一、句法语。文章一个段落的开头和结尾意思相连，屈曲盘伏呈一圆线，如蛇自衔其尾。清代陈善《扪虱新语》卷二：“桓温见八阵图，曰：‘此常山蛇势也。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钱锺书先生谓“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管锥编·左传正义》）如《公孙龙子·名实论》：“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前后呼应，自有语意连贯之妙。这是于一段之中运用蟠蛇法的例子。二、章法语。即将此法应用于整篇文章的结构安排中。如宋代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开头先提出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这一观点，接着叙述唐庄宗亡国之事，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最后仍归结到文章开端时所提出的论点上。运用蟠蛇章法，可使文章宛转回复，首尾呼应，使要阐述的主题更加突出。　（王一娟）

一字褒贬　于一字之中寓褒贬之意。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儒家评《春秋》“微言大义”，常选择一些适当的文字暗寓褒贬（不限一字），故“一字褒贬”又称“春秋笔法”。范宁《谷梁传集解序》：“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言记事论人用字辞关系重大，片言只字也须慎用。《左传》、《史记》都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笔法。如《春秋》记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曾对此作了释解：“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说段（庄公之弟）不行孝悌之道，故不称弟；兄弟二人如二君之争，故称“克”；叫庄公“郑伯”，是讽刺他没有好好地管教其弟；说郑伯早有杀弟的想法，所以不明说段出奔共（春秋国名），这都是怪罪郑伯。言辞寓褒贬，是一种曲婉评论事或人的表现手法，可以使叙述客观，富有说服力，而且因是暗寓，读者反复吟味作者字斟句酌的用心方能心领神会，比直接参入断语更含蓄和合乎情理。

入彀之法　原指旧时考场哄骗考官的作文法。入彀，本意是入圈套，后称科举中式为入彀。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三：“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

（主考官）入彀之法。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此说与“凤头”、“豹尾”相同。没有真才实学，仅以篇首奇句夺目和篇末媚语摄魂，自不可取，但是在作文中讲究开头和结尾的作法，如开篇引人入胜和结末余味隽永等也是应该的。

引经结意 又称“引证作结”、“结末据古法”、经，经典著作。引经，即引用经史典籍中的名句、故事等。引经结意，指引用经史典籍中的名句、故事作为文章的结尾的一种方法。此法运用得好，引经据古又切中肯綮，可收意在言外之妙。明代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结尾“《春秋》书‘葬原仲’、‘翚帅师’。嗟夫！圣人之为虑深矣”，即用此法。“葬原仲”，指陈国大夫原仲去世后其旧友季友私自来陈国料理其后事一事，《春秋》认为是明党营私的行为。“翚帅师”，指宋、陈、蔡、卫等国伐郑，宋求鲁出兵相助而鲁隐公未允，鲁国大夫翚执意请求后竟私自带兵前去助战，《春秋》认为是目无君主的行为。唐顺之在历数信陵君等有罪之后引经结意，突出和深化了主题（意在写“人臣植党之戒”、“人君失权之戒”）。引经据古，可以参照古代事理增加文章的说服力，用在作结，有点醒主旨的作用。

加一倍法 又称“加倍法”。通过论述他人他事，由此及彼地引申或扩展，可以使主要人或事、主要论点更加鲜明突出的一种笔法。此法对论述主要人或事、主要论点，有推进论述，使析理深刻和增强说服力等“加倍”效果，故名。《古文笔法百篇·曲折翻驳》眉批说明代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论及赵国平原君、食客侯生、魏王宠妾如姬等人有罪时用了此法。赵平原“不请救于（魏）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而不知有王”，假如祸不在赵或赵无平原，“信陵亦不必救”，出于私情，赵平原有罪，信陵君则更有罪。侯生献窃符之计，如姬窃出虎符，二人为私情助信陵一臂之力，“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决非是为了救亡国、救赵国而去“窃魏之符以纾（解除）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的。罪平原君、罪侯生、罪如姬，信陵君之罪愈见，如罪亦加等，即使不直接历数信陵之罪，主意也相当清楚。

同文异取 同样的素材，因题旨不同以及作者认识差异，可以从不同角度择取所需。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橙、橘、楂、梅，庖人得之，选甘脆以供笾实也；医师取之，备药物以疗疾疢（chèn，热病）也。知斯义者，可以同文异取，同取异用，而不滞其迹者矣。”意指同是橙、橘、楂、梅，厨师选了放在竹篮子里供客人享用，医师则用来制作药品，如客人去皮吃果肉，而医师却用果皮制药等。题旨是作者对素材的一种认识、判断或评价，所以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去看素材，素材就如“横看成岭侧成峰”一般。同样是说千里马，唐代韩愈《杂说·马》重在说有伯乐才有千里马，没

有发现人才和重视人才的伯乐，千里马即使存在也等于无，故取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人才被埋没）的悲惨遭遇着墨，而宋岳飞《良马对》也写了千里马，重在写千里马若不能得精心爱护也会"不幸相继死去"，所以集中笔墨写饲养和使用千里马要注意什么，并以驽钝之马作了比较。这种立意技法可以突出和深化主题，即选材为主旨服务。

连篇总锁 指文章篇末作一总括，回顾全篇点题。明代李腾芳《山居杂著》称作文"有连篇总锁者，有逐段分锁者"。例析见"关锁法"。（林 岫）

放宽起法 指作文起端的一种方法。放宽，即宕开，推远。起端推远说来，然后笔笔扎紧，后扣文题，例如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卷是"环滁皆山也"，与"醉翁亭"似无关系，然后由山及琅琊；及酿泉，最后再说"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清人李扶九编《古文笔法百篇》有评解说，"一'也'字起下许多'也'字，是放宽起法。"文章的首句为"环滁皆山也"，接下去有"……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等共二十个"也"字如一红线，将醉翁亭的位置、命名以及建亭原因有机地贯串起来。《古文笔法百篇》解评曰："随记随解，记体中千古创调也。劈首用一'也'字，生出下二十'也'字，然首一'也'字，是拖起下文，尚虚；与下众'也'字实煞者不同。从来文中用'也'字之多，无过于此，故独出一奇。"（王一娟）

阴阳向背 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画诀》：'石有三面，树有四枝。'盖笔法须兼阴阳向背也。"《画诀》为明末清初人龚贤著。这里意指作文之笔法，须象作书画一样有整体构思和设计，多侧面地不拘一格地运用，就象石画三面、树写四枝一般。阴阳，即表里，向背，即正反。笔法的运用须灵活，而且兼顾整体。如此，方通篇圆合，"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明代袁宏道《徐文长传》通篇写徐文长人奇、诗奇、书奇、画奇、才奇、病奇，通篇章法浑然一体，用"一字立骨法"统之。就列数徐文长数奇之后又总结为"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此字误正，解作"倒霉"）也哉！悲夫"，这又是先分后合法。此文篇首用初识徐文长诗时"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作侧面叙述，又是借叙手法。笔法兼阴阳向背，交叉错综，又和谐浑然，能增强文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指从正反两方面论述问题的一种笔法。（林 岫）

阳绍阴违 绍，继续。从表面意义上来看，前后句子的意思是相连接的，而实际上，作者的寓意与字面意义完全不同。如《左传·昭公五年》："楚子欲辱晋，大夫莫对，薳启强曰：'可！苟有其备，何故不可？……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遗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并始说有备则可，中间用五百字敷陈事理，说明国家并没有作好准备，最后说无备则不可，却用反语，说："何不可之有"，妙极。此等

句式，钱锺书先生谓之“阳若语绍，阴则意违”。此法故意正语反说，富于变化，而且顺着对方的心理说，在不知不觉中巧妙地移花接木，驳倒对方观点，阐明自己的看法，含蓄委婉，暗含讽刺意味，钱锺书先生称赞这种写法“起结呼应衔接，如圜之周而复始。”（《管锥编·左传正义》卷49）

（王一娟）

事中见指 叙述中作者不持论断，只让事件自然铺展，若需对其中某人某事作评论时只借事件中的其他人来论断而作者始终不发议论的一种手法。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指者，唯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唯班孟坚（即班固）间一有之，……”事中见指，即述事中自见旨意，寓论断于述事，故又称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例如《荆轲传》中写荆轲不畏强暴的侠义精勇精神，但始终未对荆轲作任何评论，篇末借鲁勾践“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一席话，既赞扬了荆轲息怒让人的品德，又批评了他不精剑术以致刺秦王失败，这实际上就是司马迁对荆轲的评价。此种手法因为不插入作者议论，始终由事实或事中人物说话，故有叙事客观和真实性强的效果。

首尾相援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附会》：“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则遗势郁湮，余风不畅。……唯首尾相援，则附会之体，固亦无以加于此矣。”元人倪士毅《作义要诀》谓作文：“首尾当照应”。如宋代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论》，全篇专论庄宗盛衰之得失天下事，故首尾照应在“盛”、“衰”二字上，虽尺幅短章，却一统首尾，唤人警醒。又唐代韩愈《龙说》，文尾有“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与文首“龙嘘气成云”照应。首尾相援，可以使文章血脉贯通，融为一体，文中纵有几番转环，如鱼游水，鱼身摆动活泼，也须首尾相衔方能贯通。

春秋笔法 又称“一字褒贬”。指《春秋》中使用的文笔曲折而暗寓褒贬的一种传统笔法。因常见于史传，也称“史传笔法”。鲁迅《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说“（我）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就是指这种笔法。古代儒学者认为孔子修《春秋》在用字上颇见斟酌用心，能够“以一字为褒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而含有“微言大义”（《汉书·艺文志》），故又称“一字褒贬法”。可参见“一字褒贬”。

叙来历起 指由叙述人物或事物的来历并以此作为文章的开头的一种写法。例如元代元明善《舣槎亭记》文首先道亭名之来历。舣，泊船。槎，枯木。汉武帝时使张骞于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带）寻河源，乘槎经月。张君锡慕其事，曾建舣槎亭。此文针对文章题目直道来历：“汲人张君

锡氏作叙槎之亭；志怪者云'海与天河通'，盖有人乘槎至斗牛间，征而纂之，故以名亭。"下文则借斗牛乘槎这个虚传的故事写张君昔日所游之危等等。"叙来历起"能给人以完整的印象。此法类同"叙祖起法"。

叙祖起法　指由叙述人物或事物的身世、缘由、根底等历史情况起笔作为文章开端的一种方法。叙祖，即叙祖宗、说家世。例如唐代韩愈《毛颖传》，全文皆为喻写，旨在为"笔"立传，文章开端由笔之祖宗（中山兔）、家世说起，次言造笔者、出身、才能、遇合、荣幸、伴侣、老死、后代等，最后落到"颖之无负于秦，秦之少恩于颖"，感慨作结。此法因是"从头说来"，故一般常用作传状文章开篇笔法。又如宋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首段，尽叙山名之来历，先道"褒禅"来历，次言"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再辨二洞名之来历。叙祖起法，是按历史情况的时间推移来展开叙述的，读起来条理清楚，又因开端就追根溯源，和盘托出，故能给读者留下一个完整而深刻的印象。

高一层起　指文章开篇立足高远、见识深宏，寓有精警正大之意。《古文笔法百篇·起笔不平》眉批称宋司马光《谏院题名记》文章用"高一层起"法。此文记在石上刻谏官名姓以待后人品评一事，说明谏官对国家和人民肩负的责任，敦促谏官为后世留下忠直的清名。文章一开头若写谏官的职责如何则太一般化了，此文由"古者谏无官……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说起，起手不凡。古时无谏官而汉以后有，一肩担负天下"得失利病"之重任，字字含钴锷，则落地有声。次言其职守，说谏官本无利，而且最易犯名，汲汲于名（非一己之荣名，乃国家朝廷之大名）亦是"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说到"名"上。最后方点题事：人皆以题名荣，而谏院题名则是以题名警惕作为。再回顾文章首段，愈见其起笔高远。若无篇首"高一层起"，后段说以题名警惕作为，又有何人惧之。如此可见，题名之了得或了不得，全系在首端。　（林　岫）

起笔不平　指作文时要善于安排文章起端，不要平平而起。或一呼而起，或劈首问起，或奇语夺人，出语不凡，足以醒人耳目，才有引人入胜之妙。如唐代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开头便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气韵雄浑悲凉，极富力度，可谓一鸣惊人。下面并没有接着写燕赵，而是转到对董生的叙述上来。董生因多次考进士不中，打算到河北一带去投靠藩镇的军阀，而韩愈希望他能留在长安作官，文中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中评解曰："劈首突起一句，下文不接，最为奇横。中一正一反，文意委婉。末结出'明天子在上'五字，凛然责诸镇之不臣而讽董生以不必往。寥寥短章，一起一结，笔亦不平如此，韩文之所以如潮也。"运用此法不唯苦心经营起端，下文也须气势贯注，转折、结尾推均要跟起笔相称，否则"长坂坡一吼"下文无戏，也是败笔。

如宋欧阳修《纵囚论》，起笔借议论君子与小人在信用、正义上的不同发端，然后落笔到死囚四百纵释而归狱事，层层辨驳，愈逼愈紧，结尾推出尧、舜、三王，批评标新立异、违背情理来沽名钓誉的作法。一起一结，如壁立千仞，愈见起笔之不平。

（林　岫、王一娟）

起端立案　文章开端写法之一。指在文章开篇亮明论点或以精炼的文字道出主旨的写法。如明代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开篇"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为通篇立案，下文层层翻驳均围绕着窃符有罪但未足以罪信陵而生气势。又如唐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开头"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韩愈字）往年言史事甚大谬"。一曰"甚不喜"，一曰韩愈所言"甚大谬"，下文针对韩愈政治上的软弱提出"居官行道"的原则，以及身为史官者"当为而不为"不如引去（辞职让位）等激切言辞，均据此而来。又如秦李斯《谏逐客书》，奏章首句"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即是立案。此法先亮明论点，道出主旨，有利于上下贯通，所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予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引刘勰《文心雕龙》语）。

绵里针法　清人冯李骅《左绣·宣公十二年》说："晋人作吴语，是借此衬出殿卒不败，为上军略见生色，与下不可苟射，为下军略见生色同，皆是暗暗为士会、栾书、荀首出脱。遥映前半篇议论，以反射林父'不知所为'，为绵里针笔法也。"绵里针，即暗中有刺，表面是叙事，实际是讽刺。冯李骅这段话是指《左传》楚邲之战的描写。晋上军逃跑时兵车陷坑不能进，楚人教他们把车横木扔掉，后来马盘旋而不进是因为旗大兜风，楚人又教他们把车上的大旗拔下来，晋上军边逃边回头对楚人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你们逃跑得多，有经验）。晋下军中荀首儿子为楚军俘虏后，荀重上战场寻找可以作为人质去交换儿子的人才射箭，所以有"不可苟射"，略为下军生色。当然，这样写是为了替晋上军和下军的将领们开脱。暗中讽刺的均是指挥这场战斗的无能统帅林父。晋上下二军均不弱，何以遭到如此结局呢？读者深思之后，是不难知道暗讽的对象的。此法须含而不露，耐人咀嚼，亦不可暗藏得过于隐蔽。

虚实互用　这是一种使情节曲折多变、人物形象更加丰厚真实的艺术手法。按照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作正面描绘或直接记叙，是实写，作侧面烘托或间接映衬，则是是虚写。清代冯李骅《左绣·成公十六年》："文子不欲战，纾忧外惧，照定首尾落笔。范匄趋进，与楚之登车，一于楚阵之压晋军也，不用实写，却于范匄口中论出；一于晋阵之疏行首也，亦不用实写，却于楚子眼中望出，虚实互用，结构尤奇。"说的是《左传》写晋楚鄢陵之战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当时晋厉公将要伐郑，范文子不欲战，因为他认为晋国胜利会引起内部争权夺利的混乱，结尾奉劝晋君戒惧，则是

"照定首尾落笔" 战前"楚晨压晋军而阵，军吏患之"，是实写。当时范匄趋进，提出填平炉灶腾出空地来列阵，是虚写。后来楚子（王）登车观察晋军活动，说晋军那边很乱和尘土飞扬，伯州犁在旁边解释说"晋军要填平炉灶来列阵"。这时"晋阵之疏行首"等情况均未作实写，却一一由楚王眼中看出，这是实写。虚实映带，是相反相成，相辅相生的。虚因实写更能唤起读者的想象，而且使文章简洁和增强真实感。实因虚写烘托后，直接记述或正面描绘的事件、场面、人物等会显得前景开阔、包孕丰富。虚实互用，最适合表现比较复杂的事件和多场景的生活画面，能更生动形象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使文章结构紧凑合理并具有较大的内涵。虚实互用须注意的是，虚写终要以实写为基础。

劈首问起　指正面就文题发出疑问的一种文章开篇方法。劈首，即正面照头而来。此法有一喝而起之势，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兴趣，也有利于下文接应。《古文笔法百篇·起笔不平》称清代刘曾《汉关夫子春秋楼记》文章开篇用"劈首问起"。此文首句"夫楼胡以'春秋'名也?"正对"春秋"二字发问，次言《春秋》书之来历、汉代关羽（关夫子）读《春秋》书之来历，以及"起危楼""与晴川、黄鹤二楼鼎峙相望，肖夫子读《春秋》像于其上。"说到"春秋楼"之来历，再回扣首句发问，有"登高一呼，众山皆响之势"。

一字立骨法　清李扶九编集之《古文笔法百篇》卷三列有"一字立骨"法。骨，意指文章的体干、意脉。一字立骨，指全文材料安排、结构脉络、旨意的脉络均围绕一个字（文眼）张本，此字贯穿、牵动、照应全篇。如明代袁宏道《徐文长传》写明代多才多艺的杰出剧作家、艺术家徐文长，以"奇"字立骨，写徐的才奇、用兵奇、诗奇、文奇、书奇、画奇、病奇等，将徐坎坷的遭遇、杰出的成就作了简洁明快的介绍和评价，最后独擅数奇的徐文长因郁郁不得志而抱愤辞世，必能使惜才之人哀忧深思。又如宋苏轼《留侯论》写汉代张良，全篇以"忍"字为骨，唐刘禹锡《陋室铭》以一"德"字为骨等。此法在结构上可以形成体干，使文脉清晰、整体性强，在内容表现上能突出重要特征，深化主题，意脉浑然畅通，材料的安排自然能各得其所。　（林　岫）

小中见大法　又称"以小见大法"、"洞眼观天法"。是以小题材生发大主题的一种写法。"大"和"小"是对立而统一的。作者透过一些貌似平常的题材，发现、生发或挖掘出有重大意义的主题，即可用此法表现。或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写，或由某些侧面去反映全局等，以力求达到"以小见大"、"一叶知秋"的艺术效果。例如南宋林景熙《蜃说》，写的是作者亲眼目睹浙江海滨的海市蜃楼。如果笔触只写见闻，主题肯定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可言。此文由见闻产生联想，将历代帝王营建的阿房宫、章华宫、铜雀台、临春楼、结绮楼等比作稍纵即逝的海市蜃楼，结合南宋国事飘摇堪哀的现实抒发感慨，即是

“小中见大”。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岳阳楼写景绘情，如果只落笔到写“亭台楼阁记”一类，就成不了“掀扬天地之大观”了。作者以“忧”、“乐”、“悲”、“喜”四字，切定洞庭，提出仁人之用心，何其正大。《古文笔法百篇》评解此文谓“《楼记》发此大议，可谓小中见大之文”。此法要求作者善于发现和把握“小”题材与时代、社会等“大”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所谓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洞眼虽小，也可观天。此法便于用简洁明朗的叙述深化主题，而且能使作者要说明的大道理具体而亲切地传达给读者。（白 迪）

无中生有法 用寓言手法虚构出一个故事，为表达自己的观点服务。古人为文尚实，故称此类文为“无中生有”。清人李扶九《古文笔精妙法百篇》中评晋代陶潜《桃花源记》，有评解曰：“予尝言文未有无为而作者，如何又有无中生有之文？不知情意是实有，而事与境不必尽有。如此首，桃源是有、渔人之遇所未有，乃作者添出为文之波澜，以寄托其意耳。”《桃花源记》开头叙述武陵人之奇遇，历历分明，读之如亲临其境。及至结尾，方知这“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处原来是作者想象中的一方乐土。这种写作方法，在作者是“无中生有”，在读者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作者用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片幻境紧紧地抓住了读者，读者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文中的观点。此法与虚托法不同，虽然文格均高奇，但是“无中生有”须有寓意，明明一篇子虚文字，却“假”得逼真，虚托法实为虚实写法（如虚实相生、避实击虚等）。

（王一娟）

引证作结法 又称“引经结意”。指结尾处用引证法。引证，即引用若干事理作为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论证方法。引用的事理通常指经典性著作的言论、历史事实等早有公论的材料。文章结尾引证切合，可以对前文论述作一补充，或引古比今使论证更有说服力，或翻作余波使论证方圆俱到而更进一层。《古文笔法百篇·曲折翻驳》称明代郭子章《管、蔡论》是用引证作结法。此文评论武王伐纣，封纣子武庚于殷并使弟管叔、蔡叔、霍叔监之，后来此三叔与武庚叛一事。郭子章独抒己见，力论“古今皆力诋其叛之非”为非，文章结尾引“新莽之篡汉也，其子宇不以为可；朱温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为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即父子兄弟之间有不可得而灭者。彼管、蔡者即不类，吾以为宇与昱之俦而已”，引证得力最见作者识见和文笔精妙。王莽篡汉，其子王宇反对，朱温篡唐，其兄朱昱也反对，因天理存乎人心，父子兄弟也不会苟同。这两件早有公论的史实引来为管、蔡等“叛乱”事作参照，结论自然十分清楚，使前文论证更有说服力，所以说“彼管、蔡者即不类，吾以为宇与昱之俦而已”（如果说管、蔡等都不是好人，那么我认为王宇和朱昱也是一样的）。用此法须注意与前文的衔接，意脉相贯，顺理成章，引证必须针对性强，否则引证作结就有拖泥带水之嫌。

反类尊题法 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文字有反类尊题者，子瞻（苏东坡）《秋旸赋》先说夏潦之可忧，却说秋旸之可喜，绝妙。若出《文选》诸人手，则通篇说秋旸，斩（一本作"渐"）无余味矣。"此种笔法是先不正面写，而是从跟要写的人或事相反的意思说起，形成一个对照面，然后转向要写的人或事时，前后映衬，能突出题旨，比孤立地表现一种内容更富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反类尊题，就与题旨相反。如写种花，可先写无花使环境单调等等。苏东坡《秋旸赋》如果正面说秋旸可贵，文势无跌宕起伏，就很难给人以深刻鲜明的印象。先从夏潦（音 lǎo，雨水太多）可忧说起，再转写秋旸之可贵，"浴于旸谷、升于扶桑"，给百姓们带来的欢乐，秋旸之可贵便跳脱而出了。此法与抑扬笔法不同，后者指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此法所写非同一事物，用反类尊题的目的是为衬托出题旨。（林 岫）

水涨船高法 欲叙说甲事物，不直接着笔，而是先说乙事物，在对乙事物的褒或贬中表现作者对甲事物的态度。金圣叹评宋代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一文说："题目是严先生，却以光武对讲，说得光武大，愈显得先生高。此水长（涨）船高法。"《严先生祠堂记》首句"先生，光武之故人也"，言明光武与严先生的关系。接着说光武帝位之显赫："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而"惟先生以节高之。"然后再说"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这样就在先生与光武的映衬中，先生的高大形象屹立在前。用此法，须有主客二体，客为"水"，主为"船"，虚写客体（衬体）光武帝礼贤下士，气度恢宏，实写主体严光鄙视权贵，气节清高，以虚托实，即所谓水涨船必高，可以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王一娟）

皮里阳秋法 又称"皮里春秋"，是一种暗寓褒贬而表面不作评论的表现手法。《晋书·褚裒传》："裒少有简贵之风……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如明人查继佐写《徐光启传》全文不参议断，皆以事实说话，如写其"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著述手草，尘束而已。启居约啬（简朴），如寒士，门无杂宾，不设姬媵，厅事（厅堂）至不能旋马"，褒赞徐光启清廉品格自然溢于言外。此手法是前承春秋笔法的传统手法，用一些适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例如《春秋》记载隐公元年郑庄公（郑伯）与其弟郑段争权一事，有"郑伯克段于鄢"句，《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作了解释："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作者不持论断，叙述便客观可信，写史和传记等多用此法。改"皮里春秋"为"皮里阳秋"，据说是避晋文帝皇后郑阿春名讳。

正喻夹写法 这是一种正写与喻写交互使用的手法。正写，即一般的正面叙述或说明。喻写，是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写法。清人李扶九编《古文笔法百篇》在唐代

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文前有评曰："此从将军取士上立论，真大手眼——苏氏行文每从此出，是为正喻夹写之祖。"韩愈此文以"伯东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说明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即乌公）爱才、用才之事，全文皆由喻起渡下，以"空"字为骨写乌公，所谓"东都才尽"，这是正写。恰与"马群遂空"、"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夹写。后段写人才接连被擢用，"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耶"等，似乎因失去有才华的友人而有怨，犹如"马群遂空"之憾，却巧妙地表现出对乌公知人善任的赞美和对有志之士与有才之人的合作寄予深切的希望之情。从伯乐喻乌公，以千里马喻温生、石生等被擢用的人才，结合韩愈《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喻意是显而易见的。正喻夹写可以使抽象或复杂的事物介绍得更为形象生动，便于读者认识和理解。运用此法须注意正写和喻写二者之间有无可比性和可说明性，即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特点，借助这些特点可否构成能说明正写的联系。一般认为，韩愈、柳宗元最擅此法，宋代苏轼等饮承之。

夹叙夹议法　指在叙述或议论的过程中，作者出于有感而发或交待事件发展经过的需要，插入议论或叙述的写法。叙议结合，可以使叙述兼有评价、议理，而议论又兼有可感知的形象和生动的情节等，这样既能加深读者理解叙述人物或事件的本质意义，又能有利于读者认识议论的实质和获得深刻的印象。《古文观止》评明人张溥《五人墓碑记》："议论随叙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尽致，当与史公（司马迁）伯夷（指《伯夷列传》）、屈原（指《屈原贾生列传》）二传并垂不朽。"然笔亦似之。此文开篇点出五人来历，次叙立碑的缘由，接着插入议论（言无闻而死者远不及五人之死），又叙五人激义之由、姓名可考和"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脸色丝毫未变）"，再插入议论（言五人之死可歌可颂，缙绅和高爵显位者"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叙议熔合巧妙，可收叙事见理趣、议论蕴深情的效果，从而增强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如果议论牵强或叙述连续不当，叙议游离，文章则支离破碎，有拼凑之病。

伪立主客法　先秦两汉时辞作家常用一种假托主客对话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手法，如屈原的《渔父》。唐代刘知已《史通·杂说下》说："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主客，假相酬答。"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也说"《卜居》、《渔父》两篇，设为回答，以显己意，《客难》、《解嘲》之所以出也"。这种手法可以回避正面切入的叙述，在伪立主客对话中使情节顿生波澜曲折，引人入胜，也便于作者表情达意，故为历代散文家所继承。如唐代韩愈《进学解》，伪立了国子先生（即韩愈自已）与诸生在太学馆的一番对话，表达了韩愈对政治、仕进、学业等的思想态度。先是韩愈正面堂皇的教诲之词，然后是

学生诘难，最后是韩的辩解。一些赞誉自己之辞不便己出，均可借客体道出，比正面说教更加生动形象。作者的牢骚和读者满腹疑问可借学生反诘，由韩愈之答辩释明，有豁然开朗之妙。文笔由板正转曲折，由庄重转轻松，正如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所评："文不过一问一答，而啼笑横生，庄谐间作，文心之狡狯，叹观止矣"。（林　岫）

曲折翻驳法　翻驳，即反驳。此法指在曲折深入的剖析中步步进逼以反驳对方论点的写作方法。此法最宜作翻案文。可采用例证反驳、事理反驳等手法达到曲折反驳的目的。明代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即用此法。（见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此文开篇欲擒故纵，说窃符"未足以罪信陵"，窃符只是为解救自己的亲戚平原君。全文围绕此点作层层反驳，如姬窃符、侯生帮他出窃符的主意，都是为了报答信陵君的私恩。又设一难以诘之"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赵无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这就更见信陵君罪之无可逃避。接着又论说魏王之罪，如姬之所以敢窃符，"素恃魏王之宠也"，这样，信陵君之罪就不仅罪及侯生、如姬，而且罪及魏王，极为彻底。其写作效果正如《古文观止》所云："诛信陵君之心，暴信陵君之罪，一层深一层，一节深一节，愈驳愈解，愈转愈刻，词严义正。"此法要善于抓住对方论点中的漏洞和矛盾之处，在理直气壮的层层剖析中从不同方面驳倒对方，才能取得雄辩的力量。（王一娟）

画龙点睛法　又简称"点睛法"。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梁）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张繇）画之……（画）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见在。"后称诗文中以精辟警要句点明主旨的为"画龙点睛"，因一、二句能使通篇灵动活泼之故。点睛要视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议论展开的发展情况需要而定，常在结处点睛，但不限篇末，点在全局紧要处，也可以开篇即点，也可以篇中点明。只要是用含意深邃、最富有概括力和表现力的语句，能集中生动地表现主题或人物性格特征，都可以看作是"画龙点睛"。例如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为秀才以来一贯的政治胸襟和抱负。借岳阳楼、洞庭湖之景色抒发的正是自己的这种政治思想，所以写迁客骚人的忧乐悲喜之后提出古仁人之用心，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点醒全篇，自能大气包举。点睛必须文字精炼明快，多从推敲锤炼中来，要点得恰到好处，如自然顺势而出。

抑扬互用法　这是一种使文势起伏转折，结构变化有致的表现手法。清人刘熙载说抑扬有四法（参见"抑扬四法"）。抑扬，即按下和高扬，二者互用，如反正交叉，貌似矛盾的叙述中营构出参照、对比的气氛，以便更真切生动地展开人物的内心世界、

性格特征以及故事情节。《史记·曹相国世家赞》写汉朝宰相曹参，说他“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是因为“与淮阴侯（韩信）俱（在一起）”的缘故。有抑有扬。写曹参在韩信被杀后独擅其名，是抑。写曹参当宰相后，主张清静无为，正好当时百姓脱离了秦国酷法，故“天下俱称其美矣”，言其功德归于走运，又有抑有扬。抑扬互用，或明扬暗抑，或明抑暗扬，读者当于言外得之。

匣剑帷灯法 匣剑帷灯，指宝剑在匣，明灯在帷，其剑气灯光毕竟遮挡不住。借此喻笔法，意思是作文旨意含而不露，无一泄露语，但旨意若隐若现，留待读者仔细玩味。凡诗文传记中写人、叙事、状物，有若隐若现之妙的，常以此法称之。《西京杂记》有“高帝斩白蛇剑，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胡怀琛《古文笔法百篇》称岳飞《良马对》属匣剑帷灯法。清人林西仲评此文说，“得良马与未得，一言可尽。武穆（岳飞被害后，孝宗曾谥武穆）乃将马之所以为良，所以为不良处，细细分别出来，全为国家用人说法。妙在含蓄不露，若添一语相士，便索然无味。玩‘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两者句，骂尽举朝无人，皆属驽钝，尤感慨之极也。高宗称善，而不悟其意，国事可知。其行文竟可作一篇《国策》读”。此文通篇无一语点破题旨，皆含而不露，字里行间显见为国家用人说法，高宗不悟其意，故称善。人材如马，唐代韩愈《马说》早已借影自喻，岳飞以得良马和未得良马喻人材，本来就显而易见，最后说到良马“不幸相继以死”，而“今所乘者”又是“驽钝之材”，国事之悲哀溢于文外。运用此法，须善藏。藏得要合情合理，不能云山雾罩，使人不知所云。藏得自然，在若隐若现之中展示内蕴，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转处用驻法 明末清初魏禧《日录论文》：“古文接处用提法，人所易知，转处用驻法，人所难晓。”如宋代王安石的《伤仲永》。先写“金溪民方仲永”幼时聪颖，因能“指物作诗立就”，乡人奇之，其父图利，经常拉伤永环谒乡人而不培养他。至“余闻之也久”一接，暗示时过已久。下转王安石十三岁于舅家见伤永，作诗已“不能称前时之闻”，略作顿驻。“又七年”后又转王安石二十岁复到舅家，伤永早已沉没无闻，又一驻。（可参见“接处用提法”）

事理辩驳法 辩驳是议论的一种方式。运用充分有力的论据，或以此为依据进行严密而合理的分析，层层辩驳对立的论点，并使自己的论点立于不败之地。又称“反驳法”。事理辩驳，重在从理论上层层剖析，直接揭露对方论点的不实、虚假和谬误之处，其长处是就事论事，不容置辩。胡怀琛编《古文笔法百篇》列《战国策·田需对管燕》、《桐叶封弟辩》等五篇古文归“事理辩驳法”。《桐叶封弟辩》是唐代柳宗元就《史记·晋世家》记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封一事所写的辩驳文。全文以当封不当封二

意夹击，以倘然当封，周公来及时言于成王，“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周公有错；若不当封，周公又以戏言当真，也有错，作正反辩驳。接着，又以成王若以桐叶与宫人、太监作戏言，“亦将举而从之乎”，驳“天子无戏言”之谬；以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看他行事如何），只求至当，不妨更易，若戏言也要当真，则是周公“教王遂过”（支持成王做错事）；辅臣之责任应在于使王之行合乎“道”，周公不应该为君王文过饰非和钳制君王，从周公本身的作为上剖析，三驳“封弟”之谬。全篇计五驳，结论沛然如流，认为这种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林　岫）

波澜纵横法　指文势矫变抑扬，情节跌宕起伏，结构开合纵擒的一种写法。此法与平铺直叙正好相对。通常用顺逆、擒纵、铺垫、断续、抑扬、张弛等手法，可以获得这种峰起岭伏、云卷霞飞的艺术效果。唐代韩愈《送孟东野序》即用此法（见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起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包括人、物在内，立一篇主旨。先由物说起，再说到人。又插入音乐、天时一段，然后转到人，历叙古人之鸣，最后点出孟郊之诗鸣，结句“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则是作者为孟郊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文势雄放恣肆，纵横开阖，一步紧似一步。绂麟引过商侯语：“以鸣字作骨，以善字作低昂，其手法变化在鸣字，其线索抽牵却在善字。极变化纵横，不可捉摹。”（《增批古文笔法》）（王一娟）

前后叫应法　胡怀琛编《古文笔法百篇》（文言对照）中“三十二法”之一。又称“首尾照应法”。叫应，即呼应，前后，即文章首尾。古人作文于此最用心机。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统首尾”、“制首以通尾”、“首尾相援”均指作文要首尾呼应，意脉贯通。如唐柳宗元贬谪永州时写的《送薛存义序》，薛存义将行，柳宗元“载肉于俎，祟（斟满）酒于觞，追而送之江之浒，饮食之”，“载肉”“祟酒”送行，而且“追而送之”、“饮食之（请薛饮酒食肉）”，是因为薛在零陵（今湖南零陵县）当了两年好县令，“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作者发了一通议论和评价薛之功绩后，结尾说“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我地位低贱且遭贬谪，不能考核官吏政绩好坏，所以只能在他要远行时敬赠酒肉和再写上这篇赠序作为饯行），与开端“载肉”、“祟酒”、“追而送之”等叫应，首尾连贯，浑然一体。

结末垂戒法　明人归有光在《文章指南》中说：“凡作骂题文字，须于结末垂规戒意，方有余味。此虽小节，亦不可略。如杜牧《阿房宫赋》、苏明允（苏洵）《六国论》皆得此法。”此法在文尾一方面点明题旨，一方面以警戒语给读者留下思考，有如撞钟，既唤人警觉，又清音有余，发人深思。《阿房宫赋》末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既点明作文之主脑，又以憾秦王，并憾六国，哀六国，亦哀秦王，引出垂戒之意：殷鉴不远，

如复蹈故辙，则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不亦可惧可戒吗？结尾一出，回顾前篇可知，壮丽铺陈均是为垂戒今人而设。如此，自能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结末括应法 明人归有光《文章指南》说："凡文章前面散散铺叙，后宜结括大意，与前相应。"此法指结尾对全篇有总括、回顾的作用，能兜裹全文，首尾照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的结尾："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既总括全文之乐是同禽鸟、山林、游人之乐，又照应全文的太守是醒能述以文（非真醉）的庐陵欧阳修。如果在文首即点明醉翁是谁，就失去了令人神往的吸引力。明代袁宏道《徐文长传》的结尾以"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音 ji，倒霉）也哉！悲夫"，对一代奇才徐文长的性格、遭遇、成就作了总括，因为徐"无之而不奇（没有一处不奇）"，所以在那个时代没有不倒霉的。

结末推广法 明人归有光《文章指南》说："题意止此，而于结末复因类以及其余，谓之推广文法。"此法在文尾又辟新意，此及由彼，启发读者的联想，能别出一层，发掘出作者要表达的比较深邃幽远的意思。如宋代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论》，最后以"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结，把庄宗盛衰之事推而广之，深化了主题：得失之数、成败之迹，不能尽诿天命，祸患之根多在逸豫安乐。推广作结，概想深远，有醒明题旨之妙。

结末推原法 明人归有光《文章指南》说："篇内但据事议论，而于结束复究其由，谓之推原文法。"此法指在文章结尾处对叙述的事件发生的缘由或失败的原因等作一探本溯源的交代。例如清人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写参观巴黎蜡人馆后在油画院看《普法交战图》的情景，文尾以翻译的解释作结，交代出法国人在油画上如此精细刻画自己的战败惨景是为了激发义愤和记住耻辱。又如汉贾谊《过秦论》结尾以"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复究秦由强转衰以至灭亡的原因，有深化主题和启发读者思考的作用。（林 岫）

结处点睛法 又称"画龙点睛法"。魏晋《水衡记》："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畜壁，不点睛。每曰：点之则飞去。人以为诞。因点其一，须臾雷电破壁，一龙乘云上天。不点睛者皆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有载。后来诗论家、文论家称行文透示精警醒篇之句为点睛之笔，将片言只语点明题旨的方法称作画龙点睛法。点睛，意指抓住事物最富有特征意义的部分着意点染，以此叫醒全篇，随即神态毕现、通体灵动。睛之所在，即"文眼"所在。结处点睛，是点睛法中最常见的。文章结尾点睛，既可以使事物穷形尽相或议论升华到理性的高度，还可以统摄全篇、深化主题。

例如明代张溥《五人墓碑记》结尾说“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末两句点出作文的意旨,并将五人之死作出评价,纵后世观之,生气亦凛凛。又如唐杜牧《阿房宫赋》文尾“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等,宋苏洵《六国论》结尾“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均为结处点睛,既统摄全篇,又亮明作文的本意(以古事垂戒当朝等),深化了主题。 (白 迪)

结意有余法 明人归有光《文章指南》说:“人于结末处多忽略,谓文之用工,不在尾,殊不知一篇命脉归束在此,须要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清庙三叹而有余音,方为妙手。如欧阳修《纵囚论》可以为式。”此法须结尾有弦外之音,能发人深思,所谓“文有压卷之笔”,意趣深微,妙在文字之外。所举宋代欧阳修《纵囚论》结尾,识见地高远,在层层以人情物理辩驳纵囚之后结出本意,则警策有力,耐人寻味,尤其是将“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留在章尾,更意味无穷。又明代查继佐《徐光启传》写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在明末东疆危急时主练兵、屯田、垦荒、设翻译历书局等事迹,文尾由徐教训子孙不要什么都推托到明天,写到“且曰:‘吾儿可幸,吾孙其不免矣(难免当亡国奴)。’其审以天道也夫!”作结,在明末清初之际其弦外音是发人深省的。

宾主相形法 又称“借宾形主法”。一、句法语。相形,有相喻、陪衬的意思。写“宾”是为了衬托“主”,使“主”更加鲜明突出。清人朱宗洛《古文一隅》评唐人杜牧《阿房宫赋》时说:“行文最妙是相形之法,为其情事易达也。……至结处以六国陪秦,此又宾主相形之法,有目所共晓也。”杜文中写“灭六国者,六国也”(即分析内因起主要作用),目的是要推出“族秦者,秦也”;说“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即分析失人心则失天下),落笔是要托出“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也是为了突出题旨:“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二、笔法语。即以客作陪,衬托主体,可使人物或叙事更为鲜明。《史记》最善此法。如《春申君列传》本写春申君,但吕不韦使用同样的阴谋,也遭到同样的失败,故司马迁大书吕之罪状,贬春申君之意亦不言而喻,“有同恶之阴谋,同时败露,是天然陪客”(见林纾《春觉斋论文》)。又唐韩愈的《送杨少尹序》,起端写“客”,即疏广、疏受二子,结讲写“主”,即杨少尹(巨源),中段用客衬主,更见杨少尹之过人处。中段用的主客相映,就是宾主相形。孙月峰评此文:“借二疏(疏广、疏受)形容,全在空中簸弄,其宾主相映,虚实相生,情景奇绝。”(见清人李扶九编《古文笔法百篇》)用此法,主要是在对照相形之下突出主体。

借宾形主法 句法、笔法语。见"宾主相形法"。

盘马弯弓法 这是一种引出矛盾、问题或疑惑之后故意"顾左右而言他"，宕意行笔，如盘马弯弓惜不发，以引起读者阅读和思考兴趣的表现手法。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诗文无顿挫，只是说白话，无复行文之妙。顿挫者，横断不即下，欲说又不直说，所谓'盘马弯弓惜不发'。若一直滚去，如骏马下坡，无控纵之妙，成何文法?"文中所引"盘马弯弓惜不发"是唐代韩愈诗《雉带箭》中的两句，意思是狩猎时盘马弯弓等待时机。用于诗文写作，指作者故意留下悬念，有疑不解，待情节发展至高潮处再点破题旨，能收出奇制胜之妙。如果正面直接陈述，文无波澜，和盘托出，就象骏马下坡，无控纵之妙。《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续补《西门豹治邺》文中，为了突出表现西门豹沉着机智且诙谐幽默的性格，写长老诉"河伯娶妇"之苦后，西门豹说"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留下悬念，然后写西门豹借口民女不好，烦大巫去河伯处送信，将大巫、弟子、三老（乡官）等罪大恶极者一一投入水中，至"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方解开悬念。悬念须要出人意外，又要在意料之中，盘旋弯弓，也须与题旨和情节发展有内在联系。

接处用提法 文章的承转有多种写法。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日录论文》："古文接处用提法，人所易知，转处用驻法，人所难晓。凡文之转，易流便无力，故每于字句未转时情势先转，少驻而后下，则顿挫沉郁之意生。譬如骏马下坂，虽疾驰如飞，而四蹄着石处步步有力，若驽马下峻坂只是滑溜将去，四蹄全主不得。有当转而不用转语，以开为转，以起为转者。以起为转，转之能事尽矣。"如宋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先提出一个"世皆称"的看法（即"孟尝君能得士"的老看法），然后提出相反的直法，用"嗟乎"作承接，这是接处用提。接着，又用"不然"作转，转到"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转处有顿驻，少驻而后再下。所谓"有当转而不用转语，以开为转，以起为转"即指另换一开头，提出另一个思路或看法而不用转语，如宋欧阳修《〈苏氏文集〉序》，先写集友人苏舜钦之文章遗稿与其岳父，认为苏文贵如金玉，然后提出"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其伸于后世宜如何也"，是接处用提法。如顺接下去写今人应看重苏文等，则比较平庸。作者不用转语，另开一话题："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由唐代百余年文说到宋代百余年文，以开为转，落笔到对象苏子美如此难得人才不幸"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的哀惜。表面上岔开话题，实际上全篇仍贯通一气。另有先点出旨意，然后层层转环，如唐代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也有文首不露旨意，到承转才亮出旨意的，如宋欧阳修《丰乐亭记》。

绿叶扶花法 通过对主要对象

周围的人物和环境的刻划描写来托出主要对象的一种表现手法。于光华《古文分编集评》引《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吴齐贤评语："季布一传，正写处只折樊哙、对文帝数语，余则借周氏、鲁朱家、滕公、曹丘生四面衬贴，而季布节概无不现出，此绿叶扶花之法也。"司马迁写季布（原楚将）正面刻划只有当着吕后责樊哙（吕后妹夫）"面欺"、"面谀，欲摇动天下"之罪，以及对孝文帝说"陛下以一个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其余皆以他人他事来烘托季布有大志而甘屈辱、善取批评性意见等。这种写法如绿叶扶花，着墨于"绿叶"，目的是写"红花"，主次对照，相映成辉。中国画中画月，往往画些云彩，可使月亮更加突出，称之"烘云托月"，与此法同。避开正面直接地描写，采用四面衬贴来托出主要对象，可以使作品更富有艺术魅力。

欲扬先抑法　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抑扬之法有四种，其二就是欲扬先抑。此法的目的是扬。抑，是压抑、按下；扬，是抬起、振发。抑下是为了扬得更高。先抑，可以从反面造成一种反差高度，再扬起，文势昂扬而有波澜，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使"扬"更有说服力。例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赞》说萧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是抑笔，继写萧何奉法惟谨，其势而行，司库藏、更旧法等，是扬笔。《史记》中写秦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与楚"合纵"，门客毛遂自荐，初写毛"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指毛遂）无所有也"，是抑笔，写至楚后"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以至于按剑唐突楚王，吐气楚殿，使平原君赞不绝口，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是后扬之笔。若无前段毛遂久为门下轻薄，向未知名，后段写贤者不可测，就难收出奇制胜之妙。抑扬过渡，前后一定要自然。抑，终不过是衬垫，要重在后扬。

欲抑先扬法　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抑扬之法有四种，其一为欲抑先扬。此法目的是抑。先扬，不过是从反面造成一种反差高度，转至抑笔时，前后对照，自会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先扬，有时是借他人赞扬之词，有时是作者先作出正面肯定，然后笔锋一转，揭出真象或点出他人赞扬之词的不实处。如《史记·平原君列传赞》中先写"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后批评其不识大体，利令智昏，为溺利而祸其国，落笔是抑。写赵相虞卿，也是欲抑先扬。先说"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一扬，然后说他"及不忍魏齐（败亡），卒困于大梁"事，是"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还是抑。从扬到抑，过渡要自然，须符合人物性格和事态发展的必然性，无悖乎情理；所扬之事情或某些特点与后抑之事或本质特征要有必然联系。此法运用得好，如先抬后跌，很富有戏剧性，能有助于多侧面地认识所写的人或事。

离合相生法　意指写文章要放得开，收得拢，放开与收拢均为表现主题的需要所安排。清唐彪《读书作

文谱》之七中称“世间文字断无句句着题、句句不着题之理，其法在于离合相生。离合相生者，谓将与题近，忽然扬开，将与题远，又复掉转回顾是也”。清人魏僖也说：“古人之妙，只是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见梁章钜《退庵随笔》）此法可以使文势多变，章法富于变化，行文忽离忽合，时远时近，离合错综，笔底多生波澜，更能引人入胜。参见“开合”。

虚势作跌法 跌，指行文顿挫。此法指以条件句、假使句等拓开而使行文顿挫的一种手法。跌，也指贬抑。《古文笔法百篇·波澜纵横》称汉贾谊之《过秦论》至“子婴立，遂不寤”后用“虚势作跌法”：“藉使（假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只要能找些中等之人才来辅政），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因为此句只是“假使如何”，使文势顿挫生姿，故称虚势作跌。作者旨意是指陈秦子婴没有救亡扶倾之能力，若作正面切入，终不及“虚势作跌”有文势起伏。

脱胎换骨法 又称“点化”，或分称“脱胎（或夺胎）法”、“换骨法”。原出于古代诗论家论诗法，如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诗家有换骨法，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列有《点化》一篇，又元代王构《修辞鉴衡》引《诗宪》说“夺胎者，因人之意，触类而长之，虽不尽为因袭，又不尽至于转移，盖亦大同而小异耳。《冷斋夜话》云：‘规模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换骨者，意同而语异也。《冷》斋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后也多用于评论作文之法。指一种脱胎古文且翻新意的写作方法。通常寄胎于古人、前人或他人之作，孕育变化之后另有新意。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捕蛇者说》，胎《苛政猛于虎》而来，命意非奇，然蓄势甚奇。”唐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意在抨击苛政弊端，寄胎《礼记·檀弓》中孔子说“苛政猛于虎”的那则小故事（妇人的舅舅、丈夫和儿子三代人均为猛虎吃掉，仍不愿迁居，是因为山中虽有虎，却没有苛政），写蒋氏祖父及父亲虽为捕毒蛇而被毒死，仍操捕蛇这一冒险行业，也是因为“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两篇所抨击的同是苛政，唯写法不同、深刻性不同。前作写得简单，后作对苛政如何毒于蛇，用蒋氏和乡民的遭迁作了具体描写，对悍吏征赋之凶狠、百姓之困苦，以及蒋氏“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驰然而卧”之侥幸生存等有细节描写，故“蓄势甚奇”，揭露抨击更为有力。脱胎不同于仿作，须有新变，用意虽有前袭，但写法和效果应力求“更上一层楼”。有人将搬用成句而融会贯通，写新内容、新题材者，称作“脱胎（夺胎）法”，将语句虽有不同而意思相同者，称作“换骨法”。（林 曲）

断续离合法 断续，即离合。指作文叙述、描写过程中，故意中断文路，插叙其他人或事，因插入的内容与文章意脉暗相呼应或有内在联系，故明断暗续，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古文很重视此法。清人刘熙载

《艺概·文概》中说，“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先秦文善断，所以高不易攀。……明断，正取暗续也”。何处断，如何断，都要见用心良苦。若能断在巧处，续在好处，断续有致，可以使文章文势奇变错综，又文气贯通，引人入胜。清人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中有评解明代归有光《吴山图记》语：“一山图耳，有甚情趣，乃从为令上生发，说得极有情。至笔墨之妙，尤深于开拓，断续离合之法。”《吴山图记》先叙吴山之奇，再写同年友魏君得吴山图之原因，魏君贤与不贤，作正反两方面论述，两层拓开，浑然淋漓。结尾“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吴民能忘之也”，余韵悠然。《古文观止》评曰：“因令赠图，因图作记。因赠图而知令之不能忘情于民，因记图而知民之不能忘情于令。婉转情深，笔墨在山水之外。”

（王一娟）

寓主于客法 指叙事过程中作者不发议论，自己的观点或论断可以借客观事件的叙述表现出来。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司马迁）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即指此法。如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是有褒有贬的。写褒是从他重视人心向背、除秦苛法、善于采纳意见等具体生动的叙事中表现出来的。对刘贬抑之笔，在《高祖本纪》写他“为泗水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骗萧何说“贺钱万”而“实不持一钱”等客观事情的叙述中表现出来，而且司马迁还有意将更多更暴露的情节，如在儒冠中溺尿、骑周昌颈上问“我何如主也”等，放到其他人物传记中去写。对汉高祖褒少贬多的态度明显而易见。此法可以启发读者的分析和思考，叙述客观，文章才能更富有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援古证今法 这是论辩文常用的一种引古代典事来作论据的类比笔法。把古代某些属性基本相同或相似的事实援引出来作为论证的依据，类比古今，可以有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从而间接地论证出论点的正确性。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使用此法，须援证的古今两类事物之间的共同属性越多越好，这样能使文章说理更为形象生动，一比即明，结论更有说服力。如秦李斯《谏逐客书》论证客卿不负于秦，援引秦穆公四方求士、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秦惠王用张仪之计、秦昭王得范雎而成帝业等，来证今日逐客事将“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

避实击虚法 清代朱宗洛《古文一隅》：“作文须知避实击虚之法，如题是送温处士，便当赞美温生，然必实讲温生之贤若何，便是呆笔。作者已有送石生文，便从彼联络下来，想出‘空群’二字，全用吞吐之笔，令读者于言外得温生之贤，而乌公能得士意，亦于笔端带出，此所谓避实击虚法也。”说的是唐代韩愈的《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此序未从实处直接赞扬温生，而是避实写去作虚写，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然

后再点明冀北就是东都洛阳，伯乐就是河阳军节度使乌公，千里马则是象石生、温生这样的人才。此种手法给人以峰回路转、曲径通幽的艺术魅力。清人袁枚谓"作人贵直，作诗文贵曲"，文情曲折，不会令读者一览无余而了无余味。（林　岫）

就题字生情法　行文紧紧扣住题目中的某些关键字眼，进行多方铺叙，以说明主旨。如唐代柳宗元《愚溪诗序》通篇就一"愚"字贯通成文。先叙"愚溪"之由来，又分别叙出八愚：愚邱、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愚溪。接着说明以"愚"名溪的原因："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无以利世"，又将溪之愚与已之愚融汇在一起，最后以"于是作八愚诗记于溪石上"作结。此文表面以溪水不可以溉田负舟而名之为愚，实为感叹自己济世救国愿望之不遂。诚如清人李扶九所引林西仲评言："只因胸中许多郁抑，忽寻出一个愚字，自嘲不已，无故将所居山水尽数拖入溪水中，一齐嘲杀。而且以是溪当得是嘲，已所当嘲，人莫能与。反复推驳，令人无处再寻出路。然后以溪不失为溪者代为解嘲，又以已不失其为已者，自为解嘲。转入作诗处觉溪与已同归化境。"如此，清莹透彻，可照鉴万物的溪水名"愚"，在那个美丑和智愚颠倒的社会倒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由此生发之情，落纸为"诗"，故为序。全篇均是扣题文字，又字字染情。此种笔法须"情景相生，物我双会"，景是客体，情是主体，皆因景触动情后发为感叹述怀，故拿定题字去写必定通篇浑然。（林岫、王一娟）

百尺竿头进步法　百尺竿头，本指高竿的顶端，文论家常用来指情节发展高潮、结尾处。此法指在铺陈叙说高潮的基础上，忽又翻出妙笔，意思更深一层。如明代李攀龙《可楼记》，通篇就"可"字生情，首段说此楼件件可，次段忽翻说无一可，或在已说，或在人说，而仍收到"可"字上。结尾处更进一层，说"吾将由兹忘乎可，忘乎不可"，可与不可两忘，方是最佳境界，这就将全文上升到了哲理性高度。绂麟《增批古文笔法》曰："收结可字，正意已完。更进一层，乃百尺竿头进步法。"从写作效果来看，运用此法，可使文章富于变化，突出题旨，有出人意料之妙。（王一娟）

修辞手法

互文 又称“互辞”、“互见”、“互文见义”。将通常合起来说的两组词组或句子，前后各出现一个，从整体看参互成文，语义可互为补充或呼应，合而见义。例如“改朝换代”，原意是“改朝代、换朝代”；“披星戴月”，原意是“身披星月、头戴星月”等。古代散文中常见。例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有“公入而赋”、“姜出而赋”，实际上是上句省去了“出而赋”，而下句省去了“入而赋”，原意是“公出入而赋”，“姜出入而赋”。钱锺书《管锥篇·周易·损》称此法为“互文相足”之法。意指前后句各有保留和侧重。《礼记·坊记》：“君子约言，小人先言。”原意要说“君子约言，小人多言；小人先言，君子后言”。唐柳宗元《捕蛇者说》中“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前句不限“只在东、西”，后句也不限“只在南、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思是“不以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欢喜悲哀，也不因个人处境的好坏而悲哀欢喜”。此手法可以使文章简炼生动而且有含蓄之妙。

互省 修辞用语。见“省略”和“承上探下省”。

引用 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可以援引他人的话语或典实等。引用可分为引言、引文、引事，或明引、暗引等。这种修辞方法因为引用的是内涵精警的格言、名言，或者熟悉的历史故事，或者形象生动、脍炙人口的文字等，故能增加文章的理论色彩和说服力，因能唤人联想，给人以鲜明生动的印象，也常有韵味深长之妙。例如唐李白《与韩荆州书》中“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就引用了《后汉书·李膺传》中“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一事。又如唐王勃《滕王阁序》中“酌贪泉而觉爽”用《晋书·吴隐之传》写吴路过贪泉时特意“酌而饮之”事。可参见有关词条。

引文 作文中引用见于载籍的文字，叫引文。先秦时典籍、著作甚少，以引经书为主，如《孟子》中引《诗经》有二十六次，《荀子》引《诗经》多达七十次。引文也有明引、暗引之分。如例如唐韩愈《争臣论》“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是引《孟子·万章下》“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抱关击柝”。又如《前赤壁赋》“逝者如斯”是引《论语·子罕》。可参考有关词条。

引言　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引用一些民间俗语、格言、谚语、歌词等。例如唐李白《与韩荆州书》开篇用“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谈士所言未见载于书籍，也无具体人士，引用到文中，有醒人眼目之妙。如直接由作者道出，容易流于空泛单调或勉强生硬。又如《庄子·秋水》：“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已若’者，我之谓也。”

引事　见“用事”。

双关　指借用语音或语义相近、相同的关系，使词或句兼顾双义。宋范仲淹《赋林衡鉴序》：“别析二十门，以分其礼执，……兼明二物者谓之‘双关’，词有不羁者谓之‘变态’。”双关可以使文章含蓄，耐人寻味，增强文章表现力。双关一般分“音同形异”和“音形皆同”两类。或称“谐音双关”和“借义双关”(又称“语义双关”)，并无二致。“音同形异”指语音相同而字形不一的双关，例如利用“人”和“仁”、“离”和“梨”、“碑”和“悲”、“怀丝”和“怀思”等构成的双关。唐朱揆《谐噱录》：“隋河间刘焯，与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其大儒也，咸与枷着。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文中第一个“枷”是本义（动词），后文的“枷”是双关，“枷”即“家”，“负枷”即“妇家”。又宋王观国之《学林》(卷九)：“刘应声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此处“狄”与“笛”同音，可造成双关。“音形皆同”指语音和语义均同的一类双关，例如利用“骨肉”、“当归”、“远志”、“虎豹”等构成的双关。如《史记·淮阴侯列传》：“相君之面（字面上指“颜面”，双关“面向刘邦”），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字面上指“后背”，双关“背叛刘邦”），贵乃不可言”。运用双关，必须营构一定的语言环境，这样才能利用语音或语义的条件，言此意彼，获得双重的意义，否则读者看不出双关的含义，是无法体味这种修辞手法的特殊表现力的。

(林　岫)

反复　指连续或间隔使用完全相同的词语、句子或短文，以抒发强烈的感情或表示强调、照应等。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列“反复”为三十八种辞格之一。反复，也称“重复”。分“连续反复”或“间隔反复”两种。前者，例如唐代柳宗元《梓人传》“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桡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说“如果贪图其钱财，容忍其错误而又不离开他；丢掉自己的原则，屈从他人主张而又不坚持，待栋梁断折、房塌屋陷时说：‘并非我的过错。’难道可以吗？难道可以吗？”后两句用“反复”修辞手法，重复出现完全相同的句子，在文中加强语气，也表达了作者将当好梓人（建筑师）与当好宰相的道理连系起来的深沉感情。“间隔反复”，与“连续反复”略有不同，这是一种间隔式出现完全相同的词语、句子或短文

的修辞方法，例如唐代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如退之（韩愈字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说“如果您韩愈只要把自己所知道的写出来，孜孜不倦而不敢怠懈；同事、后继任的史官也只要把自己所知道的写出来，孜孜不倦而不敢怠懈，那么历史事实也许不会失传，终于有记载清楚明白的时候”，因为强调韩愈以及同职者、后来继任者都始终如一的撰史态度，间隔出现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形成复沓，收增强表达效果之妙。反复经常与排比连用，可相当益彰，但前者是为了突出强调效果，字句完全相同，而后者只是为了多侧面、多向地描绘，字句局部相同，主要是结构上的重迭。

反语　即“说反（意的）话”。指所说的语意与实际要表达的相反，以此可获得一种讽刺、批评或表示不满的表意效果。又称“倒反”。例如宋袁褧《枫窗小牍》（上）：“宣和（宋徽宗时期）中有反语云：寇莱公（即寇准）之知人则哲，王子明（即王元彻）之将顺其美，包孝肃（即包拯）之饮人以和，王介甫（即王安石）之不言所利。”反语运用得当，能使文章突出人物或事物的某些特征，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和表达一些深层的复杂心情。例如唐柳宗元《愚溪诗序》：“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文中说“今天我身逢政治清明的时代而作了与事理相违背的事，所以蠢笨的人中没有谁比我更笨的了”。结合前句“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而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用反语来抨击当政者美丑不分、智愚颠倒的不平心情是十分清楚的。

用事　指引用成语、事典等来说明问题或表情达意。又称“用典”、“引事”。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说沈侯（即沈约）用事（引用典故等）用得好，不使人觉，犹如直接从胸臆出。例如李白《与韩荆州书》“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登龙门”用东汉李膺事，《后汉书·李膺传》记李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典故用得好，不露痕迹，有利于表情达意。待读者细细品味深层蕴意后，还能获得更多的美感享受。

对代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借代手法。指以局部代全体、特定代一般、具体代抽象、结果代原因等。如《太玄·法次七》“密网离于渊，不利于鳞”，“鳞”是鱼之局部，用以代“鱼”。又《庄子·应帝王》“列子见之而心醉”，“心醉”是倾心迷恋所产生的快感，是结果，在此直接说“心醉”，是借结果代原因。古文中常用“汗颜”、“股栗”、“结舌”等陈述惭愧、恐惧、慌张等心情所造成的结果的词，来借代惭愧、恐惧、慌张等心情。又如唐刘禹锡《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晋王羲之《兰亭集序》“虽无丝

竹管弦之盛，一咏一觞，亦足以畅叙幽情”。“丝竹”、“丝竹管弦”均借指“音乐”，是具体代抽象。参见“借代”。（林 岫）

对偶 源自韵文。指结构、字数相同、语意相近、相反或相连的两个句子或词组并指起来进行修辞的一种方法。句式整齐匀称，音声抑扬有致，能增加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和说服力。又称“对语”。古文对偶比诗歌要宽，一般不讲平仄。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偶与对比、排比不同，对偶只限一组对句（即两句）。例如唐白居易的《荔枝图序》中“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是排比句，而“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是对偶句。对比与对偶之比较，可参见“对比”。（白 迪）

对语 指偶句，又称对偶句。借助对称的形式和和谐的音节，把相对或相关的部分在互为补充、映衬中突出地表达出来，因其匀称齐整，便于记忆醒目，因抑扬有致，读起来琅琅上口，能增加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古代骈体文多用对偶（骈偶）句，如“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吴均《与宋元思书》）、“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等。宋之文赋也有对语，如“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前赤壁赋》）。骈体之对偶不但要求句法结构相同，而且要求平仄相对和用典及藻饰。散文也用对语。宋陈师道《后山集》卷23《诗话》：“范文正《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岳阳楼记》中“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等均为两两相对。散文对语只要求字数相等、形式工整、音节协调即可，不须刻意求工，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夏完淳《狱中上母书》）、“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韩愈《答李翊书》）等。

同字 指相同的词语同时出现在三个以上并列的语句开头或末尾，形成一种复沓回环的结构，可以加重语气，表示强调、周到等意义，并能使语句具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音乐美。例如唐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或以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排比句。出现句尾者，例如唐代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今学如退之（韩愈字），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

夸饰 即“夸张”。南朝梁刘勰有《文心雕龙·夸饰》，认为“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意指夸张能做得不过分，修饰能做到不悖情理，也可以称作佳作。夸饰，指为了突出人或事物的特征，故意扩大或缩小，以便醒人眼目，造成一种强烈印象的修

辞手法。例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鸿门宴，樊哙"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就是夸张。明代宋濂《秦士录》中写萧、冯二书生平时自负，"闻溺（秦士邓弼）言，大愧，下楼足不得成步"，又写秦士于德王前作盛气语，"庭中人闻之，皆缩颈吐舌，舌久不能收（缩回）"，皆用夸饰。运用此法，虽"言过其实"，但必须"夸而有信"（合乎情理）和"夸而有节"（要有分寸）。夸张失实，则使文章失去艺术感染力。《史记·蔺相如列传》中写相如持璧却立，"怒发上冲冠"，言虽虚而不觉其虚，颇能传神。《晋书·王逊传》袭此语又增一句（"怒发冲冠，冠为之裂"），则成败笔。

（林 岫）

合叙 一、辞格语。又称"并提"、"合说"。指语词的变化修辞，特点是变分为合，化繁为简，使句子简洁紧凑并富有变化。例如三国蜀诸葛亮《前出师表》"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作奸犯科"和"为忠善者"是两种不同的人，先作分说，然合说其不同结果，即对前者予"刑"和对后者以"赏"。又如"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据《三国志·蜀志·董允传》，侍中唯郭攸之、费祎二人，董允是侍郎，文中将三人以"侍中、侍郎"并提，也是一种"合叙"。与前例略有不同。与前例相同者还有《汉书·晁错传》"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劲弩所以射疏，长戟及远。又如《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原文意思是"种无一罪，身死（自杀而死）"、"蠡无一罪，身亡（亡命出逃）"，"无一罪"是共同的，先说，然后合说"身死亡"，不可理解为"二人皆身死"。与上述后例相同者，如《汉书·魏豹传》"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赵"，事实是齐国派遣项它，楚国派遣田巴。这种前后皆用合叙的，如《庄子·徐无鬼》"饮食君之酒肉"，本意说"饮君之酒、食君之肉"而文中全作合叙。

二、叙述笔法语。常常与"分叙"配合起来使用。分叙，指在叙述过程中分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同一时间内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又称"平叙"。合叙，则是以综合叙述之方式将分叙的统一起来，可以更加突出主题，使脉络清晰，故又称作"总述"。可参见"叙事十一法"及有关各条。

三、句法语。指总述语句。常常与"分说"配合起来使用，有"合而分"或"分而合"的效果。例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范雎既相，王稽谓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以上合叙）：宫车一日晏驾，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馆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沟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以上分述"事有不可知者三"）。宫车一日晏驾，君虽恨于臣，无可奈何；君卒然捐馆舍，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沟壑，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以上分述"有不可奈何者亦三"）。'范雎不怿。"今人或称"总说"。"复指"中有一类"总分复指"，与此并无二致。先总述后分述的，例

如，《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先分述后总述的，例如唐代韩愈《送孟东野序》"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

曲指　又称"婉曲"、"委婉""婉转"。指在不便直言、不忍直言或难以直言的场合，故意用委婉曲折的话语把本意表达出来的一种修辞手法。古人出于礼俗、忌讳或者外交辞令的需要，比较注意委婉地表情达意，故古文中也多见这种修辞手法。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将"曲指"分为"称名之曲"和"述事之曲"两类。《修辞学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分"婉曲"为"婉言"和"曲语"两类。又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分"委婉"为"避粗俗"、"避忌讳"、"避冒犯"和"外交辞令"四类。均可参见。这里按"讳饰曲指"和"礼貌曲指"介绍如下。

一、讳饰曲指。为了避免误会，对别人忌讳和不忍直接表达的事情应当避讳时采用的委婉含蓄的说法。例如诸葛亮《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避讳说"死"而用"崩殂(塌落)"，如《史记·李斯列传》"陛下富于春秋"，不直说"太子太年轻"而用"富于春秋（富于年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上初即位，富于春秋"，也是同样曲言。有一种避免"锋芒毕露"或言词过于激烈而故意用含蓄曲折的表达方式，也当属曲指。例如宋苏辙《黄州快哉亭记》"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不说"交战争斗"而说"睥睨(侧目窥视)"、"驰骛(驰骋奔走)"。又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不说"日后将率领军队来报仇"(太锋芒毕露)，而委婉地说"将拜君赐"。所谓"恶语善说"，即是。

二、礼貌曲指。为了避免粗俗，出于礼节、交际、外交等不同需要和场合采用的委婉含蓄的说法。例如《汉书·玄成传》"即阳为病狂，卧便利"，"便利"是"大小便"的委婉语。如宋司马光《赤壁之战》"是时（曹）操遗（孙）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所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明明是挑战，却说"要与将军在吴地会猎（打猎)"。又如《左传·成公二年》写齐军为晋军大败，危急时与车右逢丑父换位而得以逃走，后者充当齐侯为晋将韩厥俘虏，韩说的那段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历来被认为是既合乎礼仪又不失身分的一等好文字。"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我国君王叫群臣替鲁、卫二国请求你们不要打他们，并说不要让我们军队深入贵国领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敝臣不幸，恰与贵军交战，又无处躲避，如果临阵逃走又会使晋齐两国君主蒙受羞耻)。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臣当军官极不称职，冒昧地说我很笨，因人才太缺，故让我来凑数)。"曲指可以使表达曲折委婉，但只是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使用，不可故作委婉曲折而使读者百思不得其解。

存真　指词句修辞一种方法。为了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真实感，在描写对话中模仿对话的口气、特点（如蹇吃等）、神态以及方言用语等，可以使对话的情景、人物的性格表现得维妙维肖和真实生动。例如《史记·张苍传》写周昌蹇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文中两处出现“期……期……”，就是存真。又如《旧唐书·狄仁杰传》中记“武后谓仁杰曰：‘安得一好汉用之！’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宰相才也。’”文中武后谓仁杰语，属语辞上存真（尽量写出说话人的语辞风格、特点），生动地表现了武后当时吐辞之英气豪爽。《新唐书·张柬之传》也记同一事，改武后语为“安得一奇士用之”，虽“奇士”易“好汉”，二字之别，此当雅驯，却令口中英气荡然无存。按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存真”可分为“语气存真”和“语辞存真”两类。可参见各条。

并提　辞格语。见“合叙”。

自释　指文中作者对叙述的人物、地点、事件，加以解释性的穿插语，可以起到交代清楚、豁然醒目的效果。按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可分为释人、释地、释事三类。

一、释人。如《国策·齐策》写邹忌“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文中对“城北徐公”特意用穿插语的形式作了释解。又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鸿门宴”，“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对文中“亚父”特意作出解释。

二、释地。如《左传·定公十年》“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夹谷”是对“祝其”（地点）的释解。

三、释事。如《史记·匈奴传》“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插入语“多步兵，三十二万”是对“汉悉兵”之“兵”的释解。

连及　指一种特殊的表意修辞手法，即说甲事物的特征时顺带将乙事物也连及入内。按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可分为四类。

一、私名连及。如《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三过其门而不入”本来是禹的事，与稷无关，这里将稷也一齐称赞进去。因禹、稷皆为个人，故称“私名连及”。

二、公名连及。如《春秋·公羊经·襄公四年》“秋，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齐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此文中“吴人、鄫人”均为不辞，“吴人”之称由于与“鄫人”连称而并及之。因并非指私人，故称“公名连及”。

三、事名连及。如《后汉书·何进传》中“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这里说的是失败，“成”是因“败”连及。又《后汉书·孙皓传》“荡同异如反掌”，这里要说的只是“荡异如反掌”，“同”是因“异”连及。

因指事件、事情之类的连及，故称“事名连及”。

四、物名连及。如《易·系辞》有“润之以风雨”，原意说“润之以雨”，这里“风”因“雨”连及。又如《礼记·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车马”，“车”可造，“马”不可造，“马”在这里是因说“车”而连及。

连及可以使语句显得充实匀称，但须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主要看前后文意）中出现，才能使读者体会出作者偏重的方面（即主体）。连及而出的词（连及体）仅起一种充实、陪伴的作用。

别白　用于区别同名异实之词语，即涉及相同的人名、官衔、年号、书名、地名时，须对其中一词作限定处理（或加限定词，或换异称），以示区别。例如《国语·周语》“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文中“襄王使邵公”和“内史”二人的名字相同，都叫“过”，为示区别，下文提及“过归”时必须加限定词，说“内史过归”，这就是“别白”，即另加限定性解释。又如《汉书·王莽传》“以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封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国师刘歆子迭为伊休侯，奉尧后”，文中出现三个人物：一是红休侯刘歆，即国师嘉新公；一是祁烈伯刘歆；一是国师嘉新公的儿子刘迭，即伊休侯。因为有两个刘歆（同姓、同名），可以“国师”限定第一个“刘歆”，以示区别。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20）也说王莽时有两个刘歆，可为佐证。别白，在古文中常见。通常是人名同者以姓别之，姓名同者以故里、官位别之，官衔同者以官衔异称或故里等别之。别白能使人物交待清楚，不致于因名称重复或相同引起误解而影响到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古文语句极为简炼，不会轻易作“自释”，故别白在写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删削　削，即删。因古时文字写于竹简之上，删改时须用力刮去竹简上的字，故删改叫“削”。类同“笔削”。指删改或削减文章中某些字词或句子，以使文章更精炼、表意更明晰。按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分“删字”和“删句”两类。前者，如《汉书·张苍传》有“年老，口中无齿”，唐代刘知已《史通·叙事篇》认为此句有烦字，其中“三字妄加”，可删去“年”及“口中”三字，成“老，无齿”。删削后比原文简洁，而且并不影响原意的表达。删句，如《孔子家语》（原书27卷，《汉书·艺文志》曾著录，早佚。今本10卷，乃三国魏王肃辑录和伪作）有“鲁公索氏将祭而忘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门人问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这段话中，门人问话没有必要将刚叙述过的事又重复一遍，所以唐代刘知几《史通·点烦篇》说“宜除二十四字”（即“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若得删这二十四字，原文则更加精炼，而且因前后文的连贯理解，对门人的问话

也不会产生歧义。删削，在古人看来非常重要，所谓“文贵简”、“意则期多，言唯求少”，“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皆是主张简朴文风的肯綮之言，但是删削太多，一味求简，犹如枝叶削尽，简则简矣，文无灵动活泼之神情，也不可取。

改窜 指引用别人话语或文章等故意挪动、替换、压缩其中词语，以求避复、避嫌、避讳、避熟或表示谦逊。改窜得好，可以使引言、引文生采而且突出，更便于说明问题。用改窜来避复的，例如《论语·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说：花言巧语，假面逢迎，这种人很少有仁德），后来《汉书·翟方进传》中引此言时作了改窜。“兄宣静言令色，外巧内嫉”，“静言即巧言”（见王念孙《读书杂志》），将“巧言令色”改为“静言令色”是为了避下文“外巧内嫉”之“巧”。用改窜来避嫌的，如《史记·萧相国世家》“上大怒，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文中王卫尉问话“相国何大罪”，本意是“相国有什么了不得的罪过”，但因为相国是萧何（有一“何”字），所以此话也可能被误解为“相国萧何虽然有大罪，但陛下……”。班固在《汉书·萧何传》中对此作了改窜：“上大怒，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胡大罪，陛下系之暴也？’”虽然“何”与“胡”在这里是一样的，但改窜后可以避嫌。以改窜避讳，最为常见。如《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孔子说：君子惦记道德，小人惦记田土）”。后《汉书·贡禹传》记“禹上书乞骸骨，天子报曰：‘传曰：“亡怀土。”何必思故乡’”，据明代杨慎《丹铅录》称“传曰”即《论语·里仁》语，改窜“小人怀土”为“亡（即“无”）怀土”，可以避讳说“小人”疑是称其臣。对熟语加以改窜，也可添加新意，例如《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后来陈后主《与詹事江总书》改窜为“言不写意”，既压缩了文句，又可以避熟，似添了新意。改窜后表示谦逊的，如《晏子·篇下》有“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后来《汉书·韩信传》记“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足用，愿效愚忠。’”广武君将“圣人千虑”改窜为“智者千虑”，一为避复（下文有“圣人择焉”），一为避讳。将“必有一得”改窜为“亦有一得”，表示广武君吐词谦逊。

明引 明确地指出文中引用的言语、故事、文字等出自何处、何人所言或所书。如明代宋濂《杜环小传》结尾：“交友之道难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过论也，实有见于人情而云也。”翟公（汉文帝时人）之言，就是明引。宋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论》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明引《尚书》语。明引要准确无误，不得窜改文字和语意，书名、人名均要写明，如此才能增强文章的论辩性和说服力。 （林 岫）

空字 避讳方法之一。古人讲究避讳，若书信往来、写文章时遇到古代圣贤、当朝帝王或自己父辈、祖辈等名字，要为尊者讳，通常使用的方法是“空字”、“缺笔”、“换字”等。“空字”通常是在避讳的某字处以空格表示，并注“上讳”二字。（白 迪）

转类 指词类活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又称“转品”。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范增数目项王”（范增几次向项王递眼色）。“目”原指“眼睛”（名词），这里转成“看”、“有意地看”等，均为动词。又如《孟子·滕文公上》“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许子戴帽子吗？’回答说：‘戴。’问：‘戴什么帽子？’回答说：‘戴素绢缝制的帽子。’”）“冠”原本是帽子（名词），。文中转类为“戴帽子”（动词）。有的动词也转类作名词用，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尺为步”。“步”本指走路（动词），文中转类作名词（秦时长度名，秦六尺为一步，周代以八尺为一步）。形容词转类名词的，如《左传·襄公十九年》：“大毋侵小”（大诸侯不要侵略小诸侯）。形容词也可转类动词，如《论语·先进》“君子正其衣冠”（君子要把衣服、帽子穿戴端正）之“正”。其他还有叹词转动词等，不一一举。转类是古文中常见的辞格，只是在表情达意的特殊条件下使用 。

（林 岫）

顶真 又称“顶针”、“联珠”。指用前文结句处的词语或短句，作下文起句处的词语或短句的修辞手法。此手法可以使语句累累相贯，如同联珠，紧凑而畅达，也能加深印象。例如《列子·愚公移山》中愚公的一段话：“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话中“子又生孙”至“子又有孙”，即顶真法，语如贯珠，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愚公子孙绵延、挖山必成的自信心情。又如《荀子·儒效》“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管子·治国》“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西汉刘向《说苑》“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践”等。顶真反映事物的连锁关系，一环扣一环，既可用于层层剖析以近实质的说理，也可用表述时空先后位置的叙事。“顶真”与“回环”不同，后者在末句结尾处的词语或短句，必须与起句开头处的词语或短句相同，所谓“首尾相衔，方可回环”，而顶真只是突出中间句与句之间的衔接或蝉联。

相形 表示比喻、陪衬等手法的灵活运用。西晋潘尼《琉璃碗赋》有“灼烁旁烛，表里相形”句，表示表里互相衬托显现的意思。清朱宗洛《古文一隅》：“行文最妙是相形之法，为其情事易达也。故或借粗形精，或借宾形主，或借小形大，其法无穷。”如杜牧《阿房宫赋》中“明镜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等均为相形。相形使用时，经常与其他修辞手法合用，如

"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这里既有相形、又有夸张、比较等手法说阿房宫中负栋之柱比田里农夫还多，架梁的椽子比织布机旁的工女还多。又如歌台奏乐唱歌，是听觉，感到如融融春光般舒适和温暖，这也移觉手法（听觉移为触觉）。舞殿挥袖摇步，本是视觉，让人感到如风雨凄凄般寒冷，也是移觉手法（视觉移为触觉）。这是相形、移觉和夸张手法的交叉使用。（林　岫）

复沓　古代诗文中常用的技法，故意以词语或文句的重复来加强讲话语气、表现人物思想感情或烘托艺术氛围等。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史记渊妙处"条以史书为例介绍了这一手法。《史记·魏世家》中魏公子无忌与王论韩事曰："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连用五个"魏"字，揭示了当时韩魏之间的利害关系、客观情势以及魏公子无忌对此的主观把握。后代散文多用此法。（徐远之）

复指　指用重复的称谓来指代同一事物或人物，或者对同类事物或人物作总述、分述等，意在强调、突出要说明的事物或人物。例如《史记·项羽本纪》"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楚左尹"即"项伯"，这是一种有意的重复。复指分重迭式、总分式和称代式三种。

重迭式复指，通常以官名、字号等重迭复指，如"淮阴侯韩信"、"右丞相陈平"、"左师触龙"等。总分式复指，如唐代韩愈《送孟东野序》"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先分述，后总述，列八者名于前，然后总说"八者，物之善鸣者也"；也有先总后分的，例如《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诸侯有三件法宝：土地、百姓、政治）。称代式复指，比较常见，例如《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代词）指代前面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如《汉书·蒯通传》"通说范阳令徐公曰：'臣，范阳百姓蒯通也。窃（私下）闵（可怜）公之将死，故吊之。'""故吊之"（所以前来吊唁您）的"之"，即上文的"公"。又唐代柳宗元《捕蛇者说》"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引孔子话，是"引言"，"吾尝疑乎是"（我曾经怀疑过这句话）中的"是"是称代式复指。

省略　为了语言表达简洁明快，作者故意省去一些句或句成分而不影响理解的修辞方法。按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分为省字、省词、省句三部分。省字分为省姓、省名、省字号、姓字连省等八类。省词又分为"承上省"、"探下省"、"承上探下两省"三类。省句又分为"承上省"、"语急省"两类。一般认为，省略是文言语法问题，但作为句或句成分的省略，还是具有修辞意义。可参见各条。

举隅　这是一种举一反三的语句修辞手法。《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言物有四隅（方面、角落），举其一隅，则不必再一一列出其余。用于语句修辞，则指举其一而推知其他。如《礼记·王制

篇》"六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先说大国之卿不过三命（礼遇等级），则知次国之卿不过再命，大国下卿再命，则知次国下卿一命。又如《左传·昭公九年》"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其中"梼杌"是"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凶之一，举其一，则余下三凶则不言自明。《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舜臣尧，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两句对照起来看，不难知"举隅"的作用。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将"举隅"列入"参互"类。

借代　又称"代称"、"代用"。这是一种曲婉表达意思的修辞方法。指借用有关系的人或事物的名称来取代人或事物的本来名称，例如不说"过了三年（或三岁）"，而说"过了三冬（或三秋、三春等）"。借代的方式极多，主要有五种。

一、以某人物或事物的特点来代替某人或事物，例如《左传·曹刿论战》中曹刿请见时，"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是借那些权贵者饮食上的特点来指代权贵者。古文中常用"布衣"、"短褐"、"儒冠"等借代平民或文人，用"长缨"、"高冕"、"衣冠"等借代权贵或贵人。

二、借用事物的原料、质地、产地或制作者等来指代事物名称。例如用"杜康"（传说中的造酒者）代酒，用"丹青"（颜料）代绘画等。《孟子·滕文公篇》："许自釜甑爨，以铁耕乎？"借"铁"代"犁"。又如《后汉书·冯衍传》有"怀金垂紫"，"怀金"即怀中揣印，借"金"代"印"。这种取代，又称"以质代物"。

三、借全局代局部（借面代点）或借局部代全局（借点代面），或称"以大代小"或"以小代大"。前者如《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叔孙昭子曰：'然则戴、桓也。汰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文中"戴"、"桓"为二族名，借来代"华氏"、"向氏"，族大氏小，以大代小。又《孟子·滕文公下》"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又《孟子·梁惠王上篇》梁惠王议论魏国时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当时韩、魏、赵三国合称"三晋"，这里以晋代魏，是借全局代局部。后者最为常见，如《汉书·东方朔传》"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借"三冬"代"三载"、"三年"，是以小代大。又汉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七庙"为天子宗庙，秦祀七代祖先。这里是借代"国家"。

四、借官名（公名）或泛指（通名）代私名，或者以私名代官名（公名）或泛指（通名）。如宋司马光《赤壁之战》"肃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刘备作过"豫州牧"（地方官名），鲁肃以"豫州"代刘备。后者如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尾生"为传说中宁为大水淹死也不失信的人，文中借私名代泛指（即"重然诺的守信用者"）。又如《左传·哀公十六年》记白公胜本以郑人为仇敌，说"郑人在

此，仇不远矣”，比子西为郑人，说“郑人在此”如说“仇敌在此也”。

五、借具体事物代抽象事物。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借代。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蚡辩有口”，这里“口”借代“善辩的口才”。

借代与借喻不同，前者重在“代替”，不存在以甲比乙的关系，后者重在“比喻”，存在着明显的以甲比乙的比喻关系。

换字 避讳改字方法之一。古人讲究避讳，若书信往来、写文章时遇到古代圣贤、当朝帝王或自己父辈、祖辈等名字，要为尊者讳，通常使用的方法是“空字”、“缺笔”、“换字”等，其中“换字”是最常见的。例如晋代避司马昭名讳，称王昭君为明君或明妃，又避晋简文帝皇后郑阿春名讳，谓“皮里春秋”（笔法名）为“皮里阳秋”。“换字”通常是换同音字或同义、近义词。例如汉代淮南王刘安（汉高祖之孙）因其父刘长（汉高祖子，淮南厉王）名讳，著《淮南子》一书通篇不著一“长”字，须用此字处以“修”字代之。汉司马迁因父亲司马谈（西汉史学家）名讳，在《史记·赵世家》中将“张孟谈”改为“张孟同”，在《史记·佞幸传》中将“赵谈”改为“赵同”，因汉代时“谈”与“同”二字同音，故换。后代避讳益众，连同音字也在避讳之列，如唐代避唐明皇李隆基名讳，改“万机”为“万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为避宋孝宗赵眘（同“慎”）名讳，将“四书”中“慎”字均换成“谨”字，又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将《孟子》“一匡天下”换字为“一正天下”等。这种对前代著作因讳避而行追改的作法，常常给后人阅读古书造成很多困难。

旁借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借代手法。有的认为用事物的构成部分、工具、产地或作者来借代事物本身，是旁借，如汉司马迁《报任安书》“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金铁”（原料）借代“刑具”。又如“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中“应瑒”、“刘桢”均是人名，在此借指其各自的作品。旁借，原指他事物的名称在特定语言环境下也可以用来指另一事物。如“折冲”。“冲”本指一种战车，“折冲”就是挫败敌方战车并使之后撤。《吕氏春秋·召类》有“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借来指外交，如宋苏洵的《嘉佑集·送石昌言使北引》“丈夫生不为将，得为吏，折冲口舌之间足矣”，就是旁借。

缺笔 避讳改字方法之一。古人写文章若遇到古代圣贤、当朝帝王或自己父辈、祖辈名字时，须要避讳，通常使用的方法有“空字”、“缺笔”、“换字”等。缺笔，是对忌讳的某字一些笔划进行省略，例如“丘”字，为避孔子讳，古代常省去一笔，写作“⿰”。

婉曲 又称“曲指”、“委婉”、“婉转”。通常分“婉言”和“曲语”两种。“婉言”是不便直言，故意将话说得委婉含蓄一些，以免刺激对方和可以回

避使用某些字词。例如《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不好直接催促荆轲启程，又担心他改变初衷，"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欲长待足下，岂可得乎？'"说"欲长待足下，岂可得乎"即婉言。又如《左传·僖公三十年》"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说"敢以烦执事"（打扰您手下的人了）实际是指要麻烦秦王本人，全句字面意思是"要用灭亡郑国这件事来打扰您了"（实际上是"那就请您去打郑国吧"），这是客套语，也是一类婉言。"曲语"是一种故作曲折表达的婉言，通常用于外交辞令或者表达一些婉讽的效果。如《国语·越语上》"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沉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言激怒时将一个抵两个战斗力），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说"带甲五千人，如果拼死（"致死"）战斗，一个抵两个，则是用万人之众跟您较量了"，说话时没有说得那么锋芒毕露，只说"是以带甲万人事君"，即"曲语"。

倒反　辞格语。指口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意思完全相反的一种修辞手法。俗称"正话反说"。或以是否暗含讽刺嘲笑意味而分为"反辞（或倒辞）"和"反语"两类。反辞，不含讽刺嘲笑，如古文中称小孩和心爱的人为"冤家"、"魔星"等。反语，含有讽刺嘲笑的意味。可参见"反语"。

累迭　在结构相同或相近的句子中使用相同的字词，表示强调、回环、呼应等语气的一种修辞手法。钱锺书《管锥篇·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行文，深得累迭之妙，如本篇末写项羽'自度不能脱'，一则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再则曰'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三则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或称宋欧阳修《醉翁亭记》用二十一个"也"字，如"环滁皆山也"、"酿泉也"、"醉翁亭也"等，也是一种累迭手法。

（林　岫）

断章　句法语。"引文"之一种。指写作中引用前人诗文中的某一章或某一句，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钱锺书先生按："癸强颜藉口，而道出春秋以来词令一法。"（《管锥篇·左传正义》卷46）如《左传·昭公元年》，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常棣》"，即子皮和赵孟分别引用了《诗经》中"野有死麕》和《常棣》篇中的部分章句。钱锺书先生曰：'断章乃古人惯为之事，经籍中习见。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同作者之运化。"引用前人章句，可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王一娟）

割裂　又称"藏词"。这是一种割取句子或词组的一部分用来指代全体或另一部分，甚至表示其他新的语意的修辞方法。"断章"的目的是为了"取义"，运用恰到好处的，可以使表达含蓄、精炼且耐人寻味，反之，则语意隐晦，或句残章缺而徒增阅读困难。此方法在古文中并不少见，如用"不惑"指四十岁之壮年，用"耳顺"指六十岁之老年，用"而立"指三十岁之中年等，皆取自《论语·为政》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如《汉书·萧望之传》"（萧望之）至乎耳顺之年，履折冲之位，号至将军，诚士之高致也"。文中"耳顺"为割裂，"折冲"为借代。又如《文子·道德》有"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后人多以"神听"、"心听"、"耳听"表示学习的不同层次。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又尝见谓矜诞为夸毗，呼高年为富有春秋，皆耳学之过也"。此"耳学"也是割裂而来。又例如萧统《文选序》中"君非从流、臣进逆耳"，其"从流"是割裂《左传·成公八年》"从善如流"而代全句，在这里表示接受别人意见如同流水一般快而自然。"逆耳"是割裂《孔子家语·六本》"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而代全句，在这里表示听起来不顺耳却有利于改正错误的忠言。《史记·留侯世家》中有"忠言逆耳利于行"句，是引文，而非割裂。割裂运用得好，能使语言含蓄幽默，有的具有今天歇后语的表达效果。反之，则晦涩不明，令人难以领会，给阅读造成困难。例如唐代刘知已《史通·杂说》"马卿为自叙传，具有其集中"，"马卿"指汉代司马相如（字长卿）。又《晋书·王濬传》"世祖旌贤，建葛亮之胤"，将"诸葛"（复姓）割裂为一字（"葛"）。这种"任意宰割"到非作者自注而不得知的作法，是不足取的。

博喻　同时连用几个比喻，去比同一个本体（人或事物），从本体的各个特征去说明或描绘。又称"复喻"。宋陈骙《文则》说"博喻，取以为喻，不一而足。《书（指尚书）》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甘霖"。这段话出自《尚书·说命上》，殷王武丁用了三个比喻来说明大臣傅说的作用、即磨刀时，傅说可以起磨刀石的作用，过大河时，他可以与舟楫相比，天大旱时，他可以象甘霖一样。运用博喻须注意喻体忌雷同，要从本体的不同特征去寻觅新颖合适的喻体，从而使本体形象更鲜明具体。另外，在运用博喻中一般不换主体。还有一种博喻将几个比喻连在一起比几个意思。如唐韩愈《送石处士序》文中"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用了五个比喻，分别表示议论的流畅（若河决下流而东注）、熟练（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洞察力（烛照）、有预见性（数计而龟卜），被比的是"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四个意思。这种博喻中几个喻体对要比的几个意思均适用。这与《尚书》那个文例（分开来比）不同，是一种合起来比的特殊博喻（以上可参见周振甫先生《文章例话》）。这两种运用博喻的方法，也可以交叉使用。

暗引　与"明引"相反，引用的言语、故事、文字等不标明出自何处、何人所言或所著，这些引言、引事或引

文自然镶嵌于文章中，可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熟悉古籍的读者心领神会后可玩味不已。例如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商旅不行”，句出于《易经·复卦》。明代女作家叶观《与外》有“借米五斗，幸不烦折腰，可伸十日眉头也”，语出自《晋书·陶潜传》。唐韩愈《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有“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取于盗”出自《礼记·杂记下》，“举于管库”见《礼记·檀弓下》。暗引中暗用典事为最多，可半引半藏，也可以概括语道出。如南朝宋范晔《乐羊子妻》，羊子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暗引了曾子过盗泉不饮（见《淮南子》）和饥者不接受侮辱性施舍（见《礼记·檀弓下》）两事。

错举 辞格语。见“错综”。

错综 为了避免叙述的单调，故意使语句参差错落，或改变句式结构，或选用别异的词语以呈变化。例如《论语·乡党》“迅雷风烈必变”，按顺应语序应是“迅雷烈风”，“风烈”对“迅雷”来说，是一种结构上的错综，有增强语势、避免重复的效果。错综即交错综合。《易·系辞》有“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也有“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有时称“错举”。错综对整齐来说，有一种“破势”的作用。王力在《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中说：“光有整齐，不免呆板；光有错综，又欠整齐；整齐和错综结合起来，才显得更美。”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将“错综”分为三类，即称谓错综、组织错综和上下文错综。可参见各条。

（林 岫）

摹状 又称摹拟或摹绘。它是运用语言文字把所要描绘的事物的声音、颜色、形状摹拟出来的一种写作方法。运用摹状可以把事物描述得形象生动，活灵活现，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如风有声而无形无色，但宋人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却以高超的手法，使无形无色的风生动形象地活现在纸上。作者这样写风之声音：“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𫓩𫓩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作者又用秋天的景象来写秋风之色：“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又进一步写了秋风“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的特点。这样，秋风的形象便是具体可见的了。摹状在文学创作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技法。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或主要场景，为了使之突出醒目，往往需要有精雕细刻的摹状，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摹状通常按摹绘的对象不同分为摹声、摹味、摹色、摹景象、摹形态、摹情态六种。多用连绵字、迭音（连珠）词。如唐韩愈《进学解》“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描摹勤勉的形态）以穷年”、唐柳宗元《送徐从事北游序》“其容貌充充然”（“充充”表示精神饱满、精力充沛）、韩愈《顺宗实录》“屏人切切（摹话语声）私语”

等。（王一娟）

增益 指用增添字词或句子的方法来增加文章语句的表现力的一种修辞手法。例如宋代欧阳修《昼锦堂记》原有“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今昔之所同也”，后来将前句各增加一字，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见黎靖德辑《朱子语类》），使原来平直叙述的两件事均加重了语气，而且增添一层“进一步”的含义。增益的修辞效果，与删削一样重要。作文讲究“炼字”、“炼句”，实则也是“炼意”。增加字词或句子可以使原文内容更为充实完善，说明原句本有欠缺。增益，也是一种“炼字”和“炼意”。增益分“增字”和“增句”两类（按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增字”，如上例。又如宋欧阳修作史照《岘山亭记》，以示章子厚，章读原文至“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一投汉水”处说“亦可”。后来欧阳修改为“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增益四字，突出了二石的去向，语气也加重了。增句，例如《后汉书·范滂传》写建宁二年（169）大诛党人时，诏下，急捕范滂，范恐牵连他人“即自诣狱。县令大惊，出，解绶印，引与俱亡（一起逃出），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行路闻之，莫不流涕”。后来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后汉书·范滂传》此段叙至范滂辞母而母训滂后应加一句，即加“滂竟被害”，然后再写“行路闻之，莫不流涕”。若增此四字，人物命运的结果交待得就比较清楚了，而且“行路闻之”之“之”不再是范与母辞别和母训范一事，而是指“滂竟被害”事，可以突出影响。增字、增句，不仅可以加重语气，还可以增意，故须慎重，不能改窜原意，以致引起歧义或误解。

避讳 又称“讳饰”。对犯忌或触讳的事不便直言道出，改用其他委婉语来避开一下，这种委婉曲折表达本意的修辞手法就是“避讳”。例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和《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言帝王之死，均委婉地说“宫车晏（即“迟”）驾”（宫车晚出，即皇帝去世，已不能上朝了）。参见“曲指”。在词句修辞中有一种是为了避冒犯而采用改窜文字以行曲婉的手法，也是避讳。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列入“改窜”之中。如《说苑·贵德》“故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又《公羊传·桓公十五年》何注有“王者不当求。求则诸侯贪，大夫鄙，士庶盗窃”，又《盐铁论·本议》“文学曰：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以上三书皆本《春秋》家说，只是一举天子，一言王者，独《盐铁论·本议》改为“诸侯好利”而不涉及天子，盐铁本是天子好利之事，避而不言去言他，是一种以改窜形式行委婉的手法。又如《史记·自序》“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而《汉书·司马迁传》却改窜为“以为天下仪表，贬

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太史公司马迁说“贬天子，退诸侯”，班固因避讳只说“贬诸侯”。另有一种为了避免与帝王或帝王长辈名字同音、同字而引起的冒犯，便改用他词的手法，也属“避讳”。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列入“被动变化”之中。例如《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中“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说“娶于薛”、“娶于齐”，皆列出二国（薛、齐）国名，唯独说孝惠时不说国名“宋”而说“商”（宋都在商丘，也为商始祖契所居，后商自盘庚迁都于殷，商人仍自称商），因哀公之父定公名宋，为了避讳而改用他词。避讳通常还有“空字”、“缺笔”等，可参见有关词条。

避实 指不说实语，而借他词言之的一种修辞方法。避实，可以使文字含蓄，避免通常实说所带来的浅白易露之病。例如宋陆游《老学庵笔语》“秦会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参政，委任颇专，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凡将相出入，唐代诏书由翰林草制，谓之“白麻”），又不能辨，假手于士人陈丰。丰以其姓魏，遂以‘晋绛和戎’对‘郑公论谏’”。《左传·襄公四年》记有春秋时晋国大夫魏绛（即魏庄子）力主与戎族友善事。文中用“魏绛和戎”事，为了避“魏”而以“晋”代，即“避实”之法。古人作诗词最善用此法，以求含蓄之妙，如用“红皱”说“枣”、用“刘郎”说“桃花”等，古文亦用之。另有通篇避实的，如唐代韩愈的《毛颖传》，先写毛颖的家世，次写经历，再写其子孙后代的情况，最后以“太史公曰”的传赞形式作结，通篇不道破“笔”字，全用拟人笔法。避实须置于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实”虽含而不露，但读者仍能从字里行间醒悟得出来。否则，过于隐晦或凭虚凿空，读者百思不得其解，避实就失去了意义。

避复 指古文中避免使用重复的句子结构或词语，以求得文句的错落和生动。例如《易·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先总说“君子进德修业”，下文分说。一说忠信进德，一说“修辞立其诚”，为了回避“修辞”之“修”，故改“修业”为“居业”。又《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是说同类相感，物以类聚，有圣人出现，其他人材也随着显露出来，伯夷、叔齐、颜渊等都是随着孔子而名行昭著的。骥，千里马。附骥尾，即尾随圣贤之后。为了避上下文雷同，下文则改变说法，用“附骥尾而行益显”，与上文“得夫子而名益彰”内容并无二致。以上二例均是以变化词语的方式避复的。还有一种以改窜方式回避重复的，如《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穷困时要搞好自身的品德修养，得志时要让天下都普遍地各得其所），与同章前文“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是一样的意思。为避免单调，梁武帝《请征朴谢朏何胤表》改窜此句为“穷则独善，达以兼济”，一是压缩原句，一是避前文“独善”之“善”，将后文

"达则兼善天下"改为"达以兼济"。又前文用"则"，后文用"以"，也是避复。（林 岫）

颠倒 指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故意把正常语序颠倒过来，可以造成一种特殊的语感，以便产生强调、醒目等效果。例如《史记·鲁仲连传》"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正常语序应是"先生之言（也），亦太甚矣"，将谓语部分置前有强调作用。又如《左传·昭公十九年》"颜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正常语序是"怒于室色于市"。《战国策·韩策》有"怒于室者色于市"句，正好佐证。还有一种是因果句颠倒(即果句在前，因句在后)，例如《礼记·戒論》"中妇诸子谓宫人：盍不出从乎？君将有行"，正常语序是"君将有行，盍不出从乎？"此为颠倒。与文言语法中的倒装不同，如《史记·项羽本纪》"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即"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岳阳楼记》"微斯人，吾谁与归"，即"吾与谁归"。这是文言语法中介词宾语前置的问题。"颠倒"，指句子的颠倒，而非词的前置等。

避嫌 在叙述过程中若使用的某些词语与叙述出现的人物或地点等名称相同时，须变化或改窜其中某些词语，以避免混同或误解。例如《史记·萧相国世家》"上方怒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相国名萧何，王卫尉的问话"相国何大罪"易生误解（本意是说"相国有什么了不得的罪过，但陛下……"），以为是"相国萧何虽有了不得的罪过"。《汉书·萧何传》中，班固在笔下作了避嫌，改窜成"上大怒，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胡大罪，陛下系之暴也？'"虽以"胡"易"何"，一字之差，就不会误解王卫尉的问话了。又如《国语·周语》"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文中"先王后稷"是古代周族之始祖，为神话传说有邰氏之女姜嫄踏了巨人脚迹后怀孕所生，因一度被遗弃，故名弃，是最早种稷和麦子的人。"弃稷不务"本意是"去稷不务"，因后稷名弃，这里易生误解。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改窜为"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去稷（粟或高粱）不务"就不会误解为其他意思了。以上是以改窜方式避嫌，还有一种以变化方式行避嫌的手法，类同"别白"，即称同姓名者，可以对其中一人姓名前作限定处理（或加限定词，或换异称），以示区别。例如《汉书·王䜣传》"䜣昭帝时代车千秋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子谭嗣，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宠"。说王䜣被封宜春侯，传至儿子，王莽篡位后因其妻是王咸女，所以王氏（指宜春侯家）以外戚沾光得势，如果说"王氏以外戚宠"，恐与王莽王氏混同，故称其号，以示区别。

避熟 炼字用语。对常用的熟语或前贤脍炙人口的名句，改窜其中一二字以避免熟俗。如《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后来陈后主《与

祭事江总书》改窜为"言不写意"。又如魏文帝《与吴质书》"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梁简文帝《与刘孝仪令》改窜此熟语为"酒阑耳热，言志赋诗"。避熟，可以使文句新颖醒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繁复　又称"复迭"、"层迭"。这是按照事物或人的认识的大小、多少、轻重、主次、深浅等不同，逐层排列，以加强语言艺术效果的一种手法。清包世臣《艺舟双楫·文谱》："至于繁复者，与垫拽相需而成，而为用尤广。……繁以助澜，复以畅趣；复如鼓风之浪，繁如卷风之云；浪厚而荡，万石比一叶之轻；云深而酿，零雨有千里之远。斯诚文阵之雄师，词圃之家法矣。"这里的"繁是把一个意思说得波澜起伏，富有文情；复，不完全是重复，是把同一个意思，或加概括，或加生发。两者结合起来，使文章写得鲜明生动，波澜壮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见周振甫《文章例话》）。例如南朝宋范晔《乐羊子妻》有"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韩非子·扁鹊见蔡桓公》中写扁鹊见蔡桓公病情逐步加重，用"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君之病在肠胃，不中治将益深"、"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等来加重表达效果，均为繁复。与这种步步深入加重的层层递升法相比，还有一种层层由深、重、大而渐至浅、轻、小的繁复手法，叫层层递减法。如《孙子·谋攻》："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论用兵之法，按国、军、旅、卒、伍顺序，逐步缩小范围，也是层层递减的繁复法："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林　岫）

丫叉法　句法语。为避免叙述呆板平直将文章叙述的前后次序作交叉式的调换。最早为诗法语，后散文中亦用之，见于《毛诗》卷论《关雎序》（钱锺书《管锥编·全上古三代文》卷3）。如乐毅《献收报燕王》"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前面几句话先言齐（大吕、故鼎、齐器）而后言燕（元英、历室、宁台），后面一句则先说燕（蓟丘）而后言齐（汶篁），"蓟丘之植，植于汶篁"即"燕之蓟丘所植，植齐王汶上之竹"意（《史记·索隐》）。

丫叉法不限于数句片断，也可用来谋篇布局。如诸葛亮《出师表》，先言"允等"而后言"臣"："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段承以"臣本布衣"段；然后先言"臣"，再言"允等"："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承以"至于斟酌损益，……则攸之、祎、允之任也"；结尾先言"臣"，后言"允等"："不效则治臣之罪"，承以"则戮允等以章其慢"。此种写法，钱锺书称赞曰："错综流动"、"长短奇偶

错落交递，几泯间架之迹，工于行布者也。”（见《管锥编·全上古三代文》卷3）

阶进法　句意逐层递进，如登台阶拾级增高。钱锺书先生谓“窃欲取陆佃《埤雅》卷三论《麟趾》所谓‘每况愈上’名之。西方词学命为‘阶进’或‘造极’语法”。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凡四层递进，最后道出“东家之子”之美，而且“佳”、“丽”、“美”意思相近而用语各异，变化多姿。阶进法不仅限于句子，还可以谋篇成章，如陆机《文赋》中的一节：“含清唱而靡应。……故虽应而不和，……故虽和而不悲。……又虽悲而不雅。……固既雅而不艳”，钱锺书先生谓：“五层升进，一气贯串，章法紧密而姿致舒闲，读之猝不觉其累迭”（《管锥篇·全上古三代文卷10》）正概括出了阶进法文心之妙。

（王一娟）

承上省　“省略”之一种。又称作“蒙上省”、“承前省”。如《左传·隐公元年》中“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中都和小都的情况均承前面的大都作了省略。上文出现过的词语（句子或句子成分），下文再提及时可以省去，这就是“承上省”。又如《左传·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意思是说“一鼓（之，指士兵）作气，再（鼓之）而衰，三（鼓之）而竭”，后文蒙前文省略。又《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意思是“故有得神以兴，说有得神以亡”，后句“得神”承前省略。“承上省”跟“探下省”一样，都可以使文章精简和强化前后文的语势连贯衔接。“承上省”还有一种省略句子的情况，例如《易·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传云：不耕获，未富也。”后说省略了前文。另有一种对话中常见的省略，也可归于“承上省”。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樊哙问话中已经出现了“今日之事”，故张良答话作承上省，直接给出了谓语，不加省略的原话应是“良曰：‘今日之事甚急。’”

语急省　“省略”之一种。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列“语急省”为“省句”之第二类。这是一种特殊的省略形式，指文中人物说话急迫时省去不说的部分语句，省去的部分可以从前文意思贯穿下来理解。如《史记·冯唐传》中“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博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将，吾岂忧匈奴哉！’”从后两句看，语意似不连续，因为中间省去一句，原意应产“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将，吾若能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这就是“语急省”。这种省略不但能使语言简洁明快，还具有表示说话人急迫心情的表情效果和能增加真实感。

探下省　“省略”之一种。又称作“蒙下省”、“探后省”。如《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可以远怨矣”，意思是“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可以避免怨恨了”，文中“躬自

厚”之后省略了谓语“责”，因为“薄”后有“责”，故前略，这就是“探下省”。又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意思是“你估计我已到了军营之中，你再进去”，“度我至军中”前省略了主语“公”，因为“乃入”前有“公”，故前略。又如《汉书·西域传》中“扜弥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意思是说“扜弥南方与渠勒相接，东北与龟兹相接，西北与姑墨相接”，因为第三句有“接”，故前面“渠勒”、“龟兹”后均省一“接”字。这种下文将出现的词语（句子成分）在上文提到时可以省去的“省略”，也可以使文章精简和强化前后文的语势连贯衔接。

蒙上省　修辞用语。见“省略”和“承上省”。

蒙下省　修辞用语。见“省略”和“探下省。”（林　岫）

一意数喻　又称“博喻”。连用几个比喻来说明一个问题，从而使自己表达的意思更加准确、全面。罗璧《识遗》卷七曰：“文章一事数喻为难，独庄子百变不穷。”如《庄子·马蹄》篇中论述“治天下者之过”，用了三个比喻：“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奔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一喻）。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二喻）。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应绳’。（三喻）。夫植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鉤绳哉？然且世之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说治天下者之过也。”通过伯乐治马，陶人治埴，匠人治木这三个比喻，说明善治天下者就象伯乐、陶人、匠人一样，是有违于事物的自然属性的。钱锺书先生谓“说理明道而一意数喻者，所以防读者之囿于一喻而生执着也。星繁则月失明，连林则独树不奇，应接多则心眼活；纷至沓来，争妍竞秀，见异斯迁，因物以付，庶几过而勿留，运而无所积，流行而不滞，通多方而不守一隅矣。”（《管锥编·周易正义卷2》）

公名连及　辞格语。见“连及”。

以言破言　先说明一件事情，然后再反过来否定它。钱锺书说：“古之哲人有鉴于词之足以害意也，或乃以言破言，即用文字消除文字之执，每下一语，辄反其语以破之。”（《管锥编·周易正义》卷2）如《关尹子·三极》篇：“蝍蛆（jí jū 蜈蚣）食蛇，蛇食青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圣人之言亦然。……唯善圣者不留一言。”追求这种无言的境界。钱钟书谓“不能得意忘言，则将以词害意，以权为实，假喻也而认作真知。”（王一娟）

比物连类　又称“排比”、“排迭”。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结构相同或相似的词组或句子，匀称地排列起来，表达语气贯通、意义相关的一种修辞手法。因其排列匀称，音律铿锵，既能多侧面地渲染艺术形象，又能收到

醒人眼目、气势畅达的艺术效果。比物连类，即是排比同类事物（语句、事件等）。例如唐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清泠之状与目谋，潜潜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等。又如唐杜牧《阿房宫赋》中“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排比不限句数，可以分排，也可以总排（同一主体引出的排比句）。比物连类必须从内容的需要出发，不能生拼硬凑。古代散文有一些排比句，也不限词组或句子字数相等。 （林 蛐）

反象以征 物象（形与外者）本来的意思与其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意思正相反。革，本义是坚硬难变的牛皮，后来“革”又有“变更”的意思。故钱锺书曰：“夫以‘难变’之物，为‘变改之名’，象之与意，大似凿枘。此固屡见不鲜者，姑命之曰‘反象以征’。”（《管锥编·周易正义卷12》）。又如《韩非子·观行》：“西门豹性急，常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慢，常佩弦以自急。”就是这个意思。运用反象以征手法，正言若反，可取得欲盖弥彰、相反相成的效果，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更为明了。 （王一娟）

引喻取分 喻，或指比喻，或指说明。引喻，指援引例证或借助比喻来说明事理。引喻取分，指根据文章的需要选取事物某一个方面的特点来引喻而不必面面俱到的一种手法。分，不尽、不全之意。《大般涅槃经·狮子吼菩萨品》第十：“引喻不必尽取，或取少分，或取多分。”如古代散文中常用满月来比喻人的面庞，这里取的就是月亮“圆”的意思来说明面庞“圆”这一个特点。实际上，人的脸上有眼睛、眉毛，而月亮没有。取其一个方面而已。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言：“盖一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管锥编·周易正义》卷16）这也可使行文灵活变化。例如唐代白居易《荔枝图序》中“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引喻有二，一是冰雪，只取其晶莹洁白的特点来比荔枝瓤肉，一是醴酪，只取其味道甘美而微酸的特点来比荔枝浆液。

（王一娟、白 迪）

句散意偶 句法语。又称“句奇意偶”，指句子如散行句那样长短散漫，而意思却是对偶句的用意。周振甫《文章例话》中认为李斯的《谏逐客书》写“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取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是句散意偶。虽然字数不尽相同，但用意上对偶，即从“西并”、“北取”、“南取”、“东据”上说明。又如“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等句，皆是参差不齐之散行句，但用意上却是对偶。此种手法能加强句与句之间的联系和凝聚力，

又能避免只用对偶或偶句过多时容易出现的单调板正格局。

私名连及　辞格语。见“连及”。

听声类形　听声，是听觉感受，由此联想到某些形象，如同目视。钱锺书《管锥篇·全后汉文卷十八》：“马融《长笛赋》。按拟状繁音殊调，蔚为大观，此赋殆最早矣。‘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机杼发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闻乐，‘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杜预注：‘论其声’；又《乐记》：‘止如槁木，累累乎端若贯珠’云云；均是‘听声类形’。五蕴异趣而可同调，分床而亦通梦，此官所接，若与他官共，故‘声’能具‘形’，……”钱文引了季札闻乐事来说明由听觉感受移向可视形象来认识某事物的特殊手法，听音乐之起伏变化，想到物体曲而有直，这就是听声类形。因为是听觉和视觉在特定条件下的沟通，故又称“通感”。《乐记》记“止如槁木”“累累乎端如贯珠”等，都是由听声联想到各种形象，声止如同槁木、声音连续不缀时如同贯穿完好的珠子般圆满等，均是听声类形。文中说“五蕴”，此原佛家语，即色（形相）、受（情欲）、想（意念）、行（行为）、识（心灵）。这里指人主观感受和对客观的认识，若能“异趣而同调”，感觉沟通，就能够听声类形。

事名连及　辞格语。见“连及”。

组织错综　修辞用语。指一种句子结构的错综，可以使语句富于变化，灵活生动。例如《淮南子·主术篇》“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波兴”、“木茂”、“鸟集”均为主谓式结构，“疾风”起“破势”作用，有意打破这种整齐的排列，使之出现变化，用了偏正式结构。又如《易·杂卦》“丰多故；亲寡，旅也”，“丰”（卦名）为主语，“多故”是谓语。下句有意先出现谓语“亲寡”，再说“旅（卦名，主语）。后句主谓倒置，对前句是一种错综变化，还有一种动词谓语与宾语的错综，犹如不说“粉身碎骨”，而说“粉身骨碎”一般。如唐韩愈《太原王君墓志铭》中“安身功立，无愧于国家可也”，按“安身”语序（动宾结构），后面应是“立功”，韩愈用错综以呈变化，成了“安身功立”。

奇偶错综　奇，指散行（散文）句。偶，指对偶句。散行句可以改善只用对偶句出现的板正格局，偶句可以为长短散漫的散文营构出庄重、匀称之美。清包世臣《艺舟双楫·文谱》：“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至如微妙。”奇偶错综，就是散行句和对偶句的交错使用，兼具二者之所长，能形成一种类似画面的空间感，使读者产生可感触、可闻见的深切感受。如杜牧《阿房宫赋》起端用两两对出的偶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后用散行句写地势和宫之外貌。又如“戍卒叫，函谷举（偶）；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奇）”。这种手法不仅可以增加文章的气势，还有利于强调和说理。如《史记·高祖本纪》中“高祖曰：‘公知其

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偶），吾不如子房（奇）；……连百万之军（奇），战必胜，攻必取（偶），吾不如韩信（奇）……'"，意在强调。秦李斯《谏逐客书》中列秦国四君任用客卿成大业，皆奇偶错综，意在说理。另有句散意偶的特殊形式，可参考有关词条。

语气存真　"存真"修辞方法之一种。按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存真"可分为语气存真和语辞存真两类。语气存真又可分为"戛止"、"蹇吃"、"嗫嚅"三种，即描写对话者话语中断、口吃、吞吞吐吐等语气，可以维妙维肖地描绘出对话者顾虑迟疑、怯懦心虚等心态。例如《史记·张释之传》"今盗宗庙服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长陵，高帝陵。此言有人要掘高祖墓陵，尽管是一种假设，但说话嗫嚅而迟迟不敢出言的情况用了语气存真。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太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于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盟书有"所不与崔、庆者，有如上帝"，未待读毕，晏子即抢过话头并易其词说了"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这段话。这是当时说话人急迫抢话的真实情况，用语气存真。又《史记·张苍传》记当时周昌因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如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语气存真可以维妙维肖地将周昌口吃的说话神态描绘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林　岫）

语断脉承　一句话尚未说完便插入别的句子，而接下去的句子之意又和前句话相通。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崔杼"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注》："盟书云：'所不与崔庆者，有如上帝！'"崔杼盟书尚未念定，晏子便插了一句，但不影响整句意思的联贯性。钱锺书谓："吾国古记言，语中断而脉遥承之例莫早于此。"此法的运用使句子之间有起伏，有波澜，文章更加生动多姿。（见《管锥篇·左传正义三一》）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列入《存真·戛止》，属"语气存真"类，意指晏子插入语岔断了崔杼念盟书的话。此法常用来表达特定语境的对话，给人以真实而生动的印象。（王一娟）

语辞存真　"存真"修辞方法之一种。按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存真"可分为语气存真和语辞存真两类。语辞，可指书面语，也可指口语。语辞存真，指真实记述不同身分、地位的各种人物在特定场合下的语言。如《北齐书·琅邪王俨传》记王俨一段话说"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头使作阿尼"，"剃家头头"是语辞存真。《北齐书·南阳王绰传》有"绰兄弟皆呼嫡母为家家"。语辞存真须往往抓住人物的口头语、方言、俗

语、时语等，仅一二语，即可生动形象地表现人物。如《五代史·汉高祖纪》写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临决，指知远曰：‘此都军甚操剌！无大故，勿弃之！’”说“此都军（官名，即都监）甚操剌（俗语，勇猛）”，就是录其本语，能突出个性特色，是语辞存真。

称谓错综 又称“称谓错举”。指名称的出现有错综现象。按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可细分为四类，即姓名错举、姓字错举、姓国错举和上下错举。各类又有细分。

一、姓名错举。指人物的姓氏与名字交错排列。如汉贾谊《新书》“使曹、勃不能制”，“曹、勃”为曹参和周勃，前者取其姓氏，后者用其名字。又如班固《幽通赋》“周、贾盪而贡愤”，“周、贾”为庄周和贾谊，前者取其名字，后者用其姓氏。

二、姓字错举。指人物的姓氏与字号交错排列。如《荀子·性恶篇》“天非私曾、骞、孝已而外众人也”，“曾骞”即曾参，取其姓，“骞”即闵子骞，取其字。

三、姓国错举。指人物的姓氏与国名交错排列。如《汉书·徐乐传》“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夏”是国名，传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大禹之子启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子”，即汤，子姓。

四、上下错举。如《汉书·霍去病传》中“票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之士”。文中“荤”同薰，“允”同狁。荤允，又称作獯狁、薰粥、玁狁等，古之游牧民族。尧时称薰鬻，周时称玁狁，秦时称匈奴。这里用错综法排列，先用“薰鬻”之上一字，再用“玁狁”之下一字。

借影相形 这是一种特殊的比喻手法。清朱宗洛《古文一隅》评杜牧的《阿房宫赋》中“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说“如明星、绿云、烟雾、雷霆等，皆借来相形字眼也，而各下句用注释，此又以相形而兼借影者也”。相形，是互相映衬或比喻，这里是比喻。如果说妆镜如明星、晓鬟如绿云等，这是一般性比喻。以一事物的动态来比喻另一事物展开动作时的状态、形象等，如开妆镜如同明星荧荧闪烁、梳晓鬟如同绿云纷乱环绕、弃脂水好比渭水涨腻、焚椒兰好比烟斜雾横、宫车驰过好比雷霆乍惊，可以使要描写的对象不仅形神毕肖，而且增添了动态的描绘，可感可触，可见可闻，能给人以更加鲜明生动的艺术魅力。借影，只借其某些特征，如只借明星之荧荧闪烁等。因先出现喻体，本体用释句的形式出现在后，故可省略“如同”、“好似”等。

（林 岫）

虚字连珠 连珠本文体之名，非修辞作文之法，今借用之，以示虚字用得好，能使它如《文选·演连珠》李善注所说的“历历如贯珠，易看而可悦”那样。三国蜀诸葛亮《出师表》以十四个“也”字（据《文选》本）贯穿通篇，气势恢宏有刚性美。宋欧阳修《醉翁亭记》以二十一个“也”字贯穿全篇，神韵悠扬有柔性美。清龚

自珍《病梅馆记》字数不足三百，却饶层次迭转之致。首先肯定梅以曲、欹、疏为三美，原来不错，是一层。错在强求，提出三不可，为二层的前半部。哀梅之病，斥人之祸，为二层的后半部。于是解放病梅，针砭俗肠，为三层的前半部，终于为天下之梅请命，大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概，是三层的后半部。这么多的层次，却未用一个转折的助词。当三不可(未可——不可——非能)业已挑起势头之际，迅速提笔，连下“之梅、之民、之欹、之疏、之曲”五个“之”字，还有句中带过，毋需重读的两个“之”字。下文又连下“泣之，疗之，纵之，顺之，毁之，全之，贮之，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疗”下本可用“之”字，为醒目改用“也哉”)计三百七十一字中用了二十个“之”字。分而过目，恍如不觉，合而上口，则势如连弩，莫之能御。

（艾　岩）

翻笔相形　这是一种特殊的比喻手法。清朱宗洛《古文一隅》称《阿房宫赋》“此文前半借龙形桥，而曰‘未云何龙’；借虹形道，而曰‘不霁何虹’；此又以相形而兼翻笔者也。”杜牧《阿房宫赋》写宫中长桥和复道用了排句：“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如果说长桥卧波有如龙游云中，复道行空有如霁晓现虹，这只是通常的比喻。文中用翻笔式语气写没有云也会出现龙、没有雨也会出现虹，更能唤起读者的注意和想象。这种相形与翻笔合用的句式须抓住所写事物的鲜明特征，不出现“象”、“如”等词，设喻精巧含蓄，较之正面描写和一般比喻，更能形象蕴藉，韵味深长。

上下文错综　又称“上下文关系错综”。“错综”之一种，指利用上下文语意连贯之关系，举此而赅彼，造成交错变化。例如《礼记·中庸》：“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古代“郊祀上帝，社祀后土”，这里“郊社之礼”，应是祭祀上帝和后土的礼节，后半句只说“礼上帝”而不提“祀后土”，实际上“祀后土”也在其中了(以上见杨树达《中国修辞学》)。或以为是一种句子的省略现象。

回避假借法　语出自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21)：“自汉以来，作文者即有回避假借之法。”其实，汉之前周人记孔子语而晓此法。《易·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先总说“进德修业”，后分说。一说忠信进德，一说“修辞立其诚”，为了回避“修辞”之“修”，改“修业”为“居业”。又如宋沈括《梦溪笔谈·活板》“此印者才毕，则第二版书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有奇字素(平时)无备者，旋(立刻)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文中“瞬息”即“转眼之间”，“可成”与“可就”是同义词，前文用“瞬间可就”，后文用“瞬间可成”，意思一样，只是为了回避同字句出现的单调枯燥之病。

承上探下省　“省略”之一种。又称作“上下省”、“前后省”、“互省”。是“承上省”和“探下省”两种省略

手法的综合使用，即上句探下句作省略，同时下句又承上句作省略。例如《诗·大雅·召旻》中“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意思是说“维昔之富今不如时，维今之疚昔不如兹”，因为后句有“今”，故前“富”后省去“今”、又因前句有“昔”，故后“不”前省去“昔”。（林　岫）

写作著作

《文则》　古代写作学著作。宋人陈骙著。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辞章学的专著。齐梁刘勰虽在《文心雕龙》中提出过文法修辞等若干问题，但不是成系统的专著。成书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此书以六经诸子文为范例，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项，计62条，探讨了诗文写作的一般性原则，对修辞和炼句的方法，以及不同文体的风格特征均有独到阐述。清《四库提要》谓“其所标举，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固不必以定法泥此书，亦不必以定法病此书”。书中择用的书证多为古文范例。采用阐解和例析相结合的方式，有助于读者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故后代研究辞章学著作也多仿此方式。书中论述有不少精辟之处，例如文章“长短有法”须因表情达意之需要而定，从“文道统一”的传统观点出发，提出“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在辞语运用上，反对滥用古语“撰叙今事”，认为语言因时代变迁而异，主张使用民间之“通语”、“浅语”、“常语”；提出比喻十法（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后人所称明喻、暗喻、借喻等均滥觞于此。此书今刊本多以清《台州丛书》重刊《文则》为底本，校以元代陶宗仪刻本、明代陈哲刻本（又称弘治本）、《宝颜堂秘笈本》等。元代高耻传撰《群书钩玄十二卷》中附有此书，并作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有刘明晖校点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有刘彦成注译本。（林　岫）

《文微》　论写作著作。林纾著。此书是朱悟园记录其师林纾平日有关文章写作的论述。书分十章，辑280条。论述范围较广，涉及文章的作法、写作技巧、篇章布局、作者修养，评论的古文选自周秦至明清的名篇，其中不乏独特的见解。有黄启祯校刊单行本。（白　迪）

《汉文典》　古代写作学著作。清末民初来裕恂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行。分为《文字典》和《文章典》两部分。《文字典》讲述文字源流及字词用法。《文章典》论述文章作法与体格，其中包括

字法、句法、章法、篇法、文章体式、文章变迁及作者修养等内容。此书分类编著颇为细致周祥，涉及较广，对把握理解古代文章学很有启示。

（王一娟）

《日录论文》 古代写作学著作。清人魏僖（字叔子）撰著。魏僖无文论专著，此书乃清人张潮从杂录中摘辑其论述而成，书名亦张潮题名。论作文之法多新颖精当，对后学者启发较大。如论“文字首尾照应之法，有明明缴应（即照应）起处者，有竟不顾者，有若无意牵动者，有反骂破（即道破）通篇大意，实是照应收拾（指结尾）者”，意主变化，认为作文要讲法，但只拘一法则易入板俗。其他如作论有“三不必”、“二不可”、作文“往而复还则生顾盼”等论述，皆写作经验语，非笔耕者难道出甘苦。魏僖，又号裕斋、勺庭，江西宁都人，其兄魏际瑞、其弟魏礼均有文才，一门风雅，时有“宁都三魏”之誉。明亡后拒仕，隐居翠微峰。此书有世楷堂《昭代丛书》乙集本、有正书局石印《文学津梁》有收录。有康熙间林时益辑《宁都三魏全集》本，其中《日录》有3卷。

《文章轨范》 古代写作学著作。宋代谢枋得编。七卷。辑录汉、晋、唐、宋名作69篇。因主张“凡学文，初要胆大”，放开笔写，“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矣”，故前卷题为“放胆文”，后五卷题为“小心文”，文中皆有圈点评语，意在指点作文要津，使学文者“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给初探作文要津的读者很有启发。有元刊本、明刊本和清刊本。

（林　岫）

《文章例话》 写作评论著作。周振甫著。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从古人、近人、今人关于文章的论述中，选录了具有独到见解和代表性的文论百余条，按阅读、写作、修辞、风格四个方面进行编排分类，并结合文论中所谈到的名篇佳作，进行分析比较，论述其高下优劣，语言深入浅出，评述中肯，且有新见。能帮助读者体会文章的立意构思之巧、遣词造语之妙。（王一娟）

《文章指南》 古代写作学著作。明人归有光（字熙甫）撰著。66则。专论文章作法。归有光是明代“唐宋派”散文家，擅叙事，文章风格恬淡朴实，有《震川先生集》。《文章指南》均以作法标目，如抑扬则、前后相应则、文势层迭则、题外生意则、结意有余则、用意奇巧则、总提分应则等，每则除概述作法要诀外，还列出前人范文，以资对照领悟。如“结末垂戒”之法，说“凡作骂题文字，须于结末垂规戒意，方有余味。此虽小节，亦不可略。如杜牧《阿房宫赋》、苏明允（洵）《六国论》皆得此法。”有民国间印本。（林　岫）

《文章缘起》 古代文体论著作。又名《文章始》。旧本题师南朝梁任昉撰。全书一卷。内容主要阐述各类文章体裁的缘起，包括诗、骚、赋、歌、诏、策、表、书、奏、启等，共85种。有明代陈懋仁注本，清代方熊补注本、

《学海类编》本、《文字津梁》本等。

《文章概论》　文章学著作。汪馥泉著。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文章的要素，包括意思的构成、表达意思的工具、作者与读者三节；第二章文章的特质，包括文章的历史性、社会性、个性三节；第三章文章的构成，包括词及其选择、句子及其整理、段落及其剪裁、篇章及其经营四节；第四章文章的体制，包括描写文、记叙文、发抒文、议论文、说明文等五种文体的糅杂五节；第五章文章的材料，其中有材料的源头、选择材料的态度两节。书中各节中又分若干段，一段说一个专题。此书是我国现代较早的一部文章学专著，对研究文章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王一娟）

《文章精义》　古代文章学著作。宋人李涂（耆卿）著。原书早佚，文津阁《四库全书》所收系由《永乐大典》录出。今本只一卷，计101条。或谓于钦笔录其师李涂论文章之语录而成此书。至元至顺三年（1332）付梓。明代焦竑《经籍志》著录本称二卷，疑今本也非足本。此书为评点古文写作方法、风格专著，多以先秦、两汉、唐宋名家名作为例，形式如诗话，虽然比较零散，但不少论断精当，有“点到为止”之妙。例如对作文起句发意、结句见主意、师承渊源等论述均有独见。其中，论“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学文切不可学怪句，且先明白正大”以及反对“务要崎岖隐奥辞不足以达意”等，影响颇大。清《四库提要》评说“世传韩文如潮，苏文如海，及春蚕作茧之说”“亦具见于是书”，足见其波澜。有《格致丛书》本、《文学津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刘明晖校点本（与《文则》合本）。

《古文关键》　古代写作学著作。宋人吕祖谦编著。二卷。采辑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唐宋散文家之作品六十余篇，每篇纲目关键或字句着力处多有评点。卷一前列“看古文要法”，分“总论看文字法”（分述看韩、柳等各家文须学什么、戒什么）、“论作文法”、“论文字病”三部分。卷中辑文，一般是文前先解通篇立法，起首、过渡、承转、波澜、照应、关锁、结尾等关纽处均有圈点，道出作者布局、立意之用心。论断多精辟语，如谓看欧阳修文要“学欧平淡，不可不学他渊源，徒平淡而无渊源，则委靡不振”，又如说如何从五个方面去看全文警策句法等，皆有见地。《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发行）收录。

（林　岫）

《论文八则》　古代写作学著作。清代邵作舟著。此为介绍古文作法的著作。主要内容有立意、辨体、布局、修辞、风格、弊病等，其中论及记事的方法十四种，最为细致。文中对前人所论有分析，颇多经验之谈，可资借鉴。　（王一娟）

《论文偶记》　古代辞章学著作。清人刘大櫆（号海峰）撰著。一卷，共31则。刘大櫆是桐城派重要作家之一，师承方苞，主张阐发程朱理学。《论文偶记》原载《刘海峰文集》者。

论述意在弘扬古文，在探讨作法、神气、音节、字句等方面均有见地。如论“文章最要节奏，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窈渺处”、文笔八简、文贵远等，多深入浅出、可资借鉴之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初月楼古文绪论》（吴德旋著）、《春觉斋论文》（林纾著）与此书的合刊本。

《伯子论文》 古代写作著作。清人魏际瑞（字伯子）撰著。语录体。论文章作法常喻以形象的说明，且多有创见，如谓“用故事（即用典实、史事）”，好象一花一石，须“偶然安放”，“否则，穷人补衣，但贴上一块而已”。又如说“著佳语佳事太多，如京肆（商场）列杂物，非不炫目，正为有市井气”。主张著文要言之有物，所谓“文主于意”、“议论主于事”，但“意多乱文”、“事杂乱议”，不束之以法则“如蒙师离塾，叫喊跳踢，哄然一屋矣”。魏际瑞博学多才，宁都人（今江西宁都），与其弟魏禧、魏礼的诗文，均世称特出，有“宁都三魏”之誉。《伯子论文》有世楷堂《昭代丛书》乙集本、有正书局石印《文学津梁》有收录。另有康熙间林时益辑《宁都三魏全集》本。 （林 岫）

《秋山论文》 古代写作学著作。清代李绂撰。收入《穆堂别稿》第44卷。主要讲述文章的写作方法。作者将叙事的方法分为顺叙、倒叙、分叙、类叙、追叙、暗叙、借叙、补叙、特叙等九类，每一类都加以分析例证，条分缕析，通俗易懂。对指导读写实践有启发意义。

《文体论纂要》 文体学著作。介绍我国古代文体知识为主的专著。蒋伯潜著。正中书局1942年出版。全书分20章。主要内容有：骈文派文体分类述评；骈文兼宗派文体分类述评；散文派文体分类述评；新派文体分类述评，文体分类的尝试；论说；颂赞与箴铭；序跋注疏与考证；赠序书牍与契约；公文；哀祭与对联；传状与碑志；叙记与典志；辞赋；诗歌；小说；戏剧；风格等。内容非常丰富，各类文体皆有文例，纂要述概，也论及发展、演变情况，是研究古代文体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中国修辞学》 修辞学著作。杨树达著。见《汉文文言修辞学》。

《文章学概论》 文章学著作。杨振道、韩玉奎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全书分三大编。第一编是文章能力结构论，包括文章阅读能力、文章写作能力两章；第二编文章本体构造论，包括文章的内容、文章的形式、文章的运思、文章的罗辑、文章的文风五章；第三编是财经文体写作论，有学术论文、调查报告、总结、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公文等五章。此书的特点是体系较为新颖，论述得当，同时还吸取了近年来文章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对指导读写实践有启发指导作用。

《文章学概论》 文章学著作。张寿康主编。1983年出版。全书分绪论、文章的源流、文章的分类、文章的要素、文章的写作、章法和技法、文章的阅读、分析和鉴赏、文风等九章。此书对我国文章学进行了综合性地研

究，对各章内容作了科学的分析和介绍。各章之间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保持了内在的联系，兼具知识性和理论性的特点，是我国建国后出现的第一本专门研究文章学的专著。因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对指导写作和提高辞章学修养很有启发。

（王一娟）

《文镜秘府论》　古代写作学著作。日僧遍照金刚（即空海、弘法大师）编著。所引录我国古代诗论著作多已早佚，而赖以此书得存于世者，弥足珍贵。此书分天地东西南北六册。阐发理论有精到创见之处，诗文也均作涉及。如说“作文章，但多立意。……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所作词句，莫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等论述，对后人研究文章作法很有启发。此书论修辞的辞格，有十二种之多，如映衬、示现、复迭、双关、婉转、借代、对偶、警策、摹状、回文、析字、引用等，比《文心雕龙》、《史通》所论还要多，而且均作定义、说明和例析。对中国修辞学影响和贡献比较大。此书有日本《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古钞本及讲谈社校印本，日本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

（林　岫）

《古人论写作》　写作知识丛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合编。本书依据古为今用的原则，从我国古典文论专著，以及笔记、信札、序跋等中摘选出对写作具有借鉴意义的论述八百余条，分为六辑三十六类。每辑按照文章总论、立意构思、篇章结构、表现方法、语言运用、体裁风格等六个方面，先作概括区分，然后在每辑中具体分类集纳。为了便于掌握各条目的内容，编者在每一类的开头都写出简短的说明，对有些条目，也作了必要的补充、阐发和注释。此为对研究者和阅读者均为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作文与文法》　写作学著作。黄洁如著。开明书店1930年出版。全书共分九章。分词和句、词类和句法、单句成分的总括和图解法、复句和连词、语气和词类、词类总括和辨词法等。各章又分为“作文”和“文法复习”两部分。作者把文法与作文混合成编的目的，是在于指导和启发学生的读写实践，使文字分析的研究和综合的应用很好地结合起来，因为评述和分析有地对性，读者能开卷得闪，故有利于解决在写作和阅读时遇到的实际问题。

（王一娟）

《春觉斋论文》　写作学著作名。清末民初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字琴南）撰著。不知成书何时，估计在清末民初。后改名为《畏庐论文》。林推崇清代桐城派古文，但自己创作的散文叙事抒情却十分生动有趣，风格近似明代归有光，故论文章作法、得失、风格等虽有桐城派观点，但主张参伍其变，不拘一格。此书《应知八则》一章，比较详细地阐发了意境、识度、气势、声调筋脉、风趣、情韵、神味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对文章内容、形式

均有涉及，有的结合创作和阅读中的实际问题分析，对读者颇有启发。如论穿插之笔说“穿插非嵌附之谓，亦非挖补之谓。……法在叙到吃紧之处，非插笔则眉目不清，故必补其所以致此之由；叙到纷烦处，非插笔则纲要不得，故必揭其所以必然之故。总之，须近自然，无嵌附填塞之弊，方为佳笔”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与此书之合刊本。

《修辞学发凡》 修辞学著作。陈望道著。分十二篇。阐述颇为精当，以大量白话文和文言文语例作证分析，将修辞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类，计三十八种辞格，详细讨论了材料、意境、语词和章句等，对系统研究汉语言修辞学、学习和研究写作学，都有重要价值。三十八种辞格：譬喻、借代、映衬、摹状、双关、引用、仿拟、拈连、移就、比拟、讽喻、示现、呼告、夸张、倒反、婉转、避讳、设问、感叹、析字、藏词、飞白、镶嵌、复迭、节缩、省略、警策、折绕、转类、回文、反复、对偶、排比、层递、错综、顶真、倒装、跳脱。每种辞格又分有若干式。此书为“五四”后汉语修辞学的代表著作，后来研究者多参考此书。初版于1932年，后陆续有修订本。197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有新修订本。

《读书作文谱》 古代写作著作。清人唐彪撰著。刊行于康熙年间。刻本与《父师善诱法》（有上下二卷）合集。计八卷。此书为提供教师授课用之教材，故阐述条理清晰，重在介绍文章的写作方法，对读书、修辞、用字等均有涉及，以上各方面在构思上的心手之妙，也有评点。对古人写作的一些看法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古人虽云文章多做则疵病不待人指摘而能自知之，然当其甫做就（即刚完成）时，疵病亦不能自见”，故主张“且置之，俟迟数月，取出一观，妍丑了然于心，改之自易，亦惟斯时改之使确耳”等，皆经验之谈，比较切合实际。

《古文笔法百篇》 古代论写作著作。清人李扶九编集。原书选各代名家文百篇，辑20卷。每卷归一种笔法，计20种，每种篇章数不等。分别为对偶、就题字生情、一字立骨、波澜纵横、曲折翻驳、起笔不平、小中见大、无中生有、借影、写照、进步、虚托、巧避、旷达、感慨、雄伟、奇异、华丽、正大、论文等。辑文均以笔法为序，不分时代先后，汇聚观法，方便初学。后湘西黄仁黼对此书作了重要纂定，原书评解中或未尽阐发者，或与所见闻未符者，又各为书后，并裒集先正评语，撷取精英汇附小批之上，有未经前人道及，虽无可发挥之处，也参以管见，补其遗漏。对李氏原选白居易之《琵琶行》、李赞之《杂说》等10篇，因其体制不同，或体格不宜，或艰于学步，皆抽出汰去，换以韩愈《原道》、苏洵《辨奸论》等，百篇成数。每篇古文前有作者简介或解题，后有评解、书后，文中有眉批。此书评论集各家之言，不乏真知灼见，读者参互众说，笔法自斐然可观。唯“雄伟”、“奇异”、“华丽”等以风格代

笔法，似欠妥。有清光绪间刻本，锦章书局本、广益书局本，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校点本。

《古书疑义举例》　训诂学著作。晚清俞樾著。俞樾（1827～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清著名学者。此书分七卷，八十八节，卷首有总题目，节有分题目。周秦两汉之书在遣词造语上不尽相同，后人欲通晓古书疑义，须具有训诂、文法、修辞、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此书列举前人发现的疑义文例，逐一分析，涉及范围甚广，包括文言句式、词义、修辞、校勘等问题，对今人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有很重要的价值。其中，一至四卷谈到了很多文言修辞的问题，并列举了大量文例，对研究古文写作学启发较大。后来学者为此书不断增补，主要有刘师培的《古书疑义举例补》、马叙伦的《古书疑义校录》、杨树达的《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姚维锐的《古书疑义举例补附》等四种。中华书局1956年将俞书与四种合并出版了《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韩柳文研究法》　写作学著作。清末民初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字琴南）撰著。分《韩文研究法》和《柳文研究法》两部分。对唐代两位大散文家在创作中的构思、作法、风格等均有评论。林擅书画，常以画家之目观韩柳文，形貌取神，多有笃论。如对柳宗元之《袁家渴记》一文，点出“妙在拈出一个‘风’字，将草木收缩入‘风’字”，“此等文字，须含一个静气，又须十分画理，再著以一段诗情，方能成此杰构”等。有商务印书馆1914年本。　（林　岫）

《文字法三十五则》　古代写作学著作。明代李腾芳撰，清刻《李文庄公全集》卷九《山居杂著》中收录。书中讲述了文章的作法，从立意、布局、选辞等各个方面论述了作文章的技巧。共35则，有意、格、句、字、擒纵、缀跌等。每条论述后面都有例证，通俗易懂。此书对认识文章的规律和写作技巧都有很大帮助。

（王一娟）

《汉文文言修辞学》　修辞学著作。杨树达（1885～1956）著。作者本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2卷），后在清华大学讲授修辞学，便以此为主，并旁及古人用词造句的特例和文病，分为18章（释名、修辞之重要、修辞举例、变化、改窜、嫌疑、参互、双关、曲指、夸张、存真、代用、合叙、连及、自释、错综、颠倒、省略）并附“文病若干事”，而成此书。此书以古文句为例，一一列出，或章首略加介绍，或例尾附加按语，言简意赅，点到为止。唯大多数例句未加释解，初学者理解比较困难，可供大学教学者或修辞研究者参考用。此书历来被看作是晚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第一至四卷关于修辞内容的扩充。此书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时名为《中国修辞学》，因内容只限于古汉语修辞，故重版本改为现名。1980年9月中华书局有新版本。　（林　岫）

《古代文章学概论》　文章学著作。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本系统总结我

国古代文章理论的专著。由王凯符等编著。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具有“章以总规”、“引证得当”、“阐释入微”、“以文明理”四方面的特点。分12章，有结构、文道、修养、立意、谋篇、辨体、文辞、论辨、记叙、求新、风格、修改等。分析详略得当，例析皆有代表性。书末附“古代文章学参考书目简介”极方便读者，为他书所未见。此书对提高古文的阅读能力和现代文的写作水平都很大帮助。 （王一娟）

《古汉语修辞简论》 修辞学著作。赵克勤著。八章，八万余字。分比喻、映衬、摹状、代称、割裂、夸张、委婉、用典、隐语、双关、反语、炼字、点化、互文见义等节，分别予以释解和例析，是在分析、归纳和综合古汉语语言材料的基础上阐述古汉语修辞规律和某些疑义问题的一本深入浅出之书，对研究者和阅读古文者都有启发。商务印书馆1983年3月有初版本。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 写作学论著。研究探讨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理论问题的专著。作者张少康。198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艺术构思，有虚静、神思、感兴、物化四节；第二章论艺术形象，分物象和意象、神用象通和拟容取心、隐秀、意境四节，第三章论创作方法，有实录写真和奇幻夸诞两节；第四章论艺术表现的辩证法，有形与神、假与真、一与万、虚与实、情与理、理与趣、情与景、意与势、文与质、通与变、风骨和辞采、法度与自然等十二节；第五章论艺术风格，有才气学习、世情与体式、八体屡迁，会通合数、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四节。此书论述了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创作中的共同规律，内容丰富翔实，分类有特色，论述立根于深厚的材料基础之上，条分缕析，偏重比较，对读者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章章法与阅读写作》 写作学著作。夏绍臣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年出版。作者立足于“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文”、“言之有体”等几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对文章章法进行了探讨。全书共分八章，依次为：什么是章法；章法的由来；章法的实际应用；文章的基础；文章的句子；文章的层次；文章的段落；文章的结构。此书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对指导读写实践很有启发，有助于学，也有助于教。 （王一娟）

《文言对照古文笔法百篇》 论写作著作。胡怀琛编辑，吴曼青校点。上海大东书局二十年代出版之古文译注本。集古文百篇（自周秦迄于明代），按笔法特点分为“三十二法”（又称“三十二法”），每类中篇数不等，以短简浅显为主，难解文句有简明注释，不少篇目附有清人林西仲点评语，可资参照。32类依次为事理辩驳法、一字立骨法、感慨生情法，抑扬互用法、逐层推论法、严婉并用法、一气承接法、虚境实写法、跌宕取神法、夹叙夹议法、纯用叙述法、匣剑帷灯法、驭繁以简法、复笔取神法、虚字取神法、写景琢句法、先喻后正法、步步

传神法、用笔矫变法、步步停顿法、起迄不平法、结处点睛法、小题大作法、三段分叙法、谐笑讽刺法、前后叫应法、正喻夹写法、措词得体法、狭题宽做法、宽题狭做法、两两比较法、托物寓意法。每篇附有白话译文，可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唯笔法分类欠准确，有的还有交叉、摘段为篇的，论笔法也有不当之处。此书对研究写作技巧和指导写作有参考价值。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有重印本。

《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

修辞学资料辑录。郑奠、谭全基编。约55万字。此汇编按修辞理论、修辞手法、风格理论和描写、不同文体的修辞问题和修辞批评等五个方面，辑录了传统的修辞学和修辞学史的资料，每方面均按时代和作家的先后顺序编排。其中有不少是不易查找的资料，对研究者和阅读古文者是不可多得的资料荟萃集。商务印务馆1980年7月第1版。（林 岫）

古文知识

文体总类

文 ①指书写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传达信息的一种载体，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之一。在我国古代，有甲骨文、金文、籀书、隶书、楷书等。它是构成文章的基本单位，每字均有一定的字形、字义与字音，是形音义的统一。②与字对举，指书面的文字凭证，如文契、单据、图表、谱牒之类。③指有组织的、能单独成篇的各体诗文辞章与学术文献，即“文章”，它反映社会生活，传达思想感情，说明观点理论，有相应的结构形式与表达方法。④与“质”对举，指文章的形式因素，如辞采、文情、文风之类。

文章 ①在汉代，人们将文章与文学对举，文章是指有文采的辞章，如辞赋、颂赞、乐府歌行之类；文学则指文化学术。②人们通常将各种叙事明理或表情达意的、独立成篇的文字称为文章。晋人挚虞有《文章流别论》等专著，就涵盖了各体诗文作品。南北朝时颜之推著《颜氏家训》，有《文章篇》，也综述了各体诗文的“源流”，提出“夫文章者，源出五经”之说。③近人将诗歌、戏剧、小说以外的辞赋、散文、骈文及各体应用文字概称为文章，这是从汉语书面文字的实际出发提出的概念。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称之为“汉语文章”。

文学 ①先秦两汉时指文史哲等学术著作；汉政府置“文学”一职，以讲授儒家著作及法律条文为职责；②六朝时，将文学与史学、玄学相对举，将辞章经术统称为文学。③指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用口头的或书面的语言，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有一定的艺术表现手法与语言结构，古人将其分为韵文与散文两大类，现在通常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大基本样式。 （文 白）

文体 ①指文章的风格体制。它决定于文学所反映的内容，由语言、结构、表现手法、文学技巧等形式因素构成，具有时代的、社会的、个人的特色，如文学史上的建安体、齐梁体、

吴均体、元白体等。②指文章的表达方式及规格与程式，即文学体裁。就散文说，从表达方式分，有叙事体、说明体、议论体、抒情体等。就应用场合、书写程式分，有公文、社会交际应用文等。文体一旦形成，有相对的稳定性、独立性。各种文体，都有自己的构成要素，是约定俗成，必须遵守的。《昭明文选》把文体分为39类。《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苏天爵《元文类》、程敏政《明文衡》均沿用其分类方法。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分类更繁，竟达150体。姚鼐《古文辞类纂》分为13类，曾国藩又改为11类。一般地说，文体分为散文、韵文两体。散文体包括：论辨类（论、辨、难、议、说、解、释、原、对、问、喻），序记类（序、后序、送序、赠序、寿序，记、纪事、志、述、传、行状），诏令类（诰、誓、令、诏、制、敕、谕、玺书、口宣、策、策问、御札、批答、赦文、九锡、铁券文），奏疏类（奏、疏、上书、章、表、对策、射策、进策、帖括、札子、笺、启、封事、弹文、状、露布），题跋类（题、书后、跋、引、例言、读），书牍类（书、简札、帖、牍、扇、移、书、檄），碑碣类（碑、墓碑、碑颂、神道碑、碣、墓碣、碣颂、墓表、阡表、殡表、灵表、神道表、墓志、圹志、权厝志、门志、祔迁祔志、盖石文、坟版文、墓版文）；韵文体包括：谣谚（谣、讴、诵、谚），箴铭（箴、铭、戒、规），颂赞（颂、赞、符命文），哀吊（哀辞、哀策文、吊文、诔），祝祭（祝辞、祭文、盟辞、誓辞、嘏辞、玉牒文、上梁文、醮辞、醮辞、字辞），诗赋（诗、歌、乐府、歌行），辞骚（赋、骚、辞、七），连珠，词。

（杨恩成）

文笔　六朝时代对文体的辨析和分类。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多处出现“文”与“笔”两词，但“文”指一切文章，“笔”指文人用笔和书写工具的笔。直到刘宋时代，才从文的角度将“文”、“笔”对举。颜延之有，“竣得臣笔，测得臣文”之说（《南史・颜延之传》），但是，颜延之又把“笔”按有文采和没有文采分为“言”和“笔”两类。范晔也把《后汉书》中无韵的序论称为“笔”，有韵的赞称为“文”。他们都没有从文体学角度去认识，唯有刘勰，接受了他们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点，明确标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萧绎（梁元帝）《金楼子・立言》则泛称有文采的诗赋为“文”，叙述议论一类的文章为“笔”。至唐宋古文运动兴起后，古文家强调古文，反对骈文，“文”、“笔”的区分逐渐为人们重视。到了清代，阮元为了提倡骈文，又把“文笔说”重新提出来，他主张有韵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　（樊德三）

古文　文体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古文即指古代的散文，又有专指和泛指之分。中唐作家为区别于称为“时文”的骈文，将先秦、两汉时期用散文形式所写的各种文章定名为“古文”。这是专指。后来中唐作家自己创

作的散文也称“古文”，如“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这是最初的引申义。后世更用来指历代的散文。这是泛指。狭义的古文是相对于骈文而言的，它以散行单句，不拘格式，不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为特征；又是相对于韵文而言的，它以抒写自由、不押韵为特点。但它包括各体论说文章，与现代文学体裁“四分法”的散文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广义的古文包括骈文和辞赋在内。历来的文章选本如《古文观止》以及近时的《古代散文选》等，编选者大抵都这样做。因为骈文辞赋是汉语文章走向俪偶的一个极端，最能体现汉语文章的语言特点。有些辞赋虽然介于诗文之间，但多数作品不近于诗，而近于文。

(王文龙)

骈文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骈，驾二马也。”骈文以俪句、偶句为主，两两相对，注重声调和谐，要求平仄相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其源头始于汉魏，及至南北朝，流于卑靡。韩柳首倡古文运动，意在打破骈文独占文坛之局面。后人遂以骈文之名与散文对举。

四六文　文体名。骈文的一种。全篇多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世称“骈四俪六”。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四六文起源于南北朝，至唐宋而不衰。李商隐《樊南四六甲乙集》可证。四六文音韵和谐，对仗工稳，讲究辞藻、典故。由于四六文大都迁就句式，堆砌辞藻和罗列典故，故常因词害意。(杨恩成)

时文　流行于一个时期、一个时代的文体。在唐代主要指当时通常应用的骈文和科举考试采用的律赋。详见“骈文”条和“律赋”条。至北宋前期，杨亿、刘筠等的骈俪文体风行一时，也称时文。欧阳修《证旧本韩文后》记述当时文坛：“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明清时期所谓时文则指八股文，也称“制艺”。　(萧　晨)

八股文　文体名。亦称“时文”、“制艺”，为明清科举所定之文体。其源出于唐之帖经与宋之经义。“文中有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梁杰《四书文源流考》)等八段，故名。破题共两句，道破题之要义；承题，伸明破题之意；起讲，一曰原起，为一篇开讲之处；提比，一曰提股，起讲后入手之处。虚比，一曰虚股，承提比之后；中比，一曰中股，为全篇之中坚；后比，畅发中比未尽大义；大结为一篇之总结。后四部分都有两股对偶排比文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停试八股文。

(杨恩成)

文言　①汉语书面语的一种，是我国古代书面作品的通用语言，它有词汇丰富、表意精练的特点，语法上和现代汉语也有差别。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与人民大众的口头语的距离越来越大，难以为绝大多数民众所掌握，

因而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②指用古代汉语书面语写成的文章，即文言文。

白话文 ①与文言文相对应，指用民间口语写成的文章，唐代变文与某些小品，宋代语录，宋元明的话本、拟话本和一些故事、小品、杂文等，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历代民间传说也都是“白话文”。②与“古文”相对应，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的、以当代口语为基础写成的书面文章。

散文 ①广义的散文，即散体文，又称“平文”，不讲究用韵，不追求对偶。古人将包括经传史书在内的各种散体文章均称为散文，以别于韵文或骈文；②狭义的散文，指文学散文，与诗歌、戏剧、小说相对应，它以记叙或描写生活片断、表述作者生活感受或思想观点为主，一般篇幅短小，手法灵活，有多样的表现功能。文学散文根据其表现的内容和表现手法，可以分为记叙散文（含记事散文、记人散文、故事散文、写景散文等，古代的史传、记游等属此），议论散文（即说理散文，古代的政治、史论、哲理、杂说等也属此）、抒情散文（有写景抒情，托物言志等品类，古代的骈文和辞赋中尤多此类作品）。

记叙文 文体基本类别之一，是记人记事写景状物的文章，又称叙记文、纪叙文。记叙文记述生活，一般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结果六要素。通常所说记叙文，是指单篇记述性文章，广义的记叙文包括记述性诗歌与小说等在内。古人将记言之文也均入此类，将记人记事记物记言写景状物之文统称为“记”，历史、史传、传状、志、录、碑记、游记、语录之类，也统属于此。

议论文 文体基本类别之一，是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进行说理论证的文章，也称论辨文、论说文。它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一般具有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它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任务，诉诸读者的理智。在许多情况下，议论中也有形象，也有激情，不仅以理服人，同时以情感人，从而成为说理散文（如先秦诗子散文与秦汉政论散文）的重要品类。古人将单篇议论文归入“论说”类，包括各种论、议、说、对、策问、奏议、杂说等。

抒情文 文体基本类别之一。以抒情为主要表达手段。抒情文往往通过对外界事物的刻画描摹、记述议论来传达作者的主观感情，抒发作者强烈而鲜明的爱憎，从情感上打动读者。或写景抒情，或议论抒情，或记叙抒情，或描写抒情，其所记、所议、所写，均服从于畅抒胸臆，服从于表达作者感情的需要。广义的抒情文包括诗歌等样式在内，一般指抒情性单篇文章，古代的哀祭文、山川游记、抒情辞赋及某些书札小品和论议文章，也可归入此类。

说明文 文体基本类别之一，又称解说文、解释文，它以说明为基本表达手段。其任务是介绍事物、说明关系、阐释事理。介绍事物的性状、结构、功能；说明事物间的联系、影响、

因果、主次；阐释事物的规律性发展情况与原理、依据……总之，说明文要朴实而真切地给人以科学知识，其实用性很强，而且有相应的写作程式与专业用语。

描写文 文体基本类别之一，以描写与叙述为主要表现手段，有时也兼用议论、抒情与说明，将作者的耳闻目见连同想像的情景具体地再现出来，诉诸读者的情感。它是描摹景色、描绘人物、刻画具体场景的基本文体，在散文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记人记事散文 文学散文的基本品种之一。它以记叙为主，因事缘情，借所记的人和事传达出作者的主观感情、主体感受与评价。注重形象性与抒情性。司马迁的史传散文便是其杰出代表。

说理散文 文学散文的基本品种之一，它以议论为主，托物言志，借生活中的具体事件、具体现象进行议论，以一种富于理性的形象和情感，启迪读者的积极思维。先秦哲理散文、秦及汉初政论散文，以至晚唐小品和历代著名的寓言、杂说之类，均属说理散文中的佳构。

写景散文 文学散文的基本品种之一，它以写景为主，即景抒情，通常以名山大川、胜境为题材，交织进风物人情，古迹传闻，表达作者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历代山川游记大多属于此类。

（文 白）

诸子散文 指中国先秦诸子所写的散文。所谓"诸子"，是指先秦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将先秦各学派归纳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则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中国文学史上通称这些作品为诸子散文。诸子散文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品中，《论语》是纯语录体散文。《老子》多用韵语，它们都词约义丰。《墨子》在对话中夹杂议论，初具议论的规模。第二阶段是战国中叶，主要作品有《孟子》、《庄子》等，它们的文辞比前一阶段繁富，也较畅达。《孟子》虽然也是对话体，但有所发展，成为对话式的辩论文。《庄子》则大多突破对话体，向专题议论文过渡。第三阶段是战国末期，主要作品有《荀子》、《韩非子》等，这阶段的作品注意结构和修辞，富有逻辑性，代表了先秦理论文的最高成就。先秦诸子散文对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特别是《论语》、《孟子》和《庄子》这三部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樊德三）

哲理散文 通过叙述或描写以寄寓玄妙高深之理的散文。先秦时代，庄子、孟子散文中借寓言故事示人以一定的哲理的，可视为哲理散文的肇始。《庄子·天下篇》说："以天下的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

神化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友。”如《秋水篇》，作者不用抽象的理性说教，而是借河伯望洋兴叹的寓言说明在无限的宇宙中，人类所知有限，人类的知识、眼界、对世界的理解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文章言近旨远，且富于形象性。唐宋八大家中，一些作家继承了庄子散文以寓言寄托微言大义的传统，如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苏轼《前赤壁赋》等，均属哲理散文中的名篇。哲理散文要求作者用可见可感的形象阐述创作本旨，从而给读者以启迪。如刘熙载所言："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至于南宋时期的道学派散文，亦属阐释哲理之列，惟其留心于经义，故缺乏形象性，实属哲理散文之变体。

（杨恩成）

政论散文　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散文。源于汉代。如贾谊《过秦论》，晁错《言兵事疏》等，或总结历史教训，或针砭时弊，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张亚萍）

历史散文　一种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散文。现在一般与诸子散文相对举，专指先秦时代这类散文。《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散文。它以记言为主，大都是一些誓词、文告以及告诫之词，其中也有一些记事文字。语言简短而艰涩，后来的《春秋》、《国语》、《战国策》逐步有所发展，比较注意运用当时的口语，讲究文字的表现力，篇幅由短到长。在记叙中也能够比较细致地记述复杂的事件和人物言行，表现不同历史人物的特征。从这几部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脉络。《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为后代散文家所重视，几乎成为他们学习散文写作的典范。贾谊、晁错、司马迁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先秦某些历史散文的影响，至于唐宋以后的著名古文家，更是多数爱好并学习先秦的历史散文，他们的叙事文、传记文以及议论文，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表现方法上，很多受了先秦历史散文的影响。　（樊德三）

史传散文　一种以文学笔法描述历史人物的散文。史传散文以人物为中心，或写历史人物的一生，或写历史人物的生平片断，或写一人，或同时写几人。史传散文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既不虚构也不夸大，不过，史传散文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既具有真实性又具有文学性，即进行必要的艺术渲染和艺术加工，因而具有生动性。我国历史散文的传统是悠久的，遗产很丰富。从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始，历代史书中的“纪”、《传》部分都有不少优秀的史传文学作品。唐代古文运动兴起之后，历代均有作家学习史记笔法写作历史人物的单篇传记，也属史传散文之列。

寓言散文　以寓言故事为主，借助具有哲理性、形象性的事物抒发作者的主观感情。《庄子》为最早的寓言散文。林中铭《庄子因》："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

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寓言散文要求想象缤纷，善用譬喻，辞采华赡，富于变化。（张亚萍）

文体分类

辞赋

赋 文体名。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也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赋者，古诗之流也”。溯其源流，“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信兴楚而盛汉”（《文心雕龙》）。初有荀子《礼赋》、《智赋》，宋玉《风赋》、《钓赋》。及至汉代，“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文心雕龙》）。或长于叙事，或长于说理，体制宏大，铺张扬厉，遂蔚成汉赋之大国。赋体，多用客主问答形式，极声貌以穷文，缘情发义，托物兴词。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受诗歌声律对偶之影响，汉赋变为俳赋（亦称骈赋）；唐代，再变而为律赋，宋代又变而为文赋。故赋之为体，可分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咏物小赋、骈赋、律赋、文赋等。（张亚萍）

辞赋 中国古代“辞”、“赋”两种类似文体的合称。辞和赋因为在形式上差不多，所以，汉代人认为是同一体裁，于是统称为“辞赋”。辞赋，文体体制特点是既有抒情又有叙述或说理，介于诗与散文之间。从广义上说，属于古代散文的一种。“辞”原产生于战国楚地，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之曰“楚辞”。西汉刘向编辑了《楚辞》一书。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是沿用屈辞的形式。因为屈原《离骚》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故亦称骚体。后人沿用汉人的说法，也把屈原作品叫作“屈赋”。“赋”名始于战国荀卿的《赋篇》，最早出现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的赋，称为“短赋”。赋可分为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四类。到汉代发展演变成规模宏大的汉赋，汉赋称“古赋”，一般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形式。六朝赋称“俳赋”，又称“骈赋”，篇幅一般较短，讲究骈偶和用典。唐代又由骈体入律体，谓之“律赋”。格式要求严格，对仗比较工整，平仄和谐。宋代多以散文方式作赋，称为“文赋”。句式参差，押韵比较随便，即多以散代骈。“辞”和“赋”两者都要求文采华丽，句式比较规整，讲究韵律，富有音乐感，常用夸张、铺陈手法，兼具诗歌和散文的特点，是一种半诗半文的独特文体。（樊德三）

骚体 汉初赋家，仿照屈原《离骚》的体制与句式，从事赋的创作，如贾谊作《鹏鸟赋》，世称之为“骚体赋”。它是汉大赋问世之前的一种流行赋体。比起楚辞来，它进一步散体化了，可视为楚辞与汉赋之间的过渡性赋体。 （文 白）

七体 古代文体名。《文选》把“七”列为一体，和“赋”、“诗”、“骚”并列，“七体”之名由此而来。“七”之体，刘勰认为乃枚乘所创：“枚乘摛艳，首制七发”（《文心雕龙·杂文》）。《七发》是一篇问答体散赋，“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文选》李善注）。《七发》文辞瑰丽，气势壮阔，善用比喻，形象鲜明，描绘生动，极富艺术感染力，以至于骚人墨客争相仿效，以“七”名篇。如傅毅的《七激》、崔骃的《七依》、张衡的《七辨》、曹植的《七启》等，于是形成文中一体。后来又把这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称为“七林”。《隋书·经籍书》即录有《七林》十卷。今天看来，七体仅是赋体的一个分支。枚乘的《七发》，成了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的标志。 （殷大云）

汉大赋（古赋） 文体名。其体式为主客问答，极声貌以穷文；字句为散韵相间。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甘泉赋》即属此体（参见“赋”、“骈赋”条）。相对于后来的俳赋、律赋、汉大赋．又称“古赋”。

连珠 文体名。《文选·演连珠注》：“连，贯也。言穿贯情理，如珠之在贯焉。”吴讷《文章辨体》：“连珠者，假物陈义以通讽谕之词也。”连珠之文，出自扬雄。综述碎文，如珠在贯。其后班固、贾逵、傅毅之流受诏继起，托物陈旨，合于古诗风兴之义。刘勰《文心雕龙》：“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连珠体崇尚辞丽、言约，行文则四六对偶而有韵。 （杨恩成）

俳赋 又称骈赋，它是骈体文中的一种，由汉赋发展而来，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像一般骈文一样，它讲究字句对偶整齐，声调平仄匀称还讲究辞藻与用典，特殊的是它要求押韵。庾信《哀江南赋》是骈赋（俳赋）的高峰之作。唐代俳赋又发展成律赋。

（文 白）

律赋 文体名。由六朝俳赋演化而来，为唐宋科举考试时所采用。徐师曾《文体明辨》：“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徐庾隔句作对之理，终于隋唐宋取仕限韵之制。但以音律协谐，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于辞皆置弗论。”洪迈《容斋随笔》：“唐以赋取仕，而韵数多寡，平仄次序原无定格”，“自太和以后，始以八韵为常。”律赋限韵极严，平仄以四平四仄为准。

（杨恩成）

文赋 文体名。宋代用散文章法作赋，不拘泥于字句的声律对偶，而专门抒情说理，因文而名，故称“文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开文赋先声。

叙事赋 赋的一种类型，以叙事手法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赋体文章。客

观描述多，主观抒情少。班固的《两都赋》可为代表。

咏史赋 赋的一种类型。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赋体文章。借古喻今，托古讽今，在咏叹史实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如东晋袁宏的《东征赋》。

说理赋 赋的一种类型。以说理为目的，对某一事物进行铺写的赋体文章。往往在形象的描述中渗入理性的内涵，利用各种生活素材和故事进行说理。如贾谊的《鹏鸟赋》，托物言志，借"鹏鸟"表达自己的苦闷，来说明怎样以理遣情的道理。（张亚萍）

抒情赋（抒情小赋） 东汉后期，在汉大赋创作高潮过去之后，抒情小赋在赋坛上兴盛起来。这类赋作，篇幅短小，感情强烈，多以抒写社会不平与作者的愤激为主旨，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其代表。随着赋体的发展，六朝作家用骈体写抒情赋，出现了《恨赋》、《别赋》之类的抒情佳作。后世代有名篇。

咏物赋 以某种具体事物为对象，铺写描摹，举凡物品的原料、材料、产地、品类、性状、功能、相关典故、轶闻、史地沿革等等，皆可作为题材写的人赋中，从而对事物作多侧面的歌咏介绍。不少咏物赋，贯串着作者对生活的特殊观察与特殊评价，灌注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表明了作者的生活态度。庾信《枯树赋》可为代表。（文　白）

论　说

论 文体名。论者，议也。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论之立名，始于《论语》。至汉，贾谊有《过秦论》，东方朔有《非有先生论》。至唐宋，则用以出题取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文心雕龙·议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将论分为八种，"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论，四曰史论，五曰文论，六曰讽论，七曰寓论，八曰设论"。（张亚萍）

史论 古代文体名。《文选》中列有"史论"一门。原指作史者在"本纪"、"列传"之后评述所记事件和人物的文字，如《史记》中人物传记结尾"太史公曰"的赞语即是。史论实际是作者对所记人物或历史事件含有褒贬性质的结论，反映出作者的历史识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由于作者在发表议论时往往带有情感性，因而多少具备了文学的和美学的特征，如《史记》中《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的结尾。后来凡是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注文，也都称为"史论"。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论》就是一篇富有美感的史论。（吴嘉才）

说 文体名，论说文的一种。《说文解字》："说者，道也，谈说也"。吴讷《文章辨体》："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于《说卦》。汉许慎作《说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至唐韩愈《师说》，则更具抑扬详赡。《文心雕龙》云："凡

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说之本则须"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

原 文体名。徐师曾《文体明辨》："原者，本也。谓推论其本原也。"其义始于《周易》"原始要终"。其名始于韩愈所作"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以"原"名篇，盖推其本原以示于人也。其题或曰原某，或曰某原，本无区别。

议 文体名。《说文解字》："议，语也"。刘勰《文心雕龙·议对》："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徐师曾《文体明辨》："盖古国有大事，必集群臣而廷议之，交口往复，务尽其情，若罢盐铁、击匈奴之类是也。厥后下公卿议，乃始撰词书以简牍以进，而学士偶有所见，又复私议于家，或商今，或订古，由是议浸盛焉"。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乃最早源流。至汉又立驳议。"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意者曰驳议"（蔡邕《独断》）。议之体，"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古今"。"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文心雕龙》）。驳之别体，有对策、射策；议之二体，有奏议、私议。（张亚萍）

辨（辩） 文体名。唐以前用"辨"，许慎《说文解字》："辨，判也。"亦有作"辩"者，《墨子·经上》："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彼"，即命题；"争彼"即论证或反驳过程；"辩胜，当也"，即指结论须符合实际，使与之相矛盾的论题被否定。唐宋以后，多用"辨"，如韩愈有《讳辩》。徐师曾《文体明辨》："其字从言，或从刂（从"刀"，判也），盖执其言行之是非真伪而以大义断这也。"辨之源，首出于孟庄。孟子答公孙丑问好辨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故辨有不得已而辨之意，属于辨析性质的论说文。其写作目的在于阐明作者自己的立场、观点与主张，辨首先在"破"，同时，破中有立。其写法有驳、有论、有断。一般地说与论相辅相承，"辨"在于"破"；"论"在于立。

解 文体名。徐师曾《文体明辨》："解者，释也。因人有疑而解释之也。"吴讷《文章辨体》："解者，亦以讲释解剥为义，其与说亦无大相远焉。"扬雄《解嘲》即属此体。解说有设辞以释意者，如韩愈《进学解》。其题曰解某，或曰某解，唯从作者之意。

论谏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论，议也。"谏，止也，直言规劝也。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论也者，弥纶群言，则研一理者也。"论谏一般用于下对上。《周礼·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故"谏"亦含制止、挽救之间。先秦无谏官，汉立诸臣进谏制度，论谏之文遂兴。

问对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问，讯也。"徐师曾《文体明辨》："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其名既殊，其实复异。"《文选》录宋玉之对问于楚王，为此体首制。名实皆问者，如屈原的《天问》、江淹的《邃古篇》。名问而实对者，如柳宗元的《晋问》。此

体多为一问一答的议论文，亦有设客难而著其意者。前者如张衡的《应问》，后者如东方朔的《答客难》。也有将题标为“对”者，如柳宗元的《天对》。其他又有标为难、谕、应、答者，属同体异名。　（杨恩成）

寓言　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寓言往往采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把原来不易为人所理解、所接受的道理和主张，寄托在具体的、通俗的、形象性的故事中。形式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生物或无生物，主题鲜明，有强烈的劝诫和讽刺作用。我国古代的寓言，起源于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士阶层的兴起，游说之风以及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因此，在言谈和著作中出现了许多精采的寓言故事。《孟子》、《庄子》、诸子百家著作中，均有很多寓言。但先秦寓言仅仅是文章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以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的。唐代柳宗元创造性地继承前人的成就，大量地创作寓言，使之成为独立、完整而又富有美学价值的文学作品，在寓言文学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殷大云）

小品　文体名。随笔、杂感类短文的通称。其名本于佛经。公元四世纪时，鸠摩罗什翻译《般若经》，把详本称作《大品般若》，即“大品”，把略本称作《小品般若》，即“小品”。小品盛行于明清时代，传有《六朝小品》、《唐小品》、《明人小品》。其体不拘一格，短小精悍。　（杨恩成）

史　传

传（史传）　文体名。“传者，传（chuán）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古人有小传、家传、外传、史传、托传、假传之分。我国先秦历史著作《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以及其他诸子著作，不少篇章生动地刻划了人物形象（如《左传》中的《晋公子重耳之亡》，《战国策》中的《冯谖客孟尝君》等）。《论语》、《孟子》等语录体散文中有些篇章也能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些作品虽非人物传记，但已经具备了传记文某些方面的特征，可以说是传记文的准备阶段或雏形阶段。司马迁的《史记》正式出现了以人物为描写中心的史传文，以反映历史事件、描写人物、刻划性格为主。以后历代正史，都基本上沿用这一体例。史书以外的传记文，可以上溯到汉代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等著作，其中多写一些人物故事，虽未必完整，但已是以人物为中心叙写其生平事迹，是属于史传文以外的传记文。唐代的古文运动推动了传记文的发展。韩愈、柳宗元等作家创作了较多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圬者王承福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等作品，把写作对象从过去的文臣武将、高士名流转为下层社会的小人物，侧重介绍其生平某一方面的事迹，加以生动具体的描写和思想内容上的发挥，从而既具思想性，又富艺术感染力。至于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蝜蝂传》，虽以“传”名篇，其实都是意在讽世的寓言。　（吴嘉才）

纪传体 文体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有通古纪传体和断代纪传体之分，前者以《史记》为代表，后者以《汉书》为代表。《北史·魏孝文帝纪》："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霍光，改析国纪，依纪传体"。赵翼《廿二史札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纪传体分门别类地叙述典章制度，详细具体地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踪迹与言行，但对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一般不做综合叙述。

编年体 史书文体名。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的史书体裁。《春秋》为最早的编年体。《隋志》不以编年为正史，称为古史；《明史·艺文志》则将纪传、编年均入正史。编年体以年月为经，纵贯历史，以事件为纬，横接各国，易于看出同时期各事件的联系。然而记事又前后割裂，首尾不能连贯，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典章制度也很难面面俱到。

国别体 把不同国家的史料加以编撰而成的史书体裁。《国语》是第一部国别史，其中分别叙述了东周王室及晋、鲁、楚、齐、郑、吴、越等各诸侯各国的历史。与《左传》相参证，故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以记言为主，后世修史已不采用此体。

（张亚萍）

纪事本末体 史书体例之一，以历史事件为纲，完整地记述事件的起因、发展过程及其结局，与编年体的以年月为纲、纪传体的以人物为纲不同，它可以使读者完整地了解一个历史事件的本末。宋人袁枢有《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的滥觞；其后明人陈邦瞻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人高士奇有《左传纪事本末》等，均为名著。然所记均为大事件，作者排比次第，详叙始终；而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实就被排除在记载之外了。如《左传纪事本末》所记史事，就比《左传》本身要少。因为有些事在《左传》原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记录，无所谓"本末"，《左传纪事本末》则不录。 （文 白）

本纪（纪） 纪传体史书文体之一。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论赞载，先秦已有《禹本纪》一书，但已亡佚。一般认为"本纪"的体例为司马迁所首创。"本纪"按帝王的世序和年代记述重大政治事件。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本纪"记事，有似于《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后来历代史家都仿此体。"本纪"虽为史书体例，但不少篇章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项羽本纪》，作者的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通过各自的语言、行动以及种种艺术手法，刻划出了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史记》有"本纪"，从《汉书》开始，"本纪"体例改题为"纪"，历代正史因之。

列传（传） 纪传体史书文体之一。"列传"是帝五以外的有影响的人物传记。列叙事迹，传于后世，故以

名之。这种体例为司马迁所首创，以后历代史家仿效。“列传”是《史记》全书最有光彩的部分，涉及内容较为广泛。它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事件，并借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态度。凡品行高洁及有功于天下之人，甚或有一技之长，得以传闻后世的，都在入“传”之列。部分“列传”还记载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大事及其风俗土产。“列传”有分传、合传、寄传、类传四种类型。分传记一人之事。编次、时间和事件本末都很清楚，如《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等。合传则把生平事迹相似、相连者合编，如《老子韩非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寄传以一人事迹为主，兼记他人行事，如《鲁仲连邹阳列传》，即以记鲁仲连事迹为主而兼及邹阳之事。类传没有固定的人物名称，但行事相类或属性相同，如《儒林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列传”一般采用记述方法，但也常用描写手段，间或议论抒情，这类作品在史书各类文体中具有最高的文学成就和审美价值。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等篇，至今仍脍炙人口。《史记》中有“列传”的体例，还有专记侯王的“世家”，《汉书》统称为“传”，此后历代正史因之，今称为人物传。(殷大云)

载记 史书体例之一，专记曾立政权名号、称王称帝的割据政权或非正统政权的史实。如唐人撰《晋书》，用载记的名目历叙十六国事即是。它其实是“本纪”的变体。

实录 史书体例之一。唐宋明清时期，每当新帝即位，便让史臣修撰“先帝实录”，成为定制。因是奉命编制，对于当代事往往多所忌讳，“实录不实”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史料毕竟丰富而详尽，多为史家所取材。据统计，历代实录有一百六十多部，今存者以明清两代为多。 (文 白)

自传 文体名。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述生平情况，始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有王充《论衡·自纪篇》；魏晋有曹丕《自叙》，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唐有刘禹锡《子刘子自传》，白居易《醉吟先生传》等。

事略 文体名。概括记叙人物事迹之体。或以人为主，或以事为主。多用于已逝的亲朋。宋王禹偁有《东都事略》，明归有光有《先妣事略》，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杨恩成)

行状 古代记叙死者生平事迹的文体。亦称状、行述，是传记的一种。大多由死者门生、故旧、亲属写作，供撰写墓志铭或史传者作为主要依据。汉代傅干始作《杨元伯行状》，今已亡佚。《文选》著录南朝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行状对死者的世系、名字、里籍、官阶、生平介绍全面，文末写上撰写者姓名和撰写送交的目的或撰写原委。行状比史书中的传记叙写人物详尽，篇幅较长，对人物只褒不贬。好的行状文，具有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如韩愈的《赠太傅董公(晋)行状》、李翱的《韩文公(愈)行状》等。另有仅记写死者的某些逸事轶闻的逸事状，属于行状的变体，如柳宗元的《段太尉(秀实)逸事状》。

(殷大云)

逸事状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逸，失也。"状逸散之事以传于世谓之逸事状。刘知几《史通·杂述》："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逸事状乃"行状"之变体。参见"行状"。

（杨恩成）

志 史书，如《三国志》、《通志》、《地理志》、《地方志》。其名起于《汉书》十志，后人因之，大体记事之作。也有写作"誌"、"录"的。总的看来，作为史书的一种，"志"更强调所记内容的专题性或专业性。

总志 综合若干政区的史地情况、如方域、山川、物产、贡赋、人口、道里、古迹、异闻等等编修而成的史书，称"总志"，如汉代应邵的《十三州记》、唐李泰的《括地志》等。

方志 即地方史志、地方志，源于古代史书中的地理志，定型于宋代，盛行于清代，记述一地的地理、风俗、物产、人物、名胜，风俗、文教等方面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全国现存方志近六千种、九万余卷。清人章学诚提出：方志应遵循"三书八门"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及编年，方舆、建置、民政、秩官、选举、人物、艺文等，使方志的修撰更臻完善化。

稗史 以记载里巷风俗、民间琐事为内容的史书，往往能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如《宋稗类钞》之类。

杂钞（杂抄） 杂抄旁记而成的私家史籍，往往能为正史提供参照，有不少知识性、文学性强的作品。

（文　白）

序　记

记 文体名。古人将以"记"名篇的文章称为"杂记体"。杂记内容复杂，有的记人叙事，有的记物状景。写法上灵活多样，有的主记叙议论，有的尚描写抒情。今人一般将古代的"记"分为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四类。台阁名胜记是指古人在修筑亭台、楼观以及观览某处名胜古迹时写下的文章。内容一般是记叙或修葺的过程、历史沿革，以及抒发作者对历史的或现实的感慨。这类文章记事往往只是缘由，重点在于发挥议论，抒发怀抱，因而常常以写景状物形象生动，情味隽永深厚取胜。著名作品有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山水游记是指模山范水的记游文章。它以描写山川胜景、自然风光，表现自然美为其内容和艺术特征。开山之作是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宋代有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等作品。明代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张岱以及清代的姚鼐等人也有不少山水游记的佳作传世。书画杂物记是指专为记述书画和其他一些器物而题写的文章。一般是记述该书画的内容、物体的形状以及其形制或艺术特点，流传的情况等。有的则借题发挥，抒情述志或阐述自己的艺术见解。此类文章除以"记"名篇外，有时也署"序某"、"某序"或"书某画后"等。如唐代白居易的《荔枝图序》、《韩愈的《画记》，宋代苏轼的《书蒲永升画

后》、《刘敞的《先秦古器记》，明代魏学洢的《核舟记》等是此类记文中的名篇。人事杂记是指专以记人叙事为内容的文章。多以"记"名篇，少数标为"志"。著名作品有唐代刘禹锡的《救沉志》、宋代曾巩的《越州赵公救灾记》、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以及清代方苞的《狱中杂记》、全祖望的《梅花岭记》、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等。

游记 是一种专门记游的文体，属于杂记文一类。它以作者亲见真闻的山川胜景、自然风物为题材，借以表达作者对大自然美好风光的切身感受和对生活的见解。它篇幅短小，体式玲珑，写法灵活，可以状物写景，也可抒情议论。好的山水游记，作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以此去捕捉真切鲜明的具体形象，用生动的描绘、精巧的结构、深邃的意境、清丽的语言来展示，把祖国无数瑰伟奇秀的山川溪壑、湖光水色、林野烟霞的真实情貌呈现出来，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有益的启迪。汉代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虽然并非专记游览山水，但着意于山水景色的刻画，开后世山水游记之先河。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文人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转向游赏山水，游记之作日多。唐宋是我国山水游记的成熟时期。柳宗元是奠基人，他把自己遭受贬谪的幽愤不平之情寓于山水之中，赋予描写对象以生命和个性，富有艺术魅力。其代表作是《永州八记》。宋代游记受尚理的文化思潮影响，借记游而说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以理取胜，别开生面。南宋以后，又产生日记体游记，如陆游《入蜀记》、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写景物、记古迹、作考证、咏史事、抒感慨，具有文学和史料双重价值。明清山水，游记大盛，最有特色的是晚明的记游小品，如袁宏道的《晚游六桥待月记》、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抒性灵，写意境，隽永精致，富有情韵。清代桐城派继承唐宋古文家传统，文笔简炼，雅洁俊逸，不乏名篇，如姚鼐的《登泰山记》。也有的虽以"记"名，但不属游记，如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纯系虚构，更接近寓言或小说。

笔记 文体名。指随笔记录的文章，结集成书，仍称"笔记"。北宋宋祁著有《笔记》，始以笔记为书名。笔记不拘体例，形式灵活，题材广泛，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但也可专门记叙、论述某一个方面。南宋以来，凡杂记见闻者，常以笔记为名，如龚颐正的《芥隐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又有笔谈、笔录、随笔、杂识、杂记等异名，如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杨彦龄的《杨公笔录》、洪迈的《容斋随笔》。有的笔记专门用来铺写故事，记载人物轶事或民间传说，如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称之为笔记小说。此外，古代将散文与辞赋对称时，也称"笔记"。《文心雕龙·才略》云："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云："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所说的"笔记"都相当于"文笔"的"笔"（见"文

笔”条），实际上是指散文。

（殷大云　吴嘉才）

劄记　文体名。又称“札记”。古代文人常将读书心得、见解，以及平日闻见记录成篇，日积月累成册，谓之“劄记”。劄，即札。如清人赵翼有《二十二史劄记》。札记，如清卢文绍《龙城札记》、《钟山札记》。

札记　文体名。又称“劄记”。见“劄记”。（林　岫）

随笔　文体名。随手笔录，不拘一格之文字。洪迈《容斋随笔序》：“予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宋代以后，写杂记、见闻亦用此名。（杨恩成）

杂著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杂，五采相合也”。刘勰《文心雕龙》：“并归体要之词，名人讨论之域”。吴讷《文章辨体》：“杂著者何？辑诸儒先所著之杂文也。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夜古今，或详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然称名虽杂，而其本乎义理，发乎性情，则自有致一之道焉。”（徐师曾《文体明辨》）。（张亚萍）

杂俎　文体名。与杂录、随笔相似。唐段成式所作笔记，命名为《酉阳杂俎》。书中多记鬼怪不经之谈、荒诞无稽之境，以山川怪异、仙佛人间无所不涉，分类记录。后世编纂书刊文集，常将无类可归之文，标目曰杂俎。

语录　古代记录人物论辨语言的一种文体。语出后晋刘昫《旧唐书·经籍志》上《杂史类》：“孔思尚《宋齐语录》十卷”。语录是一种记言的散文。商周时代的诏诰大多是对国王或执政者独白的笔录，既是法令，又是训诫辞。当时重要人物的谏语和政论，因为包含有供后人学习借鉴的政治经验，也被用对话的形式记录下来。这类语录体的散文大多收集在以记言为主的《尚书》里。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学者的语录散文。最早的学术性语录是孔子的言论集《论语》。自唐以来，禅宗佛教徒记录其师言谈，由于所用多口语，故沿称语录。后来道学家门人也用来记录其师论学之语。如宋时程颢、程颐门人把二程有关哲学、政治等言谈编为“语录”，又由朱熹辑成《二程遗书》，朱熹讲学言论则由门人追记并汇集成《朱子语录》。语录体散文虽以记言为主，但有的篇章亦富文学色彩，如《论语·侍坐章》通过对话生动地体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有的则在散文美学方面卓有见地，如《朱子语录·论文》。

序　文体名。指序文，是写在一部书或一篇诗文前边的文字。宋王应麟《辞学指南》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由此可知，序或叙，是在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起、立意、内容、体例、目次等加以叙述、说明的一种文章。序的正式出现大约始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有《太史公自序》，班固的《汉书》有《叙传》，扬雄的《法言》有《法言序》。序在写法

上大体分为主叙事和主议论两种，但两种写法往往交互使用，许多优秀序文还常常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如宋代欧阳修所撰《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以议论为主的名文，而又情理兼长；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是一篇以记叙为主的著名序文，而又情采并藏。此外，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则是一篇记叙而兼抒情的著名序文。隋唐以前的序文一般置于全书之后，与后世置于书前不同。序文还有“引”、“题辞”等异名。序中另有一种文体，用于惜别赠言，内容多推重、赞许或之辞，称为赠序。赠序形成于唐初，韩愈所作最多，也被论为最好。

（吴嘉才）

赠序 文体名。姚鼐《古文辞类纂》：“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见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溯其源起，始于晋代，由诗集序演变而来。潘尼有《赠李二郎诗序》。及至唐宋，独立而为赠别之作，推崇赞美，议事咏怀。赠序之式，先赞行者，抒写别情，次表祝愿，以期再会。 （杨恩成）

题跋 是写在书后、文后的说明文字或议论文字。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跋文之名，始见于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跋尾”附在作者所珍藏的碑文真迹之后，考证和说明每篇碑文的情况。一般说来，跋文与序文体例无多大差别，不过跋文比序文更为简括。跋文主要是说明，但也有记叙性较强的跋文，如宋陆游的《跋李庄简公家书》。此类文学性较强的跋文，实际上是一些优秀的散文小品。唐以后，一般序于书前，跋于文后，合称为“序跋”。 （殷大云）

题辞 文体名。亦称题词。徐师曾《文体明辨》：“题辞，所以题号其书本末，指义文辞之表也”。汉代赵岐《孟子题辞》：“孟子题辞者，所以题号于孟子之书，本末指义，文辞之表也。”是以题辞之性质与序、跋相近，标举全书本旨。置于书后，多为韵语，篇幅亦较短小。文辞简练。 （张亚萍）

诏 令 檄 移

诏 即诏令。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诏，告也”。乃上告下之辞。刘勰《文心雕龙》以为：古者王言，若轩辕、唐虞同称为命。至三代始兼诏誓而称之，如周文王之《诏牧》、《诏太子发》。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诏，于是诏始兴焉。汉初，命定四品，其三曰诏，诏者，诏告百官，又若高祖之《求贤诏》、文帝之《除肉刑诏》，后世因之。诏之体，或用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或用四六，以用语浑全为尚。两汉诏令，有足称者。

敕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敕，诫也。”刘勰《文心雕龙》：“敕，

饬也，使之警饬不敢废慢也”，“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敕体始于春秋。汉时，凡官长之谕僚属，尊长之谕其子弟皆称敕。南北朝以后，敕为朝廷专用文体。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发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可见唐时敕体用途甚广。宋敕，或用之于奖谕，非敕初意。明以后，凡褒嘉责让并用敕。其格或散或骈，也有同时并用的。

制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制，裁也”。周官太祝有六辞，其一曰命，其三曰诰。诰以命播诰四方。秦统一，改命为制。是则制即敕命之文。汉时，有制书，有策书。蔡邕《独断》：“其文曰制，诰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制书者，用载制度之文，与诏无别。至唐，王言之体唯大赏罚，大除授方用。及武则天，因讳避，诏书复皆称制。宋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职，或罢免大臣。吴讷《文章辨体》：“制诰皆王言，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为善矣”。制书格式，有四六俪语，也有专门用语。后者如“敷告在庭”、“诞扬赞册”之类。

令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令，发号也。”徐师曾《文体明辨》：“令，即命也。七国之时并称曰令。秦法，皇后、太子称令。”其文与制诏无大异，特避天子而别其名目。

诰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诰，告也。”乃古代君王训诫、劝勉臣民之文辞。始于商周，《尚书》中载有《汤诰》、《大诰》、《康诰》等，用以喻众。徐师曾《文体明辨》：“诰者，诰也，告上曰告，发下曰诰。”秦时只称制诏，汉武帝元狩六年始复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代帝王之言亦不称诰，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赠大臣、贬谪有罪、赠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宣于廷者，皆用诰。故诰体盛行于宋。诰之行文，或骈，或散，无严格限制。

谕 文体名。有“上谕”和“谕”之发。“上谕”者，专用于王对臣下；“谕”则用于大臣晓告僚属，如诸葛亮有《谕谏》、《谕参佐停更》。

谕告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谕，晓也；告，命也。以上敕下之词。”商周之前，不传此体。至《左传》载有周天子谕告诸侯及列国往来相告之词，此为“谕”名之始。“然皆使人传言，不假书翰”。（徐师曾《文体明辨》）汉时，高祖入关，以约法三章谕告关中父老，从此“谕”“告”合称。

批答 文体名。吴讷《文章辨体》：“批答与诏异，诏则宣达君上之意；批答则采臣下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徐师曾《文体明辨》：“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谓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太宗之答刘洎；玄宗之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俱为明证。至宋体制有变，据《朝野类要》：“执政以上有章奏请则降批答，以下则降诏”。

玺书 文体名。玺，印也，信也，上古尊卑共用。玺书，则是以印封书。《国语·鲁语》：“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玺书”。至秦始皇，天子之印以玉，独称玺、臣下避

其称，从此玺书为天子诏敕之别名。唐之后，玺书独称为书。其为用，或以告谕，或以答报，或以奖劳，或以责让，而其体则以委曲恳到，能以褒劝警饬之意为工”(徐师曾《文体明辨》)。

册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册者，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当时之时，唯用木简，故其字同“策”通用。据《汉书》载，天子所下之书有四，其一曰策书。若三公以罢免，或以命诸侯王公，皆赐策。至唐宋后不用竹简，以金玉为册，故专谓之册也。《新唐书·百官志》：“王言有七，一曰册书，立皇后皇太子，封诸王则用之”。后世之册，“则祭祀、祭享、称尊加谥寓哀之属皆用之”(《正字通》)。册之格式，首句常书年月日，皇帝曰，正文则为四字句式。徐师曾《文体明辨》将册分为祝册、玉册、立册、封册、哀册、赠册、谥册、赠谥册、祭册、赐册、免册等。 (杨恩成 张亚萍)

檄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以号召；若有急则插鸡羽而遣之，故谓之羽檄，言如飞之急也”。檄为告急之文，多用于声讨和征伐，后世也用于晓喻部属臣民。刘勰《文心雕龙》：“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直到战国，檄名始称。《史记·陈余传》：“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檄之措辞表义，务在刚健。李充《翰林论》：“檄不切厉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文心雕龙》)。檄文写作的特点往往是矜夸己方，指责对方，铺陈夸饰，张扬其辞，具有雄壮刚健、气势奔放的风格。魏晋时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以及唐代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都是脍炙人口的檄文名篇。后人评赞后者“雄文劲采，足以壮军声而作义勇”，可见此文具有极大的鼓动性。檄文在唐以前多用散体，唐以后多用骈文。

移文 文体名。刘勰解释说：“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文心雕龙·檄移》)可知移文的主要作用是移风易俗，发布命令让老百姓执行。关于檄文和移文的联系和区别，刘勰说：“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可知移文通用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在军事上对敌方用“檄”，对顺从的人则用“移”。在不相统属的政治军事单位之间用移。檄文和移文的体制上大致相同而稍有区别，都是官方的一种文告。好的檄移文，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孔稚圭《北山移文》是其变体。(殷大云)

教 一种公文样式，王侯官吏的下行文字，《文心雕龙》说：“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这类文体，篇幅不大，文字简炼，语气果断。诸葛亮有《与群下教》。 (文 白)

露布 文体名。刘勰《文心雕龙》：“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视听。”封演《封氏见闻记》：“露布，捷书之别

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露版。"《新唐书·礼乐志》："贼平而宣露布。"其体始于魏晋，《世说新语》："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马撰露布。"此"露布"则有"檄文"性质。元魏时专为捷报之称。《通典》："元魏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漆竿上，名为露布。""露布贵奋发雄壮，少粗无害。"至唐宋，命辞遣句，全用四六，与当时表文无异。如唐骆宾王有《兵部奏姚州道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

弹文 文体名。弹，弹劾。按《汉书》注："群目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台，卿校送谒者台"。由是按劾之名，为弹文之源。至萧统《文选》另立其目，又曰弹事。弹事者，弹劾官吏之奏疏，载有沈约、任昉弹事文。刘勰《文心雕龙·奏启》："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唐文粹》《宋文鉴》又将其载入奏疏之中。然"奏以明允诚笃为本。若弹文，则必理有典宪，辞有风，轨使气流墨中，声动简外，斯称绝席之雄也"(吴讷《文章辨体》)。弹文有其固定格式。古人有取弹文格式而撰讥评文字者，如《修竹弹甘蔗文》。

(杨恩成)

爰书 秦汉时期的一种法律文书。《睡虎地秦墓竹简》记有不少《爰书》，或为囚徒供辞的记录，或为人犯自首的狱词，或为法吏现场检验的笔录，均具有法律效力。

供状 诉讼双方所述事件始末的供词。有法律效力。

牒诉(诉牒) 诉状，原告人向官府呈递的陈述事故始末、请求审理的文书。

判辞 或作判词、判牍，是判记司法案件的文章，有实判、甲乙判、花判等。实判是对真实案件的判决书，如唐人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甲乙判是假设案例的判决书，用来考核作者对法律条文适用条件的熟悉程度与准确程度的。唐代王维、白居易均有《甲乙判》；花判是文艺作品中以判决书形式出现的文艺作品，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判词便是。古代判词多用骈体。 (文 白)

章表书启

表 公文类文体名，即"奏表"，又称"表文"，是臣属给君王的上书。这种文体，始于秦汉，唐宋以后历代沿用，但西汉以前的表文皆已散佚不存。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云："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这就是说，"表"的作用是常常用来述志陈情，诉说心曲。表文具有一定的程式，由于具有陈情的特点，又与一般上书不同。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均写得情辞恳切，所以久诵不衰。 (殷大云)

章 文体名。刘勰《文心雕龙》："章者，明也。""古人言事皆称上书。汉定礼仪，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谢恩。及考后汉，论谏庆贺，间亦称章。"(徐师曾《文体明辨》)唐以后，章体渐亡。章之格式，"需头称稽首上

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蔡邕《独断》）

奏疏 奏议的一种。许慎《说文解字》：“奏，进也。”故称进奏于君之文为奏疏。徐师曾《文体明辨》：“奏疏者，群臣论谏之总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刘勰《文心雕龙·奏启》：“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秦立奏制，李斯奏骊山。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如贾谊有《论积贮疏》。“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物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刘勰《文心雕龙·奏启》）其体有章、奏、表、议、封事、弹事等名。

制策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策者，谋也。凡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徐师曾《文体明辨》：“制策，天子称制以问对者是也”。汉武帝元光元年诏贤良，各“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至宋苏轼又以输忠陈义、婉切恳到答对仁宗。由是，凡策之体“练治为上，工文次之”（《文体明辨》）。刘勰《文心雕龙》：制策可分射策与对策。“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以甲科入仕。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以第一登庸。皆选贤之要术也”。

封事 文体名。刘勰《文心雕龙·奏启》：“自汉置八仪，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蔡邕《独断》：“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奏章以皂囊封缄呈进，为防泄密。《汉书·宣帝纪》：“而今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所云封事者，实则奏章。

贴黄 文体名。《说文新附》：“贴，以物为质也。”顾炎武《日知录·艺文·贴黄》：“命内阁为贴黄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牍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宋代，因奏状意有未尽，摘要引于书后，亦谓贴黄。明清两代，贴黄则指摘取奏疏之要点，粘附于奏疏之后。（杨恩成）

青词 文体名。又称“绿章”。道教斋醮仪式上，由道士写给“天神”的表章。因是用朱笔书于青藤纸，故名。唐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后发展为一种文体。宋人集中常见。明代道教炽盛，文臣等士多以青词邀宠，如明世宗时，词臣顾鼎臣、袁炜、严嵩等均以善作青词而得宠，时有“青词宰相”之诮。青词，一般为骈体，内容多空泛。

绿章 文体名。又称“青词”。见“青词”。唐以来诗人写道教事多以“绿章”、“青词”入诗，如宋陆游“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荫护海棠”等。（林 岫）

谥议 文体名。吴讷《文章辨体》：“谥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谥议，则劝人为善而戒人为晋也。《札记》云：“先生谥以尊名，节以喜惠。”晋有秦秀议何曾、贾充；唐有独孤及议苗俊卿；宋有邓忠臣议欧

阳永叔。其体为四，一曰谥议，二曰必议，三曰驳议，四曰重议（答驳议）”。（张亚萍）

书 文体名。古代泛指书信，也有人把臣下向皇帝奏言进辞而写的文章称“上书”或“奏书”等属“奏议”一类。刘勰《文心雕龙》云：“书者，舒也。舒布其言。”“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战国之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称表奏。亲朋之间的私人信件亦称书。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等属于书牍类。书牍类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不少有政治、学术价值的散文也采用书牍形式，如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韩愈的《答李翊书》、柳宗元的《与友人论文书》等。其内容极为灵活，可论政、讲道、评述人物；写法上有叙事、说理、言情。其格式一般为起首有称谓、敬辞，然后为正方文结尾有敬辞、写信人姓名及日期等。（杨恩成）

书简 文体名。即书信。书是古代书信的总名，或称书简、书牍、书札，又称简、启、笺、牍、札、尺牍、尺素、尺翰、函等。我国最早的书简产生于春秋时期，《左传》载有《郑子产与赵宣子书》等。（吴嘉才）

尺牍 文体名。书信的异名。尺，谓书函书简之长；牍，指书写所用木简。汉代简策制度规定：诏书律令之简长三尺；抄写经书之简长二尺四寸；民间书信之简长一尺，故称之为尺牍。《史记·仓公传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书牍 文体名。书信、简牍之通称。《史记·匈奴传》：“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书牍产生于春秋时期，汉代弃公文之用而专为个人所用。如司马迁《报任安书》。魏晋南北朝，嵇康、陈琳以书信擅名。唐宋时书牍多政治、学术价值，如韩愈《答李翊书》、白居易《与元九书》。明清时代，复为应酬之作。其格式为：开头有称谓及敬辞，正文为书信宗旨，结尾敬辞。

笺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笺，表识书也。”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故笺乃介于表、书之间。为臣下向皇帝及诸王表达谢意或贺忱之信件。如刘禹锡《贺太子笺》。有骈、散两体。

启 文体名。介于表、书之间。刘勰《文心雕龙·奏启》：“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启乃奏之异条，自晋始盛，兼以表奏。其形式多为骈体，“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刘勰《文心雕龙·奏启》）（杨恩成）

行卷 唐代举子应试前先把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显贵或主考官，希望得到赏识、援引，称为“行卷”。宋程大昌《演繁露·唐人行卷》：“唐人举进士，必有行卷，为缄轴，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至明代，书坊刻举人中试之作，以供学子揣摩仿作，亦称“行卷”。

札子 文体名。即劄子。尺牍无

封，指事而陈者，劄子也。初为奏事之文，唐人因其非表非状而称牓子。至宋始称劄子，凡百官上殿奏事或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劄子。如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劄子》、陆游《上二府论事劄子》。后世劄子渐为上司行下之公文，《却扫编》："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劄子，犹堂帖也。"如欧阳修《归田录·二》。（张亚萍）

颂箴碑铭

颂　文体名。刘勰《文心雕龙》："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容告神明谓之颂。"颂之名，郑玄、孔颖达认为源于《诗经》中"风、雅、颂"之"颂"，为歌颂功业、褒扬盛德之文章。故其体必典雅，其义必纯美。铺张扬厉，以繁缛为贵。"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刘勰《文心雕龙》）如班固《北征颂》，陆机《功臣颂》。颂文一般为字句整齐的四字句，三句一韵。后世亦有用散体者。哀颂则为颂之别体。西晋刘伶的《酒德颂》则为颂之变体。

赞　文体名。赞，称美也，字本作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刘勰《文心雕龙·颂赞》："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汉司马相如首赞荆轲，是为后世之宗。至唐用以取士，则其体尤为时尚。赞为褒美专用。是以赞体"贵乎赡丽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顿挫起伏之态"（吴讷《文章辨体》）。"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按徐师曾《文体明辨》，赞体有三，一曰杂赞，意专褒美；一曰哀赞，哀人之没而述德以赞；三曰史赞，词兼褒贬。

盟书　文体名。亦称"载书"，记载盟誓之书。《礼记》："莅牲曰盟。"刘勰《文心雕龙·祝盟》："盟者，明也。骍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盟，亦称誓，为约信之词，盛于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刘勰《文心雕龙·祝盟》）（杨恩成）

箴　古代文体之一类。箴是以规戒为主题的韵文。臣下对君王或其他上层官员所作的谏劝文，称为官箴；自警自戒或劝世的箴文，称为私箴。箴戒文章平易畅通，朴实无华。唐韩愈有《五箴》。（殷大云）

戒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戒，警也"。戒者，警勅之辞。萧统《文选·序》："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淮南子》载有《尧戒》，班昭传有《女戒》七篇。有韩愈《守戒》，柳宗元《乱戒》。其词或用散体，或用韵语。

规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规，规矩、有法度也。"徐师曾《文体明辨》："规者，臣下之互相规谏者也。"规之名，见于《书经》："官师相规。"规之成为文体，始于唐代。元吉

首作《五规》，缘书之名，独创此体。其特征与“箴”相同，有用以自箴者，实箴之滥觞。

铭 文体名。以用劝勉或褒赞的韵文，镌刻在碑版或器物上。一种是给名山大川立的石勒铭，重在歌功颂德，如西晋张载有《剑阁铭》，一种是给器物作铭，借物寓意，表示劝勉儆戒，如北宋苏轼有《莲花漏铭》。还有一种座右铭，作者置于身旁，随时自儆，如汉崔瑗有《座右铭》。后二种作用与箴相近，故后世铭与箴连称。铭文文句简约，押韵，用语温和圆润。

座右铭 文体名。自规之文。《文选·座右铭注》：“（崔）瑗兄璋为人所杀，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为西汉严遵首创。白居易有《续座右铭序》：“崔子玉（瑗字）《座右铭》，余窃慕之，虽未能尽行，常书屋壁。然其间似有未尽者，因续为座右铭。”多为韵语。 （杨恩成）

墓志铭 古代文体之一。又称墓志、圹志、圹铭。内容与墓碑文相同，都是记述死者姓氏及生平事迹的。刻石立于地上者称墓碑文，埋于地下者称墓志铭。通常前有序（或志），后有铭。序为散文，似传记，记载死者的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月日以及子孙大略等。铭用韵文，一般为四字句，表达对死者的赞颂、悼念之情。也有只用序或铭的变体。南北朝时期的墓志铭都用骈文，也有用典精当、辞采华茂、富有情韵的佳作，如庾信《吴明彻墓志铭》。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所作墓志铭风格简古，刻划人物各具个性。他的《柳子厚墓志铭》，记叙中夹有议论，寄慨深沉，行文顿挫激宕，更是别创一格。

（吴嘉才）

埋铭 墓志之异名。徐师曾《文体明辨》：“书于木版者，曰坟版文，曰埋铭。”

碑 文体名。亦称碑文、碑志、碑铭。许慎《说文解字》：“碑，竖石也。”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碑者，埤也。上古皇帝，始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秦代称刻石，如李斯峄山之刻。汉以后始称碑。其才锋卓立者，首推蔡邕。徐师曾《文体明辨》：“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此碑之体也。”碑须“披文以相生”（陆机《文赋》），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刘勰《文心雕龙》）碑文种类繁多，“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徐师曾《文体明辨》）按用途和内容来分，主要有三种。一类为宫室寺观碑文，记载该建筑兴建的缘由、过程、规模、主其事者等情况。其中的寺观碑文，还要叙述所供奉的神佛或圣贤的“法力”、“灵验”事迹或德业，如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一类为功德碑文，记述古代帝王封禅或歌颂自己功德，或者记述某人功绩、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如班固的

《封燕然山铭》、韩愈的《平淮西碑》。第三类为墓碑文，又称墓铭、墓表、神道碑、阡表等。内容为记载死者生前事迹，兼诉悼念、称颂之情。古代的碑文往往保存许多珍贵的史料，不少出自名家之手，质朴凝重，条理清晰，用语典雅。

神道碑 文体名。神，死者，墓道；神道即墓前甬道。神道之名始于东汉。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后汉杨震碑，首题云：'故太尉杨震公神道碑铭'。"即为此义。神道碑乃墓表文之一种，其刻文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碑。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崔说神道碑》流传较广。

墓表 文体名。表者，取"表而出之"之意。吴讷《文章辨体》："其文体与碑碣同，有官无官者皆可用。若非碑碣之有等级限制也。"墓表始于东汉安帝元初元年立《谒者景君墓表》。因其名树于神道（墓道），故又曰神道表，或神道碑。"墓表与神道碑异名同物，故墓表也多铭文"（《碑版广例》卷九）。墓表分阡表、殡表、灵表；如欧阳修有《泷冈阡表》。

墓碣文 文体名。吴讷《文章辨体》："古者碑之与碣，本相通用，后世乃以官阶之故，而别其名，其实无大异也。"《文体通论》："石方曰碑，圆曰碣。"碣之作，自晋始。如潘尼有《潘黄门碣》。至唐，以其方趺圆首，五品以下官阶使用。

墓碑文 文体名。《事祖广记》："古者葬有丰碑以窆，秦汉以来，死有功业，则刻于上，稍改用石。晋宋间，始称神道碑，盖地理家以东南为神道，碑立地而名之耳。"秦以前为木制，作悬棺入土用。至汉，改为石制，在碑上刻字，以垂永远。所谓"葬者既为志以藏诸幽，又为碑碣表以揭于外，皆孝子慈孙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徐师曾《文体明辨》）至唐，仅供五品以上官阶使用。韩愈之文，推为最高。

祭文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祭，祭祀也。"徐师曾《文体明辨》："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最早的祭文，当首推东汉杜笃《祭延钟文》。及至唐宋两代，韩柳欧苏，或祈祷雨赐，或干求福降，或祭奠亲旧，真情实意，溢于言表。所谓"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辞华而靡实，情郁而不宣，皆非工于此者也。"（《文心雕龙》）祭文有散文，有韵语，且又四言、六言、骚体、俪体，各有不同。其格式有序在前，即"维某年某月某日，某人仅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某某之灵"，以下转入正文；结尾亦有常格，即"呜呼哀哉，尚飨！"

吊文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吊，问终也。"刘勰《文心雕龙·哀吊》："吊者，至也。""吊之所设也，或骄贵而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贾谊《吊屈原赋》乃吊文之首作。其文以追思死者事迹、抒发伤悼之情为主。后来也用以吊今人、吊物、吊古迹。如唐白居易的《吊二良文》、韩愈的《吊武侍御所画佛文》、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祭吊古人、古迹之作，其特点是抚今思昔、借古人古

事以咏怀，或讽喻现实，或感慨身世。如在《吊屈原赋》中，贾谊以屈原自比，抒发自己遭受排挤、壮志难酬的激愤。吊文在形式上近似于楚辞，但辞藻不过分华丽，比较注重抒发悲怆之情。（殷大云）

哀辞 文体名。刘勰《文心雕龙·哀吊》："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挚虞《文章流别论》："哀辞者，诔之流也"，"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唐时，诔辞亦称哀辞，本无异处。及宋，诔辞多叙世业，以四言为句；哀辞则寄寓怀悼之情，长短句与楚体皆为使用。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文心雕龙》）。班固有《梁氏哀辞》，韩愈有《欧阳生哀辞》。也用于非夭折者，如清方苞《张彝叹哀辞》，死者已年逾六十。

诔辞 文体名。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睹；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诔之有忌，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体先述世系行业，而末寓哀伤之意。"（徐师曾《文体明辨》）是以诔须"缠绵而凄怆"（陆机《文赋》）。诔有官诔、私诔之分。前者如《左传·哀公十六年》载鲁哀公《孔子诔》，后者如颜延之《陶征士诔》。

挽辞 文体名。哀悼死者的词章。有诗、文、歌、词等形式。多用韵文。因古称哀丧之歌为挽歌，故名。田横死，门客作《薤露》、《蒿里》以悼之，乃挽辞之首作。汉乐府中，《薤露》为王公贵人用，《蒿里》为士庶用。挽辞以律诗居多，或七言，或五言。

祝文 文体名。许慎《说文解字》："祝，祭主赞词者。"刘勰《文心雕龙·祝盟》："祝史陈信，资乎文辞。""考其大旨有六，一曰告，二曰修，三曰祈，四曰报，五曰辟，六曰谒，用以飨天地、山川、社稷、宗庙五祀群神，而总谓之祝文。"（徐师曾《文体明辨》）通常将祭神灵以祈福佑的文字称为祝文，又兼善恶，又有祈、告、祠、诅等别名。其辞有散文，有韵语。

（张亚萍）

祷文 也称祷书，祈神赐福的文辞之一种，传说商汤有《桑林祷》，周公有《祷书》。文献记载有汉代匡衡的《祷庙文》、《刘宋武帝的《祷嗜文》。

（文 白）

流 派 并 称

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处于大变革时代，新兴地主阶级逐渐

代替了奴隶主贵族阶级，产生了新型的阶层“士”。这些人从各自代表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各种不同看法和主张，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

三墨 墨子以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亦称别墨。

（杨恩成）

三玄 魏晋时期，清谈盛行，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形成“玄学”。南朝刘宋时期正式将《老子》《庄子》与《易经》（《周易》）列为玄学经典。《颜氏家训·勉学》篇说：“老庄周易，总谓三玄”。

九流 名称始于东汉班固。班固将先秦诸子划分为九大流派，称之为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阴阳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纵横家者流、农家者流、杂家者流，另有小说家者流，但他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艺术志》）因而世有“九流”之说。

（文 白）

六子 指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扬子、文中子。其著作合称“六子全书”。

二十二子 老子、庄子、列子、墨子、管子、晏子、鬼谷子、吴子、孙武子、荀子、韩非子、吕子、孔丛子、淮南子、扬子、白虎通、风俗通、抱朴子、文中子、东莱子、邵子、横渠子。

（杨恩成）

王扬枚马 汉代四位辞赋家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的合称。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叩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王褒《洞箫赋》，扬雄《甘泉赋》，枚乘《兔园赋》，司马相如《上林赋》为各自的代表作。

班马 又称“马班”，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和司马迁的合称。《晋书·陈寿传论》：“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两京，骋直词于东观。”班固著有《汉书》，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司马迁著有《史记》是最早的通史。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评：“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

（张亚萍）

三曹七子 曹操、曹丕、曹植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汉末魏初作家的共称。汉末魏初，“世积乱离”，他们亲历战乱，慷慨多志，“并志深而笔长”，所作诗文，富有时代特色，所以有此共称。其中，曹操为一代文坛领袖，其散文清峻通脱，鲁迅称之为“改造文学的祖师”。徐干有《中论》一书传世，孔融文章体气高妙，很受人重视。

（文 白）

竹林七贤 指魏晋时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七人。他们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因不满于现实，便肆意畅饮酣歌，寄情竹林山水。《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

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以文学论，阮籍、嵇康最著名。阮籍长于五言诗，文思极其高远，嵇康长于散文，亦善诗，笔力极其峻切。

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旧唐书·杨炯传》又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因此，四杰齐名当兼指诗文。

十八学士 唐高祖武德四年，太宗在儒宫城西修筑文学馆，定名为弘文馆。馆内收聘贤才，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十八人。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古今，号称十八学士。其中，以文学闻名的是虞世南、褚亮、许敬宗、蔡允恭、姚思廉、薛元敬、苏勖、薛收八人；以经学闻名的是陆德明、颜相时、孔颖达、盖文达四人。至于其余诸人，或显赫于政治，或有功于军旅，均驰名当世。

文章四友 指唐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唐书·杜审言传》：“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

燕许大手笔 燕即燕国公张说，许即许国公苏颋。唐玄宗时，二人皆为文章之能手。《唐书·苏颋传》：“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

韩柳 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合称。他们都因反对骈文，重视散体文章，积极倡导古文运动而驰名当世。北宋穆修《唐柳先生文集后叙》：“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染”。韩愈对各种文体皆擅长，柳宗元的寓言、山水游记别具一格。后人评他们的文章是：“韩如海，柳如泉”，即指韩文浑浩流转，柳文雄深雅健。 （杨恩成 张亚萍）

晚唐小品 唐代末年，罗隐、陆龟蒙、皮日休等人，用小品文抨击社会黑暗，有很强的战斗力。鲁迅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称这些小品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辉和锋芒”。罗隐《谗书》、皮日休《皮子文薮》与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中，有很好的晚唐小品文，如《英雄之言》等，历来脍炙人口。（文 白）

二徐 宋代的徐铉、徐锴兄弟，二人曾为《说文解字》作注，都以文名，世称二徐。又称铉为大徐，锴为小徐。

二宋 宋代的宋庠、宋祁兄弟，二人都以文名。《宋史·宋庠传》：“庠与弟祁，同举进士，礼部奏郊（即宋庠）第一，而置祁第十，呼曰二宋。”

嘉佑四友 指北宋散文家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他们主要活动在嘉佑年间。宋徐度《却扫编》：“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佑四友。”四人均以古文名于当时。其中王安石与司马

光文学成就最高。（杨恩成）

韩海苏潮 初见于南宋李涂《文章精义》："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韩愈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他的卫道的热情以及"不平则鸣"的创作思想，都在散文创作中得到充分表露，其文雄奇刚劲，波推浪涌，确有大海的气势。苏轼心胸豁达，儒道释对他的思想都有影响，其文雄健奔放，挥洒自如，恰如他自己所言："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李涂借"海"与"潮"为喻，分别概括了韩、苏两家散文富于阳刚之美的风格特点，以及给读者的特殊的审美感受。（胡 健）

欧苏 北宋诗文革新自欧阳修开始，至苏轼方告成功，二人在诗、词、文方面皆长，尤以文名，后世遂将他们合称"欧苏"。明代张斯桂《唐宋八家文序》："夫唐之韩柳，宋之欧苏诸家，皆超前轶后，为千古来文家之巨擘。"二人文章各具风采，"欧阳公之文，粹如金玉，苏公之文，浩如江河"（杨慎《丹铅总录》）。

三苏 即宋代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他们皆工散文，雄健流畅是共同风格。苏洵以议论擅长，苏辙以记叙取胜，苏轼在诗、词、文方面俱以明白畅达著称。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苏门六君子 北宋苏轼门下的六位文学家。即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陈师道和李廌的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苏门六君子者，盖陈、李虽与苏轼交甚晚，而师道则以苏荐起官，廌亦以文章见知于轼，故以类附也。"六人中，学术见解、文学成就、艺术风格俱不一致。黄等五人以诗词见长，文章也佳善，李则以文见长。（张亚萍）

唐宋八大家 唐代散文家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散文家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的并称。他们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或代表作家。文学成就都比较高，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明初朱右编《八先生文集》，"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唐宋部分也仅选这八家。稍后的茅坤，根据朱右和唐顺之的选本，又编了这八家的文选，定名为《唐宋八大家文抄》，此书广泛流传，从此，"唐宋八大家"的名称也就随之而流行。（樊德三）

唐宋十大家 清代储欣辑有《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书中除了"唐宋八大家"外，又增加韩愈的弟子李翱和三传弟子孙樵二人，故有"唐宋十大家"之称。

道学家 指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他们以儒家的道统为主，兼容佛道思想某些内容，形成独立的哲学体系。道学家以阐道说理为根本，认为"作文害道"，主张"重道轻文"。《朱子语类》："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后世传有《朱熹语录》和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等，均为道学家的著

述。

二程 北宋道学家程颢、程颐的并称。他们同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俱以文名。程颐著有《易传》等书。《宋史·张载传》："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功利派 南宋前期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陈亮、陈傅良、叶适。他们的散文以政治上的活动为目的。务求切合世用，不屑于句斟字酌，呈现出奔放雄赡的特点。功利派的散文言恢复、言世务、言经济，其文才辨纵横，有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杰豪的雄姿。

杨赵 金代杨云翼、赵秉文的并称。他们是继党怀英之后活跃于贞佑、正大文坛上。二人均长于古文，时人比之宋欧阳修。

儒林四杰 指元朝的古文宗黄溍、柳贯、虞集、揭奚斯。他们以古文驰名元代文坛，并对明初的古文产生直接影响。

台阁体 明代永乐、弘治前后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因他们都是"台阁重臣"故有"台阁体"之称。台阁体作品，内容歌颂功德，粉饰太平，形式精工典丽，平庸乏味，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后来，由于前后七子的反对渐渐退出文坛。

弘正十才子 指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十位文学家。其文学主张与创作倾向与"前子子"基本一致。

明四大家 指明代前、后七子中的主要作家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的并称。《明史·文苑·李梦阳传》："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前七子 指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和八股文"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风气，当时影响很大。但他们又"刻意范古，铸形宿模"，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文章内容狭窄，思想贫乏，模拟剽窃者多，创意标新者少，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

后七子 指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他们遵从"前七子"的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史称"后七子"。与"前七子"比较，"后七子"要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反对王慎中、唐顺之提倡的平淡放达的文风，把明代复古思潮推向了顶端。

（杨恩成　张亚萍）

唐宋派 明代中叶散文流派之一。因极力推崇唐宋散文、并以其作为学习的典范而得名。唐宋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为代表。唐宋派成员文学见解相近，主张明确，理论建树主要在散文方面。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拟古主张及其文风，提倡学习唐宋时代散文大家的文章法度，但必须有自己面目，强调

“直抒胸臆”所作“皆自胸中流出”，以见“本色”。这些文学主张在当时反对复古具有积极意义。唐宋派的散文一般文从字顺，不象前后七子那样佶屈聱牙。其中成就较大的是归有光。

（樊德三）

前五子 明代后七子中的李攀龙、徐中行、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均以诗、文名于当时，和“后五子”相比较，故有此称。

后五子 明代后七子的支派。以胡应麟、屠隆、王世懋、李维桢为代表，也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又反对“拘而不化”。屠隆就曾批评道：“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篇一律。”后五子对于诗歌创作的艺术特点与规律较前都有发展。又有将明代的余曰德、张九一、张佳胤、魏裳、汪道昆也称为“后五子”，他们也以诗、文闻名。

续五子 指明代后期的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赵用贤。他们均以诗文著称当世。

末五子 指明代后期的李维桢、屠隆、胡应麟、赵用贤等。

广五子 指明代后期的卢柟、欧大任、俞允文、李先芳、吴维岳。

嘉靖八才子 明代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陈束、任瀚、李开先、吕高等八人的并称。他们的古文创作，继唐宋以来韩、欧、曾、苏诸家，在文坛上形成与前七子相抗衡的局面。

嘉定四先生 指明代后期的程嘉燧、李流芳、娄坚、唐时升。因他们都是嘉定人，又以诗文著称，故人称嘉定四先生。 （杨恩成）

公安派 明代万历年兴起的散文流派，因公安（今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而得名。《明史·袁宏道传》：“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众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公安派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从体制上讲，不同时代不同作品有不同的“音节”、“体致”和写作方法；从风格上讲，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的时代风格。不论是体制或风格，陈陈相因则弊生。变则通，通则久，久而又穷则又变。另外，他们又认为写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他们看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在创作实践中，公安派以散文为主，反对艰深古奥、佶屈聱牙的文风，提倡意达辞畅、清新明快之文风。

三袁 明万历年间，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合称。《明史·袁宏道传》：“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在散文创作中形成公安派。宗道文章质朴自然，开创“公安”先河，宏道文章清新轻俊，提出“公安派”的系统理论主张。

竟陵派 和“公安派”同时，是反对拟古主义的文学流派。因竟陵人钟

惺、谭元春为代表而得名。《明史・袁宏道传》："自宏道矫王（世贞）李（攀龙）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他们主张文章要独抒性灵，却又"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在创作上，乞灵于古人。另外，为纠正"公安派"浮浅之弊，追求"幽情单绪"、"孤行静寂"的意境，结果使文章流于艰涩，隐晦金陵山中。竟陵派反对形式主义，但把诗文创作引向狭窄，其形式主义更加明显。

娄东二张 指明朝末年的张溥、张采。崇祯末，他们在家乡集诸名士，成立复社。

几社 明末文学团体。由夏允彝、陈子龙等创立于江苏松江。《明史・陈子龙传》："是时，东林讲习盛，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徐孚远、王光承等亦结几社相应和。"他们以前后七子为宗，取名"几社"，是因为"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其神也。"康熙初年初解散。

复社 明末文学团体。以张溥、张采为首，崇祯六年成立于江苏苏州。《明史・张溥传》："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曰复社。"文学主张复古，推崇七子，后因民族矛盾使作家改变作风，主张改良，"务为有用"。陈子龙为诗歌代表，张溥为散文代表。顺治九年（1652）复社被迫解散。 （张亚萍）

章罗陈艾 指明末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等四位八股文作家。他们的八股文多为有寄托的愤世嫉俗之作，富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学色彩。《明史・文苑・艾南英传》云：艾南英深嫉"场屋文腐烂，""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四人中，陈际泰文思敏捷，所作多至万首，为有明一代之首。艾南英的八股文则坚粹质朴，为三人所不及，其《危行言孙》，浑朴醇古，风行一时，为八股文中的高品。

归奇顾怪 指明末清初文学家归庄、顾炎武。《同治苏州府志》：归庄"生平最善顾炎武，以博雅独行相推许，而俱不谐于俗。里中有'归奇顾怪'之目。"二人诗文多写抗清斗争，抒发故国之思，气势雄浑，笔力酣畅，不事雕琢。但有粗率、隐晦之嫌。

清初三遗老 指由明入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不满于七子的复古和摹拟的文学主张，注重诗文的社会作用和创造性。其中黄宗羲的诗文直抒故国之悲，顾炎武的诗文多感时伤世，沉雄悲壮而又淳朴自然，影响较大。

吴中七子 清代的王昶、王鸣盛、钱大昕、曹仁虎、黄文莲、赵文哲、吴泰来，他们均以文名当世，时称"吴中七子"。 （杨恩成）

易堂九子 清初以魏禧为代表的九个文学家之称。魏禧之父北风在明亡后为了避世削发隐居于翠微峰，曾将其居室名为"易堂"。魏禧常与其

兄际瑞、其弟礼，邀当时文士如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于易堂雅集论文。因九人文章皆名重当世，故时称“易堂九子”。道光年间，彭玉雯编有《易堂九子文钞》。（林 岫）

清初三家 清初的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均以古文驰名当世。

宁都三魏 清初散文家魏际瑞、魏禧、魏礼为三兄弟，家在江西宁都，所以人称“宁都三魏”。他们三人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其中魏禧最负文名。为了纠正明代文风，他们批评了“株守古人之法”的“好古”倾向，树立了“不变”与“善变”灵活运用的“法”的观念。他们强调创作主体思想、观点的独到以及创作兴会的形成，做到中有所得，“慨然发吾志之所欲发”（《伯子文集》一），以“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魏禧《宗子发文集序》）作为好古而中无所有的药石。他们还主张作家“更历世情”，在古文中反映现实，暴露现实，眼光比桐城派阔大，在当时文论中最值得注意。（王文龙）

经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成为历代学者研究的对象。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教授子弟学习《诗》、《书》、《易》、《礼》、《春秋》。讲授经书的人称经师，由此类入形成的研究经书的学术流派称作经学。经学主要为经书作训诂，或阐发经书中的义理、典制。早期的公羊派主张阐发微言大义。宋儒释经则注重义理，故又称理学，或道学、宋学。其中又分程朱与陆王两派。清代经学自乾、嘉以后大都以汉人的经学主张为宗，兼承宋学，其研究成就超过汉、宋。经学有两大流派，即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 西汉时，五经博士所授经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称今文，或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从孔子故居的墙壁中获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书，均用汉以前的文字书写，称为古文。后来，河间献王刘德把他搜集到的古文经传献给朝廷。从此，经书便有了今文、古文之分。今古文经书不但书写的字体不同，字句、篇章、解释以及对古代制度，人物的评论等也有出入主。西汉经师多不用古文经书。王莽时把古文列入学官，汉光武帝刘秀时又罢废。至东汉末，马融、服虔、郑玄都尊崇古文经书，学习文经书者渐多。晋王肃解《毛诗》、王弼注《易》、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完全脱离今文经书的影响，独树古文经学一帜，今文便逐渐衰落。现存的《十三经注疏》，多采用古文经学派的说法，只有《公羊传》的何休“注”属于今文学派。（杨恩成）

朴学（汉学） 清代人治学以经学为主，他们不主浮夸，专贵质朴。因其所标举的旗帜是表彰汉唐人的经学，故叫做“汉学”。又因其讲究考证、校勘、解释，所以又叫做“朴学”，朴学盛行于清朝初年至光绪末年的二百六十余年间，主要包括古文学和今文

学两大系统。清代初年的主要经学家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发展到乾隆至道光年间，经学达到全盛时期。此时，古文经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谨守家法，笃信汉儒，偏于泥古；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长于创新。两派虽有所分歧，实质上都是经学的正统。清代末年，另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承上启下，创立了今文学派，但其势力影响远远不如古文经学。

（樊德仁）

桐城派 清代中叶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他们提倡古文，强调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所谓"义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他们还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在语言上追求"雅洁"，并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桐城派所写的主要是应用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为高。他们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顺，简洁明了，语言通畅。有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内容比较贫薄，生动性不够。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时文的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桐城派其他成员还有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

阳湖派 清代中叶的一个散文流派。属于桐城派的一个旁支。以代表人物恽敬、张惠言是阳湖（今江苏武进）人而得名。他们师承桐城派，与其古文理论基本相同，但不满于桐城派提出的一些清规戒律。他们主张模仿古人要取长去短，博采百家。他们的文章讲究词藻；语言取法于六经史汉，旁及诸子杂书，在手法上，"散文中时时间以八字骈语。"因此，显得较有文采，文章气势也比较开阔，不象桐城派那样拘谨枯淡，但在典雅和凝炼方面又不如桐城派。 （樊德三）

骈文派 与桐城派古文同时存在的散文流派。其代表人物较早的有陈维崧、吴绮、章藻功等，乾、嘉之际，又有胡天游、汪中、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孙星衍、吴锡麒、洪亮吉、曾燠、孔森广等。其中袁枚等八人又称骈文八大家。骈文派对文章的见解与桐城派相反。如汪中等人主张骈与散并无高低轻重之分，主张骈散结合。而阮元则认为，文、笔应该分立，只有骈文才是美文，从而主张重骈轻散，甚至否定散文在"文"中的地位，为骈文争正统。他在《文韵说》中说："韵者即声音也，声音即文也。然则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骈文派的主张有其片面性，但在当时文坛上对桐城派的文统说起了遏制作用。

骈文三大家 清朝中期骈文家中的汪中、洪亮吉、邵齐焘的并称。他们是清代骈文中兴的主要代表。其作品讲究辞藻、对仗、用典。三人中，以汪中的成就最大。

湘乡派 近代古文流派，以湖南

湘乡人曾国藩为代表。晚清李详《论桐城派》："文正之文，虽从姬传人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作为湘乡派的领袖，曾国藩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并且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但是，曾国藩又不全以"桐城派"为宗，他以为"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说明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他又指出"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便不宜说理耳。"(《致吴国屏书》)，这就矫正了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求雅洁的弊病，相应掩饰了内容的空虚。然而，说理需要格物博辨，使湘乡派古文不可避免地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更为适应的工具。 (杨恩成)

新文体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宣传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倡导了一次散文改革运动，即"文体革命"。在创作实践上，以梁启超为代表，发扬传统，采摘西学，形成了一种自由抒写、见解新颖、条理清晰而又半文半白的文体。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清代学术概论》)。风靡一时，学者竟相仿效，号称"新文体"。新文体宣传新思想，讴歌新事物，成为旧体散文和"五四"时期的白话散文之间的过渡性文体。 (张亚萍)

古文作家

周秦汉

管夷吾（？——前645）　字仲，谥敬，故亦称敬仲。春秋时齐国颍上（今山东淄博）人。春秋初期政治家。早年经商，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他辅佐齐桓公整顿齐政，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是记载管仲思想的著作，其中个别篇可能是管仲自著，其余大都系后人对管仲思想言行的记载、阐释和发挥。书中包容着儒、道、法、兵、阴阳、地理学、经济学等各种言论，而以法家，道家的思想为重。（落馥香）

左丘明（生卒年不详）　生平无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唐孔颖达认为他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俞正燮又认为左是左史之官，姓丘名明。关于《左传》是否为左丘明撰，后人也时有异议，然尚无充分证据论定。《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它又是一部出色的散文著作，与《春秋》相较，它更具备了文学性，书中出现的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其叙述历史事件，谋篇布局详略得当，优游不迫，其语言之简要尤为历代之楷模："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刘知几《史通·六家》），"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刘熙载《艺概·文概》）。《左传》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在散文史上更为历代所推崇倍至。

（文益人）

晏　婴（？——前500）　字平仲。春秋时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春秋时齐国大夫，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曾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省刑薄敛、节俭力行显于世。《晏子春秋》8篇215条，系后人追述他生前佚事及谏议言论的著作，全书故事生动，语

言简练，多用寓言故事深入浅出地说明深奥的道理。晏婴的形象栩栩如生，初步具备了小说的形态，对后世文学发展有较大影响。

孔　丘（公元前551——前479）

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宋国内乱，移居鲁国。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孔子幼时常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戏；早年丧父，家境中落。成年后曾做过鲁国"委吏"、"乘田"、"中都宰"、"司空"、"司寇"等。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春秋末期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大约55岁左右，他带领弟子先后到卫国、陈国、曹国、宋国、蔡国、楚国等周游，陈述自己的主张。因与当时现实背离甚远，终不为用。晚年集中精力从事教育，始创私人办学，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同时整理《诗》、《书》，删修《春秋》。《论语》所记述的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因是"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虽是语录体的散文著作，却往往能够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和具体的生活片段的描写，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塑造出孔子及其弟子们的鲜明生动的形象；孔子的形象对后世影响颇大。《论语》的语言简洁含蓄，耐人寻味，行文舒缓、温文尔雅。代表了诸子滥觞期语录体散文的最高成就。

墨　翟（约前468——前376）

鲁国（今山东）人。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起初受业于儒者之门，在现实中发现儒家的弊病后，转而自创墨家学派。这个学派是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的政治集团，类似于宗教团体。其宗旨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的思想系统很完整，主要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墨子始终没有脱离和下层社会的联系，周游列国，为结束动乱的社会而不懈努力。《墨子》一书系墨翟及其弟子共同撰辑而成，今存53篇。全书内容包罗万象，不仅有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方面的论述，而且有光学、力学、数学、几何、逻辑、军事的理论。《墨子》散文的最大成就是，将中国哲理散文真正推向论理的道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察类"、"明故"等论辩术的应用，加强了文章的逻辑性。比喻层出不穷，行文质朴无华，也是《墨子》散文的特色。

列御寇（约前450——前375）

郑国人。列子学说主正贵虚，时人称他为"有道之士"，向他学习的人很多。他家里很穷，当时郑国的执政子阳曾派人送米接济，但他拒不接受。《列子》一书，是由列子的著作和列子后学根据列子言行及能体现列子思想的寓言故事荟萃而成。流传中散失，西汉末年刘向搜集整理定为《列子》8篇。《列子》思想深刻，艺术上颇有特色。其中记载的寓言非常丰富，多数录自民间传说故事，对哲学和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李　耳（生卒年不详）　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世称

"老子"，实即"李子"，老、李一声之转。老子曾任周守藏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到晚年时，周朝衰落，归隐。他整理自己的思想，反思宇宙的本质，著书五千言，即今《老子》。《老子》的核心是"道"。"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是为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哲学观点，老子因此成为"道家"学派的鼻祖。《老子》散文，有极强的思想性，对现实的认识也非常深刻，批判和揭露丑恶社会毫不留情。深奥的哲理、辨证的思想、丰富的经验是其特色。《老子》散文的艺术性也颇高。语言精粹、文辞灵敏；意境深远，旨趣杳冥。正因为它是优美言辞和深邃哲理的结晶，对后世的影响才历久不衰。

（落馥香）

吴　起（?——前381）　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善用兵，为战国时兵家。初任鲁将，继任魏将，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后到楚国，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楚悼王死，被旧贵族杀害。《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佚。现存《吴子》六篇，系后人所托。

孙　武（生卒年不详）　字长卿，齐国人，春秋时兵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著有《孙子兵法》，为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兵书。今存本13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该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作战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一些重要规律，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孙子兵法》论理严密、精到，逻辑谨严，历来被称为"兵经"，对后代影响很大。

公孙龙（生卒年不详）　传说字子秉，赵国人。战国时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在哲学上他着重分析了概念的规定性和差别性，对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他的名辨论题有"离坚白"、"白马非马"等。著有《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原著录十四篇，今存六篇。首篇《迹府》为后人辑录公孙龙事迹而成的传记，其余《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五篇，为研究其名辨思想的重要材料。作为理论性的文章，《公孙龙子》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

慎　到（约前395——约前315）

赵国人，战国时法家。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当时各学派争论学术思想的地方）讲学，负有盛名。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的法家政治思想。《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崇文总目》作37篇，已失传，现仅存7篇。内容从"贵势"和"齐万物"思想出发，提出了法治的主张。另外有《慎子内外篇》，系伪作。　（姚远）

商　鞅（?——前338）　卫国人，曾辅助秦孝公实行变法，取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李斯《谏逐客书》）的实效。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

之一，《商君书》即是他及其后学的言论著作集。据《四库全书总目》称，《商君书》的产生，“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而非为商鞅自撰，但书中阐发的却是反映商鞅一派法家学说的主张。书中文章有议论，有说明，语言风格冷峻廉悍，朴实无华，体现了法家不事文饰，务求明白实用的特点。（文益人）

孟　轲（约前372——前289）

字子舆，战国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成为当时儒家的主要代表，以孔子继承人自居。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义”，并为此奋斗一生。他历游齐、宋、滕、梁等国，向各国君主宣扬他的“仁政”主张，虽一度仕齐为卿，但其主张终不被用。退而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成《孟子》一书，约三万五千言。《孟子》散文是我国豪放派文学的先河，雄宏恣肆，波澜壮阔。其雄辩气势之磅礴，行文言辞之犀利，在先秦诸子中鲜有其匹。加之长于比喻，文采华赡，更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无论是短小精悍的寓言，还是洋洋洒洒的长篇，都是一气呵成，顺理成章。前人说“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覆，明白峻洁，无一字闲入。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朱子语类》卷十九）洵非虚言。

庄　周（约前355——前275）

战国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曾为漆园吏，这是其一生中唯一的官职。庄子年轻时曾学儒家，但当认识到儒家的虚伪、危害后，转而批儒。由批儒到崇道，在老子“道”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庄子敝屣富贵、淡薄利禄的思想和老子的隐士思想相吻合，这就使庄子得以和老子并列为“老庄”而成为道家思想体系中的两座丰碑。庄子一生贫困潦倒，但精神上富有，《庄子》一书便是他全部的财产。《庄子》原有52篇，今只存32篇。庄子散文在先秦诸子中最具特色，也最有个性。《庄子》一书，“寓言十九”；他创造性地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虚构寓言故事以为论据，有的通篇是寓言。所以庄子的文章想象奇幻，汪洋恣肆，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庄子又是刻画、描写物态的高手，往往寥寥数笔即可活龙活现。《庄子》散文中韵脚连绵、声调铿锵增加了文章的节奏感和音乐美。总之，庄子的散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先秦诸子不可同日而语，即在后世的古典散文中亦鲜有其匹。（落馥香）

吕不韦（？——前235）　濮阳（今属河南）人。战国末为秦相国，门下有宾客三千。他使宾客人人写下所闻，汇编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号曰《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全书体例一致，文章结构完整。许多文章常用寓言说理，既使文章读来生动有趣，亦以所含的深刻哲理丰富了文章内容，即如“刻舟求剑”（《察今》）等。《吕氏春秋》署名吕不韦而传世。

（文益人）

荀　况（约前314——前217）

被尊称为荀卿、孙卿。战国时赵国

(今山西安泽)人。年15游学于齐，为稷下学者之一。齐湣王晚年昏庸，学士纷纷出走，荀子到楚。齐襄王立，稷下学社复兴鼎盛，荀子返回齐国，“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被谗离齐至楚，春申君任他为兰陵令。被谗离职，回到赵国。又从赵国到秦国，见应侯范睢，答问秦昭王，但不为用，仍返回赵国。最后应春申君之邀，又从赵国返到楚国，再做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被废，客死兰陵。荀子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派最大的代表人物。《荀子》32篇阐述了他的思想。《荀子》散文，论题宏大，论证广博；分析问题全面深刻，行文风格典博浑厚。比喻、排偶手法的应用，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韵律美。《荀子》文章政论性强，开启了两汉政论的先河。 (落馥香)

韩 非(前280？——前233)

韩国贵公子。和李斯同学于荀子。是继李悝、申不害、慎到之后法家的集大成者。战国后期，韩国日渐削弱，他屡次上书谏韩王，但终不为用。韩非口吃，不擅辩说而长于著书。秦始皇读了他的《孤愤》、《五蠹》，大加赞赏，加兵韩国，韩王只好让韩非到秦国。秦始皇还没来得及重用他，他便遭姚贾和老同学李斯的陷害，狱中自杀。著有《韩非子》55篇。《韩非子》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表达其政治立场、思想主张以及批判社会的政论体，笔锋锐利，结构严谨；其二是以辩难的方式行文，类似读书笔记，是为辩难体；其三是经说体，即用故事(“说”)来解释命题(“经”)。这类文章中所用的故事、寓言感染力强，讽刺现实，效果显著。这些散文总的特点是议论透辟，一针见血，分析和综合能力强，令人心服口服。韩非的散文表明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

李 斯(？——208) 秦代政治家。楚上蔡(今属河南)人。曾经是荀况的学生，但他的政治主张却更接近于商鞅和韩非。为了建功立业，他西入秦国。初为吕不韦舍人，后被秦王政(秦始皇)任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以韩国水工郑国事件，宗室贵族建议逐客，李斯亦在被逐之列。他上书谏阻，秦王乃除逐客之令。不久官为廷尉，对秦统一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六国后任丞相，主张“焚书坑儒”，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秦始皇死后追随赵高，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被杀。李斯是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有《谏逐客书》、《苍颉篇》(今佚)、《论督责书》等，另外秦代有一些刻石文，如泰山、会稽等处的刻石文，大都出自李斯之手。《谏逐客书》是李斯的一篇名作，文章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辞说的习气，文辞修饰整齐，音节和谐流畅，与汉初散文和汉代辞赋颇为接近。李斯的散文，语言明快简洁，严于结构，并且很有气势。

陆 贾(生卒年不详) 汉初政论家、辞赋家，楚人，有口辩。从刘邦定天下，居左右，常出使诸侯做说客，官至太中大夫。力主提倡儒学，并辅以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做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刘邦命他，“试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著12篇，刘邦皆称善，称其书为《新语》。今存《新语》为后人所托。陆贾又能赋，有赋3篇，已佚。（姚远）

公孙宏（前199——前120）

字季（《古文苑》作字次卿），淄川（今山东淄博）人。少年时做过薛的狱吏，因罪免官。武帝初即位（前140年）诏征贤良文学之士，宏以贤良征为博士，年已60奉使匈奴，还报不称意，乃移病免归，元光五年（前130）复被征，迁为御史大夫，元朔五年（前124）为丞相，封平津侯，终于位。其著作文章多载在《史记》、《汉书》中，《论治道疏》一篇，笔意挺拔，言简而意完，是散文小品中名作。又有《答东方书》，见于《艺文类聚》。

（文益人）

贾　谊（前200——前168）

世称贾生、贾长沙、贾太傅。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年少多才，二十余岁即被召为博士，官太中大夫。后谪为长沙王太傅。4年后，复被召回，为文帝宠子梁怀王太傅。怀王堕马而死，他自伤失职，忧郁而死，年仅33岁。贾谊的文学成就及影响是很大的，原有赋7篇，今存4篇，以在谪居长沙时所作的《吊屈原赋》、《鹏鸟赋》较为有名，为汉赋之声。贾谊的散文成就更在辞赋之上。《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为其代表作，也是开汉鸿文，这些名篇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政论家的远见卓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革新现实的坚决态度。他的文章峻拔锋利，针砭时弊，淋漓酣畅，形象生动，对后世说理性散文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刘向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原有集四卷，明人张溥辑有《贾长沙集》一卷，另传有《新书》十卷。（杨文）

晁　错（前200——前154）

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为太常掌故，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智囊”。景帝即位，任为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的政策，有很多建议得到景帝采纳。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武装叛乱，他为人所谮，被杀。所著政论较著名的有《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切合实际，立论精辟。晁错宦途得意，政治实践经验丰富，发而为文章，则能从历史事实、当前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体分析，议论犀利，分析深刻，说理透彻，明白易晓，不足之处是略乏文采。（姚远）

邹长倩　生卒年、字里均不详。今仅存其《遗公孙贤良书》一篇。公孙宏于汉元光五年（130）再被举为贤良，邹长倩以其家贫无资，乃解衣裳、冠履与之，又赠以生刍一束，素丝一襚，扑满一枚，并在《书》中解释了三者的喻意，后人因谓之“三事喻”。他的文章韵幽色秀，于闲雅中带有规戒，是散文小品中名篇。文见《古文苑》。

（文益人）

枚　乘（？——前140年）

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西汉辞赋家，是大赋体的“奠基者”。初为吴

王刘濞郎中，濞企图谋反，他上书劝阻，不被采纳。后为梁孝王刘武宾客。景帝曾召拜他为弘农都尉，不受。汉武帝即位，他应召去京师，因年老力衰，死于途中。有赋九篇，今存《七发》、《柳赋》、《梁王菟园赋》3篇，后2篇疑是伪作，《七发》为其代表作，全文二千多字，文章气象开阔，铺写细腻，含义深刻，是从骚体到赋体的承前启后之作，也是标志汉代大赋正式形成的作品，对辞赋的发展影响很大，后世辞赋家仿作的很多，有"七体"之目。原有集，已佚，近人辑有《枚叔集》。（杨文）

邹　阳（生卒年不详）　齐（郡治今山东东部）人。初从吴王刘濞，有《上吴王书》，劝阻濞叛汉，濞不听。后为梁孝王客，被谗下狱，有《狱中上梁王书》，申诉冤屈。邹阳的散文博引史实，排比铺张，有战国游士纵横善辩之风，故《汉书·艺文志》列之入纵横家，收文七篇。《狱中上梁王书》体现了邹阳散文的特色。在文章里，他巧妙地对孝王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显示出其"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汉书·邹阳传》）的性格。同时文章句式整齐，且多用对偶，在形式上开了后代骈体文的先河。（姚远）

刘　彻（前156—前87）　即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是封建社会颇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接受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采用法术、刑名，以加强统治，在位期间，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发展了农业生产；派张骞出使西域，派唐蒙至夜郎，加强了对其地的统治；并用卫青、霍去病为将，解除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他的《下州郡求贤诏》、《定仪礼诏》，都可作为出色的散文小品来读。文见《古文小品咀华》。

（文益人）

刘　安（前179——前122）　西汉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孙，袭父爵为淮南王。好读书，喜鼓琴，善为文辞，才思敏捷。后因谋反事泄而自杀，受株连者达千人。曾奉武帝命作《离骚传》，为我国最早解说屈原作品的著作，惜已不存。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撰《内书》21篇，即今传《淮南鸿烈》（又称《淮南子》），含《内书》、《外书》、《中篇》，今仅存《内书》。杂采儒、墨申、韩、阴阳五行众家之说，而以道家为归。常以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说理，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古代神话传说。《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有集，除《淮南鸿烈》、《招隐士》外，已佚。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

字长卿，因慕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少年好读书击剑，青年时因得仕宦为郎，事汉景帝为武骑常侍。后客游于梁，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后，他回到成都，与卓文君私奔。武帝即位，复任为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受人指控，停职，后复召为郎，拜孝文园令。善著书，学问很广，精通文字学，是汉赋的代表作家，有赋29篇，今存6篇，《子虚赋》、《上林赋》是其代表作品。两赋极写天子、

诸侯田猎之盛，皇帝苑囿之大，旨在歌颂皇朝的声势气魄，迎合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篇末虽有讽谏之句，其实只是"劝百讽一"。其赋结构宏大，词采富丽，绘声绘色，反映出作者的学识和丰富的想象力，有"不师故辙，自摅妙才"的评价。另传有《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等。《长门赋》所写陈皇后失宠后的悲凉生活，委婉曲折，对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诗篇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在作赋的理论上，提出"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作赋之迹"，和"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家之心"。但有堆砌词藻之病。他的散文，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意沉力劲，简当深切，刘勰称之为"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

董仲舒(前179——前104)

广川（今河北枣强广川镇）人。汉景帝时任博士，武帝时任江都、胶西王相。晚年退居在家。他自幼攻读《春秋》，"三年不窥（花）园"，专治《春秋公羊传》。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上《天人三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春秋繁露》是其哲学著作汇辑，宣传"天人感应"说，建起"三统"、"三正"的循环史观。又著有《董子文集》。

东方朔(前154——前93)

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早年多有所好，曾学书、学诗、学剑、学孙吴兵法。汉武帝即位，征文学之士，他上书自荐，被召入朝，为常侍郎，后任太中大夫，给事中。因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诙谐调笑，被视如俳优。有正义感，能以诙谐的言辞，直言切谏，曾上书反对武帝大修上林苑，因不被重用，而写散文赋《答客难》，虽托辞自解，意在发泄个人牢骚，但也揭露了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事实。《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20篇，今散佚。明人辑有《东方大中集》。（杨文）

司马迁(前145?——前87?)

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父司马谈是太史令、有名学者，对他后来治史有直接的影响。司马迁10岁随父亲到长安，曾受学于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20岁"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游历江淮，调查故实，接触下层。返长安后，先任郎中，曾奉命出使巴蜀，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后继任太史令。为实现其父论载"天下之史文"的遗愿，又经过四五年的阅读整理国家历史文献，搜集资料，于太初元年（前104）完成了改革历法的工作，接着开始了《史记》的编撰。天汉二年（前99）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遭受腐刑。他忍受奇耻，为完成《史记》而矢志活下去。太始元年（前96）被赦出狱后，迁中书令。在汉武帝末年完成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伟大著作《史记》，后不几年即离开了人世。《史记》既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

传体史学，又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比较全面、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生活的画卷，描述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作为最早的传记文学，成功地刻画了众多的富于时代特征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对中国史学，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史记》所体现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手法，为历代所效法。其今存《悲士不遇赋》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一篇。《报任安书》叙述充满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作用，成为古代散文中不可多得的名作。 （孙安邦）

终　军（140？——前113）　字子云，济南（今属山东）人。少好学，辩博能文，年18，为博士弟子，至长安上书言事，拜谒者给事中，累擢谏大夫。南越与汉和亲，遣终军往说其王入朝，事成，赐南越王大臣印，留为使者，用汉法以改其俗，越相吕嘉不愿属汉，发兵杀王，终军亦遇害，年仅20余岁，故世人谓之“终童”。存世之作以《请使匈奴书》可见其风格，文章气雄骨奇，词简意畅。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文益人）

孔安国（生卒年不详）　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武帝时为谏大夫。《尚书》古文学派开创者。相传于武帝末年得孔子住宅壁中所藏古文经书（《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其中《尚书》较伏生所传29篇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西汉末，王莽当政，经刘歆奏请，方立于学官。相传其又著有《尚书孔氏传》13卷，清人阎若璩等考证为后人伪托之作。

（杨文）

王　褒（生卒年不详）　字子渊。西汉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工歌诗，善辞赋。汉宣帝“欲兴协律之事”（《汉书·王褒传》），益州刺史王襄闻褒有俊材，向宣帝举荐，被召入朝。他同张子侨诸人并待诏，常从帝游猎赋诗，旋擢谏大夫。后被召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太子疾平复，喜褒所作《甘泉》、《洞箫赋》，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因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他奉命前往祭祀，死于道中。《洞箫赋》以人事人情巧喻箫声，新颖别致，多有骈丽偶句，刘勰称之“穷变于声貌”（《文心雕龙·诠赋》），渐开魏晋南北朝骈赋之端。其作品今存明张溥所辑《王谏议集》。 （孙安邦）

杨　恽（？——前54）　字子幼，华阴（今属陕西）人。司马迁外孙。宣帝时为郎，以首告霍氏谋反有功，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好发人隐私，人多怨尤，因之败，废为庶人，归家赋闲，治产业宴宾客，穷奢极侈，友人孙会宗以书劝戒，恽心中不服，复书中语多怨怼，时会日蚀，有人告系恽奢侈不悔过所致，下廷尉按验，又得《报孙会宗书》，宣帝怒，坐恽大逆不道罪，腰斩于市。留世散文仅《报孙会宗书》一篇，存《汉书》卷66《公孙刘车王杨蔡陈郑传》及《文选》中。文章结构严谨，文气酣畅，不失

为一篇散文佳作。（文益人）

桓　宽（生卒年不详）　字次公。西汉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境）人。宣帝时任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学识渊博通达，善属文。汉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召集全国的文学、贤良60余人到京师，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共议盐铁事，互相诘难。当时会上议论颇多，内容庞杂，桓宽集其所论，著数万言，名《盐铁论》，全书共60篇，认为治国之道应以仁义为本，以趋利为末；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是一部既有历史意义，又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它继承了先秦论辩散文的优良传统，采用对话形式，层层深入，为古代论辩散文的重要作品。

刘　向（约前77——前6）　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12岁时即以父任为郎，年20任谏议大夫，历仕宣、元、成三朝，居官30余年，曾任散骑宗正给事、光禄大夫等职，终中垒校尉，故亦称"刘中垒"。刘向为人简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常以阴阳吉凶论时政得失。曾校书于天禄阁（皇家馆），主持经传、诗赋的校正整理工作达20年之久，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校雠学的创始人。平生著述甚丰，以《新序》、《说苑》最有文学价值。《新序》为历史故事集，以春秋时事为多，利用寓言、比喻等形式来达到讽谏的目的，著名的如"叶公好龙"。《说苑》为分类故事选，共20篇，内容与时政颇相切合，取材通俗、风格朴实。其文多为奏疏及校书后为古书所作的"叙录"。以《谏营昌陵疏》最为有名，融情于事，被视为具有"阴柔"之美的代表作。在经学上，向专治《春秋穀梁传》。所作《九叹》等辞赋33篇，大都已亡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另有《洪范五行传》、《烈女传》等。清马国翰辑存《别录》《五经通义》1卷。（杨　文）

扬　雄（前53——18）　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从小即好学博览、酷爱辞赋。家贫而不慕富贵，口吃而敏于深思。《汉书》本传记载："年四十馀，自蜀来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成帝初召入宫，任给事黄门郎。官职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时受人牵累坠阁自杀未遂，后复被召为大夫。扬雄早期即以辞赋闻名。其辞赋每以司马相如为式，效《子虚》、《上林》而作《羽猎》、《甘泉》诸赋，所以后世有"扬马"之誉。还有《解嘲》《酒箴》和《逐贫赋》。《逐贫赋》"呼贫与语"，发泄怨愤，抒惆怅失志之情，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小赋。晚年认为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经典为典范。对作赋和后代的文论有很大影响。辞赋之外，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哲学思想。散文方面还有一些优美政论文，创立了"连珠体"。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明人张溥辑有《扬侍郎集》。（孙安邦）

桓　谭（前？——56）　字君

山。东汉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后汉书·桓谭传》）历任太中大夫、议郎给事中。因喜“非毁俗儒”，屡次上疏切谏时政，“极言谶之非经”，坚决反对谶纬之学，被光武帝视之为“非圣无法”，几被处斩。出为六安郡丞，上任途中病卒。著有《新论》29篇，早佚。今存《新论·形神》1篇，收入《弘明集》；有清人辑本。他“以烛火喻形神”，认为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正象烛光不能离开烛体而存在一样，对后来的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充在《论衡·超奇》中给予很高的评价。

（张　韬）

刘　歆（？——23）　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少以通《诗》、《书》能属文为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后受诏与其“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汉书·楚元王传》）向死，他继父志，总校群籍，撰成《七略》，为建立中国的目录学奠基。自称发现《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开创了古文经学派，遭到反对。王莽执政，立古文经博士，刘歆任“国师”。后因谋杀王莽，事泄自刎。他又是天文学家，著《三统历谱》，造圆柱形量器，使用的圆周率是3.1547，称“刘歆率”。原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　（孙安邦）

马　援（前14——后49）　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新莽末，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依附割据陇西的隗嚣，继归刘秀，参加攻灭隗嚣的战争。建武十一年（35）任陇西太守，率军击破先零羌，建武十七年（41）任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后在进击武陵“五溪蛮”时，病死军中。曾在西北养马，得专家传授，发展了相马法，著有《铜马相法》。不以文名，但如《诫兄子书》、《与官属》等文，皆情辞恳切，发自肺腑，文字质直厚朴，不失为传世佳作。文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刘　秀（前6——57）　即汉光武帝，东汉王朝建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王莽末年农民起义爆发，与兄演乘机起兵，加入绿林军。建武六年（25）称帝。后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在位期间，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减轻赋税，废止地方兵役制，兴修水利，精简官吏，并在中央加重尚书职权，在地方废除掌握军权的都尉，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存世诏书数十篇，大略文笔简拔，辞采秀发，《劳耿弇诏》、《与子陵书》等，均不失传世妙文，文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马第伯　东汉光武帝时人，籍贯生平无考。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登封泰山，马第伯随往，就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作《封禅仪记》，详尽地记录了所见所感，文理清晰；着墨

洁净，且颇富文采。文存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

（文益人）

班　彪（3—54）　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东汉史学家、散文家。西汉末，班彪避难随隗嚣至天水，后至河西，为大将军窦融"画策事汉"。后为汉光武帝征召，任为徐县令。不久因病免官，专心致力于史籍。班彪博学多才，有志于续写《史记》："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成为后来班固撰写《汉书》的基础。此外，《后汉书》载其"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今存《北征赋》等，《文选》、《艺文类聚》有收录。（萧　晨）

王　充（27——约97）　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早年受业于太学，从师班彪。家贫无书，常游于洛阳书摊，一见则能诵忆，博览百家之书。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官家居，教授生徒，专意著述。王充的文学成就表现在文学批评方面。他的著作《论衡》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其中也论述了文学问题。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词藻华靡等倾向，王充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文学创作应劝善惩恶、有补世用，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反对徒有华丽之观而无切实内容的作品。王充十分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因袭，批判了贵古贱今的文学观："文有真伪，无有故新。才有浅深，无有古今"。这种文学观对后代的文艺理论家颇有启发。《论衡》是一部很好的政论体散文，深切著明，极富感染和说服力。刘熙载评其"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艺概》）。

（谢琛香）

班　固（32——92）　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家世儒学，其父班彪博学多才，续《史记》"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班固从小受其父影响，《后汉书·班固传》称他"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班彪死后，班固承继父志，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后因有人诬告他私改国史，被明帝捕入京兆狱。得其弟班超上书辩解，方获释。因明帝赏识他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明帝永平中奉诏修史，经过二十多年努力，终于章帝建初七年（82），撰成《汉书》。汉和帝永元元年（89），他随窦宪出征匈奴，任中护军，窦宪骄横跋扈，不久因谋反被诛，他被株连入狱而死。《汉书》中的八"表"与"天文志"由其妹班昭等续成。《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同《史记》并称，有"言皆精炼，事甚该密"（刘知几《史通·六家》）的特点。但评价历史人物往往以儒家道德观念为标准，故对陈涉、项羽横加贬抑。班固又是东汉前期著名的辞赋家。其《两都赋》铺张扬厉，模仿"扬马"之作，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是西汉大

赋的继续。此外还有《幽通赋》、《答宾戏》等名篇。其《咏史诗》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之一，为完整的五言体。明人张溥辑有《班兰台集》。

（孙安邦）

班　昭（生卒年不详）　一名姬，字惠班。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适曹世叔，早寡。"博学高才"（《后汉书·列女传》），后妃师事之，号曰："曹大家"。曾奉诏续完其兄班固《汉书》未竟之八"表"和"天文志"。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著名学者马融，曾从其受读《汉书》。朝廷每有贡献异物，辄令昭作赋颂。"年70馀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著有赋、文16篇，《东征赋》、《女诫》七篇及为兄班超求征还疏为代表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张　璐）

傅　毅（生卒年不详）　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明帝永平中，在平陵习章句之学，曾因明帝求贤无诚意，而作《七激》以讽谏。章帝时，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作《显宗颂》10篇。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请为主记室，后任司马。傅毅辞赋中以《舞赋》最为有名。它以清丽、流畅的笔触，描写歌舞场面，不乏精彩的片段。所存之赋见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萧　晨）

崔　寔（？——170？）　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东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少沈静，好典籍。"（《后汉书·崔寔列传》）"明于政体，吏才有馀。"官至尚书。抨击时事，著有《政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今存一卷，系清严可均辑本），"指切时要，言辩而确"。重视生产知识，著述《四民月令》，记载农作物种植方法，流传至今。他历位边郡，关心国计民生。但度用贫乏，死后"家徒四壁立，无所殡敛。"其《四民月令》引载入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

王　符（85？——163？）　字节信。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少好学，有志操"（《后汉书·王符传》）。同马融、张衡等友善。因他系庶出，又无舅家，为乡人歧视。加之他不求荐引、不苟流俗，所以不得升迁。因而隐遁著述，终生不仕。著《潜夫论》，"以讥当时失得"，"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实践了他文章以载教训，"遂道术而崇德义"的主张。批评弊端，说理透辟，通篇排偶，以政论文之骈化，启建安之际骈丽文风。　（孙安邦）

张　衡（78——139）　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永元十二年（100），任南阳主簿，后入朝，拜郎中，两次任太史令，又作过侍中、河间相等官。勤敏好学，博识多能，是科学家兼文学家。在任太史令期间，他悉心研究天文、历算，著《灵宪》、《算罔论》等科学著作，并先后发明和制作了举世闻名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又上《请禁绝图谶疏》，反对谶纬迷信。文学创作以善辞赋著名于世，其散体大赋《西京赋》、《东京赋》及抒情小赋《归田赋》都是不朽的传世佳作，《归田赋》通常被论为东汉抒情小赋之

首。亦能诗。著有《张河间集》。

马　融（79——166）　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中，于东观典校秘书，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因忤大将军梁冀，遭诬陷，徙朔方，后得赦，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辞官，才高博洽，曾遍注儒家经籍及《老子》、《淮南子》等，均已佚。善文赋，以《长笛赋》较著名。明代张溥辑有《马季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李　固（94—147）　字子坚，汉中南郑（今属陕西）人。少好学，郡举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阳嘉二年（133）以对策为议郎，永和（136—141）中，任荆州刺史、太山太守，旋任将作大匠、大司农，冲帝时为太尉，与大将军梁冀参录尚书事，冲帝死，他议立清河王，冀不从，后被冀所诬，下狱死。存世文章凡十一篇，文风质朴，如《遗黄琼书》，文中引古语"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历代传诵的名言。文存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秦　嘉（生卒年不详）　字士会，陇西（今甘肃东南）人。汉桓帝时，为郡上计吏，赴洛阳，妻徐淑因病还母家。嘉在洛阳任黄门郎，夫妇间诗文往还，今存《与妻徐淑书》、《重报妻书》及《赠妇诗》四首等，均为情辞深挚之作。文收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徐　淑（生卒年不详）　陇西（今甘肃东南）人。汉桓帝时，其夫秦嘉为郡上计吏，赴洛阳，淑病居母家，不及面别，相互诗、文赠答，表示怀念之情，其《答秦嘉诗》1首及《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情深意浓，溢于言表。《为誓书与兄弟》1篇，是秦嘉亡后，兄弟欲嫁淑，淑以书明不嫁之志，言辞质直衷恳。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王　逸（生卒年不详）　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汉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善诗、文，作有赋、诔、书、论等21篇，又作汉诗123篇，今多亡佚，原有集，已佚，明张溥辑有《王叔师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逸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

王延寿（生卒年不详）　字文考，一字子山，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王逸之子，少时随父游鲁，归渡湘水溺死，年仅20余岁。在鲁时曾作《鲁灵光殿赋》，生动地描述了宫殿的雄伟气势、栋宇结构和彩绘雕刻，为蔡邕所称赏。又有《梦赋》、《王孙赋》等，见《艺文类聚》。原有集，已佚。

赵　壹（生卒年不详）　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为人耿直，狂傲不羁，受地方乡党所排斥，几乎被杀。灵帝光和元年（178），任上计吏，后西归，屡为公府征召，皆不就。赵壹为东汉著名辞赋家，《刺世疾邪赋》是他的代表作，文章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语言犀利，感情激烈，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傲岸耿介的个性。又有以穷鸟自比的《穷

鸟赋》。亦能诗。原有集，已佚。今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文十六篇。

刘梁（？——181？） 一名岑，字曼山，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刘桢的祖父。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城长，于管地大作讲舍，延聚生徒百人，朝夕自往劝诫，执经试策，儒化大行，特召拜入尚书令，累迁为野王令，未行病卒。因疾愤世人多利交，以邪曲相党，曾著《破群论》，时之览者，以仲尼作《春秋》比并，其文已不存。又著《辩和同论》，见《后汉书·刘梁传》，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褚少孙（生卒年不详）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汉元帝、成帝时博士，一说宣帝时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号先生。曾补过司马迁《史记》，其补文多言简意赅。笔意双妙，如《续卜筮列传》、《卫将军青传赞》等。明人辑有《褚先生集》。

（文益人）

蔡邕（132—192） 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人。少时博学，擅长辞章。书法精妙，尤工于隶书，创"飞白"书。他做过郎中，校书于东观，后迁为议郎。熹平四年（175），蔡邕自写《六经》，刻碑石立于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碑始立时，观瞻、摹写者每日车乘千余辆，堵塞街巷。董卓专权时，他被迫出任侍御史、中郎将，封为高阳乡侯。董卓被诛，他亦被捕，卒于狱。蔡邕著诗、赋、诔、铭等百余篇。辞赋以《述行赋》最为有名。蔡邕的文章讲究音节谐协，字句典雅，多用偶句，在汉末很有地位。散文的风格在东汉末年有一个转变，西汉以来那种朴实厚重的文风至此销歇，魏晋典雅清丽的文风开始兴起。蔡邕是这一转变中的代表作家，其文多为谀墓之作，名篇有《郭泰碑》等。刘勰有赞语云"蔡邕铭思，独冠古今"。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蔡中郎集》。

荀悦（148——209） 字仲豫。东汉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幼时聪慧好学，因家贫无书，每到人家，遇书即读，过目成诵，尤善诵《春秋》。汉灵帝时，因宦官专权，托疾隐居。后应曹操征召，历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汉献帝好文学，亦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懂，命荀悦依《左传》体制，成《汉纪》三十篇，为史传体散文，其文"辞约事详，论辩多美"。宋代王铚誉曰："其词纵横放肆，反复辩达，明白条畅，既启告当代，而垂训无穷"。（《两汉纪后序》）荀悦另著《申鉴》5篇，为政论体散文，是西汉以来政论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明代何孟春称其文"无贾谊之经制而近于醇，无刘向之愤激而长于讽"。

孔融（153——208） 字文举。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少有异才，勤奋博学，历任侍御史、中军侯、虎贲中郎将、议郎，官至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又任少府、太中大夫等职。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为当时文章宗师，被

誉为建安七子之首。其文章以议论为主，内容大抵为申张教化，宣扬仁政，荐贤举能，评论人物，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颇露锋芒，个性鲜明。在散文艺术上，骈丽气息较浓，文句整饬，辞彩典雅，引古论今，比喻精妙，以气盛见长。其长于奏议散文，名作有《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都表现出“飞辩骋辞，溢气坌涌”的艺术特色。曹丕论其文“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典论·论文》）孔融的诗作流传下来者很少，以咏史诗为主，语言通俗，叙史简明。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孔北海集》。

阮　瑀（？——212）　字元瑜。东汉陈留尉氏（今河南陈留）人。少时从学于蔡邕。曹操素闻其名，召为司空军师祭酒，管记室。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他和陈琳所拟。擅诗，名篇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一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情况，从侧面反映了汉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在建安七子中，他的诗歌格调最为凄凉低沉。著有《文质论》，主张文章“意崇敦朴”，有重质轻文的倾向。其散文长于章表书记，文气顺畅，舒卷自如，善于征引史事和运用辞藻。代表作是《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曹丕评之“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应　玚（？——217）　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县西南）人。建安中，曹操召其为丞相掾属，转任平原侯庶子。颇有才学，为建安七子之一。今存赋十余篇，其《正情赋》祖述《离骚》香草美人之意，假托仰慕一位“淑美之人”，寄寓他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其诗作仅存七首，《别诗》二首写羁旅行役之思，富于真情实感。其散文作品和谐而多文采。曹丕曾有评语曰：“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与吴质书》）

陈　琳（？——217）　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人。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的主簿。何进谋诛宦官，陈琳曾谏阻，未被采纳，遂避祸至冀州，投奔袁绍，后转归曹操，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陈琳诗、文、赋皆能。其诗歌的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其辞赋的名篇为《武军赋》，写得颇为壮伟。其散文以章、表、书、记见称。其文风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多用骈偶，名篇如《为袁绍檄豫州文》。当时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陈琳的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视的环节。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陈记室集》。

（谢琛香）

徐　干（170——217）　字伟长。北海郡（今山东昌乐附近）人。少年勤学，潜心典籍，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染疾而亡。文学上诗、赋、散文皆擅。诗歌仅存3篇，均为五言诗。其辞赋的名声颇高，曹丕《典论·论文》论之“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则把他与王粲一起作为魏之“赋首”加以标举（见《文心雕龙·诠

赋》)。他的散文见《中论》一书，这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论集。今存辑本分上、下两卷，上卷10篇，多论述处事原则和品德修养；下卷10篇，多论述君臣关系和政治机微。作者一般不指斥时事，所以文章显得辞旨邈远，较少锋芒。而语言平实，条理贯通，亦是其散文特点之一。徐干为“建安七子”之一。由清代人辑补的《徐伟长集》，收在《汇刻建安七子集》中。 （文益人）

繁　钦（？——218）　字休伯，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幼即以文章辩才闻名于汝、颍之间，长而擅长书记，尤善为诗赋。初为豫州从事，后任曹操丞相府主簿。著有文集10卷，今佚。现存诗7首，文章22篇。诗歌创作以五言长诗《定情诗》最有名，描写女子心理，细致体贴。散文作品《与魏文帝笺》，记述薛访车子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曲尽其妙，描画工巧，辞彩绮丽。曹丕以为“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文章志》)。

祢　衡（173——198）　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少有才辩，性格刚毅傲慢，好侮慢权贵。因拒绝曹操召见，操怀忿，罚作鼓史，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反辱曹操。操怒，欲借刘表手杀之，刘表又转送之与黄祖，因冒犯黄祖，被杀。祢衡为汉末辞赋名家，代表作《鹦鹉赋》托物言志，抒写才智之士生于乱世的愤闷心情，是汉末小赋中的优秀之作。其《吊张衡文》，刘勰称之为“缛丽而轻清”(《文心雕龙·哀吊》)。原有集，已佚，文、赋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文益人）

杨　修（175——219）　字德祖，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其家为汉代名门，累世大官。修少年好学能文，才思敏捷，谦恭多识。建安中举孝廉，除授郎中，丞相曹操请为仓曹属主簿。与曹植为密友，积极为其谋取太子地位，后曹植失宠，杨修以智谋才略及与袁术的舅甥关系而为曹操所忌，遂借故杀之。著有赋、颂、赞、诗、表、记等共计15篇，曹植曾论及当世作者，称杨修“高视于上京”(《文选》卷四二)。原有集2卷，已散佚。今尚存作品7篇，其中赋5篇、笺1篇、赞1篇。 （刘宜生）

仲长统（180——220）　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年轻时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倜傥敢言，行为不羁。常托病拒绝州郡召命，被称为“狂生”。建安十一年(206)，尚书令荀悦举为尚书郎。曹操为丞相，曾一度入幕参军事。仲长统生长于汉末乱世，怀才不遇，有志不达，“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后汉书·仲长统传》)。所著《昌言》，是他的思想政治杂论集。文章锋芒直指汉末黑暗政治现实，抨击了昏君、外戚、宦官的专治政治。其文风任气骋词，铺张扬厉，骈偶排比，形象鲜明，表现出建安时代政论散文“渐尚通脱”、“颇慕纵横”的“骋词之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昌言》原34卷，已散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辑有遗文数十条。 （文益人）

三国两晋

曹　操（155——220）　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20岁举孝廉，历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等职。曾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后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208）进位丞相。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曹操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文学事业上也很有地位和成就。他招集了当时的许多著名文人，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曹操的散文大多是应用性文字，大致可分为表、令、书三大类，质朴刚健、率真流畅，简约严明、生动活泼，有清峻、通脱之长，无典雅浮华之弊，往往直抒胸臆，不受传统思想和格式的束缚。代表作有《让县自明本志令》、《置屯田令》等。在散文出现骈化趋势之时，曹操以其平易自如、质实明练的文体，独树一帜。　（谢琛香）

王　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平西南）人。少有才名，得蔡邕赏识。年17，司徒辟举，诏授黄门侍郎，时董卓新诛，其党李傕、郭汜在长安作乱，粲乃不应召，而往依荆州牧刘表，居荆州16年，不得重用，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征荆州，粲劝刘表之子刘琮归降，操授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迁军师祭酒，建安十八年（213），魏国既建，拜侍中，染疾卒。粲为建安七子之一，天资聪颖，博闻强记，诗、文、赋皆工，且精数学、棋艺。粲在魏多参与朝廷奏议及拟订制度，《太庙颂》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其文学成就以五言诗最高，赋也多优秀篇章，以《登楼赋》最著名，是汉魏抒情小赋中的名篇；其他文章也有成功之作，如《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等，写得"词章纵横"（张溥《王侍中集题辞》），颇具情采。刘勰评王粲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原有集，已佚，明张溥辑有《王侍中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文益人）

吴　质（177——230）　字季重，济阴（治今山东定陶西北）人，以文才为曹丕所喜，甚见礼爱，交游无间。建安中出为朝歌长，又迁元城令。曹丕称帝，拜振威将军，复拜北中郎将，使持节都督幽、并诸军事。太和年间入朝为侍中，封列侯。卒，初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其子应上书论枉，后改谥威侯。有集5卷，今佚。作品存世颇稀，仅有文3篇、诗1首。其诗抒写怀抱，感情真挚，为文则词藻繁缛，内容平庸无物，刘师培讥其

"词浮于意"(《中古文学史讲义》)。

(刘宜生)

刘　桢(? ——217)　字公干，东平(今属山东)人。建安中，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217)染疾疫而亡。刘桢为建安七子之一，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其诗格调颇高，与王粲合称"刘王"。善辞赋，亦以气格见长，惟文采稍弱。明代张溥辑有《刘公干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文益人)

诸葛亮(181——234)　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早孤，随叔父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后又往依荆州牧刘表，躬耕于南阳隆中(今湖北襄阳城西)。素有大志，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刘备曾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共图大业。在他的谋划下，刘备与孙权联合，在赤壁击败曹操，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的文学成就以散文著称。其代表作有《出师表》(又称"前出师表")、《建兴六年上言》(又称"后出师表")、《正议》等篇。《出师表》是作者率军北伐曹魏之前给蜀汉后主刘禅的奏表。文章叙事详切，说理透彻晓畅，为人们所推崇。宋代陆游《书愤》诗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诸葛亮著作，晋初陈寿曾为辑集。他的散文真挚、朴素，富有激情，对后世颇有影响。

(宁志荣)

曹　丕(187——226)　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曹操长子。少有逸才，博览群书。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后立为太子。曹操卒，他嗣位为丞相、魏王，不久又代汉称帝，都洛阳，国号魏。曹丕爱好文学，常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宴饮唱和，往来甚密，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曹丕的散文以书信为佳，代表作如《与吴质书》，语言质朴诚恳，令人感到亲切。其文笔清新流利，对后世短篇抒情散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的《典论》作为一部政治、文化论著，亦是重要的散文作品。

曹　植(192——232)　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年少即善属文，才思敏捷，下笔成章，甚得赏识。其父曾考虑立他为太子，因其任性而行、饮酒不节而未果。曹植后来多次上书请求任用，终未如愿，忧郁而死。在建安作家中，曹植作品流传下来的最多，共有80多首诗、40多篇散文、辞赋。曹植的赋形制较短、取材广泛、注重抒情，《洛神赋》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曹植的散文"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包括颂赞、碑文、章表、令、书等多种体裁，或慷慨激昂、情绪强烈，或轻松有趣、亲切直率。名篇有《与杨祖德书》、《求自试表》等。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曹植对后世影响很大，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

(谢琛香)

蒋　济(? ——249)　字子通。楚国平阿人。生年不详，卒于魏嘉平元年。初仕为郡计吏，后为州别驾。曹操屡用其言，辟为丞相主簿西曹属。曹

丕即王位，为相国长史。明帝时，为中护军。景初中，外勤征役，内修宫室，济上疏力谏。齐王即位，迁太尉。时丁谧等轻改法度，济复因星变极言得失。后以随司马懿屯洛水浮桥，诛曹爽等，进封都乡侯。济会致书劝爽罢兵，以仅免官勿治罪为约，后爽遭诛，济自伤失信，发病而卒。济著有《万机论》，会于黄初中上之政府，他的逸文，今尚可见其一二。（余久春）

何　晏（？——249）　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曹魏哲学家、散文家。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何进被杀后，其母尹氏被曹操纳为夫人，何晏被收养，后娶操女金乡公主为妻。正始初，曹爽执政，擢晏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吏部尚书。司马懿发动政变，被杀。何晏是魏晋玄学家代表人物之一，与王弼合称"王何"。作品主要是散文和赋，散文多是哲学、政治论文，如《无名论》、《无为论》等。赋今仅存一篇，即《景德殿赋》。著作有《论语集解》10卷，《道德论》2卷，本集11卷。后二者已佚，清人严可均辑其佚文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萧　晟）

桓　范（？——249）　字元则。沛国人。生年不详，卒于魏嘉平元年。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220），为羽林左监，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籍皇览。正始中（244），拜为大司农，以清省称。时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加敬重。司马懿起兵讨爽，范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征外兵自辅，爽不从。初，司马懿闻范出从爽，不觉爽然道："智囊往矣"！后曹爽被骗罢兵，为所收，夷三族。范亦被诛。范作有文集2卷，传于世。（余久春）

应　璩（？——252）　字休琏，汝阳（今属河南）人。应玚之弟。魏文帝、明帝时，历官散骑常侍。曹芳即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博学好作文，大将军曹爽擅权，举措失当，璩曾作《百一诗》讽劝，颇具时名。他的散文以书信较有名，《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与侍郎曹长思书》等，都是富有文采的佳作。原有集，已佚，明代张溥辑其诗文，与应玚作品合为《应德琏应休琏集》，存《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文益人）

王　肃（195——256）　字子雍。东海郡人。生于汉献帝兴平二年，卒于魏甘露元年。年18，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黄初中，为散骑黄门侍郎。后拜侍中，迁太常。没，谥景侯。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喜郑玄，故采会同异，成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又集圣证论以讥短郑玄。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又注孔子家语，今尚盛行。（余久春）

李　康（196?——265?）　三国魏文学家。字萧远，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人。性介立不能和俗，尝作《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出仕为浔阳长，政绩有美声。其散文今仅存《运命论》1篇，文中探讨了国家治乱与士人命运间关系的问题，他既提出了"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存乎乐天知命矣"，"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的处世观点，又强调虽然"木秀

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但志士仁人“蹈之而弗悔”，是为了“遂志而成名”。曲折地反映出魏晋易代之际知识分子对待政治的矛盾心情。文收《文选》。（文益人）

杜　恕（198——252）　字务伯。京兆杜陵人。生于汉献帝建安三年，卒于魏嘉平四年。年55岁。为人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太和中（230左右）为散骑黄门侍郎。推诚以质，不治华饰，专心向公，论议亢直，故无名誉。在朝八年，不结党援。后为幽州刺使，为程喜所劾，徙章武郡，卒。恕在章武，著体论8篇，又著兴性论1篇。隋书经籍志又有笃论4卷，亦称恕撰。

夏侯玄（209——254）　字太初。沛国谯人。生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卒于魏嘉平六年，年46岁。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曹爽辅政，因玄为爽姑子，累迁散骑侍中护军。旋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州诸军事。爽诛，征为大鸿胪。时司马懿权重，李丰、张辑共谋除懿，以玄辅政。事泄，夷三族。玄规格局度，负一时重望，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玄著有文集3卷，传于世。（余久春）

阮　籍（210——263）　字嗣宗，三国魏文学家，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为步兵校尉。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与当权的司马氏集团有一定的矛盾。蔑视礼教，后期则“口不臧否人物”，常常醉酒，对黑暗现实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他的82首五言《咏怀诗》在表现上多用比兴手法，或用自然事物象征，或用神话游仙暗示，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表现了诗人一生的复杂思想感情。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阮籍的散文，特别是著名的《大人先生传》，流露出倜傥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讽刺了那些礼法之士，比喻生动巧妙，笔锋辛辣之至。（宁志荣）

皇甫谧（215——282）　西晋文学家。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家贫，曾躬自耕稼，常常携书劳作。后患严重风痹，常委顿不起，犹手不释卷。朝廷屡召，皆不赴，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挚虞等出其门下。《晋书·皇甫谧传》称其“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今其著作多已散佚，仅存《高士传》和一些论、序文字。见收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羊　祜（221——278）　西晋文学家。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人。蔡邕的外孙。其姐即司马师之妻。羊祜以外戚之重，佐命之勋，历任高官，参预机要，封南城侯。博学能属文，然其作品多已亡佚，今存《请伐吴疏》和《让开府表》两篇，前者表现了作者对全国统一这一历史趋势的清醒认识，议论稳健，语言简捷有力；后者则表现了作者不以贵戚自居的品格，情意恳切，语言清通平实，文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益人）

杜　预（222——284）　字元

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将领、学者，曾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以灭吴功，封当阳县侯。多谋略，当时号称“杜武库”。主张以“立功立言”为达于圣贤之路。平吴后，乃耽思经术，大观群典，于《春秋》，扬周公以抑孔子。认为《公羊传》等系诡辩之言，汉儒注《左传》亦未合左丘明原意。撰有《春秋左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其中《集解》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杨文）

嵇　康（223——263）　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人。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与魏宗室通婚，官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嵇康既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好服食，求长生；又尚奇任侠，刚肠嫉恶，在现实生活中锋芒毕露，因此为司马氏所不容，而遭杀身之祸。嵇康的散文表现了愤世嫉俗，桀傲不驯和孤高自赏的思想。其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对自己的整个人格作了最好的写真，有着浓厚的文学意味和大胆的反抗思想。全文嘻笑怒骂，锋利洒脱，很能表现出他峻急刚烈的性格。

李　密（224——287?）　字令伯。一名虔。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人。父早亡，母何氏改嫁，李密被其祖母刘氏收养。历任蜀国州从事、尚书郎等职。泰始三年（267），晋武帝征李密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李密为此上《陈情事表》。武帝览表感动，命郡县供其祖母奉膳。《陈情事表》中，李密陈述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暂时不能应诏的苦衷，把处境和祖孙间真挚深厚的感情写得婉转凄恻。文章的语言尤具特色。如“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形象生动，词意真切，传为千古名句。另著有《述理论》十篇，已佚。

钟　会（225——264）　字士季，三国魏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西）人。幼时好学，机敏善辩。正始中为秘书郎，转任尚书中书侍郎。历任黄门侍郎、司隶校尉，官至司徒。是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其散文精炼名理，工于文辞。著《道论》20篇。作品以《檄蜀文》较著名。《文心雕龙·檄移篇》誉之为“壮笔”。（宁志荣）

王　弼（226——249）　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卒于魏嘉平元年。玄学家。曾任尚书郎，少年即享高名。好谈儒道，辞才逸辩，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世称“正始之音”。认为“道者‘无’之称也”，天地虽大，“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对“道”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更从“凡有皆始于无”，肯定名教（有）出于自然（无）。用“援老入儒”方式，为封建伦理纲常辩护，即以新的玄学代替当时逐渐失势的汉儒经学。其注《易》偏重哲理，扫除汉代经学烦琐之风。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余久春）

刘　伶（生卒年不详）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仕魏为

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对朝廷策问，盛言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不妄交游，唯与阮籍、嵇康友善，为竹林七贤之一。嗜酒，作《酒德颂》，蔑视礼法，主张“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放诞颓废的精神面貌，文章为历代所盛传。亦能诗。

向　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颖慧，与嵇康等友善。本隐居不出，景元四年（263）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应征到洛阳，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为“竹林七贤”之一。今存赋、文各一篇，《思旧赋》是其入洛途经嵇康故居，睹物思人所作，情辞沉痛，是赋中名篇；《难嵇叔夜养生论》，是为引发嵇康主张而写，与嵇康的《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论》形成一组阐发养生之道的完整文章。又好老庄之学。作《庄子隐解》，是注《庄子》中很有影响的一种。文赋收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成公绥（231—273）　字子安，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人。博涉经传，张华“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晋书·成公绥传》）。举荐为太常博士。擅长辞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将他和陆机并列，其赋多文辞清隽，《啸赋》可为其代表。原有集，已佚，明人张溥辑有《成公子安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文益人）

张　华（232—300）　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晋初任中书令、散骑常侍，以力赞伐吴功封广武侯，迁尚书，后进为侍郎中书监。尽忠匡辅，加封为公。元康六年拜司空。后被赵王伦和孙秀所杀。有志怪小说《博物志》10卷，王嘉《拾遗记》里说，张华尝“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400卷，奏于武帝。”后整理成10卷，书中分类记载了异境、奇物以及古代琐闻杂事，又传《列异传》亦为张华所撰。　（姚远）

陈　寿（233—297）　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治《尚书》、《春秋》三传，精于《史记》、《汉书》。仕蜀汉为观阁令史、散骑黄门等职，入晋，张华爱其才，举孝廉，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晋书·陈寿传》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著《三国志》65卷，分《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时期60年间的历史。其文笔简约，以一些传记文写得较生动精采。如《诸葛亮传》、《张昭传》、《周瑜传》等。他在《志》中所记载叙述的历史故事，对后世的文学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夏侯湛（243？—291？）　字孝若，谯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少为太尉掾，晋武帝泰始时，拜郎中，后为中书侍郎、南阳相，惠帝时为散骑常侍，元康初病逝。他和潘岳相友善，二人均神逸貌美，时人号为“连璧”。其散文颇具文采，以《东方朔画赞》最为著名。其《昆弟诰》1篇，系模仿《尚书》，文辞古奥，在魏晋散文中颇

为罕见。亦能诗、赋。著有《夏侯湛集》，已佚，明人张溥辑有《夏侯常侍集》。（文益人）

挚　虞（？——312？）　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师事皇甫谧。武帝泰始中，举贤良，拜中郎，擢太子舍人，除闻喜令。历任秘书监、卫尉卿、太常卿等职。后遇洛京荒乱，以馁卒。挚虞一生著述颇富，有《文章流别志论》，《诗品》称为"详而博赡"。书已亡，从佚文看，他主张诗文以情志为本，诗则以四言为宗。他的《文章流别集》分类编集了古代文章。另有《三辅决录注》，已佚。今存诗5首和《思游赋》等文。辑本有明人的《挚太常集》、近人张鹏的《挚太常遗书》。（张文颖）

潘　岳（247？——300）　字安仁。西晋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东）人。世宦之家，从小受到文学熏陶。"总角辩惠，摛藻清艳，乡邑称奇童"（《文选·藉田赋》李善注引）。"美姿仪"，有"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晋书·潘岳传》）之说。晋武帝时，举秀才为郎。仕途坎坷，曾为司空掾、太尉掾，出为河阳令、怀县令，补尚书度支郎，几被免职。元康初回到洛阳，历任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性轻躁，为"二十四友"之首，依附于贾谧。永康元年（300），赵王伦辅政，中书令孙秀诬潘岳、石崇等为乱，被杀，夷三族。潘岳"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其辞赋既有写景抒情的《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又有叙事咏物的《西征赋》、《射雉赋》、《寡妇赋》。昭明《文选》收录其赋篇最多。在写作手法上铺陈求工、"烂若披锦"，充分体现了太康文学形式美的倾向。其哀诔文多达20馀篇，"辞婉情切"，哀痛感人。其诗以《悼亡诗》和《河阳县作诗》二首为代表作，缠绵婉曲，细腻真挚。故有"陆（机）才如海，潘才如江"（钟嵘《诗品》）、"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之赞誉。对郭璞及南北朝文人影响很大。明人张溥辑有《潘黄门集》。（孙安邦）

陆　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今江苏松江县附近）人。祖逊、父抗皆三国吴名将。少时任吴牙门将。吴亡，家居勤学。太康末与弟同至洛阳，是太康时期文坛最著名的作家。陆机的诗注重形式，雕琢词句，成就不如散文。他的散文《文赋》是一篇名作，总结前人的写作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创作感受，目的是"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内容包括文学创作的过程与经验，如文学上的想象、感兴和文学语言的创造性等问题，也谈到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文体的特征。另外，他的《演连珠》、《叹逝赋》和《吊魏武帝文》都很可观。《吊魏武帝文》对曹操功业的估价很有见地，那种凄怆的吊古之情也写得很浓郁。（宁志荣）

陆　云（262——303）　字士龙，吴郡华亭（今上海市）人。少有文名，与兄机时称"二陆"。历任浚仪令、清河内史、大将军右司马等职，陆机为成都王司马颖所杀，云亦同时被害。善诗文，文辞藻丽，旨意深雅。

《与杨彦明书》文笔简约，从对世事无常、人命奄忽的悲哀，可以看出作者对所处动乱时代的危机感。著作由后人辑为《陆士龙集》

张　载（生卒年不详）　字孟阳，安平（今河北安平）人。父收，官蜀郡太守，太康初（280左右），张载至蜀省父，道经剑阁，因作《剑阁铭》，益州刺史张敏上其文，晋武帝派人镌之于剑阁山。载起家为著作郎，累官太子中舍人，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长沙王请为记室督，拜中书侍郎，因世乱托病告归。与弟张协、张亢以文学著称，时称“三张”。善诗、文、辞赋，《蒙汜赋》是其成名之作，曾受到傅玄的推崇。《剑阁铭》影响最著，铭文先写剑阁形势的险要，次引古史指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的道理，被后人誉为“文章典则”（张溥《张孟阳景阳集题辞》）。原有集，已佚，明人张溥把他及弟协的作品辑为《张孟阳景阳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王　沈（生卒年不详）　字彦伯。高平（今山东巨野）人。出身寒素，受豪门世族压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终于乡闾。存世作品仅《释时论》一篇，为发抒内心积愤之作。《晋书·惠帝纪》载，惠帝“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释时论》，南阳鲁褒作《钱神论》，庐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时之作也。”文章指责了世族制度对人才的压抑，也表明了作者自己怀真抱素，甘于澹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向。文字或庄或谐，辛辣有力，是晋代一篇思想性很强的散文。

鲁　褒（生卒年不详）　字元道。南阳（今属河南）人。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隐居不仕。《晋书·隐逸传》谓：“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今所见《钱神论》，系严可均《全晋文》据《晋书·鲁褒传》、《艺文类聚》、《初学记》合抄而拼成。文章沿袭辞赋问难之体，虚拟司空公子与綦毋先生的问答，极论钱之妙用如神，语带诙谐，揶揄笑骂，姿肆酣畅。文中多愤世疾俗之语，颇为当时痛疾时世者所传诵。

左　思（生卒年不详）　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貌丑口讷，不好交游。泰始八年（272）前后，因其妹左芬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年间，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左思的文学成就在诗与赋，代表作为《咏史》诗和《三都赋》、《晋书》本传谓《三都赋》乃构思10年而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其体制宏大，事类广博，文采富丽，在后期大赋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抒情小赋《白发赋》以头发与人对话的寓言体抨击了“贵华贱枯”的社会现实，语言朴实，行文幽默。原有集，已佚，两篇赋收在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

左　芬（？——300）　字兰芝，

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左思之妹。少好学，善属文，晋武帝闻其名而纳入后宫，泰始八年（272）拜为修仪，后为贵嫔，姿陋无宠。《晋书·后妃传》称“帝重芬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所以今传赋颂多咏物之作。今存诗、赋、颂、赞诔等20余篇。其中以体物抒情小赋较有特色，如《离思赋》。旧有集，已佚，文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文益人）

刘　琨（270——317）　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东南部）人。早年生活浮华放荡，西晋末年，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成为爱国志士。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常为后人所传颂。历任刺史、大将军等职，转战抗敌，后被害。他的散文《答卢谌书》写得腾挪跌宕，层次分明，感情上激昂酸楚悲壮，文字简约劲拔，辞约义丰。由于他一生戎马倥偬，没有吟风赋月的闲情，传世作品不多。他的才学很为当世推崇。《晋书》本传评价道：“谌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宁志荣）

郭　璞（276——324）　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西晋末年他预计到家乡战乱将起，避地东南，在宣城太守殷佑幕下任参军，后转丹阳太守王导处任参军，晋元帝即位，任著作佐郎，迁尚书郎，后任大将军王敦的记室参军，因劝阻敦图逆，被杀。追赠弘农太守。善诗、赋，其《游仙诗》很有名，是其诗歌代表作。今存辞赋十篇，《江赋》为其代表作，文中极写大江之浩翰，地势之险峻，物产之丰富，铺张夸饰，文采宏丽，另如《流寓赋》、《登百尺楼赋》，也是他赋中佳作。郭璞在古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也有颇深的造诣，又精历算、术数。原有集，已佚、明人张溥辑《郭弘农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束　皙（？——300后）　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元康中，任司空张华属官、佐著作郎、博士尚书郎等职，永康元年（300）赵王伦辅政，召为记室，托病辞职归里，教授门徒。才学博通，曾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五经通论》等，及文数十篇，今佚，其作品今存《补亡诗》六首及数篇赋，其赋文笔质朴，有口语化倾向，与崇尚绮丽的文坛时尚不合，因此被时人所鄙薄，如《贫家赋》《劝农赋》等，原有集，已佚，明张溥辑有《束广微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木　华（生卒年不详）　字玄虚，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曾为太傅杨骏府主簿。擅长辞赋，今存《海赋》一篇，描写大海的气势浩翰，物产丰富，神怪精灵的出没，写得壮丽多姿，文采斐然。李善《文选注》引傅亮《文章志》称赞说：“广川木玄虚为《海赋》，文甚隽丽，足继前良。”在西晋辞赋中极负盛名。见萧统《文选》。（文益人）

干　宝（生卒年不详）　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少时勤学好读，博览书记，又好阴阳术数，留心《易传》。初以才学器识任著作郎，以参与平定杜弢之乱有功，赐爵关内

侯。晋元帝时以佐著作郎领国史，后为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宰相王导请为司徒左长史，迁散骑常侍。所著《晋纪》23卷，为两晋一朝编年体史书，人称良史，今亡佚。又撰集古今神怪灵异人物变化故事为《搜神记》30卷，亦散佚，今有后人辑本20卷。此外，尚著有《春秋左氏传义》15卷、《周易注》10卷、《周官注》12卷及《干子》8卷、集5卷，大多亡佚，现存文章约10篇，诗1首。其《晋纪总论》，抨击西晋朝政腐败淆乱，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斥责士风轻浮，论虚谈空，淫侈无度，奔竞名利，终至西晋倾覆，河洛为墟。高屋建瓴，理直气壮，抽绎细密，立论中允，为晋代论说文之名篇。　　(刘宣生)

葛　洪(284——364)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少好神仙导养之法，曾任谘议、参军等职。著有《抱朴子》、《神仙传》，托名汉刘歆撰《西京杂记》。《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论文主张立言须有助于教化，同时又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反对贵古贱今。又托名汉刘歆撰《西京杂记》，书中记述了西汉的宫室制度、风俗习惯，怪异传说、人物轶事等多方面的内容。在人物轶事中，不乏文彩动人的佳作。

(姚　远)

庾　亮(289——340)　字元规。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东晋政治家、文学家。晋明帝妻庾后之兄。永嘉五年(311)被征召任命为西曹掾，后转任丞相参军，封都亭侯。东晋初年拜官中书郎。咸和九年(334)，都督江、荆等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他谋求收复中原，未成身死。能诗、文，原有集21卷(《隋书·经籍志》)，已亡佚，其诗今不存，存世的几篇文为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让中书令表》一篇，表现了以国事为重的诚意，文章写得明白晓畅，有异于一般典重的表奏之文。

李　充(生卒年不详)　字弘度。江夏(今湖北安陆)人。晋成帝时丞相王导召他为掾，转记室参军，又曾任剡县令、大著作郎，奉命整理典籍。后迁中书侍郎，卒于任上。李充的散文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反映主要见于《翰林论》。此书原是总集，共54卷，至唐初仅存3卷，只是录其评论。留存至今的只有佚文8则，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论文比较注重文采，只是对"表"与"驳"认为"不以华藻为先"。大约因其议论较简略，《文心雕龙·序志篇》批评说"《翰林》浅而寡要"。亦能诗、赋。

孙　绰(314——371)　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历官著作佐郎、散骑常侍、廷尉卿、领著作郎。善诗文，为当时文士之冠。所为碑文尤为时人所重。东晋玄言诗盛行，绰与许询为之代表，绰少有高尚之志，为官前，尝居会稽，放浪山水十余年，作《遂初赋》以示其志；又作《游天台山赋》，词旨清新，文辞工丽，绰视之为平生得意之作，赋成，示

友人范启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世说新语·文学》）原有集，已佚，明人张溥辑《孙廷尉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文益人）

王羲之（321——379）　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幼讷于言，及长辩赡。以骨鲠见称。初为秘书郎，迁江州刺史。后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晚年不仕。善书，能博采众长，自成一体。后世许多大家都受到他的影响，被尊为"书圣"。文名为书名所掩，所作书信和杂帖，或慷慨言国家大事，或娓娓述生平之趣、友朋往来，写得不同流俗。其中尤以《兰亭集序》传诵久远，文章在叙述名士宴集兰亭的同时，描绘了山水之秀美，抒发了对死生的感慨。全文一气呵成，文笔清新俊美。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王右军集》。　（张文颖）

袁　宏（约328——约376）　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初入仕，谢尚引为参军，累迁至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文笔典雅，才思敏捷，深受桓温器重，使专掌书记。后入吏部郎，授东阳太守。袁宏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文心雕龙·才略》篇称："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他的散文大都辞意疏达，清颖有致。又曾撰《后汉纪》，对东汉史料的抉择去取，多自出鉴裁，为稍后的范晔撰写《后汉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而已"。亦能诗、赋，颇有时誉。原有集20卷，已佚，今存《后汉纪》30卷，佚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文益人）

陶渊明（365——427）　一名潜，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到他时家境已经没落。少年时怀有"大济苍生"的壮志，直到29岁才出仕。几次做官都不过是祭酒、参军等职。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陶渊明的抱负无从施展，而且必须降节辱身在官场周旋。曾一度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逢郡督邮来县，属吏告他应束带相见，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职而归。从此结束了仕隐不定的生活，走上了归田的"独善其身"的道路。陶渊明的作品现存诗120多首，散文6篇，辞赋3篇，及《读史述九章》和《扇上画赞》两篇近四言诗的韵文。陶渊明的散文虽然不多，但文笔简洁朴素，真切传神，反映了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五柳先生传》是诗人自撰的小传。文中以精粹的笔墨描写他的爱好、生活态度以及思想性情等。《桃花源记》，则生动地展现了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令人悠然神往。《自祭文》对自己的一生的行事，毫无悔恨之意，表现了诗人的骨气。陶渊明的作品表现出了耿介品格和一种孤高的态度，对污浊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对后世影响甚大。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曾经激励了后世许多人。　（宁志荣）

傅　亮（374——426）　字季友，祖籍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后籍北地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博涉经史，尤善文辞。初仕

东晋为中书黄门侍郎，刘宋禅晋，以佐命之功封县公，入直中书，专典诏命，表策文诰，悉出其手。又任尚书仆射、顾命大臣。少帝时为中书监、尚书令，领护军将军。文帝即位，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始兴郡公，固让不受。但终因参与杀死文帝之兄刘义符（少帝）、刘义真之谋，为文帝诛杀，著有文集31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傅光禄集》。现存文章近30篇，诗数首。其文颇具气势而词采丰华，名作如《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写故国沦丧之痛，语言精练，近于白描，感人颇深。《为宋公修张良庙教》，则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气势浑成而首尾完具。 （刘宜生）

南 北 朝

颜延之（384——456） 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幼时家庭贫穷，喜欢读书，无所不览。晋时为豫章公世子参军。入仕，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好酒，肆意直言，不畏权贵，且敢于面责文帝之过，不能容于世。其诗好词藻，喜用事。他的散文情感真实，语言朴素，但堆砌典故，成就不大。赴任始安太守途中，经汨潭，作《祭屈原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颜光禄集》。 （宁志荣）

谢灵运（385——433） 小名客儿。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十年，年49岁。少好学，博览群书，工书画，文章之美，与颜延之齐名。性奢侈，车服鲜丽。著有文集19卷，又编有策集10卷，诗集50卷，诗集抄10卷，设论集5卷，连珠集、新撰集乐府集11卷，回文诗集1卷，并传于世。 （余久春）

范　晔（398——445） 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南朝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少时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能隶书，晓音律，喜弹琵琶。历任秘书丞、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等职。后左迁宣城太守。元嘉二十二年，因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发，被诛。被贬宣城后，因对诸家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不满，博采资料，撰写了《后汉书》。原定为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其中十志未完成。今天所见《后汉书》中加入了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后汉书》继承了《史记》的优良传统，字里行间带有很强的思想倾向性，臧否人物，爱憎分明，传记刻划人物，形象生动，有血有肉。《张衡传》、《班超传》、《范滂传》都是杰出的篇章。作为史书的独创，范晔新增了党锢、文苑、列女等类传。除了博大精深的《后汉书》，范氏还存有《狱

中与诸甥侄书》。文中指出"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文章"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是当时进步的文学主张。原有集，已佚。今存文5篇，诗2首。　　（张文颖）

刘义庆（403——444）　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宗室。幼年即为宋武帝所知，初为豫州刺史、都督淮北诸军事。永初元年（420）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历任散骑常侍、度支尚书、丹阳尹，后出任荆州刺史、使持节都督七州诸军事，元嘉十七年（440）改任南兖州刺史、都督六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卒谥康王。其为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学，虽才词不富，已足为宗室之表。招纳文学之士，共相唱和，时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等著名文士并以辞章之美，从其左右。撰有《徐州先贤传》10卷、《典叙》、《幽明录》30卷、文集8卷，已散佚。其著名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新书》）8卷（今本作3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门，分类记叙汉晋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对后代笔记文学影响极大，仿作者甚多，在中国古小说中自成一体。另有赋、表等文章6篇、诗歌若干存世。《世说新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艺术成就很高。语言精练、文简意赅，颇能传达人物的个性特点，淡淡数笔，人物性格便跃然纸上，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但意味隽永，描画传神，一种高远疏淡的气质，很难企及。鲁迅评价曰："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丽"（《中国小说史略》）。在晋宋人的文章中颇具特色。此外《幽明录》现有佚文二百余条，描写叙述委婉入情，也反映出作者的功力。

（刘宜生）

谢惠连（407——433）　南朝宋散文家。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灵运族弟。他10岁能文，深得谢灵运赏识。《诗品》引《谢氏家录》称："康氏每对惠连，辄得佳语"。惠连行止不检，后在元嘉七年（430），才得做彭城王刘义康的法曹行参军。谢惠连的抒情咏物的小赋较有名，尤以《雪赋》为代表作。此赋沿用汉赋中假设主客的形式，展现了素洁瑰奇的画面。《隋书·经籍志》载有谢惠连集6卷。　　（萧　晨）

王　微（415——453）　南朝宋文学家。字景玄。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少好学，善属文，工书，兼解音律及医方卜筮、阴阳数术之事"，而"素无宦情"（《南史·王微传》）。16岁举秀才，曾任司徒祭酒等职，后被举为吏部郎，辞官家居。宋文帝下旨令就职，未应诏，终于不仕。因此钟嵘《诗品》称他"微君"。在骈文流行的刘宋文坛，王微的散文较有特色，文辞比较质朴，风格接近魏末嵇康等人。《报何偃书》自述胸襟，很少雕饰，几同口语，颇能显示作者淡泊名利的个性。又著有文学批评专著《鸿宝》，久佚。亦能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文9篇。

鲍　照（？——466）　南朝文学家。字明远。东海（治所在今山东

鄄城）人。出身寒微。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鲍照20多岁，为谋求官职，去谒见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被任为国侍郎。刘义庆逝世，他随之失职。后又出任过中书舍人等职，入临海王刘子顼幕，任刑狱参军，子顼起兵失败，照为乱兵所杀。鲍照一生沉沦下僚而不得志，但他的诗文俱佳，在当时即颇负盛名。其诗风格俊逸，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他的文基本上属于骈体范畴，但在声律方面不象后来的骈文那样严格，文中又时有抒情、议论的散句，如《登大雷岸与妹书》，文气跌宕，辞藻绚丽，兼骈、散之长，堪称佳构。著有《鲍参军集》。

谢　庄（421——466）　字希逸，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7岁能属文，及长，善辞令，美容仪，宋文帝见而叹曰："蓝田生玉，岂虚也哉！"后为随王诞后军谘议，领记室，元嘉二十九年（452）除太子中庶子，历官吏部尚书、吴郡太守、金紫光禄大夫，卒谥宪。史传谢庄著诗文400余篇，有文集20卷（《隋书·经籍志》作19卷），今存不及十分之一，其中《月赋》是南朝咏物写景小赋的代表作。明张溥辑有《谢光禄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文益人）

沈　约（441——513）　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梁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父璞，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被诛。约少年流寓，笃志好学，博通群书，宋初，起家奉朝请。入齐，任征虏记室，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国子监祭酒等职，为"竟陵八友"之一。后助萧衍登帝业，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官尚书令、太子少傅等职。卒。谥隐。沈约为齐梁文坛领袖。与小谢等共创"永明体"诗。他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强调诗歌的音韵格律，促进了律诗的形成，但也有过于苛细之处。其诗造语工丽，但思想内容贫弱，只有少数写景诗清新可喜。作为一代词臣，沈约的文章诸体兼备，但奉旨而作的持论文章，"逢时之意多，则觉性之辞少。"（张溥语）他的书信之作写得较为平易自然，如《与徐勉书》等。以文学家、学问家写史，沈约的史论写得有理有据，颇富文采。《谢灵运传》、《恩幸传论》诸文正是"出于沉思""归于翰藻"（萧统语）之作。所著《四声谱》、《宋文章志》、《晋书》、《齐记》均已佚。今仅存《宋书》及明人辑本《沈隐侯集》。　（张文颖）

张　融（444——497）　字思光，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孝武帝刘骏时，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参军，出为封溪令，后为仪曹郎，又入萧道成幕，萧道成代宋建齐，累迁至司徒右长史。言行诡怪狂放，"见者惊异"（《南史·张融传》），为文亦肖其为人，"独与众异"。原著作甚富，有《玉海集》10卷，《大泽集》10卷，《金波集》60卷，均已佚。今存《海赋》是其代表作，文辞诡激，与木华《海赋》并为名篇。明张溥辑有《张长史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文益人）

江　淹（444——505）　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历

仕宋、齐、梁三朝。宋时，起家南徐州从事。仕齐，历御史中丞、秘书监、侍中。入梁，迁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少孤贫好学，博览群书，早有文名。后以为“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自叙传》），于是不再著书为文。世人谓之“江郎才尽”。他的诗鲜有独创，较著名的《杂体诗》30首，是对自汉到宋三十位诗人作品的模拟。他的《恨赋》和《别赋》却是六朝赋的代表作。江淹的文章中，能反映其思想性格的是几篇书信，如《狱中上建平王书》、《与交友论隐书》等，其命意吐辞，颇有汉魏文之淳厚，在六朝不可多得。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江文通集》。（张文颖）

孔稚圭（447——501）　一作孔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刘宋时，曾任尚书殿中郎。齐明帝建武初年，上书建议北征。东昏侯永元元年（499），迁太子詹事。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孔稚圭文享盛名，曾和江淹同在萧道成幕中。史称他“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骈文《北山移文》。文章借北山山灵的口吻，嘲讽了当时的名士周颙故作清高而又醉心利禄的行为。文章写得尖刻泼辣，通过对山川草木拟人化的描写，嘻笑调侃，历来为之传诵。据《隋书·经籍志》，孔稚圭有集十卷，现仅存文十多篇。（宁志荣）

王　俭（452——489）　字仲宝。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南朝齐文学家、目录学家。自幼勤学，手不释卷。宋明帝时，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历任秘书郎、秘书丞、义兴太守等职，后辅佐齐太祖萧道成即位，礼仪诏策，皆出其手，封南昌县公，升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兼丹阳尹。齐武帝时任侍中、尚书令，领国子祭酒、太子少傅，卫军将军，中书监，卒谥文宪。王俭是齐初文坛的核心人物，曾主持学士馆，以其家为馆舍。殷勤奖掖后进。南朝文章，以用事为贵，数典为工，王俭是风气的推动者之一，《南史·王谌简传》说：“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自此以后，齐梁文翰，率以富博为长。不过，王俭本人的多数文章用典还不算太繁琐。他的文章大多是讨论礼制的议论文，纯用散体，少见骈偶。任昉《王文宪集序》说他“立言必雅”、“持论从容”。其“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南齐书·王俭传》）。王俭在目录学上很有贡献，他依刘歆《七略》撰《七志》，对旧例颇有突破。亦能诗。原有集，已散佚，今存《王文宪集》，系明人张溥所辑。（文益人）

范　缜（450?——510?）　字子真，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南朝齐梁间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少孤贫，事母孝谨。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从学名儒刘瓛。仕齐，任尚书殿中郎、宜都太守、尚书左丞等职。坐事流放广州，还为国子博士。著有《神灭论》一文，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思想。他以唯物主义物质第一的观点反对佛教的神不灭及因果报应思想。此论一出，朝野为之哗然。梁武

帝和竟陵王萧子良曾组织朝臣、僧众与之辨驳，都没有难倒他。《诗品》对他的诗有评论，但诗已不传。原有集，已佚。《神灭论》、《拟招隐士赋》、《与王仆射书》等文，存《弘明集》中。（张文颖）

陶弘景（456——536）　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朝齐、梁间文学家、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好读书，喜道术。20岁以前被萧道成引为诸王侍读。永明十年（492）辞官，归隐于句容茅山，炼丹习道，自号华阳陶隐居，其骈文《答谢中书书》："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是六朝山水小品名作之一。有集30卷，江总曾为之撰《陶贞白先生集序》，明人张溥辑为《陶隐居集》。（萧　晨）

任　昉（460——508）　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幼而好学，早年知名，举秀才。初仕宋为丹阳尹主簿，入齐为尚书殿中郎，司徒记室参军，与萧衍等同为"竟陵八友"中人。又拜太子步兵校尉，掌东宫书记，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贵戚之表奏，莫不请其代笔。他起草即成，不假点窜。梁代齐，禅让文诰，多出其手，历任吏部郎中、掌著作郎、义兴太守、秘书监等职。于典籍无所不读，聚书至万余卷，又手校宫廷秘阁所藏书，定其篇目。著述达数十万言，盛行于世，编为《杂传》247卷、《地记》252卷。文集34卷，今多散佚，明人辑有《任彦升集》，又有《文章缘起》、《述异记》二书，并题为任昉撰。今存诗歌20首左右，文章60余篇。为文师法傅亮，有文采而见渊博，尤长于表、奏、书、启诸体散文，刘孝标称其"遒文丽藻，方驾曹、王；英特俊迈，联衡许、郭。……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梁书》卷十四）。其时沈约的诗著名，时人并号曰"沈诗任笔"，享誉甚隆。现存《王文宪集序》、《吊刘文范》、《为萧扬州荐士表》等文章，笔调抒情，哀婉动人，虽"丽体行文"、"无伤逸气"。清人何焯评论说："任笔为有重名，亦以在当时稍为质健，特不能离去俗格，故高出有限耳"（《义门读书记》）。所论尚称中肯。晚年不忿"沈诗"之说，转好写诗，但用典过多，属辞滞涩，《诗品》讥为"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故时有"才尽"之谈。（刘宜生）

刘　峻（462——521）　字孝标，平原（今山东平原）人。南朝梁文学家、学者。幼时家贫，好学不辍。嗜书，闻有异书，必往观之。齐永明中，奔江南。建武中，为豫州府刑狱，在梁，安成王引为荆州户曹参军。后以疾辞，居东阳紫岩山讲学，从者甚众。普通二年卒，门人谥曰玄靖先生。武帝时，刘峻著《辩命论》抒写不被任用的感慨。任昉死后，他又写《广绝交论》讽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文中多慷慨不平之气。其《山栖志》、《追答刘沼书》等文在当时都极为人所称道。峻曾为《世说新语》作注，大受考据家的欢迎。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户曹集》。（张文颖）

谢　朓（464——499）　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父

纬，官散骑侍郎，母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家世既贵，少又好学，为南齐藩王所重。入仕后，累官至宣城太守、尚书吏部郎。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始安王萧遥光谋夺帝位，他不预其谋，反遭诬陷，下狱死。青年时即以文学知名，曾参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的文学活动，是"竟陵八友"之一，八友中，以他的成就最高。他又是永明诗人的代表。他的诗歌，对唐代诗坛有着深刻的影响，"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和杜甫对他都十分推重。其文名为诗名所掩，成就亦不如诗，但他的散文和抒情小赋，文辞清美，情见乎辞，不乏堪诵佳制。诸如《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齐海陵王墓志铭》、《思归赋》等，都是文情并茂的篇章。原有集，已佚，今存《谢宣城集》为后人所辑。（文益人）

丘　迟（464—508）　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其父灵鞠，也是当时的著名文人。丘迟在南齐时入仕，入萧衍幕为主簿。入齐后任中书侍郎，出为永嘉太守，又内迁为中书郎、司空从事中郎。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为脍炙人口之作，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一段，用江南风物打动陈伯之的故国之思，情景交融，清新明丽，尤为传诵。其作品，由张溥辑为《丘司空集》，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周季平）

王　融（467—493）　字元长，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举秀才，自恃才地，弱冠即欲绍兴家业，早至公辅，遂上书齐武帝求自试，官秘书丞，寻迁丹阳丞、中书郎，复以才辩机敏，兼主客郎。后为竟陵王萧子良举为宁朔将军军主，为"竟陵八友"之一，因助萧子良谋夺帝位，败，下狱赐死。著有文集16卷，今佚。现存诗歌80余首，文章50多篇，明人辑为《王宁朔集》。其诗歌创作讲究声律，与沈、谢等同为倡导"永明体"之健将。其文辞辩捷，尤善仓促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为文颇多陈述政见之作。永明九年（491），齐武帝于芳林园禊宴，命群臣赋诗，使王融为《曲水诗序》，状物写景，文藻富丽，极见才思，当世称之，钟嵘论其诗文，认为"有盛才，词美英净"，但五言诗非其所长（《诗品》卷下）。（刘宜生）

陆　厥（472—499）　字韩卿。吴郡吴人。生于宋明帝泰豫元年，卒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年28岁。少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奇。尝与沈约论四声。州举秀才，为王晏少傅主簿。迁后军行参军。永元初，父闲被诛，厥弟绛抱颈求代死，并见杀。厥坐系，寻遇赦，感痛而卒。厥著有文集10卷，传于世。（余久春）

钟　嵘（？—518）　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齐时，官司徒行参军。入梁，任衡阳王记室、晋安王记室等职。曾上书言事，抨击官场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的恶行。有感于当时形式主义诗风泛滥，创作《诗品》。钟嵘的文章写得自然而有特色，本传中尚存残篇《上齐明帝谏亲细务》和《上言军官》。

郦道元（466或472？——527） 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袭永宁侯。历冀州镇东府长史、东荆州刺史等职，为政威猛，深为权豪忌恨。晚年被谗出为关右大使，遭雍州刺史萧宝夤杀害。郦道元好学不倦，博览奇书。鉴于《水经》一书太过简略，又无旁证，他广泛搜求资料，亲到实地寻访考察，完成了价值远非原书可比的历史地理巨著《水经注》。书中将原来137条水道增至1252条，注文扩到原文的20倍。在记载水道的同时，他加入了大量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传说谣谚、有描述，有抒情，也有议论、考证文字，使全书内容丰富，文采绚烂，此书最有文学价值的乃是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它开拓了山水散文的新领域。如《巫峡》一段文字，简洁生动，引人入胜。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受其影响极大，苏轼亦曾有语“今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寄周安孺茶诗》）。 （张文颖）

吴　均（469——520） 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家世贫贱，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其文，颇称赏之。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刺史，辟为郡主簿，日与赋诗，文体清拔有古气，时人效之，称“吴均体”。其文工于写景，尤以小品书札见称，如《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写山水之佳美，文辞清新，意境高远，文学意味很浓，是优秀的山水小品。著有《吴朝请集》、《钱塘先贤传》，及小说《续齐谐记》等。

裴子野（469——530） 字几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少好学，善属文，初入仕为齐武陵王国左常侍。入梁后历任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等职。后被吏部尚书徐勉推荐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又兼中书通事舍人，掌中书诏诰，当时符檄，多出其手。大通元年（527）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卒于任上。裴子野继曾祖裴松之先业，撰《宋略》20卷。全书已散佚，其片断散见于《建康实录》、《通典》、《通鉴》，以《文苑英华》所载《宋略·总论》较完整。此文陈述刘宋兴亡史，叙事简捷，明畅易晓。《梁书·裴子野传》称“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他的文章一般都质朴无华，有秦汉遗风。亦能诗。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文益人）

周　颙（约公元473年前后在世） 字彦伦。汝南安城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前后在世。言辞辩丽，工隶书，兼善老易，长于佛理。初为宋益州主簿。宋明帝颇好玄理，以周有辞义，引入殿内。帝所为惨毒，他不敢显谏，辄诵经中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建元中，为始兴王前军咨议，直侍殿省。他于钟山西筑隐舍，休沐则居之，终日长蔬，颇以为适。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后卒于官。著有文集20卷。

温子升（495——547） 字鹏举。济阴冤句（今山东河泽）人。家世寒素，受学于崔灵恩等。长乃博览

百家，文章清婉。初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熙平初（516），对策高第，补御史。台中文笔，皆出子升手。历官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子升文笔，传于江外。梁武帝称他道："曹植、陆机，复生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济阴王晖业尝说道："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子升尝作《韩陵山寺碑》，庾信使北还，人问北方文士如何？信道："惟韩陵片石堪共语耳"！高澄引为咨议参军。及元仅、刘思逸等作乱，澄疑子升与其谋，饿之于晋阳狱而死。有文集35卷，及《永安记》3卷，皆传于世。

周弘正（496——574）　字思行。汝南安城人，周颙之孙。生于齐明帝建武三年，卒于陈宣帝太建六年。幼孤，与弟弘让、弘直俱为叔父侍中护军舍所养。年10岁，通《老子》、《周易》。舍每与谈论，辄异之曰："汝神情颖悟，清理惊发。后世知名，当出吾右。"年十五，补国子生，于国学讲易，诸生传习其义。起家梁太学博士，后为梁平西邵陵王府咨议参军。弘正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预知侯景之乱。又善清淡，为梁末玄宗之冠。入陈，累官尚书右仆射。卒，谥简子。著有《周易讲疏》16卷，《论语疏》11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5卷，《孝经疏》2卷，及文集20卷，并行于世。

邢　邵（496——？）　字子才，小字吉少。河间鄚（今河北任邱北）人。生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卒年不详。10岁能属文，雅有才思，日诵万言，一览便记。少在洛阳，承平无事，与时流专以山水游宴为娱。文章典丽，既博且速。年未20，名动公卿。常与阳固、裴伯茂等相唱和。每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初仕魏为著作郎，累迁中书侍郎。尔朱兆为乱，邵避居嵩山。入北齐为黄门侍郎，国子祭酒。晚年，博览典籍，无不精通。时温子升为文士之冠，世谓之"温邢"。邵虽贵，不以才傲物。尝居一小屋，满置果饵，与宾客共啖。内行修谨，亲戚雍穆。著有文集30卷，传于世。　（余久春）

苏　绰（498——546）　字令绰。武功（今属陕西）人。西魏政治家、散文家。早年因从兄苏让荐举，被宇文泰任命为行台郎中，后任大行台左丞、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等职。西魏文帝大统十年（544）（《北史·苏绰传》作十一年），他奉宇文泰之命，作六条诏书。同年，又奉宇文泰之命，欲革晋代以来文章浮华之弊，仿《尚书》作《大诰》。这两篇文章纯属散体，质朴无文，一反当时骈体风尚，因此他被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但他的主张和创作在当时的影响却不是很大，对扭变骈俪文风也未起多大作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评论说："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刘令娴（生卒年不详）　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孝绰第三妹、徐悱妻，世称刘三娘。约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前后在世。能诗善文，诗多

写闺怨，以《答外诗》2首较有名。文仅存《祭夫文》1篇，乃徐悱死后所作，文辞凄怆哀惋，颇为时所称道。见于《艺文类聚》，又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益人）

萧　统（501—531）　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梁武帝长子，甫2岁，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曰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耋年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及长，读书数行俱下，诗文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又随武帝笃信佛教，遍览众经，招引名僧，讲论不绝，自立新义。尤爱文学，聚书近3万卷，招引才学之士，讨论篇籍，商榷古今，继之以文章著述，唱和相酬。曾聚集文士，编集《文选》30卷，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共700余首，分为38类，包罗宏富，代表性很强，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重要的文学史参考资料。又有文集20卷，已佚，后人辑为《昭明太子集》。复撰集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10卷，选编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20卷，现均亡佚。今存各体诗歌若干首，文章约50篇。《文选》选录诗文的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要以"文为本"。讲求辞藻华美，声律和谐，对偶用事切当，内容典雅，形式华丽，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学发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力求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并独推崇陶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但实际上有偏重辞采的倾向。《文选》对后世影响极大，形成专门研究《文选》的"选学"。宋代谚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可见一斑。

（刘宜生）

沈　炯（502—560）　字礼明。吴兴武康人。生于梁武帝天监元年，卒于陈文帝天嘉元年，年59岁。少有隽才，为时所重。仕梁为吴令。元帝时，领尚书左丞。为西魏所虏，授仪同三司。以母老在东，恒思归国。恐魏人爱其文才而留之，恒闭门却扫。时有文章，随即弃毁，不令流布。尝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之，陈已思乡之意。寻获东归，武帝即位，加通直散骑常侍。军国大政，多预谋谟。文帝尤重其才，欲宠贵之。会王琳入寇，帝欲使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将军，遣还乡里，收合徒众。以疾卒于吴中，谥恭子。炯著有文集20卷，行于世。

（余久春）

萧　纲（503—551）　即梁简文帝。字世缵，公元549—551年在位。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武帝子，于大通三年（531）立为皇太子，太清三年（549）侯景攻破建康，武帝死，他即位，大宝二年（551）为侯景所杀。为太子时，常与文士徐摛、庾肩吾等，以轻靡绮艳的文辞写上层社会生活，时称"宫体"。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梁简文帝集》。萧纲的文章，流传较广的是其尺牍，如《诫当阳公大心书》，文中有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慎重，文章且须放荡。"在当时颇有影响。另如《答徐摛书》，亦是其书中名篇。（文益人）

魏　收（506—572）　字伯

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魏宣武帝正始三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年67岁。年15，能属文。在魏除太学博士。后典起居注，兼修国史。节闵帝立，以北主客郎中召试，下笔便就。与温子升、邢邵齐名，世称“三才”，又称“邢魏”。高欢召赴晋阳，以为中外府主簿。高澄深重其才，及齐受禅，诏册皆出收手。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寻诏令撰《魏书》。武成帝立，仕至开府右仆射。武平中，以开府中书监卒于位。谥文贞。收虽以文才显，然性褊狭，见当途贵游，每以言色相悦，在洛阳日，行动轻薄，人号为“惊蛱蝶”。又好音乐，善胡舞，曾使梁，与部下各买婢馆中，遍行奸秽。《魏书》一出，举国大哗。因其挟私妄为，前后颠倒，贿赂成书，来朝廷诉事者，日数十起，怨声沸道，名其书曰“秽史”。齐亡之后，冢为人所发，骨被弃于外，相传即报其曲笔之恨。收所著《魏书》共120卷，清人列为二十四史之一。又有文集70卷，并传于世。

张正见（？——575左右） 字见赜。清河东武城人。生年不详，卒于陈宣帝太建中。幼好学，有清才，梁简文在东宫，正见年13，献颂，简文甚赞赏之。尝预讲筵，请决疑义，吐纳和顺，进退详雅，四座咸为属目。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国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骑侍郎，迁彭泽令。值梁季丧乱，避地于匡俗山。陈武帝受禅，诏为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历宜都王限外记室，撰史著士，带寻阳郡丞。累迁通直散骑侍郎，卒。正见著有文集14卷，其五言诗尤善，大行于世。 （余久春）

徐　陵（507——583） 字孝穆。祖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南朝梁陈间骈文家。早年即以诗文闻名，随其父徐摛在萧纲幕下任职，后任东宫学士。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出使东魏，被留于邺城达7年之久。南归后入陈，位至太子少傅。徐陵骈文中比较优秀的作品是他羁留北齐时所写的一些书信。如《在北齐与宗室书》真切地流露了自己羁旅愁苦的心情。《玉台新咏序》绮艳精工，也是一篇传诵的文章。徐陵与庾信齐名，合称为“徐庾”，但笔力不如庾信遒劲。徐集最通行的版本是清人吴兆宜注本。《玉台新咏》也被认为是徐陵所编选。

（萧　晨）

庾　信（513——581） 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早年曾任梁湘东国常侍等职，随同父庾肩吾及徐摛、徐陵父子出入宫禁，陪同太子萧纲等写作一些绮艳的诗歌，被称为“徐庾体”。曾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梁武帝末，为建康令，建康失陷，往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元帝承圣三年（554）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克江陵，因被留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诗歌成就很高，杜甫对之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的评价。又擅辞赋、骈文，其骈文成就在六朝堪称首屈一指。其辞赋中象《枯树赋》、《竹杖赋》、《伤心赋》等抒情小赋都是

传诵一时的名作；《哀江南赋》是其代表作，文章用赋体写梁代兴亡史和作者自传，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其著作，后人辑其遗文编有《庾子山集》(《四部丛刊》本)、《庾开府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　(文益人)

顾野王（519——581）　字希冯。吴郡吴（今江苏吴县）人。生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卒于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幼好学，尝制《日赋》，领军朱异见而奇之。12岁随父至建安，著建安地记二篇。长而遍观经史，精记默识，天文、地理、筮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又善丹青。与王褒同为梁宣城王宾客。王于东府起斋，命野王画古贤像，褒作赞，时人称为“二绝”。梁亡入陈，天嘉初，补撰史学士。任终黄门侍郎、光禄卿。野王撰著《玉篇》30卷，《舆地志》30卷，《符瑞图》10卷，《顾氏谱传》10卷，《分野枢要》1卷，《续洞冥记》1卷，《玄象表》1卷，及文集20卷，并行于世。又撰《通史要略》100卷，《国史纪传》200卷，未就而卒。

江　总（519——594）　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生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卒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年76岁。7岁而孤，依于外氏。幼聪颖有至性。及长。笃学有辞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昼夜寻读，未尝辍手。年18，起家梁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参军。累迁至太子中舍人。侯景之乱，流离岭南。入陈，为太子詹事。后主即位，擢仆射尚书令，不持政务，日与后主宴游后庭，与诸文士共为艳诗，号为狎客。君臣昏乱，以至灭亡。入隋，复拜上开府。卒于江都，世称江令。著有文集30卷，传于世。　(佘久春)

陈　暄（？——607左右）国山（治所在今江苏宜兴西南）人。学不师受，文才俊逸。陈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及即位，迁通直散骑常侍，与孔范、袁权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谓为狎客，后主甚亲昵而轻侮之，尝倒悬于梁，临之以刃，命使作赋，限以晷刻，援笔即成，不以为意，而傲弄转甚，后主不能容，尤侮之，发悸而死，性嗜酒，沉湎无度，《与兄子秀书》，论饮酒之道，涉笔成趣，颇具逸旷之致，为后世所传诵。文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文益人)

颜之推（531——？）　字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其家世精《周官》、《左传》之学，之推早传其业，性恶虚谈，博览群书，词情典丽。初仕南朝齐，历任湘东王左常侍、中书舍人、散骑侍郎。西魏攻破江陵，携妻子奔北齐；任奉朝请、黄门侍郎、平源太守。齐亡入周，为御史上士。周亡复于隋开皇中被太子召为学士，旋卒。史载其为人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尤工尺牍，应对闲明。著有文集30卷，《集灵记》20卷，已散佚，《冤魂志》(一名《还冤记》)3卷，今存。又撰《颜氏家训》7卷，分序致、教子、兄弟等20篇，盛行后世。另有诗歌五首、文章二篇存世。其《观我生赋》感慨一生际遇，文词清远，与庾信《哀江南赋》并称于时。诗仅五首，却为后世推为北魏、北齐间最优秀的作品。

其散文创作主要为《颜氏家训》，全书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亦不乏具有积极意义的见解，其文学观首重政治社会作用，次及抒发性情、艺术欣赏，强调内容重于形式。其文长于说理，多为随笔式的短文，风格平易亲切，对比鲜明具体，描写人物故事均极生动，语言运用通俗平淡，朴素无华，意味隽永，间有讽刺之笔，又常采用形象比喻及谣谚入文，接近当时口语，在南北朝文学史上独具一格。

（刘宜生）

杨衒之（生卒年不详） 杨，或作阳，又误作羊。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曾任期城郡太守、秘书监等职。北魏大兴佛教，洛阳佛寺逾千，后经战乱，多化为灰烬。他重过洛阳，感其颓败，恐后世湮没无闻，于是作《洛阳伽蓝记》。此书不仅描述了佛教建筑的富丽，揭露了王公贵族的奢华，而且还记载了大量当时的人物故实、政治、风俗等，具有历史地理方面的价值，其文笔浓丽秀逸，记述婉转有致，又是优秀的散文集，著名的篇章有《法云寺》、《寿丘里》等。

（张文颖）

隋 唐 五 代

虞世南（558——638） 字伯施，越州馀姚（今属浙江）人。与兄虞世基同受学于南朝陈顾野王。文章婉丽，慨慕徐陵；徐陵亦以为类己，由是知名。仕隋为秘书郎，未见重用。入唐，为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后为秘书监，封永兴县公。以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见称于世。尤精于书法。亲承王羲之七代孙僧智永传授，继承了二王的传统，外柔内刚，笔墨圆融遒丽。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另辑有《北堂书钞》160卷，分类编排，摘录群书之名言隽句，供当时作文采摭之用，颇有影响。

魏　征（580——643） 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少孤贫落拓，而有大志，著意纵横之术。隋末参加瓦岗军起义，后随李密投唐。初为太子洗马，及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贞观三年（629）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常被召入内室询以政事得失。他敢于直谏，史有“诤臣”之誉。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世称魏郑公。曾主持编撰《隋书》和《贞观治要》。《隋书》的序论及《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皆出其手，故又有良史之称。在文学上，他崇尚质朴纯正，反对浮靡轻巧，鄙弃梁陈以来的轻艳文风。所著以政论文最为出色，颇多传世名篇。《十思疏》告诫太宗“居安思危，戒奢思俭”，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

十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这类文章，由骈入散，气势雄骏。对后来刘知几、陆贽、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原有文集20卷，已佚。《全唐文》存其文3卷。

王　绩（585——644）　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尝居东皋，号东皋子。隋大业年间中举孝悌廉洁科，授秘书省正字。入唐，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曾任大乐丞。后弃官还乡。王绩早年有用世之志，曾两度出仕，皆因失意而归隐。因而每每寄情于酒，向往阮籍、嵇康和陶渊明，著《醉乡记》以见其意。诗以《野望》最为人所传诵。其文则骈、散兼长，雅有魏晋文章的萧疏风致。今存其集有《东皋子集》3卷和《王无功集》3卷。　（吴小平）

李世民（598——649）　唐高祖李渊第二子。隋末天下大乱，他亲临戎阵，征服四方，以成统一。即位后，励精图治，从谏如流，去奢轻赋、宽刑整武，海内升平，威及域外，史称"贞观之治"。李世民雅好文学、书法艺术，开文学馆，又于殿左置弘文馆，听朝之后，则与诸学士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未尝少息，在位23年，卒，庙号太宗。其文和平真挚，气舒力遒，善用比喻，晓畅自然。　（朱野坪）

玄　奘（600——664）　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13岁出家，游学各地。曾冒险孤征到南亚各地。一生中翻译了佛经74部，1335卷，1300多万字。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贞观二十年（646），完成了由他口述、门徒辩机记录的《大唐西域记》12卷。书中翔实地记载了玄奘离开高昌后，亲历的110国和传闻的28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势、政治文化、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全书文笔谨严，朴质流畅，骈散相间之中，体现出绚丽雅致的风格。在唐初文坛上堪称上乘之作。十九世纪以后，法、英、日等国先后出版了该书的译本，影响深广。玄奘所译佛典存于《大藏经》中。所著除《大唐西域记》，多已亡佚，今仅存《表启》1卷及《三类境》诸文。

骆宾王（626?——684?）　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7岁能诗，有神童之誉。曾任临海丞。光宅元年（684），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被任为艺文令。兵败后下落不明，或说被杀，或说为僧。他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四人齐名，为"初唐四杰"。其诗擅长七言歌行和五言律诗，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颇善骈文。所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是其代表作。才华清艳，词采富赡，气势充沛个中蕴有一股清新俊逸之气，充分体现了骆宾王的文学才能。据说武则天读此文，曾发出"宰相安得失此人"（《新唐本》本传）的感叹。文集久已散佚。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较为完善。　（吴小平）

朱敬则（634——709）　字少连，亳州永城（今属河南）人。历任高宗、武则天、中宗诸朝，官洹水尉、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郑州刺史等职。在朝敢于直谏，为政清廉。

他早以辞学知名，史论颇有新意，富于气势。文章虽仍受骈体束缚，但在风格上比较朴质自然，显示了散文发展的趋势。《全唐文》存其文2卷。

（宋野坪）

卢照邻（636？——695？） 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郡治今河北涿县）人。博学能文。初为邓王府典签，极受邓王爱重，比之司马相如，出为益州新都尉。曾遭横祸，被友人救护得免。后为风痹症所困，投颍水而死。为"初唐四杰"之一。杨炯自称"愧在卢前"，可见颇为推崇他。其诗以歌行体最佳。《长安古意》等名作，意境清迥，以韵致取胜，擅长骈文。尝著《五悲文》以自明。原有文集20卷，已佚。现存文集《卢升之集》和《幽忧子集》，均为7卷。

（吴小平）

李　峤（645——714） 字巨山，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少有才名，20岁时擢进士第，举制策甲科，累官监察御史，曾劝降僚兵，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迁给事中，武后、中宗朝，屡居相位，封赵国公。后左迁怀州刺史。玄宗时贬滁州别驾，改庐州别驾。李峤与杜审言、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为时人景仰。有文集50卷，今佚。 （宋野坪）

王　勃（650——676） 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王通为隋末著名学者。家学深远，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赞为神童，对策高第。历官朝散郎、虢州参军。王勃诗文，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誉称"初唐四杰"。他在文学上主张实用，力图改变当时文坛上"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的诗风，并创作了许多"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改变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其诗风格比较清新。王勃的文章为"四杰之冠"（《四库全书总目》）。所作多为骈文，但不乏佳作。尤其是《滕王阁序》，在唐代即已脍炙人口，传为天才佳作。其中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为历代所激赏。因此崔融称赞："王勃文章宏逸，固非常流所及。"（《旧唐书·文苑传》）所著文集，较早的三种本子均已不传。现有清人蒋清翊著《王子安集笺注》。

杨　炯（650——？） 华阴（今属陕西）人。十岁举神童。上元三年（676）应制举及第。补校书郎，累迁詹事司直。官终盈川令，世称杨盈川。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合称"王杨卢骆"，为"初唐四杰"。杨则自称"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诗以边塞诗著称，风格豪放。今存赋、序等文50篇。时人认为所为佳构既胜于卢照邻，也不在王勃之下。其《王勃集序》，高度评价了王勃改革当时轻靡文风的创作实践，反映了"四杰"较为一致的文学思想。原有文集30卷，已佚。今有明人童佩辑编的《盈川集》10卷，附录1卷。 （吴小平）

陈子昂（659？——700）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出生于豪富家庭，青年时代轻财好施，慷慨任侠。又博览群书，关心政治，睿宗文明元年（684）举进士，官麟台正

字，后升右拾遗，切直敢言，不畏权贵。曾两度出塞：26岁时随右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过西北边塞居延海、张掖河、同城等地；36岁时又随建安郡王武攸宜东征，抵御契丹，到过燕京一带地方。圣历元年（698）辞官还乡，权臣武三思唆使射洪令段简罗织罪名，将他诬陷下狱而死。陈子昂是初唐杰出的诗人，他提出革新的主张，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并以自己具有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和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的诗歌实践，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他又是著名的散文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作为一个有宏伟抱负的政治家，他的许多政论奏疏，切中时弊，关心整个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其关于反对穷兵黩武、滥施刑罚和官吏贪暴等，都揭露得剀切而详尽。振笔直书、气势磅礴，疏朴近古，风格同他的诗歌一致，改变了六朝以来靡丽柔丽的文风，具有很大的变革性。他的散文时而也夹杂着骈偶语句，烙上了时代的烙印。唐代许多散文家对他的散文予以很高的评价，韩愈《荐士》诗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有《陈伯玉文集》。（朱野坪）

慧　立（生卒年不详）　俗姓赵，天水（今属甘肃）人。15岁出家，他是玄奘的弟子，以擅长文学见称。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传述玄奘一生的活动业绩，把玄奘的精神意志、音容笑貌描绘得栩栩如生。写法上以年系事，详略得当，叙事简洁而有章法。文笔则以散为主，不同于当时的骈体，可谓别具一格。此书初为5卷，慧立去世以后，文稿散佚，经玄奘另一弟子彦悰搜求完备，笺补为10卷，垂拱四年（688）成书。是我国传记文学中的巨著。

富嘉谟　武功（今属陕西）人。生卒年、字号均不详。与陈子昂同时而稍后。举进士后，于武后长安中转晋阳尉，与吴少微同官友善。唐中宗时预修《三教珠英》，官终左（一作右）台监察御史。富嘉谟与吴少微的文章，不与当时轻靡文风相沉浮，而是独辟门径，以经术为本，崇尚雅质，摒弃浮靡，文辞渐趋雄迈。因而名重一时，号为“富吴体”（或“吴富体”）。风格约与陈子昂相近，对后来的古文运动具有启迪作用。原有文集10卷，已佚。《全唐文》收其文4篇，《全唐诗》存其诗1首。

吴少微　新安（今安徽歙县）人。生卒年、字号均不详。进士及第。中宗时与富嘉谟同官，拜左（一作右）台监察御史。二人同官友善，所作文章，风格趋于遒劲，重于一时，人称“吴富体”（或“富吴体”）。是陈子昂到韩柳古文运动之间的一个重要阶段。原有文集10卷，已佚，《全唐文》收其文6篇。（吴小平）

刘知几（661——721）　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高宗永隆元年（680）进士，授获嘉主簿。武则天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兼修国史。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因事贬授安州都护府别驾。刘知几是唐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专攻史学，兼修国史30余年，著成《史通》这部系统

地阐述史学理论的名著。书中严正批评了当时史学著作中存在的骈俪之风，提出了一些正确主张，对后代史学、文学影响都很大。刘知几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宋　璟（663——737）　号广平，邢州南和（今河北南和）人。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少耿介有大节，博学、工文翰。弱冠举进士，累迁凤阁舍人。得武后器重，升任左御史中丞。中宗时历任吏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职。后被排挤出为杭、相二州刺史。开元四年（716）拜相，累封广平郡公。开元八年罢相，位终尚书右丞相。宋璟文妩媚多姿，清新活泼，平易通晓，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皮日休十分推崇他。《全唐文》录其文18篇。

张嘉真（666——729）　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弱冠应五经举，为平乡尉，后坐事罢职归。武后长安（701—705）中被荐于武则天，拜为监察御史，累迁中书舍人，历秦州都督、并州长史。玄宗八年（720）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令。十一年（723）出为幽州刺史，后为工部尚书、定州刺史，知北平军事。累封河东侯。张嘉贞为政严肃，数受嘉赏。他断决敏速，善于敷奏。他的《石桥铭并序》典雅古奥，骈俪之文，间以散句，自成一格，亦唐文一体。

张　说（667——730）　字道济，一字说之。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后徙洛阳。武后时授太子校书，累官至凤阁舍人。后以不附张易之兄弟，忤旨，流配钦州。中宗朝召还，睿宗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时拜中书令，因不附太平公主，罢知政事。复拜中书令，封燕国公。坐事贬岳州，后以平朔方胡酋叛乱功，拜兵部尚书。开元十七年（729）复拜尚书左丞相，加开府仪同三司，卒谥文贞。张说三次拜相，掌文学之任三十年，崇儒重道，喜延纳后进，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他为文俊丽，用思精密，长于碑文、墓志，在当时影响很大，世称“大手笔”，与许国公苏颋齐名，号称“燕许”。存有《张说之文集》。

潘好礼（生卒年不详）　贝州宗城（今河北威县）人。举明经，累授上蔡令。擢监察御史。开元三年，累转邠王府长史。不久，邠王出任滑州刺史，以好礼兼邠王府司马，知滑州事。后迁豫州刺史。他勤于吏治，清廉无私。复以公累，徙温州别驾。他博学善议，文笔流畅，说理透彻，当时颇有声名。《全唐文》收其文2篇。

苏　颋（670——727）　字廷硕，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自幼敏悟，弱冠登进士第，授乌程尉，举贤良方正。神龙中，历官至中书舍人。景云中，袭父封爵，为许国公。玄宗爱其文，擢中书侍郎，迁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后罢为益州长史。复入朝知吏部选事。去世后赠尚书右丞相，谥文宪。苏颋以文章显名，与张说并称“燕许”。有集30卷，已佚。

张九龄（673——740）　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唐中宗景龙初中进士，官秘书省校书郎，

后曾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等职，累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他为人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受李林甫排挤，贬为荆州长史。张九龄中年即有文名，奖掖和提拔了不少文人如王维等，对促进盛唐诗歌的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张九龄是盛唐前期重要诗人，尤其他的五言古诗影响极大。其文多应制之作，但有一部分书信、记序体文，风格自然，平易畅达，突破了当时浮艳的社会风尚。著有《曲江集》20卷。

李　邕（678——747）　字泰和，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李善之子。唐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李邕早具才名，善于属文。武后长安时召为左拾遗。中宗时贬富州司户，玄宗朝历任户部郎中、诸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世称李北海。他性格刚毅激烈，放任不羁，又多积财货，为李林甫所害。李邕最著名的是书法，挺峭顿挫，法度谨严而有奇变。亦善文，尤擅碑颂，语言平实、富有气势。明人辑有《李北海集》，《全唐文》收其文5卷。

王　维（701——761）　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父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他青少年时富有才华，博学多艺。开元九年（721）举进士，为大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事谪为洛州司仓参军。后归长安，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累迁监察御史、给事中等职。安史之乱时接受伪职，平乱后受到降职处分。后复累迁至给事中，终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他青年时就信佛，张九龄被逐对他思想上打击亦很大，中年以后一度居住于终南山，后又住蓝田辋川别业。退朝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又与裴迪等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有《王右丞集》；又是著名的画家，且精通音律。其文名为诗名所掩，其文多为骈体或骈散相间，属对工整，精于用典，平仄严格，音韵铿锵，文笔秀美，无论叙事、抒情。写景，都各臻其妙，亦擅一时之秀。

李　白（701——762）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他生活在一个富商家庭，少有逸才，遍读诸书，性格豪放，喜纵横术，好击剑，为任侠，重义轻财。他喜爱山水，漫游各地，常与隐士、道教徒交往，嗜酒求仙，有出世思想，同时又怀"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25岁左右出蜀东游，游踪几遍于全国，亦结交了许多名人。42岁时奉诏入长安，玄宗殊礼接见，命为供奉翰林，名动京师。但他傲岸狂放，不肯低眉事人，被赐金放还。安史之乱起，入永王李璘幕，后受株连，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晚年流落江南一带。享年62岁，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杰出的散文家。他的文善把议论、叙事、写景、抒情结合起来，奔放豪逸，自然流畅，风格近于他的诗歌，但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骈文风尚，其《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与韩荆州书》两文，传诵很广。今有《李太白全集》。

高　适（702？——765）　字

达夫，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少孤贫，性拓落，以建功立业自期，好游侠，与李白、杜甫等交游。天宝八载（749），经张九皋推荐，中“有道科”，任封丘尉，不久弃职。后为哥舒翰幕掌书记。安史之乱后，曾任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官至左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高适是唐代杰出的诗人，其文、赋流传甚少，但具意志沉雄、风骨高骞的风格，有《高常侍集》。

李　华（715——766）　字遐叔，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天宝二年举博学宏词，天宝十一年拜监察御史，为权贵所嫉。除右补阙。安禄山陷长安，受伪职。乱平，贬杭州司户参军，后擢检校吏部员外郎，以风痹去官，隐居山阳（今江苏淮安）。晚年奉佛，不甚著书。天宝时，李华与萧颖士齐名。李华爱奖士类，许多士人因之而得名。李华主张道为文本，文切实用，务反时文陋习，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是唐朝“文章中兴”的开启者。对韩柳亦有很大影响，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其为人称道的《吊古战场文》，极力描写战争严酷，人民罹难的惨况，借古讽今，低沉伤感。总的来说，他的风格是笔意纵横，辞气峻急。有后人辑《李遐叔文集》4卷传世。　（朱野坪）

萧颖士（717——768）　字茂挺，兰陵（今山东枣庄）人。另有晋陵（今江苏常州）、颍川（今河南许昌）两说，待考。开元二十三年（735）举进士，对策第一。天宝（742—756）初补秘书正字。奉使赵、卫间，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留客濮阳（今属河南），尹徵等皆执弟子礼，号萧夫子。召为集贤校理，李林甫数召见，不应。作《伐樱桃树赋》以讽林甫，李氏怒其不附己，调广陵参军事。史官韦述荐其自代，召诣史馆待制，以不屈李林甫而免职。林甫死，更调河南府参军事。时安禄山宠恣，颖士托疾游太室山。禄山反，往见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御守计。不见纳，因走山南，为节度使源洧所辟，掌书记。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见。乾元初，上书宰相崔圆，授扬州功曹参军，至官仅信宿即去。大历三年客死汝南逆旅，门人共谥其为“文元先生”。颖士聪隽过人，过目成诵。通百家谱系，尝编史传百篇，为时人所重。日本国使自陈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颖士与李华同以文学著于时，世称“萧李”。萧氏推崇屈原、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曹植、陈子昂等人，提出“宗经”、“载道”、“尚简”等主张，竭力反对当时衰靡的文风，实为韩愈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游梁新集》3卷，又文集10卷，均佚。今存《萧茂挺文集》1卷，系后人辑录。

（吴伟斌）

贾　至（？——772）　字幼邻，一作幼几，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初以校书郎为单父尉，与高适、独孤及等交游。天宝末任中书舍人。安史之乱中随玄宗奔四川。乾元元年（758）春，出为汝州刺史，后贬岳州司马。代宗宝应元年（762），复为中书舍人。官终散骑常侍。贾至曾为朝

廷掌执文笔，以文著称当时，甚受独孤及、梁肃等推崇。其文具有典雅华赡的风格。《全唐文》存文3卷。

苏　预（生卒年不详）　字弱夫，又名源明，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生卒年不详，活动年代在安史之乱期间，与杜甫、郑虔为友，玄宗朝曾任东平太守，国子司业。安禄山攻陷京师，他不受伪职。肃宗朝官考功郎中、知制诰等职。他工于文辞，语言流畅，清新可喜，天宝年间有文名。曾有集30卷，已佚，存文于《唐文粹》、《全唐文》中共7篇，韩愈对他的作品甚为称赞。

元　结（719——772）　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县（今河南鲁山）人。早年耘艺山区，折节向学。天宝十二年（753）举进士，明年擢第。安史之乱起，他率族人避难于猗玗洞（在今湖北大冶）因号猗玗子。乾元二年（759）受国子司业苏源明推荐，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翙幕参谋，招缉义军，抗击史思明叛军，保全城池。代宗时，任道州刺史。调客州，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使。大历七年（772）奉诏赴京，病死于长安。元结政绩卓著，同情人民，深受爱戴。他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他的散文，尤其是杂文体的散文，最具风格。行文意气超迈，笔力雄健，力扫骈俪绮靡之积习，具扬善除恶的现实性。总的来说，他的文章大抵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发人深省。他的《大唐中兴颂》峻伟雄刚，气象恢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唐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为者，自结始。"其他体裁的作品如诗、赋、颂、铭等，亦奇古峻绝，不同时俗，在大历时期，他是最有风格的散文家。他的针砭时弊的杂文和山水景物小记，对韩柳产生重大影响，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今有《元次山集》和他编选的《箧中集》存世。

独孤及（725——777）　字至之，洛阳（今属河南）人。幼丧父，得母教导，后通读五经，志大才高。20余岁游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间，与贾至、高适等友善。玄宗天宝十三载（754）举进士，补华阴尉。安史之乱时，避乱江南。后代宗召为左拾遗，迁吏部员外郎，历濠、舒二州刺史，以政清加检校司封郎中，徙常州。卒谥宪。独孤及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与李华、萧颖士齐名，喜荐拔后进，梁肃等师事之，对韩愈等亦有直接影响，独孤及的文章彰明善恶，长于议论，不徒以辞藻取胜，文风峭丽奇警。在唐代古文运动中起有重要作用。有《毗陵集》20卷。

陆　羽（733——804）　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不知所生，是个弃儿，为和尚积公拾得，抚育成人，自占《易经》得陆姓，羽为名，鸿渐为字。他经历坎坷，一度沦为伶工。上元初，隐居苕溪，自号桑苎翁、东岗子。陆羽能诗，工古调，多与人唱和。嗜茶，对茶道颇有研究，著有《茶经》。《全唐文》存其文4篇，其中《陆文学自传》叙事晓畅，人物形象丰满，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梁　肃（753——793）　字敬

之，一字宪中。安定（今甘肃泾川）人，世居陆浑（今河南嵩县）。幼逢安史之乱，转徙厄难于吴越。建中元年（780）至京师。中文辞清丽科，任太子校书郎。后受荐为右拾遗，因母老病辞。贞元五年（789）召为监察御史，转右补阙、翰林学士、皇太子储王侍读等职。卒，赠礼部郎中。梁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他自称是独孤及的"门下士"，在理论上受独孤及的影响，也主张"文本于道"，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其文具古朴流畅、粹美深远的风格，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且波及以后的韩愈。《全唐文》存其文6卷。

陆　贽（753——805）　字敬舆。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少孤，性格孤僻，勤于儒学。大历八年（773）登进士第。未几中博学鸿词科，授郑县尉。之后又以书判拔萃，补渭南县主簿，迁监察御史。德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建中四年（783）长安兵变，随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还朝后由谏议大夫转中书舍人，迁兵部侍郎。贞元八年（792）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因直言谏诤，又遭裴延龄等构陷，贬忠州别驾。待顺宗即位征他还朝时已去世，卒谥宣，世称陆宣公。陆贽一生博古通今，精于谋略，是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的政论文都以骈体写成，对仗工整，音韵协调，语言流丽，文气纡徐，善于以情入理，雄辩而有气势，且采用散文句法，具有自然流畅之优点，实为骈文体裁之又一改造与解放，体现了骈文向散文过渡的趋势，对韩愈、苏轼等人影响甚深。他亦被称为散文大家。《四库全书总目》云："《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贽文十余篇；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贽议，采奏疏三十九篇；其后，苏轼亦乞以贽文校正进读。盖其文号多出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往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陆贽的著作，今传《翰苑集》24卷，另有诗文别集15卷，已佚。（朱野坪）

欧阳詹（756前——798后）

字行周，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贞元八年（792）与韩愈、崔群、李观等23人联第，时号"龙虎榜"，闽人之举进士，由詹始。尝游太原，恋一妓。别后思念苦甚，闻妓死，一恸而卒。年四十余。文学上与韩愈等为同道。愈称詹文"切深，喜往复，善自道"（《欧阳生哀辞》）。唐末李贻孙也说："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故言而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欧阳行周文集序》）。著文集十卷，为詹子欧阳价所编集。《全唐文》存其文62篇。　（吴伟斌）

权德舆（759——818）　字载之，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人。后徙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自幼以文章闻名。德宗时召为太常博士，进中书舍人，知礼部贡举，后拜侍郎。宪宗元和五年（810）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年拜相。复守本官，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十三年（818）以病乞还，卒谥文。权德舆博览群书，著述特盛，能赋诗，工古调，乐府多情致。文章儒雅含蓄而又气势恢宏，独具一格，有《权载之文集》50卷。

裴　度（765——839）　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东）人。贞元五年（789）进士，宪宗元和时拜相。曾率兵讨平吴元济，封晋国公。官至中书令。死后赠太傅。他对士人多提携，时人无不敬重。文章不事雕琢，平直自然。《全唐文》存其文2卷。

李　观（766——794）　字元宾，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人，迁居苏州。贞元八年（792）与韩愈、欧阳詹等同登进士第，次年中博学宏词科。授太子校书郎。一年去世。他的散文仍多用对偶句式，没有完全摆脱骈文的束缚。虽不事华藻，但语言生硬艰涩。今传《李元宾文集》6卷。

柳　冕（生卒年不详）　字敬叔，河东（治今山西永济）人。生卒年不详。承家学渊薮，精通文史。历官右补阙、史馆修撰。因事贬巴州司户参军。还为太常博士、吏部郎中。因言事切直，为执政者所不容，出为婺州刺史。德宗贞元十三年（797）拜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团练观察使。死后赠工部尚书。柳冕主张文道并重，重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其关于"气"的理论，开韩愈作文论气的先河，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全唐文》存其文14篇。　（朱野坪）

令狐楚（766——837）　字壳士。宜州华原（今广西宜山）人。先世居敦煌（今属甘肃）。贞元七年（791）登进士第。宪宗时，为中书舍人、知制诰。敬宗时为尚书仆射，后出为刺史、节度使。《全唐文》载其文5卷，多为表奏，风格自然流畅。当时，世人称其"于笺奏制令尤善，每成一篇，人皆传讽"（《新唐书·令狐楚传》），其骈文"隶事生动，犹得子山遗意"，评价甚高。　（马清江）

韩　愈（768——824）　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3岁而孤，由兄嫂抚育成人，自幼备受艰辛，知读书，通六艺、百家学。25岁时中进士。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请免徭赋，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唐宪宗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随裴度平淮西有功，拜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书谏迎佛骨，触怒皇帝，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卒谥文。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在他和柳宗元的倡导下，造就了一大批古文作家，一时清新流畅的新文体蔚然成风，取代了骈文数百年来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文起八代之衰"（苏轼语），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韩愈主张文道合一，建立儒家道统，同时革新文体，建立新的文学语言。他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后人建立了楷模，韩愈的散文是唐文的最高典范。他继承了秦汉古文的优良传统，而且吸收骈文长处和古今语言，使文章骈散相间，节奏铿锵，形成了完美的形式。论说文在其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或结构严整，层次分明；或构思奇特，逻辑性强。杂文讽刺幽默，形式活泼，记叙文也占很大比重，或句奇语重、大笔淋漓；或夹叙夹议，形象丰满。抒情文中的祭文，感情真挚、文笔曲折

入微。总的来说，韩文气势充沛，雄奇奔放，奇偶交错，巧譬善喻，具有多样的艺术风格。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韩愈亦是唐代著名的诗人。有《昌黎先生集》。

吕　温（772——811）　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登进士第，次年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与王叔文等友善，是酝酿永贞革新的重要成员。贞元二十年（804）夏，以侍御史为入蕃副使，永贞革新失败后从吐蕃还朝，未能参与永贞革新。历任户部员外郎、刑部侍郎。元和三年（808），因与宰相李吉甫有隙，贬为道州刺史。以有善政，徙衡州。吕温曾从陆质治《春秋》，从梁肃为文章，学有渊源。擅长铭赞和政论，风格俊拔赡逸，雄辞杰出。刘禹锡、柳宗元对他极为称赞，清人王士祯《香祖笔记》特别推重吕温的赞、颂体作品，谓"时而奇逸之气"。有《吕和叔文集》10卷传世。　　　　　　（朱野坪）

李　翱（772——836）　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人，一说河北赵郡（今河北赵县）人。贞元十四年（798）进士，授校书郎，三迁为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805－820）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再迁考功员外郎，因李景俭之贬，除朗州（今湖南常德）刺史。元和末为礼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之过，出为庐州（今安徽合肥）刺史，有政绩。大和（827—835）时为谏议大夫，知制诰、中书舍人，历任郑州刺史，桂管湖南观察使，刑、户二部侍郎。后充山南东道节度使，时称李襄阳。卒于镇，赐谥文，世称李文公。李翱从韩愈学古文，主张"儒家立行为本，立言为表"，应"先仁义而后文章"，与韩柳所论，如出一辙。其重道轻文之倾向，上承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下启宋代理学家"道至则文自工"之风。其文详而不冗，简而不略，辞致浑厚，古茂严正。唐人赞其文"激清教义，焕于史氏"，宋人评其文有欧阳修之态。大多数文如《杨烈妇传》、《高愍女碑》、《韩吏部行状》等平实流畅，富有感情色彩，发展了韩文平易的一面，因而见重于当时，曾被列入唐宋十大家之列。李氏自评也甚高，称愈为兄为友，不自居于弟子之列。有《李文公集》，又有《论语笔解》、《五木经》传于世。　　　　　　（吴伟斌）

刘禹锡（772——842）　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为匈奴族后裔。其七世祖刘亮迁洛阳，始改汉族。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即出生于嘉兴。贞元九年（793），他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进入仕途，后任京兆府渭南主簿，擢监察御史。永贞元年（805），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事败，贬为朗州司马。元和十年（815），奉召还京，因诗作得罪执政，外放为连州刺史，后连刺夔州、和州。大和二年（828），拜主客郎中，复出为苏州、汝州、同州刺史。

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官终检校礼部尚书。有《刘梦得文集》40卷传世。刘禹锡诗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他又是唐代古文运动积极参加者，主张文章应是“见志之具”，提倡“文非空言”、“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其文章大致分二类，一是专题性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等方面，如《天论》、《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等，特点是引征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是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华陀论》、《辨迹论》、《明贽论》等，特点是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有一定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柳宗元评其文章“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刘禹锡散文辞藻美丽、题旨隐微的风格。

白居易（772——846）　学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本人生于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早年避难于徐州、杭州，少有诗才，发愤读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曾上书支持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改革。元和元年（806）授县尉，后授翰林院学士、左拾遗、左赞善大夫等职。十年，上疏言事，触怒权贵，贬为江州司马，后改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召还京城，历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长庆二年（822），出为杭州、苏州刺史。后再返京城，拜秘书监、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职，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寺。今存《白氏长庆集》71卷。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纲领。白诗风格平易浅切，明畅通俗，白文亦以内容深刻、风格平易见长。他虽不属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文学实践推动散文革新。其《策林》75篇纵论天下大事，析理透彻。词气谠直，为议论文之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劲直剀切，深入浅出，开启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之先声。《与元九书》夹叙夹议，洋洋洒洒，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荔枝图序》、《庐山草堂记》、《养竹记》等杂记小品，则写景状物，朴素自然，意趣隽永，别有一番风味。

李　绅（772——846）　学公垂，排行二十，时称李二十。润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六岁丧父，由母教授经义。元和元年（806）进士，历任校书郎、右拾遗、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敬宗初立，贬为端州司马，后赦，任江州长史，滁州、寿州刺史、宣武节度使。会昌二年（842）入朝，拜尚书右仆射，封赵郡公。后复出为淮南节度使，卒于任所。谥文肃。绅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一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所作诗大多亡佚，《悯农》诗流传最广。《全唐文》收绅文11篇。　（马清江）

柳宗元（773——819）　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早有奇名，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

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805）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擢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贬永州司马，10年后迁柳州刺史，政绩卓著，病卒柳州任上，柳宗元同韩愈一起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他在散文理论方面，主张“文者以明道”，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同时又重视艺术形式的作用，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推崇先秦两汉之文，代表了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他以进步的文学理论和丰富的创作实践，对唐代古文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列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的散文大致可分为论说、寓言、传记、山水游记、骚赋五类，尤以寓言、山水游记和短篇传记最有特色。他的论说文文笔犀利，论证精确；寓言散文继承先秦诸子善用寓言故事作比喻的传统，抨击社会丑恶现实，短小警策，幽默含蓄；传记文或写英勇正直的上层人物，或取材于市井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进步的思想性；山水游记是柳文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它继承了《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不仅用凝练的文笔、精萃的语言描绘南国美好风物，而且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幸遭遇、怨愤抑郁的心情融注其间，文笔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骚赋也是柳文有特色的部分。他的散文同韩愈文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柳宗元亦是唐代著名诗人，有《河东先生集》。

（朱野坪）

樊宗师（？——823或824）

字绍述，南阳（今属河南）人，一说河中宝鼎（今山西万荣）人。始为国子主簿，元和三年（808）擢军谋宏远科，授著作佐郎，与元稹、白居易交善。曾任绵州（今四川绵阳）刺史，征拜左司郎中，继出刺绛州（今山西新绛），有治绩。后拜谏议大夫，未到职而卒，世称樊谏议。宗师从韩愈，为唐代著名的古文作家之一。他独标一格，力去陈言，一言一句皆戛戛独造，不肯剽袭前人，文僻涩不可句读，时号涩体，把古文运动倡导的创新要求推向了极端。《国史补》云：“元和已后……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樊文也属“元和体”之一。韩愈评樊文，有“文从字顺各识职”、“议论平正有经据”的赞语。其《樊说墓志铭》明白晓畅，文从字顺，合于韩说，这说明樊文除苦涩之外尚有另一种风格的作品存在。宗师生前有文集75卷，但传世仅《绛守园池记》等寥寥数篇。后人辑有《樊谏议集七家注》、《樊集句读合刻三种》。

皇甫湜（约777——约835）

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元和元年（806）进士，授河南府陆浑县尉。后仕至工部郎中，因酒屡忤同僚，备受排挤，乃请分司东都。大和八年（834）八月，东都留守裴度辟为判官。裴度修福先寺，将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征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酣饮，援笔立就。湜从韩愈为古文，为韩门弟子之一，与李翱、张籍齐名。《答李生书》三篇，是其文论的代表作，论证了“奇”与“常”的关系，认为内容有新

见，形式有独创，必然导致怪奇，但强调太过，形成了奇诡的偏向。他散文“雕琢艰深”、“句奇语重”，与李翱相反，发展了韩文奇诡的一面。有《皇甫持正文集》六卷。

许尧佐　约贞元、元和前后在世，字里不详，礼部尚书康佐弟，德宗时第进士，贞元十年（794）与裴垍、裴度、崔群同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为协律郎。贞元十六年（800）与张宗本、郑权赴西川任幕府判官。又举宏词，为太子校书郎。元和十一年（816）五月，以左赞善大夫充赴南诏册立吊祭副使。后位谏议大夫，卒。今《全唐文》有《庐山东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师碑铭》、《五经阁赋》等文六篇，另有传奇《柳氏传》行于世。

元　稹（779——831）　字微之，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贞元九年（793）擢明经；十八年（802）应吏部试判入等，授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因屡献言为执政所恶，出为河南尉。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使东川，劾节度使严砺等贪状，招怨朋砺者。令分务东台，论奏权臣内官十余事。五年召稹还，次敷水驿，为内官所辱，出贬江陵士曹参军，转唐州从事。十年继贬通州司马，徙虢州长史。十四年冬入京，历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知制诰、翰林承旨学士等职。因长庆元年（821）科试案中力主重试，榜落势门子弟，得罪重臣，罢为工部侍郎。次年拜相，未及三月，为人诬陷，出刺同州（今陕西大荔）。三年秋移镇浙东（治会稽，即今浙江绍兴）。大和三年（829）年底回京任尚书左丞，因振举纪纲，为李宗闵辈排挤，次年一月出镇武昌军（治鄂州，即今湖北武汉）。大和五年七月暴卒于任所。“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白居易对元稹文学贡献的高度评价；“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这是历史对当时情况的客观描述。元稹工散文，其《才识策》、《论教本书》等。观点鲜明，长于议论；其《杜甫墓志铭》等一反长期忽视杜诗的潮流，第一个对杜甫作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他的制文更是“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传奇《莺莺传》是“震撼文林”的名篇。其诗文在当时“无胫而走，疾于珠玉”，“贤不肖皆赏其文”。有《元氏长庆集》六十卷。

吴武陵　约为贞元、太和间人，原名侃，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元和二年（807），主司误解宰相李吉甫之意，特擢其进士及第。与刘轲并以史才直史馆，撰《十三代史驳议》后坐事流永州（今湖南零陵），与柳宗元交厚。九年，吴元济叛，武陵遗书晓之。太和初，为太学博士，于崔郾前献杜牧《阿房宫赋》，牧因此而以第五人及第。自尚书员外郎出为忠州刺史；改刺韶州，以赃贬播州司户参军，卒于任所，武陵流放永州期间，与柳宗元诗文频频往来，甚得柳氏称赞，有“超轶之才”语。清人吴汝纶评其文为“生气可喜”，评其人为“元和间一健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书一卷，现已亡佚大半，《全唐文》存《遗吴元济书》、《上韩舍人行军书》等7篇。

刘宽夫 贞元、太和前后在世，字盛之，铭州广平（今河北永年）人，伯刍之子。元和年间登进士第，以秘书省校书郎于泽潞掌书记，又历诸府从事。宝历中，入京为监察御史。陈岵注浮屠书，因供奉僧以闻，除濠州刺史，宽夫劾之，敬宗震怒，宽夫力争，敬宗说其言，释之。旋转左补阙。太和中，曾历郇州、汴州从事。旋迁起居郎。《全唐文》存其《汴州纠曹厅壁记》、《郇州节度使院新建食堂记》等文3篇，以嘲讽中唐朋党相争的《剿竹记》最为传诵。

杨敬之 约为贞元、会昌间人，字茂孝，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杨凌子，排行八，故称杨八。元和二年（807）登进士第，平判人等，迁右卫胄曹参军。累官户部郎中、连州刺史、同州刺史、太常少卿、检校工部尚书。敬之在当时为有影响之人物，以文学名播士林，韩愈、柳宗元比之为当代贾、马。所作《华山赋》最为传名，尤为韩愈、李德裕所咨赏。其文仅存世这一篇，见《全唐文》。

殷 侔 长庆、太和前后人，生平事迹不详。太和年间，曾为魏州（今河北大名）书佐。其《窦建德碑》不以成败论英雄，对失败了的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极尽歌颂，深加赞扬，因而最为传诵。 （吴伟斌）

蒋 防（生卒年不详） 字子徵（一作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元和中，因诗作而受到李绅、元稹的赏识和推荐。长庆元年（821），自右补阙充翰林学士。二年，加司封员外郎。三年，加知制诰。四年，李绅被逐，蒋防也贬为汀州刺史，后调任连州刺史。《霍小玉传》是其所著，描写了陇西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被视为唐传奇中代表作之一。明代胡应麟认为："此篇尤为唐人最精采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少室山房笔丛》）明汤显祖演作戏曲《紫钗记》。 （马清江）

李 汉 贞元、大中间人，字南纪，宗室淮阳王李道明之后。元和七年（812）登进士第，累辟使府，历官左拾遗、屯田员外郎、馆修撰、兵部员外郎、御史中丞、礼部、户部、吏部侍郎等。大中时，召拜宗正少卿，卒于任上。李汉师法韩愈，精通古学，愈以女妻之。李氏主张"文以贯道"，其文既有韩愈文之雄浑，又兼有文彩，后人称其风格为雄蔚。其文多佚，《全唐文》仅存两篇，以《昌黎先生集序》最为传名。 （吴伟斌）

牛僧孺（780——848） 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中唐以后"牛李党争"中牛党首领。元和三年（808），应贤良方正科对策第一。历任户部侍郎、左仆射等职。会昌二年（842），贬循州员外长史。大中元年（847）召还，为太子少师。一般认为，传奇小说集《玄怪录》是其所作。该集故事奇异，篇幅漫长，文字委婉，无论是细节描写还是人物对话，都超过魏晋志怪小说，其中《刘讽》、《元无有》、《古元之》等最有特色。

李德裕（787——849） 字文

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中唐以后“牛李党争”中李党首领。武宗时，拜太尉，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执政六年，政绩显赫。宣宗即位，牛党执政，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参军，卒于贬所。李德裕善为文章，留下不少诗文，《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会昌一品集》20卷，《姑臧集》15卷，《穷愁集》3卷，《杂赋》2卷。他在《文章论》中曾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认为文章当继承《诗》、《骚》传统，“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语言当注重自然气势，反对雕琢和囿于声律。他还著有笔记小说《次柳氏旧闻》，记唐玄宗遗事，多诡异之词，并非实录。

（马清江）

舒元与（789——835） 婺州东阳（今属浙江）人；一作江州（今江西九江）人，误。出身寒微，始学即聪警过人，江夏节度使郗士美奇其才，屡为延誉。元和八年（813）登进士第，拜县尉。有干练名，裴度表掌兴元节度府书记。入朝为监察御史，再迁为刑部员外郎。太和五年（831）两次上书，得文宗赏识，但宰相李宗闵以“浮躁诞肆”加以阻拦，改授著作郎，分司东都。“甘露事变”中与李训等同为宦官所害。元与才学过人，能诗善文。其书奏、文檄、诗赋“锻炼精粹”、“披剔剖抉”，《新唐书》本传赞其“文檄豪健，一时推许。”《问国学记》尊儒学，《鄂政记》论施政，《录桃源画记》评艺术，时有卓见。其《牡丹赋》首开歌咏牡丹之端。有《舒元与集》一卷，已佚。今《全唐文》存有《长安雪下望月记》、《养狸述》等文20篇。

（吴伟斌）

杜　牧（803——852） 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太和二年（828）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同年十月离京，为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及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僚。后三进二出长安，放外为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内调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晚年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称杜紫微、杜樊川。杜牧文学创作颇丰，诗、赋、古文均足称名家，今存《樊川文集》20卷，《外集》、《别集》各1卷。他主张“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重视内容，反对片面追求形式，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杜牧文章独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他的作品有感而发，具有针砭时事的意义，其文笔锋犀利，明白晓畅，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传统，在晚唐盛行四六骈文的风气中独树一帜。新体散赋《阿房宫赋》，突破六朝、唐初以来赋作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赋体发展有重要影响。

段成式（803——863） 字柯古，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父亲官至宰相，段成式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吉州刺史，终太常少卿。《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庐陵官下记》2卷，已佚；《说郛》辑得佚文60余则。《全唐文》收其文16篇。所作笔记小说《酉阳杂俎》最为著名，其

书内容广泛驳杂，分类编录，一部分为志怪传奇类，一部分为各地与异域珍异之物的记载，与晋张华《博物志》相类。

李商隐（813——858） 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文宗太和三年（829），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李商隐入幕，并亲自指教今体文。开成二年（837）登进士第。因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女为妻，而卷入"牛李党争"之中，一直受到牛党排挤，在各藩镇幕府中过着幕僚生活，潦倒至死。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与杜牧合称"小李杜"。其文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樊南甲集》20卷、《乙集》20卷、赋1卷、文1卷；《宋史·艺文志》载，更有文集8卷，别集20卷。其骈文属对工整，用事精切，疏密相间，气韵自然，婉约雅饬，于晚唐别具一格。

（马清江）

来 鹄（生卒年不详） 豫章（今江西南昌）人，自称"乡校小臣"。散文宗法韩、柳，在大中、咸通年间（847－874）颇有时誉。文存《全唐文》。其《猫虎说》写农民为保护庄稼，迎猫驱鼠，迎虎驱豕，然终不免为贪吏所夺，是一篇抨击贪官污吏的佳构。

（宫晓卫）

刘 锐（821？——？） 字复愚，长沙（今属湖南）人。一云商州（今陕西商县）人。幼孤，母姚氏抚其成立。会昌、大中间漫游岭南、东川各地。宣宗大中三年（849）自荆州获解，次年登进士第。初授寿州从官，再补校书郎，皆不久即去职。后任太学助教、集贤校理。懿宗咸通四年（863）因言事得罪，由左拾遗贬华阴令。累迁中书舍人、户部郎中，官至商州刺史，约卒于乾符年间。刘锐工古文，文风奇崛，以复古自任，多取法于扬雄，所作常自嗟不遇，亦多愤激之言，"意欲自成一子"（《艺概》卷一）。代表作有《山书》十八篇、《古渔父》四篇等，"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同上）。有文集《文泉子》10卷，已佚。明人辑为《刘锐集》6卷。

孙 樵 字可之，生卒年、籍贯皆不详，曾自称"家本关东"。宣宗大中九年（855）登进士第，授中书舍人。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随僖宗奔岐、陇，迁职方郎中、上柱国。其"藏书五千卷，常自探讨"，"于时以文见称"（《孙樵文集自序》），时称樵"有扬、马之文"。中和四年（884），自编《经纬集》十卷，收文35篇。在散文创作理论上，继承尚奇说。自称"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为韩愈的三传弟子。所作古文，刻意求奇，讲究"储思必深，摛辞必高"，目的是为矫一代之弊端。其记叙文，《书何易于》、《书褒城驿壁》等篇，深刻揭露了晚唐政治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孤愤激烈，颇多讽刺，文字遒劲，笔调激切；其说理文，《复佛寺奏》、《与李谏议行方书》等篇，批佛教、砭时弊，皆能一针见血，匡谏君非之心恳诚之至，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在骈俪浮艳文

风重新抬头的晚唐，孙樵从文学理论到创作实践上，都坚持了古文运动的方向，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殿军。

皮日休（约834——883） 字逸少，后改袭美，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隐居鹿门山读书，自号鹿门子、间气布衣、醉吟先生等。懿宗咸通四年（863）离家，漫游求仕，抵至长安。七年春，应举不第，归寿州（今安徽寿县）编次诗文集《文薮》。咸通八年登进士第，但未得官职。次年离京达苏州，与吴中名士陆龟蒙相识，结为诗友，酬答唱和，有《松陵集》。十三年回长安，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后参加黄巢起义军，黄巢称帝后以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中和四年（883）起义失败，其下落不详。一说为黄巢所害，一说被唐朝统治者诛杀，一说逃奔吴越投靠了钱镠，至今尚无定论。皮日休的文学创作十分丰富，几乎包括当时所有文体。与陆龟蒙齐名，人称“皮陆”。他推崇韩愈“文以载道”的主张，认为文学必须“上剥远非，下补近失”（《文薮序》）。其散文作品，深刻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政论小品文，更富于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是晚唐时期大放光彩的一枝奇葩。鲁迅称其小品文，“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他的散文具有观点鲜明、锋芒犀利、说理透辟、爱憎分明、短小精悍、善用比喻的特点。《皮子文薮》，今存，凡10卷，散文作品占9卷。另，《全唐文》辑录短文7篇。

陆龟蒙（？——约881） 字鲁直，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为人耿直，傲岸不屈，曾举进士，不第，遂不再应试。曾任苏、湖二郡从事，后隐居松江甫里，自号甫里先生、江湖散人，又号天随子。陆龟蒙工诗文，与皮日休同为唐末著名文学家，人称“皮陆”。二人酬答唱和，有《松陵集》。其诗除唱和应酬之作外，以写景咏物为多。其散文作品，短小精悍，尖锐泼辣，颇多愤世嫉俗之词，讽刺、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朽，极富现实意义。鲁迅曾称皮陆二人的小品文，“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其散文名篇《野庙碑》，从碑字引出悲字，作通篇线索，构思奇妙。且文章语言犀利，形象鲜明，讽刺辛辣，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卓越的讽刺艺术才能，情味隽永，耐人寻绎。代表作《招野龙对》一篇，是寓言式的杂文，文笔冷隽而锐利，近似《庄子》。有《笠泽丛书》4卷、补遗1卷，《甫里集》19卷。

杨夔（生卒年不详） 自号宏农子。杨行密大将田頵守宣州，夔与诗人杜荀鹤同为田门客。田欲叛行密，夔为《溺赋》以戒之。田不听，以至于败。田死，夔不知所终。夔工诗文，《全唐诗》存诗12首，《全唐文》存文2卷。夔所作散文，文笔雅洁清畅，说理透辟而有气势，结构谨严，语言明快。《公狱辨》、《植兰说》、《蓄狸说》、《善恶鉴》、《较贪》等篇，皆为有感而发之佳作。

罗隐（833——909） 本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余杭新城

（今浙江富阳）人。因举进士十余年不第，乃改名。懿宗咸通八年（867），编成《谗书》5卷。咸通十一年为衡阳主簿。乾符三年（876）因父殁丁忧回乡。服除后又往游京师，编《湘南应用集》，凡3卷，多书启之文。广明中遇黄巢攻陷长安，遂归隐池州。后依镇海节度使钱镠，光启三年（887）为钱塘令，迁著作郎、掌书记。天佑三年（906）充节度判官，后梁开平二年（908）授给事中，后迁盐铁发运副使。开平三年病卒。罗隐工诗文，其散文作品有《谗书》、《湘南应用集》、《淮海寓言》等。尤善小品文，笔锋犀利，多讽世之作。《谗书》颇享盛名，鲁迅称其“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对后代有较大影响。其代表作《英雄之言》、《荆巫》、《辩害》、《越妇言》等篇，都借历史针砭现实，语言明快犀利，深入浅出，说理透彻，发人深思。罗隐与宗人罗邺、罗虬同有诗名，合称“三罗”。著作多种，唯《甲乙集》、《两同书》及《谗书》行世。清人辑有《罗昭谏集》。（卞 岐）

司空图（837——908） 字表圣，自号耐辱居士、知非子。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咸通十年（869）进士，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旋解职，归隐中条山王官谷别墅中。其文《休休亭记》即记其去官后的放达情怀。司空图以诗论著于世。除其论诗专著《二十四诗品》外，他还有许多论诗散文。他那注重诗之含蓄蕴藉的韵味与清远醇美的意境的主张，如提倡“咸酸之外”的“味外之旨”和“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韵外之致”，以及讲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等等，都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等文章中提出的。他的散文承袭古文运动之风，颇具刚正之气，而无五季猥杂之习。著有《司空表圣文集》4卷。亦能诗，有《司空表圣诗集》。

（宫晓卫）

徐 寅（生卒年不详） 字昭梦，莆田（今属福建）人。昭宗乾宁元年（894）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后归闽，闽王审知辟为掌书记。后唐庄宗即位，因徐寅曾讥刺其父，故命审知杀之，审知惧而不敢复用，寅遂拂衣而去，归隐不知其终。寅工诗善赋，“尝作《人生几何赋》，四方传写，长安纸价为高者三日”（《闽书》）。其所作《止戈为武赋》，有“破山加点，疑成无人”之句，为人称道。《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赋“句雕字琢，不出当时程试之格，而刻意锻炼，时多秀句”。著作颇多，有《徐寅别集》5卷、《探龙集》5卷、《徐寅赋》5卷等。《全唐文》收赋1卷，《唐文拾遗》补录赋1卷。

沈 颜 字可铸，吴郡（治所今江苏苏州）人。生年不详，约卒于后唐庄宗同光中（924前后）。少有词藻，琴棋皆臻妙境。性闲淡，不乐世利，天复初（901）举进士第，为校书郎。唐末乱离，奔湖南，为吴国淮南巡官、礼仪使、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少能文，疾当时浮靡文风，而仿古著书百篇，取元次山聱叟之说，名曰《聱书》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声书》）。又有诗集《陵阳集》五卷。

（文益人）

牛希济（872？——？）　先世为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后为狄道（今甘肃临洮）人。曾客居山东，遭丧乱，流寓于蜀，召为起居郎，累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同光三年（925）后唐灭蜀，唐明宗令作蜀主降唐诗，希济只言数尽，不谤蜀王，为明宗所赏，授雍州节度副使。希济才思敏妙，文学繁赡，超于时辈。尤善文，颇能切中时弊；亦工诗词，为花间词派重要词人之一。著有《理源》2卷、《治书》10卷，今佚。其散文代表作《崔烈论》，运用历史人物针砭时弊，论述详赡，结构严谨，语言流畅。《全唐文》存其文2卷。

程　晏　字宴然，生卒年、籍贯皆不详。昭宗乾宁二年（895）进士。《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程晏集》七卷。《郡斋读书志》记载："程晏集六卷"，"集皆杂文"。《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程晏集一卷"。其集今不存。《全唐文》收其文7篇。其《萧何求继论》，比喻鲜明恰当，进行形象化的论证，颇具说服力。于此可见程晏散文创作的特色。

欧阳炯（896——971）　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少事前蜀，为中书舍人。前蜀亡，入洛阳，补为秦州从事。后又入蜀事后蜀，历官武德军判官、翰林学士、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修国史等职。入宋后，为右散骑常侍，俄充翰林学士，转左散骑常侍，后分司西京。开宝四年（871）卒。欧阳炯工诗文，以词称，为花间词派重要作家，《花间集》存其词17首。所作《花间集序》采用骈体，对仗、用典讲究，辞藻华丽典雅，全文叙事与议论结合，文字通畅，一气呵成，在骈体文中是一篇较好的作品。

（卞　岐）

宋　代

李　昉（925——996）　字明远，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五代后汉乾佑年间进士，曾仕后汉、后周两朝，入宋后拜为中书舍人，历任翰林学士、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等职，监修国史。卒，追赠司徒，谥文正。李为人宽厚恭让，为官平稳审慎。平生倾慕白居易，文章浅近晓畅，著有文集50卷，已佚。曾预修《旧五代史》，奉敕主编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型类书，此三书加上《册府元龟》被称为宋代四部大书，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太平广记》所引图书多达470余种，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乐　史（930——1007）　字子亚，抚州宜黄（今江西宜黄）人。南唐时为秘书郎，入宋为平原主簿。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迁著作佐郎，知陵州。献《金明池赋》，召为三馆编修。雍熙三年（986）献《贡举事》30卷、《登科记》30卷、《题解》20卷、《唐登科文选》50卷、《孝弟录》20卷、《续卓异记》3卷，太宗嘉其勤，迁著作郎、直史馆、转太常博士、知舒州，迁水部员外郎。又献《广孝传》50卷、《总仙记》141卷等。出知商州，以年老多疾，分司西京。他学识渊博，著述甚勤，但所作往往博而寡要。他同时也是著名的小说家和地理学家。所著尚有《太平寰宇记》，《总记传》，《坐知天下记》等。又编所著为《仙洞集》。

柳　开（947——1000）　大名（今属河北）人。少年时仰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元（一作始元），后改为开，字仲途，意为"开圣道之途"，又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幼年颖异，有胆勇，既就学，喜讨论经义。开宝六年（973）举进士、补宋州司寇参军，迁本州录事参军。太平兴国中迁右赞善大夫、殿中丞、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知崇义军，真宗时为忻州刺史。有《河东先生集》十六卷。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最早发端者，他反对宋初的华靡文风，提倡作文要"古其理，高其意，随言长短，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他主张文道合一，强调内容的重要性，认为"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上王学士第三书》）。他的主张在当时有着震聋发聩的作用，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说："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途起而麾之。"柳开所作多为表、疏、论、序，虽不免有"辞涩言苦"之病，但其力求古朴平实，立意谋篇，亦多重理义，表现了与五代宋初浮艳文体相对立的朴实文风。

王禹偁（954——1001）　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出身农家，家世清贫。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补任左司谏、翰林学士、知制诰，他秉性直率激切，遇事敢言，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多所规讽，故屡遭贬谪。宋真宗咸平初，被贬为黄州知州，世称王黄州。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鄙弃唐末宋初以来"秉笔多艳冶"的浮靡绮艳的文风，欲革新时弊，复兴古文。他提倡散文学韩愈、柳宗元，主张写"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句易道，义易晓"，在理论和创作上都颇有成就。其《待漏院记》、《录海人书》、《唐河店妪传》、《黄冈竹楼记》等著名散文，不尚浮彩雕琢，以白描见长，内容切实，风格平易朴素，文辞清新简练，卓然成家，有力地推动了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吴之振在《宋诗钞》中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由此可见他在宋初文坛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著有《小畜集》、《小畜外集》。

姚　铉（968——1020）　字宝之，庐州合肥人。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淳化五年（994）直史馆，历任右正言、右司谏、河东转运使等。姚铉为人隽爽尚气，因之得罪薛映，被

贬连州，后会赦，授舒州团练副使。姚铉是宋初提倡写古文的作家之一，有文集20卷。文辞敏丽，特别擅长笔记小札。藏书甚丰，颇有异本。曾编录唐人古文古诗100卷，目为《文粹》，骈体文和近体诗一概不收，并特立"古文"一类，以示继承韩愈、柳宗元的传统，对宋初古文运动的展开起了促进作用。

杨　亿（974——1020）　字大年，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少时聪慧过人，7岁便能属文。11岁时，太宗闻其文名，诏送阙下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后赐进士第，迁光禄寺丞。历官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工部侍郎等，参与主编过《太宗实录》、《册府元龟》。杨亿天性颖悟，终身不离翰墨。博闻强记，才思敏捷。他的诗学李商隐，专取其刻镂艳丽的一面，风格浓纤典丽，是西昆派的领袖之一。文章以骈文为主，风格与其诗相类。欧阳修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以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记旧本韩文后》）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原有《括苍集》、《韩城集》等，多亡佚，今存《武夷新集》。

钱惟演（962——1034）　字希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吴越王钱俶之子，少补牙门将。归宋后为右神武将军。咸平三年（1000）召试学士院，起草立就，真宗称善。遂改任太仆少卿，直秘阁，修《册府元龟》。历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工部尚书等职。后以事落职，出为崇信军节度使。著有《典懿集》、《金坡遗事》等。文辞清丽，于书无所不读，博学而赡敏。尤工诗，与杨亿同为西昆派领袖。他与杨亿、刘筠等17人以诗互相唱和，辑为《西昆酬唱集》。

钱　易（约1017年前后在世）

字希白，临安（今浙江杭州）人。钱惟演之从弟。年17举进士，因缴卷过快，主考者恶其轻率，遂落第。真宗时，再以探花及第。历官蕲州通判、太常博士、左司郎中，官至翰林学士。钱易以才藻知名，文思敏捷，虽数千言，援笔立就。著有《金闺瀛洲西垣制集》、《洞微言》、《青云总录》、《青云新录》等，均佚。今仅存《南部新书》10卷。

穆　修（979——1032）　字伯长，郓州（今山东郓城）人。出身清寒，幼年好学，不事章句。真宗大中祥符间，赐进士出身，初任泰州司理参军，后负才被黜，被贬池州，又为颍州、蔡州文学参军。他性格刚介，好论贬时弊，诋诮权贵，故一生穷困。穆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得唐《韩愈集》后，爱若生命，行以身随，穷且老，又得《柳宗元集》。他在宋初西昆蜚声文坛，"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之际，不顾流俗，竭力提倡学习韩、柳古文，他曾在《答乔适书》中盛赞韩、柳之文"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虽然仕途潦倒，生活窘困，却千方百计收集、整理、刻印、销售韩柳文集，声称"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日能之，非余所敢知也。"（《唐柳先生集后序》）大力提倡韩柳

文风。穆修在当时名声颇大，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宋史》本传说："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苏舜钦、欧阳修等都一致肯定了他开宋古文运动之风，以救时弊之功。有《河南穆公集》。

范仲淹（989——1052）　字希文。祖籍邠州（今陕西）人，后移居吴县（今江苏苏州）。少孤贫而有志操，学习刻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仁宗康定元年（1040）以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守边塞多年，抗御西夏侵扰，卓有成效。庆历三年（1043）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针对时弊提出了均田赋、修武备等10条革新建议，即所谓"庆历新政"，不久失败，后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于赴颍州途中病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范仲淹一生致力于政治改革，同时主张诗文革新，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行者之一。斥责当时文坛流行的"词多纤秽，言不及道"的不良文风，强调"国之文章，应于风化"。他的散文、诗、词均有佳作名篇，《岳阳楼记》文情并茂，表现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至今传诵人口。范仲淹的诗文，虽多涉及政治怀抱，但却少干枯说教，形象鲜明，节奏明快，慷慨而悲壮。有《范文正公集》。

孙　复（992——1057）　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曾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写有《尊王发微》12篇。庆历中，由范仲淹、富弼荐举，为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累迁殿中丞。孙复病死之前，韩琦言于仁宗，命他的门人祖无择至孙复家抄录其文，得书15万言。孙复为文主张重道，致用。他认为"明道"之文，除"列圣人之微旨"外，还包括"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等内容。有《睢阳子集》10卷。

宋　庠（996——1066）　字公序，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后迁居雍丘（今河南杞县）。初名郊，后仁宗改名为庠。天圣二年（1024）进士，累试皆第一，擢大理寺评事，通判襄州。累官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封莒国公。英宗时移镇武军，改封郑国公。以司空致仕，卒，赠太尉及侍中。庠与弟祁俱以文学擅名天下，人称"大宋"、"小宋"。庠为人俭朴，至老好学不倦。著有《宋元献集》40卷，文风诗风犹有晚唐余习。庠又勤考订，善正讹谬，另著有《国语补音》、《纪年通谱》、《掖垣丛志》等。

宋　祁（998——1061）　字子京，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后迁居雍丘（今河北杞县）。天圣二年（1024）与其兄宋庠同举进士，以词赋高第，初为复州军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等，迁太常博士，参与修《广业记》，书成，累迁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留为翰林学士，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又迁左丞，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后赠尚书，谥号景文。原有文集，已散佚，清人辑有《宋景文集》，近人赵万里辑有《宋景文公长短句》。祁为文质朴简古，然喜用僻词，有晦涩之病。《新唐书》列传150卷出自其手笔，精采描述甚多。祁亦善长

短句，其《玉楼春》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颇受人称赞，因而人称"红杏尚书"。祁又著有《大乐图》、《益部方物略》、《笔记》等。

尹　洙（1001——1047）　字师鲁。河南洛阳人。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初为正平县主簿，召试为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被贬，上书为之辩护，降为校勘，出监唐州酒税。后历知泾州、渭州、庆州等地，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尹洙性内刚外和，博学有识，与穆修志同道合，交谊颇深，力主写作古文，反对晚唐以来卑弱文风，提倡文以明道、文以致用，主张作文明白易晓。尹洙的散文多为章、奏、记、序，风格质朴简古，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所推重。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说："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说："师鲁文简而意深。"尹洙在当时名声颇大，世称河南先生。《宋史》本传说："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肯定了他在宋初提倡古文的先导作用。有《河南先生文集》。

石　介（1005——1045）　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历郓州、南京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因守父母丧而躬耕于徂徕山下，人称徂徕先生。后又为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介乐善疾恶，遇事敢为，著文切指时弊，无所讳忌。他对继承韩柳文风的柳开极为推崇，而对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文风攻击甚烈。他高举"尊韩"的旗帜，主张"文道合一"，认为文就是道，将《尚书》、《易经》等都视为文学正统，虽能矫枉，却不免过正。石介的散文创作，如《怪说》、《上范思远书》、《辨惑》、《尊韩》等，虽能切中时弊，但文学成就不高。作为批判宋初形式主义文风的猛士，石介在宋代古文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徂徕集》。

尹　源（1005——1054）　字子渐，河南洛阳人。初以祖荫补三班借职，迁殿直。进士及第后为奉礼郎，累官通判泾州、庆州。曾作《唐说》及《叙兵》10篇，范仲淹、韩琦荐其才，召试学士院，尹源不愿试赋，故而除知怀州。尹源是尹洙之弟，其文风与其兄相类，博学强记，以文学知名，世称"河内先生"。有文集6卷。

祖无择（1006——1085）　字择之，上蔡（今属河南）人。少从孙复学习经术，又师承穆修写作古文。进士及第后，人集贤院，后任通进银台使。因与王安石不和，王安石恶之，遂贬为忠正军节度副使，后知信阳军。祖无择为人忠信好义，笃于师友，文风简古明畅。有《龙学文集》。

文彦博（1006——1097）　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仁宗时进士及第，累官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潞国公。熙宁中，与王安石不和，出为河东节度使，居洛阳。元祐初，为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历仕四朝，任将相50年，名闻四夷。为人平易谦和，曾与富弼、司马光等13人置酒赋诗，名为洛阳耆英会，为一时盛事。有

《潞公集》。

欧阳修（1007——1072） 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4岁丧父，母郑氏亲教之，家境甚贫。天圣八年（1030）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始从尹洙游，与梅尧臣诗文交往，后入为馆阁校勘，庆历初（1041）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范仲淹改革失败，革新派相继罢黜，他上疏极谏，被贬知滁州、扬州、颍州。后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熙宁初与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集》153卷，附录5卷。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早年深爱韩愈文的广博深厚，为官后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致力提倡古文，反对浮华的西昆体和险怪奇涩的时文，并用知贡举的地位打击华而不实的文风，识别和培养古文人才，三苏、曾巩、王安石皆出自其门下。经过欧阳修等人的多年努力，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造就了宋代文学群星璀灿的鼎盛局面。他继承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致用，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其散文创作，大都具有平易流畅，委婉曲折的特色，他的政论、史论以及抒情散文，都有着很高的成就，不少篇章成了千古名篇。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欧阳修都是一代文坛宗师，他是宋代第一个在散文、诗、词上都卓有成就的作家。他的诗词也有着与散文同样的清新流丽的特色，其《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诗论的新形式。欧阳修著作甚丰，又有《新五代史》、《集古录》、《牡丹记》、《归田录》、《毛诗本义》，与宋祁等合著《新唐书》等。

苏舜钦（1008——1048） 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后迁开封。少慷慨有大志，初以父荫补太调斋郎，调荥阳县尉。景佑元年（1034）进士，改光禄寺主簿、知长垣县，迁大理评事。范仲淹荐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因上书议政，为权贵所忌，革职为民，居苏州作沧浪亭，自号沧浪翁。舜钦早年与其兄舜元及穆修等人倡写古文，后又积极参与诗文革新运动。他主张发扬《诗经》、楚辞的现实主义传统，反对西昆浮艳文风，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作家之一。今存散文70多篇，以《沧浪亭记》较为著名。其诗歌创作成就略高于散文，与梅尧臣齐名，世称“苏梅”。著有《苏学士文集》。

苏　洵（1009——1066） 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27岁始发愤读书，举进士、茂才等皆不中，愤而尽焚其文，闭门攻读，于是学间精通，下笔千言。嘉佑元年（1056）与子苏轼、苏辙至京师，通过欧阳修将《权书》等22篇文章献给仁宗，士大夫争相传之。除秘书省校书郎，迁霸州文安县主簿，与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100卷，书成而卒。追赠光禄寺丞。苏洵为“唐宋八大家”一，与其子轼、辙并称“三苏”。其散文创作以史论策论见长，笔力雄健，善于议论，语言畅达。文章多指补时政，主

张坚决抵抗辽和西夏的侵略，反对一味输银求和，富有现实意义。《六国论》是这类文章的著名代表作。其它如书、记、序等类文章中也有不少佳作。曾巩《苏明允哀辞并引》评其文说："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洵亦能诗，但不如其文。著有《嘉佑集》、《谥法》等。

李　觏（1009——1059）　字泰伯。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自称"南城小民"。又因南城在盱江边，因其创建盱江书院，故也称盱江先生。少年家贫，两次应试不中，居乡里教学为业，从者常数百人。仁宗皇佑初（1049）经范仲淹推荐为太学助教，后擢直讲，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李觏是北宋具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俊辩能文，文中多以载道，对某些儒家传统思想，往往提出非议。他极力推崇韩愈，主张一切文章都要有"兴国家，靖民生"的作用。（《上李舍人书》）。其散文大多是论、策、书、表等，广泛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被誉为"皆从大处起议论。"如《潜书》、《广潜书》、《礼论》、《庆历民言》、《富国》、《安民》、《强兵》等，反映了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方面的主张，语言简练，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著有《直讲李先生文集》。

蔡　襄（1012——1067）　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厦门）人。天圣年进士，累官知谏院、直史馆，兼修《起居注》。后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和福州，又以端明殿学士移守杭州。蔡襄能文善诗，风格清遒俊美，常有佳作。尤善书法，其字在当时号称第一，为"宋四家"之一。有文集60卷、奏议10卷，及《茶录》、《荔枝谱》等行世。

周敦颐（1017——1073）　原名敦实，因避英宗讳，改为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仁宗景佑三年（1036）为分宁主簿，调南安军司事参军，移桂阳令。嘉佑六年（1061）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熙宁初（1068）任广东转运判官。后筑书堂定居于庐山莲花峰下，因堂前有溪发源于莲花峰，遂以故居营道濂溪名之，时人称其为"濂溪先生。"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之祖，濂洛学派的创始人，二程（程颢、程颐）都是他的学生。在文学思想上，他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思想内容应居于首位，但也注意到艺术形式的作用，"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敦颐能文能诗，多言志抒怀之作。散文以《爱莲说》最为著名，表现了洁身自好、不同流俗的情操，质朴清新，脍炙人口。著有《濂溪集》，《周子全书》。　（耿百鸣）

文　同（1018——1079）　字与可，梓州梓潼（今属四川）人。自号笑笑先生，又称石室先生。皇佑元年（1049）进士，解褐为邛州军事判官，后历知陵州、洋州，改知湖州，未上任而卒，亦称文湖州。同与司马光、苏轼有诗文往来，其未及第时，已以文章见知于文彦博。善诗文书画，尤精墨竹，文名为画名所掩。著有《丹

渊集》40卷。（文益人）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陕西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初（1038）进士，任知制诰、知谏院。神宗时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后任西京御史台，居洛阳15年，专心编纂《资治通鉴》。哲宗即位后，拜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废新法，复旧制。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其历史著作有《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纪闻》等。其中《资治通鉴》不仅在我国编年通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全书材料取舍严谨，叙事周详，文笔简洁流畅。也擅诗词，但为文名所掩。有《司马文正公集》

曾　巩（1019——1083） 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少即颖悟能文，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仁宗嘉佑二年（1057）进士。初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累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英宗时为实录检讨官，历知齐、襄、洪、福等州。官至中书舍人。在史馆任职期间，曾整理校勘《战国策》、《说苑》、《新序》、《李太白集》等，学者称其为“南丰先生”。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深于儒术，好发议论。其为文严谨细密、古雅典重、雍容平正，深得欧阳修的称赏。《宋史》本传说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著名的散文有《墨池记》、《宜黄县学记》、《越州赵公救灾记》、《拟岘台记》、《寄欧阳舍人书》等，尤以《〈战国策〉目录序》、《〈说苑〉目录序》等序文最为人称赞。方苞说：“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曾巩之文，在当时即名重一时，时人“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是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虽以文名，然诗笔亦清新劲健，颇有佳作。有《元丰类稿》50卷。

刘　敞（1019——1068） 字原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通判蔡州，迁知制诰，奉使契丹，辽人对其熟知山川道路及鸟兽形状，深为叹服。累迁集贤院学士、南京御史台通判。卒后生徒们私谥其为“公是先生”。刘敞学问渊博，文思敏捷，能面对来使，立马挥笔而就。欧阳修佩服其博学，每有疑问，往往求问。其文往往触时伤事，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如《患盗论》。著有《公是集》。

宋敏求（1019——1079） 字次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赐进士及第。英宗治平中，为《仁宗实录》检讨官、修起居注、知制诰。累迁史馆修撰、龙图阁直学士。家富藏书，皆校勘研读多遍。敏求住汴京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移居其侧。著有笔记《春明退朝录》，记述典制掌故。《长安志》考订长安古迹，详备明晰。又有《唐大诏令集。》

张　载（1020——1077） 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年少时喜谈兵事，曾造谒范仲淹，嘉佑间举进士，为祁州司法

参军，调云岩令，为政以敦本善俗为先。熙宁初，御史中丞吕公著荐之，召为崇文院校书。未几，以疾屏居南山下，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吕大防荐知太常礼院。以疾归，卒，谥明公。有《崇文集》及《易说》、《正蒙》、《西铭》等。张载主要是个道学家，但散文创作也有一定成就，尤以《西铭》为佳。

王安石（1021——1086） 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少好读书，文思敏捷，曾巩荐之于欧阳修，修极力为之延誉。庆历二年（1042）进士，历淮南判官、鄞县知县、常州知州、江东提点刑狱等。嘉佑三年（1058）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主张改革政事，后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积极推行新法，因遭保守派反对，于熙宁七年（1074）罢相。次年再度入相，一年后又罢，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封舒国公，改封荆，卒谥文，追封舒王。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注重文章的社会意义，主张文学要“有补于世”，要“适用”。其创作多为政治性学术性论文，游记散文亦多寓哲理。其文以拗折峭劲见称，结构严谨，说理透彻，笔力雄健，感情充沛，语言朴素简洁，概括力很强。《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伤仲永》、《游褒禅山记》等，都是独树一帜的不朽名篇。王安石诗歌创作的成就不在散文之下，风格与散文略似，名篇佳句甚多。其词所作不多，却能一扫旧习，开豪放派之先声。王安石文学上成就甚高，影响巨大，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著有《临川集》等。（耿百鸣）

沈　括（1031——1095） 字存中。宋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佑进士，除扬州司理参军，熙宁中参与王安石变法。历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提举司天监。迁集贤校理，擢知制诰兼知通进银台司。熙宁八年（1075），出使辽国。元丰五年（1082）坐罪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徙秀州。晚年居润州梦溪园。他博学多闻，于天文、地理、典制、律历、音乐、医药等无所不通，著述近40种，多亡佚。现存有《梦溪笔谈》、《长兴集》、《苏沈良方》等。沈括的文章，如其《梦溪笔谈》所载，往往精确详实，文理缜密，明快简洁，中心突出，然又长于形容，摇曳多姿，堪称是富有文学情味的科学小品。

苏　轼（1037——1101） 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进士，复举制科，授凤翔府签书判官。治平中入判登闻鼓院，召试得直史馆。历判官告院、开封府推官。熙宁中，上书力陈王安石新法之弊，因出为杭州通判，徙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1079），因被告作诗讽刺新法下御史狱，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即位，高后听政，起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召为起居舍人，寻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佑二年（1087），

兼侍读。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后为他人所攻，数月后复出知颍州，徙扬州。七年，以兵部尚书召还，改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哲宗亲政，出知定州。绍圣初，御使弹劾其掌制日所作词命“讥斥先朝”、“诽谤先帝”，落职降官知英州，未至，贬惠州安置。四年（1097），再贬昌化军安置。元符三年（1100）赦还，次年病卒于常州。苏轼一生著述甚丰，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他是我国历史上多才多艺的大文豪。不仅在诗、词、书法、绘画方面享有盛名，其散文亦是继往开来，雄视百代的大家。他的散文，既吸取了先秦策论纵横辩博的长处，又借鉴了六朝骈赋华美的特色，并能博取众长，自铸伟词，做到文理自然，姿趣横生，将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古文作用发挥到了更高的境地。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正是他写作的经验谈，又强调艺术技巧，做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苏轼的散文与文论对当时与后世有重大影响。他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　辙（1039——1112）　字子由，一字同叔，号颍滨遗老。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轼弟。嘉佑进士，复举制科。因反对熙宁新法，出为河南府留守推官，历陈州教授、齐州掌书记、应天府签书判官。元丰中，以兄轼作诗讽刺新法得罪，坐谪监筠州盐酒税。哲宗朝，历秘书省校书郎，改右司谏。擢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元佑六年（1091）拜尚书右丞，次年进门下侍郎。后落职知汝州，复责雷州安置。徽宗时，提举宫观，致仕。所著有《栾城集》、《春秋集解》、《诗集传》等。苏辙的散文，议论文不如兄，然其记叙文纡徐曲折，汪洋澹泊，饶有情致。苏轼称其有一唱三叹之声。他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后人将他与父洵兄轼合称为“三苏”。

李格非（生卒年不详）　字文叔，宋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熙宁进士。元佑中，为太学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绍圣时，通判广信军。后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建中靖国元年（1101），罢职，入元佑党籍。卒年61。平生工词章，然所传绝少。唯其文《洛阳名园记》最著名。文章通过叙述洛阳名园由唐至五代的兴衰之迹，表示千古之鉴，其文寄慨深沉，情理兼胜，为历代散文名篇。

李之仪（生卒年不详）　字端叔，号姑溪居士。宋沧州无棣（今山东无棣西北）人。元丰进士。历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后坐草范纯仁遗表及行状，编管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姑孰溪，因以自号。政和七年（1117）终朝请大夫，年80余。有《姑溪居士全集》。　（祝振玉）

黄庭坚（1045——1105）　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自幼好学，博览经

史百家。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历任国子监教授、太和知县，元佑时入京编《神宗实录》，书成，迁起居舍人，后贬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徽宗即位，受命内迁，又因赵挺之排挤，被除名编管宜州（今广西宜山），死于贬所。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首，其诗歌成就最大，与苏轼并称“苏黄”，并被后人奉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黄庭坚的散文不少提出了他的文学主张，如《答洪驹父书》中说：“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又说：“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与王观复书》则说：“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于《王定国文集序》又认为文章应“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这些认识，也直接反映在他的诗文创作中。亦能词，工书法，风格纵横奇倔，颇负盛名。著有《豫章先生文集》、《山谷全集》。

秦　观（1049——1100）　字少游，一字太虚，号邗沟居士，学者称淮海先生，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八年（1085）登进士第，授定海主簿，调蔡州教授，苏轼曾以贤良方正荐之于朝，为人所阻，未赴任，后为宣教郎、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正字，绍圣元年（1094），元佑旧党受打击，出为杭州通判，继贬郴州、横州、雷州等地，徽宗即位，得复职北还，途中逝于滕州。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诗、文、词皆工，而以词著称。其古文在当时亦颇有名，其文字自学西汉，长于议论，史论喜欢标新立异；策论则多针对时事而发，但颇刻露空泛，不甚含蓄。著有《淮海集》40卷、《后集》6卷、《长短句》3卷。（文益人）

晁补之（1053——1110）　字无咎，号归来子，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17岁至杭州。著《钱塘七述》，为苏轼称赏。元丰进士。元佑初，为太学正，累迁著作佐郎。绍圣末，坐元佑党籍，谪监处州、信州酒税。徽宗朝，为吏部员外郎，转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后历知湖州、密州、果州、泗州。他是当时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著有《鸡肋集》、《晁氏琴趣外篇》。黄庭坚评其文有汉唐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文“波澜方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祝振玉）

张　耒（1054——1114）　字文潜，号柯山，祖籍亳州谯县（今属江苏）。熙宁六年（1073）举进士，历任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等职，元佑初授秘书省正字，官至起居舍人，绍圣中谪监黄州酒税，徙复州，徽宗立，起为黄州通判，历知、颍、汝等州，坐元佑党，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寻得自便，居于陈州。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工诗、文，以诗歌成就最高。论文渊源于三苏，主张主理并重，平易自然。苏轼称其文甚似苏辙“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著作今存《柯山集》50卷、《张右史文集》60卷等。

（文益人）

李　廌（1059——1109）　字方叔，宋华州（今陕西华县）人，一说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少孤贫，勤

奋力学。元丰中受教于苏轼，颇见推重。与范祖禹谋荐于朝，未果。遂绝意仕进，定居颍昌（今河南许昌）。著有《济南集》、《德隅斋画品》等。元佑中尝上《忠谏书》、《忠厚论》、《兵鉴》于朝，其文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辩而中理。

李清照（1084——？） 自号易安居士。宋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幼有才藻，善属文，工诗词。早年生活优裕，居青州（今山东益都），与其夫赵明诚伉俪相得，致力于金石书画之收藏研究。金兵南侵后，其夫赵明诚死，李清照遂辗转流离南方。绍兴二年（1132），再适张汝舟，不久即离异。晚岁处境哀伤孤独，不知所终。卒年约70余。著有《李易安集》，已佚。后人辑有《漱玉集》，今有《李清照集》辑本。其文学创作以词著称，亦工散文与骈文。其《金石录后序》一文，笔墨疏秀，叙次详曲，光景可睹，而存亡之感，更凄然言外。（祝振玉）

孟元老 生平无考，自署幽兰居士。盖为北宋人，著有《东京梦华录》10卷，系南渡之后追忆汴京繁盛而作，书中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典礼、仪卫，都有记载，许多记载本身就是出色的散文小品。《梦华录序》概括了书的主要内容，是一篇文情并茂之作。

邓　肃（1091——1132） 字志宏，南剑沙县（今属福建）人。在太学时，就东南贡花石之事献诗得罪，被逐，靖康初，召对赐进士出身，补承务郎，授鸿胪寺簿，后不肯屈从张邦昌政权，赴南京，擢右正言。李纲罢相，肃上书论救，触怒执政，遭贬逐归里。著有《栟榈集》16卷。肃性耿介，其文亦多剀切质直，《具瞻堂记》一文较有名。 （文益人）

刘子翚（1101——1147） 字彦冲，号屏山，一号病翁。宋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父刘韐死于金兵南渡之际。以荫补承务郎，通判兴化军。后辞归武夷山，专事讲学，深研《周易》，朱熹曾从之学。著有《屏山集》。在宋代的道学家中，他的文章是艺术性较高、道学气最少的。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文论事论理，皆曲折明畅，无语录俚词。"

胡　铨（1102——1180） 字邦衡，号澹庵。宋吉州庐陵芗城（今江西吉安南）人。高宗建炎二年进士。任枢密院编修官。绍兴八年（1138），呈《戊午上高宗封事》，坚决反对秦桧主和，乞斩桧与参政孙近、使臣王伦三人之首，声振朝野，由此被贬谪编管，转徙岭南，至绍兴二十五年（1145）桧死始得内移衡州。孝宗时历国史院编修、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以资政殿学士致仕。著作有《澹庵集》等。散文成就主要在政论方面，其议论慷慨激越，语言明达条畅，具有惊顽起懦、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祝振玉）

岳　飞（1103——1142） 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家贫力学。宣和四年（1122）应募敢战士，参加守边，在抗金战斗中战功卓著，历任武安军承宣使，荆南、鄂岳州制置使，检校少保，进封公，拜太

尉，授少保，任枢密副使。在大败金兵，进军朱仙镇之时，为秦桧拘陷入狱，于绍兴十一年岁暮（1142）以“莫须有”之罪遭杀害。孝宗时追谥武穆，后改谥忠武，宁宗时追封鄂王。著有《岳忠武王文集》10卷。其文议论正大，语言刚劲质朴。《五岳祠盟记》为其代表作。能诗词，慷慨激切。《满江红》（“怒发冲冠”）一首尤为后世所传诵。（文益人）

洪　迈（1123——1202）　字景卢，号容斋。宋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绍兴进士，累官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修国史。淳熙十三年（1180）为翰林学士。宁宗时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曾使金，几被拘留。洪迈学识渊博，尤熟于宋代掌故。撰有《容斋五笔》、《夷坚志》等，编有《万首唐人绝句》。他以笔记杂文见长，凡读书心得、生活琐事，世情风习、风景名胜、朝政掌故、历史传说、名人轶事无所不包。不仅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文体上也自成一格，往往短小精悍，别具识见。

陆　游（1125——1210）　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试礼部，名在前列，因触怒秦桧被免职。孝宗时赐进士出身。历官隆兴、夔州通判，提举福建及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权知严州，光宗时除朝议大夫、礼部郎中。后被劾去职，归老故乡。他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词和散文的成就也很高。其散文不仅正气凛然，且详实委曲，博约精要。著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等。（祝振玉）

范成大（1126——1193）　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官徽州司户参军，历任吏部员外郎、中书舍人、四川知置使、礼部尚书，仕途几经浮沉，在淳熙十年（1183）58岁时以病辞官，隐居石湖。善诗文，其诗境界开阔，辞藻华赡，为南宋著名诗人。文赋在当时也享有盛名，其政论文大都篇章短小，语言平实，但多切中时弊，记叙文也很有成就，《三高祀记》被周密称为“天下奇笔”，时誉甚高；其山水游记得柳宗元笔法，随物赋形。《泛石湖记》为其代表作。亦能词，工书法。著有《吴郡志》、《吴船录》、《桂海虞衡志》、《揽辔录》等及《范石湖集》。

王　质（1127——1189）　字景文，号雪山，兴国（今属江西）人。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为太学正，因上疏论易相国事，为忌者所谗，罢去，虞允文当国，荐为右正言，官枢密院编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博经史，善属文，著有《雪山集》十六卷及《诗总闻》、《林泉结契》等。王质的奏疏之文多言辞剀切，当于事理；其游记文则多为临景适情之趣而为之，文笔清隽，轻灵流利，如《游东林山水记》。

杨万里（1127——1206）　字廷秀，自名书室为“诚斋”，世称诚斋先生，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授赣州司户参军，历任永州零陵县丞、漳州知

州、广东提点刑狱、吏部郎中、秘书监、江东转运副使，后辞官归里，闲居15年。善诗，初学江西诗派，50岁后跳出步人后尘的路子，自辟蹊径，形成了独具特色、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诚斋体”。其诗名在当时与陆游、范成大比肩。亦善属文，以山水游记为佳，语言平易浅近，文风清新流畅，得柳宗元笔法，如《景延楼记》。工词与辞赋，其《浯溪赋》与范成大《馆娃宫赋》齐名，为时所传诵。又精《易》学。著有《诚斋集》133卷及《杨文节公诗集》、《诚斋易传》、《诚斋诗话》等。　（文益人）

朱　熹（1130——1200）　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又以本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二年（1196），落职罢祠，后致仕。朱熹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考亭学派、程朱学派。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楚辞集注》、《诗集传》、《韩文考异》及后人编纂的《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他的文章主张明义理、切实用，反对浮华无实。他发展了先秦以来的语录体散文并兼取佛教禅宗的灯录形式，倡导一种接近口语的语录体文章，在宋代散文中自树一帜，对后人亦有很大影响。

楼　钥（1137——1213）　字大防，号攻愧主人。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隆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乾道年间，以书状官从汪大猷使金。所撰《北行日录》，记叙行程道里见闻，详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原的残破景象及人民的苦难生活。有《攻愧集》，其散文多论治国之道，政治性较强。

吕祖谦（1137——1181）　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婺州金华（属浙江）人。祖籍寿州（今安徽凤台）。隆兴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累官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曾邀集鹅湖之会，开浙东学派。著有《东莱集》、《吕氏家塾读书记》。散文创作反对空谈，所作文辞闳肆辩博、凌厉无前。

（祝振玉）

陆九渊（1139——1192）　字子静，自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曾结茅讲学于象山，学者称象山先生。乾道八年（1172）进士，官至奉议郎知荆门军。为理学中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心学”的创始人，其学与兄九韶、九龄并称“三陆子之学”。在“太极”、“无极”问题和治学方法上，和朱熹进行长期的辩论。其学说后由明代王守仁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工散文，其文文理清晰，笔法严谨流畅，《送宜黄何尉序》一篇较有名。著有《象山先生全集》。

（文益人）

辛弃疾（1140——1207）　原字坦夫，后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宋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绍兴三十一年（1161），聚众二千隶耿京共同

恢复，为掌书记，次年率部渡淮南归。累官提点江西刑狱、提点福建刑狱、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开禧二年(1206)为谏官所劾落职，后卒于铅山。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擅为长短句，风格悲壮沉雄。著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他虽以词称名，散文也足可观。其《美芹十论》、《九议》诸文，“英伟磊落……笔势浩荡，智略辐辏，有权书衡论之风。”(见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陈　亮(1143——1194)　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光宗绍熙四年(1193)中进士第一，得任建康府佥判，未至官而卒。他年轻时即有抗金救国、奔走四方之志，好言霸王大略、兵机利害，曾四次上书力主克复中原。三次被诬入狱。他反对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终其身以布衣而纵论天下事。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等。其政论文以意与理为基础，体不诡异，词不险怪，宏富典丽，气势纵横，具有政论家的风采。

叶　适(1150——1223)　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进士，历任蕲州，权吏部侍郎、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多次上书指陈弊政，建议实行改革。在学术思想方面，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后世推为永嘉学派巨擘，著有《水心文集》及《习学记言序目》等。叶适的散文在南宋卓然为一大宗，他的政论文可为代表，大抵以经史之学为基础，并能从实际出发，提出政见，语言简朴厚重有力。论文反对模拟古人，主张有裨政教。

岳　珂(1183——1234)　字肃之，号亦斋，又号倦翁。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岳飞孙，岳霖子。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宝谟阁学士。生平富收藏，精鉴赏，工诗文。著有《九经三传沿革例》、《金陀粹编》、《岳少保岳鄂王行实编年》、《愧郯录》、《桯史》等。其文章略似《左传》，往往情见乎词，寓忠愤褒贬之意于外史稗乘之中。

罗大经(生卒年不详)　字景纶，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约宁州嘉定末(1224)前后在世。尝登第，为容州法曹掾。著有《鹤林玉露》16卷。擅长于笔记杂文，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著作形式，它评论艺文，褒贬人物，指责弊政，往往别见识见，发人深思。　(祝振玉)

马端临(约1228——1322)　字贵与，乐平(今属江西)人。宋朝咸淳年间漕试第一，父马廷鸾为宋宰相，因与贾似道不合罢了官，他也就没出去作官。入元，曾任慈湖、柯山两书院山长，台洲儒学教授。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传》等。《文献通考》历20年始成，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书前序文一篇，文字朴厚，行文流畅，且命意严正，层次井然，是史学家文章，也是一篇优秀散文。

胡三省(1230——1302)　字身之，号梅涧，天台(今属浙江)人。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进士，历任

县令、府学教授等，宋亡后隐居不仕。用一生的大部分精力为《资治通鉴》作注，对《通鉴》作了解释、校勘、考证工作，在史学方面贡献很大。书前作序文一篇，语言简炼，条理清晰，内容精博，也是一篇比较优秀的散文。

（文益人）

周　密（1232——1298）　字公谨，号草窗、苹州、四水潜夫、弁阳老人等。济南（今属山东）人。早年随父往来闽、浙间。景定间，为临安府幕属，后监和剂局、丰储仓，为义乌令。宋亡不仕。生平广交游、富藏书，著有《草窗韵语》、《草窗词》、《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浩然斋雅谈》、《云烟过眼录》等。所作文多记朝野故实、佚闻琐事，不仅可补史料之阙，亦有较强的文学性，如其《武林旧事·观潮》一文，叙次详曲，写景宛然。　（祝振玉）

陆秀夫（1236——1279）　字君实，楚州盐城（今属江苏）人。宝佑四年（1256）与文天祥同中进士。临安（今浙江杭州）为元兵攻陷时，他任礼部侍郎职。后与文天祥等在福州拥赵昰为景炎皇帝，继续抗元，赵昰死。他和张世杰等又立赵昺为帝，任左丞相，在厓山（今广东新会南）抵抗，元兵破厓山，他背负赵昺投海死。为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忠臣。著有《陆忠烈集》。陆秀夫随南宋小朝廷辗转南方时，朝内不少公文出自他的手笔，其《拟景炎皇帝遗诏》一篇尤为知名。

王炎午（生卒年不详）　初名应梅，字鼎翁，后改炎午，安成（今江西安复）人。咸淳间（1265——1274）为太学生，文天祥募兵勤王，炎午杖策谒之，留入幕府，旋以母老辞归，天祥被执北上，他为文生祭之，激励文天祥为国死节。入元后，终身不仕。炎午大节不亏，而文章不甚著名，但《望祭文丞相文》一篇既在当时为世所称，亦足可流传后世。著有《吾汶稿》10卷。

文天祥（1236——1283）　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佑四年（1256）中进士第一名，历任湖南提刑，知瑞、赣等州。德佑元年（1275）闻元兵东下，在赣州组织义军，入卫临安（今浙江杭州）。次年任右丞相，奉命赴元军谈判被拘，后脱险，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曾于景炎二年（1277）进兵江西，恢复州县多处，不久兵败，于广东五坡岭被俘，拘囚三年，坚贞不屈，被害于大都（今北京）柴市。长于诗，后期所作《指南录》、《指南后录》中的诗作，表现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堪称诗史，以《过零丁洋》、《正气歌》尤为后世所传诵。亦能词，文天祥的散文也写得笔墨酣畅，气势磅礴。《正气歌序》、《指南录后序》等乃是其代表作。有《文山先生全集》20卷存世。（文益人）

林景熙（1242——1310）　字德旸，号霁山，平阳（今浙江平阳）人。咸淳七年（1271），自太学生授泉州教官。历礼部架阁，转从政郎。宋亡不仕，隐居家乡，教授生徒。生平以文章风节著称于时。著有《霁山集》。其文章多托物述志、不事雕绘而寄慨良

深。（祝振玉）

邓　牧（1247——1306）　字牧心，自号九锁山人，又号三教外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亡不仕，元至元十二年（1275），入居大涤山中洞霄宫之超然馆，世称文行先生。与谢翱、周密相友善。善属文，其文章高旷绝俗，虽不如周密文章感繁华消歇而慷慨悲愤，而实为侘傺幽忧，不能自释，故而发为世外放旷之谈，文风冲和修洁，尤以游记为佳。著有《伯牙琴》1卷、《洞霄图志》6卷及《洞霄诗集》。（文益人）

谢　翱（1249——1295）　字皋羽，号宋累，又号晞发子。试进士不中，元军南下时，曾率乡兵数百投文天祥幕下，任咨议参军。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兵败被俘，遂脱身隐伏民间。宋亡不仕，著有《晞发集》，编有《天地间集》。散文学柳宗元，长于记叙。以《登西台恸哭记》最为有名。（祝振玉）

谢枋得（1226——1289）　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属江西）人。宝佑四年（1256）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德佑元年（1275），以江东提刑、江西诏谕使知信州；宋亡，寓居闽中。元朝屡召出仕，坚辞不应，后被强行送往大都，绝食而死。其文格调高齐，气势非凡。《上丞相刘忠斋书》、《送史县尹朝京序》等，皆为佳作，于唐宋赠序文中，颇具特色。所著《叠山集》16卷，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萧　晨）

辽　金

萧观音（1040——1075）　辽道宗耶律洪基懿德皇后，死后追谥宣懿。她爱好音乐，善琵琶，工诗，能自制歌词，被道宗誉为女中才子。太康初年，被人诬陷含冤而死。萧观音的诗文载于王鼎所撰《焚椒录》中。

萧韩家奴（？——？）　字休坚。辽契丹剌部人。精通契丹文、汉文。兴宗时任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曾编撰从遥辇可汗到兴宗为止的辽代历史20卷；又译《贞观政要》、《五代史》为契丹文。72岁死。

蔡松年（1107——1159）　字伯坚，号萧闲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以宋人随父降金，官至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卒谥文简。能诗文，诗风隽爽清丽，部分作品流露出对仕金的悔恨，表达了归隐的心情。词作尤负盛名，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词集为《明秀集》。

蔡　珪（？——1174）　字正甫，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蔡松年之子。天德三年（1151）进士。入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改户部员外郎

兼太常丞。其辨博号称天下第一，金朝稽古代礼文之事，取其议论为多。以文名世，其文章在大定年间声名很大，被推为金代文学的实际奠基人。元人郝经评其文，有“高古劲欲摩欧苏”（《书蔡正甫集后》）语。诗亦清劲雄奇。著有文集55卷、《晋阳志》等，文集今佚，诗见《中州集》。

王　寂（1128——1194）　字元老。蓟州玉田（河北玉田）人。海陵炀王天德三年（1151）进士。历任太原祁县令、通州刺史、中都副留守、中都路转运等职。卒谥文肃。工诗文，其文有戛戛独造之风；古文亦博大疏畅。他的诗歌和散文对同时而稍晚的王若虚、李俊民都有一定影响。著有《拙轩集》。

党怀英（1134——1211）　字世杰，号竹溪。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进士，任莒州军事判官，入为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能诗，善书法。他在金章宗明昌年间为文坛盟主。作品不尚虚饰，因事遣词，对金代文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其文平实畅达，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著有《竹溪集》，今佚。其诗见《中州集》。

赵秉文（1159——1232）　字周臣，号闲闲。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大定进士，累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工诗文，擅书画，继党怀英之后主盟文坛。不满于当时不断滋长的浮艳尖新的文风，力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政治影响加以挽救。刘祁曾指出：“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他的散文以周程理学为主，往往出于经义名理之学，长于辩析，议论横生。亦能诗，以唐人为宗法。著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钟家新）

杨云翼（1170——1228）　字之美，平定乐平（今山西昔阳）人。章宗明昌五年（1194）经义进士第一。宣宗兴定二年（1218）拜礼部尚书，转吏部尚书，终于翰林学士，卒谥文献。文章与赵秉文齐名，时称“杨赵”。一时高文典册，多出其手。论文主张“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理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引）。其文章长于论辨，说理明晰，《谏伐宋疏》为其代表作。原有文集，已佚，文存《金文雅》。

（文益人）

王若虚（1174——1243）　字从之，号慵夫，入元自称滹南遗老。真定藁城（今河北藁城）人。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历任管城、门山县令。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间修《宣宗实录》，书成，迁平凉府判官，不久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金亡北归，隐居乡里以终。王若虚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论文主张“文章唯求真是而已”（《文辨》）“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诗话》下）“浑然天成”（《诗话》中），认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

为知本末”（《文辨》）。他的散文创作也以其理论为旨归，不事雕琢，唯求理当。亦能诗，以白居易为法。著有《滹南遗老集》、《滹南诗话》等。

李俊民（1176——1260） 字用章，自号鹤鸣老人。泽州晋城（今属山西）人。章宗承安五年（1200）举经义进士第一，官应奉翰林文字。由于不满政治腐败，弃官。金亡后，忽必烈召见，颇加礼遇，仍乞还不出，卒赐谥庄靖。李俊民少习二程理学，有文名。其文冲淡和平，语言流畅。亦能诗词。有《庄靖集》。

李纯甫（1177——1223） 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章宗承安二年（1197）进士，前后三入翰林，后出任京兆府判官，官至尚书右司都事。于书无所不读，而于《庄子》《列子》《战国策》《左传》尤长。散文创作亦以之为师法，文风雄奇简古，时人多有效法者。30岁后遍观佛道书，能悉其精微。文章对性理、佛老之学颇多涉及。《归潜志》记载他曾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碑志诗赋号外稿。今仅存《鸣道集说》1卷，其诗则见《中州集》。

元好问（1190——1257） 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代文学家、史学家。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博学宏词科，充国史院编修。后数年，历官镇平、内乡、南阳县令。正大八年秋，受诏入都。天兴元年（1232），任尚书省掾、左司都事。天兴三年，金亡。此后20余年，他致力于保存金代文化。纂有金诗总集《中州集》，金词总集《中州乐府》等。元好问论文学涉及诗、词、文多种文体，而以《论诗绝句三十首》最具代表性。诗中标举建安的优良传统，提倡诗应真淳自然、不因袭模拟，亦反映了他对其他文体的认识。其创作则涉足诗、词、文、散曲和笔记小说各个领域，以诗的成就最高。其词能溶汇婉约、豪放诸家风格，堪称金词之冠。他的散文承继韩愈、欧阳修传统，风格清新雄健，语言平易自然，亦可卓然成家。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

段克己（1196——1254） 字复之，号遁庵，别号菊庄。绛州稷山（今属山西）人。金末进士，未入仕。入元后，避乱龙门山中。以文章擅名。段克己为河汾诗派作者，兼擅填词，作品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受苏、辛的影响比较明显。其弟段成己也有文名，为赵秉文以“二妙”相誉。后人汇集其兄弟诗词为《二妙集》。

刘　祁（1203——1250） 字京叔，号神川遁士，浑源（今属山西）人。为太学生时甚有文名，然屡试不第。入元，复出就试得中，充山西东路考试官。工诗文，著有《神川遁士集》，不传。在金末丧乱之际北还，作《归潜志》，书中记录了许多金代文学家的传记及金代作者对诗文的评论，是研究金代文学的重要资料。

（钟家新）

麻　革（生卒年不详） 字信之，虞乡（今山西永济）人。金正大

中，与杜仁杰、张澄共隐内乡（今河南内乡）山中，教授生徒，诗歌唱和，人称贻穀先生。蒙古灭金后，他迁居代北，淹留于居延（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著有《贻穀集》。元太宗八年（1239），麻革赴试武川（今河北宣化），归途游龙山，写下的《游龙山记》，是其散文佳作。　（文益人）

元　代

杨　奂（1186—1255）　又名知章，字焕然，乾州奉天（今陕西乾县）人。金末，尝作万言策，指陈时病，欲上不果。元初，隐居为教授，学者称为紫阳先生。耶律楚材荐为河南廉访使。在官十年。卒谥文宪。散文风格古朴。著有《还山集》《近鉴》《北见记》《正统纪》等。

耶律楚材（1190—1244）　字晋卿，契丹族人。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老、医卜之说。金末，为开州同知，又任左右司员外郎。元太祖入燕京，闻其名而召用，随从左右，以备咨询。元太宗时，官拜中书令。太宗卒，皇后称制，楚材以忧死。后追封广宁王，谥文正。楚材天才卓异，工诗，散文亦可见。他从征西域，所著《西游录》，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西域风光人情。著有《湛然居士麻》14卷。

郝　经（1223—1275）　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山西晋城）人。金亡后迁河北，在元将张柔家，得读其藏书。后入忽必烈王府，甚受信任。忽必烈继位世祖，郝经以翰林学士充国信使使宋议和，为贾似道所沮，留宋16年，至元十二年（1275）得释北还，不久病逝。其学术思想和文学见解都受有理学的影响。为文崇实黜华，强调内心修养而轻视社会阅历。主张文无定法，“文自新而法无穷”（《答友人论文法书》），反对蹈袭前人。其论文之作亦写得畅达明析。著有《郝文忠公集》。

胡祗遹（1227—1293）　字绍闻，磁州武安（今河北磁县）人。早年以文辞知名，受大名安抚张文谦辟，为员外郎，官至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善诗文，能自抒胸臆，无所依傍，不事雕饰，在元人中别树一帜。著有《紫山大全集》。

王　恽（1227—1304）　字仲谋，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初为卫州详议官，后拜监察御史，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20岁时曾访谒元好问，颇受称赏。工诗词，词风平易通达。散文学韩愈。著有《秋涧先生大全文集》。

方　回（1227—1302）　字万里，号虚谷，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

南宋理宗时登第，知严州。元兵至，迎降，授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往来杭州、歙县一带。为学崇奉朱熹，诗歌标榜江西诗派，罢官后，选唐、宋近体诗为《瀛奎律髓》加以评论，创“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反映了多年研诗的心得。诗学黄庭坚、陈师道，风格失之粗劲。他的散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余力，居然醇儒之言。”一些文字简当扼要的短文尤佳。著有《桐江集》。

姚 燧（1238—1313） 字端甫，号牧庵，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38岁入仕，为秦王府文学，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以文章见称。论文主张文道并重，认为“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创作上多碑、铭、诏诰等，文章结构谨严，叙事简要，气势流畅，格高调古。《元史·姚燧传》称他：“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积弊为之一变。盖自延佑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黄宗羲亦推他“非有明一作者所能及”（《明文授读序》）。著有《牧庵集》。

刘 壎（1240—1319） 字起潜，南丰（今属江西）人。由宋入元，元时曾任南丰、延平等地教官，而以隐居自命。受理学影响，论文主张“文以载道，学以明理”。推重真得秀《文章正宗》为“去取有法，足以垂训不朽”。不遗余力地摈斥科举时文，视之为“亡国之具”（《答友人论时文书》）。著有《水云村稿》等。

萧 𣂏（1241—1318） 字维斗，奉元（治所在今陕西西安）人。曾读书终南山下30年，博览群书。大德中，拜太子右谕德，后除集贤学士，国子祭酒，卒谥贞敏。著有《勤斋集》八卷，存文42篇及诗、词200余首，萧于六经百氏无不通，为文悉本诸经，立意精深，言近指远，为一代醇儒。其文风质实简洁，惟气格稍弱。

卢 挚（约1243—1315） 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汲郡（今河北涿县）人。入元先后任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河南府路总管等职，官至翰林承旨。他的散文当时人称与姚燧比肩，诗与刘因齐名，然实际成就颇不及。而以散曲成就为高。有《疏斋集》等，已佚。其文见于《天下同文集》中。

刘敏中（1243—1318） 字端甫，章邱（今属山东）人。至元十一年（1274）由中书掾擢兵部主事，拜监察御史，因劾权臣僧格，不报，辞职归。复起，历任集贤学士、翰林学士承旨，以疾还，卒谥文简，追封齐国公。著有《平宋录》、《中庵集》等。刘敏中的诗文平正通达，无钩章棘句之习。其文理明辞备，所谓“不藻缋而华，不琢镂而工”，其金石之文，不独以文章传世，亦可备史传之订正。

戴表元（1244—1310） 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今属浙江）人。宋末咸淳进士，官建宁府教授。入元，出为信州教授等职，后以病辞。戴表元是当时东南地区有影响的文章大家。他为学尊崇朱熹，论文

注意到新变，反映了元代文坛的普遍风气。《元史》本传称他“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散文又多伤时悯乱之作。文章不乏佳构，诸如《寒光亭记》《猫议》《观渔赋》等。亦能诗，近体诗风致近晚唐。有《剡源文集》及佚诗6卷。

熊朋来（1246—1232） 字与可，号天慵子，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宋咸淳进士。入元，为福清州判官。通音律，尤善鼓瑟，著有《琴谱》。能文。有《五经说》。

刘　因（1249—1293） 字梦吉。字梦骥，容城（今属河北）人。因爱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题所居为“静修”。至元十九年（1282）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以母病辞官，母死居丧在家，忽必烈召他为官，以疾辞。为人清高傲岸，引陶渊明为知己。博览群书，7岁即能属文。精通经学及宋儒理学。论诗推崇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文章写得流畅明析，著名的如《上宰相书》，以恳切委婉的措词申明了自己辞官的理由，“书上，朝廷不强致”（《元史·刘因传》）。著有《静修先生文集》。

吴　澄（1249—1331） 字幼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尝举进士不第，至大元年（1308）召为国子监丞，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泰定初，开经筵，以澄为讲官，会修《英宗实录》，澄总其事，实录成，即引疾去，诏加资善大夫，卒，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澄为当时名儒，与北方许衡称为南北学者之宗，许衡之学主于笃实以化人，吴澄之学主于著作立教，生平著作甚丰。其散文词华典雅，斐然可观。文存《吴文正集》。

任士林（1253—1309） 字叔实，号松乡。奉化（今属浙江）人。尝讲道会稽，授徒钱塘，至大初（1308），以郝天挺荐，授安定书院山长。散文学韩愈，然其力不足以及愈。《四库总目提要》评曰：“南宋季年，文章凋敝。道学一派，以冗沓为详明；江湖一派，以纤佻为雅隽。先民旧法，几于荡析无遗。士林承极坏之后，毅然欲追步于唐人，虽明而未融，要亦有振衰起废之功。”赵孟頫见其文，颇为称赏。文以碑、志为多。著有《松乡文集》。

赵孟頫（1254—1322） 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是宋宗室秦王赵德芳的后代，入元以前，是一个公子王孙，风流散诞。入元后，由程钜夫荐举，入造刑部主事，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死后谥文敏。诗、书、画皆擅，书法尤有名，人称“赵体”。《四库总目提要》说：“论其堵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让于虞、杨、范、揭之间，不甚出其后也。”论文要求“明理”，只在把道理说清，不需要深文曲笔，以此为旨归，其散文风格即颇为简朴明晰。著有《松雪斋文集》。

陆文圭（1256—1340） 字子方，江阴（今属江苏）人。宋亡后隐居城东，世称墙东先生。宋咸淳九年

(1173)方试中式，当时元兵已下樊城襄阳，所以未应省试。元延佑间恢复科举，中乡举，后为容山教授。工文，史称其"为文融会经传，纵横变化，莫测其涯际"(《元史·陆文圭传》)。著有《墙东类稿》。

邓文原(1258—1328) 字善之，一字匪石，绵州(今四川绵阳东)人。随其父流寓钱塘(今浙江杭州)。著作题为《巴西文集》，乃为不忘本也。宋末，应浙西转运司试，中魁选。至元间，辟为杭州路儒学正，迁翰林待制，官至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卒，谥文肃。其散文风格温醇典雅，以碑、志、记、序为多。《四库总目提要》评："当大德、延佑之世，独以词林耆旧主持风气。袁桷、贡奎左右之，操觚之士，响附景从。元之文章，于是进为极盛，文原实有独导之功。"

蒲道源(1260—1336) 字得之，号顺斋，世居眉州之青神(今属四川)，徙居兴元(今陕西汉中)。初为郡学正，罢归，皇庆中(1313)征为国史院编修官，进国子博士，越岁，引疾去；后十年，召为陕西儒学提举，不就。其生平恬于仕宦，以闲居之日居多，故其子机裒辑其文为《闲居丛稿》，凡26卷。其文真朴无华，雍容不迫，平实显易。亦能诗赋。

袁　桷(1267—1327) 字伯修，号清容居士，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早年举茂材异等科，为丽泽书院山长，官至侍讲学士。少从戴表元、王应麟学。后入翰林，朝廷制册、勋臣碑版，多出其手。论文崇奉韩愈、欧阳修，对理学家文论的狭隘偏颇深致不满。其散文雍容典雅，博硕伟丽，为一代名家。在大德、延佑元治极盛之际，他的文章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四库总目提要》)著有《清容居士集》。

刘　诜(1268—1350) 字桂翁，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延佑复科举后，肆力于名物、度数、训诂、笺注之学，既十年不第，乃刻意于诗古文。论文主张自出机杼，不求对古人字句的摹拟。欧阳玄序其文集，称其文温柔敦厚似欧，明辨雄隽似苏，亦能诗，著有《桂隐文集》。

贡　奎(1269—1329) 字仲章，宣城(今属安徽)人。10岁能属文，后为齐山书院山长，会议行郊祀礼，大臣以奎荐，授太常奉礼郎，兼检讨，累迁集贤直学士，卒，追封广陵郡侯，谥文靖。著有《云林小稿》、《听雪斋记》、《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录》、《南州纪行》，凡百二十卷，皆不传，今仅存《云林集》六卷。贡奎的诗，在元代卓然名家，《四库全书总目》评之曰："诗格在虞、杨、范、揭之间。"其散文温醇清纯，吴澄称其温然粹然，得黄雅之体，然仅存遗文2篇。

元明善(1269—1322) 字复初，大名清河(今属河北)人。资颖悟绝，读书过目不忘。弱冠游吴中，已以能文名，浙东使者荐为安丰、建康两学正，又辟为掾，行枢密院，官至

翰林学士，卒于官，追封清河郡公。明善少以文章自豪。取法于秦汉，文风亦近之。在江西、金陵时，每以文章与虞集相切磋，其文至老愈精诣。著有《清河集》。

柳　贯（1270—1342）　字道传，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曾任江山县教谕、后官国子助教、太常博士，擢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到官七月而卒，世称柳待制。其古文从学于方凤、吴思齐、谢翱等，又与方回、龚开、仇远、戴表元等交游，文章精湛闳肆，雄浑严整，长于议论，以墓铭碑表为多。文名颇著于时。其题跋小品则短小自然，清新活泼。著有《柳待制文集》。

张养浩（1270—1329）　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今属山东）人。曾任监察御史，以批评时政为权贵所忌，免官。后复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至治元年（1321），因上疏元夕放灯得罪，辞官归隐济南。张养浩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不以文名，但他的文亦如其散曲，能直抒情怀，尤以游记为佳，文章多表达了作者旷达超俗，寄情山水，隐居乐道的思想，文词简约清新可读。著有《云庄类稿》、《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

杨　载（1271—1323）　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徙居杭州。年40未仕，以布衣召为国史院编修官。后中进士，官至宁国路总管府推官。诗文颇具时名，与虞集、范梈、揭傒斯并称。散文以气为主，而以诗成就为高。著有《杨仲弘集》。

范　梈（1272—1330）　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湖北恩施）人。少孤贫，耽诗工文，用力精深，吴澄称他为特立独行之士，荐为左卫教授，迁翰要院编修官，后任福建闽海道知事等职。文学上与虞集、杨载、揭傒斯齐名，善诗，亦能文。著作存《范德机诗》。

虞　集（1272—1348）　字伯生，号道园，人称邵庵先生。祖籍仁寿（今属四川），宋亡后随父迁居临川（今属江西）。成宗大备初年到大都（今北京），任国子助教，后迁集贤修撰，泰定帝时升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卒谥文靖。虞集在当时与杨、范、揭号称文章四大家，以集名最著。《四库总目提要》评云："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佑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他为学推崇程、朱，其散文亦多颂扬元室、推尊儒术之作。但论文见解颇为通达，认为作者人品不同。"所遇异时，所发异志，所感异事，极其才之所能"，不可一概而论（《会上人诗序》）。著有《道园学古录》。

欧阳玄（1273—1357）　字原功，号圭斋。本欧阳修的同族而迁居潭州浏阳（今属湖南）。延佑二年（1315）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历官40余年，朝廷诏文典册，多出其手。当时海内名山庙院、权贵墓碑，以得玄文为荣。他在散文《芳林记》中，说一个人只要清白自守，声名自然远畅，正如兰生深林，芳香之气必然外溢。他

所作散文也是力求平实，不务矫饰，我清新扼要，简明流畅。著有《老斋集》。

揭傒斯（1274—1344） 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因卢挚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曾参加编修辽、宋、金三史。谥文安。与同时虞、杨、范齐名。欧阳玄撰《豫章公墓志铭》说他的文章“正大简洁，体制严整”。就内容而论，其散文则多宣扬封建伦理思想，亦有抒写个人闲情逸志之作。又能诗。著有《揭文安公全集》。文见《元明八大家文集》。

刘将孙（生卒年不详） 字尚友。其父辰翁号须溪先生，因又称上须。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末举进士，入元后曾主讲临汀书院，官延平教授。为学崇奉程、朱，为文推尊欧、苏。论文重性情，重意趣，不分流派，融文辞与义理，古文与时文，语录与禅悦为一炉。他的为他人诗文集所作序等论文散文，本身就是文笔流畅可读之作。著有《养吾斋集》。

黄溍（1277—1357） 字晋卿。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延佑二年（1315）进士，授台州宁海丞，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谥文献。与虞集、揭傒斯、柳贯号为“儒林四杰”。他为学尊崇朱熹，论文亦不出南宋理学家观点。他的散文，不少为颂扬操行高洁之士之作，反映了作者自身的品格。其文章风格，《元史·黄溍传》评曰：“文辞布置谨严，援据业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著有《黄学士文集》。

马祖常（1279—1338） 字伯庸。先世为雍古特部，居靖州天山（在今新疆），其高祖锡里吉思在金末为凤翔兵马判官，即以马为姓。其父曾任漳州同知，徙家光州定城（今河南潢川），遂为光州人。延佑二年（1315）利害试第二，官应奉翰林文字，后任监察御史，历任礼部尚书、枢密副使等职。善诗文，作文取法先秦两汉，诗学汉魏盛唐。散文多碑志之作，简洁新奇，条理明晰；质实平易有余，文采藻饰不足。著有《石田集》。

朱夏（生卒年不详） 字元会，一字好谦。金溪（今属江西）人。曾多次应进士试不第，遂居家治经史。元末死于兵乱。论文推崇古文家，主张自然，反对矫揉造作，雕琢刻镂，以雄深雅健为标的。著有《鸣阳集》。

李存（1281—1354） 字明远，又字仲公，安仁（治所今江西余江县东北）人。少博涉典籍，好为文章，尝师事陈苑，受陆九渊之学，论学以省察本心为主。论文主张代有其文，而以其学笃实，故其诗文皆平正醇雅，不露圭角，粹然有儒者之风。著有《俟庵集》三十卷，凡文十九卷，诗十一卷。

程端学（生卒年不详） 字时叔，庆元（今浙江宁波）人。元仁宗皇庆初前后在世，通《春秋》，以能赋名，举至治进士，为国子助教，迁太常博士。著有《春秋三传辨疑》、《积斋集》卷等。能诗，风格近乎南宋诗风。端学人品端谨，学术亦醇，故其

文结构缜密颇有闳深肃括之风。

李孝光（1285—1350） 字季和。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少年时博学，以文章负名于世，与杨维桢并称“杨李”。隐居雁荡五峰山下。至正四年（1344）征召隐士，以秘书监著作郎召，后擢秘书监丞。工诗词，其诗风骨遒上，在元诗坛上卓然成；其词直抒胸臆，平易浅近。擅文，取法古人，不趋时高。杨维桢曾举元代作者4人，以孝光与姚燧、吴澄、虞集并称。著有《五峰集》。

许有壬（1286—1364） 字可用。彰德汤阴（今属河南）人。延佑二年（1315）进士，授同知辽州事，后迁集贤殿大学士，改枢密副使，又拜中书左丞，以老病致仕。诗、词、文均能。其散文曾得到欧阳玄的称赞，有盛名。著有《至正集》《圭塘小稿》。

陈　旅（1288—1343） 字众仲，莆田（今属福建）人。以荐为闽海儒学官，马祖常奇之，与游京师，又为虞集所知，累官翰林文字、国子监丞。工散文，其文典雅峻洁，必求合于古作，不徒趋时尚。虞集见其文而有：“我老将休，付子斯文”之语，苏天爵辑《元文类》，独请陈旅为序，亦反映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著有《安雅堂集》。

苏天爵（1294—1352） 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曾师事吴澄、虞集。延佑四年（1317）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授大都路蓟州判官，后历任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大都路总管等职，卒于官。能诗。其散文多为碑志等，一些叙事文写得亦佳。文风明洁而粹温，谨严而敷畅。又耗费20年时间纂辑《元文类》（原名《国朝文类》）70卷，“自元兴以逮中叶，英华采撷，略备于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元代许多作者的作品因此书而得以传世。著有《滋溪文稿》《春风亭笔记》《国朝名臣事略》等。

危　素（1295—1372） 字太仆，一字云林，金溪（今属江西）人。少通五经，游吴澄、范梈门，元至正间，以荐授经筵检讨，与修《宋》、《辽》、《金》三史，官至礼部尚书、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出为岭北行省左丞，退居房山。入明，洪武二年（1369）授翰林侍讲学士，与宋濂同修《元史》，兼弘文馆学士，因人以亡国之臣不应列侍从论，谪居和州以卒。工诗，气格雄伟，风骨遒上。善属文，其文演迤澄泓，平易之中不乏意蕴，原有文集50卷，已散佚，存《说学斋稿》4卷。危素的诗文在元末都可推为大家。诗存《云林集》2卷。又著有《草庐年谱》。 （文益人）

杨维桢（1296—1370） 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又号铁笛道人、抱遗老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泰定四年（1327）进士，官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元末避乱钱塘，入明后未出仕。以诗文擅名当时，其诗号为“铁崖体”，誉者推为“一代诗宗”。散文亦为一代大家，文章朴雅奇奥，文笔纵横老练。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复古诗集》等。

吴　莱（1297—1340） 字立

夫，本名来凤，浦阳（今分归浙江义乌、兰溪）人。延佑间举进士不第，隐居松山，深研经史。后以荐署长芗书院山长，未行而卒。其门人宋濂等取“经义元深为渊，文词贞敏为颖”之谥议，私谥渊颖先生。散文为元末一大家，颇为世所推重，文风崭绝雄深，人说为文“他人患其浅陋，而莱独患其宏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也能诗。著有《渊颖集》。

贡师泰（1298—1362） 字泰甫，宣城（今属徽）人。以国子生中江浙乡试，除泰和州判官，荐充应奉要文字，官至礼部、户部尚书。少承家学，后师受吴澄，继而又与虞、揭游，其为文可谓渊源有自。王祎在《宣城贡公文集序》中说，元末文学之士“几于寥寥”，只有贡师泰的文章“气充而能畅，辞严而有体。讲道学则精而不凿，陈政理则辨而不夸，诚足以成一家文言而继前人之绪矣。”亦能诗。著有《玩斋集》。

郑　玉（1298—1358） 字子美，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幼敏悟嗜学，既长，博通六经，尤精《春秋》，教授于乡，门人甚众，学者称师山先生。至正间，征拜翰林待制、奏议大夫，辞疾不起，日以著述为事。明兵至，自经死。郑玉学术醇厚，发而为文，则雅洁不支，严而有法，颇得时人推重。有《师山文集》存世。

汪克宽（1301—1369） 字德辅（一作仲裕，亦作德一），祁门（今属安徽）人。泰定三年（1326）中乡试，会试以答策切直见黜，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教授宣、歙间，学者称环谷先生。明洪武初，征修《元史》，书成，将授官，以老疾辞归。著有《环谷集》8卷，《礼经补逸》9卷等，克宽学宗朱熹，其文章持论谨严，敷词明达，无支离迂怪之习。亦能诗。

张以宁（1301—1370） 字志道，古田（今属福建）人。家于古田翠屏山下，学者称翠屏先生。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1369）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于道。史称以宁以《春秋》举进士，所学尤专《春秋》，多所自得，著有《春王正月考》2卷。亦善诗文，其诗高雅清逸，文则神锋隽利，在元末擅名于时，人呼之“小张学士”。诗文集有《翠屏集》4卷。

萨都刺（1308—?） 字天锡，号直斋，答失蛮氏，蒙古人。因祖父留镇云、代，遂居雁门（今山西代县）。一云本朱氏子，其父阿鲁赤养为己子。泰定进士，官淮西江北道经历。晚年寓武林。以诗名，其诗多写自然景物，亦工词。喜游历山水，除以诗、词纪之外，亦作游记，文章文词简洁，笔锋雄建，可以《龙门记》为代表。著有《雁门集》《萨天锡诗集》等。

邵亨贞（1309—1401） 字复孺，先世为淳安（今属浙江）人，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卜筑溪上，自号贞溪。博通经史，工篆隶。明洪武中，官松江训导。著有《野处集》4卷。亨贞终于儒官，足迹不出乡里，故其文无雄篇巨制，所存文章六十余篇，大

致文辞清快，章法井然。亦能词，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收其词2首。

迺　贤（1309—?）　字易之，别号河朔外史。本突厥葛逻禄氏。“葛逻禄”为突厥语，意思是“马”，所以又名马易之。先祖世居金山（今新疆北部阿尔泰山之西），元统一中国后，内迁南阳（今属河南），称南阳人。早年随兄塔海仲良宦游江浙，后定居于鄞（今浙江宁波）。至正间以荐为翰林编修官，出参桑哥失里军事，卒于军。长于诗，清润流丽，不喜雕琢，有人把其诗与韩与玉的书画、王子充的散文并称“江南三绝”。著有《河朔访古记》和诗集《金台集》。

陈　基（1314—1370）　字敬初，临海（今属浙江）人。至正中，以荐授经筵检讨，获罪避归。张士诚据吴，引为学士，书檄多出其手。入明，明太祖召入预修《元史》，赐金而还。基受业于黄溍之门，所作诗文皆操纵驰骋，有雍容揖让之度。其寓舍有“夷白斋”，故其著作曰《夷白斋稿》。

脱　脱（1314—1355）　字大用，蔑儿吉䚟氏。顺帝至元六年（1340）发动政变，驱逐专权横暴的伯颜，次年任丞相，恢复科举。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起义，次年，他率军围徐州，杀芝麻李。十四年又率军到高邮围攻张士诚，旋被朝臣劾其劳师费财，撤职流放云南，不久被毒死。脱脱曾奉敕主修宋、辽、金三史，自可在史学史及散文史上居一席之地。

王　礼（1314—1389）　字子尚，后更字子让，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元末为广东元帅府照磨，入明不仕，聘为考官，亦不就。工于文章，著有《麟原文集》24卷。李祁的序评其文：“蔼然仁义之词，凛然忠愤之气，深切恳至，无不可人意者。”

赵　汸（1319—1369）　字子常，休宁（今属安徽）人。师事黄泽，受《易象》《春秋》之学，隐居著述，筑东山精舍以奉母，明洪武二年（1369）召修《元史》，不愿出仕，乞归，未逾月而卒。学者称东山先生。著有《东山存稿》《周易文诠》等。赵于经术学黄泽，于文章学虞集。学有根柢，故其文章波澜意度，均有典型，在元末亦可谓翘然独出者。

胡行简（生卒年不详）　字居敬，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至正二年（1342）进士，授国子监助教，历翰林修撰，除江南道御史，迁江西廉访司经历。遭世乱，乞归，以经学教授乡里。洪武二年（1369）诏郡县举高洁博雅之士，同修《礼》书。为所选八人之一。征至京师，欲官之，以老病辞。著有《樗隐集》6卷。其文章以冲和淡雅为宗，不为支离冗赘之词，章法严谨，惟波澜稍弱。

钟嗣成（约1329—约1360）　字继先，号丑斋，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寓居杭州。钟嗣成为戏曲史家，所著《录鬼簿》，是一部记录元代杂剧散曲作家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目录的要籍，作者的自序，托物言志，情见乎辞，是一篇出色的散文。又著有杂剧、文集多种，均亡佚。今存散曲

数十首。

陶宗仪（生卒年不详） 字九成，号南村，黄岩（今属浙江）人。元末举进士不第，明洪武中曾任教官。勤于记述典章制度，编有《南村辍耕录》30卷。亦能诗，有《南村诗集》。又节录前人笔记小说史志为《说郛》。《南村辍耕录》多记元代政事、典章制度和北京当时的文物建筑，也涉及到诗词、小说、戏曲、音乐和绘画诸方面内容，其文大多短小精悍、明白如话，斐然可观。 （宫晓卫）

明　代

宋　濂（1310—1381） 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自幼英敏强记，刻苦自学。早年从道学家吴莱、柳贯等游。元末被荐任翰林院编修，以亲老固辞，人山著书10余年。朱元璋起兵，濂与刘基同被征。明初任江南儒学提举，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参与制定明初的典章制度，并任《元史》总裁官，被明太祖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晚年辞官还乡，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杀丞相胡惟庸，濂因长孙宋慎获罪而遭牵连，赖太子力救得免死，全家谪徙茂州（今四川茂县）。濂中途病死于夔州（治所今四川奉节）。英宗正统年间追谥文宪。濂博极群书，著述甚富，有《宋学士文集》，为其手定，明正德年间刊行。清嘉庆年间，严荣编刻《宋文宪公全集》，为通行足本。论文力主义理、事功、文辞三者的统一。散文创作继承唐宋古文的传统，雄深雅洁，开一代文风；尤其擅长人物传记，用笔细致而简练。

刘　基（1311—1375） 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元末至顺年间进士，历任江西高安县丞、浙江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因屡遭排斥，遂弃官归隐。元至正二十年（1360），应朱元璋之请到应天（今江苏南京），陈时务十八徽，朱建礼贤馆居之。后佐朱平定天下，建立帝业，其功甚伟。明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明洪武四年（1371）以宏文馆学士致仕。后为丞相胡惟庸构陷，遭太祖疑忌，忧愤而卒。正德中追谥文成。基博通经史，学识渊博，并精象纬之学，加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故民间多有关于他的神话传说。基诗军而文奔放，与宋濂同主明初文坛。著作后人编为《诚意伯文集》20卷；其中《郁离子》4卷，代表其散文成就。《郁离子》为基元末归隐故里时作品，以寓言的形式抨击暴攻、反映社会，感情激越，文风犀利，寓意深远。

（王兴康）

孙　作（生卒年不详） 字大

雅，一字次知，江阴（今属江苏）人。元至正一避兵于吴，初受张士诚招，旋以母病谢去。洪武六年（1373）召修日历，书成，除翰林院编修，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教授，人为国子助教，寻迁司业，以事废为民，后复官长乐县教谕。自号东家子，宋濂为作《东家子传》，推挹甚至。工诗文，其诗力追黄庭坚，在元末别为一调；其文醇正典雅，磊落奇伟，亦自成家。著有《沧螺集》6卷。

宋　讷（1311—1390）　字仲每，滑县（今属河南）人。元至正进干，官盐山知县，弃官归。洪武十三年征为国子助教，擢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迁国子祭酒，卒谥文恪。性持重，学问该博，能诗善文，著有《西隐集》10卷。他的散文浑厚醇雅，颇得明太祖赏识。其诗亦缠绵悱恻，有风人忠厚之遗。

朱　右（1314—1376）　字伯贤，一字序贤，自号邹阳子，临海（今属浙江）人。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曾诣阙献《河清颂》，不遇而归。洪武三年（1370）召修《元史》，六年，修日历，除翰林院编修，七年，修《洪武正韵》，寻迁晋府右长史，卒于官。工散文，以唐宋为宗，尝选韩、柳、欧、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乃自右始。所作散文皆规矩八家，无支蔓之词，亦不为深之语，然缺少变化，又不免有意言并尽之失。著有《白云稿》五卷及《秦汉文衡》、《元史补遗》等。（文益人）

王　袆（1314—1378）　字子充，义乌（今属浙江）人。幼敏慧，及长师柳贯、黄溍，遂以文章著称当时。元末隐居青岩山。明太祖诏授江南儒学提举，后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洪武初，征为中书省掾史，与宋濂同修《元史》成，官翰林待制。时云南尚未归顺明朝，他奉使赴滇谕降，遇害。能诗，尤善属文。《明史·文苑传》称明初“宋濂、王袆、方孝孺，以文雄”。有《王忠文公集》、《卮辞》等。

贝　琼（1314—1378）　字廷琚，一名阙，字廷臣，崇德（浙江桐乡）人。元末领乡荐，遭乱客游江浙间，张士诚据吴，累征不就。明初召修《元史》，官国子助教，改中都国子助教。琼能诗善文。有《清江贝先生文集、诗集》。

高　启（1336—1374）　字季迪，号槎轩。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元末张士诚据吴，启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丘，因自号“青丘子”。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称“吴中四杰”。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洪武三年秋，擢升户部右侍郎，以“年少不敢当重任”固辞。启尝赋诗，有所讽刺，触忤明太祖。乞归后，教书自给。知府魏观，因改修府治而获罪。明太祖见启曾为作《上梁文》，文中有“龙蟠虎踞”之语，因借故腰斩，时年仅39岁。启诗众体兼长，虽壮年身死，未能自成一体，但才华横溢，清新超拔，是明代成就最高的诗人。有诗集《高太史大全集》。启文亦可观，简洁畅达，得力子史家笔法，非当时“台阁体”文人所能比拟。文存《凫藻集》。

苏伯衡（约1360年前后在世）

字平仲，金华（今属浙江）人。元末贡于乡。明太祖辟礼贤馆，伯衡亦被延致。后任国子学录，升学正。授翰林编修，辞不受。洪武十年（1377），学士宋濂致仕，荐伯衡代，又以疾辞。后为处州教授，得罪，下狱死。伯衡博洽古籍，为文颇有名声，散文创作活泼流畅，多尚辞藻。有《苏平仲文集》。（王兴康）

张孟兼（生卒年不详） 名丁，以字行，浦江（今属浙江）人。洪武初（1368）征为国子监学录，与修《元史》，以太常丞出为山西按察司佥事，迁山东按察司副使，以执法不阿，为吴印所诬讦，弃市。孟兼与宋濂为同里，因宋濂荐被召。明太祖与刘基论一时文人，基称宋濂为第一，已居其次，又其次即孟兼。其诗文于温雅清丽中寓有奇气。著有《白石山房逸稿》2卷。

王叔英（？—1402） 名原采，以字行，黄岩（今属浙江）人。洪武中，与杨大中、方孝孺等并征至，叔英固辞还乡，后以荐官仙居训导，改德安教授，迁汉阳知县，建文时，召为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诏募兵，行至广德，知事不可为，自经死，赐谥忠节。为文学韩愈，务实用，文章简朴有度，知时达势。会存《静学文集》1卷。（文益人）

方孝孺（1357—1402） 字希直，又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年36从宋濂学。洪武年间，任汉中教授。蜀献王朱椿聘为世子师，名其学舍为"正学"。建文时任侍讲学士。燕王朱棣起兵，朝廷诏令、檄文多出其手。燕兵入京，燕王召草登基诏书，拒不从命，被杀。株连者十族（九族加学生），死者达870余人，是历史上罕见的惨案。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孝孺志气高洁，学术纯正，散文风格纵横豪放，受苏轼、陈亮的影响较明显。史称时方文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诗亦雄峻奇逸。永乐年间，凡藏方文者判死罪，门生王稌冒死抄录，编为《侯城集》。宣德以后，文禁渐宽，方文才稍稍流传。后人编为《逊志斋集》。（王兴康）

杨士奇（1365—1444） 名寓，以字行，泰和（今属江西）人。少时家贫，以教授学生为生。建文初，集诸儒修《太祖实录》，士奇以史材荐，遂召入翰林院，充编纂官。成祖即位，入内阁典机务，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卒谥文贞。士奇文章平正纡徐，叙事平稳，制诰碑版多出其手。著有《东里文集》《三朝圣谕录》《奏对录》等。

梁　潜（1366—1418） 字用之，泰和（今属江西）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举人，授苍溪训导，历知四会、阳江、阳春三县，永乐初，召修《太祖实录》，累迁右春坊右赞善，会修《永乐大典》，代礼部尚书郑赐为总裁，升侍读，永乐北征，仁宗监国时坐事死。工散文，文格清隽，兼有纵横浩翰之气，于是有初文坛自可为一家。杨士奇为作墓志铭，称其文章，驰骋司马子长、韩退之、苏子瞻，亦间出庄、列为奇，务去陈言出新意；古诗高处逼晋宋。著有《泊庵集》16卷。

杨 荣（1371—1440） 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属福建）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除翰林编修，永乐时入直内客，更名荣，历官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卒谥文每。杨荣一生显达，遭遇至荣，发为文章，则多富贵福泽之气，其诗文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骋之才，然而雍容平易，醇实无疵，亦可备一格。杨荣与杨士奇、杨溥号称“三杨”，他们同为台阁重臣，故其诗文有“台阁体”之称，他们的脱离社会生活，徒具工丽形式的创作，为明代文风带来了消极影响。杨荣著作存《杨文敏集》25卷和《后北征录》等。

金 实（1371—1439） 字用诚，开化（今属浙江）人。成祖即位，实上书论治道，颇得赏识，授翰林院典籍，参加修《太祖实录》和《永乐大典》，选为东宫讲官。仁宗即位，任卫王府左长史。好读书，为文淳正朴质。有《金实文集》。 （文益人）

薛 瑄（1392—1464） 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属山西）人。明永乐年间进士。宣德年间，官御史，因触忤宦官王振，下狱论死，旋得释。景帝即位，出任大理寺丞。英宗复辟，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密。卒后谥文清。薛性刚直，不惧权贵。散文雅正，堪为典型；诗冲淡高秀，自然天成。有《薛文清公文集》，为其门人张鼎编刻。清雍正薛氏刊本和《正谊棠全书》本题为《薛敬轩集》。 （王兴康）

沈 周（1427—1509） 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长洲（江苏苏州人）。一生绝意仕进，为人耿介，风神萧散。周工画，与唐寅、文徵明、仇英并称明四家。又博极群书，文学《左传》。有《石田集》《石田杂记》等。

吴 宽（1435—1504） 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宪宗成化八年（1472）会试、廷试获第一，入翰林，授修撰。孝宗即位，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后升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一生清正处守，谥文定。宽少壮好学，尤喜读《左传》《汉书》及唐宋大家散文，最喜苏轼文章。其为文能见所受影响。宽兼工书法，字亦学东坡。有诗文集《家藏集》。

黄仲昭（1435—1508） 名潜，以字行，莆田（今属福建）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编修，因直谏，被杖谪官，时有“翰林三君子”之目。弘治初（1488）起江西提学佥事，旋乞归，以讲学为事，学者称未轩先生。著有《未轩文集》12卷，《补遗》2卷，《宏治八闽通志》87卷，又编有《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南平县志》等。所为文章大多文词典雅，浑厚典重，平实无华，不作艰深聱牍之语，足独立于明文坛。

程敏政（约1445—1499） 字克勤，休宁（今属安徽）人。少时有神童之誉，受巡抚罗绮推荐，诏读书翰林院。成化年间中进士，历任左谕德，直讲东宫，其学问渊博，为一时冠。官至礼部右侍郎。文与李东阳齐名。编有《明文衡》（原名《皇明文

衡》）98卷，补缺2卷，目录2卷，收录明初至弘治时文、赋；以“载道”为选文标准，所收虽失之芜杂，但颇能反映明初的文风，其中传状碑志有30余卷，保存了部分历史资料。有《篁墩集》。

桑　悦（1447—1503）　字民怿，常熟（今属江苏）人。成化举人，迁柳州通判，丁外艰归，遂不出。史称悦为人怪妄，敢为大言，著《桑子庸言》，自诩穷究天人之际，非儒者所知；又自称其诗根于太极。作《两都赋》，颇有名于时，然实远不及班固、张衡之作。其《独坐轩记》抒孤芳自赏之态，是其散文代表作。著有《思元集》16卷。　（文益人）

李东阳（1447—1516）　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属湖南）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后升侍讲学士。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武宗时，宦官刘瑾入司礼监，他与刘健、谢迁都上表辞职，谕旨却去刘、谢而独留东阳，后人对此毁誉不一。东阳身居相位，以诗文奖掖后进，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其诗论推崇盛唐而反对摹拟，颇受严羽的影响；而创作未脱台阁体的气息，形式典雅工丽，内容多应酬题赠。在他的影响下，明代诗坛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散文长于记述，开阖自如，富于层次，但颇多应酬之作，田尚未摆脱台阁体的影响。其创作中的拟古倾向，又为后起的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后七子”拟古派开了门户。有《怀麓堂集》。

马中锡（？—約1512）　字天禄，号东田，故城（今属河北）人。明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任刑科给事中。因疏劾权贵，受廷杖。正德年间，升任兵部侍郎。因得罪宦官刘瑾，削职为民。瑾诛，起复任大同巡抚，授右都御史。受命征讨刘兴、刘七叛乱，因诸将怯弱，用招抚诱降之计。所谋不成，被朝廷以“纵贼”罪下狱，死于狱中。中锡诗文俱佳，钱谦益称他“为文有隽才，于诗尤工”。其文长于“寓言”，结构巧妙，寓意深远，足以传世，惜其所作不多。有《东田集》。

（王兴康）

吴　俨（？—1519）　字克温，宜兴（今属江苏）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历侍讲学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肃。俨为诗文，沿明初风习，在“台阁体”盛行之际，能不为时文所染，其才学虽不如李东阳宏富，而其文章局度春容，诗格亦复娴雅，亦堪与东阳比肩。有《吴文肃公摘稿》4卷传世。

孙　绪（生卒年不详）　字诚甫，号沙溪，故城（今属河北）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户部主事，转吏部郎中，为中官诬事褫职，嘉靖初（1522）起太仆寺卿，旋致仕。著有《沙溪集》23卷，其中《无用闲谈》论文曰：“文章与时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秦汉战国，犹秦汉战国不能为六经也。世之文士，尺寸步骤，影响摹拟，晦涩险深，破碎难读。”对七子的复古模拟提出了批评。他的散文沉著有健气，亦能诗，风格类李东阳。

王　鏊（1450—1524）　字济

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成化间乡试、会试皆第一，授编修，弘治中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正德初(1506)累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恪。著有杂记《震泽长语》2卷、《姑苏志》60卷、《史馀》1卷及《震泽集》36卷等。鏊以制义名一代，当时虽乡塾童稚，无不知有鏊者。亦工古文，文章湛深经术，典雅遒劲，有唐宋遗风，得之苏、韩，折衷于程、朱，故耳。

邵　宝（1460—1527）　字国宝，号二泉，无锡（今属江苏）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历为江西提学副使，右副都御史，户部侍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庄。著有《容春堂集》及《后集》、《续集》、《别集》共61卷，又有《简端》、《慧山记》、《学史》等。宝为李东阳门人，其诗文皆宗法李东阳，极得李东阳推奖。其文简括醇正，典重和雅，诗则清和澹泊，均可居文坛一席之地。

（文益人）

祝允明（1460—1526）　字希哲，因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弘治五年（1492）中举人，官广东兴宁知县，迁应天府通判，未几致仕。允明5岁能作径尺大字，9岁能诗，稍长即博览群书。为文多奇气，不拘一格，潇洒自如；作诗题材颇广，风格颇妍；尤工书法，自成一体，是当时书家代表之一。与唐寅、徐祯卿、文徵明并称“吴中四子”。有《怀星堂集》。

罗　玘（？—约1519）　字景明，南城（今属江西）人。成化末(1487)以京闱乡试第一中举人；次年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正德初，迁南京太常。刘瑾专权，李东阳相与周旋依违。他为东阳所举，贻书责大义，并请削门生籍。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后致仕。宸濠慕名遣使馈赠，他避之深山。及宸濠叛，抱病驰书守臣，相约讨伐，未几而卒。谥文肃。罗博学而好古文，文风奇奥。有《圭峰文集》。

唐　寅（1470—1524）　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寅天资聪颖，初与乡里狂生张灵相善，纵酒为乐，不事科举。后听从祝允明规劝，闭户读书经年。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第一。座主梁储荐其文于程敏政，亦被赏识。不久，寅会试时因牵涉科场鬻弊案而被黜落，并下狱。谪为吏，寅以为耻，辞不就任。家居时益放浪形骸。筑室名桃花坞，日与客醉饮其中。寅擅丹青，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称“明四家”，兼擅书法。能诗文。诗初尚才情，晚年不拘成格，颓然自放。文以师法六朝为主。有《六如居士全集》。

文徵明（1470—1559）　初名壁（亦作璧），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徵明少不颖慧，稍长，聪敏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法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一起切磋文艺，时称“吴中四才子”。为人宽和而以操守自励，时宁王朱宸濠慕名相聘，辞病不赴。54岁时，

以岁贡生荐试吏部，任翰林院待诏，3年后辞归乡里。卒后私谥贞献。徵明书画兼擅，而画尤胜，名重当代，学生甚多，以致形成“吴门画派”；后人把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亦工诗文。有《甫田集》。

王守仁（1472—1529） 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故世称“阳明先生”。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正德初因救言官崔铣等而触犯宦官刘瑾，受廷杖，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瑾诛，累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而封新建伯，总督两广。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主要成就在哲学。他提出了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主张以心为本体，反对宋儒朱熹“外心以求理”的客观唯心主义。其学说影响很大，弟子几遍天下，从而在明代思想界和哲学界形成了“阳明学派”（或称“姚江学派”）。守仁文博大昌达，诗秀逸有致。文中关于论学的文字尤其精彩。有《王文成公全书》。

李梦阳（1473—1530） 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后徙商扶沟。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因代尚出韩文草奏劾权阉刘瑾，被下狱。以气节名于当世。瑾败，起任江西提学副使。又因事罢官。为人刚毅，不畏权势。论文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有明显的贵古贱今的复古、拟古主义倾向，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主张虽有复古的倾向，但在“台阁体”和八股文统治文坛的形势下，这些主张又提醒人们除此之外还有传统的优秀文学，从而为文坛摆脱“台阁体”和八股文的不良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李诗风格雄浑，虽力主摹拟盛唐，失之偏颇但仍有不少关心民生、反映社会的佳作。

（王兴康）

何　瑭（1474—1543） 字粹夫，号柏斋，怀庆（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人，一说武陟（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南）人。弘治进士，初为翰林修撰，以不屈刘瑾，出为开州同知，历工、户、礼三部侍郎，进南京右都御史，卒谥文定。论学以格致为宗，处世以躬行为本，笃行励志。发为文章，则文体朴质，讲求体用，不斤斤于格律法度及雕章绘句，又多切中时弊之言。著有《柏斋集》11卷及《医学管见》、《柏斋三书》等。又善散曲，有《柏斋何先生乐府》1卷。

康　海（1475—1540） 字德涵，号对山、浒东渔父，武功（今属陕西）人。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任翰林院修撰。武宗时宦官刘瑾被杀后，他名列瑾党而免官。著有《武功县志》、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10卷等。康海为“前七子”之一，但其为文与李梦阳等的规摹秦汉不同，其逸气往来，迥然自异，其《铸钱论》等文，颇能切中时弊，要高出李梦阳之上。

（文益人）

崔　铣（1478—1541） 字仲凫，又字子钟，安阳（今属河南）人。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选庶吉

士，授编修。曾与同官见权阉刘瑾，独长揖不拜，瑾因此怀恨。后出任南京吏部主事。瑾败，召充经筵讲官。后擢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初，张璁、桂萼骤贵用事，铣上疏求去，且劾璁、萼邪佞。世宗览奏不悦，遂令致仕。十五年后，因荐起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升南京礼部右侍郎。旋因疾辞官。卒谥文敏。铣著述颇富。编有文章总集《文苑春秋》4卷，收文100篇，起自汉高祖《入关告谕》，止于明太祖《谕中原檄》。文集名《洹词》。（王兴康）

严　嵩（1480—1567）　字惟中，一字介溪，分宜（今属江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编修，以疾归，读书钤山。嘉靖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专国政20年，官至太子太师，居首辅。恃宠揽权，操纵国事，构杀夏言，凡直陈时政者，皆斥戮之。子世蕃为太常寺卿，父子济恶。谏官杨继盛劾他十大罪五奸，被诬杀之。晚年渐为世宗疏远，御史邹应龙等弹劾嵩父子不法，世蕃下狱死，他也被革职，籍其家，不久病死。嵩工诗与散文，王世贞曾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他的散文大都文理清晰，言词清隽，自可为文坛一家。著有《钤山堂集》三十五卷。　（文益人）

何景明（1483—1521）　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今属河南）人。幼聪慧，8岁能诗古文；年15中举人；4年后中进士，授中书舍人。正德年间，官至陕西提学副使。嘉靖初，引疾归里，不久病卒。景明秉性耿介，坚持操守，鄙薄荣利，与李梦阳并具国士之风。梦阳论文主摹仿，景明论文主创造，措词虽异而复古、拟古的实质则一。李主张要象临摹古代碑帖那样学习古代诗文的创作技巧，要求维妙维肖；何则主张领会古人的精神面貌，不追求外在形式的一致；此则为二人同中之异。李、何同为"前七子"复古派的领袖，始则气味相投，相得甚欢；后何以文坛的后起之秀而与李并驾齐驱，遂因文学主张的分歧而互相批评，各树壁垒，私交亦随之恶化。景明论文持论甚高，曾说："诗溺于陶，谢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文靡于隋，韩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钱谦益诋之为"大言无当"。有《大复集》。

何孟春（生卒年不详）　字子元，郴州（今属湖南）人。弘治六年进士。李东阳赏识其才干，推荐他进史馆，以父丧作罢。后授兵部主事，累迁右副都御史。嘉靖初，为吏部左侍郎，大礼议起，上疏力争，又偕百官伏阙号泣，夺俸，调南京工部郎。旋削籍归里。何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学问宏博。生平以气节自许，对上下古今、时事得失均喜评议，论说性散文较多。文风比较恣肆疏阔。有《何文简疏议》《余冬序录》等。

杨　慎（1488—1559）　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正德六年（1511）举进士第一，授修撰。世宗即位，充经筵讲官。其父杨廷和，时任首辅，因议礼触世宗，辞官归里。慎与同列执前议极谏。世宗命执首事者下狱。慎与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帝愈怒，悉下诏狱廷杖。慎罢官后遣戍云南永昌卫。天启中卒，追谥文宪。慎

投荒后专心治学，博览群书，其记诵之广，著作之富，为明代第一。惟其务博，故时有粗疏之处；而争强好胜，说有窒碍，便不惜伪造古书以济之，更为识者诟病。慎才气横溢，有多方面的文学成就。能诗文。诗虽不专主盛唐，但仍有拟古倾向；贬谪之后，特多感愤，非为文造情者可比。散文属词雅洁，成就在同时的李、何之上。亦擅词及散曲，对民间文学也颇重视。生平著作达100多种，万历中四川巡抚张士佩辑为《升庵集》。

田汝成(约1540前后在世)

字叔禾，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广西右参议分守右江，政绩卓著。累迁福建提学副使。归田后游览名山，以风流自赏。汝成博学，工诗及古文，尤善叙述。有《田叔禾集》、《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等。。

归有光（1507—1571） 字熙甫，人称“震川”先生，昆山今（今属江苏）人。九岁能属文，弱冠时已尽通五经三史。乡试中式后，会试不第，徙居嘉定（今属上海市）安亭江上。读书讲道二十余年，学生常数百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始举进士，授长兴县令。隆庆中，受高拱等荐举，任南京太仆寺丞。后卒于官。有光从事文学创作时，拟古主义文风正笼罩文坛。他能不为风尚转移，卓然独立，斥当时“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为“妄庸巨子”，主张“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相颉颃”，公开赞扬唐宋古文的传统，与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对抗。与王慎中、茅 坤等被称为“唐宋派”。散文创作受司马迁和欧阳修的影响较大，但能自成一家。风格纡徐平淡，朴素简洁。其记事抒情的散文尤其为后人传诵。其中回忆往事、怀念故旧亲朋的一些篇章写得感情真挚，纯朴动人，往往善于从家人、朋友和自己身边不易被人注意的琐事中选取富于表现力的细节，出之以疏淡悠远的笔墨。归有光的散文创作不仅对当时的文坛时弊有所矫正，而且对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有《震川先生集》。

唐顺之（1507—1560） 字应德，一字义修，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以第一名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后罢官至阳羡山中读书十年。当时，倭寇在长江下游一带猖獗，顺之以兵部郎中指挥作战，亲率兵船屡破敌于海上。因功擢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淮扬。顺之学识渊博，留心经济，凡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兵法、乐律，无不精研。嘉靖中，与王慎中、茅坤等人起而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盲目尊古、拟古理论，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文创作理论主张直抒胸臆，不落俗套，使人读之能“真见其面目，瑕瑜俱不容掩”；对于古文遗产，则既尊崇三代两汉的传统地位，也承认唐、宋散文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散文创作虽未能完全实践他的理论，但信手写来，间用口语，风格平易流畅。曾自评所作文有“宋头巾（道学家）气习”。所选《文编》除《左传》、《国语》、《史记》以外，也选了韩、柳、欧

阳、三苏、曾、王等人的大量古文，进一步明确了“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为后来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所本。有《荆川先生文集》。

王慎中（1509—1559）　字道思，号南江，别号遵岩居士，晋江（今属福建）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明世宗登位之初，大兴礼乐，时慎中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因精通典故而受上司重视。后任吏部验封司郎中，因得罪执政而被贬常州通判。后官至河南布政使参政。在一次外官考绩中，被首相夏言罢官，归里。慎中早年论文受七子的影响，也标榜秦汉；28岁之后始悟鄙薄唐宋之非，尤其推崇曾巩的散文。唐顺之初亦受七子的影响而尊崇秦汉的散文，与慎中结识后互相辨论，最后也被折服。散文创作主张“道其中之所欲言”，即表达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同拟古形式主义的理论相径庭。壮年去官后，益努力钻研古文，一意做文从字顺的唐宋古文，被钱谦益称为“演迤详赡，蔚为文宗”。与唐顺之并称“王唐”，同为“唐宋派”的代表作家。有《遵岩集》。

茅　坤（1512—1601）　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中进士。历官青阳、丹徒知县、广西兵备佥事等职。曾镇压广西瑶民的反抗。后迁大名兵备副使，尝率兵戍守倒马关，总督杨博视其营垒，叹为奇才，特荐于朝。后为同僚中伤，落职而归。时倭寇猖獗，浙江总督胡宗宪延坤入幕，共商征倭方略，又被人以“家人横于里”的罪名弹劾，遂悉心治产业，家业大起，年90而终。坤于当时文人最心折唐顺之，并通过《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选评，更明确地表现了“唐宋派”对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反对和对唐宋八大家的肯定、提倡，当时《文钞》盛行海内，以至连乡里小儿无不知茅鹿门者，从而扩大了“唐宋派”的影响。论文主张体察物情，莫逆于心；至于作品内容则主张必须阐发“六经”之旨；于唐、宋古文家尤其推崇韩愈、欧阳修和苏轼。散文创作刻意规摹司马迁、欧阳修之文，不免有摹拟之迹；风格喜跌宕激射；成就在归、唐之下。有《白华楼藏稿》，但刻本罕见。行世者有《茅鹿门集》。

李攀龙（1514—1570）　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幼年丧父，家贫，刻苦自学。嗜诗歌，日读古文，乡人视为狂生。嘉靖二十三年（1544）举进士。历陕西提学副使。家居十年后复出，官至河南按察使。母丧，哀伤过度而卒。与王世贞同为“后七子”的领袖。论文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明朝独推李梦阳。诗文创作模拟过甚。文则生吞治剥之代两汉，佶屈聱牙，不能卒读；且自夸“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其理论和创作对当时的文坛影响甚大。有《沧溟集》。

海　瑞（1514—1587）　字汝贤，一字国祥，号刚峰，琼山（今海南海口）人，回族。出身贫寒，嘉靖年间中举人。初任南平教谕，后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嘉靖四十五年

(1566)任户部主事时，冒死上《治安疏》于世宗，切谏不可迷信道教而不理国政。下诏狱。世宗死，获释。隆庆时任应天巡抚，推行一条鞭法，曾令大量兼并土地的大官僚徐阶退田，并兴修水利，疏浚吴淞江，政绩卓著。因被张居正、高拱排挤，革职。赋闲达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复起用，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和右佥都御史。以力主严惩贪官污吏著称。卒时家贫至不能入殓。谥忠介。（王兴康）

陆树声（生卒年不详） 字与吉，号平泉，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嘉靖辛丑(1541)进士，官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累迁至礼部尚书。初入翰林，曾与严嵩不合而罢归家居。陆树声为晚明小品文名家，其《平泉题跋》所录的书画题跋多简洁清隽；罢归家居时著《茶寮记》1卷亦皆寥寥数语、聊以寄意的短文；《长水日钞》1卷则是年老辞官归田后的随笔札记。他的著作汇辑为《陆学士杂著》11卷，又有《陆文定公书》行业。

杨继盛（1516—1555） 字仲芳，号椒山，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以疏劾权相严嵩十大罪，为所构陷下狱，弃市。后追赠太常寺卿，谥忠愍。以经济气节自许，不屑屑于文字，而其文章多披肝沥胆、伉直之气，其《遗嘱》一篇尤为世所传。有《杨忠愍集》3卷存世。

（文益人）

徐 渭（1521—1593） 字文长，又字文清，号天池山人、青藤道人，或署名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年20为诸生，后屡应乡试，均不中。闽浙总督胡宗宪奇其才，聘为幕客，于抗倭军事方略屡出奇计。后胡遭弹劾下狱，渭因此发狂。屡自杀，不死；又杀死其妻，因此入狱，赖人力救得免。遂遍游南北，以诗酒自娱。渭终生不得志，晚年鬻书画，抱恨而终。诗文俱擅，诗奇恣，文纵肆。论文反对摹拟，强调独创，对后来的公安派有直接的影响。袁宏道曾称赞他“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又擅作杂剧。工书法，长于行草。善于绘画，特长花鸟。有《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稿》。

张元忭（1523—1593） 字子荩，号阳和，绍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素以气节自负，年19闻杨继盛死，为文遥祭之，慷慨泣下。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修撰，后进左谕德，官至翰林侍读。卒谥文恭。著有《不二斋文选》7卷、《绍兴府志》、《云门志略》等。文章大都雅洁流畅。

（文益人）

宗 臣（1525—1560） 字子相，兴化（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中进士。任刑部主事，移吏部文选司。其时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权，官吏多趋炎附势，贪污纳贿之风盛行。臣生性耿介，不媚附权贵，并作文竭力抨击时弊，因此触忤严嵩，出任福建布政参议，任内曾率众击退倭寇的进犯，以功升任福建提学副使。卒于任，时年36。论文主张复古，为“后七子”之一。散文时有佳作。有《宗子相集》。（王兴康）

王世贞（1526—1590） 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幼有才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著述颇多，主要著作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堂别集》及传奇《鸣凤记》等。其散文创作亦甚夥，志传铭记等多为应酬趋时之作，倒是其小品散文，文笔清新隽永，并语涉诙谐。王世贞是明季文坛大家，为继承并鼓吹“前七子”复古理论的“后七子”的首领。其文学主张主要见于其重要理论著作《艺苑卮言》中，虽仍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又强调格调，持论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晚年甚至推崇归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说明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

李　贽（1527—1602） 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龙湖叟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回族。出身航海世家。嘉靖三十一年（1552）考取举人，后曾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晚年曾出家，在黄安、麻城等地著书立说；并辗转到北京、南京等地讲学，被称为“说法教主”。万历三十年（1602）被人诬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系狱，自刎身死。李贽身陷囹圄，当局即明令将其著作尽行焚毁，现保存下来的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氏文集》等。还流传有他评点的一些小说、戏曲等。散文成就主要表现在议论文方面，如其主张破除对孔子的迷信，嘲讽盲目尊孔的假道学的文章，辛辣风趣，风格独特，类似杂文，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和战斗性。其创作理论主要是“童心说”。“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虽是唯心主义文学观，但在当时条件下，无疑起了“反复古”、“反道学”的积极作用。同时，对明末文坛如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的反封建礼教、反复古运动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对清代王夫之、叶燮等的文学理论有过积极影响。他是明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

王稚登（1535—1612） 字百谷，号玉遮山人。先世江阴（今属江苏），移居苏州。10岁能诗，名满吴门。尝及文徵明门，遥接其风，擅词翰之席者30余年。嘉靖末入太学。万历中曾召修国史，未上而史局罢。散文长于记传史乘，文笔简洁明畅，风格近“公安派”。著有《王百谷全集》。

王世懋（1536—1588） 字敬美，号麟洲，世贞弟。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累官太常少卿。好学善诗文。其文学主张与世贞大致相同，故其散文创作亦多蹈袭秦汉复辙，以古文为规模，未脱七子习气。著有《王仪部集》、《艺圃撷余》等。

屠　隆（1542—1605） 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别号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莱仙客，晚年又号鸿苞居士。鄞县（今属浙江）人。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曾任颍上知县，转为青浦令，后迁礼部主事、郎中。万历十二年（1584）年被陷罢官。

晚年，曾以卖文为生。著有《栖真馆集》、《由拳集》、《采真集》、《南游集》、《鸿苞集》，并著传奇《昙花记》等三种。他的散文，无论记传、尺牍，皆信笔直书，瑰奇横逸，名重一时。创作上追随王世贞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是“末五子”之一。

于慎行（1545—1607） 字可远，更字无垢。东阿（今属山东）人。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万历初历修撰。充日讲官，因忤张居正，以疾归。居正卒，起故官，累迁礼部尚书，后家居10余年，复入阁加太子太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以疾归，卒谥文定。其学有原委，贯穿百家。其散文多杂文散记，语多平淡，不能与“唐宋派”诸家并列文坛。但其记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轶事颇详实，具有史料价值。著有《谷城山馆诗文集》。

虞淳熙（？—1621） 字长孺，号德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授兵部主事，官至吏部稽勋司郎中，引疾归。其散文简洁明快，文笔清新，尺牍时杂诙谐，别有风趣。早年追随王世贞、李攀龙，后推崇徐渭、汤显祖和袁宏道，故其为文“调剂诸子”，不宗一派，自有特色。其文不存专集。有笔记《孝经集灵》传世。 （周　晶）

刘元卿（生卒年不详） 字调父，安福（今属江西）人。隆庆四年（1570）举人，万历中官至礼部主事，以病归，专心著述以终。著有《山居草》、《还山续草》、《诸儒学案》、《贤奕编》及《刘聘君全集》12卷等。文章多庆吊之篇，一些讽喻小品颇可观。

支大纶（生卒年不详） 字心易，一字华平，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由南昌府教授擢泉州府推官，因事谪江西布政使理问，卒于奉新县知县任上。著有《支子馀集》52卷、《世穆两朝编年史》6卷，及《华萃词》等。其《示儿》以极简洁的文笔反映了他的品质和为人。《与京辞同年》一文以“白头媳妇”喻为官之难，亦十分形象。

李维桢（1547—1626） 字本宁，京山（今属湖北）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累迁提学副使，天启初，以布政使家居，召修《神宗实录》，累官礼部尚书，告老归。著有《史通评释》及《大泌山房集》134卷。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宏肆有才气，时名甚盛，海内求文者无虚日，故其文又多率意应酬之作，因之品格不能高。

（文益人）

汤显祖（1550—1616） 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临川（今属江西）人。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先官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以引劾大学士，降为广东徐闻典史，后改任浙江遂昌知县。六年后弃官归里，未再出仕。其主要著作有传奇《牡丹亭》等五种，是明代著名的戏曲作家。诗文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其散文长于议论文，颇具“好辩”特色。另尺牍亦文笔流利，极富感情，为后人所推崇。他早年师事泰州学派罗汝

芳，后又受李贽思想影响，故其文学上反前、后七子蹈袭古人、剽窃词句的文风，散文以宋濂为宗，指斥"李梦阳以下"诸人作品"等赝文尔"，为当时反复古思潮的中坚人物。

胡应麟（1551—1602） 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兰溪（今属浙江）人。举万历四年（1576）乡荐，久不第，筑室山中，购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记诵淹博。曾携诗谒王世贞，世贞激赏之，置诸"末五子"之列。其散文承七子余风，但持论已稍变，由重视格调转向于神韵。著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少室山房笔丛》等。

唐时升（1551—1636） 字叔达，嘉定（今属上海）人。早年师事归有光。年未三十，弃举子业，专事古文。后曾为王世贞幕僚。家贫，以园艺为乐。与里人娄坚、程嘉燧并称"练川三老"，后加李流芳，又称"嘉定四先生"。其散文创作深受归有光影响，善于叙事，简洁自然，风格质朴。其创作主张亦同唐宋古文派。著有《三易集》。

董其昌（1556—1637） 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天启初召修《神宗实录》，拜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敏"。其昌天才俊逸，尤精书画，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其昌书画，论者比之赵孟頫，但其散文虽亦有佳作，却多率尔而成，不暇研炼，平淡者居多，不及孟頫之文。

宋懋澄（生卒年不详） 字幼清，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万历间举于乡。好藏书，尤多秘本及名人手抄本。少慕神仙，往往征于梦寐，其为诗文亦似之。但仍有部分散文写实证史，文笔流畅犀利，反映了其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著有《九籥集》，清代列为禁书。 （周　晶）

娄　坚（1567—1631） 字子柔，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隆庆、万历间贡生。早从归有光游，与唐时升、程嘉燧号"练川三老"，加之李流芳，又号称"嘉定四先生"。时升、流芳亦得归有光之传，然能融会师说，以成一家言者，以坚为冠。其文尚溯唐宋八家，而不剿袭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王士祯《居易录》曾称其《长庆集序》："真古文矣"，实其集中之文多有古法，在公安、竟陵崛起之时，他是坚持延古文一脉较突出的一家。亦工诗与书法。著有《学古绪言》25卷。 （文益人）

黄汝亨（1558—1626） 字贞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其散文以游记为优，文笔简洁朴素，清新明快。早年曾师事茅坤，受"唐宋派"影响较大，故散文风格亦似之。著有《天目记游》、《廉吏传》、《寓庸子游记》等。

陈继儒（1558—1639） 字仲醇，号眉公、麋公，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幼聪异能文章，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29岁，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小昆山，杜门著述，名倾朝

野。工诗善文，散文长于尺牍序传，隽雅风致，时出新意。早年为王世贞所推重，接近复古派，但对公安派也能客观评价。其作文宗旨不泥今人，也反对泥古，取公安派之信腕直寄，无法为法的主张，又济之复古派的典雅，遂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晚明文坛中影响颇大。著有《陈眉公全集》。

袁宗道（1560—1600） 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闳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因推崇白居易、苏轼，名其斋为"白苏斋"，著有《白苏斋集》。宗道与其弟宏道、中道文学主张相同，崇尚本色，反对摹拟，人称"公安派"。他的散文优于诗歌，率真自然。如尺牍多情运笔端，亲切直率；游记作品也多清淡恬远，清新感人。论说文中有些篇章，浅显通达，警辟有味。然从社会意义认识，宗道许多散文多写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或谈理说禅，逊于宏道。

李日华（1565—1635） 字君实，号竹懒，又号九疑。嘉兴（今属浙江）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为人恬淡和易，工书画，精鉴赏，世称博物君子。其散文长于随笔杂记，内容多论书画，笔调清新隽永，极富小品意致。著有《味水轩日记》、《紫桃轩杂缀》。

程嘉燧（1565—1643） 字孟阳，号松圆、偈庵。休宁（今属安徽）人。少不羁，弃举子业。精音律，工书画，尤长于诗，世称为松圆诗老。侨居嘉定（今属上海），与唐时升、娄坚、李流芳齐名，人称"嘉定四先生"。其散文长于游记小品，风格朴实，文笔清新流利，有唐宋派文风。其文学创作主张先立人格，反对前后七子剽窃摹拟之风。著有《松圆浪淘集》、《偈庵集》。

谢肇淛（生卒年不详） 字在杭。长乐（今属福建）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除湖州推官，累迁工部郎中，终广西右布政，有善政。博学能诗文。其杂文笔记，多记风物掌故，有类史乘。著有《五杂俎》、《文海披沙》等。

袁宏道（1568—1610） 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曾官吏部主事、考功员外郎、稽勋郎中等职。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他是"公安派"的创始者和首领，其文学思想受李贽影响，不满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主张文随时变，"直写性情"，"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对扫除当时文坛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泥古拟古文风，变粉饰为本色，变公式为率真等方面，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的诗文作品繁富，尤以散文见长。他的散文一反宗法韩、柳、欧、曾的窠臼，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他的尺牍情真意切，简凝活泼，间以趣语横生；他的传记文写人状情，鲜明传神，栩栩如生。而成就更大的，则是其针砭官场时弊、讽刺道学气的随笔杂文，嬉笑怒骂，酣畅淋漓。至

于其记游的山水小品，文笔清丽秀逸，描写真切细腻，开拓了晚明小品文的新领域，促进了这一时期小品文创作的繁荣局面。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和散文创作，不仅在当时有较大反响，而且影响了清代的散文创作（例如郑燮等的散文），也影响到清代“性灵说”的形成。著有《袁中郎全集》。

袁中道（1570—1623） 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后历任国子监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职。他与其兄宗道、宏道同属公安派，也强调性灵，但其晚年针对公安派文人的俗浅流弊，提出兼重格调的观点，与乃兄稍异。他的作品也以散文为优。游记多文笔酣畅，直抒胸臆；日记《游居柿录》亦多明快精粹之作，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较大影响。著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即《袁小修日记》）。

钟　惺（1574—1624） 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曾任工部主事，后官至福建提学佥事。他与同里谭元春共选《唐诗归》、《古诗归》，名重一时，形成“竟陵派”，世称“钟谭”。其著作有《隐秀轩集》。集中散文作品多新奇隽永之作。其游记文写景寄情多生动细腻，议论文也立意新奇，体现了“竟陵派”的“孤行静寄”的情怀和个性，以及“幽深孤峭”的风格。他的创作主张反拟古，主性灵，提倡求新求奇的文风，对传统散文有所突破，与“公安派”一样，对晚明小品文的繁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对“公安派”末流矫枉过正，代之以艰涩幽冷的语言文字，狭窄的题材，束缚了其散文创作取得更大成就。

王思任（1574—1646） 字季重，号遂东，又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曾任九江佥事。清兵破南京后，鲁王监国，任礼部右侍郎，进尚书。绍兴城破，绝食而死。他的散文作品，笔调恢谐，时有讽刺时政之作，隐寓愤激之情。其风格有复古派之雄浑，而无其虚矫；有公安派之清隽，而无其浮浅。其文学见解，不拘一派，于王世贞、李攀龙、袁宏道皆甚推许，故其散文创作“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尽情刻画”，在晚明散文诸家中，独树一帜。著有《王季重十种》。

曹学佺（1574—1646） 字能始，号石仓，又号雁泽，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天启间官广西参议。梃击狱兴，著《野史纪略》，直书本末，被劾之削籍。崇祯初起副使，辞不就。唐王时官至礼部尚书。明亡，自缢死，谥忠节。其散文率真自然，特别是游记清新隽永，别有风致，亦是晚明小品散文较有特色者。著有《石仓集》等。

张　鼐（生卒年不详） 字世调，一字侗初，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有《吴淞甲乙倭变志》、《宝日

堂初集》等。其散文以小品文为长，善于叙事，其记明季倭乱，可作史乘。

李流芳（1575—1629） 字长蘅，一字茂宰，号檀园，歙县（今属安徽）人，侨居嘉定（今属上海）。万历举人。因与嘉定唐时升等三人倡和，被誉为“嘉定四先生”。他工诗善文，尤擅绘事。其散文雍容典雅，特别是游记与书画题跋，清新雅洁，令人读之忘倦。在散文创作上，他本是一位唐宋派作者，作文受归有光的影响，但他不象一般古文家的拘泥，不重明道，而重抒情，为明季古文派别开生面者。著有《檀园集》、《西湖卧游图题跋》等。

沈德符（1578—1642） 字景倩，又字虎臣。嘉兴（今属浙江）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精音律，熟谙掌故。其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编》，多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国故，并及文人学士的琐事逸闻，文笔简洁流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有《清权堂集》。

艾南英（1583—1646） 字千子。东乡（今属江西）人。曾与同郡章世纯等致力于八股文的改革，名扬一时。天启四年（1624）乡试，因对策讥刺魏阉被罚。创豫章社，为首领。明亡，入闽见唐王，授兵部主事，后改御史。不久死于延平。他著文推崇司马迁、欧阳修，提倡散文古雅畅达，并手定《历代诗文选》等，为作文的楷模。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辩的尺牍序文等为优，笔力峻厉酣畅，文气尚舒卷自由。但多数文章模仿欧阳修，仅以形似，缺乏神采和韵味。其为文主张宗唐宋，反对“文必秦汉”，对步趋前、后七子者不满。著有《天佣子集》。

黄道周（1585—1646） 字幼玄，一字螭若，又字细遵，号石斋。漳浦（今属福建）人。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崇祯初官右中允，后因不谐流俗屡遭黜。福王时官礼部尚书。南都覆，唐王以为武英殿大学士，率师与清兵遇，兵败不屈死，谥“忠烈”。其工书善画，以文章风节高天下，著有《易象正义》、《续离骚》、《石斋集》、《骈枝别集》、《大涤函书》等。其散文长于议论文，慷慨激昂，据理雄辩，文中所论，凡天文地理、经史百家，无不随问阐发，足见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响应不穷。

徐弘祖（1586—1641） 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幼好学，应试不第，断绝功名之念，以“问奇于名山大川”为志，22岁起外出游历，凡30余年，足迹遍于华东、华北、中南、西南，并以其亲身经历，撰成《徐霞客游记》。《游记》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地理学著作，而且也是优美的游记文学作品。其游记散文的特点，首先是写景记事，据实写出，毫无虚构痕迹；次是文笔细密，远较前人游记细致入微；再是写景状物注意抒情，寓情于景，寓景于情，情景交融。另外，《游记》不因袭套语，词语朴实生动，增强了描写物的质感和立体感。凡此种种，被后人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为我国古代游记文学做出了总结性的贡献。

谭元春（1586—1637）　字友夏。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天启七年（1627）乡试第一。与同里钟惺同为"竟陵派"创始者。其散文创作主要成就是游记，如三篇《游乌龙潭记》，受郦道元影响，笔墨清隽灵活，堪称晚明小品文中的神品。其书牍铭序，也多洁清隽永之文，别有意致。他的文学思想受钟惺影响，创作主张一致，提倡抒写性灵，反对复古，但又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使其文又生涩艰深难读。著有《谭友夏合集》。

叶绍袁（1589—1648）　字仲韶，号天寥道人。吴江（今属江苏）人人。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官工部主事，不耐吏职，乞归养。其妻与五子三女，并有文藻，更相唱和，绍袁辑刻之，曰《午梦堂诗文》。明亡，弃家隐遁为僧，自号粟庵。有《湖隐外史》、《甲行日注》。此时散文皆记亡国之痛，述黍离之哀，真实地反映了明亡之际的动乱生活。

刘　侗（约1593—1636）　字同人，号格庵。湖广麻城（今属湖北）人。崇祯七年（1634）中进士。后选任吴县知县，赴任途中逝于扬州。其重要著作是与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主要记述北京地区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除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外，也表现出其散文创作的特色。他的散文，充分体现了"竟陵派"特点，遣词造句，每每打破常规，改变通常句式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文笔奇崛峻削，流于怪僻。刘侗早年即与谭元春等因"文奇"被人奏参。关系密切，其文学观点属"竟陵派"，追求幽深冷僻的风格，《帝京景物略》可称其派散文的代表作。　（周　晶）

倪元璐（1593—1644）　字玉汝，号鸿宝，上虞（今属浙江）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编修，累迁国子祭酒，为温体仁所忌，落职，起兵部侍郎，以母老固辞，后拜户部尚书，李自成陷京师，自缢死，谥文正，清谥文贞。倪元璐官翰林时，掌外制之词，文章典雅，为馆阁所宗。其诗文虽不脱"七子"旧格，但其奏疏之文多详明剀切，尤为当世所推重。著有《倪文贞集》17卷及《续编》3卷《奏疏》12卷《诗集》4卷，又有《儿易内外仪》。

魏学洢（约1596—1625）　字子敬，嘉善（今属浙江）人。父魏大中忤魏忠贤被逮，他百般营救不得，父死，扶柩归，悲痛父亲之冤，不忍阉党之肆虐，忧愤而死。工散文，在大中被逮之日，他愿出万死以救父命，其与人书信均至性恻怛，真能感天地而动鬼神。他的其他散文也大都写得文理明晰，颇具词采，《核舟记》是其代表作。著有《茅檐集》8卷。

陈仁锡（？—1634）　字明卿，号芝台。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授编修，典诰敕，以忤魏忠贤落职。崇祯初，召复故官，累迁南京国子祭酒，卒谥文庄。讲求经济，性好学，好著书，有《系辞》、《易经颂》、《四书考》等。他重视古代散文，辑有《古文奇赏》、《续古文奇赏》等。他的散文创作长于

游记小品，文笔清新自然，颇受苏轼影响。

吴应箕（1594—1645） 字风之，又字次尾，贵池（今属安徽）人。崇祯贡生。曾参加复社。清兵破南京后，因参加抗清军事活动被捕，不屈死。善今古文，意气横厉，文如其人。著有《楼山堂集》、《读书止观录》。

陈宏绪（1597—1665） 字士业，新建（今属江西）人。明末，以任子荐授晋州知州，时阁臣刘宇亮出督师，欲移师晋州，拒不纳，谪湖州经历，署长兴、孝丰二县事。入清，屡荐不起。移居章江，辑《宋遗民录》以见志。工古文，有时名，著有《陈士业全集》16卷及《江城名迹录》《诗经解义》等。 （文益人）

张　岱（1597—1679） 字宗子，改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侨寓杭州。明亡后披发入山，安贫著书。其主要著作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多为散文作品。他的散文创作题材范围广阔，于写山状景外，又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多写亡国之思，沉痛感人。其山水小品，记事短章，均写得清新活泼，意境极佳，时杂诙谐，趣味盎然。张岱在创作上沿袭公安、竟陵二派的主张，但又不为二派所囿，能扬长避短，提倡任情适性的文风。他在散文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被认为是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作家。

张　溥（1602—1641） 字天如。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后改庶吉士。与同里张采齐名，号称“娄东二张”。崇祯初，组织复社，兴复古学，进行文学和政治活动，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他的散文，风格质朴，文笔明快爽放，慷慨激昂，直抒胸臆，在当时即以文名于世。其代表作品《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叙议相间，以对比反衬手法叙写，被传诵至今。其创作推崇前、后七子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只描写山水或追求“幽深孤峭”的风格，但又主张“务为有用”，表明他对古人不是亦步亦趋，而是要于现实“有用”。著有《七录斋集》，并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祁彪佳（1602—1645） 字弘吉，号士培，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累官右佥都御史。清兵南下，南都失守，绝食死，唐王时谥忠敏。有《寓山注》。集中散文纯是写景之作，“不事铺张，不事雕绘，意随景到，笔借目传，如数家物，如写字书”，“遒劲苍老”，“深远冷淡”，“灵活俊快”（张岱评语），实为晚明散文中佼佼者。他与张岱同为融合公安、竟陵二派而自成一家的散文作者，为晚明的散文创作开创了新局面。

黄淳耀（1605—1645） 初名金耀，字蕴生，号桃庵，又号水镜居士。嘉定（今属上海）人。崇祯十六年（1643）中进士。南都亡，嘉定亦破，偕弟缢死于西城僧舍，门人私谥贞文。其散文长于时文，精深纯粹，一扫明季剽掌诡怪之习；论学之文，亦

极其醇正，平易可近，绝无党同伐异之风。著有《山左笔谈》、《陶庵集》。

（周　晶）

傅　山（1607—1684）　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仁仲，又字啬庐，别号甚多，有朱衣道人、石道人、丹崖子、酒肉道人、观化翁等等，太原（今属山西）人。以气节自持，明亡，隐居不仕，康熙十八年（1679）举应博学鸿儒，固辞不就，免试授内阁中书，放还山。博通经史诸子、释老及医学，兼工诗文书画金石，他的散文思路开阔，语文洒脱，文如其人。著有《霜红龛集》。

陈子龙（1608—1647）　字人中，更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崇祯十年（1637）中进士。曾与夏允彝等组织“几社”。南明弘光帝时曾任兵科给事中。南都失，遁为僧。寻以受鲁王部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泄被擒，乘间投水死，谥忠裕。其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其文学主张继承后七子传统，有复古倾向。著有《陈忠裕公全集》。

曾异撰（生卒年不详）　明末晋江（今属福建人），字弗人。个性耿介，终身不求仕进。家境贫寒，善为文，有《纺授集》。其文章以尺牍尤为佳妙，如《复曾叔祈》，写朋友相交的微妙情感；《问余希之足疾》，劝戒友人忍节嗜欲，善养身体。都是优秀之作。

（文益人）

张煌言（1620—1664）　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南都覆，倡仪奉鲁王监国，以佥都御史监军，屡抗清兵。舟山破，曾与郑成功欲取南京，未果。后鲁王卒，煌言散兵隐居，旋为清军俘获，不屈死。谥忠烈。著有《张苍水集》。集中散文多率直酣畅，豪壮激昂，于其起兵的经历与思想多有反映，犹如民族的“正气歌”。

夏完淳（1631—1647）　原名复，字存古。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14岁时，从父夏允彝、师陈子龙举兵抗清。其父兵败自杀后，又从陈子龙参与太湖军事活动。后被捕，在南京痛骂洪承畴，不屈死。所作诗文，抒发其壮志浩气，反映其斗争经历，悲歌慷慨，以《南冠草》诗著名。其纪实散文《续幸存录》（传本不全），记南明史事颇详，亦足见其少年英雄，国事为重，其文为绝笔，为史笔。

（周　晶）

清　代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常

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编修。崇祯初官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被革职。南明弘光朝，为礼部尚书。仕清后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顺治三年（1646）辞归。家有绛云楼，以藏书丰富著称。钱谦益学问淹博，诗文在当时甚负盛名。论文论诗倡“情真”“情至”以反对模拟，倡学问以反对空疏，对明代“复古派”“竟陵派”“公安派”的流弊起了矫正纠偏的作用。其诗转益多师，不拘一格。文章纵横曲折，奔放恣肆，气格健举，足以转变明文的衰微格局，振作明末清初文风。著作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

王猷定（1598—1662） 字于一，号轸石，南昌（今属江西）人。明拔贡生。为人倜傥自豪，与侯方域齐名。少好驰骋声伎狗马，家产为尽。后人史可法幕，为记室。入清。绝意仕进，日以诗文自娱，晚寓浙中西湖僧舍，与宋琬相投契。猷定为文，嗜两汉及唐宋八家，下笔猖狂睢随，信笔所如，亦不失章法，且郁勃多奇气。擅书法，名重一时。亦工诗。著有《四照堂集》。

陈贞慧（1604—1656） 字定生，宜兴（今属江苏）人。明万历间廪生，读书砥行，倾家财以交天下士，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称“四公子”。曾与复社名士吴应箕草《留都防乱檄》声讨阮大诚。福王时，马士英秉政，阮大诚为兵部尚书，乃陷贞慧人狱，旋得释。明亡后，隐居家乡不出。著有《雪岑集》、《山阳录》、《交游录》、《皇明语林》及《八大家文选》等。他的表扬抗清人物的散文，感情深沉悲痛。后人辑其遗著为《陈处士遗书》。

金人瑞（1608—1661） 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更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诸生，为人狂放不羁，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务。人清后，以哭庙案被杀，妻子家产籍没。少有才名，博览群籍，喜批书。曾以《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合称“六才子书”，拟逐一批注，但仅完成后两种。能诗，有《沉吟楼诗选》传世。其著作收入今人辑本《金圣叹全集》中。金圣叹能文，他的许多批点文字本身就是优美的小品文，他的《第五才子书序》《第六才子书序》也是散文佳构。

彭士望（1610—1683） 本姓危，字士望，号躬庵，一号树庐，南昌（今属江西）人。明诸生。明亡，移居江西宁都，与魏禧兄弟隐居翠微峰，讲学易堂，为“易堂九子”之一。一生交游甚广，往来奔走，在湖南，曾有人邀他出仕，坚拒，避入山中，等回到江西，年已70余。论文主张切合实用，他的散文大多具体生动，如《九牛坝观抵戏记》，生动地记录了一次杂技表演，描述具体详实，文笔有声有色。著有《耻躬堂集》。

黄宗羲（1610—1695） 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父尊素为“东林”名士，兼

魏忠贤陷害。受家庭影响，黄宗羲反对宦官与权贵，疾恶如仇，成为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武装抗击，失败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论学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倡言治史，为清代史家之开山祖，学问淹博，史学之外，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及释道之书都有研究。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文坛上，又与顾炎武、王夫之有"国初三老"之目。论文主张言之有物，强调"性情"，认为"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明文案序》），不满明复古派的徒具模拟。创作上文风纵横恣肆，宏伟浑朴。著作有《黄梨洲文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方以智（1611—1671） 字密之，号鹿起，桐城（今属安徽）人。明崇祯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明末复社领袖之一。南明永历朝，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均辞不就。明亡后削发为僧，改名大智、字无可，别号弘智、雪山愚者、愚者大师，人称药地和尚。博览群书，聪颖过人，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不通，对哲学、自然科学的研究亦卓有成效。文集有《浮山全集》。

李　渔（1611—约1679） 字笠鸿、谪凡，号笠翁，兰溪（今属浙江）人。明代曾考取秀才，入清未应试做官。文学成就主要在戏曲和戏曲理论，又作小说，多写才子佳人。散文亦佳，文间每杂以诙谐滑稽，故不为正统派所重。其诗文见《笠翁一家言》，并有杂著《闲情偶寄》等。

冒　襄（1611—1693） 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今属江苏）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副贡，授台州推官，不赴。明亡后隐居不仕。在家筑水绘园，交会四方文士。善诗文。其散文笔调秀逸，游记近于柳宗元。有《巢民文集》《影梅庵忆语》等。

周亮工（1612—1672） 字元亮，一字缄斋，号栎园，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崇祯进士，官潍县知县，迁浙江道监察御史。入清后，任布政使、户部右侍郎等。屡被劾下狱，遇赦，康熙朝起为青州海道。嗜绘画、书法、篆刻，善鉴赏。擅古文，尊宗唐宋八大家，因入清后仕途坎坷，文中时有默然抑郁之气。文章又多题跋、书后一类文字。著有《赖古堂全集》《因树屋书影》等。

顾炎武（1613—1682） 初名绛，字宁人，明亡后改名炎武，号亭林，昆山（今属江苏）人。少时弃举业，讲求经世之学。明亡后，参加昆山、嘉定等地的抗清斗争。失败后，曾垦田于山东章丘以自给。又遍游华北，十谒昌平明陵。所到之处访问风俗，搜集材料，纠合同道，时刻不忘恢复。康熙朝举博学鸿词，荐修《明史》，皆不就。晚年定居华阴。顾炎武学识广博，著作宏富，在经学、音韵学、史学、文学诸方面有很深造诣。其研究经学，反对空谈，注重辨别源流，审核名实，开清代朴学风气。文学成就以诗最高。散文亦出色。论文反对盲目摹仿古人，且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友人书》三）。其文风质直锐利，简明宏伟并带有强烈

的现实性。有《亭林诗文集》《日知录》等。

邱维屏（1614—1679） 字邦士，宁都（今属江西）人。明诸生，明亡，隐居翠微峰。为“易堂九子”之一，古文为众所推重，魏禧尝从之学。有《邦士文集》等。

曾 灿（生卒年不详） 原名传灿，字青藜，一字止山，宁都（今属江西）人。少有诗名。明亡，祝发为僧。后归家养母。又侨居吴下二十余年。为“易堂九子”之一。亦能诗。有《六松堂文集》《止山集》等。

魏裔介（1616—1688） 字石生，号贞庵，一号昆林，柏乡（今属河北）人。顺治进士，由庶吉士授工部给事中，累官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保。颇有政声，不以文学名世。但诗文皆擅，风格醇正儒雅。著述丰富，文存《兼济堂文集》。

王弘撰（？—约1679以后） 字无异，一字文修，号山史，华阴（今属陕西）人。博雅能文，精于《易》学，隐居华山下，筑“读《易》庐”居之。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征至京师，以老病不能试，罢归，卒。著有《砥斋集》、《周易筮述》、《正学偶见述》、《山志》等。其散文简洁有法，能得《史记》神韵，为汪琬所称道。

侯方域（1618—1655） 字朝宗，商邱（今属河南）人。明末诸生。少有才名，明末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并称“四公子”。入清后，应乡试，中副榜。擅长散文，与魏禧、汪琬齐名，为“国初三大家”。论文批评明代拟古派的好高骛远，主张近法唐宋诸家。创作上以人物传记及论文书信尤佳，文章有奇气，文笔生动，流畅恣肆。有《壮悔堂文集》。

施闰章（1618—1683） 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又号蠖斋，晚号矩斋。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进士，官江西布政司参议。康熙十八年（164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侍讲，与修《明史》。有诗名，康熙间与宋琬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目。古文学欧阳修、苏轼，魏禧评之“意静气朴”。文为诗名所掩，成就亦不如诗。文存《学馀堂文集》。

周 容（1619—1679） 字茂三，鄞县（今属浙江）人。明诸生。明亡后，一度剃发为僧。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人多举荐，不赴。擅文，多黍离麦秀之音、桑田之感。亦工书能诗。有《春酒堂遗书》。

王夫之（1619—1692） 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后人称为船山先生。明崇祯举乡试。明亡，在衡山举兵抗清，兵败退居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后从瞿式耜抗清，式耜殉难，遂决意隐遁著述。王夫之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是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之一。文学上诗、文、词俱工。论文认为须以意为主，不能强立“门庭”，强立“死法”，党同伐异，对明“复古派”“竟陵派”均有

批评。其散文风格纵横捭阖，雄肆不羁，卓然为一大家。著作经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

毛先舒（1620—1688） 字稚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诸生，明亡后不求仕进。尝从陈子龙游。善诗文，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人语云："浙中三毛，文中三豪。"著有《东苑文钞》《思古堂集》《诗辨坻》等。

魏际瑞（1620—1675） 原名祥，字善伯，号伯子，宁都（今属江西）人。明末诸生。入清为岁贡生。魏禧兄，"易堂九子"之一。笃治古文，推崇《史记》。有文集10卷及《五杂俎》行世。

林嗣环（生卒年不详） 字铁厓，晋江（今属福建）人。顺治己丑（1649）进士，历任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分巡兵备道兼理学政，驻节琼州，后以事免官，谪戍，遇赦免，客居武林。工文，以《口技》一篇知名于世。

李邺嗣（1622—1680） 原名文允，字杲堂，鄞县（今属浙江）人。明诸生。明亡，曾入狱。后专以著述为事，与黄宗羲友善，曾一起校《古文雅》。擅诗文，创作上能破除明末"复古""竟陵"之窠臼，卓然成家。有《杲室文钞》《续世说新语》等。

毛奇龄（1623—1716） 字大可，又字于一、齐于，号秋晴，又号初晴，以郡望西河，称西河先生，萧山（今属浙江）人。明末廪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后引疾归里，一心著述。以经学傲睨一世，阮元推他对乾嘉学术有开山之功。亦工诗，善骈、散文。著述甚富，后人编为《西河合集》。

魏　禧（1624—1681） 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宁都（今属江西）人。明末诸生，明亡后绝意仕进，隐居翠微峰，所居勺庭，学者称勺庭先生。康熙间举博学鸿词，不应，逝于扬州。其堂名易堂，禧与兄际瑞、弟礼时称"宁都三魏"，加上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号为"易堂九子"，以禧名最著。论文主张"积理""练实"，强调"道"与"文"的结合。创作上得力于《左传》及苏洵、苏轼，散文风格凌厉雄杰，有刚劲慷慨之气。在清初与侯方域、汪琬并称三大家。有《魏叔子集》等，文又见《宁都三魏全集》。

汪　琬（1624—1691） 字苕文，号钝庵，人称尧峰先生，长洲（今江苏吴县）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编修，与修《明史》。以病辞，隐居尧峰山，专心著述。通经学。善古文，与魏禧、侯方域齐名。论文重才气又强调法度，崇尚古文艺术并主张维护唐宋古文雅正的传统，对于稍后的桐城派文论颇具影响。创作上"为文原本六经，疏畅类南宋诸家，叙事有法"（《清史稿·汪琬传》）。著有《钝翁类稿》《尧峰文钞》等。

计　东（1625—1676） 字甫草，号改亭，吴江（今属江苏）人。顺治举乡试，后以江南奏销案被黜，浪

游四方。擅长古文，有时名。有《改亭集》。

陈维崧（1625—1682） 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清初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纂《明史》。少时即善为文，文思敏捷，词采瑰玮，被吴伟业誉之为“江左凤凰”。文学成就主要在词，在清初词坛与朱彝尊齐名，并为“阳羡派”领袖。为文擅长骈体，为清初一大家。著作有《湖海楼诗文词全集》。

叶　燮（1627—1703） 字星期，号已畦，晚年寓居吴江之横山，时称横山先生，吴江（今属江苏）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宝应知县，以忤长官被参落职。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以诗论见称，其《原诗》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散文中亦不乏文学论文。有诗文集《已畦集》。

汤　斌（1627—1687） 字孔伯，号潜庵，睢州（今河南睢县）人。顺治进士，官国史院检讨、翰林院侍读、江宁巡抚、工部尚书。尝从孙奇逢学，通宋明理学，举措多道学气。论文推崇汪琬，文章朴厚而不枯涩。有《汤子遗书》《潜庵语录》等。

唐梦赉（1628—1698） 字济武，号豹岩，又号岚亭，淄川（今属山东）人。顺治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因言事直切，罢归。归里后，寄情山水，栖心禅悦，再未入仕。梦赉诗文俱佳。诗以不拘樊篱、新颖自得为宗；文写得明白恺切，不事雕琢。与王士祯友善，极得其称赏。著有《志壑堂集》《借鹄楼小集》等。

姜宸英（1628—1699） 字西溟，号湛园，慈溪（今属浙江）人。明末诸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时年已70岁，授翰林院编修。两年后因事被劾，死狱中。深谙经史之学。曾参与《明史》修纂，文章宏博雅健。亦工诗词。著有《姜先生全集》。

朱彝尊（1629—1709） 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曾与修《明史》。诗、文、词皆擅。诗与王士祯齐名，时称“南朱北王”；词为清一大词派“浙西派”的开创者。朱彝尊学植深厚，所作散文多渊雅醇正，亦当推为大家。有《曝书亭集》等。

唐　甄（1630—1704） 初名大陶，字铸万，改名甄，号圃亭，达州（今四川达县）人。顺治举人。曾任知县，与长官不合，十个月即罢官。后居苏州，一意著述。为文多为社会贫富不均抱不平，学术思想上则反对宋儒的只讲心性不谈事功。是清初进步思想家。著有《圃亭集》及《潜书》。

储　欣（1631—1706） 字同人，宜兴（今属江苏）人。康熙举人，试礼部不遇，遂归，著书教授以终。能诗。论文推崇唐宋，取唐顺之、茅坤等所倡“唐宋八大家”之说，增入李翱、孙樵两人，称为“唐宋十大家”，选有《唐宋十大家全集录》。著有《在

陆草堂集》。

毛际可（1633—1708） 字会侯，号鹤舫，晚号松皋老人，遂安（今属浙江）人。顺治进士，官河南彰德府推官，迁祥符令。罢官后返里著述。文学上与毛奇龄、毛先舒齐名，有“三毛”之称。尤以擅词名家。文存《安序堂文钞》。

宋　荦（1634—1713） 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绵津山人，商邱（今属河南）人。顺治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后授黄州通判，擢江苏巡抚，官至吏部尚书。有诗名，是清代学宋诗派中的重要诗人。论文宗唐宋诸大家，合刻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文为《国朝三家文钞》，影响颇大。著有《西陂类稿》等。

王士祯（1634—1711） 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死后因避雍正（胤禛）讳，改称士正，乾隆时诏改士祯。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进士，出任扬州推官，官至刑部尚书。以诗名，论诗创神韵说，极具影响。亦能词，且多杂著。其散文亦颇明净，游记及人物传记多清丽可读。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话》《香祖笔记》等。

李良年（1635—1694） 初名法远，又名光满，年30更名良年，字武曾，号秋锦，秀水（今属浙江）人。少有隽才，与朱彝尊交厚，并称“朱李”。喜游历，游踪遍及南北。后至京师，举试博学鸿儒，不遇。徐乾学开志局于洞庭西山，聘主分修。工诗词，在浙江时，即与朱彝尊共作古文，沿波溯源论次之，其文章长于议论，深得汪琬推重，颇有时誉。著有《秋锦山房集》。

宋起凤（生卒年不详） 字来仪，号紫庭，沧州（今属河北）人。康熙间曾有人荐他应博学鸿词科考试，未赴。喜游历，到过南北各地。著有《家塾座右铭》、《大茂山房合稿》等。《核工记》是他的散文名篇，文章生动细致、层次井然地向人们介绍了一件桃坠微雕的全貌。

邵长蘅（1637—1704） 一名衡，字子湘，别号青门山人，武进（今江苏常州）人。顺治诸生，未入仕。后曾入宋荦（时为江苏巡抚）幕。工诗文，为王士祯、汪琬所称赏。主张为文必多读书，忌俗避伪。继承唐顺之、归有光的传统，取法于唐宋大家，文章苍秀简洁，合乎法度。宋荦选侯方域、魏禧、汪琬散文为《国朝三家文钞》，邵氏为序，认为“侯氏以气胜，魏氏以力胜，汪氏以法胜。”亦见其论文之识见。有《青门全集》。

郑日奎（生卒年不详） 字次公，号静庵，贵溪（今属江西）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出任礼部郎中。与王士祯同往四川主持乡试，士祯赠诗说他“风流似郑虔”。写作上主张自立文风，反对门户之见。其文章能够洗净浮词，质朴简古。有《静庵集》。

陈廷敬（1639—1712） 本名敬，因应试中与人重名，奉旨增廷字；字子端，号说岩，泽州（今山西晋城）人。顺治进士，改庶吉士，授检

讨，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能诗文，诗得王士祯称赏。与汪琬以文章切磋，虽面目不同，自成一家，亦深得汪氏推重。有《尊闻堂集》《午亭文编》等。

蒲松龄（1640—1715） 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早岁即有文名，为施闰章、王士祯所重。但屡应省试皆落第，71岁始成贡生。除中年在宝应、高邮作过幕宾外，都在家乡为塾师。擅诗文、小说、俚曲。对经史、天文、农桑、医药亦有研究。著有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及《聊斋文集》《聊斋诗集》等。

张　贞（生卒年不详） 字起元，号杞园，安邱（今属山东）人。康熙十一年（1672）拔贡生，官翰林院孔目，十八年，举博学鸿儒，以母忧未仕。常出游吴越间，晚居杞城故园，著述自娱。博雅好古，精鉴别，工金石篆刻。工古文，尝游施闰章之门，又与王士祯为莫逆交，他博引古书作《杞纪》22卷，王士祯作序，称之有良史才。又著有《乡贤传》、《潜州集》、《娱老集》等。

钮　琇（？—1704） 字玉樵。吴江（今属江苏）人。康熙贡生，官高明知县。有笔记《觚剩》，多记人物故事及诗话。又有《临野堂集》。

廖　燕（1644—1705） 初名燕生，字人也，号柴舟。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诸生，后厌弃科举，专事著述。廖燕对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及八股文多持异议。文学创作上主张抒写性灵与愤郁，反对模仿，力主独创，与明"公安派"有相通之处。但他要求文章的内容与艺术风格朴素而深刻，戛戛独造而丰富博洽，则高出于"公安"。其文挥洒自如，恣肆犀利，"自我别辟一天地"。亦能戏曲。有《二十七松堂集》。

魏世杰（1645—1677） 字兴士，宁都（今属江西）人。魏际瑞之子，从叔父禧学古文辞，与从弟世效、世俨，时称"小三魏"。著有《梓室诗文集》。

潘　耒（1646—1708） 字次耕，又字稼堂。吴江（今属江苏）人。师事顾炎武，承其教，博涉经史、历算、声韵之学。康熙时以布衣中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性好山水，罢官后，以游历名胜为乐，所历必以诗文纪之。散文中又多论学之作。著有《遂初堂文集、诗集》等。

冯　景（1652—1715） 字山公，一字少渠。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间被人荐举博学鸿儒，辞不就，后应试不第，遂绝意仕进。曾为宋荦幕宾。受知于王士祯，其文尤得汤斌称赏。著有《幸草》《樊中集》等。

戴名世（1653—1713） 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南山，别号忧庵，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授编修。早年有志于修明史，同时精心于散文创作，著有《南山集》。因集中收有抒发明亡遗恨的文章，康熙五十年（1711）被御史以"大逆"罪参劾，旋入狱。两年后被杀，《南山集》亦遭禁毁。同乡后人戴存庄

于道光年间辑其遗文，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十四卷。散文创作长于史传，杂文，游记亦有特色。其风格于简洁朴实中见雄奇犀利。创作主张立诚有物，率其自然。生前与方苞过从甚密，对方氏散文及创作理论不无影响。是桐城派奠基者之一。

魏世效（1655—？） 字昭士，宁都（今属江西）人。年稍长，随仲父魏禧读书。多病，不应试，遍游燕、楚、吴、越间。能诗，颇得王士禛赏识。与从兄世杰、弟世俨齐名，时称“小三魏”。性狷急，勇于事，魏禧评价其散文曰：“其文一如其人，锋锐所及，往往有没羽之力。”有《耕庑文稿》。

汪士鋐（1658—1723） 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右中允，入直南书房。善诗文，与姜宸英齐名，时称“姜汪”。尤工书法。著有《秋泉居士集》《近光集》等。

朱　轼（1665—1736） 字若瞻，号可亭，高安（今属江西）人。康熙进士，由庶吉士改授潜江知县，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端。工古文，著有《历代名儒循吏传》《文端公集》等。

储大文（1665—1743） 字六雅，号画山，宜兴（今属江苏）人。康熙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告归后，主扬州安定书院。肆力为古文，从祖储欣称为东坡化身，姜宸英赏其文，叹为旷代奇才。著有《存研楼文集》。

赵执信（1662—1744） 字仲符，号秋谷，又号饴山，益都（今属山东）人。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迁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在“国丧”期间观演洪升《长生殿》被革职。后数次漫游江南，抑郁困顿到老。以诗名，革职后，愤激不平之气每见于诗歌中。为王士祯甥婿，但论诗与王士祯不合，并著《谈龙录》以伸其说。亦能文，成就不如诗，但集中也时见佳构，如《原山狼》。著有《饴山堂诗文集》。

俞长城（生卒年不详） 字宁世，桐乡（今属浙江）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著有《可仪堂文集》。其散文以讽喻小品写得尤佳。

方　苞（1668—1749） 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今属安徽）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以母病未仕。五十年（1711）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牵连入狱。赦出后隶汉军旗籍，入直南书房。雍正初，始免去旗籍归汉籍。乾隆时官至礼部侍郎，充文颖馆、经史馆、三礼馆总裁，晚年辞官归里。苞是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他青年时期专治古文，后在著名学者万斯同等影响下，从事经学研究，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很大。他在思想上尊奉程朱理学。散文创作尊奉唐宋散文，倡导“义法”说，主张“言有物”、“言有序”，文章要“清真雅正”和“雅洁”，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为桐城派散文

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的文章风格以自己的主张为旨归，严谨雅洁，不重雕饰，然敦厚有余，锐气不足，被袁枚讥之"才力薄"。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所编《古文约选》，在当时很有影响。

唐绍祖（1669—1749） 字次衣，号改堂，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授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官至湖州府知府，仍入为刑部员外郎，告归，卒于家。绍祖少师姜宸英，后出李光地之门。其文苍劲有师法。著有《改堂文钞》。

陈景云（1670—1747） 字少章，吴县（今属江苏）人。一生未仕。少从何焯游，博通群籍，尤长于史。为文简严有法，著有文集二卷。又有《三国志校误》《韩文校误》《柳文校误》《文选校正》等。

方粲如（生卒年不详） 字若文，号朴山，淳安（今属浙江）人。康熙四十五年（1705）进士，授知县，坐事免。善诗、文、词，与方舟、方苞并称"三方"。散文劲奥有笔力，喜雕琢新句，自成一家。著有《集虚斋学古文》《朴山存稿》等。

杨兆鲁（生卒年不详） 字又平，瑞金（今属江西）人。生平不详。工古文，风格如归有光，然文中不免冗句俗字，则不及。著有《钝斋文钞》。

李　绂（1673—1750） 字巨来，别号穆堂，临川（今属江西）人。康熙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工部右侍郎，以事罢官。乾隆时授户部侍郎，累至内阁学士。善诗文，文章风格似曾巩，有时名。著有《穆堂类稿》《续稿》《阳明学录》等。

杨　椿（1676—1753） 字农先，武进（今属江苏）人。康熙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参与修纂《明史》，擢侍读学士。致仕家居，又奉召与修《明鉴纲目》。杨椿弱冠即工古文词，为朱彝尊、姜宸英所赏。所为古文，方苞、李绂等极为推重。著有《孟邻堂集》等。

蓝鼎元（1680—1733） 字云锦，号玉霖，又号鹿洲，漳浦（今属福建）人。雍正元年（1723）选拔贡，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后授普宁知县，改任潮阳县，忤监司被职。工古文，亦善诗。古文为闽中大家，文笔条畅，多切事理，被张之洞《书目答问》推为有清古文名家。著有《鹿洲初集》等。

王又朴（1681—1760） 号介山，天津人。雍正进士，改庶吉士，授吏部主事，累官至徽州知府。工古文，受知于方苞。著有《诗礼堂文集》等。

蔡世远（1682—1733） 字闻之，号梁村，漳浦（今属福建）人。康熙进士，改庶吉士，雍正间官至礼部侍郎。散文溯源六经，学韩、柳、欧、苏。著有《二希堂文集》。

厉　鹗（1692—1752） 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举人。乾隆元年（1736）应博学鸿词科试，误写诗在论前，报罢。此后无意仕进，以著述歌咏自娱。不以文名，诗以取法宋人为主，是清代雍

正、乾隆时期“宋诗派”代表作家，为“浙派”诗领袖。词名亦著，是以朱彝尊为首的“浙派词”巨子。亦能文。著有《樊榭山房集》《宋诗纪事》《湖船录题辞》等。

汪由敦（1692—1758） 字师茗，一作师敏，号谨堂，休宁（今属安徽）人。雍正进士，改庶吉士，累官至吏部尚书，卒，加赠太子太师。为诸生时，即以才学著称。善诗文，兼工书法。文章典重有体，属辞雅正清醇。著有《松泉文集》等。

郑 燮（1693—1765） 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今属江苏）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任山东范县知县。后知潍县，以触忤大吏辞官。终老扬州。诗、书、画皆善，人称“三绝”。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词亦佳。散文风格真率自然，不事雕饰，富有风趣，题画小品及《家书》尤为突出。文见《郑板桥集》。

杭世骏（1695—1772） 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时举博学鸿词，授编修。因主张“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罢归。杜门奉母，自号秦亭老民，与友人结“南屏诗社”。晚年主讲粤秀、安定两书院。长于史学及小学，善诗，亦能文。文存《道古堂文集》。

胡天游（1696—1758） 一度改姓方，字云持，又字稚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雍正副贡，乾隆初举博学鸿词，因病作罢。客死于山西。善属文，尤工骈文，尝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致力为文。清代骈文至胡天游而更盛。袁枚赞其文“直掩徐、庾。”著有《石笥山房集》。

彭端淑（生卒年不详） 字乐斋，丹棱（今四川洪雅）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授吏部主事，出为广东肇罗道，辞官归乡，主锦江书院讲席，有时名。肆力于诗古文，诗学汉魏，文学《左传》《史记》，文风质实厚重。著有《白鹤堂文集》等。

齐周华（1698—1767） 字巨山，天台（今属浙江）人。雍正间因为吕留良一案仗义直言、下狱五年，乾隆朝遇赦。回乡后，弃儒服，易名姓，漫游名山大川，评山品水，兴之所至，抒而为文。其山水游记是堪与《徐霞客游记》媲美之佳构。亦有序、跋、传、赞之作，皆任意发抒，不就绳墨。文存《名山藏副本》。

刘大櫆（1698—1779） 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今属安徽）人。诸生，雍正时两举副贡生，乾隆间应博学鸿词，皆未成。晚年为安徽黟县教谕，后归里，一生不得志。大櫆古文师事方苞，极得方氏赞赏。姚鼐从其学古文，甚加推崇。是桐城派创始人之一。论文主张“义理、书卷、经济”，要求作品阐发程朱理学，艺术形式上强调模仿古人要“神气”“音节”“字句”统一，对艺术表现的注重，对方苞的文论是一个发展。其文章风格长于气势，富有文采。亦工诗。著有《刘海峰诗文集》《论文偶记》等。

法坤宏（1699—1785） 字直方，一字镜野，号迂斋，胶州（今属山东）人。乾隆举人，以年老授大理

寺评事。善长散文，创作上严于义法，于《史记》、唐宋八大家外，好学归有光、方苞。著有《学古编》《纲目要略》等。

陈兆仑（1700—1771） 字星斋，号句山，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雍正进士，授知县，后授内阁中书，兼撰文，充军机章京。乾隆元年（1736）召试博学鸿儒，授翰林检讨，迁太常寺卿，官终太仆寺卿。工书，善诗文，尝云："我书第一，文章次之。"时人奉为"文章宗匠"。文章醇古澹泊，清远简放。著有《紫竹山房文集》。

姚　范（1702—1771） 字蕴坞，一字已铜，又字南菁，桐城（今属安徽）人。乾隆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告归。与刘大櫆友善，承受方苞的论文主张，持论对其侄姚鼐颇有影响。文章务求达意，自成体势。著有《援鹑堂笔记》《援鹑堂文集》等。

沈廷芳（1702—1772） 字畹叔，号椒园，仁和（今属浙江）人。乾隆元年（1736）以监生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至按察使。学古文法于方苞。著有《隐拙斋文集》《古文指授》等。

全祖望（1705—1755） 字绍衣，号谢山，鄞县（今属浙江）人。雍正举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回家后，再未出任。曾主讲浙江蕺山、广东端溪书院。全祖望上承清初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博通经史，为清代浙东史学名家。散文创作以传记为主，保存了不少清代人物史料。其文风不拘成法，自然可观。晚年自订其文稿为《鲒埼亭文集》。

朱仕琇（1715—1780） 字裴瞻，或作斐瞻，号梅崖，建宁（今属福建）人。年15补诸生，博学通识，从汪世麟学为古文。乾隆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选知县，改福宁府教授。其散文始学韩昌黎，后博采秦汉以来诸家之长，文章醇古冲淡，自成一家，闽中古文，蓝鼎元后以仕琇称最。张之洞将之列入清代古文名家。著有《梅崖文集》。

袁　枚（1716—1797） 字子才，号简斋，因筑室小仓山随园，又号随园老人、仓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放外任，任溧水、沭阳等地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辞官，再未出仕。有诗名，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论诗主张抒写性情，继明末公安派而持性灵说。论文主张文章不应受"道统"限制，诗是言志抒情，文应载道本德，因而文章须要雅正，他认为古文、骈文各有所用，"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骈，文之道也。"（《书茅氏八家文选》）又认为文章的发展各有时代原因和自己的特征。其散文创作性灵独抒，不事雕饰，自然流畅，自成风格。有《小仓山房集》。

程晋芳（1718—1784） 初名廷璜，字鱼门，号蕺园，歙县（今属安徽）人。乾隆进士，补吏部主事，迁员外郎，任《四库》馆纂修官，书成，

擢翰林院编修。诗文并擅，时与袁枚等相唱和。学古文于刘大櫆著有《勉行斋文》《群书题跋》《蕺园诗》等。

梁同书（1723—1815） 字元颖，号山舟、晚号不翁，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举人，特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讲。以文章书法名世。其文清峭拔俗，极得时人推赏。著有《频罗庵遗集》等。

余庆长（1724—1800） 字庚耦，安陆（今属湖北）人。乾隆举人，累官广西同知。告归后，主讲五华书院。善诗，工古文，文风清深简洁。著有《大树山房文稿》等。

纪 昀（1724—1805） 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死后谥文达。学问渊博，长于考证训诂，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主持写定《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辨析正伪，为世所宗。所作书序等散文中，亦多论文之见，认为"文章格律与世俱变"，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其创作尤以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著名于世。散文存《纪文达公遗集》。

蒋士铨（1725—1785） 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容，一号藏园，铅山（今属江西）人。乾隆间先由举人授内阁中书，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辞官后曾主持蕺山、崇文、安定书院讲席。以诗名，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也是清代著名的戏曲作家，有《藏园九种曲》。亦善词工文，文章雅正有法，笔力简洁深厚。著有《忠雅堂集》。

汪 缙（1725—1792） 字大绅，吴县（今属江苏）人。乾隆贡生。工古文，与彭绍升、罗有高相讲贯，其文章覃思奥颐，游刃百家。张之洞《书目答问》将之排在清代古文名家之列。亦工诗，为袁枚所称赏。著有《汪子文录》等。

钱大昕（1728—1804） 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进士，官至少詹事。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主讲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学识渊博，为清代著名学者，于音韵训诂、金石历史诸方面均有较高成就。他的散文风格严谨，文辞精炼，而一些讽喻小品则活泼生动，文采斐然，如《镜喻》、《弈喻》等。见于《潜研堂文集》中。又著有《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恒言录》等。

王 昶（1725—1807） 字德甫，号述庵，学者称兰泉先生。青浦（今属上海市）人。乾隆进士，高宗南巡，召试第一，赐内阁中书，协办侍读，累官刑部右侍郎。昶博学通识，诗与王鸣盛、钱大昕等称"吴中七子"；词拟姜夔、张炎，有时名；文学韩愈、苏轼。又长于经学，人称通儒。著有《春龙堂诗文集》《湖海文传》等。

陈奉兹（1726—1799） 字时若，号东浦，德化（今属江西）人。乾隆进士，授知县，擢知州，累迁布政使。善诗，师法杜甫，为洪亮吉所推

赏。散文推重姚鼐，己作亦皆有古法。著有《敦拙堂集》

姚　鼐（1732－1815）　字姬传，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桐城（今属安徽）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刑部郎中，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中年弃官，主持江宁、扬州、徽州、安庆等地书院40年，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都是他的弟子。早年曾受业于刘大櫆，继承同乡方苞、刘大櫆、姚范的古文之学，成为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论文主张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并以阳刚、阴柔区别文章风格，认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都是文章需要的，不能偏执；同时又发展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总结出模拟古文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要素。其文章风格大致与欧阳修、曾巩之文相近，简洁清淡，醇正严谨，雍容和易，一如其人。总体上偏于阴柔之美，在桐城派诸家中，最富情韵。唯缺少气魄而风采见弱。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影响甚广。

严长明（1731－1787）　字冬有（一作冬友），一字道甫，江宁（今属江苏）人。乾隆南巡，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旋入直军机处，累官至内阁侍读。乞归后，筑归求草堂，著述其间。博学多识，诗文皆善。文章运思缜密，纡徐平和。著有《归求草堂诗文集》《文选课读》等。

鲁九皋（1732－1794）　原名仕骥，字絜非，号山木，新城（今江西黎川）人。乾隆进士，家居养亲10余年，出选山西夏县知县，卒于官。受古文法于朱仕琇，且与姚鼐相友善，为文亦受影响。文章冲和平易。著有《山木居士集》。

罗有高（1733－1778）　字台山，瑞金（今属江西）人。乾隆举人。后归心惮悦。与彭绍升友善，为文独抒性灵，不事依傍。张之洞论之为清代古文名家。有高临终尽焚其著书，彭绍升辑其遗文为《尊闻居士集》。

吴　骞（1733－1813）　字槎客，别号兔床山人，海宁（今属浙江）人。乾隆贡生。藏书家，亦能诗善画。工古文，陈鳣称其文章说：“文笔之高坚，词旨之敦厚，固世之有目共赏者。”（《愚谷文存序》），以序跋为主。著有《愚谷文存》《续编》《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等。

翁方纲（1733－1818）　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乾隆进士，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精于考据、金石、书法之学，又是清代“肌理说”诗论的首倡者。论诗调和了王士祯“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以“肌理”说予以新的解释，重张复古旗帜，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喜作学问诗，缺少人之性情。文章醇正厚朴，不失章法，然鲜活不足。著有《复初斋文集》《复初斋诗集》等。

管世铭（1738－1798）　字缄若，号韫山，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进士，改户部主事，累迁郎中，擢御史。善诗，诗风朗畅深厚。尤工古文。著有《韫山堂诗文集》。

章学诚（1738—1801） 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著名的史学家，所撰《文史通义》，是清中叶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论文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和袁枚的专讲“性灵”，强调内容，反对横拟古人和追求形式，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撰《古文十弊》，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等不良文风提出了批评。所作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著作均收人《章氏遗书》。

钱伯坰（1738—1812） 字鲁斯，所居近仆射山，自号仆射山樵。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工书法，宗李邕，颇有时名。亦善诗。从刘大櫆学古文义法，以师说称诵于同里恽敬、张惠言，后者创立了清文坛上“阳湖”，一派。著有《仆射山庄诗集》。

彭绍升（1740—1796） 字允初，号尺木，又号知归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进士，选知县，不就。与汪缙、罗有高、薛起凤游，阅《大藏经》，绝欲素食数十年。工古文，宗法归有光，好写传记、碑志等文章。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他入清代古文名家。著有《二林居集》、《一行居集》、《测海集》、《观河集》等。

彭　绩（1742—1785） 字其凝，更字秋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布衣，绝意科举。不刻意为文，然有文必工。著有《秋士先生遗集》，文又收入《续古文辞类纂》。

汪　中（1744—1794） 字容甫，江都（今属江苏）人。乾隆贡生，后绝意仕进。禀性耿直，然一生坎坷，怀才不遇。私淑顾炎武，为经世致用之学，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文章尤工骈文，为清代骈文一大家，论者评其格调最高。王引之评其文说：“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汪中行状》）著作有《述学》《广陵通典》等。

崔　述（1740—1816） 字武承，号东壁，大名（今属河北）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历任福建罗源、上杭知县，后辞官，卜居相州，著述以终。精于考证之学，著有《考信录》、《知非集》、《闻见杂记》、《涉世杂谈》等，达34种。近人汇辑为《崔东壁遗书》。工散文，《冉氏烹狗记》一篇写得曲折而有变化，且富于讽喻意味，是其文中佳作。

吴　定（1744—1809） 字殿麟，号澹泉，歙县（今属安徽）人。诸生，嘉庆初举孝廉方正。早年从刘大櫆学习古文，与姚鼐过从较多。姚鼐文章写成，常先向他征求意见。王先谦称其文有“浩然自得之气，未尝揣摩趋步，于规矩亦无乎不合”。散文风格与刘大櫆相近。有《紫石山房文集》。

洪亮吉（1746—1809） 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后督贵州学政。嘉庆元年回京供职，以越职言事获罪，充

军伊犁。五年赦还，家居著述以终。亮吉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精于史地、声韵、训诂之学。善诗文，尤工骈体文。文风高古遒迈。著有《卷施阁诗文集》《更生斋诗文集》《北江诗话》等。

赵怀玉（1747—1823） 字亿孙，号味辛，武进（今属江苏）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出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署登州、兖州知府。丁父忧归，遂不复出。怀玉诗与孙星衍、洪亮吉、黄景仁齐名，时称"孙洪黄赵"。亦善散文，著有《亦有生斋文集》。

宋　湘（1748—1826） 字焕襄，一字芷湾，嘉应（今广东梅县）人。九岁时，见诸叔伯为文会，即取片纸学文，下笔有奇气。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任云南曲靖府知府，迁湖北督粮道，卒于任。湘善古文，文章质醇而恣肆，著有《不易居斋集》等。

王　灼（1752—1819） 字明甫，一字宾麓，桐城（今属安徽）人。乾隆举人，官东流县教谕。少从刘大櫆游，散文步趋刘大櫆，其文雅洁可诵，尤以记传为佳。著有《悔生诗文钞》。

铁　保（1752—1824） 姓觉罗，后改栋鄂，字冶亭，号梅庵，满洲正黄旗人。乾隆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吏部尚书。以诗名，与百龄、法式善并称"三才子"；尤擅长书法，与刘墉、翁方纲齐名。文存《惟清斋全集》。

谢振定（1753—1809） 字一之，号芗泉，湘乡（今属湖南）人。乾隆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擢御史，以忤和珅坐罢。和珅败，官至礼部员外郎。为文磊落雄爽，一如其人。著有《知耻堂集》。

张士元（1755—1824） 字翰先，号鲈江，震泽（今江苏吴县）人。乾隆举人，授教谕，不就。后应阮元聘，主讲诸暨书院。为文师法归有光，尝与王芑孙、陈用光等以古文相研究，深为姚鼐所激赏。著有《嘉树山房集》。

恽　敬（1757—1817） 字子居，号简堂，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举人，在京师为教习，后出任知县，擢南昌府同知。受人诬告，被劾去官。少好骈文，后受桐城派影响，改治散文。其主张和桐城派不同，认为文应兼取骈文之长，且须兼及考据与经世之学，以转变桐城派文内容的薄弱。与同里张惠言、李兆洛为同道，世称为阳湖派古文。其文章得力于韩非、李斯，风格峻峭廉悍，颇具雄刚之气，然情韵不及桐城派。著有《大云山房文稿》。

孙原湘（1760—1829） 字子潇，号心青，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嘉庆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假归，因病不出。擅诗、书、画，与舒位、王昙称为"三君"。工骈散文，著有《天真阁集》。

张惠言（1761—1802） 原名

一鸣，字皋文，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庆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早年治经学，工骈文辞赋，后受桐城派刘大櫆弟子王杓、钱伯坰的影响，与同里恽敬共治唐、宋古文，欲合骈、散之长，开创阳湖派。后来文学韩愈、欧阳修。其文章或恢宏奇丽，或温润朴健，卓然为一大家。又以词名，为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著有《茗柯文编》《茗柯词》等。

严可均（1762—1843） 字景文，号铁桥，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嘉庆举人，官教谕，以疾归。历时27年辑纂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与《全唐文》相接。使研究者由此一部书即可看到唐以前所有存世的单篇文章和子书佚文。又著有《铁桥漫稿》《说文校议》等。（宫晓卫）

沈　复（1763—1808**年后**） 字三白，号梅逸，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衣冠之家，一生从未出仕，游幕四方，并随翰林院编修齐鲲出使过琉球。亦曾从商，但因折资而辍，晚年学道以终。著有《浮生六记》。文章简洁生动，纯朴自然，比较真实地记载了作者大半生的欢乐、情趣和坎坷。

焦　循（1763—1820） 字里堂，一字理堂，江都（一作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应礼部试后，遂托疾归隐。葺其老屋曰“半九书塾”，复构一楼曰“雕菰楼”，读书著述其中。后以足疾不治而卒。焦氏世传《易》学，尚经术，与阮元齐名。博闻强记，识力精卓，每读一书，必穷究其源，故经史、历算、声音，训诂无所不通。文学柳宗元，习之不倦。主张“通核”之学，即“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著有《里堂道听录》、《雕菰集》等。

张问陶（1764—1814） 字仲冶，号船山，又号蜀山老猿、药庵退守。四川遂宁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迁都察院御史，累官至山东莱州知府。因与上官抵牾，辞官居吴县（今苏州）虎丘，后以病卒。工书善画，诗文尤精。在京时，与洪亮吉、罗聘等人相唱和。创作主张抒写性情，反对模拟，极为袁枚所推重。散文奇杰廉劲，笔力浑厚，亦为时贤所重。著有《船山诗文集》。

张　琦（1764—1833） 字玉可（初名翊，字翰风），号宛邻，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历知邹平、章丘、馆陶等县，病卒于馆陶。居官清明，仁术兼济，政绩显著。博学多精，善医术，通舆地之学，诗、词、散文皆有深造。著有《宛邻诗文集》等。

阮　元（1764—1849） 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直南书房。历官山东、浙江学使，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湖广、两广、云贵总督等，累迁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进太傅，卒后谥文达。生平虽为达官，不废问学，尤以提倡学术自任。曾在浙江立“诂

经精舍”，在广州立“学海堂”，培植、罗致学者编书。自所为学，博学淹通，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皆造其微，诗文亦精。提倡骈文，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所作散文和骈文，大都写得渊懿闲雅，有深纯自得之概。著有《研经室集》、《诂经精舍文集》等。

陈用光（1767－1835）　字硕士，一字实思（又作石士），新城（今江西黎川）人。嘉庆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国史馆纂修总纂、礼部左侍郎等职，为道光皇帝所器重，是方苞以后桐城派文人中官运最为亨通的。生平笃于师友之谊，以学行重一时。青年时期即为姚鼐弟子，是姚鼐打出文派旗帜后的第一代传人。创作严格遵守桐城派义法，为梅曾亮等所推重。著有《太乙舟文集》、《衲被录》等。

吴德旋（1767－1840）　字仲伦，江苏宜兴人。诸生，三次入京应试不中，生活困顿，遂教馆谋生。曾学散文于姚鼐，是姚鼐的著名弟子之一。诗亦高澹绝俗，闻名一时。其文虽宗桐城派，但自有特色，朴实雅洁，时寓深意，为阳湖派作家恽敬、陆继辂、吕璜等所推重。其文论著作《初月楼古文绪论》（由吕璜记述），对桐城派文学主张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另著有《初月楼文钞》、《续钞》、《闻见录》、《续闻见录》等。

胡　敬（1769－？）　字以庄，号书农，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充武英殿、文颖馆纂修官，《全唐文》、《治河方略》、《明鉴》总纂官，累迁至侍讲学士。学深思精，收辑之文皆精审。所进《唐文表》，有六朝、李唐之美，时称杰作。亦能诗。著有《崇雅堂诗文集》。

李兆洛（1769－1841）　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安徽凤台知县，县境大治。后主讲江阴书院近20年，成材颇众。晚以疾卒。精考证、舆地之学，通训诂，工诗。尤以文名，是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为文主张骈、散合一，取两体之长。虽与桐城派主张有异，对姚范、姚鼐的文章却颇为推崇，不持门户之见。其创作基本能贯彻自己的主张，骈、散兼济，事理交融，钩稽历代，实事求是。著有《养一斋文集》，辑有《骈体文钞》、《皇朝文典》、《旧言集》等。

陈寿祺（1771－1834）　字恭甫，号左海，晚号隐屏山人，闽县（今福建闽侯）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充广东、河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记名御史。晚年于浙江诂经精舍讲学，又主讲泉州清源、鳌峰两书院，卒于家。初治宋、明理学，后专治汉学，兼擅诗文。为学博涉多通，诗文深博绝丽，有六朝三唐风格，其文尤为世所重。著有《左海文集》、《东观存稿》等。

董士锡（约1811年前后在世）

字晋卿，一字损甫，江苏武进人。副榜贡生，候选直隶州州判。曾被聘续修《怀远县志》、《续行水金鉴》，先后主通州紫琅书院、扬州广陵书院、泰州书院讲席。通经史，尤精虞氏易义。工诗词，散文尤精，曾经其舅张惠言指授，文风直承张惠言，是阳湖派的重要作家之一。著有《齐物论斋文集》等。

陆继辂（1772—1834） 字祁孙（一作祁生），一字修平，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安徽合肥县训导，甚得时誉。以修《安徽省志》叙劳，迁江西贵溪知县。初致力于诗，所作颇多。自常州张惠言、恽敬以散文名，遂与董士锡同时并起，世推为阳湖派，与桐城派相抗。论文既赞赏从源及流，亦称扬由博反约。主张兼取百家之长，不以宗派论优劣。其文识义多通，语多精诣。著有《崇百药斋文集》、《合肥学舍札记》等。

方东树（1772—1851） 字植之，居室名"仪卫轩"，人称仪卫先生。安徽桐城人。诸生，曾主讲庐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等书院。早通诗词，后用功于心性之学。又学散文于姚鼐，为姚鼐的著名弟子之一。四十岁后，不欲以诗文名世，转攻义理，以治经史著称，于文论亦有研讨。所著《汉学商兑》、《辨道论》、《匡民正俗对》、《病榻罪言》等书，或攻汉学家之失，或陈禁烟之道，论御敌之策，表现了一定的爱国思想。作为桐城派的理论家，方东树主要是从思想上维护其文派的地位，而对于写作上的要求，则不拘泥。他的文章言议简洁，笔锋犀利，独具一格。另著有《书林扬觯》、《思适居钤语》、《昭昧詹言》、《仪卫轩文集》等。

梁章钜（1775—1849） 字茝邻，又字闳中，号退庵，福建长乐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历官军机章京，湖北荆州知府，江苏淮海道，山东、江西按察使，江苏、甘肃、直隶布政使，广西、江苏巡抚，后以病卒。一生虽政务繁重，暇中仍综览群书，勤于写作，熟于掌故，喜作笔记小说，诗文亦精。著作有《浪迹丛谈》、《称谓录》、《制义丛话》、《楹联丛话》、《归田琐记》、《退庵随笔》等70余种。

邓显鹤（1777—1851） 字子立，号湘皋，湖南新化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屡试礼部不第。晚官宁乡训导，旋乞病归，专意著书。因事至长沙，请诗文者络绎不绝。始以诗名世数十年，后乃专心于表章乡邦文献，搜讨楚故，匡谬拾遗。同时讲求文字声韵，精通校书之法。所作散文情深义明，气深节古。著有《南村草堂文钞》等。

姚　椿（1777—1853） 字春木，一字子寿，江苏娄县人。幼通声律，喜博览。18岁应顺天乡试，才名大起。继而屡试不第，亦不以为意。尝与洪亮吉、张问陶极论词赋，气甚凌厉。后从学于姚鼐，以散文名。先后主讲河南夷山、湖北荆南、松江景贤书院。文论虽承桐城派，亦不尽相同，

认为“文之为用，不外四目：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辞之美。”虽以文名世，但其文与质均未越出姚鼐范围。著有《晚学斋文集》、《樗寮文续稿》等。又辑有《国朝文录》。

吕璜（1778—1838） 字礼北，号月沧，广西永福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官浙江知县，累迁至海防同知，时称循吏，断狱无能翻案者。晚年归里，以散文名，主讲秀峰书院。文法师承桐城派作家吴德旋，然能于规矩中出新意，成阳湖派之风格。其文于纡回百折之中，复有峻赠离合之势。著有《月沧小集》。

冯登府（？—1840） 字柳东，号云伯，别号勺园。又自号小长芦旧史。浙江嘉兴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江西将乐知县，后官宁波府教授。为学勤谨，于两汉、唐、宋诸儒之经谊，旁及诸子百家传注，无不强识博通，声音训诂尤为探邃。工诗词散文，文以桐城派为宗。著有《小谪仙馆摭言》、《酌史岩摭谈》、《石经阁文集》等。

管同（1780—1831） 字异之，上元（今江苏南京）人。道光五年（1825）举人，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幕。工诗散文，为姚鼐著名弟子之一，是姚鼐之后桐城派的重要作家。然颇能自立，论学之作，往往直言其师之失。其文刚健清新，简洁明快，长于议论，时有卓见。所撰《拟言风俗书》、《拟筹积贮书》、《禁用洋货议》等，纵论天下大计，指陈弊端，颇中肯綮，传诵一时。著有《因寄轩文集》等。

刘开（1784—1824） 字方来，一字明东（一作东明），号孟涂。安徽桐城人。诸生，终身未仕。喜交游，落拓不羁，是姚鼐著名弟子之一，姚鼐颇以为重，认为：“此子他日当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之坠绪，赖以复振，吾乡幸也。”时与同门方东树、管同、梅曾亮齐名，有“方、刘、梅、管”之称。创作主张“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然后变而出之，用之于一家之言。所作散文气积势盛，纵横排宕，明白晓畅，自成一体。著有《孟涂文集》等。

周树槐（约1824年前后在世）

字星叔，湖南长沙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历官山西礼县、江西吉水等县知县。为政简易便民，有古循吏风。年未五十即告归，杜门不入城市，专治散文，以起散文之衰为自任。其文精深纯古，简洁明快，直追古作者。著有《壮学斋文集》。

潘德舆（1785—1839） 字彦辅，一字四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道光八年（1828）举人，候补安徽知县，未到任，仍教授乡里，卒于家。养亲至孝，为人正直，颇有用世之志。故其为学，力求古人微言大义，时人鲁一同综论其学曰：“挽回世运，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其用在有刚直之气，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时之顽懦鄙薄，以复于古。”盖其学以克己为要，以有耻为归。所作散文入幽出显，沉痛吐露。诗亦精深奥秘，耐人深思。著有《养一斋诗

文集》、《养一斋札记》等。

姚柬之（1785—1847） 字佑之，号伯山，亦号檗山，又号且看山人。安徽桐城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累官至贵州大定知府。为官廉正，决狱清明。因与上官意多不合，尚气负才，遂引疾归，数年后卒。工诗文，是桐城派作家之一。著有《且看山人文集》等。

姚 莹（1785—1853） 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因以“十幸”名其斋，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姚鼐侄孙。嘉庆进士，选福建平和县知县。鸦片战争时，特旨命为台湾道，加按察御使衔。因抗击英军有功，进阶二品。和议成后，为英人所陷，一度被逮入狱。出狱后，官至广西、湖南按察使，以病卒。早年从姚鼐学散文，名入“姚门四弟子”之列。论文继承桐城派“义法”之说，认为应“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其文长于议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笔锋峻利。亦工诗，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著有《东槎纪略》、《东溟文集》、《寸阴丛录》等，后人辑有《中复堂全集》。

李祖陶（约1825年前后在世）

字钦之，号迈堂，江西上高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少孤贫，嗜读书。既长，博综群籍，致力于散文创作，深以“北宋以后无文”之说为非，认为“文无古今，惟得神解者为贵”。主张为文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论文也以此衡优劣。其自为文，则仍取径唐、宋，不脱八家窠臼。著有《迈堂文略初编》、《续编》、《剩稿》等。又辑有《国朝文录》、《金元明八家文钞》。

梅曾亮（1786—1856） 字伯言，上元（今江苏南京）人。道光三年（1823）进士，授知县不就，援例改户部郎中。后因弟病告归，主讲扬州书院。晚年馆于河道总督杨以增之署以终。少喜骈文，及游学于姚鼐，与管同友善，乃一变而为散文。其文章义法一本桐城，成为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居京师二十余年，笃古嗜学，宗稷辰、朱琦、龙启瑞、王拯等与其游，咸称赏其才。治散文者多从之问义法，文名颇盛。姚鼐去世后，有继主文坛之势。创作提倡因时立言，认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应以昌明道术、辩析是非为己任。其创作义法虽不脱桐城派窠臼，但也同时注意吸收非桐城派的长处，故其散文虽多选声练色，姿韵安雅，笔力微弱，也不乏雄健浑厚、情理交融之作。著有《柏枧山房文集》等。

龚自珍（1792—1841） 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岑山民。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授内阁中书，历任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后辞官南归，途中卒于丹阳书院。好学博通，先后致力于经学、史学、目录学、金石之学及古典文学，出入《九经》、《七纬》，兼通诸子百家，

生平著作等身。文学上主张以有用为主，诗文都应与社会历史相联系，或引古喻今，以古为用；或批评历史，喻鉴当今。故其所作虽内容不同，但富于现实意义。其诗作打破了清中叶后诗坛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着眼于社会形势，抒发感慨，纵横议论，有“龚派”之称。散文大部分是政论文，指陈时事，笔锋犀利，奥博纵横，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其著作有《定盦文集》、《续集》、《文集补》等。

（于春香）

轶事掌故

老　子

骑牛出关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列传》）

韩非子

高才见妒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史记·韩非列传》）

吕不韦

一字千金　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李　斯

谏王逐客　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史记·李斯列传》）

陆　贾

进呈《新语》　陆生时时前说称

《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陆贾列传》）

贾谊

渡湘吊屈　谊既以適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汉书·贾谊传》）

邹阳

狱中上书　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王濞）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阳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汉书·邹阳传》）

司马相如

著《子虚赋》　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

献《上林赋》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籍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悦。（同上）

上《大人赋》　上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同上）

茂陵遗书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后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

者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所忠奏焉，天子异之。（同上）

百金买赋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为）解悲愁之词，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文选·长门赋序》）

精思为赋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西京杂记》卷二）

董仲舒

诡书致祸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陵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东方朔

作《答客难》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汉书·东方朔传》）

司马迁

发愤著书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史记·太史公自序》）

王　褒

奇文愈疾　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书·王褒传》）

刘　向

疾俗著书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乃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乃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书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汉书·楚元王传》)

扬　雄

作《反离骚》　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汉书·扬雄传》)

自我解嘲　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同上)

闲居授《玄》　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同上)

吐凤集《玄》　扬雄读书，有人语之曰："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而灭。(《西京杂记》卷二)

精苦作赋　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使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新论》)

班　彪

踵武《史记》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后汉书·班彪列传》)

班　固

世重《汉书》　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

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同上)

上《两都赋》 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池，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劝讽，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后汉书·班固传》)

感作《宾戏》 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诵，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扬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同上)

王　充

勤著《论衡》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世俗嫌疑。(《后汉书·王充列传》)

张　衡

《二京》讽世 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十年乃成。(《后汉书·张衡列传》)

《思玄》寄志 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同上)

王　符

隐居著书 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后汉书·王符列传》)

祢　衡

即席赋鹦鹉 (黄祖长子)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彩甚丽。(《后汉书·文苑列传》)

仲长统

著论砭俗 尚书令荀彧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后汉书·仲长统列

传》）

曹　丕

驴鸣祭吊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世说新语·伤逝》）

曹　植

下笔成章　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余岁，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三国志·魏书》）

感甄作赋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曹丕）。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旋，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文选·洛神赋》李善注）

孔　融

幼有异才　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家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答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后汉书·孔融列传》）

撰典讽曹　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同上）

王　粲

蔡邕倒屣迎　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皆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三国志·魏书》）

过目成诵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旁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同上）

陈　琳

草檄辱曹　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三国志·魏书》）

书檄愈疾　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三国志·魏书》裴注）

诸葛亮

解带写诚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三国志·蜀书》）

出师上疏　（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同上）

何　晏

服膺王弼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世说新语·文学》）

刘　伶

赞颂酒德　（伶）尝渴饮，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伶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措意文翰，唯著《酒德颂》一篇。（《晋书·刘伶传》）

阮　籍

神交"大人"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晋书·阮籍传》）

嵇　康

著《养生论》　（康）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

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晋书·嵇康传》）

守志绝友 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同上）

向 秀

作《思旧赋》 （嵇）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晋书·向秀传》）

成公绥

孝乌集庐 （成公绥）幼而聪敏，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闲默自守，不求闻达。时有孝乌，每集其庐舍，绥谓有反哺之德，以为祥禽，乃作赋美之。（《晋书·文苑传》）

皇甫谧

改过勤学 （皇甫谧）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览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释卷。（《晋书·皇甫谧传》）

杜 预

《左传》癖 （预）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晋书·杜预传》）

李 密

上《陈情表》 （密）事祖母以孝闻，其侍疾则泣涕侧息，日夜不解带。膳饮汤药，必自口尝。本郡礼命不应，州辟从事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奉使聘吴。吴主问蜀马多少，对曰："官用有余，人间自足。"吴

主与群臣泛论道义，谓宁为人弟，密曰："愿为人兄矣。"吴主曰："何以为兄？"密曰："为兄供养之日长。"吴主及群臣皆称善。蜀平后，征西将军邓艾闻其名，请为主簿，及书招，欲与相见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养。晋武帝立太子，征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遣，于是密上书。（武帝）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服膳。（《三国志·蜀书》裴注）

陈　寿

良史之才　（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晋书·陈寿传》）

左　思

洛阳纸贵　（左思）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精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文选·三者赋》李注）

张　载

著铭垂戒　张载字孟阳，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载性闲雅，博学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晋书·张载传》）

夏侯湛

"连璧"美誉　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而美容观，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都谓之"连璧"。（《晋书·夏侯湛传》）

《抵疑》自广　（湛）少为太府椽。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同上）

潘　岳

望尘而拜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悯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晋书·潘岳传》）

陆　机

作《辩亡论》　（机）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晋书·陆机传》）

为文患才多　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常

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云尝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其为人所推服如此。（同上）

王羲之

兰亭雅集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晋书·王羲之传》）

孙　绰

掷地有声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云：“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世说新语·文学》）

袁　宏

《东征》纠纷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同上）

增韵惊坐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宏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同上）

陶渊明

著文自况　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晋书·隐逸传》）

解印归田　（潜）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一百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同上）

傅　亮

忧危作赋　亮之方贵，兄迪每深诫焉，而不能从。及见世路屯险，著论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内怀忧惧。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烛，作《感物赋》以寄意。（《南史·傅亮传》）

颜延之

连挫续之 雁门周续之隐庐山，儒学著称。永初中，征诣都下，开馆以居之。武帝亲幸，朝彦毕至。延之官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以简要连挫续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畅，莫不称善。（《南史·颜延之传》）

范　晔

失意著书 元嘉九年，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广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彭城王义康大怒，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南史·范晔传》）

谢惠连

神助族兄 惠连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常云："此语有神功，非吾语也。"（《南史·谢惠连传》）

文比张华 义康修东府城，城堑中得古冢，为之改葬，使惠连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为《雪赋》，以高丽见奇。灵运见其新文，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文章并行于世。（同上）

鲍　照

河清献颂 鲍照字明远，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元嘉中，河、济俱清，当时以为美瑞，照为《河清颂》，其序甚工。（《宋书·宗室传》）

为文自晦 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同上）

谢　庄

蓝田美玉 （庄）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及长，韶令美容仪，太祖见而异之，谓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曰："蓝田出玉，岂虚也哉。"（《宋书·谢庄传》）

江东独秀 （庄）除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赍以示庄，庄赋亦竟。淑见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遂隐其赋。（同上）

江　淹

江郎才尽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

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南史·江淹传》)

王　俭

诵书致讽　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南齐书·王俭传》)

沈　约

为《郊居赋》　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立宅东田，瞩望郊阜，尝为《郊居赋》以序其事。(《南史·沈约传》)

撰写《宋书》　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将军蔡兴宗为启明帝，有敕赐许，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书，凡一百二十卷。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永明初，遇盗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终，被敕撰国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兹王役，无暇搜撰。五年春，又被敕撰《宋书》。六年二月功毕，表上之。(《宋书·自序》)

奖掖后学　初，(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文学传》)

张　融

赋超木华　融文辞诡激，独与众异。后还京师，以(《海赋》)示镇军将军顾觊之，觊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之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四句，后所足也。(《南齐书·张融传》)

陶弘景

梦访冥事　弘景为人，圆通谦慎，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辄觉。建武中，齐宜都王铿为明帝所害，其夜，弘景梦铿告别，因访其幽冥中事，多说秘异，因著《梦记》焉。(《梁书·处士传》)

才高受抑　初，梁武帝每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

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偏略》以高之，竟不见用。乃著《辩命论》以寄其怀。(《南史·刘峻传》)

丘　迟

劝降伯之　(天监)四年，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伐，迟为谘议参军，领记室。时陈伯之在北，与魏军来拒，迟以书喻之，伯之遂降。(《梁书·文学传》)

吴　均

著书免职　均将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南史·文学传》)

文壮人懦　齐吴均为文多慷慨军旅之意。梁武帝被围台城，朝廷问均外御之计，怯但不知所答。启云："愚计速降为上计。"(《隋唐嘉话》)

裴子野

体弱文壮　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高祖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梁书·裴子野传》)

文成于心　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之，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问其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虽有见否之异，其于刊改一也。"(同上)

萧　统

文思敏捷　太子美容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二谛、法身义，并有新意。(《梁书·昭明太子传》)

引纳才士　(太子)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同上)

苏　绰

强国六条　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

之。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周书·苏绰传》）

改易文风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同上）

徐 陵

一代文宗 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其于后进之徒，接引无倦。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陈书·徐陵传》）

为人藏拙 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隋唐嘉话》）

庾 信

文艳东宫 肩吾（庾信父）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肩吾子）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周书·庾信传》）

诋议北文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朝野佥载》卷六）

富嘉谟

文变徐庾 （嘉谟）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嘉谟作《双龙泉颂》、《千蠋谷颂》，少微撰《崇福寺钟铭》，词最高雅，作者推重。（《旧唐书·文苑传》）

吴少微

北京三杰 嘉谟与少微在晋阳，魏郡谷倚为太原主簿，皆以文词著名，时人谓之"北京三杰。"（同上）

王 勃

为文檄鸡 乾封初，（勃）诣阙上《宸游东岳颂》。时东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颂》。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

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同上)

《滕王阁序》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唐摭言》卷五)

腹稿作文 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数升，饮酒数杯，以被覆面而寝。既寤，援笔而成，文不加点，时人谓为腹稿也。(《唐语林》卷二)

杨 炯

耻居王后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者，亦以为然。(《旧唐书·文苑传》)

卢照邻

喜居王后 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朝野佥载》卷六)

著文自悲 (照邻)家贫苦，贵宦时时供衣药，乃去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颍水周舍，复预为墓，偃卧其中。自以当高宗之时尚吏，已独儒。武后尚法，已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已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手足挛缓，不起行已十年，每春归秋至，云壑烟郊，辄舆出户庭，悠然一望，遂自伤，作《释疾文》，有云："覆焘虽广，嗟不容乎此生；亭育虽繁，恩已绝乎斯代。"与亲属诀，自沉颍水。(《唐才子传》卷一)

骆宾王

檄惊武后 骆宾王年方弱冠，时徐敬业据扬州而反，宾王陷于贼庭，其时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每与朝庭文字，极数伪周，天后览之，至"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见"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悦，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盖有遗才之恨。(《唐语林》卷二)

陈子昂

长安裂琴 《独异记》载：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谓左右曰："辇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

曰："明日可集宣扬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郡。（《唐诗纪事》卷八）

张　说

月旦四杰　　崔融与张说评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邻可以企之。"说曰："不然。盈川文如悬河，酌之不竭，优于卢而不减王。耻居后，信然；愧在前，谦也。"（《新唐书·文艺传》）

评议时文　　开元中，说为集贤大学士十余年，常与学士徐坚论近代文士，悲其凋丧。坚曰："李赵公、崔文公之笔术，擅价一时，其间孰优？"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则骇矣。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问后进词人之优劣，说曰："韩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如丰肌腻理，虽秾华可爱，而微少风骨。张九龄之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王翰之文，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坚以为然。（《旧唐书·文苑传》）

苏　颋

吹火照书　　苏颋少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而好学不倦。每欲读书，又患无灯烛，常于马厩灶中，旋吹火光照书诵焉。其苦学如此。后至相位。（《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诵赋知讳　　苏颋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颋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树，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凄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朝野佥载》卷四）

文显当时　　自景龙后，（苏）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帝爱其文，曰："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新唐书·苏颋传》）

李　邕

补注《文选》　　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新唐书·文艺传》）

遍读秘书　　（邕）既冠，见特进李峤，自言"读书未遍，愿一见秘书。"峤曰："秘阁万卷，岂时日能借邪？"邕固请，乃假直秘书。未几辞去，峤惊，试问奥篇隐帙，了辩如响。峤叹曰：

"子且名家!"(同上)

鬻文获财 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张韩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书巨源谥议》，文士推重之。(《旧唐书·文苑传》)

萧颖士

阅碑成诵 (颖士)聪警绝伦，尝与李华、陆据同游洛南龙门，三人共读路侧古碑，颖士一阅，即能诵之。华再阅，据三阅，方能记之，议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同上)

仆爱其才 (颖士)赋性躁忿浮戾，举无其比。常使一仆杜亮，每一决责，皆由非义。平复，遭其指使如故。或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择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朝野佥载》卷六)

李　华

熏文试友 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华进士时，著《含元殿赋》万余言，颖士见而赏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文体温丽，少宏杰之气，颖士词锋俊发，华自以所业过之，疑其诬词，乃为《祭古战场文》，熏污之如故物，置于佛书之阁。华与颖士因阅佛书得之，华谓之曰:"此文何如?"颖士曰:"可矣。"华曰:"当代秉笔者，谁及于此?"颖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华愕然。(《旧唐书·文苑传》)

四绝碑 华尝为《鲁山令元德秀墓碑》，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四绝碑。"(同上)

贾　至

挥涕制诰 至天宝末为中书舍人。禄山之乱，从上皇幸蜀。时肃宗即位于灵武，上皇遣至为传位册文，上皇览之叹曰:"昔先帝逊位于朕，册文则卿之先父所为。今朕以神器大宝付储君，卿又当演诰。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至伏于御前，呜咽感涕。(《旧唐书·文苑传》)

李　白

梦笔生花 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粲花之论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同上)

"醉圣"之号 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同上)

美人呵笔 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时十月大寒，笔冻莫能书字。帝敕宫嫔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

执牙笔呵之。遂取而书其诏，其受圣眷如此。（同上）

自比大鹏 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李白集·大鹏赋序》）

梁 肃

赏拔李翱 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贡举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右补阙梁君。当此时，梁君誉塞天下，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走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梁君知人之故也。亦既相见，遂于翱有相知之道焉，谓翱得古人之遗风，期翱之名不朽于无穷，许翱以拂试吹嘘。翱初谓其面相进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没，翱渐游于朋友公卿间，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于补阙梁君也。"翱乃知其非面进也。（《唐摭言》卷七引李翱《感知己赋序》）

陆 贽

下笔如神 贽为朋党所挤，同职害其能，加以言事急切，动失上之欢心，故久之不为辅相。其于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判断，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贞元初，李抱真入朝，从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时，赦书至山东，宣谕之时，士卒无不感泣，臣即时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旧唐书·陆贽传》）

上书责奸 始，帝仓卒变故，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然自古兴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贽退而上书。（《新唐书·陆贽传》）

奉天草制 （贽）在奉天，朝夕进见，然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由是帝亲倚，至解衣衣之，同辈莫敢望。虽外有宰相主大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尝为帝言："今盗遍天下，宜痛自悔咎，以感人心。昔成汤罪己以兴，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复国，陛下诚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臣持笔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从之。故奉天所下制书，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同上）

裴 度

还玉带表 裴晋公平淮西后，宪宗赐玉带一条，公临薨，却进，使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状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间，谨却封进。"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因话录》卷三）

吕 温

文艳见赏 温文体富艳，有丘

明、班固之风，所著《凌烟阁功臣铭》、《张始兴画赞》、《移博士书》，颇为文士所赏。有文集十卷。（《旧唐书·吕温传》）

李 观

颉颃韩愈 观属文，不旁沿前人，时谓与韩愈相上下。及观少夭，而愈后文愈工，议者以观文未极，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陆希声以为“观尚辞，故辞胜理；愈尚质，故理胜辞。虽愈穷老，终不能加观之辞；观后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质”云。（《新唐书·文艺传》）

韩 愈

作《进学解》 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愈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值。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奭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旧唐书·韩愈传》）

碑文风波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词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同上）

谏迎佛骨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同上）

撰文驱鳄 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是以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咒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同上）

文章功过 （愈）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对偶，而经诰之指

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若南人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同上）

谀墓之金　（刘叉）闻韩吏部接天下贫士，步而归之，出入门馆无间。时韩碑铭独唱，润笔之货盈缶，因持案上金数斤而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唐才子传》卷五）

柳宗元

谪官著文　叔文败，（宗元）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新唐书·柳宗元传》）

撰述《贞符》　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厚久，宜享年无极之义，本末宏阔。会贬逐中辍，不克备究。（吴）武陵即叩头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圣王之典不立，无以抑诡类，拔正道，表核万代。"臣不胜奋激，即具为书。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独不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地所憾，用是自决。（《柳宗元集·贞符序》）

《佩韦》自诫　柳子读古书，睹直道守节者即壮之，盖有激也。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慕西门氏佩韦以戒，故作是赋。（《柳宗元集·佩韦赋序》）

唾骂尸虫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虫三，处腹中，伺人隐微失误，辄籍记。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谗于帝以求飨。是以人多谪过、疾疠、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闻聪明正直者为神。帝，神之尤者，其为聪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此阴秽小虫，纵其狙诡，延其变诈，以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飨？其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虫若果为是，则帝必将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类，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后为帝也。"余既处卑，不得质之于帝，而嫉斯虫之说，为文而骂之。（《柳宗元集·骂尸虫文序》）

《三戒》警世　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柳宗元集·三戒序》）

欧阳詹

怀忠作赋　丙寅岁，因受遣，季冬之月，次于殷墟。历关龙逢墓焉。昔聆其风，未尝不回肠飒涕，观夫茔域，心又增伤，遂写愤于言，为赋以吊。先

生以忠谏致命，故以怀忠命篇云。（《欧阳行周集·怀忠赋序》）

李 翱

著《复性书》 翱邂逅于（惟）俨，顿了本心。末由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复遇紫玉禅翁，且增明道趣，著《复性书》上下二篇，大抵谓本性明白，为六情玷污，迷而不返。今牵复之，犹地雷之复见天地心矣。即内教之返本还源也。其书露而且隐，盖而又彰，其文则《象》、《系》、《中庸》，隐而不援释教；其理则从真舍妄，彰而乃显自心。弗事言陈，唯萌意许也。韩柳览之，叹曰："吾道萎迟，翱且逃矣！"（《宋高僧传》卷十七）

皇甫湜

不羁之才 公（裴度）讨淮西日，恩赐钜万，贮于集贤私第。公素奉佛，因尽舍所得，再修福先寺。既成，将请白居易为碑。湜曰："近舍湜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烦，虑为大手笔见拒。是所愿也。"因请斗酒而归，独饮其半，乘醉挥毫，立就。又明日，挈本以献，文思高古，字复怪僻，公寻绎久之，叹曰："木玄虚、郭景纯《江（赋）》《海（赋）》之流也！"命小将以车马缯彩器玩约千余缗酬之。湜省书，掷于地，而叱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者；请制此碑，盖受恩深厚耳！其词约三千余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真不羁之才。"立遣依数酬之。（《唐语林》卷六）

孙 樵

行在三绝 黄巢陷长安，孙樵赴岐陇，授职方员外，诏书曰："行在三绝。"以常侍李骘有曾、闵之行，（司空）图有巢、由之风，樵有扬、马之文故也。（《唐诗纪事》卷六三）

舒元舆

上书自售 元舆自负才有过人者，锐进取。大和五年，献文阙下，不得报，上书自言。文宗得书，高其自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闵以浮躁诞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东都。（《新唐书·舒元舆传》）

帝吟其赋 （文宗）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吟罢，方省元舆（《牡丹赋》）词，不觉叹息，泣下沾衣。（《唐诗纪事》卷四三）

白居易

赋惊逢吉 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德以慎立，

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唐摭言》卷三）

池上逸兴　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因为《池上篇》。（《旧唐书·白居易传》）

名山藏文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同上）

精著《策林》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白居易集·策林序》）

刘禹锡

谪居作赋　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作《问大钧》、《谪九年》等赋数篇。（《新唐书·刘禹锡传》）

悔改文卷　公（牛僧孺）赴举之秋，尝投贽于刘补阙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历二十余岁，刘转汝州，公镇海南，枉道旌，信宿酒酣赋诗。刘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因咸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禹锡和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语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公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也。刘乃戒其子咸久、承雍曰：“吾成人之志，岂料为非；汝辈进修，守中为上。”（《唐诗纪事》卷三九）

牛僧孺

受知韩愈　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谒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其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公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孺曰：“某始出山随计，进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国门。”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遗阙而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唐摭言》卷六）

李德裕

作诏称意　元和后数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继火乃得罢。德裕在位，虽遽书警奏，皆从容裁决，率午漏下还

第，休沐辄如令，沛然若无事时。其处报机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诏，德裕数辞，帝曰："学士不能尽吾意。"伐刘稹也，诏王元逵、何弘敬曰："勿为子孙之谋，存辅车之势。"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贼遂平。帝每称魏博功，则顾德裕道诏语，咨其切于事而能伐谋也。（《新唐书·李德裕传》）

杜　牧

佳赋驰誉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数十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此赋。"郾应声曰："谨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唐摭言》卷六）

令狐楚

刀丛草表　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郑儋在镇暴卒，不及处分后事，军中喧哗，将有急变。中夜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自是声名益重。（《旧唐书·令狐楚传》）

援笔作判　相国令狐公楚，自河阳征入，至阌乡，暴风，有裨将饲官马在逆旅，屋毁马毙。到京，公旋大拜。时魏义通以检校常侍，代镇三城，裨将当还，因马死，惧帅之责，以状请一字为押。公援笔判曰："厩焚鲁国，先师唯恐伤人；屋倒阌乡，常侍岂宜问马？"（《因话录》卷三）

李商隐

受学令狐　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旧唐书·文苑传》）

段成式

俪事惊众　（成式）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畋猎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谏止。明日以雉兔遍遗幕府，人为书，因所获俪前世事，无复用者。众大惊。（《新唐书·段成式传》）

山寺论碑　段郎中成式，博学文章，著书甚多。守庐陵，尝游山寺，读一碑，二字不过，曰："此碑无用于世

矣。戚式读之不过，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二字遍问人，果无知者。（《唐语林》卷二）

陆龟蒙

文稿被盗　（龟蒙）文成，窜稿箧中，或历年不省，为好事者盗去。（《新唐书·隐逸传》）

作赋自怜　余抱病三年于衡泌之下，医甚庸而气益盛，药非良而价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尝不解衣辍食而后致也，其为穷且否，亦已至矣。圣人云：五福六极之数，曰寿曰富曰康，宁曰贫曰疾曰忧。既贫且疾，能无忧乎？忧既盈矣，能无伤乎？人既伤矣，能无夺寿乎？是不蒙五福，偏被六极者也。谁其怜之？作《自怜赋》。（《甫里先生集·自怜赋序》）

作赋自广　天随子宅荒少墙，屋多隙地，著图书所，前后皆树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以采撷之，以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旦暮犹责儿童辈拾掇不已。人或叹曰："千乘之邑，非无好事之家，日欲击鲜为具以饱君者多矣，君独闭关不出，率空肠贮古圣贤道德言语，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几年来忍饥诵经，岂不知屠沽儿有酒食邪？"退而作《杞菊赋》以自广。（《甫里先生集·杞菊赋序》）

罗　隐

《谗书》自谗　谗书者何？江东罗生所著之书也。生少时自道有言语，及来京师七年，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丁亥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余之书乃自谗耳。"目曰《谗书》。（《罗隐集·谗书序》）

皮日休

著《桃花赋》　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后苏相公味道得而称之，广平之名遂振。呜呼！以广平之才，未为是赋，则苏公果暇知其人哉？将广平困于穷，厄于贱，然强为是文耶？日休于文，尚矣。状花卉，体风物，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因感广平之所作，复为《桃花赋》。（《皮子文薮·桃花赋序》）

作《反招魂》　屈原作《大招魂》，宋玉作《招魂》。皮子以为忠放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为？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皮子文薮·反招魂序》）

鹿门隐书　醉士隐于鹿门，不醉则游，不游则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惭其所未周。故复草《隐书》焉。呜呼！古圣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皮子文薮·鹿门隐书序》）

司空图

作赋自警 西方之鸟，有名共命者，连腹异首而爱憎同一，伺其寐，得毒卉，乃饵之，既而药作，果皆毙。吾痛其愚，因为赋，且以自警。（《司空表圣文集·共命鸟赋序》）

赋咏春情 余尝赋春情数百言，状其思媚，自谓摭众骚之遗，恨遭乱而失。今独忆其间三十五字，存于濯缨之东楹。（《司空表圣文集·情赋序》）

柳开

改名寓志 既就学，喜讨论经义。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既而改名字，以为能开圣道之途也。著书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作二传以见意。（《宋史·柳开传》）

柳范之誉 （柳开）尚气自任，不顾小节，所交皆一时豪俊。范杲好古学，尤重开文，世称为“柳、范”。（《宋史·柳开传》）

作文劝民 （柳开）徙全州。全西溪洞有粟氏，聚众五百余人，常钞劫民口粮畜。开作为衣带巾帽，选牙吏勇辨者得三辈，使之谕之曰：“尔能归我，即有厚赏，给田为屋处之；不然，发兵深入，灭尔类矣。”粟氏惧，留二吏为质，率其酋四个与一吏偕来。开厚其犒赐，吏民争以鼓吹饮之。居数日遣还，如期携老幼悉至。开即赋其居业，作《时鉴》一篇，刻石劝之。（《宋史·柳开传》）

《家戒》训子 开善射，喜弈棋。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余言，刻石以训诸子。

穆修

拒题匪名 修性刚介，好论斥时病，诋诮权贵，人欲与交结，往往拒之。张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庙成，知白使召修作记，记成，不书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遗修为寿，且求载其名于记，修投金庭下，俶装去郡。士谢之，终不受，且曰：“吾宁糊口为旅人，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宋史·穆修传》）

文显当时 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宋史·穆修传》）

自售柳集 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版，印数百部，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许值，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宋人轶事汇编》卷五）

石介

嫉世著文 介为文有气，尝患文

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又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宋史·石介传》）

执教太学　先生自闲居徂徕，后官于南京，常以经术教授。及在太学，益以师道自居，门人弟子从之者甚众。太学之兴，自先生始。（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欧阳修

师友唱和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时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天下。（《宋史·欧阳修传》）

力排险异之文　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事毕，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欧阳修传》）

不掩宋祁文功　欧阳公于修《唐书》，最后至局，专任《纪》、《志》而已，《列传》则宋尚书祁所修。朝廷以一书出两手，体不能一，遂令公详看《列传》，令删革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叹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多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及书成奏御，御史曰："旧例修书，只列局内官高者一人姓名，公官高，宜书。"公曰："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而夺其功乎？"于是《纪》《志》书公姓名，《列传》书宋公姓名。宋公闻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让，而好相陵，此事前所未闻也。"（《宋人轶事汇编》）

以文济民　欧公撰石曼卿墓表，苏子美书，邵悚篆额。山东诗僧祕演屡督欧俾速撰。文方成，演置石于相蓝，砻讫白欧公，写石之日，为具召馆阁诸公。观子美书毕，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饮散，欧、苏嘱演曰："镌讫且未得打。"竟以辞翰之妙，演不能却。欧公于定力院见之，问寺僧，僧曰："半千买得。"欧怒，回诟演曰："吾之文乃与庸人半千鬻之！"演徐语欧曰："学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欧愈怒曰："是何言？"演曰："公岂不记省元时，庸人竞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名呼曰：两文来买欧阳某省元赋。今一碑五百，价已多矣。"欧因解颐，徐又语欧曰："吾友曼卿不幸早世，因欲得君之文，张其名，与日星相磨。而又穷民售之，颇济其乏，又非利乎？"公笑而不语。（《宋人轶事汇编》）

用字精致　韩魏公在相为昼锦堂，欧公记之"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韩公得之爱赏。后数日，欧复遣介，别以本至，曰："前有未是，可换此本。"韩再三玩之，无异前者，但于"富贵""仕宦"下各添一"而"字，文义尤畅。（《宋人轶事汇编》）

怕后生笑　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宋人轶事汇编》）

自号六一居士 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欧阳文忠文集·六一居士传》）

苏舜钦

好为古文 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宋史·苏舜钦传》）

苏 洵

苏氏文章 至和、嘉佑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文章。（《宋史·苏洵传》）

结怨安石 明允平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当有改作，仍挟其所著书，嘉佑初来京，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喜之，屡诋于众，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论》一篇，密以献安道，而不以示欧阳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宋人轶事汇编》）

眉山三苏 苏洵生轼、辙，以文章名世，故时人谣曰："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老泉携东坡、颍滨谒张文定公，时方习制科业，文定与语奇之，馆于斋舍。翌日，文定公忽出六题，令人持与坡、颍云："请学士试拟。"文定密于壁间窥之。两公得题，各坐致思，颍滨于题有疑，指以示坡，坡不言，第举笔倒敲几上云："《管子注》。"颍滨疑而未决也。又示其次，东坡以笔勾去，即拟撰以纳。文定阅其文，益喜。勾去一题，乃无出处，文定欲试之也。次日，文定语老泉曰："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所以二公皆爱文定，而颍滨感之尤深。（《宋人轶事汇编》）

周敦颐

孔颜学风 掾南安，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宋史·周敦颐传》）

曾 巩

十二为伟文 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宋史·曾巩传》）

妙语评安石 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知，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章行义，不

贓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宋史·曾巩传》）

司马光

酷爱《春秋》 先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大指，自是手不释书，不知饥渴寒暑。（《宋史·司马光传》）

不喜释老 先生于物淡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宋史·司马光传》）

王安石

上万言书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嘉佑三年）上万言书。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宋史·王安石传》）

经术务世 拜参政知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宋史·王安石传》）

穿凿《字说》 初，安石训释《诗》、《书》、《礼》，即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宋史·王安石传》）

坡滑之谑 东坡闻荆公《字说》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举坡字问荆公曰：“何义？”荆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亦水之骨乎？”荆公默然。荆公又问曰：“鸠字从九鸟亦有证乎？”东坡曰：“《诗》云：‘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荆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宋人轶事汇编》）

悟道而笑 舒王性酷嗜书，虽寝食，手不释卷。知常州，对客未尝有笑容。一日大会宾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乃共呼优人，厚遗之曰：“汝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可赏也。”有人窃疑公笑不因此，乘间启公，公曰：“畴昔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宋人轶事汇编》）

金版书经名 元丰间，王荆公居半山，好观佛书。每以故金漆版书藏经名，遣人就蒋山寺取之，人因有用金漆版代书帖与朋侪往来者。王荆公一日访蒋山寺元禅师，谓元曰：“坐禅实不亏人。余数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间坐禅间已就。”元大笑。（《宋人轶事汇编》）

王　令

无师自通　年十数岁，昼从群儿嬉，夜独诵书，往往达旦不眠，率以是为常。未尝从师为辞章，即雄伟老成，人见之皆惊，年稍长，倜傥不羁束，周乡里之急，为不义者，面加毁折无所避，人皆畏而服之。（刘发《广陵先生传》，《王令集》附）

苏　轼

少立范滂志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宋史·苏轼传》）

文惊欧公　嘉佑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议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一头地。"闻者始哗而厌，久乃信服。（《宋史·苏轼传》）

何须出处　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以示欧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及揭榜，见东坡姓名，欧公曰："此郎必有所据。"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宋人轶事汇编》）

名慑举子　（东坡）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魏公语客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宋人轶事汇编》）

老兵有鉴识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宋人轶事汇编》）

作文先有意　有问作文之法于东坡，坡曰："譬如城市种种物，欲致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宋人轶事汇编》）

平生快意事　东坡尝谓："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宋人轶事汇编》）

换羊肉书　黄鲁直戏东坡曰："昔右军书为换鹅书，近日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家换羊肉数斤，可名公书为换羊书矣。"公在翰苑，一日宗儒致简相寄，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公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宋人轶事汇编》）

苏　辙

默坐颍滨　崇宁中，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罢祠，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宋史·苏辙传》）

自幼豁达　子由之达，自幼而然。方先君与某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子由观之漠然，不甚经意。（《东坡志林》）

晁补之

东坡阁笔　补之聪敏强记，才能事即善属文，王安国一见奇之。十七岁从父官杭州，萃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作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辨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晁补之传》）

神宗深服　举进士，试开封府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宋史·晁补之传》）

秦　观

屈宋之才　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宋史·秦观传》）

张　耒

受知苏轼　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岁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宋史·张耒传》）

作文以理为主　耒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没，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肴饮食之。诲人作文以理为主（中略），学者以为至言。（《宋史·张耒传》）

黄庭坚

苏轼激赏　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宋史·黄庭坚传》）

熟读《唐史稿》　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归而熟视之，自是文章日进。此无他，见其窜易句字，与初造意不同，而视其用意所起故也。（《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

陆　游

屡遭秦桧黜　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

是为所嫉。(《宋史·陆游传》)

作书巢自处 陆务观作书巢以自处，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未尝不与书俱。每至欲起，书围绕左右，如积槁枝，至不得行。时引客观之，客人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与大笑，遂名书巢。(《宋人轶事汇编》)

杨万里

规警太子 东宫讲官阙，帝(宋高宗)亲擢万里为侍读。宫僚以得端人相贺。他日读《陆宣公奏议》等书，皆随事规警，太子深敬之。(《宋史·杨万里传》)

朱熹

幼年颖悟 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其父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宋史·朱熹传》)

复建白鹿洞书院 隆兴五年，除知南康军，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宋史·朱熹传》)

敬祀诸葛亮 白鹿洞书院有孔明木刻小像，先生尝作卧龙庵，祀孔明于此。意以高宗偏安江左，委靡颓废，不能复仇，故于孔明三致意焉。(《宋人轶事汇编》)

陆九渊

顿悟宇宙之道 生之四岁，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及总角，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谓人曰："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视其间多有不是处。"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然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宋史·陆九渊传》)

我注六经 还乡，学者辐凑，每开讲席，户外屦满，耆老扶杖观听。自号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尝谓学者曰："汝身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悌，本无欠阙，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宋史·陆九渊传》)

讲学白鹿洞 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辨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宋史·陆九渊传》)

辛弃疾

抗俗悼朱熹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

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辛弃疾传》）

谢　翱

泪洒子陵台　宋亡，文天祥被执，翱悲不能禁。严有子陵台，孤绝千尺。时天凉风急，挟酒登之，设天祥主，跪酬号痛，取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其辞曰："魂来兮何极？魂去兮江水黑。比为朱鸟兮，其喙焉食？"歌阕，竹石俱碎，失声大哭，作《西台恸哭》记。（《遗民录》）

王若虚

义不写颂碑　天光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合，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必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瑜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金史·王若虚传》）

元好问

不事举业　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金史·元好问传》）

构亭著史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家，愿为撰述，即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氏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金史·元好问传》）

刘　因

思友古人　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元史·刘因传》）

耿介寡合　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者，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过保定者众，闻因名，往往来谒，因多逊避，不与相见，不知者或以为傲，弗恤也。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语，表所居曰静修。

（《元史·刘因传》）

吴 澄

慈母节膏火 三岁，颖悟日发，教之古诗，随口成诵。五岁，日受长余言，夜读书至旦。母忧其过勤，节膏火，不多与。澄候母寝，燃火复诵习。九岁，与群子弟试分校，每中前列。（《元史·吴澄传》）

草堂先生 初，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钜夫题曰草楼，故学者称之为草堂先生。（《元史·吴澄传》）

宋 濂

名扬中外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近视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明史·宋濂》）

刘 基

愤著《郁离子》 （元末）山寇蜂起，行省复辟基剿捕，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上其功，执政抑之，授总管府判，不与兵事。基遂弃官还青山，著《郁离子》以见志。（《明史·刘基传》）

自命屈强书生 濂之友御史中丞刘基伯温，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强书生自命。一日，侍上于谨身殿，偶以文学之臣为问。伯温对曰："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华夷无间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让。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气烨然。"（宋濂《跋张孟兼文稿后》）

高 启

为文遭祸 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志获谴，帝（明太祖）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明史·高启传》）

方孝孺

乡中小韩子 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明史·方孝孺传》）

拜谒宋濂 洪武丙辰（九年），余官禁林，宁海方生以文为挚，一览辄奇之，馆置左右，与其谈经，历三时乃去。明年丁巳（十年），予蒙恩谢事还浦阳，生复执经来侍。凡理学渊源之流，人文绝续之奇，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肆言之，离析于一丝，而会归于大通。生精敏绝伦，每粗发其端，即能推而至于极，本末兼举，细大弗遗。其于论著，文义森蔚，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辞意濯然常新。细占其进修之功，日有异而月不同，仅越四春秋，英发光著如斯；使后春秋，则其所至，又不知为如何。以

近代言人，欧阳少师、苏长公辈姑置未论，自余诸子与之角逐于文艺之场，不知孰为后而孰为先也。予今为此说，人必疑予之过情，后二十余年，当信其为知言，而称许者非过也。（宋濂《送方生还宁海序》）

受知蜀献王 除汉中教授，日与诸生讲学不倦。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每见，陈说道德。王尊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明史·方孝孺传》）

王守仁

英武豪迈 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既益好言兵，且善射。（《明史·王守仁传》）

创阳明之学 守仁天资异敏，年十七谒上尧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山，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和，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之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明史·王守仁传》）

词气俊爽 先生在郎署，与李空同诸人游，刻意为词章。居夷以后，讲道有得，遂不复措意工拙，然其俊爽之气，往往涌出于行墨之间。荆川之门人，专取其晚年诗，以为极则。（《列朝诗集小传》）

何景明

乡试被围观 八岁能诗古文。弘治十一年举于乡，年方十五，宗藩贵人争遣人负视，所至聚观若堵。十五年第进士，授中书舍人。与李梦阳辈倡诗古文，梦阳最雄骏，景明稍后出，相与颉颃。（《明史·何景明传》）

归有光

精诵朱子文 余始五六岁，即知有紫阳先生（即朱熹），而能读其书。迨长，习进士业，于朱氏之书，颇能精诵之。（归有光《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

八次落榜 嘉靖庚子，举南京第二人，为茶陵张文隐公所知。其后八年上春官不第。读书谈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海内称震川先生，不以名氏。（《列朝诗集小传》）

痛失国士 往张文隐公为考官，榜出而有光落第，见公于邸第。公忽忽不乐，对客曰：“吾为国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为恨。”又谓有光曰：“吾阅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谓人水不濡，人火不热者也。”公再为考官，再见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

不能得子，二君者终必能得子矣。”（归有光《上瞿侍郎书》）

震川别号 余性不喜道人号，尤不喜人以号加己；往往相字，以为尊敬。一日，诸公会聚里中，以为独无称号，不可；因谓之曰震川。余生大江东南，东南之薮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书》谓之震泽，故谓为震川云。其后，人传相呼，便以为余所自号，其实漫应之，不欲受也。（归有光《震川别号记》）

指斥时文 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

世贞赞颂 时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抵排，目为妄庸子，世贞大憾，其后心亦折服有光。（《明史·归有光传》又王世贞《归太仆赞序》云：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

梦趣贾人 熙甫殁，其子宁辑其遗文，妄加改窜。贾人童氏梦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缓涂乙尽矣!"刻既成，贾人为文祭熙甫，具言所梦。（《列朝诗集小传》）

唐顺之

倡唐宋诗文 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剽窃云拢，应德与陈约之辈，一变为初唐，于是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为文始尊秦汉，颇效空同，已而闻王思道之论，洒然大悟，尽改其少作。（《列朝诗集小传》）

茅 坤

批点唐宋文 （坤）为文滔滔莽莽，谓文章之逸气，司马子长之后，千余年而得欧阳子，又五百年而得茅子。疾世之为伪秦汉者，批点唐宋八家之文，曰《八大家文钞》。（《明史·茅坤传》）

推崇唐顺之 顺甫于同时惟推荆川（顺之）一人，胡绩溪尝以徐文长文示之，诡云荆川。顺甫赞叹不已，曰："非荆川不能作。"已而知为文长也，复取视曰："故是名手，惜后半稍弱，不振耳。"（《列朝诗集小传》）

王世贞

独操文柄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义笼盖海内。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诗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明史·王世贞传》）

李 贽

妖幻之人 子庸死，遂至麻城龙潭湖上，闭门下楗，日以读书为事。一

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秃而加巾。卓吾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而喜剖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马御使经纶迎于通州，寻以妖人逮下诏狱。狱词上议，勒还原籍。卓吾曰："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遂夺剃发刀自刭，两日而死。（《列朝诗集小传》）

抨击道学 卓吾多病寡欲，妻庄夫人，生一女，庄殁后，不复近女色。其戒行老禅和尚不复是过也。平生痛恶伪学，每入书院讲堂，峨冠大带，执经请问，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妓舞女，浅酌低唱。"诸生有挟妓女者见之，或破颜微笑："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列朝诗集小传》）

袁宏道

少年为师 年四岁，著新履，舅龚孝廉呼之曰："足下生云"先生即应声曰："头上顶天。"孝廉大骇。八岁，龚太孺人即世，先生不数哭，一哭即痛绝，人以是知其有隐慧焉。总角，工为时文，塾师大奇之。入乡校，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遍游秦中 先生主试秦中，试官以避嫌，不过搜罗，先生曰："岂可以一己之功名，忽多士之进取！"故通场皆阅，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及出榜，多名士，其录为天下第一。先生典试后，与左辖任公可受，密以道相证，遍游秦中诸胜，历中岳嵩山，登华山绝顶而还。所著游记及诗，浑厚蕴藉，极一唱三叹之致，较前诸作，又一格矣。（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

风雅县令 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明史·袁宏道传》）

袁宗道

白苏书斋 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行之日，厌薄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于唐好香山，于宋好眉山，名其斋曰白苏，所以自别于时流也。（《列朝诗集小传》）

袁中道

以豪杰自命 十岁余，著《黄山》、《雪》二赋，五千余言。长而通轻侠，游于酒人，以豪杰自命。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以日进。（《列朝诗集小传》）

欲焚文稿 小修尝自叙《雪珂斋集》，谓其诗文不及古人者有五，欲付之一炬，而名根本忘，不忍弃掷。（《列朝诗集小传》）

徐宏祖

博雅君子 霞客之生平磊落英奇，目空万卷，少应试不得志，即肆志玄览，尽发先世藏书，并鬻未见书，缥缃充栋，叩如探囊，称博雅君子，人能言之矣。（吴国华《圹志铭》）

探奇测幽 霞客尝谓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故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穷上下，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不惮以身命殉。最奇者，晚年流沙一行，登昆仑天柱，参西番法宝，往来鸡足山中。单装徒步，行十万余里，因得探江、河发源、寻三大龙脉。（吴国华《圹志铭》）

西游求实 霞客不喜谶纬术数家言。游踪既遍天下，于星辰经络，地气萦回，咸得其分合渊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纪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

钟　惺

静心研史 惺貌寝，羸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官南都，僦秦淮水阁读史，恒至丙夜，有所见即笔之，名曰《史怀》。（《明史·钟惺传》）

创钟谭体 伯敬少负才藻，有声公车里。擢第后，思别出手眼，另主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同里谭生元春，为之应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所选《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列朝诗集小传》）

张　溥

娄东二张 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书斋曰“七录”，以此也。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崇祯元年以选贡生入都，采方进士，两人名彻都下。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明史·张溥传》）

张　岱

梦绕西湖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一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无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如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因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张岱《西湖梦寻·序》）

夏完淳

江左少年 生有异禀，五岁通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为邑诸生，师事陈忠裕公子龙，公深器之，崇祯甲申，存古年十四，与杜登春等数人，称江左少年。上书缙绅数十家，乞举义勤王，及京师陷落，存古又草檄讨从贼诸臣，时人壮其忠义。（汪端明《三十家诗选》）

钱谦益

力振颓文 谦益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力振之。家富藏书，晚岁绛云楼火，惟一佛像不烬，遂归心释老，著《楞严经蒙钞》。（《清史稿·钱谦益传》）

剪字读书法 钱牧斋极淹贯经史之能，其读书法，每种各有副本。凡遇字句新奇者，即从副本抉出，粘于正本上格，以便寻览，供采撷。盖以正本或宋元精刻，不欲轻用丹黄也。（《清稗类钞·文学》）

傅 山

力抵宋后文 傅青主不喜宋后之文，尝曰："此所谓江南之文也。"于欧阳永叔亦力抵之，尝书集古录后曰："此者真不读书。"（《清稗类钞·文学》）

彭士望

少负壮志 士望少自负，不屑为庸人。年十六，补县学生，与新建欧阳斌元辈相厉为有用之学。甲申变，闻故兵部职方司主事杨廷麟谋起兵，士望为募兵九江。福王称号，有以蜚语中廷麟者并及士望，乃罢。而楚崇阳叶𣏌荐士望以兵部司务宣谕楚，至南都，部司索赂，与同荐六人怒叱之，遂弗用。阁臣史可法督师扬州，招士望，时斌元亦先在，士望到则献奇策请用高左兵夹攻，清君侧之恶，可法骇曰："君年少气锐，果尔得为纯乎？"由是惮二人，二人辞归。（陆麟书《彭先生士望传》）

学归于实用 赣州破，廷麟赴水死，士望遂自废躬耕，间以相地术游江南北，复教授宁化，而为学益力。时江西讲学者，易堂（魏禧）外，在星子者曰髻山，南丰曰程山，士望皆与往复，大抵以阳明念庵之说为宗，而归于实用可试诸行事，尝曰："天下学者之病在于虚于经义，气节旷达，文章延，而至于理学、经济皆病也。"又曰："学者凡病皆可医，惟伪不可医。"欲以此激发后学而造就之，使用于世。（陆麟书《彭先生士望传》）

黄宗羲

浙东三黄 山阴刘宗因倡道蕺山，以忠端（父）遗命从之游，而越中承海门周氏之绪，援儒入释，姚江

之绪几坏。宗羲独约同学六十余人力排其说。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自教之，有“浙东三黄”之目。(《清史稿·黄宗羲传》)

传刻《学案》 书成于丙辰之后，许酉山刻数卷而止，万贞一又刻之未毕，然钞本流传。陈介眉以谨守之学读之，而转手汤潜庵，谓余曰：“《学案》宗旨杂越，苟善读之，未始非一贯也。”壬申七月，某病几革，文字因缘，一切摒除，仇沧柱都中寓书，言北地贾若水者，见《学案》而叹曰：“此明室数百岁之书也，可听之埋没乎?”无何，贾君死，其子醇庵承遗命而刻之。嗟呼！温公《通鉴》成，叹览者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读之终篇，惟王益柔尔。此书何幸，而累为君子所不弃乎！(黄宗羲《明儒学案序》)

侯方域

独倡韩欧之文 明亡不仕，益放意声妓，发愤为诗古文，倡韩欧学于举世不为之日。尝游吴下，将刻集，集中文有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就，人益奇之。(《清稗类钞·文学》)

施闰章

今之元道州 迁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属郡残破多盗，偏历山谷抚循之，人呼眯施佛子。尝作《弹子岭》、《大阬叹》等篇告长史，读者皆曰“今人元道州也。”尤崇奖风教，所至辄葺书院，会讲常数百人。(《清史稿·施闰章传》)

创宣城体 闰章与同邑高咏友善，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清史稿·施闰章传》)

注重文德 尝憾文人之不护细行，为世口实，因取古之文人近道者嘉言懿行集为一书，目曰《文人懿德》。(毛奇龄《翰林院侍讲施君闰章墓表》)

王夫之

怒斥吴三桂 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于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清史稿·王夫之传》)

自为墓铭 (明亡)遂决计老牖下。浪游于浯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间，所至人士慕从者益众，先生辄辞去，最后归隐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名曰观生居，晨夕杜门，萧然自得。自题其墓曰明遗臣王夫之之墓，自铭曰：“抱刘越石之孤衷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余廷灿《王夫之传》)

魏禧

创易堂学 年十一，补县学生。

与兄际瑞、弟礼及南昌彭士望、林时益、同邑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九人为易堂学，皆躬耕自食，切劘读书，“三魏”之名遍海内。禧束身砥行，才学尤高，门前有池，颜其居曰勺庭，学者称勺庭先生。（《清史稿·魏禧传》）

侯魏齐名　其生后方域六岁，然不相识，方域既早殁，而禧名继起，与之相埒，故世或称侯魏。（邵长蘅《魏禧传》）

肆力古文　禧既谢诸生，益肆力为古文辞，授徒穷山，弟子著籍者常数十人。喜读史，尤好左氏传及苏洵。其为人主识议，凌厉雄健，不屑屑模拟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节义事则感慨激昂，摹画淋漓，故其所为《新乐侯刘文炳传》及《姜埰江天一诸侯》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吴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闻有隐逸士，不惮千里造访。（邵长蘅《魏禧传》）

当为古人子孙　吾辈生古人之后，当为古人子孙，不可为古人奴婢，盖为子孙，则有得于古人真血脉，为奴婢则依傍古人作活耳。（魏禧《日录论文》）

洗刷古人病处　唐宋八大家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灵怪；子厚如幽岩怪壑，鸟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远，春谷倩丽，园亭林沼，悉可图画，其奏札朴健刻切，终带本色之妙；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发令，虽无理事，谁敢不承；东坡如长江大河，时或疏为清渠，潴为池沼；子由如晴丝袅空，其雄伟者，如天半风雨，袅娜而下；介甫如断岸千尺，又如高士溪刻，不近人情，子固如陂泽春涨，虽滤漫而深厚有气力，说苑等叙，乃特紧严。然诸家亦各有病，学古人者，知得古人病处，极力洗刷，方能步趋，否则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丑图也。（魏禧《日录论文》）

汪　琬

思起文衰　先生以孤童自奋读书，一目能五行俱下，三遍不忘。研古纂辞，一抉绝今文陋迹，尝慨然念前明隆万以后古文道丧，沿溯宋元以上，唐柳欧苏迄明之唐应德、王道思、归熙甫诸家，盖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夹杂不淳者，卓然思起百数十年文运之衰，此先生之志也。（陈廷敬《翰林编修汪先生琬墓志铭》）

帝赐一轴书　初，圣祖尝问廷敬，今世谁能为古文者，廷敬举琬以对。及琬病归，圣祖南巡驻无锡，谕巡抚汤斌曰：“汪琬久在翰林，有文誉。今闻其居乡甚清正，特赐御书一轴。”当时荣之。（《清史稿·汪琬传》）

蒲松龄

文雄一时　（松龄）以文章意气雄一时，学者无问亲疏远迩，识与不识，盖无不知有柳泉先生者，由是先生名满天下。先生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之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然如棘闱辄见斥，

然曰："其命也夫！"用是决然舍去，而一肆力于古文，奋发砥淬，与日俱新。其文章颖发苕竖，诡恢魁垒，绝去町畦，自成一家。（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久困科场 惨淡经营，冀博一第，而终困于场屋。至五十余尚希进取。夫人止之曰："君勿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自是灰心场屋，而甄陶一世之意，始托意于著述焉。（蒲箬泣《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

结郢中诗社 先生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始终一节，无少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姜宸英

海内三布衣 宸英积学工文辞，闳博雅健，屡踬于有司，而名达禁中。圣祖目宸英及朱彝尊、严绳孙为海内三布衣。（《清史稿·姜宸英传》）

推崇《战国策》 少工诗古文词，其论文以为周秦之际莫衰于《左传》而盛于《战国策》，闻者骇，莫之信也。及见其所作，洋洋洒洒，随意出之，无不合于律度，始皆心折。宁都魏叔子（禧）谓侯朝宗（方域）肆而不醇、汪苕文（琬）醇而不肆，惟先生兼乎醇肆之间。（全祖望《翰林编修姜先生宸英墓表》）

名动京师 一日，（帝）谓侍臣曰："闻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又尝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当今作者。"于是京师之人来求文者，户外恒满。（全祖望《翰林编修姜先生宸英墓表》）

连蹇科场 先生入闱，同考官无不急欲得先生者，顾俛得俛失，而先生亦疏纵，累以醉后违科场格，致斥。又尝于谢表中用义山点窜尧典舜典二典语，受卷官见而问曰："是语甚粗，有出处乎？"先生曰："义山诗，未读耶？"受卷官怒，高阁其卷，不复发誊，顾先生所以连蹇。（全祖望《翰林编修姜先生宸英墓表》）

朱彝尊

弃诗学文 祯贞十三年，浙东西大旱，饥人相食。先生家无储粟，贫至绝食，而先生自守书册自若也。既而曰："河北贼盗，朝中党朋，乱既成矣，何以诗文？不如舍之学古。"乃肆力于《周官》、《春秋左氏传》、《楚辞》、《文选》。《丹元子步天歌》，从皆以为狂迂，未几，乱果作。（陈廷敬《朱公彝尊墓志铭》）

经史随游 君年十七岁，赘婚嘉兴练浦之阳冯村，冯公有客王廌桀，华亭名士也，见君，大奇之，曰："此必以诗名世。"公名益高，四方以币聘者争集其门，所至皆以师宾之礼遇焉。客游南北，必以十三经、廿一史以随。（陈廷敬《朱公彝尊墓志铭》）

兼得众长 当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

众长。(及归)圣祖南巡，迎驾无锡，御书“研经博物”额赐之。(《清史稿·朱彝尊传》)

朱王齐名 彝尊学富才高，初宗王孟，其后风骨愈壮，明丽博雅，遂与王士祯并名，时人称为朱贪多、王爱好。(《清稗类钞·文学》)

宋 荦

清静无为之治 (公为江苏巡抚)，时承平日久，虽征赋殷繁而法令画一，公遂以清静无为治之，岁丰人和，狱盗衰息，暇日搜访古迹，延接俊流，杯觞笔砚，相与啸吟于湖山之间，其他细务，一委有司，循旧章而已。在职十四年，每逢车驾南幸，送迎占对，辄蒙嘉奖，上至亲解所御衣冠赐之，屡次乞身，以公安静平和得大臣体，优诏不许。(汤右曾《吏部尚书宋公荦墓志铭》)

奖掖文士 (少)侍父家居，才人贾静子、侯朝宗辈结为应社，公与讲画辞章，讨论今古，故公一生好尚风雅，虽出天性，而根株派别，盖有所自。(抚苏日)东南名士从之游，所奖成者率皆发闻当时。(汤右曾《吏部尚书宋公荦墓志铭》)

郑 燮

郑虔三绝 先生为人，疏宕洒脱，天性独挚。工画兰竹，兰叶用焦墨挥毫，以草书之中竖长撇法运之；画竹神似坡公，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书有别致，以隶行之体相参，圆润古秀，楷书尤精，惟不多作。诗近香山放翁，吊古诸篇，激昂慷慨，词亦不肯作熟语，时有“郑虔三绝”之目。(《清代学者像传》)

邵长蘅

文须自立根柢 山人束发能诗，弱冠又以古文雄一时。时既谢举业，则尽弃少作，益沉酣三史唐宋大家，又潜心经学，凡六七年，涣然有得，而后山人之文乃大昌。常曰：“文章须十数年苦攻，自立根柢，不则沾沾抚秦汉，抚八家，要是华叶耳，奚其传。”(陈玉璂《邵山人长蘅传》)

名动京师 囊其所著北游燕，一日名动京师，(施闰章、王士祯辈)皆折辈行，与定交，若恐失之。与陈维崧、朱彝尊、姜宸英、梅庚相友善，一时知名。山人性朴直，意所不可，不能为唯阿，诸公持诗就正，辄膻点窜，无所徇，亦不能以名刺先贵显人，诸公乃更以是多山人。(陈玉璂《邵山人长蘅传》)

方 苞

贫中厉学 家贫，冬无复襦，屦穿，行雪中，两指恒见迹，益厉学。弱冠，游京师，安溪李文贞正见其文，曰：“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雷鋐《方望溪先生行状》)

终身未作诗 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侍郎少时尝作诗以示海宁

奁侍郎慎行，侍郎曰："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方侍郎从之，终身未尝作诗。(姚鼐《刘海峰先生传》)

刘大櫆

今世之韩欧 年二十余，入京师，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见海峰，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自是天下皆闻海峰。"(姚鼐《刘海峰先生传》)

彭端淑

兄弟齐名 生而颖异，十岁能文，与弟肇洙、遵泗读书紫云山下，相为师友，如是者六七年。官京师时，与弟俱知名，时有三彭之目。(《清代七百名人传》)

全祖望

文惊试官 十六能为古文，讨论经史，证明掌故。补诸生。雍正七年，督学王兰生选以充贡，入京师，旋举顺天乡试，户部侍郎李绂见其文，曰："此深宁(黄震)东发(王应麟)后一人也!"(《清史稿·全祖望传》)

袁 枚

少年得志 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鉷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清史稿·袁枚传》)

作歌颂政德 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枚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清史稿·袁枚传》)

优游随园 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卜居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门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名流造请无虚日，诙谐佚荡，人人意满。(《清史稿·袁枚传》)

蒋士铨

断竹为笔 家故贫，四岁，母钟氏授书，断竹篾为点画，攒簇成字教之，既长，工为文。(《清史稿·蒋士铨传》)

江南名士 成进士，文名籍甚。裘日修、彭元瑞并荐其才，旋乞病归。帝(乾隆)从元瑞询之，元瑞以士铨母老对，帝赐元瑞诗，有"江南两名士"之句。(《清史稿·蒋士铨传》)

姚 鼐

学品兼备 鼐清约寡欲，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欢，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学品兼备，推鼐无异词。(《清史稿·姚鼐传》)

汪　中

鬻书市肆　生七岁而孤，家贫不能就外傅。母邹，授以《四子书》。稍长，助书贾鬻书于市，因遍读经史百家，过目成诵，遂为通人。乾隆二十四年拔贡生，提学使者谢墉尝曰："余之先容甫（汪中字），爵也，若以学，当北面事之。"（《清史稿·汪中传》）

难得吾骂　以经义自娱当时，于王昶、姚鼐、蒋士铨、王鸣盛辈为后进，皆辨难无所让。别自书当代名人姓名，品铺高下，人愈疾之，以为中善骂人。中曰："吾乡多贾人，不知学短长，日见谀者，众遭骂，乃疑为俊士。且吾不骂庸俗人也，得吾骂亦大难。"（孙星衍《汪中传》）

钱大昕

不喜佛典　大昕始以文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经、史，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民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氏书，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惟不喜二氏书，尝曰："立德立功立言者，吾儒之不朽也。先儒言释氏近于墨，予以为释氏亦终于杨氏为己而已。彼弃父母而学道，是视己重于父母也。"（《清史稿·钱大昕传》）

龚自珍

豪放不羁　巩祚（自珍）年十二岁，玉裁授以《说文》部目。巩祚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而说经必原本字训，由始教也。（《清史稿·龚自珍传》）

文字骜杰　官中书时，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凡五千言。后复上书论礼部四司政体沿革者，亦三千言。其文字骜杰，出入于诸子百家，自成学派。（《清史稿·龚自珍传》）

名篇精要

先　　秦

《有无相生》　本篇为《老子》的第二章。《老子》一书相传是春秋时代老聃所作，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著作，后又称《道德经》。《老子》是一部哲理散文，从哲学角度说，它的主要特点在于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它已经超出了用具体的某一种元素说明世界的困难，开始建立起“道”这一最高哲学范畴及其它一系列范畴、概念，试图为世界的生成、变化寻找总根源；从文学角度说，《老子》一书的主要特色在于运用极易体察的生活经验、通俗的语言说明深刻的道理。本篇是阐述关于世界的变化思想，揭示世间万物都是相互依存，而不是静止孤立的。文中从美丑、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进退各个方面，反复说明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的观念，词约义丰，含意深刻。而从行文中看，绝不类于官方的典籍训诰，而有意采取民间谣谚的形式，形成一种浓缩、凝炼的格言体。就格言体这一具体形式来说，本篇中运用自若，长短互参，错落有致。如开篇一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系长句，下面一系列“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均为四言短句，句中已初步发挥了汉字的特点，做到了大体上对偶，句未押韵。这种有韵而对仗的格言体，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后来的《法言》、《兔园策》、《三字经》、《菜根谈》、《增广贤文》等，都采用了《老子》这种格言体形式。

《小国寡民》　本篇为《老子》一书中的第八十章，在这一章中，老子对他理想中的社会生活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这个社会的特点是，国家小，人民少，人们珍视自己的生命而不愿冒险远徙，虽有功效十倍百倍的工具器物却弃之不用，人们以自己吃的食物为香，以自己穿的衣服为美，习惯于自己安适的生活，虽然国与国之间隔得很近，鸡鸣犬吠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但人们一直到老死也不互相来往。一般认为，老子的这种理想是

要倒退到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去，是老子反对社会进步的观念的反映，是反动的。现在看来，老子在人类文明之始，就洞察到文化进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以重视人的内心生活的主张反对技术异化，也有其深刻的一面。本篇文字在一般性概述之外，也有“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富有形象性的句子，显得很生动。另外，象“甘其食，美其服”的句式中，把形容词作动词（意动动词）用，也很新颖别致。

《乘桴浮于海》 本篇出自《论语·公冶长》。《论语》是孔子的言论集。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将直接或间接听到的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记录下来作为讲学材料。这些记录者以敬仰、思慕、感念的心情，回忆笔录老师对自己或别人的教诲，不仅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而且逼真地记述了孔子说话时的表情和口气，这就使得《论语》一书不仅是一部学术性语录，而且是一部具有文学意义的著作。因为在《论语》中，不仅记述了孔子的思想，而且生动地表现了孔子的性格，孔子作为一个有性情、有血有肉的人，在《论语》中被表现得很丰满。孔子并不是后世儒家所描绘的一天到晚总板着面孔、动不动就要训人的“圣人”，他有自己的性情，有时也爱发几句牢骚，也爱开玩笑，甚至生气骂人。本篇所记录的，就是孔子对弟子子路发牢骚的一个场面。孔子为了推行他那一套主张，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列国之间，但始终不被采用，这时的孔子不免有些丧气，故而发牢骚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适逢子路在旁，于是又顺势说了一句：“从我者，其由与？”孔子的前一句是道出心事的真心话，后一句其实是无关痛痒的话，但天真、鲁莽得可爱的子路，对孔子的后一句话却格外认真，以为老师真的看重自己，马上喜形于色，做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孔子看了未免好笑，于是用一种表面严肃实则是玩笑的口气说：“仲由你这个人真是太勇敢了，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可是，我们到那里去找造筏的材料呢。”孔子虽是开玩笑，但依然是心事重重，因而在玩笑中也泄露出他的忧虑。这句话里的“材”，可以解作“材料”，也可以假借为“凭借”之意，浮海无所凭借，实则寓言含着“道不行也因无所凭借”的意思。本篇记录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仅仅两段，但却简约传神，意味隽永，使人想见孔子的思想深沉，忧患重重而又有几分幽默，而这，又以子路的思想流于表层和直率鲁莽衬托得更加鲜明。

《贤哉，回也》 本篇出自《论语·雍也》。这是记录孔子一段称赞他的学生颜渊有修养的话，短短几句话，总共只有二十多字，却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表现出孔子说话的艺术。原文全文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本为称述颜渊的修养，但正面描述颜渊的仅“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九个字，下面偏偏又要扯上别人，来了句“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似乎是闲扯，但这样一对比衬托，却使颜渊的生活、

性格更加鲜明。在短短二十多字的一段话中，又不避反复，“贤哉，回也!”的感叹前后出现了两次，读起来有一种一唱三叹的味道。若要按简洁行文的要求，这些衬托和感叹似乎都是废话，统统都要删掉，但这样一删，本篇中的文学味道必然尽失。由此看来，《论语》的记录者也是很懂得说话艺术、有很深的文学修养的，故而能很传神的记录下孔子这段精采、生动的话。

《师生言志》 本篇出自《论语·先进》。篇中记述孔子与其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谈论各自的志向。篇中通过说话的语气、神态充分显示出各人的性格，各人的性格又互相对比映衬，益发使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分外鲜明。就篇中参与谈话的人物来说，基本可分为两组。一组是希望从政入世者，如子路、冉有、公西华，他们各具各的风貌，子路直率而颇为自负，冉有谨慎，公西华善于辞令。与他们相对的是曾皙，篇中对这个人物的刻划很成功。当孔子的其它弟子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却很闲散自在地弹着琴，当孔子问到他时，他才“舍瑟而作”，说出他的“异乎三子者之撰”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舞乎风雩，咏而归。”更具体地展示出曾皙闲云野鹤般的性格。而出人意料的是孔夫子竟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我赞同曾皙的主张啊!）也使人看到了孔夫子绝不是个古板的人，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重视情感生活的人。篇末又叙孔子对弟子的评论，显示出孔子对弟子的了解和观察人的高超能力。本篇在《论语》中是较长的一篇，记述的内容丰富，头绪又多，但记叙者把握住了笔下人物的特点，着墨不多就将各人的特点表现得鲜明突出，具有可读性和耐读性。（刘传新）

《晋公子重耳之亡》 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此书实成于战国初期。该文分别属于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却以回顾的笔触集中叙写了晋公子重耳在外漂泊十九年的坎坷经历及回国为君后事迹，在《左传》中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曲折、完整、富于故事性的长篇叙写散文。十九年岁月漫长，历事繁多，作者在记述中极善于选择那些典型、生动的事件和细节着力描写，如其中写重耳奔狄、取季隗，与之戏言而别；过卫，乞食于五鹿；及齐，安之，姜与子犯谋而醉遣；在曹，曹共公闻其骈胁，观其裸体；还有回国后寺人披告密、竖头须请见、介之推亡隐等等，无不富于戏剧性。文章在叙事过程中展示了一系列颇具特点的历史人物，其中尤以重耳的形象最为成功，全文清楚地展示了重耳由一个任性的贵公子历经坎坷成长为一位有胆有识、善克制、能下士的成熟君王的性格发展过程。文章可读性强，虽为历史散文，实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晋楚城濮之战》 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该书实完成于战国初期，该文具体记述了楚联合陈、蔡、郑、许围宋，宋向晋告急，晋联合秦、齐

与楚在城濮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争霸战争。作者记述战争，重心并不在军事行动本身，而更多地着眼于政治、策略、条件等问题，因而以大量篇幅写了晋楚交战前的酝酿发展过程，楚令尹子玉“刚而无礼”，楚国君臣意见不一；晋国则注意有效利用各国间的矛盾，并争取道义上的主动权，且晋文公善以“义”“信”“礼”教其民，这一切便预示着晋胜楚败的必然结局。此次战争头绪繁多，事件复杂，作者却以十分简洁之笔清楚地交待了战争始末，其中还不乏具体而富于细节的描述，显示了作者驾驭材料的能力；文章在叙述中还写了一些有个性特点的历史人物，其中楚令尹子玉的易怒、轻狂、刚愎自用，晋文公的多虑、沉稳、善于听取下级意见，在鲜明对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能给人以深刻印象。

《烛之武退秦师》 见《左传·僖公三十年》，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该书实完成于战国初期。该文记述的是烛之武凭一段说辞使秦退兵的故事。晋秦围郑，郑国危在旦夕，烛之武奉命出见秦君，抓住秦、郑间晋在其中的地理条件，以秦“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晋东封郑，必将西封而阙秦”的道理，说服秦君不再助晋，与郑盟而还。文中记述人物对话十分精采，突出表现了一种行人辞令之美。烛之武只身入秦师，沉着冷静，巧妙地申之以利害，言语不多，适可而止，却句句沉重，余音未尽，说得秦君心服口服，表现出高超的讲话艺术。

《蹇叔哭师》 见《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此书实完成于战国初期。该文具体记述了秦晋殽之战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蹇叔哭师始，以秦穆公谢罪终，是一篇完整、曲折的叙事散文。穆公不顾蹇叔力劝，使孟明等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师，曰“将见其出而不见其入”，其子与师，蹇叔又哭而送之，预言晋必于殽击师，结果秦因郑有备不战而还，晋于殽截击之，秦师败绩。穆公素服效次向师而哭，承认自己有违蹇叔酿成大过。这里蹇叔作为一位老臣的深谋远虑，以及以哭师劝阻的耿耿忠心，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随文叙写的王孙满观秦师、郑弦高犒师、皇武子辞秦客、晋先轸“不顾而唾”等，也都是一些生动的细节，较富于文学色彩。

《城者嘲华元》 见《左传·宣公二年》，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此书实完成于战国初期。该文记述的是宋大夫华元率师御郑、败绩被俘、逃归后被筑城者嘲笑的故事，其中华元与筑城者间对话的场面写得尤为生动逼真。华元巡视工地，筑城者指桑骂槐：“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华元勉强解嘲，所谓“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筑城者却不相让，反问道：“纵其有皮，丹漆若何！”元哑口无言，悻悻而去。这段对话形象风趣，筑城者作为下层劳动人民鲜明的爱憎感情、应对的智慧机敏以及语言的丰富犀利，在此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所唱歌谣，充分显示了民歌喜笑怒骂的风格特征。正是这种栩栩如生的细节描写，使文章极富于艺术兴味。

《晋灵公不君》 见《左传·宣公二年》，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此书实完成于战国初期。该文具体描述了晋灵公与赵盾间尖锐的矛盾冲突。晋灵公失为君之道，赵盾屡屡进谏，灵公深以为患，派人刺杀之，不成，又欲设酒宴伏而击之，赵盾在士兵帮助下逃生，后灵公被赵盾同族所杀。这一段记述文字的主要特点是善于抓住典型事件细腻描述，展示了一幅幅具体的场面。其中写晋灵公‘台上弹人，观其避丸”、“杀宰夫而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其凶残无礼令人发指；钮麑行刺，见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感叹其不忘恭敬，不忍下手，为全忠信，自己“触槐而死”，其情景感人至深；而提弥明搏獒、翳桑饿人倒戟御公徒的场面更是紧张激烈，扣人心弦。这都使文章极富于戏剧性，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晋侯梦大厉》 见《左传·成公十年》，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此书实完成于战国初期。该文生动记述了晋景公梦遇大鬼病入膏肓乃至陷厕身亡的故事，其叙述描写极其细腻，如写梦中大鬼：“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门及寝门而人”；写梦中疾为二竖子的有趣的对话：“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梦境被描述得极其逼真。该文故事情节曲折有致，首尾一贯，始写晋侯梦大厉，桑田巫曰“将不食新麦”；转而写晋侯病入膏肓；之后便是进入六月，甸人献新麦，馈人烹调毕，晋侯召桑田巫示而杀之；然而，晋侯将食，“张，如厕，陷而卒”，正呼应了开始所谓“不食新”之语。文章读来趣味性强，几乎堪称小说之作。

《曹刿论战》 见《左传·庄公十年》，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此书实完成于战国初期。该文乃《左传》记述战争的名篇之一，写的是历史上鲁于长勺以弱军战胜来犯的强齐的著名战事，全文紧紧围绕着展示战胜敌人的条件、方针、策略这一主旨，以曹刿的活动为主线，大刀阔斧地略去战争的其他内容。集中写曹刿关于战争的见识和谋略。战前写曹刿关于“何以战”的见识，即执政者不但要“衣食所安弗敢专”、“牺牲玉帛弗敢加”，还必须“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体现了曹刿鲜明的民本思想；战争中写曹刿的沉着、智谋，齐人三鼓，方曰“可攻”，下视车辙，方曰“可追”。战争后又写曹刿对战略战术的总结，文章剪材精当，旨归明确，层次清楚，结构严谨，堪称记叙文的典范之作。

《召公谏弭谤》 见《国语·周语上》，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此书实完成于战国初期。周厉王暴虐，国人谤王，厉王乃以杀戮弭谤，召公进谏劝阻，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后“乃流王于彘”。该文即记述了此事的经过。作为以记言为主的历史散文，其中最精采之处在于召公进谏之语。召公以恰切生动的比喻，阐明了以武力弭谤的危害，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进而又以对仗排比句式，渲染民言之可贵，所谓“民之有口，犹

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议论形象、具体、有气势、有说服力，实开纵横家畅所欲言之先河。

《勾践灭吴》 见《国语·越语上》，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此书实完成于战国初期。该文以简洁之笔具体叙写了公元前494年越王句践被吴王夫差战败后先是用大夫种之谋向吴求和、保全国土未遭灭亡，之后又动员举国上下军民一心、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发展生产、壮大民力，终于于前473年灭掉吴国的历史故事。二十几年励精图治，历时漫长，材料浩繁、文章注意把具体描写与概括叙述结合起来，既展示了事件的全过程与总面貌，又有不少具体的对话描写，避免了给人以笼统之感。象句践栖于会稽之上号令三军时与大夫种的一段对话，痛快淋漓，君臣合拍执手相谋的情景可想而知；而写句践安抚民心争取民力，则以排比句式概而言之，所谓“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该文对越王句践故事的集中记述，使之得以广泛流传，后代有关的杂史、戏剧、小说时出，应该说得力于此篇的重要影响。

《叔向贺贫》 见《国语·晋语八》，相传为春秋末左丘明撰，此书实完成于战国初期。这篇短文记述的是叔向贺贫的一段佚事。叔向见韩宣子，韩宣子忧贫，叔向贺之，韩宣子未知何故，叔向趁机大讲特讲了贫而有德与富而无德的优劣短长，使韩宣子颇有“将亡，赖子存之”之感。以贺贫方式提倡廉洁修德，批评奢侈贪欲，既见出其为人之正直，又可见其机敏幽默，这确是一个极有特点的人物形象；而贺贫的一段说辞，直接以晋先大夫贫富不同、福祸有别的生动事例为喻，也极发人深省，有说服力。该文深刻、生动、饶有兴味，是一篇值得品味的小品文。

《孔子复醢》 见《礼记·檀弓上》，战国孔子后学撰。该文以简洁传神之笔记述了孔子痛悼弟子子路的佚事。子路死于卫，孔夫子以哭师之礼哭于子路寝中庭，遇前来吊唁者，又以主人身份施拜谢礼，见自卫而来者，则关切地探问子路死时的情景，当知道子路死于最残酷的醢刑即被剁成肉酱后，“遂命复醢”，不忍食用肉酱，令人倒掉了。这篇短文寥寥数语，记述却准确、清晰，有余味，看似平淡、沉静，内里却深蕴情感，以夫子的身份，哭弟子如哭师，已经见出其感情的深厚，一句“遂命复醢”，更见出其痛心疾首之状态。孔夫子感情丰富、富于人情味的特点于此可见一斑。

《曾子易箦》 见《礼记·檀弓下》，战国孔子后学撰。该文具体描述了孔子弟子曾参死前的一段佚事。曾子病重，子及弟子守候在旁，举烛童子忽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意谓曾子之垫乃大夫所当用，旁人欲止之，曾子闻声瞿然警觉，童子又重复了一遍，曾子会意，不顾劝阻，使人举扶易箦，反席未安而殁。文章笔墨简洁而细腻，“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三言

两语，即写出了深夜里病榻前肃穆的情景和气氛；童子的声音，打破了沉静，也透出几分稚气；曾子“瞿然曰：呼”，一病重之人昏沉中忽然警觉的神态被描画得活灵活现。这里曾子临殁不忘守身的精神，其子及弟子的谨慎、童子的纯真不假，都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苛政猛于虎》 见《礼记·檀弓下》，战国孔子后学撰。该文生动记述了孔子路遇墓前哭妇有感而发的情景。妇人公爹死于虎，其夫死于虎，其子又死于虎，当孔子询问为何不放弃捕虎时，妇人答以“无苛政”。于是孔子感慨万千，要随从弟子们“识之，苛政猛于虎”。孔子一贯主张“仁者爱人”，反对粗暴残忍，这里即表现出对下层人民的某些同情，“苛政猛于虎”的概括也尖锐批评了统治者的残暴。该文篇幅短小，却有细腻传神之笔。路过泰山，有妇人哭声，“夫子式而听之”，可以想见其关切、同情的神态；妇人答毕。孔子立即道：“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对苛政深恶痛绝的情状和语气也十分明显。同时，夫子以师长身份抓住时机现身说法的特点在此也有形象的表现。

《非攻》 见《墨子》。《墨子》一书主要记述墨子的思想、活动及其同弟子的问答，其中大部分是墨子徒属记录写成，约成书于战国前期，该文集中反映了墨子反对兼并战争的政治主张。文章先以窃人桃李、攘人鸡犬、取人马牛、杀不辜人等罪过步步加重为喻，指责攻国乃“大为不义”却“弗知非，从而誉之”，可谓不明是非。接着又以杀一人、杀十人、杀百人其死罪步步加重为比，进一步指责“攻国”的罪恶。最后文章以“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的荒唐滑稽总结上文，指出赞誉攻国乃不知“义与不义之辩”。全文多用比喻，通俗晓畅；且喜用层次递进，由浅入深，步步近题；文章语句整齐，善用排比，不避重复，内含一种回还往复之势。通篇质朴无华，平实浅近，自具特色。

《齐桓晋文之事章》 见《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主要记述孟子言行，乃孟子及弟子共同编成，成书于战国中期。该文记述了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次谈话，集中阐述了孟子的“仁政”主张。齐宣王问齐桓晋文霸业之事，孟子推说不知，却趁机引出关于王道的话题。先言王有“不忍之心”可以保民而王，未王天下乃不为非不能；进而指出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乃以小敌大后必有灾，“发政施仁”方无敌天下；最后正面阐述予民恒产、安民王天下的政治主张。文章记述人物对话语气十分逼真，孟子善于引导话题、揣忖人心、自负好辩、口若悬河的特点得到充分展露；其中论说随文设喻，明白晓畅，以“挟泰山以超北海”喻难能，以“为长者折枝”喻易为，以“缘木求鱼”喻不得，以“邹不胜楚”喻不成等等，皆谈话间信手拈来，既有助于语义表达，且增加了行文的生动活泼。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见《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主要记述孟子言行，乃孟子及弟子共同编撰，成书于战国中期。本文通过孟子

与托言神农的农家学派的论辩，突出强调了社会分工的必要和人君的重要作用，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陈良之徒陈相见之大悦，尽弃己学而师之，且对孟子称道许行之言，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孟子不动声色，步步发问，使陈相自己说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及时抓住对方自相矛盾之处，以“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发端，迅速转入正题，正面阐述他所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的社会分工的观点，以尧、舜、后稷等治天下为例，论证其“不得耕”“不暇耕”“不用于耕”其作用却远大于“躬耕”的道理。本文集中表现了孟子散文好辩善辩的特色，首先便是“善设机巧，引人入彀”，抓住对方弱点，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提出一些似乎不相干的问题，所谓“必种粟而后食乎？”“必织布而后衣乎？”话题渐引到社会分工，要害抓得准，反击自然有力。而大量引征事实，论证滔滔不绝，也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方。

《逍遥游》 见《庄子·内篇》，战国庄周撰。文章以鲲鹏高翔却要有所待、蜩与鸴鸠讥笑大鹏却不自知也要有所待为喻，指出即使“于世未数数然”的宋荣子、御风而行的列御寇都不能摆脱任何条件的制约，只有那“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表现出作者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因此他的结论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只有物我两忘，弃圣绝智，才能实现真正的逍遥游。本文在艺术上堪称奇篇，首先寓说理于奇幻的形象，无论鲲鹏的变化、腾云驾雾的气势，还是蜩与鸴鸠讥笑大鹏的情态，乃至藐姑射山神人的冰清玉洁，都极富于想象力、创造力；其中写鲲鹏之大，写上古大椿之长，又极尽夸张之能事，这都使文章具有惊警动人的奇特效果。该文构篇也别具一格，忽而大鹏，忽而小鸟，忽而朝菌蟪蛄，整篇内容象是信手拈来，漫无边际，起伏迭宕，实则层层设喻，一步步逼近结论，文章大开大阖，时放时收，表现出驾驭文字的大手笔风度。

《梦蝶》 节录于《庄子·内篇·齐物论》，战国庄周撰。《齐物论》，集中阐述万物齐一的哲学观点，“梦蝶”是作者描绘的一种与物俱化的至境。庄周梦中化蝶，欣然自得，仿佛真的是蝶，不知自己本是庄周，一觉醒来，惊惧地发现自己原来是庄周，于是自己也糊涂了，不知庄周梦中化蝶，还是蝴蝶梦中化周。这里作者精于选材，巧于构思，以梦为媒介，把蝴蝶与庄周的幻化写得既具体可感又朦胧隐晦，写出了一种物我两忘的奇妙境界。庄周梦中化蝶是实，蝶梦中变周则是虚，是奇特的想象，这是虚虚实实，虚实相生，引人入胜。至于其中的具体描述，以“栩栩然”写蝴蝶欢乐飞舞的状态，“蘧蘧然”，写醒后庄周惊惧的样子，也都给人以真切、生动的感受。

《庖丁解牛》 节录于《庄子·内篇·养生主》，战国庄周撰。作者以主观精神上齐万物、一死生、超越一切的态度，在现实中蔑视世俗原则，游戏人生，“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

儿"，主张逃避矛盾，在是非空隙中苟全性命，该文即是作者借以阐发这种处世哲学的第一则寓言故事。庖丁善解牛，文惠君问其技，庖丁回答其奥妙在于"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掌握牛骨节间的空隙，"以无厚入有间"，自然"游刃有余"，于是文惠君"得养生焉"。故事本意是谈养生，寓言形象却说明掌握事物内在规律的必要。该文描写至为细腻传神，写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其动作的熟练、声音的动听，体态的潇洒，如在目前，而其解牛到谨慎处，"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而微，"令人屏息静气，一朝完毕，那"提刀而立"踌躇满志之态又神气活现，作者的描写绘声绘色，穷形尽相，曲尽其妙，确给人以美的享受。

《望洋兴叹》 节录于《庄子·外篇·秋水》，战国庄子后学撰。《秋水》乃庄子学派阐述无为思想的论文，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是其中的一则寓言故事，该文即生动描写了河伯初见北海若惊讶感叹的情景。秋季河水暴涨，河伯自以为大，志高意满，顺流东下，目睹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才自知弗如，"望洋向若而叹"，深感自己之可笑。河伯、海神本是想象之物，但在作者笔下，不但有语言，有思想，有动作，而且表情丰富，语气逼真，或喜或叹，极富生活气息，实为小说前奏；该文写景也极有特色，"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寥寥几语，即写出秋水之浩汜，确为写景之佳句。

《濠上之辩》 节录于《庄子·外篇·秋水》，战国庄子后学撰。该文生动记述了庄周与惠施一段有趣的对话。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水桥上，庄子见水中游鱼，忽发感慨，言鱼儿从容自在，自是他们的欢乐，惠子以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有意抬杠，二人争论不休，最后庄子以惠子非己可推测自己，自己非鱼正也可推测鱼作结，二人谁是谁非本不必细究，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饶有兴味的描绘。庄子与惠子本是一对爱抬杠的挚友，惠子去世，庄子有失去对手、再无知音之叹，这里正形象表现了他们在一起那种亲密无间、斗嘴顶牛、爱钻牛角尖的气氛和情景，其人物对话描写得尤为成功，人物口语的真切、语气的逼真，都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

《儒以诗礼发冢》 节录于《庄子·杂篇·外物》，战国庄子后学撰。该文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两位儒生以诗礼盗掘古坟的故事。天将放亮，盗坟未毕，大儒催问，小儒见死者口中有珠，不忍离去，便吟诗以证，所谓"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二人小心别开死者下巴，要"无伤口中珠"！这是一幕令人喷饭的喜剧小品，把礼乐与盗行相连的本身，已经蕴含着对虚伪礼教辛辣的嘲讽；其中对两位儒生以文质彬彬之态行野蛮粗鲁之事的滑稽可笑的举动的描写，更是富于喜剧效果；尤其是写他们为得到死者口中珠那种小心翼翼的丑态，所谓"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细致入微，维妙维肖，更增加了小品的讽刺的意味。

《劝学》 节录于《荀子·劝学》，

战国荀子撰。该文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后天加强学习、修养的必要性以及应持的用心专一、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文章在论述中运用了一连串比喻，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喻后学居上；"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喻环境易人，比比皆是，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形象生动性。该文语言形式也极富特色，通篇使用对仗、排比，语句十分整齐有力，象"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强自取柱，柔自取束"，对仗已十分工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排比也极有气势。总之，这是一篇规整而充满形象的议论散文。

《邹忌讽齐威王纳谏》 见《战国策·齐策》，约作于战国后期，作者不详。该文生动记述了邹忌以巧妙方法讽谏齐威王的故事。邹忌貌美，但自感弗如城北徐公，其妻、妾、客却异口同声，皆言邹忌要美于城北徐公，邹忌从中悟出彼"私我""畏我""有求于我"，便虚言相瞒的道理，于是入见威王，由身边琐事言及朝廷内外，"私王""畏王""有求于王"者正不知有多少，"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毋须多言，齐王已有四面被围之感必须广开言路、屏弃偏见，正确纳谏的道理自在其中，该文文笔优美，描述具体，其中写邹忌视镜自审的情状、与其妻、妾、客的对话，极富于生活气息，给人以亲切之感。以一进谏文字，却被如此生活化、情感化，正是此文特点所在。（廖 群）

《冯谖客孟尝君》 选自《战国策·齐策》，撰者不详，约作于战国后期。本篇写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为其主人精心筹划，使之赢得国人拥戴的故事。文章在构思上尤具匠心。它首先以十分生动的笔调写了冯谖的三次弹铗，使人对之产生"贪得无厌"的错觉，在这个基础上再详细地叙述"市义"之举和"狡兔三窟"的谋划，便曲折而有情味，使读者于恍然大悟中不由得对冯谖的幽默、机智和深谋远虑发出由衷的赞叹。本文的语言也极有风格，通过语气的转换反映人物心理的变化是它的特色，如文章的开始，冯谖对孟尝君说自己"无好无能"时，"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当他"市义"完毕归报时，"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前一个"诺"字十分微妙地传达了孟尝君对一个隐才未露的贫士态度上的轻贱，后一个"诺"字则流露他对冯谖擅自主张的不满。

《郑袖谗魏美人》 选自《战国策·楚策》，撰者不详。本文通过楚王之妃郑袖谗害魏美人的故事，反映了她为人的阴险毒辣。当她发现楚王"甚爱美人"，便投其所好，"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当这种做法受到了楚王赞赏后，便一边让美人做出"掩鼻"之举，一边进谗，终于使楚王对美人产生了厌恶之情，并残酷地处之以劓刑。文字虽然不多，却曲尽其妙，非但郑袖的阴暗心理暴露无遗，而且楚王的昏昧和美人的单纯也历历在目。

《触龙说赵太后》 选自《战国

策·赵策》，撰者不详。文章通过触龙对赵太后的劝说，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做父母的要使自己的子女自立，就必须给他提供得到锻炼的机会，而不能一味地溺爱。作为一个老臣，触龙的一言一行无不透露出稳健而又智慧的光彩。为了避免一开始就与盛怒的赵太后处于对立的状态，他先以亲子之爱作诱饵，使之打消心理上的防范，然后则从亲子之爱引出诸侯无继的现象，这样作为赵太后爱子的长安君就和赵国的存亡达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申以爱子之道，就成了一种十分自然而理性的发明。最终，冥顽不化的赵太后在"请君入瓮"方式的诱导下，一步步地走进了触龙预设的目标，很爽快地让长安君"质于齐"，一场严肃的政治纷争，在十分轻松、充满人情味的氛围中化为乌有。本文基本上由对话组成，因此，通过对话反映人物的情绪、性格是它的一大特色，如写赵太后前后态度的变化，除了用"色稍解"和"笑曰"两处外形描写外，就基本上是依靠对话微妙地传达出来的。

《鲁仲连义不帝秦》 选自《战国策·赵策》，撰者不详。公元前258年，秦出兵围赵之都城邯郸，魏王遣使者辛垣衍入赵，托平原君说服赵王尊秦王为帝，试图以此使秦罢兵，此时齐国的高士鲁仲连正在赵国，闻讯后前往游说，终于打消了辛垣衍原先的想法。本文即记载了这一史实。正如战国其他游士一样，鲁仲连主要采用了由此及彼的方法，在逻辑上形成一种自然的气势，使对方处于完全为自己所控制的尴尬境地。他首先摆出了鬼侯献子而遭醢，鄂侯献忠而遭脯，文王兴叹而遭囚的历史教训，表明对邪恶的纵容只能招致可悲的下场。在这个前提下，又从正面引出了邹、鲁以蕞尔小国的身份拒绝齐闵王的史实，从而给有着万乘之尊的梁国以强烈的刺激。最后，又无情地揭示出尊秦为帝所要造成的恶果。可谓有理有据，难以辩驳。虽然鲁仲连的游说方法与当时纵横家同出一辙，但它完全是建立在道义基础之上的，丝毫不含有个人的功利因素，他的功成身退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的游说才更有力，后人提到他的名字才肃然起敬。

《唐且为安陵君劫秦王》 选自《战国策·魏国策》，撰者不详。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唯安陵独存，为了达到完全吞并的目的，秦王诈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允，秦王愠怒，于是安陵君遣唐且人秦游说。此篇即叙述了唐且使秦而不辱使命的故事。本文明显地体现了"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这一艺术特征。当秦王勃然色变，以"天子之怒"相威胁，从而使对立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时，主人公唐且的人格也完全凸现出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话虽不多，但唐且为人的勇敢、正直、机智已包含其中。

《燕昭王求士》 选自《战国策·

燕策》，撰者不详。本文虽然叙述的是燕昭王求贤兴国的故事，但表现的中心实为这一故事的背景人物郭隗先生。文章用了很长的篇幅介绍郭隗的“求士之法”，说明礼贤下士是招致人材、振兴国家的根本。其中“百金买马骨”的插曲不但生动有趣，而且很富哲理，后人从中得到启示，常用它证明讲究信用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意义。但这篇文章给我们的启发还不仅因为它揭示了以上的道理，还在于从某个侧面暗示了士阶层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后来东方朔所说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

《荆轲刺秦王》 选自《战国策·燕策》，撰者不详。本文以十分生动的文笔塑造了荆轲这一千古奇士的崇高形象，反映了他“士为知己者死”的伟大的人格，文章的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肃杀之气：易水萧萧，衣冠似雪，渐离击筑，壮士高歌。这种悲壮的气氛，既表达了作者对即将发生的荆轲刺秦王的事件道义上的肯定，同时也从情绪上暗示了它悲剧性的结局。自“既至秦”以下，文章渐入高潮，在扣人心弦的情境中，对立的双方——荆轲与秦王的性格渐趋明朗。当作为配角的秦武阳“色变振恐”时，荆轲则“笑顾武阳”，表现出惊人的机智与镇定；当事败受创时，他则“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体现了足以动天地、泣鬼神的精诚。与荆轲相反，面对死亡的威胁，秦王则完全失去了平时不可一世的风度，显得那样地胆怯、惶恐、手足无措，这从他“还柱而走”，“惶急不知所为”、“目眩良久”等狼狈的动作中可以看出。由于作者出色的塑造，才使荆轲成了勇敢与正义的化身，才使他虽于千载之下仍熠熠闪光。

《楚王欲辱晏子》 选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撰者不详。在先秦的政治家中，晏子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本篇即通过晏子使楚的故事反映了他机智而又幽默的性格。文中说，晏子到了楚国，楚王以事先预谋好的方式试图对晏子进行污辱，并挑衅地说：“齐人固善盗乎？”晏子巧妙地回答：“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这种独特的反唇相讥的方法，不但维护了晏子自身和齐国的尊严，而且还使对方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文中的橘枳之喻虽属即兴杜撰，但却反映了晏子的才思敏捷，具有智慧色彩，故深得后人赞赏。

（郑训佐）

《察今》 见《吕氏春秋·慎大览》，战国末吕不韦门徒撰。作者首先以古今异俗论先王法之不可法，进而指出不法先王之成法而法先王之所以为法，即察己知人，察今知古，因时易法。多用寓言故事随文设喻是该文的突出特点，如以荆人袭宋，先表澭水“循表而夜涉，溺死千有余人”说明不思时世变迁的可悲之处；以病变药却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喻死守旧法的危害程度；用“刻舟求剑”讽刺“时已徙矣而法不徙”的可笑无知；用有人欲投善水者之婴儿入水指责死

用旧法为国治民的悖谬荒唐。这些比喻恰切、形象、生动，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而这一则则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则流传千古，有了它们独立而扩大的内涵意义。

《五蠹》 节录于《韩非子·五蠹》，战国韩非撰。《五蠹》是代表韩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论文。作者以发展的眼光，根据“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现实，主张因时制宜，实行法制，重视耕战；因而斥当时的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提倡养耕战之士而除五蠹之民。该文是其第一部分，首先以夏后氏之世毋须构木钻燧、殷周之世毋须决渎、当今之世毋须美尧舜为据，正面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主张；然后从经济、政治、军事、刑法等各方面具体论述古今不可同一之理；最后则以仲尼臣于哀公为喻，证明民服于势而寡能怀于义的现实，文章论说务实、犀利、冷峻，有政治家之风，刑法官之威，而一则“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又给这严谨、切实的政论文章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氛。

《卜居》 见《楚辞》，相传为战国屈原撰。这是一篇感情激越的文字，具体描写了屈原在流放中“心烦虑乱”、往见太卜、抒发愤懑的情景。文章重心在于屈原向太卜詹尹的发问，其中一连提出了八对选择性问题，象“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氾氾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等等，这岂是在占卜，完全是借卜问以抒情，是以问作答，前者的崇高，后者的卑俗在提问中已给以肯定的答复，难怪太卜只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该文构思奇特，以问卜形式，既写出了屈原的苦闷，更写出其对信念的执著；文中一连串排句的运用，一句句发问的语气，则使文章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使之极富于艺术魅力。

《渔父》 见《楚辞》，相传为战国屈原撰。该文通过描述流放于江泽湖畔的屈原与一位渔父（实为隐者）的对话，形象地展示了两种处世态度，在对比中写出屈原不同流俗的性格特征，同样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屈原不予妥协以至见放，渔父则劝屈原“不凝滞于物，与世推移”；屈原“宁赴湘流”，不愿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则不以为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以一曲《沧浪歌》表现了随俗浮沉的超然态度，这里，屈原的执著，渔父的飘逸，都给人以深刻印象。文中出现的人物对话，语句整齐，富于形象，充满比喻，如“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使文章颇具诗的韵味。

《对楚王问》 见《文选》，题为战国宋玉撰，对此学术界有异议，一般认为乃后人所托。该文描述了宋玉与楚王的一段精采的对话。楚王以“士民众庶不誉之甚”责问宋玉，宋玉并不回避，对得却十分巧妙。歌“下里巴人”，和者数千，歌“阳春白雪”，和者数十，自有高低层次之不同，且“曲弥高其和弥寡”；藩篱之鷃，怎晓

凤凰，尺泽之鲵，岂知鲲鱼，多数世俗之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也就十分自然了。这里不自夸而誉在其中，可见宋玉之机敏；以曲和多寡喻层次之距、贵贱之分、雅俗之别，也极其形象恰切。作者文思敏捷，时出妙语，其中诸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曲高和寡”已成著名成语，至今活在人们的语言中，可见本文的深远影响。

《风赋》 见《文选》，题为战国宋玉撰，对此学术界有异议，一般认为乃后人所托。该文叙写宋玉在楚襄王面前对于风的描摹、议论，故为“风赋”。宋玉陪襄王游兰台，襄王遇风而喜，以为此乃“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则曰“此独大王之风耳”。下面便是宋玉关于雄风、雌风、高贵之风与低贱之风洋洋洒洒的描述状写。风乃自然现象，自应如襄王所言，应是“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宋玉在此不过是借题发挥，写出了富贵贫贱之悬殊，其中明显有对襄王的阿谀之辞，然字里行间，似又有些许微讽之意，穷巷之风的阴湿，玉堂之风的清冷，其对照本身即有深思之必要。该文文笔华美，语言纯熟，雄风的气派，雌风的黯然，几至触手可摸，可见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性。

《登徒子好色赋》 见《文选》，题为战国宋玉撰，对此学术界有异议，一般认为乃后人所托。该文叙写宋玉与秦章华大夫关于好色的一段议论。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谗宋玉好色，宋玉反唇相讥，谓登徒子至为好色，因为己邻有美女却不为所动，登徒子妻丑却与之生育五子。秦章华大夫不以为然，又叙说了自己遍游盛地，美女如云却“扬诗守礼，终不过差”的行事。该篇内容本不足取义，其突出特点在于描摹的出神入画，美妙动人，其中对宋玉邻里美女的描绘尤堪称绝：“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简直是一完美的化身，这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创造天赋。 （廖　群）

《高唐赋》 本赋萧统《文选》题为宋玉作，历代学者对此颇有争议，但缺乏有力的否定理由，今仍依《文选》，确定为宋玉的作品。赋以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之台，望高唐上倏忽变幻的云气而引起，在宋玉为楚襄王叙楚先王与巫山之女梦中交接之事后，继之以大量文字，为楚襄王赋高唐形势，凡山之高峻，水之汪洋，树木花草之盛，水虫禽兽之繁，尽都收入笔端，结尾又及祭诸神、礼太一的仪式，而以楚王田猎事收束。本赋的深层结构，实为对楚先民祭祀高禖神的追忆，也可以说是远古生殖崇拜的原型在文明时代的转化、移位。赋中的原始意象被梦所掩饰、被朝云暮雨所缭绕、被奇瑰的言辞所包裹，但欲盖弥彰，仍然顽强地呈露出来，成为本赋的注意中心，“云雨”一词此后遂成为男欢女爱的代名词。与对原始的追忆相对照的，是本赋所表现出的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纯熟的表现技巧，显示出人类在文化创造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赋前序叙巫山之女行状一节，写得迷离恍惚，若有若无，不即不离，表现

出作者善于编织氛围而又合度的描写能力。赋的正文以正面铺陈为主，又辅之以侧面的烘托衬染，如在写水之浩荡汹涌之状后，以“猛兽惊而跳骇兮，妄奔走而驰迈”加以衬托；写山之险峻之貌后，又以观者“久而不去，足尽汗出，悠悠忽忽，怊怅自失，使人心动，无故自恐”加以衬染，凡此，都已显示出作者具备高度的文学表现技巧。

《神女赋》　本赋与《高唐赋》为姐妹篇，前后相续，均以巫山神女事为本事，然文字层面上的侧重点不同，《高唐赋》重在铺叙高唐之山川形势，本赋则着重描写巫山神女的艳质丽态。故在风格上《高唐赋》奇伟，而本赋奇丽。本赋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全力刻划神女的形象。赋前序中对神女的描写，就先声夺人：”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花），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步裔裔兮耀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不仅写出了神女的体貌，而且写出了她的光采；不是停留静态的摹写，而重在展示神女的动作姿态。在赋的正文中，又更细致地描绘了神女的容貌：“貌丰盈以庄姝兮，包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文中用了形容（丰盈、庄姝、温润、精朗、联娟）加比喻（象玉、蛾、丹砂）的手法，一一描绘出了神女的面貌、脸色、眼睛、眉毛、嘴唇。作者还善于通过对外形的描写，传达出神女内心微妙的变化和她的神态情意：“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躅而不安……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写出了神女脉脉含情而又庄重矜持的态度。就艺术成就说，本赋的表现手法新颖而富有创造性，超出了同样以美女为题材的《诗经·硕人》、曹植《洛神赋》诸作；就美学意义说，赋中注重“传神”、“重姿”的倾向，已经昭示出中国艺术的美学走向。（刘传新）

《谏逐客书》　秦李斯撰。此篇作于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是历代传诵的名作。文章针对秦王逐客的想法，提出了借六国人材打击六国的策略。它首先历叙穆公以来秦以客而成霸业的事实，然后再以各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的现象作比，最后归结到文章的中心议题：“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本文在气势上深受纵横家的影响，铺张扬厉、荡气回肠，具有无以辩驳的力量，难怪秦王读后，“乃除逐客之令。”在文字风格上则又不同于先秦的一般文章，而是与汉初的文风十分相近，文辞整饬，音节和谐，已向华丽丰赡一路发展。

（郑训佐）

两 汉

《治安策》 汉贾谊撰。此文从维护汉代的中央集权，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向汉文帝提出了限制削弱藩王势力的主张。文章劈首以“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诸侯强大，则必与天子成相疑之势）领起，并征引汉初定之后接连发生的同姓王与异性王谋反的十余件事实，支持这一论点，作者的观察敏锐，分析透彻，笔锋犀利，言辞迫切，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出一身冷汗。以下，文中又以解牛为喻，提出了天子对诸侯不能一味迁就，而须恩、威并施：“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钝）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从而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意。此句是全篇的纲领。以下议论，又从正面论述此法可能产生的功效，贾谊此论，对汉代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出他的政治远见；文章善于剖析，注重说服力和感染力的特色，也对汉代的学术界、文学界影响深远。

《吊屈原赋》 汉贾谊撰。汉文帝初年，贾谊被任用为大中大夫，力主改革政制，因而被一班老臣权贵中伤，谪迁为长沙王太傅。长沙乃楚地，屈原身世与贾谊又极为相似，贾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实寓自怜自伤之意。赋中多沿袭，发挥屈原《离骚》中之意，感叹“遭世罔极”、“逢时不详”，抒发对现实中混浊不分、贤愚倒置的愤懑。赋中多用四字句，较少《离骚》式的长句。结构为直线推进式，不同于《离骚》的反复回旋式，故比起《离骚》来，本赋显得斩截峻峭。赋末谓：“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表现出一股倔强傲然之气，与《离骚》中的一味缠绵悱恻也有异。

《鹏鸟赋》 贾谊谪居长沙时所作。关于本赋的写作缘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已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赋中假托作者与鹏的问答，抒发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试图以老、庄哲学中的齐生死、等祸福的达观思想来自我排遣，以驱除鹏鸟（俗名猫头鹰）作为凶物造成的死亡阴影。文中用一连串的政治风云人物的成败生死难测，说明祸与福相倚伏，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棲会稽兮，勾践霸世。斯

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作者本希图用世之人，故各种政治风云人物的命运是他的主要关心所在，作者虽在文字层面上作“达人大观”状，但内心悲愤难平，越欲排遣反越加激烈，文字上的排遣语反成一种反讽语。文末作者虽谓鹏鸟人斧为“细故蒂芥，何足以疑！”但作者终未终能真正驱除掉死亡的困扰，而六年之后，作者最终郁郁而死。按照现代瑞士心理分析学家荣格的学说，鹏鸟作为一种死亡“原型”，它从无意识层中的涌现已经摧毁了贾谊生的意志并预示了他的命运。（刘传新）

《过秦论（下）》 汉贾谊撰。贾谊为汉初著名的政论家，他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针对当时最敏感的问题而写的，本篇即含有这种政治上的功利性。它首先指出君臣之间的互相猜忌、互不信任是导致秦王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进而又通过历史的比较揭示了它策略上的失误和用人的庸残。最后则从历史的描述回到现实中来，希望当政者接受前朝的教训、审时度势好自为之。正是这种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由此产生的现实危机感赋予了作者深刻的理性精神和高昂的政治热情。如文中写道：“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可谓有理有情，而文字之汪洋恣肆，淋漓酣畅，更具有一种慑人的气势，典型地体现了汉初的文风。

《论贵粟疏》 汉晁错撰。本文是作者写给皇帝的一篇疏奏，主要阐述了务农著本和“贵粟”的重要，与此同时，揭露了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困苦等社会现象。从历史的角度看，其中大部分的观点，都能切中要害，对袒转堕落的社会风气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因为传统的抑商情绪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夸大了商人对于农业的危害；因为现实危机的催迫，出现了追求短期效应的倾向，如“以粟拜爵”主张的提出。事实证明，所有这些，虽在当时有“矫枉过正”的意义，但却在以后的历史中投入了消极的阴影。本文作者不象贾谊那样以情采见称，而是以说理擅场。表现在本文中就是：论点明确，论证充分，语言凝重有力。

《上吴王书》 汉枚乘撰。此书作于吴王蓄谋叛逆之时。在文章中，作者以侍臣的身份向吴王提出忠告，希望他不要铤而走险，而议论之纵横，陈辞之慷慨，很有战国游士的风格。所不同的是，它在态度上则比较折中，即既效忠于吴王，同时又照顾到汉帝国的利益，但这并不是作者人格上浮滑的表现，而是当时特殊的处境使他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我们具体地看一看他的行文，就会发现其中的底蕴。如文中写道：“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这很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意味，应该说，以作者当时的

身份，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郑训佐）

《七发》 汉枚乘作。本文假设楚太子患病，吴客往问，用七种不同类型的事启发楚太子，故名《七发》。文中开头一段作为序曲，叙述此文写作的缘起，下面依次陈说音乐、美食、车马、游观之乐，但都引不起太子的兴趣；再说以田猎、观涛，太子略有起色；最后吴客说到要向太子推荐有道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听了据几而起，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愈。本文的格式明显是从《楚辞》中的《招魂》、《大招》演化而来，但淡化了咏叹抒情的成分，加强了"铺叙的功能"。全文规模宏大，前后脉络贯串，对所写事物，无不极力摹状，穷形尽象，文中"观涛"一段，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其文曰："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这段文字对涛的形状，远近、气势的描写层次分明，语汇丰富，比喻贴切而新鲜，可谓酣畅淋漓，惊心动魄。《七发》是从骚体赋演化出来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它为汉代大赋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的辞赋，都受到枚乘的影响；《七发》以后，还产生了沿袭这种形式的"七"体，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王粲《七释》、徐干《七喻》、陆机《七徵》等不胜枚举。（刘传新）

《狱中上梁王书》 汉邹阳撰。本文作者初仕于吴，曾上书谏吴王，不纳。后归梁孝王门下，又为羊胜、公孙诡等所疾，以致下狱，本文即在狱中所作。文章有自我申辩的意味。它先从历史的教训说起，然后再归结到现实，希望梁王知人善用，不要重蹈前人的覆辙："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为了说明这种规劝并不是完全建立在有个人色彩的功利主义之上的，作者又进行了一番人格上的表白："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砥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这充分显示了作者虽在逆境之中亦不愿以人格市宠的高尚品格。

《求贤诏》 汉武帝刘彻撰。本文是一篇非同寻常的诏令，它反映了一个帝王在风格上通脱的一面。文中写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文字虽然简略，却表达了一种急求冲破世俗罗网、招贤求能的心境，这在世俗禁忌已渐趋森严的汉初是少见的。后来曹操的《求贤令》深受此文的影响，但在风格上比它更放达、更具有叛逆性。

《喻巴蜀檄》 汉司马相如撰。相如虽以赋名世，然散文也颇具大家风范，本文即为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汉书》本传说，相如为郎数载，会唐蒙出使夜郎，征发巴蜀吏卒，致使百姓惶恐，于是皇帝遣相如前往责难，并

喻告蜀民此非朝廷本意。由此可知，这是一篇体现官方意志的文字。从总体上看，本文不脱此类文章的俗套，无非威之以势，晓之以理，可谓恩威并加。但在具体的写法上，却不乏独到之处。这主要体现在前半部分对汉帝国声威的描述上。作者主要采用了赋法，从各个层面展开铺叙，奋发扬厉，夸丽风骇，令人目荡神移。其中虽不免虚夸，但基本上与汉帝国的实际情形相符，故读者仍感到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

《子虚上林赋》 汉司马相如撰。《子虚》、《上林》虽然写于不同的时期，但却是在情节上互为关联的姐妹篇，为了分析的方便，今合为一篇。此赋为汉赋的经典性作品，因为它不但在精神气质上体现了西汉王朝的昂扬与恢宏，而且也在艺术上将汉赋这样一种独特的文体推向了更加成熟的境界。文章采取了问答的形式，即由甲与乙互相夸耀，最后由丙出面压倒双方。显然，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当时的时代氛围，如同一副威武的铠甲穿在了一个剽悍的将军的身上，显得那样地自然、和谐，当然，不容否认，也正由于时代氛围的影响，作者对西汉王朝的豪华与辉煌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过多的留恋，以至最终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相反，即对奢华的津津乐道，淹没了反奢华的本旨。这就是扬雄所说的"劝百讽一"。如果说这种"劝百讽一"在司马相如这里还多少带有潜意识的色彩，那么到了此后的辞赋家那里，便成了一种主观的追求，后来的一些以京都、宫苑，田猎为背景的大赋，都表现了这种倾向。

《答客难》 汉东方朔撰。这是一篇著名的牢骚之文。它采取了此类文章通常所用的问答式的形式，抒发了才高位卑的悲愤。从表面看，作者只是在自怨自艾，但实际上流露了对武帝专制政策的不满，这从文章中对战国纵横之士和汉文人不同处境的比较可以看出。文中写道："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寓悲愤于幽默，寄失意于超然，实有皮里阳秋的意味。这固然反映了作者机智的一面，但同时也暴露了封建专制给文人所造成的心理障碍。本文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封建文人的失意的心态，故此后仿效者不绝。

《上书自荐》 汉东方朔撰。这是一篇向武帝自荐的文章，虽然不长，但生气灌注，趣味盎然。作者自称"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可谓文武全才；"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又可谓仪表堂堂的美男子；而"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更是一个古今无比的义士。这种自荐的方式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辩士说秦的情形，只不过本文作者比他们又多了一些幽默感。后来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亦以夸耀自炫，显然是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启发。

《高祖本纪》 选自《史记》，汉

司马迁撰。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汉高祖刘邦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从身份上看，他既是一个曾经混迹于市井的无赖之徒，同时又是叱咤风云的汉王朝的开创者，就人格而言，他既有深谋远虑、豁达大度的理性的一面，也有粗鲁不文、阴险狡诈的非理性倾向。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一般的历史学家也许只能采取“为尊者讳”的办法，隐恶扬善，以此求得对象人格的完美和自身的安全。但司马迁并没有落入这种历史的俗套，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他选择了与之相悖的方法——秉笔直书。从文中看，他对刘邦人格因素中善的一面固然如实写来，但对其不光彩的一面也毫不掩饰，文章的开始对刘邦青年时代诸多劣迹的昭示就体现了这种实录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司马迁带来了千古不灭的声誉。

《项羽本纪》 选自《史记》，汉司马迁撰。作为一个具有浪漫精神和诗人气质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似乎怀有更多的偏爱，他在《史记》中为不被时人所重的游侠、刺客列传，固然有反抗世俗的一面，但爱“奇”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正是这种爱“奇”的精神意向的驱使，才使他对项羽这个千古奇人倾注了无限的热情，也正是这种热情熔铸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项羽本纪》。为了全面、典型地展现项羽的精神风度，司马迁从其复杂的经历选择了三个情节，即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作为描述的重点，它们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项羽人格的主要因素：机智、粗豪、悲壮。这种看似矛盾而实际上极为客观的方法使司马迁在艺术上跃上了一个新的境界，即他已打破那种单靠形式的和谐以达到人格完善的简单的方法，转而凭藉矛盾的张力揭示出人格丰富的内涵。

（郑训佐）

《报任安书》 汉司马迁撰，见于《汉书·司马迁传》，是给任安的复信。任安，字少卿，司马迁的朋友，曾写信对司马迁提出“慎于接物，推贤进士”的要求。遭受宫刑后的司马迁，虽职任中书令，却深感“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因此，在复信中，针对任安之教，详细叙述自己因忠直而获罪的不幸遭遇，坦陈自己之所以忍辱苟活，只是为了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未竟著作，至于其他，实非所能。全文紧紧围绕回答任安要求这一中心，纵笔为文，曲尽其意。议论则理至语警，叙述则细致生动，陈情则感人至深，三者密切结合，集中体现作者深广的忧愤之情。它既是了解和研究司马迁的最宝贵的资料，又是雄深雅健、情文并茂的出色散文。

《伯夷列传》 汉司马迁撰，是《史记》“列传”的首篇。这篇传记重点不在于记述伯夷、叔齐的事迹，而主要在于传写他们的节操和精神，并结合表现司马迁与写作《史记》有关的一些想法，这就是：一“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即要求证于历史事实。即如孔子所论伯夷不确当之处，也须以史实纠正。二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云从龙，虎从风，圣

人作而万物睹”，即要学习孔子通过著作而显名，且使万物彰明，使伯夷高尚节操能流传后世，发扬光大。本文把伯夷、叔齐的不幸遭遇和坚持理想的精神，通过议论表达出来，又融入了作者很浓的抒情成份，使文势离合变化，莫可端倪。作者借伯夷而抒愤之情愫，千载而下，读者也是容易感觉到的。

《屈原贾生列传》 汉司马迁撰，《史记》“列传”第二十四。屈原贾谊都是一生不得行其志的典型，尤其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志洁行廉而终不免放流。这在司马迁心中激起了强烈共鸣，正象他自己竭忠尽智以求亲媚于主上，但却不被理解而终于招致宫刑之祸一样。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同情抒写屈原的不幸遭遇，高度赞扬屈原存君兴国之志及“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高洁胸怀。全文有叙述，但不以情节胜，有议论但不以理念胜，一切都笼罩在炽烈的激情之中，它象一团火，炙烤着人们的心灵。人们感受到的是屈原痛苦而愤懑的灵魂的呼喊，是以死报国的忠诚，它是我们了解屈原一生的最早最系统的材料，也是洋溢着爱国精神的生动篇章。

《酷吏列传序》 汉司马迁撰，是《史记·酷吏列传》的序言。酷吏，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一批手段特别残酷暴烈的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虽有“据法守正”的一面，但大多是对人民残暴统治的刽子手，是统治者的忠实爪牙。汉代也不例外，针对酷吏之治，司马迁提出，德为治之本，而“法令者治之具”，法网愈密会导致“奸伪萌起”“上下相遁”。虽然司马迁公开表扬汉代“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但传文却全为汉代酷吏。司马迁在序中实是正话反说，言在彼而意在此，对汉代严酷政治提出了自己的警告，指出酷吏治政只能是“救火扬沸”，解燃眉于一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以曲笔而批评汉代政治，语似平和而实含讥讽，正是本序的特色。

《游侠列传序》 汉司马迁撰。是为《史记·游侠列传》所加的序言，重在说明为游侠立传的原因。文中肯定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是“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表现了司马迁过人的史识。在行文上，司马迁紧紧围绕与儒者情况的对照和社会情况的需要，论游侠之义之不可少，又详加区分贵势之贤者与闾巷之侠的不同，区分侠者与“侵陵孤弱”的豪暴之客的不同，从而肯定闾巷之侠的难能可贵。论述细致而文势流畅，辞情深切，尤其开头引韩非之语以逆起，有雄健警拔之气。这篇文章是司马迁从自己的痛切遭遇中发出的对游侠精神的赞美之辞。

《太史公自序》 汉司马迁撰，《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全书的序略，即目录。文中追叙了自己“世主天官”的家世渊源，详细说明了写作《史记》的原始及全书组成原则，提要介绍了每一篇的内容主旨。它不但是

阅读《史记》全书的指导，而且使我们看到了司马谈、迁父子两代相继，效法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的榜样，为创作“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的史书而兢兢业业、竭心尽智的精神和责任感。父子二人的声情形貌历历在目，学问渊源了了可寻，深情贯注，自然感人，实在是一篇生动出色的人物传。书中所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于阴阳、儒、墨、法、名、道诸家短长得失，剖析详明，言简意赅，亦大有益于后世学术。（王培元）

《答苏武书》 传为汉李陵撰。李陵攻打匈奴，兵败被俘，这封书信便是对其这一段不幸的遭遇详加辩解。文章首先写自己的现实处境：“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次写兵败被俘的情形：“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于为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使复战，不得免耳。”再次写之所以违背初衷，滞留匈奴的原因：“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功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此中有忏悔，有悲愤，更有不为人所理解的绝望的哀吟！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对一个身处异域的降将来说，是相当真实的。这大概是这篇文章虽被疑为伪作，但仍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郑训佐）

《贤良对策》 汉董仲舒撰。董仲舒，仕于景武之世，《贤良对策》作于武帝初年，共3篇，董氏在汉代是精通春秋公羊学的学者，因此，在对策中即以阴阳灾异、天人感应的观点，针对汉代的统治状况，提出“治乱兴废在于己”的论点，从而设想出“任德不任刑”、兴教化、通礼义、举贤者、明天性、化民众的一系列措施，而这一切的要害，在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从而奠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础，对汉代及汉以后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是“对策”，要针对帝王的策问作出相应的分析回答，因此，这篇散文显得亲切近情，以大量的论据和详细的分析论证说理，使文章显得充实，又由于是对帝王立言，语气委婉而论述曲折含蓄，意味醇厚，是富有特色的文章。

《盐铁论·取下》 汉桓宽撰。桓宽，宣帝时人。《盐铁论》是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的资料写成的政论散文集，它较生动记述了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就盐铁官营问题展开的辩论。《取下》是其中的一篇，记录了一次双方辩论的情况，在辩论中，大夫一方以为盐铁不实行官营，“则利归下而县官无可为者”，贤良、文学一方则认为在上位者应当“仁以恕、义以度，所好恶与天下共之”，体恤下情才能天下治。全书采用对话体的形式来写，本篇行文整齐而灵活，大量的对比和铺排的描述，使文章显得很有气势，而论述时又运用相当多的历史事例，使说理具体而又明确，字里行间还充溢着显著的感情色彩，从而具有一定感染力和

说服力，是文学色彩较浓一篇。

（王培良）

《圣主得贤臣颂》 选自《汉书·王褒传》。西汉王褒撰。作者是汉宣帝时的文学侍臣，也是一位有自己特点的汉代作家。这篇颂是王褒散文的代表作，作者主要从贤者只有得遇明主才能发挥作用，封建帝王只有任用贤臣才能弘扬功业两个方面来论述选贤任能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使它有别于那些仅仅流于歌功颂德的颂赞之作。作者为文，最大的特点便是描写细微精到，形象鲜明突出。如文中用良御骏马的形象比喻圣主得贤臣的妙处，把良骏追风逐电的迅疾之态描绘得穷形尽相，生气十足，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能充分感受到作者笔底形象的动态美。绘影绘形的精巧描绘，使王褒的作品在汉代别出一格，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报孙会宗书》 选自《汉书·杨敞传》。西汉杨恽撰。杨恽是昭帝时的丞相杨敞的儿子，著名文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曾因告发霍光子弟的谋反被封侯，官至光禄勋。杨恽为人公平廉洁，但好揭发别人阴私，终因遭同僚的忌恨而被免为庶人。他因此广治田产住宅，以经理家财自娱。友人孙会宗来信相劝，所以作者写了这封信来回答他。作者在信中抒写怀抱，发不平之鸣，历述了自己遭人毁谤而不被朋辈理解的处境，文章充满真情实感。作者为人刻直，为文也尽如其人。嬉笑怒骂，皆为文章，以一吐胸中块垒为快，充分反映了作者直人快语、嫉恶如仇、敢于向权贵挑战的性格。论者以为此文有作者外祖父《报任安书》的风格，是古代书信体散文的优秀之作。 （邹宗良）

《谏营昌陵疏》 汉刘向撰。刘向是汉王朝宗室，历仕宣、元、成帝诸朝。昌陵是汉元帝（公元前48一前33年）为自己予营的寝陵，规模宏大，极尽奢侈，因此刘向写了这篇奏疏。疏中先以自古无不亡之国、世之长短，以德为效的道理开始，又以历来薄葬之人为例，说明这才是"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而厚葬只有招致灾祸，最后以"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劝告元帝以前人为则，停建陵寝。全文立论明确，论述剀切，无不尽之言，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论述中，以大量历史事例作为论述的依据，又运用正反对比的方法，以增强说服力。刘向其他散文多平易流畅，而这篇奏疏语言整齐、结构曲折，有一唱三叹之妙，在汉代奏疏中是很有特色的。 （王培元）

《解嘲》 西汉扬雄撰。《解嘲》是一篇抒写作者遭逢乱世的失意情怀的优秀散文。作者以客嘲己答的论辩方式写出了西汉末年政治黑暗，小人当道横行而贤士不被见用的社会现实，表明了自己超然世外、默然著书的处世之道。有汉一代，知识分子发不遇之慨的文章为数是不少的。贾谊、司马迁等人因不遇的境况而悲愤，东方朔则因自己身同俳优的地位而牢骚满腹。但到扬雄的时代，作者对统治阶级不重知识和人才的做法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所发的感慨也就比较地客观冷静。文章对时势的认识是相当深刻

的，对汉末知识分子处境的感慨也显得分外深沉。作者善于通过对照说明古今时势的不同，又善用人事的排比纵横驰说以增加文章的气势，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自己的特色。

《剧秦美新》 西汉扬雄撰。扬雄是由汉而入新朝的作家，他的《剧秦美新》即是一篇称颂王莽新朝的文字。剧秦，是言秦代的灭亡之速；美新，则是称扬王莽的新政之美。文章主要是以秦朝尽坏旧典、实行暴政而灭国，西汉承袭秦制，不补阙失而国衰的教训作为反衬，通过与前代的比较来赞扬王莽推行新政的功德的。作为一种"美新"的文字，文章承袭了秦世刻石和司马相如《封禅文》的传统，自然是难脱后人所谓歌功颂德之评的，作者更因此而受到人格上的非议。但历史地看，王莽的改制固然有复古的成份，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上的革新，其中自有值得肯定的内容和受人欢迎的一面。扬雄本来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他殚精竭虑地来写这篇《剧秦美新》，也未尝不是出于对新朝新政拥护的真心。如果摒除了论者头脑中隐然存在的正统观念，我们从中或可以看到王莽推行新政之初所受儒士们欢迎的情况。文章写得庄重典雅，结构严密而允当，自是鲁迅所说以文采而传的一类文章。

《移太常博士书》 西汉刘歆撰。刘歆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古文经学派的创立者。他首先引用古文《春秋左氏》来解释儒家经典，打破了《左传》不传《春秋》的传统看法，并建议将古文《逸礼》、《左传》、《毛诗》和《古文尚书》立为官学，与今文经并重。在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抵制之后，他写成此文与他们说理辩难。文章阐述了儒家的发展源流，指出了古文典籍的重要价值与今文经学的弊端，斥责了今文经学家们的抱残守缺和门户之见。作者明辨是非，说理透彻，所论皆凿然有据，使今文学者不易招架，无可辩驳，行文则峻洁有力，畅所欲言，被刘勰评论为"文移之首"。文章不仅对《左传》等古文典籍的传播和地位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对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和汉代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具有重要价值。

（邹宗良）

《诫兄子严、敦书》 东汉马援撰。此信写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是年马援在南征军中作战，对在家的两个侄儿马严、马敦（兄马余之子）的日常行为甚为担心，于是在戎马倥偬之中写了这封警戒信。信中首先指出两侄儿喜欢议论别人长短是非、诋毁非议国家法令的缺点，又举山都长龙伯高敦朴厚道、口不失言、谦逊恭让、廉洁奉公作正面例子，让侄儿们向他学习，做一个谨慎守法之人。还举越骑司马杜季良豪侠好义、良莠皆交，使历任郡守切齿愤恨作反面例子来告戒侄儿们切莫轻通侠客，不分清浊地广泛结交，感情恳切真挚，既有严肃的批评警告，也有明确要求和热切希望，因而倍受历代方正人士的推崇，被尊为"凡教子弟者皆当书一幅置其座右"的教子铭言，但信中所反映的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处世哲学，这是历史所局限的。 （郑杰文）

《封禅仪记》 东汉马第伯撰。东汉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光武帝刘秀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禅仪记》所记的便是这次泰山封禅的经过。作者在文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登山途中所见到的种种景物。怪石奇峰,翠柏苍松,石室古刹,溪谷流泉,如线曲径,如蚁行人,以及仰视俯瞰所目睹的种种奇丽风光,无不尽收笔底,仿佛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雄奇壮观的泰山风景图卷。叙述描写委曲详尽,刻写景致极尽工妍。这种以山水景物作为描绘重点的游记之作,在此之前是未曾有过的。因此,马第伯的《封禅仪记》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的发轫之作,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邹宗良)

《自纪》 选自《论衡》,汉王充撰。在中国学术史上,《论衡》是一部奇书。它针对当时的谶纬之风和世俗禁忌,从各个层面展开了批判,表现了独立不羁的精神。本文是《论衡》的最后一篇,主要叙述了作者自己的生平和著书立说的原则。文章体现了典型的"王充精神",直率、偏激、愤世嫉俗、充满自信,读之如饮大白,令人神意潇洒。古代文人自叙性的文字,大都因受封建陋习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半抱琵琶"的羞涩,王充则不然,他对自己的行迹及时人的评价皆如实道来,表现了一种罕见的真淳。在谈到文章写作时,更是力排"虚妄"与"华饰";提倡以"务实"为本。文章采用了对话的形式,于答难中体现思想的光辉,非但逻辑严密,亦文采斐然,如文中写道:"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美,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

《答宾戏》 汉班固撰。作者在本文的序言中说,他有感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未能"折之以正道",故作此篇以明之。正是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所以本文虽然在论题上与以上两家相同,但所表现的精神走向却大相径庭。在本文中,作者也把战国和汉代进行了对比,可对比的目的并不是显示今不如昔,而是为了更进一步地体现汉帝国的声威:"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幽之如海,枝附叶著,譬犹草木之植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零落。参天地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很显然,在作者的眼中,汉帝国是一尊绝对的偶像,因此它的一切是不容置疑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荣辱得失也只能归之于天命了:"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已,神之听之,名其舍诸。"

《杨王孙传》 选自《汉书》,汉班固撰。在中国思想史上,杨王孙是一个具有异端色彩的人物。本文即通过杨王孙临终前与友人祁侯的争辩,介绍了他著名的"薄葬"理论。从文中可以看出,班固虽未将杨王孙视为同调,但对其主张却大有赞赏的意味,这从文章结尾的赞语中不难体会:"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如果我们细加推究,就会从这简单的赞语的背后领略到这样两层意思:一、以正统者自居的班固垂青于一个异端者,这

固然反映了他世界观矛盾的一面，但同时也暴露了儒家内部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二、以杨王孙与秦始皇相比，实有影射的意图，因为汉自武帝以降，帝王们无一不以厚葬而终。

（郑训佐）

《为兄上书》　东汉班昭撰。这是东汉女史学家班昭请求皇上召还次兄班超的奏书，作于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东汉名将班超在西域镇守长达31年，平定内部叛乱，抵御外侮侵犯，为保卫东汉边陲、守护丝绸之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当他“年且七十，衰老被病”、不能胜任职责之时，皇上仍不准他“请代”入关。于是班昭为兄向和帝奏写此书。奏书首先列述班超保卫东汉江山的功绩，陈奏他如今年老多病不能胜任的现状，先动之以情；然后叙写自古“十五受兵，六十还之”的通例和汉家以“至孝理天下”的政治策略，陈述召还班超的合理性，晓之以理；最后直抒自己因班超“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捐死于旷野”所引发的哀伤，恳请皇上召还班超。据《后汉书・班超传》载，“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终于实现了班超“生入玉门关”的愿望。这封奏书，感情真切、说理透辟，并能用隐曲含蓄的手法把自己对班超“大功不能归养”的不平巧妙地表达出来，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潜夫论・本政》　东汉王符撰。王符是东汉后期著名政论家。他出身寒微，性情耿介，与世俗不合，终身隐居，愤愤不平，遂著书36篇，指摘时政得失，评讥污浊世风，因不愿显名于当世，故号其书曰《潜夫论》。《本政》是其第九篇。此篇主要论述民心向背问题，指出：民心向背是君主治天下的依据；政令之出，必以顺乎民心为务；欲天下大治，必先顺乎民心。并列数尧舜以至当朝治乱兴衰，皆因顺逆民心所致，具有一定思想深度。文章朴实无华，笔锋犀利，说古论今，切中款要，具有较强的论辩力。

《归田赋》　东汉张衡撰。张衡是东汉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一生淡泊宁静，不趋荣利，不为世俗所容，“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安帝时为太史令，后一度被免。他在宦官专权，朝政日非而又无力回天的情况下，遂产生归隐田园之志，于是写下这篇抒情小赋，渲染归隐田园的闲情逸趣，抒发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怀。先写自己与世不合，愿离开都邑而归隐田园，次写田居啸吟弋钓之乐，后写自己发思古之幽情而寄情于文章。据《后汉书》本传载，张衡并没有真正归隐。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抒发了对大自然美妙景物的喜爱之情，表现了甘心恬淡的志趣。语言清新明丽，骈偶成分颇浓。此赋开东汉抒情小赋之先河，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与黄琼书》　东汉李固撰。这是一封劝说名士黄琼应召出仕的敦促信，汉顺帝永建二年（127）三月，黄琼经公卿推荐，前去京师应召，但随公车到洛阳东南的缑氏（今河南偃师）时，却又称疾不进，因而遭人诋毁。经李固写此信劝说，才至京师任议郎，后官至太尉、司空，颇有政声。信先从一个“闻”字开始，表明作者

对黄琼行止的关切和出仕的期待，以"伯夷之隘"对黄琼称疾观望提出委婉批评。然后指出若怀"辅政济民"之志则应当机立断出仕为官，以"弘此远谟"的实际行动为名士雪清"纯盗虚名"的流言，用激将法督促黄琼应召。文中征譬引喻，要言不烦；词情恳切，动人心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答夫书》 东汉徐淑撰。这是女诗人徐淑给丈夫秦嘉的回信，又名《答夫秦嘉书》。徐淑婚后有疾回娘家治疗，适逢秦嘉举官，远去京城，秦嘉写信告知妻子。徐淑因疾不能面别，遂写此信作答。信中对自己不能相送表示歉意，对丈夫旅途辛劳预示关切，并在信末委婉地表示出恐丈夫在京日久而"目玩意移，往而不出"的担心。全信语言华丽，感情真挚，通过对丈夫旅途辛劳的想象描写，表现出对丈夫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和真挚动人的夫妻感情。在骈散相间的句式中饱含着缠绵的情意和缕缕愁思。信末隐约流露的恐被遗弃的担心，是封建社会已婚女子的共同心理，是封建礼教在广大妇女心灵中制造的阴影。这种描写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戒子书》 东汉郑玄撰。此信写于建安二年（197）郑玄70岁时，这年他得了一场大病，怕自己一病不起，于是给独子郑益恩写下此信。信中首先追述了自己的生平，突出了以读书著述自娱的情趣和不为高官厚禄所惑的清高品质。次写行将就木，到了"告尔以老，归尔以事"的时候了，把家务交待给儿子的同时，提出了对他的期望：学业上"钻研勿替"，道德上"敬慎威仪"，以"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最后自谓一生"庶不遗后人之羞"，惟整理书籍之事未竟，甚为遗憾，并告诫儿子勤俭持家。此信质朴无华，意[illegible]，结构谨严，在追述自己不[illegible]、甘心学问的人生道路的基础上提出对儿子的要求：刻苦学习，勤奋修德。这是郑玄的人生理想，也是对儿子的殷切希望。最后回顾行事，告诫后辈。前后契合，文意联贯。

《刺世疾邪赋》 东汉赵壹撰。东汉后期，皇帝皆幼年即位，外戚宦官轮番掌权。他们勾结豪强，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培植亲信，致使政治混乱，社会黑暗，投机钻营、阿谀拍马之风大盛。名士赵壹生性耿直，不肯趋炎附势，对世风十分愤怒，遂写此赋以刺之。赋中首先揭露历代执政者虽手法不同，但都是"唯利己而自足"的本质。其次猛烈抨击黑暗政治和社会恶习，揭露小人"舐痔结驷"、"抚拍豪强"的卑鄙行径。其后追寻这种世风的根源是恶人执政，并表明自己"乘理虽死而匪亡，违义虽生而匪存"的信念。最后假托秦客鲁生赋诗概括文意，强作安慰。这篇赋一改汉大赋板滞、凝涩、堆砌的文风，变得疏朗、通俗、文气直贯，成为东汉抒情赋中的佳品。

《辩和同论》 东汉刘梁撰。"和"与"同"是春秋时习用的哲学术语，晏婴和史伯都曾对它们作过专门论述（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国语·郑语》）。和，即通过争辩斗争而达到一致。同，即无原则地随声附

和。东汉中后期，朝政混乱，阿谀苟合之风大行。针对这种情况，刘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君子为政"得由和兴，失由同起"的政治主张，重申"以可济否（即以正纠误）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的原则，征引前人故事，阐明"不在逆顺，以义为断；不在憎爱，以道为贵"的取言标准，对于匡正世风，清肃朝政起了一定作用。

《郭有道碑》 东汉蔡邕撰。这是文学家蔡邕为东汉名士郭泰撰写的碑文。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今山西汾州）人。他贫贱早孤，刻苦学习，博通坟典。后游洛阳，与名士李膺成莫逆之交，被举为有道（东汉选举科目之一），时人称为郭有道。郭泰刚正不阿，奖训士类，事亲至孝，为世人称道。党锢祸起，幸免于难，遂闭门授徒，弟子以千数。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太傅陈蕃、大将军窦宪为宦官所害，郭泰悲恸过度，于第二年春卒于家中，年仅 42 岁。四方之士千余前来会葬，刻石立碑，由蔡邕撰写了这篇碑文。碑文追述了墓主的家世出身，叙述了郭泰"考览六籍，探综群纬，周流华夏，游集帝学"，"潜隐衡门，收朋勤诲"的经历，赞美了郭泰累召不应，"翔区外以舒翼"的高风亮节，并抒发了四方士人的深切悼念。辞情慷慨，感情真切，不谀美，不虚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政论》 东汉崔寔撰。作者出身于仕宦之家，汉桓帝初被举为至孝独行之士，后曾著作于东观，与诸儒博士杂定五经。又任过五原太守、辽东太守，颇有政绩，官至尚书。著述 15 篇，《政论》是其代表作，作者针对当时"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的社会政治现状，主张效法尧舜，选贤任能，但又不要囿于前人德政，应针对社会现实，象调治身体那样"平则致养，疾则攻泻"，要"参以霸政"，"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用严刑峻法，矫衰汉时弊，颇为当时有识之士所称道。仲长统曾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昌言·理乱》 东汉仲长统撰。仲长统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论家。汉献帝时被举为尚书郎，后曾参与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常发愤叹息，因著《昌言》34 篇，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理乱篇》首先指出"祸乱并起，中国扰攘"的根源在于统治者"奔其私欲，骋其邪径"，"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其次抨击汉末"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不合理现象，分析了政治黑暗、世风日下的原因是统治者不能"斟酌贤愚之分"，而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从而阐明了"人事为本"的政治观点，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郑杰文）

《论盛孝章书》 东汉孔融撰。盛孝章原任吴郡太守，晚年去官居乡，名望极高，但遭到据有江东的孙策、孙权的迫害。孔融与盛孝章有深厚的友谊，他写此信给主持朝政的曹操，请求救助身处危境的盛孝章。文章即先叙述盛孝章的处境艰危，希望曹操从

弘扬友道的角度出发而予以救助；继而又从任贤匡汉的角度请求曹操录用盛孝章。文章引证史事，议论透辟。文笔简洁，气势劲健。

《难曹公禁酒书》 东汉孔融撰。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东汉末年的名士、文学家。因对没落的汉朝怀抱忠诚，以及出于世家观念的自豪与倨傲，孔融对曹操的政治作为颇有不满，好加讥评，后终遭曹操杀害。《难曹公禁酒书》是一篇故意与曹操捣乱的文字，它针对曹操的禁酒令而高弹反调，故意宣扬古先贤圣哲千钟百觚而成就伟业的传说，盛赞酒德，又针对曹操复函所举以酒亡国的史事，更举历史上因仁义、谦让、学问及婚姻等等而失社稷的例证，嘲讽曹操不禁仁义等而独禁酒，不过是为保证军粮而欲管制米谷罢了。孔融长于写作散文，文气劲健。但有时也有如《难曹公禁酒书》一文所表现的"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论理杂以嘲戏的弊病。

（倪志云）

《鹦鹉赋》 汉末祢衡撰。才高性刚的祢衡，以言语侮慢曹操，被曹操一再遣送发落，最后到了江夏太守黄祖处。在一次宴会上，有人献鹦鹉，祢衡即席援笔，一挥而就，写下了此赋。作者纵性使气，以情运文，一改前人赋体中铺陈堆砌、全面描绘的基本手法，而仅对鹦鹉予以特征式的描述，以便于在此基础上抒发感情。故此赋深情贯注，词气流畅，较之此前的大赋富有感染力，实开六朝抒情小赋的先声。赋中有"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一语，既是体物，亦以自况，尤为贴切。赋末写鹦鹉樊笼中之状，凄惨怨痛，真切感人。 （刘传新）

三 国 两 晋

《述志令》 魏曹操撰。又题《让县自明本志令》或《自明本志令》。曹操是汉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雅爱诗章的文学家。建安元年（196），曹操受任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挟天子以令诸侯，征讨分裂割据的豪强势力，北方地区渐为曹操所统一。后曹操任丞相，以位高权重，而招致内外谤议，内部政敌攻击他有废汉自立之野心，南方孙权、刘备等集团也以讨伐"汉贼"为名，与曹操相对抗。建安十五年（210）冬，曹操针对政敌的谤议，颁布这篇令文。文章叙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申明自己本志有限，身为宰相，意望已过，而效法前贤，忠义为国，并无代汉自立的意图。文章最后特别强调由于自己今日的地位与国家命运紧

密相关，因而决不能慕谦退之虚名而使国家处倾危之实祸，可以让还食邑，而不能让出相位、委弃兵权的正意。曹操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作为文学家的曹操，其诗风慷慨沉雄；其存世的散文虽多为实用的表、令，也自具特色。鲁迅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曹操《述志令》正是清峻通脱风格的代表作品。

《求贤令》 魏曹操撰。曹操被史家称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格外重视人才是曹操雄才过人的一个突出方面。曹操敢于超越两汉儒学礼教“经明行修”的传统取士标准，破除世族门第观念。建安十五年（210）发布《求贤令》，强调用人不必求全责备，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任贤主张。令文简约而立论鲜明。曹操所以能建立“外定武功、内修文学”的业绩，重视人才，善用人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唯才是举”的任贤原则，即使在今天也仍不失其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

《举贤勿拘品行令》 魏曹操撰。在发布《求贤令》之后，曹操又先后发布《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反复申述“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举贤勿拘品行令》是一篇简明质朴的短文，文章着力引古证今，明确要求，凡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纵或为不仁不孝之人，也应“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令文表现出曹操不拘礼教传统的、坦率通脱的思想作风。

《遗令》 魏曹操撰。《遗令》是曹操的遗嘱。此令的完整原文已不存，现在一般所见的令文系辑录片断而成。《遗令》不仅对自己死后的葬地、葬仪等作了细致的吩咐，甚至不忘留连妾妇之情，叮咛分香卖履之事。“无情未必真豪杰”。《遗令》表白临终前种种琐屑的眷顾爱恋，言无虚饰，坦然表露出既为一世英雄又是千古诗人的曹操至死不泯的至性真情。

《为袁绍檄豫州》 魏陈琳撰。陈琳为“建安七子”之一，在归附曹操之前，曾为袁绍掌管书记。陈琳擅长草拟公事文书，文笔雄健，称隽于时。建安五年（200），袁绍从河北率大军南攻曹操，陈琳为袁绍拟此檄文，意在动摇曹操控制之下的豫州士众的抵抗意志。文章揭露曹操卑微的家世，历数曹操种种政治罪状，指斥曹操为“无道之臣”，有“篡逆”之谋。因此，袁绍的讨伐曹操行动便被渲染为“奉汉威灵”的正义之举。文章夸张袁绍军力的强大，指出曹操部众的弱点，张扬袁军必胜的声势，以明确的号召争取环邻豫州的其它州、郡的响应。这篇檄文引古证今，纵横骋辞，铺张扬厉，气势夺人，极富攻击与鼓动的力量。官渡之战，曹操以劣势兵力战胜了强敌袁绍。陈琳归附曹操后，曹操“爱其才而不咎”，并以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后陈琳又为曹操草拟了不少军国书檄。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魏阮瑀撰。作者与陈琳同以擅长章表书记而

著名。孙策初与曹操俱事汉朝。孙策死，孙权采纳周瑜、鲁肃的建议，据有江东，西与刘备结盟，共同对抗曹操。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曾南征，败于赤壁。建安十六年（211），作者为曹操作此书与孙权，书信主旨是劝孙权背弃刘备而与曹操表里联合。文中以曹操口吻表示愿与孙氏“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但提出用复前好的条件是内除张昭，外与刘备断交。文中提及赤壁之战，饰言败北为“自还”，更以婉含威胁的语气提醒孙权“若恃水战，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江河之广，其长难卫也。”文章围绕主旨，引据史事，申述利害，纵横从容，曹丕称赞他“书记翩翩”，简明地概括了其散文的独特风貌。

《报庞惠公书》 魏应玚撰。这是一封宣布绝交的书信。作者在信中叙述自己的深挚友情受到发迹为高官的故人的疏慢，并向这位倨傲无礼、贪图逸乐的故旧之交申明自己不再是他的知友。行文骈散相参，多引《诗经》典故，委婉而从容地表达了自己的严正态度。

《谏平原侯植书》 魏刘桢撰。平原侯植即曹植。曹操委任严守法度的邢颙为平原侯家丞，邢为人刚直，敢于用礼法约束曹植。任性洒脱的曹植必因反感而待邢十分简慢。此时任平原侯庶子、与邢同为曹植幕僚的刘桢，便写了这封劝谏曹植的书信。刘桢在信中盛称邢的品德与智慧，以自己为不肖，推邢为雅贤。刘桢认为自己受到特殊的礼遇，而邢却遭疏简相待，这将使曹植蒙受“礼贤不足”的谤议，故深表不安。文中巧借“春华”、“秋实”之喻，既表现出自己的谦逊，又赞扬了邢的品格，委婉地表达了希望曹植能以礼厚待邢的意见。文字简约明了，也颇优美。

《答曹丕借廓落带书》 魏刘桢撰。曹丕曾赠刘桢廓落带，后因故欲借取，便给刘桢写了一封语气诙谐的短信。刘桢作此答复的书信，骈文妙语，多所譬喻。然而借带小事，如此骋辞，未免献巧之嫌。

《登楼赋》 魏王粲撰。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登楼赋》是王粲避乱荆州时所作，赋文起叙登楼所见，景物信美，由此引发故乡之思。在“人情同于怀土兮”的深沉感喟之中，包含着对其所以思乡情切而不得归的南北阻隔的时代背景的沉重优患。文章最后慨叹时光易逝，抒发了济世之志不得伸展的慷慨悲凉的情怀。《登楼赋》能超越一般登览写景的堆砌铺排，而将写景与抒情紧密结合；超越一般乡思之情，而将乡关之思与时代优患紧密结合，情境广阔苍凉，因而成为建安时期抒情小赋中的名篇。

（倪志云）

《答东阿王书》 魏吴质撰。东阿王曹植在给本文作者的信中主要表述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回忆他们之间流连诗酒的生活；二是申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三是以政事相勉。该篇就这三方面作了回答。从总体上看，文章仍不脱御用文人本色。但由于作者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且长期与曹氏

父子相周旋，因此遣情说理，既见分寸，又有文采，与一般的应酬文字相比，殊多雅致。本文明显地反映了建安以后审美倾向的转变，即在情绪上由激扬慷慨转为曲折低徊，在形式上由质朴自然转为注重翰藻，如文章中对自己“驽钝”的描述：“虽恃平原养士之懿，愧无毛遂耀颖之才，深蒙薛公折节之礼，而无冯谖三窟之效，屡获信陵虚左之德，又无侯生可述之美。”此段文字皆由典故连缀而成，表述之婉转，风调之翩翩，迥非“建安风骨”的本来面貌。

《出师表》 三国・蜀诸葛亮撰。本文写于公元 277 年，此时作者欲率兵北伐，这份文表是出发前写给后主刘禅的。文章的大意是，希望刘禅不要忘记先主刘备的遗愿，要亲贤能，远奸佞，励精图治，共谋大业，与此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北伐中原的坚定信念。文章思考缜密，议论风发，反映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而剖肝输胆，义薄云天，又体现了一个老臣对国事的拳拳之忠。可谓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严谨处似辩士说秦，逻辑森然，不容置喙；动情处则如渐离击筑，慷慨苍凉，催人泪下。另外，本篇在语气的把握上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一般说来，臣下对皇上的文表，在态度上往往过分卑下与委琐，这样，就很难达到自由的境界；本篇则不同，它不断地变更自己的角色，以达到整体的效应，忽而如严父教子，忽而似挚友话旧，忽而又以老臣的身份，作出无情的剖析。无疑，这种角色的复杂性很符合作者与刘禅特殊的关系。

《与侍郎曹长思书》 魏应璩撰。张溥说：“休琏（应璩字）书最多，俱秀绝时表。”本篇即为他书信中的代表作。文章叙述了自己的困顿之状和“离群之志”。但这非作者的本心，由“王肃以宿德显授，何曾以后进见拔，皆鹰扬虎视，有万里之望。濡接助者，不能追参于高妙，复敛翼于故枝”一段观之，超脱的背后偃卧的是一颗急于仕进的心，不过因门寒位卑，无人提携，只能作怅然状而已。文章的最后以“自然之数”比附人生的遭际，很有情采：“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鱼逝，春生者繁荣，秋荣者零悴，自然之数，岂有恨哉？”正话反说，更具力度。可见，前人“词浮于意”的说法实不切情。 （郑训佐）

《洛神赋》 魏曹植撰。曹植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同母弟。曹操曾极宠爱才华出众的曹植，几次欲立为太子。但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去了曹操的信任。而善于矫情自饰的曹丕得立为太子。曹操死后，曹丕代汉称帝。由于遭到曹丕很深的猜忌，曹植强烈的功名抱负在沉重的忧患压抑中，必然发而为沉郁悲凉的生命的慨叹。生命易逝的悲哀，壮志难酬的人生忧患，是激响于曹植后期文学创作中的主旋律。《洛神赋》是曹植于黄初四年（223）入朝京都洛阳后，在回封邑途中经洛水时有感而作。洛神相传是伏羲之女宓妃。《洛神赋》叙写了作者与洛神两相爱慕，但因人神道殊，无从结合，而终于怅然分离的一段充满梦幻色彩的离奇故事。作者用清丽的词藻，精致的描绘，塑造了

一个美丽多情、楚楚动人的神女形象。洛神形象应是曹植执着追求的理想的象征。“恨人神之道殊”，正是曹植对于无从实现其理想而感发的叹惋悲慨。《洛神赋》是建安时期抒情赋中极优美隽秀的篇章。

《与杨德祖书》 魏曹植撰。这是曹植写给杨德祖的一封书信。信中论及当时诸著名作家。提出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瑕，作家应能虚心接受批评，加以改进。这种看法自然可取。但曹植又提出，批评者应首先具有高度的创作修养方可进行批评，这一主张是片面狭隘的。曹植在这封书信中，既表露出对自己文学才能的自信，也表达了不甘心于仅仅做一个文学家，而希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宏愿。这是曹植早期的理想与抱负。但此后曹植的人生之路恰是一幕与理想相违的悲剧，他一生执着追求、但终于没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与功名抱负，他最终只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而名扬千古。

《求自试表》 魏曹植撰。曹丕代汉称帝后，曹植虽贵为王侯，用享厚禄，但政治上始终遭受着压抑，其存在一如“圈牢之养物”。现实遭遇的挫折困迫，激扬起更为强烈而充满忧患的生命意识。魏明帝即位次年，曹植不甘心于将落得“微才弗试，没世无闻”的结局，上《求自试表》，陈述自己的建功立德、捐躯报国之志，希望能受到信任，使自己在消灭蜀吴、统一全国的战事中，有机会建树勋绩，以弥补平生无功于国的愧憾。纵然因此身死，也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追求。表文披肝沥胆，慷慨激昂，同时流露着“抱利器而无所施”的忧患怨愤之情。 （倪志云）

《大人先生传》 晋阮籍撰。这是一篇非常独特的文章。它在形式上以问答式的散赋为主，杂以骚赋体格与五言诗，变化诡奇，生动至极。在精神上则深受庄子的影响，其“大人先生”就是《庄子》中“真人”、“至人”的投影，具有自况的意义。文章大胆地批判了奴隶社会以来的统治制度，认为正是这种制度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在这个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这样的社会理想：“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在君为主宰、仁义为外衣的封建时代，出此奇音，已远非“勇气”二字所能褒扬的了。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批判是建立在道家“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之上的，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种倒退。这未免过于苛刻。以古喻今是古代文人鞭挞时事的常用的方式，在人命如草、朝不保夕的魏晋之际，这更是唯一的选择，这从“近者夏丧于商，周播之于刘……厥居未定，他人已有”的暗示中可以体会。

《与山巨源绝交书》 晋嵇康撰。山涛字巨源，他与本篇作者都是“竹林七贤”中人物。涛曾任选曹郎，后他迁，欲荐嵇康代其原职，康作此书拒绝。本篇以老庄思想为精神指归，就礼法的森严提出“七不堪”，就生性的放荡提出“二甚不可”，以此表示不

与世俗合流的决心。文笔之幽默，骋情之自由，可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如写自己的独立不羁："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再如对山涛的抨击："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养鹓雏以死鼠也。"文章所流露的批判精神，具有广泛的针对性，它不但触及到了山涛的灵魂，还触及到了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本质，这不免为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前因。

《管蔡论》 晋嵇康撰。这是一篇历史翻案文章，作者认为周初管、蔡作乱，乃是误解周公可能取代成王，因此，这是对周室忠贞的表现。文章首先在名份上对管、蔡加以肯定："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功业有绩，故旷世不废。"作者还对封建时代人们所尊崇的偶像周公发出了微辞："荣爵所显，必钟盛德，戮挞所施，必加有罪。斯乃为教之正，古今之明义也。管蔡虽怀忠抱诚，要为罪诛。罪诛已显，不得复理。"如果联系一下，毋丘俭等人的叛乱事件，其对司马氏集团的嘲讽是明显的。鲁迅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的好，思想新颖，往往与旧说反对。"鲁迅的所谓"新颖"很可能就是指这种以历史为观照对象以现实为参照物的对比的方法。

《酒德颂》 晋刘伶撰。在"竹林七贤"中刘伶既以脱略形骸见称，更以善饮著名。本篇即表达了为酒所沉醉的"大人先生"藐视一切的气概。在"大人先生"眼中，一切都充满了主观的色彩，而这都源于驾驭外物、追求永恒的精神欲求。在他看来，时间不再构成对生命的威胁，"朝为美少年，夕暮成老丑"的悲哀已为"以天地为一朝，以万物为须臾"的豪迈所替代。生命的呈现也不再是如履薄冰状态下的苟延残喘，而是"幕天席地，纵意所如"的自由翱翔。而外界的存在经过一番主观化以后，则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力量："孰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很显然，本篇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了庄子的影响，但比庄子更激烈，更惊世骇俗。据史载，刘伶为人异常羸弱，以此羸弱之躯出此雄奇之文，大概也是一种心理平衡吧。

《思旧赋》 晋向秀撰。本文作者与嵇康、吕安友善，嵇、吕被杀后，途经他们的山阳旧居，感念前事，写成该作。赋由序和正文两部分组成，而"序"的文字尤为凄绝："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是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正文在风格上则袭楚骚遗意，虽深沉含蓄，却不乏对善恶的褒贬："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它通过历史的回味表达了世纪末的情绪，而这又显然基于善的失落和恶的膨胀这一现实背景之上。这种态度上的暧昧与笔调上的隐晦从侧面说明了时代的残酷，难怪鲁迅感叹："年青时读向子期的《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现在我懂了。"

《隆中对》 选自《三国志·诸葛亮传》，晋陈寿撰。本篇写刘备到隆中

拜访诸葛亮时，两人对时事的分析探讨。文章虽不失史家笔法，但又非一般史笔可比，其写人叙事，显示出浓厚的文学意味。文章基本由两人的对话组成，一问一答，此起彼伏，饶有波澜，非但声势夺人，即人物个性特征，亦呼之欲出。如写刘备："屏人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识短浅，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里面，既有落魄者的自怜，也有败北者的哀叹，既有志大者的高傲，也有求贤者的卑微。总之，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与刘备复杂的身份相合。与刘备相比，诸葛亮的形象则更为鲜明，在那一大段纵横捭阖的议论中，一代名臣的深谋远虑，初出茅庐者的踌躇满志，遭遇知己者的兴奋，都历历如现。正如宋叶适所说："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耳，要终胜固也。"读了此文后，我们只能说：此语不虚！

《陈情表》 晋李密撰。与一般的文表不同，此表的目的不在干禄，而是拒绝朝廷的征召，这便摆脱了政治上的功利性，从而为本文的写作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和自由度。总观全篇，作者采取的方法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前者表现在对"孝"的执著上，可谓对症下药，一语中的，如文中写道："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这对以名教自任的晋统治者来说，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后者表现在对自己和祖母特殊关系的叙述上。述孤苦则"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独立，形影相吊"；念祖母则"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正由于这二者的相辅相承，交互感应，才收到了"皇天后土，实当共鉴"的效果。

《剑阁铭》 晋张载撰。古之镌刻于山川的铭文，大都或客观地描述地理形势，或一味地颂扬王朝的功业，文字刻板迂阔，可诵者不多，但本文在精神上却非以上两类文字可比。《晋书》说：太康初，张载至蜀省父，道经剑阁，因蜀人恃险好乱，乃著《剑阁铭》以为戒。立意既高，文字自能拔俗。文章中对剑阁地理形势的介绍，充其量只起着一种感发的作用，以此生发出理性的说明，但这种理性的说明并不在于对蜀人恃险好乱行为的规劝，而是希望统治者从中悟出治国的大道，即"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斯顺。"在这个基础上，再申以历史的教训，便如洪钟在耳，振聋发聩："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洞庭孟门，三国不祀，天命匪易，凭阻作乱，鲜不败绩。"据说，此铭一出，武帝便遣使者镌之于剑阁山，可见它在当时的影响。

《闲居赋》 晋潘岳撰。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和山水田园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同为模山范水，所表现的精神气韵却大相径庭，陶渊明追求的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人格的自然回归，而本篇作者潘岳感兴趣的则是带有贵族气的天伦之乐，前者是至真至淳天性的流露，后者则是官场困顿后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自我安慰。正因为如此，元好问才有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的浩叹。尽管如此，如果撇开作者的人格背景不谈，本篇仍不失为一篇气韵生动的佳作，其中对田园风光的描述尤为清爽入神：“长杨映沼，芳枳树篱，……灵果参差。”华丽而不乏清新之致，铺陈而不乏疏朗之态，的为潘文本色。

《秋兴赋》 晋潘岳撰。悲秋是文学的老话题，宋玉可谓始作俑者。本篇虽然在写作方法上受到了宋玉《九辩》的启发，但也有独到之处。一般说来，宋赋是随物感兴，又因兴而体物，意境混沌，气象宏大，但缺乏层次性。潘作在后者下了一番铺排的功夫，它先从盛衰荣悴说起，次写秋之萧瑟，再次写由秋之摇落所产生的迟暮之感，末尾归结到“江湖山薮”之思，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如剥茧抽丝，秩序井然。再则，宋赋是草创期的产物，因此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自有一种磊落不平之气。潘作则不然，非但句式整饬，而且音韵流转圆美，这正好和结构的精致相得，有整体和谐的效果。正因为宋潘二人各有会心，各有千秋，故后人往往把他们都看作悲秋的化身。

《三都赋序》 晋左思撰。自司马相如之后，大赋的创作呈每况愈下之势，本文作者左思虽穷十年之力，精心构制，完成了《三都赋》，但也只能规模前人而已，虽“洛阳纸贵”于一时，却寂寞萧条于后世。倒是这篇序文喧宾夺主，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值得思索的东西。作者对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假称珍怪，以为润色”的毫无根据的夸饰极为不满，认为这“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这对大赋创作中的浮夸之风确有针砭的作用。但遗憾的是作者在批判的同时，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即混淆了文学的真实与科学的真实的区别，提倡“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很显然，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创作，只能是山川文物的总汇，毫无文学性可言。由此看来，《三都赋》的淹没无闻是必然的。

《吊魏武帝文》 晋陆机撰。作者在本篇的序文中说，元康八年（公元298年）他于秘阁中看到曹操的遗令，“叹息伤怀者久之”，故作此文以吊之。文章的立意很高，面对如此复杂的对象，既不一味地谴责，也不一味地颂扬，而是从其为人的矛盾处着手，探讨其悲剧性格。文章的前半部分侧重写其“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的豪情壮举，后半部分则写其临终前“婉娈房闼之内，绸缪家人之务”的琐碎与软弱。前者有威震八荒之慨，读之令人心骨开张，后者极儿女情长之状，览之使人悄然低徊。正是这种由对立所产生的张力萌发了作者的悲剧意识。在谈到曹操死后的情景时，这样写道：“徽清弦而独奏，……怨西陵之茫茫。登雀台而群悲，眝美目兮何望！”又正是这种死亡后的空虚与渺茫，把作者的悲剧意识推向了高峰。此外，文章的序文也很精采，有些地方虽与正文重合，但叙事抒情很能相得，而参差迭宕之势还胜一筹。

《神钱论》 晋鲁褒撰。本篇名为"论"，实是用赋体写成。文章通过司空公子和綦毋先生的对话，讽刺了金钱万能的社会现象，论题之新颖，论述之深刻，笔调之幽默，实为古今罕见。如下面一段文字："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从生死到忿争，从怨仇到令问，在冥冥中起作用的都是一个大写的"钱"字，这真是一个唯钱是尊的世界！当然，作者是有感而发的，因为魏晋六朝是一个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而享乐又必须以金钱为前提，因此，一切向钱看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从当时有些帝王以至尊之身行市侩之事的史实可以得到印证。作者能以金钱为视点，旁及人情世态，寓愤懑于嘻笑怒骂之中，实有"含泪的微笑"的意味。

《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 晋刘琨撰。这是一篇反映军事与社会现状的文章。其慷慨悲凉的音调，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建安风骨"。如写百姓的惨状："自臣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胡人的猖獗："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见寇。"自身的忧虑："以臣愚短，当此至难，忧如循环，不遑寝食。"文中所表现的敢于面对现实的精神和爱国之忱，在轻实践务虚华的两晋真是空谷足音，就形式而言，本文也完全摆脱了同时代人追求骈偶的习气，自有一番独立的面貌。正如张溥所说："劲气直辞，迴薄霄汉。"当然，作者之所以能写出如此超拔的文字，和他紧迫的民族危机感以及那种"闻鸡起舞"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大有关系。（郑训佐）

《江赋》 晋郭璞撰。郭璞是晋室南渡前后的著名诗人。东晋定都建康（今南京），号称中兴，郭璞作《江赋》述赞长江之美，显然着意于为晋室偏安江南寻求心理上的安慰。《江赋》以宏篇巨制，状写长江发源经行、长逾万里的地理形势，描摹江水的骇浪惊波、洪澜涴演的奔流声势，列叙江中鱼豚龟鳖的喷浪游延，江天羽族的千类万声，江畔水草竹树的繁蔚葱茏，又写出长江的渔商之利、交通之便。最后盛称长江有"混万尽于一科"之妙观。全文气势磅礴，但未能摆脱汉赋好用生僻字词的习气，使赋文有艰涩之病。（倪志云）

《华子》 选自《列子·周穆王》。《列子》一书作者无考，一般认为出于晋人张湛之手。该书内容复杂，但从总体上说，受道家的影响较深。本文即体现了这种思想背景。文章的主人公华子中年"病忘"，最后在儒生的治疗下，终于恢复了记忆，于是，数十年的存亡得失、喜怒哀乐又重现于眼前，因此烦恼顿生，怒而操戈逐儒生。很显然，华子试图以"病忘"这种消极手段，抵御外界的压力，以求得精神上永恒的宁静。这与庄子的自我麻醉不无相通之处。《列子》中此类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很多，这从某个层面反映了魏晋之际残酷的社会现实给士

林阶层在心理上造成的阴影。

（郑训佐）

《游天台山赋序》 晋孙绰撰。《游天台山赋》借赋山水而谈论玄佛哲理，文字平淡而少情韵。唯此赋序文叙天台山之峻美宏丽，写自己受遥想重登之念的驱动而奋藻作赋的原由，行文尚为生动有致。

《兰亭集序》 晋王羲之撰。王羲之是东晋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其书法精妙，后世尊为“书圣”。永和九年（353）春，王羲之与当时名流、文士四十多人在兰亭修禊宴聚，《兰亭集序》即是作者为与会者所作诗篇的集子撰写的序文。文章描写兰亭明丽的春景及修禊聚会的盛况，转而兴怀世事，感慨生死，表现出作者对短暂的人生的执着热爱与深切感伤。全文骈散相参，叙议结合，文笔清新隽永，自然洒脱。这篇序文的拟稿书法更极为后世所珍视，享有“天下行书第一”的美誉。 （倪志云）

《庐山记》 晋慧远撰。两晋为佛学兴盛的时代，释门之中以文章见长的很多，慧远即其一也，本篇为其传诵尤广的名作。慧远晚年移居庐山，感其山川风物之美，故作此文。由于作者是释门中的巨子，因此，当他聆听山水之音时，又别有一番情趣。文章开始对匡续先生和庐山因缘的交待，已为此名山染上了空灵之气，其后对庐山变幻之奇的描述，则更具幽趣：“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等神奇的观照，只有与大山弥日弥深者才能做出，而非一般游山玩水者所能为。从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六朝山水游记简约的风格，还体会到了唐人山水小品俊拔的先声。

（郑训佐）

《五柳先生传》 晋陶渊明撰。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文学家之一。在东晋腐朽的士族专制时代，出身寒门的陶渊明“有志不获骋”，遂与黑暗污浊的官场绝裂，归隐园田。胸怀淡泊超旷，所作诗文纯朴自然，意味隽永，成就极高。《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一篇著名散文。全文仅170余字，却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五柳先生”的个性与追求。“五柳先生”平凡闲静，饮酒读书，安贫乐道，具有超绝尘俗的率真禀性和高尚情趣。作者运用简练的白描笔法，粗线条地勾勒出“五柳先生”的古朴纯真的禀性和风采。“五柳先生”的高尚情趣也正是作者的精神追求。因而，有的史著认为《五柳先生传》就是陶渊明的自况实录。

《归去来兮辞》 晋陶渊明撰。陶渊明出身寒门士族，早年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怀有济苍生的壮志。但几度出仕，使他深知现实官场的污浊、政治的黑暗。陶渊明41岁时任彭泽县令，在官80多天，便辞职归乡，从此不再出仕。《归去来兮辞》即是此次将要辞官时写的。辞前有序，正文三段。序写自己出仕及辞官的原因，辞的第一段也从自己辞官归田的缘由写起，接着写想象中的归途景象及到家后的欢快情景，辞的第二段写归田后的生

活，末段以人生易老、当顺其自然以使短促的人生充实而欢乐的感怀作结。全文表达了作者与当时污浊官场的决绝态度，以及归耕园田、在纯朴的生活中追求生存的价值及生命的欢乐的意志。行文流畅自然，富有韵律，情感朴素纯厚，善于借写景以抒情，情景交融，充满诗意。

《与子俨等疏》 晋陶渊明撰。陶渊明五十多岁时一场大病之后，自以为身体衰损，余生有限，因而写下这篇留给儿子们的类似遗嘱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陶渊明回顾平生怀正志道，辞官归田，但躬耕垄亩的生活最终总不能如他曾经想象的那样充实与欢乐，贫困的生活使孩子们幼而饥寒。陶渊明自己虽能持"道胜无戚颜"的精神胜利态度，但念及自己的努力从未能使孩子们获得温饱的生活，则不能不深怀歉疚之心。文章最后一段嘱咐五个儿子在将来的生活中要相亲相爱，并出于传统宗法观念要求子孙不要分家，在当时，这也是对于一种人伦美德的追求。文章表达了陶渊明一片至善的父爱之情。全文基本由四言句构成，间用长句穿插，使行文均衡之中也有波澜起伏之韵致。

《闲情赋》 晋陶渊明撰。在此赋序言中，陶渊明说此赋的写作是依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目的在于讽谏人们防闲流宕的情思。赋中一段用一连串排比句描述强烈爱慕的情思，十愿十悲，想象奇瑰，辞采华美，声韵跌宕，情致淋漓。从赋序中"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一句来看，其所写情思当别有寄托之义。

《桃花源记》 晋陶渊明撰。《桃花源记》原是《桃花源诗》前面的小记，但也是可以相对独立的一篇散文。记文以一个渔人的意外经历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干戈扰攘，没有君权统治、阶级压迫，人人劳动，民风淳朴，生活富足欢乐、和平安宁的"桃花源"社会。虽然"桃花源"只是作者虚构的一个理想境界，但作者又着意将它写得凿凿有据，使人感到并非仙境，而是一个与黑暗现实相对立的理想社会。陶渊明在归田躬耕的艰难生活中，深切地体验了劳动者的辛酸。因而，"桃花源"理想社会的向往，也反映出劳苦农民的美好愿望，标志着陶渊明思想发展的高度。《桃花源记》文字简洁优美，笔法疏淡传神，为历来传诵不绝的散文杰作。

南　朝

《陶征士诔》 南朝·宋颜延之撰。陶征士即陶渊明。陶渊明晚年曾被刘宋朝廷征诏而不就，古代称不应征出仕的名士为"征士"。颜延之是刘

宋时代著名文学家，他与陶渊明是性情相洽的亲密朋友。他在赴任始安郡太守时，路过浔阳，曾与渊明连日畅饮，临走时还给渊明留下二万钱以助炊饮之资。诔是哀悼死者的一种专用文体。颜延之作《陶征士诔》表达他对亡友陶渊明高尚情操的赞扬及其沉痛悼念之情。诔分序文及诔辞两部分，序文赞叹高人隐士的可贵难得，叙述陶渊明的生平事迹。诔辞颂扬陶渊明的高蹈独善，追怀自己与亡友的道义相亲之情，倾吐痛失知音的悲哀。序文以骈俪为主，诔辞以四言为句。通篇哀情真切，文辞精美。

（倪志云）

《宦者传论》 本篇是《后汉书·宦者传》的序论，南朝·宋范晔撰。范为史学大家，以文采著称，《后汉书》中论赞的文字尤为辉煌绝伦。本篇即体现了这一特征。它以深刻的历史眼光探讨了宦官势力成长的始末和原因，揭露了他们政治上的跋扈和生活上的奢侈，和由此造成的恶果。文章的开始，偏重冷静的历史描述，但随着论述的深入，情感渐趋昂愤，达到了惊心动魄、振聋发聩的效果。其对宦官专权残害忠良罪恶行径的针砭，尤见力度："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一幅秽人乱国的图画历历在目。中国历史上列论宦者的文字可谓多矣，但论辩之精当，目光之犀利，抨击之无情，却无出其右，真可谓千古奇文。

（郑训佐）

《山居赋》 南朝·宋谢灵运撰。此赋描写作者在祖居基础上修营的地主大庄园始宁墅，并叙述自己在这个傍山带江的庄园中的山居生活。赋序谈作赋缘起及创作旨趣。赋分五段，首先叙述自己的人生信念，然后描写始宁墅所处的地理位置，叙述庄园的变迁与物产的丰盛，描述庄园中台观建筑及湖山之美，最后写自己物质生活的享受与精神生活的追求。《山居赋》宏篇巨制，吸收汉赋的铺排手法，详尽地描述了一个南朝时期的大地主庄园。其行文既有繁芜的名物罗列，也有生动的景观描绘。此赋随文自注，也别具一格。作为一幅大地主庄园的形象图画，《山居赋》的史料价值则极为突出。

《诣阙自理表》 南朝·宋谢灵运撰。这是谢灵运向朝廷痛陈自己安分隐居却遭受地方官诽谤迫害之事的一篇短文。全文三百多字，一气呵成，多用短句，节奏急促。指控辩解，申冤抒愤，情绪激昂，淋漓酣畅。它虽然只是一篇愤极投诉的应用表文，但也充分表现出作者的文学才华，情文并茂，动人心弦。

《雪赋》 南朝·宋谢惠连撰。谢惠连是著名文学家谢灵运族弟，颇受谢灵运赏爱。《雪赋》采用汉赋假设主客命对的形式，托以汉代梁王雪天游宴，招请宾客，命司马相如赋雪，枚乘为乱辞。其中描写雪的飘洒聚积，冒覆凝缀，随物赋形，皓白灿烂的种种景象，辞句清丽，体物极工，脱尽前人华丽之气。随后因雪而发年岁易暮之感慨，赋末乱辞进一步将雪拟人化，形象地表述了作者超然尘襟、委运任

化的道家人生观。《雪赋》已超越前代仅仅描摹自然景象的赋作，而使所赋清奇的雪景之中溶入了作者纵心浩然的情趣。（倪志云）

《华歆王朗》 选自《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汉末魏晋在士林阶层中曾流行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人们习惯通过某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判断一个人品格的优劣。本篇即以华歆与王朗在患难之中对待他人的态度，划出了他们的人格上的不同分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朗是一个轻易许诺，但又会随时食言的缺少操守的浮滑之辈。与之相反，华歆则不轻易出言，言则一诺千金，是一个能够洁身自守的义士。这种人格类型在讲究"仁义"的封建时代具有很大的魅力，"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既反映了时人的褒贬，也暗示了作者的主观评价。《世说新语》在笔法上有皮里阳秋的意味，唯于细微处见精神。此篇即有这种特征。

《过江诸人》 选自《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本篇写南渡后的东晋政府的几个大臣在金陵附近的新亭饮宴时的对话，反映了一部分南渡士族官僚国破家亡后的复杂情绪。文章虽然很短，却饶有情味，催人肝肠。因为全篇都由对话组成，所以在客观上能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又因为这些对话都发自经历了亡国之痛的东晋大臣们之口，因此又于真实中凭添了几份凝重与凄凉。本篇的有些文字，已经成为具有成语意义的名句，如"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何至作楚囚相对"等。一篇之中，佳句联翩，说明人们对它的偏爱确是建立在作品本身的魅力这一基础之上的。

《周处》 选自《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本篇叙述了周处为民除害、改过自新的故事。文章夹叙夹议，颇见波澜。如斩蛟一段，虽只有二十余字，但主人公出没波涛与蛟恶斗的情状历历如现，而"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的插曲，既在情节上极富戏剧性，同时也为此后主人公人格上的转变埋下了潜因。本篇通过浪子回头的故事，试图向人们进行忠臣孝子的说教。这反映了虽在思想比较开放的魏晋六朝，传统的儒家伦理仍然发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刘伶病酒》 选自《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自古以来，酒与文人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对魏晋名士来说，酒更是形成其独特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其中的功用却大不一样：在陶渊明那里，饮酒无疑是净化人格的一种手段；对阮籍而言，沉湎于醉乡则是逃避现实，消灾免祸的一种途径；但对本篇的主人公刘伶来说，鲸吞海饮却是纵欲放荡、自我摧残的象征，本篇即反映了这种精神意向。它通过刘伶和其妻一段极富幽默感的对话，展现了主人公对酒的近乎病态的嗜好和颓废的人格，文字虽然简略，但情态毕现，非但刘伶的形象生动如画，即作为陪衬的刘妻的性格也跃然纸上。言简意赅，方寸中见天地是六朝小品的特点，本篇体现了这种风格。

《王子猷居山阴》 选自《世说

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魏晋名士大多以任诞著名，王子猷即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趣闻，本篇“雪夜访戴”就是他的故事。主人公于大雪之夜，吟咏左思之《招隐诗》，忽念好友戴安道，于是命舟前往，但终造门不前而返，这就是著名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典故的由来。王子猷的行状，看似怪异，不合常情，但却自有历史的逻辑，魏晋是传统规范分崩离析的时代，文人大多以精神上的自由飞翔为人格的终极目标，故虽寻常小事，亦标新立异，率性而行。由此看来，本篇的故事虽小，涉及的背景却大，这也许正是历代文人对之津津乐道的原因。

《王蓝田性急》 选自《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本篇通过王蓝田吃鸡子的极富戏剧性的情节，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性急者的形象。其细节描写尤具特色，动作之间的急速跳跃与主人公暴怒的神情相得益彰。如“以筋刺之不得”；“举以掷地”；“以屐齿碾之”；“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动作连贯而下，如急风骤雨，声势夺人。魏晋崇尚潇洒，标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定，王蓝田的骄躁与当时的风尚相去甚远，这样王右军对他的“使安期（蓝田之父王承之字）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耶”的诟病也就是自然的了。

（郑训佐）

《芜城赋》 南朝·宋鲍照撰。鲍照为南朝杰出的文学家，其诗以俊逸雄浑著名，其赋作冠绝刘宋一代。“芜城”指在刘宋时期两次遭受兵祸而荒芜的广陵城。《芜城赋》写广陵这一名城今昔盛衰的景象。作者采用对照写法，把广陵城昔日的繁荣与目前的衰败夸张铺叙，在对这个城市的盛衰极变的描述中，表达出作者沉郁的伤古忧今的沧桑感慨。通篇俪句，或长或短，缓急错综，使文章气势起伏遒健。

《登大雷岸与妹书》 南朝·宋鲍照撰。这是鲍照沿江西上赴江州，途中登大雷岸（在今安徽省望江县境内），触景生情，给其妹鲍令晖写的一封骈文书信。这封书信中间一大段描写作者在大雷岸近观远眺所见到的山川形胜。文以方位为序，条理清晰，用精美传神之笔，图山绘水，气象雄浑壮丽。如此着力刻画山川景色，为前所未有的创举。而作者于记述景观的行文中，也即景抒发其壮志与悲慨。这种体物写志的手法，对后世山水游记散文具有深远的影响。 （倪志云）

《月赋》 南朝·宋谢庄撰。《月赋》与谢惠连《雪赋》同为物色赋名篇。《月赋》的格局也与《雪赋》相似，它假设陈王曹植与王粲为主客，叙写月夜景色与情思。赋中对明月本身着墨不多，但月色之美却借描绘清幽洁静的月下秋景烘托出来。赋末系以歌辞，因明月而思美人，情致隽永，韵味深长。《月赋》写景抒情，情景交融，对后世抒情诗赋有其积极的影响。

《北山移文》 南朝·齐孔稚圭撰。由于受“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隐”传统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便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一个特殊的阶层，即隐士阶层，其中有的是洁身自好、抱朴守真的“真隐”，如陶渊明，

但也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的“伪隐”，如本文的抨击对象周颙。本文以“移文”(古代文书的一种，旨在宣述自身的意图，使对方明白)的形式，深刻地嘲讽了周颙隐居时的道貌岸然和征召后色变神动的虚伪面目。文章采用拟人化写法，对北山的一草一木，无不投之以情，报之以意，具有动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如写大自然的惭愧：“林惭无尽，涧愧不歇，秋桂遣风，春萝罢月。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通过草木的羞愧之心反衬人的无耻之状，比寻常的直接描述更有力量。

《辞隋王子隆笺》 南朝·齐谢朓撰。中国封建文人或为生计，或为了一展宏图，往往宦海飘零，故多应制之作，本文作者也未能免俗。据《齐书》记载：“谢朓为隋王子隆府文学，世祖敕朓还都，迁新安王中军记室，笺辞子隆。”但和一般的应制之作不同，本篇虽不能摆脱侍从辞章的特点，但却能以“情”贯之。文章先写别情，次及前好，中述去意，末订后期。而其中对“前好”的叙述尤其扣人心扉，是全篇的主干，因为无此“前好”则无此别情去意，无此“前好”，更不会约订后期。

《神思》 选自《文心雕龙》，南朝·梁刘勰撰。这是《文心雕龙》中写得最精采的篇章之一，它相当生动地揭示了文学创作从萌发到完成的整个过程，具有总论的意义。文章主要论述了神思的作用、怎样构思、创作需要保持的心理状态、思言意三者的关系等问题。它不但在理论上比陆机更深了一步，趋向缜密、系统，而且文字的绚烂，也足以与之比肩，如文章的前面对神思的描述，就极富形象性，读之令人思绪飞扬，如翔九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显然，形象化并未给理性的传达造成障碍，相反，为人们进一步领略其中的内涵提供了一个十分感性的起点。

《修竹弹甘蔗文》 南朝·梁沈约撰。沈约一向以“弹奏”之文著称，本篇即以“弹奏”的形式叙述了一个具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因为题材本身即含一定的娱乐性，所以它不象一般的公之于庙堂的“弹奏”之文那么刻板。如文中“修竹”对“甘蔗”的指责：“窃寻甘蔗出自药草，本无芬馥之香，柯条之任，非有松柏后凋之心，盖缺葵藿倾阳之识。冯籍庆会，稽绝伦等，而得人之誉即靡，称平之声寂寞，遂使言树之草，忘忧之用莫施；无绝之芳，当门之弊斯在。妨贤败政，孰过于此。”语气之幽默，足以娱人情怀，而逻辑之严密，又似老吏判案，分毫不爽。难怪有人把它看作一代弹文的楷模。

《别赋》 南朝·梁江淹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出现了以某种情感类型为描述对象的作品，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们在写作上已转向对自身综合能力的训练。但与此同时，也给人们在创作上提出了新的难题，因为同类事物的罗织，固然能在程度上更深刻、更明晰，但也容易因事物之间的分野不明，而造成雷同的毛病。本

篇虽然以“别情”这一情感类型为描述对象，但却能同中求异，以敏锐而细腻的笔调，刻画出其中不同的内涵。达官贵人的离别便免不了一番繁华：“琴羽张兮箫鼓陈，燕赵歌兮伤美人。”游侠剑客的离别则充满了悲壮之气：“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对从军者来说，离别时自然少不了眼泪：“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衣。”可谓形态各一，曲尽其妙。

《恨赋》 南朝·梁江淹撰。这篇作品在方法上完全与《别赋》相同，都是以一种情感类型作为描述对象；在效果上也和前者一样，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古今恨事可谓多矣，但在众多的恨事中，作者只选择了帝王之恨、去国之恨和屈死之恨作为情感的切入点，应该说，这种选择是相当精当的，因为与其它的恨事相比，它们在份量上更为沉重，“恨”的内涵都已经突破个人的天地进入家国的范围，这样，它们激起的回响就不同于一般的恨事。本篇在结构上亦相当严谨，开头由死亡感引入人生之恨，字字千钧，荡人魂魄。在描述了各种不同的“恨”之后，于结尾处又通过不同命运人的死重提恨事，首尾一致，形成一种互相映带的效果。

《广绝交论》 南朝·梁刘峻撰。《梁典》云：“刘峻见任昉诸子西华兄弟等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著葛巾，帔练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广朱公叔《绝交论》。”由此可知，本篇是由感而发的。虽然如此，作者亦未胶著于一人一事，而是把思维的触须伸向了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和现实空间。他首先以十分犀利的笔触对“世交”进行了无情的剖析：一曰“势交”，二曰“贿交”，三曰“谈交”，四曰“穷交”，五曰“量交”；并进而指出由这“五交”生出的“三衅”，即“败德殄义，禽兽相若”；“难固易携，仇讼所聚”；“名陷饕餮，贞介所羞。”有此深刻的背景，以下对任昉生前死后的描述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生前则“冠盖辐辏，衣裳云合，……坐客恒满。”死后则“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这种生前繁华死后寂寞的对立，使作者即发现了道德的沦落也感到了世情的可怕：“诚耻之也，诚畏之也。”态度之峻烈，令卑鄙者震荡，难怪任的那个伪友到溉读后“抵几于地，终身恨之。”

《追答刘秣陵沼书》 南朝·梁刘峻撰。关于此篇的写作背景，《梁书》云：“峻以不得志，著《辨命论》，沼致书难之，言不由命由人，自行书答，往返非一。其后沼作书未出而死，有人于沼家得书，以示峻，峻乃作此书答之”。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与死者虽然在学术观念上相左，但却视之为学术上的畏友。正因为如此，才能产生异乎寻常的深悲：“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简尚新，宿草将列。泫然不知涕之无从也。”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有高山流水失知音的悲慨：“但悬剑空垅，有恨何如？”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读此篇什，真令狭隘者淋然汗下。

《答谢中书书》 南朝·梁陶弘景撰。本篇是著名的写景小品。全文

不足70字，但叙述江南山水之美，生动如画，使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南朝人小品，大都如其学问，清通简要，本篇即其一也。弘景是集儒道于一身的巨子，思辩固然是其所长，但其对自然山水的体验也非一般文人可比。孔子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弘景岂亦仁亦智者耶！

《与陈伯之书》 南朝·梁丘迟撰。伯之本为梁朝属官，于天监元年投降北魏，都督淮南诸军事。天监四年，临川王萧宏北伐，伯之率兵抵抗，宏命丘迟作书伯之，伯之为文所感，复归梁朝。这种"强将投戈"的效果有力地说明了本文的魅力。在文章中，作者除了晓之以常理之外，还根据对方的特殊处境，在心理上下功夫。一是利用传统的夷夏之别，激起对方的民族自尊感，这在今天看来，虽有民族观念狭隘之嫌，但在当时却不失为攻心的上策。二是通过乡国之情，唤起对方对故国的思念，这在家国意识十分强烈的封建时代，是有很大的感召力的；作者深知其中的奥妙，故有意打破了这类文章的常规，对故乡的春色进行了一番渲染。这更给文章赋予一种感性的力量。

《净业赋序》 南朝梁武帝萧衍撰。在中国的封建帝王中，梁武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其对佛教的迷恋尤富传奇色彩。本篇即以宗教精神为依据，叙述了自己的生平志向与行为。它在态度上虽不如曹操的《自明本志令》直率，但毕竟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暴露他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一隅。如谈到自己在学术上如何自励，生活上如何节制，都与实际情形相符。当然，不能否认，这带有明显的禁欲意向，但它在客观上对当时朝野上下的纵欲之风却有着规劝的作用。本篇的文字也非常流畅，如谈家常，娓娓道来，神韵天然。这在六朝文字中也是少见的。

《为衡山侯与妇书》 南朝·梁何逊撰。衡山侯即萧恭，建安王萧伟第二子。本篇即是何逊为之代写的一封书信。代人致书，若使对方不隔，已属不易，况能深通款曲者乎？但本文作者却做到了这一点。神思缥缈，使人如对倩影；别情惆怅，自是心如膏火；而爱念之笃，更非一般念远文字所能企及。另外，本篇虽然在风格上不脱六朝人习气，轻靡典雅，但因文章的主题本在艳情，故自有自然之势，而无做作之态。

《与朱元思书》 南朝·梁吴均撰。在南朝众多的作家中，吴均是以清拔见长的。此篇小品在风格上更是清空省净，风神独秀，为历代文人所激赏。开篇的"风烟俱净，天山共色"虽在语气上有些突兀，但在气势上却有笼罩全篇的效果，如冰雪贯胸，令人尘虑顿消。"自富阳至桐庐"以下为具体描写，虽多用四字骈俪句式，但因视角上富于变化，故亦不乏流转之势。而通篇寓主观喜好于客观描述之中，更使人掩卷遐思，难以去怀。

《文选序》 南朝·梁萧统撰。六朝以前，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便相对忽视了它的审美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以纯美的眼

光对文学进行反思，本文即反映了这一美学趋势。在文章中这一倾向是通过编选标准体现出来的。在萧统看来，如果不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翰”，就算不上文学作品。在这个基础上，他不但大胆地把子、史排除于文学之外，甚至对历来备受尊崇的经书，也投以冷淡的目光。这种做法，似乎有偏颇之处，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矫枉必须过正”的效果。由于儒家诗教的影响，萧统在一些问题上仍摆脱不了迂阔之气，如把男女之情排斥于正常的“情志”之外：“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

《陶渊明集序》 南朝·梁萧统撰。在东晋的诗坛上，陶渊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他在人格上淡泊超然，游离于世俗之外，在文品上则标举自然平淡，与当时文坛华丽玄虚的文风相左，这使他生前寂寂，死后落寞。本文作者可谓别具慧眼，于超然处发现了他灵魂的伟大：“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于平泊处看出了他文章的雄奇：“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这在当时为空谷传响，旷世奇音。当然，这不等于萧统完全深入了陶渊明心灵的堂奥，由于传统的限制，他对发生在陶渊明身上的一些现象，仍然感到困惑，甚至不能理解，以至认为《闲情赋》为“白璧微瑕”。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当时评陶最切实的文字，为后世人们对陶渊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另外，本篇的文字也很有特色，骈散相杂，有顿挫之致，这在六朝时代也是不多见的。

《采莲赋》 南朝·梁萧绎撰。这是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小品，但却写得神采飞扬，趣味盎然，如同一幅沁人心脾的风俗画。作者首先对莲花美好的形态着意渲染，在视觉上造成一种无法抗拒的感召力，继而描述“妖童媛女”在水草内游戏的情节，使人的活动与莲花的美丽相映成趣，收到“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效果。而末尾以歌作结，更姿态摇曳，韵味深长。可以看出，此赋虽在内容上不出男女情事，但在方法上已迥别于六朝人那浓得化不开的艳情作品。它是超尘拔俗的。

《玉台新咏序》 南朝·梁徐陵撰。南朝是形式主义盛行的时代，而最能代表这一时代特色的就是“骈文”。作为一个充分体现官方意志的御用文人，徐陵的作品可以称得上这方面的标本。以本篇而论，便典型地体现了骈文的特征：一、文字工巧华丽。全篇由骈四俪六的句式组成，遣词造句珠圆玉润，灿若云锦。二、讲究用典。文章中几乎句句有故实，非“掉书袋”可以喻之，简直是典故大全。三、内容单薄。大量典故的堆积，不但造成了意思上的重复，还影响了内容的准确传达，使人如坠万花筒中，美则美矣，但终似雾中看花，恍兮惚兮。尽管这样，它在文字上已达到了相当圆熟的境界，因此对文学史上形式主义作家影响还是很大的。

北　朝

《江水·巫峡》　选自《水经注》，北朝郦道元撰，本文描述三峡中的巫峡在不同季节所呈现的不同景致，于雄峻中透露出盎然的古意，因此为历代文人所称道。我们可以看到，同为模山范水，但南北风格却大不相同。一般说来，南朝因受骈俪习气的影响，虽百字小品，亦精心构造，不完全率意而行，在风格上偏于典雅，如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北朝在写作上则比较固守传统，讲究自然的体势，因此神韵古朴。本篇便体现了这一美学趋向。虽然句式比较整齐，但在音韵上不甚用功，描景状物，亦是随手拈来，涉笔成趣，自有一种淋漓潇洒的丰神。

《洛阳大市》　选自《洛阳伽蓝记·法云寺》，北朝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名为浮图立传，实则是一部关于文物、风土、人情的著作，本篇即描述洛阳大市的东南西北四市工商业繁荣的状况。虽然作者在总的篇章结构上严守规则，分东南西北四部进行叙述，但每一部分的构筑却波澜迭起，富有变化。如谈到市东的豪富时，自是史家笔调；说到市南“调音、乐律”二里时，却引出了音乐家田僧超与将军魏延伯的一段纠葛，描写之生动，情绪之激烈，则已具戏剧情味；在谈到市西“延酤、治觞”二里和市北“慈孝、奉终”二里时，插入“骑驴酒”和孙严的掌故，则又近小说风调矣。描述方法随题材的变化而变，且能应付自如，妙笔生花，说明了作者有着非凡的才华。

《枯树赋》　北朝庾信撰。《朝野佥载》云：“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这个小小的掌故说明了此赋在当时的影响。六朝是一个咏物赋高度繁荣的时代，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借助某个中介抒发他们的忧生之嗟，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咏物赋就自然成了他们生命的载体。本篇通过“枯树”这一媒介，表现了人生的漂零之感。尽管作者对枯树的形态、遭遇作了穷形尽相的描写，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的最终指归仍是那割不断、抛不去的生命的忧患，这就是作品最后借桓温之口说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样，枯树之摇落，便是生命的凋零，枯树之悲哀，就是人生的悲哀。

《伤心赋》　北朝庾信撰。前人云：“《伤心赋》者，虽伤弱子，亦悼亡国也。”这很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形。血缘关系在古代中国有着无比神圣

的、其它东西无法取代的意义，本文的写作早有人类本能中面对死亡所表现的恻隐之心的诱导，但更多的却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传统人伦在起作用，这从“痛斯传体……人伦此爱”的喟叹不难看出。因此对后期庾信来说，失去弱子与失去故国，实际上宣布了两大精神支柱的毁灭，即血缘的中断，使他感到了自身消亡的悲哀，梁王朝的毁灭，则使他体会到了报国梦幻的破灭。这样，他的精神状态只能处于无根的状态：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只剩下虚无与感伤，“一朝风烛，万古尘埃！”。

《小园赋》 北朝庾信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有关家居、田园的作品，多半以闲适之情出之，如潘岳的《闲居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谢灵运的《山居赋》等，但此赋读来却全无轻松之感，相反，凄怆之情直透纸背。究其原因，完全是作者的主观心境使然。此时的作者正淹留北地，亡国后的孤寂与痛苦给他眼中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黯淡的色彩，因此，虽有芳草，却“无忘忧之意”，虽有鲜花，但“无长乐之心”，他甚至还发出了这样的问语：“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鱼鸟无情，自然不能理解他的心境，读之令人泣下。文章的末段尤为感人至深，作者说：大错已铸成，即使身落淮海，也难以脱胎换骨，罪孽深重，更非金丹可以逆转，因此只有在昏昧中度过寂寞的一生。一切愤慨、忏悔、悲哀、皆包含在这无情的自我诅咒中。

《哀江南赋序》 北朝庾信撰。在南北朝这一段历史中，庾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由南朝的宠臣转而为北朝的显达，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把他推进了一个难以摆脱的痛苦的漩涡，于是，他悲身世，念王室，述家风，陈世德，通过各个层面表达他的失落之感和乡关之思，《哀江南赋》就是这方面的集大成式的作品。如果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话，亡国之痛对后期的庾信来说更成了他艺术生命的一部分。这位当年梁朝宫廷里的翩翩才子，已消失了过去的潇洒与风流，戴上了命运抛给他的沉重的荆冠，他以沦落者的心理追述昔日的豪华，又以忏悔的身份抒发屈仕敌国的悲哀。这种内容上的变化同时也引起了形式上的蜕变，即由轻绮靡艳进入了沉郁苍凉，因为这是由生命的忧患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因此在精神上就带有很大的自由性与自发性，表现在本序中，虽讲究骈偶，但毫无做作之态，虽处处用典，但了无“掉书袋”之感。总之，情感与形式已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从这一点上讲，他的“暮年诗赋动江关”不是偶然的。

《与阳休之书》 北朝祖鸿勋撰。本篇的主旨是劝说友人激流勇退，回归自然，养志全身。作者首先以自然的魅力相召：“月松，风草，缘庭绮合，日华，云实，旁沼星罗。檐下流烟，共霄气而舒卷；园中桃李，杂松柏而葱倩。”次则用历史的遗训相勉：“夫昆峰积玉，光泽者前毁，瑶山丛桂，芳茂者先折。是以东都有挂冕之臣，南国有捐情之士。”再则借私人的交谊相感：“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携酒登

巇，舒席平山，道素志，论旧款，访丹法，语玄书，斯亦乐矣，何必富贵乎。"真是有理有情，仕进者读后怎能不赧然而生愧色，油然而作云山之想？六朝人关于自然的文字很多，关于友情的文字亦复不少，但如本篇之能切痛人情者，罕矣。

《举贤诏》 北魏孝文帝拓拔宏撰。《魏书》云："太和二十年七月戊寅，帝以久旱，咸秩群神。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丁亥，下此诏。"此为本诏书的写作背景。拓拔宏为北朝比较开明的帝王，其求贤之举在史书中不乏记载，此诏虽不似曹操的一些诏令能给人以剖肝输胆之感，但却不乏厚朴之心与平和之态，如"炎阳爽节，秋零卷澍，在予之责，实深悚栗，""直言极谏，匡余不及"，可谓能放下架子，深达人心，远远非道貌岸然和盛气凌人者可比。

《禁浮华诏》 北齐文宣帝高洋撰。正如题目所明白昭示的，这是一篇针对当时浮华的社会习气而颁布的以"反朴还淳"为精神的诏书，虽然由于传统的局限，它对现实的针砭是建立在封建的等级观念之上的，但对挽救颓风仍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骄奢淫逸的南朝统治者相比，北朝统治者在风格上则偏于质朴，有此质朴，才有此诏书。正如清许梿所评："洞彻末流恶习，大似箴铭格言。谁谓齐梁间尽靡靡之奏邪？今之士大夫，当书此于门屏几席，可以起废疾，针膏肓矣！"

《涉务》 选自《颜氏家训》，北朝颜之推撰。南北朝是一个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分崩离析的时代，这固然给当时的思想界造成了活跃的一面，但在社会风气方面也出现了浮华的倾向，士大夫阶层往往坐而论道，不切实际，生活上则鄙视质朴，崇尚奢侈。本篇即针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作者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立身治家之本，并用它作为考察世态人情的标准。无疑，这有保守和迂阔的一面，但它所体现的务实态度和批判精神却是敏锐而深沉的，如对"勤学守行"和"稼穑之艰难"等问题的强调，就很有针对性和启发性，因为这些都是被时人所遗忘的常理。还有《家训》的阅读对象是家庭成员，所以语气上又尤为亲切，给人以推心置腹之感。 （郑训佐）

隋 唐 五 代

《上隋文帝革文华书》 隋李谔撰。魏晋以降，文风浮华柔靡，不切世用。文帝立意更除，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诏付有司治罪。然积习日久，"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返，"于是李谔上书文帝，

建议从改革文风入手，来转变士风，复兴儒教。文中李谔尖锐地批评了“竞骋文华”的社会风气，他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同时又指出这种风气的危害性：“世俗以此为高”，则世风浇厉；“朝廷据兹擢士”，则吏治败坏。因此，他建议文帝：“请勅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以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李永祥）

《谏太宗十思疏》 唐代名臣魏征的奏疏。贞观十一年（637）四月上给唐太宗，当时由于内外已取得成就，唐太宗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生活也日趋奢侈，对人民的剥削也加重起来。魏征遂上书规劝唐太宗要牢记过去许多人君不能善始善终的教训，要永远“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实行古代圣君的行事准则，广积德义，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文章最后提出“十思”。希望唐太宗通过“正心修身”来达到“治国平天下”。行文次序是先说理，后条陈具体规劝；说理分正反两面，每条规劝也分正反两面，前后映照，逻辑严密。虽然全篇几乎都用偶句，但因文辞质朴，所以并无浓艳、堆砌的毛病，显得平彻而闲雅，从容得体。《旧唐书》称赞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魏征在贞观十一年总共上疏四次，以此篇最受人重视。

《五斗先生传》 唐代王绩撰。写一位“常一饮五斗”的爱酒者，“以酒德游于人间”，“绝思虑，寡言语”，陶然自得。“五斗先生”其实是作者的化身。王绩出身世家，但在隋在唐，官职都不高，自叹“才高位下”。因而他靠着祖传的“东坡余业”，“园林幸足”，在隐逸和醉乡中舒闲地消磨时光。他任六合县丞时，“笃于酒德，颇妨职务”；待诏门下省时，一日酒一斗，被人称为“斗酒学士”；因太乐府史焦革善酿酒，他便“苦求为太乐丞”，得“饱美酒”。王绩之爱酒，不仅是口胃之适，而是把酒抬高到哲学理论的境界，宣扬所谓“可以全身、杜明塞智”的“酒德”，与庄子“醉者神全”的妙论遥相呼应。本文即写除酒以外“不知天地为何物”，有酒则”万物不能萦心。”

《帝京篇序》 唐太宗李世民撰。太宗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帝王好巡视，奢侈浪费，终要导致世乱国亡，所以他力主简朴，就在京城宫殿里住着就够了，不必巡幸天下纵心放欲。因而他写了十首诗，咏京城宫馆楼台、景色风物，题名《帝京篇》。本文是诗的的序，道出了接受历史教训的道理和意义。文章纵观百代，阔大宏放，自有王者气象；语言骈散结合，简炼晓畅。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初唐骆宾王撰。题目一作《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李敬业，唐开国功臣李勣（本姓徐，赐姓李）的孙子，少有勇名，屡从其祖父征讨，曾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后因事贬柳州司马。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李敬业起兵扬州反武后，以骆宾王为艺文令，骆遂作此檄文。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檄文措

词不尽符合历史真相，然就文章而论，的确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气势雄壮，音韵铿锵，尤其“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一句，更是千古名言，久为传诵。（朋 星）

《滕王阁序》 唐王勃撰。滕王阁，为唐朝滕王李元婴所建。上元二年（675），阎伯玙任洪州都督时，重修此阁，农历九月九日在阁上宴集宾客，正好王勃往南方省父经过洪州，参加了宴会，即席赋诗，并写了这篇序文。当时即震惊四座。文章从洪州的地域、人物、写到宴会；接着写宴会的时间、滕王阁的壮丽和登阁眺望中的三秋景物，着重抒发作者的坎坷身世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作者借历史上各种杰出人物的不幸遭遇，抨击封建社会压抑、弃置人才的不合理现象。在“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爱宗悫之长风”等句中，表现他报国的心愿；显示出意气昂扬的情调“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句，也具有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作用。全文感情顿挫起伏，透露出作者飞扬的神采；结构严谨而又挥洒自如，前后照应，脉胳清晰；辞采华美，通篇对仗齐整，声律配置严格，而气势奔放流畅，语言平易自然，用典贴切而不冷僻，体现出骈文进一步格律化和通俗化的倾向。脍炙人口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写景色彩鲜丽，形象飞动，脱胎于庾信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但境界全新，精彩万倍。（闻 涛）

《上吏部裴侍郎启》 唐王勃撰。见《王子安集》卷八。裴侍郎即裴行俭，高宗时官为吏部侍郎，主持典选十余年。裴行俭曾批评王勃等人“虽有才，然浮躁炫露”（见《唐书》本传），王勃遂上此书辩解并阐明自己的文学主张。他沿袭儒家的传统观点，力倡文学的经世致用的教化功能，认为文章应做到“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他批评汉魏以来浮艳雕刻的文风，甚至罪及屈原、宋玉，难免偏激之嫌。然其本意是针对初唐文风华靡纤巧之弊，提出革新要求，即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所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体变……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李永祥）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王维写给好友裴迪的一封短信。作者这篇信中，生动而细腻地描绘了他隐居所在的辋川山庄的景色，并写到游览观赏之“趣”。作者擅长写景，善于熔情，山村冬夜的月色波光，寒林灯火；春季中的春山春树，游鱼白鸥，经作者运笔描绘，无不充满诗情画意，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与他的自然风景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不愧为一则精美的山水小品，一首动人的散文诗，一幅杰出的有声画。（张培坤）

《与东方左史修竹篇序》 唐陈子昂撰。东方左史即东方虬，陈子昂的诗友，武则天时的左史（职掌记录皇帝的起居法度）。陈子昂作诗《修竹篇》以赠之，本文是诗前面的小序，序中认为六朝诗风彩丽竞繁，颓废浮艳，应予以摈弃，而主张恢复建安、正始时期的诗歌传统，标举“风骨”和

"兴寄",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小序虽短，但在唐代文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朋　星）

《与韩荆州书》　唐李白撰。这封信是开元二十二年（734）李白居安陆游襄阳时,写给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处置史韩朝宗的，称韩为韩荆州，是表示特别尊重。李白有经邦济世的大理想，迫切地希望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当时韩朝宗提拔后进享有盛名，所以李白写信给他，想得到他的荐举。文章先由推崇对方写起，并点明自荐之意；接着说自己是特立之才，故敢于自荐；又进一步从对方和自己两方面说，韩有大才，有高名，自己是奇才，能文章，暗示自己必可受到重视。继之再进一步，引古事今事，说明韩能礼贤下士，自己来归并非饥不择食；最后说到具体要求，呈献著作，请求品题。文中恭维韩朝宗的话，虽有过于夸大、华而不实之处，却无寒酸乞怜之态。全篇豪逸奔放，气势夺人，风格如其诗，充分表现出李白自负、傲岸的性格。行文尚带六朝、初唐之风，短句多，常用对偶，如："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读来声调铿锵。

《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　唐李白撰。写他在一个春夜里与诸堂弟在桃花园饮宴、幽赏、清谈、赋诗的情景，表现出作者热爱春天、热爱自然的情怀和逸趣，也流露出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文章在清新俊逸中，透出作者的博大胸襟和豪爽气概。如开篇从宏观的天地包容万物之大反衬人生短暂，渲染出夜宴的大气氛，可谓大手笔。全文仅一百多字，把议论、叙事、抒情揉合在一起，紧扣题目，点出了春、夜、桃花园和诸弟、饮宴等情事，层次多变，转折自如，有行云流水之妙。其中"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古文观止》编者评此文曰："转落层次，语无泛设。幽怀逸趣，辞短韵长，读之增人许多情思。"

（闻　涛）

《吊古战场文》　李华唐开元年间（713—741）为谴责唐王朝穷兵黩武的政策而写的一篇赋。作者由古战场的凄凉景象写到秦汉以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其间充满着他对历代士兵悲惨遭遇的同情，抒发了厌恶战争、反对战争的思想感情。文章着重反对秦汉以来的开边战争。唐玄宗时，大举进行开边战争，人民深受其害。作者最后提出制止战争的办法是：施行仁政，安定四境。因此，本文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文章采用了"铺采摛文，体物言志"的写法，极力铺陈夸张描写，有强烈的感染力。另外，语言流畅，音韵和谐，读来毫不拗口。对后世影响较大。（张培坤）

《河岳英灵集序》　唐殷璠撰。作者收录玄宗开元至天宝初年王维等二十四位诗人的二百余首作品编作一集，题为《河岳英灵集》，在这篇序文中，阐述了他的诗歌见解和编选原则。他历述了初唐诗风演变，认为唐诗在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也"，并以此为准绳："定其优劣，论其取舍"；

“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使“有周风雅，再阐今日”，而对于那些“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作家作品，则“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唐陆贽撰。琼林、大盈二库，为玄宗开元年间创立，“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以供天子燕私”（《新唐书·食货志》），是皇室专用的内库。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军叛乱，占据长安，德宗逃亡，至奉天，“於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榜曰琼林、大盈库”。（郭晔·《陆宣公奏议注》），时陆贽以考工郎中之职从幸奉天，“以为战守之功，赏赉未行，而遽私别库，则士卒怨望，无复斗志，乃上此奏。”（同前）。此文为骈体，“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然而却能做到议论风发，深切著明，流畅贯通，毫无矫揉之态。（李永祥）

《唐亭记》 唐元结撰。山水小品。描述浯溪之上的唐亭的独特景色。文章虽短，但颇有转折，先说于唐亭之上厌见“远山清川”，厌听“水声松吹”，以及“霜朝厌者零雨，方暑厌者清风”，而后突然发出感叹：“厌不厌者，厌犹爱也。”意味深长。文笔平易，简洁无华，清代王符曾在《古文小品咀华》中称此文“脱飞窠臼，卓尔不群，当与柳州诸记并驾。”

《右溪记》 山水游记名篇。唐元结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岭南溪洞夷和西原夷反叛唐王朝，进攻附近的州县，道州（今湖南道县）因此遭受战乱。战争之后，元结出任道州刺史看到城破田荒，哀鸿遍野，遂努力招抚流亡百姓，赈济灾民，上表要求免除百姓积欠的租税，又带领农民开垦田亩，造林养畜，修缮城邑。右溪是道州城西的一条小溪，本文记叙它被整治前后的情况。短文写右溪景色美丽，但是“胃州以来，无人赏爱”，似暗喻作者怀才不遇。文幽渺洁，自成境趣，开柳宗元《永州八记》之先河。

《菊圃记》 唐元结撰。见《元次山集》卷九。文章写于代宗永泰二年（766）。代宗广德元年，元结初为道州刺史，永泰元年罢职，时再度受命为道州刺史。文中叙其前任道州刺史时，曾自远方致菊植于前庭墙下，再来时，菊已遭人践踏至尽，由此而想到贤人君子，立身处世，应慎重选择环境，不要象这些菊花一样落到不为人爱重的地步。作者于是择地重辟菊圃，并作此记。文章简洁整严，于平实的记述中，寄寓作者感慨情思，有着简淡悠远的韵致。

《陋室铭》 唐刘禹锡撰。所谓“陋室”，即狭隘简陋的居室。“铭”，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内容大都是表示颂扬和警戒。文章通过对陋室的生动描写，表现作者不慕荣利，坚贞不屈，孤芳自赏，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品德和精神。全文仅八十一个字，用笔挥洒自如，却又层次清晰，艺术结构非常严谨。开篇借山水作比衬，引出“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主旨，接着写室中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一

联，把静态色彩写成了动态，反衬自己心境的闲静，尤富诗情画意。继之写室中人及其赏心乐事，创造出一个清雅优美的意境。最后将自己的陋室同诸葛亮的茅庐和扬雄的玄亭相比，又引证孔子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作结。全篇文字清丽，格调典雅，抑扬有节，言简意丰，情浓味，有如一首精美的散文诗。

《答柳子厚书》 刘禹锡撰。元和四年（809）柳宗元在永州写信给刘禹锡并寄去其近作，请刘评论。刘当时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写此信作了答复。信中首先抒写了对柳宗元的思念之苦，接到柳宗元信后的喜悦；继而评论柳宗元的两篇新作，申述自己的文学见解；最后又表达自己被贬后凄苦、孤寂心境。作者认为，文学家要“跨跞古今”一往无前，就必须坚持气为主干、文为枝叶的文学创作观点，将“气”和“文”自然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写出思想纯正而意味深长，文笔精炼而含意丰腴，文气雄健而生动，精悍而清新的作品。而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作者还高度赞扬柳宗元的文章“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关于文学批评，作者认为要咀嚼玩味文意，也要注意形式美。但不应局限在辞藻上。又提出能评文者不一定都善作文的意见。因此，这封书信，可以当作一篇言简意赅的古代文论来读。全文感情真挚朴实，议论剀切精当，多直抒胸臆语，间用比喻也准确、含蓄、得体。从此文可见书信到了唐代，已成为散文家得心应手地抒情叙事、发表政治及文学见解的重要工具。

《原道》 唐韩愈撰。议论散文。自韩愈创作“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后，“原”便成为古代一种专门用来推论事理的文章。本文集中表明了作者“崇儒学，辟佛老”的思想主张，一方面探求儒道的本原在于孔孟的“仁义”，另一方面抨击道家去仁义，返荒古，不合“圣人之道”，斥责佛教是“夷狄之法”，指出佛道信徒是游手好闲、靠他人养活的寄生虫。韩愈此文是有感而发的，唐代有寺院约四万所，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余人；道士的数量也很大。这些人不事生产，却占有大批田产，不纳税，不服役，享有特权。因此韩愈痛感这种现象害国害民，力主排斥佛、道。文章结构严谨，气势磅礴，充分体现“韩文如海”的特点。

《原毁》 唐韩愈撰。“原”是古代一种专门用来推论事理的文章，源自韩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原”有推原其本之意，“原毁”就是推论毁谤的根源。韩愈所处的唐代中期，社会矛盾重重，朝官以及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相互毁谤，已流为社会风气。作者怀才不遇，屡遭左迁，对士大夫中那些“责人也详”、“待己也廉”的颓风深恶痛绝，所以在此文中，比较了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待人待己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分析了一般人好诽谤、贬低别人的原因，指出形成这种风气的社会心理就在于“忌”，同时对当时社会上人们互相攻击的现象也表示了愤慨，渲泄了内心的不平之气。全文自

始至终围绕一个“毁”字展开议论，段与段环环相扣，逻辑性很强。通篇运用对比，语言多用排句和偶句，同时句型长短不一而又错综变化，具有散文特有的节奏感。

《伯夷颂》 唐韩愈撰。见《韩昌黎文集》卷一。《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君死，二人让国，闻西伯（周文王）善养老，归周。武王伐纣，叩马而谏。殷灭，耻食周粟而死。韩愈此文，立意在表彰一种“特立独行”，敢于为信念而献身的精神。其曰：“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矣。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可见韩愈并非在宣扬伯夷的逆历史潮流而动“愚忠”，而是借题发挥。曾国藩曰：“举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之宗旨。此自况之文也。”是有见地的。（李永祥）

《杂说（四）》 唐韩愈撰。这是一篇寓言性杂文，属议论体。全文采用托物寓意的手法，说明千里马不遇伯乐会被埋没，但意在言外，写的是识马之道，指的是知人善任的问题。作者借此揭露出当时亲贵当权而大量人才被压抑、埋没的现象，抒发了胸中的愤懑不平之气。文章用比喻贯穿全篇，把千里马隐喻为人才，把伯乐隐喻为慧眼识英才之人，寓深刻道理于生动的形象之中。构思精巧缜密，而又跌宕有致。全文分三层，第一层提出“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的中心论点，继而指出伯乐不常有，千里马不遇伯乐，也只能被埋没；第二层进一步论述识马的重要性，指出千里马如得不到相应饲养条件，就连普通马的能力也不可能达到；第三层描述庸人不识马的愚昧和空嚷“天下无马”的丑态，慨叹世人不识马，呼应开篇。文笔曲折又畅达，是一篇短小精悍、内容犀利、形式活泼的好文章。

《圬者王承福传》 唐韩愈撰。“圬（wū）者”：圬，涂抹、粉刷墙壁。圬者，即俗称的“泥水匠”。这篇传记，记述王承福当了十三年兵，立下功勋，却放弃做官回到长安，凭着手艺勤恳做工养活了自己。作者赞扬王承福从自己的能力出发，勤于自己适宜的职业的人生态度，讽刺当时社会上那些无才无能、患得患失、追求富贵又“食焉而怠其事”的人，表达自己对富贵者不劳而获、无功而坐享安乐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抨击，规劝人们要度才量力、勤于本业。韩愈为一个在当时被视为卑贱的手工劳动者立传，并认为他“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贤于“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是难能可贵的。但文中宣扬“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却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文章突破传记体文传统的、固定的格局和内容，着重记叙传主的言论，借以表达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在记叙传主言论时，多用对比手法揭示两种人生态度，夹叙夹议，衔接自然；又多用平易流畅的口语，句读或长或短，舒

展自如。结尾处又对王承福其人、其事、其言加以评赞，把全文主旨表达得十分圆满。（阎　涛）

《答李翊书》 韩愈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是答复古文家李翊关于写作问题的一封复信，其中涉及到唐代古文运动中的许多理论问题。信中强调写文章、学古文的根本问题是按照儒家的“仁义”的观念来提高作家的道德修养。只有“处心有道，行已有方”，才能够文笔奔放，纵横自如。作者在概述自己的写作过程中，特别提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文”与“气”的关系问题。信札非常简洁，开头用设问句提出论题，以引起注意，然后摆出观点，分层论述，条理清晰，句式长短错落，声调和谐，读来气势酣畅，充分体现出韩文“气盛言宜”的特点。

《送李愿归盘谷序》 赠序散文，韩愈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冬。当时韩愈在京师求官，一直未能如愿，所以牢骚满腹，写此文送给李愿（生平不详），借以曲吐心声。文章别具一格，除前以数语写盘谷（唐孟州济源县，今河南济源北）、后以歌咏盘谷为作者口吻外，中间主要篇幅都是记载李愿讲的一番话，着意形容了三种人：做了大官的人，不做官而隐居的人，奔走权贵之门干谒的人。实际上是在鄙夷官僚的声威显赫和骄奢淫逸，赞美山林隐士的潇洒高洁和自由自在，嘲笑官迷们的蝇营狗苟和趋炎附势。文章既采用散文笔法，恣意挥洒，又吸收赋的特点，整齐偶丽，音调铿锵。宋文学家苏轼对此文评价极高：“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与于襄阳书》 韩愈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是年秋，韩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为唐代文散官的最低一级，为此他郁郁不平，写信送给以工部尚书的官衔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于頔，以求引荐。于字允元，因所辖道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故称为于襄阳。信的前半部分泛论“先达之士”和“后进之士”相须以存的关系，后半部分表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况和急切希望受到荐举奖掖的心情，既恭维了于，又表白了自己的心声，“两存地步，不失轻重”。虽然于并非伯乐，没能帮助韩愈解决实际问题，但韩愈这封求人引荐的信却流传下来，广为传诵。

《送孟东野序》 唐韩愈撰。赠序散文。孟东野即孟郊，湖州武康（今浙江省武康县）人，中唐时期著名诗人。一生仕途不得志，穷困潦倒，四十六岁始中进士，以后闲置多年；贞元十九年（803），五十多岁时被任命为小小的溧阳（今江苏溧阳县）尉，郁郁寡欢。韩愈遂写此序，予以宽慰。文章用历史上善作不平之鸣的政治家、学者、诗人来衬托孟郊，赞扬孟郊正是当代的“善鸣”者。最后又以“富贵由天命，半点不由人”的解脱法来安慰孟郊，既流露深深的同情，又委婉含蓄地批评了统治者的压抑人材。

文章立论精辟，笔力雄健，句法变换多样；而文中提出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的论点，亦对后世的文论影响很大。

（朋　星）

《师说》　唐韩愈撰。“说”，是古代论说文的一种。这篇文章精辟地论述了教师的作用和从师学习的重要性，批判了当时士大夫阶层以从师为耻的恶劣社会风气，对那些诽谤他“好为人师”的人予以有力的反击。文中提出的人“非生而知之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今天仍存在积极意义。全文落墨紧扣题旨，有破有立，虚实相间，层层展开，说理透辟。作者充分运用对比和排偶手法，使文章气势异常充沛。其中有“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对比，有“小学”与“大遗”对比，有“巫医乐师”等与“士大夫之族”对比，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有理有据，形成一种无可置辩的逻辑力量。文中既大量运用排偶句式，又注意句法的错综多变，读来语气流畅，富于节奏感。

《祭十二郎文》　唐韩愈撰。这是贞元二十年（804），作者在京师任监察御史时为祭他侄子十二郎而写的祭文。作者幼年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自幼及长都和十二郎生活在一起，虽为叔侄，实同兄弟，感情极深。十二郎的死，使他悲痛欲绝，并引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以及对眼前情景的忧虑，因此在祭文中抒发了深切的悼念、无限哀思，充分地表达出恳挚的骨肉之情和对宦海浮沉的人生感叹。作者将几十年的家境、身世都流注于笔端，叙述和十二郎幼年相依，形单影只的孤苦，成长后的几经离合，两人分隔东西不能相顾的缺憾，自己的衰病，闻噩耗后悲极生疑、似信非信的心情，以及对死者后事的安排等等琐碎家事，把亲切的叙事和浓郁的抒情融而为一，写得一往情深，凄楚动人。作者一反传统祭文的固定格套，破骈为散，用纯净的散句单行形式抒发哀感，又以家常语叙写生活小事，通篇以汝与吾相称，如对活人晤谈，达到了情真语真、自然成文的高境，被誉为祭文中的“千古绝调”。

（闻　涛）

《荆潭唱和诗序》　唐韩愈撰，见《韩昌黎文集》卷四。《唐书·艺文志》载裴均有《荆潭唱和集》一卷，均于德宗贞元十九年为湖南节度使，同时杨凭为湖南节度使，二人诗文往复，部属之吏亦属而和之，编为斯集。韩愈序中提出一个卓有见地的论点，其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是对司马迁文章“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观点的进一步阐发，概括了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同时也包含着作者自己多年的创作体会。作者在《送孟东野序》中所云：“文穷而工”，“物不平则鸣”，也是这个意思。

（李永祥）

《毛颖传》　韩愈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毛颖”即毛笔，因古时笔以

直兔毫制成，有锋颖故名。本文以笔拟人，形式上模仿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首段记毛颖家世，中间几段叙述毛颖的生平、友人和晚境，末一段以“太史公曰”的方式抒发议论，巧妙地借毛颖始而见用、“老而见疏”的经历，表达了作者自己怀才不遇、迭遭贬黜的愤慨。全文虚虚实实，多用双关语，语言诙谐，妙趣横生。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唐韩愈撰。温处士，名造，字简舆，唐并州祁（今山西省太原）人。初隐王屋山，故被称为“处士”。后入寿州刺史张建封的幕中，张移徐州任节度使，被聘为节度参谋。宪宗元和五年，温造应召入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节度使乌重胤的幕府。当时，韩愈居洛阳，与温造等颇有交游，虽爱惜他们的才能，但对他们以隐士之名而趋附藩镇官僚，是心有不满、不能赞同的。本文表面上的比喻手法颂扬乌重胤识才爱才，又夸张渲染温造才高望重，实则是正话反说，暗含讽谕。（朋 垦）

《送穷文》 唐韩愈撰。相传古高辛帝有子名叫穷子，喜敝衣粗食，死于正月晦日，这一天人们陈破衣稀粥于门外祭之，号为“送穷”。韩愈此文作于元和六年正月晦日，时年四十四，任河南令。文章模拟扬雄《逐贫赋》，采用赋体常用的主客对答形式，以反诘修辞手法，来表现自己的个性、品德和才能，说明自己做人骄亢坚正，不信命运，不慕虚名，治学勤奋精深，为文不追时好，处事勇于负责，交友坦直真诚。恰恰因为这样，反而不为世俗所容，经常遭受排斥和打击，时时为穷神缠扰。作者寓庄于谐，嘲讽了当时的世俗，寄托了自己不遇时的不平和愤懑。（李永祥）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韩愈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董邵南是寿州安丰（今安徽省寿县）人，韩愈的挚友。中唐时期藩镇跋扈，河北地区处于割据状态。各地藩镇为增强实力，对抗朝廷，都广泛招揽人材，而失意之士为谋出路，也不惜依附投靠，托身幕府。董邵南于元和年间应试未中，郁郁不得志，便准备远游河北。韩愈在文中对董的遭遇表示深刻同情，但又不希望董去投靠藩镇，表明了反对分裂割据、拥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全文以“古”“今”二字为行文关键，以“吾知”、“吾恶知”转折呼应，深婉含蓄，短而曲折，表达了作者深长难言的劝讽之意，耐人寻味。

《进学解》 唐韩愈撰。作者于二十五岁登进士第后，仕途坎坷，屡遭贬逐。唐宪宗元和七年（812）他从职方员外郎再度贬为国子博士后，写成此文，时年四十五岁。文章构思奇特，通过设问设答，反话正说，含蓄地宣泄了不被朝廷重用的牢骚和愤懑。其中“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的见解，是韩愈对前人和自己关于治学、行事的经验总结，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全文以散文句式为主，同时运用排比对偶句，韵散相间，流畅自如，而且加工提炼了古代语言和当时口语，造语精粹，鲜明生动，如“同工异曲”、“动辄得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佶屈聱牙”、“含英咀华”、“爬罗剔抉”等等，至今仍

有很强的生命力。（朋　星）

《获麟解》 唐韩愈撰。本文托物寓意。通过谈麟表达了对封建社会里人才不被赏识和理解的感慨，也表达了作者对“圣明之主”的幻想。文中说，即使妇女小孩，都知道麒麟是一种祥瑞之物，但一般人很难认识它。不认识它，称之为不吉祥的东西也是应该的。麟之所以为麟是由其品德决定的，而不是由其外形决定的。麟出现，必定是圣人在位的时候，圣人认识麟。如果麟不等圣人出来自己就出现了，则是不祥。这一议论可以看作作者不遇于时的愤世之言。本文主要特点，在于善用转折手法，文中凡五转，如游龙，如辘轳，变化不穷。（张培坤）

《蓝田县丞厅壁记》 唐韩愈撰。蓝田，在陕西，其县丞崔立之，字斯立，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中进士，六年中博学宏词科。韩愈与之交往甚密，曾有诗赠寄。本文写崔立之以奇崛之才，竟只能屈就小小的县丞官职，“噤不得施用”，终日寂寞无聊。全文纯用戏谑笔法，诙谐笑傲，而实则内含沉痛，悲慨贤人失意，抒发怜才共命之意，堪称“带泪的笑”，是一篇“迸作血泪，染成杜鹃”的文章。

（朋　星）

《祭鳄鱼文》 唐韩愈撰。这篇文章是元和十四年（819）作者初贬潮州任刺史时写的。据《新唐书》本传载，他到任不久，了解到当地恶溪中鳄鱼危害很大，便采取有效措施，驱除了鳄鱼。文章即为此事而发，表现了作者关心人民疾苦，勇于为民除害的精神。不仅如此，从作者对鳄鱼义正辞严的声讨之中，还流露出他对人间一切邪恶势力（尤其是割据一方的藩镇割据势力）的痛恨之情。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堂堂正正、大义凛然的讨贼檄文。全文有三个大的层次，写得层层深人，而又波澜起伏，气势非凡。开头从先王有德说起，谈到鳄鱼潜伏溪潭，乃是后王德薄所致，并不怪罪于它。这是欲擒故纵，为下面转折蓄势。继之，指出当今天子“神圣慈武”，天下大治，刺史要“守土”“治民”，情势大变，决不许鳄鱼再危害百姓。文势紧迫，造成了势不两立情态。到第三层，又突作弛宕舒缓，对鳄鱼晓之以理，威之以势，为其指明出路，劝其自迁，而且一再宽限时日；最后才发出“最后通牒”：若不按期归海，“必尽杀乃止”。文章至此戛然而止。结尾“其无悔”三字，笔力千钧，气势逼人。全篇文句生动，语言刚劲有力，于幽默之中寓嫉恶如仇的浩然之气。（闻　涛）

《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柳子厚即柳宗元，韩愈的好友，二人同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死后，韩除为柳写了本篇墓志铭以外，还写了《祭柳子厚文》和《柳州罗池庙碑》，表达对死者的悼念。本文概括了柳宗元的一生，着重赞扬了他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对柳的坎坷困顿和抑郁而死表示婉惜和同情。但由于作者不满王叔文等人，所以文中对柳参加永贞改革持不赞许态度，认为是“不自贵重顾藉”。文章对小人落井下石的分析尤为精彩：“士穷

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全文在叙述中有议论，写得含蓄委婉，情真意切。

《封建论》 唐柳宗元撰。贞元年间，柳宗元因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集团而被贬在荒僻的永州（今湖南零陵县），但他仍十分关心政局，尤其牵挂唐王朝是统一还是分裂这一重大问题。当时藩镇割据，主张“分封制”的论调甚嚣尘上。柳宗元针对现状，研究了大量史料，论证了“郡县制”比“分封制”优越，说明了一切政治制度都由时势造成，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从而对中国历史上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问题的争论在理论上作了极其出色的总结。文章战斗性很强，观点鲜明，说理透辟，通篇以史实作依据，从分析批驳中阐明自己的论点，同时内容丰富，逻辑严密，宏论雄辩，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政论文。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作于唐德宗贞元末。文章虚构了一个善于种树的人叫郭橐驼，他以老庄哲学来种植树木，顺从树木的天性，既不揠苗助长，更不“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因而获得成功。贞元末，柳正积极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的政治革新活动，对当时的扰民政治深恶痛绝，因而写此文以讽谕。文章以平常事物为喻，浅显明白，言近旨远，笔调活泼生动。按照“卒章显其志”的方式，篇末点出“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两句，并特别注明“传其事以为官戒。” （明 星）

《捕蛇者说》 唐柳宗元撰。这是元和年间作者贬为永州司马时写的。文中写捕蛇者蒋氏，祖孙三代都以捕蛇来抵偿租税，他的祖、父都被蛇咬死，他捕蛇十二年，亦多次几乎送命。但他宁愿继续冒险捕蛇，而不愿改换职业去完粮纳税。作者通过他的遭际和控诉，反映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流离颠沛、饥饿死亡的惨状，有力地抨击了当时毒害人民的苛政。作者自己很少说话，而是借捕蛇者之口立言，真实深刻地刻画捕蛇者无限悲伤凄楚的心理，可谓字字血，声声泪，也处处渗透着作者悯时忧民之深情。通篇以赋毒与蛇毒互为映照，对比衬托。如开头就写“异蛇”之毒，而永州人竟为捕蛇“争奔走焉”。第二段更连用五组对比：蒋氏捕蛇之“不幸”与纳赋“不幸之甚”；蒋氏因捕蛇而生活未困，与“乡邻之生日蹙”；蒋氏因捕蛇而“独存”，与乡邻受赋害“非死而徙”；蒋氏不受悍吏之掠，与乡邻倍受悍吏之扰；蒋氏捕蛇“一岁之犯死者二”，与“乡邻之旦旦有是”。作品还写蒋氏反对蛇毒为安、为利、为乐。层层的对比反衬，突出了“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主题。全文虽就孔子“苛政猛于虎”一语立意，却因善于构思蓄势，文字简劲，故写得抑扬起伏、婉转曲折，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闻 涛）

《愚溪诗序》 唐柳宗元撰。唐宪

宗元和五年（801），被贬在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的柳宗元迁入冉溪边上的新居，改溪名为“愚溪”，并为此作《八愚诗》（已佚），本文就是为该诗写的序文。愚溪，潇水的支流，据《舆地纪胜》记载，“在（永）州西一里，水色蓝，谓之染水，或曰冉氏尝居于此，故名冉溪”。序文描绘了溪水的奇景异色，说明了更改溪名的原因，着重抒发了作者才智难以施展，埋没荒山野水的抑郁心情。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唐柳宗元撰。王参元，唐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人，鄜坊节度使王栖曜的小儿子，柳的朋友，宪宗元和二年（807）中进士。王家积财丰厚，十分富有，但一场天火，将财货烧得荡然无存。为此柳宗元写信慰问。文章写法一反常理，出人意外：对朋友家失火不但不表示痛心，反而“幸灾乐祸”，说了一番“将吊而贺”的原因，借以批评官场中造谣生事、妒贤嫉能的污浊风气。文章析理透辟，充满耿耿正气。（朋 星）

《永州八记》 唐·柳宗元撰。作者谪居永州期间，写有山水游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统称“永州八记”。“八记”各自独立成篇，但所记游踪有一定的联贯性，在借山水以吐胸中之气这点上又有它们的一致性。它们继承了郦道元《水经注》生动地刻画山水景物的传统，又作了发展。柳宗元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思想感情融合于自然风景的描绘中，使作品或隐或显地活动着他的身影。他借被遗弃于荒远地区的美好风物，寄喻自己的不幸遭遇，倾注怨愤抑郁的心情，创造出一种凄清幽冷的独特艺术境界。他对自然美观察深刻，感受入微，运用简洁凝炼的文字，峭拔峻洁或清深奇丽的诗笔，描绘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的形态、色彩、声音、动静、远近、氛围等，无不生动逼真，传神入妙。如绘山水草木之色，或“纷红骇绿”，或“萦青缭白”，写丘石之状，或如“牛马之饮于溪”，或如“熊罴之登于山”；绘溪水之形，或则“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或则鱼“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都可谓臻于化境。“永州八记”为古代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影响深远，后人写游记者，往往奉为楷模。

《始得西山宴游记》 唐柳宗元撰。这是作者山水游记散文“永州八记”的第一篇，描述发现并宴游西山的始末。文章开头写他贬官永州后的忧愤心情，结尾写出山水之美，使他“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从而表明他是借山川风物排遣忧愤。作者还借写西山的高峻特立，借写登临眺望、目极数州的壮阔气势，曲折地显示自己不与庸俗小人为伍的高洁正直品格，以及阔大的胸襟。文中描绘西山的高峻特立，不直接从正面着笔，而是通过写登上山顶鸟瞰与远眺所见的尺寸千里景物和西山与天地自然的契合神会，从侧面烘托，从而成功地画了一幅色彩鲜明、境界壮阔的山水图，创造了一个气势恢宏而又清峻脱俗的艺术意境。作者精心锤炼动词和形容词，

使之与所涉及的景物对象配搭熨贴，又能给人一种连续不断的运动感，显出作者体物入微、造语入化的功力。在章法上，正如清人孙琮所评："篇中欲写今日始见西山，先写昔日未见西山，欲写昔日未见西山，先写昔日得见诸山。盖昔日未见西山，而今日始见，则固大快也；昔日见尽诸山，独不见西山。则今日得见，更为大快也。"（《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全篇在体物抒情、寓意寄托以及叙写游踪等方面，都为领起后面几篇游记作了铺垫。

《钴鉧潭西小丘记》　唐柳宗元撰。这是"永州八记"中的第三篇，文章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所弃的遭遇，以及作者由此产生的感慨，开头即照应前两篇，点出西山、钴鉧潭和小丘的发现经过及其方位、距离，由此可见这组游记各篇既相对独立又前后联贯的特点。本篇突出地运用了暗喻。作者极力描写小丘经过"铲刈秽草，伐去恶木"所显露出来的被隐蔽的美，并用自己陶醉其中的感受来衬托这种难得的特异之美，是为了借这块"唐氏之弃地"自况，暗寓自己被唐王朝放逐远州，不能施展才能的抑郁之情；又以小丘价廉而"连岁不能售"，隐含自己不被人知、久贬不迁的愤懑不平。篇末贺小丘终被人识，既反衬自伤不遇，也蕴蓄着欣羡与期待。由于运用了以乐言忧的手法委婉曲折地表现自己心境，使全篇笔致幽冷，寄慨深远。本文还成功地运用了比拟手法。如把小丘上的群石比为牛马饮溪，熊罴登山，化静为动，肖貌传神，把无生命的石头写活了。又如把天色、水声、空灵的境界、幽静的气氛都赋以灵性、以人格化，使之与自己的耳目心神默契相会，从而写出了难以言传的佳趣。此外，在章法上的埋伏照应，布置自然，浑化无迹，都值得反复体味。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唐柳宗元撰。这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作者以简洁凝炼之笔，仅用一百九十三字，便引人入胜地记叙了游览小石潭的全过程：前往——游览——离去。文章以小石潭为刻划重点，较详尽地描绘了澄澈明净的潭水，争奇斗异的潭石，青翠摇曳的树、蔓，动静自如的游鱼，下澈潭底的日影，并简略地勾勒出在潭上远望中溪流蜿蜒曲折、明暗隐显的特点。同时，作者又融情于景，写出了他在游览时的心情变化：先是游兴极浓，伐竹取道而往；继而满怀喜悦地赏览潭景，体味潭中鱼似与游者相乐的佳趣；最后以其境过清，怆然离去。这就含蓄地透露出他在谪居中忧谗畏讥、孤寂悲哀的心境。作者善于抓住景物的特征取喻摹写，如用"如鸣佩环"拟水声，用"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状小溪，用"犬牙参互"状岸势的参差不齐，都逼真维妙，形神俱现。最妙的是"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一段，用以实写虚手法，借潭中游鱼如乘空飞翔衬托潭水清洌，又借日光下澈写出石上鱼影，并从鱼影变化中映现鱼儿或游或息的活泼姿态，还把鱼和人的心情结合起来

写，达到了绘形、绘神、绘影、绘色，具有无穷诗情画意的超妙境界。

《袁家渴记》 唐柳宗元撰。这是"永州八记"的第五篇，写袁家渴的风光特色。袁家渴是一个宽阔洄水湾，在永州南十里，因曾有姓袁的人居住，故称。"渴"，水反向而流，指洄流，作者尽力写出袁家渴的幽丽奇特，就是要含蓄地表现一种被遗弃、被埋没、无人认识到的山水之美，借此寄托他胸中的愤懑。文章层次清晰，详略得宜，有步步引人入胜之妙。第一段写袁家渴的方位，运用了从大到小、以宾陪主的手法，借永州诸胜为宾，以衬托、突出袁家渴。第二段写袁家渴的流水特点以及渴中洲、溪、潭、渚，用简炼生动的文字勾勒。其中"舟行若穷，忽又无际"，写船在江峡中航行景象，已显露出诗的境界。第三段写水中的山，开始细致地描绘山上的草木，美石、岩洞、景色愈益幽奇，并为下文特写风中奇景伏笔。第四段是全文重点，也是最精彩之处，作者巧妙地把众草木以及水石皆置于大风之中，以渲染一风统摄众景，使一座静山生气勃勃。文中写出风声、水响、花香、波涛冲击、急流回旋之状，还以"纷红骇绿"的警句，用拟人化手法表现出风中花草的奇光异彩和惊骇神态，尤富诗情画意。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中说，作者心含"静气"，笔带"诗情"，才能写出这段妙合"画理"的文字。

《石渠记》 唐柳宗元撰。这是"永州八记"的第六篇，描写流经石渠的泉水和泉上景物，文章后半部着意写他焚烧杂草腐木、开凿土石疏通泉水的经过。表面上似是客观记述对石渠的整治，其实委婉地表达了作者不甘心美好事物遭受遮蔽、压抑，坚决伐丑扬美的人生态度。作者捕捉住渠中泉水细微、幽静、绵长的特征，选用"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旁陷岩石下，堕小潭"等字句，具体、准确、逼真地描绘，使之有别于钴鉧潭的秀美，小石潭的清幽，以及黄溪二潭的奇丽。文中对泉上景物的描写，繁简得当，对于在永州山上司空见惯的泉上树木、花草、竹子等轻轻一笔带过，重点描绘风吹树木发出的回响。"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十六个字，妙写视觉之静和听觉之动；而风吹树木，回声激荡山谷，借动态衬托出一个无比幽静、旷远的境界。正是因为作者对自然美有着独特的感受，才能写出了别人从未发现的诗意。

《小石城山记》 唐柳宗元撰。这是"永州八记"的最后一篇。文章第一段写小石城山的方位和奇异的自然形貌，在作者富于想象力的文笔下，那些犹如城上矮墙、屋梁和碉堡的石头成了一座神奇的小石城。山上没有土壤，却生长着秀美的树木和竹子，它们参差错落，疏密俯伏，高低有致，使他感到一切好似智者的有意安排。于是自然引出第二段的议论，作者是杰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显然不相信天神存在，他在本文中关于造物有无的议论不过借此抒发他对小石城山奇异景象的惊叹赞美，并借写它的不在中州，千百年不能为人所识，来吐

露自己久被朝廷所弃的愤懑。文末明确表示对两个“或曰”的不相信，则表明他不肯乐天安命，自我陶醉，决心与统治者委婉抗争的态度。正如明人茅坤所云：“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唐大家柳柳州文钞》）“永州八记”的其它几篇，都是描写山水景物的奇丽与游赏情致，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其中，虽多有寓托，也是含蓄不露，不动声色。而本篇则引出一段议论文字，这是有意对这组游记作点题和总结。文章的议论，处处不离小石城山之景，饱含感情，反复抑扬，无平铺直叙之弊，而有奇崛诙谐、变化不测之妙，结尾更有不尽之意。全篇哲理思辩色彩浓厚，感情倾向强烈，短小而有气势，在“八记”中颇具特色。

《游黄溪记》 唐柳宗元撰，元和八年（813）作者随永州刺史韦中丞前往黄神祠求雨，得游黄溪，而作此记。文中先写黄溪山水甲于天下，次写黄神祠和黄溪两潭，最后写黄神。作者着意显示黄溪山水不为人知的奇美，含蓄地表现了自己饱受压抑的才能抱负；黄神因王莽改革失败逃到永州，也隐喻自己因永贞革新破灭被贬至永州的不幸境遇；至于赞颂黄神生前能使“民咸安焉”，被当地人民尊为“有道”之人，死后受到人们的祭祀，更是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文章写景善于移步换形，捕捉突出特征，随景物变化而变换笔墨。如写山，由总体到局部，突出的是有如丹碧的色彩美。写初潭，侧重写水，突出其奇丽。用“若剖大瓮，侧立千尺”写壁立深邃之状；用“黛蓄膏渟，来若白虹，沉沉无声”写潭水的青绿、幽静，以及润滑的质感，又以游鱼动态反衬潭的清幽，显出水的澄澈。写第二潭，重点却在石，用几个贴切的比喻写潭石的巍然奇状，用白描手法写东向而立的红头黑翅大鸟。继之，又借大冥川的山舒水缓反衬两潭之奇丽险绝，从而绘出一幅景物多变使人目不暇给的山水长卷。文章在章法结构、句式的对照和变化、层次的衔接等方面亦颇见工力。如开篇采用由远而近，逐步缩小范围的方法，层层突出黄溪，颇引人入胜。林纾盛赞本篇是“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虽合荆、关、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柳文研究法》）。 （闻 涛）

《三戒并序》 柳宗元贬官永州时所作。每则一事，都说明应该引以为戒的问题，合为一组，题名《三戒》。开头一段是序，说明写作意图，为全文的总纲。其中“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是文章的主旨。三则寓言一则写主人庇护的小麋，恃宠狂傲，不知轻重，一出家门就被狗吃掉；一则写外强中干的黔驴，一旦被老虎识破真本事，马上粉身碎骨；一则写因主人纵容而猖獗一时的恶鼠，最终逃不脱死亡的厄运。三则故事都讽刺告诫了那些恃宠骄纵、外强中干、恶贯满盈的人物。短小精悍，生动贴切，寓意深刻。每则结尾，寥寥几句，点明题旨，语言锋利。

《罴说》 唐柳宗元撰。借写楚国一猎人吹竹管引野兽，最后引来了凶猛的罴把他吃掉了。说明“不善内而

侍外"是危险的，规戒那些不求上进、身无一技，而又专想趋炎附势的士大夫。短文含义深刻，文字精炼，清代王符曾在《古文小品咀华》中赞扬"此百炼精金也。不愧与韩并驾。中、晚以后绝响矣。"

《段太尉逸事状》 柳宗元作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段太尉，名秀实，字成公，官至司农卿。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朱泚反叛，段秀实因反对朱称帝而被害。唐德宗贞元十年(794)柳宗元了解到段秀实的逸事，遂写成文章呈给史官韩愈，以为段秀实树碑立传，文章记述了三件逸事，一是段秀实严惩残害百姓的兵痞，二是段秀实卖马代农民还租，三是段秀实坚决拒收朱泚的礼物。文章主要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说明问题，虽然作者很少议论，但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爱和憎；又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刻画了段秀实廉洁爱民、操守坚贞的形象。

《送薛存义序》 唐柳宗元撰。薛存义，柳的同乡，曾在永州零陵县(今湖南零陵县)作代理县令，离职时，柳赠此序。文中斥责当时一般官吏鱼肉乡民，盘剥百姓，认为真正的官吏应该是为人民办事的，应当"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做到"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文中所发挥的"为吏者人役也"的思想，颇似今天人们所说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文章短小精悍，言之有物，诵之有情。 （朋 星）

《题燕太子丹传后》 唐李翱撰，见《李文公集》卷五。《史记》无燕太子丹传，此文所题似是小说《燕丹子》或《战国策》、《史记》中有关燕太子丹的记载。文中指出，荆轲受燕太子丹之谴，欲效曹沫劫齐桓故事，生劫秦王政，迫使秦归还侵占的六国土地，事败而殉，虽不愧为壮士，然而却是一个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之人。秦王政不同于春秋时齐桓公之类霸王，齐桓公欲称霸诸侯，故而须讲信义以树威；秦王则欲为帝天下，并吞诸侯，故生劫之事不可能奏效。另外燕太子丹本心是报私仇，并非为六国，荆轲也不明白这一点，身死而无功。这篇说理短文精警透辟，有独到之见，行文纡徐跌宕，从容不迫。

（李永祥）

《与元九书》 白居易唐元和十年（815）写给其好友元稹的一封信。信中阐述了他的诗歌理论，对政治讽喻诗作了总结，是关于诗歌的一篇重要论文。作者回顾了诗歌创作的历史，对《诗三百》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作了肯定，指出诗人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深刻地反映现实。文中对晋宋以下嘲风雪、弄花草的浮靡诗风加以鄙薄，提出了自己的创作观点，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指出诗歌的作用在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些主张，直到今天仍具有可取之处。作者也在文中宣扬了他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显然与他的以上主张相矛盾。另外，白居易强调文章"为时""为事""为民""为物"而创作的目的，主要是"为君"，是"愿得天子知"，这表现了他

的局限性。文章先叙写信因由，后叙写信时的心情，行文自然，一气呵成。言之有据，语言犀利，很有气势。

《荔枝图序》 白居易唐元和十五年(820)写的一篇介绍荔枝的短文。荔枝出产在广东、福建省，唐朝时候在长江三峡一带也有出产。当时的北方人大多只是听说有之，而亲见者少，所以白居易在产地见到，就以文配图加以说明。文章着重说明荔枝的形态，尤其是果实的形态，用了不少比喻来描绘它的外形、核、壳、膜、瓤肉和浆液的味道，并突出说明荔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尽去矣”的特点。文章写得精炼、逼真，给人印象清晰。

《冷泉亭记》 白居易唐长庆三年(823)所作，旨在阐发山水佳境有益于身心、陶冶性情的美育作用。文章集中抒写在冷泉亭所感受到的情趣和所得的启发，并没有对冷泉亭本身作大量描写。文章结构简洁，层次井然，有叙述，有议论，重点是议论；而议论从景出，情理融为一体，谈起来富于情致和理趣。尤其是中间一段，从冷泉亭春日夏夜的情趣，归结到人的情操的潜移默化，有情有景，有理有致。 (张培坤)

《答李生第一书》 唐皇甫湜撰。见《皇甫持正集》卷四。这是一篇答复青年学子问学的书信。韩愈论文，有追奇尚异的主张，作为韩门弟子的皇甫湜也崇尚奇异。信中指出“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也；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这正如虎豹之文炳于犬羊，鸾凤之音锵于乌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认为青年学子正值气盛之时，应“自尽其才”，要有高标准，大气派，“必崔嵬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所谓“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为霸”。而如果对自己降低要求，那“将不胜弊矣！”信中还针对李生的一些观点，教导他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好高骛远，徒为大言，而必须踏踏实实的努力，记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

《文章论》 唐李德裕撰。见《李文饶文集外集》卷三。这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文论，作者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作者对曹丕《典论》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做了阐发，指出“气不可以不贯”，“鼓气以势壮为美”但又“不可以不息”，犹如奏乐之有休止，激川之有迂回。其次作者谈了文旨与音韵的关系，主张文章之美在于“言妙而适情”，不取于音韵”，这实际是针对当时过分讲究音律而流弊于形式主义的骈体文而言，与韩愈提倡古文的主张相呼应。再次驳斥否定文章价值观点，提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文章会“光景常新”。最后以箴言的形式概括为文之大旨：”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怳而来，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无味。琢磨藻绘，弥不足贵”，体现了作者基本的文学主张。 (李永祥)

《阿房宫赋》 杜牧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当时敬宗即位后大造宫室，荒淫无度。杜牧不满敬宗的所作所为，便借此赋来进行讽谏。阿房宫是秦始皇父子刮尽民脂民膏修建

的庞大宫殿，从公元前212年开始营造，到公元前206年工程还未全部完成，项羽兵入咸阳，把它烧成了灰烬。文章通过铺叙阿房宫的华丽与豪奢，借秦王朝的灭亡来规劝唐朝统治者，发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警告。文章前面三段全是骈偶韵文，而最后一段是词句跌宕的散文，使叙述和议论紧密结合，富有变化。在语言锤炼上，独具匠心，炉火纯青。全文有情有义，刚柔相济，文词华丽，想象丰富，堪称唐代文赋的代表作品。

《李长吉歌诗序》 唐杜牧撰。李长吉即李贺，唐代著名诗人，才华横溢而不幸早逝。其友沈子明为他整理遗稿，汇为诗集，请杜牧作序。序文勾勒了李贺诗歌的特点，对其浪漫主义特色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同时也指出其辞胜于理的缺点。文章后半部，运用了排比句式和大量生动形象的比喻(如“风樯阵马”、“牛鬼蛇神”等)。气势充沛，文采绚烂。

《答庄充书》 唐杜牧撰，见《樊川文集》卷十三。庄充以文百余篇献呈杜牧，求作序，杜牧以此书为复。信中首先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提出“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以意能遣词，辞不能成意。”这些主张，显然是针对韩、柳之后，文坛或徒矜高奇、或再开浮艳的不良风气而发的。信中还援古为例，指出“古者其身不遇于世，寄志于言，求言遇于后世也。”诸如司马迁、贾谊、刘向、扬雄等人的文章，并不为当世所重，而他们也并不“求知于当世”，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后世的“声势光明”。后世为其文作序者，都是以其人为宗师的，从而，委婉地拒绝了庄充请他作序的要求。 (李永祥)

《李贺小传》 唐李商隐撰。李贺，字长吉，唐代天才诗人，死时年仅27岁。作者不详写李贺的生平，而只选取一两件轶事，从侧面烘托出李贺的性格和为人。其中记李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已成为诗坛佳话。传记以浪漫主义笔法，写天帝召李贺为白玉楼作记，体现了人们惋惜青年诗人早死的心情；而文章末尾“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的疑问，是对社会腐败、才大难用的强烈控诉。 (朋 星)

《与王霖秀才书》 唐孙樵撰，见《孙可之集》卷二。贡士王霖两次献呈文章于孙樵，请其品评。孙樵对他的文章直率地提出批评，然后正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章应做到“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据此，他盛赞、韩愈等前辈的诗文“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孙樵的这种“矜奇尚怪”、力主创新的文学观点是源于韩愈的，他在信中坦率地说明：“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

于韩吏部退之。”（李永祥）

《书褒城驿壁》　唐孙樵撰。讽刺性杂文。褒城是唐代县名，属山西道兴元府（今陕西省勉县境）。文章先是通过写号称“天下第一”的褒城驿的破败景象，揭露官吏士卒只知贪求财物而不存一点公心的恶劣品质；然后由褒城驿一处的现象，扩大到全国的州县，指责朝廷任免官吏过于频繁，贪官污吏就把官府当作临时住宿的驿站，一上任就急于捞钱，要在较短的任期内捞到尽可能多的钱，生怕“有权不用，过时作废”。朝廷如此任用非人，官吏既是如此心理状态，要想“生民不困，财力不竭，户口不破，垦田不寡，难哉！”基于这种感慨，作者把他的见闻和认识，写在驿壁之上，作为向朝廷的一个建议。今天看来，此文恰好是一篇短小而深刻的“官场现形记”。

《书何易于》　晚唐孙樵撰。何易于，唐代益昌（今四川省广元县）县令，清廉勤政，能为老百姓着想，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朝廷考品官吏业绩，何易于只得到中上，甚至险些因违抗诏书而获罪。另一方面，那些考绩列入上等的，却尽是些媚上欺下的瘟官。本文通过何易于一个人的故事，反映出晚唐昏暗政治的实况，是作者《书褒城驿壁》的姊妹篇，是短小辛辣的“官场现形记”。在写法上，记何易于在益昌的几件事是实写详写，记在罗江（今四川省绵阳县）的情况是虚写略写，虚实相间，极尽腾挪变化之妙。

《招野龙对》　晚唐陆龟蒙撰。讽谕散文。收入《甫里先生文集》。以寓言的形式，写了豢龙与野龙的不同志向及其遭遇。豢龙是被人驯养惯了的龙，甘愿在人的拘养下生活，而野龙却喜欢“观乎无极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的逍遥游。有一天豢龙碰到了野龙，劝野龙改变野性而遵从豢龙的生活方式，遭到了野龙的严厉嘲斥，野龙指出豢龙不过是被人戏弄的玩物而已，到头来绝无好下场。两条龙话不投机，野龙离去，不久豢龙果然成了夏后氏所吃的肉酱。文章通过野龙与豢龙的对话，嘲笑了那些迷恋爵禄，贪图安逸，甘心为统治者所豢养的利禄之徒。同时，对统治者虚伪的怀柔笼络手段也作了深刻的揭露。

《野庙碑》　晚唐陆龟蒙撰。讽谕散文，收入《甫里先生文集》。文章寓讽刺于议论之中，运用映衬类比的手法，借题发挥，别开生面。文中先是叙述“碑”的由来以及为野庙作碑文的缘起，接着具体描述迷信的农民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土木偶像，农民供奉它，害怕它，杀猪宰牛祭祀它，纯是自己愚弄自己。而后笔锋一转，以反语讥刺贪官酷吏有甚于土木偶像，他们骑在人民头上，剥削人民，残害百姓，是有血有肉的偶象，其危害超过土木偶像。文章针对唐末即将分崩离析的危机和乌七八糟的社会风气，无情地剥下了自称贤良的官僚的画皮，形象地点明了害民官吏的本质。作者长于驾驭语言，语言辛辣犀利，形象逼真，痛快淋漓。（朋　星）

《笠泽丛书序》　唐陆龟蒙撰。见《甫里先生集》卷十六。《笠泽丛书》乃

乾符六年陆龟蒙自编。序云："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也。"序中述其编书境况曰："自乾符六年春，卧病于笠泽之滨，败屋数间，蠹书十余箧。伯男儿才三尺许，长毁齿犹未遍，教以乐剥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沌笔供纸扎而已。体中不堪羸耗，持亦隐几强坐。内悒郁则外扬为声音，歌诗颂赋铭记传序，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混而载之，得为丛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集中多小品，"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 (李永祥)

《蒙叟遗意》 唐末罗隐撰。"蒙叟"即庄子，因庄子是战国时代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东北)人。《庄子·应帝王》载寓言："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本文即发挥这篇寓言的"遗意"，写上帝剖分"浑沌氏"以后，以其肢节为山岳，肠胃为江河；又怕浑沌氏复活，乃"孕铜铁于山泽，滓鱼盐于江河"，使人们不停地挖取、打捞。这样一来浑沌氏是不能东山再起了，但人们也将被自己的奇技淫巧弄得精疲力竭。文章师承庄子哲学，阐述"有为"的弊害，当是针对唐末扰民政治有感而发。

《梅先生碑》 唐末罗隐撰。讽谕散文。收入作者《谗书》。梅先生，指梅福，字子真，西汉末年人。曾任南昌尉，后弃官归乡。当时大将军王凤擅权，迫害恐吓正直敢言之士，梅福上书请削王凤权柄，未被采纳。后王莽专权，梅福弃家出走，传说成仙而去。罗隐借叙梅福忧国忧民、上书天子的事件，对西汉末年"天下无道"、"正人在下"的黑暗政治进行揭露和批判。当然也是借古讽今，讽刺唐末腐败的朝政。

《荆巫》 晚唐罗隐撰。讽谕散文。收入作者《谗书》。写楚地有个神巫，起初替人祭祀筵席简单平常，每祈必得，非常灵验；后来他替人祭祀，要备办肥猪肥羊，想不到每次都失败。乡人不解其故，有人揭出了这一秘密：原来神巫早先家里无牵无挂，所以替人祭祀时诚心诚意，因而神的福佑也相应降临；但后来他家生养子女多了，衣食费用也大了，因此替人祭祀时不能安心、虔诚，神也就不赐福保佑。神巫并非以前圣明后来愚蠢，只因有私利牵挂在心，便无暇顾及别人。文章以小见大，借荆巫祈神的故事，暗讽统治者由于"牵于心，不暇及人"，最终必然害国害民，身败名裂。

《英雄之言》 唐末罗隐撰。讽谕散文。收入《谗书》。本文从分析刘邦和项羽两位"英雄"的名言入手，讽刺了那些名曰拯救百姓，实为乘机窃国，满足私欲的所谓"英雄"，是一篇笔锋犀利、富有批判精神的短文。

《汉武山呼》 唐末罗隐撰。讽谕散文。文章首段先发议论，认为人的本性不是一生下来就奢侈放纵的，而是因为不坚守中正的本性而走向败坏；而后以汉武帝为例，写他"承富庶之后，听左右之说，穷游观之靡"，并东封泰山，沉醉于山呼万岁。殊不

知军队劳苦，风俗败坏，百姓困穷，都是万岁之声造成的。文章见解独特，有强烈的讽刺性和揭露性。

《秋虫赋》 罗隐作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正在形成。作者洞察时代风云，预见到李唐王朝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因而以秋虫（蜘蛛）和蛛网为喻，讽刺封建法网象蛛网一样“绳其小而不绳其大”，一旦农民起义爆发，强大的冲击力量就将“兼网而逝”，使统治者国破身亡。本文构思颖巧，词锋锐利。（朋 星）

《越妇言》 唐罗隐撰。见《谗书》卷四。文章借汉朱买臣出妻的故事加以发挥。《汉书·朱买臣传》载：买臣贫，其妻去买臣而再嫁，后买臣为会稽太守，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收养之，居一月，妻自经死。本文借买臣妻之口，述买臣贫困之时，常以匡国致君、安民济物为志；而通达之后，却贪恋富贵，安于尊荣，毫无作为，仅施骄矜于一妇人，故而羞于食买臣之食而决意自杀。文章借题生发，独辟蹊径，尖锐地讽刺了当世那些尸位素餐，以富贵骄人的达官贵人。（李永祥）

《铭秦坑》 唐司空图撰。“秦坑”指“焚书坑儒”一事。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有些儒生批评他“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而恼怒仇恨，下令逮捕460多个儒生，严刑拷问后在咸阳全部坑杀。本文议论“坑儒”暴举，全文仅31个字：“秦术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随覆。天复儒仇，儒祀而家。秦坑儒，儒坑秦耶？”言秦王朝残害儒生，不施仁义，丧失民心而自取灭亡。文末的疑问，尤为妙解。（朋 星）

《与李生论诗书》 唐司空图撰。见《司空表圣文集》卷二。司空图的诗论对后世有很深远的影响，严羽“以禅喻诗”，王士祯“神韵”说都溯源于此。这篇文章便是司空图论诗的代表作品。作者首先用十分贴切生动的比喻说明了他所主张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而愚以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醋，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有所乏耳。”然后，作者将其论诗之旨概括为三点，一是“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二是“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三是“不知所以神而神”，“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司空图的这些主张在他的另一名著《二十四诗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李永祥）

《读司马法》 唐末皮日休撰。《司马法》，古代兵法书，战国齐威王使人整理春秋时齐大夫司马穰苴的兵法编辑而成。本文是作者读《司马法》之后的感想，认为“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指责王朝统治是建立在对人民的屠杀和剥夺的基础上的，矛头直指唐末时政，抨击政治腐败、战祸不休、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原谤》 政论散文。唐末皮日休

撰。“原”是古代一种专门用来推论事理的文章，首创自韩愈。本文从怨天说到怨皇帝，而怨天不过是引子，主要思想是怨皇帝。文章前边的话都是陪衬铺垫的，最后的一段话：“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才是全文中心所在。本文具有强烈的反叛封建传统的思想，与清代黄宗羲的《原君》一起，是声讨君权的战斗檄文。

（明　星）

《化洽亭记》　五代沈颜撰。作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仲夏月十有九日。本篇题为《化洽亭记》，表面上似记叙名胜，实为伤时感事之作。唐朝末年战乱频仍，人民饱受其苦，生活得不到保障。本文表现了作者憎厌战乱、向往治平之世的思想感情。作者认为只有靠官吏的贤能才能建立一个治平的社会。只有社会安定了，才能谈得上建设。并且，在治平之世，人材也可依照正常渠道被识拔出来，而在乱世人材则每每被埋没。本文在艺术上的鲜明特色是以小见大，借建亭这一寻常小事来议论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作者运用暗示、象征手法，借建亭前的荒芜景象和建亭后的兴盛景象的对比描写，把文章的主旨表现出来。

《花间集序》　五代欧阳炯撰。作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夏四月。《花间集》为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词作总集。此篇序文集中阐发了花间词派的基本原则，指出了词作在五代时期社会生活中的现状和作用，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词作和韵文文学的变化线索，并对《花间集》的编辑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作者用“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这样形象化的比喻说明了词的创作应当坚持高标准，并用“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这样简洁的句子批判了宫体的浮艳文风，这些都有其积极意义。文章多用形象化的比喻，写得婉约秀美，文采斐然。貌似随意点染，实则层次分明，艺术构思颇为严谨。不仅是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的学术论文，而且也是一篇艺术性较高的骈体散文。

（王少华）

两　宋

《代王昭君谢汉帝疏》　宋柳开撰。宋朝初年，北方的契丹族直接威胁着中原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宋太宗为了解除契丹族的威胁，曾两次伐辽，但都以失败告终。朝中主降势力公开提出投降主张，自此宋朝的

腰杆再也没挺起来。鉴于这种情形，作者在这篇代拟之作中，猛烈抨击了朝廷屈辱求和、媚外亲敌的投降政策。作者采用借题发挥的手法，借汉代昭君立言，来表现反对投降的爱国思想，立意相当深刻。作者还将朝中将相与王昭君加以对比："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为陛下谋之；曰将，宜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轸顾之忧，疆埸无浸渔之患，尽系于臣妾"，其辛辣的讽刺手法运用得相当巧妙。文风朴实，与五代浮艳文体大异其趣。

（王少华）

《待漏院记》 北宋王禹偁撰。成文时间约在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1）。这是一篇以"记"为体裁的政论散文。文章褒扬了贤相，贬斥了奸相和庸官，以此规讽朝臣谨慎修德，勤于国事。此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正反对比，明褒贬爱憎。全文五百余字，共分五段。前三段描述了"有其德"、"务于勤"的宰相，后两段勾勒了"窃位以苟禄"的佞臣和庸相。正面描述的前三段和反面勾勒的后两段，从各个方面展开对比：贤相与奸臣及庸官不同的作为、他们对国家所起的作用及各自的结局。通过这些对比，作者讽谏朝臣的用意，跃然纸上。

（艾思同）

《唐河店妪传》 宋王禹偁撰。大概是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或稍后针对防备辽对边地的侵扰而写的。文章通过描写唐河（今河北省定县附近）一个老妪推敌兵坠井的故事，歌颂了边地人民的机智勇敢，并借以提出依靠边民力量增强边防的建议，表明作者对北宋边防的危机早有清醒的觉察。文章由小见大，从一平凡小事联想到增强边防的大政方针，立意颇为高远。文章虽为人物传记，但作者却花费大量笔墨进行议论。作者以叙事作为议论的基础，使议论有所附丽而不至于流入空泛；而叙事又靠议论得到了深化，显得更富有动人的光彩。文章由实到虚，虚实结合，写来平实自然，脉络清晰，恳切生动。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宋王禹偁撰。作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八月十五日。文章表现了作者贬居黄州后恬谈自适的生活态度和庄重自持的思想情操，抒发了内心的愤懑不平的情绪。文章起笔写竹，以竹连楼，通篇紧扣竹楼加以描述，无旁逸斜出之笔，显得主干突出，见出作者构思的精巧。作者将自己沉挚的感情和理想寄托于小竹楼，以轻灵洒脱之笔，排比、渲染之法，勾画出幽雅清隽的境界，并善于寓情于景，以境达意，融情与景于一炉，因而简陋而平凡的小竹楼在作者的笔下却发出了夺目的光彩，洋溢着动人心弦的诗意，充满了清丽幽芳的情韵。 （王少华）

《严先生祠堂记》 宋范仲淹撰。作于仁宗明道二年（1033）作者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时。本文为严光祠堂落成而作。它记叙了东汉光武帝与其同学严光亲密交往的故事，赞美了他们"相尚以道"的真挚友情，歌颂了严光不慕荣利的高贵品质和光武礼贤下士的宽阔胸怀。作品结构严

潇，文气流畅。它一方面写“得圣人之时”的光武“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一方面写“得圣人之清”的严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两者并提，相映成辉；而在盛赞严光“出乎日月之上”的高风亮节和光武“包乎天地之外”的豁然大度的同时，又抨击了相形见绌的“贪夫”和“懦夫”，二者反衬，倾向鲜明。骈句与单句的交错，韵文与散文的结合，更使文章既整饬严密、句丽辞畅，又开阖自如、奔放灵动。（王　勇）

《岳阳楼记》 宋范仲淹撰。岳阳楼在湖南岳阳，是著名的古迹。本文虽名为“记”，实际是一篇即事和即景抒情言志的散文。文章开头，叙述重修岳阳楼的原因、情况和作记的缘由。第二段写岳阳楼上所见的自然形胜。作者从大处落墨，用“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数句，将洞庭湖的壮阔景象跃现纸上。第三段写因天气恶劣引起迁客骚人悲伤的感情。那“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丘潜形”、“薄暮冥冥，虎啸龙吟”的景象使人惊心动魄。第四段，写从天气美好生出欢乐之情，文章也转入佳境：“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用工细柔翰写洞庭春光，绘声绘色，诗情画意浓郁，达到艺术高境，令人心旷神怡。这两大段情景迥异，相互对照，如双峰对峙，但其目的是为了写“迁客骚人”“以物喜”、“以己悲”，并以这种只局限于个人之情，反衬出古之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国忧民，不计个人得失的伟大崇高情怀。作者在第五段把这种宽阔胸襟、高尚抱负熔铸成两个千古生辉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点出了主题。全篇把写景、记事、抒情、议论冶于一炉，构思精妙，章法严密。文中多用四言，骈散结合，排比押韵，词采富丽，音节和谐，铿锵有力，形式上富于创造性，被当时古文家尹洙评为“传奇体”。由于它立意高远而又文辞优美，成为脍炙人口的散文杰作。（闻　涛）

《录田父语》 北宋宋祁撰。文章记述了作者与老农的对话，借老农之口，说明年成的丰收，是农民终年勤劳所致，决非“天幸”、“帝力”，从而对统治者宣扬天命和王道，“盗天功以私己力”，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此文所采用的手法主要是讽喻。在封建社会，只要农业丰收，统治者都认为是他们“德政”的结果，而无视农民的勤苦劳作，将农民用血汗换得的成果据为己有。对此，作者很不以为然；但作者又有所忌讳，不便直言，故用曲笔，借老农之口，说出“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揭示了事实真相。借助这些托拟之辞，作者为民请命，呼吁为政者体恤民情的深衷，表露于字里行间。（艾思同）

《辨惑》 宋石介撰。石介继承了韩愈“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思想，一贯主张反对佛老二家学说。《宋史》

作者本传说："介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本篇即辨明神仙、黄金术和佛的虚无妄诞，破除了一般人的迷信；同时也揭示了封建帝王"穷天下而奉之"的剥削实质。文章一开始即开门见山地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吾谓天地间必然无者有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然后举"无求不得其欲，无取不得其志"的皇帝中"秦始皇之求为仙"而"远游死"，"汉武帝之求为黄金"而"不成"，"梁武帝之求为佛"而"饥饿死"三个典型事例加以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心突出，逻辑性强，论据确凿而有说服力，文笔极为简练，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美。

《与高司谏书》 宋欧阳修撰。作于仁宗景佑三年（1036）。范仲淹因议时政得失、批评当政宰相吕夷简的过错而获罪遭贬，朝廷官员多论救，惟司谏高若讷以为当黜。为此，欧阳修写下这封信，揭露并痛斥了高若讷人格行径的卑劣，表现了一个古代正直知识分子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作者采用了欲抑先扬、欲破先立的写作方法，从而使文章的气势显得有起伏有跌宕，艺术魅力大大增强，文章所表现的情绪虽然十分激愤，写来却往复百折，体现出委婉曲折、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 （王少华）

《读李翱文》 北宋欧阳修撰。成文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十月（1036）。此文属读后感一类的议论散文。作者盛赞李翱的道德文章，借此影射现实，抒发他对保守派的愤懑和对政局的忧思。此文始则以抑扬手法蓄势，继则借题发挥，直摅忧愤。全文共四段，首段对李翱先抑后扬，二段抑韩愈而伸李翱，对李翱《幽怀赋》所表现的忧心国事的胸怀极表追慕，至此蓄足文势。第三段由历史的追思转入对现实的感愤，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渲发他为国担忧的郁愤，斥责了保守派的苟且误国。全文抑扬擒纵，起伏有致。 （艾思同）

《王彦章画像记》 宋欧阳修撰。作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当时宋朝边境受到西夏的严重威胁，兵祸连年不解，如何却敌取胜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此记不采取史传全面记叙人物的方法，只抓住王彦章善战与忠节这两点加以刻划和表扬，显然是有意激励宋朝将领为国出力，保卫边防。全篇议叙兼用。在首段对王彦章的生平加以概括介绍后，便以论带史，围绕智勇忠义进行叙事，并以"家传"补充旧史的缺略，特别突出王彦章用奇取胜来讽谕被常规所束缚、办事畏缩因循的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王彦章的景仰之情。文章行文亦极尽转折之妙。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一文同为表现轶事，而各极其工。 （王少华）

《朋党论》 宋欧阳修。作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作者担任谏官时。本文为进呈仁宗之作。它提出了"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的中心论点，阐述了"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大治"的深刻道理。文章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剀切，气势旺盛。开篇道明论点，继

之以常理论述“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道理，紧接着又用大量史实从纵横两个方面反复阐述国家兴亡取决于君主任用“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朋”的道理，最后得出“为人君者，可以鉴矣”的无可辩驳的结论。作品博引旁征，层层剖析，曲尽其意，无懈可击。对比手法与排比句式的娴熟运用，使文章气脉连贯，易于启悟。但作者视黄巾军为“贼”，则是阶级的偏见。（王　勇）

《丰乐亭记》　宋欧阳修撰。作于庆历六年。文章记叙了作者于“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滁州期间在丰山脚下建造丰乐亭的经过，并用赞叹的语调描绘了丰山一带清秀可爱的风光和当地人民丰足安乐的生活，既是对宋初政策的歌颂，也是从侧面肯定自己治理滁州的政绩，以证明被贬之不当。同时抒发了士大夫那种闲适清雅的情趣。文章紧紧扣住“丰乐”二字来写，用古今对比的手法，有力地突出了主旨。同时，作者还把写景、记事与抒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复咏叹，使文章生出无穷的韵味。在行文结构上起伏跌宕，一唱三叹，文章具有宛转纡徐、体势充沛的艺术美。

《醉翁亭记》　宋欧阳修撰。作于作者降职滁州（治所在今安徽省滁县）的第二年（庆历六年）。文章表现了作者遭贬后的颓放情怀，有其明显的思想局限。但文章具有诗情画意，格调清丽，其思想内容上的不足丝毫不能掩盖它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作者以“乐”这一思想意脉和秀丽多姿的山水之境有机融为一体，写出了山水相映、朝暮变化、四季变幻与动静对比之美，绘制了浸润着作者主观感情的艺术画面，意境颇为优美。作者以一“乐”字作为贯穿全文的一道红线，借以统摄文章的起、承、转、合，犹如金线串珠，加之层层烘托，呼应有方，见出文章结构的精巧。文章的语言极为概括，含蕴丰赡，凝炼精美，晶莹疏畅，骈散间行，音调和谐，抑扬抗坠，铿锵悦耳。

《送杨置序》　宋欧阳修撰。作于庆历七年（1047）。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送别的朋友杨置是一位怀才不遇之士。而此时的作者，也处于第二次贬官时期，心情之郁闷则可想而知。因之作者在文中借写琴而意欲抚慰朋友，实则也是自我感情的一种渲泄。文章构思新奇，别具一格。序文本是为他人而写，而作者却先从自身着笔，继而写琴，作者紧紧扣住琴这种乐器的特点来写，运用多种形象化的比喻，展开丰富奇妙的联想，从而化音乐中传达出来的复杂而抽象的感情为具体可感的形象，最后才托出文章主旨，说明学琴将有利于友人的平心养疾，从而收到了跌宕曲折、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王少华）

《苏氏文集序》　欧阳修撰，成文于宋仁宗皇佑三年（1051）。此文是作者为亡友苏舜钦的文集所作的序言。全文高度评价了苏舜钦的文学成就，赞扬了他对文体革新的巨大贡献；并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致同情，抒发了作者对亡友的悼惜之情。序文多用来评论所序之书，故少有抒情性。然而此文却是例外：作者在对亡友文学业绩

的备加推崇之中，深深地融入了对友人被废为民、流落以死的悲悼痛惜。故此文论说与抒情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低徊深挚的抒情性。这是此文突出的艺术特色。（艾思同）

《秋声赋》 宋欧阳修撰。作于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作者以秋声发端，通过对暮秋时节山川寂寥、草木凋零的萧飒景象的描绘和渲染，抒发了自身因人事忧劳、形神日渐衰老而产生的深沉悲凉的感慨，见出老庄思想对作者的影响，但就总体而言，作者对人生还是持进取的态度的。文中以秋声来烘托秋思，以秋夜的情思和秋夜的风光组成了完美统一的具有整体感的艺术画面，从而创造了协调和谐的意境美。作为赋体，本文发扬了六朝和唐代的骈赋、律赋在表情绘物上铺陈排比的长处，但又着意追求文辞的简约省净，从而显得既丰满又精粹。且又以散文为主，杂以骈偶、韵语的变化，遂成为有别于六朝和唐代的骈赋、律赋的文赋。通篇结构层次明晰，衔扣妥贴自然，臻于圆熟精美之化境。主要段落又都插有感叹词，既便于感情抒发，又标志了结构向深层的递进，可谓匠心独运。

《梅圣俞诗集序》 宋欧阳修撰。作于嘉佑六年（1061）。这篇序文通过对梅尧臣坎坷仕途的叙写，提出了诗歌"殆穷者而后工"这一著名美学观点。作者认为诗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才能写出好的诗歌来。也就是说，诗人必须要有真情实感，才能把难以描摹的感情形之于诗篇。这个见解，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所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是一脉相承的，与十九世纪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所说的"愤怒出诗人"也有类似之处。序文以评述梅诗作为轴心，将议论、叙事、抒情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在议论和叙述中，充溢着作者对这位杰出诗人的倾慕和惋惜之情。行文低昂顿挫，转折自然舒纡，语言平淡无华、明白流畅，这些特点都反映了作者驾驭文字的娴熟技巧。（王少华）

《相州昼锦堂记》 宋欧阳修撰。作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作者担任参加政事时。本文为宰相韩琦所筑昼锦堂而作。它概述了昼锦堂的兴建时间和地点，否定了"一介之士"衣锦为荣的庸俗观点，赞美了韩琦"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抱负。文章借题发挥，回漩跌宕。若从时风，此类文字当以描绘厅堂自身、称颂主人功德为主，但作者却一反常格，由"昼锦"堂名引出人生究以什么为最高理想的重大论题。围绕这一论题，作者首先以战国苏秦不礼于嫂、西汉朱买臣见弃于妻而他们又荣归故里为例，说明其"意气之盛"不足称道，接着写韩琦显赫多年，却不以此炫耀，反以衣锦为戒，说明其追求"邦家之光"的志向方足为羡。全篇笔势纵横，褒贬分明，给人深刻的教益。

（王　勇）

《祭石曼卿文》 北宋欧阳修撰，成文于宋英宗治平四年七月（1067）。此文是作者在友人石曼卿死后二十六年写的一篇哀悼亡友的祭文。全文三呼曼卿，称颂故友过人的才气与不朽

的声名，感叹亡友墓地的凄凉荒芜，以此抒发作者深切的哀思。其中又交织着对友人身世遭际的不平和个人官场失意的孤寂。祭文呈现出一种情深语痛、情中见理的特色。作者对友人政治、军事才略和文学才华，十分敬佩，对友人不被重用，中寿而死，又深感惋惜。对这种宦海升沉的“盛衰之理”，作者虽“知其如此”，但联想到亡友和自身的遭遇，作者无法忘情。所以在悼念亡友的真情至性中，融铸着一种欲解脱而未能的幽怨和感思。

《泷冈阡表》 欧阳修撰，成文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四月（1070）。文章追忆其母对他的抚养和教诲，记述了其父的清廉谨慎、仁厚孝敬，表达了作者对其父母的怀念。此文属碑文，碑文不同于祭文，祭文可以直抒哀思，而碑文则偏于记人叙事。此文追述往事，不假雕绘，从“廉”、“孝”、“仁”三方面赞颂其父；从“守节”、“恭俭”和“深明大义”三方面描摹其母。透过这些记述，作者自然而然地表达了缅怀父母的真挚情感。（艾思同）

《答吴充秀才书》 宋欧阳修撰。文章主要阐述文与道的关系，即作家的修养与写诗作文的关系。作者强调以道为本，以文为末，认为学者求道而不能达到高的境界的原因主要是“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尔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作者认为作家先要求得道，即要有文道的修养，敢于反映现实，联系实际，干预生活，文才能写得好，“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倘若不在道上下功夫，只在文字上用力，则“愈力愈勤而愈不至”。作者善于从各个角度反复阐释文章主旨，注意抓主干而去枝蔓，层层剖析，逐层深入，因而文章虽然十分简短，而论题却颇为集中，说理甚为透辟。

《五代史伶官传序》 宋欧阳修撰。作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至皇佑五年（1053）间。《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出自欧阳修之手，此为其中《伶官传》的序文。《伶官传》记载为后唐庄宗所宠幸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败政乱国的历史事实，本篇则通过对这段历史事实的具体分析，总结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历史教训，强调人事对于一个王朝的盛衰所起的决定作用，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不无进步意义。文章采用对比论证的手法，在盛与衰、兴与亡、正与反、扬与抑、立与破的对比中写庄宗的一生，使中心论点鲜明突出，说服力极强。作者将饱满的扬盛抑衰的感情贯注于全文的史实叙述和得失评论之中，并采用了长短句交互使用、陈述句与反诘句交错运用等抑扬顿挫的笔法，形成了起伏跌宕、一唱三叹、气势充沛、一泻千里的艺术美。（王少华）

《卖油翁》 宋欧阳修撰。出自作者晚年退居颍州（今安徽阜阳）所作的《归田录》。文章写陈尧咨以在家圃射箭十中八九自矜，卖油翁则以自钱孔注油却不湿钱相示，并进而阐明此“无他，惟手熟尔”的道理。全文只有

一百五十字，但却绰有情韵，富有哲理。它先写陈之射箭与翁之观射，初现两人情态，且为下文冲突铺垫；再写二人问答，借以显现双方心理，并将冲突展开；后写翁之注油与陈之服输，完成性格刻画，从而交代冲突结局。全篇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并在陈尧咨与卖油翁言谈举止的描绘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作者的褒贬倾向，揭示出熟能生巧的深刻哲理。（王　勇）

《沧浪亭记》　宋苏舜钦撰。作于作者在仕途上遭受打击，流寓苏州，筑沧浪亭之时。“沧浪”二字从屈原《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取意，显然寓有政治污浊则隐退闲居之意。作者从被贬后的郁闷着笔，抒写了与沧浪亭优美景色心领神会的怡然情趣，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感受的对比，表现了仕途不得意的抑郁苦闷和对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场的厌弃；希望借自然美景以遣释内心的烦忧。这种思想感情对批判恶浊现实不无积极意义，但逃避现实斗争的消极意义也是不容讳言的。文章采用移步换形的手法来写沧浪亭的位置和景物，具有亲临其境、引人入胜之妙。并把写景、叙事与言情融为一炉，字句凝练简洁，风格峭劲拗折。

《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　宋苏舜钦撰。这是一篇应人请求以记述洞庭山水月寺兴废历史的题记，但作者却把它写成一篇追忆昔游的游记，借写山水、赞僧人以寄托超脱现实的意绪，抒泻仕途失意后牢落不平的愤懑情怀。文章把叙事、记游与言情三者融合为一，将复杂的感情通过凝炼、清丽而流畅的语言委婉曲折地表现出来，既记述了作者昔游的情景，又写明了水月寺的兴废，又直诉世俗可厌、超脱快意的无限感慨，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前后浑然一体，笔锋淋漓，情调豪爽，是一篇艺术成就颇高的游记。　（王少华）

《六国论》　北宋苏洵撰。这是一篇史论散文，大约作于宋仁宗庆历四年至至和元年间（1044－1055）。文章分析了六国破灭的原因，指出对敌斗争应注意的问题，借以讽谏朝廷，不要一味对外妥协退让、赂敌求安。此文显著的艺术特色是议论透辟周严，借古而喻今，针对宋廷对外连年纳贡的状况，文章首段以“弊在赂秦”立论，又用“不赂者以赂者丧”作为补充。以下两段分别从“赂秦”与“未尝赂秦”两种情形的国家，来论证六国皆亡的原因，然后指出为国者不应被敌国的积威所吓倒。结尾一段，进一步影射现实，儆诫统治者，不要再重蹈六国败亡的覆辙。联系后来“靖康之变”的现实，文章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作者以六国覆灭的教训来讽谏宋朝统治者，可谓恰如其分。

《张益州画像记》　北宋苏洵撰，约成文于宋仁宗至和元年至至和二年之间（1054——1055）。此文通过记述四川百姓为张方平画像一事，颂扬了他的功德和才能，以及四川百姓对他的感激和爱戴。文章在写作手法上的特点是，以虚实之笔，从正侧两面描写人物，表达主题。此文共五段。首段出之以实笔，从正面记述张方平

入川安抚民心，处理危局的功德方略。次段记言，故为虚笔。然而虚笔又分正侧两面。作者发表治乱之论，从一个侧面颂扬张方平；接着又让主人公出而，以主人公为政宽厚的原话来表现他的仁慈爱民，这是从正面颂扬。三、四两段，虚实正侧合写一笔，记述为张方平画像的缘由，以及蜀中百姓对张方平的称颂感戴。最后又用诗的形式，对全文再作复述和补充，以强化主题。

《送石昌言使北引》 北宋苏洵撰，成文于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此文是作者为亲友石昌言出使契丹所作的临别赠序。文章叙述了石昌言与作者的交往过程，勉励石昌言藐视敌国，不辱使命。此文在写作手法上，以叙旧情表惜别之意，借述故事勉励亲友。全文共两段，首段以作者未学、既学、废学、复学、学成为线索，追述了石昌言对自己的亲切关怀，赞扬石昌言为国万里出使的慨然意气，借此表达了对亲友的惜别和眷恋，同时也为下文作好铺垫。末段叙述了往年契丹虚张声势以威吓宋朝使者的旧事，指出契丹不过以此炫耀武力，威胁胆怯者，告诫石昌言要藐视敌国、不损国威。首段为末段作好了感情的铺垫，在此基础上，末段亲切自然地表明了对亲友的鉴诫和勉励。（艾思同）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宋苏洵撰。作于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苏洵重游京师，以此文自通于当时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欧阳修，希望能得到引荐。文章历叙诸君子离合，夹叙自己之道未成与成，称誉欧阳修之文而论及孟子、韩愈、李翱、陆贽的文章，并自叙修道、学文终于有得的经历。文章在形式上是书信，实为叙议结合、情意深切的论说文。通篇说理精到周密，文辞委婉恳切，因而对欧阳修虽赞誉备至而无吹捧之嫌，对自己已有成绩的介绍全面细致而无自我吹嘘之弊。文章写得纡余委备，往复百折，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又不落俗套，为作者着意用力的作品。

《木假山记》 宋苏洵撰。这篇杂记记叙了木假山的形成与来历，说明了人在社会中的坎坷和艰难，及如何做一个情操高尚的人的道理。文章立意独到，多用比喻来暗示人生哲理。作者用木之生长艰难隐喻人生之坎坷与不幸，用木假山的形成和为“好事者”偶然所得隐喻机缘之难得与成功之侥幸，用“三峰”的形象喻示人的道德风尚：一个人踞于高位，但不施淫威；而“服于人”者，又不亢不卑。从而表达了感喟人生多艰与追求高尚人格的情怀。全篇先叙述树木成长之艰难，木假山经历之坎坷，“予家有三峰”的木假山命运之奇特，主旨引而不发，直到最后才点出自己的所感所悟，以实带虚，虚实结合，颇有引人入胜之妙。

《名二子说》 宋苏洵撰。本文就给两个儿子命名一事，揭示“轼”、“辙”这两个名字深刻的比喻性含义，从而表达了对两个儿子的殷切希望、亲切勉励和谆谆告诫。文章善用比喻，以车名理，以事喻情。作者以“轼”、“辙”名二子，并借此喻指二子各自的性格特点，叮嘱苏轼要“有职于车”、

"不要无所为"、力戒"不外饰"的缺陷，叮嘱苏辙要为"天下之车"立功，不要只求免于"祸福之间"。通过这些巧妙的比喻和反复辩析，使一篇记叙给儿子命名的小品却含蕴丰富而深刻，妙趣横生，具有思辨力量，给人以哲理的启迪。

《爱莲说》　宋周敦颐撰。文章通过对"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的爱慕和对牡丹的厌弃，表现了作者向往美好理想、追求高尚情操、仰慕正直人格而鄙视趋炎附势、追求富贵风气的进步理想和审美趣尚，立意颇为高远。文如其人。作者所歌咏的莲花，实际上也是作者自身犹如光风霁月的高洁人品与洒落胸怀的生动写照。全文不到150字，而含蕴却颇为丰赡。既惜墨如金，又有详有略，不枝不蔓，主旨突出。作者运用拟人化手法，把无思想感情可言的三种不同花儿写得具有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品德情操，使文章情趣盎然。作者又运用对比映衬手法，突出主要描写对象。在"花之富贵者"牡丹的反衬下，更显出莲花不倾慕富贵的高洁品格。在"花之隐逸者"的菊花的陪衬下，更显出莲花不超然世外的品德。全文文字简净峻洁，韵味深长，可谓形神兼备的咏物小品。

《捕鱼图记》　宋文同撰。此文是作者对唐朝著名画家王维《捕鱼图》画所作的简要评述。我们从中既可领略到王维的艺术匠心，也可感受到作家对王维的无限倾慕之情。文章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作者重在记述画的内容，而对其他情况，只作简略介绍，这样写，使人读此文如见原画，可以得到习文和读画两种乐趣。写这类文章，易流于琐碎和枯燥，但由于作者精于炼字炼句，用词妥贴、形象，句法错综变化，因而显得形象鲜明，富有情韵，十分耐读。文笔简练，条理清晰，在行文上颇受韩愈《画记》的影响。

《墨池记》　宋曾巩撰。作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江西省临川县的墨池，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笔砚处。文章从墨池着笔，依据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王羲之之所以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杰出成就，并非天成，进而推及学者要深造道德，尤其不可以废学。文章对只有勤学苦练才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这一道理的阐释，对于鼓励后人勤奋学习，努力上进，无疑有积极意义。文章借事立论，小题短篇，而开拓深宏，含蕴丰富，耐人寻绎。本文意在写论，因而采用略记详论、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间用、纲举目张的写作手法，既突出了主旨，又不致使议论无所附丽。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大多是以记为主而以议为附，而本篇却独出心裁，详论略记而又富于情韵，多作诘问唱叹，笔调委婉有致，艺术感染力颇强。　(王少华)

《醒心亭记》　宋曾巩撰。作于仁宗庆历七年(1046)作者在京城太学读书时。本文系受欧阳修之托为其所筑醒心亭而作。它介绍了醒心亭所处位置与兴建时间，叙述了醉后登亭的观感，赞美了欧阳修与民同乐的生活理想和随遇而安的旷达胸怀。文章借亭写人，自然淳朴。本为醒心亭写记，作者却不拘泥常格，就事论事，而以

亭之主人欧阳修为中心，把笔触逐步引向对“公与州宾客者游”足迹的记叙、“公之乐”原因的探寻和“公之贤”美德的称赞，内容充实而不庞杂，脉胳清晰而有变化。全篇没有繁辞丽句，也无雕琢痕迹，却又语浅情深，自然流畅，充分体现出曾文真挚动人、以质朴为胜的基本特点。（王　勇）

《赠黎安二生序》　宋曾巩撰。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去迎合世俗，放弃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文中反映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也是在克服重重阻力的情势下发展的。其中文中所说的“道”与“古”是宋代革新派进行诗文革新和政治改革运动的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的思想武器。文章布局完整谨严，议论萦纡曲折而又能穷尽事理，节奏从容舒缓，风格冲和平淡，温醇典重，在赠序散文中别具一格。

《战国策目录序》　宋曾巩撰。作者在此序中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政治主张和伦理观念，认为“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又认为战国游士违背了“道”，以诈伪、谲诳的言行从事政治活动，结果身亡国灭，确“为世之大祸”，因此把他们的言论斥为“邪说”。这种不加区别一律否定的做法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作者认为禁止“邪说”的最好办法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不可从”，并不一定销毁此书，并肯定此书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史实，尚有一定价值。整篇序文思路明晰，层次井然，淳古明洁而考核精详。（王少华）

《齐州北水门记》　宋曾巩撰，成文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作者在任济南地方军政长官期间，主持修筑了“北水门”，应人请求，写下此文。文章记述了兴建“北水门”的缘由和经过，以及工程的负责人。此文在记叙上具有简明而周至的特点。全文三段，首段记述了“北水门”修筑之前的水情和水患，为下文作好铺垫。中段承上而来，叙述兴建水门的过程。水门“其深八尺、广三十尺”。对这样大的工程，此段从备料、用工、水门的位置、规模和形制，以及竣工后带来的利益等方面叙说，寥寥数笔，记述得详尽细密。末段记载了工程的修筑时间、发起者和负责人，补足全文，使应记之人和事，无有遗阙。

《越州赵公救灾记》　北宋曾巩撰，约成文于宋神宗元丰二年至元丰五年间（1079—1082）。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越州（今江苏、浙江一带）遭到旱瘟之灾。知州赵抃采取各种措施赈救灾民，此文即记叙了他赈灾的情况，颂扬了他关切民瘼的功德。此文在写作上的显著特点是，叙事纡徐详尽，条理明晰，全文共八个自然段，首段叙述赵在救灾之前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二、三、四段，写他救济饥民的种种超乎寻常的有效手段。五、六两段，叙述赵如何采取非常措施，又去赈救遭到旱疫两灾的百姓。最后两段高度评价他救灾的措施在当时的巨大作用和对后来的普遍影响。对于赵抃救灾这样头绪纷繁的事件，作者从

备灾、救灾的种种措施、成效、以及此举所具有的意义等方面依次写来，使记叙既周详全面，又有条不紊。

（艾思同）

《李愬雪夜取蔡州》　宋司马光撰。文章通过叙写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唐将李愬雪夜攻取蔡州（今河南省汝南一带），活捉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结束淮西地区32年的割据局面的史事，展现了李的善于谋略和勇武决断。全篇紧紧扣住首句“李愬谋袭蔡州”中的“谋”、“袭”二字统摄材料，以写奇谋为主线，以其他具体情景加以丰富，从而使李愬这一潜心韬略、诙诡奇谲的大将形象显得格外丰满。作者集史家之长与文学特色于一体，发扬《左》、《史》以来的史学笔法，寓褒贬于历史事实的叙述之中，情节完整，描述生动，文字简洁而颇富表现力。　（王少华）

《赤壁之战》　宋司马光撰。此文选自《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属史传体散文。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在平定北方之后，挥师南下，意欲一举统一中国。在强敌面前，孙权联合刘备，结盟抗曹，用火攻战术，在今湖北嘉鱼县长江南岸的赤壁，大败曹军。此文即记述了这次战争。文章详写战前的决策，略叙战争实况，突出记述了以弱胜强的原因，故此文在写作上剪裁详略得当，重心突出。全文共九个自然段，前八段用大量的笔墨叙述战前的决策。当时曹兵号称80万，在大军压境之际，孙刘双方分析了曹兵的弱点和自己的长处，做出了联盟抗敌的决定。在东吴内部，孙权排除了主和派的障碍，作出了迎战曹兵的抉择。大战前夕，主帅周瑜针对敌方弱点，做了火攻的部署。由于详写了以上种种正确的战略、战术决策，已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觉察到了战争胜负的趋势，故末段仅以简洁的笔墨略写战况，从而突出了以弱胜强的原因。

《淝水之战》　宋司马光撰。此文选自《资治通鉴》104和105卷。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东晋和前秦战于淝水，弱小的晋军战胜了强大的秦军。此文即记述了这场战争的经过，并且指出了双方胜负的原因。此文在写作上的艺术特色是，记叙周详，脉胳分明，于叙事中写活了历史人物。全文共20个自然段，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10个自然段，记述了众人对苻坚欲征伐东晋的劝阻，以及他的一意孤行。这一部分通过苻坚和群臣、家族以及他所宠爱的人的对话，十分形象地写出了苻坚的刚愎和骄横，同时也暗示了他败亡的原因。第二部分为后十个自然段，记述了秦晋交战的具体情况。其中前四段，记述了苻坚军事部署的失误和内部的矛盾。第十五、十六两段，写了晋军方面战前的安排和谢安的镇定。第十七、十八、十九三段，记述战争的展开和胜败的过程。最后一段，以神来之笔，记叙人物的言谈举止，十分形象地刻划了谢安雍容自如的“雅量”。

《训俭示康》　宋司马光撰。此文是作者写给儿子的一篇家训。作者在文中教导儿子，要“以俭为美”，决不可奢靡腐化。作者训诫儿子，是以维护封建家族出发的，但处于奢侈腐化

的时风中，作者能够超出流俗，提倡俭素，反对奢侈，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为家训，此文避免了板着面孔的枯燥说教，在亲切的说理中，援引了许多正反两面的实例，把讲道理和摆事实结合起来，文章显得充实而有说服力。这是此文写作上的突出之处。全文5个自然段，首段现身说法，叙述自身力排众议，“独以俭素为美”的情形，第二段称赞宋朝初年尚俭的世风，批评后来侈靡的陋习。第三段列举了为政清廉的“大贤”，借他们的口，说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第四段阐明俭的好处和侈的恶果。末段再列举“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事例，让事实说话，使人由衷地信服。

《同学一首别子固》 宋王安石撰。作者与孙正文、曾子固志同道合，结为至友，共学“圣人”。孙与曾并不相识，但二人的言语志量十分相似。此文即记述了这个事例，并说明只要学习“圣人”，皆可“至乎中庸”。全文采取对称排列、两两对照的手法，层层深人地表达了主题。全文共5个自然段。首段用对偶句将作者的两位友人并列写出。第二段合写一笔，指出两位友人没有任何接触，但他们的言行却十分相似，这是学习“圣人”的结果。第三段先用对偶句，说明两位友人互相信任，再以散句说两位友人都希望达到“中庸”之境。最后两段，说明两位友人最有可能达“中庸”之境，并表达作者对他们的渴慕和追随之意。 （艾思同）

《祭欧阳文忠公文》 宋王安石撰，成文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是年欧阳修去世，时为宰相的王安石，为这位曾有知遇之恩的文坛前辈写了这篇祭文，高度评价了欧阳修一生的成就，寄托了由衷的敬爱之情。作者没有因为彼此之间的政见分歧而影响对死者的公正评价，表现了政治家的胸怀。文章精炼概括、持论中肯，绝非一般应酬性的祭文可比。对于欧阳修的文章，作者分别以“积于中”“发于外”两方面评定其修养和风格，赞扬其文如其人；论其道德，作者则从气节功业和出处进退方面进行评说，指出欧阳修秉正义、抗强权、安社稷，立下不世之功，然而“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高风亮节，垂范后世。全文评价求实而中肯，颂扬情真而意切，是一篇优秀的祭文。 （康金铭）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宋王安石撰。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文章通过对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瘫痪、农民贫困痛苦、军队软弱无力和财政空虚困难等社会危机的分析，意在向宋神宗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敏锐洞察和清醒认识；同时也表明作者的变法，只是在封建制度内部对某些环节作些改革和调整，进而达到巩固赵宋王朝统治的目的。这篇文章在构思上颇费经营。文章是为回答神宗“无事”的命题而作，但作者却巧妙而机智地在“无事”的命题下大做“有事”的文章。作者采用欲抑先扬、褒中寓贬的手法，先叙述并解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和原因，然后尖锐地揭示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情况，前面的叙写

显然是为了反衬和突出后一部分。最后自然而然回归到题旨，勉神宗“大有为”。全文指陈时弊，切中肯綮，纲举目张，组织严密，充分体现了作者政论文的艺术特色。

《伤仲永》 宋王安石撰，这是一篇杂文体散文，通过叙写方仲永的故事，说明人的知识才能决不能仅仅依靠天赋，而必须不断地用后天学得的知识来充实自己，才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文章题为《伤仲永》，而通篇不出一个“伤”字，但全篇却仅仅扣住一个“伤”字着笔，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感伤色彩。作者为方仲永和一切不知或不肯学习的人深感悲伤与惋惜，其劝人发奋攻读的拳拳之心宛然可见。这种在内容上与题目潜在呼应与契合的艺术手法，远远胜过仅仅在形式上与题目照应。全文缘事明理，叙议结合。叙事是议论的基础，议论是叙事的升华，使文章极富启发性和说服力。作者还善于通过抑扬表达文章主旨。叙事，作者以褒扬之笔极写方仲永的天赋，但已暗藏贬抑之意。议论，作者则以贬抑之笔，对方仲永的变化加以评论，得出全文结论。先扬后抑，引人入胜。

《读孟尝君传》 宋王安石撰。王安石的论说文每每能不囿于成见，而提出新颖的见解，本文既驳倒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之见。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以超人的敏锐眼光来评判历史人物。他不纠缠于具体事件，而从大处着眼，把孟尝君放在他生活的那个特定时代加以审视，从养士能否“制秦”的高度来考察他所得是否为士，写出了“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这一全文警策之句，一举把人们长期盲目崇拜的偶象推翻，具有高屋建瓴、睥睨千古的非凡气度。全文逻辑严密，篇幅虽短却语语转，笔笔紧，一气呵成。

《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撰。作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力图通过整军理财以求富国强兵。新法的实行，抑制了大官僚大地主和豪强的特权，激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熙宁三年，司马光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信给王安石，要求停止新法，恢复旧制。此为作者的复信。主要对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五事加以辨明，并对士大夫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墨守成规的守旧思想深表不满。作为一篇书信形式的驳论文章，作者善于抓住对方的要害问题加以驳斥，观点鲜明，理足气盛，文字精炼而层次清晰，不枝不蔓，主干突出，措辞委婉而有骨力，具有简劲、严整而明快的艺术风格。

《游褒禅山记》 宋王安石撰。作于宋仁宗皇祐间作者任职舒州（今安徽安庆市）时。此为游记式的论说文。阐述了立志进取、勤于思考的哲理。作者认为，无论做任何事情，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精神。治学应有求实精神和严谨的态度。文章记议结合得颇为自然。前半篇记游，后半篇议论。记游是议论的根据，议论又紧紧扣住前面的游程，由

实到虚，前呼后应，环环相生。明写记游，暗寓哲理，使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没有流于孤立的说教。作者巧妙地将记游和说理有机结合在一起，既把抽象的道理阐述的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叙事增加了思想深度。

（王少华）

《赠盖邦式序》 宋马存撰。此文是作者写给友人的一篇赠序，充分地阐发了司马迁的创作与生活经历的关系，借此告诫友人："欲学子长之文，先学其游可也"。此文在写作艺术上的突出之处是，立意精警，笔势纵恣。对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古人都有一定的识见，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得相当深刻，分析得也十分精辟。作者从《史记》风格的种种方面，去联系司马迁在各地的游历，用以阐明二者的关系，虽然不尽恰当，但总的来说，还是看出了司马迁的广泛游历，影响了他的思想、精神、心理、气质、眼界、胸襟、识见，从而影响到创作风格，在行文上，文章排比迭出，骈散相间，流畅飞动，境界阔大。用语则力避陈熟，硬健华赡，文彩斐然。在宋文中，这是一篇难得的佳构。

（艾思同）

《雁荡山》 宋沈括撰。作于神宗熙宁六年（1073）作者奉命视察两浙并顺路考察雁荡山后。本文介绍了雁荡山的名称由来，描绘了雁荡山的外貌特征，说明了雁荡诸峰的成因乃是流水浸蚀冲刷的结果。文章记叙与说明结合，层层深入，引人入胜。它从古书不载、世人不知雁荡山的概述，引出"雁荡"山名由来的考释；从雁荡山形的描绘及与黄土高原地貌的比较，得出雁荡诸峰成于流水冲蚀的结论。叙述为说明依据，说明又紧扣叙述，这就使得人们在领略雁荡山自然美景的同时，悟出雁荡山形成的道理。本文以提出水蚀形成山岳的创见而在世界地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又以对"天下奇秀"雁荡山的生动描绘而成为中国游记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束奇葩。

《正午牡丹》 宋沈括撰。出自《梦溪笔谈》。本文记叙了吴育一见欧阳修所得古画便据"花披哆而色燥""猫眼黑睛如线"断定其为"正午牡丹图"的故事，说明了鉴赏书画须有广泛的生活知识和一丝不苟的态度的道理。文章短小精悍，寓意深刻。全篇只有一百七十字，却历数并评论了鉴赏书画的三种不同方法：一是盲从他人的"耳鉴"法，二是以手摸画的"揣骨听声"法，三是从作品实际出发、依据生活经验和艺术规律品评的方法，作者对前两种是讽刺和嘲笑，对后一种是热情称赞。本文不仅对时人有教育意义。也不仅对书画鉴赏有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人们一条真理：要真正认识事物，就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多种知识的积累。

（王　勇）

《刑赏忠厚之至论》 宋苏轼撰。此文是苏轼在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应进士考试的试卷。文章从远古的政治论起，援引众多的史事，阐述为政应宽慈仁厚的道理。文章的写作手法是，引经据典，纵横论说。作者引《诗》、《书》中的名言警句，取《春秋》的微言大义，以此为立论的基

础，使得文章典重丰厚。不仅如此，作者文思飞越，历览千年，自远古而下，从纵的方面振起纲领；又例举事实，阐发经典精义，发表独到之见，从横向深化主题，从而避免了应试文的呆板单薄。全文妙言警语，跌宕纵恣，圆熟流美。

《上梅直讲书》 宋苏轼撰。此文是作者在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新中进士时，写给担任国子监直讲的梅尧臣的信。那年作者以一介书生，入京应试，被取为进士第二，在兴奋激动之余，作者写信给梅尧臣，倾诉自己受到知遇的快慰之情。全文笔墨潇洒，酣畅淋漓，突出烘托了一个“乐”字。文章共两个自然段，首段先说以周公这样的元老重臣，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虽富贵不足为乐。接着说孔子虽困厄贫贱，但他的学生皆天下贤才，彼此相知，这才是令人快乐的。此段以周公之不乐烘托孔子之乐，又以孔子与门下的相知之乐，比喻作者受知于梅尧臣、欧阳修的快乐心情。末段先叙说对梅、欧由来已久的倾慕，继而直揭突然间受到知遇的惊喜快乐。最后又补充说明，富贵不足为乐，而师友知遇之乐才为至乐。全文格调轻捷昂扬，笔飞墨舞，作者的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留侯论》 宋苏轼撰。此文是作者在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应“制科”时所上的《进论》之一。作者论述了留侯张良之所以具有大智大勇，在于经过“隐君子”的指点后，能够“忍小忿而就大谋”。文章见解新颖，紧密地结合史事来论证，议论透辟而雄辩。这是此文突出的艺术特色。自《史记》以来，黄石公授书张良的故事，一向被传为神话，人们认为张良佐汉得力于一册神书。作者却独出心裁地认为，这是当时卓有见识的“隐君子”，为磨砺张良，“折其少年刚锐之气”而采取的措施。老人的警戒使张良能够“忍小忿而就大谋”，这正是佐汉胜楚的关键所在。作者以此立论，联系秦汉之际的形势，展开论证，扫去了这则故事上的神异色彩。这种不落俗套的切实见解和雄辩的论证，令人信服。 （艾思同）

《教战守策》 宋苏轼撰。乃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作者应制科考试时所作《策别》中的一篇。当时辽和西夏是对宋朝安全具有威胁力量的劲敌，当时辽和西夏是对宋朝安全具有威胁力量的劲敌，随时都有进犯的可能。作者从国家边防安全出发，征引史实作为例证，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严重危险，极力主张教民习武，以为战、守之备，识见颇为深远。文章开篇即将全文中心论点直接提出，然后围绕中心论点逐层加以论证。作者引用史实以为借鉴，分析现实而切中弊端，用对比论证的方法，先用古今作对比，又用王公贵人与农夫小民作对比，再用“变故无自而有”与“战者，必然之势也”两种不同观点作对比，最后提出教民讲武的措施，并与那些反对教民讲武的论点作对比，说明教民讲武正是安民的有力措施，正反相形，边破边立，层层深入，从而使文章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通篇理由充足，文笔恣

肆，富有雄辩的逻辑力量，且在宏议中抒豪情，句式参差错落，多用排比，从而造成了文章席卷一切的磅礴气势。

《喜雨亭记》 宋苏轼撰。作于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作者在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任签书判官期间。本文通过记叙亭子命名的缘由、建亭经过以及亭子落成喜逢甘雨的庆贺之状，表达了作者关心农事、与民同乐的思想感情。全文始于"喜"字，终于"喜"字，前后呼应，以"喜"字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全文，颇有散而有致之妙。文章篇幅虽然短小，但文笔曲折，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作者采用剥蚕抽丝、层层递进的表现手法，先叙作亭，次记雨，再写喜乐，又联系当前人民的忧乐，这样层层展开，便觉含蕴深刻。（王少华）

《凌虚台记》 宋苏轼撰，成文于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当时知府陈希亮在其住宅内修建了一处亭台，名凌虚台，此文即是苏轼为台所作的记。全文记叙了筑台的缘由，由此作者发表了一番"废兴成毁"的议论。这些议论，是作者登高望远的感慨？还是对于陈希亮的讽谏？对此历来看法不一。此文与《超然台记》同是为台作记。《超然台记》先说理后叙事，由理入事；此文则首先叙说筑台的原因、经过、命名的由来，然后借题发挥，阐述"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的道理。这种写法则是由事入理，借事说理。（艾思同）

《超然台记》 宋苏轼撰。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作。文章记叙了作者在密州的生活和政绩，反映了无往而不乐的淡泊自适的心情，同时也表现出超然旷达、游于物外的思想情趣。作者不受前人写"记"体文的一般艺术框架的束缚，而是围绕着"超然"二字，先议后叙，由理入事，由事及景，最后以理收束全篇，从而使文章虚实相生，逐层递进，结构颇为精密。通篇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文笔流畅，语言平易清丽。（王少华）

《日喻》 宋苏轼撰，成文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此文是针对王安石改"以声律取士"为"以经取士"而提出的批评意见。作者对两种"取士"方法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前者弊病在于：士杂学而不致于道"，后者则导致了"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正确的作法应是"学以致其道"。本文着重批评当时士人离开"学"而空喊"求道"的风气，并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须"务学"才可"致道"的看法。此文的写作方法是，运用丰富多彩而又准确恰当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文中先设"盲人识日"一喻，说明只凭想当然地理解和运用别人的经验，而不亲身实践，必然导致谬误。然后再用"北人学没"之喻，说明理论虽好，而不结合实践，终于一事无成。全文设喻和说理水乳交融，配合得恰到好处。（康金铭）

《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 宋苏轼撰。作于元丰二年（1079）七月七日。这篇题画记生动、曲折地反映了作者与文与可多年来亲如手足的交情，对于画墨竹的理论和方法，也

有精辟的阐述，是苏轼文艺理论的重要篇章之一。全文因画怀人，由议论转入叙事，融议论、叙事与抒情于一炉，信笔挥洒，毫无拘束，文理自然，如流水行云，舒卷自如。同时，又紧紧扣住文与可的“画”加以生发，侧重写怀念已故友人的悲怆之情，又显得形散而神聚。可谓文笔疏密有致，自然浑成。就感情色调来说，全文虽由庄重转入幽默，再转入深沉，多有变化，但却以真挚朴素的感情作为统摄全篇的主要基调，因而读后倍觉沉挚感人。

《放鹤亭记》 宋苏轼撰。作于宋神宗十一年（1078）作者任徐州知府期间。当时作者与张天骥交游甚密，亭子落成，就为亭作记。文章主要抒写隐居的无限逸趣，表现作者淡泊自适、超然物外的思想。作者运用象征手法，曲折寄意，构思奇巧。文章旨在抒写隐士之乐，但并不直写隐士，而是花费大量笔墨写鹤的放浪潮泊、纵其所为的生活习性，且宕开一笔写卫懿公因好鹤而亡国的教训，似乎养鹤并无乐可言。然而作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写鹤的闲适优游，是象征隐士有闲适，写卫懿公养鹤是为了反衬只有隐士才可独享这种乐趣。作者横出一个与鹤对应的酒客，也同样说明好酒也会因人不同。只有隐士才享有这种乐趣，为官的是不能闲适和自由的。

（王少华）

《书蒲永升画后》 宋苏轼撰，成文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这是一篇论画的跋文。作者评说了唐宋以来画水的成败得失，指出“死水”与“活水”的区别，指明艺术家不应限于逼真地描摹事物的形状，即“形似”，而应表现出事物的神理，也即“神似”。作者对艺术的这一见解，是精当、深刻的。文章评论画水，运用了十分形象的文笔，说“画水劣者”，是“印板水纸”、“死水”；形容“画水妙者”，是“输泻跳蹙”，“汹汹欲崩屋”，如“阴风袭人，毛发为立”。这种描述画面的文笔之形象、之生动、之得神理，在古典作品中是少见的。

（艾思同）

《方山子传》 宋苏轼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作者谪居黄州，经过岐亭，为陈慥作此传记。文章通过叙写陈慥满腹文韬武略而报国无门的不幸遭遇与失意后超凡脱俗的隐逸情趣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陈的倾慕、叹惋等复杂的感情。作者没有平铺直叙地介绍人物的姓氏、乡里、家世、生平等，而只叙其游侠、隐居二三事，突出其几个侧面，而人物面貌、神态宛然可见，在不胜枚举的人物传记作品中独具一格，可谓传记别体。通篇夹叙夹议，感慨淋漓。文笔精炼而意味隽永，色调似淡实浓，臻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之化境。

《韩干画马赞》 宋苏轼撰。韩干是唐代以善画马著称的画家。文章再现了韩干的画幅，并流露出超脱世俗、与世无求的思想情趣。作者不仅写出了画幅的静态，而且还写出了原画所表现的动态；不仅写出了原画中的马的形，更传出了原画中的马的神，可谓形神兼备。作者以人喻马，用封建社会的贤大夫、贵公子比喻画中之马，

使其更加超俗洒脱，气度不凡，想象颇为新奇。通篇以散文笔法来写韵文，骈散结合，既符合赞这种文体的要求，又兼顾了散文的特色，因而既有音乐美、节奏感又灵活自然而无拘板之弊。

《前赤壁赋》 宋苏轼撰。作于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作者谪居黄州期间。通篇通过主客问答，议论风生，发抒了作者俯察人与宇宙之后的哲学的领悟，表现了作者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心灵净化的境界，以及不以得失为怀的旷达胸襟。这种深邃的意蕴，是诉诸于月下江游的眼前景物和由景物而引发的感触，而不是用抽象的言语表达，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全赋布局精妙。先点题面，描写赤壁泛舟的情景，愉悦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然后感情由愉悦转入抑郁。待渲染足后，才引出主客问答这一全赋重心。在形式上，此赋抛弃了通常作赋的框架，不用通常赋体中常用的转接的辞语，使感情的流动转折颇为畅遂；用韵自然天成，只在每节的结束数句稍加强调，独出心裁。全赋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无愧为散赋的杰出代表作之一。

《后赤壁赋》 宋苏轼撰。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通过抒写初冬月夜的赤壁之游，创造了超然逍遥的幽美意境，表达了作者清高自乐的思想情怀。文章先写初冬月夜之景和踏月之乐，隐伏游兴，以引出再游赤壁；继写酒肴俱备，隐伏更动游兴，于是推出赤壁之游，重点写江上景物异于昔游所见、舍舟独游之豪兴和鸣鹤掠岸，为后文得梦伏笔，最后写游后一梦，回应上文孤鹤，收束全篇。全文构思奇幻浪漫，虚实结合，形散神凝，文笔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写景叙事绘形绘色，使人如临其境。此文与《前赤壁赋》为姊妹篇，但各有特点。前赋人的活动限于舟中，此赋人的活动在江岸；前赋字字秋色，后赋句句冬景；前赋主要谈玄说理，此赋侧重叙事写景；前赋重在表现作者不以得失为情的旷达襟怀，此赋更多流露出遗弃尘世的思想。（王少华）

《游沙湖》 宋苏轼撰。一作《游兰溪》。作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作者贬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时。它记叙了作者请聋医庞安常治病并与之同游清泉寺的情形，反映了作者身遇逆境而不消沉的宽阔胸怀。文章言简意赅，妙趣横生。全篇虽只170字，却清楚地介绍了沙湖的位置、得疾的原因、聋医的颖悟、清泉寺的方位以及游寺的经过，信笔写来，叙次井然。篇末以《浣溪沙》词绘出兰芽浸溪、沙路无泥、子规啼雨的秀丽春景，唱出年近半百而童心未泯的人生之歌，令人回味无穷。而“余以手为口，汝以眼为耳”的戏语，既表达了苏轼与聋医一见如故的真挚友情，又体现出苏轼不以个人得失为意的旷达性格。（王　勇）

《记承天寺夜游》 宋苏轼撰。作于元丰六年（1083），即作者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的第四年。作者以富有情韵的诗的语言，十分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抒写了遭贬生涯中自我排遣的特殊心

态，创造了一个清冷皎洁的意境。文中寓深邃的人生哲理于清幽洁净的月景之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高妙境地。作者随手写来，似不经意，但寓意深刻，含蕴丰富。行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随物赋形，有自然天成之妙。

《石钟山记》 宋苏轼撰。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作者由黄州移任汝州途中，游湖口石钟山时。文章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研究、考察，终于获得真相这一事件，反对"事不目见耳闻，而断其有无"的主观臆断的作风，主张对一切事物都应当经过考察与验证，才能作出结论。文章围绕石钟山名的由来，介绍郦道元和李渤的观点，点明他对二人的说法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从而带出夜游石钟山以探知究竟一事，并在此基础上对郦道元和李渤的观点加以纠正和补充，得出结论，这样把记游和说理结合起来写，虚实相间，显得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说理透辟，令人信服。文章最精彩的一段是对月夜乘舟的描写。这一段写得有情有景，有声有色，有缓有急。作者以灵活多变的笔法，峭崛流畅的语言，创造了情景交融的幽森意境，使读者得到了极大的美感享受。

《韩文公庙碑》 宋苏轼撰。此为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作者应潮州人士之请而作。作者极力赞美韩愈的道德文章。以及在潮州（治所在今广东省潮安县）刺史任内深受人民爱戴的政绩，并流露出作者自身的悲愤感情。作为碑志体散文，此篇虽不免溢美之辞，有褒扬过当的缺点，但这并不能掩盖整篇文章的艺术成就。全篇叙述、论证、抒情等诸多手法兼用，继承韩愈散文的传统，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借对韩愈的评论抒一己之郁愤，笔锋凌厉，硬语盘空，感情基调奔放激昂，深沉浩渺，犹如长江大河波涛汹涌澎湃，有一种罕见的凌厉逼人的气势美，风格雄浑悲壮，是古代碑志体散文的上乘之作。

《答谢民师书》 宋苏轼撰。乃宋元符三年（1100）作者自海南遇赦北归，在广东省清远县舟行途中所作。文章首先倡导作文要文理自然，认为好的作品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然后提出"文"与"达"这两个概念，要求作文应深切体物，认为"行文不远"是由于"言之不文"，只有"能使是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才能做到"达"；而"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最后，作者批判了"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的扬雄，表现了作者排斥内容浅易而貌为艰深之文的文学观点。这些卓越的文艺见解，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全篇融铺排张扬的论说与通畅练达的记述于一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曲行舒缓，含而不露，挥洒自如，语言简练而含意深远。

（王少华）

《六国论》 宋苏辙撰。本文系为应考而作的史论。它提出了战国时期六国为秦所灭是因"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的论点，阐述了韩魏两国的重要战略地位，也寄托了作者对政局危机

四伏、朝廷屈辱求和的现实的隐忧与不满。文章论据确凿，明快畅达。它以秦与六国的地理位置及范雎收韩、商鞅收魏等历史事实为依据，论述了秦或齐、楚、燕、韩四国谁得韩魏则谁得天下的道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全篇先怪六国灭亡，次为六国代计，再论天下之势，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秦与诸侯的对比描写、文章末段的笔锋频转，更使作品通俗易懂，纡徐委备。但过分夸大诸侯不和对六国灭亡的作用，则是作者的偏见。

《上枢密韩太尉书》 宋苏辙撰。作于仁宗嘉佑二年（1057）作者进士及第后。本文为进呈枢密使韩琦之书。它提出了“文者，气之所形”、“气可以养而致”的文学观点，阐述了内心修养及外界阅历与文学创作的必然联系，表达了因仰慕而求见韩琦的强烈愿望。作品行文疏荡，颇有奇气。它以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自述与“太史公行天下”的史实为论据，信笔挥洒，波澜起伏。本为干谒之书，却不干瘪卑下，在集中论述了如何养气益文的观点后，水到渠成地申述了求见的心愿，既富有思想，又情真辞切。全篇雄辩滔滔，神完气足，深得《孟子》、《史记》之妙，既是一篇杰出的文论，也是一封著名的书信。

（王　勇）

《武昌九曲亭记》 宋苏辙撰。作于元丰五年（1082）。当时作者贬居筠州，苏轼贬居黄州。文章通过记述苏轼游山的乐趣和西山秀美的景物，反映“适意为悦”这样一种达观思想。作者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更抓住苏轼的思想性格加以构思。先叙述苏轼谪居后喜游武昌西山，虚含下文“适意为悦”之意，继叙修筑九曲亭的经过。着意写苏轼筑亭的渴望以及亭子修筑成后的快乐。最后以议论收束全文，说得失无常，适意者即为至乐。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真实、形象地表现了西山景物之美和人游山之乐。全文情景交融，委婉动人。

《黄州快哉亭记》 宋苏辙撰。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时作者谪监筠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盐酒税，在政治上颇不得志。篇中极写形胜与览古之快，旨在赞扬亭主张梦得的胸怀和情操，以抒发不遇处境下的士节浩气，表现不以得失为怀的开朗心境。文章紧紧扣住题目“快哉”二字加以生发，以景见情，从观感引出议论。大致前半写景，后半议论，而以记事说明背景，将古迹作为陪衬，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文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雄迈奔放而有风致。

（王少华）

《孟德传》 宋苏辙撰。本文记叙了退卒孟德只身入山，以草根木果为食两年而不饥、与猛兽数次相遇而不为其所伤的故事；阐明了“有所顾”的世人不免“弱者见侮、强者见笑”，“无所顾”的孟德则可“列于天地”的道理。文章委曲婉转，寓义深刻。全篇以孟德为中心，顺序写来，波澜起伏：少好山林却不如愿，长而为兵却又出逃，入之深山却又遇险，屡历绝境却又生还。严谨的结构与细致入微的行为描写、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使得孟德向往山林、勇往直前的性格鲜

明活脱地显现出来。篇末由孟德的行为引出对“有所顾”与“无所顾”的议论，既显得自然，又给人启示：只有摒弃杂念，勇往直前，才能所向披靡，成就事业。（王　勇）

《书洛阳名园记后》　宋李格非撰。这篇文章是以说理为主的议论散文。作者在对洛阳的历史兴衰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现实中“方进于朝”便为自己打算、追求享乐的公卿大夫提出忠告，并以唐鉴宋，垂戒当世。文章先概括洛阳的地理形胜，指出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后以盛世中高官贵戚纷纷在此营造院宅，而乱离之时皆化为灰烬来告诫现世当权人物，要居安思危，以图长治久安，不要走上“唐之末路”，重蹈覆辙。综观全文，逻辑性强，层层深入，环环扣紧，既总发议论，又选择富有代表意义的具体视角来阐明论点，令人信服。文字洗练，寥寥数语，将唐时洛阳的兴盛，五代时的衰败说得清清楚楚。文章的感情凝重，是议论散文中的佳作。

（石　玲）

《与王子予书》　宋黄庭坚撰。这封书信是谈读书方法的。作者认为读书和打仗一样，要怀有征战疆场建立功勋的意志；那么，读书才会体察出其中的深意。要学会举一反三。应在一两本书上用心琢磨、体会，而有所悟，那么其余的书，读起来也会势如破竹，一通百通，都能迎刃而解了。并且反对边读边丢走过场的读书方式，指出读书若不注意巩固成果，即使到垂暮之年也终究不能增长学识，提高水平。文章用打仗、种树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意志专一、举一反三的读书方法，使深刻的道理易于对方接受。全文娓娓而谈，如话家常，深入浅出，亲切动人。

《书林和靖诗》　宋黄庭坚撰。作者所举林逋的两联诗，都是咏梅佳句。不过人们大多赏爱前者，不仅欧阳修，司马光也赞其“曲尽梅之体态”（《温公诗话》），有人还有“暗香和月入佳句，压尽千古无诗才”的赞语，说自此联一出，骚人墨客就因此而搁笔了，南宋姜夔还以“疏影”、“暗香”为填词的调名，足见这两句诗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而黄庭坚独赏后者，对欧阳修“弃此而赏彼”表示遗憾，并说“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这后两句话倒说出了人们审美心理上主观性的表现问题。文章写得短小精悍，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把抽象的理论问题说得具体而明白，表现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本领。（王少华）

《与王观复书》　宋黄庭坚撰。作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作者贬任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戎州（今四川宜宾）安置时。本文为回复友人王观复之书。它指出了王诗“语生硬不谐律吕”、“词气不逮初造意时”的缺陷，阐述了“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的道理。文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者在关切地问候了对方的身体后，坦率地指出了王诗的缺陷，并帮他分析形成原因、寻找改进措施。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关心、帮助友人的一片深情，读来使人感动。作者以民谚及刘勰、苏轼的文论为据，通过六朝与唐宋文学创作教训与经验的总结，得出

"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的结论，读来令人信服。

《精骑集序》　宋秦观撰。本文系为自辑文选《精骑集》所作之序。它记叙了作者年少时"虽有强记之力，而常废于不勤"，长成后"虽然有勤苦之劳，而常废于善忘"的学习情况，介绍了《精骑集》的编纂目的及命名原因。文章现身说法，亲切感人。全篇既无繁辞丽句，也未侃侃而论，作者只是真实地介绍了自己少年时期与成年以后对待读书的不同态度，概括地总结了自己治学的经验教训，在少时"一见辄能诵"而"负此自放"、长成"颇发愤"而"聪明衰耗"的强烈对比中，流露出少时不读书老大徒伤悲的心态，说明了少时读书事半功倍的道理，告诫人们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文章平易畅达，短小精悍，称得上一首无韵的劝学诗。

《新城游北山记》　宋晁补之撰。作于神宗熙宁年间作者游览新城（在今浙江桐庐）北山后。本文记叙了作者游览北山的过程，刻画了北山雄奇、幽僻的景色。文章写景逼真，情景交融。前一部分重在客观景物的描摹，作者工笔刻画了山间"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的古松和山顶"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的僧舍。后一部分则是主观感受与客观景物的统一，作者寓情于景地勾画出"相顾魄动而不得寐"的冷峭可怖境界。文章大量使用四字句，同时间以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字句等，句式整齐而有变化，节奏感强而不做作，富有形式美和音乐美。　（王　勇）

《答李推官书》　宋张耒撰。此为作者第三次谪居黄州时与友人论文的书信，体现了他论文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文"是"寓理之具"，"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就"文"与"理"的关系来说，就文章的艺术形式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讲，这种文学观不无一定意义。他还给予"文"以相当的地位，指出有"知理者不能言"的情形，而能文者"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圣人贵之"。这就不仅意识到"道"不能等于"文"，不能代替"文"，而且也看到了"文"对传播"道"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文章运用"江河淮海"之水来比喻"理达"之文，化抽象的理论为具体可感的形象，显得明白易晓。

《金石录后序》　宋李清照撰。作于绍兴二年（1132）。文章记叙了《金石录》编撰的由来和作者夫妇早年的生活、志趣以及辛勤积聚的金石书画在大变乱中散失的经过。通过悼念死去的丈夫，追思旧物，从侧面反映了在宋、金连年战争中，人民的颠沛流离和珍贵文物的巨大损失。作者不为一般为书籍作序多就书论书的常规所囿，而由书籍之得失聚散，写人世之悲欢离合，从而反映了一个时代，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文章既是自传，也是赵明诚的回忆录，见出作者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全篇感慨淋漓，文情跌宕，叙致错综，笔墨疏秀，曲折周详。文生于情，情见于文，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片真情，有无意求工而文自工之妙。　（王少华）

《梦华录序》 宋孟元老撰。作于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本文系为自著《梦华录》所作之序。它描绘了昔日东京太平繁盛的生活景象，寄托了作者对北宋覆亡的沉痛感慨，说明了《梦华录》的著述缘由。文章铺张扬厉，变化多姿。前一部分，作者以其生花妙笔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昔日东京人物繁阜、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伎巧惊人、珍奇荟萃、贸易兴隆、工业发达的繁盛景象，辞彩富丽，音律谐婉，令人目不暇接，如临其境。后一部分，作者却从侧面叙写今日东京横遭劫难的衰败景象，强烈对比，使得作者的故国之思深沉而又含蓄。它以骈语为主，而又间以散句，也使文章整齐之中显变化。

《具瞻堂记》 宋邓肃撰。作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本文为吕之望所筑具瞻堂而作。它通过对具瞻堂由来的记叙，肯定了李纲身系国家的重要地位，赞美了吕之望景仰英雄、不畏强暴的高尚节操。文章线索分明，意兴遄飞。作者本为具瞻堂作记，但他却不拘泥于堂之本身。先由堂联想到其兴建者吕之望，又由吕之望联想到其所崇敬、纪念的李纲，然后逆向落笔，依次记叙了李纲、吕之望二人的事迹。李、吕二人，地位不同，性格各异，但都富有浩然正气、高风亮节。作者紧扣“具瞻”之意，既使两人事迹有机结合，又使人事与堂名相统一，因而文章既放得开，又收得拢，形虽散而神不散。（王　勇）

《试梁道士笔》 宋刘子翚撰。文章真实地表达了作者奋起抗敌的坚强意志和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作者采用即小见大的手法，由一枝笔而联想到国家兴亡，借此抒写其爱国热忱，并希图鼓舞起南方官员抗敌御侮的意志和决心。虽着墨不多，但含蕴相当丰富而深刻。全文将试笔与用兵交融而叙，浑然一体，转接自然。并围绕奋起抗敌这一主旨，引用历史上国家的兴衰为证，又明借前人的语言，暗用前人的作品，句法多姿，文辞洗炼，笔致开阔，雄浑有力。（王少华）

《戊午上高宗封事》 宋胡铨撰。写于南宋绍兴七年（1137）。本文是胡铨给宋高宗上的奏疏。当时，宋金对峙，金利诱南宋投降。宋高宗昏庸无能，只图苟安。他起用民族败类秦桧等人，与金议和。在民族危亡之际，胡铨有胆有识，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毅然上疏，弹劾并痛斥王伦、秦桧、孙近之流的卖国行径，恳求高宗为民族大业，斩除这些奸臣，以雪国耻，以图民族振兴。文章爱憎分明，感情充沛，纵横论述，慷慨陈辞。论述中言之有据，有理有节，据理力争，发人深思。在结构安排上，作者以王伦为突破口，以十分之七的篇幅历数王伦罪恶。作者匠心独运，借指斥王伦来指斥大卖国贼秦桧，尔后笔锋一转，正面陈述秦桧的罪行，匕首突现，以少胜多。文章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一篇讨伐卖国贼的战斗檄文。（石　玲）

《南京上高宗书略》 宋岳飞撰。作于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抗敌决心和信心，以

及对投降派的无比愤恨，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收复中原的共同要求，显示了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思想。这篇上书并非空洞的言辞，它首先指出当前“黎元有归，社稷有主”、兵势日盛和敌人骄怠的有利形势，继而指责黄潜善、汪伯彦苟且偷安、不图恢复、主张南迁的错误，基于此而提出车驾还京、罢南巡诏和亲帅六军恢复故疆的具体做法，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激动人心的力量。文章紧扣“恢复故疆，迎还二圣”之旨展开，时用对句来增强语势，在简洁的行文中始终奔涌着一股爱国主义激情，言词恳切，气势雄健。（王少华）

《五岳祠盟记》 宋岳飞撰。作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作者率军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重返宜兴（今江苏宜兴）后。本文系题写于宜兴五岳祠壁上的誓词。它概述了作者少年从军、身经百战的生活经历，表达了作者驱逐金兵、重整山河的雄心壮志。文章情深辞壮，气势豪迈。无论是戎马经历的回忆，还是战争时局的介绍，抑或决战前景的展望，笔触所至，无不洋溢着作者抗敌御侮、精忠报国的赤子之情。全篇句式简短整齐、措辞坚强有力，一气贯注，奔泻而下，充分体现出作者嫉恶如仇、威武不屈的刚直性格。

《游东林山水记》 宋王质撰。作于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本文描绘了东林的山水胜景，交代了作记的原由，抒发了作者“羁旅异乡”、“引领长望而不可归”的愁思。文章重点突出，长于渲染。全篇以作者游踪为序，依次记叙了两天的游程，而又各有侧重：第一天是步行，以写山景为主，同时兼写山中之水；第二天是泛舟，以写水景为主，同时兼写水旁之山。山水交织，相映成趣，宛如一幅形象生动的东林山水画。作者吸取了传统诗赋情景交融、铺陈渲染的手法，通过排比、比喻、拟人等辞格的综合运用，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东林的山水胜景，具体形象地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笔灵活多变，充满诗情画意。

《跋傅给事帖》 宋陆游撰。作于宁宗嘉定二年（1209）作者家居山阴（今浙江绍兴）时。文章记叙了作者童年所睹言战派士大夫们议论国事的情景，说明了南宋初年的和平是对敌斗争而非妥协的结果，表达了作者对爱国者的崇敬和对投降派的仇恨。文章凝炼生动，激情充沛。全文只有130字，却充分体现了士大夫的忠君爱国和秦桧的欺君误国。士大夫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写得具体而感人；对秦桧“变恢复为和戎”，写得概括而明确。两者对比写来，善恶自已分明，作者犹嫌不足，更再直抒胸臆：“死者可作，吾谁与归！”这在投降派史弥远当政的年代，显得尤为可贵。

《姚平仲小传》 宋陆游撰。本文通过对姚平仲历尽坎坷的一生的介绍，揭露了奸臣嫉贤妒能、忠将抱负难伸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景仰英雄的感情和收复失地的爱国理想。文章疏密有致，形象鲜明。它纵述平仲一生，却不平均用力，以战夏人、征

方腊、袭金兵三个事例刻画平仲沉勇善战、威武不屈的性格特点；又以身居石穴、屦诏不出的事例透露平仲迭遭压抑、事业无成的痛苦心境。全篇没有议论，但却通过四个事例的详写、通过童贯与平仲的对比，寄寓了作者对重用佞臣的愤懑和对埋没英雄的痛惜。至于姚平仲的家世等，作者只是一笔带过，既保持了传记的完整，又避免了行文的拖沓。　（王　勇）

《师伯浑文集序》　宋陆游撰。作于宋孝宗淳熙九年（1174）。文章通过对师伯浑这一抗战精英事迹的描述，着重抒发了作者为国家痛惜人才的沉重心情。文章对师伯浑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相当成功。作者采用反衬手法，以万籁俱寂的静夜与师伯浑"酒酣浩歌，声摇江山，水鸟皆惊起"的动态加以对比，师伯浑气吞山河的气势和博大的胸怀就被强烈地衬托出来。作者又以自己的"大醉"与师伯浑"饮至斗许"仍奋笔疾书的对比，衬托出师伯浑的豪壮气质。文章抒写痛惜人才的心情，又采用了夹叙夹议手法，且笔端饱含浓重的感情，字里行间充溢着愤懑不平之气。风格豪迈，典丽清新。

《烟艇记》　宋陆游撰。作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八月一日。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为宋高宗的生日，女真的贺使向宋朝提出割让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要求，并以出兵相威胁。宋朝确定了抗金的大政方针。对这一方针的确定，陆游深受鼓舞，便借为居室命名以言志，抒写了远大的抱负和积极进取的情怀。文章先以简洁文字，介绍名为"烟艇"的居室，并提出"屋之非舟"的设问，以领起下文。接着便用"新丰非楚"、"虎贲非中郎"两个典故，说明把居室命名为"烟艇"只不过是"意所诚好而不得焉，粗得其似，则名之矣。"又着重抒写放浪江湖的隐逸之趣，说自己之所以未能归隐，是因为尚有"饥寒妻子之累"，实际上其真正原因是作者欲"效尺寸之用于斯世。"最后抒写志向，并用"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纳烟云日月之伟观，揽雷霆风雨之奇变，虽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顺流放棹，瞬息千里者，则安知此室果非烟艇也哉"这样抒情意味极浓的句子点明居室以"烟艇"命名的真正原因。文章构思巧妙，委婉曲折，文笔流畅而富有变化，意味隽永。　（王少华）

《入蜀记二则》　宋陆游撰，作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乾道五年，陆游被任命为夔州通判。次年五月，他由浙江动身经水路赴任，沿途饱览了长江两岸的自然风光，他以日记的形式写成了一篇篇优美的游记，总题名为《入蜀记》。二十一日的日记描绘了巴东的雄丽风姿，特别突出了"天下幽奇绝境"的白云亭。作者抓住白云亭周围景观的特点，错落有致地描绘了山、林、瀑、溪、亭等各具神采的景致，境界优美，令人心驰神往。二十三日的日记则描绘了巫山神女峰的"纤丽奇峭"。作者用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把神女峰的神奇、缥缈的千姿百态表现得形神兼备。又用拟人的手法记叙了优美的神话传说，使人间仙境浑然一体，更增加了神女峰的奇幻、迷

离色彩。两则日记均具有诗情画意，作者用凝炼的语言把大自然的神奇、瑰丽表现得维妙维肖。

《跋李庄简公家书》 宋陆游撰，作于宋淳熙十五年（1188）。本文是陆游为李光《家书》所写的跋。李光曾官至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因力主抗战，屡遭秦桧打击迫害，数次被谪贬。本文通过回忆李光罢政归乡的言行，生动传神地描写了李光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刚正性格和英伟刚毅的气概。同时，也流露出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文章虽短，却善于选择能够表现李光性格特征的生活片断，作素描式的勾勒。如写李光每言及秦桧，必将其与暴秦相比，"愤切慨慷，形于色辞"。并用极简练的笔墨捕捉情态。如写李光言及被贬之事时，"目如炬，声如钟"，有声有色，神情俱现。采用对比手法，以同遭罢谪的赵鼎的"悲忧出涕"烘托出李光的刚毅。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散文作品。

（石 玲）

《峨眉山行记》 宋范成大撰。本篇节选自作者的《吴船录》一书，题目为后人所加。作于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六月。这里节选的一部分，是作者于二十七日（乙未）、二十八日（丙申）登游峨眉山主峰大峨的情景，重点描绘"佛光"这一奇异景观。"佛"光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阳光投射在水蒸汽上所形成的一种奇观，但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佛教徒却妄加附会为"佛光"，以宣传宗教迷信。作者受佛教思想影响虽然较深，但在文章中并未渲染"佛光"的宗教迷信色彩，而主要详细而真切地记述了"佛光"的"小现"、"大现"、"清现"、"银色世界"、"兜罗绵世界"、"洗岩雨"、"收岩"等神奇美妙的景象，艺术地再现了山河的美。作者象讲故事一样娓娓而谈，叙述亲切，文笔自然，语言朴实，使人仿佛也随同作者一起游览了峨眉山，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得到了艺术上的享受。（王少华）

《景延楼记》 宋杨万里撰。作于孝宗隆兴二年（1164）。本文系受友人祖光之托为谭氏所筑景延楼而作。它描绘了峡口上下的秋日夜景，介绍了此文的写作原由，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文章写景生动传神，议论纡徐有致。有一部分写景。作者先以寥寥数笔，刻画出峡内山重水折、石舟交错、深潭黝而幽幽、激濑白而溅溅的情形；又以一组排句，描绘出峡外水由深转浅、石由悍转夷、山由隘转廓、地由阻转畅的景象。作品既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又写泝而所顾、沿而所望，富有立体感、动态感，令人目不暇接、如临其境。后一部分，作者由写景引入议论，借"人与山水两相求而不相遭"寄托怀才不遇之感。虽为直接对话，却又水到渠成；虽言身世之感，却又委婉含蓄。

《百丈山记》 宋朱熹撰。作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作者定居建阳（今福建建阳）后。文章记叙了作者与亲友同游百丈山的经过，描绘了百丈山的自然胜景，表达了作者对锦绣山川的热爱。作品布局详略得当，绘景生动传神。它没面面俱到，只写了山腰，因为"山之胜盖自此始"；而对山

脚、山巅却只字不提。这既突出了重点，又节省了笔墨，可谓剪裁精当，匠心独具。文章移步定点，既围绕小涧描绘了石磴、山门、西阁的近景，又立足石台刻画了瀑布的远景。景物生动可感，笔法富有变化。而叙述语言的锤炼，拟人手法的运用，更使文章锦上添花。全篇顺序而写，颇似一幅精确的百丈导游图。

《记孙觌事》　宋朱熹撰。作于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作者奉祠两年后。本文通过对钦宗被掳后孙觌代写降表事件的记叙，揭露了投降派的卖国嘴脸，寄托了作者的爱国情操。文章威而能谐，婉而多讽。作者仇视投降，反对苟安，却不直接议论，更不破口大骂，其抵抗异族侵略的爱国公心，是通过孙觌形象的塑造体现出来的。本文长于写行为：金人欲得降表，"觌不复辞"；金人饷以囟妇，"觌亦不辞"；寥寥数语，其卖国丑行跃然纸上。作品又善于写自白：孙觌写降表后，"每语人"以"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道理"，只此几句其投降心理暴露无遗。而反语的运用，他人的揶揄，更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　（王　勇）

《诗集传序》　宋朱熹撰。作于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十月。作者所撰《诗集序》二十卷，为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在内容上各家之说广为采撷，解释各篇题旨，出于己见，弃传统的《诗序》而不用。此序概括地说明了诗产生的原因，《诗经》的教育作用，风、雅、颂内容体制上的不同及其流变，以及学诗之大旨。作者从维护封建伦理的立场出发，颇为强调《诗经》对于修身、治国的政治作用。全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语言简洁、明白，颇能见出作者文章的风格特色。

《送宜黄何尉序》　宋陆九渊撰。江西宜黄的县尉由于维护民众利益，与县令产生矛盾，上司不问青红皂白，将二人一齐罢免。此文即作者对友人何坦的临别赠言。文章先从分析被贬事情真相入手，以民心向背、僚属好恶作为检验官吏贤与不贤的标准对何坦进行安慰，进而引用历史上正直被杀的比干、子胥和"三黜三已"而不喜不怒的柳下惠、子文劝慰何坦，最后由慰勉进一步向何坦提出"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的期望，从而使文章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文章步步深入，文笔曲折而有气势，析理精微，友谊、别情蕴含于劝慰和期望之中，毫无泛泛应酬之弊，确能对被贬失意的友人起到安慰和鼓舞的作用。

《祭陈同甫文》　宋辛弃疾撰。文章叙写了陈亮超人的才智、崇高品德尤其是宏大的爱国抱负，追忆了二人之间的深厚友情，通过对陈亮怀才不遇、抱国无门的深切惋惜，抒写了郁积在心的无限感慨和悲愤。文章时时把自己和死者联系起来进行叙写，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死者的深厚而诚挚的感情，格调悲愤沉郁。通篇以抒情为主，辅之以议论，寓情于理，融抒情、叙事与说理于一体，从而有真切之感而无空泛之弊。全文以四言整炼的句式为主，以其他句式为辅，错

落有致，气势贯注，节奏性强，韵散有机结合，别具一格。

《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 宋辛弃疾撰。作于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三月。绍兴辛巳年金兵再度南侵，宰相陈康伯劝高宗赵构亲征，并拟了这份诏草，这次出征曾击败金兵于采石。四十八年后辛弃疾为诏草写了这篇跋。跋中表现了作者对诏草发布前后抗金时机多次丢失的痛惜，抒发了作者对国家兴衰的深沉感慨，流露了对投降政策的极度不满，表达了对劝勉皇帝亲征的先贤的无限景仰与怀念。跋文主要以适宜表现沉痛惋惜之情的两个假设句组成，而开篇又以假设词始，从而造成了突兀的气势，使作者郁积已久的满腹感慨喷迸而出。两个假设句已将无法弥补的遗恨道尽，最后又以一陈述句道出当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的悲惨现实作对照，因而“悲夫”一声喟然长叹，便如巨浪排空，猛烈地撞击着读者的心扉，其无限悲愤与感慨宛然可想。全篇文词简约而含蕴无穷，乍看似无感情，熟读则感到感情颇为浓烈，可谓字少情浓、言简意丰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宋陈亮撰。作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是年作者至京师连上皇帝三书，朝廷为之震动。此为第一书。文章强烈地表现出作者要求富国强兵、抗金御侮、收复失地的爱国思想。作者认为天命人心不可恃以为常，对儒士们安于君父之仇、低头拱手以谈性命的行径痛加贬斥，深致不满。虽然，作者所谓中原秉天地正气，吴、蜀秉偏气，以及“天道六十年一变”等均为唯心主义的观点，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全文长达四千五百余言，篇幅长，规模大，引证博洽，说理透辟，辞气慷慨，气势雄浑，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而不可阻挡。语言明快而精当。

《观潮》 宋周密撰。本文选自作者于宋亡之后写成的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往事的著作《武林旧事》，侧重描绘了钱塘江海潮的雄伟壮观、水军演习的动人情景、弄潮健儿的英武风采和观潮的盛况，从中也流露出作者对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有教阅水军之举而无收复中原之意的讽喻之意和对贫富悬殊的深沉感慨。全文不足四百字，却井井有条写出了纷繁的头绪和众多场面，思想蕴含又相当丰富而深刻，可谓言约而意丰。同时，作者又紧紧扣住“观潮”二字着笔，并以此作为贯穿全文的一道红线，这样就使得文章中心十分突出。另外，正面切入与烘云托月手法的结合，叙事与写景的相互交融，也是本文的艺术特色。

《指南录后序》 宋文天祥撰。作于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五月。《指南录》诗四卷，为文天祥自编诗集，编集了他出使元营，被扣押北行和中途脱险，历尽磨难，到达福州这一历程的作品。卷首有自序二篇，此为《后序》，追叙其出使元营、抗辞犯敌的情况以及逃脱敌手后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历险经过，表明作者守义不屈、艰苦奋斗、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并扼要说明他抄录诗篇和编纂诗集的目的。本文以具有纪传性的叙事为主，又

有浓郁的抒情意味，自首至尾寓抒情于叙议之中，字里行间充满了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洋溢着坚贞不渝的爱国热情，时时透发出一种浩然正气。文字遒劲，气势充沛，笔墨酣畅，音节铿锵激越，慷慨悲壮，可歌可泣，感人肺腑，与李清照的名篇《金石录后序》可谓南宋文坛上诗文序跋散文中两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望祭文丞相文》 宋王炎午撰。本文原有短序说："相国文公再被执时，余尝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张千载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呜呼，丞相既得死矣！谨痛哭望奠，再致一言。"此篇作于《生祭文》之后。作者"生祭"时，盼望文天祥杀身成仁，为国死节；"望祭"时，歌颂文天祥坚贞不屈、壮烈殉国如象颜常山、嵇侍中殉国一样悲壮，日月都为之收敛了光芒，山河都为之改变了颜色，是"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的人物。本文用四字骈文的形式写成，虽然篇幅很短，但容量很大。语言简洁凝练，感情充沛、悲壮而激越，感人至深，为宋末遗民爱国诗文中有名的佳作。

（王少华）

《蜃说》 宋林景熙撰。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作者隐迹山林十二年后。本文描绘了浙东的一次海市蜃楼景象，表达了作者对荣华富贵的鄙视和对宋朝覆亡的感慨。文章生动传神，委婉含蓄。开头通过家僮走报，概述蜃景之奇，给人造成悬念。此后以工笔刻画蜃景之异：如"奇峰"、"城郭"、"台榭"、"浮图老子之宫"，又如"立如人"、"散如兽"、"列若旌旗之饰，瓮盎之器"，使人目不暇接。结尾由蜃景联想到人类，说明世间繁华"亦一蜃也"的道理。本文立意在议论，但纯粹议论部分却只有五十字。作者用绝大部分篇幅描绘蜃景的"隐见不常"，并由此过渡到人世的"运去代迁"，写景、议论浑然一体，读来余味无穷。

（王　勇）

《鞍山斋记》 宋林景熙撰。本文是作者为朋友周行之新建居室所做的"记"。但作者不拘于题面，而是由马鞍山的形象、鞍山斋的环境写到鞍山斋的主人，通过写斋主人周行之不以仕途得失萦怀，虽年事已高，仍胸怀大志，期待能有机会报效祖国，表现了他崇高的爱国情怀，命意高远。通篇文笔豪迈奔放，挥洒自如，放得自然，收得紧凑。并逐段递承伸延，使人读其文如倒吃甘蔗，渐入佳境，颇能耐人寻绎，引人入胜。

《雪窦游志》 宋邓牧撰。作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记述了作者于是年畅游雪窦山的情景，我们从中既可领略到雪窦山的美丽，又可体味到作者情在山水、敝屣功名的生活志趣。文章在布局构思上别具匠心。作者先用"闻雪窦游胜最诸山"八字点明雪窦山名气之大，又表明作者是慕名而来，具有引人入胜之妙。接着，作者又遥遥着笔，描写雪窦山外围之景，从而为下面写雪窦山做了蓄势和铺垫，以下才转入对雪窦山的描写，这样布局便令人感到雪窦山确实更胜一筹。最后以饱游而归作结，照应开头，首尾一体。全文以写景为主，对自然景物的动、静之态，作者都能做生动、

细致而逼真的描绘，又能将作者超然世俗之想与世无知音之意渗透在景物刻画之中，因而颇有诗情画意。文章兼及行程所目睹之人情风俗，记述亲切动人。语言简洁，格调高雅。

《月泉游记》　宋谢翱撰。大约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稍后。本篇游记详细介绍了月泉之水“消长视月之盈亏”这种世间罕闻的奇景，并表明了作者信守旧志、至死不变的决心。文章寓深沉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于奇异的自然现象的描写中，表情隐晦曲折。作者记述月泉之奇，说它随月消长时，“视旧痕不减毫发”；由泉写到远处的仙华山，说自己“谋日游其间，与月约盈亏、泉约消长，与山约无盈亏、消长，亘来今以老”，这些都旨在含蓄地表明自己忠于南宋、终生不渝的心志。作者用古奥的语言表现深沉的情思，风格崭拔峭劲，独树一帜。　（王少华）

《登西台恸哭记》　宋谢翱撰。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本文追述了作者与文天祥共同抗元的往事，记叙了他和友人痛祭文天祥的经过，表达了他景仰英雄、热爱祖国的高贵品德和决不屈从元人统治的坚定志向。文章感情强烈而又语曲意深。战友文天祥就义后，作者“独记别时语”，数次“于梦中寻之”，甚至“恨死无以藉手见公”，敬慕、思念之切催人泪下、感人至深。但在“悲不敢泣”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作者痛悼亡友只得吞吐其辞：他以唐事代宋事，以颜真卿代文天祥，友人姓名也不直书。语词虽然隐约，意义却很明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文天祥与历史上颜真卿、张巡、颜杲卿、严光等仁人志士联系起来，既婉转含蓄，又相映成辉，确有浑然一体之妙。

（王　勇）

金　元

《焚驴志》　金王若虚撰。本文是一篇寓言小品。它通过白驴托梦，托物讽时，寄寓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执掌权柄者的鄙薄及对世情的激愤之情。文中写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河朔旱象严重，远近禾苗枯焦。作为一方之长的镇阳帅，用尽迷信法术，毫无灵验，后来又轻信怪诞之说，欲焚烧民家白驴，白驴闻而托梦，白驴托梦是文章主体。作品勾画出一个鲜明的动物形象——白驴。它义正辞严，对罚不当罪提出了抗议，并对兴谤之人和对镇阳帅的盲从提出责难。它认为人事是灾祸消长的决定因素，并引经据典，以古律今，尔后愤而指斥执政者不采取积极措施而错杀无辜，只能

助长怪诬之说而丝毫不能减轻旱情。文章运用对比手法，寓讽刺于形象的刻划中。文字朴实而寓意深刻，尤其是白驴的陈述，语言犀利，说理透彻。是一篇独具特色的好文章。

《送秦中诸人引》 金元好问撰。本文是一赠序体的散文。引，是唐代以后出现的一种文体，大致如序而稍短。作品一脱临岐慰勉的寻常窠臼，对关中的风土人情、山川名胜备加赞扬，并向"道相合而意相得"的秦中朋友表示了自己对山林田园生活的向往。作者鄙薄世俗中追名逐利之辈，并表示了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志向。文中写离别很有特色，既充满挚情，又写得委婉含蓄。因为相约后会有期，因而并没有过分伤感，重在表现志趣的一致。"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廖廖数语，使人如见作者不能随友人同往的怅然之情，可谓一往情深。最后以点睛之笔表示了自己隐逸的归宿："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之上矣。"文字简洁利落，言有尽而意无穷。

《济南行记》 金元好问撰。作于元太宗七年(1236)。这是一篇记游散文。作者少时曾路经济南，依稀记得是个大城府，长成后对济南"风物之美，游观之富"充满向往之情。是年秋终有机会游历济南，写了这篇优美的游记。文章不仅描绘了泉城济南秀丽的湖光山色，且考察山川风物源流，并有名人轶事散见其间，集审美、知识、趣味于一体，文情并茂。在写作上，文章不以时间为序，而是综合二十天中所见所闻，漫笔写来。山水之胜与作者游历踪迹穿插叙述。时值金秋，大明湖"秋荷方盛，红绿如绣"，湖水与济水会合处，耸立着华不注峰，"遥望此峰，如在水中"；趵突泉喷涌冒出水面，金线泉有纹若金线……水光山色，风光旖旎，令人陶醉，而作者学识渊博，更使游历充满情趣。文章繁简得当，疏密有致。有时用"留五日而还"之类的语句一笔带过，而对西北处五孤峰等，则历历叙述，足见作者之艺术匠心。

《游龙山记》 金麻革撰，写于元太宗八年(1239)本文是麻革游历山西浑源境内的龙山后写下的游记。作者通过对龙山秀美风光的具体描绘，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塞外奇特、迷人的画卷，令人心驰神往。作品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先抑后扬，有意制造悬念。文章一开始便说明自己生于大山之下，又遍游中原名山大川，"固已厌登"，又目睹过代北灰暗凄清的景色，更加剧了"厌"感。而初登龙山，只见"山无麓，乍入谷，未有奇"，给人一种平淡无奇的印象。然后笔峰陡转，胜境佳色层出不穷："水声锵然鸣两峰间"，"下瞰无底之壑，危峰怪石"，"溪花种种，金间玉错"……真是美不胜收，使人应接不暇。文章还运用对比手法，把游龙山后作者兴犹未尽，意欲再次登临与开头形成强烈的对比，突出龙山之美。在结构安排上，作者按照游览的先后顺序逐次把龙山美景展现在读者面前，远景、近景相互映衬。

《陟亭记》 元揭傒斯撰，作于元泰定四年(1327)。这是一篇形似状物

实则记人的散文。它赞扬了一位宋末元初的乡贤处士阮霖，宣扬孝义，并抒发了对阮霖处于宋元易代之际，以处士终，未为元朝所用的感喟。文章伊始，作者用寥寥数语，由远及近，渐渐推出了环境幽僻的陟亭。接着对阮霖的为人作了介绍，连用几个排比句，选其一生中的几件事写了他的孝道、行义、才气和不为世用。之后笔锋一转，写作者登高远望的风景，以山川秀丽的景致来衬托阮霖的人格高洁。然后收笔，再次正面写对阮霖的怀念和感喟，并以委婉的口气讽刺了元朝的用人失贤。文章构思精巧，融叙事、抒情和议论为一体，理中寓情，情中见理，并调动排比、对仗、比喻等多种手法，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

《大龙湫记》 元李孝光撰。本文是一篇山水游记，选自李孝光游览雁荡山后写下的一组游记——《雁山十记》。雁荡山位于浙江乐清、平阳县境，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其中的大龙湫瀑布更是名闻天下的奇观。作者曾长期隐居于雁荡山下。本文记述了作者游览大龙湫的见闻和感受，生动地描述了大瀑布的神奇壮美，抒发了对故乡山水的爱恋与赞美之情。文章按时间顺序，记述了两次游览大瀑布的见闻。第一次时值连绵秋雨初霁，景色清新明丽，雨后瀑布，更具气势。先闻其声，始见瀑布，飞流直下，声若雷霆，似暴雨倾泄。作者用“仰见”、“堕”“迸落”、“横射”等形象的字眼，使瀑布呈现了一种飞动、激烈、壮观的气势。第二次是作者在冬季所见到的大龙湫景象。作者以悠缓的笔调，描述了瀑布及景物的幽美。此时、瀑布水气蒸腾，迷蒙飘渺和淡淡青烟，飘然而下，潭中斑鱼悠然游动，而家僮争接瀑布之水的喧笑，更给文章增添了生气。游记虽然写了两次间隔很久的游览，但结构上并不脱节，无游离之感。

《观石梁记》 元李孝光撰。约作于元泰定元年(1324)。本文选自李孝光描写雁荡山风光的一组山水游记——《雁山十记》。它形象鲜明地描绘了冬季石梁桥的独特风姿，是一篇优美清新的散文作品。文章主要写泰定元年冬作者与友人同游雁荡山东北谷石梁的所见。作者没有孤零零地描写石梁，而是错落有致地衬托以周围景物。头上是暖融融的阳光，脚下是布满黄叶的山地。远处看去，山北口立一巨石，腰间隆起，颇似背着背包的云游之僧。夕阳把余辉洒落山上，染得红彤彤一片。然后由鸟儿叽叽喳喳投宿石梁，方将石梁推出。它“拔地而起，上如大梯，倚屋檐端”，它的下面，是可容千人的大石洞。《广雁荡山记》谓石梁“如篮环，矫坳屈曲，仿佛鹊桥”，更可帮助我们了解石梁的形观。在气势磅礴的石梁的绝壁上，倒挂一株霜叶正红的小树，使石梁既有飞动的气势，又平添几分幽静。作者又写入夜后白云的涌动和山风吹落橡果的声响，使整篇文章富有诗情画意。

《送何太虚北游序》 元吴澄撰。这是作者送别从弟何太虚写下的赠序文。文中阐述了扩大生活领域、开拓见闻的必要性，对“不出户，知天下”的蔽塞耳目的保守态度提出非议，

对当时假游历之名而奔走权门的卑庸之徒进行了抨击。文章开始，用设问的句式，提出两种观点："游"与"不游"，接下来便逐层深入来论述"士可以游天下"的中心论点。作者扣住中心，从儒家之学与老子之学的正反阐述中，强调了广闻博见的必要性，又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形象而简约地抨击了趋炎附势之徒的卑劣行径，进一步挖掘劝游的题旨。尔后充分肯定了何太虚的出游。论辩的结尾又归结到开首，前后照应。文章主旨鲜明，思路清晰，长于论辩，动用各种句式，充分说明自己的论点，是一篇思辨力较强的文章。

《标山记》 元张养浩撰，作于元至治四年（1324）这是一篇记游散文，写于作者辞官隐居期间。它记叙了作者游览标山的见闻和感受，同时表现了作者在经历了宦海沉浮之后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的思想，也含蓄地流露出对元朝弊政不满的情绪。文章仅四百多字，短小精悍，清新明快，风格淳朴自然。作者先以粗笔勾勒出标山的轮廓，然后以活泼流动的笔触描绘出山的灵秀，水的流动。作者的情与标山的景交融在一起。作者立于山顶，环视众山，伸手可及，碧绿的溪水萦绕山间，胸中的郁积被开释，身若添翼，翩翩欲仙。"不知余之为山，而山之为余也"，人和大自然已完全融为一体。文章的语言朴实自然，明快凝炼。堪称一篇优秀的山水游记。

《翠阴亭记》 元张养浩撰。约作于元至治三年（1323）。翠阴亭是作者晚年隐居期间在别墅近旁修建的一个亭子。本文借为翠阴亭作记，阐述了自己的处世哲学，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文章先是记述翠阴亭的地理方位，"历城西北十数里"，依山傍水，风景清幽。接下来描写亭之景物与生活其中的乐趣。在此"或饮或馔，或游历咏歌"，惬意无比。然后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归卧云庄"非苟活身"，也不在于寻求山水之乐，而在于"知止知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使自我生活"适于义"。文章信笔写来，看似不经意，细思则觉层次鲜明，中心突出。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 元虞集撰，写于元延祐五年（1318）。本文通过记述小孤山一山亭的兴衰变化，间接反映了元代政治的腐败和广大中下层士人的失意、潦倒、消沉和不满，具有较强的时代感。文章的构思独具匠心，作者以独特的角度来写小孤山的雄伟险峻，由自己登上此山后顿感豁然开朗，心胸坦荡，联想到其他心怀幽愤和感慨的人若能登临，必有同样的感觉。作者委婉间接地反映了元代广大知识分子的可悲处境。接下来写山上建筑，山半腰曾有一亭，游者居此，万里风景尽收眼底，百川流水俱在脚下，然而现在此亭却因失修而岌岌可危，一片凋敝的景象。至此笔锋一转，由亭向人，写作者的朋友李维肃欣然答应修建小亭。精辟之处在于他为亭取名"一柱"，取其"卓然独立，无所偏倚"，即使千钧之力，八方袭来，它自岿然不动。我们不难想象小亭那砥柱中流，巍然屹立的雄姿、而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们自然会想到这是在为广大的中下层的失意的

人们提供一个牢不可摧的发泄悒郁的场所。作品就是这样，表面上是写小孤山，而实际上是在抒发消沉悲愤的情绪。文章语言流畅，气势充沛，叙事传神。

《龙门记》 元萨都剌撰。本文是作者游览洛阳龙门石窟所作。它不仅记述了游览所见，而且还写了作者深沉的思考和感受，是一篇既状物又议论的独具特色的游记。文章伊始，作者记叙了龙门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作者用大写意笔法为读者勾勒了龙门山河的壮美雄姿。然后，作品落笔于伊河岸边的龙门石窟。形形色色的塑像立于大洞小龛，数以千记，但"鲜有完者"，旧时曾有的八寺也一无所存，其凋敝景象与上面所描绘的自然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强烈的对比，旨在表现作者冷峻的沉思和感喟——"其工力财费，不知其几千万计。"由此生发开去，认为如此靡费人力财力，在顽石上饰金施彩来惊世骇俗，是与佛祖言行相悖的。进而对学佛者假"轮回果报"之说欺世骗人表示深恶痛绝，告诫人们从蛊惑人心的"轮回果报"之说中解脱出来。纵观全文，布局独特，记述简洁，思想深刻，笔锋犀利。

《吴兴山水清远图》 元赵孟頫撰。在本篇散文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鲜为人知的浙江吴兴的绮丽山水风光，突出描写了吴兴风景所独具的清雅、悠远的韵致，意境优美，令人神往。作者是有元一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他的山水画素以布局精美而著称。本文同样工于布局。作者立于吴兴城头，由远而近，紧紧围绕清远二字，描摹了玉湖沿途山水相映的自然风光。玉湖上游沿岸，山势连绵起伏，放眼望去，"唯见草树，不见山脚。"群山与湖水相互依傍。中游浮玉山巨石堆积，芦苇丛生，山势较低，由此观赏上游景色，只见"远树微茫"，山渐远，水渐远，苍苍茫茫，依稀可见。在风和日丽的春秋季节，举目远眺，还可领略太湖之上洞庭的苍茫山色，这可算作吴兴山水最具清远特色的地方。作者把清远的吴兴山水神形兼备地描述了出来，读罢本文，一幅吴兴山水清远图宛若即在目前，给人以美的享受。

《贫乐庵记》 元耶律楚材撰。本文是一篇以议论为主的散文。三休道人给自己的庵取名"贫乐"，意为以贫为乐，乐天知命，于是引出作者与三休道人的对话，通过对话，作者阐明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对忧乐的理解。文章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采用了问答的形式。先是三休道士解释贫乐的含义，后是作者阐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处于贫贱和处于富贵同样都应是"忧乐相半"。因为自己的志向是使社会成为圣君贤臣的理想社会，乐是得志做官，可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忧是好象用烂绳驾驭六匹骏马时有危险；而贫贱君子乐在洁身自好，忧在圣道废弛，自己不被理解。一问一答，各自观点鲜明，议论在问答中进行，说理明白，条理清晰。文字简洁，话虽不多，却寓意深刻。

《孝义永安寺请予为功德主因作疏》 元耶律楚材撰。文章的题目

即已说明了作本文的缘起，永安寺进行佛事活动，请耶律楚材作住持，于是撰写了这篇疏。文中作者对自己被政事缠绕，不能断尽尘缘投身佛门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字里行间流露出归向佛门的愿望。文章的篇幅非常短小，但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却清楚地表达了多层意思：自己不能置身佛门的遗憾；对禅林的艳羡；永安寺请他做功德主的不可推辞，以及自己作为住持身居寺外，意欲归向佛门的打算。语言非常洗炼，如一句"慕禅林而未暇"，便表达了作者仰慕禅林而又身居官场不能如愿的复杂心情。表现了高超的写作技巧。

《张顺张贵传》　选自《宋史》卷450。《宋史》修于元至正三年到至正五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它虽然是从维护元朝统治出发，且文字较为粗糙，但还是保留了有关宋代历史的大量记载。本文通过叙述张顺张贵赤胆忠心、抗敌救国而英勇牺牲的事迹，说明了南宋人民对祖国的热爱，歌颂了张顺、张贵为国献身的高贵精神。文章用传记体通例，先简要介绍了张顺、张贵的身份，然后把他们放在宋元交锋的时代背景上，突出表现他们的勇敢。在增援襄阳的战斗中，张顺冲锋陷阵，最后壮烈牺牲，死后仍"怒气勃勃如生"。张贵在突围中身中数十枪，被俘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作有用富有表现力的文字把战斗写得有声有色，使读者宛若置身刀光剑影的战场，目睹两位英雄的非凡气概。

《送张叔夏西游序》　元戴表元撰。本文是一篇赠序之作。在文中，作者将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对元代统治者的不满，托之于张叔夏（即南宋著名词人张炎）世家的兴衰及奔走旅途的"牢落偃蹇"之中，流露了深沉的故国之思。作者首先采用叙述性手法，把深沉的思想感情委婉地表现在对张叔夏的经历的叙述上。文中途述了作者与友人张叔夏的三次会面：初相逢时，张叔夏是个风度翩翩的贵家公子；第二次相见，张叔夏家道衰落，作者也"失意"、"不遇"，张诉说了自己不得已而颠沛流离的苦衷；第三次，张叔夏"轻行过门"，将去西游，作者赠序以别。张叔夏的颠沛身世是由宋入元的广大知识分子境况的缩影。在写作手法上，文章简约有度，详略得当。作者非常简略地把张叔夏十年间的奔波轻轻带过，而用较多的笔墨来写其失意后的情态，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落拓，饱含感情，耐人回味。

《录鬼簿序》　元钟嗣成撰，写于元至顺元年（1330）。本文是作者为自己所著的《录鬼簿》写下的序文。《录鬼簿》为后人考察研究元代杂剧和作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序文中，作者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把为衣冠人所不齿的元曲作家视为与"圣贤之君臣，忠义之士子"相鼎足的"虽鬼而不鬼"的杰出人物，对他们大加赞颂，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文章开始，作者大谈生死之道，围绕"鬼"字作文章。认为那些稀里糊涂苟活人世的酒囊饭袋是"未死者已鬼"，从而引发出那些"不死之鬼"，即地位微贱而著作

与日月同光辉的元曲作家，阐明文章的主旨。然后笔锋一转，陡起波澜，作者为自己使这些元曲作家得以弘传后世聊慰于心。作者感慨颇深，透过文字，分明可见其胸中突兀不平之气。文章虽短，却有层次，有曲折，主旨鲜明，条理清晰，行文挥洒自如。

《辋川图记》 元刘因撰，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本文通过对《辋川图》及其作者王维的人品、节操的评述，宣扬了封建社会中忠臣烈士的纲常伦理和文人学子修身律己的准则，委婉曲折地讥刺了由宋降元的文人的软弱之气，是一篇“托物寓意”的议论散文。文章由《辋川图》发端，简单描述了图上景物后，由物及人，过渡到对人、事、理的阐发上来。作者批评王维的自命清高，指责王维的失节降贼，批判时人时事的颓败，寄托了作者的遗民思想和感情。文章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由画及人，由人及事，由事及理，层层深人，议论透彻，主旨鲜明。文字简洁，句式灵活。

（石 玲）

明 清

《秦士录》 明宋濂为秦士邓弼所作的一篇传记。作者生动地再现了邓弼的英雄豪杰形象。邓弼不仅生得臂力超群，胆魄慑人，而且谙熟经史，是一位身怀绝技、能文能武的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材。他想报效朝廷，但由于生不逢时，屡屡遭人白眼，人避之如躲瘟疫。邓弼于是变得使酒任性、狂放不羁。作者着力刻画了酒楼上嘲书生和东门外砍马首两个场面，把邓弼的傲岸个性和英雄气概，以及无用武之地的悲愤心情痛快淋漓地展现于读者面前。本文通篇借鉴《史记》人物传记的写法，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有血有肉，语言绘声绘形，笔调悲壮凄怆，对邓弼的悲剧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送东阳马生序》 明宋濂撰。洪武十一年（1378），宋濂再朝京师。太学生马生以“乡人子”的身份拜谒宋濂。宋濂写下了这篇赠序，以求学之道必刻苦勤奋勉励马生。文中作者回顾了自己青少年时代艰苦的求学经历。由于家贫买不起书，作者只能靠借书抄书来学习。天寒砚凝，抄录不怠；录毕奔走送之。“加冠”后远道求师，严师前毕恭毕敬，竭诚以求。寒冬大雪，足肤皲裂，寓居逆旅，腹中饥馁。处在一群身被锦绣、“煜若神人”的富家子弟中间，作者没有自惭形愧，而是从艰苦的学习生活中体验到了乐趣，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学子追求知识和真理时乐道忘忧的精神境界。再和当时太学生优越的学习、生

活条件作对比，作者得出了“业有不精，德有不成，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的结论。这篇文章，通篇运用现身说法和对比手法，行文中饱含情感，情意恳切，语重心长，读罢令人奋发向上。

《松风阁记》 明刘基撰。刘基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七月，两度游览松风阁，前后留连十余日，写下了这篇游记。全文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侧重于议论。作者用比较的方法，由大而小，由远至近，一层层地揭示出松风的特点，进而指出松风之声对山林之士性情的怡悦和陶冶作用。最后结笔于松风阁，描述了自己的全部身心浸于松风阁之中的感受，表达了作者乐而忘返的心情。下篇是补记，着重描写了松姿和松声，并用轻松幽默的笔触，善意地指出方舟上人否认感觉的谬误。本文观察体验细致入微，描写生动真切，读之如临其境。但本文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在于本文富有哲理意味。行文中不仅逻辑性极强，而且通过对感觉的描摹和理性的思索，揭示了感官和心相通的道理。

（张建铭）

《活水源记》 明刘基撰。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6），作者从越城（现浙江省绍兴市）经平水游览会稽山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写了八篇游记。《活水源记》便是其中的一篇。作品描述了活水源周围的优美环境，重点描绘了活水源的清冽澄碧、源中活泼可爱玲珑剔透的石蟹、赤嘴的小鸟和状如半莲子、色若紫水晶的无名小虫等。全文生动轻快，格调明朗。作者以生机勃勃的草竹虫鱼，衬托活水源环境的幽雅清新。尤为令人叹服的是作者透过对石蟹等的描绘，衬托出水的清澄明澈，使得文中景物如水晶般明亮。文末，作者赞扬活水源“有君子之德”“其泽又能及物”，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郑宝贵）

《蚊对》 明方孝孺撰。是一篇探讨生活哲理的散文。本文以虫蚊肆虐为题，借童子之口谈论了一番反对人类相残的大道理。作者先细致地描写了天台生为虫蚊咬噬、不堪肆虐的情景，接着用“呼天而叹”引出童子的议论。童子的议论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天地之间，无论禽兽虫人，不分贵贱，一律平等，既然人可以吃动物，自然动物也可以吃人。第二层进而指出人类不仅殄灭异类，而且自相残杀，手段上也更为残忍和卑鄙。这篇文章在写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即事论理，以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悟到人生不平等的重大社会问题。二是韵散结合，读来琅琅上口，加强了文章说理时的气势。

《指喻》 明方孝孺撰。是一篇借喻立说的议论文。作于洪武辛酉（1381）九月。文章的前半部分记叙了友人拇指患疹和延医治病的经过。作者先描述了患者的心理状态，继而借医者之口说明“虽病在指，其实一身病也”的理由，进而指出讳病忌医引起的严重后果。后半部分转入正面议论，作者以拇指之病比况天下之事，反复阐明“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的道理。点明最大忧患在于“不必忧之地”、“不可见之初”、“众人笑而忽之者”，突出了防患于未

然的主题思想。作者进而联系时弊，证明“以为无虞”非智者之虑。最后希望“有位”之人能够以拇指为戒。这篇文章，喻浅意深，议论透彻，既有对具体事物的细致分析，又有因小见大的深入发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游龙门记》 明薛瑄撰。龙门位于山西省河津县与陕西省韩城之间，作者在明宣德元年（1426）夏游龙门，写了这篇游记。一下笔，作者便抓住龙门的总体特征大笔勾勒，把黄河泻出于龙门山峡之间的雄伟气势和壮丽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接着作者开始刻画细部。先写禹庙的规模形制，而把重点放在描绘庭中的古树之上，表现其古雅苍劲。次写临思阁，作者用浓墨将“危出半流”的石峰稍加点染，突出其岌岌可危之势。随即把笔锋一转，用虚实映衬的手法把画面的四隅加以处理，使画面包含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显得神完气足。最后写水楼、土祠和石龛。水楼写其“凭空为楼”，巧夺天工；土祠一带而过；石龛却是放笔铺写，表现自然造化之神奇。在描绘各景点的同时，作者还着力刻画了沿途的栈道和石磴，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内涵。这篇游记，脉胳分明，画面清晰完整。不仅出色地再现了龙门山水的壮丽神奇，也表现出作者的意中之境。

《中山狼传》 明马中锡撰。是根据民间传说而改编的一篇寓言故事。写的是慈悲善良的墨家信徒东郭先生，救下了一只正在被人追杀的狼。狼非但不思报答，反而以救人须救彻的藉口要吃掉东郭先生。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来了一位老人。狼又向老人诬告东郭先生意欲将其闷死囊中，“独窃其利”。老人看透了狼的狡猾残忍，于是将计就计，把狼重新诱入囊中，从而解决了这场不应发生的危机。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狼的本性就是要吃人的，我们决不可怜悯象狼一样的恶人。这则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弛张有致，险象迭生，引人入胜。此外，东郭先生的软弱、迂腐，狼的凶残狡诈、以及老人的机智沉着，也都刻画得十分鲜明生动，富有个性。

《项脊轩志》 明归有光撰。作于明嘉靖三年（1524），时作者年仅19岁。全文以悲喜为线索，记录了作者系于项脊轩的情感经历。文中描绘了项脊轩虽简陋但宁静清雅的环境，描述了祖父死后家庭的破败局面，回忆了母亲对自己的疼爱和祖母的殷切希望，并用蜀清和孔明的典故，表达了青年归有光对前途的自信。文后两节是附记，补写于作者35岁中举之后，记录亡妻在轩的生活片断，抒发对亡妻的怀念之情。本文笔调清新，描写细腻，语言自然平易，情感真挚深沉。平淡的文字，唱出了极悲痛的人生哀歌。 （张建铭）

《见村楼记》 明归有光撰。开篇写见村楼周围的环境，其后写见村楼的由来，并提出对李延实的勉励。文章以生动简洁的文字，写见村楼周围的环境，写吴淞江的“回环曲折”，“若抱若折”，寥寥几笔，把吴淞江的曲抑优美之态尽展无余。其后，作者写见村楼“前俯隰水……塘浦纵横，田塍如画”的来历，生动优美。但全文

中多少带有一种消极感伤的情绪，而最后对李延实的勉励，更带有较明显的封建说教性质，这些是值得指出的。（郑宝贵）

《先妣事略》 明归有光撰。是对其去世母亲生平事迹的简略记述。此文打破了一般《事略》、《行状》多虚夸谀美的陈套，以平易感伤的笔调，追叙母亲生养哺育、勤俭持家、督儿成才的若干家常琐事。文章似乎不事剪裁，随意所之，想到那就说到那，但字字句句，皆发自作者肺腑，充满了对母亲的无限深情和怀念，故而娓娓琐屑的叙述，也足以打动读者。文中每每在一节叙述之后，直接抒发追忆之情，并时而发出“伤哉！”“天乎，痛哉！”的感叹，使文章更加悲切哀伤，故作者遂得“长于叙悲”之名。但此文过分拘泥于古文作法，刻意追求简洁，反使作者的感情不能得到尽情的抒发，文章显得有些窘促。（刘传新）

《寒花葬志》 明归有光撰。系为悼念婢女寒花而作的一篇墓志。在这篇短短的墓志之中，作者没有罗列死者的生平经历、行状事迹，而是捕捉了日常生活中寒花的三个细节。一是寒花初来时双鬟绿衣的童稚装束，二是吃荸荠时“持去不与”的调皮动作，三是饭几上“目眶冉冉动”的眼神，再贯之以夫人笑之，不仅活画出小女仆天真无邪、充满稚气的神态，也再现了主仆间融融的调趣氛围。可以看出，这里有悼念亡妻的成份，但令人回味之处是世俗家庭生活的情味、情趣。这篇墓志，通篇以情为文，发乎情而止乎情，所叙之事又系乎情，疏淡简短的叙述之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哀和忧思，读罢使人欲涕。（张建铭）

《答鹿门知县二》 明唐顺之撰。本文又名为《答茅鹿门知县书》。是唐顺之写给茅坤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作者以汪洋恣肆的文笔，对当时文坛上一味抄袭古人、专门追求形式的恶劣文风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主张作文学诗要直抒胸臆，要有独到的创见。作者把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独立见解、有创见的人所写。他可能不刻意于文章的形式，但直抒胸臆，如写家书，即便是草率一些，仍然是绝好的文字。另一类人虽专门学习作文的法则，但无创见，就不免流为下格。作者以陶渊明和沈约相对照，论证了这一观点。全文紧扣中心论点，旁征博引，层层阐述。脉络清晰，感情自然真挚。语言通俗形象，不失为一篇有本色、直抒胸臆的好文章。

（李玉洋）

《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 明茅坤撰。本文是作者为自己编辑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所写的总序。作者评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其用意是溯源流以昭文统，明法度以示矩范，提倡文以载道。以八大家为宗，由此上溯，形成一个完整的古文系统。作者认为：文章本于六经，作文章要文道合一。古文之所以为古文，首先在于它能够阐发儒家的道。但文学家和古文家还并不等同。孔子弟子七十余人，而文学之科却独有子游、子夏两人。这除了“各有独禀”之外，根本上是儒学并不等于文学。所以自汉至唐，其中不乏“矫然龙骧”的佼佼者，但

“六艺（经）之旨”，即作者所说的“道”，却“渐流失”。及至唐朝韩愈、柳宗元等崛起，为文“并寻六艺遗略”，才重新接续上了古文的坠绪。所以一个古文家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既精于文学，又擅长于经学。这样才符合孔子所说“旨远辞文”的标准。因此，作者着意精选出唐、宋八位作家的作品，以其为宗，由此而上溯西汉晁错、贾谊诸辈，再由此上溯至孔子师徒，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古文系统。它既不属于纯粹的经学，也不属于单纯的文学。而是旨远辞文、文道合一的专门古文之学。在说明了编选《文钞》的用意后，作者又对当时文坛的现状进行了评论，针对前七子论文宗秦汉、卑视唐、宋的做法，明确指出：古文“以道相盛衰”，而不是“与时相高下”，同时还要看作者的才能和造诣。作者提出的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意义，对前七子崇古卑今的思想，有一定的矫正作用。（李西宏）

《报刘一丈书》 明宗臣撰。这是作者给其父辈的世交所复的信。信中，作者用一种近于漫画化的艺术手法，对当时上层社会的污秽、丑恶的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形象地揭露了朝廷权贵的骄横受贿，一般官僚为夤缘以进而奔走权贵之门，摇尾乞怜、虚张声势的丑态，反映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从中也显示了作者的正直耿介。全信围绕刘一丈给作者信中勉励作者的“上下相孚”一句展开，对官场的现状进行了描摹。详尽地向读者描绘了权奸的赫赫气焰，门者的狐假虎威、敲诈勒索，干谒求进者的谄媚无耻。这封信笔锋犀利，语言简洁流畅，朴实无华。亦谐亦庄，写人叙事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赵敬利）

《叶子肃诗序》 明徐渭撰。徐渭在为友人叶子肃诗写的这篇序言中，针对当时文坛上弥漫着的复古主义风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反复古、求创新的文学主张。文中，他一方面批评了“今之为诗者”“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的模拟、抄袭之风；另一方面，又赞扬叶子肃的诗“出于己之所自得”，能够写出真性情。文中充满了愤世嫉俗之意，将前后七子倡导下出现的动辄“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文坛现象比喻为“鸟之为人言”，颇具讽刺力量；而在赞扬叶子肃能抒发真情实感的诗作时，又充满了赞赏的激情，连用四个排比句，从不同角度论情与语的关系，笔意奔放，写得很有气势；且句式于整齐中见变化，无呆板生硬之态。（刘传新）

《又与焦弱侯》 明李贽撰。本文是作者写给其好友焦竑（字弱侯）的一封信。信中，作者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深刻地揭露了当时一班假道学们“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的虚伪、丑恶的灵魂。这篇文章，显示出作者独特的见解和过人的胆量，文笔辛辣犀利，具有很强的讽刺力量。（李西宏）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明李贽撰。作者晚年住在麻城芝佛院，以

"异端"自居。为表示"从众"，在佛堂里挂起了孔子的画像，并附了这篇题词。文章中指出人皆以为孔子为大圣，以道家、佛教为异端，但并不真正了解大圣和异端，而是听惯了前辈的教导的结果。以此类推，孔子之所以为圣，乃是因为他自己说过以圣自居的话；道、佛两家之所以成为异，也是孔子所云"攻乎异端"造成的结果。这样，作者利用推理的方法，层层递进，揭示出了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道佛两家之所以成为异端的真正原因。表达了对所谓"千古大圣人"、"万世帝王师"的肆意嘲弄和对当时统治者强制尊孔的辛辣讽刺。　（赵敏利）

《海览》　明屠隆撰。本文记乘舟游普陀山一带海面的经过，肆其笔力，极力描述海之辽阔雄奇和观海的惊喜之情，文章富有气势，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文中对海上景象的描写准确、生动，如写海上日出一段："忽风起波涌，赤光迸出，横射万道，须臾，大火轮吐海底，海峰如赭，云霞紫翠，倏忽变幻，使人神悸精眩，散发狂叫。壮哉，咄咄天地，亦复好怪乃尔！"有些段落的描写又揉进作者丰富的想象，如夜宿佛阁听涛一段："通宵闻大风雷声，或如万面战鼓，訇訇而来，疑遂掩此山去，令我眇焉四大，掷于何所？其上挂扶桑蟠木，与阳乌亲乎？其下撞蛟宫水府，与龙子友乎？"还有一些对海上风光的描写与神话、传说穿插在一起，使文章显得奇幻、深沉。

《文论》　明屠隆撰。此文论述对诗文创作的见解。屠隆名列于王世贞所定的"末五子"之列，他的文学思想，虽没有摆脱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的影响，但他却是拟古论的反对者。屠隆重视才情，注重文采，这篇《文论》中评论历代诗、文的发展情况，特别强调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指出六经之所贵者固然在道术，"即其文字奚不盛哉！"六经而外，《左》、《国》、《庄》、《列》的文章，屈原的词赋，也各有特色；六朝诗文，虽有"盛粉泽而掩质素"之病，然而"浓华色泽，比物连汇，亦种种动人。"认识到风格多样化的重要，所以他对七子一派中"模辞拟法，拘而不化"，"千篇一律"的倾向表示不满。于是，他在文中提出了"取材于经史，而熔意于心神，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的主张，认为这样，才能免于傍人藩篱，拾人咳唾。屠隆对韩愈抱有成见，故在文中极力攻击韩愈的古文，理由是韩文"淡乎无采"，"索乎无味"，"其气弱，其格卑，其情缓，其法疏"。并将矛头下指向欧、苏、曾、王之文。唐宋八家的古文，确实存在着装腔做作、故意一摇三叹的弊病，但屠隆之攻击韩文，不是以自然之文而是以周、汉之文为比照的，因而并没有真正击中韩文的要害。屠隆富有才情，此文笔力恣肆，挥洒自如，有汪洋浩荡之势；散中时带骈偶之句，善于形容，带有藻绘习气。

《程原迩稿序》　张鼐为其友人程原迩文集所写序言。文中时而谈山光湖色，时而叹人生哲理，时而品评友人之文，看似松散，实则谨严有序，于闲谈中阐述了一些出自亲身体验的

文学见解。如文中第三节谓“文章之借灵于湖山，如草色之借润于酥雨，生动地说明了“文章得江山之助”的道理；也解释了程原迩之文“饶于韵而远于趣，入于正而出于奇”的原因。又如文中第二节谓“人生于世，凡浓艳之物，可争攫取者，以吾淡然当之，其味立尽”，则包含了作者的处世经验，表现了作者淡荡的胸次；又谓“游不奇不旷，文不奇不王”，则表现了作者对“文须奇”的审美要求，语句精警，富有意味。

《与姜箴胜门人》 张鼐撰。此为张鼐写给门生姜箴胜的一封信，时作者在南京礼部任右侍郎。信中先述自己处散地、作冷官的凄凉境地和落寞之情；继而表示自身不足惜，所可叹者乃“士大夫风尚，愈趋愈下”，国事日坏。文中“人才坏而国事坏，国事坏而士大夫身名爵位与之俱坏，吁！可惧也。”充满无可奈何的哀痛之情。信的末段，作者以教师的身份对任侍讲之臣的学生的处世方针予以指点，“吾辈口不宜快，而心固不可不热”，“须留一段光明于胸中”等语，既显出作者处世的老练，更可见出作者的骨鲠之气。通篇书信，不论叙己、论人，话都说得开诚、坦白，真情实感，出自胸臆，故而能深切感人。

《徐文长文集序》 明虞淳熙撰。此文约作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与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约略同时。两文之推崇徐渭，其意皆在表示对“明七子”尊古复古、模拟剽窃文风的不满，故引文长为同志知己，欲倡导独抒个人情性的文风，一扫前后七子造成的沉闷空气。淳熙此文，围绕“世文章谁为第一”而反复引说，谑浪调笑，任意挥洒，虽未将矛头直接指向王（世贞）、李（攀龙），而实欲撼动王、李“文苑之南面王”之地位。文中引袁宏道语称元美（王世贞）为“钝贼”，欲令其贼党“僵死《中原》《白雪》中”，为透露作者真实意图的痛快淋漓之语。文中又称东坡为“天西奎宿”，言其自天堕地，分身为四，语颇诙谐，这种对苏东坡清新平易文风的推崇，也暗含对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的否定。

《绿天小品题词》 明李维桢撰。为王时驭《绿天馆小品》而作。此文写得机智轻巧，王时驭好酒，自号“酒懒”，作者即从“酒”说起，历叙王氏酒人及酒人之言，自晋时的王蕴、王荟、王忱、王恭说到隋唐时的王绩，提到《绿天馆小品》，则仅“清言秀句，多人外之赏”一句，不作过多评述。其实，这也是一种聪明的评价方法，对王时驭作品的评论早已暗寓在对酒人、酒言的叙述之中。作者谓王时驭可“入《世说》‘言语’、‘文学’、‘任诞’三则中”，对其人、其作的评价已相当高。文末又生波澜，谓前述王氏酒人皆有官职，而时驭布衣，“是又乌衣马粪佳子弟之所罕有也”，突出了王时驭的隐逸品性，颇带诙谐意。

（刘传新）

《牡丹亭题词》 明汤显祖撰。在这篇题词中，作者紧紧围绕一个“情”字而生发议论，赞美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追求，抨击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对青年一代婚姻自由

的束缚，指出情的巨大力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里所说的"情"，是指人们的真正感情。同时，对滥用"情"字，对"必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的见解，嗤为皮相之见、形骸之论。 （潘相民）

《合奇序》 本文是汤显祖为其同乡好友丘毛伯所选编的文集《海内合奇》所作的序言。文中指出，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其文思似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而不在与前人的步趋形似之间。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作者以苏轼画枯株竹石、米芾画山水人物为例，说明"绝异古今画格"者奇妙，有意为之者则不佳。进而指出，作画如此，为文更应如此。为文若只是一味地摹拟前人作品的用字、造句，乃至改头换面，剽窃前人词句，这样的文章，绝无其生命力可言。而只有发自心中、冲破前人格式、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作品，才是上乘佳作。

（李西宏）

《序丘毛伯稿》 汤显祖为其同乡丘毛伯的文稿所写的序言，大力推崇"士之奇"。文中指出："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为什么呢？因为"士奇则心灵"，于是可以"飞动"，能"上下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可以"无所不知"。也就是说"士奇"则有灵气，以之为文，则可独有灵性，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反观不能如意者，则"意有所滞，常人也"，其文必无生气。紧接着，作者又提出"词以立意为宗"的创作主张，讲究要有新奇的立意。这对于当时文坛上"前七子"、"后七子"用字、造句摹拟前人的风气，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潘相民）

《王季重小题文字序》 明汤显祖撰。王季重即王思任，号谑庵，浙江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三年，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但一生坎坷，"三仕三黜，五十年内，强半林居"，遂以文学鸣其不平。汤显祖认为王思任的文笔可以与当时文坛上声名最盛的三人相比肩，原因是没有受到学问的拘束，没有经历考场的蹭蹬，没有处于闭塞的环境，"故其为文字也，高广其心神，浏亮其音节，精华甚充，颜色甚悦，渺焉者如岭云之媚天霄，绚焉者如江霞之荡林樾，尤其"多风人之致"，以古文词诗歌见长。无拘束的心灵加上诗人气质，自然笔下才气横溢，想象力可由心纵横、舒卷自如了。从中可见汤显祖对性灵的看重。

《如兰一集序》 明汤显祖撰。是为钟宗望《如兰一集》所作的序言，要在表达他自己对诗艺的看法："诗乎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禅在根尘之外，游在伶党之中，要皆以若有若无为美。通于此者，风雅之声，可得而言。"宗望"好与天下山川人物相骀荡"，便深得汤显祖之心，所谓游道亦即诗道，"晤言一室之内，旬日不出；映心千里之外，累月忘归，通之若有若无，都无迟疾欣厌之累，于以眷节怀交，必有不推排而齐，一雕饰而秀者。"艺本系乎情，情在，想象力便反

复缠绕其上，无论人情还是物理，妙在“映心”而且“忘归”，如此，“临川四梦”也正是一种“游道”，把出世的悟性化进人世的情境，便自然是美妙的。 （章亚昕）

《杨幽妍别传》 明陈继儒撰。文中记娼家妇杨幽妍与贵公子张圣清情事，其情节类乎唐人传奇，文中云幽妍艳而清，圣清俊而恬，偶一相遇，俱生爱慕之心，遂得定情。其后圣清赴试，幽妍随媪渡江，思而成疾，屡忤媪意，遭媪挞詈。圣清闻之，遣人往视，有侠客徐内史愿为调人，弹压悍媪，圣清遂得纳幽妍为妾。幽妍入室后，病益沉重，除夕夜死。圣清为之雕刻紫檀像，怀之衣袖衾裯间，永难忘怀。此文虽在外在情节上袭唐人传奇套路，但与唐传奇风格迥异，它不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行文简洁幽丽，叙事仅勾勒轮廓而已，独对于幽妍内心活动，多所抉发渲染。察作者用心，在于抒发一个“情”字，赞叹男女间的一往往深，相怜相重。于此，可以见出作者一种渐近自然的爱情观。唯文中对幽妍性格中“林下风”的强调，令人觉有乖张之嫌，似乎是作者山林习气的刻意表现。

《花史跋》 明陈继儒撰，次卜讶送踔僮《花史》所作跋语。莳花种草，本闲居小道，而作者却尽力从大处出语，亦庄亦谐，使人忍俊不禁。文中将赏花种花列为雅、俗的分界，又谓此从性生，不可得而强，已将区区小事说得非常严重，文末更谓“谛看花开花落，便与千万年兴亡盛衰之辙何异？”直将一部《花史》，比作二十一史，更属故作惊人语。此类作文法，显示出作者的精于品题和善于应酬。

（刘传新）

《论文》 作者袁宗道。《论文》上下篇，是宗道的重要文论，文中详细地阐发了他的文学主张。《论文》的上篇，批评当时文坛上李梦阳等倡导摹拟，造成了恶劣的拟古风气，连地名、官制，也都用秦汉的名称，实为可笑之举。文中指出了学习古文与模拟古文的区别：学习古文是学习其实质，不是学习其形式，更不是拘泥于字趋句随。这正如穿衣吃饭一样，穿衣是为了蔽形，吃饭是为了饱腹，而不是学习古人缀叶蔽体和茹毛饮血。学习古人的文章，重点在于如何使文章更通达。《论文》的下篇，其中心论点是：作文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作者指出：“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所以没有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这一点，切中时弊。随后，作者又指出：若使文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则必须有“理”“充于腹”中。有了“理”，则有了自己的见解。正如道、法、墨、农、阴阳各家，其文之所以为后世所推崇，正是在为文时各自阐发自已的“理”。汉、唐、宋诸名家，也莫不如此。有了“理”，文再随之，自然可写出好文章。最后，作者又尖锐地批评道：李攀龙（号沧溟）、王世贞（号凤洲）二人，一言古人无“理”，一不许今人有“理”，实在是贻误后代的谬论，必须彻底摈弃。这两篇文论，文词浅显而文意深邃，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文学主张。语言流利，

接近白话，浅显通达，率真自然。是公安派文论中写得较好的篇目之一，今天读来，对我们学写文章，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李西宏）

《上方山四记》　明袁宗道撰。上方山，在北京房山县的南部。主峰海拔880米。隋唐时已成佛教胜地，此处山峦秀丽，古木参天，为京郊的游览胜地。“记一”是写自乌山口至欢喜台的所见、所感，基本上是按行路的顺序写来。开篇即突兀而起，“两畔乱峰束涧，行人如行巷中。”一个“乱”字，言山峰之多；一个“巷”字，言两旁山峰相靠之近。但见村落井屋，前后散布。前行路愈狭，一罅似蛇径。“三步一回，五步一折”，又极言路之曲。此峰未越，他峰又出。了了数语，写出了山路的艰难曲折，山势的奇峻变幻。“记二”写自欢喜台登毗卢顶，主要介绍毗卢顶的风光。寺庙错落，莳花种竹，牡丹正盛，熏气馥郁。更兼有时新山肴野菜，确实令人心旷神怡。“记三”记述了毗卢顶周围的景致。几经曲折，始入云水洞，洞内奇景。令游者疑不似人间。有似黄龙白龙者悬石壁上，还有踞池的盘龙、卧佛、狮子、石钟、鼓楼等等，皆钟乳石。这一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云水洞内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读后使人如入其中。这组游记，着笔有浓有淡，落笔轻灵飘逸，质朴自然。整个游历过程娓娓道来，不作雕饰语，追求率真自然的风格。看似随手写去，自然流逸，但又有充实的内容，是作者游记中的上乘篇目。　（李玉洋）

《西山五记》　明袁宗道撰。作者在这组游记中，详细地记叙了其游历过程，通篇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兼以记景。“记一”叙述卧佛寺所见。以白描的手法，简略地介绍了寺内情景。“记二”写碧云寺及周围景观。“宫室敝亏，不堪远瞩”，留给读者的是一幅破败景象。幸而有卓锡泉水所注的方池，池前翠竹飒飒，泉水清冷彻肌，万头金鲫翕忽水面，为破败的古寺添加了活力。“记三”写由碧云寺、香山寺途中及周围景色。白塔与山隈青霭相间，在阳光的辉映下，别有情趣。作者在此运用了色调的对比，青白分明，分外映目。而南望又是朱碧参差。颜色的错落，造成了视觉上的愉悦，人在此处，定会神清目爽。观诸寺后，作者作出了“碧云鲜，香山古，碧云精丽，香山魁恢”的评价。又至流憩亭，复登山巅。自高处俯瞰，所见自然异于平川。作者用“诸山俱若屏息”来形容山巅近处的小山峰，而用“峰峦奋迅而出”来形容远处的山峰，确实是别出心裁，语意殊于常人。“记四”写严华寺左翠华洞，及裂帛泉之名的来历。“记五”写寻石经洞不果，其原因乃作者误记所致。这组游记，与其弟中道的《游西山十记》相比，可谓各有特色，互为伯仲。中道的《十记》主要写景，而宗道的《五记》主要写人的活动，兼以写景。从这组游记中，可以看出，作者所追求的是“辞达”，不事摹绘，简洁明白。可以说，这是作者文学主张的实践。

（李西宏）

《余杭至临安山水记》　明魏嘉毓撰。文中记途中所见景物，采用移

步换形法，就足之所履，目之所见，从不同位置、不同角度，依次描述沿途的山光水色、秀木绿筱。此记文笔清丽简洁，又注重气氛的渲染，颇似一幅水墨山水画。作者擅长山水画，故对文中所记景物常以画理出之。如文中记溪水云：“溪流曲折明灭，远水穷处，爰有高山入云。黛色欲滴，与丛林交青，深溪合翠，森沉翁郁。”即似画中常见的“平远之景”。而记中描摹细致处，如对溪流岸边树木的描写：“溪流所激啮，多崩坼，树根时踞颓岸，半迸出水上，偃蹇离奇。”则又如近景特写。文笔如画笔，故文中视觉形象鲜明。（刘传新）

《**徐文长传**》　明袁宏道撰。是作者为徐渭所作的传记。徐渭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诗文、戏曲、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性格狂傲，愤世疾俗。一生仕途坎坷，最后郁郁不得志而死。袁宏道与徐渭并不相识，在徐死后数年，袁游历吴越之地，偶然见到徐的诗集《阙编》，并了解到徐的生平。于是怀着惋惜、钦佩的心情，写下这篇传记。这篇传记简略地记叙了徐渭一生中的大体经历，对其诗文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称赞其诗匠心独出，有卓然独立的气概，不因模拟古人而损害才气，不因议论辩说而损伤格调，与韩愈、曾巩的文风相近。同时，还对徐的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作者这篇传记，写得深沉哀惋。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心中对徐谓的敬仰和哀惜，以及怨愤难平之情。（赵敬利）

《**叙小修诗**》　明袁宏道撰。为其弟袁中道的诗集刊行时写的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作者通过对袁中道诗的赞许，批评了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斥责了复古派剽窃、模拟的形式主义文风。作者在文中还响亮地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指出文学是随历史的前进而发展的，不是静止不动的东西，反对崇古非今。另外，还肯定了出自“闾阎妇女孺子”之口的歌谣的价值。全文议论风生，笔锋犀利，语言通俗流畅、简洁有力。（李玉洋）

《**晚游六桥待月记**》　明袁宏道撰。是春游西湖时所写的游记小品，文章的开头，先总写西湖景致最盛时是春天，而每一天的最佳景致是朝烟和夕岚。接着又写今年春天的奇观，是梅花因“为寒所勒”，而“与杏桃相次开发”。由此而下，作者以凝炼简洁的笔墨，写出了春游西湖的盛况。“彩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一幅万人游湖图，在读者面前豁然展开。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指出西湖景色真正秀丽所在，乃是朝日始出，夕舂未下之时。尤其月景中的花态柳情，更是别有趣味，然而这种景致，非一般俗人所能享受，只有山僧游客才可受用。这文末突兀的一笔，又把读者带入了一种更高境界之中。这篇游记小品，隽秀生动，行文恍若行云流水，语言流利浅近。写景中渗透进作者的性灵，韵味深远，情致盎然。（潘相民）

《**识张幼于箴铭后**》　明袁宏道撰。是作者为张幼于的箴铭所作的后

记，表露了作者旷达疏放、豪放不羁的性情。作者在文中把古今士君子分为两类人，一类为放达者；一类为慎密者。放达者超脱豪放，倜傥不羁，如司马相如、阮籍等人，慎密者拘谨矜持，恂恂规矩。张幼子则属慎密者一类人。接着，作者进一步论述到："两者不相肖，也不相笑。各任其性。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在这里，作者给处世为人提出了一个标准，即"率性而行"。对于二者之间能否调合，作者作了否定的答复。最后，作者指出：若把矜持守墨视为最终规则，而对古往今来的放达者持有非议，实乃拘儒小夫，效颦学步的陋习，是肤浅之见。从另一个侧面阐发了"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的道理。（赵敬利）

《文漪堂记》 明袁宏道撰。作者在这篇小品中，以水喻文，提出了"文心与水机，一种而异形者也"的论点，形象地说明了水无常形，而文也应无定式的道理。文章中作者用较大篇幅描写了水的各种形态："奔然而趋，忽然而折"，"细则为罗縠，旋则为虎眼"，"娇而为龙，喷而为雾"。接着又以司马迁、班固、杜甫、李白、韩愈、欧阳修、苏洵、苏轼等古代八大家的不同写作风格，进一步说明了写文章应象流水一样，既无常形，更无定式，信腕信口，皆发心中之性灵。以水喻文，古已有之。前人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就有韩如海，柳如泉、苏文似潮涌、欧文似闪电的说法。但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却独辟蹊径，从宏观的角度，把为文与流水巧妙地接合在一起。前朝诸多大家的文章，风格的不同，到了作者眼中，都化成了"水"的形态的变化。或为澜，或为泉，或为海，或为瀑、或为泽。林林总总，变化莫测。作者以水的形态各异，比喻文章的不同，这样就变抽象为形象，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作者的意图。而作者这种写法的本身，也充分体现了自己提倡的为文如水的写作原则。

《满井游记》 明袁宏道撰。本文是作者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任顺天府学官时，到北京东直门外的满井郊游后，所写的一篇游记。文中先简略地介绍北京地区春寒犹厉，风沙特大，难以出游。继之具体地描写郊游的所见所闻。有高柳，有波色，有山峦，有柳条，有麦田，有游人，有沙鸟，有游鱼。作者在描写乍暖还寒的早春风光时，抓住风景、游人、鸟鱼在初春的特点，娓娓道来。写波色是乍明，微波层层，写出春风的和煦；写山峦是明媚，如倩女靧鬟始掠，写出了春山如睡的慵态；写柳条是将舒未舒，柔梢披风，写出了初春杨柳抽芽如烟如雾的朦胧；写鸟鱼是悠然自得，洋洋有喜气，写出了严冬已过，万物迎春的欣喜。了了数语，如白描一般，勾勒出了北国早春二月的景象，使人如入其境，心往神驰。此情此景，是否是人人置身于其中皆得其乐呢？非也。只有象作者这种闲官，才能这样潇洒自如。这文章末尾的突起一笔，表达了作者鄙弃官场，厌恶为官的情感。游记的语言流利浅近，落笔虚实相宜，文笔隽秀生动，浑成无迹。（李国宏）

《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 明袁宏道撰。此文为作者的庐山游记之一。中郎游记，于此游后笔力富赡，渐趋丰满，描景状物淋漓尽致，意态飞动；性情与山川相映发，任意挥洒。此文中记青玉峡下潭水，尤为精警、生动：“峡苍碧立，汇为潭。巨石当其下，横偃侧布，瀑水掠潭行，与石遇，啮而斗，不胜，久乃敛狂斜趋，侵其趾而去。”拟人化的运用，使人感觉水石之中蕴含着意志和力量。文中又以水喻文，阐发“文以蓄入，以气出”的道理，其词曰：“今夫泉，渊然黛，泓然静者，其蓄也。及其触石而行，则虹飞龙矫，曳而为练，汇而为轮，络而为绅，激而为霆。故夫水之变，至于幻怪翕息，无所不有者，气为之也。”又以水评历代之文：“濯涧听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则为六经；郁激曼衍者，则骚赋；幽奇怪伟，变幻诘曲者，则为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两语隐然触及到“文心”，显示出此时中郎学养渐厚后的自信和神采焕发。

《由水溪至水心崖记》 明袁宏道撰，为作者的德山之行游记之一。此时中郎学识既富，笔力渐丰，下笔为文，奇山丽水与胸中灵气相映发，笔飞墨舞而趣味盎然。此文中记山水，绝不类郦、柳山水之简洁含蓄，而以浓厚的主观性见长。如本文中记新湘溪一段山水曰：“众山束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闲雅，无刻露态。水至此也敛怒，波澄黛蓄，递相亲媚，以与游人娱。……如是十余里，山色稍狞，水也渐汹涌，为仙掌崖。又数里，山骨而睦见，水落而滩见。”山容水态中明显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作者还时时按捺不住游兴，以独特眼光对山水予以评论，如评山曰：“山远而缓，则乏神；逼而削，则乏态。”又评所游一段山水曰：“大抵诸山之秀，非穿石，水心之峭，亦无以发其丽，如文中之有波澜，诗中之有警策也。”此类语中含有作者从游览中体会到的美学经验，耐人寻思回味。 （刘传新）

《拙效传》 明袁宏道撰。“拙效”，即效法“拙笨”之人。这是作者集人生和社会经验之和而发出的感叹，它从一个侧面，表露出作者对待人生的态度。文章的开头，先以兔子和乌贼鱼作比喻，指出善于趋避、隐藏者，反而更难保全生命，继之引出家中的四名拙仆，然后对四人作了具体的描述。作者选取了四人日常生活中一至二件具有典型性的事件娓娓道来。那迷途不知问路、年四十余尚不知自己姓名的冬；自作聪明、憨态可爱的东；绳断自伤的戚；因不知发型变换而使自买之帽不合适，反而骇叹竟日的奎，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拙形可笑，憨态可掬。但是这样的四位拙仆，却颇使主人放心，而那些狡猾的仆人却相继被逐去，致使资身无策，遭受冻饿之苦。四拙仆反而衣食无虞，悠哉游哉。何也？因他们虽拙但无过，颇能守法，得到主人的谅解，故此能赖以度日。所以说，拙者也有其使人可效法之处。那作者的本意何在呢？如果我们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了解到阉党专断国政、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正直的读书人惨遭迫

害的社会现实，就不难看出作者的苦衷。守拙以求平静，效愚保全家身，这其中，凝聚了作者对人生，社会种种深刻的感受，给人以悠悠的回味。

（赵敬利）

《华山别记》 明袁宏道撰。华山是五岳最险峻的一峰，攀登华山，古来即被人称作一种壮举。作者从自己少年时即怀有登华山的志愿写起，然后借数人之口，道出了华山的险、峻、奇，造成了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继之，作者转入写登山的过程。先写见险心怖，继而写自己从恐怖中解脱出来，终于登上南峰之巅。这一部分，作者把写自然景物和叙自己的主观情感结合起来，揭示出了遇险畏缩，则一事无成；视险淡然，则能度险而过的哲理。这篇游记，基本按时间顺序写来，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语言平易，立境高远。 （李玉洋）

《淇园序》 明王思任撰。淇园在浙东，为明相国吕文安之孙吕美箭所建，王思任应邀为序，历数“山水之缘”的难得，力陈淇园之秀：“枕负大海，襟带三江，湖山溪壑之所飞回，云霞日月之所跳荡。以榻为马，而穷峦惊峭，竟日赏心；以几代舟，而渔笛菱歌，随风入耳。”如此，淇园便是隐逸的福地。文中极尽笔法变幻之奇，“众妙绕环”，可以与园林争胜。其文思腾挪大体不外以博见才、以要见识，似乎天下事尽藏胸中，开口便能娓娓道来，而奇思妙想也如长川大河滚滚不尽。如文中云：“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巉目凹，蜀得其险；骨大肉张，秦得其壮；首昂须戟，楚得其雄；意清态远，吴得其媚；貌古奇幻，闽得其奇；骨采衣妍，滇粤得其丽。然而韶秀冲停，和静娟好，则越得其佳。”直是如数家珍，将本不易讲解的事说得极从容极精当极透辟。举重若轻，也正是这篇序文的动人之处。

《徐伯鹰天目游诗纪序》 明王思任撰。徐伯鹰游天目山，两月后返，写得有诗，有纪。王思任读后，便写了这篇序言。文中围绕悦目做文章，自谓“每岁见一绝代丽人，每月见一种异书，每日见几处山水”，才算对得起自己的眼睛；而徐伯鹰以为“色易衰，书易倦”，只有山水之美才是最可靠的，可惜游天目时逢雨天，只能算是用一只眼观览山水。王思任就此感叹说，人就是长了四只眼也不会知足的，倒不如都当独眼龙更安心些。徐伯鹰说，我还得要这双眼，“所愿一眼如天，一眼如海。……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文思颇诙谐，而“悦目”问题实指涉审美观照，寓于目必会于心，悦目的真实用意还在于畅神。文中谓见“丽人、异书、山水”则悦，见“阿堵”（钱）、“纱帽”则辱目，即以前类为美好，后一类为丑恶，表现出作者淡泊清高的情趣。

《剡溪》 明王思任撰。游记。剡溪在浙江嵊县，“山高岩束，辈绿迭丹，摇舟听鸟，杳小清绝”，作者遂想起王子猷雪中访友又兴尽而返的往事，发出“文人薄行，往往借他人爽厉心脾，岂其可”的感慨。总是“沙明小静”，山意悠闲，清通灵秀，岑寂清幽到令人有“秋冬之际，想更难为怀”之叹，那回忆古人故事的闲笔，便也使游记

境界全出。作者惯使山水与人事相映成趣，有“万壑相招赴海，如群诸侯敲玉鸣裾”的妙喻；而反衬流连山水的情趣，则以舟子“喃喃怪事我也”为插曲。如此，便有所见，有所闻，有所遇，有所感，亦有所思，区区三百字文章仿佛尺幅画卷内云烟缥缈，直是清入肺腑。

《天台》　明王思任撰。游记名。极状山形奇峻，路峭如塔，云雾迷离，瀑若飞帛的种种景观、而华顶寺拜经台本是天台山极顶，李白所谓高四万八千丈的最高峰，看日出与泰山观日峰有同样大的名气，王思任却有“予独谓其痴肥童溷，不过一高而已”的妙语。与他在《天姥》中对太白“一梦而吟”的“疑意其颠”可以相映成趣。说起来山之高下也没什么了不起，“项王一呼，千人自废，安敢摩肩背拱逊雁行乎？司空见惯，一出头山，浑闲事耳。然于形家看个字龙，分宗出祖，亦不为无补云。”是为妙悟之言。于是“略用放榜例”品题天台胜境十五处，而华顶仅列十一。那品题之笔，也正是即风格语人格，乃是极精警的文字。

《观泰山记》　明王思任撰。泰山“变化无方，奇不在一泉一石间也。此不可以游赏，而可以观。善观者，观其气而已矣。孔氏观之曰‘浑然’，孟氏观之曰‘浩然’……若予之意，止在泰山一片青也。”在观照中会心于崇高的气象，叹为观止处也有胸中不绝的生气，有口不能言的真意在焉。怪不得王思任抱怨“遇每一岩，字面赘字，何处不可恶，而共欲黥泰山为？……祖龙欲无字，今儒欲有字，藉车组耤，幸不为所坑耳，焚书有远识哉！”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毕竟不是一回事，又何苦硬把一座山变成一本书呢！凝神观照“壁立万仞”之势与“霭霭云气”之神，自能意会到高山仰止的气韵，又何必学长舌妇。

《媚樵亭记》　明王思任（字季重）撰。载《王季重十种》内的《杂记》中。王思任造通明亭，又名媚樵亭，说有樵夫很喜欢这亭，亭盖好后却不来了。王思任觉得很奇怪，讲樵夫本就有“从千仞岗来”的话头，又不肯留名，他是什么人呢？是隐者？是仙人？“媚樵”是表现一种友好的态度。因樵夫一去不返，通篇渗透失人之叹，有很深厚的情致。因为此文多猜想的成分，文字也就十分轻翔灵动，如“吾询尔，山无虎乎？桂无蠹乎？松无有辱封号者乎？溪云白乎？泉月清乎？换鱼沽酒，醉几参矣？夕阳牛笛，听几阕矣？樵乎！毋以苏秦纵横也”。欧阳修写《醉翁亭记》连用“也”字，是取解释句的气韵；《媚樵亭记》则以问句胜，每用“乎”字，可说在情调上异曲同工。

《屠田叔笑词序》　明王思任撰。为《笑词》写的序言，抒发了他对滑稽的看法，大体认为少年的笑法是真的，壮年的笑法是乐的，而老年的笑法则是苦的；笑的原因越多，人们也笑得越假。唯有屠田叔这种“憨老胸次”能“破泣为笑”，又能以滑稽诗的形式来宣泄胸中不平事，超越苦笑的心境。也唯有嘲笑“人间世一切虾蟆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才能扫荡心头郁积，从而“云去天空，但

有欢喜种子，不知更有苦矣"。所以《笑词》是"可以怨，可以群"的"真诗"。这篇序，文笔跳脱灵动，以"打起黄莺儿，摔开皱眉事"二句最为传神。王思任一生遭遇坎坷，但其性格却乐观幽默，这篇序集中体现了他察世的深切和处世的放达。　（章亚昕）

《浣花溪记》　明钟惺撰。万历辛亥年（1611）十月十七日作者独游杜甫草堂，归后写下这篇游记。一下笔，作者紧紧围绕"曲径通幽"的立意，用清疏的笔墨勾画了浣花溪草堂一带清幽的景色。溪水萦回曲折、窈然深碧，两岸竹柏苍然，平望如荠；溪流绕竹穿林，时远时近，人家三三两两，错错落落，构成了一幅境界幽静、深邃的图画。溪回路转，眼前景物顿时皆明，亭、桥、题榜、武侯祠、百花洲、梵安寺、杜甫祠堂，历历在目，境界肃穆、祥和。祠内记叙颇简略，只写杜甫塑像和此行感触，突出作者对诗人的敬仰之意和此行目的。最后补叙出游经过。这篇文章，以峭拔之笔写清幽之境，叙次井然，文脉深细，表现出竟陵派作家"孤行静寄"的艺术风格。　（张建铭）

《诗归序》　明钟惺作。钟惺与同邑谭元春合编《诗归》一书，本为具体体现某种诗歌理论。钟惺这篇序文，即是对《诗归》论旨的概括。作者在文中认为诗家途径之变有尽，而精神之变无穷，说明选《诗归》的用意在于求古人之真诗之所在，也即是求古人精神之所在。而所谓"真诗者"，在于"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作者以此衡量有明一代诗风的嬗变，批评了明七子学古取径于"极肤极狭极熟"的空廓，公安一派希图走捷径而造成的僻俚。这篇序文显示出钟惺的识趣确有过人之处。作者本要揭示自己独特的论诗主张，又似乎预感到论敌的无形存在，故行文中时而正面阐述，时而反驳诘难，有些段落语气冷峭，语言尖利。

《夏梅说》　明钟惺作。为托物寓意、讽刺世态的论说文。文章构思巧妙，专就"冷热"二态，由表及里，从物理到人情，反复论说，最后落脚到识别人情冷暖的真伪。文中将"趋梅于冬春冰雪者之人"称为"真附热者"，将能赏梅之实、梅之叶者引为同志，看似乖谬，实是以自然说人事，表现出对以巧妙手段窃取名利，而表面上又装出一副清高风雅模样的伪君子的憎恶，包含了作者宦海沉浮中对世态炎凉、人情真伪的深切体验。作者文中独赏夏梅，取喻与世俗异，笔锋冷隽犀利，流露出胸中的一股峭拔之气和孤高幽寂之情。

《洪汝含鼓山游记序》　明曹学佺撰。此文借为洪汝含游记作序机会，提出对作游记类文章的看法。文中批评了游记中的"拘而寡韵"与"泛而不切"两种通病，赞扬洪汝含《鼓山游记》"兴之所适，及手境之所凑（凑）"，"神情满足，气色生动"，实际欲以此作为游记文之准则。万历中叶后，由于袁宏道"性灵说"的兴起，游记文已渐不以单纯描摹客观景物、简洁、含蓄为满足，而开始直接抒发游者的性情趣味，游记文遂呈现一种天

真自然、生动活泼风貌。曹之此文，可视为对这类新型游记的总结。作者虽意在阐述一种文学见解，但并不枯燥，理皆从平易中说出，行文流畅生动，文中讥专事“搜索传志，铺叙程期”之文为“堆故实于满纸，但数别人财宝而已”，切中此类文章弊病，耐人寻味。

《石头庵募米疏》 明曹学佺撰。此文仅百二十字，本为石头庵募米、解决经济困难而作，但作者构思巧妙，落笔灵异，文中绝不直言“米”、“钱”二字，而仅以石头庵现今的清趣高雅之状与假设中的为筹米而出现的庸俗之状作对照，欲以此感动高人韵士接济石头庵，维持这一方清静之地。文章固然写得潇洒脱俗，但高人韵士大抵贫寒，有钱之官吏商贾又不脱庸俗之气，作者眼睛只盯在高人韵士身上，似乎打错了主意，文章的实际效果不得而知，想来大概不会很好吧？ （刘传新）

《爽籁亭记》 明袁中道撰“爽籁亭”，是作者为自己在玉泉所建亭取的名字。“爽”者，为清爽、舒服之意，“籁”者，本指声音，此处指泉声。文章的开头，先简略地介绍了泉的状况：初为溅珠，注为大泉，泉水下落，声闻数里。开篇即先声夺人，给读者一个强烈的印象。继而写听泉。开初心猿意马，“耳与泉不深入”，及至屏息人静，摈弃杂念，此时即可听出泉声的变态百出。在这里，作者为泉声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哀松碎玉，鹍弦铁拨，疾雷震霆，摇荡川岳”。这与其说是泉声，不如说是听泉者的心声。泉声渗入作者的心中，洗汰脏腹，使人忘却了尘世的烦恼。随后，作者写了自己对泉的爱护和泉对其的报答。人之于泉者，仅仅是导壅、除草、汰泥、禁踏践等人力所能及者。而泉报答于人的却是除去“根于生前，蔓于生后，师友不能箴，灵文不能洗”的热恼之疾，泉之功德，不可谓不大矣。泉声有如此妙用，难怪作者须臾也不可离也。为了使夏日亭午时分，斜风细雨之日也能时时与泉相伴，作者特意在泉边修筑一亭以便日日、时时得以听泉。这篇小品，直抒胸臆，文笔流畅，写景状物，无不带有作者的主观感情，堪称作者散文小品中的上乘之作。

（李西宏）

《游西山十记》 明袁中道撰。本文是作者游历北京西山之后作的游记。从“记一”开始，作者按游览的顺序，依次展开描写，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西山风景图。使读者也随着作者的足迹，越田畴、登山峰、进寺庙、渡溪流，宿古寺听松涛，坐山麓观云烟。实有冯虚御风、羽化登仙之感。“记一”，主要写自西直门至功德寺途中的所见。杨柳夹道，带以清溪，禅刹相接、绿叶浓郁。拄杖散步的老僧，鸣声聒噪的群蛙，使作者倍感田家之乐。“记二”主要写由功德寺至华严寺的所见。泉鸣如语。柳拂清波。洞大窦深，各有特色。虽是轻描淡写，但无不倾注着作者的情感。“记三”写香山景色，抓住香山的特点，流泉下注，朱栏千级，古刹傍岩而起，尽得峰势。以此俯瞰山下，村落疏数，点黛设色。“记四”写碧云寺景致，重点描写了殿前池中的红鱼和泉水的奇妙。这一篇

小记，作者写得有声有色，简洁明快，红鱼流泉，无不跃然纸上。“记五”重点写了卧佛寺的古树，以白描之笔，勾勒出了老树铁干、碧叶虬结的身姿。“记六”写万安山中的翠岩。作者从大处着笔，不拘细节。写于此远眺京郊景色和夜听松涛怒号一段，读来使人为之一爽。“记七”写翠岩周围之景色。循涧西行，曲径怪石，或偃或卧。舍涧登峰，则别有天地。这一篇小记，写来如行云流水，写景状物，颇有特色。“记八”写万安山绝顶的情景。有攀登中的景色描写，也有登顶后一览众山、山河尽收眼底的快感。由于作者是雨后攀登，所以在所描写的景物上，均带有微雨初霁后的特色。“记九”写鲍家寺的景观。青槐交蔽长街，树荫遮地无隙。滕公寺周遭石墙，飞楼清渠，花草芬馥。由此作者发出感叹：积几百年之人力物力，才修建起如此规模的庙宇。“记十”实际上是作者对游历的总结。作者虽自二十岁起即游览大江南北的山川，但原来皆是纯为游山而游山，未脱尘缘。此次游西山不同，是在已厌弃世事、少年豪气扫除已尽之后而游，故此游能悟山色水声之玄机，于游中有所得，所以说游山自此次始。这十篇游记，散则各自成篇，聚则为一整体，始终贯穿着游山水而陶冶性情，山水花草与人俱为一体这一主线。是作者游记中的佼佼者。

(赵敏利)

《陈无异寄生篇序》 明袁中道撰。作者在这篇序言中，以梅喻人，提出了“不经磨难，人难成大器”的观点。序言的开头，作者即引欧阳修语：“风霜冰雪，刻露清秀”来赞美梅花于风霜冰雪之中，以标格韵致为万花之冠。紧接着又指出：“人徒知万物华于温燠之余，而不知长养于寒冱之时者，尤奇也。”由此，引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人生安居饱食，不经磨难，即使有所成就，也只是“凡品”。而只有经过困苦磨炼，然后才能有非凡的成就。做人、为文，皆如此。提出这种思想的，古今不乏其人。从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到唐朝黄蘖禅师的“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都是论述的这个道理。但前人所论皆偏重于“历经磨炼”。而作者在此却又有所发挥，将其“性灵说”引入其中，讲明了为何历经磨炼后即可有所作为。这就是经“淬励磨炼”后，“心机震撼”，“灵机通极而通，而智慧生焉”。如此分析，入情入理，补充了前人所道的不足之处，强调了“灵机”在其中的作用。

(李西宏)

《回君传》 明袁中道撰。是作者记叙同乡表弟事迹的一篇记人散文。“回”者，是因其相貌似西域胡人，故被人称为“回回”。文中记回嗜酒喜放，性情旷达、豪爽。虽家产荡尽，但仍我行我素。作者借回答同乡的疑问，向读者介绍了回饮酒的状况：见酒如病人见药；如猿得果，如久饿之马见水涯芳草。三个比喻，写尽了回对酒的嗜好。喝起酒来，则是一心专志，对酒之外的事，更无所知。如此喜酒善饮者，可谓嗜酒如命了。尤其使人骇异的是，回在外饮酒，竟连家也不顾，送柴米至家门，大呼一声即去。妻子

之时，仍不忘豪饮。如此行经，使人难以理解。但作者写回饮酒的本意却并不仅仅在此。作者是借描写回的近乎放荡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见解。乡人讥回为不顾家的荡子，但作者的见解却并不如是。回不顾家，但本身却乐哉悠哉，顾家者虽田有千顷，但年只四十须发已白，此为不顾惜自己的身体。身与家之间，不可得兼，取谁舍谁呢？回对钱财的看法也颇发人深思：有钱即用尽，"箸不用尽，必不来"。如此放达，难怪作者连连称"善"了。至此，作者的用意可见其端倪，即处世要放达，以乐观的情怀面对人生，自得其乐，我行我素。作者这种厌弃官场的虚伪，以真情面对人世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无关系。文章的最后，作者追忆了少年时豪饮的情景，对比目下"无力饮"和"不堪饮"的状况，发出了"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感叹。其中，凝聚着作者的人生感受，使人掩卷长思，回味良久。　（李玉洋）

《题懒园记》　明黄汝亨为同里秦心卿的园林所作题记。此文疏朗清放，语多谐谑，围绕一"懒"字，阐发所谓"懒人"之义，揭示秦心卿将园林名为"懒园"之意。文中言"天地间人，懒者多矣"，但"懒亦未易言。真懒者世外而得身，外身而得性。性便神逸，形骸不能束，尘鞅不能绁。"又谓真懒者"独一嵇叔夜当之"，"鄙薄荣进，遗弃世俗，即肢体骨节，非其所检。而于琴于锻，于往古高士，于当世之名流仙品，欣然有合，率尔天放"。由此看来，作者所谓懒人，非懒惰之人，而是懒于应酬俗务俗人之人，此篇题记，实是倡导世外隐逸之趣。文末云："请以予之园，以葛天、无怀为懒祖，巢许下务而下，若子陵渊明嗣宗叔夜一辈人，离列两庑。"可见对历代隐逸之士的向往与推崇。

《昭华琯序》　明陈仁锡撰，为友人项伸展的文评所作序言。此文写得闲散自然，通篇以山水喻文字，以游山水喻文评，妙言谐语，时出文中，如文中云："山水之得风而鸣，得雨而润，得云而鲜，得游人闲懒之意而活者也。游人有一种闲懒之意，则评文之一诀也。"这里提倡以一种闲适放松的态度评论文章，与载道派作文、评文时的正襟危坐之态大相径庭，反映出晚明文风的趋向。文末又云："凡以文章浪得名者，罪在窃国之上。"话说得似乎很严重，但实为戏语，与曹丕庄重陈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出发点有霄壤之别。正因为作者把作文、评文看成陶情适性的赏心乐事，故而为他人文集作序也能毫不掩饰地抒发自己的性情，行文如此奔放不羁。　（刘传新）

《自序》　明艾南英撰。是作者为自己屡次参加岁考、乡试所作试卷结集时的自序，作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它具体生动地叙述了明代岁考、乡试的情况和考生所受的折磨。指出在科举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往往被摈斥、埋没，而庸腐无能者，倒可以飞黄腾达。同时也揭露了考场的种种黑暗和考官的空疏鄙陋。这篇序言，行文凝滞沉重，满蕴着作者的情感。叙事简洁明了，层次分明，叙议相得益

彰。作者以其曲尽形容之笔，表达了自己愤懑不平的感情，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真面目。　　（李玉洋）

《楚游日记》　明徐弘祖撰。本文作于明思宗崇祯十年(1637)。这以前，作者曾先后游历了湖南省茶陵以西的紫云山、云阳山、枣核岭、龙头岭、络丝潭等地。是年正月十七日，作者又游览探访了著名的麻叶洞。本文即是探访麻叶洞后所记。全文记叙了过络丝潭，访游石隙低隘、水没其半的上清潭，重点记叙了麻洞险、奇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美丽景象，尤其记叙了洞内乳石轰驾，石壁光莹欲滴，垂柱倒莲、纹同雕刻，洞中有石、石中有洞的奇妙景观。文章记叙详尽，重点突出，叙中带议，既以生动语言展示了麻叶洞之奇险，又以作者不畏艰难、穷究其境的毅力，揭示了欲觅奇胜即须勇往直前的真谛。

《游黄山后记》　明徐弘祖撰。作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弘祖初游黄山，未及顶峰而返。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九月，作者再游黄山，终于登上黄山最高峰——天都、莲花二峰。本文即作者游览天都、莲花二峰后所记。作品描绘了“松犹曲挺纵横，雾气来去无定”的天都峰和奇石异洞、危壁峭径的莲花峰及其周下奇丽动人的景色。本文语言生动活泼，记游次序井然。作者以游览时间为线，分别记叙了三日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明朗清晰地展现了黄山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同时，作者通过对攀登天都、莲花二峰的过程的描述，表现了他顽强的毅力。全文文情并茂，脍炙人口。

（郑宝贵）

《名山小论序》　明沈承撰。是为友人周介生《名山小论》所写序言。明人的序言，已渐脱离叙原委、谈学问的陈套，往往借原书为引子，尽情挥洒自己的性情，故序文千姿百态，不拘一格。但象沈承此文这样奇怪谲诡的序言，即在明人的序言中也实属罕见。文中云：“一日坐妨帽山中，忽有一阵怪风，从西北起，有无数三寸鬼腾跃而来，皆锐首长鬣、戴竹冠、骑东郭狻，执绿沉枪，枪大如椽形。其后又有无数八脚小鬼，描头画角，尾之而至，若相追迫状”。嗣后二鬼治兵相攻，“三寸之士振臂一呼，而八脚之师皆败走。”正当群鬼置酒高会之时，作者“失声大叱之，群鬼皲散，掣光如电，化为一物，如斗忽堕案间，取而视之，乃是金沙友人周介生遗我《名山小论》一册。”此文荒忽离奇，但究其用意，实为攻讦八股文而作，文中“八脚小鬼”即喻八股文，文中言“八脚小鬼”大败，即赞扬友人之笔扫尽八股习气。此文笔力恣肆，想象离奇，具有震撼人心的讽刺力量。

《祭震女文》　明沈承撰。此文为万历己未(1619)年冬沈承为祭早殇长女阿震而作。沈承本善文，文中多奇纵之气，然而此文却一反常态，写得细微曲折，平易感人。盖作者所祭对象乃仅三岁幼女，所叙事也皆琐屑儿童情状，故作者文笔也为之一变，但在唠叨如家常话的行文中，仍可显出作者较强的文字表现能力，流露出作者心底的真感情，一种略带忏悔式的

悲哀深切动人。文中记幼童天真嘻笑事，尤准确、生动，如文中云："汝齿日添，汝慧日多。呼爹呼姆，音不少讹。常手弹门，自问谁何。我侄来时，汝呼曰哥。戏攫汝物，汝窜而波。我舅来时，汝以衣拖。呼声曰母，旋笑呵呵。"在古代散文中，象此文这样深切描摹儿童天真情态、直抒父辈对幼童感情的文章实属罕见，即以文笔而言，此文也胜过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多矣。

《诗归序》 明谭元春撰。谭元春与钟惺合编《诗归》一书，各写一篇序文冠于书前，说明编选《诗归》的用意。元春此序，强调学古人要学其精神，而不必取其途径；要求于灵迥朴润之处，而不必"务自雕饰"。并对一味模仿古人的"大家"进行了抨击，指出古人之诗为"藏神奇藏灵幻之区"，今人模拟之诗则为"仇神奇仇灵幻之物"。并进而提出创作上要写"孤怀，孤诣"，品评上须"独坐静观"。元春的诗学观点，皆长期殚思竭虑所得，识趣幽微，自以为得诗家之秘，故发而为文，颇有自负之意，行文中带一股幽峭之气。文中语言，似也经过磨炼，令人感到尖新犀利。如文中说有眼光之人，观古人有性灵之言，"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即十分奇警生动。

《再游乌龙潭记》 明谭元春撰。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秋旅居南京期间写下的游记，与《初游乌龙潭记》、《三游乌龙潭记》前后相贯，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乌龙潭之美的不同方面，本篇记乘筏游潭，途中遇雨，在风狂雨骤、雷电交加的特殊天气中领略到的潭上的壮丽奇观。作者有较强的文字描写能力，将一场乌龙雷雨表现得有色有声，奇警动人。文笔幽峭瑰奇，文中对"雨"、"电"的两节描写暗含着幻觉感受，给文章增添了奇幻色彩；叙潭上"风物倏忽""苍茫历乱"一节，则稍带幽诡之气。但作者并非有意渲染阴森气氛，而是要尽力突出此次游潭的不同寻常，以在风雨雷电中游潭获得的审美愉悦，对抗世人游潭的"宜澄、宜静、宜稳、宜幽适无累"，以显示自己不拘拘于一般规范的审美态度。

《三圣庵》 明刘侗撰。本文出自《帝京景物略》一书。文中记北京德胜门外以东三圣庵附近的乡土风光和民间习俗。文中记述简洁有致，对景物按地理位置分层描述，其间以庵、台、亭标示景物所在位置；记风俗则逢以四时，分别抓住具有季节特征的情调予以表现。文中多短句，语言精炼，富有表现力，如文中记春、夏、秋农人之歌时云："春插秧歌，声疾以欲；夏桔槔水歌，声哀以啭；秋合酺赛社之乐歌，声哗以嘻。"非常准确、生动地传达出了不同季节歌声的特点，使人能想见歌者的喜怒哀乐。文中连用迭字，是字法上的一大特点，记观稻事上所见景物云："畦陇之方方，林木之行行，梵宇之厂厂。"迭字的运用，增强了所记景物的清晰度，也给文章增加了亲切感。

《报国寺》 明刘侗撰。此文出于《帝京景物略》，记述北京广宁门附近报国寺中景观。文中对寺中二偃松和

"窑变观音"的描写尤为工细。记二偃松，尽力突出其横折低垂、无意臻上的姿态，以及游人穿行其间的局促压抑感；然后以与登阁四望，意气始得扬作对比。记窑变观音像，则着力显示其与世俗人同样的闲适随便的体态，以与寻常寺庙中庄严肃穆的观音像做对比。文末云，游罢报国寺后，"别意满胸，奇情满胸"，即表现出报国寺中景观的不落俗套，耐人寻味；也显示出作者孤幽的情怀。

《水尽头》 明刘侗撰，原为《帝京景物略》书中的一节。文中写北京西郊卧佛寺西北山间林壑中的四时景色，诸如溪、石、绿竹、清泉、春花、秋叶等纷纷藉藉景物尽都纳入三百余字的篇幅之中。作者的文笔状物生动，语言冷隽，别有一种清幽孤峭的风格，读来如食橄榄，初入口觉得生涩，细嚼后方回味甘甜。文中有些句法、字法奇特，表现出作者的特殊风格，如要描写某物即将某物置放于句首的句法："皆溪，溪皆泉之委；皆石，石皆壁之余。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品文句法，精炼而耐咀嚼。文中又常将名词用如动词，如"花者，渠泉而役乎花；竹者，渠泉而役乎竹：不暇声也"一句中，即将名词"渠"作为动词用。

（刘传新）

《核舟记》 明魏学洢撰。旨在表现雕刻艺人王叔远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艺术才能。文章先简要介绍了王叔远雕刻的特点和核舟的内容，随后按照顺序，从核舟的尺寸到核舟的形制，再从船首到船尾上的人和物以及船背面的落款，一一做了详细的描绘。最后作者对核舟上的人、物和字数进行统计，把核舟的形象准确而又完整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把视觉形象转换为语言形象，表现了作者非凡的语言技巧。首先，作者的笔触极为逼真、细腻和传神。从作者的笔下，我们不仅欣赏到核舟的每一细节，也欣赏到核舟上每一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态。其次，作者极善于小中见大、密中见疏。一方面极力渲染舟小不盈寸，另一方面又刻意突出船仓的"轩敞"，窗户的开启，给狭小的核舟留出"空白"，从而把读者引入"大苏泛赤壁"的意境之中。 （张建铭）

《雪鸥阁记》 明魏学洢撰。此文为其师别业雪鸥阁所作，文中记阁周围的景色与阁所以命名"雪鸥"的原委。文中的句式结构仿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一气贯注，历叙阁上阁下、雾晨星夕中景色的变幻；对景物的具体描写上，仿杜牧《阿房宫赋》的铺陈排比之法，尽形尽态，细致入微。文笔明快，辞采华丽。但缺乏欧阳修文中那种纡徐曲折、从容不迫的态度，更无杜牧文中遒劲飞扬的气势，比起《醉翁亭记》和《阿房宫赋》来，秀逸有余而气魄不足。 （刘传新）

《陶庵梦忆·自序》 明张岱撰。自叙清兵人关后"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是回忆如梦的人生，也是借"梦呓"来寄托难遣的情怀。最让人低回的，还是"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

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可见，《陶庵梦忆》是生命力延续不绝的所在，心事因此一梦而流传千古，有如春风里的青青草，“如游旧径，如见故人”，总是“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有所求便有所得，这序文也就让人荡气回肠。那八卷“梦忆”也正是在沧桑巨变后寄托身世之感的文字，序中实多感慨，无限情思便化人弦外之音。

《鲁藩烟火》　明张岱撰。载《陶庵梦忆·卷二》。此文形容兖州鲁藩烟火妙绝天下，所谓种种人物“尽收为灯中景物”，而“灯中景物又收为烟火中景物”，人们“身人灯中、光中、影中、烟中、火中，闪烁变幻，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在燃放烟火时，“端门内外烟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说天上被“起火”挤得没空了。真真穷形尽相、讲得热闹非凡。总是恍兮惚兮，以看灯看烟火的心理感应为下笔处，便能化美为媚，灯内灯外也不辨了，火花实物也分不清了，甚至天空也不空了，“人笑其诞”，然而传神，亦“殆不诬也”。取这种写法，“鲁府”便平添了不少有声有色的戏剧效果。

《闵老子茶》　明张岱撰。载《陶庵梦忆·卷三》。作者自叙访闵汶水于桃叶渡的经历。闵氏年已七十，烹茶之技绝佳，茶具亦精绝。张岱慕名而去，等到很晚，才见到闵汶水，喝到他的茶。张岱饮茶叫绝，汶水则对张岱鉴赏口味之精称奇。二人谈茶叶的产地、制法，泉水的所在、取法，以及采茶的季节，妙趣横生，情投意合，从此成为好朋友。文章写得生动精采，于品茶见出人物的性情，有声有色，令人回味也余香满口。妙在因知味而知心，有如千古流传知音的佳话，“精赏鉴者”原本是寓知性于感性的，在爱好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怀，也正是性灵修养的表现。所以人物交流的对白虽简单数语，所包含的心理内容却非常丰富。

《湖心亭看雪》　明张岱撰。载《陶庵梦忆·卷三》，记雪中游西湖事，笔下亦晶莹澄澈，有如简笔山水，以悠悠余韵见长。看雪，实为澡雪精神的雅人高致。“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两三粒而已。”好一片白茫茫的琼玉世界，文字也显出冰雪聪明，亭中与同好“强饮三大白”即便是写实，也似神来之笔，在寒意中添了几许醉心的情调。“独钓寒江雪”似的寂寞，遂被人声冲破，变作一种精神境界，被向往被追求，于是染出片一尘不染的清凉心境。不是出世，也不是入世，而是绝俗超脱的情致，在金陵客的惊喜声和舟子的喃喃语里摇曳荡漾。

《湘湖》　明张岱撰。载《陶庵梦忆·卷五》，说湘湖本是农田，县官为浇萧山田而使数百顷良田沦为湘湖，湘湖田主一夜间便由巨富变为赤贫。此文虽说湖光水色，亦指涉人情世态。就湖光水色言，张岱说：“西湖如名妓，人人得而媟亵之；鉴湖如闺秀，可钦而不可狎；湘湖如处子，眡娗羞涩，犹及见其未嫁时也。”因湘湖水浅，波光未见澄明，而田中丘阜亦林立于水面

之上，不识水道，便难以乘船入湖。水路曲抑、水势清浅，湖光也就自成一格，所谓“盖西湖止一湖心亭为眼中黑子，湘湖皆小阜、小墩、小山乱插水面，四围山趾，棱棱砺砺，濡足入水，尤为奇峭。”张岱以人情喻湖光正是文人墨客月旦山水的传神之笔。

（章亚昕）

《柳敬亭说书》 明张岱撰。柳敬亭是明末著名的说书艺人。张岱的这篇散文，意在表现柳敬亭人品和他的说书艺术之间的联系。作者先以介绍柳麻子的面貌入手，突出其奇丑的特征，欲扬先抑。再交代其说书的“行情”，为下文描写其说书时的情态作铺垫。写柳敬亭说书，先概述其特色，随后便绘声绘色地渲染其声势和神彩，把柳敬亭进入角色时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活龙活现地再现出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接下来补叙其说书时对听众和环境的严格要求，非其人不说，表现了柳敬亭狷介孤傲的个性，洁净的环境，映衬出柳敬亭雅洁聪慧的内心。最后作者把柳敬亭和当时著名歌妓王月生作了对比，赞美其口齿、风姿、神彩直和王月生“同其婉娈”。这篇短文，形象生动，寓意深厚，文字简洁，节奏感强，有较明显的口语倾向。 （张建铭）

《金山竞渡》 明张岱撰。载《陶庵梦忆·卷五》，说赛龙舟事，所用瓜州龙船以怒、悍、绚、节、锷、危、险这七个特色见长，竞渡时“惊湍跳沫，群龙格斗”，十分壮观，“两岸沓沓然而沸”，也格外热闹。张岱说“西湖竞渡，以看竟渡之人胜，无锡亦如之，秦淮有灯船无龙船，龙船无瓜州比，而看龙船亦无金山寺比。”那船五彩绚丽，状若怒龙欲飞，比赛时金鼓齐鸣，二十人持大楫一齐用力，甲板上列军器，声威极壮，而滔滔江水波浪中，有人倒立龙头，有小孩悬挂龙尾，以其表演助兴。观望者也“蚁附蜂屯”，如痴如醉。那扬州本是天下有名的繁华去处，瓜州古渡所造龙舟自然冠绝天下，待顺流而下到镇江金山寺时，恰好到了全速行进的高潮，极动人心弦的。

《扬州瘦马》 明张岱撰。《陶庵梦忆》卷五所载，是说以往扬州人纳妾故事。自运河沟通南北扬州便成为交通要道，商业集中自然冠盖云屯，有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也就有了媒婆子人贩子赖以为生的“扬州瘦马”。其实，“瘦马”即被迫为人婢妾的女孩儿。文中讲说媒、相面、定婚、成礼诸节甚详，且颇生动，如相亲场面，“一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尽，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红衫，千篇一律，如学字者，一字写至百至千，连此字亦不认得矣。心与目谋，毫无把柄，不得不聊且迁就，定其一人。”实在好笑，不仅那“姑娘”身不由己，娶妾者也难免举棋不定了。“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从中可以想见当时风气。

《西湖七月半》 明张岱撰。载《陶庵梦忆·卷七》，道是“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有“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有“欲人看其看月者”，有什么都看“而实无一看

者”，也有“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以及“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总之大俗与大雅皆有可观，而杭人本“避月如仇”，不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罢了，多半凑热闹，“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唯俗客散尽，“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可以尽雅兴尽欢于清光之下，而一番举止便是一重性格，一般行为便是一层境界，亦不必多言。

《王月生》 明张岱撰。载《陶庵梦忆·卷八》。王月生是南京朱市妓，“善楷书，画兰竹水仙，亦解吴歌，不易出口”，其性情“如兰水红菱，矜贵寡言笑”，然而这“静以幽”的性格，竟能以无声胜有声。文中写“月生立露台上，……群婢见之皆气夺，徙他室避之”。以群妓的俗艳来衬托月生的气质高华。张岱说“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便超凡拔俗，有清远晶莹的风神气度。这“寒淡”二字确是不可易的定评，一半儿是性情，一半儿是修养，如工书画解吴歌而不易出口，如好茶如命而难得开言，如目中仿佛无人的神态行为，都在“寒”的风格里见出了“淡”的人格。此文亦有“寒淡”面清奇的笔致，很能传神。

《与何紫翔》 明张岱撰。载于《琅嬛文集》，是给何紫翔的信，信中强调无论弹琴还是作文，全靠着一口生气。所谓“古人弹琴，吟揉掉注，得手应心，其间勾留之巧，穿度之奇，呼应之灵，顿挫之妙，真有非指非弦，非勾非剔，一种生鲜之气，人不及知，己不及觉者，非十分纯熟，十分陶洗，十分脱化，必不能到此地步”。张岱认为关键在于练熟还生，有情韵贯注其间，一气流转，使技艺与性情浑然一体，有内在的脉络，神气活现的表情。“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无论艺术还是游戏，无论音乐戏曲诗文字画，少了这口气，没有内在的生命，再熟再巧也不可能出神入化，一失去情韵的脉络，便“生气全无”此是深得艺术真髓之见。

（章亚昕）

《五人墓碑记》 明张溥撰。天启七年（1627）三月，阉党在苏州逮捕了东林党人周顺昌，从而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民暴动。事后，颜佩韦等五人作为“吴民之乱”的首领惨遭杀害。次年，明思宗即位，阉党被诛，苏州人民重新安葬了五位烈士，并立石予以旌表纪念。张溥的这篇墓志，用生动而又充满激情的笔触，再现了五人就义时正气凛然、慷慨悲壮的情景。同时又用世上“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死者“众矣”映衬五人之死的伟大；用缙绅大人的卑怯反衬五人的勇气和力量；用“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反衬五人的高尚品质；用众人的敬仰泣拜歌颂五人之死重如泰山，功同日月，从而表明了“死生之大”，须“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这篇散文把叙事、议论、描写、抒情熔为一炉，行文中夹叙夹议，层层设问，层层对比，文势跌宕起伏，文情激荡曲折，是明末散文中的杰作。

（张建铭）

《寓山注序》 明祁彪佳撰。彪佳在明亡前“引疾南归”，属意于寓山风光，在那里建造一座园林，并写下了一组记述园林内建筑的文章，是为《寓山注》，本文即《寓山注》的开头部分，其实是一篇序言。文中叙开园之始末、开园之痴癖、开园之营构、开园之岁月，娓娓道出。对园中诸物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表现出作者对寓山园林的深厚感情。文中叙开园之营构时说：“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治兵，奇正并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此为在建造园林的实践过程中体会和总结的园林美学规律，值得重视。文末言“园以外山川之丽，古称万壑千岩；园以内花木之繁，不止七松五柳。四时之景，都堪泛月迎风；三径之中，自可呼云醉雪。”既表现出作者深得传统园林美学的“借景”之道，也可看出作者筑园自娱以避世的真实用意。 （刘传新）

《狱中上母书》 明夏完淳撰。明亡之后，十四岁的夏完淳即随父参加了抗清活动。顺治二年，父殉国难，两年之后，夏完淳也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作诗言志，痛骂汉奸洪承畴。同年九月就义，年仅十七岁。本文是他在狱中写给嫡母盛氏的诀别信。在生离死别之际，他向嫡母剖白了自己的赤子之心。他为自己不能奉养双慈深感不安，也为一家八口将来的生活而担忧，更为大仇不报，国耻未雪而悲痛。他想到了母亲失去儿子时的悲恸，因而他在信中一再申明大义，宽慰嫡母。他留下决不立嗣的遗言，并将爱妻和双慈嘱托于外甥和姊妹，表明了和清王朝势不两立的决心。最后的抒怀，展现了作者悲壮而又气贯长虹的胸怀。这封家书，饱含血泪，把骨肉之情与民族之痛熔为一炉，字里行间充满国破家亡的无限悲痛，表现出作者视死如归、死而不已的战斗精神。

（张建铭）

《甲行日注》 明末叶绍袁撰。日记体散文。叶绍袁在清军攻占苏州后，带儿子弃家出走为僧，颠沛流离于苏南、浙西一带的空山荒刹中。这部日记，即记起自乙酉（1645）秋，止于戊子（1648）九月，共三年多的生活经历。因作者于乙酉年八月二十五日（甲辰）出行为僧，遂取《楚辞》“甲之朝吾以行”句，名日记曰：“甲行”。日记中除记述个人流亡生活的贫困凄凉之状外，还兼及清军进占过程中的残暴镇压，抗清志士的赴难不屈，地方官绅的屈膝献媚，字里行间，充满国破家亡的黍离麦秀之悲。这部日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文采。叶绍袁为江南著名文士，文笔简洁清丽。无论记事、写景或抒情，都写得隽永多姿，许多篇什，可称得上精美的小品文。如卷六丁亥七月云：“十七日，丙辰。晴，风，夜中偶起，似可三更时分也。湫流薄岸，颓萝压波，白月挂天，蘋风隐树，四顾无声，遥村吠犬，渔棹泼刺，萤火乱飞，极夜景之幽趣矣。”文词华丽，凄清冷幽之情浸透字里行间。日记中除记贫困之状外，还多记闲适之趣，最可骇怪的是作者在

乱离悲苦中独不忘赏花，记中述观赏梅、桂、荷、桃、杏、水仙诸花之事甚多，此虽出自文人积习，但也有外界的美丽浓艳之物，极易惹动遗民的家国人事之悲的一面。如卷二丙戌六月云：“数里荷花盛开，一望红香，芳艳倾目，但寇盗出入，岸无炊烟耳。”在流连光景外，别有一种对世事人生的感慨。

《李龙眠画罗汉记》 明黄淳耀撰。此文描述并阐发宋李公麟所画《罗汉渡江图》的画面内容和画意。对画中现存十五个半罗汉与三童子的形貌动作，神情意态，分“未渡者”和“方渡者”、“已渡者”予以具体描述，语言精炼、准确，叙述有条不紊。作者对画面上的罗汉，皆作世俗人对待，故文中极力突出这些高僧渡江的艰辛，以证明“佛氏之作止语默，皆与人同”，其用意，在破除世之学佛者“徒求卓诡变幻、可喜可愕之迹”的迷信无知。此文可称得上一篇有个性、善于借题发挥的艺术鉴赏文章。

（刘传新）

《古本水浒传序》 清金圣叹撰。圣叹本姓张，后以金人瑞之名应试，又以字圣叹行。这篇序，载于金圣叹批评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首，署名“施耐庵”，也就是文学史家所称金圣叹的“伪施序”。序言出入于佛学虚无之间，是一篇抒写心灵痛苦的文字。圣叹早年颇有用世之概，纷乱的现实粉碎了梦想，便转向佛学的境界去寻求精神的解脱。这篇序言便道出了他在梦想破灭之后感慨人生无常，于万般无奈之中借书以消万古愁的心灵苦况。作者的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虚无，但虚无得并不那么彻底，于是有了虚无之中以笔墨为身光耀的《六才子书》的评点，也有了这篇展示心灵痛苦的伪施序。而在今天，通过这篇极美的文字使读者感受到一个十七世纪文学家那痛苦矛盾的心灵，则是此文的主要价值所在。

《李一足传》 清王猷定撰。叙明末人李一足事。一足名夔，为人好读书，精于《易》学，并通星相、历算、医药、占卜等术。幼时，父为里中豪强殴死，成人后与弟奋身为父报仇。后知仇人未死，避祸走他乡。先由山东入海岛，教岛民子弟习文字，又回返陆地，游履遍于天下。明末战乱，言天下事不可为，遂访道劳山。入清后遍告戚友，坐化而殁，但又有人在京师，河北等地见过他。《李一足传》是传奇体散文，内容奇诞，近于传奇小说。而以传奇之体来写散文，打破了传统的古文写法，正是此文妙处。文写李一足孝侠兼备，任性适情，仙风飘逸，道骨朗朗。奇奇幻幻，亦世亦仙，读来如雾中看山，实处如见，虚处如幻。

《汤琵琶传》 清王猷定撰。写于顺治十一年（1654）。邳州人汤应曾善弹琵琶，有“汤琵琶”之誉。所弹百十余琵琶曲，大至风雨雷霆、愁人思妇，小至百虫之声、草木之吟，无不曲尽其妙，为一时之绝。曾先后依附于明周王、襄王与征西王将军，深叹世间知音之少。先曾因弹琵琶而感动一妇人，于是携归家中事母，后萍踪飘泊，归家时母健在而妇已亡。应曾

悲不自胜，从此猖狂放诞，日荒酒色，以至耳聋目瞽鼻漏，听弹者不愿睹其面，只能隔着屏障听他的弹奏。这是一个民间艺人的悲惨故事，读之使人哀绝、痛绝。白居易的《琵琶行》写了一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的经历，此人经历犹过之。钟子期死，伯牙痛而破琴绝弦，此人经历之痛人者复有过之。众生芸芸，世上有哀历痛史者，绝非仅只汤琵琶一人，而文籍汗漫，把人的传记写得如此恸人感人者，却也为数不多。

《义虎记》　清王猷定撰。写于顺治十八年(1661)。这是一篇典型的传奇文字。一位砍柴人失足堕人虎穴，竟然得到老虎赐与的残肉，并被老虎背出深穴，送到林外大道上。砍柴人许以一猪报虎之义，虎又竟至。猎户擒虎献给县官，砍柴人前往救告陈情，虎虽不语，却也堕泪点头。最后的结果，是义虎终得获释，得猪大嚼而去。这篇记，是完全可以移入《聊斋志异》、《子不语》一类志怪专书而不觉逊色的，但我们今天称赏它，却是因为作者用堂而皇之的古文——散文的形式把它写了出来，这在当时是颇留谈柄于人的，时过境迁，方见作者手眼之高。且也，记的内容曲折详尽，荒诞中颇见人情，乃是散文中不多见的有情节的趣文，可看，可传。

《原君》　清黄宗羲撰。选自《明夷待访录》。作者根据历史和古代传说，认为古代君主不仅不自私自利，而且为天下兴利除害。而到后来，君主视自已的大私为天下的公利，把国家当成了自己的产业，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自己一个人行淫作乐，成为天下的大害。而小儒君臣之义的谬说，又足以引导君主于不义。作者指出，后世的君主常常难逃亡国灭家的结局，这正是他们把天下当作私产的缘故。这是一篇绝好的政论文，作者以鲜明的态度、激烈的言辞抨击了成为天下之害的最高统治者——封建皇帝，大胆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挑战，向封建伦理道德挑战，表现出了强烈的民主精神，对后世的反封建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柳敬亭传》　清黄宗羲撰。柳敬亭，由明入清的说书艺人。封建时代，说书被视为贱业，宋元以后的说书艺人俱湮没无闻，而至柳敬亭出，一时文人如张岱、吴伟业、周容等俱有文叙及，足见其成就之高。本传主要记载了柳敬亭习艺的过程和他的后期经历。敬亭得人指点，潜心习业，终于名重一时；而身逢明末动乱，又久处左良玉军中的生活体验，更使他的技艺炉火纯青。文章记叙的是一位奇人和他的奇特经历，有浓郁的传奇色彩，而所记柳敬亭的学艺经过，又触类旁通，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和教益。此传叙事生动，文笔甚工，史料方面的价值也是自不待言的。

《芙蕖》　清李渔撰。芙蕖即荷花。出水荷钱，临风茎叶、成花菡萏，花后莲实，皆可可人之目。而荷叶香，荷花馥，可人之鼻；老莲实，鲜莲藕，可人之口；败叶经霜，仍可裹物，所以作者认为荷花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赞赏

莲荷之美的文字，前有宋周敦颐的《爱莲说》。李渔盛赞荷花于周敦颐后，却又妙在独出机杼，不袭前人，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作者是酷爱芙蕖的，把它视为夏季里相依为命的东西，因此他在笔下倾注了感情；又因为是日常熟识的故物，所以作者笔下的荷花风姿便十分地传神。正是这种充满感情的称赏、描绘，使人觉得荷花这种普通植物是那样的适人心意，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与魅力。

《与叶讱庵书》 清顾炎武撰。炎武是由明入清的知识分子，名满天下的学者，尤以民族气节称重士林。清初，统治者设明史馆，数次请顾炎武参加明史的修纂工作，均遭严辞拒绝。讱庵，是炎武的同乡叶方蔼。康熙十八年，大批学者应征参加了清廷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叶方蔼等人又荐炎武出修明史。炎武知情后给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叶方蔼写了此信，以母亲“无仕异代”的遗命拒绝清廷对自己的笼络，并明确表示如若逼迫自已出仕新朝，则宁愿以身殉节。这封信写得义正辞严，毅然决然地表示了作者恪守母训，不仕二朝的决心，反映了作者不愿与蝇营狗苟者同流合污作违心之论的气度节操。回想当时严密的文网和残酷的高压政策，尤使人追思作者的情怀，敬仰作者的高风亮节。

《与潘次耕札》 清顾炎武撰。写于康熙十七年(1678)。潘次耕即潘耒，顾炎武的学生，与乃师情谊甚笃。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和徐彦和兄弟俱做了清朝高官，显贵一时，但炎武却看不惯他们的行径，宁可谨身节用，客死异乡而不依附诸徐。康熙十七年，徐乾学在太湖的洞庭山开设书局，并延请潘耒参与此事。顾炎武闻讯后，立即给身为贫士的潘耒写了这封信，劝他以气节大义为重，不要与那些蝇营蚁附的贵人清客混杂一处而坏了自己的声名。文札虽是对自己学生的劝谕，其实也是作者思想人品的表露。即使是尊长的骨肉至亲，也决不可因此而丧大义，辱大节，作者在札中表露的人格品行刚直不阿，高洁不污，使人可叹可敬。

《广宋遗民录序》 清顾炎武撰。写于康熙十八年(1679)。明人程敏政曾著《宋遗民录》一书，凡十五卷。清初，炎武同乡朱明德增补为《广宋遗民录》。(书今已不存)。顾炎武的这篇序文，一方面肯定了收录宋代遗民事迹的意义，一方面又借题发挥，指出有些遗民虽见于著录，但在易代之后却未必能尽终其节，从而对明代遗民中的变节者作了辛辣的讥讽。作者是十分看重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文章从人伦之道的角度指斥那些入清之后改形换骨，腆颜事敌的明代遗民为“不似”之人和“学为不似之人”，措词委曲而义蕴深沉。其所反映的那种丧国无朋的巨大的心灵痛苦尤为深切感人。

《九牛坝观抵戏记》 清彭士望撰。文章记录了清初乡村中一次出色的民间杂技表演。一群民间艺人在作者居处的九牛坝地方，先后表演了高台登人、登案、登楦、登梯和高跷、走索种种技艺。杂技的内容繁富多变，艺

人的表演复杂高难，而作者的记叙更是委曲详尽，声色俱现。封建统治者历来轻视民间艺术，下层艺人的技艺、生活一直少有完整的记载，而这篇文字不仅翔实记录了三百年前这场出色的杂技表演，而且叙出了这群艺人以路为家、以戏为田、辗转飘泊、趁食四方的生活苦况，可谓难得。作者对这些艺人的才能极力称许，认为他们同样应该有生活的权力，可以引导他们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而不应轻贱他们，识见也高出时人。

《马伶传》 清侯方域撰。文章写金陵一马姓演员，因与别的演员对演《鸣凤记》中的权相严嵩不能取胜而负气出走，投身到当朝权相的门下观察揣摩，三年后回金陵再度演出，终于技艺大进、逼肖权奸的故事。这是一篇传奇体的优秀散文，作者在文章形式和语言方面都作了大胆的探索。全文由概括介绍人物写起，先写马伶对演严嵩不似而败的场面，继写其再演得胜的经过，最后自然地揭出马伶转败为胜的缘由，使文章的结构连环曲折，委曲生动，有较强的故事性，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将小说语言融入古文创作，叙事婉转动人，人物语言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从而使文章呈现出别一副面目，表现了短篇小说的意蕴风致。

《李姬传》 清侯方域撰。《李姬传》记金陵名妓李香事，是作者散文中的名篇。文章主要记叙了李香与作者交往过从中的两件事。一是阉党余孽阮大铖暗中派人交结作者，企望通过作者的关系来缓解其与复社文人的矛盾，而李香先请作者探清原委，既又晓作者以大义，使与阮大铖绝交；二是作者离开金陵时，李香为歌《琵琶词》以见相知之情，后来漕抚田仰威胁利诱，要李香前往相会，但李香却因作者故而断然拒绝，始终不肯忘情于作者，作者并没有大费笔墨，但通过这两件事，一个坚贞机智、有正义感又一往情深的女子的性格却被刻画得鲜明生动，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李姬传》不仅以摹写性格的突出成就广为人道，更被清代文学家孔尚任选为蓝本创作了著名传奇《桃花扇》，至今盛传不衰。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清侯方域撰。作者侯方域是由明入清的作家，其文学活动多在清初，而此文则写于明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1643）。阮光禄，指做过明代的光禄卿，因名列权奸魏忠贤逆案而被削职的无行文人阮大铖。明末，侯方域去南京应试，并参加了复社。阮大铖为缓和复社文人对他的攻击以图再起，派人对侯方域施以拉拢，遭到拒绝之后又借机诬陷，迫使侯方域离开南京去宜兴安身。这封信即写于侯方域离开南京之时。作者在信中历述阮大铖对自己拉拢不成又施诬陷的卑鄙行经，表明了自己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的志向。行文洋洋洒洒，气势充沛，对奸佞的斥责痛快淋漓，切中要害，是历来传颂的散文名作。

《芋老人传》 清周容撰，一篇惊警动人的寓言性散文。一位相国在不遇未第时饱食一老人的芋，感到味香

而甘，但贵为相国后再食老人的芋，却失去了先前的口味。作者借这样一个故事表述了时位移人的道理，指出世上以今日而忘昔日者比比皆是，并不仅仅表现在相国辍箸而不食芋这一件事情上，用以讽喻那些由于地位的变化而忘旧的人。故事写得颇为生动，蕴含的道理更是极其显豁，但却道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颇能发人深省。特别是文末的“赞曰”，作者更进一步地发出了缙绅大夫所不能言但野老鄙夫却往往言之的感慨，显得语重心长，尤值得人作更加深入的思索。

《小港渡者》 清周容撰。写于顺治七年(1650)。本文写的是一件寻常小事，但却由生活中一个欲速则不达的事例引出了“躁急自败”的道理，使文章具有寓言的深刻性。作者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惨变，明亡后曾一度落发为僧，后又力辞不就康熙间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其对故明的黍离之思是显而易见的。文章借事寓意，并以此感慨“天下”的事，抒写明代亡国历史教训的用心可谓既深且长。寓深刻道理于寻常琐事之中，因小而见大，是本文艺术表现的突出特点。全文以小港渡者的警语为核心，叙事平易简洁，文笔精炼浓缩。在不足二百字的篇幅之内，作者熟练地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各种手法，既写出了人物、故事，又点明了题旨，抒发了感慨，充分显示出作者善写短文的高超本领。

《论梁元帝读书》 清王夫之撰。选自《读通鉴论》。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思想家，学以致用是他们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本文围绕着读书目的这样一个问题，借梁元帝把失国之咎归于读书之事引发议论，例举了陈后主、宋徽宗等人读书误国的教训和宋元明诸儒读书不知其用的诸多事例，指出读书人尤应注意从书中得到有关身心、世事和政教等切实有用的东西。作者对历代不善读书的人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沉溺书中不能自拔便是玩物丧志，不但得不到读书之益，反而要受读书之害。作者主张学为世用，反对空谈，思想见解允当而又深刻，对于今人的读书学习仍不失启迪引导的作用。

《戴文进传》 清毛先舒撰。戴进，字文进，明宣宗时的宫廷画家，毛先舒的这篇小传主要记述了戴进的两件大事：一是戴进是明代最优秀的画家，他作了待诏，但却得不到明宣宗的重用；二是戴进原为锻工，因见人对自己锻造的艺术品并不爱惜，因而弃去学画，终于名高一时。作者一方面赞扬了戴进在绘画上的成就和他立志不朽的决心，一方面又对戴进坎坷不遇的遭际表示了深切同情。作为一篇小传，文章的篇幅不足五百字，但内容却十分充实。作者既通过戴进向宣宗呈画而谢廷循伺机进谗的细节交代了他不被重用的原因，又通过具体情景和戴进的心理活动说明了他改行学画的经过，从环境和语言行动两个方面把人物刻画得真实可感。章法谨严，于疏中见密，是这篇文章写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亭记》 清施闰章撰。写于顺治十八年(1661)。就亭，是作者任江

西参议分守湖西道时，在驻地临江官舍就高阜而建的一座竹亭，亭名取的是就阜而构之意。《清史稿》本传说施闰章为文"意朴而气静"，本文突出地体现这一特点。作者用简朴自然的文笔记叙了建亭的经过，登临的意兴，并且夹叙夹议，道出了自己寄情山水的情怀和涵养性情的游观目的。文章没有故作惊人之语，没有对世物世情的强烈感慨，语句尽从平易中道出，但却使人看到了一个胸中有丘壑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形象，感受到了作者那种不因俗务而忘山水之真的旷阔胸怀。

《大铁椎传》 清魏禧撰。写于康熙九年(1670)。这是一篇记奇人异行的文章，为清初传奇体散文的名篇。文章描绘了一位以大铁椎为兵器的壮士形象。他为人粗豪，来去无踪，而又勇力过人，有百人难敌之概。作者记大铁椎的语言行事非常传神，使人物活脱如在目前。叙事若明若暗，疑城八面，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作者以奇笔奇文记奇人奇事，文章的传奇色彩十分突出。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把这位江湖异人比作椎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的力士，发出了天生异人应有所用的感慨，又反映了作者念念不忘恢复故国，并寄希望于江湖豪侠之士的写作深心。

《吾庐记》 清魏禧撰。吾庐，是魏禧之弟魏礼所筑的居室。这篇记是以其弟筑吾庐之事为起结的，但中心内容是记弟弟魏礼的为人行事。魏礼曾出外远游，南至海南，北抵燕地，一路上遇飓风拔屋，遇兵变杀人，又遇饥民食人，但却处之泰然，视死如归而又安然而归，唯以得遂所愿为适。作者赞赏弟弟的任性适情，赞扬他这份甘冒危险游历天下的旷达豪迈，突出地宣扬了这种敢于冒险、生死以之的志士情怀。在写法上，文章开头叙写吾庐的得名与景致，至中间语气一转，以答客问的方式交代弟弟的行事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仍回到吾庐，点明写作的缘由。转折极自然，首尾有呼应，布局甚得法，颇可见出作者为文的功力之深。

《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 清魏禧撰。写于康熙十三年(1674)。姜公指山东莱阳人姜埰，明末官礼科给事中，曾因建言遭廷杖几死，以气节为人所重；归君为江苏昆山人归庄，是顾炎武志同道合的好友，著名的抗清志士。姜、归二人都是由明入清的遗民，入清后又皆落发为僧，同殁于康熙十二年。作者与姜、归同怀易代之痛，而相交也契，这篇文章即通过自己与姜、归二人交往过程的描述，既表彰了两人的气度、风范，也写出了自己失去师友同志的悲哀。文章借叙事之笔，抒哀悼之情，写得纡徐往复，悲切动人。处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势下，作者的情绪措词不免抑郁隐约，这也进一步加重了文章的伤感气氛。

《江天一传》 清汪琬撰。江天一是明末民间一位义烈之士。清兵南下之际，他协助金声联络数县官民，组织义军抗清，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执。他舍却生机，慷慨赴死，事迹可歌可泣。作者汪琬是清初与魏禧、侯

方域齐名的散文大家，尤以叙事有法著闻。这篇传记在结构的安排处理上是很有特点的，作者先按时间顺序叙写了江天一的生平，又用补叙、插叙等手法突现他的为人和性格，使整篇文章显得匠心独运，布局灵活。对于人物的事迹，则集中笔墨通过江天一鏖战南明狼兵与抗清被执两件事来表现他的将兵之才和义烈之慨，显得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详略得当。作者身为清朝人，既要写江天一抗清不屈的事迹以表扬忠烈，又须顾到当朝的禁忌，其在语辞选酌、文字处理方面的功夫也颇有可称道之处。

《陶渊明像赞并序》 清汪琬撰。这是作者为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一幅画像所写的赞语和赞语前的序言。文章的中心内容是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所作的评论阐释。《桃花源记并诗》描绘了一个没有君主、战乱、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社会，后人名之曰“世外桃源”。对此的评论可谓代不乏人，但能揭出其中真谛的却所在不多。本文从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角度分析作品，指出《桃花源记并诗》既非纪实，也不是叙写仙境，它与作者的沉溺于酒一样，反映的都是作者对当时黑暗污浊的现实政治不满而想逃避的心理，是一个作者想往的理想世界。识见精到独特，评论颇中肯綮，可以称得上是古代文学评论中一篇杰出的作家作品论。

《周忠介公遗事》 清汪琬撰。周忠介公，指明天启年间同宦官魏忠贤的阉党作斗争而被害的苏州人周顺昌。周顺昌的被逮，激起了使朝野震惊的苏州民变，明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曾记载此事，李玉的《清忠谱》更把它搬上了戏剧舞台。“遗事”是行状文的变体，内容一般记载人物的轶事遗闻。汪琬的这篇文章写的是周顺昌被逮前后的情况，作者曾核查过所记事迹的真实性，故可补充正史的记载。文章体现了作者为文谨守法度的特点，记事中一般不掺入自己的议论，但爱憎之情俱从字行间流出。其中，对苏州人民为周顺昌呼冤反暴的斗争过程写得比较细致具体，表彰了苏州人民反奸反暴的斗争精神，也揭露了魏忠贤的爪牙们迫害忠良的险恶凶残。与明末清初反映这一斗争的其他文章相比，本文对群众斗争的描述更显得真实、详尽和突出。

《池北书库记》 清朱彝尊撰。池北书库，指的是作者友人、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的藏书之所，地在士祯故里山东新城县(今桓台县)的家中。士祯有一部被人称道的笔记《池北偶谈》，就是因池北书库而命名的。作者的这篇《池北书库记》本是应人之请而作的应酬文字，但其中记叙书库建置、藏书情况的内容却不多。作者只是在几处地方谈到了王士祯的池北书库，而大部分的篇幅却被用来叙述历代书籍流传的大略，官府和民间的刻书、钞书和藏书的情况，把文章的重点放在了对藏书意义的论述和阐发上。文章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书籍发展历史的熟识和自己的藏书爱好，而且脱出了一般应酬文尽说客气话的旧套。朱彝尊是长于古文的作家，从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其善于驾驭文字的

本领。

《奇零草序》 清姜宸英撰。《奇零草》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民族英雄张煌言的诗集，作品强烈地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张煌言抗清失败后，于康熙三年（1664）被杀，他的著作也被清统治者定为禁书，严禁抄写、刻印和流传。在这样的情况下，姜宸英毅然为《奇零草》作序，向社会表明了自己对民族英雄的热爱。作者在序中高度赞扬了张煌言的为人，认为明星虽殒，但其光焰却绝不会磨灭，并通过张煌言被执之后远近人士以至市井屠贩等人俱争求他的字幅以为纪念，而士大夫家却畏藏其书的事实讥讽了那些腆事新朝、毫无气节的封建士人。面对当时严密的文网，作者征引了大量的前代事例来说明自己为《奇零草》作序的理由。这既可以见出作者的苦心孤诣，也是这篇序文在写法上的过人之处。

《与赵韫退大参书》 清王弘撰撰。写于康熙十七年（1678）。弘撰是顾炎武的至友，与炎武同为不忘故国的民族志士。康熙十七年，弘撰被迫来北京等待博学鸿词科考试，时值文华殿大学士冯溥六十寿辰。冯溥想请弘撰为作祝寿文，并以此作为诱其参加博学鸿词考试的进阶。赵韫退，为冯溥的同乡，山东益都人赵进美。在这封信中，作者通过赵进美十分明确地向冯溥表示了自己不愿参加清廷为笼络人心而设的博学鸿词考试的决心，和不愿降节妥协来为冯溥作文祝寿的意志，从中尤可以见出作者可贵的人品与风骨。文章写得切实严谨，斩钉截铁，有汉魏唐宋作品的风致。

《口技》 清林嗣环撰。节自《秋声诗自序》。口技是中国的传统技艺，而这篇载记清初京中口技的文字尤为奇绝动人。众宾宴集，静听屏后的艺人出技发声，先是犬吠，妇人的伸欠，丈夫的呓语，又有乳儿的惊啼，一个人家中夜的生活小景，直如静池春水，波纹渐生。然后是丈夫起溺，妇人抱儿起溺，床上的大儿醒啼，于是床声、溺声、拍儿叱儿声一齐凑发，旋又渐次止息。一个家庭的夜生活如此的形象、真切，已是波澜起伏，足令听者咋舌。而这之后的突然火起，千百人呼，千百儿哭，千百犬吠，风声，火爆声，崩倒声，求救声，曳屋声，抢夺声，泼水声，万千齐作，更如骇浪惊涛，裂岸崩石，使人骇极欲绝。惊人的效果，赖于作者文字的传写。作者记载的是一种以口传声的技艺，但却不满足于仅仅写记一个“听”字，而是极力地写“状”摹“情”，通过视觉形象的描绘来调动读者丰富的想象，通过情势的铺写来渲染紧张迅疾的气氛，以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林嗣环是一位善画声者，不仅绘声，而且绘形、绘势，可以说是这篇散文成功的要诀。

《室语》 清唐甄撰。选自《潜书》。《室语》是一篇大胆深刻的议论文。作者在文中提出了“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一著名论点，认为封建社会的历代帝王无不屠杀人民而占有其财物，不仅他们杀人的数目要远远超过那些杀人越货的民贼，他们所犯的罪行也过于民贼百倍千倍。

这种激进的反君主思想的议论，不仅在当时足可惊世骇俗，而且至今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芒。室语，意即在家里所说的话。在写法上，作者采用了一家人围坐室中饮酒食鱼的情景引出议论，而最后仍以杀鱼与杀人的比照作为结束，使整篇文章显得舒卷自如，洒脱自然，不仅没有一般议论文章的艰涩，而且别有一种家常聚谈的娓娓动人之处。

《梁九传》 清王士祯撰。唐代的柳宗元写过一篇《梓人传》，文章传写了一位叫杨潜的房屋设计师。而王士祯笔下的梁九，则是清初重建北京大内太和殿的董事者。《梁九传》是作者为清初的一位宫廷建筑师而作的小传。梁九原在师傅冯巧的领导下从事宫廷建筑工作，对师傅非常尊敬，师傅也就把建造宫殿的技艺传给了他。他发挥自己的智慧，造出了被人叹为绝技的宫殿建筑模型。小传集中描述了梁九学艺的过程和他的创造，并以此来概括梁九的为人，内容不枝不蔓，传状言简意赅。在为数众多的古代人物传记中，《梁九传》可以说是一篇集中精炼、惜墨如金的好文章。

《焦山题名记》 清王士祯撰。写于顺治十七（1660）。士祯是清代著名的诗人，论诗标榜“神韵说”，他的山水游记也体现了这一特色。题名，指题记姓名，即游历。作者的这篇游记通篇只有190余字，在写法上，它不象一般游记那样叙述往来的始末，而是下笔直书自己来游焦山的四件快事。观青山落日，夕阳返照，作者不直写景色如何，而说有米家父子（宋米芾、米友仁）笔意，反觉翻新出奇；写江天晚眺，空阔中又听得梵声出自树杪，那种超然世外的感觉更是一种独到的体会。晓看日出，映射江水成明霞一片自是一快，而在惊涛骇波之中踏危石观赏名刻，又别是一番独特韵致。这些景致与感受，在作者笔下都表现得清新明丽，天然不可凑泊，有一种得意忘言之趣。

《阎典史传》 清邵长蘅撰。顺治二年，清兵大举渡江，颁布了强迫汉人剃发易服的剃发令。南明政权的高官劲将大都望风披靡，不战而降，但一个小县的典史却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组织军民，据守一县，在二十多万清兵的重重包围之中血战近三个月，毙伤清兵七万多人，城破后昂然不屈，慷慨赴死。邵长蘅的《阎典史传》，即是为这位组织江阴守城的著名民族英雄阎应元而作的传记。作者写的是这位英雄一生的事迹，但突出记载的是顺治二年的江阴守城。表彰歌颂这位民族英雄和江阴人民英勇杀敌、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是本文的中心内容。作者是清人，无法正面谴责当朝者的暴行，但那饱带感情的深沉笔触却显示出了鲜明的爱憎。文章的格调沉郁悲壮，哀切感人，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力量。

《先妣遗物记》 清张贞撰。写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张贞是清初山东的著名文人，以古文称雄山左。他的《先妣遗物记》写的是由睹故物而引起的对亡母的追思。文章继承了明代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古文创作的传统，于琐细中见至情，写得真切感人。

这篇文章最突出的特点即在于善写细节，通过零杂琐屑之物的描述来寄托感情。如写母亲敝箧中的柳杖是用来治齿的，春雪散是用来医目的，而小刀、扇佩等物，则是因为亲戚家的孩子“昵就吾母”，母亲特地准备下供孩子们玩耍嬉戏的。事甚细，甚无关紧要，但却处处关情。作者并没有直接抒情，但对母亲的追思怀念却俱从细物絮语中流出，从而给人以具体亲切之感。

《游姑苏台记》 清宋荦撰。写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姑苏台位于苏州西南的姑苏山上，相传是春秋时吴王的离宫，清人汪琬等有游记。作者这篇游记，写的是自己登临姑苏台的观感。文章的结构较为平常，先写往游的经历，然后写登台后的所见所感，但读来却不觉乏味，有一种自然的韵致。从艺术上看，这篇游记主要有以下特色：一是描绘的景物各具特征，作者的描绘又能做到绘声绘色，使读者如耳闻目见，能产生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二是作者的感慨都是触景生情，缘情而发的，情景交融，不仅使作者的感慨有所附丽，入文的景物也充满活气，与作者的情感变化融为一体。文章篇幅较短，在文字的运用上也体现出简洁精炼的特点。

《聊斋志异自序》 清蒲松龄撰。写于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是我国十七世纪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这篇文字即是他为自己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撰写的序言。序言从两个方面道出了《聊斋志异》的创作意旨。一是说明了作者对搜神志怪一类传统题材的兴趣和爱好，从喜好鬼狐故事的角度揭示了作者的创作个性；二是从自己的半生蹉跎和人生感愤说明《聊斋志异》是一部有所寄托的孤愤之书。《聊斋志异》为蒲松龄一生心血之所萃，作者的创作时间长达四五十年，其基本动力正来自这两个方面。作者是文言小说写作的名家，也工于骈文。这篇序言即用骈体形式写成。前后文句典丽洒脱，骈对工整，而语气则舒展自如，激荡传神，节奏铿锵有力，顿挫有致，从语言和艺术风格上显示了作者的大家手笔。

《促织后评》 清蒲松龄撰。选自《聊斋志异》。《促织》是《聊斋志异》中脍炙人口的佳制名篇，写的是由于皇帝喜欢玩促织，使得一个叫成名的读书人以促织之累几至家破人亡，后来找到一头轻捷善斗的促织人贡，终于受到皇帝恩荫，肥马轻裘，否去泰来的故事。故事的寓意十分深刻，着重反映的是在腐朽残暴的封建统治之下，广大人民从政治到经济，从肉体到精神所受到的严重迫害和摧残。和故事的正文相比，作者在篇末发表的议论（异史氏曰），更是一针见血，把批判锋芒直指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作者认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而成名一家先悲后喜的活剧即是封建皇帝喜尚玩物的直接结果。这便揭出一个封建时代社会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即一人的欢乐与万家遭殃的严重对立。封建帝王随意好尚的一己之私，都要成为天下奉行贡征的定例，要天下百姓付出贴妇卖儿的惨痛代价，这从客观上道出了封建压迫与剥削的终

极根源。加之对官贪吏虐的社会现象的严重谴责，作者在这里对整个封建统治制度作了强烈地揭露与控诉。

《醉乡记》 清戴名世撰。名世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奠基人，也是康熙间著名的文字狱案——《南山集》案的受害人。戴名世以《南山集》而致祸，他的作品中也的确不乏批判现实的深刻内容，《醉乡记》即是一篇以寓言形式写出的愤世之作。作者借刘伶、阮籍入醉乡事指出出现醉乡的原因是统治集团的昏昧造成的中原鼎沸，神州陆沉，并深刻揭示了醉乡并不能解人忧愤的道理。作者身处文网甚严的时代，所以寓言便成为他批判现实的一种重要方式。名世是主张言之有物的，他的文章也多以思想深刻而见称。《醉乡记》的文笔颇为犀利，文中并无一语触及时事，而对现实的激愤之情则溢于言表，可以称是清初寓言文体中的佳作。

《邻女说》 清戴名世撰。名世寓言式作品颇多，《邻女说》自是其中佳品。文中的邻女貌陋而善嫁，无论士、商、工匠、佣保、乞丐，皆随而嫁之；而处女不施粉黛，不入流俗，性貌淑美却无聘者。作者让邻女明言所见丈夫"无不类我"，实际是把讥刺锋芒直指那些辱志丧行、委身求荣的无耻之士，而以处女的与邻女绝表明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行，文中处女实是作者自况。在艺术上，作者运用对比手法两相比照，将清初士人对国家民族的不同态度表现得泾渭分明。文章还注意化寓意于具体形象的描绘之中，写出的人物语言生动，形貌如见，表现出了作者的创作个性和高度的艺术修养，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与余生书》 清戴名世撰。余生，是名世的学生余湛。戴名世痛感于明代史实的散失湮灭，决心私修明史使之流传，这封信就是为让余湛请和尚犁支来与自己谈论南明史事而写的。信中不顾清朝统治者的严禁，公然称数入清之后出现的弘光、隆武、永历等明宗室政权的年号，并以汉、宋末年的史事作比，明确表示了自己奉明政权为正统的思想。虽然其中包含着汉人帝统的传统观念，但其表露的痛悼明亡的民族思想则具有积极意义。后来有人告发名世的《南山集》中有"狂悖之语"，即与这封信大有关系。书信历述编写明史的意义、困难和自己修史的决心，反复陈辞，一唱三叹，把作者那种沉痛、悲愤的感情反映得细致深刻，足可感人。 （邹宗良）

《黄履庄小传》 清戴榕撰。是作者为其姑表兄弟作的小传，写于1684年。时黄履庄才28岁。写此传的目的不是记述黄履庄的生平，而在于记述他的特殊才能。文章围绕着奇人制奇器这个中心来写。作者首先概括介绍了黄履庄为人之奇：少聪颖，有奇才，善制奇器。接着介绍了他所制作的奇器：双轮自动木车，自动木狗、自动木鸟、自动喷水器等。继之，作者又写了黄履庄关于奇器的议论："奇器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为源"，这是进一步写黄履庄思想观念的新奇。最后写黄履庄沉静好思、思则必求得出结果的性格，说明奇才并非

自天降，而是不懈努力、刻苦钻研的结果。本文中心突出，内容精炼，剪裁得当。

《左忠毅公逸事》 清方苞撰。记叙了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不见正式记载的两件事。突出表现了他以国事为重，刚毅不屈、舍生取义的崇高品质。一是左光斗视学京畿，举荐史可法之事，表现了左光斗为国家着想、知人善任的远见卓识，突出其“忠”。二是写左光斗被诬下狱后，刚强不屈、舍生重义，斥责其得意门生史可法冒险探狱之事，把他对学生、对国家的眷眷之心和刚毅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文末写史可法在军中勤于职守，不负老师厚望，表现了左光斗的卓识，从侧面衬托了左光斗的形象。本文紧扣左光斗“忠毅”的特点来写，选材精粹。另外，十分准确生动的动作刻划和个性化语言描写，细节点染和侧面烘托手法的运用，也都是本文突出的艺术特点。

《余石民哀辞》 清方苞撰。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因《南山集》中有触怒清朝的文字而入狱被杀。余石民是戴名世的学生，因戴氏曾写信给他而被牵连入狱至死。本文是方苞有感于余石民的遭遇而作的。文中着重写了余石民的道德人格，表现了他在道德沦丧之世仍“有志于圣贤之学”、坚守道德节操的可贵品德。文章写他虽遭连累蒙冤入狱，却毫无怨言，仍恭敬地对待老师，并坚持读宋儒之书；写他入狱后，因对母亲放心不下而苦忧成疾，终于病死狱中；并描写了余石民被捕时父老子弟倾城送别的感人场面，生动地刻画出一个令人敬佩的道德君子形象。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作者对死者的同情及对清廷制造文字狱的不满。本文选材精炼，结构严谨，行文简洁朴素。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清郑板桥撰。是作者在潍县做知县时写给其堂弟郑墨的书信之一。郑板桥无亲兄弟，在外做官时，一切家务尽托郑墨料理。此信讲的全是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信中说自己52岁始得子，非常爱他，但不应溺爱纵容，而要重视其思想品德的教育。即使在日常游戏中，也要注意培养孩子博大的爱心。让孩子不要玩小动物，不要伤害生灵，要孩子从爱世界万物中，“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还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和人人平等的观念。最后明确指出，读书做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通情达理、忠厚善良的好人。信中充满了人情味，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读来亲切感人。文中论理意深而言浅，自然流畅，很具说服力。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清郑板桥撰。是乾隆九年（1744）作者在山东范县任知县时写给他的堂弟郑墨的信。郑板桥无亲兄弟、视郑墨如手足，在外做官时，一应家务全都托付给郑墨。本文通篇谈应该尊重农人，希望今后全家能以务农为本，自己也希望“长为农夫以没世”，告谕家人要勤勉地过农家生活，务农的亲朋到门，应好好招待，对来帮工的佃户也要宽厚慈爱。文中，作者认为那些

虽读书而不知经世济民、只知做官夺取钱财的士大夫，远不如“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并提出“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反传统观点。文章以今后如何安置家业作结，阐述了自己不求富贵、不随流俗、只愿做个有德之士的想法。行文带口语成分，如道家常，随手写来，不事雕饰，平易自然，清新流畅，显得亲切真挚。

《马湘灵诗集序》 清刘大櫆撰。这是为马湘灵的诗作序，但不言其诗，而只言其人其遇，显然，作者之意是让读者由其人而知其诗。文章首先举出了自己与马湘灵的八个相同之处，又于同中求异，赞扬了马湘灵的道德文章。接着又回忆了昔日湘灵在京师使酒发狂，意气勃然、悲慨悲歌、遍刺达官显贵的事，表现了他狂狷耿介、超群不凡的气概。之后，作者又简笔勾勒了马湘灵后半生因才高志远不得用而扁舟自放、寄情山水的生活际遇。抒发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埋没人才的感慨。最后写作者从马湘灵的诗作中感到他虽老病而“少年英锐之气不衰”，意在表现“文如其人”。本文有详有略，详而得当，略而不虚，对言行和心理的刻画描写，也极传神。

《游万柳堂记》 清刘大櫆撰。本文名为游记，实则为借游记之题发挥，言心志，斥时弊，抒发感慨之情。所以文章一开始便谈到，“昔之贵极富溢”的“卑庸者”，为了“震耀其乡里”，而“穷极土木之工”以建别馆，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刻的讽刺，显示了桐城文风冷峻的特点。接着就写到康熙年间临朐人冯溥，在做宰相时政绩平庸，却用民脂民膏建了一座十分豪华的别墅。作者在此也描绘了这“万柳堂”的恢弘规制、秀美景色，但这是据闻而写，仍不是记游。作者记游只用“一至”、“二至”、“三至”三笔带过，却深刻地状写出了“万柳堂”一废再废的景象。最后，作者抒发了“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的感慨，指责达官显贵榨取民膏的行为，表现了作者睥睨世俗的清高气度。本文结构谨严，首尾照应，详略得当，主题突出。

《游大慧寺记》 清刘大櫆撰。此文虽名曰游记，其主旨却在讽刺官场时弊。文章开头叙述了京城的四处山野中多奇伟状丽的佛寺，这都是历代当朝宦官在他们墓地旁建立的，实际是让和尚住在这里为他们守墓。宦官们还一定要请当朝重臣为他们写碑文记建寺情况。这是总括之笔。接着便以游踪为线索，描写了明代宦官所建、佛道并存的大慧寺的宏阔、壮丽、奇伟之象，并特意指出，寺中真武祠门外立有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撰文的石碑。最后大段议论，分析朝中贵官为宦官所挟而俯首下气为之作文的原因，讽刺了官场时弊。文章旨在借大慧寺之兴建、李东阳为太监所挟而撰文之事，讥刺官场依附权势、患得患失之风，虽托讽于古，却切中时弊。

(苗文利)

《核工记》 清宋起凤撰。这是一篇记述古代核刻工艺的文章。在一枚不到半寸见方的小小桃核上，能够镂出许多具体而微、维肖维妙的人物

和景物，从而体现出张继《枫桥夜泊》的诗意，可谓殊非易事。而要在不足五百字的篇幅之内把众多的人物、景色、器用的情状、位置与特点交代清楚，给人以亲历之感，也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作者采用了由全景到局部、由此而及彼的描述方式，不仅把这一切描绘得生动具体，而且把文章组织得层次分明，毫无杂沓纷乱之感。但作者认为“尺绡绣丝而唐微，水戏荐酒而隋替”，精巧绝伦的艺术会导致国运的衰微，则表现出一种时代的局限。（邹宗良）

《峡江寺飞泉亭记》 清袁枚撰。文章开头便说，峡江寺令人“意难决舍”，正因为有“飞泉一亭”。接着写天下名山名瀑多无亭寺临之，令人虽目悦而体不适，故难久留。这是衬托之笔。随后始写峡山的奇景异观，这是大概地介绍峡江寺、飞泉亭的地理位置。之后转入对飞泉亭的具体描写，写亭子之美及其方位和格局之妙，写亭内友人闲适愉快的交游。说明这里令人“意难决舍”的原因是：在此可以全身心地松弛，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秀美；并可在这优美的大自然的怀抱中，宾朋相聚，吟诗博弈，天人同化。这显示出袁枚特有的“性灵”、独具的审美观。最后又描绘了峡江寺飞泉亭的环境，表现了对此亭的留恋。本文首尾照应，议论和移步换形的描写手法相辅相成，使全文层次分明，浑然一体。

《答彭尺木书》 清袁枚撰。彭尺木即彭绍升，笃信佛教，居家不仕，并积极宣扬他的禅学教义。他曾写信劝袁枚信佛参禅，袁枚针对来信中的观点，给予有力驳斥。作者首先驳斥了关于文天祥不遇楚黄道人便不能了悟生死而死节的说法，说明信佛的人正是因贪生畏死而寻求自解。接着又驳斥了对佛学“不可置之度外”的观点，作者认为佛教是虚幻荒诞的，是“智者不为”的，因此必须置之度外。之后又指出，儒家学说的境界本来是广大的，也包括了生死问题，即生死要听其自然。最后以嘲讽之语表明决不信佛，决不受禅学的沾污。信中抓住对方要害，层层批驳，非常有力，并表现出了作者的现实主义精神。本文虽是有破有立的说理文章，但全文清新活泼，简洁明快。

《鸣机夜课图记》 清蒋士铨撰。《鸣机夜课图》是作者请人以其母亲为画主所作的一幅图，作者为之作记，说明作图原因，意在赞颂母亲完美的崇高品德。读后令人沉浸于一种真挚深沉的母爱之中。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叙述了母亲一生的事迹。首先概述母亲的身世和为人，接着写了母亲的勤苦持家、善教幼子，敬助丈夫，孝顺父母，表现出母亲在教子方面是慈母，在相夫方面是贤妻，在事亲方面是孝女。文章着力描述母亲苦心教子的事，表现了母亲的慈爱、贤惠，这部分写得最动人心统，催人泪下。最后点明请人作图的缘由及用意。本文贯注了作者对母亲最真挚深沉的厚爱，因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息庵翁传》 清彭绩撰。这是作者为其祖父写的小传。文章首段介绍了息庵翁的家世，以及自小受家传、精

书法的特点，同时也简单介绍了息庵翁“非礼法不行不语”的为人。第二段进一步描述息庵翁的为人，强调其清高好学。并描述了其有大志而不得施展，终于穷困以了其生的简历。息庵翁没做官，也无特别建树，可是为人廉直，嗜书好学，在淡泊中抄书以终其身，表现出一种清高淡泊而坚忍的精神。作者正是抓住这个重点来写的，取材巧而精当。本文最大特点是短小精悍，全文仅177字，内容看似单薄，而仔细研读，却觉得淡中有味，文中以息庵翁闻秋风则惊而徘徊的细节来表现其“心雄”，非常传神。

《古文辞类纂序》 清姚鼐撰。《古文辞类纂》是姚鼐按文体编选的一部古文选本，体现了桐城派推崇的古文传统，影响较大。本序首论编选此书的目的，接着说明了书中按文体进行的分类，并对各类文体及各体文章的选录标准进行的论述和说明。最后论述了古文的内容及艺术形式，并举例说明了学习古文的方法。本文实则是一篇重要的文体论和古文论，作者把古文辞分为十三类是较适当的，对每类文体的发展源流、特点、功用及历代代表作品的评述也较简明贴切。文末论古文以神、理、气、味为精，以格、律、声、色为粗，寓精于粗，由粗得精，涉及到散文的思想、风格、境界，以及语言艺术的各个方面，是姚鼐散文理论的集中表现。清通自然、简洁明快是本文的明显特点。（苗文利）

《登泰山记》 清姚鼐撰。作者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自京返乡，途经泰安，登泰山，游灵岩，遂有此文及《游灵岩记》。本文记泰山位置、道里、登山经历及闻见，简洁有余而生动不足。盖桐城派制定作文戒律，已属文章下乘，既束缚作者性情，也使文章趋于偃直干枯。游记本散文中自由活泼的文体，试看明末如袁宏道等人的游记，是何等的潇洒飘逸，神采焕发，而桐城诸人的游记，则徒记山川道里，绝少意味。姚鼐此文，在桐城诸文中还算是较有可读性的，但也如剪纸为花，缺乏生气。记中写雪中观日出一段，向来为人所称道，其文云：“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皜驳色，而皆若偻。”平心而论，此节仅能描形摹状而已，似机器人描图准确则准确矣，缺乏者，唯情耳。 （刘传新）

《游灵岩记》 清姚鼐撰。写于乾隆四十年（1775）。全文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幽绝深邃的胜景。写灵岩之石，写灵岩之境，写茂林积雪中的山寺，写灵岩的群山甘泉，还有宋以来的石碑篆刻。总之，以描写灵岩及灵岩寺为中心，并把其前后、左右、上下的各种事物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整体。第二部分写了灵岩一带的地理形势及其历史沿革，同时写了琨瑞山的兴衰演变，这是以琨瑞山来衬托灵岩的“自宋以来，观宇益兴”，也体现了作者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并重的观点。本文笔墨简省，而境界俨然，很能表现出作者深厚的描摹功力和为文的老练，同时也体现出了桐城派散文的风格特点。

《与孙季逑书》 清洪亮吉撰。孙季逑，即清代乾嘉学派中的著名经学家孙星衍，与洪亮吉同乡。此信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当时洪亮吉正在四库馆帮总校官孙星衍校书。信中表达了作者矢志治学的理想，并主张应当及时努力学习。信的开头表达了自己对孙星衍的思念和倾慕，接着就直言平生之志不愿随波逐流以放情于博弈、花鸟，只求废寝忘食以沉潜于学问，并力图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之后又征引了曹丕和陶侃的话来说明光阴易逝，生命短暂，并叙说了自己虽贫寒潦倒而犹杜门谢客、手不释卷、秉烛苦读、潜心学问的生活。文末引扬雄和韦昭的故事说明人应扬己之所长而避己之所短，再次表明自己潜心学问的志趣。本文如故人对谈，语带深情。

《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 清汪中撰。乾隆四十八年（1783），汪中旅居江宁（今南京）时，为马守真写过吊文，这是吊文前的序言。本文从马守真凄凉荒废的故居残迹写起，接着描述了其超众的才艺，抒发了对这位明末才妓凄惨遭遇的感慨，表现了作者的极大同情和对其才艺的惋惜。凭吊故迹，睹物伤情，对马守真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遭遇的感叹，又引发了作者对自己穷愁潦倒、寄人篱下的生活际遇的感慨，以及难言的不愤不平之感。文章最后点明了致吊的原因："事有伤心，不嫌非偶。"这和白居易因感于"同是天涯沦落人"而作"琵琶行"是一样的。这篇序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在于情真意切。作者是因"事有伤心"而为此文，所以令人读来有曲断悲生之感，动人心弦。

（苗文利）

《哀盐船文》 清汪中撰。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十九日，江苏仪征县盐船突发大火，130多只船葬于火海，千余人焚为灰骨。汪中此文，即为凭吊这次火灾中的罹难者而作。作者怀着对遇难者深厚的同情之心，以凄丽哀痛之笔，生动而详尽地描绘了盐船失火的惨状。文中叙火势之威烈，铺排渲染，使人惊心动魄；记船民火中相救求生，细致曲折，使人悲切欲涕。文末又加一段关于死的议论，语出肺腑，凄恻呜咽，悲怨之气袅袅不绝。通篇文章呈现出一种凄壮之美，虽用骈体文写造，而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刘传新）

《宝山记游》 清管同撰。本文是一篇写景状物的纯记游散文，记叙了作者住在宝山时多次出游的情况。文章开头不直写出游，而是写初至宝山，夜卧听潮，洒然意快。是引人入胜之笔。之后才记与友人晚上相携出游，观海塘明月；描写了海涛月影、寥阔清寒的景象。再记早起观日出，描绘了壮丽的海上日出。又记与友人在吴淞台上饮酒观海，慷慨悲歌，描绘了茫然无际的洋面上群舟行驶犹如落叶浮泛的壮观画卷。最后总括地描写介绍了所游之处。本文结构新巧严谨；行文简洁明畅、条理清晰；用词精炼准确，描写生动，无论写月下海涛，写海上日出，还是写海中群舟，都能抓住各自的特点，逼真地、有声有色地描绘出来。

《饿乡记》 清管同撰。作者描绘了一个"天下之穷处"——饿乡。这里虽是"穷处"，却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丑恶、没有世事纷扰的理想之所，只有"屏去食饮"刻苦修行的"违世乖俗、廉耻礼义之士"才能进入。在这篇寓言式的杂文中，作者以"饿乡"为喻，写守志而不慕名利的廉耻礼义之士，宁可穷饿至死，也不仰人鼻息、苟且偷生；而不能坚守节操、贪图苟活者，必混同流俗，为人所用；至于王侯贵族因"遭变故"而被迫误入"饿乡"者，也与守志之士有根本的区别。文末写自己"穷于世矣"，也将到"饿乡"去，流露了对自己身世的感慨和对社会黑暗的不满。本文联想丰富，行文流畅，简洁明快，笔力矫健清新。

《问说》 清桐城派作家刘开撰。全文着重论述了虚心好问的重要性。文章首先由学与问相辅相成的关系写起，接着转到好学尤当好问的问题。为什么要勤问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作了论述。正面分作两层：一是为什么要问，问有什么好处，说明了问的重要性；二是举古人好问的例子，说明"问"是古人的美德。反面也作两层：一是批评有些人师心自用、当问而不问；二是批评另一种错误做法，即"所问非所学"，问而不得其正的做法。最后总结前文，强调应当发扬古人美德，不分贤愚贵贱老幼，都要虚心向他们求教。本文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章法细密，条理清晰；语言古朴晓畅，文中多用对比和排比手法。本文有明显的受韩愈《师说》影响的痕迹。

《徕宁果木记》 清铁保撰。文中首先说徕宁因近仙山昆仑，得其灵气，所以果木甲天下。然后举出了"极香美"的果品，如桃、杏、葡萄、梨、苹果、林檎、樱桃等；又着力描写了桑椹、冰苹果等几种珍异果品特异的色、香、味。接着，作者又为如此香美特异的珍果未生于中土，以至于未能"贡明堂，飨清庙，供上方之馔，擅华林之春"而痛惜，为"珍品与羊胛同烹，名园与马枥为伍"而感慨。其弦外之音，实际上是为有卓异才能而不得其用的人抱不平。文末引"人轟物灵，山川清淑之气多钟于草木，以补人之不足"之说，更透露出作者内心的痛苦感慨。

《震川文钞序》 清张士元撰。震川是明代古文家归有光的号。张士元因喜爱震川文章，而从"震川文集"中选了一些"尤可法者"编为"震川文钞"，并作了本序。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一下"震川文集"的几种版本及其优劣，然后说明编"震川文钞"的旨趣和体例："录其尤可法者若干首，即用熙甫读《史记》之法读之，稍稍加评注焉。"接着，在简单论述了一番古今文章之后，极力推举震川先生："其力抗欧、曾，气追班、马，如江、汉之发源于岷、嶓，而滔滔不竭者，熙甫一人而已。"并论述了其写世俗琐事的叙事文之"古雅可观"、生动感人的特点。最后有力地驳斥了轻视震川文章的看法。全文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行文要言不繁，且极富表现力。

《观渔》 清梅曾亮撰。本文是一篇即物明理、即物寓情的杰作。文中写了作者观看渔人在池塘中打鱼的情

景，而作者的注意力则主要集中于“出水可寸许”的渔网两边跳跃的鱼，“有入者，有出者，有屡跃而不出者”。然而，不管跃进跃出，打鱼人都不着急，因为他知道，不管怎样，鱼都逃不出这个池塘。这就点出了鱼儿囿于池塘、受制于人的可怜处境。由观鱼而感于人世，于是作者发出了“其鱼之跃者，可悲也；然则人之跃者，何也”的慨叹。文章至此打住，使读者不禁思绪万千，感到在人世这个大池塘中，也难以逃脱那“渔人”的大网；同时也会令奔竞名利者汗颜、猛醒。本文短小精悍，全文仅128字，却造成了几次转折、几次飞跃，并于文字之外寄以深意，含而不露，耐人回味。

《钵山余霞阁记》 清梅曾亮撰。文章首先介绍了钵山的地理位置和余霞阁的由来。接着写登上余霞阁之所见。作者抓住最能显示事物神韵的特点，抓住居高临下时景物给人的特有感受，以寥寥数笔，勾勒出了一幅有花木、有草径、有行人、有淮水、有长江、有莫愁湖、有袅袅炊烟的素描画，给人以苍茫寥廓之感。最后写与朋友在余霞阁饮酒，因感于此处的壮美景色，而引发出了关于如何写作文章的一番高谈阔论。这里，作者认为创作灵感来无定时，稍纵即逝，所以写文章应该善于捕捉灵感，不能错过时机。本文通过描写风景来讲析自己的文学主张，作者由自然景象而引出著文之妙，所以写景之处只求传神，不求细描，用笔精洁而形象鲜明生动，所论也极自然。

《书山东河工事》 清张惠言撰。嘉庆二年，黄河在曹州决口，主持堵塞决口工程的山东巡抚伊江阿，不去设法堵缺，却沉溺于宗教迷信活动中，支持还了俗的恶僧王树勋大搞“镇龙治水”活动，不仅使数百名民工葬身于汹涌波涛之中，而且使黄河决口的事态不断恶化。本文通过记叙这一事实，来警戒后来者，深刻揭露了封建官僚及其爪牙们的凶残任性和昏庸无能。文章首先叙述了得伊江阿宠信的王树勋、“镇龙治水”，数月不成的事实，接着又以亲自调查证明了此事的真实性，并抒发感慨，说明作本文的目的。最后，以“附记”形式介绍了王树勋的行为简历，指出他是一个不择手段、投机钻营的官迷。本文选材精当，叙事简明，议论深刻。

《冉氏烹狗记》 清崔述撰。这是一篇杂记，文中借“搏行人则勇，而见盗则怯”的下等狗，来讥刺那些“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的市井无赖之徒。文章开头描写狗的凶猛，虽屡伤行人，但主人惜其勇猛而未忍杀。接着文笔急转，写它突然被烹，从而揭示出其“搏噬行人而不御贼”、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丑态。由狗而想到人，作者又描写了那些与这狗很相似的市井无赖之徒。他们平日里横行千里，恃强凌弱；遇劫盗则胆战心惊，“拔刀不能出鞘”；刚刚离开家乡，就怕战死不归。这说明“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的不仅仅是冉氏之狗，对这类役吏兵卒也不能姑息纵容。最后论诸类人材，指出只能害人而不足济事者，在狗中也是最下等的。全文曲折而有变化，议论淋漓畅快。

《为学一首示子侄》 清彭端淑撰。本文以正反两方面说明了难和易、昏庸和聪明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勉励人们坚定意志，努力学习。文章一开始便以两个设问，开门见山地点出了题旨，提出了天下事为之则易、不为则难的论点。接着以圣人之道终于由天资鲁钝的曾参传下来的历史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又以蜀鄙两僧去南海的小故事来说明之。故事中，富僧虽有优越条件而不为，终于未到南海；而贫僧凭一瓶一钵、努力跋涉，却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形象而有力地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最后作者指出，聪敏不足恃，昏庸不足畏，意在勉励子侄"自力"而不要"自败"。文章短小精悍，平易质朴。从容论析，反复对比，阐发事理至为慎密，启人深思，铭记难忘。（苗文利）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清龚自珍撰。此文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自珍辞官返杭州途中。自珍本思想敏锐者，此时已预见到清王朝的衰败颓亡，而假借扬州盛衰景象暗喻之。此文写得奇诡含蓄，扑朔迷离，内中一点真实思想若明若暗，似有似无。文首，先以客言"卿知今日之扬州乎？读鲍照《芜城赋》，则遇之"突兀而起，使人震惊而毛骨悚然，继而以己在扬州经历验证客言：先以眼中所见扬州市面之繁华冶艳疑"客言不实"，"知有极不然"，终以静夜直感言扬州六月似秋，实际以秋之衰败暗寓客言不谬，预见当时社会在歌舞升平的背后，已隐藏着"风嗥雨啸、鼯狖悲、鬼神泣"的危机。于今读之，不能不为龚自珍敏锐的历史直感叹服。

《病梅馆记》 清龚自珍撰。自珍48岁时辞官返杭州故里，辟梅圃命名曰"病梅馆"，并写下了这篇文章。自珍身处封建末世，敏感意识到封建社会的"大厦"将倾，对这个社会的腐朽和弊端也看得格外清楚。此文从说梅之病入手，将世俗公认的"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通行规范斥为"病"，并进而深刻揭示出世人的心态之病，眼光犀利，识见卓异。而其用意，则在于托物言志，以梅论政，笔锋直指封建专制对人才的摧残、婚厉和笼络，渴望一种使各种人材自然健康成长的环境。文末谓将"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可以看作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为思想启蒙，挣脱封建桎梏投身时政改革的决心。（刘传新）

古 文 名 句

壮 志

一、立 志

自强不息。(《周易·乾》)

自觉地努力向上,永远不松劲。关键在于"不息",有信心,有决心,而无恒心,仍将一事无成。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能够夺去三军的主帅,却难以夺去一个普通人的志向。一个人具有了坚定的志向,即使是普通人,也强于统领三军的主帅,可见志向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何等重要。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韩非子·喻老》)

立志的困难,不在于胜过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人的惰性出于一种本能,它是远大志向的天敌。战胜惰性,是一件很难的事。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

楚国即使仅存三户,使秦国灭亡的国家必然还是楚国。这句话告诉人们:只要有志气、决心,就能克服一切困难,达到自己的目的。(肖 星)

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淮南子·主术训》)

连用"非……无以"五个排比句,强调说明一个人不慕名利、胸怀广阔、清心寡欲、公正仁厚、兼济天下的高尚生活目的和远大理想。诸葛亮《诫子书》作"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后来常用"淡泊以明志"说明恬静寡欲、志向高洁。一个人要真正做到这五点,其精神就会达到极高的境界。(夫容 安笈)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班超传》)

不闯入老虎洞,怎能得到虎仔呢?干事业总是要有风险的,尤其是在改革和创新的年代更是如此。我们不仅要走前人已为我们开拓的路,还要走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光明永远属于不畏艰险、勇于进取的人。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

还。(《后汉书·马援传》)

男子汉应当战死在边疆旷野，用马皮包裹尸体回来埋葬。这里抒发的是一股堂堂男子汉不怕牺牲，报效国家的英武豪气。

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耿弇传》)

有志向的人，事业终究会成功。坚定的志向是成功的一半。人们常常以赞许的口气评论那些已经取得胜利的人："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那么，还未获得成功的人难道不可以从中得到启发，以此自勉，向胜利进军吗?

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徐干《中论·治学》)

学者不怕才学不够，就怕没有树立志向。有了远大理想，才华不够可以继续学习，获得才智，而胸无大志的人，即使有了丰富的学识，不思进取，也会固步自封，终将落伍而被淘汰。

志当存高远。(诸葛亮《诫外甥书》)

志向应着眼于崇高和远大。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常常使对手不寒而栗。也许正是由于"志存高远"，才使得他能够展现一番宏图大略，指挥若定、屡建战功吧。

面歧路者，有行迷之虑；仰高山者，有飞天之志。(傅玄《傅子·意林》)

面对歧路的人有迷失道路的忧虑，仰视高山的人有凌云的壮志。这段话告诉我们不要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困难，要站得高，看得远。胸襟狭小只会看到走投无路、障碍重重，胸怀博大的人则会感到宇宙在握，无坚不摧。

乘长风，破万里浪。(《宋书·宗悫传》)

帆(船)借着顺风，穿过重重的波浪前进。成语"乘风破浪"源于此，表现志向远大，不怕困难，奋勇前进的精神，也可以理解为在好条件下或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夭也。(《宋书·萧惠开传》)

人生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即使活到百岁，仍象短命一样。为理想奋斗的人即使生命短促也心地坦然、问心无愧。若没有抱负，缺乏理想，即使活得长久也没有意义。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

年老时志向应更加壮阔，岂能失去白发老人的壮心?不得意时反而更加坚定，不抛弃远大的志向。年岁日增，而信仰不变，身陷窘境，但志气不减，这正是我们所应刻意追求的。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晁错论》)

自古能成就大事的人，不仅仅有超群盖世的才能，还必须有坚韧不拔的志向。这句话使我们认识到：有超世之才当然是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但必以坚韧不拔之志为前提，否则才华无所依托，无处可用，还是无济于事。

自安于弱，而终于弱矣；自安于愚，而终于愚矣。（吕祖谦《东莱博议·葵邱之会》）

自己安心于软弱，最终也只能是软弱；自己安心于愚蠢，最终也只能是愚蠢。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陆九渊《陆象山语录》）

要自己立业，注重自己的言行，不能跟着别人的脚步，学别人说过的话。这段话强调了人的独创精神。有独创才能有知识的更新，才能有社会的进步。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何所底乎？（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

不立志，天下就没有可以成功的事。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工种技艺，但无一不是以立志开始的。不立志，（人）就象船没有舵，马无衔，没有目的地乱闯，到什么地方才是尽头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成就事业，基于立志。

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

立志用功就象种树一样，开始只生出根芽，还没有树干，有了树干，还没有树枝，生出树枝后才能长叶，长出叶子后才能开花。立下发愤用功的志向，学识会不断积累，由不知到知，由少到多，学识渊博起来，最终达到飞跃。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应当象小草扎根土壤吸取养料一样不断汲取人类文明智慧之泉。

操瓢而挹水于海，虽终日抱汲，不盈升焉；操畚而负土于山，虽终日锹掘，不盈石焉。（庄之辰《叔苴子内篇》卷一）

拿着一个水瓢到大海里舀水，即使整天抱着瓢端水，也不满一升；拿着畚箕去山上背土，即使整天用铁锹挖土，也不满一担。鼠目寸光无远大志向的人，尽管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也不会有大的成就。　　（肖　星）

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旨永。（叶燮《原诗》）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一个人的文辞，便可以反映出此人的心志。志高者，不拘于俗，故其语言明净；志大者，气魄宏伟，其辞也雄健；志远者，深藏不露，其旨味隽永。

（张增兰）

二、浩　气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天气冷了，才懂得松柏是最后凋零的。字面上是讲松柏的特性，实际上告诉人们：在和平的环境中，顺利的形势下，表现出高尚的节操往往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险恶的环境里，动荡的时局中，才更能显示出一个正直之士的高风亮节。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

富贵不能使我的身心淫乱，贫贱不能使我的志向改变，威武不能使我的气节屈服，这才叫做大丈夫。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生，是我的愿望；义，也是我的愿望。如果二者不可同时得到，那么就舍弃生而得到义。视理想、道德重于生命，是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共有的高贵品质。抛弃信仰，出卖灵魂，苟且偷生，虽生犹死；反之，为了崇高的理想，毅然舍生，则虽死犹生。

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庄子·田子方》)

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如死灰，而生命的死亡还是次要的。这里强调“养心”的重要，“心”“形”相比，“心”重于“形”，信仰胜过生命。

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宋玉《九辩》)

与其不公正而有名望，还不如处于困窘的地位而保持高风亮节。《九辩》叙述了宋玉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对黑暗统治抑郁不满的情绪。上面这句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人格的阐发。

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吕氏春秋·季冬记·诚廉》)

石头可以打破，其坚硬却夺不走，丹砂可以磨碎，其红色却去不掉。有些东西形体上可以被损毁，而内在的本质却永不泯灭。

富以苟，不如贫以誉；富以辱，不如死以荣。(《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用不正当的手段求得富贵，不如为了保全声誉而一贫如洗；为了富贵而屈辱地活着，不如光荣地死去。

(肖　星)

草木秋死，松柏独存。(刘向《说苑·谈丛》)

松柏是千古文人咏唱不绝的题材，以草木春生秋死，夏荣秋枯的短暂衬托松柏不畏严冬、四季长青的旺盛生命力。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吕晓庄)

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三国志·魏书·庞德传》)

良将不会因为怕死而乞求苟活；烈士不会毁掉名节而图谋生存。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刘子·大质》)

丹砂可以磨碎，但不能夺走它的颜色；兰花可以烧枯，但不能灭掉它的芳香；美玉可以粉碎，但不能改变它的清白；金子可以熔化，但不能变易它的刚性。高尚的节操是比生命还要贵重的。如果必失其一的话，宁死而不失节，这就是仁人志士的选择。

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北齐书·元景安传》)

大丈夫宁可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保全。人要注意精神上的追

求，靠出卖灵魂活着还不如堂堂正正地死去，留下光辉灿烂震撼人心的金质玉声。（肖 星）

太阿之剑，犀角不足齿其锋；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张九龄《与李让侍御书》）

这组排比句运用反衬、烘托的手法，以“犀角不足齿其锋”、“霜霰不能渝其操”，强调了“太阿之剑”、“高山之松”的高尚品格和坚贞情操。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还不应该象太阿剑、高山松一样高贵、圣洁，经得住任何考验吗？（简 音）

烂死于泥沙，吾宁乐之；若俯首贴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埋没烂死于泥沙之中，我宁可乐于这样做。让我俯首贴耳、驯服听命，做摇尾乞怜的人，那么这决不是我的志向。（肖 星）

水可干而不可夺湿，火可灭而不可夺热，金可柔而不可夺重，石可破而不可夺坚。（《意林》引《任子》）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规律和不可改变的属性。同水、火、金、石一样，作为人即使面对灭顶之灾、杀头之祸，亦不可夺其气、改其志。这对那些见风使舵、奴骨婢膝、出卖灵魂者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孙安邦）

穷不易操，达不患失。（林逋《省心录》）

失意时不改变自己的节操，得志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林逋一生没有做官，无妻无子，酷爱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穷不易操”恰恰表现了作者个人虽不得志却不失气节、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质。

不临难，不见忠臣之心。不临财，不见志士之节。（林逋《省心录》）

不面临危难，看不出忠臣的（忠义）之心，不是在财富面前，考验不出志士的气节。（肖 星）

见富贵而生谄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朱柏庐《治家格言》）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人需要的是一身浩然正气。反之，就是朱柏庐所说的“最可耻”“贱莫甚”之人了。

（王 端）

三、追 求

玩物丧志。（《尚书·旅獒》）

耽于玩物，就要丧失志向。玩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分迷恋。我们不要沉溺于琐碎卑微的事物，而丧失一个人应有的朝气和志向。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吃粗食，喝清水，弯曲自己的手臂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里面了。不合于仁义的富和贵，对我来说，如同过眼烟云。人生的幸福不在于吃喝玩乐，而在于为自己认定的事业进行奋斗，只要你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崇高的，那么即使生活再清苦，你也会感到幸福的。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

整天吃饱了，却没有理想和抱负，真是难啊！没有奋斗目标，整日吃吃睡睡的人，是生活中“多余的人”。孔子在这里感叹“难矣哉”，实则是为这种人的生活深感痛心！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早晨得到了“道”，即使晚上死了，也可以了。孔子认为，“道”的重要超过了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把“道”引申为真理，为了追求真理，可以不惜献出生命。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燕雀哪里能知道鸿鹄的志向呢！燕雀和鸿鹄在这里比喻了两种人。燕雀指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胸无大志的人，而鸿鹄指胸怀宽广，乐于奋斗的有识之士。这后一种人站得高，看得远，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和他们比起来，“燕雀”们的一时舒适和那点自私的欢乐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

不飞则罢，一飞就要直冲云天；不鸣则罢，一鸣就要惊人。此语本自《韩非子·喻老》：“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这是告诉我们的是一种做事的态度。要么不做，要做就横下心来，不怕困难，善始善终，做出一番成就来。

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孔子家语·在厄》）

经常处于安逸环境中的人，志向往往不广大。所谓“志向”，往往是人们在艰苦环境中产生的改变环境，争取幸福的理想。而“志向”往往就是成功的开始。所以古今中外，成大事业的人往往多起身于草莽。那些生活在安逸之中的人，则往往因满足而不思进取。

独富独贵，君子耻之。（《孔子家语·弟子》）

仅仅有财富和地位的高贵，君子以此为耻辱。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兼济天下”，因此在不少正直的儒者看来，仅求得个人的富贵是不可取的。反映出儒家学说中忧国忧民的积极方面。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后汉书·张衡列传》）

不怕地位不高贵，而怕品德修养不高尚，不以薪禄少为耻辱，羞耻的是才智的不广博。张衡，这位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的科学家，这位写过《二京赋》、《四愁诗》的文学家，告诫人们：不要为个人的名誉地位患得患失，而应把精力放在完善自己的品德、广博自己的知识上面。

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祢衡《鹦鹉赋》）

为名声与实际不相符合而担心，以才能平平为羞耻。祢衡，是汉末有名的“狂生”，性刚直、有文采。曾经当面辱骂过曹操，这就是京剧中那段“击鼓骂曹”故事的由来。最后终被曹操用“借刀杀人”之计害死。古代刚

直才智之士都很注重自己的名声与气节的，唯恐名不符实。（肖　星）

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壮观景色，而饱经沧桑浮沉的人又以生活的亲验和想象力赋予了它们生命，留下了动人的神话传说。这句表达了作者以开阔的心胸、强烈的求知欲求知天下之事，并施展其在政治上的才能和实现理想社会的愿望。

（吕晓庄）

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资治通鉴·晋记》）

活着对当时社会无所裨益，死了又不能留芳于后世，就是虚度一生。

四、执　著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志士不能不刚强果断，因为他肩负重任而且道路遥远。"任重而道远"在今天仍是很著名的成语。为了实现远大的理想，我们就不能不培养自己刚强的意志、果敢的性格及为了实现理想所必需的各种能力。（肖　星）

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面临"仁"，连最尊敬的老师都不相让，何况他人。体现了儒家对"仁"的绝对推崇。"当仁不让"这一成语就是由此衍变而来的。（落馥香）

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庄子·齐物论》）

形体固然可以使之如同枯树，心难道可以使之如同熄灭的灰烬吗？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肉体可以死亡，但一个人的伟大精神却可以不朽。相反，一个人如果心如死灰，那么即使他还活着，实际上也早已死亡了。

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

干一件事，就好比挖井，虽然挖了很深，但是没有到达有水的地方，等于还是一口废井。孟子辩论时非常善于运用比喻，把一些深奥的哲理通过生活中的事例浅显地表达出来。这里他用挖井来比喻作事，即使你为之作出过努力，但如果缺乏韧性而功亏一篑，就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商君书·更法》）

行动犹豫就不会有成就，做事犹豫就没有功效。这段话告诉人们：选择事业须慎重，但一经选择定就不应再犹豫彷徨。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事业的。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坚持做下去的人常能获得成功，不断行走的人常能到达目的地。"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川上的桥梁。"（克雷洛夫语）当然，这种行动必须是不懈的，持之以恒的。

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之一，以惰而废者十之九。（颜之推《颜氏家训》）

天下的事因困难而废弃的不过十

分之一，因懒惰而废弃的却占十分之九。阻碍事业成功的往往不是客观条件不够，而是主观努力不足。其中特别有害的就是惰性。每个人都应努力去掉自己身上的惰性，而不断增强自己的韧性。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路平且近的，游人就多，路险而远的，到达的人就少。而世界上雄奇、珍贵、奇特，不同一般的景象，常常是在险而远，并且游人又很少能到达的地方。所以，没有志气的人是不能到达那里的。王安石在当政期间，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势曾积极推行变法，最后终因触犯了保守势力的利益而被迫辞官。《游褒禅山记》表达了他作为改革家不畏险阻，勇于探索的精神。同时这篇散文也很富于哲理，告诉人们只有经过艰难曲折，才能到达人生奇伟瑰丽的峰巅。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弃。（《近思录集注》卷二程颐语）

一生都懈怠松弛，就是自暴自弃。程颐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其理学为名教纲常辩护，提出“去人欲，存天理”的口号，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他的言论也并非全无道理，我们不能因人废言。（肖　星）

白日一照，浮云自开。（苏轼《贺端明启》）

太阳普照大地，浮云自然散去。后人常用来指在遭受挫折的时候，一定要坚忍，要努力下去，困难总会过去的。（宁志荣）

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徐霞客《徐霞客游记》）

路途穷尽了却不忧虑，行程走错了却不后悔，困乏了就睡在草木山石之间，饥饿了就吃草和树木的果实。《徐霞客游记》以游记体裁，逐日记述在旅途中对自然地理诸现象的观察所得。而对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旅行”亦当有所启示。（肖　星）

人　生

一、生　死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就象一道日光从缝隙中闪过，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罢了。天地长久而人生短暂，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就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人的一生是

短的，但如卑劣的过这短的一生，就太长了。”(《莎士比亚戏剧集》)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量，而在于它的质。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人总有一死，而死的意义，有的比泰山还重，有的则比鸿毛还轻。“人固有一死”句说明人应该死得有价值，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独到的见地。

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三国志·吴书·孙登传》)

只要死得其所，即使死了，犹如活在世上一样。

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欧阳修《唐华阳颂》)

生和死，都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怕死的人不能侥幸避免，贪生的人不能随便得到。死生有命，完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也不枉为一生，何必贪生，更不必畏死。 (肖 星)

寒暑不能移，岁月不能败者，惟松柏为然。(苏辙《服茯苓赋叙》)

茯苓，菌类植物，别名松腴，寄生于山林松根，可入药。作者在序文中说自己“少而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而茯苓“虽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故作者服之“以期病愈”，“固形养气，延年却老”，作者进而以这种对健旺不衰生命的渴望倾注到对松柏的讴歌礼赞上，使松柏那种傲寒霜、迎酷暑而长青不凋的自然属性成为蓬勃旺盛生命力的象征。 (马现诚)

二、贫 富

富而不骄者鲜。(《左传·定公十三年》)

富有了而不放纵的人少。物质生活的享受和高尚情操的陶冶往往构成人生的一大矛盾，也是人生的一大考验。

知足之足，恒足矣！(《老子》第四十四章)

知道满足为满足，就会永远满足。老子反对儒墨两派的道德观，认为真正道德是不追求道德，提倡柔弱虚静，减少私欲，知足不争。对于私欲，应作具体分析，不加区别的减少任何私欲，反而会消磨应有的进取精神。

祸莫大于不知足。(《老子》第四十四章)

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灾祸了。人生的许多灾难，往往源于贪得无厌的利欲。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孔子认为君子的本分是治国致富，国富则禄自在其中。

贵富太盛，则必骄佚而生过。(王符《潜夫论·忠贵》)

过分的高贵和富有，必然导致纵欲放荡而产生过错。

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富贵对于我，就如一阵吹过耳的

秋风。古人的这种超凡脱俗的清高尽管不完全适合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然而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而致力于事业的开拓，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崇尚的境界。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

富有的人田地连成片，贫困的人却无立锥之地。封建社会贫富不均的状况是极其严重的，由此引起的阶级对立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不要为处于贫贱的地位而感到忧心忡忡，不要为得到富贵而急切地奔忙。

知足则乐，务贪必忧。（林逋《省心录》）

知足就会有欢乐，贪得无厌就会忧心忡忡。

知足而不贪，知节而不淫。（林逋《省心录》）

知足的人，就不会贪财；知道节俭的人，就不会被钱财所迷惑。"金钱的贪求和享乐，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朗吉纳斯语）一个人迷恋金钱而不能自拔，实际上就失去了人生最珍贵的自由。

人当富贵时，家中常不失寒素风味，乃能载福。（《郭嵩焘日记》卷一）

人在富贵时，能够保持节俭的作风，这样就能保住幸福了。

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足者，富贵亦忧。（林逋《省心录》）

知足的人，即使贫贱也会有欢乐；不知足的人，即使富贵也会有忧愁。

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苏轼《上梅直讲书》）

人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富贵，也不可以听任贫贱而不思进取。不放弃追求，又始终坚持正义，苏轼的这种人生态度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肖　星）

三、磨　难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

发愤攻读，废寝忘食，以学为乐而忘了忧愁，年纪将老也全不在意。不耕耘就不会收获，不历经过艰苦的努力，也就不会尝到成功时的喜悦。同时，奋斗中自有乐趣在，勇于攀登的人，才能领略险峰上的无限风光。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天将要把重任落到这个人的身上，一定先使他的心志受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身体遭受饥饿，使他困顿，他的每一行为总是不能如意，这样，便可以震动他的心意，坚定他的性情，增强他的能力。生活中的种种磨难，往往可以造就出各种人才。西方有句谚语："逆境制造强者"，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

广。(《荀子·宥坐》)

生活不穷困的人，思想难以深远；没有被遗弃过的人，志趣不会广大。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文王被拘囚而推演出《周易》；孔子遭困厄而写出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方创作出《离骚》；左丘明失明，才写出《国语》；孙子被膑脚，著述了兵法；吕不韦被迁于蜀地，世上才流传着《吕览》；韩非囚于秦国，写出了《说难》和《孤愤》两篇文章；《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圣贤之人发愤而作。司马迁这位著名的汉代历史学家，自己就曾为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捕入狱，处以腐刑。但司马迁不为厄运所压倒，以惊人的毅力，忍辱负重，顽强奋斗，终于以一生的精力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史记》，为后人所景仰。

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汉书·贾谊传》)

水势激疾，就会迅速流逝而干旱；箭受力大就能飞得远。

忍辱所负重。(《三国志·吴志·陆逊传》陆逊语)

忍受耻辱是为了担负重任。陆逊，三国时吴国名将，当年刘备伐吴，他曾率军以火攻大破刘备军队。这句话表现出这位年青军事家的气魄和心胸，也说明人才往往是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炼出来的。　(肖　星)

春也万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其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见其盛而知其阑；秋也严霜降兮，殷忧者为之不乐；冬也阴气积兮，愁颜者为之鲜欢。(卢照邻《释疾文·悲夫》)

春天万物萌生，作者因生想到万物之死而忧愁，夏天万物繁茂，作者由繁华想到它的凋零；秋天白露为霜，又引起人们闷闷不乐，冬天寒冷刺骨，又令人愁容满面缺少欢乐；四季在卢照邻的笔下是惨淡的，当然，这与他患恶疾数十载而心情抑郁不欢是有密切关系的。　(李雪枫)

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汪革语，见《万姓统谱》)

人能常以菜根为食(意为不畏艰苦)，什么事情都能做成。汪革，字信民。宋朝学士。性格坚韧，刚直。奸臣蔡京当道时，召他为宗正博士，他誓死不从。当时流言四起，他便说了这句话，成为千古名言。

君子遇穷困，则德益进，道益通。(陆九渊《象山先生集·语录》)

君子遇到厄难以后，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道德，更加开扩自己的前程。"不幸，是天才的进身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深渊。"(巴尔扎克语)人生的艰辛，不应视为畏途，"幸运喜欢照顾勇敢的人"。(达尔文语)

冰心与贫流争激，霜情与晚节弥茂。（《宋书·陆徽传》）

贫困厄境可以激励人的意志，使人心灵纯洁，品德高尚。严霜可以使松柏的节操显得更加坚贞。

处难处之事，可以长识；调难调之人，可以练性，学在其中矣！（徐桢稷《耻言二》）

处理难以处理的事，可以增长见识；调理难以调理的人，可以锻炼脾性，这中间是有学问的。

患难之来，当以心制境，不当以境役心，处处体认，则顺境反不若逆境之受益矣。（顾有孝《吴汉槎书》）

当患难来临之时，要用精神克服处境的恶劣，而不受环境所支配，并要处处认真考察，这样，处逆境反而比处顺境得到更大的好处。

棘中之兰，其花更硕茂矣。（郑燮《题兰竹石二十三则》）

生长在荆棘中的兰花，开得格外艳丽饱满。此句比喻处于艰苦环境中的人，可以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魏源《默觚·治篇》）

敢于对抗逆流就能生存，听天由命只有死亡；敢于对抗逆流就聪慧，随波逐流就会狂愚。（肖　星）

四、机　遇

时不可失，丧不可久。（《国语·晋语》）

时机不能错过，错过了也不能延误太久。

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国语·越语下》）

得到有利的时机，不要懈怠，时机一去，不会再来，天赐的良机不利用，反而会遭受灾难。

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国语·越语下》）

善于抓时机的人，就象救火、追赶逃跑的人一样，急急地奔跑还担心赶不上。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于适时，时机一到，就要果决行事，不能迟缓。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逝去的（光阴）就同（流水）这样啊，白天黑夜都不停止。时光如流水，转瞬即逝。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

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但未来的岁月还可以赶上。这是春秋战国时楚国狂人接舆走过孔子身边时劝告孔子不要再从政而唱出的歌。与其去数走过的脚印，不如去寻觅前进的路标。

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庄子·庚桑楚》）

短小的沟渠，巨鱼没有地方转动它的身体，鲵鳅却能在那里曲折回旋；低矮的丘陵，巨兽没有地方隐藏它的躯体，妖狐在那里却十分适宜。一个人再有才华，没有适宜的时机和环境，

他无异于一堆废物。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机遇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

虽然有智慧，但不如适应形势；虽然有锄头，但不如等待农时。智慧、工具、时机，对于事业的成功，是缺一不可的。

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

能吞食船只的大鱼，一旦处在陆地上，还敌不过蝼蛄和蚂蚁。不给人以施展才华的时机和环境，就如同扼杀他的前程和生命。

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吕氏春秋·召类》）

圣人不能创造时势，但能够使所做的事适应时势。做事情能适应时势的人，取得的功绩就大。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潮流，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鱼欲异群鱼，舍水跃岸即死；虎欲异群虎，舍山入市即擒。（《关尹子·三极》）

鱼想同群鱼有所区别，离开水跳上岸马上就死；虎想同群虎有所区别，离开山进入闹市就被捉。人和物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没有它就会灭亡，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现实。我们必须首先适应它，才能最终驾驭它。

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史记·淮阴侯列传》）

功业难于成功而易于失败。时光难于得到而易于丧失。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重做一次的可能，唯有时间一去不返。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史记·佞幸传》）

勤于耕田不如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善于做官不如遇到能赏识自己的人。极言机遇之重要，虽然不能不说失之于偏颇，但也不失为一条发人深省的警语。

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淮南子·说林训》）

伟人不以一尺长的玉璧为贵重，而珍惜极短的光阴，这是因为光阴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宁失瑰宝，不失寸阴，古人是早已深晓有时间就能有财富之真谛的。

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淮南子·说山训》）

那些说没有时间学习的人，即使有空闲也不会学习。时间是客观存在，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埋怨没有时间，恐怕还是没有去挤时间，或者是没有把学习摆在重要位置。

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刘向《说苑·建本》）

鱼借着水游动，鸟借着风飞翔，草木在一定的季节生长。此句比喻事业的成功一定要利用有利的条件和时机。

见机不遂者陨功。（桓宽《盐铁论·击之》）

遇到时机而不进取，就不能成就功业。

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后汉书·隗嚣传》）

神龙失去了施展威势的条件，同蚯蚓没有两样。

鸾凤食粒于庭，则受辱于鸡鹜也。（葛洪《抱朴子·博喻》）

鸾凤在庭院中吃细小的食物，就要受鸡和鸭的欺侮。

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晋书·陶侃传》）

大禹这样的圣贤，还珍惜每寸光阴；至于普通的人们，就更应当珍惜一分一秒了。（肖星）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用"高"、"迥"形容"天"、"地"，让人感觉空间无限辽阔，非想象能及。作者直抒胸臆，以无穷宇宙喻己所怀远大抱负，给人以宏廓豁达、奋争不已的强烈印象。（吕晓庄）

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李白《惜馀春赋》）

恨不得在青天上挂条长绳，系住那向西飞驰的白日！表达了作者对时光飞逝的焦虑，蕴含着作者对事业急切而执著的追求。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

天地是万物的旅舍，时光是百代的过客。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作者以精妙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唯物主义的时空观。（肖星）

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

龙门，地名，黄河至此，水险不通，鱼鳖之类不能上，上则为龙矣，故名。由此，喻一个人一旦得有力者的援引，则声誉大增，虽然他还是原先的他。（张增兰）

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时。（韩愈《闵己赋》）

君子有失掉好的机遇的厄运，小人有碰到得意的时机的侥幸。"历史的机缘，会使微不足道的小丑成了主宰世界的英雄。"（马克思语）所以，对于人生的浮沉，有时不必斤斤计较。

贤者之处世，皆以得时为至难。（苏轼《贺吴副枢启》）

仁人志士在人生的道路上，能获得适当的时机是最难的。一个正直而有才华的人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往往还要取决于政治是否清明。时机，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和机会的问题，它关系到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

时未至而为之，谓之躁；时至而不为之，谓之陋。（刘基《郁离子·井田可复）

时机未到就去做，这叫急躁；时机已经到了却不去做，这叫愚陋。

少不勤苦，老必艰辛。（林逋《省心录》）

少年时不勤奋，不吃苦，年老时便一定艰辛。少年时期体魄强健，精力充沛，却虚度一刻千金的大好时光，等到两鬓苍苍，双目昏昏，想干点事情时，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前

人对生活的切身体验，后人当永远牢记。 （肖 星）

五、祸 福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

好事做得多的人家，必然会享有很多的福禄；坏事做得多的人家，必然会遭受无穷的灾祸。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

万物没有平而不坡的，没有往而不返的。人生道路不会是一马平川，也不会总是荆棘丛生。坎坷的历程预示着坦途将至，坦途之后又会有新的坎坷。

临祸忘忧，忧必及之。（《左传·庄公二十年》）

面临灾祸而不知忧虑，忧虑必然来到面前。

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不讲道德而积聚邪恶，是最大的灾祸。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庄子·则阳》）

安和危相互变换，祸和福相互转化。

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

智慧不用在为公上，就会使福运一天天减少，灾祸一天天增多。把聪明才智用在谋取私利，会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长远来看，谋私和积怨往往是同步，私利的增长也就意味着灾祸的临近。

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韩诗外传》卷一）

利是害的根本而福是祸的先导。

（肖 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困苦危极之时，心灵受创，心理失衡，喊一声苍天，呼一声父母是人的本性。正所谓反朴则归真，“人穷则反本”。作者用对仗的手法，惟妙惟肖地描述了危难中人的心理活动，读之令人心悦诚服。 （范 阳）

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刘向《说苑·说丛》）

灾害总是由于一时的疏忽，祸事总是起于细微的小地方。“千里长堤，溃于一穴”，千万不要对看似无关大局的隐患掉以轻心。 （周季平）

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

福的根本产生于忧患，而祸开始于欢乐。

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汉书·枚乘》）

福的产生有它的缘由，祸的出现有它的根源，总结产生福的缘由、铲除出现祸的根源，祸从何而来呢？人生需要不断地反思，才能驱灾避祸。

惟不求利者为无害，惟不求福者

为无祸。(《淮南子·诠言训》)

只有不贪求利的人才会无害，只有不贪求福的人才会无祸。

善游者溺，善骑者堕。(《淮南子·原道训》)

善于游泳的人往往被水所淹，善于骑马的人往往从马上掉下来。不幸往往在自己擅长的方面产生，命运往往是这样捉弄人的。

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刘向《说苑·敬慎》)

福产生于穷愁忧困之中，祸产生于春风得意之时。患难之中不气馁，得意之时不狂妄，这样就能驾驭人生祸福转换的命运。

象以齿焚身，蚌以珠剖体。(王符《潜夫论·遏利》)

大象因为它的牙齿而丧失生命，蚌因为体内长有宝珠而被剖开身体。两句比喻因为贪利或积财而遭致祸殃。

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汉书·司马相如传下》)

灾祸本来多隐藏在细微之处，发生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由小事酿成大祸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而人们容易忽视的，恰恰是这些小事。

福不虚至，祸不易来。(陶渊明《命子》)

福不会白白得来，祸也不会轻易到来。幸福要靠艰苦奋斗才能获得。

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刘禹锡《天论·上篇》)

福是由做好事换来的，祸是干坏事召致的。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安乐有致死之道，忧患为养生之本。(林逋《省心录》)

安乐有招致丧生的途径，忧患则是调养身心的根本。人们往往认为安乐就是幸福，忧患就是痛苦，读一读这句话，恐怕对人生的祸福观该有新的启示吧。

大害必有小利为之媒，大利必有小害为之倪。(庄元辰《叔苴子内篇》卷一)

大的祸害一定会有微小的好处替它作媒介，大的好处一定会有微小的祸害替它作先导。有利未必无祸，无利未必有害，不要因为贪图小利而铸成大祸，也不要因为避免一切灾祸而放弃争取幸福的可能。

幸人之有者害，居人之功者败，无实而享显名者殆。(魏源《默觚下·治篇十六》)

企求原来是他人所有的东西将招害，占有他人的功劳要失败，没有功绩而享有美名有危险。

不幸福，斯无祸，不患得，斯无失；不求荣，斯无辱；不干誉，斯无毁。(魏源《默觚下·治篇十六》)

不希求福运，就没有灾祸；不担心得到，就不会丢失；不企冀荣华，就没有耻辱；不追求美誉，就不会有诋毁。人生在世，完全不必有奢望。奢望往往是一种包袱，想得到许多许多，

反而会失去许多许多。 （肖　星）

人　才

一、论　才

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战国策·赵策三》）

人们之所以敬重天下的贤士，是因为他们能为人排除灾祸，消除危难、调解纷乱，却一点报酬也不索取。

凡知之贵，贵知化也。（《吕氏春秋·知化》）

智慧的可贵，贵在了解事物的变化。国家的强盛，不能没有知识。要有知识，必须要有一批掌握知识的人才。

得贤则昌，失贤则亡。（《韩诗外传》卷五第十九章）

得到贤才，国家就昌盛；失掉贤才，国家就衰亡。古人已经把是否拥有贤才提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我们对于贤才的重要性还要怀疑吗？

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有才能的人在社会上，就象锥子在口袋里，他的锋芒立刻会显露出来。真有才干的人不会永远默默无闻，总有一天会崭露头角。

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扬雄《解嘲》）

国家拥有人才就富强，失去人才就贫弱。

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产于蜃蛤。（王符《潜夫论·论荣》）

和氏之璧，是从璞石中发掘出来的；隋氏之珠，是生长在蜃蛤中的。比喻优秀的人才往往出自平常人之中。

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王符《潜夫论·思贤》）

身体患病有待良医治愈，国家昏乱需要贤才治理。国家对于人才的渴求如同病人对于医生的渴求，比喻十分生动而精当。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我有了孔明，就象鱼有了水一样。刘备思贤若渴，三顾茅庐而得诸葛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视人才，善用人才的范例。

黄金累千，不如一贤。（《意林》引《傅子》）

黄金积累到千两，不如得到一个贤才。有了贤才，治国兴邦便有希望，

又何愁钱财？

士，理之本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

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

国之强弱，不在甲兵，不在金谷，独在人才之多少。（张孝祥《论用才之路欲广札子》）

国家的强弱，不在有多少军队，也不在钱粮是否充足，而在于人才的多少。没有人才，军队钱粮会得而复失。有了人才，没有军队和钱粮，会逐步创建和积累，把人才的重要性置于军队钱粮之上，是颇有远见的。

民政之难，不惟其力而惟其才。（苏辙《黄好谦知濮州》）

为民行政的难处，不在精力是否充沛而在于是否具备人才。

玉在山辉，珠存川媚。（陆九渊《祭吕伯恭文》）

有美玉在，高山也辉煌壮丽；有珍珠在，大川也妩媚动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如果有了出色的人才，那么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也会治理得格外出色。

不难于得方而难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魏源《默觚下·治篇四》）

得到治病的药方并不难，难的是得到会用药方治病的医生；制定法律并不难，难的是得到能准确贯彻法律的人。　（肖　星）

多才之士才储八斗，博学之儒学富五车。（程允升《幼学琼林·文事》）

谢灵运曾经说过：全天下的文才有一石，而曹植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所以后人称才能智力高超的人为才储八斗。古代的书为竹简，要用车载。《庄子》中说：惠施的方术多，他的书有五车。杜甫也说："男儿须读五车书。"所以后人称读书多、学问大的人为学富五车。这都是富有形象的比喻。

（牛贵琥）

二、识　才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

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一下；大家都喜欢他，也要考察一下。识别人才不能搞简单化，人云亦云。不注重调查分析，只会贤愚不辨，是非不分。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论语·卫灵公》）

应该与他说话而不说是失人；不应该和他说话而说了是说了不该说的话，该合理使用的人才不大胆起用则不能发挥其积极性，于事无益。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论语·卫灵公》）

君子不根据其言辞而举荐他，也不根据其言辞而废弃他。任用人才不能只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察其行，这样才能选拔出过硬的人才。（乐　妮）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四十五章）

最正直的人表面上好象在迂就，最灵巧的人表面上好象很笨拙，最善

辩的人表面上好象出言迟钝。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真正表现一个人正直的品格、卓越的才华，而在平时则不露其庐山真面目。

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墨子·亲士》）

好的弓很难拉满，但用它射箭能够达到很高的地方和深深地射进目标；千里马很难驾驭，但用它可以负载重物并行程遥远；优秀的人才很难驯服，但他却能为君主赢得尊严。

优秀人才往往有独立见解，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庸人俗子往往言听计从，附势趋上，前者能成就大业，后者则败事有余。这两种人到底起用谁，能检验出识才的水平。"欲知其君，观其所使"（《三国志·吴志·张温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肖 星）

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庄子·徐无鬼》）

从古至今，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能说会道、鼓弄唇舌者不乏其人，但他们未必是忠贤之士，这和良犬不一定是狂吠不已是同样的道理。要做到不为表面现象（如"善吠"、"善言"）所迷惑，确实不大容易。（杨 文）

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荀子·解蔽》）

发现贤人叫作明，辅助贤人叫作能。能够发现贤人和辅助贤人的人，本身也无愧于"贤人"的称号。

（肖 星）

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吕氏春秋·不苟论·赞能》）

伯乐善于相马，欧冶长于铸剑，而圣人则更有经天纬地的方略。所以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得到十方宝剑，不如得到一个欧冶；得到千里沃土，不如得到一个圣人。全句三个子句，于排比中把得马、得剑、得地与得人反复进行比较，突出了得人重于得物。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史记·商君列传》引古语）

春秋时，周容立于赵简子门下三日三夜，愿为"谔谔之臣"。周容死，赵简子泪眼重复周容言：千只羊的全皮，还不如狐狸的一块腋皮；上千人唯唯诺诺，又怎及一个直谏之士的抗诤！为什么？"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有为之君是深知此道的。（姜剑云）

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史记·滑稽列传》）

观察一匹马，往往因为表面上瘦弱而不认为它是千里马；评价一个人，往往因为贫而不认为他是有识之士。趋炎附势、嫌贫爱富是人性的一种弱点。不克服这种弱点，就不能识别真正的人才。

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汉书·武帝纪》）

那些狂奔乱跳的马往往能日行千里，那些受到世俗讥讽的人却常常能

建立功名。 （肖　星）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在司马相如看来，人是首要的，有了非常之人，才能做出非常之事，立下非常之功。同《汉书·求茂材异等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意思一样。关键是需要有识别“非常之人”的伯乐。 （孙安邦）

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汉·王符《潜夫论》）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冯衍传》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这句话运用比喻，是说即使是很小很小的地方，也会像有茂盛的青草一样，有忠诚守信的俊士。强调了处处都有人才，要人们善于发现并使用人才。 （安　笈）

金玉不琢，美玉不画。（桓宽《盐铁论·殊路》）

珍贵的玉石，不需要雕琢；完美的珠宝，不必再描画。靠真才实学立足于世的人才算得上人才，靠别人吹捧而名噪一时的人往往是庸才。

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诸葛亮《便宜十六策·阴察》）

洗涤并非一定在江河，重要的是能够去掉污垢；马并非一定要骐骥，重要的是能够跑得快。识别人才，重要的是看他是否真有才学，而不要贪图虚名。

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性。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才。（刘劭《人物志·接识》）

一流水平的人，能识别一流水平的才智。二流水平的人，能识别二流水平的美好。具备多种层次的水平，也就能识别各种人才。要想识别出人才首先要做到自己有才，有了多方面的才干就能发现各种类型的人才。

华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浅短所识。（葛洪《抱朴子·擢才》）

华美的诗章不为盲者所欣赏，英俊的才子不被浅薄的人所赏识。识别人才的人，首先自己要具备相当的才干，否则识别人才就是空话。

白石似玉，奸佞似贤。（葛洪《抱朴子·祛惑》）

白色的石头看起来象玉，奸佞小人看起来象贤人。识别人才不要被事物的外表所迷惑，要善于看透内在本质。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杂说四》）

世上有了（识马的）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韩愈写了《杂说四》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寄寓了对自己遭遇的满腔不平。

呐呐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朴忤逆者未必悖，承顺惬可者未必忠。（陆贽《陆宣公奏议》）

说话迟钝，寡言少语的人不一定愚笨，喋喋不休，伶牙利口的人不一定聪智；粗鄙直朴、背逆己意的人不

一定就错，承顺谄媚、满足己意的人不一定就忠诚。此条阐述了这样两层意思：第一，识别人才不能只看表象，善于抓住本质才能得到人才。第二，识别人才需有心胸，出以公心，顾全大局才能发现真正的人才。（乐 妮）

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人才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识别他是否真有能力。识别人才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践。杜甫《寄秋明府博济》云："时危始识不世才"。所以，要认准一个人才，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观察。

三、选 才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不正派的人之上，百姓就心服了；把不正派的人提拔上来，放在正直人之上，老百姓就不会服从了。是否举贤，关系到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又决定着国家的兴亡。

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管子·立政九败解》）

如果走门路，通关系来任用举荐人才的主张盛行，那么用人的标准就不正了。

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

能用权势求得官职，用贿赂得到爵位，国家也就要灭亡了。这样的话恐怕不是危言耸听吧，现代人是否都从这个高度来认识问题了呢？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宰相必须从基层官吏中逐步提拔上来，猛将必须在军队的基层当过士兵。强调高级的文官武将应该从基层有实际经验的人中提升。

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礼记·儒行》）

推举人才，对内不避开亲属，对外不避开仇家。《韩非子·说疑》中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同这句说的是一样的意思。以客观实际为标准，而不从个人恩怨出发，这需要极其宽广的胸怀和坚定的求实精神。

良辅超拔于际会。（王充《论衡·偶会》）

杰出的人才，往往在偶然时机破格提拔起来。

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王符《潜夫论·考绩》）

了解贤才的捷径，莫过于考察其功绩。如真愿走这捷径，选拔人才并非难事。可有的偏偏喜欢绕道而行，节外生枝，得不偿失。

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考于效验。（王符《潜夫论·交际》）

评定人才要根据他的志趣、言行；批评与表扬，均要以事实作验证。

非有独见之明，专任众人之誉，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获大贤哉。（徐干《中论·审大经》）

选拔人才，如果自己没有敏锐的目光，专门任用众人称赞的人，自己又不去考察，并且不以具体的事实加以考核，那么从哪里能得到杰出的人

才呢？众人交口称赞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人才，所以选拔人才，须独具慧眼，并全面考察。

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汉书·文帝纪》）

古代荐举贤良，通过陈述来听取他的言辞，通过实践来考察他的能力。通过实际考察来选拔人才，是唯一科学的选才方法。

苟得其人，虽仇必举；苟非其人，虽亲不授。（《三国志·蜀书·许靖传》）

如果得到贤人，虽是仇人也一定要荐举，如果不是贤人，即使亲人也不授予其职位。

火以吹爇生焰，镜以莹拂成鉴。（《刘子·因显》）

火因为吹风助燃而产生光焰，铜镜因为打磨拭灰而能照人。比喻贤才必须有人举荐才会发挥作用。

峻极之山，非一石所成；凌云之榭，非一木所构。（《刘子·荐贤》）

绝高的大山，不是一块石头垒成的；参天的台榭，不是一根木头建成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仅仅能举荐一个两个人才是不够的，而是要举荐一个人才群。

见贤举之如不逮。（武则天《臣轨上》）

发现贤人，唯恐来不及举荐。

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柳宗元《道论》）

如果尊贵的人是愚蠢的，卑贱的人有道德和才能，因此而让卑贱的人继承位子，那正是治理天下的最大的根本。权力不摘世袭，不囿门阀，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是治国的根本，也是治国的难题。

举人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资治通鉴·晋元帝太兴元年》）

举荐人才不出世代官宦家族的范围，施行法治又不涉及权贵，所以人才不能有益于国家，邪恶也得不到惩治。

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张居正《翰林为师相高公六十寿序》）

如果是个贤才，即使是自己的仇人，也一定举荐，并不因为其人以前曾对自己有过好处，而怕人说这是报答对方；如果是个没有才能的人，即使是亲近之人，也一定排斥，并不因为其人以前曾得罪过自己，而怕人说这是报复对方。（肖　星）

四、用　才

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尚书·大禹谟》）

任用贤能不要怀疑，除去奸邪不要犹豫。任用贤能，却又三心二意，贤能势必不能发挥其才华。

不以一眚掩大德。（《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不以一点过失而掩没大的功绩。《孔丛子·居卫》中有这样一句话："以二卵焉弃干城之将"，说的是战国时卫国有人名叫苟变，具备大将之才，作小吏时曾吃过人家两个鸡蛋，卫君因而不同意起用他。孔子之孙孔伋说，战乱之际，正是用人之时，怎么能因为两个鸡蛋而放弃一个护国的将领呢？力劝卫君不可因小过而失大才。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不以一眚掩大德"的道理。

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楚国虽然有人才，然而使用他们的是晋国。今有成语"楚材晋用"源于此。声子出使晋国后回到楚国，令尹子木问他晋、楚两国的大夫谁更贤明，声子说了这句话，说明本国的人才，因为没人使用，而流入他国。

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也。（《九歌·礼魂》洪兴祖补注引古语）

春天的兰花和秋天的菊花，都是它们各自所处季节最美丽的花。用"春兰秋菊"来比喻各种人才各有所长，各有其用，正如苏轼所说"各尽其能，各效其力"。（《策略第二》）

世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屈原《卜居》）

世道混浊不清：蝉的翅膀被看作重的，千钧的重量却被看为轻的；金子铸成的钟被毁弃，瓦烧的锅却能响得如雷鸣一般。比喻贤愚不辨，小人得志贤才失意的社会弊政。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有才能的人就提拔他，无才能的人就罢免他。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就反对"终身制"了。《墨子·尚贤》中还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些论述，至今仍是熠熠闪光的。

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荀子·五霸》）

任用一人得当，就能夺取天下；任用一人失当，就会危及国家。历史上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都由卑下的地位跃居帝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当一人"。　（肖　星）

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二》）

唯贤是任，历来为富民强国之举。但有贤而不知，知而不能用，纵用了又不任之以事，诸如此类，皆为社稷存亡的不祥之兆。此者非昏君而何？历史上楚王对屈原一再疏远流放、用而不任以致兵败国破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姜剑云）

待士不敬，举士不信，则善士不往焉。（尸佼《尸子》卷上）

对待人才，轻慢失礼，举荐人才又不加以信任，是不能得到杰出人才的。只有尊重贤才，才能得到贤才。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终于以诚挚之心感动了诸葛亮，得到了这位旷世之才。若不尊重贤才，只能适得其反，给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

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史记·淮阴侯列传》）

百里奚居住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居住在秦国秦却成就霸业，不是他在虞国愚笨而在秦国聪明，而是用与不用，听与不听的区别。有识之士的才华就象种子需要土壤一样，需要理解、信任和支持。

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桓宽《盐铁论·刺复》）

任用有才能的人，只需督促他们办成事情而不劳心力；任用亲信的人，贻误公事，毫无效果。《韩非子·扬权》中有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

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善者不疵细瑕。（《汉书·陈汤传》）

评论有大功的人不必计较小的错误，举荐有大善的人不必挑剔小的过失。

非成业难，得贤难；非得贤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任之难。（《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注引《会稽典录》）

不是功业难成，而是贤才难得；不是贤才难得，而是贤才难用；不是贤才难用，而是难以信任。信任人才，是合理使用人才的前提；使用人才，又是造就人才的关键。

忘其前愆，取其后效。（《三国志·吴书·吴王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忘记他以前的过失，看重他后来的成绩。录用人才，重在现实表现。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

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

讲话不符合实际的人，不可重用。三国中的马谡，才器过人，却华而不实。刘备临终前曾告诫诸葛亮，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看重马谡的才干，并不以为然，最终导致失街亭挥泪斩马谡的悲剧。

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晋公·王猛传》）

没有一个罪犯不受到惩罚，没有一个人才不得到任用。

朽索充羁，不收奔马之逸；轻缗振网，或随吞舟之势。（王勃《上刘右相书》）

腐朽的绳索充当缰绳，收不住奔马的放纵，细软的绳子控制罗网，只能跟随着大鱼走。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李世民语）

任用人才，如同使用器具，扬长弃短，量才而用。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就应该懂得集中所有人的长处，来治理国家，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的一个明君，当有人说天下没有奇才时他驳斥道："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 （肖　星）

自古英达未必尽用于当年。（李白《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

这是大诗人李白发自肺腑的呼声。权十一也是不被重用的人；李白同金陵诸贤相送，自然有此感叹。沧桑变化，自古而今，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材。但愿今日“英达”之士都能人尽其材，有所作为。嫉贤妒能者可否引以为戒？（孙安邦）

网开三面，危疑者许以自新；耳达四聪，瑕累者期于录用。（刘禹锡《贺赦表》）

网要打开三面，允许自危自疑的人自己改过；耳要听清四方，为小缺点所累的人能被起用。

大木为杗，细木为桷。（韩愈《进学解》）

粗大的木头当梁柱，细小的木头做椽子。就象盖一所房子，面前放着各种各样的材料，通过能工巧匠的安排，让它们各得其所，漂亮的建筑才能拔地而起。用人也是如此，“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二十四》）“人各有能，因艺授任”。（《后汉书·张衡传》）要求一个人样样事情都能胜任是脱离实际的。“一身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韩愈《圬者王承福传》）

以烦手烹鱼则鱼必溃；使学者制锦则锦必伤。（苏辙《王荀龙知澶州李孝纯知棣州》）

快速弹奏的乐手去烧鱼，鱼必定会捣烂，满腹经论的学者去织锦，锦必定会损坏。（肖　星）

木屑竹头，皆为有用之物；牛溲马渤，可备药物之资。（程允升《幼学琼林·人事》）

木屑竹头，牛溲马渤，往往被视若草芥，随意抛弃。但如果使用得当，那么它们或者会发光发热，造福人类；或者能为药止血，救人膏肓。两句对仗，寓意相同：必须爱惜人力和物力，细大不捐；充分发挥事物各自的特长，物尽其用。（姜剑云）

五、育　才

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权修》）

种一次可以有十次收获的，那就是栽种树木了；而种一次有一百次收获的，那就是培养人才了。从长远的目标看问题，智力投资决不象那些鼠目寸光的人认为的那样是赔本的生意。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

一年之计，没有比种植谷物更好的了；十年之计，没有比种树更好的了；百年大计，没有比培养人更重要的了。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

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教育他，是第三种快乐。孟子的第一种快乐为“父母具存，兄弟无故”，第二种快乐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此句就是第三种快乐。

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韩非子·显学》）

管教严厉的家里没有凶暴的奴仆，而慈爱的母亲却会有不成才的儿

子。宠爱和放纵，是培养不出人才的。

弓待檠，而后能调；剑待砥，而后能利。（《淮南子·修务训》）

弓辅正之后才能调试；剑磨了之后才能锋利。比喻人才经过训练和培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土之美者善养禾，君之明者善养士。（《汉书·李寻传》）

肥沃的土地，能长出好庄稼；贤明的君王善于培养人才。凡是知道爱惜人才的人，都懂得培养人才。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韩愈《答李翊书》）

根茂盛结的果实就饱满，肪膏肥润才会光明焕发。两句比喻培育人才必须从根本上着手。

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

善于治国的人没有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了，而育才的方法没有比劝导学习更重要的。此条强调了培育人才的重要性，而培育人才又要从劝学开始。

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资治通鉴·汉纪》）

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要得到人才，就象不雕琢玉石却想让它有美丽的花纹一样。教育的发达与否，决定着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要求得人才，必须要加强教育。

木有所养，则根本固而枝叶茂，栋梁之材成；水有所养，则泉源壮而流派长，灌溉之利溥。（林逋《省心录》）

树木有所培育，那么它就会根底牢固、枝叶茂盛，栋梁之材就会长成；水有所贮存，那么它就会泉眼粗大，源远流长，灌溉之利就会广大。比喻对人才不要光使用，还要注意爱护和培养。

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张居正《论时政疏》）

人才，就象是木材，培养他贵在持之以恒，使用他贵在用其所长。这里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才培养的长期性。

鞭笞之下，有贤士乎？（方孝孺《逊志斋集·杂问》）

皮鞭抽打之下，会产生贤人吗？培养人才须注意方法，广开言路，政治民主，才会贤人辈出。　　（钱　宁）

学　习

一、论　学

学，殖也；不学将落。（《左传·昭公十八年》）

学习，就好象树木的生长，不学习就会象草木凋零一样，才智衰退。树木的生长，是一个不断吸收营养的过程，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有所长进。

人之有学也，犹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国语·晋语》）

人有了知识，就象树木有了枝叶，树木有了枝叶，就能为人庇荫，君子之学，不就是这样吗？人能否生存当然并不取决于知识的有无，但一个人的价值却与此密切相关。古人尚且如此重视知识对人的价值的作用，那么，在现代文明社会，这一问题便显得更为重要。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学习，首先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而来不得半点虚假。不懂装懂，实在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肖　星）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载子夏语）

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孔儒积极入世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只是"仕"为起点，"仕"亦归宿，封建仕进色彩浓了点。但假如推陈出新，别解其"仕"为"工作"之类，那"学习"与"工作"等的相辅相补关系也就不辨自明了。（姜剑云）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知识却是无边的。庄周看到了人类生命之有限与客观万物之无限这一永恒的矛盾，因而发出了慨叹。不过，这也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能为所学到的一点一滴而沾沾自喜。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

我曾整天整天地苦思冥想，但是所得到的东西，却不如在短短时间里所学到的东西。思考，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在还没学好基础知识之前，就好高骛远，每天不着边际地乱想，这样的"思考"，不但无益，反而是有害的。（钱　宁）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

人之不学，如玉之不琢，无论人

之初始善恶如何，都需学习，不学就不可能懂得礼节，不学就不可能懂得做事的方法，不学就不可能懂得世间诸事的原理。明确地阐述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道”字，用得最为绝妙。（范　阳）

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王充《论衡·量知篇》）

人不学习，就好象谷还没有碾成米，米还没有做成饭一样。

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王充《论衡·谢短》）

只了解今天而不知晓古代，这就叫作目盲。生理上双目失明的人，我们称之为盲人，而在学识上，也同样会有一些盲人的。一个不深刻地了解历史的人，又如何能清醒地认识现实呢？

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王充《论衡·实知》）

不学习就能通晓万物，不询问就能无所不知，古往今来，还没有这样的人。王充的思想里，很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上面这段话就能反映出他对儒学“生而知之”观点的批判精神。（肖　星）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刘向《说苑·建本》）

日中：中午。炳烛：燃烛照明。晋平公问师旷：自己想学习，但年已老了，怎么办？师旷便用这段话回答。他指出少年、中年如果好学固然很好，就象早晨初出的太阳鲜明无比、中午的太阳充分发光发热一样。但到了老年如果还能好学，就象在夜里点燃蜡烛，比在黑暗中摸索行走要好得多。形象地表明了学习是一辈子的事，要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王符《潜夫论·赞学》）

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在于能够积累知识，不断增进智慧。王符的这段话先从人为天地间最可贵者讲起，而人类中的精英崇尚德义、能成就德义的是智慧、求得智慧的途径在于学问。步步进逼，层层剥出，从而证明学问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东西，极能激发起人们学习的信心。（牛贵琥）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诸葛亮《诫子书》）

才干需要学习的辅翼，不学习，才干就不会增长。诸葛亮是一位以足智多谋、神机妙算而著称的历史人物，这样才智超群的人物也仍然强调学习的重要。实际上，诸葛亮的才智正是由于他善于学习的结果。

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号勤而无获矣。（葛洪《抱朴子·勖学》）

不学习而想有知识，就如想捕鱼而没有渔网，即使心情迫切，也不会有收获。人的知识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不学习，就不可能有知识。美好的愿望是不能代替刻苦的努力的。

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学习就好比是在种树，春天里开花，到秋天就结出果实来了。颜之推将学习比作种树，是在告诫后辈，在学习上，不要急于功利，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应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以求得长远的发展。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积累财富再多，也不如好好读书。这里是说，读书学来的知识，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而且，这种财富是丢不了，抢不走的。

积学似储宝，酌理以富才。（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积累学问就如同是在积蓄财宝，用明辨事理来丰富自己的才能。刘勰将学习比作“储宝”有多方面的含义：其一，知识即是宝，要珍惜知识的价值；其二，广博的知识要一点一滴地积累，通过艰苦学习才能真正获得。

学之染人，甚于丹青。（《太平御览·劝学篇》）

学习对人的熏染，比色彩对图画的涂抹更为重要和明显。

人不学便老而衰。（《近思录》卷二程颐语）

人不学习就要衰老。人不但有肉体上的衰老，而且还有精神上的衰老。保持生命的活力，可以通过运动；而保持精神的活力，就必须依靠不断地学习、思考。

外物之味，久之则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程颐《二程语录》）

其它东西的味道，时间长了就会令人感到厌恶，而好书的味道，却是愈读愈觉得醇厚。读书，特别是读好书，往往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而且读得越多，钻得越深，乐趣也就越大。

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彭端淑《为学一首示子侄》）

聪明和敏捷，能够依靠但却不可以依靠，自以为聪明而不刻苦学习的人，是自取失败。愚笨和平庸，可以制人，但却不一定能够限制人，不甘于昏愚和平庸而不知疲倦地学习的人，就是自强不息的人。这段话，是从作者讲的一个寓言故事里发挥出来的。那个寓言故事说，蜀地有二僧，一贫一富，都想去南海。富者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去买船，作准备工作，还未动身，贫者已凭一瓶一钵而自南海归来了。作者由此阐发了在学习上，一个人的聪明与昏愚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的哲理。（钱　宁）

二、勤　学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淇奥》）

象加工骨器那样精雕细刻，象加工玉石那样慢打细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时，首先需要自己琢磨，同时还需要同学之间的相互研讨。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

学习就如同是在追赶什么似的，就怕追不上而失去了什么。学习要有

一种紧迫感，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万万不能把今天的事情推到明天，以为自己年纪轻，来日方长，到头来，则后悔莫及。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

每天都能知道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东西，每月都能记住过去已经学到的知识，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上》)

天下虽然有非常容易生长的东西，但暴晒它一天，再冻上它十天，它也不可能生长起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心，否则，一暴十寒，即使是再容易的事情也不会成功。持之以恒的韧性，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

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不专心致志，就不能有所收获。孟子在文章中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是有两个人一同学下棋，一个人专心致志，棋艺进步很快；而另一个人老望着窗外，幻想着鸿鹄将至，拉弓射之，最后，棋艺无所提高。所以说，学习成绩的好坏，并不完全决定于一个人的智商高低，而且还要看他是否认真、勤奋。

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

学习不能停止。靛青，是从蓼蓝等草中提炼出来的，但颜色却比蓼蓝更深。冰，是水冻结成的，但它却比水更冷。两个生动的比喻，说明学无止境，学生不但要虚心向老师学习，而且将来要有勇气超过老师。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

好马一跃，不过也只有十步之远；而坏马跑上十天，也能行上千里，这是因为持之以恒。雕刻的人，如果半途而废，就是腐朽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不停地刻，即使金石也可以雕刻成功。学习、做事也是这样，坚持不懈，才能有所成就。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礼记·中庸》)

有什么没学过的就赶紧学，学了还不会，也不要轻易放弃；有什么没问到的就赶紧问，问了还不懂，也不要轻易丢下；有什么没想过的就赶紧想，想了还不通，也不要轻易扔掉；有什么没有辨明的就赶紧辨明，研讨了还不明白，也不要轻易就此罢休；有什么没有实践过的就赶紧去试试，行动起来还不够坚定，也不要轻易改变，别人一次能做到的，自己就做一百次；别人十次能做到的，自己就做一千次。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

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

学习之后，方知自己知识的贫乏，教授之后，方知许多疑难问题尚未弄清。知道自己知识贫乏之后，才能使自己反过来很好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还有许多疑难问题尚未弄清之后，才能自强不息，努力进取。自满，往往并不是因为知识的渊博，而恰恰是知识贫乏的表现。

夙兴以求，夜寐以思。（《汉书·武帝论》）

早上起来就去钻研，晚上睡觉时仍在思考。这两句话由《诗经·氓》"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点化而成。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后汉书·张衡列传》张衡语）

人生就在于勤奋，不探索怎能有所收获呢？张衡，东汉天文学家、文学家。作为科学家，他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推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作为文学家，他的《二京赋》、《四愁诗》在文学发展史上，都很有地位。他的一生之所以会有如此可观的成就，关键就在这个"勤"字上。（肖　星）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

余：多余的时间。三国时董遇的学生诉说苦于没有学习的时间。董遇用三余来回答。冬天农闲时以及下雨天、夜里，都可以利用来学习。他说明了一个道理：时间只要挤，总还是有的。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的人能够利用一切空隙，而强调工作繁忙只不过是懒汉的借口。（牛贵琥）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进学解》）

学业精通在于勤奋，贪图玩乐就会荒废；做事成功在于认真思索，因循随俗就会失败。

君子之学，死而后已。（顾炎武《与人书》六）

一个人的学习，只有到死才会停止。（肖　星）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自小，即自卑。人学习的时候，不可以自卑，因为自卑就会丧失自信，失去奋斗的动力。但又不可自大，因为自大就会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故步自封。须知虚心不是自卑，自信不是自大。因此自小是小，自大也是小，同样不能进步。（牛贵琥）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事业，具有大学问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三种境界：一夜秋风，碧树零落，一人独自登上高楼，眺望尽纵横交错的道路，这是第一种境界；被思念所折磨，人瘦衣宽，面容憔悴，而终不后悔，这是第二种境界，在人群中四处寻找那个

人，都找不见，突然一回头，却发现那人就在不远的灯光昏暗处，这就是第三种境界。王国维所说的第一种境界，实际上是指一个人如果想在学术研究中有所突破，首先需要博览群书，汲收掌握前人研究的成果，从而找到自己突破的方向。第二种境界，是指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要坚持独立思考，锲而不舍，不为一时的困难所吓倒。第三种境界，是指在苦思冥想之后，灵感之光就会突然闪现，创造性的思维往往是对辛勤的酬答。王国维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于此深有体会，所以他能巧妙地借用三位诗人的诗句，把三种境界生动地表现出来。（钱　宁）

三、善　学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学习，而且经常温习一下，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重复，是知识的母亲”，只有经常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才能打下坚实的学习基础。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在温习旧知识的同时，能推知新的知识，就可以当老师了。温故知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能“举一反三”，这是在学习中不可缺少的主动方式。学习切忌死记硬背，而应当勇于思考，勤于探索。“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教训，千万要牢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三人之中，一定会有我的老师。选择最好的为学习榜样，对其中不好的引以为戒。人各有所长，博采众家之说，独立自家之言，才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而盲从，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懈怠而无所得。学习和思考，是知识之车的双轮，缺一不可。

学而不能行，谓之病。（《庄子·让王》）

学习掌握了知识，却不能实行，这就可以称之为“病”。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知”与“行”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历来争论不定。总的来说，知行应当统一，学习和实践不可偏废，学习到的知识只有在实践中进一步掌握，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同时，在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将会激起我们进一步学习的欲望。

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

读书人虽然有学问，但行为却是根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强调“知行合一”，不但墨家如是，儒家也如此．孔子也曾说：“听其言，观其行”。的确，不能行，又焉有真学？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

完全相信《尚书》中记载的东西，还不如没有《尚书》的好。读书，可以使人获得知识，变得聪明，但迷信

书中所说的一切，却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读书，一定需要有一种批判的目光，并要尽可能地将书中的一切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一下。（钱　宁）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荀子·劝学》）

全句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积累知识的重要性。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由量变到质变，从而在学业上有所进展，达到一定境界。原句通过对仗，使语言气势增强，富有说服力。

（宁志荣）

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吕氏春秋·用众》）

善于学习的人，能借取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畅论天下古今之事，于百家九流都有所涉及，而后采撷各家精英所成。上面这段话，实际上就是体现了该书编纂者的宗旨。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

独自学习而没有学习上的朋友，就会变得学识偏颇，见闻不广。学习，即要有闭门苦读，寒窗十年的精神，又要能走出书斋，广交学友。朋友之间在学术问题上的讨论，往往能活跃思维，启发思想，开拓视野。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信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肖　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

首先要广博地学，学的过程中遇到疑难向内行询问。其次对学的知识还要认真地进行思考，有新的发现和收获，在此基础上再辨析清楚真理谬误，有所取舍。最后还要忠实地将其所学的知识落实到行动中去。这就是学习的一般步骤和方法。（牛贵琥）

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

读书读过百遍，其中的意思自然就能领会。好的文章，必须反复阅读。熟读才能理解其中的真谛。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酷爱读书，但对所读之书并不死扣字句，每当对书中含义有所领会之时，便高兴得连饭也忘了吃。今天“读书不求甚解”往往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学习不扎实，但陶渊明的原话，实际上表现出一种对汉儒繁琐经义的厌烦。在今天这样的“知识爆炸”的时代，“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也不失为一种可以借鉴的快速、大量汲取信息的方式，当然，这与陶渊明的原意已经不一样了。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愈《师说》）

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高于学生。西方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学生敬重老师，这是美德；但在学术问题上，也要勇于独立思考，突破老师的成见。同样，作为一个老师，当看到自己的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时，也会感到由衷的高兴。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杂说·送张琥》）

广泛地阅读而精简地吸取，深厚地积累而留有余地地发挥。“博”和“约”、“厚”和“薄”是学习上的两对辨证关系，处理好这两对关系，也就找到了学习的诀窍。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又答王庠书》）

书籍之浩繁，犹如大海，其中百货都有。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吸取，也就是仅仅能得到自己最想学习的那部分罢了。所以，希望有意求学的人，每次都从书中寻求一个方面的知识。苏轼提倡一种“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就是每次读一本书，只注意一个方面的知识，而不是面面俱到。等下次再读时，再注意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获取一本书的真正精华。苏轼知识渊博，强记博闻，就得益于这种读书方法。

学问须时时拈掇，及时时受用。纵无人讲，亦须去寻人讲。（李贽《焚书·答庄纯夫书》）

学问须要不时地思考掂量，而且要常常运用。即使没人可说，也一定要寻找一个人去说说。这里，李贽强调的是学习应注意的三件事：反思、实践和交流。

心中醒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颜元《颜李遗书·存学编》）

心里明白，嘴里能说，纸上可写，但不亲自做一做，都是无用的。颜元的学说，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反对一头钻进故纸堆中，托尽身心性命。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就很能体会到他学说的一些精神。

（肖　星）

学易而好难，行易而力难，耻易而知难。（王夫之《俟解》）

人们似乎有一共性：起步简单，入门尚可，但要炉火纯青、修炼到家，恐非易事一桩。如何化难为易？更高层次的要求是：路子要对，意志要坚，素养要深。不然，觉得学习容易而想学习得好就困难；觉得行动容易而要努力做好就困难；感到羞耻容易而要懂得何为羞耻就困难。　（姜剑云）

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看即过，与我何与也。（郑燮《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

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事，最不中用。虽然眼皮底下看得清清楚楚，但却从心中匆匆滑过，记住的极少，后面的内容往往应接不暇，就如同看戏中的美色，一晃而过，和自己能有什么联系呢？读书一定要注意重思考体味，求精不贪多。不然，即使读破万卷，仍然会无所得益。　（肖　星）

友　谊

一、择　友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战国策·赵策一》）

这是一句流传很广的古语，意思明白易懂。知己，即知音。世上知音难得，所以得一知己，即使为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后句是前句的衬托，使人印象深刻。（杨　文）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

注意他的行为，了解他的经历，观察他的动机。人心怎么能隐蔽呢？人心怎么能不表现呢？朋友在生活中是不能缺少的，朋友的作用，在生活中有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交友一定要谨慎。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十足的恭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对花言巧语感到刺耳，这并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应该善于识别其巧言令色的实质，才能"耻之"。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最初，我对别人，是听到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别人，是听到他的话后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听其言而观其行"，是两千年前孔子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但是，它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看一个人，不是去听他的宣言，而是要观察他的行为。

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管子·权修》）

观察他平时所交往的人，便可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唐代骆宾王《萤火赋》中有："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可见一个人的朋友往往是他的一面镜子。"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古语见《荀子·性恶》）（肖　星）

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庄子·盗跖》）

喜欢当面奉承别人的人，也一定喜欢背后诋毁别人。这是一条充满辩证思想的名言。对那些"好面誉人者"，我们要有所警惕。

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

批评我并且很中肯的人，是我的老师；称赞我并且很恰当的人，是我的朋友；阿谀奉承我的，是要陷害我的人。喜爱听赞美自己的言辞，是一般人都难以避免的，但要善于分清是

恰当的称赞鼓励还是谄谀。应当认识到："谄谀我者，我贼也"。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宋玉《登徒子》）

曲调越高雅，唱和的人就越稀少。思想越深刻，就越难于被一般人所理解，因此，知音也就越少。（周季平）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刘向《说苑·说丛》）

经过生死的考验，才能知道交情的真假。贫富之间的交往，才能知友谊的深浅。俗话说：烈火识真金。生死和贫富都是对友谊的考验。

（肖　星）

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韩婴《韩诗外传》卷三）

居：平时生活。与：给予。达：显达。举：举荐。考察一个人，从其几件事的处理上就能看出其品质如何。在富或贫的不同情况下，行为会有很大差别，居官或为民，他的态度也会不同。这句话高度概括出考察不同身份的人，所应把握的关键，为人处世，很有借鉴的必要。（杨　文）

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淮南子·氾论训》）

不同的事物，往往会以相同的面目出现，然而各自内在的规定性决定了他们之间本质上的不可逾越性。"白骨精"会摇身一变而成为弱女子，可她恰恰是一个妖怪！（姜剑云）

君子先择而后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后择，故多怨。（王通《中说·魏相》）

君子先选择朋友，然后相交，所以少忧愁。小人先交朋友，然后才选择，所以多怨仇。交友前要经过慎重考虑，这似乎浪费了精力，实际上却为后来减少了麻烦。反之，轻易交友，以后反目成仇，则会带来无穷烦恼。

交浅言深，君子所戒。（苏轼《上神宗皇帝书》）

交情浅而交谈深人，是君子所要警惕的。这是一条经过无数惨痛教训而得出的经验，我们不可不思之。

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挤我于险者，皆平日可喜人也。（《苏轼文集》卷二十二）

凡使我免于危难的，都是平时令人敬畏的人。凡是在我危急时刻还陷害我的，都是平时招人喜欢的人。苏东坡曾有过"乌台诗案"等惨痛经历，此段名言是他生活经验的总结，后人该引以为戒！（肖　星）

二、交　友

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周易·系辞下》）

君子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往时不谄媚奉承，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交往时不轻慢冷淡。平等，是待人处世中的最高准则。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周易·系辞上》）

同类的人和物相聚在一处，因而不同类的人和物才能互相区别。这句

古训，今人已演变成“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性格、气质、爱好等相同、相近的人自然会结交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乾》）所以，“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冯梦龙《警世通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

两个人如果同心协力，就会无坚不摧。共同的心声，气味香如兰花。团结就是力量，这是千古不渝的真理。

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战国策·楚策一》）

为了钱财而交友的，钱财用尽则交情断绝；为了容貌而交友的，姿色衰减则爱心改变。友情的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扬雄《法言·学行》）说的就是交友不交心，都是表面上的朋友。古人类似的警语是很多的，如：“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王通《文中子·礼乐》，“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史记·郑世家赞》）

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战国策·燕策二》）

古代的君子，与别人绝交时也不恶语伤人。有些人在相好时，出语如蜜，一旦交绝，则恶语伤人。这都不是一个有修养的人所应具有的品质。

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战国策·齐策三》）

有相同羽翼的鸟互相结伴栖息，有相同脚爪的兽互相结伴行走。比喻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很愉快的吗？远方朋友的到来，是生活中值得珍惜的事情。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看见贤人，便应该想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便应该自己反省（有没有同他一样的毛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别人之长，补自己所短，这是不断完善自己的重要方法。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

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友，同诚信的人交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友，是有益的。同谄媚奉承的人交友，同当面恭维背面毁谤的人交友，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是有害的。交友是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事情。“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至今仍不失为我们在交际中所要遵循的准则。（肖　星）

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文子·上义》）

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集体还是一个人，如果能够得到众人的帮助，就能克服暂时的困难，逐步强大起来。反之，如果众叛亲离，即使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也会灭亡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是也。（王一娟）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

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庄子·山木》）

君子间的交往，淡得象水；小人间的交往，甜得似酒。君子之交虽清淡却亲近无间，小人之交虽甜蜜却心存隔阂。那些无缘无故走到一起的人，也会无缘无故地分离。三国郭遐叔"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赠嵇康五首》）的诗句可以说是对"君子之交"的最好注释。清代翁照的"友如作画须求淡，山似论文不喜平"（《与友人寻山》）则讲得更生动形象。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

蓬草生于麻中，不用扶持自己就长直了。白沙混在涅（可做黑色染料的矾石）里，就会同它一样黑。环境的影响，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住在什么地方就学习什么地方的风俗习惯，这不是天性，而是长期积习而成自然，"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王充《论衡·率性篇》）

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荀子·大略》）

即使普通的人也不可以不慎重地选择朋友。交朋友，是为了互相帮助。简洁而透彻地指出了交朋友的目的。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在结交朋友时，就不会草率了。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芬，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刘向《说苑·杂言》）

和善人交往，就如同进入了摆着芳草的屋子，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芳香，是和它同化了；与恶人交往，就如同进入了卖鲍鱼的铺子，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臭味，也是和它同化了。

独思，则滞而不通；独为，则困而不就。（徐干《中论·自学》）

独自苦苦思索，思路往往会滞涩不通；独自去做某件事，往往会被困阻而不能达到目的。人在事业中需要朋友的帮助。互相之间切磋琢磨、交流信息、甚至质疑发难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天知识高速更新飞跃的时代，更是不可忽略的事情。

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汉书·邹阳传》）

有些人从结识至两鬓斑白，还象初相识时互不了解；有些人虽然偶尔认识，却一见如故。结交朋友，关键在于知心。心的碰撞，才能闪烁出友谊的火花。（周季平）

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汉书·宋弘传》）

这是我们民族长期流传的一句格言，它标示着一种传统美德。其可贵之处在于：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而本色不变。人的思想的转变，尤其容易在那些由贫贱而富贵，由位卑而位尊的人身上发生，这句格言，对人们即有着道德上的警醒作用。（李正民）

与善人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润。（葛洪《抱朴子·微

旨》)

与好人交往，就象在雾中行走，虽没有沾湿衣服，却暗暗地被浸润了。吸收好的思想和学习好的品行，往往不是有意去仿效，而是在不知不觉地耳濡目染中自然进行的。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北周书·卢诞传》)

能讲经典的老师容易求得，而能教做人道理的老师却难找到。“人师”之所以难得，在于“人师”不仅要有“经师”的广博学识，还需要具备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 (肖 星)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欧阳修《朋党论》)

同道：共同的志向。人以类聚，共同的追求使人们走到一起。以共同的志向结为朋友者谓君子，而以金钱利害关系结为朋友的谓小人。从中可窥见古人的道德标准。

鼋鸣而鳖应，兔死则狐悲。(田艺衡《玉笑零音》)

鼋、鳖，都是水生动物；兔、狐都是陆地动物。意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类相惜。动物如此，推及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杨 文)

三、待 人

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战国策·魏策四》)

别人憎恨我，我不可以不知道；我憎恨别人，不可以使别人知道。人对我有好处，我不可以忘记；我对别人有好处，不可以不忘记。在与人交往之中，哪些是应该时刻警醒深虑的，哪些是可以不必记挂于心的，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到一些启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多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怨恨自然不会来了。 (肖 星)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

赠人以良言，比赠予他金钱珠宝还重要；劝化别人，帮助别人，是比任何华美的色彩都要美丽的一件事；同样的，善于听取别人的劝言，也是莫大的享受。 (杨 文)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于张问入官》)

水过分清澈就没有鱼，人过分精明就没有与之交往的人。与人交往，应豁达宽容。自己的小算盘打得过于精细，必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

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礼记·坊让》)

做了好事要称赞别人，有了过错要责备自己，人与人间就不会因为小事而争执不休了。推功揽过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美德。如果我们都有豁达宽广的胸襟，人与人之间就会减少一些“内耗”，而能集中全力投身于共同的伟大事业。

记人之善，忘人之过。(《三国志

·蜀书·秦宓传》裴松之注引《益都耆旧传》)

记住别人的好处，忘记别人的过失。只有"记人之善"，才能谦虚善学；只有"忘人之过"，才能宽以待人。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韩愈《原毁》）

古代的君子，批评自己严厉而全面，对待别人宽容而简约；（批评自己）严厉而全面，所以才不骄怠，（对待别人）宽容而简约，所以别人才乐于去做好事。古希腊的"微笑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经说过："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要造就这样一种社会氛围，继承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传统美德看来很有必要的。

人有厚德，无问小节；人有大举，无訾小故。（《意林》引《体论》）

人有很好的德行，就不要追究他的小节；人有很高的荣誉，就不要挑剔他的小毛病。看人要观其大行大节，"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老子语）。

君子不责人以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文中子·魏相篇》）

君子不拿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来责备人，不强迫别人做力不能及的事，不用别人所不喜爱的去折磨人。待人处世，要经常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不强人所难，这样才能与人和谐相处。

（肖　星）

四、重　诺

能信不为人下。（《左传·昭公元年》）

能守信用的人不会居于人下。不守信用的人可能会名噪一时，但谎言终将被戳穿；守信用的人往往不能成为暴发户，但时间将会证明他的人格。

苟信不继，盟无益也。（《左传·桓公十二年》）

如果没有信用，那么发誓缔约也是没有用处的。

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左传·隐公三年》）

诺言如果不是出自内心，即使有人质也是没有用的。信用和信物，决不是一回事。没有信用，再珍贵的信物也是靠不住的。恪守诺言，没有信物又有何妨？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人不讲信用这种现象，不知道怎么可以让它存在。孔子有一次在与他的学生子贡谈到治国问题时指出充足的粮食、强盛的兵力和取信于民是治国的根本。子贡问他如果必然去掉一个的话，三者之中哪一个可以不要，孔子认为是"兵"。子贡又问他如果还必须去掉一个的话，剩下的二者之间哪一个可以不要，孔子认为是"食"，并且进一步强调："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意思是说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失去信任，国家就立不住脚了。治国如此，社交也是如此，"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

耗”。(《墨子·修身》)所以，孔子认为人如果不讲信用，那是不可思议的。

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老子》六十三章)

轻易地许诺必然很少讲信用。多变必然会引起许多麻烦。

一声而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邓析子·转辞篇》)

一句话说得不对，四匹马拉的车也不能挽回；一句话急于出口，四匹马拉的车也追赶不上。今有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源出于此。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

诚信是治国做人的关键。

巧诈不如拙诚。(《韩非子·说林上》)

智巧而诈伪还不如笨拙而诚实。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如果不用在正道上，那么聪明终将被聪明所误。智慧对于每个人来说固然重要，然而诚信则更重要。荀况说过：“士信悫而后求知能焉。”(《荀子·哀公》悫què：忠厚，诚恳。知：通“智”)诚实和忠厚才是做人之本。

面誉者不忠，饰貌者不情。(《礼记·文王官人》)

当面奉承的人不可靠，掩饰真面的人不诚实。 (肖　星)

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

在其位者，首先应做到能提出合理的建议，然后就应付诸行动，实践诺言，而不是只做哈哈先生，只会点头同意，无任何主张，更别说行动了，那是小人所为。“言必行，行必果”才是应有的态度。 (杨　文)

口惠之人鲜信。(韩婴《韩诗外传》卷五)

口头上许愿的人往往不守信用。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即使得到一百斤黄金，也不如得到季布的一句诺言。今有成语：“一诺千金”源出于此。季布，楚人，以任侠著称，极重信义。义的价值胜于金钱。

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刘向《说苑·说丛》)

君子的话少但实在，小人的话多却虚假。言语是人际交往的工具，没有真诚的言语，也就没有真诚的友情。

多许少与者，怨。(张商英《素书》)

许诺多而给予少的人，将招至怨恨。轻诺，将最终失去真诚的爱和友情。 (肖　星)

修　养

一、修　身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卫灵公》）

自我反省时不感到内疚，又会有什么值得忧虑和恐惧的呢？俗话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身正不怕影斜"。只要自己的作为光明正大，内心就会坦荡，无须瞻前顾后，疑虑重重。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载曾子语）

我一天要自我反省多次。反省，是自我修养的一种很好的方法。人就如同是一面镜子，只有经常擦拂，去掉灰土，才能达到心明如镜，一尘不染的境界。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爱他；尊敬别人的人，人家也会尊敬他。德高望重者，因其"德高"，才会"望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注重自身修养，就不愁得不到别人的爱戴和敬重。

（钱　宁）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学士把这句话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座右铭。独善其身：保全好自己；兼善天下：让天下人得到好处。这也是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侧面。

（杨　文）

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

登上泰山就感到天下太小了。人的精神修养，只有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才会具有博大的胸怀。

（宁志荣）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

孔子在回答子夏提出何以"三王之德，参于天地"的问题时答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认为禹汤文王为天下奉献无私之德，故能德参天地、光照日月。并认为只要人们自觉地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合乎"礼"，就能达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这种良好的社会效应。

（马现诚）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礼记·曲礼上》）

傲气不可增长，欲望不可放纵，志向不可满足，享乐不可过度。古人自身修养的这些境界，今天仍可作为我们的借鉴。

（肖　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辩证地阐述了以“修身”为中心的八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说明与事物接触（物格）、穷究其理，才能获得知识（知至）；有了知识，才能意诚心正，担当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安笈　夫容）

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

君子自己独处时一定要格外谨慎。儒家讲“慎独”，就是要求在别人注意不到自己的时候，也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仪和道德规范。这就对自身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君子约言，小人先言。（《礼记·坊记》）

君子说话总是很简约，而小人总是喜欢夸夸其谈。从言谈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有修养。当然，过去那种“少言语”视为美德的传统观念，今应有新的认识。问题的关键不在言谈数量的多寡，而在于言谈内容的虚实。

修其身而后交，善其谋而后动。（扬雄《法言·修身》）

先搞好自身的修养，然后再去与人交往；先计划好谋略，然后再着手行动。人应把自我修养放在第一位。当然，修身与交游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孔子有“见贤思齐”之语，说的就是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也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欲影正者端其表。（桓宽《盐铁论·疾贫》）

想使自己影子端正的人，应当先使自己站立的姿势端正。只有心灵美好，行为才能正直。

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后汉书·班超传》）

自己反省时不内疚，何必害怕他人的闲言呢？人不能为别人的议论活着，只要问心无愧，还有什么可以担忧害怕的呢？

止谤莫如修身。（徐干《中论·虚道》）

制止别人诽谤你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强自身的修养。诽语可以杀人，但是，被诽语杀死的人，往往是意志薄弱者。“修身”固然是对付诽谤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应当将诽谤勇敢地揭露出来，诽谤只能从背后伤人，它是害怕曝光的。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

君子的品行，以静来修身，以俭来养德。没有淡泊，就无法表明志向；没有宁静，就无法达到远大的目标。史书记载诸葛亮很注重品德修养，甚至娶妻时，也将品德放在择妻标准的首位。注重精神修养的人，往往安于物质生活的清贫。（钱　宁）

江河之流，不能盈无底之器也。（葛洪《抱朴子·极言》）

葛洪从延年益寿出发设喻：长江、黄河的水啊，也灌不满没底儿的器皿！意思是说，人的精、神、气、力是有限的，若无休止、无节制地消耗，将

会竭尽无遗。这一比方，形象、通俗，既让人从联想中顿悟养生之道，更启迪人深思：物质财富的节制，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姜剑云）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师说》）

道，指正确的哲学思想体系和方法。韩愈认为能够作为老师的资格，不在于富贵贫贱，也不在于年长年幼，而是在于谁掌握了道。因为作为老师，是要能够给人们传授正确的人生观、方法论，指导人们从事于崇高的事业，这和地位高低、年龄大小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韩愈所称的道是指儒家道统，但他对教师资格的看法至今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牛贵琥）

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韩愈《原毁》）

原文的主旨是探求毁谤的根源，要求自己严格并且全面，要求别人宽厚并且简单，这是为人处世之道。工整的对仗句告诉后人要注意个人修养，而不是一味地苛责别人。

（杨　文）

君子患无德，不患无土；患无土，不患无人。（柳宗元《晋问》）

这是作者在文中渲染了北山之富后，借吴武陵之口说出的话。重复儒家"太上立德"之说。意谓土地、人民、宫室都是"德"的附属产品，是下位的，不能舍本而逐末。过分追求物质享受，有悖尧之遗风。（王　端）

轻誉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王通《中说·礼乐篇》）

轻易地说赞扬的话，随随便便地诋毁他人，常常心怀嫉恨，喜好不时发怒，这都是小人的性格特征。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王通《中说·周公篇》）

有自知之明的人，就是英才。能够战胜自己的人就是强者。《老子·三十三章》有："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一个能够克服自己弱点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强者"，而所谓"弱者"，往往是对生活缺之信心和勇气的人。

（肖　星）

二、改　过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易经·益卦》）

看见好的榜样就向人看齐，有了过错就赶紧改正，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要的是怎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过错。

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

人怎么会不犯错误呢？犯了错误能够改正，就是最大的优点。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战国策·赵策》）

前人的教训不要忘记，可以成为以后做事时的老师。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

有了过错而不改正，那才是真正的错误。人不怕有缺点，怕的是不改正。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对"过"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前车覆，后车戒。（《汉书·贾谊

传》)

前面的车翻掉了，后面的车就要引以为戒。丰功伟业往往是在总结了无数次的失败教训后才取得的，在通向成功的过程中，失败，并不是坏事。

朝有所闻，则夕行之。(《后汉书·张衡列传》)

早上听到的道理，晚上就要去实行。闻而不行，就等于终身不闻。

良药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达者能受之。(《三国志·吴志·孙奋传》)

好药吃起来苦涩，只有生病的人才感到甘甜；忠言听起来不顺耳，只有豁达的人才能承受。正如每个人都要生病一样，错误和缺点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得了病，往往能吞吃苦口的良药，但犯了错误，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忠言的。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吴兢《贞观政要·任贤》)

用铜制成镜子，可以端正衣服帽子；以历史作为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以人作为镜子，可以明白行为得失的准则。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人欲自照，还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引自《贞观政要·求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最高统治者，尚能以耿直忠贞，敢于直谏的魏征作为镜子，那么，今天的领导干部，又该怎样做呢？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魏征语)

广泛地听取意见就会使人聪明，偏听偏信就会使人糊涂不清。这是一千余年前魏征劝诫唐太宗的话，今天仍不失为我们的座右铭。

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王通《中说下·关朗篇》)

最痛心的事莫过于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最令人耻辱的事莫大于不知有羞耻二字。"不闻过"就不能改正错误，"不知耻"就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格调。 (周季平)

三、谦　谨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

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会得到益处。骄傲自满往往是失败的开始，"满盈者，不损何为？慎之！慎之！"(《朱舜水集·谦》)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二十四章)

不自我夸耀，就有功劳，就会进步。居功自伐的人，有时反而会因此而失去成功的光彩，而有功自谦的人，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尊重。 (周季平)

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聪明的商人总是把钱藏得很严密，好象身上不名一文；高尚的人总是谦虚过人，从不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是一种修养的极高境界，只有那些知之甚少的人才去到处卖弄。 (张增兰)

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礼记·注解》）

君子做事一开始就特别谨慎，开始发生一丝一毫的差错，结果就会造成重大的失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谨慎地迈好第一步吧。

高议而不可及，不如卑论之有功也。（刘向《说苑·说丛》）

高谈阔论而做不到，不如说些题旨切近的话能付之行动那样有用。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刘向《说苑·说丛》）

能说的人未必能做，能做的人未必能说。我们应该追求言行一致的完美，而当言和行不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我们则应该重其行而轻其言。

（肖星）

事之成败，必由小生。（《淮南子·原道训》）

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是由小的事情开始的。

自后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扬雄《法言·寡见》）

自己以后进自谦的人，别人会认为他是先进的，自己觉得不如别人，别人会认为他胜人一筹。一个人的品行优劣，水平高低，自有公论，有自知之明，就是美德，就是高明。

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想到身居高位的危险，就会考虑到谦虚谨慎，加强自己的修养。就如担心水满而往外溢，就会想到能容下百川之水的浩瀚博大的江海。

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韩愈《原道》）

坐在井底望着天而说天小的人，天并不是真小，而是他的眼界被井口限制了。劝君莫做井底蛙，须知天外更有天！

凡百事之成也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资治通鉴》卷六）

凡事情做成的，都是因为严肃认真；做不成的，一定是因为办事轻慢、懈怠。恭之谨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则事情可成；骄之慢之，飞扬跋扈，则事情必败。古今尽然，不可违也！

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吕坤《呻吟语·人品》）

神气要防止太盛，心志要防止太满，才能要防止过分显露。从表面神态到内心世界，都要谦谨，对己，能不断进步，对人，能团结朋友。

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祸。不自满者受益。不自是者博闻。（申涵煜《省心短语》）

不尊重自己的人就会受到侮辱。自己不谨慎重的人就会招来灾祸。不自满的人才能获得教益，不自以为是的人才能知识广博。（周季平）

四、勤　俭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勤俭是所有美德中共同标志；而奢侈是最大的罪恶。节俭所得到的，不

仅仅是一点点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人们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奢侈所失去的，也不仅仅是有限的财产，更重要的，是它使人失去了理想的追求。

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慎子》外篇）

财物富有的人再富也不会感到满足，生活清贫的人再穷也觉得不缺什么。前者在精神上往往是贫穷的，后者则往往是富有的。不足和有余，物质和精神，都是互相转化的，条件就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

忧患之中往往能勃发奋起，沉溺于安乐却能导致失败和灭亡。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原动力往往产生于濒临灭亡的危机感。

患生於多欲，害生於不备。（《淮南子·缪称训》）

灾祸往往出于贪欲过多，危害往往产生于没有防备。“多欲”则势必不能得到满足，不满足则不顾道德法律，“利令智昏”，于是“患生”。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司马光《训俭示康》）

大家都以奢侈浪费为光荣，我内心只以勤俭持家为美德。豪华奢靡的物质生活的诱惑，一般人都难以抵御，司马光“独以俭素为美”，实在难能可贵。这一点，也正是他能在事业上成功的原因之一。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

由俭朴变成奢侈很容易，由奢侈变成俭朴就很难了。奢侈豪华的生活，不但能满足人们感官的愉悦，而且，能满足人们追求时尚的虚荣心理，司马光的话，可以说是鞭辟入里。

不加功于无用，不损财于无谓。（《汉书·杨王孙传》）

不在没用的事情上费功夫，也不要在没有意义的事上费钱财。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说，要把有限的时间、精力、钱财，用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周季平）

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矣。（颜元《颜李遗书·颜习斋先生年谱》）

颜元的所谓君子处世之道，是中国几千年来“士志于道”者极力追求和标榜的品格。《论语·里仁》早就提出“耻恶衣恶食”者，就不值得同他们论道。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恐怕更有深远的意义。

（笛音）

五、为　人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尚书·旅獒》）

小事情上不知检点，最终会拖累损害大德。不拘小节，人们往往并不认为是缺点，但从事物发展转化的规律来看，不拘小节恐怕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

多干不正当的事情，一定会自取

灭亡。郑庄公的弟弟段叔倚仗母亲的宠爱，欲行谋反之事，大臣劝庄公及早除之，庄公说了上面这句话，后来，段叔谋反，行不义之事，果然自取灭亡 （周季平）

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战国策·秦策》）

说话不随便附合别人，行为不随便仿效别人，只要是做正义的事，就不要理会别人是诋毁还是赞誉。明辨是非，才能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再加上勇气，作为一个人，便真正地立起来了。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三十三章）

能了解别人的人才算有智慧，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才算是聪明的。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才算有力量，能够克服自己缺点的人，才算是坚强的。

（肖 星）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

已经做成的事就不要再去解释，正在进行势不能止的事就不要再去规劝，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再去追究了。古诗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对未来，而不是向后看，这才是一种积极的处世态度。

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

说话必须要有信用，行动起来一定要果断。言行一致，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看见正义的事而不去干，这是没有勇气的表现。人活着，活的就是一口气，见义勇为，就是要争这口气。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君子为自己说得多、干得少而感到耻辱。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以"言过其行"而闻名的将军，那就是三国时失了街亭的马稷，其结果是既误国家，又害个人。"言过其行"的人，往往想用其"言"来表现自己的高尚不凡，而其"行"，则恰恰降低了他的价值。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总是胸怀坦荡，乐观通达，小人往往是心胸狭窄，忧虑重重。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

人总是先自己不争气，然后别人才来欺侮；家总是先自己把它毁坏了，然后别人才来毁坏；国总是先内部自己争斗，而后别人才来侵伐。事物变化的原因，都是自身运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周季平）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

抬头要无愧于苍天，俯首要无愧于别人。做人要心怀坦荡，光明磊落，对得起他人，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样，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才能感到内心坦然、无愧。 （肖 星）

人不可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

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没有羞耻的可耻行为，那才是真正的无耻。人一不知羞耻，就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自尊心，还可称为人乎？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以自己品德来使人信服的人，别人才会心悦诚服。

行欲先人，言欲后人。（《曾子·修身》）

行动要在别人的前面，话则要说在别人后面。让自己的具体行动来说话，这是最过硬的。

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

只有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行动，君子为此感到羞耻。（周季平）

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蔺相如完璧归赵、出使不辱，功大而气正，但廉颇妒而数辱，他又为何再三避让？"两只猛虎相互搏击，其后果是两者一定不能并存！"相如这一比喻，道出了将、相不和将会招致的严重危害，同时，也表现他为人大度、富有远见。（姜剑云）

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刘向《说苑·说丛》）

君子说的话，少而实在；小人说的话，多而虚假。君子和小人的这种区别，根本在于是否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欲人无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汉书·枚乘传》）

想要别人听不见，最好是自己别说；想要人家不知道，最好是自己别干。什么事情要做就要敢做敢当，否则，就老老实实地安分守己，不要再异想天开。

感慨而自杀，非能勇也。（《汉书·栾布季布列传赞》）

因为伤感而轻生的人，不是真正勇敢的人。直面人生，无论多么艰难，也要珍视生命。逃避人生的磨难，这是懦夫。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不好的事情，尽管很小，也不要去干；好事，即使很小，也要去做。大的好事是由小的好事积累而成的。

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

做任何事情，不要让爱你的人感到痛心，而让恨你的人感到快意。成语"亲痛仇快"即源于此。（周季平）

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左思《三都赋序》）

这是一组偶句，前句只是虚说，本自《韩非子》："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无当，可以盛水乎？"后句方是实指，讥刺扬雄、张衡赋中言辞"假称珍怪，以为润色"，好看不中用。这样，以虚衬实，劝导世人：不切实际的事莫做；没有根据的话莫说。（姜剑云）

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欧阳修《泷冈阡表》）

这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撰文悼念其母时所发的感叹。祭祀的物品再丰盛、仪式再隆重，对于死者却没有半点用处。倒不如死者健在时对其精心赡养，哪怕极其微薄，也是实实在在的奉献。天下人若从此道，则耆老幸甚！ （落馥香）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

作者用工整的对仗和恰如其分的比喻阐明，人之为人，当贫而不贱、富而不娇。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应当保持高风亮节。人的品行的好坏，自身修养是根本，客观环境只是外因。 （范 陌）

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

天下最勇敢的人，对突然来临的事变一点不惊慌，对别人无故加之的侮辱而不发怒，做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须经过多年的磨炼。 （周季平）

哲　理

一、相　对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周易·系辞上》）

仁爱的人看见它认为它是仁爱的，聪明的人看见它认为它是有智慧的。这句话本来是说人们对阴阳转化规律的认识各有不同，而以后则泛指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认识。 （姜剑云）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尚书·太甲下》）

想要到高处，必须从下面开始攀登；想要到远处，必须从近处起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事物的质的飞跃有待于量的积累。如果没有山脚下第一步的踏出，就永远攀登不上光辉的顶点，没有近处第一步的努力，就永远实现不了长远的目标。一切都要从零始。

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列子·天瑞》）

普天之下没有容括一切的功业；圣人之中没有无一不备的才能；世界万物没有具有一切功用的东西。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因为事物的“全”，总是和“不全”相对而言的。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老子·六十三章》）

准备完成艰难的事业，必须要从容易的事情做起；准备成就伟大的事业，必须要从细小的事情干起。

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

断之则悲。（《庄子·骈拇》）

野鸭子的腿虽然短，但接长了就会忧烦；仙鹤的腿虽然长，但截短了就会悲伤。事物优劣长短的相对合理性，皆应随其自然本性而定，按照事物原有的内在规律办事，这正是老庄无为思想的合理内核，也是此条的意义所在。（周季平）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庄子·秋水》）

任何事物都在具体的时空中生活运动，跨出它所感知、理解的范围，就要出问题。不独井蛙、夏虫往往"贻笑大方"，就是鲲鹏、宋荣子也是游子"有穷"，处于由相对到绝对的过渡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超越。（王　端）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上》）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而存在，"有为"与"无为"也是如此。人们只有在某些方面"不为"，才可以"有为"，只有在经历过"有不为也"之后，才"可以有为"。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屈原《卜居》）

一尺之长，有时会显得很短；一寸之短，有时又会显得挺长；事情在有些方面总会有所不足，智力在有些地方总会有所疑惑。"短"与"长"，"足"与"不足"，"明"与"不明"都不是绝对的。尺当然比寸长，但是在"丈"面前，它就很短了。所以，当人们判定某事物的属性时，应注意与其相对存在的条件。当你看到某人某物的优劣时，也应能以此在优中看到不足，在劣中看到长处。

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韩非子·功名》）

用右手画圆圈，用左手画方框，那么两个东西都画不好。"右手画圆，左手画方"，双管齐下，似乎比用一只手工作要快，但是结果往往是"两不成"。因为它违背了"一心不能二用"的客观规律。（周季平）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晏子春秋·杂下》又作："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思是即使大智大慧的天才，也不会没有失误、事事正确；即使迟钝愚拙的笨人，也决不会一无是处、一无所得。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孙安邦）

爱其人者，兼爱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六韬·逸文》）

对所喜爱的人，连他屋上的乌鸦都喜欢，对所憎恶的人，连他的墙壁、篱笆都憎恶。凭自己的好恶看人，就把好恶绝对化了，往往会产生偏见。

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不好，良工必有不巧。（王充《论衡·自纪篇》）

美味的肉汤必然会出现淡而无味的情况，最珍贵的宝玉必然会有疵病和污浊，文章高手必然会有败笔，能

工巧匠必然会有不巧妙的作品。

（肖　星）

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苏轼《御试制科策》）

时局不同，则人言的轻重缓急也不同。天下之太平无事，再重要的人讲话对于一战一役也是无关紧要的；而到了危急关头，比如兵临城下之时，即使普通人的一言一辞，也会对局势造成影响，即所谓时势造英雄。

（杨　文）

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一为千万，千万为一。（苏辙《洞山文长老语录叙》）

该句词约意丰，理趣无穷。前以形体言，小、大自成对比；后从数量说，一、万相互对举。八字衍言十六，每字互见两次。遣词至为简约，造意尤其精深。水珠一滴，可知大海；日月沧桑，人间浮沉；见微知著，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殊途同归，世界乃由分子合成。苏辙道的佛家语，不妨视为辩证观。

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苏辙《超然台赋叙》）

住在山里的人知道山，住在林里的人知道林，农夫熟悉原野，渔夫熟悉沼泽。乍看各有所长，其实皆有所短：他们都安于一角一隅，只知自己居处的乐趣，却不知可登高"超然台"，山林原泽之美尽收眼底，乐自然之趣，得万物之理！看苏辙的超然，倒暗合辩证思维的模式！

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鹖冠子·天则》）

作者以为，耳虽聪，目虽明，但难免局限，容易蔽塞。因为一片树叶遮了两眼，就连泰山也看不见了；两粒豆子堵了双耳，就连雷鸣也听不见了。所以他说圣人之政在于道而不凭耳目。不过，两句十六字有一客观比喻意义在：小处或局部的蒙蔽会使人不见大处、远处的！　（姜剑云）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刘基《卖柑者言》）

外表倒是如金似玉，里面裹的却是一团破棉花。事物的表象与本质常常并不一致，有时甚至会完全相反。刘基在《卖柑者说》中揭示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哲理性的启发：看待任何事物，不仅要看其外表，更重要的是挖掘事物的本质。　（周季平）

二、转　化

太强必折，太驰必张。（《六韬·三疑》）

物极必反，势尽必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要向自己的反面转化。　（周季平）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

天地之间充满虚空而又有无穷无尽的"气"，似虚而实，"有无相生"。天地之中万物任其自然而运化无穷、生生不息。老子这一"有"、"无"、"虚"、"实"相对立统一的思想深刻影

响了中国古典美学中关于虚实结合的原则。（马现诚）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二十三章》）

大风吹起来不过一早晨，暴雨下起来也不会超过一天。和风细雨，常常会“绵绵无绝期”，而暴风骤雨往往却来得凶猛迅疾，去得也无迹无垠。这种自然现象也正符合辩证法“物极必反”的规律。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

事物发展到绝路就会求变化，一变化，就能继续发展，一发展就能持久。任何事物都会依照一定的条件向自己的反面转化，“盛极必衰”，而衰极穷极就会变化，就会开始一个新的矛盾运动，这就是本条所蕴含的辩证思想。（周季平）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战国策·秦策三》）

大千世界无时不在起伏生灭。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开始西斜；月亮到了圆满就会开始亏缺；事物到了繁盛随后就会衰亡。蔡泽劝人贵且富当及时引退就曾这么开导。这种人生哲学固然圆滑，但句中对自然转化规律的形象描述却能戒人骄矜自大，要人居满持虚。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

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它们都各自对立，水火不能相容；但又自为互补，各以其对立面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永远相依为命。不过，听老子的说教颇似翻览画片、欣赏音乐、观看舞蹈，仔细体味，原来是一溜“对立统一规律”的趣味图解。（姜剑云）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

对手合抱的大树，是从细小的嫩芽长起，九层高的土台，是用土一点点堆成，千里远的路程，就是从脚下的一步步开始走的。本条阐述了事物质量互变的规律：任何质的飞跃都有待于量的积累。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一个人缺乏长远的打算，眼前就一定会有许多麻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忧患的产生也是长时期的积累而成。因此，人们如果不能消除当前的隐患就会产生大错，而人们如果没有长远的打算，眼前的麻烦也会接踵而至。

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

拉满弓而不放箭，只是作出跃跃欲射的样子。强弓劲弩在手，利在己方，一旦过早地发射出去，就很可能使事物发生转化，而“引而不发”，却可以始终掌握主动权，获得更大的成功。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

不是半步半步地积累起来，就不

可能走千里之远；不是一条条小溪汇集起来，就形成不了江河湖海。垂名千古的英雄伟业，是由一件件平凡小事起步的。

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荀子·非相》）

要通过周围的事情而探知远处的事情，要通过极少的迹象推出许多事情的道理，要通过细微的征兆来预知事物明显的发展趋向。事物都是处在联系之中，将来是今天的继续，细微会发展为明显。所以，要善于以此知彼，举一反三。（周季平）

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荀子·法行》）

这是《荀子》中叙述孔子的话。告诉人们一生中三项应注意思考的事。年少时容易贪玩，又是来日方长，所以应思考若不学习，长大后就没有能力工作生活。年老时容易产生万事皆休的想法，但又有一生的经验教训，所以应该思考若不把这些传给下一代，死后就没人怀念自己。人在富有时容易财大气粗，所以应该思考如果不多加施舍，等到自己穷困时就不会得到别人的帮助了。这三项都是和儒家要求人们为社会做贡献的主张相一致的。（牛贵琥）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韩非子·喻老》）

千丈高的堤坝，就是因为蝼蛄、蚂蚁的洞穴而溃塌；百尺宽的大屋，就是因为烟囱的裂缝而被焚毁。智者要“见于未萌”，防患于未然。

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驰张。（《韩非子·解老》）

世界上，万物的发展总是有盛有衰，而且有张有弛。天下万物，盛久必衰，衰久必盛，这是由于事物本身就含有“盛”与“衰”这两个对立着的因素；而对立的双方，必然会依一定的条件向自己的反面转化。

（周季平）

勿轻小事，小隙沈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勿轻小人，小人贼国。（《关尹子·九药》）

疏忘了琐事，那留下的细缝也能覆舟沉船；忽略了细物，那有害健康的小虫也会伤身夺命；轻视了小人，那奸邪之辈也要祸国殃民。一句之中，三个排比，递进层深，拾级推进。反复强调防微杜渐，莫要贻患无穷。

（姜剑云）

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

一毫一厘的失误，发展下去就会相差千里百里。事物的转化总是通过一毫一厘的量变积累而发生。因此做事情特别要注重其根本，注重其开端的方向，如果根本不正，即使是“失之毫厘”，发展下去，也必然要“差以千里”。（周季平）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史记·韩长孺列传》）

鲁缟虽是极薄的丝绢，但强弩之末对此却无可奈何。凡事都有其特定的范围，一旦超越某种限度，便会失去优势。（范　陌）

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扬雄《法言》）

干什么都要恰到好处，“过”与“不及”是同样不合适的。姑娘妆束最忌胭脂太浓，而破坏其自然美好之态；写书作文要避免夸大不当之辞，否则会妨害方正法度。（张增兰）

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杜弼《檄梁文》）

楚国丢掉了猴子，灾祸一直漫延到附近的树林；大城门着了火，一直危害到池塘里的游鱼。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是十分广泛的。有些表现上似乎毫无关系的事物，在某些条件下，也会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所以，看问题应全面、缜密。（周季平）

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苏轼《策别十二》）

名实相符，换言之即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辩证的，削弱了任何一方都不妥当。苏轼在这里的论述，使内容和形式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更加明朗，更加具体生动。（王 端）

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前赤壁赋》）

对于宇宙、人生，作者认为，若说变，则盈虚、消长、荣辱、得失，瞬息万变；若说不变，一切又无增无减，没有变化，物我长存。强求什么呢？于是逆境中就齐生死、无是非，自我排遣；苦闷中便等荣辱、同忧乐，随缘自适。其实，豁达里尽是牢骚，理趣中充满不平。（姜剑云）

三、知 行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

懂得道理并不难，难的是要能付诸行动。《左传·昭公十年》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肖 星）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孟子·梁惠王上》）

掂一下，然后就知道轻重了，量一下，然后就知道长短了。真知灼见往往来自切身的体会。实践了，知识也就在其中了。（周季平）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

没有听到的不如去听一听，听到了不如亲眼看到，看到不如能懂得其中的道理，懂得了道理不如付诸行动。用比较的方法层层说明实践第一的哲理。

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

只是听到而并没有亲眼见到，即使听到很多事情，也必然会有谬误；见到了而不加分析，即使记得很牢也必然会有差错；掌握了知识而不付诸实践，即使非常博学也必然会使人困惑。

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大戴礼记·哀公问

五义》)

掌握知识不求多，而要求详知其掌握的是什么知识；行动不求多，而要求详知其这样做的理由；说话不求多，而要求详知其说话的内容。

(肖　星)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列传》)

面对着深深的河水，羡慕着游鱼的美味，不如回去编织一张渔网去。如果只是停留在“临渊羡鱼”的阶段，就永远捕不到鱼，而回到家中去织网，看似离河边远了，却离撒网捕鱼的时刻接近了，因为它已是实践的开始。

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王充《论衡》)

下浅海的人可以找寻小虾，深一些的可看到鱼鳖，特别深的人可以观赏到蛟龙。实践的不同程度，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浅尝辄止的人就永远得不到大的收获。

地有远行，无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远罪也。(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

地面上再远的路程，都可以走得到；走不到的人，是因为不走的缘故，并不是路程远的罪过。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都说明了只要积极探索，努力实践，就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就没有不可完成的事业，关键在于实践。

(周季平)

读其书，诵其数，而不知所以行之，未是与言治也。(苏辙《王衮知兖州》)

读了书，明白了书中的道理，却不知道把这些道理付诸实践，这样的人就没有谈论治理国家的资格。

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苏辙《超然台赋叙》)

住在山里的人熟悉大山，住在林中的人熟悉森林，种田的人熟悉平原，打鱼的人熟悉江湖。形象的比喻揭示实践出真知的哲理。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朱熹《性理精义》卷八)

刚刚掌握一些理论，还没有将其付之实践，那么，所掌握的理论还是肤浅的。理论从实践来，而要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检验理论的真伪，还是要回到实践中去。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守仁《传习录》上)

掌握理论只是实践的开始，实践则是理论的成果。行和知，知和行的互相转化，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层递，而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

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魏源《默觚·学篇二》)

接触到了这件事以后才能真正理解它，实践了以后才会体会到这件事的艰难。掌握一些理论，夸大其谈，束之高阁，这恐怕谁都能做到。如果仅仅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社会来说，他只能是一个“多余的人”。

(肖　星)

四、理 趣

愚者闇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战国策·赵策》）

愚笨的人等事情有了结果还糊里糊涂，而聪明的人在事情还没开始时就能发现征兆。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重要的是善于把握规律。

（周季平）

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

天地养育了万物，而人则禀赋天地之灵，成为万物之首，不仅统领万物，为我所用，而且可以顺应天地。此句反映了古人"天地养育万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人为万物之灵"的深刻认识。

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左传·僖公十四年》）

傅，通"附"。皮与毛是相互表里的两种东西，毛是附于皮上的，这就形象地说明了一方依附于另一方的情况。它告诉人们看问题要看实质，不要流于表现和片面，否则就会犯无根之木、无皮之毛的笑话。（张增兰）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

有一种叫"朝菌"的植物，朝生暮死，不可能明白一个月的时光有多长，有一种叫"蟪蛄"的小虫子，春生夏死，或者夏生秋死，不可能看到一年的光阴。人们的知识和实践都受着一定客观条件的制约。朝生暮死的"朝菌"就永远不会理解"月"的概念。因此，人们如果想求得更多的知识，就要尽力能动地改造制约自己的条件。

（肖 星）

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子·养生主》）

庖丁解牛，技巧娴熟，令观者犹如欣赏一曲奇绝的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奥妙何在？"以无厚入有间"！须知节者本无间，刀刃亦有厚，而只有"依乎天理"、驾驭自然规律者，才会有庖丁那种"有"、"无"颠倒的神奇却真切的感受，否则，不仅无有余地，反会处处碰壁。（姜剑云）

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

观赏过大海的人是难以欣赏小河小溪的，在圣人之门学习过的人，一般的话就很难听进去。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社会实践的人，会有不同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后来唐人元稹曾用此意写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名句。（周季平）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自然规律岂因尧贤桀暴而存亡消长？吉凶祸福在人不在天，唯有顺之且加以利用，天下才能不治而治。尧桀之典，妇孺皆知，此用尧、桀二字即阐明一个深奥的哲学观点，确有点石成金的功力。（吕晓庄）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

荀子认为"性"是先天的，但可以改变，"习"虽不归我所有，但也可

以培养。把一个人放到不同的环境中，时间一长，其性情就会随着改变，外在的一些东西就转化为人内在的质的一部分。就象一个人，如住在僻远的楚越，就会有楚人越人的样子，住在腹地夏，也就成为夏人。（王　端）

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韩非子·用人》）

抛弃规和矩而随意设想，即使是奚仲那样的造车能手也不能造出一个车轮来。做任何事情，都要凭借相应的工具、方式和手段，违背了这种客观规律，即使再有能力的人，也将一事无成。

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远水不救近火也。（《韩非子·说林上》）

着了火，到海边取水去救火，海水虽多，但一定救不灭火。远处的水不能救近处着的火。"远水不救近火"，今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成语。它告诫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分清轻重缓急。

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人食，悖。（《吕氏春秋·荡兵》）

谁要是因为有人被噎死了而禁止天下人吃饭，那可就真是荒谬了。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遇到困难，受到挫折。如果害怕失败就不去做了，则将一事无成。成语"因噎废食"，即源于此。（周季平）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晏子春秋·内篇》）

枳，似橘而小，味涩。此句讲客观条件的重要性。由橘而枳，其桥梁便是由淮南至于淮北，水土变了，条件变了，环境变了，由此可见环境的重要性，故俗语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之所以择芳邻三徙其居，正是这个道理。（张增兰）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淮阴侯列传》）

空中飞的鸟儿被打尽了，好弓就要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被打死了，猎狗就要被煮着吃了。这是蒯通说韩信谋反的一段著名的话。它揭示了封建帝王与臣子之间的利用关系。后来韩信没听蒯通的劝说，果然在全国平定之后，死于吕后之手。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汉书·京房传》）

将来看现在，就象现在看过去。时间永远流逝，今天是"过去"的"将来"，又是"将来"的"过去"。

树欲静而风不止。（《孔子家语·致思》）

树木想要安静时，风却吹个不停，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季平）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日月轮回，季节更替，万物生生死死，这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规律。作者语含赞许，用"不言""不语"表示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表达了他对自然的崇拜与敬仰之情。（李雪枫）

成事在理不在势。（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

办事要讲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

的统一，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认识、驾驭的基础上。如果违背规律，要依靠“威势”强制实行，那就不免会象“以斧劈薪”而“不循其理”，结果是“斧可缺，薪不可破”。　（王　端）

治　国

一、为　政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周易·系辞下》）

处在和平环境不忘记危难的时候，国家兴旺发达的时候知道有被消灭的危险，天下大治的时候不忘记大乱时的教训。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尚书·洪范》）

王道，指国家的治理之道。执政者在处理问题时不偏颇，不营私，那么你的用人之路就宽广，大小事情就能处理得井然有序。执政者作风正派，上下就能团结一致，从而使国家大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王一娟）

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

众人的愤怒是不能触犯的，独断专行欲望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做事顺民心，从众意，才能长治久安，专制统治是难以持久的。　（周季平）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

居安思危是古今善治国者必备的素质之一。既然对危难有所考虑就必然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所准备，这样，一些不利于国家安定的因素就能在刚露苗头的时候得到制止，从而保证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王一娟）

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这是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所说的一句话。作为著名政治家，子产是深得治国执政之三昧的，所以主张用开诚布公的忠善行为消除怨言，而不提倡用威胁恫吓的恐怖手段来防止怨言。为执政者当谨记此语。（蒋馥香）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

一个国家思想舆论的自由程度，往往显示出它的进步水平。郑产能不毁乡校，观风俗而知得失。百姓即使言论有所不对，也应加以疏导。而如厉公之流，妄想依靠专制暴政，抑制人们的思想，堵住他们的嘴巴，实际上，真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

（王　端）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论语·子路》）

自身行得正，不下命令，部下也会自觉地行动；自身行不正，即使下令，部下也不会服从。领导自身的行为，对于部属来说，常常是无声的命令，是比言辞指示更有力量的命令。

（周季平）

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荀子·强国》）

一个国家当它灭亡了的时候，才知道灭亡的原因，正象一个人，临死时才知道他为什么而死，而这时一切都晚了。治理国家要时刻留心于每一件小事，“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等到出了漏洞再去补，就有些危险了，政业荒废，国家就必然灭亡。

（王一娟）

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荀子·君道》）

采用水源的清浊与水流的关系，说明了君道之清对于社会的作用。只有正本清源，才能使水流恢复清的面目，这实际上讲的是为君之道。

（宁志荣）

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身居高位，必有人投其所好，以求得到赏识。故居高位者，一定要慎其所为，应发扬好的方面，克制坏的方面；追求倡导积极向上的，排斥杜绝消极病态的。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尽量克制一己之私欲。

（王　端）

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

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治乱存亡了。而国家的兴亡又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引发的。如果能做到明察秋毫，那么在大的问题上就能够不犯错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一个国家来说，防微杜渐是很重要的。

（王一娟）

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管子·形势》）

此两句以天上多有稠云浓雾遮蔽则日月不明，以地多阻隔则高山受遮挡的自然现象来比喻君主周围多有小人则君主受惑。设喻形象而警策，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马现诚）

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列子·说符》）

这句话看似平淡朴实，实则寓意深刻，怎样治理国家，古今帝王、英雄人物莫不思之、慎之。但能真正做到知贤的却不多，因此要求统治者能知人善任，的确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吕晓庄）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

商鞅以大胆变法垂名青史，其《更法》篇屡陈变法之术，如“当（适合）时而立法，因（根据）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有利）国不必法古”。极力主张强国利民务必审时适变，反对因循守旧，表现出破旧立新、勇于改革的精神。

（娄剑云）

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

（《礼记·乐记》）

用寒暑不合时令人就容易生病，来说明为政之道必须适时。用风雨无度就要发生饥荒，比喻政治的施行一定要调节有度。天地之道有其内在的规律。人们必须依照内在的规律行事。

（宁志荣）

无常安之国，无宜治之民。得贤者安存，失贤者危亡。（《大戴礼记·保傅》）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老百姓也不都是很容易统治的。如果当权者能够任人唯贤，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反之，就有灭亡的危险。

（王一娟）

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史记·魏世家》）

这是魏国大臣李克教魏文侯的话。是说家境贫穷之时就想娶得贤慧的妻子；国家混乱之际就想得到贤良的宰相。家、国对举，告诉人们贤妻在家庭生活的不容忽视的地位；以家比国，则又更通俗而有力地说明得贤相之重要。

（姜剑云）

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引谚语）

枝条大于树干，小腿大于大腿，就是不折断也一定要分裂。此条主要是针对汉初诸王侯力量过于强大，"枝大于本"的状况而发，指出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周季平）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传》）

这句话旨在告诫统治者不能以打天下的方法治理天下。仅以"马上"二字便表达了戎马倥偬的生涯及场面，全句没有使用"天下"、"国家"等词，而其意自明，并且用疑问的方式使反诘语气贯穿全句，有很强的感染力。

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桓宽《盐铁论·非鞅》）

内因决定外因，外因不能起决定作用。微子、箕子数谏纣王，纣王仍一意孤行，致使商亡于周，这就象扁鹊虽然医术高明，但不能让枯骨附肉再生一样。

（吕晓庄）

怨生于不报，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蚤豫，存亡在于得人。（刘向《说苑》）

这既是说的做人的道理，亦是治国的方略。别人对你有怨恨，是因为你没有回报人家的好心或恩情；耽于享乐不思进取，必然会招致灾祸。一个国家的安危完全取决于当政者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陷入困境是因为早有准备，而国家存亡的关键在于要拥有贤才。

（王一娟）

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淮南子·主术训》）

上多有变故则下多有奸诈之态，上政事冗杂繁乱则下不知所从，上多所欲求则下为利纷争不已。这种认为"政苛则民乱"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批判现实意义。

（马现诚）

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孔子家语·入官》）

如果想使自己的施政方略很快得到执行，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身作则。如果想要让老百姓心悦诚服地听从领导，最好是用道义来说服他们。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他对道义是极为推崇的。（王一娟）

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孤塞之政，亡国之风也。（《后汉书·申屠刚传》）

秦始皇施暴，遂亡有秦，周厉王弥谤，终失其国，历史上行"孤"、"塞"者，无有不亡国灭族的。凡统治者切勿行此政，否则亡国之日不远矣！（吕晓庄）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北伐，怕后主被小人所困，故上此表，阐明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受命于危难之时，而要成兴汉之大业，则自家的后院千万不能起火。（王 端）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势动者不可以争竞扰。（干宝《晋纪·总论》）

"道"是与"器"相对而言的，指超越具体事物而存在的规律或法则，即《易·系辞上》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干宝认为治国之道在于认识其规律，因势而变，顺其"道"而治之。（马现诚）

幸无外难而内自相击，是避坑落井也。（《晋书·褚裒传》）

没有外来的灾难，是值得庆幸的，但内部却自相攻击，这如同避开了坑坎又落进了陷井一样。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内讧比外患更为可怕。（周季平）

朝华之草，戒旦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萧绎《金缕子·戒子篇》）

初发的芳草虽艳嫩荣茂一时，然而旦夕之间便会枯谢凋零；唯有松柏能历经严冬而犹枝叶繁茂，长青不衰。作者以此劝诫儿子注重德行的修养，保持坚贞高洁的志操，切莫追逐浮华的虚名。（马现诚）

构大厦者先择匠而后简材，治国家者先择佐而后定民。（《意林》引《物理论》）

构厦、治国虽事情大小不同，但处理方法及道理是一样的。此句以小喻大，由浅及深，生动地说明了治国先求人才的重要性。（吕晓庄）

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新唐书·魏徵传》）

三个排比句强调了一个"思"字。经常考虑可能导致国家危险的因素，就能够防止危难的发生；知道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而加以防范，国家就平安了；思考国家灭亡的原因并吸取教训，就不会有被颠覆的危险。阐述了安危、治乱、存亡之间的辨证关系。（王一娟）

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欧阳修《为君难论下》）

花言巧语总是使人迷惑，也很动

听，却未必真的有用；质朴的忠言，直切肌肤，却往往使人不爱听。这并非听人之言有多难，关键在于听人言者本身要明察秋毫，分辨真伪。

（杨　文）

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苏轼《思治论》）

国家的财力不雄厚，则百姓穷困潦倒；军队不强勇，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官吏不能择优录用，国家必然会混乱无序。这三者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灭亡。

自其所当先者为之，则其后必举；自其所当后者为之，则先后并废。（苏辙《上皇帝书》）

做事情应分清主次，有先有后，治国更应如此。如果先从重要的事情做起，那么其余的事情也就随之解决了。反之，就会把事情办糟。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牵牛要牵牛鼻子"的道理。

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终不可久。（苏辙《上曾参政书》）

得与失，安与危相辅而相成。只知道有所得而不知有所失；只知道从别人那里掠夺财富，却不知道已经失去了比财物更宝贵的东西；只知道活着，却觉察不到被别人消灭的危险。如此治国终不能长久。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原君》）

做国君的不应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应该以普天下老百姓的共同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急天下人之所急，乐天下人之所共乐。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是作者理想中的君王形象，体现了黄宗羲的政治主张。（王一娟）

二、民　本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国语·国语中》引《尚书》语）

民众可以亲近却不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体现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纲领。（周季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尊敬我的老人，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我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这是孟子对"推恩"思想的具体阐述，他认为"推恩"是保民而王的必由之路，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局限性，但它展示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李雪枫）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上》）

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膘肥体壮的马；百姓却面有菜色，田野上有饿死的尸体。

孟子从民本思想出发，揭露了"庖有肥肉"，"野有饿莩"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治易；民贫，则治难。（《管子·治国》）

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要先使民

众富裕。民富，治理就容易，民贫，治理就困难。管子强调了富民在治国中的首要地位。（周季平）

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国益大。（《管子·霸言》）

国虽大而为政者无为霸之谋略，国终必随其政亡而亡；反之国虽小而为政者富有为霸之远略，国必随其政强大而强盛。成霸之道在于重视人心的向背："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国固。"这体现了进步的民本思想。（马现诚）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

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愉快的晚年；青壮年能够学有所用；儿童能够健康成长，矜寡孤独废疾的人都能够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供养；这实际上是理想化了的上古原始社会的生活图景，但它也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所处社会广大人民的愿望。而这种"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人。（李雪枫）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

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与否，民心的向背是重要标志。而民心所向又往往能从音乐中显现出来。音乐平和、健康、积极向上，必是政通人和；音乐狂躁、散乱，定然人心不一，社会动乱；待到靡靡之音出现，社会已走向崩溃的边缘，亡国指日可待。"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为政者读此，能不怦然心动?!（落馥香）

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三国志·魏书·杜畿传》）

一个国家犹如人的身体，腹心健康，即使四肢有病，也不会有大的危害。说明治国之道在于安民丰财，务本节用。（马现诚）

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刘向《说苑·尊贤》）

国家不贪大，而要力求得到民心；辅佐的人不在多，而要力求贤才俊士。民心为一国之本，有民心则国不大而可强。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希望树木长得高大的人，一定要使它的根部长得稳固；希望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泉头。治国的根本在于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

（肖　星）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吴兢《观政要·政体》李世民语）

唐太宗李世民一代枭雄，而成为开国之祖，其贞观之治，启盛唐之世，自然深得治国安邦之三昧。栽树首要是固根，根深则叶茂，大而用之于治国，统治者制定政策便有所本。

（吕晓庄）

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苏洵《审敌》）

苏洵针对北宋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在《审敌》中提出兴邦安国抵御强敌攻掠的策略，认为富国强兵为本，向辽屈辱求和为末，劝诫宋统治者要忧劳于求本而舍末。讥时之弊切中要害，"皇皇有忧天下心。"（雷简夫《上韩忠献书》） （马现诚）

三、教　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

好的政治不如好的教育得民心。政治和教育固然不是对立的，但孟子把教育的地位提到这样的高度，倒是值得今人深思的。 （肖　星）

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韩非子·显学》）

这句话包含着辩证思想：严格要求才是真正的爱护；过分慈爱则会事与愿违。这对于当今独生子女的父母和祖辈，颇有借鉴的意义。至于所谓"严家无悍虏"，则是韩非那个时代不平等观念的反映，应予批判。

（李正民）

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

教师受到尊重然后知识才能受到尊重。知识受到尊重然后人们才会重视学习。古人这一段有关师、知、学相互关系的精辟论述，值得今天的决策者细细品味。

孤犊独乳，骄子骂母。（《后汉书·仇览传》）

过于溺爱独生子女，只会助长他们的骄恣，结果是反受其害。

磓砧者，夷不平也；榜檠者，矫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列子·贵言》）

垫着砧板捶打，是为了打平凹凸不平的地方；加力压迫檠（辅正弓弩的器具），是为了矫正不应当弯曲的地方；讲述善美的言论，是为了让恶人改过自新。运用类似诗歌比兴的手法，形象地说明要重视和善于用教育的手段来改造人。

夫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而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上》注语）

老百姓衣食不足就没有闲心去讲究礼义，解决了温饱而没有教育，又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了。

善者一日不教，则失而入于恶；恶者勤而教之，则可使至于善。（欧阳修《答李诩书》）

好人如果一天不教育，就会失足而堕落成坏人；坏人如果经常教育，就会使他变成好人。"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李觏《广潜书》之十五）人品的好坏，关键在于后天的教育。

水之不涸，以其有源也；木之不拔，以其有本也。（石介《题郓州学壁》）

水之所以不会干涸，是因为它有源头；树之所以不能拔出，是因为它有根本。比喻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于教育。 （肖　星）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宋·胡瑗《松滋县记》）

教化：教育培养。从致天下之治开始论起，以引起当权者的注意，最后归结到办学校上，其重要性不讲自明。（牛贵琥）

遗子黄金满赢，不如教子一经。（朱舜水《益广》引古人语）

给儿子留下满箱的黄金，不如教他学会一部经典著作。知识比黄金更珍贵，黄金用尽不会再生，而知识是终生享用不尽的。

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舜水《劝兴》）

重视教育劝勉治学，是建设国家的根本；发现贤士培育人才，是治理政事的首要任务。（肖　星）

四、法　制

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尚书·泰誓下》）

培养德行必须使其不断增长，剪除邪恶必须干净彻底。《左传·哀公元年》："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

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管子·版法》）

不因个人欢喜而行赏，不因个人恼怒而擅杀，做不到这两点，就会民怨四起，制定的法令也就失去了权威。

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荀子·君子》）

处罚与罪行相当，那么刑法才具有权威，与罪行不相当，就是对受罚者的侮辱；爵位与德才相当，那么这个爵位才是珍贵的，不相当就是卑贱的。

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主道》）

确实有功，那么即使是关系疏远、地位卑微的人也必须奖赏；确实有过，那么即使是关系亲近、特别喜欢的人也必须杀掉。"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左传·昭公五年》引周任语）"古之善为国者，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王勃《上刘右相书》）（肖　星）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对罪过处以刑罚，既使是大臣也不回避，对善行加以奖赏，既使是百姓也不遗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古即有之。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韩非子·饰邪》）

家有较固定的职业，虽遇荒年也不会饿死；国有较固定的法令，虽然危急也不会灭亡。古人把有无法制，提到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确实很有见识。（周季平）

农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贤者之治，去害义者也。（《尸子卷上·怒》）

农夫手中的锄头，用来铲除危害禾苗的杂草；贤君治理国家的工具，用

来翦除危害道义的恶人。“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善于掌握局势的执政者，就是要尽早杜绝产生奸邪的苗头。《后汉书·陈忠传》中说：“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如果对穿壁越墙的盗窃行为不加禁止，就会导致明火执仗的强盗。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

不符合法令的言语不听从，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凡事以法为唯一准绳，这是避免个人意志强加于国人的根本途径。

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商君书·开塞》）

执行法律的任务没有比翦除奸邪更要紧的，翦除奸邪的根本没有比严格刑罚更关键的。《管子·明法解》中说：“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对奸邪的打击，就是对贤良的保护。古人表述类似思想的还有：“养稂稗（稻田害草）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民。”（王符《潜夫论·述赦》）“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桓宽《盐铁论·后刑》）

（肖　星）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药，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

时态局势有异，变改法制便理所当然。好比治病，得对症下药，否则，同样一剂药，从前可使人长寿，而今就可能使人丧命！药与病的关系从正面说明必须随着时世的变化不断革新法制的重要；寿民与殇子的对比，从反面强调怠惰或守旧、不敢或不愿变法的危害。（姜剑云）

夫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王符《潜夫论·述赦》）

国家不会总是安定，也不会总是动乱。法令得以实行国家就安定，法令松驰不严国家就动乱。（周季平）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桓宽《盐铁论·后刑》）

俗语有“一块臭肉坏了满锅的汤”，说的是恶的东西虽然不多不大，但造成的危害却是无穷的。警戒人们不要忽视“一害”“一恶”，要及时杜绝。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张增兰）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为国尽忠有利于时事的人，即使是仇敌也必须奖赏；触犯法律轻慢国家大事的人，即使是亲属也必须惩罚；服罪并承认自己过失的人，即使罪行重也必须宽释；花言巧语掩饰罪行的人，即使罪行轻也必须重办以至杀戮。

（肖　星）

世之专于法者，不患于不通而患于刻薄。（欧阳修《剑州司理参军董寿可大理寺丞制》）

法家秦皇严刑峻法终不能长治久安，直至官逼民反；儒家以仁治天下，



法为手段，不作目的，重内服甚于外服。所以欧阳修认为，世上官操法柄的人，莫担心他不能通晓科章条令，只怕他太苛刻冷酷。这是对“学法入官”的董寿的训诫，也是对所有执法者敲的警钟。　（姜剑云）

断蛇不死、刺虎不毙，其伤人则愈多。（苏轼《读欧阳子朋党论》）

俗语曰：“斩草要除根。”对待恶势力，不能心慈手软，不能留下后患，要一举消灭干净。若不这样，造成的危害将更多更大。断蛇、刺虎的垂死反扑，其毒其狠，将是难以估量的。

（张增兰）

凡为天下国家，当爱惜名器，慎重刑罚。（苏轼《转对条上三事状》）

宋哲宗元佑三年，苏轼为革除弊政向哲宗直言上书，就广开言路、科举弊端及冗官等问题陈述己见。他认为君主应爱惜其位，躬奉天下，慎重刑罚以严明法禁，“若爱惜名器，则斗升之禄足以鼓舞豪杰，谨重刑罚，则笞杖之法足以震詟顽狡。”（马现诚）

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王通《文中子·立命》）

奖赏一人来勉励百人为善，惩罚一人来劝诫众人避恶。赏和罚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明辨是非，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肖　星）

五、经　济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

加强农业生产，并能节约费用，即使有天灾也不会贫困；不发展农业生产反而还奢侈浪费，即使风调雨顺也不可能富有。

“本”的概念，在我国封建社会，主要指农业生产。尽管几千年过去了，我们国家仍是个农业大国，所以，荀子的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牧民》）

凡有土地养活百姓的，就务必抓住农时，并要守卫好粮仓。中国是个农业国，所以，管子在这里强调了“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的重要性。其实，也就是强调了经济生产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粮仓丰实百姓就知晓礼节，衣食丰足百姓就懂得荣辱。

用今天的道理来讲，物质文明是第一性的，精神文明是第二性的。即使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恐怕还是要有所侧重。

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牧民》）

努力耕种五谷食物就充足，养蚕种麻、饲养六畜，百姓生活就能致富。

市者，可以知贵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管子·乘马》）

做买卖的人，可以知道贵贱，可以知道多少，但不能增加或减损财富。商业只能使商品流通，而不能生产商品。意在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

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子·权修》）

守卫土地关键在于城池，守卫城池关键在于兵器，用兵器守卫要靠人，用人守卫要靠粮食。逐层推演，论证了粮食的重要性。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欲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管子·侈靡》）

饮食和享乐，是人民所希望的。满足他们的希望，供给他们所期待的，就能使用他们了。

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管子·版法》）

（治理国家时）使用钱财不可以吝啬，（让百姓）出力不可以太苦。用财吝啬（百姓）就要反抗，出力太苦，就会伤其元气。治理国家，高度重视群众生活，悉心体察百姓疾苦，这是最根本的。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义赏》）

放干了池水来捕鱼，岂能捕获不到，但是第二年就会无鱼可打。烧光湖上的草来打猎，岂能捕获不到，但是第二年就会无兽可猎。

人们往往容易急功近利，贪图眼前所得而忘记长远利益。因为"竭泽而渔"、"焚薮而田"而使经济徘徊不前，我们的教训还少吗？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书·食货志上》引古语）

一农不耕种，百姓中有的人就会因此受饿，一女不纺织，百姓中有的人就会因此挨冻。经济生产，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量粟而舂，数米而炊，可以活家，不可以治国。（《淮南子·诠言训》）

量着谷物来舂捣，数着米面来做饭，可以养活家小，却不能够以此来治理国家。治国与养家，虽有相通之处，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治理国家要有长远的打算和雄厚的储备，这一点和"量粟而舂，数米而炊"的养家之道是有不同的。

食者，民之本也。（《淮南子·主术训》）

饮食，是老百姓生活的根本。"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三国志·魏书·华歆传》）要让国家的根基安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重要的。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

凭借国家的人力，来创造国家的财富；取用国家的财富，来供给国家的花费。

这是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治国理财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意在强调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周季平）

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苏轼《策别十八》）

苏轼在文章中对“三计”做了进一步阐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为长久之计，如是则“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一时之计为“一岁之入才足为一岁之出”，“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不终月之计则是“量出以为入”，苟活于天下晏然之时，“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故只有长远计划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王一娟）

世　事

一、世　态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左传·桓公十年》）

一个普通的人无罪，然而一旦他怀藏美玉就有罪了。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往往活得很舒坦，而一个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却往往会招来各种各样毁谤。（肖　星）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庄子·让王》）

魏阙，代指皇宫。指一些人虽隐身于江海之上，心却惦念着皇宫。此语以身、心相对，江海、魏阙相对，刻画了中国古代文人“儒道两栖”的假隐士形象，他们是为仕而隐，欲走一条由隐而仕的终南捷径。（张增兰）

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商君书·更法》）

不但超人的品性、智慧为世所不容，就是其他方面你有过人之处也不行，这也是一种平均主义，大家一块昏昏沌沌过日子。而问题的另一面是：社会的进步，需要一大批高人之行者和有独知之虑者，同时，社会对他们也应该多一些理解与帮助。（王　端）

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荀子·君道》）

美女的容貌，对丑陋的人就是灾祸；公正的士人，在众人眼里就成了痤疮。“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韩愈《原毁》）社会如果不能抑制嫉贤妒能的恶劣风气，就不容易涌现一大批栋梁之材。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吕氏春秋·审分览·知度》）

在最安定强盛的社会里，百姓不喜爱空言虚辞和不正派的学说。当大家都全身心地投身于为社会奉献的事业中去的时候，就不会再有精力去顾及歪门邪道了。然而，关键在于社会怎样才能具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

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慎子》内篇）

家富，连远亲也会找上门来；家

贫，连亲兄弟都闹分家。真可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水浒传》第三十七回）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可憎，可厌，可叹，可悲。

未得兽者，惟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惟恐伤肉之多也。（《淮南子·道应训》）

没有捕获到野兽，就怕它的伤口太小不能致命；一旦捕获到了，又怕伤口太大兽肉烂得太多。　（肖　星）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东观汉纪·张纲》）

豺狼，指的是专擅权柄之辈，此指大将军梁冀及其弟梁不疑。狐狸是比喻奸猾小人。既然是奸邪当权、坏人得势，那么朝野上下一片黑暗也便不言而喻了。封建政治的污浊腐朽，历来如此！　（姜剑云）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李康《运命论》）

作者所阐述的高人必受毁之论，虽有宿命论色彩，却显现着历史的真实。由此可看出我们整个民族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精神弱点是：不让别人出头。那些历代的开拓者，绝大多数都作了悲剧的主人公。　（王　端）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典论·论文》）

文人之间互相轻视这种自古而然的积习，如果永恒不变，那倒真是社会的悲哀。其实，掌握了象征人类文明的科学知识的文人，理应比一般人更大度，达观，宽容。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皮日休《鹿门隐书》）

古时候杀人，明火执杖；现在杀人，笑里藏刀，文明和虚伪，往往是同步发展的。

古之俭也，性，今之俭也，名。（皮日休《鹿门隐书》）

古时候的俭仆，是人们的本性；现在的俭仆，只是一种虚名。原始的野性往往带有天然的质朴，比起刻意雕琢的现代时尚来，更让人感到亲切、可信。

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李贽《焚书·又与焦弱侯》）

名义上是山中隐士，心里却象商人那样想着赚大钱，满嘴仁义道德，却一心要穿墙越壁去偷盗。趋附时尚，言清行浊，表里不一，是流行于社会的一种恶习，社会活动如果仅仅是一场假面舞会，那么，这个社会就谈不上什么文明和进步。　（肖　星）

二、善　恶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周易·系辞下》）

善不积累增多不能名就，恶不积累增多不能身败。功成名就和身败名裂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然而积善难而积恶易，要坚持一辈子做好事，也要认真地避免每一件坏事。

从善如流。（《左传·成公八年》）

跟随好的行为就象顺流而下那样快速。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下》）

从善象登高山那样难，从恶象山倒塌那样容易。学好难学坏易，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有体会的，所以，要完善自己，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而对不健康的观念和习性，则要防微杜渐。（肖　星）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

这是曾子问病时说的一句话。或许生命的最后一瞬才显示生命本身的价值，所以不论是动物还是人，在这一刻都将无限的悲哀、憾恨和善意表达出来。（杨　文）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

君子总是促成别人的好事，而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正好相反。

与人为善，往往反映一个人有良好的自身修养。成人之恶，则往往是一个人缺乏修养、道德败坏的标志，对待他人，还是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宽容为好。（肖　星）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子·离娄上》）

俗语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孟子从他的"性善"论出发，认识到清澈的眼光昭示了其内心的纯正善良；而胸中不正之人，其眼光则是浑浊不清的。这句名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种情况，但并非都这么简单而且直观。（张增兰）

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礼记·儒行》）

听到善要相互告知，看到善要让人知道。善，不仅要成为自身修养的准则，还要发扬光大，使之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君子之所贵者，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徐干《中论·虚道》）

君子可贵之处，就是从善惟恐达不到标准，去恶惟恐不够彻底。在善恶问题上，宽以待人和严以律己是加强个人修养的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善积者昌，恶积者丧。（《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积累善行的人必然昌盛；恶贯满盈的人必然灭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行德，必然众望所归，作恶多端，尽管可能得势于一时，日久必然众叛亲离，得到报应。

闻善若惊，疾恶如仇。（孔融《荐祢衡表》）

听到好人好事，要象吃惊一样受到震动；见到坏人坏事，要象对待仇人一样憎恶。"闻善若惊"，是指一个人在看到自己不足时，一定要激励自己努力赶上；而"疾恶如仇"，则是要求一个人有正义感，不能浑浑噩噩地作老好人。

从善如转圜，遣恶如去仇。（《列子·贵言》）

顺从善就象围着圆转（喻不断完整），消除恶就象离开仇敌。不疾恶如仇，恐难从善如流。

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韩

愈《送孟秀才序》）

善事，即使对我没什么好处，我也要努力赞助；恶事，即使对我没什么害处，我也要努力抵御。扬善惩恶，是一种社会责任。

嫉恶如仇雠，见善若饥渴。（韩愈《举张正甫自代状》）

对恶如仇敌一样痛恨，对善如饿而求食、渴而思饮一样迫切。

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贞观政要·任贤》）

阻遏浊水，拓宽清水；痛恨恶事，喜好善事。

闻善不慕，与聋聩同；见善不敬，与昏瞽同。（柳宗元《送从兄称罢选归江淮诗序》）

听到善事而不仰慕，与耳朵聋了没有两样；看到善事而不敬重，与眼睛瞎了没有两样。 （肖　星）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水，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

此语形容罪恶极大极多，无穷难尽。罪恶本是无形的东西，也是难量的，这里却用南山之竹、东海之水形象地表达出罪恶极大极多，无穷难尽的程度。 （张增兰）

三、毁　誉

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之则成虎。（《战国策·魏策二》）

市场上没有老虎，这是很显然的事情，但要是有三个人坚持说有，那就真会使人相信有虎了。流言重复多遍，有时就能使人迷惑。史书记载，曾参志高行洁，居郑国时，有一同姓名者杀了人，有人告诉曾母"曾参杀人"，曾母不信仍继续织布，到第三人来告诉时，她立即投杼下机而逃。"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曹植语）。流言可畏，在于可以乱真。

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孟子·离娄下》）

说别人的坏话，等到有了后患时又该怎么办呢？背后毫无原则地随便谈论人，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以害人开始，必将以害己告终。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众人饶舌，可以使金属熔化；诽谤堆积，可以人骨销熔。人言可畏，流语杀人。 （肖　星）

众口之毁誉，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为曲。（陆贾《新语·辨惑》）

流言与舆论之所以有"浮石沉木""以直为曲"的魔力，显示了汉民族群体意识的绝对权威地位。判断一个事物或事理正确与否的标准，并不视其与真理的接近程度，而是看它是否符合群体意识的认可，真是认识论上的悲哀！ （张增兰）

君子不畏虎，犹畏谗夫之口。（王充《论衡·言毒篇》）

君子不怕猛虎，只害怕专门搬弄是非之人的那张嘴。

救寒无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魏志·王昶传》）

抵御寒冷最好是穿上厚厚的皮

衣；制止诽谤最好是洁身自好。自修以止谤，固然不失为好办法，但多少有点消极了。制止诽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揭露它，把它放到事实面前，使它无法存在。

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与其在人前得到赞扬，不如不被人背后诋毁。当面奉承，背后诋毁，此乃天下第一等小人之品性，但是，比较起来，还是背后诋毁更为恶毒，因为毕竟是明枪好防，暗箭难躲。

（肖　星）

谗口交加，市中可信有虎；众奸鼓衅，聚蚊可以成雷。（程允升《幼学琼林·人事》）

市中本无虎，人人皆言有，谎言三遍便成为真理；蚊蝇至小，声音极微，若集聚起来，便有雷声之大。这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桥梁，便是人言，真是人言可畏！（张增兰）

四、爱　国

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语）

先考虑国家的危难，后考虑个人的仇怨。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所表现的那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质，仍不失为今人的楷模。

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汉书·陈蕃传》）

堂堂男子汉活在世上，就应当以清除天下的污垢为己任，怎么能只做打扫一厅一室的事呢？一个人立志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点。

枕戈待旦，志枭逆虏。（《晋书·刘琨传》刘琨语）

枕着武器，等待天明，立志要消灭凶恶的敌人。刘琨，晋朝将领和诗人。年轻时，与祖逖友善，共同立志要驱逐强敌，复兴祖国。后来，当祖逖领兵北伐，收复中原失地时，刘琨极为振奋，写信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信中就写有上面的话，抒发自己爱国的豪情。（肖　星）

能扶天下之危者，必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必享天下之乐。（杨炯《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只有使国家转危为安解除国家的忧患，自己才能安居乐业。这是儒家积极入世主张的体系，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异曲同工之妙。（王一娟）

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韩愈《论今年权停选举状》）

纯正信实的志士，刚直不阿的忠臣，为国家担忧就要象为自己的家一样。韩愈在另一篇《上李尚书书》中说："赤心事上，忧国如家"，认为"忧国如家"是赤胆忠心侍奉君王的具体表现。这里规定的虽是封建士大夫的道德标准，然而其中体现的爱国精神，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的名句。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为天下国家的忧患而忧虑，要先于天下之人；而享受天下人间之欢乐，则要后于天下之人，这种境界，永远是为人最高的境界。

（周季平）

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苏洵《管仲论》）

贤德之人不会为自己身死而悲伤，只会为国家的衰微而忧愁，忧国，也是个人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

忠臣体国，知无不为。（苏轼《答李琮书》）

忠臣体念国家大事，凡是知道的就要全力以赴地去付诸行动。为国为民，就应尽心尽力，不能有丝毫保留。

（肖　星）

贤者报国之功，乃在缓急有为之际。（苏轼《答试馆职人启》）

国家求贤之道必于闲暇无事之时，贤者应志在报国于危急之刻，而不要唯图“学优而仕，行浮名于辞令。”寥寥数语体现了苏轼以国事为重的风范。

（马现诚）

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张居正《答上师相徐存斋》之一）

堂堂男子汉既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知己，那么只有勤勤恳恳忘我奋斗，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为国家，为他人，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戴震《与某书》）

君子降临生存于人世，可以不被启用，一旦启用，就要让政治清明，国家安定。

（肖　星）

附录

古代散文研究论文索引

(1905—1989)

本索引分成概论和专论两个部分。概论部分以总体研究、分体总论（如传记文、游记文）以及辞赋、骈文、八股文等先后排列，同一内容，以论文发表时间先后排列。专论部分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近代）五个时期，每个时期均包括两个内容：其一为散文研究的总论；其二是作家作品研究。总论部分以时代先后为序，时代相同，以论文发表时间先后排列；作家作品研究部分，以研究对象的时代为序，同一个作家作品，以论文发表的先后为序。

本索引主要参用了《文学论文》索引（刘修业等人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全国报刊索引》以及多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并在上述索引的基础上，翻阅了许多有关资料，增补了一些内容。

一、概　论

论文杂记　（刘光汉）国粹学报1卷4—10期（1905）

文章源始　（刘光汉）国粹学报1卷1期（1905）

论文章原流　（田北湖）国粹学报1卷2—6期（1905）

论文琐言　（章廷华）国学1卷3期（1915.6）

与人论文书　（刘师培）中国学报5期（1916.5）

文笔词笔诗笔考　（刘师培）中国学报1期（1916.1）

文笔说　（王肇祥）国故1期（1919）

文说五则　（刘师培）华国1卷7期（1924.3）

散文的分类　（王统照）晨报副刊1924.2.21—3.1

治古文之意义与价值　（佚名）学灯1924.5.12.

文笔辨　（胡怀琛）小说世界14卷7期（1926.8）

论说出于纵横辨　（胡怀琛）小说世界14卷20期（1926.11）

文章体变及韵文的流衍　（徐瑞玢）东北大学周刊3期（1926.10）

散体文正名　（陈衍）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6）

散文与韵文　（李濂、李振东）北新半月刊·

2卷12期（1928.5）

文笔辨 （钟应梅）厦门大学文科半月刊1期（1928.12）

古文之研究 （钟秀峰）东北大学周刊73期（1929.5）

文笔与诗笔 （郭绍虞）睿湖2期（1930.10）

文章新论 （须尊）鞭策周刊24、25期（1932）

文章学纲要序论 （顾实）国学丛刊1卷3期（1932.9）

论文管见 （瘦堪）青鹤1卷18、19期（1933.8）

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韵文之变迁 （侯封祥）北强1卷5期（1934.10）

中国散文引论 （朱维之）协大艺文3期（1936.1）

谈古文 （启元）北平世界日报明珠（1936.10.9）

文章原始 （徐英）安雅1卷11、12期（1936.5）

石遗室论文 （陈衍）国专月刊3卷4期（1936.5）

文体流变表说 （徐英）安大季刊1卷2期（1936.4）

唐代以前的散文 （姜亮夫）青年界10卷1期（1936.8）

古文辨 （沈心燕）文学年报3期（1937.5）

文笔再辨 （郭绍虞）文学年报3期（1937).5）

骈声阁论文 （林彦博）古学丛刊5、6期（1939.11—1940.7）

阅读古文的方法 （张清常）国文月刊15—17期（1942.9—11）

论"文" （唐文播）学思3卷7期（1943.4）

历代文体的沿革 （王治心）大众12期（1944.12）

文体举要 （夏仁虎）国学丛刊14期（1944.7）

散文之发展与变易 （张须）国文月刊62期（1947.12）

说文笔 （逯钦立）史语所集刊16本（1948.1）

文笔新解 （王利器）国文月刊73期（1948.11）

古文 （王平）语文学习（1957.3）

散文与骈文的区别 （启动）文艺学习（1957.4期）

重视我国古典散文的研究工作 （王运熙）文汇报（1961.3.22）

开展古典散文的研究 （来之）光明日报（1961.4.23，文学遗产360期）

略谈散文传统中的"神理气味" （徐宗涛）天津日报（1961.4.5）

散文杂谈 （郭预衡）光明日报（1961.3.14）

古典散文的范围问题 （霍然）光明日报（1961.5.21，文学遗产314期）

略谈我国的散文传统 （郭预衡）中国青年报（1961.6.17）

尚用与尚简——谈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 （陈东阜）天津日报（1961.6.20）

关于研究古典散文的几点意见 （悲园）光明日报（1961.7.23，文学遗产373期）

古典散文研究的两个问题 （江丸）光明日报（1962.3.4，文学遗产404期）

关于散文的范畴 （潘辰）光明日报（1962.3.4文学遗产404期）

试谈继承古典散文传统 （晦之）长江文艺（1962.4）

说散文 （徐迟）长江文艺（1962.4）

散文的思想和文采 （李蕤）长江文艺（1962.4）

关于古典散文研究二三问题 （铁民等）光明日报（1962.12.2，文学遗产442

期）

论中国原始文学 （公木、杨公骥）文学丛刊（1、2辑）

散文与骈文 （徐迟）光明日报（1978. 5. 21）

散文艺术漫谈 （魏不一）山西大学学报（1978. 1期）

我国古代散文的特色和优良传统 （陈祥耀）福建文艺（1979. 4. 5期合刊）

略谈古代散文的特征、分类和源流 （章明寿）淮阴师专学报（1979. 2）

散文小史 （赫然）书评（1979. 4期）

漫谈古典散文 （施蛰存）语文教学通讯（1980. 6期2页）

传神写照，精光四射——介绍古典散文刻划人物的几种手法 （姜光斗等）散文（1980，10期44页）

古文中常见的几种文体 （王谦）语文学习（1980，8期54页）

对编选文言散文选本的意见 （辛安亭）甘肃师大学报（哲社）（1981，3期86页）

倾向鲜明，手法婉曲——介绍古典散文显示倾向性的艺术手法 （姜光斗等）散文（1981，2期39页）

我国散文传统特色论略 （常康）内蒙古师院学报（哲社）（1981，2期96页）

介绍一本古人编的短文集 （东方既白）新观察（1981、17期23页）

古典散文中的联想 （汤国铣）写作（1981创刊号28页）

古典散文的"文眼" （郭伯勋）写作（1982，1期7页）

四围皆奇景，天地作回声——我国古典散文景物描写的空间化特征 （李沐沂）写作（1982，6期42页）

试论古文中的插叙 （章秋农）杭州师院学报（社科）（1982，3期89页）

试论我国散文的民族风格 （常康）宁夏大学学报（社科）（1982，3期27页）

初探古代散文的意蕴（之二）——简析古文十篇 （李伯英）福清师专学报（1982，1期47页）

古代作家写短文的技法初探 （张嘉勋）写作（1982，2期29页）

古代散文的章法 （章明寿）淮阴师专学报（社科）（1982，1期43页）

"散"字艺术三味——漫谈古典散文的艺术特色 （蒋凡）文学月刊（1984期24页）

试论古代散文的特点和范围 （谢楚法）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4，2期47页）

片言出妙境，警策显真情——古典文艺散文的意境美释例 （姜纯哲）名作欣赏（1984，2期115页）

古典散文的音节声调与形象塑造 （蒋凡）上海广播电视（文科月刊）、（1984，3期18页）

知人论文、具体分析——谈谈怎样分析古代散文 （倪其心）文史知识（1985，5期27页）

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谈古典诗文里的夸张 （高蹈）江西大学学报（哲社）（1985、1期82页）

古典散文的转折艺术 （王桂华等）咸宁师专学报（哲社）（1986，1期46页）

谈谈古代散文谋篇的艺术 （范文质）大庆师专学报（哲社）（1986，4期59页）

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与古代散文的流变 （万陆）萍乡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7，4期11页）

试论我国古代散文与绘画的美学会通 （万陆）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7，3期1页）

意象：中国古代散文独特的美学基因 （万陆）萍乡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8，2期35—42页）

古代散文的名与实——与张铨锡先生商榷 （莫莫）文学遗产（1988，2期133—

135页）

佛典与中国古典散文 （孙昌武）文学遗产（1988，4期24—33页）

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浅见 （王彬）青春（1988，6期60—63页）

从文章辨体看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围 （曾枣庄）文学遗产（1988，4期16—23页）

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问题 （思鲁整理）文学遗产（1988，4期93—104页）

试论中国诗文中阳刚柔美的嬗变 （丁放）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6卷4期）

试论我国古代散文的语言艺术 （吴孟复）江淮论坛（1989，6期）

论学者散文 （周修睦）上海大学学报（1989，1期）

古游记一瞥 （张铁弦）光明日报（1961.3.14）

古代散文中的山水记 （振甫）文汇报（1961.5.6）

古代山水散文的表现手法 （章明寿）光明日报（1980.4.30④）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我国古代游记初探 （贝远辰等）湖南师院学报（哲社）（1980.1期111页）

略谈古代游记的发展 （张汝扬）语文学习（1980，6期20页）

古代游记散文说略 （范昌灼）四川师院学报（社科）（1981，1期36页）

古代游记艺术琐谈 （黄建宏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科）（1981，1期68页）

中国古代旅游文学概述 （吴云等）文学遗产（1982，4期138页）

试论我国游记散文 （常康等）内蒙古师院学报（哲社）（1982，2期74页）

我国古代游记散文的概况和经验 （范能船）零陵师专学报（社科）（1982，1期34页）

江山之助——中国古代的游记 （徐中玉）书林（1983，5期12页）

山水游记探源 （门立功）语文园地（1984，1期10页）

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文的美学价值发微 （皇甫修文）克山师专学报（哲社）（1984，1期43页）

山水游记之冠 （葛晓音）中文自修（1985，6期45页）

历代名"记"艺术探索 （方伯荣）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5，1期75页）

山川风物，各具情韵——三篇古代游记比较分析 （赵玉银）语文月刊（1987，7—8期41页）

山水游记——把自然融入社会 （彭建明）湘潭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87，3期26页）

游记文学纵横谈 （延青）江西大学学报（哲社）（1988，1期48页）

漫谈古代山水记 （罗宗阳）九江师专学报（1989年2—3期）

浅谈我国古代传记作品 （骆祥发）语文学习（1982，10期35页）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浅论 （吕蓓芬等）文学遗产（1983，4期27页）

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 （陈兰村）人文杂志（1984，3期114页）

传记散文和古典小说的审美关系 （吴功正）学习与探索（1986，4期101页）

中国古代传记初探 （徐凌云）安庆师院学报（社科）（1986，4期81页）

试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之功能 （陈兰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6，2期1页）

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地位 （陈兰村）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8，2期1页）

古代传记文学论略 （姜涛）辽宁大学学报（1989，4期）

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陈兰

村）人文杂志（1989，5期）

古文辞中“说”文体分类问题初探 （和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79，2期）

我国古代的说明文 （曾裕民）语文战线（1980年11月号39页）

历代论说文述略 （宗夏）语文战线（1981，6期13页）

“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学习古代论说文札记 （张慕勋）写作（1981创刊号31页）

议论文纵横谈：

1. **我国古代议论文的辉煌的成就** （文方）
2. **真知灼见——浅论精当的根本** （张明健）语文教学通讯（1982，6期42页）

古代论辩艺术初探 （吴庭振）河北大学学报（哲社）（1982，3期160页）

“说”体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 （张汝扬）语文学习（1983，5期53页）

简记我国古代说理散文的形象美 （陈洪宜）国际政治学院学报（1984，2期35页）

论中国古代讽刺散文 （韩钟文）上饶师专学报（社科）（1984，2期40页）

略谈我国古代政论散文 （宋荫谷）文学遗产增刊（第10期）

古代议论文初探 （姜涛）辽宁大学学报（哲社）（1985，4期9页）

巧喻明理，形象入论——浅谈我国古代论辨文的形象性 （周曼如）写作（1986，3期16页）

古文体新探——序跋类 （王伯峰）辽宁师院学报（1979，5期）

古代题跋概论 （黄国声）中山大学学报（哲社）（1980，4期97页）

古代题跋试探 （邓安生）天津师大学报（1986，5期64页）

浅谈古代序文和赠序 （潘玉江）外交学院学报（1988，3期77—82页）

古代随笔选读 （张学忠）随笔（1980，9集192页）

古代随笔选读 （张学忠）随笔（1980，10集167页）

历代笔记漫谈 （刘叶秋）今昔谈（1981，1期4页）

历代笔记漫谈 （刘叶秋）今昔谈（1981，2期20页）

略谈笔记与哲学 （刘叶秋）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2期103页）

古代笔记文初探 （张惠仁）四川师院学报（社科）（1984，2期21页）

历代笔记漫话 （王义耀）广东图书馆学刊（1984，1期40页）

试论我国笔记散文的民族特色 （常康）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6，1期49页）

中国的小品文 （杨剑花）中华月报6卷2期（1943，8）

试论我国古代的杂文 （贝远辰）湖南师院学报（哲社）（1984，2期62页）

论古代杂文名篇的“感”与“发” （柳枫杨）宁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6，3期38页）

古代杂文的“杂”与“文” （韩进廉）杂文界（1986，5期22页）

浅谈古代杂记文 （李志勤）应用写作（1987，5期37页）

古代哀祭文流变 （章明寿）淮阴师专学报（哲社）（1987，2期20页）

古代哀祭文发展简说 （章明寿）文学遗产（1988，5期20—24页）

我国古代文苑中一个被遗忘了的角落——自传文散论 （唐晓萍）广西师院学报（哲社）（1987，3期96页）

文学史研究中一个不应再被忽视的领域——论历代臣下上帝王书的价值 （张建业）北京师院学报（1987，2期1页）

谈中国古代民间寓言 （张振华）教学研究

集刊（1956. 3期）

读古代寓言　（张友鸾）人民日报（1956. 9. 22）

试谈我国的寓言　（魏金枝）人民文学（1957. 4）

漫谈寓言　（陈伯吹）语文学习丛刊（第1期，1977. 10）

中国古代寓言简论　（王玉骏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0，2期30页）

古代寓言体散文的艺术特色　（张学忠）散文世界（1985，12期6页）

笑话谐语，颇益讽诫——读古代文笑话札记　（苏振元）语文战线（1979，6期57页）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　（周健明）长沙文艺（1978，4期）

略论古代神话的起源　（武世珍）甘肃师大学报（1979. 1期）

中国神话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　（袁珂）文艺论丛（第7辑1979. 9）

中国古代童话浅探　（张士春）宁夏大学学报（社科）（1982，2期40页）

取材精炼的散文选集《古语文观止》　（黄肃秋）读书月刊》（1957. 10期）

《古文观止》评介　（王汝弼）语文学习（1958. 4）

谈谈《古文观止》　（振甫）读书（1959. 14期）

读《古文观止》　（许逸民）光明日报》（1978. 6. 11）

漫谈《古文观止》　（振甫）新闻战线（1979. 2期）

赋之源流及两都赋之研究法　（陈文波）清华周刊25卷23期（1926. 5）

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　（郭绍虞）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 6）

辞赋与骚赋　（许世英）文学月刊3卷1期（1932）

论赋　（解昉）山东八中校刊3期（1933. 10）

说赋　（唐言）语文战线（1980. 5期1页）

古代文体简论：赋　（褚斌杰）新闻战线（1980年4期27页）

试论赋的源流及演变　（激流）陕西教育（1982，7期51页）

我国古代文学的一枝奇葩——赋　（司汉平）柳泉（1983，3期180页）

从散文史的角度谈辞赋的归类问题——兼与谭家健同志商榷　（范羽翔）北方论丛（1983，4期56页）

大赋的艺术本质　（冯俊杰）山西师院学报（社科）1984，2期45页）

论赋与诗六义之"赋"的关系　（曹明纲）江海学刊（1984，5期120页）

关于"赋"的名称　（赵志成）语文教学与研究（辽宁）（1984，5期11页）

赋的来源及其流变　（傅刚）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3期69页）

略论我国古代辞赋中恋情描写　（刘宜芝）衡阳师专学报（社科）（1984，2—3期36页）

辞与赋　（费振刚）文史知识（1984，12期9页）

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　（黎德群）鞍山师专学报（社科）（1985，3期9页）

浅谈赋对山水文学的影响　（张子敏）锦州师院学报（哲社）（1985，3期66页）

赋体四论：（四）赋体的正式形成　（冯俊杰）山西师院学报（社科）（1986，4期56页）

铺张的艺术与杂交的优势——赋给我们的启示　（梁衡）山西师大学报（社科）（1986，2期28页）

试论古诗之流——赋　（徐宗文）安徽大学学报（哲社）（1986，2期52页）

赋体四论（2）：赋体的生命要素　（冯俊杰）山西师大学报（社科）（1986，2期

32页)
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 (姜建群)东北师大学报(哲社)(1987.1期77页)
也谈赋体的源流 (方旭东)安庆师院学报(社科)(1987,4期89页)
散体赋渊源于散文,滥觞于《庄子》 (李回)丹东师专学报(哲社)(1987,3期45页)
辞赋考辨 (韩雪)辽宁大学学报(哲社)(1987,4期101页)
论屈原与宋玉——兼论文赋的形成问题 (马积高)船山学报(1987,专号39页)
赋体文、骈体文应归入散文一类吗? (逢春等)松江学刊(社科)(1987,3期13页)
赋的溯源 (刘斯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8,1期100页)
赋体探源 (陈敬夫)中国文学研究(1988,3期32—37页)
赋体文学简述 (周维培)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89,3期)
韵文与骈体文 (严既澄)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6)
骈体文的新评价 (钱振东)新晨报副刊1920.9.20)
骈文研究法 (刘麟生)出版周刊89期(1930)
骈文漫话 (钱基博)光华大学半月刊2卷5、6期(1933.12—1934.3)
骈文通义 (钱基博)光华大学半月刊1卷7期、8期(1933.4)
骈文研究法 (李时)女师学院期刊3卷1期(1935.1)
骈文的再评价 (叶远钧)湖南师院学报(哲社)(1983,2期75页)
中国骈文的千秋功罪 (朱洪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5,2期106页)
略谈骈文的基本特征 (谭家健)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5,2期47页)
骈文兴衰原因探 (金榻智)佛山师专学报(社科)(1986,1期15页)
论骈体文形式美的心理依据 (向昆山)吉首大学学报(社科)(1986,3期71页)
杂说骈文 (舒展)福建文学(1987,7期53页)
骈文声律化管窥 (刘思汉)萍乡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7,3期13页)
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污点——八股文——的分析 (李长之)清华周刊40卷1期(1933)
八股文之沿革与形式 (胡雪)读书中学1卷2期(1933.6)
八股文研究 (朱滋萃)中法大学月刊7卷1期(1935.4)
论八股文 (胡传楷)学风7卷5期(1937.6)
八股文学 (陈德芸)岭南学报6卷4期(1941.6)
谈"古文与八股文的关系" (陈子展)人间世23期(1935.3)
八股文的沿革及其对于士风所发生之影响 (郑师许)说文月刊5卷1、2期(1944.11)
八股文琐谈 (晏得、长工)福建日报(1962.8.19)
八股文说略(上)(青云) 语文月刊(1982,3期25页)

二、专　论

先　秦

总论

诸子文学略说　（顾实）国学丛刊2卷2期（1924. 6）

周代散体文发展之趋势　（蒋天枢）复旦学报1期（1944. 10）

先秦两汉文论　（张须）国文月刊51期（1947. 1）

先秦寓言研究　（蒋天枢）复旦学报1期（1944. 1）

先秦散文发展概况　（罗根泽）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

先秦散文（王达津）天津日报（1959. 6. 21）

先秦寓言论略　（胡大浚，蓝开祥）甘肃师大学报（1978. 4期）

先秦史传文学试论　（刘心予）华南师院学报（1979. 4期）

略谈先秦寓言的思想性　（周健明）湘江文艺（1979. 4期）

晚周寓言的衍变与影响　（陈静言）函授辅导（1979. 3期）

略谈先秦寓言的思想性　（周健明）湘江文艺（1979. 4期）

先秦散文四讲（下）　（赵浩如）云南教育（1980. 4期17页）

论先秦诸子的修辞技巧　（郑子瑜）社会科学战线（1980，4期290页）

文如流水，自然多样——读先秦、唐宋散文　（萧鸿江）丹东师专学报（哲社）（1980，2期58页）

先秦散文　（周舆）河北文学（1980，11期70页）

先秦散文面面观　（朱宏达）语文战线（1981，11期3页）

敢于争鸣，善于学习，勇于创新——读先秦诸子散文有感　（施亚西）语文学习（1981，3期40页）

战国文章的两大特征　（郭预衡）社会科学战线（1981，3期269页）

诸子散文散论　（郝孝忠）南充师院学报（哲社）（1982，3期38页）

略论有关先秦散文的几个问题　（张志岳）克山师专学报（哲社）（1982，1期83页）

杂谈先秦诸子散文引喻明理的手法　（李博）河南师大学报（社科）（1982，1期76页）

先秦诸子散文之比较　（王浚清）鞍山师专学报（社科（1982，1期11页）

先秦散文论略——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规律挥微（张碧波等）社会科学战线（1982，2期274页）

重要的借鉴——先秦散文一瞥　（景明）锦州师院学报（哲社）（1983，4期79页）

先秦散文　（李元太）自修大学（文史哲经）（1983，3期3页）

先秦政论文略论　（熊宪光）四川师院学报（社科）（1984，2期15页）

孟、庄、荀、韩散文的艺术风格　（吕晴

飞）电大文科园地（1984，4期20页）
哲理和艺术的融合——先秦散文的美学分析（一）（皇甫修文）名作欣赏（1984，1期106页）
比喻在先秦文学中的运用与发展（李竹君）河北大学学报（哲社）（1984，4期81页）
建国以来先秦诸子散文研究综述（江庆柏）文学遗产（1984，4期152页）
先秦散文的审美境界（皇甫修文）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5，3期34页）
先秦散文和“言简意约”（邓绍基）散文世界（1985，5期13页）
小议先秦寓言的幽默因素（阎燕）艺谭（1985，1期135页）
审美境界的追寻——先秦散文美学分析（三）（皇甫修）名作欣赏（1985，1期137页）
诸子散文与屈骚（徐志啸）中州学刊（1986，5期90页）
谈谈先秦诸子散文（季镇淮）文献（1986，4期205页）
论先秦诸子散文的文学成就（范能船）零陵师专学报（哲社）（1986，2期7页）
散文艺术个性化的生命力——先秦散文三题（裘实）盐城师专学报（社科）（1986，4期109页）
从《周易》到《庄子》——先秦玄理之文的发展（郭预衡）河北师院学报（哲社）（1985，4期9页）
宋玉和赋体的形成（康金声）晋阳学刊（1986，3期91页）
先秦诸子散文文学成就略论（范能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6，2期58页）
话说先秦散文（熊宪光）语文（1986，1期21页）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诸子对屈原的影响（梁葳）云梦学刊（1987，1期33页）
先秦文学中的梦境描写及其历史地位初探（王立）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1987，2期67页）
论先秦兵家散文的写作特色（章沧授）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1987，1期49页）
新近发现的先秦佚书之文学价值（谭家健）（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4期）
战国赋管窥（韩雪）辽宁大学学报（哲社）（1988、4期69—73页）
先秦史传散文纵向观（徐相霖）四川大学学报（哲社）（1988，3期77－82页）
论先秦诸子散文的夸张艺术（章沧授）安庆师专学报（1989、3期）

作家作品

晏子春秋

略谈《晏子将使楚》（冯钟芸）语文学习（1957．2）
说《晏子春秋》（董治安）山东大学学报（语文）（1959．4期）
《晏子春秋》的写作时代（高亨）文学遗产增刊（第8辑）
试论《晏子春秋》（吴则虞）光明日报（1961．6．9）
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董治安）文史哲（1962．2期）
《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谭家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2，2期17页）
《晏子春秋》的性质思想和艺术（杨天堂）暨南学报（哲社）（1982，1期69页）
《晏子春秋》的文学价值（孙绿怡）东北师大学报（哲社）（1982，5期65页）

说似不甚经意，实则用心良苦——读《晏子春秋》偶记 （全晶）淮阴师专学报（哲社）（1985，3期22页）

晏子和《晏子春秋》 （薛安勤）社会科学辑刊（1988，4期116—119）

《晏子春秋》中的齐景公形象 （孙禄怡）管子学刊（1988，1期75页）

尚　书

尚书盘庚篇今译简释 （张西堂）人文杂志（1958．6期）

《尚书·大诰》今译 （顾颉刚）历史研究（1962．4期）

从《尚书》研究论到《大诰》校释 （平心）历史研究（1962．5期）

《盘庚》三篇校释译论 （顾颉刚、刘起釪）历史学（1979．1期）

《尚书·盘庚篇》的制作时代 （李民）郑州大学学报（1979．1期）

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 （刘起釪）文史（第7辑，1979．12）

《尚书》学源流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起釪）辽宁大学学报（1979．6期）

《尚书·甘誓》校释译论 （顾颉刚、刘起釪）中国史研究（1979．1期）

《尚书》——古代各类散文的开篇 （章明寿）淮阴师专学报（社科）（1980，3期26页J2（28—9））

试谈《尚书》的语言艺术 （常康）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1986，2期85页）

试论《尚书》语言的文学性 （尹砥廷）吉首大学学报（社科）（1987．1期61页）

易　经

略论《易经》的年代及其思想 （刘泽华）天津日报（1961．6．14）

试论《易》的成书年代与发源地域 （高文策）光明日报（1961．6．2）

《周易》的文学价值 （高亨）文汇报（1961．8．22）

《周易》史事索隐 （平心）历史研究1963．1期

《周易》的编纂和编纂者的思想 （李镜池）学术研究（1963．1期）

谈谈《周易》研究的一些体会 （李镜池）学术研究1963．5期

关于《周易》的性质历史内容和制作时代 （平心）学术月刊（1963．7期）

略说《周易》与《诗经》的关系 （平心）华东师大学报1964．1期

有关《易经》的信 （郭沫若）中国史研究（1979．1期）

《易经》与原始文学 （王纯庵）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1、2期）

《易经》与先秦散文 （王纯庵）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3期）

从文学角度谈《易经》谈学《易经》的必要性 （李文炳）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0，3—4期72页）

立象尽意，从小见大——《周易》中形象与典型思想试探 （卓支中）暨南学报（哲社）（1982，3期56页）

说《周易》寓言 （朱俊芳）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2，4期49页）

《周易》是研究奴隶社会文学的重要典籍 （崔文恒）包头师专学报（1982，1期9页）

《周易》反映的社会思想和奴隶社会文学的关系 （崔文恒）包头师专学报（社科）（1983，2期30页）

《周易》卦爻辞的修辞 （胡范铸）修辞学习（1983，1期54页）

周易卦爻辞的文章 （王气中）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4，2期5页）

《周易》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综述 （张善文）文学研究动态（1984，2期7页）

试论《周易》卦爻辞的文学特色 （刘心予）广东社会科学（1987，2期103页）

从文学角度读《周易》 （宗小荣）成都师专学报（文科）（1987，2期21页）

礼　记

我国古代第一部教育专著《学记》初探 （陈铁镔）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1期）

檀弓——中国第一部生活故事集 （曹大中）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3期120页）

《大学》的语言艺术 （陆文蔚）贵州文史丛刊（1987，3期142页）

我国先秦文学和《礼记·檀弓》 （杨伯俊）文史知识（1986，6期9页）

国　语

国语选序 （傅庚生）人文杂志（1957年创刊号）

《国语》散论 （白寿彝）人民日报（1962.10.16）

《国语》札记三则 （叶晨晖）南京师院学报（社科）（1982，2期48页）

试论《国语》的文学价值 （谭家健）江淮论坛（1983，6期112页）

论《国语》的叙事——《国语》研究之四 （万平）研究生学报（华中师大）（1985，3期59页）

论《国语》的人物形象——《国语》研究之三 （万平）研究生学报（华中师大）（1985，2期43页）

试谈《国语》记言的特点 （王增文）商丘师专学报（社科）（1985，1期57页）

《国语》、《左传》和《战国策》比较谈 （郭预衡）中文自学指导（1985创刊号16页）

《国语》记言刍论——《国语》研究之二 （万平）研究生学报（华中师范学院）（1985，1期47页）

略谈《国语》的思想性和语言特色 （刘路）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社科）（1987，2期22页）

"艾人必丰"之"艾"字诠释——读《国语》札记 （姜跃滨）语文学刊（1988，1期27页）

列　子

《列子》寓言故事的艺术 （戴小实）扬州师院学报（社科）（1985，3期65页）

谷梁传

论谷梁文 （黄尧坤）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7，2期18页）

左　传

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 （陈咏）光明日报（1956.12.16，文学遗产135期）

《左传》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 （郭维森）教学与研究汇刊（1958.2期）

《曹刿论战》浅析 （隽因）语文教学（1959.3）

《左传》 （刘英杰）吉林日报（1961.12.24）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徐中舒）历史教学（1962.11）

读朱东润先生的《左传选》 （宗建）光明日报（1962.6.24，文学遗产420期）

从郑庄公看《左传》人物描写的一些特点 （谭家健）文学遗产增刊（第10辑）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徐中舒）历史教学（1962.11期）

论《左传》叙事的倾向性 （胡念贻）江海学刊（1963.2期）

读《左传》随笔二则 （曹埜）光明日报（1963. 4. 14）

论《左传》的人物评述和描写 （曹道衡）光明日报（1963. 5. 19）

《曹刿论战》"必以情"说 （俞炎）语文战线（1977. 6期）

《曹刿论战》的结构及其他 （赵国彦）语文学习丛刊（第4期，1978. 7）

《左传》的成书时代及其作者 （徐仁甫）四川师院学报（1978. 3期）

言约意足·波澜曲折——《左传·曹刿论战》的写作艺术 （周溶泉、徐应佩）北方文学（1979. 1期）

《曹刿论战》讲析 （黄振中）语文教学研究（广西民族学院（1979. 1期）

从《曹刿论战》谈《左传》中的车战 （黄盛陆）语文教学研究（广西民族学院）（1979. 2期）

谈《曹刿论战》的剪裁艺术 （徐桦君）教学参考（1979. 10期）

《曹刿论战》简析 （（张荣庆）中学语文（河南师范大学）（1979. 6）

《曹刿论战》浅析 （湛瑞裕）中学语文（武汉师院）（1979. 6期）

论春秋左传的语言艺术 （刘子钦）书评（1979. 1期）

略论《左传》描写战争的问题 （王守谦）四平师院学报（1979. 1期）

《左传》泓之战"大司马固谏"注解述评 （洪诚）南京大学学报（1979. 4期）

略谈《左传》的语言艺术 （聂国栋）四川大学学报（1979. 3期）

《左传》形容词简析 （陈克炯）华中师院学报（1979. 4期）

《左传》成书年代论述 （杨伯峻）文史（第6辑，1979. 6）

《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商榷 （宋敏）吉林师大学报（1979. 3期）

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 （徐仁甫）社会科学研究（1979. 3期）

《左传》的作者决不可能是刘歆——与徐仁甫先生商榷 （洪成玉）北京师院学报（1979. 4期）

谈《子鱼论战》 （张传实）语文教学研究（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79. 3期）

略谈《左传》人物语言的特色 （陶涛）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社科汉文版（1980，2期61页）

精炼动人之一例〔《左传》成公三年《齐侯朝晋》〕 （振甫）散文（1980. 4期46页）

重读《曹刿论战》 （王若望）羊城晚报（1980. 4. 8日）

略谈《左传》和《战国策》的文学价值 （沈起炜）语文学习（1981，5期2页）

从《城濮之战》看《左传》战争描写的一些特点 （谭家健）河南师大学报（社科）（1981，3期80页）

腴辞润简牍，美句人咏歌——略论《左传》的语言 （王玉骏）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1，4期88页）

《左》疑三则——兼释《诗经》《楚辞》有关疑义 （衡兵）扬州师院学报（社科）（1981，4期27页）

《左传》的艺术成就 （胡念贻）河北师院学报（社科）（1981，1期26页）

《左传》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成就 （郭预衡）语言文学（1982，4期3页）

论《左传》的语言艺术 （朱宏达）杭州大学学报（哲社）（1982，12卷1期39页）

近几年来《左传》研究情况简述 （谭家健等）文学研究动态91982，4期1页）

逢蒙·窍门——《左传》新释一则 （裴维英）四平师院学报（哲社）（1982，1期10页）

《左传》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成就 （郭预衡）语言文学（1982，3期6页）

说《左传·殽之战》 （吴小如）语文教学通讯（1982，11期57页）

试论《左传》的人民性 （聂本立）河北大学学报（哲社）（1982，3期60页）

《左传》中的传记体雏形 （易平）安徽师大学报（哲社）（1982，4期48页）

思想·胆略·才能——《烛之武退秦师》浅释 （徐肖湄）杭州商学院学报（1982，12卷4期25页）

揭露矛盾，分化瓦解——《烛之武退秦师》的游说技巧 （刘宗汉）语文月刊（1982，5期31页）

论《左传》所记城濮之战的认识价值 （杨佐义）东北师大学学报（哲社）（1983，2期59页）

简论《左传》的战争记叙 （袁瑾洋）江西教育学院学刊（1983，2期49页）

语如其人——《左传》人物对话中的个性特征 （卞良君）语文园地（1983，3期17页）

《左传》人物描艺术对《史记》的影响 （莫砺锋）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3，4期48页）

试论《左传》的行人辞令 （沈松勤）杭州大学学报（哲社）（1983，13卷1期137页）

《左传》外交辞令描写探析 （刘淼）安徽大学学报（哲社）（1983，3期101页）

谈《左传》对子产的描写 （宋尚斋）山东师大学报（哲社）（1983，4期58页）

《左传》的语言特色 （季绍德）电大语文（1983，8期12页）

略论《左传》成书年代的有关问题 （郑君华）文学遗产（1984，1期15页）

读《秦晋淆之战》——《左传》散文艺术手法三例 （何法周）河南师大学报（社科）（1984，2期55页）

关于《秦晋殽之战》的主题〔《左传》〕 （傅贻清）陕西师大学报（哲社）（1984，2期113页）

《左传》情节与人物描写的形象性特征 （郑君华）学习与思考（1984，3期77页）

“适如其人之言——浅谈《殽之战》的人物刻划〔《左传》〕 （张补俊）名作欣赏（1984，3期38页）

试论《左传》刻画人物的形象的艺术手法 （楼风仙）杭州师院学报（社科）（1984，3期57页）

试论《左传》中子产形象的塑造 （杨明琪）教学与科研（哲社）（1984，3期86页）

从文学角度看《左传》 （沈玉成）文史知识91984，11期9页）

《左传》的写人艺术 （何新文）华中师院学报（哲社）（1984，6期86页）

“左氏浮夸”辨析〔《左传》〕 （何新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4，2期113页）

《左传》应验描写初论 （傅道彬）研究生学报（华中师范学院）（1984，2期40页）

谈《左传》的场面描写 （谭思建）研究生学报（华中师范学院）（1984，3期62页）

浅谈《左传》对历史人物的刻划 （尹致廷）吉首大学学报（社科）（1985，3期40页）

《春秋左传注》浅议五则 （郭挺之）湘潭师专学报（社科）（1985，1期67页）

异彩纷呈的《左传》战争细节描写 （姜鸿翔）写作（1985，5期6页）

试论《左传》的叙事特色 （钱茂竹）绍兴师专学报（社科）（1985，1期31页）

试论《左传》中的妇女形象 （高树）新疆大学学报（哲社）（1985，4期80页）

试论《左传》的情节 （王贵福）广西民

期）

《左传》人物描写艺术美初探 （邓韶玉）安徽师大学报（1989年3期）

战国策

试论《战国策》的作者问题 （潘辰）光明日报（1956. 12. 16文学遗产135期）

从《触詟说赵太后》看说话的技巧 （陈觉生）语文学习（1956. 9）

谈《冯谖客孟尝君》的句法和虚词 （刘锐）语文教学（1956. 8）

《战国策》简论 （潘辰）光明日报（1957. 3. 10，文学遗产147期）

《试论战国策的作者问题》商榷 （罗根泽）光明日报1957. 5. 19

重读《触詟说赵太后》 （臧克家）人民日报1961. 7. 21

《战国策》的作者及其古今本问题 （程百让）郑州大学学报（1963. 4期）

读《触詟说赵太后》 （章明港）语文战线（1974. 2期）

《触詟说赵太后》 （潘述羊）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5. 2期）

谈《战国策》在文学上的成就 （胡念贻）河北师院学报（1979. 1期）

《战国策》和《韩非子》 （周勋初）南京大学学报（1979. 2期）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觅《战国策》的艺术特色 （王家顺）书评（1979. 4期）

关于《战国策》 （张伯训）丹东师专学报（1979，1期26页）

《邹忌讽齐王纳谏》分析 （黄庆宇）教学参考（1979. 7期）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 （董应周）河南日报（1979. 3. 3）

简论《战国策》的语言特点 （张玉惠等）四平师院学报（哲社）（1980，4期47页）

《战国策》的思想与艺术 （贾传棠）河南师大学报（社科）（1981，3期80页）

论《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熊宪光）四川师院学报（社科）（1982，1期29页）

落落之玉，或乱乎石——谈《触詟说赵太后》中赵太后的形象 （江立中）岳阳师专学报（1982，1期53页）

不求须眉毕现，但求神态逼真——谈《邹忌讽齐王纳谏》的人物描写 （薄文）写作（1982，1期19页）

话说南后——《战国策·楚策·魏王遗楚王美人》浅谈 （张志烈）文谭（1983，10期51页）

《齐人有冯谖者》（《战国策》） （李元太）自修大学（文史哲经）（1983，2期13页）

《战国策》寓言思想内容初探 （张秉光）佛山师专学报（1983，1期19页）

读《淆之战》杂记 （董清洁）文科教学（1984，3期38页）

《战国策》的论辨技巧 （赵喜范）沈阳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84，3期17页）

浅谈《战国策》寓言的艺术特色 （张秉光）佛山师专学报91984，1期30页）

看似寻常最奇堀——谈《冯谖客孟尝君》中一组材料的使用 （张衡）北京商学院学报（1984，1期78页）

纵横恣肆，以言写人——《唐雎不辱使命》的人物对话欣赏（附原作） （黄建宏）名作欣赏（1984，5期91页）

《秦晋殽之战》的艺术特色 （朱吉真）教学与管理（1985，3期95页）

读《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附原作） （吴小如）名作欣赏（1985，1期26页）

《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章》小笺 （缪文远）四川大学学报（哲社）（1985，3期83页）

《庄辛说楚襄王》浅析 （贾平年）中文自

孔子和论语

（颜廷文）新疆大学学报（哲社）（1986，1期89页）

《论语》文学价值初探 （曾文星）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7，4期42页）

《论语》的文学价值 （魏学锋）贵州文史丛刊（1987，2期144页）

谈《论语》的文学语言特色 （梅俊道）九江师专学报（哲社）（1988，1期72—76页）

《复活》与《论语》的比较研究 （雷从菁）外国问题研究（1988，1期41页）

略谈《论语》中的人物语言 （边家珍）许昌师专学报（社科）（1988，4期27—29页）

《论语》语言的质朴与凝炼之美 （卞帆）盐城师专学报（神科）（1988，3期70—71页）

言之有文，行而必远——略谈《论语》的语言艺术 （陈际胥）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2期）

文彩灿然，嘉惠千秋——《论语》试论之一 （罗应涛）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89.3期）

墨　子

《墨子公输》 （卞慧）语文学习（1954.5）

说《公输》 （声越）语文学习（1958.2）

谈墨子《公输篇》 （景白）语文（1959.11）

《公输》的语言技巧的逻辑力量 （陈鼎如）破与立（1979.4期）

词直理正——略谈《公输》的艺术特色 （陈东）语文友学（江西师院）（1979.3期）

关于墨子和《墨子》一书简说 （李增林）宁夏大学学报（1979.1期）

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辨方法——从《公输》的"知类"说起 （陆襄）语文学习丛刊（第8期，1979.6）

墨子的辨论艺术——读《公输》 （刘宗德）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79.3期）

略谈《公输》中的语言艺术 （江涛）修辞学习（1982，1期37页）

《墨子》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 （谭家健）中州学刊（1983，4期65页）

《墨辩》中说理散文写作经验再探 （谷云义）郑州大学学报（哲社）（1984，4期38页）

墨子散文《兼爱》《非攻》论析 （庄伟民）宁波师院学报（社科）（1988，3期59—65页）

论墨子散文的新贡献 （章沧授）中国文学研究（1988，2期23—28页）

老　子

老子文学色彩之观察 （余迺成）金大文学院季刊，1卷2期（1931）

谈谈《老子·十一章》最后一句话的翻译问题 （姜可瑜）光明日报（1963.4.12）

《老子》校读 （张松如）社会科学战线（1978.1—2期）

《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 （高亨）社会科学战线（1979.1期）

论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 （刘毓璜）历史学（1979.2期）

老子的散文 （陆永品）齐鲁学刊（1982，2期68页）

论老子散文的艺术特色——先秦诸子散文艺术漫谈之一 （章沧授）安庆师院学报（社科）（1985，1期61页）

老庄语言特征管窥 （胡安良）青海社会科学（1985，1期61页）

论《老子》的艺术魅力 （朱俊芳）沈阳师

范学院学报（社科）（1987，4期61页）

孙子

论《孙子》的成书时间及文学价值 （杨佐义）长春师院学报（哲社）（1984，1期41页）

《孙子兵法》散文艺术特色 （常康）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6，2期70页）

《孙子兵法》的语言艺术 （谭家建）文史知识（1986，3期100页）

管子

《管子·心术上、下》等篇非宋钘、尹文遗著辨——兼说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祝瑞开）西北大学学报（1977．3期）

论《管子·轻重》各篇的经济思想体系问题（上） （巫宝三）经济科学（1983，2期62页）

孟子

孟子文学 （易显庭）金陵光13卷2期（1924．2）

孟子文学的艺术之管见 （杨寿昌）岭南学报2卷．1期（1931．7）

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长之）励学（山东大学）4期（1935．6）

《孟子》解题及其他 （金启华）语文教学（1956．10）

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 （谭家健）光明日报（1957．9．8．9．15，文学遗产173．174期）

从孟子的辩论文学习写作技巧 （振甫）新闻战线（1959．9）

《齐桓晋文之事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李景白）语文（1959．10）

一年来关于孟子思想的一些讨论 新建设（1963．1期）

"以意逆志"辨 （吴文治）光明日报（1963．11．9）

《孟子》的艺术特点 （李孝堂）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0．1期71页）

孟子论说文的特色 （徐立）华南师院学报（哲社）（1980．3期123页）

孟子——我国古代辨对散文的开元者 （张惠仁）四川师院学报（社科）（1980．3期12页）

浅谈《孟子》散文的论辨艺术 （沈惠乐）语文学习（1981．2期60页）

简析《孟子》的语言特点 （周卉）宜春师专（1981，3期40页）

因势利导，以理服人——读《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张四维）新闻大学（1981，2期118页）

《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罗星明）承德师专学报（社科）（1982，2期1页）

《孟子》骋辞逞辨的特色 （徐立）语文月刊（1982，2期23页）

《孟子》的比喻特色 （施春友）天津商学院学报（1982，1期71页）

《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 （徐华龙）思想战线（1982，5期86页）

《孟子》的修辞技巧 （吴旭民）修辞学习（1982，4期19页）

《孟子》散文的论辨艺术 （李竹君）河北大学学报（哲社）（1982，2期139页）

谈《孟子》中的譬喻并及"譬"与"比"之异同 （姚双安）孝感师专学报（哲社）（1983，2期74页）

孟子散文气势初探 （鲁洪生）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3，3期141页）

孟子的民本思想及其论辩艺术 （刘若

瀛）沈阳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84，2期85页）

论孟子散文写作的成就 （曹融南）上海广播电视（文科月刊）（1984，3期2页）

孟子散文的比喻艺术 （翁德森）中文自学指导（1985创刊号21页）

孟子散文喻证艺术的独特风格 （赵九文）语文教学（1985，1期27页）

论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先秦诸子散文艺术漫谈之三 （章沧授）安庆师院学报（社科）（1985，4期55页）

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董洪利）新闻战线（1986、2期28页）

略论孟子散文的雄辩气势 （崔勇谋）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社科）（1986，2期57页）

析《齐桓晋文之事》语言特色 （李宗儒）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87，3期16页）

《孟子》论辩艺术略论 （姚宝元）河北大学学报（哲社）（1987、4期11页）

《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读"对齐宣王同章"和"许行章" （王渊明）文史知识（1987，10期23页）

孟子《许行章》简析 （林正龙）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7，4期86页）

文与道的和谐统一——试论《孟子》的语言艺术特色 （魏民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8，1期42页）

试析孟子的辩论文及其写作技巧 （余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88）2期86—89页）

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 （陈际晋）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88、4期）

庄　子

论《庄子》的思想性 （罗根泽）文学研究（1957，1期）

论庄子 （严北溟）复旦大学学报（1962．1期）

有关《庄子》的一些历史资料 （江世荣）文史第一辑（1962．10）

《庄子·盗跖篇》再探 （张心澂）广西日报（1962．12．6）

也谈《秋水》 （庄印）光明日报（1962．12．28）

试论《庄子·内篇》散文的艺术特征 （邹云鹤）江汉学报（1963．2期）

庄子的两则寓言 （周振甫）光明日报（1963．10．8）

论庄子的散文 （胡念贻）文学研究集刊（1964．1期）

《庄子·秋水篇》校注辨正 （何善周）社会科学战线（1978．创刊号）

《庄子·秋水篇》阙文臆补——罗音室读书偶记 （吴世昌）社会科学战线（1978创刊号）

《庄子》郭象序的真伪问题 （王利器）哲学研究（1978．9期）

论《庄子》对苏轼艺术思想的影响 （项楚）四川大学学报（1979．3期）

《庄子》与浪漫主义问题 （陆永品）破与立（1979．1期）

《庄子·逍遥游》校释辨正 （何善周）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吉林师大学报编（1979．12）

论《庄子》中《骈拇》、《马蹄》、《胠箧》三篇的特点和时代 （张恒寿）函授辅导（1979．3期）

《庄子》寓言文学探索 （赵克）黑龙江大学学报（1979．3期）

《庄子》的艺术评价 （曹础基）华南师院学报（1979．3期）

《庄子》与现实主义问题 （陆永品）齐鲁学刊（1980，4期55页）

论《庄子·在宥》篇各章的异同和时代 （张恒寿）河北师院学报（哲社）（1980，1期33页）

庄子《逍遥游》的题旨 （卢良彦）台州师专学报（社科）（1983，2期40页）

浅论庄子和浪漫主义文学 （尚永亮）淮南师专学报（社科）（1983，1期1页）

试谈《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 （颜廷文）新疆大学学报（哲社）（1983，3期89页）

画龙点睛、相得益彰——《庄子》散文艺术论之一 （王景琳）河北学刊（1984，1期105页）

试论《庄子》散文和艺术特色 （章嘉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论文集107页）

谈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吴世义）南宁师院学报（哲社）（1984，3期68页）

谈谈《庄子》独特的表达方式 （张采民）南京师大学报（社科）（1984，2期21页）

略谈《逍遥游》的主旨及其论证〔《庄子》〕 （陈巽如）韶关师专学报（1984，1期59页）

从《逍遥游》看庄子的愤世嫉俗 （贾秀英）教学与自修（1984，2期11页）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谈庄子的浪漫主义兼及庄、孟比较 （赵一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3期43页）

《庄子》寓言人物形象描写刍议——《庄子》散文艺术研究之二 （王景琳）苏州大学学报（哲社）（1984，2期78页）

劳力者的赞歌——试谈《庄子》中的劳动者形象 （顾易生）上海广播电视（文科月刊）（1984，3期4页）

《逍遥游》诠评 （王树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1期83页）

熔情入理，因理铺文——试论《庄子》散文中两种思想形式的交互使用 （王实华）郑州大学学报（哲社）（1984，4期44页）

屈原庄周浪漫主义比较观 （张啸虎）江汉大学学报（社科）（1984，4期91页）

庄子散文的说理艺术 （陆万胜）散文世界（1985，12期9页）

《庄子》的文学语言 （赵纯伟）鞍山师专学报（社科）（1985，3期39页）

《庄子》哲理表达的艺术风格 （袁怀祖）社会科学（甘肃）（1985，5期101页）

读《逍遥游》笔记 （其雨）兰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5，创刊号42页）

试论《庄子》寓言的文学特色 （李平科）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85，1期25页）

谈我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滥觞——评《庄子》的创作方法论 （阮国华）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5，1期38页）

漫谈庄子的散文的成就 （顾易生）中文自学指导（185创刊号18页）

从哲学到艺术的醇化——《庄子》艺术探源 （姚曼波）学术月刊（1985，3月号76页）

评庄子的散文艺术 （孙以昭）文学评论（1985，5期112页）

我读《庄子》 （戴厚英）书林（1985，4期17页）

汪洋辟阖，义态万方——谈《庄子》的语言艺术 （曹础基）文史知识（1985，6期10页）

《庄子》的浪漫主义特色及其成因 （尚永亮）中州学刊（1986，1期69页）

为劳动者的歌——读《庄子》札记 （张祖德）浙江学刊（1986，1—2期97页）

向往自由的心声——读《庄子》外篇《马蹄》 （李知文）文史知识91986，5期35页）

《逍遥游》题旨探求述略 （赵家莹）语文导报（1986，9期23页）

从《庄子》谈到中国特色的浪漫主义　（刘绍瑾）江汉论坛（1986，8期41页）

《逍遥游》积极意义举要　（傅正谷）锦州师院学报（哲社）（1986，3期88页）

试论庄子散文的艺术结构　（王景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1986，3卷1期23页）

《庄子》对神话形象的再创造　（孟传书）天津教育学院院刊（社科）（1986，5期11页）

庄子寓言与古代短篇小说辨析——与曹大中同志商榷　（东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会科学学报（1986，5期120页）

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谈《庄子》鲲鹏的寓言　（江立中）云梦学刊（1986，3期112页）

谈庄子散文的意境　（张仲谋）九江师专学报（哲社）（1987，4期55页）

愤世疾俗，热烈追求——《逍遥游》主旨试探　（杨旭升）绵阳师专友学与研究（1987，2期27页）

《逍遥游》杂议六题　（水渭松）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7，2期9页）

《庄子》散文与后世文论　（胡乐平）文科月刊（1987，3期3页）

《庄子》：抒写心灵、表现自我的文学杰作　（郭丹）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7，1期7页）

庄子《逍遥游》艺术谈　（刘家端）中文自修（1987，2期4页）

《庄子》与汉赋（徐宗文）安庆师院学报（社科）（1987，4期82页）

愤世疾俗，热烈追求——《逍遥游》主旨试挥　（杨旭升）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87，3卷3期55页）

试论庄子艺术形象的浪漫主义实质　（陈洪波等）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87，1期18页）

庄子语言风格初探　（谭耀炬）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7，2期14页）

《庄子》寓言中的理趣　（王守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2期54页）

《庄子》形象系列之我见　（刘松来）文学遗产（1987，2期16页）

庄子寓言的艺术特征　（魏宏灿）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7，1期54页）

《庄子》论辨文章塑造形象的独特性　（邓韶玉）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8，3期17－23页）

《逍遥游》的艺术弹性美　（赵玉堂）许昌师专学报（社科）（1988，4期23－26页）

也论《逍遥游》的积极意义——与傅正谷同志商榷　（成琑萍）锦州师院学报（哲社）（1988，1期107页）

略说庄子学派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之形成　（薛敏珠）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2期65页）

试论庄子散文的论辨特色　（李敏）福建论坛（文史哲）（1988，2期77页）

一幅人类向自由王国飞跃的美妙画卷——《庄子·逍遥游》主题新论　（张国光）北方论丛（1989，1期）

《庄子》寓言概况　（张庆元）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89，1期）

《庄子·逍遥游》中大鹏形象及其主旨　（李生龙）中国文学研究（1989，1期）

悲剧灵魂的自我拯救——论《庄子》的艺术魅力及其历史意义　（王增恂）学术论坛（1989，3期）

庄子散文的感情色彩　（赵耀明）齐鲁学刊（1989年增刊）

庄子散文风格：洒脱　（徐生林）中文自学指导（1989，10期）

荀　子

荀子新笺 （高亨）山东大学学报（1957，1期）

试论荀子散文的风格 （麟助）人文杂志（1959，5期）

关于荀子的几个问题 （金景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2，3期）

荀子思想研究 （雍书业）山东大学学报（1963，3期）

《荀子“劝学”》浅析 （王伟民）友学参考（1978，4、5期合刊）

《劝学篇》的喻证特点——先秦论辨艺术纵横谈 （张大芝）语文战线（1979，1期）

《劝学》简析 （胡析）贵阳师院学报 91979，1期）

从《劝学》看《荀子》的写作特色 （胡格非）语文学习（1981，2期63页）

虎虎有生气——荀文艺术特色谈 （胡格非）上海广播电视（文科月刊）（1984，3期8页）

命赋之厥初，骚赋之续作——读荀卿《赋篇》 （李金锡）鞍山师专学报（社科）（1985，1期55页）

力学敦品，学用一致——《劝学》思想内容和作法的启示 （桂秉权）艺谭（1986，3期94页）

荀子散文的文学成就——先秦诸子散文漫谈之四 （章沧授）安庆师院学报（社科）（1986，4期91页）

论《荀子·赋篇》在赋史上的地位 （卢光霞）承德师专学报（1986，3期59页）

韩 非 子

韩非子之文学 （陈千钧）学术世界1卷9期（1936，3）

《郑人买履》的语言分析 （张拱贵、黄岳洲）中学语文教学（1979，6期）

《扁鹊见蔡桓公》讲析 （姜光斗、顾启）语文教学研究（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79，2期）

略谈《扁鹊见蔡桓公》 （王伟民）语文教学通讯（1979，3期）

韩非——我国古代“难”体散文之祖 （张惠仁）四川师院学报（社科）（1981，1期30页）

韩非散文的艺术特色 （朱宏达等）语文学习（1981，3期37页）

韩非子寓言故事研究（节录）——韩非子寓言故事对后世的影响 （李军）研究生论文集刊（社科）（1982，2期87页）

韩非散文的艺术特色 （魏宏灿）艺谭（1981，4期42页）

精深宏博，外见文采——浅谈《韩非子》的文学色彩 （闫笑非）北方论丛（1985，2期66页）

众体皆备，集其大成——《韩非子》文章漫谈 （谭家健）中州学刊（1986，1期63页）

论韩非子散文的说理艺术 （章沧授）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7，2期53页）

“博喻之富”的《韩非子》 （傅丽英）河北师院学报（哲社）（1988，2期76—81页）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怎样一部书 （李诗）文汇报（1961，8，5）

反复纵横曲尽其意——浅谈《吕氏春秋·察今》的比喻手法 （张乃立等）修辞学习（1982，4期54页）

论《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 （章沧授）文学遗产（1987，4期48页）

《吕氏春秋》寓言试探 （张秉光）佛山师专学报（社科）（1987，3期31页）

山 海 经

《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 （袁珂）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7）

《山海经》初探 （袁行霈）中华文史论丛（1979．第3辑）

《山海经》——研究古代史地、民俗医药的重要文献 （张明华）福建日报（1979．5．13）

略论《山海经》的神话 （袁珂）中华文史论丛（1979第2辑）

略谈《山海经》 （张明华）读书（1980，7期85页）

《山海经》与现代科学 （谢祖）读书（1981，8期135页）

一部瑰伟瑰奇的古籍——《山海经》 （蜀仁）吉林民间文学（1982，1期60页）

《山海经》性质考 （翁银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5，4期83页）

略谈《山海经》 （陈仁凤等）语文学习（1985，7期40页）

《山海经》作于楚怀王末年考 （翁银陶）求索（1987，5期100页）

《有夏志传》与《山海经》之双向探考 （欧阳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6期92—100页）

秦 汉

总论

试谈秦代文学 （陈玉麟）江苏师院学报（1979．4期）

汉赋韵篓 （层冰）文学杂志3期（1933．4）

论汉代的辞赋 （沛青）国闻周刊11卷8期（1934．3）

汉赋与六朝辞赋的形成及其特色 （王璠）学风4卷2期（1934．3）

汉赋篇 （朱杰勤）文史学研究所月刊3卷1期（1934．3）

汉赋篇 （王气钟）学风5卷8期（1935．10）

汉赋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 （吴烈）国民文学1卷6期（1935．3）

汉赋之双轨 （蒋天枢）志林1期（1940．1）

汉赋与古优 （冯沅君）中原月刊1卷2期（1943．9）

汉赋探源 （彭仲铎）国文月刊22期（1943．7）

汉赋与俳优 （傅庚生）东方杂志41卷23期（1945．12）

汉赋研究 （李善言）文化先锋7卷9．10期（1947．11）

文赋的思想与艺术 （郑孟彤）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

与郑孟彤先生商榷汉赋的评论问题 （单丹）光明日报（1959．1．25，文学遗产245期）

谈汉赋 （陈介白）天津日报（1959．6．16）

关于汉赋 （李嘉言）光明日报（1960．4．17，文学遗产309期）

汉赋略说 （里庸）福建日报（1962．11．18）

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 （曹道衡）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1979．7）

汉大赋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其政治意义——两汉文学史话之三 （段熙中）文学遗产（1980，2期1页）

试论汉赋的讽谕 （康金声）山西大学学报（哲社）（1981，3期55页）

汉赋新评 （张志岳）求是学刊（1981，2期62页）

论汉赋的图案化倾向 （万光治）四川师院学报（社科）（1982，3期12页）

汉赋闲谈 （郑在瀛）黄石师院学报（哲社）（1982，1期42页）

论汉赋的类型化倾向 （万光治）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3，1期59页）

汉赋“讽谕”辨 （毕万忱）光明日报（1983．9．6）

汉赋是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吗？ （金叶）教育与进修（1984，1期20页）

近代汉赋研究综述 （朱一清）文学研究动态（1984，8期8页）

论汉赋与汉诗、汉代经学的关系 （万光治）四川师院学报（社科）（1984，2期27页）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康金声）山西大学学报（哲社）（1984，2期67页）

两汉辞赋的文学价值 （马宁中）固源师专学报（社科）（1984，3期38页）

近年汉赋研究综述 （朱一清）文史知识（1984，12期114页）

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伦理意向 （阮忠）咸宁师专学报（哲社）（1984，3期84页）

汉赋再评价 （顾绍炯）贵州文史丛刊（1985，2期100页）

汉代经学对汉赋繁荣的影响 （赵辉）华中师院学报（哲社）（1985，1期76页）

论汉赋的比喻 （章沧授）艺谭（1985，4期51页）

汉大赋初探 （温正贤）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社科）（1986，8期24页）

汉代颂赞铭箴与赋同体异用 （万光治）社会科学研究（1986，4期97页）

略论汉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谭景椿）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6，2期30页）

汉赋的渊源与流变 （郭预衡）克山师专学报（哲社）（1986，2期23页）

汉代赋论浅探 （王朋）岳阳师专云梦学刊（1986，增刊49页）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罗昌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1986，4期86页）

汉代赋论浅探 （王朋）中国文学研究（1986，2期3页）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论汉赋以“大”为美 （何文）文学遗产（1986，1期62页）

论汉赋的语言成就 （康金声）山西大学学报（哲社）（1986，1期47页）

文义附庸，蔚为大国——谈刘勰对汉赋的评述 （易健贤）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7，4期35页）

也论汉大赋的消亡 （肖华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7，5期80页）

关于汉赋的“歌颂” （何新文）湖北大学学报（哲社）1987，5期29页）

汉赋琐谈 （叶幼明）中国文学研究（1987，3期105页）

论两汉的“贤人失志之赋” （李生龙）中国文学研究（1987，3期98页）

西汉抒情赋概论 （曹明纲）文学遗产（1987，1期28页）

论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龚克昌）文史哲（1987，2期37页）

汉赋的浪漫主义特色 （章沧授）文史哲（1987，2期47页）

论汉大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金荣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7，1期119页）

梁苑辞赋谈 （王增文）商丘师专学报（社科）（1987，1期43页）

汉赋作家的心态研究 （刘毓庆）山西大学学报（哲社）（1988，2期28—36页）

试论汉至南北朝散文发展的特点及其成因 （何明新）重庆师院学报（哲社）（1988，2期78—81页）

论汉代的骚体赋 （康金声）山西大学学报（哲社）（1988，2期18—27页）

数量·过程·技法—谈汉赋的一些基本情况 （曹大中）中国文学研究（1988，

作家作品

李 斯

贾 谊

63 页）

贾谊和他的政论文 （闫振云）文史知识（1981，12 期 98 页）

汉大赋之先声—贾谊的赋 （王洲明）电大科园地（1984，5 期 8 页）

贾谊的人格与《新书》的风格 （周家驹）安徽大学学报（哲社）（1984，2 期增刊 43 页）

读贾谊的《过秦论》（附原作） （韩兆琦）名作欣赏（1985，1 期 99 页）

贾谊赋论 （龚克昌）中州学刊（1985，4 期 77 页）

贾谊《吊屈原赋》臆说 （张永鑫）南充师院学报（哲社）（1985，2 期 105 页）

庄语豪迈、异彩卓烁—谈《过秦论》的语言艺术 （闫世鑫）中文自学考试辅导（1984、4—5 期）

《吊屈原》论析 （霍松林）河北师院学报（哲社）（1987，1 期 10 页）

贾谊散文略论 （董笔正）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89、1 期）

晁　错

简析晁错的《论贵粟疏》 （季涛）中学语文（武汉师院）（1979．2 期）

试谈《论贵粟疏》对比手法的运用 （沈继常）语文友学（锦州师院）（1979，3 期）

《论贵粟疏》的写作特点（刘宗德）语文教学（江西师院）（1979．3 期）

枚　乘

枚乘"七发"志疑 （叶华）龙门杂志 1 卷 5 期（1947．7）

《七发》介绍 （余冠英）文学知识（1959．10 期）

谈谈《七发》 （史文哲）北京日报（1960．1．7）

枚乘《七发》李善注订补 （吴小如）文史第 2 期（1963．1）

《七发》读后的联想 （易振）光明日报（1963．5．30）

枚乘和他的《七发》 （米寿顺）中文自学指导（1985．5 期 11 页）

枚乘散论 （姜葆夫）济宁师专学报（社科）（1985，4 期 41 页）

《七发》与形式美 （徐宗文）文史知识（1988，10 期 113—116 页）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与汉赋 （佩衡）齐大季刊 2 期（1933．6）

略述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之文学 （罗智强）民钟学刊 1 卷 4 期（1935．12）

司马相如著述考 （郑嘉莆）东方文化 2 卷 5 期（1943．5）

"长门赋"真伪辩 （许世瑛）中德学志 6 卷 1．2 期（1944．6）

司马相如赋论 （万曼）国文月刊 55．56 期（1947．5．6）

也谈司马相如 （苏鹤）四川日报（1959．6．19）

关于司马相如—和苏鹤同志商榷 （黎本初）四川日报（1959．7．12）

论司马相如赋的本原和特点 （刘开扬）文学遗产增刊（第 10 辑）

《长门赋》出现的意义—兼论其非托名之作及其他 （费振刚）光明日报（1982．11．2③）

简论司马相如散文的特色 （陶启君）四川师院学报（社科）（1982，4 期 55 页）

《天子游猎赋》辨 （龚克昌）文学遗产（1983，3 期 12 页）

司马相如论—《汉赋研究》之一 （龚克昌）社会科学战线（1983，3 期 220 页）

也谈《天子游猎赋》—兼与龚克昌同志商榷 （徐正文）徐州师院学院学报（哲

社）（1985，1期40页）

《子虚赋》《上林赋》考辩—与龚克昌同志商榷　（谌东飚）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科）（1986，2期70页）

司马相如赋和楚辞　（竖白）上海师大学学报）哲社（1987，1期37页）

司马相如对辞赋创作的贡献　（曹明纲）社会科学战线（1987，3期280页）

从审美角度看司马相如的赋　（黄广华等）文史哲（1987，3期45页）

《子虚》《上林》赋的得与失—读《赋史》札记　（叶幼明）中国文学研究（1988，1期108—112页）

司马相如大赋新论　（孙玉成）延安教育学院学刊（1988年，3—4期）

重论司马相如及其赋　（汪涌豪）思想战线（1989、4期）

东方朔

《东方朔研究》作品注释部分之二：非有先生论　（呈众）昌潍师专学报（社科）（1981，1期40页）

东方朔及其作品　（呈众）昌潍师专学报（社科）1981，2期41页）

淮南子

试论《淮南子》的宇宙观　（于首奎）文史哲（1979，5期）

可敬的英雄—读《淮南子》小札　（陈述）哈尔滨文艺（1981，1期46页）

略谈《淮南子》中的神话和传统　（杨荫深）民间文学论坛（1982，创刊号23页）

论《淮南子》的文采　（张啸虎）北方论丛（1983，6期43页）

《淮南子》的文艺思想—汉初黄老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集中反映　（徐寿凯）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3，2期52页）

《淮南子》的文学特色　（张啸虎）文史知识（1985，7期20页）

司马迁和史记

史记文学之研究　（袁芮）中央大学半月刊1卷13期（1930、5）

文学史上之司马迁　（李长之）文潮月刊1卷5、6期（1946，9，10）

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之来源　（李长之）国文月刊51期（1947，1）

伟大的现实主义散文作家司马迁　（任访秋）长江文艺（1954，8）

谈《鸿门宴》的人物描写及其他　（张郁朋）语文学习（1955，4）

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侯外庐）人民日报（1955，12，30）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刘际铨）历史研究（1955，6期）

《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郭沫若）历史研究（1955，6期）

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　（殷孟伦）文史哲（1955，6期）

《史记·陈涉世家》的人物描写　（张豈泽）教学研究集刊（1956，4期）

通过《魏其武安侯列传》来看司马迁《史记》的语言艺术　（殷孟伦）文史哲（1956，6期）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游国恩）教师报（1956，9，4）

司马迁的斗争精神及其艺术成就　（廖秉真）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56，1期）

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的　（季镇淮）语文学习（1956，6）

试论司马迁《史记》的思想性　（邓潭州）新建设（1956，4）

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长之）语文学习（1956，8）

司马迁赋作的评价　（赵省之）文史哲

(1956．2期)
《史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高亨)文史哲(1956．2期)
司马迁的人物特写　(冯其庸)新闻战线(1957．7—10)
司马迁的传记文学　(姚奠中)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7．1期)
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　(苏仲翔)文学遗产增刊(第4期)
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　(陈直)四川大学学报(社)(1957．3期)
司马迁的讽刺语言的艺术　(马仲琏)文史哲(1958．2期)
《项羽本记》评论　(王文海等)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59．2期)
应该怎样来评价《史记》的文学成就　(山鹰)解放日报(1959．9)
《史记》文学成就的评价问题　(陈咏)解放日报(1959．4．4)
《鸿门宴》的人物及其他　(魏兴南)语文(1960．2)
略谈《鸿门宴》的人物和情节　(颜学孔、董治安)语文教学(1960．2)
《史记》艺术力量的根源　(慕义)光明日报(1960．3．13，文学遗产304期)
论司马迁的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问题　(杨增华)甘肃师范大学学报(人文1960．1期)
《史记》中的项羽形象　(吴幼源、殷呈祥)光明日报(1961．4．23，文学遗产360期)
《史记》体例的分析　(葛一之)文汇报(1961．8．27)
司马迁两题　(舒芜)文汇报(1961．8．4)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吴晗)人民文学(1962．2期)
司马迁寓断于序事　(白寿彝)光明日报(1962．4．13)
司马迁和项羽　(何兹全)光明日报(1962．5．19)
关于《史记》二题　(方管)光明日报(1963．1．13)
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种种　(孙正容)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63．1期)
司班异同论　(苏渊雷)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4．2期)
应该全面正确地评价司马迁的思想　(王启兴)文史哲(1965．6．15．3期)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有人民性吗?　(唐赞功)文史哲(1965。5期)
司马迁笔下的"循吏"—谈谈《史记·循吏列传》　(徐朔方)光明日报(1966．1．30)
读《陈涉世家》　(钟古)新教育(1975．9期)
略谈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　(吴汝煜)光明日报(1977．10．22)
读司马迁的孙膑传　(何法周)开封师院学报(1977．3期)
《廉颇蔺相如列传》简析　(偃师高中语文组)语文教学参考高中版(开封师院)(1978，4期)
略谈《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艺术特色　(王伟民)破与立(1978．4期)
《廉颇蔺相如列传》浅析　(享邑)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78，3期)
谈《屈原列传》　(温一凡)江西大学报(1978．3期)
孙膑艺术特点浅析　(刘宗德)语文教学通讯(1978，6期)
关于《鸿门宴》的几个问题　(蔡文江)语文战线(1978．4)
司马迁和《史记·鸿门宴》　(刘方元)语文教学(江西师院)(1978，3期)
不可沽名学霸王—《鸿门宴》分析　(徐应佩、周溶泉)语文战线(1978，2期)

《鸿门宴》评析　（李知文、刘永章）北京师大学报（1978，1期）

《鸿门宴》的思想和艺术　（王廷梯）破与立（1978，1期）

司马迁的崇实精神　（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4期）

史学之绝唱　（刘方元）江西师院学报（1978，2期）

司马迁和《史记》　（孙达人、刘九生）陕西教育91978，2期）

《史记》人物传记给我们的启发　（桐华）福建文艺（1978，1期）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李继芬）天津文艺（1978，4期）

司马迁的《史记》　（何法周）河南文艺（1978，12期）

司马迁与《赵氏孤儿》（蜗庐漫笔）　（赵仲邑）随笔丛刊（第1集，1979．6）

《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艺术手法　（黄清上）语文学习（1979，5期）

读《五帝本纪》札记　（陈可青）北京师院学报（1979，3期）

礼赞高风亮节　倾吐回肠怨愤—读《史记·屈原列传》　（白静生）河北师院学报（1979，4期）

试谈《廉颇蔺相如列传》的结构艺术　（田素义）菏泽师专学报91979，3期）

脉络清晰，浑然一体－《廉颇蔺相如列传》结构浅析　（朱征难、乐秀峻）教学参考（1979，10期）

谈《廉颇蔺相如列传》人物形象的刻划　（徐应佩、周溶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2期）

略谈《史记》的思想性　（陈谦豫）语文学习丛刊（第8期，1979．6）

司马迁对历史素材的艺术处理　（吴汝煜）语文学习丛刊（第8期，1979．6）

《史记》的思想与艺术　（李世刚、卢文晖）辽宁师院学报（1979，4期）

略论《史记》人物的心理刻划　（朱清）安徽大学学报（1979，3期）

《鸿门宴》的人物描写　（张瑗、谈风梁）语文战线（1979，1期）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史记》读后散记　（拾遗）宁夏文艺（1979，2期）

司马迁世界观初探　（陆永品）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1979，4期）

略谈司马迁的社会观　（陆永品）吉林大学学报（1979，4期）

从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看真实人物的再现　（虞达文）广西大学学报（1979，1期）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　（王克钿）延安大学学报（哲社）（1980，4期91页）

《史记》中的照映手法　（唐跃）艺谭（1980，2期142页）

卓越的史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的结合—谈司马迁对陈胜、项羽、刘邦形象的塑造　（吴汝煜）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0，2期62页）

谈《史记》描绘人物的艺术　（陈兰村）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0，1期19页）

论《史记》的民间文学色彩　（杨迅）江西大学学报（社科）91980，2期78页）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邹越）群众艺术（1980，3期45页）

太史公笔法小议　（资中筠）光明日报（1980，4．16④）

《项羽本纪》的悲剧特色　（艾岩）名作欣赏（1981，3期4页）

《李将军列传》艺术谈—《史记》散论之四　（吴汝煜）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1，4期54页）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赵逵夫）社会科学（甘肃）（1981，4期68页）

谈《史记》的人物描写 （梁劲）宙州师专学报（1981，1期18页）

谈司马迁对项羽的塑造 （任致中）文科教学（1981，3期66页）

笔补造化，代为传神—略谈《史记》的场面描写 （胡晓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1981，1期36页）

史记的场面描写 （白静生）河北师院学报（哲社）（1981，3期69页）

随物赋形，著手成春—司马迁的创造力散论 （可永雪）内蒙古师院学报（哲社）（1981，1期48页）

试论《史记》中传记散文的文史分野 （章明寿）淮阴师专学报（社科）（1981，2期35页）

《史记》纪传体的文学意义 （李少雍）光明日报（1981.1.14④）

一篇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传记作品《屈原列传》 （刘鸣周）昌潍师专学报（社报）（1981，1期49页）

《报任安书》写作年代辨 （黄振民）北京师院学报（社科）（1981，4期55页）

互文见义—司马迁史笔札记 （宋怀仁）北方论丛（1982，4期110页）

《史》《汉》语言风格的比较—试析关于项羽、刘邦和苏武的描述 （杨松浦）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82，3卷4期83页）

《史记》琐谈（之二） （罗庚岭）教与学91982，2期36页）

《史记》中的女性形象 （白静生）河北师院学报（哲社）（1982，3期63页）

从信陵、春申、平原、孟尝四传议《史记》人物描写之特色 （莫尧舜）语文战线（1982，12期42页）

《史记》的语言研究 （朱星）河北师院学报（哲社）（1982，2期1页）

读《史记》札记之二 （赵久行）河北师院学报（哲社）（1982，2期84页）

谈太史公讽刺之“奇”—史记的讽刺艺术之一 （李世萼）杭州师院学报（社科）（1982，1期60页）

奇特—《史记》语言风格之一 （王家录）修辞学习（1983，1期38页）

《史记》的特殊修辞与畸形句例 （韩兆琦）北方论丛（1983，4期48页）

共性人物各具个性—《史记》人物画象之一 （李继芬）杭州师院学报（社科）（1983，2期35页）

谈《史记》文笔之“疏” （李世萼）杭州师院学报（社科）（1983，2期43页）

论《史记》人物传记的浪漫主义 （潘啸龙）安徽师大学报（哲社）（1983，3期50页）

司马迁怎样塑造历史人物 （张大可）兰州学刊（1983，3期75页）

凝情铺叠，寄慨悲歌—读《屈原列传》 （霜钟）名作欣赏（1983，5期24页）

曲折回环，情思盎然—读《信陵君窃符救赵》 （张补俊）名作欣赏（1983，5期27页）

试谈魏公子的形象及其塑造—读《史记·魏公子列传》 （李才亮）玉林师专学报（社科）（1983，2—3期35页）

《史记》的词句特点 （吕桂申）电大语文（1983，11期9页）

对《史记》传记文学论的几点异议 （徐中文）芜湖师专学报（哲社）（1983，2期51页）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何旭光）南充师院学报（哲社）（1983，4期55页）

垓下之绝唱和《离骚》〔《史记·项羽本纪》〕（令舟） 零陵师专学报（哲社）（1983，2期33页）

对《李将军列传》的几点认识 （聂石樵）自修大学（文史哲经）（1983，4期9页）

妙题寓旨，匠心独运—《史记》标题管窥

之一 （李志慧）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85，4期62页）

《史记》细节描写浅说 （何旭光）南通师专学报（社科）（1985，4期54页）

论《李将军列传》 （黄永堂）贵州文史丛刊（1985，4期124页）

于含蓄中见褒贬—《史记》散论之三 （李继芬）杭州师院学报（社科）91985，1期62页）

读《史记·游侠列传》 （韩兆琦）名作欣赏（1985，4期13页）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何旭光等）锦州师院学报（哲社） （1985，2期36页）

《报任少卿书》的艺术技巧 （王发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91985，1期83页）

《史记》的抒情特征 （刘德煊）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 （1985，3期102页）

读《史记》杂议之一—陈涉世家 （业衍章）艺谭91985，1期48页）

一曲爱国仗义的赞歌—对《信陵君列传》几个问题的浅探 （彭玉光）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85，1期25页）

《史记》中本纪、世家体例 （许志刚）文学遗产（1986，5期28页）

辨《史记·酷吏列传》 （沈玉成）文学遗产（1986，5期35页）

浅谈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形象 （单薇）绥化师专学报（社科）（1986，3期29页）

论司马迁对人的看法与写法 （杨松浦）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86，7卷1期103页）

刘邦是“受命而帝”吗？—析《高祖本纪》的神异描写 （赵生群）盐城师专学报（社报）（1986，2期80页）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试释（《史记》）（吴汝煜） 南通师专学报（社科）（1986，1期49页）

谈《项羽本纪》的战争描写 （李继芬）杭州师院学报（社科） （1986，1期60页）

简论《史记》的文学性 （可永雪）语文教学（1986，1期31页）

司马迁的史才和《史记》的体裁 （傅朗云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1期18页）

略论《史记》的悲剧特征 （孙海洋）湘潭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86，1期41页）

《史论》军事描写篇章的几个特点 （徐传武）人文杂志（1986，1期87页）

略论《史记》的叙事与抒情 （关四平）绥化师专学报（社科） （1986，4期25页）

《项羽本纪》的传记文学价值 （徐金凤）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7，2期49页）

悲剧英雄的自白书—《报任安书》赏析 （景明）语文学习与研究（1987，2期31页）

《史记》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 （柯天希）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科）（1987，2期81页）

论《史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整一性 （刘玉平等）南充师专学报（哲社）（1987，2期158页）

关于司马迁历史散文成就的思考 （刘松来）文学遗产（1987，4期127页）

《史记》与我国古代传记文学 （韩兆琦）文学知识（1987，7期8页）

历史的“实录”原则与文学的表现方法—《史记》的辩证艺术之一 （何旭光等）（1987，1期93页）

《史记》的语言特点 （何旭光）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7，3期91页）

错综周密，纤毫毕现—《魏其武安侯列

（龚国祥）江汉大学学报（1989，3期）

《史记》艺术略论　（杨树增）东北师大学报（1989，5期）

略论司马迁的人物描写　（王怀让）齐鲁学刊（1989，增刊）

浅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思想　（陈兰村）吉林师院学报（1989，2期）

试浅《史记》"太史公曰"的文学特色　（王增文）渭南师专学报（1989年，1期）

谈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何旭光）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9、3期）

桓　宽

序《盐铁论》读本　（郭沫若）新建设（1954、4期）

《盐铁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赵省三）山东大学学报（1957、1期）

《盐铁论》疑义补释　（王达津等）南开学报（哲社）（1981，3期68页）

说　苑

刘向《说苑》管窥　（马达）盐城师专学报（社科）（1987，1期13页）

说《说苑》　（范能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8，1期28页）

扬　雄

读扬雄太玄赋献疑　（郑文）争鸣（1957，4期）

有关扬雄　（李嘉言）光明日报（1960，5.15，文学遗产313期）

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　（王以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5，1期47页）

扬马辞赋讽谏论　（赵生群）文史哲（1987，3期51页）

王　充

关于王充的《论衡》　（徐敏）新建设（1960. 10. 1）

《论衡集解》的成就和问题　（陈监先）光明日报（1961. 11. 21）

对《论衡集解》一书的几点意见　（肖湄）文汇报（1962. 3. 2）

王充和他的《论衡》　（夏湖）浙江日报（1973，12. 1）

班　固

读"两都赋"偶记　（俞士镇）古学丛刊6期（1940，1）

班固《汉书》评述　（安作璋）破与立（1978，1期）

班固的君权思想与《汉书·苏武传》　（张玉奇）语文教学（江西师院）（1979，3期）

《苏武传》的对比反衬及其它　（纪川）语文教学（江西师院）（1979，5，6期合刊）

《苏轼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初探　（李玉宏）韶关师专学报（1981，1期）

《汉书》的文学价值　（陈梓权）中山大学学报（哲社）（1982、3期）

《两都》与《二京》〔汉赋〕　（周健）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1期84页）

《苏武传》的写人艺术　（孟庆华）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7，4期122页）

高风亮节，使不辱命—读《汉书·苏武传》　（袁启明）外交学院学报（1987，2期57页）

张　衡

论张衡《二京赋》对汉大赋讽谏艺术发展的贡献　（刘朋堂）中国文学研究

（1987，4期112页）

慷慨奋藻，独辟蹊径——读张衡《归田赋》 （杨炳校）文史知识（1988，7期36—39页）

蔡 邕

蔡伯喈之死及其遗文 （蒋星煜）随笔丛刊（第2集，1979，7）

赵 壹

赵壹赋论 （龚克昌）文学评论（1985，1期117页）

王 符

试论王符的《潜夫论》 （易国杰）南通师专学报（社科）（1985，2期53页）

诸葛亮

《隆中对》的分析 （何加陵）语文学习（1955，5）

诸葛亮的《隆中对》 （易茗）光明日报（1961，3，18）

诸葛亮《诫子书》 （马晓野）河北日报（1961，12，14）

《出师表》试析 （陈宁安）教学参考（1978，4，5期合刊）

《隆中对》串讲 （徐佩应、周溶泉）四川师院学报（1978，4期）

《隆中对》简析 （朱式平）山东师院学报（1978，4期）

《隆中对》串 （姜光斗、管武常）语文教学（江西师院）（1978，6期）

身居草庐，胸怀天下－《隆中对》析 （吴万刚）破与立（1979，5期）

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读《出师表》 （长旭）中学语文《武汉师院》（1979，6期）

对子女要严格要求—读诸葛亮《诫子书》 （陈汉楚）光明日报（1979，11，29）

忠义深情寄翰墨—谈诸葛亮的《出师表》 （徐余等）名作欣赏（1982，3期72页）

论诸葛亮散文的文学史地位 （张啸虎）中州学刊（1983，2期102页）

论《后出师表》非伪作 （庞怀靖）人文杂志（1983，2期104页）

《出师表》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王学东）语文导报（1987，11期34页）

孔 融

论孔融文气 （何人斯）中国文学研究（1987，2期13页）

孔融的思想、性格和文风 （张亚新）贵州大学学报（社科）（1987，2期42页）

祢 衡

鹦鹉不媚主，千古断肠声—试析祢衡《鹦鹉赋》 （郭长庚）中国文学研究（1988，3期58－60页）

魏晋南北朝

总论

建安七子诗文钩沉 （俞绍初）郑州大学学报（哲社）（1987，2期52页）

浅论建安散文的艺术特点 （史遵衡）东岳论丛（1989年4期）

魏晋隋唐文论 （张须）国文月刊53期（1947，3）

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及成就 （成本文等）布谷鸟（1980，10期61页）

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论 （王运熙）文学遗产（1980，1期36页）

我国古代文苑中的珍珠玫瑰——试论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艺术特色 （刘树滑）南宁师院学报（哲社）（1983，2期

54页）

浅论魏晋六朝杂传的文学价值 （陈兰村）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5，1期1页）

论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 （李祥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6，2期8页）

试论魏晋南北朝志怪文学和山水文学表现倾向和社会功能的一致性 （聂雄前）湘潭大学学报（增刊）（1987，3期14页）

魏晋赋泛论 （杨胜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8，1期92页）

魏晋南北朝散文写作的嬗变 （王兴华）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2期）

略论西晋的讽刺散文 （曹道衡）语言文学（1979．5期）

论六朝骈文 （孙德谦）学衡26期（1924．2）

谈古文 （六朝文）（启无）北平世界日报明珠1936．10．9

三竿两竿 （六朝文）（废名）北平世界日报明珠11936．10．5

六朝文章 （沈启无）风雨谈6期（1943．10）

情采缤纷的六朝抒情小赋（上） （胡国瑞）文史知识（1984．5期10页）

情采缤纷的六朝抒情小赋（下） （胡国瑞）文史知识（1984．6期12页）

六朝骈文论略（萧艾）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4期21页）

再论北朝诗赋 （郭预衡）社会科学战线（1985，1期228页）

齐梁山水信札二题 （谢楚发）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6．2期76页）

玄言诗赋新论 （马晓光）晋阳学刊（1986，5期90页）

北朝三书的思想倾向和文风特点 （郭预衡）北京师院学报（社科）（1986，4期1页）

南北朝文学研究情况综述 （吴明）文学研究参考（1987，5期14页）

六朝骈文的艺术评价 （胡国瑞）文学遗产（1987，1期37页）

骈文与六朝审美意识 （钟涛）青海师大学报（1989年、3期）

六朝小品文艺术蠡测 （王宇）辽宁商专学报（1989年、3期）

六朝赋特色初探 （王继坤）德州师专学报（1989、1期）

作家作品

曹　操

论曹操和建安文学 （今果）安徽史学通讯（1959．3期）

曹操与建安文学 （林举）羊城晚报（1959．7．14）

简论曹操的散文 （高光复）求是学刊（1981，4期27页）

一掬成才者的泪——谈曹操《祀故太尉桥玄文》 （张长明）艺谭（1982，2期136页）

曹操散文的艺术特色 （张亚新）求索（1983．5期65页）

移风易俗，简明隽永——谈曹操革除弊俗的令文 （房聚棉）朝阳师专学报（1985，4期54页）

曹操文章与建安风骨 （张啸虎）社会科学辑刊（1987，4期126页）

略论曹操散文的艺术特色 （岩岭）济宁师专学报（社科）（1988，3期33—35页）

王　粲

从王粲登楼赋说到骚赋与辞赋的分别 （殷乃）清华周刊37卷7期（1932）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从

《登楼赋》看王粲的政治思想 （凌迅）语文教学研究（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79、3期）

试论王粲的诗赋创作 （吴云等）天津社会科学（1982，6期87页）

故国与乡思，千载尚有情——王粲《登楼赋》赏析（附作品） （张永鑫）名作欣赏（1983，6期30页）

《登楼赋》楼址辨正 （俞绍初）文学遗产（1983，2期158页）

故国情思，归用心曲——王粲《登楼赋》主旨辨 （陈洪）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5．4期60页）

王粲《登楼赋》的感情脉搏 （林鸿荣等）中文自学指导（1986，7期47页）

《登楼赋》——王粲弃刘归曹的信号与准备 （曹大中）——中州学刊（1987、3期81页）

论王粲赋 （胡德怀）中国文学研究（1988、2期29－33）

王粲《登楼赋》抒情艺术的特色 （朱毅）西北师院学报（社科）（1988、4期36－40页）

王粲赋论 （张亚新）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1988、6期567—60页）

曹　植

曹子建痛赋感甄文 （谭正璧）青年界8卷2期（1935．9）

曹植"洛神赋"本事说 （詹锳）东方杂志39卷16期（1943．10）

"洛神赋"与曹氏父子 （远）大公报（1947．7．2．25）

论曹丕曹植的文章 （许世瑛）读书通讯159期（1948．6）

略论洛神赋的文学价值 （黄公渚）青岛日报（1957．1．19）

浅谈曹植的《洛神赋》 （傅淑芳）青海社会科学（1981，2期104页）

《洛神赋》主旨寻绎——为"感甄"说一辨兼驳"寄心君王"说 （陈祖美）北方论丛（1983．6期48页）

《洛神赋》为"寄心文帝"说质疑 （张瑗）南京师院学报（哲社）（1983．4期50页）

柔情丽质，哀怨蕴结——曹植《洛神赋》赏析（附作品） （李健）名作欣赏（1984，1期31页）

曹植《洛神赋》的思想和艺术管窥 （黄季耕）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5，2期68页）

《洛神赋》源流考论 （钟来因）江海学刊（文史哲）（1985、5期87页）

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洛神赋》的主题和艺术特点（附《洛神赋》注释） （陈祖美）文史知识（1985，8期30页）

《洛神赋》论 （陈弘）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1986，4期53页）

《洛神赋》主题思想研究纵览 （张亚新）语文导报（1986，3期33页）

赋颂之宗，作者之师——略论曹植在建安赋风转变中的地位 （周茂君等）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7，2期41页）

浅议从《神女赋》到《洛神赋》的艺术进展 （周小龙）南京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8，1期50—52页）

略论曹植辞赋的特点 （吕美勤）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1期）

文章曹植波澜阔——曹植散文初探 （周建国）安庆师院学报（1989、2期）

阮　籍

阮籍试论 （肖学鹏）中山大学学报（1956、4期）

阮籍《大人先生传》辨析 （韦凤娟）文学遗产（1983．4期）

嵇　康

试论嵇康　(何世华)人文杂志(1954.4期)

论嵇康　(霍松林)人文杂志(1959、3期)

略论嵇康及其作品　(张志岳)哈尔滨师院学报(1960年.1期)

嵇康思想及其诗文的特色　(郭维森)南京大学学报(1963,2期)

清远以述志,峻切而绝交——读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陈洪)语文学习(1982、8期44页)

向　秀

"短歌微吟不能长"——《思旧赋》赏析　(高莲洲)语文学习(1981,8期38页)

李　密

李密与《陈情表》　(布谷)羊城晚报(1961.1.26)

《陈情表》的写作特点　(郑宝倩)语文园地(1985,1期29页)

《陈情表》《狱中上母书》和《与妻书》比较谈　(朱一飞等)中文自修(1987,1期38页)

寓法于情,情通理达——试谈李密《陈情表》的表现手法　(郑振邦)渭南师专学报(1988,1期32—35页)

左　思

左思和左芬　(陆侃如)大众日报(1962.7.4)

左思评传　(陆侃如)山东大学(1963.2期)

《三都赋》序注〔居学偶记〕　(游国恩)文史(第5辑,1978年12)

左思《三都赋》写作年代质疑——《晋书·左思传》等辨误　(傅璇琮)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

试论左思的文学创作　(张全生)天津师院学报(1981,2期39页)

洛阳纸贵未必佳作——论左思《三都赋》　(王辉)陕西师大学报(哲社)(1984,1期59页)

亦谈《三都赋》何时写成　(方永耀)山东师大学报(社科)(1986,6期80页)

陆　机

《文赋》初探　(王纯庵)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学报(1978.2期)

陆机的《文赋》　(曹济平)江苏文艺(1978.3期)

刘　琨

刘琨诗文简评　(陈曼平等)锦州师院学报(哲社)(1984,1期54页)

鲁　褒

鲁褒《钱神论》解析　(董兴文)学习与研究(北京)(1983,9期51页)

刺世疾时的奇文——《钱神论》(附原作)　(朱迎平)名作欣赏(1985,1期76页)

王羲之

略论《兰亭序》的思想内容与文章风格　(丁灏)南京大学学报(1978.2期)

文情并茂,理趣盎然——读《兰亭集序》　(周维德)名作欣赏(1980年,2期75页)

《兰亭序》的内容问题(综考之二)　(周汝昌)江淮论坛(1981,3期)

"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王羲之《兰亭集序》之我见　(张国星)名作欣赏

陶渊明

索（1981，3期84页）
也谈《桃花源记》中的"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侍向樵）文科教学（1981年，4期47页）
读《桃花源记》札记（董消洁）鞍山师专学报（社科）（1981，2期50页）
"桃花源"是复古倒退吗？（曾宪森）玉林师专学报（1981、2期35页）
桃花园里可耕田——读《桃花园记》（宋德胤）牡丹江师范学报（哲社）（1981，3期67页）
寓真于幻，画意诗情——读《桃花源记》（朱家驰）语言文学（1981，3期15页）
说说有关《桃花源记》的几个问题（施亚西）语文学习（1982，1期9页）
笔下桃源有亦无——读《桃花源记》（杨荣）山西教育（1982，8期29页）
从陶诗看《桃花源记》（查洪德）安阳师专学报（1982，4期85页）
关于《归去来辞》写作的时地问题（贺崇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3，3期148页）
从《归田赋》到《归去来辞》（周健）衡阳师专学报（社科）（1983，2期9页）
《闲情赋》的思想性及艺术特色（许结）江汉论坛（1983，8期48页）
陶渊明诗文的倾向性问题（张啸虎）江汉论坛（1983，4期54页）
谈《桃花源记》的创作基础（钱振新）湖南师院学报（哲社）（1984，5期56页）
隐士情怀，志士节操——析《五柳先生传》（倪其心）文史知识（1984，10期33页）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写作年代辨析（刘世林）求是学刊（1984，5期52页）
发乎情，止乎礼义——读陶渊明《闲情赋》（附作品）（振甫）名作欣赏（1984，2期117页）
浅谈《桃花源诗（并记）》的积极社会意义（余新民）黄冈师专学报（1984，2期20页）
陶渊明散文艺术浅论（李伯齐）山东师大学报（哲社）（1984，2期55页）
陶渊明散文自然真朴的美学追求（常康）北京师院学报（社科）（1985，3期14页）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读《归去来辞》（周海平）中文自修考试辅导（1985，4—5期57页）
《五柳先生传》与魏晋时代的社会（邓魁英）北方论丛（1985，1期25页）
爱情的自白，理想的结晶——《闲情赋》赏析（附原作）（钟吕）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创刊号22页）
一首美妙的散文诗——桃花源记（柳嘉）文学报（1985.6.6④）
《桃花源记》是武陵蛮生活的缩影（土家族彭秀枢）吉林大学学报（社科）（1985，1期60页）
也谈陶明诗文的倾向性（赵治中）丽水师专学报（社科）（1984年，1期22页）
关于《归去来兮辞》的创作时间问题——并与朱东润先生商榷（欧阳楠等）岳阳师专云梦学刊（1986年增刊10页）
陶渊明《闲情赋》的评价问题（李文初）暨南学报（哲社）（1986，2期57页）
也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徐声扬）九江师专学报（哲社）（1986年3期1页）
也谈《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王维理）重庆师院学报（哲社）（1986，3期62页）
淡墨写幽意，于古诵华章——《桃花源记》艺术探微（初旭）语文学习与研究（1986，10期27页）

颜延之

世说新语

山西师大学报（社科）（1985，1期47页）

实中有虚，以虚衬实——浅谈《世说新语》人物塑造问题 （马宝丰）武汉大学学报（社科）（1985，2期89页）

《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 （信应举）郑州大学学报（哲社）（1985，1期40页）

《世说新语》的语言美 （范子叶）求是学刊（1986，4期85页）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征及其影响 （蔺䌹岷）浙江师大学报（社科）（1986年，1期87页）

《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 （侯忠义）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7，4期123页）

《世说新语》人物对话的艺术 （吴斤俊）淮阴师专学报（哲社）（1987，2期23页）

《世说新语》编例谈 （梁建邦）渭南师专学报（综合版）（1987，2期77页）

晋人风韵之美《世说新语》 （啸马）东岳论丛（1988，2期74页）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江兴佑）社会科学（甘肃）（1989年6期）

《世说新语》的审美观 （张永昊）文史哲（1989、6期）

范晔与《后汉书》

范晔《后汉书》的序论 （王运熙）文学遗产增刊（第10期）

《张衡传》叙说 （刘操南）语文战线（1978、2期）

《张衡传》简析 （永泉等）语文教学参考（1978、4期）

略论《后汉书》人物传纪的文学价值与特色 （裘汉康）中山大学学报（1989，2期）

鲍 照

“芜城赋”发微 （饶宗颐）东方杂志41卷4期（1945，2）

略谈鲍照 （罗根泽）光明日报（1955．9．25文学遗产73期）

鲍照与《芜城赋》 （孙楷第）光明日报（1957．7．7文学遗产164期）

鲍照和他的作品 （陈贻焮）文学遗产增刊（第1期）

鲍照研究 （曾君一）四川大学学报（社）（1957．4期）

试论鲍照创作的艺术成就 （朱思信）文学评论（1982，5期91页）

泼墨山水，形似神肖——读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 （附作品）（黄昌年）名作欣赏（1983年，6期62页）

鲍照的散文 （钟优民）学术研究丛刊（1985，1期97页）

感慨淋漓《芜城赋》 （鲍照）（龚照）中文自修（1985，2期32页）

《芜城赋》臆说 （孟庆麟）绥化师专学报（1986，4期36页）

江 淹

江淹及其作品 （曹道衡）光明日报（1961．3．19）

论江文通的《恨赋》、《别赋》 （乔正康）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2．11期）

心物相感，情景互生——江淹《别赋》赏析〔附作品〕 （曹明纲）名作欣赏（1983，2期62页）

别状万种总销魂——读江淹《别赋》 （龚斌）上海广播电视（文科月刊）（1984年，8期19页）

慷慨激昂，淋漓尽致——江淹《恨赋》赏析（附作品） （何沛雄）名作欣赏（1987，5期60页）

孔稚圭

孔稚圭的《北山移文》 （王运熙）文汇报（1961，7．29）

妙想奇谲的讽刺骈文——孔稚圭《北山移文》赏析（附作品） （林兴仁）名作欣赏（1981，4期58页）

《北山移文》与周颙及隐士〔南齐孔稚圭〕 （史铁良）求索（1982，2期80页）

读孔稚圭《北山移文》 （周涤）绍兴师专学报（社科）（1984年，1期86页）

《北山移文》侧议 （周家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6，4期38页）

陶宏景

笔笼山川，纸纳四时——陶宏景《答谢中书书》赏析（附作品） （徐应佩等）广州文艺（1984，9期76页）

吴 均

吴均和他的山水小品 （周家驹）天津师大学报（1983，6期72页）

读吴均的《与朱元思书》 （普平）中文自学考试辅导（1984，3期50页）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谈吴均《与朱元思书》（附作品） （丁长河）广州文艺（1984，9期77页）

人在画中游，美景不胜收——《与朱元思书》赏析 （周恩珍等）名作欣赏（1984年，2期50页）

扫除浮艳，淡然无尘——吴均《与朱元思书》赏析 （高山）散文（1987，10期32页）

奇异卓绝，神超形越——吴均《与宋元思书》再探 （赵昌平）中文自修（1987，9期21页）

南朝山水文学与吴均“三书” （刘文杜）文史知识（1989．11期）

丘 迟

草长莺飞，珠圆玉润——读《与陈伯之书》（附：《与陈伯之书》） （彭铎）甘肃文艺（1980，4月号102页）

感人肺腑的骈文杰作——读〔南朝梁代〕丘迟《与陈伯之书》 （方永耀）名作欣赏（1980，2期84页）

丘迟的《与陈伯之书》 （许革非）语文学习（1981年，10期30页）

理直·情真·言宜——读《与陈伯之书》 （何必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8，6期105—107页）

裴子野

关于裴子野诗文的几个问题 （曹道衡）文学遗产（1984，2期107页）

昭明文选

文选篇题考误 （刘盼遂）国学论丛1卷4期（1928．10）

昭明文选流传之原因 （家雁）清华周刊38卷12期（1932）

文札记 （层冰）文学杂志5期（1933．9）

文选问题小论 （陈君宪）矛盾月刊2卷4期（1933．12）

续选导言（附选学书目） （骆鸿凯）学术世界1卷7期（1935．12）

文选类例正失 （徐英）安徽大学月刊2卷5期（1935．3）

文选读余 （叶樾工）学风6卷5期（1936．8）

选学源流 （骆鸿凯）制言8—10期（1936．1—2）

文选指瑕 （骆鸿凯）制言11期（1936．2）

文选学考 （许世瑛）国闻周报14卷10期（1937．3）

肖统的《文选序》 （顾复生）江苏文艺（1978．6期）

《文选》的选录标准 （沈玉成）文学遗产（1984．2期113页）

《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 （王运熙）复旦学报（社科）1988．6期10－16页）

刘 峻

"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论刘峻的骈文 （曹道衡）光明日报（1984．6．26③）

徐 陵

徐陵骈文初探 （周建瑜）文学遗产（1988．4期42—57页）

郦道元与《水经注》

《水经注》在中国游记文学上的价值和影响 （吴颖）旅行家（1957．3期）

郦道元和他的杰作《水经注》 （任访秋）语文学习（1957．9）

郦道元的《水经注》 （钮仲勋）河北日报（1961．9．25）

谈谈《水经注》 （李嘉言）光明日报（1962．9．22）

郦道元语言论拾零 （张永言）中国语文（1964．3期）

精读方知文律细——谈《三峡》的写作艺术 （赵一新） 语文学习丛刊（第5期1978．8）

郦道元的《水经注》 （曹尔琴）西北大学学报（1978．3期）

《三峡》试析 （王保元）语文教学研究（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78．4期）

郦道元和《水经注》 （张明华）福建日报（1979．10．15）

游记文的开创者 （曲素艳辑）河北日报（1979．6．17）

郦道元与《水经注》简介 （吕培成）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79．3．4期合刊）

《三峡》的写景和构思 （朱正仕）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版（浙江师院）（1979．3期）

《水经注》描写山水的艺术技巧 （罗宗阳）江西大学学报（哲社）（1979．4期95页）

《水经注》中的歌谣、谚语 （房聚棉）语文学习（1981．10期34页）

壮丽清新的山水画卷——《水经注·三峡》赏析 （冯宇）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1，4期33页）

《水经注》的写景语言 （张翰勋）兰州大学学报（社科）（1981年，3期86页）

《三峡》疑释 （黄加浩）温州师专学报（社科）（1981，1期79页）

《水经注》与写景散文 （雷履平）四川文学（1982，6期81页）

试论《水经注》的文学成就 （谭家健）文学遗产（1982年4期1页）

《水经注》与游记文学 （任访秋）文史知识（1984，7期20页）

尽发山水之美的妙章绮语——论《水经注》写景的语言艺术 （李知文）贵州社会科学（1984，4期96页）

简说《水经注》的文学价值 （顾伟列）中文自修（1985，3期20页）

《水经注》文学渊源初探 （李知文）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1987，2期31页）

试论《水经注》的语言艺术 （李知文）宁夏大学学报（社科）（1987，4期44页）

庾 信

庾子山哀江南赋集注 （李详）国粹学报7卷4期（1911）

哀江南赋笺 （高步瀛）师大月刊14、18、26期（1934．10—1936．4）

对《庾信诗赋选》序言的两点意见 （太林）光明日报（1958．5．10）

对《庾信诗赋选》的选文标准和序言的几点意见 （高海夫）光明日报（1958．9．28）

论庾信及其诗赋 （刘开扬）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

论《哀江南赋》及其序 （杨白桦）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63．8．1期）

如何评价庾信及其作品中的"故国"之思 （张可礼）文史哲（1966．2期）

庾信的创作艺术（北朝） （葛晓音）中州学刊（1982．4期80页）

说《哀江南赋序》 （孙静）中文自修（1985．2期33页）

苍凉郁悒，忧思哀怨——读庾信《小园赋》 （顾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1986，4期103页）

论庾信的赋 （李正春）铁道师院学报（社科）（1987．3期66—74页）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说《哀江南赋》并序 （葛晓音）文史知识（1987，9期27页）

略论庾信及其诗赋评价问题 （李贵）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8，2期43—48页）

庾信《小园赋》赏析 （陈洪宜）名作欣赏（1989、2期）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颜之推和他的《家训》 （李剑雄）随笔（1981，14集63页）

试谈颜之推和《颜氏家训》〔南北朝〕 （谭家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2，3期31页）

杨衒之与《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 （黄公渚）文史哲（1956．11期）

《洛阳伽蓝记》试论 （罗根泽）光明日报（1960．1．31，文学遗产432期）

漫谈《洛阳伽蓝记》 （潘辰）光明日报（1962．9．16，文学遗产432期）

《洛阳伽蓝记》及作者 （林茂兴）河北日报（1979．12．7）

《洛阳伽蓝记》的几条补注 （周一良）文献（1980．3辑111页）

寓褒讥于伽蓝，寄奇思于妙笔——略论《洛阳伽蓝记》 （陈庆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6．2期63页）

论《洛阳伽蓝记》 （房聚棉）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7，2期86页）

《洛阳伽蓝记》里的一点牢骚 （张中行）读书（1989、6期）

（隋）唐宋

总论

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 （曾了若）史学专刊1卷1期（1935．12）

读唐诗文札记 （李嘉言）国文月刊10期（1941．9）

续劳格读全唐文札纪 （岑仲勉）史语所集刊9本（1947．9）

读全唐文日札 （马宗霍）师声1期（1947．6）

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 （孙昌武）社会科学战线（1982，4期299页）

关于《唐文粹》 （张涤华）安庆师院学报（社科）（1982，1期63页）

读《全唐文》札记一则 （汤一介）文献（1983．15辑202页）

谈谈诗人之文〔谈唐代几位大诗人的散文创作〕 （姜光斗等）文学教学（1984，2期68页）

论唐末小品文的锋芒与文采 （张啸虎）

求索（1984，3期83页）
论唐赋的新发展 （马积高）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6年，1期100页）
晚唐杂文的社会背景 （勾承益）成都大学学报（社科）（1987，4期92页）
试论唐代散文与骈文的关系 （吴佩珠）思想战线（1987，1期33页）
简论晚唐杂文的历史地位 （勾承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7，2期36页）
中晚唐古文趋向新议 （葛晓音）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7，5期21页）
武周治下的文章 （郭预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7，6期18页）
国内唐代散文与小说研究近况 （雨辰）文学遗产（1987，2期133页）
简说唐代文章之变迁 （郭豫衡）文学遗产（1988，4期42—57页）
唐初政治与文章 （郭预衡）河北师院学报（1988、4期）
唐文的复古运动 （陆贻白）狂飚月刊2卷3、4期（1948．8）
浅论唐代的散文革新运动 （陆联星）淮北煤师院学报（1979、创刊号）
唐代古文运动及韩柳的散文 （宗夏）语文战线（1979、3期）
中唐古文运动和韩柳散文 （顾复生）中文自学指导（1987，11期1页）
初、盛唐文的演进与古文运动 （王祥）文学遗产（1987，1期43页）
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 （罗宗强）文史知识（1988，4期9—16页）
唐宋元明文概说 （楼巍）唯是2期（1920．6）
读唐宋散文名作 （雨田）滇池（1982，3月号62页）
唐宋散文发展之辨证观 （孙连琦）锦州师院学报（哲社）（1988，4期52—57页）
唐宋古文风格差异的成因 （刘坎龙等）新疆教育学院学报（汉文版）（1988，1期34—38页）
唐宋八大家文章论序 （陈起昌）国专月刊1卷5期（1935．7）
唐宋八大家文考论 （张杰）光华大学半月刊5卷3、4期（1936．12）
略谈“唐宋八大家”散文的特色 （张文涛）甘肃日报（1984、9、6④）
谈谈唐宋八大家的散文 （周振甫）中学语文教学（1985，12期25页）
论“唐宋八大家”散文的地位和影响 （任朝弟）宝鸡师院学报（哲社）（1986，4期46页）
试论唐宋八大家散文的美学歧异及其影响 （万陆）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7，1期70页）
古文运动的复兴（论宋代古文） （陈子展）青年界4卷4期（1933．9）
宋初古文新论 （罗根泽）文化先锋6卷3、4期（1946．9）
宋元明清文论 （张须）国文月刊55期（1947．5）
北宋诗文 （胡守仁）江西师院学报（1978、2期）
宋代散文简论 （张志烈）四川大学学报（1979，1期）
行云流水，姿态横生——读宋代散文随笔之一 （郭预衡）散文（1980，10期46页）
平中见奇崛，似易却艰辛——读宋代散文随笔之二 （郭预衡）散文（1981，3期39页）
读《宋文选》 （海客）四川大学学报（哲社）（1982，1期90页）
宋文总论 （金启华）芜湖师专学报（哲社）（1983，2期77页）
近年来的宋文研究 （王锡九）语文导报（1985，12期16页）

北宋文章的两个特征 （郭预衡）社会科学战线（1985，3期300页）

略论宋代政论文的说理特色 （杨H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7，2期40页）

亭台楼观，千姿百态——北宋四篇台阁名胜记比较赏析 （周悲昌）大学文科园地（1987，5期41页）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散文艺术风格之比较 （王河）江西社会科学（1987，4期130页）

简论宋代文对唐代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靳朝济）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87，1期44页）

宋代散文之美学观照 （万陆）江西社会科学（1987，5期131页）

南宋散文评论中的几个问题 （王绮珍）文学遗产（1988，4期1—15页）

试论南北宋笔记的不同 （张辉）四川大学学报（哲社）（1988，1期68页）

宋代山水游记简论 （高洁）齐鲁学刊（1988，4期39页）

欧曾王苏散文比较 （吴小林）文史哲（1988，5期76—80页）

作家作品

骆宾王

檄文典型，骈俪佳品——读《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程玉缀）文史知识（1985，2期35页）

王　勃

王勃作《滕王阁序》之年 （蒋逸雪）江海学刊（1962，2期）

王勃《滕王阁序》的写作年代 （裴文郁）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79，试刊2期16页）

江山留胜迹，千古诵华章——《滕王阁序》的艺术构思 （邓志瑗）语文教学（1980，1期60页）

关于《滕王阁府》的写作年代 （李无逸）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3期109页）

佳句序名楼，思慨传千载——读王勃《滕王阁序》 （孙吕武）散文（1981，11期46页）

童子·弱冠·他日——试论王勃作《滕王阁序》之时间 （周本淳）淮阴师专学报（社科）（1981，1期25页）

《滕王阁序》纵横谈 （徐高祉）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学报（1982，1期61页）

从《滕王阁序》的立意谈重视人才 （曹涛）江西教育学院学刊（1982，2期85页）

王勃"落霞、秋水"句考辩 （黄镇伟）九江师专学报（哲社）（1984，3期29页）

关于《进学解》、《滕王阁序》写作年代质疑 （王婕）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1984，2期179页）

寓变化于严整，精美中见天趣——《滕王阁序》浅析 （方智范）中文自学指导（1985，3期40页）

王勃《滕王阁序》作于何年 （任国绪）北方论丛（1986，6期47页）

情景交融，造意深蕴——《滕王阁序》的表现手法 （宜侦）广州师院学报（社科）（1986，3期59页）

王勃《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及其他 （詹亚园）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1986，1期92页）

少年心事当拏云——《滕王阁序》意境浅析（附作品） （康明轩）名作欣赏（1986，1期56页）

"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新释——《滕王阁序》注释质疑 （杨卓）松辽学刊

（社科）（1987，2期87页）

王 绩

王绩诗文系年考 （韩理洲）山西大学学报（哲社）（1983，2期64页）

论王绩的诗文及其文学成就 （张锡厚）文学遗产（1984，2期116页）

陈子昂

陈子昂的《修竹篇序》 （华文）文汇报（1961. 8. 25）

谈陈子昂和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异同之处 （曹文铨）光明日报（1962. 10. 21，文学遗产437期）

陈子昂诗文编年考 （韩理洲）求是学刊（1982，3期40页）

刘知几

刘知几《史通》的史传文学理论 （吴文治）江汉论坛（1982，2期60页）

张 鷟

张鷟的《龙筋凤髓判》与《朝野佥载》 （秦瘦鸥）艺谭（1985，3期106页）

张九龄

张九龄的生平和诗文新探 （李玉宏）韶关师专学报（1986，13期60页）

李 白

试论李白散文的艺术性 （裴伟华）南充师院学报（哲社）（1981，3期52页）

李白与李白诗文札记四则 （苏兴）东北师大学报（哲社）（1981，3期42页）

李白文章管窥 （王定璋）四川师院学报（社科）（1983，4期58页）

“人生不朽是文章”——略述李白文的思想内容 （牛宝彤）成都大学学报（社科）（1988，3—4期79—81页）

颜真卿

浩然正气，凌云健笔——评价颜真卿一篇奏疏 （上韦）司法文书与公文写作（1985，1期35页）

杜 甫

杜文窥管续篇（一） （刘开扬）草堂（1982，1期70页）

杜文窥管续篇（二） （刘开扬）草堂（1982，2期67页）

李 华

悲惨阴暗的战争画卷——重读《吊古战场文》 （臧克家）文史知识（1986，7期39页）

元 结

读元结文札记 （孙昌武）社会科学战线（1985，3期292页）

次山文开子厚先声说 （黄炳辉）厦门大学学报（哲社）（1986，1期129页）

韩 愈

韩柳欧苏文之渊源 （胡怀琛）国学1卷2期（1926. 11）、小说世界15卷16期（1927. 4）

韩文读语 （钱基博）光华大学半月刊1卷1—5期（1932. 10—12）

韩文笺正 （古直）国学论衡4期下（1934. 11）

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 （李嘉言）文学2卷6期（1934. 6）

证韩篇 （论韩愈文）（陈柱）学术世界1卷17期（1935. 12）

与陈柱尊教授论韩文书 （李澍）学术世界1卷11期（1936. 5）

韩昌黎的"画记" （李健吾）学生月刊1卷3期（1940.3）

韩文研究法 （陈柱尊）大学季刊1卷4期（1941、1）、真知学报2卷5期（1943.1）

韩愈复古新论 （李嘉言）现代西北4卷6期（1943、2）

论韩愈 （陈寅恪）历史研究（1954，2期）

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 （黄云眉）文史哲（1955.8期）

关于韩愈思想的评价问题 （邓潭洲）光明日报（1955.8.28）

关于韩愈和他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 （任访秋）语文教学通讯（高中版）（1957.7—9期）

论韩愈的现实主义精神 （张仲浦）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人文）（1957.1期）

谈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 （任访秋）新建设（1957.9期）

对韩愈及其文学的评价 （丁振家）文学遗产增刊（第5期）

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 （季镇淮）文学研究（1958.1期）

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实践 （季镇淮）北京大学学报（人文）（1958.2期）

韩愈文学的评价 （黄云眉）文史哲（1959.11.12期）

韩愈祭鳄鱼文及其他 （杨荷）羊城晚报（1959.4.18）

关于韩愈的评价 （高海夫）文汇报（1959.6.9）

略谈韩愈的消极面——兼记宋代古文家对韩愈的批评 （顾易生）文汇报（1959.7.12）

略论韩愈的《师说》 （王运熙）语文教学（1959.9）

韩愈《师说》的思想和写作背景 （季镇淮）语文学习（1959.9）

韩愈散文的技巧 （振甫）新闻战线（1959.22.23期）

谈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 （任访秋）新建设（1959.9期）

试谈韩愈的尚奇及韩文与骈文的关系 （顾易生）文学遗产增刊（第10期）

试论韩愈散文的思想性 （邓谭洲）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60.1期）

读韩愈《师说》随笔 （辛田）天津日报（1961.11.26）

论韩愈的《师说》 （李清悚）文汇报（1961.3.24）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 （程留让）河南日报（1962.6.10）

勤与思，嬉与随——韩愈《进学解》一启 （山茅）人民日报（1962.4.30）

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散文的特色 （王达津）河北日报（1962.3.23）

韩愈的《师说》 （臧克家）人民日报（1962.2.19）

韩愈的《师说》——"不耻相师" （秦时伟）甘肃日报（1962.1.28）

韩愈古文运动的进步性 （卫仲璠）江淮学刊（1963.1期）

韩愈思想评论 （鲍叔）哈尔滨师院学报（1963.2期）

韩愈和柳宗元 （王芸生）新建设（1963.2期）

谈韩愈对当时及后代文学的影响 （邓潭洲）合肥师院学报（1963.3期）

从用字造句方面看韩愈提倡"古文"的作用 （褚祖耿）江淮学刊（1963.5期）

叙事·议论·抒情——读《张中丞传后叙》 （冯其庸）长春（1963.6期）

再论韩愈和柳宗元——并答吴孟复先生 （吴芸生）新建设（1963.11期）

析伯夷、叔齐——读韩愈的《伯夷颂》和王安石的《伯夷论》 （郑析）郑州大学学报（1974.2期）

韩愈《师说》讲解——兼驳几种说法 （王毅）中学语文（武汉师院）（1978．6期）

韩愈和《师说》 （温公翊）语言文学（1978、1期）

《马说》浅析 （李致钦）语文教学（锦州师院）（1979．3期）

《马说》解 （一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79．2期）

《马说》浅析 （刘宗德）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版）（浙江师院）（1979．4期）

韩愈和他的《师说》 （翟旭东）破与立（1979．6期）

《师说》杂议 （陈新璋）广东教育（1979．12期）

重读《师说》有感 （周鹄昌）昆明师院学报（1979．1期）

韩愈《师说》浅析 （朱瑛）贵阳师院学报（1979．3期）

《师说》注析 （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南宁师院（1979．1．2期合刊）

略说韩愈的《师说》 （王伟民）中学语文（开封师院）（1979．1期）

为韩愈一辨——韩愈评价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王启兴）西北大学学报（1979．4期）

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 （吴世昌）文学评论（1979．5）

韩愈、柳宗元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再评价 （蒋凡）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1979．12）

韩愈论议文的特色 （東辰）语文战线（1979．3期）

唐代古文运动及韩柳的散文 （宗夏）语文战线（1979．3期）

韩愈和柳宗元 （刘国盈）北京师院学报（1979．1期）

杰出的散文家韩愈 （郭预衡）文学评论丛刊（第2辑，1979．2）

韩愈、柳宗元和唐代的古文运动 （蔡福寿）云南教育（1980．9期26页）

关于韩愈的《伯夷颂》 （韩兆琦）齐鲁学刊（1980．2期41页）

试论韩愈散文 （胡守仁）争鸣（1981，2期79页）

论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 （孙昌武）辽宁师院学报（社科）（1981，2期20页）

所谓“谀墓之文”和“以文为戏”——读唐代散文随笔之一 （郭预衡）散文（1982，4期46页）

韩愈谀墓辩 （仇永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2，3期63页）

读韩愈《送董邵南序》 （蒋凡）写作（1982，1期17页）

一代文坛宗匠，千古语言大师——简介作为散文家的韩愈 （孙昌武）散文（1982，2期41页）

气势磅礴，千姿万态——评韩愈散文 （叶百丰）语文学习（1982，1期2页）

论韩愈的散文艺术 （刘国盈）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2，4期1页）

韩文琐札 （吴小如）文献（1982，11辑38页）

试析韩愈散文立意谋篇的“奇”处 （曾子鲁）江西师院学报（哲社）（1982，4期78页）

韩愈散文所描写的类型形象 （王玉骏）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2，3期58页）

漫话韩愈的散文 （陈乐民）榕树文学丛刊（1982，3辑434页）

试析韩愈散文的“变”与“奇” （曾子鲁）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3，3期35页）

试论韩愈散文的创新特色 （吴小林）唐代文学论丛（1983，总3辑153页）

谈韩愈作《送孟东野序》 （周振甫）写作（1983．5期6页）

57页）

从《师说》看韩愈散文的特色　（王根林）政工学刊（1986，9期17页）

说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及其它　（金启华）光明日报（1987，1．13③）

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　（张国荣）大学文科园地（1987，2期47页）

不平则鸣，切中时弊——《原毁》思想窥探　（林大勇）承德师专学报（1987，1期73页）

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　（葛晓音）学术月刊（1987，5期21页）

读韩愈《圬者王承福传》　（熊宪光）语文（1987，1月号56页）

前后映带，形散神聚——读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章鹤龄）徽州师专学报（哲社）（1987，3期65页）

“文起昌黎百世师”——曾国藩论韩愈古文的美学特征　（邓云生）求索（1987，4期121页）

读韩愈《送孟东野序》札记　（谭业谦）江汉大学学报（社科）（1987，2期63页）

瑰宕多奇，不类旧常——试论韩昌黎碑志创作的成就　（龚德才）中国文学研究（1987，1期44页）

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　（饶德江）武汉大学学报（社科）（1987，3期63页）

满纸辛酸泪，一片干谒情——韩愈《进学解》浅析　（王庆堂）渭南师专学报（综合版）（1987，1期20页）

短章圣手的一篇绝妙文字——《送董邵南序》　（萧南生）渤海学刊（1988，2期22－25页）

韩愈对“古文运动”的语言贡献　（周福如）抚顺教育学院学报（1988，3期11—14页）

评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章起）安庆师院学报（社科）（1988，4期50—55页）

韩碑思想内容探微　（鲁瑞义）江西工业大学学报（1988，10卷1期95－103页）

执正驭奇——韩愈《送穷文》与柳宗元《乞巧文》之比较　（姜兰宝）大庆师专学报（哲社）（1988，2期40—42页）

韩愈柳宗元山水散文艺术比较　（徐正英等）郑州大学学报（哲社）（1988，3期48－55页）

论韩愈、柳宗元散文的特色　（张玉麟）贵州文史丛刊（1988，1期116—123页）

论韩柳杂文的思想成就　（刘洪仁）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88，2期99—23页）

论韩柳散文的异同　（吴小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4期89—99页）

龙门家法与韩欧神理　（张家英）文学遗产（1988，4期84－92页）

韩愈“气盛言宜”新探——兼论“古文”的艺术特征　（张立伟）文学遗产（1988，4期58—67页）

韩愈《答张籍书》的写作时间考　（吴新生）延边大学学报（1988，1期）

浅谈韩愈散文的曲折美　（范文质）绥化师专学报（1989，3期）

论韩愈并不谀墓　（李光富）四川大学学报（1989，1期）

韩文如水柳文如山略说　（洪本健）江海学刊（1989，5期）

论韩柳杂文的艺术成就　（刘洪仁）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89，3期））

李　翱

论李翱文　（李光富）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8，2期59－65页）

刘禹锡

白居易

柳宗元

2期)

论柳宗元 (王芸生)文汇报(1963. 9. 12)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柳宗元的研究 (学术讨论综述·刘补整理)文汇报(1963. 9. 12)

柳宗元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吗? (陈扬炯)文汇报(1964. 1. 21)

《捕蛇者说》的艺术构思 (徐应佩、周榕泉)破与立(1978. 4期)

柳宗元及其《捕蛇者说》 (严蔚青)语文教学研究(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78. 3期)

奇山秀水异石寄真情——读柳宗元山水游记一得 (黎汉鸿)广西民族学院(1978. 3期)

《捕蛇者说》分析 (古典文学教研组)中学语文(武汉师院)(1978. 5期)

读《钴鉧潭西小丘记》小语 (金锡茹)成阳文艺(1979. 4、5期合刊)

柳宗元《永州八记》选讲〔上、下〕 (霍松林)语文学习(1979. 2—3期)

试论柳宗元山水记的特色 (林东海)榕树文学丛刊(1979第1辑)

论柳宗元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 (吴文治)文学论集(第一辑1979, 6)

柳宗元评传 (李孟存)山西师院学报(1979、1 3期)

向柳宗元的寓言学习 (丘振声)广西文学(1980. 11期64页)

文气、文风、文眼——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 (毛时安等)名作欣赏(1980, 1期5页)

试论《捕蛇者说》的结构艺术 (李应恩)语文学习(1980. 9期34页)

柳宗元论"文" (高海夫)人文杂志(1980, 1期32页)

试论柳宗元的散文艺术 (孙昌武)南开学报(哲社)(1980. 3期50页)

柳宗元散文述评 (胡守仁)江西师院学报(哲社)(1980、1期1页)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写作技巧 (胡志胃)写作(1981创刊号24页)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写作技巧 (鲍叔)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1, 1—2期74页)

试谈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特色 (郭鲸鲲等)宁波师专学报(社科)(1981, 1期7页)

柳宗元的传记文 (朱碧莲)语文学习(1981, 12期32页)

柳宗元诗文简论 (孟庆文)零陵师专学报(1981, 2期33页)

论韩柳、刘柳诗文风格异同及柳的独立性 (苏渊雷)零陵师专学报(1981, 2期9页)

简论柳宗元在永州的创作 (张玉玲)零陵师专学报(1981, 2期41页)

一幅幽洁的风景画——浅说《小石潭记》的写作技巧 (俞浩胜)泰安师专学报(1981, 1期26页)

柳宗元及其永州山水散文 (吴代芳)唐代文学论丛(1982, 2期82页)

《至小丘西小石谭记》分析 (王宽行)河南师大学报(社科)(1982, 3期53页)

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温至孝)西北师院学报(社科)(1982, 1期72页)

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读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附作品) (金敏)名作欣赏(1982, 3期4页)

自然美的发现和开掘——读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小石谭记》 (帙文正)太原文艺(1982, 2期61页)

"有境界则成高格"——也谈《永州八记》 (刘仲桥)散文(1982, 3期47页)

读《柳文指要》札逐 (徐仁甫)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2, 1期29页)

文研究） （刘广汉）杂文界（1986，5期19页）

从审美视角谈《永州八记》 （经美英）南通师专学报（社科）（1986，3期54页）

《永州八记》艺术特色五题 （樊维纲等）杭州师院学报（社科）（1986，3期9页）

论柳宗元山水记的诗情美 （李育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1986、5期35页）

柳宗元文赏析两篇 （倪木兴）泉州师专学报（哲社）（1986、2期19页）

柳宗元书信臆探 （唐高武）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1986，4期51页）

思人之树长青——《永州八记》的美学思考 （周昌乾）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1986、4期11页）

理璞成璧，返朴归真——论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美的发现和美的表现 （夏卫平）零陵师专学报（哲社）（1986，2期36页）

柳宗元的永州游记 〔日〕小野四平著（隽雪艳译）文学研究参考（1986，12期23页）

谈柳宗元文艺性散文的风格 （王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6，1期52页）

柳宗元的《牛赋》 （经美英）阅读与写作（1987，6期27页）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山水审美观探微 （杜晓勤）南通师专学报（社科）（1987年，4期54页）

《小石潭记》、《醉翁亭记》比较赏析 （谭学纯）教学研究（中学文科）（1987，4期7页）

谈柳宗元的《永州八记》 （朱元珍）南京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7，3期43页）

从柳宗元、欧阳修的山水游记看审美趣味的差异 （徐正英）殷都学刊（1987，4期48页）

柳宗元寓言与先秦寓言的比较研究 （尤力）云南社会科学（1988，6期96—102页）

浅谈《永州八记》中的意境 （丁仪）殷都学刊（1988，1期81页）

柳宗元山水记的审美意义 （王佩娟）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8，1期42—48页）

论柳宗元的山水文学 （张翥等）锦州师院学报（哲社）（1988，2期64—70页）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美学特色 （蒋崇光）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科）（1988，2期58—62页）

柳宗元传记体散文的特征 （杨素娥）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1988，2期93—98）

柳宗元书启价值论 （周陆军等）广西师大学报（1988、4期）

论柳宗元的山水散文 （李其钦）广州师院学报（1988、4期）

柳宗元寓言文幽默美初探 （徐英）华南师大学报（1989、1期）

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 （吴小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5期）

柳宗元讽刺寓言成因探 （朱国维）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9、1期）

元　稹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跋文三篇 （屈守元）草堂（1982，1期58页）

关于元稹诗文评价的思考 （吴伟斌）光明日报（1986、12、16③）

杜　牧

《阿房宫赋》介绍 （臧克家）人民教育

(1961，11期)

谈有关《阿房宫赋》的几个问题 (蒋逸雪) 扬州师院学报 (1962总15期)

杜牧《阿房宫赋》简介 (李峰)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1978，10期)

宫成焦土 赋留绝唱——谈杜牧的《阿房宫赋》 (傅平国) 语文教学 (江西师院) (1978，4期)

《阿房宫赋》简介 (肖叔) 破与立 (1978，3期)

杜牧《阿房宫赋》注析 (陶今雁) 江西师范学报 (1978，1期)

谈《阿房宫赋》 (李春芳) 山西教育 (1979，5期)

关于"冷袖"的一点理解〔杜牧〕《阿房宫赋》 (毛乐耕) 江苏师院学报 (哲社) (1980，4期91页)

略谈《阿房宫赋》 (朱德胤) 牡丹江师院学报 (哲社) (1980，4期46页)

《阿房宫赋》试析 (王玉璋) 中学语文教学 (1980，2期6页)

精美的赋体散文——《阿房宫赋》的艺术特色 (吴功正) 散文 (1980，2期42页)

《阿房宫赋》的讽喻特色和写作技巧 (兰锡麟)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哲社) (1980，4期154页)

《阿房宫赋》的语言特色 (吴亚芬) 天津师专学报 (1981，1期59页)

《阿房宫赋》的生命力 (竹亦青) 名作欣赏 (1981，3期37页)

谈谈《阿房宫赋》与汉赋和古文运动的关系 (王锡九) 教学与进修 (1983，3期33页)

谈《阿房宫赋》的写作构思〔杜牧〕 (程甦) 贵阳师院学报 (社科) (1983，2期75页)

读《樊川文集》札记 (吴在庆) 固原师专学报 (社科) (1984，3期43页)

《阿房宫赋》新笺 (徐翰逢) 教学通讯 (文科) (1984，7期6页)

略论杜牧的文和赋 (王西平等) 齐鲁学刊 (1985，3期113页)

阿房宫与《阿房宫赋》 (刘运勇) 南充师院学报 (哲社) (1986增刊61页)

杜牧《阿房宫赋》赏析 (纪作亮) 艺谭 (1986，2期79页)

《阿房宫赋》中的夸饰浅探 (陶铸) 绍兴师专学报 (社科) (1987，1期69页)

论杜牧的散文 (寇养厚) 苏州大学学报 (哲社) (1987，1期55页)

杜牧若干诗文系年之再考辨 (郭文镐) 西北师院学报 (社科) (1987，2期32页)

段成式

略谈《酉阳杂俎》中的描写 (段宝林) 楚风 (1982，4期86页)

李商隐

论樊南文 (董乃斌) 文学遗产 (1983，1期43页)

李商隐散文简论 (董乃斌)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哲社) (1984，3期119页)

形神兼备、情文并茂——李商隐《李贺小传》赏析 (周慈昌) 散文 (1988，4期39页)

孙樵

孙樵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初探 (王志昆) 广西大学学报 (哲社) (1988，1期53-58页)

罗隐

〔晚唐〕罗隐和他的《谗书》 (邓魁英) 文学遗产 (1981，1期91页)

"抗争和愤激之谈"——关于罗隐的《谗

书》（潘慧惠）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1，2期79页）

罗隐和他的《谗书》（刘金）杂文界（1988，4期43—44页）

皮日休

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缪钺）四川大学学报（社）（1955，2期）

校点《皮子文薮》说明——兼记皮日休诸问题（萧涤非）文史哲（1958，1期）

皮日休简论（唐玲玲）华中师院学报（1978，4期）

皮陆小品文浅论（张明）镇江师专学报（1988，2期）

陆龟蒙

读〔唐〕《野庙碑》（附作品）（戈帛）艺谭（1981，3期72页）

《野庙碑》的讽刺艺术（葛晓音）中文自修（1985，8期21页）

孙光宪

《北梦琐言》的史料价值（林艾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2，5期82页）

柳　开

柳开学韩得失论（祝尚书）文学遗产（1988，4期68—76页）

王禹偁

《黄冈竹楼记》赏析（纪作亮）艺谭（1984，1期121页）

《黄冈竹楼记》赏析（张振钧）语文园地（1985，7期25页）

读王禹偁《黄冈竹楼记》（殷海国）语文学习（1986，3期33页）

玲珑剔透的黄冈竹楼——王禹偁《黄冈竹楼记》赏析（周愈昌）散文（1986，8期15页）

杨　亿

杨亿佚文《南津桥记》考（谢先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7，3期40页）

范仲淹

读《岳阳楼记》（山翅）青海教育（1957，8期）

漫谈《岳阳楼记》（许世亭）语文教学（1957，9）

《岳阳楼记》的写作特点（吴方）语文学习（1958，8）

范仲淹和《岳阳楼记》的写作（温蝮）语言文学（1960，5，6）

谈《岳阳楼记》（霜松林）光明日报（1961，12，10，文学遗产373期）

优美的抒情散文《岳阳楼记》（陈过、赵景瑜）火花（1962，9期）

《岳阳楼记》的艺术构思（王缵权）陕西教育（1978，5期）

《岳阳楼记》的描写手法（吴功正）陕西教育（1978，5期）

《岳阳楼记》的艺术构思（徐应佩、周溶泉）语言文学（1978，5期）

略说《岳阳楼记》的写作特色（刘芳泉）语文学习丛刊（6期，1978，11）

读《岳阳楼记》——兼谈散文不散（李晖）北方文学（1978，7期）

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刘建国）中学语文（武汉师院）（1978，2期）

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朱德才）破与立（1978，3期）

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刘清涌）语文战线（1978，2期）

**论《岳阳楼记》的思想性——兼议《岳阳楼

记再议》一文　（毛水清）南宁师院（1979，6期46页）

《岳阳楼记》的景物描写　（徐敦忠）四川师院学报（1979．1期）

缘物书情，借情写意——《岳阳楼记》的艺术构思　（徐应佩、周溶泉）福建文艺（1979．1期）

范仲淹《岳阳楼记》考析（吴小如）语文教学通讯（1980，1期27页）

试论范仲淹《岳阳楼记》的艺术构思兼谈文风　（郑国嗣）青海教育（1980．1期21页）

《〈岳阳楼记〉的历史考察》质疑　（何培金等）云梦学刊（1986，3期81页）

《岳阳楼记》的历史考察　（王瑞明）求索（1986，3期50页）

一份研究《岳阳楼记》的珍贵资料——滕宗谅《与范经略求记书》初探　（罗生）岳阳师专云梦学刊（1986，1期107页）

《范仲淹〈岳阳楼记〉考析》的考析——与吴小如同志商榷　（江立中）岳阳师专学报（1980．2期75页）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讲析　（袁行霈）名作欣赏（1982，1期10页）

读《岳阳楼记》　（朱永平）艺谭（1982，1期108页）

"赵明年"小考〔范仲淹《岳阳楼记》〕（李作唐等）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3，2期78页）

简说《岳阳楼记》语言的声律美　（黎运汉）语文月刊（1983，12期8页）

《岳阳楼记》是怎样描写景物的　（振甫）旅行家（1983，3期14页）

《岳阳楼记》是"传道"之文　（杨海明）湖南师院学报（哲社）（1984，6期40页）

漫话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情、景、理（李菊田等）河北师院学报（1984，3期64页）

《岳阳楼记》新探　（蔡毅）扬州师院学报（社科）（1981，1期43页）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读《岳阳楼记》　（郑熙亭）河北日报（1985．9．15④）

《〈岳阳楼记〉的历史考察》质疑　（何培金）求索（1987，4期127页）

《岳阳楼记》首段注解四疑　（黄海舟）湘潭大学学报（社科）（1987，4期103页）

《岳阳楼记》的人事背景　（张仑礼）晋阳学刊（1988，2期95页）

欧阳修

欧阳修文渊源考　（俞振楣）国专月刊4卷4期（1936．12）

欧阳修与散文中兴　（张须）国文月刊76期（1949．2）

谈《醉翁亭记》　（傅義）语文学习（1957．4）

《醉翁亭记》　（宋松筠）语文教学通讯（高中版）（1957．10．11期）

谈《醉翁亭记》　（李景白）语文（1959．4）

欧阳修的散文特色　（振甫）新闻战线（1960．5期）

欧阳修的散文　（缪钺）文汇报（1961．11．28）

关于评论文章——读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　（郭预衡）中学语文教学（1979，6期12页）

诗情画意秀丽多姿——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吴功正）北方文学（1979．8期）

北宋文学革新首领欧阳修　（丹华）江西日报（1979．10．28）

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方若曾）语文学习（1979．4期）

读欧阳修《醉翁亭记》一得　（阮治佛）书评（1979．1期）

欧阳修的散文　（孙犁）解放军文艺（1980年8月号77页）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黄志冲）青海湖（1980年7号74页）

读《醉翁亭记》　（谢冕）散文（1980，1期44页）

欧阳修和他的散文　（胡念贻）散文（1981，9期35页）

欧阳修的文论与北宋文风　（云天）延安大学学报（社科）（1981，2．3期85页）

谈《醉翁亭记》中"也"字句的运用　（徐定）扬州师院学报（社科）（1981，2期120页）

一篇情词动人的史论——谈谈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　（陈新璋）语文月刊（1982．9月号35页）

一篇特色鲜明的史论——《五代史伶官传序》赏析（附：五代史伶官传序）　（张毓茂）电大语文（1982，4期8页）

《醉翁亭记》主题辨析　（赵仁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2，2期84页）

状秋声萧飒而砰湃，抒秋情深沉而豁达——读欧阳修的《秋声赋》　（吴功正）名作欣赏（1982，3期77页）

我对《醉翁亭记》的几点看法　（吴小如）名作欣赏（1982，1期6页）

欧阳修的散文和宋代古文运动　（陈晓芬）语文学习（1982，2期38页）

忧劳兴国，逸豫亡身——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傅经顺）河北师院学报（刊授增刊）（1984，1期62页）

从《五代伶官传序》看欧阳修议论文的特色　（顾伟列）文科月刊（1984，11期17页）

醉翁之意何在——从欧阳修对待被贬的态度探《醉翁亭记》的主旨　（廖三端）语文学习与研究（1985，6期12页）

《醉翁亭记》主题新探　（张汉清等）绵阳师专教学与研究（1985，1期114页）

琐议《醉翁亭记》中的"乐"　（徐天祥）艺谭（1985，1期121页）

貌似平易，其实精工——读《醉翁亭记》浅得　（欧阳修）（曾烟凡）散文世界（1985，6期58页）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醉翁亭记》主题思想发微　（李泽民）语文学习与研究（1985，1期35页）

参差错落，摇曳多姿——谈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艺术特点　（赵星元）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1985，2期116页）

欧阳修《丰乐亭记》赏析　（纪作亮）艺谭（1983，4期128页）

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简析　（吴小如）中学语文（1983，1期32页）

系乎治乱之文——欧阳修散文管窥　（唐骥）宁夏大学学报（社科）（1983，2期62页）

欧阳修和他的散文　（胡守仁）江西师院学报（哲社）（1983，4期37页）

深邃的思想，精湛的技巧——读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严明）自修大学（文史哲经）（1983，创刊号38页）

《醉翁亭记》的结构艺术　（王为民）语言文学（1984，6期19页）

浅谈文章的意脉——读《醉翁亭记》一得　（仇幼鹤）写作学习（1984，2期31页）

论欧阳修散文的句式和虚词同其情感的关系　（洪本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4，3期59页）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读欧阳修《秋声

苏舜钦

苏洵

文学习（1982，9期34页）

略谈三苏散文中的"记" （王淑均）语文学习（1982，5期40页）

铮铮至理，滔滔情怀——苏洵《六国论》 （陈菊光）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1期18页）

苏洵、苏辙文学简评 （刘乃昌）齐鲁学刊（1985，6期48页）

三苏散文之美学观照 （万陆）抚州师专学报（1988，2期）

周敦颐

《爱莲说》浅析（附〔宋〕周敦颐：爱莲说） （龙士靖）湖南群众文艺（1980，11期40页）

莲的赞歌（附周敦颐：《爱莲说》） （别嘉）太原文艺（1980，1期62页）

咏物言志，浑然一体——读《爱莲说》 （李如鸾）名作欣赏（1980，2期44页）

衬高洁而托不染——散文《爱莲说》赏析 （宣丽华）雨花（1983，6期76页）

清风洁志托莲出——《爱莲说》写作技巧赏析 （李成贵）写作（1983，2期29页）

出淤泥而染，濯清涟而不妖——介绍周敦颐的《爱莲说》 （乡人）蓼花（1983，4，60页）

[illegible]物托志，形神兼备——读周敦颐"爱莲说" （黄雅丽）渤海学刊（1987，2期85页）

曾　巩

曾巩《墨池记》艺术风格评析 （黄南南）江西社会科学（1983，5期92页）

曾巩散文理论和散文创作的特色 （万陆）江西大学学报（社科）（1983，4期73页）

曾巩散文艺术特色漫议 （唐厚纯等）争鸣（1984，1期87页）

说曾巩《送蔡元振序》 （吴小如）文史知识（1984，2期55页）

从曾巩受冷落看古代散文研究 （刘扬忠）光明日报（1984．3．20③）

略论曾巩题记文的思想内容 （袁瑾洋）江西教育学院学刊（1984，1期50页）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王永照）复旦学报（社科）（1984，4期55页）

论曾巩散文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 （熊永汇）武汉大学学报（社科）（1988，2期83页）

曾巩和他的散文 （鲍时祥）文史知识（1987，12期68页）

论曾巩散文对明代唐宋派的影响 （邓韶玉）许昌师专学报（1989，4期）

一腔郁愤，满纸波澜——曾巩《鹅湖院佛殿记》赏析 （海默）名作欣赏（1989，5期）

司马光

漫谈《李塑雪夜入蔡州》 （加滕）语文战线（1978，4期）

关于《李塑雪夜入蔡州》 （学文）数与学（宁夏大学）（1978，1期）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读《李塑雪夜入蔡州》 （沈继常）开封师院学报（1978，4期）

出奇制胜的生动战例——《李塑雪夜入蔡州》的思想与艺术 （陈东）语文教学（江西师院）（1979，5、6期合刊）

《淝水之战》赏析 （林衍经）艺谭（1983，1期93页）

明辨博通，谨严矜慎的史笔——读司马光的《赤壁之战》 （徐实）武汉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85，4期24页）

节短音长，文约势宽——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赏析 （步武尘）散文（1986，6

期48页）

司马光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何林天）山西师大学报（社科）（1986，专刊42页）

司马光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何林夫）山西师大学报（社科）（1986专刊42页）

王安石

读《伤仲永》　（若燕）光明日报（1961．8．17）

一篇短而精的散文——分析《读孟尝君传》　（余川）贵州日报（1962．5．6）

《游褒禅山记》的意境、体裁及其他　（梅运生）安徽师大学报（哲社）（1980．1期101页）

读《答司马谏议书》所想到的　（张子敏）鞍山师专学报（社科）（1981，1期27页）

一篇八十八字的名作《读孟尝君传》赏析　（刘德斌）名作欣赏（1981，5期39页）

一篇"千秋绝调"的好文章——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　（刘柏林）写作（1981，3期32页）

名文未必无讹——也谈《读孟尝君传》　（士子野）名作欣赏（1982，2期112页）

疑义相与析——也谈《读孟尝君传》　（谢纯昌）名作欣赏（1982，5期123页）

为名作《读孟尝君传》一辨　（王庆堂等）求索（1983，2期94页）

就游记的"格"谈《游褒禅山记》的艺术创新　（王松盛）写作（1983，5期13页）

《读孟尝君传》何以千古传诵？——兼谈我国古代散文的审美要素　（吴甫修文）名作欣赏（1983，3期112页）

奇伟瑰怪，在于险远——《游褒禅山记》读后（王安石）　（许良）文艺生活（1984，5期41页）

一以胜十，劲悍严厉——谈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的写作特色（附原作）　（熊大权）散文（1985，6期47页）

读《读孟尝君传》　（聂绀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2期61页）

论王安石散文的艺术风格　（王奇珍）文艺理论家（1986，2期63页）

亦叙亦议，平易深湛——读王安石《伤仲永》　（熊大权）散文（1988，5期46-47页）

沈　括

谈沈括的《雁荡山》和《采草药》　（朱宏达）语文战线（1978，2期）

读《梦溪笔谈·雁荡山》　（张化）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79，2期）

世界地质学史上的珍贵文献——读《雁荡山》　（顾启等）语文教学（1980，1．17页）

奇才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　（彭曼青）华声报（1988，9．27④）

苏　轼

日新室随笔（东坡文章）　（张维耀）国专月刊5卷3期（1937．4）

苏轼《前赤壁赋》　（吴鹤九）语文友学通讯（高中版）（1957．10．11期）

苏轼的生平、思想和艺术成就　（雷履平）四川日报（1957．1．25）

漫谈苏轼及其《前赤壁赋》《水调歌头》《念奴娇》　（林庚）语文友学（1957．3）

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　（高海夫）主汇极

(1961. 8. 9)

试论苏东坡的散文艺术 (赵继武)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1. 总12期),江海学刊(1962. 1)

试论苏轼杂记文的创作艺术 (晦之)江汉学报(1962. 4期)

旷达豪放之情——谈《前赤壁赋》(韩珍重、庄毅)

福建日报(1962. 3. 15)

佳作不套百回谈——重谈《前赤壁赋》(臧克家)解放军文艺(1962. 1)

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 (郭预衡)光明日报(1962. 1. 28,文化遗产399期)

苏轼和《石钟山记》 (曾枣庄)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8. 1期)

笔健任挥洒谈笑自旷达——《前赤壁赋》浅析 (刘文刚)辽宁师院学报(1979. 6期)

《石钟山记》小议 (杨智鹏、梁建设)陕西日报(1979. 4. 15)

《石钟山记》分析 (徐应佩、周溶泉)辽宁师院学报(1979. 3期)

苏轼的《赤壁赋》 (臧克家)人民教育(179. 9期)

读苏轼的《日喻》 (杨生枝)陕西教育(1979. 4期)

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 (薛瑞生)陕西教育(1980, 8期23页)

苏东坡《灵璧张氏园亭记》考 (张良元)安徽大学学报(哲社)(1980, 4期85页)

短文的典范——《记承天寺夜游》浅析(文朋)写作(1981, 2期37页)

"过其门、而未入其室"——苏轼《石钟山记》中的一个问题 (赵继颜)光明日报(1981. 1. 14④)

未入其室,已得其声——谈苏轼《石钟山记》的声论说 (牟应杭)语文教学通讯(1981, 12期37页)

从苏轼《石钟山记》的失误说起 (黄进德)江西社会科学(1981, 5—6期141页)

苏轼的散文艺术 (陈学超)散文(1981, 6期42页)

一首清冷的月光曲——读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吴战垒)散文(1981, 3期42页)

直面人生,积极用世——从苏轼的散文看他人生观中的积极因素 (乔国焜)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1, 2期88页)

苏东坡与《醉翁亭记》 (花纯儒)艺谭(1981, 3期65页)

关于苏轼《与滕达道书》的系年和主旨问题 (王永照)文学评论(1981, 1期58页)

缜密的艺术构思——读苏轼的《前赤壁赋》[附作品] (吴功正)长安(1981, 7期70页)

"法寓于无法之中"——读《方山子传》(魏丕一)名作欣赏(1982, 1期64页)

前、后《赤壁赋》题旨新探 (朱靖华)黄冈师专学报(1982, 3期11页)

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 (苏利生)下关师专学报(社科)(1982, 1期1页)

闪耀着哲理光辉的论说文——读苏轼的《日喻》[附作品] (徐中五)名作欣赏(1982, 4期14页)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谈苏轼的散文(王达津)散文(1982, 1期46页)

《东坡志林》初探 (周先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2, 2期69页)

形散神凝的精采之作——谈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黄松坡等)名作欣赏(1983, 1期82页)

《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注·译〔宋·苏

略论苏轼"记"体散文的艺术特色 （曾子鲁）西北师院学报（社科）（1986，4期60页）

《东坡志林》研究三题 （何凤奇）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6，4期60页）

《东坡志林》研究三题 （何凤奇）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6，4期89页）

读苏轼的《方山子传》 （韩兆琦）北方丛书（1986，4期63页）

读苏轼的《石钟山记》 （韩兆琦）名作欣赏（1986，4期90页）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游记散文艺术谈 （马承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6，1期71页）

苏轼的游记文 （王立群）河南大学学报（哲社）（1986，2期39页）

触处成春，翛然超妙——苏轼记叙文浅析 （佘成礼）成都大学学报（社科）（1986，1期91页）

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略析东坡亭·台记的艺术特色 （马赫）辽宁大学学报（哲社）（1987，6期23页）

艺术虚幻美的追求·苏轼《前赤壁赋》探微 （邹少雄）孝感师专学报（哲社）（1987，1期40页）

笔落潇潇写廖廓——我读苏轼《前赤壁赋》 （静远）散文（1987，5期47页）

试论苏轼亭台堂记类散文的笔力 （杨明洁）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社科）（1987，2期55页）

从《志林》看东坡小品文的文学成就 （王文龙）盐城师专学报（社科）（1987，2期32页）

从《前赤壁赋》看苏轼与佛学 （黄进德）扬州师院学报（社科）（1987，1期84页）

"文学、与"哲学"完美结合的绝妙之作——读苏轼的《前赤壁赋》 （杨海明）文史知识（1987，3期35页）

论苏东坡寓言的成就和贡献 （朱靖华）枣庄师专学报（1988，3期）

浅谈《前赤壁赋》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李厚肃）中国文学研究（1988，2期128--130页）

略论苏轼散文的语言艺术 （姚建文）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88，2期58—63页）

简说《前赤壁赋》的主题 （陈鉴昌）成都师专学报（文科）（1988，1期34—36页）

前后《赤壁赋》主旨及艺术魅力 （包景成）南通师专学报（社科）（1988，1期71—76页）

苏轼"以诗为文"论 （赵仁珪）文学遗产（1988，1期75页）

姿致天成，寓理传神——论苏轼的山水散文 （黄幼茵）福建论坛（1989，5期）

苏 辙

擒住题面，畅加洗发——苏辙《黄州快哉亭记》赏析（附作品） （何伍修）名作欣赏（1984，1期64页）

心胸旷达，何适不快——苏辙《黄州快哉亭记》赏析 （步武尘）散文（1985，11期47页）

风格独特，耐人寻味——读《黄州快哉亭记》〔苏辙〕 （颜玲）中学自学指导（1985，8期51页）

苏辙史论散文的舒缓平和之美 （徐正英）殷都学刊（1988，2期66—70页）

苏辙《超然台赋》赏析 （乐牛）名作欣

赏（1989，3期）

黄庭坚

黄庭坚的《宜州家乘》　（韦启良）河池师专学报（文科版）（1985，1期28页）

曾子固的诗和黄鲁直的文　（章明寿）淮阴师专学报（社科）（1986，1期78页）

李清照

李清照诗文初探　（成善楷）四川大学学报（哲社）（1981，3期12页）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由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说到散文的抒情手法　（佥梅）散文（1983，2期46页）

李清照南渡后的桩公案——读《金石录后序》某记　（丁中航）泉城（1984，12月号77页）

李清照诗文的特点　（牛宝彤）天津师大学报（1985，3期79页）

李清照的文风、诗风和词风　（郭预衡）柳泉（1985，1期188页）

读《金石录后序》札记　（王璠）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1986，2期55页）

李清照《语溪中兴碑颂》写作年代商榷　（盛静霞）杭州大学学报（哲社）（1987，17卷2期49页）

洪　皓

洪皓的籍贯及诗文　（李艳）上饶师专学报（社科）（1985，3期24页）

岳　飞

岳飞的诗文　（戴不凡）戏剧报（1960，23、24期）

陆　游

水西文话（评陆游文）　（觑庐）天津益世报说苑（1937，1，1）

陆游的《入蜀记》　（张泳源）百科知识（1980，5期36页）

陆游和《老学庵笔记》　（剑锋）读书（1980，9期120页）

陆游《入蜀记》思想艺术初探　（朱国才）杭州大学学报（哲社）（1984，14卷4期70页）

介绍陆游的《天彭牡丹谱》　（徐式文）渡江师专学报（1985，1期111页）

“缕达风土、考订古迹”的佳制——评陆游《入蜀记》　（黄镇伟）九江师专学报（哲社）（1986，1期43页）

《入蜀记》：向文化认同意识的倾斜　（王立群）河南大学学报（哲社）1987，5期59页）

陆游《入蜀记》浅析　（贾占平等）商丘师专学报（社科）（1988，4期）

范成大

范成大佚文的辑集与系年　（徐甫）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

范成大的游记散文　（华岩）光明日报（1983，11，29③）

重笔浓彩绘佛光——范成大《峨眉山行纪》赏析（附原作）　（邓星雨）散文世界（1985，9期42页）

王　质

画山绣水赋东林——《游东林山水记》欣赏　（毛冰）旅游文学（1983，2期43页）

朱　熹

绝妙的讽刺小品——说朱熹《记孙觌事》（附作品）　（霍松林）名作欣赏（1984，1期12页）

辛弃疾

论辛弃疾的政论文 （张啸虎）东岳论丛（1980，4期112页）

文天祥

读文天祥《指南录后序》 （何加陵）语文学习（1955、11）

《指南录后序》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性 （王汝弼）语文学习（1960、4）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注释 （周德范）语文教学（江西师院）（1979，1期）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和他的《指南录后序》 （黄元访）安徽师大学报（1979，2期）

试谈《指南录后序》结构艺术 （梅大圣）黄冈师专学报（1981，1期23页）

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颂歌——读文天祥《指南录后序》 （孙昌武）散文（1982，9期46页）

陆秀夫

陆秀夫《丹能馆记》小笺 （丁志安）盐城师专（社科）（1984，1期100页）

金元明清（近代）

总论

唐宋以后的散文 （阿英）青年界10卷2期（1936．9）

金代散文浅论 （周惠泉）晋阳学刊（1985，3期91页）

浅谈元代散文 （范宁）光明日报（1984．11．2③）

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 （夏崇璞）学衡9期（1922．9）

晚明文与政治 （须尊）鞭策周刊1卷2期（1932）

公安竟陵小品文读后题 （刘燮）人间世16期（1934．7）

关于公安小品文之一席话 （刘燮）人间世8期（1934．7）

归姚以来的古文究竟该给以怎样的评价 （金兆梓）文学百题（1935）

明清小品诗文研究 （魏紫铭）北强2卷5期（1935）

明清两代散文之演化 （雪帆）东方文化1卷4期（1942．9）

明代散文的初步探讨 （吴鹤九）语文教学通讯（1957．5．6期）

明人小品及三十年代关于它的论战——《明人小品选》序 （霍松林）理论研究（1981，5期50页）

明代散文及其文论管窥 （陈曼平）牡丹江师院学报（哲社）（1982，1期45页）

《明人小品选》前言（摘录） （胡义成）镇江师专·教学与进修（1982，1期1页）

独抒胜灵，不拘格套——试论明清短牍的艺术特色 （周牧）写作（1983，3期23页）

明代散文述略 （殷翔）古籍研究（1987，2期49页）

明代散文流变初探 （夏咸淳）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3期185——192页）

晚明小品文的批评 （刘明今）复旦学报（1989，5期）

清代散文发展的一个轮廓 （李茂肃）山东师院学报（1979，6期）

清代诗文别集目录述略 （潘树广）明清诗文研究丛刊（1982，1辑201页）

清代散文之反思 （万陆）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5，2期25页）

清代散文与散文的研究方法 （罗东升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6，4期88页）

清文评议 （罗东升等）文学遗产（1987，3期97页）

没世之华章——浅论清代杂文 （邵传

烈）杂文界（1989，5期）

论桐城派　（李详）国粹学报4卷12期（1908）

桐城派古文说　（林琴南）民权素13卷（1915，12）

桐城文派　（胡怀琛）国学1卷1期（1926，10）

桐城派古文评价——近古文学的一段　（陈同涛）学灯（1923．9．7——15）

桐城派文章的研究　（厉谷静）觉悟（1925．5．18—25）

论桐城派　（陈赣一）青鹤1卷20期（1933．9）

桐城文概　（李岳）文学杂志6、7期（1933．10——1934．1）

桐城古文宗派论　（罗杰）船山学报8期（1935．6）

历史的文坛两大派——桐城与义征　（徐凌霄）国艺月刊1卷2期（1940．2）

桐城文学　（钱毅）中华月报7卷3、4期（1944．3．4）

谈桐城派　（方重禹）读书与出版3年9期（1948．9）

什么是桐城派古文？　（聂石樵）文艺学习（1957．12期）

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王气中）安徽历史学报（1957创刊号）

桐城派的"义法"　（王泽浦）天津日报（1961．11．22）

论桐城派的"义法"说及其实质　（段熙仲）江海学刊（1961．11）

什么叫做桐城派　（张涤华）文汇报（1961．10．28）

试论桐城文派　（蒋逸雪）杨州师范学院学报（1961，总11期）

关于桐城派的"义法"说　（王竹楼）江海学刊（1962．4）

桐城派的古文和清政府的文化统治　（乔国璋）江海学刊（1962．4）

桐城派发生发展及其衰亡的社会原因　（王泽浦）天津日报（1962．4．25）

再论桐城派　（段熙仲）江海学刊（1962．12）

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萝茗斋读书札记　（钱仲联）文学评论（1962．2期）

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　（吴孟复）江淮论坛（1980，5期72页）

桐城派散文艺术风格论新探　（郁沅）学术月刊（1983，6期71页）

桐城派研习史传文学之方法　（艾岩）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7，2期57页）

近代桐城派散文新论　（郭延礼）东岳论丛（1989．3期）

作家作品

马致远

元人审美理想的物化——论马致远的散文　（洪柏昭）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8，3期21——26页）

李孝光

生动传神，刚柔相济——介绍元代散文《大龙湫记》　（方铭）散文（1982，5期47页）

宋　濂

宋濂的传记文　（洪克夷）语文战线（1980，4期32页）

宋濂散文述略　（陈葛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7，2期1页）

宋濂散文的阳刚美　（陈葛满）浙江学刊（1988，1期51页）

高　启

《书博鸡膏事》注析 （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南宁师院学报（哲社）（1982，1期137页）

刘　基

谈刘基的《郁离子》 （高海夫）文学遗产增刊（第10期）

谈《卖柑者言》 （张汉丁）艺谭（1982，3期105页）

读刘基《郁离子》 （熊宪光）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2，3期90页）

刘伯温和他的《郁离子》 （魏建猷等）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2，1期45页）

一部出色的政治寓言集——《郁离子》管窥 （鲍延毅）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2，4期23页）

《郁离子》管窥 （鲍延毅）明清诗文研究丛刊（1982，2辑115页）

匠心独运，贵在创新——浅析刘基的《松风阁记》 （奚锦顺）语文学习（1983，1期28页）

议论高简，鞭辟入里——读刘基的《卖柑者言》（附作品） （吴士余）名作欣赏（1983，1期78页）

刘伯温和他的寓言 （陈湘清）益阳师专学报（哲社）（1983，3期57页）

松风百态，情景一体——读刘基《松风阁记》 （邹志方）绍兴师专学报（社科）（1984，2期42页）

《郁离子》的成就 （关肇昕）南京师大学报（社科）（1984，1期34页）

刘基杂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许廷柱）重庆师院学报（哲社）（1986，4期54页）

李东阳

李东阳的散文与明代前期的文化思想 （周寅宾）中国文学研究（1987，4期26页）

薛　瑄

眼底生云雾，脚下数千年——《游龙门记》赏析（附原作） （皇甫涛）名作欣赏（1984，6期55页）

王守仁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沁人肺腑的《瘗旅文》 （赵仲邑）语文月刊（1983，4期25页）

李梦阳

李梦阳古文评价 （南玉印）兰州大学学报（社科）（1984，12卷3期49页）

杨　慎

杨升庵的《游点苍山记》 （叶余）滇池（1982，10月号60页）

崔　铣

《记王忠肃公翱事》赏析 （申士尧）教学通讯（文科）（1982，7期20页）

归有光

归有光之生平及其文学 （马厚文）光华大学半月刊2卷7期（1934．4）

谈《项脊轩志》 （宋文灏）语文教学（1957．9）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 （黄漏波）语文学习（1957．8）

归有光《项脊轩志》 （吴鹤九）语文教学通讯（高中版）（1957．14．15期）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 （逊言）语文教学（1957．7）

校点归震川全集前言 （周本淳）淮阴师专学报（1979．2期）

纡徐平淡悱恻动人——读《项脊轩记》（柴邨虹）语文教学通讯（1980，6期9页）

归有光和他的记事小品（洪克夷）语文战线（1980，10月号29页）

不事雕饰，自有风味——《寒花葬志》赏析（张汉清等）上饶师专学报（社科）（1981，4期74页）

至情言语即无声——读归有光《项脊轩志》（黄秋耘）名作欣赏（1981，1期26页）

质朴自然，情思绵邈——读归有光《项脊轩志》（周先慎）大学生丛刊（1981，5辑19页）

事细情深，形散神聚——读《项脊轩志》（常林炎）散文（1981，4期45页）

归有光散文的"人情"（马卫中）明清诗文研究丛刊（1982，2辑127页）

《项脊轩志》作于十八岁考（黄衍伯）社会科学辑刊（1982，1期160页）

一往情深，疏而不散——也谈《项脊轩志》（艾岩）名作欣赏（1982，2期38页）

情之至者，其文必至——《寒花葬志》片谈（文朴）写作（1983，4期33页）

归有光和他的《项脊轩志》（韩振西）宁夏大学学报（社科）（1983，2期55页）

浅谈归有光的散文（蒋哲伦）语文学习（1983，5期28页）

情真意切，平中见奇——读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铁中）内蒙古日报（1983，9，25④）

归有光和张岱的散文风格简说（章明寿）淮阴师专学报（社科）（1983，4期27页）

归有光简论（章铸）艺谭（1983，4期139页）

谈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赵仁珪）自修大学（文史哲经）（1984，8期12页）

归有光政论散文探（张啸虎）江汉论坛（1984，6期63页）

归有光文章别解（郭预衡）文史知识（1984，6期63页）

描写日常生活的优美篇章——介绍归有光《项脊轩志》（附作品）（周寅宾）文艺生活（1984，4期58页）

径寸之木曲尽其态——读《寒花葬志》（明朝归有光）（缉熙）语文月刊（1984，1期6页）

《项脊轩志》艺术构思探微（宣啸华）盐城师专学报（社科）（1984，4期82页）

说《项脊轩志》（赵仁珪）文史知识（1984，3期55页）

读归有光《项脊轩志》（吴小如）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5期3页）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谈《项脊轩志》的语言朴素美（郑荣馨）名作欣赏（1985，5期76页）

形散神聚，文淡情浓——归有光《项脊轩志》欣赏（韩传达）上海广播电视（文科月刊）（1985，5期44页）

温润典丽，淡泊清新——论归有光散文的抒情艺术（雅翔）盐城师专学报（社科）（1986，1期31页）

淡中设色悱切动人——《项脊轩志》赏析（洪本健）中文自学指导（1986，6期51页）

无意于感而自感——读归有光《项脊轩志》（范少琳）中文自修（1987，2期10页）

《项脊轩志》的写作时间及主题考辨（田千生）盐城师专学报（社科）（1988，1期25——28页）

简论归有光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田千生）盐城师专学报（1989，1期）

试论归有光抒情散文的文化意识（杨亚

彬）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89，7卷4期）

海　瑞

立心行已，正大光明——论海瑞赠序创作的个性特点　（张迎胜）回族文学丛刊（1980，3期18页）

宗　臣

宗臣和他的《报刘一丈书》　（陈麟德等）扬州师院学报（社科）（1980，4期1页）

读宗臣《报刘一丈书》（附作品）　（张燕勋）名作欣赏（1983，3期22页）

一幅官场现形图——介绍宗臣的《报刘一丈书》　（张广智）殷都学刊（1984，3期49页）

汤显祖

汤显祖尺牍的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　（张啸虎）江西社会科学（1984，5期132页）

袁宏道

明代公安文坛主将袁中郎先生诗文论辑　（紫铭）北强1卷6期（1934．11）

袁中郎之文章及文学批评　（吴奔星）师大月刊30期（1936．10）

公安三袁　（江边）中学语文（武汉师院）（1979，4期）

袁宏道和他的游记　（洪克夷）语文战线（1980，1月号30页）

别开生面，情意绵邈——谈袁宏道的《晚游六桥待月记》　（方铭）散文（1981，1期42页）

清新的画面，欣喜的心情——浅析《满井游记》的艺术特点　（龚德芽）宜春师专学报（1981，3期61页）

鲜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读袁宏道《满井游记》　（马瑞芳）散文（1982，8期46页）

晚明小品一例——介绍袁宏道的《游高梁桥记》　（李爱冬）语言文学（1982，3期11页）

情寓于景，含而不露——读袁宏道的《满井游记》　（杜海军）安阳师专学报（1982，4期102页）

评袁宏道的《满井游记》　（孙顺霖）许昌师专学报（社科）（1983，2期38页）

袁宏道游记散文的思想与艺术　（温至孝）西北师院学报（社科）（1986，2期62页）

凝结着明代山水游记的审美特征——读袁宏道《虎丘记》（附作品）　（吴功正）名作欣赏（1986，2期28页）

一字立骨，率真自然——读袁宏道《徐文长传》　（柳文）散文（1987，5期45页）

袁中郎山水小品论　（刘中光）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7，12期79页）

浅谈袁宏道的游记散文　（傅德林）北京师院学报（社科）（1987，4期30页）

论袁中郎游记的表现艺术　（熊礼汇）绥化师专学报（社科）（1988，1期24——29页）

袁中郎游记小品的社会内涵　（李富轩）中国文学研究（1988，2期59——64页）

钟　惺

读钟、谭小品的一点感受〔明代诗文〕　（殷翔）艺谭（1985，4期43页）

王思任

王思任散文的创作风格　（尹恭弘）文学遗产（1985，4期112页）

杨龙友

冯梦龙

徐弘祖

魏学洢

张　岱

恣意描摹，尽情刻画——张岱《白洋湖》赏析 （李伟）语文园地（1983，3期29页）

读张岱《西湖七月半》 （邹志方）绍兴师专学报（社科）（1983，2期83页）

目光含情，妙趣横生——读张岱《西湖七月半》中“看”字的妙用 （田璞）殷都学刊（1985，4期76页）

张岱的散文小品——读《琅嬛文集》 （潘运告）书林（1985，6期60页）

张岱《西湖七月半》赏析〔明末清初〕 （吴郑）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5期9页）

张岱和他的《陶庵梦忆》 （王建）语文园地（1985，6期31页）

平中见奇，语淡意浓——读张岱《湖心亭看雪》 （王景琳）文史知识（1988，3期32页）

张 溥

关于《五人墓碑记》 （吴颖）语文学习（1955．12）

评张溥《五人墓碑记》 （蒋逸雪）扬州师院学报（1978，3期）

反阉党斗争的赞歌——评《五人墓碑记》及其他 （翟松林）人文杂志（1987，1期91页）

对《五人墓碑记》理解上的异议 （郝玉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8，1期42页）

夏完淳

翩翩文采，铮铮铁骨——夏完淳诗文创作浅论 （刘秉铮）安徽大学学报（哲社）（1984，1期84页）

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附作品） （夏传才）散文世界（1985，4期36页）

傅 山

傅山的杂文 （路工）人民日报（1962，4，24）

读《霜红龛集》剳记 （赵丽生）晋阳学刊（1982，4期78页）

傅山散文的艺术特色 （张厚余）山西师大学报（社科）（1985，4期78页）

傅山《霜红龛集》中的史论和政论 （冯尔康）南开学报（哲社 0（1986，1期57页）

金圣叹

金圣叹的散文创作论 （江巨荣）语文学习（1985，1期50页）

金圣叹《才子必读古文》评介 （张国光）江汉论坛（1985，5期55页）

林嗣环

林嗣环《口技》的写作特点 （洪潮）语文学习（1960．2）

林嗣环的《口技》 （霍松林）语言文学（1960．2）

说《口技》 （林昭德）语文（1960，2期）

《口技》的艺术描写 （埝任）语文教学（江西师院）（1978，6期）

谈林嗣环的《口技》 （霍松林）陕西教育（1979．3期）

《口技》的艺术技巧 （陈豪、刘长虹）破与立（1979，2期）

《口技》的艺术特色 （埝任）开封师院学报（1979，1期）

黄宗羲

论黄宗羲的《原君》 （曹道衡）语文学习（1957．10）

黄宗羲的《原君》 （刘衍文）语文教学（1957．11）

黄宗羲与《原君》(附作品) (何存等) 名作欣赏(1982,2期71页)

民主的先声说理的典范——介绍黄宗羲的《原君》 (方铭)散文世界(1985创刊号31页)

李 渔

评李渔散文 (屑成)杭州大学学报(哲社)(1985,15卷4期58页)

立意惟新,劝惩为用——浅评李渔的《闲情偶寄》 (袁启明)语文学习(1987,10期62页)

读《笠翁一家言全集》札记 (洪伟恩)江南学刊(文史哲)(1985,5期92页)

顾炎武

《复庵记》的曲笔艺术 (秦豪)苏州大学学报(哲社)(1983,3期83页)

《复庵记》言志抒情的曲笔艺术 (秦豪)中学语文教学(1984,11期36页)

谈顾炎武《日知录》 (傅丽英)河北师院学报(1984,1期80页)

一曲感情深沉的志士之歌——读顾炎武的《吴同初行状》 (卢兴基)名作欣赏(1986,5期37页)

声情并茂的佳作——顾炎武《复庵记》简析 (卢兴基)中文自修(1987,9期23页)

侯方域

重读《马伶传》 (张真)戏剧报(1961,7、8期)

侯方域散文论 (邹志振)抚州师专学报(综合版)(1983,2期63页)

侯方域和他的《李姬传》 (田璞)殷都学刊(1984,2期67页)

侯方域和他的《与阮光禄书》(附原作) (宋谋玚)名作欣赏(1985,2期69页)

布局新巧,笔法多姿——侯方域《马伶传》赏析 (李如鸾)名作欣赏(1987,2期63页)

论侯方域的文章特色 (王凯符)北京师院学报(社科)(1988,4期31——35页)

施闰章

施闰章的散文——谈《学余堂文集》 (何鹏)图书馆工作(1984,2期46页)

王夫之

新发现的王船山佚文佚诗 (邓抗云)湖南日报(1982,12,8③)

试论王船山散文 (许山河)船山学报(1984,2期119页)

读王船山佚文《漱玉琴铭》 (陈书良)船山学报(1984,1期121页)

论王船山传记散文 (章自福)船山学报(1985,2期87页)

魏 禧

魏禧的散文理论及散文创作 (万陆)争鸣(1983,4期58页)

凌厉雄杰的魏禧散文 (洪克夷)语文战线(1984,9期9页)

朱彝尊

介绍朱彝尊的一篇佚文 (张弘)辽宁师大学报(社科)(1984,5期62页)

朱彝尊古文浅探 (朱则杰)江淮论坛(1984,3期94页)

王士禛

王渔洋的散文 (高鸿逵)文学集刊1辑(1944,4)

蒲松龄

状物绘景，象意并茂——读蒲松龄的《山市》 （吴士余）散文（1980，11期44页）

读蒲松龄《<帝京景物选略>小引》 （李茂肃）山东师大学报（哲社）（1981，6期64页）

读蒲松龄《上孙给谏书》 （诚夫）学习与研究（1982，8期59页）

小说家的散文——读蒲松龄的《地震》 （常林炎）散文（1982，2期44页）

天街仙阁，奇幻风光——《山市》赏析〔清·蒲松龄〕 （唐富龄）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5期3页）

戴名世

戴名世和他的《南山集》 （方佛平）安徽大学学报（哲社）（1981，4期62页）

《戴名世集》简介 （赵伯陶）河北师院学报（哲社）（1987，3期124页）

方　苞

桐城三君子文考论（方、刘、姚） （张杰）光华大学半月刊5卷5期（1937．1）

谈方姚文 （知堂）开明月报1卷1期（1937．1）

方望溪文论 （刘梦秋）东方杂志41卷21期（1945，11）

略论方苞的散文和他的《狱中杂记》 （马茂元）语文教学（1957．10）

《狱中杂记》 （郭翠轩）语文教学通讯（合并版）（1957．7期）

关于《狱中杂记》的几个问题 （高文）教学参考资料（开封师院）（1973，6期）

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评述 （马茂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1979．12）（注：方苞、刘大櫆、姚鼐）

方苞《狱中杂记》讲析 （孙永都）语文教学研究（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79，3期）

方苞《狱中杂记》评析 （孙永都）语文教学（锦州师院）（1979，3期）

寥寥数笔，形神毕肖——读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吴功正）散文（1980，9期47页）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析 （彭骏）陕西教育（1980，5期23页）

澄清至极，自然而发其光精——读方苞《左毅公逸事》 （杨必胜）语文教学通讯（1980，6期13页）

关于《左忠毅公逸事》注析的疑义 （黄洵）北方论丛（1981，1期48页）

方苞和他的《狱中杂记》 （王释非）艺谭（1981，1期46页）

方苞的“古文义法” （张汝扬）语文学习（1982，6期36页）

画眼睛——读《左忠毅公逸事》（附作品） （黎行端等）青年作家（1982，1月号78页）

《左忠毅公逸事》读后 （许诺）艺谭（1983，3期104页）

人间地狱的实录——试析方苞的《狱中杂记》 （李道英）自修大学）（文史哲经专业）（1984，10期11页）

郑板桥

“胸有成竹”和“胸无成竹”——读郑板桥两则画竹题记 （王双启）名作欣赏（1981，3期104页）

郑板桥佚文初探 （李百）学术月刊（1986，4月号58页）

全祖望

梅花岭下吊忠魂——读全祖望《梅花岭记》（附作品） （徐贵印）名作欣赏

(1983，5期68页)

袁 枚

抓特点，写个性——读袁枚的《书鲁亮侪》 (奚锦顺)新闻大学(1982，5期108页)

哀楚声声斥礼教——读袁枚的《祭妹文》 (姚品文)读写月报(1985，3期2页)

袁枚《祭妹文》中的悲 (曾一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4期82页)

山水多姿，神情各别——析袁枚的《浙西三瀑布记》 (奚锦顺)语文学习(1985，1期43页)

论袁枚《祭妹文》的哀婉美 (傅继宗等)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7，4期112页)

姚 鼐

从桐城派的古文谈到姚鼐的《登泰山记》 (马茂元)语文学习(1957. 10)

姚鼐和他的《登泰山记》 (午未)语文教学(1957. 11)

清代散文家姚鼐 (高绪豪)安徽日报(1961. 5. 18)

一篇引人入胜的散文——读《登泰山记》 (王庆生)湖北日报(1962. 1. 14)

重读《登泰山记》 (芮茏)雨花(1962. 11)

《登泰山记》赏析(附作品) (吴文治)艺谭(1981，2期92页)

试论姚鼐古文的艺术特色 (马亚中)江淮论坛(1983，6期95页)

《登泰山记》的美学价值浅说 (李维安)黄石师院学报(哲社)(1984，3期80页)

奇妙壮观，引人入胜——姚鼐《登泰山记》的艺术特色 (沈师麟等)柳泉(1984，2期230页)

试论姚鼐的散文主张和创作个性 (武卫华)江淮论坛(1985，6期47页)

略谈姚鼐笔下泰山的特色 (叶楠)宁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5，1期72页)

《登泰山记》的语言特色 (舒邦新)语文教学与研究(1985，7期36页)

评姚鼐《述庵文钞序》 (贾文昭)江淮论坛(1986，1期81页)

汪 中

汪中《自序》复议 (游任逵)温州师专学报(社科)(1981，1期56页)

论汪中的文与情 (王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5，1期42页)

恽 敬

完美与壮美——读恽敬《游庐山后记》(附原作) (娄无华等)艺谭(1985，1期105页)

沈 复

东西方历史阵痛时期反封建斗争的启示——卢梭《忏悔录》与沈复《浮生六记》比较研究 (周伟民)江汉论坛(1986，11期43页)

张维屏

张维屏的《读书说示简生》 (袁洪铭)岭南文史(1983，1期127页)

高 鹗

高鹗的八股文 (金克木)读书(1988，1期103页)

毛祥麟

读《墨余录》 (毕万忱)学术研究丛刊

（1982，4期169页）

梅曾亮

论梅曾亮的文学主张及其散文创作 （王镇远）江海学刊（文史哲）（1987，4期58页）

郑 珍

郑珍散文艺术片谈 （李建国）贵州文史丛刊（1985，3期124页）

汤 鹏

汤鹏和他的时文与诗歌 （石彦陶）求索（1983，4期120页）

龚自珍

《病梅馆记》浅析 （沈慧云、杨慧平）徐州师院学报（1978，2期）

试疗病梅复生机——《病梅馆记》浅析 （一冬）语言文学（1978，3期）

"夭梅"浅析 （魏中祁）中国语文通讯（1979，4期）

重读《病梅馆记》 （和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79，1期）

试论龚自珍的散文 （陈新璋）华南师院学报（社科）（1979，4期26页）

《病梅馆记》语言试析 （杨星荧）广州师院学报（社科）（1981，3期78页）

"一路坦易中忽然触著"——以《病梅馆记》为例谈文眼 （翟秀）语言文学（1981，2期22页）

托物喻人，借梅议政——龚自珍《病梅馆记》赏析（清·附作品） （方伯荣）名作欣赏（1983，4期46页）

龚自珍政论杂文的艺术特色 （杨昌江）江汉论坛（1984，9期45页）

龚自珍诗文创作散论 （周月亮）河北师院学报（哲社）（1984，4期115页）

龚自珍和他的诗文 （吕晴飞）电大文科园地（1985，7期6页）

简论龚自珍的创作和近代诗文的关系 （朱仰山）东岳论丛（1985，3期76页）

读龚自珍的《说居庸关》 （康乡利）语文教学与研究（1986，11期45页）

略谈龚自珍的记游散文 （陈新璋）散文（1986，2期43页）

心史纵横自一家——龚自珍散文的艺术特色 （邹进先）北方论丛（1987，5期24页）

释龚自珍的《表孤虚》 （诸祖歌）南京师大学报（社科）（1988，3期75——78页）

试论龚自珍的散文 （任访秋）殷都学刊（1988，1期60页）

曾国藩

曾国藩与桐城派 （舒芜）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1979，12）

王 韬

王韬和《扶桑游记》 （陈复兴）社会科学战线（1981，2期293页）

黄遵宪

黄遵宪诗文对沙俄侵略罪行的揭露 （尤振中）明清诗文研究丛刊（1982，1辑66页）

林 纾

林琴南古文的阴柔美 （张夏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88，3期1——7页）

夏正寅

可歌可泣——读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

（张海珊）天津师院学报（1979，3期34页）

梁启超

从梁启超谈到《谭嗣同传》 （振甫）语文学习（1957，11）

读梁启超《谭嗣同传》所想到的 （罗竹风）语文教学（1957，12）

梁启超的新文体 （王养兴）语文战线（1980，3期32页）

略论梁启超散文的艺术魅力 （刘增杰）河南师大学报（社科）（1983，2期27页）

谈谈梁启超的“新文体” （王杏根）语文学习（1983，8期47页）

梁启超“报章体”评议 （饶明吉）复旦学报（社科）（1984，6期108页）

评政论家梁启超的文体与文风 （张啸虎）社会科学（上海）（1981，11期77页）

为救亡图强而呼号——梁启超《呵旁观者文》析 （钟贤培）文史知识（1981，9期54页）

秋 瑾

秋瑾的诗文 （张铁弦）光明日报（1962，7，19）

（效韩整理）

国外古文研究论著目录

西文部分

中国文学史　　翟理思著　1990年伦敦威廉海纳曼出版社刊　1923年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再版　1967年纽约版　1973年版

中国文学史　　格罗贝（威廉·格鲁贝）著　1902年莱比锡阿梅朗斯出版社刊（韩愈《论佛骨表》，老子评价等）（德文版）

中国文学史，散文　　马古里埃著　1949年巴黎贝育书店刊　（法文版）

中国文学评论集　　马古里埃译著　1948年巴黎帕约出版社刊　（韩愈《鳄鱼文》等）　（法文版）

中国散文十三种文体分类指导　　叶女士（爱德华兹，伊万杰琳·多拉）《东方学院学报》（BSOS）第12号（1948）（英文版）

中国文学论题：纲要与书目　　海陶玮著　1965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英文增订片）第六章"六朝的文学批评"，第十一章"古文运动"

中国文学理论　　刘若愚著　197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刊

中国文学批评中情的真伪问题　　杨松年著《淡江评论》第6卷第2号——第7卷第1号（1975——1976）（英文版）

中国古代批评论文学的功用　　侯健著《亚洲文化季刊》（台北）第5卷第3号（1977）（英文版）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对创作个性的看法　　伽立克著《远东》第27卷（1980）（英文版）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涂经诒著　《中国语文教师学会会报》第14卷第3号（1979）（英文版）

中国的讽刺：政治与社会　　莱昂·德罗斯尼著　1927—35年北平刊

中国国文　　马古里埃译著　1926年巴黎出版（韩愈《论佛骨表》，《鳄鱼文》，王羲之《兰亭序》，萧统《文选》，柳宗元《捕蛇者说》等）

中国古今课文　　莱昂·德罗斯尼译注　1874年巴黎刊　（法文版）

古文选珍　　翟理思译著　1884年伦敦伯纳德夸里奇出版公司与上海别发洋行合刊　1卷　1989年重印　254页　1922-23年修订增补本　上下两卷

嵩山笔记：中国文学选集　　翟理想著译　1884年上海别发洋行初版　1905年再版　1914-15年修订本

选自中国笑话集的讽刺语　　翟理思译著　1925年上海别发洋行刊（散文）

《古文选珍》　　徐仲年著　1933年巴黎刊　（韩愈《原道》等）

简评，关于中国的论文、讽刺小品　　林语堂译著　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英文版）

中国的幽默　　林语堂译著　1936年北平刊

生命的重要　　林语堂译著　1937年纽约约翰戴公司刊　1974年纽约重印（包括散文）

龙书　叶女士译著（爱德华兹，伊万杰琳·多拉）　1938年伦敦威廉霍奇出版社刊

中印的智慧　林语堂译著　1942年纽约兰多姆书店刊

中国的幽默与智慧　高乔治编　1946年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出版公司刊　1974年纽约再版

中国文学选珍　chai，ch' u编译　1965年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刊（新散文选）

凤凰笛调：中国古代散文　恩斯特·施瓦茨著　1973年柏林吕滕与莱宁出版社刊

国语　德阿尔莱（M. C. de Harlez）译注　1894年巴黎国家印刷所刊（法文版）

老子道德经　波特里埃译注　1838年法国让维埃刊

老子道德经　儒莲（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译注　1842年巴黎皇家印刷所刊

老子遗著　翟理思译著　1886年香港刊（英文版）

老子道德经　保罗·卡鲁斯译注　1898年芝加哥出版

道德经探研　阿瑟·韦理著　1934年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刊　1958年美国格罗夫出版社刊"联合国代表著作集：中国卷"

孔子眼中的南锡：有关无的文选　林语堂著　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散文选）

论语　阿瑟·韦理译著　1938年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刊（1945年第二次印刷 1944年第三次印行 1952年第4次印行　1964年第5次印行　又，纽约兰多姆书局1960年初片 1964年荷兰文版

《论语》论文艺　施友忠著　《译丛》第8号（1977）　（英文版）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孔子：与古代希腊人比较　马幼垣著　《纪念饶宗颐先生的中国研究论文集》（香港　1970年）（英文版）

中国人研究文学的途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　奥斯汀·里基特主编　1978年普林斯顿大学刊

孔子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何思孟（唐纳德·霍尔兹曼）著　《中国人研究文学的途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21--41页）

庄子哲学选集　翟理思译　1906年伦敦默里出版社刊　附翟林奈所撰"导言"一篇

庄子　翟理思译著　1889年上海别发洋行刊　1926年修订再版

庄子与惠子　阿瑟·韦理著　休斯编著《中国人体与魂》　1938年伦敦刊

孟子注说　阿瑟·韦理著　《大亚细亚》（AM）N. S. 卷1（1949）

历史学家司马迁　《中日丛报》（chin&Jap. Rep.）1865；《中国丛报》（Chin. Rep.）第9期

司马迁的史记　翟理（赫伯特·詹姆斯·艾论）译著《皇家亚洲学会会志》（Jonr. R. A. S）1894. 4；1895年. 1；1895. 7（英文版）

司马迁的史记　爱德华·夏瓦纳译注　1895年巴黎欧内斯特勒鲁出版社刊（法文版）

东汉的文学理论　伯顿·沃森著　《吉川幸次朗博士六十五寿辰纪念中国文学研究论集》　1968年东京刊（英文版）

东汉末年的文学批评　罗纳德·苗著《东西文学》第16卷第3号（1972）（英文版）

关於马古里埃的〈文赋〉的翻译　冯察

赫著《通报》第25号（1928）（法文版）

陆机著、陈世骧译:《文赋》 1948年译，1952年重校 1955年波特兰安索森出版社刊 又，白之编（西里尔·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1卷 1965年纽约丛林出版社刊

陆机《文赋》简论 周汝昌著 《中国研究》第九卷第一号（1950，42—65页）（英文版）

陆机《文赋》：翻译与比较研究 E. R. 休斯著 1951年纽约万神殿书店刊

一篇论文学的有韵散文：陆机《文赋》 方志彤著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14卷（1951）又，毕效普编《中国文学研究》

王羲之《兰亭集序》 阿瑟·韦理译介 《中国绘画入门》 1923年伦敦欧内斯特本出版有限公司刊 1948年重印

五柳先生传 阿瑟·韦理著评 《猎犬》1920年纽约刊

陶渊明 洪涛生著 1928年北平北京出版社刊（德文版）

陶渊明 王闻波（音）（Wang，Wen—Po）著 1934年巴黎维戈弗雷尔出版社刊

《文心雕龙》 施友忠译 1959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刊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 施友忠著《亚洲研究》第7号（1953）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 唐纳德·吉布斯著 《华裔学志》第29号（1971，117—141文）

刘勰《文心雕龙》中'性'字的英文含义 伊丽莎白·海因著 《一九七五年巴黎第29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古代中国》1977年巴黎亚细亚刊（155—161页）

梁简文帝 约翰·马尼著 1976年波士顿霍尔出版社刊 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第372种" 第四章"文学理论"

《文选》与文体论 海陶玮著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20卷（1957） 又，毕效普编《中国文学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5）

选家：中国的文学批评家 里基特著 《东西文学》第19号（1975）

公元三、四世纪的中国文人和学士：《世说新语·文学篇》 理查德·马瑟著 《美国东方学会会报》第84号（1964）

《颜氏家训》 邓嗣禹译 1968年莱顿布利尔书店刊

韩愈的生平与著作 沃特斯著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NST（1871—72）（《与孟东野书》）（英文版）

伟大的中国散文——IV 马古里埃著 《亚细亚》34（1934. 9） （韩愈散文一篇）

韩愈与唐代小说 陈寅恪著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1卷（1936）

古文家韩愈 陈幼石著 作者博士论文1967年发表于耶鲁大学

古文家韩愈 陈幼石著 《清华学报》新第7卷第1号（1968）（英文版）

韩愈的散文创作与传奇文学 马幼垣著 《东方文化》第7号（1969 195—223页）

伟大的中国散文——IV 马古里埃著（柳宗元散文评介） 《亚细亚》34（1934，569—571页）

欧阳修：十一世纪的一位新儒家 刘子健（詹姆斯）著 1967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刊

欧阳修的文学理论与实践 陈幼石著 《中国人研究文学的途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阿黛尔·里基特编 197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刊

曾巩：宋代文学论文集 克劳斯译著 1922年海德堡温特尔出版社刊

王安石，改革家　科普斯契著　《中国评论》第2期（18…）

苏东坡著作全集注释　郭施拉（查尔斯·居茨拉夫）著释　《中国从报》（1842年11期）

苏东坡诗歌散文选　西里尔·克拉克译著　1935年上海别发洋行刊（英文版）

豪放的天才：苏东坡的生平与时代　林语堂著　1947年纽约约翰戴出版社刊　1971年重印

苏轼文学理论中的变革与继承：谈谈'赤壁赋'　陈幼石（黛安娜）著　《华裔学志》（MS）　第31号（1974—75）（英文版）

八世纪中叶的史论与文论　麦大维（戴维·麦克马伦）著　《唐朝面面观》　芮沃寿　特威彻特合编　1973年纽哈芬耶鲁大学出版社刊

中国的古典散文：唐宋八大家　刘师舜著　197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云游客：中国明代的诗文　明袁宏道著　乔纳森·查维斯译　绪论：袁宏道论文学　1978年纽约韦瑟希尔刊

中国的八股文：从文学方面做一些考察　涂经诒著　《华裔学志》第31号（1974—75）

曾国藩与桐城派　胡适著　《东亚评论》（OR）第20号（1939）　（德文版）

关于1685－1886年编纂的一部钦定古文选集（古文渊鉴）　嵇穆著　（马丁·吉姆）　《远东》　（OE）第15号（1968）　（德文版）

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评价　波拉德著　1973年伦敦赫斯特公司刊　第一章"新旧理论"，"历史上的'文以载道'"

一件论中国式古今之争的文献　雷威安（安德鲁·莱威）著　《通报》第54号（1968年）（法文版）

俄文部分

周易　休茨基译　1960年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

古代世界史文选　司徒卢威编　1950年出版（先秦散文选）

中国古典散文　阿列克谢耶夫译注　1958年科学院出版社初版　1959年再版　387页　（司马迁的名篇、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文武帝、李陵、陶渊明、韩柳、苏洵、王安石等22人的散文63篇）

中国文学文选　康拉德编　1959年出版（先秦散文选）

古代东方史文选　司徒卢威　列德尔编选　1963年出版　（先秦散文文集选）（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列子）

远东诗歌与散文　1973年出版（先秦散文选）（韩非子等）

远东古典散文　1975年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诗歌与散文（世界文学大系：古代东方诗歌与散文分册的一部分）　1979年文艺出版社出版　735页（司马迁）等

战国策　克·瓦西里耶夫译注　196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253页

山海经　杨希娜译注　197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233页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　杨兴顺著　1950年出版　150页

道德经　杨兴顺节译并注　《中国文学文选》康拉德主编　1959年出版

老子　杨兴顺译解　《古代东方史文选》　司徒卢威编　1963年出版

道德经 杨兴顺译注并撰序 《古代中国哲学》第一卷 1972年出版

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列子·杨朱·庄子） 波兹涅耶娃编译 1967年出版 231页

管子 施泰因译注 1959年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 380页

管子 杨兴顺译并撰序 《古代中国哲学》第二卷 1973年出版

孙子兵法 康拉德译注 195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 401页

商君书 佩列洛莫夫译注 196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350页

论汉代文学中对待史料的两种传统态度 克罗尔著 （论文） 1975年刊

司马迁文选 帕纳秀克译注 1956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 357页

司马迁：秦亡后的历史学家 克罗尔副博士论文 1963年发表

对《史记》给予文学评价 克罗尔著 （论文） 1966年刊

司马迁：历史学家 克罗尔著 197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446页

史记是文学作品 克罗尔著 （论文） 1970年刊

司马迁《史记》 维亚特金 塔斯金合译 第1卷 197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439页 第2卷1975版 579页

司马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 克罗尔著（论文）1974年刊

论联想思维对《史记》一书的影响 克罗尔著 （论文） 1974年刊

韩愈柳宗元文选 索科洛娃译 1979年文艺出版社出版 230页 韩愈文38篇 柳宗元文9篇

陆游《入蜀记》 谢列布里亚科夫译注 1968年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出版 158页注解、述评、跋

陆游生平与创作 谢列布里亚科夫著博士论文 1973年发表于列宁格勒大学

杂纂（九至十九世纪中国作家语录） 齐别罗维奇译注 196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136页 1975年再版 136页

日文部分

支那文批评的观点 户田浩晓著 《立正大学论丛文学编创刊号》（1941）

支那书简文与公文的构成分析 川村宗嗣著 《东文》二号（1942）

古赋中的审美意识 中岛千秋著 《东京支那学会报大会临时号》（1951. 5）

基本汉文 日荣社编集所编 1952年3月编者刊 117页

文与道 桥本循著 《立命馆文学》100（1953） 又见《中国文学，思想管见》1982年6月朋友书店刊

今文古文源流考 内野熊一郎著 文学哲学史学学会连合编集研究论文集四（1953. 3）（八—九）

今文古文源流型的研究 内野熊一郎著 东京1954年3月东京教育大学东洋文学研究定刊 388页

指示与疑问：中国中世文的诸相 内田道夫著 《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九（1958. 1，112－142页）

语录与文体：中国文章史释（二） 内田道夫著 《集刊东洋学》三（1960. 5）

中国散文选（上） 何建章、濑户口律子编 1984年岩波书店刊

黄山的诗文《黄山仙境》解说 筧文生著 1984年岩波书店刊

汉文名作选4——文章 巨势进 向岛成美译著 1985年大修馆书店刊

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三卷、第五卷 相良亨他编著 1985年ペリカン社刊

近世散文选（鉴赏中国的古典24） 本

田济著 1988年角川书店

汉诗汉文的名句名言 黑须重彦著 1987年日本实业出版社

关於经的古今的疑点 长泽规矩也著 载《书志学》五卷六号（1935）

经书的口承文艺 高桥盛孝著 载《汉学会杂志》三号一卷（1935）

汉初经书学的分立传行 内野熊一郎著 《东洋学报》二十七卷二号（1940）

汉初经书学的研究 内野熊一郎著 1942年6月清水书店刊 726页

五经索引 森本角藏编 1944年3月目黑书店刊 1604页

经书的传统 平冈武夫著 1951年1月岩波书店刊 447页

五经正义所引定本考 野间文史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37（1985）

四书的加点 大江万里著 载《斯文》十七卷二——七号（1935）

本邦四书训点及注解史的研究 大江文城著 1935年9月东京关书院出版

有关四书的成立与章句集注定本二三问题 阿部吉雄讲 《斯文》二十三编一号（1940）

从五经到四书 宇野精一著 《东京支那学会报》五（1950．6）

四书五经人门 竹内照夫著 1973年日本文艺社刊 205页

朱子经书学的构造：四书学的成立 佐野公治著 《爱知县立大学说林》32（1985）

四书学史的研究 佐野公治著 1988年创文社刊

关於易的成立 武内义雄著 载《文化》一卷一号（1934）

易字考 小岛政雄著 载《汉文学会会报》二号（1934）

易的思想 高田真治著 收入《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第十一回（1935）

论女性的使命与〈易〉的原理 七理重惠著 载《同仁》九卷六号（1935）

读易与古中国语 木村房吉著 载《思想》1936年七、八号

学庸精义周易十翼精义 北村泽吉著 1938年刊

读易私言 武内义雄著 《思想》二百号（1938）

易经 1943年5月纪元书房刊 146页

易经注释史纲 户田丰三郎著 1968年风间书房刊 735页

易（解释与鉴赏别册） 竹内照夫编 1969年至文堂刊

周易考察（3） 前川捷三著 《茨城大学教育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艺术》34（1985）

周易考察4 前川捷三著 《茨城大学教育部纪要人文·社会科学·艺术》35（1986）

新释汉文大系（23）：易经（上） 今井宇三郎著 1987年明治书院刊

易的语言（岩波新书） 高田淳著 1988年岩波书店刊

卦爻辞研究 铃木由次郎著 《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五（1956．3）

十翼论考 铃木由次郎著 《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二（1955．3）

伊川易传自序考 今井宇三郎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七 （1950．3）

诗序考 境武男著 《诗经学》(三岛书房）7（1962．8，18—40页）

论清儒与晚出古文尚书的作者 桥本成文著 载《汉学会杂志》二卷一号（1934）

关於隶古定尚书 武内义雄讲 收入《东方学报京都》第七册（1936）

我国残存的隶古定尚书 岛田钧一著 载《东方学报》（东京第七册1936）

论隶古定尚书 武内义雄著 载《支那学》八卷三号（1936）

尚书孔传与王肃 宇野哲人讲 载《东方学报》（东京第六册1936）

尚书的成立与帝尧的德业 加藤虎之亮著 载《斯文》十九编二号（1936）

红豆斋钞本尚书大传五卷 高仓正三著 载《东方学报》京都第十册二分（1938）

尚书孔传的研究 山本证道著 载《支那学》九卷二号（1938）

金縢说话与尚书的今文古文 平冈武夫著 载《东方学报》京都第十册二分（1938）

论今文尚书大誓篇 坂本良太郎著 载《文化》五卷五号（1938）

尚书正义解题 吉川幸次郎著 载《东方学报》京都第十册三分（1938）

古文尚书的二钞本 武内义雄著 载《文化》五卷五号（1938）

本邦传钞尚书附载释文 高仓正三讲 载《东方学报》京都第九册（1938）

尚书正义定本卷一至卷五 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校定 1939年7月东方文化研究所刊 二本

尚书洛诰篇的错简说 多气田治著《支那学》一二——五（1947．8）

尚书大诰篇的作者考 贝冢茂树著《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50．11）

疑〈伪古文尚书〉考（中） 野村茂夫著《爱知教育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37（1988）

《尚书古文疏证》及其时代 吉田纯著《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四十集（1988）

周礼的制作年代论 宇野精一著《斯文》三 （1949．8）

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堪记上、下 加藤虎之虎著 1957年10月、1958年9月东京无穷会刊 686、292页

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堪记的上梓 宇野哲人著《雅友》三五（1958．2）

周礼通释 本田二郎著 1977 79秀英出版 2册

仪礼 池田末利译注 1973—77年东海大学出版社刊 5册

仪礼索引 野间文史编 1988年中国书店刊

旧钞本礼记正义校勘 吉川幸次郎著 载《东方学报》京都第九册（1938）

大戴礼索引 铃木隆一编 1967年大安刊 237页

〈礼记〉成书考 山本岩著 《宇都宫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一部》35（1985）

月令诸文考 藤川熊一郎著 载《东方学报》东京第五册（1934）

中庸发微 野村瑞峰著 载《驹泽大学学报》六号（1936）

中庸解通释 西晋一郎著 1943年7月敞文馆刊 379页

春秋 竹内照夫著 1942年4月日本评论社刊 264页

春秋著作说话的原形 渡边たカレ著《叙说》五 （1950．11）

春秋学的研究 山田家 1988年明德出版社刊

读春秋 常石茂 稻田孝合著 1988年劲草书房刊

左氏春秋平义 重泽俊郎著 载《东方学报》京都第五册（1934）

左传思想史的研究 津田左右吉著 1935年9月东洋文库出版

关于左传的人名 竹内照夫著 载《汉学会杂志》四卷三号（1936）

左氏传源流二1-15 上野贤知著 载《东洋文化》百六十四——百七十二、百七十五——百八十号（1938）

左传真伪考 小野忍译 1938年东京

文求堂刊

左氏会笺的著者论左传的作者观察　上野贤知著　载《东洋文化》百六十三号（1938）

左氏传源流私考　户田丰三郎著《东方学》四　（1952，6）

春秋左氏传上（岩波文库）　小仓芳彦著　1988年岩波书店刊

论公羊传　竹内照夫著　载《中国文学月报》十七号（1936）

论公羊传所说　本田成之讲　载《斯文》二十编十二号（1938）

公羊傳疏成立年代私考　河口音彦著《支那学研究》八　（1951年9月）

公羊传的成立　山田琢著　《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哲学史学篇》五（1958，1）

公羊注疏译注稿四　公羊注疏研究会著　1988年汲古书院刊

春秋穀梁传的成立　山口义男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二　（1952，3）

穀梁传的成立　山田琢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10（1958）

穀梁传的附加傳文的意义　小林茂著《大东文化大学中国学论集》第7（1985）

春秋穀梁传范宁集解　岩本宪司著　1988年汲古书院刊

诸子概说　武内义雄著　1935年12月弘文堂书店出版

诸子概说　原富男著　载《大东文化》十八号（1938）

诸子学序说　大冢伴鹿著　《斯文》二十三编九号（1940）

诸子研究的指针　大冢伴鹿著《支那学》十卷（特别号1942）

百子全书书名索引稿　矢岛玄亮著《书志学》十七卷四号（1940）

百子全书人名索引　矢岛玄亮编　1952年1月东北大学支那研究室刊　150页

百子全书索引　矢岛玄亮编　1953年仙台东北大学　支那研究室油印　137页

孔子　井上哲次郎著　载《斯文》二十编六号（1938）

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　宫崎市定载《东洋学研究》四卷三号（1938）

日本之尊孔今昔　寇田著　《东方文化月刊》一卷二三期（1938）

孔子的新研究　大月隆仗著　1942年11月新民书房刊　319页

孔子生死说　那智佐典著　载《东洋学研究》七号（1938）

孔子论　贝冢茂树著　《世界》10（1946，10）

孔子的生涯　诸桥辙次著　1948年11月桃山书林刊　188页

高叟与子弓：论语、孝经、大学的著者论　山田统著《叙说》五（1950，11）

文学性的孔子世家　《中国文学报》二（1955，4）

孔子　尾崎辰之助著　1957年2月京都三一书房刊　290页

（如是我闻）孔子传　诸桥辙次著　1969年大法轮阁刊　498页

孔子的“文学”意识　铃木修次著《作为文学的论语》　1979年7月东京书籍刊

孔子与子产　贝冢茂树著　《东光》（1947，8）

孔子、圣的时者：永远的思想家：华文　候靖远著　《京都产业大学论集》14（1985）

孔子家语（复刊岩波文库）　藤原正著　1988年岩波书店刊

论语会笺　卷八——卷二十　竹添光鸿著　载《崇文丛书》第二辑　崇文院刊（1934）

论语解题略 长泽规矩也著 载《书志学》四卷二号（1935）

本邦旧钞本论语的二系统 武内义雄著 载《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十周年纪念史学文学论集》（1935）

关于假名书论语 川濑一马著 载《书志学》五卷三号（1935）

论语讲义 安井小太郎著 1936年大东文化协会刊

论语禘祭考 内野台岭著 载《东京文理科大学纪要》第九卷（1936）

论语尧曰篇的脱简补正我定 武内义雄著 《文化》三卷二号（1936）

论语臆断三则 加藤盛一著 载《汉学论丛》一辑（1936）

论语的三论与孔安国注 岛田钧一著 载《支那学研究》四编（1936）

敦煌出土本论语郑注残卷 子句篇 内野熊一郎著 载《东洋文化》百四十、百四十一号（1936）

从孔子传见到的论语的解释 冈村利平著 载《大东文化》十六号（1937）

何晏论语集解二三考察 藤冢邻著 载《汉学会杂志》七卷三号（1938）

论语杂感 宇野精一著 载《斯文》二十一编十一号（1938）

论语之研究 武内义雄著 1939年12月岩波书店刊 375页

论语若干句的训读 土桥八千太著 《斯文》二十二编三号（1940）

论语古义制作年代考 村井长正著 《汉学会杂志》八卷二号（1940）

关于集注本论语的训点 西泽道宽讲 《斯文》二十二编一号（1940）

集注本论语新释 西泽道宽著 1941年

论语的组织的研究 中岛德藏著 1941年3月日本出版株式公社刊 448页

论语义解 秋月胤继著 1942年岩波书店刊 664

论语句读论析 藤冢邻著 《东文》二号（1942）

论语 武内义雄译注 1943年4月岩波书店刊 265页

论语总说 藤冢邻著 1949年5月弘文堂刊 364页

新译白话论语（一） 鱼返善雄译 《中国语杂志》四——六（1949，11）

掌中论语的讲义 诸桥辙次著 东京大修馆书店 536页

论语的成立 贝冢茂树著 《东方学》一（1951，3）

论语新释 泽田总清著 1952年6月大盛堂刊 247页

论语评解 内野熊一郎著 1952年7月有精堂刊 175页

论语新释 宇野哲人著 1953年9月东京弘道馆刊 525页

蓬左文库所藏论语集解考：以中原家的学统本为主 杉浦丰治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八（1956，10）

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 金谷治编 1978年平凡社刊 408页

《论语》中的“文学”“文”“文章” 铃木修次著 《作为文学的论语》 1979年7月东京书籍刊

论语：自由思想家孔丘全译与吟咏 新岛淳良著 1984年新地书房刊

读《论语》 加地伸行著 1985年讲谈社刊

论语中所见诸弟子的记述Ⅰ：子夏与子张 保野太郎著 《东洋研究》73（1985）

论语中所见诸弟子的记述Ⅱ：（中）：颜渊与子贡 保野太郎著 《国学院杂志》86卷11号（1985）

论语中所见诸弟子的记述第二（下）：颜渊与子贡 保野太郎著 《东洋研究》

（大东文化大学）77（1986）
《论语》及其里 驹田信二著 1985年旺文社刊
论语的人间学：孔子学园的人及其思想 服部武著 1986年富山房刊
《论语》子在川上章 松川健二著 《汉文教室》155（1986）
《论语》朝闻夕死章论 松川健二著 伊藤漱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学论集（1986）
孔子描写的晏婴像论析 星野春夫著 《かなかお高校国语的研究》22（1986）
论语及其对话 金子知太郎著 1987年竹井刊
论语总说（复刊） 藤冢邻著 1988年国书刊行会刊
对汉语与论语研究执着 内藤干治著 《斯文》96（1988）
孔子与论语 森野繁夫著 1988年白帝社刊
关于旧抄本论语义疏 高桥均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41集（1989）
读孝经 盛次郎著 载《斯文》十七卷2号（1935）
敦煌出土孝经义疏解说 林秀一著 载《汉学会杂志》四卷一号（1936）
孝经刊误合纂 内田远湖著 1936年东京谷门精舍出版
关于孝经述义的辑录 林秀一著 收入《服部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论文集》（1936）
孝经郑注的辑佚及其刊行史：特别以日本为中心 林秀一著 载《支那学》九卷一号（1937）
论邢昺的孝经注疏校定 林秀一著 载大阪汉学大会研究报告 又《斯文》二十编十二号（1938）
围绕孝经直解的问题：以卷数、作者为主 林秀一著 《汉学会杂志》八卷二号（1940）
仁治本古文孝经解说 林秀一著 《汉学会杂志》九卷一号（1940）
我国有关孝经古钞本的系统 坂本良太郎著 《文化》七卷九号（1940）
日本孝经未刊本目录 林秀一著 《书志学》十五卷二、三号（1940）
孝经注疏训注（1） 宫本胜·弛和顺等著 《北海道中国哲学会》14（1985）
孝经·曾子 武内义雄 坂本良太郎合著 1988年岩波书店
颜子好学论 竹内照夫著 载《斯文》十八编二号（1936）
老子新考 武内义雄著 试航译，载《文史汇刊》一卷二期（1935）
老子 武内义雄译注 1938年东京岩波文库版
老子化胡经的研究 公本文三郎著 《东方学报》京都十五册一分（1944）
老子王注校正 波多野太郎著 1952年7月横滨市立大学刊 150页
老子王注校正（二） 波多野太郎著 1953年3月横滨市立大学刊 157页
老子对偶句的论析 吉川幸次郎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四 （1953.）
老子年代考 山下寅次著 收入《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文集》（1938）
老子新研究 木村英一著 1958年1月东京创文社刊 633页
老子读本 长谷川秀治著 1958年2月东京立花书房刊 164页
老子的文章及其思想的特色 大岛隆著《斯文》21（1958．3，46—56）
老子说 石田羊一郎著 1936年东京求文堂刊
老子传说的研究 楠山春树著 1979年创文社刊 487页
新释老子 守屋洋著 1988年PHP研

究社刊

老子道德经的研究 水野芳夫译注 1943年中和书院刊 320页

老子道德经研究 波多野太郎著 1979年国书刊行会刊 696页

老子·孔子·支那民族 长谷川如是闲 载《中央公论》五十年七号(1935)

新老子列子物语 稻田孝著译 1958年东京河出书房新社刊(中国古典物语二) 240页

中国古典百言百话老子、庄子 守屋洋著 1987年PHP研究社刊

老子·庄子(鉴赏中国的古典4) 野村茂雄著 1988年角川书店刊

论庄子 市村瓒次郎著 载《史苑》十卷二号(1936)

庄子错简实例二三 野村岳阳著 载《汉学会杂志》四卷三号(1936)

逍遥游的一断面 大滨皓著 载《汉学会杂志》六卷一号(1938)

新庄子物语 后藤基巳译著 1958年4月东京河出书房新社刊(中国古典物语五) 241页

庄子 金谷治译注 1971—75岩波书店刊 2册

庄子传 原田宪雄著 1979年和社刊

《庄子》的共通律及其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黄锦鋐著 佐藤明译 《荒木教授退休纪念中国哲学史研究论集》1981年2月苇书房刊

中国人与思想5:庄子 中岛隆藏著 1985年集英社刊

中国的古典6:庄子 池田知久译 1986年学习研究社刊

庄子素描 神田秀夫著 1988年明治书院刊

论孟子对继世君子制的见解 副岛文一著 载《东洋文化》百二十一号(1935)

孟子王道的意义 龟井基茂著 载《满蒙》十七年六 十二号(1936)

孟子古板本及其古写本 长泽规矩也著 载《书志学》四卷三号(1935)

孟子告子篇考文 野村岳阳著 载《汉学会杂志》五卷三号(1937)

孟子论 中山久四郎著 载《文斯》二十篇六号(1938)

讲孟余话 吉田松阴著 广濑丰译注 1942年东京武藏野书院刊 574页

关于孟子书的作者 石田义男著 《史潮》十二年一号(1942)

讲孟余话的研究(上) 玖村敏雄·西川平吉著 1944年11月大阪新闻社刊 518页

孟子字义疏证 安田二郎著 1948年1月养德社出版 264页

山井昆仑与七经孟子考文的稿本 野田文之助著 《东京支那学报》1(1956,6)

孟子(上、下) 金谷治著 1955—1956年东京朝日新闻社刊 上240页 下331页

新孟子物语 野口定男译著 1958年5月东京河出书房新社刊(中国古典物语四) 228页

孟子的传来及其普及 尾关富太郎著 《汉文教室》四三(1958,7)

理想的败北:孟子 村松暎著 1973年新人物往来社刊

孟子之综合研究 市川本太郎著 1974年汲古书院刊 848页

孟子·荀子·(中国古典百言百话8) 久米旺生著 1988年PHP研究社刊

惠施的学说 千叶长治著 载《汉学会杂志》三卷一号(1935)

管仲观的变迁 小林升著 载《历史学研究》四卷六号(1935)

管子一考察 小林升著 载《东洋思想研究》第二(1938)

倭汉洋管子书目 岩村忍著 载《中国文学月报》四十五号(1938)

《管子》四篇与《荀子》正名篇与语言问题 石田秀实著《日本中国学会报》37集(1985)

论管子(侈靡篇) 田仁田三郎著《东洋史研究》44—4(1986)

关于(管窥大学古本) 水野实著《防卫大学校纪要》56(1988)

管子幼官篇再考 久保田刚著 《兵库教育大学研究纪要》2—8(1988)

列子的话 本田成之著 载《立命馆文学》一卷二号(1934)

列子杨朱篇论 冈本正道著 载《文科》一卷七号(1936)

杨朱探源 大冢伴鹿著 载《东洋文化》 百七十六、百七十七号(1938)

列子年代考 天野镇雄著 《东京支那学报》五(1958.6)

列子研究 山口义男著 1976年风间书房刊 585页

列子(上、下) 小林胜人译注 1987年岩波书店刊

列子张湛注索引 北原峰树著 1988年北九州中国书店刊

关于墨子十三篇本 大冢伴鹿著 《大东文化》学报二辑(1941)

墨子研究 大冢伴鹿著 1943沂8月森北书店刊 194页

墨子书的篇目与传本考 石田公道《学艺》(北海道学艺大)(1949.12)

墨子书志学的考查 大冢伴鹿著 《大东文化学报》二辑(1941)

新墨子物语 驹田信二译著 1958年东京河出书房新社 230页

墨子研究文献目录 河崎孝治著 1973年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 70页

墨子校注摘要 河崎孝治著 《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24号原田教授退休纪念号》(1985)

墨子校注摘要(二) 河崎孝治著 《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会志第25号》(1986)

徂徕山人外集(读荀子) 北田数一编 1941审美书院刊

荀子劝学的文体 木村英一著 载《立命馆文学》一卷十二号(1934)

荀子三十二篇的构成 木村英一著 载《支那学》八卷一号(1935)

荀子的尧问篇 木村英一著 载《立命馆三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篇》(1935)

荀子与仲弓 佐藤匡玄著 载《支那学》八卷二号(1936)

江户时代的荀子学 北田数一讲 《斯文》二十编十二号(1938)

读荀子解题叙说 北田数一著 1941年审美书院刊

荀子 石黑俊逸著 1943年12月日本评论社刊 245页

荀子的文献学的研究 金谷治著 《学士院纪要》九—一(1951)

关于《荀子》的"文" 伊贺了介著《国文学论考》(都留文科大学)10(1974.3)

荀子:古代思想家的肖像 内山俊彦著 1976年评论社刊 276页

荀子不苟篇的性格与构造 儿玉六郎著 《新泻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编》26(1985)

中国的古典7:荀子(上);8:荀子(下) 大岛晃 加纳喜光等著 1986年学习研究新刊

荀子非相篇的性格及构造 儿玉六郎著 《新鉴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人文·社

会科学编》28（1987）（2）

荀子·韩非子（鉴赏中国的古典5） 片仓望、西川靖二合著 1988年角川书店刊

吕氏春秋十二纪论 竹冈八雄著 《东洋文化与社会》五（1956．9）

春秋左氏传 竹内照夫译 1958年东京平凡社刊（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三）418页

吕氏春秋名家论 诏尻正隆著 《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31号（1985）

中国的古典吕氏春秋 野田三郎编译 1987年讲谈社刊

论展韩非子学派受老子道的影响 藤川熊一郎著 载《东洋文化》百三十一——百三十三号（1935）

韩非子书经学考 藤川熊一郎著 载《东洋文化》百十五——百十七（1935）

韩非子所引老子句的成立年代私考 藤川熊一郎著 载《东洋文化》百二十一—百二十二号（1935）

韩非子考证 木村英一著 《立命馆文学》五卷一、二号（1938）

韩非子 长与善郎著 1942年3月日本评论社刊 269页

韩非子入门 冈本隆三著 1972年德间书店刊 254页

韩非子五蠹篇的研究 有高岩著 载《史潮》七年三号（1937）

〈韩非子〉难势篇的耕成 小幡敏行著《中国哲学》17（1988）

论鬼谷子的注 大冢伴鹿著 《书志学》十三卷四号（1938）

郑子的集大成及其史的意义 佐藤广治著 《立命馆文学》六九（1949．2）

淮南子（新释汉文大系62） 楠山春树著 1988年明治书店刊

汉初的公羊学与史记 丰田穰著 载《汉学会杂志》二卷二号（1934）

司马迁 武田泰淳著 1943年4月日本评论社刊（东洋思想丛书） 228页

司马迁 武田泰淳著 1943年东京日本评社初版 1952年创元社再版 198页

司马迁 冈崎文夫著 1947年11月弘文堂刊 125页

司马迁：史记的世界 武田泰淳著 1952年7月创元社刊 198页

司马迁：史记的世界 武田泰淳著 1958年2月东京文艺春秋新社刊 216页

司马迁：史记的成书 大岛利一著 1972年清水书院刊 189页

表现者的态度：关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高桥和已著 《视界》1（1960．6）又见《高桥和已全集15》 1978年10月河出书房新社刊

史记：司马迁的世界 加地伸行著 1978年讲谈社刊 211页

史记 福岛中郎译 1984年学习社刊“中国的古典12”

史记入门 桥本尧著 1984年日中出版

读史记（人间学） 狩野直祯著 1984年学阳书房刊

史记的人物评语 安积由纪子著 1984年櫂歌书房刊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立 大岛利一著 1985年学习研究社刊

中国人与思想6：司马迁 林田慎之助著 1985年英社刊

司马迁的精神（下）：列传中的同时代史诸篇论 大川富士夫著 《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 81（1985）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译注 森田傅一郎注 1986年雄山阁出版

史记桃源抄的研究 水泽利忠 龟井

考合著 1986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刊

中国的古典14——史记 竹田晃等编 1985年学习研究社刊

史记：历史与人间 藤本幸三著 《中国的古典阅读》(1987)

汉文的教材研究：司马迁的史记执笔态度 佐藤利行著 《安田女子大学纪要》15 (1987)

《廉颇蔺相如列传》本文的疑点及其考察 李锐清著 《滋贺大国文》25 (1987)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遇与文学 青木五郎著 《中国的文学论》(1987)

《史记》小事典：司马迁史记别卷 久米旺生、丹羽隼兵、竹内良雄合著 1988年德间书店刊

《上秦文》的文体论析：以邹阳的〈狱中上书自明〉为中心 福井佳夫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35 (1983)

读〈外戚世家〉1 新田幸治著 《东洋学论丛》(东洋大学文学部) 41 (1988)

王充传私论5：王充的著作意识 胜仓寿一著 《福岛大学教育学部论集》(人文科部) 39 (1987)

王充传私论7：王充文章论析(续) 大久保隆郎著 《福岛大学教育学部论集》41 (1987)

王充的人与书(论衡序说) 田向竹雄著 《大东文化学报》十一辑 (1944)

牟子研究 福井康顺著 《东洋思想研究》第二 (1938)

建安时期的文学观与文学：通过三曹 山口广为著 《反俗的思想与文学：中国文学的世界》 1977年6月笠间书院刊

关于曹丕的《典论论文》 冈村繁著 《支那学研究》(广岛支那学会) 24、25 (1960. 10)

典论论文与文赋 林田慎之助著 《文学研究》75 (1978. 3, 45—66页)

碑的文体论析：以蔡邕作品为中心 福井佳夫著 《东京大学文学部纪要》22—2 (1988)

徐干中论校注 池田秀三著 《东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4 (1985)

徐干中论校注下 池田秀三著 《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5 (1988)

论刘桢的散文 中川薰著 (鸟取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七 (1956. 12)

王弼的学问 本田济讲 《人文研究》4—3 (1953. 3)

王弼易的底本考 户田丰三郎著 《哲学》5 (1955. 3)

论丛书堂钞本嵇康集 小尾郊一著 《支那学研究》24、25 (斯波太郎博士追悼特集) (1960. 10)

稽康评传 林田慎之助著 《中国文艺座谈会释》11 (1958. 11, 1—16页)

从嵇康·阮籍到陶渊明：处理感情矛盾三个表现手法 铃木修次著 《中国文学报》18 (京都大学) (1963. 4)

文样的博物志 吉田光邦著 1985年同朋舍刊

博物志佚文补正 松本幸男著 《学林》12 (1988)

挚虞文章流别志考 兴膳宏著 《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1974. 10, 285—299页)

陆机的生平与写作《文赋》的正确时期 陈世骧著 一海知义译 《中国文学报》(京都大学) 8 (1958. 4)

《文赋》的理论根据 藤原尚著 《支那学研究》(广岛支那学会) 35 (1970. 10)

围绕文学的本质：《文赋》 兴膳宏著 《中国诗文选10·潘岳陆机》 1973年9月筑摩书房刊

读《文赋》私记 吴孟复著 《艺文志》

(1983．2)

陆机的〈文赋〉：修辞主义的发展 向岛成美著 《中国的文学论》(1987)

二陆的文章观 佐藤利行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十七集(1985．75—88页)

陆云《与平原书》：其文学论之研究 釜谷武志著 《中国文学报》(京都大学)28(1977．10)

抱朴子 石岛快隆译注 1942年10月岩波书店刊 558页

抱朴子引书考 石岛快隆著 《文化》二〇·六(1956．11)

葛洪的文艺思想 林田慎之助著 《文学研究》74(1977．3，107—127页)

抱朴子·列仙传(鉴赏中国的古典9) 尾崎正治 平木康平 大形彻合著 1988年角川书店刊

骈文史序说 铃木虎雄著 小川环树校 1960年11月芦屋刊 200页。

六朝美文论 高桥和巳著 《中国中世文学研究》9(1966．12，97－137页)

贵游文学与六朝文体 王梦鸥著 《池田末利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1980．9．573—586页)

六朝文学评论史上有关文体分类论 古川末喜著 《冈村繁教授退官纪念论集：中国诗人论》(1986)

六朝文章语汇集(B)部(1) 松冈荣志著 《陶渊明研究月报》(1)(学艺大学汉文学研究室)(1988)

正始的文章 清水茂著 《小尾博士古稀纪念中国学论集》(1983．10，135—150页)

严铁桥全齐梁文补遗 小尾郊一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25(1973．10)

王羲之的书翰 森野繁夫、佐藤利行译著 1984年第一学习社刊

围绕《宋书谢灵运传论》 兴膳宏著 《东方学》59(1980．1)

桃花源记序 狩野直喜著 《东光》五(1948．4)

桃花源记的文体 高桥君平著 《近代》13(1955)

论析渊明诗文甲子年号 大矢根文次郎著 《东洋文学研究》15(1967．3，17－28页)

陶渊明诗文综合索引 堀江忠道编 1976年汇文堂书店刊 473页

论陶渊明的虚构法：以〈桃花源记并诗〉为中心 上里贤一著 《琉球大学法文学部纪要》(国文学论集)25(1981．2)

陶渊明的年龄及其作品成立时期各家对照 上里贤一著 《琉球大学法文学部纪要》(国文学论集)26(1982．1)

陶渊明文学的人间爱 片冈政雄著 《大东文化纪要》(人文)21(1983)

论〈桃花源记并诗〉的诗情的构成的追究：陶渊明文学的诗情形成思想的探究 片冈政雄著 《大东文化大学创立六十周年纪念中国学论集》(1984．12)

陶渊明研究释：关于陶渊明诗文中所见的〈影〉 门胁广大著 《大东文化大学纪要》(人文科学)22(1984．3，35—53页)

〈桃花源〉考：创作动机论 松崎治之著 《筑紫女学园短期大学纪要》23(1988)

陶渊明的诗文山岳观小考 松田稔著 《国学院高等学校纪要》31(1988)

陶渊明的生涯作品 松本幸男著 《学林》10(立命馆大学中国艺文研究会)(1988)

诏令的文学性：傅亮的场合 四纪昭著 《中国中世文学研究》10(1974．1)

论王融的〈策秀才文〉 藤井司守著 《小尾博士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论集》

（1976．3）

江淹〈郊阮公诗〉论：其时代与文章制作的状况　中野将著　《中国文化汉文学会会报》15（1987）

唐钞本文选残篇跋　狩野直喜著　载《东洋学丛编》第一轴（1934）

四部丛刊本文选书类李注引文改正（一）　斯波六郎著　载《立命馆文学》一卷十二号（1934）；（二）载《立命馆文学》二卷五号（1935）

关于新慕东文选　滕田亮策著　载《青丘学丛》二十三号（1936）

文选之所以大　芝野六助著　载《同仁》十卷五号（1936）

文选集注论　斯波六郎著　《支那学》九卷二号（1938）

敦煌本文选二、三论　详田总清著　《大东文化学报》1辑　（1938）

文选李善注引刘熙本孟子考　小林俊雄著　《支那学研究》七　（1951）

六朝文献的索引编纂其一（文选索引）　斯波六郎等　《各国研究および助成研究报告集录》　1952年：哲、史、文学编）　（1953．11）

文选索引第一分册　斯波六郎编　1954年11月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刊　133页

文选索引第二分册　斯波六郎编　1955年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刊　油印本700页

文选诸本的研究　斯波六郎著　1957年3月广岛文理科大学内斯波博士退官纪念事业会刊　105页

文选索引第一册　斯波六郎著　1957年3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唐代研究特集第一）　刊762页

文选索引第三册·附录　斯波六郎编　1958年1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唐代研究特集第二）

细川家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　冈村繁著　《东洋学》14（1965．10）

文选心诀论　森孝太郎著　《东洋文化》（无穷会）11（1965．9）；12（1966．1）

五柳先生传　波部英喜著　《中国文学论考》2（1971）

《敦煌本文选注》校释　冈村繁著　《东北大学教养部纪要》4（1966）

昭明太子的文学意识：其基本思想　船津富彦著　《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广岛大学）5（1966．6）

昭明太子的文学论：以文选序为中心　小尾郊一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27－1（日本东洋）（1967）

文选李善注引书考证稿　小尾郊一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26－1（1966．12）

太平记与文选　增田欣著　《富山大学教育部部纪要》19（1971．3）

《文选》编纂的人与时　古田敬一著　《小尾博士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论集》（1976．3）

本邦古钞本《文选》卷一管见　中村宗彦著　《大谷女子大学纪要》16－2（1981．12，19－42页）

文选私语　大久保庄太郎著　《羽衣学园短期大学研究纪要》19（1982）

文选卷四十〈奏弹刘整〉中间部分七百余字的由来及其文学性　佐竹保子著　《文化》15－3、4（1982．2，19－33页）

关于宋代李善注文选　森野繁夫著　《东方学》64（1982．7，57－72页）

文选李善注论析　衣川贤次著　《小尾博士古稀纪念中国学论集》（1983．10，291－308页）

论《文选》中梁代作品撰录　清水凯夫

著 《学林》1（1983. 1，50—61页）
《文选》李注引书考：与《汉书》颜师古注的关系 富永一登著 《小尾博士古稀纪念中国学论集》（1983. 10，309—328页）
《文选》撰者考：照明太子与刘孝绰 清水凯夫著 《学林》3（1984. 1，46—64页）
《文选》编纂的目的与撰录基准 清水凯夫著 《学林》3（1984. 7）
文选杂识（3） 森野繁夫 1984年第一学习社刊
《文选杂识》（4） 森野繁夫著 1984年第一学习社刊
文选与国语国文读本 芝野六助著 载《同仁》九卷四号（1935）
关于金泽文库本旧钞文选集注第百十六卷的发见 关婧著 载《书志学》四卷一号（1935）
《文选》编纂的实况与当初编纂《文选》的评价 冈村繁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十八集（1986. 135—155页）
足利本文选的汉语（六） 柏欲嘉弘著 《冈山大学纪要》23（1987）
《文选》：贵族的词华 后藤秋正著 《中国古典阅读》（1987）
《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关于韵文方面的检讨 清水凯夫著 《立命馆文学》500（1987）
文选的鸷鸟类与杜诗 芳原一男著 《二松学舍创立百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7）
关于古定本《文选集注》一考察 焦雪艳著 《创价大学亚细亚研究》9（1988）
文选：南北朝末期文学的动向与《文选学》的成立 冈村繁著 《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纪要》15（1988）
文选（鉴赏中国的古典12） 兴膳宏川合康三合著 1988年角川书店刊
萧统与萧纲：《文选》与《玉台新咏》的编纂之文学认识 大上正美著 《中国文学论》（1987）
文选研究论著目录 牧角锐子主编 1988年九州大学文学部刊
裴子野《雕虫论》考证："六朝时期复古文学论的构造" 林田慎之助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20（1968. 10）
南朝放荡文学论的审美意识：简文帝的文学观 林田慎之助著 《东方学》27（1964. 2）
简文帝的文章观：以《与湘东王书》为中心 森野繁夫著 《中国中世文学研究》5（1966. 6）
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考 清水凯夫著 《立命馆文学》（1981）443、441、442
任昉的奏弹文 佐竹保子著 《集刊东洋学》45（1981. 5，31—43页）
从神思到沈思：文心雕龙与文选 户田浩晓著 《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14（1975. 3）
文心雕龙研究序说：刘勰的世界观及其文章论的展开论析 门胁广文著 《东洋学》40（1978. 11，56—68页）
文心雕龙文学原理论的诸问题：论刘勰美的理念 林田慎之助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19（1967. 11，131—143页）
文心雕龙考：关于文学原论的形成 门胁广文著 《文化》（1981. 9，45—1、2）
《文心雕龙》的基本性质：作为创作论的编述体系 甲斐胜二著 《中国文学论集》11（那须清教授退官纪念号）（1982. 10，56—79页）
《文心雕龙》与《诗品》：对修辞主义的对

峙与通底 安藤信广著 《中国的文学论》（1987）

《文心雕龙》与《书谱》比较试论 白川义郎著 《大分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9-1（1987）

《文心雕龙》考：〈辨骚〉文体论说 门胁广文著 《大东文化大学纪要》（人文科学）26（1988）

〈文心雕龙〉考：〈辨骚〉篇的构成 门胁广文著 《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27（1988）

文心雕龙范注补正 斯波六郎著 1952年11月广岛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刊

文心雕龙札记（1-4） 斯波六郎著 《支那学研究》（广岛支那学会）10（1953. 11）；12（1955. 3）；15（1956. 8）；19（1958. 2）

作为校勘资料的文心雕龙敦煌本 户田浩晓著 《立正大学教养部纪要》2（1968. 12）

刘勰《文心雕龙》文学论的基本概念之研究 高桥和已 《中国文学报》（京都大学）3（1955. 10）

文心雕龙中的"文"观念 加贺荣治著 《人文论究》（函馆人文学会）3（1951. 6）

关于《诠赋》篇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中岛千秋著 《目加田诚博士还历纪念中国学论集》《大安》1964. 11

世说新语机智的性格 村上嘉实著 《史林》二十九卷三号（1944）

《世说新语》中的评论用语（1）：以"谐"字为中心 森野繁夫著《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广岛大学）8（1971. 8）

世说新语及其注中所见的评论用语："简"与"率" 森野繁夫著《东方学》44（1972. 7）

《世说新语》中的评论用语：关于"朗"字 森野繁夫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37（1972）

世说新语与六朝文学 大矢根文次郎著 1983年3月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刊

世说新语 竹田晃著 1984年学习研究班刊 "中国的古典22"

世说的撰者析 矢渊孝良著 《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

世说新语（鉴赏中国的古典14） 井波律子著 1988年角川书店刊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试笺（1—3） 横山弘著 《天理大学报》78（1973. 3）；81（1972. 9）；90（1974. 3）

徐庾的文章 铃木虎雄著 《支那学》十卷三号（1941）

北魏·孝文帝的文学观 矢岛御辅著 《九州中国学会报》16（1970. 5）

作为山水游记的水经注：宜都山川记析 小尾郊一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九（1956. 3）

论北周的大诰 吉川幸次郎著 《石滨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学论丛》（1958. 11. 623-633页

颜之推的生活与文学观 林田慎之助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14（1962. 10）

颜之推的文学论 兴膳宏著《加贺博士退官记念中国文史哲学论集》1979年3月讲谈社

关於文馆词林 前野直彬著 《中国语学》二三 （1949. 1）

图书寮藏文馆词林 1949年7月宫内厅书陵部卷子本二卷（醒利堂印刷）

所在未详的文馆词林 森鹿三著 《神田博士还历记念书志学论集》（1957年11月）

文馆词林目录注 尾崎康著 《斯道文

库论集》4（1965．3）

经典释文解　武内义雄著　《东方学》二（1951．8）

旧唐书与新唐书　丰田穰著　《台大文学》八卷一号（1942）

全唐文作者索引　佑目潮风等编　1950年2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古典校注、索引编纂班刊　130页

唐代文集成立的过程对文化史的研究　市原亨吉著　《各个研究および助成研究报告集录》（1952年度）：哲、史、文学编　（1953．11）

唐代文学抄：王昌龄、韩退之、韦应物、杜甫、陶渊明、李白　吉川幸次郎著　1957年2月东京弘文堂刊　148页

唐代的散文作品　平冈武夫　市原亨吉　今井清合编　1960年12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　887页

唐代的诗与散文　吉川幸次郎著　1967年清水纺文堂书房刊　126页

唐代古文运动的背景　河内照圆著　《大谷学报》54　4（1975．2）

唐代古文运动的形成过程　林田慎之助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29（1977．10）

文苑英华的编纂　花房英树著　《东方学报》京都（1950．12）

陈子昂的散文评价　笕文生著　《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1986年）

张说谏避暑三阳宫疏校笺　横山弘著　《山边道》18（1974．3）

张说的散文论：唐代古文的渊源　笕文生著　《立命馆文学》430、431、432（白川静博士古稀记念中国文史论丛）（1981．6，239—252页）

张九龄作（敕渤海王大武艺书）　石井正敏著《朝鲜学报》112（1984）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冈村贞雄著　广岛大学教学部纪要（第二部）26（1978．3）

韩文二则　高桥君平著　《近代》十九（1957．5）

韩愈的送穷文　西冈弘著　《国学院杂志》73－6（1972．6，1—18页）

韩愈论阳山：〈送王秀才序〉、〈送区册序〉释　小野四平著　《东洋学》30（1973．12）

韩愈的〈寂寞〉：〈与冯宿论文书〉释　小野四平著　《东洋学》29（1973．6）

关于韩愈的写作态度　刘三富著　《西南学院大学文理论集》15—1（1974．10）

韩愈〈诗之序议〉译注　加藤实著　《诗经研究》1（1974．10）

解题韩愈〈诗之序议〉　村山吉广著　《诗经研究》1（1974．10）

〈诗之序议〉考：触及古文复兴运动的一面　坂田新著　《中国古典研究》20（1975．1）

韩愈的设论二篇：关於其滑稽感　山崎纯一著　《中国古典研究》18（1971．12）

韩愈的文章表现论　林田慎之助著《文学研究》72（1975．3，179—199页）

韩愈的生涯　前野直彬著　1976年秋山书店刊　267页

韩愈崇〈古〉的志向：以贞元年间为中心　川合康三著　《集刊东洋学》51（1984．5，51—67页）

论韩愈〈师说〉的道　西冈市佑著　《汉文学会会报》（国学院大学）30（1984．12，84—92页）

韩愈〈进学解〉的叙法　西上胜著　《文化》49—3、4（1986）

韩愈的墓志铭　西上胜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39（1986）

韩愈Ⅰ（世界古典文学会集 30B）　清水茂著　1987年筑摩书房刊

〈张中丞传后叙〉与韩愈的立场 谷口匡著 《筑波中国文化论丛》九(1988)

韩愈散文作品的立场及道的主张 谷口匡著 《中国文化：研究与教育》《汉文学会会报》16(1988)

韩愈的人间观：性三品说 吉田公平著 《国世的文化》(1988)

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 清水茂著 《中国文学报》二(1955．4，45－74页)

柳宗元的文学：〈吊屈原文〉试论 小野四平著 《宫城教育大学纪要》1(1967．3)

柳文素描 新海一著 《汉文学会会报》(国学院大学)19(1974．2)

章士钊〈柳文指要〉 筧文生著 《中国文学报》24(1974．10)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考 田中利明著 《学大国文》18(1975．2)

柳宗元的永州游记 小野四平著 《东洋学》35(1976．9)

柳文杂记：有关动物寓言 山本昭著 《小尾博士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论集》(1976．3)

柳河东集的源流 新海一著 《国学院大学纪要》15(1977．3)

柳文校勘试论：凌准的死 新海一著 《国学院大学纪要》17(1979．3)

柳宗元的文学：诗与山水记 松本肇著 《函馆大学论究》13(1980．3，13－35页)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论 松本肇著 《筑波中国文化论丛》2(1983．3，21－39页)

柳文校甚事例：〈献平淮夷雅表一首〉提挈 新海一著 (国学院大学)《汉文学会会报》29(1984)

柳文研究序说 新海一著 1987年汲古书社刊

柳宗元〈骂尸虫文〉考 吹野安著 《国学院杂志》89－1(1988)

柳宗元与中唐的佛教 户崎哲彦著 《中国文学报》38(1988)

柳宗元的〈非国语〉论析 松本肇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41集(1989)

柳宗元的散文〈捕蛇者说〉使用的语气词 1988年

元元唱和集论 铃木虎雄讲 《史学杂志》五十三编一号(1942)

白氏文集传本 小尾郊一著 《东方学报》京都15—2(1946．1)

论岑仲勉氏的《白氏长庆集研究》 花房英树著 《西京大学学术报告》二(1952．12)

白氏文集的成立 花房英树著 《西京大学学术报告》一(人文)(1952．2)

读白氏文集记 花房英树著 《西京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954．3)

读白氏文集记(二) 花房英树著 《西京大学学术报告人文》六(1955．8，72—86页)

白氏文集的金泽文库本、林家校本、宗性要文抄本、管见抄本论 平冈武夫著 《神田博士还历记念书志学论集》(1957．11)

关于宋本白氏文集 花房英树著《神田博士还历记念书志学论集》(1957．11)

白氏文集的资料批判与作品整理(一) 花房英树著 《西京大学学术报告人文》九(1957．11)

白氏文集的资料批判及其作品整理(二) 花房英树著 《(西京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0(1958．10)

林罗山手校的白氏文集 神田喜一郎著 シエジアム八二(1958．1)

大东急记念文库藏旧钞本白氏文集 花房英树著 《カガみ》四(1960．10，

1—6 页）

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　花房英树著　1960 年 3 月京都汇文学堂书店刊　747 页

《**白乐天之文学理论及其主张：资料编**》　堤留吉编　1961 年 4 月敬文社刊

白氏文集与东急本　平冈武夫著　《ガガみ》三（1960．1）

白氏文集校订余录　花房英树　《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8（1966．9）

白乐天　横山裕男著　1967 年人物往来社刊　267 页

白氏文集的影响　神山秀夫著　《金泽文库研究》14－1（1968．1）

白氏文集　平冈武夫、今井清校定　1971－73 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　3 册

杜佑致仕制札记：白居易的习作　平冈武夫著　《铃木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学论丛》（1972．10）

〈**十训抄序**〉**与**〈**白氏文集**〉　丸山茂著　《汉学研究》13、14（1975．11）

论白氏文集　平冈武夫著　《东洋文库书报》7（1976．3）

日本文学受〈白氏文集〉的影响：〈七十一番职人歌合〉的组织构成　岩崎佳枝著　《东方学》65（1983．1，104－115 页）

金泽文库旧藏本白文集　太田次男著　《小尾博士古稀记念中国学论集》（1983．10，485－503 页）

关于朝鲜铜活字本《白氏策林》　神鹰德治著　《朝鲜学报》106（1983．1，35－64 页）

关于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白氏文集新乐府元亨写本　太田次男著　《斯道文库论集》（1984）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 3、4　川濑一马监修　1984 年大东急记念文库刊

白居易百道判释义（五）　布目潮沨著　《摄南大学　摄大学术 B 人文・社会篇》2（1984）

白居易百道判释义（七）　布目潮沨　大野仁著　摄大学术（人文・社会篇）4

白乐天《策林》研究　鬼头有一著　《黄学馆大学纪要》第二十三辑（1985）

白氏长庆集谚解　森考太郎解题　1986 年和泉书院刊　"影印丛书 6"

杭州刺史白居易：以祈皋事神文为中心　吹野安著《国学院杂志》87－12（1986）

自照文学中的〈白氏文集〉：白居易的写真　丸山茂著　《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34（1987）

白氏文集（三）（新释汉文大系 99）　冈村著　1989 年明治书院刊

日本白居易的研究（以战后为中心）上：〈文集〉的校勘及其讽谕诗・〈长恨歌〉的研究　下定雅弘著　《帝冢山学院大学研究论集》23（1988）

石刻与文集其间：读白居易的会王墓志铭　平冈武夫著

宋板刘梦得文集解题　木村三四吾著　（ビブリア）四（1955．5）

刘禹锡文章中的所见士人像　阿部兼也著　《中国关於人间性的探究》（1983．2，431－453 页）

刘禹锡的谪迁与文学：以郎州司马期的寓言文学为中心　赤井益久著　《汉文学会会报》33（国学院大学）（1988）

定本湛然居士文集译　饭田利行著　1985 年国书刊会会刊

杜牧的诗与散文：两者的创作基础　爱甲弘志著　《文学研究》80（1983．2，153－174 页）

皮日休与孟轲　吹野安著　《国学院杂志》80—9（1979．9）

皮日休的散文：以〈皮子文薮〉散文为中心　吹野安著　《国学院杂志》70—10（1978．10）

读皮子文薮　本田济著　《中国哲学史的展望与模索》（1976．11）

皮日休的孟浩然评论：围绕《郢州孟亭记》　田中畅穗著　《早稻田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2（1976．3）

五代的风气及其文章　本田济著　《梅花女子大学文学部纪要》（国语国文学）19（1984）

宋代文集索引　佐伯富编　1970年东洋史研究会刊　845页

日本现存宋人文集目录　寺田寅，棚田贞彦编　1972年编者刊　150页

严铁桥全晋宋文补遗　森野繁夫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35（1976．1，120—136页）

宋史文苑传札记（4）　原田种成著　《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23（1984）

〈太学体〉考：北宋古文运动一考察　东英寿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40（1988）

唐宋八家文文钞　毛利昌著　1952年8月福村书店刊

文章规范详解：附唐宋八大家　国译汉文研究会编　1952年6月汤川弘文社刊（汉译文丛书）256页

唐宋八家文（上）　清水茂　1956年9月东京朝日新闻社刊404页列入"中国古典选"

唐宋八家（中）　清水茂　1960年3月东京朝日新闻社刊（中国古典选）323页

唐宋八家文（下）　横山伊势雄著　1984年学习研究社刊"中国古典31"

唐宋古文与近代散文　星川清孝著　《新释汉文大系季报》明治书院43号（1976）

唐宋八大家的世界：文学与道　松本肇著　1987年《中国的文学论》

柳冕之文论　小尾郊一著　《支那学研究》（广岛支那学会）27（1962．3）

读欧阳文忠公集　稻叶诚一著　《专修国文》20（1976．11，207—224页）

欧阳修散文的文体（1）：助字及其反复的二点论析　高桥明郎著《筑波中国文化论丛》　4（1984．9，1—14页）

欧阳修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小林义广著　《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42（1985）

欧阳修散文文体的特色：与韩愈散文差别的成因　高桥明郎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38（1986）

欧阳修的夷陵贬谪与古文复兴运动　东英寿著　《中国文学论集》16（1987）

欧阳修的学问及艺术论　宇佐美文理著　《中国思想史研究》9（1987）

欧阳修研究论著目录稿　（1945—1986）　东英寿编《中国文学论集》16（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1987）

欧阳修的文学理论〈杨圣俞诗集序〉论（第一部）　高桥明郎著　《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一部》72（1988）

欧阳修〈居士集〉编纂的意图　东英寿著　《中国文学论集》17（九大中国文学会）（1988）

欧阳修试论：理、人情、自然、简易　上田健次郎著　《中国——社会与文化》3（1988）

新五代史的文章　丰田穰著　《史学杂志》五十四卷九号（1942）

续、五代的风气及其文章　本田济著　《梅花女子大学二十周年记念论文集》（1984）

曾巩的文章　纲佑次著　《城南汉学》

12（1970．10）

无文印的著者道璨 八幡关太郎著 《东洋》四十一卷七、九号（1938）

王安石 佐伯富著 1941年2月富山房刊

有关王安石评价的系谱考察 东一夫著 《东京学艺大学研究报告》（历史学）10（1958．3）

王安石 小野寺郁夫著 1967年人物往来社刊 268页

苏东坡的文章观的一侧面 阿部兼也著 《汉文教室》77（1966．6）

苏轼的文学思想：性命自得与自然随顺 合山究著 《中国文艺座谈会释》（九州大学）（1967）

苏东坡 竺沙雅章著 1967年人物往来社刊 260页

苏东坡论 荒井健著 《斯文》49（1974—10）

苏东坡 田中克已著 1983年3月东京研究出版 297页

苏轼〈武王非圣人〉论的性格：'礼'的重视与'权'的否定所见经学思想的一斑 近藤正则著 《汉文学会会报》（1984．12，93—104页）

两院足本《东坡集》初探 吉井和夫著 《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1986）

苏轼〈祷祝文〉小考 石本道明著 《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19（1988）

苏轼集 大野修作译著 1988年苏轼集（玄社）刊

黄庭坚卷释文解说 大野修作著 1984年同朋舍刊"书学大系34"

黄庭坚的书简 塘耕次著 《爱知教育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36（1987）

《李纲文集》（中国古典新书续编）① 志贺一郎著 1985年风间书房刊

陆游《剑南诗稿》论：附《渭南文集》杂记 村上哲见著 （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1986）

陆游入蜀记 岩城秀夫译 1987年平凡社刊

海南朱子学发达的研究 系贺国次郎著 1936年成美堂出版

关于朱子学的传入日本 福井康顺讲 《斯文》二十五卷十二号（1942）

朱子四书或问索引 后藤俊瑞编 1955年10月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刊 848页

注释家的表现：朱熹集注的文章 近藤光男著 《汉文教室》三四（1958．1）

朱子语类自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语句索引 佐藤仁编 1975年采华书林刊 278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人名索引 佐藤仁编 1977年中文出版社刊 145页

朱子 三浦国雄著 1979年讲谈社刊 422页

中国的人与思想8：朱子 佐藤仁著 1985年集英社刊

朱熹集注论语全译 小泽正明译 1988年白帝社刊

朱熹的六朝评：从道文致论中窥见中世像 市来津由彦著 《中世的文化》（1988）

陈骙的《文则》中所见的比喻论 古田敬一著 《小尾博士古稀记念中国学论集》（1983．10，579—594页）

日本现存元人文集目录 山根幸夫、小川浩编 1970年汲古书院刊66页

明的选学 泽田总清著 《大东文化学报》五辑（1942）

明末总集的编纂：以文集为中心 横田辉俊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 11（1957．2）

明代古文辞派的文学论 前野直彬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16（1964．12）

〈增订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正误表　山根幸夫著　《明代史研究》6（1978.12）

中国故事全言集与太平记的出：与明文抄的关系　远藤光正集　《东文论研究所经要》（无穷会）7（1967.3）

〈皇明文则〉及其编者慎蒙　横山弘著　《ビブリア》48（1971.6）

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　山根幸夫编　1966年大安刊　150页　1978年汲古书院增订版　205页

明代的古文及八股文　横田辉俊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36（1976.12）

明末的道与文　沟口雄三著　《东洋文化》（东京大学）61（1981.3）

明末总集的编纂：以文集为中心　横田辉俊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11（173—196页）

关於茶陵陈仁子刊《增补六臣注文选》的宋版本　神鹰德治著　《けんぶん》6（1987，研文出版）

李梦阳的一侧面：古文辞的遗民性　吉川幸次郎著　《立命信文学》180（桥本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学论丛）（1960.6）

归有光的〈文〉理论：载道与抒情的融合　鹫野正明著　《筑波中国文化论丛》23（1983.3、3—89页）

关于归有光〈项脊轩志〉的"追记"制作年　鹫野正明著　《中国古典研究》29（1984.12）

梅鼎祚的总集编纂：以文纪为中心　横田辉俊著　《支那学研究》30（1965.3）

关于王世贞古文辞说的质变　松下忠著　《中国文学报》（京都大学）5（1956.3）

李王对古文辞分岐的意见　松下忠著　《和歌山大学学艺部纪要》（人文）7（1957.3）

张岱散文论　福本雅一著　《帝冢山学院短期大学研究年报》17（1969.12）

明末的尺牍集：以周亮工选集为中心　横田辉俊著　《支那学研究》30（1965.3）

论茶酒论　盐谷温著　载《汉学会杂志》二卷二号（1934）

明·清古文家表示段落的成立过程：关於〈唐宗八家文〉系统的诸本　佐久间まゆみ著　《东方学》61（1981.1，116—131页）》

清的诗语文　佐藤一郎著　《国学院杂志》67—9（1966.9，124—133页）

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　西村元照编　1972年东洋史研究会刊438页

全书本传习录考（一）　今井宇三郎著　《斯文》二十七编七、八、九并号（1944）

论八股文　横田辉俊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24—3（1965.3）

桐城派的气：以诗文论为中心　三石善吉著　《气的思想：自然观与人间观在中国的展开》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编1978年3月东京大学出版会刊

钱谦益的理论　横田辉俊著　《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39（1979.12）

黄宗羲的文学观　福本雅一著　《史泉》（关西大学）23、24（1962.3）

董园派诗文论的对立与李玉的古文辞　松下忠著　《汉文教室》52（1961.1）

从戴名世、方苞的交游看到桐城派古文的形成　佐藤一郎著　《艺文研究》（庆应义塾大学）16（1963.10）

论袁枚的诗文地位　佐藤一郎著　《汉文学会会报》（国学院大学）17（1972.3）

论袁枚的〈诽谐文〉　松浦崇著　《日本中国学会报》31（1979.10）

章学诚之文章论　宫崎市定著　《学

海》(秋田屋) 4——1 (1947)

湘绮楼集外文(1—10) 中和月刊三卷二——六期、八期——十二期 (1942)

日本的汉语散文 参见王晓平撰写辞条

日本江户时期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 参见王晓平撰写辞条

日本十八、十九世纪有关汉语的著述 参见王晓平撰写辞条

日本孝经年谱 林秀一著 著《汉学会杂志》三卷一、二号 (1935)

古贺侗庵的诗文论与中国诗文论 松下忠著 (东方学) 54 (1977. 7, 111—129 页)

宋元明清家集分类索引 泷泽俊亮编《满蒙》十八年六、七、九——十二号 (1937)

古贺侗庵的中国散文论 松下忠著《日本中国学会报》29 (1977. 10)

(王丽娜编译)

台港古文研究论著目录

(此目录按论著名、作者名、登载出版处、卷期、页数、年月日顺序排列。)

论中国古代散文的发达与楚辞文学的出现 洪顺隆 世界华学季利 3卷1期 22—50页 1982年3月

时代升降与古文盛衰 莫可非 述 香港 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 4期 14—27页 1966年6月

古典散文与现代散文 游唤 古典文学第五集 311—356页 台北 学生书局 1983年12月版

中国散文之发展 冯放民 台北 新时代 12卷2期 34—36页 1972年2月

中国散文的进展 程兆雄 香港 大学生活 3卷3期 4—15页 1957年7月

中国散文的演变及其代表作 陈一山 台北 文坛 205期 213—218页 1962年4月

古文运动史略 邱燮友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 1960年

我国古代的哲理散文 林祖亮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0版 1979年8月28日

中国古文的最高境界美 刘中和 台北 文艺 42期 76—90页 1972年12月

阴阳刚柔与古文八境浅释 柳作梅 台中 私立东海大学图书馆学报 11期 355—362页 1971年6月

骈散相通论 庄雅州 台北 学粹 17卷1期 22—26页 1975年4月

民族家的散文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9年5月17日

史学家的散文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9年4月16日、19日

经世家的散文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9年4月12日

经学家的散文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9年4月30日

名家散文的探讨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8年9月11日

法家散文的探讨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5版 1978年8月13日

思想家的散文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9年5月7日

训诂家的散文 李谦 台北中华日报 9版 1979年6月7日

阴阳家的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10月13日

道家的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9年7月14日

墨家的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8月5日

儒家的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7月24日

纵横家的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10月3日

杂家的散文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8年10月12日

艺术家的散文 孙旗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7年9月19日

辞赋家的散文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9年3月29日

论中国散文之艺术特征 王更生 教学与研究 9期 35 61页 1987年6月

论我国古今散文体类分合之价值原则及方法 王更生 台北 孔孟学报 54期 141—163页 1987年9月

论古文中之赠序文 黄振民 台北 国文学报15期 175—186页 1986年6月

先 秦

殷虞时代的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5月9日

西周时代的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6月6日

西周至战国之散文 钱穆 讲 谢正光 译 香港 新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 2期 1—14页 1964年6月

东周时代的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6月15日

东周散文的文体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8年10月26日

《尚书》与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6月24日

《春秋》与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7月3日

春秋时代的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10月28日

战国时代的散文 澎湃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1版 1978年11月8日

先秦散文中的韵文 龙字纯 香港 崇基学院学报 2卷2期，3卷1期 65页 1963年5月，11月

战国诸子的散文特色 史墨卿 古典文学第八集 1—32页 台北 学生书局 1986年4月版

庄子的散文形态 王仁钧 中国文学讲话第3册·周代文学 49—71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4年11月版

韩非散文的艺术 周富美 中国文学讲话第3册·周代文学 345—362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4年11月版

晏子春秋及其散文特色 王更生 中国文学讲话第3册·周代文学 365—400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4年11月版 台北 孔孟学报 47期 205—228页 1984年4月

孟子散文研究 王基伦 台北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 29期 1—148页 1985年6月

古文研析——《愚公移山》赏析 沈谦 台中 明道文艺 81期 110—119页 1982年12月

《邹忌讽齐王纳谏》评析 沈谦 台中 明道文艺 96页 105—112页 1984年3月

暴秦时代的散文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5版 1979年2月1日

缤纷灿烂的先秦散文 陈修齐 东海文艺季刊 22期 42—48页 1986年12月

孟文与韩文 吴耀玉 台北 私立辅仁大学人文学报 1期 443—452页 1970年9月

战国纵横家说话的技巧：以《触詟说赵太后》为例 连清吉 台北 国文天地 4卷7期 64—66页 1988年12月

从文学层次析论韩非子外储说《楚王问田鸠》章 杨琤玲 台北 中国国学 15期 221—224页 1987年9月

李斯《谏逐客书》及苏洵《六国论》立意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5卷11期 52—55页 1987年7月

《谏逐客书》试析 叶庆贤 台中 明道文艺 126期 38—43页 1986年9月

两 汉

汉代之散文 钱穆 讲 谢正光 译 香港 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 2期 36—47页 1964年6月

两汉时代散文的探讨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9版 1979年2月26日

论两汉散文的演变 台静农 台北 大陆杂志5卷6期 1—5页 1952年9月

论两汉散文(上下) 洪顺隆 世界华学季刊 3卷2期 1—17页 1982年6月 3卷3期 36—59页 1982年9页

汉魏之秋的散文 澎湃 台北 新生报 12版 1979年7月3日—4日

刀锯之余司马迁——穷而后工 禾子 台北 联合报 6版 1954年2月23日

也谈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年代问题 王保德 台北 联合报 14版 1973年6月29日

谈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陈振兴 台北 新潮 29期 95—97页 1975年1月

《报任安书》"东从上来"解 丁大成 台北 联合报 14版 1973年7月3日

司马迁之文章 曲颖生 台北 中国文选 60期 214—216页 1972年4月

司马迁散文风格探源 郑康民 台北 建设 16卷3期 35—36页 1967年8月

司马迁《报任安书》 童寿 台北 大陆杂志 6卷4期 2—4页 1953年2月

司马迁《报任安书》的问题 魏子云 台北 联合报 14版 1973年6月13日—14日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试探 黄文吉 台北 私立江吴大学中文系年刊 3期 79—81页 1977年6月

司马迁《报任安书》斠诂 丁介民 台北 大陆杂志 35卷4期 16—20页 1967年8月

李陵《答苏武书》辨伪 刘淑和 台北 中外杂志 24卷1期 129—130页 1978年7月

贾谊《上治安策》 衡之 台北 中原文献 8卷8期 13页 1976年8月

透视《过秦论》的艺术风格 黄瑞枝 台北 中国语文 57卷4期 41—48页 1985年10月

《过秦论》的写作技巧分析 钟吉雄 台北 中国语文 52卷6期 27—33页 1983年6月

谈对比：试析贾谊的《过秦论》 翁以伦 台中 明道文艺 121期 105—109页 1986年4月

《汉志诸子略》艺术风格的蠡测 黄瑞枝 台北 中国语文 55卷5期 37—45页 1984年12月

《汉志诸子略》艺术风格的蠡测（续） 黄瑞枝 台北 中国语文 55卷6期 26—29页 1984年12月

从《荆轲传》看太史公的虚字运用技巧 郑园玲 台中 明道文艺 95期 76—85页 1984年2月

董仲舒与春秋繁露散文研究 方丽娜 台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期下册（人文、科技篇）83—113页 1987年4月

三 国

曹氏三杰（曹操、曹丕、曹植）的散文 澎湃 台北 新生报 12版 1979年7月24日

曹魏群儒的散文 澎湃 台北 新生报 12版 1979年8月7日—8日

建安七子的散文 澎湃 台北 新生报 12版 1979年7月31日

杨修答临淄侯笺体发旦之资 童存 台北 大陆杂志 5卷3期 36页 1952年8月

杨恽报孙会宗书明明求仁义 童存 台北 大陆杂志 5卷9期 34页 1952年11月

陈琳文章愈"头风" 方刚 台北 中华日报 12版 1978年10月27日

东吴诸彦的散文 澎湃 台北 新生报 12版 1979年8月21日—22日

蜀汉俊杰的散文 澎湃 台北 新生报 12版 1979年8月14日—15日

一个小小的考证 —关于诸葛亮《前出师表》的阙文和补正 胡颂平 台北 私立铭传女子商业专科学校学报 1期 297—299页 1964年3月

也谈《后出师表》的"六未解" 高子乾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2年11月15日

我对于后出师表"六未解"的研辨 陈邦益 台北 中华日报 10版 1973年3月29日

为《后出师表》"六未解"作诠释 王保德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2年11月14日

后出师表"六未解"质疑 赵荫华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2年11月4日

后出师表真伪的考证 张永明 台北 畅流 44卷3期 6—7页 1971年9月

后出师表真伪的辨证 张永明 台北 大陆杂志 22卷10期 7—25页 1961年5月

后出师表真伪谈 吴强 台北 中央日报 7版 1958年12月12日

探讨后出师表的真伪 于令吾 台北 中华日报 5版 1976年9月6日

诸葛亮出师表真伪辨 陈作鉴 台北 畅流 27卷6期 8—9页 1963年5月

诸葛亮的出师表 李之源 台北 中国语文 35卷1期 29—32页 1974年7月

诸葛武侯出师表 杜若 台北 台肥月刊 22卷4期 31—38页 1981年4月

诸葛亮前出师表借代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4卷9期 45—46页 1986年5月

诸葛亮出师表构思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5卷2期 51—52页 1986年10月

诸葛亮出师表及顾炎武廉耻叙议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5卷6期 42—43页 1987年2月

晋 南北朝

两晋南北朝的散文 澎湃 台北 新生报 12版 1979年8月28日—29日

竹林七贤的散文 澎湃 台北 新生报

12版 1979年9月18日-19日

潘岳文补笺 王韶牛 香港 华国 4期 8-31页 1963年12月

王羲之与兰亭序 王礼溥 台北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6卷8期 59—62页 1973年8月

风流翰墨记兰亭 卢荫华 台北 幼狮月刊 25卷1期 31—33页 1967年1月

兰亭序与王羲之 书禅 台北 大华晚报 8版 1973年10月21日—26日

兰亭序与曲水流觞研究 杨敦礼 台北 私立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 53页 1978年

古文欣赏——桃花源记 刘中和 台北 中国语文 16卷2期 54—58页 1965年2月

桃花源本无问题 曹浮游 台北 中央日报 9版 1968年12月6日

桃花源在表示些什么 王镇庚 台北 中国时报 13版 1973年7月1日

桃花源记初探 陈昌明 台南 文心 7期 91—95页 1979年6月

桃花源记并诗 大矢根文次郎 著 杜正胜译 台北 幼狮月刊 35卷3期 32—43页 1972年3月

桃花源记的小问题 张佛千 台北 中央日报 9版 1968年11月28日

桃花源记的境界 王赞源 台北 中国时报 13版 1973年7月15日

桃花源记研究 黎明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0年1月4日

桃花源记研析 颜昆阳 台中 明道文艺 39期 142—164页 1976年6月

桃花源记旁证 齐益寿 台北 幼狮月刊 35期3期 44—47页 1972年3月

桃花源记真有问题吗 黄元中 台北 中央日报 9版 1968年12月15日

桃花源记闲话 陈家骥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7年8月2日

桃花源记讲评 芷园 台北 中国语文 35卷4期 13—16页 1974年10月

桃花源辨 何怀硕 台北 中国时报 13版 1973年7月14日

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 夏一粟 台北 新闻报 12版 1977年6月8日

从桃花源记思想渊源论字义疑问 椒 台北 中央日报 9版 1968年12月17日

从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的出入谈起 伍真 台北 幼狮月刊 32卷4期 39—42页 1970年10月

细读桃花源记 颜元叔 台北 中央月刊 8卷12期 65—69页 1976年10月

闲话陶渊明的桃花源 魏子云 台北 书评书目 20期 97—100页 1974年12月

丘迟与陈伯之书说义 于大成 台中 明道文艺 38期 30—44页 1979年5月

《刘孝标自序》析评 黄庆萱 台北 中央日报 10版 1976年1月22日

魏晋论辨散文之研究——以嵇康为中心的试探 范瑞如 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 1982年

向往·放逐·匮缺——《桃花源诗并记》的美感结构 廖炳惠 台北 中外文学 10卷10期 134—146页 1982年3月

魏晋南北朝的散文与赋 简宗梧 中国文学讲话第5册、魏晋南北朝文学 287—311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5年6月版

六朝文欣赏 许景重 台南 文心 2期 19—27页 1974年5月

六朝文述论略 冯承基 台北 学粹 14卷1期 1971年12月，3期 1972年4月 （共75页）

论六朝文的表现手法 童元方 台北 幼狮月刊 34卷4期 18—20页 1971年10月

两晋名家散文的探讨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9年11月5日

南朝名家的散文 李谦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9年11月19日、22日

北朝名家的散文 澎湃 台北 新生报 12版 1979年10月9日—10日

刘义庆及其世说新语之散文 尤雅姿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 硕士论文 1986年

桃花源记试析——虚构世界的写实景状 王关仕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报 15期 187—193页 1986年6月

桃花源记并诗管窥 齐益寿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中文学报 1期 285—319页 1985年11月

陶潜五柳先生传文格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3卷3期 55—57页 1984年11月

论桃花源记的现实背景 齐益寿 台北 文季 2卷4期 32—41页 1984年12月

试探《桃花源记》 林元贞 台中 明道文艺 116期 36—40页 1985年11月

关于桃花源的文和诗 杨仲揆 台北 艺文志 199期 47—53页 1982年4月

无心人境 有意问津《桃花源记》赏析 洪春柳 台北 国文天地 4卷7期 58—61页 1988年12月

《与陈伯之书》章法试析 林银森 南港 工职学报 5期 155—159页 1986年5月

山水骈文的佳作 读吴均《与宋元思书》 周兆祥 台北 国文天地 4卷6期 68-69页 1988年11月

唐

古文运动的源委 尚达齐 台北 建设 8卷12期 30—34页 1960年5月

唐代古文的发展与演变 罗联添 中国文学讲话第6册 隋唐文学 317—322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5年11月版

唐代的古文运动 蔡尚志 台北 文海 22期 39—44页 1973年3月

唐代的散文 王韶生 香港 崇基校刊 41期 13—15页 1966年12月

略论唐人文章的风格 汤承业 台北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6卷9期 34—38页 1973年9月

漫谈唐宋文章 刘中和 文教论丛 79—95页 1971年1月

论韩柳的古文复兴运动 彭逸群 台北 台北市立女子师范专科学校 2期 279—281页 1972年8月

杂论唐代古文运动 钱穆 香港 新亚书院学报 3卷1期 123—168页 1957年8月

李翱皇甫湜两家散文比较 黄国安 台北 私立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 1970年

樊宗师白居易两家散文比较谈 黄国安 台北 新境界 4期 63—68页 1969年6月

韩柳文之比较 王韶生 讲 蔡玉梅 记 香港 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 6期 7—12页 1968年7月

韩柳文比较研究 储砥中 台北 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 1966年

读韩柳文 陈耀南 香港 孔道专刊 3期 41—53页 1979年4月

白居易散文校记 罗联添 台北 文史

哲学报 19 期 277—591 页 1970 年 6 月

柳宗元的寓言散文 余利溪 台北 新潮 31 期 4—11 页 1976 年 1 月

柳宗元山水记与论辨文的分析 罗联添 中国文学讲话第 6 册 隋唐文学 347—359 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5 年 11 月版

我读《始得西山宴游记》 黄德根 台北 中央日报 10 版 1976 年 3 月 28 日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游记》新解 黄德根 香港 人生 27 卷 6 期 19—21 页 1964 年 2 月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游记》新解 黄德根 台北 湖南文献 4 期 45—49 页 1969 的 8 月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析评 黄庆萱 台北 中央日报 10 版 1976 年 2 月 11 日

从"为之"说到《始得西山宴游记》里的"为之文以志" 许世瑛 台北 教育与文化 246—247 期 35—38 页 1960 年 10 月

读《始得西山宴游记》新解后 梁宜生 香港 人生 27 卷 9 期 17—19 页 1964 年 3 月

古文欣赏——桐叶封弟辨 刘中和 香北 中国语文 17 卷 1 期 57—61 页 1965 年 7 月

朱子论韩愈文之文理 杨勇 香港 新亚书院学术年刊 19 期 57—71 页 1977 年 9 月

朱子论韩愈文之气势 杨勇 香港 新亚书院学术年刊 15 期 83—102 页 1973 年 9 月

从平淮西碑看韩愈古文 叶庆炳 台北 现代文学 35 期 168—172 页 1968 年 11 月

谁说韩愈文章天下第一 沈野 台北 世界评论 25 卷 1 期 22—23 页 1977 年 12 月

论韩愈文谋篇造句修辞的特色 李英 台北 新潮 34 期 31—46 页 1977 年

论韩愈之用字用韵与用俗语 杨勇 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 275—286 页 香港 新亚研究所 1974 年

论韩愈的作品 刘中和 台北 文艺 47—48 期 (共)21 页 1973 年 5 月-6 月

韩(愈)文的风格 马起华 台北 自立晚报 3 版 1977 年 12 月 11 日

韩文研究 王士瑞 台北 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 112 页 1977 年

韩文校注辨证节录 许景重 台南 成功大学学报 7 期 185—204 页 1972 年 6 月

韩文渊源与传承 罗联添 台北 书目季刊 10 卷 1 期 47—56 页 1976 年 6 月

韩文导读序 前人 香港 新亚生活 7 卷 17 期 2—3 页 1965 年 3 月

韩文导读序 钱穆 香港 人生 29 卷 10 期 29 页 1965 年 4 月

韩文检论 马起华 台北 大华晚报 9 版 1977 年 10 月 30 日

韩文辞句来源与改创 罗联添 台北 书目季刊 10 卷 3 期 81—91 页 1976 年 12 月

韩昌黎文之文法与布局研究 郑郁卿 台北 台湾省立台北工业专科学校学报 7 期 689- 705 页 1974 年 5 月

韩昌黎文体研究 李章佑 台北 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 1968 年

韩昌黎其人其文 张朴民 台北 反攻 359 期 13—17 页 1972 年 2 月

韩愈 散文圣手 林宗霖 高雄 励进 307 期 68—75 页 1971 年 10 月

韩愈文二三事 明颢 台北 自由青年 37卷8期 19—20页 1967年4月

韩愈文导读 杨勇 台北 学粹 18卷4—5期 6 7页 1976年10月

韩愈古文论 李金城 高雄 台湾省立高雄师范学院学报 1期 157—174页 1972年12月

韩愈散文研究 罗联添 台北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论文摘要 人文社会3期 1977年

古文欣赏——《送董邵南序》 刘中和 台北 中国语文 16卷6期 71—75页 1965年6月

古文欣赏——《鳄鱼文》 刘中和 台北 中国语文 16卷5期 60—66页 1965年5月

韩愈《答李翊书》 童寿 台北 大陆杂志 3卷10期 7页 14页 1951年11月

唐代山水小品文研究 陈启佑 台北 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 1985年

唐代山水小品的技巧与结构 陈启佑 台北 中外文学 14卷5期 4—21页 1985年10月

王勃与《檄斗鸡文》 李里 台北 自立晚报 3版 1964年4月7日

读韩昌黎《上张仆射书》与《上郑相公启》 林伯谦 台北 孔孟月刊 24卷6期 33—44页 1986年2月

王勃《滕王阁序》部论 刘启琮 台北 江西文献 103期 32—35页 1981年1月

柳宗元《永州八记》之研究 林文宝 台东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8期 201—231页 1980年4月

论柳宗元的永州游记 刘良树 台北 中外文学 8卷11期 8—24页 1980年4月

王勃与《滕王阁序》 谈素 台北 华侨日报 4张3页 1963年1月14日

柳宗元与《永州八记》 陈知青 台北 青年战士报 10版 1969年11月26日

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叙事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4卷6期 45—46页 1986年2月

柳子厚山水游记初探 颜绿清 语文教育研究集刊 4期 1—25页 1985年6月

柳宗元《永州八记》写景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4卷5期 46—47页 1986年11月

从《进学解》透视韩愈的文学观 黄瑞枝 台北 中国语文 56卷4期 49—60页 1985年4月

刘禹锡《陋室铭》性灵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3卷8期 50—51页 1985年6月

论柳宗元游记散文之思想倾向 游志诚 建国学报 4期 73—93页 1985年5月

试论柳宗元游记文章的结构 李栖 台北 中国学术年刊 6期 91—100页 1984年6月

韩愈《祭十二郎文》笔法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3卷2期 54—55页 1984年10月

简论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文学集团 何寄澎 台北 古典文学 6期 301—315页 1984年12月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心境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3卷6期 50—51页 1985年2月

《陋室铭》试评 陆春雄 台北 中国语文 56卷3期 62—65页 1985年3月

《进学解》的特色及其表达技巧 钟吉雄

台北　中国语文　56卷1期　52—55页　1985年1月

投迹水山水地　放情咏离骚：论柳宗元山水文学特色　蔡振璋　台北　中国文化月刊　68期108—128页　1985年6月

元遗山散文之探讨　祝剑韬　台北　私立新埔工业专科学校学报　9期　1—49页　1984年4月

生命的成长：试论《祭十二郎文》　江雪芬　台中　明道文艺　115期　84—90页　1985年10月

从《始得西山宴游记》看柳子厚的描景技巧及人格修养　郑圆玲　台中　明道文艺　93期　105—112页　1983年12月

《陋室铭》写作技巧之探析　余崇生　台北　中国语文　54卷2期　65—67页　1984年2月

山水与心境　评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　蔡振璋　东海文艺季刊　13期　1—6页　1984年9月

《始得西山宴游记》探究　刘远智　台北　中国语文　52卷3期　31—34页　1983年3月

《始得西山宴游记》笔法浅析　林韵梅　台北　中国语文　52卷6期　34—36页　1983年6月

柳宗元永州游记的诗情与画意　汪宝珠　南港工职学报　2期　166—178页　1982年5月

韩愈对古文复兴运动的业绩　悦志　台北　东方杂志　16卷4期　18—21页　1982年10月

韩愈诗说寓意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4卷2期　44—45页　1985年10月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文笔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4卷3期　52—53页　1985年11月

白居易琵琶行与元微之书互见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4卷11期　50页　1986年7月

论李德裕的山水小品文　陈启佑　台北　孔孟月刊　24卷12期　38—43页　1986年8月

元结山水小品文探讨　陈启佑　台北　古典文学　8期　107—123页　1986年4月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寓主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5卷7期　41页　1987年3月

试评刘禹锡的古文　刘菁菁　实践学报　18期　281—299页　1987年6月

《始得西山宴游记》探源　钟淑芬　台北　中国语文　61卷2期　46—51页　1987年8月

苦闷的象征——《永州八记》　龙亚珍　台北　中华学苑　35期　171—192页　1987年6月

唐代庄园与山水小品　陈启佑　古典文学　9期　207—218页　1987年4月

白居易与元微之书情感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5卷5期　46—47页　1987年1月

陋室何陋：刘禹锡《陋室铭》内涵　叶丽华　台北　国文天地　2卷9期　87—89页　1987年2月

《祭十二郎文》的笔法析论　黄瑞枝　台北　中国语文　63卷2期　43—50页　1988年8月

韩愈《祭田横墓文》与王安石《读孟尝君传》　胡楚生　台北　书和人　595期　1页　1988年5月21日

唐柳宗元《愚溪诗序》、《愚溪对》二文创作心理分析　袁本秀　台中商业专科学校学报　20期　209—216页　1988年6月

"稀"望、试论韩愈《画记》 陈传兴 台北 中外文学 16卷12期 136—154页 1988年5月

宗教对唐代山水小品的影响 陈启佑 台北 木铎 11期 299—306页 1987年2月

唐代赠序初探 梅家玲 台北 编译馆馆刊 13卷1期 197—214页 1984年6月

宋

宋代散文 中国文学讲话第七册、两宋文学 27—152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6年6月版

宋代古文运动之发展研究 金中枢 香港 新亚书院学报 5卷2期 79—146页 1963年8月

李清照之文 钟山 台北 联合报 8版 1951年12月16日

《岳阳楼记》的写作研究 林钟隆 台北 中华日报 5版 1971年2月1日

《岳阳楼记》研究 林祁乾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报 2期 363—372页 1973年4月

《岳阳楼记》赏析 沈谦 台中 明道文艺 37期 47—59页 1979年4月

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写作本意 陈中和 台北 中华日报 5版 1978年10月30日

论北宋的古文运动 黄启方 台北 科学委员会论文摘要 437页 1976年

读西铭：评张载 潘立夫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8年4月17日

宋代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 张朴民 台北 反攻 372期 7—10页 1973年3月

论欧阳修的古文运动 罗敬之 台北 华学月刊 95期 28—32页 1979年11月

古文欣赏——《醉翁亭记》 刘中和 台北 中国语文 16卷1期 50—55页 1965年1月

《醉翁亭记》研究 罗青 台中 明道文艺 35期 33—34页 1979年2月

《醉翁亭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尸大成 台中 明道文艺 36期 25—31页 1979年3月

《醉翁亭记》闲话 陆家骥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7年9月15日

欧阳修杂记文的思想内涵与表现特色 刘少雄 台北 中国文学研究 1期 139—154页 1987年5月

《醉翁亭记》新论 刘少雄 台北 书和人 572期 1—2页 1987年7月4日

逸豫适足亡身吗？ 李敖 台北 中国时报 12版 1979年7月15日

欧阳修《纵囚论》的新评价 柳尘 台北 中华日报 9版 1978年9月11日

欧阳修《纵囚论》的"言"与"意" 王基伦 台北 国文天地 4卷3期 62—65页 1988年8月

欧阳修泷冈阡表及其原拓珍本 鲁茛 台北 古今谈 30期 3—4页 1967年8月

看苏东坡的小文 东郭牙 台北 青年战士报 7版 1973年2月19日

苏轼文章风格的研究 羽军 台中 东风 3卷5期 23—24页 1965年6月

苏轼的古文 谦忍 台北 幼狮月刊 38卷6期 17—20页 1973年12月

苏轼的古文 谦忍 台北 畅流 49卷1期 28—31页 1974年2月

苏轼《留侯论》评析 芷园 台北 中

国语文 35 卷 2 期 12－16 页 1974 年 8 月

苏轼前赤壁赋比拟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4 卷 8 期 42－43 页 1986 年 4 月

苏轼《教战守策》正反论 杨鸿铭 台北孔孟月刊 23 卷 8 期 38－39 页 1985 年 4 月

管窥《留侯论》的写作技巧 黄瑞枝 台北 中国语文 57 卷 3 期 45－51 页 1985 年 9 月

苏轼《留侯论》及《教战守策》气势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3 卷 4 期 50－51 页 1984 年 12 月

《岳阳楼记》研究 左斌 台北 台肥月刊 19 卷 12 期 54－56 页 1978 年 12 月

范仲淹《岳阳楼记》过峡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4 卷 10 期 49－50 页 1986 年 6 月

《留侯论》文章风格 适生 台北 国文天地 3 卷 11 期 96－98 页 1988 年 4 月

论《留侯论》 郑力为 台北 鹅湖 14 卷 5 期 26－29 页 1988 年 11 月

《黄州快哉亭记》浅释 林元贞 台中 明道文艺 118 期 28－31 页 1986 年 1 月

两幅案头山水之胜境——从写景意境比较《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 沈谦 古典文学第四集 159－178 页 台北 学生书局 1982 年 12 月

周敦颐《爱莲说》排比论 杨鸿铭 台北孔孟月刊 24 卷 1 期 42－43 页 1985 年 9 月

试商《楚囚缨其冠》 仇实 台北 中华日报 9 版 1972 年 6 月 6 日

关于《正气歌》的内容问题 杜呈祥 台北 中国语文 3 卷 2 期 11－14 页 1958 年 8 月

姜太公与《正气歌》（“凛”字的用法） 魏子云 台北 中华日报 9 版 1976 年 3 月 23 日

司马光训俭示康举例论 杨鸿铭 台北孔孟月刊 24 卷 12 期 44－45 页 1986 年 8 月

析论王安石的散文 綦信发 台北 江西文献 125 期 9－12 页 1986 年 9 月

环绕《纵囚论》的几个问题 林韵梅 台北 中国语文 59 卷 6 期 24－27 页 1986 年 12 月

欧阳修《纵囚论》及《泷冈阡表》对话论 杨鸿铭 台北 孔孟月刊 25 卷 4 期 62－63 页 1986 年 12 月

俭，德之共也，有关“训俭示康”一文的商榷 张婧远 台北 国文天地 4 卷 2 期 82－83 页 1988 年 7 月

欧阳修杂记文的思想内涵与表现特色 刘少雄 台北 中国文学研究 1 期 139－154 页 1987 年 5 月

宋代山水游记研究 陈素贞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 31 期 623－740 页 1987 年 6 月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伏笔论 杨鸿铭台北 孔孟月刊 25 卷 12 期 41－42 页 1987 年 8 月

王安石《游褒禅山小记》的知性与感性 孟繁举 台北 自由青年 71 卷 3 期 46－47 页 1984 年 3 月

苏轼《日喻》语句分析 李炳杰 台北 中国语文 52 卷 6 期 37－47 页 1982 年 6 月

苏轼《教战守策》析论 瞿秀兰 台北 孔孟月刊 21 卷 10 期 60－62 页 1983 年 6 月

辽 金 元

辽金元散文 王更生 中国文学讲话

第八册 辽金元文学 127—138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6年11月版

明

明代散文 周志文 中国文学讲话第九册 明代文学 25—73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7年5月版

晚明小品 廖玉蕙 中国文学讲话第九册 明代文学 39—69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7年5月版

明清间的小品文 张中衡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学报 3期 1—20页 1964年

晚明小品文研究 李雅根 台北 私立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 1982年

晚明小品中的游记、传记与日记 廖玉蕙 中正岭学术研究集刊 4期 55—72页 1985年6月

《左忠毅公轶事》赏析 沈谦 台中 明道文艺 36期 32—40页 1979年3月

清新洒脱的小品文——张岱作品的抽样分析 许淑屏 台北 自立晚报 8版 1974年7月7日

张岱文学之评介 黄桂兰 台北私立东南工业专科学校学报 2期 61—71页 1976年12月

张岱及其所作《陶庵梦忆》 俞大纲 香港 大成 46、47期 10页 1977年9月10日

《陶庵梦忆》中的陶庵与梦忆 中岚 台北 现代文学 33期 174—180页 1967年12月

《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 罗青 台北 明报周刊(海外版) 69期 23页 1979年3月25日

万象千撰入眼来——谈晚明小品圣手张岱陈三 台北 畅流 20卷3期 2—5页 1959年9月

讽刺妙品《西湖七月半》(张岱著) 罗青 台中明道文艺 40期 34—35页 1979年7月

袁中郎的小品文 周质平 台北 中央日报 10版 1977年4月8日

归有光和他的记叙文、抒情文 许世瑛台北 文学杂志 4卷2期 17—18页 1958年4月

归有光和他的记叙文、抒情文 许世瑛台北 文学思潮 4期 153—167页 1979年5月

归有光与明代文坛 龚道明 台北 编译馆馆刊 8卷2期 227—240页 1979年12月

归有光《项脊轩志》的欣赏问题 林钟隆台北 中华日报 5版 1971年9月20日

析论归有光的散文 蔡信发 台北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20卷3期 56—59页 1987年3月

豪华落尽见真醇,从《先妣事略》看归有光的古文造诣 江雪芬 台中 明道文艺 114期 51—59页 1985年9月

由《菜根谭》看晚明小品的基本性质 龚鹏程 台北 中国学术年刊 9期 179—207页 1987年6月

浮生六记 杜若 台北 台肥月刊 24卷8期 27—34页 1983年8月

析《左忠毅公轶事》兼及桐城派之《义法》 余崇生 台北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16卷8期 29—30页 1983年8月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探析 余崇生 台北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16卷9期 71—72页 1983年9月

论晚明小品文之兴起 廖玉蕙 中正

岭学术研究集刊 2期 41—54页 1983年6月

晚明小品文蔚盛的原因(上) 耿湘元 台北畅流 65卷3期 6—9页 1982年3月

晚明小品文蔚盛的原因 耿湘元 台北 畅流 65卷4期 10—15页 1982年4月

论晚明小品的名称与特色 廖玉蕙 中正岭学术研究集刊 3期 25—43页 1984年6月

刘基《灵丘文人》轻重论 杨鸿铭 台北孔孟月刊 25卷3期 50—51页 1986年11月

清

清代古文 尤信雄 中国文学讲话第十册 清代文学 105—120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7年11月版

清代小品文 周志文 中国文学讲话第十册 清代文学 121—133页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87年11月版

桐城派 尤信雄 中国文学讲话第十册 清代文学 135—147页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7年11月版

桐城派在清代盛行的原因(上、下) 何沛雄 台北 华学月刊 104—105期 24—30页 1980年8—9月

谈纪晓岚之阅微草堂笔记 吴强 台北中央日报 7版 1958年12月2-3日

桐城文 杜若 台北 台肥月刊 19卷4期 26—32页 1978年4月

桐城派古文略论 叶龙 台北 大陆杂志 32卷12期 15—20页 1966年6月

读桐城吴氏古文法有感 黄翠薇 台北中文季刊 8卷4期 88—92页 1972年6月

林纾的古文及其与桐城派的区别 叶龙香港新亚生活 9卷8—9期 7页 1966年10—11月

袁枚《祭妹文》的疑句疑字 李咏湘台北 中央日报 9版 1969年7月5日

《祭妹文》中的"汝奋臂出其间" 牧虎 台北 中央日报 5版 1972年8月11日

《祭妹文》的语译问题 李铁濮 台北 中华日报 5版 1971年8月9日

《祭妹文》质疑 梦宇 台北 中央日报6版 1953年12月5日

关于《祭妹文》之疑字疑句 伏嘉谟 台北 中央日报 9版 1969年7月13日

论王渔洋的散文 映岳 台北 畅流 5卷4期 9—11页 1952年4月

曾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姬传启之》考索 蒋之埴 台北 私立明志工业专科学校学报 4期 3—46页 1972年11月

曾湘乡文 杜若 台北 自由谈 30卷10期 12—14页 1979年10月

湘乡曾乡文 杜若 台北 台肥月刊 20卷9期 37—44页 1979年9月

桐城后学论古文八要 曾锦坤 台北 东方杂志 22卷1期 39—45页 1988年7月

古文与现实的距离太远?谈《多尔衮、史可法致答书》及郑成功《与荷兰守将书》 林二白 台北 国文天地 2卷8期 84—89页 1987年1月

《祭妹文》与《祭十二郎文》之比较 徐嘉铭 台中 明道文艺 136期 78—83页 1987年8月

(王立柱编)

条目笔画索引

【说明】1. 本索引包括《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14个分部的全部条目。

2. 各条目按其首字笔画数目顺序排列。首字笔画数目相同的条目则以其首字起笔的笔形为序，笔形顺序依次为点、横、竖、撇、捺；横钩和横折排在横后，竖折排在竖后，撇折排在撇后。首字笔画、笔形均相同的条目，以次字的笔画、笔形为序。

3. 同一条目多次出现在不同页码者，依次列出各个页码，如在同一页中多次出现，只标明一次。

一画

〔一起〕

二画

〔一起〕

〔丨起〕

〔丿起〕

三画

〔丶起〕

〔一起〕

〔丨起〕

〔丿起〕

五画

〔丶起〕

〔一起〕

六画

〔丶起〕

〔一起〕

七画

〔丶起〕

〔丨起〕

八画

〔丶起〕

〔丨起〕

九画

〔丶起〕

〔丨起〕

〔丿起〕

十画

〔丶起〕

十一画

〔丶起〕

〔一起〕

十三画

〔丶起〕

〔一起〕

十四画

〔丶起〕

〔一起〕

〔丨起〕

〔丿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　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
作者＝
页数＝１４２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